大唐兴亡三百年

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
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

王觉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大唐兴亡三百年

大唐兴亡三百年.2

大唐兴亡三百年.3

大唐兴亡三百年.4

大唐兴亡三百年.5

大唐兴亡三百年.6

大唐兴亡三百年.7

大唐兴亡三百年

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
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

王觉仁 著



扫描关注公信号
免费获取更多电子书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兴亡三百年 / 王觉仁著 . -- 北京 : 人民日报
出版社 , 2018.10

ISBN 978-7-5115-5487-1

Ⅰ . ①大… Ⅱ . ①王… Ⅲ .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
读物 Ⅳ . ①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8984 号

书　　名	大唐兴亡三百年
作　　者	王觉仁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邀编辑	汪超毅　沈　骏
封面设计	谢明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字　　数	225 千
印　　张	16.75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487-1
定　　价	44.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扫描关注公信号
免费获取更多电子书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山河崩裂

惨重的失败：东征高丽
杨玄感叛乱
雁门之围：惊魂33天
李密：大佬是怎样炼成的
大隋帝国风雨飘摇
第二章 潜伏的李渊，强悍的李渊
血缘传说与天命神话
李渊一直在潜伏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相遇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上）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下）
在钢丝上跳舞：李渊的崛起
天才政治家：李渊的慷慨
走向长安
第三章 李渊攻入长安，挟天子以令诸侯
李密陷入泥潭
长安城的末日
瓦岗危机
李渊“匡扶帝室”
要不要当皇帝？
李渊——最强劲的对手
第四章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大唐开国

江都政变
杨广与隋朝的忌日
宇文化及的摄政之路
后杨广时代的逐鹿游戏
政客的假面具与誓言
英雄末路：瓦岗的覆灭
消灭西秦薛举
李密之死
第五章 可怕的李世民，完美的李世民
最后一个影子朝廷
王世充逼杨侗“禅位”
从天而降的馅饼：平定河西
李元吉丢掉了太原
刘文静之死：裂痕与伏笔
大唐王朝全线告急
独孤怀恩之变
刘武周的败亡
第六章 中原大决战
挺进中原：王世充的末日到了
激战洛阳：东都成了人间地狱
李世民和窦建德的对决
虎牢之战：夏朝的终结

秦王的武功秀

第七章 李世民的帝王梦

铸剑为犁是一种奢侈

大河南北风云再起

鼎定半壁：萧梁的覆灭（上）

鼎定半壁：萧梁的覆灭（下）

掌握时代的话语权

楔子

公元617年，隋大业十三年。

是时，苍穹碎裂，日月无光，黑暗笼罩大地。山河倾圮，草木成灰，四海沸腾如汤。是时，隋失其鹿，群雄竞逐，攻战杀伐连年不断，神州陆沉，中原板荡，万千尸骨垒起了座座峰峦；是时，无尽腥风吹干了征人的眼泪，漫天血雨染红了将军的战袍，乱世兵燹炙烤着生者和死者的灵魂，末日烽烟熏痛了老人和孩子的目光；是时，一度繁荣强大的隋帝国，已然风雨飘摇，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一年，有一个名叫李渊的人，正站在一座名叫晋阳的城上，遥望乱云飞渡、阴霾漫卷的天空，神情凝重，若有所思。他的身后，站着三个英姿挺拔、铠甲锃亮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器宇轩昂，神情坚毅，深邃的目光中隐隐闪耀着一种傲视天下的光芒。

他的名字，叫作李世民。

没有人知道，短短一年后，这个年轻人就将追随父亲李渊揭起义旗，剑指长安，最终颠覆隋朝社稷，扫灭群雄，统一海内。

更没有人知道，若干年后，这个年轻人将站在隋王朝轰然倒塌的废墟上，缔造一个亘古未有、空前强大的帝国，开创一个四海升平、万邦来朝的盛世，最终成为彪炳日月、名垂青史的千古一帝！

公元617年，隋炀帝杨广还在江都的离宫醉生梦死，以一种“天下无

贼”的鸵鸟心态欢享着生命中最后的奢华。而这一年，四方群雄皆已不奉隋朝正朔，纷纷拥兵割据、称帝称王，如窦建德、李密、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薛举、李轨、萧铣等等。除此之外，散落在山泽湖海之间的大大小小的草头王，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在整个大业中后期，隋朝天下所有稍具博弈资本的人似乎都迫不及待地揭竿而起了，只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始终如如不动。

他，就是隋朝太原（郡治晋阳）留守、唐国公李渊。

这些年来，无论天下如何纷扰，无论群雄逐鹿的游戏玩得多么热闹，李渊始终都表现得淡定从容，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

难道，李渊真的对此心如止水，毫无问鼎天下之志吗？

不，他是在潜伏。

李渊深知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所以他不急。他要韬光养晦、秣马厉兵，等到隋朝的统治根基被彻底动摇的时候，等到四方群雄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的时候，他才断然出手，后发制人！

公元617年农历七月，蛰伏多年的李渊父子终于在晋阳起兵，随即以所向披靡之势直趋长安，于同年九月攻入关中。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拥立代王杨侑为帝，自立为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

公元618年农历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离宫被宇文化及等人缢杀。同年五月，李渊逼迫杨侑禅位，在长安登基称帝，建立唐朝，建元武德。

一个长达二百八十九年的巅峰王朝，就此拉开了宏伟的序幕。

曾经，隋朝也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强大帝国。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民生富庶，国势日隆，史称“开皇之治”。可以说，没有隋朝奠定的制度框架和国家规模，就没有后来那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盛世唐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百年老店的姿态高调开局的朝代，却仅存在了三十七年，便葬送在隋炀帝杨广的手上。

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杨广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二代。他不但从小天赋异禀，拥有很高的文学才华，而且谦恭克己，勤勉自律，在道德上毫无瑕疵；成年后，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表现更是出类拔萃，引人瞩目。所

以，早在年轻时代，杨广就是杨坚夫妇心目中最优秀的儿子，也是帝国臣民心目中最贤明的皇子。（《隋书·炀帝纪》：“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正因为此，身为次子的杨广才能打破“嫡长继承制”原则，成功夺取长子杨勇的储君之位，进而登基为帝。

然而，看上去如此优秀的杨广，最终却把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自己也以暴君之名被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究其原因，并不在于杨广无能，恰恰相反，而是——他对自己的能力太过自负了！

出于这种自负，杨广坚信，在继承杨坚留下的雄厚国力的基础上，自己一定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缔造一份彪炳千秋的皇皇帝业。为了尽快完成这份“大业”，杨广刚一登上帝位，就迫不及待地迈开了大兴土木和盲目扩张的步伐。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起，杨广就倾尽国力开始了一系列大型工程的建设，如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驰道、筑长城、盖行宫、造龙舟等。与此同时，杨广又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了一连串对外扩张和强势外交：先是宣威突厥，击破契丹，征服吐谷浑，控制西域；继而经略海外，南平林邑（今越南南部），东征流求（今中国台湾地区），宣慰赤土（约今马来半岛），使得真腊（约今柬埔寨）、婆利（约今马来半岛）、倭国（今日本群岛）等国纷纷承认隋朝的宗主国地位，并且遣使入朝，称臣纳贡。

到了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随着各项工程的竣工和周边诸国的归附，一幅名叫“大业”的盛世蓝图仿佛已经完美地展现在杨广面前。然而，在杨广看来，这张蓝图还不够完美，因为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斑点——高丽。

高丽即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疆域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一直以来，高丽表面上向隋朝称臣，实则常怀叵测之心。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就曾“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出兵进犯辽西，并暗中联络东突厥，企图共同对抗隋朝。隋文帝闻讯大怒，立即征调水陆大军三十万讨伐高丽，不料行至中途，陆军便遭遇洪水和瘟疫，水军也在海上遭遇风暴，船只大量沉没。大军被迫班师，回到长安时，伤亡人数竟达十之八九。

从此，高丽就成了隋朝君臣无法忘却的一块心病。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杨广北巡，恰好在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遇见高丽使者。杨广当即命其转告高丽王高元，让他入朝觐见，否则将亲往其国“巡视”。可是，面对杨广的威逼恐吓，高元却置若罔闻。杨广勃然大怒，随即开始扩充军备，准备发动对高丽的战争。

事后来看，正是这场战争最终拖垮了隋朝。

因为，自从杨广即位以来，系列大型工程和连续对外扩张已经极大地消耗了隋朝的国力，长年被征发徭役的老百姓更是不堪重负。此时的隋帝国已然民生凋敝、饥荒四起，各种社会危机正在急剧酝酿，随时可能爆发。然而，极度自负、好大喜功的杨广却对此视若无睹，执意发布了东征高丽的战争动员令。

于是，隋朝覆亡的悲剧就此注定。

大业七年，当杨广驾驶着帝国这驾战车不顾一切地冲上战争轨道时，他并不知道，等待在他前方的，将是一个人亡政息、身死国灭的万丈深渊……

第一章 山河崩裂

惨重的失败：东征高丽

东征高丽的战车还没有开上战场，隋帝国的后院就起火了。

烽火首先在山东点燃。自从战争动员令下达，山东就成了主要的战备后勤基地。从大业六年开始，杨广就命当地百姓饲养战马，以供军用，同时征调大批民夫运送粮食前往辽东前线。由于运输量大，路途遥远，车辆和牛马大量损毁死亡。

与此同时，频繁的徭役挤占了耕种时令，导致山东、河北等地大量农田抛荒，粮食价格飙涨，一斗米卖到了数百钱，而各级官吏依然横征暴敛。加之黄河泛滥、洪涝成灾，致使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存底线被彻底突破。

如何在暴政中生存下去？

濒临绝境的山东百姓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大业七年冬天，山东邹

平人王薄终于在饥寒交迫中彻悟了一条真理——在暴政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起来反抗这个暴政！

于是，王薄率先在长白山（邹平县南）拉起了反旗。

为了把自己彻悟的真理向广大父老乡亲传播，王薄自称“知世郎”，并精心创作了一首政治宣传歌曲——《无向辽东浪死歌》。

歌中唱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通俗易懂、振奋人心的歌曲一经问世，立即成为当年齐鲁大地最火爆的流行曲目。四面八方的贫困百姓哼着这支让人热血澎湃的歌，像潮水一样涌向了长白山。从此，王薄带领部众在齐郡（今山东济南市）、济北郡（今山东茌平县西南）一带纵横出没，攻击官军，劫掠府库，穿金戴银，吃香喝辣，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着这一切，山东各地豪杰无不怦然心动。于是，多股反叛势力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阿舅贼”（刘霸道）崛起于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孙安祖聚众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县西），张金称聚众于河曲（今河北临西县），高士达揭竿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他们啸聚山林，攻击城邑，让各地官府疲于应付，焦头烂额。

在大业七年大大小小的变民首领中，有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后来却成了这拨人里声望最高、势力最强的义军领袖。他雄踞河北，自称“夏王”，直至唐朝建立后仍然割据一方，是武德初年李世民东征路上最强大的对手。

这个人就是窦建德。

窦建德，河北漳南（今河北故城县东）人，与孙安祖同乡，自小勇武过人，在乡里有侠义之名。大业七年，朝廷招募东征士兵，窦建德因

其骁勇之名被任命为二百人长，同乡的孙安祖也在征召之列。可孙安祖因家中遭遇洪灾，妻儿皆饿死，对官府恨之入骨，坚决不肯应征。当地县令大怒，将其逮捕并施以鞭刑。孙安祖愤而刺杀县令，逃亡至窦建德家中。

窦建德收留了他，对他说：“今主上不恤民力，欲征高丽，天下必将大乱。大丈夫若不死，当建功立业，岂能成为东躲西藏的逃犯？”随后，窦建德帮孙安祖召集了两百多个壮士，还协助他们到高鸡泊一带落草为寇。

尽管窦建德明知道天下很快就将大乱，可他对自己在军队的前程仍抱有幻想，所以他才会一边支持孙安祖造反，一边又舍不得扔掉“二百人长”这块鸡肋。

最后，还是当地官府帮他下了这个决心。

本来，窦建德窝藏孙安祖一事当地官府已有所察觉，加之张金称、高士达等盗匪凡到漳南洗劫，都自动避开窦建德家所在的那条街，所以官府认定，窦建德必然与盗匪暗中勾结。不久，官府就派兵抄了窦建德的家，并将他一家老小全部捕杀。

在家破人亡的惨痛现实面前，窦建德的最后一丝幻想终于破灭。万念俱灰的他只好脱下隋朝军装，带着手下的两百人投奔了高士达。高士达觉得自己的智谋和才略均不及窦建德，就把兵权交给了他，让他当了二当家。随后，窦建德屡屡击败前来征讨的官军，威望迅速提升。由于他善待士卒，因而人人皆愿为其效死，麾下部众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

就这样，这个原本要到辽东去当炮灰的二百人长，摇身一变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草头王。

窦建德或许从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对于潜藏在自己身上的巨大能量，他一定也会感到震惊。而此时的窦建德更不敢想象的是——短短几年后，他就将拥兵割据，称霸一方，并与天下群雄一起逐鹿中原！

窦建德的成长史告诉我们：虽然时势可以造英雄，但是要想成为英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扔掉手中的那块鸡肋。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一，隋帝国的一百多万远征军在涿郡完成了集结，同时就位的运输和后勤人员数量是士兵的两倍。

杨广将一百多万士兵分成左右各十二军，每军设大将、次将各一人；每军之中，骑兵分成四团，每团十队，每队一百人；步兵也分为四团，每团二十队，每队一百人；重装备部队和普通步卒也各有建制；所有步骑兵团每团各设偏将一人。远征军中，各团的头盔铠甲、帽穗马缨、旗帜旌幡的颜色各不相同，而前进、后退、行军、扎营都有统一的号令。

正月初三，杨广亲自率领这支空前庞大的远征军，从蓟城（涿郡郡治，今北京）正式开拔。第一军出发后，每日派遣一军，每两军相距四十里，依次出发，鱼贯前进。整整用了四十天，大军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绵延长达九百六十里。此外，杨广直属的十二禁军，朝廷的三台、五省、九寺的随驾官员，也紧跟在大军后面出发，队伍连绵达八十里，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杨广本以为，投入如此浩大的兵力，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踏平高丽。然而，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先是在三月，杨广亲率陆军进抵辽东城（今辽宁朝阳市），却长达数月久攻不克。同时，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水军渡海攻击，一开始进展顺利，甚至一度攻进了平壤，不料却在城中遭遇伏击，四万精锐尽丧，仅剩数千残兵逃脱。眼看陆、海两路接连失利，杨广不得不改变战略，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三十余万大军绕过辽东，直捣平壤。可是，当大军进抵平壤三十里处时，却又因为战线太长、粮草不继再次陷入困境。

同年七月，缺乏给养的宇文述被迫引兵西还，高丽军队迅速出城追击。当隋军撤至萨水（今清川江）时，高丽军队趁其渡河之际发起进攻，大破隋军。最后，宇文述狼狈逃回辽东，三十余万大军仅剩两千七百人，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丢失的武器、装备、辎重更是不可胜数。来护儿风闻陆军大败，也慌忙起锚，连夜率舰队撤回东莱（今山东莱州）。

第一次远征高丽，就这样以惨败告终。

大业八年七月，神情恍惚的杨广默默登上龙辇，从涿郡启程南返。一直到车驾返抵洛阳，杨广始终一言不发。曾经活力四射、阳光灿烂的杨广，如今仿佛变成了霜打的茄子。人们看见杨广脸上写满了困惑与哀伤，那是一个骄傲帝王遽然遭受重创后暴露出来的真实内心。

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挫折本是人生的题中之义，也是生命成长的必经过程。就像许多小孩子在学习木匠、铁匠这种手艺活的时候，如果手上弄出了血，他们的师傅就会说：“那是这门手艺进到你身体里面去了。”而今，生命中的第一次失败虽然深深刺痛了杨广，可这何尝不是某种有益的东西正在进入他的体内呢？也许，命运之神正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往这位骄狂自负的帝王身上注入一些必要的抗挫折能力，让他学会以一种成熟而理性的姿态面对人生，同时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

然而，命运之神很快就发现他失望了，忠于杨广的臣民们也很快就失望了。

短短半年后，杨广就在朝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资治通鉴》卷一八二）

杨广的意思很明确，二征高丽，就算“拔山移海”也在所不惜！

杨玄感叛乱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初二，一道征调天下军队齐集涿郡的诏命再次从洛阳飞出，立刻传遍了整个帝国。

皇帝是不是疯了？

面对诏令，隋朝的各级官吏和老百姓们不约而同地在心里说。这场倾尽全国之力、竭尽天下之财的战争刚刚遭遇惨败，数十万帝国将士刚刚捐躯沙场，数百万民众因为这场战争濒临破产和死亡的边缘，而这个疯狂的皇帝竟然不顾这一切，还想让悲剧重演？

人民愤怒了。

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造反的行列。除了王薄、刘霸道、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之外，齐郡（今山东济南市）人孟让、北海（今山东青州市）人郭方预、平原郡（今山东陵县）人郝孝德、河间郡（今河北河间市）人格谦、渤海郡（今山东阳信县）人孙宣雅等各自起兵，其部众多则十几万，少则数万，在山东地区纵横驰骋，令各地官兵焦头烂额。

叛乱的烽火在急剧蔓延，可杨广却不以为意。

按照杨广对历史的领悟，几百年来的中国政治一直是门阀世族玩的游戏。正所谓“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真正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从来只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泥腿子们只是这场游戏中无足轻重的配角，或者纯粹就是跑跑龙套而已，绝对成不了气候。所以，在杨广看来，所谓的叛乱只不过是一些穷疯了的暴民在聚众抢劫而已，等他灭了该死的高丽，回头再来收拾这些小毛贼也为时不晚。

大业九年春，杨广再度御驾亲征，于三月初四率领百万大军进抵辽东，拉开了第二次东征高丽的大幕。这次，杨广仍命宇文述等人分道绕袭平壤，本人则亲率正面大军猛攻辽东。隋军这回不仅用上了飞楼、撞车、云梯等大型攻城器械，而且挖掘了多条地道，夜以继日地轮番进攻。但是隋军连攻二十多天，付出了惨重的伤亡，辽东城却依旧固若金汤。同时，宇文述等部也遇阻不前。正当战事陷入胶着之际，国内突然传来杨玄感叛乱的消息，杨广如遭电击。六月，杨广不得不下令撤军。仓促之间，堆积如山的军资、器械、粮草全都来不及运走，只能白白送给高丽人。

如果说，遍及各地的农民起义在杨广眼中只不过是蚍蜉撼树，尚不足虑的话，那么杨玄感叛乱则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极大地摇撼了帝国的统治根基。

因为，杨玄感是贵族，是杨广心目中最有资格玩政治的贵族。

杨玄感，隋朝开国元勋杨素之子，袭爵楚国公，时任上柱国、礼部尚书，在帝国的政治高层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在杨广看来，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起兵反叛，必将产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可怕效应，也无疑会引发巨大的政治离心力，使更多的门阀世族生出谋求天下的野心！

事实证明，杨广的担心是对的。

杨玄感自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后，四方纷起响应，部众很快发展到十几万人。就在杨广围攻辽东时，杨玄感已迅速兵临洛阳城下，而围城不过数日，洛阳城中竟然有四十多个贵族和高官子弟出城投降，如韩擒虎之子韩世咢、观王杨雄（杨坚族侄）之子杨恭道、来护儿之子来渊、周罗睺之子周仲、虞世基之子虞柔、裴蕴之子裴爽、郑善果之子郑俨等。杨玄感为了收揽人心，一律对他们委以重任。

当然，这些官二代的加盟，充其量就是帮杨玄感撑撑门面而已，不可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此时，杨玄感帐下还有一位幕僚，也是官二代。此人目前虽默默无闻，但很快就将成为隋末乱世叱咤风云的人

物。毫不夸张地说，把上面那些纨绔子弟全部绑在一块，其能量也不及此人之万一。

这个人，就是日后瓦岗寨的义军领袖李密。

李密是隋朝上柱国、蒲山公李宽之子，其家门虽不及杨氏显赫，却也是名重一时。李密从小志向远大，仗义疏财，喜欢广交朋友，早年曾在宫中担任禁军。有一次，轮到李密当班，杨广恰好从他身边经过，忽然停在他面前，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就告诉宇文述："刚才左翼卫队中有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我发现他的眼神异于常人，最好不要让他担任侍卫。"

李密就因为皇帝的这句话丢了官，从此与仕途绝缘，在家中闭门读书。他曾经骑在牛背上读《汉书》，旁若无人，浑然忘我，被杨素遇见，视为奇人。杨素请他到家中畅谈，大为赏识，对杨玄感说："李密见识深远，气度不凡，你们兄弟无人可及。"从此，李密便与杨玄感结成了好友。

二人虽成莫逆之交，但身份地位相差悬殊，杨玄感有意无意之间，还是会瞧不起这个无官无职的落魄贵族李密。

李密看在眼里，有一天忽然对杨玄感说："朋友相交贵在坦诚，我今天就不奉承你了。说实话，如果是两军对垒，决断战机，呼啸冲锋于敌阵之中，我不如你；可要是驱策天下贤俊，让他们各安其位，各尽所能，你不如我！既然如此，你怎能自恃阶高而轻视士人呢？"杨玄感闻言大笑，从此更加佩服李密。

杨玄感起事后，自然把李密引为心腹智囊。在围攻洛阳之前，杨玄感曾就全局战略咨询李密的意见："你一向以拯济苍生为己任，如今时候到了，你有何良策？"

李密向杨玄感提出了谋取天下的上、中、下三策。他说："天子出征，远在辽东塞外，距幽州（涿郡）足有一千余里，南有大海（渤海），北有胡虏（西突厥、契丹等），中间仅有一条辽西走廊，是远征军和国内联系的唯一生命线，形势极为险峻。如果你亲率大军北上，出其不意攻占蓟县（涿郡郡治），夺取临渝（今河北抚宁县东），便能控其险要，扼其咽喉。如此一来，东征军的归路被切断，高丽人势必从他们背后发起攻击。旬月之间，粮秣给养告罄，军队不战自溃，你就能兵不血刃，生擒杨广！此乃上策。"

杨玄感略微沉吟，说："告诉我中策。"

李密说：“关中自古乃四塞之地、天府之国，如今虽有隋将卫文升据守，但此人不足为虑。我们若率大军击鼓向西，所经城池一律不加攻打，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天子纵然班师，但根据地已失，我们便有足够的时间审慎筹划，稳步进取。”

杨玄感又想了想，说：“告诉我下策。”

那一刻，李密若有所思地看了杨玄感一眼。他预料，杨玄感一定会选下策，而下策必将招致灭亡。

这样的预感让李密感到很悲伤。他久久地看着杨玄感，缓缓地说：“派出精锐，昼夜奔驰，袭取东都，号令天下！问题是，万一一百天拿不下来，天下之兵四方而至，事态就不是在下所能预料的了。所以，这是下策。”

“先生所谓下策，实乃上策！”杨玄感斩钉截铁地说，“如今百官眷属皆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摇士心，颠覆国本！”

李密沉默了。他太了解杨玄感了，这是一个被一帆风顺的命运宠坏了的世族子弟，他身上的自负、虚荣与骄矜，简直和天子杨广如出一辙！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他们都喜欢走捷径。但是有时候，捷径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短路。

是的，所谓快速成功的捷径，往往也是通向灭亡的最短道路。在李密看来，这句话对杨广适用，对杨玄感同样适用。

不出李密所料，杨玄感刚刚率大军围困洛阳不久，杨广的东征大军便已迅速回师中原。面对隋朝大军对他形成的反包围，杨玄感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略错误：他听信部将李子雄的计策，把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分成两路，一路抵挡已经屯兵黄河北岸的屈突通，一路进攻从长安赶来驰援东都的卫文升。但是，屈突通很快就突破了他的防线，顺利渡过黄河，与卫文升部和驻守洛阳的樊子盖部遥相呼应，对杨玄感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杨玄感的末日来临了。

直到此刻，他才决意实施李密当初提出的中策——西进关中，入据长安。

大业九年七月二十日，杨玄感无奈地解除了对东都的包围，率部西进潼关。宇文述与屈突通、来护儿、卫文升等人合兵一处，率大军在背后拼命追击。

数日后，杨玄感进至弘农（今河南三门峡市）。弘农太守杨智积（杨坚侄子）对左右说："杨玄感西取关中的计划一旦成功，将来就很难收拾了。我们现在想办法缠住他，让他无法西进，不出十天，定可将其生擒！"

随后，杨智积派了一些父老，出城拦住杨玄感的马头，说："如今弘农兵力薄弱，防守空虚，很容易攻取。"杨玄感信以为真，马上兵临弘农城下。杨智积当即登城叫骂，诱他攻城。杨玄感大怒，立刻命令士兵进攻。

面对如此不可救药的杨玄感，近乎绝望的李密最后一次规劝他："用兵之道贵在神速，何况追兵转眼立至，怎能在此逗留？如果进不能入据潼关，退又无险可守，大军一旦溃散，你拿什么自保？"

可是，杨玄感根本听不进去，他率部猛攻三天，弘农城却纹丝不动。等到杨玄感回过神来，准备放弃弘农继续西进时，宇文述的几十万大军已经铺天盖地地杀到了。杨玄感且战且退，于八月初一退到董杜原（今河南灵宝市西）。隋朝大军追至，杨玄感被迫在此与隋军决战。

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杨玄感全军覆没，仅带着十余骑兵逃奔上洛（今陕西商州市）。没跑多远，连那十几名亲兵也各自逃散，杨玄感身下的坐骑也被射杀，只好和他弟弟杨积善徒步逃亡，慌不择路地跑到了一个叫葭芦戍的地方（今灵宝市西南）。

在这里，疲惫不堪、满心绝望的杨玄感停下了脚步。他对杨积善说："我不能接受别人的杀戮和侮辱，你取我的性命吧。"

当生命与尊严不可得兼时，贵族杨玄感宁可选择后者。

杨玄感死了。从他起兵到败亡，为时不到两个月。

这场叛乱虽然很快就平定了，但它给杨广和隋帝国刻下的伤口却没那么容易愈合。杨广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政治威望已经被严重削弱，人气指数急剧下滑，降到了他即位以来的最低点。

暴怒的杨广决定大开杀戒，震慑天下。他对大臣们说："杨玄感振臂一呼，从者十万。以此足以证明，天下的人口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太多了就会相聚为盗。此次的一干人犯若不彻底追查，一概诛杀，就无以警醒当世和将来！"

随后，朝廷依照宁枉勿纵的原则，开始大肆追查，广为株连——上自当朝大员，下至普通士民，一口气捕杀了三万多人，流放了六千多

人。此外，由于杨玄感围攻东都时曾经开仓赈粮，于是朝廷便将当时接受赈济的百姓全部活埋，一个也没有放过。

至此，凡是跟杨玄感有过丝毫瓜葛的人几乎都被抹掉了，只有极少数人逃过了这场大屠杀。

其中一个，就是李密。

早在杨玄感兵败之前，李密就已悄悄离开了他，准备投奔其他义军，不料半路上被隋军抓获。李密用黄金贿赂看押官，使他放松了警惕，然后趁其不备再度逃亡，投奔了平原郡的郝孝德。

李密的漏网并没有引起朝廷的关注。

兵荒马乱中，隋朝官吏以为漏掉的只是一只小虾米。没有人会料到，短短几年后，这条小虾米就将变成一条翻江倒海的大鱼！

雁门之围：惊魂33天

东征高丽成了杨广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场噩梦。

连续两年，发兵两百多万，耗费资财无数，国库为之一空，天下萧然，民生凋敝，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的只有——盗贼成群，烽烟遍地，世家大族离心离德，整个帝国伤痕累累。

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杨广百思不得其解。

是要坦然承认失败，从此把目光转向国内，发愤图强收拾烂摊子，还是要再接再厉、愈挫愈勇，不灭高丽誓不罢休？

杨广最终选择了后者——他要整兵再战，三征高丽！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三月十四日，杨广率领三征高丽的大军向辽东出发。一路上，士卒纷纷逃亡，屡禁不止。七月十七日，杨广终于带着这支充满恐惧和抵触情绪的军队进抵怀远（今辽宁辽中县）。同时，来护儿的水军渡过渤海，在毕奢城大败前来迎战的高丽军队，并乘胜渡过鸭绿江，兵锋直指平壤。

此时的高丽，表面上还在顽抗，实则早已精疲力竭了。此前的两次大战固然拖垮了隋帝国，可同时也让小小的高丽元气尽丧。面对卷土重来的隋朝水陆大军，高丽王高元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只好低头妥协。

七月二十八日，高元遣使前往隋军大营，向杨广奉上降表。如果是前面两次，杨广一定会断然拒绝，并且亲自攻进平壤，活捉高元。但是这一回，杨广却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高丽的请降，并即刻传令来护儿班师回朝。

杨广为何答应得这么痛快？

原因很简单：如今的隋朝天下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繁荣富足的太平盛世了，面对风起云涌的叛乱和分崩离析的江山，杨广岂能再漠然置之？现在，只要能让高丽臣服，只要能把丢掉的面子捞回来，杨广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

三征高丽就这么不尴不尬地落下了帷幕。

对于杨广来讲，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或许足以抚慰他那受伤的心灵，可对于多数将领来说，这种充满自慰色彩的精神胜利却让他们感到极为难堪，甚至是感到万分耻辱——一征高丽大败而回，二征高丽无果而终，三征高丽不了了之，这算哪门子胜利？

对此，老将来护儿就曾当着部众的面扼腕长叹：“大军三出，未能平贼，劳而无功，吾窃耻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二）

大业十年十月底，杨广命令高元按照臣藩之礼入朝觐见，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高元居然把他的诏令当成放屁，一点反应都没有。杨广发现自己被耍了，顿时暴跳如雷，对着满朝文武发出怒吼——老子要四征高丽！

然而，杨广还能四征高丽吗？这个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隋帝国，还能经得起他的疯狂折腾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此时的国库已然空空如也，再也不可能让杨广随心所欲地往高丽这个无底洞里砸钱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杨广郁闷难当。为了消除自己的郁闷，杨广决定北巡——第三次北巡。

四征高丽的钱花不起，第三次北巡的钱他还是花得起的。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初五，杨广向帝国的北部边境出发了。此时的杨广并不知道，一场比三征高丽更让他难以想象的噩梦，

正悄悄匍匐在道路的前方。

准确地说，它匍匐在雁门郡。

大业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杨广的御驾抵达雁门郡（今山西代县）。此时，雁门以北的大地正滚过一阵剧烈的战栗——四天前，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已经率领数十万精锐骑兵从塞外呼啸南下，此刻正风驰电掣地朝雁门扑来。

他的目标是——杀死杨广。

杨广到达雁门的第二天，东突厥数十万铁骑就已将雁门团团包围。隋朝君臣惊恐万状，开始手忙脚乱地组织防御。此时，虽然雁门共有军民十五万人，足以抵挡一阵子，但问题在于——城中囤积的粮食只够食用二十天。

突厥人的攻势异常凌厉，短短几天便把雁门郡下辖的四十一座城池攻克了三十九座，只剩下杨广所在的雁门和齐王杨暕驻守的崞县。突厥人彻底扫清外围之后，开始集中兵力猛攻雁门。战斗十分激烈，一支流箭甚至射到了杨广面前，只差几步就把他射了个对穿。

杨广心胆俱裂，一把抱住幼子杨杲纵声大哭。

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一个帝王刻意维系了大半生的骄傲和尊严瞬间坍塌。剩下的，只有与常人毫无二致的恐惧和软弱。

面对突厥人的强大攻势，宇文述力劝杨广挑选数千精骑拼死突围。可他的提议却遭到了重臣苏威、樊子盖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突厥人擅长野战，突围之策太过冒险。而今之计，只有一方面死守城池，一方面紧急发布勤王诏，命四方军队前来增援。

杨广也认为这样比较保险，可要命的是：突厥人已经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勤王诏怎么送出去？还有，粮食在一天天减少，虽然实行了压缩配给，但存粮已经不多，如果不赶紧把勤王诏送出去，大家很快就会饿死。

所有人绞尽脑汁地想了十天，始终一筹莫展。到了第十一天，杨广终于大腿一拍，想到了一个主意——浮木传诏。

八月二十四日，数百根浮木被抛到流经雁门的汾水河上，迅速漂向下游的各个郡县，每根浮木上都绑着一道用黄帛写就的勤王诏。

随后的日子，汾水下游的一些郡县长官相继接获诏书，于是纷纷募兵奔赴急难。然而，仓促之间，各郡县募集的兵力都很有限，就算在最短时间内赶到雁门，恐怕也不一定打得过兵强马壮的突厥人。当时，有一支勤王队伍的将领叫云定兴，他手下有个十七岁的小兵，就针对这个问题献上了一计。

这个小兵的意见是：让队伍携带大量的军旗和战鼓，一路上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借此迷惑敌人。他说："始毕可汗胆敢以举国之师包围天子，必定认为我方短时间内难以集结大军。所以，我们应该大张军容，白天旌旗招展，夜晚钲鼓齐鸣，让敌人以为我方援军已大量集结，迫使他们闻风而遁。否则敌众我寡，万一突厥倾巢来攻，我军恐怕难以抵挡。"

云定兴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欣然采纳。

这个献计的十七岁小兵，就是李世民。

在隋末乱世的舞台上，这是史书有载的李世民的第一次亮相。虽然他现在的身份还很卑微，但作为一个即将在几年后纵横天下的军事统帅，其见识和谋略已在此初露端倪。

杨广除了浮木传诏外，还采纳近臣萧瑀（萧皇后之弟）的建议，派密使从小道潜行至突厥王庭，向义成公主（与突厥和亲的隋宗室女）求救。义成公主闻讯，马上给始毕可汗送了一封急报，上面写着：北方边境告急！

始毕可汗不太相信，却又不敢断然否定。因为连日来，已经有斥候不断汇报：隋朝东都及各郡援军已大量集结，并正往雁门方向迅速移动，前锋已进抵忻口（今山西忻县）。也就是说，如果短时间内打不下雁门，就有可能反过来被隋军包了饺子。

始毕可汗越想越不安，不得不在九月十五日下达了撤军的命令。突厥人一撤，杨广如释重负，立刻派出两千骑兵一路尾追，在马邑攻击并俘虏了两千多名突厥的老弱残兵，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屈指一算，杨广在雁门总共被围了三十三天。

突厥人撤退之日，城中的粮食刚好告罄，杨广和所有人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好悬！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杨广在东都举行新年朝贺，天下有二十余郡的贺使缺席。这是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而之

所以出现这种事，原因不外乎两个：要么是郡城已落入变民之手，要么是特使在中途被变民所杀。

杨广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派遣十二路招讨使分赴各地，负责征调军队镇压叛乱。到了五月，杨广在朝会上向大臣们询问叛乱的情形。宠臣宇文述等人都表示，大部分叛乱已被平定。杨广问叛贼还剩多少，宇文述从容奏答：“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杨广显然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满朝文武中，只有老臣苏威硬着头皮对杨广说：“对于叛乱情形，各地奏报多不属实。臣在此仅举一例：从前叛贼据有长白山，距洛阳一千余里；而今却近在汜水，距洛阳仅一百余里。请陛下想一想，如果叛贼越来越少，又怎么可能离东都越来越近？”

杨广闻言，勃然大怒，随即找了个借口罢免了苏威，并把他子孙三代的官爵全部罢黜，贬为庶民。

大业十二年，四方叛乱愈演愈烈，隋朝的文武百官都对此心知肚明，却无人敢言。因为，杨广更愿意相信宇文述的话——天下的盗贼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换句话说，杨广宁可相信天下无贼。

这年初秋，为了让自己忘却三征高丽和雁门被围的耻辱，杨广决定南巡，三下江都（今江苏扬州市）。

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再也不忍心保持沉默了。右侯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今百姓疲劳，国库空虚，盗贼蜂起，政令不行，愿陛下早回西京，安抚万民！”

杨广不由分说地把赵才扔进了监狱，随即下令龙舟队扬帆起航，毫不迟疑地离开了烽火连天的中原，朝着歌舞升平的江都翩然而去。

途中，大臣任宗、崔民象、王爱仁相继劝谏，却无一例外地掉了脑袋。龙舟行至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当地百姓联名上书：“陛下若执意南巡江都，天下将不再为陛下所有！”杨广二话不说，命人将他们全部砍杀。

从此，再也没人能阻止龙舟一帆风顺地驶向江都。

同时，再也没人能阻止杨广义无反顾地奔赴死亡。

离开洛阳时，杨广曾作诗向后宫嫔妃告别，其中一句是："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杨广所说的江南就是江都。他曾在江都坐镇十年，对这座繁华富庶又风情万种的城市怀有很深的情感。相比于洛阳，他显然更喜欢江都，也一直将其视为灵魂的故乡。这几年，杨广感觉自己走了背运，没有一件事情顺心，所以他满心希望，美丽的江都能够抚平他的焦虑，疗治他的创伤，成为他生命中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然而，历史很快就将证明，这只是杨广的一厢情愿。

因为，江都不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是一个可怕的终点——终将把属于杨广的一切全部埋葬。

李密：大佬是怎样炼成的

李密一直在逃亡。

几年来，李密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失去了方向的船，一直在隋朝末年的怒海狂涛中漂泊。

他先是投奔了郝孝德，可郝孝德当他是蹭饭的家伙，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李密又投奔了王薄，王薄对他倒还客气，可问题是客气得过了头，天天好吃好喝供着，却始终不让他参与山寨决策。李密很郁闷——看这情形，要想跻身长白山的领导层，少说也得等上一百年。

郁闷的李密只好下山继续漂泊。由于身无分文，一路上他只能以剥树皮、挖草根为生。后来，李密再也走不动了，就在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县）的一个小山沟里落脚，改名刘智远，教几个农村孩子读书识字，聊以糊口。就这么过了几个月，郁郁不得志的李密写下了一首五言诗，借以抒发自己年华虚度、壮志未酬的痛苦和失落。诗的最后几句是："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李密仰望苍穹，不觉悲从中来，泣下沾襟。

李密的反常举止很快引起了乡民的怀疑，有人马上跑到淮阳太守那里告了密。官府立刻发兵前来搜捕，李密只好再度逃亡。

走投无路的李密最后逃到雍丘（今河南杞县），想投靠他的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丘君明一看是李密，顿时吓了一大跳。这个大舅子眼下可是朝廷追捕的要犯，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丧门星哪！谁要是敢

窝藏他，谁立马仕途玩完，脑袋搬家！丘君明留也不是，不留也不是，最后只好把他送到密友王季才那里。所幸王季才是一个侠肝义胆之士，一向敬佩英雄豪杰，所以不但欣然收留，还把女儿嫁给了李密。

李密就这么捡了一条命，又意外地捡了一个老婆。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他很可能会在这穷乡僻壤当一个循规蹈矩的倒插门女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庸度日，直至终老。倘若如此，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瓦岗英雄李密了。

不过，历史之所以精彩，就在于它不喜欢平铺直叙。尤其是对那些曾经胸怀大志的人，历史老儿更喜欢给他们制造灾难，好让他们摆脱平庸，在磨难中加速成长。所以，还没等李密享受完蜜月，命运马上又给他安排了一场灾难。

早在李密刚刚来到雍丘的时候，丘君明的堂侄丘怀义就马不停蹄地跑到朝廷告了密。杨广颁下一道敕书，命丘怀义用最快的速度把敕令交到梁郡通守杨汪手上，命他逮捕李密。杨汪接获敕令，立刻率兵包围了王季才家。

这一次，李密似乎在劫难逃了。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密这天恰好有事出门，居然让官兵扑了一个空。

尽管李密无意中躲过了一劫，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一无所获的官兵一怒之下，把王季才一家和县令丘君明一家灭门，杀得鸡犬不留。

一夜之间，几十条无辜的生命都成了李密的替死鬼。李密悲愤交加，再次踏上漫漫的流亡路。这条怒海狂涛中的破船，再次失去了生命的方向。

在一次又一次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中，绝望的李密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对于一条没有方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所以，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

可是，这样的方向在哪呢？

李密把历尽沧桑的目光再次投向帝国的四面八方，开始在隋朝末年弥漫的烽烟与熊熊的战火中重新寻找。最后，他的目光终于停在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名叫瓦岗（今河南滑县南）。

瓦岗寨的首领名叫翟让，本来是东郡（今河南滑县）的法曹。大业七年的一天，这个翟法曹不知何故犯了死罪，被关在监狱里等候处斩。一个叫黄君汉的狱吏向来很仰慕他，就在半夜偷偷把他放了。

死里逃生的翟让随即跑到瓦岗，聚众拉起了反旗。附近变民纷纷来附，部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李密来到瓦岗后，通过旧友王伯当的引荐，正式加入了翟让的阵营。

由于此前空着双手到好几个山寨入伙，不招人待见，因此李密这回吸取教训，刚一加盟瓦岗，就向翟让主动请缨，提交了一个并购计划。然后空手套白狼，在不动用瓦岗一兵一卒的前提下，设计收编了瓦岗周边的多股变民武装，给老大送上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翟让喜出望外，当即让他进入了山寨的决策层。

取得翟让的赏识后，李密就迫不及待地劝翟让积极准备扩张，进而夺取天下。他说："刘邦、项羽皆以布衣之身成就帝王功业。如今主上昏庸无道，天下民怨沸腾，朝廷精锐之师尽丧于辽东，而主上却委弃东都，巡游江南，此乃刘邦、项羽奋起之时也！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加之士马精良，足以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建立大业易如反掌，颠覆杨隋指日可待啊！"

翟让听完后，只是淡淡地笑了笑，然后向李密道了声谢，说："我们只是群盗而已，旦夕偷生于草莽之间，君之所言，非我所能及也！"

李密万万没料到，翟让居然是这么一个胸无大志的家伙。当今群雄并起，形势瞬息万变，像翟让如此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其结果只能是不进则退，坐致败亡！自己怎么能把未来寄托在这种小富则安的草头王身上呢？

就在李密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忽然跃入了他的脑海——既然翟让的格局如此狭小，何不干脆将他取而代之？

要做到这点似乎很难，但绝非不可能。因为，要论跃马横刀、上阵杀敌的本事，李密或许不敢称雄；可要论心机和谋略，李密自信整个瓦岗寨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主意已定，李密随即制订了一份大胆而周密的夺权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是——制造舆论，收揽人心。

为此，李密锁定了一个人——翟让的军师贾雄。此人精通阴阳术数，翟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李密相信，只要搞定这个人，就等于控制了

翟让的大脑。

随后，李密千方百计结交贾雄，很快就与他成了好友。所以，当翟让向贾雄询问，是否应该听从李密的建议出去打天下时，贾雄立刻不假思索地说：“此计吉不可言！”

翟让一听，顿时有些兴奋，可贾雄接下来的话却给了他当头一棒：“不过……将军如果自己称王，恐怕不太吉利，要是拥立李密这个人，定当无往不利。”

翟让纳闷：“照你这么说，蒲山公大可自立，又何必追随我？”

“将军有所不知。他之所以来追随将军，是因为您姓翟。翟者，泽之义也，蒲草非泽不能生长，因此他很需要将军。当然，将军也同样需要他。”

贾雄的话对翟让来讲就是天意。后来的日子，尽管翟让心里不大舒服，可他还是不得不对李密刮目相看。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李玄英的洛阳人也来到了瓦岗。此人据说走遍了四方群雄的山寨，为寻访李密的下落历尽了无数艰辛，现在终于找到了，眼中顿时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瓦岗的老少爷们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满世界找李密呢？”

李玄英答：“因为这个人将取得隋朝天下。”

人们又问：“凭什么这么说？”

李玄英答：“就凭那首传遍天下的政治歌谣《桃李章》。”

人们又问：“《桃李章》跟李密有什么关系？”

李玄英一笑，然后对歌谣作了一番极具说服力的诠释。他说：“歌中唱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莫浪语，谁道许？’这里的‘桃李子’，指的就是姓李的逃亡人；‘皇后绕扬州’，就是指天子逃到了扬州；‘宛转花园里’，是说天子归来无日，最终会转死沟壑；‘莫浪语，谁道许’就是一个‘密’字。合起来解释，就是李密将取隋朝天下的意思。”

“哦……原来如此！”人们恍然大悟。后来，瓦岗的老少爷们儿每当看见李密，总会不由自主地仰视，目光中充满了敬畏之情。

不久，又有一个叫房彦藻的人领着几百号弟兄前来投奔李密。据说，此人本是宋城县尉，当初曾和李密一起追随杨玄感起兵。杨玄感败亡后，房彦藻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直在苦苦寻觅李密的下落，如今总算找到了，自然是跟李玄英一样热泪盈眶……

瓦岗的老少爷们儿大为感叹：李密真是众望所归啊！

就这样，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炒作，李密的人气指数迅速飙升，俨然成了瓦岗寨的明星人物。

第一步取得成功后，李密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建立战功，树立威望。

他再次向翟让提出了向外扩张的建议。这次，翟让毫不迟疑地采纳了。随后，在李密的运筹帷幄和指挥之下，瓦岗军主动出击，迅速攻陷荥阳郡下辖的多数县城，极大地拓展了根据地。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李密又在大海寺北（今河南荥阳市北）埋设伏兵，大败前来征讨的隋朝勇将张须陀，并将张须陀斩于阵中。

这些年，翟让与张须陀多有交手，却屡屡败北，没想到李密一出手，竟然轻而易举地杀了张须陀。经此一战，河南各郡县官兵闻风丧胆，瓦岗则声名大振，李密的个人威望更是如日中天。

为了表示对李密的感谢，翟让让李密建立了自己的番号和大营，所部号称“蒲山公营”。然后，翟让向李密提出了分手，并说：“现在粮秣已足，我打算回瓦岗，先生如果不愿回去，听任先生自便，我们就此别过吧。”

翟让知道，李密断非久居人下之辈，而自己一时又不甘心拥他为首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分道扬镳。随后，翟让率主力与粮草、辎重东归瓦岗，而李密则率部轻装西进，迅速抵达康城（今河南禹州市西北），然后不费一兵一卒就逼降了附近的几座城池，获取了大量的财物、粮草和物资。李密把得到的金银财宝全部分给手下，自己始终保持节俭的本色，士众大为感动，越发效忠于他。

得到李密兵不血刃、连下数城的消息后，翟让后悔了。他不得不承认——李密确实是个天生的领袖，而且很可能真是负有天命之人。

看来，跟李密分道扬镳是不明智的。

思虑及此，翟让不得不掉转马头，命令大军回过头去追随李密。

看见翟让带着一脸尴尬的笑容来到面前时，李密知道，自己的计划基本上成功了。

此刻，李密的威望、功勋、军事才能、人格魅力都已跃居翟让之上，俨然已是瓦岗寨的精神领袖。然而，李密绝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是瓦岗的头把交椅——不折不扣、实至名归的头把交椅！

要走完这最后一步，李密知道自己必须再干一票大的。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李密正式向翟让提出了“袭据洛口，攻取东都，亡隋社稷，号令四方”的战略计划。此时的李密，与其说是在向翟让请示，还不如说是在发布命令。翟让当然只能言听计从。

二月初九，李密与翟让率精锐攻克了兴洛仓（今河南巩县东），随即开仓赈粮，任百姓自取。兴洛仓是隋朝在中原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另一基地是回洛仓），瓦岗军占领此地，就等于扼住了东都洛阳的命脉。对此，隋东都留守、越王杨侗大为恐慌，急命虎贲郎将刘长恭、河南讨捕使裴仁基火速出兵，准备包围瓦岗军，夺回兴洛仓。

为了一战歼灭瓦岗军，刘长恭制订了一个分兵合击的计划：自己亲率两万五千人从正面进军，让裴仁基从汜水包抄瓦岗军后路，两军约定于兴洛仓南面会师，意欲将瓦岗军合围聚歼。

刘长恭的计划固然周全，但李密却不会坐以待毙。他通过侦察兵的报告，很快弄清了隋军的作战意图，遂兵分两路，一路在横岭埋伏，负责阻击裴仁基；自己则亲率主力，在石子河迎战刘长恭。

这一仗，李密身先士卒，率领亲自挑选的精锐从隋军战阵中拦腰切入，大破刘长恭部，斩杀了一万多人。刘长恭吓得脱下大将战袍，化装成小兵，一溜烟逃回了东都。风闻刘长恭战败，裴仁基慌忙退守百花谷（今巩县东南），再也不敢前进半步。

石子河一战，瓦岗军大获全胜，而李密的功勋和威望也在此刻达到了顶点。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相形见绌的翟让想不下课都不可能了。很快，瓦岗寨的两个元老级人物就开始频频做翟让的思想工作，要求他让位给李密。

这两个劝翟让退位的人，一个是李密的旧友王伯当；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的初唐名将，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李世勣（李勣）。

李世勣本姓徐，字懋功，祖籍离狐（今山东菏泽西北），后迁居卫南（今河南滑县东），投奔瓦岗时年仅十七岁。据说，徐世勣是个富二代，家里佣人成群，积粮如山，可他没有一点纨绔习气，而是热衷于慈善事业，“拯济贫乏，不问亲疏”。

很显然，这样一个家境优越、乐善好施的富二代投身起义，绝不是迫于生计，而是为了实现他的人生抱负和自我价值。这样一种高起点，决定了徐世勣会比那些只知道抢钱、抢粮、抢地盘的人更富有远见，也比任何人都更能看出李密的领袖才能。

大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徐世勣和王伯当等人的劝说下，翟让终于下定决心，正式推举李密为盟主，上尊号“魏公”，并设立高坛，恭请李密即位，改年号为魏公元年。李密上位后，立刻设立行军元帅府，置三司、六卫，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以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其他部众各有任命。

瓦岗的新一任大佬就这样炼成了。

李密站在瓦岗的高坛上，踌躇满志地遥望着东都洛阳。他相信，杨广耗尽民力修建的这座雄伟壮丽的都城，很快就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大隋帝国风雨飘摇

从大业十三年起，李密开始步入人生的巅峰阶段，而瓦岗寨也从此名扬天下，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全盛时代。

这一年春，赵魏（约今河南省）以南、江淮以北的变民军纷纷尊奉魏公旗号，如齐郡的孟让，平原郡（今山东陵县）的郝孝德、王德仁，济阴郡（今山东定陶县）的房献伯，上谷郡（今河北易县）的王君廓，长平郡（今山西晋城市）的李士才，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县）的魏六儿、李德谦，谯郡（今安徽亳州市）的张迁、田黑社、田白社，济北郡的张青特，上洛郡（今陕西商州市）的周比洮、胡驴贼等，都不约而同地归附了瓦岗。

李密尽皆授予官爵，命其仍统原有部众，同时设立《百官名册》遥领各部。此外，远近四方的小股变民和青壮百姓也纷纷投奔瓦岗，部众激增至数十万人。瓦岗军一举成为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而李密也成了四方群雄中风头最健的人物。

由于部众激增，李密命人紧急修筑了一座方圆四十里的洛口城（今河

南巩县东），作为元帅府所在地和新的根据地。随后，他又派遣部将房彦藻向东扩张，先后攻克了安陆（今湖北安陆市）、汝南（今河南汝南县）、淮安（今河南泌阳市）、济阳（今河南南考县东北）等郡。一时间，黄河以南的郡县悉数落入瓦岗军之手。接下来，李密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那个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目标——东都洛阳。

这一年四月，李密命新附的孟让率部突袭东都，在东市整整劫掠了一夜，直到次日黎明才呼啸而去。等到隋军回过神来时，原本繁荣富庶的东市商业区早已被夷为平地。

此次行动虽然只是突袭，并未占领东都，却给东都的留守朝廷和周边郡县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数日后，巩县县令杨孝和举城投降李密。不久，负责把守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市西）的裴仁基也向李密献关投诚。李密大喜过望，马上封他为上柱国、河东公。

让李密感到欣喜的，还不仅仅是得到虎牢关和裴仁基，还有顺带得到他麾下的一员猛将——秦叔宝。

秦叔宝，名琼，以字行世。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历城区）人，早年在隋将来护儿帐下，深得来护儿赏识。秦叔宝的母亲过世的时候，来护儿还特地遣使慰问，令左右大感诧异："家中有丧事的人多了去了，将军从不过问，为何独独为秦叔宝之母吊唁？"来护儿回答："此人勇悍，加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旧唐书·秦叔宝传》）

差不多在秦叔宝归附李密的同时，还有一个传奇人物也来到了瓦岗。在历代有关隋唐的演义和评书中，这个人一直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用"妇孺皆知"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

这个人就是程咬金。

时至今日，中国老百姓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这些俗谚依然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可在正史中，程咬金使用的武器却不是笨拙的斧头，而是灵活的长矛。他使用"程咬金"这个搞笑名字的时间也很短，加入瓦岗不久就改了一个很严肃的名字——程知节，此后也一直以此名行世。可是，程咬金这个名字基本上家喻户晓，但"程知节"在民间却鲜为人知。

虽然秦叔宝和程知节的生平不像演义描述的那么色彩斑斓，但是在隋末唐初波澜壮阔的历史上，他们也的确是响当当的人物。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秦叔宝和程知节的名字也始终绑在一起，联袂演绎了

一幕幕乱世英雄的成长历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瓦岗覆灭，他们一起归降了王世充；后来，他们不满王世充的为人，又向唐朝投诚，效力于秦王李世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们又追随李世民参与了玄武门之变；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他们又一同进入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行列。

秦叔宝和程知节来到瓦岗后，李密立刻任命他们为骠骑将军，统领麾下最精锐的八千名“内军”。李密时常对人夸口：“我这八千精锐，足以抵挡百万大军！”

大业十三年，李密的麾下可谓兵强马壮、人才济济，然而，他一心想夺取的东都也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因为，此时的东都还驻守着二十多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隋朝正规军。要消灭他们，谈何容易？

不过，在李密看来，这二十多万守军固然是东都留守朝廷的雄厚资本，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道理很简单——这二十多万人每天都要吃饭。

几年来，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一直依赖于东都附近的两大军粮储备基地：兴洛仓和回洛仓（今河南偃师县北）。如今，兴洛仓早已被李密占据，下一步，只要李密再把回洛仓拿下来，就能把东都这二十多万军队活活困死！

这才是攻取东都的上上之策，李密想。

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大业十三年初夏，瓦岗军与隋军围绕着回洛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四月十三日，李密命裴仁基和孟让率两万人进攻回洛仓，迅速将其攻克。洛阳的隋军立刻出兵反攻，将裴仁基击败。

裴仁基撤退后，李密马上亲率大军击退隋军，再次占据回洛仓，随后分兵进攻偃师（今河南偃师县）和金墉（旧洛阳西北部）。李密的计划是一鼓作气占领这两座城池，然后与回洛形成战略协防的掎角之势，同时又能达到肃清洛阳外围、缩紧包围圈的目的。

然而，瓦岗军在偃师和金墉却遭到了隋军的顽强抵抗。眼看这两座城池在短时间内难以攻克，而回洛仓又无险可守，李密只好在四月十五日放弃回洛，撤回洛口。

李密的撤兵对东都而言无疑是一大福音，因为此时的洛阳城已经断粮数日了。越王杨侗当机立断，趁李密回洛口喘息休整的间隙，命军队

前往回洛仓运粮。

为了防止瓦岗军突袭，杨侗一共派出了九支部队，在洛阳到回洛仓的一路上严防死守，终于把回洛仓中的一部分粮食运回了东都。当长长的车队满载而归的时候，杨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了这些救命的粮食，他就能死守东都，和李密打持久战！

让隋军在眼皮底下运回了粮食，李密大为恼怒。四月十九日，李密亲率三万人马再次占领了回洛仓，并挖掘壕沟，修筑城墙，发誓不让隋军再从这里得到一颗粮食。

杨侗急命光禄大夫段达等人率七万大军进攻李密。四月二十一日，两军在回洛仓北面会战，隋军战败，撤回洛阳。

眼看东都已经岌岌可危，杨侗慌忙派遣太常丞元善达赶赴江都，向杨广告急。元善达不辱使命，穿越重重险阻抵达江都，终于见到了天子杨广，声泪俱下地汇报了东都的严峻形势，并请求杨广速还东都。

杨广一听，大为不悦。

近臣虞世基注意到了杨广阴郁的脸色。他知道，天子最不想听见盗贼猖獗的消息。过去，他也曾在这方面作过诤谏，可无一例外地触了逆鳞，后来虞世基就学乖了，只一心一意取悦天子，于是君臣关系变得十分融洽。

这一次，虞世基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他轻描淡写地对杨广说：“年少的越王被这些人给诳骗了！倘若形势果真如此严峻，元善达又何由至此？”

杨广大怒：“元善达这小子，竟然敢当廷欺君！”于是立刻命他前往东阳郡（今浙江金华市），名义上是让他去征集粮草，其实是叫他去送死。很快，元善达就在半路上被变民军杀了。从此，再也没人敢跟天子提起东都的情况。

没人来报忧，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元善达带来的不愉快，转眼就被杨广抛到了九霄云外，江都的离宫依旧一派歌舞升平。

正当杨广沉浸在温柔乡中乐不思蜀的这一年，河东、陇西、河西、江南等地迅速崛起了一个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薛举、李轨、萧铣。

这是意欲颠覆隋朝的第二波力量。

相对于大业七年到大业十二年的那一波反隋浪潮，大业十三年掀起的这一波，显然动静更大，来势更猛。而且，这几个核心人物的能量和号召力，也远比此前那些暴民更为巨大。

刘武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人，少年时“骁勇善射，交通豪侠”，后随军东征高丽，以军功授建节校尉，后调任马邑郡鹰扬府校尉。马邑郡太守王仁恭视其为英雄，让他当了自己的亲兵队长。不久，刘武周因职务之便与王仁恭的侍妾私通，因担心事情泄露，便纠集同郡豪杰刺杀了王仁恭，然后自称太守，并投靠了东突厥。大业十三年三月下旬，刘武周登基称帝，改元天兴。

梁师都，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县）人，世代为郡中豪族，本人曾在隋军中担任鹰扬郎将。大业十三年春，梁师都率数十名徒众刺杀郡丞唐宗，据郡而反，并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同年三月，梁师都登基称帝，国号为梁，定都朔方，改元永隆。

郭子和，同州蒲城（今陕西蒲城县）人，曾在隋禁军任职，因罪贬谪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正逢当地爆发饥荒，人心思变，郭子和便暗中结交了十八个不怕死的弟兄，攻击郡城，生擒了郡丞王才，以不恤百姓之罪将其斩首，并开仓赈粮，随后自称永乐王，改元正平，南连梁师都，北附东突厥。

薛举，河东汾阳人，随其父徙居金城（今甘肃兰州市），家财万贯，是边境一大富豪，早年任金城府校尉。大业十三年四月，薛举和儿子薛仁果发动兵变，占领县城，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同年夏，薛举接连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岷山（今甘肃舟曲县西）、西平（今青海乐都县）、浇河（今青海贵德县）等郡，尽有陇西之地，部众增至十三万人。同年七月，薛举登基称帝。

李轨，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原任鹰扬府司马，大业十三年，与好友曹珍、梁硕等人发动兵变，据守郡城，自称河西大凉王，改元安乐，设置百官，并于次年登基称帝。

萧铣，梁朝皇室后裔，早年落魄，靠替人抄书勉强糊口。杨广登基后，萧氏被立为皇后，萧铣才靠外戚的关系当上了罗川（今湖南湘阴县东）县令。大业十三年，萧铣在董景珍、雷世猛等少壮军官的拥立下，据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市）起事，自称梁王，改元凤鸣。次年四月，萧铣称帝，国号为梁，一切典章制度皆依梁朝旧制。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公元617年，大隋帝国山河裂变、乾坤倒转，一个又一个乱世英雄争先恐后地浮出了历史水面。很显然，这些来自帝国内部的军官、富豪、贵族、外戚起兵的目的，与前期造反的那些底层民众截然不同——他们不是为了向朝廷争取生存权，而是为了与杨广争夺统治权！所以一旦起兵，他们便会迫不及待地分疆裂土、称帝称王，向隋朝的统治合法性发起强烈的挑战。

此外，这些原本便已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并且拥有相当军事实力的新一波叛乱者，在战场上的表现也远非前期的农民军可比。换言之，大业七年到大业十二年间的农民起义，充其量只是拉开隋朝灭亡的序幕而已，最终颠覆隋朝社稷、重建帝国政治、决定历史走向的，只能是来自帝国体制内部的这批精英！

大业十三年，大隋帝国已经风雨飘摇，迷失的隋鹿正在等待着新的主人。

这一年五月，一个拥兵一方、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在耐心地蛰伏数年，冷静地纵观天下大势之后，终于缓慢而坚定地出手了。

他，就是李渊。

第二章 潜伏的李渊，强悍的李渊

血缘传说与天命神话

李渊是典型的门阀世族出身。

按照李唐皇室自己的谱牒记载，他们有着极为高贵的氏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西汉时的先人则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这是李唐皇室自己记述的最早世系渊源，看上去十分辉煌。不过可惜的是，现在的学界已经彻底否定了这个说法，认为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血缘神话，根本不可信。

久远的世系被证明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那么较近的世系呢？

很遗憾，同样经不起推敲。

据李唐皇室自称，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六世祖李歆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灭亡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今内蒙古武川县），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亦为北魏重臣。

因为西凉王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后裔，所以这段世系意在表明李唐皇室不但出自汉代名门，世代均为陇西望族，而且又是西凉王室之后和北魏的豪门显宦。这样一段家谱自然也是无比显赫的，但是它上面仍然笼罩着重重的历史迷雾。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李氏家族与西凉王室绝无关系，并且据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考证，他们也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瓜葛。此外，李唐皇室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可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样的说法同样是子虚乌有。

既然如此，那么李唐皇室的世系渊源究竟出自何处呢？

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河北赵郡李氏。虽然赵郡李氏也是中国北方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但李唐一族的先祖很可能只是其中没落衰微的一支。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认为，虽然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不能被视为最终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至今尚无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

至此，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一一破灭。

然而，不管最初的渊源何在，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传说，进入了货真价实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

《周书》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从此，李氏家族再也不是什么“破落户”和“假冒牌”了，而是一跃成为堂堂正正的贵族门阀。

按宇文泰创设的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还设有十二大将军，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就是其中一员。这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其中，宇文家族建立北周，吞并了北齐；杨氏家族建立隋朝并统一了中国；李氏家族建立唐朝，开创了大唐盛世……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军事贵族集团，被陈寅恪先生命名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而且还通过联姻缔结了一条特殊的政治纽带。这条纽带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大司马独孤信。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在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门三皇后”的传奇。

北周建立后，已经去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李昞卒，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长大后，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旧唐书》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很显然，从少年时代起，李渊就以其亲和力赢得了人心。一个开国帝王所应具有的人格魅力似乎在此时便已渐露端倪。隋朝建立后，姨父隋文帝杨坚和姨母独孤皇后对李渊恩宠有加，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任命他为天子的近身侍卫——千牛备身，后来又让他在畿辅地区和西北的战略要地历练，辗转担任谯、陇、岐三州刺史。

在中国历代正史的帝王本纪中，大多数开国皇帝的头上都会笼罩许多匪夷所思的神话光环，修史者总是想借此表明他们是异于凡人、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比如汉高祖刘邦出生前，他母亲就曾在一个“雷电冥晦”的午后于野外打盹，一不小心就“梦与神遇”。她老公急急忙忙出去找她时，竟然目睹了一个很黄、很暴力的场面——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正在强行与他老婆交配！史书没有记载，刘老爹戴上这顶“天龙”牌绿帽时的心情究竟是窃喜还是悲愤，只说刘大妈“已而有娠，遂产高祖”（《汉书·高祖本纪》）。

后世的修史者可能觉得这个黄暴场面过于粗俗，有碍观瞻，所以不敢

抄袭，轮到为宋太祖赵匡胤作传时，笔墨就收敛了许多。他们说宋太祖在洛阳夹马营出生的那天，“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而刚落地的天子则“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宋史·太祖本纪》）。

赵匡胤的这个神话故事显然比刘邦那个干净，可后来的修史者又觉得它过于含蓄呆板，所以当他们在创作“历代帝王神话之朱元璋版”的时候，艺术手法上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既不失赵匡胤版的干净，又不失刘邦版的生动。故事是这么说的：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刚有身孕，就梦到一个神仙送给她一颗丹药。拿过来一看，通体放光；一吞进嘴里，口舌生香。分娩的那天晚上，老朱家的土房子忽然“红光满室”，而且红光蹿出房顶，整夜闪个不停。村里的乡亲们“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明史·太祖本纪》）。明明以为老朱家着火了，跑过来看却啥都没有，最后才知道是老朱家在生娃。实在是神奇啊！众人不约而同地想，看来此娃定非凡胎，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关于历代开国皇帝的天命神话，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记录在官方正史上，被民间后世传为美谈，或者传为笑话，让千百年来的读者顶礼膜拜，或者嗤之以鼻。

既然其他的真龙天子都有神迹，那么唐高祖李渊呢？

喜欢猎奇的读者也许会失望，因为李渊出生前后的故事非常朴素，既没有他母亲与巨龙郊外野合的黄色情节，也没有红光似火把隔壁邻居折腾一宿的生动记载。唯一让李渊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新唐书》中关于他生理特征的一个记载。

该书称李渊“体有三乳”，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应该也包括女人）多出一乳能干什么呢？既多余又不美观，甚至还有点畸形和滑稽怪诞。

然而，就是如此畸形怪诞的体貌特征，在古人眼中却是千古不遇的“大吉之征”。《史记·周本纪》称：“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淮南子·修务训》说：“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天将授文王……有四乳而大足。”可见历代有关文献都将周文王的畸形四乳，看成天下归心、周之勃兴的天命征兆。

既然周文王都能比常人多出二乳，那么大唐开国之君李渊的身上比常人多出一乳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然而我们却有理由怀疑，这第三乳极有可能不是老天爷所为，而是后世修史者强行“摁”上去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这个记载只见于《新唐书》，而该书修于北宋，属

于后出的史料，先出的修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并没有这个“体有三乳”的怪诞说法。所以我们只能说，这则“三乳奇谈”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家的杜撰。

相对于《新唐书》的“三乳奇谈”，《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就朴实了很多，它仅仅托相士之口，对李渊日后必将君临天下作出了某种暗示。该书称，一个名叫史世良的善相之人曾对李渊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从此“颇以自负”。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当然已经无从查考，但是相对于其他帝王的天命神话和《新唐书》的“三乳奇谈”来说，或者从李渊日后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旧唐书》这则“相士预言”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很可能早在担任地方刺史的时候，李渊的内心就已经暗暗生出问鼎天下的志向和使命感了。

李渊一直在潜伏

关陇集团内部流行政治联姻，这种做法自然延续到了李渊这一代。

李渊的父亲李昞娶的是鲜卑望族独孤信的女儿，而李渊同样娶了另一个鲜卑望族、隋定州总管窦毅的女儿（按《魏书·官氏志》，“窦氏”即鲜卑的“纥豆陵氏”）。众所周知，这个后来被追封为太穆皇后的窦家女儿就是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生母。

据说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便“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旧唐书·后妃列传》），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因此自然是人见人爱。由于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朝的襄阳长公主（宇文泰的五女）、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而宇文邕又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因此一直把她养在宫中，视如己出。

其时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仍然与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处于“三国鼎立”之局，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并与其联姻，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当时宇文邕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毫无半点感情基础，所以宇文邕并不宠爱这个突厥皇后，对她极为冷淡。

也许是因为出生于鲜卑的名门望族，再加上在宫廷中的耳濡目染，窦氏从小就聪慧过人，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就是在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年幼的窦氏特意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向她

的皇帝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她说："而今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舅抑制自己的感情，对皇后多加抚慰，如此才是以苍生为念！只要真正得到突厥的助力，那么江南、关东就不足为患了。"

宇文邕大为惊讶，没想到这个外甥女小小年纪，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居然如此成熟老到！又惊又喜的宇文邕当即采纳了小外甥女的意见。

窦氏的父亲窦毅听说此事后，高兴地对妻子说："此女才貌双全，不可轻易许人，当为之择一贤夫。"到了窦氏该出嫁的年龄，窦毅就在自家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然后举行"佳婿海选"，向长安城的贵族公子们宣布：若有想求婚者，就给他两支箭，必须两箭各中一只孔雀一目，才有资格成为窦家的乘龙快婿。长安城的公子哥们听说著名的长发美女要选婿了，顿时蜂拥前来，但是一连数十个帅哥出手，却没有一个能够两箭各中一目。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英姿飒爽、玉树临风的李渊一到，啪啪两箭，各中一目，干脆利索，成功夺魁。众位帅哥黯然失色，窦毅夫妇笑逐颜开。没过多久，神箭帅哥李渊就在众人既羡且妒的目光中把长发美女窦氏娶过了门。

这则"雀屏中选"的故事从此在长安坊间流传开来，并且在后世传为美谈，成了择婿许婚的代名词。

北周大象三年，亦即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立隋朝，并将幼主周静帝和北周宗室群王屠戮殆尽。面对宇文皇族遭遇的灭顶之灾，窦氏悲愤莫名，扑在床上痛哭，边哭边说："恨我不是男儿，无法拯救舅家的灾难。"窦毅夫妇当场吓得面无人色，赶紧捂住她的嘴，低声训斥道："你千万别乱说，这是会灭族的啊！"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窦氏身上具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这也许与她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有关。

大业初年，李渊历任荥阳、楼烦、扶风等郡的太守。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李渊曾得到几匹骏马，就在他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窦氏却蹙起了眉头。她告诉李渊："主上亦喜飞鹰骏马，此公之所知，所以这些马必须送入宫中，不可久留，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它们必定成为负累，请公慎重考虑。"

李渊一听大为郁闷。他明知道妻子说得有道理，可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几天后杨广果然知悉，马上对他进行责罚，搞得李渊追悔莫及。后来李渊汲取了教训，老老实实按妻子说的做，四处搜罗良马猎鹰，频频进献给杨广，终于讨得天子欢心，于大业十二年被擢升为右骁卫大将军。

可是，当李渊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窦氏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年仅四十五岁。李渊涕泪横流地对几个儿子说："若早听从你们母亲的话，我在这个官位上已经很久了。"

窦氏既没能看到李渊成为隋朝的大将军，更没看到李渊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大唐开国后，秦王李世民就曾屡屡为此而黯然神伤。（《资治通鉴》卷一九〇："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出身鲜卑望族的窦氏从小就具有异常早熟的政治智慧，北周灭亡时又表现出"恨非男儿"的血性，嫁给李渊后成为李渊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参谋和智囊，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窦氏的确是当时一位不可多得、出类拔萃的政治女性。假如不是早亡，窦氏应该能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虽然窦氏对大唐开国的这段历史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在李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中，这位鲜卑母亲的影响肯定是不可小觑的。

除了李渊所提供的政治世家的教育和熏陶之外，李氏三兄弟应该也会从窦氏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必要的政治启蒙并培养出相应的政治抱负，同时也能从母亲那鲜卑望族的血液遗传中获得精明强悍的性格基因。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窦氏虽然早亡，可她的影响力早已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植入了李氏三兄弟的体内，不但为他们日后纵横沙场、争霸天下埋下了伏笔，并且最终为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横空出世埋下了伏笔。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旋即爆发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很显然，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深为倚重的心腹大臣之一，所以他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同时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史称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一直在这几年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为日后夺取天下做充分的准备。

可是，杨广不是瞎子。

尽管李渊很谨慎，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这位大隋天子的怀疑和警觉。有一次杨广在行宫，故意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不去，杨广顿时大为疑惧。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很厉害。杨广深深地看了王氏一眼，似问非问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皇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希望李渊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皇帝随时下一道诏书，李渊就可能富贵不保，甚至人头落地。

怎么办？是索性起兵造反，还是就这么坐以待毙？

李渊知道，虽然隋朝天下已经烽烟四起、人心思乱，但远不到分崩离析、轰然倒塌的地步。所以，此时起兵绝对不是时候。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

怎么办？李渊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然而李渊并没有痛苦很久。在隋帝国的政坛上混了这么多年，这点应变的智慧还是有的。他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自秽。没有比自秽更好的保命办法了。

于是从大业九年的秋天起，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渊终日沉迷酒色，并且大肆贪污受贿，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堕落了——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成一个酒色财气的庸臣和昏官了。

李渊"堕落"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朝廷的情报网落进了天子的耳朵。

杨广笑了，他悬了许久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一个酗酒、纵欲、贪财、好色的中年男人，还有多少觊觎天下、逐鹿中原的野心和能力呢？

所以杨广特别喜欢现在这副模样的表兄李渊。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终于重获天子信任的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约今山西省）讨捕使，负责镇压当地叛乱。在龙门（今山西河津县），李渊身先士卒，仅率少数骑兵便大破变民首领毋端儿的数千部众。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年底，李渊在历任右骁卫大将军、太原道安抚大使等职务之后，终于被擢升为太原留守。

太原（郡治在晋阳，即今山西太原市）是帝国北部边陲防御突厥的一

座军事重镇，城高池深、兵强马壮，储存的粮饷可支十年。隋炀帝交给李渊的任务是让他镇守此地，负责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与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

可对心怀异志的李渊来说，这座太原郡无疑将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因为它不但是一座给养充足、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军事重镇，而且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恰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契，所以自从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后，李渊就已经“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了（《大唐创业起居注》）。

所谓“天授”，也就意味着叛隋起兵、争霸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了这一天，李渊已经等待好几年了。

早在大业九年初，李渊前往怀远督运军需，途经涿郡的时候，就曾与他的朝中密友、隋炀帝近臣宇文士及进行过一次有关“时事”的密谈。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隋炀帝的驸马，身处隋帝国的政治中枢。所以李渊和他的此次密谈，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对裴寂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宇文士及传》）

众所周知，裴寂是大唐的开国元勋、晋阳首义的第一功臣，连他都要排在宇文士及后面，可见李渊在大业九年与宇文士及所谈的“天下事”，实际上就是“问鼎天下”之事。

不久后杨玄感叛乱爆发，李渊被调任弘化留守，遂按下起兵之意，静观事态变化。其妻兄窦抗力劝其起兵，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李氏名应图谶，应该趁势举义，这是天意啊。”

但是李渊拒绝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李渊深深懂得第一根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

果不其然，仅仅两个月后杨玄感便兵败身亡。

大业十一年，李渊前往山西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他：“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旧唐书·夏侯端传》）

夏侯端所说的“切忌诸李，强者先诛”，指的就是那则流传天下的政治歌谣《桃李章》让杨广深为忌恨，因而大肆诛杀李姓之人的事，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金才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

应该说夏侯端的分析还是很中肯的。当时李渊确实处境不妙，虽然通过“自秽”成功地掩藏了心迹，但是杨广对他的猜忌仍然存在，稍有不慎就会重蹈李金才的覆辙。

但是李渊还是忍了下来，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扫灭群雄，颠覆隋朝社稷。

所以，他仍然需要蛰伏，需要隐忍。

时间终于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站在晋阳城头的李渊望着千里黄云、北风吹雁，一股澄清宇内、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情猛然在胸中激荡。

他仿佛看见天命正在向自己遥遥招手。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予而不取，祸将斯及！”

在幽暗的深渊中蛰伏了许多年的这条大唐巨龙，终于缓缓地昂起了头颅。大野苍茫的太原上空，正隐隐滚过一阵惊雷。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相遇

李渊与原配夫人窦氏共生有四男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一女是平阳公主，女婿是隋东宫千牛备身柴绍。其中除三子李玄霸早亡外，其他的三男一女一婿全部参与了李渊起兵叛隋和开创大唐王朝的整个进程。

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人，首推李世民。

公元599年1月23日，即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一座别馆，也就是李氏家族在此地的一座别墅。相对于李渊来说，李世民的出生就多出了一层神秘色彩。史称其出生时，有两条龙在他们家门口嬉戏喧闹，整整闹了三天才离开。其情形类似于我们今天开业典礼时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请来的舞龙队。唯一的差别是：人家那是吞云吐雾的真龙，而且是不请自来的，纯属义务演出、友情捧场；我们舞的则是假龙，而且还要给人家舞龙队递

茶、递烟、包红包。

李世民四岁时，又有一个神秘的相士来到他们家，对李渊说："公是贵人，定有贵子！"一转眼又看见了李世民，这位相士顿时双目炯炯地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李渊又惊又喜。喜的是他们父子二人均有天命，来日必将贵有天下；惊的是此事一旦泄露，必定惹来杀身之祸。李渊狠狠心，决定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相士杀了。可就在他愣神的间隙，那个神秘人物忽然消失无踪。从此，李渊便以"济世安民"之义为次子取名李世民。不知道李世民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别的名字，但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就将伴随他的一生，并且注定要载入史册、彪炳千古了。

关于李世民的少年时代，各种相关史籍的记载都很简略。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年间，李世民在写给魏徵的一道手诏中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全唐文》卷九）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虚岁四十三的李世民在武成殿大宴群臣，曾回忆自己的过去说："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综合上述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还原出少年李世民的一个大致轮廓。乍一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而且颇有些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他"好弓矢""喜博戏""尚威武"，可偏偏就是不喜欢读书；能把弓矢、骑射之术玩得异常精妙，可对先王之道、圣贤学问却"茫若涉海"，两眼一抹黑！

这不是纨绔子弟是什么？

比起那个"好学，善属文"，七岁就能吟诗作赋，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这位李家二公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然而，就是那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却亲手葬送了一个繁荣富庶、四海升平的帝国，并把自己钉上了"无道暴君""二世而亡"的历史耻辱柱；而这位"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的李家二公子，反而开创了一个万邦来朝的"天可汗"时代，并最终缔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唐盛世！

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

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杨广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当然更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他身上强烈的诗人气质和虚荣天性严重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他对完美的病态追求和毫无节制的浪漫主义激情，让他的执政生涯始终贯穿着浮华二字。或许是在江都任总管的十年让他过多地被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熏染了，或许是他的天性原本就与之契合，总之，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政治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美学家”。而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背离时，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统治者。此外，杨广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又导致了一种致命的自负，使他在逆境中的坚韧性和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

与杨广恰恰相反，李世民身上那种活泼强悍的尚武精神，那种质朴的、原生态的生命动能其实正是继承了关陇集团的优秀传统。在那个一切都要靠武力和实力说话的年代，李世民并不是从书本上学习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先王之道”，而是从父母亲的性格遗传和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那些开创王道霸业所需的秉性和特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说：“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从李世民日后在历史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并非修史者的溢美之词。少年李世民的这些内在气质和性格特点，一方面继承了鲜卑民族的勃勃血性和强势基因，另一方面也与关陇集团那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者所具有的人格特征相契合。

同样作为关陇集团的后人，杨广背叛了传统，而李世民则继承了前人，也无愧于他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故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我们可以说，对于即将到来的那一场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一幕幕惊险残酷的政治博弈，这个机智果断、骁勇强悍的年轻人早已做好了上场的准备，并且充分具备了角逐的资格。

换句话说，李世民注定要与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迎面相遇。

大约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十五岁的李世民娶了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众所周知，这个长孙家的女儿就是后来初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孙皇后。她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尽心辅佐而绝不干

政，在李世民登基御极、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很多贡献，不愧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性，也无愧于“母仪天下”之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性和楷模意义的皇后之一。

长孙家族是北朝的豪门显宦，其先祖出于北魏皇族拓跋氏，因在魏宗室中建功最伟，且居宗室之长，故改姓长孙。到了长孙晟这一代，其地位依然显赫。他是隋朝的重臣和名将，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隋文帝器重。此后长年经略突厥，曾向隋文帝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从而成功离间突厥各部，使其最终向隋朝称臣。在隋帝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战略上，长孙晟可谓贡献良多、功勋卓著。大业五年，长孙晟病卒。大业十一年，隋炀帝被突厥围于雁门，曾向左右感叹道：“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隋书·长孙晟传》）

长孙晟死后，年仅八岁的长孙氏和哥哥长孙无忌一起被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高士廉出自北齐皇族，其祖父高岳是北齐的实际开创者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其父高劢是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高士廉从小博览群书，尤其在文史方面颇具造诣。在他的熏陶下，长孙氏和长孙无忌自然都喜欢上了读书。史称长孙无忌“好学，该博文史”（《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而长孙氏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长孙氏十三岁时，由于高士廉对李世民非常赏识，知道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因此就把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从此，高士廉和长孙兄妹的命运就与李唐家族，尤其是李世民紧紧绑在了一起。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下诏命各地勤王。虚岁仅十七的李世民就应征入伍，并向主将提出了“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虽说此后突厥退兵、雁门围解是四方勤王之师大举云集的结果，并非李世民此计的功劳，但这一策略足以表现出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华。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时，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安置在河东，唯独带着李世民到了太原。我们不知道李渊这么安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世民已经成为李渊军事上的得力助手。这一点在随后打响的李渊讨伐甄翟儿的战斗中就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时外号“历山飞”的变民首领魏刀儿北连突厥、南寇燕赵，其势甚为猖獗。甄翟儿是他的部众，率两万余人屯驻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市），并时常袭扰太原，曾在战斗中斩杀隋朝将领潘长文。大业十二年四月，李渊与李世民率步骑五千余人前往征讨，在西河的雀鼠谷与

甄翟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李渊命精兵张开两翼，而让羸兵居中，大张旗鼓，布置出一个迷惑敌人的大阵。此举与李世民当年的那个策略如出一辙，很可能就是他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李渊的采纳。

随后，李渊亲率数百名精锐骑兵深入敌阵，迅速冲乱了敌军的阵形，但是变民军仗着人多势众，很快就把李渊团团包围。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旧唐书·太宗本纪》）。

此战官军完胜，迅速打出了李渊父子的声威。虽然这一战的主要指挥者是李渊，但是李世民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机智、果敢和勇猛，已足以让世人眼前一亮。

雀鼠谷一战，可以说是李世民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开端，也是他正式登上隋末历史大舞台的亮相之作。

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时代总是彼此孕育、相互创造的。

大业末年，未及弱冠的李世民当然意识不到会有一个怎样辉煌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清醒地看见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已经彻底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时这也并不妨碍他凝视着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庞然大物，和他的父亲李渊一起相视而笑。此刻他们仍然蛰伏在历史的水面下，但他们手里已经悄悄搭上了一支箭。

没有人知道这历史性的一箭马上会从太原射出，然后直接命中旧王朝的心脏——长安。当然也没人知道，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就将从这里开始茁壮成长。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上）

公元617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李渊父子的晋阳起兵。

它就像一道劈裂天空的绚丽闪电，一举刺破隋帝国的茫茫黑夜；又像是一束穿越浓云的熠熠曙光，瞬间照亮了大唐王朝的早晨。

这个令天地为之变色、令历史为之改辙的大事件有诸多人物参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他们是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唐俭、柴绍、殷开山、刘政会、温大雅、武

士彟（武则天的父亲）……

这些人是晋阳起兵最重要的一批骨干力量，正是有了他们的策划、推动和实施，这次起义才能获得成功，大唐王朝最终才得以横空出世。可不管怎么说，他们终究只是这个大事件的配角。

而晋阳起兵的主角，当然非李渊父子莫属。可问题是，在李渊父子当中，谁才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谁才是这个大事件真正的灵魂人物？谁才是开创大唐三百年基业的第一人？

对此，历代官方正史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世民。

后晋刘昫修撰的《旧唐书》声称："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也断言："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起兵晋阳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按照官方正史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晋阳起兵前夕都做了些什么。

李世民跟随李渊来到太原后，结交了一批江湖义士。《旧唐书·太宗本纪》称其"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资治通鉴·隋纪七》说："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

长孙顺德与刘弘基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李世民结成了生死之交。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与刘弘基原本都是隋宫廷的宿卫军官，因逃避辽东兵役，亡命太原投靠了李渊，而得以与李世民相结纳。这两个人后来在募集义兵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刘文静和裴寂也先后加入了李世民"潜图义举"的行列。

刘文静时任晋阳令，裴寂时任晋阳宫监，二人因职务交往而成为好友。他们目睹天下大乱，而自身前途未卜，时常相对而叹。有一次裴寂说："贫贱如此，又逢离乱，将何以自存？"当时刘文静还未参与李世民之谋，但是暗中已经对他极为倾慕，所以趁机游说裴寂道："李世民非寻常之人，其胸襟豁达类似汉高祖，天纵神武如同魏武帝，虽然年少，却是命世之才！"言下之意是让裴寂和他一起依附李世民，可裴寂对此却不以为然。

不久，刘文静因与李密有姻亲关系而坐罪，被关进郡狱。正当他对前途感到茫然之际，李世民忽然亲自来狱中探望他。刘文静大喜过望，马上向李世民发出试探，说：“天下大乱，非汉高祖、光武帝之才华者，不可平定四海！”

李世民笑着说：“先生怎么知道没有？只是常人不知道罢了。我之所以来看你，并不是像小儿女那样注重个人感情，而是来和先生图谋天下大事，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刘文静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如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天下群盗多如牛毛。值此之际，若有真命之主应天顺人、振臂一呼，取天下则易如反掌。今太原百姓为避战乱，皆入晋阳，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知其中豪杰之士众多，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亦有数万，一声令下，谁敢不从？进而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完朗声大笑：“君言正合我意。”

从此李世民与刘文静开始积极部署，准备起事。

而这个时候，李渊在做什么呢？

按照正史的说法：“渊不之知也。”而李世民则是“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李渊真的是这样浑浑噩噩，对李世民的起兵密谋一无所知吗？

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探讨，现在接着来看在官方正史中，李世民是如何软硬兼施地“说服”李渊起兵，而李渊又是如何举棋不定、出尔反尔的。

由于裴寂与李渊的私交很好，李世民决定从裴寂的身上突破。他天天与裴寂交游，同时拿出私人的钱数百万，让人与裴寂赌博，每一次都诈输，把裴寂乐坏了。等到那些钱输得差不多的时候，李世民也顺理成章地和裴寂变成好友了。最后李世民把自己的密谋告诉了裴寂，同时让他想办法说服李渊。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此刻裴寂已经很清楚他那些钱是怎么到手的了，只好点头同意。

李世民和裴寂很快就想了一计。随后的日子里，裴寂天天去找李渊喝酒，喝完酒又顺便送上几位美女。一连数日，把李渊伺候得舒舒服

服。几天之后，裴寂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不慌不忙地对李渊说：“二郎暗中蓄养兵马，欲举义旗，恐大事泄露被诛，所以让我以晋阳宫女奉公，此乃情急之下迫不得已之计。如今众人心意已决，不知公意下如何？”

李渊一听，当场爆出冷汗。

原来这几天与他合欢的竟然全都是晋阳行宫的宫女——皇帝杨广的女人！这可是灭门之罪啊！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老友居然使了这么一招把他绑上了“贼船”。这一招可真损哪!

李渊愣了很长时间，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吾儿既有此谋，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只好从他了。”

李渊虽然一只脚踏上了“贼船”，可毕竟是被逼无奈，所以犹豫了几天后又把脚缩了回去。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让他差点掉脑袋的事，再次把他逼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那就是东突厥的入侵。

从大业十二年底到次年正月之间，东突厥屡次出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县），李渊派遣副留守高君雅会同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抵御，结果却吃了一场败仗。人在江都的隋炀帝杨广闻讯大怒，以“不时捕虏，纵为边患”为由，遣使赴太原将李渊就地拘押，并准备将王仁恭斩首。

李世民一见时机成熟，终于当面对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父亲若再拘守小节，下有盗寇、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啊！不如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大惊失色：“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我现在就告发你。”然后找出纸笔，做出一副马上要奋笔疾书之状。

李世民一脸沉着，缓缓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所以敢说。倘若父亲一定要告发我，不敢辞死！”

李渊气得把笔一扔，说：“我怎么忍心告发你呢？你要慎重，别再说这种话了。”

不料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又来了。李渊听见他锲而不舍地说：“今盗贼日繁，遍布天下，父亲受诏讨贼，贼能讨得完吗？到最后还要承担讨贼不力的罪名。而且世人纷传李氏当应图谶，所以李金才无罪，却

一朝族灭。退一步说，即便父亲能将盗贼尽皆剿灭，自古功高不赏，届时危险更大！只有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乃万全之策，愿父亲勿疑！”

李渊仰天长叹：“我昨天一整夜都在想你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不管是家破人亡由你，化家为国也由你，一切都由你了。”

此时的李渊真是一副万般无奈、听天由命之状！

几天后，隋炀帝的使者又到了，准备把李渊和王仁恭一起押赴江都问罪。李渊顿时惊慌失措。于是，李世民和裴寂等人再次向李渊进言：“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将副手战场失利，竟然也要归罪明公。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宜早定计。况且晋阳兵强马壮，行宫中又蓄积金钱、布帛巨万，以此举事，何患不成？今留守长安的代王幼弱，明公若击鼓向西，据有长安如同探囊取物，何必被区区一个朝廷使者囚禁，坐以待毙呢？”

至此，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暗中部署。可没过几天，江都的天子使臣又到了，宣诏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的战败之罪，并且让他们官复原职。赦令一下，李渊立刻反悔，矢口不提举义之事。

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催促李渊起兵。如鹰扬府司马许世绪、行军司铠武士彟、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其弟唐俭等等。

然而，大伙把嘴皮子都磨破了，该说的话翻来覆去都讲烂了，李渊还是迟迟不动。

刘文静忍无可忍，只好向裴寂施压：“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你为何不快点劝唐公起兵，怎能一再借故拖延呢？再说了，你身为宫监，却以宫女私侍他人，你一个人死就算了，何必拖累唐公？”

裴寂被触到痛处了。是啊，假如李渊迟迟不起事，万一晋阳宫女陪侍之事泄露，那他裴寂就算有八颗脑袋也不够砍啊！

此后裴寂只好天天追着李渊，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终于把李渊彻底说服了。李渊随后让刘文静假造敕书，以朝廷准备四征高丽为名，命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应征入伍，借此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兵。

这就是历代正史所记载的关于晋阳起兵的起因和内幕。在这里，李渊被描绘成一个平庸、怯懦、胸无大志、多疑反复的傀儡型人物，而年未二十的李世民则被塑造成一个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领

袖，表现出了一种远远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在此，李世民毋庸置疑地成了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而李渊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后来迫不得已卷入了这个事件，几乎是被人用绑架的手段弄上了这条起兵叛隋的“贼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碌碌无能而且万般无奈。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下）

通过近年来诸多中外学者对这一事件相关史料的重新研究，晋阳起兵的真相已经得到了澄清。海外的研究人员普遍认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作出订正。”（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认为：“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地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新的研究结论指出，李世民在晋阳首义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并不像旧史籍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和居功至伟，而李渊也并不像旧史籍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相反，“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记室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被诬为坐享其成”（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事实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而后来编修的国史以及承用国史的两《唐书》，包括更后出的《资治通鉴》皆因袭而不改，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的部分真相从此湮没不彰。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

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史称其“少好学，以才辩知名”，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因父忧去职，回晋阳闲居，见天下大乱而不求仕进。李渊到太原后，和他成为朋友，并慕其文名而“甚礼之”。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旧唐书·温大雅传》）。

很显然，由这样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

那么，这位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到底都目击了一些什么呢？

前文说过，其实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他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所以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他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大业十三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记载，其实当时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说李渊，反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古地名，今河南汤阴县北，为殷纣王囚周文王处）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很显然，此时的李渊头脑非常清醒，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所以他告诫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么他们三兄弟就必须迅速集结、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

所以当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他时，李渊便对李世民说：“当见机而作！”随后立即行动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

但是直到此刻，李渊还是没有动手。

因为他身边安插着两颗钉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名亲信，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

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所以李渊要想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隋室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就会功亏一篑、引火烧身，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

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并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

李渊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机会。

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杨天子。李渊笑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僭称尊号。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讨伐刘武周。

李渊心中暗笑。他知道王威和高君雅急了，可他不急。他慢条斯理地说："再观察观察吧，通知楼烦稍作防备就可以了，我们要以静制动，以免自扰军心。"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攻破楼烦，并袭取汾阳行宫，将其中的宫女悉数俘获，献给了东突厥的始毕可汗。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下一步，刘武周的兵锋绝对是直指太原了。

可李渊依旧气定神闲。他召集众文武将官说："命士兵戒严，加强城池布防，拨粮赈济流民。这三件事如今废一不可，其他的事情，就看诸位的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王威和高君雅立刻拜请说："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公若推辞，谁能担此大任？"

李渊知道，现在招募和调遣军队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王、高等人的心情都比他更为迫切，只等着他一声令下了。可李渊仍旧面露难色，说："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接受朝廷节制。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阻，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据守，一来一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率领这支事事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抵御狡黠诡诈、来势凶猛的贼兵，

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能扑得灭吗？诸公皆为国之藩篱，应当同心协力，以除国难。大家都是为了报效朝廷，最好不要相互猜疑。我今天之所以召集诸位，是想商议一个最妥善的办法，并不是消极怯战、推卸责任。”

王威等人连忙说：“公之文韬武略，远近皆知，并且兼具国亲和贤臣的身份，应当与国家休戚与共。如果事事奏报，如何应付突发事变？只要是为了讨伐叛贼，专擅行事亦无不可！”

要的就是这句话。李渊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可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无奈之状，勉强同意了王、高等人的请求，下令征兵。

命令一下，旬日之间便募集了近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命他们驻扎在兴国寺，私下对李世民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同时分别遣使至河东和长安，催促李建成兄弟和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集结。

万事俱备。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收拾王威和高君雅了。

然而，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等闲之辈——能成为皇帝亲信并接受特别任务的人绝不会是笨蛋。

李渊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怀疑。

因为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分派给了三个人：李世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出在后面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逃避兵役的罪犯啊！早就应该处决了。本来没有告发他们就算是很给李渊面子了，现在李渊居然把军队交到这种逃犯手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李渊到底想干什么？

王、高二人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以防生变。可他们的想法马上被一个人劝阻了。

他就是武士彟。

武士彟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座上宾，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手，恐怕会激起事变。”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如今刘武周和突厥人虎视眈眈，倘若这时候引发内讧，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按捺下来。几天后，又有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准备建议王威和高君雅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武士彟知道后，又制止他说：“剿匪的军队全

部隶属于唐公，王威和高君雅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手中却没有实权，有什么能力调查！”田德平只好作罢。

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王威和高君雅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李渊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满腹狐疑并且心惊胆战。他们觉得李渊很可能要发动叛乱！王威和高君雅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先下手为强。

由于当时的太原多日不雨，王、高二人就提出要在晋阳城南五十里处的晋祠举行祈雨大会，请李渊主持，准备在会上伺机将李渊干掉。

与此同时，李渊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王威和高君雅。双方都在暗中磨刀霍霍，是你死还是我亡，就看谁的出手更快了。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刘世龙的当地乡长秘密来到李渊府上，把王威和高君雅准备在晋祠祈雨时动手的消息告诉了李渊。

刘世龙平日与高君雅颇有往来，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李渊当即与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紧急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率领五百名士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东门。十五日晨，李渊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宫城中的办公厅议事。众人刚刚坐定，刘文静就领着开阳府（禁军征兵府）司马刘政会来到厅前。刘政会的手里拿着一道诉状，大声禀报有事要奏。李渊示意王威和高君雅去接诉状，刘政会却说：“我要告的人正是两位副留守，只有唐公可以看！”

王威和高君雅猝不及防，顿时大惊失色。

李渊也装出一脸的惊诧，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接过诉状一看，立刻高声宣布：“王威与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准备里应外合进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王威和高君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高君雅一下就跳了起来，卷起袖子破口大骂：“这是有人要造反，故意陷害我们！”

可是，一切都由不得他们了。此刻李世民的士兵早已控制了宫城外的所有重要路口，王威和高君雅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瓮中之鳖。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迅速冲上来，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关进了监狱。

至此，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与此同时，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李渊再也没有顾虑了，只要李建成

等人一到，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就会轰然拉开。

这就是晋阳起兵的动因和真相。

根据温大雅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绝非胸无大志、庸庸碌碌之人，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并且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剑桥中国隋唐史》）。

也就是说，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包括整个过程的组织者和全局总指挥，正是李渊本人。

但是在肯定李渊的同时，我们却不能轻易抹杀李世民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贞观史臣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美化了李世民，夸大了他的功绩，可我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却不宜矫枉过正。应该说，从“密招豪友”建立核心力量，到募集义兵组建军队，再到“伏兵晋阳宫”控制王威和高君雅，李世民在整个起兵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起码相对于来不及参加晋阳起兵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来说，李世民的首义之功就是他们无法相比的。此外，李世民所表现出的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也恰与李渊老成持重、顾全大局的性格形成一种微妙的互补。

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而李渊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读〈通鉴〉论》卷二十）。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由于李渊父子在起兵叛隋、缔造大业的进程中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互补，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并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开创大唐王朝。

在钢丝上跳舞：李渊的崛起

李渊虽然以“勾结突厥”的指控逮捕了王威和高君雅，但是，任何指控都是需要证据的。李渊的证据在哪里呢？

李建成等人还在路上，所以李渊还不敢正式起兵。在此情况下，如果李渊始终拿不出证据，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导致兴师举义之事节外生枝。

让李渊料想不到的是，在这个紧张而微妙的时刻，老天爷居然帮了他一个大忙。

准确地说，是突厥人帮了他大忙。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李渊逮捕王、高二人的两天之后，数万突厥骑兵突然呼啸南下，以闪电速度对晋阳城发动了一场奇袭。

由于晋阳守兵猝不及防，突厥人得以迅速突破外城，在北门与东门之间纵横驱驰，如入无人之境。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骑兵，李渊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随口栽在王威和高君雅头上的罪名居然出人意料地坐实了，而今铁证如山，王、高二人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忧的是自己尚未举事便有强敌来犯，如果与他们开战，自己刚刚募集的这支军队就会被消耗掉。万一把老本赔光，还拿什么起兵？

情急之下，李渊决定唱一出空城计。

他一边命裴寂、刘文静等人在宫城（内城）各门暗中布防，一边下令将所有城门全部打开，将城头上的旗帜全部撤下来，同时严禁城墙上的士兵探头外看，严禁发出半点声响。

正在来回驱驰、耀武扬威的突厥人瞬间全都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看见晋阳宫的城门居然朝他们完全洞开，而且城头上看不见一名隋军士兵，整座宫城悄无声息，寂静得让人头皮发麻。

突厥人不敢贸然进攻内城，也不甘心就此离去，于是一边在外城继续劫掠，一边仍旧对内城虎视眈眈。

李渊登上东南城楼，发现突厥兵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往来驰骋、人员分散，于是命部将王康达等人率一千余人潜行至外城北门处设伏，准备袭击突厥散兵。一方面劫掠一些马匹，一方面做一些战略试探。

但是王康达的行动失败了。他们刚一动手就被突厥兵团团包围，一千多人大部分战死，王康达阵亡，只有一百多人逃了回来。军民顿时大为恐惧，于是把怨气全都集中到“勾结突厥”的王威和高君雅身上。李渊顺势将王、高二人当众斩首，既平息众怒，又彻底根除了这两个心腹之患。

城中的军队本来就不多，现在又损失了一千人，看来硬打是不行了，而且这出空城计也唱不了多久。李渊随即又设下一个疑兵计，命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潜出城外，然后第二天凌晨再旌旗招展、钲鼓齐鸣地从另一个方向进城。

突厥人一看就慌神了，看上去这是一支援兵，而且人数还不少！满腹

狐疑的突厥人又逗留了两天，却一直不敢进攻，最终在外城饱掠一番后引兵北去。

晋阳虽然暂时解围了，但是对即将起兵的李渊来说，北方的突厥人始终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威胁。万一他挥师长安，突厥人趁势进犯太原，那无疑会使他陷入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困境。所以，必须暂时向突厥人低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李渊亲自给始毕可汗写了一封词义谦恭的信，说："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安定天下，远迎君上还都，恢复与突厥和亲，就像开皇时代一样。如果能与我一同出兵南下，希望不要侵害百姓，金钱玉帛，皆为可汗所有；如果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南下，只愿和亲，也可坐享丰厚的财物。该怎么做，任凭可汗选择。"

写完后，李渊在信封上用了"某某启"的字样，以示谦卑。负责送信的官员看了那个"启"字觉得很不舒服，建议多给突厥人送一些财物，然后把"启"改为"书"。

李渊听了，大笑说："这事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况且'启'字又不值钱，你连钱都舍得多给，还舍不得这一个字吗？"

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见信大喜。对他来讲，马邑的刘武周、朔方的梁师都、蒲城的郭子和都已经归附他了，如今太原留守李渊再来投靠，这就意味着隋帝国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都已经向他豁然洞开了。日后一旦举兵南下，岂不是一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了吗？

始毕可汗立刻给李渊回了一封信，表示全力支持他，可以给他提供士兵和战马，但条件是让他像刘武周等人那样自称天子，公开反隋。其实也就是让李渊向突厥称臣，成为突厥人的附庸。收到回信后，李渊的左右都很高兴，唯独李渊不以为然。他并不是不想获得突厥的支持，而是不想这么早就即位称尊，公然与隋朝决裂。

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现在打着"尊隋"的旗号要远比"反隋"的旗号更安全，也更有利。

因为在胜败未卜、天下大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尊隋"要比"反隋"能获得更多闪转腾挪的余地和空间，而过早僭位称尊就会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更会成为众矢之的。此外，李渊也不愿意像刘武周他们那样接受突厥的所谓"天子"册封，公开成为突厥人的附庸。道理很简单，

与突厥人的合作本来就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或者说是只能一夕不能长久的。说白了，这是各取所需的政治一夜情。既然是一夜情，又怎么能大张旗鼓、广而告之呢？再说了，最起码在名义上，在现阶段，李渊仍旧倾向于把自己定位在隋朝的国戚和重臣的角色上。这样既不会过度伤害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道义感，又能为自己的叛隋起兵抹上一层“匡扶社稷、安定天下”的政治保护色，并且为壮大自身的实力赢得更多宝贵的时间。

有鉴于此，李渊认为自己目前最恰当的姿态应该是在隋朝与突厥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既不与隋朝决裂，也不与突厥为敌。

换句话说，他必须在隋王朝与突厥人之间走钢丝。

而且还要在钢丝上跳舞。

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看见李渊迟迟不答复突厥人，万分焦急地说：“而今士众已全部集结，最缺的就是战马。胡人的士兵我们不一定需要，但是胡人的马却不能不要。您如果迟迟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恐怕他们会反悔。”

李渊依旧不同意，说：“你们再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终于抵达太原。裴寂与李建成、李世民等人商议之后，一起向李渊提出了一个在钢丝上跳舞的办法：“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如此则“师出有名，以辑夷夏”（《大唐创业起居注》）。

李渊笑了。

首先，宣布废黜杨广，拥立长安留守、年幼的代王杨侑。这样既能顺应天意人心，还能抢占政治制高点，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造反披上一件正义与合法性的外衣。其次，有了这件美丽的外衣，就能堂而皇之地传檄天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缔结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结果。最后，为了获得突厥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不妨在军队的旗帜上改用突厥人所用的白色，以此向突厥示好。

很显然，这是一套既务实又灵活，既不偏不倚又左右逢源的师出有名的起兵方案。李渊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

他只修改了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在军旗的颜色上，李渊既没有使用隋朝的红色，也没有使用突厥的白色，而是使用红白相间的双色。

在钢丝上跳舞！

李渊决定将这个政治理念贯彻到底。

大业十三年六月初五，在经历了一连串惊险和曲折之后，以李渊为首的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在太原正式起兵。

隋亡唐兴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李渊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隋帝国的政治心脏——西京长安。要进军长安，首先必须攻克西河郡。

李渊把这个首战的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他说："你们年轻，未经历练，先以此郡看你们的表现和作为，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你们，自己努力吧！"说完李渊又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往返路程之外，只给你们三天军粮。

这就是说——如果李建成和李世民在三天内拿不下西河，就意味着失败。

对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率领的是一群根本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

然而，李建成和李世民还是信心百倍地上路了。一路上，他们与士卒同甘共苦，一发现敌情立刻挺身在前；士兵凡有盗窃乡民菜蔬瓜果的，他们就找到主人，给予赔偿，而且并不责罚偷盗的士兵；沿途凡是有父老贡献食物，他们一律与部众分享，从不独自享用；要是有人特别殷勤地送上牛酒等物，他们则婉拒说："此隋法也，吾不敢。"

凭着这种廉洁自律和宽仁待众的作风，年轻的李氏兄弟迅速赢得了部众的拥戴，并赢得了远近百姓的心。

"义师"的风范和声誉立即传播开来，并且传播的速度比他们行军的速度还快，马上就落进西河官民的耳中，所以守城的隋军官兵毫无斗志，唯独郡丞高德儒企图据城顽抗。六月初十，义军兵临西河城下，云梯刚刚架上城头，士气高涨的士兵就蜂拥而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了城池，逮捕了郡丞高德儒。

李氏兄弟当即将高德儒斩首，此外不杀一人，对西河官民秋毫无犯，让百姓各安其业。

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不负众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西河郡，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军事生涯的处女作，同时也在开创李唐江山的征

程上迈出了漂亮的第一步。

军队凯旋后，屈指一算，前后仅历时九天。李渊大喜过望地说：“如此用兵，足以横行天下了！”

首战告捷。李渊更加坚定了“南下关中、西取长安”的决心。

西河平定后，李渊随即开仓赈粮，远近各地的青壮年纷纷来附，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加入义军，很快部众便增至数万人。随后裴寂又打开晋阳宫的府库，献上米九万斛、彩帛五万匹、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人马、物资、粮饷都已齐备，李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名分，同时也给所有追随他的人一个合适的名分。

对于现在李渊集团的每一个人来说，名分太重要了。有一个新名分，就意味着他们将与过去的人生彻底告别，与旧王朝一刀两断，从此拥有一个崭新起点，并且在即将来临的新王朝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唐国公李渊自立为大将军，并开设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殷开山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为左右统军；同时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

这就是李渊开创大唐王朝最初的政治和军事班底。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在这一刻选择了相同的历史使命，并且攒成了一个铁拳。

它能顺利地挥向长安，对旧王朝的心脏实施致命一击吗？

天才政治家：李渊的慷慨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突厥大臣康鞘利奉始毕可汗之命来到了太原。除了带来可汗的慰问信外，他还带来了一千匹战马。

太原官兵顿时兴奋得两眼放光。

不过他们很快就兴奋不起来了。

因为这些马不是白送的，它们是康鞘利专程拉来卖的。

这情形跟我们今天的国际事务有些类似。世界上每一个战火纷飞的热点地区通常都有一些政治大国在台前幕后积极活动。表面上他们都宣称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时不时还会敦促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给战争中的难民发放点粮食什么的，可他们热心掺和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扩大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谋求政治利益；二、暗中兜售军火，牟取经济利益。

因为政治大国通常也是武器大国，所以每一个热点地区都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军火市场。

现在康鞘利就是来兜售军火的。在冷兵器时代，突厥的战马无疑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看着这些身形彪悍的“战斗机”，李渊的双眼也不能不放光。

但是这批货的价格实在高昂，要全部买下需要一笔巨款。

这笔钱李渊当然有，要全部买下不是问题。

可李渊不干。

因为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很多，李渊不想让自己的钱都变成突厥人的利润。

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赊欠。

这在我们今天就叫分期付款、信贷消费。李渊只挑了其中最健硕的五百匹，把钱付了，然后对康鞘利做出一副囊中羞涩之状。他手下的官兵见状，以为唐公缺军费，纷纷要求自掏腰包把剩下的五百匹马也买下来。李渊笑着冲他们摆摆手，私下说：“胡人的马很多，而且贪得无厌，我们买完一批，他们还会拉来一批，你们买得完吗？我之所以只要一半，一方面是向他们表明手头紧，再一个是不让他们觉得我们的需求很迫切。你们放心好了，那五百匹我也要，只不过不付现钱，而是用赊欠的办法，不用你们花钱。”官兵们恍然大悟。

营业额只完成了50%，康鞘利犯难了：难道还要把这剩下的五百匹马千里迢迢地拉回去不成？那不仅麻烦死了，而且回去还会遭人耻笑。康鞘利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只好让李渊用首付五成、尾款赊欠的办法把一千匹马全都留了下来。

李渊心中暗笑，说是先付一半、尾款赊欠，其实尾款最后肯定是不了了之的。这真是一笔好买卖！

这一年六月底，李渊的麾下已经兵强马壮，随时可以举兵南下了。

可在南下之前，李渊必须确保大后方的安全，也就是防止突厥人和刘武周乘虚进攻太原。为此，李渊特意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表面上的目的是请求突厥给予军事上的支持，实际上是观察突厥人的态度和动向，同时防范和牵制刘武周。刘文静行前，李渊特意叮嘱他："胡骑进入中国，对百姓是一大祸患。我之所以要向突厥借兵，用意就是防止刘武周为患边境。所以你要记住，与突厥联兵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只要几百人就足够了，多了没用。"

刘文静心领神会——与突厥联合只是为了稳住他们，而不是真要倚重他们！

为了达到稳住突厥人的目的，刘文静抵达突厥王庭后，就给始毕可汗开出了非常有利的合作条件，他说："一旦贵军协助我军进入长安，民众土地归唐公，金银玉帛归突厥。"

始毕可汗大喜。

这真是一笔好买卖啊！只要给李渊区区几百人就能换取长安的大量财富，突厥人何乐而不为呢？

始毕可汗当即遣使告诉李渊：这交易成了！他的兵已经上路了！很显然，李渊和刘文静是在"慷他人之慨"。因为长安的财富并不属于李渊，而是属于杨广。

但是这并不妨碍李渊把它当成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

能不能兑现不知道，反正先开了再说。

后顾之忧都已解除，李渊终于可以全力南下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初四，李渊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把军政大权全部交给这个小儿子，让他镇守后方根据地。初五，李渊在晋阳誓师，发布了声讨隋炀帝杨广的檄文，同时传檄四方郡县。李渊在檄文中痛斥杨广，说他"饰非好佞，拒谏信谗""巡幸无度，穷兵极武"，才落入"亲离众叛"的境地，并且导致"十分天下，九为盗贼"的可怕局面。最后李渊宣布，自己身为"典骁卫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的社稷重臣，目睹"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岳尘飞而土崩"的危亡之局，不

得不“举勤王之师”，“废昏立明”，拥立杨广的孙子、时年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然后“放后主（杨广）于江都，复先帝（杨坚）之鸿绩”（《大唐创业起居注》）。

同日，李渊亲率三万精兵从晋阳出发，正式踏上帝业的征程。

李渊于初八抵达西河郡。一到西河，李渊马上就做了一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收拾人心。

他一边慰劳百姓，一边给老百姓大举封官。据史书记载，李渊这天总共封了一千多个官。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封官最多的一天，直到他后来当上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全部加起来恐怕也没这天多。

这一天，李渊首先给当地所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封了散官，亦即有官称无官权的荣誉官职。接下来，李渊又不辞辛劳地给所有蜂拥而来的青年才俊一一封官。

凭什么知道他们是青年才俊，不是鸡鸣狗盗之徒呢？

据说李渊的办法是口询，也就是亲自面试。他一边询问对方有什么能力，一边大笔一挥，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与他能力相应的官职名称，然后这个人就算当官了。换句话说，只要你不是弱智或哑巴，能够随口说出你有什么才干，你就能获得相应的官职。所以一天下来，这座小小的西河城就有了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官员。

所有人都乐坏了，从来没想到当官这么容易啊！

所以这一天西河城的气氛热闹非常，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那一千多个青年才俊捧着那张轻飘飘的任命状回家后，估计很是自豪了一把，在人前人后肯定也没少嘚瑟。

用一千多张字条就收买了西河全城的心，李渊此举可谓高明。说白了，他无非是开了一千多张空头支票。再说得难听点，这又是慷他人之慨！要知道，大业十三年还是隋朝的年号，李渊自己尊奉的也仍然是隋朝的正朔，此时的西河郡虽然被李渊占领，可原则上还是隋朝的天下，所以——李渊封的理所当然都是隋朝的官。

不久后，义军相继占领霍邑、临汾等郡，每到一地，李渊皆如法炮制。左右忍不住规劝李渊：“会不会封官太滥了？”李渊的回答是：“隋朝廷就是太吝啬官爵，所以失去人心，我们何必效法？再说了，用官

位收拾人心，岂不比用刀枪更好？”

九百年后，西方的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你正在夺取王权，那么，被人誉为慷慨是十分有利的……对于那些既不是你的东西，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东西，你尽可以做一个很阔绰的施主……你慷他人之慨，只会为你增添名声，而不会对你的名声造成损毁。”（《君主论》）

很显然，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绝对是李渊跨越时空的知音。

七月十四日，李渊率军进驻贾胡堡（今山西汾西县北）。此堡南面五十多里处，就是隋虎牙郎将宋老生重兵据守的霍邑（今山西霍州市）。在霍邑后面，则有隋朝名将、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于黄河东岸的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市）严阵以待，并与宋老生遥相呼应。

李渊父子和将士们都很清楚，摆在面前的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

打霍邑绝对不可能像打西河那么轻松。

所以一贯谨慎的李渊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正巧又连续多日天降大雨，不利于攻城作战，李渊就趁这个间隙补充给养，命人回太原押运一个月的粮草过来。在等待雨停的这些日子，李渊并没有歇着，他对自己当前面对的战略形势作了一个综合的判断。

然后李渊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牛人。

一个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风头最健的义军领袖。

他就是李密。

李渊知道自己如果要顺利地西进关中，就必须稳住潼关东面的李密，就像从太原南下之前必须先稳住北方的突厥人一样。

为此李渊试探性地给李密写了一封信。

他知道李密这个牛人向来自视甚高，所以他已经想好了对付李密的办法。

果然，李密很快就回了一封牛皮烘烘的信。信中说：“我与兄虽不是同支，却是李姓同宗。我知道自己实力不够，只是承蒙四海英雄厚爱，推为盟主，希望你能从旁辅助，让我们同心协力，执子婴（杨

侑）于咸阳，杀商辛（杨广）于牧野，岂不是好事一桩？”言下之意，你打你的西京，我打我的洛阳，咱井水不犯河水！

他还在信中补充说：“如果要签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那你只能带几千步骑，亲自到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市）来，你我当面缔结盟约。”

李渊见信大喜，李密的反应正是他最想得到的结果。他笑着对左右说：“李密自我膨胀，以老大自居。我正要全力进取关中，如果马上跟他决裂，那是多树了一个敌人，不如态度谦卑，拍拍他的马屁，让他更骄傲一点，帮我们把守虎牢的关隘、拖住东都的军队，让我们专心西征。等我们平定了关中，据守险要，养精蓄锐，观鹬蚌相争，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再收拾他也为时不晚！”

李渊马上命温大雅回了一封信，说：“当今天下大乱，需要一位共主。这个人除了你，还能有谁？老夫已年过半百，志不在此，但我很高兴能拥戴老弟，攀龙鳞，附凤翼，希望老弟早应图谶，安定万民！你是盟主，但愿你看在我们同宗的分上，依旧把我封在陶唐故地，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李密见信，骄矜之情溢于言表，让人把信拿给将领们传阅，说：“连唐公都如此推举我，看来天下指日可定啊！”

李密从此对李渊大生好感，双方信函往来十分频繁。

李渊笑了。

就在这鸿雁往返、笔墨往来之间，他已经用廉价的糖衣炮弹成功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劲敌。或者说，成功地化敌为友了。

真正的高手往往是低调的，而且从不吝啬给别人戴高帽。

真正的政治家也往往是慷慨的，从不吝啬给人们开空头支票。

李渊就是这样的高手和政治家。

而无论是高帽还是空头支票，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廉价。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古往今来的高手和政治家们都很善于把老子的这个哲学思想运用到实践当中，并且有所深化。他们的深化体现在——所“予之”的东西往往是廉价的，譬如高帽和空头支票；而所“取之”的东西则往往价值巨大，甚至无价，譬如人心与天下。

就在人们迷醉于廉价赠品的一瞬间，高手已经收获了人心，政治家已经玩转了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隋末这场群雄逐鹿的生死游戏中，李密之所以快速出局，李渊之所以最终胜出，其原因绝非偶然。就军事能力而言，孰高孰低很难定论；但是在政治上，李密绝对玩不过天才政治家李渊。

走向长安

雨一直下。

从李渊带着军队来到贾胡堡时就始终没有停过。

军营中的粮草快告罄了，太原的补给却迟迟没有到。

出使突厥的刘文静也还没有回来，突厥人许诺的士兵和战马至今未见踪影。

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便开始在军营中悄悄流传。消息说——突厥人和刘武周正准备进攻太原。

这是真的吗？

李渊不愿相信它是真的。

可又不敢确定它是假的。

这支离开太原还没打过一场仗的军队，就这么在大雨、粮荒和流言的多重困扰中踯躅不前、人心浮动。连日来，李渊的心情也跟这雨水连绵的天气一样潮湿而阴郁。

最后李渊只好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到底是要打霍邑，还是要回太原。

与会的一些将吏提出了四条必须班师的理由：

一、我们的粮草快完了，而宋老生和屈突通遥相呼应、据险而守，一时半会儿绝对攻不下来。

二、李密虽然口头上说与我们联合，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阴谋还很难

说。

三、突厥人贪而无信、唯利是图，刘武周历来与其狼狈为奸，所以他们企图进犯太原的消息不可不信。

四、太原是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义兵的家属都在那里，不如先回去保住大本营，然后再从长计议。

此言一出，多数人都投了赞成票。

李渊不置可否，把目光转向一直闷声不响的李建成和李世民，说：“你们意见如何？”

此时此刻，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了。因为众位将吏的意见让他有些失望。

诚然，李渊也认为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万一出师未捷而老巢被占的话，那么后勤补给就会中断，将士们就会丧失斗志，队伍就会陷入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困境。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的，李渊心里何尝没有相同的担心和顾虑？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义军自从大张旗鼓地南下以来，至今未打一仗、未下一城，倘若稍遇挫折就当缩头乌龟，那还奢谈什么平定海内、问鼎天下？到时候不但会遭天下英雄耻笑，而且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人心和士气也会溃散瓦解、功亏一篑！太原固然重要，可始终龟缩在老巢中就能高枕无忧了吗？恰恰相反，这更危险！因为这么做等于是在向隋朝的军队示弱，向突厥人和刘武周示弱，向四方群雄示弱！到时候这些人四面来攻，太原就能保得住吗？就算勉强保住了，日后还要不要争霸天下？要不要再度出征？如果再度出征，那么来自后方的突厥人和刘武周的威胁不是照样存在吗？除非永远龟缩在太原一隅，否则这个“前进还是后退”的问题就会像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样永远缠绕在李渊和所有人的心头。

所以，选择后退实际上是在逃避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既然这个问题不可能自动消失，既然前进和后退都存在危险，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前进、放手一搏呢？

想到这里，李渊实际上决心已定。

但是这些话李渊不能说。

他必须让两个儿子来说。

所幸李建成和李世民没有让李渊失望。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条反对班师的理由：

一、眼下遍地都是庄稼，何必担心断粮？宋老生轻率急躁，一战便可将其生擒。

二、李密一门心思守着东都的大粮仓，一直在与东都军队进行拉锯战，根本无暇做长远的打算。

三、刘武周表面上投靠突厥，背地里却和突厥人互相猜疑，虽然贪图太原，可他更担心自己的老巢马邑被人抄了后路。

四、我们之所以举义，就是为了奋不顾身拯救苍生，先入长安、号令天下！如今遇上小小的挫折就遽然班师，恐怕义军会一朝解体。我们就算困守太原一城之地，到头来还是一小撮盗匪而已，拿什么保命？

最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瞟了众人一眼，毫不客气地说："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大唐创业起居注》）

这是李渊集团内部在军事战略上发生的第一次分歧。

李渊看了看这兄弟俩，又看了看他的一大帮文武将吏。一边两票，一边N票。他最终咬咬牙作出了决定——多数服从少数。

打！

自助者天助之。

或许是李渊父子的坚持最终也感动了上苍，七月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空放晴。

八月初二，李渊命全军在太阳下曝晒铠甲、武器及其他衣服装备。

八月初三，天色刚亮，李渊率全军开拔，沿着东南山麓的小道直插霍邑。

"如果宋老生拒不出战，你们说该怎么办？"在路上，李渊问李建成和李世民。

兄弟俩胸有成竹地说："宋老生有勇无谋，我们只要派小股骑兵在城下挑战，他没有理由不出战。假如他仍然固守城池，我们就散布消息，谎称他消极怯战，正暗中准备向我们投降。宋老生担心被同僚告发，不战也得战！"

李渊点点头："你们的判断没错。宋老生没有趁我们被困于贾胡堡时发动攻击，我就估计这个人没多大能耐了。"

部队迅速进抵霍邑。李渊率数百名骑兵在霍邑东面数里等待步兵主力，李建成和李世民率数十名骑兵驰至霍邑城下，一边扬鞭挥手制造攻城假象，一边高声诟骂，试图激怒宋老生。

有勇无谋的宋老生果然一下就被激怒了，率领三万人分别从东门和南门出击。李渊急命殷开山召集后续的步兵主力进入战场，随后命李建成在城东列阵，命李世民在城南列阵。

为了一战消灭宋老生，防止他逃回城中据守，李渊决定佯装败退，吸引宋老生更远地脱离城池。

宋老生首先对东面的义军发起进攻。李渊与李建成假装受挫，开始往后退却。李世民与部将段志玄立即率骑兵从南面直冲宋老生军阵，攻击他的后面。

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李世民冲锋在前，一连砍杀数十人，手上的两把刀都砍出了缺口，鲜血溅满了他的衣袖。李世民甩甩袖子，继续作战。

在李世民的冲击下，宋老生的阵势开始散乱。李渊趁机命人在阵前大呼："宋老生已经被活捉了！"

隋兵闻言斗志全失，瞬间溃散，宋老生不得不转身而逃。李渊率军追至城下，城内守军慌忙紧闭城门，放下一条绳索救宋老生。

宋老生攀上绳索，刚刚爬了几米高，李渊的部将卢君谔就从后面纵身跃起，将他硬生生拽了下来，随即一刀砍下了宋老生的首级。

这一战，隋军的三万人马全军覆没，李渊这边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两军的尸体层层堆积在霍邑城外的原野上，一直绵延了好几里。

到了这一天的黄昏时分，略作休整之后，李渊下令军队开始攻城。当时义军还缺少大型的攻城器械，士兵们都是强行攀上城墙，经过一番鏖战，终于将霍邑攻克。

这是李渊南下以来取得的第一场胜利，虽然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进入霍邑后，李渊开始论功行赏。军中负责授勋的官吏提醒他：“奴仆出身的人，似乎不该跟一般战士有同等待遇。”李渊说：“飞石流箭之间，不分谁贵谁贱，为何评定功勋的时候，却要分尊卑等级呢？应该完全平等，有什么功受什么赏！”

攻克霍邑之后，李渊迅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八月初八占据临汾郡（今山西临汾市），八月十三日攻克绛郡（今山西新绛县），八月十五日进抵黄河东岸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市）。就在这一天，刘文静和康鞘利也带着五百名突厥士兵和两千匹马赶到了。李渊大喜，对刘文静说：“马多人少，正合我意！”

终于站到黄河岸边了。望着奔腾咆哮的黄河水，李渊心中感慨万千，只要一步跨过黄河，就能进入关中直取长安了。

梦想中的皇皇帝业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李渊面前。

就在这个时候，关于下一步的进军路线，军队中再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刚刚投奔义军的河东户曹任瑰等人认为：不要攻击屈突通重兵驻守的河东，应该从龙门直接渡过黄河，招降当地义军，同时夺取潼关北面的永丰仓。如此一来，在攻克长安之前就可以把整个关中握于掌心。李渊本人也倾向于这个意见。

但是他手下的多数将领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先把河东郡这颗钉子拔掉，再渡河入关，以免后患。

谨慎的李渊决定暂不渡河，先与关中义军取得联络后再作打算。

八月十八日，李渊给当时关中势力最强的义军首领孙华写信进行招抚。六日后，孙华渡河前来晋见。李渊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兼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太守。随后命左统军王长谐、右统军刘弘基等人率步骑六千，与孙华一起渡河，在黄河西岸扎营，等待大军主力。

临行前，李渊对王长谐说：“屈突通手下精锐不少，跟我们相距才五十余里，如今却不敢出战，说明他的军心已经动摇。可屈突通担心朝廷责罚，又不敢不出战。他如果渡河攻击你们，我就进攻他的老巢，河东就绝对守不住。如果他据城坚守，你就烧掉河东与黄河西岸连接的索桥（蒲津桥），阻断他的退路，到时候我从前面扼住他的咽喉，

你从后面攻击他的背部，定可将其生擒！”

九月初七，屈突通担心腹背受敌，不得不派遣虎牙郎将桑显和率数千精锐骑兵，于深夜渡河，袭击王长谐的军营。王长谐猝不及防，接战失利。危急之时，孙华亲率骑兵前来救援，大破隋军。桑显和仓皇败退，为了阻止义军追击，渡河之后自己烧断了蒲津桥。

九月初十，李渊见时机成熟，遂率领大军将河东城团团围困。

可屈突通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义军多次攻城都被他击退。

李渊意识到这座坚城不可能轻易攻克，遂准备放弃河东，渡河入关，然而裴寂等人却坚决反对。他说：“屈突通手握重兵，固守坚城，就算今天绕开他，万一我们不能攻下长安，撤退时就会遭到河东的阻击，到时候腹背受敌，形势将万分险恶。不如先全力拿下河东，然后西进。河东是长安的门户，屈突通一旦战败，长安城指日可下！”

裴寂等人话音刚落，李世民马上又针锋相对地反驳。他说：“不然。兵贵神速，我们拥有连战连捷的余威和四方来附的部众，如果快速西进，长安必定震恐，很可能在他们来不及作出反应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城池攻了下来。如果逗留在坚城之下，自陷于疲敝之境，使长安有充分的时间加强防御，而我们自己却白白贻误战机，一旦军心离散，那大事就不可为了！”

这是李渊集团内部在军事战略上发生的第二次分歧。

这一次，李渊既没有完全听从李世民的建议，也没有纯粹采纳裴寂等人的意见，而是双管齐下，兵分两路。

他命令各将领留下来继续围攻河东，而他则与李建成、李世民亲率主力渡河入关。

九月十二日，李渊一进入关中，各地隋朝官吏立刻望风而降，纷纷献出所辖郡县。其中，华阴县令李孝常献出了下辖的永丰仓，极大地满足了义军的粮草和物资需求。此外，京兆府所属各县也纷纷派遣使者来向李渊投降。

九月十六日，李渊抵达朝邑（今陕西大荔县东）。九月十八日，李渊命李建成、刘文静、王长谐等各军进驻永丰仓，并扼守潼关，防备东方可能出现的隋朝援军；同时又命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军进攻渭水以北的泾阳、云阳、武功、盩厔（今陕西周至）诸县，从北面对长安包抄。

至此，隋朝的帝京长安已经完全暴露在李渊面前，几乎已成囊中之物。李渊走向帝座的道路只剩下最后一小段了。

尽管李渊进入长安后并没有立即称帝，可毋庸置疑的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一切都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了。

短短八个月之后，大唐王朝的一轮旭日就将彻底挣脱黑夜的禁锢，从崩裂的隋朝天空中喷薄而出，照彻寰宇。

第三章 李渊攻入长安，挟天子以令诸侯

李密陷入泥潭

从大业十二年初秋到大业十三年夏末，天地走完了一个四季的轮回，而杨广也在莺歌燕舞的江都当了一年的鸵鸟。

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它们基本上都被杨广的“鸵鸟术”成功屏蔽掉了。

但是让杨广郁闷的是，自从大业十三年四月那个叫元善达的使臣带来了关于东都的坏消息后，他维系了将近一年的屏蔽网就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尽管他很快就把元善达处理掉了，可更多让人讨厌的坏消息还是像苍蝇一样嘤嘤嗡嗡地钻进了杨广的耳中。

这些消息都是关于东都的。

杨广听说，那个破落贵族李密真的攻占了洛口仓和回洛仓，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疯子一样紧紧咬着东都不放，不但把它啃得遍体鳞伤，而且随时有可能把它一口吞掉。

杨广很生气。他不得不从温柔乡中抬起他那高贵的头颅，狠狠地关注了一回现实。

大业十三年五月下旬，杨广命监门将军庞玉和虎贲郎将霍世举率关中部队增援东都。同年七月初，杨广再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率江淮精锐，将军王隆率邛地黄蛮（四川西昌少数民族），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等人各率所部驰援东都，共同讨伐李密。

东都洛阳曾经是杨玄感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噩梦。

为了得到它，杨玄感付出了一切，包括最后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而对如今的李密来说，东都洛阳也正在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泥潭。眼前的洛阳城看上去是那么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可李密的数十万大军围着它打了好几个月，却始终一无所获。

李密会不会因为这座东都而变成第二个杨玄感？

有个人对此产生了疑虑，他就是李密的帐下幕僚柴孝和。

就像当初李密劝杨玄感西进关中一样，大业十三年五月，柴孝和也向李密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说："秦地山川险固，秦朝与汉朝皆凭借它而成就帝王霸业。而今之计，最好是命翟让留守洛口，命裴仁基留守回洛，由您自己亲率精锐，西进袭取长安。一旦攻克西京，大业的根基稳固，然后再挥师东下、扫平河洛，如此天下可传檄而定。方今隋失其鹿，四方群雄竞逐，若不趁早下手，恐怕会有人抢先，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

可令人遗憾的是，当年的杨玄感拒绝了李密，而今天的李密也同样拒绝了柴孝和。人是会变的，当年的李密只是一个幕僚，现在的李密却是一个领袖。

屁股决定脑袋，位子决定思维。此时的李密当然会有一些新想法，他说："此计诚然是上策，我也想了很久。但昏君还在，他的军队也还很多，我的部属都是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跟我西进关中？况且军中的多数将领皆盗匪出身，如果我独自西进，把他们留在这里，我担心他们谁也不服谁，万一产生内讧，大业会瞬间瓦解。"

不能不说，李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他的情况与当年的杨玄感有所不同。杨玄感出身政治豪门，而且本身又位高权重，在帝国政坛和军队中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他起兵后对自己的部属和军队也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在此情况下，他没有听从李密的建议及时入关，导致隋朝大军把他围困在四战之地，这肯定是失策的。

而李密呢？在来到瓦岗之前他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落魄贵族，一个四处漂泊的失业青年，仅仅是凭借他的心机、智谋和运气，再加上一则语焉不详的政治谣言，才使他后来居上地篡夺了瓦岗的领导权，说难听点就叫作"鸠占鹊巢"。因此他对瓦岗群雄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很有限

的，他的领袖地位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固。在此情况下，如果放弃洛阳，西进关中，很可能就会导致他所说的两个问题：一、属下的山东豪杰不听号令，各行其是；二、瓦岗内部产生内讧，自相残杀。其实还有第三个最大的隐患李密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如果他独自西进，就完全有可能会丧失瓦岗的领导权，更别提什么四方群雄的盟主地位了。

所以，明明知道西取长安才是上策，明明知道洛阳是一个危险的四战之地，可他却毫无办法。

在攻下洛阳之前，李密和瓦岗军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李密的无奈。

就在柴孝和与李密说这番话的同时，李渊正在太原招兵买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挥师南下，西取关中。

李密的无奈最终成全了李渊的辉煌。

用古人的话说，这叫天意。

用今天的话说，这叫时势。

而无论是天意还是时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难以个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为了拿下东都，李密可以说拼尽了全力。

在大业十三年五月，他多次亲率大军攻入东都的西苑，与顽强的隋朝守军进行了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厮杀，然而每一次都被隋军击退。最后李密甚至身中流箭，不得不在回洛仓的大营中疗养了多日。

这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庞玉、霍世举等第一批隋朝援军抵达东都。越王杨侗当天就命庞玉、霍世举、段达等部于夜晚出城，对回洛仓发动奇袭。李密和裴仁基仓促应战，结果被打得大败，士卒死伤被俘的超过一半。李密只好放弃回洛，退守洛口。庞玉和霍世举一路乘胜追击，最后进驻偃师，与瓦岗军对峙。

六月十七日，经过休整的李密对隋军发起反攻，在洛阳东北的平乐园与隋军会战。这一战李密几乎出动了全部精锐，把骑兵置于左翼，步兵置于右翼，中军则全部使用弓弩兵，对隋军发起了猛烈进攻，终于大败隋军，再次夺回了回洛仓。

九月初，隋武阳（今河北大名县）郡丞元宝藏献出郡城，投降了李

密。李密当即任命他为上柱国，封武阳公。元宝藏为了表示感谢，命自己帐下一位文采出众的宾客给李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议改武阳为魏州，并愿亲率部众西攻魏郡（今河南安阳市），再南下与李密会合，攻取黎阳仓。李密大喜，随即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

这个替元宝藏写信的宾客，就是后来大唐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千古第一诤臣”——魏徵。

魏徵的父亲魏长贤是北齐的一个小官，曾担任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县令，在魏徵年少时便已过世，所以魏徵是在“孤贫”“落拓”的环境中长大的。贫寒的家境导致魏徵的人生起点很低。如果是一般人，很可能会找一个贩夫走卒的职业糊口，然后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可魏徵不干，他“不事生业”，偏偏出家当了道士。关于魏徵当道士的动机和具体经历，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道士就不用为衣食奔波，并且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所以《旧唐书·魏徵传》称他“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通过元宝藏与李密的书信往来，魏徵的文采和学养得到了李密的赏识，随即被调到总部，担任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之类的职务。对于一介布衣魏徵来说，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时来运转了。魏徵很珍惜这个崭露头角的机会，随后就向李密献上了安定天下的“十策”。

可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因为李密一条也没有采用。

此刻的魏徵对于未来一定颇为茫然。他绝对料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会成为唐帝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并与唐太宗李世民共同演绎一段“明君诤臣”的千古佳话。

大业十三年九月初六，李密派遣徐世勣率五千人北渡黄河，与元宝藏、郝孝德等部会师，一举攻占了黎阳仓。

黎阳仓是隋帝国在河北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其规模之大、储粮之多，不亚于东都的洛口仓与回洛仓，所以攻占此仓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短短十天之间，便有二十多万河北的青壮年投奔了瓦岗军。与此同时，武安郡（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永安郡（今湖北新州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弋阳郡（今河南光山县）、齐郡（今山东济南市）的隋朝将吏也纷纷举城向李密投降，甚至包括已经称王的几大义军首领，如窦建德和朱粲等人都忙不迭地派遣使节去晋见李密，表示归附之意。李密随即任命朱粲为扬州总管，并封他为邓公。

就在瓦岗军攻克黎阳仓的同时，以王世充为首的第二批隋朝援军也已在东都完成了集结。九月十一日，越王杨侗命部将刘长恭率东都部队，与庞玉、王世充等部共计十万人，大举进攻李密据守的洛口。

隋军与瓦岗军就在洛水隔河对峙。

杨广从江都发出了一道诏令，命所有讨伐李密的部队皆受王世充一体节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密和王世充就在东都附近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和消耗战……

就在他们打得热火朝天、难解难分的时候，李渊已经悄然入关了。

长安城的末日

李渊进入关中就像蛟龙游进了海。

他所受到的欢迎和拥戴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基本上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史称其“舍于朝邑长春宫。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市”（《大唐创业起居注》）。

当了这么多年的帝国高官，他被人们大力追捧和热烈欢迎也不是头一回了，再怎么热闹的场面他也见识过。可这一回却有所不同，除了热闹之外，李渊发现人们仰望他的目光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依稀记得，过去人们只把这种目光投给杨坚，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把它投给了杨广。而现在，成百上千个在乱世中找不到命运方向的关中士民则像一群迷途的羔羊一样，把一种渴望获得拯救的目光齐刷刷投到了他的身上。

说老实话，李渊很喜欢这种目光，被人视为救世主的感觉真好。

屈突通得知李渊已经渡过黄河直扑长安，立刻命鹰扬郎将尧君素坚守河东，然后亲率数万精锐南下潼关，准备经蓝田驰援长安。

可是刘文静早已按照李渊的部署挡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

屈突通抵达潼关时，原驻守在此的隋将刘纲早已被义军斩杀，潼关已经陷落。屈突通在此遭遇了刘文静的顽强阻击。双方相持月余，屈突通始终不能越过潼关半步。最后屈突通命部将桑显和夜袭义军营寨，刘文静仓促应战。双方混战至次日凌晨，隋军连续攻破了义军的两座

营寨，只剩下刘文静的一座大营还在坚守。桑显和随即率部对刘文静的大营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好几次都险些将其攻破。混战中刘文静身中流矢，将士们顿时士气大挫，最后这座堡垒也已岌岌可危。

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隋军的攻势却忽然停了。

桑显和发现士兵经过一整夜的鏖战之后都已精疲力竭，所以传令部队暂停进攻，先吃早饭，准备等士兵们恢复体力后再对刘文静发起最后的攻击。

很显然，桑显和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不差这一顿饭的工夫。

可他错了。

他低估了义军的反击能力，对形势的判断也过于乐观了。就在隋军生火做饭的短暂间隙里，负伤的刘文静已经调整了兵力部署，分兵潜入已被攻破的两个营寨，杀死隋军哨兵，重新夺回了阵地。

刘文静是想据险而守，尽量拖延时间以待援兵。

此时的他绝对不敢奢望自己能反败为胜。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再次出乎他的意料，隋军还没吃完饭，一支义军却鬼使神差地出现在隋军阵地的后方。他们并不是援兵，而是一支只有几百人的四处巡弋的游骑兵。可谁也没料到他们竟然会在这关键时刻“游”到了桑显和的背后，并且对毫无防备的隋军发起突然袭击。面对这支从天而降的敌方“援兵”，隋军士兵顿时惊慌失措、阵脚大乱。与此同时，刘文静抓住战机，下令士兵从三个营寨同时出击。隋军大败，或死或降，基本上全军覆没，桑显和险险逃过一劫，只身逃回大军驻地。

桑显和功败垂成并且损兵折将无数，令屈突通大为懊丧。前面的去路被堵，后面的根据地被围，屈突通彻底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

他意识到长安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而隋王朝覆灭的日子也已经屈指可数了。可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既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屈突通感到了绝望。

随后的日子，义军不断遣使劝其归降。屈突通仰天恸哭，说：“吾蒙国厚恩，历事两主，受人厚禄，安可逃难？唯有一死而已！”那段时间，他经常摩挲自己的脖颈，慨然长叹道：“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旧唐书·屈突通传》）李渊多次招降不果，最后找到了屈突

通的一个家童，命他前去劝降。结果那人不但没有说服屈突通，反而被他一刀砍了。

当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的时候，任何试图阻挡的个人努力都注定是微弱的、渺小的，甚至是徒劳的。然而，当一个旧王朝业已分崩离析，人人自求富贵唯恐不及的时候，屈突通在绝境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与忠诚却无疑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突通不愧是隋朝的忠臣。

然而，我们后面就将看到，即便是这样的忠臣，即便一直在努力和挣扎，短短三个月后，屈突通还是无可奈何地归降了李渊。

也许这就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也许这就叫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在隋末的历史大舞台上，在竞逐“隋鹿”的四方群雄中，李渊绝对可以称得上天之骄子。

因为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也就是他起兵的时机把握得很好。如果太早，他有可能会像杨玄感那样成为最先烂掉的出头椽子；如果太晚，隋朝的大蛋糕就有可能被别人瓜分一空。而李渊起兵的时候，隋帝国的各方军队已经在野火燎原的大起义中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困境，再也无力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围剿，所以李渊的进兵就比较顺利。与此同时，西京长安尚未被任何一支义军占领，仍然向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李渊）敞开着。李渊在这个时候起兵并抢先入关，占据关中的形胜之地和长安的政治制高点，其时机可谓把握得恰到好处。

所谓地利，也就是李渊得到了太原这块宝地。这个地方是“陶唐故国”，与李渊的爵衔相契，所以从精神上给予了李渊莫大的鼓舞和必胜的信念，而对于一个准备开创帝王大业的人来说，这样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太原又是一座军事重镇，能在兵源、军需、给养等各方面给李渊的起兵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坚实的后勤保障。

所谓人和，是指李渊在起兵之初，其麾下便人才济济。他拥有裴寂、刘文静这样的谋臣，又有长孙顺德、刘弘基这样的武将，同时又有建成、世民、元吉这三个虽然年轻，但是骁勇强悍，皆能独当一面的儿子。除此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渊的女儿。这个后来被封为平阳公主的女儿既继承了父亲李渊精明务实的政治头脑，又继承了她母亲

窦氏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在隋末唐初这个兵戈横行、以武力争胜的大乱局中，平阳公主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李渊挥师南下、西进关中的同时，这位胆识过人、智勇双全的平阳公主在长安附近都做了一些什么。

大业十三年五月，即李渊起兵前夕，在长安任职的柴绍收到了李渊托人送来的一封密信，让他火速赶往太原。接到即将举事的消息后，柴绍既感到兴奋和喜悦，又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他担心的并非起义能否成功，而是他这一走，他的妻子怎么办？

柴绍不得不向平阳公主吐露了自己的不安：“尊公举兵，我们一道同行不太可能，你独自留在这里又有危险，怎么办？”

“郎君只管速行，”平阳公主不假思索地说，“我一妇人，容易藏匿，会自己想办法，你不用担心。”

就这样，柴绍走了。

可是，平阳公主并没有远逃异地，也没有就近躲藏，而是做了一件让柴绍、李渊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举兵。

她第一时间赶回位于鄠县（今陕西户县）的庄园，变卖了所有家产，然后用这笔钱开始招兵买马，积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响应李渊的晋阳起兵，同时又做李渊进兵关中的内应。

当时的长安附近已经有多支变民军在活动。其中势力最大的有两支，一支以李渊的堂弟李神通、长安侠士史万宝为首，部众一万余人；另一支是西域商人何潘仁的变民军，部众三万余人。除此以外的小股变民军还有李仲文（李密的堂叔）、向善志、丘师利等。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平阳公主的判断和行动与他的父亲李渊如出一辙，那就是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平阳公主对形势的判断是：李神通反正是自己人，没有问题；李仲文等人势力不大，可以先搁在一边；当务之急，就是说服何潘仁，表面上与其结盟，实际上将其收编。

主意已定，她立刻派遣家童马三宝前去游说何潘仁，对他晓以利害。何潘仁听说李渊即将入关的消息后意识到，只有与平阳公主结盟才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否则一旦李渊入关，关中绝对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经过短暂的权衡之后，何潘仁作出了选择——归附平阳公主。

何潘仁归附之后，平阳公主当即命他与李神通联兵进攻鄠县，迅速将其攻克，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其后，平阳公主又命马三宝先后说服了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至此，长安附近的变民军全都投到了平阳公主的麾下。李渊绝对没料到，他的兵锋尚未进抵关中，他女儿就已经在隋王朝的心脏附近狠狠插上了一颗钉子。此后，隋朝的长安留守频频派遣军队前来进攻鄠县，却屡屡被马三宝和何潘仁击败。

当李渊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地向关中挺进的同时，平阳公主也在长安外围攻城略地，先后攻克盩厔、武功、始平等地，一时间声威大振。平阳公主治军严明，所到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所以远近少壮纷纷奔赴到她的义旗之下，部众迅速增至七万人。

平阳公主随后将她在关中举义并节节胜利的消息送到了李渊的军营中，李渊大喜过望。李渊渡河之后，立刻命柴绍前往南山（秦岭）迎接平阳公主。李世民进军渭北时，平阳公主与柴绍率精锐一万余人北上与他会师。在围攻长安之前，李渊授予了平阳公主与柴绍“各置幕府”的权力，也就是让他们夫妻各自拥有自己的直系部队。

平阳公主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其番号就是“娘子军”。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正式建制及正式番号的娘子军。而平阳公主也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军事统帅之一。

今天，位于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的太行山脉西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关隘，那就是长城第九关——娘子关。此关原名苇泽关，正是因为平阳公主曾率领娘子军驻扎于此，所以改为现名。

大业十三年深秋，长安上空乌云低垂。无尽的落叶在长安坊间恓恓惶惶地飞舞，像极了葬礼上漫天飘撒的纸钱。隋朝刑部尚书、京兆内史卫文升望着天空中越来越浓重的阴霾，忍不住发出一声凄怆的长叹。

黑云压城城欲摧。

长安城的末日就快到了，隋王朝的末日还会远吗？

卫文升最后终于在一片难以排遣的抑郁和哀伤中一病不起。

京兆内史就是目前首都长安的最高行政长官。如今这个身负重任的老臣倒下了，守卫长安的职责便落到了左翊卫大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骨仪的肩上。当然，还有那个名义上的西京留守——年仅十三岁的代

王杨侑。

瓦岗危机

大业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夜。洛水。

一支军队正在夜色的掩护下紧张渡河，向李密驻守的洛口方向急速前进。王世充一马当先，神色凝重。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李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对手？

此人来到瓦岗不久就夺取了领导权，短短半年部众就发展到数十万，接连占据帝国的三大粮仓，让洛阳守军焦头烂额，令大河南北的官军闻风丧胆，被四方变军推举为盟主。和这样的一个对手过招，自己能有多少胜算？

王世充感到一片茫然。

是日深夜，王世充的部队进驻黑石（今河南巩县南）。次日清晨，王世充留一部分兵力守卫大营，亲率精锐在洛水北岸布阵。李密接到战报，立刻率部迎战。

瓦岗军刚刚渡过洛水，还未站稳脚跟，王世充就下令严阵以待的士兵发起进攻。结果瓦岗军大败，士卒纷纷落水，包括那个曾建议李密西进关中的柴孝和也在这一战中溺水身亡。

李密大怒，一边集合步兵残部，命他们退保月城（防卫洛口仓的要塞），一边亲率精锐骑兵直奔隋军的黑石大营。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王世充追着瓦岗残部向北而去，准备进攻月城和洛口；而李密则带着骑兵往南去了，准备端掉洛水南岸的隋军大营。

双方好像要各打各的。

不过这么打，王世充肯定是吃亏的。因为李密的月城经营日久，城防异常坚固；可王世充的黑石大营却是昨晚刚刚建的，绝对经不起李密的冲锋。

果不其然，李密的骑兵刚刚攻上去，守营的隋军就慌忙燃起烽火。而且怕王世充看不见，一燃就燃了六柱。

正在围攻月城的王世充顿时傻眼了。他此次出征所带的粮草、物资、辎重可都在黑石大营里，要是让李密给烧了，那他就等于不战自败了。王世充不得不匆忙解围，回师自救。李密一看“围魏救赵”之策成功，立刻回头迎击王世充。

由于隋军仓促回师，奔跑之中早已散了阵形，而李密所率领的都是麾下最精锐的骑兵，此战王世充大败，损失三千多人。

这一战是王世充与李密的第一次较量，结果让王世充得出了一个结论——李密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洛水战败之后，王世充一直紧闭营门，一连十几天拒不出战。

说实话，他现在已经对李密产生了一丝恐惧心理。

前方的王世充按兵不动，东都的越王杨侗心里马上犯了嘀咕——皇帝把你从江都调到这里，可不是让你来度假的！何况又给了你节制各军之权，你王世充要是当了缩头乌龟，这仗还怎么打？

于是杨侗天天派使者前往黑石大营，说是慰问王世充，实际上是催他出战。

王世充迫于无奈，只好给李密下了一道战书。十一月初九，双方于夹石子河（河南巩县东南洛水支流）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此战李密全军出动，旌旗南北绵延达数十里。两军列阵之后，瓦岗军的前锋翟让首先对隋军发起攻击，结果一战即溃，迅速向后退却。王世充奋起直追，不料却一头钻进李密给他张好的口袋。

王世充刚刚冲到瓦岗军的中军前方，王伯当和裴仁基就忽然从两翼杀出，横切他的军阵，生生割断了他的后军与前军的联系，而李密则亲率中军猛攻他的正面。隋军被切成两段，首尾不能相顾，而王世充又三面受敌，士众失去指挥，霎时溃散。王世充拼死突围，扔下无数士兵的尸体，带着残部向西而逃。

从军事角度而言，瓦岗军的战斗力绝对是一流的，但是从政治上来说，瓦岗集团的内部却始终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那就是——权力结构的不稳定。

说白了，就是谁也不服谁。

在这一点上，李密比任何人的感受都更加深刻。所以他不得不睁大眼

睛，对周围的人和事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

大业十三年冬天，最让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有一小撮人正蠢蠢欲动，试图挑战他的权威。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小集团。而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瓦岗寨过去的领袖——翟让。

翟让从一把手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自在。他仍然挂着司徒的头衔，过去的弟兄们照样尊重他，衣食住行的待遇也一点都没变。

翟让本来就没有问鼎天下之志，对于权力也没有什么野心，所以退居二线后，一直很享受这种养尊处优、闲云野鹤的生活。他什么事也不用操心，又不愁吃、不愁穿，人生至此，夫复何求？翟让时常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慨。

然而，翟让可以满足于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他身边的人却不甘心翟让就此大权旁落。

跟着翟老大出来混就是图个大富大贵，而今老大你居然早早退居二线，把军政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密，这算怎么回事？你自己不要富贵不打紧，可弟兄们怎么办？跟了你这么些年，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口气叫大伙如何咽得下？

所以翟让让权这件事，自始至终都让他的手下人想不通。

司马王儒信就一直劝翟让从李密手里重新把权力夺回来，自立为大冢宰，总揽全局。可翟让却一口回绝。一看翟让如此不争气，他的老哥、时任柱国的荥阳公翟弘马上跳了起来。这个翟老哥是个粗人，说话从来不绕弯，一开口就喊："皇帝你应该自己当，凭什么要让给别人？你要是真不想当，我来当！"

翟让闻言大笑，把他老哥的话当成了笑料。这句话很快就落进了李密的耳中。在李密听来，这可不是笑料，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李密全身的神经立刻绷紧了。此后他的左长史房彦藻又向李密禀报了一件事。房彦藻说他前不久攻克汝南郡（今河南汝南县）时，翟让曾向他警告："我听说你在汝南得到了大量金银财宝，却全都送给了李密，什么都没给我！李密是我一手拥立的，以后的事情如何，还很难说啊。"言下之意，他既然可以拥立李密，当然也可以随时把李密废

了。

房彦藻和左司马郑颋遂劝李密干掉翟让。他们说：“翟让贪财好利，刚愎自用，又不讲仁义，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应该早作打算。”李密说：“现在局势还不稳定，如果自相残杀，会给远近一个什么榜样？”郑颋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为的是顾全大局。万一翟让抢先下手，后悔都来不及！”

李密就这么下定了决心。

十一月十一日，李密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翟让、翟弘和他儿子、司徒府长史翟摩侯、司马王儒信一同赴宴。席间有裴仁基、郝孝德陪坐，房彦藻和郑颋在往来张罗，翟让背后则站着单雄信、徐世勣等一干侍卫。众人一坐定，李密就开口说：“今天宴请高官，不需要太多人，左右留几个人伺候就够了。”说完，他左右的侍卫都走了出去，可翟让的侍卫却站着不动。

没有翟让的命令，他们不会动。

李密和房彦藻对视一眼，房彦藻连忙堆着笑脸请示：“今天大家要饮酒作乐，天气又这么冷，司徒的卫士们都辛苦了，请主公赏赐他们酒食。”

李密瞟了瞟翟让，说：“这就要请示司徒了。”

翟让一声干笑，说：“很好。”

随后房彦藻就把单雄信、徐世勣等人领了出去。宴会厅里除了主宾数人之外，就只剩下李密的一个带刀侍卫蔡建德。

众人寒暄片刻，菜还没上齐，李密就命人拿了一张新造的良弓出来，让翟让试射。翟让接过去，刚刚把弓拉满，李密就给蔡建德使了一个眼色。蔡建德突然抽刀，从翟让的背后一刀砍在他的脖子上。翟让一头栽倒在地，从鲜血喷涌的喉咙口发出牛吼一般的惨嚎。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蔡建德就已经把翟弘、翟摩侯和王儒信三人全部砍死。

外面厢房的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听到号叫声，立刻跳起来夺路而逃。跑到大门口时，徐世勣被守门卫士砍伤了脖子。王伯当从远处看见，大声喝令卫士住手。单雄信等人慌忙跪地求饶，其他的侍卫惊恐万状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李密很快走了出来，高声道：“我与诸君同起义兵，本来就是为了除

暴平乱，可是司徒却专横贪虐，欺凌同僚。今日只诛杀翟姓一家，与诸位没有干系。”说完命人把受伤的徐世勣搀扶进去，亲自为他敷药。

翟让的部众风闻翟让已死，都准备各奔东西。李密先是命单雄信前去宣慰，随后自己单人独骑进入翟让军营，一再劝勉，终于说服了他们，然后命徐世勣、单雄信和王伯当分别接管了翟让的部众。至此，整个瓦岗军营的恐慌和骚动才逐渐平息。

翟让之死是瓦岗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集团内部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

从表面上看，李密成功消灭了内部最大的一支异己势力，顺利收编了翟让的心腹和部众，使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得到了巩固。可实际上，瓦岗内部的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并未就此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经过这场流血事件之后，李密身边的将吏都变得人人自危，几乎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翟让。

一种看不见的忧虑和恐慌就像一场可怕的瘟疫一样，从此在瓦岗军中迅速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说，翟让之死并没有为瓦岗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反而成为瓦岗从全盛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捩点。

虽然此后的瓦岗军在战场上仍然是所向披靡、胜多败少，但是败亡的危机却已经在表面的强大之下悄悄酝酿。

得知翟让被李密干掉后，王世充发出了一声怅然若失的叹息。

因为他知道瓦岗高层始终存在矛盾，尤其是翟让和李密，绝对不可能长期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存共荣。所以王世充一直认为这是他消灭瓦岗的一个机会。他在心里默默把宝押在了翟让这边，希望翟让能把李密收拾掉，然后他再轻松地收拾翟让。

可结果却与他的希望截然相反。

通过多次交手和这段时间的观察，李密这个对手越来越让王世充感到可怕。他在一声长叹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李密天资甚高，做事聪明果决，来日是一条龙还是一条蛇，实在难以预料！”

李渊“匡扶帝室”

李世民进入渭北之后，远近各地的士民、隋朝官吏、变民首领络绎不绝地前来归附，史称“归之如流”。就在这些人当中，李世民精心挑选了一批才俊之士作为自己的左右手。房玄龄就在这时候投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房玄龄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博览经史，在文学和书法上均有很高造诣。少年时代曾随父亲、泾阳令房彦谦游京师。其时国家安定，天下太平，人人都认为隋王朝一定会国祚绵长、江山永固。可房玄龄在长安逛了几天后，却从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对他父亲发表了一番时政感言，把人人称颂的隋文帝杨坚狠狠数落了一回，骂他“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到头来必定“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他父亲听了这番大逆不道之言，本来就已经吓得不轻，没想到房玄龄紧接着又说了一句：“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旧唐书·房玄龄传》）

最后这句灭九族的话彻底把他父亲吓得魂飞魄散。

房彦谦张口结舌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十八岁那年，房玄龄中了进士。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过房玄龄后，大为惊叹，忍不住对同僚说：“我阅人无数，从未见此少年，将来必成伟器，只可惜看不到他‘耸壑凌霄’的那一天啊！”

高孝基的确眼力不凡。这个年轻人日后果然成了唐太宗李世民最为得力的心腹重臣，并且最终成为初唐的一代名相，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十大贤相”之一，的确堪称伟器！

来投靠李世民的这一年，房玄龄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隰城（今山西汾阳县）县尉。但是李世民在军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马上有一种一见如故之感，随即任命他为记室参军，引为智囊。而房玄龄也将李世民视为知己，从此尽心竭力地辅佐这位英主。

大业十三年九月末，李渊集团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开始缩小对长安的包围圈。刘弘基、殷开山率军六万，西进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南渡渭水，进驻长安故城（汉长安）。与此同时，李世民率所部十三万人进驻阿城（秦阿房宫故址）。

九月二十七日，驻守永丰仓的李建成也奉李渊之命，率部从新丰（今陕西临潼县）直驱长安。

同日，延安郡（今陕西延安市）、上郡（今陕西富县）、雕阴郡（今陕西绥德县）全部投降李渊。

九月二十八日，李渊率大军从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西进，沿途凡是隋政府兴建的离宫、别苑、园林等一律拆毁，所有宫女全部放归。

十月初四，李渊抵达长安，在春明门外扎营，各路人马全部集结，共计二十余万。李渊不断遣使到城下，向隋朝廷和卫文升等人表明自己“匡扶社稷”的立场，可卫文升不予理睬。

十月十四日，李渊下令军队开始围城。军中各部纷纷砍伐驻地周围的树木，修造了大量攻城器械。长安附近的林木因此而砍伐一空。

十月二十七日，李渊大军开始攻城。李渊下令：任何人不准侵犯隋朝宗庙以及代王杨侑和所有皇室成员，违者诛灭三族。

这场攻城战几乎是没有悬念的。虽然义军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比如刚刚归附李渊的孙华就在这场战役中阵亡，但是仅仅十多天后，亦即十一月初九，李渊的部将雷永吉就率先攻上了城墙。

当天，李渊的军队攻克长安。李渊命李建成和李世民封存宫廷府库，收取隋朝的档案图籍，严禁士兵烧杀掳掠。

十三岁的代王杨侑躲进了东宫，身边的所有侍从全部作鸟兽散，只有侍读姚思廉一个人留在杨侑身边。义军士兵攻进东宫，准备冲上大殿时，姚思廉挡在面无人色的杨侑前面，厉声呵斥：“唐公举义是为了匡扶帝室，尔等不得无礼！”

到了这一步，姚思廉为了保住代王的小命，也只好代表朝廷承认现实，老老实实陪李渊玩一场“匡扶帝室”的政治秀了。

李渊入城后，毕恭毕敬地把代王杨侑从东宫接到了大兴宫，然后自己住到了旧长安的长乐宫，以示君臣之别；同时废除了隋朝廷原来的所有法令，另行颁布了过渡时期的十二条约法。

李渊起兵的时候，西京的留守长官曾经挖掉了李渊的祖坟，捣毁了李氏五庙（天子可立七庙，公爵立五庙）。现在李渊进城了，这笔账肯定是要算的。此时的老臣卫文升已经在忧惧中一病而亡，剩下来的这些隋朝高官自然成了李渊报复的对象。

十一月十一日，李渊逮捕了西京副留守阴世师、骨仪等十多人，宣布了他们“贪婪苛酷、抗拒义师”等多条罪状，随后将其斩首。除了这十

几个“首恶元凶”之外，李渊对朝中百官都极力加以安抚，对长安百姓也是秋毫无犯。

但是几天后军队逮捕了一个人，李渊马上下令要把他砍了。

因为李渊获知，早在他起兵之前，这个人就打算跑到江都向杨广告密，揭发李渊暗中募兵、准备造反的事情。

对付这种告密者，李渊当然不会心慈手软。

当这个告密未遂的人被五花大绑地带到李渊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痛哭流涕、跪地求饶，而是扯着嗓子高喊：“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难道不想成就大业，只为了一点怨恨就要砍杀壮士吗？”

这个死到临头还气壮如牛的人是谁？

他就是日后威震天下的初唐名将李靖。

李靖是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祖父李崇义官居北魏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亲李诠任隋朝赵郡太守。李靖姿貌魁伟，从少年时代起就颇有文韬武略，经常对家人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旧唐书·李靖传》）李靖的舅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每次与李靖论兵，皆大为赞叹，时常抚着他的头说：“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资治通鉴》卷一八四）

大业末年，李靖任马邑郡丞，察觉太原留守李渊行动可疑，估计有起兵之意，于是准备亲往江都禀报杨广，不料路过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道路阻绝，不得不滞留于此，所以才会被李渊逮捕。

此刻，当李靖在屠刀之下喊出那番话时，李渊已经感觉此人定非无能之辈，而李世民更欣赏李靖的胆识，于是力劝李渊留下此人。

李靖就这么死里逃生，随后被纳入李世民麾下，从此踏上一代名将的辉煌征程。

攻克长安六天后，即十一月十五日，李渊奉代王杨侑即皇帝位，是为隋恭帝；同时改元义宁，遥尊远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

十七日，新天子杨侑授予李渊黄钺、符节，任命他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

十八日，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灵武郡（今宁夏宁武市）、

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县）、安定郡（今甘肃泾川县）等郡皆派遣使节入京，尊奉新天子和新朝廷，实际上就是归附了李渊。

十九日，杨侑下诏：帝国所有政治、军事事务，全部文武官吏的任免，朝廷的一切法令刑赏，全部交由丞相府管辖；只有祭祀天地和宗庙社稷的事务，才向天子奏报。

同日，李渊任命裴寂为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

二十二日，李建成被封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任京兆尹，封秦公；李元吉封齐公。

一场“匡扶帝室”的政治秀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演了。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十三岁的小皇帝杨侑只不过是这场政治表演中的一个道具，唐王李渊才是这个新朝廷真正的主宰，但是这场演出却不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篡位夺权的人都必须遵循的潜规则。

更何况李渊比谁都清楚——自己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

首先，真正的隋朝天子杨广还在江都。尽管他的政治威信和人气指数已经降到了即位以来的最低点，可毕竟他人还活着；而只要杨广还在一天，李渊就要尊奉隋朝的正朔一天，否则他就变成了篡位谋反的乱臣贼子，他的所有行为就丧失了合法性和道义基础。倘若如此，李渊就无法建立起一条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无法把旧统治阵营中的那些人全部团结到自己的身边。

其次，李渊只据有关中一隅之地。虽然他抢占了长安这个政治制高点，能在新朝廷的势力范围内“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天下仍然四分五裂，大部分地盘要么被四方群雄割据，要么依旧掌握在隋朝的官吏和军队手中，最终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如果李渊在此时称帝，势必授人以柄，成为各种势力攻击的焦点。这无异于把自己架在火炉子上烤，显然是不明智的。

所以，李渊不能急于称帝。只有当杨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自身的势力足够强大，天下的形势也足够明朗的时候，李渊才可能把小皇帝轻轻抹掉，堂而皇之地登上天子的宝座。

李渊想，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

要不要当皇帝？

一切都显得太平静了。

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初到十二月末，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原本打得如火如荼的东都战场却忽然沉寂了下来。

这样的平静意味着什么？

连日来李密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王世充难道就甘心这么耗下去，光吃粮不打仗？

不，李密觉得王世充一定会有什么动作。

带着这样的疑虑，李密命人召来了最近刚刚逃奔瓦岗的隋军降卒。

“王世充在干什么？”李密问。

“最近他一直在募兵，一再设宴犒劳将士，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李密盯着那几个降卒的脸看了很久，心里忽然掠过一阵惊悸。

“二十二三，月出半夜天。”李密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句农谚。也就是说，每逢下旬，尤其是在二十二、二十三这几天后，前半夜没有月亮，后半夜月亮才会慢慢升起。这就意味着，在每个月最后的这几天，夜里几乎没有月光。

今天是几号？

十二月二十四。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

李密全身的神经立刻绷紧了。

“我几乎着了王世充这小子的道了，”李密对裴仁基说，“你想到没有，我们这么久没有发动攻击，而王世充军营中的粮草将尽，他急于一战，所以才会一再募兵、犒劳将士，目的就是想趁月末天黑，偷袭我们的仓城！传令下去，在今天日落之前，必须完成防御部署。”

命令一下，郝孝德、王伯当、孟让等人立刻率部进入仓城周边的阵地设伏。

是夜三更，王世充的军队果然出现了。当他们进入王伯当的埋伏圈时，王伯当马上发起攻击，但是遭到隋军的顽强抵抗，王伯当反而失利。隋军进而开始攻城，瓦岗守将鲁儒率众力战，扼制住了隋军的势头。王伯当重新组织兵力再度攻击，终于大败隋军。王世充的麾下骁将费青奴战死，士卒被杀一千余人。

王世充连遭败绩，连精心策划的偷袭也彻底落空，顿时灰心丧气。

东都的越王杨侗连忙遣使慰劳。王世充大发牢骚，说他兵力太少，而且长期作战已经疲惫不堪云云。杨侗不得不又给了他七万人，才算堵住了他的嘴。

王世充得到了这支生力军，顿时有了底气，于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正月初大举反攻，终于在洛水北岸击败李密，迅速将部队推进到巩县北郊。这是王世充与李密交手数月以来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令他不禁大为振奋。正月十五日，王世充命各军在洛水上搭建浮桥，准备乘胜进攻洛口仓。

然而人多不见得是好事。

军队数量的庞大与番号的错杂极有可能导致号令不一、指挥失灵。正在抢渡洛水的隋军现在就出了这个问题。还没等王世充下达总攻命令，先行架好浮桥的部队就率先发起了进攻。虎贲郎将王辩一马当先，率领部队一下就攻破了李密大营的外围栅栏。瓦岗守军顿时一片慌乱。

此时只要隋军坚持进攻，李密马上就会溃败。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王世充却突然下令吹响收兵的号角。

因为他只看见大军在渡河的时候行动错乱、步调不一，根本不知道前方的王辩已经成功突破了敌人大营。

正在奋力突进的王辩听到号角声，不得不率部后撤。李密乘机带领敢死队发动反击，隋军大溃。为了争夺浮桥逃命，隋军光落入河中溺毙者就有一万多人，王辩战死，士卒各自逃散，大军瞬间瓦解。王世充带着自己的嫡系部队逃离战场，不敢回东都去见越王，只好北上河阳（今河南孟县）。

王世充就这样与唾手可得的胜利擦肩而过。

这天夜里，王世充的部队在横渡黄河时，突然天降暴雨，狂风大作，天气变得极度寒冷，士卒又冻死了一万多人。等到达河阳时，十几万的部队只剩下几千人。王世充把自己关进了监狱，以此向越王请罪。

得到大军惨败的消息后，越王杨侗也只能苦笑。要是在平时，一个败得这么惨的将帅早该被砍成肉酱了，可眼下，越王能杀王世充吗？

不能。

不但不能杀，还要慰劳他、犒赏他、捧着他、哄着他。

要不然怎么办？有王世充在，好歹还能牵制李密，还能把李密拒于东都之外；要是没有王世充，东都可能转眼就会被李密吃掉。

虽然王世充屡战屡败，可还是要鼓励他屡败屡战。

所以，越王杨侗不但丝毫不敢责备王世充，反而派使节前去向王世充宣布特赦令，又赏赐他金银、绸缎、美女，百般劝慰，让他回洛阳。

吃了败仗还能得到赏赐，不知道王世充有没有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过既然朝廷如此厚爱，王世充也就实在没什么好说的，随后纠集残部一万余人回了东都，驻扎在含嘉城（洛阳北城内），只求自保，不敢出战。

李密连败王世充，士气大振，遂乘胜进攻东都，一举夺取了金墉城。李密命人将城门、城墙、官邸、民房等全部修葺一新，将瓦岗总部迁进城内，以此对东都进行威慑。随后，李密拥兵三十余万，在邙山南麓列阵，进逼洛阳上春门。

正月十九，杨侗命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出城御敌。段达率部出城后，远远望见李密军容盛大，心中恐惧，未及接战便撤出战场。李密挥军进击，韦津兵败身亡。

眼看李密的场面越搞越大了，东都附近的一大批隋朝官吏赶紧率部投降了李密，而远近的义军首领如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人也纷纷遣使奉表，鼓动李密登基称帝，属下的裴仁基等人也劝李密早正位号。

要不要当这个皇帝？

形势一片喜人，耳中一片阿谀之声，稍微不淡定的人，很可能就心花怒放地笑纳了。

可李密就跟李渊一样，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春天还没到。

他还知道，劝他当皇帝的人基本上都是心怀鬼胎。

就说窦建德这帮人吧，他们如此殷勤劝进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他李密结结实实地成为隋朝的靶子，最好是把四面八方的官军都吸引到他李密身边，好让他们躲在背后茁壮成长。等瓦岗和官军斗得两败俱伤，他们再坐收渔人之利，轻松摘走胜利果实。

这就是他们的花花肠子！

至于说手下的裴仁基这些人，倒也不能完全抹杀他们的拥戴之意。只不过他们的拥戴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私心。因为李密要是当了皇帝，这瓦岗就成了一个朝廷，那瓦岗的老少爷们儿不也立刻跟着升格了吗？或许一不留神还能混个宰相尚书什么的当当，所以他们才会把小算盘打得哗哗响，一心想把李密鼓捣成皇帝。

这些小心思李密也都心中有数。

所以，面对所有人的劝进，李密只说了八个字——东都未克，不可议此。

李渊——最强劲的对手

大业十三年末，自称秦帝的薛举击败了李弘芝（自称楚帝）和唐弼（自称唐王），吞并了他们的部众，一时声威大振，号称拥有大军三十万。不久，薛举命长子薛仁果出兵进围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准备与李渊争夺关中。

李渊立即作出部署，命军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李世民率领，攻击薛仁果；一路由姜谟和窦轨率领，自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出发，进攻薛举的根据地陇右（陇山以西）。在对付薛举的同时，李渊又命李孝恭率领一支军队，越过终南山（秦岭），向山南和巴蜀地区扩张。

十二月十七日，李世民在扶风大破薛仁果，并一直将他追到了陇山。薛举大为震恐，担心李世民越过陇山前来攻打，连忙问他的属下：“自古以来，皇帝有没有投降的？”

黄门侍郎褚亮回答：“远有赵佗归附西汉，刘禅入仕晋朝；近有萧琮，子孙迄今犹享富贵！转祸为福，古已有之。”

卫尉卿郝瑗急步上前，大声道：“陛下不应该问这种话，褚亮之言又是何等荒谬悖逆！从前汉高祖刘邦经历了无数失败，刘备甚至连妻儿都不保，但是最终都能成就大业，陛下岂能因为一次小小的失利就作亡国打算？”

薛举顿觉失言，干笑了几声，说：“我不过姑且试探一下各位的态度，并无他意。”随后便重重赏赐了郝瑗，并引为心腹智囊。

十二月下旬，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县）留守张隆、河池郡（今陕西凤县）太守萧瑀、扶风郡太守窦琎等人相继归附李渊。李渊旋即任命窦琎为工部尚书，封燕国公；任命萧瑀为礼部尚书，封宋国公。

与此同时，西路军的姜谟和窦轨进抵长道（今甘肃礼县东），遭到了薛举军队的阻击，结果兵败，不得不撤回长安。南路军的李孝恭进军秦岭以南，击败了盘踞在此的朱粲。部将建议将俘虏全都杀了，李孝恭说：“不行，要是把他们全杀了，日后谁肯投降？”随即将俘虏全部释放。此后李孝恭继续南下，从金川（今陕西安康市）进入巴蜀，檄文所到之处，有三十多州归降。

长安被李渊攻陷之后，屈突通唯一的感觉是——天塌了。

因为李渊一进城就逮捕了他的所有家人，显然是要以此为筹码，迫使他就范。

屈突通悲痛欲绝，可是他没有就范。当长安的那个家童哭哭啼啼地前来诉苦和劝降时，屈突通毫不犹豫地把他杀了。他要以行动向李渊表明——为了当一个隋朝的忠臣，他准备牺牲他的全部家人。

屈突通随后命桑显和镇守潼关，自己率军东下，准备投奔东都。

可他前脚刚走，桑显和后脚就打开关门投降了刘文静。

刘文静立刻命窦琮和桑显和率轻骑兵一路尾追，终于在稠桑（今河南灵宝市北）追上了屈突通。屈突通命军队列阵，坚守不动。窦琮再次打出了亲情牌，命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去阵前劝谕。屈突通远远地对着他儿子破口大骂：“此贼何来？昔日与你为父子，今日与你为寇仇！”随即下令左右弓箭手射杀屈突寿。

眼看一场恶战一触即发，桑显和策马飞奔到阵前，对屈突通的部众高

喊："京城已经陷落，你们都是关中人，离开家乡又能去哪里呢？"

桑显和的这句话立刻产生了令人震撼的效果。屈突通的部众互相看了看，然后齐刷刷放下了武器。

屈突通彻底绝望了。他下马跪地，朝东南方向一下又一下地叩拜，嘶声哭喊道："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所知，神明共鉴！"

随后屈突通被押解到长安，李渊大喜，对他极尽礼遇，并当即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封蒋公，兼任秦公（李世民）元帅府长史。

然后李渊就交给屈突通一个任务——回河东，劝降他的部将尧君素。屈突通带着复杂、沉重而又万般无奈的心情来到了河东。

在这样的情形下见面，这两个大男人忍不住相对而泣、涕泪沾襟。屈突通说："我军已败，而今义旗所指，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当早降，以取富贵！"

尧君素悲愤莫名，说："公为帝国大臣，主上将关中托付与公，代王更倚仗您保卫社稷，您怎能偷生投降，甚至还替别人当说客呢？公所乘之马，即代王所赐，公有何面目乘之？"

屈突通哀叹道："唉，君素，我是力屈而来啊！"

尧君素说："而今我力犹未屈，你何必多言？"

屈突通惭愧不已，只好黯然离去。

屈突通无功而返后，李渊军队加紧了对河东城的进攻。

尧君素决意死守。

其时道路断绝，尧君素为了把整个关中与河东的危急形势告知东都朝廷，只好写了一份奏表，然后命人制造了一只木鹅，将奏表挂在鹅脖子上，最后让木鹅顺流东下。

木鹅漂到河阳，被守军拾获，交给了东都的越王杨侗。杨侗见信，叹息良久，于是以朝廷名义拜尧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命人走小路将任命状送到了河东。

后来，东都守将庞玉、皇甫无逸等人归降李渊，途经河东时也曾一再对尧君素晓以利害，劝他投降，可尧君素始终不为所动。

再后来，他在长安的妻子又来到城下，泪流满面地对他说："隋室已亡，天命有属，郎君何必自苦，自取祸败呢？"

尧君素在城头上大喊一声："天下事非妇人所知！"然后亲手搭弓上箭，一箭射了出去。他妻子应声而倒，死在了自己丈夫的手中。

尧君素知道隋王朝气数已尽，每谈及国事，必泫然泪下，对将士说："我是皇上（杨广）的藩邸旧臣，累蒙奖擢，今出于君臣大义，不得不死！城中粮食还可支持数年，等吃完了，天下事也尘埃落定了。倘若隋室覆亡，天命有归，我当自断头颅付与诸君也！"

尧君素情愿为隋王朝守节尽忠，可他的部众却不甘心成为隋朝的殉葬品。他们一直想叛逃，可尧君素军纪严明且统驭有方，所以将士们一直找不到机会。

河东城就这么坚守了一年有余。到最后，江都传来了杨广被弑的消息，而城中的粮食也快吃光了，每天都有人吃人的惨剧发生。部众们忍无可忍，不得不杀了尧君素，开门投降。

也许尧君素早就在等这一天了。

也许在他眼中，富贵和生命并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比它们更值得捍卫的，是人的操守、信念和价值观。

为了捍卫他心目中的君臣大义，尧君素宁可用自己的生命献祭。

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典型的愚忠——一种毫无意义、不可救药的愚忠！

可是，就像我们不能以尧君素的"君臣大义"去要求并责备屈突通一样，我们也不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标准来评价尧君素。

当然，像尧君素这样为一个不得人心、大势已去的旧王朝殉葬的做法固然不值得效仿，但是他勇于捍卫信念的这种精神本身却值得我们崇敬和仰望。

毕竟他的心中有一种高于富贵和生命的东西。其实不管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在，人性的高贵与尊严就能在苦难与死亡面前傲然挺立。怕只怕世上的人们丧失了这样的东西，并且还以丧失这样的东西为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尧君素是一个旧王朝的殉葬品，还不如说他

是自身信念的殉道者。这种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大业十三年最后的那些日子，李渊的势力在急剧扩张。南面的巴蜀地区已经完全归附，而刘文静向关东（潼关以东）进军也大有斩获，短短时间内，弘农（今河南灵宝市）、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以西的土地城邑全部纳入了李渊的势力范围。

大业十四年正月初一，隋恭帝杨侑下诏：唐王李渊可以“剑履上殿、赞拜不名”。这就是说，从此李渊上殿不需要解下佩剑，不需要脱靴，奏事时无须由侍臣唱名。中国历代权臣都曾经拥有过这种特权，远的不说，隋文帝杨坚在篡周前夕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在新年的第一天，李渊被授予了这种特权，这似乎表明李渊已经向不远处的那个皇帝宝座又迈进了一步，同时也等于向天下人发布了一则政治预告——隋王朝寿终正寝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正月二十二日，李渊任命世子李建成为左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率诸路兵马十余万人进军东都。二月初四，李渊再命太常卿郑元璹进军南阳郡（今河南邓州市），命左领军司马马元规进军安陆郡（今湖北安陆市）及荆襄地区。

大业十四年的日历刚刚掀开，正在热火朝天竞逐隋鹿的四方群雄便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

他的实力之雄厚，声势之浩大，发展之迅猛，让所有参与逐鹿的选手都暗暗捏了一把汗。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下一个出局者是谁？

第四章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大唐开国

江都政变

公元618年是一个奇特的年份，因为这一年的隋朝天下有不下二十个年号，并且很可能还是不完全统计。

这一年首先是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十四年，同时也是隋恭帝杨侑的义宁二年，稍后还是唐高祖李渊的武德元年。

此外，东都的越王杨侗也在这一年被王世充等人拥立为帝，所以又称皇泰元年。

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草头王对这一年也各有各的叫法：陇西的秦帝薛举称秦兴二年，河西的凉帝李轨称安乐元年，马邑的定杨天子刘武周称天兴二年，朔方的梁帝梁师都称永隆二年，河北的夏王窦建德称五凤元年，魏县的许帝宇文化及称天寿元年，江南的梁帝萧铣称鸣凤二年，东南的楚帝林士弘称太平三年……

实在是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不管这一年有多少个年号，历史最终只会承认其中一个。

换句话说，这些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年号注定要一个接一个被淘汰掉。

而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就是杨广的“大业”。

大业十四年，杨广五十岁。

知天命之年。

杨广现在的天命是什么？

是及时行乐。

既然一切都已无可挽回，那么除了及时行乐，除了不停地用酒精和女人来麻醉自己之外，杨广还能做什么呢？

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朝酒醒何处！

这就是杨广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体力行的人生哲学。

他在江都的离宫中开辟了一百多座精致的别院，每一座院落都美轮美奂，而且美女常住，美酒佳肴常备。杨广每天让一座院落做东，然后带着萧皇后和宠幸的嫔妃们一院一院地宴饮作乐，天天和她们一起喝得酩酊大醉。

杨广通晓天象，并且喜好吴语。某个春天的夜晚，华枝春满，天心月

圆，杨广与萧皇后坐在璀璨的星空下，静静地仰观天穹。突然，杨广粲然一笑，对萧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叔宝），卿不失为沈后（陈朝皇后沈婺华），且共乐饮耳！”

是啊，星光如此美丽，岁月如此静好，杨广有什么理由悲观呢？

人生何妨长醉，杯中自有乾坤！山河破碎又怎么样？社稷覆亡又怎么样？只要能像陈叔宝一样保有爵禄和富贵，只要美女、美酒和美景常在眼前，他的下半辈子就可以过得与世无争、自在逍遥！

然而，最让杨广难以承受的是，再怎么烂醉也有醒来的一刻。

在那些宿醉乍醒的夜晚，江都的离宫中玉体横陈、杯盘狼藉，杨广一个人怔怔坐着，看蜡烛泪尽，听更漏声残。每当这样的时刻，那些被他苦苦压抑的痛苦、忧郁和感伤，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袭来，把这个心事苍茫的帝王一口吞没。

还会有多少日子让他这样忧郁和感伤呢？

没有多少了。

公元618年的春天，在半梦半醒之间踉跄行走的杨广知道，在自己的生命中，不独快乐变得越来越珍贵，就连感伤也变得越来越奢侈了。

于是就有另一些夕阳西下的黄昏，许多宫人看见她们的天子穿着短衫，拄着手杖，像一个飘然遗世的行吟诗人一样，独自游荡在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之间。

他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它们。

从不疲倦。

从不厌烦。

没有人知道，杨广是想把这些良辰美景深深地烙印在心间。

没有人知道，就算死神在下一刻马上把他从世界上剔除，他也要在这一刻把属于自己的世界收藏。

杨广一生中一直保持着一种习惯，即使是在这个迷乱而颓废的春天里也依然保持。他经常会长时间地揽镜自照——长时间地凝视甚至是欣赏着铜镜中的那个人。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自恋。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在这个春天里，杨广看见的不再是那个玉树临风、英气逼人的潇洒帝王，而是一个鬓发散乱、面目浮肿、神情倦怠、目光空洞的中年男人。

尽管这个镜中人已经变得让杨广感到陌生，但是他并没有过于失望。因为这个镜子里的人仍然拥有一个宽阔饱满的额头，一个端正挺拔的鼻梁以及一个微微扬起的下颌。

够了。纵使失去所有，杨广相信自己依然能拥有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

杨广到最后似乎也看淡了死亡。有一天他忽然似笑非笑地对着镜中人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萧皇后大惊失色，问他为何说出如此不祥之语。杨广凄然一笑，幽幽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资治通鉴》卷一八五）

公元618年，杨广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那个烽火连天的中原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江东而已，为此杨广准备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以防李密兵锋越过长江。

杨广把此事拿到朝会上讨论，文武百官立即产生激烈的争执。以内史侍郎虞世基为首的大臣都极力赞成，表示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计划了；而右武候大将军李才等人却坚决反对，认为杨广应该立刻返回西京，借此安定天下。

最后心直口快的李才说不过巧舌如簧的虞世基，愤然离殿。门下录事李桐客依然坚持说："江东低洼潮湿、地势险恶，而且耕地太少，如果要对内奉养皇家，对外供应三军，百姓难以负荷，恐怕最终仍将激起变乱！"李桐客话音刚落，御史们立刻发出弹劾，说他毁谤朝政。

反对的声音就此被彻底打压。公卿们纷纷阿附杨广，说："江东之民盼望圣驾已久，陛下南下长江，亲临安抚，此乃大禹之事功也！"

迁都之议就这么定了下来。丹阳郡随即破土动工，开始修建皇宫。

可是，杨广已经无福消受丹阳的这座新皇宫了，因为军队早已离心离德。

一场震惊天下的江都政变马上就将爆发。

刚开始，将士们想到的还仅仅是叛逃。

因为他们都是关中人，思乡心切，见杨广毫无西返之意，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禁军郎将窦贤首先率部西逃，结果被杨广的骑兵追了回来，马上把窦贤斩首示众。

然而杀一却不能儆百。将士逃亡的现象仍然有增无减、屡禁不止。

杨广绝对想不到，就连他最为倚重的心腹将领也有了叛逃之心。

这个人就是虎贲郎将司马德戡。

司马德戡不光想一个人逃，而且想煽动大家一起逃。他首先对他的两个好友发出了试探。一个是虎贲郎将元礼，一个是直阁将军裴虔通。司马德戡说："如今士兵人人都想逃亡，我打算告发，又怕先被士兵杀了；要是不报告，一旦事发，也难逃灭族之罪。到底该怎么办？还有，听说关中已经沦陷，李孝常就因为献出华阴叛降，皇上就逮捕了他的两个弟弟，准备处死。我们的家属都在关中，万一有人步李孝常之后尘，那我们岂不是大祸临头？"

元礼和裴虔通也是一副恐惧无奈之状，只能愁眉苦脸地说："事已至此，该怎么办？"

司马德戡盯着他们的眼睛，说："和士兵一块逃！"

元礼和裴虔通相视一眼，重重点头："善！"

一个大规模的逃亡计划就此启动。越来越多的朝廷官员和军队将领迫不及待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人包括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几乎各个级别、各个部门的文武官员全都卷入了这个计划。

由于参与的人数众多，逃亡计划逐渐从秘密转为公开。最后将吏们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毫不避讳地讨论他们的叛逃行动。有个宫女再也看不下去了，只好报告萧皇后："外间人人欲反！"萧皇后面无表情地说："任汝奏之。"宫女随即向皇帝禀报，杨广勃然大怒。

皇帝很生气，可后果并不严重。

因为只有一个人掉了脑袋，就是那个告密的宫女。

杨广认为这是她危言耸听，所以二话不说就把她砍了。

后来又有人忍不住向萧皇后禀报，萧皇后说：“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资治通鉴》卷一八五）

从此就再也没人多管闲事了。

杨广既然执意要当鸵鸟，那么叛逃计划当然就没有半点阻力了。

虎牙郎将赵行枢很快就把计划告诉了一个人，要拉他入伙。

正是这个人导致这个叛逃计划瞬间升级成了政变行动。

他就是宇文述的次子、时任将作少监的宇文智及。

司马德戡等人原计划于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逃亡，可宇文智及却告诉他：“主上虽然无道，但威信尚存，命令也还有人执行。你们一旦逃亡，恐怕会像窦贤那样自寻死路。而今上天欲亡隋室，四方英雄并起，既然同心逃亡之人已有数万，不妨干一票大的，此乃帝王之业！”

司马德戡豁然开朗，与宇文智及和赵行枢等人商议之后，决定拥护宇文智及的兄长、时任右屯卫将军的宇文化及为领袖，发动政变，杀掉杨广。

宇文化及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仗着他父亲宇文述在朝中的地位，骄矜狂暴、贪赃枉法，所以打从少年时代起就被长安百姓称为轻薄公子。当众人把政变计划向他和盘托出，告知他这是帝王之业，并暗示将由他取代杨广成为天子时，宇文化及的冷汗唰的一下沁满了他的额头、鼻尖和掌心。

帝王之业？

宇文化及的心脏在剧烈地搏动。

这是一种恐惧与兴奋交织的搏动。

帝王之业？这位朝野知名的轻薄公子这辈子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开创帝王之业。

这可能吗？

但是众人的目光是那样热情和殷切，又是那样满怀信心、不容置疑。

宇文化及一颗骚动的心在足足狂跳了一炷香的工夫之后，终于跳回了原位。他最后一咬牙、一跺脚，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好！

杨广的末日就此降临。

杨广与隋朝的忌日

政变行动开始了。

司马德戡命令许弘仁和张恺进入禁军军营，对将士们说："陛下听说你们即将叛逃，就准备了大量毒酒，打算举办宴会，在宴席上把你们全部毒死，只跟南方人留在江都。"众人闻言，大为恐惧，纷纷相互转告，一致决定响应司马德戡等人的政变行动。

三月初十，司马德戡召集全体禁军军官，正式宣布了他的行动方案，众人齐声高呼："愿听将军号令！"是日下午，司马德戡盗取了宫中御马，连同早已准备好的武器一同分发给了政变官兵。当天夜里，元礼和裴虔通在宫中当值，负责做内应；城门郎唐奉义负责将宫城的所有城门虚掩，接应政变部队。三更时分，司马德戡在东城集结了数万名士兵，燃起火把互相呼应。杨广半夜忽然醒来，看见火光照亮了江都的夜空，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裴虔通不慌不忙地答道："草坊失火，士兵们正在扑救。"

与此同时，宇文智及和孟秉等人也在宫城外集合了他们的部众一千余人，随后劫持了仍忠于杨广的将军冯普乐，命令士兵迅速封锁各个主要路口。深夜，住在宫城外的燕王杨倓（杨广的孙子）发现军队有异动，意识到将有重大事变，急忙从芳林门旁边的水洞进入宫城，准备禀报杨广，可他走到玄武门时就进不去了。

因为裴虔通早已守卫在此。

杨倓只好向城楼喊话，说："臣今夜突然中风，命在旦夕，希望能见皇上最后一面。"

年少的杨倓尽管胆色过人，可如此粗糙的谎言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信！裴虔通立刻打开城门，不过不是放他进来，而是将他逮捕囚禁。

三月十一日凌晨，司马德戡把军队交给裴虔通，命他控制宫中各城

门。裴虔通随后率领数百名骑兵冲进了成象殿，殿上的宿卫士兵大喊：“有反贼！”裴虔通随即下令关闭所有城门，只开东门，勒令所有宿卫士兵放下武器，然后把他们从东门驱逐了出去。右屯卫将军独孤盛察觉情势有变，未及披上铠甲，慌忙带着十几名侍卫从营房冲了出来，迎面碰见裴虔通，厉声质问道：“哪里来的军队？为何情形如此诡异？”

裴虔通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说：“形势所迫，不关将军的事，请将军不要轻举妄动！”

独孤盛大骂：“老贼！说什么屁话！”随即带着手下人冲了上去。

可他们才十几个，裴虔通这边却有几百人。片刻之后，独孤盛和他的手下就全部倒在了血泊中。

惊闻宫内发生政变，左千牛（御前带刀侍卫）独孤开远迅速带着几百名士兵赶到玄览门，准备入宫保卫皇帝。可宫门早已紧闭。独孤开远敲门大喊：“陛下，我们手里还有军队，足以平息叛乱，只要陛下亲自出来督战，人心自然平定，否则就大祸临头了！”

然而，任凭独孤开远把宫门擂得山响，宫中却悄无声息，始终没有半点回应。士兵们本来就没什么斗志，见此情状，只好各自散去，独孤开远最后也被变军逮捕。

至此，政变军彻底控制了整座皇宫。司马德戡率领军队从玄武门大摇大摆地进入宫城。杨广慌忙脱下御袍，换上便装，仓皇逃进西阁。裴虔通等人带兵冲到了东阁，司宫（宫廷女官）魏氏马上打开阁门。这个魏氏也是杨广的心腹，可早已被宇文化及收买，包括玄武门的卫兵也是被她矫诏调开了，才会让裴虔通等人轻而易举地占据了玄武门。

政变军从东阁进入永巷，逢人便问：“陛下在哪儿？”一个宫女用手指了指西阁，校尉令狐行达立刻拔刀，率先冲向了西阁，裴虔通等人带着士兵紧随其后。

此刻，清晨的阳光已经把整座皇宫照亮。

杨广站在阁楼上，看见他最亲信的几个大臣和将军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们目光如刀、面色如铁，锃亮的铠甲和刀剑在温暖柔媚的阳光下闪烁着森冷而坚硬的光芒。

一个凄凉的笑容在杨广的脸上缓缓绽开。

他知道——这就是终点。

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也一直在逃避的那个宿命的终点。

而眼前这个美丽的春天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终将把属于他的一切彻底埋葬。无论是他的生命、他的功业、他的江山，还是他的诗歌、他的醇酒、他的美人，一切的一切，都将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里终结、腐烂、消亡……

杨广从阁楼的窗口看着率先迫近的令狐行达，忽然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说："你是想杀我吗？"

令狐行达迟疑了一下，躲开杨广的目光，说："臣不敢，臣只想奉陛下西还。"

杨广被令狐行达从阁楼上带了下来，然后他的目光就一直定定地看着裴虔通。从杨广当晋王的时候起，这个裴虔通就始终跟随在他左右，是他最为宠信的几个心腹之一，而今连他也反了，杨广不禁有些伤感。他对裴虔通说："卿难道不是我的故人吗？是何怨恨促使你谋反？"

裴虔通低着头说："臣不敢反，只是将士思归，准备奉迎陛下回京师而已。"

杨广叹了一口气，说："朕也想回去，只因上江（长江中上游）的运粮船没到，才一直延迟，现在就和你一道动身吧。"

十一日上午，裴虔通让士兵把杨广看押起来，然后命孟秉等人出宫迎接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跟着孟秉等人策马朝宫中奔去。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害怕，此时的宇文化及居然抖成了一团，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一路上不断有人前来晋见，宇文化及都是扶着马首，低着头，嘴里喃喃地说："罪过、罪过……"

司马德戡在宫门迎接宇文化及上大殿，尊称他为"丞相"。

裴虔通对杨广说："百官都在朝堂上了，陛下必须亲自出去慰劳。"随即把自己的坐骑牵了过来，逼杨广上马。杨广嫌鞍辔破旧，不肯上马，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全新的，杨广才不情不愿地骑了上去。裴虔通一手持刀一手牵马，把杨广带到了大殿前。变军兴奋得呐喊号叫，鼓噪之声响彻宫城。

宇文化及一见杨广，冲着裴虔通一边摆手一边大喊：“何必把这个东西牵出来？赶紧带回去做掉！”

杨广神情黯然地问裴虔通：“虞世基在哪里？”

变军将领马文举在一旁冷冷答道：“已经砍了。”

杨广终于被带回了寝殿。当时萧皇后、嫔妃以及一干宗室亲王都已经被政变军软禁，杨广的身边只剩下他最宠爱的幼子，十二岁的赵王杨杲。司马德戡和裴虔通等人刀剑出鞘地环视着他们父子二人。杨广一声长叹，说：“我有何罪，一至于此？”

马文举说：“陛下违弃宗庙，巡幸无度，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青壮死于刀箭，女弱亡于沟壑，四民失业，盗贼蜂起；并且专宠佞臣，文过饰非，拒绝劝谏，还说没罪？”

杨广苦笑着说：“要说我辜负了百姓，这是实情；至于说你们，荣华富贵，应有尽有，为何要做得这么绝？今日之事，谁是主谋？”

“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司马德戡冷冷地说。

片刻之后，宇文化及又派遣内史舍人封德彝前来历数杨广的种种罪状。杨广伤心地说：“卿是士人，为何也参与谋反？”封德彝无言以对，惭悚而退。

最后的时刻到了。

由于害怕，站在杨广身边的赵王杨杲一直在号啕大哭。裴虔通手起刀落，首先砍死了杨杲，鲜血溅满了杨广的衣服。裴虔通正欲对杨广下手，杨广忽然站起来说：“且慢！诸侯之血入地，尚且要大旱三年，何况斩天子之首？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岂能用刀砍？拿鸩酒来！”

这就是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

然而这些造反者没有答应他。司马德戡使了一个眼色，令狐行达猛然揪住杨广的领口，狠狠把他按回原位。

杨广踉跄坐下。其实他很早就给自己和后宫准备了毒酒，他曾经对嫔妃们说：“如果贼兵来了，你们先喝，然后我再喝。”可等到政变爆发时，左右侍从作鸟兽散，杨广再想找毒酒已经找不到了。

现在，杨广最后悔的就是自己为何不随身携带一瓶。他用绝望的目光

最后看了看这些昔日的臣子，然后缓缓解下身上的绢巾，递给了令狐行达。令狐行达面无表情地接过去，一下就勒住了他的脖子。

绢巾越勒越紧，越勒越紧……杨广看见自己的一生呼啸着从眼前飞过。他的双手在拼命挥舞，可他什么也没有抓住。

我的生命，我的功业，我的江山……

我的诗歌，我的醇酒，我的美人……

杨广的双腿在猛烈抽动，最后猛地一蹬——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这是公元618年的农历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江都的离宫莺飞草长、鲜花盛开，迷离的柳絮仿佛一万只白色的蝴蝶在整座皇宫中飘舞和盘旋。天空明洁而高远，纯净得就像初生婴儿一尘不染的脸庞……

就在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早晨，杨广终于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死亡绳结中窒息。

就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里，五十岁的杨广终于被轰然垮塌的大业彻底埋葬。

杨广死后，名义上先后有三个傀儡皇帝和三个影子朝廷分别在江都、西京和东都尊奉隋朝正朔，可谁都知道——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是隋炀帝杨广的忌日，实际上也是隋帝国的忌日。

宇文化及的摄政之路

一代帝王就这么凄凉地走了，虽然保住了全尸，却死无葬身之地。

无处安葬的一个客观原因是——杨广从没给自己修过陵墓。

中国历代帝王往往在登基伊始就会花大力气修建自己百年后的地下寝宫，唯独杨广没这么做。他一生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无数民脂民膏修建了遍及天下的离宫别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条泽被万世的大运河，可唯独漏掉了自己的终极归宿。

天下之大，杨广却连一个坑也没给自己留下。

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只知道杨广被缢杀后，萧皇后和宫人们拆下几片床板，给杨广和幼子杨杲做了两口简陋的棺材，然后就让他们孤零零地躺在离宫西院的流珠堂里，从此再也无人问津。

直到宇文化及一路北上之后，亦即大业十四年八月末，江都太守陈稜才按照天子礼仪，把杨广葬在离宫西侧的吴公台下，总算让他入土为安。此时距杨广被杀已经将近半年，中间隔了整整一个潮湿而闷热的夏天，杨广的尸体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按说早该腐烂。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广入殓的时候，据说面容依然栩栩如生，让众人大为骇异（《隋书·炀帝纪》：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唐朝扫平了江南后，又将杨广改葬到了江都附近的雷塘（今扬州市北平冈上）。

杨广死后，萧皇后和六宫嫔妃们并没有喝下杨广给她们准备的毒酒。她们苟活了下来，无可奈何地成了宇文化及的玩偶。

萧皇后虽然逃过一死，但是此后的命运却极为不堪。大业十四年五月，宇文化及把萧皇后和六宫嫔妃一起带到了中原。其后宇文化及败亡，萧皇后又落到窦建德的手中。再后来，东突厥的处罗可汗又从窦建德手里要走了萧皇后。一直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当李靖和李世勣率领唐军破灭突厥之后，萧皇后才终于被唐朝政府以相应的礼节迎回了长安。

皇帝没了。

天子的宝座空空荡荡，总得有人坐上去。

宇文化及现在当然是不能坐的。他也必须演一场政治秀，先推一个傀儡上去，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玩一回“禅让”的游戏。

要先推谁上去呢？

宇文化及想到了杨广的四弟蜀王杨秀。

这是隋文帝杨坚五个儿子中唯一在世的一个，十几年前就被杨坚罢官软禁。杨广即位后虽然没有杀他，但也始终不让他恢复行动自由，而且担心他背后搞小动作，所以每次出巡总是带在身边——此刻杨秀就被关在江都的禁军军营中。

宇文化及觉得蜀王杨秀在目前的宗室亲王中资格最老，而且又因长期

囚禁，几乎成了一个废人，所以立他最为顺理成章，也最为安全。

可宇文化及的提议却遭到了众人的反对。

宇文智及提出了另一个人选，那就是与他私交甚笃的秦王杨浩（杨广三弟杨俊的儿子）。

宇文化及同意了。他觉得反正这皇位迟早是他的，现在牵谁出来走这个过场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区别。

新皇帝的人选一确定，剩下来的宗室亲王就没有任何存在价值了。

当天，蜀王杨秀和他的七个儿子，齐王杨暕（杨广次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燕王杨倓，包括隋室的所有亲王和外戚，无论老幼，全部遭到屠杀。

其中死得最稀里糊涂的，可能就要属齐王杨暕了。

杨暕历来失宠于杨广，父子之间长期互相猜忌，所以政变爆发当晚，杨广就曾满腹狐疑地对萧皇后说："莫非是阿孩（杨暕乳名）所为？"而当宇文化及派人诛杀杨暕时，杨暕并不知道父亲已被弑，居然以为来人是杨广所派，故央求说："且慢杀我，我不会辜负国家！"来人一声冷笑，不由分说就把他拖到大街上砍了。杨暕至死还以为是父亲杨广对他下的毒手。

清理完隋宗室，接下来就轮到杨广的那些心腹重臣了。

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晶、梁公萧钜等人，以及他们的儿子，都没能逃过这场灭顶之灾。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政变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什么呢？这些人几乎都是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老手和人精，难道关键时刻都成了瞎子和聋子？难道他们对这么大动静的一场政变事先真的毫不知情，以至最终束手就擒、任人宰割？

不，其实他们中早已有人事先得到了密报。

政变前夕，江都县令张惠绍就已经探知有人即将谋反，立刻向御史大夫裴蕴做了禀报。裴蕴随即和张惠绍一起制订了一个紧急行动方案，决定矫诏逮捕宇文化及，然后入宫保护杨广。可当裴蕴把政变消息和他们的应变计划向内史侍郎虞世基报告时，虞世基却认为消息不可

靠，把计划压了下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还没等裴蕴想出别的办法，政变就爆发了。裴蕴仰天长叹：“跟虞世基这种人商量，只能误大事啊！”

裴蕴说得没错，跟虞世基商量，不误事才怪。虞世基这几年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替杨广屏蔽各种坏消息，所以早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任何天大的坏消息到他这里都成了捕风捉影、危言耸听。

这次所谓的政变消息当然也不会例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虞世基这么做不叫“误事”，而叫“尽职”。道理很简单，他要是不具备如此强大的屏蔽功能，杨广早把他一脚踢了，怎么会把他倚为心腹？

所以这场政变注定是要发生的，或迟或早而已。

在这场政治清洗中，有少数大臣幸免于难，其中一个就是时任黄门侍郎的裴矩。他早料到有这么一天，所以自从来到江都后就一直表现得很低调，即便是对仆从差役也是执礼甚恭，尤其是想方设法讨好军队。去年八月他就向杨广提出了一个收买人心的建议。他知道军队中的很多将士在江都都找了姘头，于是决定做个顺水人情，就对杨广说，将士们之所以闹着回家，是因为老婆孩子都在京师，如果允许他们就地娶妻，人心自安。杨广觉得很有道理，就按他说的做了。大部分禁军官兵就这样在江都找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二春，当然要打心眼里感激裴矩。

所以政变发生后，士兵们都嚷嚷着说：“裴大人是个好人，没他什么事！”而且当时裴矩一见到宇文化及，立刻非常识趣地上前跪地叩头，一脸弃暗投明的表情，自然让宇文化及也大生好感。

就是凭着这样的本事，才使得裴矩在整个江都朝廷彻底崩盘的时候，仍然不失为一只逆市飘红的坚挺个股——几天后就成了宇文朝廷的右仆射。

该杀的都杀了，该降的也都降了，昔日的轻薄公子宇文化及开始堂而皇之地踏上“摄政”之路。他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以萧皇后的名义拥立秦王杨浩为帝，但一直把他软禁在别殿，命士兵严密看管，只是让他在各种诏书上签字盖章而已。随后，宇文化及又任命二弟宇文智及为左仆射、三弟宇文士及为内史令，彻底掌控了江都朝廷的军政大权。

大业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宇文化及任命左武卫将军陈稜为江都太守，同日宣布大军返回长安，带着傀儡皇帝杨浩、萧皇后，以及六宫嫔妃一同启程北上。其龙舟队的盛大排场与当初的杨广无二。

宇文化及踌躇满志、无比风光地站在巨大的龙舟上，感觉辉煌的人生正在不远处向他微笑招手。

此刻的他绝对不会料到，有两次兵变正埋伏在道路的前方，差点终结了他刚刚开启的这场帝王美梦。

第一次兵变发生在龙舟队启程的这一天。

当天傍晚，船队行至离江都不远的显福宫，三名禁军将领便开始了密谋。一个是虎贲郎将麦孟才，另外两个是虎牙郎钱杰和沈光。麦孟才说："我等受先帝厚恩，而今却俯首侍奉仇敌，受其驱使，有何面目苟活于世？我一定要杀了他，虽死无憾！"沈光也流着泪说："这正是我期望将军的。"

是日夜里，麦孟才积极联络军队中的旧交，迅速纠集了数千部众，约定于次日拔营前袭杀宇文化及。然而消息很快泄露。宇文化及带着心腹将领连夜逃离大营，同时通知司马德戡先对麦孟才等人下手。

深夜，沈光忽然听到军营中人喊马嘶，估计已经走漏了风声，立即带兵扑向宇文化及的营帐，可是帐中已空无一人。出来的时候，沈光恰巧撞见了江都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其时已被提拔为内史侍郎的元敏。沈光庆幸自己事败之前还能杀一个垫背的，随即历数了元敏的条条罪状，然后一刀砍了他。

与此同时，司马德戡已经率大军包围了军营。经过一番血战，麦孟才、沈光、钱杰及其部众数百人全部战死。虽然明知此战必败，可自始至终却无一人投降。

兵变总算是平息了。

还好，有惊无险。宇文化及在心里对司马德戡大为感激。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船队行驶到彭城郡（今江苏徐州市）的时候，第二次兵变接踵而至。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的主谋居然是司马德戡。

其实宇文化及一上台，很多人马上就后悔了。

因为这位轻薄公子不仅没有半点能耐，而且骄奢之状比杨广有过之而无不及。

把杨广的六宫嫔妃都据为己有就不说了，龙舟队的一切排场都刻意模仿杨广也不说了，单就他在日常政务中的表现就足以让人大失所望。

他每次进入大帐的时候，总是大大咧咧地面南而坐，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帝王。更令人愤怒的是，他架子虽然摆得很大，可百官凡有进奏，他却一概保持沉默，什么话也不说。

这样的沉默是代表睿智和深沉吗？

不。谁都很清楚，他这是胸无韬略，不敢决断。

每次下帐后，宇文化及都要马上召集唐奉义、张恺等一帮心腹，商量百官所奏议的事，等别人帮他出了主意，他才命人拟就相关诏书，拿去让杨浩签字。

大伙把脑袋别在裤腰上搞政变，到头来拥护的居然是这么一个既骄矜又无能的笨蛋，怎能不令众人齿冷心寒？

司马德戡第一个跳了起来。他埋怨当初主张拥护宇文化及的赵行枢："我被你害惨了！当今要拨乱反正，必须依靠一个英明的领袖，可宇文化及昏庸愚昧，又被一大群小人包围着，大事必败无疑，你说该怎么办？"

司马德戡之所以跳起来，其实也不完全是出于公心。

还有一层原因他没说，那就是宇文化及并不信任他。

宇文化及总揽大权之后，封司马德戡为温国公，加光禄大夫，几天后又调任礼部尚书。表面上加官晋爵，极为尊崇，实际上是褫夺他的兵权。司马德戡大为不满，只好把所获的赏赐全都拿去贿赂宇文智及，通过他向宇文化及说情，好不容易才重新掌握了一点兵权——负责统领一万多人的后军。

但是这点兵权其实也是不稳固的。因为宇文化及始终防着他，哪一天要是把他的兵权卸了，司马德戡就彻底任人摆布了，所以司马德戡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听完司马德戡的牢骚后，赵行枢两眼一翻，说："这全看我们自己了，要废他也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二次兵变的计划就这么定了下来。

但是司马德戡还是有些信心不足。因为宇文化及现在是大丞相，手里掌握了十几万军队，而他只有区区一万多人。万一暗杀不成，双方开打，司马德戡的胜算并不大。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司马德戡决定找一个外援。

他找的人是其时盘踞在济阴郡周桥（今山东定陶县东南）一带的变民首领孟海公。

司马德戡给孟海公写了一封信，此后一直在等待回音，然而孟海公一直没有回音。

兵变的时机就这么在焦灼的等待中流逝。

宇文化及很快得到了消息，于是设计逮捕了司马德戡。计划中的兵变就此流产。

杀司马德戡之前，宇文化及问他："你我同心协力，共定海内，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而今大事方成，正是共享富贵的时候，你为何又要谋反？"

司马德戡说："我们之所以诛杀杨广，是因为无法忍受他的荒淫暴虐，没想到阁下的所作所为比他还要严重！情势所迫，不得不如此。"

随后司马德戡便被绞死，同党十多人也全被诛杀。

几天后，让司马德戡一直望眼欲穿的孟海公终于出现了。

可孟海公不是来找宇文化及打仗的，他是来找宇文化及喝酒的。

孟海公带着弟兄，带着酒肉，要来为大丞相接风洗尘，顺便交个朋友。跟一个拥有十几万大军的人交朋友，总不是什么坏事。

至于司马德戡那封十万火急的求援信，估计孟海公看过一眼就把它烧了。

大业十四年四月下旬，由于水路受阻，宇文化及率大军改行陆路，从彭城进入中原。

在巩洛（今河南巩县）一带，宇文化及遭遇了瓦岗军的阻击，于是转

向东郡（今河南滑县），隋东郡通守王轨立刻开门迎降。

中原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宇文化及的到来，使东都的命运变得比以往更加扑朔迷离。

后杨广时代的逐鹿游戏

李建成和李世民比宇文化及先抵达中原，可还没等东都舞台上的逐鹿大戏开锣，李世民就决定弃权了。

因为他发现——此刻的东都与其说是一只肥鹿，还不如说是一个烫手山芋。

他和李建成于四月初率军抵达东都附近的芳华苑，立刻派人向东都朝廷表示增援之意，可越王杨侗不上这个当，始终紧闭城门。而李密的瓦岗军则试探性地和他们交了一下手，之后就各自按兵不动。李世民冷静地判断了一下当时的形势，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在夺取东都的时机还不成熟。

道理很简单。李密的瓦岗军总共有三十多万人，而且训练有素，都是百战之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东都的王世充虽然实力稍弱，但也算是隋朝军队中的一支劲旅；还有，宇文化及的十几万军队此刻也正朝中原扑来。这几大势力加在一起就有五六十万之众，如果硬要跟他们拼抢东都，就算获胜，也会极大地消耗自身的实力，即便是拿下东都，也不见得能守住。更何况关中刚刚平定，根基还不稳固，而他们兄弟二人以及各路远征军几乎把长安的所有精锐都拉了出来，万一西北的薛举和梁师都在此时乘虚而入，进攻长安，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李世民的想法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暂时先班师，坐山观虎斗，等这几大势力互相绞杀，斗得两败俱伤之后，再出关摘取胜利果实。

李建成同意李世民的看法。四月初四，军队班师。拔营之前，李世民料定他们一旦撤退，东都必定出兵来追，于是在三王陵（洛阳城西南）设置了三道埋伏，严阵以待。

果然，军队刚刚西行，东都的段达就率一万多人一路尾追，结果遭遇伏击，大败而逃。李世民回军反击，一直把段达追到了洛阳城下，斩杀了四千多人。随后李世民又在东都附近设置了新安郡（今河南新安县）和宜阳郡（今河南宜阳县），命部将吕绍宗和任瑰镇守新安，史万宝和盛彦师镇守宜阳。这一北一南的两个据点互为掎角、协同攻

防，一方面窥伺东都，一方面作为防守潼关的门户，其战略意义要远比直接占领东都重大得多。

世间已无杨广，所以很多人有事要忙。

后杨广时代的逐鹿游戏不会再欲说还羞、遮遮掩掩。

人人图穷匕见。

人人大干快上。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时任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太守的沈法兴。

当时沈法兴正在努力围剿东阳郡（今浙江金华市）一带的变民，一听说杨广被宇文化及诛杀，立刻起兵，以讨伐宇文化及之名，先后攻占江表（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的十几个郡，自立为江南道大总管，同时设置文武百官。

这一年四月下旬，原来称梁王的萧铣也正式称帝，并迁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市），随后派遣各路军队大举向南扩张。

原本一直在坚守城池的各地隋朝将吏听到杨广被弑的消息后，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萧铣。

萧铣的势力迅速壮大，其版图东至九江（今江西九江市），西至三峡（今湖北与重庆交界处），南至交趾（今越南），北至汉川（今汉水以南），成为当时南方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并拥有常备军四十余万。

与此同时，杨广被弑的消息也传至长安。

这一天终于到来。李渊仰天恸哭，用一种伤心欲绝的口吻说："吾北面事主，因关山阻隔而不能救，但实在不敢忘却悲哀啊！"

这场由李渊自导自演的"匡扶帝室"的政治秀，终于在这一抹煽情的泪水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五月十四日，隋恭帝杨侑将皇位禅让给唐王李渊，回代王府居住。

五月二十日，五十三岁的唐王李渊在太极殿登基称帝，同时祭天、大

赦，改元武德。

一个长达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王朝，就在此刻拉开了宏伟的序幕。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

自公元220年起，当大汉王朝在三国群雄的龙争虎斗中颓然倒地之后，神州大地就进入了一个分崩离析、征战杀伐的乱世。在此后的近四百年中，无数的英雄和枭雄，始终梦想着建立一个长治久安、河清海晏的大一统帝国，然而他们的梦想转眼就被疯狂运转的战争机器碾成了齑粉。在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的漫长的四个世纪中，华夏神州虽然也曾有过短暂的和平与统一，但皆如昙花一现。在脆弱的安宁与虚假的繁华背后，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更为残酷的分裂战争和更为暴烈的血雨腥风。

将近四百年了，这片古老的大地一直在黯淡无光的历史暗夜中沉沦，一个又一个世代的黎民百姓，一直在兵戈与战火的荼毒中呻吟和哀号，一直在群雄逐鹿的金戈铁马下流血和战栗！

没有人知道，在这求出无期的四百年中，曾经有多少鲜花般美丽的孩童，未及绽放就在浓烈的烽烟中夭折枯萎；也没有人知道，曾经有多少初为人妇的妙龄女子，为一去不归的征人哭干了一生泪水，望穿了一世眼眸；更没有人知道，曾经有多少白发苍苍的老人，临死前一次次向苍天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乞求来世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苍天缄默，大地无语。

直到时光的车轮无情地碾过这一切，缓缓走到公元618年的这一天，几十个世代的凄风苦雨才出现了渐次消歇的迹象，四百年的混沌暗夜才悄然露出了一丝朦胧的曙光。

纵然此刻的大地战火频仍，纵然此刻的天下烽烟未熄，但是历史的如椽巨笔，已经为这个新生的王朝描绘了一个光芒万丈、如日中天的未来。

是的，短短十几年后，一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就将跨越四百年的时空，向遥远的大汉王朝致敬；短短十几年后，一个世界历史上享有盛誉的盛世帝国，就将横空出世，傲然屹立在天地之间！

与李渊登基同日，唐政府将隋朝的郡县制改为州县制，命现有管辖范围内的各郡太守一律改任州刺史；并按五行关系推演，推定唐朝

属“土德”，以黄色为最高贵的颜色。

五月二十八日，李渊命裴寂和刘文静修订律法，并设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招收生员三百多人，命所属各州、县同时置学招生。

六月初一，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萧瑀、窦威为内史令，裴晞为尚书左丞，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即兼吏部尚书事），窦琎为户部尚书，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陈叔达、崔民幹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殷开山为吏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赵慈景为兵部侍郎，李瑗为刑部侍郎。

同日，唐朝政府废除隋朝律令《大业律》，另行颁布新朝律法。

六月初七，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其他宗室诸人李孝基、李道玄、李神通等也在这一日全部封王。

六月初十，秦帝薛举出兵进攻唐朝所属的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李渊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率八道总管出兵御敌。

在唐朝建立仅仅四天之后，即五月二十四日，东都的留守官员王世充等人也拥立年仅十五岁的越王杨侗登基称帝，改元皇泰。

同日，杨侗任命段达与王世充同为纳言，段达封陈国公，王世充封郑国公，与元文都、卢楚、皇甫无逸、赵长文、郭文懿等七人共同执掌朝政，时人称为“七贵”。

东都朝廷的老少爷们儿虽然集体升格了，但东都的形势却比以前更为严峻。

因为前面有虎后头有狼。一个李密就够让人头疼了，现在居然又来了一个宇文化及！

该怎么办？

有一个叫盖琮的人向杨侗上疏，建议招降李密，共同对付宇文化及。内史令元文都和卢楚等人商议说：“而今我等大仇未报（指杨广被杀一事），且兵力不足，如果赦免李密，命他攻击宇文化及，让他们互相残杀，我等便有机可乘。等到宇文化及败亡，李密必定也是疲惫不堪，再加上他的将士贪图我们的官爵赏赐，到时候就容易离间，连同李密都能手到擒来！”

众人都觉得这是拯救东都的上上之策，于是奏请杨侗，任命盖琮为通直散骑常侍，让他携带皇帝诏书前去游说李密。

宇文化及进入中原后，虽然兵不血刃地拿下了东郡，但是此地有限的粮食储备显然不足以养活他的十几万军队。

所以，必须找一个粮食充足的地方作为根据地，他才能在中原长期立足。

宇文化及很快就把目光瞄向了东郡北面不远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徐世勣驻守的黎阳仓。

这一年六月末，宇文化及擢升东郡通守王轨为刑部尚书，命他驻守滑台（东郡郡治所在地，即今河南滑县），然后留下所有辎重，亲率大军北上，渡过黄河进围黎阳仓城。李密得到消息后，立刻率两万步骑进抵清淇（今河南淇县东南）。

可他却不急着与宇文化及开战，而是深挖壕沟、高筑营垒，与徐世勣烽火相应。每当宇文化及发兵攻城，李密就从背后攻击他，牵制他的兵力，让他无法全力进攻。

有一次，李密与宇文化及对峙于淇水（古黄河支流），两个人隔河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对话。李密一开口就劈头盖脸地数落他：“你们宇文家族本来是匈奴（鲜卑）人的家奴，姓破野头，到后来才跟了主人的姓。父兄子弟，皆受隋朝厚恩，富贵累世，举朝无二。主上失德，你不能死谏倒也罢了，反而擅行弑逆、欲图篡位，此举天地不容，你还想逃到哪去？不如速来归我，尚可保全子孙后嗣。”

李密骂完以后，感觉十分酣畅。他估计宇文化及一准会以牙还牙地回敬他几句。

不料却是一阵沉默。

宇文化及把头埋得很低，不知道在酝酿什么豪言壮语。默然良久，宇文化及突然抬头，怒目圆睁地大喊一句：“我和你谈的是厮杀，又何必搬弄一套书上的话？”（《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化及默然，俯视良久，瞋目大言曰：‘与尔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

李密大笑着对左右说：“宇文化及蠢到这个地步，还异想天开要当帝王，我拿一根棍子就可以把他摆平！”

接下来的日子，恼羞成怒的宇文化及大举修造攻城武器，发誓一定要拿下黎阳仓。徐世勣不与他正面决战，而是深挖壕沟，令他寸步不前，此后又挖掘地道，偷袭宇文化及的军营。宇文化及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徐世勣随即焚毁了隋军的所有攻城器具。

东都朝廷向李密抛出橄榄枝后，立刻得到了李密的热情回应。

一见到盖琮带来的杨侗诏书后，李密大喜过望，当即拟就一道奏疏，请求归降。

双方一拍即合。杨侗随即下诏任命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封魏国公，命他先讨平宇文化及再入朝辅政；同时任命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

在诏书中，杨侗极力褒扬了李密的忠诚，同时宣布："其用兵机略，一禀魏公节度！"（《资治通鉴》卷一八五）也就是说，东都军队今后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要听从李密指挥。

成功招抚李密之后，段达、元文都等人大为兴奋，认为东都从此太平，随即在上东门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众人赋诗饮酒、载歌载舞，闹了个不亦乐乎。

只有一个人在宴会进行的过程中始终阴沉着脸。

他就是王世充。

王世充很愤怒。因为在招降李密这件事情上，他是最大的受害者。

大家都很清楚，王世充在东都朝廷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与李密抗衡。李密一日不死或者一日不降，他王世充就一日不可或缺。可如今李密居然降了，二话不说就降了！而且摇身一变成了仅次于皇帝杨侗的第二号人物，反倒骑到他王世充头上来了。瞧瞧那诏书是怎么说的："一禀魏公节度！"老子从江都千里迢迢地跑过来，为东都抛头颅、洒热血，和李密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到头来居然成了他李密的手下，要"一禀魏公节度"？

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世充盯着得意忘形的元文都等人，最后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竟然把朝廷的官爵送给盗贼，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此时此刻，元文都正在翩翩起舞。

他看上去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可眼角的余光却时不时地从王世充的脸上瞟过。

元文都很清楚王世充在想什么，可他拿不准王世充会干什么。

王世充会不会一气之下转而投靠宇文化及？

难说！

就在某个转身的刹那，元文都与王世充的目光无意中碰到了一起。

几乎只在十分之一秒间，两个心事重重的政客就各自给了对方一个温柔的笑容。

元文都朝王世充亲切友好地点点头。

王世充也朝元文都亲切友好地点点头。

都说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这世间当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亲切友好的笑容。

在这种耐人寻味的相视一笑之后，历史的剧情通常会很血腥。

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政客的假面具与誓言

李密收到东都朝廷的任命状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调集精锐，全力对付宇文化及了。

李密知道宇文化及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军队，毕竟这十几万人原本都是杨广的近卫军，其战斗力不可小觑。但是宇文化及最大的弱势有二：一是他本人没能耐，二是他的军队缺粮食。

为了充分利用这两个弱点，李密想了一计——跟宇文化及言和。

宇文化及果然中计，从此让将士们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他相信李密的三大粮仓不久就会向他敞开。可很快宇文化及就发现自己被愚弄了。因为李密有一个部属犯罪逃亡，投靠了他，把李密的阴谋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宇文化及勃然大怒，立刻率军渡过永济河，向童山（今河南滑县北）的李密大营发起进攻。

由于隋军的粮食已经吃光，因此这一仗，隋军将士人人抱定决一死战之心，对瓦岗的进攻空前猛烈。从辰时（上午七时）到酉时（晚上七时），隋军的攻击一波紧接一波，一刻也没有停止。李密率部奋力抵御，激战中被流箭射中，从马背上一头栽下，当即晕厥。左右侍从四散逃命，隋军立刻蜂拥而上。

眼看李密将死于乱刀之下，瓦岗军转眼就要一败涂地，生死存亡的一瞬间，有个人拼死挽救了李密的性命，也挽救了整个瓦岗的败局。

他就是秦叔宝。

当所有人各自逃命的时候，只有他坚守在李密身边，以一人之力挡住了围上来的隋兵，李密才得以逃过一死。

秦叔宝救出李密后，马上召集残部，重新组织防御，又击退了隋军的数次进攻。由于天色已晚，激战了一整天的隋军士兵都已精疲力竭，宇文化及只好率部撤出了战场。

为了解决军队的粮荒，宇文化及一边进入汲郡（今河南淇县东）搜刮粮食，一边派人回东郡，逼迫当地官民缴纳军粮。东郡的官民不服，宇文化及的手下就将他们逮捕，并且严刑拷打。东郡通守王轨忍无可忍，遂暗中派遣通事舍人许敬宗去晋见李密，请求投降。李密随即任命王轨为滑州总管，并将许敬宗留任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共事。

这个许敬宗日后成了李世民帐下的主要幕僚之一，与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孔颖达等人并称“秦王府十八学士”，并在贞观初年与魏徵、颜师古、孔颖达等人共同编修了《隋书》。

宇文化及得知王轨叛变，意识到自己在中原已经难以立足，不得不撤出东都战场，率军北上，准备朝黄河北面发展。

可一路上却不断有将领带着部众逃亡，南下投降了李密。其中有陈智略率领的岭南精锐一万余人，樊文超率领的江淮勇士数千人，张童儿率领的江东勇士数千人。宇文化及无力阻止，只能带着残部两万人继续北上，最后进抵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

李密知道宇文化及已经无所作为，遂留下徐世勣防备他反扑，然后率大军返回洛口。

李渊父子及其政治军事集团自从晋阳起兵之后，无论是南下河东、西进关中，还是攻克长安，建立大唐王朝，一路走来都是顺风顺水、所向披靡，几乎从未遭遇过什么挫折。

老天爷好像总是站在李渊一边。

不过到了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七月，也就是大唐王朝刚刚建立的两个月之后，这种凯歌高奏的大好形势却被秦帝薛举在战场上一举打破了。

当时薛举亲率大军进逼高墌（今甘肃泾川县东），前锋的小股部队已经突进到豳州（今陕西彬县）和岐州（今陕西凤翔县）一带，来势甚猛。可唐军元帅、秦王李世民却在这关键时刻染上了疟疾。李世民只好命令军队深挖壕沟、高筑营垒，并且把军队的指挥权暂时交给了纳言、元帅府长史刘文静和司马殷开山，同时警告他们：“薛举一支孤军，深入我方腹地，时间一久，必定粮草短缺、士卒疲惫。所以，他要是前来挑战，你们千万不要应战，等我病愈，再为诸君破敌！”

然而，刘文静和殷开山并没有听从李世民的警告。

一走出李世民的大帐，殷开山就对刘文静说：“大王担心您对付不了薛举，才有此言。而薛举听说大王患病，必定掉以轻心，我们应该趁机露一手给大伙瞧瞧。”

此言正中刘文静下怀，于是他立刻率军在高墌西南列阵，准备与薛举一决雌雄。薛举风闻唐军出战，大喜过望，一边正面列阵，一边派出一支奇兵绕到唐军背后。

武德元年七月初九，薛举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北）大败刘文静。唐军的八道总管全部溃败，超过半数的士兵阵亡，大将军刘弘基、慕容罗睺、李安远等人全部被俘。李世民只好率部撤回长安。薛举乘胜进占高墌，并将唐军的尸体堆成一座高台，以炫兵威。

这是李渊自起兵以来遭遇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刘文静等人自然是罪不可恕。回到长安后，刘文静和殷开山当即被李渊革职。

浅水原兵败实在是出乎李唐朝廷的意料，不过短短三天后，另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抹掉了李渊和所有人心头的阴影。

那就是郭子和的归降。

郭子和这个人本来就没什么野心，自从去年三月在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起兵后，一年多来始终固守榆林的一隅之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他虽然自称永乐王，但在起兵之初就坚决推掉了东突厥给他的“平杨天子”封号，可见其为人相对低调——起码比欣然接受突厥册封的刘武周和梁师都要低调得多。

而在隋末唐初这样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一个低调和没有野心的人是很容易出局的。

与其被人淘汰出局，落得个身死族灭、一无所有的下场，还不如主动出局，起码可以保住后半生和子孙的爵禄富贵。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郭子和作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归降唐朝。

李唐朝廷随即任命他为灵州（今宁夏灵武市）总管。

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子和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四方的割据群雄逐一败亡、灰飞烟灭的时候，他却能步步高升、富贵常保。归降不久，郭子和就被封为金河郡公，武德年间被赐姓李，拜右武卫将军；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被赐封邑三百户；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徙封夷国公；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转任黔州都督；后来一直活到了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虽然他的生年史书无载，但稍微推算一下便可知道，他享年绝对在八十岁以上。

所以说，这是一个聪明的出局者。

李密把宇文化及逐出中原之后，东都朝廷人心大悦、群情振奋，只有王世充咬牙切齿地对麾下将士说：“元文都这帮人只是一群刀笔吏罢了，依我看，他们早晚要死在李密手上！我们自从跟李密的瓦岗军交战以来，杀死他们的父兄子弟不计其数，一旦成为他的手下，我们恐怕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将士们听完后大感忧惧，而比他们更忧惧的是元文都。他担心的不是李密，而是王世充。

当王世充的这番话传进他的耳中时，元文都立即与卢楚等人紧急磋商，决定先下手为强，在百官上朝的时候埋设伏兵，干掉王世充。

政客的假面具一旦撕破，必然是一场血流满地的生死PK。

可是，元文都和卢楚等人绝对不会料到，即将血溅东都的人不是王世充，而是他们。

因为他们的暗杀计划刚刚拟定，一贯胆小如鼠的段达担心干不过王世充，索性第一时间就把消息告诉了他。

王世充冷笑——就凭这帮耍笔杆的，也想跟老子动刀？

这一年的七月十五日深夜，三更时分，王世充突然发兵攻击皇宫的含

嘉门。元文都闻变，急入皇宫，把杨侗“请”到了乾阳殿，派兵守卫，然后命令各将领死守各道宫门，并进攻王世充。将军跋野纲接到命令，刚刚率兵出宫，一遇到王世充就立刻下马投降了。而将军费曜和田阇在宫门外迎击王世充，也逐渐不支。元文都见情况危急，准备亲率禁军从玄武门出宫，绕到王世充背后进行攻击。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负责管理宫门的长秋监（宦官总监）段瑜声称找不到钥匙，无法打开宫门。而心急火燎的元文都面对那把“铁将军”，居然也一筹莫展。直到天色将明，元文都才折回身，准备从另一头的太阳门出宫。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当元文都行至乾阳殿时，王世充已经攻破了太阳门，带着士兵杀进了宫城。

果然就像王世充说的，元文都这种人的确只能耍耍笔杆子，要说跟王世充动刀子，那绝对是在找死。连玄武门上的一把“铁将军”都奈何不得，就算拿到钥匙，带兵出了宫，元文都就能打得过王世充吗？

他只能死得更快！

王世充一入宫，所有人都意识到死期已到，于是各自逃命。“七贵”之一的兵部尚书皇甫无逸抛下老娘和妻儿，慌忙砍开右掖门，逃出东都，直奔长安而去。而卢楚则一头躲进了太官署（宫廷膳食部），被王世充的士兵搜出，乱刀砍死。

王世充长驱直入，开始进攻乾阳殿前的紫微门。杨侗派人登上紫微门楼，质问王世充为何带兵入宫。王世充下马致歉，说：“元文都和卢楚等人无端欲加害于臣，请诛杀文都，臣甘愿领罪。”段达闻言，立刻下令逮捕元文都，交给王世充。

元文都看了杨侗一眼，说：“我早上死，晚上就轮到陛下了。”

年仅十五岁的小皇帝杨侗恸哭不止，只能挥挥手让人把他带出去。

元文都一出门，转眼就被砍成了肉酱。元文都和卢楚的儿子们悉数被王世充逮捕，全部砍杀。段达传天子命令，打开宫门迎接王世充入宫。王世充让部将立即接管皇宫的宿卫之权，然后入乾阳殿觐见杨侗。

面色惨白的小皇帝指着王世充说：“你擅行诛杀，未曾奏报，这岂是为臣之道？莫非凭借手中兵权，连我也要杀吗？”

王世充拜伏在地，痛哭流涕地说："臣蒙先帝拔擢，粉身碎骨无以为报！文都等人包藏祸心，欲召李密危害社稷，因臣不愿与其合作，便深相猜忌，臣为情势所迫，不暇奏报。如果臣有二心，辜负陛下，天地日月为证，臣情愿被满门抄斩，一个不留！"

小皇帝终于被王世充的一番发誓赌咒彻底打动了，于是命他上殿，与之叙谈良久，然后带他一起晋见了皇太后。王世充解开头发，披散两肩，一再指天盟誓，称自己绝不敢怀有二心。杨侗当天就擢升他为左仆射，并总督内外诸军事。

十六日中午，王世充又捕杀了赵长文、郭文懿，随后亲自巡城安抚军心。

至此，"七贵"死了四个，逃了一个，只剩下大权独揽的王世充和那个怯懦无能的段达。

东都朝廷从此完全落入王世充的掌心。他命自己的兄长担任内史令，让子弟掌管兵权，同时让自己的亲信党羽入主朝廷的所有要害部门。一时间，王世充权倾内外，朝野上下无不趋附，小皇帝杨侗被彻底架空。

短短半年多后，王世充就废掉杨侗，自己当了皇帝。不知道在最后被幽禁的日子里，昔日的小皇帝杨侗想起王世充当初赌咒发誓的那番情景，心里会作何感想？

他也许只能感叹——王世充的誓言真是太不可信了！

不过话说回来，要求政客守信纯属无稽之谈。

在这种事情上一般不能怪政客无耻，只能怪相信他们的人无知。

然而，小皇帝杨侗就算不无知又能怎么样呢？

刀枪里面出政权！

杨侗就算不相信王世充的誓言，他也必须相信这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不管相不相信王世充，杨侗的结局都一样。

英雄末路：瓦岗的覆灭

大业十四年（武德元年）九月，东都的秋凉一日比一日更浓。

而这些日子以来，瓦岗的人心也一日比一日更凉。

因为李密自从干掉翟让之后，人就变得越来越骄矜，对待部众的态度也开始悄悄发生了转变。

他再也不像从前那么体恤下属了。

除此之外，让瓦岗将士心凉的原因还有两个：一、由于瓦岗除了粮食什么也没有，将士们虽然屡立战功，可从来得不到钱帛之类的赏赐；二、李密往往对新附的人礼遇甚周，相形之下就冷落了旧人。

瓦岗人为此愤愤不平。

就连一向心胸宽广的徐世勣也忍不住在一次宴会上暗讽李密，希望他意识到身上的缺点和当下存在的问题。

可现在的李密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和谐的声音了。

他极为不悦，从此开始疏远徐世勣——把他派驻黎阳仓，表面上是委以重任，实际上是将他排挤出瓦岗总部。

对瓦岗人心离散的现状，李密固然有所察觉，可他认为事态并不严重，一切仍然在他的掌控之中。

到了这一年秋天，李密甚至感觉形势正在朝好的方向转化。

因为他刚刚击溃了宇文化及的十几万大军，收降了许多精锐，继而又听说东都发生了火并，王世充那帮人正在自相残杀，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这一切都让李密乐观地以为——东都已经指日可下了。

然而，李密过于乐观了。

东都火并不仅没有削弱王世充的力量，反而让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他现在掌握了东都的军政大权，随时可以调集兵力对李密发起总攻。

在王世充看来，岌岌可危的不是东都，而恰恰是李密——是他所领导的瓦岗军。

因为童山一战，宇文化及虽然败了，可李密的瓦岗军也遭受了重创。他的精锐多半死在了战场上，剩下的这些人的战斗力也已大不如前。

所以，王世充也同样乐观地相信——李密的败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两个同样乐观自信的男人。

一对注定你死我活的冤家。

命运只好安排了一场终极对决，来结束他们之间旷日持久的对峙和较量。

这一年九月初十，王世充率先出手了。他严格挑选了两万精锐，火速东进，于次日进抵偃师（今河南偃师市）西面的洛水，迅速架设了三座浮桥。

此时的李密正驻守在洛阳北面的金墉城，而王世充甩开李密，全力东进，很明显是要抢占洛口仓——因为东都军队快断粮了。

李密急命王伯当留守金墉，自率精兵驰援偃师，在邙山南麓扎营，然后命单雄信率前锋骑兵进至偃师城北扎营。

九月十一日，李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战守之策。裴仁基主张采取守势，他说：“王世充倾巢而出，洛阳必定空虚。我们可兵分两路，一路扼守险要，阻止他东进；另一路则直扑东都。如果王世充回军，我们就按兵不动；如果他再次东进，我们就进攻东都。这样一来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而他疲于奔命，必定被我军击破。”

李密同意裴仁基的方案，并进而分析说：“隋军如今有三样锐不可当。其一，武器精良；其二，决意东进；其三，粮尽而战。所以我们只需据城固守，蓄力以待，王世充欲战不得，欲走无路，不出十天，他的首级就会送到我们的麾下。”

应该说，裴仁基和李密的这个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这一仗真的按照这个计划来打，失败的人肯定是王世充，绝不会是李密。

然而，命运之神却在这关键的时刻背弃了李密。

因为绝大多数将领反对这个计划。

刚刚从宇文化及手下归降的陈智略、樊文超等人都急于建功，所以和单雄信一起极力主战。他们坚持说：“王世充的军队人数并不多，而

且屡屡被我们打败，早已丧胆。兵法有言：‘人数超过敌人两倍就应该进攻。’何况现在我们绝不止两倍！再说了，江淮新附的将士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建立功勋，趁他们斗志高昂的时候作战，一定能够取胜。”

李密心动了。是啊，如果可以一战破敌，又何必拖延呢？

他随即采纳了多数人的建议——战！此刻的李密当然不会知道，他的败亡之局就在这一个字中一锤定音了。

裴仁基苦苦劝阻，可李密心意已决。

裴仁基顿足长叹，说：“公必悔之！”

与此同时，没有资格参加军事会议的魏徵也在对长史郑颋说：“魏公虽然在童山战役中转败为胜，但是勇将锐卒多数阵亡，剩下的士卒士气低落，这种情况不利于对敌作战。而且隋军缺粮，志在死战，难以争锋。不如深沟高垒以拒之，旬月之间，王世充粮尽，必然撤退，到时候全力追击，没有不胜的道理。”

魏徵说得头头是道，郑颋只斜睨了他一眼，说：“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

魏徵火冒三丈：“这是奇策，怎么叫老生常谈？”随即拂袖而去。

九月十一日午后，王世充派遣前锋部队的数百名骑兵渡过洛水，袭击单雄信的军营。李密得到消息，即命部将裴行俨和程知节等人前去增援。裴行俨抢先杀入敌阵，被流矢射中，坠落马下。程知节立刻冲上去，杀了数名敌兵，将裴行俨抱上自己的马背。隋军在后面穷追不舍，一个骑兵赶了上来，一矛刺出，穿破了程知节的铠甲。程知节转身抓住长矛，猛然将其折成两段，随后砍杀了隋兵，终于将裴行俨救回大营。

这次小规模的遭遇战，除了裴行俨之外，李密的部下骁将孙长乐等十几人全部受了重伤。

当天深夜，王世充又派遣两百多名骑兵潜入邙山，埋伏在李密大营附近的山涧中，准备次日决战时作为内应。

九月十二日晨，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王世充集合部队誓师，高声说：“今日之战，不仅是争一个胜负，生

死存亡也在此一举。如果赢了，荣华富贵自然到手；要是输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所以，这一战关系到每个人的存亡，不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战，更是为了你们自己而战！”

正所谓哀兵必胜。

此时王世充的军队已经落入断粮的绝境，所以对这两万名士兵来讲，奋力前进打败李密，他们还有生还的机会；要是退缩，就算回到东都，也无疑是死路一条。所以，当这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军队进至李密大营时，王世充一声令下，两万人便像离弦之箭射了出去，人人奋勇争先、拼死砍杀，其势果真就像李密说的——锐不可当。

这一仗打得空前惨烈，因为双方都志在必得。

两军激战正酣时，王世充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招杀手锏。

他事先找了一个相貌酷似李密的人，此时将其五花大绑推到阵前，命人高呼：“已活捉李密！”士卒皆高呼万岁。瓦岗军见状，顿时士气大挫。紧接着，昨夜埋伏在此的那些隋军又忽然出动，直扑李密大营，纵火焚烧帐篷房舍。当瓦岗军看到身后冲天而起的火光时，意志瞬间崩溃，开始四散逃命。昨天还极力主战的陈智略等人立刻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带着残部一万余人，仓皇逃奔洛口。

李密绝对没有想到，这次逃亡竟然把他的人生送上了穷途末路。

他原以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多久就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可他错了。

邙山之败已经给他的军事生涯和逐鹿中原的大业彻底画上了句号，同时也给他波澜起伏、精彩壮阔的一生画上了一个破折号。

破折号后面写着两个字——死亡。

虽然几天后李密就逃进关中投降了唐朝，可这不过是延缓了他的死期而已，终究没能挽回他覆亡的命运。

李密的这次逃亡真是一场伤心之旅。

因为兵败如山倒。他一路跑，他的部众就在身前身后一路降。

当天夜里，王世充进围郑颋镇守的偃师。还没等隋军攻城，郑颋的部

将就打开城门，投降了王世充；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数十个文武将吏全部被俘。紧接着，单雄信等人又各自为战，拒绝接受李密的号令，致使王世充的军队迅速渡过洛水，单雄信随即率部投降。李密还没抵达洛口，驻守仓城的长史邴元真就已经暗中派人前去接应王世充的部队，准备开门迎降。

李密终于绝望了。

人心靠不住，人心真是太靠不住啊！

其实，自从除掉翟让之后，就不断有人建议李密斩草除根，把翟让的旧部全部干掉，以绝后患。比如当时房彦藻就曾力劝他除掉单雄信。他说单雄信是一个“轻于去就”的人，不可能从一而终，早杀早好。可李密始终下不了手，因为单雄信勇冠三军，在军中有“飞将”之称，李密爱惜他的才干。再比如，部将宇文温也曾劝他干掉邴元真。他说邴元真这个人是翟让的死党，其长史的职位就是翟让力荐的，心里对翟让感恩戴德，留着这样的人，迟早是个祸害。可李密听完却不置可否，因为他不希望在攻克东都之前搞太多的窝里斗。此后他只是暗中提防邴元真，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最后消息传到邴元真耳中，使其随即下定反叛的决心。

想起这一切，李密真是感慨万千，追悔莫及。

莫非自己真的是心太软？

可是，心不软又能怎样？杀人固然简单，问题是稳定太难！就算把翟让的旧部通通杀光，一个不留，瓦岗就能上下一心、坚如磐石了吗？

未必。

而且提早动手的结果很可能是把这些骄兵悍将提前逼反！

况且，要杀多少人才算把翟让的“旧部”清除干净？瓦岗原本就只是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匪帮凑到一起的松散联盟，从来就不是一支军纪严明、号令统一的正规部队，要论战斗力那是没的说，可要论部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那基本就是扯淡。自从李密执掌领导权以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松松垮垮、谁也不服谁的状况，但无法从根本上洗掉这些人身上的匪气，也扭转不了他们三心二意、随时准备跳槽的“打短工思维”，当然也就不可能把瓦岗军打造成一支以他李密为核心的具有高度忠诚与合作精神的团队。所以，小团伙的利益、江湖哥们的义气等潜规则其实一直在李密的表面权威之下大行其道。换句话

说，瓦岗寨这些老少爷们儿之间各种潜在的利益关系始终是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的。在此情况下，李密凭什么认定哪些人是翟让的“旧部”，属于定点清除的对象，而哪些人是一干二净，与翟让小集团毫无瓜葛的？这个标准要如何厘定、如何拿捏？

其实，这样的标准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说到底，真正对李密构成威胁的并不是什么翟让的“旧部”，而是一张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隐性的利益联结网。除非李密彻底撕破这张网，把瓦岗军改造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军，否则各种隐患就不可能被消除。换句话说，除非李密只留下少数心腹，把其他的人通通杀光，否则就不能算清除干净。

然而，李密能这么做吗？

当然不能。

再说了，自从坐上瓦岗的头把交椅，李密基本上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先是跟东都军队打，继而跟王世充打，后来又跟宇文化及打，天天席不暇暖、枕戈待旦，让他压根就腾不出手来清理内部。如果硬要动手，那无异于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自毁长城！

所以，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句——形势比人强！

就像当初柴孝和提出放弃东都、西进关中的建议时，李密只能表示无奈一样，此刻的李密也只有无奈。

洛口降了，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李密打算前往黎阳投奔徐世勣。可左右立刻警告他：“当初杀翟让的时候，徐世勣差一点就被做掉，眼下打了败仗才去投靠，您觉得安全吗？”

李密连忙勒住了缰绳。

是啊，徐世勣是地地道道的翟让旧部，而且被李密排挤到了黎阳，现在再去投奔他，凶多吉少！

好在原本驻守金墉城的王伯当此时已经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李密即刻掉转马头，率残部投奔王伯当。抵达河阳后，李密马上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瓦岗下一步的走向。

这次会议的气氛与几天前的那一次迥然不同。

人人垂头丧气。

人人心不在焉。

李密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决定南以黄河为界，北以太行山为界，东面与黎阳遥相呼应，在这个地区重新打造出一块根据地，再慢慢谋求发展。

此时此刻，李密的目光仍然是坚定的、自信的、乐观的。

起码看上去是这样的。

然而，他的计划却遭到了所有与会将领异口同声的反对。他们说：“大军刚刚溃散，人心惶恐不安，要是留在这里，恐怕用不了几天都会逃光。人心已去，不愿再战，成不了什么事了！”

李密瞟了众人一眼。

众人也瞟了李密一眼。

人心已去？

李密在心里苦笑——要说人心已去，这瓦岗的人心早就去得一塌糊涂了！只不过从前去得隐晦，去得巧妙，去得偷偷摸摸，现在去得猖狂，去得潇洒，去得理直气壮罢了！

去就去吧，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一切都已随风远去，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李密唰的一声抽出了身上的佩刀。

他想杀人。

杀一个叫李密的人。

李密一字一顿地说：“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说完一刀挥向自己的脖子。

不过李密这一刀的速度是大有讲究的。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别人来不及拦他，太慢会露出破绽。所以“挥刀自刎”也是一个技术活，它是古往今来许多政治人物在身陷绝境时的最后一张牌。

一张悲情牌。

要把这张悲情牌玩好的前提是要拿捏一个最恰当的时机，而且身边必须有人配合。否则这张牌砸在手里，就会把自己玩死。

现在跟李密配合的人就是王伯当。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死死抱住李密，同时放声大哭，而且哭得荡气回肠、满座皆惊，直到把自己哭晕过去。

在座的人无不动容。有人赶紧跑过去掐王伯当的人中，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忍不住涕泪飞扬。于是一屋子的大男人就这么哇哇地哭了起来。等大伙哭得差不多了，李密收起佩刀，也收起眼泪，对众人说：“诸君若不见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

众人闻言，纷纷破涕为笑。

这话他们爱听。这里混不下去就走人嘛，多简单的道理！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现在居然是老大要亲自带领他们集体跳槽，这实在是让人惊喜。幕僚柳燮立即代表众人说：“明公与唐公乃李氏同族，又曾订立过友好盟约，虽然没有一同举兵，却替他挡住了东都的隋军，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这也是明公的功劳啊！”

众人频频点头，异口同声地说：“然！”

于是，李密带着两万余人西向关中，投奔李渊而去。

李密一走，仍然驻守在中原各地的其余部众顿时群龙无首，只好连人带城纷纷归降东都朝廷。

世间再无瓦岗。

李密彻底出局。

公元618年秋天的夕阳下，李密策马西去的背影显得落寞而苍凉。

这是一个英雄的末路。

这一天，西天的晚霞一直在灼灼燃烧——在李密前途叵测、去日无多的生命里凄艳地燃烧。

落日殷红，像极了一个末路英雄滴血的伤口。

消灭西秦薛举

大业十四年秋天，从东都战场上败逃，退守魏县的宇文化及遭遇了第三次未遂兵变。

宇文化及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该死的兵变老是像噩梦一样缠着他不放？

还好他的警惕性一直很高，军中遍布耳目，所以总能在兵变的前一刻得到消息。

这一次造反的人是他的心腹张恺。

宇文化及得到密报后，迅速逮捕了张恺及其党羽，并全部诛杀。虽然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可宇文化及的心情还是一天比一天郁闷。

因为从江都带出来的十几万军队死的死、逃的逃，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北面有势力强大的窦建德，南面有骁勇善战的徐世勣，他们宇文兄弟只能龟缩在这魏县一隅，眼见局面日蹙，可他们却无计可施。

郁闷而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宇文兄弟只好整天借酒浇愁。每次喝醉，宇文化及就会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对宇文智及说："干这桩事，起初我并不知情，都是你的安排，强迫我当老大。现在可倒好，干什么都不成，兵马一天天逃散，还背上一个弑君的恶名，为天下所不容，眼看就要被灭族了，都是你小子惹的祸！"说完与两个儿子抱头痛哭。

宇文智及一听就跳了起来，怒气冲天地说："当初事情顺利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种话？现在要坏事了，就把屎盆子都扣到我头上！你为何不干脆杀了我，去投降窦建德？"

在魏县的这些日子里，宇文兄弟就这样抱着酒坛子终日对骂，除此之外什么也干不了。

部众不断有人逃亡。眼看自己的末日即将降临，帝王梦就要破碎，宇文化及仰天长叹："人生固有一死，难道我就不能当一天皇帝？"

过把瘾就死！

宇文化及豁出去了。

这一年九月末，宇文化及强迫傀儡皇帝杨浩喝下了一杯毒酒，然后登基称帝，国号为许，改元天寿，同时设立文武百官。

李密刚刚进入潼关，李渊派出的使者就络绎不绝地前来迎接。李密大喜，对左右说：“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数百座城池知我在此，一旦遣使招之，必定纷纷来归。我之功劳，比之东汉窦融（公元29年以河西之地归附刘秀，历任冀州牧、大司空等职）亦不算小，岂能不给我一个宰相当当？”

十月初八，李密率部抵达长安，然而，李密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盛大欢迎仪式。

非但如此，负责接待的部门对他们也相当冷淡，所提供的食宿条件也不好，有些士卒甚至整天吃不上饭。连饭都吃不饱，还奢谈什么富贵？将士们大为恼火，满腹怨言。

更让李密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是，几天后李渊虽然授予了他上柱国和邢国公的爵衔，可却莫名其妙地给了他一个光禄卿的职务。所谓光禄卿，说好听点叫宫廷膳食部长，说难听点就是管食堂的。

既然是管食堂的，朝廷的文武百官当然没人拿正眼瞧他，某些高官甚至还向他索贿，让他拜拜码头烧烧香。

李密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

不过李渊表面上却对他挺亲热，每次见面都笑脸相迎，嘴里总是老弟长老弟短的，而且还亲自做媒，把他的表妹独孤氏嫁给了李密。

李密就这么不情不愿地当上了管理食堂的光禄卿，硬着头皮把这个不知道长啥样的独孤氏娶过了门。可他每天都会无数次地告诉自己——这里不是我的归宿。

但是，究竟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宿？

李密感到无比茫然。

对于大唐王朝而言，它在关中最大的威胁无疑就是西秦薛举。

这是一个酣睡在卧榻之旁的人。浅水原之败更是把薛举的鼾声突然间放大了，大得让长安士民都有些心惊胆战。此人不死，李渊绝对睡不香。让人庆幸的是，七月初九唐军在浅水原惨败，八月初九薛举就死了——自己病死了。

这真是天佑李唐！

在竞逐隋鹿的赛场上，李渊刚刚丢了一分，老天爷二话不说就把薛举红牌罚下，显然颇有些偏心眼。薛举死后，秦太子薛仁果继任秦帝。虽然比赛继续进行，不过李渊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因为这个替补选手的实力不行，和他老子差了一大截。

李渊听说这个薛家的新掌门为人刻薄寡恩，在当太子的时候就跟将领们明争暗斗，现在虽然接了他老子的班，可将领们大多不买他的账。此外，薛举刚死不久，那个老成谋国的大臣郝瑗就因悲伤过度也跟着薛举去了。所以李渊料定，薛家的家底很快就会被薛仁果败光。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九月，秦王李世民率军进逼薛仁果驻守的高墌城。薛仁果命部将宗罗睺出城挑战，可李世民却紧闭营门，拒不出战。将领们纷纷请命，李世民说："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兵恃胜而骄，有轻我之心，所以我军应坚守营垒、蓄势以待，等到其军心骄躁，而我士气振奋之时，必可一战克之。"

李世民随后传令军中："敢言战者，斩！"

双方就这么对峙了六十余日，高墌城中的粮食终于吃光了，秦军将领梁胡郎等人纷纷率部向唐军投降。李世民知道秦军已经将士离心，遂命将领梁实孤军进驻浅水原，诱敌出战。宗罗睺大喜，果然出动所有精锐，对梁实的军营发起猛烈进攻。梁实按照李世民事先的部署，死守不出。军营中断水数日，梁实的人马一连几日滴水未进，可还是顽强击退了秦军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进攻。

经此数日激战，李世民料定秦军已是强弩之末，遂下达总攻命令，唐军立刻倾巢而出。宗罗睺匆忙回军，双方在浅水原展开决战。李世民亲率数十名骑兵率先冲击敌阵，大军紧随其后，发起猛攻，斩杀秦军数千人。宗罗睺的部众开始溃退，李世民准备率两千多名轻骑兵追击。他的舅父窦轨连忙拉住李世民的缰绳，苦苦劝阻："薛仁果仍据守坚城，我军虽破宗罗睺，但绝不可轻进，请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李世民一摆手说："此战是我酝酿已久的结果，现在正是破竹之势，机不可失，舅父你不要再说了！"随即扬鞭一挥，坐下那匹通体纯黑的骏马白蹄乌 [1] 立刻像离弦之箭向高墌城飞奔而去。

李世民率军进抵高墌城下，在泾水岸边扎营；薛仁果出动大军在城下列阵。片刻之后，薛仁果的麾下骁将浑幹等人率部出阵，向唐军大营飞奔而来。

眼看又是一场恶战，唐军士兵个个严阵以待。可接下来的一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秦军一到阵前便哗哗啦啦地扔下武器，全部向唐军投降。

李世民笑了。

这正是他忍了六十多天后志在必得的结果。

可薛仁果却差点哭了。他早知道这帮将领靠不住，可没想到他们会在这节骨眼上临阵倒戈。

无奈的薛仁果只好带着剩下的部众回城坚守。日暮时分，唐朝大军全部进抵高墌城下，将其团团包围。午夜，守城的秦军将士意识到薛仁果大势已去，争相出城投降。

十一月初八晨，脸色苍白、双目红肿的薛仁果万念俱灰地来到李世民的面前。他的身后是一个洞开的城门。

秦军当天全部投降。李世民接收了一万多名精锐士卒和高墌城的男女居民五万人。将领们纷纷向李世民道贺，可他们也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大王虽然在野战中击破宗罗睺，可薛仁果仍然据守坚城。您却不带步兵，不带攻城器械，只率少数轻骑直逼城下，大家都觉得难以攻克，为何竟能拿下高墌呢？"

李世民一笑，说："宗罗睺的部众都是陇西人，将领骁勇，士卒凶悍，我只是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并未摧毁他们的有生力量。如果行动迟缓，让他们撤回城中，薛仁果加以安抚，重新组织起来，就不容易对付了。所以我才急于进攻，迫使他们士众崩溃，逃回陇西。如此一来，高墌的防备自然虚弱，薛仁果胆裂，来不及应对，并且军心涣散，只能归降。这是十拿九稳的事情，诸君难道看不出来？"

众人大为叹服，都说秦王的谋略和胆识非常人可及。

收降了秦军的将士之后，李世民并未将他们改编，而是仍然把降卒交给薛仁果的兄弟以及宗罗睺等降将率领，而且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射猎，毫无猜忌之心。

西秦的众降将原本只是迫于形势而降，可以说是人降心未降，而如今他们却亲身感受到了李世民超乎常人的气度与胸襟，不禁被他的恩威所慑服，于是皆愿为其效死。此外，李世民还收降了薛仁果帐下的黄门侍郎褚亮，此人颇具时望，日后也成了"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

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世民班师回到长安，将薛仁果在闹市中斩首。数日后，李世民因功被李渊擢升为太尉，兼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正是从这时起，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华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没有人会怀疑，假以时日，这个年轻的二皇子必将成为大唐帝国最杰出的军事统帅。

割据陇西的薛举父子至此彻底出局。从起兵到败亡，历时仅一年零七个月。

李渊的卧榻之旁再无他人鼾睡。

可身边有一个人，却让他在这一年最后的日子里产生了一些烦恼。

这个人就是李密。

李密之死

李密当了一个多月的光禄卿，感觉自己的人生很失败。

想自己好歹也是牛角挂过书、瓦岗称过孤的，论学识，论事功，这李唐朝廷的衮衮诸公能有几个出其右者？可如今却沦落到替人置办酒菜的地步，真是衰透了。

几天前朝廷举办了一场大型宴会，李密职责所在，不得不忙里忙外地张罗。那几天，李密心头的怒火真是蹿得比御膳房的炉火还高。

宴会散后，李密跟王伯当大发牢骚。当时王伯当已经被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可他对这个职务同样也不满意，于是怂恿李密：“天下事都在您的掌握之中。而今东海公徐世勣在黎阳，襄阳公张善相在罗口（今河南巩县西南），河南兵马犹在，何苦再待在这里！”

李密遂下定决心叛唐，离开长安再展宏图。他向李渊上奏：“臣虚蒙荣宠，安坐京师，无所报效，山东豪杰多为臣之旧部，请让臣前往收抚。凭借我大唐国威，取王世充就像从地上拾一根草！”

李渊也正有此意，当即首肯，但是群臣却纷纷劝谏：“李密性情狡猾，很容易谋反，如今派他前往，就像投鱼入水、纵虎归山，肯定是不会回来了！”

李渊笑着说：“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纵使他叛我而去，也

不过像‘蒿箭射入蒿草’[2]。更何况，让他和王世充鹬蚌相争，我们正可坐收渔翁之利。”

十二月初一，李渊亲自设宴为李密等人饯行。同行的人有李密原来的幕僚贾闰甫。李渊把他们亲切地叫到身边来坐，还给他们夹菜，向他们敬酒，说：“我们三人同饮此杯，以明同心。希望你们好好建立功名，不辜负朕之期望。大丈夫一言既出，千金不换。确实有人坚决反对让老弟前往，可朕以一颗赤心对待老弟，任何人都无法挑拨离间！”

李密和贾闰甫叩头拜谢。李渊随即又命王伯当担任李密副手，一同启程。

李渊虽然在群臣和李密面前表现得十分坦然，可实际上他也是有顾虑的。

李密毕竟不是一支蒿箭那么简单。

这个年轻人虽然自负，可他的自负不是没有缘由的。瓦岗过去只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山寨，只是由一群不相统属的盗匪杂糅而成的变民武装，可在他手里却迅速崛起，变成了一支战斗力异常强大的割据政权，让东都朝廷和隋朝军队焦头烂额，李密也因而一度成为四方群雄共推的盟主。虽然这个称号水分不少，但不可否认，李密确实是一个兼具文韬武略的人才，也的确具有睥睨世人的资本。把这样一个人重新放回关东，固然显示了李渊作为一个圣明君主的大度和自信，但是这么做就没有一点风险吗？李渊难道不担心李密东山再起、死灰复燃吗？

不，李渊承认这么做是有风险的，但是在没有明显证据表明李密确有复叛之心的情况下，李渊也只能暂时表现出他宽容大度和用人不疑的一面。当然，与此同时李渊也进行了防范。他没有让李密把瓦岗旧部悉数带走，而是命他把一半部众留在华州（今陕西华县），只带另一半部众出关。

在随同李密出关的部众中，有一个人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这个人叫张宝德，是李密麾下的长史。

他之所以内心恐慌，是因为他料定李密此行必叛。而他现在已经一意归唐，再也不愿当一个四处流亡的草寇了，更不想在李密败亡的时候跟着他一块遭殃。所以张宝德迅速给李渊呈递了一封亲启密奏，列举

了很多理由，揭露了许多内情，其结论只有一个——李密必叛。

看着这封密奏，李渊后悔了。

他承认群臣说得没错——这的确是在放虎归山，很可能会后患无穷，但是李密早已走出潼关了，怎么办？

李渊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李密召回来，可又担心这样做会把他提前逼反。考虑再三，李渊只好颁了一道慰劳李密的诏书，命他暂且回京，再接受一个任务，让他的部众缓慢前行，等李密接受了任务再赶上去和部众会合。

然而，李渊的这招缓兵之计骗不了李密。

此刻的李密已经走到了稠桑（今河南灵宝市北）。他接到诏书后，发出一声冷笑，对贾闰甫说："诏书遣我出关，无端又命我回去。皇上自己都说过，有人坚决反对我出关。看来他已经听信挑唆之言了，我现在要是回去，绝对难逃一死，不如先就近攻破桃林县（今河南灵宝市东北），收其士兵和粮草，北渡黄河。等消息传到唐军驻守的熊州（隋宜阳郡，今河南宜阳县西），我们早已远走高飞。只要能进入黎阳，大事必成，不知你意下如何？"

贾闰甫看着李密，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预感到李密的败亡就在眼前。

贾闰甫说："皇上的姓名与图谶相应，天下终当一统。明公既已归附，岂能再生二心？况且史万宝和任瑰等将军驻守在熊州和穀州（隋新安郡，今河南新安县），我们早上发动，他们大军晚上就到。即便攻克桃林县，军队岂能一时集结？一旦被宣布为叛逆，还有谁愿意接纳？为明公计，不如暂且接受诏命，以表明绝无异志，如此一来，挑唆之言自会平息。前往山东之事，应当从长计议。"

李密勃然大怒："李唐朝廷根本没有重用我之意，我岂能忍受？至于说图谶，我和李渊应验的机会一样大。如今他不杀我，让我东行，这足以证明王者不死！纵使唐朝据有关中，山东终归我有，此乃上天所赐，我为何不取，反而要自缚双手去投降别人？你是我的心腹，竟然会有这种想法，如果不能跟我一条心，我只好杀了你再走！"

贾闰甫当即泪下，哽咽着说："明公虽应图谶，然时局已非同往日。今海内分崩，强者为雄，明公正在流亡，谁肯听从？况且自从诛杀翟让以来，人人都说明公弃恩忘本，今日谁肯将手中军队再交与您？他

们担心被您夺走兵权，势必争相抗拒，一旦失势，岂有容身之地？若非身受重恩之人，谁肯像我这样直言不讳？愿明公熟思之，只恐大福不再。只要您有立足之地，闰甫又何惜一死？”

贾闰甫的话其实句句是忠言，对形势的判断也不可谓不准确。

然而此刻的李密已经是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他只想孤注一掷，把所有的本捞回来。

唰的一声，李密再次抽出了佩刀。

这次李密不是把刀挥向自己，而是挥向了贾闰甫。

又有人迅速抱住李密。

还是那个王伯当。

在王伯当的苦苦求情之下，李密放过了贾闰甫。当天贾闰甫便逃往唐军驻守的熊州。王伯当也认为贾闰甫的分析有道理，所以极力劝阻李密。可李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王伯当最后只说了一句：“义士之志，不因生死存亡而改变。公必不听，伯当自应与公同死！只恐吾之一死无益于公。”

李密什么话也没说，随后就砍杀了李渊派来的传诏使者，而他的悲剧也就此注定。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二月三十日。

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开始。

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隋炀帝杨广的死亡与大唐王朝的诞生。而在这一年的最后时刻，又会发生什么呢？

李密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答案。

这一天凌晨时分，李密派人通知桃林县令，说他接到皇帝诏书，准备暂返京师，请允许让他的家属在县府暂住数日。桃林县令当然表示欢迎。李密随即挑选了数十名麾下勇士，让他们换上女人衣服，头蒙面纱，刀藏裙下，诈称妻妾，随同李密进入县府。片刻后，李密带领他们突然杀出，占据了县城，然后裹挟当地士兵，直奔熊耳山，沿险要道路向东进发；同时派快马飞报他的旧部、时任伊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的张善相，命他出兵接应。

驻守熊州的唐右翊卫将军史万宝对副手盛彦师说："李密，骁勇之贼也，又有王伯当辅佐，而今决意叛变，其势恐怕难以抵挡。"

盛彦师笑着说："请给我几千人马，一定砍下他的人头。"

史万宝问："你有何计？"

盛彦师再次狡黠地一笑："兵不厌诈，恕在下无可奉告。"

随后，盛彦师率部赶在李密之前进抵熊耳山南麓，立刻封锁要道，命弓箭手埋伏在两侧高地，步兵埋伏在山涧之中，下令说："等贼人走到一半，同时发起攻击。"有部将问："听说李密要东奔洛阳，将军却进入深山，这是为何？"盛彦师胸有成竹地说："李密声称要去洛阳，实际上是打算出人不意直奔伊州，投奔张善相。如果让贼人先行一步进入谷口，而我军从后面追击的话，山路险窄，我们难以进攻，他只要派一名部将殿后，就能挡住我们而从容逃脱。现在我们先占领了谷口，必定能将其手到擒来。"

李密率众马不停蹄地奔至熊耳山时，自认为已经脱离了危险，于是放慢速度，缓缓穿越山谷，刚好进入了盛彦师的伏击圈。盛彦师占据有利地形，突然发动攻击，将他们拦腰截断。李密部众首尾不能相顾，顿时溃散。

死亡竟然来得如此猝不及防！在这个滴水成冰的冬日午后，在这个白雪覆盖的山涧之中，一个曾经驰骋中原、号令四方的英雄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步。

天地之大，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李密看见唐兵从四面八方向他围了上来。

唐兵越围越近，李密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粗重的喘息声。

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李密仰望苍穹，有什么东西瞬间模糊了他的双眼。

唐兵举起了刀，一道寒光闪过，李密的头颅飞离了肩膀。还有一些液态的球状物同时飞离了李密的眼眶。

那是泪。

几颗悬而未落的泪。

李密死时，年仅三十七岁。王伯当自始至终都站在李密身边，遂一同被杀。

数日后，二人首级传至长安。

对李渊来说，这无异于一份新年贺礼——在王朝建立的第一个新年收到的第一份贺礼。

李渊很快就把这份贺礼转送给了一个人——徐世勣。

严格来讲，应该说是李世勣。因为早在一个多月前，李渊就已经把皇姓赐给了他。

当时李密入关归唐，徐世勣仍然据有李密旧地，却没有归属，而且也没有自立的打算。随同李密归唐的魏徵由于不被李渊重视，就毛遂自荐，愿意代表朝廷前去招抚徐世勣。李渊遂任命他为秘书丞，派他前往黎阳劝降徐世勣。徐世勣马上就同意了，可是他的归附方式却与众不同。他对长史郭孝恪说："这里的民众和土地都归魏公所有，如果以我自己的名义献给唐朝，就等于是利用主公之败，邀取自己的功劳和富贵，对此我深以为耻。所以，我决定把属下的郡县、户口、军队、马匹的数目开列一张清单，交给魏公，由他自己呈献。"随后徐世勣便派遣郭孝恪携带这份清单前往长安。

李渊听说徐世勣的归降使者已经入朝，却无奏表呈给朝廷，只有一封信函呈给李密，他大为奇怪，遂召见郭孝恪。郭孝恪将徐世勣的本意做了说明，李渊听完后大为赞叹，说："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当即将皇姓赐予徐世勣。

此刻，当李世勣看到长安使者送来的那颗头颅时，悲痛便不可抑制地向他袭来。

李世勣面向北方，长时间地叩拜恸哭，最后上疏朝廷，请求将李密的尸首与尸身合成一处安葬。李渊随即命人把李密的尸体运到了黎阳。李世勣及其部众全部换上丧服，以君臣之礼为李密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出殡仪式，把他安葬在了黎阳山（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的南麓。

诚如李渊所言，李世勣不愧是一个纯臣。

可就是这样的纯臣，却始终得不到李密的信任。即便是在兵败邙山走投无路的时候，李密宁可归降唐朝也不敢投奔黎阳，这不能不说是一

个重大的失策，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如果他当时不计前嫌，能够前往黎阳，与李世勣坦诚相待、和衷共济，那么大事或许仍有可为。就算最终不能战胜李渊，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败亡；就算最终一样要出局，也不至于因“降而复叛”而受人指摘，玷污了一世英名。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只有结果。

当公元619年的阳光照临大地的时候，李密的坟头很快长出了离离青草。

白云变幻，时光流转，这个世界依旧混沌而喧嚣。

在隋王朝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的大唐王朝，能否顺利地扫灭群雄，荡平宇内，重建一个拥有和平、秩序与权威的崭新帝国？

李渊父子对此充满信心，可他们的对手却对此不以为然。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游戏还在进行中……

[1]　白蹄乌是历史上著名的“昭陵六骏”之一，世传其通体纯黑，唯四蹄雪白。“白蹄”乃突厥语“少汗”之意，是地位尊崇的象征。李世民为白蹄乌题写的赞辞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2]　隋唐民谚，指无用的蒿草制成有用的箭，但没入草中复归无用。

第五章 可怕的李世民，完美的李世民

最后一个影子朝廷

李密败亡，最大的获益者无疑就是王世充。他不但收降了李密的十几万部众，而且得到了单雄信、裴仁基、秦叔宝、程知节等一大批骁

将，又夺回了洛口仓，解决了军队的粮荒，真是赢了个钵满盆满。此外，小皇帝还加封他为太尉、尚书令，总督内外诸军事，并特准开设太尉府，精选文武官吏。

王世充的权威达到了人臣的顶点，接下来，他还会干什么？

小皇帝杨侗对此忧心忡忡。

他意识到王世充随时可能对自己下手，可又丝毫没有应对之策。每天活得战战兢兢的小皇帝最后只好命人取出宫中的财物，大量布施穷人，借此消灾祈福，希望能逃过一场注定要降临的灾难。

可是，就连最后这点可怜的精神安慰很快也被王世充剥夺了。因为王世充有一次入宫赴宴，回家后忽然上吐下泻，他立刻怀疑是小皇帝让人在酒菜中下毒，从此便不再入宫朝见，并且命手下把守宫门，严禁小皇帝从宫中取出一针一线。

小皇帝彻底陷入了绝望。

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幼主杨侗还是洛阳士民，所有人都很清楚——这最后一个影子朝廷很快就要覆亡了。

宇文化及称帝不久后，听到了李密败亡的消息，顿时心中窃喜，觉得这是扩大地盘的良机，于是出兵攻打李密旧部元宝藏驻守的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但是打了四十多天，始终打不下来。

正在中原一带四处游说的魏徵立刻前往魏州，劝自己的老上级元宝藏归降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正月初七，元宝藏向唐军献出了州城。

正月十八，唐淮安王李神通率部攻击宇文化及的老巢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宇文化及无力抵抗，只好向东逃往聊城（今山东聊城市）。李神通进入魏县，俘虏并斩杀了两千余人，随即进围聊城。

此时，定都乐寿（今河北献县）的夏王窦建德也亲自率军南下，直逼聊城，准备与唐军拼抢胜利果实。他的目标并不是宇文化及这个人，而是宇文化及从江都带出来的传国玉玺。虽然这个玉玺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价值，但它毕竟是一种象征——皇权的象征。

困守聊城的宇文化及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南北两大强敌的夹攻之中。他大为惊恐，急忙拿出重金，请求附近的变民首领王薄出兵援救。王薄看在钱的面子上，决定当一回雇佣军，率部进驻聊城协

防。

可是援兵的到来并不能挽回宇文化及的败局，因为城中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宇文化及顿时绝望了，只好向李神通请求投降。

出人意料的是，李神通居然一口回绝。副手崔民干劝他接受，李神通说：“贼人既然粮食已尽，我们可以轻易将其摧毁，以耀我唐军兵威，同时虏获财宝，犒赏将士。要是接受投降，我们拿什么劳军？”

崔民干焦急地说：“窦建德马上就到，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攻克，就会内外受敌，我军必败。眼下不战便可拿下聊城，此项军功得来甚易，为何要贪图财宝而拒绝呢？”

李神通勃然大怒，随即将崔民干囚禁。

数日后，宇文士及从济北（今山东茌平县西南）运来粮食，聊城人心稍安，士气总算有所恢复，宇文化及遂继续抵抗。李神通亲自到城下督战，命各军全力攻城。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刺史赵君德第一个攻上城墙。因为他不是李神通的嫡系，李神通担心被他抢了首功，于是下令鸣锣收兵。赵君德大怒，但是军令难违，只好骂骂咧咧地从城头上撤了下来。

还没等李神通重新组织进攻，窦建德的大军已经杀到。李神通自知不敌，只好率部撤出战场。宇文化及出城迎战，可他显然不是窦建德的对手，在数战皆败之后，不得不缩回城中继续顽抗。窦建德随即对聊城发起猛烈进攻。

最后的时刻，王薄并没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是忙不迭地打开了城门。窦建德大军入城后，立刻逮捕了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以及他们的一干亲信，随后又以人臣之礼觐见了萧皇后，并换上丧服，郑重其事地祭悼了一回杨广。等这些场面上的事情都做完之后，窦建德才从容收取了隋朝的传国玉玺，还有各种印信和天子仪仗。

宇文化及和他的两个儿子最后一起被斩首。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行刑的时候，宇文化及既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磕头求饶，而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不辜负夏王。”随后便引颈就戮。

这位轻薄公子的称帝闹剧，就以这样一种“过把瘾就死”的方式匆匆开局又草草收场了。

从称帝到败亡，历时仅四个月。

也许是因为对这一天早有准备，所有的担忧和恐惧也早已提前透支，所以宇文化及在临死之前反而表现得比较平静。

刽子手的大刀高高举起的那一刻，宇文化及的内心也许只有这么一个念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当大河南北的割据群雄逐一出局的时候，李唐王朝在中原、河北一带的主要对手就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是王世充，另一个就是窦建德。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群雄中，窦建德无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

因为这个人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从大业七年起兵以来，凡是打了胜仗或攻陷城池，窦建德总是把虏获的金银财宝全部赏给将士，自己分文不取。此外，虽然他早已称王，但生活上却一贯简单朴素，从不吃肉，只吃蔬菜和糙米饭；他的妻子曹氏也只穿布衣，从不穿绫罗绸缎，所用的婢女也只有十余人。所有这一切都让窦建德赢得了广大将士和百姓的衷心拥戴。

击败宇文化及后，夏军虏获了数以千计的隋六宫嫔妃和宫女，窦建德即刻将她们就地遣散，一个也没留。而隋朝那些有才干的旧臣，则大多得到了窦建德的赏识和任用，如裴矩、何稠、虞世南、欧阳询等人[1]。至于那些不愿意为他效力，而宁愿投奔洛阳（隋朝廷）和长安（唐朝廷）的人，窦建德概不强留，一律尊重个人意愿，不但送给他们盘缠，还派兵护送他们出境。宇文士及和封德彝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投奔了李渊。

窦建德的所作所为使他广泛赢得了人心。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窦建德无疑是天下群雄中最有潜力也最有资格与李渊父子抗衡的人。

相形之下，王世充在这点上就比窦建德和李渊父子差远了。

他身上丝毫不具备让人服膺的人格力量，所以他注定留不住人心——尤其是留不住秦叔宝和程知节这种豪杰的心。

秦、程二人归降王世充之后，虽然得到了他的重用和优待，但是王世充的为人却让他们十分厌恶和不齿。为这种人效命，让秦、程二人不但觉得窝火，而且感觉前途渺茫。有一次，程知节忍不住对秦叔宝说：“王世充气量狭窄，见识浅陋，却又喜欢信口开河，动不动就赌

咒发誓，活像一个老巫婆，岂是铲除祸乱、匡扶正义之主？”于是二人决定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归降唐朝。

武德二年二月下旬，王世充在九曲（今河南宜阳县北）与中原唐军会战，命秦叔宝和程知节率军列阵。机会终于来了。秦、程二人对视一眼，忽然率领亲信骑兵数十人离开阵地，向西狂奔一百余步之后，下马回头向王世充叩拜，说：“我等蒙公厚爱，本应深思报效，可您性情猜忌，喜听谗言，非我等托身之所，而今不能再侍奉您，请允许我们就此告辞。”说完立刻翻身上马，飞奔唐军阵地投降。

王世充恨得牙痒，却又不敢追击，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绝尘而去。

秦叔宝和程知节投唐之后，被纳入了李世民帐下。李世民素闻其名，当即厚礼相待，任命秦叔宝为骑兵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秦、程二人的弃暗投明马上给王世充麾下的其他将领树立了榜样。不久后，骠骑将军李君羡、征南将军田留安相继率部降唐；李厚德和赵君颖也驱逐了隋殷州（今河南获嘉县）刺史段大师，举城归降唐朝，李厚德随即被任命为殷州刺史。

这一年闰二月底，李厚德回家探望患病的父母，命弟弟李育德驻守殷州。恼羞成怒的王世充趁此时机，亲自率领大军进攻殷州，将其攻陷，李育德和三个弟弟全部战死。三月初，王世充又率军攻打穀州和熊州。熊州刺史史万宝出兵迎战，结果又被王世充击败。

几场胜仗打下来，总算让王世充捞回了一点面子，同时也让他增加了几分逐鹿天下的底气。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一个在他心中隐藏已久的念头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称帝。

王世充觉得颠覆隋朝这最后一个影子朝廷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把这个想法跟属下一说，立刻引发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幕僚李世英深以为不可，他说：“四方人士之所以奔驰归附东都，是以为您能匡扶社稷，中兴隋室。如今九州之地，连一处都没有平定，如果断然称帝，恐怕远近之人都会叛离你！”

王世充目光闪烁地看了看他，低声说：“嗯，言之有理。”

可长史韦节、杨续等人却极表赞成，他们说：“隋朝气数已尽，灭亡

理所当然。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与寻常之人讨论。”

王世充心中暗喜，脸上却不动声色。

紧接着，负责观测天象的太史令乐德融也不失时机地开口了。他把自己近期的观测结果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大意就是除旧布新之兆早已显现，而且星象所对应的地方正是郑国公王世充的封地，如果不及时顺应天道，反而会令王气衰弱云云。

王世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但是反对者的声音并未就此平息。部将戴胄又站了出来，说：“君臣犹如父子，应当休戚与共！明公最好能竭尽忠心，报效朝廷，如此则家国俱安，否则的话……”戴胄后面的话没说，但显然已经含有警告的意味。

王世充的笑容凝结在脸上。

他干笑两声，称赞了一下戴胄的忠心，随即结束了当天的讨论。

知道自己的部众并不都跟自己一条心，王世充颇为恼怒，也有些无奈。他决定暂且将称帝之事按下不表，退而求其次，先把九锡搞到手，以此试探朝臣们的态度。所谓九锡，实际上就是历代天子专门赏赐给功臣的九种特殊礼遇和器物。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王莽、曹操、司马昭都接受过九锡，这是历代权臣的专利品，是他们篡位称帝的敲门砖。

听说王世充企图加九锡后，不识时务的戴胄居然又跳出来竭力反对。王世充勃然大怒，马上把戴胄贬为郑州长史，让他出镇虎牢（郑州府所在地），随后授意段达向杨侗上奏。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

小皇帝杨侗知道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可他还是想做最后的挣扎。他对段达说：“郑公不久前平定李密，已经擢升为太尉，近来并无特殊功勋，等天下稍微平定之后，再议此事也为时不晚。”

段达也懒得再跟小皇帝废话了。

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四个字——太尉想要。

小皇帝忽然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段达，而且盯了很长时间。最后小

皇帝把头垂了下去，无力地吐出两个字——随你。

三月十二日，段达在朝会上宣布：遵奉天子诏命，拜王世充为相国，假黄钺（有权使用天子专擅诛杀的铜斧），总百揆，加九锡，晋爵为郑王，允许郑国设立丞相以及各种文武官吏——一切都与当年隋文帝杨坚篡周的那一幕如出一辙。

颁布诏书的时候，小皇帝瘦小的身躯始终蜷缩在宽大的御榻上一动不动。他的目光越过大臣们的头顶，怔怔地凝望着大殿外那道挂了好多天的灰色雨幕。

王世充和大臣们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什么，小皇帝一个字也没听见。他的脸色异常苍白，仿佛是从下了整整一个春天的雨水中刚刚打捞出来的一样。

许久，大殿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把杨侗从遥远的地方拉了回来。他仓皇地抬起头，正好看见王世充脸上那个狰狞的笑容，还有一对鹰隼一样的眼睛。

小皇帝打了一个寒噤。

虽然时节已近暮春，初夏转眼就要来临，可杨侗还是觉得冷。

他知道，这是来自他体内的一种冷，一种与生俱来不可去除的宿命的冷。

王世充逼杨侗“禅位”

夏天说来就来了。

四月初的一个早晨，薄雾刚刚散尽，坐在乾阳殿上的小皇帝杨侗就看见段达与十几个朝臣一起匆匆上殿，带着一种眉飞色舞的表情径直走到了他的面前。

他们带来了王世充的最后通牒。

几天前王世充就已下令，让他的心腹韦节、杨续以及太常博士孔颖达等人着手筹备禅让仪式。

现在，仪式八成是已经准备就绪了。杨侗听见段达用一种毋庸置疑的

口吻说：“天命不常，郑王功德兼隆，愿陛下遵循唐尧、虞舜之迹，即日举行禅让大典，顺应天意人心！”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可乍一听见“禅让”这两个字，御榻上的杨侗还是如遭电击。他猛然坐直了身子，双手死死按在身前的几案上，似乎要用力抓牢什么。段达看见小皇帝原本苍白如纸的面容忽然间涨得通红，然后冲着他声色俱厉地说：“天下，是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应出口；若天命已改，何必再言‘禅让’！公等皆为先帝旧臣，官尊爵显，既有斯言，朕复何望！”

那一瞬间，段达和身后的一帮大臣顿时汗流浃背、张口结舌。

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发现杨侗用这样的表情和声音跟他们说话。

当天的朝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下殿后，小皇帝神色恍惚地来到后宫，面见自己的母后。那一刻杨侗止不住潸然泪下。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这对孤儿寡母唯一能做的只有以泪洗面。

说到底，杨侗其实还是个孩子。

这一年他刚满十六岁。

第二天，王世充最后一次派人入宫对小皇帝杨侗说：“今海内未宁，须立长君，等到天下太平时，我就会把政权归还给您，绝不背弃当初的誓言。”

四月初五，王世充以杨侗的名义宣布——将皇位禅让给郑王。

在整个禅让仪式举行的过程中，按照事先的安排，王世充三次上疏辞让，而杨侗则三次下诏敦劝。可事实上，杨侗对此一无所知。当王世充和一帮党羽在乾阳殿自导自演地玩禅让游戏的时候，杨侗正被囚禁在皇宫角落的含凉殿里。

四月初七，王世充乘坐天子法驾，陈列天子仪仗，大摇大摆地进入皇宫，正式登基称帝，次日改元开明。

至此，在隋炀帝杨广被弑之后又苟延残喘了一年多的这个影子朝廷终于宣告覆亡。

随着东都朝廷的覆灭，仍然忠于隋朝的最后一批将帅和残余郡县纷纷

向李渊投降，其中就包括那个收葬杨广的江都通守陈稜。李渊随即将江都郡改为扬州，任命陈稜为扬州总管。与此同时，最先燃起反隋烽火的变民首领王薄等人也在此刻归降了唐朝，随后被任命为齐州（今山东济南市）总管。

王世充虽然如愿以偿地成了皇帝，一夜之间登上万众之巅，但他的执政能力却没有随着他的地位而急剧提升。尽管他也表现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模样，一心想要当一个澄清宇内的新朝天子，可他的所作所为最终只能成为人们的笑柄。

为了表现自己的勤政爱民，王世充特意命人在宫城的各个城楼和玄武门等处设置了很多御座，随时进行现场办公，亲自接受各类上表和奏章。此外他还时常轻装简从，在街市上按辔徐行，既不戒严也不清道，而且笑容可掬地对两侧的百姓说："过去的天子都是居于九重深宫之中，民间的情况一无所闻，而今世充并非贪图天位，只是为了拯救时局艰危，就好像一州的刺史那样，亲揽庶务，与士庶共议朝政。并且我担心诸位受门禁阻拦，所以特意在各个门楼现场办公，希望能尽量听取群众的声音。"随后王世充又下令，在西朝堂接受冤案诉状，在东朝堂接受朝政谏言。

王世充的"勤政爱民"措施很快产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每天都有数百个群众响应他的号召，拥挤在宫门前上疏献策。王世充刚开始还硬着头皮勉强应付，可短短几天后，一摞摞的卷宗和文书就堆成了一座小山。王世充傻眼了，连忙一头躲进"九重深宫之中"，再也不敢"亲揽庶务，与士庶共议朝政"了。

别出心裁的"现场办公"成了一场有始无终的笑话，那么例行的"朝会办公"又如何呢？

很遗憾，王世充同样遭遇了尴尬。每天主持朝会的时候，王世充都会以一副英明领袖的姿态发表长篇累牍的讲话。但是一再重复，毫无重点，啰啰唆唆，千头万绪，把奏事的有关官员搞得一头雾水，让满朝的文武百官听得两眼发直，连侍卫人员也受不了他的疲劳轰炸，个个痛苦不堪。只有王世充一个人浑然不觉，乐此不疲。最后，御史大夫苏良实在是忍不住，只好直言不讳地说："陛下说话太多，却不得要领，其实只要作出结论就可以了，何必说那么多不相干的话！"

王世充默然良久。他没想到自己那些语重心长的讲话和高瞻远瞩的指示在百官心目中居然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对许多朝臣来说，王世充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倒还不是废话连篇和

词不达意，而是他的心胸狭隘和刻薄猜忌。称帝不久，王世充就开始猜忌一个颇有威望的前朝老臣了。

他就是时任礼部尚书的裴仁基。

王世充时常想，此人既是隋朝旧臣，又是李密旧部，是在战败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投降的，他会老老实实地当自己的臣子吗？况且他儿子裴行俨此刻又在朝中担任左辅大将军，手中握有重兵。这样一对身经百战、历事多主的父子，能死心塌地帮我王世充打江山吗？

王世充对此感到强烈的怀疑。与此同时，裴仁基父子也强烈地感受到了王世充的怀疑，都说王世充为人刻薄猜忌，此言果然不虚啊！

裴仁基父子不想坐以待毙，于是秘密联络了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和散骑常侍崔德本等人，准备发动政变，诛杀王世充，拥立杨侗复位。

但是王世充早已在裴仁基父子身边安插了耳目，所以他们的政变计划刚刚开始酝酿，王世充就获知了消息。王世充立即将裴仁基父子和参与密谋的朝臣全部捕杀，同时屠灭了他们的三族。随后，王世充的兄长、时封齐王的王世恽对他说："裴仁基这帮人之所以谋反，是因为杨侗还在人世，不如趁早把他除掉。"王世充深以为然，随即命他的侄子王仁则和家奴梁百年去毒杀杨侗。

这是唐武德二年，也是郑开明元年的五月末，洛阳皇宫的含凉殿里，隋朝的最后一任废帝杨侗看见一杯毒酒赫然摆在他的眼前。

盛夏的阳光下，杨侗忽然打了一个哆嗦。他再次感到了弥漫在他灵魂深处那种无尽的寒冷。

"请再向太尉请示，依他当初的誓言，当不至于如此。"杨侗的声音虽然有些颤抖，可在场的人都听见了，他仍然称王世充为"太尉"，而不是称他"陛下"。

此时此刻，就连王世充的家奴梁百年都不得不感到诧异和敬佩。因为这个看上去年轻而孱弱的废帝身上似乎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凛然气节。梁百年的心中泛起一丝恻隐，于是向王世恽和王仁则建议再请示一下王世充。

可他的提议马上被王世恽否决了。绝望的杨侗请求去和自己的母后辞别，却仍遭到了王世恽的拒绝。

杨侗沉默了。他转身走进佛堂，最后一次在佛前焚香跪拜。刺目的午

后阳光从雕花的紫檀木窗射了进来。在一起一伏的叩拜中，杨侗看见一些簌簌颤抖的灰尘在阳光下惊惶不安地飞舞，有一些沾在佛前的鲜花上，有一些则落在自己的脚边。

这就是命运吗？

杨侗想，这就是命运。

可是，谁又能说，落在鲜花上的尘埃就一定比别的尘埃更为尊贵，落在地上的尘埃就一定比别的尘埃更为卑贱呢？杨侗想，自己何尝不是一粒落在帝王家的尘埃？自己又何尝比落在百姓家的尘埃更幸运呢？

外面已经传来了王世恽急不可耐的催促声。杨侗知道自己该上路了。他最后在佛前一拜，说："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资治通鉴》卷一八七）

杨侗随后平静地喝下了毒酒，可他却没有顺利地上路。

不知道是毒酒的毒性不够，还是杨侗的体质太好，总之，喝完毒酒的杨侗尽管七窍流血、痛苦难当，却始终没有咽气。

最后王世恽命人用绢巾勒住了杨侗的脖子，才帮他踏上了黄泉路。

对废帝杨侗而言，不管有没有来生，死亡都绝对是一种解脱。

从天而降的馅饼：平定河西

武德二年的夏天，正当王世充在东都称帝的时候，唐王朝也在西北战场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平定了河西李轨。

这场胜利得来全不费工夫。

准确地说，它就像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李轨于大业十三年在武威起兵后，自称河西大凉王，雄踞一方，成为隋末的一支主要割据势力，并与西秦的薛举共同构成李唐王朝在西北的主要威胁。武德元年八月，李渊遣使联络李轨，下诏称他为"从弟"，与他结盟共同对付薛举。当年冬天，薛举父子败亡，李轨趁机称帝，并出兵攻陷了张掖、敦煌、西平（今青海乐都县）、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尽据河西五郡之地。

面对李轨势力的迅速壮大，李渊决定采取册封的手段对他进行招抚，遂于武德二年二月任命李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但在是否接受李唐朝廷册封的问题上，西凉朝廷却产生了分歧。李轨本人的看法是："唐天子，吾之从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争天下，吾欲去帝号，受其封爵。"可李轨的心腹、时任左仆射的曹珍却表示反对，他说："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称王称帝者何止一人！李唐称帝于关中，西凉称帝于河右，互不相碍，既已立为天子，奈何复自贬黜！"

李轨接受了曹珍的意见，随后派遣尚书左丞邓晓出使长安，向李渊递交国书，上面自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同时表示不接受李渊的册封。

李渊勃然大怒，当即扣留邓晓。当时的李渊已经决定以武力平定西凉，可问题是新生的唐王朝仍然要面对许多劲敌，北有刘武周、梁师都，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萧铣、林士弘、沈法兴……在此情况下，李渊根本腾不出手来收拾李轨。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暂时忍耐。

此刻的李渊万万没有想到，短短三个月后，一场胜利就从天而降——兵精粮足的李轨在一夜之间就被平定了。

一切都要从五月初李渊收到的一道奏疏说起。

这道奏疏是一个叫安兴贵的朝臣递上来的，大意是说他的弟弟安修仁在西凉担任户部尚书，颇为李轨所器重，他愿意利用这层关系前去游说李轨，对他晓以利害，劝他归降唐朝。

看完奏疏，李渊不禁哑然失笑。他一度想将其弃置一旁，只是后来转念一想，不管这个安兴贵的设想多么不现实，可毕竟是一片忠心。大唐刚刚开国，天下尚未平定，对于臣子们这种急于报效朝廷的热忱当然是只宜鼓励，不宜打击的。就算不采纳他的建议，起码也要接见一下，适当鼓励两句。所以李渊随后召见了安兴贵，对他说："李轨拥有强大兵力，又据守险要，南连吐谷浑，北连东突厥，我出动大军恐怕都不能攻克，就靠你几句空话，他岂能接受？"

可安兴贵却以一种胸有成竹的口吻说："我的家族世居凉州（今甘肃中西部），几代人都享有声望，得到汉人和夷人的敬畏。我的弟弟安修仁也深受李轨信任，安家子弟在凉朝身居要职者不下十人。我前去游说，李轨能听从最好，就算他不接受，我在他身边下手也比较容

易。”

听他这么一说，李渊的想法立刻发生了转变。

他感觉这个安兴贵不像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既然他如此自信，又无需动用朝廷一兵一卒，那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数日后，安兴贵以个人名义回到了家乡武威（今甘肃武威市），李轨以为他叛唐归来，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为左右卫大将军。

可李轨断然没有想到，这个安兴贵转眼就将成为他的掘墓人。

安兴贵取得李轨的信任后，找了个左右无人的时机对他发出了试探。安兴贵说：“凉国的面积不过千里，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而今唐朝起于太原，夺取函秦（陕西中部），遏制中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乃天命，非人力所能为！陛下不如以河西之地归唐，则东汉窦融之功，必当再现于今日！”

李轨忽然用一种若有所思的目光盯着他，说：“我据有坚固的山河，他们虽然强大，能奈我何？你此前在唐朝为官，莫非是为了报答李唐的知遇之恩，替他们当诱降的说客来了？”

安兴贵慌忙伏地谢罪，说：“臣听说‘富贵不回故乡，有如锦衣夜行’！而今臣合家子弟皆蒙陛下信任，满门荣庆，岂敢更怀异志！只是想为陛下献上一点愚者之虑而已，如何裁决，全在陛下。”

安兴贵出宫之后，意识到劝降已经失败，接下来只有发动兵变了。

当天，安兴贵就和弟弟安修仁悄悄溜出了武威城。

安兴贵的确没有跟李渊吹牛，他们安氏家族和他们兄弟俩在凉州的确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短短几天，他们就拉起了一支胡汉混杂、人数可观的军队，开始攻击武威。李轨大怒，亲自率兵出战，却被安氏兄弟打得大败，只好退回城中坚守。安兴贵率部将武威城团团围困，并绕城呼喊：“大唐朝廷派遣我来诛杀李轨，胆敢助之者，屠灭三族！”

安兴贵的猛烈攻势加上心理战，很快就摧毁了西凉军队的斗志。城中军民争相逃出城外，投奔安兴贵。李轨没想到他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眼见大势已去，再也无力挽回，只好带着妻儿登上不久前兴建的美轮美奂的玉女台，置酒对饮，从此诀别。

这一年五月十三日，安兴贵攻入武威，生擒李轨，河西宣告平定。

安兴贵之所以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扫平李轨，是因为西凉的人心早就散了。

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西凉的人心离散和李轨的迅速败亡。

其一，诛杀功臣。

被杀的人名叫梁硕，本是李轨起兵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时任西凉的吏部尚书，因颇富智略，且深受李轨重用，所以遭到众人的嫉妒和排挤，尤其是户部尚书安修仁与他历来不睦。在其后双方展开的明争暗斗中，安修仁设计诬陷梁硕谋反，致使李轨将梁硕鸩杀于家中。从此，李轨的亲信旧部个个惶惶不安，唯恐被李轨兔死狗烹，恐怖气氛弥漫整个西凉朝廷。

其二，修建劳民伤财的玉女台。

去年冬天，有个巫师告诉李轨："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意思是如果能迎来玉女，必能得到上天的赐福。李轨随即调动军队，耗尽国库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玉女台，虔诚地期待玉女的降临。可结果玉女不见踪影，西凉却是一片民怨沸腾。

其三，错误决策，无视民间灾情。

玉女台竣工不久，西凉出现了严重的灾荒，民间普遍出现人吃人的惨剧，而其时国库已空，李轨不得不倾尽个人资财予以救济，但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李轨只好召开廷议，讨论是否要开仓赈粮。以李轨旧部、左仆射曹珍为首的大臣都认为："国以民为本，本既不立，国将倾危，应即刻开仓，不能坐视百姓相食而不管。"然而以太仆卿谢统师为首的另一批大臣却表示反对。这些人原本都是镇守武威的隋朝旧吏，是被李轨兴兵逮捕后迫于情势才投降的，人心并未真正归顺，因此都想趁此机会激起民怨、搞垮西凉，于是纷纷表示："太仓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资源，只能等到危急关头才能启用，岂能为了几个小民而开仓？曹珍的建议显然是为了收买人心，并非真正从国家大计出发。"李轨内心的天平最终倾向了谢统师，拒绝开仓，从此"士庶怨愤，多欲叛之"（《旧唐书·李轨传》）。

而发生在西凉的这一切，无疑都通过安修仁的渠道传到了安兴贵的耳中。所以安兴贵才会认定李轨的灭亡已成定局，于是胸有成竹地向李渊呈上了平凉之策。

李轨被俘后，很快就和他的几个弟弟、儿子一起被押解到长安，于闹市中斩首。

面对这场从天而降的胜利，李渊真是惊喜万分，随即任命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封凉国公，赏赐绸缎一万匹；任命安修仁为左武候大将军，封申国公。

听到李轨灭亡的消息后，不久前被扣留在长安的西凉使臣邓晓马上要求觐见李渊。

虽然主灭国亡了，可他一点都不悲伤。相反，邓晓还感到了一丝庆幸。因为李轨不亡，他就永无出头之日，而现在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投靠新主子了。

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当邓晓手舞足蹈地向新主子表示他最衷心的祝贺时，李渊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直到邓晓尴尬地停下自己的舞蹈动作，才听见李渊冷冷地说："汝为人使臣，闻国亡，不戚而喜，以求媚于朕。不忠于李轨，肯为朕用乎？"（《资治通鉴》卷一八七）

从这一天起，邓晓终生没有得到李唐朝廷的录用。

也许在此后落寞无为、穷困潦倒的余生中，邓晓始终会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为何自己如此机灵地拍马屁，竟然也会拍出这么倒霉的结果？为何当一个聪明的识时务者，下场居然也会如此不堪？

武德二年对李渊和整个大唐王朝来讲，实在是充满意外的一年。

因为有许多事情从天而降。

然而从天而降的不一定总是馅饼，有时候也会有霹雳。

武德二年九月，李渊和他的大臣们全都被一声晴天霹雳震得目瞪口呆——太原丢了！

是谁这么该死，把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都给弄丢了？

是齐王李元吉！

李元吉丢掉了太原

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李元吉年仅十六岁。李渊率大军南下之后，命他为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后又进封齐国公，授镇北大将军，掌管太原及周围十五郡的军政大权。大唐开国后，李元吉晋爵齐王，改太原郡为并州，授并州总管。也就是说，从大业十三年五月起，这个少不更事的李家四公子就成了太原地面上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当他的父兄们在创建大唐王朝的道路上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土皇帝在太原都干了些什么呢？

他只干了三件事。

第一是玩。

第二是疯玩。

第三是没日没夜地疯玩。

他最爱玩的游戏是“打仗”。可他的打仗游戏却与众不同。首先是要求真刀真枪，其次是要求见血和死人。这与其说是游戏，还不如说是角斗。是的，李元吉要的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角斗。他喜欢把他的奴仆、宾客，甚至姬妾都召集起来，发给他们兵器和铠甲，然后让他们不分对象地混战死拼，每次不玩死和玩残一批人，他决不罢休。一旦来了兴致，李元吉还会亲自披挂上阵，参与角斗。虽然没人敢杀他，但是刀枪不长眼，李元吉也经常挂彩。不过他不以为意，一直乐此不疲。李元吉的奶娘陈善意实在看不下去，就苦苦规劝他别再玩这种死亡游戏，可李元吉非但不听，还借一次醉酒的机会耍酒疯，命手下人把陈善意活活打死。

除此之外，李元吉还喜欢打猎。他经常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李元吉的打猎技术非常专业，每次出猎，光是狩猎工具就会满满当当装上三十车。狩猎队所过之处，农民的庄稼地往往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左右侍从还经常趁机劫夺百姓财物。因此李元吉每打一次猎，并州近郊的老百姓就像遭遇了一场浩劫。除了射动物，李元吉还喜欢在闹市中射人。每当看到人群惊慌失措、抱头鼠窜的样子，他就会开怀大笑，觉得特别过瘾。

尽管齐王府中妻妾成群，李元吉还是不满足。所以，在玩杀人游戏的同时，李元吉还喜欢半夜大开府门，领着一帮人出去强奸民女。

总而言之，寻常的游戏对并州的这位土皇帝来说都是缺乏吸引力的。

不管他玩什么，都要玩新鲜的、刺激的、出格的。并州的百姓们就这样被这个新王朝的四皇子玩得苦不堪言，却又求告无门。面对李元吉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恶劣行径，难道除了一个奶娘陈善意，就没人敢劝了吗？

有。

其实李渊也知道这小子不是盏省油的灯，而且年纪太轻，毫无处理政事的经验，所以很早就派了两个人去辅佐他。一个是外戚兼驸马、时任殿内监的窦诞（窦皇后的侄子，娶李渊女儿襄阳公主），另一个是右卫将军宇文歆。

不过这个驸马爷窦诞也是位顽主，李元吉玩的那些事情他没少掺和，所以敢直言进谏的人就只有宇文歆了。但是李元吉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管宇文歆说什么，一律当成耳旁风。宇文歆忍无可忍，最后只好上疏向李渊报告，一一指出齐王的劣行，最后说："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

武德二年闰二月二十二日，李渊接到奏疏，顿时火冒三丈，当天就下诏解除了李元吉的并州总管之职。可是，被罢官的李元吉并没有从此痛改前非，而是天天在盘算对策。

他很快就想了一个官复原职的办法。你们不是说老百姓都怨声载道吗？那我就让你们听听老百姓的心声。

三月初，长安的宫门前忽然聚集了一大群来自并州的士绅父老。他们是来集体请愿的——请求皇帝让李元吉继续当他们的父母官。

李渊大喜。看来宇文歆打的小报告都是危言耸听之词，元吉还是颇得民心的嘛，不然这并州的老百姓怎么会千里迢迢地为他入朝请命？

三月十五日，李渊下诏恢复了李元吉的官职。

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元吉无声地笑了。

民意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操纵的东西。别说发动几个父老去长安请愿，就算在并州搞一个全民公投，估计李元吉也能弄出一个100%的民众支持率。

民意固然容易操纵，可有一件事情李元吉无论如何也操纵不了。

那就是战局。

从武德二年三月下旬起，刘武周就开始了对并州的进攻。四月初一，刘武周亲率五千突厥骑兵进抵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市北），兵锋甚锐，来势汹汹。李元吉命车骑将军张达率部对刘武周发动试探性攻击。可张达兵力薄弱，一再向李元吉表示无法作战。李元吉不听，强令他发动进攻。

结果可想而知，一接战，张达所部转眼之间就全军覆没。张达愤而投降刘武周，并亲自充当向导，于四月初二引刘武周攻陷了榆次。

随后刘武周迅速向纵深推进，于四月十八日兵临并州城下，李元吉率众出战，击退了刘武周的第一次进攻。四月二十日，李渊急命太常卿李仲文率军增援并州。五月十九日，刘武周转而攻陷了并州南面的平遥。六月初十，刘武周麾下猛将宋金刚率三万人攻陷了介休（今山西介休市）。随后，唐朝援军李仲文、姜宝谊部与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在雀鼠谷（今山西灵石县西南汾水河谷）展开会战，唐军大败，李仲文与姜宝谊被俘。

刘武周节节胜利，李渊深感忧虑。右仆射裴寂自告奋勇，愿意出战。六月二十六日，李渊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出兵御敌，同时让他全权指挥前线战事。

九月，裴寂率军进抵宋金刚占据的介休，于度索原（今山西灵石县东）驻扎。宋金刚派人切断了唐军的水源，唐兵饥渴难耐，裴寂只好下令拔营，打算重新寻找有水源的地方。可唐军刚刚开始拔营，宋金刚立刻挥师进攻，唐军顿时崩溃，或死或逃，几近全军覆没。裴寂仓皇逃奔晋州（今山西临汾市）。

至此，唐朝在并州以南、晋州以北的城池几乎全部沦陷，仅余西河（浩州州府，即今山西汾阳市）一座孤城。

九月中旬，刘武周再次进围并州。李元吉对司马刘德威说：“你和老弱残兵留下来守城，我率领精锐部队出战。”十六日夜，李元吉率兵出城，同行的还有他的一大群妻妾。

出战还带妻妾？

还没等守城的刘德威回过神来，李元吉已经马不停蹄地向南疾驰，直奔长安而去了。

李元吉前脚刚刚出城，刘武周后脚就已兵临城下。晋阳（并州州府所在地）土豪薛深迫不及待地打开城门，迎接刘武周进城。刘德威只能

领着剩下的那些老弱残兵乖乖地缴械投降，并州就此陷落。

李元吉带着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逃回长安，满朝文武大为震惊。

这是李渊集团自起兵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而且还是不战而败！

李渊感到了一种锥心般的疼痛。

整个李唐天下无论丢了哪块地方都不会像并州这样让他心痛不已。

必须有人来为这次惨败承担罪责。

要让谁来承担呢？李元吉吗？不行，他毕竟是齐王，堂堂大唐王朝的四皇子，治他的罪就是在扇李渊自己的耳光，也无异于是在承认自己用人不当。

窦诞呢？也不行，他是外戚兼驸马，拿他治罪势必引发许多皇室成员的反抗情绪，而且政治影响也不好，副作用太大。

既然他们都不行，那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宇文歆。

李渊对他的心腹大臣、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幼弱（这一年虚岁十七），缺乏治理政事的经验，所以才派窦诞和宇文歆去辅佐他。没想到晋阳这个强兵数万、食支十年的龙兴之地竟然被他们一朝舍弃！听说是宇文歆出的主意，我准备把他斩了！"

李纲很清楚，皇帝是想抓宇文歆当替罪羊，可这么做必将寒了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心，实在不是高明的做法。李纲遂据理力争："齐王年少骄逸，可窦诞不但从未规劝，而且替他遮盖掩饰，导致士民怨愤，今日之败，罪在窦诞。宇文歆屡屡劝谏，齐王概不接受，这些事都有奏疏在案，宇文歆是一个忠臣，岂能杀他？"

李渊很无奈。

看来这三个人谁也动不得。

既然不能动，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第二天的朝会上，李渊亲切地把李纲叫到身边来坐，说："多亏有你，我才不至于滥用刑罚。

元吉自己不学好，不是两个辅臣所能管教的。”随即赦免了宇文歆和窦诞的罪责。

李渊可以不问并州之败的罪责，可他却不能无视并州陷落的后果。

武德二年九月下旬，刘武周占领太原后，即命悍将宋金刚乘胜南下，迅速攻克了晋州，俘虏了唐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随后，宋金刚又进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县），攻陷了龙门（今山西河津市）。

战报传至长安，李渊和满朝文武再次震恐。

整个河东丢了大半，长安的门户已经豁然洞开。接下来，宋金刚只要一步跨过黄河，兵锋就可直指长安。

李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忧虑和恐慌。

刘文静之死：裂痕与伏笔

武德二年的秋天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因为在并州陷落之前，长安朝廷内部就已经发生了一件让李渊极不愉快的事。

有个人要谋反，并且他还因此掉了脑袋。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掉脑袋的事情原本是很寻常的，但是这回却不太寻常。

因为这颗脑袋是从一个朝廷重臣的身上掉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个人是大唐的民部尚书、开国元勋，也是晋阳首义的功臣。他就是刘文静。

刘文静居然会谋反？这可能吗？

是的，这件事听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可李渊和朝廷确实是以这个罪名把刘文静斩首的。

一个堂堂的开国元勋、首义功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刘文静之死对新生的大唐王朝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是李渊的左膀右臂，对大唐开国所作的贡献可以说难分伯仲。但是从私交上

来说，裴寂和李渊是好友，而刘文静则与李世民关系较为亲密。因此在李渊的心目中，裴寂的重要性自然要比刘文静略胜一筹，所以裴寂的地位也自然要比刘文静高出一头。李渊开设大将军府时，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李渊入关成为大丞相时，裴寂转任大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也转任大丞相府司马；李渊称帝后，裴寂官拜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官拜纳言……基本上可以说，在李渊的政治军事集团中，除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外，裴寂始终是第一号人物，而刘文静则始终屈居第二。

刘文静会服气吗？

他不服。

他当然不服！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才干和胆略都在裴寂之上，而且所立的军功又比裴寂多，凭什么裴寂就老是压过他一头？正所谓不平则鸣，刘文静当然也要鸣！武德元年，李渊登基之初，经常与裴寂同坐共食。刘文静马上抓住机会上奏李渊：“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昔日晋元帝诏王导升御座共坐，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而今贵贱失位，臣以为非长久之道。”

李渊一下就听出了刘文静话里的酸味。他笑了笑，你刘文静既然学会了含沙射影，跟我大掉书袋，那我也不妨跟你掉一回。他笑着对刘文静说：“昔日光武帝刘秀与旧友严子陵共寝，子陵把脚都压到了皇帝的肚子上，光武帝还不是一笑置之？而今诸公德高望重，并且都是朕的旧交好友，往昔的欢聚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公切勿介怀。”

天子李渊处处护着裴寂，对刘文静的谏言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还有点反唇相讥的味道，刘文静怎么可能不介怀？随后的日子，刘文静开始在朝堂上公开与裴寂唱对台戏。凡是裴寂赞成的他必然反对，凡是裴寂反对的他必然赞成，二人从此公然决裂，并且反目成仇。

浅水原兵败后，刘文静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免职，虽然后来他又随李世民扫平了薛仁果，因功擢任民部尚书，但是地位大不如前。从前担任纳言时好歹也是个宰相，而今与裴寂相比，身份已然悬殊。刘文静越想越气，经常与他的弟弟、时任通直散骑常侍的刘文起一起借酒浇愁。有一次喝醉后，刘文静居然拔刀猛砍柱子，怒骂道：“总有一天要砍了裴寂的脑袋！”

可是，还没等刘文静砍掉别人的脑袋，自己的脑袋就先掉了。

说起来也是事出偶然，而且只能说刘文静走了霉运。就在他满腹牢骚、郁郁寡欢的时候，他家里又平白无故地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刘文静怀疑是妖魅作祟，就让刘文起帮他找了一个巫师作法祛妖。请人祛妖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这个巫师又喜欢装神弄鬼，一连几日都是大半夜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作法，而且披头散发、口衔利刃，看上去十分恐怖，说是祛妖，其实他本人更像妖。巫师喜欢装神弄鬼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又有一个家人告发了刘文静，对他请巫师祛妖的事情做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描绘和别有用心的解释。所有描绘和解释最终指向的目标就是——谋反。

事态陡然变得严重起来。本来裴寂还愁抓不到刘文静的小辫子，这回倒好，是他自己的家人把他卖了，刘文静还能怨得了谁？

告密者是刘文静的一个小妾，因为与其他姬妾争风吃醋而失宠，索性诬告刘文静谋反，要把他往死里整。所有对刘文静最为不利的偶然因素似乎突然间都凑到了一块。所以我们只能说，刘文静这回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不死都不可能！

李渊即刻将刘文静逮捕，命裴寂和萧瑀担任主审官。明明知道裴寂与刘文静不共戴天，还让裴寂去审案，李渊的用意不言自明。

审讯中，刘文静做出了这样的供词：“首义之初，臣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和威望都差不多。而今裴寂贵为仆射，拥有豪宅，而臣的官位和赏赐却与常人无异。臣东征西讨的时候，老母亲和家人留在京师，臣都没有时间照顾。所以臣确实是心存不满，加上醉酒，才会发出怨言。”

李渊拿着刘文静的供词在朝会上对群臣说：“观文静此言，很明显就是想造反了。”

其实满朝文武全都心知肚明，刘文静落到这步田地绝不是因为他想造反，而是因为他得罪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当朝宰执裴寂裴大人，因此他也就得罪了天子。换句话说，他纯粹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既然如此，谁还敢替他说话呢？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萧瑀和李纲替刘文静说了公道话。他们都坚持认为刘文静绝无谋反之意。

最后李世民站了出来，一再替刘文静辩护。

李世民说：“当初在晋阳时，是刘文静最早提出了举义之策，后来才告诉了裴寂。等到攻克京师，他们所得到的信任和待遇却相差太大，

刘文静的失望或许是有的，但绝不敢谋反！”

李世民为什么要替刘文静辩护？

表面原因当然是李世民出于公心、仗义执言，可深层的原因则是——刘文静现在已经是秦王帐下的头号辅臣，是李世民在政治上最为得力的助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刘文静和李世民就已惺惺相惜，关系非同一般；到了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任元帅西征薛举时，刘文静则是元帅府的长史；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官拜太尉，兼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时，刘文静再次担任陕东道行台左仆射。说白了，刘文静现在不只是天子李渊的民部尚书，更是秦王李世民的死党。

对此，李渊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当然更不可能无动于衷。

因此，对裴寂的宠信和重用以及对刘文静的疏远和贬抑，在李渊这里绝不仅仅是出于旧交情的深浅厚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渊必须防止出现一个与朝廷权力平行的小集团，即便这个小集团的领袖是他的亲儿子李世民也不行。进而言之，李渊也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臣子把本该献给他的忠心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便这个臣子是开国元勋刘文静也不行！

基于上述原因，李渊就绝不会放过刘文静。

所以，李世民出面替刘文静辩护，不但不可能挽救刘文静，反而会强化李渊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以及他杀鸡儆猴的决心。

为了帮助李渊下定最后的决心，裴寂私下里一再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和智略确实是超过常人，但他性情轻躁凶险，且悖逆之言行业已昭然，何况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尽管李渊心里早已作出了决定，可诛杀刘文静的诏令还是在他手里压了好多天。判断一个开国功臣应不应该杀，不仅是在考验天子李渊的智慧，更是在考验他的情商。

因为天子也是人，要诛杀一个功臣，他的内心深处不免会有诸多的不忍。

但是不管有多少不忍，那道让刘文静人头落地的诏书最后还是从李渊的手里发了下去。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与刘文起一同被斩首，家产抄没。

临刑之前，刘文静仰天长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其实刘文静的这句临终遗言只不过是一种负气的感叹而已。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置他于死地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真相是——刘文静的存在严重威胁了李唐王朝最有权势的两个人的政治利益。

首先是天子李渊，当他意识到已经有一个小集团的羽翼正在他的眼皮底下逐渐丰满的时候，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其次是首席宰相裴寂，面对刘文静这种才干和功勋都不在他之下的政敌，他当然不会无所作为。

所以，当李唐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决意要让一个人三更死的时候，他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刘文静之死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诛杀功臣的事件。这个事件无疑给丽日当空的大唐王朝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同时，这个事件也在李渊统治集团内部——更准确地说，是在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间——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这道政治裂痕一旦出现，便再也难以抹平。随着李唐王朝扫灭群雄、统一天下的进程逐渐深入，这道裂痕也在不断扩大，等到李渊父子肃清外敌、巩固政权的事业完成，这道无形的裂痕也就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深渊，最终使得李渊父子的亲情彻底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之死，实际上已经给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一个幽微而深远的伏笔。

大唐王朝全线告急

武德二年，李唐王朝在西北战场上不战而胜，在北面战场上不战而败，而在东面战场上则是——屡战屡败。

从这一年春天开始，窦建德就对驻守河北的唐军发起了猛烈进攻，致使唐军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闰二月，刚刚消灭宇文化及的窦建德就迅速攻陷了邢州（今河北邢台市），生擒唐邢州总管陈君宾。六月初三，攻陷沧州（今河北盐山县西南）。八月初，窦建德亲率十几万大军进逼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唐淮安王李神通退守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八月十一日，窦建德攻克洺州，唐洺州总管袁子幹投降。八月十九日，窦建德挥师直指相州，李神通再次逃往黎阳（今河南浚县），投奔李世勣。九月初四，窦建德攻破相州，斩杀唐

相州刺史吕珉。九月二十五日，窦建德攻陷赵州（今河北柏乡县），生擒唐赵州总管张志昂和慰抚使张道源。

至此，唐朝在河北的城邑几乎全部落入窦建德的手中。

十月，窦建德率领大军继续向南挺进，逼近卫州（今河南淇县东）。在距黎阳三十里的地方，窦建德亲自率领的前锋部队与李世勣部将丘孝刚的三百名前哨骑兵遭遇。丘孝刚一向骁勇善战，首先发动攻击。窦建德败退，幸亏大军随后赶到，窦建德才转危为安。丘孝刚寡不敌众，被夏军斩杀，所部无一生还。

遭遇突袭的窦建德一怒之下转而命令大军围攻黎阳，很快将其攻克。淮安王李神通、秘书丞魏徵、李世勣的父亲李盖（徐盖）、唐同安公主（李渊的妹妹）全部被俘。只有李世勣带着数百名骑兵突围而出，渡黄河南下。

但是李世勣一越过黄河就勒住了缰绳。

因为父亲在窦建德的手中，这让他无论如何都放心不下。经过几天的矛盾和挣扎，李世勣最终还是掉转马头，回到黎阳投降了窦建德。

窦建德大喜过望，随即任命李世勣为左骁卫将军，仍镇守黎阳，却把李盖留在身边充当人质。同时，魏徵也被窦建德任命为起居舍人。

听说黎阳已经陷落，唐卫州守将也随之投降了窦建德。数日后，唐滑州刺史王轨的家奴刺杀王轨，携带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建德说："家奴害死主人，实属大逆不道！我窦建德怎么可能接受你这种人？"随即命人将那个家奴斩首，连同王轨的首级一同送回了滑州。滑州军民顿时大为感激，无不钦佩窦建德的为人，当天就相约向窦建德的使臣请求投降。随后，相邻的州县以及当时盘踞在兖州（今山东兖州市）的变民首领徐圆朗等，全部望风而降。

十月二十四日，大获全胜的窦建德班师凯旋，返回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开始兴筑万春宫，随后将夏朝都城从北部的乐寿迁到靠近河南的洺州，以利于进一步经略中原。

当窦建德在河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时候，刘武周和宋金刚也正在横扫河东，如入无人之境。

此时的大唐王朝可谓全线告急。令人遗憾的是，在河东战场上，身为唐晋州道行军总管的裴寂却消极怯战，毫无将帅之略，根本无力抵挡宋金刚的兵锋，只能一味退缩。他不断下令催促虞州（今山西运城市

东北）和泰州（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等少数几座未被占领的城池，烧毁城邑外围的所有村落、粮草和物资，然后把百姓驱赶入城。

裴寂的做法很快引起了河东百姓的惊恐和怨恨，一时间民间骚然，人人欲反。这一年十月，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吕崇茂聚众起兵，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裴寂出兵攻击，反而被吕崇茂打败。

河东的形势岌岌可危。李渊只好再命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汇集大军援救河东。

当时，原河东郡治所蒲坂（今山西永济市）的守将尧君素被杀后，其部将王行本重新据城抗拒，唐军多次派遣各路将领轮番进攻蒲坂城，始终不能攻下。如今王行本眼见刘武周大军南下，而唐军力不能支，顿时喜出望外，立刻派人联络刘武周，与宋金刚部遥相呼应。唐军的形势更为险恶，关中人心惶惶。李渊不得不下诏告谕河东各军，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不如暂时放弃河东，坚守关中。"

如果这个诏命真的得到执行，如果李渊真的放弃了河东，那么大唐王朝统一天下的步伐绝对会放缓，甚至有可能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与四方群雄鼎足而立，维持一个群雄混战之局。

所幸，关键时刻总算有人站出来坚决谏止，并且主动请缨，最终挽救了河东的危局。

这个人就是李世民。

李渊的诏书一下，李世民立刻上疏表示反对。他说："太原是帝业的发祥地，国家的根本所在，而河东物产丰饶、民众富庶，是京师的资源供应地，如果一举将其抛弃，臣窃感愤恨！请拨给臣精兵三万，必能平定刘武周，克复汾晋。"

李渊甚为欣慰，马上集结了关中的所有精兵，全部交给了李世民。

武德二年十月二十日，李渊亲自到华阴（今陕西华阴市）给李世民饯行。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李世民就当之无愧地成了李唐王朝的中流砥柱。帝国的每一个危急时刻和重大的转折点，几乎都是李世民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如此才使得初生的大唐王朝能顺利地迈上大一统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创大唐王朝固然是李渊的功劳，但是开疆拓土、统一天下的首功之人，则非李世民莫属。

十一月，李世民趁黄河结冰，率大军自龙门踏冰西渡，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县南），与宋金刚对峙。当时，河东各州县饱受战乱和劫掠，百姓全部逃入城邑，致使村落荒芜、仓廪空虚，唐军无从征收粮草，他们驻扎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断粮。李世民向四方发布文告，远近民众听说大军元帅是李世民，于是纷纷来附。李世民向他们征收粮草，总算缓解了粮荒。

既然唐军会断粮，宋金刚同样也会断粮，所以李世民采取的策略就是——坚守营垒，拒不出战，以此消耗宋金刚的粮食和锐气。

两军对峙的那些日子，李世民时常轻骑简从，亲自出营侦察敌情。有一次由于道路不熟，李世民和随从的骑兵走散了，身边只剩下一名侍卫。其时天色已晚，李世民和侍卫登上一座山丘，找了个避风的山坳休息，由于疲惫已极，两个人很快就沉沉睡去。

预料不到的危险就在此刻悄然降临。敌人的一支游骑路过此地发现了他们，于是悄悄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山野一片寂静，李世民和侍卫发出的鼾声清晰可闻。

如果没有接下来那一幕令人匪夷所思的“蛇鼠救秦王”，那么李世民也许就没命了，而大唐王朝的历史甚至包括中国历史就会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写。

敌兵越围越近。千钧一发的时刻，从李世民身边的地洞里忽然蹿出了一只老鼠，还有一条蛇在它身后紧紧追赶。老鼠惊慌乱窜，一头撞到了侍卫的脸上。侍卫惊醒，慌忙唤起李世民，两人随即跃上马背，拍马狂奔。刚刚跑出一百余步，敌骑就已经追了上来。李世民回身一箭，为首的将领应声倒地，敌兵才停止了追击。

李世民就此逃过一劫。

除了感谢那条毒蛇和那只老鼠之外，除了说未来的天子自有天命之外，我们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许我们只能说——老天爷也许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对这个世界不闻不问。关键时刻，他老人家还是会出手的，只不过有时候执行天意的不一定是讨人喜欢的天使，而是让人讨厌的蛇和老鼠罢了。

就在李世民与宋金刚对峙的时候，先于李世民进入河东的永安王李孝基等联军进至夏县，准备攻击吕崇茂。陕州总管于筠建议抓住战机立刻进攻，可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却认为应该赶造更多的攻城器械，才有

把握一举攻下。李孝基采纳了独孤怀恩的意见，战机就此错失，而李孝基全军覆没的悲剧也就此酿成。

吕崇茂被围之后，立刻向驻扎在浍州（今山西翼城县）的宋金刚求救。宋金刚随即派遣了两名骁将前去增援，这两名大将一个叫寻相，另一个就是日后李世民的麾下猛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是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州市）人，原名尉迟恭，以别名行世，大业末年从军，以勇武著称，官至朝散大夫；刘武周起兵后，成为其部将。此次南下，尉迟敬德是宋金刚的主要助手。当他和寻相率援军进抵夏县时，李孝基等人才蓦然发现自己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还没等他们作出反应，尉迟敬德就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唐军大败，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和行军总管刘世让全部被俘。

至此，唐王朝在河东的最后一个筹码就只剩下驻守柏壁的李世民了。而最早驰援河东，却连一场胜仗都没打过的裴寂就在这时被李渊召回了长安。

表面上李渊以丧师辱国的罪名把裴寂交给了有关部门进行审理，可没多久就把他放了，不但官爵依旧，而且宠遇更厚。

什么叫宠臣？

这就叫宠臣，做对了事就加官晋爵、重重有赏，做错了事也可以忽略不计、既往不咎！

当初的刘文静兵败浅水原便遭到了革职的处分，如今裴寂不但在度索原遭遇惨败，而且几乎丢掉了整个河东，回朝后却富贵依旧、地位安然，如此厚此薄彼、赏罚不公，怎能令朝野心服？

可李渊居然就这么做了！对于一个以恩威刑赏驾驭臣子的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致命弱点。

尉迟敬德和寻相打了大胜仗，解了夏县之围后，心满意足地回师浍州。可当他们行至美良川（今山西夏县北）时，却遭到了唐军的伏击。这支唐军是李世民派遣的，将领是殷开山和秦叔宝。尉迟敬德仓促应战，损失了两千多人才突围而出。混战中，在夏县被俘的独孤怀恩趁乱脱逃，单骑回到了长安。不久后，尉迟敬德和寻相又奉命驰援固守蒲坂的王行本。李世民探知情报，亲率三千步骑，连夜从小路直插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对尉迟敬德发起突击，将其部众拦腰

截断。尉迟敬德大败，士卒或死或降，基本上全军覆没。尉迟敬德仅和寻相逃出一命。

这两场胜仗总算报了夏县惨败之仇，唐军将士士气高涨，纷纷要求李世民跟宋金刚决战。

可是，李世民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认为此刻需要的是隐忍和等待。

他对将领们说：“刘武周据守太原，靠宋金刚打前站，所以他的精兵强将全部云集于宋金刚麾下。但是宋金刚孤军深入，军中无粮，只能靠劫掠维持，因此他最希望速战速决。而我们偏偏就要紧闭营垒、养精蓄锐，不理会任何挑战，挫伤他们的锐气，继而分兵攻击汾州（今山西吉县）和隰州（今山西隰县），冲击他的腹心地带，等到他粮尽计穷，自当遁逃。所以眼下我们应该隐忍，不宜速战。”

李世民的这种战略跟当初平定薛仁果的时候如出一辙。

可是，当初的西秦皇帝薛仁果是将士离心，如今的定杨天子刘武周却是士卒用命，李世民能打赢这场仗吗？

在即将到来的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李世民能像平定薛仁果那样一举平定刘武周吗？

独孤怀恩之变

武德二年的冬天，李世勣深刻体验了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生困境。

尽管李世勣一心想着再度归唐，可父亲在窦建德的手里攥着，让他投鼠忌器、一筹莫展。他的心腹郭孝恪建议："我们刚刚归附窦建德，一举一动都受到猜疑，最好是先建立一些战功，得到他的信任后再采取行动。"

李世勣想想也只能如此，随后主动出兵，攻克了王世充所属的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俘获大量的人员物资，呈献给窦建德，从此获取了窦建德的信任。

不久后，李世勣向窦建德献上了一条经略中原之策。他说："曹州（今山东定陶县）和戴州（今山东成武县）人口众多，被孟海公占据，他表面上归附东都，实际上与王世充貌合神离，如果我们出动大军，随时可以将其攻占。一旦平定孟海公，继而进逼徐州和兖州，河南之地便可不战而平。"窦建德深以为然，遂命曹王后的兄长曹旦率领先遣部队五万人南渡黄河，与李世勣会师。

正当他本人准备亲率大军南下中原时，他妻子曹王后刚好生产，窦建德只好暂时搁置了南下的打算。

李世勣顿时大失所望。他本来的计划是：一旦窦建德抵达河南，就发兵袭击他的大营，然后救出父亲，投奔长安。可现在计划却落空了。

自古忠孝难两全啊！李世勣痛苦地想，看来归唐是遥遥无期了。

就在李世勣彷徨无计的时候，一场突然在他身边爆发的兵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抛下父亲，头也不回地奔向长安。

这场兵变是由一个叫李文相，外号李商胡的人发动的。李商胡是据守孟津（今河南孟津县）的一个变民首领，拥有部众五千余人，表面上投靠窦建德，实则心怀异志。李商胡的母亲霍氏也是一个江湖人物，精于骑射，自称霍总管，和她的儿子皆有叛夏之心。母子俩与李世勣不谋而合，很快结成了同盟，李商胡甚至还和李世勣拜了把子。双方原本约定在窦建德南下时一起动手，可如今计划落空，霍氏大为不甘；加之曹旦的军队进驻河南后，在他们的地盘上肆意侵夺骚扰，令霍氏极为愤恨，于是催促李商胡提前发动兵变，诛杀曹旦和他的手下。

武德三年正月的一个晚上，李商胡设宴招待曹旦帐下的二十三名军官，把他们灌醉之后全部砍杀，随后又设计杀死了三百名曹旦的士兵。动手之后，李商胡才派人通知了李世勣。李世勣当时的大营跟曹旦相连，郭孝恪力劝他跟着袭击曹旦。可与此同时，曹旦也获知了兵变的消息，于是命令士兵高度戒备。李世勣知道先发制人的机会已经丧失，而且自己兵力薄弱，根本不是曹旦的对手，所以不得不和郭孝恪一起连夜逃离军营，策马向关中狂奔而去。

那一刻，李世勣料定自己的父亲必定会死在窦建德的手上。

然而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窦建德虽然不久之后便亲自率兵消灭了李商胡，但是始终没有杀李世勣的父亲。当夏朝的文武百官纷纷请求诛杀李盖时，窦建德说：“李世勣身为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

窦建德在此作出了一个让人意外，却又是最明智的选择。诛杀李盖固然可以发泄自己的愤怒，但丝毫改变不了李世勣复叛投唐的事实。

既然改变不了，何苦给自己加上一个滥杀无辜的恶名？失去李世勣已经是一种损失，何苦为了泄愤让自己导致更大的损失？

窦建德强忍心头的怒火，以一种常人少有的高姿态当众宣布赦免了李盖。在这一刻，仁者的非凡胸襟、智者的深谋远虑以及王者的雍容气度同时在他身上熠熠闪光。

这就叫人格魅力！

在这样一个领袖的统治之下，无怪乎当时的河北呈现出了一派安居乐业的太平光景。史称窦建德积极“劝课农桑”，发展生产，打造了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局面，使“境内无盗，商旅野宿”（《资治通鉴》卷一八八）。

从一个开国帝王所应具备的综合素质来看，无论是执政能力、军事能力还是个人品质，窦建德基本上都算是达标的。

但是最终他还是失败了。

导致他失败的主观因素肯定是有的，但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客观因素——他的对手李世民太强大了。

假如隋朝末年群雄逐鹿的舞台上没有李世民，那么最终君临天下的人

很可能就不是李渊，而是窦建德。

退一步说，即便窦建德最终不足以战胜李渊入主长安，但是与四方群雄成鼎足而立之势则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武德三年的春天，河东的战局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唐军丝毫没有取胜的迹象。

唯一让李渊感到欣慰的是，正月十四日，长期在蒲坂负隅顽抗的隋将王行本终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开门出降。正月十七，李渊亲赴蒲州（蒲坂）受降。

就是这一次亲赴前线，险些让李渊丢了性命，因为有人精心策划了一次谋杀，准备取代他的天子之位。

这个人是李渊的心腹重臣，也是他的表弟——时任工部尚书的独孤怀恩。

独孤怀恩为何会有这么大的野心？

说来话长。独孤怀恩是三朝外戚，他的三个姑妈分别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所以杨广和李渊都是独孤怀恩的表兄。李渊曾经跟他开玩笑说："你姑妈的儿子都当了皇帝，下次可能会轮到我舅舅的儿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渊的一句玩笑话既深深刺伤了独孤怀恩的自尊心，也煽起了他篡位称帝、君临天下的野心。独孤怀恩时常为此扼腕长叹："难道我们独孤家只有女儿的命尊贵？"

当时王行本据守蒲坂，独孤怀恩多次奉命进攻，不但久攻不克，而且损兵折将。李渊屡屡下诏责备，独孤怀恩大为怨恨，于是开始和他的部属元君宝密谋叛变。可是兵变尚未发动，独孤怀恩就和永安王李孝基、内史侍郎唐俭等人一起被派到了河东战场，随后又在夏县遭遇惨败，被尉迟敬德俘虏。口无遮拦的元君宝私下里经常愤愤不平地对唐俭说："独孤尚书近来正在谋划一件大事，如果及早发动，岂有今天的奇耻大辱！"唐俭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料到位高权重的外戚独孤怀恩居然有了谋反之心。

后来李世民在美良川伏击尉迟敬德，独孤怀恩趁乱逃回长安。一直对他深信不疑的李渊又交给了他一支军队，命他继续攻击蒲坂。就是在这个时候，元君宝再次对唐俭说："独孤尚书能逃出大难，再回蒲坂，真是命中注定要当帝王的人，可谓王者不死啊！"

唐俭闻言，意识到毫无防备的李渊随时可能遭到独孤怀恩的毒手，顿时心急如焚。不久，唐俭又听到了王行本投降，李渊将亲自前往蒲州受降的消息，他大为惊恐，料定独孤怀恩肯定会趁此机会发动兵变，谋杀李渊。可其时唐俭仍然被困在战俘营中，根本没办法把消息送出去。唐俭情急之下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向尉迟敬德建议，请他释放行军总管刘世让，让刘世让回朝劝说李渊放弃河东，与刘武周言和。尉迟敬德觉得这个建议不错，随即释放了刘世让。唐俭就把独孤怀恩企图谋反之事告诉了他，让他火速面奏李渊。

与此同时，李渊已经离开长安，来到了黄河岸边，准备渡河；而独孤怀恩也已入据蒲坂，在城中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专等着李渊到来。

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可谓惊心动魄。就在李渊刚刚登上渡船，准备前往独孤怀恩大营的时候，刘世让一路策马狂奔，终于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赶到了渡口。

听完刘世让气喘吁吁的奏报后，李渊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感慨万千地说："我能逃过这一劫，实在是天意啊！"李渊随后派遣使者入城，命独孤怀恩过河觐见。独孤怀恩不知道计划已经泄露，单独乘坐一艘小船来到了李渊的大营。刚刚进入营门，连李渊的面都没见着，独孤怀恩就被禁军逮捕了。

这一年二月二十日，李渊将独孤怀恩及其一干党羽全部诛杀。

武德三年初夏，河东战场的形势开始出现转机。

刘武周在二月上旬接连攻下长子（今山西长子县）和壶关（今山西壶关县）后，其攻势就成了强弩之末，在随后围攻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和浩州（今山西汾阳市）时一再受挫，多次被唐军击败。

四月中旬，宋金刚军中的粮草也全部告罄，不得不向北退却。

一切都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

唐军发动总攻的时机终于到了。

刘武周的败亡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这八个字既可以用来形容李世民的战术风格，又可以用来概括李世民的战略精髓。

从武德二年十一月中旬到武德三年四月下旬，李世民与宋金刚对峙了将近半年。除了发动一两次十拿九稳的奇袭之外，李世民基本上按兵不动；可当宋金刚全线撤退的时候，李世民却亲率大军死死咬住不放，一日一夜追出了二百余里，与定杨军大小数十战，连战连捷，一直把宋金刚追到了高壁岭（今山西灵石县南）。在这次长途追击中，李世民坐下那匹世所罕见的汗血宝马特勒骠[2]可以说立下了赫赫战功。通过收复河东这一战，特勒骠从此名扬天下。

在被唐军一路穷追猛打之后，宋金刚真正领教了李世民的军事才能。这种才能由两种力量组成，一个是高度的忍耐力，一个是惊人的爆发力。

当这两种能力异常完美地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会让对手深刻地体验到两个字——可怕。

感到可怕的还不只是李世民的对手，还有李世民的部属。

当唐军一口气追到高壁岭下的时候，刘弘基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往前追了。

孤军深入，用兵之大忌啊！

刘弘基紧紧抓住李世民的马缰，说："大王破贼，追逐至此，功勋已足，如果再不停止追击，一再深入不已，大王难道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再者，弟兄们已经疲惫不堪、饥渴难耐，应该就地扎营，等到大军主力和粮食全部集结，然后继续北进也为时不晚。"

李世民的回答是："宋金刚计穷而走，众心崩离，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定要一鼓作气将其消灭。倘若停滞不前，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休整和戒备，就不能再攻击了。我现在只能考虑如何尽忠报国，不能考虑自己的生命！"

没等刘弘基再说什么，李世民已经扬鞭策马，独自往前冲了出去。刘弘基和将士们无奈地对视了一眼。主帅已经一马当先地出发了，再发牢骚还有什么意义？他们最后咬了咬牙，只好全部跟上。

在雀鼠谷，唐军再度追上了宋金刚，一天之内，双方进行了八次会战，定杨军八战皆败，被唐军斩杀了数万人。

当天夜里，唐军才终于在雀鼠谷西边的平原扎营。李世民已经连续两天没吃东西，三天未脱铠甲。而此刻大帐中的军粮只剩下一头羊，其余士兵携带的口粮也都快吃完了。

当李世民和身边的将士们一起烹食那只羊时，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从明天开始，他们就断粮了。

李世民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也知道，如果说唐军此刻的处境非常艰难的话，那么此刻宋金刚的处境就是极度艰难！

谁也不比谁更好受，所以，谁能比别人撑得更久一点，谁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换句话说，除了忍耐力和爆发力之外，一个胜利者需要接受的第三项考验就是——意志力。谁具有更坚定的意志力，谁就能笑到最后。

四月二十三日，疲于奔命的宋金刚带着两万残兵逃到了介休（今山西介休市）。还没等他们缓过一口气，李世民已经兵临城下。宋金刚只好命尉迟敬德和寻相守城，然后率部在西门外列阵。李世民命李世勣发起进攻，而后佯装败退。当宋金刚挥师进击的时候，李世民率精锐骑兵迅速绕到了他的阵地背后。

腹背受敌的定杨军顿时崩溃，被唐军斩杀三千余人，宋金刚带着少数轻骑再度北逃。李世民又追出了数十里，一直追到张难堡（今山西平遥县西南）才勒住了缰绳。当时，并州以南、晋州以北的城池全部沦陷，只有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仍然坚守西河（浩州州府，即今山西汾阳市）孤城和这座张难堡。当李世民率部来到堡前，摘下头盔时，在绝境中坚守了半年的浩州将士认出了李世民，顿时喜极而泣。大家只顾着欢呼庆贺，都没有意识到李世民和他的部众们早已饥肠辘辘。李世民的左右悄声提醒樊伯通——秦王还没有吃饭，樊伯通这才忙不迭地命人呈上浊酒和糙米饭。

尉迟敬德和寻相虽然带着残部守在介休，但是连日来的数十场败仗已经让定杨军的士气近乎瓦解。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尉迟敬德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所以当李世民随后派遣宇文士及前来劝降时，尉迟敬德没有过多犹豫就开门投降了。

又一员猛将投到了帐下，李世民大喜过望，随即任命尉迟敬德为右一

府统军，让他和寻相仍然率领他们的旧部八千人。兵部尚书屈突通劝李世民要提防他们叛变，可李世民却不以为意，一笑了之。

在李世民南征北战、扫荡群雄的整个武德年间，四方豪杰就这么一个个走到了他的麾下，从你死我亡的对手变成了死心塌地的亲信。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们吸引到了李世民身边，并让他们从此变得坚贞不渝，不再选择离开和背叛呢？

是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能，还是他强大的个人魅力，或者是他大唐二皇子的身份和地位？

这些固然是重要的，但肯定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李世民给予他们一视同仁、毫无保留的信任。

这些英雄豪杰都不是第一天出来打天下的，他们也跟随过各种各样的老大。所以他们凭直觉就能断定，什么样的信任是作秀和有保留的，什么样的信任是真诚和无保留的。在李世民身上，他们体验到的无疑是后者。李世民对他们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们体验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安全感。

对李世民来说，毫无保留地信任部属肯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但是，有所保留地信任，或者说对部属时时警惕、处处提防，就能有效地规避风险吗？

未必，因为乱世之中的风险无处不在，令人防不胜防。既然如此，那么互相提防事实上只会增大风险。说穿了，每个人都不是傻瓜，你付出什么，付出多少，别人都能感受到。你付出怀疑，收获的定然是恐慌；你付出足够的信任，回报的虽不一定是超值的感恩，但一定会是等量的忠诚。

也许李世民正是意识到了这一切，才会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既然这个世界上的很多老大都在人为地制造风险，那么自己何妨做一个主动承担风险，让人有安全感的老大呢？换句话说，在征服人心的战场上，或许真诚才是最温柔且最锋利的武器，信任才是最无形且最坚实的铠甲。

或许，无防乃为大防！

当然，这一切都要有相应的实力作为保障，而李世民自认为并不缺乏这样的保障。

当宋金刚惨败的消息传到并州时，刘武周就像被利器戳中了心脏，一种尖锐的疼痛和绝望瞬间弥漫他的全身。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血本无归了。

此次倾巢南下，他把自己的精兵良将全部交给了宋金刚。而今宋金刚基本上全军覆没，刘武周还拿什么逐鹿天下？

绝望的刘武周只好放弃并州，带着少数部众流亡东突厥。宋金刚本来还想召集残部再战，可士卒们风闻刘武周已经逃亡漠北，遂不再听从他的号令。宋金刚无可奈何，只能步刘武周之后尘，率一百余骑逃奔东突厥。

李世民迅速率领大军进抵晋阳，定杨朝廷的仆射杨伏念乖乖献出城池投降。随后，原属刘武周的所有州县也纷纷归降唐朝，只有定杨都城朔州（今山西朔州市）仍为定杨朝廷内史令苑君璋所据守。李世民留下真乡公李仲文镇守并州，然后班师凯旋。

流亡东突厥的刘武周不甘心就此失败，多次借助突厥兵马南下攻击。并州守将李仲文屡屡将其击退，并乘胜占领了唐与突厥边境上的一百余座城堡。李渊随即任命李仲文为检校（代理）并州总管。

刘武周无计可施，准备离开东突厥，返回朔州东山再起。但是突厥人已经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遂将其诛杀。而不久之前，宋金刚也企图逃回他的起兵之地上谷郡（今河北易县），同样被突厥人擒获腰斩。

至此，李唐王朝在北方最强劲的一个对手覆亡，李渊父子终于可以把目光转向中原了。

武德三年七月初一，李渊下诏，命李世民率兵向关东全线挺进。

王世充得到战报，立刻在各州县招募精兵强将，全部在东都集结。同时分派他的兄弟子侄驻守洛阳四面的各个战略要地，严阵以待，摆开了与唐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七月二十一日，李世民率大军进抵新安（今河南新安县）。

大唐王朝统一中原的战争就此打响。

[1] 其中的虞世南后来成了李世民的帐下幕僚，位列“秦王府十八学

士”，排名仅在杜如晦和房玄龄之后。

[2]　特勒骠也是著名的“昭陵六骏”之一，体形壮硕、腹小腿长。李世民给它题写的赞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

第六章 中原大决战

挺进中原：王世充的末日到了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相对于平定薛举父子和刘武周，李世民与王世充的较量显得更为激烈，耗时也更为久长，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攻城战，其艰难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而且也是在这场为时长达十个月的中原之战中，李世民多次身陷重围、命悬一线，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几个生死瞬间。

唐军进入东都战场后，李世民即命大将罗士信率前锋部队进围慈涧（洛阳城西），王世充接到战报，立刻亲率三万人前往增援。

七月二十八日，李世民率领一队轻骑兵在慈涧周围侦察。

第一个生死瞬间就在这时候悄然降临。当时李世民正在专心致志地勘察地形，谁也没有料到王世充会在这个时候带着军队从天而降。由于双方兵力太过悬殊，唐军士兵大惊失色，一时间不知所措。还没等他们作出反应，王世充的军队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最容易看出一个统帅真实的个人素质。说白了，这种时候拼的是胆量。

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把“胆量”称为“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一种可贵的力量”。

也就是说，胆量首先要求的并不是战胜敌人，而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对敌人和死亡的恐惧。

克劳塞维茨曾说，对于军人而言，“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胆量

都是最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战争论》）。

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李世民身上这种“真正的钢”。敌人围上来的时候，李世民镇定自若地带领骑兵们且战且退，向着大营的方向突围，前后奔驰，左右开弓。弦声响处，最先冲上来的郑军士兵纷纷坠马，包括王世充的大将燕琪也被李世民一箭射落，唐兵立刻冲上去将其擒获。王世充慌忙勒住缰绳，不敢再向前追击。李世民遂和士兵们杀开一条血路绝尘而去。

死里逃生的李世民回到军营时，浑身上下沾满尘土，守军认不出他，差点放箭把他射杀。李世民摘下头盔大声呼喊，守门士兵才认出这个“土人”原来是他们的秦王。

“慈涧突围”的一幕充分展现了李世民作为一个军事统帅过硬的个人素质。这种素质绝对与地位无关。如果李世民不是大唐王朝的二皇子，而是普通的一个小兵，那么凭他自己的本事，估计很快也能从一个小兵干到一个将军。

同时我们也发现，李世民指挥的军队之所以能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钢铁之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每战必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其勇气和胆识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并且极大地感染每一个士兵，让他们变得跟他一样无惧死亡。

换言之，要想打造一支钢铁之师，统帅首先就必须具备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真正的钢”。

次日清晨，对整个战场地形已经了若指掌的李世民亲率五万步骑进攻慈涧，王世充怯战，撤出慈涧，退守洛阳。李世民随即命各路兵马迅速缩小包围圈：史万宝自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进军，占领龙门（洛阳城南）；刘德威穿过太行山，南下进围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王君廓自洛口（今河南巩县东）出兵，切断洛阳的粮食补给线；黄君汉自河阴（今河南孟津县北）出兵，攻击回洛仓城（今河南偃师市北）；最后李世民亲率大军屯驻于北邙山下，营阵相连，从北面威逼洛阳。

眼见唐军大兵压境，王世充属下的洧州（今河南扶沟县）长史张公谨与刺史崔枢随即作出了他们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献出州城，向李世民投降。

这个张公谨日后成了秦王府的一员得力干将，在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追随李世民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并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八月初，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的一些豪强也发动暴乱，逮捕了当地刺史，举城投降唐军。

八月十四日，黄君汉出兵攻克了回洛仓，俘获郑军将领达奚善定。王世充急命长子王玄应与将领杨公卿等人反攻回洛，但几次进攻都被黄君汉击退，只好在回洛城的西面修筑了一座城堡，派重兵驻防，抵挡黄君汉。

数日后，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城北的青城宫列阵对峙，双方隔着洛水河进行了一番对话。王世充向李世民喊话道：“隋室倾覆，唐称帝于关中，郑称帝于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秦王为何举兵东来？”

李世民不屑于跟他说话，命宇文士及回答：“四海皆归顺吾皇，唯独你阻挠大唐的声威教化，这就是我们东来的原因！”

王世充接下来的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对即将到来的这场中原大战的恐惧。他说：“你我和平共存，休战止兵，岂不更好？”

宇文士及最后给他的答复是：“我们奉诏取东都，没有奉命与你和解！”那一刻，王世充感觉有一道深秋的冷风正疾速掠过洛水河面，凶猛地打在他的脸上。

明年此刻，自己还能站在这洛水河边吗？王世充感到茫然。

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茫然。

面对四面合围、声势浩大的唐军，感到恐惧和茫然的绝不只是王世充一个人。他本人固然可以选择对抗到底，但大多数将吏却不愿陪着他一块玩完。

九月十三日，继洧州、邓州之后，王世充属下的显州（州治在今河南泌阳县）总管田瓒率下辖的二十五个州全部投降唐朝。数日后，尉州（今河南尉氏县）刺史时德叡又率下辖的杞州（今河南杞县）、夏州（今河南太康县）、陈州（今河南淮阳县）等七个州归降。李世民全部保留各州县长官的官职，只将州名做了改动。黄河以南的其他州县见状，也纷纷举城而降。

这一连串大规模的叛降行动对王世充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它不但极大地削弱了王世充的势力，而且将他的地盘肢解得七零八落，致使北面的洛阳、南面的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和剩下来的其他城邑皆被唐军一块一块地分割包围，彼此道路阻断，消息隔绝，只能各自为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世充预感那些未降的城邑很可能也会叛降，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可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就在唐军攻打洛阳的前夕，李世民忽然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

因为刚刚收降的那一批以寻相为首的刘武周旧部居然在这个时候纷纷逃离了军营，而且一逃就逃得精光，只剩下一个尉迟敬德。

唐军将士大为愤慨，立刻将尉迟敬德囚禁。

李世民的“信任原则”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曾经劝告李世民不要轻易付出信任的屈突通、殷开山等人这回抓住了把柄，再次警告李世民：“尉迟敬德骁勇绝伦，如今既已将他囚禁，他肯定会心怀怨恨，留他必有后患，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可李世民却不以为然。他说：“尉迟敬德如果要逃早就逃了，岂会等到寻相这帮人都跑了，他还不跑？”

李世民随即下令释放尉迟敬德，并且单独召见他，还拿出了一笔钱，对尉迟敬德说：“大丈夫既然意气相投，就不必因小小的嫌隙介怀，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听信闲言、残杀忠良，这点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果真要走，这笔钱就做你的路费，聊表一时共事之情。”

老大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尉迟敬德除了感激涕零之外，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说过，一个人如果愿意对别人付出足够的信任，回报的虽不一定是超值的感恩，但一定会是等量的忠诚。

很快尉迟敬德就给了李世民一份回报，并且还是一份超值的回报。

九月二十一日，李世民率尉迟敬德和五百名骑兵巡视战场，走到位于邙山脚下的景陵（北魏宣武帝元恪陵墓）时，一个多月前遭遇的那种

危险再度向他袭来。

王世充带着一万多名骑兵突然出现，迅速将他们包围。郑军大将单雄信一马当先，飞快冲了上来，手执长矛直刺李世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拍马狂奔而来，并厉声嘶喊，在单雄信出手之前的一瞬间，从侧面刺中了他。单雄信负伤落马，郑军士兵大为惊恐，不敢上前，尉迟敬德遂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随后率兵反击，在王世充的军阵中往来冲杀，如入无人之境。稍后，屈突通也闻讯率大军来援，郑军顿时崩溃。唐军俘虏了王世充的大将陈智略和六千名长矛军，斩杀了一千余人。王世充和单雄信带着少数部众狼狈逃回洛阳。

回营后，李世民大为感慨地对尉迟敬德说："你的回报真是来得太快了！"随即赠给他一箱金银，从此对尉迟敬德更为信任和器重。

李世民的帐下虽然猛将如云，但是要说到这马上执矟（长矛）的功夫，恐怕是没有出尉迟敬德之右者。他能单枪匹马在敌人的长矛丛中往返无碍、毫发无伤，不但避矟的功夫无人能及，而且夺矟的绝技更是世所罕见。史称其"每单骑入敌阵中，敌丛矟刺之，终莫能伤"（《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并能"夺取贼矟，还以刺之"（《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尉迟敬德如此大出风头，有一个人不禁妒火中烧。

他就是齐王李元吉。

李元吉一贯对自己马上执矟的功夫十分自负，于是向尉迟敬德发出挑战，提议双方都除去矛刃，只以矛杆较量胜负。尉迟敬德欣然同意，对李元吉说："我自当遵命除去矛刃，但大王不必！"

李元吉闻言心中大怒。尉迟敬德表面上是在尊重他，实际上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比赛开始后，怒火中烧的李元吉使尽浑身解数，一心想刺死尉迟敬德，可手中的矛却总是与尉迟敬德擦身而过，连他的一根毫毛也伤不着。李世民在一旁暗笑。为了让这个本事不大可脾气不小的四弟彻底服输，李世民故意问尉迟敬德："夺矟和避矟，哪一种更难？"

尉迟敬德说："夺矟难。"李世民随即命他们再比试一场，以尉迟敬德能夺矟为胜。

气急败坏的李元吉再次扑了上去。可转眼之间，他手中的矛已经鬼使神差地到了尉迟敬德手中。如是一连三次，让自以为骁勇无匹的李元

吉哑口无言，彻底没了脾气。

武德三年冬天，唐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王世充的地盘也在一天天缩小。

十月，郑朝的管州（今河南郑州市）总管郭庆、荥州（今河南荥阳市西）刺史魏陆、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县令王雄、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刺史王要汉等人纷纷举城降唐。

与此同时，唐将李大亮也奉命进逼王世充之侄王弘烈驻守的襄阳，于十一月初一攻克襄阳外围的樊城镇，斩郑军大将国大安，而且一连占领了十四座城寨；十一月下旬，李大亮再度攻占沮州（今湖北南漳县）和华州（今湖北宜城市），致使王弘烈的孤城襄阳岌岌可危。

十二月初，在各路唐军的强大攻势下，许州（今河南许昌市）、亳州（今安徽亳州市）、随州（今湖北随州市）三地也全部归降唐朝。

深冬，一场又一场暴风雪猛烈地击打着洛阳城。王世充独自坐在空旷的大殿上，感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恐惧正在把他一点一滴地吞噬。

曾经，满朝文武和万千子民都诚惶诚恐地匍匐在他脚下，向他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曾经，自己也一度焕发出开创帝王霸业的壮志与豪情。可如今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四方将吏叛他而去的脚步会跟当初他们蜂拥而来的脚步一样迅捷，一样争先恐后呢？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在这个即将灭顶的时刻，还有谁能向自己伸出援手呢？

王世充想起了一个人，只有这个人能挽救郑帝国覆亡的命运。

窦建德。

可让王世充深感忧虑的是——就在唐军大举来攻之前，他和窦建德还在不停地相互攻击。如今自己大难临头，窦建德愿意捐弃前嫌，向自己伸出援手吗？

王世充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激战洛阳：东都成了人间地狱

王世充不必忧虑，因为窦建德肯定要出手。道理很简单——唇亡齿寒。洛阳是窦建德的南面屏障，一旦被唐朝扫平，李世民的兵锋就会直指河北，所以窦建德绝不会坐视王世充的灭亡。

当王世充派他的侄子——代王王琬——和朝臣长孙安世惊慌失措地跑来求救时，窦建德立刻举行了廷议，夏朝的中书侍郎刘彬随即对时局作了一番完整而透彻的分析。他说："天下大乱，唐朝据关西，郑朝据河南，夏朝据河北，共成鼎足之势。而今唐军泰山压顶一般进攻郑国，从秋天到冬天，唐的兵力与日俱增，而郑的土地则每天都在缩小；唐强郑弱，必然不会支撑太久，一旦郑国灭亡，夏朝也难以单独存在。而今之计，不如把以前的仇恨和愤怒暂时放在一边，出兵相救；夏军攻唐军之背，郑军攻唐军之腹，定可大破唐军。唐军败退后，再静观其变，若郑国可灭则一并灭之，合两国之兵，乘唐军师老兵疲，进而夺取天下！"

窦建德完全同意刘彬的分析，随后一边遣使向王世充许诺出兵救援，一边派遣礼部侍郎李大师前往唐营，劝李世民罢兵，解除洛阳之围。可李世民当即扣留了李大师，对窦建德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

至此，唐朝与郑、夏两个割据政权的中原大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正月，郑朝梁州（今河南睢县）总管程嘉降唐；二十六日，唐将陈正通攻克梁城（今河南汝州市）。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李世民为了发挥唐军骑兵野战的特长，特别遴选了最骁勇的骑兵一千余人，组成了一支精锐中的精锐——玄甲军。军中将士全部身穿黑衣黑甲，分成左右两队，命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任左右统领。每次出战，李世民本人也披挂黑甲，亲自指挥。在随后的多次战役中，李世民率玄甲军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令王世充和他的军队闻风丧胆。

这一年正月底，屈突通和窦轨率部巡视各军的营垒阵地，途中忽然遭遇王世充。唐军猝不及防，差点被郑军歼灭。李世民闻讯，亲率玄甲军前往救援，大破王世充，生擒其骑兵将领葛彦璋，斩杀并俘虏了六千余人。

二月初，由于洛阳被围日久，粮食短缺，驻军虎牢的王世充长子王玄应率数千人押运粮草救济洛阳。李世民探知情报，命将领李君羡出兵狙击。王玄应仓促应战，被李君羡击溃，粮草全部落入唐军手中，王

玄应只身逃回洛阳。

李世民觉得对洛阳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遂遣宇文士及回朝请命。李渊批准了李世民的请求，并对宇文士及说："回去禀告你们秦王，夺取洛阳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克城之日，宫城中的乘舆法物、图籍器械，凡不是私人物品的，由他收存保管，其余子女玉帛，全部犒赏将士。"

李世民得命，遂于二月十三日率大军进驻青城宫。唐军未及修筑营寨，王世充便亲率两万人马出城攻击。诸将皆惧，李世民命精锐骑兵在北邙山下列阵，随后带着各位将领登上北魏宣武陵察看敌情，对左右说："贼兵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这次王世充把全部兵力都投入战场，准备决一死战，若今日一战破之，其后他便不敢再出城了！"于是命屈突通率五千人渡过穀水进攻王世充，随后李世民亲率骑兵冲入敌阵。

中原之战中最为激烈的这场青城宫战役就此打响。

为了探测敌阵的纵深程度并且打乱敌军的阵形，李世民骑着他钟爱的那匹通体纯紫、奔跑如飞的骏马飒露紫[1]，在数十精骑的掩护下，像一支离弦之箭直直插入敌阵，最后竟然横穿而出，一下打乱了郑军的阵脚。郑军士兵大为惊恐，被击杀甚众。可就在李世民纵横驰骋、杀得性起的时候，一道河堤忽然挡住了他的去路。

那是穀水岸边的河堤。李世民匆忙掉转马头，准备和大军会合。可是周围密密麻麻全是敌军，就连保护他的数十名骑兵也失散了。

李世民的身边只剩下一个将领丘行恭。

这是李世民自中原开战以来第三次身涉险境。

敌人围了上来，流矢纷纷射向李世民，飒露紫前胸正中一箭。危急关头，丘行恭连发数箭，射杀了几名敌兵，随即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坐骑交给李世民，然后一手牵着飒露紫，一手执长刀，左冲右突，大声叱喝，终于和李世民一起杀开一条血路，与赶上来的大军会合。

李世民突出重围后，王世充也迅速集结溃散的部众，重新摆出阵形，继续与唐军鏖战。

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从辰时（上午七时）一直激战到午时（下午一时），郑军多次被唐军骑兵冲散，可王世充却屡屡整兵再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顽强。

王世充知道，如果输掉这一仗，今后他就只能龟缩在洛阳城里，被唐军压着打了，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然而，尽管王世充已经拼尽了全力，这一仗他还是输了。

因为，郑军跟唐军的战斗力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尤其是在野战方面。

午时过后，唐军士兵越战越勇，郑军士兵却个个精疲力竭，开始往后溃退，再也不听号令了。王世充万般无奈，掉转马头向洛阳狂奔。李世民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了洛阳城下，总共斩杀并俘虏了七千余人。

唐军随后便将洛阳团团包围，最后一个阶段的攻城战开始了。唐军从二月下旬开始围攻洛阳宫城，但是最后的攻坚战却要比李世民想象的艰难得多。

因为郑军的防御部署非常严密，而且装备了大量重型武器。比如投石机，可投掷五十斤的飞石，投掷距离达二百步。可想而知，这样的"炮弹"发射出去，每一发都可以把人砸成肉酱。此外还有一种巨型连弩，把弓拉满的时候形状大如车轮，箭镞形同大斧，每次可以连续发射八箭，射程可达五百步。在这样一些"尖端武器"的猛烈打击之下，虽然唐军日夜不停地从四面猛攻，付出了重大伤亡，但是一连打了十多天，洛阳宫城还是岿然不动。

唐军将士筋疲力尽，以行军总管刘弘基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纷纷请求班师。

可志在必得的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大举进攻中原，自应夺取洛阳，此乃一劳永逸之举。而今东方各州皆已望风归降，洛阳只是一座孤城，不可能坚持太久，眼看马上就要成功，岂能弃之而去？"

随后，李世民传令全军："洛阳未破，师必不还，胆敢言班师者——斩！"

将领们只好收声，可还是有人不服，偷偷跟长安打了小报告。数日后，李渊的一道密诏就到了李世民手上，意思也是让他撤兵。李世民立刻拟了一道表奏，坚持认为洛阳必可攻克。为了加强说服力，李世民特意派遣此次随同出征的军事参谋封德彝奉表入朝，向李渊当面分析洛阳的形势，报告前线的战况。封德彝抵达长安后，禀报李渊："王世充原来所占的地盘虽然不小，但是将吏离心离德，且如今大部都已归降，号令所行，唯洛阳一城而已！王世充智竭力穷，朝夕

之间即可攻克；倘若班师，贼势复振，一旦各地贼兵再度联合，其后必定更难对付！”

李渊闻言，随即取消了撤兵的命令。

上下既已取得一致，攻克洛阳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李世民给王世充写了一封劝降信，对他晓以利害、分析祸福。可王世充却不予理会，准备和唐军血战到底。

因为王世充还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来自北方窦建德的援军。可是，从去年年底窦建德就已经答应要出兵援救，如今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窦建德在哪里呢？

窦建德还待在他的都城里面，这两个多月来他一直按兵不动。

他在坐山观虎斗。

救当然要救，但必须考虑什么时候才能救，窦建德必须拿捏一个最恰当的火候。

这个火候就是在王世充和李世民打得两败俱伤而洛阳将陷未陷之际。只有郑、唐两方的有生力量都被最大限度地耗尽之后，窦建德才会乘虚而入，后发制人，一举进占中原，坐收渔翁之利！

武德四年二月末，一直在冷眼旁观的窦建德终于迟缓地出手了。

因为王世充已经山穷水尽，而唐军也已成强弩之末。

火候到了！

窦建德不紧不慢地亲率大军渡河南下，于三月初一举攻克孟海公盘踞的周桥（今山东定陶县东南），生擒了孟海公。

下一步，只要窦建德向西越过虎牢关，便可挺进中原，直趋东都。

虎牢关位于今河南荥阳市区西北16公里的汜水镇，是洛阳东面的天险和屏障，因西周穆王曾在此狩猎，捕获一只猛虎，并将虎饲养于此而得名。其关隘修筑于汜水西面的大伾山上，“北临黄河，崖岸峻峭，岧岧孤危，高四十余丈，势尽川陆”（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

这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要断绝王世充的外援，阻遏窦建德的兵锋，唐军就必须占领虎牢关。

但是虎牢关隘险固，所以自唐军进兵中原以来，始终未能将其攻克，虎牢一直掌握在郑军的手中。其时据守虎牢的是王世充的侄子荆王王行本（非隋将王行本）。

然而，就在窦建德大举南下的一天之前，老天爷却帮了唐军一个大忙，使其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虎牢。

这一年二月三十日，王行本属下的司兵沈攸忽然派人来到唐军驻地，找到了时任左武候大将军的李世勣，请求投降。李世勣意识到这是夺取虎牢的天赐良机，当天夜里就派遣左卫将军王君廓突袭虎牢，与沈攸里应外合，迅速攻陷虎牢，生擒了王行本。

从三月开始，李世民改变了战术，不再对洛阳进行强攻，而是深挖壕沟、高筑营垒，切断了洛阳与外界的一切联络。

攻不下你，难道我还困不死你？

长期缺乏补给的洛阳城终于陷入绝境，最惨的当然就是断粮。城中的粮食价格疯狂上涨，一匹绢只能换粟米三升，十匹布才换盐一升，而平日价格高昂的精美服饰和古董珍玩则贱如草芥。百姓们吃光了城中的所有草根树皮，最后只好把土放在水桶里摇晃，等澄清后，捞取浮在水面上的细泥，混合着一点米屑烤成饼来吃。但是吃这种“土饼”无异于饮鸩止渴，很多人随后便浑身肿胀而死。一时间，洛阳宫城中到处躺满了横七竖八、扭曲变形的尸体，万千腐尸的恶臭弥漫在整个东都的上空。当初皇泰帝杨侗曾经把外城的三万户居民迁入宫城，如今只剩下不到三千户。

百姓几乎快死光了，而官员们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即便贵为公卿，朝廷往往连糠麸也难以供应；至于那些尚书、侍郎以下的官员，则只能让他们自谋生路，到头来也不免活活饿死。

堂堂东都仿佛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王世充面朝东方望眼欲穿——

窦建德啊窦建德，你到底是要来救命的，还是要来收尸的？

李世民和窦建德的对决

此时的窦建德实际上一刻也不敢耽搁。

因为他很清楚，陷入绝境的王世充随时可能投降或者覆灭，万一真的让李世民占据了洛阳，那么他坐山观虎斗的好处就全部落空了。

窦建德攻占周桥后，即命部将范愿镇守曹州（今山东定陶县），然后集结孟海公和徐圆朗的所有部众，马不停蹄地进抵滑州（今河南滑县），郑朝行台仆射韩洪立刻开门迎接。

三月二十一日，窦建德进抵酸枣（今河南延津县），随后攻陷唐军驻守的管州（今河南郑州市），斩杀唐管州刺史郭士安。其后，窦建德又迅速西进，接连攻克了荥阳（今河南荥阳市）和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大军水陆并进，用舟师运载粮食，一路溯黄河西上。王世充的弟弟、时任徐州行台的王世辩随即派遣部将郭士衡率数千人与窦建德会师，两军共计十余万人，对外号称三十万。

数日后，窦建德率大军进至虎牢关，于成皋（今河南荥阳市西北）东面的河岸平原驻扎，开始修筑营垒，并派人通知王世充。

窦建德大举南下，来势汹汹。李世民紧急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将吏们提出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

多数将领表示应该避其锋芒，可李世勣的副手郭孝恪却坚决反对。他说："王世充已经穷途末路，转眼就要投降，窦建德千里迢迢地跑来救他，这是天意要让他们一起灭亡。而今之计，应据虎牢之险，伺机而动，必可破之！"

记室薛收也说："王世充据守东都，府库充实，所率领的士兵皆江淮精锐，他们现在唯一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粮食，所以才会被我们控制，战既不能战，守又守不久，已经陷入了困境。而今窦建德亲率大军，集中了他的所有精锐远来救援，如果我们稍微松懈，使其进抵东都，双方会师，则河北之粮必将源源不绝运至东都，大战重开，偃兵无日，统一海内之日更将遥遥无期。如今应当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同时由大王亲率精锐进据虎牢，秣马厉兵，以逸待劳，必可克之。窦建德既已溃败，王世充自然瓦解，不出二十天，便可同擒二人！"

李世民频频点头称善，他的意见当然是和薛收、郭孝恪等人一致的。可是，以萧瑀、封德彝、屈突通等人为首的高级文官武将却一再坚持说："我军的士气和体能已经到达极限，王世充据守坚城，不容易马上攻克。窦建德大军席卷而来，锐不可当，我军将处于腹背受敌之境。如果两线作战，实在不是上策，不如暂时退保新安，等待敌军师老兵疲，我军伺机再战。"

这些人发言完毕，把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李世民。

刚才还闹哄哄的大帐内忽然陷入了一阵短暂的寂静。

李唐王朝的中原之战就这么走到了一个最微妙的关头。

李世民也面临着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他知道，萧瑀、屈突通等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唐军与王世充已经打了足足八个月，早已疲惫不堪，而且在此前的攻坚战中又遭遇挫折，士气已大不如前。而窦建德的夏军则是以逸待劳，并且挟着新胜的余威。两相比较，唐军实在没有多少取胜的把握。再者说，燕赵自古多豪杰，夏军的战斗力绝对不可小觑，武德二年把李神通率领的河北唐军打得一败涂地就是明证。而且这一次窦建德几乎出动了他的所有精锐，这十几万精兵强将是那么好打发的吗？这不能不让唐军的多数将吏感到巨大的不安和恐慌。

万一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听从大多数将吏的建议——暂时撤兵，伺机再战。

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认为这么做是错的，就算李渊也不会认为李世民这么做是消极怯战。因为战局确实对唐军不利，而且有这么多的文武将吏赞成退兵。再说了，避敌锋芒、暂时退守新安也不等于输掉了这场战争。稍事休整之后，仍然是有希望赢得胜利的。

战局如此险恶，退兵的理由如此充分，李世民还能坚持己见，一意死战吗？

在李世民看来，两线作战的风险固然很大，可一旦成功，便可一战平定河南河北，奠定一统天下的坚实根基，同时为他的军事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进一步巩固并提高他在李唐统治集团中的声望和地位。

这样的战果实在是诱人，所以李世民绝对不可能放弃。他最终选择了这个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的策略——围洛打援，两线作战！

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所有将领，作出了他的总结发言：“王世充连遭重挫，粮食告罄，上下离心，根本无须我军力攻，稳坐城下便可摘取战果。窦建德新近攻破孟海公，将骄兵惰，我军若据虎牢，无异于扼其咽喉。若其冒险争锋，我军取之甚易；若其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我军一旦拿下洛阳，士气自然倍增，一举两克，在此一战！若不速进，让窦建德攻占虎牢，刚刚归附的所有城池必将重新沦

陷；窦、王两军合力，其势必强，怎么可能会师老兵疲，让我军有机可乘呢？”

李世民最后斩钉截铁地说：“不必多言，吾意已决！”

李唐王朝统一中原最关键的一场战役，就在这句话中一锤定音。

李世民要放手一搏、孤注一掷了！会后屈突通忍不住再次劝谏，可丝毫改变不了李世民的决心。或许在沙场老将屈突通的眼中，此刻的李世民活脱脱就是一个年少气盛、好勇斗狠的典型。

这一年，李世民才二十三岁。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年轻人最终还是赢得了“围洛打援”的胜利，一举消灭了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两大割据政权。

或许屈突通到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的二皇子确实是一个天才——一个纵然不算千载难逢，起码也是百年不遇的军事天才。

李世民作出决议后，随即兵分两部，命齐王李元吉和屈突通率一部继续围困洛阳，自己亲率骁勇之士三千五百人，向虎牢进发。

武德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李世民进驻虎牢关。

在与窦建德决战之前，李世民就出人意料地露了一手，给了夏军一个下马威。二十六日，李世民率五百名骑兵出虎牢关，东行二十余里，侦察夏军动向。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他决定打一场小规模的伏击战，挫挫夏军的锐气。

李世民命李世勣、程知节、秦叔宝率领这五百名骑兵埋伏在道路两侧，而自己和尉迟敬德只带着四个人径直往夏军的营地驰去。路上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了一句相当自负的话，他说：“我执弓箭，你执长矛，就算有百万敌众，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在距夏军大营三里远的地方，他们碰上了夏军的游骑兵。对方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唐军的斥候，都懒得攻击他们。李世民忽然高喊：“我是秦王李世民！”同时拉弓射箭，当即射死了为首的一个夏军将领。

游骑兵飞速跑进军营中报信，夏军大营立刻炸开了锅。

唐军主帅居然只带着几个人摸到了他们眼皮底下？

这简直比白日见鬼更让他们骇异。当然，这同时也让他们感到无比惊喜——李世民这么做等于是在送死。转瞬之间，夏军的五六千名骑兵排山倒海地冲了出来，都想活捉秦王这条大鱼。

李世民的随从骑兵大惊失色。李世民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们尽管先走，我和尉迟敬德殿后。"那几个骑兵慌忙拍马狂奔而去，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却一脸悠哉，按辔徐行，等到夏军几乎快追上的时候，李世民才回头放箭。每发一箭，夏军必有一人落马。追兵恐惧，不敢逼近，想想又不甘心，于是再追。可每次追上来，为首的几个都会被李世民射杀，尉迟敬德前后也杀了十余人。如是三番五次，追追停停，最后夏军终于被李世民引入了伏击圈。李世勣等人率众突然杀出，大破夏军，砍杀了三百余人，俘获夏军勇将殷秋和石瓒。

窦建德被李世民死死地挡在虎牢关外，一挡就是一个多月。

从武德四年三月下旬到四月末，窦建德率十余万大军对虎牢发动了多次进攻，却被唐军一一击退，始终无法前进半步。四月三十日，李世民又命王君廓率一千余名轻骑兵抄掠了夏军的补给队，不但缴获全部粮草和物资，还生擒了夏朝大将军张青特。

形势急转直下，夏军士气低落，每天都在盼望班师。

虎牢成了一座泥潭。

到底是继续进攻，还是班师回朝？窦建德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命运的转折点上。

夏朝的国子祭酒凌敬向窦建德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他说："大王应率全部兵力渡河北上，夺取怀州、河阳，命心腹将领镇守，然后亲率大军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占领汾州（今山西吉县）、晋州（今山西临汾市），向蒲津（今山西永济县西黄河渡口）进攻。这么做有三个好处：其一，如入无人之境，可获全胜；其二，开疆拓土，壮大实力；其三，关中震骇，洛阳之围自解。以目前的情势看，没有比这更好的战略！"

这是一个典型的"围魏救赵"之策。按照凌敬的设想，如果夏朝出兵河东、威逼关中，李世民必定要回师自保，其结果就是——洛阳之围不解而解，中原唐军不败而败。

窦建德一开始也决定采用这个战略。可王世充的使臣王琬和长孙安世每天都在他面前痛哭流涕，同时还暗中用重金贿赂夏军将领，所以当

窦建德征求诸将意见的时候，多数人都反对凌敬的提议，说这纯粹是纸上谈兵、书生之见，绝不可听信。

事实上凌敬的战略有一定的可行性，但问题是过于理想化了，也难怪被将领们讥为书生之见。首先，夏军一旦掉头北上，早已岌岌可危、粮尽援绝的东都还能撑几天？恐怕等不到夏军占领河东，东都就陷落了。其次，河东是李唐的发祥地，经营日久、根基牢固，同时又是抵御突厥的前沿阵地，并州、浩州、晋州等战略要地皆有重兵布防，城高池深、粮草充足，岂能让夏军轻易拿下？就算窦建德不以占领河东全境为目的，只从上党直插蒲津、威逼关中，可并州、西河、介休一线的唐军又岂能坐视？而正在围攻东都的中原唐军也不是桩子，即便暂时不能攻下东都，李世民肯定也会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自己则亲率主力北上。到时候夏军必然遭到唐军的围追堵截，甚至很可能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也许正是考虑到了这一切，所以窦建德最终放弃了凌敬的战略，决定在虎牢与李世民决战。他用一种略带歉意的口吻对凌敬说：“而今军心正锐，乃天助之时，因之决战，必将大捷！故不能用公之言。”凌敬一再坚持他的意见，窦建德大怒，命人一左一右把他架出了大帐。

凌敬被拖出去后，有个人又走了进来，她是窦建德的妻子曹王后。

曹氏本身就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女中豪杰，凭着一个政治女性的特殊直觉，曹氏认为凌敬的意见是对的。对窦建德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曹氏不由自主地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她对窦建德说：“凌敬之言不可废！大王倘若从滏口（今河北武安市西南，太行山八陉之一）深入，乘唐朝后方空虚夺取河东，并且联络突厥，让他们从西方抄掠关中，那么唐军必定回师自救，何必担心洛阳之围不解？倘若继续逗留于此，劳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

窦建德猛然一挥手，说：“此非女子所知！我们来救洛阳，而今其困若倒悬、危在旦夕，我们若弃之而去，是畏惧敌人、背弃信义，这绝对不行！”

窦建德就这样推翻了一个文臣的“书生之见”和曹王后的“妇人之言”，听从了诸位将领的意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属于他的命运。

如果说窦建德纯粹是因为耳根子软，经不住王琬和诸将的劝说才放弃了这个战略，那未免小瞧了他；如果说他是因为所谓的“信守诺言”而决意要救王世充，那又未免美化了他。

事实上，窦建德的想法和李世民一模一样——他要抓住战机与对手一决雌雄！

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眼前李世民虽然占据虎牢天险，但是窦建德自忖实力远在唐军之上，如果一战击溃李世民，再伺机吞并王世充，那么整个大河南北就将全部落入他的手中，到时候李唐只能龟缩于关中一隅，很难再有大的作为。所以，窦建德相信，逐鹿天下的大业在此一举。如果赢得这场战役，即便不说一战定乾坤，起码也能雄踞中原、睥睨天下！

这是一个多么辉煌而又多么诱人的前景啊！窦建德怎么舍得放弃？

说白了，他和李世民都是想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玩一把大的！

公元621年。虎牢。

李世民和窦建德站在这座天下雄关的两侧，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们的巅峰对决。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较量。

这是一场命运的轮盘赌。

两个逐鹿的英雄都已押上他们的所有。

两个命运的赌徒都已买定离手。

最后，上帝微笑着掷出了骰子……

虎牢之战：夏朝的终结

虎牢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著名战役。

李世民仅以数千骑兵破窦建德十余万众，堪称以少胜多的经典。

就像此前的每场战役一样，李世民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一次，李世民采用了谍报战，成功诱使夏军在他希望的时间，以他希望的方式打响了这场战斗。

李世民让早已安插在夏军中的间谍向夏军高层散布了一个假情报，说唐军战马的草料已经吃完，不日将到黄河北岸的草地上放牧。窦建德信以为真，遂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对虎牢发动总攻。

五月初一，当间谍把这个消息传回来后，李世民立即北渡黄河，在接近广武（今河南荥阳市）的地方，故意把一千多匹战马放到黄河中的一个小岛上吃草。当天傍晚，李世民悄悄返回虎牢，严阵以待。

五月初二，窦建德果然中计，率领所有部队进至牛口（今荥阳市西北，汜水注入黄河处），开始筑营列阵。其阵势北至黄河，西至汜水，南到鹊山（今荥阳汜水镇东南），连绵二十里，战鼓齐鸣，兵威盛大。唐军的将领们见状，不禁感到惶恐。李世民带着诸将领登上高岗眺望，对他们说："盗匪在山东起兵，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强敌，如今正身涉险境，却鼓噪喧哗，毫无纪律，并且紧逼城下列阵，足以表明其轻敌之心。我们按兵不动，他们的士气定会衰竭，列阵太久，士卒疲惫饥饿，势必后撤，到时候我们突然发动进攻，没有不胜的道理。我跟诸位打赌，过了中午，一定把他们击破！"

李世民命人召回放牧的战马，准备等战马一回来就发动进攻。

夏军的士兵从辰时开始列阵，一直到午时都仍然傻站在那里，既无仗可打，又不能生火做饭，个个疲倦已极、饥渴难耐，最后纷纷坐下休息，还互相争夺饮用水，阵地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李世民看在眼里，心中暗喜，遂命宇文士及带领三百名轻骑兵进行试探性攻击。他吩咐道："夏军阵势如果没有松动，你就回来；要是阵脚一动，你马上变佯攻为真攻。"

宇文士及领命，随即率兵飞速迫近夏军阵地，夏军果然一片骚动。

与此同时，在北岸放牧的战马也已全部回营，李世民立刻发布了总攻命令，驻守虎牢的数千名唐军全部出击。李世民亲率轻骑兵冲锋在前，命主力随后跟进。唐军倾巢而出，快速掠过汜水，直冲夏军阵地。

此时此刻，夏王窦建德在干什么呢？

他在开朝会。

很显然，窦建德并没有把这个年轻的对手放在眼里。他以为自己的兵力数十倍于唐军，李世民绝对不敢主动出关攻击。

可他错了，李世民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就在李世民对窦建德发

起总攻的这一刻，他还在和朝臣们商讨围攻虎牢的策略。

当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传进大帐中的时候，夏朝的文武百官惊恐万状，顷刻间乱成一团。窦建德愣了一瞬之后，即刻下令骑兵反击，可骑兵们却被惊慌乱窜的朝臣挡住了去路。

窦建德连忙指挥百官退下，可刹那间大量唐军已经杀到，窦建德万般无奈，只好率领部分亲兵向营地东面的高坡撤退。唐军将领窦抗拼命追击，夏军奋死抵御，将窦抗击退。与此同时，李世民率领骑兵在夏军中来回冲杀，所到之处，夏军士兵无不望风披靡。唐淮阳王李道玄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身上连中数箭，身下的坐骑更是被射得如同刺猬，可李道玄勇气不减，依然坚持战斗，每射一箭，敌兵必定应声而倒。李世民命他骑上备用马匹，跟在自己身边。

唐、夏两军陷入鏖战，一时间杀声震野，尘埃漫天。

夏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可他们的阵势早已被唐军冲垮，指挥系统几乎完全瘫痪，只能各自为战。为了彻底击垮夏军残存的斗志，李世民率程知节、秦叔宝、史大奈、宇文歆等人，卷起旗帜，从仍然在顽抗的夏军阵地中穿过，从阵后突出，随即将唐军大旗高高竖起，夏军见状，顿时斗志全丧，一举崩溃，李世民率部追击了三十里，斩杀了三千余人。[2]

混战之中，窦建德被长矛刺中，一路向西狂奔，身边的亲兵各自逃散。窦建德逃至黄河岸边的牛口渚时，伤口剧痛难忍，忽然栽落马下。唐车骑将军白士让和杨武威尾追而至，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夏军将领，挥起长矛正欲刺下，窦建德高喊：“不要杀我，我是夏王，把我送给秦王，你们可以得到荣华富贵。”

夏王窦建德？白士让和杨武威对视一眼，无声地笑了。

虎牢之战就这么结束了。

一代枭雄也就这么完了。

其实直到被唐军绑起来的那一刻，窦建德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败的。

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一切都显得极不真实。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间一脚踏空，然后灵魂飘浮在半空中，看着自己的肉体朝着深渊无望地坠落。这时候的感觉不是痛苦，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迷惘和无助。

此刻的窦建德仿佛就飘浮在这样的半空中，怀着这样的迷惘和无助，看见自己被人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抬上马背，然后带到了一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面前。那个年轻人嘴角挂着一抹讥诮的笑意，说：“我只是讨伐王世充，碍你什么事？居然敢越过边境，犯我兵锋！”

窦建德听见自己用一种近乎讨好的口气说：“若不自己来，恐劳你远征。”

那一刻，飘浮在空中的窦建德忍不住大喊一声——不，这不是我想说的！

可是，没人理他。

那个被人五花大绑的窦建德也没有理他。

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理他。

最后窦建德终于意识到——夏王已经死了。

曾经的王道霸业已经像一个硕大而美丽的泡沫一样在空气中砰然爆裂，只有被人五花大绑的窦建德才是此刻唯一真实的存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所有的愤怒、恐惧、痛苦、悔恨在一瞬间全部向他袭来。

十年！

窦建德历经艰险奋斗了整整十年的帝王功业就这样毁于一旦！虎牢之战，十余万夏军全军覆没，除了被杀和逃散的外，与窦建德一同被俘的还有五万人，李世民随后将他们就地遣散，命他们各回家乡。

窦建德的妻子曹王后侥幸脱身，与左仆射齐善行一起，带着数百名骑兵仓皇逃回洺州。

胜利来得如此迅猛，曾经极力反对李世民与窦建德决战的封德彝等人第一反应就是入帐向李世民道贺。李世民笑着说：“不听公等之言，才有今日之胜。可见公等虽是智者，但是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啊！”

封德彝等人尴尬地赔着笑脸，无言以对。听到夏军惨败、窦建德被俘的消息后，王世充的最后一丝希望终于破灭。

五月初八，李世民将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等人装进囚车，押到了

洛阳城下，向王世充和洛阳守军示威。王世充站在城头上与窦建德遥遥对话，禁不住泪如雨下。最后王世充召集诸将讨论，准备杀出重围，南逃襄阳，但是与会的所有将领却一致反对。他们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夏王，而今夏王已成俘虏，我们即使杀出重围，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王世充彻底绝望。

五月初九，王世充换穿白衣，率太子王玄应和郑朝的文武官员两千余人，到唐军营门投降。李世民亲自出来受降。王世充趴在地上，汗流浃背。李世民说："你一直把我当成小孩，今天见了小孩，却为何如此恭敬？"

成者王侯败者贼，人为刀俎我为肉啊！此时此刻，王世充除了满脸真诚忏悔，不停地磕头谢罪之外，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五月初十，李世民进入洛阳宫城，命记室房玄龄收取隋朝的档案图籍，命萧瑀和窦轨等人封存府库，收其金帛，犒赏将士。同日，李世民命人将单雄信、段达、朱粲、杨公卿、郭士衡等十几个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押赴洛水河畔斩首。

说这些人都属"罪大恶极"恐怕并不太准确。其中除了朱粲为人残忍嗜杀，惯以人肉充当军粮，招致极大民愤之外，其他人恐怕都在可杀与不杀之间。

但最后他们还是被杀了。

这些人最终丢掉脑袋的个别原因我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作过多探究，但总的原因还是显而易见的——李世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杀戮立威。

一个割据日久、顽抗多时的政权垮台了，没有一群人来陪葬怎么说得过去？在投降的两千余人中"百里挑一"地杀他十几个，这绝对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小规模的屠杀行动会对剩下来的绝大多数人起到一种震慑作用，让他们在余生中对李唐王朝感恩戴德、死心塌地。

这就叫"恩威"。

这是任何一个政治领袖驾驭臣子的最基本手段。

虽然有关这十几颗脑袋被李世民圈中的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中一颗脑袋入选的理由却是非常充分的。

那就是单雄信。

我们都还记得，在去年九月的一场战役中，这个武功高强的单雄信曾经把长矛刺到了李世民的胸前，差一点就把他挑落马下，多亏武功更高强的尉迟敬德及时赶到，李世民才没有挂掉。

单凭这一点，单雄信就足以被李世民碎尸万段。

在单雄信被砍头之前，和他拜过把子、感情胜似亲兄弟的李世勣曾经声泪俱下地一再央求李世民饶他一命，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官爵交换他的性命，但是李世民却一口回绝，毫无商量的余地。这种情形我们经常在港产影片中看到，一个老大要杀一个人，旁边有人苦苦求情，老大愤怒咆哮："他曾经用枪指着我的头——用枪指着我的头啊！我怎么可能不杀他？"

李世民虽没有作咆哮之状，但其心情则大抵与之相去不远。

当然，李世民杀单雄信也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和立威的心理，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单雄信在江湖上历来有"轻于去就"的不良口碑。早在瓦岗时代，李密的长史房彦藻就曾以此为由劝李密把单雄信除掉。而对此刻的李世民来说，其麾下早已人才济济、猛将如云，他何苦再接纳这样一个反复无常之人呢？更何况，在即将到来的夺嫡之战中，这种人也未必没有可能倒向太子李建成一边，所以李世民实在没必要冒险收留他。

理由如此充分，单雄信当然非死不可。

数日后，李世民参观富丽堂皇的洛阳皇宫，感叹道："如此放纵奢侈之心，穷尽一己私欲，国如何不亡？"随即命人拆除端门上的华丽城楼，焚毁了隋朝的朝会大殿乾阳殿，又摧毁了则天门两旁的门阙。

巍峨壮观的殿阙转眼沦为一片废墟。

对于这个历史细节，柏杨先生曾经作出这样的评价："又是拆、烧、毁三部曲。后来，端门重建；乾阳殿焦土上重起乾元殿；则天门废墟上，再建应天门。浪费的都是人民的钱，人民的汗！"

柏杨先生出于他一贯的人本立场和人道主义精神，体恤民艰，痛恨统治者对民财和物力的浪费，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单纯就这个事情本身，柏杨先生的评价未免有些大而无当。

因为这个历史细节本是王朝更迭的题中之义，基本上和是否浪费民财

物力无关。暂且不说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就算它在历史上仅此一例，李世民这么做也很正常。

因为被摧毁的这些殿阙都是旧王朝的权力象征。

如果不把旧王朝的权力象征推倒，新王朝的政治权威如何挺立？

所以，无论它们身上凝聚了多少民脂民膏，李世民都不会觉得可惜；无论它们看上去还显得多么崭新，推倒重来都是它们无可逃脱的历史宿命。

在进驻洛阳期间，除了上述这些公开的政治举动，李世民还做了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

这件事情所传达出的政治信息绝对要比那些公开举动重要百倍！

李世民去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远知，是洛阳玉清观的住持。

李世民来找一个道士干什么？

王远知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士，他拥有一项常人没有的本领——预知未来，就像他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

当李世民与房玄龄前去微服私访的时候，李世民并未自报家门，可这位高人还是一眼就识破了李世民的真实身份。他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大吃一惊，心想这个高人果然是名不虚传，于是据实相告，并诚恳地向王远知请教了一个问题。

李世民询问的当然是自己的未来命运。

准确地说，是未来的政治命运。

王远知接下来的回答就像一道闪电准确命中李世民心中那个最敏感、最隐秘的角落，并且将其照耀得如同白昼。王远知说：“即将做太平天子的人，一定要好自珍重。”

尽管这是李世民一直在期待的答案，但是猛然听见“天子”二字，李世民的额头还是不由自主地沁出了一层冷汗。要知道，李世民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藩王，以藩王之身而觊觎天子之位，那是悖逆，是谋反！这样的事情一旦泄露，李世民就算不会人头落地，至少也会身败名裂。

然而，这样的惶恐只在李世民的心中一闪即逝，一种无与伦比的兴奋和喜悦之情很快就弥漫了他的胸膛。

很显然，武德四年夏天的这次微服私访对李世民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它把李世民原本深藏于内心的某种幽微而隐秘的权力欲望撩拨成了一种巨大而坚定的政治野心，并促使他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换言之，正是王远知的这句话让李世民获得了一种天启般的信心和力量，让他从此怀着“天命在我”的信念，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夺嫡的道路。

这是一条不归路。

从这一年夏天开始，李世民便再也没有回头。

直到十四年后的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当王远知的预言早已变成现实，而一切都已成为往事，李世民依然念念不忘曾给予他无穷力量和必胜信心的王远知。他为此公开颁布了一道诏书，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世外高人的感激之情。诏书中的一句话充分表明武德四年夏天的那次秘密会晤对李世民的深远意义，他说：“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旧唐书·王远知传》）

这句话无疑泄露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秘密。它至少可以证明李世民夺嫡问鼎的政治野心是由来已久的。最起码从武德四年夏天开始，一场终将走向流血和杀戮的政治博弈就已悄然拉开了帷幕，而玄武门之变的腥膻气息也已经在新生的李唐王朝上空隐隐飘荡。

然而，对于贞观时代的人们而言，当曾经不可告人的夺嫡阴谋已经变成创造历史的伟大举动，当昔日的唐室藩王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大唐天子，一切秘密也就不再是秘密了。

武德四年五月十五日，逃回洺州的夏朝左仆射齐善行意识到群龙无首的夏朝绝对不是李世民的对手，于是与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率领夏朝文武百官，拥奉曹王后，携带隋朝的传国玉玺向唐朝投降，同时献出了洺州、相州（今河南安阳市）、魏州（今河北大名县）等城邑。随后，原属郑朝的徐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市）、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和原属夏朝的博州（今山东聊城市）等三十余州全部向唐朝投降。

到武德四年七月初，王世充和窦建德曾经割据的疆域全部并入大唐王朝的版图。

至此，除了帝国西北部的梁师都和南部的萧铣、李子通、林士弘等几

个割据势力仍然在负隅顽抗、苟延残喘之外，李渊父子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天下。

迷失的隋鹿终于找到了新的主人。

李唐王朝统一海内已经毫无悬念。

秦王的武功秀

武德四年七月初九，天空清澈澄明，夏末初秋的金色阳光照耀着整座长安城。

这一天是大唐臣民的一个盛大节日。

宽阔的朱雀大街两侧一大早就已万头攒动，无数的长安百姓正在翘首眺望——等待班师凯旋的秦王李世民和他麾下那群骁勇善战的将士。

当气宇轩昂的李世民一马当先地出现在明德门的时候，围观的百姓立刻发出响彻云霄的欢呼。秦王李世民按辔徐行，昂首挺胸地向他们走来，初升的秋日朝阳就像一顶巨大的金色冠冕佩戴在他的头顶，他身上那一袭精美绝伦的黄金铠甲在阳光下闪耀着令人目眩神迷的华丽光芒。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这个大唐帝国最年轻、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不但有着一张坚毅而英俊的脸庞，而且身上还有一种不言自威的凛凛霸气。即便隔着一段距离，许多人还是能感受到那种无以名状却又摄人心魄的非凡力量。

紧随秦王李世民之后的是齐王李元吉、李世勣、尉迟敬德、屈突通、程知节、秦叔宝等二十五位威武豪迈的大将军。在他们身后是一万名英姿飒爽的铁甲骑兵和三万名甲仗鲜明的武装步兵。伴着雄壮的军乐，这支庞大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朱雀大街上缓缓走过。在面朝凯旋队伍的方向，天子李渊和文武百官正站在太极宫高大巍峨的朱雀门楼上，面带笑容地注视着他们。

作为一个父亲，李渊当然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个天纵神勇的儿子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作为一个皇帝，他同时也为大唐帝国能拥有这样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而感到喜悦和骄傲。

然而，李渊温婉和煦的笑容背后，却隐藏着一层常人不易发觉的东西。那是一种隐忧——一种无形却强烈的隐忧。

李渊觉得李世民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先是平定了薛举父子，占据了陇右；继而又打败刘武周，收复了太原与河东；如今又击败窦建德，逼降王世充，一举统一了河南河北……放眼当今天下，还有谁的武功比他更盛？放眼整个李唐朝廷，还有谁的功勋比他更高？这样的盖世功劳非但盖过了他的兄长太子李建成，甚至盖过了自己——至尊无上的大唐天子李渊！对此，朝廷该给予什么样的封赏，才能满足这个天纵英才的次子李世民的愿望？随着功勋、威望与实力的全面提升，李世民会不会生出觊觎最高权力的野心？如果他确实生出了觊觎储君和天子之位的野心，那自己该如何防范？

就在这举国欢庆的一刻，面带笑容的天子李渊不得不在内心对自己发出了一连串诘问。

李渊相信，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那句老话叫什么来着——功高震主？对了，李世民现在就是典型的功高震主！尽管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是历史上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导致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例子还少吗？远的不说，就说自己的姨父杨坚和他的五个儿子，不是刚刚上演了这样一幕悲剧吗？面对这种历朝历代似乎都难以避免的政治隐患和亲情危机，自己能不能找到成功化解的办法？

李渊心里没有答案。

武德四年七月的这个早晨，长安城的所有人几乎都强烈感受到了李世民要传达给他们的信息。与其说这是一场凯旋仪式，还不如说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武功秀。

作为帝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他用这种最直观的方式向万千子民展现了大唐的赫赫军威；作为天子李渊众多儿子当中的一个，他也刻意用这种锋芒毕露的方式告诉人们——秦王李世民才是最优秀的皇子！除了先天的出生顺位无法改变之外，他在人力可以企及的各个方面全都胜过了太子李建成。换句话说，如果不考虑长幼之序，他才是大唐天子李渊当之无愧的政治接班人！

所以，事实上从这一刻开始，秦王李世民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发出了对储君之位的挑战，而太子李建成也已经确凿无疑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威胁。

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外部战争刚刚告一段落，一场围绕着最高权力而展开的内部战争就已悄然开启。

武德四年这个初秋的早晨，李世民走在凯旋队伍的最前端，淋漓尽致

地体验着他有生以来最辉煌的成功。而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最末端，则有另外两个人正在深刻体验着他们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

他们就是王世充和窦建德。

此刻他们正面容枯槁、蓬头散发地跪在一前一后的两辆囚车上，绝望而麻木地承受着万千大唐子民的辱骂、耻笑和唾弃，随后又被当成祭品带到李唐的太庙里告祭李渊的祖先。

武德四年七月十一日，也就是李世民班师凯旋仅仅两天之后，天子李渊就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了王世充，将其贬为平民，连同兄弟子侄全部流放蜀地。

而窦建德则没有这么幸运，他被李唐朝廷在闹市中斩首，终年四十九岁。

李渊父子既然能赦免王世充，为什么就不能放过窦建德呢？原因只有一个——窦建德太仁义了，太深得民心了！

李渊父子比谁都清楚，窦建德在河北所缔造的夏朝政治修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商贾乐业，一直以来都深受士民拥戴。如此有目共睹的显赫政绩，即便比之关中的李唐政权来也是毫不逊色，况且他的仁义之名又远播天下。远的不说，单就他攻克黎阳后对待李唐战俘的事情就足以收买天下人心。众所周知，李世勣复叛投唐后，窦建德并没有杀李盖，而是力排众议，将其赦免；对待淮安王李神通，窦建德也一直是礼遇甚周，只是将其软禁在下博（今河北深州市东南），并没有把他关进监狱；至于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窦建德更是对她奉若上宾，并早在武德三年八月便已派人将其送回长安。总而言之，窦建德对待李唐的高级战俘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对此人们有目共睹。按照常理，他完全有理由从李渊父子这里获得相应的回报。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窦建德被砍掉了脑袋！

其实这样的结果并不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恰恰是因为窦建德的仁义让他收获了太多人心，他才会成为李渊父子逐鹿天下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尽管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俘虏，成了一个连自身命运都不能左右的失败者，但是李渊父子仍然不会对他网开一面。因为这种深得民心的人是很容易东山再起的。就算不是由他本人发动，只要他一日不死，他残存的旧部就一日怀有复国之思，就很可能打着他的旗号再度起兵，这对于李唐王朝绝对是一大隐患！李渊父子绝不允许这种可能性存在。

所以，窦建德必死无疑。

虽然他很仁义，可仁义或许能为成功者锦上添花，却绝不可能为失败者雪中送炭。

仁义的窦建德死了，不仁义的王世充却侥幸保住了一命。

王世充大为庆幸——看来做人还是不能太仁义啊！可是，王世充高兴得太早了。他只不过比窦建德多活了几天，最后还是被人一刀咔嚓。

把他咔嚓掉的人名叫独孤修德，时任唐定州刺史。他的父亲名叫独孤机，曾在王世充手下任职，武德二年正月暗中谋划归降唐朝，发动政变未遂，被王世充几乎屠灭全家。

这样的血海深仇，独孤修德当然要报。

当时王世充还未被遣送到蜀地，而是暂时软禁在雍州（长安京畿地区）驿馆。独孤修德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带上他的几个兄弟，冲进驿馆，不由分说就把王世充和他的兄长王世恽砍了。

毋庸置疑，独孤修德这么做肯定是触犯律法了。

李渊当即下诏免除了他的官爵。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黄泉之下的王世充就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不能怪李渊出尔反尔，但是，没过多久独孤修德就官复原职了。

这就让事情变得十分蹊跷。人们似乎有理由怀疑，独孤修德的刺杀行动并不是报私仇那么简单，他很可能事先得到了李唐朝廷的授意。

支持这种怀疑的另一个证据是——王世充的其他兄弟子侄在随后流放蜀地的途中也全部被杀了，其中就包括王世充的长子王玄应、弟弟王世伟。李唐朝廷对外宣称的理由是：他们企图谋反！其实这个理由非常牵强，在当时那种枷锁披身、士兵押送的情况下，这些人即便有谋反之心，也断无谋反的机会。

所以，事情的真相不难推断——赦免王世充纯粹就是一个幌子。

之所以要搞这么一个幌子，原因也很简单：天下尚未平定，几大割据势力仍然在负隅顽抗，所以李唐朝廷有必要让人们相信——只要放下武器投降，李唐一向宽大为怀，优待俘虏。

至于这些俘虏过后为何死得不明不白，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不能怪到李唐朝廷头上。

仁义的窦建德被杀了，并不仁义的王世充也被杀了，大河南北在经历多年的流血和战乱之后，终于可以太平了！

武德四年的秋天，李唐朝廷上自李渊父子，下至文武百官和军队将士，无不对中原与河北的形势抱有如此乐观的看法。

七月十八日，李渊任命陈君宾为洺州刺史，命将军秦武通等人率部进驻河北，同时任命郑善果为慰抚大使，负责安抚和收编窦夏旧部，并遴选和任命山东（太行山以东）各州县官吏。

然而，就在李渊下达诏书的次日，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河北的漳南县（今河北故城县东）再度燃起了烽火。

有一个窦建德的旧部于七月十九日聚众起兵，当天就攻占了县城。

他的名字叫刘黑闼。

在今后不算太短的时间内，这将是一个令唐军闻风丧胆的名字。

[1] 飒露紫也是“昭陵六骏”之一。战斗结束回营后，丘行恭为其拔箭疗伤，但飒露紫终因流血过多而死。李世民为其题写的赞辞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飒露紫阵亡后，李世民所乘的是“昭陵六骏”中的另一匹宝马什伐赤，此马纯赤色，是来源于波斯的汗血马。在此后继续围攻东都的战役中，什伐赤身中五箭，李世民为其题写的赞辞是：“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2] 这一战李世民的坐骑是“昭陵六骏”中的青骓。在激烈的战斗中，青骓前胸中一箭，臀部中四箭。李世民为其题写的赞辞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第七章 李世民的帝王梦

铸剑为犁是一种奢侈

当那群神色凝重的人骑着快马向漳南城郊飞驰而来的时候，原夏朝汉东公刘黑闼正在田里种菜。

起初他并不认为这些人是来找他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自从两个多月前窦建德兵败被俘，整个夏朝分崩离析之后，他就悄悄逃回家乡，老老实实地当起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尽管他从小就对农民这个身份颇为厌恶，但眼下他也没办法。

因为当农民总比当囚徒好，更比被人一刀咔嚓送了命好。

可是，当刘黑闼硬着头皮在这一亩三分地里熬了两个多月之后，他唯一的感觉就是——当农民比死还惨！

起码对他来讲是这样。想起从前那种跃马扬刀、驰骋沙场的生涯，想起那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刘黑闼还是会一阵阵地热血翻涌、心潮澎湃。

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战士。

可家里人却不这么看。他们从小就看他不顺眼，给了他一个称谓——无赖。因为他从头到脚就没有一个地方不像无赖。他不但酗酒、赌博，而且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不治产业。父兄们为此经常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他却屡教不改。家境本来就不好的父兄们最后对他死了心，干脆断了他的经济来源，让他自生自灭。刘黑闼为此也过了一些三餐不继的苦日子。好在一位与他交好的同乡大哥非常仗义，经常解囊相助，刘黑闼才不至于饿死街头。

这个大哥就是窦建德。

隋末农民起义大面积爆发后，刘黑闼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当即投奔了附近的变民首领郝孝德，从此找到了属于他的人生位置，开始否极泰来、风生水起。不久后，他跟随郝孝德并入了瓦岗军，成为李密麾下的偏将。李密兵败后，刘黑闼被王世充俘虏，王世充素闻其勇猛善战之名，任他为骑兵将领，最后刘黑闼实在看不惯王世充的所作所为，于是投奔了窦建德。

窦建德不忘过去的交情，立刻任他为将军，封汉东郡公。由于他历事多主、见多识广，加之生性诡诈、善观时变，窦建德经常把深入敌后的侦察、偷袭等任务交给他，而刘黑闼每次都能出奇制胜，多有斩获，在夏朝军队中享有“神勇”之名。正当刘黑闼准备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窦建德却在虎牢关下一败涂地，夏朝随之瓦解，刘黑闼看见自己刚刚展开的辉煌人生突然又变得漆黑无光。

命运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刘黑闼多年前赌咒发誓再也不回来的地方。

此刻，刘黑闼拄着锄头在田间愣神，他真的没想到奔驰在官道上的那群人是冲着他来的。

他更没想到从下一刻开始他就将扔掉锄头，重新回到战场，并且在半年之内横扫河北、屡败唐军，最后全部收复夏朝旧境，取代窦建德，自立为汉东王，成为与李唐朝廷争夺天下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那群神色凝重的人在田边翻身下马，大步流星地朝刘黑闼走来。

刘黑闼起初觉得有些诧异，可很快就认出了他们。

来人是高雅贤、范愿、董康买、曹湛……都是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昔日的战友。

刘黑闼笑了，把手中的锄头远远地扔了出去。他已经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了。

刘黑闼猜得没错，高雅贤等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他们要拥他为领袖，再度起兵！

夏朝覆亡之后，相当一部分将领不愿投降唐朝，纷纷逃回家乡。可是，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不要说像刘黑闼这种从来没当过农民的人，就算早年务过农的，在当了好些年威风八面的将军后，回到老家无论如何都不愿再拿锄头了。

不拿锄头拿什么？总不能坐吃山空吧？

拿刀。

虽然将军的头衔没了，可他们的刀还在，杀人越货的本领还在。

于是他们索性干起了老本行——劫掠州县府库，抢劫地方富户，凡是

能搞钱的事情都干。如此一来，自然成为民间一患。唐朝地方政府本来就想收拾这帮不愿归顺的残兵败将，如今他们又到处烧杀抢掠，已经严重触犯了大唐律法，唐朝各地方政府当然要采取高压政策，于是出动军队大肆搜捕，抓到之后就施以酷刑，严惩不贷。范愿等人不得不拖家带口，离开家乡，四处逃亡。可走到哪里都是李唐的天下，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总不能一辈子就这么东躲西藏吧？

就在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李渊颁布了一道诏书，要征召他们这些夏朝旧将前往长安，高雅贤等人都在朝廷公布的名单上。

听起来这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可当高雅贤等人一碰头，大伙的意见却高度一致——这是个陷阱，长安万万去不得！

原因很简单：王世充投降之后，其麾下的单雄信、段达等人就全部被杀，而今他们要是傻乎乎地去见李渊，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不，他们绝不会去！

高雅贤等人不说则已，一说起这些就血脉贲张、义愤填膺，最后大家纷纷表示：自从追随夏王起兵，十年以来，身经百战，此身唯欠一死！可大丈夫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决不能拿脑袋当别人的磨刀石！何不干脆以此残生，再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主意已决，众人指天盟誓：“吾属皆为夏王所厚，今不为之报仇，将无以见天下之士！”（《资治通鉴》卷一八九）

起兵计划一定下来，最后就是推选一位领袖了。

为了顺应天意，高雅贤等人决定焚香占卜，随后卜出的卦辞是：以刘氏为主，大吉。于是他们找到了刘黑闼。

这个初秋的黄昏，刘黑闼不仅扔掉了锄头，还宰掉了自己唯一的牛，搬出了家里所有的陈年老酒，和高雅贤等人痛快地喝了一场。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刘黑闼一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边心花怒放地想。

刘黑闼聚众起兵、攻陷漳南的消息传至长安，李唐朝廷虽说不上十分震恐，但也感到极为意外。七月二十二日，李渊不得不把河北的行政架构重新设置为战时编制，在洺州设立了山东道行台，任命淮安王李神通为行台右仆射。

对李唐朝廷来讲，刘黑闼这帮残兵败将实在构不成多大的威胁。他们觉得让唐朝的地方军队去对付就绰绰有余了。

从武德四年的中秋起，刘黑闼刮起的飓风就开始横扫河北了。

八月十二日，刘黑闼攻陷鄃县（今山东夏津县），唐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刺史权威、贝州（今河北清河县西）刺史戴元祥率部迎战，被刘黑闼击败，权、戴二人皆战死，所部人马和武器全部被刘黑闼俘获。十天后，刘黑闼攻陷历亭（今山东武城县东），俘虏唐屯卫将军王行敏。刘黑闼命令王行敏向他叩头，王行敏誓死不从，随即被刘黑闼斩首。

战报传来，李唐朝廷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李渊随即下诏征调关中的三千精锐步骑，命大将秦武通、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总管李玄通率领，会同幽州（今北京）总管罗艺围剿刘黑闼。

刘黑闼初战告捷之后，流落各地的窦建德旧部渐渐来附，部众增至两千余人。刘黑闼遂于漳南设坛，祭奠窦建德的亡灵，以此激励部众的士气，并自立为大将军。

高耸的祭台上，一面招魂的灵幡在秋天的大风中猎猎招展，发出阵阵裂帛似的声响。刘黑闼一脸肃穆地站在高台之上，感觉一股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正在他的体内汩汩涌动。

刘黑闼相信，这一定是夏王的在天之灵赐予他的力量。

大河南北风云再起

造反有时候也是一种流行病。

尽管隋王朝早已灰飞烟灭，尽管深得人心的李唐王朝开国已经四年，可是这种流行病还是会在某些人身上反复发作，难以治愈。

这是李渊在武德四年秋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他不得不相信，某些人就是天生反骨，简直无可救药！

本来河北出了一个刘黑闼就已经让李渊很有些不安了，没想到一个月后，河南又冒出了一个徐圆朗。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群雄中，徐圆朗可以称得上是一株典型的墙头草，

或者说是一个资深的造反专业户。他是鲁郡（唐改兖州，今山东兖州市）人，隋朝末年落草为寇，大业十三年据本郡起兵，攻城略地，拥众两万余人，不久后归附李密；李密败亡后，徐圆朗于武德二年七月以数州之地降唐，被任命为兖州总管，封鲁国公；窦建德南下援救洛阳时，徐圆朗又叛唐归附窦建德，发兵参与进攻虎牢；窦建德败亡后，徐圆朗再度降唐，李唐朝廷既往不咎，封鲁郡公，仍任其为兖州总管。

按说到这个时候天下大势已经基本明朗，徐圆朗也该消停了吧？

不，他不消停。因为他并不认为一个小小的兖州总管就是自己的人生归宿。当河北的刘黑闼再度起兵后，徐圆朗便又蠢蠢欲动了。不久，刘黑闼派人与他联络，怂恿他起兵响应，徐圆朗正中下怀，欣然应允。

这一年的八月二十六日，唐将盛彦师奉李渊之命安抚河南，行至任城（今山东济宁市）时，徐圆朗突然发兵将他逮捕，再度举兵叛唐。

屡反屡降，屡降又屡叛！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

李渊真是搞不明白，现如今这天下像刘黑闼、徐圆朗这种“生命不息，造反不止”的人到底还有多少。

很快李渊就有了答案——这种人很多。

徐圆朗复叛后，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兖州、郓州（今山东郓城县）、陈州（今河南淮阳县）、杞州（今河南杞县）、伊州（今河南汝州市）、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曹州（今山东定陶县）、戴州（今山东金乡县）等八州豪强纷纷起兵响应。徐圆朗遂自称鲁王，随后又被刘黑闼任命为大行台元帅。

一时间，叛乱的烽火又开始熊熊燃烧，刚刚平定的大河南北风云再起。如果不及时将这些反叛势力扑灭，李世民中原决战的胜利果实必将付诸东流，而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日子亦将遥遥无期。

武德四年九月初，淮安王李神通率领关中精锐火速进抵冀州（今河北冀县），与燕王罗艺会合，同时紧急征调邢、洺、相、魏、恒、赵六州军队共五万余人，在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与刘黑闼展开会战。

这一仗唐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其阵势绵延十余里。曾经是夏军手下败将的李神通这回踌躇满志地站在阵前，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一战扫平刘黑闼，把当初丢尽的脸面彻底捡回来。

李神通当然有理由这么想。

相对于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的唐军来说，刘黑闼部众的情况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他们不但衣衫褴褛、装备极差，而且人数远远少于唐军，只能背靠饶河堤岸摆出一个单行的一字阵。

看着这个可怜巴巴的一字阵，李神通顿时哑然失笑。

这只是一群打群架的农民嘛！

就在战斗即将打响的一瞬间，两军对垒的战场上突然天气骤变，一阵狂风夹着漫天飞雪，从唐军一侧猛然刮向对方阵地，刘黑闼的部众一下子都睁不开眼。

报仇雪耻的时刻到了！李神通抓住战机，长剑一挥，数万唐军乘着风势向刘黑闼发起了全线进攻。

如果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一直按这个方向刮下去，那么刘黑闼必定全军覆没。

很可惜，天不佑李神通，就在唐军刚刚冲到敌军阵前时，风向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度反转，这一下轮到唐军睁不开眼了。刘黑闼立刻率部反击，唐军大败，人马和装备损失了三分之二。

原本胜券在握的李神通又一次败在了窦建德旧部的手下。

与此同时，幽州总管罗艺也在主战场的西面攻击高雅贤部，并一举将其击破，刚刚追出了几里地，便听到大军主力被击溃的消息，遂率部退守藁城（今河北藁城市）。刘黑闼趁部众士气高昂，一鼓作气进攻藁城。罗艺兵败，其麾下将领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一同被刘黑闼俘虏，并且剪掉头发，当作奴隶驱使。不久后薛氏兄弟逃回，罗艺遂引兵撤回幽州。

经此一役，刘黑闼兵势大振。

十月初六，刘黑闼乘胜攻陷瀛洲（今河北河间市），斩杀刺史卢士叡；同日，观州（今河北东光县）变民发动暴乱，生擒刺史雷德备，举城归附刘黑闼；十九日，毛州（今河北馆陶县）变民董灯明等人聚众砍杀刺史赵元恺，起兵响应刘黑闼。

十一月十九日，刘黑闼又攻陷了定州，生擒总管李玄通。刘黑闼欣赏他的才干，打算任他为大将，李玄通拒不接受，遂被刘黑闼囚禁。李

玄通的旧部有人投靠了刘黑闼，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带着酒肉到监狱里探望李玄通。表面上说是叙旧，其实无非是劝降。李玄通心知肚明，于是故作笑颜地对旧部说：“诸君怜我被囚之辱，幸以酒肉来相开慰，当为诸君一醉！”说完便与众人开怀畅饮。

酒酣耳热之际，李玄通对看守说：“我会剑舞，请把刀借我一用。”看守没有怀疑，把刀递给了他。李玄通舞过之后，忽然仰天长叹：“大丈夫受国厚恩，镇守一方，而今却不能保全所守，有何面目活在人间！”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李玄通已经挥刀刺入自己的腹部，当场腹溃而死。

十一月二十七日，杞州变民周文举聚众起兵，杀了唐刺史王文矩，举城归附徐圆朗。

李神通败了，李玄通死了。刘黑闼在河北攻城略地，徐圆朗在河南遥相呼应。散布各地的窦建德旧部蠢蠢欲动，大河南北的唐朝将吏人人自危。

局势日益严峻。

就在这个风声鹤唳的节骨眼上，又有一个人紧继刘黑闼和徐圆朗之后起兵反唐，致使河北的形势雪上加霜。

这个人就是高开道，时任唐蔚州（今河北怀来县）总管。

说起这个高开道，显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是沧州阳信（今山东阳信县南）人，盐户出身，骁勇强悍，大业末年追随河间人格谦起兵，任将军；其后格谦被隋军剿灭，高开道率残部四处游掠。武德元年，高开道攻陷北平郡（今河北卢龙县）和渔阳郡（今天津蓟县），自称燕王，定都渔阳。同年，怀戎（今河北涿鹿县）沙门高昙晟袭杀当地县令，自称大乘皇帝，随后招降高开道。高开道遂带领五千部众诈降，在取得高昙晟信任的数月之后，突然发兵击杀高昙晟，吞并了他的部众。武德三年，窦建德率大军进围幽州，唐幽州总管罗艺向高开道求救，高开道亲率两千精骑驰援。窦建德担心腹背受敌，又慑于高开道的兵锋之锐，只好撤兵南还。高开道随后通过罗艺投降了唐朝，并因援救幽州之功被封为北平郡王，赐姓李，任蔚州总管。

应该说，从一个出身卑微的盐户奋斗到这一步，高开道也算是功成名就，足以光宗耀祖了。然而他并未满足。除了对更高的地位和权力仍然怀有强烈的渴望之外，高开道身上似乎还有一点与刘黑闼、徐圆朗等人如出一辙。

那就是——灵魂深处的不安分。

这种不安分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出人头地的功利欲望，或者说不完全是一种“理智的计算”。如果对刘黑闼来讲，再次起兵更多的是为了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束缚，重新争取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的话，那么对高开道和徐圆朗来说，这种灵魂的不安分则显得更为典型。因为随着他们在李唐政权中身份和地位的提升，再次造反的成本也随之提高了，再也不像第一次造反那样——唯一的成本就是贱命一条。换句话说，他们需要顾虑的东西比以前多得多。

因此，倘若纯粹出于理智计算的话，他们未必会步刘黑闼之后尘。由此可见，促使他们再度起兵的原因除了现实利益的计算之外，或许还有一种不断打破现状、努力寻求改变的“生命的冲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当然，这种所谓的自我实现对他们本人来讲可能是模糊的、不自觉的，更多的只是表现为一种躁动不安的生命能量，但这却是一种推动他们不断往前走的强大能量。不管是不愿当农民，还是不愿当总管，这种灵魂深处的不安分是这群人身上共有的标志，也是他们最根本的生命动能。

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某个点上凝固下来，更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在不断突破现状的过程中一刻不停地燃烧。

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状态。

对他们而言，过程本身也许远比结果更富有意义。

所以，当刘黑闼和徐圆朗复叛后，高开道灵魂深处那不安分的火焰立刻被点燃了。

这一年十一月末，幽州发生大饥荒，罗艺立即向蔚州的高开道寻求援助。高开道满口答应赈济灾民。罗艺大喜，随即把灾民中的老弱妇孺转移到蔚州安置，高开道表现得十分热情，不但来者不拒，而且给这些灾民提供了很好的食宿条件。罗艺大为感动，随后派出三千名青壮年、数百辆车和一千余匹驴马，前往蔚州运载救灾粮。

高开道就是在这时候突然翻脸的。他扣押了运粮队的人马和辎重，同时宣布与罗艺断交，并以最快的速度北连东突厥，南结刘黑闼，随后发兵进攻易州（今河北易县）。

高开道的遽然反叛让罗艺大为震惊并且百思不解。数日后，高开道的部将谢稜暗中遣使向罗艺投降，并请求出兵接应。罗艺稍感宽慰，觉

得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高开道一样疯狂。有了谢稜做内应，他就有可能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是罗艺错了。

因为这是高开道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让谢稜诈降。

罗艺本来已经被高开道捅了一刀，而谢稜的诈降无异于在他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当罗艺接应谢稜的部队刚刚进入蔚州境内，谢稜突然对其发动攻击，把幽州军队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逃。

高开道设计重创罗艺之后，旋即引突厥军队南下，屡屡入侵唐朝疆界，在恒州、定州、幽州、易州等地大肆扫荡。

与此同时，刘黑闼也正挟着一种可怕的力量和势能席卷河北。

武德四年十二月初三，刘黑闼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斩杀刺史麴稜，随后向赵魏地区（今河北中部、南部及河南北部）发布文告，各地的窦建德旧部纷纷诛杀当地唐朝官员，起兵响应刘黑闼。八日，刘黑闼率数万大军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东）。其时正驻守宗城的唐黎州总管李世勣与右武卫将军秦武通力不能支，遂放弃城池，准备集中力量固守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可就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刘黑闼却快速行军追上了他们。十二日，刘黑闼从背后对李世勣军发起猛烈进攻，大破唐军，斩杀五千余人，李世勣和秦武通仅以身免。十四日，洺州豪强与刘黑闼里应外合，不战而下洺州城。刘黑闼在这座夏朝旧都的东南面设坛祭祀上天及夏王，随后浩浩荡荡地率领大军进入洺州。与此同时，刘黑闼又遣使联络东突厥，颉利可汗立即派遣大将宋邪那率突厥骑兵南下与其会合，刘黑闼兵势更盛。

数日后，刘黑闼挥师南下，接连攻克相州（今河南安阳市）、黎州（今河南浚县）、卫州（今河南卫辉市）、邢州（今河北邢台市）、赵州（今河北赵县）、莘州（今山东莘县），各地唐军将领无人能挡其锋。右武卫将军秦武通、洺州刺史陈君宾、永宁县令程名振等人，纷纷放弃抵抗，逃回长安。

短短半年之内，刘黑闼以所向无敌、锐不可当之势横扫河北，战必胜、攻必取，克复全部夏朝旧境，创造了一个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神话。

有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神话？

当李神通、罗艺、李玄通、李世勣、秦武通等人全都成为刘黑闼的手

下败将时，偌大的李唐天下，还有谁能与之争锋？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李世民。每逢帝国最危急的时刻，他总是天子李渊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鼎定半壁：萧梁的覆灭（上）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冬天，天下的形势让唐高祖李渊忧喜参半——忧的是刘黑闼等反叛势力在大河南北死灰复燃，喜的是帝国南部半壁江山顺利平定。

正当各路唐军在河北被刘黑闼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以赵郡王李孝恭和行军总管李靖为首的唐军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这一年十月生擒了南梁皇帝萧铣，一举消灭了这个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

平定萧梁、鼎定半壁虽然挂的是宗室亲王李孝恭的名头，但是谁都知道，真正的首功之人其实是李靖。

李靖最初被李渊派往南方征讨萧梁的时候其实是很窝囊的，因为李渊并不信任他。

单从他当时担任的官职——开府——就可见一斑。所谓开府，只是一个正四品的散官，既没有实际的职权，更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李渊让李靖以这样的身份到前线去打仗，与其说是希望他建功立业，倒不如说是故意给他小鞋穿，好寻找机会整死他。

说白了，李渊仍然不忘旧恶。

当初要不是李世民大喊刀下留人，李渊早把这个可恶的“告密未遂者”一刀砍了。虽然看在李世民的面子上留了他一条命，可李渊无论如何就是看他不顺眼。

把李靖派到前线不久，李渊终于逮着了一个杀他的机会。

当时萧梁的兵力还很强大，所以李靖抵达峡州（今湖北宜昌市西）后就一直滞留不进。李渊立刻下了一道密诏给峡州刺史许绍，让他以“迁延不进”的罪名把李靖就地斩首。

如果这个许绍老老实实执行天子的密令，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初唐名将李靖了。如果许绍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普通官僚，那么李靖最后

也只能成为一个怀才不遇并且含冤而死的小角色，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

所幸峡州刺史许绍并不是个普通官僚。

他是一个有德之人，而且有惜才之心。他知道李靖胸中自有甲兵百万，只是一直缺少施展才干的机会，于是按下诏书，上疏李渊，说明前线战事吃紧，急需人才，可以让李靖戴罪立功，以观效尤。李渊看到奏疏后想想也有道理。为了统一大业，李渊只好暂时撇开私人恩怨，收回成命，等着看李靖的立功表现。

一连两次侥幸躲过皇帝的屠刀，让李靖深刻地体验到什么叫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有第三次机会了。如果不能及时建立战功，那他的脑袋就没有继续待在肩膀上的理由。

李靖仰天长叹，苦苦等待着咸鱼翻身的那一天。不久，开州（今重庆开县）蛮族首领冉肇则聚众反叛，率部进攻夔州（今重庆奉节县），赵郡王李孝恭迎战，结果被蛮军击败。

一展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李靖主动请缨，只带了为数八百人的一支小部队，便成功袭破了蛮军大营；其后又在险要之地设伏，大败十倍于己的蛮军，斩杀冉肇则，俘获五千余人，一举平定了蛮族叛乱。捷报传至长安，李渊的意外和惊喜之情溢于言表。为了掩饰自己先前对李靖的不公，李渊在朝会上对百官说了一句很巧妙的话，他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旧唐书·李靖传》）

这句话既夸奖了李靖，同时也夸奖了李渊自己。因为他把李靖所取得的战绩说成是他故意使用激将法的结果。所谓"使功不如使过"，意思就是与其用功勋去激励下属建功立业，还不如适当给他一些压力，让他感觉自己有过失，然后他才会加倍努力，以求将功补过。

这固然是很高明的驭人之术，可明眼人都知道，先前李渊对待李靖的那些做法压根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可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胜利，李渊总算彻底改变了对李靖的看法。他在随后下发给李靖的诏书中称："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朕虽与你远隔，但深明卿之至诚，极为嘉赏，卿勿忧富贵也。"除了公开颁发的诏书，李渊还特意给了李靖一道手诏，说："既往不咎，旧事吾久忘之矣！"这句私下里的体己话固然表明了天子李渊与李靖和解的诚意和热情，可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李渊之前对那些"旧事"确实是一直耿耿于怀的。

武德四年二月，否极泰来的李靖压抑多年的能量开始喷发，他胸有成竹地向赵郡王李孝恭呈上了平定萧梁的“十策”，李孝恭转呈朝廷。李渊当即采纳，以李孝恭为夔州总管，命他大规模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同时授予李靖行军总管兼长史之职，命他全权负责军事。

至此，李靖才终于有了一个与他的能力和任务相匹配的职衔。从这一刻开始，李渊已经把平定南方半壁江山的重任托付给了他。

李靖辉煌的军事生涯就此展开。

为了全力进攻萧梁，李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法解除唐军的后顾之忧。他向李孝恭建议，将巴蜀各地蛮族首领的子弟全部召集到夔州总部，考察他们的才干，任命相应的官职。此举表面上是对蛮族子弟的一种优待和礼遇，事实上是把他们作为人质，防止各地蛮族首领反叛。

就在唐军秣马厉兵，即将对萧梁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夕，梁帝萧铣却正在干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在裁军。

大敌当前，萧铣却忙着裁军，他怎么了？脑子进水了？

不，萧铣的脑子没进水，是肚子进水。

苦水。

因为跟随他造反的那帮元勋故旧纷纷以开国功臣自居，个个牛皮烘烘、鼻孔朝天、专擅杀戮、目无朝廷，让萧铣大伤脑筋。他最后只好想了个办法——以境内业已太平、急需发展生产为由大量裁军，让那些骄兵悍将通通解甲归田，回老家当农民。

可想而知，这帮居功自傲的将领绝不甘心就此被褫夺兵权。大司马董景珍的弟弟马上召集了一帮人，准备发动兵变，但消息泄露，未及发动便被萧铣镇压。其时董景珍正出镇长沙，萧铣欲盖弥彰地宣布赦免董景珍的连坐之罪，同时又下诏召他回朝，其猜忌之心昭然若揭。董景珍顿生兔死狗烹之感，遂暗中遣使向李孝恭投降。

而生性多疑的萧铣也很快就嗅出了反叛的味道，于是命齐王张绣率兵讨伐董景珍。董景珍致信张绣说：“君不见‘前年诛彭越，往年杀韩信’，奈何今日相攻？”张绣不予理会，命大军围攻长沙。董景珍不敌，突围而走，被麾下将领所杀。萧铣铲除了心头之患，大喜过望，

随即擢升张绣为尚书令。然而萧铣的喜悦之情很快便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忧虑和恐慌。

因为张绣又坐大了，他“恃勋骄慢，专恣弄权”，其嚣张气焰让萧铣忍无可忍。

萧铣不得不再次设计将张绣诛杀。

至此，萧梁王朝彻底陷入“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

皇帝萧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元勋故旧人人自危，离心离德。

萧铣眼睁睁看着王朝的人心和基业正在迅速瓦解，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武德四年十月初七，梁朝鄂州（今湖北武汉市南）刺史雷长颖举城降唐，揭开了萧梁覆亡的序幕。

唐军兵分四路，由李孝恭和李靖率两千余艘战船出巴蜀，浩浩荡荡顺长江东下；由庐江王李瑗出襄州（今湖北襄阳），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今湖南沅陵县），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从各个方向大举进攻萧梁。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萧铣却对战局产生了重大误判。他认为此时长江水势大涨，不易行舟，因此并没有及时进行防御部署。李孝恭的唐军主力遂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陷荆门和宜都两处军事重镇，迅速进抵夷陵（今湖北宜昌市）。

梁朝门户洞开，都城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一下子暴露在唐军的眼皮底下，萧铣这才慌了手脚，急命大将文士弘率数万精锐进驻清江（今清江入长江口）布防。十月初九，李孝恭和李靖大破文士弘，俘战船三百余艘，梁军被杀和溺毙者数以万计。唐军乘胜追击，进至百里洲（今湖北枝江市南的长江中小岛）。文士弘集结残部再战，却再次被击溃。唐军舰队长驱直入，兵锋直逼江陵。梁江州（今湖北长阳县西）总管盖彦举旋即以五州之地降唐。

文士弘溃败、盖彦举叛降的消息传回江陵，萧铣顿时感觉到末日降临。直到这一刻，他才充分意识到自己贸然裁军导致的恶果——眼下江陵唯一的军事力量就只有一支几千人的禁卫军了。

单凭这么一点力量如何守住江陵？

萧铣迫不及待地向各地发出了十万火急的勤王诏。然而，此刻萧梁的大多数军队都远在江南和岭南，远水救不了近火，萧铣不得不命数千禁军登上舰船，出城拒战。

李孝恭准备立刻对梁军发动攻击，李靖劝阻道："这是萧梁最后的顽抗力量，他们仍有斗志，但并没有通盘的防御计划，其势必不能久。我们不如暂且停泊南岸，休养一日，梁军兵力必定分散，很可能会留一部抗拒我军，分一部回城据守。兵分则势弱，我军乘其松懈发动进攻，无不胜之理。如果现在急攻，梁军必奋力死战，楚地士卒历来剽悍，不是那么好战胜的。"

然而李孝恭并没有听从李靖的劝阻。在他看来，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正锐，根本无须担心眼前这支区区几千人的敌军。所以，李孝恭当即命李靖留守南岸大营，自己亲率精锐出击。

结果不出李靖所料，没有退路的梁军不得不拼死作战，大意轻敌的李孝恭被打得大败而回。

李孝恭败逃时丢弃了大量的军资器械，梁军士兵纷纷弃舟登岸，哄抢战利品。李靖见梁军混乱，当即挥师反击，大破梁军，乘胜追至江陵，杀入外城，并迅速攻占水城，俘获舰船一千余艘。李靖建议将这些舰船放入江中，任它们向下游漂去。众将领大惑不解，纷纷表示反对。他们说："破敌所获，理当为我所用，奈何弃之，以此资敌？"

在这种时候，人和人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

准确地说，一介武夫和一代名将的素质差异就是在这里分野的。

在墨守成规的将领们看来，军舰就是打仗用的，怎么能抢到手以后再把它还给敌人呢？

可在李靖看来，这批战利品还有一个更大的用途，可以用它们一举击溃下游梁军的军心和斗志，让他们彻底放弃援救江陵的打算。

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眼见众将领依旧是一脸迷惑不解的神情，李靖耐心地解释："萧铣所据之地，南到岭表，东至洞庭，其军队数量仍然很大。我们孤军深入，如果不能及时攻克江陵，等敌人援兵四集，我们必将陷入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困境，就算拥有这些战船，又能起什么作用？如果我

们将这些舰船放弃，让它们蔽江而下，各地梁军见之，必然以为江陵已经陷落，不敢轻进；即便派人侦察，一来一往至少也要十天半月，到时候我们早已拿下了江陵。”

李孝恭和众将领至此才恍然大悟，遂依计而行。

当一千多艘空无一人的“幽灵船”无声无息又浩浩荡荡地漂向下游时，沿岸梁军不禁大惊失色。

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江陵陷了，梁朝完了！

这个令人恐慌和绝望的消息立刻像插上翅膀一样传遍了梁朝的四面八方。

鼎定半壁：萧梁的覆灭（下）

李孝恭和李靖率大军将江陵团团围困后，迅速切断了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梁帝萧铣自知大势已去，于是神色凄然地对文武百官说：“天不佑梁，势不能支，若竭力死战，则生灵涂炭，岂能以我一人之故而使百姓蒙难？应趁城池未陷而先出降，以免乱兵伤害士庶。诸人失我，何患无君！”

这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萧铣最后一次告祭太庙，随后下令开门出降，城上守军忍不住失声恸哭。他身穿麻衣、头裹布巾，带着百官来到唐军营门前，对李孝恭说：“当死者唯铣耳，百姓无罪，请勿杀掠！”

萧铣希望以自己的主动投降来换取一城百姓的平安，但是唐军的将领们却不买他的账。

唐军进入江陵后，将士们打量着这座繁华富庶的梁朝帝京，所有人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冒出了绿光。

他们打算纵兵劫掠。

就在他们动手之前，梁朝中书侍郎岑文本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来到了唐军统帅李孝恭的大帐，说了这样一番话：“江南之民，自隋末以来困于虐政，其后又遭群雄纷争之苦，今之存者，皆刀下余生，均翘首以盼真命天子，所以萧氏君臣与江陵父老决计归命，只愿刀兵永息。今若纵兵劫掠，使士民失望，恐江陵以南之士众，无复向化之心！”

李孝恭不得不承认，岑文本说得有道理。他虽然拿下了萧梁的都城，但是江陵以南还有大片梁朝国土以及大批梁朝军队，如果不能借此收买萧梁的人心，等待他的必然是旷日持久的战争。

李孝恭随即发布命令——严禁士兵抢掠。诸将大为失望，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抄没那些因抗拒唐军而战死的梁朝将领的家产，以此犒赏将士。李靖马上反对，他说："王者之师，应以正义之声先于兵戈而远播。那些将领为他们的君主战死，乃是忠臣，怎么能把他们视同叛逆抄没家产？"

在岑文本和李靖的阻止下，江陵城避免了一场浩劫。唐军入城后严守禁令，对百姓秋毫无犯。南方各州县听说后，无不望风而降。萧铣投降数日后，正奔驰在勤王路上的十几万梁朝军队听到江陵陷落的消息，也全部放下武器投降唐军。

至此，南方最大的一支割据政权，立国五年的萧梁王朝被彻底平定。李渊大喜过望，随即擢升李孝恭为荆州总管，封李靖为永康县公、上柱国，命他们进一步经略岭南。

萧铣被执送长安，李渊历数其罪。萧铣一脸从容地说："隋失其鹿，英雄竞逐，铣无天命，故至于此。如果这也是一种罪，那我甘愿受死！"武德四年冬天，一个北风呼啸的午后，萧铣慷慨赴死，在长安闹市被斩，时年三十九岁。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群雄中，萧铣并不是一个杰出的英雄和帝王，他的能力或许远远比不上其他人。

论执政能力和个人魅力，他比不上窦建德；论军事能力，他比不过李密和王世充；论强悍勇武，他甚至连刘武周、薛举等人都比不上……尤其是在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刻，萧铣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无所作为，更加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庸帝王。

然而，有所作为又如何呢？

即便萧铣率领江陵军民与唐军血战到底，但他除了把江陵变成第二个洛阳之外，除了像王世充那样制造出一座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之外，又能如何呢？他能挽回王朝覆灭的命运吗？

显然不能。

他也许会多撑一些日子，但败亡的结局绝对无可挽回。

既然如此，那么萧铣在最后时刻的表现就不仅令人同情，而且令人感佩。身为帝王，在王朝覆灭前夕考虑的并不是如何保全自己的权力和生命，而是如何避免满朝文武和治下百姓遭到屠戮和劫掠。这样一个帝王即使在他的世界里失去了所有，也仍然会在血腥灰暗的史册中留下一抹亮色——一抹与人性和良知有关的亮色。

仅此一点，萧铣就值得后人赞叹。

武德初年，南方的主要割据政权除了萧铣、林士弘之外，在江淮一带还盘踞着多股割据势力：沈法兴据毗陵（今江苏常州市），杜伏威据历阳（今安徽和县），李子通据海陵（今江苏泰州市），陈稜据江都。这些枭雄互相攻伐，都有称雄江表（今太湖及钱塘江流域）的野心。武德二年九月，当李唐王朝与刘武周在河东激战正酣时，这些割据势力的相争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九月初，海陵的李子通进攻陈稜据守的江都。陈稜向杜伏威和沈法兴求援，沈法兴命其子沈纶率军数万，会同杜伏威驰援江都，两军分别在杨子（今江苏扬州市南长江入口）和清流（今安徽滁州市）扎营。

为了打破对方的联盟，李子通采纳了谋士毛文深的离间计，招募江南勇士化装成沈纶的军队，于深夜攻击杜伏威大营。杜伏威大怒，也出兵反击沈纶，双方的联盟就此破裂，遂各自按兵不动，谁也不愿率先进攻李子通。李子通趁势集结精锐，一举攻陷江都。陈稜逃出一命，投奔了杜伏威。李子通占据江都后，马上又出兵击败了沈纶，杜伏威势单力薄，只好引兵而退。李子通随即在江都登基，自称吴帝，改元明政。数日后，丹阳（今江苏南京市）变民首领乐伯通率部众一万余人归附了李子通。

李子通势力迅速壮大，杜伏威时刻担心被吞并，几经犹豫之后，终于率部归降唐朝。九月十二日，杜伏威被李唐朝廷任命为淮南安抚大使兼和州（历阳郡改）总管。

武德三年十二月，就在李世民与王世充大战于东都时，李子通也渡长江南下，大举进攻沈法兴，占领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沈法兴命仆射蒋元超在庱亭（今江苏常州市西北）阻击李子通，结果他战败阵亡。沈法兴遂放弃毗陵，亡奔吴郡（今江苏苏州市）。此后，丹阳、毗陵等郡全部被李子通占据。

其时杜伏威已被唐朝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上柱国、吴王，并赐姓李，宠遇甚隆，自然负有平定一方之责。为了遏制李子通的扩张势头，杜伏威命行台左仆射辅公祏、大将阚稜、王雄诞率数千精锐渡过

长江，攻克了丹阳，并在溧水（今江苏溧水县）与李子通展开会战。唐军起先取得了优势，在追击时却遭到李子通反扑，结果失利。当天夜里，李子通因取胜而轻敌，扎营不设防备，勇将王雄诞率数百名亲兵袭击吴军大营，大破李子通，俘虏数千人。李子通狼狈逃回江都。

不久，李子通粮草告罄，只好放弃江都，退守京口。于是和州以西全部被杜伏威占据。杜伏威将总部迁至丹阳，步步进逼李子通。李子通再次放弃京口，转而攻击退守吴郡的沈法兴，并将其彻底击溃。沈法兴仅带着数百人逃亡，最后身陷绝境，投江而死。

消灭沈法兴后，吴帝李子通声势复振，于是迁都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将沈法兴原有地盘全部吞并，其势力范围北至太湖，南到仙霞岭，东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西到宣城（今安徽宣州市），成为与梁帝萧铣、楚帝林士弘鼎足而立的南方三大割据政权之一。

武德四年十一月初，亦即李孝恭和李靖扫平萧梁的半个月后，杜伏威派遣麾下猛将王雄诞率部进攻余杭，李子通亲率精锐驻防独松岭（今浙江安吉县南）。王雄诞命部下在独松岭上遍插唐军军旗，并在夜晚燃起大量火把绑在树上。于是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李子通从营寨中向外望，似乎漫山遍野都是唐军。李子通大为恐惧，遂焚烧大营，退守余杭。王雄诞挥师追击，在余杭城下大败李子通。

十一月初七，走投无路的李子通不得不向唐军投降。随后，王雄诞又接连逼降当地的变民首领汪华、闻人遂安等人，于是彻底平定江表。王雄诞因功被李唐朝廷擢为歙州（今安徽歙县）总管，封宜春郡公。

至此，帝国的南方只剩下据守余干（今江西余干县）及附近几个州县（约今江西省大部）的楚帝林士弘了。

在所向披靡的唐军面前，这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还能苟活多久？

答案可想而知。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十月，林士弘命其弟林药师进攻循州（今广东惠州市），结果林药师战败身亡。随后林士弘的大将王戎又以南昌州（今江西永修县）降唐。林士弘在四面唐军的强大压力下放弃余干，带着残部逃到安成（今江西安福县）的一个山洞里，最后又被唐军击败。林士弘忧惧而亡，其部众作鸟兽散。

至此，林士弘的割据政权前后历六年而亡，帝国南部的半壁江山宣告平定。

掌握时代的话语权

自从武德四年五月平定窦建德与王世充后，李世民就成了大唐王朝独一无二的中流砥柱。

光是如何对他进行封赏，天子李渊就大伤了一番脑筋。

朝廷现有的职位显然都与李世民的盖世功劳不相匹配。为此李渊绞尽脑汁地想了两个多月，终于在武德四年十月挖空心思地创造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官衔——天策上将，将它隆重授予了李世民。

这个官衔位在所有王公之上，极尽尊宠。此外，李世民还兼任司徒、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并且增加食邑两万户，与前共计三万户；同时李渊还特许他开设天策府，给予他任命各级官属之权。

至此，李世民可谓威震朝野、势倾天下，成为大唐帝国除了天子李渊和太子李建成之外的第三号人物。

然而，李世民绝不满足于当这个“两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三号人物。

因为他的心中装着一个东西——天下。

他现在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通往这个终极目标的一道桥梁。

如何取得天下？

吸纳人才。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

李世民深谙此道。

通过几年来的南征北战，天下的英雄豪杰已悉数入其彀中，包括享有时誉的众多文人学士也陆续归附了李世民。此刻的秦王麾下可谓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李世民知道，如今虽然海内大抵平定，金戈铁马的征战生涯也已告一段落，但是等待他的将是另一种更为残酷的战争。

那就是，秦王集团与东宫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

为了迎接这场博弈，李世民决定把这些文人学士凝聚到自己身边，将

他们打造成一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团。

武德四年冬天，李世民在宫城西侧开辟了一个文学馆，遴选了十八位满腹经纶的学者作为自己的高级幕僚，号称“十八学士”。其中的首席成员就是后来贞观初年与房玄龄共掌朝政的一代名相、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杜如晦。

杜如晦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人，世代官宦，曾祖父杜皎为北周开府仪同大将军、遂州刺史，祖父杜果官至隋工部尚书，封义兴公，父亲杜吒任隋昌州长史。杜如晦从小聪明颖悟，好谈文史；大业年间，隋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深为赏识，称其“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旧唐书·杜如晦传》），随即任其为滏阳（今河北磁县）县尉。几年后，天下渐乱，杜如晦知道自己在隋朝官场上已经不能有所作为，遂弃官归家。李渊父子攻克长安后，杜如晦投秦王麾下，任兵曹参军，不久后被朝廷擢升为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长史。

作为秦王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杜如晦表面上是被朝廷擢升外调，事实上是李渊有意剪除秦王日渐丰满的羽翼。当时秦王府上的很多官属被外放，不只是杜如晦一个，李世民为此深为忧虑。就在杜如晦即将赴任时，房玄龄及时地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但是杜如晦此人聪明识达，乃王佐之才！大王若只愿当一个藩王，诚然无所用之；若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即上奏李渊，终于把杜如晦留了下来。

杜如晦从此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一直参与各种机要及军国事务，史称其“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就这样，杜如晦与房玄龄一同成为李世民最为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同心协力、配合默契，成为中国历史上极负盛名的一对政治搭档。《旧唐书》称：“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

后人将其总结为四个字——房谋杜断！

秦王府十八学士除了杜如晦外，其余人物也都是一时之选，他们是：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皆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李世民把他们分为三班，轮流到文学馆值宿，供给他们佳肴美膳，礼遇十分优厚。李世民每当处理完当天政务，便立刻来到文学馆，和学士们纵论古今，讨论文史典籍，时常畅谈至深夜才上床就寝。李世民

又让著名画家阎立本为十八学士画像，让褚亮题写像赞，极尽尊崇之能事。一时间，秦王府的此番盛举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文学馆更是成为满朝士大夫和天下士人衷心向往的学术圣地。欣羡之余，人们都把有幸入选文学馆的学士称为“登瀛洲”。

李世民后来之所以能成功夺嫡，并且最终君临天下，应该说与这个智囊团的出谋划策息息相关。虽然这十八学士并不全是政治家，其中有些人应该算是比较纯粹的学者，但是知识精英恰恰能引导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舆论，尤其是在古代那种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中更是如此。所以，李世民的文学馆事实上就是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那个时代政治宣传的制高点，舆论导向的策源地。换句话说，掌握了文学馆和精英知识分子，也就等于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

试问，一个既能在军事上征服天下，又能在思想上领袖群伦的人，不当皇帝可能吗？

金銮殿上那张金光闪闪的御座，终究要向李世民敞开怀抱。

尽管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甚至包括天子李渊都要迫不及待地站出来说——我反对。但是他们最终只能听见历史老儿从鼻孔里重重地哼一声——

反对无效！

是的，反对无效。

因为李世民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他注定要创造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也注定要书写一段彪炳千秋的历史。

尽管此刻的天下烽烟未熄，这个新生的大唐帝国还要经受许多战火的洗礼；尽管在未来的道路上，年轻的李世民还要迎接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危险和考验。可是，一个无比瑰丽的帝王梦想早已埋藏在他的心中，一个独步古今的辉煌时代，也已经像喷薄欲出的旭日一样，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勃勃涌动。

这片饱经战乱、历尽沧桑的土地，终将被新时代的曙光照亮。

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有着黄金般的色泽，也有着比黄金更璀璨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作——贞观。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大唐兴亡三百年 ②

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
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

王觉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兴亡三百年．2 / 王觉仁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115-5488-8

Ⅰ．①大… Ⅱ．①王… Ⅲ．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8989 号

书　　名	大唐兴亡三百年．2
作　　者	王觉仁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邀编辑	汪超毅　沈　骏
封面设计	谢明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9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488-8
定　　价	4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李唐王朝统一海内

李世民：李渊的尴尬王牌

刘黑闼再犯大唐

魏徵妙计安天下，李建成赢了一回

爱吃仙丹的叛军头头

看似天下太平

第二章 政变的开端

太子李建成“谋反”

杨文干兵变的幕后黑手

如履薄冰的李世民

单枪匹马离间可汗大军

第三章 玄武门之变

突厥又来了

亲兄弟下毒，李世民吐血

被孤立的痛苦

祸到临头，秦王亮剑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上）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中）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下）

玄武门事变真相

第四章 年号：贞观

派系斗争，李渊主动退位

李世民笼络人心

赏赐功臣，以强宗室

偃武修文
弃霸道择王道
太上皇李渊的忠臣
李渊：被遗弃的太上皇
第五章 贞观制度：开明政治的典范
“三权分立”以获权力平衡
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
皇权让位于法权
对死刑慎重，就是对生命尊重
第六章 李世民：当皇帝这点事
贞观一朝的管理哲学
慧眼识人才
任命是一门艺术
恩威并施的帝王术
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
第七章 出门有忠臣，回家有贤妻
魏徵：忠臣忠言不逆耳
长孙皇后：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自制力：战胜人性的弱点
第八章 盛世唐朝，世界之心
永远的长安
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舌辩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

第九章 万邦来朝，李世民成了天可汗

东征突厥，报五年之仇

雪夜弓刀：东突厥的覆灭

高原之战：平定吐谷浑

日月照霜雪：征服高昌

西域：激烈的较量

诺真水之战：经略北疆

天可汗悔婚：薛延陀的末日

第一章 李唐王朝统一海内

李世民：李渊的尴尬王牌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月初，在河北打造了一个不败神话的刘黑闼终于顺理成章地迈上了他的人生巅峰。

他自称汉东王，定都洺州，改元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同时让旧夏朝的文武百官全部在他的新朝廷中官复原职。

对李唐王朝而言，这个继窦建德之后崛起的河北政权显然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为刘黑闼在司法、行政等一系列政治举措上全部效法窦建德，而在军事上则比窦建德更为强悍，“攻战勇决过之”（《资治通鉴》卷一九〇）。

刘黑闼之所以能一帆风顺地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应该感谢一个人。

李渊。

因为李渊客观上给了他时间——发展壮大的宝贵时间。

在刘黑闼纵横河北的半年间，其实李渊随时可以把李世民这张王牌打出去，可他就是迟迟没有打。因为李渊觉得，李世民的尾巴已经翘得太高了，不能再让他以朝廷栋梁自居了！之所以挖空心思地封给他一个所谓的天策上将，就是希望把他的虚荣心一步到位地封死，让他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从此冷却，夹起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当他李渊的好儿子、李建成的好弟弟、李唐朝廷的好臣子！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李渊不会让李世民再以舍我其谁、力挽狂澜的姿态去平定刘黑闼，去建立更大的功勋。因此，李渊自然就把平定刘黑闼的希望寄托在了李神通、罗艺和李世勣他们身上，然而，结果却让李渊大失所望。

这些人居然没有一个是刘黑闼的对手！

到了武德四年十二月末，眼看刘黑闼和徐圆朗重新点燃的战火在大河两岸已成燎原之势，李渊才不得不再度起用李世民这张一度被冷藏的王牌，把他从谈玄论道、吟诗作赋的文学馆中请出来，任他为主帅，李元吉为副帅，让李世民再度出征。

武德五年正月初八，李世民率领东征大军浩浩荡荡地进抵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刘黑闼采取避敌锋芒的战略，撤出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守军，全力据守洺州（今河北永年区）。正月十四，李世民收复相州，挺进肥乡（今河北肥乡区），在洺水（流经洺州城南）南岸扎营，威逼洺州。

与此同时，幽州罗艺也率数万兵马南下，意图对刘黑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黑闼接获战报，决定先行北上击败罗艺，回头再与李世民决战。他留给了范愿一万人，命他保卫洺州，然后亲率大军北上，迅速进抵沙河（今河北沙河市北）。

为了迫使刘黑闼回军，李世民决定对洺州施加压力。他派遣部将程名振带小队人马和六十面战鼓渡过洺水，在距洺州城西二里的河堤上猛烈擂击，对范愿发动心理战。一时间，整座洺州城都在震天的鼓声中摇撼，范愿吓破了胆，以为唐军主力马上就要攻城，慌忙派快马向刘黑闼告急。刘黑闼进退两难，最后还是不放心老巢，只好率大部队回师，同时命他的弟弟刘十善和大将张君立率一万人继续北上，阻击已进抵鼓城（今河北晋州市）的罗艺。正月三十，双方在徐河展开遭遇战，汉东军大败，损失八千余人，刘十善和张君立带着残部落荒而逃。同日，洺水县（今河北曲周县）人李去惑忽然发动暴乱占领县城，向唐军投降。李世民大喜过望，立刻命王君廓率一千五百人进驻洺水。

二月十一日，刘黑闼迅速回军，企图夺回洺水，却遭到唐将秦叔宝截击，夺回洺水的愿望落空。稍后数日，李世民又分兵绕过洺州，收复了北面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和太行山脉的一个重要关口井州（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二月中下旬，罗艺一路南下，接连攻克定州、栾州（今河北赵县）、廉州（今河北藁城区）、赵州（今河北隆尧县），兵锋直指洺州。

至此，唐军已经成功地对刘黑闼实施南北合围，将他压缩在洺州的弹丸之地，使其基本上丧失了转圜空间和机动作战能力。此时的刘黑闼可谓四面楚歌：北面的邢州和赵州已经落入唐军手中，而且罗艺来势凶猛，刘黑闼转战河北腹地的可能性已绝；西面则有太行山脉的天然阻隔；南面是李世民的唐军主力；唯一未被唐军占领的地盘就只剩下洺州东北面，也就是洺水上游一带的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冀州（今河北冀州市）等地了。这个地区现在是刘黑闼最后的后勤补给基地，要想不被唐军活活困死，刘黑闼只能依靠从这一线运来的粮草和给养。

可要命的是，如今这条生命线的咽喉也被唐军扼住了。

这个咽喉就是半个多月前丢失的洺水县。

洺水是洺州下辖的一个小县城，位于洺州城的东面，本来也算不上什么战略要地，但对于此刻的刘黑闼来讲无疑变得性命攸关，因为它就在贝州、冀州通往洺州的必经之路上。从贝冀一线运往洺州的补给，无论走陆路还是走水路，都要经过这座小小的洺水县城。所以，要想不被唐军活活困死或者瓮中捉鳖，刘黑闼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摆脱唐军前锋小股部队的牵制和纠缠，从东面突围，退守贝冀一线，伺机再战；第二，重新控制补给线，依靠持续的后勤补给与唐军对峙，再寻找机会与李世民决战。

而这两个选择的前提恰恰都是——夺回洺水。

很显然，“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因此对于唐军而言，眼下的洺水城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首要的作用当然就是扼住汉东军的咽喉；其次，由于唐军主力驻守在洺水河南岸，而洺水城位于北岸，此城就成了唐军的滩头阵地，是李世民插在刘黑闼眼皮底下的一把尖刀！占据此城有助于唐军以小股兵力对刘黑闼主力进行袭扰和牵制，刺探其动向与虚实，防止其突围逃逸，为唐军主力最终全歼刘黑闼创造有利条件。

因此，在两军真正的决战到来之前，双方势必要在洺水城展开一场激

烈的争夺战。

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这场争夺战的确打得十分惨烈。李世民的麾下猛将罗士信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被俘身亡的。

从二月下旬开始，刘黑闼就对洺水城发起了持续不断的猛烈进攻，李世民三度率军渡河增援，均被汉东军击退。眼看奋力死守的王君廓已经力不能支，李世民召开会议商讨对策，骁将罗士信遂自告奋勇，带着亲兵两百人前往接应。结果在混战之中，王君廓突围而出，罗士信反而冲进了汉东军的重围之中，继续据城而战。刘黑闼日夜猛攻，唐军多次试图增援，却因连日天降大雪而受阻，罗士信带着两百人独自坚守八天之后，终于城破被俘。刘黑闼感其骁勇，劝他投降，罗士信誓死不从，被刘黑闼斩首，死时年仅二十岁。

刘黑闼虽然一度夺回洺水，但到了二月末，李世民还是命李世勣将其重新占据。三月初，罗艺率军进抵洺水南岸，与李世民主力会师。刘黑闼不断挑战，李世民再次采用了他的一贯战略，坚壁不出，只是派兵封锁汉东军的补给线。三月十三日，从冀州、贝州、沧州（今河北盐山县西南）、瀛州（今河北河间市）等地发出的粮草和补给分水陆两路向洺州运来，李世民立刻命程名振率部阻截，将汉东军的粮船和粮车全部焚毁。

从二月初一直到三月下旬，唐军与汉东军就这样在洺水两岸僵持了将近六十天。

刘黑闼逐渐陷入绝境。

三月二十三日，为了摆脱困境，刘黑闼出动大军，全力攻击李世勣，李世民亲率一部渡河袭击刘黑闼的后背，不料刘黑闼反而回军将李世民重重包围。

李世民再次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又一个可怕的生死瞬间。

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率部突入重围，奋力救出了李世民。

随后的几天，李世民料定洺州城粮草已尽，刘黑闼必将被迫发动决战。为了吸引刘黑闼到南岸来决战，一举歼灭刘黑闼的有生力量，李世民遂命部将到洺水上游拦河筑坝，并且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待我与贼战，乃决之！”（《资治通鉴》卷一九〇）

所谓“乃决之”，就是决堤泄洪！

洪水无情，在两军会战之时决堤泄洪，是否意味着唐军将士将与敌人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这场战役的经过。

三月二十六日，决定刘黑闼命运的洺水之战打响了。

刘黑闼率步骑两万，南渡洺水，紧逼唐军大营列阵。李世民亲率精锐骑兵首先攻击刘黑闼的骑兵，将其击破，并乘胜冲入汉东军的阵地，横扫其步兵。刘黑闼深知，输掉这一仗他就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于是率众殊死奋战。而他麾下这些剽悍骁勇的河北将士也人人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所以打得异常顽强。两军一直从中午苦战到黄昏，往来冲杀，难分胜负。唐军虽然略占上风，但始终未能取得决胜的优势。

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李世民所骑的那匹旋毛黑嘴的骏马拳毛[1]身上足足被射中了九箭，前胸六箭，背后三箭，最终倒在了战场上，其表现可谓壮烈！

暮色徐徐降临，双方仍然鏖战不止。汉东军将领王小胡发现汉东军已经渐露颓势，连忙对刘黑闼说："看来是顶不住了，咱们还是趁早抽身吧。"刘黑闼虽然极不情愿，但他对战场上的形势同样不抱乐观态度，无奈之下，只好和王小胡等少数将领暗中撤出了战斗。

刘黑闼就这么脚底抹油、一走了之了，可他麾下的绝大部分将士却根本没有察觉，依旧在那里拼死砍杀。最后汉东军再也无力坚持，只好向洺水北岸溃逃。

就在他们全部进入河沟的时候，洺水河上游的滔天巨浪轰然而下。

当精疲力竭的汉东军士卒睁着血红的双眼，看见一丈多高的洪水仿佛万马奔腾一样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们几乎连恐惧和绝望都来不及体会，就在一瞬间被咆哮的洪水全部吞没。

此次战役的结果是：汉东军被"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几乎全军覆没，刘黑闼仅与范愿等人带着两百余骑逃奔东突厥。

很显然，虽然刘黑闼逃脱一死，但是有生力量丧失殆尽，唐军大获全胜，可以说李世民的战略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

但是，让后人诟病不已的就是李世民那个决堤泄洪的命令。

人们往往据此大骂李世民残酷无情。比如柏杨先生就对此大为不屑，

发表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评论，而且他的观点流传甚广，似乎挺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为了辨明这个历史真相，首先让我们来看柏杨先生的原话："一般战争中，使用水攻，都在敌人'半渡'之时，或进军半渡，或退军半渡，这样才能发挥歼灭性的效果。洺水之战则不然，李世民的命令没有提到敌人'半渡'，而是明确地说：'等我跟叛贼会战，你就破坏堤防！'两军会战时凿堤，大水没有眼睛，岂能分辨敌我！很明显的，李世民在这场战役中，采取的是敌我同归于尽的战术，李世民和高级将领没有危险，因为他们早就脱离战场……李世民决心要牺牲那些效忠他的政府军士卒，用以消灭刘黑闼这个突然崛起的劲敌。否则，不会在两军杀成一团的会战时决堤。这场在历史上并没有名气的水淹三军，恐怕是一个残酷的集体谋杀。"（《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事实果真如此吗？

并非如此。

虽然我们首先要肯定柏杨先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立场，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柏杨先生的这段评论基本上是无的放矢，甚至不客气地说——纯属无稽之谈。

柏杨先生所采信的唯一史料就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待我与贼战，乃决之"，因而一再强调使用这种水攻战术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在敌人"半渡"之时，而李世民只说"与贼战"，没提到"半渡"，所以结论当然就是李世民犯了"集体谋杀罪"。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柏杨先生单凭一种史料就如此断言，实在是过于颟顸和草率了！

在李世民发布的命令里，到底有没有提到"半渡"？

首先我们来看《旧唐书·刘黑闼传》，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击贼之日，候贼半度（渡）而决堰。"如此分明的"半度（渡）"二字，柏杨先生为何视而不见呢？此外，《新唐书·刘黑闼传》的表述更为准确："须贼度，亟决之！"一个"须"字，一个"度"字，一个"亟"字，足以表明李世民此项命令的关键之处就是对决堤时机的精确掌控，也就是必须等到敌军溃逃、渡至河沟中的时候，才决堤泄洪，断非两军在混战之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凿堤放水。

要进一步弄清李世民这个命令的真实含义，就有必要了解李世民所想达到的战略目的。关于这一点，《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拦河筑坝，目的就是"堰洺水上流使浅，令黑闼得渡"，也就是故意降低洺水的水位，诱使刘黑闼渡河到南岸与唐军决战，然后最

大限度地消灭刘黑闼的有生力量。

李世民最擅长的就是给对手布置这样一个舞台，让敌人在他所安排的时间和空间中与死神共舞，最后以他所给定的方式和节奏走向死亡。这项独特的本领无论是在平定薛仁果、宋金刚时，还是在虎牢之战与窦建德交手时，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场洺水之战，据两《唐书》记载，其结果同样不出李世民的战略预期，并没有出现任何失控的局面，更没有导致唐军将士溺毙的后果，因而所谓的“敌我同归于尽”根本就无从谈起。按《旧唐书》：“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洺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闼众不得渡。”《新唐书》的记载也与之大同小异：“黑闼果率步骑二万绝水阵，与王师大战，众溃，水暴至，贼众不得还。”由此可见，正是在这场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而汉东军向北岸溃逃之时，大水才轰然而至的，其结果就是使刘黑闼的部众无法渡过洺水，只能全部落入被杀和溺毙的绝境。而这一切恰恰与李世民所欲达到的战略目的完全吻合。

听到刘黑闼逃亡突厥的消息后，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的部众顿时斗志全丧，纷纷归降唐朝。

只有高开道和徐圆朗这两把不安分的野火在熊熊燃烧。

这一年四月初，高开道攻陷了易州（今河北易县），斩杀刺史慕容孝幹。数日后，徐圆朗也吞并了浚仪（今河南开封市）变民首领刘世彻的部众，将其诱杀，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谯州（今安徽亳州市）和杞州（今河南杞县）一带。

正当李世民准备南下进攻徐圆朗时，李渊突然把李世民召回了长安，于四月初九亲自到长乐坂迎接，满脸笑容地为李世民接风洗尘，以示尊宠。

刘黑闼终于败了，所以李渊迫不及待地要把这张尴尬的王牌收回去。可当李世民向他面陈徐圆朗依旧猖獗的反叛形势时，李渊的笑容立刻凝结在了脸上。

他不得不再次把李世民派往黎阳征讨徐圆朗。几天后李渊又追下了一道诏书，命李神通一同进攻徐圆朗，事实上就是希望他能取代李世民，接管征讨事宜。

对于父皇李渊的猜忌之心，李世民比谁都清楚。七月初，当李世民接连攻克河南的十余座城池、平定了徐圆朗的部分势力后，便主动班师回朝了，把彻底肃清徐圆朗的任务交给了李神通、李元吉和李世勣。

差不多在李世民班师的同时，刘黑闼又借助突厥兵力卷土重来，南下进围定州，其旧部董康买和曹湛立刻在鲜虞（定州州府所在地）起兵响应。七月十五日，李渊任命年仅十九岁的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让他负责征讨刘黑闼。

李渊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尽量培养宗室的后起之秀，给他们在战场上历练的机会，同时对功高盖世的李世民形成一定的制衡。

可李渊绝对没有想到，他刚把李世民这张王牌收回去，李道玄转眼就命丧刘黑闼之手，致使河北唐军再遭重挫。刘黑闼也因之死灰复燃，旬月之间再度恢复夏朝全境。

刘黑闼再犯大唐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初，正当复仇之神刘黑闼借助突厥人的力量再度南下时，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也亲率数十万铁骑大举入侵唐朝边境。

颉利可汗名叫阿史那咄苾，是启民可汗的第三子、始毕可汗和处罗可汗的弟弟，他在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即位时，正值东突厥达到全盛之际，拥有雄兵百万，所以极为骄狂，一直有侵凌中原之心。而武德初年的李渊出于天下未定、内战频仍的原因，只好对其采取绥靖策略，始终以防御为主，不愿与突厥全面开战。

自从李渊入据长安开创大唐后，东突厥与李唐王朝之间的战争总是时断时续，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从未完全停止。突厥人虽然在李渊起兵初期曾对他提供援助，但到了李渊登基称帝、势力逐渐壮大之后，突厥人就转而支持其他的割据势力，一意对李唐王朝进行制衡。几年来，东突厥曾经不遗余力地支持过薛举、李轨、刘武周、梁师都、窦建德、王世充等人，目的就是让他们与李渊相互制约，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只不过让突厥人没有想到的是，李唐崛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短短几年间便有一统天下之势，而那些原本与其势均力敌的割据群雄则一一败亡，灰飞烟灭。到了武德五年，突厥人手中的筹码只剩下梁师都、刘黑闼、高开道以及刘武周的部将苑君璋。就这几只阿猫阿狗，显然已经不能对李渊构成威胁。

这种一边倒的局面是突厥人最不愿看见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王

朝的兴起，对突厥人而言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此次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南下，就是想挫一挫李唐的锐气，让李唐感受一下突厥人在军事上的强大威胁，对突厥心存忌惮。当然，就像突厥军队每一次南下所做的那样，劫掠金银财帛也是他们此次南侵的题中之义。

这一年八月初十，颉利可汗从雁门入侵，随即兵分两路，他自己亲率十五万，攻击李唐的发祥地并州，另一路攻击原州（今宁夏固原市）。

突厥人大兵压境、来势汹汹，李渊不敢掉以轻心。八月十一日，李渊命唐军兵分四路，由太子李建成率一路出豳州（今陕西彬县），迎战突厥的西路军；由秦王李世民率一路出泰州（今山西河津市），迎战突厥主力东路军；另派云州总管李子和（郭子和）奔赴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从侧翼攻击颉利大军；最后由左武卫将军段德操奔赴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切断突厥西路军的后路。

虽然进行了周密部署，但李渊还是不希望与突厥全面开战。他随即召开廷议，向百官询问战和之策。曾多次出使东突厥的太常卿郑元璹说："开战则加深与突厥的积怨，以臣之见，还是和解比较有利。"中书令封德彝则认为："突厥人自恃兵强马壮，历来有轻视中国之心，若不战而和，则是向敌人示弱，突厥日后必定卷土重来。臣认为应当奋勇还击，先打几场胜仗再来讲和，如此方可彰显我大唐恩威！"

李渊最终采纳了封德彝的意见。

八月二十日，突厥东路的主力大军进抵汾水东岸，唐并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符率部迎战，击破突厥军队，首战告捷。稍后，汾州（今山西汾阳市）刺史萧顗也率汾州守军迎战，大破突厥的先头部队，斩首五千余级。

二十九日，突厥的西路军攻陷了大震关（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南）。

颉利可汗亲率的东路军虽然略遭挫折，但是兵力仍然十分强大，遂一路向纵深挺进。河东的唐军侦察兵很快向朝廷发回了战报，说突厥大军已经深入介休与晋州（今山西临汾市）一带，数百里之内，漫山遍野都是突厥骑兵。

眼看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就在这个时候，李渊派出的和谈使者郑

元璹来到了颉利可汗的大营。

郑元璹进入可汗大帐时，摆出一副强硬姿态，诘问颉利为何背弃盟约悍然入寇。颉利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对于这个外交斡旋高手郑元璹，颉利可汗是相当了解的。此前郑元璹曾四度出使突厥，每一次都是在他们突厥人的刀尖上游走，可到最后总能化险为夷。他上次出使突厥是在武德三年，其时李唐刚刚消灭刘武周，梁师都顿感唇亡齿寒，连忙游说当时的处罗可汗发兵进攻李唐。处罗可汗随即与梁师都制订了一个大举入侵中原的计划，但是未及实施，处罗可汗便暴病而亡。正当此时，郑元璹代表李唐来与突厥和谈，遂被强行扣押。直到后来形势缓和，两国互相交换被扣使节，郑元璹才得以安然回国。但是在郑元璹被扣期间，颉利可汗记得很清楚，这个硬骨头从来没有表现出半点恐惧，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就像住在自个儿家里一样。对于这样的胆识，颉利可汗确实是有几分佩服的。

而今这个“老朋友”又来了，颉利顿时有些头大，仓促之间实在想不出什么冠冕堂皇的入侵理由。

就在颉利可汗尴尬之时，郑元璹的脸色忽然缓和下来，换了一种商量的口吻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得到唐的土地，也不能长久居住。而今突厥掳掠所得，都落入将士之手，您身为可汗，可曾捞到什么好处？我看不如撤军，与唐室重新修好，如此一来，可汗你也不必有跋涉之劳，而唐室的金帛又能入可汗您个人的府库，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又何必幡然背弃友邦之间的兄弟之情，而给子孙后代结下无穷仇怨呢？”

听完这一席话，颉利可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因为他听见了“金帛”二字。

说老实话，颉利可汗此次南侵固然是想挫一挫李唐的锐气，可主要目的还是想捞一些真金白银，至于李唐的土地，突厥人实在没多大兴趣，就像郑元璹说的，抢过来也没什么用，而且劳师费财，得不偿失。况且此次亲征，颉利可汗也领教了唐军的战斗力，真正开打，突厥人未必能占便宜。更何况，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这一次又双双上阵，其麾下都是李唐最精锐的部队，特别是李世民，能够在短短几年里扫灭群雄，其军事才能绝对不可小觑，如果与他交手，颉利可汗并没有多少胜算。现在李唐既然主动提出馈赠金帛，颉利正好就坡下驴，当即与郑元璹达成修好协议，随后带着李唐贿赂的一大堆金帛撤

兵北还。

通过此次南侵，颉利可汗自认为在军事上对李唐还是具有威慑力的，这一点让他很有些自鸣得意。他觉得就算李唐最终一统天下，也改变不了他们对突厥心存畏惧的事实。只要他隔三岔五地派兵到李唐地面上转一转，相信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颉利可汗对此充满自信。

然而，此时的颉利绝对不会想到，短短四年后，李唐政权便会突然易手，而李世民上台之后，突厥对李唐所拥有的强势地位随即一落千丈，最后甚至荡然无存。

更让他想象不到的是，又过了四年，大唐名将李靖会一战将他击溃，曾经如日中天的突厥汗国竟然在他手中灭亡，而他本人也被俘送长安，最终抑郁而亡，客死异乡。

武德五年深秋，驻守河北的唐军再次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因为复仇之神刘黑闼归来了。

他在九月末一举攻克瀛州，斩杀了唐刺史马匡武。刘黑闼兵势复振，据守盐州（今陕西定边）的变民首领马君德立即献出州城，归附刘黑闼。十月初五，刘黑闼的弟弟刘十善与唐贝州刺史许善护在鄃县（今山东夏津县）展开激战，唐军被击溃，许善护全军覆没。初六，唐观州（今河北泊头市西）刺史刘会献出州城，投降刘黑闼。

十月十七日，刚刚被李渊任命为河北道行军总管的淮阳王李道玄在下博（今河北深州市东南下博镇）与刘黑闼会战，结果唐军大败，李道玄被刘黑闼斩首。

当时李道玄拥兵三万，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可为何最终还是兵败身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他太年轻、缺乏军事经验，而对手刘黑闼又太强悍，但最根本的原因却不在此，而在天子李渊。

李渊让年轻的李道玄担任统帅出来历练，这本身并没有错。此外李渊还让沙场老将史万宝担任李道玄的副手，事实上就是当他的教练，这看上去想得也挺周到。

可李渊的错误恰恰就在这个地方。

首先他为李道玄圈定的这个教练人选就有问题，因为史万宝历来与李道玄不睦，绝对不可能与他同心协力，更不可能传授给他什么经验。此外李渊又下了一道手诏给史万宝，说：“淮阳王还年轻，军事行动由你全权负责。”如此一来，史万宝又怎么可能把李道玄放在眼里？

李渊不经意间犯下的这两个错误，最终酿成了李道玄的悲剧。

当时战斗一打响，贪功冒进的李道玄就决定率先突击，命史万宝率大军随后跟进。可当他率轻骑兵一头冲入汉东军阵地的时候，史万宝却按兵不动。左右见淮阳王处境危急，大为不安，可史万宝居然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说：“我接到皇上手谕，说淮阳王不过是一个娃娃，军事上由老夫全权负责，而今他轻率妄进，如果跟他一同进攻，一定同归于尽。不如以淮阳王为诱饵，等他一败，贼兵争相来攻，我们严阵以待，必能将他们击败。”

于是数万大军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李道玄和他的少数轻骑被敌人慢慢吃掉，士兵们无不心寒。所以当刘黑闼的主力随后攻上来时，唐军早已斗志全失，无论史万宝如何叫喊，也挡不住大军溃逃的脚步，下博之战就此失败。

听到年仅十九岁的李道玄阵亡的消息后，李世民深感惋惜，对身边的人说：“道玄多次跟随我南征北战，看我经常深入敌阵，心中羡慕，想要效法，以至于此啊！”言罢涕泪沾襟。

淮阳王李道玄的兵败身亡对河北唐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年十月末，唐洺州总管、庐江王李瑗在无尽的恐慌中弃城而逃。

山东一片震骇，各州县纷纷叛降。

旬月之间，复仇之神刘黑闼再次克复夏朝全境。李世民洺水之战的胜利果实完全付诸东流。

十月二十七日，刘黑闼以一种王者不死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进入他的都城洺州。

十一月初，唐沧州刺史程大买弃城而逃。与此同时，正驻兵河南的齐王李元吉尽管早已接到李渊进兵的诏令，却也始终不敢跨过黄河一步。

面对这个可怕的复仇之神的归来，大河南北的唐朝将吏似乎都当起了缩头乌龟。

此时，魏徵正在长安的太极宫里用一种时不我待的口吻对一个人说——

机会来了，该您上场了！

魏徵妙计安天下，李建成赢了一回

魏徵此时的职务是太子洗马。

所谓太子洗马，并不是为太子管理马厩和洗马的，而是东宫的图书馆馆长，换言之就是太子的幕僚。

毫无疑问，这个即将在贞观时代与李世民共同演绎一出千古佳话的魏徵，此刻并不是李世民的人，而是太子李建成的死党。

眼看秦王李世民几年来威望日增、勋业日隆，魏徵一直替太子李建成感到忧心忡忡。

一年前，当李世民被封为旷古未有的天策上将并开府置官时，魏徵就觉得秦王的势力已经是一时无匹了，半个月前李世民又因驱逐刘黑闼之功被封为十二卫大将军，总揽全国兵权，更是让魏徵意识到太子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太子李建成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迟早会被秦王取而代之。

魏徵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忧惧，为李建成，也为自己的未来命运。

为此，当复仇之神刘黑闼并没有被李世民一举歼灭，而是很快就卷土重来、再度猖獗时，魏徵发自肺腑地笑了。

他原本以为所有的蛋糕都被秦王李世民一个人吃了，没想到刘黑闼这么快又做了一个。

这真是天赐良机！

魏徵随即与太子中允王珪一起对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此处指崤山以东）豪杰，庶可自安！"（《资治通鉴》卷一九〇）

李建成深以为然。

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几年来，李建成身为大唐帝国的堂堂储君，却在秦王李世民的绚丽光芒之下黯然失色。李世民赢得了多少鲜花、掌声和赞誉，他就相应承受了多少失落、愤懑和不甘。这太子当得实在是窝囊透了！瞧瞧去年七月那场万众瞩目的凯旋仪式，那简直就是李世民个人专场的武功秀嘛！瞧瞧他那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愣是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别说自己这个当兄长的，就算父皇李渊，恐怕在他心目中也没什么分量。李世民啊李世民，你怎么就敢明目张胆地把你的尾巴翘上天呢？

武德五年十一月初七，当太子李建成带着一副舍我其谁的表情向李渊主动请缨时，李渊顿时感到了一阵由衷的欣慰，并且如释重负。

是啊，太子是该上场了。

秦王那头的分量太重了，眼下还有什么比增加太子这边的砝码更迫切、更重要呢？

李渊当天就颁发了一道诏书，命太子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

李建成这次得到的职务是——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这也就意味着，整个潼关以东的所有唐朝将吏全部要受李建成一体节制，且赋予了他临事专断之权。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得知兄长李建成率领的大军已经从关中出发后，李元吉终于鼓起勇气打了一仗，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一带击败了刘十善。二十六日，刘黑闼率部南下，攻克元城（今大名县东），相州以北的州县纷纷归附，只剩下魏州总管田留安仍然在坚守孤城。刘黑闼随即将魏州团团围困，日夜猛攻。

十二月中旬，李建成的大军进抵中原战场，与李元吉会师，在昌乐（今河南南乐县）列阵扎营。刘黑闼立刻掉头南下，与唐军对峙。

此时的刘黑闼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他将不战而败。

并且将一败而亡！

因为李建成实际上跟他打了一场不见血的战斗，如此高明的战略实在

出乎刘黑闼的意料。

这个战略是魏徵提出来的。

就在两军对峙之时，魏徵对李建成说：“当初击破刘黑闼时，我们一抓到他的将领就全部处死，逃亡的全部通缉，妻子儿女也一并关进监狱，所以迫使他们下定了反抗到底的决心。前不久齐王李元吉虽然宣布了大赦令，可他们却不敢相信，以为又是一个陷阱。而今我们应该把汉东军的战俘全部释放，安抚慰勉，送他们各回家乡，如此一来，不用我们动手，定可坐视刘黑闼部众离散。”

李建成依计而行，不与刘黑闼正面对决，在战场上两次列阵却又两次收兵。刘黑闼满腹狐疑，担心李建成设下埋伏，所以没有贸然进攻。

对他来讲，昌乐对峙的这几天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机会。

但是刘黑闼错过了。

永远地错过了。

随后的几天，刘黑闼军中开始断粮。

而更要命的是，魏徵的策略对他的部队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部众中开始不断有人逃亡，有些士兵甚至把他们的将领捆起来一块投降了唐军。

刘黑闼很想发动进攻、决一死战，可他又担心魏州的田留安攻击他的后背。思前想后，刘黑闼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先退回河北的根据地，休整一阵子再说。

十二月二十五日，刘黑闼趁着夜色向馆陶（今河北馆陶县）方向撤退。就在他撤至永济运河的时候，李建成的大军尾追而至。刘黑闼命王小胡背靠运河列阵，然后亲自督促士兵搭设浮桥。桥一搭好，刘黑闼立刻带着数百名骑兵冲到了西岸。可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对岸的情景令他目瞪口呆。

留在对岸的部众全都乖乖放下了武器，高举双手向唐军投降。

还没等刘黑闼回过神来，唐军骑兵已经冲上浮桥向他杀来。万般无奈的刘黑闼只好带着几百个亲兵头也不回地落荒而逃。

唐军骑兵刚刚有一千余人冲到对岸，仓促架设的浮桥就轰然崩塌了。唐军只好停止追击。

武德五年最后的日子里，刘黑闼在冰天雪地里一路向北狂奔——除了继续流亡突厥之外，他别无选择。

李建成派出的唐军大将刘弘基在背后拼命追赶。

刘黑闼一刻也不敢停下来，他现在是在跟死神赛跑。

在马不停蹄的逃亡路上，刘黑闼肯定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自己为何不战而败？

即便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李世民，跟他过招的时候也要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最后还要靠决堤泄洪这样的损招才把他的主力吃掉，可如今这个李建成却连仗也不用打，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彻底击败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黑闼唯一知道的原因就是背叛——万千部众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集体背叛。

可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背叛？

刘黑闼不知道。

因为他只是一个将军，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关于人心向背的问题属于政治范畴，所以也就超出了刘黑闼思考的范围。

魏徵正是敏锐地抓住了他的这个致命弱点，才对他打了一场防不胜防的攻心战。

刘黑闼的部众就是在这场凌厉的攻心战中丢盔卸甲、不战而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黑闼第二次起兵不是败给了唐军元帅李建成，而是败给了政治家魏徵。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当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在迎接新年的时候，刘黑闼和他最后的一百余名亲兵却还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地奔跑

在逃亡路上。

初三，这群饥寒交迫的逃亡者跑到了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刘黑闼的部下、饶州刺史诸葛德威亲自出城迎接。

可刘黑闼却不想进城。

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只惊弓之鸟，他怀疑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他。

对于这个姓诸葛的人，刘黑闼同样不抱信任。但是这个人的真情最终却让他无法抵挡。

因为诸葛德威万分悲伤地流下了两行热泪——为汉东王刘黑闼落到这步田地而流，也为老大刘黑闼居然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而流。

在这样一个大地冰封、寒风凛冽的早晨，这两行清亮的热泪是很容易温暖人心的。

刘黑闼心上的坚冰就在这一刻彻底融化了。

他相信人间或许还有真情。

而此时此刻，他和他饥寒交迫的一百多号弟兄，是多么需要真情、多么需要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啊！

刘黑闼没有抵挡住真情和小米粥的诱惑，解除警惕走进了饶阳城。

诸葛德威果然给他们送上了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还有同样热气腾腾的白馒头。

刘黑闼和弟兄们刚喝了半碗粥，刚咬了几口馒头，殷勤的诸葛德威很快又给他们送上了一样东西。

钢刀！

每个人脖子上都架了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看着刀刃上泛起的森寒白光，刘黑闼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绝望的眩晕。

刘黑闼和弟弟刘十善一起被押到洺州斩首的时候，这位复仇之神仰天长叹，说了一句很没有英雄气概的话。他说：“我本来在老家好好种菜，都是高雅贤这帮人把我害到今天这个地步！”

很显然，刘黑闼到死也没搞懂人心向背的问题，到死也没搞清楚自己

迅速崛起又突然败亡的根本原因。

其实，刘黑闼第一次起兵之所以能够气势如虹、所向披靡，根本原因有二：首先，窦夏政权虽然已经垮台，但是它在河北经营多年的统治根基却还十分牢固。换句话说，李唐虽然凭借虎牢之战一举消灭了窦建德，并收降了齐善行、曹王后、曹旦等窦夏政权的高层人物，摧毁了窦夏政权的统治核心，但是并未真正铲除夏朝中下层将吏在河北根深蒂固的势力，进而言之，李唐朝廷根本不可能通过一场战役的胜利就彻底降服河北的人心。更何况虎牢之战本来就是窦建德离开本土所进行的外线作战，对于河北境内的大多数将吏和军民而言，由战争所引发的流血、痛苦和创伤并没有波及他们，在此情况下让他们突然接受失败，一夜之间要求他们弃旧迎新，向李唐俯首称臣、献上忠心，这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其次，窦夏政权垮台后，李唐朝廷对河北所采取的政策似乎也有高压之嫌，窦建德的旧部感受不到李唐对他们进行招抚和收编的诚意，也看不到相应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完全有理由对李唐感到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在此情况下重操旧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燕赵之地自古民风彪悍，且河北民众对窦夏政权的满意度一直都很高，因此李唐的高压政策无异于把一副强硬的弹簧压迫到底，最后这些人自然会高度反弹。

所以，刘黑闼等人再度揭竿而起是必然的。

李唐的虎牢之战赢得过于轻松了，代价就是必须回头再补上一战。

简言之——河北的血并未流够！

与此同时，李唐朝廷也必须调整其强硬的河北政策，改高压为真正的安抚，才可能消除河北叛乱的外部因素。我们看见魏徵正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所以积极采取安抚政策，迅速释放弹簧的压力，消解其反弹能力，从而促使刘黑闼在一夜之间丧失了部众的拥戴。魏徵的聪明在于，他知道河北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用政治手段解决远比用军事手段解决节约成本，也更高效。当然，李世民首先在军事上挫尽了刘黑闼及其部众的锋芒和锐气，让河北该流的血都流够，这绝对为魏徵日后采取政治手段铺平了道路。

至于刘黑闼，他当然没有能力看清楚上述这一切。

如果说在隋末唐初的乱世中，刘黑闼还称得上英雄的话，那他也只能算半截子英雄。

问题倒不是出在他最终的失败上，因为历史上多的是虽败犹荣的英雄。关键是刘黑闼身上缺乏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人生信念，所以才会在临死前说出那种很没有英雄气概的话，抹杀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一个人失败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丧失了勇气和信念，只剩下一副悔恨交加、怨天尤人的嘴脸。

所以最后我们只能说——复仇之神刘黑闼的结局，实在不够漂亮。

爱吃仙丹的叛军头头

新的一年来了。李渊欣喜地看到，燃烧多年的烽烟仿佛正在散去，遍及天下的战火似乎也已逐渐熄灭。

正月初，刘黑闼败亡，河北平定。

二月，徐圆朗势穷力蹙，弃城而逃，被流民所杀，河南平定。

三月下旬，梁师都的大将贺遂、索同率领下辖的十二州降唐。梁师都的势力从此大为削弱，虽然仗着突厥人的支持不时犯边，但基本上已是日薄西山，难以有所作为。

六月中旬，一直据守马邑（今山西朔州市）的苑君璋（刘武周旧部）被其部将高满政发动兵变驱逐，逃亡东突厥。高满政随后献出马邑归降唐朝，被封为荣国公，任朔州总管。

到这一年初秋为止，虽然高开道还在河北进行小范围的袭扰劫掠，各地也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规模叛乱，但是天下趋于稳定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四海人心在经历多年的战乱之后也无不渴望和平、期待统一。

这是李渊在武德六年对天下大势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李唐朝廷上上下下的一个基本共识。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做一个治世的良吏或良民，更愿做一个乱世的英雄或枭雄。尽管像刘黑闼和徐圆朗这种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可还是有人愿意步他们的后尘，豁出性命再玩一次心跳。

这最后一波叛乱的发动者，就是杜伏威多年的战友和副手——辅公

祏。

这一年八月初九，时任淮南道行台仆射的辅公祏据丹阳（今江苏南京市）复叛，杜伏威原有的部众和辖区几乎全部跟随辅公祏揭起反旗。

消息传至长安，杜伏威就像被一记响雷击中了天灵盖，好久没有缓过神来。

几年来他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其实早在刘黑闼、徐圆朗和高开道等人复叛之后，杜伏威就有一种临深履薄之感。因为同样作为隋末唐初折腾得比较凶的反王之一，杜伏威很难让人相信他没有复叛的企图。即便他现在自认为一颗忠心向着李唐，可过去的反王身份还是很容易招致人们怀疑和戒惧的目光。虽然李渊始终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猜忌，但是杜伏威很清楚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他知道，必须主动做点什么，才能消除朝野上下对他的腹诽和猜疑。

要做点什么呢？

思前想后，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入朝。

武德五年七月，正当李世民在淮河一带大举征讨徐圆朗时，其时驻守丹阳的杜伏威就向李渊上表请求入朝。对于杜伏威这种主动避嫌以示忠心的聪明做法，李渊甚感欣慰，随即召他入朝，并任命他为太子太保，遥领东南道行台尚书令之职。而且宠遇甚隆，连朝会的班位都排在齐王李元吉之前，随同杜伏威入朝的义子阚稜也官拜左领军将军。

面对天子的信任和礼遇，杜伏威既感激又满足。

可越是对现状感到满足，他就越担心有人会破坏它。

他担心谁？

辅公祏。

表面上，谁都以为杜伏威和辅公祏是生死之交，可事实上这种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在造反初期，他们之间或许还有点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味道，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他们二人便渐行渐远，从冷淡和隔膜走向了互相防备和猜疑。后来杜伏威的地位越来越高，辅公祏既羡且妒，可他城府极深，从不表露。内心越是觊觎权力，辅公祏的外表就越是装得满不在乎，最后甚至和老友左游仙成天炼丹修

道，以不食人间烟火之状敛藏自己的锋芒，淡化杜伏威的戒心。

然而，杜伏威对他的戒心始终没有解除。

常年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没那么容易被人麻痹。

但是表面文章总是要做的，辅公祏既然表现得如此低调，杜伏威当然也没什么理由跟他翻脸，所以始终把辅公祏放在二把手的位置上。

如果没有刘黑闼等人掀起的波澜，杜、辅二人的太极推手也许会一直这么打下去，谁也别想把谁怎么着。可后来时势大变，杜伏威不得不入朝，而且不得不把丹阳的行政大权交给辅公祏。临行之前，杜伏威特意把他的义子、麾下猛将王雄诞安插在辅公祏身边，命他掌管军权，并郑重叮嘱说："我到长安后，如果一切顺利，千万不能让辅公祏生变！"

王雄诞是一名勇将，胆识和忠心都不缺乏，可唯独缺乏心计。所以杜伏威入朝不久，辅公祏就略施小计夺取了王雄诞的兵权——他放出一条消息，说他接到杜伏威的一封密函，信中对王雄诞的忠心甚表怀疑。王雄诞立刻中计，从此心灰意冷，托病不入州衙，军政大权随即落入辅公祏手中。

直到辅公祏做好了一切叛变准备，派人对王雄诞发出最后通牒，逼他入伙时，王雄诞才如梦初醒，悔之莫及。他对来人说："而今天下方平，吴王（杜伏威）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为何要无故反叛，自求灭族？雄诞唯有一死而已，不敢自陷于不义！"随即被辅公祏缢杀。

随后辅公祏便迫不及待地揭起了反旗，在丹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宋，设立文武百官，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同时联合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变民首领张善安，命他掌西南道大行台。

辅公祏之叛，无疑让杜伏威百口莫辩。而且辅公祏又是处心积虑打着他的招牌，说是奉他的密令起兵，摆明了就是要借朝廷之刀置他于死地。

杜伏威意识到——自己的功名富贵和身家性命就这么被辅公祏一夜之间全给毁了。

八月二十八日，李渊下诏，命各地唐军兵分四路：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向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出发，岭南道特使李靖率交州、广州等地军队向宣州（今安徽宣州市）出发，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总管黄君

汉自谯亳（今安徽亳州市）出兵，齐州（今山东济南市）总管李世勣自泗水出兵，一同讨伐辅公祏。

九月，辅公祏命大将冯慧亮、陈当世率水军三万进驻博望山（今安徽当涂县西南），另派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三万进驻青林山（今安徽当涂县东南），两军互成掎角之势，协同攻防。此外，宋军又在梁山（今安徽和县南）一带的长江两岸拉起铁链，横断江面，以此阻挡唐朝的水军，并且在沿岸修筑了大量堡垒，绵延达十多里，最后在长江西岸安营扎寨，严阵以待。

宋军迅速在唐军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十月，李孝恭和李靖的水军合兵一处，进抵舒州（今安徽潜山县）。与此同时，李世勣率步兵一万南渡淮河，攻占寿阳（今安徽寿县），并进驻硖石（今安徽寿县北）。

十一月，宋军将领陈当世率部南下阻击唐军。唐舒州总管张镇周出兵迎战，在猷州（今安徽泾县）的东南面大破陈当世。

十二月，唐安抚使李大亮在洪州设计诱捕了宋西南道大行台张善安，并击溃了他的部众，成功斩断了辅公祏延伸出来的一只臂膀。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月十一，李孝恭和李靖一路向长江下游挺进，先是进围枞阳（今安徽枞阳县），击破驻守此地的宋军，继而在二月初攻克鹊头（今安徽铜陵市北），随即向冯慧亮驻守的博望山挺进。

李孝恭和李靖势如破竹、直捣宋军腹地的同时，杜伏威忽然在长安暴毙。

杜伏威之死非常蹊跷，各种史书的记载都很简略。《资治通鉴》只写了一个字“薨”，而《旧唐书》只说了两个字“暴卒”，只有《新唐书》给出了死因：“伏威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云母是道家的一种丹药，可见杜伏威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但问题是，这丹药究竟是杜伏威自己过量服用而死，还是因某种外在力量的逼迫服食而死？换言之，杜伏威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没有给出答案。可我们根据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推断，答案很可能是后者。首先，一个多月后李孝恭平定了辅公祏，抄出了杜伏威与辅公祏之间的所谓“反书”上报朝廷，声称杜伏威是辅公祏叛乱的幕后主使，而李渊竟然二话不说，当即下诏追夺杜伏

威的官爵，并将其妻儿全部籍没为奴。联想到此前杜伏威所受的尊宠和礼遇以及他的太子太保和吴王的身份，即便有所谓的“反状”，也应该通过有关部门进行周密的调查审理，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后才能定罪，而李唐朝廷为何不经过任何正常程序，仅凭别有用心的辅公祏所炮制的所谓“反书”，就迫不及待地将杜伏威“斩草除根”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李渊的真实用心。

其次，随同杜伏威入朝的义子阚稜此后的际遇则更为不堪。唐军大举征讨辅公祏时，阚稜也参与了平叛战役，并且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新唐书·阚稜传》记载：“公祏反，稜功多。”大军攻克丹阳后，李孝恭不但没有论功行赏，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抄没了杜伏威、王雄诞和阚稜在丹阳的所有家产，理由是辅公祏被捕后供认阚稜与他串通谋反。很明显，辅公祏的供词纯粹属于诬告，因为阚稜和王雄诞都是杜伏威的心腹，而阚稜又亲自参与征讨他的战斗，辅公祏死前当然要拉阚稜垫背，所以他的供词绝对是靠不住的。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想必李孝恭也是心中有数。可他居然还是抄没了阚稜的家产。阚稜当然不服，于是据理力争，李孝恭索性以谋反罪名将阚稜就地斩首，连上报朝廷的环节都省了。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李孝恭凭什么听信辅公祏的诬告，凭什么如此轻率地把“谋反”罪名安在阚稜头上并抄没他的家产？即便他本人相信阚稜的确参与谋反，可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凭什么不经过朝廷同意就擅杀一个朝廷命官、平叛功臣？如果李孝恭背后没有朝廷撑腰、没有天子李渊事先授意，他敢这么做吗？再者，王雄诞是因为不愿参与反叛而被辅公祏杀害的，这一点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按说他应该算是李唐的忠臣和烈士，可为何连他也被视同谋反？这一切实在有悖常理。

最后，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当年就为杜伏威平反昭雪，“诏复官爵，以公礼葬，仍还其子封”（《新唐书·杜伏威传》）。李世民如此急切地替杜伏威平反，起码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这起事涉多人的冤假错案绝对不可能是李渊朝廷的无心之过，而是借辅公祏叛乱的机会痛下杀手，一举剪除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小集团”。

众所周知，杜伏威是隋末最早的割据势力之一，在江淮一带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杜伏威归附了唐朝，但是他和李唐朝廷之间的相互猜忌是在所难免的。正因为此，杜伏威才会在刘黑闼、徐圆朗等人复叛后赶紧主动入朝为质。李渊表面上不动声色，对入朝的杜伏威恩宠有加，事实上内心的忌惮是极为强烈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内心越是忌惮，表面上就越要表现出对杜伏威的恩宠，二者其实是成正比的。而辅公祏公然复叛后，在江淮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势，李渊就

更加感到这股江淮旧势力是帝国南部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与其担心这个江淮小集团中还会有人继辅公祏之后造反，倒不如借此机会赶尽杀绝，一劳永逸地根除后患。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杜伏威很可能是死于谋杀，而整起冤假错案的幕后制造者就是——大唐天子李渊。

武德七年三月，李孝恭和李靖在芜湖击败宋军，并迅速北上，一举攻克梁山（今安徽和县南）的三座军镇，随即进抵博望山，将博望山和青林山的所有宋军堡垒全部攻克。冯慧亮等人狼狈逃回丹阳，宋军被杀和溺毙于长江者数以万计。

李靖所部率先攻至丹阳城下，辅公祏怯战，放弃丹阳，率数万人马向东逃窜，准备投奔左游仙驻守的会稽。其时李世勣的军队也已赶到，在后面紧追不舍。当辅公祏仓皇逃至句容时，数万大军已经相继逃散，最后只剩下五百余人。

三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失魂落魄的辅公祏带着残部逃到常州，部将吴骚等人在馆驿里密谋，准备逮捕他投降唐军。生性多疑的辅公祏察觉，于是连夜抛弃妻儿，只带着数十名亲兵再度逃窜。一行人逃到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时，遭当地流民袭击，辅公祏被生擒，旋即押赴丹阳斩首。唐军分兵搜捕辅公祏的残余党羽，随后全部诛杀。

至此，江南彻底平定。李唐王朝“北自淮，东包江，度岭而南，尽统之”（《新唐书·河间王孝恭传》）。稍后，朝廷撤销东南道行台，改称大都督府，李孝恭以平定帝国半壁之功，被擢升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都督府长史。李渊在人前人后不住地夸奖李靖：“李靖真是萧铣和辅公祏的克星啊！”

就在江南这最后一波叛乱平定前夕，河北怀戎（今河北怀来县）自称燕王的高开道就已先于辅公祏走向灭亡了。

从背后向高开道捅刀子的人，是他最信任的义子——侍卫队长张金树。

武德七年二月的一天，张金树发动兵变，包围了高开道的府邸。高开道自知在劫难逃，就把妻妾和子女全都召集起来，和他们一起饮酒，甚至还命乐工奏乐助兴。这凄凉的绝命酒喝了整整一夜。等到案上杯盘狼藉、人人酩酊大醉的时候，东方的天空也已渐露曙色。高开道手里拿着一根绳子，摇摇晃晃地在大堂里走了一圈，把妻妾子女挨个勒死，然后就上吊自杀。

当天早晨，张金树命令部队全城戒严，并把高开道的其他义子全部砍杀，然后砍下高开道的头颅，遣使向唐朝投降。

二月二十日，李渊的受降诏书和任命状迅速抵达怀戎。

几天前还无人知晓的毛头小子张金树，就在这天摇身一变，成了大唐帝国的北燕州都督。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见旧人哭？

旧人不哭。

因为旧人已经成了尸骨。

累累尸骨堆成阶梯，造就了新人脱颖而出的高度。

人皆如此，王朝何独不然？

自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邹平人王薄在齐鲁大地唱响那一支振聋发聩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到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开道和辅公祏等人的相继覆灭，一个历时十三年的天崩地裂、血雨腥风的时代终于画上了句号。

回首来时路，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只能说——

这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

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

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贵贱、穷通、生死、荣辱、成败、利钝、得失、福祸……这些貌似矛盾对立的两极事物，往往在某些阴差阳错的瞬间相互易位，迅捷如同闪电。而你在如烟过眼的短暂一生中，能见证什么叫作星移物换、沧海桑田；你也能在某个刀光闪过的短暂一秒中，见证什么叫作人生如梦、刹那永恒。

这是一个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时代。

这是一个一切皆具宿命的时代。

历史的大棋盘乍一看风起云涌、龙盘虎踞，可就在你不经意的转身与回眸之间，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你只能遗憾，为什么不能让一切从头再来？

当命运的弈局开场时精彩无比，你自以为手段精妙，纵然走不出吞吐天下的乾坤步，至少能博一个逍遥一方的玲珑局。可你却英雄气短，一步走来一寸灰，到最后你也许会伤感，为什么没有人在一开始就告诉你——小心，落子不悔！

看似天下太平

日月双飞箭，乾坤一转丸。

公元624年的农历三月，春暖花开，万物生长。新生的大唐帝国在经历了一连串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终于呈现出一片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除了依然盘踞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区）的梁师都之外，四方群雄皆灭，天下复归一统。李渊父子及其政治军事集团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和不懈努力，终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重新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恢复了崩溃已久的社会秩序，重建了大一统的政治权威。

一切似乎都已走上了正轨。

然而，当这个横空出世的新王朝正以一种生机勃发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却已经在帝国的权力之巅酝酿。

风暴起源于两大水火不容的集团之间由来已久的政治博弈。

从武德初年起，围绕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就一直在寸步不让地暗中较量。到了天下大致平定的武德五年以后，这种暗流汹涌的政治博弈就逐渐演变成公开化的激烈斗争。而齐王李元吉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作出了自己的政治抉择——加入李建成的阵营，联手对付李世民。

李元吉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投靠李建成，并非出于他与长兄的感情，而是因为他同样怀有个人的政治野心。李世民图谋取代储君之位，而李元吉同样也在觊觎皇权。假如拥戴战功显赫、威望卓著的李世民夺嫡继位，那他李元吉永远也别想有出头之日；而如果是与东宫联手剪除秦王，回头再除掉太子，在李元吉看来则是易如反掌之事。说白了，李建成在李元吉心目中就是一块通向皇位的跳板，因此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投靠东宫。

唐高祖李渊晚年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后宫嫔妃成群，终日莺歌燕舞，其中尤以张婕妤和尹德妃最受李渊宠幸。太子和秦王为了能让嫔妃们的枕头风对天子的各种决策施加影响，增加自身的博弈筹码，不约而同地把PK的阵地从外廷延伸到了后宫。

对于这些年轻的嫔妃而言，天子李渊年事已高，随时可能龙驭宾天，所以，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并长保富贵，她们必然要在年长的皇子中为自己和年幼的儿子寻找未来的政治靠山，因此也必然会自愿地

加入太子与秦王的这场政治PK中来。史称：“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据说，太子与齐王甚至还因此与张婕妤和尹德妃传出了宫廷绯闻：“或言烝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一九〇）

而在交结后宫、争取内援方面，李世民当然也不会无所作为。但是他更为谨慎，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妻子长孙氏在后宫开展活动。“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李建成）猜忌滋甚。后（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可见当时的后宫嫔妃也分成了亲太子和亲秦王的两派。但是太子和齐王最终还是在这场后宫之战中占据了上风，因为他们与张、尹二妃关系非同一般，而她们恰好又对天子李渊最有影响力。所以当李建成与张、尹二妃拧成一股绳之后，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对李世民出手了。手段是故意制造事端，引发冲突，从而离间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

太子集团的离间计非常成功，可以从下面这几件事情中明显地看出来。有一次杜如晦骑马从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的府门前经过，尹府的下人忽然冲出来，把杜如晦拉下马一顿暴打，并且折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尹阿鼠还指着杜如晦的鼻子咆哮：“你是什么东西，敢过我家门而不下马！”然后尹德妃就恶人先告状，向李渊哭诉说：“秦王左右欺凌妾家。”李渊不分青红皂白，回头便斥责李世民：“我嫔妃家尚且被你左右的人欺凌，更何况小老百姓？”李世民极力解释，可李渊却不肯相信。

还有一次，李世民把长安附近几十顷的良田赐给了淮安王李神通，太子集团马上采取行动，由张婕妤去向李渊求情，替自己的父亲讨要这块田产。李渊不知此田已赐给李神通在先，于是二话不说颁下手诏，把地赐给了张婕妤的父亲。在武德中后期，太子令、秦王教和齐王教可以与天子诏书并行，具有同等效力，有司对此无所适从，最后形成了一个惯例：以先收到的为准。既然如此，李神通手上有秦王的赐令，当然不肯把土地让出来。张婕妤抓住把柄，对李渊说：“皇上赐给妾家的田地，被秦王夺走，转赐给李神通了。”李渊勃然大怒，立即把李世民叫来一顿训斥，最后说：“我的手诏不如你的手令，是不是？”

通过这些刻意制造出来的摩擦，太子集团达到了目的。李渊对李世民越来越失望，曾经对左仆射裴寂感叹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旧唐书·隐太子建成

传》）

武德五年以后，随着天下的逐渐平定，李渊便经常在宫中大宴群臣。每逢此刻，李世民就会思念自己早逝的母亲，感叹她不能亲见父亲君临天下，一念及此，总是黯然神伤，独自垂泪。正在兴头上的李渊时常在无意中看到秦王那张郁郁寡欢的脸，愉快的心情总是一扫而光。

秦王这种不合时宜的触景生情，很快又成了心怀叵测的嫔妃们尽情攻击的靶子。宴会过后，嫔妃们就不失时机地对皇帝说："如今四海升平，陛下年事已高，唯一的养生之道就是娱乐。可秦王却总是哭泣败兴，正是因为憎恨妾身们。陛下万岁以后，妾身母子们必不为秦王所容，到时候恐怕一个也不会剩下了！"说到伤心处，这些嫔妃一个个哭成了泪人。

最后她们说："皇太子为人仁孝，陛下将妾身母子们托付给他，方能保全性命。"

李渊看着这群美丽的嫔妃梨花带雨的脸庞，听着她们伤心凄恻的啜泣，不禁悲从中来，陪着她们长吁短叹。他无奈地发现，自己和次子李世民之间的那条裂痕，如今已然塌陷成一道巨大的鸿沟！

面对这种历朝历代似乎都难以避免的政治隐患和亲情危机，他至今也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此外，建成、元吉与世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也让他感到莫大的忧虑和恐慌。

怎么办？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历史上那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悲剧在自己面前重演吗？

[1]　拳毛也是著名的昭陵六骏之一。李世民为其题写的赞辞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

第二章 政变的开端

太子李建成"谋反"

许多年以后，当鬓发苍白的唐高祖李渊被遗弃在宫城西侧那座不事修缮而且乏人问津的大安宫里，独自咀嚼生命中最后的孤独、失落和忧伤时，他将会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武德七年那个燠热难当的夏天。

在老病交侵的落寞岁月里，尽管不堪回首的沧桑往事早已把这个老人的生命记忆啃噬得面目全非、斑驳支离，但是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还是无比清晰地烙印在他的心底。对于这个从权力之巅遽然跌落并丧失了一切的昔日天子而言，似乎没有人比他更有理由确信武德七年夏天是所有悲剧的开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张由欲望、阴谋和杀戮共同编织成的灾难之网，便不由分说地朝着李唐皇族的头顶罩了下来，最终酿成了武德九年那一幕禁门喋血、骨肉相残的惨剧。

其实李渊一直在努力避免悲剧的发生。

面对建成、元吉与世民之间明争暗斗的诸般事实，李渊并不是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而是一直在他们之间尽力弥缝，煞费苦心地维持某种利益平衡，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然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李渊的努力就在武德七年夏天结出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恶果——庆州都督杨文干悍然起兵，而太子竟然涉嫌谋反！

许多年后，李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愤怒、震惊与错愕。

太子谋反？

这可能吗？太子真的是杨文干兵变的幕后主使吗？

自从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平定刘黑闼之后，太子李建成就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发现自己终于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而日渐动摇的储君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巩固。此外这次东征还让他得到了两个额外收获：其一是和四弟李元吉结成了政治同盟，一起把矛头指向了李世民；其二是与燕王李艺（罗艺）深相交结，推荐他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阵营。

凯旋回朝后，李建成开始不遗余力地扩充武装力量。他私自招募长安及四方的骁勇之士两千余人，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同时他暗中派遣右虞侯可达志前往幽州，从李艺的旧部中抽调了三百名身经百战的突击骑兵，秘密屯驻东宫附近诸坊，准备进一步充实东宫卫队。

李建成之所以搞这么多小动作，目的只有一个——对付李世民。

因为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要和李世民刀兵相见。

然而，就在那三百名幽州骑兵刚刚进驻长安不久，事情就被人告发了。有人一状告到了皇帝那里，李渊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一个储君居然背着朝廷，把一支地方军队千里迢迢地调入京师，这绝对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李渊立刻把李建成召去训斥了一番，随后便将东宫将领可达志流放嶲州（今四川西昌市），以示惩戒。

李建成很窝火。他比谁都清楚，告密者肯定是秦王的人。可既然是自己违规操作被人抓了小辫子，他也无话可说，只好忍耐。

可有个人却不想忍耐。

他就是齐王李元吉。

这个一贯凶暴蛮横的老四，再也不想跟李世民玩暗中角力的游戏了，他频频怂恿太子先下手为强，干掉李世民。他咬牙切齿地对李建成说："当为兄手刃之！"李建成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没有答应。李元吉嫌老大优柔寡断，决定自己找机会动手。

机会很快就来了。

有一次李世民陪同李渊莅临齐王府，李元吉遂命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内室，准备刺杀李世民。李建成察觉之后，及时制止了他。在他看来，老四这么做简直就是玩火自焚——在你自己的府上、在天子的眼皮底下行凶杀人，暂且不说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就算得手了，你的手下刺客宇文宝能逃得掉吗？万一他招供了，你李元吉就算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就算他不招，你齐王身为他的主人，难道不要负主要责任？现如今谁都知道我和你是一条船上的人，到时候不光你身败名裂、小命不保，就连我李建成恐怕也难逃干系！

在李建成的极力阻止下，李元吉的暗杀计划被迫取消。他愤愤不平地对李建成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天，炎炎烈日炙烤着帝京长安。

李渊发觉整座皇宫到处闪耀着令他头晕目眩的白光，灼人的热浪团团包裹着他，让他浑身乏力、呼吸沉重。除此之外，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这一切都让李渊感到心烦意乱。

五月中旬，位于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一座山中行宫——仁智宫竣工落成，李渊当即决定去仁智宫避暑散心，纾解一下连日来郁闷烦躁的心境。为此他特意点了两个儿子的名：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让他们陪同前往，同时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兄弟仨待在一起，否则他们准得闹事。

李渊觉得自己的安排很合理。把这几个小子分开，自己或许就能在这林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仁智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夏天了。

可李渊并不知道，他的銮驾刚出长安，有两个东宫的军官随后就押着几车物资悄悄离开京城，一路向西北方向急行。

他们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车上装的是一大批崭新的盔甲。

二人奉太子之命，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市）交给都督杨文干。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违规操作。就像前几次一样，李建成自以为这次私运兵器同样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他绝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秦王的眼睛。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秦王会抓住这个把柄把他往死里整。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从长安到庆州途中的豳州。

而武德七年这场震惊朝野的“太子谋反”事件，就在这一刻东窗事发。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后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地方官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今甘肃宁县）赶赴仁智宫告发了太子。

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他和尔朱焕、桥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发出对太子李建成同样不利的指控。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控告，李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仁智宫面圣。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的手诏后，李建成蒙了。

出了什么事？天子为何平白无故召自己上山？

此时的李建成并不知道尔朱焕等人不但已经把他卖了，而且给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私运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发了。

私运盔甲虽然不是什么死罪，但是这一次却不太一样。因为运送的目的地是庆州，而众所周知的是，庆州都督杨文干是东宫旧部、太子嫡系，李建成当初组建卫队时就曾经从庆州暗中征调过一批将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极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何况此前可达志的事情已经是一次严厉的教训，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大为震怒，否则也不会这么急着召他去行宫。要知道，身为储君却暗中与地方将领交结，并且频频征调部队、私运军用物资，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个可怕的罪名，那就是——串通地方将领，阴谋反叛。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不知道此刻的天子是否已经起了这样的疑心，可他知道这种可能性绝对不会小。

怎么办？

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献计。太子舍人徐师谟提议，干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师占了。

这显然是个馊主意，跟挖一个坑把自己埋了没啥两样，所以李建成并未采纳。

詹事主簿赵弘智则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李建成觉得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仁智宫，在距行宫六十里外的毛鸿宾堡命随从们留下，然后带着十余个侍卫上山。

一见到李渊，太子立刻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可李渊却一脸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殿中监陈福严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驰赴庆州，召杨文干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此行不但没有召来杨文干，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干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干说的是实情，亦即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干不太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在客观上证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干是太子的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太子谋反的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干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

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干孤注一掷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

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干，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废黜，谋反行迹已经彻底败露，从而让杨文干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如果我们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

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诱使杨文干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干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

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手段就是，看看有哪些人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取利益或消除风险，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在这些人中间。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干兵变对谁最有利？

进而言之，在尔朱焕、桥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背后，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

杨文干兵变的幕后黑手

六月二十四日，杨文干兵变爆发。消息传到仁智宫，李渊勃然大怒，同时也感到极度的伤心和失望。因为杨文干的行动等于自动承认了他与太子串通谋反的事实。联系此前尔朱焕等人的告发，整个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似乎没必要再寻找什么证据了，李渊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太子李建成。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渊的难过自不待言。废立太子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却是如何把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次日，李渊立刻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会同灵州（今宁夏灵武市）都督杨师道出兵讨伐杨文干。

二十六日，也就是杨文干起兵的第三天，李渊召见了李世民。

李渊首先询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杨文干这个竖子，竟敢如此狂逆！儿臣以为，他很快就会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即便不会，派遣一个普通将领也足以将他讨平。”

李渊摇了摇头，说：“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你应该亲自出征，回来后就立你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儿子，所以，应该给建成留条后路，封他为蜀王。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至此，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最大的获益者就站在我们面前了。

他就是秦王李世民。

杨文干兵变最终促使李渊下定决心——废黜太子，改立秦王。

那么，李世民在这次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在背后都做了些什么？

要弄清这一点，首先必须研究一个问题：李建成有没有可能谋反？

我们的答案是：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虽然太子与秦王的矛盾由来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李建成的储君地位始终是稳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渊出于立嫡以长的原则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不可能像当年的隋文帝杨坚那样随意废立太子。

事实上，当秦王势强、太子势弱的时候，李渊也始终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场上，否则也不会在刘黑闼第一次起兵时迟迟不愿起用李世民，更不会在刘黑闼二次起兵时全力支持李建成挂帅出征，建立战功。而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之后，声望显著提升，势力有所增强，储君地位也随之巩固，根本无须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只要李建成保持现状，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天子宝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的危险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也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因为直到武德七年，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违规操作被揭发的情况下，李渊仍旧一如既往地对他寄予信任，否则也不会在前往仁智宫避暑的时候命太子监国，留守长安。

但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杨文干谋反的目的却是篡夺皇位。换句话说，他们矛头所指正是李渊本人。试问，在明知道李世民对其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李渊和李世民一举剪除，否则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势力来看，李建成这么做无异于自掘坟墓。

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李建成真的铁了心要将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也应该是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正是一边控制皇帝一边剪除对手的），掌握了中枢大权后，再命令杨文干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事实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渊去了仁智宫后，才让杨文干在异地起兵，此时无论是李建成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干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高祖仍然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仁智宫。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打草惊蛇。暂且不说叛军有没有能力打到宜君县，就算其占了先机，一路畅通无阻地打到仁智宫，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扬长而去，并且极有可能调集了四方兵马，给他们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纵然军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开创李唐的元勋之一，其政治智商断不至于如此低下。

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李建成这么做是想趁李渊离开京师、朝廷空虚的时候夺取政权，那么这个谋反计划是否就变得可行了呢？

很遗憾，这样的设想同样不能成立。

道理很简单，在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论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无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况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领了京师，他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政权的空架子和长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县的避暑行宫中，同样可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牢牢把握这个帝国，照样可以从仁智宫发出一道道对全国州县具有绝对权威的政令和军令。而这一切，当了多年太子、长期在李渊身边协理政务的李建成绝对不可能意识不到。

综上所述，李建成谋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违背逻辑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所以，当代的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纷纷提出质疑，最后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如李树桐在《唐史考辨》中说：“《通鉴》内，有关杨文干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

牛致功的《唐高祖传》称：“事实证明，杨文干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

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中说：“李渊既然对李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毫无恩宠衰薄的

迹象？足见统统出于诬陷增饰，不是事实。”

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餗（《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在相关著述中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所谓“妄告东宫”，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也就是说，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显然，他们如果不是被人收买，就是受人胁迫。

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府的人。

众所周知，在武德年间，当“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与事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为李世民出力卖命的”（牛致功《唐高祖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是尔朱焕和桥公山，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

换言之，李世民就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当高祖对秦王郑重作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漫长的政治PK中胜出。那一刻，道士王远知三年前说的那句“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的预言一定无比豪迈地回响在他的耳边。

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李世民的预料。

就在他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破灭，功亏一篑，一切都打回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

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李渊反悔了。

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率军前去征讨杨文干时，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动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

后宫的嫔妃群和当朝重臣、侍中封德彝，最后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

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政治智慧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围剿杨文干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和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无非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干的起兵一定是太子的指使，那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当然，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断不至于被废黜。

所以，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太子的储君之位。

换句话说，这是一起阴谋。

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今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

当然，李渊没有证据。

他只能猜测。

但就算是这样的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了。

他随后就把太子放了，命他仍回京师留守，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个替罪羊，把他们全部流放嶲州，他们是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

就在李渊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杨文干叛乱。

在这场短命的叛乱中，杨文干唯一的“战绩”就是出兵占领了宁州，可当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抵宁州城下的时候，杨文干的军队马上就不战自溃了。七月初五，杨文干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立刻传送长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杨文干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了。

高祖李渊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给这起震惊朝野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并不算圆满的句号。之所以说它不算圆满，是因为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方式即便能够勉强维系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那也是一种极其脆弱、危机四伏的平衡。

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对这个处置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

对李建成来说，既然高祖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并且对太子和秦王各打五十大板，那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太子是被诬陷的，而且肯定也意识到秦王就是制造假案的那只幕后黑手。按照唐律，诬告别人谋反若不属实，诬告者本人是要处以谋反罪的，这就是“反坐法”。可现在倒好，仅仅流放一个秦王府的属官杜淹，秦王本人却安然无恙，丝毫不受惩处，这怎么说得过去？这不是在纵容秦王阴谋夺嫡吗？

而对李世民来说，既然高祖已经做出了立他为太子的承诺，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太子谋反案确为秦王府一手炮制，那么高祖就不应该打秦王板子——流放他的属官，而应该兑现承诺，立他为储君。所谓天子口中无戏言，堂堂的一国之君怎么能信口开河、出尔反尔呢？再者说，就算太子谋反是假，可杨文干兵变总是真的吧？杨文干是东宫旧部也是真的吧？太子给杨文干私运盔甲更是不争的事实吧？就冲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太子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能不痛不痒地流放两个东宫官吏就算完事了呢？更何况杨文干兵变毕竟是秦王平定的，到头来平叛功臣反而遭到责罚，如何能让人心服？

所以，尽管让李渊深感不快的这一页貌似翻过去了，但是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却远远没有了结。

换言之，杨文干事件仅仅是一个悲剧的开端。

不把对方整垮甚至彻底消灭，太子和秦王谁也不会善罢甘休。

如履薄冰的李世民

李渊期望中的清凉一夏就这么被搞得兴味索然，于七月底悻悻回到了长安。

为了改善一下父子及兄弟间日趋紧张的关系，李渊特意在城南举行了一次狩猎活动，让三个儿子比赛骑射。

李渊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旨在增进感情的比赛居然又出了问题，使得

原本就极为紧张的父子和兄弟关系再度雪上加霜。

问题源于一匹胡马。

这匹胡马属于李建成。

比赛开始时，李建成笑容满面地牵着这匹膘肥体壮的胡马，亲手把缰绳交给了李世民，很诚恳地说："这是匹罕见的骏马，能跨越数丈宽的沟涧，二弟善于骑术，可以驾驭看看。"李世民接过缰绳，想都没想就跃上马背，然后鞭子一挥，胡马立刻像离弦之箭奔了出去。

那一刻，李渊一定甚感欣慰。不容易啊，这对天天死磕的兄弟终于握手言和了。

可李渊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太子交给秦王的是一匹尚未驯服的烈马。这种野性未驯的烈马通常都有一个特征——喜欢玩它的骑手。往往在飞速奔跑的过程中，烈马会忽然玩一些惊险动作，而骑手就算不被摔死，也得落个残废。

李世民正恣意狂奔，拼命追逐前面的一头麋鹿，李建成和李元吉紧随其后，不觉相视一笑。很快，他们期待中的一幕发生了：秦王胯下飞奔的胡马突然间身子一蹶，两条前腿跪屈在地，李世民立刻从马背上飞了出去……

太子和齐王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再次交换了一下得意的眼神。

然而，当他们再把头转过去的时候，眼前的情景却让他们目瞪口呆——秦王正稳稳当当地站在胡马旁边，神情自若，毫发无损。

紧接着，太子和齐王看见秦王远远地对他们冷笑了一下，再次跃上马背。胡马不断故伎重施，可秦王每次都安然无恙。最后这匹烈马服了，任由秦王纵横驰骋，一点脾气也没有。

回来的路上，李世民笑着对身边的宇文士及说："有人想用这匹马杀我！奈何死生有命，他岂能杀得了我！"

有人立刻把这句话向太子通报，然后又通过太子之口落进了后宫嫔妃的耳中，李渊回宫后，嫔妃们马上又把秦王的话告诉了皇帝。但是这句话最后却变成了这个样子："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怒不可遏，随即把三个儿子都召了进来，当着太子和齐王的面怒斥秦王："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

邪？”（《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很显然，高祖对秦王的这句斥责分量很重，因为它赤裸裸地揭露了李世民夺嫡篡位的野心。

其实，与其说这是李渊听信谗言后的一种无端指责，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借机发泄对李世民由来已久的不满。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早在武德四年七月，当李世民一举消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割据政权，并且刻意搞出那场锋芒毕露的武功秀后，李渊必定已经感受到了秦王功高震主的威胁了。更何况，在这些年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秦王顺理成章地招揽了四方豪杰和天下名士，在高祖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政治军事集团。对这一切，李渊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如果秦王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任何一个异姓功臣，李渊很可能早就把他杀了。

开国元勋刘文静之死就是明证。因此，李渊对李世民的种种不满其实已经在心里埋藏了很久，只是一直没有挑明罢了。而这次李渊之所以不再隐忍，无疑是受到了杨文干事件的刺激。

假如李渊大致能够确定秦王是此事的幕后操纵者，那他必然会感到极大的恐慌——既然秦王已经具有操控东宫官属和朝中大臣的能量，那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李渊完全有理由相信——秦王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并且极大地超出了他可以容忍的范围。

所以李渊才会毫不客气地对秦王提出严厉的警告，目的就是防止他在阴谋夺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和此前流放他的属官、打他的板子是一个道理。

但是，面对高祖的斥责，秦王却不卑不亢地“免冠顿首”，要求皇帝“下法司案验”，也就是主动要求由司法部门立案审查，表现出一副坦荡无愧的样子。

秦王的这种表现意味着他并不接受皇帝的警告。因为“免冠顿首”只是人臣在面对君父斥责时的正常礼节，并不代表屈服。而更让李渊愤怒的是，李世民竟然主动提出“下法司案验”，这就几乎是在跟他抬杠了。

众所周知，无论李渊对李世民做出怎样的指责，其性质仍然是君父在教训儿臣；无论李渊和太子对秦王的不满和忌惮已经达到了怎样严重

的程度，这一切通通属于皇族内部矛盾。而一旦“下法司案验”，就是把矛盾公开化了，而且性质要严重得多，那相当于把李唐皇室的父子相猜和兄弟不睦扩大并升级为朝野皆知的一起政治案件——而且是严重影响社稷稳定的重大案件。暂且不论李家的父子及兄弟到底谁是谁非，单是把这件事情闹上公堂本身，就已经是李唐皇室的一个莫大耻辱了。

李世民很清楚，李渊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

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还偏偏要提出来，这不是抬杠是什么？

面对李渊的敲打和警告，李世民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毫不屈服，而且充满了对抗和要挟的意味。

李渊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看来自己不久前对心腹裴寂发的那句牢骚一点都没错——“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再不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他真要把尾巴翘上天了。

看着皇帝吹胡子瞪眼的模样，旁边的太子和齐王不禁眉飞色舞，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幸灾乐祸之情。

这一次，秦王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一道来自边境的加急战报飞进了长安的太极宫。

李渊的愤怒转眼就被震惊所取代。

该死的突厥人又来了。

早在一个月前，当李渊被杨文干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突厥人就已经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对唐朝发起了攻击。当时，代州（今山西代县）、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原州（今宁夏固原市）、陇州（今陕西陇县）、阴盘（今甘肃平凉市东）、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等重镇和据点都遭到了进攻，但是突厥人的这一次攻击力度却不是很大，基本上仍是以袭扰劫掠为主，并无进一步南侵的意图，所以李唐朝廷只命骁将尉迟敬德及各地守将出兵迎击，便遏止了突厥人的攻势。

可眼下边境发来的战报却显示：这一次突厥大可汗颉利亲自出马，并与小可汗突利（颉利长兄始毕可汗之子）联合出兵，倾全国精锐之师

南下，而且兵锋直指原州，显然有入侵关中、进逼长安的企图。

这种大规模的、带有明显战略意图的入侵不能不引起李渊和整个朝廷的震恐。

大敌当前，李渊还能处罚李世民吗？

当然不能。

李渊不得不收起满面怒容，再次施展他一贯擅长的变脸绝技，让秦王起身系好冠带，并且大加慰勉，然后就直奔主题，和他商讨应对突厥的策略。

那一刻，太子和齐王肯定在心里把突厥人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

因为该死的突厥人又帮了李世民一个大忙。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世民的运气就是这么好。

每当高祖试图将李世民打压或冷藏的时候，某种不可预知的外部力量就会突然降临，把李唐王朝这张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且再次给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不管是武德二年刘武周进犯河东，还是武德四年刘黑闼悍然起兵，或者是眼下突厥人大举入寇，无疑都在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高祖李渊召开御前会议，命三个儿子和当朝重臣一起讨论当前的抗突形势。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迁都的动议。理由是长安离边境线太近，而“子女玉帛”众多，所以突厥才会屡屡入侵，不如一把火烧了长安，把都城迁移到内地，突厥人自然就不会来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消极，甚至近乎荒谬的提议。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帝王都不可能采纳。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渊居然同意了。他即刻下令，命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准备前往樊、邓（今湖北襄阳）一带考察迁都地点，而太子、齐王和尚书仆射裴寂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如此荒谬的提议，为何有这么多人赞同呢？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这些人没有头脑，而是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秦王再

立军功。当然，即便是迁都樊、邓也不能彻底杜绝突厥对唐朝的入侵，但能有效避免突厥对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一旦都城远离前线，突厥人顶多就是在边境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袭扰而已，很难发起针对大唐帝都的战略性进攻。既然如此，边境的防御交给一些普通将领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秦王挂帅出征，这样就能达到将这张王牌长期冷藏的目的。

此外，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当初李渊太原起兵时“称臣”于突厥，往来交涉的虽是刘文静，但主谋者却正是李世民，所以李世民一直被李渊和李建成“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陈寅恪全集》之《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可见，高祖等人执意迁都表面上是为了防范和消除突厥人的威胁，其实更是对李世民的一种刻意打压。

对于这个匪夷所思的迁都之议，大臣萧瑀等人都不以为然，因为迁都是动摇国本的一件大事，绝不可草率行之。但既然高祖发话了，他们也只能保持缄默，谁也不敢犯颜直谏。

最后只有一个人发出了孤独的抗议之声。

这个人当然就是李世民。

他说：“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神圣英武，犹如巨龙兴起民间，鼎定中原！麾下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岂能因为胡人骚扰边境就迁都躲避？岂非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当年的霍去病不过汉廷一将，犹立志消灭匈奴，何况臣身为帝国藩垣？请给臣数年时间，定当拴住颉利的脖子牵到宫门。如若不成，迁都未晚！”

太子大为不屑地瞥了秦王一眼，说：“当年，西汉的樊哙大言不惭，曾经在朝堂上说要率十万部众横扫匈奴，结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不到了，秦王今天的话何其相似也。”

李世民据理力争：“形势不同，战略不同。樊哙一个小人物何足道哉？我不出十年，必定漠北，绝无虚言！”。

秦王的这番豪言壮语有没有打动李渊呢？

我们只知道，最终的结果是，李渊确实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但是这个回心转意的过程，各种史料却记载不一。据《通鉴》记载，李渊听完后立刻大呼一声：“善！”而《册府元龟》甚至称李渊哈哈大笑，并称赞秦王乃“吾家千里驹”云云。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显然不太符合常理，李渊即使要改变主意也需要一个过程，或者说需要一个台阶下，

不大可能当着大臣和儿子们的面轻易反悔，自打嘴巴。

相对而言，我们发现《旧唐书·太宗本纪》中的记载就合理得多——就在秦王慷慨陈词之后，“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也就是说，在当天的廷议上，李渊非但没有被李世民的豪言壮语打动，反而故意命他去考察新都地点，直到李世民回朝，仍旧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一些实地考察中发现的现实问题，李渊才取消了迁都计划。

其实，李渊最终之所以放弃迁都，恐怕也并不是被李世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谏所说服，而是因为这个迁都之议本来就不是什么铁板钉钉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更像是对李世民“挟突厥以自重”的严厉警告：为了遏制你的锋芒，我连烧毁长安这种事都敢做，我还有什么不敢豁出去的？

而现在李渊反正已经作足了姿态，不管是威胁还是警告都已表露无遗，所以趁势就坡下驴也就很好理解了。更何况突厥两可汗的大军已经长驱南下，很快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即便他内心仍有迁都之念，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要先打退突厥大军。

所以，武德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李渊不得不再次起用这张独一无二的王牌，命李世民挂帅出征，迎战突厥。同时，李渊还特意安排齐王李元吉当副帅，用意很明显，就是防止秦王一人独大。

秦王李世民在危难之际重新走上战场，其中流砥柱的形象又一次无比高大地树立在世人面前，太子李建成自然又感到强烈的不安。他怂恿嫔妃们一起跟高祖吹风，说：“突厥虽然屡屡侵犯边境，可事实上得到贿赂就退兵了。秦王表面上打着一致对外、抵御外寇的旗号，其实还不是想总揽兵权，完成他夺嫡篡位的阴谋？”

李建成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私心的揣度，可也道出了一部分事实：在整个武德中后期，李世民在朝中受到太子、齐王、裴寂和后宫嫔妃们的联手打压，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唯一可以凭恃的就是自己的军功。只有通过战争，他才能继续保持自己在朝野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世民再次出征了。

李渊在兰池（今陕西咸阳市东）为他和齐王把盏饯行。

这一年初秋的大风从北方席卷而来，在满目萧瑟的五陵原上奔走呼

啸。李世民听见父皇李渊的一番勖勉之词在呜咽的秋风中显得空洞而缥缈。他仰起脖颈把那杯饯行酒一饮而尽，一股难以言传的苦涩迅速从他的喉咙一直流到他的心里。

是从什么时候起，这杯盛满了壮志与豪情的饯行酒变得如此难以下咽？

是从什么时候起，奔赴沙场的激越与兴奋之情已经蒙上了一层莫名的沉重和焦虑？

李世民不知道。

他只知道很多日子以来，自己就像一个在深渊上走索的人，必须保持不断前行的惯性才能维持身体的平衡。他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否则马上会从悬索上跌落。而不断前行的结果同样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由低到高的悬索，往前多走一步，安全系数就会降低一分。尽管李世民相信这条危险的高空之索最终必然通向一座风光无限的山峰，但是此时此刻，眼前只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黑雾。除此之外，就只有从四面八方凶猛袭来的冷雨和阴风。

还需要走多远？

没有人告诉他。

在这个初秋的早晨，让李世民感到忧虑的不是他在朝中的艰难处境，也不是茫然不可预知的政治前途，而是他即将面临的这场抗击突厥的战争。

李世民之所以感到忧虑，并不是由于对手的强大，而是由于军队的虚弱。

曾经骁勇善战的李唐军队已经今非昔比了。

当奉命出征的唐军将士，在兰池宫外的五陵原上完成集结，李世民稍事检阅之后，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暴露在他的面前——士兵们军容不整、士气低落，所装备的铠甲和武器也显得残破陈旧。谁都看得出来，一股浓厚的厌战情绪正在即将出征的这支军队中蔓延。

李世民很清楚，自从武德初年以来，李唐军队长年征战、兵戈不息，将士们的疲惫情绪一直在潜滋暗长，之所以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封和犒赏鼓舞着他们的斗志，支撑着他们的精神。而当统一天下的战争宣告结束，勉强撑持的

士气就不可避免地衰竭了，而酝酿已久的厌战情绪也就随之爆发。

并且，频繁征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各种武器装备过快的折旧和损耗。但是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李唐朝廷把执政重点从军事建设转向了政治和经济建设，军队待遇也就随之降低，因而各种武器装备便得不到及时更新和补充，这也从另一方面导致了士兵的不满，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除了军队的现状不容乐观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也让李世民感到如芒在背。

那是一个人的眼神。

齐王李元吉。

从两个人并辔走出长安金光门的那一刻起，李世民就发现齐王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和敌视的意味，却唯独没有半点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意思。齐王似乎憋足了劲要看秦王的笑话，看他如何打赢这场敌强我弱的战争。

李世民不禁苦笑，这就是父皇李渊给他安排的副手——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准备看主帅笑话的副统帅。

军队迅速向前线开拔。

远方的天际黑云翻涌。

这年秋天的五陵原上，李世民打马北去的背影写满了忧郁和苍凉。

单枪匹马离间可汗大军

武德七年八月初一，突厥颉利、突利两可汗率领的大军开始猛攻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并很快突破外围防线，连营南下，直逼长安。与此同时，为了多方牵制唐军，突厥又派出偏师分别攻击忻州（今山西忻州市）、并州和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其附庸国吐谷浑也出兵入寇鄯州（今青海乐都区）。

形势危急。

八月初九，长安宣布戒严。

此时，北上御敌的唐军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关中连日来天降暴雨、洪水泛滥，许多道路和桥梁被阻断，加剧了行军的难度，后方的粮草和补给又供应不上，致使原本就萎靡不振的士气越发消沉。

八月十二日，唐军与突厥大军在豳州的五陇阪（今陕西彬县西南）正面遭遇。突厥军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列阵，唐军将士大为震恐。李世民意识到一场恶战已经在所难免，遂对李元吉说：“而今胡虏逼到眼前，不可示之以怯，当与之一战，你能不能和我一起上阵？”

李元吉的嘴角滑过一丝冷笑：“胡虏兵势如此强大，岂能轻率出战？万一失利，后悔都来不及！”

不出所料，齐王果然是一心作壁上观来了。

大敌当前，副帅公然对主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对原本涣散的军心无疑又是一大打击。史书没有记载此次随同出征的其他将领的情况，但我们根据唐军此时面临的不利局面，再结合李世民稍后出人意料的做法来看，其他将领的反应很可能和齐王一样——有意无意地采取了消极避战的立场。

此刻的李世民显然在某种意义上被孤立了。

这个曾经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力的秦王、天策上将、十二卫大将军，现在却忽然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连自己的部属都无法支配，还打什么仗？

外面的突厥大军虎视眈眈，内部的局面又如此艰难，李世民该怎么办？

就在此刻，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李世民再次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若无其事地对李元吉说：“既然你不敢出战，那我就单独前往，你就留在大营中观战吧。”

还没等齐王反应过来，李世民已经率领仅有的百余名亲兵朝敌阵飞驰而去。

来到突厥大军前，李世民高声向颉利可汗喊话：“可汗既与大唐和亲，为何背弃盟约，深入我国？我是秦王，可汗如果认为自己能打，就出来和我单挑！如果要以众凌寡，我就用这一百人和你拼了！”

颉利可汗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小子在玩什么？居然只带着百来个人出战？而且居然用这种蹩脚的激将法逼我跟他单挑？他是不是早已埋设了伏兵，想引诱我往口袋里钻？

颉利可汗相信这其中必定有诈，于是按兵不动，笑而不答。

接下来，让颉利更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李世民居然带着他的一百名骑兵又往前逼近了一程，而且派人跑到他的侄子突利小可汗阵前，唧唧歪歪地不知道说一些什么。颉利可汗满腹狐疑地拉长耳朵，终于听了个大概——“你从前跟我盟誓，有难同当，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

颉利可汗大惊失色。难道突利这小子早就跟李唐二皇子有一腿了？怪不得他这回屁颠屁颠地一定要随我一同出征，原来是早有预谋，想趁两军交战之际对我下黑手！好悬啊……还好自己遇事冷静，刚才没有一下子冲出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思虑及此，颉利转过头去看突利，只见他默不作声，一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

就在这时候，李世民再次逼近，正准备策马跨过两军之间的河沟。颉利可汗立即派人去跟李世民传话：“大王不必过河，我并无他意，只想与贵国重申前盟而已。”随后传令全军，即刻收兵回营。

看着颉利可汗率大军匆忙退去的身影，李世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回总算是忽悠过去了，可突厥大军并未撤退，危险仍然存在。接下来该怎么做？

李世民知道，急中生智的忽悠只能偶尔来一次，再来就不好使了。要让突厥人退兵，必须在军事上有所行动。即便没有办法与突厥大军正面决战，也要适当对他们施加压力。同时让李世民感到庆幸的是，这次成功的忽悠让他抓住了突厥人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颉利大可汗与突利小可汗之间的矛盾。

只要利用这个矛盾，军事手段和谋略手段双管齐下，进一步离间两个可汗的关系，就能让他们互相猜疑，最终迫使颉利可汗撤军，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一刻，虽然连绵不绝的秋雨依旧笼罩在五陇阪的上空，可盘桓在李世民心头多日的阴霾却一扫而光。

李世民随即召开了军事会议。

他环顾着毫无斗志的唐军将领，胸有成竹地说："突厥人最倚仗的武器是弓箭，如今他们在野地宿营，连日的雨水会使弓矢上的弦筋胶化，失去弹性，弓箭的威力就发挥不出来，犹如飞鸟折断翅膀。而我们则住在可以生火的干燥房屋内，刀槊等武器仍然锐利，此刻不发动攻击，更待何时？"

当天夜里，李世民出动军队，冒着大雨悄悄逼近突厥军营。与此同时，他派遣了一个特使秘密潜入敌营，找到了突利可汗，与他进行了一番密谈。史书没有记载这次密谈的内容，但是李世民肯定是向突利抛出了颇具诱惑力的橄榄枝，所以就在唐军逼近突厥大营的同时，突利已经愉快地同李世民派来的密使订下了盟约。

突厥军队绝对没有料到，唐军会在这个大雨滂沱之夜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军营上下顿时一片慌乱。颉利可汗本来想要迎战，可一想到他的侄子突利和李世民之间很可能有什么阴谋，心里马上敲起了退堂鼓。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颉利终于决定退兵。

因为他绝不希望在与唐军交战的时候，让这个居心不良的侄子从背后捅他一刀。

尽管此刻退兵让颉利很不甘心，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遣突利和另一个亲王阿史那思摩到唐军大营，与李世民议和。而突利则借此机会，正式和李世民结下了兄弟之盟。

此后突厥退兵，这场有惊无险的五陇阪之战终于落下帷幕。李世民以他超乎寻常的胆识和谋略，演绎了一出经典的"孤胆英雄记"，不但兵不血刃地逼退突厥大军，而且成功地缔结了一个政治盟友，可以说在他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又增添了精彩绝伦的一笔。

也许正因为李世民的表现太过精彩了，所以历来很多人认为五陇阪之战精彩得有些过头。除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外，似乎还有严重低估突厥人智商的嫌疑。对此胡如雷先生也曾提出如下疑问：首先，突厥倾国而来，意在一决，怎么会以优势兵力而慑于世民的诱说，竟轻易讲和退兵呢？世民的个人作用似乎夸大得太不近情理了。其次，世民施反间计是肯定的，但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世民对待两可汗的态度有显著差别，可以概括为拉突利打颉利，采取这样的策略有什么根据和条件呢？

对此，胡如雷先生以陈寅恪先生的考证为依据，证实“大约在克长安前，世民曾遵突厥风俗，与突利可汗约为‘香火兄弟’（这可能只是一次非正式的口头约定）”。因此，李世民在五陇阪不战而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他在突厥上层中实行分化政策的反映，正因为世民在过去早已在二可汗中预布了棋子，才能在这次事件中收‘叔侄内离’之效，取得戏剧性的结果。”（胡如雷《李世民传》）

至于李世民派密使向突利施行反间计的具体内容，史书没有记载，胡如雷先生也没有提出他的看法，但是我们站在突利小可汗的立场上，完全可以推测出李世民向他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据《旧唐书·突厥传》，突利可汗在“幽州以北”统领着数十个小部落，但由于“征税无度”，导致“诸部多怨之”。由此可见，作为颉利长兄始毕可汗的嫡子，突利不但因年龄关系未能继承大可汗的宝座，而且现在连小可汗的位子也坐得不太稳当，日子显然并不好过。在此情况下，李世民很可能会向突利做出承诺：只要他与李唐交好，密切配合李唐对突厥的一切军事和外交行动，那么李世民就能保证作为突利的强力外援，尽可能维护他的利益，帮助他巩固地位，甚至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帮他夺回大可汗之位。

为了自己的利益，突利可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李世民。

不管李世民采用了什么手段，总之“五陇阪之战”确实是不战而胜了。

毫无疑问，五陇阪的精彩表现，使得李世民在那条通往权力顶峰的高空悬索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不知道，当秦王李世民再次凯旋时，齐王李元吉和太子李建成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看他。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眼中那嫉妒和愤怒的火焰，一定燃烧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灼热。

而此刻的高祖李渊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他首先当然是感到欣慰，因为穷凶极恶的突厥人终于走了，京师长安总算化险为夷了。但是除了欣慰外，李渊肯定也会感到更深的无奈和不安，因为秦王头上的光环更加璀璨了，他对太子的威胁当然也就更大了。

然而，李渊又能怎么办呢？

除了尽其所能对秦王进行制约和防范之外，老皇帝还能做什么呢？毕竟秦王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如今边患频仍，只要突厥人的威

胁一日不除，秦王就一日不可或缺。虽然李唐王朝并不缺将才，可问题是把兵权交给任何一个异姓将领，李渊都会一百个不放心。退一步说，即便秦王不是帝国的中流砥柱，他也是自己的儿子——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只要他没有公然做出夺嫡篡位的举动，李渊就只能苦心孤诣地保持现状，维持平衡。他一方面必须遵循“立嫡以长”的原则，始终维护李建成的太子之位，防止李世民越过雷池；另一方面也要念在秦王长年征战、劳苦功高的分上，给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地位，不赞成太子和齐王采取过激的手段对付他。

总而言之，李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把一碗水端平。

但是武德七年夏秋之交，我们却赫然发现，老皇帝手上的这碗水正在儿子们日渐升级的政治PK中剧烈颤动……

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倾覆。

第三章 玄武门之变

突厥又来了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夏末秋初，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再次燃起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自从去年秋天倾巢南侵、无功而返后，顿觉颜面尽失，大为不甘。经过将近一年的养精蓄锐，颉利便再度挥师南下。

这一次，颉利改变了战略。他并不打算再干上次那种看上去气势汹汹、到头来却劳而无功的蠢事，而是在西起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东至幽州（今北京）的数千里战线上，采用“多点进攻、袭扰为主”的战略，专搞打砸抢，捞一把就走，不问仗打得漂不漂亮，只求有没有捞到实惠。这样的战争虽然不像去年那样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东奔西跑、疲于应付，大伤了一回脑筋。

从六月末颉利亲率大军攻击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开始，这场长达一年多的断断续续的骚扰战就拉开了序幕。

七月十二日，李渊对负责起草诏书的侍臣宣布：“突厥人贪得无厌，

朕将与其全面开战，从今往后，给突厥人去函不能再以平等的‘国书’形式，而要一律改用‘诏书’和‘敕令’！”

相对于突厥的战略转变，李唐朝廷这次的军事任命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李渊先后把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行军总管任瑰等人调到前线御敌，而李世民则只是作为后备力量被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

李世民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被推上第一线，主要原因当然是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未对唐帝国构成太大的威胁，但同时也表明了李渊的用心，那就是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在前线看不到李世民的身影，这对颉利来讲绝对是一大利好。八月初，颉利亲率十万大军劫掠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张瑾等人急忙北上御敌，于十一日在太谷（今山西太谷县）与颉利会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仗张瑾全军覆没，出任行军长史的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张瑾仅以身免，狼狈投奔李靖。

此仗突厥完胜，颉利发现自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便在八月末派人与唐帝国“和解”。可想而知，这种打完胜仗后主动提出的所谓“和解”事实上就是要挟，无非是想挟新胜之威狠狠敲一次竹杠。史书没有记载李渊对此作何反应，但从颉利随后便引兵北还的结果来看，李唐朝廷很可能又是违心地给了颉利可汗一笔数目可观的贿赂。

颉利这次之所以见好就收，一来当然是贯彻他“捞一把就走”的战略思想，二来估计也是担心继续向纵深推进迟早会碰上李世民。

突厥人的主力虽然撤了，但是其他各路偏师却依然在唐帝国广袤的北部边境袭扰不止。这场旷日持久、令人不胜厌烦的骚扰战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打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在这一年的六月份之前，除了边境线上这种小打小闹的骚扰之外，唐帝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四月二十日这天，李靖在灵州境内的硖石与突厥军队狠狠干了一仗。据说这一仗打得极为惨烈，唐军从是日清晨一直血战到黄昏，最后终于将突厥人击退。大约也在同一天，朝中的太史令傅奕上了一道奏疏，内容是请求皇帝禁止佛教。李渊基本上采纳了傅奕的奏议，随后颁下一道诏书，对全国范围内的寺庙和道观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除了这两件事，这些日子总体而言相对平静。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之下，时间走到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

这个盛夏的早晨，大唐帝国的一切看上去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阳光依旧明媚而灿烂，天空依旧澄澈而蔚蓝。

然而仔细一看，这个早晨的天空却有些异样。

因为天上多出了一个东西。

那不是UFO。那是一颗星星——一颗大白天跑出来闲逛的星星。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的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从大唐帝国的天空上划了过去。

按古人的说法，这叫“太白经天”，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

那么，这种天象意味着什么？

史书说：“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汉书·天文志》）金星白昼划过长空，天下将发生变革，人民将拥有一个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世民并不知道，两个月后，他就将成为这个新的君王。

尽管冥冥中一直怀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尽管对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拥有的绝世才华从来不曾怀疑，但是眼下，李世民却只是一个受困于现实的藩王。

是的，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只是不断遭人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一介藩王。

从懂事的时候起，李世民就感到自己体内奔流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显得如此完美、强烈而又如此自然，以至于李世民相信它绝对是上天的赐予。随着这种与生俱来的能量在生命各个阶段的流淌、奔腾和外溢，它便具有了诸多的表现形式，并被赋予了各种名称——

在少年时代，它表现为“幼聪睿”（《旧唐书·太宗本纪》）、“好弓矢”（《贞观政要》卷一）、“尚威武”（《全唐文》卷九）；稍长，它表现为“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旧唐书·太宗本纪》）、“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后来，它在战场上表现为一种无坚不摧的惊人意志，一种藐视对手的傲然气概，一种冲锋陷阵横扫千军的骁勇和无畏；再后来，这种能量逐渐转化为一种掌控外部世界的欲望，一种睥睨世间万物的雄心，一种经天纬地、济世安民

的抱负；到了最后，这种能量终于不可遏止地演变成一种问鼎皇权、君临天下的政治野心。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巨大的潜能促使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着生命的自我实现。他似乎始终坚信，上天既然赋予他这种潜能，必是要让他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期许。

说白了，这就叫自我暗示。武德四年李世民刻意去找道士王远知，也许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心理暗示。所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旧唐书·王远知传》），正是他不断进行自我暗示的生动写照。

不过，我们有必要知道，这样的自我暗示恰恰是一个伟人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恰恰是伟人区别于凡人的重要标志——“它标示出我们，似乎我们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我们不知不觉自我赋予的价值。正是靠这种品质，我们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也正是它，常常使我们高出那些门第出身、高官显爵和功勋本身。”（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激励，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李世民精神力量的源泉。毋庸置疑，这种精神力量要远远大于门第、官爵和功勋这些外部事物所提供的价值。换言之，只有始终如一地告诉自己“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只有持续不断地让这种自我激励的精神之光投射到外部事物上面，通往伟大的道路才能被真正照亮。

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说：“一心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

然而，如果说在武德前期整个世界确实都在为李世民让路的话，那么到了武德中后期，这个世界却在他面前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与此同时，李世民发现自己汪洋恣肆的巨大能量也被悄然纳入了一个无形的容器中。

这个容器是高祖李渊亲自为他量身定制的——不但划定了尺度，而且打造了边框。

李世民试图冲破它，可无论他往哪个方向奔突，到头来所有努力均告失败。

最后一次努力就是武德七年六月的杨文干事件。

从这个事件之后，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建成，肯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武力。

只有挥起手中的剑，才可能结束这一切。

就像亚历山大曾经做过的那样。

传说在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入侵小亚细亚，并占领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伦帝那王国的首都格尔迪奥斯城。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城中的宙斯神殿，希望了却自己的一桩夙愿。

几百年来，这座神殿中一直供奉着一辆古老的战车。在这辆战车的车辕上打着一个复杂的绳结。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的统治者。几百年来，无数的国王、智者、能工巧匠为之殚精竭虑，却无人能将其解开。

这就是著名的格尔迪奥斯绳结。

当亚历山大站在这个绳结前的时候，他凝视了很久，可最终的心情却跟所有人一样沮丧。

亚历山大非常沮丧。因为他连绳头都找不到，遑论把它解开。

就在亚历山大即将放弃的一瞬间，他忽然想：为什么一定要遵循常规呢？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解开呢？

亚历山大唰的一声抽出佩剑。

寒光闪过之处，绳结断裂。

这个几百年来难倒了无数人的格尔迪奥斯绳结就这样被亚历山大“解开”了。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当你无法用智慧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只能用武力。

这是一切政治斗争中的永恒法则。

而当李世民和李建成长久地凝视着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格尔迪奥

斯绳结”，到最后肯定也都有了拔剑的冲动。

唯一的问题只是——谁会比谁先出手。

亲兄弟下毒，李世民吐血

在最后的PK到来之前，李世民首先意识到的一点是：必须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

为此他选择了关东的那个形胜之地——洛阳。

那是他经营已久的根据地。此前李世民早已将自己的嫡系、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派驻洛阳。而眼下，为了迎接这场生死PK，李世民又特意命麾下骁将、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左右侍卫一千余人前往洛阳。李世民给了张亮一大笔金帛，让他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形势一再恶化，实在迫不得已，就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然而，此次秘密行动却没有逃过齐王李元吉的眼睛。

他一直在暗中监视秦王府的一举一动，而今这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忽然大举调动，当然会引起他的高度怀疑和警觉。李元吉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李渊随即下令逮捕了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

情况十分危险。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世民的麻烦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没有用错人，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只语片言。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朝廷只好将他释放。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

“张亮事件”总算是有惊无险，但是下面这个事件却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

这是一场诡异的夜宴。

就是在这次夜宴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备受后人争议的“毒酒事件”。

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载与之大同小异）：“（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李渊肯定意识到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了，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推辞。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其实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两千余人，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两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李渊最后说了一句：“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猛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二人紧急磋商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随后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时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向高祖分析其中弊

害，劝他收回成命。这些人向李渊说了什么史书无载，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内容，其游说之言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据有洛阳这个形胜之地，刚刚统一的国家就会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陛下您健在的时候，秦王和太子或许还能暂时隐忍，可一旦您千秋之后，双方势必爆发武装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到时候家国分崩、生灵涂炭，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也许就是在近臣的如此游说之下，李渊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暂时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余波。

许多学者认为夜宴一事疑点太多，不足采信，很可能是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综合怀疑论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太子与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怎么可能聚宴饮酒？

二、即便太子为了谋害秦王而故意设下鸿门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轨意图，为何还敢去赴宴，并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为何“吐血数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

四、按《通鉴》记载，毒酒事件是在“太白经天”的六月初一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此事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六月初一。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后就能生龙活虎地发动政变，并力挽强弓射杀太子呢？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点这么多，那么毒酒事件果真是虚构的吗？

我们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质疑也并非无懈可击，值得推敲。由于除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辨别此事的真伪，因此，我们只能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的考察和推论。

第一，中国人最讲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面上的东西也是要维持的。背地里越是斗得不可开交，面子上越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甚至还要比平时显得更为友善。这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当时的情况下聚宴，

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经赴宴，李世民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顿酒他非喝不可。联系此前的胡马事件，以李世民对马术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给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骑了上去。由此可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计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地谋杀。在当时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杀了李世民，毒死自己亲弟弟的罪名也不小。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对于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来说，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药性缓慢发作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不会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或者一段更长的时期后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毙命。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就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干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后。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

九年之前。

其次，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初四的玄武门之变，其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还有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

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也太漫长了！

在此，我们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确切的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内。在此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知节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知节传》，这件事却分明是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知节事件一样，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实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

最后，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庆贺一番吗？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仅举两例：首

先，秦王的“吐血数升”之说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但“数升”显然过多，定属虚妄。

除了吐血的细节不真实外，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说的“建天子旌旗”的话。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秦王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秦王“建天子旌旗”则显然属于夸诞之词。因为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作为一个年长的开国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

因此，这场毒酒事件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其中类似于“吐血数升”和“建天子旌旗”这种细节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些夸诞增饰，其目的无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其迫不得已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且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无论这场诡异的夜宴确切发生在何时，也无论毒酒事件的真实程度有多高，总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之前，一个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太子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那些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文臣武将，包括大唐天子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

一个相同的疑虑必定会在他们的心中盘旋——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被孤立的痛苦

夜宴之后，太子和齐王对秦王发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强力攻击。

首先，他们动用了朝中和后宫的所有政治力量，不断对李渊施加影响，有力地加剧了李渊对李世民更深的猜忌和反感。在所有的离间之词中，有一个当朝重臣的话似乎一下子就说到了李渊的心坎里。

这个人就是封德彝。

在太子与秦王的政治博弈中，封德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因为每一方都把他当成自己人。

李世民一直认为他是忠心耿耿的秦王党，李建成也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而高祖也始终将其视为心腹重臣。直到时过境迁后的贞观初年，也就是这个“所为秘隐，时人莫知”的封德彝死后数年，其生前的真实面目才被唐太宗知悉——原来他一直“潜持两端，阴附建成”。

在毒酒事件之后，这个八面玲珑的封德彝一方面劝秦王对太子下手，一方面又劝太子除掉秦王，同时又跟高祖说了这么一句话：“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秦王居功自傲，不愿屈居太子之下，这一点陛下您也知道，既然您不可能废黜太子而改立秦王，那就要早做打算。

封德彝很聪明，他没有明说应该作何打算，但是其潜台词无非是——早日铲除秦王，以绝后患。

此刻的李渊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封德彝的劝告是有道理的。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一切都将变得无法收拾。

可问题是——老皇帝下不了这个手。

对于一个年逾六旬、儿孙满堂的老人而言，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和和睦睦更值得珍惜呢？还有什么比父子之情、天伦之乐更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呢？

没有了。

权力固然重要，江山社稷固然重要，可要让一个老人为了这些东西而牺牲亲情甚至亲手除掉自己的儿子，那实在是太残忍了。

所以，尽管封德彝的话切中肯綮，尽管高祖手中的这碗水颤动得越来越厉害了，但是他只能满怀无奈地把它端下去。

除此之外，李渊什么也做不了。

所幸老皇帝身边也不完全是反对秦王的声音。比如另一个心腹重臣陈叔达就站在秦王这边。他对高祖说：“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陈叔达的话让李渊多少缓解了一些内心的痛苦，也让他多了一个继续把水端下去的理由。所以不久后的一天，当齐王李元吉明目张胆地劝老皇帝杀掉秦王时，李渊就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他有定天下之功，而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罪状，你有什么理由杀他？”

齐王咬牙切齿地说：“当初攻克东都洛阳时，他盘桓逗留，不肯马上班师，还散发大量金帛树立私恩，又违抗敕令，不是反叛是什么？但应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闭上了眼睛，一个字也不想再说。

齐王只听到一个长久的沉默。

老皇帝虽然老了，有时候难免轻信而多疑，可还没老到李元吉希望的那个程度。

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让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感到一根无形的绞索已经套上他们的脖颈，而周遭的空气也已变得日渐稀薄。

房玄龄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对秦王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说：“如今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岂止是府廷血流满地，简直是社稷的灾难啊！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蔡），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际，不容延误，必须尽早发动。”

长孙无忌说：“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你今日所说，正合我心，我马上去跟秦王说。”

当长孙无忌将他们心中的想法向秦王和盘托出后，李世民沉吟了很久。

长孙无忌看见，他原本沉郁冷峻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尽管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妹夫眉宇间依旧英气逼人，但是长孙无忌还是注意到了，多年的戎马倥偬已经过早地在秦王脸上刻下了岁月的风霜，而紧随其后的这场旷日持久、临深履薄的政治博弈，更是让他原本清澈的目光变得日益浑浊而灰暗。

许久，长孙无忌听见秦王用一种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说：“传房玄龄。”

房玄龄来到后，迎面就说：“大王功盖天地，应该继承帝业。今日之

忧危，正是上天赐给的机会，请大王不要再迟疑了！”片刻后，杜如晦也匆匆步入了议事厅。他们异口同声地劝说秦王当机立断，诛杀太子和齐王。

李世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光芒，可转瞬之间便又黯然消隐了。

房玄龄等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秦王怎么了？他到底在想什么？

在太子和齐王发动的这一波攻击中，除了进一步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不择手段地剪除李世民的羽翼。

李建成首先把目标锁定在李世民麾下一位大名鼎鼎的骁将身上。

他就是尉迟敬德。

李建成派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金银器皿。他在信中说：“献上这点菲薄的礼物，希望得到长者眷顾，并增进我们的私人友谊。”

尉迟敬德当即提笔回信：“敬德乃一介草民，遭隋末之离乱，长久沦为草寇，罪不容赦！秦王赐我以再生之恩，而今又列位秦府，唯当以一死相报！我无功于殿下，不敢贸然接受重赏，倘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为了利益抛弃忠诚，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何用？”

同时，太子也给另一个秦王府将领段志玄送去了重贿，同样遭到段志玄严词拒绝。

尉迟敬德随后把太子的诱降信拿给秦王看。李世民大为感动，说：“你的心志如同山岳一般坚定，纵然把黄金堆积到星辰，我知道你也不会变节。如果他再有什么馈赠，你只管收下，何须避什么嫌疑！你可以乘机刺探他们的情报，岂非良策？如果不这么做，你恐怕会有危险。”

李世民的判断没错。

看完回信的太子顿时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虎不发威，你还以为我是病猫！

当天黄昏，尉迟敬德的府第门前就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刺客。

齐王派来的刺客。

尉迟敬德对此心知肚明。他一脸冷笑，吩咐手下把府上的每一道门全部打开，然后自己高卧床榻，若无其事地等着刺客进来。

刺客傻眼了。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刺杀对象。

眼前门户洞开，可他不能这么冠冕堂皇地走进去。

刺客照例飞檐走壁地进入尉迟敬德府内，忽然感到周围好像有无数道目光正在盯着自己。

尉迟敬德躺在内室的床上闭目养神，并且优哉游哉地晃着二郎腿。外面的刺客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迟疑。他好几次沮丧地退了出去，又好几次不甘心地摸了回来。

然而最终，刺客还是不敢下手。

当这个手下灰溜溜地空手而归时，齐王顿时一跳三丈高——老子就不信收拾不了你尉迟敬德！

齐王立刻进宫，向高祖控告尉迟敬德谋反。李渊当然知道这是无端加罪，但是剪除秦王羽翼事实上也符合他的想法，所以当即把尉迟敬德拿下诏狱。

就在齐王准备在狱中对尉迟敬德下手的时候，秦王火速入宫向高祖陈情，极力证明尉迟敬德的清白。

所谓谋反毕竟是子虚乌有之事，既然秦王力保，李渊当然也无话可说，只好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

老虎虽然发了威，但是伤不到秦王的人一根毫毛，仍有被视为病猫的嫌疑。

太子和齐王只好调整策略，转而采用斥逐手段，怂恿高祖把秦王府的

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外调为康州（今甘肃成县）刺史。程知节置朝廷调令于不顾，冒死去见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全被剪除，身躯还能活多久？知节宁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计。”

同时，太子又把漫天撒网的进攻方式改为精确打击，他对齐王说：“秦王府的智囊，足以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

至此，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尽数被逐，只剩下一个长孙无忌。

形势万分险恶。

长孙无忌立刻把舅父高士廉（时任雍州治中，即京畿行政长官）、右侯卫车骑将军侯君集，还有死里逃生的尉迟敬德全都召到秦王府，日夜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诛杀太子和齐王。

可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平素英勇果决的李世民却变得优柔寡断。无论众人如何劝说，秦王就是不置可否。

其实，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比任何人都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行动。可他首先顾虑的是——自己在京师的军事实力远在太子和齐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就必须在行动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

为此，李世民锁定了两个人。

他们就是李靖和李世勣。此刻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驻在北方边境防御突厥。李世民希望他们能够暗中提供军事支援，起码希望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其保持一致。

面对李世民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勣究竟作何选择？

对此，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李靖和李世勣还没等秦王开口，就主动对其大表忠心，频频劝他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则与之大相径庭：“（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也就是说，两位骁将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李世民，选择了中立。

那么，上述记载到底哪一种更为可信？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团，并且主动请缨，愿意效“犬马之力”，何以在整个玄武门事变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踪影？

众所周知，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上第一线就不用说了，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都要跟着秦王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要亲临现场，鼓舞士气。（《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长孙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则在情况危急时不得不释放狱囚，授以兵器，率之驰援秦王。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秦王集团是全体上场，孤注一掷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参与了这场政变，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会如此捉襟见肘，而史料中也不会不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其他参与政变的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的各个纪传中就算没留下具体事迹，也都留下了姓名）。

因此，所谓的二李“愿效犬马”云云，很可能是贞观史臣编撰《太宗实录》时的虚构。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实记载，无非是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广泛的拥戴，从而为这场流血政变提供更多的正当性。

面对李靖和李世勣的拒绝，李世民作何反应呢？

《通鉴》称他“由是重二人”，也就是打心眼里尊重他们的选择，并从此越发敬重他们的为人。根据李世民在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从总体上说，贞观年间，李世民对二李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并且一再予以重用。

虽然李世民并未因此怀恨，但是被人拒绝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何况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缺少这两位骁将的支持，肯定会让李世民感到一种极大的无奈和失望。

然而，不管内心多么失望，也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太子都已经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这场迫在眉睫的恶仗都不能不打。

问题只在于，这一仗该怎么打？

最大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实力的悬殊，也不在于时机的把握和战术的选择，而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是说，李世民此刻面对的是一

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争。

这一次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兄长和弟弟，还有父亲。

向自己的骨肉至亲挥起屠刀，这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智慧、勇气和力量。

可到底还需要什么？

李世民不知道。

他不无痛苦地发现，以自己二十八年的人生阅历和十年的从政经验，似乎仍然不足以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足以让他逃避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

原来自以为成竹在胸的一切，到头来还是如此地困惑和迷茫。

原来手足亲情，并不像自己一直以为的那样容易割舍、那样无足轻重。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不是外在那些强大的敌人和坚固的城池，而是自己灵魂深处最不堪碰触的那个地方。

这一切，是李世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感同身受的。

面对他们焦急的脸庞和殷切的目光，李世民只能报以沉默，一种近乎麻木的沉默。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能给他们什么呢？

起码在这场令人不安的道德拷问终结之前，李世民给不出任何答复。太子和齐王已经磨刀霍霍，李世民的灵魂却还在挣扎和思考。

就在此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郁设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战报迅速传至长安。

太子和齐王笑了。

一个彻底整垮李世民的计划迅速在他们的脑中成形。

祸到临头，秦王亮剑

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

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进而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同时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将他们全部编入了北征军。

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并一举置于死地。

图穷匕见的李建成决定对秦王发出最后一击。他对齐王说：“眼下你已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位于唐长安城西南）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

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

关键时刻，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

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

他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世民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

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

既然太子和齐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亲兄弟挥起屠刀，那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现在李世民终于知道，要举起寒光闪闪的屠刀，除了智慧、勇气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

那就是残忍。

是的，残忍！

如果道德秩序和礼教伦常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

如果仁爱与亲情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就斩断仁爱的牵缠，割舍亲情的锁链。

李世民相信，为了完成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自己就必须从一撇一捺的“人伦的小我”中升华出来，去追求那个超越时空、辉映古今的“历史的大我”。

至此，这场令人不安的灵魂拷问终于尘埃落定。

当秦王李世民从这场道德困境和灵魂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由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这场灵魂拷问的真相。

也许对于自己内心的困惑，李世民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一直在期待太子和齐王能给他一个答案。

而今答案终于出来了——让你们率先举起罪恶的屠刀，然后我的复仇之刃就能镀上一层正义的光环。让你们把我逼到绝路，然后我的身上就会披上一件“悲剧英雄”的战袍。让你们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同根相煎的嘴脸，我的所有反击行动就会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是大义凛然。

所以，亮剑吧，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PK最终见一个分晓。

当李世民意味深长地说出那句“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话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晚到李世民获悉太子“昆明池政变”的阴谋时，他已经在道义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拷问和说服，或者说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魂蜕变。

他可以杀弟，可以弑兄，可以逼宫，可以篡逆；他愿意牺牲仁爱，牺

牲亲情，牺牲人性中许多柔软而美好的东西……为了夺取储君之位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李世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李世民接下来会斩钉截铁地喊一声——“杀！”然后就开启了玄武门之变，那我们就太低估他了。

李世民固然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可他必须确认的一点是——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

为了确认这一点，李世民就必须有意识地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股肱心腹都来表决心、抒壮志。说白了，就是让大伙都来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

在大伙提着脑袋赌明天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认为——

这场恶仗绝不仅仅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更多的是为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

除了让心腹们都来立这样的投名状之外，李世民或许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场不为人知的灵魂拷问在现实中重演一遍，以便为即将发动的流血政变获取更多的道义资源，提供更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进而在世人和后人的心目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尽管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可表面上仍旧装出一副优柔寡断、痛苦彷徨的样子。于是，接下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众府僚力谏秦王”的这一幕，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强的作秀成分——秦王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恨不得把心掏给秦王看，可李世民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

尉迟敬德第一个跳起来说：“人之常情，谁不畏死！如今大家愿意为大王效死，此乃上天所授。大祸随时可能降临，大王怎么能安然不以为忧？您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又怎能不顾社稷宗庙之安危？大王若不用敬德之言，我将逃离王府，流浪江湖，不能留在大王身边束手待毙！”

李世民沉默不语。

长孙无忌也忍不住道：“不接受敬德的建议，大事必败，敬德等人必定远走高飞，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

话都挑明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沉吟半晌，终于开口了，可他的话一下子让众人的心凉了半截。

他说："我的意见还是让他们先动手，诸公可以再考虑考虑。"

来自东宫的威胁越大，众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越强；秦王越是不置可否，众人急于采取行动的自觉程度就越高。

李世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尉迟敬德急了，把尊卑抛到一边，大声说："大王今天处理事情，一直犹豫，这是没有智慧！面对危难，无法迅速解决，这是缺乏勇敢！大王素所蓄养的勇士八百余人，如今都已进入宫城，全副武装，如箭在弦，只等您一声令下！大王说该怎么办？"

李世民把脸转向其他幕僚，询问他们的意见。众人一致认为，就算现在不诛太子，凶狠暴戾的齐王也终究不愿屈居太子之下。他们还向秦王透露了一件事，不久前，齐王府护军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名字合在一起，成一个'唐'字，可见大王终有一天要主持宗庙社稷。"齐王闻言大喜，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幕僚们接着说："齐王跟太子的阴谋未成，就有夺嫡之意，如此狠毒之心，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倘若二人得志，恐怕天下不再为李唐所有了。以大王的智慧和能力，擒获二人不过像弯腰拾草一样，为何只顾及个人节操，而忘却社稷大计呢？"

该摆的事实都摆了，该讲的道理也都讲了，李世民却依旧沉默。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其实他们也都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无论情势如何紧迫，无论正义之帜如何高涨，一旦动手，就是夺嫡篡位，不仅贻当世之讥，更要取千古骂名。任何理由也改变不了它的性质。所以，与其说秦王现在缺的是智慧和勇敢，还不如说他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援。

于是众人问他："大王，您认为舜是何等人？"

“圣人。”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

“假使舜在挖掘水井时不设法出来而被埋葬，他不过化为井里的一撮泥土；假使舜在涂刷廪仓时不设法下来而被焚烧，他不过烧成屋顶的一团灰炭！如何能将恩泽普施天下，让法则行于后世呢？所以，父母用小杖打，我们就该接受；父母用大杖打，我们就该逃走。因为要保全性命以图大事。”众人义正词严地说。

李世民环顾了众人一眼，命人取出一副龟壳，准备卜卦以占吉凶。

差不多了，该说的话都说了，众人的决心也已经表露无遗了。最后一刻，李世民希望用天意来为这场灵魂的挣扎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此时，府僚张公谨刚好从外面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他显然是迟到了。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生性豪爽的张公谨一看见那副龟壳，猛然把它抓起来砸到地上，说：“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毋庸置疑，还卜什么！倘若占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张公谨的话干脆利落、掷地有声，显然比任何虚无缥缈的天意更为有力，也更足以让李世民感到欣喜和快慰。

于是大计就此议定。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伯恩斯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怀有某些动机和意志的人们与他人产生竞争和冲突，而调动体制、政治、心理及其他力量，从而激发、吸引并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时，对人们实施领导即告完成。”

他还说：“所谓‘领导’，就是一种领袖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伯恩斯《领袖论》）

也许，伯恩斯的话正是对中国式“投名状”所作的一种现代化的、学理性的阐释，而此刻李世民所完成的，恰恰也是这么一个价值聚合和道德整合的过程。

灼热的太阳在西边天际挣扎了许久，终于无可挽回地朝远方的地平线坠落。

暮色四合。

李世民屏退了所有幕僚，只留下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他命无忌前去传召已被逐出秦府、未及参加此次密谋的房玄龄和杜如晦。

关键时刻，他需要这两个满腹韬略的左右手一起制订行动计划。

长孙无忌很快就回来了，脸上却写满了沮丧。

他转述了房、杜二人的答复："奉皇上旨意，不准再听从秦王命令，今日如果私自晋见，我们必死无疑，所以不敢奉命！"

很显然，房、杜二人是在有意试探李世民，目的是看他有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说完唰的一声抽出佩刀，递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刚刚片刻之前，李世民还在彷徨复彷徨，现在反应居然如此强烈，由此也足以看出——倘若李世民不是早已说服了自己，单凭府僚们的怂恿和煽动是不足以让他下定这么大的决心的。

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再次去找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大王决心已定，你们应该前往王府共同策划，但我们四个人不能一起走，要分开行动。"

长孙无忌特意让房玄龄和杜如晦换上道袍，借以掩人耳目，然后和尉迟敬德分别绕道，匆匆赶回秦王府。

当晚，秦王府议事厅中的几盏烛光彻夜不灭，一直燃到了次日。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清晨，那颗行踪诡异的太白金星，再度于光天化日之下从长安的上空掠过。太史令（天文台台长）傅奕用一种无比惊异的目光久久地凝望苍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神色凝重的傅奕迈着急促的步伐匆匆进入太极宫，向李渊呈上了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那一刻，高祖李渊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秦王真有天命，注定要坐这个天下？倘若如此，又要将太子置于何地？

不，这不可能！只要自己还活着，就绝不能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

极度不安的李渊随即命人传秦王入宫。

武德殿内，李渊脸色阴沉地坐在御榻上，秦王毕恭毕敬地跪伏在地。李渊把傅奕的奏疏猛然扔到秦王面前，瓮声瓮气地说：“自己看吧。”

李世民悄悄瞥了一眼。他不用看也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

“儿臣也有一道密奏！”秦王朗声道。

李渊满腹狐疑地盯着李世民看了很长时间，然后缓缓打开秦王的密奏。才看了一眼，他的脸唰的一下全绿了。

淫乱后宫？

秦王居然控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李渊顿感血往上冲，脑袋几欲炸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秦王会来这么一手。

这绿油油的帽子到底是太子和齐王给老子戴的，还是你秦王血口喷人、造谣中伤、恶意诽谤？

李渊的胸口在剧烈起伏，嘴里不断喘着粗气。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秦王又接着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阋墙之争啊！

李渊在心里发出一声长叹。

你们兄弟三个难道真的谁也容不下谁，非要斗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吗？

李渊痛苦而无奈地意识到，是时候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做一个了断了。就在明天吧……明天，自己将召集朝中的宰执重臣，命他们三兄弟入宫当面对质，把事情彻底弄个水落石出。

其实，李渊心里很清楚，不管怎么对质，秦王这场官司基本上是输定了。

道理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秦王既然提出了指控，就必须拿出确

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指控的罪名。可问题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宫闱丑闻又怎么可能有确凿的证据呢？即便秦王你买通一两个太监或宫女出面指证，可谁又能保证他们说的是实话？退一步说，就算太子和齐王真的干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可除非被你捉奸在床，否则不管你拿出什么证据，都可以被视为捕风捉影、造谣中伤。

所以，明天的对质说到底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这一回，你秦王绝对难逃诬告的罪名。就算不治你一个死罪，最低限度也要把你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秦王啊秦王，是你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别怪父皇不念父子之情，别怪朕对你下重手！

“明早鞫问，汝宜早参。”李渊扔下一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

一切等到明天就清楚了。李渊愤愤地想。

等到明天，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子夜。

长安城万籁俱寂。

一轮皎洁的明月孤悬夜空。

高大的玄武门就像一头巨兽静静地笼罩在如水的月光下。

没有人知道，它正在假寐，几个时辰后，它就将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中醒来。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上）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凌晨。

星光渐逝，残月将隐。繁华的长安从宁谧香软的夏夜之梦中幽幽醒转。晨光熹微中，已经有一些美丽的蛱蝶扑扇着斑斓的羽翼在坊间的花丛中往来穿飞，无数晶莹的露珠凝结在花间、柳梢、叶脉、草尖，仿佛十万颗闪亮的珍珠一同点缀着纤尘不染的长安。街肆的酒楼和茶坊也开始陆陆续续卸下紧闭了一夜的门板，京郊的农人推着一车车新鲜的瓜果菜蔬从薄雾中辘辘走来。谁家少妇蓦然推开某一扇雕花长窗，席席暖风照旧温柔地拂过她飘飞的鬓发和慵懒的脸庞。此刻，无

论是长安的男人还是女人，通常会兴奋地张开双臂，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熟悉的早晨揽入怀中，尽情地拥抱这温馨而醉人的太平时光……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早晨，有谁会闻见一股腥膻的气息已经在太极宫的上空隐隐飘荡？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早晨，富贵、雍容、妩媚的长安又如何容得下阴谋、杀戮和死亡？

然而，嘚嘚的马蹄还是响起来了。

刀剑与盔甲的铿锵还是响起来了。

这样的声音清晰、坚硬、冰冷、不容置疑。它们来自彻夜不眠的秦王府，来自一颗历经善恶之火煎熬、淬炼并最终浇铸成形的年轻而沧桑的钢铁之心。

嘚嘚马蹄踏破夏夜残留的氤氲，惊起了一树飞鸟。

铠甲和刀剑的寒光映入它们惊慌的瞳孔，空中的鸟儿拍打着凌乱的翅膀四处逃散。

从秦王府疾驰而出的这队飞骑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气直扑玄武门。

玄武门，太极宫的北正门，皇城禁军的屯驻地，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

谁控制了玄武门，谁就控制了太极宫。

谁控制了太极宫，谁就控制了长安。

谁控制了长安，谁就控制了天下。

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仍旧是那个英气逼人、神色冷峻的秦王，和他并辔齐驱的就是即将在两个月后母仪天下的秦王妃长孙氏，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秦王府的十个文武将吏。他们是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1] 在他们后面，是秦王“素所蓄养”的数百名精锐武士。

是日，在玄武门当值的禁军将领常何早早就在宫门接应，秦王等人到达后，立即进入有利地形埋伏。这个常何是李世民很早就布置在玄武门的一颗棋子。据《常何碑》载：“太宗文皇帝出讨东都，以公为左

右骁骑……勇迈三军，声超七萃……令从隐太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李（世）勣穷追（徐）圆朗。贼平，留镇于洧州。六年，奉敕应接赵郡王于蒋州……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玄武门）领健儿长上……九年六月初四，令总北门之寄。”

由此可见，常何既追随过李世民，也曾跟随太子李建成一同出征，但是在武德七年便已被李世民暗中纳入了自己的阵营，并且被放在了玄武门这个要害部位上。同时被李世民收买的玄武门禁军将领还有敬君弘、吕世衡等人。

而李建成却对此一无所知。

他绝没有想到，在这场迟早会来的巅峰对决中，秦王李世民竟然棋先一着控制了玄武门——控制了这个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中枢。

李建成失算了。

就在李世民伏兵玄武门的同时，后宫的张婕妤十万火急地赶到东宫，把昨夜探知的秦王密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子。太子立刻通知了齐王。齐王警觉地说：“应该立刻集结军队随时待命，同时托疾不朝，静观其变。”

如果李建成听从李元吉的建议，那么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就彻底落空了，而太子和齐王也将就此躲过这场灭顶之灾。

然而，李建成太自信了。他以为曾经骁勇强悍的秦王如今已是一只被剪除了翅膀和利爪的苍鹰，再也无力搏击长空了。所以，太子对齐王露出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笑容，说：“卫戍部队都已集结待命，我们大可以放心入朝，关注事态的进展。”

太子的自信和轻敌就此铸成大错。

在这个夏日的早晨，他们就这么策马走出东宫，从而走向死亡的深渊，走向一个无可逃脱的历史宿命。

太子一行缓缓行至临湖殿的时候，内苑的景致看上去依旧美丽安详，可是李建成的心头却忽然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周遭的一切太安静了，静得就像一座空山幽谷，静得让人头皮发麻、脊背生寒。李建成说不上这种怪异的宁静背后是否暗藏杀机，可强烈的不祥之感还是像水上的涟漪一样迅速在他的胸中弥散开来。

李建成不由自主地勒住了缰绳。

“恐怕有变！”他低低地对齐王说了一声。刹那间，齐王看见太子的眼中充满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

他们下意识地一起掉转马头。

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李世民策马立于玄武门巨大的阴影中。他在这里静静守候生命中最重要一刻的来临。时光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既流动得如此缓慢而艰难，又消逝得如此仓促而迅捷。

到最后李世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里等待了多久。

是一瞬，还是一生？

他只知道，当那两个熟悉的身影和一队侍卫缓缓映入他眼帘的时候，所有的正常知觉才在一瞬间恢复过来。他的手心立刻沁满了细密的汗珠，心脏就像一面隆隆的战鼓在他胸中剧烈擂动，仿佛随时会击破他的胸膛。

太子和齐王越走越近了。

李世民看见一束阳光正在他们神情倨傲的脸上闪烁和跳跃。

他们其实都还年轻——大哥才三十八岁，正值盛年，或许正在信心满满地期待着登基御极的那一天；四弟就更年轻了，才二十四，华美的人生才刚刚开场。然而，就是如此年轻的一母同胞的生命，却马上要在自己手中变成两具僵硬的尸体，变成两缕惨恻的亡魂。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世民内心的某个地方又不可遏止地掠过一阵战栗……

就在李世民神思恍惚的片刻，太子和齐王突然掉头而去。

刹那间，冥冥中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李世民狠狠甩下马鞭。身下的骏马立刻像离弦之箭从玄武门的阴影中激射而出，飞驰在武德九年六月的阳光下。那一刻我们仿佛可以望见，一个英武而决绝的李世民就这样从阴暗抑郁的武德一下跃入了华丽灿烂的贞观，把另一个无奈而伤感的李世民永远遗落在玄武门锯齿状的阴影之下，遗落在不堪回首的武德往事之中。

很多年以后，当日渐苍老的李世民预感到自己即将结束在人世的这一趟辉煌演出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屡屡回望武德九年那个夏天的早晨。在泛黄的视线和依稀的泪光中，暮年的唐太宗看见青年李世民依旧孤独地伫立在玄武门下，伫立在那个没有人愿意碰触的历史暗角。任世间花开花谢、沧桑变化，任天上云卷云舒、日月轮转，那个年轻的李世民却永远定格在那里——他的目光依然是那么焦灼而迷惘，他的神情依然是那么痛切而感伤。

“吾死之年，廿六而已！”

据说晚年的李世民曾经在某种场合发出过这样的苍凉一叹。玄武门的那段悲情往事，也许终归是李世民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一场灵魂之殇。在这声宿命般的叹息中，有谁能窥见这个千古一帝灵魂中深藏的暗伤和隐痛？又有谁能参透这场玄武之殇中有关人性与政治的种种奥秘与玄机？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中）

李建成最初听见的是一声呼唤。

这声音从背后追上来，轻轻落进他的耳膜，听起来是如此从容而熟稔，以至于他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一声死神的召唤。

还是年轻的齐王反应敏捷。尽管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中布满惊惶，可他还是转过身去，飞快地搭弓上箭。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一向自诩勇武的大唐四皇子一连三次都没能把手上的那张弓拉满，结果三箭射出都在距秦王一丈开外的地方颓然落地。李元吉惊讶地看着自己不停颤抖的双手，不相信自己在死亡袭来的时候居然会变得如此软弱无力。与此同时，李建成正疯狂地挥动马鞭，带着他的一小队侍从头也不回地朝东宫狂奔而去，试图逃离近在咫尺的死神魔爪。

可是李建成拍马疾驰的速度显然不会比李世民索命一箭的速度快到哪里去。

空中划过一声尖锐的呼啸。

李建成下意识地回头去看。

那一刻，他圆睁的瞳孔恍如惊鸟。

凌厉的一箭不偏不倚地从他的后背没入，然后穿胸而出。李建成看见殷红的鲜血汩汩而出，在自己的胸口洇散开来，像极了一朵灼灼绽放的红色牡丹。

这是大唐帝国第一任皇太子李建成在人世间看见的最后一幅凄美的图景。

当无边的黑暗把他彻底吞没的时候，李建成依旧困惑地睁着双眼。

为何一切如此仓促就发生了？却又如此仓促就结束了？

是的，结束了。

很久以来自己日思夜想的一件事终于干完了。当李世民射出那一箭时，他知道自己的大哥、自己政治上最大的对手李建成从此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原来这件事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艰难。这一箭跟自己曾经射出的千百支箭一样——它射出去了，然后有个人应声坠马，一命呜呼，事情就这么简单。

可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如果真这么简单，为什么当想象中最值得庆幸的一幕发生后，自己心中竟然没有一丝胜利的激动和喜悦，而是一种若有所失的空旷和茫然？为什么当夺嫡之路上这块最大的拦路石被一举清除时，自己胸中那一团强劲的力量却忽然崩溃消散？

李世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恍然如梦的状态之中。周遭的事物看上去是那么虚幻而缥缈，仿佛已经静止不动。身下的坐骑什么时候冲进了斜刺的一片小树林，李世民似乎也全无察觉。直到被一根横亘的树枝绊下马背，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李世民才隐隐感觉——也许就在大哥李建成坠地的一刹那，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就已经跟着他一同坠落了，永远地坠落了。

那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那将是李世民用尽一生也无法重新拾回的东西。

李元吉曾经自以为见惯了流血和死亡，所以早就祛除了对死神的恐

惧。可直到大哥李建成睁着血红的双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时候，李元吉才知道自己错了——原来死亡跟阳光一样无法直视。

就在李元吉愣神的间隙，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已经率领七十余骑冲了过来，箭矢纷纷射向李元吉。他左闪右避，慌乱间被流矢射中，失足坠马。但是李元吉很快又爬了起来，带着箭伤狼狈不堪地窜进身边的小树林，结果一眼就看见了躺在地上神情恍惚的秦王。李元吉怒从心头起，劈手夺过李世民的弓，用弓弦紧紧勒住了他的咽喉。

就在李世民命悬一线之际，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发出厉声叱喝。李元吉无奈地丢掉手中的弓，撒开双腿拼命朝武德殿方向跑去。尉迟敬德纵马追逐，同时不慌不忙地射出一箭。弦声响处，李元吉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面朝尘土颓然仆倒。他的手脚强烈地抽搐了几下，随后便一动不动了。

当初与尉迟敬德比试马槊功夫而再三败北时，李元吉曾经深以为耻。假如他和太子兼并秦王府将领的计划成功，那他李元吉肯定会一雪前耻，亲手杀死尉迟敬德。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最终竟然会死在尉迟敬德的手上。

秦王集团在玄武门前突然实施的“斩首行动”非常成功。东宫将领冯翊、冯立得知太子被杀的消息后，顿时仰天长叹：“我等岂能在他生时受其恩，而在他死后逃其难呢？”遂与东宫将领薛万彻、齐王府将领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精兵两千人，迅速杀向玄武门。

大兵骤至，情势危急，臂力过人的张公谨未及叫上左右，独自一人关闭了沉重的宫门。

负责防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敬君弘准备挺身出战，左右劝阻：“事情未见分晓，暂且静观其变，等大兵会集再出战也为时不晚！”

应该说，左右将士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秦王虽然一举除掉了太子和齐王，可接下来形势会如何演变谁也无法预料，所以作壁上观才是最安全的办法。然而，对秦王忠心耿耿的敬君弘并未采纳这个消极观望的建议，他毫不犹豫地与中郎将吕世衡一起率部迎战。可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一番血战之后，敬、吕二将终因寡不敌众而相继阵亡。

冯立、薛万彻等人继续指挥军队猛攻玄武门，战斗极为激烈。薛万彻见部下多有伤亡而宫门久攻不下，马上和士兵们一起鼓噪着要转攻秦王府。玄武门上的将士大为惶恐。秦王府的精锐都已倾巢出动了，现在守卫王府的那些老弱残兵根本没有防御能力，怎么办？

正在众人焦急之际，尉迟敬德突然纵马疾驰到东宫和齐王卫队的阵前。

他的手上高高举着两颗鲜血淋漓的头颅。

冯立、薛万彻等人顿时绝望——他们很清楚士兵们看见太子和齐王的首级后会作何反应。

果不其然，尉迟敬德的举动一下子令东宫和齐王的部队士气尽丧，士兵们开始四散逃逸。薛万彻只好带着数十名亲信骑兵逃出长安城，亡命终南山。冯立对部众说："我斩杀了敬君弘，多少可以回报太子了！"随即解散了军队，独自一人落荒而逃。

按《通鉴》记载，当太子和齐王血染玄武门、其部众与秦王军激战正酣的时候，高祖李渊正与裴寂、陈叔达、萧瑀等人在海池（皇宫内的人工湖）上惬意地泛舟。

天蓝水碧，蝶舞莺啼。

大唐天子李渊仍然在享受一个与往常一样美丽而宁静的早晨。

李渊万万没有料到，他颤颤巍巍端了多年的那碗水已经在这天早晨彻底倾覆了。

舟船缓缓靠岸，高祖李渊和诸位大臣准备去上早朝。那个浑身上下沾满鲜血的尉迟敬德就在这时候走近了海池。他披戴盔甲，手执长矛，身后跟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脸上带着同一种肃杀的表情，迈着大步径直朝皇帝走来，就像一根尖锐的锥子无情地刺入这个静美的早晨，也狠狠刺伤了高祖李渊。

巨大的震惊与错愕让李渊的脸色瞬间苍白如纸，身边的大臣们也同样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李渊的脑中一片空白。

直觉告诉他——一定有非常严重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直到尉迟敬德走到面前跪地叩首，李渊才回过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厉声质问："今日谁人作乱？你来这里干什么？"

尽管李渊努力要表现出一个天子应有的威严，可他分明听见了自己声音中的战栗。他不知道这种战栗究竟是出于震惊和愤怒，还是出于对

一种不祥之兆的恐惧。

“回禀皇上，太子和齐王叛变，秦王已率领军队将二人诛杀！唯恐惊动陛下，特意命臣前来护驾。”

果然是意料中的惊天噩耗。

就像一声晴天霹雳在耳边轰然炸响，李渊感到了一阵剧烈的晕眩。他的身体摇摇欲倒，左右连忙上前搀扶。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长久以来的担忧和疑惧终于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自己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在李唐皇族的身上发生，还是不可避免地重蹈了姨父杨坚的覆辙……不，是导致了一场比杨隋皇室更为惨烈的宫廷祸乱和政治灾难。

这一切究竟是谁造成的？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自己没有扮演好一个皇帝的角色，还是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是因为太子和齐王不择手段把秦王逼得无路可走，还是秦王处心积虑要夺嫡篡位？

其实，现在追问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了。就算能得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不也只是徒然加深自己的哀伤和悔恨吗？

李渊感到头痛欲裂。

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惨痛的现实——曾经苦心经营的政治平衡，曾经努力维系的家族亲情，此刻已经像一个被风暴劈打得四分五裂的鸟巢，在狂风骤雨中飘零了一地。李渊预感到自己的余生注定要变成一根残破的羽毛，没有了任何分量，也掌控不了方向，只能在秦王划定的轨迹中独自飘荡，最后黯然走向生命的终点。

实际上这样的命运从眼前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李渊在心里苦笑，尉迟敬德说得好听，护驾！天底下有这么护驾的吗？说白了不就是逼宫吗？

看着尉迟敬德身上的斑斑血迹，李渊的目光忽然有些迷离。他不知道在那些已经变得乌黑，甚至有些肮脏的血迹中，哪一簇是太子的，哪一簇又是齐王的？

有那么一瞬间，建成和元吉的笑容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李渊觉得自己伸出手去，仿佛仍然可以触摸他们年轻的脸庞，感受他们温热的

呼吸……

可是，这样的幻象稍纵即逝。

李渊艰难地把目光从尉迟敬德的身上移开，把脸转向那些宰执重臣，用一种近乎虚脱的声音说：“没料到今日终于发生这种事，诸贤卿认为该怎么办？”

一向倾向于太子的裴寂比皇帝更加惶惑而茫然，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一向同情秦王的陈叔达和萧瑀则斩钉截铁地说：“建成和元吉当初就没有参加起义，对于帝国的建立也没有多大功劳，并且嫉妒秦王功高望重，所以才会共同策划对秦王不利的阴谋。秦王今日既已将他们剪除，而且功盖宇宙，天下归心，陛下如果封他为太子，把朝政大权移交给他，便不会再有什么事端了！”

此时此刻，老皇帝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们说得对。”李渊喃喃地说，“这正是我的夙愿。”

此时，玄武门的兵戈尚未停息，禁军、秦王卫队与东宫、齐王卫队依然在鏖战不止。尉迟敬德向高祖提出要求，请他颁布一道敕令——命各军一律服从秦王指挥。

李渊很清楚，这是秦王诛杀太子和齐王后必然要走的一步棋。第一步是兵权，第二步是储君之权，而第三步，无疑就是皇权。

这是一个夺嫡篡位者必然要上演的政变三部曲。

然而，明知如此，李渊也只能照办。

片刻后，检校（代理）侍中兼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飞驰出宫，一路高声宣布皇帝敕令，那些仍在纠缠恶斗的士兵才陆陆续续放下了武器。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李渊又命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晓谕众将士，惶惶不安的东宫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太子和齐王既已“伏诛”，秦王既已接管了京畿兵权，全面控制了皇宫，这场血流满地的政治灾难就该结束了吧？

此时此刻，东宫和齐王府的上上下下也许都在暗中祈祷——但愿秦王就此收起他的屠刀，不要再赶尽杀绝。

可不幸的是，秦王的刀并未入鞘。

很快它就将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准确地落在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头上。

谁都无法阻挡。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下）

一轮丽日高悬在大唐帝国的中天。

鲜血满地、死尸狼藉的玄武门就像一个巨大的伤口怆然裸露在正午的阳光下。

李世民踏着未及擦干的血迹一路向宫中走去。

偌大的太极宫内，到处可见惊魂甫定的太监和宫女忙忙碌碌地往来穿梭。他们不时向秦王投来暧昧而惊恐的一瞥，然后赶紧低下头匆忙走过。

空旷的武德殿上，高祖李渊正低垂着头，神情木然地坐在御榻上，静静等待着李世民的到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李渊下意识地抬起头，发现一身铠甲的秦王已经赫然站在自己的面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之后，当这对尴尬的父子猛然间四目相对，他们的眼中顿时充满了太多难以言表的东西。

李世民急忙跪地叩首。老皇帝招招手，让李世民跪到跟前，然后伸出颤抖的手抚了抚他的脖颈，说："这些日子，差点被人言所误，犯了'投杼之惑'（有人误传曾参杀人，其母相信）啊！"

李世民失声痛哭，把脸埋在父亲胸前。紧接着，秦王做出了一个让无数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举动——"跪而吮上乳"。

其实，李世民的这个吮乳动作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我们对此的种种反应。

因为我们少见多怪了。

其实，在当时那种父子兄弟刀兵相见并且已经酿成惨祸的情况下，这是李世民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举动。进而言之，这是李世民在第一时间唤醒父子亲情的最直接方式，也是他在最大限度上取得父亲谅解，弥

补父子间巨大裂痕的最有效方式。

何以见得呢？

李宗侗、夏德仪先生在《资治通鉴今注》中说：“跪而舐上之乳房，以示为孺子时无间之态。”这句话的意思是：李世民做出这个“吮乳”举动，目的是为了唤起父亲的记忆，重现当年身为“孺子”时与父亲的亲密无间之态。

可是，孺子吮乳的对象难道不应该是母亲才对吗？李世民怎么会向父亲李渊吮乳呢？除非李渊曾扮演母亲的角色，早年曾有过哺乳婴儿的举动，否则李世民这个动作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然而，要说李渊真有过哺乳婴儿的举动，这似乎更为耸人听闻，也更让人难以置信。

可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答案恰恰是这个。

准确地说，应该是——李渊早年曾有过“哺乳婴儿”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仪式”。

按照有关学者对古代民俗学的研究发现，男子（父亲）作哺乳婴儿之状，确实是唐代周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产翁”和“乳子”习俗。

比如唐代的房千里就曾在《异物志》中记载当时南方獠人的这种习俗：“獠妇生子即出，夫惫卧，如乳妇，不谨则病，其妻乃无苦。”

唐尉迟枢《南楚新闻》中也有相关记载，表明越人也有这种“产翁”习俗：“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另据清人李宗昉《黔记》所载，苗人亦有此习俗：“妇人产子，必夫守房，不逾门户，弥月乃出。产妇则出入耕作，措饮食以供夫乳儿。”

由此可见，古代的獠、越、苗人均有这种女人产后即正常劳作，而由男性卧床“坐月子”、象征性地给婴儿哺乳的习俗，其意义在于表明父权在子女生产和哺育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子女与父亲间的亲密联系。

靠“父乳”的哺育而成长的观念，还可以从南朝的民谚中得到佐证。据《梁书·始兴王萧憺传》，梁朝始兴王萧憺有德政于地方，天监七年被

梁武帝征召还朝，当地百姓依依不舍，作民谚曰："始兴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这里所反映的老百姓将始兴王比为父，以"哺乳我"的言词表达对始兴王的依恋之情，是古代汉族地区也存在这种习俗的一个有力证据。（参见阎爱民《"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兼谈中国古代"乳翁"遗俗》）

当然，在李世民出生时，李渊不可能像那些獠、越、苗人那样真的去卧床"坐月子"，但是他曾经象征性地举行过"乳子"仪式，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所以，当李世民在这场弑兄屠弟、颠覆伦常的流血政变之后，及时做出"跪而吮上乳"的举动，就不但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当时几近断裂的父子亲情而言，应该是最具有修补作用的一注"情感黏合剂"。

到此，玄武门之变基本上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李唐皇族的血并未流够。

因为斩草还须除根。

太子和齐王虽然已经被除掉了，但是他们的十个儿子还在。对于李世民而言，这就意味着残存的政治异己势力还在，一种潜在的复仇力量还在。问题倒不是担心这十个年少和年幼的侄子长大后会揭竿而起，替他们的父亲报仇，而是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不会有心怀叵测之人利用他们的仇恨，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兴风作浪。所以，既然这场弑兄、杀弟、逼父的流血政变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么李世民只能按照它本身的惯性，把它进一步推向那个无可避免的逻辑终点——屠侄。

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要说残忍，这或许是一种残忍。可是，这就是权力斗争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内，每个人都是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你或许可以选择充当什么角色，但你绝对无法改变角色固有的规定性。在历史和时代条件圈定的樊笼中，你只能最大限度地适应并利用规则，却绝对无力改变规则。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规则中游刃有余，但是你不可能溢出规则之外。进而言之，如果武德九年发生的是昆明池之变而非玄武门之变，如果这场巅峰对决最终胜出的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那么李建成在杀掉秦王之后，会不会向秦王的儿子们挥起屠刀呢？

答案是肯定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所以，一旦历史选择了玄武门之变，一旦命运之神钟情于李世民，那么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就注定在劫难逃。

六月初四这一天午后，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立刻发出了恐惧而绝望的哭号。那十个年轻或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

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而已。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

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仅仅在蹒跚学步。

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祭日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各自短暂的一生中都曾经做过什么；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情和嗜好，又有着怎样的欢乐和忧伤；不知道他们心里曾有过什么难忘的记忆，也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怀有怎样美丽的梦想……这一切，我们通通无法知道。

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是——当闪着寒光的鬼头刀不由分说地朝他们细嫩的脖颈猛然铡下的时候，他们依然清澈的眼神中一定写满了无尽的恐怖和迷惘。刀锋闪过，十道鲜艳的血光飞溅而起，然后那十颗睁圆了瞳孔的头颅就落地了，一如一些含苞欲放的花朵，出人意料地从春天的枝头黯然凋谢，萎落成泥。

在这样的悲情时刻，他们的祖父李渊在哪呢？

这一天午后，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上空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片惨烈的哀号时，这位老皇帝听见了吗？当这群昨天还环绕在膝前的孙子衣冠不整、满面泪痕地被拉到刑场上的时候，老皇帝看见了吗？

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李渊把自己藏在深宫最深的某个角落，即便他用力捂上自己的耳朵，再紧紧闭上自己的眼睛，十个孙子血光飞溅、人头落地的那一幕还是会执着地浮现在他眼前，而声声凄厉的惨叫同样会毫不留情地钻进他的耳中，落在他早已不堪负荷的垂老的心上。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至痛，莫过于斯。

何况这个白发人昨天还是这个帝国独一无二的主宰者，手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威。何况这些黑发人昨天还是帝国的天潢贵胄，身上流淌着天下最高贵的皇族血液。

可是一夜之间，这一切已恍如隔世。这个最高主宰者已经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而这些天潢贵胄不但已经人头落地，而且全部被开除了皇籍。

这样的失落和反差就尤其让人难以面对，尤其让人无力承担……

此刻，李渊坐在太极宫中那仍然属于他的一方御榻上，目光凄楚而迷离，面容苍老而疲倦。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他根本无能为力。连身子下面这方御榻还能坐几天都不知道，他还能怎么办？

他最遗憾的事情，也许是没有见上这两个儿子和十个孙子的最后一面。

也许，在这些儿孙的心里，这也是他们仓促离开人世时最大的遗憾吧？

如果你们纠结不散的冤魂注定要在太极宫里徘徊和飘荡，那就再来和朕见上最后一面。

不管你们是带着满身的鲜血，还是带着一副可怕的幽冥之状，都请你们入梦来吧……

与其让朕辗转反侧、夜夜难眠，还不如来到朕的身边，一吐你们最深的怨恨和不甘，倾诉你们无尽的伤痛和凄惶。

最后，希望你们的灵魂能从此安息。

朕已经老了，不需要太久，就会过去和你们相伴。等朕百年之后，希望上苍垂悯，能够让我们的灵魂永远团聚在一个快乐安宁的地方，团聚在一个没有纷争、没有阴谋、没有杀戮、没有死亡的地方。

人死后有没有天堂？

没有人知道。

此刻的长安人唯一知道的是——东宫和齐王府已经被连根拔起了，这场杀戮似乎还没有终结的迹象。

杀完太子和齐王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他说："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

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

同日，李渊下诏大赦天下，并称："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

六月初五，冯立和谢叔方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

六月初七，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他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一举扭转乾坤，剪除了政敌，取得了政变的成功，而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从而顺利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大唐帝国的历史遽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恢宏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将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

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也许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到贞观年间，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这个流血事件是怎样深深地纠缠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旧唐书·庶人祐传》）

贞观十七年那个阴雨蒙蒙的春天，当第五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的消息传来，唐太宗李世民愤然提笔写下了这道谴责李祐的手诏。书毕，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胜。

除了对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脑海中，是否也会闪过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当他颤抖的笔墨写到“背礼违义”“弃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是否也会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呢？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会不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而那潸然而下的泪水，又岂止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的呢？

无独有偶。齐王李祐刚刚伏诛，这一年四月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此后，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惨剧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担心被李泰所图而“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则无异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时的唐太宗才会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诚如学者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

玄武门事变真相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

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

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的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邦邦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为何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初四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初四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们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种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换言之，这种行为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发露”的，宁可背负着它沉重前行，也绝不愿将其公之于世。

那么，有关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

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

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他会继续悠然自得地泛舟，等着尉迟敬德前来逼宫吗？

显然不会。这个时候，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第一，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近卫禁军刀出鞘、箭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第二，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裁决；第三，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随后调查事变真相，严惩政变者。

一旦皇帝采取上述举措，李世民的这场政变还有几分胜算？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但是他必然要与皇帝开战。而我们知道，在玄武门事变前夕，李渊对皇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所以，秦王斗胆与皇帝开战的结果，恐怕无异于自杀。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是真实的，也就是尉迟敬德是直到前方战斗接近尾声时才入宫去找高祖的，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个天大的赌。

赌什么呢？

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极宫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丧失了正常的视觉、听觉和行动能力。

这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么李世民要如何保证在玄武门前开战的同时，太极宫

中的所有侍卫、嫔妃、宦官、宫女都不会去向皇帝报信呢？

答案只有一个——控制他们。

如何控制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宫，用武力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可行且真正有效的“定身术”。

到这里，一个被李世民和贞观史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玄武门之变事实上有两个战场：一个在玄武门前，一个在太极宫中。

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是公开的第一战场；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

那么，这个战场的范围有多大？是整个太极宫吗？最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是所有侍卫、嫔妃、宦官、宫女吗？

李世民绝不会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个太极宫中去漫天撒网，而且就算你控制了九十九个，只要有一个漏网，跑去跟皇帝报信，整个行动照样是前功尽弃。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由此可见，李世民要想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精神正常、大权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绝对会采取应变措施，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而事实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后，立刻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

这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那么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当然是逼迫父亲交出政权。

假如李渊坚决反抗，誓死也不交权，那李世民该怎么办？

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

至此，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即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们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即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弑父”。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逃避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词地敷衍过去。

[1] 关于伏兵玄武门的具体人员，《资治通鉴》无载，《旧唐书》的《太宗本纪》和其他各传记载不一，今从《长孙无忌传》所载。

第四章 年号：贞观

派系斗争，李渊主动退位

武德九年六月初七，亦即政变的三天后，李世民被李渊册立为皇太子。虽然李世民还没有登基继位，可朝野上下都很清楚，从这一天起，李渊已经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皇帝，而新太子李世民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掌舵者。

随着李世民成功入主东宫，原秦王府的一批核心成员也摇身一变，于六月十二日一同被任命为东宫官吏：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太子舍人，姚思廉为太子洗马。同日，李世民将齐王府的所有财产全部赏赐给了尉迟敬德。一夜之间，尉迟敬德就成了长安城里最富有的人之一。

与此同时，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顺利招抚了前东宫和齐王府将领薛万彻、冯立、谢叔方。随后他又迅速起用了原太子集团中的骨干人物魏徵、王珪和韦挺，任魏徵为东宫詹事主簿，任王珪和韦挺为谏议大夫。

面对李世民刻意表现出的这种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政治和解姿态，原来的政敌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然而，长安的政局虽然是稳定了，但是由政变引发的派系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各个地方相继爆发，其中以益州和幽州发生的两起血案最为引人注目。

当时的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还是行台编制，尚书令是李世民兼任的，左仆射是窦轨。窦轨是李渊原配夫人窦氏的族侄，算是比较显赫的外戚，在统一战争中又立了一些战功，而且李世民的尚书令一职只是挂名，所以窦轨就被委以“便宜从事”之权，成了益州实质上的一把手。当时益州行台的兵部尚书韦云起与弟弟庆俭、堂弟庆嗣及整个宗族都与前太子李建成私交甚笃，可韦云起却和他的顶头上司窦轨素来不睦，所以当玄武门事变与李建成之死的消息传到益州时，窦轨就动了杀心。

尽管朝廷下达了“大赦”诏书，可窦轨还是无视朝廷的赦令，决定趁此机会除掉韦云起。他在府上埋伏了卫兵，然后以朝廷下诏追拿建成党羽为由，将韦云起召来。韦云起一到，问朝廷的诏书在哪里，窦轨把诏书藏在袖中，厉声说：“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同反明矣！”（《旧唐书·韦云起传》）还没等韦云起开口申辩，窦轨一声令下，左右卫兵随即冲出，当场将韦云起砍杀。另一个也跟窦轨有仇的行台尚书郭行方闻讯，抱着脑袋没命地逃往长安。窦轨发兵追捕，没有追上。郭行方总算躲过一劫。

紧继益州的韦云起事件之后，幽州又爆发了一起性质更为严重的案件。

这就是庐江王李瑗谋反案。

庐江王李瑗是李渊的族侄，时任幽州大都督。由于李渊一贯不放心外姓将领，只敢把兵权交给宗室亲王，因而尽管明知道李瑗为人懦弱，“非边将才”，可还是把他放在了幽州这个重要的位置上。

当然，李渊同时还给李瑗配备了一个副手。

他就是猛将王君廓。

就跟早先把猛人李靖配给赵郡王李孝恭、把老将史万宝配给淮阳王李道玄一样，这是李渊驭下的惯用招式。可是，这一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亲王和副将双赢，如功成名就的李孝恭和李靖；用得不好，不

懂军事的亲王就会被沙场老手玩得很惨，比如那个年纪轻轻的淮阳王李道玄，可以说是间接死在了老将史万宝的手上。

而眼下的李瑗呢？

他的运气更差，不但始终被王君廓玩得团团转，无端背了个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而且最后还死在了王君廓的刀下，用自己的皇族鲜血染红了副将头顶的乌纱。

李瑗固然很不幸，可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不仅仅是因为他缺乏军事才能，还因为他站错了政治队列——他是前太子李建成的死党。

李建成跟李世民死磕的那阵子，早就暗中把李瑗结为外援，就像李世民以洛阳的温大雅和张亮为外援一样。

然而，站错了队其实也不要紧，只要在李建成死后及时把屁股挪到李世民这边就没事了。因为李世民在政变之后也确实给他们这些建成死党提供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只要像薛万彻、魏徵他们那样“迷途知返”，李世民肯定都是既往不咎的。可问题在于，这个李瑗偏偏连这点最起码的政治头脑也没有。

就在李世民派出通事舍人崔敦礼前往幽州召他回朝的时候，李瑗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以为李世民是要拿他回去问罪的，当即吓得面无人色，惶惶不可终日。

而这一切都被王君廓看在了眼里。

一个踩着李瑗往上爬的计划迅速在他脑中成形。

其实李瑗一直是待王君廓不薄的，他知道自己缺乏军事才干，所以一直非常倚重王君廓，将其视为心腹，并且许诺要和他结为儿女亲家。

然而，李瑗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心腹兼准亲家，却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他布了一个只要掉进一次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死局。

正当李瑗面对朝廷使臣彷徨无措的时候，王君廓用一种股肱心腹特有的口吻跟李瑗说了一番体己话。他说：“京都有变，事未可知。大王一旦入朝，必定凶多吉少。如今您拥兵数万，岂能受制于区区一个使臣，甘愿自投罗网？”

王君廓说完，两行激动的热泪立刻夺眶而出，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表情。李瑗万分感动，与王君廓相对而泣。许久，李瑗昂起头颅，

斩钉截铁地说：“我今以命托公，举事决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李瑗的悲剧就此铸成。

王君廓的嘴角掠过一丝无人察觉的狞笑。

当天李瑗就派兵逮捕了朝廷使臣崔敦礼，逼迫他交代京师的情况，可崔敦礼宁死不屈。李瑗只好把他囚禁，随即向下辖的各州县发布了征兵令和集结令，同时命燕州（今河北怀来县）刺史王诜火速前来蓟城（幽州州府所在地，今北京），共商举兵大计。李瑗麾下的兵曹参军王利涉知道王君廓这个人靠不住，于是力劝李瑗说：“王君廓此人反复无常，切不可委以机柄，应该趁早除掉，让王诜取而代之。”

李瑗一听，顿时满腹狐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把身家性命托付给王君廓。

王诜到达蓟城后，李瑗仍然犹豫不决。而王君廓早就在李瑗身边安插了眼线，所以很快得知了王利涉与李瑗的谈话内容。他当即决定采取行动，立刻前去拜会王诜。此时王诜正在沐浴，一听二当家的大驾光临，连身上的水都来不及擦，赶紧套上衣服，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拜见。王君廓一见王诜出来，还没等他开口说话，猛然拔刀出鞘，一刀就砍下了王诜的脑袋。

随后，王君廓提着王诜的首级，进入军营对众将士说：“李瑗和王诜一同密谋造反，囚禁朝廷敕使，擅自征调军队。如今王诜已被我诛杀，只剩下一个李瑗，成不了什么事。你们是宁可跟着他一块被灭族，还是追随我一起建功立业、自取富贵？”

毫无疑问，这帮原本就和王君廓一条心的将士绝对不可能站在李瑗一边。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愿从公讨贼！”王君廓立即率领麾下将士一千余人冲出军营，翻越西城而入，首先冲进监狱释放了敕使崔敦礼，然后杀向都督府。

等到李瑗得知兵变的消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他慌慌张张地带着左右数百名亲兵披甲而出，恰好在府门口与王君廓的军队遭遇。王君廓向李瑗的亲兵们喊话：“李瑗阴谋叛逆，你们何苦跟着他往火坑里跳！”李瑗的左右面面相觑，随即抛下武器，哗然四散。

转瞬间，偌大的都督府门前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陪伴他的只有满腔的后悔、愤怒和恐惧以及那扔了一地的刀枪

和长矛。

李瑗怒不可遏地指着王君廓破口大骂："卑鄙小人出卖我，你很快就会遭报应！"

面对横眉怒目、气急败坏的庐江王李瑗，王君廓一直在冷笑，一言不发。但李瑗却仿佛听见他在说——不是我王君廓太过阴险和卑鄙，而是你庐江王李瑗太过无能和无知。

兵变当天，李瑗被王君廓生擒，随即缢杀，首级迅速传送长安。

六月二十六日，朝廷的一纸诏书飞抵幽州：以王君廓为左领军将军兼幽州都督，并把李瑗的家人眷属全部赏赐给王君廓，充当奴仆和婢女。

王君廓笑了。

一切如他所愿。

然而，此时的王君廓绝不会料到，李瑗临死前的那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

一年多后他就遭了报应，而且下场几乎与李瑗如出一辙。

王君廓成了幽州的一把手后，自以为山高皇帝远，于是狂放骄纵，贪赃枉法。朝廷很快就有所耳闻，随即征召他还朝。王君廓顿时惊惶不安，李瑗曾经有过的恐惧如今也丝毫不差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可他不敢违抗朝廷敕命，只好硬着头皮上路。临行前，他的长史李玄道（房玄龄的族甥）托他把一封书信转交给房玄龄，王君廓立刻起了疑心。行至渭南（今陕西渭南市）时，王君廓忍不住偷偷拆看。由于不认识草书，他误以为李玄道在信中告发了他的罪行，于是杀了驿站官吏，向北逃亡，准备投奔东突厥，可逃至半道便被流浪汉所杀。时在贞观元年九月，距离他陷害李瑗，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

在玄武门之变后，人们或许无法确切知道，唐朝的各级地方官吏到底利用派系斗争的时机制造了多少损人利己的阴谋和公报私仇的惨剧，但是仅从益州和幽州的流血事件中，人们还是能强烈感觉到这场政变所造成的冲击波，同时应该也能闻到，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后，大唐帝国的每个角落似乎都飘荡着一缕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息。史称："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虽然李世民屡屡颁布大赦令，但是仍然遏制不了人们争相告密以邀赏的汹涌势头。谏议大夫王珪对此忧心如焚，一再请求太子李世民设法制止。七月初十，李世民不得不再次颁下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此令重申：与玄武门事件和李瑗谋反案有所牵连者一律赦免，除非有人在此之后依旧图谋不轨，否则一概禁止相互告发，违令者将处以“反坐”之罪，也就是谁再告发别人参与谋反，自己将被视同谋反罪论处。

发布命令的次日，李世民随即派遣魏徵前往山东（崤山以东）地区进行宣慰，并委以便宜从事之权，实际上就是希望魏徵能以前东宫旧臣的身份，安抚散亡各地的建成余党，制止告密和滥捕滥杀之风。

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时，当地州县政府正用囚车押着两个人，准备送往京师问罪。他们是前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魏徵当即将囚车拦下，对当地官吏说：“我受命之日，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左右已经全部赦免了，如果再把他们捕送京师，必将人人自疑。就算派遣使者到处宣慰，又有谁肯相信？我今天不可以为了避嫌而不为国家着想，况且我既已受到‘国士’的礼遇，又岂能不以‘国士’的行为相报？”于是下令将李志安和李思行当场释放。

李世民在长安接到报告后，甚感欣慰。

他意识到，魏徵绝对是一个可以寄予信任和厚望的人。

在六月初四以后的这些日子里，随着新太子李世民的闪亮登场，有一个人正在悄然淡出人们的视野。

这个人曾经是帝国的最高主宰者，而眼下，所有大唐帝国的臣民却在用最快的速度将他遗忘，甚至是将他抛弃。

这个人就是李渊。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些日子里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他的心境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正在尝试着接受属于他的命运。

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正在主动地接受被天下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无论这份命运如何不堪承受，主动接受总比被动接受要明智得多，同时也要好受得多。

所以，早在李瑗谋反案之前，也就是六月十六日，李渊就已经给了心腹裴寂一道手诏，内容是：“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李渊通过这个方式向太子李世民主动表露了退位的意思。

这个意思当然是李世民最希望看到的。

六月二十九日，李唐朝廷正式撤销了天策府。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太子李世民的登基大典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李世民笼络人心

一朝天子一朝臣。

政治权力的交替必然伴随着帝国政坛的全面洗牌。

随着李世民登基日期的临近，李世民的左右心腹迅速进入了大唐帝国的权力核心，而麾下将领也全都进入了军队高层。

七月初三，以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七月初六，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七月初七，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

在这一长串的升官名单中，有一个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名单中的最后一个：李客师。之所以要特别提起这个人，是因为他是李靖的弟弟。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李靖并未参与玄武门之变，可如今他的弟弟居然出现在李世民论功行赏的升官名单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可以证明他们兄弟俩都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很多人对此持肯定观点。他们根据这份名单，判定李客师是李世民的手下，而且是政变的“打手”之一，并进而推断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其实这样的推论是很不可靠的。首先，单凭那一纸封官令，并不能得出李客师是秦王打手并且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结论，当然更不能得出李靖也参与其中的结论。道理很简单，前东宫将领薛万彻也在同一天被提拔了，可他恰恰是在政变当天与李世民死拼的人，我们能据此认为他也是李世民的打手吗？

再者，据《旧唐书·职官志》，李客师被提拔之前所担任的“右内副率”一职并非天策府的编制，而是东宫编制。也就是说，李客师要么是李建成的部下，要么是李世民当上太子后才任职东宫的，而并非原本就是天策府的人。

最后，在两《唐书》的李靖传后面，都附有李客师传，其中根本没有提及玄武门之变的事。如果他确实在玄武门立了功，为何在他的个人传记中只字未提？据我们所知，追随李世民参加政变的大大小小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提及，就算没有具体事迹，也会在相关的纪传中提到名字，为何只有李客师被漏掉了？

由此可见，并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李客师在政变中充当了李世民的打手。所以，认为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说法就更是无稽之谈。

既然李靖兄弟都未参与玄武门之变，那么李客师又怎么会和其他功臣一起出现在升官名单中呢？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李世民笼络李靖的一种手段。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也是李世民宽大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因为现在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秦王了，而是一个马上要当皇帝的人，所以他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旧的支持者，而应该包括全天下的人。换句话说，不管是原来的支持者，还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李世民都必须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姿态，这就叫“泽被天下”。

因此，李世民在这样一个时刻所抛出的这份升官名单，就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名单。

当然，其中出现的绝大部分人肯定都是一贯的支持者，但是除了支持者外，这份名单还必须出现另外两种人，那就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明新天子泽被天下的诚意，也才能真正收揽天下人心。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发现，前东宫将领薛万彻正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因为他是为了替李建成报仇而不惜与李世民刀兵相见、以命相搏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典型，还有谁更能成为典型呢？我们甚至可

以说，他绝对比魏徵、王珪等人更有资格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而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则可以视为中立者的代表。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有三。第一，其兄李靖在政变之前确实拒绝了李世民的拉拢，选择了中立，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李靖不相信李世民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取得成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靖错了。不被他看好的秦王不但成功夺嫡，而且转眼就将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对此，李靖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到心安。如果说这个皇帝登基后会找他“秋后算账”，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李靖越是感到不安，李世民就越要表现出对他一如既往地信任，这不但是做给他看的，同时也是做给其他中立者，比如李世勣等人看的。

第二，在政变之前，明哲保身、选择中立的人肯定不少，绝对不止李靖和李世勣，而最后之所以要笼络李靖，把他弟弟放进这份名单，是因为李靖在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统一战争期间，李靖强力辅佐李孝恭平定江南半壁，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可谓尽人皆知，所以原本一直看他不顺眼的李渊才会竖起大拇指说：“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旧唐书·李靖传》）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其当时盛名可见一斑。所以说，李靖在诸多中立者中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三，既然要选择李靖为中立者代表，为什么不直接升他的官，而是把他弟弟挑了出来呢？这恰恰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因为这么做既能让李靖感受到新天子既往不咎的诚意，又能避免刺激那些铁杆支持者的感情。假如李世民直接升李靖的官，首先他的官位很可能马上会跃居某些功臣之上，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次，没有参与政变的人居然也能堂而皇之地升官，难免会引起那些铁杆支持者的嫉妒和不平。而挑选李客师来当这个中立者代表，就能有效避免上述麻烦。这就是为什么进入名单的人不是李靖，而是李客师。

此外，从李世民登基后对李靖所做的连续提拔来看，也足以证明他确实有意笼络李靖。第二年，即贞观元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李靖提到了刑部尚书的高位；贞观二年，又让他以本官兼任检校中书令。

综上所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推行宽大政策安抚反对派，还是想方设法笼络中立者，其目的都是为了加速完成从藩王到天子的角色转换。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那是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曾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晋爵的时

候，我们反而落在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诸之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武德九年八月初八，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

大唐帝国首任天子李渊正式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

八月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正式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同日大赦天下，免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的田赋和捐税两年，免除其余各州差役一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时代，就从这一天起拉开了序幕。

在大力推行宽大政策、努力实现天下和解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赢得人心，李世民在登基前后还做了三件事情，迅速树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辉形象。

换言之，这是一个新天子上任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废除高祖李渊此前发布的宗教改革令，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四月，高祖曾采纳傅奕的谏言，下令对佛、道两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只在京师保留寺院三所、道观两所；天下各州，每州保留寺院和道观各一所，其余全部拆除；所属的僧、尼、道士、女冠一律还俗，勒归乡里。李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僧道队伍极其庞大，仅佛教僧侣就有二十几万之众，对社会确实构成了不小的负担，正如傅奕在奏章中所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可见李渊的这个裁汰令对于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佛、道两教则不啻一场灾难，所有宗教人士对这项改革肯定抱有强烈的反对情绪。

六月初四，即玄武门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义发布命令，让所有被迫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观，一切恢复旧制。此举无疑极大地赢得了宗教界的人心，同时也是对高祖政策的断然否定。尽管高祖的这项宗教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李世

民居然在第一时间就将其推翻，足以说明他是多么迫切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佛、道两教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民间团体，无疑是一支强有力的舆论力量。

第二把火是“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也就是释放宫中豢养的各种飞禽走兽，罢停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同时，给政府各级官吏提供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渠道，让他们的想法有机会直达天听，进而获得越级提拔的可能。此举固然是让百官对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献计献策，事实上也是鼓励他们批评旧政、放胆直言高祖一朝的执政得失。

第三把火是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让她们“各归亲戚，任其适人”，亦即放她们各回家乡，要么投奔亲戚，要么择夫而嫁。

上述举措，不管是“纵鹰犬”“罢贡献”，还是“百官上疏”“释放宫女”，其政治指向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与高祖一朝划清界限，揭露上一届政府在执政中存在的种种奢靡之风和弊端陋习，从而充分展示新天子的改革勇气和执政力度，并且树立起新一届政府“清正廉洁、简朴寡欲、以民为本、广开言路”的良好形象。

作为执政伊始的亮相之作，李世民这三把火可以说烧得相当漂亮，每一条新政策都使得相应的目标受众从中获益，所以迅速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史书对此的评价是：“政令简肃，中外大悦。”（《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八月末，正当李世民准备全力以赴治理天下时，北方边境再度燃起了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得知李唐王朝发生政变，顿时大喜过望，立刻与突利一起出动十几万骑兵南下，从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方向入寇，迅速逼近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李唐朝野震恐，京师宣布戒严。

二十四日，突厥的前锋部队开始进攻长安以北的高陵（今陕西高陵区）。李世民立即命尉迟敬德开赴前线御敌。

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与突厥会战，大破突厥前锋，擒获其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并斩杀一千余人。

然而，尉迟敬德的胜利并未挡住突厥人南侵的脚步。

二十八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突然进抵渭水便桥北岸，兵临长安城下。

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瞬间笼罩着刚刚经历巨变的李唐王朝……

赏赐功臣，以强宗室

一道难题摆在了登基还不到二十天的李世民面前。

是战，还是和？

作为曾经的最高军事统帅，李世民恨不得马上与突厥人开战；可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天子，李世民知道自己决不能草率行事。

因为国内政局未稳，一旦与突厥人全面开战，不但会对百姓造成负担，不利于新政权的建设，而且万一国内的反对派趁机起事，到时候内忧外患一齐袭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李世民只能暂时隐忍，与突厥人议和。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唐王朝换取一个和平发展、积蓄力量的机会。

颉利大军进抵渭水后，立即派遣心腹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刺探虚实。执失思力一见到李世民，马上用一种趾高气扬、胜券在握的口吻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如今已经到你们的家门口了！"言下之意是让李世民放弃抵抗，服从突厥人的意志。

可是，执失思力错了。

李世民并不是那么好讹诈的。虽然他已经做好了与突厥人谈判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向敌人示弱。相反，心里越是倾向于和谈，表面上就越是要摆出强硬姿态，拉出一副与对方决一死战的架势，才能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所以，李世民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执失思力一个下马威。只见他脸色一沉，冷冷地说："我与你们的可汗曾经当面缔结盟约，前后馈赠给你们的金帛不计其数。可你们可汗却背弃盟约，引兵深入，竟然还毫不惭愧！你虽是戎狄，亦有人心，怎能恩德全忘，大言不惭地自夸强盛？我今天就先砍下你的人头！"

执失思力大惊失色，慌忙请求恕罪。左、右仆射萧瑀、封德彝担心与突厥人闹僵，局面不好收拾，连忙替他求情，劝李世民按照礼节送他回去。李世民勃然作色："我今天送他回去，蛮虏一定认为我怕他们，就会更加放肆！"说完立刻命人逮捕执失思力，把他囚禁在门下省。

随后，李世民设下了一个疑兵计，然后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

玄武门，策马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河喊话，责备他违背盟约。就在颉利满腹狐疑之际，李世民等人的身后突然旌旗招展、铠甲耀目，漫山遍野几乎全是唐军。

颉利发现执失思力没有回来，原本就已经感到不妙了，现在看见李世民又有恃无恐地挺身而出，背后的唐军更是军容浩大，脸上不禁露出惧色。

李世民命军队稍稍退后严阵以待，然后独自一人留下来与颉利谈判。萧瑀觉得皇帝太过轻敌，立刻拦住马头劝阻。李世民说："我已计划妥当，你有所不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逼京畿，是以为我们国内有变，而朕新登帝位，势必不能抵抗。我如果示弱，闭门拒守，蛮虏必定纵兵大掠，局势就难以控制。所以朕单骑独出，以示轻蔑之意；又炫耀军威，显示决战之心，这一切肯定都出乎蛮虏的意料，让他们难以应对。蛮虏孤军深入，必有惧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战是和，我们都有把握。制伏突厥，在此一举，卿等尽管旁观！"

其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颉利主动请和。

八月三十日，李世民出长安西郊，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并馈以金帛。颉利可汗得到贿赂，如愿以偿地引兵北还。

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就这样被李世民化于无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

很显然，李世民在这个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然而，毋庸讳言，渭水之盟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毕竟这是城下之盟，唐朝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才换取了这个和平的结果。对此，李世民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对于后人来说，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对李世民本人而言，与其说这次结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光荣事迹，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心中长时间引以为憾的耻辱记忆。

换言之，在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堂堂李世民，还是无可奈何地被要挟了一把。

所以，就在颉利可汗得到贿赂、满载而归的同时，李世民正在用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口吻对萧瑀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

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在引兵北还的路上，颉利肯定颇有几分得意。他自以为这次趁火打劫非常成功，他自以为在李世民自顾不暇的时候咬他一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颉利并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入侵唐朝，也将是他最后一次从李唐皇帝的手中得到贿赂了。

很快，他就将为此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

通过短短三年的养精蓄锐之后，李世民就向颉利可汗挥出了复仇的铁拳，结果一拳就将东突厥砸得粉碎。而颉利可汗则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在长安度过了几年生不如死的软禁生涯，最后抑郁而终。

可见，李世民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绝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也绝不是毫无把握的吹牛，而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典型表现。

为了政权的巩固和百姓的安宁，李世民竭力避免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世民没有为战争作准备。尽管已经贵为天子，可李世民身上的尚武精神仍然没有丝毫减退。

就在突厥人撤兵的几天后，李世民立刻召集禁军将士训话。他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这并不值得忧虑。值得忧患的是每当边境稍微安宁，君王就沉湎于逸乐之中而忘记战争，所以敌寇一旦入侵就莫之能御。而今，朕不打算征调你们去开凿池塘、修筑宫苑，只要你们专心练习弓矢。平常无事，朕就当你们的教练；突厥入寇，就当你们的将军。如此，希望天下百姓能得享太平！”

随后李世民就把显德殿庭当成靶场，每天召集数百名禁军将士训练射箭。他亲自主持考试，中靶次数多者，就赏赐弓箭、刀枪、布帛，同时给予他们的将领上等考绩。

此举顿时让满朝文武瞠目结舌。

按照唐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也就是说，只要拿着武器进入天子所在的地方，一律要处以绞刑。如今皇帝居然天天带着一帮士兵在大殿前射箭，这算什么事？不但有失体统，而且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群臣吓坏了，纷纷劝谏说：“让一些卑微的士卒在宫殿中拉弓射箭，而陛下却置身于他们中间，万一有狂徒居心不良，暗中下手，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陛下这么做，是没有以社稷为重啊！”

有一个名叫封同人的地方刺史听说此事，专门从任职的韩州（今山西襄垣县）千里迢迢地赶回京师，就是为了面见李世民，劝谏此事。

然而，对于所有人苦口婆心的劝谏，李世民一概不以为然。

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从此与千古一帝李世民一起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没办法，这就是李世民。

他的胸襟、气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异于常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这些禁军士卒并没有辜负李世民。此后不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而且“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登基一个月后，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赏名单。

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一等功臣名单。

上面共有五个人，全部获封一等公的爵位，他们是：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封邢国公；尉迟敬德，封吴国公；杜如晦，封蔡国公；侯君集，封潞国公。

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最后一个：侯君集。

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和战功，他绝不在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力闭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立下某种特殊的功勋呢？

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书》更简略，只有七个字：“预诛隐太子尤力。”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

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 [1] 等。既然这四个人在政变中都是厥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们认为——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囚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逼宫行动，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统一指挥，而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估计，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 [2] ，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而可靠的代理人，出面帮他完成整个行动，而这个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

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

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从狭义上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

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囚父、逼父”之事。

也许正因为侯君集当年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时，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并且“歔欷下泣”（《旧唐书·侯君集传》）。

如此种种，都足以表明侯君集当年“所展之力”，实在非同寻常。

公布了玄武门之变的五功臣名单后，李世民还拟定了一张长长的开国元勋名单，同时论功行赏，分封食邑，并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公示，表示如有异议、认为“勋赏未当”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见。

名单公布后，文臣们没有意见，可一帮武将却炸开了锅。

很多将军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别人高，可如今封赏却比别人低，因此大为不满。其中尤以淮安王李神通的意见最大，他愤愤不平地对李世民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专弄刀笔之人，功劳却在臣之上，臣心里不服。”

对于李神通和武将们的牢骚，李世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他很清楚，这些提着脑袋出来打天下的武夫，对房玄龄、杜如晦这种文人本来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如今官位、勋阶、封赏居然都在他们之下，自然是满腹怨言。所以李世民故意要在殿前公示，并鼓励大家提意见，其实就是想借此机会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一点——如今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于往日。过去打天下，当然凡事都是武将优先；可现在要治天下，就必须以文臣为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今，老资格的宗室亲王李神通第一个跳出来，这样最好。只要把他说服，其他人就不敢不服。

所以，李世民毫不客气地告诉李神通：“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先起兵响应，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自营前途和躲避灾祸。其后，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死灰复燃，叔父望风败北。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要论功行赏，当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叔父虽是国之至亲，朕也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不能因为私情就与勋臣同赏！”

李神通无话可说。

其他将领看见李世民连自己叔父的面子都不给了，再闹下去只能是自讨苦吃，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互相说：“陛下是出于至公之心，就连对淮安王也无所偏私，我们这帮人又怎敢不安其分！”

随后人人噤声，一句牢骚也没了。

其实，李世民对自己的亲族绝不仅仅是“无所偏私”而已，很快他就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他还要对宗室亲王们“大加贬抑”。

有一天在朝会上，李世民忽然一脸正色地问群臣：“遍封宗室子弟，对天下是否有利？”

此言一出，很多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天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有一个人看懂了李世民的心思。

他就是封德彝。

这是一个极其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手，他一下就明白李世民想干什么了，于是站出来回答说：“过去的朝代，只有皇子、皇兄、皇弟才可以封王，其余人等，除非建立大功，否则无人可以封王。而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从两汉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亲王！爵位既然尊显，国家当然要供应大量劳役，这恐怕不是向天下人显示为政至公的做法。”

此言正中李世民下怀。他马上说：“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随后立即下诏，除了几个立有战功者之外，把所有宗室郡王全部降为县公。

在李渊当政的武德时期，由于国家草创、海内未宁，李渊只能把权力紧紧握在李唐皇族手中，不但将所有的族兄、族弟和族侄全部封王，而且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例外，试图以此达到“强宗室以镇天下”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家族企业的经营思维。

可是，到了李世民登基之后，天下已经安定，皇权的稳固并不需要建立在“强宗室”的基础上，因此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家族成员对“企业福利”的垄断，不惜“损宗室以利天下”。李世民这么做，首先当然是要否定武德旧政，开创“为政在民”的新政风，其次是通过牺牲皇室成员的利益，刻意迎合广大百姓的利益。对于天下人而言，这当然是他们乐见的善政。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刺”[3]。

举行葬礼的那天，李世民登宜秋门痛哭了一场。

也许，我们并不能把这样的表现完全视为作秀。

毕竟死者是自己的一母同胞，当李世民的政治目的一旦达成，过去的种种矛盾冲突与是非恩怨自然会逐渐淡去，一度被搁置的亲情就有可能被重新唤醒，而一度被压抑的无奈和悲伤也完全有可能悄然爬上李

世民的心头。

然而，无论李世民在宜秋门上的仰天一哭是真情所至还是政治表演，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注定要作为悲剧人物与即将过去的旧时代一同埋葬。

当天，魏徵和王珪联名上表，请求李世民送葬到墓地。李世民欣表同意，命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官员随同前往。

站在武德时代最后一个大风呼啸的冬天里，李世民看见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棺椁被缓缓放入幽暗的墓穴之中。当最后一抔黄土将他们轻轻覆盖，李世民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

萧瑟苍凉的武德冬天很快就被他遗落在身后。

在他的前方，一个华美灿烂的春天正朝他迎面走来。

偃武修文

公元627年农历正月初一，大唐帝国改元贞观。

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九岁。

虽然年未而立，但是一个独步古今的治世典范，却已经在这一刻从他的手中开启。

正月初三，李世民在宫中大宴群臣，命乐工即席演奏大气磅礴、震人心魄的《秦王破阵乐》。此曲是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时，由军中将士集体创作。他们为旧曲填入新词，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从此这首歌曲就成了唐朝的军歌。

在宴会上，李世民听着雄壮激越的《秦王破阵乐》，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朕昔日受命征伐，民间遂有此曲，虽然比不上文德之雍容，但功业由此而成，朕不敢忘本！"

旁边的右仆射封德彝一听，赶紧顺着天子的口气奉承说："陛下以神圣武功平定海内，岂是区区文德所能比拟。"

可是封德彝这次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李世民不以为然地说："戡

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封德彝顿时惭悚不能对，连忙顿首谢罪。

李世民很清楚，建立一个帝国需要凭借战争和武功，可要缔造一个盛世却必须依靠文治与教化。

换言之，如果说武德时代的关键词是征战与杀伐，那么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就是——文教和礼乐。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认知，所以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就开辟了名闻天下的文学馆，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十八学士”。登基刚一个月，李世民就再次在弘文殿的旁边建立了一所弘文馆，收集了经、史、子、集共二十余万卷的书籍，陈列于馆中，命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硕学鸿儒，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每隔一天到馆中值宿。而李世民则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见缝插针地将他们召入内殿，与他们探讨历代兴亡，商榷朝廷政事，经常谈到午夜才罢。

很显然，李世民要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天下人——兵戈横行、战火肆虐的日子已经远去，一个偃武修文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却还是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逆流而动。

他就是燕王李艺（罗艺）。

贞观元年正月十七日，时任天节将军的李艺突然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揭起反旗。

众所周知，李艺是李建成的死党。武德六年初，李建成平定刘黑闼后，推荐李艺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李艺从此对李建成死心塌地，在朝中公然以太子党自居，而且自恃军功，所以就没把秦王府的人放在眼里。据记载，秦王左右的人有一次到他军营中办事，不知何故，双方起了冲突，李艺就把秦王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李渊觉得李艺做得有点过分，为了公平起见，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可李渊一直很器重李艺，所以没过多久就把他释放了，不但让他官复原职，而且还以本官领天节军镇守泾州。

李艺殴打秦王手下的原因，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估计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李艺为了表明自己对李建成的死忠，故意找秦王手下的麻烦；

或者是秦王府的人看不惯李艺的太子党嘴脸，言行举止有所冒犯，所以激怒了他。但是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李艺与秦王的关系在武德后期极度恶化，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当太子被杀、秦王即位后，李艺自然会感到惶恐不安。他意识到，就算李世民不收拾他，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也完蛋了。

果然，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艺封了个“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李艺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褫夺他的兵权了，于是更加恐惧。正在此时，一个名叫李五戒的女巫又煽动李艺的妻子孟氏说：“王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氏窃喜，又让李五戒偷偷观察李艺。李五戒说：“王妃之贵，缘于大王，而今大王贵气已现，十日间当升大位！”孟氏狂喜，于是不断怂恿李艺兴兵反叛、争夺天下。

在当时那种天下一统、四海归心的形势下，举兵造反无异于找死。

但是李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因为造反是找死，可不造反就是等死，所以李艺豁出去了。

起兵造反起码还有一线生机，实在不行还可以逃奔突厥，再怎么样也比待在这里被李世民温水煮青蛙慢慢弄死的好。

主意已定，李艺就诈称奉皇帝密诏，要勒兵入朝，遂发兵进抵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不辨真假，只好硬着头皮出城迎接，李艺随即入据豳州。

李世民得知兵变消息，立刻下诏，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出任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朝廷已经发兵征讨李艺，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白白送给李艺一座城池。为了将功补过，赵慈皓连忙暗中与豳州将领杨岌谋划，准备对付李艺。不料事情泄露，赵慈皓随即被李艺囚禁。杨岌在城外察觉有变，立刻发兵攻打李艺。

此时此刻，李艺的手下将士已经知道所谓的奉密诏入朝纯粹是个骗局，所以没人愿意替他卖命。双方刚刚接战，李艺的部众便哗然溃散。李艺万般无奈，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带走，率左右数百骑仓皇北走，亡奔突厥。

可是，就连这最后的几百个亲兵，也没人肯跟着李艺去当突厥人的鹰犬。所以一行人刚刚跑到乌氏驿（今甘肃泾川县北），左右就趁李艺不备，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即传首长安。李世民立刻革去李艺的皇

姓，将其首级挂在闹市示众，同时逮捕其妻孟氏、女巫李五戒，一同在闹市斩首。不久，罗艺的弟弟、时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都督的罗寿，也坐罪被诛。

罗艺的造反就像是一场闹剧。

朝廷的讨伐大军还没走出长安，他的首级就被左右砍下送到了京师，可见他的造反实在是不得人心。此外，罗艺自隋朝末年起便是威震一方的猛将，身经百战，强悍骁勇，而今败亡却如此之速，也足见当时的军队将士在历经多年战乱之后，是多么厌倦战争，渴望和平，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李世民偃武修文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贞观元年五月，李世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贺礼。

这就是北方残余的两大割据势力之一——苑君璋的归降。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枭雄中，这个苑君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典型的骑墙派。他本是刘武周的部下，当初刘武周要发兵进攻李唐时，苑君璋就曾经劝他说：“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纷纷归附，海内望风而降，此乃天命，非人力可为。况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孤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一方面联合突厥，一方面结援唐朝，而后自保一方、南面称孤，方为上策！”

如果刘武周采纳苑君璋的建议，那即便没有大的作为，起码也可以偏安一隅，让自己的割据政权活得更久一点。可野心勃勃的刘武周却没有采纳，而是命苑君璋镇守朔州，然后倾巢南下，最后果然血本无归。兵败之时，刘武周后悔不迭、扼腕泣下，对苑君璋说：“恨不用君之言，乃至于此！”

刘武周死后，苑君璋接管了他的剩余地盘和势力。东突厥封苑君璋为大行台，派遣了一支军队协防，名义上是督兵助镇，实际上是在监视他。当时高祖李渊多次遣使劝苑君璋归降，可苑君璋一心想要在突厥人和唐朝之间玩平衡术，所以始终没有答应。但是其部将高满政却有心归唐，于是劝他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旧唐书·苑君璋传》）苑君璋不从，高满政只好发动兵变，企图迫使他就范。苑君璋猝不及防，只好逃亡突厥。

高满政以城降唐后，被任命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苑君璋为了报仇，于武德六年引突厥兵南下，攻破马邑（朔州治所，今山西朔州市），杀了高满政，随后退保恒安（今山西大同市）。但是此后的几年中，随着李唐王朝国势日隆，苑君璋部众人心离散，不断有人叛逃

唐朝。苑君璋势蹙，不得不向高祖李渊请降，并在降表中提出“请捍北边以赎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苑君璋这个要求看上去好像很有诚意，其实无非还是想玩他那套政治平衡术。

然而，苑君璋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落空了。

虽然李渊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遣使臣元普与其签订协约，并赐给他免死金券，但是颉利可汗听说后却大为不满，立刻遣使向他施加压力。

苑君璋的骑墙术遭遇了尴尬。处于两大强邻之中，苑君璋不但未能左右逢源，反而颇有左右为难、骑墙难下之势。他的儿子苑孝政心向李唐，于是对他说：“刘武周殷鉴不远。如今既已降唐，就不应再归突厥，否则是自取灭亡。况且粮储已尽，人心离散，如更迟疑，祸在旦夕！”可他的一个幕僚郭子威却心向突厥，极力游说他：“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地险城坚。而今突厥方强，足可倚为后援，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苦降于李唐、束手于人呢？”

苑君璋最后还是听信了郭子威之言，翻然撕破那一纸墨迹未干的协约，逮捕了唐朝使臣元普，将其押送突厥，并再次投靠了突厥人，随后频频与突厥联兵，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边境。

这一次苑君璋是打算彻底依附东突厥，死心塌地把屁股挪到墙的那一边去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度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间就日薄西山了。

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接连遭遇了一连串严重问题。到了贞观元年前后，这棵昔日的大树不但不能再荫庇他，而且本身都已摇摇欲坠。苑君璋痛定思痛，最后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墙的这一头——率众归降唐朝。

至此，这棵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终于有了归宿。而自从隋朝末年以来便一直为患边境的这股割据势力，也总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怀抱。

这对于即位不久的李世民而言，当然是一份特殊的贺礼。所以李世民并没有亏待苑君璋，随即任命他为隰州（今山西隰县）都督，封芮国公，并赐食邑五百户。

那么，东突厥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苑君璋这个一贯首鼠两端的人最终下决心归降李唐呢？

答案是四个字：天灾人祸。

首先是人祸。东突厥自从始毕可汗以来，国势之所以日益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简便易行，符合突厥人质朴的天性，至颉利可汗执政初期，仍然保留着这个优良传统，所以国力依旧强大。但是到了后期，颉利专门宠信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此人得宠之后作威作福，将突厥的种种制度、政策和法令悉数变更，导致政令烦苛，国人不胜其扰，大为不满。加上颉利可汗又与敕勒诸部族交恶，频频与其中的薛延陀、回纥等部交战，因此内政大乱，国力日衰。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东突厥局势日益严峻之时，又连续几年遭遇罕见的雪灾，致使牲畜普遍死亡，民间爆发了大规模饥荒，百姓纷纷冻馁而死。颉利眼见国库日渐空虚，王庭的各项开支捉襟见肘，不得不对突厥各部落征收重税。这样一来愈发导致恶性循环，突厥民众不堪负荷，“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到了贞观元年秋天，东突厥已经日暮途穷，彻底暴露出亡国之兆，于是唐朝的大臣们纷纷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攻击突厥。

很显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尽管已经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准备专心致力于内政建设，但是在如此诱人的机会面前，李世民还是心动了。

他召集了萧瑀、长孙无忌等宰执重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发兵攻击，则背弃了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可要是不打，又会坐失良机，你们认为该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巴不得雪洗渭水之盟的耻辱，所以担心违背盟约云云，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他真正的难处并不在于是否会违背盟约，而在于是否会违背他刚刚确立的大政方针。

要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绝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虽然此时的突厥虚弱不堪，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所以尽管李世民内心跃跃欲试，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希望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分成了两派，萧瑀等人赞成出兵，而长孙无忌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蛮虏并未侵犯边境，所以臣以为不便开战。理由有三：第一，违背盟约；第二，劳民伤财；第三，非王者之

师！”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停止了对突战争的动议。

其实，真正让李世民放弃战争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劳民伤财。

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早日达成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后还是放弃了平灭突厥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

他知道，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治。

贞观元年初秋，李世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弃了对突战争，可紧接着在九月份，他却不得不发布了另一道战争命令，进攻目标是岭南的酋长冯盎。

此人其实很早就已归顺唐朝，却长年与其他部落相互攻击，而且不到长安朝贡，所以与他毗邻的唐朝各州纷纷上表，奏称冯盎反叛，请求朝廷下令征讨，前后奏章不下数十件。

像这样的战争，李世民就认为非打不可了，因为冯盎的性质是叛乱，与突厥截然不同。所以李世民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命江南、岭南数十州的军队，共同出兵讨伐冯盎。

然而，有一个人对李世民的战争决策却大不以为然。

他并不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

这个人就是魏徵。

就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夕，魏徵极力劝谏李世民：“如今天下初定，而岭南瘴气流行、路途遥远，无法驻扎重兵，况且指控冯盎叛乱的证据并不充分，臣以为不应兴师动众。”

李世民说：“检举冯盎的奏章不绝于途，怎能说证据不充分？”

魏徵说：“冯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如今对他的指控已有数年，而他的军队始终没有越出辖区，显然并不是反叛。只因江南各州众口一词，都说他反，陛下又从不曾遣使安抚，冯盎畏惧一死，当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遣使臣前往，示以至诚，冯盎喜于免祸，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

李世民一想，魏徵之言确实有道理，自己终究还是百密一疏了，于是即刻收回战争命令。

这年十月，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抚，冯盎果然马上让他儿子率使团到长安觐见朝贡。李世民大为感慨，在朝会上对群臣说："魏徵让我派出一个使节，岭南遂得以安定，其效果胜过十万雄兵，不可不赏！"随即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

李世民即位之后，大唐王朝一连多次化解了战争危机，从而牢牢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执政路线。在此，除了要归功于李世民本身的隐忍、明智和审慎之外，长孙无忌、魏徵等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能够上下一致、协力同心，大唐帝国才赢得一个休养生息、长足发展的机会，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李世民的品格、能力、智慧与韬略，也从此开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上尽情展现，并且大放异彩。

弃霸道择王道

李世民即位之初，虽然海内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经走过九个春秋，但是李世民从高祖手中接过来的却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也就是说，经历隋末唐初的多年战乱之后，人口数量急剧萎缩，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普通百姓虽已逃脱战争和死神的魔爪，却依旧生活在饥寒与贫困的阴影之中。

大乱之后，如何求治？

如果把几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线图，那么此刻的大唐王朝无疑正处在一个长达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公元220年大汉帝国覆亡之后，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纷争的黑暗岁月里呻吟和板荡，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中华帝国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轨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点燃。然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隋炀帝杨广却粗暴地葬送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在位仅十余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场幻梦，在短暂的精彩之后破灭无余，中华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织

的乱世深渊。

而此时此刻，在隋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国，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历史教训，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在大一统的基础上重建一条坚实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于大汉王朝那样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抑或仍旧实行强力统治，骄奢纵欲，穷兵黩武，重蹈隋王朝的历史覆辙，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昙花一现？

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一道历史课题。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捩点上，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数月后，大唐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

准确地说，这是一场辩论。

话题由李世民提出。他说："我朝承大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见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观点："不然。长期安定之人容易骄逸，骄逸才难以教化；而久经离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于治理。譬如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

李世民说："贤明的人为政百年，才能祛除残忍好杀之风。大乱之后，欲求大治，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达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频频颔首，深以为然。

可是，魏徵的观点立刻遭到大多数宰执重臣的反驳。

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

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败乱国家！"

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应对："五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淳厚质朴，后世浇薄诡诈，那么迄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顿时语塞，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但他们坚持认为：魏徵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断不可行。

很显然，魏徵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而"政"的语源是"正"，确实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所以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克己修身，进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治理天下；同时轻刑罚、薄徭赋、发展生产、选贤用能，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场则是与王道对立的霸道。

所谓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权术、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完全不服从周王室的统治，竞相以武力与权谋进行杀伐和兼并，于是产生了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等所谓春秋五霸，从而构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论基础。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而后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让人"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后世儒者所不齿。

发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而以封德彝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

然而，最终结果却是魏徵胜出了。

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不久后，李世民就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从此，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处就是宽减刑罚。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人依旧未脱"乱世用重典"的旧习，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地说："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赋繁役重，二是官吏贪求，所以饥寒交迫，才顾不上礼义廉耻。以朕看来，对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又何须用重法！"

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弘文馆诸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五十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之后，李世民还是觉得此刑过于残酷，于是对朝臣说："废除肉刑，由来已久。[4] 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所以此法仍须改易。"有人随即提出，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

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时的长安官场，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5] 此计一施，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仅仅是一匹绢，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

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

贞观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摆摆手说："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

此事足以证明，经过"王霸之辩"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诚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无疑就是寡欲。

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资治通鉴》总结说：“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大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古代中国常有“十羊九牧”之说，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隋文帝时，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十羊九牧”的状况。但是从隋大业年间起，“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李唐崛起之后，群雄相率来归，李渊“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是从贞观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此后，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观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会要》）。

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又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有隋一朝，长安的各级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大唐帝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史称：“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然而，这种四海升平的繁荣景象却是来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的局面。贞观元年，关中饥荒，物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与一匹绢相当；贞观二年，全国又遍地蝗灾；贞观三年，有些地方旱情严重，而有些地方却又洪涝成灾……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李世民却能矢志不渝地坚持王道路线，“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并且“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所以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整个帝国的形势便焕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政要》卷一）。而多年来一直侵扰中原的东突厥也在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对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贞观之初，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独魏徵劝朕推行王道。同时很多人上疏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可魏徵还是劝朕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采纳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几年，果然收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劲敌，而今颉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长甚至成了朕的带刀侍卫，各部落皆服中国衣冠，所有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的这一席话，不仅高度肯定了魏徵对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充分表明——武德九年那场“王霸之辩”确实对整个大唐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换言之，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黄金时代——贞观。

太上皇李渊的忠臣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手中的权力日益巩固，大唐王朝也日益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

这样的时刻，李世民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正月，李世民用一种阴冷的目光锁定了朝中的一个大臣。

这个人曾经是武德年间满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风光的一个人物。进入贞观后，他仍然身居高位，名重一时。

他，就是时任司空的裴寂。

众所周知，裴寂是晋阳首义功臣、李唐开国元勋，深得李渊宠信。登基之初，李渊就曾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随后拜其为尚书右仆射，赏赐华服珍玩无数，并且每天赐以御膳，临朝之时，必引裴寂同坐，极尽恩宠之能事。《旧唐书·裴寂传》称："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进犯并州、横扫河东，裴寂自告奋勇率兵出征，结果丢盔弃甲，铩羽而归。李渊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几句，表面上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实际上没过几天就把他放了，而且"顾待弥重"，恩宠不减往日。此后不久，另一个开国元勋刘文静企图与裴寂争宠，却被李渊和裴寂以谋反之名联手铲除。可见在武德一朝，裴寂第一宠臣的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撼动。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李渊又擢升裴寂为左仆射，并赐宴于含章殿。裴寂故作谦恭地辞让了一下，表示既然天下已经平定，自己就应该告老还乡了。李渊一听就急了，眼泪哗哗地下来，十分动情地说："未也，要当相与老尔。公为宗臣，我为太上皇，逍遥晚岁，不亦善乎！"随即加封裴寂为司空，赐食邑五百户，而且派遣一名官员天天到裴府蹲点，生怕他偷偷挂冠而去。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李渊对裴寂的宠信早已超出君臣的范畴，可以说有深厚的私谊。

李世民即位后，一开始对裴寂也显得恩宠有加，优礼备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与前共计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返程时忽然命裴寂和长孙无忌与他共乘御辇，以示尊崇。裴寂受宠若惊，不敢奉命。李世民笑着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旧唐书·裴寂传》）

恭敬不如从命。最后裴寂只好硬着头皮与天子同乘而归。

也许正是从"同乘"的这一刻起，裴寂就已经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了。因为李世民的那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一种莫大的恩宠，实则充满了弦外之音。

因为，李世民所说的"佐命之勋"，无疑是在向裴寂强调——你佐的是我父亲的命，不是我的。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是在夸奖裴寂，还不如

说他是在警告裴寂——不论你有多大的“佐命之勋”，你终究是太上皇的人，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

裴寂不无恐惧地发现：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自己当初的“佐命之勋”不但不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政治资本，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随时有可能被连根拔掉。换言之，自己的荣宠到头了。

裴寂的恐惧很快变成了现实。

贞观三年正月，李世民突然颁下一纸诏书，罢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职，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并且将他驱逐出京，遣返原籍。

当然，李世民要清除裴寂这种功高望重的元勋老臣，总是要找一个理由的。

或者说要找一个借口。

这次的借口缘于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

武德年间，法雅得宠于高祖，因而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可到了贞观初年，法雅的这项特权被取消了，于是他心怀怨恨，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的“妖言”，随即被朝廷有关部门逮捕。兵部尚书杜如晦亲自审理此案。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杜如晦亲自审问的结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

据法雅供认，裴寂曾经听他说起过那些“妖言”，可裴寂却没有及时上报。也就是说，裴寂犯了知情不报之罪。

有关部门查到了裴寂头上，裴寂当然矢口否认。但法雅却死死咬住他不放，令他百口莫辩。最后杜如晦从容结案，裴寂罪责难逃。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桩十足不合常理的案子。

首先，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怪话，居然把兵部尚书杜如晦都惊动了，这不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之嫌；其次，杜如晦除了兵部尚书的身份外，还是皇帝李世民的心腹重臣，这就更容易让人产生微妙的联想；最后，单凭和尚法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裴寂有罪，似乎也显得过于草率。毕竟裴寂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虽说没有掌握实权，但也是堂堂的开国元勋，如此草率将其定罪，其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说白了，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裴寂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找他麻烦的人不是什么和尚法雅，也不是什么兵部尚书杜如晦，而是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皇帝李世民。

尽管明知道李世民不能容他，可裴寂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央求皇帝让他留在京城养老。

然而，他的要求遭到了李世民的一口回绝。

不但一口回绝，而且李世民还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数落了一番。

数落的对象不仅是裴寂，还包括李渊。

李世民说："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论先生的功勋，岂能擢升到如此高位？你不过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泽，侥幸在群臣中位居第一而已。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朝纲紊乱，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只因念在你是故旧，不忍心依法处置，你能活着回到家乡，已经是万幸了！"

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裴寂还能怎么办？

他当然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不过，裴寂离开长安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丝庆幸的。

因为李世民说得没错，能让他活着回老家，确实是已经法外开恩、手下留情了。换句话说，就算李世民找个更严重的罪名砍他的头，甚至是抄他满门，裴寂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在凄凉的返乡路上，裴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刘文静——同样是首义功臣、开国元勋，一朝不能见容于皇帝李渊，便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倘若今天的李世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裴寂很可能会死得比刘文静更难看。

所以，没有步刘文静之后尘，得以全身而退，保一个善终，裴寂实在是要谢天谢地了。

李世民将裴寂逐出朝廷不久，就为刘文静平反昭雪，不但下诏追复了他的官爵，让其子刘树义承袭了鲁国公的爵位，还把一位公主许配给

了刘树义。

毫无疑问，这是对刘文静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和补偿。

裴寂黯然回到了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本以为离开了长安的是非之地，总算可以安度晚年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更倒霉的事情随即接踵而至。

无独有偶。上一次疯和尚法雅随口说了几句“妖言”就让他倒了大霉，而这回一个叫信行的狂人又大放厥词，差点要了裴寂的老命。

这个信行是个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裴寂的家童，忽然心血来潮地附在他的耳边说：“你知道吗？裴公是有天命的人啊！”

家童把这话告诉了裴府的管家恭命。后来恭命又向裴寂做了禀报。裴寂一听之下，当即吓得目瞪口呆，浑身暴汗。

说他“有天命”，这不等于是说他想造反吗？这可是满门抄斩、十恶不赦的大罪啊！

按照常理，听到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裴寂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当地官府，将传话的人逮捕问罪，借以洗脱干系。

可是，眼下裴寂根本不敢这么做。

因为他本来就是戴罪之身，如今传播这句话的人又是自己的家童，他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洗不脱干系的，更何况皇帝李世民原本就愁抓不他的小辫子，要是裴寂主动报官，那无异于自寻死路。

所以，裴寂绝对不能报官。

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灭口。

当时信行已经死了，于是裴寂就让恭命马上杀掉那个传话的家童。

恭命嘴上唯唯，可一转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个家童放掉了。

因为他心里另外藏着一本小九九。

恭命是裴寂十分信任的管家，专门负责收纳封邑之内的各种贡赋。经手的钱多了，恭命自然就起了贪念。他前后侵吞了一百万的巨款，并

且早已挥霍一空。因此，他这次之所以放走家童，就是准备东窗事发的时候，拿手里的把柄和证人要挟裴寂。

果然，“天命事件”过去不久，恭命侵吞钱财之事就败露了。裴寂怒不可遏，立即遣人捉拿。恭命连忙一口气逃到长安，向朝廷告发了这件事。

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宣布了裴寂的四大罪状：“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裴寂）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旧唐书·裴寂传》）

李世民本来完全可以置裴寂于死地，可很多朝臣替他求情，说裴寂罪不至死，应该发配，李世民最后便把他流放到了静州（今广西梧州市）。

短短几个月之内，裴寂两次遭贬。他万念俱灰地走在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上，感觉这就是自己人生的末路。

他知道自己终将在这遥远的边瘴之地了却残生。

不久，静州境内的羌人作乱，有人立刻奏报朝廷，说造反的羌人要拥裴寂当首领。

可这一次李世民却没有听信谣传。他很有信心地说：“国家对裴寂有性命之恩，他必定不会造反。”

是的，李世民的判断没错，裴寂没那么傻。即便屡遭贬谪，裴寂还是想尽力保住自己的晚节，就算不替自己着想，他也要为子孙后代的富贵和前程着想。所以，为了平息谣言，同时为了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裴寂毅然披上戎装，率领家丁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裴寂最后的表现终于换取了李世民的谅解。

他随后就接到了一道征召他还朝的诏书。

然而，年老多病又频遭变故的裴寂已经不可能回长安了。接到诏命的几天后，时年六十的裴寂便在抑郁而苍凉的心境中一病而亡。

尽管裴寂最后得以善终，并且保住了晚节和子孙富贵，但是相对于武德时期所享有的荣宠，他的晚年可以说是相当不幸的。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裴寂晚年不幸的根源，绝非出于什么和尚法雅与术士信行的所谓“妖言”，而是在于天子李世民。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因为李世民心中深藏已久的某种报复心理。道理很简单：从晋阳起兵之后，裴寂就经常与李世民意见相左，双方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武德二年，李世民的心腹刘文静又遭裴寂排挤，并一举被诛；到了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裴寂又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反对李世民……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李世民报复吗？

可是，难以理解的是，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贯表现得宽容大度，为什么唯独会对裴寂存有报复心理呢？他即位之初，曾以既往不咎的和解姿态赦免了数以千计的前太子党和所有政敌，从而赢得了天下人心，可为何到了时过境迁的贞观三年，却仍然不放过裴寂呢？

其实，李世民对裴寂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心理，更主要的是出于某种潜在的政治需要。

这种政治需要并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实。

那么，对于贞观三年的李世民来说，什么才是最现实、最迫切的政治需要呢？

答案只有一个——正位太极宫。

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位的时候，李渊还住在太极宫中，所以他只能在东宫的显德殿举行登基大典。时至贞观三年，身为皇帝的李世民不管生活起居还是治理政务都仍然还在东宫里面，这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觉得好受，况且也有名实不副之嫌。考虑到李世民夺嫡继位又是采用了非正常手段，本来就已存在某种“合法性危机”，而始终不能正位太极宫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危机。

所以，李世民必须尽早进入太极宫，不管采用什么办法。

但是，李渊毕竟是太上皇，只要他一日不挪窝，李世民就搬不进去。

这是李世民在贞观初年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该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李渊主动迁出太极宫。因为任何强迫手段都会让李世民招致骂名。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李渊主动迁出呢？

当李世民若有所思的目光在满朝文武中来回巡视，最后落在裴寂身上的时候，一个巧妙的主意就浮现在他的脑中了。

是的，只有这么干了。李世民对自己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贞观三年的春天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裴寂被逐出朝廷，并一贬再贬，最后死于流放之地；刘文静被彻底平反，子孙得享恩荫；李世民对武德旧政的否定和攻击突然从间接、隐晦转为直接和公开……所有这一切，最后无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些政治事件注定会对某个人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在他的内心世界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

这个人是谁？

他当然就是李渊——大唐王朝的太上皇李渊。

李渊：被遗弃的太上皇

武德九年八月以后，尽管唐高祖李渊头上依旧挂着一个“太上皇”的头衔，可这顶帽子不仅不能给他带来尊贵和荣耀，反而只会让他感到沉重和压抑。

古人说：“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集解》）

可在李渊看来，史书上的这种定义和解释毋宁说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从李世民登基御极的那一天起，李渊感觉自己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李世民每颁布一条新政策，都无异于在他脸上狠狠掴了一巴掌——

玄武门事变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李渊刚刚施行的宗教政策，让所有已经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回寺院道观；几天后，李世民又宣布“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紧接着，他又下令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意味着什么呢？

这显然是李世民在和武德旧政划清界限，同时向天下人表明——李渊执政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必须及时予以揭露、批判和纠正。

这难道不是在打李渊的耳光吗？

面对李世民的左右开弓，李渊只能一忍再忍，打脱牙也要和血吞。而更让李渊始料未及的是，到了贞观三年春天，李世民的“掌掴行动”就突然升级——将裴寂放逐，给刘文静平反，并且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武德旧政。这一切已经不只是在抽耳光了，它们更像是一记记重拳狠狠地砸在李渊的心上。

“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旧唐书·裴寂传》）

按照常理，当前任皇帝仍然在世的时候，这种话几乎是不可能从一个现任皇帝的口中说出来的。然而，李世民还是理直气壮地把它们说出来了。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力重千钧，足以把李渊原本就抑郁寡欢的精神彻底压垮。

李渊很清楚，当年自己不但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意愿废黜李建成，改立他为太子，还对他极力打压，甚至差点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一切一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可李世民始终没有原谅他。此刻李世民之所以拿裴寂大做文章，还替刘文静平反，并且公然把武德政治涂抹得一团漆黑，贬低得一无是处，除了出于一定程度的报复心理之外，其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施加压力，并且向他发出强烈的暗示——让他主动迁出太极宫。

看来，自己是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座象征着权力和尊严的太极宫中了。

李渊无奈而悲凉地想，既然迟早要被人“请”出去，那还不如识相一点，主动滚蛋，免得到时候大家难堪。

贞观三年四月，也就是裴寂死后不久，太上皇李渊终于“主动”提出，愿意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表面上的迁居理由是这样的：“高祖以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乃徙居之，改名大安宫。”（《唐会要》卷三十）

众所周知，弘义宫就是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无论建筑规格、占地面积还是庭苑规模都远远不及太极宫，甚至远不及东宫，说高祖“雅好

之”，愿意主动搬过去住，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刚刚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高祖就主动要求迁居，这恐怕也并不是巧合。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后，李世民总算达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可以冠冕堂皇、顺理成章地入主太极宫了。

离开太极宫的那天，李渊悄然回望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巍峨华丽的皇宫，一种巨大的苦涩和感伤瞬间攫住了他。

他在心里默默地告别这熟悉的一切，同时也与过去的辉煌记忆彻底诀别。

那一刻，李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而位于宫城之外的那座弘义宫，则是一个丧失一切、寂寞潦倒的老人最后的收容所。

搬进大安宫（弘义宫）后，李渊在这里又生活了六年，直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去世。与其说这六年间李渊是在一座有着山林胜景的宫殿里安度晚年，还不如说他是在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凄凉岁月。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大安宫的各方面条件与太极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监察御史马周的一道奏疏中得到佐证。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正月，马周上疏说：“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旧唐书·马周传》）

马周认为，大安宫地处宫城之外，过于偏僻，而且规格至为卑小，与太上皇的至尊身份不太相称，无论是在番夷人还是在四方百姓看来，都显得有点丢份。所以，马周提议修缮扩建，而且务必要高大显赫，如此才能符合天下人的愿望，同时体现皇帝对太上皇的孝心。

马周其实是在暗示李世民——就目前状况而言，陛下在孝道上实在有所亏欠，唯一能弥补的办法，就是赶紧提升大安宫的规格，改建得壮观一点，以免天下人说闲话。

很显然，马周的劝谏触及了当时人人避讳的一个敏感问题。

李世民看过奏疏后，既没有责怪马周，也不采纳他的建议，只是一笑置之，丝毫没有扩建大安宫的意思。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除了居住环境不太理想之外，李渊在大安宫的生活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那就是——缺乏行动自由。

从前的李渊是一个坐不住的皇帝。武德年间，尽管建国初期政务繁忙，而且统一战争仍未结束，可李渊还是经常以巡幸、狩猎、避暑等名义，马不停蹄地四处游玩，东到华山（今陕西华阴县）、西到稷州（今陕西周至县）、北至宜州（今陕西宜君县），尽情地享受着皇权赋予他的无上权力和自由。

可是，自从成为太上皇，尤其是搬进大安宫以后，李渊就连一次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样的生活与过去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在大安宫生活的六年里，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之外，李渊几乎是足不出户。

不是他不想出来，而是根本没有机会。

因为李世民没有给他机会。

这一切当然又被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看在眼里。

不久，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宫（今陕西麟游县）避暑，马周听说后，马上又毫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奏疏，说："臣又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为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凊之道，臣窃未安！"（《旧唐书·马周传》）

如果说前一道奏疏的措辞还比较委婉的话，那么这一次马周的口气则要尖锐得多。他摆明了就是在批评皇帝——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时年六十七岁），陛下应该每天探视他的饮食起居，而现在您居然自己跑到三百里外的行宫避暑，万一太上皇想你了怎么办？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没错，可您把老爷子扔在热烘烘的大安宫里，自个儿跑去九成宫凉快，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所谓"温凊之道"，就是冬天要让老

人家得到温暖，夏天要让老人家享受清凉，可您却把这些孝道抛到脑后，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安啊！

尽管马周的谏言和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可李世民的态度照旧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纳，仍然把李渊留在大安宫里，于这一年三月径自去了九成宫。

此后的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五月和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三月，李世民又连续两次去九成宫避暑，可始终没有带李渊同行。直到贞观八年的七月，李世民才“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

这是否表明李世民终于想通了，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对高祖履行“温清之道”了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高祖李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他患的是“风疾”，也就是中风。

所以，不论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请，也不论李渊本人多么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经走不动了。

对于高祖的病情，李世民当然是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那么李世民此举有多少诚意呢？明知道高祖已经卧床不起了，才屡屡向老人家大表殷勤，那早几年李渊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他干吗去了？

贞观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诏，开始兴建大明宫，表面上说是要“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太上皇李渊已经无福消受了。

果不其然，大明宫刚刚拔地而起，李渊的病情就日渐沉重，“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卧病大半年的李渊终于在大安宫的垂拱殿驾崩，终年七十岁。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这个晚年遭遇巨变落入凄凉之境的孤独抑郁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告别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世界。群臣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同年十月，葬高祖于献陵。

高祖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早在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随着李渊手中那碗水逐渐朝太子一方倾斜，李世民对父皇李渊的敬意和温情就已变得日

渐稀薄，双方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当李世民不得不采用阴谋和暴力的手段从李渊手中夺取最高权力后，原本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就更是雪上加霜——即便不说荡然无存，起码也是形同虚设。

在权力斗争面前，亲情是苍白而脆弱的，所谓“父慈子孝”的人伦大义最终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政治对亲情的扼杀。

玄武门事变后，双方之所以还能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其实只是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确保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而已。

简言之，这是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贞观年间，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纯粹是虚有其表，毫无真情可言。

既然如此，李世民对死去的高祖又怎能有什么思念之情呢？

真正让李世民痛彻心扉的，不是高祖之死，而是短短一年后另一个人的死亡。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因病去世，十一月葬于昭陵。李世民万分悲伤，“念后不已”，遂“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也就是在宫城的御苑中建筑了一座瞭望台，经常在此眺望，以慰思念之情。

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徵同登瞭望台，又让魏徵和他一起眺望昭陵。魏徵说：“臣眼花，看不见。”李世民觉得非常奇怪，又指给他看了一次。

魏徵忽然说：“哦，臣以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献陵。如果是说昭陵，那臣早就看见了。”

李世民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魏徵这是在趁机进谏啊！

说白了，魏徵就是拐着弯在骂他——一门心思只想老婆，却把死去的老爹抛诸脑后，你于心何安？

李世民十分尴尬，只好含泪命人拆毁了这座瞭望台。

不管昭陵还是献陵，我干脆什么陵都不看总成了吧？

这件事情，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夫妻情深，但与此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的父子情薄。

一直到李渊去世许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争，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的冲突中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时，他才蓦然体会到高祖在武德年间的苦衷，从而反思自己在高祖晚年的所作所为，并且发自内心地涌起对高祖的惭悚和愧悔之情。

我们前文曾经提到过，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在偶然读到一篇讨论孝道的古代文章后，曾极为伤感地对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这显然是一种真实而痛切的忏悔。

只是不知道这种迟来的忏悔，可否告慰高祖李渊的在天之灵。

[1] 虽然高祖"泛舟海池"一幕有所虚构，但是尉迟敬德在第一战场的形势稳定后继而参与逼宫行动当是事实。

[2] 一来是避免陷入父子刀兵相见、当面摊牌或者翻脸的尴尬，二来是便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举措。

[3] 按谥法所说：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

[4] 中国废除肉刑始于汉文帝刘恒，但后世多有恢复，至隋文帝杨坚才再次废除。

[5] 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当今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称为"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

第五章 贞观制度：开明政治的典范

“三权分立”以获权力平衡

有唐一朝的政治制度虽大多源于隋朝，但真正有效的施行、改进和创新，无疑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中完成的。换言之，贞观时代可以说是唐朝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奠基时代和建制时代。而其中某些重要制度，如科举制，则更是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继承和沿袭，从而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宰相制度。要考察一个朝代的制度创设、执政得失和政治开明程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它的宰相制度。因为宰相是百官之长、群僚之首，是整个帝国官僚集团的领袖和代表。所以，考察相权本身的范围和运作方式，并且考察相权与君权之间的关系，就能深入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沿革，其宰相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演变：秦汉的三公制，隋唐的三省制，明、清的内阁制。虽然制度在不断演变，但基本上遵循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

相权的衰落自然意味着君权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就是一部相权不断削弱而君权不断强化的历史，整个演变的趋势就是政治上不断趋向于皇权专制与个人独裁。至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后，不管是明代的内阁还是清代的军机处，其实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明、清的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相对于汉唐时期的宰相已不可同日而语，偶有张居正这样的强势首辅出现，也仅属特例，并非常态。

单从君臣礼仪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形象地看出这种君尊臣卑的制度是如何一步步被强化的：从秦汉到隋唐，皇帝与宰相一同议政的时候，宰相是可以坐下来的，并有赐茶的礼遇，也就是所谓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君臣之间可以“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跟皇帝说话；从元以后，迄于明清，宰辅们在皇帝面前连站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非皇帝让你平身，否则就只能跪着奏事。

中国式君主专制的深化过程，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反过来看，在宋代之前，尤其是汉、唐时期，相权所受到的制约

无疑是最小的。

唐朝的宰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一个重大区别：汉代采用的是“领袖制”，即由宰相一人独掌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是采用“委员制”，就是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几个相互制约的部门，由许多人共同负责。天子各种诏敕，国家一切最高政令，必须经由几个部门反复磋商，共同研讨，最后才能颁布施行，所以也可以说，唐代实行的是一种“集体相权”。

李世民知道，一个人即使贵为天子，即使英明盖世，他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难免会犯错误。而各种小错误日积月累，就可能酿成致命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就曾对前朝的隋文帝杨坚做出这样的批评：“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形苦神，未能尽合于理。”

隋文帝可以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可他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他过于勤政了，总是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其结果未必就是好的。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更为完备、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之所以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目的是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使“权重”向皇帝一方倾斜。换言之，就是皇帝要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

这种观点乍一看有些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君权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难能可贵的是——贞观时期的政事堂恰恰对君权的范围有明确的划定。按照唐初的宰相制度，皇帝发布的任何敕令都必须经由政事堂会议集体研究通过，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可送交尚书省执行。如果是皇帝直接发出诏命，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便被视为违法，各个下级机关可以不予承认。

这就是贞观时期相权对君权的制约。

虽然相权对君权的这种制约到后来逐渐废弛，未能有效延续，可即便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这种传统却仍然深植人心。

当时发生的一起“刘祎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时任宰相的刘祎之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曾私下跟凤阁[1]舍人贾大隐抱怨，说武氏应该还政于李

唐，“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随即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大为不悦，从此怀恨于心。不久后，武则天罗织了一些罪名，颁下一道敕令，要将刘祎之治罪。敕使向刘祎之宣读敕令后，刘祎之接过敕书一看，当即不屑一顾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祎之传》）

武则天大怒，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祎之赐死。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刘祎之对敕使的那一句严厉质问，不仅代表着臣对君的反抗，更能充分说明贞观传统对后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所以当相权遭到君权的侵犯后，刘祎之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进行对抗。

尽管这种对抗是微弱而渺小的，丝毫不能改善刘祎之的处境，更不能使他免遭杀身之祸，但足以在泛黄的史册中留下一道值得后人崇仰的光芒。

而这道光芒的源头，就是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所共同缔造的那个制度典范。

如果说李世民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的目的是削弱相权，强化君权，那么在唐初的宰相制度中，为何还有皇帝敕令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生效的规定？为何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宰相刘祎之仍然可以凭借这种贞观传统，公然与代表君权的武则天对抗？

可见，所谓唐代皇帝是为了强化君权才分散相权的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贞观政治制度的出发点和本质精神并不在于将哪一方的权力削弱，而是在于对各方的权力进行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存在于政事堂的宰相们之间，还存在于相权与君权之间。换言之，贞观制度最有价值、最弥足珍贵的地方，就是相权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

综观秦汉以降的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的宰相制度无论比起前后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既定框架之内，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贞观政治的开明程度可以说是最高的，也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贞观时代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之一，唐初的宰相制度仍然不失其震古烁今的价值。

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任何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怀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待九品中正评定。

虽然唐代的入仕之门向全社会开放，但是其考试过程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体貌丰伟”；“言”是指口才谈吐，讲究的是“词论辩证”；“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优长”，往往取一些州县和大理寺过去的疑难案件，“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须通晓事理，谙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也就是说，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过县府、州府、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选：既要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齿伶俐、雄辩滔滔，还要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最后还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够对疑难案件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文必须写得文辞优美、对仗工整、言约旨远。

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称为出类拔萃，凤毛麟角。

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因此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称的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犹然布衣。而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过吏部考试，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严格，它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达80%以上，如武宗时期80%，宣宗时期87%，懿宗时期81%。（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速崛起，越来

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宰相。比如高宗时期的宰相李义府就是一个寒门出身、“家代无名”的人，他在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以后，担心家世贫寒，难以跻身高位，因而赋诗表达自己的忧虑，其中一句是：“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李世民听到后，当即表了一个态，打消了李义府的顾虑。

李世民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隋唐嘉话》）

后来，李义府果然仕途通达，位列宰辅。

自贞观之后，像李义府这种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居宰相、位极人臣者已经不胜枚举。据两《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寒门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字当不止此。而相应时期高门世族出身的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经低于前者。

由此可见，自贞观时代起，终唐之世，唐朝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向着广大的寒门庶族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从而充分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

在隋朝播下种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在贞观时期盛开和绽放，自然是与唐太宗李世民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

打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而坐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

作为一个兼具创业与守成之长的杰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一个王朝如果能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平民阶层普遍开放上升之阶，并且最大限度地获得平民阶层和读书人的归属感与政治认同，最终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实现社会公正，那么这个王朝必将因此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贞观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两百年后的唐文宗开成年间，诗人赵嘏也对贞观时期所确立的科举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国史补》）

钱穆先生说：“科举制度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从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科举制作为一种具有显著优越性的选官制度，一经制定便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从而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废除为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达一千两百多年。

皇权让位于法权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从春秋末期李悝制定第一部系统法典《法经》六篇起，自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启后的《唐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最为后人所称道。

武德元年，李渊废除了隋炀帝的《大业律》，命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文帝的《开皇律》，修订了一部新律令，并于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是为《武德律》。《武德律》虽然对《开皇律》有所损益，但基本上一仍其旧，没有太大发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着手对《武德律》进行完善。他采纳了魏徵“专尚仁义，慎刑恤典”（《贞观政要》卷五）的建议，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法律，积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贞观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领衔，以《贞观律》为蓝本，修订并颁布了《永徽律》。稍后，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部法典当时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简称《唐律》。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遗训，在贞观立法原则的指导下，按照《贞观律》的基本精神修订的。直至唐玄宗时，人们仍然认为

《贞观律》与《永徽律疏》是“至今并行”的。由此可见，《唐律》实际上是定型于贞观时期，而完善于永徽年间。

《贞观律》和《永徽律疏》的制定和颁行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们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并且影响遍及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各国，乃至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疏议》为圭臬，虽代有损益，但终不敢越出其规范之外。元代律学家柳赟说：“所谓十二篇云者，裁正于唐，而长孙无忌等十九人承诏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范甚详，节目甚简，虽总归之唐可也。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唐律疏议·序》）

清代律学家吉同钧也说：“论者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诚确论也！”（《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

由此可见，定型于贞观时期、完善于永徽年间的《唐律疏议》，在后世法学家的眼中确实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

在古代中国，法律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因为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头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威——皇帝。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皇权绝对高于法权。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定出来，并不是用来约束皇帝本人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臣子和老百姓。正所谓：“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韩非子也说：“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说得更透彻：“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明太祖实录》）

总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与人治”的社会，而不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

此言可谓确论。

所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法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约

束不了皇帝，反而经常被皇权所凌驾，甚至随时可能被践踏。

既然如此，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总设计师，李世民又是怎样看待“皇权与法权”的关系呢？

对此，李世民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卷五）

单纯从这句话本身来看，李世民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他并不把法律视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够承认并尊重法律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相比于朱元璋把法律当作一种“防民之具”和“辅治之术”，李世民的境界无疑要高出许多。

不过，即便我们相信这句话确乎是李世民“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肺腑之言，我们也仍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进一步考察他的实际行动，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从下面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贞观元年正月，有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与李世民发生激烈的争执。

事情本身并不大，但性质却很严重。因为争论的焦点就是——皇帝的敕令与国家的法律，到底哪一个更有威信？哪一个更应该作为断案的依据？

说白了，这就是皇权与法权之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李唐立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很多将吏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国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后人，就出台了恩荫政策，让烈士后代能承袭先人官爵。于是就不断有人弄虚作假，谎称自己是功臣元勋的后代，以此骗取朝廷恩荫。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时候，也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在隋朝为官，具有仕途资历和从政经验的人，所以就经常有人伪造资历，企图走一条加官晋爵的捷径。

上述这些现象就叫作“诈冒资荫”。有关部门难辨真伪，对此大伤脑筋。针对这些现象，李世民专门颁布了一道敕令，严令作假者主动自首，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处以死罪。

敕令颁布后，还是有不怕死的人顶风作案。后来有关部门查获了一个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决定杀一儆百，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后，负责判决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

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个郎中，因有“忠清公直”的美誉，不久前刚刚被李世民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从一个国防部的小司长突然晋升为最高法院副院长。皇恩如此浩荡，按理说戴胄应该知恩图报，事事顺着李世民的脾气才对，可秉公执法的戴胄却在柳雄这件案子上狠狠地触逆了龙鳞。

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据法应流”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做出的，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戴胄说：“朕早就颁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条，你现在却要依法改判，这岂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如果直接杀了他，臣无话可说；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违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说：“你为了让自己秉公执法，就不惜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之喜怒，而国家的法律却是布大信于天下！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这么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

李世民沉默了。

他知道，如果他执意要杀柳雄，谁也拦不住，因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问题是，这么做虽然足以体现帝王的权威，但无疑会大大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坏，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

思虑及此，李世民立刻转怒为喜，当着群臣的面对戴胄大加褒扬，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贞观政要》卷五）

这是贞观时期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凸显了皇权与法权的冲突，并且以皇权的妥协告终，最后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在这件事情上，李世民体现出了一个古代君主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司法独立的尊重。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实属罕见。

“柳雄事件”之后，史称：“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泉涌。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贞观时代吏治清明、执法公正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要说“天下无冤狱”，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一个王朝拥有像戴胄这种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法官，并且拥有像李世民这种善于妥协、尊重法律的皇帝时，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贞观时期即便不是历史上最少冤狱的时期，起码也是最少冤狱的时期之一。

对死刑慎重，就是对生命尊重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待死刑的态度。

而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

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了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贞观政要》卷八）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在上一章我们说过，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正月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除此之外，“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在这种“宽仁慎刑”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势。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一千八百万。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

“几致刑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

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

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判处绞刑。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000万。

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

对死刑的慎重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

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当然，毋庸讳言，无论贞观时代的法治精神多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

贞观五年发生的“张蕴古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蕴古，河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曾任幽州记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义甚美，可为规诫”的奏疏《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

事情缘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张蕴古上奏为他辩护，说他癫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应该判处无罪。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张蕴古随即前去探监，将皇帝准备赦免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好德，并且颇为忘形地在狱中陪张好德下棋。以张蕴古的身份，这么做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执法犯法。侍御史权万纪立刻发出弹劾，声称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曾在张蕴古的家乡相州担任刺史，与张蕴古有过交情，所以张蕴古替张好德辩护显然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徇私包庇。

李世民大怒，未及调查便下令将张蕴古斩于长安东市。

张蕴古被杀不久，李世民经过一番冷静的反省之后，深感后悔。他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

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李世民之所以责怪大臣们没有及时谏诤，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即便张蕴古确有徇私，论罪也不至于死，自己显然是在盛怒之下办了一桩错案。

为了汲取教训，杜绝此后类似错案冤案的发生，李世民随即下诏，规定今后“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贞观政要》卷八）。具体而言，就是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执行的，京畿地区内也必须在两天内五次覆奏，其他州县也至少要三次覆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

此举是对“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随后，这项“五覆奏”的死刑复核规定就被纳入了《永徽律》，成为正式的成文法。后来的《唐律疏议》对这条法律的执行做出了详细解释和严格规定：凡是“不待覆奏”而擅自处决死刑犯的官员，一律处以“二千里”的流刑；即便经过了覆奏，也必须在上级的最后一次批复下达的三天后，才能执行死刑，若未满三日即行刑，有关官员必须处以一年徒刑。

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出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之严及其对待死刑的态度之慎重。

贞观五年，李世民在做出“五覆奏”的规定后不久，发现许多司法官员在审判中完全拘泥于法律条文，即使是情有可原的案子也不敢从宽处理。虽然如此执法不失严明，但李世民还是担心这样难以避免冤案，于是他再次颁布诏令，规定：“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贞观政要》卷八）也就是说，门下省在复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凡是发现有依法应予处死但确属情有可原的，应写明情况直接向皇帝奏报。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制定一部严明而公正的法律需要执政者具备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在执法过程中既能贯彻“法理”又能兼顾“人情”，就不仅需要执政者具备卓越的智慧，更需要有一种悲悯的情怀。

在李世民身上，我们显然看见了这种悲悯。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又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更是把这种难能可贵的悲悯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纵囚事件”。

贞观六年的十二月末，年关在即，李世民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的监狱时，想到春节将至，而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顿时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但规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

相信在当时，肯定有很多官员为此捏了一把汗。

因为要求死刑犯守信用，时间一到自动回来受死，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这批囚犯的人数足足有三百九十个，其中只要有十分之一不回来，各级司法部门就要忙得四脚朝天了。况且，在把他们重新捉拿归案之前，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不会再次犯案，这显然是平白无故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到了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李世民欣慰地笑了。

他当天就下令将这三百九十个死囚全部释放。

这个“纵囚事件”在当时迅速传为美谈，而且成为有唐一代的政治佳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就有“死囚四百来归狱”之句赞叹此事。

然而，也有许多后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李世民为了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而表演的一场政治秀。北宋的欧阳修就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进行抨击，说李世民此举纯粹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他说，这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只能“偶一为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那么“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所以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圣人之法”，“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也就是说，真正好的法律必须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没必要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也没必要用违背常理的手段来沽名钓誉。

欧阳修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这种“纵囚”的事情要是经常干，那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了。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也不会这么愚蠢，他断然不至于每年都来搞一次“纵囚”。平心而论，“纵囚事件”虽然不能完

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认为此举除了作秀再无任何意义，那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

李世民这么做，最起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天下人明白：刑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众所周知，“刑罚”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目的不仅是对“已然之罪”进行惩戒，更重要的是对“未然之罪”进行预防。从理论上说，如果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刑罚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如果那些死囚都能遵守“君子协定”，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返回，那起码表明他们确实有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决心和行为。既然如此，李世民取消对他们的刑罚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弥足珍贵的。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也并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减损。而且整个社会，上至执法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有责任和义务挽救这些失足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做人。其实法律真正的本意也正在于此。当然，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简单的，而改造人的生命却要困难得多，但是后者绝对比前者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李世民的“纵囚”举动，实际上就是凸显了上述理念，只不过他采取的是一种最典型、最特殊、最不可复制的方式而已。

由此可见，“纵囚事件”绝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更不是单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在“宽仁慎刑”的立法思想的基础上，把“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发挥到极致之后必然会有的一种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照贞观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允许的话，贞观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将这种“宽仁慎刑”的法治进行到底，最终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废除死刑”的结果。

其实，我们这个假设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

——天宝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贞观的法治精神，一度废除了

绞刑和斩刑。他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发布的一道诏书中强调，这是为了“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册府元龟·刑法部》）。这项刑法改革后来虽因“安史之乱”而中辍，没能延续下去，但足以表明贞观的法治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几乎与唐玄宗大幅度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也于神龟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从而开创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无死刑的奇迹。而日本此举，无疑受到了唐朝的影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

时至今日，限制死刑、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明与理性程度的标志。

自从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的进步和人权运动的发展，限制并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据有关学者统计，截至2013年，在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中，在法律上废除死刑和事实上停止死刑适用的国家已经达到152个，占总数的77%；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46个，占23%。在欧洲，“废除死刑”甚至成为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此外，在美国，联邦法律虽仍保留死刑，但已有19个州废除了死刑。

在这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中，虽然短期内还不可能完全废除死刑，但是在“少杀、慎杀、防止错杀”这一司法原则上无疑具有普遍共识。而我国同样是将“慎用死刑和逐步减少死刑”作为刑法的改革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尽管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直到今天，“宽仁慎刑”的贞观法治精神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而这种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1] 武则天时期，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

第六章 李世民：当皇帝这点事

贞观一朝的管理哲学

作为大唐贞观的掌舵人，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十年间打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煌煌盛世，成就冠绝百代的一世伟业，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拥有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哲学。因而能够把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全部吸引到他的身边，从而发挥出空前绝后的创造力。

从武德年间起，李世民的麾下就可谓是“谋臣如云，猛将如雨”。到了贞观时代，各种人才更是纷纷涌现，济济一堂。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就曾描述过贞观一朝的人才盛况：“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徵）、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于斯为盛！”（《全唐文》）

贞观的人才集团不仅在当时是最优秀的，而且跟其他朝代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王夫之所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读通鉴论》卷二十）

那么，贞观一朝人才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换言之，李世民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究竟有何秘诀呢？

贞观元年，李世民刚刚上台执政，就命当时的右仆射封德彝负责向朝廷推荐人才。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见什么动静。李世民很不高兴，就诘问封德彝。

封德彝一脸无辜地说：“不是臣不尽心，而是当今天下确实没什么人才啊。”

李世民顿时脸色一沉，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封德彝无言以对，只好惭悚而退。

这段话就是李世民用人哲学的精髓。正所谓“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所以关键是要“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全唐文》卷十，《金镜》）。也就是说，在真正高明的管理者眼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人才。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缺点，并且都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特点或特长。身为一个组织的领袖或者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就是要善于发现每个人身上的独到之处，然后把他们放到最适合的位置上，让他们的才能与他们的职务相匹配，从而发挥出最佳效能。

进而言之，在很多时候，一个高明的管理者从你身上发掘出的优点，很可能连你自己都很少意识到，甚至根本不曾察觉。

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眼睛。

封德彝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因为他缺少这样一双眼睛。

无怪乎李世民会挖苦他：从前天下治理得好的人，难道是跑到别的朝代去“借”人才吗？是你自己没有知人之明，怎么能把天下人全给看扁了？

但是，知人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魏徵就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贞观政要》卷三）李世民自己也说过：“用人之道，尤为未易。”（《金镜》）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鉴别人才之优劣长短的呢？

除了从战争年代起就练就了一双识别人才的慧眼之外，贞观年间的李世民还会不定期地召开“民主生活会”，让大臣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准确把握每个人的优点，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比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十二月，李世民就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了当时政事堂的所有宰相出席。酒过三巡之后，李世民忽然用一种闲聊天的口吻对侍中王珪说：“爱卿见识深远，而且口才又好，现在就请你从房玄龄开始，对在座诸位一一评鉴，最后也谈谈你自己，看看你的才能跟他们比起来如何？”

王珪略微沉吟，而后环视众人，有条不紊地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撰写诏书和奏报事务，详明而公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和紧急之务，妥当而周到，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微臣与在座诸位比起来，也算是略有所长。”

李世民听得频频点头，深以为然。众人也大为叹服，承认王珪确实都说到点子上了。

实际上，李世民的这种做法就是今天管理学中所谓的“人才测评”。要做到“用人如器”，首先当然要知道每个人是什么“器”。而李世民自己就是人才测评的顶尖高手，他对于部属们的优劣长短，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了如指掌。

贞观末年，有一次在朝会上，李世民就当着群臣的面对长孙无忌说：“朕听说，主贤则臣直。但是人苦于不自知，今日就请你当面批评一下朕的得失。”

长孙无忌吓了一跳，赶紧拣好听的说：“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李世民立刻皱起眉头：“朕希望听到自己的缺点和过失，可你却一味阿谀奉承。那好，既然你们不谈，那朕今天就当面谈一谈你们的得失长短，好让大家引以为鉴。大家听一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然后李世民就从长孙无忌开始，把面前的这些宰执重臣挨个评价了一遍。

“长孙无忌为人善避嫌疑，应对敏捷，比之古代贤者也毫不逊色，然而统兵作战，却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面临危难不改气节，为官亦不私结朋党，唯独缺少的是耿直规谏、忠直进言；唐俭言辞漂亮流利，性情平和，善解人意，觥筹交错之间，言语更是滔滔不绝，可惜跟随朕整整三十载，却无一言论及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品德无可指摘，但是为人怯懦，难当大任，无论事务缓急，皆不得力；岑文本品性敦厚，文章是其所长，可是惯于引经据典，有时未免脱离实际……”

接下来李世民又一一评价了刘洎、马周、褚遂良等人，虽然总的来说口气还算温和委婉，但是所说的内容却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相信当时在场的这些帝国大佬肯定都听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他们的优点也都得到了李世民的肯定，但是身为臣子，每个人的软肋居然被皇帝拿捏得如此精到，不吓出冷汗才怪。

太宗的这双眼睛可真“毒”啊！

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犀利的眼光和洞察一切的能力，李世民才能“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并且建立起一套“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进而打造出一支各具所长、优势互补的高绩效团队。

在晚年所著的《帝范》中，李世民就对这种“用人如器”的管理思想做出了极为精辟的阐述。千载之后读之，字里行间犹然闪烁着发人深省的智慧光芒。

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

慧眼识人才

在人力资源开发上，除了“用人如器”、善于对部属进行“性向测评”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李世民选拔人才的时候，从来不论门第，不论新故，不论华夷，不论士庶，而是看其品行才学是否出众，有没有一技之长，即所谓“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帝范》）。

在“门第”方面，无论是像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等出身高门世族的，还是像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出自寒门庶族的，李世民对他们皆一视同仁。此外，武德年间，高祖李渊偏重于任用关陇集团的后人，而到了贞观时期，山东（崤山以东）士族也大量进入政治高层。如崔敦礼，出身于博陵崔氏，“世为山东著姓”，历任左卫郎将、中书舍人等职，最后官至兵部尚书；卢承庆，源出范阳卢氏，后来也官至民部侍郎、兵部侍郎。

在“新故”方面，魏徵、王珪、韦挺等人原来都是典型的太子集团，算是李世民的头号政敌，可后来却成为他的股肱重臣；反而是一些秦王府的故旧，由于才学不足，能力有限，李世民即位后并没有重用他们。这些秦府旧人曾经跟房玄龄发牢骚，房玄龄向李世民反映，可李世民的态度很明确：“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贞观政要》卷五）

在对待异族方面，李世民也根本没有“华夷之防”的狭隘观念，而是以“天下一家，不贱夷狄”的恢宏胸襟，大胆擢用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异族将领。如“以智勇闻”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九年归附唐朝，被封为左骑卫大将军，并娶了李世民的妹妹衡阳公主；贞观十四

年，阿史那社尔与侯君集等人一同攻灭高昌，其后又在唐朝对高丽、薛延陀、西域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此外如突厥酋长执失思力、铁勒族酋长契苾何力等人，也都先后被委以重任，为大唐王朝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在破格提拔民间人才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对马周的擢用。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命百官上疏直言朝政得失。这对多数人来讲是件好事，因为谏言一旦得到皇帝采纳就有可能青云直上。可有一个人提起笔来却一筹莫展，急得抓耳挠腮。

这个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常何。

他是一介武夫，要论带兵打仗自然不在话下，可要叫他舞文弄墨实在是强人所难。正当常何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个门客自告奋勇，愿意替他草拟奏疏。常何大喜过望，当即命人笔墨伺候。只见这个门客提笔挥毫，片刻工夫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二十几条谏言。次日常何把奏疏呈了上去，本来只是想应付一下，交差了事，没想到太宗李世民看完奏疏，居然大为赞赏，立刻把常何叫进了宫，问他为何有这么大长进，几天不见文章就写得这么漂亮。

常何不敢隐瞒，只好据实相告，说自己根本没这本事，奏疏是一个叫马周的门客代写的。

李世民一听就来了兴致，追问他马周的情况。

常何说，马周是博州茌平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乡里人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先秦典籍。武德年间谋了一个博州助教的职务，可他却不以教书为意，屡屡被当地刺史斥责，马周一怒之下离开家乡，四处云游，随后来到长安，寓居常何家中。

李世民听完，意识到这个马周虽然表面上落拓不羁，却是一个腹有诗书、胸怀大志之人，当即命使者前去传召马周。

不知道是马周有意延宕，还是李世民心情过于迫切，总之那天李世民整整派出了四批使者，才把这个布衣马周请进了宫。《贞观政要》卷三："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双方一番畅谈之后，李世民发现马周果然是满腹经纶，见识深远，顿生相见恨晚之感，随即让他当天就到门下省报到。

一夜之间，马周就从一介平民变成了朝廷命官，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进

入了帝国的政治中枢。

这是一个典型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马周从此登上帝国政坛，不久就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历任朝散大夫、中书侍郎、吏部尚书、中书令等职。史称他“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因而“甚获当时之誉”（《贞观政要》卷三）。甚至连李世民都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旧唐书·马周传》）可见对他赏识和倚重的程度。

虽然马周确实具有比较出众的能力，但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皇帝，马周恐怕也难逃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命运，绝不可能演绎这一出“布衣变卿相”的千古佳话，更不可能成为享誉后世的贞观名臣之一。

任命是一门艺术

无论是“用人如器”，还是“唯才是举”，都说明李世民拥有高度的“知人之明”。但是在管理学中，“知人”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可还有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必须“善任”。

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只有做到知人善任，让部属各司其职，管理者才能从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中抽身而出，站在一个最宏观的层面上，制订整个团队的战略规划，实现整个组织的愿景目标。如北宋的范祖禹所言：“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唐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善任，其实就是授权的艺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善于授权。中国古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治国能力颇为自负的开国之君，很多人根本不愿授权，也不敢授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促狭猜忌，事必躬亲，甚至到最后连宰相都废了。还有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敢轻易放权的主子。

在这方面，李世民就从杨坚身上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贞观四年，李世民曾经问隋朝旧臣萧瑀：“你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萧瑀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天朝会都要开到夕阳西下，凡是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召见赐坐，与他们谈论政务，以至于经常忘了吃饭时间，只好叫侍卫给他们送饭。虽然他的品性称不上仁智，但应该算是励精之主。"

李世民听完后，笑着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心暗则不通事理，至察则多疑于物。况且他又是靠欺负孤儿寡妇才得天下的，所以总是担心群臣内怀不服，因而不肯信任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殚精竭虑，劳神苦形，却未必凡事都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也就不敢直言进谏，宰相以下，唯有承顺其旨意而已。"

正是因为认识到隋文帝为政的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种"广任贤良，高居深视"（《贞观政要》卷一）的管理方式，对部属进行充分有效的授权。

早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于是亲自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就建议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李世民对张玄素的建言非常赞赏，随后将其擢升为侍御史，并且立即将其建言付诸实施。

张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实就是一种充分授权。如果每个部属都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妥善地履行职责，那么高层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此外，贞观一朝之所以能够确立"三省驳议"的宰相制度，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衡，并且相权还能够对君权形成有效制约，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这种授权原则的充分运用。

而张玄素所谓的"考其成败，以施刑赏"，实际上就是一种绩效考核。对此，李世民专门制定了对各级官员的"考课之法"，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谓"四善"，是指四种优异的工作表现，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一套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等。根据这些标准每年对官员进行考核，把成绩分为九等，报至尚书省予以公布。凡列为一至四等的官吏，每进一等增发一季的俸禄；五等无所增减；六等以下则每退一等扣发一季俸禄。这套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澄清吏治显然是十分有效的。

“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是权力控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刑赏而无授权，那必然会使百官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最终造成帝王的独裁和专权；假如只有授权而无考核，那必然会导致君主大权旁落，甚至被权臣玩弄于股掌，到头来授权就变成了“弃权”。

很显然，这两种现象都是错误的权力控制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与“天下大治”的执政理想背道而驰。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学，无疑正是“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

恩威并施的帝王术

有人曾经把管理称为权力控制的游戏。

如果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此言可谓确论。

我们上面所说的李世民的那些管理哲学，显然都属于明面上的游戏规则。那么，除了这些规则之外，李世民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是否还运用了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御下手段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今天一个组织的领袖，在权力控制的游戏中难免都要运用一些隐性手段。

这种隐性手段在古代称为“恩威并施”，是一种帝王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挥舞这把利剑的呢？

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与李靖、尉迟敬德、李世勣、房玄龄等元勋功臣的关系，其微妙之处就颇值得我们玩味，也可以让我们充分领略李世民的帝王术。

贞观四年春天，李靖一举平定了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凯旋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

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弹劾的理由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旧唐书·李靖传》）。

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李靖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得胜凯旋的喜悦还没退去，功高不赏的忧惧已经袭来。

“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

李靖一边硬着头皮入宫觐见皇帝，一边回味着这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弹劾理由。

天知道温彦博人在朝中，他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就算他所说属实，可自古以来，在外征战的将士一旦打了胜仗，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着上纲上线吗？更何况，相对于平定突厥这样的不世之功，那几件所谓的“虏中奇宝”又算得了什么？

李靖摇头苦笑。

这种事其实是可大可小的。往小了说，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犯了军纪，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往大了说，却是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中饱私囊，不但可以把打胜仗的功劳全部抵消，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李靖大感恐惧。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一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翻云覆雨手正在那金銮殿上等着自己。

见到李世民的时候，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

因为李世民的脸上果然罩着一层可怕的冰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李靖的预料之中。李世民根据温彦博奏疏中提到的那些事端和理由，把李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然而却绝口不提此战的功勋。李靖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旧唐书·李靖传》记载：“太宗大加责让，李靖顿首谢。”

后来的日子，李靖颇有些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会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传召他进宫。李靖带着一种赴难的心情去见皇帝。

还好，谢天谢地！这回皇帝的脸色平和了许多。

李靖听见太宗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是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

听完这一席话，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

随后李世民就下诏加封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赐食邑五百户（与前共计）。

又过了几天，李世民对李靖说："前些日子有人进谗言，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随即又赐绢两千匹，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那一刻，李靖真的有一种冰火两重天之感。几天前还在担心被兔死狗烹，现在居然频频获赏，并且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如此跌宕起伏、乍起乍落的境遇真是让他无限感慨。

换言之，李靖算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一边是皇恩浩荡，如"慈母之手"化育万物；一边又是天威凛凛，如"钟馗之剑"森冷逼人。李靖在感恩戴德之余，不免惶恐之至，从此在余生中平添了几分临深履薄的戒慎之心。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贞观九年李靖再度出师大破吐谷浑，却又再次遭人诬告谋反时，他就深刻汲取了上次的教训，赶紧闭门谢客，低调做人。虽然史书称太宗很快就把诬告的人逮捕治罪，证实了李靖的清白，可李靖却从此"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旧唐书·李靖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何尝不是在李世民恩威并施的"特殊教育"之下，一个担心功高震主的臣子到最后必然会有的一种选择。

与李靖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尉迟敬德身上。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在他的出生地——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赐宴百官。其时四夷宾服，海内晏安，君臣自然心情舒畅，于是在宴席上奏乐观舞，饮酒赋诗，一派喜庆祥和之状。

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之间，却有一个人满面怒容。

他就是尉迟敬德。

从一入席，尉迟敬德的怒火就腾腾地往上蹿了。

因为有某个功勋并不高的将领，此时此刻的座次却在他之上，尉迟敬德无论如何也吞不下这口恶气。

他越想越是火大，于是借着酒劲发飙，对那个将领怒喝："你有何功劳，座次居然在我之上？"

对方慑于尉迟敬德的气势，也怕破坏宴会的气氛，只好低下头不敢吱声。坐在尉迟敬德下面的任城王李道宗见势不妙，赶紧过来打圆场，不住地好言劝解。没想到尉迟敬德突然怒目圆睁，额头上青筋暴起，猛然挥出一拳砸在了这位亲王的脸上。

李道宗当场血流如注，一只眼睛差点报废。

庆善宫的喜庆气氛在刹那间凝固。百官目瞪口呆，搞不清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太宗李世民龙颜大怒，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

一场好端端的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宴席散后，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叫到了自己面前。

此刻尉迟敬德的酒早已醒了。他满心惶恐，意识到接下来要听到的，很可能是足以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

果然，尉迟敬德听见李世民说："朕过去对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之事非常反感，所以总想跟你们同保富贵，让子子孙孙共享荣华，世代不绝。可是你身为朝廷命官，却屡屡触犯国法！朕到今天才知道，韩信、彭越之所以被剁成肉酱，并不是刘邦的过错。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常有！你要深加反省，好自为之，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身为人臣，听见皇帝当面说这些话，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恐惧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时节已近深秋，那一天他的全身还是被冷汗浸透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大半生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

放，为人变得谨小慎微，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

因为他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和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学会自我克制。

要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自我克制。《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记载：“敬德由是始惧而自戢。”

尽管尉迟敬德从这件事后就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凡事小心翼翼，但是，李世民还是没有忘记随时敲打他。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君臣间又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李世民先是和尉迟敬德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后忽然话锋一转，说：“有人说你要造反，是怎么回事？”

尉迟敬德顿时一怔。

可他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这是在对他念紧箍咒啊！

“是的，臣是要造反！”尉迟敬德忽然提高了嗓门，悲愤莫名地说，“臣追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天剩下的这副躯壳，不过是刀锋箭头下的残余罢了。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竟然疑心臣要造反？”

话音未落，尉迟敬德哗的一声解下上衣——遍身的箭伤和刀疤赫然裸露在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不无尴尬地看着这个一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心腹猛将，眼前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仿佛都在述说着当年浴血奋战的悲壮和艰辛以及君臣之间同生共死的特殊情谊。

李世民的眼眶湿润了。

他随即和颜悦色地对尉迟敬德说：“贤卿快把衣服穿上。朕就是因为不怀疑你，才会跟你说这事，你还埋怨什么！”

高明的帝王在运用恩威术的时候，都很善于把握一种分寸感，既不会一味施恩，也不会总是发威，而是在两者之间维系一种动态平衡。

李世民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高手。

经过这次敲打，尉迟敬德越发低调内敛，而李世民对他的表现也感到

满意，所以自然而然地收起了“大棒”，很快就给出了一根足以让尉迟敬德受宠若惊的“胡萝卜”。

有一天，照旧是君臣间在说话，李世民说着说着忽然冒出一句：“朕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不知贤卿意下如何？”

虽然这次不再是什么坏消息，而是天大的好事，可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诧异和震惊却丝毫不亚于上次。

因为这一年，尉迟敬德已经五十五岁了，而太宗皇帝本人也不过四十一岁，他的女儿能有多大可想而知。暂且不说皇帝的女儿是何等尊贵，让人不敢高攀，单纯就年龄来说，双方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了，简直大得离谱。

如此不可思议的恩宠，叫尉迟敬德如何消受？

好在尉迟敬德仕途多年，经验丰富，闻言立刻跪地叩首，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他说：“臣的妻室虽然出身卑微，但与臣共贫贱、同患难已经几十年了；再者，臣虽然不学无术，但也知道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所以迎娶公主一事，实在非臣所愿。”

李世民微笑颔首，没再说什么。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其实尉迟敬德很清楚，皇帝并不是真想把女儿嫁给他。之所以没头没脑地唱这么一出，无非是想表明对他的信任和恩宠罢了。所以，这种事千万不能真的答应，而应该婉言谢绝。

换句话说，皇帝的这种美意只能心领，绝不能实受。假如尉迟不开窍，真的顺着杆儿往上爬，傻乎乎地应承下来，那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抱得美人归”的美妙结局，而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下场。

尉迟敬德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和李世民之间就配合得相当默契。

当皇帝的，要善于表现自己的慷慨，不妨偶尔表示一下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要懂得恪守自己的本分，知道什么叫作器满则盈、知足不辱。大家把该说的话都说得漂亮一点，不该说的则一句也不说。许多事情点到为止，心照就好。

也许，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君臣博弈之中，尉迟敬德居安思危的忧患之

情才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五十九岁的尉迟敬德就不断上疏“乞骸骨”（请求退休），随后便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致仕了。

而就在致仕的前一年，尉迟敬德就已经有意识地淡出现实政治，栖心于神仙道术了。史称：“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直到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去世，尉迟敬德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种远离政治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和李靖晚年“阖门自守、杜绝宾客”的结局可谓如出一辙。

不过，比起历朝历代那些“功高不赏”“兔死狗烹”的功臣名将，他们实在应该感到庆幸了。就算是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他们也远比后来因涉嫌谋反而被诛的侯君集、张亮等人聪明得多，也幸运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把这种“恩威并施”的帝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牢牢掌控手中权力，所以才能与绝大多数元勋宿将相安无事，善始善终，而不至于像历代帝王那样，在江山到手、权力稳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屠杀功臣，以至在历史上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和骂名。

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

除了李靖和尉迟敬德，还有一个初唐名将对李世民的恩威之术也体验得非常深刻。

这个人就是李世勣。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二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勣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服药方，说必须用“须灰”做药引子才能治病。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前去探视李世勣，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把它赐给了李世勣。

可想而知，当李世勣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内心是何等感激，又是何等惶恐！

他当即跪倒在地，“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这个药引子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李世勣不但感动得热泪涟涟，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也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宽宏地一笑，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旧唐书·李勣传》）

史书没有记载李世勣是否因服用这服药而得以痊愈，但是我们不难想见，当李世勣把这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龙须汤"喝进肚子里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无比激动、无比滚烫的。李世民的这几绺胡须就算没有对李世勣的身体发挥作用，也足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发挥某种神奇的效用。

这种神效就是——一个深受感动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对皇帝死心塌地地忠诚。

在李世民的帝王生涯中，恩威之术施展得最典型的一次，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时李世民已经病势沉重，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边，给他交代政治遗嘱。

在李世民的遗言中，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勣才智过人，但是你予他无恩，恐怕难以使他效忠。我现在把他贬黜到地方，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重新起用他为仆射；要是他迟疑拖延，你只能把他杀了！"

五月十五日的朝会上，李世民一纸诏书颁下，把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勣贬为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都督。

没有人知道在接到贬谪令的那一刻，李世勣心中作何感想。

相信他肯定有过一瞬间的震惊和困惑。

然后就是一阵紧张而激烈的思考。

在皇帝病重、帝国最高权力即将交接的这一重大时刻，自己突然无过而遭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世勣不知道弥留中的皇帝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究竟是福是祸，但是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一切都取决于他当下这一刻的

选择。

也就是说，是散朝后直接离开长安，赶赴叠州，还是暂时回到家中，静观事态演变？

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片刻思索，李世勣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连家都没回，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告别，径直揣上诏书就踏上了贬谪之途。

听到李世勣当天就起程前往叠州的消息，即将登基的太子李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弥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李世勣被贬当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仅三天后，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兼洛阳宫留守；半个月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

至此，所有的人肯定都会为李世勣当初所做的那个决定庆幸不已。

因为这个决定不但让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诛杀功臣的恶名，而且也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义胆的开国元老和辅弼重臣。假如李世勣当初不是当机立断，毅然离京，而是多一念迟疑，回家多耽搁几天，那么下面这一页辉煌历史，有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出现。

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以七十五岁高龄挂帅出征，一举平定了高丽。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三个皇帝倾尽国力，终其一生都无法战胜的强悍小国，终于匍匐在了须发皆白的老将李世勣的脚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国的脚下。

此时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因为他在临终前所走的最后一步棋，似乎仍然影响着他身后数十年的历史。

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李世勣能否对重新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没有贞观二十三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际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禄永固，富贵长保呢？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勣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高龄创造出平定高丽、鹰扬国威的历史功绩呢？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据的比重绝对不可小觑，而它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以上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将之间展开的。那么，在李世民与文臣之间，演绎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

说起贞观的文臣，其代表人物当非房玄龄莫属。

作为后人心目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房玄龄对贞观之治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称其“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论者称为良相焉（《旧唐书·房玄龄传》）”。

毫无疑问，在贞观群臣中，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最信任、最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宰辅重臣，也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钟馗利剑”的森寒之光。

据《旧唐书》记载，大约在贞观初年，房玄龄“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若无所容”。意思是他时常会因某些过错而遭到太宗的谴责，以至于一连数日都要到朝堂上叩头请罪，内心恐惧不安，一副彷徨失措、无地自容的样子。

史书并未记载房玄龄到底犯了什么错。

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臣子，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时常给他念念紧箍咒。这一点我们从李靖、尉迟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龄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被“谴责”那么简单。只要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有必要，房玄龄甚至会被勒令停职。

按史书记载，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曾经被停职三次。

第一次大概是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资治通鉴》称“时房玄龄以谴归第”，也就是说他遭到太宗的谴责，被勒归私宅。长孙皇后临终前，特意为此事劝谏李世民：“房玄龄侍奉陛下时日已久，一贯谦恭谨慎，所有的朝廷机密从

未泄露半句。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过失，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此次房玄龄的停职原因史书没有交代，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谴归私第”，绝不是要舍弃他，充其量只是想冷却他。

暂时冷却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把他解冻，然后让他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倍地发挥光和热。

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劝谏，李世民在适当的时候肯定会召他回来。

对此长孙皇后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不过该劝谏的她还是得劝谏，因为第三者的劝谏有时候也未尝不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好让君臣双方在“握手言和”的时候显得比较自然，也显得比较有面子。

比如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时任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就连忙上疏，列举了房玄龄对国家的诸多贡献：“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然后褚遂良说，假如不是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就不应该把他摒弃；如果是因为他年迈体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动致仕。若非如此，只是因为一些小过失，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跟随数十年的元勋老臣。

褚遂良的谏言句句在理，当然给足了双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龄召回了朝廷。

但是，并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龄“赶”回家去，都有和事佬出来打圆场。比如房玄龄这次复职没多久，就再一次“避位还家”，史书还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记载了这次复出的过程。

这个过程很简单，却很微妙。

再次把房玄龄“谴归”后，一连过了好几天，始终没人来劝谏，李世民不免有些着急。朝中政务繁冗，绝不允许他把房玄龄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好听的理由公开让房玄龄复职。

该怎么办？

李世民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有了办法。

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说他要去芙蓉园游玩。芙蓉园位于长安东南角的曲江，要去那里必然要经过房玄龄的宅邸。房玄龄得知消

息后，立刻命子弟洒扫门庭。子弟问其故，房玄龄笑着说："皇上随时会驾到！"

片刻之后，龙辇果然"顺道"来到了房府的大门口，然后太宗李世民就"顺便"进来看望赋闲在家的房玄龄，最后又"顺带"用御辇把房玄龄接回了皇宫。

这个故事很经典。

除了表明李世民和房玄龄之间的默契和相知之外，这个故事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告诉我们——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

只有读懂人心，才能读懂政治。

综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政治游戏，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些内涵。

首先，不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要把贞观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他们两个就谁也离不开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个界限到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们之间更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

在这两重关系之下，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而复杂。

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李世民必须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赐给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又让弟弟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以此加强双方的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

这些都属于"恩"的范畴，目的是赢得房玄龄的绝对效忠。

另一方面，李世民又必须经常玩一些"小动作"，时不时把房玄龄"谴归私第"，晾在一边。这么做的目的有三：一是检验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权臣"架空；二是借此显示皇权的威严，让房玄龄懂得，君与臣之间，有一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三是提醒房玄龄：虽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不转了。你应该始终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永远不能骄傲自大、忘乎所以。

这些都属于"威"的范畴，目的是让房玄龄时刻牢记——我是君，你是

臣；政治第一，友谊第二。

其次，对于房玄龄而言，或许一开始他对李世民的帝王术还比较陌生，所以在贞观初年一被批评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可他后来就逐渐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钟馗利剑”尽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种威吓作用的，只要你忠心不改，恪尽职守，那把剑就不会真的往你身上招呼。

正因为房玄龄后来弄懂了这一点，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却时刻有着被皇帝“谴归私第”的心理准备。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食难安，而且就算被停职，他也权当是度假。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朝廷离不开他，所以不管怎么“谴归”都能很快官复原职，一点也不用担心。

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荣宠和恩泽都是天子的赐予，假如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被天子全盘收回。所以，必须时刻保持临深履薄、戒慎恐惧之心，越是皇恩浩荡，越是要谦逊辞让。总而言之一句话，做事必须尽职尽责，才能显示能力；但做人必须谦恭低调，才能显示品德。有才有德，才是让领导放心的好下属。

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说明房玄龄的这种“觉悟”。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时任左仆射的房玄龄又被李世民加封为太子少师，不仅肩负国之重任，而且更兼辅弼少主之责，房玄龄大为惶恐，不断上表请辞仆射之职。李世民当然没有批准，而是下诏对他进行了勉励，房玄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到了太子拜师那天，东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可房玄龄却“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他深感自己不够资格，所以不敢去东宫接受太子礼拜，只好躲在家里，始终不愿露面。

房玄龄的谦卑赢得了时人的一片赞誉。《旧唐书》称：“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又进封房玄龄为司空，仍旧让他总揽朝政，并且监修国史。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李世民又下诏勉励

他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旧唐书·房玄龄传》）

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词，实则大有深意。所谓"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那皇帝自然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换言之，臣子越是谦让，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越敢把权力交给他。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

正是因为对房玄龄的信任，所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的时候，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让他"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

那么，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

有一天，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有人突然闯进来，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那人说："告你的密！"

房玄龄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命人准备车马，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天子的行在。

李世民听说留守送来了一个告密者，刚开始颇为诧异。因为以房玄龄的能力而论，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皮球踢给皇帝的，更何况此时皇帝还在前线打仗。所以李世民断定，若非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房玄龄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李世民转念一想，马上就猜出了答案。

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然后接见告密者，问他要告谁，那人回答说："房玄龄。"

李世民冷笑一声："果然！"当即喝令左右，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告密者腰斩了。

事后李世民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诏，责怪他不够自信，还说：“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玩的政治游戏。

作为房玄龄，虽然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但是碰上这档子事，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是把房玄龄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那就是——要恪尽一个留守的职责，还是要谨守一个臣子的本分？

如果房玄龄选择前者，自作主张把这个人杀了，那固然是尽了留守的职责，可皇帝过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对房玄龄起疑心呢？会不会觉得房玄龄过于独断专行，因而对他产生不满和戒备呢？

完全有这种可能。

所以房玄龄宁可挨骂，也必须把事情交给皇帝处理。这么做，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二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最后还能向皇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谨守人臣本分，碰到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他绝不会越俎代庖。

而作为李世民，他内心对房玄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满意的。他之所以在听到告密者的回答时会说出“果然”二字，是因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来意；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来意，恰恰是因为他了解房玄龄的性格，也知道房玄龄这么做的用心所在。

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表面上他也必须“责怪”他，并且重申对他的授权和信任，这样才能展示一个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怀。

总之，君臣双方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所以我们说——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

第七章 出门有忠臣，回家有贤妻

魏徵：忠臣忠言不逆耳

在中国历史上，有资格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

几个，大半也都有争议。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共识最多、争议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

但是，即便李世民能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无瑕的。

无论李世民如何天赋异禀，才智过人，他身上也难免会有一些人性的弱点。

换句话说，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而在于他有个办法对治自己身上的弱点。

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字——纳谏。

纳谏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他们通常更听不进任何不和谐音。

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听。

不但愿意听，而且对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饴。

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天生就是一个受虐狂，而是因为他深知这样一些道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鉴于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倘若当皇帝的都像隋炀帝那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那么结果就是"人臣钳口"，最终必然"恶积祸盈，灭亡斯及"。所以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一再对大臣们强调："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卷二）

在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和鼓励下，贞观群臣谏诤成风，人人勇于进言。而其中对李世民影响最大、对贞观善政贡献最多、在历史上享有"第一诤臣"之美誉的人，无疑就是魏徵。

魏徵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

他说他不想当忠臣。

不想当忠臣，难道还想当奸臣？

不，魏徵说，他想当一个“良臣”。

贞观元年，当魏徵在朝堂上公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李世民大为诧异：“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魏徵说：“所谓‘良臣’，应该像稷、契、皋陶那样，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所谓‘忠臣’，只能像龙逢、比干那样，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区别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纳其言”，当即赐给魏徵五百匹绢。

魏徵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廷争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魏徵的进谏，有时候就颇能体现这种中道的智慧。

比如贞观二年，李世民曾经用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无上，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样的。朕总是上畏皇天之监临，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说的固然是实情，可像他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好，未免就有点矜夸的味道，而且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

这个时候，魏徵发话了。他说：“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魏徵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

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当然好，但是最好能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

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

这样的进谏可谓寓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

处，实在是含蓄而又巧妙。

类似的对话在贞观五年还有一次。当时国内安定，天下丰稔，东突厥又彻底平定，整个大唐帝国一片欣欣向荣，李世民又对侍臣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

这一次李世民的话就说得比较全面了，他一方面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希”的历史功绩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惧之心。

所以魏徵就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魏徵并不对这种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势歌功颂德，而是对皇帝居安思危的谨慎态度表示赞赏。这种发言显然要比纯粹的附和之词高明许多。

正是由于魏徵的谏言往往既委婉又能击中要害，李世民才会评价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旧唐书·魏徵传》）“妩媚”二字，堪称绝妙。

当然，魏徵的谏言也并不都是这么妩媚的。

如果每次进谏都拐弯抹角，那最后就算不流于阿谀谄媚，也会变得庸庸碌碌。倘若如此，那魏徵也绝不可能被李世民所倚重，更不可能以诤臣之名享誉后世。

所以，该据理力争的时候，魏徵也绝不含糊。

史称魏徵“犯颜苦谏”的时候，“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意思是说：每当李世民被魏徵的谏言刺激得怒不可遏的时候，魏徵总是毫无惧色，李世民到最后也不得不收起帝王的威风，把自己的怒火强压下去。

有两则小故事颇能说明李世民对魏徵的这种忌惮之情。

有一次魏徵离京去祭扫祖墓，回来的时候听说皇帝打算去终南山游玩，连仪仗队和随从都已整装待发，可后来却无故取消了，魏徵就问皇帝有没有这回事。李世民尴尬地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生气，只好作罢了。”

还有一次，有人进献了一只漂亮的鹞鹰，李世民非常喜欢，就让它站在自己的手臂上，正在逗弄玩耍，忽然看见魏徵走了进来，情急之下赶紧把鹞鹰塞进怀里。魏徵其实早就看在眼里，可他嘴上却不说，故

意在奏事的时候把时间拖得很长。等到他告辞离去，鹞鹰早已活活闷死在李世民的怀里了。

魏徵平常的谏诤一般都会讲究方式方法，可要是碰到至关重要的大事，魏徵也会与太宗面折廷争。

君臣之间最激烈的一次言语交锋，发生在贞观六年春天。

当时的大唐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所以满朝文武纷纷劝请太宗前往泰山封禅。“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册府元龟》卷三十五）

所谓封禅，是帝王祭告天地的一种大典。泰山是五岳之首，所以封禅大典都在泰山举行——于泰山设坛祭天曰“封”，于泰山南麓的梁父山辟基祭地曰“禅”。在古代中国，泰山封禅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但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获此殊荣。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还有东汉的光武帝等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

对此，李世民内心当然也是满怀渴望。

但是当百官劝请时，李世民一开始还是谦虚地推辞了一下。他说：“诸位贤卿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但朕却不这么看。如果天下安定，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就算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失？昔日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以为文帝之贤不如始皇吗？况且即使是祭拜天地，又何必一定要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才算表达出对天地的诚敬呢？”

群臣都知道这只是皇帝的客套话，所以还是极力劝请。

后来李世民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虽然表面上似乎有点勉强，可大家都知道，其实皇帝心里还是很乐意的。

就在皇帝和满朝文武其乐融融地探讨具体的行程安排和相关事宜的时候，魏徵忽然表情严肃地站了出来，坚决表示反对。

李世民脸色一沉，问：“你不赞成朕封禅，是不是认为朕的功业还不够高？”

魏徵说：“够高。”

李世民又问：“那是不是德不够厚？”

魏徵说："够厚。"

"是不是社稷还不安定？"

"已经安定。"

"是不是四夷尚未臣服？"

"都已臣服。"

"是不是庄稼还没有丰收？"

"丰收了。"

"是不是祥瑞还没有呈现？"

"呈现了。"

"既然如此……"李世民冷笑着说，"那为何还不能封禅？"

魏徵从容自若地回答道："陛下虽然已经拥有这六项成就，但是，我朝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凋零，仓廪空虚，陛下一旦车驾东巡，千乘万骑，每到一处，地方州县必定难以承受各种负担。更何况，陛下举行封禅大典，四夷君长必定前来共襄盛举，可如今自伊水、洛水以东，至于东海、泰山，村庄寥落，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极目所见，千里蛮荒。这岂不是引戎狄至我腹地，然后示之以虚弱吗？再者说，即使给予四夷君长厚重的赏赐，也未必能满足他们远道而来的愿望；纵然免除百姓几年的捐税赋役，也未必能弥补他们的损失。为了博得一个封禅的虚名，却遭受一些实实在在的损害，这对陛下又有什么好处？"

李世民听完，不得不表示赞赏，立即停止了封禅的动议。"太宗称善，于是乃止。"（《贞观政要》卷二）然而他在感情上其实是不太情愿的。

碰巧，几天后黄河两岸的几个州突然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满朝文武再也不敢提半个字，封禅之事就此不了了之。可是在内心深处，李世民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封禅的想法。"终太宗世，未行封禅，然帝意亦非遂终止也。"（《魏郑公谏录》卷二）

魏徵这次谏诤虽然得到了李世民的采纳，但此事多少还是伤及了皇帝的自尊心，所以那些日子，李世民一直看魏徵不顺眼，再也不觉得他

妩媚了。

有一天，可能魏徵又因什么事触怒了太宗，所以散朝之后，李世民怒气冲天地回到宫中，咬牙切齿地说：“找个机会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大为惊愕，连忙问皇帝说的是哪个乡巴佬。

李世民脸色铁青：“就是魏徵！他经常在朝堂上当众羞辱我。”

长孙皇后听完，一声不响地退回寝殿，片刻后就一身凤冠霞帔地来到皇帝面前。李世民大为诧异，问她穿得这么隆重干什么。长孙皇后说：“臣妾听说，君王英明，臣子一定正直。如今魏徵之所以敢直谏，正是由于陛下的英明，臣妾怎么能不道贺！”

李世民本来也没想杀魏徵，他这么说其实只是发泄发泄而已。现在皇后又给了他这么大一顶高帽，他当然更没有理由生气了，于是就把连日来的不愉快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长孙皇后实在是一个既贤淑又聪慧的女人。因为此举不但保全了魏徵，而且维护了皇帝的尊严，诚可谓一举两得。

古代有一种传说，说龙的咽喉部位“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韩非子·说难》）。其实意思就是说绝大多数帝王都容不得臣子进谏。所以，历朝历代因犯颜直谏、触逆龙鳞而被帝王诛杀的臣子不知凡几。

然而贞观一朝却人人敢于犯颜直谏，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李世民确实具有从谏如流的见识和器度。而魏徵之所以在谏诤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因为他知道太宗求谏的诚意和决心要远远大于历代帝王，因此必然需要像他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诤臣。

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徵的谏诤行为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正直和勇气，而是基于一种精明而准确的判断。

关于这一点，魏徵自己就曾经当着李世民和其他大臣的面坦言：“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可想而知，以魏徵那套“只当良臣、不当忠臣”的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

来看，假如李世民是一个猜忌刻薄的昏聩之君，那魏徵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平庸之臣。

所以，只要李世民有成为明君的愿望，魏徵就有成为诤臣的动力。他们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像是金矿与良工——“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贞观政要》卷二）

如果我们问：李世民的千古一帝是怎样炼成的？那么从他自己的比喻中，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即便李世民是一个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皇帝，最初他也只是像金子蕴藏在矿石中一样，体现不出任何价值。只有经过“良工”耐心细致地斧凿敲打，日复一日，千锤百炼，才能最终把他身上的杂质和瑕疵一一敲打掉，让矿石中的黄金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换言之，假如没有诤臣的监督、约束和针砭，李世民即使天赋再高、能力再强，最终也可能毫无建树，甚至有可能重蹈隋王朝之覆辙，沦为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的亡国之君。

正如《菜根谭》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李世民的明君之路，又何尝不是这么走过来的。

魏徵一生对李世民的谏言无数，其中有一句出自《荀子》的话曾经被广为传颂，成为后世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政治格言。这句话就是——“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李世民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也许是时刻萦绕在他耳旁、倏忽不敢忘怀的一句话。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徵病殁。李世民“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并且亲自撰写了墓志铭，书于碑石之上。

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

魏徵的离世不仅让李世民失去了一个臣子，更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

在一种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这番话从此也和他们君臣二人的名字一起，永远镌刻在了青史之

上，令无数后人感慨和深思——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

长孙皇后：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站着一个女人。

这句话确实有道理。李世民这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就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长孙皇后。

古人经常用“母仪天下”这个词来形容皇后，意思是作为皇后的这个女人，其修养、德行、智慧、才情、气度、仪容，都应该成为普天之下所有女性的典范和表率。

然而，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配得上这个称号的皇后实在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而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皇后中，长孙氏绝对是其中非常出众的一位。她是一个绝对称得上母仪天下的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男人都热衷于追求权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当一部分女人在这方面似乎也不遑多让。

所以才会有哲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

在男人看来，一旦得到权力自然就会得到一切；而在女人看来，一旦征服了男人自然就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垂帘听政的皇后相信都会对这句话深有同感。

可是，这句话在长孙氏身上却不太适用。长孙氏既不热衷于征服男人，也不热衷于征服世界。

她热衷的事情只有一件——辅佐他的男人征服世界。

当我们翻阅史籍时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最值得后人称道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尽力辅佐，但绝不干政。

早在长孙氏还是秦王妃的时候，就在政治上为李世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当时李世民正和太子齐王斗法，在后宫这条战线上显然处于下风，于是长孙氏便“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为李世民最终成功夺嫡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而玄武门事变当天，长孙氏更是和李世民一起站在了第一线，既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更坚定了李世民及其麾下将士的信心和斗志。

正是因为一路走来，长孙氏能够与李世民一起沐风栉雨、同生死共进退，所以李世民登基之后对长孙氏更为倚重，时常想和她讨论朝政，可长孙氏却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李世民坚持要和她讨论，可长孙氏却始终保持沉默。

长孙氏不但自己绝不干政，而且极力避免让自己的亲族掌握太大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的衰亡都和外戚擅权有直接关系，比如两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长孙氏从小在舅父高士廉的影响下熟读经史，自然对此深怀戒惧。所以在贞观元年七月，当李世民准备擢升长孙无忌为宰相的时候，长孙氏就极力劝阻，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可李世民不听，执意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左武候大将军。

如果长孙皇后不再表示反对，默认了这件事，那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怀疑——她先前的劝阻只不过是一种欲迎还拒、故作谦让的作秀罢了。

然而，长孙皇后绝不是作秀。诏书一下达，她私下里立刻去找他的兄长，坚决反对他接受任命。长孙无忌没办法，只好向李世民一再请辞。最后搞得李世民也很无奈，只好改授他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至此，长孙皇后才如释重负。

长孙兄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长孙安业，比他们兄妹年长许多，是一个“嗜酒无赖”的纨绔子弟。当长孙兄妹尚且年幼之时，他们的父亲长孙晟亡故，长孙安业立刻把兄妹二人赶出了家门，让他们去投靠舅父高士廉。

当时的长孙安业当然不会想到，被他赶出家门的这两个孩子日后居然

飞黄腾达，一个成了帝国的宰相，一个成了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皇后。

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长孙氏得势之后，不但没有因为以前的事情报复他，反而以德报怨，屡屡让皇帝对他“厚加恩礼”，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京城的监门将军。

可惜长孙安业终究是一个不懂得惭愧和感恩的小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他居然恩将仇报，丧心病狂地参与了一次未遂政变，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当时，心怀异志的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因事入朝，暗中联络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和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等人，与他们“互说符命”，准备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政变。不料未及行动，他们的阴谋便全盘败露。以李孝常为首的政变分子当即被一网打尽，全部被捕入狱。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长孙安业。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按说这回长孙安业绝对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任凭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他了。可是，居然还是有人想救他一命。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不过，她之所以想救长孙安业，绝不是简单地出于妇人之仁，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考虑。

她流着眼泪对李世民说：“安业之罪，诚当万死！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经对臣妾做过绝情之事，如今一旦将他处以极刑，天下人必然认为是臣妾想报复他，这对于朝廷的名誉恐怕会有损害。”

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随后便赦免了长孙安业的死罪，将他流放嶲州。

从长孙安业的事情上，我们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确实有许多优秀的品质。首先，对长孙安业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这足以表明她的善良和宽容；其次，当不知好歹的长孙安业竟然又“以怨报德”的时候，长孙皇后能再次替他求情，这就不仅仅是善良所能概括的了。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智慧——一种顾全大局的智慧。

如果说李世民是一块蕴藏在矿石中的金子，那么善于对他进行“斧凿”的良工绝不仅仅只有魏徵一人。

除了朝中还有很多善谏的大臣之外，在后宫，长孙皇后也是时常对李世民进行规谏的一大良工。

李世民扬言要杀魏徵的那次，我们就已经领略了长孙皇后的聪明和善巧，下面这则故事同样可以表明这一点。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匹骏马，喜欢得不得了，就命宫人好生饲养。没想到刚养了几天，这匹马突然无病而暴死。李世民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要杀了这个宫人。

为了区区一匹马而杀人，这显然有损李世民的明君形象。于是长孙皇后当即站出来劝谏。这一次，她还是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段，并不直接进谏，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齐景公也因喜爱的马死了，要杀养马人，当时的三朝老臣晏子就指着那个养马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你犯了三宗罪你知不知道？第一宗罪，好好的马被你养死了；第二宗罪，害得我们的国君为马而杀人，百姓听说了，一定会骂我们的国君不仁；第三宗罪，四方诸侯知道这事，也一定会轻视我国……"等晏子骂完这些话，旁边的齐景公很自觉，一句话也没说就把那个养马人放了。

说完这个故事，长孙皇后对李世民说："陛下肯定从史书中读到过这个故事，莫非是把它忘了？"

李世民听完后，反应和齐景公如出一辙，马上就赦免了那个宫人。

类似这样的劝谏还有很多。比如李世民有时候一生气，难免会迁怒宫人，往往因为一些小事就要治她们死罪。而长孙皇后总是装出一副比皇帝更生气的样子，让皇帝把这些犯了错的宫人交给她，由她处置。然后皇后便将她们暂时拘押，事实上是把这些宫人暗中保护了起来。等过了一些日子，李世民的气消了，长孙皇后才慢慢分析个中道理给他听，证明那些宫人其实是无罪的，从而多次避免了滥杀无辜，"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

正是因为有长孙氏这样的贤内助屡屡帮李世民矫正错误，弥补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颇为感慨地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贞观政要》卷二）

很显然，有长孙皇后和魏徵这一内一外两大良工的"斧凿"和"敲打"，李世民这块矿石中的金子想不发光都难。

长孙氏在后人的心目中之所以能成为皇后的楷模，李世民夫妇之所以

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模范夫妻，其主要原因不仅是长孙氏能在政治上尽力辅佐李世民，更是因为在生活上，他们的伉俪情深也足以让后人感动。

大约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患上了“气疾”，将近一年都没有痊愈，长孙皇后一直守候在李世民身边，日夜悉心照料。由于担心李世民的病情不能好转，此时的长孙氏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她把一包毒药藏在衣带中，对亲近的侍女说：“皇上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独自求生！”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长孙氏自己其实是抱病照顾李世民的，因为她本人恰恰也是从小就患有气疾。贞观八年，长孙氏陪李世民一起上九成宫避暑养病。有一天下半夜，柴绍等人突然上山，向李世民报告了一起突发事件。李世民大为震惊，当即全副武装，到前殿询问事件的详情。长孙皇后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带病跟随，左右极力劝阻，长孙皇后却说：“皇上如此震惊，我岂能心安！”

或许是因为这次半夜出宫感染了风寒，再加上紧张和焦虑，长孙皇后的病情突然加重，从此一病不起。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所有该服的药物都服过了，您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起来，不如奏请父皇大赦囚犯，同时度化一些人出家，也许可以得到冥福的庇佑。”

长孙皇后不以为然地说：“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从没做过坏事，又何必担心？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国家大事，而佛法是异国之教，对政治不见得有什么助益，何况皇上从来也不信这个，岂能以我区区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话做，我还不如速死！”

可李承乾没有听从他母亲的话，还是认为自己的办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转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也觉得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准备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后极力反对，李世民最后只好作罢。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重不治。弥留之际，她给李世民留下了这样一些遗言。

第一，要求起用房玄龄：“玄龄事陛下久……苟无大故，愿勿弃之。”

第二，再次强调不要让自己的亲族掌权：“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

奉朝请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最后的谏言：“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讲完这些，长孙皇后取出一直藏在衣带中的毒药，最后说了一句：“臣妾在陛下卧病的那些日子，发誓以死跟随陛下，绝不像吕后那样！[1]”。

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前曾经编纂了一本有关古代妇女言行得失的书，共三十卷，名为《女则》。但她只是将其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不是想以此博取声誉，所以一直叮嘱宫人不要告诉李世民。直到她去世后，宫人才把这本书交给李世民。

李世民睹物思人，泫然泪下，悲恸不已，对近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长孙皇后的早逝对李世民而言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晚年的李世民之所以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犯下许多错误，未能做到“慎终如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无魏徵的犯颜直谏，内无长孙皇后的拾遗补阙。假如长孙皇后能伴随李世民走得更远一点，乃至共同走完人生岁月，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李世民千古一帝的形象一定会更加完美，而贞观的历史也无疑会更加璀璨。

自制力：战胜人性的弱点

李世民的成功，固然与魏徵和长孙皇后等人的规谏和辅佐息息相关，但是有一点我们却不能不强调，那就是——假如李世民本身根本不是一块当明君的料，那身边不管有多少个魏徵和长孙氏，无论他们怎么“斧凿”和“敲打”，李世民也绝对不可能“发光”，所谓的千古一帝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李世民自己。

贞观二年，李世民就曾经对侍臣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贞观政要》卷六）

君犹器，人犹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

李世民的见解可谓精辟！

如果一个皇帝不具有明君的潜质，其他人再怎么努力帮他也是白搭。说难听点，在一堆石头上敲打一万年也敲不出一座金矿，给一只鸡插再多羽毛也变不出一只凤凰。

由此可见，李世民最后之所以能成就千古一帝的功业和盛名，除了外界的助力之外，更需要他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自制力。

一种能战胜自身人性弱点的高度的自制力。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古往今来，许多意志坚定、功成名就的男人通常挡不住美女的诱惑。他们纵然可以征服天下，可往往会在某个美女的石榴裙下变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那么，作为一世英雄的李世民，在面对美人的时候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贞观二年十二月，李世民在宫中宴请新任的代理侍中王珪，当时旁边就有一位绝色美女在侍宴陪酒。她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因谋反伏诛后，这个美女就被“籍没入宫”，成了李世民的妃子。

酒酣耳热时，李世民指着这个美女对王珪说：“庐江王不是东西，当初因为贪图她的美色，就杀了她丈夫并把她纳为小妾，如此暴虐无道的小人，哪有不灭亡的道理！”

王珪听完后一言不发，忽然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问了皇帝一个问题：“陛下认为李瑗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李世民愕然说：“杀人之夫而夺人之妻，这种事你还问对不对？”

王珪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管子》一书。春秋时期，齐国出兵攻占了毗邻的一个小诸侯国郭国。几年后齐桓公经过此地，问当地父老：“郭国为何灭亡？”父老说：“因为国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齐桓公大惑不解，问道：“照各位所言，你们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又怎么会亡国呢？”父老回答说：“国君知道什么是善，却不去做；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所以灭亡。”

故事讲完，王珪就进入了正题：“而今，这位美女仍然在陛下左右，臣还以为陛下认同李瑗杀夫夺妻的做法。如果陛下认为他的做法是错的，却仍旧留着这位美女，那就叫‘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

李世民闻言，顿时朗声大笑，连连称善，随后就把这位美女送回了家乡。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很少见到喜好道德如喜好美色那样的人啊！可孔子他老人家假如碰上李世民，肯定会把他算一个。

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男人，并且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一定程度的好色也不算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当好色与好德产生冲突时，李世民却能舍色而取德，这就足以表明他确实拥有超越常人的自制力。

如果说放归一个叛臣的姬妾还算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在下面这则故事中，李世民的做法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

那是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李世民物色了一个“容色绝姝，当时莫及”的妙龄少女，准备将其纳入后宫为“充华”。这个美女是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仅十六七岁，不但姿色出众，而且知书达理。对于这个人选，太宗本人和朝中大臣都很满意。于是李世民立即下诏书，确定了成婚的日子。可就在宫中使节正准备

前往郑家迎娶新人时，魏徵却忽然站出来，把这桩美事搅黄了。

因为魏徵得知这个郑家女儿早已许配给了士人陆爽，当即上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贞观政要》卷二）

李世民闻言，大为惊讶，连忙下诏“深自克责”，并且罢停了迎婚策使，命人赶紧将郑氏送还旧夫。可是，当时朝中的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一帮宰执大臣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他们说：“郑氏许配给陆爽的事情，只是传闻，并不能确定，朝廷大礼既行，绝不可中止。”

与此同时，那个忽然成了皇帝情敌的读书人陆爽也吓得不轻，赶紧上书表白说：“陆某家父在世之时，确实与郑家有所交往，可婚姻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都是外人乱传。”

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这回更有理由了，于是力劝皇帝早日完婚。

然而，李世民对此还是半信半疑。他问魏徵：“群臣大概是为了讨好朕，可陆爽本人为何也这么说呢？”

魏徵回答：“臣猜想，他可能是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了。”

李世民诧异地问：“这怎么说？”

魏徵说：“当年太上皇平定京城时，曾经把辛处俭的女人纳入后宫，颇为宠幸。辛处俭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很不高兴，就把他逐出东宫，贬为万年县的属吏。辛处俭为此恐惧不安，时常担心性命不保。而今陆爽也一样，他以为陛下就算今天能容他，日后也必定会暗中谴谪，所以一再自我表白，实在不足为怪。”

李世民听完，很坚决地取消了这个婚礼，并且公开下诏承认自己的错误：“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贞观政要》卷二）

在中国古代，一个稍微有点地位的男人拥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不用说至高无上、富有四海的皇帝了。从当时的制度和社会习俗来说，六宫粉黛、三千佳丽是皇帝必然有的特权。无论皇帝要娶普天之下的哪一个女人，也绝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并且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而太宗迎娶郑氏这件事情，就更是无可厚非了。首先，诏书已经下达，宫中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皇帝大婚绝非儿戏，不能说停就停；其次，只有魏徵一人持反对意见，朝中所有宰执大臣全都极力赞成，李世民要想顺水推舟把美女娶进宫很容易；最后，连陆爽本人都表态说没有婚约这回事了，李世民当然更没有理由取消这个婚礼。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世民最后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皇帝这种深明大义的做法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

李世民之所以做出这个明智的决定，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魏徵的谏言，但是最重要的，无疑还是他内在的自制力在发挥作用——他能够用理性战胜自己的感情，用道义战胜自己的欲望，而且能勇于向天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尽管这个女人他即便娶了，也几乎没有人会说他是错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一帝，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征服天下，更在于他能征服自身——征服人性普遍的弱点。

正所谓：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1]　西汉的吕雉在汉高祖刘邦死后，打击刘姓宗室，极力扶植外戚，擅权揽政，历时八年，史称“吕氏之祸”。

第八章 盛世唐朝，世界之心

永远的长安

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永不褪色的历史记忆。

这份记忆是如此辉煌，以至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目光向历史的深处回望，仿佛总是能看见一个澄明的天空，一片辽阔的大地，还有天地之间——那一座金黄色的富贵雍容的城。

这座城就是长安。

它生长在唐朝。

在我的眼中，唐朝的长安凝聚了所有男性的雄伟与阳刚，也蕴含着所有女性的华丽和妩媚。我无法用更多的形容词来描摹它。我只愿独自穿过岁月的长廊，悄悄掀开时光的帷幔，用一种朝圣的目光，去抚摸这座城的每一块砖墙、每一株草木、每一寸土地、每一角飞檐以及这座城中每一个男女老幼的脸庞……

我看见唐朝的阳光像花一样绽放，我看见长安向我敞开了母亲一样的胸膛。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是唐朝人。

我告诉自己——

长安，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市，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它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米，全城周长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1.4倍，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城内共有三个建筑群：位于北部正中的是宫城，为皇帝和皇族所居；宫城南面是皇城，面积比宫城略大，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宫城和皇城之外是外郭城，为居民区和商业区。

整座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有11条大街，东西有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长安的每条街道都笔直而宽广，其宽度达到了令人咋舌、近乎奢侈的地步。比如南北主干道朱雀大街的宽度就达150多米，而今天中国的“第一街”——北京长安街最宽的地段也没有超过120米。再如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承天门横街，宽度更是达到441米，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宽的街道，其气势之雄伟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宽阔平坦的街道两侧大多种有整排的槐树和榆树，而宫城与皇城中遍植梧桐和垂柳，整座城市绿树成荫，风景宜人，既繁华热闹，又不失幽雅和静美。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东北部的龙首原上初建了大明宫。龙首原地势高耸，可以俯瞰整座长安城，故而大明宫的气势远比太极宫更为煊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又对大明宫进行了扩建，使其功能更为完备，规模更为宏大。从此，大明宫取代太极宫，成为唐朝皇帝的起居和听政之所。

大明宫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规制最为严整、规划最具特色的宫殿建筑群，其周长为7.6公里，面积达3.2平方公里，是明清紫禁城的4.5倍。宫城四面有11座城门，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部有三道宫墙护卫，目前已探明的殿、台、楼、亭等基址共有40余处。在大明宫的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大明宫就是以这三个宫殿群为中心组成的。其中，含元殿是大明宫正殿，是唐朝皇帝举行朝会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大仪式的殿宇。此殿殿基高达15.6米，面阔75.9米，进深41.3米，面积达3134.67平方米，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宫殿——北京故宫太和殿——面积的1.3倍。

在含元殿主殿的两翼即东南和西南方向，分别建有突出主殿的翔鸾阁和栖凤阁，两阁相距150米，各以曲尺形廊庑与主殿相连。整组建筑两翼突出，主殿缩进，呈“凹”字形。主殿前是左右两条各长78米的蜿蜒迤逦的龙尾道。

在整个含元殿建筑群的前方，是一个南北宽615米、东西长750米的大型广场，总面积达461 250平方米，比今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还大，相当于60多个标准的现代足球场。

站在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广场上仰望巍峨壮丽的含元殿，任何人都会为之悚然动容，心潮澎湃。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哪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唐朝？

哪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这样的一座长安？

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走在长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宽阔大道上，你遇见的绝不仅仅是唐朝人。

你随时会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东罗马）人、日本人、新罗人、天竺（印度）人、真腊（柬埔寨）人、骠国（缅甸）人……他们中有元首、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黑色人种昆仑奴，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要感受什么叫作国际性大都市，你必须来长安；要感受什么叫作对外开放、与时俱进，你也要来长安；要了解当时的东西方和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盛况，你更要来长安。

因为当时的大唐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而大唐帝京长安则是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学家向达先生说，在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了中国的威望。”

据统计，唐朝曾先后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为了接待各国使节和来宾，唐朝专门设立了鸿胪寺，由当时朝中的国际政治专家担任主管官员。长安城中甚至有专供外国人长期居住的“番坊”。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唐朝读书之后，进而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终身在唐朝为官。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到长安的太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完成学业后留在唐朝任职，历任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等职。

晁衡在长安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结成了好友。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晁衡作为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者，与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不料途中遇险，船只漂到越南，友人们误以为他已经遇难，极为悲伤，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又辗转回到了长安，一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前后在中国一共生活了53年。

有一些外国使臣出使唐朝后也留了下来。比如波斯大酋长阿罗撼，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出使中国后便留在唐朝为官，此后又

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拂菻等国，因功被任命为右屯卫将军，授上柱国，封开国公，位尊爵显，并一直在中国活到了95岁高龄。

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说过：“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著名人物荟萃之地。”

除了留学生和使节，在唐朝定居数量最多的就是商人。唐朝专门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兰州、凉州、敦煌，都成了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贞观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而各国商人在长安西市开店经商、长期居住的也有数千家之多。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有唐一朝，曾有大量的外商在广州定居，从事各种贸易活动，仅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死于战乱的外商就达12万人以上。

为了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可直达中亚、西亚、东欧，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方面，可由登州、楚州或明州出海，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此外，由扬州、明州、泉州或广州出发，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穿越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可到达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越过阿拉伯海，可到达阿曼湾、波斯湾，并可远至红海，抵达埃及和东非的港口，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通过陆地和海上这两条“黄金通道”，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了中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东罗马皇帝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赠绫、绮等丝织品。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和妇女都极其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拂菻也成了唐朝丝织物传入其他国家的重要转输地。

7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本人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食遣使来唐共达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后来又从这里传入了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唐朝后期，火药的主要成分——硝，也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也对唐朝产生了一定影响。阿拉伯的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而其外科医术就是在这时候传入了中国。

7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当时许多波斯商人也流亡到了唐朝，纷纷在中国落户。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开设的“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通过贸易活动，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而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也传入了波斯。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的戒日王征服了五天竺，统一了印度半岛，随即遣使与唐通好。从此，天竺与唐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纻丝、色绢、瓷器、铜钱，从天竺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据说学成归国后制出的糖，其颜色和味道比印度原产的还好。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分。

唐初，在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来。高宗时期，唐朝先后出兵平定了百济和高丽，新罗遂于公元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与唐朝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品的首位。他们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新罗人。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中举后就留在唐朝为官。

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罗就相继设立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据《唐律》改订了《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文宗太

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带回了茶叶种子，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有唐一朝，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无比向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过上“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向中国派出留学生、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26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计19次，其中实际到达长安为15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可从8世纪初起，人数已多达550人以上。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唐朝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团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中国大乘佛教的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而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于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诣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他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其时已经年近七旬，双目失明，可他不仅将中国佛教的律宗传到了日本，而且向日本人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各种知识。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葬在了招提寺。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藤原京，此后又于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是模

仿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等，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纹饰也和唐朝如出一辙。

基本上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京城俨然就是山寨版的长安。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唐朝与南亚的林邑（越南）、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尼婆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的吐火罗（阿富汗）等国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外交往来。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欧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如八面来风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正是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的唐朝，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博大、最宽容、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

这就叫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舌辩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

公元642年，五天竺的最高领袖戒日王向当时的印度全境发布了一道敕命——他要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无遮大会，即大型的佛教经义辩论会。会议邀请了十八个国王，还有各国的大小乘佛教僧人三千多人、著名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的僧人一千余人以及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的僧人两千余人，几乎集中了当时五天竺的所有政治和宗教精英。

而邀请这些人与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与一个来自中国的僧

人进行自由辩论。

大会正式举行那天，整座曲女城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锣鼓喧天。除了被邀请的代表外，云集于此的还有各国的大臣、卫兵、侍从以及慕名而来的社会各界人士。会场内外“或象或舆，或幢或幡，各自围绕……若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场面之盛大隆重可谓前所未有，百年不遇。

人们纷涌进入会场后，看见高坛的宝床上静静地坐着一个面目清癯、肤色白皙的僧人，在会场的门楼前高悬着两部用大字书写的大乘佛教论著——《会宗论》和《制恶见论》。

这位僧人就是论主，他写的这两部论著就是本次大会的论题。与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就这两部论著的任何一个论点提出质疑，进行辩论和驳难。戒日王命人在会场前高声宣布：大会为时十八天，在此期间，任何人只要能从这两部论著中找出一个字不合义理，并且将论主驳倒，这个中国僧人就要当场被砍掉脑袋，向众人谢罪！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学识、智慧和辩才充满自信，绝不敢做出如此承诺，夸下如此海口。

可是，这个中国僧人真有那么厉害吗？

要知道，在座的这些人绝非等闲之辈——“诸贤并博蕴文义，富瞻辩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就是说，五天竺最有学问、最有智慧、对佛法造诣最为精深的人都在这里了，难道以他们多年的修行和深厚的学养，果真挑不出这个中国僧人一个字的毛病？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在这十八天里，不断有人站出来挑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进行了激烈的辩难。而这个中国僧人却始终神色自若，从容应对，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最后，挑战者无不理屈词穷，一一败下阵来。到大会结束时，确实没有一个人能攻破他的学说，驳倒他的立论。与会的众多高僧大德无不心服口服，对这个中国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戒日王非常高兴，当即赐给他大量的金银和法衣，在场的十八个国王也纷纷供养各种珍宝。按照印度惯例，无遮大会得胜的论主可以乘坐璎珞庄严的大象游行于各地，接受人们的礼敬和瞻仰。可对于这些赏赐、供养和尊贵的礼遇，这个中国僧人全都婉言谢绝了。

本来人们对这位精通三藏、智慧如海的法师已经敬佩不已，而此刻他对名利的这种淡泊超然的态度越发赢得人们的崇敬。他的美名随后就传遍了五天竺，大乘僧众盛赞他为“大乘天”，小乘僧众尊称他为“解脱天”。

这位来自东土大唐、名震五天竺并最终在世界佛教史上写下辉煌一页的中国僧人，就是玄奘。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世称“唐三藏”。“三藏”是指佛教的经藏、律藏、论藏，此称号意谓对佛教典籍的精通，只是一种泛用的尊称，并非玄奘专名。玄奘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 [1] ，其祖上历代为官，父陈惠曾任隋朝江陵县令，后辞官归隐，潜心儒学。

玄奘十一岁时，跟随他的二兄、已出家的长捷法师进入洛阳净土寺修学佛法，不久便熟习《法华经》《维摩经》。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旨到洛阳度僧，年仅十三岁的玄奘闻讯前往。素有“知士之鉴”的郑善果见其容貌俊逸、器宇不凡，就问他是否想出家，玄奘说是。郑善果又问他为何出家，他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大为赞叹，对身边的人说：“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当时玄奘的年龄尚幼，本来是不能出家的，可郑善果却破格录取了他，将年少的玄奘剃度为僧。

郑善果预料到这个少年终将成为“释门伟器”、一代高僧，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自己此刻的这个决定竟然会深刻影响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的历史。

玄奘出家后，很快就精通了《大涅槃经》《摄大乘论》等重要的大乘经论。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天下分崩离析，熊熊战火燃遍中原，洛阳更是首当其冲。为了躲避战乱，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深造，玄奘离开洛阳，前往天下的名山大寺参学，先是到了成都，后来又辗转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于贞观元年来到长安。

将近十年间，玄奘遍访名师，究通各家，此时已成为备受赞誉的一介高僧。但是在多年参学的过程中，玄奘逐渐发现众多名师对佛法的理解异说纷纭，歧义互见，而考诸现有各种佛典译本，却又颇多矛盾抵牾之处，令人无所适从，于是萌生了前往印度求取更多佛学原典，尤

其是大乘经典的强烈愿望。

恰逢当时中天竺的僧人波颇密多罗来到长安，向他介绍了著名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的学术规模以及天竺高僧、该寺住持戒贤法师弘讲《瑜伽师地论》的盛况，更加坚定了玄奘西行的决心。他立即向朝廷上表，要求出境前往天竺。可由于当时出国之禁甚严，他的申请被驳回了，但是玄奘始终没有放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的决心和信念，一直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2]，长安和关东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霜灾和饥荒，朝廷同意灾民可以前往各地自谋生路，玄奘意识到时机成熟，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混在难民队伍中偷越国境，西行求法。

此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出发的这一刻，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十九年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会带着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载誉归来，不仅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而且得到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

没有人知道，他迈出长安的这一步，是在书写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

玄奘茕然西去的背影显得寂寞而苍凉。

走向天竺的这一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一路上虽然没有白骨精和盘丝洞，没有牛魔王和火焰山，没有魑魅魍魉和九九八十一难，却有一望无际的大漠黄沙，有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有关卡盘查、官吏缉捕的困扰，有缺水断粮、迷失方向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他葬身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或者迫使他心生懊悔，黯然东返。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挡住玄奘的脚步。

早在迈出长安的那一刻，玄奘就已发出宏大的誓愿——

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

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宁可就西而死，岂能归东而生？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正是这样一种单纯而伟大的信仰，使他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甚至蔑视死亡的威胁，顽强地走向自己生命中的圣地。

玄奘从长安起程，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出玉门关外五烽（五道重兵把守的关卡），进入“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八百里戈壁——莫贺延碛，在克服了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困难之后，终于穿越这个可怕的死亡地带，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国王麴文泰盛情接待了他，但执意要求他留在高昌讲经说法，否则就要把他遣送回国。玄奘无奈，只好以绝食相抗，“水浆不涉于口三日”。最后麴文泰终于被玄奘的至诚所感动，提出两个放行的条件：一、与他约为兄弟；二、求法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

玄奘同意。麴文泰大喜，当即“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麴文泰还专门准备了二十四封国书，命护送的大臣交给沿途的二十四国国王，每书奉送大绫一匹为礼物，并且亲手写了一封辞义谦恭的信，随信献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请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致信其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为玄奘法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就这样，玄奘离开高昌，过焉耆、龟兹等国，翻越凌山（葱岭北部），到达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会晤了统叶护可汗。随后，在统叶护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护送使节的帮助下，玄奘顺利经过西域诸国，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进入了北印度。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秋天，玄奘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这里，玄奘拜戒贤为师，潜心学习梵语，研习各种大小乘经论，尤其专攻印度法相宗（唯识宗）代表作《瑜伽师地

论》，历时五年。此后，玄奘遍访五天竺，足迹遍及印度各地。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重回那烂陀寺。此时他的学业已经粲然大成，戒贤命其升座为众讲解大乘唯识经典。在此期间，他著有《会宗论》，会通了印度大乘瑜伽、般若二宗，将唯识与中观学说相互融贯，自成一家。此外，由于当时南天竺的小乘僧人著有《破大乘论》攻击大乘学说，负面影响很大，玄奘就应戒日王之请，又撰写了破除小乘见地的《制恶见论》。

从此，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玄奘又在戒日王举办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挫败了五天竺所有的论敌，其盛名更是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戒贤，成为全印度造诣最深、声誉最隆的佛教思想界领袖。

玄奘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遂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告别了戒贤法师和戒日王，返回中国。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长安。

和他一起回到中国的，是657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梵文佛典。

玄奘大师的西行求法，前后历时十九年，行程共计五万里，堪称世界中古史上一次艰难而伟大的探险之旅、朝圣之旅，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术和文化之旅。

玄奘回到长安的时候，受到了朝野上下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与他当年“偷越国境”时寂寞而苍凉的境况相去不啻霄壤。

然而，玄奘还是当年的那个玄奘，信仰还是当年的那个信仰。

唯一不同的，只是外在的评价和世人的目光。

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去洛阳见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极为赞叹和欣赏，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于是李世民就请他把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随后，玄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唐西域记》。

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

它记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人

情等，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众所周知，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甚至声称："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因此，要研究印度古代史，《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谁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

一回国，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佛学典籍。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译经事业，命房玄龄在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个规模完备的译场，并"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当他的助手。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译出了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太宗御笔钦赐《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太子李治为亡母长孙皇后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玄奘奉命成为住持，进入该寺继续译经。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已六十八岁的玄奘终于译出了多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而他的生命也已在彪炳千秋的译经事业中走到了终点。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初五夜，玄奘大师在宜君山的玉华寺圆寂，终年六十九岁。

出殡之日，莽莽苍苍的白鹿原上出现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

这里有朝廷官员，有佛教僧人，可更多的是自发为大师送行的长安百姓。史称："（玄奘）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玄奘传》）

从回到长安的第二十七天起，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佛典，一直到去世前的二十七天，他才搁下手中的译笔，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九年间，玄奘带领弟子们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计1300万言。

玄奘大师对梵文造诣精深，而且学术态度极为严谨，因而由他主译的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文义的精确畅达，还是在翻译体例的制定、矫正旧译的讹谬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后世因此将他与前秦的鸠摩罗什、萧梁的真谛、开元时代的不空，并称为中国佛

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个人中，其他三个都是外籍僧人：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真谛是西天竺人，不空是北天竺人，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国人。

梁启超说："自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

[1] 玄奘生年多有异说，此处从梁启超之说。

[2] 玄奘西行的时间，普遍认为是贞观三年，此处依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元年。

第九章 万邦来朝，李世民成了天可汗

东征突厥，报五年之仇

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引领着大唐帝国走上了一条励精图治的强国之路，短短十余年间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无论是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还是社会的稳定、民生的富庶、人口的增长，无不显示出大唐帝国在文治方面所取

得的骄人成就。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强大。

对此，作为一个从血与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帝王，作为一个曾经用刀剑荡平群雄、鼎定天下的创业之君，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缔造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帝国，既要有一袭崇文的华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

换言之，李世民所追求的不仅是“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李世民《重幸武功》）的煌煌文治，他同时更憧憬着“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的赫赫武功。

上苍没有亏待李世民。

历史没有辜负李世民。

面对他那经天纬地的宏大抱负，上苍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历史似乎也显得出奇慷慨——就在李世民执政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威震四夷、功盖八荒的时代就在他的憧憬和仰望中訇然降临。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的天可汗时代。

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天可汗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被唐朝征服的对手，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东突厥。

从南北朝时起，东突厥就是历代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敌人。到隋大业年间，东突厥在始毕可汗执政时期臻于全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突厥传》）

大业末年，中原板荡，天下分崩，东突厥的百万铁骑屡屡伺机入寇。其兵锋所到之处，城郭宫室焚毁殆尽，财帛子女为之一空。而四方的逐鹿群雄也纷纷依附在东突厥的卵翼之下，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王世充、高开道等人，“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通典》卷一九七）。就连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也不得不借助东突厥的力量，将其引为奥援。

唐帝国建立之后，颉利可汗即位，依旧肆无忌惮，“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多次倾巢南侵，深入唐朝腹地。“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却越发变本

加厉，不但“言辞悖傲”，而且“求请无厌”（《旧唐书·突厥传》）。

如此强大的外患一天不铲除，大唐王朝就一天也不得安宁。

而最让李世民感到耻辱的一次，就是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

那一次，李世民刚刚登基，政局未稳，颉利可汗就亲率十多万铁骑直逼长安。李世民被迫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与颉利签订了城下之盟，才换取了暂时的和平。

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李世民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刚当上皇帝就被突厥人无可奈何地要挟了一把，结结实实地敲诈了一回。

这样的奇耻大辱不啻一道丑陋的伤疤，从此深深刻在李世民的记忆之中，并且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李世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雪洗前耻、根除外患的那一天。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从贞观元年起，曾经“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的东突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鼎盛走向了衰落——

一方面，颉利可汗宠信佞臣，导致政局大乱，原本臣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北方诸部相率反叛；另一方面，东突厥境内又遭遇了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旧唐书·突厥传》）。如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巨大困境使东突厥很快露出了亡国之兆。

此外，东突厥王室又产生了严重的分裂，更使其形势雪上加霜。

这个致命的分裂源于颉利可汗与突利小可汗的叔侄反目。

颉利可汗即位之后，突利小可汗封藩于幽州北面，统辖其国东部。贞观元年，严重的雪灾导致东突厥各部族无以为生，于是，突利可汗下辖的奚、霫、契丹等部纷纷叛离，归降唐朝，突利没有办法阻止。颉利大为不满，怒斥其统御无方。双方的裂痕由此产生。不久，颉利在讨伐北方叛乱诸部的战争中失利，于是征调突利北上平叛，没想到突利又遭遇惨败，仅以少数轻骑逃回。颉利怒不可遏，将突利囚禁了十

多天，并施以鞭挞的惩罚。二人的关系就此严重恶化，叔侄之间开始各打各的算盘。

突利先是满腹怨恨，继而生出了反叛之心。而颉利对突利也彻底失去了信任，在随后的日子里连连向他征兵，试图削弱他的力量。

突利意识到颉利这是在温水煮青蛙，迟早会把他弄死，所以他决不能坐以待毙。

危急之中，突利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当年在豳州五陇阪与他“约为兄弟”的秦王、如今的大唐天子李世民。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突利向李世民呈上密表，请求归降。颉利很快就得到消息，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发兵进攻突利。

突利急忙遣使向唐朝求援，李世民问策于群臣。满朝文武都认为对付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时任兵部尚书的杜如晦更是强烈主张，应趁突厥内乱而将其一举荡平，否则将后悔无及。

然而，李世民最终还是没有大举出兵。

因为他知道，以唐朝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以发动一场平定东突厥的大规模战争。

可他也知道，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削弱东突厥的机会。

所以，李世民绝不会无所作为。

他一边派遣秦武通率兵接应突利，一边把目标锁定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十几年来，这个人一直盘踞在唐帝国的北部边境，而且不遗余力地充当东突厥的打手，始终是唐王朝的肘腋之患。

他，就是梁师都。

在隋末的逐鹿群雄之中，梁师都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硕果仅存的老前辈。

早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即李渊父子起兵之前，梁师都就

已经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区）登基称帝了，此后一直在东突厥的支持下割据一方，虽然无力扩张地盘，却活得长久。当四方的逐鹿群雄都已被李渊父子一一剪灭的时候，梁师都却始终活蹦乱跳。直到大唐王朝已经建立了整整十个年头，梁师都依然在他的独立王国里自在逍遥，始终没有出局的意思。

可是到了贞观二年，梁师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因为颉利可汗自顾不暇，再也罩不住他这个小弟了。

李世民先是打算“和平解放”朔方，于是给梁师都去了一封信，对他晓以利害，劝他弃暗投明，可梁师都偏偏不见棺材不掉泪，硬是不从。李世民遂决定武力铲除，把任务交给了夏州（今陕西横山区西）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命他们想办法拔掉这颗扎在帝国北部十几年的钉子。

二刘很有谋略。他们第一步采取的是骚扰行动，不断派遣轻骑兵深入梁国国境，践踏摧毁其农田庄稼，使其人心惶惶；第二步，他们发动了间谍战，派出大量间谍潜入朔方，造谣生事，上下撺掇，成功离间了梁师都与群臣的关系。自此，梁国国力渐衰，归降唐朝的人不绝于途。其国名将李正宝等人打算发动政变，劫持梁师都举国归唐，不料事情泄露，李正宝逃奔唐朝。

经此变故，梁国上下越发相互猜忌。二刘意识到时机成熟，遂上表请求出兵。李世民当即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部出征，同时命刘旻和刘兰成协同作战。

在此之前，东突厥曾经想放弃梁师都，拿他和唐朝做交易，交换叛逃到唐朝的契丹人。

可突厥人的这项提议遭到李世民的断然拒绝。

李世民说：“契丹人和突厥人是两个种族，而今契丹人已经归附大唐，你们有什么资格索回？梁师都身为中原汉人，侵盗大唐土地，凌辱大唐百姓，你们突厥人却庇护他。我兴兵讨伐，你们就出面干预。可他终究只是锅里的一条鱼，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算暂时消灭不了他，我也绝不会以归附大唐的人和他交换。”

颉利可汗恼羞成怒，决定力保梁师都。当唐军逼近朔方时，突厥立刻出兵援救。在朔方以南数十里的地方，突厥与唐军展开遭遇战。此战突厥大败，柴绍乘胜进围朔方，突厥军队不敢救援，只能远远观望。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朔方城粮尽援绝，回天乏术，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不得不将梁师都刺杀，举城投降唐军。

至此，这个在突厥卵翼下苟延残喘了十余年的割据政权终于覆灭。

接下来，李世民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东突厥了。

贞观二年冬，叛离东突厥的北方各部纷纷推举薛延陀的首领乙失夷男为可汗。乙失夷男心里虽然很渴望，可表面上却一再推辞。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一旦自立为可汗，就意味着与颉利可汗势不两立，成为东突厥最首要的敌人，一点回旋的余地和退路都没有了，所以乙失夷男不敢贸然行事。

最起码，在明确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前，乙失夷男不想冒冒失失地当这根出头的椽子。

在当时，“国际社会”的首要代表当然就是唐朝。

要想当这个可汗，唐朝的态度很重要。

而让乙失夷男不敢想象的是，就在他大做可汗梦的时候，一个名叫乔师望的唐朝特使居然千里迢迢地给他送来了一道册封诏书。

千真万确！这道诏书是大唐天子李世民颁发的，不但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还赐给他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鼓纛”（巨鼓和大旗）。乙失夷男激动万分，随即遣使到唐朝入贡，同时登上可汗之位，宣布成立薛延陀汗国，建王庭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下。

从此，薛延陀的势力空前壮大，“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落皆属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秋天，乙失夷男又派遣其弟统特勒入唐朝贡，李世民又赐以宝刀和宝鞭。唐朝与薛延陀的关系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很显然，李世民所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战略。他主动对乙失夷男进行册封，承认薛延陀独立，与其建立同盟关系，摆明了就是要让东突厥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面对如此不利的战略形势，颉利可汗大为惶恐，只好硬着头皮向唐朝称臣，并且要求迎娶唐朝公主，“请修婿礼”（《旧唐书·突厥传》）。

谁都知道，这种表面上的低姿态只不过是突厥人的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所缓和，国力有所恢复，突厥人绝不会放弃对唐朝的侵略。

对此，大唐君臣自然心知肚明。

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瑾就上表力请朝廷出兵，并列举了东突厥必然灭亡的六大理由：“第一，颉利纵欲凶暴，诛杀贤良，亲近奸佞；第二，薛延陀等部族纷纷叛离；第三，突利小可汗、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皆被颉利问罪而无处容身；第四，塞北连年遭遇霜冻，突厥人粮食缺乏；第五，颉利不信任突厥人，将大权交给外族胡人，而外族胡人反复无常，如果大军压境，必生内变；第六，汉人因躲避战乱而流亡突厥的人数众多，如今突厥内乱，他们据险自保，若唐军出塞，其众必然纷起响应。”

张公瑾对形势的判断既全面又准确，可谓一针见血。

李世民意识到征服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八月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北伐统帅，负责组建远征军。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远征军集结完毕，各路将领多为当世名将。李世民命大军兵分六路：以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总管，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世勣、右武卫将军丘行恭出通汉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灵州大都督薛万彻出畅武道；任城王李道宗出大同道。六路大军共计十余万人，皆受李靖节度，从各个方向大举进攻东突厥。其中，担任正面攻击的主力部队是李靖与李世勣的部队。

六路大军就像六支寒光闪闪的利剑同时刺向漠北。这一次，唐帝国倾尽精锐，志在必得。

东突厥注定在劫难逃……

十一月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首战告捷，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击败东突厥的边境部队。

十二月初二，突利小可汗逃离东突厥汗国，抵达长安朝见大唐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不无自豪地对侍臣说：“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叩首），庶几可雪前耻。”（《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同月下旬，东突厥的重要将领阿史那郁射也率部来降。

突利是东突厥的二号人物，阿史那郁射是颉利的心腹大将，他们的投诚意味着颉利已经众叛亲离，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东突厥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雪夜弓刀：东突厥的覆灭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唐帝国北部边境。

地冻天寒，朔风怒吼。一支军队正顶着漫天飞雪从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北推进。

一马当先的人就是李靖。

尽管这一年李靖已经年届六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将了，可他跃马扬鞭的身影却依然和年轻人一样矫健。

紧跟在李靖身后的，是他从北伐大军中亲自挑选出来的三千精锐骑兵。

这三千铁骑要跟随李靖执行一项突袭任务，目标就是颉利可汗的王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突袭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恶阳岭（和林格尔县南），出其不意地歼灭了这里的突厥守军。稍事休整之后，李靖命令部队连夜开拔，直指定襄。

又有谁能想到，在这大雪纷飞、月黑风高的隆冬深夜里，大唐最精锐的一支铁骑居然会孤军深入，像一柄钢刀一样直直插向东突厥汗国的心脏？

头一个想不到的，就是颉利可汗。

此时此刻，颉利正在他那温暖如春的可汗大帐中烤火饮酒。尽管早已获悉唐朝出兵的消息，可颉利并不十分担心。

因为边境线上到处都有重兵布防，唐军北上的每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况且时值严冬，越往北天气越冷，唐军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后勤

补给都将遭遇重重困难，要想在短时间内打到他的突厥王庭，无异于痴人说梦。此外，从最近得到的战报判断，唐朝各路大军进展都很缓慢，显然也是受制于天气因素，很可能要等到春天气候回暖，唐军才会发动大规模攻势。

所以，眼下的颉利根本没有理由感到恐慌。

周遭万籁俱寂，除了帐外的巡逻兵踏雪而过的脚步声，天地间什么动静也没有。摇曳的烛光下，颉利醉意朦胧，睡眼惺忪。

然而，那震耳欲聋的喊杀声还是响起来了。

就在颉利毫无防备的时刻突然响起来了。

有那么一瞬间，颉利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可他马上就清醒了。

这不是梦。

这是让人不敢相信却不得不相信的现实——唐军杀来了。

唐军就像插上了翅膀的雄鹰一样，越过茫茫雪原从天而降了。

颉利一个箭步冲出大帐的时候，看见整座王庭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砍杀声和哀号声。颉利对着左右怒吼：“如果不是唐朝倾国而来，李靖何敢孤军至此？”

可是，不管唐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此刻的颉利都已无心恋战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逃！

当夜，颉利带着部众逃出王庭，一路上恍如惊弓之鸟，头也不回地朝着阴山方向没命狂奔。

此战唐军出奇制胜，一举攻占了定襄。

这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长途奔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大唐名将李靖在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又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大喜过望。当年的渭水之耻一朝冰释。数月后，当李靖班师凯旋时，李世民曾当面称赞他说：“昔李陵提步卒五

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旧唐书·突厥传》）

中唐诗人卢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塞下曲》，正是定襄之战的生动写照。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定襄的陷落对于东突厥和颉利可汗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此役之败，使颉利不仅丢掉了王庭，更丢掉了突厥军民最后的一点士气和人心。

李靖没有让颉利喘息，又派出间谍离间颉利的君臣关系。这一年正月初九，颉利的心腹大臣康苏密带着一干亲信投奔了唐朝。

与康苏密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流亡塞北多年的隋朝萧皇后以及她的孙子杨政道。

颉利绝对没有料到唐军会对定襄发动突袭。在逃往阴山的路上，他一定对此百思不解。

可他更加没有料到的是：另一支唐军居然又守候在他的逃亡路上。

这就是李世勣。

按照李靖事先的战略部署，在他奔袭定襄的同时，另一支唐军主力李世勣部也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出发，绕道进抵颉利逃往阴山山区的必经之路——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在那里给颉利张开了一个口袋。

二月初八，当颉利逃至白道时，唐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而李靖的追兵又迅速追至，对其形成了合围之势。突厥军队一日数惊，士气降到了最低点。但是突厥人毕竟骁勇善战，在扔下无数具尸体之后，残部硬是拥着颉利可汗杀开一条血路，仓皇逃进了阴山。

颉利一口气跑到了阴山以北的碛口（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没有力气再往前跑，只好暂时在此设立牙帐。惊魂甫定，颉利急忙派遣心腹执失思力前往长安，向唐太宗李世民谢罪，愿意举国投降，并承诺

由颉利可汗亲自入朝。

李世民很清楚，这只是颉利的缓兵之计，此时如果不乘胜将东突厥一举击溃，颉利就会逃亡漠北，日后也必定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于是李世民一边命鸿胪卿唐俭前去与颉利谈判——实际上是稳住他——一边密令李靖继续进兵，不让颉利有丝毫喘息之机。

李靖与李世勣会师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他们很快就得出了一致结论："颉利虽然兵败，但残部仍有数万之众。如果他们穿越大漠，与漠北的铁勒九姓会合，到时路途遥远，又为大漠所阻，唐军势必无法深入追击。现在唐朝特使唐俭正在碛口与颉利谈判，突厥人肯定会放松警戒。如果我们出动一万名精锐骑兵，携带二十日口粮，从白道出发，奇袭突厥牙帐，必然可以生擒颉利。"

副帅张公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皇上已经下诏接受了突厥人的投降，特使唐俭仍在突厥大营中，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

李靖斩钉截铁地答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不可失。当年韩信大破齐国，便是抓住了战机。如果能以此一战击破突厥，唐俭之辈何足惜哉？"

这就是名将之所以是名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不但要比普通将领更有谋略、更有胆识、更有决断力，而且绝对要比普通将领更为冷酷无情。

在李靖看来，牺牲一颗唐俭的人头，换取对突战争的最终胜利，这绝对值得。

是日深夜，李靖率部先行，李世勣随后跟进。大军进入阴山，遇到东突厥的殿后部队一千余帐，唐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悉数擒获。李靖命这些人当向导，大军继续向纵深挺进。

东突厥的丧钟已经敲响，可颉利可汗依旧没有听见。

他再次犯了麻痹轻敌的大错。

当唐朝特使唐俭一行来到碛口时，颉利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他一阵窃喜，同时暗暗打定了主意——权且跟唐朝虚与委蛇，诈降称臣，伺机返回漠北，养精蓄锐，等到来年秋高马肥之时，再南下报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颉利的如意算盘打得哗哗响。

可令人遗憾的是，他这辈子再也没这机会了。此时，唐军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轻骑，已经在大雾的掩护下悄悄逼近了突厥大营。

直到唐军摸到了距离颉利大帐只有七里地的时候，突厥哨兵才侦察到敌情，慌忙发出了警报。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颉利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只好再一次脚底抹油，骑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匹千里马，带着骑兵一万余人继续向漠北逃亡。

李靖大军杀入突厥军营后，与其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不如说是在实施一次大规模屠宰。

因为颉利一溜，突厥部众彻底丧失斗志，人人争相逃命，只能任唐军宰割。

片刻之间，一万多颗突厥人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剩下的十几万男女全部投降。唐军擒获各种牲畜数十万头。同时，东突厥历任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也被斩于乱兵之中[1]，其子阿史那叠罗施被唐军俘虏。

特使唐俭趁乱逃出，捡了一条命。

就在李靖进攻突厥大营之际，李世勣故伎重施，火速北进截断了颉利向北逃窜的退路。颉利麾下的几大酋长纷纷率部向李世勣投降，唐军共俘获五万余人。

面对唐军给他布下的天罗地网，颉利可汗傻眼了。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数十万部众死的死、降的降。短短几天之间，他就从一个堂堂的可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丧家之犬，眼下甚至到了灭亡的边缘。

流亡漠北、重整旗鼓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颉利现在唯一焦虑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近乎绝望之下，颉利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叔父阿史那苏尼失。

苏尼失是启民可汗的弟弟，管辖部落五万家，牙帐位于灵州（今宁夏宁武市）西北。在颉利国势日衰、众叛亲离的这几年，苏尼失是少数忠于他的人之一。突利亡奔唐朝后，颉利就把小可汗的位子给了苏尼失，算是对他一腔忠诚的报答。此时此刻，颉利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只有他了。

思虑及此，颉利迅速掉转马头，带着少数亲兵往灵州方向奔去。

莽莽的黄尘中，颉利落荒而去的背影仿佛一只断翅的苍鹰，充满了孤独、恐惧和无望。

此次出征，唐朝大获全胜，斩杀突厥骑兵数万人，收降部众数十万人。北起阴山、南抵大漠的广袤土地，全部落入大唐帝国的掌控之中。

二月十八日，李靖大破东突厥的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喜悦，当即下诏大赦天下。

经过四年的忍辱负重和养精蓄锐，唐帝国终于一举平定了东突厥，洗雪了当年的称臣之辱和渭水之耻。自北朝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强大威胁的边患，至此也宣告终结。

贞观四年三月初三，大唐帝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四方各部族的酋长和首领纷纷来到长安，齐集在太极宫前，共同向唐太宗李世民敬献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尊号——天可汗。

李世民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一刻，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皆山呼万岁。自此，唐太宗李世民对四夷君长颁发诏书时，一律自称“天可汗”。

一个彪炳千秋、光芒万丈的天可汗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天可汗不仅是一种尊严和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个体系的确立，意味着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大唐皇帝，更成为四夷诸番共尊的万王之王，同时也意味着大唐帝国从此取得了国际联盟的首脑地位，不但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处理国际争端的唯一仲裁者。

唐太宗以大唐天子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保持原有的制度，又可以接受唐帝国任命，出任大唐官员。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称其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先生称其为“胡、汉分治”，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之为“双轨政制”或“一国两制”。

唐朝的天可汗制度，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组织和制度。四夷诸番自愿结成联盟，共推大唐天子为联盟首脑，以唐帝国的国力和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在唐帝国的主导下，体系内全体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实施制裁。唐帝国也有权力和义务保障各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维护各国独立，仲裁国际争端。各成员国必须绝对服从天可汗；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可以联合起来，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必要时也要接受征调到中国平叛。

在这种以天可汗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战略格局之下，唐帝国可以利用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制衡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防务开支和战争成本，而广大的成员国则能享有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尤其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家而言，更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受到强大邻国的侵略。所以，这种天可汗体系既有现代国际安全组织的性质，又有类似于今天联合国的作用。

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国力为依托、没有一个强盛的文明为背景，唐太宗李世民绝不可能成为号令四方的天下共主，而大唐帝国也绝不可能在公元7世纪初就创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历史功绩。

后世史家对此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北狄列传》）

颉利狼狈投奔苏尼失之后，虽然已经是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可他心里依旧残存着一丝翻本的希望。

因为苏尼失麾下仍有五万帐的部众，其中作战部队绝对不少于五万人。此外，他的另一个心腹将领阿史那思结麾下也还有四万铁骑。

颉利想，凭着这些筹码，自己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

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颉利残存的希望——三月初五，东突厥最后一支劲旅阿史那思结率部投降了唐朝。

消息传来，颉利目瞪口呆，如遭电击。

在这种树倒猢狲散的时刻，颉利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怀疑和恐惧——苏尼失会不会把自己卖了？

东突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人都降了，他苏尼失能忠贞不渝，誓与可汗共存亡吗？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在此刻的颉利看来，眼下整个东突厥已经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任了。与其坐在这里束手就擒，还不如继续逃亡，投奔吐谷浑。

现在任何异族人都比本族人更让颉利感到放心。

就在颉利准备再度逃亡的同时，唐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的军队已经向苏尼失的大营迅速逼近。李道宗还先行遣使警告苏尼失，让他即刻逮捕颉利，向唐朝投降。

疑心满腹的颉利嗅出了危险的气息，随即不辞而别，带着几个亲信连夜出逃，进入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中，抄小路往吐谷浑方向狂奔。

接到李道宗的信后，苏尼失大为忧惧。尽管他很不情愿背叛颉利，可眼下的东突厥就快死翘翘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假如不按李道宗说的办，他苏尼失只能陪着颉利一块完蛋。

现在颉利从他的眼皮底下溜了，唐军一定会认为是他故意放跑的，这份罪责他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思虑及此，苏尼失不得不痛下决心，火速派人进入山区追捕，最后硬是把颉利给抓了回来。

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唐大同道副总管张宝相率部进抵苏尼失大营，苏尼失连忙把五花大绑的颉利交了出去，随后率麾下的五万帐全部降唐。

至此，“漠南之地遂空”，唐朝平定东突厥的战争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东突厥亡国后，其残余部众一部分归降薛延陀，一部分投奔西突厥，另有十万余人归附唐朝。太宗李世民在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后，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授以生业，教之礼义”的意见，将突厥降众安置于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各个州县内，希望以中华礼仪之邦的文明力量，逐步将其同化。

原东突厥的疆域，颉利辖境被分置为六个州，设立定襄都督府与云中都督府；突利辖境分置为顺、祐、化、长四州。

颉利被擒至长安后，李世民先是把他的家人和他一起软禁在太仆寺。颉利终日抑郁寡欢，与家人悲歌而泣。李世民遂安排他出任虢州刺史，因为其地“多獐鹿”，可以让他纵情打猎。但颉利辞谢，李世民只好授予他右卫大将军之职，并赐以田宅。

对于一个自即位之后便屡屡侵犯唐朝的亡国之君来说，李世民的做法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颉利在无尽的悔恨和哀伤中郁郁而终。李世民命其族人以突厥礼仪葬之，赠其“归义王”，谥号“荒”。

对于东突厥的突利小可汗及一干降将，李世民更是展示出了一个天可汗的非凡气度和博大胸襟。他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旧唐书·突厥传》）

突利先是被封为北平郡王、右卫大将军，后又出任顺州都督；苏尼失封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封怀化郡王、右武候大将军，后出任北开州都督，统领颉利旧部。其他突厥降将官居五品以上者共有一百余人，占朝廷高阶官员的一半；原东突厥的贵族政要进入长安定居的将近一万家。

高原之战：平定吐谷浑

在唐朝与西域诸国之间，有一条地形狭长的交通要道，称为河西走廊。从长安往西北方向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可到达西域；再穿过西域，可直抵中亚、西亚诸国，甚至远抵欧洲大陆。

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线和贸易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而吐谷浑汗国就位于河西走廊的南侧，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

很显然，吐谷浑与唐朝的双边关系如果良好，就能保障这条贸易生命线的安全与畅通。

不过可惜的是，从李世民上台执政起，双方的关系就一直显得不太良好。尽管太宗李世民努力与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可吐谷浑却屡屡入寇河西走廊，严重威胁着唐朝边境与丝绸之路的安全。

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年从东北的白山黑水迁徙至水草丰沃的青海、甘肃一带，“有地数千里”。6世纪中叶，其王慕容夸吕自立为可汗，建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隋末唐初，慕容伏允在位，曾一度被隋炀帝杨广击败，逃奔党项。大业末年，趁中原战乱之际，慕容伏允收复失地，重建其国。其长子慕容顺曾入隋为人质，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以送还慕容顺为条件，与吐谷浑相约共击河西李轨。平定李轨后，李渊履约将慕容顺遣送回国。

贞观初年，慕容伏允年事已高，遂将朝政大权委于宰相天柱王，对其言听计从。天柱王是一个鹰派人物，倾向于对外扩张。在他的影响下，吐谷浑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表面上经常遣使朝贡，背地里又频频入侵唐朝的西北边境，曾先后纵兵大掠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区）、廓州（今青海化隆县西）等地。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五月，吐谷浑又一次故伎重演，一边“遣使入贡”，一边又“大掠鄯州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忍无可忍，遣使对慕容伏允大加责备，并命他亲自到长安朝见。

慕容伏允谎称有病，拒绝入朝，同时又为其子尊王请婚，要求迎娶唐朝公主。

吐谷浑的这种做法看上去好像颇为自相矛盾，不可理喻，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这么做，无非是一方面想多劫掠一些财帛，捞一些实惠，一方面又不想与唐朝彻底决裂，怕唐朝大动干戈，所以才会屡屡玩这种既当强盗又抛媚眼的不入流把戏。

吐谷浑自以为高明，其实是在玩火。

而玩火者必自焚。

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李世民对吐谷浑的求婚做出了非常明确的答复——要娶唐朝公主可以，但是尊王必须亲自到长安迎娶。

慕容伏允再次当起了缩头乌龟，不但没有让他儿子入朝，而且再度纵兵入寇，甚至扣押了出使吐谷浑的唐朝使臣赵德楷。

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李世民一再容忍，连续派遣十批使者与吐谷浑交涉，但是毫无结果，

慕容伏允置若罔闻。李世民又亲自对吐谷浑的使者“谕以祸福”，但冥顽不灵的慕容伏允“终无悛心”（《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李世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虽然天可汗这种国际政治体系的性质决定了李世民必须把忍耐的尺度放到最宽，必须尽量采用政治斡旋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忍耐绝不意味着纵容，政治斡旋更不意味着放弃武力征服。

就在李世民考虑对吐谷浑用兵的同时，鄯州刺史李玄运也上了一道奏疏：“吐谷浑有非常优良的马匹，这些马都放牧于青海湖一带，如果我们派出一支轻骑兵进行突袭，必能夺取他们的良马。”

吐谷浑的良马就是著名的青海骢。这是原产于波斯的良种马，极为健硕，耐力超常，据说可以日行千里。因为吐谷浑地处青藏高原，水草丰美，很适宜放养这种波斯马，因此吐谷浑大量引进，将其放牧于青海湖一带，并且迅速繁衍。吐谷浑骑兵就是凭借这种优良的青海骢，才得以快速出击，在对唐朝的侵略和作战中占据了充分的速度优势，攻击河西走廊屡屡得手。如果唐朝能夺取这些马匹，不但是给吐谷浑一次严厉教训，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意义。

贞观八年六月，天可汗终于出手了。

李世民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唐朝边境守军及契苾、党项等外族军队，组成一支多国联军，对吐谷浑发动了一次闪电战。段志玄出征后，迅速击溃了吐谷浑的边境部队，并向纵深追击了八百余里。然而，深入吐谷浑的国境后，段志玄却担心粮草不继而下令撤兵。

唐军的第一次西征就这样无功而返。

此次出征的结果让李世民很不满意。

看来，要想彻底平定吐谷浑，段志玄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么，满朝文武中谁最合适呢？

答案只有一个——李靖。

在李世民看来，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出任远征军的统帅。可问题在于，此时的李靖已经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而且身患足疾，前不久刚刚因病辞去右仆射之职，李世民还特意赐给他一把灵寿杖。这么一个年过花甲、连行走都要借助拐杖的老人，愿意承担这项重任吗？

李靖得知天子有意让他出征后，当即找到房玄龄，让他向皇帝转告：“靖虽年老，固堪一行！”（《旧唐书·李靖传》）

李世民龙颜大悦。

不出所料，李靖这把宝刀果然未老。

贞观八年十二月，李世民命李靖为远征军最高统帅，李道宗与侯君集为副统帅，率契苾何力、执失思力、薛万均、薛万彻等人，下辖唐军和东突厥、铁勒、契苾等骑兵部队，组成六大兵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对桀骜不驯的吐谷浑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

为了抵御唐朝的远征大军，吐谷浑积极施展外交手段，先后把南部的党项族人和洮州（今甘肃临潭县）的羌族人从唐朝阵营中拉拢了过去。党项人和羌人在这种时候背叛唐朝，无疑是在给吐谷浑当陪葬。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三月，高甑生部率先对洮州羌发起进攻，很快就将其击溃。闰四月初八，李道宗部进抵库山（今青海湟源县南），大败吐谷浑的前锋部队，首战告捷。

面对来势汹汹的唐朝大军，慕容伏允感到了一阵莫大的恐惧。这个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九年的可汗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将是一生中最危险的一场战争。

慕容伏允很清楚，以吐谷浑的国力和兵力，绝对不可能与强大的唐军抗衡，如果硬着头皮与其正面对决，无疑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拖。

具体的战略就是：首先，大幅度向吐谷浑西部的山区和沙碛地带后撤，保存实力，避敌锋芒；其次，利用吐谷浑国境的广袤和纵深拖长唐军的战线，让唐军在寻找对手主力的过程中疲于奔命，使其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同时陷入困境；最后，凭借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挫尽唐军的锐气，再利用各种复杂地形进行阻击，并从各个方向出动小股部队进行袭扰，不断消耗其有生力量，最终拖垮唐军。

打不赢你，难道我还拖不死你？

李靖的主力部队刚刚抵达鄯州（今青海乐都区），慕容伏允就丢弃了他的王庭伏俟城，带着军队一撤两千里，轻装进入了沙碛地带（今青海柴达木盆地）。

临走之前，慕容伏允下了一道命令，把青海湖沿岸的广袤草场全部焚毁，给唐军留下了千里赤地和一片焦土。

这是一记狠招。

他想把唐军的战马活活饿死。

要想进行远距离作战，马匹没有草料是万万不行的。李靖得到这个不利消息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以副统帅李道宗为首的多数将领认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侯君集立即反驳。他说：“吐谷浑才打了一场败仗就鼠逃鸟散，连侦察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见他们士气低落，无心恋战。眼下他们君臣离心，收拾他们易如反掌。若不把握战机，必然后悔不及！”

侯君集的看法与李靖不谋而合。

李靖知道，慕容伏允之所以弃城而逃，就是因为他非常了解李靖的打法，担心李靖又给他来一招长途奔袭，擒贼先擒王，使他重蹈东突厥颉利可汗的覆辙，所以才第一时间远避沙碛，企图一方面自我保全，一方面又拉长唐军的战线，最后伺机将唐军各个击破。

对于慕容伏允这种自作聪明的打法，李靖不禁冷笑。

针对敌方的图谋，李靖制定了一个“兵分两路，迂回包抄，大举扫荡”的宏大战略——北路由他亲自指挥，率领李大亮的部队和薛万均、薛万彻的部队，沿青海湖南岸由北向南作战，扫荡盘踞在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一带的吐谷浑主力；南路由侯君集、李道宗两路部队组成，直插吐谷浑的大后方，进攻黄河源头的吐谷浑各部落据点，最后在大非川与李靖的部队会师，完成南北夹击、包抄合围之势，全歼吐谷浑军队的所有主力。

伏允啊伏允，你以为我李靖纵横天下数十载，靠的就是一招直捣王庭、猛虎掏心吗？

笑话，真是笑话！

你想拉长我的战线，把我一步步拖垮，再把我一块块吃掉是吧？

行，我成全你！

就让你伏允好好瞧一瞧，看看我李靖除了打擒贼先擒王的奇袭战之外，怎么打一场硬碰硬的歼灭战！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艰苦卓绝的远征。

按照李靖的战略部署，唐朝的两路大军必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深入吐谷浑国境数千里，克服种种恶劣的自然条件，穿越复杂而陌生的地形，在缺乏粮草、补给和后援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作战和大尺度迂回，追踪吐谷浑的主力并与其决战，其艰难和危险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对于所有出征的将士——上至六十四岁的统帅李靖，下至每一个普通士兵来说，都是一场勇气、耐力和意志力的考验。

他们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吗？

由李靖率领的北线兵团，首先在曼头山（今青海湖南岸日月山）打响了第一战。

闰四月二十三日，李靖的部将薛孤儿带着一支轻骑兵，在曼头山与吐谷浑的军队遭遇。由于唐军是主动求战，而吐谷浑军是被动应战，双方的士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唐军骑兵发起冲锋后，很快就将吐谷浑军击溃，不但斩杀了这支军队的首领——吐谷浑的一个亲王，而且缴获了大量的牛羊。

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唐军的士气更为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军粮也有了保障。

这就叫以战养战。

对于任何一支深入敌境、补给匮乏的军队而言，这四个字都是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曼头山战役后，李靖率部继续向纵深挺进，又在牛心堆（今青海湖南岸）打了一场胜仗。

闰四月二十八日，大军迅速推进到赤水原（曼头山西）。

在这里，唐军遭遇了自出征吐谷浑以来最危险的一场战斗。

因为连连败北，吐谷浑军队不甘心失败，于是在这里集结了一支重兵，给唐军设下了一个伏击圈。

唐军前锋薛万均、薛万彻部一进入赤水原，吐谷浑军队立即发起异常猛烈的进攻。薛氏兄弟率领麾下骑兵左冲右突，可漫山遍野都是敌军，根本无法杀出重围。一番鏖战后，兄弟二人身中多处枪伤，坐骑也被砍倒，只好下马作战。敌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唐军伤亡惨重，战死者超过了三分之二，眼看就将全军覆没。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奉李靖之命率援军赶到。他亲率数百骑突入重围，竭力反击。兵锋所过之处，敌军望风披靡，战场形势迅速逆转。最后唐军反败为胜，大破吐谷浑军队，俘虏其南昌王慕容秀俊，并再次缴获各种牲畜数万头。

其后，李靖的北线部队长驱直入，连战连捷：李大亮部在蜀浑山（今青海天峻县西部山区）击败吐谷浑军，俘虏了二十个亲王，获杂畜五万头；薛万均、薛万彻部在赤海（今青海茶卡盐湖）大破吐谷浑宰相天柱王率领的主力部队，缴获各种牲畜二十万头；稍后，执失思力又在居茹川（茶卡盐湖附近山川）击退了吐谷浑军队的反击。

北线部队在李靖的指挥下，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青海湖南岸，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盘踞在这一带的吐谷浑主力全部歼灭。

李靖不愧为千古名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线的战况。

在南路，侯君集和李道宗部队遭遇了比北路更大的困难。因为南面都是高海拔地区，平均海拔起码要比青海湖沿岸高出1000米以上。将士们不但要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而且所经之地荒无人烟，粮草和补给都供应不上，甚至连“以战养战”都不太可能。

南线部队面临的第一道障碍，名叫“汉哭山”（今青海鄂拉山）。

这座山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史书无载。但是依常理判断，这个相当不吉利的名字不可能是汉人自己取的，很可能是从前的汉人经过这座山时，经常会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所以吐谷浑人才会以此命名，说这是一座让汉人哭泣的大山。

但是跟后面要遭遇的困难比起来，汉哭山根本算不上什么。

当唐军翻过此山，穿越破逻真谷（鄂拉山口）后，更为严峻的考验就来了。

南线部队此次远征的目标是分布在黄河源头的吐谷浑各部落，而从鄂

拉山口到目的地之间，是绵延数千里的不毛之地和雪域冰川。唐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农历五月，在汉地早已是骄阳似火、热浪逼人，可这里却依然是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侯君集和李道宗部队整整跋涉了两千里，不但一头牛羊都找不到，而且连人马的饮用水也无从寻觅。将士们只好“人吃冰、马啖雪”（《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辛苦总是有回报的。

南线部队进抵乌海（今苦海，位于鄂拉山口西南）时，终于发现了一支吐谷浑的大股部队，其首领是吐谷浑的亲王梁屈葱。

好些日子没打过仗的唐军将士顿时大为兴奋，于是人人奋勇争先。经过一番激烈厮杀，吐谷浑军大败，梁屈葱被唐军俘虏。

不言而喻，南线部队同时也缴获了大量牲畜。

获得充分的补给之后，唐军开始长驱直入，从星宿川（今黄河源头的星宿海）一路打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连战连捷，彻底摧毁了吐谷浑在黄河源头一带的军事力量。

最后，南线部队胜利班师，与李靖部队会师于大非川。

此次远征，两路大军历尽千难万险，奔袭数千里，大小几十战，终于将吐谷浑军队的有生力量歼灭殆尽，完全实现了李靖预期的战略目标。

就算放在几千年的中国战争史上，这一战都堪称难得一见的大手笔。

然而，慕容伏允仍然在逃。

没有把他彻底摆平，这场战争就谈不上完美。

此时，慕容伏允已经穿过柴达木盆地的戈壁荒漠，越过阿尔金山脉，一口气逃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部的且末城（今新疆且末县）。

这里是吐谷浑国境的最西端。经过一个多月连续作战的唐军将士，还有没有勇气和力量进行数千里的追击？

有。

稍事休整之后，李靖就发出了一道新的命令——追！

慕容伏允万万没有料到——唐军说来就来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撒丫子跑吧！

于是伏允就跑，埋着脑袋继续跑，沿着突伦川（又称图伦碛，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直向西跑。

只是在跑路的过程中慕容伏允百思不得其解——唐军难道是铁打的？为什么如此辽阔的高原冰川非但拖不死他们，反倒被他们轻而易举地征服了？

慕容伏允逃进突伦川后，想想自己的国家好像也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了，要保住老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投奔于阗。

留得这把老骨头在，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像当年从隋帝国手中夺回失去的江山一样，慕容伏允想。

遗憾的是，这一次，伏允他老人家再也没机会了。

唐军前锋将领契苾何力一听说慕容伏允逃进了突伦川，马上要领兵再追。薛万均担心像上次那样遭遇伏击，坚决不同意。契苾何力瞪着眼说：“那老家伙现在没有城郭了，只能随水草迁徙，如果不趁他们聚居在此地时发兵袭取，一旦四散逃去，就没机会端他们的老巢了。”

话一说完，契苾何力也不管薛万均同不同意，自己挑了一千精锐骑兵，鞭子一甩就直奔突伦川而去。薛万均无奈，只好随后跟进。

时值盛夏，沙漠地带又严重缺水，被热辣辣的太阳暴晒几个时辰后，唐军将士个个嘴唇干裂，头晕目眩。最后没办法，只能杀了心爱的战马，生饮其血。

就是靠着这种坚毅顽强的精神，这群不怕死的硬汉终于进入了突伦川。

唐军再一次从天而降，慕容伏允的残余部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也没心思打仗了，个个抱头鼠窜，争相逃命。唐军轻而易举地砍下了数千颗首级，同时俘获牲畜二十余万头，并生擒了伏允的妻子和儿子。

慕容伏允跑得快，没被唐军逮着。可是在沙漠里跑了十来天，最后的

一千多名骑兵几乎都跑光了。剩下的几个亲兵蓦然发现，再跟着这个国破家亡的老头混下去实在是没前途，索性一刀把他砍了，提着脑袋投降了唐军。

吐谷浑之战至此取得圆满胜利。

贞观九年五月十八日，李靖向朝廷呈上了捷报。

慕容伏允败亡后，唐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吐谷浑这个国家。

选择有两个：第一，把它从这个世界上抹掉，在其地建立羁縻州府；第二，扶植一个亲唐政权，让它在唐帝国的西大门站岗，防范并制约西域诸国。

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节约成本，更高明，并且在道义上显得更为堂皇。

好在吐谷浑国内也不全是鹰派，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比较典型的亲唐派。

他就是慕容伏允的长子慕容顺。

此人久居汉地，对中原王朝有亲近之感，而且由于从小就出国当人质，太子之位被弟弟夺去，所以他“意常怏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回国后自然就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自古以来，这种前朝政坛的“非主流”往往最适合充当新政权的领导人。

就在吐谷浑军队连连败北之际，慕容顺就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顺因众心”，把一直独揽朝政的宰相天柱王斩了，顺势夺回了政权。慕容伏允一死，慕容顺便自然而然地“举国请降”，归附了唐朝。

贞观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李世民下诏，特准吐谷浑复国，册封慕容顺为吐谷浑第十八任可汗，兼大唐的平西郡王。此外，李世民还命凉州都督李大亮率部留驻吐谷浑，以防慕容顺镇不住人心。

吐谷浑平定后，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又像往常一样热闹起来了。

然而，表面的繁荣之下却隐藏着新的危机和隐患。

在吐谷浑西边，有一块地方始终令李世民放心不下。

那就是西域。

日月照霜雪：征服高昌

西域是一个统称，泛指今天的青海、新疆以及中亚的东部地区，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在西域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国家和部族，诸如西突厥、吐谷浑、党项、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罽宾、康国等，其中势力最为强大，唯一能与唐帝国抗衡的国家，无疑就是西突厥。

突厥是南北朝晚叶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崛起的一个游牧民族，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此后东突厥日益强盛，而西突厥则日渐衰弱。到了隋大业年间，也就是射匮可汗执政时代，西突厥的国力逐渐恢复，开始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唐武德初年，射匮可汗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

统叶护是一代雄主，史称其“勇而有谋，善攻战”。他上台之后，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扩张的力度：“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旧唐书·突厥传》）

到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的时候，整个西域的控制权已经牢牢掌握在西突厥手中。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底，西突厥突然爆发政变，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莫贺咄所杀，莫贺咄随后自立为可汗。统叶护可汗的旧部不服从莫贺咄，遂拥立统叶护之子为可汗，称为肆叶护可汗。于是双方开打，西突厥陷入内战，对西域的控制开始削弱。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帝国一举平定了曾经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这对西域诸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同年九月，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国王率先摆脱西突厥的控制，亲自入朝，以其国七城归附唐朝，李世民在其地置西伊州。十二月，西域的一个重要国家高昌也向唐朝伸出了橄榄枝，国王麹文泰亲自到长安朝见。李世民隆重接待了他，不仅赏赐甚厚，而且赐其妻宇文氏姓李，封为常乐公主。

伊吾的归附和高昌的入朝让李世民大喜过望。

因为唐朝如果要经营西域，要从西突厥手中夺取对西域的控制权，就必须首先控制伊吾和高昌。

尤其是高昌——它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

从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后，第一站是伊吾，第二站就是高昌。而伊吾面积狭小，与高昌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高昌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

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在汉代称为车师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两汉时期，汉朝与匈奴就曾经为了争夺此地而爆发多次战争。

要从西域诸国进入河西走廊，本来有两条通道：一条是南道，也就是穿过白龙堆沙漠，途经楼兰国，抵达玉门关；另一条是北道，就是穿过高昌国境，经伊吾到玉门关。

但是自从楼兰古国神秘消失后，南道就被废弃了，于是高昌自然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独一无二的黄金通道，其重要性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取代。当初玄奘西行求法时就曾经在此滞留数月，差一点被麴文泰挽留而无法成行。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高昌几乎垄断了西域与中原之间所有的过境贸易，从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

高昌的得天独厚令人羡慕，自然也就令人垂涎。

位于高昌西南面的焉耆就对此垂涎不已。

但是光垂涎是没有用的，心动不如行动。

焉耆人很快就行动了，他们卷起袖子喊出了一句令高昌人振聋发聩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

是的，焉耆要修路，要把当初废弃不用的那条碛路——楼兰古道重新修起来。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焉耆国王龙突骑支遣使到长安朝贡，“顺便”向唐太宗提出了请求——“开大碛路，以便行李”（《旧唐书·焉耆传》）。

李世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反正多修一条路，对唐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更何况是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又不要中央政府拨款，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李世民当即表示同意，并对焉耆善于搞活经济的思路和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听到焉耆喊出修路的口号后，麹文泰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如今听说他们居然还跑步进京，把唐朝政府的“红头文件”都搞到手了，顿时暴跳如雷。

这还了得！这不明摆着跟老子抢饭吃吗？

还有，这李世民也忒不靠谱了，对于这种抢人饭碗、恶性竞争的卑鄙行径不但不进行批评教育，反而还公开支持，鼓励纵容，这当的是哪门子天可汗！

麹文泰当即决定出兵，给龙突骑支一点厉害尝尝。

你小子想虎口夺食，老子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随后麹文泰便纵兵攻打焉耆国，并尽情地洗劫了一番，然后满载而归。

高昌估计是把焉耆打算修路的资金都抢走了，要不就是把他们搞活经济的勇气给吓没了，所以修路之事后来就莫名其妙地没了下文。

修路事件虽然不了了之，但高昌与焉耆却因此结下了梁子，而唐朝与高昌的关系也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的几年里，高昌对唐朝越来越不客气，不但自己不来朝贡，而且屡屡拦截西域各国的入朝使者和过往商旅，摆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蛮横架势。

这已经不叫垄断经营了，而是活脱脱一个车匪路霸。

麹文泰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背后的原因跟西突厥有关。

西突厥在贞观初年爆发内战，后来肆叶护可汗击败莫贺咄，重新统一了西突厥。但是到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西突厥就再度分裂为东、西二部，以伊犁水为界，西部由乙毗咄陆可汗统辖，东部由咥利失可汗统辖。两个可汗一方面大打内战，一方面又积极寻找外部盟友。东部的咥利失与唐朝通好，成了亲唐政权；西部的乙毗咄陆则与高昌结盟，成了麹文泰的后台老板。

正是有了这支西突厥势力的撑腰，麹文泰才会有恃无恐，屡屡与唐朝作对。

为了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麹文泰又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与

西突厥联兵进攻伊吾（西伊州），大有将其吞并并彻底封锁河西走廊之势。

李世民勃然大怒。

这一次要是再不出面干预，不但天可汗的脸面无存，大唐帝国的安全和利益也要受到赤裸裸的威胁和侵犯。李世民下诏怒斥麹文泰，点名要高昌的执政大臣阿史那矩入朝，当面作出解释。

可是，麹文泰却拒绝派遣阿史那矩，只派了长史麹雍来到长安，装模作样地向唐太宗谢罪。

李世民叫麹雍回去告诉麹文泰：要谢罪可以，但是要拿出点诚意和实际行动来。当初东突厥败亡时，很多流亡当地的汉人转而投奔了高昌，你们马上把这些汉人都送回来。

麹雍带着李世民的诏命回去后，麹文泰依旧装聋作哑，毫无行动。

非但如此，他还变本加厉，又联合西突厥大举进攻他的死对头焉耆，连破焉耆三座城池，大掠其男女而去。满腹冤屈的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连忙遣使向天可汗告状。

李世民再次遣使诘问高昌。麹文泰却冷笑着说："苍鹰在高天上飞翔，野鸡在荒草中躲藏，猫在堂间悠游嬉戏，鼠在洞里偷吃东西，各得其所。难道就不能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天地吗？"（《资治通鉴》卷一九五："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

明摆着，麹文泰根本就没把天可汗放在眼里。他甚至还遣使对薛延陀的真珠可汗进行挑拨，说："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必对唐朝卑躬屈膝，顶礼膜拜呢？"

李世民随即遣使对麹文泰发出了严厉警告："为恶不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

面对唐朝的战争威胁，麹文泰毫不示弱，开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积极备战。

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开始玩火了。

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可不想引火烧身，他赶紧遣使向李世民大表忠心："我受大唐厚恩，常思报答，请允许我发兵作为前锋进击高昌。"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一月，李世民对麹文泰发出了最后通牒，下诏“示以祸福，征之入朝”，希望他能悬崖勒马，悔过自新。然而，麹文泰却依旧置若罔闻，“称疾不至”（《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在所有的政治手段都宣告无效后，天可汗终于忍无可忍，只能开动战争机器。

是年十二月，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薛万均为副总管，率赵元楷、阿史那社尔等将领，大举发兵远征高昌。

听说唐朝真的出兵了，高昌朝野顿时人心惶惶，可麹文泰还是一脸镇定自若的表情。

他胸有成竹地对群臣说：“长安距我们七千里，其中沙漠戈壁就有两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大军岂能通过？以前我去长安，亲眼看见秦陇北部地区一片荒凉，城邑萧条，和隋朝根本没得比。如今他们伐我，发兵多则粮草运送不及，发兵若少于三万人，我们完全有力量将其制伏。现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逸待劳，坐收其弊。唐军若屯兵城下，最多二十天，粮食吃光，必定撤走。到时候我们就追，必能将其俘虏，根本用不着担心！”

大臣们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满腔忧虑一扫而光，并且对国王麹文泰这种临危不惧的王者风范、这种蔑视一切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大无畏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国王就是国王，心理素质就是比一般人强啊！

可是，让高昌人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短短几天后他们对麹文泰的信仰就彻底崩溃了。

因为麹文泰死了。

准确地说，他是被吓死的——“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旧唐书·焉耆传》）

高昌的臣民们目瞪口呆——几天前的豪言壮语犹然在耳，他怎么就死了呢？大敌当前、生死存亡之际，让他们无比景仰、无比信赖的这位国王怎么能抛下他的万千子民，说死就死了呢？

直到此刻，高昌人才蓦然发现，麹文泰的心理素质要远比他们想象的低得多。

可他已经两手一甩，双腿一蹬，撂挑子了。现在再去研究他的心理素质已经毫无意义。如丧考妣的高昌人赶紧把麴文泰的儿子麴智盛拥上王位，希望这位新国王能继承乃父遗志，带领他们抗击入侵之敌。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五月，唐朝远征军抵达高昌边境的柳谷（今新疆哈密市东），此时侦察兵来报："麴文泰的葬礼即将举行，达官显要都将云集于都城。"众将闻讯，纷纷建议直接对高昌都城发动突袭。侯君集却说："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命我讨伐它，如今在人家的葬礼上发动袭击，不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于是命大军向高昌城东南的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进发，于次日拂晓兵抵田城城下。唐军命守军投降，守军不从，唐军随即发起强攻，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将其攻克，俘虏了七千余人。

高昌国丧结束后，侯君集立刻命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向高昌城发起进攻。高昌军出城迎战，辛獠儿迅速将其击溃。随后，唐军主力全部进抵高昌城下。

麴智盛慌忙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说："先王麴文泰得罪唐朝天子，已遭天惩，身已亡故。我继位时间尚短，恳请阁下怜悯体察。"侯君集回信说："若真心悔过，当自缚双手到军营前投降。"

自缚投降？麴智盛当然不干。他老爸生前早把高昌城修筑得沟深城坚，何况西突厥的援军此时就驻扎在北边不远的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既然手上还有这些筹码，麴智盛岂能不战而降？

高昌不降，唐军只好开打。

侯君集一声令下，士兵们迅速填平了护城壕沟，随即把云梯、撞车、抛石机、巢车等大型攻城器械全部推上战场，一股脑儿往高昌城上招呼。

一时间，箭矢飞石犹如暴雨倾盆而下，高昌城内顿时血肉横飞，一片哀号。守军一个个抱头鼠窜，纷纷躲进房屋里面，压根就不敢露头。

值得一提的是，唐军此役动用的这些攻城器械都是经过特殊改进的，不但打击力度超强，而且精确程度非常高，属于当时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尖端武器。比如巢车，就是高昌人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它的高度足有十丈，士兵躲在巢车中，足以"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也就是说，巢车并不是攻击型武器，而是一种"精确制导"武器，犹如

今天的卫星定位系统和电子制导仪器。在它的指挥下，唐军的抛石机指哪打哪，一打一个准。如果准确命中目标，车顶上的“观察员”就向下面汇报战况；假如没有命中，下面的投石手就根据观察员的提示，改变打击的角度和力度，直到命中为止。

在唐军的这种致命打击之下，高昌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眼看高昌城即将灭顶，麹智盛不住地向天祈祷，巴望着西突厥援军赶紧到来。

可是，西突厥的援军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他们所在不远——就在唐军的军营里。

准确地说，是在唐军的俘虏营里。

尽管高昌很早就和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订立了攻守同盟，相约“有急相助”，然而，这种“相助”绝对是有条件的。如果是帮助高昌欺负伊吾、焉耆这些西域小国，顺便掳掠财帛子女，咄陆可汗的积极性当然很高，可要是碰上唐朝这样的巨无霸对手，咄陆可汗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当侯君集的远征军刚刚抵达高昌国境，咄陆可汗就一溜烟跑了，“惧而西走千余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只留下一个亲王驻守可汗浮图城。没想到这个亲王比咄陆更怕死，咄陆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开门投降了唐军。

事已至此，麹智盛还有什么指望呢？

这一年八月初八，彻底绝望的高昌国王麹智盛举城投降了唐军。侯君集随即兵分数路，把高昌境内的二十二座城池全部占领，俘获人口共计一万七千七百。

早在唐朝出兵之前，高昌国内就已经悄悄流传着一首民谣。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旧唐书·焉耆传》）

这是一则末日预言。当时麹文泰怒不可遏，曾下令彻查初唱者，可后来却一无所获。麹智盛断然没有想到，他即位不过才几天，这则可怕的预言就应验了。

至此，曾经猖獗一时的高昌，终于像烈日下的霜雪一样化为乌有。

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将可汗浮图城置为庭州，各置属县，同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

唐朝征服高昌后，“国威既震，西域大惧”（《唐会要·高昌》）。尤其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既确保了丝绸之路上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与畅通，又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唐帝国在西域的强势介入令西突厥大为恼怒并且深感不安。

一山不容二虎。

西突厥一贯将西域诸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自然不甘心就此放弃这个经营已久的“后花园”。

所以，围绕着西域诸国的控制权，一场激烈的较量在所难免。

西域：激烈的较量

西突厥自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分裂为东、西二部后，西部的乙毗咄陆可汗和东部的咥利失可汗一直处于混战状态，双方势均力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底，咥利失可汗被叛乱的部下所杀，其麾下的另一个部落拥立其侄继位，是为沙钵罗叶护可汗。自此，咄陆的政权称为北汗庭，沙钵罗叶护的政权称为南汗庭。南汗庭继承了咥利失的外交政策，仍旧与唐朝通好，“累遣使朝贡”，唐太宗李世民则“降玺书慰勉”（《旧唐书·突厥传》）。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也就是唐朝征服高昌之后，李世民再次遣使前往南汗庭，赐以鼓纛，极力扶持这个亲唐政权。然而从这一年起，北汗庭的势力逐渐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南汗庭的沙钵罗叶护可汗又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被杀，北汗庭的咄陆可汗遂重新统一了西突厥。

这对唐朝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因为南汗庭的败亡意味着唐朝几年来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而北汗庭

的崛起则意味着西域的安全开始受到严重威胁。

果不其然，统一后的咄陆可汗“自恃强大，遂骄倨”，不但出兵攻灭了吐火罗，而且屡屡“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西突厥突然发兵入侵伊州（伊吾）。

唐朝与西突厥在西域的激烈较量自此展开。

由于西突厥刚刚一举踏平了吐火罗，咄陆可汗的气焰十分嚣张。

他认为唐朝在西域经营的时间还很短，驻扎的兵力也十分有限，所以在他看来，要击溃唐朝在西域的势力，重新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简直是易如反掌之事。

可是，咄陆错了。

唐朝不是吐火罗。

在西域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异常强悍的对手。

这个人就是唐太宗亲自选拔任命的安西都护——郭孝恪。

郭孝恪，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史称其“少有志节”，隋末率数百乡人投奔瓦岗。因其足智多谋，深受李密赏识，他与李世勣一同被派驻黎阳仓，随后与李世勣一起降唐。虎牢之战中，郭孝恪曾向李世民献策，力主两线作战，围洛打援，被李世民采纳。破窦建德、王世充后，李世民在庆功宴上当众褒扬：“郭孝恪谋擒建德之策，出诸人之右也。”（《旧唐书·郭孝恪传》）此后，郭孝恪历任贝、赵、江、泾四州刺史，因能力突出，政绩显著，不久便获得升迁，入朝担任太府少卿，随后又迁左骁卫将军。

在考虑安西都护人选的时候，李世民很自然地想到了郭孝恪。因为他既在开国战争中立过功勋，有勇有谋，又拥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足以独当一面，这样的人才当然是镇守西域的不二人选。李世民随即任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

李世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西突厥很快就要在郭孝恪面前尝尽苦头。

西突厥此次入寇的目标之所以选择伊州，很显然并不是为了劫掠财帛子女，而是出于一种试探虚实、炫耀兵威的目的。因为伊州远在高昌故地之东，西突厥要攻打它，就必须横穿整个高昌故地，即眼下的安西都护府辖境（西州），倘若仅仅是为了打劫，显然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舍近求远。

所以，郭孝恪马上就判断出——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战略进攻，敌人出动的兵力肯定不会很多。他当即决定予以迎头痛击。

郭孝恪亲率两千骑兵轻装疾进，在半道上对西突厥军发动了一场阻击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这支来犯之敌，给了突厥人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第一次试探失败，西突厥很快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

这次攻击的力度明显加大了，而且兵锋直指安西都护府。

咄陆可汗命令屯驻在西州附近的处月、处密两个突厥部落，出兵进攻西州境内的天山城（今新疆托克逊县）。在它东北面不远处就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交河城，可见西突厥此次进攻的目的是想直捣郭孝恪的心脏，企图一举摧毁唐朝在西域的指挥中枢。

假如天山失守，交河必定危急。

郭孝恪意识到，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于是火速率部进援天山城，亲自指挥城防战。

突厥军队多为骑兵，本来就长于野战，短于攻城，何况此次郭孝恪又亲自坐镇指挥，所以西突厥军根本捞不着半点便宜，多次强攻均被击退，付出了重大伤亡。处月、处密两部落见取胜无望，只好收拾部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郭孝恪居然率部出城，紧紧咬住了他们。

突厥人慌了神，赶紧拍马狂奔。可不管他们跑多远，郭孝恪就追多远。这一追直接追到了处月部落的老巢。处月人逃进城中，还没来得及喘息，唐军就开始攻城了。而且，与他们啃不动天山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军没花多少力气就把城攻破了，处月酋长慌忙带着族人再次落荒而逃。

相比之下，处密部落似乎幸运得多，他们眼见唐军追着处月部落去了，心里大呼侥幸。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翻过遏索山

（天山支脉），狼狈不堪地回到驻地不久，郭孝恪的唐军居然又打过来了。

处密人彻底傻了——这唐军到底是插了翅膀还是会分身术，怎么能两头一块打呢？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唐军的刀已经架到了他们的脖子上。

结果，处密的下场比处月更为不堪——处月只不过丢了王城，处密的部众则大多数投降了唐军。

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

这样的结局真是令咄陆可汗大跌眼镜，同时也让他惊愕不已。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安西都护郭孝恪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一连两次败北之后，咄陆可汗再也不敢与唐军交锋了，转而向西攻击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途经米国（今撒马尔罕东南朱马巴扎尔）的时候，又顺便将其攻破，掳获了大量战利品。

咄陆可汗打仗很有一套，可他这个人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吝啬。

对于普通人来说，吝啬也许算不上什么毛病；对于一个土老财来讲，吝啬兴许还是一种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政治领袖而言，吝啬就是一种致命的缺陷了。

咄陆可汗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全部据为己有，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大为不满，其中有一个将领企图强行夺取，结果被咄陆可汗一刀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顿时引起了部众的公愤，大伙忍无可忍，索性起兵造反。咄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随后，咄陆可汗的旧部阿史那屋利等人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咄陆，改立可汗。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上自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彻底占领了龟兹全境。

唐朝成功征服龟兹之后，史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

意。

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唐朝笑到了最后。

阿史那社尔在龟兹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班师凯旋。

诺真水之战：经略北疆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唐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

尽管东突厥汗国早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已被彻底平定，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唐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同时，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世民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七月，李世民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候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

东突厥突然复国，这对薛延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于是也给他发了一道诏书，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

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为了稳住真珠可汗，李世民又强调说：“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

但是在诏书的末尾，李世民也对薛延陀进行了警告：“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真珠可汗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可表面上也只能唯唯。

东突厥复国，不但薛延陀不乐意，就连被李世民册封为新可汗的阿史那思摩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对于这顶从天而降的可汗冠冕，阿史那思摩丝毫感觉不到喜悦和荣耀，有的只是恐惧和忧虑。因为时移世易，今非昔比，如今的薛延陀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吆喝的铁勒小部落，而东突厥就算重建，也不是那个“高视阴山、控弦百万”的大汗国了。

这北返漠南的一步，阿史那思摩始终没有勇气迈出去。他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一直拖到了两年后的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才带着一脸凄惶动身北上。临行前，他凄凄惨惨地给皇帝上了一道临别奏疏，说：“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阿史那思摩打定了主意，反正自己就是一条看门狗，一旦薛延陀来攻，自己立即撒腿往南跑，管他三七二十一。

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后，建牙帐于定襄故城，麾下有户数三万、士兵四万、马匹九万。

看着这个迷你型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又好气又好笑——就这点家当还复什么国啊，捏死你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吗！

这一年十月，真珠可汗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要前往泰山封禅，大喜过望地对部下说：“唐朝天子去泰山封禅，必有大部队随从，边境必然空虚，我利用这个机会打阿史那思摩，简直就是摧枯拉朽！”随即命其子乙失大度为统帅，征调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部落军队，共计二十万人，以志在必得之势横穿大漠，直扑定襄。

阿史那思摩风闻敌人来了，赶紧带着他的部众一溜烟跑进了长城内，

一直到朔州（今山西朔州市）才停下来喘气，随即派快马去长安告急。

阿史那思摩说他要为大唐“守吠北门”。如今看来，“守”是谈不上了，“吠”倒是吠得挺及时。

该来的终于来了。

其实李世民早就在等这么一天。

重建东突厥，让阿史那思摩迁居漠南的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防范，二是试探。如果薛延陀有自知之明，与东突厥相安无事，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假如它始终不愿放弃扩张的野心，那就利用东突厥的复国来刺激他们，使其狼子野心尽早暴露，那么大唐就能顺理成章地铲除这颗日渐壮大的毒瘤。

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担心薛延陀来打，还不如说他担心薛延陀不来打。

道理很简单——乙失夷男要是够聪明的话，再忍个十年八年，到时候唐朝要铲除薛延陀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一月，李世民迅速作出了反击薛延陀的战略部署。唐帝国一共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在东起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西至凉州的数千里战线上，命兵部尚书李世勣、右卫大将军李大亮、营州都督张俭等人，分五路出击，与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大军出征之前，李世民特地召集众将面授机宜：“薛延陀自以为强大，横穿大漠南下，行程数千里，战马定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军队未能趁思摩不备而迅速发起攻击，在思摩退入长城之后，他们战机已失，却又没有果断撤退，他们败局已定。我已授命思摩在撤退时焚毁沿途的草场，薛延陀军队粮草日尽，在野外又劫掠不到任何东西。方才谍报人员回来，说薛延陀的战马没有草料，只好啃树皮，而且连树皮都快啃光了。你们当与思摩互为掎角之势，不必急于交战，等他们撤退之时，立刻发动进攻，必能大破薛延陀。”

真珠可汗眼见儿子领着二十万大军直扑漠南，虽然吓跑了阿史那思摩，却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反而让几十万大军陷入粮秣日尽的困境，而且唐朝多路大军已经出动，要是再拖下去，自己这点老本怕是要全

部赔光。无奈之下，真珠可汗只好遣使入唐，要求与东突厥和解。

和解？

说得倒轻巧，你乙失夷男把漠南当什么了？当你们家门口的草坪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那么便宜！

李世民没有对薛延陀的使者作出任何答复。

他料定，不出十天，前线的李世勣必能传回捷报，到时候再让使者回去传话，教教乙失夷男如何做人。

乙失大度亲率三万骑兵一路猛追阿史那思摩，追到长城脚下不得不勒住了缰绳。

再往南就是唐朝的地界了，乙失大度可不敢轻举妄动。

要进进不得，要退又不甘心，乙失大度左右为难，只好派人登上长城叫骂，想把阿史那思摩逼出来。

可阿史那思摩就是龟缩着不肯出来。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任你口水漫天，我自岿然不动。

乙失大度站在长城脚下吹胡子瞪眼，彻底没辙。

就在此刻，远处忽然尘埃滚滚、杀声震天——李世勣率领的唐军主力到了。

乙失大度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随即马鞭一挥，掉头就跑。李世勣亲自遴选了六千名精锐骑兵，迅速向北追击，越过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一直追到了青山（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

乙失大度跑到青山北麓的诺真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时，决定不再跑了。

因为经过白道川的时候，他已经和自己的主力部队会合，眼下足足有二十万人。

三万人被六千人追着跑已经够没面子了，难道二十万大军也要被六千人追着跑？乙失大度愤愤地想，那我回到薛延陀还怎么立足？

不，老子今天不跑了，就在这里和你李世勣决一雌雄。

随后，薛延陀的二十万大军在诺真水沿岸一字摆开，阵势横亘十里，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看那架势，就是踩也要把唐军踩死。

六千对阵二十万，这绝对是李世勣军事生涯中少有的一场恶战。

李世勣能赢吗？

乙失大度之所以敢和唐军决战，除了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薛延陀通过这些年的征战，尤其是在对付突厥骑兵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了一种新的战术：作战时以五人为一组，其中一人负责管理五匹马，其余四人徒步作战，而马匹主要是在战斗获胜后追击敌人用的。

换句话说，作为擅长骑兵作战的游牧部落，薛延陀已经在固有的骑兵优势基础上，着重强化了步兵的战斗力，所以当两个兵种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时，仍旧固守单一骑兵战术的突厥人就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此刻，乙失大度正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注视着兵少将寡的唐军，想看看当世名将李世勣如何败在他的手中。

果不其然，当李世勣麾下的三千突厥骑兵率先对薛延陀军队发起进攻后，很快就招架不住，迅速败下阵来。乙失大度战旗一挥，薛延陀大军立刻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唐军，同时万箭齐发，唐军骑兵的战马纷纷扑倒。

李世勣果断下令士兵下马，用长矛与薛延陀士兵贴身肉搏。

这是一场血肉横飞的白刃战。

乙失大度自以为他的步兵已经很强悍了，可是在唐军面前，他这套所谓的新战术无异于班门弄斧。唐军步兵的战斗力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尽管薛延陀人多势众，可还是抵挡不住唐军的冲锋，阵脚开始溃乱，乙失大度的指挥系统顿时有些失灵，人多的优势不但发挥不出来，反而变成了劣势。

就在这决定胜败的关键一刻，李世勣使出了撒手锏。

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副总管薛万彻率领数千骑兵突然杀出，直冲敌军后方，专砍那些负责管理马匹的士兵。薛延陀军没料到唐军会来这一手，那些牵马的士卒顿时抱着脑袋各自逃命，受惊的战马无人看管，

四散逃奔。

前方的步兵回头一看，集体傻眼。

那些战马不但是战胜时追击敌人用的，也是战败时逃命用的。更何况，现在时值严冬，他们又是在远离薛延陀千里之遥的地方作战，无论此战胜负，他们都不可能留在漠南地区过冬，可眼下战马都跑光了，他们如何回去？总不能用两条腿走回郁督军山吧？

所以战马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没了战马，他们死定了。

在这种心态下，薛延陀军的士气一落千丈，人人无心恋战，二十万人瞬间变成了二十万只无头苍蝇。乙失大度知道大势已去，立刻掉头而逃。主帅一跑，薛延陀军兵败如山倒。唐军乘胜追击，砍杀三千余人，生擒五万余人，大获全胜。

屋漏偏逢连夜雨，乙失大度率残部穿越大沙漠时，又碰上了暴风雪，结果又有大部分士兵与马匹活活冻死。

等到乙失大度狼狈不堪地回到薛延陀时，二十万大军只剩下不到两万。

诺真水一战，大唐名将李世勣以六千破二十万，而且生擒五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同时也在他那辉煌的名将征途上又书写了传奇的一页。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李世勣的捷报传回长安。与薛延陀使者入唐要求和解，时隔仅仅五天。

李世民笑了。

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就在薛延陀使者灰溜溜地打点行囊，准备返回漠北的时候，李世民又特意召见了他，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回去告诉你们可汗：要做一件事之前，最好先动动脑子！

不知道薛延陀使者把这句话转告真珠可汗的时候，他老人家会作何感

想？

不管他有什么想法，反正这次老本是赔光了——将近二十万铁勒将士啊，外加与之数量相等的战马，就这样埋骨黄沙，有去无回了。

乙失夷男仰望苍天，无语凝噎。

这就叫血的教训。

可是，薛延陀会汲取诺真水惨败的教训吗？

天可汗悔婚：薛延陀的末日

诺真水惨败后，薛延陀的真珠可汗锐气尽失。

他决定夹起尾巴做人，向唐朝臣服。

起码在薛延陀恢复元气之前，乙失夷男绝不敢再与唐帝国为敌。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真珠可汗派遣他的叔父入唐，献上三千匹良马、三万八千张貂皮和一面稀有的玛瑙镜，请求与唐王朝和亲。李世民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是要以武力征服薛延陀，还是要与之和亲？"房玄龄说："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还是和亲比较有利。"李世民遂同意与薛延陀和亲。

随后，李世民遣使赴薛延陀，答应将大唐的新兴公主许配给真珠可汗，但是有一个条件，薛延陀必须释放一个人——契毖何力。

这个曾经在吐谷浑战争中千里追击伏允可汗、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怎么会落到真珠可汗手里呢？

契毖何力是铁勒族契苾部落的人，东突厥败亡后，他与母亲、弟弟率千余部众归降唐朝，任左领军将军，在大唐征服吐谷浑和高昌的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年初，被安置在凉州的契苾部落有异动迹象，李世民遂命契毖何力前往凉州探望他母亲和弟弟，同时安抚其部落。

没想到契毖何力抵达凉州后，契苾部落已经决定叛逃薛延陀，而且他的母亲和弟弟（时任贺兰都督）早已先行离开凉州，逃到了薛延陀。何力大为震惊："主上对我们恩重如山，为何突然反叛？"族人要挟

说："老夫人和都督都已经走了，你怎么能不走？"何力坚决不从，说："我弟弟孝顺母亲，我忠于君王，绝不跟你们走。"

族人一听，不由分说就把他绑了，强行押往薛延陀。

到达真珠可汗大帐前的时候，桀骜不驯的契苾何力突然拔出佩刀，向东高呼："大唐烈士岂能在此贼帐之中受辱？我之忠心，天地日月可鉴！"说完一刀割下自己的左耳，以表誓死不降之心。真珠可汗勃然大怒，准备把他砍了，后来可汗夫人劝解，真珠可汗才悻悻作罢，把契苾何力关了起来。

契苾部落叛逃，朝野哗然，群臣纷纷传言是契苾何力带的头。李世民说："这绝对不是何力的主意。"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蛮夷就是蛮夷，臭味相投，契苾何力到了薛延陀，岂不是如鱼得水了！"

李世民脸色一沉："大谬不然！何力忠肝义胆，心如铁石，必不叛我！"

薛延陀的和亲使者来到长安后，李世民详细询问了契苾何力的情况，听到他自割左耳一事，李世民不禁泣下，对左右说："听见了吧？何力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吗？"

随后，李世民便以和亲为条件，命薛延陀放回了契苾何力。为了表彰他的坚贞和忠义，李世民将他提拔为右骁卫大将军。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六月，按照预定的和亲协议，薛延陀遣使入唐，向唐太宗呈上了和亲的聘礼目录：马五万匹，牛和骆驼各一万头，羊十万头。

这份聘礼绝对够厚重，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薛延陀与大唐的和亲就算成了。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

因为有人坚决反对此次和亲。

他就是契苾何力。

薛延陀暗中策反契苾部落一事，让李世民颇有几分不悦。所以他实际上对这门亲事也已心生悔意，只是天子金口玉言，实在不好轻易反悔。李世民有些为难地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身为天子，岂可食言？"

契苾何力反正是铁定了心要搅黄这门婚事，所以早就想好了对策："臣不是让陛下一口回绝，而是故意迁延，命夷男亲自到大唐迎亲，就算不来长安，起码也要到灵州（今宁夏宁武市）。夷男必定不敢来，到时就名正言顺地把这门亲事推掉。夷男生性刚愎暴戾，大唐一旦不与其和亲，其号召力自然减弱，部众必怀二心。而且臣斗胆估计，夷男已经年老，也没有几年好活了，只要他一死，两个儿子争位，其国必乱，到时候陛下便可坐而制之！"

李世民一想，有道理，于是依计而行。

可是，出乎李世民和契苾何力意料的是——乙失夷男居然来了。

他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毅然带上他的聘礼——几十万头牲畜，一路浩浩荡荡直奔灵州而来。

这回，他也是铁定了心要把唐朝公主娶到手。

眼看契苾何力的计策失灵，李世民也有点头大，没想到乙失夷男这老匹夫这么有勇气。如果他如期抵达灵州，李世民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公主嫁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乙失夷男的运气实在是太背了。由于薛延陀距灵州有数千里之遥，所经之地又多为沙漠戈壁，尽管他一路紧赶慢赶，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可赶到灵州的时候，还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而且更惨的是——他的几十万头牲畜因为缺乏草料而饿死了将近一半。

李世民总算找到了借口，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拒绝了这桩婚事。

乙失夷男也只好自认倒霉，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怨气打道回府。

堂堂天可汗居然食言悔婚？

此事顿时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

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立即上疏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天子既然已经许婚，就不应"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此举实在是"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其不良后果就是"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而"嫌隙既生，必构边患"！他最后说："陛下君临天下十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天下莫不欣然，为何不能有始有终呢？更何况漠北的夷狄部落数不胜数，中国岂能尽而诛之？臣以为，应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

此外，群臣也纷纷表示：“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可在李世民看来，这些看法通通是书生之见、迂阔之谈。为此，他很不客气地给群臣上了一堂“国际政治”课。

“诸卿只知古代而不知当今形势。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所以采用和亲政策，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可如今中国强大，戎狄弱小，以我步兵一千，可击破胡骑数万。薛延陀之所以向我们匍匐叩首，不敢骄慢，只不过是想借中国之势威服周边部落罢了。倘若同罗、仆骨、回纥等十几个部落联手进攻，薛延陀必定破灭。这些部落之所以不敢发动，是因为真珠可汗是中国册封的。如今再把公主嫁过去，乙失夷男自恃为大唐之婿，其他部落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然反咬一口，成为大唐的祸害。如今我拒绝和亲，其他部落知道他被大唐抛弃，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把他的汗国瓜分一空。诸卿走着瞧！”

这次和亲失败让乙失夷男顿感颜面扫地。

没想到自己一张热脸居然贴到了唐朝的冷屁股上，乙失夷男又羞又恼，一腔愤怒无从发泄，只好找东突厥出气。当然，他不敢再像上次那样兴师动众了，而是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对东突厥进行骚扰。

阿史那思摩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可汗，如今面对薛延陀的骚扰更是束手无策，只好上疏太宗，要求南渡黄河，迁往河套地区。

李世民知道阿史那思摩镇不住他的手下，只好同意。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十二月，光杆司令阿史那思摩灰溜溜地回到了长安。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右武卫将军的职务，以示安慰。

至此，由唐帝国一意扶持、大力重建的东突厥汗国再度宣告解体。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不顾文武百官的极力反对，御驾亲征高丽，乙失夷男马上遣使入唐，表面上说是来朝贡，实则是来刺探虚实。李世民很清楚夷男在想什么，对他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可汗，如今我父子东征高丽，要是他觉得有能力乘虚而入的话，叫他赶快来！”

乙失夷男一听天可汗这话味道不对，赶紧再次遣使到长安谢罪，还说要出兵帮助唐朝打高丽。李世民一摆手：出兵就免了，叫你们可汗自重就行。

唐军开始攻打高丽后，高丽执政官泉盖苏文派人游说薛延陀，让他们南下进攻长安，并以厚礼相诱。乙失夷男鉴于诺真水的惨败，又想起李世民的警告，最后还是拒绝了高丽的游说。

这一年九月，乙失夷男病卒。他一死，薛延陀的灾难就来了。

因为一切就像契苾何力当初预测的那样，他的两个儿子果然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结果嫡出的小儿子杀了庶出的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多弥可汗显然就是这么一只牛犊。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兵攻打唐朝。乙失夷男苦心孤诣维持了好些年的和平局面，就这么被他儿子一朝打破了。

而薛延陀的末日也随之降临。

多弥可汗自以为唐帝国正对高丽用兵，所以有机可乘。可他错了，李世民早在出征高丽之前，就已命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部驻扎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的北面，专门防备薛延陀。现在听说薛延陀来犯，李世民又命左武候中郎将田仁会率部驰援。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年底，多弥可汗亲率大军入侵河套地区。执失思力故意以老弱残兵诱敌深入，然后在夏州境内与田仁会部左右夹击，大败薛延陀军，并且一直向北追击了六百余里，直到将其打回漠北，才班师凯旋。

第一次出兵就狼狈而回，年轻气盛的多弥可汗大为不甘，没几天就再度集结大军卷土重来。此时李世民已从高丽退兵，闻讯立即派遣李道宗镇朔州，薛万彻、阿史那社尔镇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宋君明镇灵州，执失思力镇夏州。

多弥可汗没想到唐军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见对手已经严阵以待，不敢贸然进攻，可又不甘心退兵，于是就在夏州北面与唐军对峙。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春，唐军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之后，开始对薛延陀军发起猛烈进攻，再次将其击破，俘虏了两千余人。

经过这么多次打击，多弥可汗总算领教了唐军的厉害，当即丢下他的大军，轻骑逃遁。

看见这个年轻的可汗如此不堪一击，并且如此贪生怕死，薛延陀国内顿时人心思变，辖下的各个部族开始蠢蠢欲动。

多弥可汗为了稳定政局，于是大力清除前朝旧臣，培植个人势力。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这么做无异于加速自己的灭亡。薛延陀朝野更是人心惶惶，回纥酋长随即联合仆骨、同罗等部落一起发动兵变。多弥可汗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薛延陀顿时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一切就跟当年的东突厥一样，薛延陀亡国的征兆已经彻底显露。

贞观二十年六月，天可汗果断地出手了。

李世民任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数路并进，大举北伐；同时又征调薛延陀东边的乌罗护、靺鞨两部落，命他们出其不意，从东面攻入薛延陀。

在如此泰山压顶般的致命打击面前，多弥可汗又岂是唐军的对手。少数仍然忠于他的军队稍微抵抗之后便纷纷溃散，薛延陀举国震恐。

多弥可汗迅速丧失了对局势的掌控，随即带着数千骑兵准备投奔其他部落，却在半道上被回纥骑兵截住。多弥的脑袋很快就被砍了下来，其领地被回纥部落全部占据，宗族也被屠杀殆尽。

多弥一死，薛延陀各部落一边大打出手，互相攻击，一边争先恐后地遣使归唐。多弥可汗的旧部尚有七万余人，他们共推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为首领，咄摩支随后自动削除可汗之号，并遣使奉表向唐朝称臣，请求回到其旧地郁督军山之北。

此次北伐，唐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薛延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咄摩支这支残余的薛延陀势力。

李世民针对这个问题举行了廷议。廷议的结果，群臣普遍认为：假如保留咄摩支这个势力，恐怕日后又会坐大，遗患无穷。与此同时，原来臣属于薛延陀的铁勒九部听说咄摩支又要回郁督军山，无不担心其死灰复燃，也是极力反对。

在此情况下，李世民当然没有理由再留着这条尾巴了。他随即派遣李世勣前往漠北，会同铁勒九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李世勣临行前，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八字方针——“降则抚之，叛则讨之。”

李世勣抵达郁督军山后，咄摩支部下的一个酋长随即率部投降。可咄摩支却率众逃进了郁督军山南麓的荒谷中，既不抵抗，也不投降。李世勣先礼后兵，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往招降，咄摩支意识到薛延陀已经没有复国之望，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还是向萧嗣业投降。

但是，他的部众仍有三万多人不肯放下武器。李世勣随即命令军队发起进攻。

这一战当然没有任何悬念。尽管薛延陀这支最后的武装力量依旧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在被唐军砍下五千颗首级之后，余下的三万人再也没有斗志了，全部缴械投降。

至此，这个继东突厥汗国之后称雄大漠十余年的薛延陀汗国，终于在唐帝国的致命打击下彻底灭亡。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正月，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在漠北设立六个羁縻都督府、七个羁縻都督州，合称“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六府是：瀚海府、金微府、燕然府、幽陵府、龟林府、卢山府。

七州是：皋兰州、高阙州、鸡鹿州、鸡田州、榆溪州、蹛林州、窴颜州。

其范围包括今蒙古中部、北部和俄罗斯南部。

同年四月，李世民又设置了燕然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统辖六府七州。

此后，随着漠北其他部落的归降，燕然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同年八月，骨利干部落归附，唐朝在其地置玄阙州。骨利干部落位于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即汉代苏武牧羊之处，“去京师最远，自古未通中国”（《旧唐书·北狄传》）。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二月，结骨部落归降，唐朝在其地置坚昆都督府。据《资治通鉴》记载，结骨部落的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意思是他们身材高大、红发碧眼，显然属于白色人种。

这就是伟大的天可汗时代。

这个时代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它已然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

时至今日，天可汗时代之所以仍然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崇敬和仰望，就是因为它能把华夏帝国的疆域拓展得如此广袤而辽远，也能把许多不同文、不同种的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文明坚毅而宽广的怀抱。

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和文明传播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一种强悍而勇

武的英雄血性，也看见了一种开放而博大的文化胸襟，更看见了一种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

无论岁月如何久远，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天可汗的精神必将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传承，天可汗时代也永远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朽的骄傲与荣光。

[1] 按照突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风俗，义成公主曾先后成为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父子四人的妻子，在东突厥整整生活了三十年。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大唐兴亡三百年 3

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
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

王觉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兴亡三百年．3 / 王觉仁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115-5489-5

Ⅰ．①大… Ⅱ．①王… Ⅲ．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Ⅳ．①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8988 号

书　　名	大唐兴亡三百年．3
作　　者	王觉仁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邀编辑	汪超毅　沈　骏
封面设计	谢明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字　　数	293 千
印　　张	21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489-5
定　　价	54.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瘸子储君李承乾

齐王李祐造反

李世民想废掉太子

李承乾把自己玩死了

李泰的一步臭棋

李治成了皇位接班人

第二章 李世民御驾亲征，讨平高丽

这真是一支可怕的军队！

驻跸山大捷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懂得欣赏自己的对手

贞观的黄昏

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天下？

第三章 武氏初次入宫

一个木材商人的华丽转身

将来必为天下之主！

武媚说：我不当白头宫女

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

不伦之恋

第四章 感业寺的涅槃

我是一只不死鸟

谁也别想再让我离开

天子的旧爱兼新欢

是谁杀死了小公主？

第五章 永徽政局：长孙无忌的网

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
长孙无忌，无所顾忌！
一场残酷的政治清洗
一个都不饶恕！
第六章 武媚的皇后之路
李勣的仕途沉浮
天子的政治突围
向长孙集团宣战
越演越烈的政君臣博弈
新皇后：武媚
第七章 走向权力的巅峰
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长孙无忌的悲剧：不懂得及时放手
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这个皇后，不是天子说废就废的
封禅：皇后的盛典
第八章 帝国的扩张
名将之路：苏定方西征
百济：一场得而复失的战争
独臂擎天：刘仁轨传奇（上）
独臂擎天：刘仁轨传奇（下）
平定高丽：李勣老而弥坚（上）

平定高丽：李勣老而弥坚（下）

第九章 天后临朝

从皇后到天后

太子李弘暴亡

扫除最后的障碍——李贤

内忧外患的帝国

平定突厥叛乱

第十章 武皇后的盛唐

天牢囚犯成了天子保镖

高宗驾崩：终结与开始

不流血的政变：废黜中宗

帝国唯一的主宰

第一章 瘸子储君李承乾

齐王李祐造反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春天，大唐的天空依旧澄明。

这一年，太宗李世民四十五岁，君临天下十又七载。

十七年来，大唐帝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四海升平、万邦来朝，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繁荣强大的帝国都足以让李世民感到欣慰和自豪。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但是，这年正月，一则令人不安的流言却开始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悄

悄流传。

流言说的是太子李承乾。

要了解流言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到长安的酒肆茶坊里，听听某长安百姓和某外地旅人的如下对话：

某外地旅人问（下面简称外地人）：人们说太子什么？

某长安百姓答（下面简称长安人）：说他有病。

外地人：什么病？

长安人：足疾。十几岁时生病落下的。

外地人：这么说，堂堂储君居然是个瘸子？

长安人：别说得这么难听，人家那叫足疾！

外地人：足疾也罢，瘸子也罢，问题是这种人将来怎么当皇帝？这不是有失国体吗？将来岂不是要让番邦人笑掉大牙？

长安人：说得也是……不过，皇上还有一个儿子魏王李泰，长得膘肥体壮、膀大腰圆……不，是长得高大威猛、仪表堂堂，而且聪明颖悟、多才多艺，最受皇上宠幸。您不知道吧，皇上出门都把他带在身边，瞧这势头啊，这魏王李泰迟早有一天会把李承乾拱掉，自己当太子。

外地人：哦？如此说来，当今皇上也有废立之意啦？

长安人：这个嘛，咱平头百姓不敢瞎猜。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名流政要和勋贵子弟都在向魏王靠拢，如果不是他有戏可唱，那帮人精干吗要削尖了脑袋往他身边拱？

外地人：嗯，有道理。那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这些流言蜚语就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在长安坊间到处乱窜，恣意飞扬，最后终于不可阻挡地飞进皇宫，落进太宗李世民的耳中。

李世民勃然大怒，同时也隐隐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五，在元宵佳节的朝会上，一脸阴霾的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作出了严正声明：“听说有的官员、百姓认为太子有足

疾，而魏王颖悟，又时常随朕出游，所以议论纷纷，甚至有投机之徒已经开始攀龙附凤。今天，朕要明白告诉诸卿，太子的脚虽然有毛病，但并不是不能走路。而且《礼记》说：‘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朕绝对不会让庶子取代嫡子，开启夺嫡之源！”

谣言止于智者。

愚蠢的流言止于自信的帝王。

李世民坚信，只要自己毫不动摇地坚持嫡长制的原则，不让任何人有机可乘，太子李承乾就能在皇权的接力赛上稳稳当当地接好下一棒。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李世民都绝不允许武德九年那场兄弟阋墙、父子反目的悲剧在今日重演！

坊间的流言虽然可恶，不过它顶多就是让李世民感到郁闷和不安而已，但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情，却足以令他陷入巨大的悲怆和哀伤之中。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李世民最为倚重的股肱大臣之一、一代名臣魏徵与世长辞。

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李世民如遭雷击，哀恸不已。

他为魏徵举行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葬礼，命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全部去给魏徵送行，并赐予“羽葆鼓吹，陪葬昭陵”的特殊待遇。在当时，这是人臣所能享有的最大哀荣。

魏徵出殡的那天，李世民登上御苑的西楼，望着那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往事在他眼前一幕幕掠过，泪水止不住潸潸而下……

还没等李世民从魏徵之死的哀伤中完全解脱出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先是鄠县（今陕西户县）县尉游文芝密告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刘兰成谋反，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证实刘兰成谋反罪名成立，随即将其逮捕并腰斩。紧接着，新任洛州（今河南洛阳市）都督张亮入宫辞行时，居然向皇帝告密，又说有个朝廷重臣要谋反。

谁？

侯君集。

张亮是开国功臣，侯君集也是开国功臣，如今一个开国功臣状告另一个开国功臣谋反，这个问题绝对要比刘兰成一案严重得多！

是张亮在诬陷，还是侯君集真的要造反？

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侯君集这个人，其实早在贞观十四年就开始出问题了。当时他出任西征统帅，率部平定了高昌，于是就有些居功自恃，公然侵吞高昌王室的大量珍宝。上梁不正下梁歪，其部众看见主帅带头贪墨，顿时一哄而上，争抢战利品。

侯君集不敢制止，因为他是第一个伸黑手的。要是他贼喊捉贼，手下人绝对不服，而且回朝后肯定会把事情抖出来。所以，侯君集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手下人尽情哄抢战利品。

也许是事情闹得太大，所以他刚刚班师回朝，就东窗事发了。

有关部门抓到了他贪墨的证据，立刻对他发出弹劾。太宗李世民一听奏报，二话不说就把他丢进了诏狱。

侯君集满腹不平。

自己刚刚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一回来，居然连皇帝的面都还没见着，连一杯庆功酒都还没喝到，就先蹲号子吃了牢饭，这算怎么回事？

后来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替他求情，李世民才把他放出了诏狱。可侯君集平定高昌的功勋好像从此一笔勾销了，不但没人给他摆庆功宴，更没人给他加官晋爵。这口鸟气，侯君集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在侯君集看来，李世民在玩弄帝王术，借惩贪之名对功臣进行打压。从此，侯君集心灰意懒，“志殊怏怏”（《旧唐书·侯君集传》），对李唐朝廷和太宗李世民的忠诚度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开始在他心中蠢蠢欲动。

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子詹事张亮被调出朝廷，改任洛州都督，侯君集故意刺激他说：“是什么人排挤你？”

张亮没好气地说：“不是你还有谁？”

侯君集急得跳脚：“我讨平一个国家回来，却碰上比一间屋子还大的嗔恨和猜忌，我还有心思排挤你？”

见张亮不语，侯君集忽然卷起袖子大声说：“老子郁闷得不想活了，你要不要反？我和你一起反！”

乍一听如此大逆不道之言，张亮着实吓了一大跳。他先是在心里问候了侯君集的十八辈祖宗，继而暗暗叫苦：今天这些话要是被人听见，自己就得陪着侯君集一块儿玩完！虽然此次无缘无故被弄出京师他也很憋屈，可他万万不敢往造反的事上想，如今侯君集这么一嚷嚷，简直是拽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狗日的侯君集，你自己想死就死，何苦拉着老子当垫背！

张亮为此郁闷了好几天，最后一狠心，找皇帝告御状去了。

张亮知道，只有这么做，他才能与侯君集划清界限，彻底洗刷同谋造反的嫌疑。

李世民听完张亮的告密后，良久无语。

最后，李世民长叹一声：“你跟侯君集都是开国功臣，而且侯君集说这种话时，旁边没有第三者在场。如果交付法司审讯，他必定不服，到头来也审不出个子丑寅卯，这件事你暂且不要再提了。”

事后，李世民虽然待侯君集如故，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显然已经对他多留了一个心眼。

这真是一个让人无语的春天。

政治流言猖獗，股肱重臣辞世，地方大员刚因谋反被诛，开国功臣又涉嫌谋反……好像所有坏事都凑到一块儿去了。

要照老百姓的话说，这就叫流年不利！

数日后的一次朝会上，情绪恶劣的李世民忽然对群臣发了一通牢骚：“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听着天子这段既像独白又像训斥的牢骚话，满朝文武面面相觑，猝然不知应对。

许多人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瞥了瞥御榻上的皇帝，心里头纷纷敲起了

鼓。

勇力、辩口、谄谀、奸诈、嗜欲，各求自售，以取宠禄……这说的都是谁呢？不会是说我吧？

也许是为了冲淡这个春天的晦气，并且纾解一下坏到了极点的心情，李世民决定做一件酝酿已久的事。

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夙愿，也是大唐王朝的一件盛事。

二月二十八日，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了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悬挂于太极宫三清殿旁边的凌烟阁。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做完这件事，李世民的心情总算有所好转。

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更坏的消息马上就来了。

贞观十七年三月初，一匹快马风驰电掣地进入长安。大汗淋漓的信使抵达京师后，不顾满面灰尘，直接拍马驰进了太极宫。

这个风尘仆仆的信使，给朝廷和天子带来了一则十万火急的消息——

齐王李祐造反了！

齐王李祐是太宗李世民的第五子，武德八年封宜阳王，同年改封楚王。贞观二年，徙封燕王，就任豳州都督，贞观十年改封齐王，授齐州（今山东济南市）都督。

从这份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这个齐王也算是经过历练的人，不像是那种长于深宫、昏庸无能的纨绔子弟。

但是很可惜，尽管李世民早早就让他出任封疆大吏，把他放在地方上历练，可这个齐王李祐却始终无甚长进，只学会了飞鹰走马、游弋射猎，压根没学到什么抚众驭民的真本事。

亲王无能，外戚自然乘虚而入。

李祐的舅父阴弘智在朝中担任尚乘直长，是一个管理御马的七品芝麻官，仕途很不得意，当然希望齐王李祐能够竞争天子宝座，以便跟着鸡犬升天，于是暗中劝告李祐说：“大王兄弟这么多（李世民共有十四子），陛下千秋万岁之后，你应该招募一批壮士保卫自己的安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齐王暗中积蓄力量，以备来日夺取皇位。

李祐深纳其言。阴弘智随即举荐了他的两个大舅子：燕弘亮和燕弘信。

这兄弟俩本是江湖中人，平日里耍枪弄棒，吆朋喝友，也有几分老大的派头。李祐一见倾心，赐给他们大量财宝，让他们暗中招募死士。

太宗李世民对皇子们一向管教甚严，给他们派任的长史和司马都是一些刚烈正直之人。其中，负责辅佐齐王的长史权万纪就是一个性情褊狭、极端严厉的人。齐王喜欢飞鹰走马，权万纪就屡屡谏诤；齐王宠幸手下的两个卫士昝君謩、梁猛彪，权万纪就把他们视为眼中钉，找个借口就把他们逐出了齐王府。李祐大为不快，暗中又把他们召了回来，对他们的宠幸有增无减。

对于齐王李祐的所作所为，李世民也有所耳闻，于是经常写信斥责。权万纪担心皇帝怪罪他辅佐无方，随即想了一个免责的办法，对齐王说：“大王是皇上爱子，陛下是为你好才严加教训，大王若能改过自新，我愿入朝替大王说话。”随即写了一道奏疏，条条列出李祐所犯的错误，然后强迫李祐在上面签字，以表明他真心悔过的态度。李祐无奈，只好乖乖地签字画押。

权万纪拿着奏疏到了京师，对皇帝说，齐王李祐在他的辅佐下一定可以改过自新。李世民非常高兴，一边勉励权万纪，一边下诏历数李祐的种种过失，并且再次发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李祐听说皇帝褒奖了权万纪，却独独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顿时暴跳如雷：“这姓权的出卖我！竟敢以我的过失换取他的功劳，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

自此，齐王李祐与权万纪嫌隙日深，而叛乱的祸根从这一天起便已悄然埋下。

权万纪到长安走了一趟后，自以为有了皇帝的嘉奖和信任，从此就像拿到了一把尚方宝剑，对齐王的管束越发变本加厉，不但不让他迈出城门一步，而且把他打猎用的鹰犬全都放跑了，此外还严禁昝君謩、梁猛彪与齐王见面。

堂堂一个皇子，竟然被自己的辅臣管制到这种地步，叫齐王如何忍受？

权万纪并不知道，他的过分刻薄终将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有一天夜里，权万纪家的院子里忽然扔进来几块石头，权万纪料想这肯定是昝君謩和梁猛彪所为，下一步很可能会谋杀他。于是第二天一早断然将二人逮捕，并且立刻用快马投递奏章到京师，弹劾齐王李祐及其党羽数十人。

到这一步，权万纪与齐王李祐的矛盾就彻底激化了，双方已呈水火不容之势。

李世民闻奏后，立即派遣刑部尚书刘德威亲自到齐州调查取证，结果很多证据都对齐王非常不利。李世民大怒，随即下令李祐随同权万纪一起回京。

齐王李祐大为恐惧，知道自己又被权万纪打了小报告，于是蓄积已久的怨恨终于爆发，随即与燕弘亮等人一起密谋，决定除掉权万纪。

此时权万纪也已嗅出危险的气息，所以不等齐王一起，自己先行动身回京了。齐王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命燕弘亮率二十几个骑兵追杀，在半道上射死了权万纪。

擅自诛杀皇帝亲任的辅臣，这回的娄子算是捅大了。事已至此，反是死，不反也是半条命，齐王李祐一咬牙——那就反了！

除了权万纪外，李祐对另一个经常劝谏他的辅臣韦文振也是恨之入骨。韦文振时任齐王府典军，手中握有兵权，李祐要想起兵，头一个就得先摆平他。于是李祐便派人胁迫他一起造反，韦文振不从，率一干部属出逃，只跑出数里地，就被齐王李祐追获，当场砍杀。部属们吓得趴在地上，浑身颤抖，纷纷向齐王磕头求饶。

做完这一切，齐王李祐彻底掌控了齐州的局势。

坐镇齐州十年，他还是头一回品尝到手握大权、说一不二的滋味。

这滋味真是美极了。

李祐感觉自己胸中一股睥睨天下、傲视群伦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

原来造反是如此惬意的一件事情，早知道就早反了！

随后，李祐开始给党羽们大肆封官，名头有什么上柱国、开府、拓东王、拓西王等等，同时打开府库尽情赏赐，俨然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帝王。接着，李祐又把城外的老百姓悉数赶进城中，又命军队磨利武器、加固城墙，大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

齐王李祐激情澎湃地进行着他的造反大业，可在齐州的官员和百姓看来，齐王这么做简直是在自掘坟墓。

士民们当然不想当他的陪葬品，于是纷纷撇下妻儿老小，半夜里偷偷从城墙上缒下，争先恐后地逃亡。

齐王李祐根本无力阻止。

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李祐竟然会走到这一步！

他知道这小子一贯是烂泥扶不上墙，本来也没指望他有多大出息，只是想严加督导，别让他捅出太大的娄子就行。不承想这小子放着好好的亲王和都督不当，居然干起了杀人造反的勾当！

如此丧心病狂，无异于宣判自己的死刑。

李世民心里又恨又痛。

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月初六，李世民一边下诏命兵部尚书李世勣集结齐州以西九个州的军队进行讨伐，一边给齐王李祐下了最后一道手诏：

吾常诫汝勿近小人，正为此也。汝素乖诚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为枭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磐石之亲，为寻戈之衅。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万纪存为忠烈，死不妨义；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嘉声不，尔则恶迹无穷。吾闻郑叔、汉戾，并为猖獗，岂期生子，乃自为之？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旧唐书·庶人祐传》）

这是一个苦心孤诣的帝王对一个大逆不道的臣子最后的谴责。

这也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父亲给一个冥顽不灵的儿子最后的诀别书。

书毕，李世民悲从中来，泫然泣下。

就像我们在前文说过的那样，对于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李世民除了感到痛心疾首之外，脑海中一定也会闪过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那一幕。当他颤抖地写到“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一定也会泛起一种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一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那潸然而下的泪水，又岂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

大难将至，可齐王李祐似乎毫无察觉。

眼下他正在齐州城里美滋滋地当着他的土皇帝。

他命部众分头把守各个城门，然后把燕弘亮、燕弘信等五个最亲信的死党召进卧内，天天和他们一起寻欢作乐，左手抱着美女，右手端着酒盅，通宵达旦，好不快活。

觥筹交错之间，说到朝廷和官军的动向，燕弘亮拍着胸脯对齐王说：“大王不必忧虑！我右手拿酒杯，左手为大王挥刀，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

李祐顿时喜上眉梢。

有燕弘亮这等武功盖世的大侠替他包打天下，他还怕什么鸟官军？

此刻，李世勣的讨伐大军正在向齐州火速推进，而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淄州（今山东淄博市）等数州兵马也已纷纷开进齐州地界。朝廷已经给齐王及其党羽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可这帮家伙却还在温柔乡中大做白日梦！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朝廷为了此次平叛而兴师动众，准备大动干戈，可最后讨平齐王的，既不是李世勣的讨伐大军，也不是青州等地的兵马，而是齐王府里头的一个小小兵曹。

这个兵曹名叫杜行敏，是一个正七品的芝麻官。他知道齐王的谋反不得人心，于是暗中纠集了不附齐王的官兵和百姓一千余人，于三月初十深夜突然发动兵变，齐州城里顿时杀声震天。当天夜里，齐王党羽凡是居住在府外的，都被变兵一一砍杀。李祐惊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左右也不知何故，只好随口说：“恐怕是李世勣的军队已经攻进城了！”

此刻，杜行敏已经凿破了齐王府的外墙，率众蜂拥而入。李祐和燕弘亮等人慌忙披上铠甲拿上兵器，躲进内堂顽抗。杜行敏等一千余人将

内堂团团围住，从次日凌晨一直打到中午，始终不能攻破。

杜行敏最后决定采用火攻。他向齐王喊话说：“你从前是皇子，现在是国贼！行敏为国讨贼，更无所顾，倘若你拒不投降，立刻让你变成灰烬！”随即命人在房屋四周堆上柴薪，手举火把，随时准备点燃。

齐王李祐忽然挑开窗户，扔出来一句话：“我马上就开门，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保燕弘亮兄弟不死。”

直到这一刻，这位愚蠢透顶、不可救药的齐王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他不但以为自己可以逃过一死，而且还想保住燕弘亮兄弟的性命。

李祐实在是太可爱了。都说虎父无犬子，可英明神武的太宗李世民居然生出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实在让人无语。

杜行敏答应了齐王的要求，李祐等人随即开门投降。燕弘亮刚一露头，马上有一帮人冲上去把他摁倒在地，然后狠狠地抠出了他的眼珠子，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答应保你不死，可没答应保你的眼珠子！

其他的党羽更惨，先是被打断了腿，随后又全部被斩首。

杜行敏押着蓬头散发的齐王在城里走了一圈，以此安抚众心，最后将他押回齐王府关了起来，上表向朝廷奏捷。

齐王李祐的这场叛乱，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闹剧。

还没等平叛官军踏进齐州城一步，李祐的皇帝梦就灰飞烟灭了。

李祐被押赴京城之后，囚禁在内侍省。李世民毫不犹豫地给他下了一道最后的圣旨——贬为庶人，赐其自尽。

李祐死后，同党被判处死刑的共有四十四人，其中当然包括燕弘亮、燕弘信兄弟以及野心家阴弘智。而七品芝麻官杜行敏则因平叛有功，被破格提拔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刺史，封南阳郡公；权万纪和韦文振也各有追封。

这一年春天，霏霏淫雨一直笼罩在太极宫的上空。

太宗李世民独自一人站在寝殿的窗前，望着窗外迷离的雨雾出神。细心的宫人们发现皇帝的神情憔悴而疲惫，目光中郁结着一层浓重的忧伤。

而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皇帝的脸色。

那是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苍白，仿佛刚刚从落了一季的雨水中打捞出来的一样。

宫人们知道，齐王李祐的叛乱事件已经给皇帝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眼下东宫又尽干些出格离谱的事，频频爆出令人震惊的丑闻。更让人气愤和无奈的是，太子李承乾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肆无忌惮、一意孤行，真是让皇帝伤透了心……

雨下得更大了。

天色越发晦暗，宫人们赶忙亮起了几盏烛灯。

隐隐约约中，人们看见皇帝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那是泪。

两行清亮的泪。

李世民想废掉太子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遂以此殿命名。

他从小聪慧敏捷，一直深受李世民喜爱，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为帝，同时将八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那段时期朝廷政务皆由太子决断。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颇识大体”，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李世民对他非常信任，“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也从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可李世民仍然对他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差不多从贞观十年起，李承乾身上的纨绔习气就越发严重了。他开始沉湎于声色犬马，终日射箭打猎、嬉戏宴游，毫无节制。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背着那些刻板严厉的辅臣干的。

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绝对一流。凡是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说到紧要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啧啧称赞。

可一回到东宫，李承乾把朝服一脱、靴子一蹬，立刻就变了个人，终日“与群小相亵狎”，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把那些圣贤学问全都扔到了爪哇国。

如果连续好些日子玩得太疯，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肯定会来进谏，于是就会主动出去迎接，一见他们到来，便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引咎自责”，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搞得他们一脸窘迫，“拜答不暇”（《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因为李承乾深谙变脸绝技，所以在他当太子的早期，朝野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

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因此越发肆无忌惮，所玩的游戏也越来越不靠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遴选了一批面貌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以五个人为一组把他们编为一个迷你型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然后自己住进去，每天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就拔出佩刀，割成一块一块与左右分享。

干完这些，李承乾还是不过瘾，有一天忽然对左右说：“我假装是可汗，现在翘了辫子，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地上一倒，当即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许久，李承乾才高兴地跳起来，说：“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只要当一个突厥将军，我就绝不会落于人后。”

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很快就落进了辅臣们的耳中。东宫大臣于志宁、张玄素、孔颖达等人吓坏了，赶紧苦口婆心地对太子进行劝谏。

可太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李承乾现在甚至连变脸都懒得变了，他决定采用新的办法来对付辅臣。

什么办法？

杀。

李承乾一怒之下就派出了几名杀手，打算一举除掉于志宁等人。后来刺杀行动虽然未能得手，但是从此以后，太子李承乾就和东宫的大臣们彻底决裂了，同时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

在李唐皇室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绝不仅仅只有李承乾一人。

还有一个宗室亲王和李承乾一样，也不是什么好鸟。

他就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

李元昌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时常为非作歹、触犯国法，所以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

这两个家伙称得上是一对臭味相投的活宝——太子李承乾是年少轻狂，而汉王李元昌则是为老不尊。

这对活宝凑在一块儿的时候，最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然后扎营列阵，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下人个个被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

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假如这个活宝真的当上了大唐天子，那么不出几年，大唐王朝必定像隋朝一样立刻玩完。

不过李承乾这种人注定是当不上天子的。

他的所作所为到头来除了把自己玩死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有个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李承乾玩得越离谱，这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趁早把自己玩死。

这个人就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

也就是说，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

李泰生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太宗欢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魏王。

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旧唐书·韦挺传》）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

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

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有心人当然就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新唐书·濮恭王泰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朝臣都想去攀魏王李泰的大腿。

比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等坚持嫡长制原则的朝廷重臣就根本不买李泰的账。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李泰就暗中授意个别朝臣到天子面前告状，说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大多轻视魏王。李世民为了树立李泰的威信，以便他来日入主东宫，遂把所有宰执重臣召集起来，声色俱厉地训斥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却听说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因此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汗流浃背，纷纷跪地谢罪。只有魏徵直挺挺地站着，不以为然地说："臣以为，如今的文武百官，绝对没有人轻视魏王。从礼制上来讲，皇帝的臣属与儿子地位相等；按《春秋》记载，周王派出的朝廷使节，其地位甚至在诸侯之上。因此，凡三品以上者皆为朝廷公卿，就连陛下也应该对他们尊重礼敬。如果是乱世之时纪纲大坏，那当然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可如今圣明在位，魏王就断无凌辱群臣之理。隋文帝放纵诸子，让他们为非作歹，最后自取灭亡，这种榜样岂能效法？"

魏徵的反驳义正词严、有理有节，李世民无言以对，只好勉强挂出一副笑容，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徵言，方知理屈。"（《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可是，李世民的这种妥协终究只是表面上的。在心里，他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仍旧处处维护李泰。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李世民一听就火了："你们一个个自以为尊贵，都瞧不起我的儿子们，是不是？"

魏徵马上又站出来说："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以上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这次李世民不再让步了，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这话说得已经很露骨了。满朝文武都很清楚，天子所谓的“诸王”，其实就是指魏王。

在此，天子的废立之心已经表露无遗。

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皇帝的说法：“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巨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作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是有增无减。

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泰听从司马苏勖的建议，认为“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旧唐书·濮王泰传》），因而“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

《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正文550卷，序略5卷，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此书历三年而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此书上呈天子。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褚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褚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臣职在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

魏徵则针对魏王入居武德殿一事谏言："此殿在内，处所宽闲，参奉往来，极为便近。但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李元吉）昔居，时人以为不可。"（《旧唐书·濮王泰传》）

面对他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才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

尽管褚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有皇帝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也是纷纷向他靠拢。

太宗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他们十分卖力地替李泰穿针引线，大量结交朝廷官员。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权贵们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当然也乐意把他们的筹码押在获胜概率更高的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其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两个字——夺嫡。

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魏王李泰及其同党蠢蠢欲动，大有志在必得之势。

一股夺嫡潜流已经在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剧烈奔涌。

李泰坚信：李承乾这个没用的瘸子迟早有一天会从储君的位子上滚蛋，只有他这个文武双全、众望所归的魏王才是入主东宫的不二人选！

李承乾把自己玩死了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泰暗中交结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警觉和反感。

在这件事情上，李泰显然操之过急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又在朝中拉帮结派，大肆树立朋党，那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大忌！

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太子李承乾的想法，可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情况下，李泰就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和迫不及待，终究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深深的不快——你李泰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

再者，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以魏徵、褚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大约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下半年起，李世民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打消了废立之心。

这一年八月，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说："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马上答道："今四方无虞，惟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所谓"宜有定分"，实际上就是劝告天子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从而杜绝魏王的夺嫡之心。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便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

众所周知，魏徵是贞观群臣中最以忠直著称的人，同时更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李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以此"绝天下之疑"。

换言之，就是让魏王李泰死了当太子的这条心！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后来魏王党人有意在京城散布不利于太子的政治流言时，李世民才会坚决地站出来辟谣，在朝会上向满朝文武重申嫡长继承制的原则。

尽管太子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然没有放弃李承乾。

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把他扶上帝位。

然而，李承乾终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时，东宫就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

事情源于一个叫称心的乐童。

称心这个名字是李承乾起的。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乐童让太子感到非常“称心如意”。史书称，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

宠爱到什么程度呢？

宠爱到“与同卧起”（《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的程度，也就是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做爱做的事。

在中国历史上，演绎这一幕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远有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分桃”典故、魏安釐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陈文帝与韩子高的“男后奇谈”……历朝历代，有这种同性恋倾向和恋童癖行为的帝王将相可谓不胜枚举。

但是，别人有十个称心可能都没问题，而李承乾只要拥有一个称心就足以把他害死。因为眼下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喷发。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承乾的这些龌龊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

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废了。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敌人往往并非来自于外，而是来自于内——来自人性深处种种难以克制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不能首先战胜内心之敌，他就不可能变得强大，更别指望战胜对手。在你死我亡的政治斗争中，你身上每多出一种欲望，都有可能会向对手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对方就有可能抓住你的破绽，一举将你置于死地！

很可惜，大唐储君李承乾似乎不懂得这个道理。在魏王李泰处心积虑要整垮他的危急关头，他居然不懂得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甚至处处向对手暴露自己的死穴，这种储君不被废掉简直没有天理。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称心之死依旧没有引起李承乾应有的反思和警

觉。他不但没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反而在宫中为称心建起一座灵堂、供起一尊塑像，朝夕焚香祭奠，终日泪水涟涟。此外，他又把称心的尸体埋葬在东宫的后花园里，暗中追赠官爵，竖立墓碑。

对于太子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这一点李承乾当然比谁都清楚。可他并不是想方设法挽回局面，而是连续几个月赌气不进宫朝见，甚至“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因而“鼓角之声，日闻于外”（《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这就叫破罐子破摔。

这就叫铁定了心，一条道走到黑！

李承乾认定称心事件是李泰告的密，对李泰痛恨到了极点，于是暗中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刺杀团，头目有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三人，李承乾命令他们——随时找机会干掉李泰！

此刻的李承乾当然不会知道，这伙刺客最终不但没有干掉李泰，其中一个反而出卖了他。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暮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终于走到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王朝的储君危机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面临着一场即位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这一切是如此似曾相识。

一个雄心勃勃意欲夺嫡继位的藩王。

一个岌岌可危只能拼死一搏的太子。

一个惴惴不安唯恐悲剧重演的皇帝。

大唐王朝的政治K线图走到了变幻莫测的拐点，谁也不知道历史将作出怎样的方向性选择。

李承乾决定拼了——

纵然拼他一个玉石俱焚、鱼死网破，他也在所不惜。

他知道，父皇李世民的废黜诏书随时会降临他头上，所以他只能孤注

一掷、先发制人！

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李承乾决定拉一个人入伙。

谁？

侯君集。

他会入伙吗？

会的。李承乾对此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在所有的开国元勋和朝廷重臣中，只有这个人对现状最为不满，也只有这个人对天子的怨恨最深。

李承乾相信，有了他的加盟，这场储位保卫战和皇位争夺战定然会多出三分胜算。

事不宜迟，李承乾随即通过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时任东宫带刀侍卫），向侯君集发出了诚邀加盟的信息。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当贺兰楚石一脸神秘地告知来意时，侯君集的心里顿时滚过一阵莫名的兴奋和战栗。

憋屈了这么多年，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玩一把大的了！

侯君集立刻前往东宫拜会太子。

李承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看来我这个太子之位是朝不保夕了，先生何以教我？"

侯君集面无表情地从嘴里吐出了一个字——反。

李承乾故作惊悚："先生何出此言，这可是要灭族的啊！"

侯君集忽然把一只手伸到太子面前，声若洪钟地说："微臣长着这只好手，就是要让殿下用的。"

李承乾大腿一拍："好！要的就是先生这句话！"

侯君集看着太子那张骄矜而浅薄的嘴脸，不禁在心里冷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这熊样也想当皇帝？等老夫帮你夺取了皇位，回头再收拾你，让你瞧瞧什么叫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紧继侯君集之后，李承乾又以重金收买了负责大内宿卫的禁军将领李安俨，让他密切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东宫通报。

汉王李元昌也极力煽动太子谋反，不过他的目标跟侯君集大不一样。

侯君集瞄准的是天子之位，这位王爷相中的却是一个美人。

他对太子说："我最近看见皇上身边有位美女，琵琶弹得极好，等事成之后，希望殿下能把她赏给我。"

李承乾满口答应。

到时候整个天下都是咱们的了，更何况区区一个女人！

太子党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行动，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戚纷纷加入，其中就有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其母是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等人。这帮人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计划发动政变，派兵攻入皇宫。杜荷对李承乾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

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齐王李祐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冷笑着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我们要是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

然而，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大事"最终就是坏在这个齐王李祐的身上。

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灭顶之灾便已从天而降。

李泰的一步臭棋

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把太子党的政变阴谋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旋即爆发！

在如此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五内俱焚。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

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

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无比心痛和无奈。他神情黯然地问大臣们：“该如何处置承乾？”

群臣面面相觑，没人敢发话。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敢替皇帝拿主意？

朝堂上一片沉默。

最后终于有一个小官站了出来，打破了这种难挨的沉默。

这个人叫来济，是隋朝名将来护儿的儿子，时任通事舍人。他对皇帝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保住李承乾一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

四月初六，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那帮党羽了。李安俨、杜荷、赵节等人全部被斩首，但是另外两个人，李世民却想对他们网开一面。

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

另一个就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跟随自己多年，而且是开国功臣，打算法外开恩，饶他一命。

然而，满朝文武却一致反对。李世民没办法，只好亲自到牢中去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旧唐书·侯君集传》）言罢泣下沾襟。

押往刑场斩首的时候，面对鬼头刀，侯君集表现出了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地对监刑官说："我一误再误，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便已侍奉左右，此后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吐谷浑和高昌），乞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以继承侯家香火。"

侯君集被斩首后，李世民命人抄没了他的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只将他们流放岭南。

太子终于出局了！

魏王李泰盯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嘴角掠过一抹深藏已久的微笑。

他相信，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

随后的日子，他天天入宫侍奉父皇李世民，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孝顺和谦恭。

李泰的表现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此时此刻，也唯有李泰可以抚慰这个天子兼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灵。

其实，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一直都觉得这个儿子最像自己——他有志向、有韬略、有智慧、有才情，由这样一个儿子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承乾既然已经废了，由李泰来继任储君，就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情，相信那些一贯坚持嫡长制的朝臣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与此同时，李世民也就此事对朝臣们进行了试探。但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

泰；而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却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事情顿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朝野上下的人们认定魏王李泰入主东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之时，晋王李治就像一匹政治黑马蓦然闯进人们的视野中。就在魏王李泰自认为一只脚已经迈进东宫的时候，晋王李治就像一颗从天而降的拦路石横亘在他的面前。

看着这个嘴上还没有长毛却居然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而面对这一两难局面，太宗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

平心而论，李世民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立为太子。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

而且，李治不适合当太子除了年纪太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开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六七岁的李治就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李世民大喜，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了。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旧唐书·高宗本纪》）。

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然而，此“宠”非彼“宠”。李世民对李治的“深宠”充其量只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而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从李世民那里获得的，却是一个皇帝对储君和后备储君的赏识、器重和期望。

前者关乎亲情，后者关乎政治。二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而今，要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心他如何能下？

李世民决定为李泰作最后的努力。

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有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他这种情形，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打了一张悲情牌。

他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

可是，这些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买他的账。

谏议大夫褚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褚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皇帝，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其次，褚遂良又警告皇帝，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你想立魏王，可你有没有考虑过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外，褚遂良的“措置”一词还隐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考虑，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将他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旋涡，或许这样能够让魏王放他一马，最终保住晋王一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皇帝你怎么能够为了册立那个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这个年少无辜的晋王？

褚遂良的这番尖锐之词和言外之意一下子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在他眼皮底下重演。所以，当褚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夺眶而出。

他不得不承认，褚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思虑及此，李世民的哀伤之泪顿时潸潸而下！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我不能……"

话还没有说完，李世民就忽然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步履缓缓向内宫走去。

那一瞬间，皇帝仿佛一下子苍老了。

这是许多大臣的强烈直觉。

当天的朝会戛然而止。除了半截语焉不详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给大臣们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

大臣们百思不解——皇帝那半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不能，可到底不能什么？是不能因为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因为顾及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心目中的储君？

没有人知道。

这些日子，魏王李泰觉得自己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元老极力撺掇皇帝改立晋王，而父皇在当面承诺立自己为太子后，却又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如此局面，怎能不令李泰心急如焚？

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眼看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李泰又如何能够气定神闲、安之若素？

急不可耐的李泰终于乱了方寸，走出了一步臭棋。

准确地说，他是忍不住对晋王李治说了一句威胁恐吓的话。

而恰恰就是这句话，促成李世民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最终下定了决心——放弃魏王，改立晋王！

李泰对李治说的那句话是："你历来和元昌友善，如今元昌已被处死，你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脑袋？"

十六岁的李治当即吓得面无人色，此后天天哭丧着脸，惶惶不可终日。李世民大为奇怪，屡屡追问他原因，李治不得不坦白交代，把李泰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皇帝听。

那一刻，李世民的心里忽然掠过一阵强烈的痉挛。

他痛苦地意识到——褚遂良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这个李泰一旦登上大位，绝不会放过李治！

而差不多在此前后，李世民去看望了一趟废太子，言语之间不免又大加斥责。李承乾愤愤然地说："儿臣既为太子，还有何求？皆因李泰暗算，儿臣才不得不与朝臣谋求自安之术，没想到被野心家教唆，撺掇我犯上作乱。今天父皇要是立李泰为太子，就是跳进他的圈套了。"

李承乾此语虽有泄愤之嫌，却不无道理。它最起码揭露了一点——李泰确实一直都有夺嫡的野心。如果真的立他为太子，那就是对藩王夺嫡的纵容，也等于开启了祸乱之源。

单凭这一点，李世民就断然不能让李泰得逞。

没的选了。

看来大唐帝国的新任储君非李治莫属了。

一旦册立晋王李治，也就意味着必须把魏王李泰逐出权力中心，彻底终结他的政治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李治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

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李世民感觉自己在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一颗心仿佛裂成了好几瓣，而且瓣瓣滴血。

君临天下十七年来，李世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皇帝是如此艰难。

当年高祖李渊在储君问题上所经历的千般苦痛和万般无奈，而今李世民终于淋漓尽致、彻头彻尾地品尝了一遍。

随后的一次朝会上，当满朝文武散班之后，李世民唯独留下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四人，神情凄然地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话音刚落，李世民就一头扑倒在御榻上。长孙无忌等人慌忙上前搀扶。突然，李世民拔出佩刀，作势要刺向自己。褚遂良眼疾手快，一把夺下皇帝的佩刀，转身递给呆立在一旁的晋王李治。

长孙无忌还没等皇帝心情平复，就迫不及待地问他要立谁为太子。

李世民有气无力地说："我打算立晋王。"

长孙无忌马上抢着说："臣等恭奉圣诏，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

李世民把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汝舅许汝矣，宜拜谢。"）

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

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的人选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

李治成了皇位接班人

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

呢？

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

很显然，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

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所以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目的就是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其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可想而知，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而长孙无忌之所以坚决拥立李治，就在于李治年龄小，性格柔弱，易于掌控。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毋庸讳言，其原因就是这个外戚试图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长孙无忌拥立李治的深层动机正在于此！

在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中，除了长孙无忌外还有一个就是褚遂良。

褚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褚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

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但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褚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第三号人物，也在其中发挥了看似无形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

说来话长。早在贞观七年，年仅六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这么小的毛孩子当然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世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李世勣算得上是晋王李治的“故吏”。他在并州取得的政绩，既是他自己的，也可以算是李治的，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场储位之争中，李世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众所周知，李世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如李靖已七十多岁，早已致仕；尉迟敬德也于贞观十六年淡出现实政治；而侯君集又在此次储君危机中因谋反被诛……在此情况下，李世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综上所述，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褚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世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

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

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贞观政要》卷三）

李世民很清楚，假如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不保，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

因此，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

换句话说，他是选择了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

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然而，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

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呢？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旧唐书·濮王泰传》）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当他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头肯定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恐怕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

职是之故，李世民才会表现得那么一反常态，先是把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儿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是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也是做给长孙无忌等人看的，目的是让他们充分意识到——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作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从而提醒他们——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换言之，他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

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李世民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那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

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七，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选择。

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作的一次重大妥协。

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个结果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正应了那句老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未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历史老儿阴差阳错选中的这个渔翁。

李治继任储君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世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一口气把这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李世民对李治的期望之高。同时，此举也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痾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

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

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旧唐书·濮王泰传》）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李泰被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

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跌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

到死，他也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

第二章 李世民御驾亲征，讨平高丽

这真是一支可怕的军队！

隋唐之际，朝鲜半岛上共有三个国家：高丽、新罗、百济。

高丽为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疆域东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两千里，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中部。

朝鲜半岛的另外两个国家——新罗和百济，分别位于半岛南部的东面和西面，国土面积比高丽小，实力稍弱。三个国家长期处于三足鼎立

的状态，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经常爆发战争。

尽管它们自古以来同是中国的藩属国，自两汉以迄魏晋南北朝，一直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可自从隋文帝时代起，高丽就开始屡屡挑战隋朝宗主国的地位，不但“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出兵入寇辽西，而且南征新罗和百济，大有强力扩张之势。

蕞尔小国竟然也敢蔑视天朝权威，企图称霸一方？

这当然令人无法容忍！

于是隋朝便先后对高丽发动了四次规模浩大的远征。其中隋文帝曾发兵三十万讨伐，但因瘟疫流行、粮草不继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被迫撤兵，结果未及与高丽交战便损失了十之八九的士兵。到了隋炀帝时代，好大喜功的杨广更是连续三次亲征高丽，仅第一次出动的军队就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后两次据称也都在百万人以上，然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隋炀帝的三次远征全部铩羽而归！

最后一次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可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惨重。

而更让世人料想不到的是，三征高丽竟然成了隋帝国由盛而衰的致命拐点。短短几年后，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就因国力耗尽、民变四起而轰然崩塌。

对于杨广来说，桀骜不驯的小国高丽就是他生命中的滑铁卢；而对于代隋而兴的唐王朝而言，该死的高丽照旧不让人省心。

武德年间，高丽与唐帝国之间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双方曾经交换战俘，高丽还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遣使上表，奉唐正朔，在国内颁行唐朝历法。唐高祖李渊也分别对高丽、新罗和百济进行了册封。

然而好景不长，从武德末年开始，高丽便又故态复萌了。它不但频频阻挠新罗和百济从陆路对唐的朝贡，而且不时出兵侵扰新罗和百济。即位之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愿轻启战端，于是积极施展外交手段，遣使对三国进行调解。高丽表面上做出谢罪与和解的姿态，暗地里却一直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并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在边境线上修筑了一条一千余里的长城，东北起于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市），西南直达渤海的入海口。

在贞观初期和中期，由于唐帝国对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积极经略漠北和西域，因而暂时无暇顾及辽东，但是李世民却一直密切关

注着高丽的一举一动。他曾经对朝臣说：“高丽本是汉朝四郡之地，只是后来国家不武，以致沦为异域。倘若我们发精兵数万进攻辽东，高丽必以倾国之兵相救，到时候再派一支海军从东莱直趋平壤，海陆夹击，要攻取高丽并非难事。只是如今中原地区仍然凋敝，我不忍心发动战争，让百姓受苦。”

由此可见，一旦时机成熟，李世民必定要征服高丽，完成隋朝两代帝王未竟的事功！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高丽国内爆发政变，其东部总督渊盖苏文杀了国王高建武，拥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继位，然后一手把持军政大权，成了高丽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渊盖苏文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不仅是个工于心计的权臣，还是个异常凶悍的武士。史书说他“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一个人居然随身佩带五把刀，实在是有够威猛。暂且不说他的功夫如何，光是这份气势就让人畏惧三分。

这位猛人平常还有个习惯，凡是他上下马的时候，左右的大臣和武将必须趴在地上当他的下马石。甭管你官阶多高，在渊大人面前你们通通是脚蹬和脚垫！

每逢出门的时候，渊大人就更是威风八面、派头十足。仪仗队的前导大老远就开始驱赶行人，如果是在大街上，路人还可以往两边躲，可要是碰上狭窄的山路，那行人就惨了，不管两边是悬崖峭壁还是万丈深渊，你都得闭着眼睛往下跳！

碰上这么一个猛人掌权，高丽的臣民们真是苦不堪言。

渊盖苏文的弑君篡权和擅作威福无疑为唐帝国出兵高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但是，就在李世民刚刚把目光锁定在高丽时，国内的一连串政治危机就相继爆发了。李世民一下子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之中。直到贞观十七年夏末，当所有内部问题彻底解决后，李世民才重新想起了高丽。

他对长孙无忌说："如今渊盖苏文弑君篡权，令人难以容忍。以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要击败他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想劳民远征，所以考虑征调契丹和靺鞨的兵力进攻高丽，你认为如何？"

长孙无忌答道："渊盖苏文自知罪无可赦，一直担心我们讨伐，现在必然严加防备，陛下可暂且隐忍。只要渊盖苏文自以为安全，必定更加骄横凶暴，到时我们再出兵讨伐也为时不晚。"

李世民听从了他的意见，随即下诏，册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表示对新政权的认可，同时也是想借此麻痹渊盖苏文。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之所以不在此刻用兵，真正的原因其实有两个：一、储君危机刚刚平息，朝廷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稳定政局；二、唐朝刚刚对漠北的薛延陀悔婚，双边关系趋于紧张，所以必须作好与薛延陀开战的准备。在此情况下，高丽问题只能继续搁置，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内外交困和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朝鲜半岛上风云突变，迫使李世民再次把高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九月，新罗遣使向唐朝告急，说百济悍然出兵攻占了新罗的四十余座城池，并与高丽结盟，新罗危在旦夕，请求唐朝火速发兵救援。

李世民立刻派遣使者相里玄奖携带诏书前往高丽。他在诏书中对高丽发出了严厉警告："新罗是中国的藩国，一直朝贡不断，你们与百济应该马上收兵，如果再侵犯新罗，明年必将发兵攻打你们。"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正月，相里玄奖抵达高丽都城平壤，对渊盖苏文转达了唐太宗的旨意，并重申唐帝国对此事件的严正立场。

渊盖苏文冷冷地瞥了一眼唐朝使者，不以为然地说："当初隋朝进犯我国，新罗乘机在背后插了一刀，侵占我国五百里的土地，在没有夺回这些土地之前，战争恐怕不会结束。"

相里玄奖针锋相对地说："那都是陈年老账了，何苦锱铢必较？如果一定要计较，那辽东之地当年也是中国的郡县，如今中国尚且不计较，高丽又何必一定要追回旧地呢？"

然而，渊盖苏文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仍旧坚持强硬态度。

二月，相里玄奖黯然回国，唐朝的外交斡旋宣告失败。

李世民勃然大怒："渊盖苏文弑君篡权、逆天虐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不讨伐！"

随后，太宗李世民作出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大为惊愕的决定——

他要御驾亲征，讨平高丽！

褚遂良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他说："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率四五万众，仗陛下威名，取之易如反掌，实在没必要亲自出马。何况太子新立，年纪尚幼，天子更不宜御驾亲征。"

与此同时，群臣也纷纷劝谏。

但是，李世民决心已定，谁劝都没有用。

他即刻下令进行战争准备：一边命将作大匠阎立德在南方督造四百艘战船，用于装载军粮；一边又命营州（今辽宁朝阳市）都督张俭率本部兵马，征调契丹、靺鞨等部落兵力突入辽东，对高丽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又命太常卿韦挺等人负责将河北、河南诸州的粮草调往前线。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李世民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船五百艘、海军四万三千人，从莱州（今山东莱州市）军港起航，横渡渤海，直趋辽东半岛；任命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副大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共计六万人，从陆路进击辽东。

李世民满怀必胜的信心，临行前专门下诏告谕天下，无比豪迈地宣告了唐帝国必将赢得这场战争的五大理由——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敌劳，以悦当怨！

他坚信，隋帝国倾尽国力、四度远征而未竟的事功必将在他的手中完成！（《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

君临天下十八年来，这是李世民第一次穿上戎装，走向战场。

奔驰在壮阔而苍凉的冬日原野上，青年时代那一腔跃马横刀、叱咤疆场的豪情再度激荡在他的胸中。

此刻的唐太宗李世民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一样，丝毫不把蕞尔小国高丽放在眼里。

这是与杨广如出一辙的自信。

没有人知道这份自信会换来怎样的结果。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李世民命房玄龄留守长安，命萧瑀留守洛阳，命太子李治监国，坐镇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同时命高士廉、刘洎、马周等人驻定州辅佐太子。

安排好这一切后，李世民随即亲率六军北上，浩浩荡荡地开赴辽东战场。随行的大臣有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等人。

三月，李世勣的前锋大军从边境重镇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市）出击，拉开了辽东之战的序幕。

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李世勣采用了疑兵之计，派出部分兵力直趋辽河东岸的怀远镇（今辽宁辽中县），并且虚张声势，给高丽守军造成唐军主力要从这里突破的假象。就在高丽军队纷纷向此集结，在这一线严阵以待的时候，李世勣主力却悄悄掉头北上，于四月初突然从通定镇（今辽宁新民市东）渡过辽河，兵锋直指玄菟（今辽宁沈阳市）。

高丽的防御重点在正西，此刻唐军主力突然从正北方向杀出，真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高丽举国震骇，辽东境内的所有城池全部闭门自守。

四月十五日，李世勣与李道宗开始对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市）发起进攻，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将其攻克，俘虏士兵两万余人，缴获粮食十余万石。

帝国远征军首战告捷！

盖牟城是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之一，此战的胜利令唐军士气空前高涨。

在南线，担任助攻任务的营州都督张俭也率领契丹、靺鞨等少数民族军队渡过辽河，攻击建安城（今辽宁盖州市），歼灭高丽军队数千人。

与此同时，张亮的舰队也已渡过渤海，在辽东半岛南端成功登陆。右骁卫将军程名振立刻率部进抵卑沙城（今辽宁大连市）。

卑沙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城堡，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唯有西门可以攀登。程名振仔细观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夜色的掩护，从西门对卑沙城发起强攻。

是日深夜，唐军将领王大度率领敢死队从西门攀登。等到高丽守军觉察时，敢死队已经攀上了城门，双方随即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一番血战之后，王大度终于占领西门，程名振立刻率大军杀进城中，与高丽守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至五月初二，唐军全部肃清了守城之敌，并俘虏八千余人。

第一阶段的战役，唐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而高丽在辽东的军事据点则接连失守。接下来，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高丽军队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屯驻了重兵。

就在程名振攻克卑沙城的当天，李世勣率部火速南下，将辽东城团团围困。

同日，李世民车驾抵达辽泽（今辽宁辽阳市西）。这是一片方圆两百余里的沼泽地，人马无法通行。李世民立刻命阎立德用干土铺出了一条道路，于是大军顺利通过，于五月初三抵达辽河西岸。

唐军来势汹汹，大有一口吞掉辽东城的架势。

渊盖苏文不无惊恐地意识到，辽东城一旦失守，整个辽东的门户就彻底洞开了！

所以，他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座重镇。

五月初八，高丽一支四万人的步骑混合兵团越过鸭绿江，紧急驰援辽东城。唐军统帅部马上作出反应，命李道宗率领四千骑兵阻击这支高丽援军。

四千对四万，兵力对比如此悬殊，这仗该怎么打？

尽管唐军的战斗力是首屈一指的，可高丽人也不是软蛋，当年杨广的百万大军在辽东折戟沉沙就是明证。所以部将们纷纷向李道宗建议，应该采取守势，以深沟高垒来抵挡高丽援军，等皇帝大军一到，再与敌人决战。

李道宗瞪了他们一眼：“我们是前锋，本来就是清道夫的角色，为皇上扫清障碍是我们的职责，怎么能当缩头乌龟，把敌人留给皇上？”

话音刚落，果毅都尉马文举就挺身而出，慨然道：“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

大家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李道宗随即率部出发。战斗打响后，马文举身先士卒，奋勇砍杀，所过之处，敌人纷纷扑倒。

有这样的勇士打头阵，总算稳住了唐军将士的军心。

但是，有勇士必定有懦夫。

此刻，李道宗手下一个叫张君乂的部将就是贪生怕死的懦夫。他从一开始就认定此战必败无疑，于是趁着混战之际，偷偷率部下脱离了战场。

唐军在人数上本来就居于劣势，张君乂这一跑，形势更加险恶。唐军逐渐不支，开始往后溃退。李道宗临危不惧，一边撤退一边重新集结溃散的士兵。稍后，李道宗登上一座山丘观察敌情，发现高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阵形混乱，于是当机立断，亲自率领数十名精锐骑兵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往来驰骋，暂时遏住了高丽军的攻势。

但是高丽军队仗着人多势众，很快又围了上来。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勣率领援军赶到，马上对敌人发起反攻。高丽军队抵挡不住，迅速溃败，被唐军斩杀一千余人，余众被迫后撤。

五月初十，李世民亲率六军渡过辽河，随后下令拆除河上的桥梁，以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此举大大坚定了将士们的战斗意志。

李世民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市西）扎营。在听取了前方的战报后，李世民下令犒赏李道宗，并将果毅都尉马文举提拔为中郎将，同时将临阵脱逃的张君乂斩首示众。随后，李世民亲自带着数百名骑兵抵达辽东城下。

此刻围城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士兵们正扛着一个个装满沙土的大麻袋在填充城墙四周的壕沟。李世民见状，立刻翻身下马，命士兵把袋子放到马背上，然后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扶着麻袋，亲自把沙土运到了壕沟边。

皇帝居然亲自加入了填充壕沟的行列！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又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迅速在士兵中传播开来。

将士们无不受到极大的感动和鼓舞，一袋又一袋的沙土被迅速扔进了壕沟中。很快，辽东城下的一大段壕沟被填成了平地。李世勣立刻指挥军队，将抛石机、撞车等大型攻城器械运过壕沟，对辽东城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但是，高丽守军的英勇和顽强也大大出乎李世民的意料。

唐军昼夜不停地猛攻了十二天，将这座城池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箭矢巨石如雨而下，战鼓声、喊杀声惊天动地，可辽东城却依旧固若金汤。

在唐军的攻城武器中，大型抛石车是高丽人最害怕的东西。这种武器可以抛出重达三百斤的巨石，射程为一里。为了抵御抛石车，高丽守军在城墙上修筑了一排排战楼，而且在城墙外缘还建有塔楼，作为第一道防线。

李世勣发现分散的抛石车难以充分发挥威力，于是下令将所有的抛石车密集排列，然后在同一时间发射巨石。

这一招果然奏效。随着无数的巨石像雨点一样密密麻麻地从天而降，辽东城上的战楼被纷纷砸塌。李世勣抓住战机，迅速出动撞车，将城墙边缘的塔楼又一一撞倒，高丽守军只好退入城中，放弃了第一道防线。

为了加强攻城力量，李世民又亲率一万多名铁甲骑兵加入了攻城行列之中。

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唐军围攻辽东城的第十五天，老天爷终于站在了唐军这边。

这一天忽然刮起了猛烈的南风。李世民敏锐地抓住战机，派出敢死队登上冲竿（一种比较坚固的攻城梯）的顶端，纵火焚烧辽东城的西南城楼。在强风之下，火势迅速向城内蔓延。高丽守军大为惊恐，赶紧手忙脚乱地扑火，城中顿时乱成一团。

就在这一刻，李世民迅速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唐军将士纷纷攀上云梯，冲上城墙。尽管高丽守军拼死抵抗，可还是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

激战一天后，辽东城终于被唐军攻克。高丽守军一万多人战死，另有一万多名士兵和四万多平民被俘。李世民随即将辽东城置为辽州。

辽东城的陷落，对辽东境内其他高丽守军的士气绝对是一大打击！

五月二十八日，唐军稍事休整之后，又乘胜进攻辽东城东北面的白岩城（今辽宁灯塔市西）。白岩城守将孙代音自忖不是唐军的对手，便派人向唐太宗请降。然而，白岩城的大多数将领却坚决反对投降。面对众人的抵制，孙代音被迫改变了主意。当李世民率领唐军兵临城下，准备受降时，看到的却是严阵以待的高丽军队。

李世民大怒，立刻下了一道命令："攻下白岩城后，将城中男女以及所有财物全部赏赐给攻城将士。"

二十九日，右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率先进攻白岩城，不料身中流矢。李世民闻讯，立刻到军营中看望，并且亲自为他吸吮淤血。

此举再度令将士们感动不已。

无论是运沙土还是吸淤血，作为一个九五之尊的皇帝，李世民这些表现确实深深赢得了所有将士的心。有人肯定会说这是在作秀，可是，能把秀作到这份儿上，不也足以体现出李世民的过人之处吗？

白岩城被围后，位于辽东腹地、鸭绿江以西的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市）即刻派出一万余人北上支援白岩城。

李世勣随即命右骁卫将军契苾何力率八百名精锐骑兵进行阻击。

八百对一万多。

又是一场敌众我寡、凶多吉少的恶战！

尽管契苾何力骁勇无匹，尽管唐军将士个个都有以一当十之勇，可高丽军队也不是吃素的。就在此次增援白岩城的部队中，一个叫高突勃的高丽将领就同样勇猛。当契苾何力不顾一切冲进高丽军队的战阵中时，高突勃就挺枪拦住了他。双方拼杀许久，高突勃瞅准机会，狠狠一枪刺入了契苾何力的腰部。

契苾何力当即重重摔下马背。就在这生死关头，薛万备（薛万钧、薛万彻的弟弟）单枪匹马杀到高突勃面前，硬是在千军万马中救了契苾何力一命。

从来没有被人刺落马下的契苾何力顿时怒发冲冠。他仰面向天，发出一声令人震悚的长啸，然后用力撕下一角战袍，裹住鲜血直流的伤口，翻身上马再战。左右将士受其激励，无不奋勇厮杀，终于将高丽

援军击溃。

最后，这支几百人的骑兵不仅把一万多人的高丽军队追出了数十里地，而且生擒了高突勃，一路砍下了一千余颗首级。

直到暮色笼罩大地，这群杀红了眼的大唐勇士才心有不甘地勒住了缰绳。

如血的残阳下，一股冲天的斗志和怒火依然在他们的眼中灼烧。

这真是一支可怕的军队！

李世勣率领大军从白岩城的西南面连续三天发动猛烈攻击，李世民则坐镇西北亲自指挥。眼看唐军的攻势如此强大，而乌骨城来的援军又已被唐军击退，孙代音彻底丧失了抵抗的意志。

六月初一，孙代音再次密遣心腹，出城向唐太宗请降，并且表示了他的难处——部将们不肯投降。李世民命人拿出唐军旗帜，告诉密使：如果孙代音真心要投降，就把唐军的旗帜插在城头之上。

孙代音依计而行。城中守军一看，以为唐军已经攻上了城墙，顿时斗志全无，只好乖乖缴械投降。

就在李世民准备进城受降时，脸色阴沉的李世勣突然带着几十名官兵拦在了他的马前。

李世民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当初孙代音反悔，李世民一气之下作出洗劫白岩城的承诺，可现在白岩城一旦投降，官兵们期望中的战利品便会全盘落空。所以，此刻李世勣是代表将士们讨赏来了。

换句话说，他们是来“胁迫”天子兑现承诺的。

果不其然，李世勣一开口就说：“皇上，将士们之所以冒着矢石、不顾生死地战斗，就是希望破城后分得自己的一份战利品。眼下城破在即，却要接受他们的投降，实在是让将士们为之心寒！”

阵前讨赏这种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万一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激发兵变。

不过这种事情对李世民来讲只能算是小菜一碟。

李世勣话音刚落，李世民立刻翻身下马，首先向将士们表示道歉，然后说："将军所言甚是！然而，纵兵杀人，掠虏人家妻儿，朕实在于心不忍。请你们放心，凡是将军麾下的有功之人，朕一定用府库中的钱物来赏赐，以此向将军赎回这座城。"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李世勣等人当然就无话可说了。

唐军受降后，白岩城的一万多居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李世民甚至下令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赏赐布帛。而对于其他各城派驻白岩城协防的高丽士兵，李世民则发给他们干粮，要去要留，任他们自便。

随后，李世民将白岩城置为岩州，任命孙代音为岩州刺史。

六月初三，李世民又将最早攻下的盖牟城置为盖州。

早在唐军攻破盖牟城之前，渊盖苏文曾经从加尸城（今朝鲜平壤西南）派出一支七百人的特遣兵团进驻该城。城破之时，这些人都愿意加入唐军，为唐帝国效力。可是李世民却没有同意，他说："你们的家都在加尸，如果为我而战，渊盖苏文肯定会杀死你们的家人。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我不忍心这么做。"随即发给路费和干粮，将他们全部放归。

从这些战后处理来看，李世民不愧是一代明君。

因为上述表现确实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

当然了，这些做法也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比如——彰显大唐军队王者之师的风范，以吊民伐罪的姿态收揽人心，从而瓦解其他城市高丽军民的抵抗斗志，等等。然而，无论李世民的动机中掺杂了多少政治意图，只要这些做法能够避免生灵涂炭，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挽救无辜平民的生命，那么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些行为都值得我们敬佩和感动。

不过，尽管李世民放过了绝大多数平民和战俘，但是有一个人他却不想放过。

这个人就是高突勃。

李世民把高突勃五花大绑地送到契苾何力面前，要让他亲手结果高突勃，以报那一枪之仇。不料契苾何力却对李世民说："他为了自己的主公，在战场上冒着刀枪箭矢与臣搏杀，虽然刺伤了臣，但却是忠勇之士。臣与他本来就素不相识，更谈不上什么怨仇，只不过各为其主

罢了，请皇上赦免他吧。”

契苾何力可以称得上一个真正的英雄。因为他身上不仅有一种舍生忘死的勇猛，更有一种超越常人的宽宏气度和磊落胸襟。

这就叫大将风度，也叫作武士精神！

只有具备这种风度和精神的人，才配得上英雄两个字。

在李世民的亲自指挥下，大唐远征军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辽东。

唐军铁骑纵横驰骋在白山黑水之间。

坚实而广袤的辽东大地发出了阵阵战栗。

踌躇满志的李世民将目光转向辽东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市）。只要拿下它，大唐远征军就可扫平辽东半岛，继而跨过鸭绿江，一举夺取平壤！

在李世民看来，这场战争已经赢了大半。

征服高丽只是时间问题了。

驻跸山大捷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六月中旬，李世民率领远征军迅速南下，于六月二十日包围了安市城。

在辽东境内的所有高丽据点中，这座安市城的情况最为特殊。

严格来讲，它现在处于半独立状态。

当初，渊盖苏文发动政变、大权独揽后，高丽各地方的守将和城主都慑于他的淫威，不得不向他屈服，唯独安市城主拒不承认渊盖苏文的新政权。渊盖苏文勃然大怒，数度发兵攻打。但安市城城防坚固，加上安市城主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所以屡屡将政府军击退。渊盖苏文没辙，最后只好放弃，任凭安市城变成一个没有归属的独立王国。

但是此时此刻，渊盖苏文却不能再对安市城置之不理了。

因为辽东的其他重镇均已陷落，只剩下这座安市城可以阻遏唐军的兵

锋。虽说它的南部还有建安、后黄、银城、乌骨等城池，可这些地方的防御都相当薄弱，根本经不起唐军一击。安市一旦失陷，唐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鸭绿江，直捣平壤。

所以，渊盖苏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安市城——保住这辽东的最后一道屏障！

就在唐军进围安市城的次日，渊盖苏文就命令北部总督高延寿、高惠真，统领高丽、靺鞨兵共计十五万人，大举救援安市城。

十五万人是什么概念？是倾国之师，是高丽王国目前可以动用的所有机动兵力和后备部队！

毫无疑问，唐帝国的远征军与倾国而来的高丽军队必将在安市城展开一场大决战。

安市城的存亡将对这场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李世民很清楚——安市城是一颗硬钉子，要拔下它并不容易。

所以一开始，李世民曾打算绕过安市城，先把南部的建安城打下来。可李世勣却不同意皇帝的战略，他的理由是：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唐军的补给中转站在辽东城，如果绕过安市进攻建安，那么后方的运输线很容易被安市守军切断；反之，如果先攻下安市城，则建安城唾手可得。

李世民尊重李世勣的意见，遂决意攻打安市城。

当高延寿的救援大军火速向安市城推进的时候，李世民对当前的形势作出了三种判断。

他说："现在高延寿有三种战略选择：第一，率领大军前进，与安市城的守军互为掎角，占据险要地形，派出靺鞨骑兵抄掠我们的牛马，一旦我们进攻受挫，要撤退又受阻于沼泽，就会陷入困境，这是上策；第二，救出安市城的军民，然后撤退，这是中策；第三，自不量力，与我们在战场上一决胜负，这是下策。诸位等着瞧，高延寿必出下策，要生擒他易如反掌。"

与此同时，高丽军中的一个谋士也正在向高延寿献策："李世民对内扫除群雄，对外制伏戎狄，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如今倾国而来，我们不是他的对手。而今之计，只有坚壁清野，避其锋芒，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然后派出奇兵切断唐军的补给线。一旦唐军的粮食告

鏖，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我军便可大获全胜。”

很显然，这个谋士的策略正是李世民所说的上策。

可惜的是，刚愎自用的高延寿根本听不进去。他断然拒绝了谋士的建议，毅然挥师西进，决意与李世民一决雌雄。

一切都被李世民掐准了，而高延寿的败局也就此注定。

高丽援军马不停蹄地向安市城奔来。

当他们距离安市城四十里地的时候，李世民担心他们不敢前进，于是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一千名突厥骑兵作为诱饵，去诱使高丽军队继续深入。

阿史那社尔与高丽军刚一交锋，就佯装败北。高丽士兵大喜，互相喊着说：“唐军太容易对付了！”于是争先恐后地追击，直抵安市城南八里，然后紧靠山麓扎营列阵。

李世民笑了。

高延寿果然有勇无谋。

他随即带着长孙无忌等人和数百名骑兵登高远望，观察敌情，只见高丽军队旌旗飘飘，阵营绵延达四十里。同时，李世民又仔细观察了高丽军营附近的山川地形，寻找适合伏击和冲锋的地点。

一番侦察之后，李世民心里已经有了八成的胜算。

就在这时候，江夏王李道宗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直捣腹心的战略。他说：“高丽以倾国之兵来战，都城平壤的防御必然薄弱，臣请率精兵五千，直捣腹心，拔其根本！只要攻下平壤，高丽的数十万众便可不战而降。”

这是一个出奇制胜的战略。

假如李世民采用了这个战略，那么这场高丽战争的结局很可能就会全然不同。可令人困惑的是，李世民听完后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没有说话并不代表默许，而是表示拒绝。

李世民为什么会拒绝李道宗的提议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太自信了。眼下他已经成竹在胸，完全有把握一举吃掉高延寿的这支援军。而安市守军一旦没有了外援，就算他们想负隅顽抗，其下场也必定和辽东城一样！

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

李世民用沉默拒绝了李道宗之后，随即遣使给高延寿送了个口信，说："渊盖苏文强臣弑主，所以我前来问罪，至于交战，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愿。我大军深入你们国境，粮食供应不上，所以先夺你们几座城池，等你们政府恢复藩臣的礼节，自然会将城池交还给你们。"

很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释放的烟幕弹。他知道高延寿有勇无谋，所以吃定他了。

高延寿果然中计，随后便放松了警惕，军营的防备也异常松懈。

而李世民则连夜召开了军事会议，抓住战机进行决战部署。他命李世勣率领步骑混成部队一万五千人，抢占西面的山头；又命长孙无忌率精锐部队一万一千人，从山北狭谷秘密行军，迂回到高丽大军的后方；而他本人则亲率四千人坐镇北山，将总指挥部设置于此，从这里俯瞰整个战场，以战鼓、号角及各种旗帜作为指挥作战的信号。

这场歼灭战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这支奇兵能否顺利迂回到敌军后方，扰乱其军心，并且切断其后路。

李世民在北山的制高点上，迫切等待着长孙无忌发出的信号。

六月二十二日清晨，李世勣率部悄悄占领了西岭。当薄雾逐渐散去，高丽军队才赫然发现唐军早已在他们身边摆出了一个攻击阵形。

高延寿大惊失色，立即下令军队准备作战。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此刻，长孙无忌的奇兵已经穿过狭谷，进入了预定战场，并且掀起漫天尘埃，向指挥部发出了信号。

李世民一见，即刻命鼓手和旗手发出进攻的指令。

刹那间，唐军各部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各个方向对高丽军营同时发起了攻击。高延寿根本弄不清唐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更不知道唐军的作战意图。他试图分兵抵御，可是军营长达四十里，战前又毫无准备，所

以他根本来不及对十五万士兵发出不同的作战指令。

在这一刻，高延寿生平第一次发现——原来带着十几万人打仗是一件如此痛苦的事情！

唐军各部就像几把尖刀从各个方向猛然插入高丽军营。高延寿的部下们得不到主帅的指令，只能硬着头皮各自为战。

十五万人顷刻间变成了十五万只无头苍蝇。

就在此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雷鸣电闪、风雨大作，使得这个数十万兵马奔腾厮杀的战场变得更加惨烈、诡异而壮观。

李世民在北山上俯瞰着这一幕，心头不禁掠过一阵阵难以名状的悸动。

忽然间，在千军万马中，有一袭鲜艳的白袍赫然映入了他的眼帘。

那是一个年轻的战士。所有人都身披铠甲，只有他是一袭白袍。

只见他手持长戟，腰挂箭袋，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李世民大为惊异，连忙问左右此人是谁。

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白袍勇士。

此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逐渐明朗，高丽军队全线崩溃，在战场上扔下了两万多具尸体。高延寿、高惠真带着残部仓皇逃进了山区。

此战唐军完胜。

战斗结束后，李世民第一时间就命人把白袍勇士带到了他的面前。

这个人，就是享誉后世的大唐传奇名将薛仁贵。

然而此时，他还只是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普通一兵，这是他第一次走上战场大显身手。

薛仁贵自恃骁勇，为了创建奇功，故意不穿铠甲而披白袍，希望以此引起高级将领们的注意。可他绝对没有想到，第一个注意到他的人，居然就是大唐皇帝李世民！

李世民略为询问他的身世之后，对他大为赞赏，随即赐给他两匹战马、四十匹绢，并擢升他为游击将军。

高丽战争结束后，李世民在撤军途中曾经颇为感慨地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薛仁贵就这么一战成名，从此走上一代名将的辉煌征程。

经此一役，高丽的十五万大军被杀两万多人，余众作鸟兽散，只剩下不足四万人跟着高延寿逃进了深山，依险固守。长孙无忌按照原定计划，毁坏了后方河流的所有桥梁，彻底切断了高延寿的退路。

随后，李世民命令各军守住各个山口，把这支残敌团团围困。

高延寿已成瓮中之鳖。

六月二十四日，高丽军队残存的军粮告罄。高延寿、高惠真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余众三万六千八百人向唐军投降。

高延寿、高惠真被押到了唐军大营，从辕门开始屈膝跪行，一直来到唐军的受降台前，听候唐朝皇帝发落。李世民一身戎装、威风凛凛地坐在高台上，冷笑着说：“你们这些东夷少年，在海边跳梁还行，要想打硬仗一决胜负，恐怕还不是我的对手。怎么样，从今往后，还敢与天子交战吗？”

高延寿等一干降将全都匍匐在地，浑身战栗，一声也不敢吭。

都已经是人家砧板上的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一战，可以说是李世民东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唐军不但将这支十五万人的大军一举击溃，而且缴获了战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件以及大量其他武器。

对于三万多名战俘的处理，李世民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办法。

首先是三千五百名各级军官，李世民分别授予他们官职，然后悉数遣回中国，随宜任用；其次是三万多名高丽士兵，李世民二话不说，全部将他们放归平壤。

在古代战争中，如此慷慨地纵俘还是比较少见的。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于深入辽东腹地的唐军来说，此时最缺的不是兵力，而

是粮食和补给。眼下这三万多人就是三万多张吃饭的嘴，李世民断然不能留下他们。此外，出于政治考虑和人道主义立场，李世民也不想杀降，所以只有放归一途。

高丽降卒们顿时感激涕零，欢呼之声响彻数十里地。

最后是三千三百名靺鞨士兵。

对于他们，李世民的命令只有两个字——坑杀。

在辽东战争初期，靺鞨人本来是站在唐朝一边、老实听从天可汗调遣的，可后来不知为何受了渊盖苏文的蛊惑，居然反戈一击，与唐朝为敌。对于这种背信弃义、不知好歹的蛮夷，李世民当然不会饶恕。

那一天，三千三百名靺鞨士兵被毫不留情地全部坑杀。李世民希望以此警示其他戎狄——这就是背叛天可汗的下场！

取得这场近乎决定性的胜利后，李世民的自信和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他把自己御帐所在的这座山命名为驻跸山，同时还派快马向留驻定州的太子报捷，并且给高士廉等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喜不自胜地说：“朕为将如此，何如？”

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是说给那些反对天子亲征的大臣们听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老人家打仗还是这么牛，大伙都瞧见了没？

是啊，李世民是有理由感到自豪。把高丽倾国来战的十几万人一下就给灭了，诚可谓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

李世民的高度自信为他换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而这些胜利又助长了他的高度自信。

这真的是与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如出一辙的自信！

可是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将在这座安市城遭遇与杨广如出一辙的命运。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懂得欣赏自己的对手

高延寿全军覆没，令高丽举国震惊。

位于安市城后方的后黄城、银城等地（均在今辽宁岫岩县北）的高丽军民有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城而逃，一口气跑过了鸭绿江。

安市后方的方圆几百里顿时荒无人烟。安市彻底成了一座孤城。

然而，就是这座几乎是指日可下的孤城，却成了李世民军事生涯中的滑铁卢。

安市城的防御超乎寻常地坚固，而安市军民的抵抗也出人意料地顽强。

唐军围攻了一个多月，安市城依旧岿然不动。

每当李世民的御驾经过安市城下的时候，城上守军就擂鼓喊叫，肆意取笑大唐天子，气焰极为嚣张。

看着皇帝一阵青一阵白的脸色，李世勣愤然提议——“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这个可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安市城。城中军民越发同仇敌忾、全民皆兵，人人抱定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对唐军的抵抗也更加顽强。

战事陷入了胶着状态，一转眼时节已近深秋。

辽东早寒，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等到草木干枯、河水结冰的时候，唐军的后勤补给势必更加困难，到时候大量的士兵和战马很可能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是冻死在雪地里！

怎么办？

关键时刻，高丽降将高延寿、高惠真站出来献计了。他们向李世民提议：“如今，安市人全民皆兵、人自为战，此城绝对不易攻拔。在下率高丽十余万众，却望风披靡，一朝崩溃，国人皆为之丧胆。而今之计，不如绕过安市，直取乌骨城。乌骨城主年已老迈，大军定可朝至夕克，进军途中的其他小城也会望风而逃，只要收取这些城池里的粮食辎重，大军的供给就不会匮乏，而后乘胜前进，平壤指日可下！”

这个计划得到了绝大多数将领的支持。他们说：“我军在南部还有张亮的四万海军，可命他即刻向乌骨城进军，与主力会师，攻占乌骨城，然后渡过鸭绿江，定可直取平壤。”

如果说此前李道宗的绕道建议根本不能让李世民动心的话，那么此刻

李世民的想法就不得不发生转变了。其一，这么多人支持这个计划，说明它的可行性很高；其二，李世民亲眼目睹了安市军民的顽强斗志，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他的自信心。

所以，李世民略为沉吟后，很快同意了绕道计划。

可就在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发言了。

他说："天子亲征，跟诸位将军不同，不能抱着侥幸之心去冒险。如今安市、建安的守军还有十余万众，如果绕过它们攻打乌骨，万一两城军队倾巢而出，袭击我们的后背怎么办？所以，臣以为应该先破安市后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这才是万全之策。"

在此，是否要绕道已经成为整个高丽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步棋。

如果不采用绕道计划，一意要拔下安市城这颗硬钉子，就得面临辽东早寒的威胁。假如进入冬天还拿不下安市城，那么李世民就只能选择撤兵，此次远征就会功亏一篑。

而如果绕过安市直取平壤，看上去是一个出奇制胜的妙招，但是唐军的运输补给线势必更加漫长。万一平壤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防御薄弱，而是跟安市城一样又臭又硬，那么到时候的情况就会更加险恶——不但天气严寒、缺乏给养，而且会腹背受敌，后果将不堪设想。当年杨广第一次亲征不就是因为绕道深入、粮草不继而遭遇惨败的吗？

所以，无论哪一种战略都是有利有弊的，绝没有所谓的万全之策。

到底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最后，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倾向了长孙无忌。

他决定放弃绕道计划，在冬季来临之前拿下安市——不克安市，誓不罢休！

天子既然下定了决心，将士们当然只能豁出命来打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唐军对安市城展开了空前猛烈的进攻。士兵们每天都发起六七轮冲锋，各种攻城武器也都拉上去了，无奈安市城城高墙厚，抛石机抛出的巨石只能砸塌城墙上的雉堞[1]，根本轰不倒城

墙。就连被砸塌的雉堞，安市守军也能马上在缺口处修筑木栅，令唐军无机可乘。

眼看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胜利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李道宗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办法——筑一座土山。

筑一座比安市城墙还高的土山，然后居高临下发动攻击！

随后，唐军花了整整六十天的时间，动用了五十万人次的劳力，终于筑起了一座比安市城墙还高出数丈的土山。

安市城彻底暴露在唐军的眼皮底下。

最重要的是：安市城的楼房街道彻底暴露在了抛石机的射程之内！

可想而知，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安市城必定会像当年西域的高昌城一样，被唐军的重型抛石机彻底砸烂，而安市军民无论怎么顽强，最后也肯定要乖乖地开门投降。

可是，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意外，而历史也总是充满了偶然。

就在这个大型工程即将竣工的那一天，安市城外突然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土山崩了。

唐军将士彻底傻眼。

同一刻，安市军民也差一点哭出声来。

因为安市城的一段城墙竟然被土山压塌了！

这场僵持了三个月的围城战役顿时出现了万分惊险而又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此时只要唐军抓住战机，从倒塌的城墙处杀进去，安市城基本上就是唐军的囊中之物了。

可我们说过，历史充满了偶然。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负责守卫土山的唐军将领傅伏爱却不知上哪儿溜达去了，根本不在军营，只剩下一群士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手足无措。许久才有人反应过来，赶紧撒丫子跑去大本营报告情况。

趁着唐军愣神的间隙，高丽军队迅速作出了反应。守城将领马上组织

了一支数百人的敢死队，从倒塌的缺口处冲出来，向守卫土山的唐军发起了攻击。唐军的这支守卫部队本来人数就不多，加上将领又开了小差，部队无人指挥，顿时乱成一团。于是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只不过片刻工夫，就把这座耗费了两个月时间修筑的土山拱手让给了高丽人。

高丽军队占领土山后，立刻挖掘战壕，修筑防御工事，并派出重兵把守。

等到唐军最高统帅部得到消息，土山早已变成了高丽人手中的一座坚固堡垒。

李世民的肺都快气炸了，马上把玩忽职守的将领傅伏爱拖出去砍了脑袋，然后对所有将领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土山！

接下来的三个昼夜里，一拨接一拨的唐军士兵对这块弹丸之地发起了不间断的攻击，而高丽军队也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谁都知道这座土山的重要性：唐军只要将其夺回，安市城立马玩完；而高丽人只要拼死守住，安市城就能高枕无忧。

所以，双方都倾尽全力、志在必得！

这三个昼夜简直成了一场噩梦。双方在小小的土山上扔下了无数具尸体，鲜血染红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然而，整整三天过去了，土山依然牢牢控制在高丽人的手中。

此时已经接近九月下旬，从唐军围攻安市城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漫山遍野的草木都已枯黄，刺骨的北风在耳旁呼啸，而唐军将士们仍然穿着单薄的夏装，粮草也已逐渐告罄。

看来，这场战是无论如何也打不下去了。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漠北的局势也在此时骤然紧张起来。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已于九月初七病殁，他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后，开始蠢蠢欲动，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河套地区。

所有情况都表明：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都只能立刻从高丽撤兵，别无选择！

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日，李世民神色黯然地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整个撤军行动是有条不紊的。李世民先是下令将辽州、盖州、岩州的所有居民迁往国内，然后在安市城下摆出了一个盛大的军容，让各军结成整齐雄壮的方阵缓缓而退。

要来，唐军就来得雄赳赳、气昂昂。

要走，唐军也要走得从从容容、体体面面！

安市城主站在千疮百孔的城墙上，望着唐军渐行渐远的旌旗和队伍，用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遥拜送别。

而李世民对安市城主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极为嘉许，在临走前特意赐给了他一百匹绸缎，勉励他这种忠君卫国的行为。

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

在战场上，他们是你死我亡的对手；可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却都能够以一种罕见的真诚，向对方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西方，这或许就叫骑士风度；而在东方，这就叫英雄惜英雄！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懂得欣赏自己的对手。

李世民绝对不会料到，此次亲征高丽，竟然会以势如破竹的胜利开场，而以万般无奈的撤兵告终。

在这片辽东的土地上，此刻的李世民与三十三年前的杨广一样，播下的是信心和希望的种子，收获的却是沮丧和失败的果实。

两代帝王踌躇满志地亲征高丽，却遭遇了如出一辙的历史命运。

李世民顿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之感。就在班师途中，他忍不住仰天长叹："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虽然此次亲征，李世民和杨广一样，未能达到讨平高丽的战略目的，但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李世民与杨广的所得所失却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二者付出的代价不同。

杨广第一次亲征高丽就出动了一百多万大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几乎一下子就拖垮了国家财政。而且，隋军在交战中也付出了大量的伤亡和损失，前面的多次战斗暂且不论，仅宇文述最后一次长途奔袭率领的三十万五千人，在撤至萨水时一次就损失了三十万两千三百人，几近全军覆没，同时损失的武器、装备、辎重更是数以亿计。

回头来看李世民的亲征，唐军出动的总兵力不过十几万人，仅是隋军的十分之一，而且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军在这场战争中的阵亡人数总共才区区两千人。虽然这个数字非常值得怀疑，可即便给它后面加上一个零，算它两万人，跟隋军比起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次，二者取得的战果不同。

杨广一征高丽时，仅在辽东城下就被拖了整整三个月，始终不能前进半步。后来虽说宇文述绕过辽东直趋平壤，却是中了高丽人的诱敌深入之计，最后全军覆没，根本不足为训。此外，来护儿的水军虽也曾一度攻入平壤，但结果也是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相反，唐军在这场战争中却几乎横扫了整个辽东地区，先后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池，后来虽因撤军而放弃，但将辽州、盖州、岩州的七万居民迁入中国，使得高丽在辽东经营已久的几大军事重镇一朝空虚，变成了荒城和死城。此外，唐军前后共斩获四万余颗首级，仅驻跸山一战就将高延寿的十五万大军彻底击溃，极大地歼灭了高丽军队的有生力量。后来虽然释放了大量战俘，但将其中训练有素的三千五百名军官悉数遣回中国任职，获得了一笔无形的军事财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李世民和杨广从失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截然不同。

虽然二者从高丽撤军后，沮丧的心情是一样的，二征高丽的决心也是一样的，但是杨广却并未从失败中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东征时，他照例拉出了一百万人的大军，也照例命宇文述绕过辽东奔袭平壤，自己又照例在辽东城下埋头攻打了两个月，一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模样。后来虽说想出了一招堆筑“布袋大道”的主意（与唐军“修筑土山”可谓异曲同工），可毕竟只是小小的战术改变，对于整场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杨玄感叛乱一爆发，杨广就不得不匆匆撤军，使得二征高丽无果而终，属于典型的在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的搞笑之举。

反观李世民，亲征高丽的失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也让他终于找

出了失败的症结，那就是——忽视了海军在运输补给和迂回机动方面应该发挥的巨大作用。

此次东征，李世民虽然也派出了一支由张亮率领的四万人的海军，且其在海陆总兵力中的比例并不算低，但是综观这支海军在整场战争中的表现，实在有点不尽如人意。除了在前期攻下一座卑沙城，在后期与陆军遥相呼应、协攻安市南部的建安城之外，海军唯一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军事行动就是——曾派出一支偏师，由丘孝忠率领直接开到了鸭绿江口。可他们到底去干什么史书却语焉不详，据说只是去“耀兵”了一下，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去执行了一次侦察任务，刺探高丽军队在鸭绿江至平壤一线的布防情况。

由上可知，张亮的这支海军在此次东征中实在没发挥什么重要作用。这其中除了张亮本人的能力确实有限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李世民的战略思想有问题——

他压根就没想让海军担任什么重要任务，顶多就是让他们在辽东半岛给陆军敲敲边鼓、唱唱配角而已！

虽然李世民在战前也曾派人将河南诸州的粮草运往莱州军港，也让海军承担了一部分运输任务，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够，仍然只是陆地运输线的补充而已，大部分的粮食补给还是由河北诸州运到辽东边境的怀远镇。

在这里，李世民犯了一个和杨广一模一样的错误——过于倚重陆上的运输线！

所以，当战争中好几次出现是否绕道的争议时，李世民最大的顾虑就是陆地补给线被后方的高丽军队切断，就像当年的宇文述绕道奔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后方粮草供应不上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战争的成败与否，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要绕过辽东。

对于这次东征高丽，后世论者大多认为如果采用李道宗等人的建议，跨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唐军就有可能出奇制胜。

然而，这实在是忘记历史教训的迂阔之谈。当年的杨广不就派大军绕过去了吗，可结果还不是全军覆没？

所以，现在的李世民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也根本不是没有采用绕道计划。

假如李世民真的绕过去了，说不定结局会更惨，或许连保存有生力量、体体面面地退兵都不可能。

无论是当年杨广的三征三败，还是如今李世民的功亏一篑，其共同的原因只有一个——忽视海军！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高丽班师后，李世民的目光就锁定了海军。

他决定建设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九月，李世民下诏，命“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上（李世民）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七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大军东征，后方必须储备一年以上的粮草。而这么大的运输量很难由陆路的“畜乘”单独承担，所以，应该开辟一条海上运输线，以“舟舰”来承担主要的后勤补给工作。

这就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取得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

对于杨广来说，失败只会让他疯狂，让他加速走向灭亡；而对于李世民来说，失败却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战争经验，提升了他的军事智慧。

虽然天不假年，上苍没有给李世民更多的时间去亲手征服高丽，但是在第一次东征失败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无论是李世民晚年对高丽发动的一系列骚扰战，还是在后来唐高宗征服朝鲜半岛的一系列战争中，由李世民晚年所建立的强大海军，在运输补给、迂回机动、与陆军协同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单兵种作战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

正是李世民深刻汲取了高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得唐帝国能够在高宗之世平定高丽和百济，并进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最终虽亡于高宗之世，可又何尝不是亡于太宗之手呢？

贞观的黄昏

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帝国的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然而，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

在这二十三年里，前期的李世民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其政风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大约从贞观十年起，贞观政治就已出现“渐不克终”的景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太宗李世民身上渐露端倪的拒谏和骄逸之风，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

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李世民听说后，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

房玄龄和高士廉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魏徵在旁边一看，忍不住发话了：“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房玄龄他们，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何以谢罪。臣只知道，房玄龄他们是陛下的股肱耳目，于朝野上下的事情岂有不应该知道的？如果北门的工程应该兴建，他们当辅佐陛下完成；如果不应该建，就请陛下马上停工。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理所当然，不知陛下何罪而责，更不知他们何罪而谢！”

面对魏徵的铁齿铜牙，李世民顿时没了脾气，只好面露愧色，一言不发。

从这件小事情，就足以见出贞观后期的李世民实在是大不如前，而贞观的政风也已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东征高丽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由于“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嫔妃徐惠也忍不住上疏规谏：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贞观政要》卷九）

徐惠是李世民晚年最喜爱的嫔妃，从小聪颖好学，遍涉经史，素有“贤妃”之称，亦大有长孙皇后当年的风范。她的这道奏疏不但文辞优美，而且切中时弊。李世民看过后“甚善其言”，并且“优赐甚厚”。

也是在同一年，李世民似乎预感到了自己时日无多，于是“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专门写作了一篇《帝范》，总结了前人的政治智慧和自己一生的执政经验，郑重其事地把它交给了大唐王朝的政治接班人——皇太子李治。

这是一篇名垂千古的政治遗嘱，也是一册享誉后世的政治教科书。

李世民在文章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既可以视为他对太子李治的谆谆教诲，也可以视为李世民对自己二十三年帝王生涯所作的一次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

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

诚哉斯言！

这句话，完全可以作为李世民一生的盖棺论定之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在晚年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并且如此真诚地剖析一生的功过，既不刻意隐恶，也不过分溢美，实属难能可贵。

在贞观的早晨，李世民的青年时代曾经有过一种丽日喷薄的激昂之美。

在贞观的正午，李世民的壮年时代也曾经有过一种如日中天的壮阔之美。

而当贞观时代的黄昏来临，当一个伟人与自己生命中的夕阳迎面相遇，有谁能说，在一切绚烂终归于平淡的这一刻，西天的那抹斜阳没有一种凄艳而无言的静美呢？

李世民的健康状况是从贞观十九年冬天开始恶化的。

从辽东班师的途中，李世民就患上了痈病。直到次年三月回到长安后，病情才略有好转，但始终未能痊愈。“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因而下诏，将“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太子李治在“听政于东宫”的间隙，随时“入侍药膳，不离左右”。

同年十月，李世民从灵州回来，又患了重感冒，身心疲累，只好静心调养，于十一月又把一般政务交给了太子李治。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二月，也就是在李世民宣布二征高丽的同时，他再次患上风疾，直到十一月才基本病愈，不过只能“三日一视朝”（《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可见当时李世民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体质已经非常虚弱了。

从东征高丽回来后的这几年中，李世民就这样被接二连三的疾病所困扰。积极的药物治疗始终未能有效改善他的身体状况，在此情况下，李世民终于把目光转向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他开始服食丹药。

他开始服食江湖方士为他炼制的所谓“长生丹药”。

曾几何时，唐太宗李世民对诸如此类的迷信是最为嗤之以鼻的。比如贞观二年，李世民就曾经在一次谈话中，对秦皇汉武迷信神仙之术发出了耻笑。他说：“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贞观政要》卷六）

贞观十一年二月，李世民又曾经在一道号召“俭葬”的诏书中，提出了自己随顺自然的生死观。他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脩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六）

这番话说得何等透彻，这样的生死观又是何等超然和洒脱！

可令人遗憾的是，当死亡的阴影真的降临他头上的时候，李世民却彻底放弃了他早年的生死观，无可挽回地走上一条与古代帝王一样的迷信方术、希求长生的老路。

可是，长生丹药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长生，反而使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

李世民以为是国内的方士水平不够，又在大臣的引荐之下，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把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僧召进了太极宫。此人“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

如果在早年，光凭这句话，李世民肯定一下子就能断定——这家伙是个标准的大忽悠。

可现在不一样了。越是能忽悠的家伙，李世民就越是会以礼相待，把他奉为上宾。

这个胡僧来到长安后，李世民便对其“深加礼敬”，把他安置在金飚门内的一处高级宾馆，让他专门“造延年之药”。此外又“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旧唐书·天竺传》）。

很显然，此刻的太宗李世民已经和历史上所有老来昏聩的帝王没啥两样了。

尽管严格说来，此时的李世民并不算老——他这一年虚岁才五十，刚刚是知天命之年。

但是，当婆罗门僧花一年时间把“长生不老药”炼成后，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李世民就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春天，李世民在服用了几次胡僧献上的丹药后，病情就突然加剧了。那些名满天下的御医们急得满头大汗，可是人人都对天子的病情束手无策。

这哪是什么长生不老药啊，这简直就是催命夺魂丹！

印度来的大忽悠果然比中国方士的水平高。中国方士们折腾了好几年，也只是把皇帝的龙体折腾坏而已，没想到印度大忽悠只来了一年时间，才用了几颗丹药就把一代英主李世民直接送上了西天。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在翠微宫避暑的太宗李世民痢疾转剧，十分痛苦。太子李治昼夜不离左右，一连数日茶饭不进，愁得头发都白了。李世民看着这个从小柔顺仁孝的儿子，泪水夺眶而出，说：“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

五月二十四日，李世民陷入了弥留状态，紧急召见长孙无忌入含风

殿。长孙无忌跪在皇帝的病榻前，悲不自胜，涕泪横流。气若游丝的李世民伸出一只手抚着他的脖颈，许久，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李世民只好挥挥手让他退了出去。

五月二十六日，李世民的精神略为好转。趁着这回光返照的片刻，李世民再次把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召进寝殿，正式交代政治遗嘱。

李世民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然后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最后把脸转向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随即命褚遂良草拟遗诏。

遗诏拟就，李世民轻轻闭上了眼睛。翠微宫外，有风在终南山的山谷间穿梭呜咽。满山葳蕤葱茏的草木在劲风中簌簌颤抖，宛若十万个绿衣人在同一时刻无声地啜泣。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一岁。

贞观之治就此落下帷幕。

这一天，太子李治一直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恸哭哀号，几度险些昏迷。等太子哭得差不多了，长孙无忌板着脸说了一句："殿下现在肩负着皇上托付的宗庙社稷，干吗像个匹夫一样哭个不停？"李治这才止住了哭泣。

长孙无忌秘不发丧，于二十七日命精锐禁军护送太子返回长安。

二十八日，太子进入京师。皇帝的灵柩放在御辇内，所有的侍卫和仪仗一如往常。

二十九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在太极殿正式发丧，同时宣读遗诏：一、命太子即位；二、军国大事不可停顿，所有中央政府机构照常运作；三、诸王在各地担任都督、刺史者可全部回京奔丧，唯独濮王李泰不在此列；四、取消东征高丽的军事计划；五、在建的所有土木工程一律停工。

随后的几天里，周边少数民族在唐朝担任公职的人员以及正巧抵达长安朝贡的各国使节，听到天可汗驾崩的消息后，无不失声痛哭。前后有数百人依照各自的民族风俗，或剪去头发，或用刀划脸，或割下耳朵，以表对天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贞观二十三年六月初一，太子李治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高宗。

这一年，李治二十二岁。

无论人们对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英年早逝如何悲痛和惋惜，也无论人们对于美好的贞观时代如何眷念和不舍，总之从这一天开始，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年轻的天子李治站在太极殿上，目光清澈透明，却又略显稚嫩和柔弱。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站在他身后，脸上则写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坚毅与从容。

没有人知道，在这一老一少的两张面孔背后，帝国的未来将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天下？

在李世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曾经有一则政治预言困扰了他很久。预言是这么说的——“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起初李世民并不在意，因为他不相信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天下。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李世民感到了恐惧。因为天上出现了“太白昼见”的天象，就跟武德九年六月的那幕一模一样。当年的太史令傅奕得出的结论是——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而现在的太史令李淳风告诉李世民的则是——太白昼见，女主昌。

很显然，这是天意！

流言与天意居然如此高度吻合，李世民又岂能不感到恐惧？！

从此，这个“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就像一个黑色的梦魇一样久久缠绕在李世民的心中。

那么，这个即将窃取李唐天下的“女主武王”究竟是谁？李世民焦灼的目光开始在满朝文武中来回逡巡，最后终于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这个人叫李君羡。

李君羡虽然不姓武，但他的官职是左武卫将军。同时，他的爵位又是武连县公。此外，他又是河北武安人。不仅如此，作为禁军将领，李君羡驻守的地方恰恰又是——玄武门。

四个武字，李君羡身上居然有四个武字！

天底下还能找出第二个这样的人吗？

说起李世民发现李君羡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出于偶然。那是一次宫廷宴会，李世民宴请了在京的一些武官。席间大家用酒令助兴，约定输的人都要报上自己的乳名。轮到李君羡时，行酒令输了，就老实交代他的乳名——五娘。

一个人高马大、胡子拉碴的大男人居然叫五娘？在场众人顿时爆出哄堂大笑，至少有一半的人把口中的酒全都喷了出来。

可李世民并不觉得搞笑，而是感到万分惊愕。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李世民的脑中飞快闪过李君羡的官职名、爵位名、出生地和驻守地。

李世民仿佛忽然间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主武王”并不是女人，而是一个有着女人乳名的男人、一个手握重兵并且驻扎在玄武门的武将！

玄武门是什么地方？是帝国的宫禁重地，是当年自己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地方！

这一刻，李世民的心中翻江倒海。但他却笑容可掬地用一种打趣的口吻说：“哪里来的‘女子’，竟如此骁勇健壮？”

李君羡闻言呵呵地笑了。

在场的武将们也都笑了。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李世民的心中满是杀机。

几天后李君羡就遭到了贬黜，外放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又过了没多久，朝中御史突然发出弹劾，指控李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妖人，只不过是华州的一个老百姓，只因通晓佛法，自称能入定不食，李君羡对他颇为仰慕，所以二人结成好友，过从甚密。仅仅因为这些，李君羡就被栽了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

数日后，李君羡被斩首，家产充公，家人籍没为奴。

尽管一举除掉了李君羡，可李世民心头的梦魇却并未就此消失。

一种莫名的恐惧还是缠绕着他。

终于有一天，李世民屏退左右，只留下太史令李淳风，神色凝重地问："民间的那些传言，会不会应验？"

李淳风回答："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陛下宫中，而且是陛下的亲近眷属。从现在起，不出三十年，此人必定据有天下，并会将李唐子孙屠戮殆尽，这样的征兆已经形成了！"

听着李淳风用一种近乎冷酷的语调描述着这个恐怖的未来，李世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将会如何？"

李淳风看见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额头上青筋暴起，目光像刀子一样尖锐而森冷。

"天意如此，人力不可违抗。"李淳风说，"正所谓王者不死，如果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只不过多杀掉一些无辜的生命而已。再者，从今往后三十年，这个人年岁已老，或许还能有几分慈心，制造的灾难也许会小一点。假如现在把此人杀了，上天也许会再遣一个，到时候正当壮年，一旦施展毒手，恐怕陛下的子孙一个也剩不下了！"

李世民沉默了。

既然如此，那就随它去吧。李世民最后无奈地想，也许儿孙自有儿孙福，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收拾这个可怕的"女主武王"；也许纯粹是李淳风危言耸听，李唐的未来绝不会像他形容的那么恐怖。

李世民被这则恐怖的政治预言深深困扰的那一年，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此时此刻，在李世民后宫的三千佳丽之中，有一个方额广颐的美貌女子，正用一种抑郁而迷惘的目光仰望着掖庭宫上那一方青灰色的天空。

在她的印象中，这片天空好像永远是青灰色的。

十年了，已经整整十年了！

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入宫到现在，生命中最美丽的十年时光已经从她的指缝、眉间、两鬓、发梢悄悄溜走，而她只能永远盯着掖庭宫的天空发呆。

这个女子在后宫的品秩是才人，位列嫔妃群的第五品。

从十四岁入宫的那一年起，她就已经是才人了。可时至今日，她依旧是一个不上不下、不咸不淡的才人！

就在入宫第二年的某个夜晚，一个满庭弥漫着栀子花香的夏日夜晚，大唐天子临幸了她。

无论年华如何老去，她永远记得那一夜皇帝在她耳旁留下的粗重喘息声。然而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年轻的武才人根本来不及感受和体验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也许她的内心刚刚泛起一阵幸福的涟漪，太宗皇帝的大手就熟练而潦草地滑过她的肌肤，然后用一种简单的，甚至是略显粗暴的方式，把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

对了，皇帝临走时还托着她的下颌端详了许久，最后赐给了她一个名字——媚娘。

是的，她就是武媚娘。

至今，武媚娘犹然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早晨，那个彻底改变她命运的早晨。

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

冬日。长安。

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天色晦冥。宽阔的朱雀大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两只落单的白头翁从空中低低掠过，扔下几声孤独而凄婉的鸣叫，随即扑扇着翅膀朝终南山方向飞去。一驾来自皇宫的豪华车辇轧着厚厚的积雪在坊间辘辘而行，最后缓缓停在已故荆州都督、应国公武士彟的宅邸前。

来自宫中的使者径直走进应国府，高声宣读了皇帝的诏书。武士彟的遗孀、应国夫人杨氏带着家人跪地接旨。当她从使者手中接过诏书的那一瞬间，两行清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

尽管数日前已经接到宫中告谕，说天子要把她十四岁的次女召进宫中纳为才人，尽管杨氏一再告诉自己，这是皇帝对武氏一门的恩宠，也是女儿命中注定的福分，可是事到临头，一种深切的感伤和不舍还是强烈地撕扯着她的心扉。

宫门一入深似海。女儿一旦踏上这驾皇家车辇，今生便极有可能不复相见。纵然凡尘俗世与帝王宫阙仅仅隔着一道红墙，但这道薄薄的红墙却形同天堑，足以令她们母女骨肉分离，咫尺天涯。杨氏一想到女儿这一去无异于永诀，便禁不住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然而，天子的诏命是不可违抗的。

无论女儿这一去是福是祸，杨氏都只能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地祷告上苍，千万不要让女儿遭遇无数白头宫女那样的命运——一生得不到天子宠幸，只能在千芳竞妍的掖庭永巷中独自枯萎，在无人注目的深宫一隅中默默老去。

杨氏并不敢奢望女儿能够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更不敢奢望她有朝一日能够母仪天下，她只是祈求上天能让女儿一生平安，让她获得一个女人应有的幸福。

仅此而已。

可即便只是这点念想，杨氏依然担心它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

空中不知何时又飘起了大雪，天色越发晦暗。

在使者的一再催促下，杨氏终于还是让她的女儿——那个方额广颐、蛾眉凤目的女孩——走出了她厮守十四年的闺房，走出了应国府的九曲回廊和深深庭院，走出她成人之前的最后一寸光阴，来到这驾镶玉鎏金的皇家车辇旁，来到这驾承载着未知命运的马车旁。

虽说早已看惯了后宫的三千佳丽，可当几个使者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孩时，心里还是不约而同地掠过了一阵惊艳之感。

让他们感到惊艳的不仅仅是女孩的容貌，还有她那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神情。

那是一半妩媚映衬着一半孤傲，还有一半矜持遮掩着一半忧伤。

杨氏和一干女眷站在府门前的台阶上，目送着女儿步下台阶。杨氏依然泪流不止，左右女眷不住地低声劝慰，但显然阻止不了她的感伤和悲泣。即将迈上车辇的一瞬间，女孩忽然转过身来，向母亲深深施了一礼，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

见天子何尝不是一种福分，何必像小儿女一样悲泣？

直到很多年以后，来自宫中的使者依然清晰记得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说过的这句出人意表的话。在许多私下的场合，他们始终声称——早在迎她入宫的那一天，他们就已看出这个女孩绝非凡人，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女儿说这句话时带着一脸从容自若的神情，杨氏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蓦然止住了哭泣。

那一刻，她的目光中满是错愕。

因为女儿让她感到了一种陌生。

这驾皇家马车很快就走远了，在白茫茫的天地之间缩成了一个缓缓蠕动的小黑点。

当沉重的宫门从身后砰然关上，马车内的女孩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被截成两段，一半扔进了帝王之家，一半抛出了宫墙之外。

雪一直下，自苍旻深处不停落下，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应国府到太极宫的这条路上。

这一场仿佛永远也下不完的雪，多年后依旧在女皇武曌苍老的记忆中久久弥漫。

[1]　古代在城墙上面修筑矮而短的墙，守城的人可借以掩护自己。

第三章 武氏初次入宫

一个木材商人的华丽转身

若干年后，当李唐帝国的天空忽然升起武周王朝的日月，当几千年来一贯由男人统治的江山忽然被胭脂红粉所主宰，女皇武曌的家世出身自然成了大周臣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很多人都知道，女皇武曌是并州文水人，其父武士彟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可谓官尊爵显、位高权重，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女皇之父武士彟早年其实是一个地位卑下的木材商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的排序历来是：士、农、工、商。商人就是四等公民、社会末流。即便你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在当权者面前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连农民兄弟的腰杆都可能挺得比你直。因为他们身后有一条永远开放的上升之阶。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说农民出身的人只要肯付出努力寒窗苦读，就有可能一朝翻身光宗耀祖，可这样的机会商人却没有，因为科举考场的大门永远都向“铜臭满身”的工商从业者关闭。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歧视商业的官本位社会中，财大者未必就能气粗。

青年时代的武士彟就感觉自己的气一点都粗不起来。虽说趁着隋炀帝大兴土木、营建东京之机发了一笔横财，腰包里沉甸甸的，但是在那些手握大权、颐指气使的官老爷面前，来自并州的木材商人武士彟也只有低声下气、点头哈腰的份。

这个心结也许就是武士彟后来弃商从政的诱因之一。

做生意的人都善于交结应酬，这一点武士彟自然不会例外。他之所以能快速致富，原因就是攀上了当时朝廷的“四贵”之一——观王杨雄，而杨雄的弟弟就是主管东京营建工程的副使——纳言（宰相）杨达[1]。

武士彟虽然通过杨氏兄弟的关系在洛阳营建工程中大发其财，但是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却没有及时巴结（也可能是没巴结上），这个人就是东京营建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尚书令（第一宰相）杨素。武士彟得罪杨素的具体原因史书无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杨素对这个姓武的木材贩子非常不爽。所以，当武士彟忘情地奔走于并州林场与东京官场之间，其财富也随着拔地而起的洛阳宫阙而节节看涨之时，杨素就已经在暗中给武士彟罗织了一些罪名，一意要置他于死地。

危急时刻，武士彟此前打造的权力保护伞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朝权贵杨雄等人积极出面营护，总算帮他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

许多年后，一贯快意恩仇的女皇武曌替自己的父亲出了这口恶气。她颁下一道敕书，下令杨素一族的子孙世世代代不能担任京官。表面理由是说什么杨素为臣不忠、对隋朝之亡负有重大责任云云，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女皇这么做分明就是有冤申冤、有仇报仇。

在权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武士彟一口气逃回了并州老家。惊魂甫定之余，武士彟不禁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自己的命虽然是保住了，但是经营多年的生财之道也彻底断了，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武士彟知道自己必须进行转行，可他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转。

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群雄蜂起，天下大乱，蛰居家乡的武士彟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也是自己脱胎换骨的绝佳时机。他略为思考之后，随即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弃商从戎。

他希望在乱世中建立军功、扬名立万，最后跻身政界，彻底摆脱地位卑下的商人角色！

武士彟花钱买了一个“鹰扬府队正”的低级军职，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

后来发生的事情人们都耳熟能详——武士彟搭上了太原留守李渊这条乘风破浪的大船，从此咸鱼翻身，不但摇身一变成了太原首义元勋和李唐开国功臣，而且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最终跻身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华丽转身。

可是，武士彟出道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队正”，手下就管着区区五十号人，而太原留守李渊则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并且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兄，双方的身份地位如此悬殊，武士彟又是如何攀上这根高枝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士彟的发迹史比之八百多年前的邯郸巨富吕不韦以及一千多年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身上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商业上的成功不仅让他们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且培养了他们长袖善舞的处世能力和精明务实的经营才能。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商业领域中取得的经验给了他们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也给了他们一种高度前瞻的风险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千千万万人中一眼就锁定那个可以给他们带来无穷回报

的“奇货”，并且毫不犹豫地出手，不惜代价地投资！

对于吕不韦而言，秦国公子嬴异人就是难值难遇的奇货；而对于武士彟来讲，太原留守李渊同样是不可多得的奇货。

早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奉命征讨当地变民时，就曾在行军途中路过武士彟的家，受到了这个低级军官的热情款待。当时武士彟一见到李渊，就认定他“雄杰简易，聪明神武，此可从事矣”（《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当即决定把筹码押在李渊身上，以期在日后获取巨大的政治回报。而当时的李渊早已有了起兵举义的打算，一直在暗中积蓄势力、结纳四方豪杰，当然也乐意结交像武士彟这种精明强干而且家底殷实的人物。

初次见面，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很好，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所以到了第二年李渊正式坐镇太原后，他就立即把富有经营才干的武士彟提拔为行军司铠，亦即主管后勤装备的军械部长，也算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武士彟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棵足以庇荫的大树，于是更加不遗余力地逢迎攀附。李渊也很给面子，时常光临武宅做客，与武士彟“乐饮经宿，恩情逾重”。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朝天下分崩离析，人人都知道——改朝换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时，武士彟的几个兄长一致看好瓦岗寨的义军领袖李密，认为只有他才是四方群雄中最有实力问鼎天下的人，于是纷纷劝说武士彟投奔李密。可武士彟却冷冷一笑，说：“李密虽有才气，未能经远，欲图功业，终恐无成。”（《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

在他的心目中，普天之下，唯有雄才大略却又引而不发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才是未来的真命天子！

可问题在于，四方的逐鹿群雄已经风风火火地干了好几年了，隋朝的大蛋糕眼看就要被他们蚕食殆尽、瓜分一空，可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唐国公李渊却还在默默蛰伏，他究竟在等什么呢？

武士彟坐不住了。

他决定采取行动，在背后推唐公一把。

他先是试探性地送给李渊几本兵书，可李渊却装聋作哑，不为所动。武士彟又换了个法子，一连数日绘声绘色地向李渊描述自己的奇异梦境，说某一夜，梦见空中传来一个神秘而威严的声音在说：“唐公当

为天子！”又某一夜，他梦见唐公骑着马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忽然看见唐公噌地一下飞到天上去了，而且还伸出两只手，一手擎起了太阳，一手揽住了月亮……（《攀龙台碑》：“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

这显然是一个正宗的天子架势！

如果说武士彟此前送兵书时李渊还在装傻充愣的话，那么当武士彟告诉他这些意味深长的“梦境”时，李渊就不能不表态了。他随即推心置腹地告诉武士彟，自己“深识雅意”，只是兹事体大，请武士彟“幸勿多言”，如果将来大事成功，定当“同富贵耳”（《旧唐书·武士彟传》）！

听到李渊的许诺时，武士彟禁不住一阵狂喜。

那一刻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个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未来。

事后来看，武士彟应该算是最早劝李渊起兵的人之一。单就这一点而言，武士彟就无愧于“太原元从”的称号。当然，要从一个首谋举义的幕僚变成一个王朝的开国功臣，绝不仅仅是做几个怪诞的梦、拍几个肉麻的马屁就可以办到的，你还必须脚踏实地地干几件正经事。

当时的太原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们是隋炀帝杨广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颗钉子。有他们在，举义之事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当王威和高君雅察觉李渊有所异动之后，就准备拿李渊的亲信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开刀，理由是这两个人逃避兵役，应该逮捕问罪。王、高二人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打和警告李渊，同时削弱他的力量。关键时刻，武士彟站出来了，他说，这两人都是唐公的亲信，如果逮捕他们，唐公很可能会翻脸，万一引发内讧，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只好作罢。

稍后，李渊以防备刘武周和突厥人为由，开始大举募兵，随时准备起事。王威手下的一个将领田德平对此深感怀疑，就想建议王威暗中调查李渊募兵的真实意图。武士彟又当即出面阻止，他说：“兵权在唐公手上，王、高二人只是挂名而已，即使他们真的查出什么，又能拿唐公怎么样？”田德平闻言，也只好打消调查李渊的念头。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太原起兵前夕。当时的形势可谓错综复杂、千钧一发，武士彟能够及时将问题摆平，从客观上保证募兵举义之事的顺利进行，贡献自然不能算小。

李渊正式起兵后，武士彟被任命为铠曹参军，随军西进关中，其间因功被封为寿阳县开国公，赐食邑一千户。唐军攻取长安后，武士彟又以“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旧唐书·武士彟传》），再增食邑一千户，并赐宅一所。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废掉隋恭帝，建元武德，开创唐朝。武士彟被任命为库部郎，并赐以“太原元谋勋效功臣”之衔。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升任工部尚书，一举进入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

至此，武士彟的风险投资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当年那个地位卑下、从权力的魔掌中死里逃生的木材商人，如今终于咸鱼翻身、否极泰来，成为新王朝为数不多的勋贵之一！

那一刻，武士彟内心的满足和喜悦肯定是无以言表的。

很多年后，女皇武曌也许完全能够体会父亲当年成功实现华丽转身时的心境和感受。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父亲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无论是落寞困顿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惶惑与焦灼，还是位卑人轻时对于权力和地位的无限向往与极度渴望，都曾经如出一辙地植根于父女二人的灵魂深处。

与此同时，女皇身上的许多特质无疑也是她父亲的遗传。比如自信、坚忍、心机、谋略，比如精明的洞察力和果断的执行力，还有认准目标一往无前的决心，超越常人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等等，皆是拜她父亲所赐。

当然，在女皇武曌人格成长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人的影响同样是巨大而深远的。

那就是她的母亲杨氏。

将来必为天下之主！

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是胡人后代，门第寒微，先后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武德三年以后，武士彟功成名就、官尊爵显，按说一家人可以好好享受荣华富贵了，怎奈世事无常、人命危脆，两个儿子在数月间

相继病死，一年后相里氏又一病而亡。

武士彟当时除了工部尚书之职外，还一度兼领关中十二军之一的井钺军，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无暇照料家人，甚至连妻儿病重时都从未请假回家照看。而一妻二子竟然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相继亡故，这对武士彟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他仍然恪尽职守，从未对外声张。在随后的日子里，武士彟独自带着余下的两个儿子元庆、元爽，默默过上了鳏居生活。

由于武士彟是朝廷高官，有关部门依例将其妻病故的消息上奏皇帝。高祖李渊听说后，大为感动，立即下敕褒扬："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以比！"（《册府元龟·环卫部·忠节》）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武士彟参与修订了唐朝的第一部法典——《武德律令》，随后因功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大约就在此时，皇帝李渊亲自当了一回月老，为他物色了一个女子作为继室。

这个女子就是后来女皇武曌的母亲——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弘农杨氏之女。

弘农杨氏从汉朝起就是关陇的高门世族，历代显赫，至隋唐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武曌的母亲杨氏与杨坚出自同宗，杨氏的伯父杨雄与父亲杨达皆贵为隋朝宰相。及至唐朝，杨雄之子杨恭仁又是武德一朝的宰相，另一子杨师道后来也成了贞观一朝的宰相。

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杨氏自然从小就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史载她通文史、工诗书、善属文，同时又具有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仰，曾被杨达誉为"隆家之女"（《全唐书》卷二三九《望凤台碑》）。

杨氏身上的这些优点，或者说特点，无疑都被后来的女皇武曌一一继承。许多年后人们将会发现，无论是修养、才情、学识、宗教信仰，还是健康的体质、充沛的精力，乃至得享天年的长寿基因（杨氏享年九十二岁，武曌享年八十一岁），女皇都与她母亲杨氏如出一辙。

也许是因为杨氏的条件太过优越，难以找到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所以她的终身大事反而一再蹉跎。在其父杨达生前，杨氏始终没有出嫁。到了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杨达死于东征高丽的途中，此时的杨氏已经是三十四岁的老姑娘了。她干脆宣布"永奉严亲，长栖雅志"（《望凤台碑》），决定栖心佛教，终身不嫁。

如果不是后来皇帝李渊亲自撮合她和武士彟的这桩婚事，杨氏也许真的会在木鱼钟磬、青灯黄卷的陪伴下优游卒岁、了此一生了。

嫁给武士彟的这一年，杨氏已经四十六岁。在唐朝，女子结婚的年龄通常都在十三到十八岁之间，而此时的杨氏完全可以算是奶奶级的人物了。假如不是当朝天子亲自点名主婚，超大龄女杨氏恐怕不一定会答应这门亲事。

不管杨氏是在怎样的心境中嫁给了武士彟，反正过门之后，夫妻生活倒也算和谐美满。杨氏不愧系出名门，其教养和学识都非寻常妇人可比，自从她取代相里氏成为从一品的应国夫人之后，很快就成了武士彟的贤内助。此后的几年间，杨氏为武士彟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就是后来的韩国夫人，二女儿就是后来的女皇武曌，三女儿出嫁不久就亡故了。

武曌生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底 [2] 。她出生的第二年，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事变爆发，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嫡，进而逼迫高祖退位，登基为帝，大唐的历史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在如此巨大的政治变动中，武士彟的仕途命运当然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李世民夺嫡继位之后，虽然极力与各派势力达成政治和解，没有对异己力量进行迫害或清洗，可毋庸置疑的是——他肯定要将朝政大权从武德旧臣手里转移到自己的嫡系和亲信手中。在此情况下，作为太原元从和深受高祖重用的武德高官——武士彟当然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因此，贞观一朝，武士彟先后被外放为豫州、利州、荆州都督，终其一生再也没回到京师任职。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童年武曌就跟着父母和家人离开长安，开始辗转各地。在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市）、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等地，至今仍有一些以“则天”“天后”命名的地名、古迹和传说。在这些充满了玄幻色彩的民间传说中，女皇武曌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祇，为千百年来的当地民众所津津乐道和顶礼膜拜。

与色彩斑斓的传说相反，关于女皇的童年时代，正史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唯一值得一提的，也许就是著名相士袁天罡所作的那个神秘预言。

据说当时女皇武曌尚在襁褓，名闻天下的相士袁天罡有一次路过利州，做客武宅。在看过女主人杨氏的面相后，袁天罡赞叹道：“看夫人的骨法，必生贵子。”杨氏随即把孩子们都叫了出来，让袁天罡看相。看到元庆、元爽时，袁天罡说：“这两个男孩是保家之主，将来可官至三品。”看过杨氏的大女儿后，他说：“此女也是大贵之命，但是对她将来的夫君不利。”（韩国夫人日后果然早寡）最后，当袁天罡看到被乳母抱在怀中、身着男装的武曌时，眼中忽然闪过一道光芒。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孩，脸色骤变。武士彟夫妇下意识地对视一眼，赶紧追问缘故。袁天罡摇着头说：“此子不易断言，请让他下地走几步看看。”乳母依言把孩子放了下来，牵着她的手，让她搭着床沿走了几步。武曌一边走一边笑呵呵地仰起头来，扑闪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看着袁天罡。袁天罡忍不住惊叹一声：“此子龙睛凤颈，乃大贵之相啊！”然后又绕着孩子左看右看，连连惊叹：“可惜是郎君，若为女子，前程实在不可限量，将来必为天下之主！”（《旧唐书·袁天罡传》：“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在这个故事里，袁天罡语出惊人、言之凿凿，其预言也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历朝的开国皇帝多有与此大同小异的神秘预言。远的暂且不提，就说唐朝的开创者李渊父子，就曾当仁不让地拥有过类似预言。年轻时的李渊从“善相之人”史世良那里得到的预言是——“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旧唐书·高祖本纪》），而李世民更是早在四岁的时候就被一个来去无踪的白衣相士如此评价——“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这些预言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越高，它纯属事后编造的可能性就越大。

换言之，当你发现历史上某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几乎是百分之百时，你就该知道它与谎言和神话的距离近似于零。尤其当这个预言与政治密切相关时，更应该作如是观。

此外，还有一点我们也可以肯定，无论这个预言故事是真是假，武士彟夫妇恐怕都不会把这个女儿真的当成一个未来的女皇来养。而且就算预言为真，武士彟夫妇也不会感到高兴，只会感到恐惧。

因为在当时那种社会，自己的孩子被预言为“天下之主”绝不是一件好

玩的事情，万一风声传开了，被朝廷或皇帝知悉，那就是大逆不道之罪，不但武士彟要丢乌纱、掉脑袋，全家人恐怕也要跟着遭殃！更何况，袁天罡预言的“天下之主”居然是一个女孩，这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在古代中国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条件下，一个被纲常礼教牢牢捆绑的女子，怎么可能逾越男权至上的藩篱，成为统驭万民、富有四海的天子呢？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当武士彟夫妇听到这个耸人听闻的预言时，他们除了目瞪口呆和心惊肉跳之外，心里头恐怕只有一个想法——袁天罡疯了。

这个名闻天下，据说是十言九中的算命大师，这回八成是疯了！

当然，打小就美丽聪慧的武曌就算不被父母当成未来的女皇来养，被视为掌上明珠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从母亲杨氏那里，武曌得到了极为优良的教育。短短数年后，武曌就出落成一个才貌双全、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了。史称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所以后来太宗皇帝才会“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旧唐书·则天本纪》）。所谓“美容止”，就是指她容貌美丽，举止优雅。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这一年五月，太上皇李渊驾崩。噩耗传至荆州，武士彟由于悲伤过度，竟然口吐鲜血，一病而亡，终年五十九岁。

年仅十一岁的武曌就这样失去了父亲。

贞观九年的秋天，满身缟素的武曌与母亲、姐妹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一起扶着父亲的棺木回并州老家归葬。装载着楠木棺椁的马车走在前面，武曌和家人们坐在后面的马车上。扶棺返乡的车队一路向北辘辘而行，沿途的景致苍凉而凄惶。武曌偷偷掀开一角车帘，看见瘦瘦高高的丧幡一直在萧瑟的秋风中簌簌颤抖，漫天飘飞的纸钱宛如一群折断了翅膀的白色精灵，在空中徒劳地挣扎盘旋，然后无奈地一一坠落。

那一刻，武曌的生命第一次感到了疼痛。

年少的武曌知道，随着父亲的溘然长逝，自己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也就结束了。

武媚说：我不当白头宫女

武士彟之死无疑是女皇武曌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

就跟每一个失去男主人的大家庭一样，武士彟前妻留下的两个业已成年的儿子，势必要与后母杨氏争夺这个大家庭的主导权，所以武士彟一死，杨氏母女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家族纷争之中。（《新唐书·武士彟传》：“士彟卒后，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

武氏两兄弟的背后，站着那些老于世故的叔伯和堂兄弟；而杨氏的背后，却只有三个年幼而不谙世事的女儿。因而这场家族纷争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面对武氏兄弟及其族人的侮辱、欺凌和排挤，杨氏母女无力抗争，只能默默忍受。

而对于年少的武曌来讲，这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情往事。

命运的巨大落差，让她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忍辱负重的成人。

她终于懂得什么叫作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终于学会了隐忍，学会了不动声色地仇恨，学会了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一个人舔自己的伤口，然后把一切都记在心里，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刻，让那些伤害过她的人加倍偿还。即便这些人是和她有着相同血缘的亲人，她也绝不手软。

《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称：“始，兄子（武士彟的二哥武士让之子）惟良、怀运与元庆等遇杨（杨氏）及后（武曌）礼薄，后衔不置。”所谓“后衔不置”，是说武曌当年对惟良、元庆等人怀恨在心，却因年龄太小、力量不足，所以隐忍不发。史书中这言简意赅的四个字，足以让我们窥见女皇武曌生命初期人格蜕变的某种痕迹，也足以让我们找到惟良、元庆等人后来同遭厄运的根本原因。

若干年后，武曌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变成了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而她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和几个堂兄，也都凭借外戚身份获得了升迁——武元庆以右卫郎将升任宗正少卿，武元爽以安州户曹升任少府少监，武惟良以始州长史升任司卫少卿，武怀运以瀛洲长史升任淄州刺史。

武氏兄弟荣升之后的某一天，杨老夫人以庆贺为由宴请了他们。酒过三巡，杨氏盯着这几个容光焕发、眉飞色舞的武氏兄弟，忽然讪讪地说：“不知你们可否记得往昔之事？也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今日的荣

华富贵是从哪里来的？”

武氏兄弟顿时面面相觑。

可他们只愣了一会儿，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们迎着杨老夫人的目光，神色自若地说：“我等位列功臣子弟，早登宦籍，自忖才干有限，不敢奢求富贵腾达，不料却因皇后之故，获享非分之恩，我等夙夜忧惧，并不敢以此为荣。”

杨氏万万没有料到，这几个姓武的小子居然会如此大言不惭、不识抬举！明明沾了女儿的光，却丝毫不领情，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功臣子弟”“早登宦籍”“夙夜忧惧”“并不取不以为荣”，这不是不知好歹吗？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

武氏兄弟没有想到，他们这几句看似聪明实则愚蠢透顶的话，终将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

杨氏怒不可遏地向女儿转述了这番话，皇后听完后冷冷一笑，什么也没说。

随后她就给皇帝李治上了一道奏疏，建议将武氏兄弟外放为远地刺史，以此表明本朝并不偏袒外戚，从而示天下以无私。

武氏兄弟头上的那几顶新乌纱还没戴热，就一起被扫地出门，贬出了朝廷。名义上说是外放，实则与流放无异。武元庆刚刚到任便抑郁而死，武元爽后来被随便栽了一个罪名，流放振州，不久也死在贬所。武惟良和武怀运虽然比他们多活了几年，可下场却比他们难看得多——武后设计诬陷他们毒杀了魏国夫人（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之女），随即将他们斩首，并把他们的姓改为蝮。

蝮是一种灰褐色的长有毒牙的蛇。当武后想象惟良、怀运两兄弟从此就像两条肮脏丑陋的毒蛇，只能在暗无天日的墓穴中卑贱地爬行时，嘴角就会泛起一抹笑容。

那是一抹快意恩仇的笑容。

为父亲守孝三年之后，亦即贞观十二年[3]（公元638年），一驾来自皇宫的马车接走了十四岁的武曌，从而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可是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个大雪飞扬的冬日早晨，当那扇沉重的宫门在这个姓武的女孩身后砰然关上时，大唐帝国今后数十年的命运就在冥冥之中被彻底改写了。

太宗皇帝的后宫是一座姹紫嫣红的大花园，尽管太宗即位之初曾先后释放了几千名宫女，可这座园子丝毫也不显得冷清。除了千百个普通宫女之外，皇帝还拥有四妃（一品）、九嫔（二品）、九婕妤（三品）、九美人（四品）、九才人（五品）、二十七宝林（六品）、二十七御女（七品）和二十七采女（八品）。这八级一百二十一人共同组成了皇帝的妃嫔群，制度上的名称叫内官。她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分工和职能，比如五品才人的职责就是“掌叙宴寝，理丝枲，以献岁功”（《旧唐书·职官志》），亦即安排宫廷宴乐、伺候天子起居晏寝、管理宫女的蚕丝纺织等等。

在这座美女如云、脂粉飘香的大花园里，年轻的武曌就像一株含苞待放的青涩花蕊，被随意栽植在掖庭宫的某个角落寂寞地成长。她知道，过去的一切已经像蝉蜕一样从她身上彻底剥落了。从今往后，她除了日复一日地打理那些单调而琐碎的宫廷事务之外，生命中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一个又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期待或幻想着某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

那就是天子临幸的那一刻。

然而，这一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十四岁的武曌知道，自己在容貌、才学、修养、智商等诸方面都拥有和别人一较短长的竞争力，可她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份可遇而不可求的好运气。

事后来看，武曌担任的这个“掌叙宴寝”的职务多少还是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因为她毕竟经常有伺候天子沐浴更衣、休息晏寝的机会。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武曌是否得到过太宗皇帝的临幸，但是从她的工作性质来看，至少在概率上，武曌曾经为太宗侍寝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此外，史书明载太宗皇帝曾给她赐名“武媚”，这起码也算是一个旁证，足以表明太宗李世民曾对武曌有过关注和兴趣。

虽然史料付诸阙如，无法让我们去记述女皇生命中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可我们不妨借助合理的想象来填补这一空白。

我们不妨想象，那是一个满庭飘荡着栀子花香的溽热夏夜，当年轻的武才人一边帮天子宽衣解带，一边猜想着今夜会是哪个女子得享这份荣宠时，天子忽然伸出粗壮有力的大手，一把就将她拽上了龙床。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年轻的武才人根本来不及感受和体验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在太宗皇帝的一生中，这肯定只是极为普通的一夜。他不过是在属于他的大花园里，随手摘下一朵看上去还算可人的花，漫不经心地嗅了

一嗅，一时兴起给她取了个名字，仅此而已！

也许第二天醒来，他就把这一切彻底遗忘了。

对于年轻的武才人来讲，无论事先对于这个夜晚曾经有过多少缠绵悱恻、美丽动人的想象，可仓促发生的一切还是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许多年后，在阅尽沧桑的女皇武曌心中，关于这个夜晚的记忆肯定是破碎凌乱而又残缺不全的；或者说，这个初夜充其量不过是一场来去匆匆、事过无痕的春梦。

梦境过后还能剩下什么呢？

除了从女孩变成女人，除了从此拥有一个新的名字之外，还能剩下什么呢？

没有了。

什么也不会剩下。

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自从那个夜晚之后，太宗皇帝似乎再也没有对才人武媚产生过一丝一毫的兴趣。尽管她依旧有机会伺候天子沐浴更衣、休息晏寝，可她在天子面前仿佛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或者是透明人。

那些年龄比她稍大一点的嫔妃和宫女们见到才人武媚，脸上总是荡漾着一副幸灾乐祸的笑容。这个被天子一夕临幸旋即彻底忘却的武才人，就这样成了让人讥嘲的对象。宫中的女人们大多不愿放过诸如此类的机会，因为从这样的嘲笑中，她们可以获得某种短暂的平衡和虚幻的慰藉。

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相同的境遇有时候会让人同病相怜，让人互相依偎着取暖；可有时候也会让人彼此撕咬，彼此用别人的不幸来舒缓自己的痛苦，用别人的悲惨来映衬自己的幸福。

单调刻板的宫廷生活依然在千篇一律地延续着，每一个日子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在一些天色灰蒙的晨昏，才人武媚长久地枯坐在铜镜前，仿佛可以看见青春韶华恍如沙漏一样从自己的脸上流失，无可挽回地流失。她觉得自己就像是漂流在时光之河上的一枚花瓣，只能被命运的浊浪裹挟着，身不由己地涌向茫然不可预知的远方。

那些日子里，武媚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忧伤和迷惘。

见天子庸知非福？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武媚重回那个大雪弥漫的冬日早晨，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说出这句话。

在万籁俱寂的子夜，才人武媚总是会从一些离奇而可怕的噩梦中惊醒。梦中的武媚一直在不停地奔跑，她身后是一片白骨枕藉的乱葬岗，从那些阴森可怖的墓穴中爬出了千万根长长的白发，它们迅速绞在一起，不断地膨胀和生长，然后从各个方向飞快地追逐着武媚，有时候缠上了她的裙裾，有时候抓住了她的衣袂，有时候则径直套上了她的脖颈，让她几近窒息。

这样的午夜惊梦总是把武媚吓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她醒来之后就再也无法睡去，只好怔怔地看蜡烛滴泪，听更漏声残，黯然神伤地等待着又一个百无聊赖的天明。

千百年来，无数个有关白头宫女的悲情故事，似乎都拥有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开端。如今的武媚总是在恍惚中闻见一股陈腐霉烂的气息，它缠绕在自己的衣袂裙裾上，缠绕在自己的两鬓和耳旁。武媚猜想，这种令人恐惧和厌恶的气息也许就来自梦中的白发，来自阴森墓穴中的那些千年白发。

终于有一天，才人武媚默默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忽然一把抓起铜镜，把它狠狠掷在了地上。

铜镜砰然落地的同时，武媚听见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不当白头宫女。

武媚说她宁死也不当白头宫女。

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

在那段抑郁而落寞的深宫岁月里，武媚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起自己的父亲。

关于亡父的记忆其实是遥远而模糊的。父亲生前武媚尚且年幼，当然不可能从庶务繁忙的父亲那里得到什么具体的教诲。很多父亲的早年经历几乎都是母亲告诉她的。通过母亲的转述，年少的武媚了解了父亲那充满传奇色彩的过去，知道了父亲是怎样从一个身份卑微的木材商人变成了大唐帝国的开国功臣。从父亲惊险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中，

年少的武媚未必能解读出太多深邃的内涵，但她却能从中隐隐感悟到某种令人悸动和振奋的东西。

如今，身处寂寞深宫中的才人武媚已经知道——那是一种能量。

那是一种不甘被命运摆布的桀骜不驯的生命能量。

此刻，武媚分明感觉这种能量就像一头躁动不安的幼兽一样，深深蛰伏在自己的体内。

她知道，早在自己来到人间的那一刻，这种神秘的能量就已经从父亲的血管直接流进了她的血脉之中。而现在，这股深藏不露的能量正在强烈地驱使她去做一些事情——一些突破现状、改变命运的事情。

才人武媚决定寻找一切机会重新唤起太宗皇帝对她的关注。作为武士彟的女儿，她相信自己天生就是与众不同的。她现在决定勇敢地把这份与众不同表现出来。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狮子骢事件。

这个故事源于女皇晚年的回忆。她说一生爱马如命的太宗皇帝曾经得到一匹西域进贡的名贵宝马，名叫狮子骢。这匹宝马世所罕见，但是也桀骜难驯，连骑术高超、一生驯马无数的太宗皇帝也对它无可奈何。

那天太宗皇帝兴之所至，带着一群嫔妃和宫女来到驯马场上，才人武媚也在其中。太宗指着那匹狮子骢，兴味盎然地说：“你们之中，谁有办法驯服朕的狮子骢？”

女皇武曌清晰地记得，就在那一刻，在她心中蛰伏多年的那头小兽忽然之间就苏醒了。

人们看见才人武媚往前迈出一大步，朗声回答了天子之问。

她说：“臣妾有办法驯服它，但是需要三样东西。”

那天的太宗皇帝显然心情不错。他微笑地看着武媚，似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哦，你需要哪三样东西？”

“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

太宗皇帝怔住了。

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怔住了。

就在众人深感讶异之际，才人武媚紧接着说：“臣妾先用铁鞭抽它的背，倘若不服，就用铁锤击它的头，要是还不服，臣妾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

时隔多年，当女皇武曌坐在大周王朝的金銮殿上讲述这个故事时，脸上依然流淌着一种自豪和喜悦之光。她最后不无得意地对群臣说，对于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胆识和魄力，太宗皇帝给予了高度赞赏——“太宗壮朕之志！”（《资治通鉴》卷二○六）

事实上，女皇所说的这个故事结尾是颇为可疑的。她是否真的得到太宗皇帝的赞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狮子骢事件之后，才人武媚不但没能重新唤起天子对她的关注和兴趣，而且遭到了比以前更为彻底的冷落和遗忘，并且这一忘就是整整十年！

如果真如女皇所说，狮子骢事件令她博得了太宗皇帝的赏识，那么很难想象她会在此后的十年里始终默默无闻，终太宗之世都未获宠幸。由此可见，女皇多年之后对这个故事的追忆恐怕多少有些失真，尤其是那个结尾，不免有矜夸之嫌。这样的事后夸耀颇为类似某个黑道上的大哥，在血拼多年终于坐上老大的交椅后，总会有意无意地向人展示身上的刀疤，或者喜欢跟人说，兄弟我当年坐牢的时候如何如何。

人就是这样子，一旦咸鱼翻身、否极泰来，曾经鲜血淋漓的伤口就会变成值得炫耀的资本，而过去的惨痛遭遇也会变成无比光荣的回忆。

其实人的记忆都是有选择性的，甚至还会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虚构能力。人们总是会选择，或者创造出一些东西来把它记住，所以过去的苦难越是深重，时过境迁后就越有可能被镀上一层圣洁的光环。英明神武如女皇武曌，在这一点上恐怕也未能免俗。只因为她终于熬过来了，并且熬出头了，所以她就有权选择自己的记忆，也有权给自己曾经的苦难镀上一层圣洁的光环。

因此，关于狮子骢事件的结尾，我们更情愿认为：在才人武媚说出那番惊世骇俗的话后，在场众人肯定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而太宗皇帝的脸色恐怕也好看不到哪里去。我们可以想见，武媚的驯马手段肯定会让太宗感到震惊和错愕，他断然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温婉可人、举止优雅的才人武媚竟然会如此地残忍无情。

最毒莫过妇人心！

那一刻，太宗的心里很可能只有这样的念头。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太宗皇帝很可能只是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长久地注视着故作镇定的才人武媚，直到她内心的忐忑不安彻底暴露在脸上，太宗才淡淡地说了一句——武才人真了不起。

假如太宗真是这么说的，后来的女皇武曌也大可以把它理解为赏识和赞扬，可我们似乎更有理由把它理解成讥刺和嘲讽。因为在阅尽沧桑的太宗眼里，武才人这么做实在是有点矫揉造作、哗众取宠之嫌。换言之，企图用这种极端和另类的方式博得天子青睐，只能是武媚的自作聪明和一厢情愿。这场弄巧成拙的表演除了招致太宗反感并且徒然授人以笑柄之外，不可能给武媚带来任何好处。

狮子骢事件之后，武媚进入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段黑暗时光。她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样年华就这样在星移斗转、浮云变幻的十年中逐渐消逝。她心中躁动不安的那头小兽早已在暗淡无光的深宫岁月中死去，而袁天罡多年前的那个神秘预言，似乎也变成了一则令人心酸的笑话。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冬天，太宗皇帝亲征高丽失败而归，宫廷内外的人们明显感觉出了皇帝的疲惫和苍老。这个天纵神武、曾经无往不胜的一代英主，在辽东战场上遭遇了他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这一前所未有的失败给他的内心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开始被各种各样的病魔所缠绕。

武媚依旧在从事着伺候天子起居的工作。她为太宗更衣的时候，发现神圣的天子之躯已经出现了某些未老先衰的征兆。太宗原本如鹰隼一样锐利清澈的目光如今已然变得浑浊而迟钝，而他身上原本结实有力的肌肉也已经变得松弛和臃肿。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曾经光芒万丈的贞观皇帝李世民已然是英雄迟暮了。

那时候，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的夺嫡之争已经以两败俱伤的结果黯然收场，而从不为人瞩目的晋王李治，则像一匹政坛黑马忽然间脱颖而出，出人意料地成了新的大唐太子。贞观末年的这场政治风波时隔多年后依旧让人记忆犹新。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太宗皇帝一度被这场巨大的政治变故搞得心力交瘁，正是这一重大的精神打击，连同两年后东征高丽的失败，一起把太宗皇帝李世民迅速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在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武媚曾经在几次宫廷宴会上见过他，不过这个文质彬彬、性情柔弱的晋王从未给武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甚至是在太子册封的大典上，这个已然成为帝国储君的九皇子依然是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起码在武媚的眼中就是如此。

看着这个被命运女神的诡谲之手一把推到历史前台的渔翁，武媚心里总有一种想笑的感觉。

她发现这个新太子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太子，而且还透着一股傻气。

不过让武媚略感意外的是，这个傻傻的大男孩李治非但不让她感到讨厌，反而还因为一种特有的稚气和腼腆而显得有些可爱。

在册封大典过后的宴会上，武媚一边操持着手头的事务，一边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太子李治投去关注的一瞥。

武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一直看他——看这个比自己小了整整三岁的大男孩。为此她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比如李治因不胜酒力而逐渐泛红的脸颊，比如他被人敬酒时依旧腼腆的表情举止，等等。

后来武媚又找了一个她认为最重要的理由。

那就是太子李治的眼神。

那是在这座偌大的太极宫里难得一见的眼神，它干净、质朴、纤尘不染，就像一泓清可见底的泉水。

多年以后的女皇武曌相信，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自己对这个大男孩李治就已经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愫了。

不过，对这份情感的认知毕竟只是女皇时过境迁之后的一种沧桑追忆，当初的才人武媚是不可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切的，她更不可能对这份隐隐约约的情愫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对未来深感无望的才人武媚自然也不会料到，就是这股若有若无、暧昧不明的情愫，最终居然将她的一生与李治的一生紧紧捆绑，同时也将她的个人命运与整个帝国的政治命运紧紧捆绑。

不伦之恋

在贞观时代的最后几年中，太宗皇帝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痈病、风疾、痢疾等各种疾病交替困扰着他，使他原本旺盛的精力急剧退化。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春天，太宗为了专门调养病体，不得不下决心从繁杂的政务中抽身而出，为此他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军国

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把军政大权一并交给了太子李治。一向仁孝的李治对太宗的病情满腹牵挂，他每隔一天在东宫听政，其余时间则始终待在太宗居住的承庆殿，“入侍药膳，不离左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对于太子李治表现出的孝顺之情，太宗深受感动。他犹然记得东征高丽归来的途中，他的背部生出了几个又红又肿的毒疮，坐卧不宁，疼痛难耐，太子李治看见他的痛苦之状，不顾一切地用嘴去吸吮，硬是把疮中的脓血吸了出来，使他的痈病在回到长安之后便得以痊愈，当时随行的文武百官都对太子的大孝之举赞叹有加。

而今太子在听政之余，又夜以继日地守护在自己的病榻之侧，亲自侍奉汤药膳食，太宗真是既感动又欣慰。他一再劝太子不要太担心他的病情，应该抽空到宫外去踏青游玩，可这样的建议却总是遭到太子的婉拒。太宗不忍心看到太子总是奔波于东宫和承庆殿之间，最后只好命人在寝殿之侧安置了一座别院，专门供太子休息居住。

自此，太子李治除了每十天回东宫一趟之外，大多数时间都与病中的父皇朝夕相伴。

没有人会想到，太宗皇帝的这个安排无意中竟然开启了一扇幽玄之门。

在这扇门后，一桩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宫闱情缘正在等待着年轻的李治。

更没有人会想到，这桩情缘不仅从此改变了李治的人生，也最终改变了帝国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

才人武媚曾经有好几年很少看见太子李治，就算偶尔遇到，那也是远远地一瞥。武媚顶多能望见李治乘坐的太子车辇在仪仗队的簇拥下匆匆而过，可她根本看不见端坐在厚重车帘后的那个人。

太宗皇帝患病的这几年，负责天子起居晏寝的才人武媚明显感觉自己的工作内容日渐乏味。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待在天子的病榻旁，满足这个至高无上的病人所有必要和没必要的需求。承庆殿里终日飘荡的浓烈煎药气味让她感到无比压抑，而一种永无出头之日的沮丧之感更是弥漫她的全身。

是太子李治的到来及时挽救了濒临绝望的才人武媚。

就在这一年春天，太子李治开始频繁出入太宗的寝殿，而且很快就住

进了大殿之侧的别院。太子的到来顿时让武媚惊喜不已。几年前就已在她心中潜滋暗长可后来却无果而终的那段暧昧情愫忽然间就苏醒了，像一只蓦然惊醒的小鹿一样在她的心头奔突乱窜。那一刻武媚的世界观禁不住开始动摇——原来太阳底下还是有新鲜事的，比如这个仿佛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太子李治，居然可以如此近距离地出现在她面前！

武媚看见李治的脸上早已脱去了晋王时代的稚气和傻气，几年来的政治历练让这个原本质朴而柔弱的大男孩理所当然地多出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那是一个男人应有的成熟和稳重。

而让武媚颇感意外同时也颇为庆幸的是，尽管岁月已经在李治的脸上刻出了一些男人的线条和棱角，可却丝毫未曾改变他的眼神。

李治的那双眸子一如既往地荡漾着那种干净而澄澈的光芒。

贞观二十年春天，才人武媚与太子李治就这样邂逅于太宗皇帝的病榻前。

对李治而言，这当然只是人生中的初见。

可在武媚看来，这却是上天刻意安排的再度相遇。

那些日子，武媚看见自己暗淡的人生蓦然出现了一道弥足珍贵的亮光。

她朦朦胧胧地预感到——循着这道亮光，她一定能够找到生命的出口。

厮守在天子病榻旁的时光是无聊而琐碎的，李治纵然是一个十二分标准的孝子，日子一久也难免生出烦闷和厌倦之感。但他不敢接受父皇让他出宫游玩的建议，因为那会有损于他的仁孝之名，也有悖于他从圣贤书中学到的纲常礼教。尽管在表面上李治一直强打着精神，对病中的父皇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但是太极宫外明媚的春光还是时时撩拨着他的心扉，让他多少有些神思恍惚、魂不守舍。

才人武媚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这个命中注定要与他相伴一世、纠缠一生的女人，就在这时候悄然进入了他的视线。

千百年来，有关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曌的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可太子李治与才人武媚最初的那一段宫闱情缘却一直湮灭在时光深处，让人无从追寻、无从窥探。人们只知道作为太子的李治与作为庶母的武媚确实在太宗的病榻旁发生过一段不伦之恋，但是这段恋情具体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后世的人们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们究竟是“发乎情，止乎礼”，仅限于眉目传情、秋波暗送，携手在爱河边走了一遭，却连裙裾和裤脚都没有沾湿，还是无视纲常礼教的束缚，不顾一切地让情欲的洪水冲破人伦的堤坝，任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一同淹没在汹涌的欲望之浪中？

没有人知道。

人们只能猜测。带着好奇心，或带着窥视欲；带着纯情目光，或带着香艳视角；带着鄙夷和不屑，或带着同情和赞赏；带着历史学家特有的严谨和责任感，或带着八点档电视连续剧特有的煽情力和恶俗想象——一起去猜测。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武媚和李治曾经肉体出轨，但显然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两个你情我愿的成年人只能在一起玩一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在诸多有关唐朝的史书中，对于这段令人羞于启齿的暧昧恋情，无论人们如何煞费苦心、刨根究底，最终也只能找到这样一句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的话：“上（李治）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其他史料的记载与之大同小异。）

一个“悦”字，隐藏着这段不伦之恋的全部信息。

一个“悦”字，亦足以包容无数后人的无数想象。

虽然这桩神秘莫测的宫闱情缘无从让人一睹庐山真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经由另一条路径去探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尝试着进入李治和武媚的人格世界和心灵深处，或许更易于品读出这段恋情的个中三昧。

一提起唐高宗李治，人们的眼前似乎马上就会浮现出一张苍白羸弱、畏葸无能的脸。无论是在传统史家的笔下，还是在普通百姓的眼中，不幸的李治似乎始终戴着这样一张令人无奈的脸谱。

这也难怪。因为他的父亲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李世民，他的妻子又

是空前绝后的旷世女皇武则天，可怜的李治被夹在这两个光芒万丈的伟人中间，不但不配发出自己的光亮，甚至都不配拥有自己的色彩和个性。

可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

作为大唐王朝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帝王，高宗李治并不是这样一个没有血肉、缺乏个性的扁平人，也不是一个没有能力、毫无主见的弱智儿。

在此，我们暂且不论李治日后如何摆平他的舅父——帝国元老兼顾命大臣长孙无忌，也暂且不论在他治下的大唐帝国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文治武功，单论贞观末期的青年李治，似乎也远不只是一块一览无余的透明水晶，更不只是太宗膝下柔弱温顺、永远长不大的小白兔乖乖。换言之，李治的仁弱和孝顺固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他的人格世界绝不会只有这简单的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特征大体是遵循一种代偿性原则的。当人在正式场合越是表现出一种恒定的人格特征，他的潜意识中就越有可能产生一种“反向的冲动”。

在这种压抑之下，代偿性原则会发挥它的无形威力，让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受到抑制的那部分心理、意识、情感或者欲望，通过另外一些较为隐蔽的方式和渠道释放出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情绪发泄或者逆反心理，严重的就称为心理变态或者反社会人格。

严格来讲，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受到这种代偿性原则支配的。

我们同样可以在李治的内心世界发现这种反向的冲动。也即是说，越是在公开场合被人普遍视为宽仁孝友的乖乖儿，李治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就可能越发强烈。这样的反向能量在内心世界日积月累，一旦达到临界点，再加上外在因素的刺激和诱发，就必然会通过某种隐蔽的方式和渠道爆发出来。

从贞观十九年东征高丽归来后，太宗皇帝就患病不断，其间太子李治对他的照料可谓不遗余力（比如“吮痈”之举，便非常人所能为）。可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李治再孝顺，时间一长也难免生出疲倦和厌烦，因此太宗才会主动劝他出宫散心。但是，李治早已习惯在世人面前扮演孝子的角色，假如真的在父皇患病期间溜出去玩，他担心满朝文武会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使他享誉多年的仁孝之名毁于一旦，所

以他宁可更深地压抑自己，也不敢接受父皇的建议。

搬到承庆殿的别院之后，李治的压抑之感有增无减。于是，郁积在他内心的各种反向能量就像是一堆越积越高的干柴，一旦碰到一丝火星，必定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

要命的是，此刻蓦然出现在他眼前的才人武媚又绝不只是一丝小火星，而且是一团无比炽热的火焰！

干柴遇烈火，地球人都知道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有人认为，在李治的逆反心理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父权的反抗——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这种心态在他当太子时或许表现得还比较隐蔽，但是到他即位后就逐渐暴露出来了。李治登基之后，曾经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罢演歌颂太宗功业的《秦王破阵乐》。此举从正常的角度来看，颇为令人费解，可要是从反抗父权、力图走出父亲阴影这个角度来说，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此外，早在晋王时代，太宗就为李治主婚，纳山东望族、著名五大姓之一——太原王氏之女为妃（即后来的王皇后）。王氏既然是太宗亲自看中的儿媳，而且出身又是如此高贵，其才貌定属上乘，因此太宗才会称赞李治和王氏是一对“佳儿佳妇”。可就是这样一个由父皇亲自选定的“佳妇”，却长期得不到李治的宠幸，以至终生没有为李治生儿育女，这似乎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李治在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意志确实具有某种反抗和背离的倾向。

鉴于上述的反父情结，加之李治在幼年时期经历过非常深刻的丧母之痛，而且李治的性情确实也偏于柔弱，所以有人据此认为，李治身上很可能存在一种“反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很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恋人和情侣。

因此，当带有上述复杂性格和暧昧情结的李治遇见武媚时，让他突破禁忌、激情燃烧的理由就显得非常充分了。武媚年轻、貌美、有修养、有才学、善解人意、别具风情，而且比他年长，名义上又是他的“庶母”，因此，李治从武媚身上所获得的，就不仅是一种男女之情的愉悦，甚至也不仅是一种偷情的刺激，还是一种兼具母爱般的温暖和乱伦的诱惑以及暗中对父权进行挑战的那种隐秘而淋漓的快感。

如此种种，让李治如何抵挡？

如此种种，又让李治如何做到“发乎情，止乎礼”，只保证精神出轨，

不允许肉体出轨呢？

从武媚这方面来看，她似乎也不会允许自己跟太子李治的恋情仅止于眉目传情、秋波暗送的阶段。

因为，她等待这一刻已经等得太久了。

见天子庸知非福？！

武媚早年这句不识人间愁滋味的话，如今早已变成了对她自己的一个绝妙讽刺，然而她始终不相信自己的一生会彻底埋葬在这寂寥深宫之中。无数个孤枕寒衾的夜晚，当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棂静静洒在她的身上，武媚看见自己的肌肤依然如同凝脂一样散发着美丽而迷人的光芒。她相信这样的光芒不会永远沉睡在黑夜里，她相信这样的光芒总有一天会刺破命运的厚茧，在没有人可以意料的某个时刻无比璀璨地绽放。

是的，武媚有理由如此相信。

因为她是武士彟的女儿。

因为她的灵魂里流淌着父亲传承给她的一种信念，那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武媚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起，许多年前，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权势人物的暗算和追杀，并且像一条狗一样被人从洛阳撵回并州的时候，心里肯定也一度充满了沮丧和绝望。可是残酷的命运非但没有把父亲打垮，反而激起了他改变命运的决心和勇气。几年后机会来临，父亲义无反顾地押上了他的全部财产和身家性命，与诡谲无情的命运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最终，他成功了。

父亲的故事告诉武媚——人可以失去一切，但唯独不能失去希望。

只要你心存希望，就有可能赢回失去的一切，甚至赢得更多！

所以，当太子李治蓦然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武媚就知道，属于自己的机会来了。

她意识到——这很可能是自己暗淡无光的掖庭生涯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所以她无论如何都要把太子李治紧紧抓住，无论如何都要俘获这个男人的心！

而要俘获一个男人的心，你当然没有理由吝啬自己的肉体。

不厚道地说，无论武媚长得如何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她也不过是一张过期的旧船票。所以，当李治这艘豪华客轮（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班了）从她身边驶过时，武媚既没有理由把这张旧船票当个宝贝似的藏着掖着，更没有理由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女那样羞羞答答地拒绝登船。

我们可以想象，服侍病中天子的工作原本是枯燥而琐碎的，可当李治和武媚就像两块磁石一样相互吸引到一起时，厮守在太宗病榻前的时光就变得美妙而短暂了。

就跟世界上所有的爱情故事一样，李治和武媚这场风花雪月的事，起初肯定也是从目光的纠缠和挑逗开始的。然后通过端药送水的机会，他们之间肯定也会有意无意地发生一些肌肤的摩擦和碰触。接下来，或许是在某个四下无人的午后，或者是在某个万籁俱寂的子夜，当承庆殿里的宦官和宫女们纷纷打起了盹，而病榻上的太宗也已发出均匀的鼾声，李治和武媚的手一定会不约而同地朝对方伸过去，一点一点地伸过去，然后紧紧绞在了一起。到最后，情欲的洪水肯定也会顺其自然地越过道德的藩篱和人伦的堤坝，把他们的灵魂和肉体一同淹没……

然而，无论武媚和李治如何在太宗的病榻之侧激情燃烧，这一场风花雪月都只能像一束美丽而短暂的烟花一样稍纵即逝。

因为太宗皇帝不久之后就驾崩了。

随着太宗的离世，武媚的命运再次发生重大转折。

她从一个掖庭宫的才人，变成了感业寺的一个尼姑。

直到许多年以后，女皇武曌依然认为，感业寺的尼姑生涯是她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岁月。

[1]　这个杨达就是后来女皇武曌的外公。当然，那时候的武士彟还不知道十几年后自己会娶杨达的女儿为继室。

[2]　关于她的生年，各种史书记载不一，本书依据雷家骥先生在

《武则天传》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武德八年。

[3] 关于武曌的入宫时间，多数人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认为是贞观十一年，本书依据雷家骥先生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十二年。

第四章 感业寺的涅槃

我是一只不死鸟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太宗的病情日渐沉重，御医们束手无策。才人武媚看见死神已经向这个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伸出了冰冷的白爪，而太子李治依然日夜守候在病入膏肓的父皇身边。武媚看见他一连数日茶饭不思、滴水未进，两鬓甚至生出了几缕白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子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

那些日子，太子李治神色憔悴，目光呆滞，对行走在他身边的才人武媚视若无睹。武媚感觉自己的心隐隐有些疼痛，可她毫无办法。她既不知道如何安慰太子，也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在翠微宫的含风殿里，环绕在太宗病榻旁的所有嫔妾和宫女们早已惶惶不可终日，她们一想到自己恍若飘蓬的未来命运，就止不住黯然神伤、相对而泣。

武媚当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她知道太宗一旦驾崩，自己的明天就会变成一只渺然无依的断线风筝。可她仍然心存一丝侥幸，因为她与太子有过一段无人知晓的炽热恋情。她暗中祈祷她与太子的这个情分能够帮助她摆脱弃履般的命运。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才人武媚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溘然长逝。当含风殿里传出天子驾崩的消息时，武媚听见翠微宫的每个角落都不约而同地传出了裂帛般的哭泣声。天子一死就意味着厄运的降临，武媚知道没有几个人是因为太宗的离去而伤心落泪的，她们其实都是为自己而哭——为自己仍然活着却又不知该如何活下去而同声一哭！

那一天太子李治也一直抱着长孙无忌的脖颈恸哭不已，他的哭声听上去撕心裂肺、悲痛欲绝。事实上过度的悲伤也确实令太子好几次险些昏死过去。听着太子那令人肝肠寸断的哭泣，武媚也忍不住潸然泪下。凭着一个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她和太子的这段恋情已经随着太宗的亡故而悄然死去。因为太宗之死恍如泰山之崩，足以让任何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都变得黯然失色，也足以把无名无分的才人武媚从太子不堪重负的内心世界中驱逐出去。

太宗崩逝的第三天，太子李治就在长孙无忌的安排下，扶着父皇的灵柩动身返回长安。武媚偷偷站在翠微宫的宫楼上，看见太子车辇在一大队禁军骑兵的簇拥下渐行渐远，最后从她的视线中彻底消失。

武媚不知道，太子李治会不会就这样从她的生命中消失。她只知道那一天骄阳似火，整座翠微宫都热气蒸腾，可她却像掉进了隆冬腊月的冰窟之中，感觉从头到脚都弥漫着一种刺骨的寒冷。

同样作为已故太宗皇帝的未亡人，太极宫中的女人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归宿。一部分生有子嗣的妃嫔可以出宫去投靠自己的儿女；另外的极少数人则以一种勇敢而贞洁的姿态选择了变相的殉葬，比如太宗晚年甚为宠幸的嫔妃徐惠，便因哀伤成疾并拒绝医治而于次年病逝，年仅二十四岁，死后陪葬昭陵；至于像才人武媚这种没有子嗣，同时又不愿殉情的嫔妃宫女，则必须循例出家，到寺院或者道观中了却残生。

才人武媚被分配的命运是削发为尼，她的归宿是位于长安皇城内的感业寺。

虽然感业寺与太极宫近在咫尺，可武媚却感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进入感业寺的时候，武媚和一大群宫女刚刚走到弥勒殿前就不约而同地止步了。她们带着同一种迷惘和惶然的表情转过身去，看见身后那道威严肃穆的山门已经訇然关上。这一门之隔，从此隔断了她们回望红尘的目光，也隔断了她们或喜或悲、或浓或淡的所有旧梦前缘。

举行剃度仪式的那一天，当缕缕青丝恍若柳叶在她们眼前簌簌飘落，武媚听见有人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哭喊和哀号。人们看见一个近乎疯狂的昔日宫女突然挣脱剃度老尼的手，冲到紧闭的殿门前拼命地捶打和摇撼，被剃了一半的黑发犹如杂草一般披散在她苍白的脸上，让她看上去形同鬼魅。

后来这个绝望发狂的女子被几个老尼七手八脚地拖了出去，可那令人

不寒而栗的哭号却在空旷的大雄宝殿上久久回荡。

据说宫女们剃度的这一天也是新天子举行登基大典的时间。

在庄严的大典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武媚已然是一副青丝落尽、素面朝天的僧尼之相。她站在大殿前的台阶上，看见六月的太阳正高悬中天，向人间喷射着万道金光。武媚想象李治那张清癯白皙的脸庞，此刻一定被镀上了一层至尊无上的金黄，而大唐的万千臣民正匍匐在地上山呼万岁，向这位年轻的天子表达他们由衷的拥戴之情。

此刻的皇帝李治还会记得承庆殿里的那个才人武媚吗？

此刻的皇帝李治还会关心感业寺里的这个小小女尼吗？

不可能了。

当然不可能了！

因为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因为，他和她正被命运之手推向截然相反的两极——一个理所当然地登上权力的巅峰，一个被逼无奈地遁入寂灭的空门；一个为万众拥戴、为兆民景仰，一个被上天抛弃、被尘世遗忘；一个将在六宫粉黛和三千佳丽的簇拥和环绕中尽享人间声色，一个只能在钟磬梵唱和青灯古佛的陪伴下独自咀嚼爱断情伤。

那一天，女尼武媚孑然一人站在感业寺的最高处，眺望喧嚣依旧的凡尘俗世，眺望咫尺天涯的太极宫阙，眺望永远回不去的青春时光，眺望那场惊心动魄却又稍纵即逝的爱情，汹涌的泪水就这样顺着她洗尽铅华的脸庞潸潸而下。

削发为尼的这一年，武媚二十五岁。

这原本是一个女人生命力最旺盛的年龄，然而一袭冷酷的缁衣却把她饱满欲滴的生命彻底囚禁了，令她在清规戒律的樊笼中无可逃脱地干瘪和枯萎。

感业寺里几乎找不到一面可照人的铜镜，因为再没有人需要挽髻、描眉和梳妆。武媚看见和她同时剃度的昔日宫女们总是会借故在水井边徘徊，她知道她们是在对着水中的容颜顾影自怜。武媚觉得她们的行为既可怜又可笑，所以她始终不愿在水井旁多待一刻。直到有一次，武媚终于忍不住临水而照，这一照让她无比惊讶，因为她看到水面上

漂浮的那张脸异常憔悴，而且写满了哀怨和忧伤，看上去和所有顾影自怜的女尼一模一样。

秋去冬来，感业寺的暮鼓晨钟日复一日地敲打着女尼们日渐麻木的耳膜和心灵，武媚知道很多人已经学会了接受命运的安排。她发现，曾经的愤懑和不甘已经从她们的身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行尸走肉般的绝望和麻木。当然，女尼们也在绝望中发明了许多苦中作乐的把戏，这些深夜庵房里的私密游戏甚至让许多人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久违的红晕。

可所有这一切都让武媚觉得可悲而荒唐。

武媚在后来的日子里急剧消瘦，她的脸色看上去苍白如纸，女尼们普遍认为这是她离群索居、自命清高的结果。每当武媚从感业寺凄冷空旷的庭院中走过，冬天的大风就会吹起她身上那袭宽大的缁衣，让她看上去就像一只无比孤单的飞鸟。

许多女尼暗地里都说，这个总是满脸冰霜的武媚也许就快死了，她最后的下场就是变成一个无人理睬的孤魂野鬼。

对于女尼们背后的嘲讽和诅咒，武媚听到后只是冷然一笑。

我不会变成孤魂野鬼，武媚说，我会变成一只鸟，一只不死鸟，永远在自己的天空里飞翔。

冬天里暮色四合的时候，感业寺的其他女尼总会成双结对地躲进庵房，早早就吹熄了灯火，只有武媚的庵房里一灯如豆，固执而凄清地燃到天明。没有人看见武媚总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铺开一纸素笺，用笔墨一遍遍倾诉着自己的爱断情伤。其中一首名叫《如意娘》的乐府，后来被收录在了《全唐诗》中。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没有人知道女尼姑武媚长夜无眠的相思对象就是至尊无上的当朝天子。

没有人知道女尼姑武媚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追寻那片曾经翱翔过的天空。

无论感业寺的生涯如何漆黑和艰难，武媚始终没有感到绝望。

因为她坚信，自己是一只鸟。

一只不死鸟。

谁也别想再让我离开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当女尼武媚依旧在感业寺里“看朱成碧”“憔悴支离”的时候，年轻的天子李治正在意气风发地指点着大唐江山。

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这个繁荣而庞大的盛世帝国，既给了他强大的动力，也给了他巨大的压力，所以李治丝毫不敢懈怠。刚一即位，他就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热情一头扑在了天子的工作岗位上。每天上朝，他总是既严肃又诚恳地对文武百官说：“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并且散朝之后，李治总是孜孜不倦地加班加点，“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新天子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勤政爱民的作风很快博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百姓们更是极力称颂，说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年轻的高宗李治就这样忘情地投入一个新皇帝的职业生涯中，巨大的新鲜感和责任感暂时冲淡了他对男女之情的需求和想念，先前那场昙花一现的暧昧恋情似乎也已经从他的记忆中淡出。如果不是在太宗周年忌日的时候，高宗李治必须循例前往感业寺行香，如果诡谲的命运没有再度安排他和她邂逅，那么日理万机的年轻天子也许会把那个风情万种的才人武媚彻底遗忘，而中国历史或许也就不会出现那个空前绝后的女皇武曌。

永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新君李治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来到感业寺行香。寺内尼众经过多日精心筹备，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迎接圣驾。当天子仪仗进入山门的时候，寺内钟鼓齐鸣，所有束手站立在甬道两侧的人们一起跪了下来，口中山呼万岁。

坐在銮驾内的天子李治当然没有听到，在这雷鸣般的恭迎圣驾的呼声中，夹杂着一个女尼剧烈颤抖的声音。

那是武媚的声音。

当时的武媚全身都在发出一种幸福和激动的颤抖。

跪在武媚身边的人甚至听见她的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奇怪的哽咽。

是的，自从听说天子要来感业寺行香的那一刻起，武媚就无法抑制这种哽咽了。

一年了，整整三百六十五个日夜，武媚无时无刻不在向上苍祈求，祈求她与天子别后重逢的这一天。一年来女尼武媚为伊消得人憔悴，一年来女尼武媚相思成灰、望穿秋水，终于得到上苍垂悯，让天子重新来到了她的身边，又怎能让她不发出激动的哽咽，又怎能让她不喜极而泣呢？

在整个行香仪式进行的过程中，武媚的目光始终没有从天子的身上离开，她害怕自己一转睛、一眨眼，李治就会再度从她的生命中消失，就像一年前那个炎热而又冰冷的夏日，太子李治在终南山的山道上渐行渐远，头也不回地从她的视线中消失一样。

行香礼毕的时候，李治出于某种礼节上的需要，亲自走到因太宗亡故而循例出家的这群女尼身边，亲切地表达了他的关怀和慰问之情。有好几个女尼为此感动得眼眶都红了，李治象征性地安抚几句之后，正准备转身离去，而那个令人出乎意料的尴尬场面，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人群后的一个女尼忽然用力拨开挡在她前面的几个人，径直走到了天子面前。

四目相对的这一刻，天子李治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睁大了眼睛，木立当场。

当时在场的人也全都怔住了，她们不无惊愕地发现，把天子牢牢钉在当场的那道闪电分明来自女尼武媚的眼中。而且她们还看见，那一刻的女尼武媚仿佛变了一个人——随着胸膛的剧烈起伏，她原本消瘦而苍白的脸庞忽然绽放出一种朝霞般绚丽的光芒。

许多年以后，感业寺的一些老尼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女尼武媚确实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妩媚，所有人都看见她的脸上闪动着一种流光溢彩的惊艳之美。

那种美实在是稀世罕有、摄人心魄。她们说。

无怪乎天子李治会深陷其中，终其一生无法自拔。她们说。

行香那天的意外重逢令天子李治猝不及防，人们看见天子忽然有些手足无措，脸上的表情也极为怪异。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马上转过头去，匆匆离开了现场。片刻之后，人们看见寺中的住持老尼一脸严肃地把女尼武媚带走了。女尼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冷笑，她们认为这个自视清高的武媚这回肯定是要遭殃了。

可是没有人知道，住持老尼把武媚匆匆领到了感业寺的客堂，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当然更没人知道，就在这座清幽僻静的客堂中，有一个人正在等待着武媚。

他就是天子李治。

当时天子已经屏退左右，正独自一人站在堂中，用一种焦急的目光朝门口张望。

武媚走进客堂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天子脸上复杂的表情。

那上面写满了激动和惊喜，同时也有一丝隐隐的尴尬和歉意。而最让武媚感到欣慰的是，李治的眼神依然清澈，而且分明荡漾着一种缠绵悱恻的回忆之光。

武媚庆幸自己终于唤醒了李治对于那场爱情的回忆，她也庆幸自己身上的美丽光芒没有在感业寺的枯寂时光中消磨殆尽。

一年来，天子李治就是她生命中唯一不灭的信仰。

她全部的孤独和全部的坚持，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这样的时刻，有太多的言语需要表达，有太多的衷肠需要倾诉，但是武媚却让它们全都化成了幸福而感伤的泪水，任它们在自己的脸上肆无忌惮地奔涌和流淌。

此情此景，天子李治再也无法抑制胸中沸腾的情感。

他哭了。

两行清泪顺着他的脸颊潸然而下。

那一瞬间，李治和武媚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唐会要·皇后》：“上因忌日行香，武氏泣，上亦潸然。”）

尽管已经有意识地压低了声音，可他们的啜泣声还是不可避免地传出了屋外，隐约落进一些侍从的耳中。听着天子李治和女尼武媚纠缠在一起的哭声，这些随行的宦官和宫女止不住浮想联翩。他们暗暗惊讶于行香之日发生的这一切，也暗暗猜测着这个女尼与当今天子非同寻常的关系。而理所当然的是，就在天子一行起驾回宫之后，某个宦官或宫女便及时地把这份惊愕和猜疑传达给了王皇后。

作为天子李治的第一夫人，同时也作为一个长期得不到丈夫宠爱的女人，王皇后蓦然听到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时，心里泛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强烈的愤怒和嫉妒。可在一阵酸劲过后，王皇后的嘴角旋即掠过一抹得意的微笑。

她不无惊喜地发现——在她即将与萧淑妃展开的后宫之战中，感业寺的这个女尼出现得正是时候！

她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把女尼武媚暗中控制起来，命她偷偷蓄发，然后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把她弄进宫来，让她去夺取天子的宠爱，把原本占尽天子之宠的萧淑妃彻底整垮！（《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王皇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他日，帝过佛庐，才人见且泣，帝感动。后廉知状，引内后宫，以挠妃宠。”）

“帝过佛庐，才人见且泣”这一幕无疑是女皇武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如果没有王皇后借刀杀人的阴谋，武媚的命运绝对不可能改变。恰恰是王皇后企图把武媚当成后宫之战中的一枚卒子，才促成了她的二度入宫及此后的脱颖而出。假如没有自作聪明的王皇后极力促成，很难想象高宗李治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敢把一个已经出家为尼的先帝嫔妾纳入自己的后宫[1]，也很难想象日后的武媚会有那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如果说，早年的晋王李治在太子承乾和魏王泰的东宫大战中是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幸运儿，那么，后来的武媚又何尝不是在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后宫之战中捡了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便宜？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治和武媚都是上天垂青的幸运儿。

当然，能够在历史上绽放光芒的人物，不仅需要绝好的运气，还需要过人的实力。武媚之所以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固然是有“三分天注定”的因素，但更需要的无疑是“七分靠打拼”的进取姿态和奋斗精神。

永徽元年，与李治在感业寺的别后重逢虽然给武媚的命运带来了一丝转机，但是仍然有重重的艰难险阻等待在她生命的前方。

对于女人而言，天子的后宫历来是天底下最险恶的战场，曾经在掖庭宫中生活过十一年的才人武媚，由于品秩低下、年龄幼小，并没有真

正领教过后宫之战的惊险和惨烈。所以，二度入宫的武媚要想在争权夺宠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学会在谎言和阴谋中生存、在残忍和绝情中成长，也必须学会在刀尖上舐血和觅食、在悬崖边行走和舞蹈……

如果说在当年的狮子骢事件中，年少轻狂的武媚还只是凭一时意气，逞嘴上英雄，那么从今往后，武媚则必须面对无数情敌和政敌，真刀实枪地亮出她的铁鞭、她的铁锤，还有她的匕首！

武媚做好准备了吗？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七月的某个黄昏，一驾皇家马车悄悄来到感业寺。

片刻之后，一个罩着面纱的女子在宫中使者的引领下，匆匆走出山门，径直登上了马车。

马车迅速掉头，朝太极宫疾驰而去。

车中的女子已经蓄了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并且挽起了一个宫中流行的发髻。经过一年多的精心保养，这个原本方额广颐、蛾眉凤目的女子看上去显得更加丰腴而白皙，也更加雍容华贵、妩媚动人。

车辇缓缓驶进皇宫的时候，女子下意识地挑开一角车帘。在橘红色的夕阳映照之下，她看见这座熟悉的太极宫依旧散发着一种华丽而森严的光芒。

我回来了。武媚说。

谁也别想再让我离开。

天子的旧爱兼新欢

随着武媚的二度入宫，她和天子李治这段暧昧曲折的恋情终于结束了地下状态，堂而皇之地走到了阳光底下。此刻的武媚真有一种劫后余生、苦尽甘来的沧桑之感。

第一次入宫，她十四岁。

现在，她已经二十七岁。

从表面上看，命运绕了一大圈，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然而武媚知道，这绝对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因为，皇宫虽然还是当年的那座皇宫，但是武媚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武媚。

见天子庸知非福？

如果说当年的武媚对天子之爱的朦胧渴望纯粹是出于一种撞大运的赌徒心态的话，那么今天的武媚无疑可以自豪地宣称——天子之爱已经在我的掌中！

是的，武媚对此满怀自信，她相信天子李治对她的爱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女人，这一点她完全可以从李治的眼睛中看出来。

可是，有一点武媚却不得不承认，尽管她拥有天子之爱，可如今的她却没有丝毫名分，甚至比十三年前初入宫的时候还不如。当时的她至少是一个五品才人，可眼下的她只是王皇后身边一个小小的侍女。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目前的起点甚至比过去的还低。

所以，武媚知道自己必须把所有的锋芒都深深敛藏。

换言之，她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谦恭、更加谨慎、更加韬光养晦、更加低调做人。而最重要的是——她必须对王皇后百依百顺，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从而取得她的绝对信任。（《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

有人说，所谓百依百顺，就是在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未完成前，所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耐心。

此时的武媚正是这么做的。

因为她知道，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将王皇后取而代之。

平心而论，王皇后其实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虽然她出身名门、天生丽质，而且贵为皇后、母仪天下，看上去似乎拥有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一切，可实际上她的幸福指数很低，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民间妇女。

因为她始终得不到丈夫的爱。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

从成为晋王妃的那一天起，到后来成为太子妃，再到今天贵为皇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把一个女人生命中最美丽、最宝贵的时光都给了今上李治，可她换来的却是十年如一日的忽视和冷落。

她的身份一天比一天尊贵，可她的失落感也一天比一天更深。

在人前她风光十足，在人后她形同弃妇。

在她的记忆中，天子与她同床共寝的次数简直屈指可数，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肚子始终平坦如初、空空如也——连爱情都没有，遑论爱情的结晶？

既没有天子之爱，又没有自己的子嗣，这对于一个皇后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同时更是一种莫大的危机。

而在王皇后看来，自己的处境之所以如此不堪，罪魁祸首就是那个萧淑妃！

这个姓萧的女人似乎命中注定是她的天敌。

无论出身门第，还是容貌才学，这个萧淑妃都与王皇后旗鼓相当。王皇后出身于北方望族——太原王氏，而萧淑妃则出身于南朝世族——兰陵萧氏，系出梁昭明太子一支，是后梁帝室的后裔，家族中出了前隋的萧皇后，还有大唐的开国功臣萧瑀，因此，其家世背景和才学修养丝毫不比王皇后逊色。

此外，早从东宫时代起，萧氏的地位就总是紧挨着王氏。王氏册封为太子妃时，萧氏的身份是萧良娣（东宫嫔御之职）；王氏晋封为皇后之后，萧氏就紧跟着晋位为淑妃（仅次于皇后的一品妃，员额四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

而最让王皇后妒火中烧的是，萧淑妃似乎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天子李治全部的爱，所以短短几年间就生下了一子两女——贞观二十年生雍王李素节，稍后生义阳公主，贞观二十三年又生宣城公主。

眼看着这个女人在天子的深耕细作下硕果累累，而自家的田地则是一片荒芜、颗粒无收，王皇后几欲抓狂，同时也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都说母以子贵，有了这一子二女，萧淑妃不仅后半生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而且具备了跟王皇后叫板的资格。换言之，距皇后宝座仅一步

之遥的萧淑妃随时有可能一步跨过来，把王皇后取而代之！

幸好打了武媚这张牌。让王皇后颇感自得和欣慰的是，武媚果然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她一入宫就牢牢锁定了天子的欢心，使得萧淑妃所获的宠爱急剧衰减。此外，武媚又聪明乖巧、善解人意，所言所行总是让王皇后感到称心如意。为此，王皇后屡屡在天子面前替武媚说好话，希望进一步帮她提升地位，以便把萧淑妃彻底整垮。

在王皇后这个“贵人”的一再荫庇和帮助下，武媚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次辉煌——大约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左右，她被立为二品的昭仪，位列九嫔之首，地位仅次于皇后和四妃。

在立为昭仪的数月之后，武媚又生下了长子李弘，真是双喜临门。天子李治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对武媚的宠爱更是有增无减。相形之下，那个曾经垄断了天子之爱的萧淑妃，其命运则是一落千丈，几乎已被天子遗忘。

当初王皇后曾经品尝过的所有痛苦、失落和嫉妒，而今萧淑妃也不得不一一体验。每当看见萧淑妃日渐憔悴的面容和日渐暗淡的目光，王皇后的心里总是一片阳光灿烂。

可王皇后也知道，虽然萧淑妃已经无力对她构成威胁，但她必须防患于未然。天知道，在这美女如云的后宫中，会不会哪一天又冒出一个蛊惑天子的狐狸精，成为萧淑妃第二呢？所以，她必须做一件事情，才能确保自己的皇后之位和整个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王皇后要做的事就是——把皇长子陈王李忠认作义子，再把他扶上太子之位。

其实这个主意不是王皇后自己想的，而是她舅舅柳奭帮她出的。

柳奭时任朝廷的中书令，位高权重，可他却时常感到忧惧。因为外甥女虽然贵为皇后，但一来得不到天子之宠，二来又没有自己的子嗣，这样的处境使她随时面临被废的危险。而万一她哪一天真的被废了，柳奭的仕途也就到头了。因此，出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考虑，柳奭便一直暗中帮王皇后策划立嗣之事。

而柳奭之所以把立嗣的对象锁定为陈王李忠，原因有二：其一，他是高宗的长子，具有储君的资格；其二，陈王李忠虽是长子，却是庶出，生母刘氏只是一个卑微的宫女，所以他需要一座坚实的靠山，而王皇后正是这样一座靠山。一旦被皇后收为义子，陈王李忠就不仅是

长子，同时是嫡出，自然就是储君的不二人选。

因此，王皇后和李忠都需要对方——一个需要子嗣才能保住皇后之位，一个需要名分才能入主东宫，二者可谓“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为了圆满达成这种双赢之局，柳奭在朝中积极活动，联络了与他交情甚深的宰辅重臣长孙无忌等人，屡屡上表，劝请天子立陈王李忠为储君。高宗李治起初并不同意，可是迫于一帮宰相的压力，最后不得不点头。于是，就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差不多与武媚立为昭仪同时，陈王李忠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王皇后终于如愿以偿。

那些日子，诸事顺遂的王皇后终于有了一种扬眉吐气、否极泰来之感。

情敌萧淑妃失宠了，义子李忠也入主东宫了，她生命中的阴霾已经一扫而光，再也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担忧和恐惧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王皇后想象的这么简单。

因为，老对手萧淑妃虽然倒下了，可更为强势的新对手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了。

这个新对手，就是天子李治的旧爱兼新欢——武昭仪。

王皇后绝对没有料到，这个被她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女尼武媚，这个由她一手扶植起来的侍女武媚，居然在她刚刚取得胜利的一刻掉转枪口，摇身一变就成了她生命中最强大的敌人！

在王皇后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这个曾经温顺而乖巧的武媚，这个看上去丝毫不构成威胁的武媚，居然带着她的铁鞭、她的铁锤，还有她的匕首，迎面朝皇后的宝座走来，然后微笑着向皇后扔出一纸生死对决的宣战书。

猝不及防的王皇后来不及思考这一切，就被迫与她过去的敌人萧淑妃重新联手，硬着头皮匆匆投入了战斗。

是谁杀死了小公主？

永徽年间这场惊心动魄、震撼朝野的后宫之战最初是以情报战的方式打响的。

据说王皇后是一个不善于笼络人心的人，史书称她“性简重，不曲事上下”（《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也许是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地位造就了她清高倨傲的性格，抑或是人生道路过于顺畅，缺乏必要的历练，导致她的心机、谋略和手腕都相对不足，因此她虽然入宫多年，但从未在后宫中培植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势力，也没有在天子左右安插自己的耳目和亲信。在这方面，她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和舅舅中书令柳奭，好像也和王皇后如出一辙，都让人有一种鼻孔朝天、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宫中的各色人等只好对这一家子敬而远之。

相形之下，武媚就要比他们高明许多。

从二度入宫的第一天起，武媚就知道，要想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并且出人头地，仅仅依靠天子的宠爱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一个坚实宽广的群众基础。所以武媚再入宫门之后，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广结善缘，不管对方身份高低，只要是她认为有用的，就一定会刻意逢迎，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到她被立为昭仪并且与王皇后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之后，武媚更是加紧了笼络人心的步伐。尤其是那些被王皇后一家子轻视和冷落的人，武媚更是倾力结交。凡是天子赏赐给她的钱物，她总是一转手就送给了那些人，自己则不留分毫。（《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

武媚的平易近人和慷慨大方迅速赢得了宫中各色人等的心，她的人气指数直线飙升。凡是跟她打过交道的人，无不被她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因而都愿意为她效犬马之劳。而在这些人中，无疑有相当一部分是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宦官和宫女。

短短几年间，武媚就成功地缔造了一张无孔不入的后宫情报网。从此，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她的掌握之中。武媚稳稳盘踞在这张网的中央，每天收集着从各种渠道传递到她手中的情报，然后一一甄别，挑出对王皇后和萧淑妃不利的东西，第一时间就告到了天子那里。

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当然也是使尽浑身解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武媚进行反击。

但是这种飞短流长、捕风捉影的情报战，其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因为天子李治对女人们在背后互相使绊子这一套好像不太感冒。他采取了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的方式，不管双方说了多少对方的坏话，他一概不表态，让所有谗毁之言自来自去、自生自灭。

武媚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手段实在难以奏效，要想把对手彻底打垮，

似乎应该另辟蹊径，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年初，武媚又给天子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公主。天子李治对这个漂亮的小公主钟爱有加，每天政务之余都会抽空过来看上一眼，抱上一抱。

当时王皇后与武昭仪的矛盾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谁都知道不能生育的皇后对连生两胎的武昭仪恨之入骨，嫉妒得要发狂，就跟她当初嫉妒萧淑妃时一样。可是作为后宫之主，在得知武昭仪又产下一女之后，王皇后却不得不故作姿态，隔三差五总要来看望一下武昭仪和小公主，以表关心和慰问。

每次来“慰问”的时候，出于必要的礼貌，也出于女人的天性，王皇后总不免要抱起女婴逗弄一番，而武媚当然也要强作欢颜地陪在一边。

也许就是在这种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就不期而至地跃入了武媚的脑海。

这个念头是如此大胆和疯狂，以至于它乍一出现的时候，连武媚自己都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可是，这个想法又是如此强烈而又如此可行，以至于它一旦出现，武媚就无力也无意把它从自己的脑海中驱逐出去。

终于有那么一个早晨，当王皇后照例来看望小公主，而且照例抱起来逗弄一番时，武媚便下意识地屏退左右，躲在纱帐后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当王皇后放下女婴转身离去后，那个可怕的念头再次浮现，就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一样不可抗拒地击中了武媚，让她不由自主地走向自己的女儿。

摇篮中的女儿正在熟睡，武媚看见襁褓中那张粉红的小脸在睡梦中露出了一丝甜美的笑靥，这无疑是人世间最纯洁、最无瑕的笑容。可武媚知道，片刻之后，这个笑容就将从世界上消失，从此只能凝固在自己的心底，成为生命中最温柔也最残酷的记忆。

武媚看见自己的手慢慢伸了出去，像一条冰冷的白蛇一样缓慢而坚定地游向女儿细嫩的脖颈，然后一下子锁住了她的咽喉。

女儿的四肢在挣扎，身体在抽搐。

武媚的灵魂在崩裂，内心在流血。

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已经颠倒过来，武媚看见周遭的事物开始围绕着她飞快地旋转，旋转……

不知道过了多久，或许只是一刹那，一切就都恢复了原状。

女儿依然在熟睡，但已永远无法再醒来。

武媚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她分明看见自己灵魂深处的某个角落已经鲜血淋漓。她知道，这也许是她用尽一生都无法抹平的伤口。

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毫无悬念，一切都像已经写好的剧本一样，按照预定的时间和逻辑顺序一幕一幕地上演。

天子散朝之后特意来看他的小公主，武昭仪跟往常一样面带笑容迎接天子。可当天子掀开温暖的锦衾，抱起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极度震惊的天子向周围的人发出了暴怒的质问，而女儿的母亲武昭仪则猛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人们看见她身形摇晃、状若晕厥。

是谁杀了小公主？

负责伺候小公主的侍妾和宫女们在第一时间被叫到了天子面前。她们脸色煞白，手脚打战，在天子的厉声质问下，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刚刚只有皇后来过。

一切都明白了。

那一刻的天子咆哮如雷：皇后杀了我的女儿，皇后杀了我的女儿！

而武昭仪则在泪流满面的同时不停地对王皇后发出声讨和控诉——以一个善良无助的母亲的身份，对一个阴险冷酷的杀婴凶手，发出最强有力的声讨和控诉！

据说王皇后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变成一个扼杀女婴的凶手，然而所有不利的证词和怀疑的目光都在同一时刻指向了她，令她百口莫辩、无以自解。满腹冤屈的王皇后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她确信这是心狠手辣的武昭仪对她实施的一个苦肉计，可她却没有任何办法证明这一点。

而且她知道，就算她说出来也没有人会相信她。

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一个受到伤害的可怜的母亲，也不会相信一个被嫉妒之火烧坏了心肠的女人。

永徽五年的这桩女婴猝死案直到千百年后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按照相关正史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是武昭仪亲手扼死了自己的女儿，以此嫁祸于王皇后。然而后世史家却不断有人提出质疑，理由是“虎毒不食子”。许多人认为，尽管武曌在对付政敌的时候确实非常残忍，可是作为一个母亲，她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此毒手呢？

论者从普遍人性与人之常情的角度提出质疑，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武曌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按世俗规范去衡量、可以用人之常情去揣度的人物。如果一般的道德规范可以束缚武曌，那她就绝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如果世间的常情常理可以界定武曌，那她一生中大多数所作所为就通通变成不可理喻的了，又何止杀婴一事？

暂且不说武曌在后来漫长的一生中还有多少突破常规的作为，单纯从她早年的许多言行和经历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她那非同寻常的人格特征，尤其是在她的人生遭遇瓶颈或者陷入困顿的时候，她的表现就更是迥异于常人。十四岁离家入宫的时候，她母亲杨氏哭得何其悲切，可她居然说出“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那份镇定、乐观和自信，又岂是同龄人可以比拟？当年为了博得太宗的赏识和青睐，在驯马场上故作惊人之语，用想象中的铁鞭、铁锤和匕首“残杀”了太宗钟爱的狮子骢，其表现又是何等出格出位！在太宗的病榻之侧，居然敢和太子激情燃烧、共浴爱河，那份渴望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又岂是常人可以理解和想象的？

所以，当武曌在通往皇后宝座的道路上遭遇障碍的时候，当她发现女儿的牺牲足以成全她对于权力的野心和梦想的时候，她为什么就不能像从前屡屡做过的那样，再一次逾越人性的藩篱，再一次颠覆世俗的道德规范，毅然决然地扼住女儿的咽喉呢？

其实，对于那一刻的武曌而言，与其说她扼住的是女儿的咽喉，还不如说她扼住的是敌人的咽喉，是命运的咽喉！

当然，不论武曌如何决绝和无情，这件事对她造成的伤痛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十二年后，武曌还专门为女儿举办了一场异常隆重的迁葬仪式，葬礼规格用的是“卤簿鼓吹”的“亲王之制”，显然已经逾制。此外，她还把这个夭折的长女追封为“安定公主”，谥号为“思”。这个谥号不仅表达了她对女儿的绵长哀思，而且蕴藏着另一层更深的意味。

依照有唐一代的谥法，“追悔前过曰思”。于是我们就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时过境迁的十几年后，还有什么样的“前过”值得母仪天下的武曌追悔不已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这是武曌对长女的亏欠。

这是她用尽一生也弥补不了的亏欠。

也许日后武曌之所以对幼女太平公主百般溺爱，在此就可以找到某种隐秘而深远的原因——因为太平公主得到了双份的爱。

一份是她自己的，另一份属于那个在襁褓中便已夭亡的姐姐——安定公主。

事后来看，女婴暴卒事件无疑是永徽年间这场后宫之战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高宗李治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产生了废后之意，他对王皇后由冷淡变成了憎恨，而对武媚的宠爱和信任则与日俱增，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就这样，王皇后与武媚之间原本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武媚看见那张母仪天下的宝座已经在向她遥遥招手，而王皇后和萧淑妃则只能在午夜惊梦中频频看见厄运之神对她们发出一脸狞笑。

永徽五年上半年，也就是在女婴暴卒案发生后不久，朝廷又发生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有心人不难发现，这两件事的出现，恰足以证明王皇后与武媚之间的力量消长。

第一件事是在这一年三月，朝廷忽然以“褒赏功臣”的名义追赠了一批武德功臣的官爵。在这份以屈突通为首的十三人追赠名单中，武媚的亡父武士彟赫然在目，他被追赠的官职是并州都督。朝中的大臣们都知道，这件事显然是武媚在背后一手策划的，她撺掇天子追赠亡父，其目的无非是想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屈突通等另外十二人只不过是十二枚绿叶，为了陪衬武士彟这朵红花罢了。当然，能当一回这样的绿叶也是很荣幸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六月，中书令柳奭忽然向皇帝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皇帝很快就批准了，将他降为吏部尚书。这件事乍一看有些蹊跷，因为柳奭在宰相任内一直尽职尽责，从没听说有什么差错。可

人们再一想就明白了，在女婴暴卒事件后，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的信任，随时有可能被废黜。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作为皇后母舅的柳奭主动离开相位，也算是急流勇退的明智之举吧。

永徽五年的年终岁末，一个瑞雪飘飘的午后，太尉长孙无忌的府邸上迎来了两位无比尊贵的客人。

他们是今上李治，还有他最宠爱的武昭仪。

人们看见天子身边的武昭仪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从步下车辇的那一刻起，她的脸上始终荡漾着一个灿烂而迷人的笑容。

尽管天子和武昭仪的突然造访让太尉府上的许多人都颇感意外，可是长孙无忌却很清楚天子此行的目的——除了皇后废立，不可能有别的事情。

作为太宗皇帝临终托孤的首席顾命大臣，并且作为天子李治的母舅和永徽政局实际上的掌舵者，长孙无忌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和立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他的点头，天子和武昭仪的心愿断难达成。可如今的问题在于，长孙无忌早已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天子把当年太宗亲自选定的王氏废掉，而另立这个曾经是先帝侍妾的武媚。

所以，自从天子迈进府门的那一刻起，长孙无忌就暗暗告诫自己，不管天子今天采取什么手段，自己绝不在这件事情上妥协半步！

长孙无忌准备了一场丰盛的酒宴款待天子一行，席间一片欢声笑语，气氛显得十分融洽。酒酣耳热之际，兴致甚高的天子当场封官，给长孙无忌宠妾所生的三个儿子都封了朝散大夫之职；此外，还命人把早已准备好的十车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赏赐给长孙无忌，搞得太尉府的上上下下都受宠若惊、拜谢不暇。

不出所料，天子今天果然是“行贿”来了！长孙无忌暗自冷笑，可脸上却不动声色。除了正常答礼并保持一个矜持的微笑之外，天子和武昭仪始终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可乘之机。后来天子终于忍耐不住，只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长孙无忌表示，王皇后膝下无子，这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于朝廷而言，都是一件莫大的憾事，是否可以考虑在其他的妃嫔之中，物色一个德馨才淑者立为皇后？

天子言毕，目光便停留在了武昭仪身上，以此暗示长孙无忌。

然而，让李治和武媚大失所望的是，长孙无忌对这种强烈的暗示却完全不加理会，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李治和武媚的脸上不约而同地罩上

了一层浓重的阴霾，而长孙无忌则是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频频端起酒盅向天子敬酒。

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武昭仪一眼。

这顿酒再喝下去实在是毫无意义了。天子和武昭仪最后带着不悦之色拂袖而去，一场貌似其乐融融的酒宴就这么不欢而散。

长孙无忌领着家眷在府门前恭送天子一行。家眷们大多面面相觑，不知道刚才还欢声笑语的天子为何会中途离席、愤然而去。

天子的銮驾很快就走远了，可长孙无忌依然久久地伫立在雪地里。

人们看见簌簌飞落的雪花转眼就染白了他的须眉。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帝国大佬的眉宇间隐藏着一丝深重的忧虑，也没有人听见他心里发出的那声叹息。

那是一声不安的叹息。

那是一个权倾朝野的老人对未来深感不安的叹息。

[1]　按《唐律》，李治这么做同时触犯了“和奸父祖妾”与“和奸女冠尼”两条大罪；而如果是由皇后出面为夫纳妾，则显得合情合理，且较可掩人耳目。

第五章 永徽政局：长孙无忌的网

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

“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徽”是标帜、美好之意，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高举贞观之治的伟大旗帜，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

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在

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史称他们“同心辅政，上（李治）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徽时代也可以称为后贞观时代。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

唯独有一件事情，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就是晋州（今山西临汾）地震。

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开始，晋州地区就频频发生地震，仅第一次就倒塌了众多民房，压死了五千余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晋州又接连地震，“有声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

世人皆知，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晋王时的封邑，如此龙脉所系之地，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地震，这对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而言，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兆。

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认为，大自然一旦发生灾变，或者发生什么奇异现象，一定是人事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问题。所以当高宗李治针对此事询问他的东宫旧僚、时任侍中的张行成时，老臣张行成就直言不讳地吐露了他的隐忧：“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旧唐书·张行成传》）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于八个字：女谒用事，大臣阴谋。

如果放在许多年后来看，张行成所说的这八个字无疑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因为前四个字说的就是几度浮沉而最终崛起的女人武曌，后四个字说的就是权倾一时而最终垮台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

当然，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帝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相反，李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大臣阴谋”四个字，

更是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他的耳边。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又将制造出什么样的阴谋？

李治对此忧心忡忡，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远虑，以杜未萌！”

张行成说的是对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隐患，自己都必须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并且想办法把隐患挖出来！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样，命群臣上疏进谏，直言朝政得失。随后，李治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旧唐书·高宗本纪》）

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立刻像雪片般飞来。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们的奏疏虽然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只言片语。

就在李治大感不满的时候，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似乎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这是一桩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是时任中书令的褚遂良。

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祐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褚遂良“抑买土地”。所谓抑买，就是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强买的是一个胡人，其时在中书省担任翻译，是褚遂良属下的一个小职员。

此案的性质一目了然，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褚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就是他以“抑买”的方式变相收受下属的贿赂。而无论是哪一种，褚遂良显然都已触犯了法律。根据《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处以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作出判决：罚褚遂良铜二十斤[1]。

这个判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案情属实，褚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第二，量刑结果是以罚代刑，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性处罚，明显有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

可是，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改判褚遂良无罪，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

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谄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当诛！"

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褚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褚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

这就是永徽初年的褚遂良抑买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褚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褚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

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却一无可用呢？"

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

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

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

谁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所以，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说什么政治清明，说什么法律齐备，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

况且，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褚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们公然袒护褚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褚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进而言之，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

思虑及此，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

他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他答案了，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

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讲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

长孙无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说：“讲面子，讲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难免，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敢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顿了一顿，接着说，“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

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

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收取人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还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这像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说的话吗？如果在政风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长孙无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说这样的话，也绝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在这个舅父兼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面前，自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永远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

那一刻，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

可他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李治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

他知道，如今的朝廷并不是存在什么朋党，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真有什么“大臣阴谋”的话，那么这个大臣无疑就是长孙无忌，而他的阴谋就是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

李治悲哀地发现——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长孙无忌才是当今天下的无冕之王！

长孙无忌，无所顾忌！

三个月后，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调动完全证实了高宗李治的想法。

褚遂良回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褚遂良在同州刺史任上被征调回朝，摇身一变就成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不管李治作何感想，反正褚遂良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回长安来了。这个刚刚在两年前因“枉法求财”而被贬的大臣，如今居然一回朝就恢复了宰相之职，并且一手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大权。

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长孙无忌策划的。

现在李治终于明白，原来长孙无忌当时极力建议把褚遂良外放，不过是为了让他逃脱刑事处分、出外暂避风头罢了。

更夸张的是，褚遂良复相不久，竟公然打击报复，把当初弹劾他的御史大夫李乾祐和监察御史韦思谦双双贬黜，一个贬为刺史，一个贬为县令。

面对这一切，李治感到愤怒，也感到无语。

短短四个月后，另一件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无语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这件事就是立储。

永徽三年，高宗李治才二十五岁，他压根就没想过要这么早给自己确立一个皇位继承人。

然而，很多人都在帮他想。

王皇后在想，她舅舅中书令柳奭在想，就连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于志宁这帮人也都在想。

皇帝不急，可这帮人都急。

他们急什么呢？

急他们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储君就是未来的皇帝，谁拥立了皇帝，谁当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起初王皇后一直在李治耳边叽叽歪歪的时候，李治始终装聋作哑，没有理她。后来中书令柳奭就跳出来了，再后来长孙无忌也跳出来了，请立储君的奏疏频频递到李治面前。而长孙无忌一出面，其他宰相无不同声附和，李治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点头同意。

皇帝当到这个份儿上，李治实在是有些沮丧。

自从他当上太子的那天起，他的命运就一直是被别人安排好的，过去他做不了主，如今连储君都是别人立的，连未来都被别人早早规划好

了，李治的内心真是充满了无力感和挫折感。

陈王李忠被立为太子后，李治知道，最为得意的人不是王皇后，也不是柳奭。他们充其量就是感到庆幸而已，谈不上得意。

最得意的人应该是长孙无忌。

道理很简单，他曾经拥立过秦王李世民，也曾经拥立过晋王李治，如今又拥立陈王李忠，一个连续拥立三任太子的人，难道不应该得意吗？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储君生产专业户”的人，难道不应该为自己那无与伦比的智慧、能力和运气而得意非凡吗？

长孙无忌当然可以感到得意。

只不过，他不应该一得意就忘形。

长孙无忌忘形了吗？

是的，他忘形了，而且忘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长孙无忌邀请了一帮当朝权贵，在自己家中举办宴会。酒过三巡、笙歌曼舞之后，长孙无忌环顾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番感慨：“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假如他只把话说到这里，那顶多就算是吹吹牛皮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偏偏没忍住，硬是让下面的话脱口而出：“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朝尚书令、越国公杨素）？”

你们看我今日的富贵，和越公比起来怎样？

在场众人有的比较谨慎，说略有不及；有的则把马屁拍得山响，说超过越公。

长孙无忌笑着看了看他们，最后说了一句：“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刘餗《隋唐嘉话》）

我自认为实在没必要羡慕越公，因为只有一件事比不上他：越公富贵的时候已经老了，而我富贵的时候比他年轻多了！

在此，长孙无忌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傲慢与骄狂之态亦可谓跃然

纸上！

不过他其实没有夸张，因为事实就是他说的那样。他的年龄与太宗相仿，太宗即位后，年未而立的长孙无忌就成了宰相；他妹妹又是太宗的皇后，而他的长子长孙冲又娶了太宗五女长乐公主，几个堂兄弟也分别娶了三个公主，一门出了一宰相一皇后四驸马。迄于永徽，他本人官居宰相已近三十年，如今的天子又是他一手拥立的，一贯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长孙无忌当然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骄傲。

然而，感到骄傲是一回事，把骄傲赤裸裸地挂在脸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古往今来，官场上有许多深谙进退之道的人，往往权势越隆、富贵越甚，就越是低调而内敛，因为他们深知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远的不说，与长孙无忌同朝为官的房玄龄、李靖、李世勣等人，都是深惧盈满、韬光养晦的典型。越到晚年，地位越高，他们就越是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临深履薄之态。

曾几何时，长孙无忌也和他们一样，时时谦恭，处处谨慎，唯恐“权宠过盛”“深以盈满为诫”，而他那个智慧过人的皇后妹妹也是成天给他敲警钟，所以太宗皇帝一直对长孙无忌非常信任，甚至当面称赞他“善避嫌疑”“求之古人，亦当无比”（《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可如今，长孙无忌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自认为已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连皇帝都已被他牢牢掌控，连储君都已被他早早拥立，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又有什么可忌讳的？

他自认为已经是大唐帝国实质上的主宰者，所以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得这么牛、这么拽、这么得意张狂。

此时此刻的长孙无忌，真可谓人如其名，对一切都无所顾忌。

这样一个权倾朝野而又无所顾忌的人，注定是一个危险人物。

因为总有一天，他会让那些得罪过他的人、那些不依附他的人、那些大大小小或隐或显的政敌，通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谁也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长安突然爆发了一起惊天大案。长孙无忌利用此案广为株连，大肆铲除异己，在帝国政坛掀起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血雨腥风。通过这场政治清洗，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无限膨胀，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

一场残酷的政治清洗

这起被长孙无忌利用并扩大化的案件，就是永徽年间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

引发这场大案的人，就是太宗皇帝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

说起这个高阳公主，当时的长安可谓无人不知。因为她除了一贯明目张胆地给老公房遗爱戴绿帽外，婚外情的对象也非常特别，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外高人，不是和尚就是道士，基本没有世俗中人。

房玄龄还在世的时候，房家表面上合家欢乐、太平无事，可房玄龄一去世，房家立刻就热闹了。因为高阳公主闹着要分家，不但要和房家长子房遗直争夺财产，而且还要争夺梁国公（房玄龄的封爵，依例由长子继承）的爵位。

面对这个任性刁蛮的公主，房遗直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告到了太宗那里。太宗勃然大怒，把公主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从此对她的宠爱大不如前。高阳公主恼羞成怒，不但对房遗直恨之入骨，连带着对父皇李世民也怀恨在心。

这件事刚过去不久，高阳公主给老公戴绿帽的事情就彻底曝光了。

事情坏在公主的情人辩机和尚身上。

当时朝廷的御史在调查一起盗窃案时，不知何故牵连到了辩机，从他那里查获了一个镶金饰玉的宝枕，御史们大感蹊跷。倒不是说这个枕头特别值钱，怀疑这个和尚用不起，而是因为这个宝枕是御用物品，为何会跑到一个和尚床上去了呢？

御史随即提审辩机，这个花和尚扛不住，不仅供认宝枕乃高阳公主所赠，而且老老实实交代了他和公主的奸情。御史后来还从辩机的住所查获了价值上亿的各种财物，证实均为高阳公主所赠。

此案一曝光，朝野舆论一片哗然。

公主与和尚通奸！这真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要多八卦有多八卦，要多

香艳有多香艳。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条新闻一直是长安坊间的娱乐头条，成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

太宗皇帝得到御史的禀报后，气得差点吐血。如此龌龊的丑闻居然发生在自己最宠爱的女儿身上，这对太宗无疑是一大打击。可太宗皇帝终究舍不得拿这个宝贝女儿怎么样，只好把满腔愤怒发泄到辩机和其他人身上，不但即刻命人腰斩了辩机，还把高阳公主身边的十几个仆人和婢女全部砍杀。

出了这么一桩大糗事，高阳公主却丝毫没有愧悔之心，而且当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情人被砍成两截后，心里更是对太宗充满了怨恨。所以后来太宗皇帝驾崩的时候，公主的脸上没有半点哀容。

高宗李治即位后，高阳公主没了父亲的管束，越发肆无忌惮。一个辩机被砍成了两截，她又找了一堆辩机，其中有善于“占祸福”的和尚智勖，有“能视鬼”的和尚惠弘，还有医术高明的道士李晃，等等。这帮世外高人抱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勇气和决心，前仆后继地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而高阳公主则是摆出一副誓将婚外情进行到底的姿态，义无反顾地奔跑在追求性福的大道上。

与此同时，高阳公主又不断怂恿房遗爱与大哥房遗直争夺爵位。在她看来，既然连太宗皇帝都管不了她，这个仁弱的兄弟李治就更是拿她没辙，于是拼命追着房遗直死缠烂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高宗李治被这桩无聊官司纠缠得实在受不了，干脆各打五十大板，把房遗爱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把房遗直贬为隰州（今山西隰县）刺史，打算把他们全都轰出长安，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高阳公主一见老公被贬，顿时傻眼了，没想到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她愤愤不平，整天绞尽脑汁，决定要在老公离京赴任之前，想一个办法整垮房遗直。

后来她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

她认为这一次出手，房遗直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梁国公的爵位就非她老公莫属了。

然而，高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准备置房遗直于死地的这个阴谋，竟然变成了一根导火索，莫名其妙地引发了大唐开国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政治清洗，最终不但害死了她自己，害死了老公房遗爱，还给李唐朝廷的一大帮亲王、驸马、名将、大臣惹来了一场杀身流放、

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

高阳公主想出的绝招其实并不高明，但够阴毒。

有一天，她装出一副花容失色、满腹委屈的样子跑进皇宫，向高宗李治告了御状，说房遗直非礼了她。

所谓非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性骚扰。

李治闻言，不禁大为惊愕。这房家究竟是撞了什么邪了，怎么尽出这等龌龊事呢？

高阳公主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妹，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如今居然被人性骚扰了，他这个当皇帝的兄弟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李治准备着令有关部门严加审理。

就在这个时候，太尉长孙无忌站出来了，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桩案子。

堂堂的当朝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天子舅父，居然要亲自主审一桩性骚扰案，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可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长孙无忌要杀的并不是一只鸡，甚至也不仅是一头牛。他是要利用这只上蹿下跳、不知死活的鸡，牵出躲藏在暗处的一大群牛。

长孙无忌是要利用这个案子，把朝中的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其实，从贞观十七年的那场夺嫡之争后，长孙无忌就一直在等这一天了。

因为他拥立晋王，而房遗爱却是众所周知的魏王李泰的心腹，所以长孙无忌自然就对房玄龄也产生了敌意。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房玄龄加入了魏王党，但是在后来长孙无忌拥立晋王的时候，房玄龄显然也没站在他这一边。表面上房玄龄似乎保持中立，可实际上他内心的想法和太宗初期一样，无疑都是倾向于魏王的。所以，从长孙无忌力挺晋王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把房玄龄及其家族视为自己政治上的对立面了。

李治即位后，尽管当年的夺嫡之争已经成为如烟往事，房玄龄也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就已作古，可长孙无忌却始终没有忘记，房家的人曾经是魏王党，曾经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在永徽的头三年里，长

孙无忌对房家的监控从没有一天间断过。在此期间，以房遗爱为圆心，以李唐宗室和满朝文武为半径，所有和房遗爱走得比较近的人，全都落进了长孙无忌的视线，并且一个不漏地列入了他的黑名单。

第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人，是驸马都尉薛万彻。

薛万彻是初唐的一代名将，骁勇善战，早年追随幽州罗艺，后来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忠实部下，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率部与秦王将士力战。李世民成功夺嫡后，念在他忠于其主，且作战英勇，遂既往不咎，仍予以重用。薛万彻没有辜负太宗的期望，在贞观年间平定东突厥、平定吐谷浑、北击薛延陀、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都曾经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薛万彻升任左卫将军，并娶了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此后历任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等军中要职。对于薛万彻的军事才干，太宗李世民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能被天子誉为当世三大名将之一，诚可谓绝无仅有的殊荣！

然而，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薛万彻的辉煌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原因是他的副将裴行方控告他在军中"仗气凌物"，并有"怨望"之语。所谓怨望之语，意思就是政治上的牢骚话。当裴行方与薛万彻就此事当廷对质的时候，据说薛万彻理屈词穷，无法辩白，随后便被朝廷"除名徙边"，也就是开除官职，流放边疆。

薛万彻也许真的是说过一些牢骚怪话，否则也不至于在对质的时候哑口无言。可如果以为他纯粹是因为这个被贬黜流放，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朝中的政治倾轧和派系斗争。因为薛万彻也是魏王党，而且与房遗爱是好友，所以长孙无忌容不下他。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高宗即位，大赦天下，薛万彻遇赦回京，并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被起用为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如果薛万彻能因为这次流放的遭遇而深刻认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他也许可以避开最后的这场灾难。

可惜他没有。就在被重新起用的这一年，薛万彻因足疾回京疗养，其间便与房遗爱打得火热，并再次"有怨望语"。他愤愤不平地对房遗爱

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鼠辈”，意指朝廷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指长孙无忌。

闻听此言，房遗爱当年被彻底粉碎的“拥立梦”再度被激活了。他带着满脸的兴奋之情对薛万彻说：“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旧唐书·薛万彻传》）

房遗爱所说的这个荆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子，时任司徒，他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房遗则，和房家是亲家关系，双方之间的走动自然比较频繁。据说他曾经向房遗爱吹嘘，说他在梦中“手把日月”，也就是一手握住了太阳，一手握住了月亮。我们都知道，当年武士彟为了劝李渊起兵，也曾说在梦中看见高祖摆这个姿势。如今李元景居然也敢摆这么一个正宗的天子姿势，而且还向人吹嘘，这无疑成了他日后被定罪的一个铁证。

在房遗爱的小圈子中，除了薛万彻和李元景，还有一个就是驸马都尉柴令武。

柴令武是柴绍之子，娶的是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当初柴令武和房遗爱都是魏王党的核心成员，魏王被废黜后，柴令武自然也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气。高宗即位后，朝廷给了柴令武一个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刺史的职务，显然有把他排挤出朝廷之意。柴令武更加不爽，以公主身体不适，要留在京师就医为由拒绝赴任。

柴令武就这么赖在京师不走了，据说还长期与房遗爱“谋议相结”。可想而知，他们暗中“谋议”的内容，一方面无非是发泄对当权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失败，很可能确实动了拥立荆王李元景的心思。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被贬黜到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的魏王李泰终于在长久的抑郁寡欢中一病而殁。消息传至长安，长孙无忌发出了数声冷笑。

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刻到了。

彻底肃清魏王党残余势力、全面铲除各种政治隐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阳公主状告房遗直非礼的案件又适时出现，长孙无忌心中暗喜，随即主动请缨，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此案的调查。

从一开始，长孙无忌就根本没打算往性骚扰案的思路上走，而是准备不择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入手，就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的一个政治问题——“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步星次。”（《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高阳公主曾经指使掖庭令陈玄运（内侍省的宦官）暗中窥伺宫禁中的情况和动向，并且观察星象变化。

很显然，光凭这一条，就可以给高阳公主直接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因为禁中是天子所居的重地，而天象的解释权也只能归朝廷所有，所以无论是窥伺禁中还是私窥天象，其行为都已经触犯了天子和朝廷的权威，其性质也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

高阳公主的政治问题一曝光，案件立刻自动升级，长孙无忌顿时信心倍增——既然公主都已经涉嫌谋反了，她老公房遗爱又岂能逃得了干系？

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时，房遗直又主动站了出来，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检举揭发，把他们夫妇平日里的种种不轨言行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令长孙无忌大喜过望。

其实也怪不得房遗直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因为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实在是让他没法做人，房遗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当然要和房遗爱夫妇拼个鱼死网破。

揭发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之后，房遗直知道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必定难以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止不住发出悲凉的长叹：“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房遗爱夫妇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恐将累及房氏一门。

房遗爱一到案，整个案件就彻底复杂化并扩大化了。长孙无忌精神抖擞，对房遗爱软硬兼施，终于从他嘴里把薛万彻、李元景、柴令武等人一个一个撬了出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当然都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满朝文武当中，长孙无忌想让谁三更死，那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为了自保，不仅把他的“战友”全部出卖，而且在长孙无忌的威胁利诱之下，张开血盆大口，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一群无辜的人。他们是：司空、梁州都督吴王李恪，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

力。

这些位尊爵显的朝廷大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该死的房遗爱居然会咬上他们！

仿佛就是一觉醒来，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成了朝廷的阶下之囚，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更成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

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载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

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第二，储君是国家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

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

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甚至足以左右天子的意志。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

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宗室亲王。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原因各有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主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儿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做伴，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把他与李世勣、薛万彻放在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

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但是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除了李道宗，遭长孙无忌陷害的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被一并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极度震惊，而且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匄"同"丐"，是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地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

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更不敢吱声。

大臣们都不说话，天子则泪流满面，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战，以致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吗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旧唐书·薛万彻传》："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执刀者斩之不殊，万彻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绝。"）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

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许多年以后，当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

至此，这起震惊朝野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春天，高宗李治感觉自己像一只羸弱不堪的飞蛾，被缠在一张铺天盖地的黑网中无望地挣扎。而长孙无忌则牢牢盘踞在这张由权力、野心和阴谋编织而成的巨网中央，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色蜘蛛。

李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挣脱这张网。

[1]　按《唐律》，罚铜二十斤相当于徒刑一年。

第六章 武媚的皇后之路

李勣的仕途沉浮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紧继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此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员是：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因避太宗讳，去掉"世"字）；

中书令柳奭；

侍中高季辅、宇文节；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张行成；

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瑗；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其人员构成和相应职位已经变成：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中书令柳奭；

侍中崔敦礼；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瑗；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从这两张名单的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至巅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因为在前一张名单中，九个宰相中起码还有四个（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不是他的亲信；可在第二张名单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六个宰相都是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

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名单上，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这三个人消失了。其中，宇文节因房遗爱案被流放，张行成于这一年九月病逝，高季辅十二月病逝。在此，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长孙无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么被迫出局，要么自己病死，真是令他满心欢畅。

其次，有一个新人赫然出现在了新名单上，他就是崔敦礼。我们都还记得，此人曾代表长孙无忌出面，强硬地拒绝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请求。鉴于他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其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最后，在整个宰相团的人事变动中，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那就是李勣的职位变动——从原本的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促成这一变化的人当然就是高宗李治。这点小小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

要看清这层意义，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而李治并不到任，因此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并且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并咬指出血，以示坚贞不渝之意。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前，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勣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也就是说，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

料到，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做的最妥善的安排。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权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就是褚遂良抑买土地案爆发的几天前，李勣就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在李勣“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对于李勣的主动引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李勣虽然还挂着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另外，就那个“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来说，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一个虚衔，基本上是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谁要是挂上这个头衔，谁在政治上就彻底靠边站了。而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勣自己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

那么，李勣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答案很简单——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要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你要么主动向他靠拢，要么迟早被他搞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一切，李勣看得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宁愿选择隐忍和退让。

但是，隐忍不等于怯懦，退让也不代表无能。

这是策略，是战术，是避敌锋芒、保存实力！

事后来看，李勣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旋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勣当初主动引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把他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诚然，司空也仍旧是个没有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勣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

同时，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借助李勣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了一次反击。

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甚至微弱到引不起长孙无忌的警觉），但是，假如李治连这一点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

因此，李勣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实在是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

有了李勣这样一个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尽管是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天子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那张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子的突围行动中，尤其是在李治准备册立武媚为皇后的关键时刻，李勣果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数第二。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因为它并不是学校班级的座位号，而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威望和地位。

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同时也为了提高李勣的政治威望，高宗李治特意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也就是擢升李勣为司空的不久以后，命人重新绘制了李勣的画像，并且亲自提笔作序。

在画像的序赞中，李治说："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李勣墓志铭》）

李治这段话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因为长孙无忌、褚遂良与李勣同为顾命大臣，可高宗却独独对李勣说"所寄斯重""惟公而已"，这样的表述当然是意味深长的。

对此，李勣自然也是心领神会。

那么，面对天子如此"偏心"的态度和话语，长孙无忌又作何感想呢？

很遗憾，他没有任何感想。

因为他毫无警觉。

此时此刻，长孙无忌正扬扬自得地品尝着独揽朝纲、权倾天下的美妙滋味。他不相信李治敢突围。就算他相信，他也不认为李治有能力突围！

陶醉在成功中的长孙无忌没有意识到，李治的身后不但已经出现了一个李勣，还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即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无穷能量的女人。

有了这两股力量的强势加盟，高宗李治就注定要突破长孙无忌精心构筑的政治包围圈。

天子的政治突围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天子李治的突围行动逐渐展开。

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情，乍一看似乎无关大局，可事实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李治正在尝试着独立行使天子职权。

这一年六月，中书令柳奭意识到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恩宠，迟早会被废掉，所以"内不自安"，主动提出辞去宰相职务。高宗二话不

说，当即把他降职为吏部尚书。就在两年前，柳奭还与长孙无忌等一帮宰相联手，迫使天子将陈王李忠立为太子，企图借此巩固权位、长保富贵，而今却灰溜溜地主动离开相位，这对于天子李治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紧接着在这一年九月，高宗李治召集朝廷五品以上官员进行了一次训话，他说："朕从前陪侍在先帝左右，发现五品以上官员都忠直敢言，要么当廷评论朝政，要么过后呈上密奏，可谓终日不绝，可如今却一片沉默，难道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了吗？诸位为何都不说话？"

从高宗即位以来，如此严肃地批评五品以上高官，似乎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大臣们都分明感受到了天子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他们也知道天子所言确是实情。与进谏成风的贞观政治比起来，永徽朝廷实在是太不正常了，简直可以说是万马齐喑。

可大臣们是有苦衷的。在贞观时代直言朝政得失，通常都能得到太宗皇帝的嘉奖；可在如今的永徽朝廷上，谁要敢议论朝政，谁就等于是对首席宰相长孙无忌指手画脚，也就等于是在与他为敌！试问，谁愿意当这根出头的椽子呢？

况且房遗爱案刚刚过去，与长孙无忌为敌的下场赫然摆在所有人面前。因此，在这场杀一儆百的政治清洗之后，就算满朝文武不会全都去抱长孙无忌的大腿，至少也没人胆敢和他公然作对。

所以，面对天子李治的批评和不满，所有大臣都保持沉默，朝堂上仍旧是鸦雀无声。

李治感觉自己使出了浑身力气，却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是一拳打在了虚空中，连声回响都没有！

高宗大为失望。

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个月后，终于有人勇敢地发出了声音。

这个人叫薛景宣，时任雍州参军，是一个区区的七品小吏。大臣们都不出声，只好轮到小吏来发言了。

这个小吏都说了些什么？

他呈上了一道封事，也就是密封的奏疏，在奏疏中对朝廷刚刚竣工的一项工程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当时，朝廷动用了雍州（京畿地区）的四万一千名民工，历时三十天修建了长安的外郭城，薛景宣可能是觉

得天子在滥用民力，于是在奏疏中说："从前，西汉的惠帝修筑长安城，没多久就晏驾了，现在也来搞这一套，必定没什么好下场。"

李治看到这道密奏的时候，顿时哭笑不得。

这哪是什么进谏，这分明是诅咒嘛！

不过，在满朝文武人人三缄其口的情况下，这个七品小吏的诅咒在李治听来却十分悦耳，毕竟天子的要求总算有人正式回应了。不管薛景宣多么人微言轻，也不管他说得有没有道理，至少敢说话就是好同志。

可是，就在李治大感欣慰的时候，宰相于志宁等人却跳出来替天子打抱不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薛景宣出言不逊，应该诛杀！"

李治看着宰相们义愤填膺的表情，淡淡地说了一句："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当即宣布赦免薛景宣出言不逊之罪。

谁都知道，杀薛景宣是长孙无忌的主意。他不仅要钳制文武百官的言论，还想堵住下级官员的嘴，让朝野上下都不敢发出和他不一样的声音，让天下人都不敢越过他与天子李治直接对话。

可这一次，李治毅然反抗了长孙无忌的意志。

通过永徽五年发生的这几件事，李治的信心和勇气正在逐步增强，他的姿态也正在变得强硬。接下来，只需要一个适当的时机和突破口，李治就能够拨开阴霾，重见天日！

时机很快就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高宗的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现了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

继"女婴猝死案"，武媚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

事后来看，风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刮起来的。

武媚所控告的这种巫术称为“厌胜”，方法是因厌憎某人而制作其形象——或泥塑木雕，或画在纸上——然后刺心钉眼，系手缚足，以此诅咒对方早日死于非命。

这是一种很歹毒的巫术，论罪也相当严重。按照《唐律》，敢玩这种“厌胜”之术的人可以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依律当斩。

没有人知道武媚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皇后的母舅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刺史。柳奭刚刚走到扶风（今陕西扶风县），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员指控他“漏泄禁中语”，于是再度把他贬到更为偏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

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天子李治为了让武昭仪能够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

此举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抵制。唐依隋制，后宫的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为了一个武媚而特设一个宸妃之号，显然不合旧制，无据可依。侍中韩瑗与中书令来济以此为由，在朝会上与天子面折廷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生生顶了回去。

谁都知道，韩瑗与来济之所以敢和天子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无非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而看上去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后，之所以还能牢牢占据皇后的宝座，也是因为她背后站着长孙无忌！

此时此刻，高宗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这场后宫之战向长孙无忌的超级权威发出挑战，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就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

永徽六年已经是李治君临天下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

对此时的李治而言，如果连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实至名归的身份都办不到，如果连选择谁来当皇后的权力都没有，那他还算什么皇帝？

如果不能通过这件事情让长孙无忌认识到他李治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立掌控朝政的能力，那么李治还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做到什么时候？

所以，李治决定向长孙无忌宣战，无论如何也要把武媚扶上皇后之位，无论如何也要夺回他的天子权威！

至此，这场后宫之战的熊熊战火终于从内宫蔓延到了外朝。表面上看，这是王皇后与武媚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一场废立之争，而实际上，这是天子李治与长孙无忌（及其背后的宰相团）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进行的一场政治博弈。

永徽年间这场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后宫之战进行到这里，其性质已经悄然蜕变，从女人们的战争演变成了男人们的战争。而且战争的规模也已经扩大升级，其后果不仅将决定这几个女人后半生的命运，并且将决定整个帝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向长孙集团宣战

高宗李治准备向长孙无忌宣战，决心固然是很大，可当下的政治现实又不免让他有些心虚。因为满朝文武当中，除了一个司空李勣，几乎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信。反观长孙无忌，不但牢牢掌控着整个宰相团，而且通过房遗爱案大肆清除异己、杀戮立威，使得文武百官人人俯首帖耳、个个噤若寒蝉。

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高宗又如何打赢这场仗呢？

这不仅是天子李治的忧虑，同时也是昭仪武媚的忧虑。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

有需求就有供给。

这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就在高宗李治因势单力薄而万分焦虑的时候，朝中已经有一批素怀野心的政客，敏锐地觉察出了天子的需求。他们是：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丞袁公瑜

等。

李义府，出身于寒门庶族，据说长相俊美，能写一手漂亮诗文。他于贞观中期登第入仕，不久就因刘洎、马周的推荐出任监察御史。也许是因为人和文章都太漂亮了，所以当时有人风传他和刘洎、马周搞同性恋，说他以“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旧唐书·李义府传》）。

由于李义府才华横溢，而且外表温良谦恭，逢人说话必和颜悦色、面带微笑，因此很多人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以为他是一个厚道人。直到许多年后他当权得势，整起人来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物，因此给了他四个字的评语——“笑中有刀”，还赠给他一个外号——“李猫”。

这就是成语“笑里藏刀”的出处。李义府的这个性格特征跟后来玄宗时代的权相李林甫颇为神似。李林甫也是因为表面上总是笑语温存，可背地里却拼命给人捅刀子，所以人们给他的赠语是“口蜜腹剑”。李义府和李林甫，这一前一后的两个唐朝宰相，不仅名字的读音类似，所处的时代相近、职位相同、为人处世的性格类似，而且连他们给后世贡献的两个成语都如出一辙，以致经常被人张冠李戴、弄错出处，说起来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贞观年间，刚刚出道的李义府由于担心家世贫寒，难以飞黄腾达，曾赋诗一首，自抒心志。此诗名为《咏乌》：“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太宗李世民听说后，当即表态：“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隋唐嘉话》）

李义府受宠若惊，从此牢记太宗勉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攀上帝国政坛的最高枝，在上面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

晋王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李义府得到重用，进入东宫担任了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当时同侍太子左右的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旧唐书·李义府传》）。

可李义府没有料到造化会如此弄人。李治当上皇帝后，他只是从太子舍人变成了中书舍人，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大步升迁。几年后，当初和李义府齐名的来济因为攀上长孙无忌这根高枝，很快就青云直上，位登宰辅，可李义府却一直原地踏步，始终在中书舍人这根老枝上不咸不淡地晃悠。

更让李义府感到悲哀的是，到了永徽六年，不知道他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朝廷忽然下了一纸敕令，要把他贬到偏僻荒凉的壁州（今四川通江县）去当司马。太宗当年的勉励言犹在耳，可对如今的李义府来讲不啻莫大的讽刺。连这赖以栖身的唯一枝丫都快断了，还奢谈什么“全树”呢？

由于职务的便利，李义府在贬谪令下达门下省之前便已获悉，于是惶惶不可终日，连忙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为人工于心计，且因脖子上长了一个肉瘤，因此被人称为“智囊”。“智囊”看着李义府一脸惶悚的表情，不禁拈须微笑，半晌才说：“皇上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一直犹豫不决，原因就是一帮宰相从中阻挠。李君若能襄助皇上和武昭仪达成这个心愿，必定可以转祸为福。”

李义府闻言，当即茅塞顿开，转忧为喜。当天，李义府顶替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夜班，然后向高宗呈上了一道奏章，请高宗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以满足朝野上下的共同愿望云云。高宗阅后，顿时喜出望外，连夜召见李义府，和他进行了一番密谈，随后赏赐珍珠一斗，并让他留任原职。

武昭仪听说朝臣中终于有人站出来帮她说话了，更是喜上眉梢，随即暗中派人前去和李义府接触，自然又是一番优厚的赏赐，不久又让高宗把李义府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

在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待了整整六年，李义府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仕途的春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义府、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人迅速团结在了天子和武昭仪周围，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随时准备与长孙无忌及其宰相团一决雌雄。许多年后，大周女皇武曌仍然念念不忘这批人当年的“翊赞之功”，特地下诏追赠了官爵，并给他们的儿子们一一赏赐了封邑。

眼见天子用最短的时间就纠集了一帮政治打手，并且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召集他们的人，秘密举行了一个碰头会，谈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在会上，长安令裴行俭一脸义愤，声称如果让武昭仪当上皇后，“国家之祸必由此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就是这句忧患之言，为裴行俭惹来了祸端。

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武媚的掌控之中。

秘密会议刚一开完，一直在暗中侦察的大理丞袁公瑜就把会议详情一五一十地通报给了武媚的母亲杨氏。

武媚听到这个消息后，嘴角掠过了一抹冷笑。

几天后，裴行俭就被贬出了朝廷，并且一下就被踢到了帝国最辽远的西北边陲，担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都督府长史。

这一贬谪形同流放。如果换成一个意志不坚的人，也许只能在条件艰苦的大漠西域抑郁而终了，可裴行俭不是一般人，他非但没有怨天尤人，反而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投入到了经略西域的事业中。此后十年间，裴行俭在西域边陲多有建树，终于在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被朝廷任命为安西大都护。在此任内，裴行俭统驭有方，政声卓著，使得“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旧唐书·裴行俭传》）。

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裴行俭先后提拔并重用了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郭待封、李多祚等一大批军事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英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将领。此外，在裴行俭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刺史、将军还有数十人之多。而裴行俭本人，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初唐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

裴行俭的被贬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着高宗和武昭仪已经向长孙集团发出了挑战。而就在贬谪裴行俭的几天后，也就是这一年的九月初一，高宗又忽然把许敬宗擢升为礼部尚书。众所周知，礼部主管朝廷的册封事宜，高宗让许敬宗担任礼部的一把手，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冲着皇后废立去的，同时也等于是在向长孙集团示威。

说起来，这个许敬宗也是一个老资格的政客了。早在隋朝末年，他就与魏徵同在李密帐下任职；归唐后，许敬宗又以文才见重于李世民，成为朝野倾慕的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在当时可谓风光十足。可到了贞观年间，许敬宗却一直官运不畅——早年的同僚们都已纷纷拜相，甚至连许多年轻后进也已经身居高位，可他却几起几落、屡遭贬谪，始终进不了帝国的权力中枢。这始终是早年得志的许敬宗最大的一块心病。

高宗即位之初，许敬宗以东宫旧臣身份，一度升任礼部尚书，眼看距离宰相之位已经不远，可他时运不济，不久又因事被贬，外放为郑州刺史，到了永徽三年才又回朝担任卫尉卿。

而复拜礼部尚书的这一年，许敬宗已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花甲老人。

此时此刻，他那双浑浊的老眼依然死死盯着宰相之位。

许敬宗知道，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再蹉跎了。所以，他现在最迫切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和长孙无忌死磕，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拥立武昭仪为皇后。

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拜相的梦想，抵达仕途的巅峰！

越演越烈的政君臣博弈

永徽六年九月的一天，高宗李治在散朝之后，忽然点了几个宰相的名字，让他们到内殿，说有要事相商。

被点到名字的人是：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

而其他三个宰相韩瑗、来济、崔敦礼则不在被召之列。

对于天子召见的目的，四个宰相都心知肚明——皇上要摊牌了。

进内殿面圣之前，他们在政事堂小聚了片刻，准备商量一个对策。

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重大事件，四个宰相表情各异。

长孙无忌眉头紧锁，始终一言不发。

李勣则是一会儿闭目养神，一会儿抬头望天。

于志宁表情暧昧，目光闪烁。

只剩下一个褚遂良带着忧愤不安的表情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终于无奈地意识到——和天子死磕的光荣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自己的肩上了！

他知道，在即将与天子展开的这场对决中，长孙无忌是己方的大佬，是主帅，是最后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上场的；而李勣呢，看他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无疑是和天子一个鼻孔出气的；至于这个老滑头于志宁，从头到尾都在躲避他的目光，八成也是指望不上了。

褚遂良最后用一种慷慨赴义的口吻打破了沉默："皇上今日之召，大半是为了皇后废立之事，皇上既然心意已决，触逆龙鳞只有死路一条。太尉是天子舅父，司空是开国功臣，所以你们不宜进谏，不能让皇上有杀元舅和功臣之名。只有遂良起于草茅，对帝国并无汗马功劳，而今又忝居宰辅之位、身受顾命之责，若今日不以死相争，有何面目去见先帝？"

褚遂良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表面上好像是要同时保护长孙无忌和李勣，怕他们被皇帝怪罪，其实他保护长孙是真的，保护李勣则纯属扯淡！说白了，他无非是想堵住李勣的嘴，希望他不要开口罢了。

这几句话说得实在漂亮，所以他话音刚落，长孙无忌就立刻投来赞赏和鼓励的一瞥。

李勣一听，心中暗笑。好你个褚遂良，居然不让我说话？行，不说就不说！李勣马上站起来，借口身体不适，要先行告辞，然后拍拍屁股就径直出宫了。

李勣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天子这回是志在必得，长孙无忌这帮人想跟天子硬拼，最后只能是自取其咎。所以，与其跟他们撕破脸面，轻易暴露自己的立场，还不如表面上弃权，作隔岸观火之态，等到双方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再投天子一票。

至此，四个宰相都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博弈姿态——长孙无忌老谋深算，按兵不动；褚遂良摩拳擦掌，准备冲锋；李勣貌似弃权，实则保存实力；而于志宁则是立场模糊，态度暧昧。

李勣走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三人随即进入内殿。

看着他们姗姗来迟的身影，天子李治显得很不耐烦。他直直地盯着长孙无忌，开门见山地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

褚遂良趋前一步，挡住了天子直视长孙的目光，朗声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在中国古代，男人想要把老婆休掉，必须要有圣贤规定、社会公认的七种理由，这七种理由称为"七出"或"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大戴礼记·本命》）

也就是说，至少要具备这七条理由中的一条，才可以休妻。

高宗始终强调的废后理由，就是其中的第二条——无子。

诚然，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社会，这个理由确实是很充分的。但是，“无子去”这个休妻理由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有了附加条件，那就是：只有当女人过了五十岁而仍然无子，才可以被休掉。而此时的王皇后才二十几岁，谁敢说她一辈子都不能生育呢？

因此，褚遂良才会理直气壮地说“皇后未闻有过”。

可是，就算这个废后理由不成立，高宗应该也还有其他理由才对，比如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杀婴案和厌胜案，王皇后不是都难逃干系吗？有这么好的废后理由，高宗为何只字不提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证据不足。

也就是说，在这两起案件中，王皇后尽管都有嫌疑，却都不能坐实。换言之，高宗对这两起案件可能一直抱有疑问；或许在心里面，他并不能完全排除武媚陷害皇后的可能性。这样的疑虑很可能导致了他的心虚，所以他不敢公然用这两项罪名作为废后的理由。

高宗的理由被褚遂良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而褚遂良提出的两大理由，却又让高宗无力反驳。

第一，说皇后系出名门。这确是事实，而且此言还有暗示武昭仪家世卑微的意思。

第二，说皇后是太宗皇帝亲自选定的，不能轻废。这个理由当然更是冠冕堂皇。其言下之意就是——皇上您既然一向以仁孝著称，怎么能随意做出违背先帝意志的不孝之举呢？

面对褚遂良的强势反击，天子李治哑口无言。

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铁青着脸拂袖而去。

当天的对决以天子的失败告终。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对视一眼，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于志宁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庆幸这难挨的一天总算过去了。

可是，难挨的日子并没有过去。

天子睡了一宿，仿佛把昨天的理屈和尴尬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天又把几个宰相叫到了内殿，还是那两个字——废后。

很显然，天子开始耍赖皮了。

他要跟长孙和褚遂良打疲劳战——反正我就是要废王立武，你们今天不答应，我明天再提，你们明天不答应，我后天再提，跟你们耗到底，看谁耗得过谁！

这一天，褚遂良照例打前锋。可是面对天子的死缠烂打，褚遂良明显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用一种面红耳赤的激愤神情对高宗说："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也请选择天下的名门望族，何必一定要娶武氏？武氏曾经侍奉先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天下万民的耳目，又岂能轻易蒙蔽？千秋万代之后，世人将如何评价陛下？愿陛下三思！臣今日忤逆陛下，罪当万死！"

褚遂良慷慨陈词之后，似乎被自己的一腔忠义感动了，忽然退到殿前，放下手中的朝笏，解开头巾，然后一边用头撞击台阶，一边颤声高喊："臣把朝笏还给陛下，乞求陛下让臣告老还乡！"

殷红的鲜血顺着褚遂良的额头汩汩而下。

那一刻，长孙无忌蒙了。

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一下子脱离了他的掌控。

很显然，褚遂良的表现过火了。

当众揭穿天子的隐私，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又以辞职相要挟，更是恶化了本已剑拔弩张的事态。褚遂良这么做，不仅把他自己推上了万丈悬崖，而且把天子和长孙无忌全都逼到了绝地死角，让每个人都没有了转圜的余地。

完了。长孙无忌在心里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褚遂良这回彻底完了。没想到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也有这么糊涂的时候！

站在一旁的于志宁看着这令人震惊的一幕，顿时脸色煞白，细密的汗珠布满了他的额头和鼻尖。

而此时此刻，坐在御榻上的天子更是青筋暴起、怒目圆睁。

他涨红着脸似乎要说什么，可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褚遂良的话不仅让李治感到极度愤怒，而且让他无比难堪。

他万万没有料到，那层最让人羞于启齿的窗户纸，居然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褚遂良捅破了！

这一刻，高宗李治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天下人面前裸奔。

“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岂可蔽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褚遂良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打在了他的脸上，李治感觉自己的皮肤有一种被烧灼的刺痛感。

他恨不得现在就杀了褚遂良。

可他还是忍住了。

李治最后艰难地挥了挥手，用一种嘶哑的嗓音喝令左右把褚遂良拉出去。

“何不扑杀此獠？”

就在人们还没从这血溅丹墀的一幕中回过神来的时候，一个异常激愤的女人的声音，又猛然从珠帘后面飞了出来，像一根尖锐的金针同时刺进所有人的耳膜。

这是武昭仪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如此突兀而又如此狠戾，以至于在场众人无不悚然一惊，就连天子的脸上都充满了错愕。君臣议事，天子却让一个女人躲在珠帘后面偷听，而且这个女人还公然发出咆哮，扬言要诛杀大臣，这实在是令人既尴尬又震惊。

现场的气氛就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于志宁脸上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正在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最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发言了。

这个饱经沧桑的帝国大佬，用一种沉稳而淡定的表情冲着珠帘背后瞟了一眼，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高宗君臣的第二次交锋，就在长孙无忌的这句话中草草收场。

一切看上去都和昨天没什么两样。

天子照例拂袖而去。

众人照例默然而退。

关于皇后废立的问题，照例是无果而终。

唯一不同的，就是内殿的台阶上赫然多出了几点血迹。

这几点血迹似乎是一个征兆，预示着在这场越演越烈的君臣博弈中，长孙集团开始要付出代价了。

那将是血的代价。

听说天子废后的态度极其强硬，而褚遂良在进谏的时候居然血染丹墀，侍中韩瑗再也坐不住了。几天后，韩瑗趁着上奏政事的间隙，又对废后一事进行劝谏，说到关键处，韩瑗禁不住涕泗横流。可是，就连褚遂良的鲜血都无法打动高宗了，韩瑗的泪水当然更是无济于事。李治根本听不进去，很不耐烦地把他打发了。

第二天，韩瑗又谏，再次摆出一副悲不自胜的表情，李治大怒，喝令左右把他架了出去。

韩瑗碰了几次钉子，仍不死心，随后便又呈上一道奏疏，说如果天子不慎重考虑，将“为天下所笑”“恐海内失望”，并用历史上著名的红颜祸水妲己、褒姒影射武昭仪，还说什么“使臣有以益国，菹醢之戮，臣之分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只要他的行为有益于国家，就算皇帝把他剁成肉酱，也是他分内应得的。然而李治却丝毫不为所动，看过奏疏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除了韩瑗，中书令来济也上疏力谏，李治照旧视而不见。

至此，七个宰相中有四个毅然决然地站在天子的对立面，而左仆射于志宁则一直噤若寒蝉，不敢表态，另一个宰相、时任中书令的崔敦礼也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动静，显然也是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立场，投了弃权票。

与此同时，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勣意识到——长孙集团的火力已经耗尽，再也玩不出花样了，而天子在长孙集团的强力阻击下也已是焦头

烂额。

这种时候，自然就该轮到他上场了。

这就叫后发制人！

于是李勣便入宫去觐见天子。

终于看见李勣露面了，李治的脸上露出了无比欣慰的笑容。他迫不及待地对李勣说：“朕想立武昭仪为后，可褚遂良却坚决反对。他既然是顾命大臣，莫非这件事只能照他的意思，就这么算了？”

李治之所以故意强调褚遂良顾命大臣的身份，无非是想提醒并暗示李勣——你也是托孤大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你来发话，朕才有底气。

李勣显然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他趋前一步，用一种举重若轻而又毋庸置疑的口吻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李治笑了。

要的就是这句话！

这场旷日持久胜负难分的后位之争，终于在老臣李勣这句四两拨千斤的话中一锤定音。

随后，礼部尚书许敬宗数度前往太尉府，劝长孙无忌放弃立场。这无疑是许敬宗代表天子在对长孙无忌发出最后通牒。

可许敬宗的劝说还是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厉声驳斥。

许敬宗碰了一鼻子灰，转而在朝中到处放话，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个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尚且打算换掉老婆；何况天子打算另立皇后，跟别人有何相干，竟然妄加非议？

许敬宗这话虽然有点粗俗，但是话糙理不糙。尤其在武媚听来，许敬宗的“换妻”高论简直像歌声一样动听。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这句话，武媚当即命左右亲信到处传播，一意要让它成为朝野上下众口一词的舆

论。

九月的一个清晨，霜露浓重，一驾马车从长安的明德门辚辚而出，孤单地行驶在铺满落叶的官道上。

马车的方向是东南，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潭州（今湖南长沙市）。

车中的人双目微闭，神情疲惫，脸色就像道路两旁随风飘舞的落叶一样，显得枯黄而了无生气。

他就是褚遂良。

他现在的职务已经不再是朝廷的右仆射了，而是潭州都督。

深秋的阳光透过半掀的车帘照射进来，斑驳陆离地打在他的额头上。随着马车的晃动，他额前那道新添的疤痕看上去就像一条正在困境中挣扎的褐色蜈蚣。

新皇后：武媚

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唐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资治通鉴》卷二百）

至此，这场旷日持久、震动中外（宫中和外廷）的后宫之战，终于以王、萧的全面失败而落下帷幕。

说王、萧二人"谋行鸩毒"，这实在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有人去关心天子所言是否属实了，更没有人敢替这两个被天子抛弃的女人说话。满朝文武如今关心的只是——如何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中，迅速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十月十九日，大唐帝国的文武百官联名上疏，请求让武昭仪正位中宫。

同日，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册立武昭仪为皇后。

在这道历史上著名的《立武昭仪为皇后诏》中，李治冠冕堂皇地向天下人隆重推出了他的新皇后武媚，诏书称：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文》卷十一）

这道诏书的大意是：武氏门第煊赫，功勋彪炳，出身高贵。过去因才德出众被选入宫中，美誉之声溢满宫闱，德行之光照耀掖庭。朕昔日为储君时，蒙受先帝慈恩，常得侍奉左右，朝夕不离。在内宫之中，始终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身处嫔妃之间，从未与人耳目交接。先帝有感于此，每每赞赏称叹，遂将武氏赐给了朕，就像汉宣帝把王政君赐给太子一样。现在，可以立她为皇后。

很显然，诏书中这些肉麻辞藻和吹捧之词都是文臣们帮天子堆砌的，纯属政治上的空话套话，不值一哂，关键是“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这一句，明显是出自高宗的授意，否则没人敢这么编排。

不过很多人都知道，所谓“遂以武氏赐朕”只不过是李治对天下人撒的一个弥天大谎。他试图以此淡化武媚曾经是先帝侍妾的尴尬事实——只要把武媚说成是先帝所赐，那么她的身份就不再是李治的庶母，而是名正言顺的妻妾了，立武媚为皇后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有了。

然而，这个美丽的谎言实在是编得有些牵强，它固然是把李治和武媚的关系洗白了，可同时却把太宗李世民的脸给抹黑了——很难想象天底下会有这样的皇帝和父亲，居然不惜违背礼教人伦，把自己的女人（而且是已经临幸过的）主动送给儿子当老婆！

不过太宗皇帝既然已经作古，死无对证，这件事就成了一桩无头公案，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只要高宗能把谎扯得理直气壮，扯得正气凛然，扯得脸不变色心不跳，扯得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那又有谁敢公然指责呢？

再说了，有了褚遂良被贬的前车之鉴，百官们谁愿意步他后尘？他们当然乐得与高宗皇帝一起圆谎，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和胜利的果实，一起为武昭仪的苦尽甘来拊掌相庆，一起为她的正位中宫举手欢呼。

永徽六年这场后宫之战的结果，传统史家往往把它归功于（或者归罪于）武曌的个人因素。在传统的解读之下，武曌纯粹是因为施展了狐媚之术迷惑高宗，并且处心积虑陷害皇后，不遗余力拉拢朝臣，最终才得以正位中宫。而高宗李治则被普遍描述成一个毫无主见、纯粹被武曌利用的昏庸皇帝。

事实上，这未免高看了当时的武曌，也未免低估了当时的李治。

解读历史都难以避免事后诸葛亮。人们往往是因为武曌日后缔造了一个女主登基、牝鸡司晨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李治的确对日后阴盛阳衰的政治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才会以此倒推，从一开始就把武曌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把李治始终看成是一个懦弱的丈夫和无能的皇帝。

可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目光，因为它把动态的历史静态化了，也把复杂多变的人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武曌固然是一个自信、坚忍、工于心计、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人，但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在不同的时势和情境当中，她的生命能量必然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在正位中宫之前，无论她有多大的野心和阴谋，其力量和手段也终归是有限的。所以，不能认为她当时就已经把李治玩弄于股掌之中。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逐渐成长、逐渐成熟的过程，武曌当然也不例外。从深宫中的武才人，到感业寺里的女尼，再到二度入宫的武昭仪，她强势的人格特征是一点一滴养成的，她巨大的生命潜能也是一步一步开发的。对于当时的武曌来说，未来如同一条迷雾中的河流，谁也不知道前面是暗礁、激流，还是深不可测的漩涡，所以她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绝不可能以一种未来女皇的姿态无所顾忌地往前冲！

武曌如此，李治亦然。

永徽初年，李治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帝王，他渴望像父亲太宗那样建功立业，也渴望走出父亲的阴影，缔造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元舅长孙无忌却把他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幼主，不仅架空了李治的君权，而且以他的巨大权威牢牢束缚着李治。

长孙无忌的身份是绝无仅有的——天子舅父、开国功臣、顾命大臣、首席宰相，这些特殊身份就像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光环在他身上交织闪耀，令朝野上下的所有人都不敢直目而视。可想而知的是，长孙无忌身上有多少重光环，李治头上就会有多少重紧箍咒。所以，血气方刚的天子李治必然会有突围的欲望和冲动，而武曌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无疑给李治压抑已久的欲望和冲动提供了一个释放的机会。

因此，在废立皇后这件事上，与其说李治是一个被炽热的爱情烧坏了头脑的男人，一个纯粹被武曌利用和支配的昏懦之君，还不如说他是

在借机消解长孙无忌的权威，并且在此过程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进而巩固岌岌可危的皇权。

武曌固然是利用了李治对她的爱夺取了皇后之位，可李治又何尝不是以爱情的名义，夺回了一度旁落的天子之权？

说白了，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说白了，在永徽年间这场争位夺权的大战中，李治和武曌不仅是一对被火热爱情吸引到一起的恩爱夫妻，更是一对被相同利益捆绑到一起的政治拍档！

后宫大战尘埃落定之后，满朝文武全都义无反顾地站到了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媚一边，只剩下长孙无忌、韩瑗、来济三个宰相终日愁眉不展，忧惧难安。

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刺激他们脆弱的神经，皇后武媚又故意在天子下诏的第三天，上了一道奏疏，说：“陛下前些时候打算立臣妾为宸妃，韩瑗和来济为此事与陛下面折廷争，如此行为实属难能可贵，诚可谓深情为国！臣妾乞求对他们加以褒赏。”

这道奏疏就像是一个无比辛辣的嘲讽，又不啻打了这两个大佬一记响亮的耳光。

李治看到奏疏，忍不住乐了，赶紧拿给韩瑗和来济看。

看着这两个宰相难堪而窘迫的表情，李治的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报复的快意。

两个宰相实在受不了这等羞辱，过后便频频向高宗提出辞职，可李治自始至终就是两个字——不许。

现在知道引火烧身了，想抽身而退了？

没门！

当初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犯颜死谏的劲头哪里去了？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初一，长安城仿佛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太极宫隆重举行了新皇后武媚的册封大典。忙碌的礼官和辛勤的宫人们从十天前就开始精心筹备这场盛典，他们不仅竭尽全力让太极宫的每个角落都变得焕然一新、流光溢彩，而且还从各地采集了数十万朵金黄色的龙爪寒菊，把这座森严肃穆的皇宫装点得妩媚多姿、富丽堂皇。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蓦然照破东方天际的斑斓云霭，把温暖的光芒洒向冬日的长安，太极宫中早已是万众云集、旌旗飘扬。朝中的文武百官、外廷与内宫的诰命夫人以及在京的四夷酋长和各国使节，从天色微明的时候起就已经守候在皇宫的肃义门下，用一种毕恭毕敬的神态和望眼欲穿的目光，等待着朝见大唐帝国的新皇后武媚。

此刻，皇后的銮驾和仪仗正浩浩荡荡地从内殿走向肃义门。伫立在道路两侧的后宫嫔妃们，纷纷带着一半欣羡一半嫉妒的表情向新皇后行注目礼。她们看见华盖下的皇后武媚头戴凤冠，身着霞帔，脸上始终荡漾着一个雍容而华美的微笑。

当盛妆华服的皇后武媚终于出现在肃义门巍峨雄伟的城楼上时，整座太极宫霎时钟鼓齐鸣，等待已久的人们怀着无限神往的心情纷纷把目光投向城楼。那天有风从终南山的方向吹来，人们看见皇后武媚的衣袂和裙裾在风中款款拂动，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彩翼鸟。

许多初次目睹皇后仪容的官员和藩使都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发出了一声惊叹。让他们感到讶异的是，这个新皇后的容貌虽然谈不上什么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但是她的气质、风韵和神采却分明让人有一种超凡出尘、绝世惊艳之感，尤其是她身上自然散发出的那种摄人心魄的女性魅力，更是绝大多数妇人所没有的。

在响彻云霄的钟鼓之声中，司空李勣和左仆射于志宁代表朝廷向武媚奉上了皇后玺绶。这一刻，武媚的眼前忽然闪现出十七年前那个大雪飘飞的冬日。她看见那个十四岁的女孩被一驾马车接进了皇宫，女孩的脸上一半矜持遮掩着一半忧伤，她听见女孩说——见天子庸知非福？

这一刻，武媚耳旁又响起了感业寺的晨钟暮鼓。她看见那个青丝落尽、素面朝天的女尼独自一人从感业寺凄冷的庭院中走过，宽大的缁衣被大风鼓起，看上去就像一只孤单的飞鸟。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彻夜无眠的女尼总是铺开一纸素笺，任汹涌的泪水与凄凉的笔墨一起落下，一遍遍倾诉着绵绵不绝的爱断情伤……

这一刻，十七载的悲喜光阴恍如变幻的流云一样在武媚记忆的天空中飘浮，而永徽六年的真实阳光已经不可阻挡地刺破云层，映红了皇后

武媚灿若桃花的脸庞，还有她头上那顶金光闪闪的凤冠。天子李治微笑着携起皇后的手，一起向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万千臣民挥舞致意，人群立刻报以潮涌般的欢呼和祝福。

想当年，十四岁的才人武媚只是一株含苞待放的青涩花蕊，被随意栽植在掖庭宫的某个角落里寂寞成长；而今天，三十二岁的皇后武媚已经以一种母仪天下的姿态伫立在肃义门上，接受万众的顶礼膜拜。

这一天的册封大典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那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凤冠，就像是一朵娇艳而丰满的金黄牡丹，灼灼盛开在帝国的宫阙之巅，注定会让许多大唐臣民终生难忘。

第七章 走向权力的巅峰

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武媚正位中宫后，被废为庶人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就坠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她们被囚禁在暗无天日、蛛网盘结的冷宫别院中，与她们日夜相伴的，只有横行无阻的跳蚤、蟑螂和老鼠。宫人们起初还会听见她们凄厉的哭喊声和疯狂的叫骂声，可是没过多久，漆黑潮湿的别院中就逐渐没了声息。

忽然有那么一天，天子李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皇后和萧淑妃。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李治早已对她们爱断情绝，可还是无法彻底割舍对她们的想念。

李治决定去看一看她们。

然而李治绝对不会想到，就是这次带有念旧色彩的探访，最后居然把王、萧二人一下子推进了死亡的深渊。

那天高宗李治悄悄来到别院，看见囚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宫室门窗紧闭，都从外面钉死了，只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用来递送食物。李治一看之下，顿时悲伤不已，禁不住高声呼喊：“皇后、淑妃，你们都还好吗？你们在哪里？”

天子的这声呼喊犹如漫漫黑暗中的一簇亮光，瞬间照亮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早已绝望的内心，她们挣扎着扑到门后，声泪俱下地说：“臣妾已经沦为罪人宫婢，怎敢还有尊称！”

李治闻言，也忍不住潸然泪下。王、萧二人稍停片刻，又说：“陛下如果还念及过去的情分，能够让妾身等起死回生、重见天日，乞求陛下将这座别院命名为‘回心院’。”

李治频频点头，说：“会的，朕会马上处理的。”

然而，李治此行并没有逃过武媚的眼睛。

当李治前脚刚刚回宫，有人后脚就向皇后作了禀报。听到宫中眼线的密报时，武媚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回心院？

武媚在心里发出冷笑，还想起死回生、重见天日？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看来，对付这两只并未真正驯服的“狮子骢”，武媚有必要施展她的驯马三招了。她已经用“铁鞭”把她们逐出了后宫，打入了黑牢；现在，她要亮出她的“铁锤”，让她们生不如死；最后，她要亮出她的“匕首”，把她们置于死地！

所以，还没等高宗李治把回心院的牌匾送到别院，皇后武媚派遣的使者就到了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面前。他们严格按照皇后的吩咐，先是将王氏和萧氏捆起来各自杖打一百，接着又残忍地砍掉她们的手足，最后居然匪夷所思地把她们投进了酒瓮里。

用武媚的话说，这叫“令二妪骨醉！”（《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武媚以天子的名义让使者前来宣读刑杖诏书时，王皇后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面对终于到来的酷刑和死亡，王皇后忽然变得出奇地镇定。

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当她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时候，心里反而充满了焦躁和恐惧，可如今与死神直面相对，反倒变得平静和坦然了。

王皇后神色自若地看着武媚派来的使者，说：“祝愿皇上万寿无疆！

祝愿武昭仪恩宠永在！死，是我分内的事。”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皇后用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撑起了最后的高贵与尊严，同时也用一种平静的嘲讽表达了对武媚彻头彻尾的蔑视——到死，我也不认为你是什么皇后！

在我眼中，你永远都是昭仪——一个永远比皇后卑微的昭仪！

跟王皇后比起来，萧淑妃在临死前就没有那么平静和超然了。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对武媚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姓武的女人是妖精，才会作恶如此！愿我来生投生为猫，她投生为鼠，生生世世，都让我掐住她的喉咙！”

也许是萧淑妃在黑牢中与老鼠打仗已经打出了经验，所以才会随口发出这样的诅咒。可她恐怕不会想到，这个脱口而出的诅咒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

据说，从萧淑妃发出诅咒的这一天起，皇后武媚就禁止宫中养猫，仿佛萧淑妃真的已投生为猫一样。更有甚者，在武媚整个漫长的后半生中，萧淑妃临死前的诅咒就像一个巨大的梦魇，始终把她紧紧缠绕。在那些可怕的梦境里，萧淑妃化身为鬼魅，披头散发，手足流血，一次次扼住了武媚的咽喉，要向她复仇索命。

据说武媚被这个梦魇搞得寝食难安，命巫师多次作法禳解都没有效果，后来只好迁居大明宫，再后来干脆逃离长安，后半生都居住在东都洛阳，几乎终身不归西京。

事实上，武媚的神经远没有民间传闻和旧史家所形容的那么脆弱。其实她后来自己就养过猫，还曾经把猫和鹦鹉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拿到朝堂上训诫百官。而武媚和高宗后来之所以迁居大明宫，也不是因为什么萧淑妃的诅咒，而是因为地势低洼的太极宫不利于高宗养病。至于她登基后为什么要迁都洛阳，也涉及很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绝不是什么萧淑妃的鬼魂作祟那么简单。

王皇后和萧淑妃被砍去手足浸泡在酒瓮中后，没过几天就死了。她们死后，武媚仍不解恨，先是命人捞出她们的尸体，砍下她们的首级，最后又迫使李治下诏，把王皇后的姓改成蟒，把萧淑妃的姓改成枭。

干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武媚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她知道，要想确保皇后之位，还有一件事非做不可。

那就是——把现任太子李忠废掉，让自己的长子李弘入主东宫。

在武媚的授意下，曾经在后宫之战中替武媚充当急先锋的许敬宗再次出马。

他是礼部尚书，由他来倡议太子废立，名正而言顺。

许敬宗随即上疏，称：“永徽初年，国本（指武后之子李弘）未生，权且让彗星超越了日月。而今，皇后已经正位，嫡子理应现身，让太阳更加光明，让残余的火星早日熄灭。决不能本末倒置、衣裤倒穿。臣深知父子之间的事，外人不好插嘴，但臣已经作好准备，就算下油锅，把臣煎成肉膏，臣也心甘情愿。”

许敬宗不愧是官场老油条，总能把枯燥的政治语言表述得这么形象生动。李治见到奏疏后，立刻召见了他。许敬宗再次向天子强调，应该早日废立太子，以安国本，否则“恐非宗庙之福”。李治答道：“忠儿自己已经提出辞让了。”许敬宗赶紧说：“太子明智，请陛下早日帮他完成心愿。”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任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刺史，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皇后武媚的亡父武士彟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女皇武曌选定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彟的这个爵号。

做完这些事，武媚知道自己的地位算是暂时稳固了。

接下来，她开始把目光转向外朝。

因为那里还有四匹“狮子骢”——韩瑗、来济、褚遂良、长孙无忌，等着她调教和驯服。

自从褚遂良被贬出朝廷之后，韩瑗就深感唇亡齿寒，可他没有放弃努力，还是不断上疏替褚遂良喊冤。他说：“遂良公忠体国、高风亮节，为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未闻他有何罪状，却被逐出朝廷，朝野上下无不扼腕茫然。遂良被贬已有一年，就算违逆陛下，也已受到责罚，请求陛下体察无辜，宽宥其罪，怜其赤诚，以顺人心。”

李治见疏，大不以为然，随即召见韩瑗，说：“遂良的情形，朕也知道。可他一贯性情悖戾，喜好犯上，所以才将他贬谪。你在奏疏中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点过了？”

韩瑗仍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遭到谗谀之徒迫害，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长孙一党在朝政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韩瑗的力争除了召来高宗更深的厌恶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韩瑗最后死心了，再次要求致仕。

可他的要求再次遭到了高宗的否决。

因为武媚不会这么轻易放他走。

武媚很清楚，对于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来说，“致仕”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还可以享受高级官员的离休待遇，还能保住名声和晚节，得一个善终。可是，武媚是决不会让这些政敌得到善终的，她期待的结果是让他们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无论是对付王皇后、萧淑妃这样的内宫情敌，还是对付长孙无忌等外朝政敌，武媚始终坚守这么一个信条——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长孙无忌的悲剧：不懂得及时放手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皇后武媚的第三子、刚出生三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武后次子李贤已于永徽六年封为潞王）；稍后，萧淑妃的儿子雍王李素节被降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褚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几天后，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

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都有皇后武媚的一只纤纤玉手在拨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媚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

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褚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褚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褚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褚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

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苍鹰，再也不能翱翔于权力之巅了。

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

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

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

因此，长孙无忌的悲剧可以说是注定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像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把一只幼狮放在笼子里饲养，双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可等到狮子长大了，驯兽师却对此浑然不觉，或者故意视而不见，依然把它当成没有能力又需要保护的幼崽。这时候恰好又有一只母狮来到了笼子边，不断鼓励笼中狮去勇敢地追求自由，这只狮子就有可能愤然而起，和母狮联手撕破铁笼，并最终咬死这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

所以，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给李治。

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

手。

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一贬再贬的褚遂良来到迢迢万里的爱州后，预感到这个边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追忆往日荣华，褚遂良不禁悲从中来。

他遥望长安，黯然提笔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疏：“从前，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争，皆陛下所见。后来，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临终，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突遭巨变，不胜哀恸，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颈。当时，臣与无忌处理政务，毫无缺失，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臣力量很小，而责任很重，动辄招致罪愆，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仅余残生，乞请陛下哀怜！”

褚遂良在奏疏中处处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长孙无忌的功劳。然而，在高宗李治看来，如果说他和长孙在贞观末年确有大功的话，这样的功劳也早已被他们在永徽年间的居功自傲、大权独揽彻底毁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谏，褚遂良当面揭穿了天子隐私，让李治仿佛在众人面前裸奔了一回，这种羞辱让李治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

不管褚遂良自认为在奏疏中如何真情流露、如何忠言耿耿，高宗李治都不可能为其所动。

结果可想而知，奏疏呈上如同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年后，亦即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褚遂良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三岁。

随着长孙一党的垮台，高宗和皇后武媚的亲信迅速跻身帝国的权力中枢。显庆三年十一月，年近七旬的许敬宗终于如愿以偿，继李义府之后晋升为中书令；同日，还有一个叫辛茂将的大理卿也获得晋升，兼任侍中。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媚终于图穷匕见，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

许敬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随便找了一起案件，就把谋反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长孙无忌头上。

当时，许敬宗和辛茂将刚好在会审一个案子，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韦季方不堪忍受，企图自杀，结果自杀未遂。

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许敬宗却灵机一动，突然上奏说，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

什么隐情？

许敬宗称："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资治通鉴》卷二百）意思是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然后伺机发动政变，只因事情败露，韦季方才畏罪自杀。

案情发展到这里，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

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舅父长孙无忌。

很显然，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许敬宗的手法，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许敬宗是在照着葫芦画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高宗李治做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父遭到小人离间，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

许敬宗答道："臣推究案情始末，长孙无忌反状已露，陛下却犹然怀疑，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李治黯然落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天元舅还是这样，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此事若属实，该如何处置？"

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能有什么作为？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一旦发动，陛下派谁抵挡？如今幸赖宗庙有灵、

皇天疾恶，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实乃天下之庆。臣现在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情急之下发动政变，攘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愿陛下速作定夺！”

李治半晌无语，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

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瑗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奭、褚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瑗这么说，不免忧愁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瑗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词：“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

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

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功。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

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

秀。

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

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

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

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

可是，李治有吗？

没有。

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

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

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离开长安的那一天，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带着孤独和屈辱，带着忧惧和彷徨，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

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长孙无忌一倒，长孙集团的灭顶之灾就真正降临了。

在皇后武媚的授意和高宗的支持下，许敬宗开始乘胜追击，一方面大肆株连，扩大打击面；一方面又穷追猛打，一意要把长孙一党的核心成员赶尽杀绝。

长孙无忌刚刚被逐出长安，许敬宗就上奏说：“长孙无忌之所以谋反，都是因为褚遂良、柳奭、韩瑗等人在背后煽动蛊惑；柳奭还暗中勾结中宫（王皇后），谋行鸩毒；另外，于志宁也一直是长孙无忌的死党。”

奏疏一上，高宗的追贬诏书立刻就下来了。已经病逝的褚遂良被追夺了官职和爵位，柳奭、韩瑗被开除官籍，于志宁被免职；长孙无忌的儿子、时任秘书监的驸马都尉长孙冲（娶太宗之女长乐公主）等人也均被开除官籍，流放岭南；褚遂良的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他们行至中途便被朝廷派出的人诛杀）；益州长史高履行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

五月，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诠被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抵达贬所不久，当地县令为了谄媚朝中的当权派，便命人把他乱棍打死。稍后，长孙诠的外甥、时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刺史的赵持满（他的姨母是韩瑗的妻子）被逮捕，押送京师后遭到严刑拷打。赵持满拒不认罪，旋即被诛杀，抛尸城西，亲戚无人敢替他收尸，最后是一个叫王方翼[1]的友人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将其收葬。

七月，朝廷再次下令，命御史分别前往高州（今广东高州市东北）、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振州（今海南三亚市），把已经被流放的长孙恩（长孙无忌族弟）、柳奭、韩瑗重新逮捕，披枷戴锁押回长安，同时命各州县抄没他们在当地的家产。

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

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有重新审理的必要吗？

明眼人都看得出，天子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宣判长孙无忌的死刑。

许敬宗马上猜出了天子的心思，于是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资治通鉴》卷二百）。

袁公瑜当然也知道所谓的“再鞫”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他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所以一到黔州，袁公瑜就迫不及待地向长孙无忌亮出了底牌——事到如今，您老也只有一死以谢天下了！

当鬓发散乱的长孙无忌颤颤巍巍地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吴王李恪在六年前发出的那句诅咒。

盖棺论定之际，史书对长孙无忌的终局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旧唐书·宗室列传》）

“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解决了长孙无忌后，高宗再也无所顾忌，索性推翻前诏，派出使臣前去处死柳奭和韩瑗。（数日前李治刚刚下诏，命各路御史将柳、韩等人押回京师。）使臣随后便赶赴象州诛杀了柳奭。另一路使臣赶至振州时，韩瑗已死于贬所，使臣当即掘墓开棺，验明正身后才回京复命。

同时，朝廷抄没了长孙无忌、柳奭。韩瑗三家的所有财产，将他们的近亲全部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数日后，早先在工部尚书任上被贬至常州的长孙祥（长孙无忌族侄）又因在此期间与长孙无忌通信，被判处绞刑。

八月，又有十三个朝臣受到长孙无忌和柳奭的株连被贬官。此外，洪州都督高履行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刺史，于志宁被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随后，在朝中任职的于姓亲戚又有九个遭到贬谪。

显庆四年的这场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还是残酷性，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制造的房遗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砍头的砍头，该绞死的绞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一党的垮台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和君臣博弈中，李治和武媚这对恩爱夫妻兼政治拍档，终于彻底击败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取得了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

这一刻，李治和武媚连续几年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为了庆祝胜利，他们决定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游玩散心，然后再回一趟皇后的老家——并州（今山西太原）。

这一年冬天，高宗李治下诏，命年仅八岁的太子李弘监国，然后携皇后武媚启程前往东都。没想到天子一行刚出潼关，后面就有朝臣追了上来，告诉他们年幼的太子因思念双亲，终日抑郁寡欢、哭泣不止，让朝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高宗和武媚一听，顿时大为不忍，马上命太子前来会合，干脆不监国了，一家人痛痛快快地玩一趟。

在李弘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显庆四年冬天的这趟旅行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快乐记忆。他坐在宽敞舒适的车辇内，看着外面被白雪覆盖的广阔无垠的世界，看着道路两侧的松柏上结满的奇形怪状的冰凌，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和喜悦。而一路上始终面带笑容的父皇和母后又一左一右紧拥着他，更是让他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温暖。

李弘多么希望这驾马车能够永远这么走下去啊。

直到十七年后那个杀机四伏的夜晚，当太子李弘在合璧宫绮云殿的夜宴上颓然仆倒，当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从他的嘴里涌出，李弘仿佛仍然可以看见，显庆四年那驾满载着快乐和幸福的马车，还在一片晶莹无瑕的世界中缓缓地走着，永远也不会到达终点。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天子一行从东都启程前往并州。

这显然是高宗李治特意替皇后武媚安排的一场衣锦还乡。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皇后武媚于并州州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亲戚、故旧、邻里参加。宴会结束后，皇后武媚又让所有妇人进入内殿，给予了数量不等的赏赐。随后，高宗李治又颁下一道诏书，向并州境内所有八十岁以上的妇人授予了“郡君”的爵位。

这一天，皇后武媚用行动向世人再一次证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显庆五年十月，也就是高宗李治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才一年多，还没等他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生命中最大的不幸就不由分说地降临他的身上。

他病了。

让李治感到痛苦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是非常严重的风疾。所谓风疾，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风，属于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李唐皇族的家族遗传病，当年导致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死亡的主要病因，就是这个风疾。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唐朝历史上，这个可怕的遗传病还会像一只无法驱散的恶灵一样，接二连三地附着在一个又一个李唐皇帝的身上。

风疾是一种慢性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长期调理，而且病人不能过度劳累，必须长年静心调养。这对于刚刚夺回大权、一心想要重振朝纲的高宗李治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更让李治郁闷的是，他一发病，症状似乎就显得比较严重。史称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也就是眩晕、头痛，并且由于脑部的气血淤塞压迫到了视觉神经，引发严重的视力衰退，甚至导致间歇性失明。

发病的这一年，李治才三十三岁，本来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可这个该死的遗传病却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李治为此大为苦恼，可是又万般无奈。每当百官奏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李治不得不经常让皇后武媚一同临朝听政，协助他裁决政务。

就这样，刚刚正位中宫的武媚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在她本人都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命运之手就把她一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过武媚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她天性聪颖，反应敏捷，加上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对政治的天然热衷和高度悟性，这一切都使她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高宗李治对皇后的表现非常满意，“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百）。

从此，武媚开始顺理成章地与她的夫皇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这一年，武媚三十七岁。

权力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精神鸦片，对于武媚这种女人来说尤其如此。

她似乎与生俱来就怀有一种极度的权力饥渴。一旦那种生杀予夺的豪情快意稍稍掠过她的心头，对于权力的进一步渴望就会瞬间布满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春天，李唐朝廷发生了一件让满朝文武都颇感意外的事情。

这就是更改官署名称和百官名号。

高宗下诏宣布，从即日起：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有相应的新名称，只是职能如故。

随着皇后武媚开始正式干预朝政，高宗李治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生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隐忧。他发现——这个工于权谋、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皇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长孙无忌曾经走过的老路，颇有些欲望膨胀、架空天子的苗头了！

这样的发现让高宗李治大为不悦，也让他与武媚之间原本如胶似漆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此外，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李治感到自己的天子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满朝文武和宰相们基本上都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然而，唯独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这个人就是李义府。

众所周知，在李治夫妇与长孙一党斗法的时候，这个李义府一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可以说是天子阵营的忠实打手。可这几年来，李治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与其说李义府是他的亲信，还不如说这家伙只是皇后一个人的鹰犬。

这家伙自以为有皇后罩着，几乎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也在皇后的手心里攥着。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春天，忍无可忍的高宗李治终于决定拿李义府开刀。他要让这小子尝一尝雷霆之怒的滋味，同时也用这种敲山震虎的方式警告皇后——天子权威是绝对不容侵犯的！

当然，高宗要拿李义府开刀，肯定也需要一些正当的理由。

好在这样的理由并不难找，因为李义府自从当上宰相以来，几乎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他做过的那些事情只能用两个成语来形容。

一个叫劣迹斑斑。

一个叫天怒人怨。

永徽六年末，李义府以中书侍郎衔“参知政事”，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仕途多年，李义府总算是如愿以偿地攀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枝，终于可以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了。也许是压抑多年的欲望亟须宣泄，所以李义府一朝得势，便开始“恃宠用事”、恣意妄为。

显庆元年秋天，一个叫淳于氏的洛州妇人因为犯案被拘押在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个妇人颇有姿色，顿时垂涎三尺、色心大动，当即决定把她搞到手。

为了得到淳于氏，李义府就向主管此案的大理丞毕正义施压，让他制造伪证帮淳于氏洗脱罪名，准备等淳于氏出狱后纳她为妾。不料大理卿段宝玄在调阅卷宗的时候，发现了毕正义做的手脚，立刻将毕正义逮捕，并将此案上奏天子。高宗李治随即命给事中刘仁轨提审毕正义，李义府唯恐毕正义把他抖出去，便逼迫他在狱中自杀。

毕正义被逼自杀后，高宗命人暗中调查，得知此案的幕后操纵者就是

李义府。可当时长孙集团尚未垮台，这个李义府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高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命大理寺草草结案了。

不久，御史王义方又对李义府发起弹劾，高宗却公然袒护，不但不追究李义府的罪状，反而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为由，把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

显庆二年春，李义府又被擢升为中书令，正式跨入了宰相的行列。李义府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又有天子和皇后撑腰，于是越发有恃无恐，不但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连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然充当权钱交易的经纪人，一时间“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时，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自认为资格比李义府老，加之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而李义府依恃帝后宠信，自然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双方由此结怨，此后无论大事小事多有抵牾。到了显庆三年十月，双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杜正伦派人监视李义府，暗中搜罗他的罪证；而李义府索性恶人先告状，指使手下呈上密奏，说杜正伦用卑鄙手段暗算他。随后，双方当着高宗的面公开对质，拼命揭对方疮疤。高宗听来听去，好像两个人的屁股都不太干净，最后干脆以“大臣不和”为由，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贬杜正伦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贬李义府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仅仅因为一次争吵，高宗就贬掉了两个宰相，乍一看似乎有些处罚过重，但是有心人不难发现，李义府被贬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什么“大臣不和”，而是下面这两条：

第一，他得宠用事之后玩得太过火了，不要说他本人如何贪赃枉法，就说他家人干过的那些事，随便抓一件就足以把他贬谪流放了。

第二，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无非是因为天子要利用他来对付长孙无忌。而时至显庆三年末，长孙一党早已被驱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高宗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当然没必要再留着这个贪财好色、败坏朝纲的李义府。至于说那个杜正伦，纯粹是因为运气不好——高宗正想拿李义府开刀，他恰好自个儿撞了上去，高宗也就顺手拿他当“刀”使了。

对于高宗兔死狗烹的真实动机，李义府当然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从此对高宗恨之入骨。

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皇后武媚并没有抛弃他。

李义府被贬普州后，皇后仍然隔三差五地派人前来慰问，并且向他暗示：很快就会让他回到京师重掌大权。（《资治通鉴》卷二百：“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

显庆四年八月，也就是长孙无忌在黔州自缢的几天后，李义府果然堂而皇之地回来了，而且一回朝就担任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义府不禁对皇后感激涕零，从此愈发忠心耿耿，发誓愿为皇后效死。

当然，他只为皇后一个人效死。

因为高宗李治已经不在他的效忠之列了。

在他看来，从今往后只要死命抱住皇后的大腿，就能权力永固、富贵长保。而此番回朝，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皇后居然让他执掌了吏部人事大权。

对于一向以卖官鬻爵为敛财之道的李义府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兴奋的呢？

所以，李义府一回到长安，他的“李氏专卖店”就重新开张了，专营朝廷的官印和乌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时间，上上下下的钻营之徒纷纷趋附，李义府的生意顿时比以前更为红火。朝野的正直之士纷纷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可他却毫无愧色、我行我素。

这一切，自然都被高宗李治看在了眼里。

本来，李义府在皇后的庇佑之下大摇大摆地回朝复相，就已经让天子李治老大不痛快了，如今这该死的李义府又恶习不改、重操旧业，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铺面，在那里公然兜售官印乌纱，怎能不让李治义愤填膺？

可愤怒归愤怒，李义府毕竟是皇后的人，李治一开始也没想要收拾他，只是希望他能收敛一点。龙朔三年春的某一天，高宗李治特意把李义府找来谈话，和颜悦色地说：“你儿子、女婿行为都很不检点，干了不少非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没有把这些事情公开。你最好是警告一下他们，别再这么干了。”

高宗这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客气，给李义府留足面子了，可他断然没

有想到，这个胆大包天的李义府居然丝毫不买他的账。

李义府当场勃然变色，脸红脖子粗地说：“这是谁告诉陛下的？”

高宗一听，立刻也火了：“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李义府一脸阴沉，半晌无语。

可他接下来的这个举动却再次令天子火冒三丈，同时也彻底葬送了他的权力和富贵。

李义府瞥了一眼天子，唇边掠过一抹冷笑，突然转过身，连声屁都没放就扬长而去了。

面对天子的责备和警告，李义府非但一点都不认错，反而还跟天子翻脸，甚至干脆拍屁股走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忤逆犯上、大逆不道啊！

看着李义府傲然而去的背影，李治顿觉血往上涌。

李义府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他背后有皇后撑腰！

就在这一刻，李治下定了收拾李义府的决心。

不仅是因为他忤逆犯上，更因为他是皇后的一颗棋子。不拿掉这颗棋子，李治就无法震慑皇后；不震慑皇后，李治就有重新沦为影子皇帝的危险！

所以，李义府的末日到了。

龙朔三年暮春，就在高宗准备对李义府动手的时候，一个叫杜元纪的阴阳术士忽然告诉李义府：贵宅被不祥之气笼罩，您恐怕会有牢狱之灾。

应该说，这个姓杜的术士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因为他对李义府的预测确实很准。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随后提出来的这个禳解之法，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加速了李义府的灭亡。

杜元纪对李义府说：应该在宅中积财二千万钱，才能化解这场灾难。李义府对此深信不疑，开始变本加厉地聚敛。为了赶紧凑齐二千万，

他只能拼命卖官。短时间没那么多客户，他就让儿子女婿们到处撒网。很快，儿子李津就抓来了一堆新客户，其中一个居然是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

李津以七十万钱的价格，把一个司津监的官职（从六品）卖给了长孙延。

本来李家父子的行动就已经被高宗监控了，如今李津竟然还敢把乌纱卖给罪臣长孙无忌的后人，这简直就是自己往刀口上撞，于是马上就有人向高宗作了禀报。

在大肆卖官的同时，李义府还经常身着微服，和杜元纪一起跑到长安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可能是想观察他宅邸上空的不祥之气是否已经化解。有关部门密切监视了几次之后，随即指控他暗中窥测天象变异，“阴有异图”（《资治通鉴》卷二百）。

李义府原本就已劣迹斑斑，现在又让天子抓住了好几个现成的把柄，当然是死有余辜了。龙朔三年四月，李治下令将李义府逮捕下狱，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刘祥道与御史进行会审，同时由司空李勣监审。

审理结果，证据确凿，李义府罪无可恕。李治随即下诏，将李义府父子一起开除官籍，流放李义府于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流放李津于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其他的儿子和女婿也全都除名，流放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恶贯满盈的李义府一垮台，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有个极具娱乐精神的民间写手马上用匿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并且把它贴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文章的标题是——《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

之所以把主审官刘祥道称为“河间道行军元帅”，是因为李义府的爵位是“河间郡公”，刘祥道奉天子之命讨伐他，当然要荣膺此项称号；而所谓“铜山大贼”，意指李义府是躺在铜钱堆积的山上专事聚敛的大盗。

自大唐开国以来，被朝廷贬谪的官员可谓不计其数，可似乎只有李义府被人写过这种搞笑挖苦的布告，足见其罪孽之深、民愤之大。

然而，谁都知道，李义府是皇后的死党，几年前被天子踢到普州，就

是皇后把他弄回来的，而且复相之后比以前更为嚣张。确实，皇后武媚确实想过要力保李义府，可毕竟他官声太坏、民愤太大，武媚不免担心自己会被他所累，最后也就无可奈何地把他放弃了。

三年后，天子李治封禅泰山，下诏大赦天下，但是流放远地的人却不在赦免之列。而李义府恰恰就属于流放远地的人，他因此忧愤成疾，在贬所一病而亡。

听到李义府终于死去的消息后，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资治通鉴》卷二○一："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这个皇后，不是天子说废就废的

高宗虽然轻而易举地拿掉了李义府这颗棋子，但是大权旁落的危险却丝毫没有解除。

自从患上风疾之后，高宗的健康状况始终不见改善，所以皇后武媚干政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高宗李治不无悲哀地发现——当年那个"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武媚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非但不再顺从他、尊敬他，反而一步一步架空了他，甚至已然凌驾了他！

悲哀之余，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愤怒。（《资治通鉴》卷二○一："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一切都和当年的长孙无忌如出一辙。

不，是比当年的长孙无忌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这样，高宗对武媚的愤怒一天比一天更为强烈。可他并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武媚对他的不满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深。

高宗的愤怒是因为自己的天子之权被妻子窃取了，而武媚的不满则是因为自己老公的心被别的女人偷走了。

是的，这几年来，高宗对武媚的爱意日渐淡薄，而对另外两个女人的宠幸则是与日俱增。而尤其让武媚感到讽刺的是，这两个女人居然一

个是她的亲姐姐——韩国夫人，一个是她的外甥女——魏国夫人。

韩国夫人的夫家也算得上世家大族，丈夫叫贺兰越石。她生下了一双儿女，儿子叫贺兰敏之，长大后成了名闻长安的美少年；女儿就是后来的魏国夫人，据说也是长得天姿国色、美艳动人。贺兰越石早亡，所以韩国夫人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武媚正位中宫后，韩国夫人就经常带着女儿出入禁中，日子一久，高宗李治就看上了这个风韵犹存的俏寡妇，顺带着把她身边的美少女也一并纳入怀中，不久就封这个小情人为魏国夫人。

这对母女就这样成了天子的枕边新欢。每当武媚看见她的姐姐和外甥女满面春风、花枝招展地出入天子寝殿时，她的眼中就会屡屡喷射出愤怒和嫉妒的火焰。

高宗李治没有注意到这道火焰。

韩国夫人也没有看见这道火焰。

直到后来有一天，当宫人们无意间发现，频繁出入天子寝殿的不再是母女俩，而只剩下一个年轻的魏国夫人时，人们才恍然想起，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过韩国夫人了。

是的，韩国夫人消失了。

就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韩国夫人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史书没有记载韩国夫人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但是民间却盛传她是被她的亲妹妹皇后武媚毒死的。然而宫闱之事从来幽微难测，没有人说得清韩国夫人的真正死因，细心的宫人们只能从魏国夫人美丽而忧伤的脸上，看见一丝哀怨和仇恨的眼神。

尤其是当皇后武媚在场时，她眼中的那种仇恨似乎尤为强烈。

韩国夫人死后，高宗李治就把对她们母女的爱全都倾注到了魏国夫人身上，他甚至想正式封她为九嫔之一，只不过他也知道，只要武媚还在皇后的位子上，他就不可能迈出这一步。

那么，有没有可能把武媚从皇后的位子上撸了呢？

当然有可能。

既然当年可以废王立武，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废掉武媚，然后纳贺兰氏为嫔，与这个美丽温柔而又善解人意的小情人厮守终生呢？

这样的念头一经出现在高宗的脑海，就像一枚石子投进了湖心，不断泛起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涟漪，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于是，为了重新夺回天子大权，同时也为了美丽可人的贺兰氏，高宗李治决定放手一搏！

接下来，他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恰如其分的废除皇后的理由。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冬天，这样的时机终于出现了。

有一天，宫中的宦官王伏胜忽然向天子告发，说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在皇后的安排下“出入禁中”，设坛作法，并且——“尝为厌胜之术”！（《资治通鉴》卷二○一）

厌胜？

又是这个可怕的罪名。

人们都还记得，当年武昭仪陷害王皇后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谁也没想到许多年后，居然有人会以同样的罪名对武后发出指控。

得到王伏胜的密报时，高宗李治表面上勃然大怒，可内心却在窃喜——还有什么比“厌胜”更正当的废后理由呢？

厌胜事件爆发后，高宗李治立刻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官仪进入内殿，商议如何处置皇后。

这个上官仪在一年前才刚刚拜相，其资历要比其他宰相浅得多，可高宗为何偏偏找他密商呢？

原因只有一个——像李勣、许敬宗这样的资深宰相都曾经是拥立武后的人，所以高宗根本不敢把事情交给他们。如今要对付武后，只能用上官仪这样的新面孔。

上官仪是贞观初年进士，也是一代文章圣手，尤工五言诗，成名很早。太宗闻其名，曾召入宫中，授弘文馆直学士，经常与他诗文唱和，甚至让他修改诏敕，后又擢任其为秘书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

升任秘书少监，此后一度担任陈王李忠的属官；李忠册封为太子后，他又任职东宫，此后屡获升迁，于龙朔二年正式拜相，仍兼弘文馆学士。

上官仪是典型的文学侍臣，他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主要并不是依靠政治才干，而是凭借其文学才能。他是齐梁余风的代表诗人，其五言诗"绮错婉媚"、自成一格，素有"上官体"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据说上官仪的风度和仪态可以用俊逸出尘、飘然若仙来形容。《隋唐嘉话》曾记载，上官仪拜相之后，时在东都洛阳，"尝于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即兴吟咏了一首《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洛阳宫外，晨光熹微，晓月将残，垂柳摇曳，微风拂面。就在这一幅安恬静美的画面中，洛水边上等候入朝的百官们不约而同地望见，当朝宰相上官仪正骑着一匹白马飘然而来，只觉他吟出的诗句用字精巧、"音韵清亮"，而他本人则是衣袂飘飘、神采飞扬，"望之犹神仙焉"。

许多年后，人们似乎还能从女皇武曌最宠信的那个女官——上官婉儿身上，依稀看见她祖父上官仪当年的气质和风采。

上官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而文人从政，通常难以避免自命清高、恃才傲物的毛病，更难以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长期生存。所以，上官仪纵然被高宗倚为心腹，并且拔擢为宰相，但是他并不知道，在这短暂的显贵和荣宠之后，会是一种怎样叵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作为高宗时下最信赖、最倚重的宰相，上官仪很清楚天子心里想要什么。所以当高宗密召他进入内殿，并且问他要如何处置皇后时，上官仪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皇后专权横行，令海内失望，请求废黜。"

李治频频点头，马上命上官仪草拟一道废后的诏书。

此刻的上官仪绝对没有料到，皇帝要他草拟的这道诏书竟然会变成他的死亡通知书。

在内殿的御案前，满腹诗书的上官仪铺开一纸素笺，略微沉吟之后，开始洋洋洒洒地写下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字。

随着上官仪的这道诏书拟就，曾经携手走过十八年风风雨雨的高宗李

治和皇后武媚，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皇上要废黜皇后了！

千钧一发的时刻，武媚长久以来精心打造的宫廷情报网终于发挥了生死攸关的作用。

当安插在天子身边的耳目纷纷跑来告诉她这个可怕的消息时，人们看见皇后武媚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表情的话，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平静。

片刻之后，皇后武媚忽然向人们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然后一言不发地朝内殿走去。

那一刻，皇后处变不惊的神态和镇定自若的表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惊讶，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了由衷的敬佩。

他们相信，这样一个皇后绝对是比任何女人都更有资格母仪天下的，肯定也不是天子说废就能废的！

武媚径直走入内殿的时候，那一道墨迹未干的废后诏书正静静地躺在天子的御案上。而御案后面，则是天子李治那张惊愕且惶然的脸。

武媚走到御案前站定了，她的目光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笔直地射向天子。

天子慌张地闪避着，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

紧接着，武媚用一种异常淡定的口吻开始了对往事的叙述。

那是这风风雨雨十八年来，发生在她和他之间的那些往事。

当然，这种叙述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是一种有选择、有重点的前情提要。

不过对于此刻的李治来说，这样的前情提要已经足够了——足够他惭悚，足够他畏怯，足够他无地自容，也足够他回心转意了。

最后，李治把头深深地垂了下去，嗫嚅着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资治通鉴》卷二○一）

这一刻，天子李治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而皇后武媚则露出了一个母亲般宽宏大度的笑容。

天子既然已经承认错误了，武后当然可以摆出一副既往不咎的姿态，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天子必须为他犯下的错误买单。

换言之，李治本人固然可以推卸责任、逃避惩罚，但是他手下的那几个帮凶以及他在朝中的一干亲信，却必须替他们的主子付出代价！

这才是武后笑容中的真实含义。

就在武媚迈着轻盈的步履转身走出内殿的那一刻，一张长长的报复名单已经完整地浮现在她的脑中。

名单上的头两个，就是上官仪和王伏胜。

第三个，就是废太子李忠。

因为上官仪和王伏胜都曾经是李忠的东宫旧部，如今这两个人都参与了废后事件，那么李忠自然也难逃干系。而且，李忠一天不死，现太子李弘的地位就始终不能稳固。所以，无论是出于报复还是出于斩草除根的考虑，武媚都必须利用这次机会除掉李忠。

这些年来，废太子李忠可谓尝遍了人间冷暖、阅尽了世态炎凉。当初他被立为太子时，年纪尚幼，还不完全明白权力和富贵的意义，可身边却整天围着一大群讨好和献媚的人。十四岁那年，他忽然被废黜了，一夜之间丧失了所有，然后身边那些人就像逃避瘟疫一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离开京城的那天，所有东宫旧臣没有一个人来给他送行，真是令他伤透了心。

被贬谪为梁州都督的同年年底，他再一次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后来的日子，李忠慢慢长大，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原来他自始至终都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不论是入主东宫，还是被流放远地，都是别人权力斗争的结果。在他大起大落的命运背后，一直都有一些可怕的力量在操控和主宰。

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李忠感到了无比恐惧，他仿佛看见阴谋和死亡正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李忠从此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夜里总是噩梦连连，白天也始终担心会有刺客行刺。为了化解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李忠屡屡请巫师设坛作法，占卜吉凶；为了防备刺客，他甚至乔装改扮，经常穿上妇人的衣服。

李忠在房州的一举一动，自然都逃不过武媚的眼睛。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初秋，朝廷再次颁下一纸诏书，把李忠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囚于前废太子李承乾的旧宅。

在那座阴气森森的宅子里，李忠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恐惧。那几年里，他逐渐变得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生命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一场漫长的刑罚，他已经如同废人，活着就是在等死。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许敬宗在武媚的授意之下，上疏指控上官仪、王伏胜、废太子李忠暗中勾结，企图谋反。上官仪旋即被捕下狱，几天后就与长子上官庭芝、宦官王伏胜一起被斩首，家产抄没，府中女眷也全部没入宫中为婢。就是在这场家破人亡的灾难中，刚出生不久的上官婉儿随母亲一起被没入了掖庭。

十二月十五日，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贬所，年仅二十二岁。稍后，时任右相（中书令）的刘祥道因与上官仪交情深厚，被罢免了宰相职务，降为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同时，朝中还有左肃机（尚书左丞）郑钦泰等一大批官员，都被指控与上官仪有交情，或遭贬谪、或遭流放，全被逐出了朝廷。

高宗李治很清楚，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与上官仪友善而被株连，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信，所以才会被皇后通通赶出长安。

明知如此，可李治却无能为力。

从皇后武媚带着利刃般的目光走进内殿的那一刻起，从李治被迫说出“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这句话之后，李治就知道自己完了，他只能把天子大权拱手让给皇后武媚。

因为他别无选择。

其实，李治何尝不想把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又何尝不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这个帝国！然而，自从患上这该死的风疾之后，很多事情就不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每当他想集中精力聆听百官奏事的时候，每当他要打起精神裁决政务的时候，可恶的病魔就会猛然攫住他，让他头晕目眩、四肢乏力。

在这种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他除了把权力交给皇后之外，还能交给谁呢？交给宰相吗？如今的这些宰相，虽然一个个貌似谦恭，好像对天子唯命是从，可一旦天子真的把最高权力下放给他们，假以时日，谁敢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长孙无忌呢？

在李治看来，即便他和武媚早已同床异梦，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恩爱夫妻；即便他和武媚早已貌合神离，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生死与共的政治拍档！更何况，皇后毕竟给他生下了四个儿子：太子弘、沛王贤、周王显、殷王旭轮（后改名旦），来日自己驾鹤西去，皇后必然要把权力归还给太子李弘，到时候江山就仍是李唐的江山，社稷也仍然是李唐的社稷。这样的结果，总比让朝政大权落入异姓权臣的手中更好吧？

如果说身体状况的恶化注定了高宗的天子大权非旁落不可，那么他宁可旁落给皇后武媚，也绝不能旁落给长孙无忌第二！

李治固然知道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呢？

当然，在这场废后风波中，李治的表现确实显得有些懦弱。可是，与其说李治是在武后的逼迫下产生了畏怯，不如说他是在那一瞬间察觉了自己废后举动的鲁莽。因为倘若真的把武后废了，李治在病魔缠绕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宰相，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引发如上所述的外姓掌权的危险。

此外，让李治最终产生悔意、收回成命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武后协助处理朝政的这几年中，她的表现确实无懈可击、可圈可点，甚至比李治本人显得更圆熟、更老到、更具政治智慧。既然如此，李治在冷静下来的时候，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对魏国夫人的感情已经损害了身为帝王的理智，所以他不得不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发，从李唐社稷的长治久安出发，进一步提升武后的权威。

无论高宗李治是主动还是被迫，总之从麟德元年的冬天开始，李治的帝王权威就逐渐被削弱了。在这场有惊无险的废后风波中，皇后武媚非但毫发无损，反而趁机铲除了天子在朝中的一干亲信，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因祸得福，获取了更大的权力。

从此，金銮殿上不再只有高宗李治一人，而是高宗与武后并列。满朝文武几乎都能感受到，帝国的最高权力正在逐步落入皇后武媚的手中。史称："自是，上（高宗）每视事，则后（武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二○一）

一个"二圣临朝"的时代就此掀开大幕。

这一年，武媚四十岁。

此时的武媚，就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和耸壑凌霄的姿态，展翅翱翔在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

封禅：皇后的盛典

麟德元年的废后风波如同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在短暂的喧哗与骚动之后，一切很快就都回复了原样。

李治和武媚这对冤家看上去闹得挺凶，可人家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没过几天就又相敬如宾了，唯独害苦了一大帮忠于天子的朝臣——上官仪丢了脑袋，刘祥道罢了相职，其他人或贬黜或流放，什么都没捞着，却赔上了辛苦大半生赚来的功名富贵。

这样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

为了汲取教训，满朝文武从此都当起了聋子和哑巴——不管你们天子夫妻是打是和，都是你们自己家的事，犯不着我们当臣子的冒着杀身流放的危险去瞎搅和！

所以，自从“二圣临朝”之后，天下好像忽然间就太平无事了，朝臣们也一个个都学会了沉默是金，把高宗李治搞得既纳闷又郁闷。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二月，李治终于忍不住对宰相们发了牢骚：“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

宰相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继续保持沉默。只有司空李勣回答了天子的提问，他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资治通鉴》卷二○一）

李治顿时语塞。

什么意思？这么漂亮的话，说了不跟没说一样吗？你是在讽刺朕，还是在跟朕打官腔？

李治知道这根本不是李勣心中的真实想法。可是，在发生了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之后，他还能指望李勣给他什么答案呢？

这一刻，高宗李治不禁在心里苦笑——世事真就像一场无可奈何的轮回！想当初他屡屡跟长孙无忌提出类似问题时，老家伙就一再跟他打官腔，没想到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这么些年，一心想在君臣之间营造一派忠直进谏、从谏如流的良性互动局面，可到头来朝堂上还是一片鸦雀无声，连他最信任的老臣李勣也在跟他打这种政治上绝对正确的哈哈，这太让人郁闷了！

虽然郁闷，可李治也没有办法。大唐君臣就在这种了无生气的沉默中又挨过了两年，高宗李治再一次忍无可忍，又接连几次在朝会上责怪大臣们没有尽到“进贤才”的责任。

宰相们闻言，照例一言不发，最后是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李安期于心不忍，才跟天子说了几句真话：“天下未尝没有贤才，也不是群臣敢遮蔽贤才。只因近来公卿一有推荐，被荐者未获任用而推荐者先已获罪，所以人人三缄其口。陛下若真能推诚以待贤才，谁不愿举其所知呢？此关键在于陛下，不在群臣。”

李治再一次语塞。

官腔不好听，可真话就好听了吗？

很明显，真话更难听。

所以，李治死心了。

从此以后，不管群臣进不进谏、进不进贤，反正高宗自己是保持沉默了。

麟德二年冬天，高宗朝廷酝酿数年的封禅大典终于要举行了。

所谓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盛大仪式，据说早在三皇五帝的时期便已有之。古人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所以封禅大典通常都在泰山举行——于泰山设圆坛以祭天，称为封；于泰山旁边的小山设方坛祭地，称为禅。在古代中国，封禅泰山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

然而，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获此殊荣。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还有东汉的光武帝等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

贞观年间，太宗君臣也曾多次有过封禅泰山的动议，但一来太宗皇帝顾惜民力，二来当时战事不断，周边形势较为紧张，所以始终未能成行。高宗一朝首次提出封禅是在龙朔元年，当时益州等地都上报了见龙的祥瑞，所以朝廷在改元龙朔的同时，宣布于龙朔三年正月举行封禅，但是随后便因对高丽和百济用兵而中止。

麟德元年七月，由于此前唐军在白江口大破日本海军，成功平定百济，朝廷受此胜利的鼓舞，遂再次宣布于三年正月封禅泰山，并命各地都督、刺史必须在二年十月齐集泰山脚下，命诸王集合于东都，筹

备封禅的相关事宜。

对于此次盛典，武媚当然也是一直持赞同态度。因为这不仅是对她参与朝政以来所获政绩的一种高度肯定，而且可以极大地提升她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威望。

封禅大典主要由两部分典礼构成，一是祭祀昊天上帝（祭天）的封礼，二是祭皇地祇（祭地）的禅礼。按照古代惯例，两种祭礼皆由天子行初献礼，再由公卿行亚献礼和终献礼。换句话说，自古以来，封禅都是男人的事，女人根本没资格参与，就算贵为皇后，也只能在一边待着看热闹。

对此，武媚自然是深感不满。于是就在麟德二年十月，武媚毅然上表，对“封禅旧仪”提出了批评。她认为，典礼规定皇后配享祭地之礼，而又令公卿代行，实在是“礼有未安”，因此她郑重其事地向高宗要求——“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资治通鉴》卷二○一）。

对于武媚的要求，高宗当然不敢不答应。他当天就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在社首山举行的祭地典礼部分，由皇后行亚献礼，由越国太妃燕氏（越王李贞的生母，是太宗的嫔妃群中唯一在世的一位）行终献礼。

由女性参与并主持帝国最高级别的祭祀大典，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头一遭！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武媚此举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如此创举所折射出来的政治意义，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它标志着武媚在大唐帝国的政治地位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再也无人可以撼动。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媚携文武百官和六宫妃嫔，浩浩荡荡地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整个仪仗队前后绵延达数百里，旌旗招展，鼓乐齐鸣，列营置幕，弥亘原野。此外，东自高丽，西至波斯，突厥、于阗、天竺、日本、新罗、百济等各国的元首、酋长和使节也各率部属随同出发，穹庐帐幕、驼马牛羊充塞道路。如此阵容，诚可谓盛况空前、古来未有！

麟德三年正月初一，庄严隆重的封禅大典在泰山正式举行，典礼一共进行了五天。初五，高宗在朝觐坛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的朝贺，当日下诏大赦天下，改元乾封。同日，宣布文武百官凡三品以上者赐爵一等，四品以下者晋级一阶。

自从大唐开国以来，所有官员的进阶均须通过政绩考核，升至五品和三品时，更须由天子亲自裁决。可是，这次泰山封禅却开启了“泛阶”的先河，从此冗官日多，以至到高宗晚年，穿四品绯色朝服的官员已经多如牛毛了。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的这场封禅大典，无疑是武媚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之一。

站在社首山高高矗立的降禅方坛上，武媚时而仰望清澈澄明的天穹，时而俯瞰辽阔苍茫的大地，一种睥睨天下、指点江山的豪情顿时在她的胸中奔涌激荡。

那一刻，武媚仿佛在冥冥之中听见了上天的一声召唤，她并不能真切了解这声召唤所蕴含的全部意义，可她却依稀看见一个属于她的世界已经在不远的未来等待着她，那里有别样的天地乾坤，也有别样的山河日月，令她心驰神往、激动莫名。

就是这次封禅，让武媚对权力、地位、尊严、威望等诸如此类的事物，有了更为淋漓尽致的体验，同时也有了更加强烈而炽热的渴望！

大典进行的过程中，许多大臣不约而同地发现，皇后武媚的眼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在灼灼燃烧，而她脸上也分明闪耀着一种奇异而瑰丽的红色光芒。

在这种红光的映衬之下，天子李治的脸色越发憔悴和苍白。

人们不禁在心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谁的盛典？

是这个脸色苍白的男主角，还是那个满面红光的女一号？

此次封禅，武媚除了享受到无上权威所带来的巨大快感之外，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额外收获。那就是——借机除掉了她的小外甥兼小情敌贺兰氏。

许多年前，武媚曾经把几个不识好歹的兄长和堂兄弟贬出了朝廷，外放为远地刺史，其中，同父异母的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先后死于贬所，而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则尚在人世。此次封禅，朝廷要求各地刺史都必须参加，时任始州刺史的武惟良与淄州刺史武怀运也都赶到泰山参与了盛典。大典结束后，他们又随銮驾返回京师。大唐百官都有在一些重大庆典之后向皇帝和后妃献食的习惯，于是武氏兄弟也按照惯例进行献食。

武氏兄弟绝不会料到，就是这次普通的献食，让武媚发现了下手的良机。于是，一个一石三鸟的计划迅速在她的脑中成形。

当献给魏国夫人的那份佳肴送进宫中后，武媚便暗中指使手下在贺兰氏的食物中下毒。毫无防备的贺兰氏当天就中毒身亡。自古红颜多薄命，可怜这个年轻貌美的贺兰氏，连一个正式的嫔妃名分都还没有，就这样香消玉殒、命丧黄泉了。

贺兰氏一死，武惟良和武怀运当然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由于他们曾经与皇后武媚发生过太多不愉快，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武氏兄弟原本是想毒死皇后，结果却错杀了魏国夫人。

贺兰氏之死让天子李治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在无法查出凶手的情况下，他只能把满腔悲愤都发泄到武氏兄弟身上。数日后，高宗未经审讯就颁下敕令，将武惟良和武怀运斩首，妻女没入掖庭。

武媚略施小计，就一举拔掉了几颗眼中钉，这对于刚刚从封禅大典尽兴而归的武媚来说，不啻一种锦上添花之喜。

杀了武氏兄弟，武媚还觉得不够过瘾，就把他们的姓改为蝮。

她希望他们变成两条肮脏丑陋的毒蛇，从此在暗无天日的墓穴中卑贱地爬行，永世不得超生！

高宗李治即位的十几年来，虽然帝国的政治高层风云变幻，始终没有停止过权力斗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国计民生。高宗治下的唐王朝继承了贞观时代的强大国力，所以这些年来，大唐帝国在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安定、繁荣和强盛的局面。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威望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截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统治下的帝国疆域已达至极盛，比前后的各个时期都更为广阔，唐朝的影响力也进而扩大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那么，这一页辉煌的历史又是如何铸就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永徽初年，让我们跟随英勇的大唐将士，一起去跃马横刀、驰骋沙场，一起去开疆拓土、鹰扬国威，去谱写辉煌的英雄史诗，去缔造不朽的战争传奇……

[1]　这个王方翼后来追随裴行俭驰骋西域，并最终平定了西突厥，成为一代名将。

第八章 帝国的扩张

名将之路：苏定方西征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天，登基不久的高宗李治正踌躇满志地打理着太宗皇帝留下的这个广土众民的帝国，就在这个时候，西域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消息是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刺史骆弘义派快马递到京师的。他在奏章中称，原西突厥降将，时任左骁卫大将军兼瑶池（今新疆阜康市）都督的阿史那贺鲁，一直在暗中召集旧部，势力日渐膨胀，很可能是想利用太宗驾崩、新君刚刚即位的时机发动叛乱，袭取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和庭州。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高宗的高度警觉，他马上派遣通事舍人桥宝明前往瑶池，对阿史那贺鲁进行慰抚，实际上就是对他发出警告。

天子特使的到来令阿史那贺鲁大为惊愕，他没想到自己的行动这么快就被朝廷察觉了。

特使桥宝明还带来了天子旨意，命阿史那贺鲁的长子阿史那咥运入朝充当人质。由于叛乱的准备还不充分，阿史那贺鲁只好硬着头皮服从了朝廷的安排。

在此，年轻的高宗显然走了一步好棋。因为如此一来，投鼠忌器的阿史那贺鲁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如果高宗长期把阿史那咥运扣为人质，那么阿史那贺鲁绝不可能跟唐朝反目，也不可能在后来的几年里闹出那么大动静。

可惜，也许是因为高宗还年轻，缺乏政治经验，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阿史那咥运放回去了。他或许以为这样小小地震慑一下，就足以让阿史那贺鲁放弃叛乱的念头。可他错了，阿史那贺鲁的野心要比他想象的大得多。

阿史那咥运返回瑶池之后，阿史那贺鲁立刻率领部队向西而去，叛离

了唐朝。

阿史那贺鲁这一走，有如猛虎归山，唐朝的西域边陲立刻罩上了一层浓密的战争阴云。

此时，西突厥的在位可汗是乙毗射匮，此人才能平庸，西突厥各部早已不服其统辖，所以当阿史那贺鲁的兵锋突然直逼他的王庭时，乙毗射匮马上乱了阵脚。他仓促集结部众抵御阿史那贺鲁，结果一战即溃，其部众全被阿史那贺鲁吞并。

阿史那贺鲁一战平定了西突厥可汗，其野心大为膨胀，随即在双河与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一带建立了王庭，自立为沙钵罗可汗。原乙毗射匮可汗辖下的十个直属部落一齐归附，数月之间，阿史那贺鲁摇身一变就成了西突厥的头号人物，麾下拥有精兵数十万众。稍后，处月（今新疆新源县境）、处密（今新疆塔城市境）两大部落以及西域诸国，又相继投靠了阿史那贺鲁。

唐朝在西北边境的一大劲敌就这样悍然崛起了。

永徽二年七月，志得意满的阿史那贺鲁亲自率部入侵庭州，很快就攻陷了庭州境内的战略要地金岭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北）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县东南），杀死并俘虏了数千唐军。

高宗李治勃然大怒，同时也为自己当初的掉以轻心追悔不已。此后的几年里，高宗先后派遣梁建方、程知节等人进行了两次西征，虽然占据了一些土地，也歼灭了西突厥的一些有生力量，却始终没有达成最主要的战略目的——平定阿史那贺鲁。

对此，高宗李治自然是极不甘心。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闰正月，也就是二次西征刚刚结束的两个月后，高宗就宣布对西突厥发动第三次远征。

此次远征军的主帅，就是曾在第二次西征立下战功的苏定方。

苏定方，冀州人，出道很早，但是命途多蹇，一生的道路颇为曲折。大业末年，天下板荡，盗贼蜂起，苏定方的父亲苏邕率领本郡的数千乡勇征讨盗贼，当时年仅十余岁的苏定方就随父从军，每战必冲锋在前，“骁悍多力，胆气绝伦”（《旧唐书·苏定方传》）。后来苏邕战死，郡守便让苏定方接管其父的军队，负责讨伐郡南的盗贼张金称。苏定方不负众望，大破贼众，并且手刃了匪首张金称。不久，郡西又有杨公卿聚众起事，苏定方又迅速将其击溃，杀获甚众，一时间享誉

郡县，深受当地人的尊敬和拥戴。

此后，群雄逐鹿的烽火渐成燎原之势，苏定方知道隋朝天下已经名存实亡，随即投奔窦建德。窦建德的部将高雅贤对他极为赏识，便收他为养子。可惜没过多久，窦建德就兵败身死，苏定方只好跟高雅贤一起追随刘黑闼，其后又在刘黑闼麾下屡立战功，没想到刘黑闼最终还是成不了气候，很快又被唐军平定，苏定方只好解甲归田，隐居乡里。

绕了一大圈，苏定方又变成了默默无闻的一介布衣。直到贞观初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苏定方才再次从戎，重新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李靖平定东突厥的战役中，苏定方担任前锋，于碛口突袭颉利可汗，成功击破颉利的牙帐，收降了颉利的大量部众，为唐军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再次崭露了他的过人胆识。

尽管立过这样的战功，可在灿若星辰的初唐名将中，贞观时期的苏定方还是显得很不起眼。参加二次西征的那一年，苏定方已经年过六旬，年龄与程知节相仿，可他的职务还只是区区的中郎将，基本上还是个小人物。

可是，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个垂垂老矣、默默无闻的苏定方，很快就将威震西域、名动朝野。

或许连苏定方自己都不会料到，就是在西域的这片大漠黄沙中，一条大器晚成的名将之路已经在他的脚下悄然开启。

为了确保第三次远征的胜利，唐军兵分两路，征讨与安抚并重：一路由苏定方（此时已被擢升为右屯卫将军）担任总管，以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为副总管，征调回纥骑兵，从北线直接进攻西突厥；另一路由西突厥降将——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安抚大使，从南线西进，负责招抚他们在西突厥的旧部。

这一年春天，唐朝的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西北方向挺进。苏定方率领主力沿着金山（今新疆阿尔泰山）山脉，直逼驻扎在北麓的处木昆部落。这个部落在去年的咽城大战中曾遭唐军重创，此时元气远未恢复，唐军一发起进攻，处木昆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其部落酋长懒独禄不得不率麾下一万余帐向唐军投降。苏定方尽力安抚，随即挑选了处木昆的一千多名精锐骑兵，编入唐军作为前锋。

紧接着，唐军继续西进，目标是突骑施部落。

这个部落和处木昆一样，也是在去年遭到了唐军的重创，此时他们眼见处木昆已经投降，情知自己无力抵抗，慌忙向阿史那贺鲁求援。

阿史那贺鲁意识到，如果不挡住唐军的攻势，西突厥的十姓部落势必会被唐军各个击破。他旋即发出命令，集结了十姓部落（包括处木昆的残部）的十万大军，准备在曳咥河（今中亚额尔齐斯河）西岸列阵，凭借天堑阻击唐军。

苏定方察觉了阿史那贺鲁的战略意图，于是亲率唐军精锐及回纥骑兵共计一万多人，迅速抢渡曳咥河，在西岸摆开了阵势。

阿史那贺鲁的意图彻底落空，不禁大为恼怒。可当他率领十万大军逼近曳咥河时，心中的恼怒就全部转化成了窃喜。

因为唐军的兵力不但只有突厥军的十分之一，而且还背靠大河，想逃跑都没有退路。

阿史那贺鲁顿时信心倍增，他相信这一仗一定可以全歼唐军主力。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苏定方镇定自若，毫无惧色。他命令步兵在南部平原上密集排列，长矛的枪尖全部向外，自己则亲率精锐骑兵在步兵阵后方的北部平原上列阵。

西突厥军队依仗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对唐军的步兵阵连续发起了三次冲锋，可是在如林的长枪面前，突厥人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却始终无法撕开唐军的防线。

此时，苏定方正策马立于北部的高坡上静观战场的变化。他知道，突厥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由十个部落构成，其中的左厢五部还一度背叛过阿史那贺鲁，右厢五部中的泥孰部落也向来与阿史那贺鲁不睦。所以，突厥人表面强大，实则内部矛盾重重。

这就是突厥军队的致命弱点。

当突厥军队的第三波攻击又被唐军击退后，苏定方知道其战斗力已经衰竭，立刻下令全体骑兵跟随他一起冲锋。

随着苏定方一声令下，唐军骑兵随即像两把尖锐的钢刀，从步兵阵的两翼伸出，然后直直插入敌阵之中。

决战时刻，西突厥十个部落貌合神离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唐军的猛烈进攻下，突厥人各自为战，互不相援，人多的优势丝毫发挥不出来。

而且只要一个部落的阵脚被打乱，其他部落马上争相溃退。到最后，尽管阿史那贺鲁的帅旗拼命挥舞，也仍然阻止不了十万大军的全线溃败。

唐军随即转入全面反攻，苏定方亲率骑兵深入追击了三十里，斩杀及俘虏的敌军达数万之众。

此战，唐军大获全胜。苏定方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又一次创造了以寡击众的经典战例，从此威震西域，在一代名将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曳咥河会战的前夕，朝中的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曾向高宗献上了一条离间突厥人的计策，他说："泥孰部落的酋长向来不服从阿史那贺鲁，后来被阿史那贺鲁击败，妻子儿女均被掳为人质。今后，西征军一旦击破阿史那贺鲁的部众，只要擒获泥孰的妻子儿女，应当将其全部送还，并给予赏赐。如此一来，泥孰必定会背叛阿史那贺鲁，并且誓死效忠大唐。"

高宗采纳了薛仁贵的计策，随即向苏定方发出了一道密诏。

而在此次会战所俘虏的西突厥人中，果然有泥孰酋长的妻子儿女，苏定方当天就派人秘密将其送还。泥孰酋长顿时感激涕零，当即表示愿意归降唐朝。

曳咥河会战的次日，苏定方继续勒兵追击，阿史那贺鲁自恃兵力仍然占优，于是回头再战。可他绝没有想到，这一天他将败得更惨，并且将成为他短暂的可汗生涯中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捩点。

当唐军与突厥军接战之后，刚开始胜负难分，可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泥孰部落忽然临阵倒戈，西突厥军队措手不及，顿时军心大乱。在泥孰部落倒戈的效应下，其他四个右厢部落也全部向唐军投降。

一见右厢五部在片刻之间全都放下了武器，左厢五部再也无心恋战，于是各自落荒而逃。最后只剩下处木昆的大首领屈律啜率领数百亲兵，簇拥着阿史那贺鲁仓皇向西逃窜。

紧继苏定方大破阿史那贺鲁之后，由阿史那步真率领的南线唐军也迅速逼近西突厥左厢五部的驻地。

左厢五部逃回驻地后，终日惶惶不安，一直在担心他们今后的命运。惊魂未定之时，又得知南线唐军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而且接到了阿

史那步真派人送来的招降信。五大酋长料定阿史那贺鲁大势已去，再跟着他混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同一天，五大酋长作出了归降唐朝的决定，随后一同前往唐军大营，向阿史那步真投降。

稍后，另一路南线唐军的指挥官阿史那弥射也利用他在西突厥原有的影响力，成功收降了处月、处密两部落。

至此，阿史那贺鲁已经众叛亲离，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显庆二年冬天，苏定方命萧嗣业、回纥酋长婆闰担任先头部队，他本人和任雅相率主力殿后，冒着冬季的严寒继续向西挺进，兵锋直指阿史那贺鲁的王庭。

其时正逢天降大雪，朔风怒吼，地上的积雪足足有两尺之厚，远征军的行进极为困难。于是部将们纷纷向苏定方建议：原地休整，等待天晴再行军。

然而，他们的提议马上遭到了苏定方的否决。他告诉将士们："阿史那贺鲁一定以为，现在天寒地冻、大雪封山，我军难以前进，所以他肯定会有恃无恐、放松警惕。这正是我军追上他的大好时机，倘若行动迟缓，他们必定远遁，到时候想追就追不上了。所以，建立不世之功，就在此时！"

大唐帝国三次西征阿史那贺鲁，前两次都功败垂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统帅的意志、勇气和决断力不够。较之前两次西征，苏定方这一次遭遇的自然条件其实是最恶劣的，但是他身上却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必胜的信念和无坚不摧的意志。

大军继续西行，在茫茫的雪原中昼夜兼程地向西突厥的王庭挺进。

经过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苏定方率领的北路军终于进抵双河。而南线的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也同时抵达，两路唐军胜利会师，力量更加强大。

双河距离阿史那贺鲁的王庭仅有两百里。此时，阿史那贺鲁仍然毫无防备，正优哉游哉地在金牙山附近打猎。

不出苏定方所料，阿史那贺鲁认定唐军不可能在这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中长途奔袭，所以他依旧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绝对有机会东山再起。

可阿史那贺鲁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唐军恍如从天而降的雄鹰一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阿史那贺鲁才如梦初醒。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仓促集合起来的部队根本抵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转眼间阿史那贺鲁的王庭就被攻破了，数万颗突厥人的首级被唐军将士斩落马下，而象征着可汗权威的大鼓和巨纛也被唐军缴获，万般无奈的阿史那贺鲁只好带着儿子咥运、女婿阎啜等少数几人突围而去，逃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

阿史那贺鲁的战败和流亡，意味着大唐帝国的第三次远征取得了全面胜利。

苏定方知道，阿史那贺鲁已成丧家之犬，终究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所以并没有忙着追击，而是着手安抚西突厥的各个部落，处理战争遗留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苏定方深知，与平息叛乱同等重要的就是安定人心。只有在战乱过后迅速恢复西突厥的和平与稳定，大唐帝国的军队才真正称得上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史称阿史那贺鲁败逃之后，“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阿史那贺鲁）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资治通鉴》卷二百）。

苏定方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面恢复了西突厥汗国的社会秩序，从而获得了西突厥各个部落及其民众的拥戴和支持。

做完这一切后，苏定方把追缉阿史那贺鲁的任务交给了副手萧嗣业，然后光荣凯旋。

阿史那贺鲁一口气逃到石国西北部的苏咄城外，人困马乏、饥渴难耐，但他不敢进城，只命手下人拿着珠宝去城里换购马匹和食物。苏咄城主得知阿史那贺鲁到来的消息，随即命人准备了丰盛的美酒佳肴，然后毕恭毕敬地出城迎接。

走投无路的阿史那贺鲁看见苏咄城主如此盛情，不禁大为庆幸，马上消除了戒备，随同苏咄城主一起入城。

可阿史那贺鲁断然没有想到，就在他跨入苏咄城的一瞬间，背后的城门便訇然关上，紧接着从四周冲出了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他们一行人团团围住。而刚才还一脸热情的苏咄城主，此刻正远远地站

着，用一种得意而轻蔑的笑容注视着他。

那一刻，阿史那贺鲁彻底绝望。

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这六年的可汗生涯对此刻的阿史那贺鲁而言，就像是南柯一梦。

这场梦有多么辉煌，他此刻的痛苦就有多么强烈。

这六年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他此刻感到的沮丧就有多深。

阿史那贺鲁最后重重地把头垂了下去。

同时垂下的，还有他手中的剑。

他曾经用这把剑掌控了整个西突厥汗国的命运，可现在，他却连一己的命运都掌控不了。

苏咄城主擒获阿史那贺鲁后，立刻把他交给了石国国君，石国国君随后又把他交给了唐军将领萧嗣业。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阿史那贺鲁被押送到京师长安，高宗李治特意举行了一场献俘仪式。苏定方一身戎装，亲自押解阿史那贺鲁入宫献俘。随后，苏定方因平定西突厥之功，被擢升为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

战后，大唐帝国在西突厥的土地上设置了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封为兴昔亡可汗，统领西突厥的左厢五部（五咄陆）；以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封为继往绝可汗，统领西突厥的右厢五部（五弩失毕）。两个都护府均归属安西都护府管辖。此外，对于西突厥的各个部落首领，唐朝廷也依据其部落大小和位望高下，分别授予刺史以下的官职。

曾经强盛一时的西突厥汗国宣告瓦解。

由于西突厥汗国已经不复存在，原本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各国，纷纷回过头来归附大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朝廷又在中亚的石国、米国、史国、大安国、小安国、曹国、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1]设置了州、县、府共一百二十七个。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中亚的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个国家又相继归附大唐帝国。唐朝先后在这十六个国家建立了八个都

督府，七十六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并将其全部划入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

至此，大唐帝国的疆域已经由西域延伸到了中亚，又从中亚进一步拓展到了西亚的伊朗高原。高宗朝君臣继承了贞观时代的雄厚国力和开拓进取的尚武精神，终于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国力和声威在公元七世纪中叶臻于极盛！

百济：一场得而复失的战争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也就是在大唐帝国刚刚平定西突厥之后，高宗李治接到了来自新罗的一道奏表。

准确地说，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新罗国王金春秋发出的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他在信中说，百济再度勾结高丽屡屡入侵，已经占领了新罗的大片土地，唐朝要是再不出兵，新罗就彻底完蛋了！

看完信后，一股按捺已久的怒火终于在高宗李治的心中升腾起来。

当年太宗皇帝亲征高丽失败，不久后便赍志而殁，这件事一直是李治心头的一个阴影。登基之后，李治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出兵踏平桀骜不驯的高丽和百济，完成隋唐三代帝王（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未了的心愿，以慰父皇李世民在天之灵！

但自高宗即位以来，帝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上。同时，为了征讨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帝国在西线共发动了三次远征，前后历时六年，付出了相当高的战争成本，所以高宗一直无法腾出手来处理朝鲜半岛的事务。

这些年来唐帝国虽然没有对朝鲜半岛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高丽的打击和袭扰。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铩羽而归之后，太宗就开始大规模扩建海军，大规模地制造战船。很快，唐帝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太宗还制定了“有限战争”的战略，不以歼灭敌军、攻城略地为目的，而是频繁出兵，重点袭击并破坏高丽的农耕区，以此打击高丽的经济，为最终平灭高丽铺平道路。

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到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的十几年间，唐帝国在上述战略的指引下，从海陆两线屡屡出兵，持续不断地对高丽发动袭扰战。帝国名将如李勣、薛万彻、程名振、苏定方、契苾何力、薛仁贵等人，都曾先后开赴高丽作战，对高丽实施了沉重的打击。

然而，高丽却始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就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丽还曾联合百济和靺鞨部落，再次悍然入侵新罗，那次入侵一共占领了新罗三十三座城池。

高丽的态度明摆着——你打我，我就打你小弟！既然连你们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都灭不了我，你这个大权旁落、软弱无能的李治又能奈我何？

当时唐帝国正在对西突厥用兵，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高宗李治只好暂时隐忍，只派遣程名振和苏定方从陆路对高丽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进攻，在取得小胜之后就撤回国内，目的显然不是要与高丽全面开战，而仅是实施一次必要的战略威慑。

也许高丽把唐高宗的隐忍当成了懦弱，所以此次才会再度与百济联手攻击新罗，以此跟唐帝国叫板。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此刻在高宗李治眼中，高丽和百济无疑就是这种自取灭亡的疯子。

显庆五年三月初十，高宗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以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其副手，共率领水陆十万大军，由海路出发，东征百济；同时，任命新罗国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负责统率新罗军队，配合苏定方的远征军夹击百济。

高宗的战略是——先把百济这个狐假虎威的爪牙灭了，再集中全力收拾高丽。

苏定方的东征大军自山东半岛的成山港出发，横跨黄海，于同年八月进抵朝鲜半岛南端的熊津江口。

百济军队已经在此严阵以待。

唐军在熊津江口抢滩登陆，海军从正面对百济守军发动进攻，陆军则在强行登陆之后迅速迂回到百济防线的后侧进行攻击。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之下，百济军队的防线迅速崩溃，被唐军斩杀数千人，余部被迫

后撤。

占领熊津江口后，唐军水陆并进，直逼百济都城。百济军队倾国而出，在都城外二十里处摆开阵势，准备与唐军决一死战。

百济军队和高丽军队一样，长于守城，短于野战，此时竟然倾尽主力与唐军展开决战，无疑是自己把脖子伸到了苏定方的刀下。

这一战毫无悬念，唐军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百济军队，斩杀了一万多人，旋即兵临城下，把百济都城团团围困。

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自知此城难保，在唐军围城之前，便带着太子扶余隆等人夺路而逃，一直逃到了百济的北部边境，只留下次子扶余泰守都城。

扶余泰看见老爸和大哥自顾自逃命去了，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了他，心里头老大不爽。他料定都城迟早会落入唐军手中，最后索性自立为百济国王。

在扶余泰看来，既然横竖是个死，那就过把瘾再死！更何况，国王比亲王的号召力大得多，以国王的身份率众固守，或许将士因此奋勇，百济还有一线生机。

扶余泰自立为王，有一个人立刻绝望了。

他就是太子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他想，爷爷和老爸这一王一太子都还没死，叔叔就拥兵自立了，就算到时候能把唐军击退，可爷爷和老爸还回得来吗？就算能回来，八成也会被叔叔干掉。

扶余文思越想越怕，最后干脆带着部众翻墙而下，投降了唐军。

扶余文思的出降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城中百姓纷纷步其后尘，争先恐后地出城投降。扶余泰勃然大怒，可他无论用什么办法也阻挡不了投降的人潮。

趁百济人心大乱之际，苏定方又命士兵悄悄攀上城墙，把唐军旗帜赫然插在了百济都城的城头上。

看着高高飘扬的唐军旗帜，扶余泰傻眼了。

他知道，人心已失，大势已去，再负隅顽抗也没有用了。随后，刚过了几天国王瘾的扶余泰就万念俱灰地打开了城门，向苏定方投降。

就这样，唐军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了百济的都城。

百济都城的失陷再次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群龙无首的各城城主纷纷举城归降。稍后，走投无路的老国王义慈和太子隆也乖乖回来投降了唐军。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百济的五部、三十七郡、两百座城池和七十六万户人口就全部归降。

至此，立国达六百七十八年的百济宣告灭亡。

老将苏定方轻而易举地平定了百济，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唐高宗李治大喜过望，随即下诏，在百济设置了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百济的原有官员担任各地的都督和刺史。

百济的灭亡太迅速了，迅速得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立国六百多年，拥有人口将近四百万的国家，会这么容易屈服吗？

答案是否定的。

面对轻松到手的巨大胜利，唐军将士不免都有些飘飘然，于是纵兵劫掠的行为时有发生，此举顿时激起了百济军民的反抗情绪。正当唐军上上下下都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时候，百济军民就已经悄然打响了一场复国战争。

率先揭起反旗的人，就是百济勇将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是百济西部人，史称其“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他在百济的官职是达率，相当于中国的刺史。当百济举国降唐时，黑齿常之也归降了唐军。但是不久之后，黑齿常之就发现唐军有纵兵劫掠的行为，许多试图反抗的百济青壮年均遭唐兵屠戮。黑齿常之又惊又怒，随即带着十几个心腹逃回本部，并且召集流亡部众，占据任存山，很快就修筑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作为反抗唐军的基地。

黑齿常之揭起反旗之后，顿时应者云集，短短十天之间就有三万多人投奔到他的麾下。苏定方得知叛乱的消息后，迅速率军前往镇压，黑齿常之亲自带着敢死队迎击，数次挫败唐军的进攻。

反抗军获胜之后，士气大振，黑齿常之遂率领军队发起反攻。由于百济各地的郡守和士兵都是原百济军队的官兵，因此黑齿常之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在短短的时间内，黑齿常之就以破竹之势一连收复了将近两百座城池。

面对来势汹涌的百济复国浪潮，苏定方一筹莫展。他多次出兵试图消灭黑齿常之，无奈却被其一一击败。最后苏定方只好放弃，留下中郎将刘仁愿镇守熊津都督府（原百济都城），然后押着百济老国王扶余义慈和一干高级官员班师回国。

苏定方率唐军主力回国之后，百济的叛乱顿时越演越烈。

除了猛将黑齿常之外，百济僧人道琛、将军福信等人也在周留城聚众起事。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四处召集徒众，势力迅速壮大。与此同时，他们又从日本接回了百济王子扶余丰，拥立他为百济的新国王。

至此，苏定方在百济取得的辉煌战果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整个百济名义上是唐朝的五都督府，实则只有一座熊津城掌握在唐军手中。

道琛、福信随后又率大军猛攻熊津，势单力薄的刘仁愿只能拼尽全力困守孤城。

熊津城危在旦夕。

危急时刻，高宗李治紧急起用了一位将领，命他即刻率领留在百济的另一部唐军火速援救熊津。

这个人就是刘仁轨。

被命运之手一把推上风口浪尖的这一年，刘仁轨跟苏定方一样，也已经是六十多岁高龄了。但有一点刘仁轨跟苏定方却大不一样，那就是——苏定方十几岁就开始驰骋沙场，可刘仁轨却一辈子都没有上过战场，更不用说带兵打仗！

高宗起用这么一个人，能够挽回万分危急的百济形势吗？

连身经百战的名将苏定方都不得不知难而退了，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刘仁轨，又怎么可能扭转乾坤呢？

人们对此充满了疑虑。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六旬老人刘仁轨，最终不但彻底扭转了百济的危局，而且一不留神就成

了一代名将。

谁也不会料到，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的得而复失和功亏一篑，到头来居然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刘仁轨的传奇人生。

在高宗时期的战争史上，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那就是老将特别多。这些人中有的是年轻时代便建功立业的元勋宿将，如李世勣和程知节等人；有的是戎马一生，老来才有机会崭露头角、扬名立万，如苏定方；有的是遭到政治迫害，被流放边疆却因祸得福地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如裴行俭；再有就是刘仁轨这种人，一辈子都与战场无缘，到老却一不留神变成了一代名将。

那么，在敌众我寡、形势异常严峻的百济战场上，刘仁轨究竟是如何力挽狂澜，成为一代名将的呢？

独臂擎天：刘仁轨传奇（上）

刘仁轨原本在朝廷担任给事中，因参与审理大理丞毕正义自缢一案，在审理过程中秉公执法，差点挖出了幕后主使李义府，因而得罪了李义府，旋即遭到报复，被贬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刺史。几年后，高宗下诏征讨百济，刘仁轨承担了东征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负责海上的粮食运输。就在刘仁轨准备督船出海的时候，突遇海上气候变化，他便推迟了出海日期。

可是，一直想把刘仁轨置于死地的李义府在得知情况后，却严令刘仁轨按时出行，不得耽搁。刘仁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出海，结果遭遇暴风，船只沉没，大多数水手葬身海底。

李义府立刻抓住把柄，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去调查刘仁轨失职一案，并且特意叮嘱袁异式说：“君能办事，勿忧无官。”

李义府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袁异式利用这个案子整死刘仁轨。袁异式抵达青州后，对刘仁轨说：“您在朝中得罪了什么人，心里应该很清楚。依我看，您最好早作打算。”

袁异式其实是在暗示刘仁轨——既然你已经犯在了李义府手里，那迟早也是个死；与其被朝廷明正典刑，弄得个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还不如趁早自我了断，留一个全尸，保一家平安。

可是袁异式的“忠告”却遭到了刘仁轨的断然拒绝。他说：“我为官失

职，理当接受国法的制裁，你如果依照法律将我处死，我绝不逃避。可是，如果要我自杀而让仇人称心快意，我绝不甘心！”

袁异式奈何不了刘仁轨，只好把他绑了，押回京师复命。案件上报朝廷后，李义府马上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旁边的一个朝臣源直心听了，当即替刘仁轨打抱不平，说：“海上突起风暴，非人力所能及。”认为刘仁轨失职情有可原，罪不当死。

高宗随后作出裁决，将刘仁轨罢官，让他以布衣身份随军东征。

就这样，刘仁轨来到了战火纷飞的百济。可他已经无官无职，连普通士兵都算不上，充其量就是一个推车挑担的伙夫。

在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居然落到了这般田地，刘仁轨内心的痛苦和失落可想而知。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消沉。

即便只是当一个随军出征的伙夫，刘仁轨胸中的报国热情也丝毫没有减退。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百济形势风云突变、急转直下，刘仁轨这一生恐怕就再也没有出头的机会了。

当高宗李治任命刘仁轨为检校（代理）带方州刺史时，刘仁轨哈哈大笑地说：“天将富贵此翁矣！”其乐观和自信的心态溢于言表。

高宗给刘仁轨下达的任务是：会同新罗军队，火速率部驰援熊津。

出发之前，刘仁轨特意向州司请领《唐历》及唐朝历代皇帝的庙讳名册。然后，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满腔豪情地说了一句话：

“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资治通鉴》卷二○一）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涌现的人才特别多，而最令人瞩目、最值得后人称道的就是——其中大多是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在初唐时期，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就活跃着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上马便可杀贼，下马即能治国，在朝堂和沙场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才华。

而刘仁轨正是其中的一员。

他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可带领军队却是一把好手。史称

他“御军严整”、指挥有方，因而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三月，刘仁轨率部驰援熊津，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百济复国军在熊津江口修筑了坚固的防线，并派重兵布防，企图阻止他的攻势，结果一战而溃，被杀和溺死了一万多人。正在围困熊津城的道琛听到前方惨败的消息，不敢与刘仁轨交锋，仓促解围而去，退守任存城。

刘仁轨一出手就解了熊津之围，顿时让留守百济的唐军士气大振。刘仁轨随即与刘仁愿合兵一处，共守熊津城。

稍后，百济的军事高层出现了内讧。福信刺杀了道琛，兼并了他的部众，夺取了百济复国军的最高指挥权，随后又大力招集各地的流亡部众，势力顿时更加强大。

正当二刘在百济苦撑危局的时候，高宗又策划了一场崭新的军事行动。

那是埋藏在他心中多年的夙愿——征讨高丽。

高宗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急着出兵高丽呢？

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已经等待了太久，所以不耐烦了。这一点其实不难看出来，因为他在宣布征讨高丽的同时，竟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御驾亲征，让武后和满朝文武都吓了一大跳，后来是武后上表力谏，他才悻悻作罢。此举充分说明，高宗征服高丽的愿望确实已经压抑得太久，所以急于想了却夙愿。

另一个原因，估计是想通过对高丽用兵来威慑百济。因为高丽一直是百济的坚强后盾，如果能一举消灭高丽，百济复国军的斗志必然会受到严重打击，甚至很可能因此瓦解。如此一来，熊津的危险便能解除，百济也可不战而下，用兵高丽就收到了一石二鸟之效。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设想，所以在龙朔元年四月，高宗正式下诏，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率萧嗣业及诸胡兵力共三十五军，从海陆两道分兵合击高丽。

这一年七月，苏定方率领海军直趋江，在此大破高丽守军，随后屡战皆捷，迅速进围平壤。与此同时，陆军也快速越过辽东，兵锋直指鸭绿江。高丽权臣渊盖苏文派遣其长子渊男生率数万精兵扼守，唐军前锋受到阻击，无法渡江。

九月，契苾何力率主力进抵鸭绿江。其时正逢江水结冰，契苾何力立刻下令全军踏冰冲锋。高丽守军本来在兵力上就处于劣势，如今失去了天险，顿时斗志全无，防线瞬间崩溃。唐军一直追击了数十里，斩首三万余级，余众皆降，渊男生仅以身免。

此次出征，唐帝国的海陆两军都大获全胜，而且苏定方部已经开始围攻平壤，如果契苾何力能够乘胜而进，与苏定方会师，完全有可能一举攻克平壤，进而平定高丽。

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高宗李治却忽然下诏，命令契苾何力班师回国。

高宗突然撤兵的原因史书无载，但是从隋唐两朝多次东征高丽的失败教训中，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被迫撤兵的原因都是因为陆路的运输出现了重大问题。此次契苾何力的陆上远征军直接绕过辽东的多座坚城，长驱直入高丽境内，其漫长的运输补给线随时有可能被辽东的高丽军队切断。而且契苾何力攻过鸭绿江的时候，时节已经进入冬季，唐军需要大量的冬衣和粮草，无奈后勤补给又得不到保障，在这种形势下，高宗只能要求契苾何力撤军，以免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契苾何力部撤退后，苏定方部依旧猛攻平壤。他的后勤没有问题，因为他率领的是海军，海上运输不会遭到高丽军队阻截。

于是，从这一年七月兵围平壤，到次年（公元662年）二月，苏定方部对平壤整整围攻了八个月，但是这座坚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为了早日攻克平壤，高宗再次派出了一支海军，由左骁卫将军庞孝泰率领，自海路进入高丽的蛇水（今朝鲜合井江），准备增援苏定方。

然而，庞孝泰部却在此遭到了高丽军队的顽强阻击。庞孝泰率部殊死奋战，最后还是输掉了这场战斗，庞孝泰本人，连同跟随他出征的十三个儿子，全部壮烈殉国。

蛇水之败是唐军此次东征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平壤城下的苏定方部得知援军覆没的消息，士气顿时大挫。此时虽然已经进入春季，但是平壤城的上空忽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唐军将士的战斗力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高宗朝廷眼见攻克平壤的希望日益渺茫，不得不命令苏定方撤兵回国。

在讨伐高丽的漫漫征途上，唐帝国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百济战争几乎前功尽弃，高丽战争再度无功而返，朝鲜半岛逐步恶化的形势顿时让高宗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忧虑。

要不要放弃这场东征？

李治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

独臂擎天：刘仁轨传奇（下）

东征高丽的失败，意味着百济战场上的刘仁愿和刘仁轨已经彻底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此时，这支孤军已经在熊津坚守了整整一年。高宗担心他们无法长期坚持，最后不得不下了一道敕书——命他们放弃熊津，撤往新罗。他在敕书中特地强调：如果新罗国王需要他们留下来，那就留驻新罗；如果不需要，就即刻渡海回国。

高宗的这道敕令显然是出于对将士们的关心和体恤，但是作出这个决定却是痛苦而无奈的。因为最后这支部队一旦撤出百济，就意味着唐帝国这两年来在朝鲜半岛上付出的所有努力将全部付诸东流！

刘仁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可是，在接到天子敕令的时候，熊津城中的将士们却都庆幸不已。

因为他们太想念故国，太想念亲人了！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出征到现在，他们离开故土已经整整两年，而且长期困守在熊津孤城里，更让他们觉得憋屈和窝囊。在他们看来，与其在这里毫无希望地苦撑苦熬，还不如尽早放弃。

所以，此刻的唐军将士们都巴不得两位将领马上作出决定——撤军回国。

就在这个时候，刘仁轨站出来了。

他告诉众人，他的决定是——继续坚守。

将士们一片哗然。

刘仁轨环视着这些面容枯槁、神情疲惫的唐军将士，开始陈述他反对

撤军的四大理由。

其一，“《春秋》大义，大夫出疆，若能安社稷、利国家，独断专行亦无不可。诸君都是帝国的臣民，就要以国家的利益为上，除了抱定必死的决心，我等别无选择！岂能各怀私心、苟且偷安？”

其二，“皇上欲征服高丽，故先讨伐百济。如今我等就是一把尖刀，插在了敌国的心脏。敌军虽然看上去人数众多、守备森严，但是只要我们秣马厉兵，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没有打不赢的道理。一旦取得初步胜利，军心自然安定，然后分兵据险，扩大战果，并且及时向皇上奏捷，要求增兵。朝廷知道我们有成功的把握，必然遣将出师。到时候里应外合，百济反抗军一定会被歼灭。这不仅能保住既得的胜利，而且可以永保海外的风平浪静。”

其三，“现在围攻平壤的大军已经撤退，如果再放弃熊津，那么百济的残敌必将死灰复燃，而高丽的平定就更是遥遥无期。况且，如今我们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假如弃城而走，很可能身陷重围，被敌人俘虏。就算安全撤往新罗，也终归是寄人篱下，万一出现意外，必然悔之不及。”

其四，“敌军首领福信凶悖残暴，与他拥立的国王扶余丰貌合神离、相互猜忌，随时可能爆发内讧，自相残杀。在此情况下，我等更应坚守到底，静观其变，伺机发动反攻，决不可轻言放弃！”

唐军将士们看着年已老迈却依然壮志在胸的刘仁轨，一股已然冷却的热血逐渐在他们心头重新沸腾起来。

并不仅仅是刘仁轨对战况的冷静分析说服了大家，更主要的是——这个老人无比坚定的勇气、意志和信念最终感染了他们，打动了他们。

“在我们的人生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挫折和磨难。这时，只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并奋力拼搏，就能战胜磨难。在困境中，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失败了，那你就会消沉下去；如果你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那么你就会走过坎坷，最终获得成功。只要信念不被厄运打垮，希望之光就终会驱散绝望之云！”（阿尔伯特·哈伯德《送给加西亚的信》）

刘仁轨正是这样一个屡遭陷害、历经磨难的人，即便后来被高宗起用，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置身于强敌之中。如果不是依靠一种强大的信念，如果不是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刘仁轨就绝不可能把这场东征从失败的边缘拯救回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老当益壮的刘仁轨在这种危难时刻所发出的“希望之光”，终于驱散了笼罩在将士们心头的“绝望之云”。在刘仁轨的影响下，无论是刚刚升任熊津都督的刘仁愿，还是每一个普通士兵，无不抱定必胜的信念，誓与熊津共存亡。

与此同时，百济国王扶余丰和军队首领福信却以为唐军必定会撤出熊津，所以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中讥笑说：“诸位使节何时西还？我方当派人为你们送行。”

看到这封信时，刘仁轨笑了。

因为他知道机会来了。

百济军队自以为唐军在高丽遭到了严重挫折，困守熊津的这支部队势必很快就会撤离，所以他们长期绷紧的神经已经放松了下来。

这无疑是唐军扭转战局、反败为胜的良机！

刘仁轨与刘仁愿商议之后，决定发动反攻。

龙朔二年七月，熊津城中的唐军忽然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百济复国军发起了一场闪击战，一连攻克了支罗城、尹城、大山、沙井（均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等多座堡垒，歼灭了大量敌军，并迅速分兵据守。

就在百济军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刘仁轨又密约新罗出兵，兵锋直指熊津城东面的一座战略要地——真岘城。

真岘城是一座修筑在峭壁上的城池，易守难攻。福信深知其重要性，很早就加派了军队，严加防范。然而，正因为此城险要，加上有重兵布防，所以百济军队反而放松了警惕。刘仁轨率部进抵真岘城下后，马上利用夜色的掩护，顺着峭壁上繁盛的草木攀爬而上，悄悄干掉了所有哨兵，到天亮时分就已占据该城，百济守军一觉醒来，都乖乖地做了唐军的俘虏。

拿下真岘城是百济战争的一大转折点。

因为此城位于百济与新罗的交通要道上，占据此城就等于打通了熊津与新罗的运输通道，从此唐军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新罗获得必要的粮食和给养。百济要想拔掉插在他们心脏上的这颗钉子，已经是难如登

天了。

随后，刘仁愿迅速上表向朝廷报捷，并要求增兵。

眼见百济这盘死棋忽然之间就走活了，高宗大喜过望，随即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即刻率领七千名士兵渡海增援。

就在唐军发动反攻的同时，百济内部再次爆发了内讧。

不出刘仁轨所料，福信和扶余丰这对君臣始终貌合神离，一直处在相互猜忌的状态。自从福信刺杀道琛、大权独揽之后，扶余丰更是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便暗中在福信身边安插了几个眼线。

七月的某一天，福信忽然称病闭门不出。满腹狐疑的扶余丰马上让他的眼线刺探实情，结果不出他的预料，福信果然是想趁他前去探病之机，将他刺杀，然后自立。扶余丰勃然大怒，索性将计就计，带着自己的一干亲信，以探病为由把福信杀了，并且清除了他的党羽。

福信一死，扶余丰算是铲除了一大心腹之患，可同时也失去了一条强有力的臂膀。扶余丰深知自己不是唐军的对手，于是慌忙派遣使节，前往高丽和日本乞援，请求共同出兵对付唐军。

孙仁师率援兵进入百济后，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兵一处，唐军声势大振。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秋天，经过长时间休整的唐军决定对百济发起全面反攻。诸将纷纷建议先取加林城，因为此城地处水陆要冲，是一个战略要地。然而刘仁轨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加林城异常险要，如果我们采取强攻，必定伤亡惨重；倘若采取围困战术，又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依我之见，不如直捣敌军老巢周留城，这是百济反抗军的总部，所谓除恶务本、擒贼擒王，只要攻克周留城，其他城池必将闻风而下。"

众人经过商议，都对刘仁轨的意见表示赞同。随后，唐军兵分两路：孙仁师、刘仁愿会同新罗军队从陆路进攻；刘仁轨则与副将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海军出熊津江，在白江口与陆军会师，一同夹击周留城。

就在唐军准备发动全面反攻之前，日本在百济国王扶余丰的请求下，已经决定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随即出动了一支庞大的海军支援百济。

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当刘仁轨率领海军进抵白江口时，日本海军已经在此严阵以待。

中日海军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白江口战役，就此拉开序幕。

日本海军的兵力将近四万人，拥有一千艘战船；而大唐海军的兵力大约是一万三千人，战舰一百七十艘。

很显然，日本海军在舰船数量和兵力上占尽了优势。但是，在舰船体积、性能和武器装备方面，日军却远远不如唐军。在两军各有所长的情况下，究竟哪一方能取得胜利，谁也没有把握。

作为中日两国海军的首次交锋，双方都不了解彼此的实力，所以在这一天的战斗中都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军只是彼此发动了几次试探性进攻，试图摸清对方的战术和打法，随后便各自收兵。第一天的战斗，以日军损失几艘战舰而告终，唐军小胜。

当天夜晚，双方的高级将领都连夜举行军事会议，讨论破敌的战术。日军将领一致认为，应该发扬武士道精神，主动进攻，“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同时利用自身的数量优势，以穿插战术将唐军舰船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刘仁轨也在紧张思考着对付敌人的办法。唐军的舰船数量虽然少，但是都配备了投射机、强弩等尖端武器，可以远距离打击日军。此外，唐军舰船的体积庞大，在与日舰的近距离对抗中也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有鉴于此，刘仁轨决定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采用火攻的战术。

八月二十七日，中日海军在白江口的决战正式打响。

白江口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战船密布，千帆相连，日本海军采用既定的战术，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率先对唐军发动进攻。当一千艘日军战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唐军冲来时，唐军的战舰上万箭齐发，瞬间便有大量日军士兵中箭身亡。

两军接战之后，日军迅速以穿梭战术插入唐军舰队之中，凭借六比一的优势将唐军各舰团团包围。就在此刻，唐军舰船上的投射机突然抛出无数火球，全部砸向日舰。顷刻之间，日本的数百艘军舰同时燃起熊熊大火，滚滚浓烟冲天而起，海面上到处是一片鬼哭狼嚎，日军士兵纷纷跳入海中逃生，但是一个个都成了唐军弓箭手的活靶子，就算

不被烧死溺死，最后也都被箭射死。

困兽犹斗的日本海军不甘失败，连续四次重整队形，前后对唐军发动了四次冲锋，但是每一次都有大量舰船被毁，众多士兵伤亡。这一天，“烟炎灼天，海水尽赤”，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资治通鉴》卷二○一）。日军残部仓皇撤离白江口海面，张起船帆拼命逃回了日本。随后，唐军水陆两路并进，迅速攻克了百济反抗军的总部周留城。

发生在公元七世纪的这场中日大海战，以中国海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同时，白江口海战也是百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此战的胜利宣告了百济复国运动的彻底失败。日军势力撤出朝鲜半岛后，百济国王扶余丰万念俱灰，只好流亡高丽，他的两个儿子忠胜、忠志率百济残部向唐军投降。稍后，百济猛将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等人也相继率部归降。

至此，百济再次被唐军征服，只剩下一个叫迟受信的将领仍然据守任存城。

刘仁轨深知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都是难得的将才，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和让他们彻底效忠大唐，刘仁轨断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二人统领旧部，负责进攻任存城，由唐军提供所需的全部粮草和装备。

此举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孙仁师说：“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可能讲信用？”

刘仁轨说：“不然。据我观察，此二人都是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之人，只是未遇明主。若我等以诚相待，他们必将心怀感激、力图报效，诸君大可不必怀疑。”

事实证明，刘仁轨的判断是正确的。

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果然毫无二心，在得到粮草和给养之后，随即率部猛攻任存城。迟受信抵挡不住，只好扔下部众城池、抛弃妻儿老小，只身逃奔高丽。

到此，百济全境终于重新回到唐军手中。

自从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功亏一篑、黯然撤兵之后，刘仁轨就临危受

命，主动承担起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六旬老人刘仁轨，不仅让孤城熊津在强敌环伺之中顽强屹立，而且又在所有人都决定放弃的时刻，以一己的信念和勇气点亮了希望之光，并最终带领大唐将士赢得了百济战争的辉煌胜利。

这是一个力挽狂澜、独臂擎天的英雄传奇。

无论多少年岁月过去，刘仁轨的传奇故事都将在泛黄的史册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

战争结束之后，高宗特意留下刘仁轨镇守百济，命刘仁愿、孙仁师班师回国。刘仁轨脱下戎装，开始致力于百济的战后重建工作。史称："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涂，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资治通鉴》卷二○一）

刘仁轨终于实现了他临危受命时许下的诺言——"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

百济的灭亡，让北方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唇亡齿寒的忧惧感。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从泰山封禅归来的唐高宗李治得到了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高丽权臣渊盖苏文死了。

李治的嘴角悄然泛起一抹笑容。

渊盖苏文死了，高丽的末日还会远吗？

平定高丽：李勣老而弥坚（上）

渊盖苏文死后，他的长子渊男生接任莫离支，亦即高丽首辅之职，继续执掌高丽王国的权柄。

初执朝柄的渊男生为了取得各级官吏和百姓的支持和拥戴，决定前往全国各地巡察。临走之前，他把留守之权交给了两个弟弟：渊男建和渊男产。

对于刚刚取得权力的渊男生来说，满朝文武当然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在他看来，只有把朝廷大权暂时交给两个弟弟保管，他才能放心出巡。

可是，渊男生错了。

面对权力的诱惑，亲兄弟很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反目成仇。

他前脚刚刚离开平壤，马上就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投机政客对他两个弟弟说："你们大哥想独揽大权，迟早会把你们除掉，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渊男生发出了警告："你那两个弟弟打算把首辅大权据为己有，估计不会让你回京了。"渊男生大惊失色，赶紧派心腹潜回京城，侦察两个弟弟的动静。

不料两个弟弟早已野心膨胀，渊男生的心腹刚刚回到平壤，就被他们逮了个正着。随后他们便以国王的名义下诏，命渊男生即刻回京。

渊男生一下子慌了手脚。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亲弟弟居然真的在背后捅他的刀子。

得知两个弟弟已经向他张开了血盆大口，渊男生当然是不敢回平壤了，只好仓皇逃往辽东。渊男生一跑，二弟渊男建正中下怀，随即便以拒不奉诏为名撤了他的职务，然后自立为莫离支，并且马上派遣军队追杀渊男生。

渊男生躲在辽东的一座城池里面，越想越不甘心——明明自己才是高丽王国的莫离支，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流亡者了呢？

可不甘心也没有用，因为一切都已经发生了。眼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座强大的政治靠山，然后兴兵报仇，夺回大权。

去哪里找政治靠山呢？

当然是去大唐。

渊男生随后就派遣儿子泉盖献诚前往长安，请求唐高宗发兵救援。

渊盖苏文死后，高宗李治就密切关注高丽的局势，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又爆发内讧，这无疑是征服高丽的天赐良机。

乾封元年六月，高宗任命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等部，进讨高丽，驰援渊男生。同时授予泉

盖献诚右武卫将军之职，让他当唐军的向导。

九月，庞同善部率先进抵辽东，大破前来追杀渊男生的高丽军队，随后与渊男生合兵一处。高宗当即下诏，封渊男生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从而扶植起了一支反对高丽现政府的政治力量。

这一年年底，高宗李治意识到，全面进攻高丽的时机已经成熟。可是，要让谁担任此次东征的最高统帅呢？鉴于隋唐两朝多次对高丽用兵均遭失败，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统帅人选，高宗不得不慎之又慎。

权衡再三之后，高宗终于敲定了一个人选。

他，就是李勣。

这一年，李勣已经七十三岁高龄，是灿若星辰的大唐开国名将中真正硕果仅存的老将。从大业年间开始，李勣历经隋末的群雄混战、大唐的开国战争以及贞观时代的平定东突厥、薛延陀之战，可谓身经百战、军功赫赫。更重要的是，在贞观末年太宗亲征高丽的战争中，李勣作为主将之一，积累了丰富的辽东作战经验。所以，除了李勣，没有谁更适合担任此次东征高丽的统帅。

乾封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郝处俊、契苾何力、庞同善为副大总管，率高侃、薛仁贵、郭待封等人分海陆两路大举进击高丽。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九月，李勣亲率陆路主力进入辽东，一举攻克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然后挥师东进，以破竹之势连下辽东十六座城池，高丽顿时举国震恐。

渊男建慌忙派遣军队对驻守新城的唐军发起反攻，但被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退。稍后，高侃部进抵金山（今辽宁康平县东），与高丽大军展开遭遇战。唐军失利，被迫后撤，高丽大军乘胜追击，准备一举吃掉高侃部。就在此时，薛仁贵部突然从高丽军队的侧翼杀出，将其截为两段。高侃部随即掉过头来，与薛仁贵前后夹击，高丽军队猝不及防，随即四散溃逃。

这一战打得异常惨烈，高丽军队一共被斩首五万余级，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薛仁贵与高侃挟新胜之威，又连克南苏（今辽宁西丰县南）、木底（今辽宁新宾县）、苍岩（今辽宁清原县东）三城，并与渊男生会师。

就在陆军横扫辽东的同时，郭待封（前安西都护郭孝恪之子）也率领

一支海军跨越黄海，直趋平壤。李勣派遣将军冯师本负责为郭待封运输粮食和装备，不料冯师本在运输途中遇到风暴，船只沉没，郭待封军中随之断粮，情况极为艰难。

郭待封打算写信向李勣求救，可转念一想，万一书信被敌人截获，让高丽军队知道他目前的处境，势必倾巢来攻。可是，要怎么做才能既传达军情，又确保不让敌人破获呢？郭待封思前想后，最后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写了一首离合诗。

所谓离合诗，就是从诗歌的表面文字上看不出真实内容，必须按一定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才能知悉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含义。

可是，当这首诗送到李勣手中的时候，老将李勣却破口大骂："军情紧急，郭待封这小子居然还有心思写诗，老子非宰了他不可！"

李勣手下的文书元万顷觉得事有蹊跷，便拿过去看了看，很快就把郭待封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念了出来。李勣大为诧异，经元万顷一番解释后才恍然大悟，连忙派人给郭待封运送粮草和装备。

郭待封此举，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以密码形式发送的情报。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春天，高宗李治派遣了侍御史贾言忠前往辽东前线，负责视察战况并慰问官兵。

贾言忠回朝复命时，高宗问他对高丽局势的看法，贾言忠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四个字——高丽必灭。

高宗问："你凭什么这么说？"

贾言忠侃侃而谈："隋炀帝之所以东征不克，是因为国内人心怨离；先帝之所以东征不克，是因为高丽内部精诚团结。而现在，高藏（高丽国王）昏庸懦弱，权臣独揽朝纲，渊盖苏文一朝身死，三个儿子旋即内讧。渊男生诚心归顺，为我军之向导，高丽的各种情况，我军洞若观火。以陛下之圣明，国家之富强，加上将士尽力，乘乱取之，高丽之亡翘首可待！"

毫无疑问，贾言忠所列举的诸多理由，确实都是高丽即将覆灭的征兆。高宗听在耳中，喜在心头。他接着又问："辽东前线的几大将领，哪个最能干？"

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了，因为不管贾言忠说谁最能干，都难免得罪其他人。贾言忠略加沉吟，就给了天子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复。他说：“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战，但治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勇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不适合充当前锋，却有统御之才；然而，要论到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者，还是非李勣莫属！”

贾言忠这个回答虽说有些八面玲珑，但确实也道出了实情。

此次出征的这些将领，实在是无可挑剔的。比如其中的薛仁贵，的确当得起“勇冠三军”这个至高的评价。当年太宗李世民亲征高丽，薛仁贵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随军东征，就是凭借其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武艺，故意不穿铠甲而披白袍，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从而一战成名。太宗对他极为赏识，亲自提拔他为游击将军，并且高兴地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薛仁贵从此名扬天下。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薛仁贵率部平定铁勒九姓的叛乱，他亲临阵前，三箭射杀三个铁勒武士，令对手闻风丧胆，进而一战平定了叛乱，缔造了一个“三箭定天山”的千古传奇。此次东征高丽，薛仁贵更将以一系列辉煌的战绩，再次向天下人展现出他勇冠三军的名将风采。

尽管高宗本人对此次东征的将帅阵容也颇有信心，但是为了确保此战能够彻底平定高丽，他最后还是给李勣又增派了一个副大总管。

这个人就是刘仁轨。

其时刘仁轨已经回朝，并且高居右相（中书令）之职。高宗此刻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把他派往朝鲜半岛，足见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之情。

二月，李勣挥师继续向高丽纵深挺进。猛将薛仁贵在金山大捷之后，又担任前锋直逼辽东的另一座军事重镇——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市）。

薛仁贵出发前，只挑选了三千名士兵。诸将都说兵力太少，让他多带一些人去。薛仁贵却笑着说：“兵不必多，关键是看如何指挥罢了。”

薛仁贵随后率兵直扑扶余城。高丽守军侦知唐军兵少，遂倾巢而出，在一马平川的扶余平原摆开阵势，主动迎战唐军。

此举正中薛仁贵下怀。因为高丽军队向来长于守城，短于野战，所以薛仁贵要的就是引蛇出洞，诱使高丽军队出城跟他决战。

当敌军漫山遍野地冲过来时，薛仁贵一马当先杀入敌阵，唐军将士紧

随其后，个个奋勇拼杀。虽然高丽军队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可是碰到拼命三郎薛仁贵，他们也只有挨砍的份儿。此战薛仁贵再次以少胜多，砍杀并俘虏了一万多人，随后又乘胜而进，一举攻克了扶余城。

一听说重镇扶余城被薛仁贵一战而下，扶余平原上四十余城的守将顿时胆破，没过多久就全部望风而降。

薛仁贵以三千骑兵大破高丽军队，不仅斩获一万多人，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扶余城，并且兵不血刃地逼降四十余城，如此辉煌之战果，令人击节称叹！

平定高丽：李勣老而弥坚（下）

扶余城及其附近诸城全盘沦陷，令渊男建大为恐慌。他意识到，以唐军这种犁庭扫穴、雷霆万钧的势头，不消多久就可以直逼平壤，攻克高丽全境。所以，渊男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扶余城，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唐军主力越过鸭绿江。

高丽随即集结了五万大军，火速向扶余城逼近。李勣料定，这差不多是高丽所能调动的最后一支预备队了。如果把这支部队歼灭，高丽势必再也无力组织有效的反扑。

唐军的高级将领们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主帅李勣的上述判断。随后，李勣与多位副总管一同率领唐军主力，在薛贺水（流经辽宁凤城市境）严阵以待，准备与这支高丽大军决战。

总章元年二月底，两军在薛贺水展开大规模会战。

这场大战的结果同样是毫无悬念的——战斗以高丽军队阵亡三万余人而告终。

高丽又一次遭到惨败。

其实，从渊男建决定夺回扶余城的那一刻起，高丽军队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当时的亚洲战场上，唐军无疑是最擅长野战的一支军队，而高丽军队最显著的优势则是守城战。只要渊男建仔细研究过隋唐两朝多次东征的战例，他就应该采取避敌锋芒、坚壁清野的战略，尽量避免与唐军野战，更要避免战略性的决战。他应该像历史上的每一次高丽战争一样，不断地诱敌深入，拉长对方的战线和补给线，最终拖垮对手。

假如渊盖苏文在世，唐军绝对不可能通过野战一次又一次吃掉高丽的有生力量。可渊男建毕竟是初生牛犊，太缺乏军事经验和战略智慧了。他基本上自始至终都被唐军牵着鼻子走，根本没有自己的通盘战略，只会纠缠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并且一再以己之所短去对抗敌之所长。于是，高丽军队每一次与唐军展开野战，都不啻以卵击石！金山会战、扶余川之战、薛贺水会战，莫不如此。

高丽军队在这样一个最高统帅的指挥下，又岂能不败？

主动把脖子一次次伸到对手的刀下，高丽又岂能不亡？

薛贺水大捷后，李勣又乘胜东进，攻克了鸭绿江西岸的军事重镇——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市）。拿下该城，意味着广袤的辽东土地已经全部落入唐军手中，平壤的门户已经轰然洞开。

总章元年夏天，各路唐军会师于大行城，经过数月休整和养精蓄锐之后，唐军于八月对鸭绿江的高丽守军发起强攻。此时，屡战屡败的高丽军队的士气已经落到了低谷，而唐军挟数次大捷之威，士气正空前高涨。高丽军队当然抵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很快就全线崩溃。

唐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一鼓作气向东追击了两百余里，并顺势攻下了半岛北部的要塞辱夷城（平壤城西北）。

至此，高丽大势已去。其他各城的守将闻风丧胆，要么弃城而逃，要么举城归降，唐军如入无人之境。勇将契苾何力担任前锋率先杀到平壤城下，紧接着，李勣的主力也进抵平壤，随即将其团团围困。

平壤作为高丽的都城，经过多代人的苦心经营，其防御体系固若金汤。此前苏定方曾经对它围攻了八个月，最后也不得不黯然收兵，可见平壤的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坚城。

然而，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并不是城墙，而是人心。

隋唐两朝的多位帝王之所以屡屡在高丽这个东夷小国折戟沉沙，并不仅仅是因为高丽的城墙特别坚固，而主要是因为高丽君臣能够团结一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而今日，平壤虽然依旧拥有坚固的城墙，但是此刻的高丽君臣显然已经失去了拒敌的勇气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这样一座貌似坚固的堡垒，到头来也就避免不了从内部被攻破的命运。

当唐帝国的东征大军围攻平壤一个月后，有一个人的意志就彻底垮了。

他就是现任的高丽国王高藏。

作为一个长期大权旁落的君主，高藏捍卫国土的信念和责任感显然比较匮乏，起码比权臣渊男建匮乏得多，他的意志率先垮掉，说起来也是情理中事。他携渊男建的弟弟渊男产以及高丽朝廷的各级文武官员共九十八人，趁渊男建不备，偷偷缒下城墙，手举白幡归降了唐军。

国王亲自带着文武百官投降唐军，这对平壤守军的士气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渊男建暴跳如雷，但他仍然闭门坚守，准备顽抗到底。

随后的日子，困兽犹斗的渊男建屡次出兵反攻唐军，可这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高丽军队的反击屡屡被唐军挫败，平壤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在此危急的时刻，又有一个人背叛了渊男建，从而敲响了高丽的丧钟。

这是一个武僧，名叫信诚，是渊男建的心腹，手中握有平壤守军的指挥权。他意识到高丽大势已去，再负隅顽抗也无法挽回败局，于是秘密派人与李勣接洽，表示愿意充当内应，投降唐军。

总章元年九月十二日，信诚忽然打开城门，唐军随即蜂拥而入。李勣命士兵攀上城墙，插上唐军旗帜，擂鼓呐喊，并且焚烧城墙四周的各个城楼，平壤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听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看着到处燃烧的熊熊火焰，渊男建彻底绝望了。

他拔出佩剑，狠狠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这一天，平壤陷落，立国长达七百零五年的高丽王国宣告灭亡。

城破的这一刻，渊男建不愧是一个武士，把最后一剑勇敢地刺向了自己。

可他下手还不够狠，所以没有死，结果还是成了唐军的俘虏。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流亡高丽的百济国王扶余丰。

十二月，李勣押着高丽的这些高级战俘班师回国，朝廷为远征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高宗李治在大明宫含元殿接受李勣献俘。同时，上至主帅李勣，下至普通将士，全部依照功劳大小给予相应的封

赏。

对待高丽的这些战俘，唐朝采取了一贯的宽大原则，除了将首恶渊男建流放黔州、将百济国王扶余丰流放岭南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并且授予了他们相应官职。高藏被封为司平太常伯，渊男产被封为司宰少卿，信诚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此外，最早归附唐朝的渊男生也被封为右卫大将军。

随后，唐朝将高丽划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同时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一管辖。各都督、刺史、县令的职位由一部分有功的高丽旧将出任，另外也配备了一部分中国官员协同治理。薛仁贵由于在此次东征中战功卓著，被擢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并出任安东都护，率两万人马镇守。

高丽战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隋唐两朝四代帝王都曾经为了征服高丽而倾注了大量心血——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发动三十万大军征讨高丽，结果未及踏上高丽国土就遭遇天灾和疾病，导致士兵死亡十之八九；隋炀帝杨广更是因为三征高丽而耗尽国力，引发了国内风起云涌的全面叛乱，最终葬送了隋朝江山；天纵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也是因为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此次失败的亲征不但拖垮了他的身体，而且沉重打击了他的精神，使他在短短几年后就抱憾而终、赍志而殁；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时代，即便他继承了贞观时代强大的国力和丰厚的人才资本，可还是在龙朔二年第一次东征高丽时遭遇了失败，并因此几乎放弃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经略。如此种种，足以证明高丽人确实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坚韧与顽强。

作为朝鲜半岛上的蕞尔小国，高丽屡屡横挑强邻，频频遭到大军征伐，却一次又一次以弱胜强。在当时周边国家无不被唐帝国一一征服的情况下，唯独它始终屹立不倒，诚可谓绝无仅有，亦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不是渊盖苏文之死以及后来他三个儿子为了争夺权力而爆发内讧，唐帝国征服高丽的时间表，也许还要被大大推迟。

然而，无论如何，立国长达七百余年的高丽王国还是在大唐帝国的强力打击之下彻底覆灭了。

平定高丽，标志着唐王朝的军事扩张达到了一个巅峰，大唐的版图也至此臻于极盛。

然而，月圆则亏、水满则溢，盛极而衰往往是世间万物的常理。

自从征服高丽之后，唐初的军事制度府兵制就开始逐渐瓦解，国人和士兵的厌战情绪日益滋长蔓延。同时由于元勋名将的相继凋零以及周边各个被征服国家此起彼伏的反叛浪潮和复国运动，大唐的军事力量开始走向衰弱，唐军无敌于天下的神话宣告破灭，王朝初期生机勃勃的扩张史也随之戛然而止。

高丽覆灭的次年，即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十二月，战功赫赫、威震四夷的一代名将李勣也终于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终年七十六岁。

临终前，李勣对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资治通鉴》卷二○一）

从一个"逢人则杀"的亡命之徒变成"用兵以救人死"的一代名将，李勣在血火与刀剑的洗礼中完成了生命的成长与蜕变，也铸就了他光耀史册、彪炳千古的辉煌人生。

盖棺论定之时，《资治通鉴》对李勣的名将风范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而在《旧唐书》中，史臣也把李勣与李靖并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英公指李勣，卫公指李靖），诚烟阁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义藩身，与物无忤，遂得功名始终。贤哉，垂命之诫！"（《旧唐书·李勣传》）

李勣去世后，高宗李治为之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陪葬昭陵，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命皇太子李弘与文武百官送葬。此外，高宗还参照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的故事，为李勣修建了形状像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一样的陵墓，以表彰他平定东突厥、薛延陀的不朽功绩。

作为大唐开国元勋中最后辞世的一位，李勣的去世，意味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奠基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大唐王朝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承前启后的守成时代。

而人到中年又病魔缠身的唐高宗李治，能够好好守住高祖和太宗留下的这座锦绣江山吗？在皇后武媚强势干政的情况下，高宗李治在未来

的日子里，能够平稳地把帝国的最高权力过渡给太子李弘吗？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1]　这些国家大致分布在今新疆西部、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一带。

第九章 天后临朝

从皇后到天后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是一个不幸的年份。

无论对于大唐帝国还是对于武后个人而言，莫不如此。

首先是帝国在对外军事上，遭到了来自西陲吐蕃王朝的严峻挑战。

吐蕃王国是差不多与唐帝国同时崛起的一个国家。正当唐帝国在太宗李世民手中建立起具有国际联盟性质的天可汗体系时，吐蕃王国也在一代雄主松赞干布的治下臻于强盛。太宗时代，唐朝与吐蕃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先有文成公主入藏的千古佳话，后有吐蕃出兵帮助唐使王玄策征服中天竺的事迹。但是随着松赞干布的去世，吐蕃国相禄东赞大权独揽，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首先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唐帝国的属国吐谷浑。

吐蕃与吐谷浑同位于青藏高原，两国历来存在边境争端，时常爆发军事冲突。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由于吐蕃的蓄意入侵，两国的军事冲突迅速升级，吐谷浑屡屡遣使向唐朝告急，而吐蕃也装腔作势地遣使向唐求援。由于当时唐帝国东征百济的战争还处于胶着状态，而且唐朝对吐蕃的扩张野心也估计不足，因此高宗对两国的争端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唐王朝的失策进一步刺激了吐蕃的野心。当年五月，吐蕃悍然出动大军，一举吞并了吐谷浑，并进而窥视西域，准备与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

几年后，吐蕃国相禄东赞去世，但是吐蕃对外扩张的进程并未中止，而是越发猖獗。因为禄东赞虽死，可他的儿子论钦陵又继承了相位。正所谓虎父无犬子，这个论钦陵比他的父亲更具有传奇色彩，是吐蕃历史上最富于雄才大略的一代名相。

就在咸亨元年四月，吐蕃王国出兵攻陷了大唐在西域的十八个州，进而占据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战报传来，大唐朝野一片震惊。高宗不得不下诏撤销了安西四镇，随后任命名将薛仁贵为主帅，以郭待封等人为副帅，率十余万大军西进青海湖地区，准备在讨伐吐蕃的同时协助吐谷浑复国。

然而高宗绝不会料到，他这次指定的副帅人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西征军进抵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时，按照薛仁贵原来的战略部署，是让郭待封率两万人在大非岭上筑营固守，保护大军的辎重和粮草，然后由他本人亲率主力进击乌海（今苦海）方向的吐蕃军队。如果郭待封按此计划行动，或许就能避免后来那个可怕的失败。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当薛仁贵率部在河口大破吐蕃前锋时，郭待封却放弃了大非岭，擅自带领辎重部队继续前进，终于遭到吐蕃二十万大军的伏击，辎重和军粮丧失殆尽。薛仁贵闻讯，连忙退守大非川。然而就在此时，吐蕃国相论钦陵亲自率领的四十万大军已经把唐军团团包围了。经过一场空前惨烈的厮杀之后，唐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薛仁贵、郭待封等将领被迫与吐蕃议和，才得以保住性命。随后，朝廷派出特使将他们押解回京。虽然高宗念在他们以往的功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但均将他们革职除名，可惜薛仁贵的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于一旦！

大非川之败，一举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的神话，成为唐朝对外战争史上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捩点。究其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副帅郭待封自恃为名将之后，根本不服平民出身的薛仁贵的统辖，致使两人在战略战术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其次，唐军士兵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海湖地区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

从后面这点来看，此时唐军士兵的身体素质显然远远不如贞观时代。当年李靖、侯君集等人平定吐谷浑时，同样也是在青藏高原上转战数千里，大小数十战，最后仍然取得了全面胜利。由此可见，唐朝的军事实力之所以在高宗执政的中后期由盛而衰，其内在原因之一，就是兵员素质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

正当唐帝国在西线遭遇吐蕃严峻挑战的时候，东方的局势也出现了逆转。

由于高宗朝廷在帝国疆域急速扩张的同时，对各羁縻州府缺乏同步的强有效的治理，并且在各占领区驻扎的军队数量也很少，本已臣服的这些周边地区迅速掀起了一股叛乱和复国的浪潮。

最先死灰复燃的是两年前刚刚被李勣平定的高丽。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丽贵族剑牟岑拥立原高丽国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首领，起兵反叛。唐朝随即派遣高侃出兵镇压。不久高丽内部爆发内讧，安舜不满于傀儡地位，刺杀了剑牟岑。严重的内部分裂导致了高丽反抗军元气大伤，于是在后来的几年里，高侃先后在安市城、白水山大败高丽反抗军。然而，就在唐军即将平定叛乱的节骨眼上，历来臣属于唐帝国的新罗突然与唐朝反目，不仅收留了逃亡新罗的安舜，公然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而且陆续出兵占领了原属百济的一部分土地，其称霸朝鲜半岛的野心昭然若揭。

除了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之外，国内形势也令人担忧。从咸亨元年三月开始，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旱情，到了八月，关中又遭遇严重的干旱，导致京畿地区出现饥荒，朝廷不得不让百姓前往各州逐食，同时朝廷也准备暂时迁往洛阳，以解决皇室和文武百官的吃饭问题。

国家如此，武媚个人也同样面临危机。

首先是她在外朝的心腹都相继离去。如李义府早在几年前就被流放远地、死于贬所，而袁公瑜也是被一贬再贬，早就远离了权力中心，其他的几个“翊赞功臣”也都已病故，剩下最后一个死党许敬宗，又在这一年三月因年老体衰而不得不致仕。这些人都是皇后武媚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没有了他们，武媚自然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

其次，武媚的母亲荣国夫人也在这一年九月病逝。这位常年诵经礼佛的老太太活了九十二岁，虽说如此高寿已属人间稀有，但是她的亡故还是让武媚感到了极大的悲伤。因为这么多年来，母亲杨氏始终是她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她争夺皇后之位的关键时刻，母亲不仅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还不顾年迈亲自出面奔走，这一切都让武媚一直深怀感激。此外，在武媚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沾着亲人的鲜血，如长女安定公主，姐姐韩国夫人，外甥女贺兰氏，同父兄武元庆、武元爽，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无不是死在武媚的手中。当亲情在政治的碾压下近乎完全泯灭的时候，母亲杨氏无疑是武媚唯一的情感慰藉和亲情寄托。

如今母亲终于驾鹤西去，而国家忧患又与个人危机同时袭来，顿时让武媚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之中。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笃定地认为，凡是出现重大天灾，必是人事出了问题。所以当这一年国家突然遭遇内忧外患时，朝中许多对武媚心怀不满的大臣便借机发难，纷纷把矛头指向武后，宣称天下大旱必然与皇后专权有关。

面对骤然来临的各种压力，皇后武媚忽然作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咸亨元年闰九月，她以天下久旱为由，正式向高宗提出避位的请求。所谓避位，也就是因天灾而引咎，要求辞去皇后之位。

朝野舆论顿时哗然。

武后居然提出避位？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这个视权力如生命的女人，这个从来不向任何困难屈服的武后，居然甘心放弃她为之拼搏了半生的皇后之位，从此向命运缴械投降吗？

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朝野上下顿时把目光全部聚焦到了天子李治的身上，都睁大了眼睛看他到底会怎么做。

高宗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两个字——不许。

他当然不许。因为这几年来，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长年的疾病缠身使他不得不对武后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依赖。一旦没有武后，高宗根本就无法独自处理政务。

此外，让高宗不同意武后避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心里很清楚，武后这么做并不是真的想放弃权力，而是在以退为进！

她的目的有二：

第一，故作高姿态，平息朝野上下对她的不利舆论。

你们不是都说我专权吗？那我干脆辞职不干了，看你们还能说些什么！

第二，用这种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向天下人强调，她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主宰者。

因为权力和责任是成正比的，所以，谁承担最大责任，谁当然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试问，武后这么做，不是明摆着把天子李治置于尴尬之地吗？古往今来，只听说出了天灾由皇帝下诏罪己的，哪里有皇后自请避位的？

如果高宗真的答应了她的请求，那无异于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从属的地位，更无异于扇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高宗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他必然要驳回武后的避位请求。

咸亨元年的避位事件，显然是武后化被动为主动的一着妙棋。如此一来，她不但巧妙地堵住了朝野上下的悠悠众口，而且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了“心系天下、不徇己私”的高大形象。

武后既然表现得如此高姿态，高宗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随后，高宗宣布辍朝三日，为武后的母亲杨氏举办了无比风光的高规格葬礼——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卢承庆主持丧葬事宜，特令宰相戴至德持节吊唁，又命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外朝诰命夫人，都必须前去吊丧哭拜，并送葬至渭桥；葬礼规格等同亲王，墓碑由高宗亲笔书写。稍后，又追赠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封杨氏为太原王妃，谥号忠烈。

至此，武后又一次以她那绝顶高明的政治手腕化解了危机，并且强化了“二圣临朝”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其实，平心而论，武后在掌控朝政的这些年里，大多数时候确实是在帮高宗打理政务的，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个人的小算盘。

要是从显庆五年高宗患上风疾算起，武后参预朝政已经整整十年；就算从麟德元年的“二圣临朝”算起，武后垂帘听政也已经六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武后既没有在外朝培植新的政治势力，也没有引进任何强势干政的外戚。单凭这一点，武媚这个辅政的皇后也算当得尽职尽责，并没有多少值得诟病和指摘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高宗才会越来越倚重她。

当然，武后表现得如此谨慎和内敛，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博取高宗的信

任；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她的外戚力量先天不足——那几个同父兄和堂兄弟老早就被她搞掉了，他们的儿子也均遭流放。如今唯一在朝中任职的外戚，就是她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

说起这个贺兰敏之，武后本来也是要用心培养的，不承想这小子纯粹是烂泥扶不上墙，让武后伤透了心。

贺兰敏之据说是长安有口皆碑的美少年，长得明眸皓齿、玉树临风，而且腹有诗书、才华横溢。史称他“不杂风尘，鸾章凤姿”“风情外朗，神采内融”“飞文染翰，为伯为雄”。（《全唐文补遗》第二辑《大唐故贺兰都督墓志》）古代的墓志大多都有溢美吹捧之嫌，贺兰敏之这一篇也不例外，但是综合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各种史料来看，说他是才貌双全的美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武后确实有心栽培贺兰敏之。武后早在当年除掉武元庆等人之后，就奏请高宗以贺兰敏之为武士彟的继嗣，改姓武，袭爵周国公，并擢升他为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

然而，贺兰敏之却根本没有理会武后的一片苦心。

首先，他在政治上就没有和武后站在一边。这一点武后是在乾封元年看出来的。当时魏国夫人贺兰氏因武氏兄弟献食而暴亡，贺兰敏之参加妹妹的葬礼时，高宗哭着对他说：“我上朝时她还好好的，怎么一退朝就中毒不治了呢？事情为何发生得如此仓促？”

如果贺兰敏之够聪明的话，不管他当时心里想什么，都应该立刻把责任推到武氏兄弟身上，请高宗主持公道，说一些依法严惩武氏兄弟、替妹妹报仇之类的话。

可是他没有。

他自始至终只是陪着高宗伤心落泪，什么话都没说。

这说明什么？

这至少表明——他知道杀死妹妹的凶手不是武氏兄弟。

当武后得知贺兰敏之对这件事的反应之后，她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此儿疑我。”（《资治通鉴》卷二○二）

心机缜密的武后知道，贺兰敏之已经猜出谁才是幕后真凶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武后意识到，这个贺兰敏之绝对成不了自己政治上的帮手。

除了政治上让武后觉得靠不住之外，贺兰敏之的个人秉性和所作所为也让武后深感厌恶。

因为这小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基本上什么样的女人都敢搞。

最让武后吐血的就是，和贺兰敏之私通的女人，有一个居然是他的外祖母，也就是武后的母亲——杨氏！

八九十岁的外祖母居然与自己年方弱冠的亲外孙通奸？

如此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乱伦故事，即便是今天最恶心的八卦记者恐怕也杜撰不出来，可这在当时的长安却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各种有关的史料也对此言之凿凿。如《旧唐书·武承嗣传》称：“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则天颇不悦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也称：“敏之貌美，烝于太原王妃（杨氏）。”

武后感觉自己的脸真是被这祖孙俩给丢尽了！

而更让武后无语的是——花花公子贺兰敏之恶心人的事情还远不止此。

当时太子李弘已经长大成人，高宗和武后准备为太子纳妃，于是从众多的名门闺秀中挑选了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这个女孩据说长得天姿国色，所以高宗和武后都很满意。可没人会料到，就在太子即将举行大婚之前，这个该死的贺兰敏之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地把这个准太子妃逼奸了！

武后又惊又怒，被迫取消了太子与杨氏的婚约。

贺兰敏之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他自认为有他的外祖母兼老情人杨氏撑腰。武后虽然气得浑身发抖，但是碍于母亲的面子，也只好忍了。

贺兰敏之有恃无恐，没过多久，居然又把魔爪伸到了太平公主身边。众所周知，武后的长女多年前就已夭折，所以武后一直将这个小女儿视同掌上明珠，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武后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色胆包天的贺兰敏之竟然趁着太平公主出宫去看望荣国夫人的机会，又一次淫心大发，逼奸了小公主身边的侍女。

既然连公主身边的侍女都敢下手，那谁敢保证他不会对公主下手呢？

这一回，得寸进尺的贺兰敏之终于突破了武后的底线。

武后忍无可忍，决定除掉贺兰敏之。

就在这个时候，杨氏恰好病故，于是武后再无顾忌，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四月向高宗上表，详细列举了贺兰敏之的五大罪状，随即将其流放雷州（今广东雷州市）。

贺兰敏之刚走到半道，就被武后派来的杀手用马缰勒死。随后，朝中一大批与贺兰敏之交好的大臣也均遭株连，全部被流放岭南。

贺兰敏之死后，武后不得不开始考虑她在朝中的处境。

自从参与朝政以来，她过去的心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贬死的贬死，退休的退休，一个都没有剩下。而唯一用心扶植的外戚竟然又是这么一个死有余辜的货色！如今的武后，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光杆司令。

尽管她目前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看上去似乎还很稳固，可武后却不能不居安思危。

因为现在的一切都是高宗给的。万一哪天高宗又受了哪个宰相的蛊惑，再来上演一出废后事件，那武后该怎么办？既没有宰相支持，又没有外戚襄助，武后要靠什么跟高宗和大臣们博弈？

所以，从现在开始，武后意识到自己必须在朝中培养一批新的势力，同时扶植一些可靠的外戚，让他们逐步进入帝国的政治中枢，成为她的左膀右臂。

只有这样，她才能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再受到任何威胁！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春天，有一个流放岭南的政治犯家属突然被一道诏书召回了长安。

这个人就是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

虽然他父亲生前曾经和武后发生过很多不愉快，可现在，武后却不得不捐弃前嫌、既往不咎。因为除了武承嗣、武三思这几个被流放在外的侄子，武后实在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外戚了。再者说，上一辈人的恩怨早已成为如烟往事，武后该发泄的仇恨也早已发泄完了。如今，

武后的这些侄子已经和她成了政治上相互需要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武后需要侄子们成为她的左膀右臂，以便在将来的政治博弈中替她冲锋陷阵；而武承嗣等人也需要武后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权力和富贵，从而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武承嗣一回朝，马上承袭了周国公的爵位，并被任命为尚衣奉御（正五品下）。而仅仅一个月后，武承嗣就连跳数级，以火箭速度当上了宗正卿（从三品）。所谓宗正卿，就是皇族事务部长，虽然不是什么要害职位，但是官秩很高。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位子上，自然就会对所有李唐皇室成员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换言之，这是武后合法监控李唐皇族的开始。许多年后，当高祖和太宗的龙子龙孙们有如覆巢之卵一一暴死在武后的铁掌之下时，人们一定会想起武承嗣从遥远的岭南飘然回朝的那一天。

不久，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也回朝担任了右卫将军。

随着武后的这些侄子相继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一个外戚当权的时代就悄然拉开了帷幕。

在积极扶植外戚的同时，武后又在这一年八月，撺掇高宗颁布了一道诏书。

这是一道“追尊祖宗”的诏书。

具体而言，就是从高祖的爷爷奶奶开始，给李唐的历代祖宗都加上一些尊贵的字号。如尊高祖李渊为神尧皇帝，尊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尊太宗李世民为文武圣皇帝，尊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等等。

乍一看，这好像又是武后习惯玩的那种文字游戏。

可实际上，“追尊祖宗”只是个幌子而已，武后的真正目的是想借此改换自己的名号。

把祖宗封了个遍后，武后紧接着提出——为了避先帝、先后的称讳，从此以后，皇帝李治应该改称“天皇”；皇后武媚也不再称皇后了，而要改称“天后”。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天皇”“天后”诞生了。

武后从此就由皇后变成了天后。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举措。一字之差，就让武后从古往今来的

众多皇后中脱颖而出，成了独一无二的“天字头”皇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说是为了避讳，貌似很谦虚，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天后”绝对要比“皇后”尊贵得多。因为“后为坤德”，皇后再怎么尊贵也绝不能和“乾”“天”扯上关系，可如今武后居然自称“天后”，这显然已经突破了宗法礼教的限制，把自己与至高无上的天子完全并列了！

变身天后的这一年，武后五十岁。

这是继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圣临朝”之后，武后在通往女皇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也许要到若干年后，当武曌把自己头上那顶天后桂冠的“后”字轻轻剥落，让它仅剩下一个“天”字时，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她自称天后的那一年，一切都已经埋下深远的伏笔了。

在扶植外戚并晋位天后之后，武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着手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了。

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可是，武后却面临一个难题。

因为如今的宰相刘仁轨、戴至德、李敬玄、郝处俊等，都是高宗一手提拔的，武后既不可能把他们拉下来，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自己人弄上去，而拉拢中下级官员又意义不大，且远水救不了近火。既然如此，那武后该怎么办？

富有政治智慧的武后当然有她的办法——既然不能从宰相那里夺权，那就从他们那里分权！

如何分权？

建立私人内阁。

如何建立私人内阁？

参照太宗皇帝当年开弘文馆的做法——延揽学士。

随后的日子，武后便以编撰著作为名，亲自选拔了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韩楚宾等一批才华出众的学士，特许他们进入禁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撰《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列

女传》等，洋洋洒洒一千余卷，署名都是“大圣天后亲撰”。表面上，武后率领这帮学士著书立说，好像无关朝政，可实际上，武后却暗中把“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悄悄拿到了学士们的案头，“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资治通鉴》卷二○二）。

由于普通朝臣上朝都是从南门入宫，而武后这个私人内阁的成员都被特准从北门直接进入禁中，因此时人都称之为“北门学士”。这些北门学士就这样成了武后的心腹和智囊团，从此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然而，尽管他们都是武后一手栽培的，可对于武后的跋扈和专权，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买账。比如刘祎之，十几年后官至宰相，可他却不甘心充当武后篡唐的鹰犬，曾要求武后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因而触怒武后，终遭杀身之祸。

其他的北门学士，由于参与武后的私密太多，结局也都颇为不堪。大约在武周革命前夕，他们都被武后假酷吏之手一一诛杀，落了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随着高宗身体的日渐衰弱，更随着武后在政治上的日益强势，一个异常敏感而微妙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了李唐朝廷的面前。

那就是——万一重病缠身的高宗驾鹤西去，大唐帝国的最高权力将落入谁的手中？是天后武媚，还是太子李弘？

此时的李弘已经二十四岁，早已成年，而且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在正常情况下，高宗一旦宾天，当然应该由他入继大统。这本来是毫无疑问的。可它之所以变成一个问题，是因为武后早把李弘当成了政治上的对手。

原因很简单，一旦李弘登基为帝，武后就要从天后变成太后，虽说她仍然可以用太后身份对李弘施加影响，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现在她作为高宗的妻子，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帮患病的夫皇料理政务，但是高宗一旦退位为太上皇，武后唯一的职责就是悉心照料老病交侵的丈夫了。到时候如果过多地对新君指手画脚，肯定会遭到大臣们的非议和反对。而且，让武后一直深感忧虑的是，李弘虽然是她的亲生儿子，但在政治上从来和她不是一条心。到时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李弘，武后根本没有把握。

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高宗的特意安排下，如今的宰相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反武派，而且基本上都兼任东宫属官，所以他们的政

治立场和政治利益都是与太子保持高度一致的。如果李弘即位，他们势必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君周围，形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政治集团。到那时，只要他们认为武后的存在对他们和新君构成威胁，那就随时有可能把武后从帝国的权力舞台上驱逐出去。届时，不要说武后已经不可能控制李弘或继续干预朝政，就算武后仅仅想保住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兴许都不可得。即便生性仁孝的李弘会对她手下留情，可那几个一向反对妇人干政的宰相也不可能轻易放过她。

简言之，一旦李弘登基，武后的未来绝对不会乐观！

这对于一生都在为权力奋斗，并且已经非常接近最高权力的武后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她绝不可能心甘情愿退出帝国的政治舞台，更不可能放弃目前拥有的一切！

不仅不会放弃，她甚至早已不再满足。从九年前参与泰山封禅的那一天起，一种既模糊又清晰、既隐约又强烈的梦想就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并且逐渐支配着她的全部生命和所有行动。这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这个帝国名副其实的最高主宰者！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会不惜一切代价。

谁成为她的阻碍，她就把谁铲除！

而眼下最大的障碍，无疑就是她的亲生儿子李弘。

武后会下手吗？

太子李弘暴亡

李弘根本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母亲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他更没有想到——给予她生命的母亲最后竟然会亲手将他的生命终结！

在李弘眼中，这个世界是美好而光明的。

至少，他认为世界应该是美好而光明的。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眼中就容不下一丝黑暗与邪恶。少年时代，东

宫的老师郭瑜教他读《春秋》，当他读到楚国王子弑君篡位的事情时，立刻把书盖上，又惊又疑地说："此事是身为臣子的人不忍卒读的，经典既然是圣人垂训后世之用，为何会记载这种事呢？"

郭瑜回答："孔子作《春秋》，义存褒贬，故善恶必书，如此方能惩恶扬善、教化世人。"

可李弘还是无法接受。他态度坚决地说："我认为这种事情不仅不能说，而且连听都不忍听，还是换其他书来读吧。"

老师郭瑜被太子的仁孝深深感动，于是就把教材换成了专门讲解正面道德规范的《礼记》。

李弘的仁孝显然是得自高宗的遗传。除了这一点外，他还从高宗和武后那里继承了异常早慧的文学才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年仅十岁的李弘就有了编纂书籍的想法。他召集了当时的东宫属官许敬宗、上官仪、杨思俭等人，一起博采古今文集，摘录其中的嘉言丽句，予以分门别类，最后由李弘本人综览审订，编成了一部五百卷的大型文集，起名为《瑶山玉彩》，献给了高宗。看到太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过人的才华和领导能力，高宗大感欣慰，马上赐给太子绸缎三万匹，以示赞赏和鼓励。

由于李弘的仁孝和早慧，高宗一直对他钟爱有加，并且寄予厚望，因而早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就曾让年仅八岁的李弘监国。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患上风疾之后，高宗更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迫切想把太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于是便在后来的日子里频频命太子监国。

因为高宗在位的三分之一时间都不在长安，而是在东都洛阳，所以在李弘短暂的一生中，就有多达七次的监国纪录——分别是八岁、十一岁、十二岁、十六岁、二十岁、二十一岁和二十二岁。其中除了八岁那次因年纪太小、力不胜任而被高宗和武后接到东都之外，其余六次显然都是胜任愉快的。按《资治通鉴》记载，朝野上下对李弘监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太子弘仁孝谦谨……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

随着李弘监国次数的增多和政治经验的日益丰富，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不断发出与他母亲武后截然不同的声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黔州，死后暴尸荒野，无人收葬。李弘得知后，深感哀怜，立刻上表请求高宗收葬这个异母兄长。此事令武后非常不快，尽管她表面上也不得不跟着高宗和其他人一起称赞太子仁厚，可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她对这个越来越有主见

的儿子就开始生出不满和警惕了。

此后的几年间，太子李弘与武后的母子关系日渐紧张。到了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一个敏感事件的发生，导致李弘与武后的矛盾冲突迅速趋于尖锐并且完全公开化了。

这个事件是由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引发的。

那一年，由于关中饥荒，高宗和武后率文武百官前往东都就食，让李弘留在京师监国。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弘忽然发现义阳、宣城两公主自从她们母亲死后一直被幽禁在掖庭冷宫。这个意外发现让李弘大为惊讶，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恻隐之情。当时，义阳公主二十七八岁，宣城公主也已二十四岁，而唐朝女子出嫁的高峰年龄段都在十五岁左右，所以二公主显然已属大龄女了。[1]

有鉴于二公主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而且早已过了适婚年龄，所以李弘立刻上奏，请求高宗和武后为她们选择夫婿，让她们出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看见太子的奏疏后，高宗当即应允，可武后却勃然大怒。

你小子什么意思，这不是故意让老娘难堪吗？

众所周知，萧淑妃是武后当年的死敌，她和王皇后的结局之悲惨，朝野上下的人们都有目共睹，并且记忆犹新。所以这么多年来，尽管大家明知道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始终没有人敢替她们说话。

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们这辈子也只能这样了。除了在寂寞深宫中自生自灭之外，她们还能怎么办？要想让谁来帮助她们脱离苦海，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在时过境迁的多年之后，居然会有人站出来帮两个落难公主求情。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人居然是武后的亲生儿子李弘。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李弘的奏疏一上，朝野顿时哗然。

往小了说，这只不过是李弘在向两个处境凄凉的异母姐姐伸出援手；可往大了说，李弘此举不啻在替武后的政敌萧淑妃申冤平反！

因为李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王子，而是堂堂的帝国储君，所以，他的一举一动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情感和好恶，还必然会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李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不管他的个人动机是否与政治有关，朝野上下的人们都会对他的行为作出各种富有政治意涵的解读。职是之故，太子此举就必然会深深刺痛他的母亲武后，也无异于狠狠扇了武后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武后看来，太子这么做，摆明了是在以他的慈悲仁义衬托她的冷酷无情，更摆明了是在挑战她这个母亲的权威！

武后感到了无比愤怒和伤心……

然而，武后毕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女人，不管她心里如何翻江倒海，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面对太子的上疏，武后拿出了一副宽宏大度的姿态，当即把义阳、宣城二公主许配给了高宗的两个近身侍卫：权毅和王勖。

这两个侍卫虽然本人官职不高，但是家世出身都还不错[2]，论其门第，也还算配得上这两位落难的公主。

至此，这令人尴尬的一幕总算是翻过去了。

整个事件以武后再一次妥协退让、李弘又一次如愿以偿而告终。

表面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可事实上，经过这个“请嫁二公主”事件之后，武后与李弘的母子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史称，太子李弘“由是失爱于天后”（《资治通鉴》卷二○二）。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子李弘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悄然跃入了武后的脑海。

就像多年以前，当武后凝视着襁褓中的安定公主，也曾有一个黑色的念头蓦然跃入她的脑海一样。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二月，太子李弘一度被耽误的婚事终于要举行了。

此前的那个准太子妃杨氏被贺兰敏之辣手摧花，玷污了名节，所以婚事告吹。这一次，高宗和武后又替太子挑选了左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据说这个女子温柔贤淑，“甚有妇礼”，而裴氏本身又是河东大姓，所以高宗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曾对侍臣说：“东宫内政，吾无

忧矣！”（《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其欢喜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高宗这句话，在一般人听来，很可能只是对儿媳的嘉许和赞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在武后听来，这句话却充满了让她紧张的弦外之音。

因为太子妃就是未来的皇后，“东宫内政”就是未来的“宫廷内政”，天子在公开场合如此强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高宗已经有了传位于太子之意，才会如此在乎裴氏有没有母仪天下的妇德？

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武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就在太子大婚的两年后，亦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高宗忽然对太子李弘表示，准备将皇位内禅于他。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武后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她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

天子无戏言。高宗的禅位之意既已出口，那就不可能收回成命。既然如此，那武后该怎么办？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个一向忤逆她的儿子登上皇位，然后名正言顺地拿走她奋斗了大半生才获得的这一切吗？

不。武后绝不会就此承认失败，更不可能败给自己的亲生儿子。

她知道，要阻止李弘登基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此时此刻，武后已经不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个决意要问鼎天下的女人。

此时此刻，李弘也不再是一个儿子，而是武后在这个世界上的头号政敌！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大唐帝国的皇太子李弘，于上元二年四月随高宗和武后从幸东都，忽然暴亡于合璧宫绮云殿，年仅二十四岁。

太子之死让高宗李治悲痛欲绝。

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宣布要禅位，年纪轻轻的太子就遽然离世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无疑是世间至深至痛的悲剧之一。

高宗李治在无尽的哀伤中颁布了一道《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在制书中履行了对太子李弘的承诺，破例追赠他为孝敬皇帝：

皇太子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迁上宾之驾……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作为以高宗名义发布的官方文件，这道制书承担了两个任务：第一，对太子进行追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第一时间对太子死因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沉瘵婴身”“旧疾增甚”而自然死亡。

那么，李弘究竟是怎么死的？是像大多数史料记载和民间纷传的那样，被他的母亲武后鸩杀，还是如这份官方声明所言，是因罹患疾病而不治身亡？

要弄清李弘之死的真相，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弘的病史。

作为高宗的嫡长子，李弘不仅遗传了李治仁厚的性格，而且遗传了李治羸弱的体质。李弘从童年时代起就体弱多病，上面这道制书中所说的“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就是说他打小就重病缠身了。“琰圭”是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通常在举行某种大典时使用。李弘执圭的年龄难以具体确定，但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他四岁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二是八岁加元服并奉旨监国的时候。而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说明李弘得病时的年龄还很小。而“沉瘵”的“瘵”指的是肺结核。在古代，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依靠长期的药物调理来控制病情。

到李弘长大成人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日渐加重的倾向。咸亨元年，也就是李弘十九岁时，负责太子膳食的典膳丞邢文伟，就曾因为太子长久居于内殿、很少接见东宫臣僚而上书批评，并依照礼制减免了对他的膳食供应。李弘连忙回信解释，说：“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旧唐书·邢文伟传》），也就是说他

近来病情加重，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不许过度劳累。

到了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至东都就食，留李弘于京师监国。当时的宰相戴至德、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于是受命辅佐太子。可李弘还是由于“多疾病”、精力不济而无法打理政务，因此在监国期间，实际上“庶政皆决于至德等”（《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十八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唐会要·储君》）此举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太子分劳。

时至上元二年，婚后李弘的健康状况也并未因新婚之喜而有所改善。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宗向李弘表示要禅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就是说一旦太子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这句话意思同前面一样，也是说等太子肤色稍微好看一点（指病情改善），就正式传位给他。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太子的心情愉快一点、振作一点，借由心境的改善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但不感到快乐，反而“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也就是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产生极大的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至“俄迁上宾之驾”，突然就去世了。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做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没有明说李弘是怎么死的。而《旧唐书》中的李弘本传，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事实上也并未说明李弘的死因。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

大多数的人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比如《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此外，如《旧唐书》中李弘本传以外的其他传记以及《唐会要》《唐

历》《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上也都持这种看法。

其中，《旧唐书·肃宗诸子列传》《唐会要·追谥皇帝》这两种史料，都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

成书于中唐时期的《唐历》也称：“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所谓“不以寿终”，实际上就是死于非命。

《新唐书》的记载更是毫不含糊。该书的《则天武皇后传》直截了当地说：“后（武后）怒，鸩杀弘。”《高宗本纪》也说：“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孝敬皇帝传》称：“后（武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李弘死后，大唐帝国的储君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六月，也就是李弘暴亡的两个月后，有个人立刻补上了这个空缺。

他就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

这一年，李贤二十二岁。

相对于多愁善感、体弱多病的故太子李弘而言，新太子李贤的出现顿时让朝野上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李贤和他那病恹恹的大哥截然不同，他身体强健、文武双全，是一个标准的阳光男孩。

不过此时的李贤并不知道，无论他过去的生命有多么阳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很快就将被一团巨大的阴霾所笼罩。

因为他坐上了大哥李弘曾经坐过的位子，所以他必然也要面对李弘曾经遭遇的命运。

一场新的噩梦开始了。

扫除最后的障碍——李贤

据说李贤天性聪敏，很小的时候就已熟读《尚书》《礼记》《论语》

等儒家经典，并能背诵古诗赋数十篇，有“暂经领览，遂即不忘”的本领。他勤奋好学，腹有诗书，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

上元二年六月，李贤刚刚继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监国。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经验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监国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贤的表现也并未让朝野失望。在监国期间，史称其“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诏，对李贤大加褒扬，说他“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即说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宽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审慎，而且表扬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能用功读书，等等。总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现都让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诏的最后，高宗还特意强调了八个字——“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旧唐书·章怀太子传》）

在此，高宗的满腔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贤能够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李弘之死对他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高宗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刚刚把李弘培养成一个朝野公认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却说没就没了。这不仅让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给东宫造成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权力真空。所以，此时摆在高宗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打造一个储君——一个让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并拥戴的合格储君！

为了尽快达成这个目标，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间，亦即李弘刚刚下葬之后，马上对宰相班子（实际上就是东宫班子）作出了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显而易见，整个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马，现在已经全部转为新太子贤的东宫属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以高宗培养李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新太子贤必将很快入继大统、登基为帝。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并且众说纷纭的“高宗逊位”事件。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们提出，准备让武后“摄知国政”，实际上就是打算逊位给天后。

这是怎么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涂了？刚刚在李贤身上花了那么大力气，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自己又把它全盘推翻，说要逊位给天后，他到底什么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议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反对。

中书令郝处俊忧心忡忡地说：“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于后，犹日之于月，阳之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成祸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同时，另一个宰相李义琰也说：“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唐会要·识量上》）

其他宰相的意见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他们的立场却不难推知。比如刘仁轨，曾是李义府的头号政敌，而且历来反对武后临朝，他当然不会支持天后摄政；再如戴至德和张文瓘，长期兼任东宫僚属，在李弘最后一次监国期间又曾实际主持政务，和武后之间无疑也存在着极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紧张关系。因此，高宗的动议必然会遭到宰相们的否决。

虽然这个逊位动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此举却让宰相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给后世的治史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高宗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都知道，早在李弘临死之前，高宗就已经宣布要禅位给他了。就

算是在李弘暴亡之后，高宗也很快就把李贤立为太子，并且强烈表现出要让他尽快接班的样子，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高宗又一反常态，突然提出要逊位给武后呢？如果说是因为不堪忍受长年病痛的折磨，急欲脱卸治理天下的重担，那他为什么不干脆传位给李贤呢？

对此，诸多史书都语焉不详，一概没有对高宗的动机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对于高宗这一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我们又该作何理解呢？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很可能受到了某种外来压力。

准确地说，是受到了来自武后的压力。

从政治角度来看，武后无疑是李弘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因为她借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积聚政治实力，为夺取李唐江山作好充分准备。然而，李贤继位东宫之后，武后明显察觉高宗在用速成的办法培养李贤，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会把皇位传给李贤。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武后的危机感自不待言。尤其是当高宗把整个宰相班子及李弘的原班人马全部转为新太子的属官时，武后更是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武后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向高宗施加压力，希望他主动逊位。

这是最直接、最有效、成本最低的办法。要是高宗答应，那当然最好不过，因为谁也不用再提着脑袋拼个你死我活；就算不答应，武后权当投石问路，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武后真的向高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且施加压力，那高宗又会作何反应呢？

第一反应，高宗肯定是非常不爽的。要是他真有逊位给武后的想法，又何必等到今天？早一天把权力交给武后，不是什么事都没了吗？所以，不管武后采用什么方式施压，高宗刚开始绝对是不会同意的。

可他为什么最后又同意了呢？

依笔者看来，高宗很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宰相们做一个试探。也就是说，尽管高宗已经把宰相们都任命为太子贤的属官了，可他们毕

竟一直是故太子弘的人。如今虽说李弘不在了，可宰相们能够把他们当初对李弘的忠心，全都贡献给新太子李贤吗？

对此，高宗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高宗就有必要通过“逊位”之举来试探宰相们。

如果我们的上述推测成立，那么高宗的“逊位”动议显然是很聪明的：一方面，他可以把这颗皮球踢给宰相，要是宰相们投反对票，那武后自然就无话可说；另一方面，就是借此试探宰相们对太子贤，包括对高宗本人的忠诚度。

高宗的逊位动议被宰相否决，最失落的人莫过于武后了。

不管这个动议是她的主意还是高宗本人的，总之这个结果是她最不想看见的。

因为这样的结果显然在向武后表明——如今的皇帝、宰相、太子，俨然已是“三位一体”了，无形中都把矛头指向了她。

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反对派，武后该怎么办？

她自然有她的手段。

对于高宗，武后基本上没有任何顾虑。今后她只要继续扮演“贤内助”的角色，高宗就不能拿她怎么样。

对于宰相，武后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但她也并不十分担心——当初长孙一党何其强大，最后不也是在她的严厉手段之下纷纷垮台、人亡政息了吗？所以武后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她就能把宰相班子逐一换成自己的人。

至于说对付太子李贤，武后更是拥有绝对自信。她决定拿出驯服狮子骢的惯用方法——先用鞭子抽，如果不服的话，再用铁锤和匕首！

随后的日子，武后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开始对李贤进行调教。她命北门学士送给李贤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好太子；另一本是《孝子传》，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乖儿子。与此同时，武后还不断写信给李贤，对他的种种过失和缺点大加数落，最重要的，当然是指责他不孝。

然而，让武后断然没有料到的是，李贤不仅把她送的书扔到了一边、把她的谆谆教诲全都当成了耳旁风，还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她

进行了强有力的还击。

李贤的还击就是——写书。

关键时刻，李贤早年勤奋好学打下的根底终于发挥了作用。他学着母后的样子，很快召集了一帮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人，卷起袖子，准备为一部史书作注。

哪一部？

《后汉书》。

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李贤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部书呢？

原因很简单，整个东汉一朝最显著的历史特征，莫过于太后临朝和外戚擅权！而今李贤专门挑出这部书来作注，摆明了就是要跟武后叫板。

对不起，你想教育我怎么当一个好太子和乖儿子，那就请你先用这部书照照自己，看你是如何做一个好皇后和好母亲的！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十二月，李贤的《后汉书注》大功告成。他立刻郑重其事地把书献给了高宗。高宗大喜，就像当初看到李弘献给他的《瑶山玉彩》一样，内心充满了欣慰，当即赐给李贤三万匹绸缎。

李贤注此书，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向朝野上下显示自己的才学，进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第二，效法当年的秦王和如今的武后，延揽学士，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第三，以此对母后进行坚决的反击！

虽然带有这么多政治目的，可李贤这部注疏的学术价值却不可低估。清末学者王先谦曾经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意思是说，李贤（谥号章怀太子）所注的范晔《后汉书》，水平不低于颜师古（曾任秘书少监）所注的班固《汉书》。

时至今日，我们阅读的比较权威的《后汉书》版本，仍然是李贤的这个注本。

看着李贤得意扬扬地捧出他的《后汉书注》，武后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

她断然没有想到——眼下的李贤居然会比当初的李弘走得更远，对她的挑衅和攻击也更为有力、更加明目张胆！

这是武后绝对无法容忍的。

既然李贤可以无视她的鞭子，她当然只能动用铁锤和匕首了。

仪凤元年，新太子李贤以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和武后抗争并决裂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在步李弘之后尘。

很显然，这是一条不归路。

正当武后与太子的冲突日渐升级之际，一则耸人听闻的流言又在宫中不胫而走。流言说太子李贤并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而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

没有人知道这则流言的出处，只知道它一下子就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且使得武后和李贤原已异常紧张的母子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面对这则杀伤力极强的流言，一贯自信而倔强的李贤也不得不产生了深深的疑惧。

他知道，尽管这种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值得深究，更不值得让人牵肠挂肚，可他还是不无痛苦地发现——这则流言并非空穴来风！

原因很简单，只要算一下武后几个子女的出生日期，李贤的身世自然就显得疑窦丛生了：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下半年，而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的十二月，其间相隔两年。这本来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在弘和贤之间，还有一个在襁褓中便已夭折的安定公主！

这就是说，如果李贤真的是武后所生，那武后就必须在两年之间连续怀孕并产下三个子女，这可能吗？

显然不太可能。

既然如此，那李贤会不会真的如流言所说，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呢？

可能性很大。

因为武后当时正以昭仪的身份得宠于高宗，她的姐姐就有可能以这层关系得以自由出入禁中，并因此被高宗宠幸，产下李贤。可韩国夫人根本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高宗想要留下这个孩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武后认养。而当时武后正与王皇后激烈较量，就算她对高宗和韩国夫人的暧昧关系心生不爽，也只能以大局为重，暂时忍耐。所以我们认为，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形势下，由武后出面认下姐姐的这个“未婚先有子”，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这个世上无忧无虑地活了二十几年，有一天却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世原来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这样的发现无论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异常强烈的打击。

李贤当然也不会例外。面对这个巨大的谜团，他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可他却不知道要如何消解自己的愤怒和悲哀。他既不可能去问武后——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也不可能去问高宗——当年您和韩国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只能咬紧牙关，对一切保持沉默。

用沉默来对抗这则居心叵测、甚嚣尘上的流言，用沉默来对抗那个身份暧昧、性格冷酷的“母亲”！

接下来的日子，大明宫中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关太子身世的流言还没有消停，又有一些让人不快的政治谣言开始在李贤的耳边嘤嘤嗡嗡地飞舞。

此前的流言来历不明，让人想发泄都找不到对象。可这次却不同，所有的谣言都有一个明确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这个人就是明崇俨。

明崇俨是一个术士，在江湖上名声很响，据说很早就跟师傅学了一手绝活——役使鬼神。除此之外，他还擅长画符、厌胜、医术等，总之是旁门左道中的顶尖高手。乾封初年（公元666年），明崇俨在某地当县丞，当地刺史的女儿得了绝症，眼看就要没救了，明崇俨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副偏方，竟然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把上司女儿的一条命硬是从鬼门关外拉了回来。

从此，明崇俨声名大噪，连天子李治都被他惊动了，很快就把他召进宫中，对他甚为赏识。明崇俨入宫后，屡经升迁，于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被任命为正谏大夫，并得到天子特许，入阁侍奉。从此明崇

俨就成了高宗和武后身边的红人。

如果是一般的江湖术士，混到这份上绝对应该知足了。

可明崇俨显然不是一般人。

他对政治似乎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兴趣。史称高宗每次召见他时，明崇俨都会做出一副神秘兮兮并且忧国忧民的样子，“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借着鬼神说政治，这自然要比朝臣们千篇一律的奏议新鲜得多，所以高宗每回都被他说得频频点头，“深加允纳”（《旧唐书·明崇俨传》）。

明崇俨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引起了武后的关注。后来的日子，武后就经常密召明崇俨，让他暗中搞一些厌胜之术，俨然把他视为心腹。很快，明崇俨就成了武后手中的一枚棋子，被摆上了与太子对弈的棋盘。

能得到天后宠信，明崇俨深感三生有幸，自然愿意替天后效犬马之劳。

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棋局。他贸然入局的结果，最终不仅为他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且由此引发了高宗末年性质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

在武后的授意下，明崇俨开始刻意制造对太子李贤不利的政治言论。比如说什么“太子庸劣无德，不堪继承大统，只有英王（李显）相貌最似太宗”，又说“看来看去，还是相王（李旦）的相貌最为尊贵”云云，总之是一意挑拨太子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借此蛊惑人心，制造矛盾。

明崇俨在宫廷内外肆意散播这些言论，当然引起了太子李贤极大的愤怒。

一个靠旁门左道上位的江湖术士，居然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攻击当朝太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李贤知道，明崇俨之所以如此嚣张，无非是因为背后有天后撑腰。

一想起自己的身世之谜，再加上明崇俨的恶意攻击和公然挑衅，李贤的气真的是不打一处来——明崇俨，你别以为仗着天后撑腰就可以有恃无恐！老子明里是拿你没辙，可暗里还收拾不了你吗？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五月，东都洛阳爆发了轰动一时的“明崇俨被

刺案”，深受高宗和天后宠信的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当时，二圣与太子均在东都。武后对此案异常重视，立刻命人缉查凶手，几乎把洛阳翻了个底朝天，可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朝廷只好含糊其词地宣布明崇俨“为盗所杀”，然后追赠他为侍中，连带着赏给他儿子一个秘书郎的官职。

其实对于这个案件，武后心里是有数的。她知道，刺杀明崇俨的幕后真凶并不是什么江洋大盗，而很可能就是太子李贤！

可是，武后没有证据。

所以她只能等待。

她的铁锤和匕首早已准备好了。

她等待的，就是太子李贤自己露一个破绽——露一个致命的破绽！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武后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

此前不久，东宫的谏官、司议郎韦承庆上书劝谏太子，劝他不要过度纵情声色、嬉戏宴游，应该“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旧唐书·韦思谦传》）。

可令人遗憾的是，太子李贤却对此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说起李贤的私生活，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唐代享乐之风盛行，王公贵族的生活更是惯以飞鹰走马、嬉戏宴游为主题。李贤不是李弘，他从小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储君教育，私生活自然要比太子放纵一些，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李贤也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的才学修养在王公贵族中还是属于上乘的，否则也不会受到高宗的一再褒扬，更不可能拿出《后汉书注》这样的学术著作。

然而，尽管李贤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问题，可还是在某方面让人抓了小辫子。

那就是李贤的性取向。

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可李贤的性取向依然是男女通吃，极度宠爱一个叫赵道生的户奴，时常与他同床共寝、出双入对，而且赏赐极厚。谏官韦承庆所批评的“纵情声色”，主要就是针对此事。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贵族男子经常有这种断袖之风、龙阳之好，

所以就算李贤有双性恋的倾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李贤不是普通贵族，而是堂堂帝国储君！既然是这样的身份，他当然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比别人更为检点。

贞观年间的太子李承乾就是因为宠幸娈童称心，才被矢志夺嫡的魏王泰抓住了把柄，一状告到了太宗那里，最终被废黜。可见有唐一朝，对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如今李贤当上了太子，还一如既往地把亲密爱人赵道生带在身边，这不啻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尤其是他现在正处于和天后激烈交锋的非常时期，就更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可李贤毕竟太年轻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你死我亡的政治角斗场上，任何一个细微的破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如今他既然露出了这么大一个破绽，精明过人的武后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于是，武后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李贤的末日就此降临。

抓住了李贤“纵情声色”的把柄后，武后立刻命人对太子发出指控，旋即立案审查。武后亲自点名，命不久前刚刚升任宰相的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会同御史大夫高智周，组成三司合议庭，开始了对李贤的审查。

按照唐制，只有性质特别严重的大案要案，才需要由中书、门下两省长官会同御史大夫共同审理，现在武后搞出这么一个豪华阵容，摆明了就是要把这个普通的“风化案”整成大案，就像当初的长孙无忌硬是把一起“性骚扰案”弄成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一样！

而此次的两位主审官——薛元超和裴炎，又恰恰是武后一手提拔上来的。这几年来，原本铁板一块的宰相班子已经有数人因病去世，武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于是破格提拔了几个低品级官员，总算在帝国的权力核心中楔入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薛元超是初唐的著名文人，文品甚佳，但人品不怎么样，曾先后依附李义府和上官仪，但两次遭贬，属于比较典型的墙头草，如今得到武后的信任和器重，自然是感恩戴德、决意报效。还有裴炎，在拜相之前官秩仅为四品，能够青云直上也全拜武后所赐，这次主审太子案，正是他扬名立万、捞取政治资本的良机，所以他必然也要全力以赴。

由武后这两个一心想创造政绩的亲信来审案，李贤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薛元超和裴炎首先从李贤的情人赵道生身上打开了突破口。有司把赵道生逮捕归案后，还没有动用大刑，赵道生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声称太子李贤唆使他刺杀了明崇俨。赵道生一招供，案件的性质突然就严重了，从毫不起眼的“风化案”变成了富有政治色彩的“教唆杀人案”。但是据此还不足以彻底整垮太子，于是主审官们再接再厉，又从东宫的马坊中搜出了几百副崭新锃亮的盔甲。至此，案件再度升级，从教唆杀人案又变成了谋反案。武后非常满意，马上为此案定调，宣称太子谋逆，其罪当诛！

武后已经把绞索套上了李贤的脖子，长年躲在深宫中养病的高宗才如梦初醒。他慌忙要求武后手下留情，宽宥太子的过失。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武后严词拒绝了天子的请求，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资治通鉴》卷二○二）

武后声色俱厉，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而高宗则只能低声下气，苦苦请求。最后的处理结果相对折中：太子贤免予一死，但废为庶人，押往长安幽禁；那几百副惹来滔天大祸的盔甲在洛水桥当众焚毁。一年后，李贤又被流放到了离京师两千多里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在那个边瘴之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

李贤被废后，武后趁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几位支持太子的宰相先后被罢黜，其他一些与太子友善的宗室亲王和朝臣也遭受株连，或贬谪或流放，被驱逐殆尽。而在此案中立下大功的两位主审官则在一年后再次荣升：裴炎升为侍中，薛元超升为中书令。

至此，一度与武后分庭抗礼、激烈争锋的太子贤被彻底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全部肃清。武后以她的心机和铁腕，又一次铲除了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在天下人面前牢不可破地树立起了她的无上权威！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亦即李贤被废的第二天，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原名李显）被立为太子，朝廷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有唐一朝，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政治歌谣，名为《黄瓜台辞》，相传为李贤所作：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如今，武后这个种瓜人已经亲手摘下了两条黄瓜，显然已是“再摘使瓜稀”了。

接下来，她还会“三摘”吗？

内忧外患的帝国

据说李贤在被废的不久之前，曾经谱写了一首曲子，名为《宝庆之曲》。有一天，李贤命乐工在太清观演奏此曲，被一个叫李嗣贞的始平县令偶然听见。李嗣贞是善解音律之人，当他静静地听完曲子后，脸上忽然浮出一层浓重的忧虑之色。他对身边的那些道士说：“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协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

数月之后，太子李贤果然被废为庶人。

没有人会想到，李嗣贞的几句感叹竟然成了如此准确的预言。后来高宗听说此事，感念李嗣贞的忧国之心，就将他擢升为太常丞。

不久后，李嗣贞又发出了一番感叹。

也可以说，他又作出了一个预言。

当然，这一次他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而是在私下里对密友做了透露。因为这则预言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涉及天皇、天后、李唐皇室，而且涉及整个帝国的未来！

李嗣贞说：“祸犹未已！主不亲庶务，事无巨细，决于中宫，将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势不敌。我恐诸王藩翰，皆为中宫所蹂践矣……我见患难之作，不复久矣！”（《唐会要·论乐》）

祸乱尚未结束！皇上不理政务，事无巨细皆决于中宫，把权力交付给别人，要收回来又谈何容易。李唐的宗室亲王虽多，但都分散在外；中宫居中制外，其势无人能敌。我担心李唐诸王，都不免被中宫所蹂躏啊！……我预感到帝国的危难，不久就会来临！

不管李嗣贞是否曾作过如此可怕的预言，如今大唐帝国的政治局面确实令人忧虑：大唐天子重病缠身，大权旁落；帝国储君一再罹祸，死的死，废的废；而中宫的主人——天后，则一手掌握了恩威刑赏、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此阴阳颠倒、上下违和，又怎么能不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呢？

无独有偶。就在李哲继任太子的第二年，亦即开耀元年（公元681年）三月，高宗李治让老臣刘仁轨陪他到一座新建的宫殿参观。此殿名为镜殿，顾名思义，就是相关的负责官员为了讨天子欢心，别出心裁地在宫殿四壁装饰了许多光可鉴人的铜镜。

可想而知，这样一座宫殿必定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

然而，就在高宗带着大臣们刚刚进入殿中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宰相刘仁轨忽然吓得面无人色，拔腿就往外跑。高宗被他搞得莫名其妙，赶紧叫住他，问他怎么回事。

刘仁轨当场作出了回答，可他的回答却更让人感到意外。他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适才发现，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不祥之兆！"

很显然，刘仁轨纯粹是在借题发挥。

他老人家出将入相，在官场和沙场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什么场面没见过？又岂能让区区几面镜子吓倒？假如不是心中郁结了太多的困惑和忧虑，他绝不会如此故作惊人之语。

对此，高宗李治当然也是心领神会。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刘仁轨的良苦用心，也比任何人都更能听懂刘仁轨的弦外之音。

可是，听懂了又能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武后当权的政治现实，是事出有因、由来已久的，又岂是高宗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如果高宗不是一直被病魔所困扰，如果他的病情能够好转，那一切自然就另当别论了。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如果。

参观镜殿的当天，高宗立刻命主管官员拆掉了那些充满"不祥之兆"的

镜子。

镜子当然是可以说拆就拆的，可帝国政治中潜伏的危机和隐患，又岂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消除的？

这些年来，除了帝国的内政让人异常担忧之外，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对外军事方面，大唐帝国也遭遇了自开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和最严重的挫折。

对帝国最具有威胁性的挑战首先来自日益强大的吐蕃王朝。自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惨败于大非川之后，帝国与吐蕃的交锋就败多胜少了。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李敬玄的十八万唐军又被吐蕃国相论钦陵大败于青海湖，工部尚书兼左卫大将军刘审礼被俘。眼看唐军又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所幸勇将黑齿常之率敢死队夜袭敌营，迫使吐蕃军队败退，李敬玄才得以带领残部逃回鄯州。

此后，虽有新近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黑齿常之、娄师德等人守御边境，使吐蕃有所顾忌，数年不敢犯边，但唐军也始终只能采取守势，根本没有力量对吐蕃发动反攻。

吐蕃的悍然崛起本来就已经让高宗君臣感到焦头烂额了，而朝鲜半岛的形势同样不让人省心。从咸亨年间（公元670—674年）起，高丽的旧势力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叛乱，虽然屡屡被唐将高侃击败，但由于新罗一直在全力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唐军始终无法将高丽彻底荡平。此后新罗又出兵占领了百济故地，大有称霸朝鲜半岛之势。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正月，高宗终于忍无可忍，命老将刘仁轨再度挂帅，以卫尉卿李弼、靺鞨族将领李谨行为副帅，发兵征讨新罗；与此同时，高宗又下诏削除了新罗国王金法敏的封号和官爵，封他的弟弟，其时正在唐朝任职的金仁问为新罗的新国王，让他即日归国赴任。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刘仁轨亲率主力在七重城大破新罗军队，同时又命李谨行率靺鞨部众在新罗南部海岸登陆，横扫驻扎在这一带的新罗守军，斩获甚众。稍后，高宗考虑到刘仁轨年事已高，不宜长久在外征战，遂召他回国，然后任命靺鞨勇将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让他进驻新罗的买肖城，摆出与新罗打持久战的架势。

新罗国王金法敏不甘心失败，一连对李谨行发动了三次反攻，试图夺回买肖城，拔掉唐军插在他心窝上的这枚钉子。不料，新罗军队的三次进攻皆被李谨行挫败。金法敏发现自己在军事上已经无牌可打，只

好转而打起了政治牌，当即遣使向唐朝入贡，并口口声声向高宗谢罪。

唐帝国这些年一直疲于应付吐蕃，本来就不希望两线作战，所以高宗马上趁这个机会就坡下驴，赦免了金法敏，并恢复了他的封号和官爵。此时金仁问刚刚走到半道，朝廷忙不迭地将他召了回去，并把他原来的爵位“临海郡公”还给了他。可惜金仁问才做了几天国王梦，就稀里糊涂地被打回了原形。

新罗既然已经谢罪，唐军便主动撤出了朝鲜半岛。可高宗君臣断然没有想到，唐军一走，金法敏便故态复萌，马上又开始了对高丽和百济的蚕食，成心要跟大唐打一场“敌进我退、敌退我扰”的疲劳战。

面对朝鲜半岛如此风云变幻、反复无常的形势，高宗君臣到最后确实也有些疲惫和无奈之感。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二月，高宗不得不改变战略：一方面收缩战线，把安东都护府从朝鲜半岛的平壤撤至辽东的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另一方面，任命原高丽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封爵朝鲜王，任命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爵带方王，让他们回国安抚旧众。

高宗此举，名义上是让他们复国，实际目的是要在朝鲜半岛建立亲唐政权，以此遏制新罗。这与当年太宗让阿史那思摩返回漠南重建东突厥以遏制薛延陀的战略，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然而，太宗当年的计划失败了，如今高宗的这个举措会成功吗？

很遗憾，结果也是失败。

问题首先出在高藏身上。

九年前，高藏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来到唐朝，虽然备受优待，甚至被高宗授予工部尚书的要职，但是亡国之痛一天也没有从他的心头消失。就算现在高宗给了他“朝鲜王”的封号，并在名义上让他复国，可高藏很清楚，在大唐的扶植下重建起来的高丽当然不可能是原来的高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傀儡政权。而高藏在亡国之前已经做了太长时间的傀儡，所以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做傀儡！

一回到辽东，高藏便暗中与靺鞨人联络，企图与他们联手反叛大唐。可是高藏刚开始筹划，安插在他身边的朝廷耳目便察觉了他的阴谋，当即向朝廷密报。于是高藏很快就被召回，随即流放邛州，最后死于贬所。

随着高藏的贬死，高丽的复国行动随之搁浅。新罗趁势向北扩张，出兵占据了高丽的旧都平壤。由于当时百济荒残，扶余隆暂时寓居在辽东，一见新罗势强，当然不敢回国，所谓的重建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至此，高丽、百济的复国计划彻底泡汤，高宗的新战略宣告失败。

没有人会料到，大唐帝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多年经略，到头来只是为别人做了嫁衣裳；而当初一直在扮演弱势群体的那个可怜兮兮的新罗，却成了笑到最后的唯一赢家！

新罗占据了百济故地和原高丽部分领土后，继而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所有地区，从此国势蒸蒸日上，进入了其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时期。

新罗的背信弃义和以怨报德让高宗李治怒不可遏。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高宗宣布，准备再度发兵征讨新罗。当时正卧病在家的宰相张文瓘闻讯，连忙抱病入宫进行劝谏："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资治通鉴》卷二○二）

张文瓘的谏言正反映了当时朝野上下的普遍忧虑——多年征战的唐帝国已经没有那份雄厚的国力，可以在东、西两线同时打赢战争了！

这样的担忧高宗又何尝没有？

只是新罗实在是太操蛋了，不杀一杀它的嚣张气焰，高宗绝对吞不下这口恶气！

然而，来自吐蕃的巨大威胁又让人不敢忽视。

怎么办？

就在高宗万分踌躇、左右为难的时候，西部边境传来了李敬玄十八万唐军惨败的消息，高宗的一颗心顿时跌入了谷底，东征新罗的计划就此搁浅。

紧接着在第二年，即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北方边境又爆发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迫使高宗彻底放弃了东征高丽的计划，而且在今后的几年里，令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大唐帝国陷入了更深的战争泥潭之中。

这个来自北方的危机就是东突厥的复国运动。

平定突厥叛乱

在历史上，东突厥一直是中原王朝最强劲的对手。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平定东突厥之前，它也是唐帝国最大的心腹之患。自从其覆灭之后，大唐帝国的北疆基本上就平静了，除了突厥余部车鼻可汗在贞观末年发动过一次小小的叛乱之外，东突厥的降众大多数时候都还算老实。但是这些年来，眼见唐帝国在吐蕃的打击下连遭惨败，国力大不如前，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突厥人终于坐不住了。

调露元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阿史德家族率先揭起了反旗。

阿史德家族分为两部：一部由阿史德温傅统领，一部由阿史德奉职统领。两部同时起兵，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随后，原东突厥境内的二十四州酋长也纷纷起兵响应，一时间，叛乱部众多达数十万人。

消息传来，朝廷大为震惊，高宗急命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率部平叛。一开始，平叛战役进展顺利，所以萧嗣业就起了轻敌之心。其时正逢天降大雪，唐军更无戒备，突厥叛军遂对唐军发动夜袭。萧嗣业猝不及防，狼狈拔营而走，唐军大溃，被俘和阵亡者不计其数。随后，萧嗣业因战败之罪被流放桂州，两名副帅也均被革职。

此次惨败令高宗又惊又怒。他意识到，如果不慎重选择一位真正具有才干的统帅，势必无法扑灭东突厥的叛乱。

十一月，高宗经过慎重考虑，终于锁定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他，就是初唐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裴行俭。

裴行俭是绛州闻喜县人，父亲裴仁基是隋朝将领，曾任河南讨捕使，后来归附李密、王世充，武德初年曾密谋归唐，因事泄被王世充所杀，武德中期被追赠为原州都督。裴行俭幼年时以父荫入弘文馆就读，于贞观中期参加科举考试，考中明经科，开始进入仕途，任左屯卫仓曹参军。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恰好是左屯卫中郎将苏定方。苏定方对他颇有好感，于是“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旧唐书·裴行俭传》）。

永徽年间，裴行俭经过六次升迁，当上了长安令一职，但紧接着就遭遇了他仕途上最大的一次挫折。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裴行俭因

反对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被逐出长安，贬至西域，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可是，仕途挫折并没有磨掉裴行俭的锐气，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此后十年间，裴行俭在西域边陲多有建树，遂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升任安西大都护。

几年后，政绩卓著的裴行俭又被调回朝中担任吏部侍郎。在此任上，裴行俭再次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华，创造了著名的诠注法，作为官吏选拔和升降的标准。所谓诠注法，就是在选拔官吏的时候从身、言、书、判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身，要求体貌丰伟；言，要求言辞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先观其书、判，再察以身、言，最后再注明其有何特长，以此标准来任命官吏。

由于此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量化性，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制度，因此一经颁行，就在唐朝成为定制。

除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具有过人的才华之外，裴行俭也是初唐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尤工草书，与当时的褚遂良、虞世南等大家齐名。裴行俭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褚遂良写字时，一定要用上好的笔墨；不择笔墨而能写出一手好字的，大约就只有我和虞世南了。”

调露元年五月，也就是在东突厥的阿史德家族发动叛乱的半年之前，西突厥的贵族阿史那都支就已暗中联合吐蕃，侵逼安西，并密谋重建西突厥。情报传回长安后，朝臣们纷纷建议出兵讨伐。由于当时李敬玄、刘审礼刚刚败于吐蕃，帝国元气未复，不宜再出动大军西征，因此裴行俭力排众议，向高宗提出了一个智取西突厥之策。

在取得高宗的同意后，裴行俭率副将王方翼，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为名，向西突厥进发，在途经阿史那都支的驻地时，趁其不备将其生擒，从而兵不血刃地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

裴行俭的智慧和胆识顿时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同时也让高宗大为叹服。

正因为裴行俭在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能力都相当突出，并且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所以高宗此次才会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征军的统帅。

这一年，裴行俭已经年逾六旬。

出征之前，高宗专门设宴为裴行俭饯行，对他说：“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资治通鉴》卷二○二）随即任命裴行俭为礼部尚书

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由于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英王李哲挂名，因而裴行俭实际上就成了京师宿卫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最高军事统帅。于此足见高宗对他的倚重和信任，也足以表明此时的裴行俭已经成为大唐帝国数一数二的名将。

调露元年年底，帝国的北征军集结完毕，由主帅裴行俭亲率十八万主力，另以丰州都督程务挺为西路军，以幽州都督李文暕为东路军，两路皆受裴行俭节制，兵分三路直取东突厥。

为了一举平定东突厥的叛乱，唐帝国此次一共出动了三十多万大军，其动员兵力之多，为高宗登基以来所仅见。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春，北征军进抵朔川（今山西朔州市境内），与东突厥的前锋部队已经近在咫尺。由于在此次北征之前，东突厥叛军曾成功偷袭萧嗣业的运粮队，因此裴行俭料定，此次突厥人一定还会故伎重施。于是他将计就计，挑选了一些老弱残兵伪装成运粮部队，负责押送三百辆粮车，同时在每辆车中隐藏五名勇士，一律装备劲弓和长柄大刀，专等突厥人上钩。

果不其然，唐军的“运粮队”刚出发不久，东突厥的偷袭部队便呼啸而至。按原定计划，那些押送粮草的老弱残兵立刻一哄而散。突厥人抢了粮车后，毫无戒备，纷纷下马饮水。就在此时，埋伏在粮秣车中的唐军勇士突然冲杀出来，东突厥军猝不及防，顷刻间便都成了唐军的刀下之鬼。

首战告捷之后，唐军主力迅速北上，于三月进抵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在此与东突厥叛军的主力展开决战，一战便将其击败，生擒叛军首脑之一阿史德奉职。

经此一役，东突厥叛军元气大伤，军心开始动摇，当初参加叛乱的二十四个部落个个心怀鬼胎，都想要自我保全。可汗麾下的几个部落酋长经过密商，最后干脆刺杀了新立可汗阿史那泥熟匐，砍下他的首级投降了唐军。

其余部众不敢再与唐军交锋，随后便在阿史德温傅的率领下仓皇退守狼山（阴山）。

北征军的东、西两路尚未出击，裴行俭的中路主力就已基本平定了叛乱。捷报传至长安，高宗大喜过望，即命户部尚书崔知悌到前线去慰劳官兵，并处理善后事宜，同时命裴行俭班师回朝。

高宗之所以急着把大军调回，目的是要应付日趋紧张的吐蕃战事。

这一年，吐蕃攻陷大唐西南的军事重镇安戎城（今四川理县西），致使西洱诸胡（今云南洱海湖一带）全部投降吐蕃。随后，吐蕃完全占据了羊同（今西藏西北部）、党项（今四川西北部）以及诸羌的地盘，向东威胁大唐西部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松州（今四川松潘县）、茂州（今四川茂县）、嶲州（今四川西昌市），南部边境与天竺接壤，西陷安西四镇，北抵东突厥，疆域纵横万余里，其势力空前强大，如日中天。

裴行俭班师时，无论是高宗本人，还是朝中的大臣们，几乎都认定东突厥的叛乱已经平息。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东突厥残部并未放弃复国的念头。

很快，他们就将卷土重来。

斩草而不除根的结果，就是给对手以喘息之机，并且让对手变得比原来更加强大！

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正月，东突厥的一个酋长阿史那伏念又在部众的拥戴下自立为可汗，随后又与叛乱首谋阿史德温傅联手，重新纠集了叛乱各部，于是声势复振。

裴行俭再度临危受命，率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第二次踏上了北征之路。

三月，唐军前锋曹怀舜部刚刚越过边界，就得到一个来源不明的情报，说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正在阴山北面的黑沙巡视，随从骑兵不足二十人。曹怀舜为了抢一个头功，当即亲率一支精锐骑兵直扑黑沙。可到了目的地后，不要说突厥可汗，连一个鬼影都没见着。曹怀舜大为沮丧，只好往回撤。

当人困马乏的曹怀舜部撤至长城北面时，突遇阿史德温傅。双方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随即各自引兵而去。此时，唐军的第二梯队李文暕、副将刘敬同也已率部越过长城，与曹怀舜会师于横水。就在这时候，阿史那伏念的主力突然出现，而阿史德温傅也迅速折返，与阿史那伏念合兵一处，将唐军团团包围。

由于曹怀舜此前误信假情报，导致部队长途奔袭，消耗了大量体力，此刻又是仓促迎战，战斗力明显不如突厥人。所以曹怀舜不敢恋战，只好和李文暕部一起结成方阵，且战且退。

突厥人紧紧咬住唐军，整整追击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趁着一次刮顺风的机会，阿史那伏念命令部队发起总攻。唐军的方阵被冲乱，曹怀舜等人一见大事不妙，赶紧扔下部队，拍马便逃。指挥官一跑，士兵们更是争相逃窜，大军当即崩溃，被杀者不计其数。

后来曹怀舜又担心跑不出突厥人的包围圈，为了保住性命，只好收拾金帛前去贿赂阿史那伏念，请求议和。阿史那伏念也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主，他见金帛的数量不少，便欣然与曹怀舜议和，杀牛盟誓，然后引兵北还。

曹怀舜虽保住一命，但是回国之后，还是遭到了革职流放的处罚。

横水之战的失败，显然是因为唐军中了突厥人的圈套。

首先，突厥人抛出假情报，目的就是要诱使曹怀舜长途奔袭，消耗体力；其次，阿史德温傅与曹怀舜略微交手便主动撤离战场，明显是为了试探唐军的战斗力；最后，唐军二部刚一会师，突厥主力就突然出现，更加说明阿史那伏念实际上一直在盯着曹怀舜，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想等李文暕过来，然后把这两支部队一块儿吃掉。

总之，突厥人事先已设计好了一切，然后才把唐军一步一步引上了歧途。

要命的是，唐军的前锋指挥官曹怀舜偏偏又是一个既贪功又怕死的草包，所以才会自始至终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最终让突厥人的阴谋得逞。

那么，当北征军的前锋被突厥人玩弄于股掌并围歼于横水的时候，主帅裴行俭在干什么呢？

值得庆幸的是，裴行俭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并没有把胜利的赌注全部押在前锋曹怀舜和李文暕身上，而是暗中打出了一张绝妙的好牌：就在前锋二部刚刚出发时，裴行俭便已派遣裨将何迦密、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各率一支精锐骑兵分路出击，目标直指阿史那伏念的老巢——金牙山。

由于阿史那伏念为了一举吃掉唐军的前锋二部，早已把主力全都拉了出去，因此留守金牙山的兵力十分薄弱，根本不是唐军的对手，很快便被击垮。阿史那伏念的妻儿皆被唐军俘虏，辎重粮草也尽数落入唐军之手。

阿史那伏念绝对没有料到——就在他自以为得计地斩断唐军手臂的同

时，裴行俭却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端掉了他的老巢。

一来一去，阿史那伏念显然是亏大了！

老巢被洗劫一空，后勤补给出现了严重困难，阿史那伏念只好率部撤进了大漠深处。

虽然裴行俭策划的奇袭行动大获全胜，但横水之败毕竟也给唐军造成了重创，所以裴行俭不得不把军队暂时拉回代州（今山西代县）休整。

然而，休整期间的裴行俭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酝酿一个新的更大的计划。

他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接下来的日子，裴行俭频频派出间谍，对突厥人实施了一系列的反间计。渐渐地，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开始互相猜疑。此前阿史那伏念因贪图金帛与唐军议和，放走了曹怀舜等人，阿史德温傅已经对他非常不满，背后大骂他“竖子不可与谋”，所以阿史那伏念时刻担心阿史德温傅会对他下黑手。此外，他的妻子儿女现在都在唐军手里，阿史那伏念自然也要考虑他们的安危。

在多种不安的折磨下，阿史那伏念最后终于动了降唐的念头，于是派密使去晋见裴行俭，表示可以逮捕阿史德温傅，然后归降唐军。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保证他和妻儿的生命安全。

这个条件并不过分，裴行俭当即满口答应。

尽管与裴行俭暗中达成了协议，可阿史那伏念还是有些举棋不定。毕竟裴行俭的唐军主力现在与他远隔千里，短时间内根本就打不过来。所以阿史那伏念还是心存一丝侥幸，不想轻易放弃可汗的位子。

对于阿史那伏念这点花花肠子，裴行俭其实心知肚明。

他知道，不使出撒手锏，阿史那伏念绝不会轻易就范。

可是，如何使用撒手锏呢？阿史那伏念不是早已退至大漠深处了吗？此刻裴行俭的主力又驻扎在代州，双方远隔千里大漠，岂不是鞭长莫及？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因为，早在阿史那伏念率部北撤的时候，裴行俭就已派遣程务挺和张虔勖，就近调集单于都护府的府兵，从背后悄悄跟上了他。所以，此刻唐军并非与阿史那伏念远隔千里，而是隐藏在他的大营附近，随时等待着裴行俭的下一步指令。

这一招，阿史那伏念当然是打死也想不到的。

而裴行俭之所以没有命令这支追兵发动进攻，就是想通过实施反间计，加上手中的人质筹码，迫使阿史那伏念投降，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随后，刘敬同和程务挺接到了裴行俭的指令，随即逼近阿史那伏念的牙帐。阿史那伏念一直以为唐军不会这么快越过大漠，所以根本没什么戒备。直到唐军突然出现，阿史那伏念才如梦初醒。他万般无奈，只好设计逮捕了阿史德温傅，然后带着各部酋长及其部众，前往裴行俭的大营投降。

至此，东突厥的第二次叛乱宣告平定。

在这个世界上，凭借勇悍和武力取胜的名将常有，而善于用智慧和谋略克敌的名将则不常有。

裴行俭显然属于后者。

通过这场平叛战争，裴行俭再次向世人展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杰出军事才华，同时也用生动的战例诠释了孙子的那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永隆二年九月末，裴行俭班师凯旋，向朝廷献俘。三天后，朝廷为庆祝此次大捷，改元开耀。

然而，就在改元的次日，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高宗忽然下令，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名东突厥战俘全部押赴长安闹市斩首。

听到这个消息时，裴行俭目瞪口呆。

裴行俭此前曾答应过阿史那伏念，一旦归降就保住他的性命。如今朝廷却背信弃义、公然杀降，这不是令天下人齿冷心寒吗？

更何况，自从贞观初年以来，唐军几乎每一次出征都会带回来一大批

高级战俘，而这些人基本上都会被朝廷赦免，并且被授予官爵。最典型的当属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那一次，自颉利可汗以下，东突厥的所有战俘和降将一律受到了大唐的优待，在朝中官居五品以上者共有一百余人，占到朝廷高阶官员的一半。

贞观时代，唐帝国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争中所向披靡、百战百胜，并且赢得周边四夷的尊敬和拥戴，主要就是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所制定的这种怀柔政策。高宗执政前期，朝廷也一直在奉行这种深得人心的宽大政策，所以才能维持帝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可为什么这一次，高宗竟然会一反常态、大开杀戒呢？

裴行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才知道，高宗之所以一反常态，原因是宰相裴炎对他进了谗言。

裴炎是这么对高宗说的："此次大捷并不是裴行俭的功劳，而是副将程务挺和张虔勖北上进逼阿史那伏念，加上漠北的回纥人向南压迫，阿史那伏念走投无路，这才投降，并不是裴行俭真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

就在裴炎的这几句话中，裴行俭平定东突厥的功劳被一笔勾销。

那么，裴炎为什么要跟裴行俭过不去呢？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裴炎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另外一个人。

谁？

武后。

众所周知，从咸亨年间开始，武后就一直试图与宰相分权，并且处心积虑地向宰相班子渗透自己的势力，像裴炎、薛元超等人就是她一手提拔的。可这些年来，武后的老政敌裴行俭却成了满朝文武中风头最健的人，无论是经略西域、整顿边务、改革吏治还是出征突厥，每一次出手都令人刮目，每一回表现都可圈可点，论其资历、功勋和声望，已经完全具备了拜相的资格，随时有可能入相。

对此，武后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一旦裴行俭拜相，肯定会成为她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她必须未雨绸缪，尽一切可能对他进行打压！

裴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面的。而高宗未经调查，便听信了裴炎的一面之词，认为阿史那伏念并非真心归降，于是断然下达杀降的命令。可怜阿史那伏念这五十多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了大唐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他们被斩的那一天，裴行俭仰天长叹："浑、浚争功[3]，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资治通鉴》卷二○二）

裴行俭的意思是：他不会像小肚鸡肠的王浑那样与自己的部下争功，所以，无论此次大捷的功劳算在谁的头上，他都不会在乎。他唯一担心的只是——大唐如果开了杀降的先例，日后恐怕就无人敢来归附了。

经过这件事，裴行俭颇有些心灰意冷，从此称疾不出，主动淡出了政坛。

就像裴行俭所担心的那样，杀降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二年，亦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春，这种恶果就初步显现出来了——西突厥的一个酋长阿史那车薄率十姓部落发动了叛乱。

危急时刻，高宗再次想起了裴行俭，慌忙任命他为西征军统帅，准备让他率领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人，分兵征讨西突厥。

然而，就在大军即将出征的前夕，一代名将裴行俭就因病去世了，终年六十四岁。

裴行俭的去世，对战事方殷、外患频仍的大唐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平定西突厥的重任，就此落到了裴行俭先前培养起来的一位重要将领、时任安西都护的王方翼身上。

阿史那车薄起兵之后，首先进攻弓月城（今新疆霍城县），王方翼立刻率部驰援，在伊丽水（伊犁河）大破西突厥叛军，斩首千余级。稍后，西突厥的三姓咽面部落（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东）又与阿史那车薄联手，叛军的势力顿时更加强大。

不久，王方翼率部与西突厥联军在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展开了一场大型会战。在激烈的交战中，一支流箭射穿了王方翼的手臂，王方翼用佩刀砍下箭杆，继续与敌人激战，连左右亲兵都不知道他已负伤。

经过热海会战，阿史那车薄充分领教了王方翼的厉害，知道自己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于是想出一计：当时王方翼麾下有一部分外族士兵，

阿史那车薄就暗中派人与他们联络，唆使他们发动兵变，生擒王方翼。

可是，阿史那车薄的小动作并没有瞒过王方翼的眼睛。他随后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把企图发动兵变的那些头目都召集起来，然后又谎称要赏赐财物，让念到名字的人到帐外去领赏。这些人根本没意识到其中有诈，当即兴高采烈地排队出去领赏。而王方翼早已命刀斧手准备在帐外，出来一个就干掉一个，一共杀了七十余人。在动手的过程中，王方翼还命人在一旁敲锣打鼓，以防参与叛乱的士兵听见动静。所以，直到所有头目都被送进了鬼门关，这些士兵还是毫无察觉。等他们最后明白过来时，已经全部成了俘虏。

肃清内部之敌后，王方翼随即兵分数路，对阿史那车薄和咽面部落发起了总攻。此时阿史那车薄正在信心满满地等待着王方翼被俘的消息，所以完全放松了警惕，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迅速崩溃。这最后一战，唐军基本上将西突厥联军悉数歼灭，仅生擒的叛军酋长就多达三百余人。

这场来势汹涌的叛乱就这么被王方翼平定了。

当时因为裴行俭病逝，朝廷重新任命阎怀旦为主帅，准备让他率领西征军去平定叛乱。可阎怀旦尚未出发，王方翼的捷报便已传回了长安。

高宗大喜过望，旋即征召王方翼入朝。许多人都认为，王方翼此次入朝，肯定是去接受嘉奖和封赏的。

可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接见王方翼的时候，高宗发现他的衣服上渗出了血迹，连忙问他原因。王方翼解开衣襟，露出手臂上的箭伤，据实禀告了热海苦战的经过。

高宗看着那个流血的伤口，不住地叹息。

然而，高宗也只能叹息而已。

因为王方翼是被废的王皇后的族兄，一直深受武后嫉恨。碍着这层关系，高宗当然不敢为王方翼论功行赏，更不敢予以重用。

就这样，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王方翼千里迢迢地回到长安，除了听到天子的几声叹息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王方翼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注重裙带关系的社会，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飞黄腾达的最首要因素，往往是他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其次才是能力和业绩，总有一种让你很无奈又很无力的东西，会始终凌驾于你的“专业能力”之上！

永淳元年四月，西突厥的二次叛乱刚刚平息；十月，东突厥的第三次叛乱旋即爆发。

这就叫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这就叫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

这次叛乱是由东突厥残部的一个酋长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德元珍发动的，他们召集残部，占据了黑沙城（阴山北麓）；随后一边进攻北面的铁勒九姓，抄掠了大量牛羊，一边向南入寇并州、岚州等地，砍杀了岚州（今山西岚县）刺史王德茂。随着叛军势力的逐渐强盛，各部落纷纷归附，阿史那骨咄禄遂自立为可汗。

面对一波比一波更为凶猛的反叛浪潮，唐高宗肯定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突厥人为什么会对叛乱如此情有独钟呢？

论主观原因，这固然是出于他们的复国信念和那些叛乱头目的权力野心，可要论客观原因，却显然与高宗上次的杀降密切相关。

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刻，高宗会不会为当初草率而错误的行为感到后悔呢？

不过就算后悔也没有用了，因为一切已经成为事实。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物色一位合格的将领，北上抵御东突厥。

可是，突厥人的克星裴行俭 [4] 已经不在了，如今要派谁去，才能镇得住穷凶极恶的突厥人呢？

高宗思前想后，最后终于决定起用一位老将。

薛仁贵。

自从大非川惨败之后，名将薛仁贵就落入了他人生的低谷。虽说后来曾经被短暂地起用过一次，去征讨高丽叛乱，但是回朝后他不知因为犯了什么事，就再度被罢职免官，流放象州。几年后他遇赦回京，不过已经是一个无官无职的庶民。

现在薛仁贵终于二次复出，被高宗任命为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代州都督。

可是，这一年薛仁贵已经七十高龄了。

当年雄姿英发、勇冠三军的青壮派，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名副其实的老将军了。古稀之年的薛仁贵，还能挑起捍卫帝国边塞的重任吗？还能创造出“三箭定天山”那样辉煌的业绩吗？

薛仁贵就任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后，很快就接到一则战报，说叛军的二号人物阿史德元珍正在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一带出没。薛仁贵随即率部出发，很快就在云州附近与东突厥军队正面遭遇。

听说大唐名将薛仁贵来了，阿史德元珍不禁将信将疑。为了弄清真相，他便亲自跑到阵前向唐军喊话，问对方大将是谁。薛仁贵报上自己的名号。阿史德元珍还是不信，大声说：“听说薛仁贵被流放象州，已经死了好久了，你少拿他的名号来唬人！”

薛仁贵哈哈大笑，当即摘下头盔，让对方看个清楚。阿史德元珍定睛一看，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没错，眼前这个须发皆白却依然威风凛凛的老将军，正是名震天下的传奇英雄薛仁贵！

阿史德元珍来不及多想，赶紧和他的随从们一起下马，毕恭毕敬地向薛仁贵行礼。随后，可能是出于内心的敬畏，阿史德元珍率部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

双方还没有开打，突厥人在气势上就已经输了。

薛仁贵则抓住战机，果断下令军队出击。突厥人无心恋战，当即四散奔逃。唐军就此大破东突厥军队，斩首万余级，俘获了两万余人，还有驼马牛羊三万余头。

经此一战，老将薛仁贵的威名再度远播塞北，令突厥人闻风丧胆。史称突厥人“闻仁贵复起为将，素惮其名，皆奔散，不敢当之”（《旧唐书·薛仁贵传》）。

刚刚自立为可汗的阿史那骨咄禄更是暗暗叫苦——有了这个战神一样的人物镇守唐帝国的北大门，自己还能捞得着半点便宜吗？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云州之战刚刚结束不久，薛仁贵便卧病不起了。

云州大捷就此成为名将薛仁贵一生中最后的辉煌。

这一年年底，薛仁贵紧继裴行俭之后，在代州都督任上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岁。

两颗将星的相继陨落，不仅对于危机中的大唐帝国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宣告了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从此，唐帝国在军事上就告别了天可汗时代的巅峰，开始步入一个漫长的衰退期。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唐玄宗时代，帝国才重新拾起往日的辉煌。

当薛仁贵去世的消息传到塞外，突厥人顿时欣喜若狂。

没有了薛仁贵，唐帝国的北部边防在突厥人的眼中就形同虚设了。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东突厥军队开始从各个方向对大唐帝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

二月，突厥大军进攻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妫州（今河北怀来县）。

三月，骨咄禄可汗与阿史德元珍大举围攻位于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单于都护府，都护府司马张行师率部迎战，被突厥人斩杀。

五月，骨咄禄可汗进攻蔚州（今山西灵丘县），蔚州刺史李思俭兵败被杀；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都督崔智辩率军在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县东）截击突厥军队，遭遇惨败，崔智辩被俘。

六月，东突厥军队又攻掠岚州（今山西岚县）……

仿佛一夜之间，突厥人就回到了全盛时期——始毕可汗的时代。

在唐帝国广袤而绵长的北部边境线上，他们的骑兵纵横驰骋、呼啸来去，刮起了一阵比一阵更猛烈的战争旋风。

东突厥的崛起速度之快、来势之凶猛，令大唐君臣和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虽然此时骨咄禄的势力范围还没有扩大到突厥全境，但是，从他自立为可汗的那一天起，东突厥的全新时代就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这个再度崛起的新突厥，在历史上称为突厥第二汗国，或称后突厥。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后突厥将再次成为大唐帝国最强劲的对手。

[1]　关于两公主的年龄，《资治通鉴》称“年逾三十不嫁”，《新唐书》更夸张，说是“四十不嫁”。其实两书的记载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此时高宗本人的年龄也不过四十四岁，怎么可能有两个三十多甚至四十岁的女儿呢？事实上，高宗十六岁当上太子不久便娶了萧淑妃，就算当年生子，长女义阳公主的年龄也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八岁；而次女宣城公主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年，享年六十六岁，所以倒推回来，咸亨二年应该是二十四岁。

[2]　权毅的祖父是秦王府嫡系，封卢国公，父亲也官至桂州都督；王勖的祖父官至监门将军，封平舒公，父亲是歙州司马。

[3]　王浑，西晋大将，因在平吴战争中被部将王浚夺得头功，便愤然与其争功，故而备受后世讥讽。

[4]　西突厥的首次叛乱与东突厥的前两次叛乱，皆为裴行俭所平定。

第十章 武皇后的盛唐

天牢囚犯成了天子保镖

这些年来，高宗李治感觉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像是一场噩梦。

首先是多种病症的长期折磨，其次是两个太子的一死一废，最后是帝国在对外军事上的屡屡受挫……如此种种，都足以让他充满痛苦和无力之感。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闰七月，高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不得不走上太宗皇帝的老路——开始服用长生不老药。

就像太宗李世民一样，高宗李治在患上风疾之前也曾嘲笑过希求长生的秦皇汉武，可自从患病之后，高宗就开始征召方士开炉炼丹了，据说前后征召的方士达百人之多。虽然各色药丸炼了一大堆，但高宗一直碍于大臣谏诤，也不敢轻易服用。只是这一次，高宗或许是被病痛折磨得太厉害，因此也就横下一条心，死马当活马医了。

可吞食丹药的结果，当然也是和太宗当年如出一辙——病情不但不见改善，反而越发严重。

眼看高宗已经时日无多，武后自然要郑重考虑夫皇的身后事。

准确地说，武后必须确保在高宗宾天的时刻，自己还能牢牢掌控帝国的政局。

为此，她决定想办法让高宗离开长安，东幸洛阳。

因为长安是关陇集团的发祥地，是李唐旧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巢，在这里，武后难免会受到掣肘，无法放开手脚。而东都洛阳则不同，那是她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只有在那里，武后才能自如地掌控一切！

但是，在高宗已经病入膏肓的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说服他离开长安，离开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呢？

武后首先想到的理由就是——封禅。

是的，没有比这个更正当的理由了。

武后劝高宗说，既然天下有五岳，那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封禅泰山。接下来，应该前往东都洛阳，准备封禅嵩山，最后把五岳封一个遍。

封禅五岳？

这真是个激动人心的建议！尽管眼下高宗的身子骨已经是弱不禁风了，可他还是被武后这个前无古人的倡议搞得有点心动。

然而，心动不等于行动。日渐恶化的病情实在不允许他长途颠簸，所以高宗不免又有些踌躇。

正当武后为此犯难、颇感无计可施的时候，上天忽然帮了她一个大忙。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关中遭遇严重的饥荒，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三百钱，吃饭问题又一次尴尬地摆在朝廷的面前。由于洛阳拥有漕运的便利，储存了大量从江淮运来的粮食，因此从隋朝开始，每当关中出现灾荒，朝廷就会前往洛阳就食，这已经成为惯例。既然如此，高宗无论病得再厉害，也不得不宣布东幸洛阳了。

武后笑了。

这就叫时来天地皆同力！

关键时刻，老天爷似乎总是站在她这一边。

东幸洛阳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可武后仍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这一路上要由谁来为天子护驾？

天子出巡历来都是由军队护驾的，这本来不成问题。但关键在于，武后现在不希望军队前往洛阳。因为她对军方的掌控力还比较弱，而且目前军队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又是她的老政敌裴行俭（永淳元年四月初，裴行俭尚未去世），所以，武后自然要对军方严加防范，绝不可能把军队调到洛阳。换言之，她可不希望在高宗驾崩的时候，被手握军权的裴行俭从背后捅她一刀。

但是，既要保证天子一路上的安全，又不想动用军队，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

武后不想为此费神，径直把问题抛给了新任的监察御史魏元忠，让他去想办法。

这个魏元忠就是未来武周和中宗两朝的著名宰相，也是日后李唐复国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眼下，他还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八品文官，手底下连半个兵都没有，你叫他如何保证天子一路上的安全？

天知道武后是怎么想的，竟然会把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扔给官卑权轻的魏元忠。莫非她认定他是个人才，所以故意拿这个棘手的问题考验他的能力？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可不管武后是出于什么目的，反正这下子是把魏元忠害惨了。

他一连数日茶饭不思，冥思苦想，差点把脑袋想破，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几天后，魏元忠利用手中仅有的权限，跑到长安县和万年县的大牢里，命看守逐个打开牢房，这里瞧一瞧，那里看一看，几乎把里面的囚犯都看了个遍，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想找的人——一个举止做派、表情言语都像江湖老大的人物。

魏元忠仔细观察了半天，最后下定决心——就是他了！

他赶紧命人打开这位老大的手铐脚镣，好酒好菜一顿招待，然后道明来意，说天子要巡幸东都，一路上怕盗贼捣乱，所以请他陪着走一趟。

这位老大一听就乐了。没想到自己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居然一不留神混成了天子的保镖，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啊！干完这趟差使，往后在江湖上行走，谁还敢不给他这个天子保镖面子？

于是这位老大胸脯一拍：啥也别说了，包在兄弟身上！

魏元忠大喜，赶紧给他换上官袍，然后就让他陪着銮驾一起开赴洛阳。一路上，沿途盗贼听说有某位江湖老大替天子保驾护航，也就没敢轻举妄动。于是这浩浩荡荡的一万多人的天子队伍，果真就在没有军队护驾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抵达了东都。

堂堂天子出巡，居然由黑社会老大护驾，这可真是旷世奇闻！如此奇闻就算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仅此一例。

魏元忠的表现让武后非常满意。他日后能够在武周一朝平步青云、官居宰辅，或许就和这次急中生智的特殊表现密切相关。

顺利地把高宗弄到洛阳之后，武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重组宰相班子。

在李贤被废之前，宰相团的成员是：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崔知温、裴炎、薛元超、王德真、张大安。其中，张大安因李贤被废而遭贬谪，不久，王德真、郝处俊也先后罢相。在剩下的五个宰相中，刘仁轨、李义琰是铁打的反武派，崔知温的立场不太明朗，但显然也不是武后的人，只有裴炎和薛元超是武后的亲信。很明显，武后在宰相班子中的支持率还是偏低的，所以这几年来，武后早就有意打造一个完全听命于她的宰相班子。

现在，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这三个宰相都奉高宗之命，留在长安辅佐监国的太子李哲，而李义琰目前的职务是太子右庶子，自然也要留在太子身边。所以，此次跟随高宗来到东都的，只有一个年迈体弱的崔知温，这当然就为武后重组宰相班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和机会！

四月二十二日，高宗和武后刚刚抵达洛阳；二十四日，武后就以闪电速度提拔了四个官员入相。他们是：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

按照唐制，只有拥有相当资历才能入相，可武后却一再打破这个制度——无论是先前提拔的裴炎和薛元超，还是此次提拔的这四个人，在拜相前都仅有四品官秩。而且，这四个人的资历甚至比当初的裴、薛二人要浅得多。为了不使他们的入相显得太过突兀而引起那些资深宰相的不满，武后就挖空心思地抛出了一个新的官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 ，以示和先前的宰相官衔同中书门下三品相区别。

从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新官衔就成了年纪轻、资历浅、品秩低的官员们拜相的常用头衔，到最后甚至取代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中晚唐宰相的唯一头衔。

武后如此折腾，此时的高宗究竟作何感想呢？

他并不反对。

不仅不反对，而且他还在帮武后补台——为了尽量不让老宰相们对这个出人意料的政治举措产生过于强烈的抵触情绪，高宗特意对崔知温解释说：“待举等资历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资治通鉴》卷二○三）

其实，高宗之所以默许武后的所作所为，甚至还帮她补台，原因并不

是他病糊涂了，而是因为高宗知道，一旦自己驾鹤西去，唯一可以稳定大局的人，唯一可以保证帝国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不至于出现动荡的人，就只有武后了！

所以，他只能信任武后。

如果说，李弘和李贤其中任何一个现在还是太子的话，高宗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武后的势力，同时加强太子那一头的权力比重。只可惜，眼下的帝国储君既不是李弘，也不是李贤，而是一直让他深感失望的李哲。

早在服食丹药期间，高宗就首度命太子李哲监国。离开长安之前，高宗还特意安排了三个宰相给他辅政，并且对其中的薛元超（其时兼任太子左庶子）作出了郑重的嘱咐："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

就像当年不遗余力地培养李弘和李贤一样，如今高宗也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李哲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

然而，令高宗大失所望的是，李哲和他的大哥、二哥根本没得比！

从小，李哲就沉湎于斗鸡走马，喜好射猎宴游，既无出众的品行，又无过人的才学，属于皇族中那种典型的纨绔子弟。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亲王而言，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人能料到，高宗和武后最终竟然会三易太子，把储君的桂冠戴到李哲头上。所以，从小到大不曾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的李哲，身上的纨绔习气难免就会浓厚一些。

但是不管以前怎样，至少在当上太子之后，李哲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就必须主动减少一些玩乐，多学习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高宗和武后东幸洛阳期间，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还是照样飞鹰走马、射猎宴游。深受高宗重托的薛元超一再劝谏，可李哲却依然故我。最后薛元超只好一状告到了东都，高宗赶紧遣使慰劳薛元超。

李哲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行，自然是让高宗极度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当然只能希望在自己宾天之后，武后能够继续把握大局，全力辅佐太子。

虽然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除此之外，高宗又能作何选择呢？

高宗驾崩：终结与开始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帝国的宰相班子里头又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

首先是在三月初，李义琰因改葬父母之事有违礼制，武后趁机对高宗大吹枕头风，使得高宗对李义琰大为不悦。李义琰自忖再恋栈禄位必定是凶多吉少，于是主动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随即获准致仕。紧接着在三月末，崔知温又因病亡故。至此，整个宰相班子中除了一个年逾八旬的刘仁轨，其他人都已经是清一色的后党。

一切都在按照武后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与此同时，高宗李治的病情也在无可挽回地恶化着。

这一年七月，原定将于十月举行的嵩山封禅，因为天子的健康原因不得不推迟到下一年正月。

八月，高宗紧急下诏，命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赶赴东都。表面上的理由说是为明年的封禅大典作准备，实际上是高宗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所以必须让太子守候在皇帝身边，以便随时接班。

趁着太子离开京师的机会，武后又以高宗名义下令，由李哲的儿子、年仅两岁的皇太孙李重照留守京师，同时命老臣刘仁轨为副留守，辅佐皇太孙。

让一个八十多岁的宰相辅佐一个两岁的婴儿，如此绝妙的组合恐怕也只有武后想得出来！一位是已经老态龙钟、行将就木，一位却还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假如在此期间京师真出了什么乱子，真不知道这两位留守长官该如何应付。

其实，武后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无非就是把刘仁轨钉死在长安，以便她能够在东都大展拳脚。

十月，高宗和武后从东都起程，前往嵩山脚下的奉天宫（今河南登封县境），看上去似乎是为了筹备两个月后的封禅大典，可实际上一到奉天宫，高宗就因病势沉重而下诏取消了嵩山封禅的计划。

十一月初，高宗的病情再度恶化，眩晕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甚至出现了失明的症状。御医秦鸣鹤立刻被召来诊治天子的病情。据有关学者考证，这个秦鸣鹤是来自大秦（东罗马帝国）的景教徒。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徒在初唐时期大量涌入长安。他们除了传播基督教义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外科医术。据说，为失明的患者实施开颅手术，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秦鸣鹤仔细观察了高宗的症状后，马上作出诊断："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所谓风毒上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脑部血管堵塞，压迫到视觉神经。所以，只要适当释放脑部淤血，便能恢复视力。

但是秦鸣鹤话音刚落，珠帘后立刻传出一声怒叱："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

毫无疑问，珠帘后的人就是武后。

秦鸣鹤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

还好这时候高宗发话了。他说："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大唐新语》）

武后闻言，只好悻悻地闭上了嘴。

秦鸣鹤战战兢兢地针刺高宗头部的百会、脑户二穴。片刻后，高宗果然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吾眼明矣！"秦鸣鹤顿时如释重负，赶紧擦了擦额头上不断冒出的冷汗。

武后在帘后，立刻做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秦鸣鹤顶礼致谢，说："这是苍天赐我神医啊！"

据说为了表示对这位神医的感谢，武后还"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资治通鉴》卷二○三），也就是亲自背了一百匹彩帛赏赐给秦鸣鹤。

武后这个举动实在是有够夸张。就算她确实对秦鸣鹤充满了感激之情，似乎也没必要亲自动手。要知道，背一百匹帛是需要相当体力的，尤其对武后这么一个年届六旬的老妇来说，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见武后此举，摆明了就是要拍高宗的马屁，而且还拍得相当肉麻。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唐人刘肃才会在他编撰的《大唐新语》中，把这个故事归入了《谀佞篇》。

根据常识，一个人越是对另一个人大献殷勤、猛拍马屁，越是表明这个人心里有企图。

而且，很可能还是不可告人的企图。

武后有不可告人的企图吗？

据刘肃记载，高宗的病情之所以极度恶化，就是因为武后“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武后希望高宗的病情加重，以便早日实现她的个人意志，所以暗中阻止良医诊治，不希望高宗病愈。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作了类似的表述：“（武后）不欲上（高宗）疾愈。”

尽管大秦医生秦鸣鹤的医术确实高超，可令人遗憾的是，短暂的复明对此刻的高宗来讲只能是一次回光返照。

十一月末，高宗下诏命太子监国，数日后返回东都。

十二月初四，高宗李治在病势垂危的情况下，宣布改元弘道，大赦天下。

本来高宗还想登上则天门楼亲自宣布赦令，可是严重的气喘已经让他无法骑马，只好召集百姓代表在殿前听宣。大赦典礼结束后，躺在病榻上的李治轻声问侍臣：“百姓们都高兴吗？”

侍臣答：“百姓蒙赦，无不感悦。”

李治苍白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个笑容，可最后凝结在他嘴角的竟然是一丝凄怆。他微微地叹了口气，说：“苍生虽喜，吾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旧唐书·高宗本纪》）

这是史书记载的高宗李治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心愿。

然而，他已经回不去了。

弥留之际的李治只能在美丽而忧伤的回忆中静静地遥望自己的故乡长安。当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烟云和人世沧桑从他的眼前倏忽飘过，李治无力地伸出了手，想抓住什么，然而他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

最后他无力地垂下了手。

同时垂下的，还有他噙满思乡之泪的疲惫的眼帘。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初四深夜，唐高宗李治崩于东都洛阳的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

高宗留下遗命，由宰相裴炎辅佐朝政，同时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史称《大帝遗诏》。

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唐大诏令集》卷一一）

一个时代就这样终结了。

在这个时代里，唐高宗秉承贞观时代之余烈，将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并且将大唐的疆域拓展得比太宗时代都更加广袤而辽远。然而也是在这个时代里，帝国的命运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外交和军事频频受挫，内忧和外患纷至沓来，李唐的江山社稷也面临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危险。

随着高宗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此时的大唐臣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终将令天地变色、令历史改辙的时代。

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女皇。

她的名字就叫武曌。

不流血的政变：废黜中宗

高宗留下的那道遗诏是耐人寻味的。

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惯用说辞之外，诏书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最后一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嗣皇帝对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的，应该听取天后的意见。

这一方面固然是授权，可同时也对武后形成了双重限制：第一，普通的行政权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只有特殊的军国大事，武后才有发

言权；第二，只有当李哲碰到难以定夺的军国大事时，武后才有最终裁决权。

面对这份授权与限制并存的遗诏，武后的心情自然是喜忧参半。

不过，宰相裴炎很快就出面替武后打破了这个限制。十二月初七，也就是高宗驾崩的三天之后，裴炎就奏称："由于太子尚未即位，没有资格发布诏敕，若遇紧急情况，应由天后发布政令，交与中书、门下两省施行。"

武后笑了。

如此一来她就大大突破了遗诏的限制，拥有单独处理政务的权力。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皇帝，可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后手中。

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需服丧一天，所以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后就必须归政于皇帝。

除非武后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就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控制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把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时间异常紧迫，可武后还是以一副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姿态，不慌不忙地出手了。

在短短二十天之间，武后一共完成了四项意义重大的政治举措：

第一，安抚李唐宗室。十二月十七日，武后下令，将李唐宗室中一批"地尊望重"的亲王加封为一品大员：高祖诸子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舒王李元名为司空，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另封太宗诸子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此举有效地安抚并拉拢了李唐皇族的大部分重要成员，让他们成了武后临朝的利益共享者，从而彻底麻痹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不但对随后的废黜中宗之举视若无睹，而且对即将降临他们头上的灭顶之灾也毫无察觉。

第二，调整宰相班子。首先，把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提升为从二品的左仆射，借此笼络其心；而在外示尊崇的同时，又任命他为西京留守，实际上就是把他闲置在长安，让他无法插手东都的政务。其次，

将不久前提拔上来的几个新宰相转正，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改成“同中书门下三品”。最后，同意裴炎的要求，把他从门下省的侍中调任中书省的中书令，同时对宰相制度进行了一次配套改革，将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了中书省。

这项改革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却是唐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众所周知，从贞观时代开始，唐朝的宰相制度就实行三省合议制，亦即中书省起草政令、门下省审核驳议、尚书省颁布施行。也就是说，唐朝所实行的是一种集体宰相制。然而就是从这次改革之后，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就被大大削弱了，掌握出旨权的中书省取得了一种独尊地位，原本属于“三省宰相联席会议”的政事堂，逐渐变成了中书令一人独大的“一言堂”，裴炎成了唯我独尊的首席宰相，不但每次会议都由他主持，而且各台省官员要进入政事堂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从此，唐朝三省合议的集体宰相制就名存实亡了。

裴炎通过这次改革独揽了相权，这无疑是他前不久出面替武后打破权力限制的回报。说白了，这就是裴炎和武后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而这笔政治买卖对武后来说显然是非常合算的，因为三省合议的宰相制度不仅是对相权的分化和制衡，同时也是对君权的监督和制约，如今武后借裴炎之手削弱了门下省的驳议之权，这自然为她日后畅通无阻地行使最高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控制禁军。高宗去世前，在武后苦心经营的权力之网中，军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武后当然知道，倘若没有军队的拥戴，任何执政者的地位都将是不稳固的。所以这一次，武后特意提拔了两名将领，让他们分别掌管左右羽林军。这两个人就是程务挺和张虔勖。当初裴炎为了排挤裴行俭，就把平定东突厥的功劳归给了他们。而这一次，武后又让他们掌管了禁军，程、张二将无不对此感恩戴德，从此成为武后的铁杆拥趸。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武后接下来废黜中宗的行动中，程务挺和张虔勖的禁军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镇抚地方。弘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武后派遣了四名心腹将领：王果、令狐智通、杨玄俭和郭齐宗，分别前往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扬州（今江苏扬州市），与当地的府司共同镇守。这四大都督府是唐朝地方上的军事和经济重镇，其中，并州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又是防御东突厥的桥头堡，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益州素称天府之国，历来享有“沃野千里”“民殷国富”的盛誉，是唐朝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荆州是中南地区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四通八达，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扬州富甲天下，是唐代最大的经济都会，也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与益州正相颉颃，被时人称为“扬一益二”。

在权力过渡的敏感时期，武后以心腹将领出镇这些重地，足见她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此举具有双重作用：从积极意义上讲，是为了防止地方叛乱；从消极意义上讲，即便武后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她也还有许多后路可退。所以，武后的这最后一招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之策。

公元684年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

这一年，朝廷先后更换了三个年号：嗣圣、文明、光宅。这背后，是一段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历史。朝野各种势力在这一年里竞相登场，展开了一幕幕有声或无声的博弈和厮杀。而武后则独自一人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翻掌为云，覆手为雨，把各式各样的对手一个个打入万劫不复之地，或者径直推入死亡的深渊。

第一个被她从天堂打入地狱的对手，就是她的第三子：中宗李哲。

新年的正月初一，新君李哲就迫不及待地改元嗣圣、大赦天下，同时册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

然而，此刻的李哲却不无郁闷地发现——尽管他已经贵为皇帝，可武后丝毫没有还政于君的意思。

而更让他感到悲哀的是——满朝文武，宫廷内外，几乎都是他母亲的党羽。放眼所及，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信赖的人。

李哲愤怒了。

既然让我当这个天子，你就要给我天子的权力！

李哲开始愤而行使自己的天子权力了。就在册立韦后的同一天，李哲就把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从小小的普州参军（正九品下）一下子提拔为豫州刺史（从三品）。正月初十，李哲又把韦后的一个远亲、时任左散骑常侍的韦弘敏任命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一步跨入了宰相的行列。

很显然，血气方刚的中宗李哲既不想当傀儡天子，也不想当光杆司令，所以他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如今既然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赖，那他当然只能倚重外戚了。

又过了几天，李哲再次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宣布要将岳父韦玄贞从尚未坐热的刺史交椅上再度擢升为侍中，并且还想把乳

母的儿子提拔为五品官。

面对新天子任性而鲁莽的惊人之举，顾命大臣兼首席宰相裴炎顿时有一种啼笑皆非之感。尽管他很了解新君李哲此时此刻的心情，可他对李哲的行为却不可能抱有丝毫同情。

没错，韦玄贞贵为国丈，天子想任用他、提拔他，实属人之常情，原也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国家有国家的法度，朝廷有朝廷的规矩。要想升官可以，但也要讲条件、论资历，岂能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把一个小小的九品参军一下子擢升为堂堂的三品宰相？你李哲虽然是天子，可你也要按规矩办事，像这种有违法度的事情，对不起，我裴炎万难从命！再者说，门下省握有封驳之权，假如让韦玄贞当上了侍中，那岂不是恰好对我这个中书令形成制约？我裴炎好不容易独揽了宰相之权，又岂能让他韦玄贞来分我的蛋糕？

因此，裴炎十分坚决地把天子的旨意顶了回去。不管李哲说什么，裴炎就是两个字——不行。

最后李哲终于勃然大怒，忍不住指着裴炎的鼻子咆哮："我就算把整个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况一个小小的侍中？"

李哲的首次帝王生涯，就在这句没头没脑的气话中悄然地画上了句号。

裴炎看着暴跳如雷的天子，什么话也没说，一转身就去晋见太后，并把天子的话原封不动地向太后作了汇报。

武后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

她比谁都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她知道，以他的能耐，不可能在天子的位子上坐太久，迟早有一天，他自己就会露出马脚，然后乖乖滚下台。只是让武后有点始料未及的是——李哲竟然这么沉不住气，才当了几天皇帝就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真是不长进的东西！

当天，一个废立皇帝的计划就在武后与裴炎的密谈中定了下来。

嗣圣元年二月初六，武后把文武百官全部召集到洛阳宫的正殿——乾元殿，准备举行一场特殊的朝会。按惯例，从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开始，朝会都是间隔一天举行的，也就是逢单上朝，逢双不上朝。而这一天是双日，武后却突然召集百官上朝，她到底想干什么

呢？中宗李哲对此大惑不解，同时也隐隐嗅出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当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时，所有人都感到今日朝会的气氛有些异样。天子端坐在御榻之上，神情略显张皇；太后依然隐于透明的帷帘之后，人们看不清她的脸，却分明可以感受到一股威严和肃杀之气正在整座殿庭中弥漫。

百官按班位依次站定后，赫然发现班首的位置少了两个人。

中书令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炜之。

就在百官们满腹狐疑之际，殿门口忽然响起一阵急促而杂沓的脚步声，人们看见裴炎和刘炜之带着一脸凝重之色双双步入殿中，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禁军将领程务挺和张虔勖，后面还有一大群铠甲铿锵、杀气腾腾的羽林军士兵。

百官们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发出一声惊呼——

要变天了！

中宗李哲的脸色也在这一瞬间变得煞白。裴炎径直走到丹墀前，用一种略带轻蔑的眼神瞥了天子一眼，然后转过身去，面向百官高声宣读了太后敕令：自即日起，废皇帝李哲为庐陵王。话音刚落，两名全副武装的羽林军士兵迅速冲上丹墀，不容分说地把天子架了下来。李哲一边挣扎一边扭头大喊：“我有何罪？”

帷帘后传出了武后不容置疑的声音：“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资治通鉴》卷二○三）

蓦然听见这句话，刚才还在拼命挣扎的李哲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任由士兵把他架出了大殿。

目睹这突如其来而又惊心动魄的一幕，百官们面面相觑，整座乾元殿鸦雀无声。

一个由高宗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一位登基还不到两个月、实际当政不过三十六天的皇帝，就这样说废就废了。武后似乎连一根小指头都没动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就这样在转瞬之间宣告完成！

次日，武后的第四子豫王李旦就以一个普通亲王的身份被武后直接册立为皇帝，是为唐睿宗；同日改元文明、大赦天下，并册立睿王妃刘氏为皇后，六岁的嫡长子李成器为皇太子。然而，李旦虽然挂了一个

皇帝的头衔，可只不过是个政治花瓶，一切政务皆由太后处置。李旦被安置在别殿里，不得参预政事，实际上形同软禁。

二月初八，武后将高宗所立的皇太孙李重照废为庶人，将李哲的岳父韦玄贞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市）。

二月初九，武后派遣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前往废太子贤的流放地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表面上是让他监视李贤，其实是暗示他逼李贤自尽。

二月十二日，武后亲临武成殿，由皇帝李旦率王公大臣向武后重上太后尊号，正式确立了武后临朝称制的合法性。从此，洛阳宫的紫宸殿上赫然升起了一道淡紫色的纱帐，在薄如蝉翼的纱帐背后，端坐着一个睥睨天下、拨弄乾坤的女人——太后武媚。

这是武后独断朝纲的开始。

这一年，武后六十岁。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妇人，此时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含饴弄孙中优游卒岁，在天伦之乐中安度晚年。可对未来的女皇武曌而言，她传奇人生中真正的华彩乐章才刚刚奏响，由她领衔主演的一出空前绝后、精彩纷呈的历史大戏也才刚刚开场！

好戏还在后头。

帝国唯一的主宰

李旦被立为皇帝的那天夜里，洛阳城中爆出了一条令人不寒而栗的新闻。

那是十几个禁军飞骑因为一句牢骚话而全部脑袋搬家的故事。

这十几个禁军士官在前一天参与了废黜中宗的行动，可能是领到了一些赏钱，于是结伴到一家妓院中饮酒作乐。酒过三巡，其中一个就借着酒劲发牢骚：“早知道才赏这几个酒钱，没有加官晋爵的赏赐，还不如拥护庐陵王呢！”

其他人深有同感，连声附和。大伙发完牢骚，继续喝酒，话题自然也就转到别处去了。可谁也没有料到，正当他们酒酣耳热、浑然忘我的

时候，其中一人已经悄然离席，拍马飞奔玄武门，向他们的长官告密去了。

片刻之后，一群凶神恶煞的羽林军就冲进这座灯红酒绿的妓院，把这十几个沉醉在温柔乡中的飞骑兵悉数逮捕，一起扔进了禁军监狱。当天夜里，带头发牢骚的那个就被砍掉了脑袋，其他人以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处以绞刑，唯独告密的那个被授予了五品官。

这条爆炸性新闻很快就在洛阳坊间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人们对这十几个惨遭杀身之祸的飞骑兵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谈论最多的还是那个因出卖同僚而加官晋爵的告密者——一次轻轻巧巧的告密就能换来一袭五品官服，一次聪明的选择就可以让人少奋斗几十年，这种出人头地的方式实在是让很多人艳羡不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这次告密事件，人们蓦然发现了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从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出卖朋友为荣，以知情不报为耻；以拥护朝廷为荣，以议论时政为耻。

“告密之端自此兴矣。”（《资治通鉴》卷二○三）

到了武周王朝，由于女皇武曌的大力倡导和丰厚赏赐，告密之风更是像空气一样弥漫在大周帝国的每个角落，甚至渗入了武周臣民的呼吸和血液之中。

人生就像是一场可笑而荒诞的梦。

这是睿宗李旦在这个变幻莫测又杀机四伏的春天里最为强烈的生命体验。

一夜之间，他就被母亲的权力铁腕从亲王直接推上了皇帝宝座，成了这个帝国名义上最有权势的人；旋即又被打入冷宫，成了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囚徒。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李旦实在看不透这大起大落的命运背后隐藏的玄机。

他只知道——自己并不喜欢当皇帝。从小到大，李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静静地待在书斋里，读书、写字、研究、思考，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旧唐书·睿宗本纪》：“及长，廉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他对政治根本没有兴趣，对权力更无野心。

这辈子，他只想做一个自在逍遥、无忧无虑的亲王，而不愿意像大哥李弘和二哥李贤那样，被关进那个由欲望、阴谋、权术、暴力所编织的政治樊笼中，压抑心灵、斫丧天性，到头来又落得个身死流放的可悲下场。因此，李旦一直很庆幸自己是排行最小的儿子。他一直以为，不管是当太子还是当皇帝，这种烦人的事情肯定不会轮到他，这种大起大落的凄凉命运也绝对不会降临到他身上。

可是，李旦错了。无情的现实还是一举击溃了他纯真的梦想。就在他二十三岁的这个春天，母亲武后还是把这顶沉重的帝王冠冕不由分说地扣到了他的头上！

这是普天之下人人垂涎的冠冕，唯独李旦从来对它缺乏好感。然而人生就是如此荒诞——喜欢这顶帽子的人硬是得不到（如大哥李弘和二哥李贤）、戴不长（如三哥李哲），不喜欢它的人偏偏又逃不掉、躲不开。

面对如此人生，李旦唯有苦笑而已。

面对这囚徒般的帝王生涯，李旦也唯有苦笑而已。

因为这是来自母亲的囚禁，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也最残酷的囚禁，让你无从辩驳、无力反抗，更让你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从戴上帝王冠冕的那一刻起，李旦知道自己已经变成天底下最高贵的一只金丝鸟，从此没了灵魂、没了意志，只能披着一身虚有其表的光鲜羽毛，在母亲的恩赐和施舍下作感恩和幸福状，在金碧辉煌的牢笼中发出温良恭顺的啼啭。

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

这一年二月末，巴州的瘦山枯水迎来了武后的特使丘神勣将军。李贤第一眼看见丘神勣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到了。

因为丘神勣的嘴角虽然挂着微笑，但眼里却布满杀机。

丘神勣告诉李贤的第一句话是——你母亲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

话音未落，李贤就突然发出了几声刺耳的笑声。

母亲？

对李贤而言，这是一个多么温暖又多么冷酷、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的

称谓啊！迄今为止，李贤依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是韩国夫人给的还是武后给的，但是有一点他很清楚——自己这条命早就在武后手里头攥着了，早一天拿去晚一天拿去，对他来讲实在没有半点分别。

所以，当丘神勣字斟句酌、拐弯抹角地表明来意时，李贤忍不住再次仰天狂笑。

这笑声是如此凄厉，以致在场的人都觉得毛骨悚然。

李贤用一种近乎蔑视的眼神最后看了丘神勣一眼，返身走进内室，把一条白绢抛上了房梁，毫不犹豫地结束了自己三十一岁的生命。多年以后，当丘神勣偶尔回想起李贤临死之前的笑声，脊背还是会不由自主地阵阵发凉。

三月，丘神勣圆满完成任务，如期返回东都。武后很满意，但表面上还是以误解太后懿旨、错杀李贤的罪名，把丘神勣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县）刺史。但是这样的贬谪形同公费旅游，丘神勣去叠州待了一阵子，很快就被武后召回洛阳，仍旧当他的左金吾将军。

对于李贤的身后事，武后自然也是做得相当体面。她不但追封李贤为雍王，并且亲率文武百官，在洛阳宫的显福门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举哀”仪式。武后此举，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爱子之情，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将李贤已死的事实昭告天下，让所有拥护李贤的人死了翻盘的这条心。

四月末，庐陵王李哲被流放房州（今湖北房县）；几天后，李哲再次被押往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软禁在当年魏王李泰住过的那所旧宅里。

在高宗去世后的短短几个月里，武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废黜李哲、挟持李旦、逼杀李贤，轻而易举地排除了所有障碍，把帝国的最高权柄紧紧攥在了掌心。做完这一切，武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开始回头料理高宗的后事，命睿宗李旦护送高宗灵柩返回长安，于八月安葬于乾陵。

随着高宗的入土，武后顿时有了一种如获新生之感。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她将不再扮演别人的妻子和配角，而将彻底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从这一刻开始，她将不再是天皇李治的天后，而是这个庞大帝国至高无上的唯一主宰！

从四十六年前入宫到今天，武后历经各种曲折艰险与荣辱悲欢，在你

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击败了各路对手，阅尽沧桑，几度浮沉，如今终于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蓦然回首，四十余载的岁月恍如一梦。

从今往后，她将独自伫立于仅容一人驻足的权力之巅，笑傲天下，指点江山，再也无人可以阻止她去实现改天换日、翻转乾坤的宏大梦想……

[1]　贞观八年，时任右仆射的李靖曾因病请求致仕，被太宗下诏挽留，并特许他“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这应该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由来，但是此衔被正式确立为宰相头衔，还是从武后开始的。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大唐兴亡三百年 4

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
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

王觉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今日域中，谁家天下

李敬业兵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兴亡三百年. 4 / 王觉仁著.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115-5490-1

Ⅰ. ①大… Ⅱ. ①王… Ⅲ.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Ⅳ. ①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8987 号

书　　名	大唐兴亡三百年. 4
作　　者	王觉仁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邀编辑	汪超毅　沈　骏
封面设计	谢明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字　　数	306 千
印　　张	22.5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490-1
定　　价	5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大清洗：裴炎之死
武后的男宠：面首的诞生
告密旋风与酷吏时代
大周帝国的标志：万象神宫
燕啄皇孙：李唐宗室的劫难
第二章 武周王朝
女皇登基
立储之争
万象神宫的崩塌
北方的狼烟：契丹叛乱（上）
北方的狼烟：契丹叛乱（下）
请君入瓮：酷吏的终局
第三章 李唐归来
一代名相狄仁杰
莲花似六郎：男宠的崛起
重归长安
男宠乱政
大臣与男宠的博弈
神龙政变
第四章 神龙政局
孤家寡人李显
武三思东山再起

功臣集团的垮台
五大臣之死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
第五章 一团糜烂的政治
皇后一党崛起
韦后的政治模仿秀
安乐公主：新女性的代表
“和事天子”李显的幸福生活
丧钟为谁敲响？
中宗暴崩
第六章 睿宗李旦复辟
李隆基登场
绝地反击
血腥一夜：后党的覆灭（上）
血腥一夜：后党的覆灭（下）
是皇冠，还是枷锁？
两强相争中的夹缝天子
第七章 梦魇的终结
李重福兵变
一场政治恶斗
太平公主的强力干政
玄宗登基：这个皇帝不好当

始料未及的政治灾难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巅峰对决

第八章 走向开元盛世

飞鸟尽，良弓藏

姚崇：为盛世奠基（上）

姚崇：为盛世奠基（下）

宋璟：贤臣的典范（上）

宋璟：贤臣的典范（下）

张说：一个全能型宰相

封禅泰山：走向历史之巅

第一章 今日域中，谁家天下

李敬业兵变

公元684年农历九月初六，武后宣布改元光宅，大赦天下，将东都洛阳改称神都，将洛阳宫改称太初宫，并且将所有旗帜旌幡全部改成了鲜艳夺目的金黄色。同时，中央各级政府机构和官职名称也全部都更换一新：

尚书省——文昌台；中书省——凤阁；门下省——鸾台；左仆射——文昌左相；右仆射——文昌右相；中书令——内史；侍中——纳言；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

此外，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并增设右肃政台，以左肃政台监察中央，以右肃政台监察地方，从而加强了对全国各州的掌控。与此同时，其他中央机构如“省、寺、监、率”等，也全部易名。

这是自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以来，武后对中央机构和官职名称所做的第二次改弦更张。大唐臣民再度陷入了一片眼花缭乱之中。许多人百思不解，不知道武后为何如此热衷于玩弄文字游戏。而且没有人料到，在未来的日子里，武后还将在世人诧异的目光中乐此不疲地改文字，改名字，改年号……

然而，这绝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如果说龙朔二年的更换官称是武后正式踏上权力之路的一声开道锣鼓，那么这一次改弦易辙无疑是武后意欲改朝换代的先声嚆矢。再打个比方，假如女皇武曌的一生是一部传奇大书，那么所有那些深深带着她个人烙印的文字、官称、年号，就相当于这部书的封面和目录。

它们华丽，典雅，意味深长，引人入胜，既摇曳多姿又凝然厚重，既端庄肃穆又风情万种……

不先读懂它们，我们就读不懂女皇武曌。

紧接着这次规模宏大的改弦易辙之后，武后不等朝野上下回过神来，再度做出了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举动——授意她的侄子，时任礼部尚书的武承嗣上表，奏请追封祖先爵位，并建立“武氏七庙”。

按照礼制规定，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建立“七庙”（祭祀七代祖先的宗庙），如今武后竟然做出如此明目张胆的僭越之举，到底是何居心？

面对武后越来越出格的举动，首席宰相裴炎终于忍无可忍了。

在随后举行的一次朝会上，裴炎鼓足勇气站了出来，对武后说：“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资治通鉴》卷二○三）

这是裴炎自当上宰相以来，第一次和武后公开唱反调，而且言辞激切，直接把历史上最典型的反面教材——西汉初年的“吕氏之祸”给搬了出来，实在是大出武后意料之外。

武后目光炯炯地盯着裴炎，冷然一笑：“吕后是把权力交给那些在世的外戚，所以招致败亡。如今我只是追尊已故的祖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裴炎不敢直视武后的目光，但嘴上还是寸步不让：“凡事皆当防微杜渐，不可助长！”

武后闻言，顿时怫然作色。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人人缄默不语。

当天的朝会就此不欢而散。

当裴炎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出朝会大殿的时候，望着空中变幻不定的浮云，心头忽然掠过阵阵悲凉。实际上他很清楚，只要是紫宸殿上这个老妇人想做的事情，普天之下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拦。但是，作为高宗临终前亲自指定的唯一一位顾命大臣，作为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宰相，裴炎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因此不能不谏。

也许在别人眼中，他今天的行为完全是螳臂挡车的愚蠢之举，可无奈的裴炎也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说裴炎是武后一手提拔的，而且在此前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废黜太子李贤，改革三省制度，废黜中宗李哲，拥立睿宗李旦——裴炎也一直是武后的得力助手，双方配合得相当默契，但是对裴炎来说，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违背儒家的纲常礼教和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这是裴炎的底线。只有在这样一个合乎道统和法统的范围内，他才愿意和武后通力合作，实现政治上的互利双赢。然而，如今武后却在背离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已经暴露出篡夺君权、颠覆李唐的野心，这就把裴炎的底线彻底突破了，他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所以，除了硬着头皮出面谏阻，裴炎实在没有别的选择。纵然要为今天的这一谏付出代价，他也绝不愿意助纣为虐，成为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老妇人篡唐的帮凶。

至于说自己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裴炎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鉴于裴炎的强烈反对，武后也不得不有所收敛，随后放弃了建立“七庙”的打算，只追封了五代祖先，并且在家乡文水建立了“五代祠堂”。

虽然武后在这件事情上作出了让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放缓改朝换代的步伐，更不意味着她会原谅这个公然背叛她的裴炎。

当武后正在紧张思考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的时候，扬州突然爆发了一场来势凶猛的叛乱，一下子打乱了她的步骤。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李敬业兵变。

李敬业是一代名将李勣之孙，承袭了祖父英国公的爵位，时任眉州刺史，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被贬为柳州司马。李敬业为此愤懑不平，于是纠集了一批同样遭到贬谪的郁郁不得志的低级官吏，在扬州揭起了造反大旗。

李敬业打出的旗号是——讨伐武氏，拥立李哲，匡扶唐室。他自称匡

复府上将兼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短短的十天之间便集结了十几万军队。为了加强号召力，李敬业还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相貌酷似李贤的人，以他的名义号令天下。

大军未发，骆宾王的一纸《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便已经传遍四方州县。

骆宾王是享誉后世的文章圣手，与卢照邻、王勃、杨炯并称“初唐四杰”。他的这道檄文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文采绚烂，词锋犀利，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并誉为“唐赋双璧”，堪称千古绝唱。此文后来被收进《古文观止》，改名《讨武曌檄》。下面，就让我们奇文共欣赏，一起来拜读一下这篇绝世美文：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居汉地，或叶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武后拿到这篇檄文，很认真地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尽管落魄文人骆宾王在檄文中把她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可武后

还是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才华。尤其是当她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不禁悚然动容，急问左右：“这是谁写的？”左右答以骆宾王，武后长叹：“这是宰相之过啊！如此人才，竟然让他流落民间！”

李敬业既然打出了讨伐武氏、匡扶李唐的旗号，身为外戚的武承嗣和武三思自然就坐立不安了。为了防止李唐宗室与李敬业里应外合，共讨诸武，武承嗣和武三思屡屡上表，怂恿武后找个借口处置目前资格最老的两个宗室亲王——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和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武后拿着二武的奏章试探宰相们的口风，想看看他们的屁股究竟坐在哪一边。中书侍郎刘祎之和黄门侍郎韦思谦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唯独裴炎据理力争，坚决反对。

武后静静地看着裴炎那张因激愤而涨红的面孔，心里不停冷笑，眼中隐隐掠过一道杀机。

其实武后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诛杀裴炎了。暂且不说他先前公然反对建立“武氏七庙”的事，就说眼下，武后便有三条理由足以治裴炎一个谋反的罪名。

一、叛军首领之一、李敬业麾下的右司马薛仲璋是裴炎的亲外甥。对于这层关系，朝野上下一直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薛仲璋正是裴炎派过去的。换言之，人们有理由怀疑裴炎就是这场叛乱的幕后主使。

二、自从扬州叛乱爆发以来，裴炎身为朝廷的首席宰相，却只字不提讨伐大计，成天优哉游哉，像个无事人一样，人们当然也有理由打上一个问号：你裴炎究竟是何居心？

三、洛阳坊间近日风传一首神秘的歌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显而易见，歌中所唱正是裴炎，而且暗指他将登上帝王宝座。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你裴炎若无谋反迹象，何以会有如此耸人听闻的谣谶在坊间风传？

凭此三条，就足以让裴炎死无葬身之地！

此时此刻，武后心中杀机已炽，可脸上却丝毫不动声色。她不再言及李唐宗室之事，而是话题一转，询问裴炎有何良策讨伐叛乱。

裴炎似乎对武后眼中的杀机浑然不觉，又似乎已经抱定必死之心。只见他猛然趋前几步，一下子跪伏在地，用一种凄怆而决绝的语调高声奏答：“皇帝（李旦）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

政，则（叛乱）不讨自平矣！”（《资治通鉴》卷二○三）

此言一出，满朝文武在一瞬间全都变了脸色——惶恐不安者有之，惊怖错愕者有之，瞠目结舌者有之，幸灾乐祸者亦有之。

原本气定神闲的武后也终于按捺不住了。人们看见她腾地从御榻上跳起，整张脸因暴怒而变得异常狰狞，看上去就像一头毛发倒竖的母兽，仿佛随时会把匍匐在地的裴炎一口吞噬。

这一刻，整座紫宸殿的空气似乎也已凝固，人人呼吸沉重，气氛僵硬如铁。

就在此时，寂静的大殿上突然响起监察御史崔詧的声音。他挺身出列，大声说：“裴炎是托孤重臣，手握朝廷大权，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

崔詧这句话就像一把尖锐的匕首，一下子刺中了裴炎的软肋。

众所周知，睿宗李旦是一个性情内向、不喜政治的人，一旦太后还政，睿宗亲政，那么作为顾命大臣兼首席宰相的裴炎，无疑将成为满朝文武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裴炎之所以利用此次叛乱要挟武后还政，就是想在日后架空天子，独掌大权，成为像长孙无忌那种一手遮天的权臣。

这，就是崔詧所指的“异图”。

那么，裴炎到底有没有这份异图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

裴炎毕竟是一个从政者，不是卫道士。尽管他身上不乏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但是任何一个从政者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不可能仅仅是气节，而多数是出于政治利益，在这一点上，裴炎甚至比普通政客表现得更为明显。从他的发迹史来看，如果没有和武后进行一连串的政治交易，他绝对不可能获得今天的权力和地位。所以，毋庸讳言，从裴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他的大多数所作所为就都是与个人的政治利益挂钩的。也因为此，崔詧所提出的质疑就不能说没有道理。

不过，无论裴炎心里是否包藏上述异图，在这个时候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他斗胆说出要武后还政的那句话后，其借助叛乱进行逼宫的意图便已暴露无遗，铁腕无情如武后，又岂能对此无动于衷？

所以说，其实是裴炎自己把脖子伸进了死亡的绳套。崔詧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最后时刻帮武后勒紧了绳子而已……

在这天的朝会上，崔詧话音刚落，武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出了逮捕裴炎的命令。

几名如狼似虎的御前侍卫立刻朝裴炎扑了过去。

一代权相就此锒铛入狱。

李敬业兵变是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叛乱，而叛军巢穴扬州又是有唐一代的财税重镇，因而这场叛乱对武后造成的危机是不言而喻的。天下人似乎都在拭目以待，很想知道这个在政治上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女人，是否也能在战场上保持同样的强势。

对此武后当然不会掉以轻心，她坚信自己必将再次用事实向世人证明——她是不可战胜的！

当东都朝廷正因裴炎一案闹得不可开交时，武后一边与宰相们进行着激烈的政治博弈，一边也迅速完成了平叛的军事部署。这一年十月初六，她任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淮安王李神通之子）为扬州道大总管，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总管，率领三十万大军开赴战场。

武后之所以选择李孝逸为主帅，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很会打仗，而是因为他的身份——宗室亲王。你李敬业不是叫嚣着要匡扶李唐吗？那我就派一个李唐亲王来灭你，让天下人知道李唐宗室始终是和我站在一边的，把你那冠冕堂皇的政治遮羞布一举戳穿，再撕个粉碎，让你在兵败身死之前，先在天下人面前裸奔一回！

武后此举可谓高明。平叛军队尚未开拔，她就已经在道义上扳回了至关重要的一分，让李敬业的起兵丧失了最起码的合法性，同时也丧失了人心。

此外，武后还给这支出征部队配备了一位监军——魏元忠。他就是当初急中生智拉黑帮老大来为高宗护驾的那个家伙。武后之所以这么安排，有两个重要目的：一、让足智多谋的魏元忠弥补李孝逸在战略战术上的不足，确保平叛战争的胜利；二、监视李孝逸，防止他临阵倒戈，毕竟他是李唐亲王，是否能真正忠于武后还很难说，所以这层风险必须严加防范。

就在李孝逸开拔的一个月后，武后再度任命了一个江南道大总管，亦即第二梯队的主帅。这是在做两手准备，万一李孝逸战败，第二梯队

可以迅速出击。而这个第二梯队的主帅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威震一方的抗蕃名将，时任左鹰扬大将军的黑齿常之。

如果说任用李孝逸是武后打的一张政治牌，那么任命黑齿常之则是一张百分之百的军事牌。李敬业虽说是将门之后，可他本人的军事能力和作战经验跟黑齿常之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因此就算李孝逸战败，武后也还有黑齿常之这张王牌，足以摆平李敬业。

综观武后在这场平叛战争中所作的战略部署和人事任命，其心机和谋略确实是常人莫及的，无怪乎后来朝廷军队会迅速平定李敬业叛乱，可谓“其胜也宜哉”！

相对于武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和谋略，李敬业的表现就差得太远了。

李敬业一起兵，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挥师北上直指洛阳，夺取东都号令天下；二是南渡长江攻占金陵，经营江东以求自固。

军师魏思温力主北上，他认为，既然义师打的是勤王旗号，自然要进军东都，才可获得四方响应。而裴炎的外甥薛仲璋则力主南下，因为金陵乃历朝古都，有帝王气，且有长江天险可以依恃，所以他认为，应先取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奠定霸业之基，而后再北图中原。这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良策。

面对金陵王气、定霸之基的诱惑，李敬业怦然心动，旋即采纳薛仲璋之策，决定渡江南下。

这是李敬业一生中最重大的，也是最失败的一次抉择。

魏思温极力反对，说这是大事未举就先躲到巢穴里，会让天下志士灰心丧气。可李敬业充耳不闻，命左长史唐之奇留守扬州，然后亲率大军南渡长江，攻打润州。魏思温无奈地对右长史杜求仁说：“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并力渡淮，收山东（崤山以东）之众以取洛阳，败在眼中矣！”（《资治通鉴》卷二○三）

后来的事实证明，魏思温的担忧是对的。李敬业起兵，最大的本钱既不是他将门之后的招牌，也不是那个假冒的章怀太子李贤，更不是他仓促集结的十万乌合之众，而是“志在勤王，匡扶李唐”的政治口号。因为天下人对武后擅权专制的不满由来已久，如果充分利用这一点，必可收揽人心，号令天下。只可惜李敬业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鼠目寸光的武夫，他拒绝北上、掉头南下的行为，一下子就暴露了割地称

王的野心和意图，也彻底暴露了他假勤王、真叛逆的嘴脸，所以天下人必然会对他极度失望，因而也就注定了他的败亡。

光宅元年十月中旬，李敬业攻陷润州，生擒他的叔父——润州刺史李思文。李敬业对他说：“叔父是武氏的狐朋狗党，应该改姓‘武’！”

就在李敬业给他叔父改姓的五天之后，他自己的姓也被朝廷改了。武后剥夺了他的世袭爵位和皇姓，恢复徐姓，同时刨开了他祖父李勣的坟墓，并且剖棺暴尸。可怜李勣一世英名，死后却被他的孙子玷污和连累，连灵魂都要在九泉之下背负耻辱，不得安宁！

十月下旬，李孝逸大军逼近润州，徐敬业兵分三路迎战，自己亲率一路进驻高邮，派胞弟徐敬猷进至淮阴，再派将领韦超、尉迟昭进驻都梁山（今江苏盱眙县南）。

李孝逸进抵淮河北岸后，前锋雷仁智与徐敬业遭遇，首战失利，李孝逸胆怯，于是逗留不进。关键时刻，武后特意安排的监军魏元忠开始发挥作用了。他马上去找李孝逸谈心，话头话尾一直在暗示李孝逸：徐敬业打的是匡扶唐室的旗号，而您又是宗室亲王，若您一直畏缩不前，难免让人怀疑与徐敬业暗中勾结，万一太后怪罪下来，到时您一定罪责难逃！

李孝逸吓得冷汗直冒，只好下令军队出击。

朝廷军的战斗力本来就在叛军之上，一旦主帅下定进攻的决心，自然是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十月下旬，副总管马敬臣在都梁山击败并斩杀了尉迟昭；十一月初，李孝逸大军又先后击败叛军将领韦超和徐敬猷。至此，徐敬业的左膀右臂被全部砍断。朝廷军乘胜而进，于十一月中旬在下阿溪与徐敬业主力展开了决战。

下阿溪一战，朝廷军一开始频频受挫。先是前锋苏孝祥率五千人趁夜抢渡溪流，遭遇叛军顽强阻击，苏孝祥战死，官兵多半落水溺毙；继而李孝逸主力又多次发动进攻，均被叛军一一击退。生性怯懦的李孝逸再次萌生退意，被魏元忠阻止。魏元忠仔细观察了战场上的风向之后，力劝李孝逸采用火攻之策。

李孝逸本人虽然怯懦无能，但却善于听取正确意见。冬天里漫山遍野的枯草成全了官军的火攻战术，只见数千艘燃烧着熊熊烈焰的草船顺着呼啸的北风迅速扑向驻守南岸的叛军。火船撞上南岸之后，漫天大火开始在叛军营帐疯狂蔓延，顷刻间吞噬了徐敬业麾下的七千部众，也一举烧毁了徐敬业的所有梦想。

徐敬业在惨遭重创之后落荒而逃，跟随他逃亡的只有徐敬猷、骆宾王以及少数残部。大多数部众就算没被烧死，也都成了官军的刀下之鬼，或者沉入下阿溪喂鱼去了。徐敬业仓皇败退扬州之后，一刻也不敢耽搁，又匆忙带上家眷逃奔润州。

光宅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徐敬业一行逃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准备从这里渡海流亡高丽。无奈老天爷总是和他作对，这一天又刮起猛烈的东北风，使他的船只根本无法张帆出海。徐敬业望着浊浪翻涌的海面，一种冰冷的绝望瞬间弥漫他的全身。那天夜里，一个叫王那相的部将趁徐敬业熟睡之际，偷偷潜入他的帐中，轻而易举地割下了他的首级，随后又砍杀了徐敬猷和骆宾王，带着三人的首级投降了官军。数日后，叛军余党唐之奇、魏思温等人也相继被捕，被官兵砍下首级，传送神都。

至此，徐敬业叛乱宣告平定。

拥兵十万的徐敬业从起兵到被杀，历时仅两个多月。其败亡之速，其下场之不堪，让许多大唐臣民在日后追忆的时候仍然唏嘘不已。

徐敬业等人沾满血污的首级传送洛阳后，被高高悬挂在端门前的旗杆上示众。那天，盛装华服的武后站在则天门楼上远远地望着，感觉那几颗肮脏的首级就像是烂在枝头上无人采摘的野果，只等乌鸦和秃鹫前来啄食。武后那天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然而细心的朝臣却分明看见她的嘴角荡漾着一抹矜持的笑容。

那天有状若血火的凄美晚霞在西天灼灼燃烧，像极了下阿溪岸边百年一遇的熊熊烈焰。武后起驾回宫的时候，随行的文武百官束手站立在甬道两侧，看见武后端坐在御辇上，从太初宫宽广的殿庭中徐徐而过。在金黄色的余晖映照之下，武后那张方额广颐的脸庞似乎罩上了一层绮丽的光晕。

百官们敛首低眉，莫敢仰视。

他们都说，当时的武后看上去就像一尊凛然不可侵犯的神祇。

大清洗：裴炎之死

在徐敬业败亡之前，帝国的一个重要人物已经先他而死。

这个人就是裴炎。

裴炎下狱后，武后亲自点名，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和侍御史鱼承晔负责审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不择手段坐实裴炎的谋反罪名。

审讯过程中，裴炎语气强硬，毫不妥协。有人劝他适当让步，或者态度谦逊一点，以求避死免祸，可裴炎却摇头苦笑，说：“宰相一旦下狱，岂有活命的可能？”

基本上可以说，此刻的裴炎已经无惧于死亡了。

从裴炎确凿无疑地看见武后改朝换代的决心和野心后，他就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与武后公开决裂，然后坦然赴死。

不管他过去和武后有过多少默契于心的政治交易，也不管裴炎心里还藏有多少个人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总之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在这个涉及君臣纲常、社稷安危的原则性问题上，裴炎还是清醒的。作为一个从小就进入弘文馆就学，熟读圣贤经典的儒家士大夫，裴炎的立场和态度很明确——与其充当武后颠覆李唐的帮凶，变成一个人神共愤的乱臣贼子，或者在这个老妇人的石榴裙下摇尾乞怜，蝇营狗苟地活过下半辈子，那还不如引颈就戮，痛快一死，起码也能保住一个李唐忠臣的名节，起码还有脸面到地下去见高宗。

所以，裴炎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除了不愿成为武后篡唐的工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迫使裴炎主动选择死亡。那就是——他后悔当初帮了武后太多的忙！谁都不能否认，武后之所以能够顺利摆平几个儿子，获得临朝称制、母临天下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裴炎的。因此，未来武后如果真的篡了李唐天下，无疑也有裴炎的一份功劳。想到这一点，裴炎就会有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和自责。

因此，死亡对于此刻的裴炎来讲，与其说是一种惩罚和灾难，还不如说是一种救赎和解脱。

正当徐敬业兵变的烽火在扬州熊熊燃烧之时，神都洛阳的朝廷上也打响了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面对悬而未决的裴炎谋反案，文武百官们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以主审官骞味道和凤阁舍人（中书舍人）李景谌为首，坚称裴炎必反；另一派以纳言（侍中）刘景先和凤阁侍郎（中书侍郎）胡元范为首，竭力为裴炎鸣冤叫屈。他们在朝堂上公然对武后说：“炎，社稷元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资治通鉴》卷二○三）

扬州叛乱未平，当朝首席宰相又涉嫌谋反，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此时的武后当然不希望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所以她只能强捺心头的怒火，淡淡地说：“裴炎有种种谋反的迹象，只是诸卿不知道罢了。”

可刘景先和胡元范根本不买武后的账。他们异口同声、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裴炎谋反，那臣等也都是反贼了！”

裴炎的落难，无疑让同僚刘景先和胡元范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危险。他们意识到，裴炎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明天，所以此时此刻，他们必定要豁出身家性命力保裴炎。

因为只有保住裴炎，才能保住他们自己的明天。

武后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

这一眼顿时让刘景先和胡元范不寒而栗。

但武后最后还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口吻说：“我知道裴炎谋反，也知道你们不反。”

武后在最大程度上作出了让步，但同时也是在暗示并警告刘、胡二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最好是认清形势，和裴炎划清界限，没必要和他掺和在一起。

然而，令武后深感意外的是——她的克制和忍让并没有获得宰相和大臣们的理解，她的暗示和警告更是被当成了耳旁风。在刘景先和胡元范的带头作用下，文武百官中的大多数居然都站到了裴炎一边，力保裴炎的奏章如同雪片一般纷纷飞到她的面前。

武后愤怒了。

虽然她不希望因为裴炎一案而掀翻整个朝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容忍满朝文武伺机对她发难。

她绝不容忍！

因此，武后决定杀鸡儆猴，对东都朝堂来一场大清洗。

但是在动手之前，为了避免局势的全盘恶化，武后还是先跟一个老臣打了一声招呼。

他就是文昌左相兼西京留守，时年八十三岁的刘仁轨。尽管他早就被

武后以“外示尊崇，内夺其权”的方式晾在了一边，可毕竟是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在武后决定清洗东都朝堂之前，她还是希望稳住刘仁轨，以便稳住长安的局势。

武后派出了一个叫姜嗣宗的使臣，前往长安通报裴炎一案的情况。此时的姜嗣宗绝对不会料到，就是这趟普普通通的差使，最后竟然让他送掉了小命。

本来姜嗣宗是不会死的，问题在于这个人的话太多。当他眉飞色舞、添油加醋地向刘仁轨介绍完裴炎的案情后，又意犹未尽地加了一句：“我很早就察觉裴炎心怀异志了，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刘仁轨眯着眼睛看着这个来自东都的太后心腹，突然觉得阵阵反胃。在他看来，裴炎这个人固然该死，几年来帝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几乎都是裴炎在背后搞的鬼，现在机关算尽，反遭太后兔死狗烹，可谓死有余辜！但是眼前的这个人显然也不是什么好鸟，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一副龌龊的小人嘴脸，显然也是武后门下的一条走狗。

既然你小子今天撞到了老夫手上，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

心念电转之间，刘仁轨已经有了主意。他一脸凝重地看着姜嗣宗，说：“哦？尊使早就察觉了？”

“那是当然！”姜嗣宗得意扬扬地说。

刘仁轨点点头，忽然话题一转：“仁轨有一道奏章，有劳尊使顺道带回。”

姜嗣宗满口答应。

他并不知道，刘仁轨交给他的这道奏章就是他的死亡通知书。

姜嗣宗兴冲冲地回东都复命时，武后展开刘仁轨的奏章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嗣宗知裴炎反，不言。”

武后一声令下，姜嗣宗被当廷逮捕，并立即绑赴都亭绞死。

很可能直到绞索套上脖子的那一刻，姜嗣宗依旧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随后的日子，武后迅速果断地展开了一场政治清洗。

带头力保裴炎，公然与武后面折廷争的刘景先和胡元范率先下狱。文武百官一见势头不妙，赶紧夹起尾巴做人，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替裴炎说话。

光宅元年十月十八日，裴炎以谋反罪名被押赴洛阳城郊的都亭驿斩首，家产抄没，亲属全部流放岭南。出人意料的是，朝廷查抄裴炎的家产时，发现堂堂的首席宰相居然一贫如洗，家中储存的粮食还不到一石！时人闻之，无不感叹。

临刑前，裴炎看着前来为他送行的兄弟们，满面凄惶地说："各位兄弟当官都是靠自己奋斗，我没有尽丝毫力量。而今却受我牵连流放边地，实在令人悲伤！"

若仅从史书记载的上述二例来看，裴炎居官，足以当得上"清廉"二字。

行刑的这天浓云低垂，法场四周秋风呜咽，无数的落叶在空中飘飞乱舞，辗转无凭，一如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

面容枯槁的裴炎拖着枷锁脚镣，一步一步走向法场中央的行刑台。

此刻他的心中异常宁静。

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走向解脱。

刀光闪过，一代权相人头落地。曾经的辉煌随风而逝，一世功过任人评说。

裴炎被斩后，侍中刘景先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不久又贬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员外长史；中书侍郎胡元范被流放到琼州（今海南定安县），随后死在贬所；另一个宰相郭待举也被罢相，贬为太子左庶子。

在武后的清洗名单中，不仅有文臣，也有武将。

首当其冲的，就是时任左武卫大将军的程务挺。

自从裴行俭死后，程务挺就成了帝国军界最引人瞩目的一颗新星。短短几年来，在裴炎和武后的大力栽培和提拔下，程务挺迅速升迁，从一个普通将领成长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兼左武卫大将军。他手握重兵，在抗击东突厥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俨然已是帝国军界的擎天一柱。喝水不忘挖井人，程务挺对裴炎的知遇之恩一直深怀感激，所以一得知

裴炎入狱，马上写了一道密奏呈给武后，为裴炎求情。

这道密奏立刻引起了武后的高度警觉。

裴炎和程务挺，一个掌朝廷之重权，一个执军界之牛耳，身份如此特殊的两个人物一旦搞到一起，对任何统治者都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武后当然不能对此漠然置之。而且据有关方面奏报，徐敬业叛军中的两个核心人物——唐之奇和杜求仁，又与程务挺关系密切。综合这些因素，武后不禁暗暗捏了一把冷汗。倘若手握重兵的程务挺突然倒戈，与朝中的裴炎一党内外串通，再与扬州的徐敬业南北呼应，那后果岂堪设想！

思虑及此，武后当即在心里给程务挺判了死刑。

就在处决裴炎的不久之后，武后随即派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带着她的敕令前往程务挺军中，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其斩于军中，并籍没其家。程务挺一死，突厥人顿时欢天喜地，不但设宴庆贺，还给程务挺立了一座祠堂，每次出战，必先在其灵位前焚香祷告。此举常令后世的许多读者百思不解，搞不懂突厥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奉若神明。其实这不难理解，草原民族历来拥有浓厚的英雄崇拜情结，一个人只要被他们视为英雄，就有资格获得他们的顶礼膜拜。至于说这个人生前属于哪个阵营，那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差不多与程务挺被杀同时，帝国的另一个重要将领也随之罹难。

他就是那个一直深受武后嫉恨，时任夏州（今陕西靖边县）都督的王方翼。

早在安西都护任内，王方翼就曾独力平定西突厥的叛乱，为西域边陲的安宁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就因为他是王皇后的近亲，所以武后始终对他耿耿于怀，一直想找机会把他除掉。由于王方翼与程务挺私交甚笃，这一次武后终于有了借口，于是将他逮捕下狱，旋即又流放崖州（今海南琼山市）。王方翼无故而遭流放，终日抑郁寡欢，不久就死于贬所。

程务挺和王方翼这两位功勋卓著、骁勇善战的名将，就这样相继死于国内的政治斗争，这对大唐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但对突厥人而言却是一大福音。从此，东突厥军队更是无所忌惮，屡屡纵兵入寇，逐渐成为唐帝国北方的一大边患。

武后在实施政治清洗的同时，也迅速拔擢了一批对她唯命是从的官

员。其中，当廷指控裴炎心怀异图的监察御史崔詧、裴炎一案的主审官左肃政大夫骞味道，还有坚称裴炎必反的凤阁舍人李景谌，都先后拜相，一夜之间飞黄腾达。

公元684年，武后就是以这样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尽情挥舞着手中的刑赏大棒，把反对她的人从天堂瞬间打入地狱，又把拥戴她的人从平地径直捧上云端。就在这生杀予夺、翻云覆雨之间，满朝文武都在她的脚下匍匐，整个帝国都在她的手中战栗……

放眼天下，还有谁能与其争锋？

这一年岁末的一天，武后召集文武百官在紫宸殿上训话："朕辅佐先帝逾三十年，忧劳天下。诸卿之爵位富贵，皆拜朕之所赐；天下安宁与百姓福祉，皆赖朕之所养。先帝弃群臣而去，以社稷托付与朕，朕不敢爱一身，唯知爱天下人。为何如今公然反叛者，皆出自公卿将相？诸卿负朕何其深也！"

这一刻，帝国庙堂的衮衮诸公全都俯首帖耳，鸦雀无声，唯有武后中气十足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诸卿当中，有谁是顾命老臣，且桀骜不驯如裴炎者？有谁是将门贵种，旬日之间纠集十万亡命如徐敬业者？有谁是手握重兵，骁勇善战如程务挺者？此三人皆当世豪杰，不利于朕，朕能戮之！诸卿有自认才能超过此三人者，可以及早动手。如若不然，便应从此洗心革面，忠心事朕，不要再让天下人耻笑！"

武后话音未落，满朝文武齐刷刷跪伏在地，异口同声地说："唯太后所使。"

就在武后这番赤裸裸的教训与恐吓中，这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嗣圣、文明、光宅元年，终于落下了沉重的帷幕。

与此同时，就在大唐帝国的衮衮诸公们面对那道薄薄的紫纱帐叩头如捣蒜的时候，一个女主天下、乾坤倒转的时代便已悄然来临了……

武后的男宠：面首的诞生

新的一年，武后改元垂拱，取"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之义。很显然，过去的一年太惊心动魄了，武后高度绷紧的神经确实需要放松一下。更何况，在对女皇之位发起最后的冲刺之前，武后也需要养精蓄锐，储备足够的能量。

在同龄的妇人当中，武后的身体素质绝对是一流的，否则她也无法在紧张而惊险的政治生涯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这一点，她和去世的高宗恰成鲜明的对照。整个中年时期，高宗都是在病痛的折磨下度过的，而武后则恰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再爆发出令人惊诧的强大生命力。也许就身体素质而言，武后真的是遗传了母亲杨氏的基因。杨氏以九十二岁高龄而寿终，这在当时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寿星，就算在今天恐怕也是相当罕见的。

然而，拥有一副强健的体魄有时候也不完全是好事。

比如武后就因此产生了某种烦恼。

某种难以启齿的烦恼。

具体而言，就是内分泌过于旺盛，雌性荷尔蒙始终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无从挥洒，因而对男女之欲也就有了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需求。在这方面，武后恐怕也和她的母亲杨氏如出一辙。我们都还记得，杨氏晚年曾爆出一桩惊世骇俗的性丑闻，八九十岁高龄还与她的外孙贺兰敏之乱伦私通，足见杨氏对男女之欲的需求之旺盛。

而武后最大的痛苦和烦恼在于——高宗李治在整个后半生中天天与病魔厮斗，自然难以尽到丈夫的义务。一方面自己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合法丈夫又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武后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尽管这几十年里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转移了武后的大量精力，但这并不等于她的这种私密需求会自动从生命中消失。

所以，当激烈的权力斗争告一段落的时候，当武后在帝国的庙堂上征服所有峨冠博带的男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另一种冲动——在一些别样的场合征服一些别样的男人。

比如在她那空旷寂寞的寝殿里，在她那鎏金镶玉的床笫之上，武后需要另一种男人让她享受另一种征服的快感。

这种男人就叫面首。

而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面首薛怀义，就在这时候走进了武后空旷寂寞的寝殿……

在成为名闻天下的面首之前，薛怀义不叫薛怀义，而叫冯小宝。小宝最初的职业是在洛阳坊间打拳头卖膏药，可神都洛阳无尽繁华，红尘万丈，却与混迹市井的冯小宝了不相干，他只能在这通衢闹市的某个角落支一个摊子，凭借强壮的身躯和粗大的嗓门，吸引三三两两的眼

球，有一搭没一搭地卖他的狗皮膏药，挣几把铜钱聊以糊口。

可又有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蝼蚁般卑贱的小混混，有朝一日竟会变成朝野上下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最先慧眼识“英雄”的女人是千金公主府上的一个侍女。某日从热闹的坊间经过时，这个目光如炬的侍女一眼就瞥见了小宝那裸露在阳光下的黝黑强健的肌肉。这惊鸿一瞥不禁让这个侍女芳心荡漾，于是她偷偷把小宝带进公主府邸，每日云雨，无尽欢畅。但是纸包不住火，终于有一天，年逾七旬的千金公主带着冲天的怒气一脚蹬开了侍女的房门。

尽管眼前的一幕龌龊不堪，可千金公主的目光还是被小宝的身躯牢牢吸引了，以至满腔怒火瞬间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百爪挠心的强烈欲念。

于是这场捉奸行动就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结局。千金公主毅然“没收”了侍女的玩伴，以示对她不守妇道、红杏出墙的惩罚。后来的日子，小宝因祸得福，从侍女的小小闺房转战到了公主的锦衾绣床上，并且雄风不减，越战越勇。公主如获至宝，本欲从此秘不示人，独自享用，可转念一想，太后威权日盛一日，却只能夜夜独守空房，不如将小宝慷慨转赠，以此博取太后欢心。

于是，本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无私精神，千金公主悄悄把冯小宝带进了太初宫，并直接领进了太后的寝殿。对于这份暗中渴望已久的特殊礼物，武后自然是欢喜笑纳了。

至此，洛阳街头卖艺为生的冯小宝，摇身一变就成了太后的枕边新欢。当然，突如其来的巨大荣宠一开始还是把冯小宝撞击得头晕目眩、无所适从，不过他很快就适应了角色。毕竟前面的两度艳遇已经壮了他的胆子，锻炼了他的床上绝技，同时也告诉了他一个人间至理——男人“胯”下有黄金。

尽管“胯”和“膝”一字之差，义理悬隔不啻天渊，但这并不妨碍小宝将其适当修正之后奉为至理名言。小宝从此格外爱护自己的脐下三寸，因为它将给他带来天底下所有男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

自从生命中有了妙不可言的小宝，武后便如枯木逢春，老树开花，迟暮之年却绽放出了少妇般的光彩，脸色红润了，皮肤也细腻了，每天的心情更是舒畅无比。

武后意识到小宝对她已经不可或缺，所以决定对他进行包装，以便长期留在身边。她让小宝出家为僧，取名怀义，并让他当上了千古名刹白马寺的住持。小宝从此自由出入宫禁，美其名曰在宫内道场诵经念佛，实则天天与太后切磋“阴阳之道”。此外，鉴于小宝出身卑微，武后就让他认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为族叔，改姓为薛。

从此，穷酸卑贱的冯小宝就变成了当朝第一大红人薛怀义。他私自剃度了一帮小流氓当和尚，每天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着在洛阳城里呼啸来去。无论官民，见了他都要绕道走，躲避不及就被当街暴打，打不死算走运，打死了活该。最惨的就是道士，被薛怀义和他手下碰见，抓过来先是劈头盖脸一顿打，然后剃光了头发，硬是拉到庙里当和尚。满朝文武和名流政要，见到薛怀义都要尊称“薛师”，并且匍匐礼拜，就连当红外戚武承嗣和武三思兄弟，也要对他执僮仆礼，为其牵马执辔，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

薛怀义把洛阳城闹得鸡飞狗跳，老百姓深受其害，各级官府又没人敢管，右台御史冯思勖实在看不过眼，多次将薛怀义的手下逮捕法办。薛怀义恨之入骨，就找了个机会把冯思勖堵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命手下大打出手，直到把冯思勖打得奄奄一息才扬长而去。

但是，也不见得所有人都治不了这个骄横跋扈的面首。

有一次，薛怀义就狠狠地挨了一回教训。

那天薛怀义带着喽啰大摇大摆地进宫，刚好在宫门口碰见宰相苏良嗣。唐代的宰相历来地位尊崇，号称“礼绝百僚”，自然不会给这个凭借床上功夫而耀武扬威的男宠让路；而薛怀义骄横惯了，也没把宰相苏良嗣放在眼里。于是两队人马互不相让，就在宫门口僵持着。苏良嗣勃然大怒，心想这该死的男宠就是欠抽，随即命手下把薛怀义抓过来，当场噼噼啪啪给了他几十记耳光。薛怀义的喽啰一见宰相发威，又见对方人多势众，都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老大被抽。

薛怀义自从入宫以来，何曾受过此等羞辱？他又急又恼，当即捂着火辣辣的脸颊跑到武后面前哭诉，口口声声要太后为他做主。武后充满爱怜地抚了抚薛怀义的脸颊，然后慢慢收回了手，淡淡地说了一句：“怀义你也不要太张扬了，以后进出都走北门吧，南门是百官和宰相出入的地方，你何苦去招惹他们？”

薛怀义一脸愕然地看着武后，懊恼沮丧，好长时间没有回过味来。

不过这几十个耳光也不算白挨。因为薛怀义过后就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终究只是太后的玩偶而已，要想永保荣华富贵，要想在天下人面前抬起头来，就不能只是在太后的床上操练，而要实实在在地干几件大事让天下人瞧瞧。

挫折往往能使人更快成长。也许正是苏良嗣的几十个耳光打醒了这个浅薄无知的男宠，所以薛怀义才会化悲愤为动力，在未来的日子里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件名留青史的事情。然而，也恰恰是这些所谓的大事让他陷入了极度的自我膨胀之中，旋即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告密旋风与酷吏时代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正月，长期处于软禁状态的睿宗李旦忽然接到太后的一道诏书，说是要“复政于皇帝”。李旦大为惶恐。他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三个兄长过去的遭遇已经给他留下太多血的教训，所以他很清楚，母亲这么做，绝不是真心想要归还政权颐养天年，而是打算一边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一边试探他的态度。

有鉴于此，李旦当然只能一再上表坚决辞让。他声称，自己既没有兴趣打理朝政，更没有能力统治天下，所以为了社稷苍生的福祉，还须母亲勉为其难，继续临朝听政。

看着李旦一连呈上的三道让表，武后笑了。

看来还是老四比较聪明啊，当初他的三个哥哥要是像他这般乖巧的话，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武后的还政表演确实是高明而有效的。从此，那些口口声声要求太后还政的人就不得不保持缄默了。但是武后知道，很多宗室亲王和文武大臣嘴上不说什么，可并不代表他们心里面没有想法。换言之，很多人不会心甘情愿接受她的统治，他们心里肯定藏着许多怨言，甚至很可能藏有对武后不利的企图。

自从徐敬业兵变，裴炎逼宫，宰相百官联名上书等一系列恶性事件发生之后，武后就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才能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预先察觉阴谋的存在？如何防患于未然，把所有不利于她统治的事物全都扼杀在萌芽状态？

作为武后精心思考的结果，垂拱二年三月，一项全新的制度在大唐帝国应运而生。

这就是“匦检制度”。

所谓匦检制度，说好听点叫作广开言路，下情上达，说难听点就是鼓励天下人都来告密。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在朝堂前设置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铜箱，分成四格，开四个孔，可入不可出。四面正对东南西北，涂成四种颜色。东面青色，名“延恩匦”，求仕进者投之；南面红色，名“招谏匦”，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面白色，名“申冤匦”，有冤抑者投之；北面黑色，名“通玄匦”，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资治通鉴》卷二○三）

朝廷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一人为“知匦使”，以御史中丞、侍御史各一人为“理匦使”。每天傍晚由知匦使开箱审阅，紧急事件先行处理，其余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最后再向武后汇总上报。补阙、拾遗的官职以及匦使的设置，都是武后的发明。而具体设计制造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当初裴炎案的审查官之一侍御史鱼承晔之子。

虽然朝堂前的这口大铜匦并不仅仅只为告密而设，但是知匦使每天拿到的最多的奏状，都是从那面漆黑阴森的通玄匦中取出的，其他三匦则形同虚设。

这绝不是一个偶然。

因为，相对于“求仕进”“言得失”“申冤抑”而言，人们显然对告密更为情有独钟。文明元年那个禁军飞骑告密事件，至今依然清晰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闪烁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幽玄之光。这道光照亮了很多人的梦想——通过告密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梦想。

当然，这也恰恰是武后最希望看到的。

不让群众互相检举揭发，她怎么可能知道群众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们都在背地里干些什么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被铜匦中的密状揭了老底，从而被武后砍头的，不是别人，正是铜匦的设计制造者——鱼保家。

鱼保家无疑是个能工巧匠，但他的智慧最初并不是贡献给武后，而是贡献给了徐敬业的。因为他曾是徐敬业的好友，所以当徐敬业起兵时，他便把刀、弩、攻城车等兵器的制造技术传授给了叛军。徐敬业兵败后，鱼保家侥幸躲过了朝廷的清查，但一直惶惶不可终日。为了

捞取一些政治资本以便安身立命，他仔细观察了朝廷的政治风向，然后主动上书给武后，提出了四格铜匦的设计思路。

鱼保家的设计方案得到了武后的高度赞赏，随后他便奉命制造了铜匦。原以为过去的政治污点再也不会有人提起，而未来的荣华富贵也将因首创铜匦之功而有了保障，但是鱼保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他亲手设计并制造的这口大铜箱，头一个就把他自己埋葬了。

因为有人把一封告密信投进了黑色的通玄匦中，鱼保家帮助叛军制造兵器的罪行就此暴露在世人面前。几天后鱼保家就被押赴刑场斩首了，他父亲鱼承晔也坐贬仪州司马。行刑的那天，围观百姓看见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鱼保家一直在笑，从走向行刑台那一刻起，直到人头落地的一瞬间，他始终在笑。旁观的人们过后都说，那种笑容异常凄凉也异常恐怖，这辈子从没见人那样笑过。仔细回忆那天观刑的感受，也许只能用“毛骨悚然”四个字来形容。

鱼保家的故事尽管令人唏嘘，可它却以一种罕见的黑色幽默的方式，宣告了铜匦告密制度的强大功能。

武后显然是所有人中最受鼓舞的一个。

当一种器物诞生之初，却一口反噬了它的制造者，那就足以证明这种东西是有灵性的。尤其是当武后注视着那口散发着幽冥之光的通玄匦时，她总会恍惚看见一头通体黝黑的神兽——它叫玄武，是一种龟蛇合体的神兽，是传说中让人敬畏的北方之神。武后猜想鱼保家设计铜匦的时候，一定也曾被这只神兽的意象吸引和缠绕，只是鱼保家福浅命薄，注定看不见玄武神兽降临尘世，在九州大地刮起黑色旋风的那一天。

而现在武后看见了。

她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让这股旋风席卷帝国的四面八方，在一夜之间剥去所有人的面具和伪装，让他们一丝不挂地行走在彼此的目光中，让他们内心的欲望和罪恶从此裸裎在阳光之下，让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秘密可言……

从垂拱二年的春天起，武后便以她那惯用的惊世骇俗的方式，面对天下人彻底打开了“告密之门”。她发布诏书明令所有州县：凡有告密者，各级官吏皆不得过问，只负责提供车辆驿马；在旅途中，各地官府一律按五品官的礼遇接待告密者，并负责将其安全送抵神都；即便是农夫樵人，也都由武后亲自召见，夜宿官方馆舍，所奏之事若得到

武后认可，则破例授予官职，就算捕风捉影查无实据，也可免于问罪；各级官吏若有敢于阻拦告密的，以该告密者所告之罪惩处该官吏。

皇太后的这道懿旨一下，就像有一股巨大的魔力瞬间攫住了帝国的万千子民，让他们即刻陷入一种空前的亢奋和癫狂之中。“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资治通鉴》卷二○三），人人都怀抱着一夜腾达的梦想，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地向神都洛阳涌去。每一条道路、每一个驿站都挤满了上京告密的人群，让沿途的各级官吏疲于应付，焦头烂额。

官吏们看见，这些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的山野村夫，脸上一概闪动着一种如痴如狂的兴奋之光。官吏们不禁在心里苦笑，在这些人中，又有几个能够“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的呢？如果连田头的老农、山中的樵夫都有能力也有资格言及“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那还要我们这些官吏干什么？大伙不如找根绳子上吊算了。

说白了，这些所谓的告密者绝大多数就是出来享受公费旅游的（而且还是五品待遇的高档旅游）。这辈子能够坐一趟官家车马，住一回皇家宾馆，享受一次五品官的待遇，而且还能登上金銮殿亲睹太后圣容，对这些穷乡僻壤的农夫樵人来讲，实在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就算是死也够本了。

令满朝文武颇为惊讶的是，在诏书颁布之后的日子里，太后果然言出必行，说到做到。每天一大早，她都会精神饱满地登上紫宸殿，以一种超乎寻常的耐心和毅力亲切接见每个告密者。即便形形色色的告密者以及他们所操的方言俚语经常把武后搞得哭笑不得，但她从来没有失去耐心，而是乐此不疲，并且对所有人都是和颜悦色，恩赏有加。直到席卷整个帝国的告密风潮渐趋消歇之时，据说她已经亲自接见了近万人。

武后的辛苦没有白费。

因为她亟需的一批特殊人才就是乘着告密的东风来到洛阳的。

这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酷吏。

这些新时代的弄潮儿裹挟在告密者的人流中，带着异于常人的一身本领，带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踌躇满志地来到了武后的身边。而武后则用一种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仿佛沙里淘金一样，一眼就从成千上万的告密者中把他们挑了出来。

胡人索元礼是最早被武后树立起来的酷吏样板。他因告密之功被擢升为游击将军，专门负责审理武后钦定的大案要案。史称其生性残忍，嗜血好杀，每审一人必牵连罗织数十百人。武后大为赏识，频频召见，赏赐有加，并且不断赋予他直达天听，临机独断的实权。

在索元礼示范效应的带动下，醴泉人侯思止、长安人周兴、万年人来俊臣等大批酷吏闻风继起，纷纷效法。其中以侯思止和来俊臣的发迹最具传奇色彩。

侯思止是个文盲，原来的职业是卖烧饼的，由于好吃懒做，后来连烧饼铺也关张了，只好去给一个将军当仆人。告密风起后，他抓住时机状告本州刺史裴贞与宗室亲王李元名串通谋反，从而博得武后赏识，被授予游击将军之职。按说，从一个卑贱的仆人变成一个五品将军，侯思止已经算是一步登天了，可他仍未满足，又去找武后要官，一开口就是御史。

武后笑问：“你又不识字，如何当御史？”

早有准备的侯思止振振有词地说：“神兽獬豸何尝识字？可它却能凭借本能和直觉辨别忠奸善恶！”

武后笑了。

她不得不承认，侯思止是一个聪明的文盲。这句话确实挠到了她的痒处。如今她需要的不是凡事讲求程序和证据的法官，更不是那些满腹经纶却处处与她意志相左的朝臣，而是像侯思止这种来自于体制之外的、无知无畏、百无禁忌的人。只要他具有一种绝对效忠于武后的本能，只要他能够凭直觉去对付武后的敌人，文盲白丁又有何妨？

资源放错了位置就是废物，废物放对了位置就是资源。

就这样，文盲侯思止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侍御史的职位，从此成为武后最忠实、最得力的鹰犬之一。

在武周一朝的所有酷吏中，后起之秀来俊臣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这不仅因为他长相俊美，堪称“酷吏之花”，更是因为他近乎天方夜谭的发迹过程和日后登峰造极的酷吏生涯。来俊臣生于一个赌徒之家，从小游手好闲，无恶不作，后来因作奸犯科身陷囹圄。当武后向天下人发出那道鼓励告密的诏书时，正在坐牢的来俊臣仿佛在绝望中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他拼命摇撼铁窗厉声高喊：“我要申冤，我要告密！”

狱吏不知道囚犯有没有权力告密，踌躇多日不敢处置，只好把情况上报刺史东平王李续。李续冷然一笑，只说了四个字“杖打一百”。来俊臣被打得皮开肉绽，从此老老实实，再也不敢提告密之事。几年后，李唐宗室遭遇空前的政治劫难，东平王李续被杀，来俊臣闻讯欣喜若狂，再次摇撼铁窗，发出了比上次更为凄厉的呼喊——“我要告密！”

这回来俊臣终于得偿所愿，被送到神都面见太后。伶牙俐齿的来俊臣从容奏言，说早在几年前便已察觉李续有谋反企图，却因此遭到李续居心险恶的报复，险些命丧黄泉，如此遭遇，实属人间奇冤。所幸今日苍天开眼，终于让他见到了传说中英明神武的皇太后，才得以一吐冤情，一表忠心，他这辈子也算死而无憾了云云。

那天武后一直注视着来俊臣，不仅惊讶于他的容貌之美，也折服于他雄辩滔滔的口才，更被他的一腔忠心所打动。于是来俊臣话音刚落，武后便毫不迟疑地赦免了他过去的罪行，并即刻提拔他为侍御史。

来俊臣就此奇迹般地咸鱼翻身，从阶下之囚一跃而成朝廷命官，开始了他青史留名的酷吏生涯。经过数年的努力奋斗，来俊臣不仅为武后铲除了大量异己，“前后坐族千余家”（《旧唐书·酷吏列传》），而且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会同其党羽精心创作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冤狱制造过程的经典著作——《罗织经》。

在《罗织经》中，来俊臣及其党羽不仅详细说明了制造冤狱的流程、步骤和要点，而且几乎把刑讯逼供升华成了一种艺术，将人性中最残忍且最富有创意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光是各种酷刑的名目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如将木板绑在人犯的双手双脚上，然后用力扭绞，名为“凤凰展翅”；将人犯腰部绑住，然后向前猛拉颈上的枷锁，名为“驴驹拔撅”；命人犯跪地捧枷，然后把砖头堆积在枷上，名为“仙人献果”；将人犯绑在柱子上，用绳子拴住枷尾往后猛拽，名为“玉女登梯”。此外，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十种不同款式的刑具及其应用在犯人身上后产生的效果：一曰“定百脉”——全身麻痹，二曰“喘不得”——近乎窒息，三曰“突地吼”——嗷嗷乱叫，四曰“着即承”——马上招供，五曰“失魂胆”——魂飞魄散，六曰“实同反”——供认同谋，七曰“反是实”——胡乱承认自己谋反，八曰“死猪愁”——就算是死猪也会犯愁，九曰“求即死”——但求速死，十曰“求破家”——赶紧把我们一家老小全杀了吧，也好过戴这玩意儿啊！

在来俊臣等酷吏所创造的这种登峰造极的暴力美学面前，骨头再硬的人犯都会浑身酥软，变成任人摆布的可怜虫。来俊臣等人每次要逼供时，往往在大刑未动之前先展览他们发明的各种刑具，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各自的功能，结果还没等他们把话说完，人犯早已吓得屁滚尿

流，“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而武后对来俊臣等人的办案效率也非常满意，对他们的赤胆忠心更是赞赏有加，因而越发宠信他们，并且赋予了他们越来越大的权力。是故，“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资治通鉴》卷二○三）

来俊臣等人就这样联手缔造了一个恐怖而辉煌的酷吏时代。

在一场比一场更为暴烈的血雨腥风中，大唐的江山社稷正在无声地倾圮，一个亘古未有的女皇时代已经呼之欲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无所不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双城记》）

而金銮殿上的武后则始终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她必须放手让酷吏制造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她才能让自己拥有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强权就是公理，暴力即为正义。

这就是武周革命前夕，这个即将横空出世的一代女皇唯一信奉的人间真理。

大周帝国的标志：万象神宫

自从裴炎一党因逼迫太后还政被纷纷送上断头台后，朝堂上公然反对武后的声音就渐渐消失了，此后又经过一场还政表演以及甚嚣尘上的告密风潮，满朝文武的嘴巴更是被堵得严严实实，似乎再也没人敢对太后揽政之事妄生非议，指手画脚了。

然而，让武后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这个大狱迭兴，人人自顾不暇的时刻，居然还是有人逆流而动，再次对她临朝称制的合法性发出了质疑之声。

而更让她震惊错愕的是，这个人居然是她一直以来最得力的亲信——刘炜之。

刘炜之，常州人，少年时便以文藻知名，入朝之后，以其才华见重于武后，遂被延揽为北门学士，从此成为武后的左膀右臂。刘炜之在亲族中素有孝友之名，故深受高宗赏识，被高宗亲自指定为相王府司马，成为李旦的授业之师。高宗曾对刘炜之说：“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籍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旧唐书·刘炜之传》）嗣圣元年，在武后废黜李哲、拥立李旦的行动中，刘炜之与裴炎、程务挺等人一起立下汗马功劳，因而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官名改易后，刘炜之成了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虽说在武后临朝称制的道路上，刘炜之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刘炜之心里还是不可遏止地产生了和裴炎当初一模一样的情结——唯恐自己变成武后篡唐的帮凶。

事实上，从睿宗李旦被武后软禁的那一刻起，作为与李旦有着师生之谊的刘炜之就已经对武后心生不满了。及至后来告密蜂起，眼见满朝文武人人噤若寒蝉，而武后改朝换代的步伐则越迈越快，加之睿宗亲政的希望又日渐渺茫，刘炜之心中的愤懑更是越积越深，不吐不快。

某一天，在某个私下场合，刘炜之心中的不平终于化成了一句致命的牢骚。

那天，刘炜之和他最信任的一个下属凤阁舍人贾大隐讨论时政，说着说着不禁发出一声浩叹：“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资治通鉴》卷二○四）

就是这句不平则鸣的牢骚话为刘炜之招来了杀身之祸。

其时告密之风正盛，贾大隐正愁没有升官发财的捷径可走，现在刘炜之自己送上门来，他当然不会放过，于是一转身就去向武后告了密。

武后闻奏，先是一阵愕然，继而脸色铁青地说：“炜之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没想到又背叛了我！”

随后，武后便授意有关部门给刘炜之捏造了两个罪名：一是收受归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二是与许敬宗的小妾私通。

“刑有不及，陷无不至；不患罪无名，患上不疑也。”（来俊臣《罗织经》）刑罚总有不能及的地方，而诬陷则没有什么不能办到；不必担心加罪于人没有名义，就怕君主对这个人没有猜疑。

刘炜之的遭遇，无疑为酷吏来俊臣的上述妙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捏造了罪名后，武后随即指派肃州刺史王本立负责调查。此举颇令人费解——武后为什么放着朝中的那么多司法官员不用，偏偏指派一个地方刺史去审查一个堂堂宰相呢？

在我们看来，此举大概有两种解释：一、刘炜之入相已久，所以武后担心朝中的司法官员会暗中回护，影响审案；二、武后对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股肱或许还抱有一丝不舍，所以她不想让酷吏出马，因为他们一旦出手便没了回旋的余地。综合言之，指派王本立很可能是一个折中的做法，也就是说——武后既不想轻易放过刘炜之，也不想马上让他死。

然而，已经抱定必死之心的刘炜之根本不领武后的情。当王本立向刘炜之宣读武后的敕书时，刘炜之发出了几声冷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炜之传》）

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起草审议的敕令，也配叫敕令？

刘炜之这句掷地有声的质问，从此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句经典名言。论者经常引用这句话，来说明唐代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以刘炜之最终难逃一死的遭遇，证明唐代的这种宰相制度仍然无法有效制约皇权专制，尤其是当君主具有极权和独裁倾向的时候，相权的制约作用更是荡然无存。

在刘炜之充满嘲讽的质问下，王本立哑口无言，就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记耳光。然而刘炜之说出这句话，也无疑是把自己一举推到了武后的铡刀下。

听到王本立的汇报时，武后勃然大怒。

如果说刘炜之此前的牢骚还只是在背地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那么现在这句话就是在公然挑战武后的权威了。对此武后当然不能容忍，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炜之逮捕入狱。睿宗李旦闻讯，连忙上疏为恩师求情。刘炜之的亲友大为庆幸，以为皇帝既已出面，事情定然会有转机，所以纷纷向刘炜之道喜。可刘炜之却摇头苦笑，说："这回我必死无疑了！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这么做只能加速我的死亡。"

作为武后十多年来最宠任的亲信，刘炜之确实太了解武后了。他说得没错，李旦的上表非但挽回不了武后的心意，反而坚定了她除掉刘炜之的决心。原因很简单——刘炜之身为宰相，又是皇帝的老师，其身份、地位和政治威望皆非常人可比，假如武后真的答应皇帝的请求赦

免了刘炜之，那不仅使皇帝借机收买了天下人心，而且谁敢保证刘炜之日后不会与皇帝联手来对付她呢？所以，留下刘炜之就等于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也等于给武后自己留下了一颗重磅的定时炸弹。武后当然没有这么傻，因而刘炜之必死无疑。不过，念在刘炜之这些年来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武后还是决定网开一面，给他留一个全尸。

数日后，武后特许刘炜之回家，紧接着便派出使臣将他赐死于家中。刘炜之临终前沐浴更衣，神色自若，并且亲自书写谢表，“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旧唐书·刘炜之传》）。当时见到这份谢表的人不少，但是大伙看完都把感触埋在了心里，只有麟台郎郭翰与太子文学周思均这两个小官读罢忍不住赞叹了几句。

他们的赞语当天就传进了武后的耳中。武后轻轻皱了皱眉头，一句话也没说。几天后，这两个口不择言的年轻人就一起被贬黜外放了。不久，此案的主审官王本立便因功被擢升为夏官侍郎（兵部侍郎），并一举入相。

刘炜之事件，让朝野上下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了武后消灭异己、改朝换代的决心和意志。人们蓦然发现，不管是当初的裴炎，还是今天的刘炜之，尽管都曾荣宠一时，但到头来也不过是武后为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献上的祭品而已。

面对武后铁血无情的强权统治，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不禁在心里战战兢兢地打上了一个问号——谁将成为下一个祭品？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正月，位于洛阳太初宫正中心的乾元殿轰然倒塌，滚滚尘烟冲天而起，瞬间遮蔽了太阳的光芒。

这不是地震。

这是武后下令拆毁的。

因为她要在乾元殿的旧址上，重新建起一座普天之下最雄伟、最神圣、最华丽、最庄严的政治性建筑——明堂。

在古代中国，明堂是天子祭祀上天、宣明政教的神圣殿堂，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政治哲学观念的物质载体，是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交合融汇的精神象征，是皇帝顺天应命、统治万民的权威标志，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历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名副其实的“上层建筑”。因此，历代天子都把明堂的建造视为一项激动人心的伟业，甚至比封

禅泰山更让他们心驰神往。仅就隋唐两朝而言，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都曾有过建造明堂的动议，但最终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如今，在大唐东都乾元殿轰然倒塌的巨大烟尘中，一座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伟的明堂终于要拔地而起了。

这就是属于武后的明堂，这就是即将诞生的大周帝国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建筑。

武后连名字都想好了，她要把这座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建筑命名为——万象神宫。

而主持修建这一历史性工程的人，就是她最宠爱的情人薛怀义。

就在万象神宫破土动工的两个月后，一个叫唐同泰的雍州百姓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神都洛阳，口口声声说要觐见皇太后。

他声称自己无意间从洛水中捞出了一块神物，所以特地赶来把它献给太后。

有关官员接过所谓的神物一看，原来只是一块白色的石头。

这块石头看上去普普通通，和世界上的任何一块石头都没什么两样。但是当官员们定睛细看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惊呼。

那上面赫然刻着八个紫红色的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果然是天赐神物！有关官员不敢怠慢，立刻把唐同泰和这块神物一起送进了宫。

河出图，洛出书。这是圣人出现，盛世降临的标志，是旷古未有，千载难逢的一大祥瑞。武后大喜过望，当即把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稍后又改为“天授圣图”），并一举擢升唐同泰为游击将军。次月，武后下诏，宣布将在十二月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然后祭告昊天上帝，最后在新建的明堂——万象神宫——中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鉴于这一系列大典的重要性，武后特别提出要求，全国各州都督、刺史以及李唐宗室、外戚一律要在典礼举行的十天之前赶赴神都，不得有误！

五月十八日，武后自加尊号，称“圣母神皇”。

一个月后，武后又命人铸造了三颗神皇玉玺。

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武后以周代唐的历史性时刻马上就要到来。

一切都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看着自己一手炮制的作品终于拉开了姑母篡唐称帝的序幕，武承嗣无声地笑了。

是的，所谓“宝图”确实是武承嗣的得意之作。石头是他捡的，字是他刻的，唐同泰是他找的，就连进献神物的那番说辞也是他教的。

古往今来，哪个新政权的诞生不需要一些美丽的谎言来引产呢？

武承嗣想，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

燕啄皇孙：李唐宗室的劫难

那个金銮殿上的老妇人终于图穷匕见了。

接到赴洛阳参加大典的诏书之时，李唐宗室的亲王们仿佛看见了自己的死亡通知书。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武后分明是要借此机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

在如今的李唐宗室中，高祖二十二子现存四人：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舒王李元名、鲁王李灵夔。太宗十四子现存二人：越王李贞、纪王李慎。高宗八子现存四人：庐陵王李哲和睿宗李旦皆被武后软禁，李上金和李素节这两个庶子也早已被武后搞得半死不活。所以，在这些亲王中，真正具有反抗能量的，就只有高祖四子、太宗二子及他们的子嗣了。

时任绛州刺史的韩王李元嘉是目前李唐皇族中威望最高的一个。他率先采取了反对武后的行动。早在武后征召诸王入京的诏书发布之前，李元嘉就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于是让儿子李给时任豫州刺史的越王李贞写了一份密信，信中说：“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报。”（《旧唐书·越王贞传》）这封信在一般人看来，很可能只是封普通的家信，但是在默契于心的亲王们读来，却分明是一道起兵的动员令。其中，“内人”实指武后，“病渐重”意指武后篡唐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而“宜早下手”当然就是号召诸王迅速起兵反武了。

及至武后的诏书发布后，所有的宗室亲王就再也坐不住了，一封封密

函在他们手中飞来飞去，互相警告的基本上都是同一句话——“神皇欲于大飨之际，使人告密，尽收宗室，诛之无遗类！”（《资治通鉴》卷二○四）武后将在大典举行之时，命人告密，将李唐宗室尽数逮捕诛杀，一个不留！

既然武后的屠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伸头一死，缩头也是一死，那就只能跟她拼了！

李为了增强大家反武的决心，就以睿宗李旦之名伪造了一份玺书，送到了李贞儿子琅琊王李冲的手上，说：“朕遭幽絷，诸王宜各发兵救我。”李冲收到玺书后，心领神会，又伪造了一份意思更明确的玺书，分送诸王，声称：“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

至此，一个以韩王李元嘉父子、越王李贞父子为核心的反武同盟就宣告成立了。因为宗室诸王全都在各州担任刺史，具备随时募兵起事的条件，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制订一个周密计划，并且统一指挥，协调行动的话，势必对洛阳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也必将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对武后形成强大的威胁。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这个告密之风已经深入人们骨髓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秘密是可以藏得住的。就在李唐宗室联合起兵之前，他们的秘密就泄露了。

告密者正是宗室的内部成员——鲁王李灵夔的儿子李蔼。

人们也许都还记得文明元年那个禁军飞骑的告密事件，他用十几个同僚的性命换来了自己的五品官服。如果说那次告密的结果足以令君子扼腕，令小人雀跃的话，那么此次李蔼告密的结果则足以令人神共愤，令九州同悲了。

此次告密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可悲的李蔼仅仅为了保住一己性命，就出卖了自己的父亲，出卖了李唐皇族的所有人，从而一举葬送了李唐宗室的起兵计划，也就此决定了李唐宗室的悲剧命运。

得知计划泄露后，时任博州（今山东聊城市）刺史的李冲大为震惊。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提着脑袋往前冲了。垂拱四年八月十七日，李冲在博州仓促起兵，同时派快马分报韩、霍、鲁、越、纪诸王，希望他们起兵响应，共取东都。与此同时，武后派遣的讨伐大军也已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主帅正是当年逼杀李贤的左金吾将军丘神勣。

李冲紧急招募了五千多名士兵，准备抢渡黄河直取济州（今山东茌平

县西南），但是刚走出博州不远，便在其辖下的武水县（今聊城市西南）遭遇了顽强抵抗。当地县令闭门拒守，李冲久攻不下，只好命士兵用草车塞其南门，然后顺风纵火，打算乘火突入。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大火刚一点燃，风向瞬间逆转，不但没有烧毁城门，反而烧到了自己士兵身上，军队一下子乱了阵脚，士气大挫。李冲的一个部将董玄寂眼见出师不利，料定李冲必败，于是逢人便说：“琅邪王与国家交战，这分明是在造反！”

李冲勃然大怒，当即把董玄寂斩于军中。士兵们见状，更是慌乱恐惧，于是一夜之间逃了个精光。天亮时分，李冲的身边只剩下数十名家丁。一筹莫展的李冲只好黯然返回博州。临近博州城门的时候，李冲依然沉浸在巨大的悲怆和沮丧之中，浑然不觉死亡已经在前方等待着他。

准确地说，是博州的一个守门人正在城门的拐角处等待着李冲。

这个人叫孟青棒。

他的手里握着一把刀。

神思恍惚的李冲通过城门的一瞬间，孟青棒用他平生最快的速度一跃而出。刀光闪过，琅邪王李冲的头颅应声落地。受惊的坐骑载着李冲的尸身嘶鸣而去，扬起了一道薄薄的黄尘。最后有几粒尘埃，轻轻落入了李冲圆睁的瞳孔……

孟青棒提着李冲的头颅直奔洛阳，得到了武后的嘉奖，换来了一个将军的职务。

李冲从起兵到败亡，历时仅七日。

丘神勣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率领大军兵不血刃地开进博州，满城官吏素服出迎。丘神勣狞笑着瞥了他们一眼，忽然挥刀出鞘，将手无寸铁的一州官吏及其家属全部砍杀。博州城内顿时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所破千余家。丘神勣拎着一大串头颅得意扬扬地回朝复命，旋即被擢升为大将军。

就在李冲起兵的同时，越王李贞也在豫州（今河南汝南县）举兵响应，很快就出兵攻陷了上蔡（今河南上蔡县）。武后即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宰相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又命宰相张光辅统领诸军，发兵十万直扑豫州。

当时，除了李贞父子仓促起兵之外，诸王皆抱持观望态度，不敢轻举

妄动。及至李冲败亡，势单力孤的李贞顿感绝望，第一反应就是自缚到洛阳请罪。就在这个时候，新蔡县令傅延庆招募了二千多名勇士前来投奔，李贞当即打消投降的念头，决定破釜沉舟，与朝廷拼死一搏。为了鼓舞士气，李贞就向部众宣称：李冲已攻破魏、相数州，正率领二十万大军前来会合。随后，李贞又征召了五千名士兵，命汝阳县丞裴守德率领，同时拼命封官，一口气任命了九品以上官五百多人，试图以此收买人心。但是，这些临时招募的士兵大多是被胁迫的，根本没有斗志，全军上下似乎只有裴守德跟李贞一条心。李贞马上任命裴守德为大将军，又把女儿嫁给了他。

尽管李贞竭尽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可是随着朝廷十万大军的逼近，这位孤掌难鸣的亲王还是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恐惧。他连忙找来一帮和尚道士，天天念经做法，祈求神灵保佑大事成功，并发给将士们“辟兵符”，希望他们能够刀枪不入。

然而，这终究只是种虚幻的慰藉，也许连李贞自己都不会相信。

麹崇裕大军很快就兵临城下，李贞命少子李规和女婿裴守德出城迎战。可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是朝廷军的对手，刚一接战便全线溃败，士卒死伤逃亡殆尽，只剩李规和裴守德仓皇逃回城中。李贞惊慌失措，赶紧闭门自守。豫州的官吏和百姓纷纷逾城出降。左右眼见越王败局已定，便劝他自我了断，以免“坐待戮辱”。万般无奈的李贞只好和妻子、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部自杀。

从起兵到自杀，李贞的兵变前后也不过才十七天。

数日后，李贞的头颅被传送东都，与李冲的头颅一起，被悬挂在太初宫门前的旗杆上示众。在李唐诸王人人争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只有满腔热血的李贞父子攘臂而起，但结果却是悲壮而无奈的。除了为武后的祭坛又献上两颗新鲜的头颅之外，他们的抗争最终只能被视为一场螳臂挡车的徒劳。

事实上，李贞父子的起兵不仅徒劳，而且让武后找到了一个全面消灭李唐宗室的借口。因为眼下她仍然是以大唐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的，所以，李唐诸王反她就等于是在叛国。有了这么好的理由，武后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置李唐诸王于死地了。她随即命监察御史苏珦负责审理宗室联反案，首批目标就锁定了威望最高的韩王、鲁王等人。

可武后没有想到，她亲自指定的这个主审官苏珦竟然是个书呆子，根本没有（或者不愿）领会她的意图，查了好些天，愣说找不到韩、鲁诸王与李贞父子串通谋反的证据。武后大为不悦。朝臣中的摇尾派见

状，马上跳出来诬告苏珦与诸王暗中勾结。武后立刻把苏珦找来严厉质问，苏珦被吓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但还是一口咬定查无实据，不能定案。

看着这个一根筋的书呆子，武后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她最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卿大雅之士，朕当别有任使，此狱不必卿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当即把苏珦贬为河西监军，眼不见为净。

武后随后就把案子交给了大名鼎鼎的酷吏周兴。

关键时刻，还是要这种人上场才能搞定。

周兴果然不负武后所望，二话不说就把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公李、高祖之女常乐公主悉数逮捕归案。才审了几天，这几个李唐皇族的核心人物就全部死于狱中。据说死因是畏罪自杀，而且自杀方式与他们的血缘一样整齐划一，都是悬梁自缢。随后，他们的亲党族人全部被诛，仅李灵夔之子李蔼因告密有功免于一死，并擢任右散骑常侍。

此时的李蔼一定会为自己当初的弃暗投明之举而庆幸不已，因为他不仅保住了颈上人头，而且头上还多出了一顶乌纱。

只可惜，他的颈上人头和头上乌纱都没有保留太久。

因为武后固然善于利用小人，可她更善于在利用完后把他们一脚踢飞，所以，告密者李蔼的下场并不比其他人更为美妙。他只比他父亲多活了几个月，过后便被酷吏随口栽个罪名一刀砍了。没有人知道被武后兔死狗烹的李蔼临死前会作何感想，更没人知道他到了九泉之下，将如何面对他的父亲和所有李唐皇族的亲人。

韩王、鲁王等人的惨死正式揭开了李唐宗室大劫难的序幕。

垂拱四年冬天，一股肃杀的寒风从神都洛阳吹出，猛烈地向所有李唐皇族的封地袭来。寒风过处，一茬一茬的人头纷纷落地，一群一群的男女老幼被驱赶着踏上凄凉的流放之途。昔日的天潢贵胄和金枝玉叶转眼间凋零殆尽，就像山路上任人踩踏的野果一样消失于泥土之中。原本枝繁叶茂的大树唯剩一条条瘦骨嶙峋的枝桠，看上去宛如一只只向天求告的手，正艰难地伸向冰冷而高远的苍穹，无望地诉说着什么……

这年十月，已故虢王李凤之子、东莞郡公李融被戮于市，家产被抄，家属籍没为奴。

十一月，太宗之女城阳公主的三个儿子薛、薛绪、薛绍坐与琅邪王李冲通谋，被捕下狱。稍后，薛、薛绪被斩，薛绍因是武后爱女太平公主夫婿之故，免于斩刑，杖打一百，饿死于狱。

十二月，霍王李元轨坐与越王李贞连谋，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以囚车押送，行至中途而死；同月，霍王之子江都王李绪被戮于市。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四月，已故蒋王李恽之子汝南王李炜、已故道王李元庆之子鄱阳公李等宗室十二人全部被杀，家属流放嶲州。

七月，纪王李慎被捕下狱，稍后流放巴州，以囚车押送，行至中途而死；同月，他的八个儿子东平王李续等人相继被诛，家属流放岭南。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四月，舒王李元名被废为庶人，流放和州；稍后，与儿子豫章王李亶相继被杀。至此，高祖二十二子，太宗十四子，已经无一幸存。史称："元嘉修身，元轨无短，元名高洁，灵夔严整，皆有封册之名，而无磐石之固。武氏之乱，或连颈被刑；奸臣擅权，则束手为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难乎！"（《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元嘉修身自持，元轨品德无缺，元名秉性高洁，灵夔治家严整，都有封王受册之名号，却无坚如磐石之福泽。武周革命之时，一个个相继被杀；酷吏擅权之际，一个个束手待毙。原本希望李唐宗枝能够绵延百世，如今看来也是千难万难啊！

永昌二年七月，高宗的两个庶子泽王李上金和许王李素节被告谋反，受征召入京。时任舒州刺史的李素节出发时，路遇一队出殡人群，闻其家属扶棺痛哭，李素节凄怆长叹："老病而死是求之不得的事啊，何必哭呢！"显然预感到自己必将死于非命。数日后李素节行至洛阳城南龙门驿，果然被武后派出的酷吏缢杀。泽王李上金听闻噩耗，旋即自尽。二王死后，李上金的七个儿子全部流放，死于边荒；仅有一子李珣侥幸逃脱，流窜岭南，隐姓埋名为人仆佣，总算保住一命。李素节共有九个儿子被杀，另外四个最年幼的儿子被流放雷州，长期监禁。

八月，已故密王李元晓之子、南安王李颍等宗室十二人被杀；同月，故太子贤的两个儿子皆被祖母派人鞭杀。

从垂拱四年八月李贞父子起兵算起，截至天授元年九月武后以周代唐前夕，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武后以铁血无情的手段和犁庭扫穴之势，对李唐皇族及其亲党实施了一波又一波的清洗和屠杀，就像一只异常凶猛的燕子，几乎将枝繁叶茂的李唐宗枝啄食净尽。

以《旧唐书》所载的李唐皇族子弟二百一十五人来看，自高祖武德年间迄于武周革命时期，共有一百一十三人遭遇非正常死亡，而其中被武后所杀和贬死者就达六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若加上流徙、削爵和潜逃者十四人，遭遇重大政治变故的比例竟然高达百分之七十三。《资治通鉴》在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禁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随后，所有遭到镇压的李唐皇族全部被开除宗籍，并改姓"虺"[1] 。

李淳风当年对太宗皇帝所说的那则恐怖大预言，如今终于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当然，也有个别聪明乖巧的宗室之人逃脱了这场劫难。

比如高祖的女儿千金长公主。

早在几年前，这个颇有先见之明的老妇人就因进献面首冯小宝而得宠于武后。宗室遭遇大清洗时，千金公主更是恬不知耻地主动要求认武后为干妈。论辈分，千金公主是姑母，武后只是侄媳妇；论年龄，千金公主已经年逾七旬，而武后不过才六十出头。可这一切并不妨碍武后微笑着认下这个善于摇尾献媚的"超龄女儿"。千金公主随后便被改封为延安大长公主，并赐姓武。

垂拱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祭祀洛水、拜受宝图的大典如期举行。这天的洛水岸边旌旗招展，万头攒动。盛装华服、仪态雍容的圣母神皇亲临洛水，身后紧跟着睿宗李旦和太子李成器，四周环立着文武百官和八荒四夷的元首酋长。来宾进献的各色珍宝和珍禽异兽被罗列在祭坛周围，整个大典的文物仪仗之盛，被史家称为"唐兴以来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二○四）。

河出图，洛出书。

轩辕以河出龙图为贵，尧舜以龟负洛书为尊。

这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象征，这是太平盛世降临时才会出现的最大祥瑞。而今，千百年来无数政治家孜孜以求的王道理想和人间乐土，仿佛已经在圣母神皇的强权统治下彻底实现……否则，又怎么可能出现如此万世瞻仰、千载一时的祥瑞呢？

胆敢质疑这一切的人都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勉强活下来的人也

只能钳口噤声。

假如还有人敢于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圣母神皇一定会轻轻拨弄她的纤纤玉指，然后面带微笑地告诉他——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1]　一种苟活于肮脏阴湿之地的爬虫，比如毒蛇、蜥蜴之类。

第二章 武周王朝

女皇登基

垂拱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亦即祭洛大典的两天之后，一座中国历史上气魄最为宏伟，造型最为独特的明堂——万象神宫——终于在洛阳太初宫的正中心竣工落成。

据相关史书记载，万象神宫高二百九十四尺。唐尺有大小两种，小尺合今25厘米，一般用于测量小型物品；大尺运用较为普遍，其长度据王国维的研究以及实测日本所藏唐尺，在今29.3至31.3厘米之间，若取中间值30.3厘米换算，则万象神宫高度将近90米，是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两倍，相当于今天的25层楼那么高。整座建筑分为三层：下层为方形，象征四季；中层为多边形，象征十二时辰，层顶四周雕饰着九条张牙舞爪的金龙，共同托起一个圆盖；圆盖之上，就是明堂的最上层，亦为多边形，象征二十四节气，上覆圆形宝顶，宝顶上赫然耸立着一只高达一丈的铁凤凰。凤凰周身涂满黄金，傲然屹立于明堂之巅，高耸入云，展翅欲飞。

在蔚蓝的穹苍和灿烂的阳光下，九条金龙众星捧月地托着这只耸壑凌霄的金凤凰，其惊世骇俗的政治姿态足以让天下臣民瞠目结舌，其离经叛道的象征意义亦足以让海内宿儒气极吐血。

这就是神皇武氏推倒万世，“自我作古”的傲然气概！她抛弃了自古明堂“茅宇土阶”的简陋形制，冲破了儒家文化男尊女卑的思想藩篱，在男权至上的传统中国毅然创造了一个完全属于女人的政治图腾。

是的。

一个图腾。

一个只属于神皇武氏的图腾。

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主天下的图腾！

为了庆祝万象神宫的落成，同时为了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盛德大业，神皇武氏当天就在这座崭新的殿堂中宴赐群臣，宣布大赦天下，并特许普通百姓入内参观。与万象神宫同时落成的，还有坐落于它北面的“天堂”，堂中供奉一尊巨型佛像。据说这座宗教圣殿的规模更加雄伟，殿高五层，站在第三层就可以俯视明堂。主持修建明堂和天堂的薛怀义，因功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

垂拱五年（公元689年）正月初一，神皇武氏在万象神宫举行了首次祭祀大典。她身着天子衮冕，手执大珪（帝王专用的一种祭祀玉器），行初献礼，睿宗李旦行亚献礼，太子李成器行终献礼。先拜昊天上帝，次拜高祖、太宗、高宗，再拜魏国先王（武士彟），最后拜五方帝座。礼毕，神皇武氏亲御则天门，大赦天下，改元永昌。

此次大飨，武后俨然已是以一副天子的姿态在主持祭献之礼。有心人不难发现，这几乎就是一次隆重的登基预演。

至此，武周革命的大幕已经訇然拉开，一个新王朝的曙光也已经喷薄而出。

按照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王朝更迭、革故鼎新之际，首先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改正朔”了。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神皇武氏再飨万象神宫，宣布废除沿用千百年的夏历，启用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按照儒家学说，夏、商、周各承天命，皆以建立正朔来表明其为天命所归，故夏之正朔就是一月，商之正朔为十二月，周之正朔就是十一月了。武后自称姓出姬周，所以在此刻改行周历，显然是为其政权革命建立意识形态的基础。正所谓“于彼新邑，造我旧周；光宅四表，权制六合”（《全唐文补遗·武懿宗墓志铭》）

正朔易则新命生，武周兴而李唐除。

改完正朔后，武后又做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改文字。

她让族侄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宗秦客负责起草，由她最终敲定，一共改了“天”“地”“君”“臣”“日”“月”“年”等十二个最常用和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字 [1] 。从这些新字的字形构造上，人们足以解读出丰富的政治意涵。比如“君（）”字，就是由“天下大吉”四个字合成；“臣（）”字，是上面一个“一”，下面一个“忠”；“年（）”字由“千千万万”四字合成；“圣（）”字由“长、正、主”三字合成。

在所有新造的文字中，只有一个字是永远属于神皇武氏一个人的。当其她的新字随着武周王朝的湮灭而迅速被人们抛弃和遗忘时，唯独这个字永远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它就是“曌”。日月当空，千秋彪炳。

神皇武氏用这个华丽、大气、厚重的文字，为自己重新作了命名。

从此，她就是武曌。

神皇武曌。

后世的人们似乎习惯于用她日后的封号，称呼她武则天，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一定更喜欢人们叫她武曌。

因为这是她自己创造的文字，一如她更喜欢自己创造的命运一样。

千百年来，再也没有人使用过这个字。但是只要中国历史还在，这个字就会在时光深处绽放永恒的光芒。无论你何时回过头去，它都会在历史的星空中默默闪烁。这个字承载了女皇武曌辉煌而独特的一生，这个字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

武曌一生似乎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

她母亲杨氏自小虔诚奉佛，终身不渝，武曌耳濡目染，自然也会在八识田中播下信佛的种子。据说武曌幼时，还曾一度披缁茹素，随母亲入寺奉佛。太宗崩逝后，身为才人的武曌恰恰又被遣送到感业寺落发为尼，尽管与木鱼钟磬相伴一生绝非她的意愿，但是在青灯古佛旁度过的那些日子，无疑也在她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麟德年间，高宗李治为太宗皇帝追福，于洛阳龙门修建大奉先寺。咸亨三年（公

元672年），武曌为了表示对高宗的支持以及对佛教的信仰，遂捐出脂粉钱雕刻寺内主佛像——龙门石窟卢舍那佛。这尊石刻佛像后来被誉为中国佛教造像史上的巅峰之作。据说，佛像的面容正是按照武曌的容貌雕刻的——方额广颐，蛾眉凤目，神情既慈悲又威严，目光既沉静又有力。

如今我们翻开汉传佛教经典，几乎每一部佛经的扉页都印有一首《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相传这首《开经偈》便是武曌所写，可见她与佛教的渊源之深。

拜洛水、受宝图、建明堂、改正朔……在武周革命的蓝图上，武曌已经用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为自己的新王朝撑起了一根擎天大柱。接下来，她当然就要利用佛教的意识形态，为新王朝的殿堂打造一个金碧辉煌的宝顶了。

武曌的情人和尚薛怀义当仁不让地挑起了这项重任。在武曌的授意下，薛怀义组织了东魏国寺僧法明等人，一头扑进了经藏之中，苦苦寻找佛经中有关女主天下的理论依据。经藏如海，薛怀义和法明等人夜以继日勤奋攻坚，终于沙里淘金地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经典，最后又在旧译本的基础上杂糅新说，附会己意，于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七月打造出了武周王朝的佛教圣典——四卷本的《大云经》及其注疏。薛怀义等人在经疏中盛言，神皇武曌“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资治通鉴》卷二○四）。

《大云经》中记载了两则女主天下的故事：一、一个菩萨为救度众生而化现女身，名净光天女，后又舍去天形而为人间的国王；二、佛灭七百年后，南天竺有一国王女，名增长，父死后被群臣拥戴继承王位，以佛教正法治国。

这两则记载无疑都为武曌的登基称帝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然而佛经通常文字晦涩，义理艰深，考虑到普通百姓难以通达经文，而且佛经中所言的净光和增长这两位女国王在中国的知名度都不高，不利于塑造神皇的无上权威，所以薛怀义等人便在注疏中大量掺杂了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弥勒信仰。

按照佛教经典，弥勒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之一，释迦灭度

之后，弥勒当在未来降生于阎浮提，救度众生，而后成佛。所谓阎浮提，又译为南瞻部洲，即指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弥勒信仰广泛流传于民间之后，其实已经不是纯粹的佛教，而是与民众固有的偶像崇拜合流，变成了一种救世主信仰，所以自南北朝以迄隋唐，多有人民利用此信仰举兵起事。如今武曌欲神道设教，当然也要对此充分利用。于是薛怀义便秉承武曌旨意，在注疏中将弥勒下生之说与净光、增长女主天下的故事共冶一炉，大肆宣扬神皇武曌就是当世弥勒，自然应该代唐为天下主，同时又利用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对民众进行了明目张胆的威胁恐吓。如经中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疏文便道："今神皇王南阎浮提天下也。"经中说："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违拒者。"疏文便道："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

显而易见，薛怀义等人的注疏已经远远背离了佛教义理，所谓的《大云经疏》也不过是本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手册而已。

不过，武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本手册。《大云经疏》一出炉，武曌就迫不及待地颁行天下，命各州都要建一座大云寺，各寺收藏一部《大云经疏》，并且号召各地的高僧大德升座讲解，务求让天下臣民深刻领会《大云经疏》的精神。

一时间，东起渤海，西止葱岭，南抵交趾，北至大漠，一座座大云寺拔地而起，一场场贯彻朝廷精神的讲经法会如火如荼地开展，《大云经疏》成了人人必读的"红宝书"，女主天下的政治舆论被一步步推向了高潮……

从"天授圣图"到《大云经疏》，武曌的造神运动就这样一浪高过一浪，至此终于达到顶峰。

天命已归，此时的武曌距女皇之位仅有半步之遥。

接下来还需要什么呢？

两个字：民意。

所谓的民意是通过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表现出来的。

载初元年九月初三，一个从七品的小官、侍御史傅游艺突然率关中父老九百多人诣阙上表，声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请求神皇改国号为"周"，代唐自立；赐皇帝李旦姓"武"，降为皇嗣。武曌没有马上同

意。她向这群可爱的父老们露出了一个矜持的笑容，然后立刻把请愿的组织者傅游艺破格提拔为正五品的给事中。

从“从七品”到“正五品”，其间相隔整整九阶，可傅游艺就这么一步跨了过去。从此，傅游艺更是以令人瞠目的速度一路飙升，短短数月后便升任朝散大夫、鸾台侍郎，并一举拜相，次年五月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芝麻官傅游艺青衫换绿衣，绿衣换红袍，红袍换紫服，是真正的大红大紫，平步青云，时人既羡且妒，谓之为“四时仕宦”。

民众的第一次请愿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所有人都可以从傅游艺的仕途飞升中读出神皇的本意，所以就在九月初八，第二波大规模的请愿就出现了。洛阳百姓、番人胡客、和尚道士共计一万二千余人，齐集于宫阙之前，再度拥戴劝进，希望神皇把握此“天人交际”“万代一时”的机会，当仁不让，缔造大周。然而武曌还是“谦而未许”。

九月初九，第三波请愿来势更为汹涌。共有文武百官、宗室外戚、远近百姓、四夷君长等五万余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则天门下，“守阙固请”，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并在奏书中称：“圣人则天以王，顺人以昌。今天命陛下以主，人以陛下为母……陛下不应天，不顺人，独高谦让之道……臣等何所仰则？敬冒昧万死，固请！”（《全唐文》卷二○九《大周受命颂》）而在手舞足蹈、神态癫狂的劝进人潮的最前列，赫然站立着李唐王朝的影子皇帝——睿宗李旦。他的脸庞还是那么白皙文静，他的神情还是那么冲淡谦和。人们看见他高高举起自己的上表，主动请求圣母神皇赐他武姓。

就在同一天，据说有凤凰从南方飞来，先栖于明堂之巅，接着飞到上阳宫，然后又飞到左肃政台的梧桐树上；继而又有数万只朱雀，遮天蔽日从东方飞来，云集于朝堂之上……

此时此刻，神皇武曌端坐于九重宫阙之中，聆听着百官万民山呼海啸般的请愿之声，目睹百鸟朝凤、凤栖梧桐的稀世祥瑞一幕幕出现，脸上终于绽放出一个等待多年的笑容。武曌十四岁进宫，二十五岁入感业寺为尼，二十七岁二度入宫，三十一岁当皇后，四十岁以二圣之名垂帘听政，五十岁晋升天后，六十岁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这一年，她六十六岁。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沉浮，踏着无数的鲜血和白骨，武曌终于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

这一步迈过去，前面就是巍巍煌煌的武周之天。

武曌缓缓地站了起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俞哉，此亦天授也！”

好吧，这就是上天授予我的天命啊！

公元690年农历九月初九。

一个值得铭记的特殊时刻。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就在这一天宣告诞生。

九九重阳，艳阳高照。武曌身着天子衮冕站在巍峨的则天门上，面朝九月的天空，面朝她的帝国，面朝匍匐在脚下的万千臣民，面朝明媚而喧嚣的尘世，面朝如梦如烟的六十载过往，粲然而无声地笑了。

这一天，六十六岁的神皇武曌用特制的脂粉巧妙地遮盖了岁月刻在她脸上的痕迹，则天门下的臣民都说他们的女皇是一个红颜常驻永不衰老的女人。她饱满而流光溢彩的面庞形同中秋夜空中的满月，而她脸上的灿烂笑容则恰似阳光下灼灼盛开的白色牡丹。

几年来一直在风雨中飘摇的李唐社稷终于在这一天颓然倒地，代之而兴的大周王朝如同一轮鲜红的旭日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在登基大典上，女皇武曌隆重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天授。

大唐载初元年就这样成了大周天授元年。

九月十二日，文武百官向女皇武曌进献尊号，称“圣神皇帝”；同日，以睿宗李旦为皇嗣，改姓武，以皇太子成器为皇孙。十三日，武曌按天子礼制在神都洛阳建立了武氏七庙，追尊西周的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以父亲武士彟为太祖高皇帝；同日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其他诸武皆封郡王，诸姑姐皆封长公主，所有武氏外戚摇身一变而为皇族宗室。次月，武曌又宣布免除天下所有武姓人氏的租赋徭役。

翌年正月，位于西京长安的李唐太庙被降格为“享德庙”；同时，七庙缩减为三庙，仅供奉高祖、太宗、高宗，其余四室皆关闭。

至此，轰轰烈烈的武周革命宣告完成。

改朝换代和建立宗庙的工作结束之后，武曌出于安抚人心和政权稳定的考虑，依旧承认她是李家媳妇，并且毫不讳言地宣称，她的皇位是从李唐三圣那里继承来的。

这样的表态无疑赢得了众多李唐旧臣的心。然而，无论是武曌本人，

还是新生的武周政权，在此却都遭遇了一个极大的尴尬——武曌既追尊武氏父辈和祖先为皇帝，又承认她继承了李唐天下，那么日后她要把政权传给谁？是传给李家子孙，还是传给武家子孙？

如果武曌把来自李唐的政权归还给“皇嗣”李旦，武周王朝势必一世而亡。[2]

这当然是武曌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武曌把政权交给本家侄子武承嗣，武家天下自然可以传承下去，可问题是侄子毕竟是外人，总不如自己的儿子来得亲。再者说，武承嗣将来一旦即位，李旦、李哲及其子嗣还有好日子过吗？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为了让王朝延续而令自己断子绝孙，这样的代价太过于惨痛了，很难想象武曌愿意这么做。

可事情就这么明摆着——倘若立子，便有国祚断绝之虞；要是立侄，则有子孙断绝之危。

这就是武曌的尴尬。

这就是武周政权的悖论。

从武周王朝横空出世的第一天起，这个巨大的悖论便已相伴而生，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携带着不治之症来到世界上一样。

英明神武如女皇武曌，将如何面对这个政治和伦理的两难困境？

几年来一直在母亲的软禁下活得战战兢兢的李旦，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

还有那个一心梦想着在武周革命之后顺势当上太子的武承嗣，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面对这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和隐患，新生的武周王朝必将不得安宁……

立储之争

李旦现在的身份是“皇嗣”，这个名号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

因为它既不是拥有皇位继承权的太子，也不是普通的皇子，而是大致

介于这两者之间。

李旦的尴尬身份充分表明了武曌的矛盾心态，而武承嗣无疑对武曌的这个心态洞若观火。

武周革命后，武承嗣就成了满朝文武中最得势的人。他不但受封魏王，而且官拜首席宰相——文昌左相（尚书左仆射）。此外，作为武皇所有族侄中年纪最大、资望最高的一个，他自然就是武周王朝潜在的皇位继承人。所以在武承嗣看来，普天之下有可能与他竞争太子之位的，就是昔日的皇帝、今日的皇嗣李旦了。

不把李旦从皇嗣的位子上拉下来，武承嗣就无法实现太子之梦。

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在武承嗣的暗中授意下，洛阳人王庆之纠集了数百人联名上表，奏请废黜李旦，册立武承嗣为皇太子。作为武周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武承嗣深知群众运动的威力，所以这一次他依样画葫芦，准备通过群众性的请愿运动达成他的政治目标。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武承嗣想象的那样顺利。王庆之等人的上书刚到文昌右相岑长倩那里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岑长倩在武周革命之际也立有拥戴之功，此时算得上是朝廷的二号人物，但他毕竟是李唐旧臣，在感情上自然更倾向于李旦。于是岑长倩当即向武皇表态，皇嗣住在东宫，未闻有过，不可轻言废黜，何况皇嗣废立之事也不宜让一群平头百姓指手画脚。所以，应该对上书者加以斥责惩戒，同时解散请愿人群。

武曌不置可否，又去问另一位宰相格辅元，格辅元也坚决反对废黜李旦。见宰相们如此坚决，武曌也不想和他们闹得太僵，于是就把这件事情搁置了。

武承嗣的第一次夺嫡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他恼羞成怒，随后就动用他首席宰相的权力，以边关战事吃紧为由，打发岑长倩去西征吐蕃。岑长倩无奈，只好率部出发，刚刚走到半路，武承嗣就以拥兵谋反的罪名把他抓回洛阳，扔进了诏狱。同时又让酷吏来俊臣出马，逮捕了岑长倩的儿子，一番恐吓逼供之下，就把司礼卿欧阳通等数十个朝臣一一罗织了进来。这些都是武承嗣平时看不顺眼的人，刚好借此机会一网打尽。来俊臣随后便将他们全部逮捕，并且严刑逼供。欧阳通受不住酷刑，最后屈打成招，承认与岑长

倩串通谋反。这一年十月，宰相岑长倩、格辅元、大臣欧阳通等数十人全部被处决。

略施小计就把一帮位高权重的反对派悉数铲除，武承嗣的兴奋和得意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扫清障碍之后，他便趁热打铁，再度指使王庆之诣阙上书，口口声声要求武皇废黜皇嗣李旦。这次武曌亲自接见了王庆之，问他："皇嗣是我的儿子，为何要废他？"

王庆之早已把一套说辞背得滚瓜烂熟，当即不假思索地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神灵不接受异族的供奉，百姓不祭祀异族的祖先）。当今是谁家的天下，为何要以李氏为皇嗣？"

武曌闻言，半晌不语。

王庆之所言又何尝不是她的一块心病？可如果要让她立刻在儿子和侄子中间作出选择，她委实下不了这个决心。武曌随即命王庆之退下，表示此事当从长计议。王庆之没有完成任务，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伏地叩首，以死泣请，硬是赖着不走。武曌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命人给了他一张纸，上面盖有玉玺，告诉他："想见我，就向宫门守卫出示这张纸。"

这张纸片儿就相当于特别通行证。小民王庆之得了这个宝贝，顿时精神抖擞，三天两头往宫里跑，像只绿头苍蝇一样在武皇的耳边嘤嘤嗡嗡，反复唠叨那几句话，最后终于把武皇彻底惹恼了。

老娘还没死呢，你武承嗣就如此猴急？一个劲儿死缠烂打，这叫请愿吗？这叫要挟！而且还找了这么个不上道的家伙，给点阳光就灿烂，拿根鸡毛就当令箭，成天往皇宫里钻，简直把宫禁大内当成了自家菜园子，这叫什么事儿！

武曌马上叫来凤阁侍郎李昭德，命他将王庆之杖责一顿，给他一点教训，同时也是给武承嗣一个警告。

武承嗣绝对没有料到，他这回碰上了一颗比岑长倩更硬的钉子。

李昭德此人一向敢作敢为，疾恶如仇，对武承嗣这帮骄横外戚早就不齿，如今接到武皇命令，刚好出口恶气。他立刻命人把王庆之五花大绑，架出光政门外，当着一大群朝臣的面高声宣布："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今奉皇帝之命予以惩戒！"随即下令开打。左右乱棍齐下，照着这家伙的致命部位一顿招呼，不消片刻，王庆之就七窍流血，死翘翘了。群集在宫外的请愿团一见老大被当场打死，顿时作鸟

兽散。

李昭德满心畅快地回宫复命，说手下人不知轻重，不小心把王庆之打死了。

武曌深长地看了李昭德一眼，知道他是故意下狠手了。不过王庆之这种小人死了就死了，也没什么好追究的。武曌轻声一叹，说：“王庆之死不足惜，但是他说的话也有道理。”

李昭德顺势发出劝谏：“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不能享受宗庙祭祀）矣。”（《资治通鉴》卷二○四）

这几句话顿时说到了武曌的心窝里。

是啊，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侄子为姑母立庙的，倘若立武承嗣为太子，来日当了皇帝，那自己和高宗不就变成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了吗？

武曌顿时有些伤感，也有些恍惚，不知不觉间，内心的天平已经转向了李旦。而李昭德一番贴心的忠言，也让武曌颇为受用。从此李昭德官运亨通，迅速成为武曌最为倚重的心腹。

至此，武承嗣苦心孤诣的夺嫡计划再次宣告破产。

他知道是李昭德坏了他的好事。而更让他咬牙切齿的是，就在第二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二月，武皇忽然罢免了他的宰相之职，只给了他一个“特进”的荣誉衔。武承嗣百思不解又痛苦难当，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又是这个该死的李昭德在背后捅了他一刀。

有一天，李昭德忽然向武曌密奏：“魏王承嗣的权力太大。”

武曌说：“吾侄也，故委以腹心。”

李昭德莞尔一笑，不疾不徐地说：“侄子和姑母的关系，怎么比得上儿子跟父亲？自古以来，儿子为了篡夺君权而弑父者比比皆是，何况侄子！如今武承嗣是陛下最宠爱的侄儿，既是亲王，又是宰相，权力已经不亚于人主，臣担心陛下难以长久保住天子之位啊！”

武曌一听之下顿时猛醒。

这些年来，她在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确实走得太过顺畅了，以至于几乎忘记了政治的基本准则，那就是——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一个人，而且，越是亲近的人就越要提防。当初自己不就是一步一步从丈夫和儿子的手中拿走了天子之权吗？谁敢保证武承嗣不会狗急跳墙，在得不到太子之位的情况下篡位夺权呢？是的，李昭德说得太对了，这样的危险确实存在，必须居安思危！

武曌最后一脸凝重地对李昭德说：“是啊，我的确是欠考虑了。”

就在武皇的这声感叹中，武承嗣头上的宰相乌纱就应声落地了。与此同时，李昭德恰与他形成鲜明对照，以凤阁侍郎衔翩然拜相，让武承嗣气得差点吐血。满腔愤恨的武承嗣随后便拼命在武皇面前说李昭德的坏话。可武曌正对李昭德宠信有加，所以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自从任用昭德，我才能安然入寝，他这是在替我分忧解劳，你根本比不上他，不用再说了。”

武承嗣夺嫡不成反被罢官，如今欲进谗言又遭抢白，不禁一肚子委屈懊恼。

他知道，终年蜗居东宫的李旦本身其实没什么能量，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的，但问题就在于有岑长倩、李昭德等一大帮李唐旧臣一直在前仆后继地力保他。如今李昭德又成了武皇跟前的大红人，而自己的宰相大权反倒一朝之内丧失，眼看太子之梦即将破碎，武承嗣顿时很有些伤心绝望。

然而，紧接着发生在李旦身上的一件事情，却让武承嗣垂死的斗志瞬间又高涨起来。

这件事跟一个女人有关。

李旦莫名其妙地交上了桃花运。

更准确地说，他是平白无故遭遇了一场桃花劫……

爱上李旦的这个女人是武曌身边的一个户婢。所谓户婢，就是掌管宫中门户的宫女。这个宫女名叫韦团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又聪慧可人，所以颇受武曌宠爱。每当皇嗣李旦入宫向武皇请安，团儿必定在前引导。日子一久，团儿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个气质高贵、俊秀儒雅的皇嗣。

其实宫廷爱情历来是不纯粹的，韦团儿对李旦的感情固然含有爱情成分，但其中恐怕也不乏改变命运的强烈企图，正如当年的才人武媚之

于太子李治一样。此时的李旦虽然地位不稳，但名义上毕竟还是皇嗣。身为宫女的韦团儿要想出人头地，最有效最快速的办法当然就是攀上李旦这根高枝。于是团儿便施展浑身解数，对李旦百般引诱。然而让她大失所望的是，无论她如何挑逗，李旦始终静如止水，不为所动；无论她如何热情似火，却始终温暖不了李旦冰冷的心窝。

其实，并不是李旦天生不解风情，而是长年笼罩在母亲的权威和阴影之下，李旦早已成了一只惊弓之鸟。何况团儿还是武皇宠爱的侍女，所以就算李旦有那颗贼心，他也不敢有那个贼胆。

频频放电的韦团儿遭遇了李旦这块绝缘体，女人的自尊心顿时受到了严重挫伤。最后她终于恼羞成怒，把一肚子怨气全撒到了李旦的两个妃子身上。

因为她得不到的东西也绝不让其他女人占有。

就这样，李旦最心爱的两个女人，正妃刘氏（李成器的生母）和德妃窦氏（李隆基的生母）便平白无故地变成了韦团儿的情敌，从而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

韦团儿利用武皇对她的信任，状告刘氏和窦氏暗中施行厌胜之术，制作桐人诅咒武皇。此事当然引起了武曌的震怒。因为在武曌看来，李旦从皇帝被废为皇嗣，这两个女人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肯定对此怀恨在心，因而完全具备诅咒她的动机。更何况对于这类事情，武曌向来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正月初二，李旦并不知道，这将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个日子。这天一大早，刘氏和窦氏按惯例前往嘉豫殿向武皇拜贺新年，可她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李旦在东宫从下午等到晚上，又从晚上等到第二天早晨，始终看不到她们的身影，最后李旦终于意识到——她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那一刻李旦肝肠寸断。

他并不知道他的两个妻子为何会无缘无故遭遇死亡，他只知道膝下这一群年幼的儿女从此再也见不到母亲。

两个安分守己、相夫教子的女人，两个从不过问政治，更不敢对武皇有半句怨言的女人，就这样被另一个打翻了醋坛子的女人莫名其妙地送入了鬼门关……

刘氏和窦氏的最终下落或许只有武皇身边最宠信的少数几个宦官知

情。他们那天奉武皇之命悄无声息地抹了这两个女人的脖子，然后又用最不着痕迹的方法处理了她们的尸体。一切都干得神不知鬼不觉，两个大活人顷刻间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连尸骨都没有留下。多年后睿宗李旦复位，曾严令宫人掘地三尺，翻遍了嘉豫殿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始终找不到含冤被害的两个妻子的尸骨。最后李旦只好用她们穿过的衣物为她们招魂，随后筑起了两座衣冠冢，用最隆重的礼节下葬，希望她们漂泊的冤魂能够入土为安。

这当然是李旦重登君位后才有能力办到的事情，而在二妃被害的当时，李旦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强忍悲恸，在武皇面前神色自若，装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韦团儿害死刘氏和窦氏之后，仍然不解恨，甚至还想设计谋害李旦。不过恶人自有恶人磨，没过多久她就被别的宫女告发了，她诬告刘氏和窦氏的事情也随之真相大白。武曌怒不可遏，二话不说就命人杀了韦团儿。

虽然韦团儿已经作法自毙，玩火自焚，但是由她一手制造的这场灾难却远远没有终止。

因为武曌对李旦的猜忌和防范仍然存在。

尽管李旦从未在她面前表露过任何哀怨之色，可知子莫若母，武曌当然知道李旦强颜欢笑的背后是什么。世上没有哪个男人会对自己爱妻的死亡无动于衷，何况还是李旦这种心细如发、感情丰富之人，所以武曌有理由认为李旦肯定会对她怀恨在心。因此武曌当然就更不能放松警惕，而必须严加防范了。

如果武曌是普通的母亲和婆婆，在明知错杀了两个儿媳之后，她一定会对儿子心怀愧疚，并且对他做出某种补偿。可武曌首先是一个皇帝，这就决定了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要变本加厉地提防自己的儿子。

这一年腊月，武曌把李旦的五个儿子全部降为郡王，女儿一律降为县主，同时加强了对李旦的监禁，不许他迈出东宫一步，更不许朝臣和他有任何接触。不久后，有两个官员傻乎乎地前往东宫探望李旦，马上就被告发，武曌立即下令将二人腰斩于市。

腰斩是一种极刑，其残忍程度远甚于斩首和绞刑，所以通常施于那些十恶不赦的重犯。可武曌此次居然动用此刑，显然是要杀鸡儆猴，震慑百官。经此教训，满朝文武再也无人敢踏进东宫半步。

皇嗣李旦落入了如此窘迫危险的处境，最高兴的莫过于武承嗣了。

他意识到李旦已经被武皇推到了悬崖边上，只要他再加一把力，必定可以把李旦推进死亡的深渊。如此天赐良机，武承嗣岂能放过？

随后，一道匿名密奏便递到了武曌手上，指控皇嗣李旦谋反。武曌即刻命来俊臣负责审理。李旦一听说有人告他谋反，而且主审官又是杀人魔王来俊臣，心中顿时绝望，觉得这一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来俊臣效率奇高，一接到武皇敕命，马上进入东宫现场办案，在大堂架起刑具，然后把东宫的各色人等全都押来讯问。东宫的侍从和下人们一见到那些名闻天下的刑具，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来俊臣二话不说，抓过一批就开始动刑。须臾之间，东宫内已是一片惨号。眼看这些人马上就要屈打成招，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个人，大声说："皇嗣没有谋反！"

人们循声望去，原来是东宫的一个乐工，名叫安金藏。

来俊臣当即发出冷笑。

如此卑贱的一个小人物竟然也敢挺身而出替主子担保，来俊臣相信这人的脑袋一定被驴踢了，否则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马上向左右使了一个眼色。就在酷吏们拥上前去的时候，安金藏突然夺下其中一人的佩刀，转过刀口指向自己，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你们如果不信我说的话，我愿意剖出自己的心，证明皇嗣没有谋反！"

来俊臣和所有酷吏们顿时愣在当场。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安金藏已经挥刀直刺自己的胸膛，然后又向下划入腹部，鲜血立刻喷溅而出，五脏六腑全都流了出来。安金藏随即昏死过去，一头撞倒在地。

来俊臣目瞪口呆。

尽管这些年来杀人无数，可像安金藏这样刚强决绝之人，他还是头一回碰上。一时间来俊臣也有些慌神，不知该如何收拾残局。

案子未果就在东宫闹出人命，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捂不住的，马上就有人飞报皇帝。武曌闻讯，立刻命人把安金藏抬进宫，让御医全力抢救，最后总算保住了安金藏一命。安金藏幽幽醒转后，武曌又亲自前去看望，长叹一声说："我连自己的儿子都错怪了，才害你走到这一步。"

随后，武曌就命来俊臣停止审查，放弃了对李旦的追究。

这件原本已经板上钉钉、毫无悬念的皇嗣谋反案，就这样在安金藏的惊人之举中峰回路转，化险为夷。李旦就此躲过一劫，感觉像是去地狱走了一趟又回来一样，浑身充满了虚脱之感。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乐工竟然会做出如此义薄云天之举，更没有想到安金藏的侠肝义胆会打动母亲武曌的铁石心肠。

是的，武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被安金藏感动了。在她看来，这个小人物的一条命固然算不上什么，但他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忠义品格，却足以让人震撼，更足以令人感佩。而且，恰恰是一个小人物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所作的证词，才更为真实可信。因为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更不代表任何政治派别的立场，而是纯粹出于内心的忠义与良知。尽管武曌本人奉行的是利益至上的处世哲学，可这并不妨碍她对安金藏这种具有侠士遗风的忠义之士心怀敬意。

所以，她愿意相信安金藏的话，她愿意相信皇嗣李旦是清白的。

三次阴谋夺嫡，三次惨遭失败。

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武承嗣不禁仰天长叹。他搞不明白，为什么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站出来力保李旦，甚至甘愿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莫非李旦真有天命，所以总是能够绝处逢生，遇难呈祥，就像人们常说的“王者不死”？

尽管屡屡受挫，可在后来的日子，武承嗣并未放弃他的夺嫡之梦。

因为武皇在立储问题上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武承嗣相信自己还有机会。

但是，武周王朝的太子冠冕最终究竟会落到谁头上，没有人知道。

甚至连女皇武曌本人也不知道。

万象神宫的崩塌

自从武周革命的大幕拉开后，薛怀义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牛人。

他不仅亲自监造了大周帝国最神圣、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两大建筑——

万象神宫和供奉巨佛的天堂，而且还一手打造了武周王朝的佛教圣经——《大云经疏》。在他看来，就凭这几项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他就足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了。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也就是武后称帝的前一年，东突厥的骨咄禄可汗纵兵入寇，薛怀义又以左威卫大将军的身份出任新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二十万北上抗击突厥。也是他运气好，一路上没遇到突厥主力，只碰上了一些散兵游勇，薛怀义不费吹灰之力就荡平了东突厥的小股部队，而后一路进至单于台，在那里勒石记功，随后班师凯旋。

得胜还朝时，薛怀义别提有多风光了。武后不但笑容满面地为他接风洗尘，设宴庆功，而且加封他为辅国大将军、柱国，赐帛二千段。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亦即武后正式登基那年，又进封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爵鄂国公，可谓荣宠备至。

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东突厥的骨咄禄可汗病死，其弟默啜自立为可汗，再度纵兵入寇。薛怀义又受命出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两位当朝宰相李昭德、苏味道分任他的司马和长史，麾下有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位赫赫有名的将领，摆出了一个异常强大的北征阵容；就连当时威震西域，收复安西四镇的名将王孝杰（时任兵部尚书兼宰相）也受他节度，足见当时薛怀义在军队中的地位之高。此外，宰相李昭德虽说是朝中出了名的硬骨头，就连武承嗣和来俊臣都要怕他三分，可就因为和薛怀义议事之时拂逆其意，就被薛怀义狠狠地抽了一顿鞭子，李昭德也只好惶惧请罪，不敢有半句怨言。

所有这一切，无不让薛怀义的自信心极度爆棚。

可就在大军出征前夕，前方忽然传回战报，说突厥军队已经撤回漠南了。

北征就此取消，但是薛怀义却颇有一种不战而胜的自豪，因为在他看来，突厥人肯定是慑于他的威名，所以没等他出征就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了。

不管薛怀义的这种想法仅仅是一种自我感觉，还是事实如此，总之到了这一年，薛怀义不仅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巅峰，而且俨然已是武周王朝屈指可数的栋梁之一（起码他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建明堂，造佛经，征突厥，这其中哪一样不是厥功至伟、可圈可点的呢？哪一样不足以成为薛怀义睥睨天下、傲视群伦的资本呢？

所以当时的薛怀义最想对天下人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绝不仅仅是一个男宠！

薛怀义自认为已经成功实现了职业转型，所以对于“面首”这份工作自然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其敬业精神大打折扣。他大多数时候都待在白马寺里，不再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往宫里跑，更不会成天在街上横冲直撞，打架斗殴了。

人都是会成长的。

薛怀义现在就感觉自己比以前成熟多了。就算武皇派人来请他进宫，他也是爱理不理。碰上心情好的时候就去对付一下，心情不好的话当即一口回绝。

眼看薛怀义不断自我膨胀，架子越摆越大，武曌终于愤怒了。

莫非天下就你一个男人不成？老娘现在已经贵为天子，正打算广召“后宫佳丽”呢，你不来拉倒！老娘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随后就有另一个男人迅速补上了薛怀义留下的空缺。

他就是御医沈南璆。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玉树临风的年轻人利用为武皇调理身体的机会，调着调着就往床上去了。而年近七旬的武曌在这位御医的悉心“调理”之下，身体果然健朗如初，皮肤也依然像以前那样细腻红润。据说在天授三年（公元692）秋天，她居然“齿落更生”，重新长出了一口洁白如玉的新牙。武曌特意为此亲御则天门，大赦天下，改元“长寿”。

天下第一面首开始失势了，原来一直看薛怀义不顺眼的朝臣马上行动起来。侍御史周矩向武皇奏称：“薛怀义私自剃度了一千多个小流氓为僧，恐有奸谋！”武曌本来就想杀一杀这小子的嚣张气焰，于是马上命薛怀义前往御史台接受聆讯。

周矩前脚刚回御史台，薛怀义后脚就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了。可周矩万万没有料到，这小子根本不是来过堂，而是来示威的。他骑着马径直闯到堂前阶下，然后下马大步跨进堂中，一下子躺倒在御史台长官的床榻上，四仰八叉，袒胸露背，还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直视周矩。

周矩气得七窍生烟，立刻下令左右把他拿下。

薛怀义一看周矩也不是软蛋，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起身，骑上马扬长而去。周矩无奈，只好如实向武皇回禀。武曌摇头苦笑，说：“这和尚疯了，你也不用审他，直接把他剃度的那些小流氓处理掉吧。”

随后，周矩便奉命把这一千多个野和尚全部流放边地，本人因此升迁为天官（吏部）员外郎。

这回薛怀义终于清醒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武皇的宠爱。

为了挽回昔日的荣宠，薛怀义决定在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正月十五这天，也就是元宵佳节的晚上，好好地为武皇操办一场别出心裁的庆典活动，借此表明他对武皇的衷情。

薛怀义说干就干，立刻挽起袖子，带上一帮人进宫，在明堂前的空地上挖了一个五丈深的大坑，埋入一尊大型佛像，然后又在大坑上方用彩缎搭起了一座姹紫嫣红、美轮美奂的“宫殿”。元宵晚上，当武皇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莅临庆典现场时，薛怀义一声令下，早已做好准备的壮汉们一起拉动裹着彩缎的粗绳，于是坑中的大佛冉冉升起，一直升至上方的宫殿中，场面既神奇又壮观。薛怀义当即高声宣布，说这是佛像“自地涌出”的祥瑞。

原以为如此奇观一定可以博得武皇的欢心和赞赏，可让薛怀义大失所望的是，武皇只是面无表情地看了一会儿，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薛怀义挖空心思才想出这个创意，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付诸实施，没想到居然换不来武皇的一句勉励和一丝笑容。薛怀义整整沮丧了一个晚上，不过第二天他就告诉自己——一定是自己的诚意还不够，所以决不能气馁，应该再努力一把！

正月十七日这天，薛怀义让手下人买了好几头牛，然后杀牛取血，用牛血亲手绘制了一幅高达二百尺的巨大佛像，将其悬挂在天津桥南；同时大设斋宴，让洛阳城中的和尚尼姑以及官绅百姓全都来瞻仰他的旷世杰作；最后又派人去禀报武皇，声称这是他割破膝盖，用自己的血一笔一笔画成的。

这天的天津桥南，万头攒动，冠盖如云。但令人遗憾的是，所有人都来了，唯独薛怀义最渴望的那个人迟迟不来。

可怜的薛怀义从上午等到黄昏，一直等到夕阳西下，众人皆散，还是不见伊人的身影。

薛怀义绝望了。

暮色徐徐落下，空旷阒寂的天津桥上，冷冷的夜风吹动着薛怀义宽大的僧袍，让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忘了归巢的倦鸟。薛怀义抬头仰望那幅在风中不停摇摆的佛像，仿佛看见大佛的嘴角正挂着一丝冷冷的讪

笑。

一股可怕的怒火突然从薛怀义的丹田烧了起来，然后一下子蹿上了他的头顶。薛怀义飞身上马，向着宫中狂奔而去……

那场令女皇武曌终生难忘的大火就是在这天夜里燃烧起来的。

据守卫宫门的禁军士兵事后回忆说，那天傍晚薛怀义像疯了一样闯进了宫门，然后骑着快马朝明堂方向飞驰而去。由于他身份特殊，没人敢加以阻拦。没过多久，明堂方向的夜空就变得一片通红了。禁军们赶过去的时候，供奉巨佛的天堂已经全部着火了，一根根巨大的圆木喷吐着火舌从空中纷纷坠落，很快就把前面的明堂也点着了。赶到现场的人们都只能目瞪口呆地远远站着，根本不敢上去扑救，因为上去也只能白白送死。

那天夜里，武曌在睡梦中被嘈杂的人声惊醒了，醒来后她第一眼就看见了亮如白昼的夜空。当判断出失火的方向正是万象神宫时，武曌顿时感到了一阵晕眩。后来她不顾左右的劝阻亲自前往失火现场，当时的惨况马上就让她惊呆了。

天堂和明堂就像两支仰天而立的巨大火把，疯狂地向四周和上空喷发着炽热的火焰。就算是距离那么远，武曌依然感到手上和脸上的皮肤被炙烤得火热生疼。

这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一场火，而且很久以后依旧在她的记忆中灼灼燃烧。武曌记得明堂之巅的那只金凤一直在大火中苦苦挣扎，先是翅膀折断，然后身子一歪，最后从空中一头栽下。再后来天堂和万象神宫就一前一后地轰然崩塌了……直到事情过去好几年，女皇武曌才对她最宠信的助手上官婉儿说，那天夜里她在冲天的火光中清晰地看见了一张面目狰狞的脸。

那是薛怀义的脸。

次日凌晨武曌第二次来到火灾现场，她看见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已经不复存在，昔日的神圣和庄严已然化为一地的瓦砾和灰烬，焦黑的残垣断壁上白烟袅袅，偶尔有一两根悬空的断木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武曌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猛然收紧，仿佛被某种锐器狠狠地扎了一下……

那天转身离开之时，武曌默默地对自己说：重建，我要马上重建。

上天赐予我的东西，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

听说明堂和天堂的重建工作仍旧由薛怀义负责时，很多朝臣都感到极为诧异，因为有不少迹象表明，这把火就是薛怀义放的。但是武皇却对此讳莫如深，矢口不提追查纵火犯的事。人们都觉得武皇的表现很是蹊跷，唯一的解释是——天下第一面首薛怀义很可能又要重新得势了。

薛怀义自己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刚刚得知武皇把重建的任务交给他时，薛怀义也稍微诧异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就回过神来了。

他相信，武皇心里面最重要的人还是他。他相信这把火已经烧尽了笼罩在头上的层层阴霾，同时烧出了他曾经拥有的那片朗朗乾坤。

烧对了，这把火真是烧得太对了！

薛怀义随即精神饱满地投入到了明堂和天堂的重建工作中。在尘土飞扬的施工现场，薛怀义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他知道，随着新的明堂和天堂从他的手中拔地而起，原本属于他的一切就会恢复如初，仿佛那场可怕的大火从来不曾燃烧过一样。

或者说，那只是一场噩梦。梦醒后，天堂还是从前的天堂，万象神宫还是从前的万象神宫，薛怀义也还是从前那个威风八面的薛怀义。

然而，总有什么是不一样的。

就在重建工作开始不久，薛怀义的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了。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

薛怀义苦思冥想，后来终于想起来了。新明堂动工的几天后，武皇曾亲临工地视察。那天薛怀义一直想找机会和武皇说话，可她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一直到临走之前，武皇才漫不经心地回过头来，深长地看了薛怀义一眼，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当时薛怀义没有及时读懂那一眼的意思。

后来薛怀义终于明白了——那眼睛里满满的全是杀机！

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薛怀义顿时眼前一黑，感觉都要瘫倒了。

但愿自己搞错了。

但愿那不是杀机……

可是，薛怀义没搞错。

那正是杀机。

让他负责重建工作，仅仅是武曌的缓兵之计。

她需要时间来考虑怎么处置这个为爱而狂的男人。

武曌其实并不反对男人因爱成狂，尤其是为她而狂，因为那只会让她体验另一种征服的快感。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女人不喜欢男人为她吃醋，尤其是像武曌这种权威型人格的女人，更喜欢男人为她醋意飞扬。因为男人的醋意有时候就像一味不可或缺的调味料，会让她的私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妙不可言。可让武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薛怀义竟然疯狂到这种程度——一把火烧掉了天堂和万象神宫！

那是她生命中最珍贵的事物，那是大周王朝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那是女皇武曌秉承天命统御万民的神圣图腾！

可它们就这样一夜之间化成了灰烬，武曌又怎么可能原谅薛怀义？

经过短短几天的思考和犹豫，武曌终于下定决心——除掉这个疯狂的男人。

为了防止薛怀义利用出入宫禁的特权又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武曌还特地找了一百多个身体健硕的宫女，组成了一支“女子特警队”，专门保护她的安全。

证圣元年二月初四，洛阳太初宫，瑶光殿。

瑶光殿坐落在湖心的一座小岛上，四面环水，景色非常宜人。当年薛怀义初入宫时，便时常与武后在此幽会，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妙而销魂的时光。

这一天清晨，天空干净湛蓝，阳光稍微有点刺眼。薛怀义策马奔驰在通往瑶光殿的长堤上。四周一片波光潋滟，柳绿花红。

时隔多年之后旧地重游，薛怀义不禁感慨万千。他相信，武皇之所以在此与他约会，显然是要旧梦重温，再续前缘了。想起自己竟然误读了武皇的眼神，薛怀义略感惭愧地笑了一下。

薛怀义很快就通过长堤，向大殿驰去。忽然，前面一棵大榕树下慢慢转出一个人来，站在那眯着眼看他。

薛怀义放慢了速度，又走近十几步，才看清那个人不就是建昌王武攸宁吗？

这小子一大早站在这干什么？

薛怀义满腹狐疑……武皇如果要和自己幽会，怎么可能让这小子在场呢？

忽然间，薛怀义仿佛明白了什么，赶紧掉转马头。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武攸宁轻轻地挥了挥手，四周的树丛后迅速蹿出一群手持棍棒的黑衣大汉。薛怀义刚刚策马跑出几步，就被一棍打落马下，然后十几根棍棒就劈头盖脸地落了下来……

薛怀义遮挡了几下，也哀号了几声。可在雨点般密集的棍棒打击之下，所有的动作和声音很快就都止息了。他双目圆睁，七窍流血，死状极其可怖。武攸宁随后把尸体秘密运到了白马寺，并且遵照武皇的命令将其焚毁，然后把骨灰搅拌在泥土中，用这些泥土建起了一座佛塔。最后，朝廷又将薛怀义手下的一干侍者和僧徒全部流放边地，彻底肃清了他在白马寺的势力。

薛怀义就这么死了。

曾经炙手可热的一代男宠就这样人间蒸发，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从冯小宝入宫得势，到薛怀义被焚尸灭迹，相隔恰好十年。

如果人生可以从头来过，冯小宝还愿不愿意变成薛怀义？他还会不会心甘情愿地跟着千金公主迈上那辆驶往皇宫的马车，然后疯狂地恋上太后武氏的床，恋上所有他承载不起的荣华富贵？

也许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就算没有冯小宝，也会有张小宝、陈小宝、李小宝……总之，在女皇武曌的历史大戏中，必然要有这样的一些角色，来演绎这样的一些人间悲欢与红尘颠倒。

薛怀义死后两年，两个比他更年轻、更貌美、更多才多艺、也更乖巧听话的男宠，就娉娉婷婷地来到了武皇的身边。

他们就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

当面若莲花的二张陪着古稀之年的女皇在太初宫中颠鸾倒凤、夜夜销魂的时候，白马寺的某一座佛塔下面已经长出了离离青草。

陪伴这几株青草的，只有南来北往的风，以及白马寺终年不绝的钟磬梵唱……

北方的狼烟：契丹叛乱（上）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四月，洛阳皇城的正南门——端门之前，赫然耸立起一座神奇而壮观的金属建筑物。

它的名字叫天枢，全称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这座纪念碑式的建筑物是武三思倡议铸造的，其宗旨在于“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资治通鉴》卷二○五）。天枢基座为铁铸，高二十尺，周长一百七十尺，周围有铜铸的蟠龙、狮子、麒麟等瑞兽环绕；其上为八棱铜柱，高度一百零五尺，直径十二尺；顶部为腾云承露盘，四条十二尺长的蛟龙人立而起，捧出一颗硕大的铜火珠；火珠高一丈，周长三丈，金碧辉煌，光侔日月。整座天枢的整体高度大概在一百四十七尺左右，约合今四十四米，相当于十几层楼那么高。整项工程耗费铜五十余万斤，铁三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七千贯。基座上刻有武三思撰写的碑文，还有文武百官及四夷君长的名字，以及武曌御笔亲书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八个大字。

天枢本是北斗七星中第一星的名称，通常用来比喻国家权柄。《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就是国君如果施行德政，就会像北极星被众星环绕一样，得到臣民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的寓意，就是吹捧女皇武曌以德政治国，并且表达了天下臣民和周边四夷对她的万分景仰和衷心拥戴之情。

女皇武曌很欣慰，也很自豪。

既得上天眷顾，又获兆民拥戴，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当皇帝当到这个份上，还不足以令人欣慰和自豪吗？这一年九月，满腔豪情的武曌又在神都南郊祭祀天地，加尊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大赦天下，改元“天册万岁”。

天册万岁二年（公元696年）腊月，大周王朝再度迎来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盛典。

女皇武曌在嵩山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典礼。

三十年前，她曾经以皇后的身份参与了泰山封禅。而今天，她是以皇帝的身份——以古往今来第一位女皇帝的身份——主持嵩山封禅。中国历史上举行过封禅的皇帝共有七位：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其中，六位男性皇帝皆封禅泰山，只有武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泰山之外封禅的皇帝。

武曌为什么会选择嵩山呢？首先，是她一贯喜欢标新立异的性格使然；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据说嵩山之神姓武，算是武曌的本家，所以她当然希望本家之神能够保佑大周王朝国祚永昌。

封禅礼毕，武曌又改元“万岁登封”，并免除天下人全年租税，同时大宴九日，接受百官朝觐。一时间，大周帝国仿佛呈现出一派普天同庆、举国欢腾的盛世景象。

紧接着在三月，新的明堂又竣工落成，又一次巍然屹立在世人面前。新明堂规模比旧的略小，但是明堂之巅的金凤却高达二丈，比原来那只整整高出一丈！

铸天枢，加尊号，封嵩山，立明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武曌就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动作。这一年，她已经七十二岁，可她仍然活力四射，激情饱满，仍然像世界上所有的年轻人那样，一刻不停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普天之下的武周臣民都不禁为此惊叹不已。

女皇武曌也几乎完全陶醉在自己的宏大梦想之中。

她就像新明堂的宝顶上那只浴火重生的金凤凰，一如既往地昂首向天，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凡尘世俗的束缚和局限，同时神情倨傲地俯视脚下的苍茫大地与芸芸众生……

这，无疑是女皇武曌生命中的巅峰时刻。

然而，光明的另一面就是黑暗，上升的尽头就是坠落的开始，所以巅峰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转折点的到来。

武曌生命中的转折点始于一场来历不明的狂风。某日，太初宫中突然狂风大作，吹折了明堂之巅那只刚刚矗立起来的金凤凰。

女皇武曌为此伤感不已，同时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惶惑。

这难道是天意吗？

难道上天也不满于她的桀骜不驯和离经叛道，因而降下惩罚，以此向她示警吗？

自从登基称帝以来，女皇武曌似乎还是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强大的神秘力量面前，她只好选择妥协——下令拆除金凤，代之以铜火珠，仍旧以群龙捧之；同时将新明堂改称为通天宫，大赦天下，并再次改元“万岁通天”。

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我们不难发现女皇的内心正在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似乎少了一点自信和倨傲，多了一点对天意的敬畏和依赖。

然而，狂风吹凤也许真的是上天的示警。

这一年五月，帝国的东北边陲突然爆发了一场由契丹部落发动的叛乱。这本来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地方叛乱，可武曌绝对没有料到，在随后的日子里，她竟然会为此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甚至受到突厥人的无耻要挟和政治讹诈，而堂堂的帝国军队也将在小小的契丹面前屡屡遭遇惨败……

这场来自北方的烽火狼烟首先是在营州（今辽宁朝阳市）点燃的。

当时，营州辖区内的契丹部落遭遇饥荒，营州都督赵文翙为人刚愎自用，不但不赈济灾民，而且颐指气使，视契丹酋长如同奴仆。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妻兄孙万荣遂揭竿而起，攻占营州，杀死赵文翙。李尽忠自立为“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前锋，一路攻城略地，所向皆下，旬日之间兵至数万，迅速进围檀州（今北京密云县）。

消息传来，举朝皆惊。而更让武曌和满朝文武大为错愕的是，孙万荣居然打出了拥护庐陵王李哲的旗号，大声疾呼：“何不归我庐陵王？”（《资治通鉴》卷二○六）

武曌勃然大怒。

一群未沾王化的野蛮人，竟然也配替李唐出头，跟她大打政治牌！

她即刻将李尽忠改名李尽灭，将孙万荣改名孙万斩，以示彻底镇压的决心；同时派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等二十八位将领，率领大军出征。不久后，又以春官（礼部）尚书武三思为榆关道（今河北抚宁县）安抚大使，开赴前线，以备契丹。

二十八个将领，外加一个安抚大使，此次出征将领人数之多，似乎为大唐开国以来所仅见。表面上大张旗鼓，志在必得，其实充分暴露了武周一朝在军事上存在的严重弊端。

首先，武曌为什么会铺这么大一个场面？答案很简单——心虚。她为什么会心虚？因为此时的武周王朝实际上已经无将可用。说得更准确点，是没有真正能够独当一面的名将可用。自从武周革命以来，武曌为了篡唐称帝，不惜展开大规模清洗整肃，因而像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等军界奇才，便先后因政治原因遭到诛杀。此外，当时的外患又异常严重，如日中天的突厥和吐蕃对唐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比如契丹叛乱的两个月前，长期在对吐蕃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名将王孝杰、娄师德就在素罗汗山被吐蕃国相论陵钦击败，王孝杰因之贬为庶人，娄师德亦贬为原州员外司马。由此可知，一方面是国内的政治清洗在不断自毁长城，一方面是客观上的外敌侵逼加剧了人才危机，因而到了紧要关头，当政者必然会陷入捉襟见肘的困窘。

其次，正是因为武曌没有真正的名将可用，所以她才不得不虚张声势，靠人多势众来吆喝壮胆。可她这么做恰恰犯了兵家之大忌。因为用兵之道历来是贵精不贵多，将领太多的话反而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或者为了争功而相互掣肘，这种情况在战争史上并不罕见。更何况，此次出征的这些将领没几个真能打仗的，说他们是滥竽充数也不为过。所以，武曌越是想显摆自己兵多将广，越是证明她在军事上纯属外行，并且这种外行的战略很快就将在战场上结出恶果。

最后，武曌任命侄子武三思担任所谓的安抚大使，无非是希望他能借机分享战功，以此树立威望，捞取政治资本，为武周政权向第二代过渡做准备。这么做显然有任人唯亲，因私害公之嫌。更有甚者，在此后朝廷军连遭惨败的情况下，武曌又执迷不悟，一次次把庸懦无能的武家子弟派上战场。如此昏招频出，自然就决定了帝国军队在战场上损兵折将的命运，同时也充分说明——武曌脑袋里只有政治和权谋，基本无视战争本身固有的规律。

这一年八月末，唐军（为便于行文，仍称唐军，不称武周军队）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等部率先进抵硖石谷（今河北昌黎县北），遭遇契丹军队伏击，大败。稍后，诸军进至黄麞谷（昌黎县西北），再次落入敌人的口袋，张玄遇、麻仁节被生擒，唐军将士尸横遍野，几乎无人生还。契丹人缴获唐军大印，遂伪造军令，强迫张玄遇等人签署姓名，然后把命令送到唐军的后军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人手中，声称："官军已大破叛贼，你们后方部队应火速跟进。倘若迁延观望，等到克复营州之日必定予以严惩，将领一律斩首，士卒不计战功。"燕匪石得令，赶紧昼夜兼程直奔营州，连停下来吃饭和睡觉都

不敢，以致人困马乏，到了半途，又一次进入契丹军队的埋伏圈，终于全军覆没。

北征军惨败的消息传回，举朝震恐。武曌更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和窘迫。

因为，此刻的武周王朝不仅无将可派，甚至已经无兵可征了。

兵源的紧张源于府兵制的衰败。

自从高宗即位以来，天下人口急剧增长，土地不敷分配，而且豪强大户兼并之风日益猖獗，导致大量农民无地可耕，只好四处流亡。到了武周时代，逃户现象越发严重，甚至发展到“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地步。众所周知，府兵制是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如今土地匮乏，人口大量逃亡，府兵制自然遭到了沉重打击，所以一旦战事吃紧，必然出现无兵可征的局面。

面对如此窘境，武曌只好颁布了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诏书（武曌登基改名后，为避讳，改“诏”为“制”，本书依据行文习惯，仍称诏书）：“天下各州县囚犯以及官民家中奴仆，若有骁勇者，可由官府替其赎身，编入军队，以击契丹。”同时，再度任命她的一个族侄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卫大将军，出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军队二次北征。

形势如此严峻，女皇照样把兵权牢牢抓在武家人手中，而且这个武攸宜又从没上过战场，毫无军事经验，这仗要怎么打？

武皇如此不顾大局，实在是让朝野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年九月末，东突厥的默啜可汗突然派遣使臣来到洛阳，声称要当武皇的干儿子，又说要把一个女儿嫁给武周皇室，还说可以帮助武周攻打契丹。

一贯穷凶极恶的突厥人，怎么会突然抛出这么一个提议呢？

其动机实在令人生疑。

果不其然，默啜是有附加条件的——他要求武皇把当初内迁到河套及河南地区的降众归还突厥。

贞观初年东突厥覆灭时，曾有大量人口归附唐朝，所以复国之后，突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不足。如今默啜可汗开出这个条件，对他来讲显然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此外，所谓的认干妈、嫁女儿其实都是障眼法，目的无非是麻痹武曌，以便他在武周与契丹的战争中浑水摸鱼、趁火打劫。至于说攻打契丹，也不是因为默啜可汗有多仗义，而是因为他担心契丹坐大，日后变成他的劲敌，所以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帮武周灭了契丹。

尽管默啜可汗如此居心叵测，可此时的武曌却根本无暇思考。她大喜过望，当即遣使前往突厥，任命默啜为左卫大将军，并册封他为“迁善可汗”。

十月，武曌又听到了一个让她喜出望外的消息——叛军首领李尽忠病死了，只剩下一个孙万荣，其势力大为削弱。数日后，前方又传捷报，说默啜可汗率部端掉了契丹人的老巢，把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妻子儿女全都掳走了。

武曌顿时心花怒放，当即进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又封“立功报国可汗”。

在她看来，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转化，契丹的平定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

北方的狼烟：契丹叛乱（下）

可是，武曌高兴得太早了。

孙万荣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好对付。

虽然老大死了，可孙万荣并未气馁。他重新召集了部众，于是军势复振，先是攻陷冀州，斩杀刺史陆宝积，屠戮当地官民数千人，继而又攻克瀛洲（今河北河间市），整个河北为之震动。

次年春，狡诈无信的默啜一边顶着武皇赐给他的大单于和可汗头衔，一边仍旧肆无忌惮地入寇灵州（今宁夏宁武市）、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等地，实实在在地耍了武皇一把。

眼看契丹人兵势复振，横行河北，而突厥人又背信弃义，肆虐边关，武曌真的是慌了手脚。无奈之下，只好起用一年前被贬为庶人的王孝杰，让他出任清边道总管，率十七万大军北上抵御契丹；同时命大总管武攸宜镇守渔阳（今天津市蓟县），表面上说是策应，实则是让他避免与契丹人正面交锋，只等打胜仗后捞取胜利果实。

三月，重上战场的王孝杰立功心切，一路急行军，迅速进抵去年唐军大败的硖石谷。契丹叛军稍微抵挡之后，就急急向山中退却。王孝杰大喜，自以为胜利在望，遂纵兵深入。行至一处悬崖时，契丹人突然回军反扑，副将苏宏晖先行遁逃，王孝杰力战不敌，坠崖身死，麾下将士死亡殆尽。

这个硖石谷真正成了唐军的死亡之谷。

王孝杰，这颗武周时期闪亮崛起的军界新星，就此彻底陨落。

武攸宜得知王孝杰败亡的消息，吓得胆子都破了，龟缩在渔阳城内不敢动弹。孙万荣乘胜南下，杀入幽州（今北京）境内，攻占城邑，纵兵大掠，如入无人之境。武攸宜硬着头皮派兵去讨伐，却被杀得丢盔弃甲，只好按兵不动。

东突厥的默啜可汗一见武周连遭惨败，趁机狮子大开口，再次表示愿意出手相助，但条件是：一、归还丰州、胜州、朔州、代州、胜州、灵州六州的突厥降众数千帐；二、将单于都护府辖下的土地割让给突厥；三、提供给突厥四万斛谷种，五万段彩绸，三千套农具，四万斤铁；四、允许突厥的可汗家族与武周皇族通婚。

武曌刚开始一口回绝，可宰相杨再思等人一再劝谏，说契丹未平，宜与突厥亲善，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好了。武曌想来想去，如今的武周确实不具备两线作战的实力，最后只好答应了默啜可汗的全部要求。东突厥的势力从此愈发强大。

这一年四月，为了阻遏契丹叛军的凌厉攻势，武曌勉强凑齐了二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三次北征。而让朝野上下大失所望的是，这次北征的统帅，居然又是一个武家人！

他就是时任左金吾卫大将军的河内王武懿宗。

说起这个武懿宗，满朝文武无不切齿。此人不仅容貌猥琐，面目可憎，而且为人阴险，生性残暴。武周革命以来，武懿宗多次秉承武曌旨意，制造冤狱陷害王公大臣，且惯于逞其私意大肆株连，仅数月前与酷吏来俊臣、吉顼联手审理刘思礼谋反案，就将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个海内名士满门抄斩，并将其亲党故旧流放了一千多人。时人都说，此人的卑劣和残暴堪与周兴和来俊臣媲美。

武懿宗既然如此杀人不眨眼，那在战场上应该也会有英勇表现吧？

很可惜，答案是否定的。

当武懿宗大摇大摆地带着二十万人抵达赵州（今河北赵县）时，忽然得到一条情报，说契丹将领骆务整正率数千骑兵来犯。武懿宗一听，顿时脸色苍白，浑身战栗，马上下达了一个命令——撤。

部将们全都蒙了。有没搞错？二十万大军对阵几千契丹骑兵，居然要逃跑！他们纷纷劝阻说：“契丹不过几千人，而且只是游击部队，没有后勤补给，又没有攻城武器，只要我们据城而守，他们必定离去，到时候乘机反击，可建大功。”

可武懿宗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当即掉头就跑，一溜烟跑到了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连辎重甲仗都来不及带走，全部留给了契丹人。骆务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赵州，随即将城中的男女老幼尽皆屠杀。

发现对方的统帅居然是个无能鼠辈时，孙万荣乐了。

他决定抓住时机大举南下。

但是在南下之前，他必须想办法先稳住突厥人，否则突厥人肯定会像上次那样从背后又捅他一刀。为此孙万荣特地派出使者前往突厥，请求与默啜可汗联手，共取幽州。

第一拨使者出发后，孙万荣担心谈不拢，又派出了两名使者，以确保事情成功。可孙万荣绝对没有料到，就是后面这两个家伙，将彻底葬送他的一切。

本来第一拨使者已经和默啜可汗谈得差不多了，可当后两名契丹使者姗姗来迟的时候，默啜怒了，他认为这两个家伙是有意怠慢他，准备把他们砍了。这两人为了自保，不得不向默啜透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他们说，孙万荣为了避免再次被突厥偷袭，就在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市）西北四百里处，修筑了一座新城，将不能作战的老弱妇孺都留在城内，同时在城中囤积了大量从唐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和金银财宝。此城位于深山之中，位置非常隐蔽，孙万荣本人已率领全部精锐南下进攻幽州，此城防守薄弱，正可拿下。

这两个使者最后还是说出了这座城的准确位置，并且自告奋勇担任向导。

默啜可汗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后，顿时仰天狂笑，当即亲率大军直扑契丹大本营，围城三日后将其攻克，随即将城中的辎重、财宝和人口掳掠一空，最后满载而归。

正在前线与唐军对峙的孙万荣得知这个惊天噩耗时，几乎晕厥，而那些失去了亲人和财产的将士们更是无心恋战，士气落到了最低点。作为契丹友军的奚族军队，眼见孙万荣大势已去，随即阵前倒戈，与唐军神兵道行军总管杨玄基相约，前后夹击契丹军队。此时契丹人早已没有半点斗志，结果兵败如山倒。契丹勇将何阿小被生擒，孙万荣带着几千残兵落荒而逃，途中又遭唐前军总管张九节截击。走投无路的孙万荣最后仰天长叹：“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资治通鉴》卷二○六）

此时他的数千残兵已全部逃散，身边只剩下几个家奴。

对于这几个家奴来说，他们肯定没有走投无路的痛苦，因为他们手中还有归唐的筹码。

什么筹码？

孙万荣的人头。

孙万荣仰天长叹的话音刚刚落下，几个家奴就迫不及待地砍了他的脑袋。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六月三十日，孙万荣的家奴带着他的首级投降了唐军。

至此，历时一年的契丹叛乱宣告平定。

为了庆祝平叛胜利，女皇武曌于是年九月在通天宫举行大祭，同时大赦天下，改元神功。

胆小如鼠的北征军统帅武懿宗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获得了胜利，但是他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人所共知，所以武曌也很无奈，于是命他和娄师德、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算是给他一个将功赎罪、收买人心的机会。

可是，这个没用的软蛋一旦转身面对老百姓，马上又拿出了一副残暴无情的嘴脸。当时被契丹掳掠的百姓在战后纷纷回到家乡，武懿宗却以叛国为名把他们全都逮捕，然后一个个开膛破肚，生取其胆。每当有人被行刑的时候，武懿宗总会言笑自若地站在一旁观赏。

奉旨安抚河北的武懿宗就是这么“安抚”的，这和凶残的契丹人有何差别？当时契丹人中最嗜杀的将领是何阿小，而武懿宗来了之后，比起何阿小却有过之无不及。由于武懿宗的封爵是河内王，河北百姓就编了一句顺口溜，以此表达他们的愤怒——“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即使已经把整个河北弄得怨声载道，可武懿宗的嗜血欲望似乎仍未满足。回朝复命时，他又在朝会上奏请武皇，要求将所有“从贼者”满门抄斩。闻听此言，朝堂上的文武百官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是没人敢站出来阻止。最后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左拾遗王求礼毅然出列，大声说：“这些所谓的叛国者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无力反抗契丹人的胁迫，为了生存才不得不从贼，岂有叛国之心？反倒是武懿宗，手握二十万重兵，遇敌数千人便望风而走，致使贼人坐大，到头来却将罪过全部归之于百姓，如果要杀，请先杀他以谢河北！”

武懿宗被揭了疮疤，顿时面红耳赤，却又无言以对。武曌赶紧出面圆场，否决了武懿宗的奏请。

河北百姓成千上万颗无辜的人头，就这样在小官王求礼的一番仗义直言中保住了。回想起贞观时代太宗君臣对死刑判决是何等慎重，再看看武周时期人命贱如草芥的黑暗现实，所有的李唐旧臣一定都会满心悲凉，并为之扼腕长叹。

在武周一朝，不要说普通百姓的生命危如累卵，就是贵为大臣宰相

者，往往也是朝不保夕，时时刻刻活在恐惧之中。自从武周革命以来，很多大臣每日上朝之前，都要与家人执手诀别，因为很可能今早迈出这个家门，从此就再也回不来了。在这种政治生态中，许多人自然就只能奉行阿谀谄媚、明哲保身的混世之道。比如武周中期的一个宰相苏味道，居相位数年，碌碌无为，唯知依阿取容，却经常自鸣得意地对人说：“处事不宜明白，但模棱持两端可矣！”（《资治通鉴》卷二○六）时人称其为“苏模棱”。

这就是成语“模棱两可”的出处。

不仅是苏味道这种昏庸官僚如此，就连武周一朝颇负盛名，一生中出将入相的著名人物娄师德，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也不得不彻底收敛锋芒，把自己磨成一个通体圆滑、逆来顺受的鹅卵石，以此消灾免祸，自保求生。

娄师德曾与爱憎分明、锋芒毕露的宰相李昭德同朝为相。由于娄师德身体肥胖，行动迟缓，他每天上朝的时候都走得慢慢吞吞，李昭德偶尔跟在他后面，半天走不过去，不禁恨恨地骂道：“田舍夫！”

田舍夫的意思就是农民。在唐代，这估计是一句标准的国骂，因为当年太宗李世民被诤臣魏徵气得够呛的时候，也曾经狠狠地骂他田舍夫。如今娄师德无缘无故招来这句国骂，换成其他人，估计一回头就跟李昭德干起来了。可是娄师德却慢慢地回过头来，笑容可掬地说：“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资治通鉴》卷二○五）

此言一出，当场把李昭德搞得哭笑不得。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面对这种人，再大的脾气你也消了。

娄师德的弟弟也在朝中任职，有一次外放为代州刺史，来跟大哥辞行。娄师德语重心长地说：“我贵为宰相，而今你又担任州牧，荣宠过盛，必定招人嫉妒。在你看来，我等当如何自处？”他弟弟说：“大哥放心，从今往后，就算有人把唾沫吐到我脸上，我也只会擦去而已，不同他计较，绝不为大哥惹祸。”

他弟弟以为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大哥一定满意。没想到娄师德却忧心忡忡地说：“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人家把唾沫吐到你脸上，证明他对你火大；你把唾沫擦了，就是表示不服气，这不是让他的火更大吗？你应该任唾沫留在脸上，让它自己干掉，然后还要面带笑容，表示你欣然接受。”（《资治通鉴》卷二○五）

这就是成语“唾面自干”的出处。如果人们仅仅透过这则著名的典故了

解娄师德，那完全有理由把他当成一个怯懦、庸俗、胸无大志、没有骨气的混世官僚。

然而，真正的娄师德绝非这样的人。上元初年，吐蕃大举入寇，高宗征召勇士御敌，时任监察御史、年已四十多岁的娄师德毅然投笔从戎，奔赴边疆，其后在对蕃战争中屡建功勋，遂率部驻守西部边陲，令吐蕃人数年不敢犯边；同时又创设屯田之举，让边关的戍卫部队得以自给自足，使朝廷免却了“和籴（征购军粮）之费”与“转输之艰”，故而深受武曌赏识。

入朝为相后，娄师德一方面忍辱负重，在酷吏和群小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另一方面又为朝廷拔擢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正直之士，默默地为朝廷选拔并储备人才资源，以待日后的拨乱反正。

比如名垂青史的一代良相狄仁杰，正是得益于娄师德的推荐援引。但是娄师德却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引荐之功，甚至连狄仁杰本人也长期误会娄师德，并且对他表面上的为人颇为鄙视，好几次想把他排挤出朝。武曌察觉后，故意问狄仁杰：“你认为娄师德是否贤能？”狄仁杰说：“当大将，尚能谨守边陲，至于贤不贤能，臣不知。”武曌又问：“娄师德可有知人之明？”狄仁杰答：“臣与他同朝为官，从未听说他有知人之明。”

武曌最后微笑着告诉狄仁杰：“朕之所以能了解狄卿，正是因为娄师德的引荐。就此而言，他也算是有知人之明吧。”狄仁杰闻言，顿时惭愧不已。过后他时常感叹，并屡屡对人说：“娄公可谓盛德之人，我被他包容了这么久，竟然从未看出他有如此博大的胸怀！”

《旧唐书》对娄师德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评价：“师德颇有学涉，器量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自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虽参知政事，深怀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终，甚为识者所重。”《资治通鉴》也说：“师德在河陇（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沉厚宽恕……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韬武略、智勇双全之人，却不得不在武周朝堂上以一副圆滑世故、苟且偷生的模样自保，足见当时的政治环境之苛酷与恐怖。

好在，阴霾总有散尽的一日。武曌虽然在革命前后大肆任用酷吏铲除异己，杀戮立威，可她比谁都清楚酷吏政治的负面作用。所以自从登基之后，武曌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对这拨人的清除。

首先被武曌除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兴。

周兴最后的下场至为可悲，但也堪为经典。

因为他的结局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成语——请君入瓮。

请君入瓮：酷吏的终局

周兴是雍州长安人，自幼学习法律，深谙帝国的典章律令。高宗时代，周兴曾以河阳县令的身份被召见，在朝堂上对答如流，高宗大为赏识，准备予以擢用。可周兴退下之后，就有人告诉高宗，说周兴不是科举出身，不便入朝任职，高宗颇为遗憾，只好作罢。周兴不知道事情已经黄了，还天天带着满腔希望入宫，眼巴巴地等着皇帝和宰相给他封官。宰相们都在背后笑他没有自知之明，可就是没人把真相告诉他，任他天天坐在朝堂外头傻等。后来一个叫魏玄同的宰相实在看不下去，就好心对他说："周兴啊，你升职的事儿还要研究研究，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

周兴闻言，一颗火热的心顿时跌入了冰窖。他误以为是这个叫魏玄同的宰相挡了他的升官之路，从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人。此后周兴虽然也通过长期的勤勉苦干升至尚书省都事，但仍然是个不入流的芝麻绿豆官，整天只能埋首于如山的公文中，忙忙碌碌，抄抄写写，出人头地的希望日益渺茫。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武周革命的时代大潮转瞬来临，告密求官之风迅速席卷天下。当周兴蓦然从高高的公文堆中抬起头来时，他又惊又喜地发现——一夜腾达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周兴随即踌躇满志地加入了告密的行列，并很快就被武曌看中，旋即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开始了他名闻天下的酷吏生涯。

一个半辈子以法律为业，专门维护公序良俗的法官，到头来竟然变成了践踏法律，专以罗织陷害为业的酷吏，这种极具颠覆性的人生经历不但没有给周兴带来困扰，反而令他如虎添翼。虽然那些法律知识不能起什么正面作用，但却足以让他的罗织和刑讯手段比别人更专业、更狠毒、更致命，当然也就更加高效。周兴因其所长大展拳脚，在武周革命前夕替武曌清除了数以千计的异己和政敌，从此青云直上，历任司刑少卿、秋官侍郎、文昌右丞。

垂拱四年初，周兴奉命审查郝处俊（当年坚决反对武后摄政的宰相）

的孙子郝象贤谋反案，很快就将其满门抄斩。随后，因武曌准备全力铲除李唐宗室，命御史苏珦审理韩、鲁诸王谋反案，可书呆子苏珦却始终审不出个子丑寅卯，所以武曌立刻让周兴接手。而周兴则不费吹灰之力就让韩、鲁诸王全部悬梁自尽了。死无对证，案子自然轻松搞定。人们在背后骂他制造冤案，周兴却扬扬自得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

永昌元年，周兴终于把目光转向当年的“仇人”——宰相魏玄同。他只不过随便捏造了一个罪名，武曌便下令把魏玄同赐死于家。有人劝魏玄同也去告密，借此表明清白，可魏玄同深知自己难逃周兴魔爪，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资治通鉴》卷二○四）随即从容赴死。稍后，周兴又诬告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谋反，将其逮捕下狱。当年十月，黑齿常之不堪其辱，自缢于狱中。

天授元年，周兴又受命除掉了高宗的两个庶子：泽王李上金和许王李素节。

办完这一系列大案后，周兴不仅当之无愧地成为武周革命的一大功臣，而且俨然已是酷吏行业中的老大。

然而，周兴绝对没有想到，就在他自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女皇武曌的翻云覆雨手就已经向他的头顶罩了下来。

因为革命已经成功，同志当然就可以躺下休息了。

天授二年，也就是武曌称帝的次年春天，曾逼杀李贤的酷吏丘神勣以谋反之名被武曌诛杀。武曌随后又授意朝臣控告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并把收拾周兴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刚刚崛起的酷吏。

他就是来俊臣。

来俊臣深知，作为酷吏行业的老前辈和领军人物，周兴并不那么好对付。为了收拾这个特殊人物，聪明的来俊臣想了一个特殊的办法。

这就叫特事特办。

来俊臣在家中备下酒菜，向周兴发出了盛情邀请。周兴不知有诈，欣然赴约。入席之后，来俊臣频频劝酒，并且毕恭毕敬地向周前辈请教了许多问题。

酒过三巡，来俊臣幽幽地说：“最近审案，人犯多不招供，前辈有何良策？”

已然微醺的周兴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抹了抹嘴巴，慢条斯理地说：“这还不简单！天这么冷，你就支一口大缸，把底下的炭火烧得旺旺的，请人犯进去暖暖身子，到时候，你看他招是不招！”

来俊臣粲然一笑，眸中闪过一道亮丽而森冷的光芒，马上命手下按周兴所言，支起一口大缸，烧起了熊熊的炭火。屋内很快就热气逼人，来俊臣悠然起身，朝周兴深深一揖，说：“奉旨查办周兄，烦请周兄入瓮！”

周兴一下子呆住了。

他希望这只是个玩笑，或者只是一场梦。

是的。他巴不得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他多么希望这场梦醒来之后，他依然趴在如山的公文堆边，身上依旧穿着那件皱巴巴的粗布官服，他像往常一样走出灰暗阴冷的衙门，让夕阳暖暖地抚摸他的脸庞。他看见老母和妻儿依旧站在那条陋巷的深处，在那片熟悉的竹篱笆后面，伸长了脖子向巷口张望，等着他早点回家，等着他揣着菲薄的俸禄回家……

然而周兴知道眼前的一切并不是梦。因为他现在身上穿的，是一件崭新而尊贵的紫袍；因为他的老母妻儿早已搬出陋巷，住进了一座宽敞奢华的豪宅；因为此刻他的浑身上下，都在不停地冒出冷汗……

这一切分明都在告诉他——这不是梦！

周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下又一下地向来俊臣磕头：“来兄想知道什么，我都招！我全部都招！”

就这样，周兴一案迅速审结，谋反罪名成立。武曌念其有功，赦免死罪，流放岭南。

周兴无限凄凉而又感激涕零地踏上了流放之途。

无论如何，活着就好。只要活着就有机会……

可周兴错了。

武曌能够饶他，他遍布天涯海角的仇家也不会放过他。

这一年二月，周兴行至流放中途便不明不白地死了，不知是哪路仇家

杀了他。

当然，不会有人关心这个问题，更不会有人去追查凶手。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请君入瓮”的故事。紧继周兴之后，一批最先登上历史舞台的酷吏如索元礼、傅游艺等人，纷纷被女皇武曌兔死狗烹。

然而，武曌的恐怖统治并未终止。

因为旧的酷吏倒下去了，新的酷吏又站了起来。而且，以来俊臣为首的新一批酷吏大有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之势，无论是罗织陷害的手段，还是刑讯逼供的残酷程度，都比周兴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后的日子，来俊臣迅速取代周兴，成了女皇武曌跟前的大红人，升任左肃政台中丞，所有大案都由他一手经办。短短几年内，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如宰相岑长倩、格辅元、乐思晦，大将张虔勖、泉盖献诚、李安静等人，都先后死于他的罗织之网。长寿元年，宰相狄仁杰、御史中丞魏元忠等一批能臣也都被来俊臣诬告下狱，差一点死在他手里，后来虽然侥幸免死，也都被贬黜为远地县令。

延载元年，来俊臣由于杀戮太盛，仇人太多，终于被人以贪污罪名一状告倒，贬为同州参军。但是武曌觉得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没过多久便重新起用，擢为洛阳令。来俊臣自以为有武皇罩着，从此更加肆无忌惮。最初他陷害的一般都是武皇的潜在政敌，后来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都会被他拿来开刀，到最后，诬告杀人甚至成了来俊臣的一种娱乐活动。他和手下人把满朝文武的名单分别写在靶子上，每天要陷害什么人，就拿起石头来掷，掷中谁就陷害谁，不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名流政要，一旦被掷中，你就死定了。

除了掷靶子决定陷害对象之外，还有一类人也逃不出来俊臣的魔爪。那就是拥有漂亮老婆的人。

只要你的妻妾长得年轻貌美，对不起，你的死期就到了。因为来大官人只要见过哪个美女一眼，就会昼夜萦怀，辗转难眠，必欲娶之而后快。所以那年头谁要是娶了漂亮老婆，每天必然活得战战兢兢。比如一个叫段简的洛阳人就天天恐惧得要死，因为他老婆不仅姿色出众，而且又是名门望族太原王庆诜的女儿，其美名早已传遍天下。不久，段简最恐惧的事情终于来了。来俊臣假造了一道敕令，说武皇已经把王氏赐给了他，要段简马上交人。可怜的段简明知有诈，但打死也不敢和这个杀人魔头理论，只好含泪把老婆王氏休了，乖乖送到了来俊

臣的府上。

来俊臣轻而易举就把这个名闻天下的美女弄到了手，不禁心花怒放。可此时的来俊臣并不知道，就在他把王氏娶过门之后，死神就已悄悄攫住了他。

让来俊臣更加没有料到的是，就像他当初亲手把前辈酷吏周兴送入死亡之瓮一样，最后把他送上断头台的人，也是他的一个手下酷吏。

这个人叫卫遂忠。

本来卫遂忠也是来俊臣的死党，此人聪明伶俐，能说会道，颇得来俊臣赏识，两人经常在一块喝酒。这一天，卫遂忠照例拎着几瓶好酒来到来俊臣府上，打算好好和他喝两盅，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当时来俊臣正在宴请王氏的族人，刚刚喝到兴头上，就听门人说卫遂忠来访，来俊臣觉得烦，就随口对门人说，告诉他我不在。门人照此回复，卫遂忠一听就火了，明明里头一片觥筹交错之声，还想把老子打发走！来之前卫遂忠已经喝了一些酒，此时便趁着酒劲径直闯了进去，指着王氏和她家人的鼻子一通臭骂，说王氏你算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我们大哥的玩物罢了，摆什么谱啊，小心老子哪天整死你们全家！

王氏及其家人都是养尊处优的贵族，何尝受过这等羞辱！王氏又羞又愤，当即离席。她家人的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而来俊臣更是气得七窍生烟，立刻命人把卫遂忠绑了起来，然后劈头盖脸一顿暴打。等卫遂忠被打得半死，酒劲也过去之后，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只好拼命求饶。来俊臣想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该教训也教训了，总不能因为这事把一个忠诚能干的手下打死，所以就骂骂咧咧地把他放了。

本来卫遂忠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几天后，一条惊人的消息就传遍了长安城，说王氏上吊自杀了。

这下卫遂忠傻眼了。

他知道，心狠手辣的来俊臣绝不会放过他。

怎么办？

卫遂忠像热锅上的蚂蚁焦灼地思考了好几天，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与其坐而待毙，不如主动出击！随后，卫遂忠找到了武承嗣，说来俊

臣下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他。武承嗣一听就吓坏了。虽然他也曾经和来俊臣联手扳倒过一批大臣，可来俊臣是条疯狗，现在掉头来咬他是完全有可能的，况且卫遂忠又是他的死党，看来这条情报绝对靠谱！武承嗣如临大敌，马上召集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薛绍死后，太平改嫁武攸暨，也算武家人），说来俊臣的诬陷名单中也有他们。众人大为震恐，纷纷表示要先下手为强，团结一致把这条疯狗打死。会后，众人分头行动，太平公主找了她的四哥李旦，诸武找了南北牙的禁军将领。

就这样，一个针对来俊臣的反恐政治联盟迅速成立。

而此时的来俊臣根本不知自己死期已到。

万岁通天二年五月，反恐联盟出手了。以武承嗣牵头，众人联名，对来俊臣提出了一连串指控，如残害大臣、贪赃枉法、夺人妻女，并企图迫害宗室、篡夺君位等等。有关部门当即把来俊臣逮捕。朝臣们本来就对这个杀人魔王恨之入骨，人人必欲诛之而后快，所以案子很快审结，结案报告旋即递到武皇手上，请求将来俊臣处以极刑。

这些年来，武曌当然很清楚来俊臣都干了些什么。对于他的种种劣迹，武曌一直是睁一眼闭一眼，反正要让马儿跑，总得让马儿吃草，偶尔吃些夜草也无伤大雅。至于说来俊臣想篡夺君位，这未免就言过其实了。武曌相信，来俊臣虽然凶残，但他充其量就是自己手里的一条狗，绝没有那份胆量，更没有那份能力染指君权，所以武曌就把报告压了下来，一连三天都不予答复。

武皇拒不表态，诸武急坏了，赶紧积极活动，一致推举老臣王及善去进谏。王及善原已致仕，因忠正清廉，深受武皇的信任，不久前刚刚被重新起用，一举提拔为内史（中书令），所以众人觉得由他出马，事情必能成功。

王及善向来痛恨酷吏，此番更是当仁不让，立刻向武曌进谏：“来俊臣凶险狡猾，残暴贪婪，是国之大恶，不除掉他，必然会动摇朝廷。”

然而，武曌听完后还是保持沉默，不置可否。

看这样子，武皇似乎是打算力保来俊臣了，众人顿感无计可施。

就在这个重要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

他就是时下正受武曌宠信的又一个酷吏——吉顼。

吉顼据说和来俊臣一样，也是一个仪貌丰伟的美男子，而且同样拥有缜密深沉的心机和雄辩滔滔的口才。当初刘思礼谋反案就是吉顼首先告发，而后与来俊臣、武懿宗一同侦办的。武曌对此案结果颇为满意，所以来俊臣就拼命争功，打算把吉顼也罗织进此案之中，以便独吞胜利果实。吉顼察觉后，及时在武皇面前自表清白。武曌觉得这两个人都挺能干，也都有利用价值，于是同时予以拔擢：来俊臣进位司仆少卿，吉顼也一举升任右肃政台中丞。

虽然吉顼最后没有被搞倒，但毕竟差点死在来俊臣手上，所以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总有一天要置他于死地。

如今，这一天终于来了。

六月初的一个黄昏，武曌在御苑中骑马散步，吉顼为她牵马。最近来俊臣的案子让武曌颇为踌躇，她一直在犹豫该不该对这个昔日的宠臣下狠手。走了一段路，武曌若有所思地问："最近外面有何动静？"吉顼心里蓦然一动，小心答道："一切安好，大家就是奇怪来俊臣的案子为何迟迟判不下来。"武曌轻轻一叹，说："俊臣有功于国，朕还在考虑。"

报仇雪恨的时刻到了！吉顼知道，在武皇举棋不定的这个时候，他的意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武皇之所以会提起这个话头，无非也是想试探他的态度。思虑及此，吉顼不再犹豫，当即拜倒在地，朗声说："来俊臣聚结暴徒，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

武曌闻言，不禁在心里发出一声长叹：来俊臣啊来俊臣，这么多人希望你死，朕若是再保你，岂不是替你承担骂名，被天下人戳脊梁骨？罢了罢了，是你自己种下的罪孽，就让你自己去承受报应吧！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六月初三，昔日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酷吏之王来俊臣，终于被武皇下令斩首。这一天，洛阳城万人空巷。不论王公大臣还是缙绅百姓，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像潮水一样涌向法场，争相目睹杀人魔王被处决的一幕。

刽子手的刀光闪过，来俊臣那颗恶贯满盈的头颅就飞离了身躯。围观的百姓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就像一群疯狂的公牛一样蜂拥而上，将来俊臣扒皮抽筋，开膛破肚，并且抠出他的眼珠子，掏出他的五脏六腑，扔在地上踩成烂泥，最后一片一片撕下他身上的肉，争先恐后地抢着吞吃……须臾之间，来俊臣的尸身就只剩下一副血淋淋的骨架。

得知刑场上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时，武曌惊呆了。

虽然她早知来俊臣民愤极大，但是大到这种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她不禁为自己最终痛下杀手而感到庆幸。假如她一意力保来俊臣，天下人的愤怒无疑将集中到她的身上，日后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有鉴于此，武曌决定和来俊臣彻底划清界限，随后特地颁布了一道《暴来俊臣罪状制》，在制书中历数这个昔日宠臣的斑斑罪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掷地有声地宣布："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资治通鉴》卷二○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立场。

数日后，来俊臣被满门抄斩，家产全部抄没。朝野上下人人拍手称快，互相在道路上庆贺说："从今往后，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随着来俊臣的身死族灭，一个血雨腥风的酷吏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如果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盛开告密之门算起，到这一年（公元697年）来俊臣伏诛为止，武曌借助酷吏实行恐怖统治的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

毫无疑问，酷吏政治是女皇武曌一生中最让人诟病的一大污点。

初唐（高祖、太宗、高宗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法律体系最为完备，司法制度最为健全的时期之一，尤其在唐太宗贞观时代，"宽仁慎刑"成为立法、司法的主要原则，人权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和体现。迄于高宗初年，宰相长孙无忌等人更是在《贞观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古代中国最具有典范性的一部法律——《永徽律》及《律疏》（后世合称为《唐律疏议》）。然而，这一切优良的制度传统却在武周革命前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致命的颠覆。在酷吏肆虐的十余年间，朝廷的司法制度形同虚设，所有的法律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真情贱如粪土，他人即是地狱，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荡然无存。在这个黑白颠倒、正邪易位的年代里，世界就像一个蓦然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人性中所有最丑陋的事物都在阳光下尽情飞舞，疯狂地吞噬着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无情地践踏着法律、道德、公序、良俗、正义、良知，以及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所幸的是，武曌并没有让这个世界陷入彻底的疯狂。

因为酷吏们始终在她的掌控之中。

无论武曌表面上多么宠信酷吏，她也只是把他们当成铲除异己和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已。所以，她给予他们的权力通常囿于监察权和司法权之内，很少涉及行政权。综观武周一朝为患最烈的二十七个酷吏（参见《旧唐书·来俊臣传》），仅傅游艺因带头劝进之功而一度拜相，但时隔一年就被武曌借故诛杀，其他几个著名酷吏如周兴、来俊臣等人，均未掌握相权，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左右帝国大政。因此，武曌才能做到“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资治通鉴》卷二○五）。亦即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改朝换代的目标，避免了大规模的动乱。

换言之，尽管在酷吏横行的十余年间，帝国的统治高层被清洗得面目全非，但是基层政权和民间社会却基本能够保持正常运转和稳步发展，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曌就像是一个高明的驯兽师，既能从容地驱使虎狼去撕咬猎物，又能不动声色地迫使虎狼自相残杀。最后，当武曌意识到酷吏们已经在政治上造成相当程度的负面作用时，尤其是当她确认自己的统治不再受到威胁时，她又能从容收网，兔死狗烹，给臣民们一个交代，还帝国政坛一个朗朗乾坤。

武曌比谁都清楚，杀戮立威只是一种手段，恐怖统治也不能维持长久，要想坐稳江山，就必须得人心，而要想得人心，就必须在适当的时机结束阴霾密布的政治冬天，逐步恢复帝国原有的法律和道德秩序。为此，武曌在诛杀来俊臣之后，便重新起用了一批颇具时望和贤名的正直官员，让他们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十月，一个差点死于酷吏之手的前宰相终于从地方上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洛阳，开始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制度重建的工作。

他，就是一代名相狄仁杰。

[1]　其后又陆续更改了一些，据说前后共计十七字，或说二十一字。

[2]　即便武曌暂时给他改了姓，可永远改变不了他的血缘，何况他当上皇帝后自然也会改回李姓。

第三章 李唐归来

一代名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唯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唯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狄仁杰更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而享誉西方，被西方读者惊呼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那么，真实的狄仁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否被后世的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

答案是：不。

历史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神探。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一年之内勘断的积压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一万七千人，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神探了！

作为神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在小说和影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越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其智谋比起虚构的人物似乎也不遑多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与魏元忠等人一起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当时朝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可以免于死刑。所以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狄仁杰立刻就说："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

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意思就是说，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你说我谋反我就谋反吧！来俊臣一看这家伙这么老实，也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就没人来找狄仁杰麻烦了，酷吏们只等着判决下来，到时候执行就是了。

可来俊臣绝对没有想到，狄仁杰是在跟他玩心眼。

由于当时已是初春，天气逐日转暖，于是狄仁杰就跟狱吏讨了一副笔砚，然后撕下被单上的一角布帛，写明了自己的冤情，最后又拆开身上的棉衣，把帛书藏在衣服的棉絮内，交给狱吏说：“天太热了，烦请把衣服交给我家人，让他们拆掉里头的棉絮，再送回来给我穿。”

狱吏拿起那件棉衣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就转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他儿子狄光远也很聪明，知道父亲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于是拆开棉衣仔细检查，果然发现了那封帛书，随即以告密为由求见武皇，把帛书当面呈上。

武曌看过后，立刻召见狄仁杰，问：“你既然没有谋反，又何必承认？”

狄仁杰说：“我要不承认，早就被他们打死了。”

武曌想想也是，随后就赦免了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把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魏元忠贬为涪陵县令。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千古传颂，除了通达权变、智谋过人、断案如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恤。在武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狄仁杰一生仕途浮沉，辗转四方，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每到一地，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早年担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就感怀他的仁政，为他竖起了一块德政碑。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入宁州境内时，当地父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御史不禁感叹：“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旧唐书·狄仁杰传》）回朝后更是大力推荐。狄仁杰随即被征召入朝，擢为冬官（工部）侍郎。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随宰相张光辅讨伐越王李贞，平叛之后，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张光辅进入豫州后，大肆屠杀降众，并逼迫狄仁杰以州府财物赏赐将士，遭狄仁杰严词拒绝。张光辅

勃然大怒："一个小小的州将，胆敢不听元帅命令？"狄仁杰也愤然而起，对张光辅说："乱河南的，原本只有一个李贞。如今一个李贞死了，没想到却有一万个李贞活了！"张光辅大声质问他什么意思。狄仁杰面不改色地说："张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对付一个乱臣，豫州百姓争相出城迎降，可官兵入城后却大肆屠杀，令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贞活了？你放纵邀功之人，诛杀归降之众，我担心冤声沸腾，上彻于天。要是我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现在就砍断你的脖子，我虽死如归！"张光辅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言以对。

过后，豫州百姓被株连者又达六七百人，朝廷使者屡屡催促狄仁杰将他们诛杀。狄仁杰有心拯救他们，所以一再推迟刑期。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狄仁杰思虑再三，最后向武皇呈上了一道密奏，说："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并无大罪。臣本打算公开上奏，却有替罪人求情之嫌，可要是不奏，又担心不能贯彻陛下体恤百姓之旨。所以这道奏书写了撕，撕了又写，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恳请陛下能赦免他们。"狄仁杰这道奏书有两点非常聪明：一、以密奏的形式呈上，不会让武曌难堪；二、给武曌戴了一顶"体恤百姓"的高帽，让她不做好事都不行。后来，武曌果然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流放丰州。这些人经过宁州时，当地百姓纷纷出来慰问他们，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啊！"于是众人相携至当初的德政碑前，因感念狄公的恩德放声大哭，然后又设斋三日为狄仁杰祈福。到达流放地后，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狄仁杰立碑颂德。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契丹叛军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朝廷命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抵御契丹南下。狄仁杰赴任后，发现前任刺史把城外的百姓通通驱赶入城，让他们修筑防御工事。狄仁杰很不以为然，当即把百姓全都放回田里，对前任说："贼人还很远，何必这么紧张？就算贼人来了，我自能应付，没百姓什么事。"及至叛军退却后，当地百姓马上又为狄仁杰立了一块感恩碑。

狄仁杰一生中被百姓立了多少块碑，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像狄仁杰这样的好官，老百姓碰上，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形同中了福利彩票；碰不上，实属正常现象，没什么好委屈的。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在宰相娄师德的暗中举荐下，政声卓著的狄仁杰终于在幽州都督任上被征召入朝，担任鸾台（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一年，狄仁杰六十八岁。

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宰相。第一次拜相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可短短三个月后就被来俊臣诬陷入狱，旋即贬为彭泽县令。此刻狄仁杰再度以宰相身份重返帝国朝堂，两鬓已然多出了一层岁月的风霜，但是匡复社稷、重振朝纲之志，却依然在他的胸中翻涌沸腾。

当然，身为武周宰相，狄仁杰要下手整肃的自然是武周的朝纲；但是作为李唐旧臣，狄仁杰真正要匡复的却必将是李唐的社稷。

这将是狄仁杰余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的夺嫡。

这些年来，武承嗣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夺嫡的梦想。为了讨武皇欢心，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率五千人上表请愿，为武皇进献尊号，称“金轮圣神皇帝”；第二年，武承嗣再接再厉，又搞了一场声势更大的请愿活动，率领二万六千余人为武皇再献尊号，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帽子一顶比一顶更大，媚态一次比一次更足，可让武承嗣极度郁闷的是，武皇把这些高帽都笑纳了，却绝口不提立储之事。这情形就像贪官收了你的巨额贿款，却一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吗？

眼见武皇春秋已高，而自己也一年比一年老了，武承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春，他终于铆足了劲儿对储君之位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武承嗣收买了许多武皇身边的人，天天跟武皇吹风：“自古以来的天子，从没有立异姓人为储君的。”言下之意，只有武家兄弟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武皇听完后只是笑笑，始终不肯表态。

对武曌来说，“立储悖论”始终是她无法突破的困境。又或许在她看来，引而不发、悬而不决才是人君掌控权力的最高境界。换言之，只有把人人垂涎的香饽饽始终捂在手心里，她才能永远握有主动权。

可无论如何，这香饽饽迟早有一天是要给出去的。

这件事可以拖延，可以逃避，却不能当它不存在。

所以，一天不确立储君，武曌的心里其实和别人一样——一天也不得安宁。

就在这个时候，狄仁杰上场了。他对武曌说：“文皇帝（太宗李世民）栉风沐雨，亲冒锋矢，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高宗李治）以二子托付陛下。陛下如今却想把江山传给外族，这难道不是违背天意吗？况且，姑侄和母子哪一样更亲呢？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倘若立侄，则从没听说过侄儿做天子后，把姑母供奉在太庙里的。”

其实，狄仁杰的这套说辞和当初的李昭德如出一辙，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有些时候，把同样的道理不厌其烦地反复宣讲，却不见得是多余的。再者说，狄仁杰的人格魅力也和李昭德不同。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经常会碰见这种事情，同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甲说的我们听不进去，偏偏乙一说我们就觉得十分顺耳。眼下的女皇武曌也是，狄仁杰在她心目中的分量非他人可比，他的话自然也更有力量。所以狄仁杰一开口，武曌事实上已经听进了大半，可她嘴上还是不愿示弱：“此乃朕之家事，贤卿不必操心。”

狄仁杰寸步不让：“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哪一样不是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本来一体，况且臣备位宰相，岂能不操这份心？”话说到这，狄仁杰索性亮出底牌，请求武皇召回流放房州的庐陵王李哲，以安天下人心。

随后，老臣王及善等人也都和狄仁杰统一口径，屡屡对武皇发出劝谏。武曌更是心烦意乱，内心的天平开始朝儿子这边倾斜。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某一天晚上，武曌忽然做了一个怪梦，次日便召见狄仁杰，非常困惑地说：“朕梦见一只巨大的鹦鹉在空中飞翔，后来却两翅皆折，再也飞不起来，这是何故？”

狄仁杰一听，心中窃喜，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答道：“武（鹉）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

武曌脸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若有所悟。

人老了就容易迷信，容易受神秘事物影响。对于这个怪诞的梦境，除了狄仁杰的解释，武曌自己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所以，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武曌彻底打消了立武家子弟为储君的念头。（《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然而，不立侄子是一回事，什么时候立子，要立哪个儿子又是另一回事。武皇时年已经七十四岁，万一没来得及立储就驾鹤西去，那帝国的政局可就危险了。

其实，担心武皇身后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狄仁杰这样的正直朝臣，就连武曌的枕边新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极为忧虑。当然，他们担心的不是政局，而是他们自身的命运——万一老太婆哪天两腿一蹬，咱哥俩要靠什么混饭吃呢？

二张的这层恐惧被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当初一举把来俊臣送上断头台的酷吏吉顼。

这几年，吉顼已经成功转型，不再当那种没前途的酷吏了。他一方面和张氏兄弟打得火热，所以总能通过他们及时摸清武皇的心态，另一方面，他又密切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和演变。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观察，吉顼得出结论——未来的天下必定复归李唐。所以，要想确保日后的荣华富贵，就必须拥立庐陵王复位，借此捞取政治资本。

兹事体大，吉顼当然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因此便把目光锁定二张，决定通过他们向武皇施加影响。某日，吉顼用一种闲话家常的口吻对二张说："你们兄弟享有如此的富贵和恩宠，一不靠功业，二不靠品德，天下对你们侧目切齿的多了去了。如果不立大功于天下，何以自保呢？在下真是替二位担忧啊！"

吉顼一番话，准确命中二张的伤心处，二张哭丧着脸求他指一条明路。吉顼不慌不忙地说："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主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岂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资治通鉴》卷二○六）

二张一听，顿如茫茫黑夜里看见了一盏明灯，旋即依计而行，天天在武皇耳边吹风。武曌料定这两个绣花枕头不可能有这种政治头脑，这主意一定是吉顼教他们的，随即召见吉顼。吉顼好不容易得到了表态的机会，立刻施展他的滔滔辩才，反复为武皇分析利害，终于彻底打消了武曌残存的疑虑。

至此，女皇武曌总算打破了困扰她许久的"立储悖论"，决定把储君之位传给儿子。

帝国的未来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走向。

令人感觉吊诡的是，在这件事上，转型酷吏吉顼和一代名相狄仁杰居然同样立下了赫赫功勋。

当然，二者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狄仁杰纯粹出于公心，吉顼仅

仅是出于私利。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三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驾长途跋涉的马车悄悄驶进了洛阳，然后穿过人潮拥挤的天门大街，径直驶进了皇宫。

车上坐着庐陵王李哲的一家人。

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被赶下皇位贬出东都，到这一天归来为止，李哲与洛阳已经阔别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人生有多少个十四年？

李哲不知道。

他只知道，被流放的那一年他还是个血气方刚英俊挺拔的年轻人，而现在已经是一个满面风霜身体发胖的中年男子了。在历尽沧桑的十四年后，重返洛阳的李哲真是充满了一种劫后余生、恍如隔世之感。看着洛阳城内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木，望着太初宫华丽而森严的九重宫阙，李哲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淌下了两行清泪。

然而在感慨之余，李哲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困惑。

因为母亲武曌是以“庐陵王有疾，应回洛阳疗疾”为由把他暗中召回来的。

母亲这么做，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扇缓缓打开的宫门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李哲的内心一片茫然。

莲花似六郎：男宠的崛起

庐陵王李哲突然归来，受打击最大的人无疑就是武承嗣了。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处心积虑地折腾了这么多年，换来的居然是这样一种结果！

武承嗣从此万念俱灰，一蹶不振。

在愤恨与失落的双重煎熬中度过了几个月后，武承嗣终于在这一年八月一病而亡。

李哲的归来让武承嗣抑郁而终，却让另一个人大喜过望。

他就是在东宫中度日如年的皇嗣李旦。

随着那个喜欢当皇帝的三哥的归来，这个视权位如桎梏的弟弟顿时有了一种云开雾散的解脱之感——他终于可以重新回到他那闲云野鹤的生活中去了。

心情异常激动的李旦随即频频上表，请求将皇嗣之位还给他的三哥李哲。

圣历元年九月十五日，亦即李哲回到洛阳的半年之后，武皇终于颁下了一道诏书，册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同时恢复了他以前的名字——显。

跪地接旨的那一刻，李显激动得泪流满面。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在得到了以后再度失去。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也不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而是在失去了以后重新得到。

得而复失与失而复得，这两种生命中的极端境遇竟然让李显挨个尝了一遍，可见他是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幸运。在这仿佛蹦极一样的命运起落中，李显所体验到的人生况味一定比别人无奈得多，当然也比别人丰富得多。

在登基称帝的第七个年头，女皇武曌结束了酷吏政治；在第八个年头，她解决了令她牵肠挂肚的立储问题。做完这一切，七十四岁的武曌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如释重负的一刹那，女皇武曌明显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苍老。

那是一种年龄的苍老。

也是一种灵魂的苍老。

尽管到目前为止，她仍然是大周帝国至高无上的天子，尽管她手里仍

然握有威福刑赏之柄与生杀予夺之权，可武曌还是不由自主地发现——自己的心态正在发生某种微妙而重大的变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逐渐厌倦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越来越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诸如与宰相狄仁杰之间的君臣之情，还有与李显、李旦、太平、诸武之间的亲人之情，甚至包括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之情，都在她的内心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改变，所以武曌现在最不想看见的事情，就是亲人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

如何确保在自己百年之后，儿女和侄子们之间能够相安无事呢？

武曌为此绞尽了脑汁。

最后她想到了两个办法：一、立誓；二、联姻。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四月，武曌命李显、李旦、太平公主与诸武共同写下盟誓，保证今后绝不互相侵犯，然后在明堂祭告天地，最后又将誓文镌刻在铁券上，交付史馆永远收藏。随后，武曌又亲自做主，把李显的几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诸武：安乐郡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永泰郡主嫁给武承嗣之子武延基，新都郡主嫁给武承业之子武延晖。

武曌希望通过这两个办法，消弭武李之间的政治宿怨和利益分歧，帮他们树立起更为牢固的关系。

然而，尽管处心积虑地做了这么多事，武曌还是不能保证武李之间今后不生龃龉。

其实说到底，她做这些事情也只是图个心安而已。

因为武曌深知，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讲，权力的诱惑从来都要大于誓言的约束，同时也要大于亲情的牵绊。为了权力，誓言可以轻易撕毁，亲情也可以随时斩断。不要说别人，武曌自己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如果说权力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武曌想，那么人的感情就一定是铁匠铺里那红彤彤的铁水。只有让铁水冷却、凝固，再反复淬炼、锻打，最后才可能获得一把斩金断玉、削铁如泥的宝剑。这是必然的道理。你不可能既想得到宝剑，又不想让铁水凝固，就像你不可能既想

得到冷酷的权力，又不想失去温柔的感情一样。而一旦你的感情恢复了柔软，那就像铁水重新开始了沸腾，最终的结果就是销熔掉你手中的宝剑……

所以，武曌其实并不相信她的儿女和侄子们会因为立誓和联姻而放弃各自的权力野心。即使不相信，武曌还是不由自主地这么做了。

也许自己真的是老了。

武曌想，只有老人才有如此矛盾的心境和行为吧？

反正，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武曌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至于未来究竟怎样，那是儿孙们自己的事情。对于武曌来说，最重要的是现在。

武曌蛮喜欢目前这种轻松逍遥的生活状态。外朝的政务有狄仁杰、魏元忠这些能臣在帮她打理，宫里有张易之、张昌宗这对玲珑剔透、善解人意的宝贝随侍在侧，膝下还有一大群孝子贤孙日夜环绕……

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武曌现在只希望这种日子长一点，长一点，再长一点……

和女皇武曌的心愿一样，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眼下最渴望的，也是武皇能够长命百岁。

因为武曌是他们的庇荫大树，是他们的富贵源泉，是他们飞黄腾达的唯一靠山。没有了武皇，他们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二张在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入宫，他们是高宗时代的宰相张行本的族孙，不仅人长得明眸皓齿、玉树临风，而且因为出身名门，从小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所以气质优雅，颇具艺术才能，尤其擅长音乐。

最初看上二张的人是武曌的女儿太平公主。就像当初的千金公主在享用了冯小宝之后慨然将其转赠给武曌一样，太平也是个孝顺女儿，自己试过之后觉得好，便十分慷慨地献给了母亲。刚开始是张昌宗先入的宫，得宠之后又把异母哥哥张易之也推荐给了武皇，从此兄弟俩便天天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脸上涂着香喷喷的脂粉，成双结对地陪伴在武皇身边。

每天被这两个花样美男伺候得舒舒服服，武曌感觉自己枯皱的肌肤似

乎又重新舒展开来，而布满了岁月之痕的脸庞也再度焕发出了神奇的光泽。

女皇一爽，乌纱自然就不在话下。张昌宗很快就被封为散骑常侍，张易之也官至司卫少卿。而且武皇还爱屋及乌，把二张的两个母亲都封为太夫人，前后赏赐的钱物不可胜计。更有甚者，武曌还专门为张易之的母亲臧氏指定了一个情人。她特地颁下一道敕书，命长相俊美的凤阁侍郎李迥秀去给这个臧太夫人当“私夫”，说白了就是当一个“合法奸夫”。可怜李迥秀不仅白天要在朝堂上奉旨办公，晚上还要到臧太夫人府上“奉旨通奸”，个中凄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后来可能是李迥秀的妻子摔破了醋坛子，搞得李迥秀两头不是人，只好忍痛把妻子休了。当然，李迥秀表面的休妻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说妻子经常呵斥奴婢，惹得他老母不高兴，为了孝顺老母才不得不休妻云云。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迥秀纯粹是因为奉旨通奸才导致家庭破裂的。当然，李迥秀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几年后便青云直上，官至宰相。

二张如此得宠，诸武自然就趋之若鹜了。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等人，争相为二张牵马执辔，就像当初捧薛怀义的臭脚一样。为了和二张拉近关系，诸武还十分亲昵地称张易之为五郎，称张昌宗为六郎。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正月，武曌为了得到更多的男宠，就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名为控鹤监，后来又改名奉宸府。可不管是控鹤监还是奉宸府，其性质就是武曌的“男宠俱乐部”。她命二张主持工作，专门招收一些婀娜多姿的美少年和一帮轻薄文人进去当“供奉”。

那些日子，武曌几乎天天带着诸武和一帮佞臣在此饮酒作乐。席间武三思常常不失时机地拍二张马屁，有一次居然说张昌宗是神仙王子晋转世。王子晋原为周朝太子，清静寡欲，仁厚爱民，然而不幸早夭，百姓出于敬意，就传说他是坐着仙鹤升天而去，羽化成仙了。

武曌一听大为高兴，就让张昌宗穿上羽毛编织的衣裳，坐在木制的仙鹤上，然后一边吹笙，一边做着飞翔的动作。那一刻的张昌宗真的是恍若天人，武曌不禁深深地迷醉，陪坐的一干御用文人也纷纷作诗赞美。有人盛赞张昌宗貌似莲花，众人纷纷附和，唯独宰相杨再思一脸正色地说：“不对！怎么能说六郎像莲花呢？应该是莲花像六郎才对啊！”

众人闻言，顿时对杨再思的谄媚功夫大为叹服。

宰相就是有文化啊，连马屁都能拍得如此诗意盎然，别出心裁！

由于杨再思的摇尾功夫天下无双，时人就送给他一个外号——“两脚狐”。

自从武皇设立了这么一个男宠俱乐部，很多人都蠢蠢欲动，争着要进奉宸府，其中不仅有民间的美少年，同时更有朝廷官员。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当时有一个叫朱敬则的谏官实在看不下去，就向武曌上奏说：“陛下内宠有易之、昌宗就足够了。可臣最近却听说，有很多官员不知羞耻，都毛遂自荐要进奉宸府，这一丑闻已传遍朝野，社会影响非常不好。臣的职责是谏诤，不敢不奏。”

武曌闻奏，顿时有些难堪，于是想出了一个掩人耳目的办法，命二张牵头，召集了一帮文人学士，开始编纂一部大型诗集，名为《三教珠英》，亦即选取儒释道三家的代表性诗歌汇编成册。当时参加编纂工作的，就有著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人，还有李峤、李迥秀等朝中政要。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二张贵宠无比，他们的弟弟，时任洛阳令的张昌仪便因此肆无忌惮，公开卖官鬻爵。有一天上朝，一个姓薛的候补官员拦下他的马，当街行贿求官，送给他黄金五十两，并递上了一份履历表。张昌仪上朝后就把履历表交给了天官（吏部）侍郎张锡。几天后张锡把履历表弄丢了，就询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你这糊涂虫！我怎么记得他的名字？干脆这样，凡是姓薛的都给他官做！”张锡惶恐不已，回到吏部一查档案，一共有六十多个姓薛的候补官员，张锡不敢违背张昌仪的意思，只好横下一条心，全部任官。

既然连弟弟都能如此飞扬跋扈，一手遮天，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把主管官员视同奴仆喝来骂去，那么二张的气焰之盛与权势之隆就不难想见了。

在武曌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帝国的政治形势表面上风平浪静，背地里却是暗潮汹涌。

随着庐陵王李显的入主东宫，所有人都知道李唐的复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与此同时，诸武却仍然身居要津，且仍受武皇宠幸，这种矛盾局面的背后无疑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尽管武曌极力想要撮合李武，但是谁都很清楚，这两股政治势力始终是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去的。他们之间的博弈必将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一直延续下去，而未来的政局究竟将如何演变，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正月，终于有一个人成了李武暗中角力的牺牲品。

他就是吉顼。

因拥护庐陵王之功，吉顼已经官至吏部侍郎兼宰相，且被武皇视为心腹。吉顼为此深感得意，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一次政治选择，而且只要继续站在这个政治队列中，今后的仕途必将一帆风顺。然而吉顼似乎没有意识到，正因为他在拥护庐陵王这件事上表现得太过锋芒毕露，所以早已成为诸武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而武皇介于李家和武家之间，其心态也一直是复杂而矛盾的。可吉顼却被自己迅速到来的成功所陶醉，并未充分意识到诸武的敌意，更严重低估了诸武在武皇心目中的分量，因而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和前程。

事情缘于这年正月的一次朝会，当时吉顼因某事与武懿宗争功，双方当着百官和武皇的面大吵起来。吉顼身材魁梧，声若洪钟，原本口才就十分了得，一吵起架来更是声色俱厉，咄咄逼人；而武懿宗则矮小伛偻，一激动就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所以这场架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吉顼居高临下，气势汹汹，武懿宗则是结结巴巴，汗如雨下。

武皇端坐在御榻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中大为不悦。当天散朝后，武曌便对左右说了这么一句话：“吉顼在朕的面前，尚且看不起我们武家人，要是到了将来的某个时候，这种人岂能依靠？”

吉顼就此彻底失去了武皇的信任。

可他似乎对此浑然不觉。

后来有一天，吉顼奏事的时候，又在武皇面前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武皇终于勃然大怒，厉声打断了他：“够了！你这一套朕早就听够了，朕不想再听你的废话！”随后，武皇就抛出了她那个经典的“狮子骢故事”。她说：“太宗有马名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资治通鉴》卷二○六）

你难道自认为有资格弄脏朕的匕首吗？

最后这一句让吉顼心胆俱丧，如梦初醒。他极度惶恐地拜倒在地，频频磕头请求武皇恕罪。然而，现在清醒已经来不及了。诸武随后便群起而攻，指控他帮助弟弟诈冒资荫骗取官职，武皇旋即将吉顼贬为安固（今浙江瑞安市）县尉。

从一个堂堂宰相贬为边远地区的九品小吏，吉顼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临走之前，吉顼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去向武皇辞行，说：“臣今远离朝廷，今生恐无再见之期，想说一句话。”武曌让他坐下，问他想说什么。吉顼说：“土和水，和合成泥，二者会不会争执？”

武曌说：“那当然不会。”

吉顼又说：“如果分一半塑造佛像，另一半塑造道家天尊呢？”

武曌说：“那争执就大了。”

吉顼倏然起身，倒头便拜，朗声说：“宗室、外戚若能各安本分，则天下安宁。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然为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日后互相争斗，使双方都不得安宁啊。”

无论吉顼临行前的这番进言是否包含私心，这句话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

武曌听完后怅然一叹，说：“朕也知道……可是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吉顼张口还想说什么，武曌已经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吉顼彻底绝望，当天就失魂落魄地踏上了贬谪之途，不久后就在贬所抑郁而终。

吉顼的落败固然与他的骄矜自负和锋芒毕露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武曌容不下他。对于此时的武曌而言，尽力调和李武，维持李武的政治均势和利益平衡是她最重要的任务，吉顼在“李弱武强”的时候拥护李家，这当然符合武曌的原则，所以吉顼才能够青云直上。但是到了庐陵王被立为太子之后，吉顼却不知道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姿态，仍然在“尊李卑武”的道路上高歌猛进，这当然就极大地触犯了武曌的原则。

就像武曌与吉顼的最后那场对话所反映出来的一样，虽然武曌明知道自己的“平衡原则”实际上是在掩盖矛盾，不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武曌却宁可这么做。因为她并不希望为了解决问题，而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见李家和武家任何一方遭受损害。至于吉顼所说的李武的矛盾会在未来激化，那就不在武曌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换言之，对于眼下的武曌来说，搁置矛盾远比解决问题更聪明，在和稀泥中保持各方的相安无事也远比用自己的右手砍断自己的左手更明智！

从这个意义上说，吉顼的丢官和仕途命运的变化，就不仅是李武暗中

角力的结果，同时更是武曌矛盾心态的写照。

久视元年的吉项事件充分说明，李武之间的政治宿怨已经为帝国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而这几年来，李武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势力——以二张为代表的男宠又忽然间强势崛起，顿时使得未来的政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武曌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作为几十年来帝国的实际掌舵者，她的铁腕统治固然严厉而高效，能够在大体上维持政局的稳定，但恰恰是这一点加大了未来的变数。因为这种极权型的政治领袖一旦过世，所有被压制着的矛盾就必然会集中爆发，宗室、外戚与男宠这三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势力也势必会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展开殊死博弈，到那时候，局面会不会变得不可收拾？

久视元年深秋的一天，帝国朝堂上一位德高望重的栋梁人物又在萧瑟的秋风中溘然长逝，更是让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感到忧心忡忡，同时也让年老的女皇武曌感到了巨大的悲伤和失落。

这个人就是狄仁杰。

重归长安

狄仁杰一生中两度拜相，加起来的时间总共也才三年多，但却比武周一朝的任何一个宰相更让武曌尊重和信任。因为狄仁杰的人格魅力确实非一般人臣可比。综观狄仁杰宦海浮沉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儒家的理想人格“三达德”来概括，那就是——智、仁、勇。

“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面对酷吏的陷害善于权变，这就是“智”；始终坚守道德原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尤其珍爱百姓生命，这就是“仁”；身为刺史，为了维护百姓利益而不惜与宰相公然反目，这就是“勇”。

女皇武曌一生中接触过无数官员，也曾经为了改朝换代和巩固政权而屡屡任用小人和酷吏，但是她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人，往往是利用完后就毫不留情地兔死狗烹。而对于像狄仁杰、娄师德、魏元忠这种德才兼备，有经有权的能臣，武曌却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并最终都能予以重用。

出于对狄仁杰的尊重，武曌常称呼他“国老”而不称其名，甚至当狄仁杰因重大问题而屡屡与她面折廷争时，武曌也总能“屈意从之”。狄仁

杰常以年迈多病请求致仕，武曌始终不许。每当狄仁杰上殿，武曌总是免其跪拜，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资治通鉴》卷二○六）并且特许狄仁杰不用入朝值宿，还叮嘱百官说："除非军国大事，否则一般政务都不要去麻烦狄公。"种种殊荣，在武周一朝的文武百官中可谓绝无仅有。

惊闻狄仁杰去世的噩耗时，武曌忍不住潸然泪下，悲泣不止，过了好长时间才喃喃地说："朝堂空了，朝堂空了……"从此每当朝廷遇到大事，而百官又商议许久不能定夺时，武曌就会不由自主地仰天长叹："老天为何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

狄仁杰虽然走了，来不及亲眼看见李唐的光复，但他却引荐了一大批人才进入朝廷，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臣。比如玄宗一朝的名相姚崇（初名姚元崇），以及数年后发动政变光复李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都是狄仁杰大力引荐的。有人曾经对狄仁杰感叹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的回答是："荐贤为国，非为私也。"（《资治通鉴》卷二○六）

作为日后光复李唐的首席功臣，老臣张柬之的起用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武曌经常让狄仁杰荐贤举能，有一天对他说："朕非常想提拔一位奇才，国老有这样的人选吗？"

狄仁杰说："不知道陛下用他做什么？"

武曌答："欲用为将相。"

狄仁杰说："以臣看来，陛下若只是想得到文人学士，则如今的宰相苏味道、李峤等人都是合格人选。臣斗胆估计，陛下是嫌这些文臣庸碌无为，所以想另择人才，以经纬天下，不知是否？"

武曌笑了："国老深知朕心。"

狄仁杰向武皇郑重地一揖，说："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长久怀才不遇，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

武曌微微颔首，随后便把张柬之擢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她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说："臣上次推荐的张柬之，陛下尚未起用。"武曌说："早就擢升了。"狄仁杰不以为然地说："臣推荐的是宰相，不是司马。"武曌略显尴尬地笑了笑，不久就把张柬之擢为秋官（刑部）侍郎，最后果然拜为宰相。

如果不是狄仁杰的坚持举荐，籍籍无名的张柬之绝不可能在年逾八旬

的时候才入阁拜相，更不可能在八十多岁高龄发动神龙革命，匡复李唐社稷。

事后来看，狄仁杰当初所说的“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果然得到了应验。仅此一点，足以证明狄仁杰确实具有高度的识人之智，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然而，当须发苍苍的张柬之在几年后的某一天突然率领士兵出现在武曌面前的时候，武曌一定会为自己当初听信狄仁杰之言提拔了这样一位“奇才”而痛悔不已。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狄仁杰去世的一个月后，亦即久视元年十月，武曌下诏宣布：废除实行了十一年的周历，恢复李唐王朝使用的夏历。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表明女皇已经着手准备回归李唐了。

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七十七岁的女皇武曌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秋风中的草木一样迅速枯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眼前似乎始终笼罩着一层薄雾，而耳朵仿佛也被塞进了两团棉花，所见所闻都是那样的模糊而飘忽。身体的迟钝和老化让她的心思时常变得恍惚而慵懒，对于政事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倦怠之感。

所幸身边还有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小情人。

如果说他们早先带给女皇的更多的只是床笫之欢，那么他们现在对于女皇则是兼具耳目喉舌之用了。

是的，两兄弟现在已经成了女皇延伸在外的耳目喉舌，朝堂的很多事情都是通过他们传递给女皇的，而女皇的很多旨意自然也要通过他们传达给朝臣。

古往今来，所谓的弄权之臣就是这么产生的。

就像吉顼所说的那样，二张专以美色得宠本来就已经让天下人“侧目切齿”了，如今他们趁武皇年迈又得寸进尺地弄权揽政，自然更是让朝野上下感到义愤填膺。

这年深秋的某一天，有三个年轻人就聚在一起谈起了这个话题。

他们是太子李显的嫡长子邵王李重润，还有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夫婿、武承嗣的嫡子魏王武延基。这一年，李重润十九岁，永泰郡主十七岁（已经身怀六甲即将临盆），武延基也比他们兄妹大不了几岁。年轻人都比较容易冲动，说起话来口无遮拦。这天他们偶然议论起了二张，说着说着嗓门就大了，话也越来越难听了，最后还牵

扯到了他们的祖母武曌，自然也没什么好话。

三个年轻人一通发泄之后，话题慢慢就转到了别的地方，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番话竟然会给他们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因为隔墙有耳。

李重润的异母弟弟李重福无意中听见了这些话。

而李重福的老婆就是张易之的外甥女，所以这番话很快就传进了二张的耳中。二张气得直跺脚，马上去找武皇告状，而且还添油加醋地形容了一番。

女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太子李显第一时间被叫到了武皇面前，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等到他听明白事情的原委，全身的衣服已经被瞬间爆出的冷汗浸透了。武皇最后余怒未消地扔给了李显一句话——回去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子女和女婿，让他们别太放肆了！

李显木立当场，整个人都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攫住了。这十几年来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好不容易重见天日当上了太子，没想到子女和女婿竟然给他惹来了如此的滔天大祸……怎么办？母亲让他“好好管教”究竟是什么意思？

李显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东宫，最后咬咬牙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寒而栗的决定——逼令李重润和武延基自杀！

在犹如惊弓之鸟的李显看来，不管母亲那句话意味着什么，自己都必须下狠手。因为母亲完全有可能借这件事情来试探他的忠诚度，倘若无法给母亲一个圆满的交代，等待他的必将又是贬黜流放的命运。这几十年来他已经看过了太多的流血和杀戮，也一次次领教了母亲铁血无情的手段，所以，无论心里再苦、再痛、再不舍，他也必须壮士断腕，丢卒保车！

就这样，正值青春年华的李重润和武延基同时被逼自尽。稍后，身怀六甲的永泰郡主受不了如此严重的打击，婴儿早产死亡，本人也在无尽的痛苦和凄凉中死去。

一番激愤之词，就葬送了三条犹如鲜花一般刚刚绽放的生命，还外加一朵夭折的蓓蕾。

没有人知道女皇武曌听到这个消息时会作何感想——是对儿子李显的忠诚感到满意和欣慰，还是痛心于李显错解了她的用意？

没有人知道。

人们只知道经过这件事后，二张和他们的兄弟就更加一手遮天，势倾朝野了。

就在这幕惨剧发生的一个月后，武曌忽然颁布了一道敕令，命太子、相王及文武百官全部跟随她西返长安，同时大赦天下，改元长安。

自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离开长安东赴洛阳，武曌已经有整整二十年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了。虽然这里承载着她出生、成长、奋斗、挣扎，以至最后获得成功的全部记忆，但是武曌对于这片土地却没有多少好感。

原因只有一个——这是李家王朝的龙脉，是大唐帝国的象征。

在这里，武曌难免会有一种鹊巢鸠占的尴尬，而只有在洛阳，她才会有一种我主沉浮的自信。所以，她不愿意回来。

不过今天，她终于还是回来了。

龙首原上高高矗立的宫阙还是像当年那样壮丽巍峨，长安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看上去依旧是那样熟稔而亲切，一切似乎都和她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星移斗转，物是人非。二十年时光就像一簇璀璨的烟花，刹那绽放，刹那凋零。当年那个英姿勃发的天后武媚仿佛刚刚离开，而今这个白发苍苍的女皇武曌已经悄然归来……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

带着二十年恩怨交织的情感，带着二十年山重水复的记忆，带着一个老人乡音未改鬓毛已衰的悲欣与惆怅，武曌终于回到了她梦想开始的地方。

女皇武曌的归来无疑昭示着帝国的政治重心已经从洛阳回归长安，同时也等于是向天下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李唐的复国已经为期不远了。

似乎是为了加强这个信息，武曌随后又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牧，亦即李唐龙兴之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后来又将其调任雍州牧，成为京畿地区的军政首长，一步步扩大了相王李旦的权力。此外，武曌又先后任

命了好几个德才兼备的实干型宰相兼任太子李显的东宫属官，如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等。

有心人不难发现，武皇已经悄然启动了权力交接的进程。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平民苏安恒公然上书劝武皇尽早还政李唐，而且措辞非常露骨，几乎没有给武皇留半点面子："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要是在以前，有人胆敢这么跟武皇说话，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可现在武皇看完后只是淡然一笑，虽然没有采纳，但也不加罪。

稍后，武曌又下令："自今有告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宣布各级官府从此不再追究参与徐敬业和李唐诸王叛乱的人。不久，又派御史"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资治通鉴》卷二○七）。也就是为来俊臣等人所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女皇武曌就像一个在海边堆筑沙堡的孩子，正在一点一点地推倒她曾经努力建造的一切。

首先当然是从那些看上去不太舒服的地方开始。

虽然女皇不动声色，动作缓慢，但却目光坚定，有条不紊，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沙堡不久就将从世界上消失，成为人们心中或眷恋或厌憎的一份记忆。

然而事情还是出现了不可预料的变化，使女皇推动沙堡的那只手忽然停了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变故缘于女皇宠爱的二张。

男宠乱政

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老了，有两样指标通常很准确：一、这个人清晰地记得久远的事情，但常常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二、看得清远处

的东西，却看不清近处的事物。

垂暮之年的武皇就是这样子。

她对于武周革命时期的弊政心知肚明，所以老来才会逐步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可对于枕边的两个小情人却一再纵容，对他们肆无忌惮地弄权乱政根本不以为意。

所以说，女皇武曌真的老了。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八月，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联名上表，请求封张易之、张昌宗为王。此举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天下，二张俨然已是女皇武曌的代言人，是大周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无论是李唐宗室、武氏诸王，还是满朝文武，都只能对他们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因为巴结讨好他们，就等于是向女皇表示敬意和效忠。既然如此，太子兄妹们的这种做法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二张毕竟只是男宠，受封异姓王实在过于扎眼，武皇只好拒绝了太子兄妹的奏请。可李显等人却不屈不挠，数日后再度上表。武皇一看儿女们如此盛情，也就不好再拒绝，于是退而求其次，赐张易之为恒国公，张昌宗为邺国公，各封食邑三百户。

连堂堂的帝国储君都要千方百计地向二张献媚，当朝宰相们就更要不遗余力地巴结他们了，如参与《三教珠英》编纂的李峤、忙着和二张攀亲戚的韦嗣立、说莲花似六郎的“两脚狐”杨再思、凡事模棱两可但求明哲保身的苏味道、奉旨通奸搞得家庭破裂的李迥秀等人，几乎都投靠于二张门下，溜须拍马，百般逢迎，一心一意受其驱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宰相都是这样的软骨头。

有一个人就自始至终不愿向二张摇尾乞怜，更不愿与其同流合污。

他就是时任左肃政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魏元忠。

几年前魏元忠担任洛州长史时，恰好是洛阳令张昌仪的顶头上司。张昌仪仗着两个哥哥的权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却一贯骄狂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每次到州府公干都是鼻孔朝天横着走的。前几任长史都对他阿谀谄媚犹恐不及，当然不敢有半点得罪，对他比对宰相还尊重。有一天张昌仪照旧大摇大摆地闯进长史办公室，里面的人忽然把他轰了出来，命他按规矩乖乖到走廊外面排队等候。张昌仪恼羞成怒，一问才知道此人是新任长史魏元忠。这件事过去没多

久，张易之的一个家奴又在洛阳街市闹事行凶，魏元忠毫不客气，一抓到这个恶奴就把他杖杀了。从此张氏兄弟更是对他恨之入骨。

后来，魏元忠当上了宰相。有一次雍州长史出缺，张易之想让他的弟弟，时任歧州刺史的张昌期接任，武皇马上就答应了，其他几个宰相也纷纷附议表示赞同，唯独魏元忠坚决反对："张昌期年纪太轻，没有行政经验，在歧州任内，居民几乎全逃光了。雍州是帝京，政务繁重，张昌期绝对不够资格。"

武曌默然，此事遂不了了之。过后魏元忠又面奏武皇，说："臣自先帝时代起蒙受皇恩，而今忝居宰相之职，不能尽忠职守，致使卑劣小人充斥陛下左右，这是臣的罪过！"

武曌心里大为不悦。

二张更是对魏元忠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除掉他。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七十九岁的武皇开始病魔缠身了。二张顿感不妙，于是决定对魏元忠下手。九月初的一天，张昌宗突然向武皇递上一纸诉状，指控魏元忠私下与人议论："太后老了，不如辅佐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二张的这项指控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魏元忠以宰相之尊兼任东宫属官，其政治立场自然是倾向于太子的，所以这项指控很容易让生性多疑的女皇相信。其次，由于二张不久前间接逼死了李显的儿女、女婿和外孙，这不仅彻底抵消了他们拥立太子复位的功劳，而且还与太子结下了血仇，如此一来，二张肯定会担心太子即位后找他们报仇，于是不如来个一箭双雕，利用这项指控把太子李显一块儿整倒。

不出二张所料，武曌一看到诉状便勃然大怒，立刻把魏元忠逮捕下狱，并命他第二天在朝堂上与张昌宗当廷对质。

为了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二张决定找一个人出来作伪证。

他们找到的这个人叫张说。

张说是武曌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开制举时通过殿试亲自录取的第一个状元郎，称得上是朝野知名的大才子，曾参与编纂《三教珠英》，时任凤阁舍人。二张对他软硬兼施，既以权势相逼，又以富贵相诱。张说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翌日，武曌召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各位宰相在朝堂上旁听。魏元忠和张昌宗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吵来吵去也没一个结果，最后张昌宗使出杀手锏，说：“张说听过魏元忠讲的话，可以让他作证。”

武曌随即传唤张说上殿。

此时，一批拥护李唐的朝臣正在殿外焦急地关注着事态发展，因为此事牵连太子，万一魏元忠之罪坐实，那太子无疑也要身处险境。

就在这时候，张说匆匆而来的身影映入了大家的眼帘。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其时与张说同任凤阁舍人的宋璟，立刻冲上去拉住张说的手，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依附奸邪陷害君子以求苟免，即使因此获罪流放也不失荣耀。若有不测，我当叩开殿门，据理力争，与你同死！请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

此时其他的朝臣也纷纷上前为张说打气。殿中侍御史张廷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也说：“不要在青史上留下污点，让后世子孙背负骂名！”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张说的立场开始动摇了。关键倒不是众人的道德说教激励了他，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选择重新进行了考量。他很清楚，二张无德无功，仅以美色事人，其荣宠不可能维持长久，等到女皇一死，他们必定没有好下场。倘若今天替他们诬陷魏元忠和太子，来日一旦太子即位，自己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可是，要不听他们的，所有的富贵和前程恐怕在今天就得断送。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这是一个问题。

张说就这样带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迈上了大殿。

武曌迫不及待地问他，是否听过魏元忠的大逆不道之言。张说正在沉吟，还没来得及说话，魏元忠就冲着他喊：“张说，你打算和张昌宗联手陷害我吗？”

张说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这个宰相说话怎么跟市井小民一个口气，怎么听风就是雨？”

张昌宗在一旁催逼他废话少说，赶紧作证。

这时候张说已经打定主意：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宁可吃些眼前亏，也

决不能把身家性命和仕途前程寄托在随时有可能垮台的二张身上。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说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虽然因此暂时遭到了贬谪流放的命运，但是很快就重返朝堂，在后半生中三度出任宰相，可谓位极人臣，被世人誉为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代文宗”。

决心已定，张说看都不看张昌宗一眼，仰头对着武皇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张昌宗尚且如此逼迫，何况在外呢？臣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敢不据实回答，臣实在没有听见魏元忠说什么话，完全是张昌宗逼臣作伪证！”

此言一出，旁听众人顿时哗然，没有人想到张昌宗自己找来的证人居然临阵倒戈。

二张暴跳如雷，厉声高喊：“张说也参与了魏元忠的谋反，他们都是反贼！”

这下连武皇也蒙了，她脸色一沉，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二张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人一句抢着说：“张说曾经说过魏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放太甲，周公代王位，不是想造反是什么！”

二张话音未落，张说旋即发出几声冷笑：“你们这两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只听过伊尹、周公之事，何尝得闻伊尹、周公之道！没错，魏元忠荣任宰相之日，臣确曾前往道贺，并勉励他以伊尹、周公为楷模，只因伊尹辅商汤，周公辅成王，皆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教他效法伊尹、周公，教他效法谁？臣岂不知今日附张昌宗立可拜相，附魏元忠立致族灭！但是，臣畏惧魏元忠冤魂不灭，故不敢任意诬陷。”

“张说！”武皇歇斯底里地喊，“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应该和魏元忠一起被扔到监狱里！”

几天后，武曌又传唤张说，他还是那些话。武曌怒不可遏，命各宰相会同河内王武懿宗一起审理，张说仍然坚持初供。

魏元忠被诬下狱，张说因不作伪证也身陷囹圄，朝野上下顿时群情哗然。正谏大夫兼宰相朱敬则当即上疏抗辩：“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那个曾劝武皇还政李唐的平民苏安恒也再次上书，依然是一副毫无顾忌的口吻：“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恟恟，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

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资治通鉴》卷二○七）

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苏安恒一介平民，却敢于三番五次上书直谏，触逆龙鳞，除了个人的忠义和胆识之外，也足见长安确实是李唐的命脉所系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一日也不曾忘却李唐。

二张看到苏安恒的奏书时，不禁勃然大怒。一个小老百姓，居然也敢用这种口气跟皇帝说话，还说什么“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这不是公然煽动百姓造反吗？二张随即力劝武皇诛杀苏安恒，幸得朱敬则和凤阁舍人桓彦范等人力保，苏安恒才免于一死。

这年九月，闹得沸沸扬扬的魏元忠案终于尘埃落定。武曌颁下一道敕令，将魏元忠贬为高要（今广东高要市）县尉，将张说流放岭南。

这个结果当然令二张很不满意。

他们的目标是要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如今只不过是贬官，日后一旦复出，岂不是要找他们算账？

数日后，魏元忠启程前往贬所，东宫官员崔贞慎等八人在郊外为他饯行。二张抓住最后的时机，再次诬告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同谋造反。武曌命监察御史马怀素审理此案，特意交代说：“此案证据确凿，随便审一下，马上结案上报。”马怀素审问之后，认为查无实据。武曌大怒：“你是不是想包庇谋反之人？”马怀素面不改色地说：“臣不敢包庇谋反者。但是魏元忠以宰相身份贬官，几个同僚出于旧情为他饯行，若说这就是谋反，臣不敢定案。陛下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大可圣衷独断；若命臣审理，臣不敢不据实奏报！”

武曌真的没有料到，一个魏元忠的案子，竟然让朝野上下如此同仇敌忾，把矛头全部对准了她宠爱的人，并且还隐隐指向了她。

其实武曌并不是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不听话的朝臣，她只需再起用一两个酷吏似的人物，就足以让这些人全部钳口了。但问题在于，今日的女皇已经没有那份心力，也没有那份狠劲在朝堂上重新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更何况当初是为了篡唐称帝、巩固政权，因而不得不杀戮立威，可如今不过是两个小情人在耍脾气，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武曌固然是宠着他们，但她并不希望因此把自己摆在大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

最后，案子不了了之，除了魏元忠与张说被贬谪流放之外，其他人一

概不予追究。

魏元忠一案虽然就此了结，没有给朝廷带来更大的危害，最后也没有牵连到太子李显，但却导致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结果——这年十月，武曌突然带着文武百官离开长安，又回到了洛阳。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武皇不顾病体和旅途颠簸，决意重返武周王朝的大本营呢？

拥护李唐的朝臣们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和困惑。本来一心盼望武皇能够在长安进行权力交接，正式还政于李唐，没想到让二张这么一折腾，武皇与太子、朝臣之间的关系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回归李唐的进程也随之中断。

接下来，太子能否顺利继位？李唐能否顺利复国？二张还会干出什么出格离谱的事情？拥李派的大臣又将如何应对？

这些问题就像一团迷雾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大臣与男宠的博弈

在武皇的庇护和纵容下，二张的私欲和野心就像春天里无人修剪的藤蔓一样疯狂滋长。回到洛阳之后，他们不仅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包揽朝廷的大型土木工程，营私舞弊，上下其手，从中获取的非法所得不可胜计。与此同时，他们的几个兄弟也再度鸡犬升天——原洛阳县令张昌仪升为尚方少监，曾被魏元忠阻挠而未获升迁的张昌期出任汴州刺史，还有一个哥哥张同休也升为司礼少卿。

真可谓一门贵盛，举世无匹。

看着这帮鲜衣怒马、年少轻狂的张氏兄弟，世人的目光无比复杂，既充满了痛恨和不齿，也饱含着羡慕和嫉妒。

是的，少年得志确实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高官显爵，豪宅香车，钟鸣鼎食，肥马轻裘，醇酒美人，艳舞笙歌，还有每日每夜释放不尽的激情，外加大把大把挥霍不完的青春……如此种种，自然惹人艳羡。然而，正所谓“天欲福人，先以微祸警之；天欲祸人，先以微福骄之”。年轻人未被老天打过“微祸”的预防针，不知世路艰辛，不懂

人生无常，所以一朝富贵，便极易产生天之骄子的错觉，从而迷失自我，任凭欲望泛滥，因此弥天大祸也就随之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的张氏兄弟们仿佛就是在一把名叫“灾祸”的刀子上，舔着一种名叫“富贵”的蜜，只是年少轻狂的他们何尝想过，这种刀头之蜜舔得了一时，又岂能舔得了一世？

其实，洛阳的百姓就曾向张昌仪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和质问。当时张昌仪在大肆贪贿之后用不义之财盖起了一座美轮美奂的豪宅，其奢华程度远远超越了亲王和公主的府邸。张昌仪为此得意非凡，有一天早上醒来，却赫然发现朱漆大门上被人写了这样一行字：一日丝能做几日络？

“丝”与“死”谐音，“络”与“乐”谐音，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日死能做几日乐？你随时会完蛋，还能快乐几天？

张昌仪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然而他读不懂背后那种祸福无常的道理。他站在那儿翻了一会儿白眼，就命下人把字擦掉了。第二天，这行字又出现了，张昌仪又命人擦掉。可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同样的字天天出现，写字的人非常执着，似乎要跟张昌仪耗到底。第七天，张昌仪支着下巴在门口站了半天，最后提笔写了四个字——一日亦足！

张昌仪的办法果然奏效。不知道是写字的人厌倦了这场无聊的游戏，还是他终于看透了张氏兄弟无可救药的卑劣本性，总之，自从张昌仪给出这个无知无畏的答案之后，那行字就再也没出现了。

张昌仪说：快乐一天就够！

这是张氏兄弟的心里话吗？

当然不是。

他们这是在向洛阳百姓和朝中大臣示威——俺们就是要把快乐进行到底，有种你们就放马过来！

对于恃宠擅权并且严重阻碍李唐复国的张氏兄弟，拥护李唐的朝臣们当然不会没有办法。这几年来，他们一直在暗中搜集张氏兄弟贪赃枉法的证据，只等着证据确凿后对他们发起致命一击。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七月十二日，张氏兄弟的所有犯罪事实突然被全部曝光。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武皇只好让有关部门逮捕了张昌仪、张同休、张昌期，命左右御史台共同审理。数日后，朝臣们又发

出了对张易之和张昌宗的指控。迫于压力，武曌最后不得不同意对二张立案审查。

然而，总有一些软骨头是照着女皇的旨意行事的。十八日，司刑正（相当于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敬言拿出了一份判决，说："张昌宗强买别人田地，应罚铜二十斤。"

亏这位贾兄想得出来！一起重大的贪污受贿案到他这里就成了轻描淡写的强买田地，而且惩罚手段轻得连屁都不算，什么二十斤铜，就算两百斤黄金对张氏兄弟来讲也只是九牛一毛，遑论二十斤铜！

武皇对这个结果显然非常满意，赶紧朱笔一挥：可！

倒张派大臣当然不会让二张就这么逍遥法外。在数日后举行的朝会上，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发动神龙政变的五大臣之一）拿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判决："张氏兄弟贪污的赃款共计四千余缗，应该依法将春官（礼部）侍郎张昌宗免职。"

张昌宗当场跳了起来，面对武皇大喊："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

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纷纷窃笑，一个靠床上功夫得宠的家伙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什么"有功于国"，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武皇也略微有些尴尬，只好把脸转向几个亲附二张的宰相，说："昌宗是不是有功？"

一代摇尾宗师，江湖人称两脚狐的杨再思马上抢着说："张昌宗研制神丹，圣躬服之效用显著，此乃莫大之功！"

武曌笑了，要的就是这句话。随后她便赦免了张昌宗，让他官复原职，同时也作出了适当的妥协，把张昌仪贬为博望县丞，张同休贬为岐山县丞，希望以此平息倒张派大臣的愤怒。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倒张派大臣绝不会就此收手。不久，宰相韦安石和唐休璟又对张易之提出了指控。这两个人可谓倒张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因为他们不仅是宰相，而且还兼任东宫的左庶子和右庶子，属于拥护李唐的核心力量。他们一出手，事态顿时有扩大升级的倾向。武曌感到苗头不对，干脆颁下一纸诏书，把韦安石贬为检校扬州长史，命唐休璟出任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

倒张派大臣接连发动了好几波攻势，最后只是除掉了二张的两只手

臂，自己反倒丧失了两员大将，实在是得不偿失。然而，只要李唐一天没有复国，只要二张仍然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拥护李唐的大臣们就不能停止战斗。

唐休璟临行之前，特意跟太子李显进行了一番密谈。最后，他目光凝重地对太子说了一句话：“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资治通鉴》卷二○七）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拥李派大臣与二张的博弈必将越演越烈……

长安四年冬天，八十岁的女皇武曌病势日渐沉重，一连数月躺在长生殿里没有上朝，宰相们都没有机会和她照面，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日夜陪在她的身边。

女皇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宰相崔玄暐（发动神龙政变的五大臣之一）觉得，在这微妙的时刻让这两兄弟隔绝内外绝对不是好事，于是上奏武皇说：“太子与相王仁厚孝顺，足可在陛下身边侍奉汤药。宫禁大事非比寻常，不宜让皇家以外的人出入。”武皇回道：“你的厚意朕心领了。”然后就没了下文。

这些日子，二张的神经也是时刻紧绷着。他们知道，女皇一旦撒手西去，他们必将大祸临头。于是二张一边悉心侍奉武皇，一边也与亲附他们的朝臣暗中联络，相互引为奥援，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拥李派大臣再次出手了。

这一次，他们不再纠缠于贪赃问题，而是下了重手，派人在洛阳的街市坊间到处散发、张贴匿名传单，写着六个大字：易之兄弟谋反！

每天都有人就此事上奏武皇，可老太太硬是装耳背，理都不理。

眼看匿名传单不能奏效，拥李派大臣急了，终于使出了一记狠招。

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突然有许州人杨元嗣举报说：“张昌宗曾经召见术士李弘泰占卜看相，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并声称只要他在定州建造佛寺，就可得到天下人的拥戴。”这次指控远非匿名传单可比，不但有人出面举报，而且性质非常严重。武皇再也回护不了，只好命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组成联合调查组会审此案。

女皇虽然已是风烛残年，重病在身，可她的心思依然精明。她挑的三个主审官有两个是亲附二张的。韦承庆和崔神庆装模作样地审了一下，马上得出结论说："张昌宗供称，李弘泰说的那段话不久前就已禀明陛下了。依照法律，自首的可以免罪。至于李弘泰这个人，纯属妖言惑众，应即刻逮捕法办。"

可宋璟却紧追不放，上奏说："张昌宗已经受到陛下极大的荣宠，还召术士看相，他居心何在？李弘泰说占卜得出'纯乾卦'乃天子之卦，张昌宗既然知其为妖言，当时为何不将他绑起来送交衙门？纵然他自己说曾禀明陛下，可终归是包藏祸心，依法当处斩抄家！请将他收押并彻底追查！"

老太太又装起了耳背，不回话。

宋璟不依不饶，再次上奏："若不立即收押，恐怕会动摇民心。"

武曌干脆取消了他的主审官资格，发话说："你暂时停止调查，等待进一步搜集详细证据。"数日后，武曌挖空心思地给宋璟找了一大堆差使，目的只有一个：把他支出朝廷。先是命他去扬州调查一些陈年旧案，宋璟拒不奉诏；接着又命他去幽州，调查前任幽州都督的贪污案，又被宋璟顶了回去；最后又命他前往陇、蜀（甘肃南部及四川省）一带去安抚百姓，宋璟再次拒绝。

女皇一连下了三道敕令，可硬骨头宋璟死活就是不挪窝。他上疏一一解释说："首先，依照成例，州县官犯罪，官阶高的由侍御史去审理，官阶低的由监察御史去审理，所以扬州旧案不必由臣出面调查；其次，若非军国大事，御史中丞不该出去办案，所以幽州都督贪污案也不在臣的职责范围内，臣不便前往；最后，如今陇蜀地区并没有变乱，不知陛下派臣去干什么？臣不敢奉诏！"

武曌被气得浑身哆嗦，可宋璟所言句句都是典章制度所规定的，她根本无由反驳。

与此同时，宰相崔玄暐、司刑少卿桓彦范、左拾遗李邕等一干朝臣也频频进谏，坚持认为应将张昌宗交给凤阁、鸾台及三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做彻底调查。武曌一见倒张的声势如此浩大，为了缓和局势，就表示可以让司法部门讨论一下张昌宗的案子。崔玄暐的弟弟、司刑少卿崔升马上提出了司法部门的意见——应将张昌宗处以极刑！

武曌一听，赶紧又缩了回去，不予答复。

宋璟最后横下一条心，直接闯进长生殿，再次奏请逮捕张昌宗。武曌有气无力地说："昌宗不是早就向朕自首了吗？"

宋璟说："张昌宗是被匿名传单所逼，万般无奈才自首的，并非真心悔过。何况谋反是大逆之罪，绝不能因自首而被豁免。如果张昌宗不受到极刑的制裁，还要国法干什么？"

这一刻，病榻上的武曌顿时脸色大变，心头的怒火猛然升腾而起。

你小子真的是活腻了，敢跟老娘这般面折廷争！要放在以前，你小子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武曌的心里火焰窜动。

可奇怪的是这股火焰只是扑闪了几下就忽然熄灭了。

武曌在心里苦笑。

她知道，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武曌最后冲着宋璟笑了笑，温和地劝了他几句，试图化解僵局。可宋璟一点面子都不给，反而声色俱厉地说："张昌宗受到陛下非分的恩宠！臣知道说这番话必定会招致大祸，但是正义激荡在心中，虽死不恨！"

站在一旁的宰相杨再思闻见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赶紧替武皇挡驾，高声宣旨命令宋璟退下。宋璟白了他一眼，厉声说："圣上在此，用不着宰相擅自宣旨！"

武曌长叹一声："朕准了，让昌宗去应讯吧。"

女皇武曌的声音苍老而喑哑，可在宋璟听来却无比响亮。他以为武皇终于妥协了，不禁大喜过望，立刻把张昌宗带到御史台，连堂都不升了，站在庭院中就开始了审讯。

可宋璟根本没有料到，审讯刚刚开始，宫里的宦官就带着武皇的圣旨来了。

宦官宣布将张昌宗特赦。

被武皇耍了！宋璟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资治通鉴》卷二○七）没有抓住机会先击碎这小子的脑袋，

此恨难消啊！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倒张行动彻底失败。

拥李派大臣终于看清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只要武皇在一天，二张就一天不会倒。

而且，他们最终还明白了一件事——试图用法律手段扳倒二张，只能是一种幻想。

既然不能靠法律来解决问题，那要靠什么？

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不但可以一举除掉二张，而且可以一举光复李唐！

他的方案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兵谏逼宫。

提出这个方案的人是一个须发皆白的八旬老人，两个月前刚刚就任宰相。

他就是张柬之。

神龙政变

张柬之是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物。他是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生于武德末期，少时就读太学，涉猎经史，稍长进士及第，授青城县丞。按理说，这种人生起点不能算低，如果正常升迁的话，他这辈子无论如何也跟“大器晚成”这四个字沾不上边。可老天爷偏偏和他过不去，让他在这个小小的县丞职位上一待就待了四十多年，直到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武曌开制举广纳人才，张柬之才以六十多岁高龄参加贤良科的会试，终于在一千多名年轻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被擢为监察御史。此后张柬之又在朝廷奋斗了将近十年，才慢慢升到凤阁舍人的职位。

圣历年间，武皇受到东突厥默啜可汗要挟，不得不让亲王武延秀与可汗之女和亲，张柬之认为有辱国体，上疏反对，从而忤旨，被贬到外地担任刺史，后又转任荆州都督府长史。此时的张柬之已经七十多岁，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到头了，没想到在狄仁杰的大力举荐之下，他的人生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长安初年，张柬之重新回朝，历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秋官（刑部）侍郎。

张柬之二度入朝的时候，狄仁杰已经去世，如果没有其他贵人的帮助，武曌不见得一定会提拔他为宰相。他的第二个贵人就是姚崇。长安四年十月，武曌命宰相姚崇出任灵武道安抚大使，同时让他举荐朝臣为相，姚崇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但其人已老，陛下应该尽快擢用他。”就这样，在两位能臣良相的先后举荐之下，武曌终于让张柬之入阁为相。

这一年，张柬之已经年届八旬。

八十载的沧桑岁月彻底染白了老人的须发，但却不曾湮灭他的匡复李唐之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拜相的那一天，前来道贺的文武百官看见张柬之的脸上迸发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

那些拥李派大臣都知道，只有内心具有使命感的人，才可能“诚于中而形于外”，焕发出这种震撼人心的光芒。

公元705年农历正月，大周王朝的女皇武曌宣布改元神龙，同时采纳宰相崔玄暐和司刑少卿桓彦范的建言，宣布将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以来所有在押或流放的政治犯，除扬州叛乱与诸王叛乱的魁首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

文明元年是武曌废黜中宗，软禁睿宗，正式临朝称制的那一年，也是武曌全面掌控帝国的开始，所以这道大赦令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它意味着风烛残年的女皇武曌已经决意采取宽恕与和解的政治姿态，了结过去的恩怨纠葛，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与平稳过渡。

但是，八十一岁的女皇武曌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场旨在推翻武周政权，匡复李唐社稷的政变行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了。

张柬之计划的第一步，是确立政变的核心力量。刚一拜相，张柬之便在拥李派大臣中迅速物色了四个人，作为此次政变的领导小组成员。他们是宰相兼太子右庶子崔玄暐、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

之所以会选择这四个人，原因如下：

一、此次政变的主要目标就是匡复李唐社稷，因而太子李显自然成为此次行动最重要的一面旗帜，但是他身份特殊，不便亲自参与策划，所以才由身为宰相兼东宫属官的崔玄暐出面，其身份相当于太子派出的代表；

二、敬晖、桓彦范与张柬之不仅曾有过同僚之谊，相互之间知根知底，而且都是狄仁杰举荐入朝的，大家同出狄公门下，意气相投，立场一致；

三、袁恕己的情况与崔玄暐类似，也是因为相王李旦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就由他作为相王的代表参与到领导小组中来。

计划的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掌握禁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时的禁军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北衙禁军，驻守皇宫的北正门玄武门，负责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安全[1]；还有一支是南衙禁军，驻守宫城以南的皇城。皇城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所以南衙禁军的职责就是保卫宰相和文武百官的安全，同时也负有保卫京师之责。

北衙禁军的最高统帅是左右羽林卫大将军，当时的右羽林卫大将军是李多祚。他是靺鞨人，曾追随名将裴行俭出征西域，在高宗时代便已崭露头角，所以一直感念高宗的知遇之恩。张柬之首先找到他，开门见山说："将军今日的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感怀泪下，说："大帝（高宗李治）。"张柬之当即亮出底牌："今大帝之子为二竖（二张）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李多祚收起眼泪，指天盟誓："苟利国家，唯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资治通鉴》卷二○七）

成功策反李多祚后，张柬之旋即用最快的速度将一批心腹安插进了北衙禁军，分任左、右羽林将军，他们是敬晖、桓彦范、右散骑常侍李湛（李义府之子）、荆州长史杨元琰。杨元琰是张柬之荆州长史之职的继任者，也是他的好友。当年二人在荆州办理职务交接时，曾相约于长江上泛舟，杨元琰当时便慨然吐露了匡复李唐之志。所以此次张柬之将其调任右羽林将军时，特地叮嘱他说："杨君还记得在长江上说过的话么？今天给你的职位，不是随便给的！"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张柬之就一连做出了这么多重大的人事任命，自然引起了二张的疑惧。为了消除二张的猜疑，避免打草惊蛇，张柬之就把他们的党羽、建安王武攸宜任命为左羽林卫大将军，从而稳住了二张。张柬之之所以敢把北衙禁军的一半指挥权交给武攸宜，是因为他事先已经在左、右羽林军中安插了多名中层将领，因此他完全有把握将武攸宜架空，让他变成光杆司令。

至此，北衙禁军基本上已经全部掌控在张柬之的手中，而南衙禁军则不用费张柬之任何功夫，因为其最高统帅左卫大将军正是相王李旦担任的，如果行动开始，整个皇城和外围京城的局势都可以交由李旦和袁恕己掌控，因而根本不用担心。

计划的第三步，是让太平公主负责策反武皇身边的宫女，让她们隔绝宫内外的消息，同时监视武皇和二张的一举一动。据有关学者对近年出土的相关墓志的研究，当时确有一部分九品至七品的宫女参与了神龙政变，比如她们的墓志中就记载了“遂使有唐复命，我皇登基”等语。

经过这一系列周密部署，计划基本上是万无一失了。当时姚崇推荐张柬之时曾说，此人“沉厚有谋，能断大事”，如今看来，张柬之的表现果然如其所言。

一切就绪之后，张柬之等人把行动时间定在了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二日。

帝国未来的命运，将在这一天见出分晓……

政变当日，张柬之兵分三路：第一路，由他本人与崔玄暐、桓彦范、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五百多名羽林军士兵直扑玄武门，控制这个宫禁重地；第二路，派李多祚、李湛和驸马都尉王同皎（太子李显的女婿）前往东宫迎接太子，然后前往玄武门会合；第三路，由相王李旦及其司马袁恕己率南衙禁军控制政事堂和朝廷各部，进而逮捕二张在外朝的党羽，同时稳定整个京畿的局势。

行动开始后，这三路中只有李旦和袁恕己的第三路进展最为顺利。他们率兵包围政事堂后，立刻逮捕了二张的三个心腹——宰相韦承嗣、房融、司礼卿崔神庆，然后迅速封锁皇城，并且全面控制了整个京师。

尽管整个政变计划滴水不漏，但是前两路却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差一点导致整个行动的流产。李多祚这一路来到东宫后，本以为太子李显已经整装待发了，没想到事情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面对这群全副武装、摩拳擦掌的政变将士，李显却耷拉着脑袋，脸色苍白，虚汗直冒，并且一直躲避着他们的目光。虽然对此次行动早已有了思想准备，而且貌似也下定了决心，但是事到临头，这个四十九岁的老太子还是感到了一阵强烈的恐惧。

已经二十一年了，他似乎仍然活在被废黜的阴影中。这么多年来，那个瑰丽的天子梦虽说尚未死亡，可一直蜷缩在他内心最隐蔽的角落里，在年复一年的沉睡中日渐萎靡，日渐苍白。李显偶尔打开自己的内心，往里窥探那个苟延残喘的天子之梦，似乎总能闻到一股陈年霉味的气息。

李显既担心它在日复一日的禁锢中悄然死去，更害怕它有一天突然醒来。

因为他委实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这个昔日的梦想。

可就在今天，它居然真的被唤醒了。

多年以后，梦想归来……可李显却呼吸沉重，情怯不已。

将领们面面相觑，一下子都没了主意。看着表情游移目光闪烁的老丈人，王同皎首先开口了："先帝把神圣的帝国交给殿下，却无缘无故遭到了罢黜，此事人神共愤，至今已二十一年！好不容易等到天意彰显，如今北门与南衙同心协力，必在今日诛杀凶逆，匡复李唐社稷，愿殿下不负众望，速往玄武门！"

李显注视着王同皎，可刹那间他的眼前又闪现出了另一张脸。

那是母亲武曌的脸。

母亲似乎在看着他笑，可那笑容竟是如此狰狞和森冷，让他不寒而栗。许久，李显支支吾吾地说："凶逆诚当夷灭，然而圣上龙体欠安，会不会惊吓到她？依我看，此事不妨延后，当与诸公从长计议。"

将军们再次对视了一眼，感觉一股沮丧之感就像一盆凉水一样把他们从头浇到了脚底。宝贵的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而众人每呼吸一次，就等于是向死亡靠近一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湛终于忍无可忍，厉声说："诸位将军和宰相冒着族诛的危险要为社稷尽忠，殿下怎么能把他们推入死地？要罢手可以，请殿下自己出去宣布。"

李显默然良久。

他已经听出了这句话里的威胁意味。如今一干大臣及众将士都和他绑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如果此事半途而废，众人一怒之下，说不定就先把他这个太子做了！就算他们不会这么干，但是明日等待他们的，也必将是杀头族诛的命运，而自己最好的结果，很可能也是被母亲武曌下诏赐死！

往前迈一步，生死成败还在未定之天；往后退一步，今日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必死无疑！

事情的利弊明摆着，自己还有得选吗？

没的选了。

终于，李显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履朝门口走去。众人转怒为喜，马上跟着他出了东宫。王同皎一下子把太子扶上马背，然后与众将士簇拥着太子向玄武门飞驰而去。

此时，张柬之等人正在玄武门前一筹莫展。

他原本以为计划天衣无缝，可偏偏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环——今日在此轮值宿卫的不仅有羽林军，赫然还有殿中监田归道和他率领的千骑。所谓千骑，名义上也隶属于羽林军，但其将领却由皇帝直接任命，因此算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其存在意义实际上就是与羽林军相互制衡。此刻，田归道眼见张柬之带着军队杀气腾腾而来，自然是二话不说，关门据守了。

这是张柬之事先完全没有料到的。

百密一疏，百密一疏啊！

张柬之仰头望着这座高大的玄武门，心急如焚，左右为难。想进攻，又担心武皇一旦惊觉，整个京师必然陷入一场混战；不攻，逼宫行动眼看就要功败垂成……

就在张柬之万分焦灼之际，李多祚等人终于拥着太子李显来了。

张柬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城门上的田归道一见太子驾到，知道自己不开门不行了。他本来也不是二张一党，今日闭门据守只不过是职责所在，如今既然太子来了，那他当然没有理由把未来的天子拒之门外。

张柬之与太子一行从玄武门迅速进入宫中，担任前锋的羽林军将士径直冲到了武皇所居的长生殿。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听见外面人声扰攘，想出来看个究竟，旋即被禁军士兵砍杀于殿外的回廊下。一代绝色男宠就此仆倒在肮脏的血泊中，他们美若莲花的粉面很快就变得乌黑暗紫，恐怖狰狞……

女皇武曌猝然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看见硕大而孤单的龙床周围站满了人。

虽然视线模糊，让她来不及看清这些人的脸，但她马上就意识到——

该来的还是来了！

“谁人作乱？”众人听见女皇慵懒而疲惫的声音从透明的锦帐中传了出来。

张柬之趋前一步，朗声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已奉太子之命将其诛杀！只是担心走漏消息，所以不敢先行奏报。臣等擅自在宫中用兵，罪该万死！”

武曌无声地冷笑着，把太子叫到了面前。

“原来是你？”

李显心头剧烈地一颤，差一点就在这四个字面前颓然跪倒。

“既然人已经杀了，你也可以回东宫去了。”

大汗淋漓的太子悄悄扭过脖子，向众人抛去求救的目光。

桓彦范立刻站了出来，说：“太子岂能回去！昔日先帝把爱子托付给陛下，现在他年龄已大，却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一直思念李家，群臣也念念不忘太宗和先帝之德，故奉太子诛杀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

武曌脸上挂着一个寒冷的笑意，目光一直在众人之间来回逡巡，却唯独不看桓彦范，仿佛根本没听到他说的话。

许久，她把目光停留在李湛脸上，说：“你也是杀易之的将军吗？我待你们父子不薄，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

李湛惭悚，无言以对。

接着，武曌又直直地盯着崔玄暐说：“其他人都是因人推荐才进入中枢，只有你是朕亲自提拔的，想不到你也在这里！”

崔玄暐坦然自若地说：“臣这样做，正是为了报答陛下的大德！”

武曌还想说什么。

可她终究没有再说什么。

她只是静静地躺了回去，重新闭上了眼睛。

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女皇武曌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一种山河粉碎、日月无光、天空崩裂、大地平沉的寂灭之感。

她发现自己正从尘世间最高的巅峰朝着一个无尽的深渊坠落。

她仰面向天，看见一生中经历的所有往事，都幻化成一幅幅凌乱却又清晰的画面，宛如正月十五的旋转花灯那样，以黑暗的天空为布景，在她的眼前一幕接一幕地闪过。

武曌艰难地伸出了一双瘦骨嶙峋的手。

最后她只抓住了一把虚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软禁了武皇之后，政变军队迅速逮捕了张昌仪、张昌期、张同休，将他们全部斩首，随后与张易之、张昌宗的首级一起悬挂在端门前的洛水桥南岸示众。一夜之间，他们的尸体便被愤怒的百姓割尽剐光，分抢一空。

第二天，武曌被迫下诏，命太子监国，大赦天下。

第三天，武曌传位太子。

第四天，李显第二次登上皇帝宝座，大赦天下，唯张易之一党不赦；同时将周兴、来俊臣等酷吏迫害过的人全部平反昭雪，子女被发配为奴的全部释放；加授相王李旦为安国相王，任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加授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公主；武周一朝所有被发配籍没的李唐皇族全部恢复皇室身份和相应官爵。

第五天，武曌被移送上阳宫，由李湛负责警卫，实际上就是软禁，防范她垂死挣扎。

第六天，李显率文武百官前往上阳宫，向武曌进献尊号，称“则天大圣皇帝”。

第八天，神龙政变居功至伟的五大臣全部拜相：张柬之为天官（吏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暐为内史（中书令），桓彦范、敬晖皆任纳言（侍中），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五人一律封为郡公；封李多祚为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琅琊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将军、赵国公；其他有功之臣亦相应加官晋爵。

神龙元年二月初四，李显下诏宣布，恢复国号为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全部恢复唐时旧制。

神龙革命，李唐归来。

在天地之间矗立了十五年的大周帝国终于在这一刻灰飞烟灭。

尘归尘，土归土。

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时代终于在这一刻落下了帷幕。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曌病殁于洛阳上阳宫，终年八十一岁。

武曌在临终前留下了一道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与高宗合葬乾陵，并将王皇后、萧淑妃、褚遂良、韩瑗、柳奭的亲族子孙全部赦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选择了宽恕，也选择了回归。

她宽恕了过去的敌人，也宽恕了过去的自己。她放弃了为之奋斗一生的大周帝国的皇帝称号，以李家儿媳的身份回归到了李唐皇室的谱系之中。

从哪里出发，就回到哪里。

生命是一条征途，也是一场轮回。

百年流水尽，万事落花空。

把属于你的都还给你，剩下的都属于我。

武曌走了。

一个独一无二的女人走了。

可她却在中国历史灰暗沉闷的男权叙事中楔入了一段胭脂红粉的想象，留下了一抹令人尴尬也令人神往的暗香。

她辉煌而又暧昧的一生化成了满天猩红的花瓣。

多少个世代过去了，它们依然在枯黄的史册中倨傲而华丽地飞扬。

没有人能够完全读懂这片血雨般的猩红，没有人知道它们隐含了女人武曌多少的激情与梦想，多少的欲望与忧伤。

无论何时回过头去，你总能看见武曌的脸一半落在光明之下，一半浮在黑暗之上。

当千百年后的人们站在乾陵的那块无字碑前指指点点或者浮想联翩的时候，女人武曌正孑然一身地行走在只属于自己的故事里面。

她说那里的时光永不凋谢，美丽永不漫漶。她说那里——

日月当空照着，终年都是春天。

[1]　七十九年前秦王李世民发动的那场政变，也是因为直接掌握了玄武门的禁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虽然当年是在长安的玄武门，这里是东都洛阳的玄武门，但二者同属北衙禁军的驻地，因而其地位与作用一般无二。在日后的唐朝历史上，玄武门还将数度喋血，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初唐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场玄武门之变，而是有“四次”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就是其中之一。

第四章 神龙政局

孤家寡人李显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五十岁的李显第二次登上了大唐天子的宝座。

世事的变幻无常让李显充满了感慨。

二十一年前的那个春天，母亲武曌悍然发动嗣圣宫变，把登基不过两个月的李显废为庐陵王，贬黜到了荒凉偏远的房陵；二十一年后的这个春天，李显在五大臣的拥护下发动神龙政变，一举终结了母亲武曌的强权统治，把她软禁在了凄清寂寥的上阳宫……

历史漫不经心地兜了一个圈，人间已然几度沧桑巨变。

看见自己年届半百的生命忽然间严霜落尽，中宗李显不禁百感交集。二月十四这天，他为妻子韦氏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册封大典，将皇后的凤冠再次戴在了韦氏头上，同日追封她的亡父韦玄贞为上洛王、亡母崔氏为王妃。

苦尽甘来的皇后韦氏站在太初宫的门楼上，遥望着广袤而壮丽的帝国山河，俯视着匍匐在脚下的臣民，眼里噙满了喜悦而幸福的泪水。

她激动地品味着这份渴望已久的荣耀与尊严，觉得前半生经历的所有苦难，如今总算有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偿。

该如何享受上天的这份馈赠呢？

站在早春二月暖暖的阳光下，皇后韦氏眺望着未来的岁月，不禁有些目眩神迷，心旌摇荡。冥冥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女皇武曌曾经拥有的一切，你也可以拥有！

韦后转过脸去，看着朝阳之下满面红光的皇帝，幽幽地说："皇上，还记得您当年说过的那句誓言吗？"

李显微微一怔。

韦后莞尔一笑，说："'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皇上可还记得这句话？"

慢慢地，李显终于回忆起来了。

他略显尴尬地笑了笑，看见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东都洛阳前往房陵（今湖北房县）的那驾马车依然在他的记忆中辘辘而行。那一年，妻子韦氏已经身怀六甲，那一趟漫长而颠簸的贬黜之旅对她而言不啻一场痛苦无边的炼狱。李显一路上紧紧拥抱着面无血色的妻子，在心里向上苍发出了至诚至切的呼告，乞求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她们母子平安。

苍天有眼。就在一片四野无人的荒凉山麓，一个美丽的千金公主终于呱呱落地。

李显脱下自己的锦袍小心翼翼地裹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

那一刻他和妻子都忍不住喜极而泣。

他们把这个小公主取名为“裹儿”。

裹儿是个不幸的孩子，从她降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享受过一天锦衣玉食的生活。在李显一家人的记忆中，幽禁于房陵的十四载岁月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凄风苦雨，他们几乎认定这辈子已经没有出头之日了。李显逐渐变得萎靡不振，对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每当母亲武曌派出的使臣来到房陵，满怀恐惧的李显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自杀。

是妻子韦氏一次次把他从崩溃和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韦氏总是看着李显的眼睛说：“祸福无常，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们又何必自戕？”

就是这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让李显和韦氏情爱弥笃，也让李显在无形中对韦氏充满了依赖。

那些日子里，李显不止一次地从韦氏的目光中看到了温暖和希望。终于有一天，李显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指向苍天，情不自禁地说：

“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

而今，兑现诺言的时刻终于到了。

中宗李显迎着皇后韦氏殷切的目光，轻声问道：“说吧，你想要什么？”

“垂、帘、听、政。”韦后说。

皇后的册封大典过后，百官朝会的大殿上便多出了一道透明的帷幔，帷幔后面赫然多出了一个女人。

这一幕是多么似曾相识啊！

以五大臣为首的文武百官不无痛苦地发现——阴盛阳衰的李唐王朝即便经历了神龙革命的洗礼，却依旧摆脱不了牝鸡司晨的尴尬。

侍中桓彦范第一个挺身而出，向皇帝递上了一道奏章。他开宗明义地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句名言：“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在早晨代替公鸡鸣叫，这个家庭就一定会萧条。他说：“臣见陛下每次主持朝会，皇后都隔着帷幔坐在殿上，参预政事。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哪一个跟女人共同执政而不国破身亡的。而且阴在阳上，违背天理；妇人凌驾丈夫，不合人道。伏愿陛下鉴察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主持内职女教，不要出来干预朝政。”

奏章呈上，李显瞥了一眼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每天上朝，桓彦范的眼睛照例要被那一道轻柔而坚固的帷幔深深刺痛。桓彦范百思不得其解，李显明明知道武后当年垂帘听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为什么就不能吸取教训呢？为什么还要去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桓彦范之所以不理解李显，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李显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李显虽然在五大臣的拥立下复辟了，但他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换言之，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

五大臣中，只有一个崔玄暐曾是李显的东宫属官，其他四人皆非嫡系。可是，就连这个唯一的老部下崔玄暐，在经过这场改天换地的政变之后，其身份也已从“旧部”变成了“功臣”，所以李显对他的防范自然要多于信任。

除了崔玄暐外，原本朝中还有两个重量级人物也是李显的东宫旧属，一个是魏元忠，一个是杨再思，都曾以宰相身份兼任太子属官。只可惜，魏元忠早在二张得势的时候就遭到陷害，被贬到了岭南，杨再思则是在二张垮台的时候被赶出了东都朝廷，到长安去坐西京留守的冷板凳去了。所以，现在李显的身边根本没有一个真正信得过的大臣。

李显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

除了孤独，他还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

因为他不但没有贴心的大臣，而且身边还有两个让他颇为忌惮的人物。他们就是李显的同胞骨肉——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

先说李旦。尽管他生性淡泊，不喜欢当皇帝，但这并不等于别人不会拥立他当皇帝。事实上在李显看来，李旦似乎比他更有资格戴上这顶帝王冕旒。因为在李显被贬到房陵的十四年里，李旦始终是东宫的主人。虽说李旦也长期处在母亲武曌的严厉控制之下，但名义上毕竟是帝国的皇嗣，论资历、论声望、论朝中人脉、论政治影响力，李旦都远胜于李显。而李显唯一的优势，也许就是比李旦年长，更符合“立嫡以长”的继位原则而已。

但是这样的优势显然也是脆弱的。因为从大唐立国至今，当皇帝的都不是嫡长子。太宗不是，高宗不是，中宗李显自己也不是。所以，李显实在有理由担心——哪天五大臣要是看他不顺眼了，完全有可能再搞一场革命，把他轰下台，把弟弟李旦拱上去！

再来看太平公主。她虽是一介女流，而且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但显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从小到大，太平一直就是母亲武曌的心肝宝贝。据《旧唐书》称：“（太平）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也就是说，太平公主不管是身材、长相还是性格都酷似母亲，所以武曌最疼爱这个小女儿，常常让她参预各种朝廷机密。

参政的机会多了，太平自然就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其政治经验绝非一般公主可比。神龙政变后，太平公主因功被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稍后，中宗又专门派出禁军卫队进驻太平公主的府邸负责警卫，在其府邸周围遍置岗哨，还有全副武装的卫队日夜巡逻，其警卫规格等同皇宫。只此一点，便足以见出太平公主在中宗一朝的地位之高。

除了政治上的强势之外，太平公主还具有一项非同寻常的优势。

那就是她的经济实力。

按照高宗时代的制度规定，亲王一般可以获封食邑 [1] 八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一千户；公主可以获封三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三百五十户。那么，太平公主的食邑有多少呢？

她首次获封就远远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围，达到了一千二百户，后来又加到三千户；神龙政变后，李显论功行赏，又将她的食邑加到了五千户。此外，太平与薛绍生有二男二女，改嫁武攸暨后又生下二男一女，这七个儿女全部都有封邑，加上武攸暨名下的一千户，太平公主一家获享的封邑至少达到了八千户。再加上她在高宗和武周时期先后获得的不计其数的各种财物赏赐，说太平一家富甲天下，一点也不算夸张。假如当时有胡润财富排行榜之类的东西，太平公主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上榜首富。

有身份，有头脑，有地位，有财力，这样的女人对帝国政坛所具有的影响力也就不言而喻了。许多朝臣纷纷投靠在她门下，通过她的运作和举荐步步高升。此外，民间的文人墨客和年轻士子也闻风而至，争先恐后地递帖子，拜码头，当门客。太平公主也摆出了一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姿态，十分热情地接纳天下士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寒落魄的读书人，太平公主更是屡屡慷慨解囊，馈赠金帛，让这些寒士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于是便在人前人后拼命称颂太平公主的美德。久而久之，太平公主“折节下士”的品德和事迹就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

眼见太平公主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人气指数迅速攀升，中宗李显自然感到了极度不安。

他不止一次地从太平公主的脸上看见了一种东西。

那是一种对权力不可遏止的野心和梦想，就跟当年的母亲武曌一模一样。

很显然，无论是以五大臣为首的功臣集团，还是跟李显一母同胞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拥有异常强大的政治能量，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李显构成了威胁。

在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下，李显当然不能无所作为。让韦后垂帘听政，其实就是李显在君臣博弈的棋盘上走出的第一着棋。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韦后以最快的速度介入帝国政治，以便增强自身的实力，跟这些威胁皇权的势力抗衡。

所以说，如果有人以为李显让老婆垂帘听政纯粹是出于夫妻情深，或者纯粹是为了兑现当初的诺言，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而桓彦范恰恰就在这里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他反对女人干政的那套大道理李显又何尝不懂？他强调的“牝鸡司晨”的历史教训李显又何尝不明白？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孤掌难鸣的李显要想保住刚刚失而复得的皇权，就必须想方设法从“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中突围，一如当年的高宗李治不得不从长孙无忌的权力之网中突围一样。

这才是李显的当务之急。至于以后会怎么样，李显根本来不及去思考。退一步讲，就算李显明知道让韦后垂帘听政有可能导致自己大权旁落，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宁可把大权旁落给老婆，也不会把它旁落给宰相。

在这一点上，中宗李显的思维方式显然跟他的父亲李治如出一辙。

历史在这里又出现了某种惊人的相似性。

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李治和李显的出生顺位都那么靠后呢？当初要不是因为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在夺嫡大战中打得两败俱伤，也轮不到李治当皇帝；同样的道理，要不是因为武后一路拼命“摘瓜”，把李弘和李贤先后送进了鬼门关，皇帝的桂冠也不可能落到第三条“黄瓜”李显的头上。所以说，李治和李显的帝王资格本来就是先

天不足的。正因为先天不足，所以他们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势的功臣（宰相）集团。

因此，当他们上位之后，也必然要面临同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功臣集团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时，一般会导致三种结果：第一种，也是最好的结果——功臣主动引退，把权力还给君主，双方相安无事；后两种则都是不幸的——要么是功臣坐大，变成权臣，最终架空（甚至篡夺）君权，要么是君主引进其他力量与功臣集团抗衡，待时机成熟，再出手将其铲除。

当年的长孙集团就是因为出现了架空君权的倾向，才迫使高宗李治不得不痛下杀手。而如今的五大臣集团，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他们是功成身退，把权力还给李显，以求君臣相安无事，还是步长孙无忌之后尘，任手中的权力日渐膨胀，最终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

很不幸，答案是后者。

武三思东山再起

神龙政变后，张柬之、桓彦范等人仿佛都陶醉在了成功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功高震主”的危险境地。尤其是桓彦范，不仅没有及时收手，反而把手伸得比谁都长。政变成功后，他又拜相，又封爵，又赐食邑，本来已经赢了个钵满盆满，可还不满足，又奏称他的大舅子赵履温也参与了政变谋划，要求皇帝论功行赏。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太靠谱。当时赵履温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当刺史，与东都洛阳远隔千里，政变前夕也没听说他回过洛阳，他如何参与谋划？这不是忽悠人吗？

李显大为窝火。

可他很清楚，现在还不是和五大臣翻脸的时候，所以他什么话都没说，立刻把赵履温调入朝廷，任他为司农少卿。

赵履温乐坏了，一上任就赶紧给妹夫桓彦范送去了两个大美女作为酬谢。

在赵履温这件事上，李显算是给足了桓彦范面子。

他相信，桓彦范也会还他一个面子。

可李显错了。

桓彦范丝毫没有领他的情。

这位仁兄一边拉着大舅子升官发财（顺便还笑纳了两位美女），一边却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义正词严地数落李显不应该让韦后垂帘听政。

李显顿时火冒三丈。

哦，只许你桓彦范拉着大舅子一块儿升官发财，就不许我李显带着老婆一块儿上朝听政？我一个堂堂天子还不如你桓彦范？

好像是为了跟桓彦范较劲，李显把老婆推上金銮殿后，紧接着又提拔了一批新人。为首的是胡僧慧范、术士郑普思，还有惯以“妖妄之言”讨好皇帝的尚衣奉御叶静能等人。

在五大臣眼中，这些人显然都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旁门左道，其中尤以胡僧慧范最让他们看不顺眼。这个外国和尚几年前来到洛阳，别的事没干，只一心一意交结权贵，不久就攀上了高枝，投靠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按理说二张被诛后，这种人早就该被法办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政变之后，这个胡僧慧范不仅安然无恙，反倒被中宗夫妇奉若上宾，混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显提拔慧范的借口居然跟桓彦范推荐赵履温的理由一模一样，说他也参与了诛杀二张的计划。以此借口，中宗不仅加封慧范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给了他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中宗本人还经常微服出行，屈尊到慧范的府上做客，好像成心要刺激五大臣似的。

桓彦范再次上疏，声称慧范以旁门左道乱政，请求中宗将其诛杀。

李显看着他的奏疏，唯一的答复就是报以几声冷笑。

不久，李显又任命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擢升叶静能为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自从大唐开国以来，这两个职位通常都是由硕学鸿儒担任的。比如贞观时期，魏徵、虞世南、颜师古都曾出任秘书监，担任国子祭酒的则是孔

颖达，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饱学之士。可眼下中宗竟然把这两个职位给了术士和佞臣，不禁让朝臣们大跌眼镜。桓彦范再度上疏，称郑、叶二人纯属“方伎庸流”，说中宗这么做是“官不择才，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旧唐书·桓彦范传》）。

奏疏呈上后，中宗李显照旧置若罔闻。

其实，李显并不是笨蛋。他当然知道，这些和尚道士不可能帮他治理朝政。

李显的目的本来就不在此。

他之所以擢用他们，无非是想利用这些人在宗教界和民间的影响力，为自己打造更广泛的统治基础而已。就像当年武曌以周代唐之际，也曾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来增强她的政权合法性一样。

明智的统治者从来都很清楚宗教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宗教虽不一定有助于净化他们的灵魂，但却一定有助于强化他们的统治。

只要利用得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李显对这帮和尚道士的宠幸，本来就已经让五大臣感到愤愤不平了，而他接下来重用的这个人，则无疑让五大臣在极度悲愤的同时又感到了极度惊愕。

这个人就是武三思。

早在神龙政变爆发后不久，洛州长史薛季昶就曾向张柬之他们发出警告：“二张虽已诛除，可吕产、吕禄（西汉初年的外戚，借指武三思一党）还在，斩草不除根，终当复生！”

张柬之等人却不以为然：“大局已定，他们不过是砧板上的肉，还能有何作为？况且，血已经流得够多了，该适可而止了。”

薛季昶仰天长叹，忽然说了一句让张柬之等人莫名其妙的话——“我不知自己将葬身何处！”

过后，又有一个叫刘幽求的朝邑县尉直言不讳地对桓彦范等人说：“武三思还在，诸公恐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不早点动手，到时候必定追悔莫及。”

后来的事实证明，薛季昶和刘幽求的担忧是对的——武三思一朝咸鱼

翻身，五大臣果然都死得很难看。

可张柬之等人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把薛、刘的警告当一回事。他们自以为替中宗李显的复辟立下了汗马功劳，手中又握有宰相大权，天底下再没有谁动得了他们。况且武周王朝已经玩完，武三思彻底失去了靠山，能留着一条命苟延残喘已属不易了，还能翻得了什么大浪？然而，五大臣错了。

单凭武三思个人的力量确实做不了什么，可要是加上中宗李显的力量，五大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一直以来，武氏集团无疑都是李唐皇族最主要的政敌，如今好不容易把武家势力打趴下了，李显为什么还要重新起用武三思呢？

原因有二。第一，他需要一支老牌的政治力量来制约五大臣。在李显看来，无论是妻子韦后还是胡僧慧范等人，在朝中都没什么根基，要想和五大臣斗，他们都太嫩了，力量明显不足。而武三思则不同，自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和武承嗣一起被召回朝廷后，他和武承嗣就成了诸武的当然代表，数十年来深深地介入了帝国政治。武承嗣死后，武三思就成了诸武唯一的领头羊，在政坛上拥有广泛的人脉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虽然神龙政变后武家失势，但是李显一旦重新起用武三思，他原本的人脉关系必定会迅速恢复，从而形成一股堪与五大臣匹敌的政治力量。第二，众所周知，以武三思为首的诸武是神龙政变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所以五大臣自然成了诸武的眼中钉和肉中刺。鉴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政治法则，李显当然有理由把五大臣的敌人武三思变成自己的盟友，然后充分利用武三思对五大臣的仇恨，来逐步削弱功臣集团的力量，最终将他们铲除。

神龙元年二月，也就是武周王朝覆灭的短短一个月后，武三思就重新活跃在了人们的视线中。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武三思之所以这么快就东山再起，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中宗李显在政治上需要他，但是在武三思咸鱼翻身的过程中，却有另外几个人给他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那是三个女人。

第一个是中宗的小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

当年女皇武曌亲自主婚，把她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正是因为这层亲家关系，安乐公主就成了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的第一联络人。前文说过，安乐公主是李显夫妻在贬黜途中所生，其诞生的过程颇为惊险，而且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荒凉的房陵度过的，从一出生就

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直到十五岁跟随李显回到东都，才获得了一个公主应有的尊严和待遇。所以李显一直对这个小女儿心怀歉疚，因而也就对她宠爱有加。有了这个李裹儿在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牵线搭桥，双方自然就容易接近。

给武三思提供助力的第二个女人，就是唐朝历史上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是高宗时期的宰相、著名诗人上官仪的孙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仪因替高宗起草废黜武后的诏书，事败后被武后所杀，家族籍没。尚在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随母亲郑氏一同配入掖庭为婢。虽然身份和地位一落千丈，但郑氏还是没有放松对上官婉儿的培养。在她的精心调教下，上官婉儿从小就熟读诗书，博涉文史，而且工于文词，明习吏事，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十四岁的上官婉儿受到武曌赏识，被免去奴婢身份，专门掌管宫中诏命，从此步入政坛。上官婉儿天生聪慧，而且善于察言观色，所以很快成为女皇武曌身边最得宠的女官。但是人总有疏忽的时候，有一次上官婉儿不知何故触怒了武曌，论罪当诛，差一点就被砍了脑袋，所幸武曌惜其才华，赦免了她的死罪，只在她额上刺了一个印迹（黥面）以示惩戒。

上官婉儿犯错的具体事由史书无载，但是民间却长期流传着一个颇为香艳的八卦故事。说的是武曌晚年公然宠幸二张，云雨交欢也不避宫人耳目，上官婉儿因职务之便出入女皇寝殿，每每在无意中撞见A片的现场直播，刚开始自然是又惊又羞掩面而走，次数多了就不免春情荡漾浮想联翩。后来，婉儿便与张昌宗开始眉来眼去。有一天，两人正在一处僻静所在打情骂俏，女皇武曌突然出现。暴怒的武皇二话不说，抽出一把金刀刺向上官婉儿，当即割伤了她的左额，同时厉声咆哮："汝敢近我禁脔（男宠），罪当处死！"

二人吓得面无人色，慌忙跪倒在地，拼命求饶，张昌宗更是替婉儿百般求情，武皇最后悻悻作罢，赦免了婉儿。虽然免于一死，但是那块伤疤却从此留在了婉儿的额上。为了掩盖伤痕，聪明灵巧的婉儿便在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没想到这朵遮丑的梅花却让她变得更加妩媚。宫女们皆以为美，遂偷偷以胭脂在前额点红效仿，从此这种"红梅妆"便渐渐流传开来，成了唐朝女性特有的一种时尚。

从此以后，上官婉儿更加小心谨慎，处处曲意逢迎，总算挽回了武皇的欢心。自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起，年迈的武皇又让上官婉儿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上官婉儿从此专秉内政，权势日盛，人们纷

纷称其为“女中宰相”。

中宗即位后，看上了婉儿的美色和才华，遂将其纳为婕妤，仍旧让她专掌诏命。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上官婉儿开始替武三思穿针引线，频频寻找机会让他出入宫禁，与中宗夫妻交流思想，培养感情。

上官婉儿凭什么帮武三思呢？

原因很简单，早在武周时期，婉儿就是武三思的情妇，所以这个忙她肯定要帮。

就这样，通过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的引荐，武三思就像一条鱼一样游到了第一家庭的身边。这时候，又一个女人热情地接纳了他。

她就是当今大唐的第一夫人——皇后韦氏。

中宗李显接纳武三思，是出于钳制五大臣并巩固皇权的考虑；而皇后韦氏则是因为武三思的到来可以给她的后宫生活增添一些新的情趣。

神龙元年的春天里，武三思频频造访第一家庭。他经常和韦后玩一种叫“双陆”的博弈游戏。李显在的时候，就主动在旁边替他们计算输赢的筹码，三个人时常响起一阵阵的欢声笑语；而如果李显不在的时候，韦后就会很自然地与武三思玩起了另一种事关云雨的游戏。

后者才真正引发了韦后的激情。

在每一度酣畅淋漓的云雨之后，韦后都会扬扬自得地发现——自己又拥有了一种与女皇武曌相同的生命体验。

她喜欢这种体验。

就这样，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皇后韦氏——这三个在帝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女人，就这样联袂书写了武三思在这个春天里的风生水起。

武三思在这年春天里的行踪当然没有逃过五大臣的眼睛。

至此，他们终于意识到了神龙革命的不彻底性，也终于意识到薛季昶和刘幽求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屡屡向中宗上疏，要求诛杀武氏一党。

可这样的要求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宗当然不予理睬。

张柬之等人万般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对皇帝说：“武周革命之际，李唐宗室几乎被屠杀殆尽。而今依赖天地神灵，陛下得以重返正位，武氏一党却仍窃据高官显爵，这岂是天下人所希望的？请削除他们的官爵禄位，以此告慰天下！”

告慰天下？

李显心里一声冷笑：你们是希望朕贬黜诸武，好告慰你们吧？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的心思，你们不就是想把朕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好称心快意地独霸朝纲吗？告诉你们——想都别想！

中宗马上作出了答复——不准。

张柬之等人彻底失望了。

每当这些革命功臣齐集一堂的时候，一股巨大的悲愤就会在他们中间汹涌激荡。他们“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资治通鉴》二○八），最后也只能仰天长叹：“皇上从前当英王的时候，人们称颂他勇敢英烈，我们之所以不杀诸武，是想让皇上亲自动手以便杀戮立威，没想到结果反而是这样……大势已去，我们还能怎么办？”

是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不可否认，当初他们发动政变，动机确实是高尚的，那时候他们内心的确怀有一种“匡复李唐，重振朝纲”的理想和信念。然而当政变成功之后，他们却被迅速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过度贪恋权力和富贵，以致忘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忘记了功成弗居，福祸无常的道理……

五人之中，尤以桓彦范的表现最为典型。因为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只许自己放火，不许皇帝点灯”的功臣。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个皇帝可以容忍这样的功臣呢？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这是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

无法战胜这种弱点的人，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

死路。

功臣集团的垮台

随后的日子，中宗不仅对五大臣的谏言充耳不闻，而且还多次微服私访武三思，在他府上宴饮作乐，推杯换盏，摆明了就是要刺激五大臣敏感的神经。没过多久，中宗又突然擢升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擢升武攸暨为司徒、晋爵定王。

五大臣目瞪口呆。

他们很清楚，天子李显重用武三思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他们。

可明知如此又能怎样？难不成再搞一场政变，把李显废掉，让相王李旦取而代之？

不能说五大臣绝对没有动过这个心思，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李显和武三思磨刀霍霍的声音。但是，眼下的形势已经跟神龙革命之前迥然不同了。当初大多数朝臣之所以拥护他们发动政变，目的是为了推翻武周，匡复李唐，如今目标既已达成，人心普遍渴望安定，谁又会提着脑袋跟他们再闹一场革命呢？

不可能了。

所以，明知道一张死亡的大网已经朝着头顶笼罩下来，他们也无可奈何。

也许是察觉到了朝堂上越来越紧张的斗争气氛，相王李旦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他意识到五大臣和三哥李显之间迟早会有一场对决。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历来不喜欢权力斗争的李旦随后便向中宗提出，辞去太尉和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职。

中宗正中下怀，当即表示同意，紧接着又装模作样地要封李旦为“皇太弟”。李旦当然是坚决辞让了。

数日之后，武三思和武攸暨也非常高姿态地推掉了皇帝给他们的新官爵。

武三思很聪明。他知道，对诸武心怀不满的人绝不止五大臣，如果他现在表现得太过张扬，就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因此，目前最好的策略就是尽量保持低调，然后集中精力铲除五大臣。等做完这件事，朝政大权自然会落到自己手上。

武三思对此满怀信心。

这年初夏的某个早晨，有一个人从岭南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都。

他就是魏元忠。

李显早在即位的当天，就已经派专人前往高要（今广东高要市）去征召魏元忠了。如今，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这个昔日的嫡系大臣终于回朝了。李显当天就任命魏元忠为卫尉卿、同平章事。

七天后，李显又迅速擢升魏元忠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日拜相的大臣还有韦安石、李怀远、唐休璟、崔玄暐、杨再思、祝钦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七个人之所以在同一天拜相，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相同的政治背景——七个人都是天子李显的东宫旧僚。

至此，李显终于摆脱了即位之初那种孤立无援的尴尬处境。现在的宰相班子中已经有七个人是他的嫡系。就算把具有双重身份的崔玄暐剔除出去，划入功臣集团，也还有六个宰相是李显的旧日班底。

六比五，中宗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五大臣，完全掌握了政治斗争的主动权。现在，只要他动一根指头，随时可以让五大臣卷铺盖滚蛋。

神龙元年五月，中宗李显再度做出了一个令五大臣啼笑皆非的举动。他居然声称武三思、武攸暨、术士郑普思等人也都参与了神龙政变，因此把他们与张柬之等人并列为革命功臣，赏赐给他们“免死铁券”[2]。

中宗的赏赐诏书颁下，五大臣就像是被人扇了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在他们看来，和武三思、郑普思这帮人为伍，简直是在侮辱他们的人格。他们忍无可忍，立刻发动文武百官联名上疏，对诸武同受赏赐之事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并再次要求贬黜诸武。

虽然这一次他们纠集了满朝文武一起发飙，把抗议活动搞得声势浩大，可中宗李显丝毫没有让步。

因为他知道，朝中的多数官员其实是碍于五大臣的宰相身份，迫于无奈才和他们掺和在一块的。换言之，哪一天要是摘掉五大臣头上的宰相乌纱，群臣立马会跟他们划清界限。况且，越是虚张声势，就越是表明五大臣已经黔驴技穷了。除了上奏章、发牢骚、提抗议、搞串

联，他们还能干什么？

什么也干不了！

所以，李显一点也不怕他们。

五大臣彻底没辙。

作为臣子，纠集百官联名抗议已经是他们所能做的最极端的事了，再往前迈一步，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了。

怎么办？

五大臣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派一名卧底前去监视武三思，随时掌握第一手情报，以便制定防守策略。

他们选中的这个人叫崔湜，是朝中的一名低级官员，曾经跟随他们参与政变。之所以挑上他，是因为此人比较机灵，而且官卑人轻，在从事间谍工作时不容易引起对手怀疑。

五大臣的判断没错，崔湜确实很机灵，也很适合从事间谍工作。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崔湜凭什么替他们卖命？

当初跟着五大臣闹革命，是因为李唐复辟是人心所向，成功的概率很高。现如今呢？只要眼睛没瞎的人都看得见，五大臣已经成为皇帝的眼中钉了，而武三思才是皇帝跟前的第一大红人。为几个过了气的帝国大佬去得罪一个圣眷正隆的政坛新宠，崔湜犯得着吗？

当然，五大臣尽管过气了，可名义上还是宰相，也不能不买他们的账。所以崔湜在接受任务的时候，不仅没有表现出半点抵触情绪，反而信誓旦旦地表示：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五大臣很高兴。没想到这位同志的觉悟这么高，本来想好的一大堆鼓舞斗志的话也就免了。可五大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崔湜一转身就直接奔向了武三思的府邸，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卖了。

武三思对这个年轻人弃暗投明的行为表示了高度赞赏，然后告诉他，表面上一切照常，继续从五大臣方面接受指示，不要让他们怀疑。

崔湜心领神会，这是让他当双面间谍。武三思随后便暗中举荐，把崔湜一举提拔为中书舍人。崔湜感恩戴德，从此成了武三思的死党。

对于崔湜的反水，五大臣一无所知。

也许直到死，他们也不知道好同志崔湜早就成了双面间谍。

神龙元年盛夏的某个黄昏，武三思的府上又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是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落魄男人。

第一眼看到他时，武三思差点没认出来。

此人名叫郑愔，曾任殿中侍御史，原是二张的心腹，在神龙革命前跟着二张很是得意了一阵子。二张被杀后，听说他被贬到宣州当了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参军，后来又因贪污案而弃官潜逃，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看着眼前的这个负案在逃的家伙，武三思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嫌恶之情。他以为这小子肯定是来蹭饭的，所以打算让他吃顿饱饭就滚蛋。

可郑愔接下来的举动却大出武三思意料之外。

他一看见武三思就开始号啕大哭，那悲伤的神情如丧考妣，紧接着又纵声狂笑，笑得屋顶的瓦片差点没震下来。

武三思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小子疯了。

然而，当他看到郑愔深陷的眼眶中闪过一道狡黠的光芒时，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人没疯，而且肯定有话想对他说。

“说吧，来找我干什么？”武三思盯着他的眼睛问。

郑愔说：“初见大王而哭，是因为大王就要身死族灭；次为大王而笑，是高兴大王终于遇见了我！”

好一个大言不惭的亡命之徒！武三思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了一串冷笑。不过他忽然对这个叫郑愔的人产生了兴趣，很想听听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郑愔接着说：“大王如今虽然得到了皇上的青睐，可五大臣手中依然握着宰相和将军的权力。他们的胆识和智谋非常人可及，所以当时废黜太后才会如同反掌。大王仔细想想，您拥有的力量与地位较之太后孰轻孰重？五大臣昼夜之中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吃大王的肉，不把武氏一族铲除殆尽不足以逞心快意。大王如果不马上除掉五大臣，则危

殆不啻朝露，而您却自以为稳如泰山，这正是郑愔替大王感到忧惧的地方啊！”

武三思笑了。

他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的眼光很毒，确实一语道破了他的隐忧。

他决定收留这条丧家之犬。对于这样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你给他滴水之恩，他必定会报以涌泉。更何况，在即将与五大臣展开的较量中，他正需要这种机智而凶狠的鹰犬。

武三思站了起来，拍拍郑愔的肩膀，把他请到了府中的密室。当天夜里，他就从郑愔那里得到了许多中肯的建议。

数日后，郑愔便和崔湜一样当了中书舍人，从此成为武三思的得力鹰犬。

经过一番精心谋划，武三思终于出手了。

他入宫去见韦后，并和她一起游说皇帝：“五大臣依恃自己是复辟功臣，专权跋扈，已经对帝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必须把他们除掉！”

李显问他有何良策。武三思说：“依微臣之见，对付他们最好的策略就是明升暗降，将他们封王，同时免除他们的宰相职务，表面上不失为对功臣的尊重，实际上剥夺他们的实权。”

李显深以为然。

五大臣的厄运就此降临。

这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宗忽然在朝会上宣布：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同时全部罢相，另外赐给他们黄金绸缎、雕鞍御马，规定每月一日及十五日进宫朝见，其余时间不必上朝。

五大臣带着悲哀和愤怒的神色面面相觑。可除了领旨谢恩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不久，崔玄暐第一个被逐出朝廷，贬为梁州（陕西汉中市）刺史。

这年秋天，八十一岁的张柬之意识到留在朝廷凶多吉少，于是主动上表请求回老家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养病。中宗立即照准，让他当了

挂名的襄州刺史，不主持州事，但仍可享受全额薪俸。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春天，五大臣中剩下的三个也都被逐出了东都。敬晖贬为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桓彦范贬为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刺史，袁恕己贬为豫州（今河南汝南县）刺史。

随着五大臣的垮台，他们身后的功臣集团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首先罹难的是曾在政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驸马都尉王同皎。

即便他贵为中宗的女婿，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身份、地位、功劳、亲情，一切的一切，都只能苍白如纸。

自从宫中传出武三思与韦后的秽乱丑闻，王同皎就深恶痛绝，到了五大臣被贬之后，唇亡齿寒的王同皎更是义愤填膺。每次和身边的人论及时政，王同皎总是怒形于色，出言无状。

有道是祸从口出，王同皎虽然只是躲在家中发发牢骚骂骂娘，可还是迅速招来了杀身之祸。

他被两个住在他家里的朋友卖了。

出卖他的人是两个兄弟：老大就是唐朝著名诗人宋之问，老二叫宋之逊。

宋之问对律诗的定型有过重要贡献，其诗歌不仅名重当时，而且享誉后世。“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一千古名句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宋之问的诗品固然无可挑剔，只可惜他的人品大有问题。

他们兄弟原本是二张的党羽，神龙政变后被流放岭南，后来又悄悄逃回洛阳。王同皎同情他们，把他们收留在家中。没想到二宋为了重获失去的荣华富贵，竟然恩将仇报，把王同皎平日的言行全都记录下来，然后一纸告密状递到了武三思手里。

武三思知道王同皎贵为驸马，单凭这些牢骚话还不足以置他于死地，于是炮制了一桩谋反案，硬是把王同皎定成了死罪。王同皎随即被斩首，家产抄没。因为告密有功，宋之逊、宋之问兄弟旋即恢复京官身份，用朋友兼恩人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官袍和乌纱。

随后，武三思开始了全面的政治清洗，曾追随五大臣的那些政变功臣全部被视为逆党而遭到贬谪。从此，“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

附武氏者斥之（贬谪流放），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官复原职），大权尽归三思矣！”（《资治通鉴》卷二〇八）

武三思轻而易举地扳倒了功臣集团。

神龙政变刚刚过去一年，帝国政坛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五大臣拼着身家性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彻底付诸东流。

这年春天，霏霏淫雨一直笼罩着东都洛阳，也打湿了许多朝臣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

洛阳城外的官道上，每天都有被贬官员的马车黯然驶过，没有人为他们送行，更没有人关心他们将去向何方。

这样的时节，道路两旁的梨花开得正艳。每一场风雨过后，总有一些初生的白色花瓣凄怆地离开枝头，纷纷委落于泥土之中，然后又被缓缓驶过的一辆辆马车轧得粉碎……

五大臣之死

曾几何时，张柬之等人信心满满地认为——武三思只是他们砧板上的鱼肉。可是现在，武三思却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他们——你们只是我掌中的玩偶！

在武三思眼中，如今的五大臣就是一群半死不活的耗子。他并不急于把他们一口吃掉，而是要慢慢玩弄，细细品尝那份复仇的快意。

这一年夏天，武三思唆使郑愔，指控五大臣与驸马都尉王同皎串通谋反。于是中宗再度下诏，剥夺了他们的封爵，并将张柬之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桓彦范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市南）司马，崔玄暐贬为白州（今广西博白县）司马，敬晖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袁恕己贬为窦州（今广东信宜市南）司马。

武三思与韦后的龌龊私情已经成为朝野上下公开的秘密，可没有人知道中宗李显对此作何感想。

对于天子头上这顶绿油油的大帽子，满朝文武虽然也都觉得有点为难，但是鉴于皇帝本人是自愿戴上的，所以也不便说什么，只好一个个假装色盲。

然而，当官的喜欢装色盲，并不意味着天下人也都成了瞎子。

有一个叫韦月将的读书人就忍不住站了出来，上书控告武三思秽乱后宫，而且必将作乱。李显被人公然指出了帽子的颜色，顿时恼羞成怒，下令将韦月将逮捕斩首。时任黄门侍郎的宋璟当即提出反对，表示应由司法部门进行审理。

李显一看到宋璟的奏章，越发暴跳如雷，连头巾都来不及裹好，趿拉着鞋子从寝殿的侧门跑了出来，怒斥宋璟说："朕已下令将他斩首，为何还不执行？"

宋璟不慌不忙地说："有人指控皇后和武三思有私情，陛下一句话也不问就把他杀了，臣恐天下人在背后议论。"于是坚持走司法程序，可李显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了一会儿，宋璟忽然大声说："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资治通鉴》卷二○八）

宋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当初就曾经为了扳倒二张而与女皇武曌面折廷争，武皇一怒之下连下三道敕令，要把他支出朝廷，可硬骨头宋璟却公然违抗敕令，拒不奉诏，最后把武皇搞得没脾气，只好收回成命。

此刻，李显知道跟这个硬骨头死磕也不是办法，只好退了一步，把韦月将交给了御史台。左御史大夫苏珦等人有意保韦月将一命，就推说夏天执行斩刑违背天时，建议流放。李显没辙，便下令杖打韦月将，将其流放岭南。

但是韦月将终究没有逃过一死。

这年秋分一过，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负责看押韦月将的广州都督周仁轨就把他杀了。

即使有几个正直的大臣回护，皇帝也只是让这个触逆龙鳞的人多活了一个夏天。

韦月将一案使宋璟不仅触怒了皇帝，也彻底得罪了武三思，所以没过多久，宋璟就被逐出了朝廷，贬为贝州（今河北清河县）代理刺史。

神龙二年秋天，武三思终于厌倦了猫玩耗子的游戏。

因为他在朝中的实质权力已经越来越大，所以他不免会担心——万一李显哪一天觉得他武三思的权力太大了，会不会重新起用五大臣，反过来制约他？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因此，只有把五大臣干掉，才能永绝后患。

但是，上次指控五大臣与王同皎串通谋反，皇帝也只是把他们贬到岭南而已，这说明皇帝还想留着他们。所以，要彻底剪除五大臣，就必须寻找更有力的借口。

这样的借口在哪呢？

苦思多日后，武三思的脑中灵光一闪，终于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初秋的一个清晨，天色熹微，霜露浓重，洛阳城南的洛水桥上忽然人头攒动。早起的行人们围着一张贴在墙上的传单驻足围观，看客们脸上的表情既神秘又兴奋，并且不停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当天，传单上的内容就在洛阳的坊间和街市上不胫而走，并迅速传进了皇宫。

中宗李显被刺激得暴跳如雷。

那张传单用一种绘声绘色的语调详细描述了韦后和武三思的种种淫乱情节，并且强烈要求废黜韦后。李显在暴怒中把一张传单撕得粉碎，下令御史大夫李承嘉彻底追查此事。李承嘉是武三思的党羽，所以很快就呈上了调查结果，并提出判决意见："这是张柬之等人搞的，表面上说要废黜皇后，实际上是企图谋反，请陛下将五人族诛！"

武三思笑了。

为了让这张传单起到它应有的效果，他可废了不少苦心。虽说是请人捉刀代笔，但具体的行文和细节当然少不了他这个当事人的修改和润色。为了促使皇帝早下决心，武三思一边让儿媳安乐公主进宫劝说李显，一边授意郑愔在朝会上死死咬住五大臣不放。李显遂下令司法部门结案。大理丞李朝隐表示："张柬之等人未经调查审讯，不可随意诛杀。"武三思的党羽，另一名大理丞裴谈马上针锋相对地说："张柬之等人应该族诛，不必调查审讯。"

李显考虑到五大臣手上有他御赐的免死铁券，于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准许他们不死，但是终身流放：张柬之流放泷州（今广东罗定市南），桓彦范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崔玄暐流放古州（今越南谅山市），敬晖流放琼州（今海南定安县），袁恕己流放环州（今广西环江县）；五人的宗族子弟，凡年满十六岁以上者也全部流放岭

南。

随后，办案有功的李承嘉加封金紫光禄大夫，晋爵襄武郡公，裴谈升任刑部尚书，而那个不识时务的李朝隐则被贬为闻喜县令。

没能把五大臣彻底消灭，让武三思颇为不悦。当初靠出卖五大臣换取富贵的崔湜更是惶惶不安，于是他向武三思献计："张柬之等人不死，必将后患无穷，不如派人假传圣旨，把他们全部干掉。"

武三思问："谁可以接这趟差使？"

崔湜随即推荐了一个叫周利贞的人。此人曾经和五大臣有过节，神龙政变后被贬为嘉州司马，所以一直对五大臣恨之入骨。五大臣垮台后，周利贞才被重新起用，回朝担任大理正。现在，崔湜的推荐相当于给他提供了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周利贞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欣然同意，马上前往岭南执行这项秘密任务。

让周利贞颇有些遗憾的是，他刚刚启程，五大臣中就已经有两个死在了流放的途中。

那是年已八十二岁的张柬之和六十九岁的崔玄暐。

此刻，死亡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种解脱。

相比之下，其他三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没能亲手杀死张柬之和崔玄暐，让周利贞很有些失落感。所以，当他在贵州（今广西贵港市）终于追上桓彦范时，便把郁积的怒火全都倾泻到了桓彦范身上。周利贞命人削尖了竹子，然后把桓彦范放在竹刺上来回拖曳，直到肉尽见骨，才命人把奄奄一息的桓彦范乱棍打死。

第二个惨死的人是敬晖。周利贞追上他后，命人用刀把他的肌肉片片割下，活活剐死。

最后一个是袁恕己。周利贞又换了一种手法——灌"野葛汁"。野葛是一种剧毒的野草，又名"钩吻"，一旦入口，犹如铁钩钩入咽喉，令人生不如死。袁恕己被灌下毒汁后，忍受不住剧痛，双手不停抓地，以致十指指甲全部脱落，但是挣扎许久却始终没有咽气。周利贞在一旁冷冷地享受着复仇的快感，等他觉得发泄够了，才命手下把袁恕己活活打死。

周利贞圆满完成任务，回朝后立刻被武三思提升为御史中丞。

与五大臣一同落难的，还有当初那个一语成谶的薛季昶。他同样被一贬再贬，最后在岭南的贬所被逼服毒自杀。

以五大臣为首的异己势力全盘铲除之后，李唐王朝几乎成了武三思的天下。看着朝堂上噤若寒蝉的文武百官，不可一世的武三思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他经常对身边的人感叹道：“我不知世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资治通鉴》卷二○八）

当时，兵部尚书宗楚客（武曌的族甥）、将作大匠宗晋卿（宗楚客的弟弟）、太府卿纪处讷（武三思的连襟）、鸿胪卿甘元柬等人皆为武三思死党；御史中丞周利贞、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都是武三思豢养的得力鹰犬，时人送给他们一个绰号——“五狗”。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冬天，中宗李显将朝廷迁回了西京长安。

自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武后挟高宗东赴洛阳，长安便沦为帝国的陪都。如今，时光之轮走过二十多个春秋后，这座伟大的城市终于再次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

然而，大唐的臣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帝国绕了一个圈，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原点。如今的中宗时代与当年的高宗时代如出一辙——天子懦弱，妇人干政，武氏当道，百官束手。

无精打采的帝国马车晃晃悠悠地行走在牝鸡司晨的梦魇之中，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梦魇何时终结。一个拨弄乾坤的武曌走了，又来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韦氏。与此同时，一个叫李裹儿的青春玉女也已在阳光下蓬勃地成长起来。她那明亮而宽阔的额头上闪烁着与祖母武曌和母亲韦氏一样自信的光芒，她的胸中激荡着与祖母武曌和母亲韦氏一样的对于权力的无限渴望。几年来，这个叫李裹儿的青春玉女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深深介入了帝国政治——卖官鬻爵，包揽刑讼，打压异己，培植党羽……“光艳动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门”（《旧唐书·诸帝公主传》）。

这位安乐公主甚至时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拟就诏书，然后把内容掩盖住，递到父皇跟前让他签字盖章。笑呵呵的中宗李显总是有求必应，至于那些诏书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皇帝几乎从来没有过问。

李裹儿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体验到了权力带给她的无上快感。

所以这一生，她发誓一定要将伟大的祖母、英明神武的则天皇帝所玩过的权力游戏进行到底！于是终于有一天，安乐公主郑重其事地向李显提出了一个要求——立她为皇太女。

皇太女？

这真是一个空前绝后，匪夷所思的要求。

中宗李显用了好一会工夫才弄明白宝贝女儿的这个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笑容可掬地对她摇了摇头。美丽的安乐公主用一种无比幽怨的眼神狠狠瞪了父亲一眼，气呼呼地说："则天太后不过是并州商人的女儿，最后都能当天子，我身为天子的女儿，为何不能当皇太女？"

尽管李显对这个宝贝女儿的溺爱有些过头，可在事关皇位继承权的问题上，李显还是清醒的，因此当然不会同意。

但是李显也舍不得斥责安乐公主。面对她的胡搅蛮缠，李显始终温言劝慰，最后好说歹说，总算把她打发走了。看着宝贝女儿拂袖而去的背影，李显的脸上依旧充满慈爱的笑容。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一贯任性的女儿又一次突发奇想，心血来潮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被宠坏的小孩子吵着要摘天上的星星一样，当不得真，所以他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可是，李显万万没有料到，这件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小事，居然会变成一根导火索，很快点燃了某个人内心深处潜藏已久的恐惧和愤怒，从而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

这个被点燃愤怒的人就是安乐公主的异母兄长，当今的帝国储君——太子李重俊。

中宗共有四个儿子，李重俊排行第三，非嫡非长，本来是没有资格当太子的，可由于中宗长子李重润早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因得罪二张而被武曌逼杀，次子李重福又在中宗复位之初遭韦后谗毁，被贬出东都，软禁于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因此尽管中宗并不宠爱李重俊，可储君的冠冕还是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他的头上。

表面上看，李重俊是幸运的，可实际上，他这个太子当得实在是够窝囊。因为他不是韦后所生，所以韦后从不给他好脸色看；此外，大权独揽的武三思对他这个“未来天子”也是颇为忌恨，一直在暗中排挤他；还有那个骄纵任性的安乐公主，更不把他当一回事，经常和驸马武崇训一起肆意凌辱他，还当面呼他为“奴”；而那个专掌诏命的宫中女官上官婉儿，则时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尊武氏一党，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这个当朝储君构成了威胁。

如此种种，无不让李重俊感到深深的孤独，更让他感到了强烈的恐惧。因为这些人都是当今大唐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并且还在处心积虑地向更高的权力巅峰迈进，而李重俊的太子身份则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而也就必然成为他（她）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所以，与其说这顶储君的冠冕象征着地位和荣耀，还不如说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魔咒。从它戴在李重俊头上的那一刻起，李重俊就感觉自己被一片莫名而可怕的阴影笼罩住了，因而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整天都活得战战兢兢。

随着武韦一党的权力越来越大，李重俊也越来越强烈地预感到——自己迟早有一天会被这些人废掉，甚至死在这些人手上。

而当安乐公主公然向中宗提出立她为“皇太女”时，李重俊更是被一种末日将临的恐慌彻底攫住了。虽然中宗拒绝了安乐公主的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她会从此善罢甘休。据李重俊所知，驸马武崇训天天都在怂恿安乐公主，让她想办法迫使中宗废黜太子。照此情形发展下去，无论安乐公主最后能不能当上皇太女，李重俊今后的日子都绝对不会好过。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

李重俊听见自己内心有一个愤怒而绝望的声音在喊——不！

与其这样无所作为，任人宰割，还不如铤而走险，拼个鱼死网破！

决心已定，李重俊开始寻找同盟。

他首先找到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此人是神龙政变的主要功臣之一，当初就是因为他在军事上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可是这几年来，以张柬之为首的功臣集团却被武三思铲除殆尽，神龙政变的胜利果实也轻而易举地落入武三思手中，这一切，无不让李多祚感到义愤填膺。虽然他暂时还没有被武三思列入打击范围，但是唇亡齿寒的忧惧却时刻缠绕着他，让他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当太子李重俊暗中找到他，向他提出发动政变，诛杀武氏一党的计划时，李多祚当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李重俊找到的第二个人是成王李千里。他是吴王李恪之子，时任左金吾大将军。当年武曌篡唐时，李唐宗室遭遇了灭顶之灾，李千里是少数劫后余生的亲王之一。神龙政变后，李千里和其他硕果仅存的宗室亲王一样，以为可以重见天日，扬眉吐气了，没想到武氏一党转眼又把持了朝政大权。现在的大唐江山表面上虽然是李家的，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却是武三思和他的姘头韦后。这样的局面对残存的李唐宗室而言，显然是极大的威胁。因此，对武氏一党的共同愤恨让成王李千里和太子李重俊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接触之后，双方迅速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并肩作战——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为了赢得一个更安全、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而拼死一战！

除了李多祚和李千里这两个手握禁军的大将外，参与政变计划的人还有李多祚的部将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以及李多祚的女婿野呼利、李千里的儿子天水王李禧等。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样的阵容无疑是强大的。然而，一场政变能否取得成功，并不单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大小。换句话说，在政治的角斗场上，拳头固然重要，但是比拳头更重要的却是头脑。可惜在这一点上，李重俊和他的战友们显然都有些认识不足。

参与政变的人员确定后，李重俊等人开始制订行动计划。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李重俊、李多祚率领，直扑武三思宅邸，一举消灭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另一路由李千里父子率领，分兵把守太极宫的各座宫门，封锁宫廷内外的交通。待诛杀武三思后，第一路人马迅速回头攻进内廷，捕杀上官婉儿；第二路人马则杀入朝堂，铲除武三思在朝

中的党羽（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等人），最后再与太子合兵一处，彻底控制整个太极宫的局势。

计划看上去似乎是完美的。

可是，它真的是完美的吗？

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七月初六，蓄谋已久的李重俊终于出手了。他伪造了一道皇帝诏书，调集羽林军士兵三百多人，和李多祚、野呼利、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人一起，径直杀向休祥坊南门内的武三思宅邸。休祥坊位于长安城的西北角，与宫城之间仅隔一个辅兴坊，所以政变军队一从宫城西侧的安福门杀出，不消片刻便可冲到武三思的宅邸前。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初秋早晨，武三思和他的儿子武崇训正在书房中品茗聊天。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空气中飘荡着缕缕沁人心脾的花香。武三思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儿子说着话，眼睛半睁半闭，嘴里呷着香茗，鼻中嗅着花香，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尽情享受着这一份恬静、安逸与祥和。

然而，末日就在这一瞬间降临了。

死神就这样毫无预兆，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武三思父子的面前。

武三思最初是听见一阵刺耳的喊杀声像潮水一样由远而近地漫了过来，紧接着，太子李重俊挥舞佩刀左劈右砍的画面就映入了他的眼帘。他看见太子怒目圆睁，表情狰狞，身后紧跟着一群杀红了眼的禁军官兵。他们顺着后花园的那条碎石甬道飞快地向书房扑来。在甬道两侧，武府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扑倒在血泊中。武三思想喊，可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丝声音也发不出来；他想跑，可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无法挪动半步。而他的儿子武崇训也跟他一模一样，无比惊愕地张大着嘴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刹那间，凶神恶煞的太子就冲到了他们眼前。一道寒光闪过，武三思看见儿子武崇训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一道鲜红的血光立刻从肩膀中间的窟窿中喷射而出，一下子染红了武三思的目光……

这是武三思在这个世界上看见的最后一幅图景，继而他感觉自己的脖子一凉，眼前一黑，整个世界就彻底陷入了黑暗。

李重俊和李多祚等人杀死武三思父子及亲党十余人后，又按计划杀回皇宫，率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肃章门是分隔“外朝”与“内廷”的一道

重要宫门，一旦杀进这道门，就意味着政变的性质已经不仅是“清除奸党”，而是公然与皇帝为敌了。不管太子的主观目的为何，至少在客观上，他已经把皇帝和自己同时逼上了绝路。李重俊等人一路冲进内廷，沿途撞开多处殿阁，高喊着要逮捕上官婉儿。与此同时，李千里父子也率兵扑向右延明门，准备从这里攻入位于太极殿东侧的门下省，砍杀正在朝堂办公的宗楚客、纪处讷等武氏党羽。

上官婉儿听到外面杀声震天，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又听见宫人飞报，说变军口口声声要抓她，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过她毕竟在宫中多年，多少还是练就了一点临危不乱的定力，所以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她知道，要想保住性命，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皇帝皇后绑在一块。太子要是连皇帝也敢杀，那就只好跟着皇帝一起死；倘若太子不敢杀皇帝，那自己就能躲过这一劫。上官婉儿心里这么想着，人已经飞快地冲向皇帝的寝殿。

此时，李显、韦后和安乐公主也已乱成一团（安乐公主昨夜恰好在宫中留宿，没有回家，所以侥幸躲过了刚才的那场屠杀）。当李显等人看见鬓发散乱的上官婉儿冲进来时，赶紧问她外面情形如何。上官婉儿一边喘息一边对着他们大喊：“太子是想先抓我，然后抓皇后，最后再抓皇上！”

李显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和鼻尖往外冒。

他断然不会想到，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太子居然会起兵造反！

不过，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只有逃命要紧。变军是从皇宫南边杀过来的，所以眼下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北面的玄武门了。因为玄武门是禁军的屯驻地，可以调动部队阻遏变军，而且此门建于龙首原的余坡上，地势较高，站在城楼上可以俯瞰大半个宫城，便于观察形势，无疑是整个太极宫中最好的避难所。思虑及此，李显赶紧带着韦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在一群宦官宫女的簇拥下，仓皇跑到玄武门，立刻登上城楼，同时命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百余名士兵在城楼下护驾，结阵抵御变军。

李显前脚刚登上玄武门，太子和李多祚后脚就杀到了。面对眼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李重俊顿时犯了踌躇。因为在他的计划中，并没有与皇帝开战的打算，所以他实在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办。迟疑了片刻，他只好下令士兵暂停进攻，等着看皇帝接下来会如何表态。

双方就这样在玄武门下对峙着。

这场政变走到了一个最微妙的关头。

太子的变军有三百多人，皇帝这边仓促集结的士兵只有一百多人，如果太子一鼓作气，下令强攻，胜利多半是属于他的。可是，他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莫名其妙地停手了。

这显然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趁着太子这边犹豫的间隙，皇帝身边一个叫杨思勖的宦官意识到有机可乘，立刻向皇帝请命，主动要求下去攻击。一般的宦官都是苍白瘦弱之人，可这个杨思勖却与众不同，不仅身材魁梧，而且一脸勇武之色。李显大喜过望，当即首肯。杨思勖旋即冲下城楼，飞身上马，独自一人朝变军驰去。

李多祚的女婿野呼利是一员勇将，此时担任变军的前锋将领。他眼见对方单枪匹马杀来，心中不禁冷笑，当即上前迎战。双方在阵前交手，三五个回合后，杨思勖故意卖了一个破绽，野呼利不知是计，挥刀便砍，杨思勖侧身躲过，反手一刀，立时将野呼利斩于马下。

凝神观战的两军士兵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高呼，只不过皇帝这边是高声欢呼，而太子那边却是一片惊呼。

变军人人骇异，士气顿时大挫。李重俊、李多祚和其他几个将领也都是满脸惊惶。

城楼上的李显一见杨思勖得手，马上抓住时机，倚着栏杆向变军士兵喊话：“你们都是朕的宿卫之士，何苦追随李多祚造反？只要你们斩杀叛贼，不必担心没有富贵！”

变军士兵面面相觑。

只犹豫了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把刀枪转向了自己的将军们。

李多祚、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当即被一部分倒戈的士兵乱刀砍杀。太子李重俊见大势已去，慌忙带着亲兵一百余人夺路而逃，其余的部众各自作鸟兽散。

一场胜利在望的政变，就这样功亏一篑。

太子李重俊的这路人马一败涂地，而成王李千里的那一路也不比他们幸运。

当李千里父子率兵进攻右延明门时，早有防备的宗楚客、纪处讷已经调集了二千余名禁军闭门拒守。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宗楚客一方占据城楼，居高临下，弓箭兵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而李千里一方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只能变成对手的活靶子，因此他们很快就输了。李千里和儿子李禧双双阵亡，余众或死或降，行动彻底失败。

一百余名骑兵跟着太子李重俊狂奔出城，准备亡命终南山。可是，跟着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主子混，还有什么富贵和前途可言呢？

一路上，皇帝承诺富贵的那番话始终在他们的耳边回响。于是不断有人偷偷勒住缰绳，掉转马头往回跑。等到李重俊逃到鄠县（今陕西户县）附近的树林中时，身边只剩下最后的几名亲信。精疲力竭的李重俊翻身下马，跌坐在一棵老树下，背靠着树干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耷拉着脑袋，生平第一次感到呼吸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

不过，他很快就不会觉得困难了。

因为几名亲信已经拔出佩刀，正慢慢朝他逼近。几秒钟后，他就永远也不需要呼吸了。

当李重俊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刚好看见几把钢刀同时向他的头顶劈了下来……

李重俊输了，输得干干净净！不仅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搭上了李多祚翁婿、李千里父子等一大帮人的性命。

他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究其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政变领导者的素质有问题。

表面上看，太子亲自领导政变，下面又有李多祚这样的前期政变功臣和军方高层将领，还有李千里这种老牌的李唐宗室亲王，其号召力和战斗力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只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来看李重俊。他虽然贵为太子，但是年纪太轻，缺乏相应的人生阅历和政治历练，入主东宫的时间又太短（政变前一年七月刚被立为太子），而且东宫官属又大多是一些权贵子弟，根本没有德行和能力辅佐他，“唯以蹴鞠猥戏取狎于重俊，竟无调护之意”（《旧唐书·中宗诸子传》）。所以，李重俊在政治上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再来看李多祚。虽然他是禁军的高级将领，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介武

夫。尽管他在神龙政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可那也要归功于张柬之等五大臣的谋划有方和调度得当。说白了，李多祚只是一把刀，好不好使的关键不在于刀，而在于使刀的人。碰上五大臣，李多祚就是一把屠龙刀；可碰到李重俊，他就只能是一把切菜刀。

最后来看李千里。他虽然是李唐宗室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能力超群，让武曌舍不得杀他。恰恰相反，史称“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而李千里“偏躁无才”，加之善于谄媚武曌，“数献符瑞”（《资治通鉴》卷二○八），所以才逃过了那场灭顶之灾。此外，李千里虽然担任左金吾大将军，握有禁军兵权，但任职时间短（中宗复位时才被授予这个职务），因此难以真正获得将士的拥戴。

由上可知，无论是太子李重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还是宗室亲王李千里，显然都缺乏成功的领导者所需的素质，尤其缺乏政变所需的谋略和政治智慧，所以从一开始，这场政变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进而言之，这场政变更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算不上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变，因此无论成功与否，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第二，政变缺乏合法性依据与有效的利益驱动。

由于领导者缺乏政治头脑，这场政变既没有提出煽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这就极大地制约了成功的可能性。

关于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看出来。太子和李多祚在征调三百余名羽林士兵时，居然不是由太子进行政治动员，也不是由李多祚下达军事命令，而是采用名不正言不顺的“矫诏（假传诏书）”手段！

如果李重俊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身边有得力的政治幕僚的话，那他绝不会采取这种愚蠢的“矫诏”方式，而会像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政变者所做的那样——首先指出奸党（武氏一党）对朝政的危害，阐明此次行动的正义性，激发士兵的斗志和血性；其次许诺功名富贵，用利益来驱动人心；最后进行一定程度的威胁恐吓，宣称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倘有异心，立斩不赦等等。以李重俊的储君身份，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做这样一番动员，接着再让禁军长官李多祚出面，和官兵弟兄们套套近乎，说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类的煽情话，然后一人一大碗酒，指天为誓，歃血为盟，最后就可以激情澎湃地拿起刀枪，大义凛然地干革命去了。

假如政变是这样发动的，那么当他们在玄武门下与保护皇帝的军队对峙时，士兵们就不会轻易背叛。因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太子这边的实力还是要比皇帝那边强得多。然而，变军士兵之所以听了皇帝李显的一句话就阵前倒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太子和李多祚是以一纸伪造的诏书骗他们起来造反的，这就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忠诚度和积极性。如果政变行动自始至终都很顺利，大家事后都有好处，那当然没话说；可当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士兵们当然宁可听皇帝的，也不肯再为太子卖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听从“皇帝命令”才行动的，如今既然知道那命令是假的，而皇帝在城楼上说的金口玉言则是千真万确的，结果自然是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太子他们了。

反观神龙政变，自始至终，以五大臣为首的领导集团都有一个鲜明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口号，那就是——诛杀二张，推翻武周，匡复李唐社稷，拥立李显复位。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才能团结大多数文武官员，从而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最终赢得胜利。而李重俊等人策划的这场政变却全然没有类似的东西，只是把整个行动建立在一张假造的皇帝诏书之上，如此政变要是能成功，那就是老天爷瞎了眼了。

第三，没有为政变设定一个高端的政治目标。

李重俊等人发动政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武氏一党，为自己赢得更安全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没有更高的政治诉求，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搞一场“半拉子”政变。

李重俊之所以会在玄武门下产生迟疑，按兵不战，就是因为他只想捕杀武氏党羽、上官婉儿，而不愿意与皇帝刀兵相见。我们说过，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李重俊此举，充分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愚蠢。他似乎以为，只要除掉武氏一党就万事大吉了，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讲，不管太子是否有颠覆皇权的意图，只要他胆敢把军队开进内廷，就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之罪！

如果李重俊具有成熟的政治经验，那他在制订政变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也就是说，除非不发动，一旦发动，就必须以“控制皇帝，夺取政权”为最终目标。只要这个目标实现，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除掉任何他所认定的“奸党”！因此，对于李重俊来说，就算他没有弑君篡位的想法，至少也应该用武力把中宗李显控制起来，迫使他下诏诛杀所有武氏余党，同时授命太子监国。如此一来，他才能一方面达到清除政敌的目的，一方面又防止皇帝秋后算账。只有这么做，他才能真正保障自身的安全。

这才是一场成功的政变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李重俊并没有这么做。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经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中宗李显虽然毫发无损，但是也饱受了一场虚惊。

当李重俊的尸体和首级被运回长安后，惊魂甫定的李显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之情，即刻命人用太子首级祭祀了太庙和武三思父子，随后又将其悬挂在朝堂上示众。

同时，李显把成王李千里的姓改为“蝮”，将他的党羽全部逮捕诛杀；被变军攻破的各道宫门的守卫官兵，皆因失职之罪被判处流放；平乱有功的宫闱令杨思勖则被擢升为银青光禄大夫、内常侍。稍后，李显又追赠武三思为太尉、梁宣王，追赠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

这一年九月，朝廷改元景龙。

一个动荡不安的神龙时代就这样匆匆画上了句号。

这个时代虽然短暂，历时不过三年，但是却发生了太多让人始料未及的变故。先是五大臣一举推翻了女皇武曌，继而武三思又整垮了功臣集团，如今，太子李重俊又悍然发动政变，诛杀了一手遮天、权倾朝野的武三思，然后本人也死于非命……如此种种，真是令大唐臣民们心惊肉跳，唏嘘不已。

现在，波谲云诡的神龙政局终于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帝国政坛势必要重新洗牌。在即将展开的又一轮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中，谁又将成为下一个出局者？

[1]　所谓食邑，也叫汤沐邑，只有皇亲国戚和功臣元勋才可获享。获得多少封邑，就意味着有多少户人家的赋税不用上缴国库，而是直接进入获封者的私人腰包，相当于就是在自己家里开了一家税务分局。

[2]　持免死铁券者，除谋逆大罪外，一般死罪可赦免十次。

第五章 一团糜烂的政治

皇后一党崛起

武三思一死，失去靠山的宗楚客、纪处讷等人纷纷向皇后韦氏靠拢，迅速缔结了一个以韦后为核心的“后党”。

李重俊政变后，中宗李显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命司法部门大力搜罗太子余党，大有“宁可错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之势。后党意识到这是一个铲除异己的良机，立刻把矛头对准了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

在安乐公主、宗楚客的授意下，侍御史冉祖雍等人随即对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发出弹劾，指控他们是李重俊同党，应该逮捕归案。李显看到奏疏后，二话不说，即命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立案审查。

一接到指控马上就走司法程序，这分明是一副法不容情的姿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皇帝之所以摆出这种姿态，无非是在暗示司法部门——一切秉公办理，不必忌讳他们的皇亲身份！

朝臣们不禁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捏了一把汗。接下来，他们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关键就要看主审官萧至忠了。准确地说，是要看萧至忠的政治立场。

不过大多数朝臣对此并不乐观，因为一直以来，萧至忠都是武三思的人。神龙之初，萧至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吏部员外郎，随后因为依附武三思，便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青云直上，爬至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高位。虽说现在武三思死了，但武氏一党基本上都投靠了韦后，人们相信这个萧至忠肯定也已经变成后党了，否则皇帝李显凭什么挑他当主审官？

因此，很多人都悲观地认为——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这回八成是死定了！

然而，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意外。

萧至忠非但没有依照皇帝的旨意去搜罗李旦和太平公主谋反的证据，反而跑去做皇帝的思想工作，拼命替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说到动情处甚至声泪俱下：“陛下富有四海，竟然容不下一弟一妹，要眼睁睁看着他们被人罗织陷害吗？当年相王身为皇储时，曾一再向则天皇后请求，愿将天下让给陛下，为此数日饮食不进，此事海内共知，奈何

如今却要以冉祖雍的一句话而猜忌他？”

李显蒙了。

他顿时感觉眼前的情景有些荒诞。原本以为钦点萧至忠为主审官，应该能把这件案子办成铁案，没想到却自摆了一回乌龙。

那么，萧至忠为什么会悄然改变他的政治立场呢？

李显百思不得其解。

实际上，萧至忠并未改变立场。他确实已经投靠了韦后，但这不等于他一定要以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敌。

说白了，他之所以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并非出于政治立场，更非出于道德良知，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在他看来，大权独揽的武三思一死，朝中的政局就变得扑朔迷离了。韦后这个格局狭小、轻浅浮躁的女人能否斗得过器识深远、机智沉稳的太平公主？能否迅速填补武三思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且稳定地、持久地掌控朝政？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所以，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萧至忠绝不愿像宗楚客和纪处讷那样，把宝全押在韦后那一头。他宁可暂时采取骑墙态度，两边都不得罪，静观事态发展。他相信，等尘埃落定之后，再选择自己的政治队列也为时不晚。

后来的事实证明，萧至忠的这种骑墙态度确实很明智。几年后韦氏一党垮台，睿宗李旦即位，太平公主用事，他被贬出朝廷，外放为地方刺史。但他凭借此次替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的功劳，轻而易举地攀上了太平公主，旋即回朝担任刑部尚书，不久又复任中书令，一度成为帝国政坛的不倒翁，并且被太平公主视为心腹股肱，让很多人艳羡不已。只是萧至忠千算万算，怎么也算不到，太平公主居然那么快就被她的侄子李隆基给收拾了。而萧至忠作为太平公主的死党，最终也没能逃过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就在萧至忠极力替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的同时，右补阙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也上疏说：“自古以来，因委任异姓，猜忌骨肉而导致国破家亡者不知有多少，陛下岂可不鉴察？如今，陛下身边的宗室至亲已经所剩无几，且登基不久，便有一子因故贬窜，一子弄兵被诛，唯余一弟朝夕侍奉左右，陛下不可不慎啊！”

李显顿时产生了莫大的迟疑。

问题倒不是萧、吴二人的劝谏果真唤醒了李显的骨肉之情，而是他们的话提醒了他——李旦和太平绝非一般人。他们所拥有的身份、地位、资历、功勋、声望，放眼当今天下，几无一人能及。不要说满朝文武和王公大臣，就是他李显本人在这些方面也比不上这两个弟弟妹妹。

这些年来，太平公主利用她特殊的地位、卓著的声望和雄厚的财力，已经在朝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脉关系网，谁也说不清哪个朝臣曾受过她的提携，或者得到过她的什么好处。正因为此，李显才会一不留神就钦点了一个极力替嫌疑人说话的主审官，闹出一个自摆乌龙的笑话。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萧至忠曾经受过太平公主的恩惠，但是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萧至忠对这个神通广大的女人心存忌惮。

基于上述理由，李显不得不重新考虑，倘若执意对李旦和太平公主下手，会不会激起难以意料的变故？他们会不会像太子李重俊那样，跟他李显拼一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李显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而且，还有一个促使李显重新考虑的因素就是——指控李旦和太平公主参与政变的理由本来就很难成立。

众所周知，李旦和太平公主是拥立李显复位的功臣，神龙政变后，他们的政治待遇和威望都已达至人臣顶点，若说他们参与李重俊政变，那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就算政变成功了，他们也不过是再当一回功臣而已，不可能得到比现在更大的利益；而一旦失败，他们便会丧失所有。在这样的利弊权衡之下，他们还会参与李重俊的政变吗？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若要强行将他们定罪，不仅不能让满朝文武和天下人信服，而且还有可能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拔刀相向。倘若真的逼得他们动手，那后果绝不会像李重俊政变那么简单，而极有可能是第二次神龙政变。

想到这里，李显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罢了罢了，还是谁也别玩火，大家相安无事的好。

随后，李显马上作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撤销了对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指控，宣布从此不再追究此事。

没能扳倒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韦后一党很不甘心。不过他们其实也很清楚，以他们目前的实力而言，要想把这两个功高望重的帝国大佬一举置于死地，似乎还欠些火候。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壮大实力。

为此，他们随即把矛头转向了时任右仆射兼中书令的魏元忠。

只有除掉此人，韦后一党才能彻底把持帝国的权力中枢。

魏元忠位居百官之首，按理说权力应该很大，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自从回朝复相的那天起，魏元忠就一直受到武三思一党的打压，表面上贵为首席宰相，实则根本无力制约武氏一党，以致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都对他颇为失望，认为他尸位素餐，不堪为百官表率。河南的一个低级官吏甚至专门写信骂他，并历数当今朝政十大阙失，说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魏元忠一边受到武党的打压，一边又被士人们在背后戳脊梁骨，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内心大为郁闷。直到李重俊政变爆发，武三思被杀，他才有了一种重见天日之感。

但是，这场政变也给魏元忠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因为他儿子死了。

李重俊发动政变时，魏元忠之子、太仆少卿魏升遭到胁迫，无端卷入其中，事后又被乱兵所杀，不仅死得稀里糊涂，而且还背上了一个“勾结逆党”的罪名。魏元忠悲愤难当，于是四处扬言：“元凶首恶已死，现在就算把我拿到油锅里炸了，我也死而无憾，只可惜太子英年早逝，死得太不值得！”

魏元忠这句话，既是在为太子鸣冤，又是在替自己的儿子叫屈，显然是“大逆不道”之言。中宗念在魏元忠是三朝元老，而且又是自己的东宫旧属，所以不予追究。然而，后党骨干宗楚客、纪处讷等人却死死抓住魏升参与政变的把柄，指控魏元忠与太子通谋，奏请中宗“夷其三族”。当然，李显马上否决了宗楚客等人的奏议。

虽然有皇帝保他，可魏元忠还是强烈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为了让自己的“三族”数百口人免遭灭顶之灾，魏元忠不得不主动递交了辞呈。

李显知道魏元忠老了，再把他留在朝中也没多大意义，所以没有挽留他，而是让他以特进（正二品散官）的官职致仕，并保留每月初一、

十五两次进宫朝见的权利，算是给了他相当高的离休待遇。

首席宰相魏元忠一倒，后党的势力立刻崛起。

太子政变后不过两个月，宗楚客、纪处讷便同时拜相，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由于担心魏元忠卷土重来，宗楚客等人随后一再上奏中宗，一意要置魏元忠于死地。

率先出招的是刚刚被宗楚客提拔为御史中丞的姚廷筠。他在奏疏中说："想当年，侯君集虽然是开国元勋，可当他谋反的时候，太宗向群臣求情想饶他不死，群臣坚决不同意，太宗也只好含泪将他处斩。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李祐等人叛乱，虽是至亲，皆依国法处分。元忠功勋不及君集，身份不属国戚，儿子名列叛党，自该满门抄斩，把家宅夷为池沼！陛下仁慈，难免受其迷惑，故一再掩饰他的罪过。臣今日不惜触犯龙麟，忤逆圣意，实在是因为此事关系到社稷大业！"

姚廷筠的一番话说得有理有节，大义凛然，李显无力反驳，只好退了一步，命大理寺收押魏元忠，随后贬为渠州（今四川渠县）司马。

紧接着，已升任给事中的冉祖雍再度发飙，上奏说："魏元忠既然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就不应该授予他渠州司马的官职。"与此同时，同为后党成员的侍中杨再思和中书令李峤也随声附和，要求严惩魏元忠。

李显忍无可忍，终于发火："元忠为国效力多年，朕才特意赦免他，诏书已经发布，岂能一改再改？更何况，裁决之权理应在朕的手中，你们上奏个没完，是不是成心为难朕？"杨再思等人从来没看过皇帝发怒，顿时大为惶恐，一再磕头谢罪。

然而，魏元忠一日不死，宗楚客便一日不肯善罢甘休。不久，他再次授意监察御史袁守一上疏："重俊是陛下的儿子，尚且加以罪刑昭明国法，元忠既非元勋亦非国戚，岂能单独逃脱法网？"

这句话显然戳到了李显的痛处。

他不得不再退一步，把魏元忠贬为务川（今贵州沿河县）县尉。

尽管一退再退，可李显的底线也非常明确——无论如何都要保住魏元忠一条命。

宗楚客仍不死心，命令袁守一再奏：“则天太后当年卧病上阳宫，狄仁杰请求由陛下监国，可魏元忠却上密奏反对，这证明魏元忠心怀逆谋，为时已久，请将他处以极刑！”

李显没好气地说：“依朕看来，人臣事主，必须一心，岂有主上小疾，就马上请太子主持政务？这是狄仁杰想讨好我，不见得魏元忠有错，你袁守一怎么可以借以前的事情陷害他？”

就这样，中宗李显再次把诛杀魏元忠的声浪压了下去。

可是，魏元忠最后还是死了。

因为他已经年迈体衰，再也经不起这种一贬再贬的折腾了。魏元忠没有走完他的贬谪之路，而是中途死在了涪陵（今重庆涪陵区）。

目睹老臣魏元忠的凄凉结局，正直的朝臣无不感到义愤填膺。

然而，他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因为，韦后一党的强势崛起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韦后的政治模仿秀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春天，桃红柳绿，百花盛开，繁华的长安就像一位富丽雍容的贵妇一样在世人面前展现出娇美灿烂的容颜。在这样一个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季节里，大唐帝国的皇后韦氏感觉自己的人生仿佛也迎来了第二次青春。

是的，尽管她已人到中年，但是谁规定“青春”只能用生理年龄界定，而不能用心理状态衡量呢？谁说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就不可以拥有青春常驻的生命状态呢？

至少在韦后的记忆中，这世上就曾经有一个女人青春了一辈子。

准确地说，是用一种年轻的心态活过了一辈子。

这个女人就是武曌。而现在，韦氏发誓自己也要成为武曌这样的女人。她要让自己拥有跟她一样的心态和人生，也要拥有跟她一样的权力、地位和无上的尊严！

是的，没有谁可以阻挡她成为这样的人。

武曌曾经是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一点，韦后做到了。

武曌曾经是垂帘听政的皇后。这一点，韦后也做到了。

武曌曾经让自己的党羽遍布朝廷，位居要津，牢牢掌控了帝国权柄。这一点，韦后正在努力，很快就会大功告成。

武曌曾经制造了许多美丽的政治神话，让天下人都相信（或者被迫相信）她是上天派来的造福社稷，利益苍生的旷世女主。

这一点，韦后还没开始做。所以，她必须马上着手。

事不宜迟，时不我待。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舞台上，美丽的政治神话总是层出不穷，有多少帝王君临天下，或者有多少想当帝王的人准备君临天下，就有多少政治神话横空出世。在历史上，这些神话通常都有一个专用名词——祥瑞。

一心一意要上演政治模仿秀的韦后，当然也要拥有自己的祥瑞。

早春二月的某一天，皇后寝殿中，一群宫女正在伺候韦后更衣。忽然间，某个宫女爆出了一声惊叫。众人吓了一跳，循声望去，只见该宫女毕恭毕敬地捧着一条裙子，眼睛和嘴巴都张成了一个圆，口中激动地喃喃自语：“祥云，祥云，多么美丽的五彩祥云啊……”

裙子是皇后的，刚刚从衣箧中取出。宫女所说的祥云并不是指裙子上的图案，而是说她看见了一团五彩祥云正在皇后的裙子上飘飞缭绕。顷刻间，众宫女齐齐跪倒，频频向皇后祝福：“恭喜皇后，贺喜皇后，恭喜皇后，贺喜皇后……”

笑容像一朵鲜花一样在韦后的脸上粲然盛开。很快，皇后裙上生出五彩祥云的消息便传遍了整座太极宫，并传进了皇帝李显的耳中。

李显又惊又喜，立刻起驾前去观赏。

当然，皇帝来迟了一步，没有亲眼目睹这一人间稀有的祥瑞。

不过没关系，宫中多的是技艺一流的画师，让他们拿出看家本领，让现场目击的众宫女都来作证和描述，依然可以还原出一幅绝无仅有

的“五彩祥云图”。

画作一成，李显眯着眼睛看了又看，不停地欢喜赞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李显随后便召集文武百官，在宫中举办了一次画展，让臣工百僚大饱了一回眼福，也分享了这份稀有难得的喜悦。侍中韦巨源（韦后亲族）立刻向皇帝提议，应该临摹更多的“五彩祥云图”，然后流布天下，让天下万民都来瞻仰膜拜。李显龙颜大悦，当即照准。

中国人历来笃信天人感应之说，所以“祥瑞”总是很有市场。如果说祥瑞代表的是天意，那么有一种与祥瑞类似的东西，则既有天意的成分，也可以代表民心，它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学名，叫作“谣谶”。每当改朝换代之时，总有各式各样的谣谶满天飞。虽然绝大多数谣谶都是旋生旋灭的肥皂泡，但只要其中一个应验了，人们就会说：这则谣谶真是太准了！至于那百分之九十九不准的，则再也没人提起。

几乎在“五彩祥云”的祥瑞诞生的同时，长安坊间便开始盛传一则《桑条韦》的谣谶了。据说《桑条韦》早已有之，但却是到了最近才忽然流行起来。人们时常可以看见里坊小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唱什么“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之类的古怪歌词。跟古往今来所有的谣谶一样，这首《桑条韦》的特征也是：文字通俗，语意却非常神秘；内容简单，含义却极为丰富。所以很多人不太明白它究竟在唱什么。

因此，谣谶往往需要有人去解说。

有个叫迦叶志忠的朝臣，就主动承担了这项解释工作。他非常用心地呈上了一道奏疏，首先对现当代的一些著名谣谶与实际政治的对应关系作了一番讲解，大意是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最终由唐国公李渊定鼎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天下盛唱《桃李子》；大唐开国后，秦王李世民原本并不是太子，可他最终却能入继大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军中盛唱《秦王破阵乐》；高宗李治原本也不是太子，可照样继位为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天下流行一首名叫《堂堂》的乐曲；则天皇后是妇人，却能以女主之身君临天下，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自隋朝以来，天下到处都在歌咏《娬媚娘》……

说完大唐历代天子与谣谶的关系，迦叶志忠就隆重推出了当今的皇帝和皇后。他说，当今圣上之所以得到天命，是因为早在他当英王时，就已经有一则名叫《英王石州》的谣谶广为传唱了。如今，天下又盛唱《桑条韦》，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分明意味着，皇后韦氏之所以能够母仪天下，完全是天意使然！所

谓“桑条韦也，女时韦也”，正是韦后主持养蚕种桑的写照，是对韦后国母风范的传扬和歌颂。

最后，迦叶志忠郑重其事地向皇帝献上了由他本人创作的《桑条韦》升级版——《桑韦歌》十二篇，请求皇帝将其流布天下，让老百姓广为传唱，并且编入乐府，以备韦后每次祭祀蚕神时演奏。

迦叶志忠的奏疏和《桑韦歌》呈上后，皇帝李显非常高兴，当即赏赐给他田庄一处、彩缎七百匹。一见皇上如此喜欢，太常卿郑愔[1]马上组织乐工对《桑韦歌》进行编曲配乐，组织舞者练习彩排。皇帝十分满意，马上也给了他一笔丰厚的赏赐。

祥瑞有了，谣谶有了，韦后对武曌的克隆越来越像模像样，但是还有最后的画龙点睛之笔，韦后还没有完成。

这最后一笔，就是参与某项国事大典，以此提升政治威望。

要论顶级的国事大典，那当然要属“泰山封禅”了。“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封禅”就是天子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泰山祭祀天地的典礼。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古代帝王最重视的一项祭祀大典，因为它是天下太平和帝业鼎盛的象征。高宗李治曾经在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举行过泰山封禅，而当时武曌就是以皇后身份主持了大典中的“亚献”（第一轮献礼称为“初献”，第二轮献礼称为“亚献”），从而一举打破自古以来没有皇后主持亚献的纪录，极大地提升了她个人的政治威望。

如今的韦后，当然是做梦也想来这么一回。

不过，中宗一朝的文治武功稀松平常，要想举行泰山封禅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韦后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南郊”祭祀中主持亚献。

南郊祭祀是帝王率领文武百官前往京师南郊祭天的典礼，比泰山封禅低一个级别。虽然典礼的级别比封禅低，但是按照《周礼》规定，皇后还是没有资格参与主持，顶多只能参与更低一级的祖宗祭祀而已。

可韦后决意要突破礼制。

武曌破得，我为何破不得？

其实，不管是当年的武后还是现在的韦后，对祭祀活动本身都不可能有什么兴趣。她们真正想要的，只是对礼制的突破而已。

因为只有突破礼制，才能最大程度地凸显她们的个人权威。

于是，在韦后的授意下，国子祭酒祝钦明等人随即提出动议，认为应该由皇后在南郊祭祀中主持亚献。但是此议立刻遭到太常博士唐绍等人的反驳。双方为此大打口水仗，各自引经据典，一时间竟也相持不下。不过，无论是国子祭酒还是太常博士，都只能提提建议而已，根本做不了主。最后的裁定权，还是在负责制订礼仪规程的宰相手里。

而这个宰相，就是侍中韦巨源，所以这场口水仗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韦巨源随即向皇帝提出，应该由皇后主持亚献，李显当然马上就批准了。

紧接着，祝钦明等人又得寸进尺，居然提出由安乐公主主持“终献”（第三轮献礼）。唐绍等人怒不可遏，再次据理力争。最后祝钦明等人自知理屈，只好悻悻作罢，结果是由韦巨源主持终献。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十一月十三日，韦后梦寐以求的祭天大典终于在长安南郊举行了。

她站在高高的祭坛上，想象着武曌当年参与泰山封禅的情景，内心深处泛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喜悦和满足。极目望去，深冬时节的少陵原满目萧瑟，万物凋零，但是韦后的心中却是一派春意盎然，脸上也荡漾着一片傲人的春光。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再往前迈一步，就是人间的极顶，就是帝国的巅峰，就是武曌当年曾经缔造过的那片旷古未有的女主乾坤！

那里有着怎样异乎寻常的山河日月，又有着怎样撼人心魄的生命体验呢？

北风在天地间奔涌呼啸，祭坛上的韦后神思迷离，裙裾飘飘。她恍惚觉得自己立刻就要迎风而起，振翅飞翔，遨游在那片崭新而神奇的国度之上……

那里有一种激情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

那里有一种梦想像鲜花一样灼灼绽放。

韦后醉了，彻底醉了。

有人说过，权力的美酒比世上的任何佳酿都更能使人迷醉，也更易使人疯狂。

安乐公主：新女性的代表

没有人会否认，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在古代中国，男性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制定了一套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和游戏规则，而绝大多数女性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庸，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参政议政了。

然而，武曌却颠覆了这个传统。

虽然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无法用她掌握的权力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更谈不上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她却用她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女人并非天生是男人的附庸，也并非注定与权力无缘，女人也有能力统治天下，也有资格统治男人！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曌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只能是一种个人行为，不可能具有制度变革的性质，但她的行为足以对后来的女性形成强大的诱惑力。在她之后，许多女性对权力的热望便被不可遏止地撩拨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就像春天里疯狂生长的藤蔓，又像冬眠中被猝然惊醒的蛇一样，那种潜藏在她们内心的权力欲望一旦被唤醒，就再也无法被压抑和禁锢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后武曌时代，把武曌的人生故事视为励志教材和成功宝典的，绝不仅仅只有皇后韦氏一人。人们不难发现，在著名政治女性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一些武曌的余光魅影，也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对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渴望。

除了一线的这些政治女性，中宗一朝的政坛上还活跃着一群极度热衷权势的女人，她们是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的姐姐）、郕国夫人（韦后的妹妹）、沛国夫人郑氏（上官婉儿的母亲），内宫女官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等。

景龙年间，以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为首的这群女人恃宠弄权，卖官鬻爵，俨然组成了第二个帝国政府，与大唐吏部同时行使职权，有时甚至凌驾于三省六部之上。一时间，无论你是杀猪的屠夫，卖货的小

贩，还是卑贱的奴仆，只要能凑够三十万钱孝敬这些神通广大的女人，马上就有一张写着你名字的任命状递进中书省，时人称之为“斜封官”[2]。

从此，形形色色的另类乌纱开始在大唐官场漫天飘飞。诸如“员外官”“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官”“知官”等各式花样纷纷出炉，任君选购，不仅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而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由于“斜封官”的销售形势太过火爆，花钱买官等待任命的人太多，大唐吏部不得不在长安和洛阳各设两个吏部侍郎，一年遴选四次。可即便如此，每年排队等待任命的人还是有数万之多。后来，安乐公主等人干脆绕开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把任命状下达各部司。两省的主管官员也不敢过问，只能任由这些乌七八糟的斜封官直接到各级衙门走马上任。

景龙年间，由于后党正处于权力的上升期，气焰极为嚣张，太平公主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尽量不与后党正面抗衡。职是之故，一直把太平公主视为潜在对手的安乐公主便越发得意忘形，有恃无恐，其影响力一度超越了太平公主，俨然成为新一代政治女性的代表。

在中宗李显的宠爱和纵容下，安乐公主几乎成了一个无冕宰相，朝中宰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超过半数以上出自她的引荐。除了大力培植党羽，左右朝政之外，安乐公主还极力在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富贵。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与姐姐长宁公主斗富，斗富的主要手段，是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在她们的竞赛活动中，一座比一座更堂皇的府第，一处比一处更富丽的别墅，争先恐后地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瞠目结舌的世人面前。当时的人们都说，两位公主的豪宅虽然规模不比皇宫大，但是其奢华和精巧的程度，却比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进行豪宅大赛，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还有一项别出心裁的竞技活动，那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抢人。

准确地说，是两位公主竞相放纵自己的家奴，把人抢回来当奴婢和仆役。

看谁抢的人数多，质量好，看谁抢的模样俊，块头大！

有一个叫袁从之的侍御史实在看不过眼，就秉公执法，将公主那些为虎作伥的家奴逮捕治罪。两个公主立刻向父皇告状。中宗李显赶紧下达手谕，命袁从之放人。袁从之上疏说：“陛下放纵公主的家奴掳掠

良家子女，如何治理天下？”

可是在中宗李显看来，能让两个宝贝女儿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几个百姓的子女又算得了什么？真是小题大做！

最后，李显还是坚持让袁从之释放了公主的家奴。

就在“豪宅大赛”和“抢人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安乐公主就觉得不过瘾了，因为这样很难分出胜负。最后安乐公主灵机一动，就去找父皇李显，开口就要父皇把长安城内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昆明池”赐给她。

李显顿时吓了一跳。

这昆明池可不是一般的小池塘，它是大有来历的。

据班固在《汉书》中记载，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象滇河”。亦即仿造昆明的滇池，在上林苑开凿了方圆数十里的昆明池。汉武帝之所以开凿这个人工湖，并非出于娱乐目的，而是出于军事用途。如《史记·平准书》记载：“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这就是说，当时南越（今越南）欲与汉军在海上进行船战，汉武帝为了训练士兵的水上作战能力，便修建了昆明池，让士兵在此用楼船演习水战。只是到了后来，昆明池不再专门用于军事训练，而是逐渐具有了旅游、养鱼、蓄洪等多种功能。

到了唐朝中宗年间，昆明池不但成了历史悠久的人文古迹和风景名胜，而且还是附近许多百姓打鱼捕虾赖以维生的地方。如果把它赐给安乐公主，成了她的私人领地，不仅长安官民失去了一处踏青休闲的游览胜地，而且断了附近百姓的生计。中宗李显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拒绝了这个要求。

安乐公主大为懊恼，一怒之下，竟然强占了长安城南方圆四十九里的民田，然后仿照昆明池，开凿了一个比它更大的池子，取名“定昆池”（顾名思义，就是要压过昆明池一头的意思）。池子凿好后，安乐公主又命人仿造华山形状，在池中央修筑了一座巨大的假山，并引水到山巅，使其形成一道瀑布飞泻而下，远远望去，状若银河；同时又在山上修路、筑亭、造桥，“飞阁步檐，斜桥磴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穷天下之壮丽”（《朝野佥载》卷三）。

比之昆明池，定昆池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当即引来了无数百姓的赞叹，也吸引了许多达官贵人既羡且妒的目光。

这一切，无不让安乐公主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面对烟波浩渺、穷极壮丽的定昆池，长宁公主也只能甘拜下风，自愧弗如。

然而，安乐公主的炫富行动并未就此终止。

很快，她又做出了一个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举动，挖空心思地打造了一条史上最贵的裙子——百鸟羽毛裙。

据史书记载，这条裙子价值一亿钱！之所以如此昂贵，一是制作材料非常特殊，二是人工成本出奇高昂。

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安乐公主命人专程到各地捕杀各种珍禽异鸟，采集它们身上的羽毛，然后精心挑选出其中最惊艳、最绮丽的一小部分，命能工巧匠用手工编织在裙子上。这样做成的裙子，据说“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资治通鉴》卷二○九）。意思是说，从正面看，从侧面看，在阳光下看，在阴影中看，这条价值连城的裙子就会焕发出四种不同的色彩。如果再仔细看，会发现上面绣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的图案都极端小巧，只有米粒大小，而且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如此材料，如此工艺，如此效果，当然可以称得上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了。所以百鸟羽毛裙一问世，立刻在长安引起轰动。从此，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士绅百姓家中的女眷，都纷纷效仿，争做百鸟裙。一时间，“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尽，至于网罗杀获无数”（《朝野佥载》卷三）。

这是一条裙子引发的生态灾难。那时候还没有《动物保护法》，所以乱捕滥杀也没人来管，很多珍稀鸟类很可能就这样灭绝了，或者变成了濒危物种。

景龙年间，安乐公主无比自豪地发现——自己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大唐帝国最夺人眼球的女人！

无论是与长宁公主进行豪宅大赛，还是在大街上进行抢人比赛，或者是定昆池的修建，再或是百鸟羽毛裙的问世，都一再证明了她的与众不同与至尊无敌，也无不让她成为舆论的焦点和时尚的风向标。

到了景龙二年冬天，安乐公主又独领风骚地火了一把，再度成为长安百姓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冬天里的这把火是安乐公主的第二次婚礼。中宗李显似乎是为了抚慰她一度孀居的不幸，所以特地为她举办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婚礼，其规格、排场和轰动效应，都远胜于第一次。

公主的新驸马，是前夫武崇训的堂弟——武延秀。

说起这个武延秀，也是知名度颇高的一个人物。他是长安城内数得着的美男子，曾在圣历年间被武皇远“嫁”东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和亲，没想到默啜有意刁难，说他想要的女婿是李唐的皇族贵胄，不是身份低微的武氏小儿，硬是把他给“退货”了。

武延秀虽然没当成可汗的女婿，但是去塞外走了一遭，却学会了突厥舞。回国后，每逢大小宴会，武延秀都会秀一把他的异域风情。俊美的容颜加上曼妙的舞姿，使他更显得风流倜傥。后来他堂兄武崇训与安乐公主成婚，武延秀又在宴席上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回，顿时赢得满座喝彩。

武延秀没想到，就是这次献舞，竟然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

因为安乐公主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从此，安乐公主就经常借故让武延秀到她府上去玩。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很多事情心照不宣，所以一来二去，叔嫂二人就把好事办了，只是碍着有武崇训在，不得不偷偷摸摸。后来武崇训一死，两人就完全没了顾忌，成天出双入对，卿卿我我，从一对野鸳鸯变成了一对人所共知的“无证夫妻”。中宗李显一见孀居的女儿又有了新爱人，赶紧给他们发结婚证，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皇帝为安乐公主举办的这场婚礼异常高调，不仅派出了皇后的仪仗队，而且动用了禁军作为护卫，甚至命令相王李旦亲自护送公主的花轿，以彰显婚礼的隆重。成婚翌日，李显宣布大赦天下，并擢升新驸马武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随后又召集文武百官，在两仪殿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席间，李显让安乐公主起身拜谢公卿，可公卿们哪敢接受这个天下第一跋扈公主的拜礼，未等她起身离席，就全都趴在地上叩拜如仪了。

看着满朝文武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表情和动作，安乐公主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无遮无拦地笑了。而尤其让她感到万分得意的是，

一直与她明争暗斗的姑母太平公主，竟然也在这时候向她露出了一个带有奉承意味的微笑。

不仅如此，这个昔日高傲无比的太平公主还携夫君武攸暨起身离席，为众人献上了一支双人舞。虽然太平公主嘴上说是要把这支舞献给皇帝，祝皇帝天寿永享，但是安乐公主看得出来——太平公主这是在向她示好。

权势真是一个好东西。一旦你拥有权势，人人都会向你示好，就连对手也要向你露出谄媚的微笑！假如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情形又会变成怎样呢？

安乐公主禁不住浮想联翩。

要怎么才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势呢？

“和事天子”李显的幸福生活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皇权专制的国家，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始终有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在代表皇帝履行统治职能，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裁定权和最终解释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换句话说，文官政府充其量就是这个国家的躯干和四肢，唯独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所以，如果这个灵魂的品格、才智和能力是上乘和优秀的，那么他所领导的文官政府就较有可能体现出廉洁、高效和睿智的品质；反之，帝国政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腐败、混乱和黑暗。

用黑格尔的话说，古代中国的这种统治模式是“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所以“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家长”的皇帝当然就“必须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历史哲学》）

正是由于这种“家长制”的政治传统几千年延续不断，中国的老百姓才会像嗷嗷待哺的幼儿一样，把社会的清明和自身的福祉全都寄望于“圣主明君”的降临。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寄望通常都会落空。

因为老天爷降下圣明天子的概率通常不会比我们今天中彩票的概率高。像唐太宗李世民这种世所公认的英明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即便不说独一无二，至少也是千载难逢。大多数时候，老百姓殷切盼来的天子，在才智和能力方面往往只能归于平庸一类，其道德品质也不见得比一个普通百姓更加高尚（甚至有可能更加卑下）。因为皇帝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不受制约的，所以他的欲望就更有机会膨胀，他的品质也就更有可能败坏。

比如眼下的大唐皇帝李显，就绝对不属于“不断行动，永远警醒”“道德的、辛勤的”那一流。他治下的帝国政府虽然还没有败坏到“一切废弛，全部解体”的地步，但也早已是腐败丛生，一团糜烂了。也许是房陵那十几年的幽禁生涯让李显受够了苦日子，所以景龙年间的李显像是要把失去的享乐拼命捞回来的样子，几乎从不把心思放在朝政上，天天都在变着花样地寻欢作乐。

除了时常召集一帮佞幸之臣嬉戏宴游之外，李显还在内宫开辟了一块“集贸市场”，让宫女们扮成商家，开设各种店铺，再让公卿百官扮成商贩，和她们做生意，谈买卖，用市井俚语讨价还价，甚至用污言秽语吵架谩骂。而李显和韦后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赏这种原生态的“市井生活”，经常被逗得哈哈大笑，乐不可支。

李显还喜欢体育活动，最热衷的项目当属打马球。在天子的示范效应下，当时朝野上下的马球运动蔚然成风。安乐公主的前夫武崇训、长宁公主的驸马杨慎交等人，包括青少年时代的李隆基，都成了马球高手。据说有一次吐蕃组团来长安与唐人比赛，武崇训、杨慎交、李隆基就曾以四人组队迎战对方的十人队，结果还大获全胜。

李显本人爱好运动，当然也希望人人跟他一样，所以经常举办群众性的拔河比赛。一般参加这种比赛的都是年轻活泼的宫女，可这样的比赛看久了，李显不免厌烦。于是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就把朝廷三品以上的大员全部召集到了球场上，命他们分组进行拔河。可怜这些当朝大员大多已老态龙钟，比如宰相韦巨源、唐休璟等人，都已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可君命难违，也只好硬着头皮参赛。结果比赛开始后，绳子刚一拉，韦巨源、唐休璟等人就摔得四仰八叉，一把老骨头几乎散架，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每当这个时候，观众席上就会响起天子李显、皇后韦氏、安乐公主以及一大群嫔妃宫女的笑声。

她们的笑声是如此欢快，可在这些老臣听来却无比刺耳。

碰上这样的昏庸天子，这些帝国大佬的权力和富贵固然没什么失落的危险，可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就只能扫地殆尽了。

没办法，凡事总有代价。倘若他们希望保住权力和富贵，就只能割舍人格和尊严。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

所以，别说天子喜欢看他们拔河，就算天子喜欢看他们裸泳，这些老家伙估计也会扒光了衣裤往水里跳。

在李显眼中，他统治下的大唐帝国虽然没什么骄人的文治武功，但却足以称得上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小康之世。尤其是李重俊政变后的这几年，他觉得到处是一派歌舞升平，整个世界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在这种时候，他当然会本能地抵拒一切不和谐的事物。

然而，有一天在朝会上，一件不和谐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个叫崔琬的监察御史，突对两个朝廷高官发出了严厉的弹劾。

他弹劾的是后党的核心成员、当朝宰相宗楚客和纪处讷。崔琬指控他们暗通西突厥，收受重贿，导致边境不安，请求皇帝予以严惩。这个罪名非同小可，而且遭到弹劾的又是两个最得势的宰相，所以文武百官不免暗暗心惊，预料到帝国政坛必将因此掀起一场死斗。

依照大唐律法，大臣在朝会大殿上遭到弹劾时，应该俯首弯腰退出大殿，到自己的衙门中听候处理。可恼羞成怒的宗楚客竟然无视朝规，不仅不退下，而且厉声辩白，大骂崔琬诬陷。

在正常情况下，皇帝无论多么偏袒宰相，也应该让他们以身作则，先依照惯例退下，过后再慢慢找借口替他们开脱。如此，才既不会坏了朝廷规矩，又能保住自己的宠臣。

然而，李显根本没这么做。

他为了保持和谐，非但不做追究，反而当场命令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握手言和。于是，这件令人心惊的弹劾案就稀里糊涂地了结了。

如此荒诞的一幕，顿时令满朝文武啼笑皆非。

崔琬与宗楚客最后到底有没有结成兄弟没人知道，但是人们却因此给皇帝李显送了一个绰号——“和事天子”。

和事天子喜欢和稀泥，所以不仅对朝政的黑暗视而不见，对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也显得出奇地宽容。比如他头上帽子的颜色，就绿得触目惊心，可他却不以为意。

古代皇帝的后宫泛称“三千佳丽”。按照唐制，李显拥有一皇后、四

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九才人、二十七宝林、二十七御女和二十七采女，除了这八级，一百二十一个人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宫女。

然而，老婆太多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普通百姓的老婆只有一个，万一老婆红杏出墙，绿帽子顶多也就戴个一顶两顶，可皇帝的老婆一旦红杏出墙，那绿帽子可就数以千计，蔚为壮观了。

很不幸，中宗李显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壮观绿帽的皇帝。

首先来看他的第一夫人——皇后韦氏。

自从武三思死后，韦后的凤榻就比以前寂寞和冷清多了，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她的身边就出现了两个年轻貌美的男人：一个是精通医术的散骑常侍（宫廷高级顾问官）马秦客，一个是善于烹饪的光禄少卿（宫廷膳食部副部长）杨均。

每当韦后身体有某种不适，她就会频频传唤马秦客，而医术高明的马秦客当然不会令她失望，总是能够“药到病除”。每次马秦客离去之后，太监和宫女们总能看到韦后脸上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神采。除此之外，韦后还忽然喜欢上了饮食营养学，所以时常单独召见杨均，和他在一起切磋一些营养保健方面的学问。切磋既久，自然效用显著，韦后的容颜便愈加散发出一种少女般的光泽。所以，一些侍奉过则天皇后的老太监都说，如今韦后的精神状态真的跟当年的武后如出一辙，貌似越活越年轻了。

不仅第一夫人的宫闱生活多姿多彩，李显的其他妃嫔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

由于李显毫无原则的纵容，上官婉儿和后宫的一些得势嫔妃悍然打破自古以来的宫廷规矩，纷纷在宫外建立私第，而且多数时间都住在私第里，什么时候入宫，什么时候出宫都没人管束，简直称得上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自由度最高的后宫嫔妃。和历朝历代那些“一入宫门深似海”的深宫怨妇比起来，上官婉儿等人几乎不能叫嫔妃，而应该称为唐朝后宫的高级白领。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比现代的职业女性更自由，也更幸福。因为她们上下班都不用打卡，不想去还不用请假，同时又没有业绩压力，各种福利待遇还高得没边，实在是让人羡慕死了。

既然这些白领丽人兼有美色和权势，而且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宫外，那

她们身边当然不会缺男人。朝中的一些官员如蚁附膻，纷纷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从之游处，以求进达”（《资治通鉴》卷二○九）。

这种时候，要说这些女人还会自觉自律地抵拒诱惑，为皇帝李显守身如玉，那显然就是扯淡了。比如上官婉儿身边，就经常有一个美男子朝夕相伴，这个男人就是当初武三思的鹰犬崔湜。

既然上官婉儿等妃嫔大多时候都住在宫外，那她们身边必然会有一大批侍候起居的普通宫女。可以想见的是，这些寂寞难耐的宫女一旦有机会在宫外生活，一颗颗驿动的芳心自然也会去寻找各自停泊的港湾。

史书中有一则“后宫红杏集体出墙”的记载，就足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那是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元宵节的晚上，李显携韦后微服出行，到闹市去观赏花灯，同时把几千名宫女放出宫去游玩，没想到大多数宫女竟然集体失踪，从此一去不回，让李显目瞪口呆，懊悔不迭。

这几千不辞而别的宫女到底上哪去了呢？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绝对不敢回自己的家乡，因为她们当年入宫都是登记在册的，逃回老家的唯一结果就只能是抓回来治罪。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她们从此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毅然决然地追求自己的终身幸福去了。

当皇帝当到李显这份上，被自己的妻妾戴上数以千计的绿帽，也算古往今来只此一个了。

唐中宗李显连自己的老婆们都管不住，自然很难希望他管好手下的文武百官。所以他在位时的大唐朝廷，可以说是开国将近一百年来最腐败、最混乱、最糜烂的一届政府。

景龙年间的帝国政坛上，不仅有一大群政治女性恃宠弄权，贪赃枉法，搞得斜封官满天飞，而且掌管大唐吏部的官员本身也不是什么好鸟。

在不算太短的时间内，朝廷两个握有实权的吏部侍郎居然都是武三思当年的鹰犬：一个是崔湜，一个是郑愔。

武三思死前，崔湜只不过是个中书舍人，可自从成为上官婉儿的情人后，就开始飞黄腾达了，先是升任中书侍郎，很快又兼任吏部侍郎、

同平章事，赫然进入了宰相行列。郑愔也差不多同时擢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这两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政治投机客共同执掌朝廷的吏部后，便利用手中的人事大权，倾力交结权贵，大肆贪赃受贿，所录用的官员经常超过原定的编制。有时因收受重贿，职位缺额又不够，就寅吃卯粮，提前支取后三年的缺额，把大唐的选官制度败坏得一塌糊涂。

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湜得势后，他老爸也不甘寂寞，硬是捞了一个国子司业的官，然后整天正事不干，专门帮着儿子卖乌纱。

当然，乌纱都是由儿子给，钱却是落入老崔自己的腰包。有一阵子生意太好，老崔光顾着收钱，把人家托付的事给忘了，没跟儿子打招呼。那个买官的仁兄兴冲冲地交了钱后，左等右等，却始终等不到官做，就去找崔湜告状，说：“崔大人，您有个亲戚收了我的钱，为什么不给我官做？”

崔湜勃然大怒：“哪个亲戚收了你的钱？看我不把他乱棍打死！”

那人冷笑：“千万别，您要是把他打死了，可得守孝三年啊！”

崔湜闻言，才知道是他老爸干的好事，顿时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墙缝钻进去。

崔湜和郑愔如此丧心病狂地大搞腐败，自然引起了少数正直朝臣的愤慨。几个御史暗中搜集了一堆铁证，在一次朝会上突然对他们发起了弹劾。

看着御史呈上来的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李显终于如梦初醒，慌忙将二人逮捕下狱，命监察御史裴漼审理。

眼见后党的两个骨干一下子被告倒了，安乐公主马上跳了起来，亲自出马去找裴漼，又是威胁又是利诱，让他识相一点，将崔、郑二人从宽发落。没想到裴漼根本不买她的账，反而在次日朝会上弹劾她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当天就判处郑愔死刑、崔湜流放。

关键时刻，李显再次和起了稀泥。他匆忙下旨，将判为死刑的郑愔赦免，改判为流放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将判为流放的崔湜赦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可即便如此，后党的人还是不依不饶。

尤其是上官婉儿，一看自己的情夫要被贬到那鸟不拉屎的边瘴之地，马上和安乐公主、驸马武延秀一起去找李显，拼命为崔、郑二人求情辩护。李显不愧是天下第一和事佬，赶紧又作出改判，让崔湜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刺史，郑愔改任江州司马。

一件证据确凿的铁案，居然被皇帝如此轻描淡写地了结了；两个罪行昭彰的败类，居然如此轻易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御史们义愤填膺，但是却无可奈何。

而更让人们愤怒和无奈的是，没过多久，崔湜就大摇大摆地回到长安，官复原职了。原来皇帝对他的贬谪，纯粹是做做样子而已。

朝政腐败到了这个程度，人们夫复何言？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一转眼中宗李显已经五十五岁了。在他这个年纪，祖父太宗皇帝已经作古四年，父亲高宗皇帝也已经病入膏肓，即将不久于人世，唯独李显在这个岁数上还是身心康泰，无病无殃。

李显甚感欣慰。

他觉得，照自己这个精神头，起码再活个二三十年不成问题。

然而，此时的李显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幸福的生活将在这一年戛然而止，他健康的生命也将在这一年无疾而终。

按照佛教的说法，每个人的福报，亦即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幸福、快乐、成功、寿命等等，就像是银行的一个存款账户。你如果懂得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并且懂得利乐人群，造福社会，那么你就等于是在向账户里头存进更多款项；而假如你耽于声色，纵情享乐，对自我、他人和社会都产生了太多负面作用，那么你就是在拼命支取你的银行存款，等到账户余额显示为零的时候，对不起，福报享尽，你这一生的游戏也就结束了。

而李显在这些年里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把自己的福报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于是拼命挖掘，尽情挥霍……

所以，在五十五岁这一年的夏天，他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丧钟为谁敲响？

自从几个不畏权贵的御史弹劾宗楚客和崔湜相继失败后，朝中少数仍抱有正义感的官员对时局就心灰意冷了。因为有这样一个黑白不分、稀里糊涂的天子在位，帝国政治就只能是乌烟瘴气、一团糜烂，所以那些正直的朝臣到头来也只能独善其身而已，再也没有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动力了。

然而，就在满朝文武都在令人失望的现实面前保持沉默的时候，帝国的底层却传来了几声微弱却又清晰的呐喊。

首先，一个叫郎岌的定州士人大胆上书皇帝，说出了朝野上下人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韦后和宗楚客等人擅权乱政，迟早会谋逆作乱！"

听到如此强烈而直接的指控，韦后顿时暴跳如雷。她马上去找皇帝告状，要求杖杀上书者。李显二话不说，立刻命人将郎岌乱棍打死。

可是，有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布衣郎岌刚刚因为说真话掉了脑袋，随即又有一个叫燕钦融的低级军官再度上言："皇后淫乱，干预朝政，致使外戚坐大；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这些人，都有危害社稷的图谋！"

这一次，中宗李显终于觉着有些不对劲了。

如果说布衣郎岌胆敢大放厥词是因为他脑子坏了，那么燕钦融明知道这么干只有死路一条，为什么还要往刀口上撞？难道他们都疯了？

李显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最后决定亲自召见燕钦融，听听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在许州担任司兵参军的小官燕钦融破天荒地得到了天子的召见，来到了长安。

在皇帝面前，燕钦融面不改色，侃侃而谈，一一指陈朝政的弊端，并且毫无惧色地对韦后一党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李显听完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无力地摆了摆手，示意燕钦融退下，既不作任何表态，也不对他作任何追究。

就在天子接见燕钦融的同时，宰相宗楚客也寸步不离地守在殿外。燕钦融一退下，马上就有眼线向宗楚客通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宗楚客

立刻感觉有些不妙。因为皇帝虽然没有表态，但他对燕钦融的那番“大逆不道”之言居然保持沉默，而且又没有治他的罪，这足以说明皇帝已经默认了燕钦融对后党的指控。

这还得了！假如皇帝真信了他说的话，那岂不是大祸临头了？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司兵参军，竟然敢在皇后、公主、驸马、宰相的头上屙屎屙尿，而且还能毫发无损地走出太极宫，这样的事一旦传开了，朝中的谏官一定会趁此机会对后党群起而攻，他宗楚客日后还怎么混？

不行，决不能放过这小子！

可皇帝摆明了就是要放他一马，自己一时间又找不到什么借口收拾他，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太极宫，走出长安城？

不，老子今天就算得罪皇帝，也一定要把你小子灭了！

一想到这里，宗楚客就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假造了一道皇帝诏书，然后飞身而起，跑到飞骑营召集了一帮禁军侍卫，最后终于在宫门附近截住了即将离去的燕钦融。

一追到人，宗楚客马上命令禁军开打，十几个人拳脚齐下，很快就把燕钦融打了个半死。接着，宗楚客又命人抓住他的脑袋往石头上撞，最后当场扭断了他的脖子。

看着桀骜不驯的燕钦融终于像一条破麻袋一样瘫软下去，宗楚客忍不住大呼痛快。

宗楚客固然是痛快了，可有一个人却很不痛快。

他就是天子李显。

光天化日之下，当朝宰相居然敢在皇宫中杀人，而且还是矫诏杀人，这也太无法无天了！你宗楚客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天子放在眼里？暂且不论你的矫诏之罪，也不论你知法犯法之罪，单单看你的杀人动机，就够耐人寻味了。你为什么非要打死燕钦融不可？这不恰好证明你做贼心虚吗？如果燕钦融的控告纯属诬陷，你大可以在大唐律法规定的范围内，启动正常的司法程序，定他一个诽谤罪，按“反坐法”来惩治他，同时还你自己一个清白。可你偏偏不这么做，而是恼羞成怒地杀人灭口，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不是恰好坐实了燕钦融对你的指控吗？

李显越想越不爽，巴不得马上拿宗楚客问罪。

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大，远不是宗楚客一个人的问题，假如拿他开刀，皇后和裹儿肯定会站出来阻挠……一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宝贝女儿，多年前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那一幕马上又浮现在李显的眼前。

想到这里，李显的满腔怒气顿时消失了大半。

说到底，他还是太爱她们了，所以，他永远不希望和她们发生任何意义上的不愉快。假如对燕钦融一案穷追不舍，结果证明他所指控的都是事实，那李显该怎么办？当所有事情全部掀开，一切都暴露在阳光底下，李显有勇气直面真相吗？

没有。

与追究真相比起来，李显似乎更在乎与妻女保持一贯的和睦关系，同时也更在乎眼下的幸福生活——即便为了保持这种关系和这种生活，他要以一定程度的“无知”作为代价。

燕钦融被杀之后，李显虽然没有对宗楚客等人作任何追究，但内心难免“怏怏不悦”（《资治通鉴》卷二○九），因而脸上便不由自主地罩上了一层阴霾。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阴霾。韦后和宗楚客等人看在眼里，顿时感到了深深的忧惧。

他们知道——皇帝被惹恼了。

虽说这是一个一贯温柔得像头绵羊的皇帝，可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是手中仍然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

自从“燕钦融事件”后，韦后便隐隐感到皇帝注视她的目光中，似乎多出了一丝狐疑和闪烁。虽然她并未因此中断与马秦客和杨均的暧昧关系，但是每当和他们云雨交欢时，韦后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之感。

黑暗中，似乎有一双冷冷的眼睛在窥视着她。

那是一双遭遇背叛的丈夫的眼睛。

一旦这双眼睛蓦然浮现，韦后便会从快乐的巅峰直接坠入不安的深渊。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是会猛然推开身上的马秦客或是杨均，一丝不挂地走到铜镜前。

借着微弱的烛光，她看见了一个鬓发散乱、脸色苍白、肌肉松弛的女人。

岁月不饶人啊……她看见铜镜中的这个女人分明有了人老珠黄的迹象，可那个光芒万丈的女皇梦，却还距离她如此遥远。

还要等待多久，她才能拥有跟武曌一样的自由、快乐和权力呢？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韦后不知道。

她只知道，自己的老公李显还活得十分健康，他分明遗传了他母亲武曌的体质，一点都不像他那个一辈子都病恹恹的父亲李治。按照李显目前仍然良好的身体状况来看，再活个二三十年似乎都不成问题。倘若如此，自己十有八九会死在他的前面，还做什么女皇梦呢？还侈谈什么母临天下，女主乾坤呢？

所以，不能再等下去了。韦后想，如果不能主动敲响李显的丧钟，就只能坐等自己的丧钟敲响！

别无选择！老娘豁出去了……

决心已定，韦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女儿安乐公主。

韦后知道，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像她女儿这么迫切渴望她当上女皇。

因为，只有她当上女皇，安乐公主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女。

所以，为了共同的利益，她们没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更没有理由不联手行动。

此时此刻，在韦后和安乐公主眼中，夫君已经不再是夫君，父皇也已不再是父皇，而是横亘在她们权力之路上的一个障碍——一个亟待粉碎的巨大障碍。

此时此刻，对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来说，所谓的爱情和亲情已经变成一种既可笑又脆弱的东西。在巨大而真实的权力面前，爱情和亲情又算什么呢？除了让人变得优柔寡断、无所适从，变得软弱愚蠢又不堪一击之外，还能给人带来什么呢？

在这一点上，她们一致认为，当年的女皇武曌就做得很好。别人都背负着感情的锁链，唯独武曌抛弃了这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只有她才

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并且掌控所有人的命运。

这些年来，韦后和安乐公主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思考一个问题——武曌能够做到的事情，她们难道就不能做到吗？在这个帝国，难道就只能出现一个名叫武曌的女皇吗？

现在她们终于可以大声地作出回答：我不相信！

于是这一年夏天，便有了一碗汤饼（唐朝流行的面食，类似于现在的面条）与两双手的相遇。

汤饼是看上去很普通的汤饼。

手是两双看上去很纤弱的手。

可当这碗汤饼和这两双手相遇之后，汤饼就不再是普通的汤饼，手也不再是纤弱的手。

因为这碗汤饼毒死了一个皇帝。

因为这两双手，从此紧紧扼住了帝国的咽喉……

中宗暴崩

景龙四年六月初二，唐中宗李显吃过一碗汤饼后，忽然七窍流血，暴崩于太极宫的神龙殿。

韦后秘不发丧，于次日召集宰相们进入内宫，小范围通报了皇上宾天的消息。还没等宰相们回过神来，韦后旋即有条不紊地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从京师附近紧急征调五万名府兵进入长安戒备，同时把这支部队的兵权分别交给了驸马都尉韦捷（韦后侄子，娶李显女儿成安公主），韦濯（韦后侄子，娶李显女儿定安公主），卫尉卿韦璿（韦后的族弟），左千牛中郎将韦琦（韦后侄子），长安令韦播（韦后侄子），郎将高嵩（韦后外甥）；其次，命中书舍人韦元（韦氏族戚）率兵在长安城内巡逻，维持治安；最后，命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率五百人迅速进驻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严密控制软禁在此的李显次子谯王李重福。

尽管天子暴崩的消息让宰相们感到了无比的震惊，但是此时的宰相班子绝大多数是后党成员，所以韦后的命令当即得到了执行。

全面控制住京师长安的局势后，韦后又在同一天，将五名后党成员全部擢升为宰相，以加强对政治中枢的控制。这五人分别是：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其中，裴谈和张锡原本都在东都担任留守，韦后此次没有调动二人的岗位，只是在他们的原职务上又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通过对这两个留守的笼络，加强对东都洛阳的遥控。

做完这一切，韦后终于牢牢掌控了帝国的最高权力。

接下来，韦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刚刚到手的巨大权力合法化，并且常态化？

换言之，韦后必须扶植一个人来当傀儡天子，然后像当年的武后那样，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摄政，其权力才能得到巩固，才能在此基础上向女皇之位发起冲刺。

那么，要挑选谁来充当这个政治花瓶呢？

当然只能从李显的儿子中来选。

李显一共生有四个儿子，老大李重润和老三李重俊都死了，所以剩下的人选只有两个：一个是流放均州的老二，时年三十一岁的谯王李重福；再一个就是李显的幼子，年仅十六岁的温王李重茂。

按照立嫡以长的古代政治传统，李重福绝对比李重茂有资格入继大统，然而，韦后绝对不会选他。原因有二：其一，他已年长，不易控制，当然不适合当傀儡；其二，韦后跟李重福有血海深仇。

韦后为什么跟他有仇？

这就要从多年前的一桩公案说起。

李显的长子李重润是韦后亲生，当年一出生就深受高宗李治的宠爱，还不到一岁就被立为皇太孙，并且开府置僚属，这无疑是早早确立了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当时的韦后欣喜万分，因为有这样的儿子做靠山，她后半生的权力和富贵就有了保障。然而，让韦后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李重润十九岁那年，因对二张乱政不满，在背后肆意抨击，结果被人一状告到武曌那里。武曌勃然大怒，当即向李显施加压力，迫

使他逼杀了李重润。

和李重润一起罹难的，还有他的妻子永泰郡主，以及她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

这场变故对韦后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她自然就把满腔怒火对准了那个出卖他儿子的告密者，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在韦后看来，这个杀千刀的告密者，正是李显的次子李重福。

韦后之所以咬定李重福是罪魁祸首，是因为她相信，李重福比任何人都更具备告密的动机。首先，他排行老二，只要抓住机会整死老大，他就最有资格成为太子；其次，他老婆是张易之的外甥女，作为二张得势的受益者，他们夫妻俩自然容不得别人非议二张。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李重福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告密者，但这并不影响韦后的上述判断。于是从李重润死的那一天起，李重福就成了韦后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到了神龙元年，李显刚一复位，韦后就迫不及待地把李重福流放到了均州。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韦后都绝不可能扶立李重福。

因此，年幼的温王李重茂就成了傀儡天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废长立幼不合礼制，如果以韦后的懿旨强行拥立李重茂，势必招惹非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韦后决定假造一份天子遗诏，在遗诏中宣布由温王李重茂即皇帝位，并由她以太后身份临朝摄政，这样就没人敢说三道四了。

韦后把这个伪造遗诏的任务，交给了她信任的后党成员，专门负责宫中诏命的“女中宰相”——上官婉儿。

接到任务的那一刻，上官婉儿马上意识到，这是决定帝国命运的重大时刻，也是决定她个人后半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换言之，她如果全盘按照韦后的授意来草拟这份遗诏，那就是彻彻底底地把自己跟韦后绑在一起了，日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也没有了半点退路。

这么做妥当吗？

上官婉儿很清醒地告诉自己——不妥。

道理很简单，韦后并不像看上去，或者像她自己认为的那样强大。

在帝国宫廷这个天下最险恶的角斗场上浮沉了大半生，上官婉儿已经练就了一种鉴人识人的深刻洞察力。她看得非常清楚，如今的韦后虽然一门心思想当武曌第二，但她的智慧、城府、能力、谋略、胆识，包括政治根基和执政经验，跟当年的武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武后三十六岁就开始临朝听政，一直到六十六岁才登基称帝，时隔整整三十度春秋。也就是说，她为了实现自己的女皇梦，整整花了三十年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其间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和心血，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种种代价。然而，很多人往往只盯着她那炫人眼目的巨大成功，却无视她走过的那条充满了荆棘和血泪的艰辛历程。

反观韦后，从神龙元年开始垂帘听政，迄今也不过五年，而且其中有一段时间，真正大权独揽的是武三思，并不是她韦后。所以，无论是在收拾人心、培植党羽方面，还是在打击异己、铲除政敌方面，抑或是在积累政治经验、锻炼执政能力方面，韦后都还做得非常不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座值得攀登的巅峰都没有捷径可走，任何一处绝美的风光都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所以，只有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去征服一切艰难险阻，你最终抵达的地方才是别人无法逾越的极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韦后要自作聪明，想抄一条近路达到目标的话，那别人也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她，并很快把她踩在脚下。说白了，速成的结果只能是速败，捷径的同义词只能是短路。韦后倘若一味急功近利，心存侥幸的话，其结果很可能是自取灭亡，并且徒然授人以笑柄。

所以，要是把自己的后半生绑在这么一个女人身上，上官婉儿觉得风险太大。

因此，眼下最妥当的办法，就只有利用草拟遗诏的这个机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准确地说，就是采取骑墙态度，在不得罪韦后的前提下，为自己多找一座政治靠山。而这样一座靠山，当然就是以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代表的李唐宗室。

这几年来，尽管随着韦后一党的强势崛起，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表现得很低调，可他们的政治能量并没有因此而减损。在上官婉儿看来，与其说这两个李唐宗室的代表人物是怕了韦后和安乐公主，还不如说他们是在避敌锋芒，保存实力。暂时保持低调，韬光养晦，是聪明人在眼下最好的选择。

上官婉儿知道，以相王李旦的身份、资历和名望来说，他其实比李显的儿子们更有资格入继大统。因为他毕竟是高宗和武后唯一在世的儿子，而且已经当过一任皇帝，更当过很长时间的帝国储君。无论李旦本人如何淡泊寡欲，谦恭自持，他始终是一面足以凝聚天下人心的政治旗帜。因此，一旦形势有所变化，别人就完全有可能再度拥立他为天子。

那么，哪些人有可能拥立相王呢？

在上官婉儿看来，满朝文武虽然表面上慑于韦后之淫威，其实心向李唐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所以，不排除一些朝臣会拥有跟当年五大臣一样的志向。此外，一直与后党明争暗斗，在朝中拥有极大势力的太平公主，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李唐的江山社稷落入韦后一党的手中，所以，她也完全有可能挺身而出，帮他的四哥夺回天子宝座。还有，相王李旦的五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其中颇有英武果敢之辈（比如相王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就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假如后党要对相王动手，李隆基等人为了自身的安危荣辱，就必然会奋起抗争，拥立他们的父亲即位。

上官婉儿之所以会对相王的这几个儿子如此刮目相看，实在是与近日在长安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的一则预言有关。

长安城的东北角上，有一个隆庆坊，相王的五个儿子就居住在这里。据说在武周时期，这里有一口普通水井有一天忽然往外冒水，而且一冒就不可收拾，到最后竟然把方圆数十顷的地方淹成了一口大水池，时人称其为“隆庆池”。

这池子的来历本来就甚为古怪，到了中宗年间，相王的五个儿子在池的北面建立宅第之后，更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有一天，一个道行高深的风水师路经此地，偶然望见隆庆池上空缭绕着一团奇异的云气，忽然间神色大变。随后的日子，风水师天天都到隆庆池边长久伫立，遥望相王五子的那片宅第，心中若有所思，脸上的神色越发凝重而怪异。最后，隆庆池附近的居民听到风水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此地）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甚！”（《资治通鉴》卷二○九）

很显然，风水师所指的“帝王气”，正是针对住在隆庆池北面的相王五子而言。

此言一出，顿时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坊间，并且传进了中宗

李显的耳中。

开什么玩笑！有道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朕还好端端地坐在金銮殿上，隆庆池居然敢冒出什么“帝王气”！

李显大为不快。尤其让他感到惴惴不安的是，相王李旦本来就是皇位的潜在争夺者，如今他儿子们的宅子上竟然又冒出了帝王气，这让李显如何能安心？

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把这股“邪气”压下去！李显马上召来宫中术士，命他们提出禳除的办法。

当然，办法很快就有了。

景龙四年四月中旬，也就是李显暴崩的一个多月前，他率领一大群侍臣、术士、宦官、宫女，浩浩荡荡地驾临隆庆池，命人用彩缎搭起一座楼台，在此大宴百官，接着又在隆庆池上泛舟，最后又牵出几头大象，绕着隆庆池踩了好几圈。

这样一场热热闹闹的活动搞完，李显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

按照宫中术士的说法，如此一来，就足以把威胁天子的那片帝王气化解掉了。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短短一个多月后，中宗李显就平白无故地暴崩了。所以，在此时的上官婉儿看来，这则有关“帝王气”的预言，其应验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既然如此，她当然更有理由向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示好了。

如何示好呢？

上官婉儿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暗中邀请太平公主来共同草拟遗诏。换言之，就是不能让后党独吞这块巨大的权力蛋糕，而应该让李唐宗室也来分享。

李显暴崩次日，一份由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联手炮制的“天子遗诏”就出炉了：“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资治通鉴》卷二○九）

遗诏的前两项内容，显然是按照韦后的授意拟定的；而第三项，则分明是出自太平公主的意志。假如这份遗诏得到执行，相王李旦就能在

一定程度上对韦后形成制约，从而在李唐宗室和后党之间达成一种政治平衡。

可想而知，这样的设计自然会遭到后党的强烈反对。

诏书一送到中书省，后党的核心成员、时任中书令的宗楚客马上就跳了起来。

这块权力蛋糕明明是后党千方百计挣来的，凭什么让相王李旦来分享？宗楚客急忙找到韦后的兄长韦温（时任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说："由相王参与辅政，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况且，相王和皇后是叔嫂，自古以来，叔嫂之间就不便共事，今后在朝会上裁决政务，二者要依何种礼节相处？"

韦温深以为然，随后便与宗楚客共同牵头，率领所有宰相联名上表，请皇后临朝摄政，同时罢除相王李旦的辅政之权。当时，有一个叫苏瑰的宰相不属于后党成员，于是怯生生地嘀咕了一声："既然是遗诏，能随便更改吗？"韦温和宗楚客当即怒目而视，苏瑰吓得不敢再多说半句。

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精心设计的平衡构想，就这样被后党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上官婉儿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愉快，因为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向李唐宗室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和诚意。如今个人目的既已达到，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当然就与她无关了。

至于此事的当事人相王李旦，似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因为他本来对权力就毫不热衷，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自然乐得继续做他的逍遥王爷。

只有太平公主对此结果愤愤不平。这几年来，她一直对韦后和安乐公主忍气吞声，原本就活得十分压抑，如今三哥李显又死得不明不白，后党又如此嚣张跋扈，一手遮天，她和四哥李旦今后的日子，又怎么可能好过？

一贯自视甚高的太平公主绝不会就这样无所作为，束手待毙。

此刻，太平公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

除了防守反击，没有别的选择。

六月初四，韦后召集文武百官，正式发布中宗李显驾崩的消息，同时

发布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由韦后临朝摄政，同日大赦天下，改元唐隆。为了安抚李唐宗室，韦后同时擢升相王李旦为太尉，进封雍王李守礼（李贤的次子）为豳王，寿春王李成器（李旦的长子）为宋王。最后，韦后又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亦即让他掌握全国武装部队及京师内外的所有警备力量。

六月初七，太子李重茂登基，尊韦后为皇太后。

六月十二日，韦后命侍中纪处讷秉持符节巡抚关内道（陕西省中部和北部），命中书侍郎岑羲巡抚河南道（黄河以南地区），命吏部尚书张嘉福巡抚河北道（黄河以北地区）。

这是大唐帝国新一任女主人在向四方的臣民宣告她的登场，昭示她的权威！

在此时的韦后看来，那顶金光灿烂的女皇冠冕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了。只要再迈一步，就那么一小步，她就将登上权力的巅峰，实现所有的梦想！然而，此时的韦后并不知道——这一小步，她永远也迈不过去了。因为有两个人挡在了她的前面。

一个是太平公主。

另一个就是临淄王李隆基。

[1] 就是当初被武三思收为鹰犬的那个逃犯，现在居然成了负责朝廷礼乐和宗庙祭祀的一把手。

[2] 双关语：一指任命状的封口是斜的，一指由特殊渠道任命。

第六章 睿宗李旦复辟

李隆基登场

中宗李显死后的那些日子，假如那个曾望见“帝王气”的风水师再度驻

足隆庆池，肯定会惊讶地发现，相王五子宅第上空的帝王气正愈积愈浓。如果更仔细地观察，他肯定还会发现，那股龙气正准确地聚集在其中一位亲王的宅邸上空。

这个亲王就是李隆基。

李隆基，相王李旦第三子，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八月初五生于东都洛阳，生母是相王的侧妃窦氏。他出生的前一年，李旦刚刚被武曌推上傀儡皇帝的位子。李隆基六岁时，武曌以周代唐，正式登上女皇宝座，李旦被降为皇嗣，并受到严密监管。以当时李旦所处的政治境况而言，加之李隆基的“庶出”身份和相对靠后的出生顺位，绝对没有人想到，这个孩子日后竟然会当上皇帝；更不会有人想到，他将终结一个“牝鸡司晨”的时代，并且最终缔造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

史称李隆基聪明颖悟，多才多艺，尤其在音乐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而且“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除了才艺出众，相貌堂堂之外，李隆基身上很早就显露出了一种英武果敢的王霸之气。据说他从小就崇拜汉末枭雄曹操，因而宫人都称呼他为“阿瞒”（曹操小名）。此外，史书还记载了他童年时代的一个故事，颇能表明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这个故事发生在他七岁那年。有一次，李隆基带着一队衣甲鲜明的侍卫入朝，要去觐见祖母武曌，刚好在宫门口碰见正在当值的金吾将军武懿宗。武懿宗是武曌的族侄，一贯恃宠骄横，看见李隆基小小年纪却派头十足，就想杀一杀他的威风，于是上前大声呵斥，并动手驱赶他的侍卫和仪仗。就在随从们不知所措之际，李隆基却镇定自若地走到武懿宗面前，突然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旧唐书·玄宗本纪》）

武懿宗万万没想到，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竟然有如此震人心魄的威严和霸气，竟当场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李隆基和他的侍卫队扬长而去。武曌听说这件事后，惊讶于这个孙儿小小年纪却有如此过人的胆色，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特加宠异之”。

李隆基这种刚毅果敢的性格，和他父亲李旦谦柔冲淡的性情恰好相反，和祖父李治也完全不同，倒是和曾祖父李世民、祖母武曌颇有几分相似。也许这样的秉性，就注定了他日后会有一番经天纬地的宏大作为。

在李隆基的青少年时代，帝国的政治高层风云变幻，朝堂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而他父亲李旦身为皇嗣，更是长期处于

各种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度险遭毒手。李隆基九岁那年，他的生母窦德妃就因遭到宫人陷害而被武曌暗杀，死后连尸骨都找不到。这样的环境和人生遭遇，无疑让他过早地体验了政治的可怕和残酷，但是与此同时，也将他的性格磨砺得更为沉毅和坚忍。

随着李隆基的日渐成长，帝国政局越发动荡不安。他二十一岁那年，神龙政变爆发，实行铁腕统治的祖母武曌被赶下了台，武周王朝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没过多久，功高权重的五大臣又被强势崛起的武三思彻底整垮，并且一一迫害致死；紧接着，太子李重俊又发动了一场政变，诛杀了武三思，却又因决心和行动不彻底而功亏一篑，事败被杀；到了李隆基二十六岁这一年，中宗李显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驾崩，死因异常蹊跷，而韦后一党则迅速拥立少帝李重茂，并一举攫取了朝政大权……如此种种，无不让李隆基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从生存角度而言，“现实”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从现实人物的成功和失败中汲取各种经验教训，永远是最直接、最生动、最有效的生存教育。

在这样一个极端险恶、危机四伏的“政治丛林”中长大成人，面对一系列用死亡和鲜血书写的案例和教材，李隆基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许多丛林生存的法则，也谙熟了各种权力斗争的路数和技巧。尤其是“军事政变”这种极端的政治斗争形式，更是引起了李隆基极大的关注和思考。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要在帝国宫廷这一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角斗场上生存发展并且出人头地，就必须随时做好武力相争的准备。也就是说，在对手有可能向你挥起屠刀之前，你就必须毫不犹豫地亮剑！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当然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从十七八岁起，李隆基便开始在朝中任职，曾先后担任右卫郎将、尚辇奉御、卫尉少卿等职，此后又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担任了一年多的地方官。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社交圈的扩大，李隆基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暗中打造自己的势力，尤其注重结交北门禁军“万骑营”的人。

万骑营是大唐天子的近卫部队，其前身是“百骑”，组建于唐太宗时期，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是由官奴和少数民族中精心挑选出的骁勇之士组成。由于是皇帝的贴身侍卫，这些人的衣着和装备自然就比较拉风——身上穿的是虎皮纹的衣服，胯下骑的是豹皮纹的马鞍，一个个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每逢天子出游狩猎，他们便前呼后拥，担任开

道和护卫的工作；到了猎场上，就张弓射箭，呼啸驰骋，帮助天子围捕猎物。到了武周时期，这支部队进行了扩编，增至一千余人，故改称“千骑”；及至中宗年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扩编，遂称“万骑”，并专门设置了指挥官。

可想而知，在皇帝和宫廷的安全保卫方面，这支“特种部队”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谁能够掌握这支军事力量，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帝国的政治中枢。

景龙三年冬，李隆基结束了潞州别驾的任期，回到长安。由于暂时别无任用，赋闲在家，他便趁此机会大力笼络万骑营的军官。当时他身边有个奴仆兼侍卫，叫王毛仲，是高丽人，其身份也是官奴，和很多万骑卫士的出身一样，所以李隆基就让他专门负责与万骑卫士的联络。王毛仲为人十分机敏，他很了解李隆基的胸怀和抱负，也知道这些人迟早会派上大用场，便十分卖力地为双方穿针引线。于是，李隆基很快就和万骑卫士们打得火热，“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新唐书·王毛仲传》）。尤其是万骑营的几个中层将领，如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人，都和李隆基结成了莫逆之交。

除了结交禁军之外，李隆基还利用他在朝中和地方任职的机会，先后结纳了一批才俊之士。如朝邑（今陕西大荔县）县尉刘幽求、苑总监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人，都被他引为心腹。其中，刘幽求和钟绍京是李隆基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二人在日后的政变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在政变成功后，双双从默默无闻的官场小吏一跃而为帝国的宰辅重臣。

刘幽求，冀州（今属河北）人，制举出身，武周圣历年间担任阆中（今属四川）县尉，相当于一个山区小县的公安局长。由于官职卑微，当地的刺史没把他放在眼里，总是对他颐指气使。刘幽求是一个自视甚高之人，受不了这个鸟气，于是愤然辞官，归隐乡里。直到武周末年，朝廷才重新授予他朝邑县尉的官职，可仍然还是个不入流的芝麻官。当时刘幽求已年近五十，眼看半截子入土了，但是仕途前程依然一片黯淡，他大为郁闷，一直在焦急地寻找自己人生的突破口。

不久，神龙政变爆发，帝国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刘幽求顿感时机来临，立刻赶回朝廷晋见五大臣，向他们提出了根除武三思势力的建议，并且郑重警告他们——如果不这么做，很快就会遭到武氏一党的反击，终将死无葬身之地。

毫无疑问，刘幽求的这个提议确实是很明智的，假如五大臣听从他的

劝告，帝国日后的政局必将全然不同，五大臣也不会遽然失势，更不会死于非命，而刘幽求更有可能因此献策之功得到提拔和重用。

然而，让刘幽求大失所望的是，五大臣把他的建议和警告完全当成了耳旁风，压根没拿他当回事儿。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刘幽求的预料，一度总揽朝纲的五大臣不仅彻底丧失了权力，而且最后都死得很难看。

就这样，刘幽求又一次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死心。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相信自己不会永远这么倒霉。

皇天不负有心人，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正当年过五旬的刘幽求还在帝国官场的最底层苦苦煎熬的时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那个年轻有为的临淄王李隆基，终于在不经意间来到了他的身边。

刘幽求顿觉眼前一亮。

他发现，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压抑和挫折，一贯对他视而不见的幸运女神终于向他抛出了一个迟来的媚眼。他预感到——眼前这个年纪不大，但是志向不小的亲王，日后必将会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

而李隆基认识刘幽求之后，也顿生一种相见恨晚之感。因为他看得出来——这个看上去郁郁不得志的朝邑县尉，绝不是一般官场中司空见惯的那种庸碌无能之辈。[1]

就这样，李隆基和刘幽求一拍即合。

一个是雄心勃勃但是缺少帮手的宗室亲王，一个是经验丰富但是缺乏机遇的低级官吏，就这样为了他们梦想中的远大前程，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景，充满信心地走到了一起。

钟绍京，虔州（今江西赣州市）人，小吏出身，最初只是农业部的一名小干事（司农录事），由于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受到武曌的重视，随后进入中书省（当时称凤阁），成为女皇的御前秘书。当时，明堂的匾额、九鼎的铭文，包括各座宫殿的牌匾榜文，无一例外，都是出自钟绍京的手笔，可见武皇对有才的人还是相当重视的。

而有才的人通常也都比较自负，所以钟绍京的自我感觉也比较良好。每天看着满朝文武在自己题字的门匾下进进出出，或者在自己书写的

铭文前啧啧赞叹，他的虚荣心别提有多满足了。他相信，只要好好为女皇写字，飞黄腾达肯定是迟早的事。

可是，神龙政变后，随着女皇的下台，他的升官梦也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景龙年间，钟绍京被调任皇家园林总管（苑总监）。虽然是五品官，品秩不算很低，但却是典型的清水衙门，手中没什么职权，除了管理一帮花匠园丁，就是伺候一些花花草草，日子过得平淡如水。

后来，钟绍京认识了临淄王李隆基，心境忽然就变得不一样了。尽管此时的钟绍京比刘幽求年纪还大，已经年近六旬，可在他心中沉睡已久的升官梦还是突然被唤醒了，就像一口干涸多年的老井重新泛出了活水一样。

他暗暗下决心要搏他一把——既然不甘心守着眼下这种不咸不淡的日子，那就干脆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这个年轻有为、胸怀大志的临淄王，搏他一把老来富贵！

对于除了写字就别无所长的钟绍京而言，临淄王能够看上他，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分，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而对于李隆基来说，之所以把年过半百的钟绍京也纳入自己的人才队伍，当然不是看上了他的一手好字，而是因为钟绍京能为他提供出入宫禁的便利。

皇家禁苑位于太极宫北部，而苑总监的官舍就位于玄武门附近，所以在李隆基的构想中，日后一旦发动政变，他就可以从禁苑悄悄潜入皇宫大内，利用钟绍京的官舍作为行动指挥部。

到了景龙四年夏天，二十六岁的李隆基已经成功打造了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

这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只要李隆基一声令下，它立刻就会像一支离弦之箭一样，呼啸着射向帝国的政治心脏。

而此时的后党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

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自以为完全占领了权力制高点的同时，李隆基已经从他们背后悄然登场了……

绝地反击

唐中宗李显死后不到十天，首席宰相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还有以韦温为首的诸韦，便一再呈上密奏，“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并“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资治通鉴》卷二○九）。

武曌六十岁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直到六十六岁才发动武周革命，其步伐何其沉稳，其心机又是何其缜密。可反观韦后，几天前才刚刚毒死中宗，临朝摄政，现在便迫不及待地授意后党启动了篡唐称帝的计划，准备一鼓作气革掉李唐王朝的命，其浮躁轻狂的浅薄嘴脸可谓暴露无遗。

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对于韦后的所作所为，人们或许只能这么理解。

可是，韦后自己是不会这么想的。她自认为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在她的股掌之中，所以，她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也奈何不了她。

在韦后的授意下，后党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策划。而李唐宗室的两个代表人物——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自然也就成了后党准备猎杀的目标……

这一年夏末的某个傍晚，暮色刚刚笼罩大地，一个和尚就匆匆来到了隆庆坊。他的神色异常警觉，一路上不断回头张望。走到临淄王府门前的时候，和尚蓦然停下了脚步。他再次回头观望了一会儿，直到确定无人跟踪，才轻轻叩响了朱漆大门上的铜环。

片刻后，大门打开了一条缝，王府的门人探出了半个脑袋。和尚一脸凝重地告诉门人，有要事求见临淄王。门人发现这个和尚很面生，就反复追问他有何来意。和尚始终不肯透露分毫，只坚持要见王爷，说此事非同小可，并且十万火急，无论如何必须亲自禀明王爷。下人无奈，只好进去通报。

听说有一个陌生和尚要找他，李隆基也颇感诧异，但他没说什么，只命下人马上把客人请进来。

落座之后，和尚即刻自报家门，说他来自宝昌寺，法名普润。

宝昌寺？普润？

李隆基极力在脑海中搜索，但记忆中一片空白。

很显然，此人与自己素昧平生。李隆基静静地端详着这个不速之客，忽然有种强烈的直觉——这个和尚肯定来头不小。

一番寒暄之后，李隆基问起他的来意。

普润和尚没有直说，而是轻轻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李隆基悚然一惊。

普润报出的这个人是当朝的兵部侍郎崔日用。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崔日用是韦后与宗楚客的死党，如今他居然托一个和尚找上门来，他想干什么？

李隆基当即屏退了左右。他知道，普润和尚今夜的造访必定干系重大。果然，普润接下来的一席话让李隆基全身的神经立刻就绷紧了。

普润说，宗楚客、韦温和安乐公主等人，已经制定了一个诛杀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计划，不日即将发动。

李隆基紧紧盯着普润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崔大人为何要告诉我这一切？"

普润无声地一笑："王爷，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崔大人认为太后与宰相的做法不得人心，料定其阴谋必然不会得逞，所以……"普润顿了一顿，接着说，"所以崔大人不想给他们当陪葬。"

李隆基沉默了。他知道，普润刚刚传递的这个情报肯定是真的。因为这几天后党频繁异动，其篡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接下来，他们肯定要对李唐宗室祭起屠刀，而首要目标必定是父亲李旦和姑母太平！李隆基其实对此早有警觉，眼下崔日用送来的这份情报只是确认了他的判断而已。

"请转告崔大人，他的话，本王都已记在心里了。"李隆基说。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情报收到了；二、人情也领了。

普润脸上露出了一个如释重负的表情："王爷，贫僧来时，崔大人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

李隆基看着普润，忽然发现自己的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

冥冥之中，一个帝国的命运已经悄然落在了自己的肩头。

他知道，这是一种使命——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

李隆基开始行动了。

第一步，他联络了万骑营的那帮铁哥们。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李隆基相信，只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政治动员，加上升官发财的许诺，一定可以激发他们的勇气和血性。可是，让李隆基颇有些意外又有些欣喜的是，这些人根本用不着他动员——因为他们对后党的愤怒根本不亚于他。

自从韦后的侄子韦播等人接管禁军后，因为担心威信不够，怕镇不住军心，便经常借故杖打万骑将士，试图以此立威。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收拾不了人心，反倒把所有万骑卫士都给惹毛了。所以，当葛福顺、陈玄礼等人来见李隆基的时候，一个个吹胡子瞪眼，把韦后一党的祖宗十八代都狠狠问候了一遍，而且恨不得把诸韦扒皮抽筋，大卸八块。李隆基一见他们革命热情如此高涨，便顺势怂恿他们诛杀韦后一党，既可以出这口窝囊气，又可以剪除逆党安定社稷，于公于私，都值得毫不犹豫地干它一票！

葛福顺等人一听，当即摩拳擦掌，纷纷表示愿意效死。个别人比较谨慎，建议说此事重大，或许应当先禀告相王再采取行动。李隆基一摆手，斩钉截铁地说：“我等举事是为了社稷大业，事成自当归功于相王，不成也只有以死殉国。如果现在禀报他，就等于增加了他的危险，没这个必要；要是他不同意，反而会坏了大事，何必多此一举？”

众人听完都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李隆基很聪明，他之所以不想让相王知道此事，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父亲。他知道，以父亲那与世无争淡泊自处的秉性，十有八九不会同意他们搞政变。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秉性，也很难期望父亲能在这件事上给他提供什么助力。所以，与其让他担惊受怕并且出手阻挠，还不如不让他知道。

在李隆基看来，能够给自己提供助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姑母太平公主。

放眼整个李唐宗室，甚至放眼整个天下，有资格，有能力，又有意愿挑战韦后的人，就只有太平公主了。首先，她是深得女皇武曌真传的人，无论是先天遗传的强势性格，还是后天养成的心机、谋略和智慧，她都继承了武曌的衣钵。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就算是满朝文武

也无人能望其项背。其次，她经历了帝国高层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而且亲身参与了神龙政变，从中得到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获取了极大的功勋和威望。因此，就连韦后和安乐公主也都惧她三分，“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旧唐书·太平公主传》）。

总而言之，太平公主属于当今政坛上少数几个可以左右政局的大腕级人物。有这样一个姑母，李隆基当然没有理由不和她联手。

所以，李隆基采取的第二步行动，就是力邀太平公主加盟。

当侄子李隆基向她坦陈政变的想法时，太平公主既感到有些意外，又觉得在意料之中。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没想到这个侄子成长得这么快，不仅具备了一种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和稳重，而且勇气和魄力也非常人可比；之所以又在意料之中，是因为从小到大，这个侄子都是她最看好的后辈之一。当年这毛头小子一声怒斥就把武懿宗彻底震住的故事，几乎在朝野上下传为一时佳话。从那个时候起她就相信，这个小家伙将来肯定不会屈居人下。

如今看来，自己当初的判断完全正确。

看着眼前这个英气勃发的侄子李隆基，太平公主的心绪忽然有些微妙而复杂。

她心里忽然闪过这样一些念头——李唐皇族出了一个如此强悍的后起之秀，对自己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换言之，自己将来如何同这个侄子打交道？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有效地控制他？

尽管意识到了这些潜在的问题，可太平公主此刻还无暇去担忧将来。当务之急，应该是考虑如何团结起来，把不可一世的韦后集团彻底铲除，以确保自己和整个李唐皇族的安全。

为此，太平公主当即对李隆基的想法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支持，同时她还表示，可以让自己的儿子、时任卫尉卿的薛崇简出面，和李隆基联手行动，而她本人则负责在幕后出谋划策，帮他们制定政变方案。

在太平公主的积极参与和全力策划下，一个完美的政变计划迅速出笼。该计划分成五个步骤：

第一步，李隆基率刘幽求等人，在钟绍京的接应下进入禁苑，以钟绍京的官舍作为行动指挥部。

第二步，由葛福顺、李仙凫率万骑卫士突入玄武门的羽林军营地，斩

杀韦璿、韦播等人，夺取禁军指挥权。

第三步，李隆基进入玄武门坐镇，同时，由葛福顺和李仙凫分别率领左右万骑，兵分两路攻入内宫，在凌烟阁前会合。之所以从两个方向进攻，一来是相互策应，形成包围，防止韦后等人择路脱逃，二来是考虑到万一遭遇对手强烈反击，两路可以分头行动，避免全军覆没。

第四步，等葛福顺等人发出成功会合的信号，李隆基再率羽林军进入太极宫，全面控制宫中局势，捕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

第五步，关闭各道宫门及京师所有城门，分兵搜捕诸韦亲党，彻底肃清整个后党势力。

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强强联手之下，一场捍卫李唐的绝地反击战即将打响。

而此刻的韦后却依然沉浸在她的女皇梦中不可自拔。

不过，她很快就会从梦中醒来。

醒来的韦后将会发现——等待在她面前的并不是主宰天下、睥睨苍生的权力巅峰，而是身死族灭、人亡政息的万丈深渊。

血腥一夜：后党的覆灭（上）

唐隆元年（公元710年）六月二十日。长安。皇家禁苑。

时节虽然已近夏末，但是高悬中天的太阳还是把大地炙烤得一片灼热。御苑的花圃中开满了金黄的玉簪、洁白的芍药和紫色的蔷薇。波光潋滟的池塘里，袅袅婷婷地生长着一株株粉红的莲花，有的仍自含苞待放，有的已然灼灼盛开。明晃晃的阳光下，成群的红蜻蜓在花叶间款款飞舞，间或低低地掠过水面，点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间或立在宽大的荷叶上，用一双透明的复眼，滴溜溜地盯着从塘边甬道上不时走过的一两个园丁。

大约申时（下午三时至五时）时分，日影逐渐西斜，灼人的热浪开始消退，只见一队花匠模样的人迈着急促的步伐匆匆进入禁苑。当他们经过池塘边的时候，靠近甬道的三五只蜻蜓显然受到了惊吓，立刻扑扇着翅膀飞向池塘中央，久久不敢落下。

尽管这群“花匠”的装束和宫中仆役一模一样，可他们的神色、举止和气质，还是和那些神情慵懒、双目无神的宫役有很大不同。尤其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年轻人，纵然一身粗布便装，可身上还是隐隐透出了一种不言自威的凛凛霸气。

没错，这个人就是李隆基。

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刘幽求、薛崇简、麻嗣宗，以及贴身侍卫李守德等二十多人。

该来的似乎都来了。但是，好像还缺了一个。

那个原本一直跟随在李隆基左右的亲信王毛仲，此时并没有在列。

难道他另有任务？

不，王毛仲“失踪”了。就在行动的前一刻，这小子连一声招呼也没打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大事尚未发动，就有一个亲信当了逃兵，李隆基心里不免也有几分懊恼，但他脸上并未流露丝毫。其他人虽然心里直犯嘀咕，担心这小子跑去跟后党告密，可是一看到临淄王若无其事的表情，也只好把心里的担忧和疑虑压了下去。

尽管王毛仲的脱逃还不足以扰乱军心，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李隆基和所有人都感到了强烈的困惑和沮丧。

当他们按照原定计划来到钟绍京的官舍时，只见四下无人，大门紧闭，根本不见钟绍京的身影。众人大为诧异，赶紧上前拍门。可拍了老半天，大门还是纹丝不动，院墙里也是悄然无声。

这下麻烦大了！

李隆基眉头紧蹙，不停地在门外来回踱步。众人面面相觑，心里七上八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莫非这姓钟的老小子也和那该死的王毛仲一样，脚底抹油，一走了之了？

不，钟绍京没跑，他还好端端地待在官舍里。之所以装聋作哑不开门，是因为他和王毛仲一样——怕了。

事到临头，钟绍京心里忽然打起了鼓。自己再怎么说也是堂堂的朝廷五品官，虽然没什么权力，没多少油水，可毕竟不愁吃不愁穿，犯得着去干这杀头诛族的事吗？眼下韦后一党牢牢掌控了军政大权，就凭一个小小的临淄王和他手下的几个兄弟，就能翻得了天吗？

钟绍京越想越怕，越想越悔，最后干脆一转身躲进了内堂，对外头的拍门声充耳不闻。

一轮红日渐渐西坠，眼看暮色马上就要降临，可李隆基等人依旧在屋外心急如焚，一筹莫展。

就在大伙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苑总监官舍的大门突然吱呀一声打开，门开处，露出了钟绍京那张充满愧疚和不安的老脸。

李隆基和众人对视一眼，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们真的搞不懂，在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时辰里，在这扇紧闭的大门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隆基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是一个女人改变了一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挽救了这场即将流产的政变。

方才，正当钟绍京躲在内堂里当缩头乌龟的时候，他妻子许氏走到了他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舍身救国，神灵一定会保佑。况且，你已经参与了密谋，就算你现在反悔，想退出行动，恐怕事后也是难逃一死！"

这真叫一语惊醒梦中人。

刚才，钟绍京光顾着害怕，却忘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自己早就在贼船上了，岂能轻易逃脱干系？

倘若现在撒手不干，无论政变成败，他都没有好果子吃——成了，他是一个可耻的逃兵；败了，他是参与谋逆的叛党。横竖都没有好下场！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舍命一搏，至少还有一半成功的机会。

想到这里，钟绍京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好老婆大人英明，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钟绍京忙不迭地打开大门，一个劲地向李隆基拱手作揖，并且毕恭毕敬地把众人请了进去。李隆基面带笑容，只字不提刚才发生的事情，而是握住钟绍京的手，和他一同来到正堂坐下，然后招呼众人落座。

钟绍京看见临淄王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心头的不安才渐渐消除。

夜色徐徐降临，像一袭黑色的绸缎覆盖着垂宇重檐的太极宫。

皇宫北面的禁苑一片漆黑，咫尺莫辨，只有苑总监的官舍中灯火通明。距离官舍不远处，就是禁军的屯驻地——玄武门。此时的玄武门，就像一只黑色的巨兽昏昏沉沉地蜷卧在黑暗中，对即将到来的这场血腥的政变浑然不觉。约摸一更时分，从玄武门驰出一队飞骑，径直朝苑总监的官舍飞奔而来。为首的人，正是葛福顺、李仙凫、陈玄礼等万骑军官。当这些人进入官舍之后，参加政变的人员就全部到齐了。

但是李隆基却不急着发布行动指令。因为按照计划，他们的行动时间定在亥时，亦即敲二更鼓的时候（晚十时至十二时）。这个时辰，宫里的大多数人都已熟睡，最适合采取突然行动，足以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时间在缓慢地流逝，艰难地流逝，一点一滴地流逝……

李隆基、刘幽求、钟绍京、葛福顺等人都静静地坐在大堂上，耐心而又焦灼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周遭的夜色越来越浓厚，禁苑中万籁俱寂。除了远处池塘和草丛中隐约传来的时断时续的蛙鸣和虫吟，众人仿佛只能听见自己胸腔中剧烈搏动的心跳。

刘幽求不知何时已经悄悄离座，信步走进堂前的庭院中，抬头默默地仰望夜空。

这是一个月明星稀、和风拂面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栀子花香，一切都显得如此安宁和静谧。忽然间，刘幽求看见了夜空中出现了一幅瑰丽而奇异的景象。他张大了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惊呼。李隆基等人闻声，纷纷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随着刘幽求的目光向夜空望去。

蓦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片缤纷夺目、晶莹璀璨的流星雨。只见如墨的夜空中，“天星散落如雪”（《资治通鉴》卷二○九），仿佛一千颗熠熠闪亮的珍珠同时撒落在一面黑色的丝绸上。这一幕天象是如此罕见，如此美丽而壮观，以至于院落中不约而同地响起了一片压抑不

住的惊叹。

与此同时，宫中传来了清晰的二更鼓响。

天意！在行动时间来临的这一刻，空中恰好出现这一奇谲的天象，这难道不是上天在向他们发出召唤吗？

刘幽求激动地说：“天意如此，时不可失！”

众人闻言，一齐把目光投向了临淄王李隆基。

李隆基的双眸陡然射出炽烈的光芒。

众人看见了一个字——杀！

葛福顺立刻拔剑出鞘，带着他的手下直扑玄武门的禁军营地。

行动开始了。

此时，韦璿、韦播和高嵩等一干韦氏子弟，正在香甜的睡梦中发出均匀的鼾声。他们甚至连哼都没有哼一声，首级就已经脱离了身躯。无论他们正在做着怎样的美梦，这一生都将永不再醒。

葛福顺高高举起三颗血淋淋的头颅，向不知所措的羽林军士兵们厉声高呼：“韦后毒死先帝，阴谋危害社稷！今夜我等应当同心协力诛杀诸韦、拥立相王，以此安定天下！倘若有首鼠两端，暗助逆党者，一律屠灭三族！”

大唐帝国最核心的军事重地玄武门，太极宫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羽林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李隆基的手中。

这个年轻的亲王，此刻已经牢牢握住了当年秦王李世民曾经握过的这块决定胜负的筹码。

三颗滴血的头颅迅速送到了李隆基面前。

李隆基举着火把，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然后他猛烈地挥动了一下手中的火炬，政变军立刻兵分三路：葛福顺率领左翼万骑卫士攻击玄德门，李仙凫率领右翼万骑卫士攻击白兽门，双方约定于凌烟阁前会合，李隆基则亲率刘幽求、钟绍京以及两百多名手持斧锯的园丁工匠，从御苑南门进入玄武门驻防，一方面坐镇指挥，一方面随时准备策应。

阒寂无声的太极宫顷刻间杀声震天。

由于宫中的守卫部队猝不及防，葛福顺与李仙凫的两路人马全都进展顺利。他们分别砍杀了玄德门与白兽门的守门将军，打开宫门长驱直入。

这一天，距离中宗暴崩、韦后临朝仅半个多月，李显的灵柩还停留在太极殿里，尚未入土。此刻，在殿中守卫灵柩的士兵听见外面杀声四起，马上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皇帝李显之死本来就让人疑窦丛生，韦后一党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又丝毫不得人心，所以这一刻，当这些卫兵意识到已经有人起兵反韦的时候，就绝对没人愿意再替后党卖命了。他们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披上铠甲冲出太极殿，加入了政变部队的行列。

三更时分（午夜零时至凌晨二时），李隆基听见万骑卫士胜利的呐喊声，知道他们已经顺利攻进大内，当即依照原定计划，率领麾下士兵浩浩荡荡地杀入太极宫，准备执行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诛杀韦后及其亲党。

当韦后从睡梦中猝然惊醒的时候，脸上几乎还残留着一丝笑靥。

因为在梦中，她已经登上了女皇宝座，正在接受满朝文武和天下苍生的朝拜。恍惚中，那一顶金黄色的女皇冠冕似乎还在眼前闪闪发亮，那一片山呼万岁的壮阔声响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可为什么忽然之间，一切就都消失了呢？为什么此刻眼前所见，居然是御榻旁昏黄微弱而且摇曳不定的烛光？为什么此刻耳中所听，居然是寝殿外惊天动地而且纷至沓来的呐喊？

没想到梦醒时分，现实竟是如此残忍，人生竟是如此荒诞！

不过，此刻的韦后已经不敢再去细想那个遽然失落的女皇梦了，因为眼下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逃命。

鬓发散乱，衣裳不整的韦后就这样失魂落魄地跑出了寝殿，只身逃进位于不远处的飞骑卫士营（羽林军一部）。危急关头，韦后仍然保留着一丝清醒。她还记得，当初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时，她和李显一开始也是惊慌失措，可后来有了军队保护，他们就彻底击溃了政变部队。如今，她希望自己也能像上次那样绝处逢生，反败为胜。

然而，韦后错了。

她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当她像一只惊弓之鸟一头撞进飞骑卫士营的时候，恰好遇见了一个全副武装的飞骑军官。

韦后如释重负地笑了。

之所以如释重负，是因为她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救兵。

那个军官也得意地笑了。

之所以得意，是因为在他眼中，此刻的韦后早已不是什么至尊无上的皇后，而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女人，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

是的，一块肥肉。军官想，只要砍下她的头向临淄王李隆基邀功请赏，自己起码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心念电转之间，军官快步上前，手中钢刀一挥，对面的那颗人头就飞了起来。

然后，韦后的身躯就像一具僵硬的稻草人一样，直直地仆倒在了泥土之中。

她倒下去的时候无声无息。

原来，如此权势熏天、不可一世的女人，倒下去的时候也可以如此无声无息。

韦后死了，死在距女皇宝座仅半步之遥的地方。

她没有想到，这半步竟然是一道天堑。

一道成与败的天堑，一道生与死的天堑，一道永恒与幻灭的天堑。

而韦后之所以在这道天堑前一失足成千古恨，原因只有一个——她不是武曌。

纵然她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坐上了武曌曾经坐过的位置，可她并没有忍辱负重、呕心沥血地付出武曌曾经付出的一切。

在发动革命篡唐称帝之前，武曌已经花了整整三十年的光阴编织她的权力之网。直到确认这张网已经环环相扣，坚不可摧，足以经受来自各个方向各个角度的冲击和震荡时，武曌才敢堂而皇之地革掉李唐王

朝的命。

而韦氏一直迷醉在武曌所创造的女主天下的神话光环之中，却不愿去了解武曌究竟用了多大的代价才支撑起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神话。

武曌之所以能貌似轻巧地革掉李唐王朝的命，是因为她自己早已成长为一个铁腕无敌的政治巨人。而韦氏在根基未稳的情况下毒死中宗李显，则无异于亲手折断了自己的政治保护伞，让自己过早地暴露在了政敌的枪口下。

武曌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文武百官，是因为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已经让她化身为帝国的灵魂，使她确凿无疑地拥有了恩威刑赏的统治权柄，从而将每一个大臣的政治生命牢牢握在了手中——无论生死荣辱，无论贵贱穷通，都在武曌的股掌之间。

而韦氏呢？仓促夺权使她根本不可能拥有主宰天下的实力，也来不及对帝国的权力结构进行必要的重组，更来不及让她的势力渗透到帝国政坛的每一个角落。换言之，仅仅占据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效驾驭帝国的统治机器。举例来说，兵部侍郎崔日用正是看穿了这一点，才会毅然倒戈，把他的筹码押在了李隆基身上。因为他知道——天下人心仍在李唐而不在韦氏。

综上所述，韦氏政权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

说到底，是韦后的平庸无能、急功近利和倒行逆施，决定了她自己及其党人的可悲下场。韦后一心一意想成为武曌第二，只可惜，她既没有武曌的命，更没有武曌的智慧、能力、胆识、城府和手腕，所以，她最终只能成为一个失败的“山寨版”。

血腥一夜：后党的覆灭（下）

差不多与韦后被杀同时，安乐公主等人也死在了政变士兵的刀下。

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安乐公主似乎要比惊惶奔走的韦后镇定和从容得多。当一队政变士兵杀进安乐公主居住的偏殿时，她早已衣裳齐整地坐在烛光下，并且神色自若地对着铜镜化妆描眉。

门扉被猛然撞开的一瞬间，安乐公主慢慢地转过身来，直直地盯着这群杀红了眼的士兵，脸上并没有丝毫惊愕。

反而是大兵们不无惊异地发现——美丽的安乐公主还是和往常一样，目光中写满冷艳和高傲，嘴角甚至还悬挂着一丝轻蔑的笑意。

大兵们愣了片刻，但很快就被这种目光和笑意激怒了。离她最近的一个大兵低吼一声，手中的利剑划出一道弧线，一下子削过安乐公主细嫩的脖颈。

那颗美丽的头颅滚落在地的时候，上面有一双不肯闭上的凤眼，还有一对没有描完的蛾眉。

紧随安乐公主之后，驸马武延秀被杀死在了肃章门外，宫廷女官贺娄氏被杀死在了太极殿西边……就在这些韦氏亲党一一死于非命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却一直在为自己感到庆幸。

她就是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之所以庆幸，是因为她早就给自己找好了后路。当初草拟遗诏的时候，她不仅暗中邀请太平公主参与草诏，而且力挺相王李旦辅政。虽然后来事情被宗楚客搅黄了，但这不是她的责任。在上官婉儿看来，仅凭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主动表现出的忠心和诚意，李唐宗室就应该记住她的这份情。

所以，当外面杀声四起时，上官婉儿一点也不担心。她不慌不忙地找出当初那份遗诏的副本，命宫人提上灯笼，然后打开官舍的大门，满怀坦然地走到外面，准备亲自迎接李隆基的到来。

她相信，就凭手中的这份诏书，她就一定可以逃过这场劫难。

然而，上官婉儿过于乐观了。

因为李隆基并不领她这份情。

当李隆基的军队过来的时候，上官婉儿看见刘幽求在前面开路，赶紧把遗诏副本毕恭毕敬地呈了上去。刘幽求拿过去呈给了李隆基。可李隆基几乎连看都不看，嘴里只轻轻地吐出了一个字——斩！

尽管刘幽求一再替上官婉儿求情，可李隆基脸上始终是一副坚硬如铁的表情。

刘幽求无奈，只好命手下把上官婉儿拖到了迎风招展的帅旗下。此刻的上官婉儿四肢冰冷，全身瘫软，几乎连跪也跪不住了。

当一把闪着寒光的大刀劈下来时，上官婉儿无力地望向李隆基。

她渴望李隆基在最后的时刻发出赦免的命令。

可是没有。

她只看见了那张自始至终都坚硬如铁的脸。

这是上官婉儿在世上看见的最后一幅画面。

刘幽求认为大事已定，指着少帝李重茂所在的太极殿对李隆基说："按原计划，今夜应该拥护相王登基，现在是时候了吧？"

李隆基摇了摇头。

他告诉刘幽求——除恶务尽！

要把宫中残余的韦氏党羽全部铲除，相王才能登基。

于是，杀戮继续进行，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天亮。

六月二十一日黎明，当鲜红的朝霞涂满整个东方天际，李隆基才踏着遍地的鲜血和尸体，出宫去迎接相王李旦。

见到父亲时，李隆基为自己事先没有禀报而叩首谢罪。

事已至此，相王李旦当然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了。要是没有这个胆识过人的儿子率先发难，自己最终也只能是韦后砧板上的鱼肉。李旦热泪盈眶地向儿子张开双臂，然后紧紧拥抱着他，哽咽地说："挽救社稷宗庙于危亡之地，是你的功劳啊！"

李隆基迎接相王入宫后，立刻下令关闭宫门及长安所有城门，派万骑卫士分头捕杀余下的韦氏亲党。

太子少保、宰相韦温逃到东市北面时，被万骑抓获，当场砍杀。

中书令宗楚客身穿丧服，头蒙灰布，骑着一头青驴，企图从通化门蒙混出城，被守门士兵识破，当即被斩首，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弟弟宗晋卿。

侍中纪处讷逃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东都留守张嘉福逃到怀州（今河南沁阳市），均被追获，就地诛杀。

是日上午，相王李旦拥着少帝李重茂登临安福门，宣旨安抚人心。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后党成员屁颠屁颠地跑到安福门下，演出了一幕滑稽戏。这个人就是司农卿赵履温。只见他慌慌张张地挤到人群前面，对着城楼三拜九叩，手舞足蹈，嘴里还一声声地高呼万岁。看着他那副诚惶诚恐的谄媚嘴脸，李旦脸上立刻浮出鄙夷之色。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此人就是桓彦范的大舅子，当初靠着裙带关系从地方调到朝廷任职，为此特地送了两个年轻貌美的侍妾给桓彦范作为谢礼。不久桓彦范一失势，他便忙不迭地把两个侍妾讨了回去，可谓无耻至极。后来，他又一心一意投靠了后党，不择手段地巴结安乐公主。为了帮公主修建豪宅和园林，他不惜挪用大量公款，强行征用大批民夫，耗费了无数的民脂民膏。更有甚者，每当公主视察工程进度的时候，他就亲自跑到建筑工地上，将紫色官袍掖到腰际，伸长脖子去拉牛车，把身为大臣最起码的体面和做人最起码的尊严都通通抛弃了，其寡廉鲜耻简直到了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的地步。

如此超级无耻的极品小人，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望着城楼下兀自舞蹈不休的赵履温，相王李旦迅速朝身边的万骑卫士做了个手势。

赵履温高喊万岁的声音还没有止息，万骑卫士就已经干净利索地把他劈成了两段。百姓听说赵履温被砍了，争先恐后地跑到城楼下割他的肉。一转眼，赵履温就变成了一具白骨。

这一天，还有两个大臣提着自己妻子的脑袋献给了相王。他们是御史大夫窦怀贞和秘书监李邕。窦怀贞娶了韦后的乳母，李邕娶了韦后的妹妹崇国夫人。想当初韦后得势之时，这两个家伙别提有多牛逼了，总在人前人后端着一副皇亲国戚的架子。尤其是窦怀贞，娶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奶妈为妻，还把这当成是韦后的恩赐，每次写奏章的时候，总是在落款处煞有介事地写上“皇后阿奢（zhě）”（唐朝民间，习惯称奶妈的丈夫为“阿奢”）。时人故意拿他开涮，经常叫他“国奢”。没想到窦怀贞非但不生气，反而“欣然有自负之色”（《资治通鉴》卷二○九）。

而眼下，不管是窦怀贞还是李邕，都赫然发现自己头上的“国戚”帽子已经变成了“逆党”的标志。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大义灭亲，不约而同地抛出了妻子的脑袋，以此表明自己弃暗投明的决心。虽然他们因此

逃过一死，但是几天后就被逐出了朝廷。窦怀贞贬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县）司马，李邕贬为沁州（今山西沁源县）刺史。

所有后党成员中，唯一一个表现出气节的人，也许就是时年八十的宰相韦巨源了。当政变的消息传来时，家人劝他赶紧逃亡，韦巨源却说："我身为朝廷大臣，国家有难岂能逃避？"随后神色自若地走出府邸，在街上被士兵们乱刀砍杀。稍后，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人也相继被诛，首级悬在闹市示众。

当天，兵部侍郎崔日用又率兵血洗了聚居在长安城南的韦氏宗族，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当时城南有两个世家大族，一是韦氏，一是杜氏，两大豪族比邻而居，时称"城南韦杜，距天尺五"，意谓其尊贵无匹。但是这一天，不仅韦氏全族从"距天尺五"的地方一下堕进了恐怖的地狱，甚至连杜家也跟着一块遭了殃。因为士兵们都杀红了眼，根本顾不上去看"门牌号"，只要是豪宅大院就往里冲，只要是人就拼命砍，哪管你姓韦还是姓杜。

可怜杜氏一族的男女老少，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成了刀下之鬼，生时与韦家为邻，死了也要与韦家做伴。

一夜之间，曾经飞扬跋扈的韦后一党就彻底覆灭了。

杀光了所有该杀的人，朝廷才颁下一道诏书，大赦天下，宣称"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资治通鉴》卷二○九）。

实际上屠杀行动进行到这一步，韦后也没剩下多少"支党"了。

是日，相王李旦论功行赏，以少帝的名义发布诏书，晋封临淄王李隆基为平王，升任宫廷御马总管兼万骑卫士营总管；晋封薛崇简为立节王；擢任钟绍京为中书侍郎，刘幽求为中书舍人，二人皆加"参知机务"之衔 [2] 。葛福顺、麻嗣宗、李守德等人，也各因其功劳大小，分别晋升为将军或中郎将。

经过这血腥一夜，李隆基就像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在帝国的政坛上冉冉升起。

尽管许多大唐百姓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个叫李隆基的人，但是通过这场流血政变，人们已经彻底领教了这个年轻人的厉害，也见识了他的巨大能量。

只不过，此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能量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

一旦横空出世，他就绝不仅仅是一颗星星，而是将变成一颗太阳。

一颗光芒万丈的太阳。

是皇冠，还是枷锁？

政变后的第三天，相王李旦的五个儿子全部进入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高层。平王李隆基擢升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子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次子衡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四子巴陵王李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五子彭城王李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

同日，刚刚升任中书侍郎兼“三级宰相”的钟绍京也正式加封“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的另一个儿子薛崇训也升任右千牛卫将军。

鉴于朝廷的整个局势已经牢牢掌控在相王父子手中，所以，出于安定人心的考虑，相王父子决定放过几个侥幸未死的后党成员，只对他们做贬谪外放的处理。如驸马都尉杨慎交、中书令萧至忠、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崔湜等人，均被贬为地方刺史。

让李隆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一切都已尘埃落定的时候，那个失踪多日的王毛仲居然又回来了。

他在外头躲了好几天，看见临淄王已经大获全胜，再也没有任何危险了，才带着一脸的尴尬和歉意回到了王府。

像这种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家伙，李隆基完全有理由把他一脚踢飞，可李隆基没有这么做。他原谅了王毛仲，并且同样给予他功臣待遇，封了他一个龙武将军的官衔。

李隆基之所以对王毛仲既往不咎，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宽宏之心，也不仅仅是念及多年的主仆情谊，而是因为现在还是用人之时，与其拿他问罪，不如让他常怀愧悔之心，以备日后将功补过。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隆基这么做是对的。几年后，当他和太平公主围绕着帝国的最高权力展开又一轮生死博弈时，王毛仲果然冲锋在前，真正做到戴罪立功了。

李隆基的这种驭人手段，就叫使功不如使过。

铲除韦后集团，夺取朝政大权之后，李隆基发动的这场政变可以说取

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政变的最终目标却还没有达成。

最终目标是什么？

拥立相王。

可现在，少帝李重茂却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金銮殿上，要如何名正言顺地让他下台呢？尽管地球人都知道，这个李重茂只是个傀儡，可他毕竟是中宗李显的儿子，是按照合法程序登基的皇帝。所以，要让他下台，就不能随便采用暴力，而要采取“禅让”的方式，让他“自愿”把皇位让给相王。

为此，太平公主上场了。

如今，没有谁比她更适合来做少帝的思想工作了。

事情并不复杂，几句话谈下来，李重茂就知道自己除了主动让位，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于是乖乖地按照太平公主的意思，签署了一份自愿禅让的诏书。

然而，当太平公主兴冲冲地把诏书拿给相王时，一个麻烦的问题来了——相王不干。

《资治通鉴》称：“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固辞。”所谓“固辞”，也就是坚决推辞，怎么劝都没用。

这回倒好，一大帮人提着脑袋换来的胜利果实，无数人虎视眈眈的皇帝之位，相王李旦居然死活不要。

作为政变骨干的刘幽求第一个坐不住了。他立刻去找李隆基，忧心忡忡地说：“相王曾为天子，众望所归。而今人心未安，家国事重，相王岂能拘于小节，不早日登基以安天下？”

其实对于李隆基来说，相王不肯当皇帝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因为这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当初中宗李显还是庐陵王的时候，就是因为相王坚决辞让“皇嗣”之位，李显才得以第二次当上储君，并在神龙政变后顺利复位。所以，李隆基知道，父亲此次“固辞”，同样是出于真心，而并非故作姿态。

既然是出于真心，那问题就很麻烦了。因此面对刘幽求迫切的质问，李隆基也只能十分无奈地回答：“王爷禀性淡泊，素来不以天下事挂怀，纵然天下曾经是他的，他还要让给别人，何况现在的皇帝是他的

亲侄子，他岂肯将其取而代之！”

刘幽求说：“众心不可违，虽然王爷喜欢独善其身，但总不能把社稷置于不顾吧？”

其实，这句话也是李隆基想说的。

其实李隆基心里比刘幽求更着急，比任何人都更着急。

说白了，李隆基比任何人都更希望父亲当皇帝。若非如此，他何必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搞这么一场血流成河的政变？

李隆基之所以发动政变，表面原因固然是为了社稷的安定和李唐皇族的安全，而内在的原因，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他自己早就怀揣着一个君临天下的梦想。

自从懂事的时候起，李隆基就拥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果敢和自信。冥冥之中，他总觉得自己是有使命的人，是必将缔造一番伟业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隆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曾祖父李世民的遗传基因。也就是说，他们都自觉地意识到了隐藏在自己身上的巨大潜能，所以总是会尽一切努力去实现它。而在中国古代，一个男人所能实现的最高的人生目标，当然就是登基御极，君临天下了。

如果说在青少年时代，李隆基的人生目标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建功立业的模糊冲动的话，那么到他长大成人之后，尤其是在担任潞州别驾的那几年里，“君临天下”的梦想便已经确凿无疑地成为李隆基心中最强烈的生命愿景了。

在客观上帮助他确立这种愿景的，据说是许多不可思议的祥瑞。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当时预示他日后将成为天子的“符瑞”，前后居然多达“一十九事”。比如他刚刚到潞州上任，就有百姓看见“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有一次出猎，又有人看见李隆基头上有“紫云”环绕。再比如景龙四年，中宗准备在南郊祭天，命所有宗室子弟必须回京参加。李隆基临行前，让术士用蓍草占卜，以此卜算前程，结果竟然是“蓍一茎，孑然独立”。那个术士大吃一惊，说：“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

后来，李隆基从潞州回到长安，立宅于隆庆坊，结果又出现了那则众所周知的“隆庆池帝王气”的传言。除此之外，还有术士暗中告诉李隆基，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隆”字，所居之坊又有一个“隆”字，韦后临朝后又把年号改为“唐隆”，而“隆”与“龙”可通假，这么多的暗合之处，

足以说明——李隆基就是命中注定的真龙天子。

如此种种，无不让李隆基充满了一种天命在我的绝对自信，而这样的自信无疑又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他发动政变的决心。（《旧唐书·玄宗本纪》：“上益自负，乃与太平公主谋之。”）

如今，政变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全面成功，李隆基当然就更有理由憧憬那个越来越真实的天子之梦了。

李隆基相信，只要父亲李旦登基，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帝国的储君。虽然他不是嫡长子，但是在他看来，就凭这场政变所取得的“安定社稷”和“拥立相王”之功，天下人就没有理由不拥戴他，大哥李成器更没有什么资格跟他竞争太子之位。

说白了，谁打下的江山，当然就要由谁来坐。

所以，眼下李隆基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服父亲当皇帝。

当天夜里，李隆基就找到了大哥李成器，然后和他一起来到相王府，苦口婆心地劝说父亲接受禅让，登基为帝。（《资治通鉴》卷二○九：“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

看着两个儿子万分诚恳的表情，听着他们一遍遍近乎乞求的劝说，相王李旦在心里不停地发出一声声长叹。

为什么天底下无数人拼了性命要夺取的东西，却偏偏是自己不想要的呢？

为什么被自己视同枷锁、视同藩篱、视同禁锢的这顶天子冠冕，却要一次次地被别人强加在自己头上呢？

当初母亲武曌把他强行推上皇帝之位，实际上是把他变成了一只装点门面的政治花瓶，表面上让他成为帝国最尊贵的男人，实际上是把他变成了世界上最高级的“囚徒”。

而现在，虽然再也没有母亲的铁腕来操控他的生命，但是儿子们现在要求他做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胁迫”呢？

李旦一生崇尚淡泊宁静、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可事实上他的一生丝毫也不宁静自然，而是时刻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载沉载浮，身不由己。原以为母亲武曌下台后，他的人生就再也不会落入被利用，被胁迫的窘境，没想到天地如此之大，他却始终逃不出“被”字的网

罗。

如今，妹妹太平和三郎隆基又扛着他的旗号搞了一场流血政变，再度把他推入“被代表”“被拥立”的政治漩涡之中，真是让他备感无奈。其实李旦很清楚，妹妹太平和三郎隆基都是不甘居于人下之辈，二者的权力野心谁也不比谁小。现在他们之所以合起伙来把他强行推到前台，无非是想利用他的身份来强化新政权的合法性而已。换句话说，他们其实是把他当成了一面幌子、一个跳板，一种暂时性的过渡。迟早有一天，在太平和隆基之间，必定会再次爆发一场权力斗争。到那时候，李旦悲哀地想，自己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就像眼下的少帝李重茂不得不在时势逼迫下“被禅让”一样，到那时候，自己恐怕也只能步他的后尘，在妹妹或儿子的逼迫下“被逊位”……

可明知如此，相王李旦又能如何呢？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

六月二十三日深夜，在两个儿子的一意坚持和苦苦劝说之下，相王李旦终于被说服，被感动了，最后无力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六月二十四日。晨。太极殿。

一具贵重的楠木棺椁停放在大殿的西边，里面躺着二十多天前被毒死的中宗李显。

一张宽大的御座被放置在大殿的东边（原来的位置是坐北朝南，国丧期间改为坐东朝西），上面坐着二十天前刚刚登基的少帝李重茂。

中宗灵柩旁站着面无表情的相王李旦。

少帝御座旁站着容光焕发的太平公主。

大殿下方站满了鸦雀无声的文武百官。

百官前列站着目光炯炯的李隆基和刘幽求。

这是一场特殊的朝会。

整个太极殿一片静默。

人人都在静默中等待一个毫无悬念的谜底揭晓。

太平公主用一种矜持的目光依次扫过所有人的脸，然后不紧不慢地开口了：“家国多难，社稷不宁，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诸位认为如何？”

文武百官低垂着头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继续保持沉默。

只有刘幽求挺身出列朗声道：“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资治通鉴》卷二○九）

皇帝仁孝，故“被禅让”；相王慈爱，故“被拥立”；百官沉默，故“被代表”。很好，叔慈侄孝，君仁臣忠，上下和睦，一团和谐。

然而，刘幽求说完后，瘦小的少帝李重茂却依旧一脸茫然地坐在宽大的御座上，仿佛根本没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

太平公主嘴角掠过一丝鄙夷的冷笑，径直走上前去，对少帝说：“天下之心已归相王，这不是你小孩子的座位。”说完一把抓住李重茂的衣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他提下了御座。

就这样，在几个政变首脑的一手操纵下，大唐帝国迅速完成了新一轮的权力交接。

当天，李旦正式登基，并亲临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一个月后，朝廷改元景云。

这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二次登基，与第一次登基时隔二十六年。

人生如梦，世事如烟。

二十六年是一场无奈的轮回，充满了一种宿命的怅惘。李旦发现自己走了很久，走了很远，可是一不小心，却又回到了当初那个极力想要逃离的地方。当初被他弃如敝屣的那顶皇冠，而今又成了他不得不戴上的一副枷锁。

第一次帝王生涯给李旦带来了无尽的压抑、苦闷和烦恼，而第二次帝王生涯，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两强相争中的夹缝天子

李旦即位后，一个严峻的问题立刻摆在了他的面前。

要立谁为太子？

李旦知道，三郎隆基发动这场政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太子之位，而且以他的能力和功劳而言，这个位子确实也是他应得的。但是棘手的问题在于，隆基排行老三，而且还是庶出，如果立他，嫡长子成器会作何感想？

按照自古以来“立长不立贤”的传统，只有成器才是储君的不二人选，无论隆基能力再强，功劳再大，都不应该染指太子之位。可是，如果隆基一心要争，而成器又坚决不让的话，事情又该如何解决？

一个建有不世之功，一个拥有法理依据，立谁都没错，可立谁又都不妥。

在此，李旦发现自己陷入了跟当年的高祖李渊一样的困局。搞不好，李唐皇室就有可能重演一场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悲剧。

怎么办？

就在李旦万分焦灼，无计可施的时刻，长子宋王李成器主动站出来了。他对李旦说：“国家安定，则先考虑嫡长子；国家危险，则先考虑首功之人。倘若违背这个原则，天下必将失望。所以，臣宁死也不敢居于平王之上！”一连几天，李成器流泪请求，态度坚决。

很显然，这是一个明智的嫡长子。

他对目前的形势有非常清醒的判断，对李隆基的实力和野心也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仅凭自己嫡长子的身份，是远远不足以同三郎竞争和较量的。因此，与其冒着丧失一切的风险去打一场同根相煎并且毫无把握的仗，还不如做得漂亮一点，主动让位。这样既显得自己深明大义，又能换取李隆基的感激和信任，从而保住自己的亲王地位和后半生的富贵，何乐而不为？

李成器的主动弃权让李旦如释重负。与此同时，大多数朝臣也认为平王李隆基建立奇功，应为太子。紧接着，李隆基的心腹刘幽求又一次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对睿宗李旦说：“臣听说，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功莫大焉！何况他素有贤德，请陛下不必再犹豫。”

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六月二十七日，亦即政变后的第七天，睿宗李旦正式册立平王李隆基

为太子。为了取得平衡，李旦又于次日将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三个要职同时授予了长子李成器。

接到诏书的这一刻，李隆基似乎显得出奇的平静。

或许该有的激动和喜悦都已在他心中预演过无数次，因而兴奋之情早就淡了；又或者拿到一种命定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有什么从天而降的惊喜之感。总之，李隆基很平静。

当然，即便李隆基心里认定太子之位是自己分内应得的，表面上的客套文章还是要做的。他随即上表，非常谦虚地推让了一番，不过马上就被睿宗李旦驳回了。

就这样，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李隆基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皇太子。

一条通往天子宝座的红毯已经在他的脚下铺开。不过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障碍也已经出现在红毯的前方。

准确地说，是一个女人挡住了李隆基的去路。

她就是太平公主。

韦后和安乐公主死后，如果有人认为，大唐帝国从此已经摆脱了牝鸡司晨的尴尬和女主天下的危险，那他就太过乐观了。因为，原本就比这两个女人强过百倍的太平公主，此时正在用一种比过去更加强势的姿态，在帝国政坛上迅速崛起。

要了解太平公主在睿宗一朝究竟拥有怎样的强势地位，有必要引述一段《资治通鉴》的记载：

太平公主沈敏多权略……中宗之世，韦后、安乐公主皆畏之，又与太子共诛韦氏。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睿宗）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馀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简皆封王，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居处奉养，拟于宫掖。

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说，太平公主性情沉稳，机智灵敏，擅长权谋，早在中宗时代，韦后和安乐公主就对她甚为忌惮，后来她又与李隆基一起铲除韦氏、拥立睿宗，因而屡立大功，位尊权重。睿宗李旦经常召

她入宫商议大政方针，每次商谈的时间都很久；有时太平公主没有入宫，睿宗便会派宰相到她府上请示磋商。此外，每当宰相向睿宗呈递奏章时，他第一句话总是问："跟太平公主商议过了吗？"紧接着又问，"跟三郎商议过了吗？"在听到肯定的答复后，才着手批复。

当时，太平公主所想望的，睿宗没有一件不应允。宰相以下文武百官的擢升或贬降，只在太平公主一句话，其余经她推荐而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官员，更是不可胜数。

由于太平公主的权势之隆完全不亚于皇帝李旦，因而朝野上下人人趋之若鹜，其府邸总是门庭若市。她的三个儿子薛崇行、薛崇敏和薛崇简都被封王，地产和庄园遍布京师郊外。为了收藏各种奇珍异宝和器物古玩，他们不惜派人远赴岭南和蜀地去淘宝，运送的人马和车辆一路上络绎不绝。同时，太平公主饮食起居的奢华程度，简直可媲美于皇宫。

从上述记载明显可以看出，睿宗李旦是一个典型的夹缝天子——一边是建有大功，自命不凡的儿子，一边是素来强势，权倾朝野的妹妹，属于李旦的空间自然就变得十分狭小。为此，他不得不在这两个强势人物之间勉力维持平衡，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几乎是从李旦登基的第一天起，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政治博弈就已经开始了。

博弈的焦点在于朝政大权的争夺，而表现方式则是宰相班子的人事变动。

唐隆政变后，以萧至忠和崔湜为首的一帮后党成员本来已经被逐出朝廷，可这帮官场老手并不轻易认栽。以他们从政多年所养成的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很容易就能察觉出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对萧至忠等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机会。他们相信，只要及时靠上太平公主的码头，就完全有可能咸鱼翻身，东山再起。所以，尽管接到了朝廷的贬谪令，可他们并不急于动身赴任，而是一个个削尖了脑袋，不约而同地往太平公主的府上跑。

看着这些栖栖遑遑的丧家之犬，太平公主面带微笑地敞开了大门。

对太平公主来讲，这些人过去是谁的党羽根本无关紧要，他们的操守和品行如何就更是无须多虑，只要他们从现在开始效忠于她，她就可以既往不咎，来者不拒。尤其是这个萧至忠，几年前曾在中宗面前极力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如今带着这份功劳前来投靠太平公

主，自然更容易被接纳。

于是，太平公主迅速收编了这帮韦后余党，随后极力向睿宗施压，终于迫使睿宗重新起用了这批人。萧至忠官复中书令，崔湜官复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其他几个也照样官复原职。这些在唐隆政变中侥幸逃过一死的有罪之臣，就这样在太平公主的荫庇下，摇身一变又成了堂堂的帝国宰相。

眼看太平公主如此明目张胆地培植党羽，控制朝政，李隆基当然不会无所作为。被立为太子后，他马上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迅速提拔了两个官员，把他们从地方调入中央，一举让他们进入了宰相班子。

这两个人，一个叫姚崇，一个叫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生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早在武周时期，姚崇便已官至宰相，因处事精明干练而深受武曌赏识。张柬之得以在八十高龄入阁为相，便是姚崇和狄仁杰大力举荐的结果。神龙政变后，武曌被废黜，姚崇念及往日君臣之情，为武曌一洒同情泪，引起五大臣不满，被贬为地方刺史。

宋璟，邢州南和（今河北邢台市）人，生于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自少博学多识，工于文翰，弱冠中进士，武周时期官居御史中丞，以忠直耿介、执法严明、不阿权贵著称，颇为武曌所器重，曾为弹劾二张而与武曌面折廷争。中宗时，宋璟担任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因不满武三思擅权而遭排挤，被贬为地方刺史。

如今，在太子李隆基的垂青之下，这两个人终于回到了帝国的权力中枢。姚崇就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就任检校（代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事实证明，李隆基识人用人的眼光确实高明，因为姚、宋二人都没有让他失望。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姚、宋二人成了李隆基最为得力的心腹股肱，不仅尽心竭力地帮助李隆基对付太平公主，并且还在几年后辅佐李隆基缔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辉煌时代——开元盛世。因此功绩，姚崇和宋璟也成了青史留名的一代贤相。

史称姚、宋此次回朝后，同心协力“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

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资治通鉴》卷二○九）。

在姚崇和宋璟的大力整饬下，帝国政坛出现了一派拨乱反正的崭新气象。比如在中宗时期被武三思迫害致死的张柬之等五大臣，皆被平反昭雪；李重俊也被追复太子位号，谥号“节愍”；成王李千里、羽林大进军李多祚等人，也都被追复官爵。此外，因犯颜直谏而冤死的郎岌、燕钦融、韦月将等人，也都被追赠了官职。

同时，废除武氏宗庙，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的爵位谥号，并开棺暴尸，铲平坟墓；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黜退了中宗一朝的“斜封官”数千人。

由于姚崇和宋璟的改革举措深得人心，因而立刻获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拥护。他们的威望显著提升，自信心也大为增强。紧接着，在李隆基的授意下，他们又迅速把矛头指向了同为宰相的萧至忠等人。

尽管萧至忠的职位还在姚、宋二人之上，可他明白，自己毕竟是旧势力的代表，在当前这种革故鼎新的形势下，他只能一心一意地夹着尾巴做人，根本无力与姚、宋二人抗衡。而像崔湜这样的二级宰相（同平章事），面对姚、宋雷厉风行的改革行动，就更是心惊肉跳，寝食难安了，他们只能巴望在太平公主的庇佑下躲过这一劫。

然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还是要来。

不知道李隆基向睿宗施加了什么影响，总之，就在萧至忠等人刚刚被重新起用的数日之后，再次贬谪的诏书就下来了。崔湜被免去相职，罢为尚书左丞；萧至忠、韦嗣立、赵彦昭等人，全部被贬为地方刺史。

萧至忠等人贬而复用，用而复贬的这一幕，就发生在短短的几天之间，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反复无常的人事变动，足以证明一点——睿宗李旦刚一登基，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争夺朝政大权的战争就已经打响了。

第一回合，李隆基完胜。

通过姚崇和宋璟实施的一系列雷霆行动，以太子李隆基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正式在帝国政坛上登台亮相，崭露头角，并且先声夺人地获取了斗争的主动权。

一轮旭日已经从地平线上探出了一缕光芒。

然而，它的上方依旧笼罩着一团浓重的阴霾。

因为太平公主绝不会轻易承认失败。

天空尚未破晓，李隆基仍须努力。

而睿宗李旦，也仍然要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激烈政争中颤颤巍巍地当他的夹缝天子。

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这个在“牝鸡司晨”的巨大梦魇中艰难行进了许多年的大唐帝国，究竟还要多久，才能重新迎来像贞观时代那样的朗朗乾坤。

[1] 据《旧唐书·刘幽求传》记载，几年后已登基为帝的李隆基曾经在一道诏书中盛赞刘幽求，称他“风云玄感，川岳粹灵，学综九流，文穷三变。义以临事，精能贯日；忠以成谋，用若投水”等等，毫不吝惜赞美之辞，足见他对刘幽求的赏识和器重。

[2] 这个头衔与“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一样，皆有参与决策之权，均可视为宰相，但地位较前二者为低，所以大致可理解为“三级宰相”。

第七章 梦魇的终结

李重福兵变

公元710年无疑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这一年共有三个年号：景龙、唐隆、景云。第一个使用了将近半年，被韦后废掉了；第二个才用了二十多天，又被李隆基的一场政变终结了；而当第三个年号刚刚使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又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兵变就突然爆发了。这场兵变的领导者，就是被中宗长期流放的那个次子——谯王李重福。

这些年来，帝国政坛风云变幻，长安的金銮殿上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

场，大唐天子走马灯似的一个一个换，但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与李重福全然无关。他就像一颗被遗忘的弃子，在热闹纷繁的棋局边缘独自咀嚼无边的落寞与哀伤。中宗暴崩时，他心里曾经闪过一丝极其微弱的企盼——企盼能以次子的身份入继大统。毕竟，在中宗仅存的两个儿子中，他的年纪几乎比李重茂大过一倍，所以他有理由生出这种企盼。

但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只要韦后在朝中掌权，他这种企盼就是一种奢望，一种既可笑又可怜的幻想。

果不其然，中宗暴崩不久，京师就传来了李重茂即位，韦后临朝摄政的消息。

几乎就在李重福得知这个消息的同时，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就奉韦后之命，带着五百名士兵来到均州，层层封锁了他的宅第，彻底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李重福在心里苦笑。

他知道，只要韦后掌权一天，他就一天也摆脱不掉这种囚犯的命运。而且李重福也很清楚，韦后的最终目标就是像武曌那样篡唐称帝，所以她很快就会把傀儡皇帝李重茂废掉。而一旦韦后走到这一步，那他李重福的死期也就到了。

作为李唐皇室的天潢贵胄，作为最有资格继承中宗帝座的年长皇子，李重福实在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无情摆布，更不甘心沦为韦后砧板上的鱼肉。

于是，他心中逐渐燃起了一簇火焰。

这簇火焰一开始还很微弱，但是很快就变成了一团熊熊烈火。

因为，有两个素怀野心的人就在这时候来到了李重福的身边。

如果说，李重福心中长年郁积的痛苦是一堆柴薪，对韦后的仇恨是一颗火种，那么这两个野心家的到来，则无疑是在这两样东西上面猛然浇下了两桶油。

这两个人，一个叫张灵均，洛阳人，身份是平民，职业无考，估计是混黑道的江湖人物；还有一个，就是当初武三思手下的鹰犬，后来因贪污受贿被贬谪出朝的原吏部侍郎——郑愔。

郑愔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属于典型的投机政客。但是这种人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百折不挠，永不言败。

只要有一口气在，这种人的野心就永远不死。

最初，郑愔是酷吏来俊臣的手下，来俊臣被诛后，他又成了二张门下走狗，继而二张被杀，他被贬为地方上的低级军官，随后又因贪污军饷而弃官潜逃，成了一个在逃通缉犯。按理说，一般人混到这个地步，这辈子就算交待了。可郑愔不是一般人，他的政治野心从不因为身陷困境而消失。在东躲西藏，走投无路之际，他居然走了一步险棋，冒死潜回东都，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博得了武三思的青睐，从而摇身一变又成了朝廷的中书舍人。

说到郑愔，就不能不提崔湜。武三思当权时，郑愔和崔湜一块成了武氏门下的哼哈二将，在打击五大臣的过程中紧密合作，出力尤多。后来武三思被杀，郑、崔二人又结伙投靠了韦后，在一段时间里同任宰相，并且联手把持了大唐的吏部，大肆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哥俩有钱一起赚，有福一起享，真是滋润无比，得意非凡。然而没过多久，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就败露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郑愔和崔湜的仕途命运开始分叉。

说起来也很可笑，导致他们命运分叉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容貌。

据说崔湜是一个以“美姿仪”而名闻朝野的稀世美男，所以他可以靠美色取悦上官婉儿、安乐公主等女强人，碰到危急关头，这些手握大权的红颜知己自然会出面保护他。可郑愔却“貌丑多须”，形容猥琐，丝毫攀不上那些女强人的裙带，所以自然要比崔湜倒霉。人家崔湜虽然被定了罪，可只不过在形式上被外放了几天，没多久就回朝复相了；而他郑愔只能灰溜溜地滚出长安，被贬到山高皇帝远的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去当司马。

这次被贬，在郑愔的人生中虽然不是最惨的一次，但却是他的官运曲线图中跌幅最深的一次。因为这次是从宰相的高位上直接跌到了帝国政坛的最底层，落差太大，所以感觉似乎比当初沦为逃犯更为惨痛。

走在那条凄凄惨惨的贬谪路上时，郑愔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一生，难道就这么完了？难道辛辛苦苦混了一辈子，结果却因为长得比较粗犷就没的混了？

不。郑愔很快就告诉自己——我很丑，可是我很有野心！

回首自己的前半生，一次次失去靠山，落入困境，结果却又一次次咸鱼翻身，否极泰来，凭的是什么？不就是凭胸中这一点不死的野心吗？由此可见，男人不怕长得丑，就怕没野心。

可是话说回来，光有野心是没有用的，还要有靠山。换言之，野心只是一条藤蔓，如果不能缠上像二张、武三思、韦后这样的大树，藤蔓再大条也只能枯死。

那么，放眼当今天下，还有哪一棵大树可以让自己缠绕呢？

郑愔坐在晃晃悠悠的马车中不停地苦思冥想，结果却一无所获。直到马车行走到荆楚地界，距离均州不远的时候，一个人的名字才忽然跃入了郑愔的脑海。

李重福……谯王李重福！

天哪，这不是现成的一棵遮阴大树吗？

刹那间，郑愔发现自己愁云惨淡的人生顿然变得柳暗花明。

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啊！

就在去往贬所江州的路上，郑愔特意绕道均州，暗中拜见了谯王李重福，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和拥戴之意。

自从李重福被流放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敢踏进他的宅邸，更不用说向他表示拥立之意了，所以李重福既兴奋又感动，马上将郑愔引为知己。

不久，中宗暴崩，韦后临朝，郑愔感到时机来临，立刻前往洛阳，找到了当初流落江湖时结识的一个黑老大张灵均，力邀他共创大业。张灵均欣然同意，于是和郑愔双双来到均州，极力怂恿李重福正式起兵，讨伐韦后。

然而，正当三人加紧密谋之时，唐隆政变就突然爆发了。韦后一党被铲除殆尽，少帝李重茂退位，睿宗李旦登基，帝国政局一夜之间就变得面目全非。随后，郑愔被调回朝中担任秘书少监，可刚刚走到半道，姚崇、宋璟就上台了，他旋即又被贬为沅州（今湖南洪江市西北）刺史。与此同时，谯王李重福也接到了睿宗的一纸诏令，要将他调任集州（今四川南江县）刺史。

就在李重福犹豫着要不要去集州赴任时，郑愔和张灵均又来了。

郑愔告诉他，王爷您别走了，我也不去当什么鸟刺史了，咱还是按原计划动手吧，把本来就属于您的江山夺回来。张灵均也对李重福说："大王位居嫡长，当为天子！相王虽然有功，但是没有资格入继大统。如今，东都的士人和百姓都翘首以待大王的到来。您若能暗中进入东都，调动宫城两翼的左右屯营兵，袭杀留守，占据东都，就有如从天而降一样。到时候，向西进攻陕州，向东夺取河南河北，只要大王您旗帜一挥，天下须臾可定！"

张灵均不愧是江湖老大，说起话来就是这么牛气冲天，好像天下是他家的一口锅，一抬手就能把它翻个底朝天。李重福被说得心潮澎湃，两眼放光，当即大腿一拍——没啥好说了，起兵！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李重福随即派遣家臣王道，随同郑愔先行进入东都打前站。抵达洛阳后，王道负责暗中招募死士，短短时间就召集了数百人。而郑愔则负责建立据点，他秘密联络了驸马都尉裴巽（娶中宗的女儿宜城公主），准备利用他家作为李重福的落脚点和行动指挥部。随后，郑愔又胸有成竹地起草了一道拥立李重福为帝的诏书，在诏书中宣布将年号改为"中元克复"，然后遥尊李旦为"皇季叔"，以李重茂为皇太弟；同时，郑愔自任左丞相，"知内外文事"，总揽行政大权，任张灵均为右丞相、天柱大将军，"知武事"，负责军政事务。

一口气写完诏书，郑愔拿起来反反复复念了十几遍，感觉自己好像就站在高高的金銮殿上，正和李重福、张灵均一起，用一种睥睨天下的目光俯视着匍匐在脚下的文武百官和芸芸众生……

这感觉，真是爽呆了！

与此同时，张灵均也召集了数十个弟兄，然后簇拥着李重福，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朝洛阳飞奔而来。

此时的李重福并不知道，他们的异动已经被洛阳县令察觉。就在他们风驰电掣地奔向东都的同时，洛州司马崔日知（崔日用的堂兄）也已根据接获的情报展开了一场搜捕行动。李重福的家臣王道在洛阳募集的党羽，先后有数十人落入了法网。

景云元年八月十二日，洛阳县令从逮捕的人犯口中获知，郑愔、王道等人就躲藏在驸马裴巽家中。县令不敢拖延，立刻带上人马来到裴巽府邸，准备进行搜查。

然而县令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同一天，李重福、张灵均也恰好抵达东都。双方人马就在裴巽的宅邸门口狭路相逢。县令一见对方人多势众，顿时大惊失色，赶紧掉转马头，飞驰进入宫城，向东都留守裴谈作了禀报。

裴谈胆小如鼠，一听说发生叛乱，立刻脚底抹油，头一个溜出宫城躲了起来。其他官员一见长官跑了，也一个个争相逃匿。结果偌大的东都留守朝廷，只剩下崔日知和少数几个官员在支撑危局。

此时，李重福、张灵均、郑愔、王道已经率领几百个党徒，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地向洛阳宫城冲来。当他们接近天津桥（宫城南面的洛水桥）时，正巧与准备逃跑的侍御史李邕撞个正着。李邕一看乱兵已经杀到了眼皮底下，顿时叫苦不迭，只好掉头往宫里跑。他一边跑一边想，现在宫里的官员逃了十之八九，左右屯营兵群龙无首，要是被李重福争取过去，再一倒戈，那东都就彻底完蛋了，自己肯定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左右屯营兵落入李重福的手里。

想到这里，李邕不再往宫里跑了，而是折向了屯营兵的驻地。他先跑进右屯营，召集士兵高声喊话，说："李重福是被先帝流放的罪人，现在无缘无故窜到东都，肯定是想犯上作乱。诸位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只要奋勇杀贼，就不愁没有富贵！"接着，李邕又找到负责宫门守卫的皇城使，让他赶紧关闭各道宫门，率兵拒守。

经过这一番紧急动员，守卫宫城的士兵们都已经刀出鞘，箭上弦，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所以当李重福等人杀到右屯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开口喊话，迎接他的就是一阵如蝗箭矢。李重福无奈，只好放弃策反屯营兵的想法，带领部下转攻左掖门，准备直接从这里杀进宫城。可此时的左掖门也早已紧闭。李重福连连受挫，顿时勃然大怒，命人纵火焚烧宫门。

门楼上的卫兵大为恐慌，既担心宫门被烧破，又不敢出门迎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崔日知率领左屯营兵突然从李重福的背后杀出。李重福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他手下的这帮乌合之众一见形势不妙，当即各自逃命，作鸟兽散。

李重福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拍马狂奔，一路从上东门（洛阳东北第一门）逃出城外，躲进了邙山的山谷之中。

第二天，东都留守裴谈发现叛乱已经平息，才赶紧出头抢功，出动大批部队进入邙山进行地毯式搜捕，同时封锁各道城门，在各个主要路口设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

李重福孤身一人在荒山野岭中游荡了一天一夜。疲倦、饥渴、愤怒、沮丧、懊悔、恐惧，像一条条冰冷的毒蛇一样紧紧缠绕着他。

眼看东都军队的搜捕大网越收越紧，李重福心中的绝望也越来越深。他蓬头散发，踉踉跄跄地走到一处断崖边，向西遥望了一眼长安方向的天空，最后凄然一笑，纵身跃入了深不可测的潭渊之中……

李重福的尸体最后还是被官兵捞了起来，然后运回东都，吊在闹市中寸磔三日。他的党羽也在同一天纷纷落网。其中，“貌丑多须”的郑愔居然化装成一个贵妇，躲藏在一辆马车中企图蒙混过关，最后还是被盘查的士兵识破了。

郑愔和张灵均一同受审时，张灵均昂首挺胸，神情自若，依旧是一副江湖老大的做派；可郑愔却面如土色，浑身筛糠，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张灵均斜乜了他一眼，摇头苦笑道：“老子和这种人一块起事，真是活该失败！”

然而，张灵均此刻明白已经太晚了。被捕当天，他和郑愔便在洛阳闹市被斩首了。

直到临刑的前一刻，郑愔还在思考一个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这辈子靠上谁谁就倒呢？不管是最初的来俊臣、二张，后来的武三思、韦后，还是现在的李重福，只要他郑愔靠上谁，谁就立马死得很难看。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他们太无能，还是我太倒霉？

郑愔肯定是永远得不到答案了，因为刽子手的刀光闪过，他那颗“貌丑多须”的头颅就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上。

不过就算他不死，估计到头来也还是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他没有弄懂，那就是——成功的人生依靠的是经营，不是投机。

善于经营的人，更多时候是把目光放在自身的修行上，所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纵然会遭遇短暂的挫折，也不会被长期埋没；而习惯投机的人，则始终把目光放在外界和他人身上，疏于自身品格和能力的修炼，所以尽管能得逞一时，但绝不可能辉煌一世。换言之，投机者虽然比别人更有机会一夜暴富，但也随时有可能一朝破产。

只可惜，这样的道理，像郑愔这种人永远不会明白。

兵变平息后，朝廷赏罚分明，擢升平乱有功的洛州司马崔日知为东都留守，同时将贪生怕死的原留守裴谈贬为蒲州刺史。

李重福兵变虽然旋起旋灭，并未对睿宗李旦构成任何威胁，但这并不等于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随着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日趋激烈和公开化，睿宗李旦发现，长安的朝堂上正弥漫着一股越来越浓的火药味。种种迹象表明，一场远比李重福兵变规模更大，性质也更严重的政治动乱随时有可能爆发……

一场政治恶斗

自从李隆基当上太子后，太平公主的心情几乎就没有轻松过。

尽管早在唐隆政变之初，她对这个能力过人的侄子就怀有很深的戒备，可直到李隆基在争夺朝权的斗争中漂漂亮亮地赢了第一回合，太平公主才赫然发现——李隆基的魄力和手腕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

不过，太平公主并不十分担心。

因为她自信——姜还是老的辣。虽然李隆基初试啼声就搞得满朝皆惊，但是太平公主相信，以自己从政多年所累积的智慧和经验，对付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更何况，李隆基身上还有一个致命的软肋。

那就是他庶出的身份和相对靠后的出生顺位。

太平公主相信，只要死命抓住这个软肋，就完全有可能把李隆基从储君的位子上弄下来。连皇帝李重茂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废掉，更何况他一个小小的太子？

为此，太平公主开始在朝野上下到处散布舆论，声称李隆基不是嫡长子，没有资格立为太子。在太平公主看来，只要把李隆基废掉，重立一个柔弱暗昧的太子，她就能长久地把持帝国权柄。

面对太平公主咄咄逼人的姿态，睿宗李旦的心里老大不舒服。自从被儿子和妹妹拥立的那一天起，李旦就给自己确立了一条底线，那就是——无论他们两个如何争权夺利，自己始终都要保持不偏不倚。

换言之，李旦给自己的任务，就是维持双方的势力均衡，只求大家相安无事。可现在，太平公主的做法显然已经触及了他的底线，他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所以睿宗很快就颁发了一道诏书，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再谈论废立太子之事。

然而，太平公主对睿宗的诏令却置若罔闻。除了继续散布流言外，她又利用自己多年来精心打造的人脉关系网，开始在李隆基身边不断安插耳目，对他实行全天候的监控。只要太子有任何细微的过失，她都会第一时间向睿宗呈上密奏。

通常情况下，这一招是很管用的。无论是太宗时代的太子李承乾，还是高宗时代的太子李贤，都是在私生活方面出了问题，最后遭到了废黜流放的厄运。所以太平公主信心满满地认为，这么一来，很快就会抓住李隆基的小辫子。

可结果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因为李隆基不是笨蛋。他知道身边都是太平公主安插的“特务”，所以一举一动都万分小心，中规中矩。到头来，太平公主派去的那些特务都累得半死，也只是搜罗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根本不足以整垮李隆基。

频频出手却伤不到李隆基一根汗毛，让太平公主十分恼火。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正月，太平公主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乘坐车辇进入皇城的光范门，把宰相们堵在了下班回家的路上，然后跟他们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迫使他们一起出面，敦促睿宗废立太子。

谁也没有料到，太平公主居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摊牌。

宰相们一个个脸色煞白，半晌无语。

这里头的水太深了！现如今的大唐帝国，还有什么比这件事的水更深呢？

宰相们没人想去蹚这趟浑水，所以始终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接腔。

最后，一个宰相站了出来，迎着太平公主倨傲的目光，从容说道：“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资治通鉴》卷二一○）

太平公主定睛一看，这个公然和她唱反调的人，就是太子李隆基的心腹，如今帝国政坛上风头最健的宰执大臣——宋璟。

太平公主森然一笑。

很好，说得很好！她一边冷笑，一边深长地看了宋璟一眼，然后快步走回车辇，命车夫掉转马头，在众宰相惊魂未定的目光中绝尘而去。

望着太平公主渐渐远去的车辇，宋璟的心头瞬间沉重如铁。

他知道，太平公主绝不会善罢甘休。

一场政治恶斗已经在所难免……

既然在所难免，当然要先下手为强。

宋璟和姚崇随后就向睿宗私下奏言：“宋王成器是陛下的嫡长子，豳王守礼是高宗的嫡长孙 [1] 。如今，太平公主又在其中挑拨离间，臣等担心太子会有危险。为保社稷安宁、东宫无恙，应将宋王和豳王外放为地方刺史，同时撤除岐王（李旦四子李隆范）、薛王（李旦五子李隆业）的禁军兵权，让他们分任太子左、右率（东宫武官），事奉太子。此外，也是最重要的是，应将太平公主及驸马武攸暨迁出京师，于东都安置。”

这显然是一个全面巩固太子地位的计划，其考虑不可谓不周详。然而，在睿宗李旦看来，太平公主并没有犯什么太大的过失，就这样把她逐出京师，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于是李旦作出了这样的表态：“朕现在已经没有兄弟了，身边只剩这一个妹妹，岂能把她赶到东都那么远的地方？这件事断不可行。至于其他几个亲王，倒不妨按照你们的办法处置。”

随后，李旦颁发了一道诏书，宣布诸王、驸马从今往后不得统御禁军，已经任职的，一律改任其他官职。

李旦之所以不想贬黜太平，除了没有正当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么做不符合他的平衡原则。

然而，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让李旦很不爽的事情，迫使他一怒之下主动打破了这个平衡。

这件事与一则预言有关。某日，一个宫廷术士忽然郑重其事地告诉睿宗，说最近天象怪异，“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资治通鉴》卷二一○）。

李旦大惊失色。这些年来，帝国政局动荡不安，宫廷政变此起彼伏，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更何况，眼下太平公主和三郎隆基的矛盾冲突又愈演愈烈，若说他们中有人打算再发动一场政变，勒兵入宫夺取皇位，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李旦越想越怕，赶紧召集几个宰执大臣，把术士的预言告诉了他们，命他们一定要严加戒备，以防不测。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张说（曾任李隆基的东宫侍臣）闻言，不以为然地说：“如此耸人听闻之言，必是有小人企图离间东宫。臣请求陛下让太子监国，流言必然自

动平息。”姚崇也赶紧说：“张说所言，是安定社稷的上上之策。”

李旦恍然大悟。

原来，指使术士捏造预言，制造恐慌的不是别人，正是太平公主！而她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让李旦父子互相猜忌，进而迫使李旦废黜李隆基，甚至让他们父子刀兵相见！其用心是何其险恶，其计谋又是何其歹毒啊！

李旦是很少发脾气的人，可他这次真的动了肝火。此前他还在勉力维系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的平衡，还在顾虑驱逐太平没有理由，可太平公主这回真的是太不地道了，已经大大突破了李旦的底线。

所以，必须给她一点颜色瞧瞧！

这一年二月初一，睿宗李旦终于全盘采纳了宋璟和姚崇的建议，正式颁布诏书，命宋王李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李隆范为太子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李隆业为右卫率；同时，将太平公主逐出长安，迁往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安置。

次日，睿宗又断然发布了太子监国的命令，宣布自即日起，凡六品以下官员的任用，以及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全部交由太子裁决。

至此，李旦完全抛弃了即位以来一直坚持的平衡原则，决定彻底朝太子李隆基倾斜。

儿子毕竟是儿子，到任何时候都比妹妹更值得信任。

接到驱逐令的那一刻，太平公主一下子傻眼了。她万万没有想到，指使术士散布流言的结果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迁往蒲州安置！

太平公主看着手中的这一纸诏令，心里不停地发出冷笑。

从小到大，她一直是帝国地位最尊、势力最大、声望最高的公主，无论政坛上如何风云变幻，无论谁入主中枢，掌握大权，都没有哪一个人敢给她颜色看，更没有人敢算计她。而今天，宋璟和姚崇这两个家伙仗着太子撑腰，居然敢挑战她的权威，甚至怂恿李旦给她下驱逐令，真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完全出乎太平公主的意料。

尽管气得七窍生烟，可太平公主并没有乱了方寸。跟随在母亲武曌身

边那么多年，她学到的最大一项本事就是——定力。

是的，定力，一种临危不乱，临难不恐的定力。

所以，太平公主很快就告诉自己：没关系，你们一心要赶我走，那我就走好了，权当到河东去散散心、度度假，相信不用多久，你们就会恭恭敬敬地把老娘请回来！不过，我不会就这么灰溜溜地走的，在走之前，我会给你们留下一点临别赠礼……

接到诏令的当天，太平公主就着手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授意她的心腹，殿中侍御史崔莅和太子中允薛昭素向睿宗进言：“斜封官都是先帝任用的，都已经是既成事实，如今先帝尸骨未寒，姚崇等人竟然把他们一朝废黜，这么做必然带来两大弊害：其一，彰显先帝之过；其二，为陛下招来怨恨。而今，朝野怨声载道，海内众口沸腾，臣等担心会激发事变，陛下不可不慎啊！”

太平公主在关键时刻打出这张牌，目的有二。

首先是利用斜封官的事情把姚崇和宋璟搞臭。她授意心腹说这番话，就是在暗示睿宗：姚、宋二人之所以花那么大力气罢黜斜封官，其实并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了沽名钓誉，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

其次，斜封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太平公主的人，这些人被逐出朝廷，无疑大大削弱了她的势力。所以，如果能在离开长安之前把姚崇和宋璟搞下台，把自己的人重新弄回朝廷，那样既可收买人心，又能遥控朝中局势，还能为她日后回朝铺平道路，可谓一石三鸟。

就像太平公主所预料的那样，听完崔、薛二人的一席话，李旦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就在李旦满腹狐疑，忧心忡忡的当口，太平公主又以辞行为由亲自入宫，极力强调罢黜斜封官的种种弊端，把睿宗李旦说得频频点头，连连称是。

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有时候人之将走，其言往往也比较悦耳。在睿宗李旦看来，太平不但欣然接受诏令，毫无怨言地前来辞行，而且只字不提被驱逐一事，同时还一心牵挂朝政，如此豁达的心胸，如此不计私利，以大局为重的坦荡襟怀，没有理由不让人感动。

因此，李旦当天就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先帝时期任命的所有斜封官，凡已被停职的，皆可重新量才录用。”

做完这件事后，太平公主心满意足地从宫中出来，然后一刻不停地直奔东宫。

临走之前，她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还太子以颜色。

一听到宫人禀报太平公主驾到的消息时，李隆基心里马上跳出了四个字：来者不善。

但是人既然已经来了，李隆基也只好硬着头皮匆匆出迎。

尽管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可李隆基绝对没有想到，太平公主一见到他的时候，竟然会摒弃所有礼节，撕破一切脸面，当着双方下人的面，指着他的鼻子一顿臭骂。

这是李隆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这个姑母的狠戾与强悍。

出于对姑母的尊重，同时也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李隆基在太平公主口沫横飞的痛骂声中始终保持冷静，一直敛首低眉，一言不发。

与此同时，李隆基心念电转，飞快地盘算着应对之策。

刚才父皇李旦发布恢复斜封官的诏令时，他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毫无疑问，这个消息让他非常不安。因为此事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姚崇和宋璟上台后的改革力度太大，已经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现在分明已经通过太平公主传递到了父皇那里；二、父皇既然恢复了斜封官，就相当于否定了姚崇和宋璟的政绩，或迟或早，姚、宋二人必定被贬。

太平公主这次败得太惨，可以说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否则她也不会不顾公主之尊，找上门来大吵大闹。在此情况下，自己势必要给她一个说法。而按照父皇李旦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他必然会在太平公主利益受损之后寻求一种新的平衡。说白了，很可能就是将矛盾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因此，就算自己不主动给太平公主一个说法，父皇肯定也会下手剪除东宫的势力。

想到这里，李隆基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他决定主动认错，丢卒保车。

也就是说，与其坐等姚崇和宋璟被贬，还不如主动把他们抛出去。如果不这么做，不但姚崇和宋璟的宰相乌纱保不住，就连李隆基自己的储君之位恐怕也有失落的危险。

李隆基很清楚，在复杂多变、诡谲无常的政治博弈中，一路奏凯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有时候主动输掉一两张牌，会起到麻痹对手的作用。尤其是在自己实力不足，尚不能一口吃掉对方的时候，这么做就是明智和必要之举。

于是，就在太平公主大闹东宫的当天，李隆基便入宫去向睿宗请罪。他郑重表示：姚崇和宋璟这么做，显然是在离间他和姑母、兄长之间的感情，其用心不可谓不险恶，所以建议将他们处以极刑。

李隆基当然不想真的让姚、宋二人为此送命。

他之所以敢把话说得这么绝，是因为他料定父皇不可能对他们痛下杀手。

二月初九，亦即太平公主动身前往蒲州的数日之后，睿宗李旦下诏，把姚崇贬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刺史，宋璟贬为（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刺史；两天后，又撤销了将李成器和李守礼外放的命令。

综观景云二年发生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这场政治恶斗，双方各有损伤，谁也没有捞到便宜，更没有人取得绝对优势。

以太平公主在大唐帝国所享有的地位和威望而言，她是不可能被长久放逐的，更不可能轻易被淘汰出局。

太平公主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太子李隆基对此也心知肚明。

所以，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真正的对决，其实还没有开始。

这一切都还只是热身，或者说前戏。

真正的高潮还在后头。

太平公主的强力干政

姚崇和宋璟黯然离开相位之后，接替他们执掌朝政的两个宰相是韦安石和李日知。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政治立场不太明显的中间派，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执政手段相当温和，与姚、宋二人相去不啻霄壤。

随着温和派的上台和斜封官的大量复任，姚崇和宋璟辛苦改革的成果付诸东流，刚刚树立起来的赏善罚恶、举贤用能的新政风也荡然无存。“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资治通鉴》卷二一○）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一利起则一害生。想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就必然要得罪人；想要一团和气不得罪人，就只能以丧失原则，混淆是非为代价。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好事。

虽然韦安石和李日知这种人很对睿宗李旦的胃口，可李旦毕竟跟李显不一样。李显为了追求表面和谐可以牺牲一切，李旦钟情于和谐但却不敢泯灭是非。因此，对于韦、李二人上台后的表现，睿宗李旦并不满意；对当下“纲纪紊乱”的政治现实，李旦更是感到忧心和自责。

也许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李旦萌生了退意。

本来这顶帝王冠冕就是自己不想戴的，如今勉强戴下来的结果，既不能尽如人意，又不能无愧我心，那又何苦勉力支撑，自误误人呢？

景云二年四月的一天，睿宗李旦忽然召集三品以上大臣举行廷议，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引退之意。他说：“朕素怀澹泊，不以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资治通鉴》卷二一○）

这些当朝大员面面相觑，没有人敢表态。

当天的廷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事后，太子李隆基立刻派遣东宫大臣入宫，极力表示推辞之意，但是睿宗不许。

不久后，太平公主在蒲州得知消息，随即派人入京，授意一名心腹朝臣对睿宗说：“陛下春秋未高（年龄不大），刚刚获得天下苍生的拥戴和仰望，岂能忽然言及退位之事？”

李旦意识到退位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暂时按下不表。尽管如此，他还是随后下诏，宣布今后的政务都交给太子裁决，只有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和军中死刑的判处，才先由太子议处，然后向皇帝奏报。

很显然，睿宗退意已决，目前的做法无疑是在逐步把皇权过渡到太子手上。

对于父皇的让位之意，李隆基心里当然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不过他同时也一再对自己说——现在还远远不是高兴的时候。

原因很简单，太平公主人虽在蒲州，可她在长安的影响力一天也没有消失，甚至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如今朝中依旧遍布她的党羽，甚至连东宫也依旧充斥着她的耳目，比如时任太子詹事的崔湜、时任太子中允的薛昭素，皆太平之党。相形之下，李隆基这边的势力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姚崇和宋璟被贬出了朝廷，另一个心腹股肱刘幽求也刚刚被卸掉“参知机务”的宰相之权，罢为户部尚书。在此情况下，李隆基只能反复用两个词告诫自己：一个是“清醒”，一个是“低调”。

是的，一定要保持清醒和低调。

越是在即将企及权力巅峰的时刻，越是要注意自己的姿态，尤其要警惕自己的心态——千万不能让自己眼高于顶，脚跟虚浮。

随后的日子，李隆基频频上奏，要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大哥李成器。

他的要求当然被睿宗驳回了。

紧接着，李隆基又向睿宗陈情，请求把太平公主召还京师。

面对太子的谦逊之举和仁孝之心，睿宗李旦大为感动。当初一气之下将太平公主驱逐到蒲州，李旦一直心怀愧疚，如今既然是太子主动提议，他当然是欣然赞同了。

就这样，是年五月，在离开长安仅仅三个月后，太平公主就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她的脸上依旧悬挂着一副倨傲的笑容。

她的眼中依旧闪烁着一抹自负的光芒。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迟早会请我回来的！

年轻人，你自以为得计的东西，其实都是别人玩剩下的。所以，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也别得意得太早，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你要学的事也还很多！

看见李隆基带着一种毕恭毕敬的表情前来迎接时，太平公主在心里如是说。

是的，是我请您回来的，因为我了解父亲，所以我知道，这么做是最容易博得他好感的方式，也是最能够促使他主动传位的方式。

所以，敬爱的姑母，我必须请您回来！

看见太平公主带着一种得胜还朝的表情回到长安时，李隆基在心里如是说。

随着太平公主的回京，朝中的高层人事又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一轮新的震荡。

首先引起人们关注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殿中监窦怀贞的入相，二是御史大夫薛谦光的贬谪。两个当朝大员的一升一降，就发生在太平公主回朝不过十来天的时候。

前文说过，韦后一党覆灭时，号称“皇后阿奢”的窦怀贞“大义灭亲”，毅然砍下老婆的人头弃暗投明，虽因此免于一死，但终究没保住乌纱，被贬为濠州司马。窦怀贞不甘心就此败落，于是一转身又投靠了太平公主，旋即升任益州长史，没多久又回朝担任殿中监。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咸鱼翻身，窦怀贞真是喜出望外。他发誓，后半生一定要一心一意跟着太平走，生当太平的人，死当太平的鬼。所以，自从调回长安之后，窦怀贞每天下班都不是往家里走，而是屁颠屁颠地往太平公主的府上跑，又是磕头又是请安，极尽巴结奉承之能事。凡是太平公主交代的事情，他必定不辞劳苦，辛勤操办，从而极大地博得了太平公主的欢心。

有付出就有回报。这一年的五月，窦怀贞终于一跃而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赫然跻身宰相行列。几个月后又升任侍中，把持了门下省的大权。

由于尝到了依附公主的甜头，窦怀贞不仅猛拍太平公主的马屁，而且对其他得宠的公主也是阿谀谄媚唯恐不及。当时，睿宗李旦为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修建私人道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多数朝臣纷纷劝谏，唯独窦怀贞一人极力赞成，并且自告奋勇担任监工，天天往建筑工地跑，几乎很少在朝堂上办公。时人对他颇为不齿，纷纷耻笑他“前为皇后阿奢，今为公主邑司（管家）”（《资治通鉴》卷二一○）。

就在窦怀贞擢任御史大夫、荣升宰相的同时，原御史大夫薛谦光被罢职，贬为岐州刺史。薛谦光之所以被贬，是因为弹劾了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就是当初深受中宗和韦后宠幸的胡僧慧范。

和窦怀贞的经历类似，这个终日不务正业，既不诵经也不念佛，专以

巴结权贵为业的外国和尚，现在也投靠了太平公主。仗着太平公主的庇佑，他横行不法，大肆侵占民宅民田。薛谦光看不过眼，就搜集罪证对他发起弹劾。没想到太平公主马上跳了起来，直接去找睿宗告状，结果非但没有惩治慧范，反而倒打一耙，把薛谦光逐出了朝廷。

太平公主如此强力干政，一手遮天，不仅朝野上下人人侧目，就连睿宗李旦也深感无奈。其实李旦明明知道不能让这个骄横的妹妹为所欲为，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又总是不由自主地屈从和妥协。

李旦对自己性格上的这种软弱非常不满，可又无力改变。同时，他对朝政日非的现状也非常担忧，颇有澄清吏治之心，却照样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李旦对现任的这些宰相也不免心生怨言。他觉得这些人要么是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要么是明哲保身远离是非，总之都有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嫌疑，实在担不起辅弼之责。

景云二年十月的一天，李旦内心的不满忽然爆发。他御临承天门，同时召集现任的五位宰相，公开宣布将他们集体罢免。诏书称："政教多阙，水旱为灾，府库益竭，僚吏日滋。虽朕之薄德，亦辅佐非才。"然后一一宣读了对这些人的处理办法：韦安石为东都留守，郭元振为吏部尚书，窦怀贞为左御史大夫，李日知为户部尚书，张说为尚书左丞，"同日并罢政事"（《资治通鉴》卷二一○）。

集体罢相的这一幕发生后，满朝文武纷纷猜测，睿宗接下来恐怕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了。因为他登基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干过一件这么有爆发力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不禁感到眼前一亮。

然而，结果却再次让人们大失所望。

因为，此后有七个大臣先后拜相，可其中居然有五个出自太平公主门下。

这七个人分别是：刘幽求、魏知古、崔湜、陆象先、窦怀贞（重新入相）、岑曦、萧至忠。其中，除了刘幽求和魏知古（睿宗李旦的相王府旧部）之外，后面五人清一色是太平公主的党羽。

人们绝对没有想到——睿宗李旦为了澄清吏治而集体罢相，其结果反倒替太平一党入主中枢扫清了道路！

帝国高层的这番人事变动真是充满了讽刺意味。

仅以此事，人们便足以看出，李旦这辈子恐怕是要软弱到底了。因为

偶尔一两次爆发根本不足以让他变得强硬起来。说到底，帝国的朝政还是太平公主一个人说了算。

对于太平公主力挺的这五个人，睿宗李旦对其他四个都不敢有什么意见，唯独对其中一个的人品极感厌恶，所以一开始坚决不用。

这个人就是崔湜。

在唐隆政变的落马官员中，崔湜算是复出比较早的，因为他拥有一项别人没有的优势——美色。自从上官婉儿死后，这位惯以美色事人的稀世美男就又恋上了太平公主的床，所以很快就被公主安插到了东宫，担任太子詹事，专门潜伏在李隆基身边刺探情报。

说起来，崔湜干谍报工作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早在神龙年间，他就已经是一个出色的“双面间谍”，曾帮助武三思成功剪除了五大臣，所以现在太平公主让他重操旧业，也算是人尽其才，充分发挥其特长。

对于这么一个资深男宠兼职业间谍，睿宗当然有理由鄙视了。可是，在太平公主的软磨硬泡，甚至是“涕泣以请”之下，李旦最后还是心软了，不得不在任命诏书上签了字。

从景云二年五月太平公主回京，到次年上半年其党羽纷纷入主中枢，在不算太短的一段时间内，太子李隆基似乎销声匿迹了。在各种史料中，都看不到有关他言行的记载，只看见太平公主一帮人上蹿下跳。

李隆基在干什么？

面对太平公主的步步紧逼，难道他完全无动于衷，或者已经丧失还手之力了？

答案是否定的。

此时的李隆基正在默默蛰伏，冷眼旁观。

他之所以不采取任何动作，是因为他正在养精蓄锐。

是的。他在蓄势。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一飞冲天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他要用一种最完美的精神状态，去迎接生命中最辉煌的那个时刻……

玄宗登基：这个皇帝不好当

延和元年（公元712年）的七月，一颗耀眼的彗星从西方天际出现，赫然划破大唐帝国的长空，掠过轩辕星座，进入太微星座，止于大角星。

太平公主仰望苍穹，若有所思。

她即刻找来宫廷的占星师，说："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

占星师面露难色，欲言又止。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这预示着帝国的灾难！"太平公主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是一颗灾星，它的出现意味着皇上将被废黜，天下将有新君！你看见了没有？帝星和心前星都已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太子将要取代当今圣上，自立为天子！"

占星师低着头连声称是。他不知道，在这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间又掌控着帝国一切人事的太平公主面前，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应该入宫面圣，把上天的预警告诉皇上。"太平公主回过头来看着脸色苍白的占星师，说，"听见了吗？这是你的职责！"

占星师一刻也不敢拖延，当即进宫，把太平公主的观测结果一字不漏地禀告了睿宗李旦。

占星师说完后，一直在偷偷地注视皇帝的表情。

只见李旦忽然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色，接着长吁一口气，说："把皇位传给有才德之人，便可以避免帝国的灾难，朕已经决定了！"

把皇位传给有才德之人？

谁是有才德之人？

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听到占星师的回话之后，太平公主几乎当场晕厥。

她居然犯了一个如此低级的错误！

她以为四哥李旦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淡泊寡欲；她以为只要是人（特别是男人）都有追求权力的欲望，不可能主动放弃至高无上的皇权；她以为只要把太子篡位的天象向李旦示警，他一定会对李隆基采取整治手段；她以为如此一来自己就可以乘虚而入，废黜李隆基，另立一个懦弱的太子；她以为从此就可以把帝国权柄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可现在，所有的“以为”都错了！错得一塌糊涂，错得毫无道理，错得荒唐可笑，错得不可原谅！

太平公主做梦也不会想到，和李隆基处心积虑地斗了这么久，到头来她居然以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李旦下定了传位太子的决心，以至于亲手把李隆基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糊涂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太平公主不住地摇头苦笑，为自己的疏忽大意和弄巧成拙而懊悔不迭。

为了修正这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太平公主立刻入宫面见睿宗，同时调动她在朝中的所有势力，拼命向睿宗劝谏，请求他收回成命。

然而，决心已定的睿宗李旦根本不为所动。

他说：“中宗在位时，奸臣当道，天象屡变，朕当时就请求中宗在皇子中遴选才德兼备之人立为太子，以化解灾异。中宗为此大为不悦，朕忧心恐惧，数日不食。难道朕当时能劝谏别人，而今自己反而做不到吗？”

太平公主和她的党羽们面面相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完了。

大错已然铸成，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听到父皇李旦决定传位的消息时，李隆基的全身滚过了一阵痉挛般的战栗。

这是狂喜的痉挛。

这是激动的战栗。

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李隆基呆立了很长时间。

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道闪电。

李隆基觉得自己活了二十八年，就是在等待这一刻，等待这道幸福的闪电。

而今，它终于劈开苍穹，照彻了灰暗的大地！

而今，它终于带着上天的旨意，带着命运之神的嘱托，带着神圣的历史使命訇然降临，准确地击中了他，穿透了他，并且直抵他的心灵深处。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从明天起，做一个肩负使命的人。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那命中注定落在我肩上的使命，我将责无旁贷地去完成……

当然，无论内心如何翻江倒海，幸福万状，李隆基的脸上还是保持着往日的平静。

他知道，此刻还有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李隆基即刻入宫，匆匆来到睿宗李旦的寝殿，匍匐在父皇面前，带着十二分的真诚和惶恐说道："儿臣以微小的功劳就超越次序被立为太子，已感不能胜任，更没有想到陛下突然传大位于儿臣，不知何故？"

李旦说："帝国之所以转危为安，我之所以得到天下，都是你的力量。如今帝星有变，预示着社稷之灾，因此传位于你，希望能转祸为福，你不必疑惑！"

李隆基再三辞让。

李旦忽然用一种疲倦的声音说："朕知道你是孝子，可你何苦一定要等到朕死后才即位呢？"说完，李旦轻轻地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

既然父皇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李隆基还有什么可谦让的？

他眼中噙着泪水，微微哽咽着退出了寝殿。

这是十分复杂的泪水。

其中有三分矫情，三分感慨，三分激动。

还有一丝惶恐。

是的，尽管壮志在胸，豪情满怀，可一想到登基之后必然要与太平公主展开的生死对决，李隆基的内心还是不免缠绕着一丝惶恐。

次日，睿宗正式下诏传位太子。

太平公主看见事已至此，无由挽回，只好叮嘱睿宗说：“即便是传位，也仍须总揽大政，不宜彻底放权。”

很显然，太平公主的用意是想亡羊补牢。她希望睿宗仍然保留一部分权力，就是为了继续保持她对朝政的影响力。

在李旦看来，太平公主的提议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至少可以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三郎尽管能力过人，可毕竟还年轻，既然把他扶上了马，那就不妨再送他一程。于是，李旦随后便对李隆基说：“你一再辞让，或许是因为治理天下事关重大，希望朕仍兼顾其责吧？你放心，朕虽传位，又岂能忘记家国！日后的军国大事，朕自当兼顾。”

公元712年农历八月初三，太子李隆基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唐玄宗；同时尊睿宗李旦为太上皇，并宣布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命、重大刑案及帝国大政仍由太上皇裁决，其余由皇帝裁决。八月初七，朝廷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先天。

李隆基虽然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在形式上成了帝国最有权力的人，但事实上他的博弈力量非常弱，跟太平公主比完全处于劣势。

首先，在整个宰相班子中，只有一个刘幽求是他的人，还有一个魏知古是太上皇的人，其他则都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其次，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也仍然掌握在太上皇李旦手里，而根据李旦一贯的软弱性格，他的权力差不多就等于是太平公主的权力。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王到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李隆基的地位提升了N倍，可拥有的实力却并没有相应提升。换言之，李隆基或许曾经是一个异常强势的亲王，也曾经是一个实力与身份大致匹配的太子，可如今，他却只能算是一个实力与身份极不相称的弱势皇帝。

从历史上看，这种弱势皇帝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正所谓福薄位尊，力小任重，此乃万祸之源也。

李隆基当然不能算是一个“福薄”的人，可眼下他的“力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样的皇帝不好当。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满盘皆输。

在此情况下，李隆基就必须比以前多加十二分的小心。可是，李隆基万万没有料到，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往往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就在他当上皇帝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一起突发事件就把他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甚至差点让他成了短命天子……

始料未及的政治灾难

这起事件是刘幽求搞出来的。

李隆基这个皇帝的处境难堪，刘幽求这个皇帝心腹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唐隆政变的功臣，他原本以为政变成功后，自己一定可以平步青云，位极人臣，一劳永逸地成为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人物，然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事后他仅仅被授予中书舍人之职，虽然有“参知机务”之权，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三级宰相，地位远在三省、六部的正副长官和那些一二级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之下。

尽管刘幽求后来又逐步擢任尚书左丞、户部尚书等职，玄宗登基后他又进位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但这些职务仍然与他此前的心理预期差距甚大。

尤其让刘幽求愤愤不平的是，那些原本应该被砍头的韦后党羽不仅没有人头落地，反而在短暂的贬黜之后又纷纷回朝，甚至一个个入阁拜相，纷纷爬到了他的头上，这算什么事儿？（《旧唐书·刘幽求传》：“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

而眼下，太平一党由于不甘心让太子上台，正蠢蠢欲动，大有将李隆基重新废黜之势。万一他们的奸谋得逞，李隆基自然是没有好日子过了，而他刘幽求作为李隆基的头号心腹，又岂能活得舒坦？不要说“位极人臣”的梦想从此烟消云散，就连当下已经到手的权力和富贵恐怕也要变成黄粱一梦，甚至肩膀上的脑袋八成也得搬家。

刘幽求会甘心接受这样的结局吗？

当然不会。

刘幽求能够从一个小小的朝邑县尉变成今天的帝国宰辅，靠的就是不平则鸣的勇气和血性，靠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胆识和魄力。所以，为了实现自己位极人臣的梦想，同时为了帮助李隆基巩固刚刚到手的皇权，刘幽求毅然决定——再搞一场政变，彻底铲除太平一党！

搞政变当然需要军队。刘幽求很快就联络了一个禁军将领，并与他达成了共识。

这个人名叫张暐，时任右羽林将军，是玄宗李隆基的一个旧交。

此人出身于富豪之家，为人疏阔豪爽，好结交四海宾朋，尤喜射猎宴游。李隆基在潞州担任别驾时，张暐在附近的一个地方担任县令，两个人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张暐交游广阔，阅人无数，自然看得出这个年轻的亲王并非寻常之辈，于是倾力结交，跟李隆基打得火热，三天两头在一起聚宴饮酒，游玩打猎。[2]

有一次，张暐请了一个叫赵玄礼的著名乐人到他家里演出，赵玄礼带了自己的女儿同行。这个女孩长得美丽动人，而且能歌善舞，当李隆基受邀到张暐府上做客时，顿时一见倾心，很快就和这个女孩好上了，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的赵丽妃，生下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太子李瑛）。由于李隆基身份特殊，不便迎娶这个出身卑微的歌姬过门，于是张暐便替他金屋藏娇，让赵氏母子住在自己的府上。李隆基对此当然是感激不尽，从此更是将张暐视为知己。

唐隆政变爆发后，李隆基入主东宫，旋即把张暐召至身边，让他担任东宫官吏，不久又将其擢为侍御史，稍后又拜为御史中丞。李隆基登基后，为防范太平公主，特意将张暐调任右羽林将军，把一部分禁军兵权交给了他。

既为天子故旧，如今又手握禁军，可见张暐在玄宗心目中的分量非同一般。刘幽求正是看上了这点，才邀他入伙共谋大事。

作为凭借政变起家的人，刘幽求在这方面自然是轻车熟路的，于是他很快就和张暐制订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一切就绪后，张暐立刻去向玄宗请示，说："窦怀贞、崔湜、岑羲等人都是太平公主一手提拔的，如今他们利用宰相的权力日夜密谋，事态看来已经非常严重了。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不及早打算，一旦他们先发制人，陛下

和上皇恐怕都会有危险。臣以为，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将他们诛杀！刘幽求与臣已计划停当，臣既然职典禁兵，自当为陛下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如今，只等陛下一声号令，臣等即刻动手。”

李隆基知道，自己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了，所以迟早会有刀兵相见的一天。与其坐等这一天的来临，让自己陷入被动，还不如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尽管李隆基也知道目前的各种准备还不是很充分，但是多等一天，磨刀霍霍的太平公主势必会向自己逼近一步，危险就会加重一分，既然如此，那就只好放手一搏了！

正是居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张暐话音刚落，李隆基深以为然，当即表示赞同，并且仔细地叮嘱了一番，告诉他事关重大，务必严守秘密，千万不能走漏消息。

然而，让李隆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贯信任的这个张暐，居然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

他让张暐严守保密原则，可张暐竟然一转身就把消息泄露了。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张暐是在什么情况下走漏消息的，只说他把政变计划泄露给了一个叫邓光宾的侍御史。根据张暐的从政经历，这个邓光宾很可能是他过去的同事。而且从张暐疏阔豪爽，喜欢呼朋引伴、聚会饮酒的习性来看，他很可能是在某次私人聚会上，因酒酣耳热而口吐真言，把这件天大的事情给说漏嘴了。

当李隆基得知计划泄露时，震惊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

此事岂是儿戏？

多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就意味着多一分失败的可能！

太平公主的党羽遍布朝廷内外，天知道这个邓光宾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就算他坐在自己这一边，可天知道他还会把这个绝密计划透露给多少人？如果太平公主知道了这个计划，岂不是给她送上了一个废黜自己的借口？

呆立半晌之后，李隆基知道，他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举报。

是的，举报。只有主动把刘幽求和张暐交出去，才能洗脱干系，证明自己的清白。

尽管这两个人是自己一直倚重的左膀右臂，可到了这个时候，李隆基也不得不壮士断腕了。而且，恰恰是把自己的心腹交出去，才能让太上皇和太平公主相信自己，或者至少让他们无话可说。

对不住了，两位兄弟，朕当尽力保你们一条命，但朕实在是保不住你们的富贵和前程了。如果你们能够活到朕乾纲独断的那一天，朕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随后，李隆基立刻赶在太上皇和太平公主尚未得知消息之时，呈上了一道奏章给李旦，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刘、张二人企图动用武力对付太平公主的整个计划。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八月十九日，太上皇李旦下令，将刘幽求、张暐、邓光宾全部逮捕下狱。主管官员审讯后上奏："刘幽求等人离间皇上的骨肉亲情，按律当斩！"李隆基立刻出面向太上皇求情，说刘幽求在拥立睿宗即位的政变中立过大功，请免他一死。李旦最后接受了李隆基的请求，将斩刑改为流刑。

八月二十六日，刘幽求被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张暐流放峰州（今越南永安县），邓光宾流放绣州（今广西桂平市）。

当这个胎死腹中的政变计划被彻底曝光后，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无不恨得咬牙切齿。崔湜立即致信广州都督周利贞（就是当年被崔湜引荐给武三思，出面残杀五大臣的那个人），让他暗中除掉刘幽求。

然而，有道是吉人自有天相，刘幽求有一个好友叫王晙，当时正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他不知从什么渠道获知了崔湜的阴谋，便强行将刘幽求扣在了桂州，不让他前往贬所。

周利贞闻讯大怒，频频发出公函，要求王晙放人，同时崔湜也一再向王晙施压，但王晙始终置若罔闻。刘幽求担心连累朋友，说："你一意抗拒当权宰相，保护一个被流放的人，恐怕不仅不能保全我，而且还会连累你自己。"极力表示要前往封州。王晙不以为然地说："你犯的又不是连朋友都要跟你绝交的罪，我就算因此受牵连，也绝无怨恨。"最后还是坚持不肯放行，刘幽求就此逃过一死。

这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未遂政变对李隆基而言无疑是一场始料未及的政治灾难，也是他自出道以来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尽管他万分惊险地躲过了被废黜的命运，可却被迫自毁长城，亲手斩断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使自己原本就很有限的势力再次受到了严重削

弱。此外，这起打草惊蛇的事件也等于过早地暴露了李隆基的政治意图，让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的警惕心得到了空前加强，甚至促使他们加快了全面反击的步伐。

如果说，此前太平公主更多的只是考虑如何废黜李隆基，还并不打算杀他的话，那么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她无疑已经下定了置李隆基于死地的决心。

所有这一切，无不让李隆基变得十分被动。

在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即将展开的巅峰对决中，他未及出手已经先丢一分，明显处于极端不利的态势。相形之下，太平公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赢面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先天元年深秋，望着太极宫中无凭无依随风飘舞的片片落叶，李隆基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萧瑟和苍凉。

秋天的大风猛然掠过脸庞，让他感到了一丝寒意。

天冷了。

一个肃杀的季节就要来了。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从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到当上太子，再到登基为帝，他身边的主要谋臣先后有刘幽求、崔日用、姚崇、宋璟、张说、郭元振等人。这些人都曾经入阁拜相，在李隆基走向皇帝宝座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为其最终登上权力巅峰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然而，也是在这一路上，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政治博弈越演越烈，于是这些元勋功臣一个个相继落马，全部被罢去相职，多数还被逐出了朝廷。

其中，崔日用最早被贬为荆州长史；接着是姚崇和宋璟，被贬为地方刺史；然后是张说和郭元振，张被罢为尚书左丞，贬至东都，郭被罢为吏部尚书，后转兵部尚书；最后是刘幽求，下场最为不堪，被剥夺一切职务，披枷戴锁流放岭南。

在太平一党看来，当这些人被一个个清除出权力中枢之后，李隆基就只能算是一个光杆司令了。

然而，事实并不像太平一党所想象的那样。

李隆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上述那些众所周知的谋臣之外，李隆基身边一直隐藏着一个得力心腹，只因此人入仕很晚，资历较浅，而且刻意表现得非常低调，所以并不为人所熟知，自然也就没有引起太平一党的警觉。

这个人就是时任中书侍郎的王琚。

跟朝中一般的官员比起来，王琚的人生显得颇有传奇色彩。

他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人，少时即为孤儿，但是人很聪明，富有才略，喜欢术数炼丹之学。他有一个叔父在武周时期官至凤阁侍郎，王琚估计是得到了这个叔父的照顾和荐引，所以在神龙初年进入东都，与中宗驸马王同皎交往，颇受器重，渐渐成了王同皎的密友。

当时，武三思擅权乱政，极力打压异己，尤其是对五大臣进行了残酷的打击迫害。作为神龙政变的功臣之一，王同皎自然是感到义愤填膺，故时常与王琚等一帮好友在私下里议论朝政，甚至谈起了刺杀武三思的计划。王琚闻言，欣表赞同。但是，让王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王同皎就被宋之问兄弟出卖了，旋即被斩首，家产抄没。王琚担心受到株连，赶紧逃亡到了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从此隐姓埋名，在一个富商家里做了教书先生。

可王琚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其言谈举止自然与常人不同。那个富商观察了他一段时间，知道此人来历不凡，日后很可能会发达，于是便将女儿嫁给了他，并且送给了他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

在富商家里当了几年上门女婿后，帝国政坛再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隆政变爆发，睿宗李旦登基，临淄王李隆基入主东宫，原来的朝廷高官纷纷落马，帝国朝堂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洗牌。王琚意识到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立刻决定入朝求官。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告诉了老丈人。老丈人大喜过望，马上给了他一笔丰厚的盘缠，让他即刻启程赴京。

王琚来到长安的时候，太子李隆基正与太平公主斗得不可开交。王琚对当时的政局作了一番深入的分析之后，决定把宝押在太子身上。

然而，此时的王琚只是一介布衣，他凭什么攀上堂堂的皇太子呢？不要说想获得太子垂青，就算见上太子一面，恐怕也是难如登天。

不过王琚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要是没有一个够分量的人引荐，自己是不可能鲤鱼跳龙门的。

王琚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的人。

他就是宝昌寺的和尚普润。

普润曾在唐隆政变中立功，此时已被朝廷授予三品待遇，享有自由出入东宫之权，是一个政治地位非常高的和尚，只要有他的引荐，王琚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平步青云。

随后，王琚利用自己从江都带来的那笔盘缠开路，很快就成了宝昌寺的大施主，因而自然就成了方丈普润的常客。

当然，钱不是万能的。它也许能帮你叩开机遇的大门，但最终能否登堂入室，还要看你的能力和本事。但因为王琚对阴阳术数极为精通，在与普润的交往中，“说以天时人事，历然可观”（《旧唐书·王琚传》），所以很快就被普润视为高人，并引为知己。不久，普润就向太子郑重推荐了王琚。李隆基听说后，虽然表现出了一副很惊异的样子，但内心对这种阴阳术数的小道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因此他没有兴趣见王琚，只是看在普润的面子上，赏给了王琚一个诸暨主簿（相当于县委办主任）的小官。

王琚满怀信心地在客栈中等了好多天，最后没有等到太子约见的邀请，只接到了一张毫无诱惑力的任命状。

诸暨主簿？

看着那张轻飘飘的任命状，王琚不禁哑然失笑。

如果我王琚是这么容易打发的，那我当初就不会来了。

如果是一般人，走到这一步基本上就没辙了。要么带着满腹牢骚到诸暨去上任，要么怀着满腔失落乖乖地打道回府。总之，想要依靠一点小聪明在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基本上是白日做梦。

然而，人生是很奇妙的。有时候幸运之神的降临，往往只是因为你多看了一眼，多想了一下，多走了一步。换言之，在人生的某一些特殊时刻，成功与失败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此刻，当王琚再次翻看着手中的任命状时，心中忽然电光一闪，原本毫无希望的人生刹那间云开雾散，柳暗花明。

就在这个瞬间，王琚感觉自己手中握着的，已经不再是一份苍白的任命状，而是一张金光闪闪的邀请函。

王琚立刻站起身来，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客栈。

他大踏步向东宫走去，同时也大踏步向他后半生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走去。

第一眼见到王琚的时候，东宫的接待宦官就感觉极度不爽。因为平常那些得了官职前来向太子拜谢的人，一个个都是满脸堆笑，毕恭毕敬的，除了不停地点头作揖之外，还一个劲地塞红包。可眼前这个不知从哪个山沟里跑出来的愣头青，非但一点表示都没有，还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牛皮哄哄的模样，真他娘的不知天高地厚！看太子赏给他的官儿，也就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诸暨主簿”，要是封他一个刺史，这小子还不把尾巴翘到东宫的屋顶上？

宦官不情不愿地把王琚领到了太子所在的内殿，然后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请先生自重，殿下就在帘内。”

没想到宦官话音未落，王琚忽然两眼一翻，提着嗓门说：“谁是殿下？当今天下不是只有太平公主一人吗？”

宦官一听，差一点没背过气去。

见过无知和狂妄的，就是没见过如此无知加狂妄的！

宦官刚想发作，就听见太子的声音从帘内传了出来，传王琚即刻上殿进见。宦官无奈，只好忍着怒气掀开帘子，看着王琚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心里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其实宦官并不知道，王琚是故意做这一番表演的。

假如嫌“诸暨主簿”的官小而不来拜谢，王琚就绝对没有机会见到太子；而假如王琚不用这种另类的方式引起太子注意，太子也绝对没有兴趣见他。所以，同样一张任命状，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一根弃之可惜，嚼之无味的鸡肋，可在王琚看来，却是一块可以改变命运的敲门砖。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

说到底，王琚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能耐。他只不过是在即将放弃的最后一个瞬间，比别人多看了一眼，多想了一下，多走了一步。

仅此而已。

当王琚走进内殿的时候，李隆基迅速打量了他一下，然后示意他在下首落座。

李隆基知道，这个人今天绝不是来拜谢的。

王琚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往榻上一坐，果然只字不提拜谢一事，而是直直地盯着太子的眼睛，说："殿下，您虽然铲除凶顽，为帝国立下大功，可您是否知道，您现在的处境已经危在旦夕？"

李隆基深长地瞥了王琚一眼。

尽管他心里对这个不知轻重，一再口出狂言的人也有几分反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狂人"也让李隆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循规蹈矩之辈遍地都是，而特立独行之人则只能间或一睹。尤其对李隆基来说，每天眼中所见多是谄媚的笑脸，耳中所听多为阿谀的言辞，他早已麻木不堪，厌倦已极了。所以，冷不丁冒出一个如此生猛的人，李隆基自然会感到眼前一亮。先不说这个家伙肚子里有没有料，光凭这份与众不同的勇气，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了。

李隆基饶有兴味地迎着王琚的目光，缓缓地说："不知先生有何见教，寡人愿闻其详。"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在长安待了这么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金钱和心思，王琚终于等到了这么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

他强抑着心头的激动和喜悦，用一种不紧不慢的语气说道："韦庶人智识浅短，叛逆弑君，人心不服，所以殿下杀她易如反掌；可太平公主却是则天皇后的女儿，为人凶狡无比，且屡立大功，朝中大臣多为她的党羽，如此种种，令微臣不得不替殿下感到忧惧啊！"

很显然，这番话很多人会讲，但是他们却不敢讲或者不愿意讲。如今，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居然敢在第一次与李隆基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一切和盘托出，这无疑是需要一定的智慧和胆识的。李隆基猛然意识到——倘若真的把这个叫王琚的人打发到诸暨去当小吏，那无疑是一种损失。值此用人之际，如果把这个人留在身边，日后定然会大有用处。

思虑及此，李隆基的脸上迅速露出一个真诚而亲切的笑容："来，先

生，请上坐！”一边说一边立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延请王琚同榻而坐。接下来的对话就完全不必客套了。虽然双方的身份和地位相距悬殊，但是却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相知恨晚之感。

就在同一张坐榻上，王琚和太子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当王琚彻底剖析了当前的局势，并且发自内心地表明了他对太子处境的深切忧思之后，李隆基的眼中顿时泪光闪动。

应该说，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笼络人心的作秀和矫情。因为自从成为万众瞩目的帝国储君以来，李隆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所有人的关注，同时还要受到太平公主耳目的监视，长时间的压抑已经让他不堪重负，所以，当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突然像真正的朋友一样和他坦诚相见时，李隆基内心潜藏已久的痛苦、压力和担忧自然会不可遏止地宣泄出来。

李隆基毫不掩饰地长叹道：“皇上仁孝，如今同胞手足又只剩下太平公主一人，要对付她，就必然要伤害皇上的感情；不对付她，祸患却又一天天加深。身为人臣，身为人子，寡人深感焦虑，却又计无可出啊……”

“天子的孝跟平民不同，当以宗庙社稷为重！”王琚斩钉截铁地说，“汉朝时的盖长公主是汉昭帝的姐姐，一手把昭帝带大，一旦犯罪，照样诛杀！有志于担当天下的人，又岂能事事顾全小节？”

李隆基沉吟良久，紧蹙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接着，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笑着问王琚：“先生会不会什么小把戏，可以掩藏行迹，从此长久留在寡人身边？”

王琚心领神会地笑了：“有。微臣炼丹制药的本事，不逊于方士；插科打诨的能耐，不亚于优伶。”

二人对视一眼，同时发出朗声大笑。

很明显，李隆基的用意是要让王琚以东宫“弄臣”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以此消除政敌的警惕。

事后来看，李隆基此举可谓深谋远虑。

因为刘幽求事件后，当太平公主自以为已经把李隆基身边的得力干将都剪除殆尽的时候，她并没有料到，李隆基身边居然还藏着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狠角儿。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王琚完成了他人生中最漂亮的一次华丽的转身，从默默无闻的一介布衣，一跃成为皇太子李隆基身边最重要的亲信之一。

面见太子次日，王琚就被任命为东宫内奉官兼崇文馆学士，不久又擢升为太子舍人（东宫副总管）。李隆基即位后，王琚随之青云直上，被授予中书侍郎之职，一举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从先天元年秋天到第二年夏天，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忽然变得风平浪静，玄宗和太平公主这两大政治势力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仿佛一时间都收起了龇牙咧嘴的姿态，不约而同地变成了善男信女。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假象。当你周围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闷、黏稠，甚至凝滞不动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生活常识，同时，这也是一个政治常识。

在这个暑气蒸腾、燠热难当的夏天里，时任中书侍郎的王琚就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准确地说，他嗅到了变天的气息。

通过一段时间以来对各种情报的侦察、搜集、分析和判断，王琚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在这种貌似平静的表象之下，一场旨在推翻李隆基，进而另立天子的军事政变，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之中了。

因为据可靠情报显示，太平公主已经收买了禁军的两位高级将领，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右羽林将军李慈。

六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当王琚再次接到耳目奏报，说常、李二人最近出入太平府邸的次数异常频繁时，王琚立刻意识到太平一党已经磨刀霍霍，随时有可能动手。

所以，无论如何必须说服天子先下手为强。

他随即吩咐下人备车，连夜进入了太极宫。

“事迫矣，不可不速发！”（《资治通鉴》卷二一○）这是王琚见到李隆基时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他深夜离宫时反复强调的最后一句话。

然而，令王琚百思不解并且万分忧虑的是——自始至终，天子李隆基都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

他到底在想什么？

形势已经如此紧迫，天子到底还在顾虑什么？

巅峰对决

是的，李隆基还在顾虑。因为他缺乏自信。这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缺乏自信。原因来自两个方面——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从主观上来讲，是因为李隆基现在的得失心比以前重了，重得太多了。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位子决定思维，身份地位的巨大变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李隆基的心态。发动唐隆政变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亲王，挑战的对象则是临朝摄政、大权独揽的韦后，这就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又像是一场赔率为1:N的赌博，赢了就能得到整个天下，输了也不过是赔上性命一条，所以李隆基才会无所顾忌，拼死一搏。

而现在的情形则与从前判若天渊。如今，李隆基已经是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至少在形式上，他已经拥有了整个天下，现在让他押上一切跟太平公主赌，赢了得不到更多，输了则会丧失一切。在此情况下，李隆基当然会不可避免地生出投鼠忌器，患得患失之心。

以上是主观原因，至于客观原因，则是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强大了。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巅峰对决中，太平公主麾下可谓是兵强马壮。除了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检校中书令崔湜、中书侍郎（兼同平章事）陆象先这五个宰相之外，还有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晙、政治和尚惠范等等。正所谓“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资治通鉴》卷二一○）

相形之下，李隆基这边的阵容就寒碜多了。宰相班子中，只有一个兵部尚书郭元振（这一年六月刚刚复相）是他的人，其他亲信是：中书侍郎王琚、岐王李范、薛王李业（李隆基即位后，两个弟弟主动把名字中的“隆”字去掉了）、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数虽然也不少，但都是四品以下的小官吏，无论是手中掌握的职权，还是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太平一党显然都没有可比性。

职是之故，李隆基不能不顾虑重重。

尤其是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刘幽求事件，至今还让他心有余悸。那次失败，李隆基还可以通过丢卒保帅而及时化解危险，保住皇位，这一次要是再失手，就不可能再有什么转圜的余地了，等待他的只能是废黜和杀头的命运。

就是在上述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李隆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彷徨之中。

面对天子一反常态，优柔寡断的表现，王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绞尽脑汁地想了好几天，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送给人在东都的尚书左丞张说，一封送给荆州长史崔日用。他在信中详细说明了当前朝中的严峻形势，并敦促张、崔二人劝天子赶紧动手，切不可坐以待毙。

张说接到王琚的信后，随即摘下身上的佩刀，命人赶赴京师，把刀呈给了天子。

除了这把刀之外，他一个字也没有说。但是李隆基很清楚，张说是在劝他做两件事：一、斩断亲情的束缚；二、以武力平定太平公主。

差不多与此同时，崔日用也火速从荆州赶回了长安。他即刻入宫面见李隆基，忧心忡忡地说："太平公主随时可能发动政变，陛下您还等什么？您以前只是太子，要想摆平她就必须依靠计谋和武力，如今既已贵为天子，只要下一道诏书，还有谁敢不从？再拖延下去，万一逆党抢先动手，悔之何及啊！"

应该说，张说和崔日用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为李隆基打气，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的信心。可崔日用的话却说得太过轻巧，要想摆平太平公主，岂是一道诏书就能办到的？当初把她放逐到了蒲州，她不是照样有能力遥控朝政吗？所以，除非不动手，一旦动手，就必须像张说所暗示的那样，用武力把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全部歼灭，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然而，诛杀自己的亲姑母，毕竟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

问题倒不是在于李隆基直到此刻还在挂念姑侄亲情（早在唐隆政变后，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亲情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而是一旦对太平公主动武，太上皇李旦会作何反应？李隆基又将如何处理与父亲李旦的关系？如今李旦虽然已经退位，可军国大权仍然在他手里，假

如他出手阻止李隆基，那李隆基该怎么办？

因此，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果要对太平公主采取行动，就必然要把太上皇李旦考虑在内。换言之，万一李旦成为李隆基巩固皇权的障碍，李隆基势必也要对他采取非常手段。倘若真走到这一步，父子之间岂不是要反目成仇，刀兵相见？

这才是李隆基最大的顾虑。

于是李隆基坦言道："贤卿所言极是，可朕还是担心惊动了太上皇。"（《资治通鉴》卷二一○）

崔日用不假思索地说："天子之孝，在于安定天下。倘若奸人得志，则社稷崩溃形同废墟，到时候又要到哪里去尽孝？请陛下不要再犹豫了，只要先掌握禁军，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捕逆党，臣相信，一定不会惊动上皇。"

崔日用这番建议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新鲜之处，其实里头包含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夺取禁军兵权。进而言之，崔日用其实是在暗示李隆基——只要在捕杀太平一党的同时分兵控制太上皇，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除此之外，李隆基还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了。所以他不得不下定了动手的决心。

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李隆基没有让崔日用回荆州，而是当天就任命他为吏部侍郎，把他留在了身边。

既然决心已定，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行动了。为了做到知己知彼，李隆基决定策反太平公主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以便掌握太平一党的具体动向和谋划内容。

李隆基锁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崔湜。

之所以选择他，原因有三：

一、崔湜虽然是太平公主的人，但他毕竟曾经担任李隆基的东宫官吏，所以在场面上，李隆基和他还是颇有往来的。根据《旧唐书·崔湜传》记载，玄宗在身为太子期间，曾"数幸其第，恩意甚密"。由此可见，李隆基可能很早就想拉拢崔湜，否则也不会屡屡到他家做客，更不会有什么"恩意甚密"之说了；

二、崔湜有一个弟弟叫崔涤，非但和崔湜不是一个阵营，反而是李隆基这边的人。所以，李隆基想利用这层关系，让崔涤做通崔湜的思想工作；

三、众所周知，崔湜不仅是太平的死党，更是她的情人。有这种特殊身份，意味着崔湜就比窦怀贞、萧至忠等人更能获得太平公主的信任，从而就能掌握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和信息。一旦将他策反，太平公主在李隆基面前将再无任何秘密可言。

所以，在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这场巅峰对决中，崔湜就是一块对双方都至关重要的筹码。假如他反水，太平一党基本上就输定了。

然而，让李隆基大失所望的是——崔湜根本不买他的账。

当李隆基以皇帝之尊暗中向崔湜发出邀请的时候，崔湜表面上并没有拒绝，而是乖乖入宫来了。觐见李隆基之前，崔涤还特意把崔湜拉到一边，郑重其事地叮嘱他："主上若有所问，不得有所隐也。"（《旧唐书·崔湜传》）但尽管如此，崔湜最终还是拒绝了李隆基的笼络。无论李隆基如何循循善诱，旁敲侧击，崔湜始终不为所动，三缄其口，搞得李隆基十分尴尬，最后只好悻悻作罢。

就在李隆基积极行动起来的同时，太平一党也加紧了密谋。

太平公主虽然号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可她的阵营也并非铁板一块。就在她召集五位宰相商议废黜皇帝的计划时，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四人皆踊跃发言，献计献策，唯独陆象先一直缄默不语，最后轮到他发言时，居然态度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其实太平公主很早就知道，这个陆象先和她根本不是一条心。此人在朝中，历来以"清净寡欲，言论高远"著称，从不介入党派斗争。他之所以能被太平公主举荐入相，是因为与崔湜私交不错，所以沾了崔湜的光。太平公主起初坚决不同意提拔他，无奈崔湜力荐，甚至以同进同退相要挟，太平公主才勉强同意。

所以太平公主很清楚，这个自命清高的家伙不可能为她所用。如今一碰到重要关头，这家伙果然就站出来唱反调了。

太平公主大为不悦地说："当初三郎超越次序登基，就已经是废长立少，不合礼法了，其后又不顾姑侄之情，授意刘幽求和张暐对我下手，这又是重大的失德行为。如此种种，何故不能废黜？"

陆象先不顾崔湜频频抛来的眼色，仍然梗着脖子说："既然因功而

立，自然要因罪而废。公主认为他失德，在下却不认为他有罪，所以，恕在下不能从命。”

太平公主勃然大怒，当即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有了这次教训，太平公主就学乖了，后来再次召集亲信密谋时，她便彻底抛开了陆象先，于是会议的效率大为提高，没几天就制定了两个对付李隆基的行动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派人暗杀。

太平公主很早就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卧底，其中就有一个姓元的宫女。平时李隆基经常让御膳房熬制一种叫“赤箭粉”[3]的补药，宫女元氏就是专门负责进奉汤药的。太平一党决定充分利用这条内线，让元氏在汤药中下毒，鸩杀李隆基。

这个方案由崔湜提供，并且由他监督执行，假如行动失败，立即执行第二个方案：发动政变。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由常元楷和李慈率领羽林军突入武德殿（玄宗举行朝会、批阅奏章的地方），诛杀李隆基；另一路由窦、岑、萧、崔四宰相率卫兵在南衙（中央各机关所在地）响应，控制帝国的政治中枢。

史书没有记载太平一党是否执行了第一个方案，但是根据事后的相关记载（元氏被法司逮捕审讯，并供认崔湜为主谋）来看，不管是未及行动还是行动失败，总之第一方案没有成功，所以太平公主决定执行第二方案。

政变时间定在先天二年七月初四。

太平公主自以为她的计划天衣无缝，可她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切居然被另一个宰相魏知古全盘获悉了。而更让太平公主无法预料的是——这个原本在她和李隆基之间保持中立的人物，居然又在这生死攸关的重大时刻倒向了李隆基……

七月初一，宰相魏知古突然入宫，把太平一党准备于本月初四发动政变的消息告知了李隆基。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七月初三，李隆基向亲信发出了行动指令。首先，他命龙武将军王毛仲率三百余名万骑卫士埋伏在虔化门，同时发出一道敕书，紧急召见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右羽林将军李慈。这两个禁军将领根本没有料

到皇帝已经全盘掌握了他们的政变计划，所以毫无防备地进入太极宫，刚刚走到虔化门，立刻被埋伏在此的王毛仲砍杀。

解决掉这两个人，禁军就完全落入李隆基的手中了，行动已经成功了一半。随后，李隆基亲自出马，与王琚、王毛仲等十余个亲信率兵从武德殿一路冲进朝堂，迅速捕杀了萧至忠、岑羲、贾膺福、李猷等人。士兵逮捕崔湜后，没有当场砍杀，而是奉命将他关押了起来。太平一党中，要数“皇后阿奢”窦怀贞的反应最为敏捷，一见情形不妙，立刻抱头鼠窜，但是没跑多远就被追兵追上，窦怀贞走投无路，只好投水而死。

在铲除太平一党的同时，李隆基命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另率一路人马，直奔太上皇寝殿。

听到事变的消息时，李旦大惊失色，赶紧在几个宦官的簇拥下逃离寝殿，慌慌张张地跑上了承天门楼。李旦前脚刚刚上楼，郭元振后脚就率兵追到了。李旦满心以为郭元振是来护驾的，可还没等他探出城楼喊一些鼓励的话，郭元振就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上了城楼。李旦看见郭元振径直走到他面前，然后面无表情地跪地启奏，说：“皇上奉太上皇诰命，诛杀窦怀贞等图谋作乱的逆党，今天只是遵照诰命执行，没有其他意图。”

诰命？

自己什么时候发布诛杀宰相的诰命了？

李旦脸上写满了惊愕，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这是政变，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三郎的目的就是要铲除太平，同时迫使他李旦彻底放权！

尽管这场政变的爆发让李旦猝不及防，但是今天发生的一切其实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是的，自从被三郎和太平拥立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早已注定了。

惊魂未定的李旦来不及做更多思考，马上在郭元振的“保护”之下发布了一道诰命，宣布窦怀贞等人阴谋作乱，罪大恶极，已被皇帝依法诛杀；同时宣布大赦天下，唯参与逆乱的亲党一概不赦。

七月初四，亦即事变次日，李旦颁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诰命，宣布自即日起，“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

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同日，李旦由太极殿移居百福殿，从此淡出权力中心，也彻底淡出了满朝文武和帝国臣民的视线。

太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会败得这么惨！

她原本以为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李隆基也不过是她砧板上的鱼肉；她原本以为帝国的最高权力已经唾手可得，她马上就能拥有一个像母亲武曌那样的辉煌人生……可是，残酷的现实却一举粉碎了她的所有梦想。

此时此刻，她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镇国太平公主，不再是那个貌似强大的势力集团的领袖，而是一个孤家寡人，一个输光了家当的赌徒，一个被命运之神一脚踢开的弃妇！

太平公主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

她仓皇逃出长安，躲进了终南山的一座寺院，在那里整整躲了三天三夜。

她满怀困惑、满腹冤屈、满心愤恨地向佛菩萨发出质问，发出呼告，发出祈求，可佛菩萨始终庄严而慈悲地沉默着。

第三天的傍晚，夕阳将落未落之际，太平公主登上了寺院旁边的一座悬崖。

她面朝长安良久伫立。

猎猎山风鼓起她的衣袂裙裾，让她远远看去就像是一面孤独而绝望的旗帜。

兀立在万仞绝壁之上，置身于寥廓苍茫的天地之间，太平公主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和渺小……

直到最后一只归巢的倦鸟从她头顶缓缓掠过，直到天边的残阳燃尽了它的最后一点亮光，太平公主才木然转身，默默地向来路走去。

次日，太平公主回到长安。一迈进府门，皇帝的赐死诏书就到了。

这就是结局吗？

是的，这就是结局。

当太平公主把头伸进白绢的一刹那，她仿佛看见母亲武曌正在不远处对她微笑。母亲的身上沐浴着一片圣洁的光芒。这片光芒是如此安详而又如此温暖，以致太平公主感觉自己很快就在这片白光中彻底融化了……

太平公主自缢身亡的当天，除薛崇简外，其他几个儿子，连同所有党羽全部被朝廷诛杀。薛崇简虽是太平公主长子，但他的政治队列不在母亲那边，且因数次劝谏母亲不要与皇帝为敌而遭到鞭挞，所以官职爵位仍然保留，并赐姓李。

随后，朝廷抄没太平公主的家产，发现奇珍异宝堆积如山，丝毫不亚于皇宫。此外，“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收之数年不尽”（《资治通鉴》卷二一○）。投水而死的窦怀贞仍遭“戮尸”之刑，并被改姓为“毒”；参与谋反的宗室亲王李晋被判斩首，改姓为“厉”。

太平一党中，唯独被赦免死罪的是太平的两个男宠崔湜和卢藏用，二人分别被流放窦州（今广东信宜市）和泷州（今广东罗定市）。

崔湜暗自庆幸自己福大命大，居然又一次从灭顶之灾中死里逃生。尽管他颇为后悔当初没有接受皇帝的笼络，以致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但是相对于窦怀贞、萧至忠等人而言，崔湜还是有理由感到庆幸——毕竟皇帝对他网开一面，留了他一条命。

仅凭这一点，崔湜就相信自己很快便会东山再起。

他慢慢悠悠地走上了贬谪之路，信心满满地期待着再次被朝廷召回的消息。

可崔湜错了。

这一次，他不会再那么走运了。就在他被贬出长安不久，宫女元氏在有司的审讯下招供，称崔湜就是企图鸩杀皇帝的首谋。有司立即上奏，李隆基勃然大怒，马上追发了一道诏书，将刚刚走到荆州的崔湜就地赐死。

紧随这场流血政变之后，李隆基又着手对朝廷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肃——文武百官中，凡是曾获太平公主青睐者皆遭贬降，而原本受她排挤的则全部得到升迁，整个换血行动一直持续到这年年底仍然没有停止。（《资治通鉴》卷二一○）

经过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经过一轮又一轮鲜血和死亡的洗礼，一个妇人干政、皇权旁落的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如果从公元

664年武曌垂帘听政算起，到公元713年太平公主覆灭为止，大唐帝国在这个“牝鸡司晨”的巨大梦魇中已经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半个世纪之久。尽管这段混乱无序、阴盛阳衰的历史并未导致帝国走向没落，但是中枢政治的频繁动荡却使这个原本生机勃勃的王朝一度丧失了动力和方向，只能在混沌和迷茫中徘徊蹉跌，踯躅不前……

如今，无论是病弱的高宗李治，昏聩的中宗李显，淡泊的睿宗李旦，还是铁腕无情的武曌，野心勃勃的韦后，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都已经从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一消失，唯独剩下一个天赋异禀、雄才大略的年轻帝王，正踌躇满志地屹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

此时，年仅二十九岁的唐玄宗李隆基相信，在他的引领下，这个历经沧桑的百年帝国必将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迎来新时代的熠熠曙光！

是的，李隆基即将开创的这个时代，将是大唐三百年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一页，也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心驰神往，追慕不已的一个黄金时代。

它的名字叫开元。

[1]　李守礼是李贤的嫡长子，在高宗的所有孙子中排行最大。也就是说，他和李成器都比李隆基更有资格入继大统，所以客观上都对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

[2]　《旧唐书·张暐传》：“会临淄王为潞州别驾，暐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

[3]　赤箭，草名，又名“合离草”，根部碾碎成粉，可作药用，又称“天麻”。

第八章 走向开元盛世

飞鸟尽，良弓藏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李隆基以雷霆手段铲除太平集团，从太上皇李旦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成为名副其实乾纲独断的大唐天子，从此开始亲政。十一月，李隆基接受群臣敬献的尊号，称“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初一，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开元。

自此，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然而，大权独揽的李隆基并不能从此高枕无忧。

因为他是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皇帝，所以他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威力，也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危害。说白了，既然他可以通过权谋和武力从别人手中攫取权力，别人凭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手段从他手中夺取政权呢？

尤其让李隆基感到忐忑不安的是——曾经帮他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胜利的这批功臣，一个个都是搞政变的行家里手。换句话说，这些政变功臣当初表现出的能力越强，手段越是高明，如今对李隆基构成的潜在威胁就越大，让他感到的担忧和恐惧就越深……

虽然在铲除太平，坐稳皇位后，李隆基给予了这些功臣极其丰厚的赏赐，无论是官职、爵位，还是田园宅邸、金银绸缎，李隆基都毫不吝啬，慷慨赐予，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谁又敢保证，他们能够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一切，而不会觊觎更多，贪求更多呢？

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反正李隆基绝不敢对此掉以轻心。

因此，革命虽已成功，但李隆基仍须努力，努力肃清有可能威胁皇权的所有因素。

头一个被李隆基“鸟尽弓藏”的功臣，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

因为手握兵权，所以他首当其冲。

在七月初三的政变中，郭元振因率兵“侍卫”（实则软禁）太上皇有功，事后进封代国公，赐食邑四百户，赏绸缎一千匹。这当然是极大的荣宠。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郭元振一定可以在玄宗一朝荣宠一生，富贵终老，包括郭元振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

短短三个月后，他一生的荣宠就都化成了梦幻泡影……

这一年十月十三日，玄宗李隆基在骊山（今陕西临潼县东南）脚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集结的部队多达二十万人。平原上大风猎猎，旌旗招展，军阵绵延五十余里。李隆基一身戎装，御驾亲临，文武百官随驾扈从。整个阅兵式规模空前，场面极为壮观。

作为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自然是这场大阅兵的总指挥，同时也是最高责任人。

阅兵式开始后，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唯独观礼台上策马而立的天子一直眉头紧蹙，脸色阴沉。

没有人注意到天子的脸色，当然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阅兵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天子李隆基突然发出一声怒喝，命人即刻逮捕郭元振。随行百官尽皆失色，目瞪口呆，不知道天子这是唱的哪一出。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郭元振已经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帅旗下。李隆基二话不说，当即以“军容不整”为由，下令将郭元振就地斩首。

面对这从天而降的杀头罪名，郭元振惊骇莫名，吓得说不出一句话。和他同样感到震骇的，还有与他同为功臣的刘幽求和张说。先天政变后，刘幽求已入朝担任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徐国公；张说也已官任中书令，封燕国公。此时此刻，虽然他们和在场众人一样都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且一时也摸不清天子突然变脸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无论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还是作为与郭元振有着相同背景的功臣元勋，刘、张二人都没有理由对此保持缄默。于是天子话音刚落，刘幽求和张说便双双跪倒在天子马前，高声谏言：“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资治通鉴》卷二一○）

刘、张二人说郭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仅是指他在先天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指他从政多年为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早在武曌当政时期，郭元振就已经是朝野皆知的一位名将，在抗击突厥和吐蕃的战场上屡立战功，素以治军严整，擅长边务著称。武周末年，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史称其“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旧唐书·郭元振传》）。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出将入相，各方面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军政元老，

几乎是不太可能在“骊山讲武”这样的重大场合犯下“军容不整”这种低级错误的。说到底，所谓的“军容不整”，无非就是李隆基罢黜功臣的一个借口罢了。

当然，李隆基的目的只是想解除郭元振的兵权，而不是非杀了他不可，所以当刘、张二宰相出面求情的时候，李隆基便就坡下驴，赦免了郭元振的死罪，但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将其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

郭元振一生显赫，历事四朝，不料晚景竟如此凄凉，朝野闻之，无不唏嘘感慨。“自恃功勋”的郭元振本人更是满腹冤屈，“怏怏不得志”。两个月后，朝廷改元开元，大赦天下，郭元振被赦免，起用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但是经过这次沉重打击，郭元振的心境和身体状况都已大不如前，所以未及走到饶州就一病而殁了。

郭元振的贬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标志着玄宗罢黜功臣的大幕已经轰然拉开。

紧继郭元振之后被罢黜的功臣，就是曾替他说情的刘幽求和张说。

不能不说，当初刘、张二人之所以站出来帮郭元振求情，本身就有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味道。郭元振遭流放后，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生出了唇亡齿寒的忧惧。

张说最先察觉到了危险的降临。

就在骊山阅兵的数日后，张说就通过可靠渠道获知，玄宗准备征召姚崇（几年前被太平公主平排挤出朝，时任同州刺史）入朝为相。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因此大为恐慌。骊山一幕本来已经让他成了惊弓之鸟，如今又听到老对手即将回朝复相的消息，张说更是寝食难安，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授意御史大夫赵彦昭对姚崇进行弹劾。

然而玄宗却不为所动。

张说不甘心，马上又去找与他私交甚笃的殿中监姜皎，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出面阻挠姚崇回朝。姜皎依计而行，找了个机会对玄宗说：“陛下不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吗？臣如今帮陛下物色了一个。”

玄宗眼睛一亮，忙问：“谁？”

姜皎心下暗喜，朗声答道：“同州刺史姚崇文武全才，乃是河东总管

的不二人选。”

姜皎原本以为张说此计甚妙，因为如此一来，既可不着痕迹地阻止姚崇入朝，又能在天子面前表现自己为君分忧的忠心，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可姜皎打错了如意算盘。

玄宗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话音刚落，玄宗就发出了一声冷笑，说：“这都是张说的意思吧？你竟敢当面欺君，论罪当死！”

姜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慌忙伏地叩首，拼命谢罪。

张说万万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结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玄宗随后便遣使召回了姚崇，拜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补了郭元振的缺。两个月后，又让他兼任中书令（时称紫微令），大有彻底取代张说之势。

眼看自己随时可能出局，张说惶惶不可终日。

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张说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举动，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向他大表忠心。

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往轻了说，这叫行为不检；往重了说，这叫阴谋篡逆！尤其对玄宗李隆基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来说，大臣和亲王背着他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更是一种最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的行为，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

张说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对手姚崇看在了眼里。

有一天，姚崇奉召入对，走进殿中的时候，故意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玄宗问他：“有足疾乎？”姚崇答：“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

玄宗大为诧异，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姚崇不紧不慢地说：“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乃宰辅重臣。日前，张说竟然私下拜诣岐王，臣担心岐王受其蛊惑，故而为此忧心。”

居然有这回事？

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末，玄宗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将其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刺史；同日，刘幽求亦被罢相，贬为太子少保。

刘幽求一向自视甚高，经常自诩为拥立玄宗的第一功臣。唐隆政变中他功劳最大，可事后也不过当上了中书舍人，虽然有“参知机务”之权，可充其量也就是个三级宰相。先天元年，他为了巩固李隆基的皇位，发动政变未遂而遭流放，其后又险些被太平一党害死。如今玄宗亲政了，他好不容易从岭南回到朝中，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尚书左仆射，可是屁股还没坐热，便又无故遭贬。对此，刘幽求自然是愤愤不平，因而不免“有怨望语”。

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很早就靠边站的钟绍京。唐隆政变后，钟绍京只当了几天的中书令就被罢为户部尚书，不久又贬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后，他回朝复任户部尚书，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面对如此际遇，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

刘、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

他就是新任宰相姚崇。

姚崇很清楚，虽然他和刘幽求他们一样，都是李隆基的心腹股肱，但是单纯从拥立李隆基为帝的角度来说，刘幽求等人的功劳是远远大过他的。所以姚崇觉得，如果不将刘幽求等人彻底排挤出朝，他的宰相之位就不可能牢固，更难以放手施政。

为此，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刘幽求和钟绍京。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二月，玄宗命姚崇对刘幽求和钟绍京立案审查，准备治罪。刘、钟二人不服，不断上疏抗辩。

其实，无论是玄宗还是姚崇，他们的目的一样，只是想把刘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并不希望事态扩大。所以，当刘、钟二人极力抗辩，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姚崇便又恰到好处地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他与另两个新任宰相卢怀慎、薛讷联名，向玄宗奏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虑惊远听。”（《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忽然转任闲散职务，心情

难免沮丧，此乃人之常情。功劳既大，所受的荣宠也深，一旦逮捕下狱，恐怕会惊动朝野舆论。

姚崇的言下之意，就是暗示玄宗见好就收，不宜把事情做得太绝。

玄宗心领神会，当即贬刘幽求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刺史，并把他的七百户封邑削掉了六百户，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刺史。

不久，在姚崇的积极配合下，玄宗又把王琚、魏知古、崔日用等人也先后贬出了朝廷。

至此，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

这就叫飞鸟尽，良弓藏。

此乃政治角斗场上的游戏规则，自古皆然。更何况，为了彻底改变自神龙革命以来政变频仍、皇权危弱的局面，李隆基也只能这么做。

《新唐书》称："幽求之谋，绍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辩，皆足济危纾难，方多故时，必资以成功者也。然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这"不可与共治平"一语，道破了玄宗罢黜功臣的个中原委。

从历史上看，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一幕，几乎也是每个强势帝王为了巩固皇权，开创大业而必修的一课。尤其对李隆基这种非嫡长子出身，并且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而言，这更是他亲政之初的势在必行之举。

作为睿宗庶出的第三子，相对卑微的出身始终是李隆基的一块心病。所以，如果想要坐稳皇位，他就必须在摆平功臣的同时再摆平宗室。

当时，能够对李隆基构成潜在威胁的宗室亲王，就是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堂兄（豳王李守礼）。一开始，李隆基对五王采取的主要是怀柔手段，"专以衣食声色蓄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让他们在富贵温柔乡中当逍遥王爷。

每当政务之余，李隆基总是陪五王一起寻欢作乐，彼此间不以君臣相称，而以家人之礼游处，有时候一起到郊外击毬、游猎，有时候召他们入宫一同宴饮、斗鸡、下棋、吟诗作赋、演奏乐器，待酒足饭饱，笙歌散尽之后，就用特制的"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据说，要是诸王偶染微恙，李隆基便会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有一次薛王

李业生病，李隆基甚至亲自为其熬药，以致胡须不小心被火烧着了，左右大惊失色，连忙扑火，李隆基却说：“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由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称赞天子李隆基“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继感情笼络之后，李隆基又在制度上采取了防范措施。开元二年六七月间，在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议下，玄宗把五个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担任刺史，并且规定：五王到任后不负责具体政务，一切州务都交由僚佐处理。到了开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权已经相当巩固了，才让五王陆续回到了长安，授予了他们司空、司徒等荣誉衔，同时严禁他们“与群臣相结”。

就这样，在玄宗的情感安抚和制度约束之下，这些亲王都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在余生中始终表现得临深履薄，谦恭谨慎，让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们搞阴谋也无从下手。有些侥幸之徒想要轻举妄动，到头来也只能自遗其咎，招致祸败。比如开元八年，有几个朝臣就跟岐王李范、薛王李业走得很近，企图背着玄宗搞一些小动作，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贬谪流放的下场。

事后，李范和李业惶恐不安，主动向玄宗请罪，李隆基还安慰他们说：“我们兄弟亲密无间，都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强相托附，我不会责怪自己的兄弟。”最后，为了表明自己对兄弟的真情，李隆基甚至赌咒发誓说：“倘若我有心猜忌兄弟，就让我天诛地灭！”

就这样，李隆基以他的高明手腕巧妙地摆平了功臣和宗室，消除了所有潜在威胁与后顾之忧，牢牢握住了他的帝王权杖。

不可否认，在处理功臣和宗室的问题上，李隆基的做法具有浓厚的权谋色彩。但是，和历史上那些为了巩固皇权而剪除功臣、诛杀兄弟的皇帝比起来，李隆基采取的手段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他充其量只是做到了“飞鸟尽，良弓藏”，而没有发展到“狡兔死，走狗烹”的地步。

换而言之，李隆基身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人情味。用一句经典台词来说：“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在皇帝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四十五年，而且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他的人情味，在于他执政手段的温和。

姚崇：为盛世奠基（上）

在李隆基摆平功臣和宗室的过程中，宰相姚崇一直与他默契配合，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同样作为玄宗昔日的亲信，姚崇为何没有遭遇“兔死狗烹”的命运，反而能得到玄宗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倚重，从而位极人臣，独揽朝纲呢？

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三点。

首先，姚崇虽然和郭元振、刘幽求等人一样，都是玄宗政变的支持者，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对玄宗的皇权当然也就构不成威胁；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强干著称，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这种富有执政经验的大臣辅佐；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姚崇忠于人主，深明君臣大义。

有一则故事很能表明姚崇的这种节操。

那是在神龙政变成功后，女皇武曌被软禁上阳宫，姚崇作为武曌一手提拔起来的宰相，虽然追随张柬之等人参与了政变，但得知女皇被软禁之后，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感的泪水。别人都兴高采烈，唯独他一个人“呜咽流涕”。张柬之见状大为不满，警告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

姚崇说：“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旧唐书·姚崇传》）随后，姚崇果然被逐出了朝廷，贬为亳州刺史。

像这样一个忠于旧主、性情坚贞、绝不与时俯仰的臣子，有哪一个皇帝不喜欢呢？又有什么理由让李隆基不放心呢？

当然没有。

因此，姚崇必然会成为辅佐玄宗开创盛世的不二人选。

姚崇没有让李隆基失望。

据说，姚崇于先天二年十月奉密诏赴骊山觐见玄宗时，一见面就提出了十个条件，相当于跟皇帝“约法十章”，声称若是玄宗不答应，他便拒绝出任宰相之职。（《新唐书·姚崇传》）

居然会有如此牛逼的臣子，皇帝让他当宰相，他还和皇帝讲条件。

是的，姚崇就是如此牛逼，否则他就不是姚崇了。

当然，姚崇之所以敢跟玄宗讲条件，是基于两个判断：一、玄宗为人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量；二、玄宗锐意求治，亟需一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果然不出姚崇所料，虽然他的倨傲态度让玄宗颇有些诧异，但玄宗还是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很想听听他所谓的“十事”。

姚崇随即侃侃而谈，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条政治建议：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执法从亲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五、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六、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七、对臣下接之以礼；八、鼓励犯颜直谏；九、停止建造各种佛寺道观；十、杜绝外戚干政。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说”。

此“十事”，与其说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条约法，不如说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纲领。当时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皆为切中时弊之言，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盘采纳。

从玄宗朝廷日后出台的种种政治举措来看，基本上都是以这十大纲领作为指导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所言的“十事”，实际上就是一整套针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治国方略。正是这一套方略的推行实施，玄宗朝廷才会呈现出一派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清正廉洁、抑奢求俭的政治新气象，从而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本纪》）。

玄宗深知，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才，只因这些年来政局紊乱，仕途颠沛，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如今所有的障碍既已清除，自然要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史称开元之初，“上初即位（实际应为“初亲政”），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资治通鉴》卷二一○）。

然而，玄宗固然敢于“专委”放权，姚崇复相之初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级官吏，姚崇也要一一禀报，不敢自专。有一次，玄宗听完他的奏报，忽然仰头望着房梁，一句话也不说。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却始终沉默。姚崇又惊又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后，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问：“陛下刚开始治理大

政，宰相奏事，可与不可都当面议，陛下为何一言不发？”

玄宗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把政务交给姚崇，有大事理当奏闻，可像这种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又何必事事来烦朕？”

高力士恍然大悟，随后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姚崇闻言，所有的忧愁和顾虑一扫而光，从此大胆秉政，“独当重任”，于大小政务“断割不滞”。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自知才干不及姚崇，于是“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旧唐书·卢怀慎传》）。

有一次，姚崇家中办丧事，请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务公文堆积如山，卢怀慎不敢决断，只好向玄宗请罪，没想到玄宗却说：“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

姚崇假满归来，没几天就把积压的政务全部处理掉了。众人大为叹服，姚崇亦颇为自得，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澣：“我当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齐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订之法，随时变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问：“那么你对我作何评价？”

齐澣道：“公可谓‘救时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笔一掷，说：“救时宰相，也殊为难得了！”

姚崇理政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陈规，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救时宰相”之誉亦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姚崇的上述执政风格，在随后展开的灭蝗斗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开元三四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在古代农业社会，蝗灾所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各种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如果对治不当，不仅国家的粮食储备会出现问题，还会造成大量的灾民和流民，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统治根基。

所以，如何对付这场前所未有的蝗灾，就成了姚崇最后一任宰相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蝗灾始发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夏。古代人笃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蝗灾是一种天谴，人力不可违抗，因而面对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蝗虫，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不敢捕杀，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灾，希望以此感动上苍，使蝗灾自灭。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人们拜得越虔诚，蝗虫就繁殖得越厉害，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中的农作物被蝗群吞噬殆尽。对此，各地官员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姚崇闻报后，立即上奏玄宗，强烈建议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组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捕杀蝗虫。可朝臣们多以为蝗虫数量太多，难以除尽，玄宗对此也是满怀疑虑。

姚崇坚持说："如今蝗满山东（崤山以东），且繁殖速度极快，为历来所罕见。河南、河北百姓储粮不多，倘若农田无收，必定流离失所，事关百姓存亡，社稷安危，切不可犹疑拖延。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臣知陛下有好生恶杀之德，故此事无需陛下颁布诏书，只需臣下发牒文，督促各地灭蝗。若仍除之不尽，请陛下将臣的官职爵位全部削除！"

这就叫"有功归于上，有过归于己"。

这是一种为官的智慧，也是一种做人的勇气和担当。

既然姚崇都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玄宗当然没有理由再表示反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平日里唯唯诺诺，对姚崇唯命是从的宰相卢怀慎却站了出来，再次反驳说："蝗是天灾，岂能以人事对治？外间舆论均以为此法不妥，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地和气。此事尚可商榷，请公三思。"

姚崇厉声应道："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此言一出，卢怀慎哑口无言，满朝文武也顿时噤声，于是此议遂定。

随后，姚崇立即行动起来，一边发文，一边派遣御史分赴各地。他还在牒文中提出了灭蝗的具体办法：根据蝗虫夜间趋火的特点，"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yì，掩埋），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

为了提高百姓灭蝗的积极性，姚崇还采取了特殊的赈灾办法，将赈粮数量与灭蝗数量挂钩，"采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

之”（《朝野佥载》）。

采取了上述措施后，一度肆虐的蝗灾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控制。“是岁，田收有获，民不甚饥”（《旧唐书·玄宗本纪》）。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春夏之交，蝗灾再次爆发。姚崇按照去年的经验，任命一批御史为“驱蝗使”，分赴各地组织灭蝗。不料，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御史却遭到了当地刺史倪若水的强烈抵制。即便已经有了去年收效甚著的灭蝗事实，可倪若水还是死抱着旧观念不放，一再声称：“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

姚崇勃然大怒，当即发文予以驳斥：“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这句话的大意是：古代有德的地方长官，蝗虫不入其境，如果说他是靠修德才免灾的，那你倪若水岂不是因无德才导致蝗灾？

姚崇此言，可谓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倪若水接到牒文后，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最后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姚崇的“焚瘗之法”组织力量灭蝗，结果很快就“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姚崇传》）。

与此同时，玄宗还颁布诏书，命各地“驱蝗使”严格审查州县官吏在捕蝗方面的成绩，并予以公布，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之一。

有了姚崇极力推行的灭蝗举措，加上玄宗的支持，灾情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姚崇：为盛世奠基（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开元盛世”几乎就是繁荣和富庶的代名词。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其他朝代暂且不论，仅以唐朝自身来看，开元、天宝时期的繁荣和富庶程度，在本朝三百年历史上就是属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开元、天宝的富庶呢？

答案有二：一是开源，二是节流。换言之，就是勤奋和节俭。

要想致富，舍此别无他途。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莫不如此。也就是说，倘若没有开元初期自上而下的抑奢求俭，就绝对没有开元中后期和天宝年间的繁荣富庶。

其实，早在姚崇复相之初所提的“十事”中，“施政以仁义为先”“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停止建造佛寺道观”等主张，就都包含了“抑奢求俭”的思想。

开元二年七月，为了改变自中宗以来“风俗奢靡”的社会现状，玄宗就从自身入手，率先垂范，开始了一场“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他下诏宣布：“凡是宫中多余的车辆、服饰以及各种金银珠宝器具，都应交由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珠宝璧玉、锦绣绸缎，焚于殿前；后妃以下，一律不准穿戴珠玉锦绣。”

三天后，改革对象指向了文武百官：“朝中百官的衣服上、腰带上以及饮酒器具、马勒马镫上，三品以上官员可镶嵌璧玉，四品官员可镶嵌黄金，五品官员可镶嵌白银，余下官员一律禁止；妇人服饰以其夫、其子为准。旧有的锦绣绸缎，全部染为黑色。自今以后，全国范围内一律不准开采珠玉，纺织锦绣，违者杖打一百，工匠杖打八十。”同日，撤销了西京和东都的织锦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年中宗李显喜好享乐，就有了安乐公主价值上亿的“百鸟羽毛裙”，并引发了一场捕杀珍稀鸟类的生态灾难；如今玄宗李隆基以身作则，力行节俭，朝野上下当然就不敢奢靡了。

在俭朴持身、清廉为政方面，宰相卢怀慎最为世人称道，也最堪为百官表率。

史称其“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开元四年十一月，卢怀慎病逝，家中毫无积蓄，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家唯一的一个老仆人只好把自己卖掉，用所得的钱替主人办丧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堂堂帝国宰相竟然困窘若此，委实令人不可思议。

如果史书记载没有夸大其辞的话，那么只能有两种解释：一、开元初年的官员俸禄菲薄，加之卢怀慎为人又慷慨好施，“所得俸赐，随散亲旧”，所以才会穷到这个地步；二、玄宗为了树立清廉政风，故意塑造了这么一个典型，以此作为教育官员和百姓的活教材。

但是，无论我们作何理解，卢怀慎生前的清廉和俭朴都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仔细想想，若非他本人确实为官清廉，只要利用手中职权适当搞一点灰色收入，无论他如何乐善好施，总还会留下一点家底，绝不至于买不起棺材。此外，若非他本人确实是穷，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恐怕也是无从下手，总不能故意扣卢怀慎的工资吧？

总之，即便我们仅仅把卢怀慎当成一个特例，但是仅此一例也足以表明——开元初年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确实要比中宗时代健康和淳朴得多。

除了卢怀慎，作为首席宰相的姚崇，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也是不讲排场，因陋就简的。史称他在担任中书令期间，在京城竟然连一座宅邸都没有，只好长期寓居在长安大宁坊的一座寺院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和卢怀慎穷得买不起棺材一样，姚崇寓居寺庙之事，同样也让人难以理解。难道玄宗真的“节俭”到舍不得赐给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赏赐，难道姚崇自己为官数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几个儿子在朝为官（并且颇有些灰色收入），这样还凑不起钱买一座像样的房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稍后我们就将看到，就是因为姚崇那两个宝贝儿子，还有他的一个心腹下属贪赃受贿被揭发，姚崇才被迫引咎辞职的。除此之外，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临终前曾“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可见姚崇生前并不缺财产，自然也就不可能买不起房子。所以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作秀，是为了配合“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而不得不这么做的。

说白了，就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

然而，就算这只是玄宗和姚崇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场政治秀，可一个堂堂的宰辅重臣，能够长期摒弃个人享受，置首席宰相的体面于不顾，在三年多的任期内始终住在条件简陋的寺院里头，这样的表现，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吗？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从侧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谨严和刻苦吗？

无论姚崇身后留下了多少财产，也无论玄宗中年以后变得如何奢侈纵欲，总之，日后的大唐臣民应该都不会忘记，在开元初年，有一个励精图治的年轻天子，主动放弃了许多帝王应有的享受；有一个“清贫

宰相”，穷得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还有一个“蜗居宰相”，你在偌大的长安城里找不到一座属于他的宰相府邸……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假如没有开元初年玄宗君臣携手同心奠定的基业，也就没有后来那一页歌舞升平的盛世华章，也就没有那一个锦天绣地的巍巍盛唐。

卢怀慎病逝后，玄宗又提拔尚书左丞源乾曜入相，充当姚崇的副手。和卢怀慎差不多，源乾曜拜相之后，也是一切以姚崇的意志为转移，基本上没什么个人主张。每当他上殿奏事符合玄宗心愿的时候，玄宗就说：“这肯定是姚崇的意见。”而凡是玄宗觉得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说：“你为何不和姚崇多商量商量？”

源乾曜真是晕死，碰上如此“偏心武断”的皇帝，他也只能夹着尾巴甘当卢怀慎第二了。所以，无论皇帝对他所奏之事满不满意，源乾曜每次都是老老实实地向玄宗表示歉意，承认事实就是皇帝所说的这样。故而每当朝廷有什么重要事务，玄宗总是催促源乾曜去罔极寺找姚崇。

卢怀慎去世不久，姚崇患上疟疾，便向玄宗告假。玄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天天派宦官去罔极寺慰问，最多的时候一天派出好几十个，往往是前面一拨宦官还没走，后面一拨宦官就到了。源乾曜觉得大家天天往罔极寺跑也不是办法，就向玄宗建议，让姚崇从罔极寺迁入皇城内的“四方馆”（皇家礼宾馆）居住，这样既可方便皇帝问讯，又能让姚崇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养病。

玄宗欣然同意。

可姚崇却不干。

他的理由是，四方馆存放着许多重要的典籍和文件，如果让一个病人住进去，于礼不合，所以坚决推辞。玄宗一听就急了：“设立四方馆，是方便各国的朝贡使节；让你住进去，是有利于社稷。朕恨不得让你住到宫城大内来，区区四方馆，有什么好推辞的？”

史书没有记载姚崇后来是否住进了四方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他住进去了，没过几天就得再搬出来。

因为他的仕途到头了。

导致姚崇下台的表面原因，出在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下属身上。

姚崇长子名姚彝，官任光禄少卿（主管宫廷膳食的副部长）；次子名姚异，官任宗正少卿（主管皇族事务的副部长）。姚崇为官，对自己还是比较高标准严要求的，只可惜对儿子管教不严。这俩小子仗着父亲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长期“广通宾客，颇受馈遗”，几年前就曾因请托魏知古而差点惹出祸端，幸赖姚崇机警，才没出事。但他们却没有因此收敛，而是照旧我行我素，招权纳贿，因而颇受当时舆论谴责。

除了对儿子缺乏管束，姚崇对自己的亲信下属也过于纵容。他有个秘书（主书，从七品）名叫赵诲，收受胡人的贿赂，不料没多久就被人告发了。玄宗对此案极为重视，亲自审问，结果发现案情属实，遂将赵诲逮捕下狱，并判处了死刑。

本来此案与姚崇并没有直接关系，充其量也就是负一些间接的领导责任而已。怎奈姚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出面营救，由此令玄宗大为不悦。不久，朝廷恰好要大赦，玄宗看在姚崇的面子上，特别在大赦诏书中标出赵诲的名字，下令免其死罪，杖打一百，流放岭南。

尽管皇帝给足了面子，可姚崇还是不无痛苦地意识到——经过这件事之后，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了。倘若不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万一两个儿子贪赃纳贿的事实再被揭发，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思虑及此，忧惧不安的姚崇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辞职请求，而且提出了不止一次。

同时，姚崇还向玄宗郑重推荐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他就是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同时将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

姚崇被罢相一事，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就因为一个七品小文书受贿，便罢免了一个兢兢业业、精明强干、对帝国政治有着突出贡献的宰相，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其实，无论是赵诲的枉法求财，还是姚崇两个儿子的招权纳贿，都不是导致姚崇下台的真正原因。道理很简单，打狗也要看主人。倘若玄宗仍然倚重姚崇，仍然寄望于他在宰相任上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就算赵诲和姚氏兄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只要他们不是阴谋造反，玄宗

都大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又何必非把姚崇的宰相乌纱摘掉不可呢？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玄宗本来就已经有了罢免姚崇之意，赵诲受贿的事情，只是恰好让玄宗拿来当一个借口罢了。

在赵诲一案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足以让我们窥见玄宗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当赵诲东窗事发时，玄宗居然以天子之尊亲自审问他，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如果不是玄宗存心要抓姚崇的小辫子，一个小小七品文书的受贿案，又何须劳驾他皇帝大人亲自出马？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玄宗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

换言之，就是故意抓一条狗来打，让主人瞧瞧颜色。

可是，姚崇一直在宰相任上干得好好的，玄宗为什么忽然要把他撸了呢？

这就要涉及玄宗的用人之术了。

玄宗任用宰相的原则，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专任而不久任。

所谓专任，就是一改大唐立国以来的集体宰相制，把宰相名额控制为两个，并且一个为主，一个为辅。比如玄宗先后为姚崇配备的两个副手，前面的卢怀慎就被称为“伴食宰相”，后来的源乾曜同样也是唯唯诺诺；姚崇卸任后，宋璟继任首席宰相，他的搭档苏颋照旧是陪衬人物。这种绿叶配红花的用人原则，正是玄宗刻意为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朝政大权全部集中到首席宰相一个人手上。

之所以要实行这种专任制，是因为玄宗亲政后，所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政治局面，所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因此，只有让一个能力突出的宰相独揽朝纲，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集体宰相制下常见的掣肘、推诿、扯皮等低效现象。

但是专任制也有两大副作用：一是宰相大权独揽，最终必然导致皇权受到威胁；二是一人执政必然导致整个政治运作过多地带上个人烙印，从而日久生弊。而要消除这两个副作用，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手握大权的宰相干太久。

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被罢相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玄宗深思熟虑的结果。

姚崇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政治中枢，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玄宗对他依

旧礼遇甚隆，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阁供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在许多大政方针上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死后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姚崇在任三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与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开启了清明、高效、务实、俭朴的新政风，终结了自神龙政变以来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帝国引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轨道，为盛世的来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宋璟：贤臣的典范（上）

宋璟于开元四年底被玄宗征召入朝，初授刑部尚书，次月擢任侍中（时称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正式入相。玄宗给他配备的副手是中书侍郎（时称紫微侍郎）苏颋。

和姚崇一样，宋璟也是三朝元老，素以“耿介有大节”“当官正色”（《旧唐书·宋璟传》）著称，武周时期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皇面折廷争，以致铁腕无情的武曌虽“内不容之”，也不免要“惮其公正”（《大唐新语》卷二）。

从宋璟回朝之初发生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见出他刚直不阿的性情。

当时，宋璟从广州回长安，临近京师时，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愈发敬重。

作为姚崇的继任者，宋璟在国家大政方面大致继承了姚崇的路线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萧规曹随”，但是在具体的执政风格上，他却与姚崇有着根本的不同。

史称“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正”（《新唐书·姚崇宋璟传》）。对于姚崇来讲，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身上颇有些权谋色彩；而对于宋璟来说，只有原则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规矩法度，是非曲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天子本人，在这一点上一概不能例外。

其实，宋璟与姚崇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是发现姚崇执政过于“权变”，担心日久生弊，才会起用善于“守正”的宋璟，以此弥补姚崇的缺失，矫正朝廷的风气。

宋璟拜相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恢复了废弛已久的“谏官议政制度”。

大唐的谏官议政制度始创于太宗贞观初年。当时的制度规定，凡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三品以上官员上朝奏事时，谏官、史官必须随同宰相们上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朝廷各部长官在朝会上向皇帝奏事时，御史有权当面弹劾，并当众宣读弹劾奏章。有了这样的谏议制度，高级官员就无法蒙蔽皇帝，低级官员也不能暗进谗言，所以太宗才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最后择善而从，在兼听博采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

这就是贞观时代进谏成风，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高宗时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恃宠用事，这项制度就逐渐废弛了。史称当时“政多私僻”，奏事官员往往等到朝会结束，才在御前呈上密奏，谏官、史官皆随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员到底呈上了什么奏议，更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

及至武周时期，女皇武曌以严刑峻法控制臣下，于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谏官、御史们虽然又有了当廷谏议之权，但是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滥用手中职权陷害朝臣，打压异己。所以上至御史大夫，下至监察御史，莫不以相互倾轧为能事。整个帝国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到了开元初年，谏官议政制度已经废弛了半个世纪之久。“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议下，玄宗终于下诏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自今以后，除非情况特殊或事关机密，否则一切奏事，均应在朝会上公开报告，谏官、史官议政，皆依贞观故事。”

谏议制度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玄宗朝廷的进谏、纳谏之风，为帝国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玄宗李隆基虽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虚怀纳诲”。于是在开元前期的二十年间，出现了继贞观之后谏诤风行的第二次高潮。上至宰相、百官和地方刺史，下至文人、隐士和普通百姓，上书直谏者络绎不绝，公开议论朝政蔚为一时风尚。

当然，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制度，还要有人去贯彻推行，才

有可能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沦为摆设。

在坚持原则，犯颜直谏方面，作为百官之首的宋璟，就是头一个身体力行的。

对于外戚，他敢于不讲情面；对于宗室，他敢于秉公办事；甚至对于玄宗本人，他也敢于“触逆龙麟”。

这就是一代贤相的傲骨和风范。

如果说，“善应变”的姚崇可以称为能臣的话，那么“善守文”的宋璟就堪称贤臣的典范。下面有几件事情，足以让我们领略宋璟的贤相之风。

第一件事发生在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玄宗的岳父王仁皎去世。王仁皎是王皇后的父亲，封祁公，官任开府仪同三司（一级文散官，从一品）。既然是当朝国丈，身份显赫，爵高位尊，身后事的规格自然是不能低的，尤其是坟墓，更要修得巍峨高大。这不仅是顾及王皇后的面子，更涉及皇家的尊严。所以，王仁皎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就出面向玄宗要求，比照窦太后之父（李隆基外祖父）的丧葬规格，修筑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大坟。

这个王守一不仅是玄宗的大舅子、皇室的驸马，而且是李隆基在当临淄王时的好友，本身又是先天政变的功臣，在李隆基诛灭太平一党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因此，无论是出于皇家尊严、个人亲情，还是出于旧友兼功臣的情面，玄宗都不能不答应。于是玄宗很快就下了一道手诏，命有关部门按照王守一的要求办理。

然而，王守一万万没有料到，天子这一关他是过了，可宰相那一关他却死活也过不了。

宋璟得知这件事后，立刻拉上副手苏颋，当面向玄宗进谏，说：“按照朝廷的有关制度规定，一品官的坟墓高度是一丈九尺，即使是陪葬皇陵，最高也不过三丈。所以，王守一的要求于礼不合，不能同意。”

玄宗闻言，赶紧把外祖父搬了出来，说既然有成例可依，那王守一的要求也不算过分。

宋璟说：“窦太后的父亲逾越礼制，当时朝野都议论纷纷，只是没人敢出面指出错误罢了，现在既然已经知道错了，怎么还能明知故犯？”

玄宗表情尴尬，可还是不想松口。

宋璟寸步不让，接着给皇帝上课："从前太宗皇帝嫁女儿，嫁妆的价值超过了长公主（太宗这一辈的公主），魏徵进谏，太宗欣然接受，长孙皇后也甚为嘉许。可不像后来的韦庶人（韦后）那样，为了抬高其父的身价，竟然把坟墓称为'酆陵'，结果也只能加速败亡，为天下笑！如今，以皇后的父亲身份之尊贵，要修筑大坟又有何难？可臣等之所以再三进言，只不过是想成全皇后的俭德，维护皇上您的尊礼守法之形象罢了。何况今日所为，正可以传之无穷，永为后法，岂可不慎重！"

玄宗是聪明人，既然宋璟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他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还显得自己太没水平。于是玄宗赶紧换了一副愉快的表情，变被动为主动地说："朕经常想修养品德，做群臣的表率，对自己的妻小又岂敢徇私！但此事是一般人不愿说也不敢说的，如今贤卿能固守典章礼仪，以成就朕的美德，并垂法将来，这样很好，正是朕所期望的。"

就这样，王国丈修筑大坟的事情彻底黄了，玄宗还特意赏赐给宋璟和苏颋每人四百匹彩帛，以资鼓励。不知道当皇帝的大舅子王守一看到两个宰相搅了他的好事还赚了好几大车的彩帛时，心里会作何感想？

宋璟反对修筑大坟，针对的是外戚。接下来的这件事，针对的则是宗室。

此事发生在同年十一月，宁王李宪（就是李隆基的长兄宋王李成器，于开元四年更名）有一个亲戚叫薛嗣先，曾经在皇家宗庙当过一段时间的"斋郎"（负责宗庙祭祀洒扫的小吏）。李宪上奏玄宗，请求让薛嗣先在朝中任职。玄宗把奏章转给了中书、门下省，虽然没有明说给他当什么官，可意思还是明摆着，让宰相酌情授予他一个官职。

宋璟接手这件事后，马上就向玄宗启奏，说："薛嗣先当过斋郎，虽然没什么优越的表现可堪留用，但毕竟是皇亲国戚，按理说总该给个小官做。可不知陛下是否还记得，景龙年间，常有天子授官不经中书、门下，而是直接下敕，称为'斜封官'，在当时可以说是泛滥成灾。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这种事已经完全杜绝，无论是发给赏赐还是任命官吏，必定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的考核评议。正所谓天下至公之道，唯有圣人能行。薛嗣先虽是皇家姻亲，陛下却不因他而废法，将此事交由臣等议决，臣很感动，但是臣还是想把此事交给吏部，让他们照章办理，希望陛下不要另行颁布敕令。"

宋璟这番话，百分之百是公事公办的意思，而且还特别举了斜封官的例子，摆明了就是把薛嗣先当官的事给否决了，只不过一副官腔打得滴水不漏，十分含蓄委婉，没有让皇帝和宁王太难堪而已。此外，他还给皇帝戴了一顶“至公之道，圣人能行”的高帽，玄宗若要当这个“圣人”，想必也不敢再搞一个斜封官出来。

毫无疑问，薛嗣先的官没当成，宁王的面子也给驳了。

在宋璟面前，一是一二是二，什么事都要秉公而行，照章办理，不要说宁王，就算是天子李隆基本人的事情，该驳的时候他也照驳不误。

宋璟就任宰相期间，有几次都是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

第一次是在他拜相不久的开元五年年底，玄宗命宋璟和苏颋给自己的皇子公主起名字和封号，总共起三十对备用，还特别交代他们，除了这三十对外，一定要另想一对最漂亮的名字和封号呈上，显然是想赐给他最心爱的某个皇子或公主。

按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不过举手之劳，又能讨天子欢心，何乐而不为呢？

可宋璟偏偏不认为这是小事，而是关乎皇室和社稷稳定的大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道理很简单，玄宗既然有某个特别宠爱的皇子或公主，那就意味着他有某个特别宠爱的嫔妃，正所谓“母宠子爱”“母以子贵”。如果在这件事上迁就天子，那就等于助长了后宫的争权夺宠之风，而在宋璟看来，后宫的女人战争，最后往往会波及外朝，导致社稷不宁，政局动荡。自古以来，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单说高宗永徽年间武昭仪和王皇后之间的后宫大战，最终就酿成了高宗与宰相集团的君臣对决，彻底改写了大唐王朝的历史。所以，此风断不可长，必须把天子的这点偏私之念扼杀在萌芽状态。

职是之故，宋璟一点面子也不给玄宗，当场就把事情挑明了，说：“天子之爱，犹如天地覆载苍生；陛下对子女的爱，也应无袒无偏，一视同仁。如今命臣等另撰一对佳名美号，显然已有所偏私。所以臣还是想将三十对名号混同以进，以彰显陛下覆载无偏之德。”

玄宗闻言，尽管心里非常不爽，表面上还是把宋璟赞许了一番。

还有一次，是在开元七年五月初一，这一天发生了日食。古人通常把

日食看成是皇帝德行有亏的象征，于是玄宗慌忙下了一大堆诏书，今天宣布自己要改穿素色衣服，要撤除宫廷伎乐，减免膳食；明天又命令中书、门下省要重审监狱中的囚犯，查看有没有冤情；后天又要求有关部门要赈济贫民，劝课农桑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玄宗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怕遭天谴，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要作秀给百官看。宋璟对这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超级反感，所以立刻进谏：“陛下体恤民情，诚然是苍生之福。不过臣听说，遇到日食应该砥砺自己的品德，但关键还是在于诚心。所谓亲君子，远小人，杜绝妇人干政，排斥谗言奸佞，这才是真正的修德。对于君子来说，言大于行，光说不练是一种羞耻，若能以至诚之心去实践，也就不用下那么多诏书了。”

宋璟这番谏言，可以说是毫不避讳地揭穿了玄宗的作秀心态，一下子把皇帝搞得很下不来台。

史书没有记载玄宗对此作何反应，但是不难想象，李隆基心里八成是又羞又恼的。估计跟太宗李世民当初被魏徵弄得很不爽，回宫后只好对老婆嚷嚷，说总有一天要杀了魏徵这个乡巴佬一样，李隆基很可能当面不便发怒，可转过身也会拼命问候宋璟的十八代祖宗。

不过，无论李隆基对宋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逆龙麟”是否心存怨恨，但至少他在表面上还是“虚怀纳诲”的。

因为，他要当一个像太宗李世民一样的治世明君。

所以，他只能忍。

即便宋璟的谏言让他有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他也只能一忍再忍。就像佛教所说的“修大忍辱，得大福报”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那个繁荣富庶的盛唐，又何尝不是这么忍出来的？

司马光有一句话总结玄宗和宋璟的君臣关系，说得非常到位。他说，宋璟“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所以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最后这“虽不合意，亦屈从之”八个字，道破了玄宗的真实心境。

宋璟：贤臣的典范（下）

当然，宋璟之所以敢于处处坚持原则，违背玄宗意志，而且对宗室和外戚都不讲情面，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也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正所谓欲正人者，必先正己。

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宋璟的严于律己。

宋璟回朝拜相之前的职务是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地处岭南一隅，文化相对落后，老百姓住的都是竹子和茅草搭盖的简易房子，平时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就是每逢干燥的季节便容易失火，而且一旦失火，往往一烧就是一条街。老百姓深受其弊，却又没有能力改变。宋璟到任之后，马上教当地百姓烧制砖瓦，同时大力实施旧城改造。没多久，广州百姓就住上了砖瓦结构的房子，“自是无复延烧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老百姓感念宋璟的恩德，就在开元六年初为他立了一块“遗爱碑”，以此称颂他在广州的惠民之政。

当时宋璟已经回朝担任宰相，听说这件事后，当即对玄宗说：“臣在广州并没有特殊的政绩，只因今日蒙受陛下恩宠，才会有这种阿谀谄媚的事情发生。如果要革除这种风气，希望从臣开始，请陛下下诏禁止。”玄宗很满意，遂依言而行，于是天下各州从此再也不敢随便为官员树碑立传。

这件事是宋璟自我约束的典型例子。

在这方面，宋璟和姚崇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姚崇长期纵容儿子和属下照权纳贿，可宋璟不仅自律甚谨，对亲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开元七年底，吏部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官员选拔工作，众多的候补官员云集京师。由于候选者多，职务缺额少，这些候补官儿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山的找靠山，没靠山的包红包，一个个上下奔走，四处请托，忙得不可开交。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宋元超的候补官，却显得超级自信。别人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唯独他显得气定神闲，不慌不忙。

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他如此自信的原因。

有一天，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吏部，直接找到主管官员，报上自己的候补官身份，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有个堂侄在朝中任职。

你侄子是谁呀？看把你牛的！

宋元超不紧不慢地报出了官职和名字——侍中兼吏部尚书宋璟。

主管官员吓坏了，这可是首席宰相的堂叔啊，怪不得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于是吏部赶紧一边给他物色肥缺，一边上报宋璟。

宋璟闻报，马上给吏部下了一道牒文，说：“宋元超是我的堂叔，长期住在洛阳，我和他很少打交道。他确实是我的长辈，这一点我不想隐瞒，但是我更不想因为这层关系而以私害公。本来他如果不自曝身份的话，你们还可以公事公办，现在他既然说了，那就没别的选择了，一句话——请解除宋元超的候补官资格。”

宋元超打死也不会想到，宋璟居然会如此六亲不认！本来如果走正常程序，他还有被选上的机会，如今倒好，恰恰因为他是宰相的堂叔，反而鸡飞蛋打，连候补官的资格都没了。

这件事传开后，宋璟的廉政之名自然是朝野皆知。

宰相身为“百僚之长”，不仅本身要率先垂范，具备严明高洁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

宋璟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冬，他给玄宗呈上了一道任免官吏的奏疏，疏中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干和文采，然性喜异端，好生是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但全然不用，又可惜了他们的才干，故可分别授予渝州、硖州刺史；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兼备，初用之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颇不称职，请转任左散骑常侍（没有实际政务的散官），以执法严正的李朝隐代之；陆象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为人宽厚，又能做到是非分明，可授河南尹一职。”

这就叫扬长避短，量才录用。有这样一双火眼金睛替皇帝严把人才关，玄宗就既不用担心官员队伍中有人滥竽充数，也不用担心有人怀才不遇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此言可谓确论。

唐代有不少隐士，其中固然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真隐士，但也不乏以归隐山林作为升官捷径的投机者。有人就曾经向宋璟推荐过一个叫范知睿的隐士，称他富有文学才华，并献上其所著的《良宰论》。宋璟阅毕，在书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其《良宰论》，颇多阿谀之辞。隐士理应直言朝政得失，岂能如此谄媚取容？若自以为文章作得好，可走科举应试之途，不应私下请托。”可想而知，在如此刚直不阿、明察秋毫的宰相面前，任何人想抱着侥幸心理走一条“终南捷

径”，结果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尽管宋璟有严明高洁的操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宋璟在为相期间也犯了两大错误，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第一个错误是在治理经济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货币政策的失败。

唐朝的货币流通领域从立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始终不足。当时的货币以铜铸为主，不像我们今天的纸币想印多少就有多少，而铜矿的开采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铜钱长期无法满足市场和贸易的需要。

唐朝的货币发行始于高祖武德四年，称为“开元通宝”，规定每个铜钱的直径为八分，重二铢四分（约5克）。在官铸货币发行的同时，政府明文规定：民间不得盗铸，违者处以死刑，家属籍没为奴。

然而，随着唐朝立国日久，经济逐渐繁荣，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发行的货币完全不能满足民间的需求，于是开始出现私人的盗铸，当时称为“恶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假币。既然是民间私铸的假币，在成色和分量上当然与官铸货币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可以极大地缓解市场需求，因而禁止盗铸的法令变成形同虚设。到了高宗显庆、乾封年间，恶钱已经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政府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温和的干预手段，下令用官铸一钱兑换五恶钱，再将恶钱回收销毁。

但是，这个措施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道理很简单，官府以一抵五，意味着老百姓手头的钱就要贬值80%，哪个傻瓜愿意乖乖地把钱拿去兑换呢？于是民间大多把恶钱藏起来，等禁令松弛了，再把钱拿出来花。不仅持有者不换，铸造者更是加大了盗铸的规模。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盗铸者甚至把铸币工场设在了船上，然后把船划到江心，让你鞭长莫及。所以高宗政府虽一度想要推行新货币“乾封泉宝”（其尺寸和重量都比“开元通宝”略大），到最后还是归于失败。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说，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到了武周时期，恶钱的成色和质量越来越差，连铁和锡都掺进了铜钱里。也就是说，盗铸的成本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高，于是恶钱更是泛滥成灾。江淮一带的百姓纷纷以铸钱为业，假币制造商们要么把工场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要么设在船上，直接划船出海，让官府的缉捕人员束手无策。

及至开元初年，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长安和洛阳两京，恶钱已经满

天飞了。有的假币制造商干脆不用铜，而全部用价值低，熔点也更低的锡来铸造，片刻工夫就能铸造数十上百个锡钱，在市场上也同样大行其道。

恶钱的大量制造和普遍流通固然弥补了政府货币供应的不足，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会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其次，致使百姓“皆弃农而竞利”，破坏农业生产；最后，利入私门，使国家财政受到私铸货币的左右，严重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这种现象当然引起了宋璟极大的关注和忧虑。开元六年春，在宋璟的主持下，唐朝廷再度下令禁止恶钱，规定只有重二铢四分的标准铜钱才能继续流通。此次禁令在两京得到了比较严格的执行，长安和洛阳市面上的恶钱迅速被大量回收销毁。

然而问题却接踵而至，民间的货币流通量骤减，直接造成了贸易萎缩和市场萧条，于是两京舆情哗然，百姓怨声载道。宋璟当即采取补救措施，在征得玄宗的同意后，动用国库存款二万缗，以市场价格购入百姓手中滞销而官府可用的商品，同时让两京的各级政府官员预支薪俸，以便让官铸货币迅速占领流通领域。

开元七年二月，宋璟又采取了一项强力措施，将国家粮食储备库（太府）和州县储备的十万石粟米出售给百姓，借此吸收民间恶钱，然后全部予以销毁。稍后，宋璟又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私铸恶钱的重灾区——江淮流域，负责恶钱的禁止和收缴。

应该说，宋璟的上述举措都是对的，于国家也是有利的。可问题是，对的不见得是好的，于国家有利的也不见得是于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萧隐之前往江淮以后，为了急于搞出政绩，动用了极为严厉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仅挨家挨户收缴恶钱，而且“捕责甚峻”（《新唐书·食货志》）。如此一来，不但为数众多的假币制造商破产、坐牢，并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经济上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的萧条乃至瘫痪。

到了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个江淮地区已经被萧隐之搞得民怨沸腾，百业凋零，原本甚为合理的经济政策到头来变成了彻底的扰民之政。有鉴于此，玄宗不得不罢免了萧隐之的官职，随后禁令取消，恶钱复行。而宋璟作为这项政策的制定者和负责人，当然也被玄宗记了一大过。

就在禁止恶钱的政策遭到挫败的同时，宋璟在司法领域又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可以称为“旱魃事件”。

宋璟性格刚正，疾恶如仇，所以对于犯罪的人极其痛恨，尤其是对那些不服判决而不断上诉的在押犯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便交代负责审理上诉案件的御史：“凡是服从判决，诚心悔过的，可以酌情减刑甚至释放；而那些上诉不已的冥顽之徒，就一直把他们关着，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此令一下，那些有冤情的犯人可就惨了。本来蒙冤入狱还有上诉的机会，如今宰相大人一句话，就把他们申冤昭雪的希望彻底粉碎了，一时间群情汹涌，喊冤的呼声比平日更高。

当时又正巧碰上关中大旱，有人便借题发挥，搞出了一个旱魃事件。所谓旱魃，意思是制造旱灾的妖魅。古时候每逢天旱，人们总是认为旱魃作祟，所以就要举行仪式驱魅。由于很多人对宋璟这项政令不满，包括一些宫中优伶，也对那些有冤无处申的犯人非常同情，于是就专门编了一出讽刺小品，准备在宫中举行驱魅仪式的时候向皇帝献演，借此发泄对宋璟的不满。

当玄宗来观看演出时，一个优伶扮演旱魃，另一个就问他：“你为何出来作祟？”旱魃答：“奉宰相大人之命。”另一人作困惑状，问他何故。旱魃说：“如今含冤入狱的人足足有三百余个，可宰相大人却不让人申冤，这些人怨气冲天，我就不得不出来了。”

玄宗听着这几句台词，脸上顿时阴霾密布。

而宋璟的宰相生涯就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点。

开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罢免了宋璟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将另一个宰相苏颋也罢为礼部尚书；同日，征召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长史张嘉贞入朝为相。

和姚崇一样，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只有三年多。

毫无疑问，尽管宋璟罢相的表面原因是在经济政策上遇到挫败，并且在司法领域犯了错误，但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和姚崇如出一辙，同样是出自玄宗的用人原则——专任而不久任。

在离开相位后的好几年里，玄宗仍然对宋璟甚为倚重，曾当面对他说：“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犯颜直谏”的刚正风范，对朝政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旧唐

书·宋璟传》）

姚崇、宋璟为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帝国政治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唐朝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说：“开元初，上（玄宗）励精治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郑綮所谓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期。由此可见，说姚、宋二人是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应该是不为过的。

对于姚崇和宋璟的历史功绩，司马光曾经在《资治通鉴》中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张说：一个全能型宰相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源乾曜和张嘉贞继任宰相。就像前面两届宰相班子都是一正一辅、一刚一柔一样，这次唱主角的人是张嘉贞。而源乾曜虽说是二次拜相，资格比张嘉贞老得多，但他为人宽厚，所以还是像从前那样甘当配角，凡事皆推让之，不敢与其争权。

张嘉贞为人精明强干，早在武周时期就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历任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等职，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史称其“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旧唐书·张嘉贞传》）。如果单纯从治理政务的能力来看，张嘉贞可以说是一个能臣，与姚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他却没有姚崇善变圆滑的一面，而是极为刚愎自用。拜相没多久，他就毫不避讳地提拔了几个朝臣作为心腹，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尽管时人对此颇有微词，他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

假如在他的宰相任内，始终只有一个源乾曜给他当绿叶的话，那张嘉贞的宰相生涯肯定是顺风顺水的。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他拜相的第二年，有个注定要和他死磕的人就从地方上飘然回朝，旋即入相，成了这一届领导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

让张嘉贞颇有些懊恼的是——这个人的资历比源乾曜还要老，与前两任宰相姚崇和宋璟也不相上下。并且更要命的是，这个人的性格绝不像源乾曜那样温良敦厚、唯唯诺诺，而是跟他张嘉贞一样精明自负、

不肯让人。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张说。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任上回朝，擢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作为数年前被玄宗罢黜的功臣，张说能够有机会回朝，并且还能官复宰相，委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当初那么多被罢黜的功臣中，他是唯一能东山再起，梅开二度的。

那么，张说凭什么能梅开二度呢？

其实，只要细究玄宗此时的心态，张说的复相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此一时彼一时也。玄宗亲政之初，最大的担心是皇权受到功臣的威胁，所以必须把功臣们逐出权力核心，他才能心安。而现在，经过姚崇、宋璟两任宰相的治理，政治早已步入正轨，国力也是蒸蒸日上，玄宗的皇权更是稳如泰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篡位夺权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玄宗觉得某个昔日功臣的身上还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他有什么理由不加以利用呢？

其次，随着开元初期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时至开元九年，一个太平治世已经初具规模。如果说前面的八年，玄宗需要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能臣贤相来奠定治世基业的话，那么此刻，玄宗最迫切需要的，则是有一个文学宰相来替他粉饰太平，铺排盛世风光。

而张说，恰恰是这方面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因为在当时，张说是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被誉为“一代文宗”。

早在武周时期，张说的文才便深受武曌赏识，曾奉命参与大型古诗集《三教珠英》的编纂。当时参加编纂的还有著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皆为一时才俊。睿宗时期，张说还曾供职东宫，担任李隆基的文学侍从，“深见亲敬”。后来张说拜相，又奉诏监修国史。即便是在被玄宗罢黜之后，在北方边境担任军职的那几年里，张说仍奉朝廷之命，“赍史本随军修撰”，也就是在繁忙的军务之余，始终兼着国史的编撰工作，从来没有间断。由此可见，玄宗对他在文史方面的才能一直是深为倚重的。

史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旧唐书·张说传》）。可想而知，由这样一位政坛元老兼文章圣手来为玄宗描摹盛世画卷，再合适不过了。

最后，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张说不仅是一代文宗，同时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而此时的大唐帝国通过近十年的积累，国力已经日渐雄厚，所以当初姚崇“不幸边功”的建言也已被玄宗抛诸脑后，其开边拓土，炫耀武功的思想早已抬头。在此情况下，让文武兼资、熟悉军队和边防事务的张说复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于张说在军事上的才干和胆略，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

开元八年，张说担任天兵军节度使，驻扎在并州，与驻扎在朔方（今宁夏灵武市）的王晙[1]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之势。由于地处胡汉交界地带，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都住着许多归降的突厥部落。这些突厥人虽然已经降唐，表面上似乎没什么威胁，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有可能复叛，所以无论对张说还是对王晙来讲，这些突厥降众始终是他们眼皮底下的定时炸弹，一点也不让人省心。

这一年秋天，王晙就收到了一份情报，称他辖区内的突厥部落有可能与北方的突厥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朔方城。王晙当即奏报朝廷，准备设计除掉这颗定时炸弹。在得到朝廷的批准后，王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辖区内的各部落酋长出席，然后设置伏兵，在席上把他们全部砍杀，随后又率部血洗了这些部落的余众。

诱杀事件发生后，整个北方地区的突厥降众大为震恐，包括张说辖区内的拔曳固、同罗等部落也是人心惶惶，唯恐遭到唐军的屠杀。张说知道，如果不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必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于是他随即带上一支骑兵，直奔这两个部落而去。

他带了多少人？

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二十个。

因为他不是去打仗的，所以人多不但没用，反而会坏事。

到达突厥人的营地后，张说就住在这些部落酋长的牙帐里面，跟他们同吃同睡，然后耐心讲解唐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让他们不必恐慌，安心过日子。

本来张说带着那么少人出去，留在并州看家的副使就担心得要死，如今听说他居然跟那些突厥人同寝共食，更是吓坏了，赶紧修书一封，命快马送到张说手上，告诉他胡人无信，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赌。没想到张说给他的回信却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意思是：我的肉不是羊肉，不怕人吃；我的血不是马血，不怕人喝。何况大丈夫理应直面危难无惧死亡，今日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你不必再劝。

张说的勇气和诚意最终感动了突厥人，也让他们的疑虑和恐惧一扫而光。

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张说成功安抚了辖区内的突厥降众，把一场可能发生的叛乱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比之王晙的暴力镇压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开元九年四月。

这一次，真的有一场叛乱爆发了。为首的是一个叫康待宾的胡人，他纠集了七万突厥降众，迅速攻陷了六胡州[2]。不久，叛军又策动党项人（在今陕西北部）加入了叛乱，然后兵分两路，一路与党项联手，向东攻击银城（今陕西神木县南）、连谷（神木县北），准备越过黄河，威胁唐朝的龙兴之地并州；另一路由康待宾亲率主力南下，攻击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兵锋直指长安。

形势异常危急，玄宗亟命王晙的朔方军、郭知运的陇右军和张说的天兵军共同讨伐叛军。

张说驻扎在并州，其当面之敌就是党项与突厥的联兵。接到命令后，张说立刻率步骑一万多人向西进发，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西北裴家川口），与叛军发生遭遇战，结果一战便将叛军击溃。叛军余众向西逃窜，逃到骆驼堰（神木县西北）的时候，党项人不跑了。

因为他们后悔了。

悔不该听信突厥人的蛊惑之言，冒冒失失地起来造反，结果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被人在屁股后面追着打，真他娘的鬼迷了心窍！

他们一边后悔一边苦思自保之计，最后灵机一动，索性来个阵前倒戈，掉过头来打突厥人，希望以此戴罪立功，取得朝廷的宽恕。

突厥叛军没想到党项人会突然把矛头指向他们，猝不及防中被砍杀了

一大片，残部仓皇北窜，逃往铁建山（铁山，属阴山山脉）。

此战唐军大获全胜。张说召集党项部众，一番安抚之后，命他们回到原住地，恢复从前的正常生活。有部将表示强烈反对，说党项人反复无常，应该全部诛杀。张说大怒，说：“王者之师，理当讨伐叛逆，安抚忠顺，岂能随便杀降？”

随后，张说奏请朝廷，在党项人的游牧区域设置了麟州（今陕西神木县），以此镇抚党项余众。

张说回朝复相之后，帝国的权力核心就有了三个宰相。

自玄宗亲政以来，宰相班子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原本一正一辅、一刚一柔的格局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张说与张嘉贞两强相争的态势。

作为二次拜相的政坛元老张说，当然没有把一年多以前刚刚入相的张嘉贞放在眼里；而作为现任中书令、首席宰相的张嘉贞，自然也不把排名第三的张说当一回事。

一山难容二虎。这两个同样姓张的政治强人碰到一块，注定会有一场较量，也注定要有一个被淘汰出局。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十一月，原本一直暗中较劲的二张终于在一次廷议中当着皇帝的面发生了争执。争执的起因是广州都督裴伷先因罪下狱，玄宗召集宰相们廷议，讨论对裴伷先的处置办法。

张嘉贞建议对其实施廷杖之责。所谓廷杖，说白了就是当众打屁股。张嘉贞话音刚落，张说立刻反驳：“臣听说，古人主张‘刑不上大夫’，目的是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廉耻心。更何况，士可杀不可辱！如果有罪，该死刑就死刑，该流放就流放。据臣看来，裴伷先的罪状理应判处流放，何苦要以廷杖相辱？”

张说一番话说得有理有节，大义凛然，张嘉贞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应对。

玄宗深以为然，决定按张说说的办。

张嘉贞被一顿抢白，又在皇帝跟前丢了面子，心里大为恼怒。退出大殿后，他忍不住质问张说：“也就讨论个芝麻大点的事儿，你何必上纲上线？”

张说悠长地看了他一眼，冷笑着说：“宰相这个位子，运气来了就坐上去，运气走了就乖乖下台，岂能坐一辈子？要是今天可以随意对大臣施以廷杖之辱，谁敢保证明天不会轮到你我头上？我刚刚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为了区区一个裴伷先，而是为了普天下的所有士君子。”

张嘉贞气得脸红脖子粗，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说向他拱了拱手，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扬长而去。

很显然，姜还是老的辣。

在官场斗争方面，张嘉贞比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张说嫩多了，压根就不是他的对手。

也是张嘉贞自己流年不利，就在廷杖事件发生后没多久，也就是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二月，张嘉贞自家的后院起火了。

问题出在张嘉贞的弟弟，时任金吾将军的张嘉祐身上。

本来，在张说没有回朝之前，张氏兄弟在朝中是很拉风的，哥哥贵为宰相，弟弟又是皇帝的御前侍卫将领，兄弟俩“并居将相之位，甚为时人之所畏惮”（《旧唐书·张嘉贞传》）。可张说来了之后，张氏兄弟的幸福生活就戛然而止了。先是哥哥在皇帝跟前被张说抢了风头，继而弟弟张嘉祐又突然被人检举揭发，说他贪污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

这下麻烦大了。弟弟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身为宰相的哥哥自然逃不了干系。

就在张嘉贞忧心忡忡的时候，张说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告诉张嘉贞，你也不用太着急，事情反正已经这样了，而今之计，你最好先不要上朝，而是换上素服在家里待罪，让皇上觉得你诚心悔过，也许事情还有转机，结果也不至于太坏。

尽管张嘉贞明知道张说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可人在倒霉的时候，脑袋往往也不太清楚。彷徨无措的张嘉贞想来想去，觉得张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于是就听从了他的劝告，此后一连几天都没去上朝，而是躲在家里闭门思过，专心忏悔。

张嘉贞没有想到，他这么做，其实是在自我毁灭。

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上朝，还能当面向玄宗表明清白，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君臣面对面把事情说开了，或许玄宗还会网开一面，饶他这一回；可现在他躲着不上朝，其结果并不会让玄宗觉得他是在悔过，而只会让人觉得他这是做贼心虚，所以没脸见人。

这一年二月十三日，一道贬谪令就递到了张嘉贞手上——他被罢免了宰相之职，贬为幽州（今北京）刺史。

直到这一刻，张嘉贞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又一次被张说那老狐狸算计了。

可事已至此，无由挽回，张嘉贞只有怀着满腔悔恨打点行囊，黯然离开朝廷。

短短十几天后，张说就顺理成章地顶了张嘉贞的缺，荣升中书令，成了首席宰相。张嘉贞气得咬牙切齿，逢人便说："中书令的名额有两个，他张说何必非得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言下之意是双方大可以平分秋色，相安无事，不一定非要斗个你死我活。

可这显然是失败以后才会有的言论。在他没下台之前，就算张说想和他平起平坐，他张嘉贞肯干吗？

当然不肯。

所以说，人在台上和台下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其实，为官的道理大致跟挤公交类似。还没挤上去的时候会拼命嚷嚷，说上面还有位子，大伙再挤一挤；可一挤上去，就会冲后面的人吹胡子瞪眼，大骂别人眼睛瞎了，明明没位子了还挤，甚至恨不得踹下面的人两脚。

张嘉贞前后不同的心态，大抵如此。

张说与张嘉贞的二虎相争，就这样以张嘉贞的落败告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一年多之后，二张之间又当面发生了一次摩擦。准确地说，是上演了一幕小小的闹剧。

张嘉贞罢相的第二年，又被玄宗征召回朝，就任户部尚书。玄宗为了化解他和张说的矛盾，特意命中书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尽管张说很不情愿，可天子之命又不能违抗，只好硬着头皮出面作陪。两人一见面就大眼瞪小眼，现场气氛十分尴尬。勉强喝过几杯之后，张嘉贞

突然借着酒劲发飙，冲到张说的面前破口大骂，甚至挽起袖子准备揍他，还好被源乾曜和王晙等人死死拦住，才没出什么大事。

堂堂宰相因权力之争而结仇，到最后甚至搞到当众打架，委实有辱斯文。满朝文武听说之后，都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此时的大唐百官们并不知道，张说和张嘉贞的矛盾斗争其实只是一个引子，在未来的帝国政坛上，宰相之间的纷争还将一次又一次地频繁上演。换言之，以张说复相、张嘉贞罢相为标志，开元初期那种宰相班子同心同德的良性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对玄宗而言，让张说取代张嘉贞，并不是他的决策失误，而恰恰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张嘉贞虽说是一个挺能干的大臣，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入相后也以“断决敏速，善于敷奏”著称，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事务型宰相，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更不能满足玄宗对宰相的需要。

正如前文所说，此时的玄宗，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制定方向，统揽全局，渲染文治武功，铺排盛世风光的全能型宰相。而除了张说，还有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呢？

没有了。

所以，历史注定要在这一刻，把文武双全的张说推上帝国政坛的巅峰，而张说也注定要在这一刻，把玄宗治下的大唐帝国推向历史的巅峰。

套一句很俗的话，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也叫英雄造时势。

封禅泰山：走向历史之巅

其实也怪不得玄宗会大力提拔张说，因为他这个人确实有才。

张说开元九年年底回朝，第二年就在军事上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这两项改革最终都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三年上半年，他又在文化建设、政治宣传方面开创了崭新局面，下半年，又对宰相制度进行了改革；第四年，又“首建封禅之议”，并且积极筹划，一手操办，终于在次年成功举行了泰山封禅。

在有唐一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张说的上述举措几乎都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首倡和筹划下，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举行的泰山封禅，更是大唐全盛时代来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下面，就让我们近距离地看一看，作为一个文武兼济的全能型宰相，张说是如何从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帮玄宗打造一个巍巍煌煌的太平盛世的……

由于张说在边疆任职多年，对帝国的边防事务了如指掌，对其中存在的积弊更是洞若观火，因而他复相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对冗员充斥的边防部队实施了大规模裁员，让裁撤下来的这些人员全部返乡务农。

此次裁军人数说出来令人咋舌——足足有二十多万！

当时唐朝的边防军总数不过六十几万，这一裁等于裁掉了三分之一。乍一看，这对于一个边境线漫长、强敌环伺、边患频仍的帝国而言，实在是有点伤筋动骨的危险。自从高宗末年，武曌当政以来，帝国在军事上就频频失利，几乎同时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军事威胁。西线有吐蕃王国的强势崛起，北方有东突厥第二汗国的死灰复燃和急速扩张，东北有奚和契丹的叛乱，在西域又与西突厥反复争夺，连年征战……尽管到了开元时代，大唐帝国与各条战线上的对手们基本上都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强敌环伺、边患频仍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当张说向玄宗提出这项裁军建议的时候，玄宗心里顿时充满了疑虑。

二十多万？

一下子裁这么多人，是不是有点伤筋动骨了？

然而，在张说看来，这二十多万边防戍卒既非筋，也非骨，只能说是一堆可有可无的烂肉。

为什么这么说？

张说向玄宗道出了实情。他说：“陛下，臣久在疆场，十分清楚边防军的情况。那么多边防戍卒，其实并不都是在捍卫边疆的，而是将帅们用以自保的私人武装和任意驱使的工具罢了。而且，兵贵精不贵多，真的要御敌制胜，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与其白白浪费这些劳动力，妨碍农业生产，还不如让他们回家种田。陛下如果不放心，臣愿意以阖家一百多口人作担保！”（《旧唐书·张说传》）

玄宗经过慎重考虑，最后还是同意了张说的裁军计划。

就这样，张说这个“朝廷大手笔”振臂一挥，二十多万人就解甲归田了。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二十多万青壮劳力返乡务农，无疑可以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所以，尽管裁军举措表面上是属于国防政策，但实际上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却是体现在经济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说新官上任烧的这第一把火，其实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开元时代的经济发展，影响殊为深远。

紧继裁军行动之后，张说在军事上推行的第二项根本性的改革就是改“府兵制”为“募兵制”。

府兵制起源于西魏，完善于北周，是宇文泰创立的一项“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被隋、唐沿用，至玄宗开元年间，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七十余年。按府兵制规定，凡二十至六十岁的农民，平时在家务农，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奉调出征，每年还须轮番宿卫京师，并轮流到边疆镇戍。

显而易见，府兵制最大的好处就是：国家不用养兵，可以省去一大笔国防开支。但是最大的弊端也在这里。按规定，府兵出征时的武器、装备、粮食、日常用品等等，一切均需自备。这固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可对于个人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负。为国家卖命打仗，还要花自己的钱，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

唐朝初年，国力强盛，社会稳定，制度比较健全，府兵虽然负担重，但他们可以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分配到足够的农田，本人还可免除租赋徭役，而且无论是出征还是宿卫，都有严格的制度保障，兵役一结束便可回家务农，因此经济相对比较优裕。然而，到了高宗末年和武曌时代，豪强兼并之风大起，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很难分配到足额的田产，加之国家连年征战，府兵家属承担的租赋徭役日重，而府兵出征戍边的时间又严重逾期，往往是壮年应征而白首未归，导致家中田地经年抛荒，府兵及其家属普遍陷入贫困，甚至濒临破产。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在役的府兵还是即将服役的适龄青年，要想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只有一个字——逃！

只有带上妻儿老小，逃离他们的户籍所在地，跑到别的地方垦殖开荒，他们才能活命。就算日子依然困窘，但至少不会战死，不会饿

死，而且一家人还可以在一起，不用承受生离死别之痛。

从武周时代起，户口逃亡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府兵制渐趋衰败。及至玄宗开元初年，逃亡人口有增无减，府兵制更是名存实亡，根本抽调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宿卫京师。（《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说向玄宗提出了改革兵役制度的建议。他采取的办法是：面向全国的所有青壮年公开招募，不问背景，不问资历，不追查过去，并提供优厚待遇。张说相信，只要采取这种新的兵役制度，已经逃亡的府兵必定会争先恐后地前来应征。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九月，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开始实行募兵制。果然不出张说所料，短短旬日之间，朝廷便招募了足足十三万精兵。

至此，已经在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实行了一百七十余年的府兵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被募兵制所取代。

“兵农之分，从此始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张说的这项改革，不仅使国家的兵源得以恢复，使军队实现了职业化，大幅提高了兵员的专业素质，而且彻底消除了老百姓的兵役负担，让大量的青壮劳力回到了田间地头，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经济繁荣。因此，此举跟裁军一样，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一项于国于民都有极大利益的德政。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盛世修史的传统。

无论哪朝哪代，帝王和士大夫们总是把此举视为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的象征，并以此作为衡量盛世的主要标准之一。远的暂且不说，仅以唐初的贞观时代而论，在唐太宗治下的短短二十余年间，官方修纂的前代正史就多达八种，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堪称规模空前的一大文化盛举。唐代以后，每逢国力较为强盛的时候，官方就会适时启动庞大的修书计划，而且往往一代比一代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种类更多，卷帙更繁。比如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四库全书》等，无不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彰显其盛世气象而倾力为之的重大文化成果。

而唐玄宗之所以起用张说，其主要目的之一，当然也是让这个“一代文宗”能够在“文治”上作出贡献。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创办了丽正书院（两年后更名为集贤殿书院），由张说领衔，担任“修

书使”主持院事，然后汇聚当时的文学英才（其中就有著名诗人贺知章），以四部分类法对古籍进行全面的编校整理，同时承担为皇帝讲解经史的职能。书院成立后，玄宗特意交代有关部门，一定要为书院提供最好的设施和条件，并为院士们提供最优厚的待遇。

由张说领导的这个书院，既是当时最具权威的文化机构和思想库，也是皇帝的决策咨询机构和智囊团，同时更是推进文治，铺排盛世风光的主阵地。说白了，其政治宣传的功能并不亚于文化建设的功能，甚至前者的色彩远比后者更浓。

史称张说“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旧唐书·张说传》）。这“粉饰盛时”四个字，就是玄宗赋予集贤院的主要政治使命。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玄宗的意图。

当时，有个别政治嗅觉比较迟钝的朝臣，对书院的创办就持否定态度。尤其是看到那些院士们一个个既尊贵，又清闲，还能享受高额津贴，有人就更是眼红得要命。比如一个叫陆坚的中书舍人，就曾经在朝会上公开发牢骚，说这些院士都是吃干饭的，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徒然浪费国家资源而已，还说他一定要上疏，奏请皇帝撤销书院。

张说听说后，亲自去找陆坚，当面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这段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国家太平无事之时，通常都会大兴土木，纵情声色。可唯独当今天子能够尊崇儒学，延揽文士，研究古籍，阐扬经典，这么做对国家大有裨益，相应的花费实在算不上什么。可见陆先生您说的那些话，是何其无知、何其狭隘啊！很显然，张说这番话，表面上是说给陆坚听的，其实是说给玄宗听的。

玄宗得知此事后，当然对张说非常满意，也对他越发倚重。而那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陆坚，则引起了玄宗的强烈反感，这辈子要想再升官，估计是比登天还难了。

张说自从取代张嘉贞成为中书令后，就成了帝国的首席宰相，然而在他看来，自己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很多无形的制约，难以放开手脚。

让他感到掣肘的，并不是具体的哪个部门或官员，而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本身。

唐代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大多数时候，宰相都在六至十人之间。这些宰相本身都是三省或六部的长官，上午在“政事堂”集中议政，下午各回本省或本部办公，所以都是兼职宰相。而政事堂也只是举行联席会议的场所，并不是凌驾于三省六部的决策机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个别宰相大权独揽。此外，从机构职能来看，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驳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之间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也能有效防止宰相专权。

尽管到了玄宗时代，宰相名额已缩减为二至三人，首席宰相的权力也已远远大于初唐时期，但是制度的惯性力量仍在，所以就算是首席宰相，在具体工作中也还是会受到很多限制。

为此，张说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得到玄宗的批准后，“政事堂”被取消，改为“中书门下”，同时下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管各项政务。

这是大唐立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行政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引起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名称那么简单，而是从一个议政场所变成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次，无论宰相是三省长官还是六部尚书，也都由兼职变成了专职，从此不需要在宰相官署和本司之间两头跑，“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旧唐书·杨国忠传》）；最后，中书省和门下省成为一个联合的宰相官署，就意味着把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取消了，同时，五房的行政职能又基本对应于尚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就相当于把尚书省的行政权力也架空了。如此一来，中书门下既是最高决策机构，又兼具最高行政机构的职能，首席宰相便可以随时绕开六部，让五房直接贯彻他的政策意图了。

上述三点变化，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三省分工趋于模糊，分权体制宣告瓦解，首席宰相一人独大。

这项改革的好处是：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彻底杜绝扯皮、推诿等现象，可以迅速而高效地执行皇帝和宰相的政令。但是弊

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极易导致宰相专权。若干年之后，大唐帝国之所以会出现一个独揽朝纲十九年的权相李林甫，未尝不是此次改革埋下的祸根。

完成上述这几项重大改革后，张说就步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了。此时的张说上有天子宠信，下有百官拥戴，要声望有声望，要政绩有政绩，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真可谓万事顺遂，风光无限。

一般人走到这一步，肯定会感到心满意足了。可是，张说并不满足。对他来讲，这一切固然令人自豪，却不足以令他止步。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什么事？

封禅。准确地说，是由他牵头，帮助玄宗完成泰山封禅。在张说看来，只有做完这件事，他才能以一个盛世贤相的光辉姿态当之无愧地走进青史。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一月，张说“首建封禅之议”，满朝文武群起响应，“屡上表请封禅”（《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一再表示谦让，而张说则率领百官和四方文学之士再三请愿，“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旧唐书·礼仪志三》）。

在作足了一番姿态后，玄宗才颁下一道《允行封禅诏》，宣布将于来年十一月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封禅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的重大仪式。古人认为，只有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帝王贤明、天下大治的情况下，才有资格举行封禅。用张说在《大唐封祀坛颂》中的话来说，就是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意思是政权必须具备正统性与合法性；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亦即天下太平，国力强盛；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指帝王必须具备高尚圣明、崇文重道的品德。

在张说看来，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举行封禅才能名实相副。“是谓与天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未许，其如天何！”（《全唐文》卷二二一）

正是因为条件如此苛刻，所以在唐朝之前，举行过封禅大典的皇帝只有三个：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此后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而无人敢行封禅。迄至唐代，太宗君臣亦曾有过封禅之议，最后却因各种

原因不得不取消。直到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李治凭借太宗李世民缔造的盛世余威，才以守成之主的身份举行了泰山封禅，但后人普遍认为他不具备封禅的资格，称其“封岱礼天，其德不类”（《旧唐书·高宗本纪》）。至于女皇武曌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举行的嵩山封禅，更是因其女主身份而得不到后人的认同。

而作为大唐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封禅，玄宗此次封禅应该说是最符合条件的。

首先从个人条件来看，与高宗李治和女皇武曌相比，李隆基身上似乎更具有创业色彩。众所周知，李隆基完全是凭借个人奋斗和不懈努力才取得天下的，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奋斗，才终结了“后武曌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使得大唐帝国不至于在“牝鸡司晨”的梦魇中继续沉沦。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宗李隆基与太宗李世民的创业历程最为相似，他们所拥有的人格魅力也最为相近。如果给大唐开国以来的七个皇帝制作一个“个人综合素质排行榜”，那么玄宗应该和太宗一样，都是属于名列前茅的。

其次，从社会条件来看，正是因为玄宗和太宗一样，深知“草创之难”，所以在亲政之后，他才会“依贞观故事”，任贤纳谏，兴利除弊，并通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使得国力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累岁丰稔”“年谷屡登”。据唐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称，唐玄宗封禅泰山前后，大唐天下“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由此可见，此时的大唐帝国确实已经呈现出一派繁荣富庶的盛世景象。

综合上述的主客观条件，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的唐玄宗是配得上“治世明君”之称号的，因此当然也就有资格举行一次“受天命，告成功”的封禅大典。

玄宗的《允行封禅诏》颁布后，以张说为首的文武百官就开始了礼仪制定、文告草拟、议程安排、人员派遣、物资调配等一系列筹备工作。在紧张忙碌地筹备了将近一年之后，张说等人的工作才宣告完成。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十一日，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启程前往泰山，随行的有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各国使节，以及大批的军队和侍从人员，一路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扈从人员所骑的数万匹马，分别以不同颜色单独编队，或纯白，或纯黑，或棕

黄，或枣红，形成了一个个色彩鲜明的方阵，远远望去，如同大片大片的锦缎铺展在大地上。在绵延不绝的大队人马后方，还有满载各种物资的后勤车队，从首至尾长达数百里。每当封禅队伍停下来进餐或休息，方圆数十里内全是人员和马匹，熙熙攘攘，万头攒动……

此次封禅规模之浩大，场面之壮观，比之高宗当年的封禅，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一月初六，浩浩荡荡的封禅队伍终于来到泰山脚下。玄宗命百官、仪仗和军队留在山下，仅率张说等中书门下的主要官员、宗室亲王及负责祭仪的礼官登山。

十一月初十，玄宗君臣在泰山顶峰正式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

仪式开始后，礼官在封坛上高声宣读告天玉牒："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上帝眷祐，赐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旧唐书·礼仪志三》）随后，玄宗亲自主持初献，由邠王（原豳王）李守礼主持亚献，宁王李宪主持终献。

献礼毕，玄宗亲手点燃了堆满柴薪的"燎坛"。当巨大的火焰腾空而起，群臣山呼万岁，山下的文武百官和大队人马立刻响应，一时间万岁之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此时此刻，正值不惑之年的李隆基伫立在高耸入云的泰山之巅，俯瞰着莽莽苍苍的帝国山河，回首过去四十年的峥嵘岁月，眺望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不禁豪情满怀，感慨万千。

是的，李隆基有理由为这一刻感到自豪。因为这一刻，他所登临的不仅是泰山之巅，同时也是历史之巅。因为他终于实现了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开启了一个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

这一刻注定要彪炳千秋，永垂史册。

以开元十三年的泰山封禅为标志，大唐帝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盛时代。

后人把这个时代称为盛唐。

然而，与盛唐的绝世繁华同时到来的，则是玄宗李隆基日渐膨胀的欲望，以及帝国高层日趋复杂的矛盾斗争。

从外朝的宰相，到内宫的后妃；从骄恣的宠臣，到得势的宦官；从权相的崛起，到太子的废立，这样的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绚丽斑斓的盛世画卷背后，涂抹着另一种诡谲、阴郁、变幻不定而又令人心悸的色彩……

[1]　这个王晙，就是当初救了刘幽求一命的那个桂州都督，时任朔方军节度使。

[2]　高宗调露年间，唐朝在河套地区为归降的突厥人设置的六个羁縻州，分别是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大唐兴亡三百年 5

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
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

王觉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兴亡三百年．5 / 王觉仁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115-5491-8

Ⅰ．①大… Ⅱ．①王… Ⅲ．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Ⅳ．①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9575 号

书　名	大唐兴亡三百年．5
作　者	王觉仁
出版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邀编辑	汪超毅　沈　骏
封面设计	谢明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字　数	297 千
印　张	21.75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491-8
定　价	5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开元盛世背后

都是封禅惹的祸：张说下台

后宫的战争
致命的舌头：宠臣与宦官的对决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上）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下）
第二章 权相李林甫登场
李林甫：一个问题青年的奋斗史
冰与火的较量
最后一击：张九龄罢相
太子废立
第三章 天宝政局
命运之神的雷人想象
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
李白：落入凡间的天人
口蜜腹剑：权力的独角戏
罗钳吉网：酷吏的兴起
东宫危情：韦坚谋反案
将星陨落：石堡城事件
第四章 安禄山的骚动
安禄山：偷羊贼的祸福人生
一个男人的心灵被撩动了
杨国忠：小混混的华丽转身
天宝大狱

李林甫把自己吓死了

最后的博弈：狼来了吗？

第七十一个春天

第五章 安史之乱爆发

狼真的来了！

威震中亚：高仙芝的锋芒

怛罗斯之战

封常清：我很丑，可是我很努力

东京洛阳的陷落

名将之死：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第六章 对峙：唐朝与伪燕

星火燎原：河北的抵抗

临危受命：郭子仪和李光弼

史思明的梦魇

四面楚歌：安禄山的恐惧

哥舒翰：生死潼关

灵宝之战

第七章 逃亡进行时

孤独的长安

千乘万骑西南行

马嵬驿之变

分道扬镳：你往何处去？

肃宗登基

灵武：帝国的灵魂

长安乱

第八章 大唐反击战

李泌：布衣“宰相”

张良娣：这个女人有心机

一个被失望笼罩的冬天

安禄山之死

建宁枉死，永王兵变

第一章 开元盛世背后

都是封禅惹的祸：张说下台

泰山封禅这桩盛事，不仅让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历史的巅峰，同时也让宰相张说走上了人生的最高处，达到了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在当时的满朝文武中，借封禅之举而极尽荣耀、备享尊宠的，几乎只有张说一人。因为他不仅全程策划了这场盛典，而且自始至终陪同在皇帝身边，抢尽了所有人的风头，俨然成了整个封禅活动中仅次于玄宗的二号人物。玄宗这个领衔主演有多风光，张说这个总策划人就有多炫！

然而，月盈则亏，水满则溢，顶点的到来就是下降走势的开始，从灿烂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腐烂。这既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是人世间的普遍法则，任何人概莫能外，张说当然也不能幸免。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玄宗君臣从泰山回到东都还不到半年，山呼万岁的余音还在人们的耳旁萦绕，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封禅大典的总策划人张说，突然从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变成了披枷戴锁的阶下之囚。

到底出了什么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张说这个人有才，可有才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恃才傲物。自从他就任首席宰相以来，凡是百官向他禀报事情不合他意的，轻则被他讽刺挖苦，重则遭他厉声叱骂，总之在他手底下当差，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那些被他“面折”过的官员，没有人不在背后诅咒他。

假如张说只是让一般官员讨厌，那问题倒也不大，可关键是他太过专横霸道了，一心打压冒尖的人，结果跟皇帝新近宠任的一个大红人也成了死对头。

这个人，就是开元中期著名的财政专家——宇文融。

宇文融，长安万年县人，高门显宦出身，曾祖父官至隋朝礼部尚书，祖父宇文节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宰相，父亲也官任莱州刺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注定了宇文融在官场上绝不会无所作为。史称他“明辩有

吏干”，入仕没多久，就受到了前后两任京兆尹的赏识（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宰相源乾曜）。

宇文融的发迹始于开元九年。当时，民间的逃户现象非常严重，朝廷深以为患，时任监察御史的宇文融就向玄宗上奏，建议对各地的逃亡、迁移和虚假不实的户口进行彻底清查。一向对其才干甚为欣赏的侍中源乾曜也极力赞成此事。玄宗遂任命宇文融为特使，专门负责逃户和“籍外田”（不在当地政府登记注册的农田）的清查工作。

宇文融没有让玄宗失望，很快就查获了大量逃亡人口和私自开垦的农田。玄宗非常满意，立刻擢升宇文融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让他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政绩，宇文融又奏请玄宗，专门设置了十个“劝农判官”，让他们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分赴全国各地，负责监督括户政策的执行。

特使们邀功心切，遂不顾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以严厉的督责手段逼迫州县官吏加大括户力度。由于宇文融圣眷正隆，连朝廷公卿都惧他三分，各州县的地方官就更是不敢抗命，为了交差，只好弄虚作假，把当地的原住户也当成逃户报了上去，“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逃亡人口被查出这么多，所谓的无照农田也查出这么多，各地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就大幅增长了。当年底，朝廷就额外“征得客户钱数百万”（《旧唐书·宇文融传》）。

对此，玄宗自然是满心欢喜。

即便民间颇受其弊，很多老百姓也被搞得苦不堪言，可玄宗看不见这一切，只看见了宇文融的显著政绩。当时有个地方官曾上疏朝廷，力陈括户政策导致的各种弊端，却旋即遭到贬谪。不久，又有一个户部侍郎据实上奏，称此次括户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但奏章一上，又被玄宗贬出了朝廷。此后，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对此多说一个字，而宇文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玄宗最倚重的财政专家。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八月，宇文融荣升御史中丞，并以“劝农使”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面对这个天子宠臣，各州县官吏拼命巴结，不管政务大小，一律先禀告宇文融，然后再上奏中书省；朝廷有关部司也都不敢随意批复，总是眼巴巴地等到宇文融拿出处理意见后，才敢作出裁决。

一时间，宇文融俨然成了无冕宰相。

眼看宇文融权势日隆，张说当然是极度不爽，于是处处给宇文融小鞋穿。此后，凡是宇文融提出的议案和建言，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说的否决。

正在春风得意的宇文融当然受不了张说的打压，遂将其视为头号政敌，处心积虑想把他搞垮。

就这样，张说和宇文融结下了梁子。

不过，假如张说只是得罪了一个宇文融，恐怕也不至于落到锒铛入狱的下场。他毕竟是首席宰相，无论是资历、威望、贡献，还是天子宠信，哪一点都胜过宇文融。所以，导致张说败落的主要原因，其实也还不是出在宇文融身上。尽管最后出面扳倒张说的人是宇文融，可如果不是张说自己身上出了非常大的纰漏，不管宇文融再怎么使劲，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他送进监狱。

那么，张说到底出了什么纰漏呢？

说到底，还是封禅惹的祸。

虽然策划封禅是张说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但是，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张说虽然通过封禅成就了不世之功，但也恰恰是因为封禅酿成了不虞之祸。

准确地说，是张说在此次封禅中犯了众怒，把不该得罪的人全都得罪光了。

从封禅动议刚一提出来，张说就和另一个宰相源乾曜干上了。

源乾曜本来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不管是以前的姚崇，后来的张嘉贞，还是现在的张说，源乾曜都心甘情愿给他们当绿叶，老老实实无怨无悔，什么事都顺着他们，从没和他们急过眼。可这次不一样，这是封禅！事情太大了，他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源乾曜的看法是：封禅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物、财力，既劳民伤财又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所以能不搞就不要搞。

然而，一贯目中无人的张说根本不把源乾曜当一回事，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在劝请的奏章中，每一次都把源乾曜的名字强行署了上去，简直有点绑架的意味。源乾曜虽然对此无可奈何，但从此对张说极为不满。所以，当后来源乾曜成为张说一案的主审官时，就公事公办，据实上奏，一点情面也不讲，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除了触怒源乾曜之外，张说也触怒了朝中的文武百官。

因为封禅是件普天同庆的大事，所以相关的制度规定，凡是陪同天子上泰山的礼官，不管之前的官阶多高，一旦参与了盛典，天子就予以“推恩”，一律超拔为五品官。而满朝文武那么多人，当然不可能都以礼官的身份上去。所以，谁能上谁不能上，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

这个标准谁来定？

当然是张说。

如果你是张说的亲信、朋友、亲戚，或是中书门下的官员，平时又很会巴结老大，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用礼官的身份上去了。就算你原来是九品，爬一回泰山你就“通贵”了，胜过你奋斗大半辈子。

假如你完全不符合上述条件，是不是就没戏了？

不，你还可以临时抱佛脚，揣上一些黄白之物或者贵重珍玩去拜访一趟张老大。倘若分量不是太轻的话，那也要恭喜你，你也可以“通贵”了。

这就是封禅背后的猫腻。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光鲜亮丽的事情背后藏有如许见不得人的猫腻，满朝文武的眼睛自然就会像探照灯一样，牢牢锁定在张说身上。所以，当随同天子登山的人员名单一公布，百官立刻炸开了锅，纷纷指责张说滥用职权，营私舞弊。

其实，早在张说公布这份名单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下属提醒过他了，说这么干太过招摇，恐怕会惹来众怒，力劝张说三思后行。

这个下属就是后来的著名宰相张九龄，其时官任中书舍人，因富有文学才华而深受张说赏识。

可是，一贯专横的张说并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谏，还是一意孤行地把名单公布了，于是就把满朝文武全给得罪了。

在得罪文武百官的同时，张说还得罪了另外一大拨人。从人数上看，这拨人的数量最大，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力量自然也不可小觑。

这拨人就是护卫天子出行的数万士卒。

整个封禅行动，最辛苦的莫过于这些当兵的。朝廷官员乘车骑马，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步行；夜里当官的都睡了，他们还要站岗放哨、巡逻值夜。所以，几乎每个士兵都认为，封禅结束后，他们肯定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赏赐。

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由于封禅活动耗费甚巨，张说为了节省经费，就只给士兵们“加勋”，而没有发放任何物质上的赏赐。这些当兵的眼巴巴地盼着赏钱，结果只盼来了没有任何鸟用的荣誉称号，一个个肺都气炸了，拼命在心里问候张说的祖宗十八代。

“由是，中外怨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就这样，张说把参与封禅的人几乎都得罪光了。

可纵然如此，也还不是张说败落的最主要原因。

假如张说因策划封禅而进一步受到玄宗宠信的话，那么就算天下人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最后也还是奈何不了他。换句话说，只要哄得皇帝开心，把天下人全得罪了又有何妨？就算天塌下来也有皇帝顶着！

然而，张说的不幸在于——就连他竭尽全力要讨好的天子，最后也对他产生了不满。

这才是最要命的。

玄宗之所以对张说不满，就是因为他在拟定登山名单的事情上太过独断专行了。

就在封禅礼毕的几天后，玄宗大宴群臣，席间有一个穿五品大红官服的年轻官员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这个年轻人是张说的女婿，名叫郑镒。

玄宗记得很清楚，郑镒本来只是一个九品官，印象中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为何短短几天就连升四品了呢？

玄宗随即把郑镒叫到跟前，问他突然升官的原因。郑镒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还是玄宗身边一个叫黄幡绰的优伶帮他作了回答。

黄幡绰不无讥讽地笑着说：“此泰山之力也！”（段成式《酉阳杂俎》）

这句话既是在提醒玄宗，这个郑镒就是前几天在泰山顶上被“推恩”授官的人之一，同时也是在暗讽郑镒，说他纯粹是靠岳父的关系才得以连升四级的。后人之所以称岳父为泰山，其典故正出于此。

玄宗闻言，心里大为不快。

敢情那天跟自己同登泰山的所谓“礼官”，都是张说的亲党啊？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吗？

由此，玄宗对张说的倚重和信任之情大打折扣。

自从封禅归来，张说表面上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其实明眼人不难发现——张说已经失去天子的信任了。

开元十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张说的失宠。

当时，玄宗征召河南尹崔隐甫入朝，准备授予他御史大夫的要职。张说认为此人粗鄙无文，便奏请玄宗改任其为金吾大将军，同时推荐了另一个人选。

这个人就是几年前因贪赃受贿而遭贬谪的崔日知，据说与张说私交甚笃。

张说的奏章呈上后，玄宗愤怒了。

好你个张说！朕看中的人你认为粗鄙，可你自己推荐的又是什么货色？一个品行不端的腐败官员！就因为和你张说是好友，你就敢公然推荐他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什么官？是监察百官的官！一个连自己品行都有问题的官，又如何监察百官？朕把中书令的大权交到你张说手上，难道就是让你这么干的？

玄宗断然否决了张说的提议，还是依照原计划把崔隐甫调到了中央，担任御史大夫。

崔隐甫走马上任之后，听说自己差一点被张说搞掉，当然对他恨之入骨。

就这样，张说又多了一个仇敌。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张说基本上是自绝于人民了——除了跟他爬上泰山的那一小撮亲党外，他在朝中已经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眼看张说自己一步步走到了悬崖边上，他的宿敌宇文融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宇文融马上去找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新上司、御史大夫崔隐甫，还有一个就是日后大名鼎鼎、权倾朝野的李林甫，他不久前因宇文融援引，与他同任御史中丞。

三个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头行动，大力搜集张说违法乱纪的证据。

这一次，张说注定是在劫难逃了。

搜集罪证、弹劾高官历来是御史台的看家本领，何况现在又是纪检部门的三个主要领导联手，加上张说自己的屁股又不干净，皇帝也已不再信任他，如果这样还不能把他扳倒，那简直是没天理了。

敏锐的张九龄觉察出了宇文融的异动，忧心忡忡地告诫张说："宇文融受皇上宠信，正吃得开，而且头脑精明，工于权术，您不可不防。"

可是，一贯自负的张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他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鼠辈何能为！"（《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开元十四年四月初四，张说眼中的"鼠辈"便正式向他发难了。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联名上疏，以三项罪名弹劾张说：一、私交术士，占卜星象；二、结党营私，腐败奢侈；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这三大罪名，随便哪一条都够张说喝一壶的。

此案引起了玄宗的高度重视。他立刻将张说逮捕下狱，随后指定侍中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会同御史大夫崔隐甫，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

这时张说早把朝中的官员都得罪光了，大伙都盼着他早点完蛋，所以审讯结果可想而知。源乾曜等人会审后一致认为：此案证据确凿，张说罪无可赦。

直到此刻，张说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公卿百官的众矢之的，成了朝野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暗无天日、肮脏潮湿的牢房中呆了几天后，张说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当宦官高力士受玄宗之托前来探监时，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首席宰相，而是一个披头散发、目光呆滞的干巴老头。

高力士叹了口气，回宫向玄宗奏报："说（张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玄宗闻言，也不禁有些怅惘。回想往日种种，张说还是为国家作了不少贡献，其文学才华也是当世少有，如果就此埋没，实在是可惜。

一向善于揣摩人主之意的高力士见状，赶紧对玄宗说，张说曾在东宫担任侍读，跟随陛下多年，且于国有功，理应从宽发落。

玄宗深以为然，数日后下令，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之职，其余一切如旧。

随着张说的下台，宇文融与张说的斗法总算告一段落。然而，政坛高层的矛盾纷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整个开元中后期，乃至整个天宝年间，帝国的高层政争还将越演越烈。目前的这场对决，只不过刚刚露出冰山一角而已。

就在外朝大臣相互倾轧的同时，玄宗的后宫也打响了一场争位夺宠的战争。

交战双方，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嫔妃。

这个皇后姓王，这个嫔妃姓武。

这一幕看上去似乎有些眼熟。

许多年前，帝国的后宫也曾有一位姓王的皇后，因无子而失宠，最后被废黜了皇后之位；还有一个姓武的昭仪，深受宠幸，咄咄逼人，"阴怀倾夺之志"，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戴上了凤冠。

如今的这位王皇后，一样是无子、失宠、色衰爱弛，后位岌岌可危；而如今这位姓武的妃子，正是当年那个武昭仪的侄孙女，并且跟她一样深受宠幸，咄咄逼人，也跟她一样"阴怀倾夺之志"……

一切似乎都与七十年前"废王立武"的那一幕如出一辙。

历史会重演吗？

后宫的战争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唐玄宗和王皇后都应该算是一对患难夫妻。

早在玄宗还是临淄王的时候，王皇后就是她的王妃了。当时韦后专权，李旦遭到排挤，整个李唐皇族的命运都有些前途叵测，至于小小的临淄王李隆基，更谈不上有什么远大前程。正常来说，就算后来李旦有了出头之日，李隆基作为庶出的第三子，充其量也就是做一个逍遥王爷，根本不可能有入主东宫的机会，更不用说登基当皇帝了。

所以说，在当时的情势下，王氏嫁给李隆基，就意味着要和他一起面对未知的命运，一起承担难以预料的祸福。换言之，要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王氏就必须和李隆基共同创业，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

后来，当李隆基开始策划唐隆政变的时候，王氏就成了他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上（玄宗）将起事，（王氏）颇预其谋，赞成大业。”（《旧唐书·后妃传》）由此可见，王氏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少奶奶，而是一个能和李隆基同甘苦、共命运的贤内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共患难的贤内助，只和玄宗一起享受了几年荣华富贵，就被彻底冷落了。

表面的原因，是她没有生育能力。

如果是在今天，女人不能生育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甚至很多女性不愿意生育孩子，也不会遭到丈夫的歧视或社会舆论的谴责。然而在古代，这可是非常要命的一种过失。因为古圣贤规定，女人只要犯了“七出”（丈夫休妻的七条理由）中的任何一条，她老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她休掉。而“无子”就是“七出”中的第二条，仅位列“不顺父母”之后，比“淫”“妒”“恶疾”“窃盗”还要严重。

更何况，王氏还是母仪天下的皇后，“无子”就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缺点，足以使她在皇帝和天下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可是，导致王皇后被冷落的原因还不仅仅是无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玄宗爱上了别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武氏。

武氏是女皇武曌的侄孙女、恒安王武攸止的幼女，算起来还是玄宗的表妹。武攸止早亡，所以武氏很小就被接到了宫中抚养。开元元年，武氏差不多十五岁左右时，被李隆基纳入了后宫。

也许是因为武氏多少继承了武曌的基因，或者是从小生长在宫中，受到了较好的文化教育，所以她不仅美丽温婉、举止优雅，而且熟悉古籍经史，言谈之间总是引经据典，颇有才女风范，因而很快就博得了玄宗的宠爱。自开元元年进入后宫，短短几年间，武氏就连续为玄宗生下了二子一女，而且一个个长得端正美丽、活泼可爱，让玄宗喜不自胜、爱不释手，同时也让不能生育的王皇后嫉妒得眼冒绿光，几欲抓狂。

可让玄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几个可爱的小皇子和小公主出生没多久，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夭折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玄宗为此伤心不已，但对武氏的宠幸却有增无减。

不久，武氏又生下了寿王李瑁（初名李清）。出于女人特有的直觉，武氏相信，把孩子留在宫中抚养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搞不好又会像前几个一样无疾而终。于是武氏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征得玄宗的同意后，把孩子送出了皇宫，寄养在孩子的大伯——宁王李宪的家中，连哺乳都是由李宪的妻子元氏代劳的。

后来，李瑁果然平平安安地长大了，在宁王府一直长到了十余岁，才被玄宗接进了宫中。

随着李瑁的健康成长，武氏的野心也开始逐渐膨胀。她深知，一个女人仅凭容貌，是不可能长久留住男人的心的。要想长保眼前的荣华富贵，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当年的武昭仪一样，不择手段地夺取皇后之位，然后再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入主东宫。

对于武氏的夺位野心，王皇后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她为此陷入了深深的忧愁和恐惧之中。

每当想起武氏那张妖艳的面孔，王皇后就会气得浑身哆嗦。可除了在心里一遍遍地诅咒之外，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情敌，更不知道该怎样避免被废黜的命运。出于本能，王皇后不止一次地在玄宗面前表现出了对武氏的痛恨，经常恶语相加，有时候说到伤心处或激愤处，还会出言不逊，把玄宗也给数落进去。

可想而知，王皇后这种“泼妇骂街”的行为只能招致玄宗对她更深的反

感。

有人说，憎恨别人就像是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你自己的房子，但耗子还不一定逮到了。

如今，王皇后用这种本能的方式发泄她的憎恨，的确既无助于逮到耗子，又面临着烧毁自己房子的危险。

本来玄宗对她只是冷落，现在玄宗对她几乎就是鄙夷和厌恶了。

于是玄宗开始把废黜皇后的事情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然，玄宗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件事情。废后毕竟是一桩大事，在没有很成熟的考虑之前，他不想轻易暴露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只是暗中和一个比较亲近的侍臣开始了相关的谋划。

这个侍臣就是先天政变的功臣之一，时任秘书监的姜皎。

姜皎跟随玄宗多年，早在临淄王时代，他就是玄宗的好友。玄宗即位后，表面上和他君臣相称，实际上友情依然如故，还是拿他当哥们儿，时常召他进入寝殿，“与后妃同榻”，一起击毬斗鸡、宴饮作乐，而且前后赏赐给他的“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旧唐书·姜皎传》）。先天二年，在铲除太平一党的过程中，姜皎积极参与谋划，事后因功拜殿中监，封楚国公，实封四百户。

开元初年，玄宗开始罢黜功臣，姜皎也因“权宠太盛”被“放归田园”，但是几年后便被重新起用，初为宗正卿，后任秘书监。

对于这样一个鞍前马后追随多年，既是功臣又是哥们儿的人，玄宗自然是非常放心的。而且姜皎对后宫的情况知根知底，玄宗老早就不把他当外人了，所以此刻要找人商量，没有谁比姜皎更合适。

然而，玄宗绝对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让人放心的哥们儿，得知他想废黜皇后，不仅没帮他拿什么主意，反而一出宫就把事情给泄露了。

史书没有记载姜皎泄露此事是有心还是无意，但是从他泄露的对象来看，似乎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对方是滕王李峤，身份比较特殊，既是宗室亲王，又是王皇后的妹夫，相当于跟玄宗既是堂兄弟又是连襟。所以姜皎很可能是对玄宗废黜皇后的事情不太赞同，但又不敢当面劝谏，只好跟李峤通气，希望他能劝玄宗回心转意。

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姜

皎完了。

从玄宗得知他把事情泄露出去后，就已经在心里宣判了他的死刑。

玄宗没想到，姜皎居然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废后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这小子就把风声传了出去，这不是撕破他李隆基的天子颜面，并且陷他于十足被动的境地吗？

玄宗也懒得去深究姜皎这么干的动机了，就算他是出于善意，也同样是不可原谅的。

盛怒之下，玄宗即刻命人逮捕了姜皎。几十年的兄弟和主从之情，就此恩断义绝、一笔勾销！数日后，玄宗以“妄谈宫掖”的罪名，把姜皎杖打六十，流放岭南。同时被株连的还有姜皎的弟弟姜晦，他从吏部侍郎任上一下子被贬为远地司马，此外还有亲党数人，或流放或赐死，一同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

姜皎带着浑身杖伤走上了流放之途，但是没走多远就含恨而终了。

由于闹出这场意想不到的风波，玄宗只好暂时搁置废后之事。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一旦时机成熟，玄宗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废掉这个黄脸婆！

都说男人一旦变心，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李隆基很快就将用他的实际行动，再次向我们证明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姜皎之死，为“伴君如伴虎”这句古训做了生动的注脚。这件事告诉我们，在皇帝身边讨生活，是一件多么艰难又多么危险的事情。而对于王皇后来说，姜皎事件更是让她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场意外风波，王皇后强烈感觉到了天子的决绝、冷酷和无情，同时也更强烈地预感到——姜皎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

好在王皇后平常待左右不薄，所以也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玄宗虽然一直想抓皇后的小辫子，可后宫的上上下下全都忠心护主、谨言慎行，所以始终找不到强有力的废后借口，只好让这件事一直拖着。

到了开元十二年秋，距姜皎之死已经过去整整两年，玄宗的后宫始终风平浪静，再也没闹出什么事情，貌似皇帝已经打消了废后的念头。

可王皇后知道，这是假象。除非自己的肚子争气，马上给皇帝生一个

大胖小子，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否则被废黜的危险就一天也不会消除了。

然而，儿子岂是说生就能生的？当初年轻时天天跟皇帝待在一块还老是没动静呢，如今皇帝一年半载才来敷衍一下，又怎么可能怀上呢？

除非出现奇迹……

一筹莫展的王皇后只好找她哥哥王守一商量。

对于妹妹的处境，王守一也是感同身受，焦急万分。因为妹妹一旦被废，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虽然他也是先天政变的功臣，可自从玄宗亲政以来，功臣就是衰人的代名词，远的如刘幽求他们，近的如姜皎，哪一个不是说下台就下台，说完蛋就完蛋呢？所以，要想保住荣华富贵，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祈祷上天垂悯，让妹妹赶紧生个儿子！

为此，王守一暗中找来了一个叫明悟的和尚，让他作法施咒，看能不能创造奇迹。

明悟大师胸脯一拍，这事包在贫僧身上！随后就帮王皇后做了一场“祭祀南北斗”的法事。具体的做法是：拿一块“霹雳木”，在木头上写上“天”“地”和“李隆基”的字样，再用这块木头祭祀南北斗，佩戴在王皇后身上，最后再让王皇后念一句咒语，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的确，明悟大师做完这场法事后，旷日持久的废后事件总算有了一个了局。

换言之，有人总算大功告成了。

谁？

玄宗。

当然，还有那个对皇后之位虎视眈眈的武氏。

玄宗和武氏苦苦盯了王皇后这么长时间，等的不就是这么一个破绽吗？如今王皇后如此自摆乌龙，又岂能逃过玄宗和武氏的眼睛？何况请和尚作法施咒这种事，在当时称为“厌胜”，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高宗时代的王皇后，就是因为搞厌胜被武昭仪揭发，才导致高宗下定了废后的决心。如今这个王皇后还来这么一套，又怎么可能不重蹈当年那个王皇后的覆辙呢？

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东窗事发后，有关部门调查后得知，明悟和尚教皇后念的那句咒语，居然是："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佩戴这块霹雳木，必定可以生儿子，而且将来还能像则天皇后一样！

像则天皇后什么？

傻瓜也知道，当然是像则天皇后那样临朝听政、大权独揽了。

假如咒语说的是"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类的东西，也许玄宗还不至于暴跳如雷，可偏偏神机妙算的明悟大师给整了这么一句，就休怪皇帝无情无义了！

开元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玄宗正式下诏，将王皇后废为庶人，打入冷宫，同时将王守一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别驾。

王守一惨惨戚戚地坐上了贬谪的马车，可刚刚走到半路，玄宗又追下了一道诏书，将他就地赐死。

三个月后，废后王氏在冷宫中郁郁而终。后宫上上下下，凡是侍奉过王氏的人，都为之怆然流涕，追思不已。

听到王氏去世的消息，玄宗李隆基也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毕竟是结发夫妻，毕竟共同经历过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如今斯人已去，玄宗独自凭栏，内心也不免有些悲伤和懊悔。（《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废后王氏卒，后宫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时隔七十余年，两个王皇后，两场废后事件，两幕宫廷悲剧，看上去竟然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目睹如此雷同的情节，观众似乎有理由质问：历史老儿的想象力何以如此贫乏，总是让一些相同的故事在同一个舞台上频频上演？

当年的高宗导演了一场"废王立武"的大戏，莫非今天的玄宗也会如此这般地再来一遍？

幸好，历史老儿的想象力还不至于彻底衰竭。在观众们即将丧失新鲜感之前，历史老儿总算及时宕开一笔，修改了第二场戏的结局。

——玄宗废王，但没有立武。

不是他不想立，而是他立不了。

因为大臣们不让他立。

开元十四年夏，也就是泰山封禅归来，张说刚刚下台不久，玄宗忙完了朝中的大事，就准备册封武氏为皇后了。

自从王氏被废后，后宫虚位已久，武氏没有一天不在他枕边念叨这件事。如今王氏也已去世一年多了，玄宗内心残存的一点怀念之情也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漠，所以，该是册立武氏的时候了。

然而，玄宗刚刚流露了这个想法，马上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武氏是李唐皇族不共戴天的仇人，岂可立为国母？而且，如今朝野纷纷传言，说张说企图暗中拥戴武氏，借此重回相位，事虽无凭，但不可不防。此外，当今太子非武氏所生，而武氏自己又有儿子，一旦立为皇后，太子必危！万望陛下三思。"

大臣的态度如此坚决，反对的理由如此充分，玄宗还能怎么办呢？

武后临朝给帝国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他玄宗比谁都清楚。难道他还要学当年的高宗，为了又一个姓武的女人跟满朝文武死磕？

此时的玄宗虽然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己自律、谨身节欲，可也远远没有像后期那样骄奢放逸、因私废公，所以，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向大臣妥协。

随后，玄宗给了武氏一个"惠妃"的封号，虽然没有皇后之名，但是"宫中礼秩，一如皇后"，算是在大臣和武氏之间取了一个折中。

这场后宫争夺战刚刚尘埃落定，另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接踵而至了。这场新的斗争发生在两大阵营之间。

一边是家奴出身的宠臣，代表人物是王毛仲。

一边是得势的宦官，其代表人物就是日后权势熏天的大宦官——高力士。

两派都是皇帝的心腹和近臣，都是深得玄宗宠幸的内廷势力。他们的对决，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比真刀明枪的厮杀更为惊险。

因为，在这场对决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那件武器，虽比刀剑无形，却比刀剑锋利；虽比刀剑柔软，却比刀剑致命。

它的名字叫舌头。

用刀剑杀人，很残忍，很暴力，儿童不宜。

用舌头杀人，不见血，很温柔，百无禁忌。

致命的舌头：宠臣与宦官的对决

王毛仲是一个出身不好，但一辈子运气都很好的人。

他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奴隶到将军。而且，这个将军还不是一般的将军，是深受皇帝宠幸的国公级别的大将军！

王毛仲的父亲是高丽人，估计是高丽被灭后加入了唐军，曾官任游击将军，后来犯了罪，官职被削，家属也被籍没为奴，所以王毛仲从小就成了奴隶。

可是，当奴隶却不是王毛仲厄运的开始，而是他一生好运的起点。

因为他的主人不是别人，是临淄王李隆基。王毛仲跟着临淄王，成天斗鸡走马，飞鹰逐兔，吃香的喝辣的，基本上没吃过一天苦头。名为奴隶，事实上不亚于王公子弟。后来，王毛仲在唐隆政变中当了逃兵，按理说再好的运气到这里也就完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居然原谅了他，还让他跟其他功臣一样当了禁军将领。

到了先天政变时，王毛仲学乖了，很是替李隆基出了一把力，事后拜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赐爵霍国公，实封五百户，从此脱胎换骨，由一个卑贱的家奴变成了人人敬畏的帝国功臣和当朝显贵。

开元初期，玄宗开始清理功臣集团，按说王毛仲也是在劫难逃，可他非但没被罢黜，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说到底，还是他的“家奴”身份救了他。因为他从小跟随在玄宗左右，和玄宗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最重要的是——像他这种出身的人，在朝

中没有根基，在政坛上没有势力，所以不会让玄宗觉得有什么威胁。

功臣集团被清理掉后，作为少数几个在朝的功臣之一，王毛仲更加得宠，经常与诸王、姜皎等人奉召入宫，在“御幄前连榻而坐”，与天子聚会宴饮。据说玄宗要是一天见不着他，就会闷闷不乐，若有所失；一旦见了他，立马笑逐颜开，赶紧拉他一块饮酒作乐，有时候甚至玩到通宵达旦。

王毛仲从玄宗那里获得的赏赐，有“庄宅、奴婢、驼马、钱帛”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不可胜纪”（《旧唐书·王毛仲传》）。王毛仲的正妻，本来已被封为霍国夫人，后来玄宗又赐给王毛仲一个小老婆，不仅在名分上与元配并列，而且连封号都共享。每次入宫朝谒，两个夫人总是成双入对，共承恩遇，别人领一份赏赐，王毛仲却能领双份。这两个老婆生下的几个儿子，小小年纪就被授予五品官职，且常常与太子一起游玩，贵如皇族后裔。

说起王毛仲所享的荣宠，还有一件事不可不提。

那是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冬，王毛仲的大女儿要出嫁，满朝文武争相送礼，都想借机巴结这位天子宠臣。玄宗也非常关心，问他还有什么需要，王毛仲拜谢说：“臣万事已备，就是有一两个客人请不来。”

当时的宰相是张说和源乾曜，除了玄宗外，最尊贵的客人莫过于他们两个了。玄宗说：“不就是张说和源乾曜吗，他们有什么不好请的？”

王毛仲答：“他们两位，早请到了。”

玄宗纳闷了，思索片刻，忽然明白过来，文武百官中，王毛仲唯一请不动的人物，估计就只有宋璟了。此公一向清高耿介、不阿权贵，虽说现在已不是宰相，可他的架子还是端得比谁都高，怪不得王毛仲犯难。玄宗笑着说：“放心吧，你要的客人，朕保证帮你请到。”

既然是皇帝亲自邀请，宋璟当然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第二天，宋璟果然应邀出席了。虽说在所有宾客中，宋璟是最晚到的一个，而且仅仅喝了半杯酒就推说身体不适提前离席，可谁都知道，能让从不应酬的宋璟来晃这么一下子，王毛仲的面子已经是够大了。同时大伙也都猜得出来，这是皇帝帮的忙。

当今天下，能请得动宋璟的人，除了皇帝还能有谁？并且，能够让皇帝出面帮忙请客的人，除了王毛仲，还能有谁？

王毛仲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王毛仲之所以荣宠若此，绝不仅仅是靠运气，也不仅仅是靠他的家奴身份。

在他的发迹过程中，这两项因素固然起了重要作用，可假如他没什么突出贡献的话，像李隆基这么精明的皇帝，是不可能长期宠幸他的。

说起王毛仲的贡献，概括地说就是两个字：养马。

自从玄宗亲政后，王毛仲除了大将军的头衔外，还有一个职务叫作“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这个官名很长，也很拗口，不过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简称——弼马温。

是的，弼马温。

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弼马温，因为它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中央禁军和帝国的边防部队提供战马。在古代，骑兵的地位和作用就相当于现代的坦克。在现代的常规作战中，没有坦克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冷兵器时代，没有骑兵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王毛仲这个古代的弼马温，要放在今天，就是陆军总装备部的部长。从单纯的技术角度而言，王毛仲在这个职位上的贡献大小，将直接决定帝国军队战斗力的强弱。

由此可见，玄宗让他当这个弼马温，并不是在冷落他，而恰恰是在重用他。

王毛仲没有辜负玄宗的重托。

唐朝立国之初，从隋朝得来的战马只有区区三千匹，经过将近五十年的精心蓄养和繁衍生息，到了高宗麟德年间，已经发展到七十万匹。然而好景不长，自高宗末年及武曌当政之后，帝国在军事上频频失利，战马数量损失大半，迄至开元初年，仅余二十四万匹。但是从王毛仲接手后，短短十余年间，战马数量又迅速回升到四十三万匹，将近翻了一番，其贡献不可谓不大。

为了展示王毛仲的工作成绩，同时也为了向四夷炫耀帝国的军事实力，玄宗东封泰山之时，特意命王毛仲精选了数万匹良马，“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旧唐书·王毛仲传》），在前往泰山的路上淋漓尽致地炫了一把。封禅礼毕，玄宗又加封王毛仲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一级，从一品），以此表彰他在蓄养战马上的功劳。自玄宗即位

以来，获得这个头衔的人只有四个：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宰相姚崇、宋璟，还有一个就是王毛仲。能和这三个人同授此官，足见王毛仲所获的荣宠之深。

王毛仲在玄宗跟前红得发紫，自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不过，一般的大臣不会嫉妒他。因为大臣们和他不是同一类人（出身背景不同），所以谈不上嫉妒。大臣中也许有人会喜欢他，有人会讨厌他，有人会亲近他，有人会排斥他，有人会敬畏他，有人会看不起他，但无论哪一种情绪，都跟嫉妒无关。这道理就跟男人有可能喜欢或讨厌女人的容貌，但绝不会嫉妒女人的容貌一样。

所以，会嫉妒王毛仲的人，最有可能是和他具有相同出身的人，亦即本来都是给李隆基当奴才的人。

这种人是谁？

宦官。

在当时，最嫉妒王毛仲的人，莫过于宦官首领高力士了。

高力士，潘州（今广东高州市）人，本名冯元一，是隋、唐两朝骁将冯盎的曾孙。武周圣历初年，其家因罪被抄，他被阉割为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他改名力士，送入东都朝廷。武曌看他聪明伶俐，就把他留在宫中担任随侍宦官。不久，力士因犯细微过失，遭武曌鞭挞，并驱逐出宫。就在举目无亲的力士即将饿死街头的时候，武三思门下的宦官高延福收留了他，并且认他为养子。从此，力士便以高为姓，留在武三思府中侍奉。一年多后，因武三思求情，高力士就被武曌重新召回了宫中。成年以后，高力士为人恭谨，办事严密，善传诏令，遂被授予宫闱丞之职。

玄宗为临淄王时，高力士倾心附结，追随左右，很快成了李隆基的心腹和忠实奴仆。先天政变中，高力士因参与诛杀太平一党，事后擢升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相当于宦官总管。从此，高力士风生水起，日益显赫。

有唐一代，宦官本来一直受到制约。唐初，太宗规定：内侍省的官职一律不能超过三品。至武周时期，武曌虽是女主当政，但宦官也还是没能得势；直到中宗一朝，宦官势力才逐渐抬头，宫中七品以上宦官已多达一千余人；而到了玄宗时代，宦官不仅在人数上增至三千余人，而且官秩越来越高，擢升三品将军者屡见不鲜，而穿红色（四

品、五品）及紫色（三品以上）官服的宦官，则超过了一千人。

从开元时期起，以高力士得宠用事为标志，宦官作为一个强劲的政治势力，正式登上了大唐帝国的历史舞台——“宦官之盛自此始”（《资治通鉴》卷二一○）。

随着宦官集团的得势，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文武官员，皆奉承巴结唯恐不及。凡是宦官奉旨下到州县办差，每走一趟，收到的红包至少都在一千缗（一缗为一千文）以上。有了权势和金钱，宦官们的日子就越来越滋润了。他们纷纷在长安置地买房，经营田产，以至于“京城第舍、郊畿田园，参半皆宦官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三）。更有甚者，一些有权有势的宦官还会光明正大地娶妻纳妾。比如高力士就娶了一个姓吕的官员的女儿，据说还颇有姿色。总之，除了不能生儿育女之外，这些当权宦官的生活方式完全可媲美于朝廷的公卿百官，其生活质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说，高力士等人活得这么潇潇洒洒、多姿多彩，应该没有理由嫉妒王毛仲才对。

可是，他们还是默默地、执着地、强烈地嫉妒了。

因为在高力士等人看来，王毛仲所受的宠幸远远超过了他们。

“中官等妒其（王毛仲）全盛逾己”（《旧唐书·王毛仲传》）。

同样作为李隆基早年的奴仆，王毛仲和高力士得到的恩宠究竟孰高孰低，实在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一切都只能取决于当事人的想法和心态。也许，作为生理上的残缺者，高力士等人在潜意识里，会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得到更多？或者说，看到别人和自己得到一样多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得少了？

有人说，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但一定会嫉妒别的乞丐。或许，高力士嫉妒的根源，还是在于他和王毛仲相同的出身。

在史书的记载中，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王毛仲对待宦官的态度。

“中官居高品者，毛仲视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则挫辱如己之僮仆。”（《旧唐书·王毛仲传》）这段话的意思是：对那些高阶当权的宦官，王毛仲往往把他们当成空气，视而不见；而对于那些官阶小的宦官，王毛仲则动不动就呵斥辱骂，简直把宦官当成了自家的奴仆。总而言之就是两个字：蔑视。

可是，王毛仲为什么如此蔑视宦官呢？

说穿了，其实就是因为出身相同，所以强烈渴望压过对方一头。

简单地说，就是攀比心。无论是高力士对王毛仲的嫉妒，还是王毛仲对高力士的蔑视，追根究底，很可能都是攀比心在作祟。不仅宦官们觉得王毛仲“全盛逾己”，说不定在王毛仲心里，也会觉得宦官们“全盛逾己”，所以才会通过蔑视来表达他的不平和愤怒。

古人经常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可事实往往是：正是同根生，相煎才会急！

相同的出身提供了最强的可比性，相似的攀比心又让双方戴上了一副同样不可靠的有色眼镜，这种有色眼镜又强化了双方扭曲的竞争意识。因此，乞丐不嫉妒富翁，只会嫉妒别的乞丐。

说到底，人有时候不快乐，不是因为自己不成功，而是因为别人成功了。

王毛仲与高力士的种种矛盾纠葛，说穿了，不过如此。

其实，高力士等人之所以对王毛仲既妒且恨，却又敢怒不敢言，关键还不仅是王毛仲从玄宗那里得到的宠幸太多，而是王毛仲已经恃宠而骄，有意无意地让自己手中的权力无限扩张了。

最让人觉得可怕的，就是他对禁军的控制。

开元中期，除了朝中许多文官对王毛仲趋之若鹜外，当年跟随玄宗搞政变的那帮禁军将领，如葛福顺、李守德等数十人，也全都成了他的铁杆拥趸，人人唯其马首是瞻。其中，葛福顺还跟王毛仲结成了儿女亲家。这帮人依仗王毛仲在朝中的权势，恣意妄为，横行不法，朝廷有关部门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压根不敢过问。

此时的王毛仲开始有些忘乎所以了。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交结朋党的嫌疑，甚至已经严重逾越了自身权力的边界。

本来，这帮禁军将领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功臣那样被处理掉，是因为玄宗觉得他们是比较单纯的军人，如果他们不和朝廷大臣结党的话，就不足以对朝政产生什么影响，也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可现在，他

们居然以王毛仲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意味着什么？

这分明意味着，王毛仲和这帮人已经对玄宗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如今的王毛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奴了，而是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朝廷百官也已通过各种渠道和他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利益关系。在此情况下，这帮具有政变经验的高级将领又把他奉为老大，那王毛仲的能量岂不是无人能及了？一边联结着朝臣，一边又控制着禁军，万一他生出什么野心，那玄宗要拿什么来防他？

每当想到这些，高力士就会替玄宗捏一把汗。

可是，让高力士百思不解的是——玄宗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不管王毛仲如何“骄恣日甚”，他却依旧“每优容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高力士是一个对玄宗忠心耿耿的人，无论在公在私，他都觉得应该向玄宗提出警告，让他对王毛仲严加防范，最好是尽早将其铲除！

当然，高力士此人生性谨慎，城府极深，在王毛仲权宠正盛的这个时候，他是不会随便动手的，更不会轻易暴露自己。

所以，他得先找一个人去试试水。

高力士找到的这个人，是时任吏部侍郎的齐澣。

这个齐澣，就是当年送给姚崇“救时宰相”这四字评语的人。此人博古通今，明于吏事，早在中书省任职时就有“解事舍人”之称，如今正受玄宗器重。高力士挑选这样的人去打前锋，对王毛仲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而此时的齐澣急于想要博取玄宗好感，正好可以通过王毛仲这件事来向皇帝表忠心，所以高力士一开口，他就欣然同意了。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也就是王毛仲刚刚和葛福顺结成亲家不久，齐澣找了一个单独入奏的机会，郑重其事地对玄宗说：“葛福顺统领禁军兵马，不应该与王毛仲结为亲家。王毛仲是一个轻浅浮躁之人，权宠太盛，易生奸变。倘若不尽早加以铲除，必将酿成大患。高力士为人小心谨慎，而且又是宦官，足以在宫中任事，陛下尽可委之腹心，又何必重用王毛仲呢？”

其实，对王毛仲恃宠生骄的表现，玄宗也不是毫无警觉。就在前几天，王毛仲还刚刚开口跟他讨要兵部尚书一职，简直是得陇望蜀，贪

得无厌！玄宗颇为不悦，当时就一口回绝了他。王毛仲为此怏怏形于辞色，玄宗当然也都看在了眼里。

而玄宗之所以一直没有对王毛仲采取措施，是因为王毛仲在朝中已经形成了一定势力，并且背后又有一大帮禁军将领支持，如果玄宗考虑不周，草率行事，就有可能激发事变。此时，齐澣能够在这件事上进言，玄宗当然是很欣慰的，但是这事得从长计议，急不得。

玄宗随即对齐澣说："朕知道贤卿忠心为国，可此事非同小可，容朕慢慢考虑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

齐澣心中暗喜，觉得这回参王毛仲真是参对了。为了表现自己做事的沉稳老练，齐澣还刻意卖弄了一下，说："陛下理当审慎为之，但有句话说得好，'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万望陛下一定要严守秘密。"

齐澣这话的意思是：君主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臣子，臣子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自己。

尽管对玄宗这种精明的皇帝来说，齐澣这句叮嘱显得有点多余，但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于是玄宗欣然接受。

只是，玄宗万万没有料到，他这里谨守约定，守口如瓶，可齐澣那小子却一转身就把秘密捅出去了。

事情是坏在一个叫麻察的人身上。

此人原任大理丞，因罪被贬为地方小官，齐澣和他交情很深，就出城为他饯行。好朋友分手，自然要喝几杯饯行酒。齐澣三杯酒下肚，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把他和皇帝的密约一五一十都说给麻察听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因获罪遭贬而愁肠百结的麻察听着听着，心中忽然亮光一闪，满腹愁肠顿时全部化成了惊喜——一个将功折罪、告密升官的机会不是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吗？

麻察在心中大笑：齐大人啊齐大人，您真是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

饯行酒喝完，齐澣一直目送好友渐渐远去，又站在原地伤感了一小会儿，才带着离别的惆怅返身回城。麻察则是一步三回头，作依依惜别状，等到齐澣的身影好不容易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立刻快马加鞭，从另一条小路绕回了京城，然后飞也似的冲进皇宫，将刚才的一幕向

玄宗作了禀报。

玄宗晕了。

从前有个张暐，后来有个姜皎，现在又出了个齐澣！玄宗在这一刻的惊讶和愤怒可想而知。所以，齐澣前脚刚迈进家门，宫中的传召使者后脚就到了。

当齐澣入宫觐见玄宗时，看到的是一张因暴怒而扭曲的面孔，听到的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齐澣！你担心朕不能保守秘密，却把什么都告诉了麻察，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保守秘密？麻察历来轻薄无行，难道你齐澣不知道？”

齐澣全身暴汗，面如土色，紧接着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谢罪。

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怪只怪齐澣宦海浮沉大半生，却不知舌头可以杀人的道理；怪只怪他不懂得“朋友”这个东西，不仅是用来交的，也可以是用来卖的。

数日后，玄宗下诏，以“交构将相，离间君臣”的罪名，把齐澣和麻察双双贬到了天涯海角，一个贬为边地县丞，一个贬为边地县尉，都是九品。

齐澣和麻察黯然离京的这一天，再也没有人来为他们饯行了。

虽然齐澣失手了，没能一举扳倒王毛仲，但高力士并没有觉得失望。因为，齐澣本来就只是一颗问路的石子。

经过这番投石问路，高力士至少可以确认一点——玄宗对王毛仲已经生出了戒备和猜忌之心。

够了，这就够了。

一只老虎站在高峰上，看上去固然威猛骇人，可当它脚底下的石头开始松动时，应该感到害怕的就是老虎自己了。这时候你不用管它，只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在石头上轻轻给出一个推力，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高力士很有耐心，一点也不着急。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底，机会终于来了。王毛仲又有了弄璋之喜——他老婆又生了个儿子。孩子出生三天后，玄宗让高力士前去贺喜，不但赏赐了一大堆酒肉、金帛，还授予这个婴儿五品官职。高力士强作欢颜地到王毛仲府上恭贺了一番，回宫复命时，玄宗问他：“毛仲高兴吧？”

时候到了。

给出致命一推的时候终于到了。

高力士不紧不慢地答道：“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王毛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对臣说：“这个孩子难道不应该封三品吗？！”

玄宗闻言，顿时勃然大怒：“王毛仲这个狗奴才！当年诛杀韦氏的时候，这小子就首鼠两端，躲得无影无踪，朕都没有怪他，如今竟敢为了一个小孩子埋怨我？！”

高力士在心里无声地笑了。

王毛仲啊王毛仲，你小子也有今天！

“皇上圣明！”高力士凑前一步，压低嗓门说，“北门禁军这帮奴才，势力太大，而且跟王毛仲勾结在一起，若不尽早铲除，必生大患！”

就在高力士这几句轻飘飘的话中，王毛仲等人的末日就降临了。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正月，玄宗下诏，以“不忠”和“怨望”为由，将王毛仲贬为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别驾。同日，葛福顺、李守德、唐地文、王景耀、高广济等禁军高级将领，也全部被贬为边远各州的别驾；王毛仲四个年长的儿子，均被贬为边荒地区的参军；此外，还有数十个朝臣遭到了株连。

不久，王毛仲行至永州（今湖南永州市）时，被玄宗派出的使者追上，就地缢杀。

这场宠臣与宦官的对决，以宠臣的彻底失败和宦官的全面胜利告终。高力士在这场胜利中，充分展示了舌头的力量。他用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证明——舌头的确是世界上最柔软也最致命的一种武器！

随着宠臣势力的垮台，宦官集团的势力更为强大，作为宦官首领的高力士更是权倾朝野。凡四方进奏文表，都要先经他过目，再上呈玄

宗；有些事情他认为无须上奏，便可自己“专决”。玄宗对他极度信任，曾公开表示：“力士当上（值班），我寝乃安！”（《新唐书·高力士传》）

随着王毛仲死去，高力士一枝独秀，玄宗内廷的权力斗争总算落下了帷幕。但是反观外朝，自从泰山封禅之后，宰相之间的矛盾纷争就几乎一天也没有平息过。在开元中后期的二十余年间，帝国朝堂仿佛成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大擂台，宰相们一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见面就急眼，一急眼就死磕。上一届宰相刚刚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继任者袖子一挽又开始干仗，真是让玄宗焦头烂额、大伤脑筋……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上）

自从开元十四年把张说斗倒之后，财政专家宇文融就抖擞起来了。

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用不了多久，自己一定会入阁拜相。

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是有一点不大不小的担心。

他担心张说会再度被玄宗起用。

既然张说当年有本事梅开二度，如今又凭什么不能卷土重来？

有鉴于此，宇文融决定拿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宇文融再度和御史大夫崔隐甫联手，开始在朝中大肆交结朋党，一边加紧打造自己的势力，一边频频向玄宗呈上密奏，拼命诋毁张说，一心要把他搞臭搞烂。

面对不肯善罢甘休、咄咄逼人的宇文融，张说当然也没闲着。他虽说已经离开了相位，可这么多年的宰相也不是白混的，朝中还是有不少人得到过他的提拔，受到过他的恩惠，所以张说大手一挥，便有一帮老部下应声而起，向宇文融发起了反击。

你想让我死，我也绝不让你好过！

双方就此展开死拼。

这种官员集体掐架的现象，在历史上的学名叫“朋党之争”，可要说白了，不过就是双方老大为了个人利益，各自招呼一帮喽啰聚众斗殴而已，实在没多大意思。

玄宗天天听他们吵架，最后终于被惹毛了。

领着朕的俸禄，却成天为了私人恩怨打架，朝廷的活谁来干？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二月，玄宗下诏，勒令张说致仕，仍在家修史；崔隐甫罢官，回家侍奉老母；宇文融贬出朝廷，担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刺史。

都给朕滚蛋！好让朕清静清静。

但是，尽管张说和宇文融都滚蛋了，玄宗却还是清静不了。

因为他不久前刚刚任命的两个宰相，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两个人，一个叫李元纮，一个叫杜暹。

如果单纯从个人品质来说，这两位其实都称得上是正直清廉的好官。由于前任宰相张说因贪财好贿而罢相，因此玄宗重新物色宰相时，就刻意挑选了这一对廉政模范，希望他们能像开元初期的宰相一样，同心同德，共创佳绩。

关于李元纮和杜暹公正廉洁的品行，各自都有一段佳话。

中宗神龙年间，李元纮担任雍州（京畿地区）司户，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窦怀贞。有一次，太平公主和当地的寺院争夺一处磨坊，官司打到了李元纮这里。李元纮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是太平公主仗势欺人，于是不管什么公主不公主，当即大笔一挥，把磨坊判给了寺院。窦怀贞吓坏了，命他赶紧改判。没想到李元纮竟然拿起笔来，在判决书后面加了一行大字：“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窦怀贞拿他没办法，只好悻悻作罢。

从那时候开始，李元纮的正直耿介之名就传遍了朝野。

当上宰相后，李元纮更是大力推行廉政建设，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请托求官、徇私舞弊之风，让那些走后门、搞腐败的家伙又怕又恨。“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旧唐书·李元纮传》）。

由于为官清廉，李元纮当了好几年宰相，依旧是两袖清风、一贫如

洗，不但宅子是从前的旧宅子，仆人是过去的老仆人，就连每天上朝骑的马，也还是多年前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朝廷所赐的钱物，李元纮也是随手散给了穷亲戚，从来不留分毫，大有当初的清贫宰相卢怀慎之风。

而杜暹也是一样，“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旧唐书·杜暹传》）。从青年时代起，杜暹就立志当一个清廉的好官，发誓绝不接受亲戚、朋友或同僚的任何馈赠。比如他早年在地方上任职，离任时，当地的小吏要送他一件贵重礼品，就遭到了他的婉拒。

什么贵重礼品呢？

纸。一万张纸。

纸算什么贵重礼品？还一万张？既要雇人手来搬，又要找车马来运，这不是活活累死人吗？

如果我们这么理解，那就错了。要知道，那可是唐朝，不是现在。

现在，纸张都是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只要机器一开，要多少有多少。可在当时，纸张都是手工业生产，质量高，数量少，属于异常紧俏的消费品。所以，古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练习书法，只能在水缸里或沙地上比比画画，根本用不起纸张。

杜暹一见有人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口拒绝显得太不讲人情，要接受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只好象征性地从中抽了一百张，算是领受了对方的盛情。当时给他送行的一个同僚见状，大为感叹：“古时候有‘一钱太守’，不曾想今日又见此事啊！”

所谓的“一钱太守”说的是东汉刘宠的典故。刘宠是东汉时的会稽太守，由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调往京师任职。临行前，当地父老感念他的德政，执意要送给他几百钱，刘宠不忍拂其心意，只取一钱收下。上路之后，他就把钱扔进了会稽附近的一条河里。据说那枚钱扔下去后，河水顿时变得无比清澈。这个故事从此流传开来，被千百年来的老百姓传为美谈，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市的钱清镇。

既然李元纮和杜暹都有如此令人称颂的嘉言懿行，性格和志向又如此相近，按理说在工作上也应该会互相配合、同心协力才对。

可是，他们偏偏就掐架了。

关于他们掐架的原因，史书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这么一句话："元纮、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而具体有何异同、有何嫌隙、如何在玄宗面前互相参奏，史书则付之阙如。

虽然史书无载，但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性情相近的人共事，更容易掐架。观诸开元初期的宰相，无论是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颋，还是张嘉贞与源乾曜，都是典型的一刚一柔、一主一辅，所以他们既能在性格上形成互补，又能在工作上分出主次，矛盾自然也就少了。而李元纮和杜暹，性情都是同样的刚直耿介，遇事当然也就不善于拐弯和妥协，一旦对事物的看法相左，必然要争一个是非对错，因而矛盾纷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李、杜的矛盾，玄宗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玄宗只好采取了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把两人一起赶下台。

开元十七年（公元727年）六月，李元纮和杜暹双双罢相。

也许是担心继任者又跟他们一样，在性格和处世方式上不能互补，所以玄宗这回特地挑选了三个人，希望通过人数的变化，给宰相班子增加一些弹性，注入一些活力。

新任的三位宰相，一个叫萧嵩，一个叫裴光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理财专家——宇文融。

玄宗之所以会既往不咎，让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回朝拜相，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

是的，钱。

随着太平盛世的来临，此时的玄宗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勤克俭了，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流露出了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所以，尽管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财政收入日益增长，可玄宗还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

而满朝文武，最能搞钱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宇文融了。

宇文融没有辜负玄宗的殷切期望。

一坐到宰相的位子上，宇文融就使出了浑身解数，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特使”，然后把他们派驻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展争创经济效益的竞赛，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地搜刮民脂民膏，看谁刮得多、刮得巧妙，谁就能加官晋爵、青云直上。

如此一来，玄宗自然是开心了——钱这个东西嘛，不就像海绵里的水吗，挤一挤总是有的！

可是，文武百官却叫苦不迭——权力都让特使夺走了，部门职能也都错乱了，规章制度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最苦的，莫过于底层的老百姓——今天交这个捐，明天纳那个税，后天又来个巧立名目的摊派，这日子还怎么过？

当然，百姓的痛苦和百官的烦恼宇文融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皇帝的笑颜。

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证明一个臣子的能力和才干呢？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让一个臣子心花怒放、干劲百倍的呢？

没有了。

由于博得了天子的欢心，一向矜夸自负的宇文融越发得意忘形。当宰相没多久，他便到处扬言：“只要让我在相位上待几个月，保管天下太平！”（《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宇文融到底有没有致太平的本事不好说，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相位上确实只待了几个月，然后就灰溜溜地下台了。

宇文融之所以下台，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是裴光庭等人在背后狠狠参了他一本。这一参，玄宗总算听到了朝野的呼声和百姓的怨言。然而，他还是舍不得罢免宇文融。

最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的，是另一桩弹劾案。

当时有一个宗室亲王名叫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因与吐蕃作战立下赫赫战功，颇为玄宗所器重，宇文融担心他以军功入相，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一直想找机会堵死他的入相之路。

开元十七年九月，李祎因事入朝，宇文融当即授意心腹御史李寅整理

他的黑材料，准备瞅准机会递上去。不料这个李寅也是个大嘴巴，刚弄完材料就把事情泄露了。李祎得知后，立刻入宫禀报玄宗，说宇文融打算陷害我，明天就会让御史李寅上章弹劾。

玄宗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李寅果然就把奏章递了上来。玄宗勃然大怒，当即把宇文融贬为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可是，宇文融刚走了没几天，玄宗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钱不够花了。

玄宗忍不住对裴光庭大发牢骚："你们老是挑宇文融的毛病，这下倒好，朕把他轰走了，可朝廷的开销也不够了，你说说，该怎么办？如何帮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

裴光庭无言以对。

就在玄宗琢磨着该不该把这个挣钱高手重新请回来的时候，宇文融的倒霉事又来了。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指控他在担任宰相期间滥用职权，贪赃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玄宗万般无奈，只好再次把宇文融贬为平乐（今广西平乐县）县尉。

宇文融在边瘴之地苦撑苦熬了一年多，天天盼着玄宗能召他回朝，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最终盼来的，却是比贬谪更严厉的惩罚——流放。因为他当初的聚敛手段太过恶劣，得罪了太多朝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放过他。大臣们利用他被贬谪的这段时间拼命搜集罪证，最后由司农少卿蒋岑出面指控，说宇文融曾在担任汴州刺史期间贪污了数以百万计的公款。

玄宗下令彻底追查，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玄宗大为震怒，立刻下诏把宇文融流放岩州（今广西来宾市）。

这一回，宇文融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他万念俱灰，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死了，剩下的两个宰相是不是就能和衷共济了？很遗憾，没有。

接下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帝国的朝堂就是一个铁打的擂台，宰相们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个打擂者。

只要擂台在，对决就不会终止。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下）

就算没有了宇文融，裴光庭和萧嵩也照样死掐。

说起这两个宰相，来头都不小。裴光庭是高宗时代的名将和行政专家裴行俭之子，萧嵩是南朝萧梁皇室后裔、初唐宰相萧瑀的侄孙，两人都有显赫的家世背景。裴光庭文职出身，长于行政，入相后任侍中兼吏部尚书；萧嵩擅长边务，军功显赫，以兵部尚书衔入相，后兼中书令，并遥领河西节度使。

也许是因为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都不低，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所以都有些眼高于顶，在处理政务时经常发生抵牾。往往是一个人主张的事情，另一个必定想方设法加以反对，是故“同位数年，情颇不协”（《旧唐书·萧嵩传》）。

裴光庭在任内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推行吏部的选官制度改革。在他之前，大唐吏部选拔官员时一律以能力为准，有本事的可以越级提拔，没本事的一辈子也得不到升迁。按理说这么做并没有错，但是难免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很多官员干了大半辈子，经验非常丰富，可就是因为没有突出政绩，所以混到发白齿摇仍然是个小芝麻官；还有的人年纪轻轻就考上进士，取得了任官资格，可要么是因为没门路，要么是因为运气不好，结果整整二十年补不上缺，到老还是个候补官，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了。

针对这些弊端，裴光庭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循资格”。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各级政府在任用和提拔官员时，一律不管能力大小，只看资历高低。说白了，就是论资排辈。

裴光庭的这项改革，固然可以弥补过去“唯能力论”的一些缺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庸愚沉滞者皆喜”“才俊之士无不怨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也就是说，这项改革开始实施后，那些庸庸碌碌、长期得不到升迁的老家伙无不拍手称快，可那些富有才干却缺乏资历的年轻官员却一个个牢骚满腹。

人们不禁怀疑，裴光庭的这项改革，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不可否认，过去的“唯能力论”的确有不太公平的地方，因为它会让一些善于搞政绩工程的浮夸之辈钻了空子，同时埋没了那些只会埋头干活、不善于表现的老实人，然而，“唯资历论”就没有毛病吗？它不也

是便宜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辈，压制了真正有才干的人，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吗？

也许是因为这项改革确实有些矫枉过正，所以萧嵩便与裴光庭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但裴光庭是吏部尚书，这种事情当然由他说了算，于是他便不顾萧嵩反对，仍然强力推行。

可想而知，仅仅在这件事上，两个宰相就足以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了，压根谈不上什么和衷共济。

宰相们老是这么打擂台，玄宗自然是头疼不已。好在裴、萧二人仅仅是单打独斗，没有像宇文融那样拉帮结派、聚众斗殴，所以玄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由他们去了。

日子在裴、萧二人的吵吵闹闹中又过了几年，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三月，双方的斗争才戛然而止。并不是他们终于和解了，而是因为裴光庭病逝，一个巴掌拍不响了。

裴光庭一死，萧嵩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还没等裴光庭入土为安，萧嵩就急不可耐地将其推行数年的改革一朝废除，同时还把裴光庭这几年来提拔的亲信全部外放为地方刺史，一个也没留下。

裴光庭去世后，朝廷必须再物色一个新宰相。玄宗想，既然我挑的宰相最后都要打架，那这回我干脆放权，让你萧嵩自己推荐一个——总不能你自己挑的人还跟你死掐吧？

皇帝如此信任，着实令萧嵩大为感动。他暗暗发誓，这回一定要挑一个老实厚道的，既要让自己舒心，更要让天子放心！

萧嵩随即在自己的好友圈里扫了一遍，很快就锁定了跟自己关系最铁的、时任右散骑常侍的王丘。在萧嵩看来，王丘过去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很受玄宗赏识，而且为人低调内敛、谦虚谨慎，让他来配合自己工作，保证太平无事，皆大欢喜。

是的，萧嵩看得没错，王丘这个人确实很低调。可问题是，这位仁兄低调得太过头了。一听说萧嵩要推荐他当宰相，居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我能力不够，我干不了。”

不过王丘也没让萧嵩太失望，马上就给他推荐了另一个人——尚书右丞韩休。

韩休这个人萧嵩还是了解的，跟王丘差不多，也是那种比较谦柔、性

情平和的人。萧嵩想来想去，既然没什么更好的人选，那就韩休吧。

为了表明自己看人的眼光很好，萧嵩在向玄宗举荐韩休的时候，还极力称赞韩休为人正直，不慕荣利，品行高洁，足以担当宰相大任。

韩休随即以黄门侍郎衔入相。

然而，让萧嵩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称赞韩休的话音还没有落下，麻烦事就来了。

因为韩休压根就不是他认为的那种人！

萧嵩本以为韩休“柔和易制”，叫他往东他肯定不敢往西，没想到这位老兄却“为人峭直”“守正不阿”，凡事讲原则、认死理，一切秉公而断，从来不按萧嵩的意思行事。

萧嵩为相多年，非常了解玄宗的好恶，所以奏事时难免会曲意顺旨、阿谀取容。每当这种时候，韩休就会直言不讳地驳斥萧嵩，并且当着玄宗的面跟他争一个是非曲直，从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萧嵩肺都气炸了。

不感念我的举荐之恩倒也罢了，你总不能恩将仇报吧？

很遗憾，韩休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你萧大人举荐我韩某人，是为国举才，不是为你个人树立私恩，所以，我没有义务服从你，更没有必要奉承你！身为宰相，凡事只能以社稷为重，一切必须以纲纪为凭，即便各执一词，争的也是公益，不是私利；倘若意见相同，也是出于公心，并非交情。

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什么知恩图报，更谈不上什么恩将仇报！

萧嵩晕死。

碰上这么个一根筋的，他除了骂自己瞎了眼之外，还能怎么办？难不成昨天刚跟皇帝说，这是个人才，让他上去！今天又跟皇帝讲，这家伙不行，让他下来！

这不是自打耳光吗？

不能这么干。

所以，只能忍。

韩休入相，不仅把萧嵩搞得郁闷透顶，也让玄宗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总是动不动就犯颜直谏，甚至还敢和玄宗面折廷争。

有一次，一个叫李美玉的万年县尉不知何事触怒了玄宗，玄宗大发雷霆，下令将其流放岭南。韩休闻讯，立刻入宫进谏，说："李美玉官职卑微，所犯的也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事，可朝廷有一个大奸，却长期为非作歹，仍逍遥法外，臣斗胆请问陛下，为何执法不一？"

玄宗大为不悦："你说谁是大奸？"

"金吾大将军程伯献！"韩休大声说，"此人依恃陛下恩宠，不仅贪赃枉法，而且所居宅邸、所乘车马、所用服饰，皆超越礼制，臣请陛下先治程伯献，再惩李美玉。"

韩休所说的这个程伯献，是大宦官高力士的拜把子兄弟，几年前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出殡，这家伙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哭得比亲儿子还惨。由于玄宗极度宠幸高力士，因而爱屋及乌，连带着对这个程伯献也是恩宠有加。程伯献仗着老大和天子撑腰，有恃无恐，屡屡触犯国法，韩休老早就想收拾他了，这次总算逮着了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玄宗闻言，半晌不语。许久，才瓮声瓮气地说："程伯献的事，朕自有分寸，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扯在一块。今日只谈李美玉，不谈程伯献。"

可韩休却不依不饶："李美玉只犯了细微过失，陛下就不能容他；程伯献大奸巨猾，陛下岂能不闻不问？今日陛下若不惩治程伯献，臣必不敢奉诏流放李美玉。"

玄宗一下子给呛住了。

这一刻，玄宗真想让人把韩休拖出大殿，可后来想一想还是忍了。为了一个小小的李美玉就跟宰相撕破脸皮，实在不值，而且显得自己太没雅量。

最后，玄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夸奖了韩休几句，内容不外乎是"爱卿公忠切直，朕心甚慰"之类，然后就撤销了流放李美玉的诏令。

经过这件事后，玄宗真是有点怕了韩休，一如他当初对硬骨头宋璟也是又敬又怕一样。

的确，韩休确实颇有宋璟当年的风范。自从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以来，帝国似乎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宰相了。所以，当宋璟听说这件事后，忍不住对韩休大加赞叹，说：“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旧唐书·韩休传》）

宰相既仁且勇，天子就注定难以逍遥。

自韩休上台后，玄宗的业余文化生活就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有时候在宫中宴饮作乐，或者到禁苑打猎，玩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玄宗就会惴惴不安地问左右：“韩休知不知道朕在这里？”可往往是话音刚落，韩休的一纸谏书就到了，正在兴头上的天子顿时意兴阑珊，好生没趣。

在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约束下，玄宗自然是郁郁寡欢。日子一长，人居然瘦了一圈。每当玄宗揽镜自照，看见镜子里日渐消瘦的容颜，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这个时候，身边的宦官就会替天子打抱不平，说：“自从韩休那老头当宰相，陛下不知道比以前瘦了多少，与其受他管束，还不如把他轰走算了！”

玄宗摇头苦笑，长叹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总是顺从我的意思，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奏事经常力争，退朝后，我梦稳心安。所以，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

开元中后期，玄宗正处在由明而昏的蜕变过程中，虽然早年那种励精图治、克己自律的精神已经丧失大半，但还是没有发展到天宝后期那种荒疏朝政、骄奢淫逸的地步，所以，此时的玄宗还能说出这种比较有理性的话。尤其是“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八个字，虽说略显矫情，但总体上还是真实反映了玄宗此时的心态。

换言之，在这个转型期内，一旦天理和人欲在内心交战，一旦国家利益与帝王私欲产生冲突，玄宗多半还是会尊重前者，压抑后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宗内心的天平便不可逆转地朝向后者倾斜了，以至于最终把盛世帝国一步步推向了万丈深渊。

当然了，这是后话。

随着韩休谏诤力度的不断加大，玄宗的心理承受力逐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算到目前为止，玄宗的理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战胜感性，但是有这么一个严厉苛刻的宰相经常在耳边聒噪，总不是一件让人很舒服的

事。再者，韩休和萧嵩又成天在他面前死掐，也让玄宗感到很厌烦。

正当玄宗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萧嵩主动站出来打破僵局了。

他向玄宗提交了辞呈。

玄宗大为意外，说："朕又没有厌恶你，你何必急着走？"

萧嵩说："臣蒙受皇上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极。在陛下不厌弃臣时，臣尚可从容引退；如已厌弃臣，臣脑袋尚且不保，如何自愿引退？"话刚说完，两行委屈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玄宗顿时也有些伤感，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好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让朕慢慢考虑。"

萧嵩的辞职请求究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还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实在是很难说。对此，玄宗也不好下断语。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确让所有人都很不愉快，所以，必须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么，该不该让萧嵩退休呢？

还有那个不让人省心的韩休，是不是也一块休了算了？

玄宗为这个问题又头疼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采取了那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老办法——让两个人一块儿下台。

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开元二十一年底，玄宗把萧嵩罢为尚书左丞，把韩休罢为工部尚书，同日启用了两个新宰相，一个是裴耀卿，还有一个，就是曾为后世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千古名句的著名诗人——张九龄。

张九龄，岭南人，祖上曾当过韶州别驾的小官，后来几代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出身。虽然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张九龄从小就聪明好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旧唐书·张九龄传》："幼聪敏，善属文。"）

十三岁那年，张九龄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阅后大为赞叹，连声说："这孩子不得了，前程不可限量！"几年后，张九龄赴京参加进士科考，果然一举中第，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当时玄宗还在当太子，有意搜罗天下的才学之士，亲自在东宫举行"策问"，

张九龄前往应试，又拔头筹，遂擢升为右拾遗。

从此，张九龄在朝中声名鹊起。每当吏部要考核候补官员或举行科考，必命张九龄出任考官，根据候选人或考生的文章和综合表现，专门负责评定等级。每次张榜，各方都对张九龄甚为称道，认为他的评选结果公平合理。不久，张九龄又升任司勋员外郎。

开元中期，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对张九龄的才华极为赏识，不仅将他提拔为中书舍人，而且放下首席宰相的架子，跟他认了同宗，此外还逢人便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一代词宗、文坛领袖。”

张九龄感念张说的知遇之恩，从此竭尽忠诚，成了张说的心腹。后来，张说被宇文融等人整垮，张九龄受到牵连，被贬出朝廷，历任几个地方的刺史和都督。

当初张说兼领集贤院时，曾多次向玄宗推荐张九龄，称他可以作为决策顾问。张说死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荐言，遂召张九龄回朝，拜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院长，旋即又擢任中书侍郎。此后，张九龄经常向玄宗呈上密奏，且多数受到采纳，对朝政颇有贡献。所以，当韩休和萧嵩双双下台后，张九龄自然就成了新宰相的不二人选。

从张九龄和裴耀卿日后的表现来看，玄宗应该会感到庆幸。

因为，这两个宰相不仅品行高洁，才华横溢，能力出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精诚团结，和衷共济！

对于经历了长期宰相纷争的玄宗朝廷而言，没有什么能比“精诚团结、和衷共济”这八个字更为宝贵的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帝国大擂台马上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对决。

因为，张九龄和裴耀卿刚刚上台，有个新的打擂者就紧随其后，闪亮登场了。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第二章 权相李林甫登场

李林甫：一个问题青年的奋斗史

李林甫是李唐宗室出身，论辈分，玄宗李隆基还得管他叫叔叔。

虽然出身高贵，但是李林甫的起点却很低。因为他们这一支是李唐皇族的旁系，而且混得不怎么好，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

李林甫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封长平王，官任刑部侍郎，死后赠灵州总管，从二品；祖父李孝斌官至原州长史，从五品；父亲李思诲最不如意，终其一生只混了个扬府参军，正七品。到了李林甫这一代，虽然尚有恩荫的资格，但他入仕之初，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千牛直长（宫廷侍卫官）。

因为门庭衰微，所以李林甫从小就有强烈的出人头地、光大门楣的欲望。

但是，要靠什么出人头地呢？

他父亲这头是没戏了，一个小小的扬府参军，根本帮不上他什么忙。所幸，李林甫的母亲这一系，算是出了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玄宗早年的好友兼后来的宠臣——楚国公姜皎。

他是李林甫的舅舅。

靠着舅舅姜皎的提携，李林甫在开元初年当上了太子中允，正五品，算是一举进入了“通贵”的行列。可以想见，假如姜皎没有在开元十年的废后风波中意外死亡，李林甫足以凭着这层关系再往上蹿几级，仕途肯定会顺利得多。

可是，这棵庇荫的大树一倒，他就只能另觅高枝了。

经过一番努力，李林甫又攀上了宰相源乾曜的儿子源洁，和他结成了好友。当时源乾曜官居侍中，是朝廷的二把手。李林甫就托源洁去跟他父亲求情，想调一个司门郎中的职务。所谓司门郎中，是指三省六部的中层官员，相当于今天各部委的司长，虽然官阶不是很高，但手中握有实权，比太子中允这样的闲职好得多。

李林甫原以为这件事十拿九稳，没想到源乾曜竟然一口回绝。

而且源乾曜还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让李林甫一辈子铭心刻骨。

他说："郎官必须由品行端正、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任，哥奴（李林甫的小名）岂是做郎官的料？"

言下之意，李林甫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品行、才能和名声都不怎么样的人，简直就是个问题青年。

毫无疑问，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李林甫。

在我们的经验中，一个人年轻时倘若在某个方面遇到了强烈的精神刺激，日后在这个方面必然会有强烈的反弹。换句话说，年轻时受些刺激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他会激发人的斗志，迫使人更快地成长。用佛教术语来说，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正面助力，称之为"增上缘"，反面助力则称之为"逆增上缘"。对于李林甫而言，姜皎就是他的增上缘，而源乾曜差不多可以算是他的逆增上缘。从这个意义上说，源乾曜那句十分伤人自尊的话，未尝不是李林甫后来拼命往上爬的主要动力之一。

你说我哥奴不是当郎官的料，那咱们就走着瞧，看我将来到底是个什么料！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林甫是当宰相的料。

而且他这个宰相的含金量，显然比源乾曜要大得多。

因为他在宰相的位子上一坐就将近二十年，是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权势最大、恩宠最隆、对后来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宰相。

这一层，当然是源乾曜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在随后的几年中，李林甫历任太子谕德、国子司业等职，官阶略有提升，但职权仍然不大。直到开元十四年，李林甫攀上了当时玄宗跟前的大红人宇文融，才在他的援引下就任御史中丞，真正进入实权部门。

就是在一年，李林甫和宇文融联手扳倒了张说，在帝国政坛上初露峥嵘，一举赢得了朝野的关注。随后，李林甫历任刑部、吏部侍郎，官阶虽然都只是四品，但拥有的权力显然一次比一次更大。

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哥奴，就这样一步一步迈上了帝国的政治高层。但是，他绝不满足于此。

他的目标是——大唐宰相。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林甫开始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关系网。与一般官员不同的是，李林甫并没有在朝臣中拉帮结派。在他看来，这么做有缔结朋党的嫌疑，容易引起皇帝的猜忌和政敌的攻击，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李林甫把目光从外朝转向了内宫，专门结交两类人：一是宦官，二是妃嫔。

这两种人靠皇帝最近，最了解皇帝的性情、好恶、想法，也最有可能对皇帝的各种决定产生微妙的影响。就此而言，他（她）们对朝政的影响力有时候甚至比朝中的大臣们更大。因此，谁要是跟这两种人交上朋友，谁也就掌握了所有跟皇帝有关的第一手信息。试问，这样的人想投皇帝所好，不是一投一个准吗？

由于宫中的宦官和妃嫔都从李林甫这里得了不少好处，同时也向他反馈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因而李林甫每次入宫奏事，总能符合皇帝的心意。渐渐的，玄宗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李林甫也强烈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赏识和信任。

可李林甫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要想登上宰相的宝座，必须在宫中寻找更强有力的政治同盟。换句话说，仅仅结交妃嫔是不够的，还必须结交最得宠的那一个；仅仅结交宦官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结交最得宠的那一个！

如今的后宫，最得宠的妃嫔是谁？

那当然是武惠妃了。可是，李林甫如何跟武惠妃套近乎呢？谁都知道，武惠妃虽无皇后之名，却是后宫事实上的女主人，玄宗对她的宠幸无以复加。像这样的女人，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几乎啥都不缺，李林甫凭什么跟人家交朋友？

是的，表面上看，这是个问题。

可在李林甫看来，这不是问题。

因为，再密的鸡蛋也有缝。说白了，武惠妃不过是个因美色而得宠的女人罢了，别看她在人前风光无限，其实心里始终怀有色衰爱弛的恐惧。所以，她虽然看上去什么都不缺，但唯独缺了一样东西——保障。

如果不能在皇帝对她产生厌倦之前扳倒太子，让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入主东宫，那么一旦天子移情别恋，她拥有的一切就会像海滩上的沙堡一样瞬间被潮水吞没。

可是，想要废立太子又谈何容易？武惠妃虽是后宫之主，但她的手再长，也伸不到东宫，伸不到外朝。因此，要想让东宫易主，她就必须在外朝的大臣中寻找可靠的支持者，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基于上述理由，李林甫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相信，武惠妃绝不会拒绝他的邀请。

很快，李林甫就通过一些宦官跟武惠妃搭上了线，然后托人给她送去了一句话——“愿保护寿王”。

这五个字言约旨远、意味深长，足以让武惠妃感到莫大的欣慰。

武惠妃笑了。李大人公忠体国，深谋远虑，前程一定不可限量，日后还望多多关照！

李林甫也笑了。娘娘不必客气，只要是李某办得到的事情，一定尽心竭力，在所不辞！

为了让吏部侍郎李大人“办得到”更多的事情，武惠妃随即在玄宗耳边大吹枕头风，极力赞美李林甫，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他拱上宰相之位。不久，李林甫便从吏部调任门下省，担任黄门侍郎。虽然从官阶上说属于平调，但是从职权上来看，这绝非一般的调动，而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升迁。

至此，李林甫距宰相之位仅剩下半步之遥。

与武惠妃结盟后，李林甫又迅速把目光转向了玄宗最宠幸的宦官——高力士。

相对于武惠妃而言，如何找到高力士的软肋，让李林甫煞费了一番苦心。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高力士就是天子的代言人。他所拥有的权势，不但满朝文武难以望其项背，甚至连宰相也要自叹弗如。像这样的牛人，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想巴结他吧，朝野上下等着拍他马屁的人多了去了，李林甫未必排得上号；想跟他做交易吧，人家权势熏天，啥也不稀罕。总之，要想找出高力士的软肋，可谓难上加难！

不过，李林甫之所以是李林甫，就在于他对人性的洞察力比别人细微得多，也深刻得多。所以他始终坚信——只要是人，就有弱点。

“当我们要应付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记住，我们不是在应付理论的动

物，而是在应付感情的动物。”（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李林甫虽然没来得及读卡耐基的成功学，可他很清楚，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用利益去摆平的。对大多数人，你当然只能从利益入手，否则你就是迂腐；可对某些人，你却必须从感情入手，否则你就是愚蠢。

武惠妃就属于前者，而高力士则属于后者。

根据李林甫的观察，高力士这个人外冷内热，心思细腻，重感情，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很念旧。

他念谁的旧？

武三思。

想当年，高力士被武曌驱逐出宫，流落街头，就是被武三思门下的宦官高延福收养的，后来，又是武三思跟武曌求情，高力士才回到了皇宫。所以，高力士一辈子都感念武三思的恩德，总想找机会报答。

到了高力士得势的时候，武三思和几个儿子都已死去多年，高力士无从报恩，就对武三思的女儿（侍中裴光庭之妻）格外照顾，凡武氏有所请托，他几乎没有不答应的。

由此可见，小女人武氏就是大宦官高力士的软肋。

只要摆平武氏，就不难搞定高力士。

可是，要如何摆平武氏呢？

这个问题当然是难不倒李林甫的。虽然武氏已经有了一个贵为宰相的丈夫裴光庭，但这并不表示武氏就会一辈子从一而终。尤其是在婚外恋大行其道的唐朝，一个贵妇人在老公之外多找一两个情人，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事实证明，武氏确实有一个情人。

这个人正是李林甫。

很显然，李林甫之所以和武氏搞婚外恋，并不是出于什么纯洁的爱情，而纯粹是为了利用武氏与高力士的这层特殊关系。

开元二十一年春，裴光庭病逝，武氏勉强挤了几滴眼泪，可还未做足丧夫之痛的样子，就急不可耐地去找高力士，要求他举荐李林甫继任侍中。

高力士大感为难。

这毕竟是宰相之位啊，岂是他一个宦官可以指手画脚的？

高力士虽然荣宠无匹、权倾内外，可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小心谨慎，再怎么得意也不会忘形。玄宗正是看上了他这一点，才会给予他那么大的恩宠和权力。所以，武氏的这个请托，高力士无论如何也不敢答应。

这件事没有办成，高力士难免对武氏心怀歉疚。为了缓解这种歉疚，高力士随后便经常在玄宗面前说李林甫的好话。除此之外，他还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补偿。不久，萧嵩举荐韩休为相，玄宗同意，但外界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高力士意识到补偿的机会来了，便在第一时间把消息透露给了武氏，武氏又立刻告知了李林甫。

宰相人选在正式公布之前，当然属于朝廷最高机密。而李林甫当然也知道，高力士把这个机密透露给他，是想让他在新宰相面前讨个好。

李林甫随即去找韩休，一见面就口口声声向他祝贺道喜。

韩休被弄得莫名其妙，问他何喜之有。

李林甫带着一脸神秘的笑容说："大人不必多问，三日之内，必有好事登门，届时方知李某所言不虚。"

果不其然，第二天，韩休拜相的诏书就到了。韩休顿时又惊又喜，从此对李林甫产生了莫大的好感。虽然过后韩休也知道举荐他的人是萧嵩，不是李林甫，可因为他和萧嵩存在工作上的摩擦，心里不愿对他存感恩之念，于是便不自觉地把李林甫当成了生命中的贵人。

一年后，韩休从宰相的位子上退了下来，离职时什么话都没说，唯独对玄宗说了一件事——李林甫才堪大用，可为宰相。

好了，至此李林甫已经先后摆平了皇帝身边的三类人：妃嫔、宦官、大臣。准确地说，是摆平了这三类人的代表。

做完这一切，李林甫就等于在玄宗周围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

在这个无形而又坚固的包围圈中，玄宗屡屡听到他最宠爱的妃子对李林甫的赞美，也时常听到他最信任的宦官对李林甫的夸奖，最后还听到了他最敬畏的宰相对李林甫的郑重举荐……如此种种，简直可以用众望所归来形容，玄宗又岂能无动于衷？

如果连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大臣都没有资格当宰相，那还有谁比他更有资格？

更何况，玄宗本人对李林甫的印象也一直很好。来自身边的所有这些好评，恰好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进一步证实了他对李林甫的观感。

所以，啥也别说了，拜相没商量！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李林甫被玄宗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中书令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之后，成了这一届宰相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

经过多年奋斗，李林甫终于成功了。

当年那个被源乾曜视为问题青年的哥奴，如今总算修成正果，成了堂堂的帝国宰相。

也许在别人眼中，这已经是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功了，可在李林甫看来，这只不过是新一轮奋斗的起点而已。

换言之，入阁拜相对于李林甫来说，只能算是获得了一种上场打擂的资格。

他的终极目标是——击败所有人，成为帝国擂台上无人可以比肩、无人敢于挑战的擂主；排除一切障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宰相！

冰与火的较量

李林甫来了。

当这个新的打擂者带着一脸诡谲莫测的笑容走上擂台时，现任擂主张九龄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股寒意。

他心里迅速掠过一个念头——来者不善。

是的，张九龄的感觉没错，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他和李林甫都是一对宿命的天敌。

张九龄虽出身寒门，但却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李林甫虽出身皇族，但却学识浅陋，工于权谋。

张九龄之所以入仕，是为了报效社稷、利济苍生，是为了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

而李林甫之所以为官，是为了获得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张九龄眼中，这个世界就是一袭等待他落笔挥毫的白绢，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莫不听从内心的道德召唤。

可对李林甫来讲，这个世界却是一座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所以他无时不在盘算着——谁是下一个可以利用的盟友，谁又是下一个必须铲除的政敌。

一言以蔽之，张九龄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李林甫则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

如果把张九龄比喻为一株冰山雪莲，那么李林甫则无异于一团红尘烈火。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注定不共戴天，注定会有一场冰与火的较量！

其实，早在李林甫即将入相之前，他和张九龄的暗战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玄宗出于对首席宰相张九龄的尊重，就询问他对李林甫入相的看法。张九龄的回答是：“宰相关系到国家安危，陛下用李林甫为相，臣担心将来会成为宗庙社稷之忧。”

言下之意，李林甫不但不是什么好鸟，而且迟早会败坏朝政、祸国殃民。

玄宗一听，心里老大不舒服。

朕跟你商量是给你面子，你不同意就说不同意，何必如此危言耸听呢？再怎么说，这也是朕看上的人，就算不是什么栋梁之才，至少也是个能臣干吏吧，怎么就被你说得如此卑劣不堪、一文不值呢？

玄宗没理睬自命清高的张九龄，而是按原计划把李林甫提了上来。

李林甫入相后，很快就听说了张九龄给他的那句评价。

可想而知，就像当年源乾曜的随口一说就让李林甫记了大半辈子一样，现在张九龄的这句无端贬斥更是让他怒火中烧，恨入骨髓。

伤自尊了，忒伤自尊了！

从这一刻起，张九龄就成了李林甫眼中的头号政敌。

可想而知，无论是为了争夺首席宰相之位，还是为了报此一箭之仇，李林甫都绝不会善罢甘休。

不过，李林甫是一个善于观察形势的人。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因为张九龄是张说的高徒，是继张说之后又一个名冠天下的文章圣手，而玄宗为了粉饰太平，必须依靠这种文学宰相来装点门面，所以对张九龄非常赏识和器重。在此情况下，李林甫当然只能作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在张九龄面前装孙子。（《资治通鉴》卷二一四："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

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李林甫始终夹着尾巴做人，表面上对张九龄服服帖帖、唯命是从，实则一直在耐心等待翻身做主的时机。到了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冬天，李林甫终于敏锐地抓住一个机会，开始了对张九龄的反击。

这一年十月，玄宗朝廷正在东都洛阳，原本预计要待到明年春天才返回西京长安，不料洛阳宫中忽然闹起了妖怪，搞得上上下下人心惶惶。玄宗非常不安，连忙召集宰相商议，准备提前回京。

当时正值农民收割的季节，皇帝御驾出行必定会影响沿途农田的正常收割，所以张九龄和裴耀卿都坚决反对，认为这么做会扰民，应该等到仲冬农闲时再出发。

玄宗一听，心里大为郁闷。

现在宫中闹鬼，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恨不得马上就走，本来是想让宰相们赶紧准备一下，即日启程，没想到他们却一口反对，而且提出的理由又让人难以反驳。玄宗很不爽，只好拉长了脸不说话。

李林甫察言观色，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于是一声不响。

片刻后，玄宗挥手让他们退下，李林甫故意磨磨蹭蹭地落在张九龄和裴耀卿后面，等到看着他们退出大殿，马上返身回到玄宗跟前，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而已，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何必等什么日子？假如真的妨碍农人收割，那就免除沿途百姓今冬的租税，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臣建议，陛下现在就向百官宣布，明天便可启程回京。"

玄宗闻言，顿时龙颜大悦，随即下令文武百官马上收拾东西，次日返回长安。

张九龄和裴耀卿接到天子的敕令时，不禁面面相觑。他们知道，这是李林甫出的主意，可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聪明的主意。

张、裴二相一心只想着百姓的利益，却不惜以忤逆皇帝为代价，其做法未免有些顾此失彼；可李林甫不仅讨好了皇帝，而且还顾全了百姓的利益，如此两边讨好的做法，岂不比张、裴二人高明许多？

经此一事，玄宗对李林甫的好感又提升了一大截。反之，张九龄和裴耀卿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

经过这次小小的火力侦察，李林甫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九龄远远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强大。

进而言之，张九龄身上有一个致命的死穴。

这个死穴就在于——他过高地估计了皇帝的纳谏雅量，又严重地低估了皇帝的权力意志！

李林甫相信，像张九龄这种自命清高又不识时务的宰相，迟早会在至高无上的天子权威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因此，在他和张九龄的这场较量中，李林甫知道自己根本不用花费多大力气，只需在皇帝身边煽风点火、旁敲侧击，张九龄就会乖乖地卷铺盖滚蛋！

换句话说，像张九龄这种"事无细大皆力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的姿态，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行为，短时间内没有问题，可日子一长，必定会招致皇帝的厌恶。就像一块貌似坚硬的冰，在适宜的低温环境中固然显得铁骨铮铮，可要是周围温度一旦升高，它的命运就是彻底融化。

对于这样一块冰，李林甫根本无需动手敲碎它，只要在它旁边生起一团火，再把火烧得旺一些，这样就够了。

不出李林甫所料，从洛阳回到长安没几天，张九龄就又因为一件事情和玄宗干上了。

这件事是关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与封赏。

牛仙客是边陲小吏出身，因精勤诚信、忠于职守，且立有战功，备受历任河西节度使的赏识，所以屡获升迁，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一路升到了河西节度使。他在河西任职时，朝中就盛传他不仅恪尽职守，而且善于理财，把河西治理得很好，但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也没人知道。后来，牛仙客奉命调任朔方节度使，他的继任者到河西一看，发现这个牛仙客实在不简单——虽然他和其他节度使拿着同样的经费，可辖区内的粮食储备却异常丰盈，武器装备也比其他地方精良得多。这个继任者大为叹服，不敢掠美，赶紧把牛仙客的政绩如实向朝廷作了禀报。

玄宗闻报，随即遣使前往河西视察，发现情况确实如同奏章所言。玄宗非常高兴，觉得这个牛仙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上准备把他调回朝中担任尚书。

可玄宗没想到，他刚一把事情提出来，就遭到了张九龄的否决。

张九龄说：“尚书是非常重要的职位，自大唐立国以来，这个职位要么是由卸任的宰相出任，要么是由名望、德行和才干三者兼备的人担任。牛仙客早年不过是个边疆小吏，如今突然位居要津，臣担心这么做会有辱朝廷的声誉。”

玄宗知道，张九龄一旦出言谏诤，必定不会让步，如果自己一再坚持，最后肯定又会闹得很不愉快。玄宗无奈，只好作出妥协，说：“既然如此，那么只加实封总可以吧？”所谓实封，就是分封爵位，同时赏赐相应户数的食邑。

“不可以！”玄宗话音刚落，张九龄立刻斩钉截铁地说，“封爵是用来赏赐给有功之臣的。牛仙客作为边防将领，充实武库、修备兵器是他的应尽职责，也属于日常事务，不能称为功勋。陛下如果要勉励他的勤劳，可以赐给他金帛财物，要是分封爵位，恐怕不太妥当。”

无语了。

碰上如此强悍的宰相，玄宗实在是无语了。

他之所以主动退了一步，就是想避免这种君臣相争的尴尬局面，没想到这个不知变通的张九龄还是硬生生把他逼到了墙角，真是让他既无

奈又窝火。

不过，让玄宗感到欣慰的是，并不是每个宰相都像张九龄这么不通情理。

当天散朝后，李林甫没有跟文武百官一起退出大殿，而是留了下来，单独对玄宗说："仙客有宰相之才，任尚书有何不可？九龄只是一介书生，不识大体，陛下不必理会他。"

有了李林甫的支持，玄宗的底气就足了。在第二天的朝会上，玄宗再次提出要加牛仙客实封。

当然，张九龄还是坚决反对。

玄宗勃然作色，厉声道："难道什么事都由你做主吗？"

张九龄一震，连忙跪地叩首，说："陛下不察臣之愚昧，让臣忝居相位，事有不妥，臣不敢不尽言。"

玄宗冷笑："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可你自己又是什么名门望族？

完了，皇帝说出这样的话，根本不是在讨论事情，而是在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了！

这场廷议进行到这里，满朝文武都不禁替张九龄捏了一把汗。在他们的印象中，天子李隆基似乎很少当着百官的面发这么大的脾气，如果张九龄识趣的话，到此就该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说到底，这也不是什么关乎社稷安危的大事，让天子自己做一回主也是理所应当的，你张九龄低个头、服个软，这事就算过去了，何必如此不识好歹地死扛，让自己和天子都下不来台呢？

可是，百官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不识好歹的张九龄还偏偏就死扛到底了！

只见他抬起头来，迎着天子的目光，一脸正色地说："臣是岭南蛮荒之地的微贱之人，比不上仙客生于中原。但是，臣毕竟出入台阁、掌理诰命多年，而仙客再怎么说也是个目不知书的边隅小吏，若予以大任，恐怕难孚众望。"

此言一出，说好听点叫作据理力争，说难听点就叫作反唇相讥了。张九龄这种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的名士做派和认死理的劲头，比之当初的“硬骨头”宋璟和“一根筋”韩休，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想而知，玄宗被彻底激怒了。

他忽地一下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把面面相觑的文武百官全都扔在了鸦雀无声的大殿里。

当天的朝会再次不欢而散。

看着如此火爆的一幕，李林甫无声地笑了。

当天下午，李林甫就通过内侍宦官给玄宗捎去了一句话——“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玄宗闻言，不禁在心里再次发出感叹：看来还是李林甫最贴心啊！

几天后，玄宗断然发布了一道敕令——赐牛仙客陇西县公之爵，实封食邑三百户。

这回轮到张九龄彻底无语了。

牛仙客事件后，张九龄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李林甫则扶摇直上，成了玄宗跟前的大红人。虽然李林甫在名义上还不是首席宰相，但玄宗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已经远远超过了张九龄。

局面演变到这一步，张九龄在玄宗眼中仅存的最后一个优点，也就是他那不计个人得失的坦荡公心了。尽管玄宗对张九龄的名士做派越来越难以忍受，可他也知道——无论张九龄如何与他面折廷争，毕竟是出于公心，并非出于一己之私。所以，至少在表面上，玄宗还必须尊重这样的宰相。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短短几天之后，张九龄的宰相生涯就忽然终结了。

而他被罢相的最主要原因，居然是他最不可能犯的毛病——徇私。

张九龄会“徇私”吗？

这个终身坚守道德理想，一贯孤高耿介、清谨自律的张九龄，怎么可能“徇私”呢？

张九龄最终之所以背上这个罪名，恰恰是因为他那孤傲清高、宁折不弯的性格。当然，同时也要拜他的死对头李林甫之所赐。

最后一击：张九龄罢相

众所周知，李林甫虽是皇族出身，但是家道中落，从小就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加上他自己对读书也没啥兴趣，所以自从入仕之后，就一直因不学无术而遭人诟病，同时也闹了不少笑话。

比如有一回，他的表弟太常少卿姜度（姜皎之子）添了个儿子，朝臣们纷纷前去道贺。李林甫也赶紧写了封贺信，连同贺礼一起让人送了过去。

宰相表哥这么给面子，姜度当然很高兴，随即当着宾客的面拆读贺信，打算好好显摆一下。没想到刚刚把信拆开，姜度就傻眼了，慌忙要把信合上。可是，有几个眼尖的宾客早就已经把信上的内容看得一清二楚了。

原来，宰相大人的信上赫然写着：“闻有弄獐之庆……”

众宾客一看，顿时忍俊不禁，纷纷掩口。

古人通常把生儿子称为“弄璋之庆”。“璋”是一种玉器，“弄璋”就是怀抱玉器的意思，是预祝新生儿一生吉祥富贵的象征。而李林甫却把玉器的“璋”写成了动物的“獐”，意思等于说人家的儿子抱着一只脏兮兮的獐鹿在玩，错得实在离谱。要是一般人也就罢了，可堂堂帝国宰相兼礼部尚书却犯这种低级错误，简直是匪夷所思。

从此，李林甫就有了“弄獐宰相”的“美誉”。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林甫自己没文化，手下自然就有半文盲，比如他引荐的户部侍郎萧炅，就跟他一样是个白字先生。有一次，朝中有个同僚办喜事，百官都前去赴宴，萧炅也去了。开席前，大伙在主人的书房里坐着，萧炅闲得无聊，就信手拿起一本《礼记》来翻。翻着翻着，萧炅忽然觉得有个地方不太明白，便不由自主地念出声来。他念出的两个字是“伏猎”。

此时坐在他旁边的人叫严挺之，是张九龄非常赏识的部下，时任中书侍郎。张九龄自己学富五车，他青睐的属下当然也是饱学之士。严挺之一听就知道萧炅念白字了，错把《礼记》中的“伏腊”读成了“伏

猎”。所谓“伏腊”，是指一年中的两个祭祀节日：伏日和腊日。《礼记》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但凡开过童蒙的，几乎无人不识“伏腊”二字，如今这个堂堂的户部侍郎萧炅居然把它读成了“伏猎”，真是无知得惊人，堪与他的主子“弄獐宰相”李林甫媲美！

严挺之既然是张九龄的人，自然看不起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于是故意拿萧炅开涮，提着嗓门大声问他：“萧大人，请问您刚才念什么？”

萧炅不知道人家在玩他，还一脸无辜地说：“伏猎呀，怎么了？”

在场众人本已掩嘴窃笑，听到这里终于控制不住，登时捧着肚子哄堂大笑。

严挺之也是又好气又好笑，过后就跟张九龄说：“朝廷已经出了一个‘弄獐宰相’，岂能再来一个‘伏猎侍郎’？”

张九龄二话不说，几天后就把萧炅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岐州刺史。

就因为这件事，严挺之把李林甫往死里得罪了。

当时张九龄正和李林甫明争暗斗，急欲引严挺之入相，以便增强自身实力，但是严挺之既已得罪李林甫，要想入相势必会有很大障碍，于是张九龄就劝严挺之去应付一下李林甫，说：“如今李林甫正得宠，你应该上门去拜访他，跟他缓和一下紧张关系。”

可严挺之根本听不进去。

因为他和张九龄几乎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孤傲清高，一样的负才使气，所以他压根就看不起李林甫这种人。不要说叫他登门求和，就算是李林甫来主动找他，他都未必会给对方好脸色看。

如此一来，严挺之跟李林甫的嫌隙也就越结越深了。

像严挺之这种心里藏不住事的人，自然是把他对李林甫的鄙夷和不屑全都挂在了脸上。可李林甫却不同，无论在什么场合碰见严挺之，他脸上总是一如既往地荡漾着和煦的笑容。

毫无疑问，李林甫脸上的笑容有多和煦，他对严挺之的恨意就有多深。一旦逮着个机会，他一定会让严挺之知道，得罪他李林甫将意味着什么……

开元二十四年末，也就是牛仙客事件刚刚过去不久，朝中就发生了一

起贪污案。这本来是一起极为普通的案子，犯案者是一个名叫王元琰的刺史，跟严挺之、张九龄等人没有丝毫瓜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起八竿子打不着的贪污案，却让李林甫一下子抓住了严挺之的把柄，以至最终把首席宰相张九龄也一起拖下了水。

王元琰案发后，按惯例交付三司（大理寺、御史台、刑部）审讯，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罪无可赦，可就在有关部门即将定案之前，有一个女人却找到了严挺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他救王元琰一命。

这个女人是王元琰的妻子。

本来，像这种已经铁板钉钉的案子，严挺之是绝对不应该插手、也没有必要插手的，可这一次，严挺之却觉得自己难以推脱，非插手不可。因为，这个女人是他的前妻。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严挺之和这个女人早已离婚，但毕竟还是有一些旧情。严挺之经不住前妻悲悲戚戚地一再恳求，最终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帮她这一次忙。

此时的严挺之绝对不会想到，就因为他这一次心软，不仅引火烧身，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而且还连累张九龄背负着“徇私”的罪名下了台，最终还在客观上助成了一代权相李林甫的强势崛起。

就在严挺之不顾一切地替王元琰四处奔走的时候，一双像鹰隼一样锐利的眼睛已经从背后死死盯住了他。

严挺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都落入了这双眼睛之中。

数日后，当李林甫判断严挺之已经完全坐实了徇私枉法的罪名后，才不慌不忙地递上了一份黑材料。

当然，李林甫是一贯谨慎的，他出手伤人的时候，永远不会把自己暴露在明处。所以他没有出面，而是授意自己的手下把材料递给了宫中的近侍宦官，再由他们转交给了天子李隆基。

这是致命的一击，也是最后的一击。

玄宗看完材料，顿时暴跳如雷。

好你个严挺之，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营救一个已经被定性的贪污犯？

玄宗当然知道，严挺之背后的人就是他一贯尊重的首席宰相张九龄。为了弄清是不是张九龄给了严挺之胆子，玄宗当即召集三位宰相入宫，面无表情地说：“严挺之为了一个女人，胆敢徇私枉法，为罪人王元琰开脱，你们说，这事该怎么办？”

李林甫缄默。

裴耀卿缄默。

张九龄如果聪明的话，此时当然也应该保持缄默。不管他如何器重严挺之，这个时候都只能丢卒保车、壮士断腕，与严挺之彻底撇清干系。假如再聪明一点的话，他甚至应该义正词严地痛骂严挺之几句，然后主动表示自己对属下管教不严，理应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只有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以退为进的官场哲学，他才能保住玄宗对他的信任，从而保住首席宰相的乌纱。

只可惜，张九龄没有这么做。

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因为他不屑。

面对玄宗森寒逼人的目光，张九龄竟然趋前一步，朗声说道：“据臣所知，严挺之已经和这个女人离异，应该没有什么感情，更谈不上什么徇私。”

就是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张九龄自己苦心维系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也让玄宗李隆基对他彻底丧失了信任。

玄宗之所以能够容忍他一再违忤圣意、触逆龙鳞，无非是看在其一心为公、从不徇私的分上。可现在倒好，张九龄一句话，就亲手葬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也亲手抹掉了他在玄宗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好感。既然如此，玄宗凭什么还要留他？

玄宗盯着张九龄看了很长时间，最后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说：“虽离，乃复有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严挺之和他前妻虽已离异，仍旧不免有私心！

玄宗这句话一锤定音，为王元琰贪污案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也把严挺之和张九龄一块儿定了性。

次日，玄宗颁下一道诏书：王元琰贪赃受贿，罪证确凿，流放岭南；严挺之徇私枉法，为罪犯开脱罪责，妨碍司法公正，贬为洺州刺史；

张九龄不仅徇私包庇属下，且有交结朋党之嫌疑，免去中书令之职，罢为尚书右丞；裴耀卿素与张九龄交厚，也有结党之嫌，免去侍中之职，罢为尚书左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在同一份诏书中，玄宗郑重宣布——由李林甫取代张九龄，出任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就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两道任命状，就像是狠狠扇在张九龄脸上的两记耳光。

你说李林甫最终将危害朝廷社稷，那朕就让他取代你，让他成为帝国的首席宰相，看他到底如何祸国殃民！

你说牛仙客是边陲小吏，连做尚书的资格都没有，那朕就偏偏让他当尚书，还要让他当宰相，看他当不当得起！

既然朝廷是朕的朝廷，社稷也是朕的社稷，那么只要朕愿意，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是的，只要玄宗李隆基自己愿意，确实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上（李隆基）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随着张九龄的罢相和李林甫的崛起，唐玄宗李隆基也在由俭入奢、由明而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从开元二十四年的这个冬天起，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那个“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冬天，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偌大的帝国之中，确实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大唐天子李隆基走向深渊的脚步。

当然，李隆基是无法预见未来的。

连西方哲学家休谟都十分怀疑明天的太阳是否会照常升起，李隆基又如何预见未来呢？

不要说二十年后的事情，就算接下来马上要发生的这一幕人伦悲剧，也是李隆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到的……

太子废立

作为一个皇帝，李隆基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因为他不仅通过个人奋斗攫取了大唐天子的宝座，而且通过不懈努力缔造了彪炳千秋的煌煌盛世，所以，就算用“天纵神武”“雄才伟略”这一类夸张词汇来形容他，似乎也不算过分。然而，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李隆基的表现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开元十二年，他无情地废黜了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结发妻子王皇后，导致她随后抑郁而终。时隔十三年后，他又亲手废黜了太子李瑛的储君之位，同时废黜了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的王爵，在同一天将这三个儿子贬为庶人，旋即又全部赐死。

尽管这些决定都出自玄宗本人之手，但是这一幕毕竟是谁也不愿看见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无论如何都是人生中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那么，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一个父亲不顾一切地对三个儿子痛下杀手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武惠妃容不下他们。

太子李瑛是玄宗的第二子[1]，李瑛的生母就是李隆基当年在潞州爱上的那个歌姬赵氏，后来封为赵丽妃。在李隆基当临淄王时，最宠爱的妃子有三个，除了赵丽妃外，还有皇甫德仪和刘才人。皇甫德仪生玄宗第五子鄂王李瑶，刘才人生第八子光王李琚。由于三个母亲都得宠，这三个儿子自然也备受玄宗的疼爱。

然而，几年以后，当那个美艳动人又野心勃勃的武惠妃出现在玄宗身边的时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李隆基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到了武惠妃和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身上，赵丽妃、皇甫德仪和刘才人恩宠渐衰，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也随之丧失了原有的父爱。

相同的愤怒、嫉妒和忧伤迅速在这三个年轻人的心中泛滥开来。

那个妖精武惠妃和她的儿子，凭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博得父皇的专宠？父皇身为一国之君，岂能如此偏心，如此薄情，如此寡恩？

这不公平！

三个同病相怜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这样缔结了一个悲情三人组，

时不时地聚在一起互倒苦水，怨天尤人。

在人与人之间，负面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的，就像流感一样，只要一个流鼻水，旁边的人很快就会打喷嚏。而太子李瑛的这个悲情组合也是如此，只要其中一个眉头微皱，另外两个必定长吁短叹，最后就是三个人一起捶胸顿足，指天骂地。

太子李瑛并不知道，他和两个弟弟的所有“怨望”言辞，已经一字不漏地落进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就是驸马都尉杨洄（娶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

自从王皇后被废黜后，武惠妃就把下一个打击目标锁定在了太子身上。她相信，只要抓住太子的把柄，往皇帝那里一捅，再加上宰相李林甫在外朝声援，她就一定能够扳倒太子。

为了掌握太子的一举一动，武惠妃就把窥伺东宫的任务交给了女婿杨洄。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太子李瑛恰恰又是一个毫无城府、感情用事的人。他那些怨天尤人的牢骚怪话，非但无以改变自身的处境，反而只能把自己推向绝地，遂了武惠妃的心愿。

开元二十四年冬，杨洄把悲情三人组的怨望言行一五一十地向武惠妃作了报告。武惠妃即刻发飙，跑去向玄宗哭诉：“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妾身母子，而且还用很多难听的话咒骂皇上……”

玄宗勃然大怒，马上召集宰相，准备把太子等三人一起废了。

当时张九龄还在相位上，他当然不允许皇帝随便听几句谗言就废掉太子，于是坚决谏阻，说：“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未闻大过，陛下岂能凭无据之词，在盛怒之下尽皆废黜？况且太子乃天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而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的巫蛊之言问罪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偏听贾后的一面之词废黜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采纳独孤后之言废杨勇、立杨广，最终丧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绝对不敢奉诏！”

不就是废黜一个不中用的太子吗？何必跟朕大掉书袋，还一口一个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朕看你是小题大做、危言耸听！

玄宗脸色铁青，闷声不响。

尽管对张九龄的谏言很不以为然，可废黜太子毕竟不是一件小事，要让玄宗真的撇开宰相一意孤行，他一时倒也下不了决心。

正当玄宗举棋不定之时，李林甫投出他关键的一票了。

当然，李林甫是从来不会跟张九龄发生正面冲突的。在众人廷议的时候，他故意不置一词，一直等到下殿之后，才故伎重施，凑到一个近侍宦官的耳边嘀咕了一句：“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显而易见，李林甫这句话，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武惠妃对他的拜相出力甚多，他理当回报；二、迎合皇帝，打击张九龄，向首席宰相之位再靠近一步；三、寿王李瑁一旦被立为太子，他李林甫就立下了定策之功，来日李瑁当皇帝，他这个大功臣自然可以把朝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

李林甫自以为此言一出，皇帝一定会采取行动，而太子李瑛也一定会乖乖地滚出东宫。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武惠妃自己居然走了一步臭棋，结果就把煮熟的鸭子弄飞了。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武惠妃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功亏一篑，问题就出在她太过心急了。

就在玄宗因张九龄力谏而犹豫不决的当口，武惠妃竟然吩咐一个心腹宦官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言下之意，只要你张大人高抬贵手，来日李瑁入继大统，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武惠妃的这个举动堪称愚蠢之极。她明明知道张九龄是个不可能被收买的强硬角色，还派人去跟他做交易，其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张九龄指着那个传话宦官的鼻子一通臭骂，第二天就把武惠妃的那句蠢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皇帝。

玄宗一听，心里老大不是滋味。

原本他还以为是太子三兄弟合起伙来欺负武惠妃母子，他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可现在看来，反倒是武惠妃有耍弄阴谋诡计的嫌疑。尤其让玄宗感到不悦的是，武惠妃企图与外朝宰相联手颠覆东宫，这是典型的妇人干政，大大地触犯了忌讳！

所以，经过武惠妃这么一折腾，玄宗也就闭口不提废黜之事了。

太子李瑛就此躲过一劫。

可是，他并没有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随后的日子，他照旧和两个弟弟天天泡在一块，不是骂武惠妃就是埋怨皇帝，没半点新鲜的。

很显然，这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其低下的太子，也是一个丝毫没有谋略的太子。在帝国宫廷这样一个危机四伏、万分险恶的环境中，在武惠妃处心积虑、咄咄逼人的夺嫡态势之下，如此不善于自我保护的太子，注定是要完蛋的。

废黜风波刚刚过去没几天，帝国高层的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子李瑛的保护伞张九龄被赶下了台，武惠妃的政治同盟李林甫出任首席宰相。

一时间，东宫的上空再次乌云密布。

不过，张九龄虽然离开了相位，但毕竟还是尚书右丞，对朝廷的很多事情还是有发言权的，只要他还在朝中，东宫就没那么容易被颠覆。

可令人无奈的是，张九龄现在已自身难保了。

因为李林甫不想放过他。

为了彻底杜绝张九龄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李林甫一直在寻找机会，打算把他逐出朝廷。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坏在一个叫周子谅的监察御史身上。此人是张九龄引荐的，而性格也和他一样，既自命清高又性情急躁，做事直来直去，从不讲究策略。由于看不惯牛仙客这种目不知书的武夫当宰相，加之为了替老大张九龄出口气，周子谅就对牛仙客发出了弹劾。

只可惜，他的弹劾方式太过拙劣，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按理说，要弹劾牛仙客，最准确的角度应该是说他文化程度太低，又从未在中央任职，缺乏统揽全局的经验和才能，等等，可天知道周子谅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没有从这个地方入手，而是拿了一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谶书，声称按书中所言，牛仙客没有资格当宰相。

此时的玄宗正在器重牛仙客，哪里听得进周子谅这种居心叵测、莫名其妙的弹劾，自然是火冒三丈，当场就命左右把他按倒在地，一顿棍棒伺候，直打得周子谅七窍流血，晕死过去。过了一会儿，周子谅悠悠醒转，玄宗余怒未消，又命人把他拖到百官办公的地方，再次当众暴打，最后下了一道敕令——流放岭南。

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周子谅当然走不到岭南，才走出长安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李林甫抓住机会穷追猛打，对玄宗说，这个周子谅是张九龄引荐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此次弹劾的幕后主使正是张九龄。

玄宗二话不说，当即把张九龄贬为荆州（今湖北江陵县）长史。

张九龄一离开朝廷，太子李瑛等人的末日也就到了，早已急不可耐的武惠妃再次授意女婿杨洄指控太子等三人。

为了确保此次攻击能够得手，武惠妃加大了火力，除指控三人心怀怨望外，还加上了致命的一条——称太子与太子妃的哥哥薛锈暗中勾结，企图发动叛乱！

这无疑是一条十恶不赦的罪名。

自古以来，大多数皇帝对于这样的指控，通常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更何况像李隆基这种依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这方面的神经尤其敏感，当然反应也就尤其强烈。

玄宗接到指控后，根本不作调查，而是直接召宰相入宫商议。

这一次，决定太子命运的人不再是一心为公、顾全大局的张九龄，而是一心想颠覆东宫的李林甫了。

所以，太子死定了。

李林甫只对玄宗说了一句话：“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这些臣子可以过问的。

这就是李林甫的高明之处。表面上看，他投了弃权票，不替皇帝拿主意；可事实上，他却帮皇帝下定了废黜太子的决心。

就在张九龄离开长安的第二天，亦即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下诏，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全部废为庶人，将薛锈流放岭南。

还没等太子等人从这个晴天霹雳中回过神来，第二道诏书就接踵而至了。

这是一道赐死诏。

太子三兄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父皇竟然会如此心狠手辣，翻脸无情！

不过，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

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老老实实地把头伸进三尺白绫，顶多就是在告别人世的那一瞬间，将满腔悲愤化为一句撕心裂肺的怒吼——武惠妃，我们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

李瑛、李瑶、李琚、薛锈四人被赐死的第二天，他们母族、妻族中在朝任职的官员，也有数十人遭到了贬谪和流放。

皇帝的三个儿子同日被杀的消息在长安传开后，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一个堂堂的帝国储君，已经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从来没听说犯什么大错，怎么说废就废，说杀就杀了呢？还有李瑶和李琚，据说也是很有才学的皇子，如今竟然也和太子一起无罪遭戮，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武惠妃终于赢了。

十几年来殚精竭虑、费尽心机所做的一切，总算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就像一头凶悍的母狮咬死对手后，总喜欢带着自己的幼崽巡视新领地一样，每当武惠妃和寿王李瑁一起从东宫门口经过，她总会用一种自豪而兴奋的语调对李瑁说：“看看吧，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也许是明天，或者是后天，你就将在所有皇子既羡且妒的目光中，昂首挺胸地走进去，当之无愧地成为这里的主人！”

可是，武惠妃永远也等不到这个“明天”了。

因为从太子三兄弟冤死的那一天起，她每天晚上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所缠绕。在梦中，三兄弟总是披头散发，直挺挺地在她床边站成一排，然后伸出三条长长的酱紫色的舌头，像蛇一样在她的脸上蜿蜒游走。

她想喊，可怎么也喊不出声来；她想挣扎，可浑身上下却动弹不得……直到那三条舌头死死地缠上了她的脖颈，她才会在即将窒息的一刹那厉声尖叫着惊醒过来。

醒来后的武惠妃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脸颊和脖颈，似乎仍然可以摸到一种冰冷湿滑的感觉。

武惠妃就这样无可救药地患上了神经衰弱。起初还只是被夜晚的噩梦所困，后来大白天也会出现厉鬼索命的幻觉。武惠妃请来了一茬又一茬的巫师、术士、和尚、道士，夜以继日地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驱鬼法会，可这一切都于事无补，那三条冤魂仍然不屈不挠地飘荡在她的每一个黑夜和白昼之中。武惠妃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戾气和怨气不仅始终弥漫在她的周遭，而且还一点一滴地渗进了她的皮肤、血液和骨髓之中。武惠妃先是忧怖恐惧，继而变得歇斯底里，最后终于绝望崩溃。

开元二十五年深冬的某个夜晚，也就是太子三兄弟被杀的八个月后，武惠妃在不断重复的那个噩梦中发出最后一声凄厉的尖叫，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终究还是没有看到儿子李瑁入主东宫的那一天。

不过就算她没死，她也永远看不到这一天了。

因为最终继任太子的人并不是寿王李瑁，而是另有其人。

自从太子李瑛死后，李林甫曾经不止一次地敦促玄宗立寿王李瑁为太子，可玄宗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玄宗之所以犹豫不决，其因有二：首先，李瑛虽然死了，但是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继位东宫的人应该是三子忠王李玙，而不应该是十八子寿王李瑁；其次，玄宗在盛怒之下一日废杀三子，过后冷静下来，自然会感到伤心和后悔，所以尽管他最疼爱李瑁，可感情上还是有一些难以摆脱的牵绊。再加上武惠妃一死，玄宗对李瑁的钟爱之情也随之减弱，因此在李玙和李瑁两个储君人选之间，也就更难以取舍定夺。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六月，储位虚悬已经一年有余，新太子的人选始终定不下来，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皇帝，玄宗的烦恼和苦闷可想而知，时常愁得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

一贯细心敏感、善于替皇帝分忧的高力士，自然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

里。

某日，高力士乘左右无人，就小心地询问皇帝为何闷闷不乐。

玄宗慵懒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我家的老仆人，难道还猜不透我的心思？”

高力士说：“是因为储君未定吧？”

玄宗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高力士深长地看了皇帝一眼，不紧不慢地说：“大家（皇帝的昵称）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皇上何必这般殚精竭虑，只要依年龄大的立，看谁还敢再争？

这真叫一语点醒梦中人。玄宗顿觉豁然开朗，频频点头说：“汝言是也！汝言是也！”

就在这主仆二人貌似闲谈的几句话中，旷日持久的储位纷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大唐帝国的新任太子就此诞生。

这一年六月初三，时年二十八岁的忠王李玙（亦即后来的肃宗李亨）出人意料地脱颖而出，正式入主东宫。

对此结果，李林甫当然是大为错愕。因为他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看着册封大典上意气风发的新太子李玙，李林甫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忧惧。

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在这场夺嫡之争中，李林甫一直是寿王李瑁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今李玙突然胜出，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仅意味着李林甫这些年来所做的努力已经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且意味着他和新太子已经因为这场储位纷争结下了深深的嫌隙。

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跟未来的皇帝结怨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可事已至此，李林甫还能怎么办呢？

时光无法倒流，错误已然铸成。在这件事上，从不做赔本生意的官场老手李林甫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从出道以来做过的最不合算的一笔

政治买卖。

假如李林甫从此改换门庭，投到太子麾下，是不是一切就可以从头再来呢？

不是不可以，只是很难，极有可能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因为，历史旧账不是那么容易一笔勾销的，就算太子在表面上接纳了他，双方也很可能是虚与委蛇、相互敷衍而已。换句话说，不论他怎么做，太子都很难相信他的忠诚，他也很难真正获得太子的信任。

既然如此，李林甫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他必须不择手段地搞掉这个新太子，决不能让他顺利当上皇帝！

当然，在此时的李林甫看来，眼下的当务之急还不是如何颠覆东宫，而是如何巩固并扩大自己的相权。一旦自己的政治能量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朝政，李林甫就将毫不犹豫地对太子李玙发起攻击。

李林甫相信，这一天一定不会太远。

[1]　据说长子李琮小时候被野兽抓伤了脸，故因破相而无缘太子之位。

第三章 天宝政局

命运之神的雷人想象

开元末年，唐朝政府曾经作过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表明，时至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底，全国总户数已达到8 412 871户，总人口达到48 143 609人。

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再找几个数据来对比，或许就能明白它的意义所在。

大唐开国之初，编户仅二百余万；至贞观初年仍不满三百万，永徽初年增至三百八十万；至中宗、睿宗时期，全国总户数增至六百余万。

也就是说，从唐初到开元之前的一百年间，仅增长四百万户；而开元时期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总户数就增长了二百四十万左右，显然是唐朝开国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阶段。

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口数量绝对是和GDP呈同比增长的，同时也是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由此可以说，开元年间编户齐民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唐朝走向全面繁荣的标志，也是太平盛世到来的重要标志。

《资治通鉴》称，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旧唐书·玄宗本纪》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于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用八个字给这个时代作出了高度评价：“开元之盛，汉、宋莫及！”

公元742年正月初一，唐玄宗李隆基亲御勤政楼接受百官朝贺，同时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天宝”。

开元时代就此落下帷幕。

大唐帝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加繁荣的极盛时代。

在改元的诏令中，玄宗宣称：“自朕嗣守丕业，洎三十年，实赖宗社降灵，昊穹孚祐，万方无事，寰宇晏如，庶臻于理。”（《全唐文》卷三九）

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这一年，玄宗李隆基五十八岁，君临天下已经整整三十年，就像古人常说的那样：“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时的李隆基，早已丧失了当年那种锐意进取、克己自律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日甚一日的骄奢淫逸和纵情享乐。

尤其是从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死后，玄宗的感情生活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最宠爱的妃子猝然辞世，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一下子变得消沉颓废，所以六宫粉黛、三千佳丽对他而言都失去了吸引力，“顾前后左右，粉色如土”（唐·陈鸿《长恨歌传》）。另一方面，为了发泄这种情感上的抑郁和苦闷，他又变得越发纵欲和荒淫。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当时玄宗成天和嫔妃们变着法子寻欢作乐，比如春天的时候，他就在每个佳丽头上插一朵鲜花，然后放飞一

只蝴蝶，看蝴蝶停在谁的头上就临幸谁。这种把戏玩腻了，玄宗就开坛设赌，亲自坐庄，命嫔妃们都来赌博，谁赢了谁就陪他过夜。

这种胡天胡地、瞎玩乱搞的荒唐生活整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一个女人蓦然闯进他的心扉，填补了武惠妃留下的那个巨大的感情空白，这一切才戛然而止。

众所周知，这个蓦然闯进玄宗心扉的女人，这个即将和玄宗联袂演绎千古爱情佳话的女人，就是杨贵妃。

杨贵妃，小名玉环，是世家大族弘农杨氏的后裔。远从汉朝开始，弘农杨氏就是著名的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历代名人辈出。及至隋唐两朝，这个家族更是出了一大票牛人，比如隋文帝杨坚，隋朝宰相杨素、杨雄、杨达，还有女皇武曌的母亲杨氏，武德时期的宰相杨恭仁，贞观时期的宰相杨师道等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许多史书都说杨玉环是“弘农华阴人”，就是为了强调她的这种高贵出身。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太准确。因为早在隋朝以前，她的祖上就已经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市），所以“弘农华阴”只不过是杨玉环的远祖郡望而已，和她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与隋文帝同宗，杨玉环的高祖父杨汪在隋朝很受器重，赐爵平乡县伯，官至尚书左丞。可惜隋末大乱时，杨汪投靠了王世充，后来东都被秦王李世民攻克，杨汪被杀，从此他的后人就逐渐没落了。

到了杨玉环的父亲杨玄琰这一代，其家道早已衰落，与祖上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大约在开元初年，杨玄琰由蒲州入川，到蜀州（今四川崇州市）担任司户。所谓司户，只是掌管户籍、记账、婚田等事宜的从七品小官。杨玄琰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杨玄珪，一个叫杨玄璬，后者在洛阳担任河南府士曹参军，和杨玄琰一样，也是个从七品的芝麻官。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杨玉环生于蜀州。她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大概在她十岁的时候，杨玉环的父母双双亡故。这本来是人生中的大不幸，可对于杨玉环而言，这个意外的变故却成了她人生中的一大转机——因为她从此离开了山高皇帝远的蜀州，被叔父杨玄璬接到了洛阳抚养。

众所周知，东都洛阳是唐朝的第二政治中心，著名的人文荟萃之地，同时也是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其繁华富庶的程度远非偏僻的蜀州可比。杨玉环到了这个富有时尚气息的大都会，不仅可以开阔眼界，增

长见识，而且能够得到更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个在东都成长的机会，杨玉环才能出落成一个秀外慧中、色艺双馨的绝代佳人。史称她“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旧唐书·杨贵妃传》）。在这些优点中，除了容貌是天生的以外，其他素质当然是得益于后天的培养和环境的熏陶。而这一切，正是她日后得以被选入宫的重要条件，也是她日后让玄宗深深迷醉的主要原因。

开元年间，玄宗曾先后五次巡幸东都，每次东巡，文武百官、皇族宗室、后宫妃嫔必定随驾而行。每次驻留东都的时间，短则数月，长则两三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环被叔父接到洛阳抚养，就意味着来到了天子脚下，意味着进入了皇帝和朝廷的视野，从而也就有了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机会。

总而言之，少时父母双亡的遭遇对杨玉环来讲，非但不是一种不幸，反而可以说是命运之神的一种垂青。假如不是遭遇这种变故，她当然只能在蜀州长大，日后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既不可能宠冠六宫、名动天下，更不可能进入史册。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秋，玄宗最后一次从西京长安移驾东都洛阳。这一次，他在东都住了将近三年，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才返回长安。在此期间，玄宗操办了两件大事。

准确地说，这是两桩喜事。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七月及次年正月，玄宗分别为自己最宠爱的一双儿女——咸宜公主和寿王李瑁（均为武惠妃所生），举办了两场盛大的婚礼。

巧合的是，这次选中的女婿和儿媳都姓杨，也都出自世家大族弘农杨氏。

这个女婿，就是后来帮武惠妃制造了“三庶人案”并整死了太子李瑛的杨洄。

而这个儿媳，就是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的养女——杨玉环。

此时的李隆基当然不会想到，短短四年后，他亲自选中的这个儿媳居然将变成他最爱的女人，并将在未来的日子和他共同演绎一场轰轰烈烈、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当时，在玄宗的三十个皇子中，寿王李瑁所受的宠幸“冠绝诸王”，远比太子更为得宠，所以，为他挑选王妃的事情，自然就成了李唐皇族的头等大事，俨然比挑选太子妃还要慎重。

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正月抵达洛阳后，玄宗和武惠妃就开始张罗着替寿王选妃了。这场王妃选秀活动一直进行了将近两年，经过层层选拔和各项指标的评比，年方十七岁的杨玉环终于从众多妙龄少女中脱颖而出，成了这场海选的冠军。

杨玉环之所以胜出，首先当然是因为她那“弘农杨氏”的金字招牌，虽然家道早已中落，但是名门望族的高贵背景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的；其次，她那“姿色冠代”、倾国倾城的容貌，的确让所有见过她的人都感到眼前一亮，并且过目难忘；最后，是因为她在艺术上的修养和造诣，也确实让其他选手望尘莫及。

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七品芝麻官杨玄璬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风光的一个时刻。

因为这一天，浩浩荡荡的册封使团从皇宫来到了他这座鲜有贵客登门的小小宅院中，并且隆重宣布——大唐天子将与他结成儿女亲家。

对于杨玄璬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值得庆幸和骄傲的呢？

而且，此次册封典礼的规格也是非常高的。代表皇帝前来册封的正使是堂堂宰相兼礼部尚书李林甫，副使是黄门侍郎陈希烈。在册妃诏书中，玄宗盛赞杨玉环：“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考虑到皇室尊严，当然要隐去杨玉环的养女身份），公辅之门，清白流庆，诞钟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范夙成，柔明自远；修明内湛，淑问外昭。是以选极名家，俪兹藩国。”（《唐大诏令集》卷四十）

从这一刻开始，杨玉环的个人命运，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写了。

一个月后，亦即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十八岁的杨玉环被迎娶入宫，正式成为寿王妃。

寿王李瑁与杨玉环的年龄大致相当，根据相关记载，武惠妃的几个儿女都长得相当标致，而寿王李瑁应该也是一个相貌堂堂、玉树临风的佳公子。可以想见，在当时世人的目光中，他们绝对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

然而，又有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后，这对人人艳羡的佳偶就要被活生

生地拆散呢？又有谁能想到，将他们拆散并且横刀夺爱的那个人，竟然是杨玉环的公公、大唐天子李隆基呢？

杨玉环嫁入帝王家之际，正是武惠妃一手导演的储位纷争越演越烈之时。虽然史书没有记载杨玉环在这场纷争中有什么具体言行，但是作为利益攸关的当事者，她肯定是无法作壁上观的。因为一旦夺嫡成功，她就将变成太子妃，变成未来的皇后，所以至少在心情上，初入宫门的杨玉环肯定会被这场政治旋涡掀起不小的波澜。

后来“三庶人案”爆发，太子李瑛等三兄弟同日被杀，武惠妃因良心不安一病而亡，忠王李玙随后入主东宫。原本到这里为止，所有的纷纷扰扰就都过去了，虽然李瑁当不上太子，杨玉环成不了太子妃，但这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李瑁还是寿王，杨玉环还是王妃，他们依然可以享有安宁和富贵的生活，也依然可以像普天下的所有夫妻一样，举案齐眉，长相厮守，生儿育女，白头偕老。

然而，命运之神却在这个时候跟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杨玉环绝对不会料到，她婆婆的死给她公公造成的感情创伤，最终竟然要由她这个儿媳去抚慰；而寿王李瑁当然更不会料到，他刚刚失去母亲，马上又将失去妻子，而且这个妻子居然一转眼就变成了他父皇的“娘子”，从而匪夷所思地成了他的“后妈”……

人生就是这么荒诞。

世事就是如此无常。

命运之神的想象力，就是可以这么离谱而雷人！

它漫不经心地开一个玩笑，有时候就足以让当事人欲哭无泪，让旁观者目瞪口呆，并且让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小说家跌破眼镜，自愧弗如。

那么，李隆基与杨玉环的这场不伦之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李隆基一边痛感整座后宫“粉色如土”，一边又近乎荒淫地胡搞瞎搞的时候，是谁把杨玉环隆重推到他面前的呢？

答案其实不难猜到。

这个在公媳之间牵线搭桥的另类月老，就是玄宗最贴心的那个“老奴”——高力士。

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

对于李隆基和杨玉环的这场不伦之恋，几乎所有官方正史都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无论是两《唐书》还是《通鉴》，在谈到是谁向玄宗推荐杨玉环的时候，都作“或奏”“或言”，而不说是谁。只有中唐人陈鸿所作的《长恨歌传》中，才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

那么，这个记载是否属实呢？向玄宗推荐杨玉环的人，到底是不是高力士呢？

首先，武惠妃死后，唐玄宗陷入了非常糟糕的精神状态中，这是所有史料共同记载的事实。面对这种状况，一贯善于替主子分忧的老奴高力士会怎么做呢？很显然，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帮玄宗物色一个新的意中人，以抚平玄宗的感情创伤。在高力士而言，这就叫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其次，玄宗是一个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作为天子，他固然有权用泛滥的肉欲来麻醉自己，可作为一个多情的男人，他却不可能容忍“爱情”这一美妙事物在自己生命中的长期缺席。所以，越是在酒池肉林中浸泡得久，他对于真爱的渴望就会越加强烈。这时候，他必然会把寻找真爱的目光从后宫的高墙上投射出去，在更大的范围内猎艳选美。而这个选美的任务交给谁最合适呢？当然就是他最信任的高力士了。

有人说，高力士把儿媳推荐给公公的做法是在“找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件事应该由谁来干，才不算是找死？我们知道，高力士是唐玄宗最贴心的人，那句“力士当上，我寝乃安”的感叹已经成为千古名言。终李隆基一生，他对高力士的信任从来没有改变过；而终高力士一生，他对李隆基的忠诚也从来没有动摇过。由此可见，假如连高力士都不敢“冒这个险”，那天下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人了。试问，外朝的文武百官敢吗？他们谁比高力士更了解玄宗，谁比高力士更有权插手玄宗的私生活？答案只能是两个字：没有。此外，后宫的三千佳丽会来牵这个线吗？她们会去找一个比她们出众百倍的人来独占天子恩宠吗？答案也是两个字：不会。那么剩下来的人，诸如儿女、宗室、外戚等等，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毕竟是玄宗的亲人，不要说他们不敢去做这种触犯人伦忌讳的事情，就算是他们敢，玄宗自己的脸面也挂不住。

所以说，恰恰是因为把儿媳推荐给公公的这种做法有些冒险和犯忌，恰恰是因为朝野上下、宫廷内外都没有人敢做，高力士才必须挺身而出。换言之，他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他就是做这件事的不二人选。至于说高力士这么做是不是在“找死”，我认为有待商榷。因为有唐一代胡风很盛，虽然也有三纲五常的礼教约束，但是人伦大防毕竟比其他朝代松弛得多，没有那么多道德藩篱和伦理禁忌，所以前有太宗李世民纳弟媳为妃，后有高宗李治立庶母武媚为后，再后来才有玄宗李隆基纳儿媳为妃的这一出。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有悖伦常的现象，均可谓时代风气使然，不值得后人大惊小怪。因此，若说高力士把杨玉环推荐给玄宗多少有点冒险和犯忌，那是实情，可要说是在“找死”，未免就言过其实了。

或许高力士当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创造机会让杨玉环来到玄宗身边，让他们来一次零距离接触，让杨玉环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冠代姿色和绝世才艺。如果玄宗能因此重燃爱情火苗，那当然最好；要是不乐意，那就另外再挑。对高力士来讲，他只负责推荐，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并不是要把杨玉环打扮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窈窕淑女塞给玄宗。

再者说，作为玄宗当年亲自选中的儿媳，玄宗当然很清楚杨玉环的长相，而且对她的美貌肯定印象深刻。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他当时毕竟是用挑儿媳的眼光来看杨玉环的，儿媳再怎么美，他当公公的人也只能抱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心态，欣赏欣赏罢了，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可武惠妃死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玄宗首先关心的东西只能是——她能不能成为我的爱人？而绝不会是——她原本是谁的爱人？至于说最后如何把儿子的爱人巧妙地变成自己的爱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这个在公媳之间牵线搭桥的另类月老，除了高力士，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十月，在高力士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前往骊山（今陕西临潼县境内）的温泉宫（即华清宫）与玄宗李隆基相会。这一年，杨玉环二十二岁，李隆基五十六岁。

一场缠绵悱恻、千古传诵的爱情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没有人知道杨玉环在这一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或许有几分愕然与惶恐，也有几分对过去生活的依恋，然而与此同时，肯定还有几分朦胧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希冀。毕竟，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宠，是古代女子所能享有的最大的福分，是六宫粉黛、三千佳丽梦寐以求

的事情。杨玉环虽然嫁入帝王家的时间不长，对争位夺宠的后宫斗争没什么概念，但她毕竟是一个“智算过人”的女人，仅凭直觉，她也能体会到此次“骊山相会”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

就像四年前从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忽然变成寿王妃一样，此刻摆在她面前的，同样是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甚至比当初那个机会更加稀有难得，弥足珍贵！所以，无论此刻杨玉环心里有多少愕然与惶恐，也无论有多少对寿王割舍不下的情分，她都会把它们深深地掩藏在心底，然后毫无保留、不遗余力地向这个天下最尊贵的男人，展现出她那绝世无双、撼人心魄的女性魅力！

于是，就在这座云蒸霞蔚、温暖如春的华清宫中，年过半百的李隆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杨玉环，爱上了当初由自己亲自选中的这个儿媳。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白居易《长恨歌》）

须臾花开，刹那雪乱。

那一瞬间，李隆基被一种睽违已久的激情撞击得头晕目眩。

他从来没有想到，他那早已枯萎的爱情之树，竟然还能在这个万物凋零的冬天里，重新绽放出一抹生机无限的新绿……

毫无疑问，就在这短短十几天的骊山相会中，玄宗李隆基已经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后半生，他无论如何都要与杨玉环长相厮守！

可是，杨玉环眼下的身份还是寿王妃，是自己的儿媳，要如何才能冠冕堂皇地把她变成自己的女人呢？

直接娶过来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想一个巧妙的办法。

办法很快就有了。

玄宗有先例可循。想当年，高宗李治在纳庶母武媚为妃之前，武媚不

是也曾经到感业寺当了一段时间的尼姑吗？如今，玄宗正大力推崇道教，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玉环“出家”当女道士，先剥离她寿王妃的身份，然后再暗度陈仓地将她纳入自己的后宫。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正月初二，是玄宗母亲窦太后的忌辰，玄宗借着为母亲追福的名义，以杨玉环“自愿”出家为由，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寿王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全唐文》卷三五《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

就这样，杨玉环身穿道袍，头戴黄冠，离开了寿王府，进入了玄宗为她在大明宫中特置的一座道观，成了一个女道士，道号“太真”。

在后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杨玉环一直以这个掩人耳目的身份和玄宗在一起。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杨玉环随同玄宗再登骊山，在华清宫住了二十多天。当玄宗一行回到长安后，众人蓦然发现，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杨太真”已经脱下道袍，摘下黄冠，穿上了华美的曳地长裙，戴上了从前的金钗玉簪，然后和玄宗一起住进了兴庆宫。

至此，玄宗的暗度陈仓之计大功告成。虽然杨玉环表面的身份仍然是女道士，但是在宫中，所有人都跟随玄宗称呼她为“娘子”，而杨玉环在宫中的地位和待遇也已形同皇后。

杨玉环有三个姐姐，据说“皆有才貌”，所以她得宠后，三个姐姐也来到长安，均获玄宗宠幸，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四个姐妹“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旧唐书·杨贵妃传》）。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八月，杨玉环在当了五年名不正言不顺的“娘子”之后，终于被玄宗正式册立为贵妃。而在此之前，玄宗已经替寿王另选了一位姓韦的王妃。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杨贵妃与过去的“寿王妃”已经彻底割断了一切关联，而她与玄宗的爱情也终于结束了地下状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随着杨贵妃身份的确立，杨氏一门也随之飞黄腾达。父亲杨玄琰被追赠太尉、齐国公，母亲追封凉国夫人；叔父杨玄珪任光禄卿，兄杨铦任鸿胪卿，堂兄杨锜任侍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华公主。

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杨氏满门皆随杨贵妃鸡犬升天，偏偏当年收养她的叔父杨玄璬反而湮没不闻，似乎被人彻底遗忘了。

就算他人已亡故，也应该像杨玄琰那样被追封，怎么会被人忘得一干二净呢？

其实，并不是杨贵妃忘恩负义，而是她有难言之隐。

准确地说，这是她和玄宗共有的难言之隐。

因为玄宗当年把杨玉环立为寿王妃时，诏书上明白写着“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亦即把杨玉环视为杨玄璬的女儿。如今杨玉环既然成了玄宗的贵妃，那她之前作为寿王妃的那段历史就必须被淡化，甚至是抹掉。所以，如果杨玄璬仍旧出现在推恩封赏的名单中，那无异于主动承认杨贵妃就是当年的寿王妃。试问，玄宗能这么做吗？

当然不能。

因此，杨玄璬就必须被遗忘！换言之，玄宗必须让世人相信——现在的这个杨贵妃只是杨玄琰之女，与从前的那个“杨玄璬长女”并不是同一个人。

即便这只是一种欲盖弥彰、自欺欺人的做法，但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来说，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层遮羞布；对于广大不知宫闱内情的百姓而言，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障眼法。

从杨玉环被立为贵妃的这一年起，杨氏一族迅速成为大唐帝国最有权势、最为煊赫的家族。韩、虢、秦三夫人及杨铦、杨锜五家“每有请托”，天下各级官员无不将其视为圣旨，必倾尽全力办理，巴结奉承唯恐不及，故而诸杨府邸总是“四方赂遗，其门如市”。诸杨还在京城中竞相修建豪宅，“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每建一宅，往往耗费千万，并且相互攀比，以奢侈为尚，如果发现别家宅第比自家的更豪华，当即把新宅推倒重建，“土木之工，不舍昼夜”。

每年冬天，玄宗必携杨贵妃行幸华清宫，而大宦官高力士必为杨贵妃牵马执鞭，韩、虢、秦三夫人和杨氏族人亦必随行。诸杨仪仗浩浩荡荡，每家一队，每队各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相互映照，如同百花盛开，令山川一片锦绣；一路上前呼后拥、环佩叮当，据说队伍所过之处，珠翠玉簪、金银饰物竟然遗落满途、俯拾即是……

“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旧唐书·杨贵妃传》）

杨贵妃一人得宠而满门皆贵的事实，对当时重男轻女的价值观产生了

很大的冲击，以至民间歌谣纷纷传唱：“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今看女作门楣”。

然而，尽管唐玄宗对杨贵妃的专宠超过了普天下的任何一个女人，可偌大的后宫毕竟是一座千芳竞妍的大花园，玄宗有时候也难免会对一些较为出众的嫔妃产生好感。而杨贵妃虽然知书达理、秀外慧中，但毕竟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天生就是善妒的动物，因此难免也会打翻醋坛子。仗着天子的深宠，杨贵妃一喝起醋来，劲头还挺大，“常因妒媚，有语侵上（玄宗）”（郑綮《开天传信记》）。

史载，玄宗因此龙颜大怒，曾先后两次把杨贵妃遣出了宫。

第一次是在杨贵妃被册封的次年，玄宗命高力士把她送回了她兄长杨铦府中，相当于把她轰回了娘家。可早上刚刚把人赶走，玄宗下午就后悔了，但又碍于天子颜面，不愿开口把她接回来，于是就找借口大发脾气，“暴怒笞挞左右”。精明的高力士很清楚天子在想什么，便“伏奏请迎贵妃归院”。玄宗赶紧就坡下驴，当天夜里就命高力士把杨贵妃接回了宫中。杨贵妃回宫后“伏地谢罪”，而玄宗当然也是“欢然慰抚”，于是二人重归于好，并且“自是宠遇愈隆”（《旧唐书·杨贵妃传》）。

第二次是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贵妃因为吃醋被玄宗再度赶回了娘家。当时的著名酷吏吉温为了讨好杨贵妃，遂入宫启奏，故意正言反说：“妇人智识短浅，忤逆圣情，然而贵妃久承恩顾，就算要将她治罪，也应在宫中进行，何忍让她受辱于外？”玄宗闻言，马上命宦官前去给贵妃赐御膳。杨贵妃哭着对宫使说：“妾忤圣颜，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然发肤是父母所有……”（《旧唐书·杨贵妃传》）话音未落便泣不成声，旋即剪下一缕秀发，让宫使带回。玄宗一见断发，顿时又惊又怜，慌忙命高力士把杨贵妃接了回来。

唐玄宗虽然贵为皇帝，而且此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论年纪完全当得起杨贵妃的父亲，可当他和杨贵妃一起沉醉在爱情中的时候，还是跟世上任何一对小夫妻没啥两样，床头打架床尾和，而且越吵感情越好，越闹恩爱越深。

换言之，这样的小打小闹纯属爱情游戏中不可或缺的助兴节目，不仅无伤大雅，而且适足以让双方更加珍惜这份“忘年”的情缘。

到头来，依旧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长恨歌》）。

天宝年间，宫中专门为杨贵妃织造衣物的织锦和刺绣工匠就有七百人，为她雕刻熔造各种金属器物的工匠也有数百人。此外，扬州、益州、岭南等四方官吏也争相进贡各种奇珍异宝和“奇服秘玩”，从而博得天子和贵妃欢心，相继加官晋爵，擢居显位。

杨贵妃生于蜀地，喜欢吃荔枝，玄宗就命专人从岭南运来，沿途驿站备有专骑专使，一站一站接力，昼夜兼程，片刻不停，因而荔枝虽跨越数千里运送，抵达长安后却依然肉鲜味美。杜牧那首著名的《过华清宫》，写的就是飞骑千里送荔枝的故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自古以来，描写杨贵妃的诗歌可谓不胜枚举，但是描摹最为传神、最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诗作，还是要数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

就在杨玉环以“娘子”身份入宫的不久后，李白也奉玄宗之召，意气风发地来到了长安。

此时恰值天宝元年，正是一个极盛时代刚刚拉开大幕的时刻。

就是在这个锦天绣地、歌舞升平的盛世舞台上，旷世才子李太白、千古帝王唐玄宗、绝代佳人杨玉环，这三个千年不遇的人物，将在同一盏聚光灯下，为世人联袂演绎一出千古佳话……

李白：落入凡间的天人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公元701年（武则天长安元年）。关于他的籍贯，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旧唐书》说是“山东人”（泛指崤山以东，亦即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唐书》则说他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若按此说，李白的籍贯应是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李白自己在《与韩荆州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故此说当可成立。

除了籍贯，李白的出生地也是一个历来争讼不已的谜。

《新唐书》称：“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意思是他的祖辈在隋朝末年因罪流放西域，直到神龙初年才潜逃回来，客居今四川阆中一带，他母亲就在这里生了他。此外还有一个说法，

出自范传正所撰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范传正是李白的好友之子，曾于唐宪宗元和末年为李白迁墓。他在迁墓后新撰的碑文中称，李白的祖辈因“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郭沫若据此考证，认为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当今的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尚无定论，但大部分人同意此说。

据说李白出生时，他的母亲曾梦见太白金星，遂为他取名“白”，字“太白”。大概在五岁左右，李白随父母迁居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市）。史称李白从小就有文学天赋，十岁即精通诗文，有一次还曾梦见笔头生花，后人遂以“妙笔生花”来形容一个人在写作方面所具有的高度才华。

李白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且“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新唐书·李白传》），俨然就是一个豪气干云的侠士和剑客。《旧唐书》称他“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在李白的心目中，大丈夫就不能一辈子坐在书斋中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而应该抱着“四方之志”，仗剑游历天下，同时更要进入仕途，实现辅佐帝王、澄清海内的政治理想。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为了追求这样的人生理想，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李白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秋，离开了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豪迈而壮阔的云游生涯。他自峨眉山出蜀，顺江东下，渡荆门，至江陵，游洞庭，登庐山，又先后游历了金陵、扬州等地。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李白来到安陆（今湖北安陆市），在这里娶了已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从此寓居此地。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年届而立的李白离开安陆，第一次来到长安，开始寻求从政的机会。当时，唐玄宗的妹妹、已入道多年的玉真公主在终南山建有别馆，常有文人雅士如王维、储光羲等人在此聚会，李白也躬逢其盛，与这些朝野名士广为交游。与此同时，李白还拜谒了京师的许多名流政要，希望通过他们的荐引入朝为官，然而盘桓数载，始终未能如愿，只好怏怏离去。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太原、洛阳、江夏（今湖北武汉市）等地。数年后，其妻许氏去世，李白移家东鲁，寓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市），期间与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人隐居于徂徕山，日日酣歌纵酒、吟诗作赋，人称“竹溪六逸”。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南游会稽，与道士吴筠成为好友，二人结伴隐居于剡中（今浙江嵊州市）。不久，吴筠奉召入宫，旋即向玄宗推荐李白。当时，李白的诗名早已传遍朝野，尤其是时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在见过李白的几首诗作后，忍不住大为赞叹："此天上谪仙人也！"（《旧唐书·李白传》）于是，在玉真公主、吴筠、贺知章的联袂推荐下，玄宗终于下诏征召李白入朝。

这些年里，尽管李白表面上一直在纵情山水、寻仙访道，可内心深处那种建功立业的理想却始终不曾淡忘。所以，接到天子诏书的那一刻，李白顿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从李白当时所作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想见他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亦不难想见他的自负与疏狂之态。

天宝元年秋天，时年四十二岁的李白第二次来到长安，受到了玄宗极大的礼遇。据唐人李阳冰（李白的族叔）在《草堂集序》中记载，当时玄宗曾"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意思是玄宗不仅走下车辇步行迎接，而且设宴为李白接风洗尘，甚至亲手为他调理羹汤。这几个细节虽不见得完全可信，但是李白此次入京受到了玄宗的热情接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随后，李白被玄宗任命为翰林待诏。

尽管这次终于达成了入仕的心愿，但所谓翰林待诏，只是个没有任何职权的文学侍从，相当于天子的高级门客，整天被锦衣玉食供着，唯一的任务就是奉旨赋诗作文。很显然，要在这样的职位上施展政治抱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李白的才华毕竟摆在那儿，即便只是御用文人，即便心里头很不快乐，可在供职翰林期间，他还是为后世留下了一组富有艺术魅力的诗作。

那就是赞美杨玉环的《清平调词》三首。

大约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春天，正值百花盛开、牡丹绽放的季节，有一天，玄宗携杨玉环在兴庆宫龙池东的沉香亭前赏花，著名的宫廷乐人李龟年带着一帮梨园弟子随侍在侧。当李龟年等人正准备奏乐演唱为天子助兴时，玄宗忽然开口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韦睿《松窗录》）遂命李龟年带着"金花笺"去让李白填写

新词，于是就有了这三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应该说，这组赞美诗纯属应景之作，可李白之所以是李白，就在于即便是应景之作，也可以被他写得如此惊才绝艳、超凡脱俗。

第一首的意思是：我望见天上的云彩，就仿佛见到你的衣裳；我看见妩媚的花朵，就会联想起你的容颜。春风吹拂之下，你像一朵雍容的牡丹被晶莹的露水点染。我在想，倘若不是在王母娘娘的群玉山头见过你，那一定是在瑶池蟾宫中与你有过一面之缘。

第二首的意思是：你像一枝红色的牡丹吐露芬芳，就连楚襄王梦中的巫山神女也比不上你的娇艳。要问谁能似你这般国色天香，恐怕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汉宫中的赵飞燕。只可惜她要与你相比，也必须凭借脂粉与盛妆的渲染。

第三首的意思是：名花与美女相互映衬，让君王面带笑容长久凝望。这一刻，无论再多的春愁春恨也能刹那消解，涣然冰释。因为，有这么美的鲜花绽放在沉香亭前，何况还有比花更美的美人，正风情万种地斜倚着栏杆。

玄宗见诗，顿觉春风扑面，春色满眼，自然是龙心大悦，立刻命李龟年等人“调抚丝竹”，引吭高歌。

从此，玄宗对李白的才华更加赏识，“爱其才，数宴见”（《新唐书·李白传》）。

然而，这不是李白想要的。

因为，李白之所以入仕，就是要像一个宰相那样治国经邦、济世安民，实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可如今他虽获天子荣宠，却只是一个不尴不尬的文学侍从。如此际遇，岂能不令他心灰意冷、满腹不平？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诗人。

他终究只是一个把内心的自由愉悦看得比外在的功名利禄重得多的诗人。

所以，他注定不可能在仕途上获得成就，也注定不可能实现他那远离现实的政治理想。

他没有政客的世故、练达、能屈能伸，也看不惯官场上的虚伪和倾轧之风，更看不惯权贵们粗鄙傲慢的嘴脸。这样一个豪放不羁、自命清高又多愁善感的“谪仙人”，又怎么可能在阴暗而复杂的官场中生存和立足呢？

说到底，九重宫阙只能禁锢他的性灵，扼杀他的才华。

他的世界根本就不在这里！

意识到这一切之后，李白开始有意无意地放浪形骸。他原本嗜酒，如今更是有理由把自己泡在酒池里了。随后的日子，无论是在长安的街肆坊间，还是在皇家的森严宫阙中，他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浑然忘我，把一切世俗规范和宫禁律令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就这样，李白喝着喝着，就在“诗仙”之外，又博得了一个以“仙”命名的雅号——酒仙。人们把他和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为“饮酒八仙人”。杜甫就曾经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那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力士脱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说的是李白有一天又喝得醉醺醺的，玄宗有事召他上殿，他借着酒劲，

故意命高力士帮他脱靴，高力士虽然硬着头皮帮他脱了，可从此对他恨之入骨。事后，高力士就在杨玉环跟前大肆挑拨，说李白在诗里面将她比作赵飞燕，是在暗讽她，骂她是红颜祸水。杨玉环一听，当然是恼羞成怒，随后就对玄宗大吹枕头风，极力说李白的坏话。

这个故事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如新旧《唐书·李白传》《唐国史补》《酉阳杂俎》等，但是后世史家大多断定此事不实，认为这是后人为了拔高李白、贬低当权宦官而虚构出来的故事。其理由是：一、高力士贵为三品将军，深受玄宗宠幸，势倾内外，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可能替李白脱靴；二、假如李白真的在诗中暗讽杨玉环，玄宗和杨玉环都不会看不出来，所以无须等到高力士来进谗言，才恍然察觉诗中之意。

如果说“力士脱靴”的一幕纯属虚构，李白也没有得罪高力士和杨玉环，那么他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才离开长安的呢？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李白自己想离开。因为，他在长安壮志难酬，深感压抑和苦闷，只有离开朝廷才能获得解脱；其次，朝中的一些权贵可能也看不惯他那目中无人的姿态和狂放不羁的言行，所以一直在想方设法排挤他。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从李白在供奉翰林后期写下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遭到排挤后的抑郁和孤愤之情。

天宝三年秋天，李白自知留在宫中已经毫无意义，遂“恳求还山”。而此时，玄宗对这个恃才傲物、日日烂醉如泥的家伙也逐渐丧失了好感，遂当即允准，“赐金放还”。

就这样，李白结束了短短两年的仕宦生涯，重新“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旧唐书·李白传》）。

据说李白离京之后，曾前往华山，途经华阴县衙时，醉酒骑驴，旁若无人。当地县令大怒，把他叫到庭下，大声质问：“汝何人，敢无礼？”李白眯着一双惺忪醉眼瞧了瞧县令，也不报姓名，只说了下面这句话：“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唐才子传》）

县令闻言，既惊且愧，连声拜谢道：“不知翰林至此，恕罪恕罪！”

李白朗声长笑，飘然而去。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叛军铁骑倾巢南下，玄宗仓皇亡奔蜀地。顷刻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个歌舞升平的煌煌盛世就此崩坍。

李白在战乱中避居庐山，应时任扬州节度使的永王李璘（玄宗十六子）之邀，出任其帐下幕僚。李白此举，一来是为了求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二来也是心存“欲济苍生未应晚”的念想，期望能在永王麾下建功立业，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危亡。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之十一）

然而，无情的命运再一次嘲弄了李白。

因为永王李璘并不是想光复李唐社稷，而是企图与肃宗李亨分庭抗礼，趁乱占据半壁江山。不久，永王兵败，李白受到牵连，本来论罪当诛，所幸郭子仪求情，才改为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流放中途，恰逢朝廷大赦，遂放还。接到赦令时，李白惊喜交加，就在返程的路上，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遇赦之后，李白已是年近花甲、老病侵寻，可他依然在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故国山河中执着地行走。

陪伴这个行吟诗人的，只有他的诗，还有他的酒。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十三岁的李白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关于李白的结局，历来有三种说法：一种以《新唐书》为代表，说他病逝于安徽当涂；一种以《旧唐书》为代表，说他“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今属安徽）”；最后一种说法以《唐才子传》为代表，说李白“度牛渚矶，乘酒捉月，遂沉水中”。

第一种说法就像冷冰冰的官方讣告，第二种说法稍稍具体了一点，可还是失之简略，只有第三种说法不仅说出了死因、描写了细节，而且最富有诗意，也最合乎李白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和性格。

然而，我情愿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

因为，李白本来就是一个落入凡间的“谪仙人”，所以我情愿认为：他既非病死，也不是醉死和溺死，而是化成一道光，回天上去了。

他爱过痛过，哭过歌过，给后世留下一千多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语）的性灵文字，然后倦了累了，于是悄悄脱下尘世的衣裳，化成一道光，回天上去了。

如若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天人，又怎么可能“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也许，李白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好在他留下来的诗篇，永远属于盛唐，属于我们。

口蜜腹剑：权力的独角戏

自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罢相之后，帝国朝堂忽然间就安静了下来，宰相之间那种你争我夺、激烈对决的现象一下子就消失了，大擂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大舞台。

历史的聚光灯下，只剩下一个人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这是一场权力的独角戏。

表演者是李林甫。

他目光从容，姿态优雅，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沉着老练、有板有眼，让万千看客看得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令贵宾席上最尊贵的观众李隆基也不禁觉得——没有早用李林甫简直是一种错误！

是的，李林甫太让玄宗感到满意了。

他不仅把各项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让玄宗卸下了扛在肩头多年的政治重担，而且和搭档牛仙客也是配合默契，空前团结，让玄宗根本不用烦心和操心。此外，自从李林甫上台后，文武百官也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拉帮结伙打群架了。就连平日里动不动就上疏直言朝政、批评玄宗耽于逸乐的谏官们，现在也都噤声闭口，一个个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了和谐朝廷的建设中来，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政治局面啊！（《旧唐书·李林甫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

李林甫确实是一个长袖善舞的独角戏表演者。无论是对付搭档，对付满朝文武，还是对付御史台的谏官，李林甫都自有一套办法。

首先来看李林甫的搭档牛仙客。

李林甫当初之所以力挺这位仁兄入相，就因为他是小吏出身，常年驻守边疆，对中央政务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种人来做他的副手，当然只能充当应声虫的角色。而对于李林甫的提携，牛仙客自然也是感恩戴德，所以入相之后，一直对恩公李林甫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李林甫叫他向东他不敢向西，李林甫叫他吃干他不敢喝稀。因此，宰相班子自然就能“配合默契、空前团结”了。

其次来看文武百官。

李林甫取代张九龄成为首席宰相后，马上搬出当年裴光庭实行的那套“循资格”制度，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一律要论资排辈，按照年限和资历决定升迁。有一些才能卓异但是资历不够的，就算政绩突出，升迁呼声很高，李林甫也会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拒之门外。如此一来，那些对李林甫具有潜在威胁的竞争者、或者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然就难以出头冒尖了。与此同时，那些善于钻营、主动向他靠拢的，李林甫自然有各种办法将他们破格提拔。所以，凡是在李林甫执政之后升上来的，大多是他的党羽，当然不会和他唱对台戏。

最后来看御史台的谏官。

李林甫自己在御史台干过，所以他很清楚，对于一个独揽朝纲的宰相而言，谏官的弹劾是最具有杀伤力的一种威胁。为了彻底消除这种威胁，李林甫刚刚就任中书令不久，就专门召集了朝廷的全体谏官和言官，对他们作了一次重要讲话。

他说：“如今，英明的领袖在上面指引我们，我们紧跟着走还来不及，根本无须发表言论！诸君没看见朝堂上的那些仪仗马吗？如果保持沉默，就能吃到三品的饲料，要是敢自由鸣放，只需一声，立刻被驱逐出去，悔之何及啊！”（《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众谏官面面相觑，集体沉默。

李林甫环视会场，点头微笑。

会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充分理解领导的讲话精神。那是一个叫杜琎的补阙，他一散会就不知好歹地鸣放了一下，上了一道奏疏议论朝政，结果第二天就被逐出朝廷，贬到一个穷乡僻壤当县令去了。

从此以后，大唐官场就鸦雀无声了。

在首席宰相李林甫的英明领导下，帝国朝堂上上下下都充满了安详和乐的气氛。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秋天，有一群喜鹊居然飞到了大理寺监狱的一棵树上筑巢，大理寺少卿徐峤赶紧上疏说：“今年天下判死刑的才区区五十八人。大理狱的庭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敢栖止。如今居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这真是稀有难得的祥瑞啊！”

一时间，满朝文武纷纷上表，说天下几乎不用刑罚了，真是可喜可

贺。玄宗龙颜大悦，认为这是宰相执政有方所感召的祥瑞，立刻下诏赐爵，封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随后的几年中，李林甫的权势越来越大，在中书令之外，又遥领陇右、河西节度使，兼吏部尚书，总文武选事。应声虫牛仙客也跟着沾光，在侍中之外，又遥领河西节度副使，兼兵部尚书。

作为帝国权力舞台上唯一的表演者，李林甫当然不会允许任何人和他同台竞技。

自从他上台的那一天起，他就在自己和玄宗周围画上了一条无形的警戒线——线内是他和天子的专属区，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旦李林甫发现玄宗对某些人表露出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就会在第一时间出手，把那个人的入相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将其牢牢钉死在冷板凳上，变成政治上的废人。

当然，李林甫的斗争方式是相当温柔的，整人手段也是非常巧妙的。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整人高手之一，他要是想收拾谁，一定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而且经常是把人卖了还让人帮他数钱。

众所周知，玄宗是一个爱好风雅的皇帝，当初张九龄在的时候，玄宗虽然讨厌他的犯颜直谏，但是对他的才学和风度一直是非常欣赏的。所以自从张九龄离开朝廷后，玄宗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张九龄病逝于荆州长史任上，玄宗听到消息后，更是满怀怅惘，追思不已。此后，每当李林甫要推荐什么官员入朝，玄宗总是会情不自禁地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旧唐书·张九龄传》）

可想而知，每次听到这句话，李林甫心里就会一阵阵泛酸。

受够了，人都入土了，怎么还虽死犹生、阴魂不散呢？

尽管玄宗很看重李林甫精明而务实的理政才能，可他的不学无术却始终让玄宗引以为憾。所以玄宗的目光总是在满朝文武中来回逡巡，希望能有一个像张九龄那样气质优雅、风度翩翩的大臣来继任宰相，以此弥补内心的缺憾。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期待中的人终于出现了。

这是暮春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蝶舞莺啼，玄宗心情舒畅，便在勤政楼上垂着帘子，命乐工在勤政楼下演奏乐曲。也许是明媚的春光和

悦耳的曲声让玄宗有些心醉神迷，所以当清秀俊朗的兵部侍郎卢绚骑着一匹白马从楼下缓缓走过时，玄宗一瞥之下，顿时惊为天人，忙不迭地对着身边的宦官赞叹，说卢绚气质超凡出尘，大有张九龄当年的风采。

卢绚出身于范阳卢氏，也是历代显赫的世家大族，难怪玄宗会一见倾心。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卢绚入相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然而，李林甫早就重金买通了天子身边的宦官，所以玄宗赞叹卢绚的那些话，当天就传进了他的耳中。

李林甫不动声色，很快就找到了卢绚的儿子，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对卢公子说："令尊素有清望，如今交州和广州一带缺乏有才干的官员，圣上打算派他去，你认为如何？"

卢公子一听就傻眼了。

那交州、广州是什么地方？岭南边瘴之地啊！父亲在朝中待得好好的，一旦调任交、广，那不是形同贬谪吗？这辈子八成是回不来了。

一看卢绚的儿子急得满头大汗，李林甫马上用一种体贴的口吻说："如果怕去偏远的地方，就有违抗圣命之嫌，难免要被降职。依我看，不如主动向皇上提出来，要求调任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之类的职务，去东都洛阳就任。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你看怎么样啊？"

卢公子如释重负，对李林甫千恩万谢，回去之后和老爹一商量，第二天就按照李林甫的意思，主动向玄宗提交了调职申请。

由于卢绚在朝中甚有人望，李林甫担心一下子让他去坐冷板凳会惹人非议，于是就先安排他去当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李林甫又对玄宗说，卢绚身体有病，听说在华州基本上都不怎么打理政务，还是给他调个闲职吧。玄宗一听，虽然觉得很可惜，但也没什么话好说。随后，李林甫便正式把卢绚调任太子詹事，彻底杜绝了他进入政治中枢的可能性。没能起用卢绚为相，玄宗内心不免怏怏，一直想再物色一个和张九龄一样富有文学才华的人。不久，他果然想起了一个。

这个人就是张九龄当年的老部下，被李林甫排挤出朝的严挺之。

有一天朝会上，玄宗忽然对李林甫说："严挺之如今在什么地方？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李林甫嘴上唯唯诺诺，可心里登时一紧。退朝后，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找来，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你何不上一道奏书，说尊兄得了风疾，申请回京师就医？"

作为外放官员，严挺之当然是眼巴巴地盼着有朝一日能重回天子脚下，所以当弟弟把李林甫的这个提议告诉他时，严挺之没有过多考虑，赶紧把申请报告打了上去。

随后，李林甫就拿着严挺之的报告对玄宗说："严挺之人老多病，现在又得了风疾，看来应该给他个闲职，以便就医养病。"

玄宗深感惋惜，为此叹息良久。几天后，严挺之就成了太子詹事，到东都洛阳陪卢绚一块儿养老去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有一个叫裴宽的户部尚书又引起了李林甫的关注和警惕。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此人已有入相之势。

裴宽和张九龄、严挺之一样，早年也是以"文词"为晋身之阶，凭借文学才华入仕，但是和张、严二人比起来，这位仁兄的行政经验要丰富得多，实干能力也强得多。他曾先后在朝中担任户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金吾卫大将军等文武要职，又曾出任河南尹、太原尹、范阳节度使等封疆大吏，在朝中和地方都颇有政绩，声望卓著，深得历任宰相的赏识和推举，也极为玄宗所器重。玄宗曾赐他紫金鱼袋，又曾赠诗一首，其中一句是："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对他的欣赏和倚重远远超越了一般朝臣。

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经验丰富、政治资本又极其雄厚的家伙，绝对是块当宰相的料，也绝对是李林甫的心头大患！

不把他搞掉，李林甫一天也不会安宁。

天宝三年岁末，从另一个姓裴的大臣身上，李林甫终于找到了整治裴宽的机会。

此人是刑部尚书裴敦复，他在这一年初奉诏出兵，剿灭了东南沿海猖獗一时的海盗，凯旋后受到玄宗的嘉奖。论功行赏之际，裴敦复拼命鼓吹海盗势力如何猖獗、平定海盗如何不易等等，同时趁机广开受贿之门，为行贿者冒领军功，博取官职。裴宽风闻裴敦复受贿冒功之事，就向玄宗打了小报告。不过因为没有证据，玄宗也就暂时按下不表。就在这时候，李林甫意识到收拾裴宽的机会来了。

由于耳目遍布朝廷，所以李林甫很清楚，裴宽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只要把他打小报告的事情告诉裴敦复，不需要李林甫亲自动手，裴敦复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裴宽咬死。

这就叫借刀杀人。

随后，李林甫找来裴敦复，说："你惨了，裴宽参你一本了。"

不出李林甫所料，裴敦复果然气得直跳脚，大骂裴宽忘恩负义，说裴宽过去也没少拿亲戚朋友的事来找他，现在居然倒打一耙，真是过河拆桥的卑鄙小人。

李林甫说："那你还等什么？再不动手就晚了。"

裴敦复立刻行动起来，悄悄派人送了一笔重金给杨贵妃的姐姐秦国夫人。秦国夫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随即在皇帝跟前一个劲地为裴敦复美言，同时拼命给裴宽抹黑。

其时杨氏四姐妹正受天子宠幸，秦国夫人这枕头风一吹，裴宽当然就完蛋了。

几天后，眼看就要入相的裴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逐出了朝廷，贬为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太守。

裴敦复就此躲过一劫，从此对李林甫自然是感恩戴德。

可是，他毕竟是一把杀过人的刀，李林甫肯定不会留他。更何况，自从他搭上秦国夫人这条顺风船后，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俨然已有取代裴宽入相之势，李林甫当然更不能留他了。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四月，李林甫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拿掉了裴敦复的刑部尚书之职，将他调任岭南五府经略使。

直到此刻裴敦复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李林甫当枪使了！

裴敦复愤愤不平，迟迟不肯动身赴任，这一来又给李林甫抓住了把柄。李林甫旋即以抗旨不遵、擅自逗留为名，把裴敦复贬为淄川（今山东淄博市）太守。

在李林甫长达十九年的宰相生涯中，使用这种阴柔手段整人的故事可谓不胜枚举。人们总是一边对他心怀感激，一边又不知不觉地被他挤出权力核心，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其政治生命早已被李林甫悄然终结。《资治通鉴》称："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这就是成语“口蜜腹剑”的由来。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李林甫用这一招轻易搞定。

比如应声虫牛仙客死后，继任宰相李适之就不是一颗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此人向来对李林甫的专权极为不满，所以入相之后便屡屡跟李林甫叫板。

对付这种人，李林甫自然要收起温柔的假面，露出狞厉的真容。

其实，李林甫为自己的政敌本来就准备了两手。

软的那手叫作口蜜腹剑。

硬的这手就叫——罗钳吉网。

罗钳吉网：酷吏的兴起

李适之，李唐宗室出身，贞观朝废太子李承乾的孙子，神龙初年入仕，以务实和强干见称，历任左卫郎将、秦州都督、河南尹、御史大夫、刑部尚书等职，天宝元年入相，稍后又兼兵部尚书。

从李适之的仕途经历来看，其从政经验也算是相当丰富了，只可惜，此人性情疏阔率直，缺乏心机和城府，根本不是李林甫的对手。

比如他刚上台不久，就曾经被李林甫狠狠摆了一道。

有一回在朝堂上办公，李林甫主动凑过来跟他搭讪，聊了一会闲天后，李林甫忽然压低嗓门说：“我听说华山富含金矿，一旦开采出来，国库就不缺钱花了，但是皇上好像还不知道这事。”

李林甫说得一脸神秘，那意思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李适之心中暗喜，觉得这件事报上去足以邀功，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没必要这么藏着掖着，于是第二天就向玄宗作了禀报。当然，他隐瞒了自己的消息来源。

玄宗听说有金矿，兴奋得两眼放光，连忙召见李林甫，问他有没有这回事。李林甫不紧不慢地说：“臣早就知道了，只不过华山是陛下的本命山，乃王气所在，不宜开采，所以臣一直不敢提起。”

玄宗一听，觉得还是李林甫想得周到，从此对李适之的印象一落千丈，过后就很不高兴地跟他说：“今后奏事，应当先和李林甫商议，不能再如此草率轻忽。”

李适之张口结舌，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得。

李林甫略施小计，就让李适之在玄宗面前栽了大跟头，但李适之毕竟是宰相，“金矿事件”顶多只能让他失去皇帝的信任，还不足以让他下台。

要想把李适之扳倒，就必须加大力度。

天宝四年五月，李林甫忽然指使手下控告兵部官员集体受贿，然后立即立案，一口气逮捕了兵部的六十多个官员，交付京兆府和御史台联合审理。可想而知，如果兵部官员集体受贿的罪名成立，作为兵部尚书的李适之绝对难逃干系，就算不被牵连进去，至少也要负失察之责。

然而，此事毕竟是子虚乌有，所以京兆府和御史台一连审了好几天，都审不出个子丑寅卯。时任京兆尹的萧炅（亦即当年被张九龄贬谪的那个“伏猎侍郎”）是李林甫的亲信，他知道，这个案子要是办不下来，自己肯定没法向李林甫交代。

情急之下，萧炅猛然想起了手下的一个法曹。他相信，只要让此人出手，骨头再硬的囚犯也会浑身酥软，乖乖就范！

这个即将出手的法曹，就是李林甫后来的得力鹰犬、天宝中后期大名鼎鼎的酷吏——吉温。

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此话真是一点不假。这个吉温，就是武周年间著名酷吏吉顼的亲侄子。和吉顼一样，吉温生性诡谲阴险，心狠手辣，天生就是干酷吏的料。但是他生不逢时，没赶上女皇武曌实行特务统治的大好年头，而是碰上了政治稳定的开元时期，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天宝初年还一直混不出头，只当了个小小的万年县丞。

有一次，曾有人向玄宗推荐吉温，可玄宗亲自召见后，没说上几句话，就断定他是一个心术不正的小人，随后便对那个推荐人说：“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被皇帝下了这一句断语，无异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要是换成别人，恐怕早就死了当官的这条心了。可吉温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相

信自己总有出头之日。

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而只要有斗争的地方就有他的用武之地。所以他坚信，自己的酷吏天赋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就是在这段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吉温不断放出豪言：“若遇知己，南山白额兽不足缚也！”（《旧唐书·吉温传》）

如果能遇到赏识我的人，就算是终南山里最凶猛的野兽也可以手到擒来！

从这一点来说，吉温和李林甫倒是颇为神似——被人否定非但不会磨灭他们的斗志，反而会激发出他们与人斗、与天斗的决心和劲头。

当然，要在官场上混出点名堂来，光凭一股子狠劲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巧劲。而吉温恰好两者都不缺。除了拥有酷吏的天赋之外，他还有一样本事——巴结权贵。

尤其善于巴结当权宦官，比如高力士。

正是由于高力士这层关系，吉温才最终靠上了萧炅的码头。

说起吉温和萧炅，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他们两个人之间，本来是有过一段旧怨的。早先，萧炅曾经在洛阳担任河南尹，在任上出了事情，受到有关部门审查。当时吉温正在河南府下辖的新丰县担任县丞，有关部门听说他办案能力很强，就指派他去审理此案。吉温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就对萧炅施加了很多手段，把他搞得狼狈不堪。后来，由于李林甫力保，萧炅不仅没有出事，反而官升一级，被调到长安当了京兆尹。

巧合的是，萧炅荣升京兆尹不久，吉温也通过钻营调到了京畿万年县担任县丞，而萧炅恰好是他的顶头上司。

吉温心中暗暗叫苦。

那些知道内情的同僚也都异口同声地告诉他——这回你死定了。

是的，如果吉温没有后台的话，他这回绝对是死定了。

所幸，他有一个绝对过硬的后台——高力士。

而这个后台，恰恰也是萧炅极力巴结的对象。

所以吉温不会死。

不但不会死，他还会比一般同僚拥有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只要让萧炅明白他和高力士的关系，再大的积怨也能涣然冰释，一笔勾销！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则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

吉温知道，每当高力士不在宫中当值的时候，萧炅必定会往他的府上跑。有一天，高力士没当班，吉温知道萧炅会来，便提前一步到了高力士府上。高力士明白吉温的用意，立刻与他促膝而坐，还握住吉温的手，称兄道弟，谈笑甚欢。

毫无疑问，萧炅进来的时候，正好迎头撞见了这一幕。

吉温作出一副惊慌的模样，连忙要起身回避。高力士大声说："吉七，你不用走。"然后转头对萧炅说："都是老朋友了，过来一块坐吧。"高力士用吉温的排行称呼他，显然是关系非常亲密的表现。

萧炅万万没料到，这个小小的县丞居然还能和高力士称兄道弟，连忙放下上司的架子，对吉温堆出满脸笑容，然后又是行礼又是让座，恭敬得不得了。

事后，吉温亲自到萧炅的府上拜访，用万分真诚和毕恭毕敬的口吻说："萧大人，过去的事情，是因为吉某奉命行事，不敢违背国法。从今往后，吉某一定洗心革面，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吉温有那么硬的靠山，做事情又这么漂亮，萧炅有什么理由不和他化干戈为玉帛呢？

"炅复与尽欢。"（《旧唐书·吉温传》）

总之，一段旧怨就此烟消云散。萧炅随后就把吉温提拔为京兆府法曹。从此，吉温就成了萧炅的心腹。

有了高力士和萧炅这两座靠山，吉温又怎么可能不出头呢？

此刻，当萧炅因兵部的案子找到吉温时，这个多年来一直怀才不遇的未来酷吏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扬名立万的时候到了！

吉温走进关押兵部嫌犯的监狱时，脸上始终带着一种莫测高深的微

笑。他让狱吏把那六十几个桀骜不驯的兵部官员集中到了院子里，然后笑盈盈地看着他们，甚至还和其中几个微微点了点头。

在此过程中，吉温一句话也没说。紧接着，他就返身走进关押重犯的牢房，下令提审其中的两名重犯。人犯提出来后，吉温照旧一言不发，只用眼色示意狱吏对这两个人用刑。

很快，一声比一声更为凄厉的哀号就从牢房中飞了出来，声声落进六十几个兵部官员的耳中。

他们的脸色在同一瞬间变得惨白。

几天来一直梗着脖子的这群硬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中交流着同一种不言而喻的恐惧。

最后，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并且争先恐后地喊道："把笔和纸拿来，我们交代！只要留我等一条性命，我们什么都交代！"

随后，当吉温挨个提审他们时，这群吓破了胆的兵部官员纷纷自诬，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所有渎职受贿罪行全部供认不讳。自始至终，吉温没动过半根手指头，没说过一句狠话，甚至脸上的笑容也未曾消失过。又有谁敢说，他这是刑讯逼供呢？

差不多只用了一顿饭的工夫，吉温就拿着六十几张白纸黑字的供状向萧炅复命去了。

后来，有关部门怀疑吉温使用了严刑逼供的手段，立刻派人去查，结果发现六十几名嫌犯全都毫发无损，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全都是自愿招供，并未遭到任何迫害。

这起轰动一时的兵部官员集体受贿案就这么定案了。

当玄宗接到结案报告时，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

开什么国际玩笑？假如案情属实的话，那堂堂兵部岂不成了一个硕大的老鼠窝？朝廷颜面何存？自己这个当朝天子颜面何存？

但是六十几张白纸黑字的供状摆在眼前，又由不得你不信。

最后，玄宗只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下诏对历任和现任的兵部侍郎进行了严厉斥责，相当于对他们进行了警告处分，但却只

字不提兵部尚书李适之的失察之责，同时宣布赦免了所有的涉案官员。

玄宗如此淡化这件案子，委实出乎李林甫的意料。

案子虽然办下来了，罪名也都坐实了，可最后还是伤不到李适之一根汗毛，李林甫未免有些懊恼。

但是在懊恼的同时，李林甫也感到了莫大的喜悦。

因为通过这件案子，他得到了一个人才，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吉温。

差不多在把吉温纳入麾下的同时，李林甫在御史台也物色到了一个同样擅长罗织罪案的高手。

他就是后来与吉温齐名的另一个酷吏——罗希奭。此人是李林甫女婿的外甥，原任御史台主簿，被李林甫提拔为监察御史，他虽然不如吉温那般阴险，但却比吉温更为苛酷猛厉、心狠手辣。

有了这两个得力鹰犬，李林甫可谓如虎添翼。

从今往后，只要罗希奭张开凶猛的钳子，吉温支起阴险的大网，大唐天下将再也没有李林甫办不了的案子，也没有李林甫搞不定的政敌！

东宫危情：韦坚谋反案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春天，大唐帝京长安仍然像往日那样花团锦簇、歌舞升平，然而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一张阴谋之网已经悄然张开，即将引发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

这起大案的幕后策划者就是李林甫，而他的目标将直指太子李亨（原名李玙，天宝三年改名）。

从李亨入主东宫的那一天起，李林甫就发誓总有一天要把他扳倒。可是好几年时间过去了，李林甫一直没有等到最佳的出手时机。

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

因为有两个与太子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已经进入了李林甫的狙击范

围，所以李林甫决定从他们身上下手，将他们与太子一网打尽！

这两个人，一个叫韦坚，一个叫皇甫惟明。

韦坚，太子妃的哥哥，财政专家，为人精明干练，几年前在江淮租庸转运使的位子上干得风生水起，每年替朝廷增收的赋税多达数百万，因此博得了玄宗的青睐，遂加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衔，又兼水陆转运使等职，一时间炙手可热，大有入相之势。此外，他又和宰相李适之过从甚密，俨然有联手对付李林甫的意思。为了防患于未然，李林甫遂于天宝四年九月推荐他担任了刑部尚书，同时解除了他在财政方面的多个兼职，表面上是提拔，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实权。

韦坚失势后，自然对李林甫恨之入骨，于是跟李适之的关系更为紧密，颇有些同仇敌忾的意味。

像这样的人，李林甫当然要尽早把他除掉了。

皇甫惟明，与太子和韦坚均为多年好友，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不久前刚刚在边境大破吐蕃军队，立下赫赫战功，正受玄宗赏识。此人对李林甫的专权向来不满，这一年正月奉玄宗之召回朝献捷，遂乘机进谏，抨击李林甫擅权揽政，劝玄宗罢黜李林甫。

可想而知，这番谏言旋即一字不漏地落进了李林甫的耳中。

李林甫怒不可遏，遂授意自己的心腹、御史中丞杨慎矜密切监视皇甫惟明与韦坚的一举一动。在李林甫看来，此次皇甫惟明回朝，正是下手的良机。因为皇甫惟明作为太子的故旧和韦坚的朋友，值此新春佳节回京之际，不可能不与太子和韦坚来往走动，而只要他们在私下场合一碰头，李林甫就有办法让他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身份太特殊了。

皇甫惟明是什么身份？——手握重兵的大将。

韦坚是什么身份？——深受皇帝信任的外戚。

而李亨又是什么身份？——一个年近四十却仍然看不到登基希望的中年太子。

这三种角色搅在一起，难道还不足以令人产生某种微妙的联想？

会的，一定会的。只要李林甫掌握他们的行踪，再抓住他们暗中交通的把柄，就一定可以在玄宗脑中唤起某种微妙的联想。

不，是致命的联想！

从“太子”“外戚”“大将”这三个关键词，玄宗一定会联想到“政变”“逼宫”“篡位”这三个敏感词。将这些关键词和敏感词连在一起，就必定会形成这样的扩展内容——太子年长，已经失去了等待正常即位的耐心，遂与外戚和边将勾结，企图发动政变，废黜皇帝，然后登基继位！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一个年老的皇帝如果失去联想，皇权将会怎样？

李林甫相信，作为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皇帝，玄宗一定不会失去联想。对此，李林甫成竹在胸，深信不疑！

果然不出李林甫所料，天宝五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晚上，太子出游，与韦坚会面。片刻后，韦坚又赶赴景龙观，在僻静的道士房中与皇甫惟明密谈多时。

他们在谈什么？

没人知道。

不过也没必要知道。因为他们的这些诡异举动，全都没有逃脱御史中丞杨慎矜的监控。当天深夜，杨慎矜就赶赴李林甫家中，将他所掌握的情况一五一十作了禀报。

够了。

这就够了。

李林甫说，你马上回去写一道弹劾奏章，就说韦坚身为外戚，不应私下与边将交通。明日一早，你就把奏章递上去。

次日早朝，杨慎矜依计呈上奏章，李林甫当即出列，郑重其事地向玄宗指出：这是韦坚与皇甫惟明密谋，企图共同拥立太子，篡位登基！

玄宗暴怒。

一个老皇帝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被触动了。

不，是被触痛了。

是日，韦坚和皇甫惟明被不由分说地拿下诏狱，李林甫立刻命杨慎矜、王鉷、吉温三个心腹一同出马，联手审理此案。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太子李亨就危险了。因为吉温等人一出手，韦坚和皇甫惟明十有八九扛不住，一旦从他们嘴里抠出什么不利于太子的供词，东宫很可能就要再度易主了。

然而，让李林甫意想不到的是，吉温等人未及动手，玄宗就下了一道诏书，以“干进不已”（意为钻营求进、贪得无厌）的罪名贬韦坚为缙云（今浙江丽水市）太守，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贬皇甫惟明为播川（今贵州遵义市）太守。

很显然，玄宗是有意在淡化这件谋反案。虽然他也疑心韦坚和皇甫惟明确有不轨图谋，可他却不愿相信太子李亨参与了此事。对于一个年过六旬的皇帝来说，他已经没有那份心力再去应付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了，更没有勇气再去制造一幕“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伦悲剧。所以，只要太子李亨没干什么太出格的事情，玄宗宁可抱着难得糊涂的心态，将这起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即便李林甫处心积虑，太子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他的暗算。

然而，这起“韦坚谋反案”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

因为，韦坚和皇甫惟明虽然遭到了贬谪，但他们毕竟还是一方太守，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同时，以他们为首的整个东宫集团的实力也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削弱。因此，为了防止他们反扑，李林甫就必须一鼓作气，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能不能扳倒太子暂且不说，至少也要利用这起案件，把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等人置于死地！

韦坚一落马，李适之立刻生出了唇亡齿寒的恐惧。

他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压根不是李林甫的对手。

在李林甫的步步紧逼之下，连堂堂的帝国储君都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了，其他人还有什么本事跟李林甫斗？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李适之终于无奈地向玄宗递交了辞呈，请求退居闲职。

天宝五年四月，玄宗解除了李适之的宰相职务，将其罢为太子少保。李适之带着满腔的幽怨离开了相位，随即写下一首《罢相》，借以抒发自己的满腹怨气："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李适之非常好客，喜欢饮酒，据说有"一斗不乱"的海量，平日里经常邀朋喝友在家中聚宴。他这首《罢相》，既有自嘲之意，也不乏跟李林甫赌气和叫板的意味。他明明知道自己现在失势了，人们害怕得罪李林甫，肯定不敢再和自己来往，可他偏偏不信这个邪，故意在罢相之后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还命他的儿子、时任卫尉少卿的李霅写了一堆请柬到处去发——他就是想看看，平日里和他称兄道弟的那些朝臣们，到底还有几个是讲义气的，能够不惧李林甫的淫威，毅然登门喝他的酒！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很遗憾，答案是零。

满朝文武，亲朋故旧，没有一个人敢来喝他的酒。

岂料门前客，今朝无人来！

那天，李适之和儿子李霅眼巴巴地在大门口站了一天，愣是没等到一个客人上门。

桌子上的酒菜一点一点冷透的时候，父子二人的心也一点一点地凉透了。

这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怪谁呢？

其实不能怪李适之跟李林甫赌气叫板，怪只怪他宦海一生，对人性居然还抱有如此不切实际的幻想。

李适之从此心灰意冷，决定在太子少保的闲职上安度晚年，再也不和任何人赌气，再也不和任何人叫板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他已经急流勇退，主动离开了相位，并

且决意夹起尾巴做人，可李林甫还是时时刻刻惦记着他……

天宝五年秋天，韦坚在朝中任职的两个弟弟韦兰、韦芝不甘心他们的哥哥就此失势，忽然联名上奏喊冤，并且在奏章中还扯上了太子，说太子李亨说过什么什么话，对玄宗的做法也怀有极大的不满云云。

韦氏兄弟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把太子往火坑里推，也是在给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奏章呈上，玄宗勃然大怒。老子好不容易才把这事给压下去，你们这两个不知好歹的猪头，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数日后，韦坚再度被贬为江夏（今湖北武汉市）别驾，韦兰和韦芝均被流放岭南。

太子李亨吓坏了，赶紧宣布和韦妃离婚，并郑重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

民间女子离了婚还可以改嫁，可韦妃却没有这份自由。她被太子休掉后，唯一的出路就是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伴着青灯古佛了此一生。

趁着玄宗正在气头上，李林甫又进言说："韦氏兄弟居然敢上疏喊冤，说明他们在朝中的势力不可小觑。据臣所知，李适之等人都是韦坚的朋党，正所谓除恶务尽，陛下应该对他们采取手段。"

随后，韦坚再度被流放临封（今广东封开县），李适之被贬为宜春（今属江西）太守，还有数十个平日与他们交厚的朝臣，也全部遭到了贬谪流放。

至此，太子的羽翼几乎已被剪除殆尽。

然而，李林甫似乎没有罢手的意思。因为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把他们逐出朝廷，而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正当太子李亨被韦坚一案搞得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的岳父杜有邻又陷进了一件案子，同时把他也牵扯了进去。杜有邻是李亨的另一个妃子杜良娣的父亲，时任赞善大夫，不知为何忽然成了一则流言的攻击目标，说他"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资治通鉴》二一五）。意思是说杜有邻捏造神秘言论，并与太子勾结，指摘诽谤皇帝。

很显然，这则流言的杀伤力丝毫不亚于韦坚谋反案。

李林甫无声地笑了。

老天爷似乎也在帮他。不需要他动手，一个又一个打击东宫的机会就自动送到了他面前。李林甫随即命吉温负责此案。吉温的效率出奇的高，一下子就把流言的始作俑者逮住了。

让太子李亨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流言的制造者竟然是他的连襟、杜有邻的另一个女婿——柳勣。此人生性疏狂，一直和杜有邻关系不好，所以总想找机会整治老丈人。可谁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此阴招！真是让太子李亨欲哭无泪。

李林甫又一次无声地笑了。

都是你们自家人窝里斗，可别怪我李某人心狠手辣！

很快，吉温就把柳勣、杜有邻全部捉拿归案，并且通过柳勣株连了裴敦复、李邕、王曾等一大批朝野知名的官员。

天宝五年年末，吉温拿到上述这些人自诬有罪的口供后，便将他们全部杖杀于大理狱，并奏请玄宗，将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流放边地。

幸运的是，到最后，吉温也没有真正掌握对太子不利的证据，所以也无法证明太子有罪。可尽管如此，太子李亨还是吓破了胆，赶紧宣布与杜良娣离婚，以此洗刷自己的清白。

杜良娣旋即被逐出皇宫，贬为庶人。

不到一年时间，李亨就接连陷入两起大案，失去了两个妻子，同时丧失了一大批亲信，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光杆司令。当太子当到这个份儿上，实在是够窝囊。

不过，在李林甫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罗钳吉网”之下，李亨能保住太子之位和一条性命，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了。其他的一切，他都不敢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春，李林甫乘胜追击，在奏请玄宗同意后，派出以罗希奭为首的一大批酷吏，分道前往韦坚兄弟和皇甫惟明的贬所和流放地，将他们全部赐死。罗希奭从京师一路走到岭南，所过之处，凡是因韦坚案和杜有邻案而遭牵连的所有官员全部人头落地，“州县且闻希奭到，无不惶骇”（《旧唐书·李适之传》）。

罗希奭经过宜春时，李适之风闻杀人魔头来了，为了保住最后一丝尊

严，只好喝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杯酒——毒酒。

李适之死后，他的儿子李霅护送父亲的灵柩北上，准备运回长安安葬。可刚刚走到洛阳，就被李林甫派出的酷吏截住了，然后又被胡乱安了一个罪名，活活杖死于河南府衙。

可怜李适之堂堂宰相，父子二人竟然双双死于非命，并且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像李适之这样自我了断的人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就是当年被玄宗清除出朝的功臣——王琚。自从开元初年被贬谪后，王琚辗转了十几个州，始终只能担任地方刺史和太守，一直没有机会回朝。王琚看破了，索性放开手脚纵情享乐，每到一地任职，除了贪污受贿就是花天酒地，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可是，就连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半点野心和能量的人，李林甫还是没有放过他。不为别的，只因为李林甫认为此人“负材使气”，看上去很不顺眼，于是就趁此大肆株连之机把他贬为江华（今湖南道县）司马。罗希奭途经江华时，王琚也和李适之一样，不愿死于酷吏之手，企图饮鸩自尽，可惜命大，没死成，只好改成上吊，这才终结了自己的性命。

通过韦坚谋反案，李林甫将朝野上下亲附太子的势力几乎连根拔起，对东宫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太子的地位却依旧岿然不动。

李林甫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

天宝六年的冬天，上一轮打击才刚刚平息下来，李林甫就再一次出手了。这一次，他锁定的对象是天宝初年帝国最耀眼的一颗将星——王忠嗣。

将星陨落：石堡城事件

王忠嗣，初名王训，太原人，出身于军旅家庭，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年间抗击吐蕃的一员骁将，官任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以骁勇善战闻名于陇西一带。开元二年七月，唐军与吐蕃军队在渭州（今甘肃平凉市）附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王海宾任先锋，在渭州西面的武阶驿与敌军遭遇，经过一番苦战，大破吐军前锋，杀获甚众。

吐蕃军队迅速反扑，出动主力将孤军深入的王海宾部团团包围。形势危急之时，后方的唐军诸将因嫉妒王海宾的军功，竟然全都按兵不动。王海宾力战多时，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殉国。其后，唐军主力才乘势发动反攻，大破吐蕃军队，斩首一万七千级，缴获战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

战后，玄宗感念王海宾的忠勇，追赠其为左金吾大将军。

王海宾为国捐躯的这一年，王训年仅九岁，玄宗就把他接到了宫中抚养，并授予朝散大夫、尚辇奉御之职，赐名忠嗣。正所谓将门出虎子，王忠嗣长大后，为人英武沉毅，稳重寡言，并熟读兵书，谋略过人。玄宗经常召见他，与他谈论兵法，王忠嗣“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不禁赞叹：“尔后必为良将！”（《旧唐书·王忠嗣传》）

开元中期，王忠嗣进入军界，先后效力于河西节度使萧嵩、朔方节度使李祎麾下，因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历任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代州都督等职，赐爵清源县男，并赐紫金鱼袋。开元末，因军功显赫升任河东、朔方节度使。天宝元年，又兼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都督，其后率部北伐突厥，数战皆捷，致使“塞外晏然，虏不敢入”。随后因功加授左武卫大将军。

天宝四年，又兼摄御史大夫，晋爵清源县公。

王忠嗣年轻时颇以勇猛善战自负，但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尤其是在担任节度使之后，其性格中沉稳持重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他常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旧唐书·王忠嗣传》）

很显然，王忠嗣并不是一个好勇斗狠、头脑简单的武夫，而是一个拥有政治眼光的军事家。他深知，战争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军人从军的唯一目的，更不能作为个人捞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换言之，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他并不缺乏勇悍的作风，但是作为一个身兼数职的封疆大吏，他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等多个角度，全面而理性地看待战争。

王忠嗣有一张重达150斤的漆弓，但从来不用，一直藏在袋子里，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决不轻易使用武力。不过王忠嗣也知道，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军功，普遍存在好战情绪，不见得能理解他的思想，因此，王忠嗣并没有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而是经常在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

但是，王忠嗣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次出战之前，他都会派出大量间谍深入敌境，详细掌握敌方的各种情报，然后制订极具针对性的作战计划，最后再发兵奇袭。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伤亡，而且几乎能够做到每战必胜。在这种有勇有谋的长官手下打仗，官兵们当然都非常乐意。

然而，尽管王忠嗣的军事思想于兵、于民、于国都是有利的，可却与另外一个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冲突。

这个人就是玄宗李隆基。

差不过从开元中后期开始，李隆基就逐渐抛弃了姚崇当年提出的“不幸边功”的执政方略，变得好大喜功，一心想要开疆拓土，鹰扬国威。按理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拥有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并不能算错，可问题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一旦好大喜功，军队必然会为了邀功而滋生好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有可能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理性的驾驭，最后为百姓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战争灾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就说隋炀帝杨广，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态的驱使下，才把隋帝国变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也许，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王忠嗣才会逐渐形成以防御为主的稳健的战略思想。可遗憾的是，这样的稳健最后必然会被玄宗视为保守和消极，也必然会与玄宗的激进思想产生冲突。

天宝五年，皇甫惟明因韦坚案遭到贬谪，其河西、陇右节度使之职旋即由王忠嗣兼任。一时间，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旧唐书·王忠嗣传》）。

天宝初年，唐帝国总共设置了九大节度使，如今王忠嗣一人就占去了四个，实在是够拉风。面对如此拉风的王忠嗣，有个人自然会感到强烈的威胁。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从开元中期以迄天宝，许多人都是因为建立边功、受到玄宗赏识，从而出将入相、位登宰辅的，如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牛仙客，以及后来差一点入相的安禄山等。如今，王忠嗣一人身兼四节度，声势和威名如日中天，放眼天下，已经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入朝拜相了。

李林甫深知，王忠嗣不像牛仙客那么好对付，一旦入相，自己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所以，他必须未雨绸缪，尽早将王忠嗣摆平。

可是，王忠嗣战功显赫，治军严整，既不贪赃纳贿，也不克扣兵饷，几乎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备受玄宗器重——这样的一个强人，要如何才能摆平？

一开始，李林甫确实是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直到天宝六年“石堡城事件”的出现，李林甫才终于抓住了王忠嗣的软肋。

石堡城，位于今青海省湟源县西南，一座屹立在青藏高原上的边陲重镇。此城是唐军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塞，也是吐蕃进军河陇的必经门户。从高宗时代起，一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里就是唐朝和吐蕃的必争之地。双方在此反复争夺，数度易手，用无数士兵的鲜血和尸骸，不断向世人证明着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最近易手的一回合是：开元十七年春，朔方节度使李祎以一场奇袭拿下石堡城，从此，唐军的旗帜在这里飘扬了将近十三年，至开元二十九年底，又重新被吐蕃攻占。

这几年来，玄宗无时不在想着夺回石堡城，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报仇雪耻，彰显国威。到了天宝六年十月，玄宗终于下了一道诏书给王忠嗣，命他制订一个夺取石堡城的作战计划。

在王忠嗣看来，石堡城固然重要，可是此城地势异常险峻，三面皆为断崖，唯有一条石径蜿蜒可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几年来，吐蕃不仅在此屯驻重兵，而且构筑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若要强攻，至少要牺牲数万唐军将士的生命，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王忠嗣上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在石堡城后方的积石山一线构筑防御纵深，阻止吐蕃军队向东挺进，然后再厉兵秣马，静待反攻时机。

奏疏呈上，玄宗大为不快。

王忠嗣啊王忠嗣，没想到你也有消极怯战的时候。是不是朕给了你太多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反而把你宠坏了，让你变得锐气尽丧、贪生惜命了？行，你不打，朕自然会叫别人打，总而言之一句话——石堡城非打不可！

当时，有一个叫董延光的将领贪功心切，遂自告奋勇要求出战。玄宗大喜，立刻将任务交给了他，并下令王忠嗣拨给他数万兵马，同时全力配合他的作战行动。王忠嗣万不得已，只好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

对董延光虚与委蛇，一再敷衍。部将李光弼劝他不要得罪董延光，王忠嗣愤然道：“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旧唐书·王忠嗣传》）

后来，董延光未能如期攻克石堡城，便把责任推卸到了王忠嗣身上，向玄宗告状，说王忠嗣阻挠他的军事行动，才导致任务失败。

玄宗勃然大怒。

就在这个时候，李林甫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王忠嗣生长在宫中，与太子李亨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亲密，所以李林甫就授意手下人指控王忠嗣，说他之所以违抗圣命，消极避战，就是为了保存实力，然后再拥兵尊奉太子。

尊奉太子干什么？

当然是篡位登基了。

玄宗闻奏，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下诏解除了王忠嗣的兵权，并命他即刻回朝，接受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的三堂会审。

很显然，李林甫在这起案件中采取的手法，跟去年的韦坚案一模一样，都是一边铲除威胁他地位的政敌，一边把火引向东宫，打算借机扳倒太子。

上次是企图一石三鸟，这次是准备一箭双雕。

然而，李林甫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了。

三法司刚一开审，玄宗就给这起案件定了调子。他说：“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挠军功。”（《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明确宣布此案与太子无关，只需追究王忠嗣阻挠军事行动的罪责。

虽然这些年来，玄宗对李林甫打击异己的行为一贯采取了默认和纵容的态度，但在废黜太子的问题上，他却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和难得的清醒，从未被李林甫的谗言蛊惑。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太子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没什么真正的把柄落在李林甫手里；其次是因为东宫每次遭遇险情，都有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力保；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在于玄宗本人的态度。

对玄宗来说，宰相与东宫关系不和对他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只有这

两股政治力量互相牵制，他才能坐稳自己的皇位；只有他们一直处于剑拔弩张却又相持不下的状态，玄宗才能让自己始终处于仲裁者的地位，也让自己的皇权始终保有决定性的力量，从而对双方都形成一定的制约和威慑，进而维护政治上的平衡与稳定。

这就是玄宗的帝王术。

假如李林甫和太子李亨不是目前这种敌对状态，而是成为政治上的盟友，那玄宗势必落入危险的境地。因为太子已经年近四旬，其迫切渴望入继大统的心态可想而知。倘若有了宰相做靠山，他就完全有可能动用武力迫使玄宗下台。作为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皇帝，玄宗这方面的神经特别敏感，所以绝对不会让宰相和东宫拧成一股绳。

而居于同样的理由，玄宗也不会让李林甫真的把太子整垮。因为李林甫的权势已经非常大了，从玄宗即位以来，还没有哪个宰相拥有他这样的权势，倘若再让他扳倒李亨，另行拥立太子，那他的权力岂不是大过天了？日后还不得把皇权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玄宗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综上所述，除非太子李亨自己出了问题，否则不管李林甫再怎么折腾，其结果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太子李亨总算又躲过了一劫，但是王忠嗣这回却是在劫难逃了。

负责审讯王忠嗣的官员都知道，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很快，三法司就得出了结论——王忠嗣“沮挠军功”属实，论罪当诛！性命攸关的时刻，有个人站出来替王忠嗣说话了。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大唐军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

哥舒翰，西域突骑施人，将门之后，其父哥舒道元官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由于父亲官位高，家境殷实，哥舒翰就成了典型的“富二代”，天天游手好闲，领着一帮纨绔子弟到处瞎混，除了喝酒就是赌博，几乎没干过一件正经事。

不过，哥舒翰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重然诺，好任侠，天生就是当大哥的料。

哥舒翰就这样逍遥自在地混到了四十岁。直到有一天，他老爸死了，他才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猛然清醒过来。哥舒翰知道，再这么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到京师，准备找一

份差事养活自己。没想到，在长安整整住了三年，身上的积蓄差不多花光了，他却连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也没找到。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长安县尉，还被对方狠狠羞辱了一番。

到这一步，活了大半辈子的哥舒翰才真正意识到了生存的艰难，也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做人的意义。最后，哥舒翰痛定思痛，毅然决定到边疆从军。（《旧唐书·哥舒翰传》：“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

此时的哥舒翰恐怕连自己也不会想到，四十多岁才当兵的他，竟然在短短几年后就成了享誉朝野的名将。

哥舒翰到河西从军后，在攻克新城（今青海门源县）的战役中一战成名，从此崭露头角，历任衙将、大斗军副使、左卫郎将。有一次，吐蕃军队大举入寇，哥舒翰奉命在苦拔海一带进行阻击。两军遭遇时，吐蕃人分成三个纵队，从山上向下冲锋。哥舒翰一马当先，与敌人展开激战。交战中，哥舒翰的长枪折为两段，可他毫无惧色，毅然手持断枪奋勇拼杀。吐蕃士兵一个个被他挑落马下，“三行皆败，无不摧靡”。经此一战，哥舒翰更是声名鹊起。

天宝六年，哥舒翰因屡建战功而擢升陇右节度副使，兼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

就是在这一年，哥舒翰赢得了著名的积石山战役。

积石山，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坐落于黄河之滨，峭壁千仞，危石险峰，是保卫陇右地区的重要屏障，唐朝常年在此驻军屯田。当时，每当积石军的麦子熟了，吐蕃必定发兵袭击，将粮食抢劫一空。年年如此，当地驻军莫之能御，嚣张的吐蕃人便把这个地方叫作“吐蕃麦庄”。

天宝六年十月，哥舒翰决定在此打一场伏击战。他亲自率部进驻积石山，同时命副将杨景晖等人率兵埋伏在山外。这一次，吐蕃出动了五千骑兵，仍旧像往年那样大摇大摆地前来抢粮，哥舒翰突然出击，一下子就将猝不及防的吐蕃军队杀得人仰马翻。吐蕃残部匆忙抱头鼠窜，又被早已埋伏在山外的杨景晖截断了退路。哥舒翰一马当先，挺一柄长枪紧追不舍，每追上一个敌兵，就用枪头拍拍对方的肩膀，等敌人骇然回头之际，就一枪刺入咽喉，然后把整个人挑到三到五尺的空中，再重重掷下。

哥舒翰有一个小家奴，名叫左车，年纪才十五六岁，但臂力惊人，每

次出战，都会扛一把大刀跟在哥舒翰身边，主子一路挑人下马，他就一路砍人脑袋。哥舒翰挑一个，他就砍一颗，每战皆然，配合默契。对吐蕃人来讲，这主仆二人活脱脱就是一对凶神恶煞！

积石山一战，吐蕃全军覆没，五千骑兵没有一人生还。

从此，吐蕃人再也不敢来光顾这座“麦庄”了。

通过数年的浴血奋战，哥舒翰迅速成为大唐军界中最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玄宗当然也注意到了他。

天宝六年十月末，玄宗在骊山华清宫亲自召见了哥舒翰，一番交谈后，对他非常欣赏，旋即擢升他为陇右节度使，兼鸿胪卿、摄御史中丞。此时，王忠嗣正被关在诏狱里，接受三法司的审讯。

就在哥舒翰奉召入朝前，王忠嗣麾下的许多将领就建议他多带些钱，以便入朝打点，想办法营救王忠嗣。可哥舒翰很清楚，王忠嗣此次犯的事，绝不是靠区区金钱的贿赂就可以摆平的。因为他得罪的不是别人，是当朝天子。所以，哥舒翰两手空空就上路了。他知道自己该用什么办法解救王忠嗣。

得到陇右节度使的任命后，哥舒翰照例要入宫拜谢。他借此机会，极力向玄宗陈述王忠嗣的冤情。玄宗不耐烦，起身就走，哥舒翰紧跟其后，并且一步一叩首，声泪俱下地请求——愿以自己的官爵替王忠嗣赎罪。到最后，玄宗终于被感动了，只好网开一面，下诏贬王忠嗣为汉阳（今湖北武汉市）太守。

王忠嗣虽然逃脱了天子的翻云覆雨手，但却没能逃过死神的魔爪。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王忠嗣在地方太守的任上暴卒，年仅四十五岁。天宝初年最耀眼的一颗将星就此陨落。

天宝八年六月，也就是王忠嗣刚刚去世不久，玄宗就再次下令，命哥舒翰集结了六万大军强攻石堡城。哥舒翰苦战多日，最终以牺牲数万将士的代价，攻下了这座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坚城。

当哥舒翰踩着遍地的鲜血和尸骸登上石堡城的一瞬间，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会不会闪过一丝疑惑——这么干，值得吗？

其实，如果玄宗肯采纳王忠嗣的建议，在石堡城后方的积石山一线构筑防御纵深，就能有效阻止吐蕃向东扩张，那么石堡城的战略地位就

不会那么重要了。可惜在玄宗眼里，石堡城早已不止是一座边境要塞，而是他鹰扬国威、炫耀武力的对象，更是他的盛世棋盘上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占有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史料记载，吐蕃守卫石堡城的士兵只有区区数百人，而且战后被唐军俘虏的就有四百，可见战死者最多也就几百个人。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石堡城一战，唐军与吐蕃的伤亡比是100：1。

一切正如王忠嗣当初的预言："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旧唐书·王忠嗣传》）

当然，王忠嗣已经看不到这一幕了。

倘若王忠嗣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他是该为自己的不幸言中而摇头苦笑，还是该为自己的一语成谶而扼腕伤悲？

没有人知道。

也许，只有飘荡在石堡城上空的数万唐军将士的冤魂，才能真正理解王忠嗣。而活着的人，心里除了功名利禄和高官显爵，除了厮杀的快感和胜利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呢？就算哥舒翰曾经有过一丝困惑，但在建功立业的豪情之中，在加官晋爵的利益面前，这样的困惑也只能是萤火虫试比阳光，只能是一滴水汇入汪洋，跟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天宝中期，当胡将哥舒翰在帝国的西北部跃马横刀、屡立战功的时候，在帝国的东北方，也有一个胡人因为日益显赫的边功而逐渐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宠幸。

从天宝初年开始，这个胡人就奉玄宗之召，一次又一次来到了富贵浮华、歌舞升平的长安，进入了九重宫阙，登上了金銮宝殿，走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身边，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笑声，并很快就成了他们最宠爱的干儿子。

在世人的想象中，这个勇悍的胡人很可能跟其他胡将一样，长着一脸横肉和络腮胡子，说话时其声如雷，顾盼间目露凶光。

可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胡人长得又白又胖，大腹便便，生性幽默诙谐，不管在什么场合，脸上始终洋溢着真诚而憨厚的笑容。

因为这家伙实在是胖得有些滑稽，所以玄宗有一次忍不住拿他开涮，说：“你这个胡人肚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何大到这种程度？”（《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

他马上一脸正色地回答：“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红彤彤的忠心！”（《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

众所周知，这个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硕大的肚子里只有赤胆忠心而别无他物的大胖子，就是安史之乱的缔造者、盛世唐朝的掘墓人——安禄山。

第四章 安禄山的骚动

安禄山：偷羊贼的祸福人生

安禄山，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出生，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的杂种胡人。说他是杂种并非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而是事实。因为他父亲是西域康国人，历史上称为粟特人，这个民族擅长经商，估计就是因为做生意才来到了营州；他母亲是突厥巫师，姓阿史德，以占卜算命为业。安禄山是两个少数民族的混血儿，所以《旧唐书》就称他为“杂种胡人”。

据说他母亲婚后很久没有生育，就到阿荦山下祈祷，后来果然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便为他取名阿荦山。在突厥语中，“阿荦山”是战神的意思。此时，阿史德女巫当然不会知道，很多年后，这个以突厥战神命名的孩子，将给大唐帝国带来一场生灵涂炭、血流漂杵的战争灾难。

阿荦山的父亲早死，他母亲就带着他改嫁突厥将军安延偃，从此阿荦山就以“安”为姓，并按“荦山”的谐音改名“禄山”。后来，安延偃的部落被打散，安禄山就逃到了幽州，在边境的贸易市场上做了“互市牙郎”。所谓互市牙郎，就是为胡汉各族商人提供翻译和中介服务的经纪人。

安禄山之所以选择经纪人的工作，是因为他有三项优势：一、他父亲是擅长经商的粟特人，他当然也遗传了一些从商的基因；二、他生性狡黠，善于揣测他人心理；三、语言能力超强，据说通晓六种蕃语（还有人说是九种）。

虽然安禄山有这么多优势，但是他做生意的运气却很背，干了十多年中介，还是没挣到什么钱。到了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安禄山已年届而立，依旧两手空空，一事无成。为了早点发财，他决定在中介之外再搞一份兼职。

什么兼职？

偷羊。

反正安禄山手头上客户很多，不愁销赃。晚上偷羊，白天就可以把它卖掉。这份兼职要是干好了，绝对比单纯干中介要强得多。

只可惜，安禄山既不是做生意的料，也不是当贼的料。有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干活，忽然被人麻袋一蒙，打倒在地，然后就是一顿痛扁。第二天一早，这个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偷羊贼就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公堂上。

这是安禄山人生中的第一次劫难。

如果不出意外，安禄山的人生履历将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少孤，家贫，流落市井，为互市牙郎，后盗羊事觉，棒杀，结束。

但是谁也没想到，偷羊贼安禄山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转祸为福，从此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

那天在威武森严的公堂上，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问明案情之后，二话不说，当场命人将这个偷羊贼棒杀。就在那根行刑的大棒高高挥起的一瞬间，安禄山忽然鼓起勇气，扯着嗓子厉声高喊：“大人不是想消灭奚和契丹吗？奈何打杀壮士？”

安禄山长得壮硕魁梧，本来丹田气就很足，加上人之将死的那种绝望和恐惧，这一声嘶喊真是震耳欲聋，撼人心魄。

行刑手登时一愣，连张守珪也颇有些意外。他心念一动，随即饶有兴味地走上前去，把这个气壮如牛的偷羊贼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眼前这小子生得白白胖胖，膀大腰圆，看上去还有几分胆识，应该是块当兵打仗的料。

当时，奚人和契丹人常年入寇唐朝的东北边境，是帝国的一大边患。骁将张守珪之所以被朝廷派驻幽州，就是为了对付这两个凶悍的异族。值此用人之际，安禄山这一声喊确实提醒了张守珪。

是啊，与其打杀壮士，还不如让他上阵杀敌，立功赎罪。

就这样，张守珪赦免了安禄山，并把他留在了自己麾下。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的安禄山，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从此踏上了一条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随后，安禄山在张守珪的军队里当上了捉生将。

所谓捉生将，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捉活口、抓舌头的侦察兵。安禄山的职务，很可能就是侦察排长或特务连长之类的。

不能不说，张守珪识人用人的眼光确实很好，他让安禄山当侦察兵，真是把好钢用到刀刃上了。安禄山早年干中介的优势及其积累的经验，现在全都派上了大用场。他通晓多种蕃语，跟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熟悉当地各族的风土人情，对山川、道路、地形等等都了如指掌，派这样的人出去抓舌头，当然是一抓一个准。

安禄山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通常只带数骑，回来的时候，身后总是绑了数十个奚人或契丹人。无论张守珪需要抓什么样的俘虏，了解哪方面的敌情，安禄山总能手到擒来，圆满完成任务。没过多久，安禄山就获得了张守珪的赏识，被提拔为偏将。由于他生性狡狯，善于逢迎拍马，知道张守珪老是嫌他长得胖，于是就偷偷减肥，连饭也不敢吃饱。很快，他的减肥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满身的赘肉去掉了不少，更得张守珪的欢心，随即被认作养子。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因骁勇善战、屡立军功而升任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

当年那个混得一塌糊涂的中介商，那个险些被人打死的偷羊贼，如今终于咸鱼翻身，否极泰来，成了幽州地面上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

这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然而，古人也经常说一句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就在安禄山风生水起、志得意满的当口，又一场杀身之祸就从天而降了。

人在遭遇困境时，脑袋通常会比较清醒，可一旦得意了，就很容易忘形。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安禄山自然也不会例外。

就在升任平卢讨击使不久，安禄山奉张守珪之命讨伐奚和契丹，因为这些年从没打过一次败仗，所以就骄傲轻敌，贪功冒进，结果被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回。张守珪念其骁勇，不忍诛杀，就把他执送东都（当时玄宗住在东都洛阳），交给朝廷发落。

这是安禄山的第二次劫难。

正常情况下，将领出征因主观原因而打了大败仗，就必须按军法论处，其结果只能是两个字——杀头。

但是，安禄山的命运奇就奇在——每当大祸临头、身处绝境的时候，总有人把他从阎罗王手里头抢回来，并且将他的人生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上一次的贵人是张守珪。

而这一次的贵人，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安禄山被押到东都后，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亲自审问他。两个人对答许久，张九龄深感此人绝非善类，就在他的案卷上写下批语：“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资治通鉴》二一四）意思是按照军法，张守珪本来就应该把安禄山就地处决，现在就算把他送到了朝廷，也不可能从轻发落，还是一个字——死。

关键时刻，玄宗发话了。

他认为，安禄山作战英勇，而且立过战功，理应特赦，只须免除官职，让他以“白衣”之身回军中效命，戴罪立功。

张九龄坚决反对，说：“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旧唐书·张九龄传》卷一）

张九龄不是神仙，他当然不可能预见十九年后的安史之乱。但是，作为一个阅人无数的宰相，凭直觉看出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本性，预感他日后有可能危害社稷，这倒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安禄山本来就犯了死罪，就算他将来不造反，现在杀他也不能算错。假如玄宗能够采纳张九龄之言，当时就把安禄山除掉，那么后来的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或许就将因此改写了。

然而历史没有假如——玄宗最后还是把安禄山放了。

安禄山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因祸得福。

为什么说因祸得福？

因为他得到了天子的关注。

偌大的帝国，像他这个级别的武将不知凡几，皇帝哪能认得过来？而安禄山却因触犯死罪而受到皇帝的瞩目和关照，不是因祸得福是什么？

又一次逃出鬼门关后，安禄山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他意识到，光靠在战场上拼死拼活是没有用的，即便拿命换来一官半职，一着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满盘皆输。也就是说，要想出人头地，不仅要会打仗，更要会做人。

怎么才叫会做人？

答案就一个：钱。

具体而言是四个字：学会花钱。

每个人都喜欢钱，那些有权的人更喜欢。所以，只要你学会给有权的人送钱，他们自然就会喜欢你，而且乐于拿手中的权力和你交换，让你也变得更加有权。

从古到今，社会一直在变，制度一直在变，但是这条真理则亘古常在，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在支配着这个物欲横流、权力至上的世界……

从此，安禄山一边打仗，一边不遗余力地贿赂前来视察的每一个朝廷使臣。“上（玄宗）左右至平卢（营州）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安禄山升任平卢兵马使。次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出任河北采访使，赴平卢视察军情，“禄山谄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贞，复以金帛遗其左右”。（《安禄山事迹》卷上）张利贞回朝后，拼命替安禄山说好话，玄宗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旋即擢升他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兼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正月，唐朝廷将整个帝国边境从西到东、由北至南划分为十大藩镇，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大节度使，外加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其中，安禄山正式出任平卢节度使，负责镇抚室韦、靺鞨两大部落，统

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警备区（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军队屯驻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和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总部设在营州，总兵力三万七千五百人。

安禄山就此强势崛起，成为手握重兵、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十三年。

一个男人的心灵被撩动了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正月，安禄山奉玄宗之召入朝觐见。

这是安禄山生平第一次来到长安。

秦中自古帝王州。大唐帝京的高贵、繁华与富庶给这个北地胡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龙首原上那座巍峨壮丽的大明宫，以及凝结在大明宫上空那股磅礴雄浑的帝王气，更是让安禄山激动莫名、叹为观止，并且前所未有地撩拨着他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角落，让他周身的血液不由自主地开始了一种无声的沸腾……

在大明宫的含元殿，安禄山第二次见到了玄宗，第二次见到了他事业上的明主、生命中的贵人。为了向天子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念和忠诚之心，安禄山对玄宗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去年秋天，营州闹了蝗灾，蝗虫遮天蔽日，把禾苗都吃光了。臣焚香祝祷，面对苍天说：'臣如果心术不正，事君不忠，就让蝗虫把臣的心吃掉；倘若臣不负天地神灵，就请让蝗虫赶快消失吧。'臣刚刚说完这句话，就有一群大鸟从北方飞来，顷刻间把蝗虫吃得一干二净，臣欣喜万分，感动不已。陛下，这是稀世祥瑞啊，请陛下宣付史官，载诸史册。"玄宗大悦，立刻命史官载录。随后的日子，玄宗对安禄山"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资治通鉴》二一五），旋即又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

离开长安的那天，满载着天子眷宠欢喜而归的安禄山走出了很远，忽然又回头遥望了一眼。

他望着大明宫阙那一角华丽的飞檐，目光中有一种微妙难言的东西在闪动。

这一眼的风情，要到十二年后，才能让大唐君臣读懂——用血泪浸泡的心去慢慢读懂。

毫无疑问，此次长安之行已经准确无误地撩动了安禄山的心扉，给他的生命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一个足以让欲望起舞、让野心飞扬的充满想象的空间。

后来的几年中，安禄山频频出击奚和契丹，并屡屡获胜，因而在朝野的声望直线飙升。与此同时，他对朝中高官的贿赂也从来没有停止。到后来，不仅是钦差们说他好话，连首席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礼部尚书席建侯等人，也都众口一词地盛赞安禄山。

在玄宗看来，这就叫众望所归。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被玄宗视为“镇清边裔”的“万里长城”（《安禄山事迹》卷上）。

既然是万里长城，当然就要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和使命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玄宗又让安禄山兼任了范阳节度使。

在当时的十大藩镇中，范阳镇绝对是最牛的一个。因为，无论是它所节制的军队，统辖的州境，还是拥有的兵力，都是十大藩镇中最多的。“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资治通鉴》二一五）

当时，十大藩镇的总兵力是四十九万人，而安禄山兼统两镇，兵力相加已经将近十三万人，占了四分之一。

然而，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还远远没有到头。

毋宁说，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又以平卢、范阳节度使兼摄朝廷的御史大夫。随着权势和地位的提升，他奉召入朝的次数越来越多，对玄宗的巴结谄媚也日渐升级，甚至不惜以得罪太子为代价，曲径通幽地向玄宗表达他的忠心。

有一次，安禄山上殿觐见玄宗，当时太子也在场，可安禄山却视若无睹，只拜皇帝，不拜太子。旁人提醒他，他却装作一脸懵懂地

说：“臣是胡人，不懂朝中礼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笑着向他解释：“这是储君，朕千秋万岁后，将代朕君临天下。”安禄山似懂非懂地说：“臣愚钝，向来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储君。”说完才不情不愿地向太子行礼。

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安禄山这是在演戏。但是这出戏却没人愿意拆穿。因为安禄山不可能不知道太子是什么人，但他偏偏要装傻充愣，目的就是要拐着弯儿向玄宗表达赤胆忠心。在场的人大多受过安禄山的好处，当然也会帮他一起演戏。而对于玄宗来说，安禄山竟然为了讨好他而不惜得罪未来的皇帝，这份忠心当然也是无人可及的。

玄宗当时正宠着杨贵妃一家子，如今又宠了安禄山，于是干脆把他们撮合在了一块，叫杨贵妃的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都和安禄山结拜为兄弟姐妹。从此，安禄山更加频繁地出入宫禁，和杨贵妃的关系也日渐亲密。不久后，他又向玄宗提出了一个请求——要认杨贵妃为干妈。

玄宗当然是笑呵呵地同意了。

随后，安禄山每次入宫，都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玄宗不解，问他何故。安禄山恭恭敬敬地说：“我们胡人的习俗，都是先拜母亲，后拜父亲。”玄宗释然，对安禄山的憨厚和朴实又平添了几分好感。

史称安禄山“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连走路都要左右两个人搀扶着他。但是，每当在玄宗面前跳胡旋舞的时候，安禄山却总能“疾如风焉”（《旧唐书·安禄山传》）。要论当时胡旋舞跳得最好的人，天下只有两个——安禄山和杨贵妃。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白居易《胡旋女》）

为什么一个连走路都显得有困难的人，能把胡旋舞跳得跟杨贵妃一样完美呢？

因为他是为皇帝而跳的。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玄宗为了方便安禄山入朝觐见，就命有关部门在亲仁坊为他建立一座宅邸，并下令只求富丽堂皇，不必顾惜财力。豪宅落成后，里面的所有家具器物全部是御赐的，而且极尽高档豪华之能事，连厨房里头的锅碗瓢盆、马厩里头的筛子箩筐等物，都是用金银打造的。从开始修建豪宅的第一天起，到竣工之后的种种器具添置，玄宗本人都跟得很紧，而且经常对监工的宦官说：“胡人眼高，别让他笑我吝啬。”

这一年正月二十，是安禄山的生日。玄宗和杨贵妃作为干爹干妈，当然赏赐了很多珍宝、衣服、酒食。三天后，杨贵妃命人用锦绣绸缎缝制了一件特大的襁褓，然后召安禄山入宫，让宫女和宦官用襁褓把他团团裹住，装在彩轿里抬着走。玄宗听见后宫忽然一片嬉戏喧哗，忙问在搞什么名堂，左右说："这是贵妃分娩的第三天，所以在给禄儿洗澡（民间的"洗三"习俗）。"玄宗赶紧跑过去看热闹，一看三百多斤的安禄山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襁褓里头，仅露出一张憨厚的胖脸，不禁捧腹大笑。

干儿子洗三了，他这个干爹当然要有所表示。玄宗随即赐给了杨贵妃"洗儿钱"，又厚赐了安禄山，"一家三口"又嬉闹了大半天，才尽欢而罢。

从杨贵妃为安禄山"洗三"的这一天起，安禄山就有了自由出入宫禁之权，过后他经常陪杨贵妃一起吃饭，有时候甚至彻夜不归，留宿宫中。日子一长，宫中自然就传出了绯闻。朝野上下的人们私底下议论纷纷，都怀疑皇帝被那个大胖子戴了绿帽。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玄宗自始至终没起过半点疑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天宝十年二月，安禄山又向玄宗提出了一个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在旁人看来，这绝对属于非分的请求，只能用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来形容。

可出人意料的是，玄宗居然一口答应了，并随即把当时的河东节度使调回朝中，任左羽林将军，然后立马把职务给了安禄山。

河东镇与朔方镇互为掎角之势，两镇共同防御突厥，河东镇统辖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及云中警备区，屯驻忻、代、岚三州之境，总部设在太原，兵力五万五千人。

至此，安禄山已一人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辖下的总兵力已达到十八万五千人，足足占了全国藩镇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

除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还兼任河北采访使，受封上柱国，赐爵东平郡王。

大唐开国一百年多来，外姓武将封王者，唯安禄山一人。

安禄山不仅本人权倾天下、位极人臣，而且一家老小也都跟着他鸡犬

升天。他母亲、祖母皆赐国夫人，十一个儿子都由玄宗赐名，长子安庆宗官任太仆卿，次子安庆绪官任鸿胪卿，安庆宗后来又娶了皇族的荣义郡主……放眼当时满朝文武，安氏一门可谓显赫无匹、荣宠绝伦。

有谁能料到，此时的安禄山已经“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了呢？史称，安禄山每次入宫，“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站在大明宫前的龙尾道上，这个昔日的偷羊贼正在以一种睥睨天下的姿态南北眺望，并且久久伫立，迟迟不舍得离开……

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

史书的回答是——“凶逆之萌，常在心矣。”（《安禄山事迹》卷上）

是谁撩动了安禄山的野心？

答案只有一个——唐玄宗李隆基。

正是他对安禄山毫无原则的宠信、无休无止的纵容，才孕育了安禄山觊觎皇位的野心，助长了安禄山睥睨天下的欲望。

此时，历史的指针正指在天宝十年，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四年……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朝臣也日益受到玄宗的宠幸，正在朝着帝国的权力巅峰跑步前进。

这个人的到来，将对天宝末年的帝国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才在客观上给安禄山提供了起兵的借口，并加快了安禄山反叛的步伐。

这个人就是杨国忠。

杨国忠：小混混的华丽转身

杨国忠，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市）人，杨贵妃的远房堂兄。他的父祖辈皆默默无闻，但却有一个舅父大名鼎鼎，就是女皇武曌的晚年男宠张易之。张易之得宠的时候，杨钊尚在襁褓，没能沾上舅舅的光，等他稍微大一点，张易之早就在神龙政变中翘了辫子，而且身后还留下了恃宠乱政、死有余辜的骂名，所以这层关系对杨钊丝毫没有帮助。

虽然杨钊的祖上也是名门望族弘农杨氏，可杨钊这一支比杨玉环那一支败落得更厉害。杨玉环她父亲好歹还是个七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公务员，可杨钊的父亲却是个平头老百姓，家境还很不好，所以杨钊从小就没受到什么正规教育，成天在社会上瞎混，长大后别的本事没有，就只学会了喝酒跟赌博。

不过，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生存，没有文化不可怕，没有文凭也不可怕，怕就怕没有一技之长。杨钊喜欢赌博固然不是什么有益身心的爱好，可他却从赌博里面玩出了一样本事，那就是——对数字的敏感，以及出众的运算能力。

我们千万别小看这种本事，因为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器，甚至连算盘都还没有（现在的算盘大致是北宋时期才出现的，唐代使用的计算工具是用竹签削成的筹码），如果一个人眼睛一眨就能给你来个多位数的加减乘除运算，你当然要惊呼他为天才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这样的本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理财能力，加之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杨钊才从一个小混混一步步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了天宝末年的天子宠臣和帝国宰辅。

然而，尽管杨钊很早就具有数字才能，可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却认识不到他的天才。在他们眼里，他始终只是个不学无术、狂饮滥赌的混混，所以一直对他敬而远之。

由于长期遭人白眼，杨钊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终于有一天，他发愤图强了——老子要去从军，当一个大官回来给你们瞧瞧！

杨钊发愤的情形，大致与哥舒翰类似。不过人家哥舒翰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一跑到边境就噌噌地立功，可他杨钊却恶习难改，到了四川当兵后，还是喝酒赌博两不误，有一回估计是因此触犯了军纪，还被上司狠抽了一顿鞭子。

所幸杨钊还有一技之长——理财能力，所以入伍之后没被送上前线，而是留在后方负责屯田工作。屯田是当时边防军队的主要经济来源，一贯受到军方和朝廷的高度重视。在这个岗位上，杨钊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干出了一些成绩，随即受到上峰赏识，被提拔为新都县尉。

杨钊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三年，可惜一直没能升迁。按当时的人事制度规定，官员任职期满，若无升迁或调动，就只能暂时赋闲在家，每年到吏部去挂号，得到补缺机会再出来任职。杨钊在新都县尉任上干满三年后，赋闲了，经济来源一下子中断，过了一段坐吃山空的日子，

手头越来越拮据，以至连回蒲州老家的路费都没有，于是被困在了川中。

就在杨钊陷入窘境、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人及时向他伸出了援手。这个人叫鲜于仲通，不仅见多识广，才智过人，而且家财万贯，在当时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麾下担任采访支使，是节度使的心腹幕僚。这个鲜于仲通为人非常精明，他见过杨钊几次面后，就认定杨钊绝非久居人下之辈，便时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地接济他。

鲜于仲通相信，杨钊是个很好的政治投资对象。所以，必须在他万分饥渴的时候给予他滴水之恩，以此换取他日后的涌泉相报。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章仇兼琼决定搭上这根“天线”，就把鲜于仲通找来商量，说：“我现在很受皇上器重，可要是上面没人，就很容易受到李林甫的排挤。最近我听说杨贵妃正受皇上宠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若能替我到长安跑一趟，跟杨家人结交，我就有备无患了。”

鲜于仲通立刻意识到，只要让杨钊走这一趟，这个年轻人日后必定飞黄腾达，而自己的投资也必将取得丰厚的回报！果然不出鲜于仲通所料，短短几年后，已然成为天子宠臣的杨国忠就给了他一个绝对超值的回报——剑南节度使之职。这是后话。

主意已定，鲜于仲通就对章仇兼琼说：“我是蜀地人，从来没去过京师那种大地方，恐怕会坏了大人的事。”他瞟了章仇兼琼一眼，顿了顿，又接着说，“不过，我可以为大人举荐一个人，此人若出马，一定不会让大人失望。”

杨钊的好运就这么来了。

章仇兼琼闻言，随即召见杨钊。一见之下，章仇兼琼大喜过望。他发现，这个杨钊不仅长得仪表堂堂，而且口才伶俐，为人异常机敏，确实是入朝打点的合适人选。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杨贵妃的族兄。裙带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官场上最好用的通行证，所以，啥也别说了，就是这小子了！

随后的日子，章仇兼琼不仅任命杨钊为推官，有事没事还经常召见他，并且总是嘘寒问暖、关照有加，把杨钊搞得感激涕零、受宠若惊。

天宝四年秋天，章仇兼琼命杨钊负责运送贡品入朝，临行前，忽然用

一种不经意的口吻对他说："我有一点东西放在郫县，可以给你作几日盘缠之用，你路过时顺便带走吧。"

杨钊到达郫县后，一看到章仇兼琼所说的那"一点东西"，顿时惊呆了。

那可是满满几十大车的礼品啊，都是蜀地的著名特产和奇珍异宝，杨钊凭着自己的心算能力大致估算，价值起码在千万（一万缗）以上。

杨钊明白了——这趟差事不仅是向朝廷上贡，更是向贵妃一家子上贡，不仅是帮章仇兼琼"搭天线"，更是帮自己"跳龙门"啊！

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美差吗？

杨钊欣喜若狂，随即拉上几十车礼物，昼夜兼程直奔长安。

抵达长安后，杨钊带上礼物马不停蹄地走访了三个堂妹，告诉她们："这都是节度使章仇大人送的。"杨氏三姐妹喜笑颜开，当即笑纳，随后天天在玄宗跟前吹风，极力鼓吹章仇兼琼如何有才、如何能干等等。不久后，章仇兼琼就如愿以偿地调入朝中，荣任户部尚书了。

在杨氏三姐妹之中，杨钊并没有将礼物平均分配，而是把其中的一半给了二堂妹（也就是后来的虢国夫人），另外一半才给其他两个堂妹平分。虢国夫人之所以占了大头，是因为她和杨钊并不仅仅是堂兄妹的关系。

早在她们三姐妹还待字闺中的时候（当时杨玉环还小），杨钊就常去她们家串门，并且跟这个二堂妹有了私情。后来二堂妹嫁人了，杨钊自己也混得很不像样，两人的关系就中断了。如今，好多年没见的这位远方堂兄再次出现时，居然带来了这么贵重而丰厚的见面礼，怎能不让虢国夫人心花怒放？并且巧合的是，虢国夫人不久前刚刚守寡，满怀寂寞正无处安放，杨钊居然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又岂能不让她旧情复燃、芳心荡漾？

所以，一到长安，杨钊就顺理成章地住进了虢国夫人的家里。

接下来的日子，杨氏三姐妹就经常跟玄宗提起她们的这位堂兄，尤其是虢国夫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玄宗推荐杨钊，宣扬了他的一大堆优点，而其中最能打动玄宗的一点就是——杨钊善玩樗蒲。

所谓樗蒲，是一种类似于掷骰子的博彩游戏，但规则比普通的掷骰子

复杂得多，胜负结果需要有精密的计算，正是杨钊所擅长。

玄宗当时最喜欢玩，一听说有人善玩樗蒲，立马召见，随后就任命杨钊为金吾兵曹参军，并准许他以供奉官的身份出入禁中。从此，每当玄宗在宫中玩樗蒲，杨钊就专门在一旁负责计算点数和输赢，每次都算得又快又准，玄宗不禁大为赞叹：“好度支郎！”（《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度支郎就是财政官员的意思。当时玄宗除了爱玩就是爱钱，谁要是能帮他大把大把搞钱，保管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比如早年的宇文融，以及后来的韦坚、杨慎矜、王鉷，都是因为善于聚敛而成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杨氏三姐妹随即抓住玄宗的这句话不放，天天缠着他，要他给杨钊封个管财政的官。玄宗拗不过，只好让杨钊到户部当差，不久又擢升他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让他在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王鉷的手下任职。

后来的事实证明，玄宗的决定是相当英明的。因为杨钊搞钱的本事不仅没有让他失望，而且还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

从杨钊被任命为度支郎中的这一刻开始，他就彻底告别了穷愁潦倒、郁闷不堪的过去，从此左右逢源、顺风顺水，就好比从艰险崎岖的蜀道直接拐上一览无余的高速一样，周遭景物豁然开朗，前程顿时变得无限远大……

在此后的几年中，杨钊使尽浑身解数，细心窥伺玄宗好恶，千方百计加以迎合，同时拿出看家本领大肆聚敛，迅速博得玄宗的赏识和宠幸，于是不断获得升迁，在短短几年间就兼任了十几个财政职务。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杨钊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主管全国财政工作），恩幸日隆”（《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从前混迹市井、狂饮滥赌的小混混，几年前还抑郁不得志的这个蜀中小吏，如今已然脱胎换骨，成了位高权重的当朝大员。当初对他敬而远之的那帮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现在肯定懊悔不迭——过去怎么就没看出这小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为了让天子对自己的政绩有一个直观而美好的印象，杨钊自从当上财政大臣后，就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将上缴中央的粮食兑换成绸缎，同时又用各种苛捐杂税的收入购买布帛，全部收进国库，然后频频上奏玄

宗，宣称国库中的财帛已经堆积如山，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程度——“帑藏充牣，古今罕俦！”（《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国家不差钱了，玄宗当然高兴。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二月，玄宗召集文武百官，兴高采烈地前去参观国库，一看之下，果然如同杨钊所说——府库盈满，财物山积，放眼古今，罕有其匹！

目睹如此盛况，满朝文武无不咋舌，大唐天子也止不住两眼放光——如今的大唐帝国岂止是不差钱，简直是富得流油、富得冒烟了！

玄宗兴奋得无以言表，当即宣布：满朝文武通通有赏，一律按官阶大小赐给相应布帛；同时赐给杨钊三品紫袍和金鱼袋，以示无上恩宠。

自开元后期以来，玄宗在赏赐宠臣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把钱当回事了，自从这次“国库观摩”之后，其思想更是获得了空前解放，达到了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赏赐贵幸之家，无有限极”（《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俨然把国库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钊向玄宗呈上一道奏疏，请求为他的舅舅张易之、张昌宗平反昭雪。玄宗二话不说，当即准奏，以二张当年曾劝武皇迎回中宗、对社稷有功为由，下诏追复二张的官爵，并赐其一子为官。数日后，杨钊又以自己名字中含有“金刀”，暗合某图谶，对天子和朝廷不吉为由，请求玄宗赐给他一个新名字。玄宗有求必应，立刻赐名为“国忠”。

有道是名正则言顺，杨国忠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搞出这两个花样，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几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换言之，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包装自己，为日后攫取大权铺平道路。首先，通过为二张平反，他就不再是逆臣余孽，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功臣之后，从此拥有了一个非常光荣的出身；其次，通过改名，既能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和从前的自己一刀两断，又能通过皇帝赐名，让所有人意识到他的身份是何等尊贵与不同凡响。

从今往后，这世上就不再有那个叫杨钊的小人物了，取而代之的是天子亲自赐名的这个功臣后代杨国忠。

昔日的小混混就此华丽转身。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

从今往后，杨国忠就将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里，向权力之巅发起冲锋。

当然，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从来都是险峻而狭窄的。正如自古华山一条道一样，你要想在这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上快速攀登，就必须千方百计把挡在你前面的家伙从悬崖上挤下去。直到你毫不留情地把所有挡路者推入万丈深渊，你才能先于众人到达无限风光的绝顶。

事实上，从天宝六年开始，杨国忠就已经在这么做了。

在幕后策划并且与他配合无间的人，就是李林甫。

天宝中后期，他们联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大狱，强力打击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而在被他们铲除的异己中，死得最难看的，就是先于杨国忠受到玄宗宠幸的两大理财高手——杨慎矜和王鉷。

天宝大狱

杨慎矜，隋炀帝杨广的玄孙，为人沉毅有才干，尤其是财政工作方面，能力特别突出，历任监察御史、太府出纳、含嘉仓出纳使、京畿采访使、户部侍郎、御史中丞等职。天宝五年，杨慎矜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整垮了另一个理财高手韦坚，进而将其取代，成为玄宗心目中最能干的财政大臣。

毫无疑问，在李林甫的手下干活，有一条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得到天子的信任和赏识。而韦坚一死，杨慎矜又渐渐“为上所厚”，自然就引起了李林甫的嫉恨。

对李林甫来讲，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他的整个宰相生涯，几乎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

如今，杨慎矜既然无视前车之鉴，再次走到五百万伏高压的边缘，李林甫当然要想办法让他领教一下碰触高压的滋味。

李林甫的整人手法是相当高超的，不管什么人，他都能准确捕捉你身上的弱点。即便你是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他也能找出你身上最脆弱的那个脚踵。一旦找到你的阿喀琉斯之踵，他就能像阿波罗那样一箭

把你射穿。

那么，杨慎矜最脆弱的脚踵在哪呢？

结交术士。杨慎矜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经常和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暗中交往。

为什么大臣不能与术士交往？

因为早在开元十年，玄宗就曾经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虽然早有明令禁止，但杨慎矜还是一直把史敬忠奉若上宾。因为在他眼中，这个史敬忠和芸芸众生大不相同，简直就是个神人。

据说有一次，杨慎矜祖坟旁边的草木忽然流出红色的液体，看上去就像流血一样，十分可怕和诡异。杨慎矜极为不安，就问史敬忠该怎么办。史敬忠马上告诉了他一个禳解之法，让他在家中的后花园设置一个道场，然后每天退朝后，必须赤身裸体、披枷戴锁在道场中静坐。杨慎矜依言而行，一直坐了十天，祖坟旁边的草木果然就止血了。杨慎矜顿时对史敬忠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不管碰到大事小事，必定要让史敬忠帮他预测吉凶。

杨慎矜自以为皇帝不可能知道他结交术士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把几十年前颁布的那道禁令当一回事。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玄宗还是听说了杨慎矜与术士暗中交往的事。玄宗很恼火，但考虑到他在财政工作方面一直干得很出色，也只好隐忍下来，没有发作。

可是，玄宗不发作，不等于杨慎矜就太平无事了。

因为，一心想让他死的人不是玄宗，而是另外三个人。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杨国忠，还有一个就是杨慎矜的表侄——王鉷。

王鉷，太原人，武后时期的名将王方翼之孙，是玄宗一朝继宇文融、韦坚、杨慎矜之后的又一个理财高手，历任监察御史、户部郎中、户口色役使、京畿采访使、关内采访使、御史中丞等职。在户部任职期间，王鉷曾在正常赋税之外，拼命向百姓搜刮，一年就给玄宗的内库增收了上百亿的收入，专供玄宗赏赐之用。尽管民间为此怨声载道，他却因此备受玄宗赏识。

当然，王鉷之所以能在政坛上崭露头角，除了他自己聚敛有术之外，也要归功于他表叔杨慎矜的引荐。

杨慎矜既是王鉷的长辈，也是他入仕的恩人，可没有人会想到，王鉷最后竟然会恩将仇报，亲手把杨慎矜置于死地。

这对叔侄最终之所以反目，说起来双方都有责任。

刚开始，其实王鉷对杨慎矜也是感恩戴德、敬重有加的，可自从当上御史中丞后，在官职上就和杨慎矜平起平坐了，心气自然也就高了，对杨慎矜的尊重便日渐淡薄；再加上他后来又攀上了李林甫，自以为有了更坚实的靠山，于是越发不把杨慎矜放在眼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鉷受人恩惠没有记住，可杨慎矜却偏偏是个给人恩惠牢记不忘的人。在他眼中，王鉷能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而且官当得再大也是他的晚辈，所以丝毫没有给予这个表侄起码的尊重，总是在朝堂上直呼其名。此外，王鉷是私生子，平常最怕人提起他的出身，偏偏杨慎矜又喜欢揭他的疮疤，总在人前人后嫌王鉷的母亲出身微贱。久而久之，王鉷不但把杨慎矜对他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对他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恨意。

而对于王鉷的这种内心转变，杨慎矜却丝毫没有察觉，平常还是习惯跟这个表侄聊一些家常话，甚至把他与史敬忠交往的一些细节，也毫不隐瞒地透露给了王鉷。

杨慎矜绝对没想到，他这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了王鉷手里。

对于杨慎矜和王鉷的恩恩怨怨，李林甫和杨国忠始终洞若观火。

李林甫是因为杨慎矜碰触了高压线而想收拾他，杨国忠则因为杨慎矜是老资格的财政专家，挡了他的升官之道，所以要把杨慎矜扳倒。

他们两个人都在寻找杨慎矜的破绽，自然对他和王鉷的关系特别关注，此外，杨慎矜与史敬忠暗中交往的事情，也没有躲过他们的眼睛。后来，当杨国忠得知玄宗对杨慎矜结交术士一事甚为不满时，就意识到收拾杨慎矜的机会来了。他当即把消息透露给王鉷，告诉他皇上很生气，时机很合适，要下手就赶紧。

紧接着，李林甫也向王鉷暗示，可利用杨慎矜系隋炀帝后人的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鉷依计而行，随即在长安坊间到处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并且在家中暗藏谶书，计划复兴祖先隋炀帝的帝业。流言不胫而走，很快传进了玄宗的耳中。

玄宗暴怒，马上命人把杨慎矜扔进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

代表御史台出面审讯的官员有两个，一个就是杨国忠，另一个叫卢铉，也是个心狠手辣的酷吏。案子开审后，卢铉立刻逮捕了杨慎矜的一名亲信——时任太府少卿的张瑄，对其百般拷打，逼他承认与杨慎矜合谋造反。没想到张瑄是条硬汉，不管怎么打，死活不说一个字。卢铉大怒，命人动用酷刑，将张瑄的双腿绑在木头上，然后命几个壮汉抓住他脖子上的枷锁，同时用力往后拉。

可想而知，这种酷刑的作用与五马分尸类似，都是把人的身体拉长撕裂。可是，五马分尸是让人当场毙命，痛苦较为短暂，这种酷刑却是只把人拉长而不把人撕裂，让你在咽气之前感受长时间的痛苦，比五马分尸更为残酷，可谓酷刑中的极品。

据《资治通鉴》记载，张瑄的身体当场就“加长数尺”，而且“腰细欲绝，眼鼻出血”。不可否认，史书的描写是有些夸张了。暂且不论几个壮汉的力量能否把人拉长“数尺”，就算能够，人也早死了。而且最先被拉长拉细的部位肯定不是腰，而是脖子。但是，即便史料记载失实，我们也不难想见这种酷刑的可怕程度，并且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种刑罚手段并不以致人死命为目的，而是要让人在清醒状态下感受痛苦。然而，尽管动用了这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卢铉还是没能从张瑄嘴里抠出一个字。

没有人证和口供，案子就定不下来。而史敬忠早在案发时就已逃之夭夭，不知所终，李林甫和杨国忠顿时有些犯难。

怎么办？

关键时刻，吉温上场了。

杨慎矜案发后，史敬忠当即潜逃，一口气逃到了老家汝州。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所以三法司也一筹莫展。而吉温接受任务后，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带上人马直奔汝州，并且直接在史敬忠家里将其抓获。

吉温之所以这么厉害，并不是他料事如神，而是因为史敬忠是他父亲的世交，吉温小时候没少被史敬忠抱过，所以史敬忠躲在哪里他最清楚。只是史敬忠没料到朝廷会派这个知根知底的吉温来抓他，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躲在家里。

吉温逮捕史敬忠后，一句话也没说，命人用铁链锁了他，给他戴上头套，然后押了就走。一直走到临近长安的时候，吉温才命人对史敬忠说：“杨慎矜已经招供了，现在就差你一个人的证词，你要是聪明的话，也许还能保住一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前面不远就是骊山了（当时玄宗在骊山华清宫），要是到了那儿，你想自首也来不及了。”

史敬忠吓傻了，恳求给他一张纸，他全部招供。可吉温还是没搭理他，继续拍马往前走。史敬忠一路上拼命哀求，吉温都装聋作哑。直到距离骊山十里开外的地方，吉温才停下来，给了史敬忠三张纸，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让史敬忠一五一十写下了供状。

拿到供词后，吉温才除去史敬忠的头套，下马向他行礼，说：“在下皇命在身，请世伯千万不要怪罪！”

史敬忠归案后，杨慎矜就彻底屈服了，乖乖承认了他和史敬忠交往的所有细节。可当问到阴谋造反的谶书时，杨慎矜却矢口否认。三法司派人搜遍了杨宅，也没找到谶书。

李林甫随即指示卢铉再去搜一遍。

卢铉心领神会，在袖子里藏了本谶书，进入杨宅转了一圈，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这个叛贼真狡猾，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

至此，人证物证全都有了，杨慎矜死定了。

天宝六年十一月底，玄宗颁布诏书，将杨慎矜和两个在朝为官的哥哥同日赐死，将史敬忠杖打一百，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同时还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李林甫、杨国忠和王鉷虽然联手除掉了杨慎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因此成为同盟。

因为在政治的角斗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同盟，更何况他们的利益联结本来就是短暂而脆弱的——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他们必然会拔刀相向，展开新一轮的权力厮杀。

不杀到剩下最后一个，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就不会停止。

唯一的问题只是——谁会笑到最后？

杨慎矜死后，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王鉷了。他先是被玄宗擢升为户部

侍郎、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继而封太原县公，又兼殿中监、京兆尹，同时在短短几年间陆续兼任了二十几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宠日盛，连李林甫的风头都被他抢了大半。

面对王鉷的强势崛起，李林甫心里虽然颇为忌恨，但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李林甫之所以一反常态，没有对王鉷下手，按照史书的解释，原因是“鉷事林甫谨”，所以李林甫“虽忌其宠，不忍害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就是说王鉷虽然得势，但对李林甫依然毕恭毕敬，所以李林甫不忍加害。

其实，《资治通鉴》提供的这个原因是很没有说服力的。众所周知，从李林甫就任首席宰相以来，任何一个在客观上对他构成威胁的人，最终都没能逃脱他的“口蜜腹剑”和“罗钳吉网”。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是玩弄权术的绝顶高手。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被王鉷表面上的尊重和恭敬所迷惑。所以，李林甫不对王鉷下手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忍”，而是因为他“不能”。

因为他知道——如今的政治格局早已非同往日了。

以前，他在朝中一人独大，可以为所欲为地大唱独角戏，可如今，王鉷和杨国忠显然已经跟他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尽管从表面上看，李林甫的权位最高，仍然是首席宰相，可事实上他已年届古稀，斗志和锐气都已大不如前，其政治能量已属强弩之末；反之，王鉷和杨国忠不仅年富力强，而且皆以其突出的理财能力深得玄宗宠幸，在仕途上正处于快速上升期。在此情况下，李林甫当然不能轻举妄动，而只能采取守势，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说李林甫在以前的政治斗争中总是主动出击、以攻为守的话，那么鉴于目前的这种复杂形势，他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也只能是按兵不动、以守为攻了。

当然，李林甫之所以按兵不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料定，目前这种三足鼎立的态势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杨国忠迟早会对王鉷发难。

既然如此，李林甫何必急着动手呢？等他们两个人先干起来，他再相机行事不是更明智吗？

这就叫一动不如一静。

这就叫保存实力，后发制人！

正如李林甫所料，对于王鉷的日渐坐大，最感到愤怒和不安的人就是杨国忠了。

从杨国忠入朝以来，王鉷就始终是他的顶头上司：王鉷当户部郎中时，杨国忠是他的手下判官；王鉷升任御史中丞时，杨国忠是他的手下御史；到了杨国忠升任御史中丞了，王鉷又成了御史大夫……可以说从头到尾，王鉷都压着杨国忠一头。

此人不除，他杨国忠岂能有出头之日？

但是，王鉷的资格比他老，帮玄宗搞钱的本事又不比他低，这些年创造的政绩工程又不比他逊色，一时间，杨国忠也找不到什么有效的办法对付王鉷。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四月，当李林甫、王鉷和杨国忠这几个帝国大佬正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中时，三足鼎立的平衡局面忽然被打破了。其实，他们三个人谁也没有先动手。

局面是被一个局外的小人物打破的。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物就是王鉷的弟弟王焊。

王焊，时任户部郎中，平日里仗着王鉷的权势，经常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有关部门碍着他老哥的面子，不敢拿他怎么样，于是这小子越发狂妄。有一天心血来潮，他忽然把一个叫任海川的术士叫到家中，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说，我有王者之相吗？”当场就把任海川雷得晕头转向。

大哥啊，这种话是随便说着玩的吗？这可是要杀头的啊！

当然，任海川没敢这么说，他只是哆哆嗦嗦地应付了两句，然后就屁滚尿流地跑了。

任海川没敢回家，当天就跑没影了。

这事很快被王鉷得知，他意识到弟弟闯了大祸，立刻派人追查任海川的下落。刺客在离长安不远的冯翊郡追上了任海川，旋即将其灭口。

可王鉷没有料到，知道这件事情的居然不止任海川一人。还有一个叫韦会的朝臣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此事，就在家里面议论。本来韦会在自

己家里嚼舌头，王鉷也不会知道。可偏偏这个韦会倒霉，说的话都被一个婢女听了去，婢女马上又把事情告诉了一个相好的用人。这个用人平日很不受韦会待见，常对他怀恨在心，现在一听说这事，立马跑去跟王鉷告了密。

王鉷一听，眼睛都直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且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这个韦会又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宗女儿定安公主之子，也算是皇室成员。

然而，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不采取手段也不行了。王鉷随即找了一个罪名逮捕了韦会，并且当天夜里就派人把他勒死了。

本以为这回总算把屁股擦干净了，可王鉷万万没有料到，这个丧门星王焊马上又给他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

什么娄子？

政变。

王焊居然想发动政变！

这已经不是叫异想天开了，而是叫丧心病狂。

王焊交了一个和他一样脑袋发热的朋友，名叫邢縡。两个人又结交了一些禁军士兵，然后就三天两头在一块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夺取兵权，发动政变，目标是刺杀李林甫、杨国忠和当时另外一个宰相陈希烈。

没有人知道王焊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也许他是以为，把这三个人干掉，他老哥王鉷就能当上宰相了。可他也不用脑袋想一想，一旦他发动政变，就算成功诛杀了李林甫等三人，可他老哥和他就全都成逆党了，还当什么宰相？如果说他是准备挟持皇帝，号令天下，玩一把曹操模仿秀，可就凭他这几十号人，又怎么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看，王焊准备发动的这场政变都像是小孩子在玩过家家，毫无逻辑，毫无常识，毫无道理！或许我们只能说，这个宝贝王焊和他那帮可爱的哥们儿，都是用脚指头在想事情的，若非如此，就是他们的脑袋通通被驴踢了。

精明强干的王鉷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

由于王焊策划的这场阴谋只是过家家的水平，保密性太差，因此未及

动手就被人告发了。

这一年四月初九的朝会上，玄宗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告状信交给了王鉷，然后面无表情地下了一道命令，让王鉷亲自带兵，由杨国忠配合，一起去缉拿乱党。

王鉷登时傻眼了。

居然有这样的事？

可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保住王焊一条小命。王鉷立刻暗中派人通知王焊逃跑，然后故意磨磨蹭蹭地拖到了日暮时分，才和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邢縡慌忙带着几十个党羽突围。他知道这回八成是逃不掉了，情急之下脑袋忽然开了窍，于是一边突围，一边命他的党羽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人。"

很显然，邢縡的目的是想让官兵误以为王鉷和他勾结，因而不敢放手追击，让他有机会逃出生天。

果然，杨国忠一听就中计了。他本来和王鉷就已经势不两立了，眼下王鉷要是真和乱党勾结，那自己岂不是就危险了？

杨国忠疑心一起，追击的力度自然就弱了。邢縡一帮人且战且退，眼看就要逃之夭夭了，可就在这时候，他们被另一队禁军堵住了去路。

这是高力士率领的四百名飞龙禁军。玄宗不放心王鉷，所以特地派高力士前来压阵。至此，邢縡一帮人是插翅难飞了。没两下，邢縡就被砍了脑袋，其他党羽也全部被擒。

杨国忠回宫后，向玄宗汇报了整个经过，最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王鉷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

此时玄宗仍然信任王鉷，就说："他受了朕那么大的恩遇，没理由参与谋反。"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林甫此刻赶紧发话，也赞同天子的判断，认为王鉷肯定不知道他弟弟的事情。

李林甫之所以力保王鉷，首先当然是为了随顺玄宗，但最重要的是——一旦王鉷就这样被除掉，杨国忠接下来肯定会把目标转向他，所以他必须保住王鉷，让他来制衡杨国忠。

最后，玄宗决定不追究王鉷的责任，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鉷做得漂亮一点，主动上表请求将王焊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他让

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鉷。

如果王鉷识相的话，这时候绝对是要就坡下驴、丢卒保帅了，可他居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回了一句让玄宗和李林甫都目瞪口呆的话——我不忍心对亲弟弟下手。

玄宗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你王鉷真的是活腻了！

随后，玄宗立刻命人逮捕了王鉷，让杨国忠取代了他的京兆尹之职，并让杨国忠和陈希烈会审王鉷。

既然是让杨国忠来审，那结果就毫无悬念了。王鉷不但被坐实了谋反罪名，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也都被抖了出来。玄宗旋即下诏，赐王鉷自尽，然后把王焊绑到朝堂上活活打死，党羽全部诛杀。同日，王鉷的两个儿子被流放岭南，数日后就被杀死在了流放路上。后来，有关部门派人查抄王鉷的家产，居然一连数日都清点不完。

王鉷一死，杨国忠就彻底熬出头了。

天宝十一年五月，玄宗把原属王鉷的二十几个职务，如御史大夫、京畿采访使、关中采访使等等，通通给了杨国忠。

不出李林甫所料，杨国忠取代王鉷之后，立刻就把枪口掉过来对准了他。

杨国忠利用王鉷的案子大做文章，指控李林甫和王鉷兄弟暗中勾结，并且和突厥叛将阿布思也有瓜葛。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隙而再度叛回漠北。

为了彻底扳倒李林甫，杨国忠还怂恿陈希烈和哥舒翰一起出面指证。对于杨国忠等人的指控，玄宗当然是不会轻易采信的。可尽管如此，从这个时候开始，玄宗还是逐渐疏远李林甫了，转而把全部的信任和恩宠都给了杨国忠。

至此，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而李林甫也成了他必欲拔除的眼中钉。“国忠贵震天下，始以林甫为仇敌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角斗中，杨国忠很可能会笑到最后。

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李林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这个位极人臣、势倾朝野、主宰帝国政局长达十多年的一代权相，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惧……

李林甫把自己吓死了

综观李林甫十九年的宰相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锋芒初露”时期，时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首席宰相的宝座；第二个阶段属于“固权保位”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五年，在此期间，他运用“口蜜腹剑”的高超权术和“罗钳吉网”的高压手段，铲除了一批又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牢牢把持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第三个阶段属于“权势熏天”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天宝五年到天宝十一年。

也就是说，差不多从李适之罢相、陈希烈入相开始，他的权势就逐渐臻于全盛了。

陈希烈，睢阳郡（今河南商丘市）人，由李林甫引荐，于天宝五年四月以门下侍郎衔入相。此人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帝，除此之外毫无过人才干，李林甫以其“柔佞易制，故引以为相”。陈希烈入相后，果然成了牛仙客第二，对李林甫唯命是从，“政事一决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依照旧例，宰相每天在朝堂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下午一点半）才能下班。李林甫此前也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上下班制度，从未迟到早退。并不是说他很敬业，而是因为不待在朝堂上他不放心，怕其他宰相私自揽政，把他架空。可自从天宝五年陈希烈来了以后，李林甫就完全放心了，他给玄宗打了份报告，声称当今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他也不用老是守在朝堂了。

从此，李林甫每天巳时（上午十点）便打道回府，命三省六部将一切军国要务直接送到他府上，然后就在家里办公，把所有文件都批复了，最后再让有关官员拿去给陈希烈过目。当然，陈希烈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在李林甫批复的意见后面签个名字而已，这样就算走完宰相联署办公的法定程序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玄宗对李林甫的宠幸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加封李林甫为开府仪同三司，赐食邑三百户，而且还把京城内外最上等的宅邸、田庄、园林、别墅，以及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大量赏赐给他，“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旧唐书·李林甫传》）。

那几年里，李林甫的权势达到了巅峰。凡是没上朝的日子，文武百官都会争先恐后地往他的家里跑，一个个忙着向他请示汇报，以致台省各级主要官员普遍都不在岗，经常只剩下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朝堂上。对此，《旧唐书》评价说，李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天宝六年岁末，临近春节之时，天下各郡县进献的所有贵重贡品先后运抵尚书省，玄宗命文武百官前去参观。可还没等众人看够，玄宗就忽然间大手一挥，命人把贡品全部装车，通通拉到了李林甫的府上。

百官们面面相觑。

原以为皇上叫他们来是要发年终福利的，没承想只是让他们过了一回眼瘾。

这不是拿咱耍着玩吗？皇上，您也忒偏心了吧？

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权倾天下、威风八面，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每一个角落很可能都隐藏着敌人，而且随时会跳出来咬他一口，所以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

他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直到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然后冷冷地窥视着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息……

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忽然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

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

谶。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会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他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中，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在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每天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李林甫或许可以如此宣称：每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在这张床或那张床上，就是在这张床到那张床的路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所以，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玄宗提出了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玄宗闻言大悦，觉得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当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自开元末年以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并纷纷出任边镇节度使，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这其中，除了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外，还有一个即将改写唐朝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就是安禄山了。

在唐玄宗之前，大唐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

这就像三条绑在边帅身上的绳子。有了这三条无形的绳子，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

然而，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亲手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条绳索。

从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如萧嵩、牛仙客、李林甫等），节度使兼统他镇的更是习以为常（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才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

然而，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事实上，在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是又敬又怕、甘拜下风的。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

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可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

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因为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

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宾主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看法，而且会谈也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往往是在宾主双方言谈甚欢的当口，李林甫总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就是这一两句话，常常会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

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就不得不在心里说——服了你了。

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李林甫面前，自己几乎就是个半透明体。

从此以后，凡是宾主双方再次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时，安禄山总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乃至大冬天里也会冷汗直冒。（《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虽盛冬，常汗沾衣。"）当然，作为一个热情而又体贴的主人，李林甫对客人的关怀一向是无微不至的。每当看见安禄山又不知何故暴汗不止了，李林甫总是会"抚以温言"，并且"自解披袍以覆之"，也就是脱下自己的袍子披在安禄山的身上，给他送去春天一般的温暖。

不知道安禄山披上袍子后，是感觉到温暖还是感到更加寒冷，反正他的表情是相当的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而且，自从披了一回袍子后，安禄山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从此不再称呼李林甫为"大人"，而是十分亲切地叫他"十郎"（李林甫排行第十）。

此后，每逢安禄山派手下入京办差，他总会特地吩咐手下人一定要来拜见十郎。手下回去后，他就会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

如果李林甫给了他几句鼓励的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李林甫的话说："告诉安大夫，一定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口中喃喃自语："完了完了，这回我死定了！"

在李林甫当政的最后几年，他就是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把安禄山收拾得服服帖帖。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天，安禄山就一天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到了天宝末年，随着杨国忠在帝国政坛上的强势崛起，李林甫独揽朝纲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冬天，杨国忠日益得宠，其拜相之势已经非常明显。正当李林甫在苦思应对之策时，剑南道忽然传来战报，称南诏军队多次入寇，蜀地军民一致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李林甫大喜过望，立刻奏请玄宗，命杨国忠出征。

杨国忠虽然当过兵，可从没打过仗，假如真的让他去边境指挥作战，就算不把命搭进去，百分百也是个输。一门心思要当宰相的杨国忠当然不想去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哭哭啼啼地跟玄宗说，李林甫建议让他出征，摆明了就是要陷害他。同时，杨贵妃也一再帮杨国忠求情。玄宗赶紧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

有了天子的承诺，杨国忠总算吃了颗定心丸，于是不情不愿地出发了。得知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李林甫大为忧惧，可是又计无所出，

惶悚之下顿时一病不起。

这个在帝国的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很多年的政治强人，如今终于无可挽回地倒了下去。

杨国忠到了剑南，没待几天，玄宗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召了回来。

一回朝，杨国忠就听说李林甫病得爬不起来了。他心中窃喜，可同时却又满腹狐疑。

这老小子诡计多端，会不会是装病，想诈我？

杨国忠带着十二分的谨慎和疑惑去探望李林甫，在他的病榻前用极为僵硬的动作行了一个跪拜礼。李林甫睁开一双浑浊无光的老眼，盯着杨国忠看了很久，最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我就要死了，您必定会当上宰相，以后的事情就麻烦您了！

杨国忠被李林甫盯得浑身发毛，可他始终不敢确定这老家伙真的快死了。"不敢当不敢当……"杨国忠连连摆手，满头大汗，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尴尬。

很显然，直到此刻，杨国忠仍然怀疑李林甫是在诈他、诳他、试探他。可他实际上是错怪李林甫了。

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林甫确实是真心实意要和杨国忠和解了。因为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已经不是谁当宰相，而是不管谁当宰相，他都希望这个人能够帮他保住身后的哀荣，及其子孙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如今，杨国忠入相既然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李林甫还有什么理由加以阻挠呢？

他当然希望跟杨国忠和解。

可问题在于——杨国忠愿意跟他和解吗？

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当了十九年首席宰相、把持了大唐朝政将近二十年的李林甫，终于无力地松开了握着权柄的那双手。

他死后，玄宗以隆重的礼节将他入殓，让他躺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还在他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袋、紫衣等物。在大唐，这些殉葬物象征着无上的恩宠和巨大的哀荣。

盖棺论定之际，《资治通鉴》给了李林甫这样的评价：“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本来，李林甫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这个“怨仇满天下”、总是无心睡眠的李林甫，现在终于可以把过度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好好享受一场宁静而安详的长眠了。

可是，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就算死后他也享受不到宁静和安详。

因为杨国忠不想让他这么好死。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正月，李林甫还未及下葬，已经就任宰相的杨国忠就再次翻起旧案，派人游说安禄山，一同指控李林甫和突厥降将阿布思同谋造反。

一听说李林甫死了，安禄山欣喜若狂。他忙不迭地与杨国忠联手，迫使阿布思的手下到朝廷作伪证，同时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胁迫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作假证出卖了他老丈人。

面对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老迈昏聩的玄宗也懒得去求证一个死人的清白了，随即颁下一道诏书，将李林甫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削除，子孙中在朝为官的也全部罢免、流放边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更有甚者，玄宗还命人剖开了李林甫的棺椁，夺去御赐珍珠、紫衣、金鱼袋等物，最后还把他塞进了一口小棺，跟普通百姓一样随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

李林甫一辈子机关算尽，却算不到自己身后会是一个如此凄凉的结局。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林甫是幸运的。

因为他死得非常及时。

短短三年后，不管是唐玄宗和杨国忠，还是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都将共同遭遇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整个歌舞升平的盛世帝国也将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历史性灾难……

而这一切，李林甫都已经感知不到了。

最后的博弈：狼来了吗？

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杨国忠也是感知不到的。

杨国忠如今已经是帝国宰相兼吏部尚书，此外还兼任了四十多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有道是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位昔日的小混混自从当上宰相，在朝堂上走路都是横的，“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杨国忠当政后，台省六部官员中，凡是稍具才干和名望的，只要不为他所用，立马就被踢出朝廷；而那些无才无行、多年不得升迁的庸碌之辈，则纷纷凭借入仕多年的资历以及对杨国忠的巴结谄媚而升上高位。对于杨国忠的用人政策，有人深表鄙视，但却有更多的人极力赞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庸人和马屁精历来占大多数。

据说杨国忠为相不到一年，他们家的门槛就快被那些逢迎谄媚的人挤破了，因此收受的各种贿赂数不胜数，其中仅绸缎就多达三千万匹，简直比国库还壮观。

杨国忠有个儿子叫杨暄，和他一样不学无术。天宝十二年，杨暄参加了“明经”科考试，由于学业荒陋，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达奚珣，这位老兄捧着杨公子的不及格试卷左看右看，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他终于碰上了一个巴结杨国忠的良机，只要动动手脚让杨公子登第，自己在仕途上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忧的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杨国忠领他这份情呢？如果杨国忠不知道是他达奚珣做了手脚，还以为儿子是凭能耐考上的，那他的人情岂不是白做了？

达奚珣决定，还是要先把杨暄的真实成绩告诉杨国忠，然后再让杨暄登第，这样就能把人情做在明处了。随后，达奚珣就命儿子达奚抚去找杨国忠。

次日，达奚抚一大早就等在了杨国忠的家门口。杨国忠出门要去上朝时，远远看见达奚抚，不禁心头暗喜，以为肯定是自己的儿子名列前茅，所以达奚珣才派他儿子报喜来了。可他没有想到，达奚抚屁颠屁颠地跑到他面前，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奉父亲大人之命，前来转告相爷，令郎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不过请相爷放心，我父亲一定不会让他落榜。”

杨国忠一听，脸上一下子挂不住，顿时勃然作色：“我儿子何患不富贵，还需要你们这帮小人来卖人情？”说完鞭子一挥，策马绝尘而去，把吓得不知所措的达奚抚扔在了原地。

达奚珣万万没料到，本想好好地拍一回马屁，居然一不留神就拍到了马腿上。儿子达奚抚劝他说：“杨国忠依仗权势，根本没把咱放在眼里，咱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跟这种人哪里有道理好讲？”

过后，达奚珣还是无奈地修改了试卷，让杨暄顺利登第了，而且还让他名列榜首。但是人情算是白做了，因为杨国忠父子压根就没领他的情。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要怪也不能怪杨国忠，只能怪达奚珣自己。

怪他的马屁功没练到家。

如今的大唐天下，争着要拍杨国忠马屁的人多了去了，如何才能拍得上、拍得好、拍得妙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讲究所拍的方式和角度，既要拍得恰到好处，又要拍得不露痕迹，如此方为上乘之马屁功，如此才能让杨国忠觉得爽。至于说达奚珣这种不上道的马屁，杨国忠压根就不稀罕。

天宝末年，杨国忠的恃宠弄权和飞扬跋扈，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管天下有多少人忌惮杨国忠，可至少有一个人是对他极度鄙视、相当不屑的。

没错，这个人就是安禄山。

自从天宝十年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来，他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俨然就成了一个无人制约的土皇帝，“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见（唐朝）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但是，随着势力的急剧膨胀，安禄山内心的忧惧也不免日渐加深。

因为，玄宗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随时有可能翘辫子，一旦驾崩，太子李亨即位，那安禄山还能如此逍遥自在地坐拥河北三镇吗？

很难。

因为安禄山当初为了讨好玄宗，连太子都不拜，等于是把太子往死里得罪了。那太子一旦御极登基，岂能有安禄山的好果子吃？

所以，安禄山必须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这几年来，安禄山已经有意识地招揽了一大批文武将吏作为心腹爪牙：文有严庄、高尚、张通儒等人，武有史思明、安守忠、蔡希德、崔乾祐、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将来一旦起事，这些人就是安禄山倾覆天下的骨干力量。

此外，安禄山还从奚、契丹等部落的降将中遴选了八千名勇士，平时作为近卫亲兵，战时就充当敢死队，然后又从这些人中精选出一百多人，作为贴身侍卫。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这些人都是“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在积极招募人才的同时，安禄山也一直在大力扩充军备。他不但蓄养了数万匹战马，囤积了大量的兵器铠甲，而且还分道派遣了许多商队与诸胡进行贸易，从中每年获取数百万利润作为军费。除此之外，安禄山还命人暗中制造了数以百万件的三品官袍和金鱼袋……

所有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造反当皇帝！

当初李林甫在的时候，安禄山心中还存有忌惮。如今李林甫一死，安禄山就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至于那个“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的杨国忠，根本就没被安禄山放在眼里。

安禄山对他的态度只有五个字——“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安禄山想造反，其实很多人都有所察觉，可就是没人敢跟玄宗讲。

最早向玄宗发出警告，而且警告过不止一次的人，就是杨国忠。

不过，杨国忠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忧国忧民之心，而纯粹是出于固权保位之计。他怕的是安禄山的权势不断膨胀，总有一天会入朝拜相，威胁他的地位，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在玄宗的耳边喊——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

可是，狼真的会来吗？

玄宗对此总是持保留态度。

像安禄山这么忠诚乖巧的人，玄宗根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会造反。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为了向玄宗证明安禄山确实怀有狼子野心，杨国忠就跟玄宗打赌，说："陛下可以下诏召见安禄山，看他敢不敢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安禄山来了吗？

来了。

一接到玄宗的诏书，他就风驰电掣、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地从范阳赶来了。

一见到玄宗，安禄山就声泪俱下地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擢升到今天这样尊贵的地位，因而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臣真不知道哪天会死在他的手里！"

看到干儿子哭得如此楚楚可怜，玄宗大起恻隐之心，马上赏赐给他一千万钱。

从此，玄宗对这个干儿子更加宠信。而杨国忠不断发出的"狼来了"的警告，则被玄宗当成了耳旁风。

很显然，杨国忠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

过去李林甫和安禄山过招时，几乎可以把安禄山当成面团来捏，要他圆他就圆，要他扁他就扁。可如今，在杨国忠与安禄山展开的这场最后的博弈中，双方的位置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杨国忠频频出手，却未能伤及安禄山一根毫毛，而安禄山不动声色，却能把大唐的天子和宰相玩弄于股掌……

安禄山入朝的几天后，玄宗又觉得干儿子受的委屈太大了，光赏赐金钱好像还不足以弥补，于是又准备擢升安禄山为宰相，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草诏。杨国忠吓坏了，当即力谏："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知书，岂能当宰相？臣担心诏书一下，四夷将轻我大唐无人！"

玄宗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悻悻作罢，但还是加封安禄山左仆射之职，并赐他一子为三品官，一子为四品官。

紧接着，安禄山又得寸进尺，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我们说过，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不亚于今天的坦克，所以，这两个职位具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既然如此，玄宗会给他吗？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和犹豫，玄宗就答应了安禄山的要求。

随后，安禄山派遣了几名亲信，命他们在御马监中挑选了数千匹最强健的战马，悄悄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饲养。

又过了几天，安禄山又奏："臣所部将士，在与奚、契丹、铁勒九部、同罗等部落的作战中，立下了很多功勋，臣请求破格提拔他们，希望朝廷提供一些空白的委任状，臣可带回军中，直接授予他们。"

如果是一个智力正常的皇帝，在听到这样的请求时肯定会生出极大的警觉，可玄宗却丝毫不起疑心，一下就给了他几千张空白的委任状。后来安禄山回到范阳时，一口气就任命了五百多个将军，两千多个中郎将，彻底收买了全军将士的心，也把他麾下的这十几万帝国军队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没有人知道玄宗为何会对安禄山纵容到这个地步。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脑子进水了，或者是他鬼迷了心窍。

在朝廷捞了个钵满盆满之后，安禄山准备开溜了。

该表的忠心已经表了，该捞的实惠也都捞了，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只会夜长梦多。

天宝十三年三月，安禄山向玄宗奏请回范阳，玄宗依依不舍，亲自脱下身上的御袍赐给了安禄山。曾几何时，安禄山披上李林甫的袍子时，心底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而今，当安禄山披上皇帝钦赐的御袍时，心里却在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是很感激大唐天子李隆基的。

因为这个慈祥而慷慨的老人不仅曾经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给了他人臣所能拥有的一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安禄山打心眼里，其实是非常尊敬，甚至喜爱这位老人的。

然而，感情从来只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极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像安禄山这种以打仗为业、以政治为生命、以权力为人生目标的男人，感情就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很不实用的奢侈品。安禄山从来不会让感情这种东西影响自己的意志，更不会让它左右自己的决定。

所以，尽管他尊敬甚至爱戴李隆基，但这并不妨碍他悍然起兵，夺取

李隆基的江山和臣民，夺取本属于李隆基的一切！

是的，这并不矛盾。

因为这就是人性。

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比他来长安时走得更快。

由于担心杨国忠又在玄宗面前叽叽歪歪，以致玄宗生出疑心，安禄山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范阳。

安禄山疾驰出关以后，改走水路，乘船沿黄河东下，命纤夫十五里换一班，昼夜兼程，片刻不息，日行三四百里，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一口气跑回了老巢。

安禄山临走时，玄宗曾派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他："此次回朝，安禄山应该感到满意吧？"

高力士答："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怏怏不乐，定是知道本来命他当宰相，可又中途变卦了，所以感到不快。"

杨国忠一听，马上说："这件事没人知道，肯定是负责草诏的张垍把消息走漏了。"

玄宗勃然大怒，立刻把张垍贬为远地司马，同时把他哥哥刑部尚书张均贬为地方太守。

出了这件事，玄宗更加感觉对不起安禄山，所以从此以后，凡是有人控告安禄山谋反的，玄宗就直接把人绑了，送到范阳给安禄山处理。自此，天下人人皆知安禄山将反，可人人只能保持缄默。

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道与南诏的战争已经持续数年，唐军屡战屡败，前后战死的士兵多达二十万，可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却隐瞒了所有战败的消息，还向玄宗谎称大捷。满朝文武纷纷摇头叹息，可没人敢说出事实。

有一天，玄宗和高力士在闲聊。玄宗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龇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

第七十一个春天

没有人会否认，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多年间，大唐帝国确实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自从李隆基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后，煌煌盛世的斑斓画卷就在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下迅速展开了……

开元年间，玄宗朝廷强力推行括户政策，并在“增殖户口”的同时积极“劝课农桑”，使人口数量获得了极大增长，并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据诗人元结所言，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繁忙的耕作景象。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大唐的国力从此蒸蒸日上。

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在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昔》中，对这个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作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农业的大发展又迅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故名“唐三彩”。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展现出了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繁荣。

玄宗时代，唐朝在诗歌、绘画、书法、音乐、歌舞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不朽作品，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自不待言，除了这两位大师之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高适等人，也都是风格独具、光芒四射的人物。

在绘画方面，也涌现了众多名师巨匠：有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有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干，曾获杜甫赠诗歌咏；有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又有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颠”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颠张醉素”；此外，又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与初唐欧阳询、晚唐柳公权、元人赵孟頫被后世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在音乐和歌舞方面，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大明宫太液池东边有一座梨花盛开的庭园，称为“梨园”，唐玄宗就在这里创

建了皇家艺术中心，亲自遴选数百名具有艺术禀赋的乐工和宫人，共同进行教学、创作和演出，称为“梨园弟子”，其中以李龟年最为知名，后人称其为“歌圣”。玄宗本人精晓音律，善击羯鼓，尤其擅长作曲，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霓裳羽衣曲》，就是由李隆基亲手谱写，杨贵妃编舞并演出的。

除了文化艺术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科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僧一行。

一行俗名张遂，自幼博览经史，精通天文历法，唐玄宗时受命主持历法修订，编成了《大衍历》，其体例结构一直为后代沿用。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恒星移动现象的人，比英国人哈雷发现恒星移动早了一千年。同时，他又倡议测量子午线的长度，虽然测量结果并不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记录。此外，他还与另一位科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以及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这就是盛唐。

这就是锦天绣地、流光溢彩的盛唐。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盛唐。

然而，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天宝末年），当大唐帝国走过一百三十多年的辉煌与沧桑，在企及鼎盛与巅峰的同时，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浮华、堕落与衰乱。

从一千多年后回头去看，透过岁月的尘烟与时光的帷幔，人们能否看清，哪一刻才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是不是从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以千古一帝的姿态伫立在人间绝顶的时候，一种器满则盈、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就已经悄然埋下了伏笔？

是不是从开元末年李林甫独揽朝纲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越来越耽于享乐、怠于朝政的时候，大唐帝国的马车就已经开始了盲目的奔驰，并日渐暴露出倾覆的危险？

又或者是从天宝初年安禄山强势崛起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毫无原则地给予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荣宠时，一场极具颠覆性和毁灭性的历史悲剧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再或者是从天宝末年杨国忠擅权乱政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宁愿把自己埋在盛世迷梦中不愿醒转的时候，曾经繁荣强大的帝国就已经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许，上述每个时刻都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只要唐玄宗李隆基能够在当时的每个节点上保持清醒，在“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面前正确选择，那么他到最后就不会被迫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极端命题，更不会在马嵬驿陷入那个“要江山还是要美人”的人生困境……

不过，对于天宝十四年春天的李隆基来说，上面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他看来，“安禄山造反”是个不值一哂的伪命题。他绝不愿为此花费脑筋，让自己徒增烦恼。此时此刻，他正怀着跟年轻人一样的激情，在热烈拥抱自己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

人生七十古来稀。既然上苍如此慷慨，赐给了他太平江山，赐给了他绝代佳人，又赐给了他享受这一切的长寿人生，那他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享受呢？！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

这样的春天，只宜享受纯净的艺术和无瑕的爱情；这样的春天，只适合在恍如天籁的《霓裳羽衣曲》中，让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比翼双飞、翩跹共舞，不能让世间一切俗务来搅扰，更不能让政治来插足、大臣来聒噪。

简言之，李隆基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只属于他的爱人杨玉环，不属于他的帝国和臣民……

然而，让李隆基感到无奈的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而一国之君就不可能真正地摆脱政治。比如早春二月的某个早晨，朝廷又接到了安禄山的奏请，要求用三十二名番将替代汉人将领。李隆基懒得去操那份心，立刻下诏让有关部门颁发任命状。诏书一下，杨国忠和新任宰相韦见素立刻入宫，极言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可同意他的奏请。

李隆基大为不悦。

安禄山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总是放不下对他的嫉恨和猜疑呢？

狼来了，狼来了……就会说这一句！你们就不能来点新鲜的？

李隆基不顾宰相的劝阻，仍旧把三十二份任命状颁给了安禄山。杨国忠和韦见素深感不安，最后只好想了一个明升暗降的办法，建议玄宗让安禄山入朝为相，然后将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副使升任正使，借此解除安禄山的兵权，从根本上削弱他的势力。

李隆基拗不过两个宰相的力谏，只好勉强同意。可诏书草拟好后，玄宗却留着不发，而是悄悄派了心腹宦官辅璆琳去范阳，让他刺探安禄山的虚实。辅璆琳去范阳走了一趟，收受了安禄山的重金贿赂，回来后就极力向玄宗鼓吹，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

李隆基笑了。他对杨国忠和韦见素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籍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朕对安禄山推心置腹，料他必不会心生异志。东北的奚和契丹，全是靠他镇守遏制的。朕可以当他的保人，你们无须担忧！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杨国忠和韦见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征召安禄山入朝的计划就此不了了之。

在李隆基看来，安禄山势力再大，也是自己的赤胆忠臣；安禄山能量再强，也是帮自己镇守国门的一条看门狗。所以，安禄山绝不会是杨国忠臆想中的那头狼！

朕自保之，卿等勿忧！

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多么乐观自信的态度啊！

然而，事实很快就将证明——李隆基错了。

这个严重的错误不仅将彻底葬送锦天绣地、歌舞升平的盛唐，而且将开启一个长达一百四十二年的乱世——一个充满了流血、杀戮、黑暗、纷争和死亡的乱世。

第五章 安史之乱爆发

狼真的来了！

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夏天起，安禄山对朝廷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本来安禄山还想再摆一下迷魂阵，没打算这么早动手，因为他觉得玄宗待他不薄，想等玄宗死后再起兵，可如今杨国忠天天喊说他要造反，终于把安禄山给彻底惹毛了。

这一年四月，玄宗派给事中裴士淹去“宣慰”河北，主要目的是去安抚安禄山，同时当然也想再摸摸安禄山的底牌。裴士淹抵达范阳后，安禄山声称身体不适，不但不出面迎接，还把这位钦差大臣晾在了宾馆里，而且一晾就是二十多天。

后来，安禄山虽然接见了裴士淹，但却故意把所有亲兵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全副武装进行警戒，摆出了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一见这阵仗，裴士淹吓得魂都没了。

这是在接见天子使臣吗？这分明是在向朝廷示威啊！

裴士淹匆匆宣完圣旨，赶紧一溜烟跑回长安，向玄宗禀报了事情的经过，说安禄山包藏祸心，“无复人臣礼”（《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对于裴士淹的汇报，玄宗却不以为意。因为前不久心腹宦官辅璆琳刚从范阳回来，还信誓旦旦地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时隔不过两个月，安禄山怎么可能就包藏祸心了呢？

在玄宗看来，裴士淹纯粹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玄宗不把裴士淹的汇报当一回事，可有个人却如获至宝。

他就是杨国忠。

这些日子以来，杨国忠正“日夜求禄山反状”，如今听说安禄山怠慢朝廷使臣，总算抓住了把柄，立刻下令京兆尹出兵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师的宅邸，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人，并把他们扔进御史台监狱，连夜突击审讯。

可御史台审来审去，也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杨国忠大怒，便命御史台把李超等人全部秘密处死。

如此一来，朝廷与安禄山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了。

当时，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和宗室的荣义郡主订了婚，住在京师。他眼见杨国忠动了杀机，大为恐惧，赶紧派人密报安禄山。

得知门客被杀的消息，安禄山又惊又怒，遂下定起兵的决心。

六月，安庆宗与荣义郡主的婚礼举行在即，玄宗亲自下诏，召安禄山入朝参加婚礼，可安禄山却推说生病，拒不入朝。

实际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玄宗当然不至于看不出这一点。然而，他还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不愿意相信安禄山真的会造反。

七月，安禄山向朝廷上表，说要献上北地良马三千匹，每匹马配备两名马夫，并由二十二名番将率部护送马匹入京。

在这个节骨眼上献马，还兴师动众地派军队护送，安禄山的心思不言自明。河南尹达奚珣赶紧上奏玄宗，说："请皇上诏令安禄山，若要献马，可由沿途各地官府供应差役，无需另派军队护送。"

安禄山这马献得实在是蹊跷，玄宗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恰在此时，宦官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之事又突然被人告发（很可能是杨国忠所为），玄宗才猛然有所醒悟，觉得自己是被辅璆琳和安禄山给结结实实地忽悠了一把。他勃然大怒，马上找了个借口杀了辅璆琳，然后又派另一个心腹宦官冯神威前往范阳，给安禄山带去了一道手诏，告诉他说献马可以，但没必要派军队护送；同时，玄宗还在手诏中情深意切地对安禄山说："朕最近专门命人为你新凿了一个温泉池，十月份在华清宫等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

如果说玄宗此前对安禄山的宠幸确实是出于真心的话，那么这一次，玄宗显然是在给安禄山灌迷魂汤了。

可是，安禄山会上钩吗？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会稀罕玄宗给他新作的这一"汤"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冯神威抵达范阳后，得到的待遇并不比裴士淹好到哪里去。他在宣读玄宗圣旨的时候，安禄山居然不跪拜接旨，而是一脸傲慢地踞坐床

榻，只微微欠了欠身，淡淡地说了一句：“圣人安好。”等冯神威宣完圣旨，安禄山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马不献也可以。你回去转告圣上，到了十月，我会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地到京师去见他。”（“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

话说到这份儿上，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安禄山随即安排冯神威住进了宾馆，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心惊胆战的冯神威在宾馆里寝食难安，度日如年。几天后，冯神威终于接到了安禄山的逐客令，却没有接到照例应该呈上的谢恩表。

可此时的冯神威也顾不上什么谢恩表了，一接到逐客令便马不停蹄地跑回长安，一见到玄宗就哭哭啼啼地说：“臣差一点就见不着皇上了！”

从冯神威离开范阳的那一天起，亦即天宝十四年八月开始，安禄山就把起兵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防止泄密，安禄山只和心腹幕僚严庄、高尚和将军阿史那承庆加紧密谋，其他文武将吏一概被蒙在鼓里。

众人只是觉得奇怪，自从入秋以来，安禄山便频频犒赏士卒，并且三天两头搞军事演练，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直到这一年冬天，当有奏事的官员从长安返回范阳，安禄山才借机伪造了一道天子密诏，然后召集众将说：“有密旨，命我举兵入朝讨伐杨国忠，诸君应全部随我出征。”

众将官相顾愕然。直到此刻，他们才终于明白——原来这几个月的好酒好肉都不是白吃的，比平时多好几倍的饷银也不是白给的，是通通要让他们拿命去抵的！

说白了，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阵杀敌也是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本来没什么好说的，可让他们感到郁闷的是——这一次并不是跟敌人拼命，而是掉转枪口跟朝廷拼命！

然而，不管众将佐中有多少是仍旧忠于李唐、不愿追随安禄山造反的，现在都已经是身不由己了。除了硬着头皮跟安禄山登上贼船，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集结了麾下的所有部队，并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共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正式在范阳起兵。

次日清晨，安禄山在蓟城（范阳治所）城南誓师，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宣布即日南征，同时告谕三军将士："胆敢反对起兵、扰乱军心者，一律屠灭三族！"

是日，安禄山命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然后亲率十五万铁骑从蓟城出发，大举南下，兵锋直指东京洛阳。

"安史之乱"就此爆发。

一场彻底改写唐朝历史，并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战乱就此拉开序幕。

《资治通鉴》称："禄山乘铁舆（防箭的铁轿），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狼烟滚滚，裹挟着安禄山觊觎九五的野心。

马蹄嘚嘚，裹挟着安禄山征服天下的欲望。

十五万范阳铁骑就这样以犁庭扫穴之势席卷燕赵大地，以所向无敌之威挺进中原。

盛世唐朝就在这一刻轰然崩坍……

狼来了。

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可此时此刻，唐玄宗李隆基在干什么呢？

他在泡温泉。他正和他最心爱的杨玉环一起，在美丽而宁静的华清宫中泡着温泉。

自从开元后期以来，玄宗每年十月都要上骊山泡温泉，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可谓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然而此时的李隆基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与杨玉环的最后一次骊山之行。

外面的世界天寒地冻，可华清宫中却温暖如春；北方的大地正在安禄山的铁蹄下呻吟和战栗，可骊山的天子行宫中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

李隆基和杨玉环一起沐浴在温泉池中，时而嬉水，时而畅游。池中热气弥漫、烟雾缭绕，美人肤如凝脂、巧笑嫣然，此情此景尽管已经看过无数遍，可玄宗还是忍不住心旌摇荡，一时间不知今夕何夕，亦不知人间天上……

如果时间就在这一刻悄然凝固该有多好。

如果人生就在这一刻进入永恒该有多好。

只可惜，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它可以让一个帝国在短短几年里走向繁荣和强大，也可以让一个太平盛世在一夜之间变得破碎支离、面目全非。

而人生同样是世界上最无常的东西，前一秒还在享受天堂般的快乐，下一秒就有可能陷入地狱般的煎熬。没有人知道哪一秒才是天堂地狱的转捩点，也没人知道是什么力量在主宰这一切。即使李隆基贵为天子，他也没有权力让时间停止不动；即使李隆基富有四海，他也无法用他的意志挽留住人生中的美好。

哪怕只是点滴。

哪怕只是一瞬。

安禄山率主力南下的同时，为了消除来自河东方面的威胁，派部将何千年率领一支小分队前往太原，以献神射手为名，设计掳走了北京（即太原）副留守杨光翙。太原守军大为惊骇，立刻将安禄山造反、长官被劫的消息奏报朝廷。与此同时，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也向朝廷呈送了战报，称安禄山已起兵叛乱。

然而，面对来自前线的奏报，人在骊山的玄宗却依旧置若罔闻。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玄宗“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也就是说，他仍然认为这是那些嫉恨安禄山的人在造谣，所以不肯相信。《资治通鉴》的说法符合事实吗？

恐怕未必。

事实上，早在宦官辅璆琳东窗事发，而裴士淹、冯神威等使臣连连在范阳遭受冷遇的时候，玄宗就已经察觉出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了。而他之所以在危机来临的时刻还把军国大事抛诸脑后，不顾一切地陪着杨贵妃上骊山，甚至在接到前线战报时还执迷不悟，其原因恐怕不是因为他看不清现实，而是因为他在逃避现实。

是的，李隆基在逃避。

作为一个统治了大唐帝国长达四十余年的皇帝，李隆基对自己的能力和运气都太自信了。所以，他既不愿承认自己在识人用人上的严重错误，更不愿直面由于这种错误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他宁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躲进温柔乡，宁可让自己变成一只自欺欺人的鸵鸟，也不想让残酷的现实剥夺掉他最后那点顽固而脆弱的自尊心。

可是，到了十一月中旬，当河北各郡县的战报像雪片般飞进华清宫的时候，玄宗终于不得不从醉人的温柔乡中百般无奈地抬起头来，勉强收拾精神，紧急召见宰辅重臣，询问他们御敌平叛之策。

对于安禄山的造反，满朝文武个个忧心忡忡、惶骇不已，唯独杨国忠得意扬扬、喜不自胜。

因为，他的预言成真了。他喊了这么久的“狼来了”，最后安禄山总算给他面子，真的来了。

“扬扬有得色”的杨国忠拍着胸脯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如今真想造反的只有一个安禄山，将士们跟他都不是一条心。不出十天，必能将他的脑袋传送行宫。

听了杨国忠的话，玄宗如释重负，脸上迅速浮现出欣慰的笑容。其他几个宰辅大臣却人人相顾失色。

十天就能平定安禄山叛乱？你杨国忠这海口也夸得太大了吧？

接下来的事实马上就将证明，杨国忠这不叫夸口，而叫扯淡！

此后，唐朝政府军非但没有在十天内平定安禄山叛乱，反而在玄宗和杨国忠一错再错的决策之下，被叛军打得节节败退、损兵折将，而且很快就把洛阳和长安两座京城都给丢了，以致玄宗君臣不得不仓皇流亡巴蜀。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刚刚两个月，安禄山就在洛阳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大燕皇帝；而时隔不过半年，声称十天就能拿下安禄山脑袋的杨国忠，自己反而在马嵬驿被砍掉了脑袋。

安禄山刚刚起兵之时，尽管朝野上下都为之震骇，却还是没有人料到局势会恶化到后来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料到官军在叛军面前会那样不堪一击、一溃千里，更没有人料到当时大唐军界最耀眼的三颗将星

——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竟然没有一个能够阻遏叛军的兵锋！

尤其让忠于李唐的臣民们扼腕愤恨的是，这三个曾经叱咤风云、威震朝野的一代名将，最终竟然都不是死在御敌的战场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谗言下……

威震中亚：高仙芝的锋芒

高仙芝，高丽人，将门之后，从小随父至安西，稍长因父荫被授予游击将军。史称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二十出头便因军功被提拔为将军，“与父同班秩”（《旧唐书·高仙芝传》），在军中传为一时佳话。

高仙芝曾先后在安西军事长官田仁琬、盖嘉运麾下效力，但一直没得到重用，直到夫蒙灵詧出任安西节度使，才对高仙芝的才华欣赏有加，屡屡对他进行提拔。到了开元末年，高仙芝已官居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兼节度副使。

此时的高仙芝虽然已经是安西唐军的二把手，但还称不上是名将。真正让他扬威西域、名动朝野的，当属千里奔袭小勃律的战役。

小勃律国位于吐蕃西北，大约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一带，介于吐蕃、中亚与安西四镇之间，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自从武周时代以来，这里便是大唐与吐蕃反复争夺的焦点。小勃律原本亲附唐朝，因而屡屡受到吐蕃的攻击。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吐蕃再次出兵小勃律，迫使其投降，并将一个吐蕃公主嫁给了小勃律国王，从而牢牢控制了这个战略要地，同时也切断了中亚二十几个小国与唐朝的联系，大有称霸中亚之势。

毫无疑问，大唐帝国要想夺回对中亚的控制权，首先就必须夺回小勃律。

然而，从田仁琬到盖嘉运，再到夫蒙灵詧，连续三任的安西军事长官都曾经出兵征讨小勃律，但每次都无功而返，玄宗对此十分不满。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夫蒙灵詧向玄宗推荐了高仙芝。玄宗立刻下诏，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一万骑兵远征小勃律。

天宝六年四月，高仙芝率部从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镇，今新疆库车县）出发，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向西南行进，经拔焕城、握瑟德、疏勒，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播密川，最后抵达特勒满川，

进逼吐蕃人控制的军事要塞连云堡（克什米尔西北），整个行军过程耗时三个多月。

连云堡是通往小勃律的必经之地，有吐蕃驻军一千余人，另外在城堡南部十五里处还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吐蕃军营，驻兵八九千人。也就是说，吐蕃在连云堡一带的守军共约一万人，与高仙芝的兵力大体相当。吐蕃军队依险而守，以逸待劳，而唐军刚刚经过一百多天的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局面显然对唐军极为不利。

不过，唐军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吐蕃军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唐军会奔袭千里，从天而降，所以唐军可以抓住先机，打吐蕃一个措手不及。

高仙芝兵分三路，于七月十三日拂晓会师于连云堡外。当地有一条河叫婆勒川，其时正逢涨水，唐军难以涉渡。高仙芝一边派人寻找河中水浅处，一边下令所有将士每人携带三日口粮，轻装上阵，准备强行渡河。将士们看着哗哗流淌的河水，都说高仙芝疯了。

暂且不说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怎么过河，就算勉强能过，万一连云堡的敌军察觉，打唐军一个“半渡”，这一万人马岂不是要全部扔到河里喂鱼？

可军令如山，众将士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跟高仙芝走。

令将士们喜出望外的是，沿着河岸走了不远，果然找到了一处水浅可渡的地方，结果人不湿旗，马不湿鞍，一万人马全都安全渡过婆勒川。高仙芝大笑道：“倘若敌人趁我们半渡时发动袭击，我军必败无疑。可现在我军既已安全渡河，并集结成战斗队形，连云堡就是老天爷送给咱们的礼物了！”

随后，高仙芝下令全军对连云堡及南部军营同时发起强攻。面对唐军的突然袭击，吐蕃守军大为惊骇，但仍然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如蝗箭矢和巨石檑木纷纷而下，给仰攻的唐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正面进攻受阻，高仙芝立刻召来军中骁将李嗣业，命他率领一支陌刀敢死队，绕开正面之敌，从后山悬崖攀登上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李嗣业临行前，高仙芝给他下了死命令，要他必须在中午之前结束战斗。

所谓陌刀，就是两面开刃的长柄大刀，是唐军野战步兵的重要武器，

既可以砍人，也可以劈马，列阵时“如墙而进”，在近身肉搏中具有极为可怕的攻击力。高仙芝麾下的这支陌刀队，是安西唐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个个训练有素，勇悍过人；尤其是这个李嗣业，更是安西唐军中著名的善使陌刀的猛将。

正是由于陌刀队超强的战斗力，高仙芝才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将其投入战斗。

李嗣业受命后，手执战旗，率陌刀队从险峻之地攀上山岭，突然出现在吐蕃守军的后侧。与此同时，高仙芝亲率大军再度实施正面强攻。吐蕃人腹背受敌，加上李嗣业的陌刀队从背后杀了上来，他们已经无险可守，军心顿时涣散。唐军则越战越勇，从辰时（早晨七点）至巳时（十一点）左右，共歼灭吐蕃守军五千多，俘敌一千余人，吐蕃余众纷纷逃散。

此战唐军大获全胜，不仅顺利攻克连云堡，而且缴获了一千多匹战马和不可胜数的军资器械。

高仙芝的远征军虽然初战告捷，但是也等于向吐蕃人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和作战意图。如果要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征服小勃律，这支唐军势必要在敌人已经察觉的情况下，在吐蕃人的势力范围内孤军深入，其面临的危险是不言自明的。

军中将士开始生出畏难情绪。

尤其是玄宗派来的监军宦官边令诚，更是越想越怕，说什么也不敢再前进半步。

可高仙芝是不会退缩的。

不征服小勃律，他绝不会鸣金收兵。

这就是普通将领和名将的差别。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名将，不仅在于他能够战胜强敌，更在于他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就像有个哲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勇气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要去做。

高仙芝并非不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也并非不感到害怕，而是他知道——成功就是在别人选择放弃的时候，你选择坚持！

高仙芝没有强迫边令诚，而是让他和三千名伤病羸弱的士兵留守连云堡，自己则亲率六千余人继续向小勃律挺进。

三日后，唐军进抵帕米尔高原的坦驹岭（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西北）。这里山峦高耸，崎岖险峻，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将士们在艰难的行军过程中不断发出抱怨。而且，就在坦驹岭前方四十里处，还有一座名叫阿弩越的胡人城堡，也是亲附吐蕃的。将士们在疲惫和畏难情绪的影响下，内心的不满终于达到顶点，于是一个个驻足不前，并纷纷质问高仙芝：“大帅这是要带我们去哪？您瞧瞧这路是人走的吗？”

面对愤怒的士兵，高仙芝镇定自若地说：“前面就是阿弩越城，我估计他们听到我军到来的消息，必定会开门投降，你们不必担忧。”

高仙芝话音刚落，就有哨探来报，说有二十余名身着胡服的骑手，从阿弩越城方向过来了。片刻后，胡骑被带到高仙芝面前，对着高仙芝和在场的将士说：“听说大唐军队前来，阿弩越城主特地派我等前来迎接将军，并且砍断了娑夷河（印度河上游支流）上的藤桥，准备跟吐蕃人断交。”

众将士闻言，顿时转忧为喜，刚才的满腹牢骚全都一扫而光。

高仙芝笑了，下令全军立刻翻越坦驹岭，向阿弩越城进发。

其实，这是高仙芝演的一出戏。

所谓的阿弩越城主欢迎唐军、与吐蕃断交云云，纯属子虚乌有。这二十余名胡骑并非阿弩越人，而是高仙芝命人假扮的。他料定一路走到这里，将士们的忍耐力肯定会达到极限，而小勃律已经近在咫尺，高仙芝绝不允许自己功亏一篑，所以才暗中安排了这一幕，以便给大家打一针强心剂。

这个善意的谎言当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可问题是，阿弩越人真的会投降吗？万一他们闭门拒守，高仙芝的谎言被戳穿，他在军中的威信岂不是要彻底扫地？

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高仙芝别无选择。

他只能赌——赌阿弩越人真的会投降。

命运之神最后还是站在了高仙芝这边。三日后，当唐军千辛万苦翻越坦驹岭，最后出现在阿弩越城下的时候，果然看见了列队迎接他们的阿弩越人，还有一个朝他们全然洞开的城门。

高仙芝让将士们在阿弩越城休整了一天，次日便命部将席元庆为前锋，率一千人向小勃律火速推进，并向小勃律国王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不占领你的城池，也不破坏你们的桥梁，只是要借个道，目标是大勃律国。”

小勃律国王当然不会轻易被高仙芝忽悠，可他又没有实力阻挡唐军，无奈之下，只好带着王后（吐蕃公主）和臣民们逃离王城，躲进了山区，准备在此等待吐蕃援军。

小勃律人的反应不出高仙芝所料。席元庆临行前，高仙芝就曾对他面授机宜：“小勃律听说大唐兵至，其君臣百姓必定会躲进山谷，你要展开宣传攻势，呼吁小勃律臣民走出山谷，只要投降，就赏赐绸缎，并说明这是大唐皇帝的敕令，至于那些亲附吐蕃的大臣，你必须把他们逮捕关押，听候我的处置。”

席元庆依计而行。小勃律的多数臣民随即投降了唐军，国王和王后则逃进了深山的石窟中。高仙芝抵达后，将几名亲附吐蕃的大臣斩首示众，然后派兵封锁山区。与此同时，高仙芝还派人毁坏了小勃律与吐蕃之间的唯一通道——位于婆夷水上的一座藤桥。

数日后，当一支吐蕃援军马不停蹄地赶到婆夷河岸时，藤桥早已不复存在，吐蕃人只能望着湍急的河水干瞪眼。婆夷河面的宽度大约与一支箭的射程相当，吐蕃人随即拼命抢修这条桥梁，但是桥梁修成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吐蕃人既已鞭长莫及，小勃律就彻底落入高仙芝的掌心了。

经过十多天的地毯式搜索，唐军终于在一处隐蔽的山洞中抓获了小勃律国王和王后。至此，亲附吐蕃的小勃律政权终于覆灭。高仙芝扶植了一个亲唐的新政府，彻底控制了小勃律，达成了此役的战略目标，圆满完成了玄宗交给他的使命。

此次长途奔袭小勃律，虽然战役规模不大，但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此役重新打通了唐朝与中亚诸国的联络通道，使大唐帝国重新获得了中亚的控制权，也极大地打击了吐蕃的扩张野心。

此役的胜利，确立了高仙芝作为大唐名将的地位。

天宝六年八月，高仙芝押着小勃律国王和王后班师回朝。得胜归来的高仙芝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行至播密川时，便派快马先行入朝，直接向玄宗呈上了捷报。

如果高仙芝是安西唐军的一把手，这么做当然没什么不妥。可问题是，他还有一个顶头上司夫蒙灵詧。高仙芝越过上司直接向皇帝奏捷，显然没把夫蒙灵詧放在眼里。

夫蒙灵詧为此暴跳如雷。

高仙芝回来后，夫蒙灵詧不仅没有半句表扬的话，反而指着他的鼻子一通臭骂："啖狗粪高丽奴！汝官皆因谁得，而不待我处分，擅奏捷书？高丽奴！汝罪当斩，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你这个吃狗屎的高丽奴才！你的官位都是谁给你的，竟然不等我处置，就擅自奏捷？该死的高丽奴，论罪当把你斩首，只是看在你新立大功的分上，不忍心杀你罢了！

面对这个满口污言秽语、近乎丧失理智的顶头上司，高仙芝无言以对，只好伏地叩首，不停地谢罪。

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已经不是过去的高仙芝了。无论夫蒙灵詧如何怒发冲冠、妒火中烧，也终究遏制不住高仙芝业已崭露的锋芒。

换句话说，此刻的高仙芝已经在玄宗心目中获得了比夫蒙灵詧更高的地位。

除了玄宗对高仙芝的赏识，还有一个人也在关键时刻帮了高仙芝。

他就是此次远征小勃律的监军宦官边令诚。

尽管边令诚到了连云堡就畏缩不前了，在这场奔袭战中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但在他自己看来，此役的胜利也有他一份功劳。如今夫蒙灵詧打压高仙芝，就等于把他也给打压了，所以边令诚立刻向玄宗呈上密奏，声称高仙芝深入敌国万里，为国家建立奇功，眼下却受到夫蒙灵詧的排挤，终日惶惶不安，实在是冤枉。

众所周知，自从开元中后期开始，玄宗就日益变得好大喜功，对于那些能够扬威异域、建立边功的将领，玄宗从来都是青睐有加、关怀备至的。而今高仙芝把前面三任节度使没有啃下的硬骨头啃下来了，玄宗自然是对他另眼相看。接到高仙芝的捷报后，玄宗正寻思着怎么犒赏他，现在突然接到边令诚替高仙芝喊冤的奏疏，玄宗当然对夫蒙灵詧大为不满。

随后，玄宗立即颁下一道诏书，征召夫蒙灵詧回朝，同时提拔高仙芝

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兼摄鸿胪卿和御史中丞，彻底取代了夫蒙灵詧。

高仙芝征服小勃律之后，吐蕃极为不甘，遂指使位于印度北部的朅师国进攻小勃律，切断了小勃律的运输通道。玄宗得到战报，马上把平定朅师国的任务交给了高仙芝。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二月，高仙芝出兵，成功击破朅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另立其兄素迦为新国王，将朅师国置于大唐的控制之下。

至此，高仙芝的声名已经威震中亚。

与此同时，他身上固有的缺点也开始逐渐暴露。

高仙芝虽然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但他却有两个很大的缺点：一是残忍，二是贪财。随着功名的日益显赫，高仙芝内心的杀戮欲和占有欲也随之日渐膨胀。

位于中亚锡尔河流域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就在这时候不幸成为高仙芝欲望的牺牲品。

由于大唐帝国在中亚的势力日渐强大，石国有心依附，便派遣使臣去见高仙芝，请求与大唐签署和平条约。高仙芝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签约仪式上，宾主双方都很愉快，高仙芝也表现得非常真诚和热情。可此时的石国使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石国已经成了高仙芝眼中待宰的羔羊；而这纸所谓的和平条约，也无异于一张温情脉脉的死亡通知书。

在高仙芝看来，石国就是自己送上门来的一块肥肉，他当然乐得把它一口吞下。

天宝九年十二月，高仙芝悍然撕毁和约，亲自带兵入侵石国。

此时的石国君臣依然沉浸在那纸条约所营造的和平幻梦中，根本没有防备，加上军事实力本来就弱，所以短短几天就被高仙芝攻破了。

高仙芝占领石国后，不仅将国王、大臣、士兵和所有青壮年全部俘虏，押回国内，而且还干了两件十足令人诟病的事情：一是屠城，二是劫掠。

高仙芝纵兵屠杀了石国都城的所有老弱妇孺，随后又将石国的财富掳掠一空，其中仅钻石就有十余斛，黄金要五六匹骆驼来拉，其余的宝

马和财物更是不计其数。而最让人不齿的是——所有这些财富，全都落入了高仙芝的私人腰包。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高仙芝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而纯粹是为了满足他那嗜血和贪婪的个人欲望。也就是说，这场战争非但对大唐的国家利益毫无增进，反而造成了极大损害。因为从此以后，大唐帝国在石国人，乃至所有中亚人心目中的道义形象就被彻底摧毁了。

作为一个高丽籍的优秀将领，高仙芝无疑深谙中国的兵法，但他显然没有学会中国的王道。要为一个国家树立起正义的旗帜，也许需要几代人付出上百年的努力；可要砍倒这面旗帜，只需要一个唯利是图的将军，还有一场被个人欲望驱使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石国战争是高仙芝一生辉煌的顶点，同时也是他军事生涯的转捩点。

从此以后，幸运女神将离他远去，他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崭露出的耀眼锋芒将逐渐黯淡，直至萎缩和消亡；而厄运之神将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高仙芝平灭石国的第二年，就在中亚一座古老的城市遭遇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滑铁卢。

这座城市名叫怛罗斯。

他的对手是黑衣大食。

恒罗斯之战

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建国时间略晚于大唐帝国。公元622年，亦即唐高祖武德五年，当李渊、李世民父子正忙于统一中国的时候，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正率领穆斯林弟子从麦加出走，沿着红海海岸，一路历经艰险抵达麦地那。从此，穆罕默德带领穆斯林圣徒开启了一个以武力传播伊斯兰教的时代，并最终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圣战的旗帜下，穆斯林军队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惊人的战斗力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而且向西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收入囊中，扩张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大帝国。

作为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大唐与大食为了确立自己在中亚的霸权地位，注定会展开一场激烈的较量。

就在高仙芝平灭石国的这一年，即公元750年，大食帝国政局突变，阿拔斯王朝取代了倭马亚王朝。由于倭马亚王朝旗帜尚白，所以中国史书称其为“白衣大食”，而新崛起的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所以称为“黑衣大食”。

石国灭亡后，一位王子侥幸逃脱，随后奔走于中亚各国，到处控诉高仙芝的暴行，说他背信弃义、“欺诱贪暴”。唇齿相依的中亚诸国对高仙芝在石国的屠城和劫掠行径也深恶痛绝，遂迅速缔结成反唐联合战线，并遣使向黑衣大食求助，准备借助黑衣大食的力量，向东进攻大唐的安西四镇。

高仙芝很快得知了中亚诸国的反唐计划。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黑衣大食。

这一次，高仙芝仍然跟从前一样充满自信。他仍旧准备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长途奔袭。

然而，黑衣大食不是小勃律，幸运女神也不会一直站在高仙芝这边。这一次，高仙芝将遭遇他一生中第一次惨痛的失败。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四月，高仙芝集结了安西四镇的两万精锐，同时征调了西域拔汗那国和葛逻禄部落的番兵，组建了一支胡汉混合兵团，共计六万人。同月，高仙芝与部将李嗣业、段秀实等人，率部从安西出发，越过葱岭和大沙漠，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同年

七月进抵中亚古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附近）。

应该说，尽管高仙芝对此役充满自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麻痹轻敌。从他投入的兵力来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按照当时大唐军队的编制，安西四镇统辖的兵力只有两万四千人，而高仙芝一下就抽调了两万人，几乎可以说是倾巢而出了。同时，高仙芝又征调了大约四万的胡人，使远征军的总兵力达到了六万，这基本上是他可以动用的全部兵力。

换句话说，为了保证此役的胜利，高仙芝已经把自己的老本全都押上了。[1]

然而，相比于黑衣大食出动的兵力，唐军在人数上还是居于明显的劣势。

据学者考证，阿拉伯出动的正规军大约五万人，雇佣兵也有五万，总计不下十万人。所以，双方在兵力上的对比还是比较悬殊的，这也是唐军在怛罗斯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仙芝的远征军逼近怛罗斯之时，阿拉伯人就接到了情报。黑衣大食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立即下令，命部将塞义德率数千人进驻怛罗斯加强防守，从而为大军的集结赢得了时间。

等到唐军兵临怛罗斯城下，先机已失，战斗的主动权已经落入了阿拉伯人手中。因为阿拉伯人既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又是以逸待劳，而且是主场作战，拥有源源不断的援军和补给。唐军要想从这样的敌人手中夺取怛罗斯，无疑是千难万难。

高仙芝命部队对怛罗斯城发起强攻，但始终未能攻克。双方就在怛罗斯城下对峙了整整五天，其间多次交战，但谁也没捞到便宜。

这种胶着状态显然对唐军极为不利。一旦不能速战速决，唐军必将因缺乏后勤补给而陷入困境。

随着时间的流逝，胜算一点一滴地从高仙芝的手中溜走了。

而随着后方大部队的陆续抵达，阿拉伯人的士气变得越来越高昂。

第六天，黑衣大食的援军全部进入战场，双方随即在怛罗斯河两岸展开了决战。东亚与西亚最强大的两个帝国，就在这里发出了最强烈的碰撞。

在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唐军依然顽强奋战。战斗开始后一段时间内，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然而，就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当口，唐军的阵脚突然一片大乱。

因为葛逻禄部落反水了。

这支为数不下两万人的胡人兵团在这时候倒戈，无疑是往高仙芝的心口上狠狠捅了一刀，也在顷刻间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

在阿拉伯人和葛逻禄叛军的前后夹攻下，原本还在竭力苦战的唐军再也支撑不住，瞬间全线崩溃，两万名汉人将士或战死或被俘，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高仙芝、李嗣业等几名主将在夜色掩护下逃离了战场。

当高仙芝等人逃至一处狭窄的山谷时，前方的道路被溃退的拔汗那士兵和大批车马牲畜挤得水泄不通。李嗣业担心黑衣大食的追兵杀到，就策马前驱，挥舞大棒击毙了一大片拔汗那士兵和马匹，硬是杀开一条血路，高仙芝才得以安然通过。

当时的情况混乱不堪，侥幸未死的残余唐军各自逃命，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乱成了一锅粥。只有部将段秀实一直在黑暗和混乱中搜罗散兵游勇，想尽量抵挡黑衣大食的追兵，多挽救一些将士的生命。此时，段秀实恰好听到了李嗣业正在棒打拔汗那士兵的叱骂声，赶紧策马追到他跟前，大声说：“避敌先奔，无勇也；全己弃众，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遇到敌人自己先逃跑，是无勇；保全自己抛弃士兵，是不仁。就算你幸而成功逃脱，能不感到惭愧吗？

闻听此言，李嗣业羞惭不已，随即把陌刀一横，掉转马头，和段秀实一起去寻找生还的士兵。随后，李、段二人集合了数千人，一边抵挡追兵一边撤退，最后终于把这几千人安全带回了安西都护府。

这场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会战，就这样以阿拉伯人的全胜、唐军的惨败而落下帷幕。

怛罗斯之战的失败，并非唐军的战斗力弱于阿拉伯军队。相反，唐军在劳师袭远和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依然打得十分英勇和顽强，给了对手相当程度的打击和杀伤，倘若不是葛逻禄部雇佣兵突然倒戈，唐军绝不会遭遇近乎全军覆没的惨败。

作为主帅，高仙芝对此次战败虽不能负全责，但仍然要承担一定责任。首先，是他悍然撕毁和约，发动对石国的入侵，并残杀妇孺、劫

掠财富，才导致了中亚诸国的同仇敌忾，并给黑衣大食提供了染指中亚的口实。其次，在面对黑衣大食这样的强势对手时，他仍然采用了过去那种长途奔袭的战略，不能不说是一种决策上的失误。

因为，深入敌境客场作战，在军事上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只有像小勃律那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弱国，才适合采用这个战略，而面对黑衣大食这样的强敌，唐军必然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一、因地理环境陌生而导致行动迟缓，从而让对手抢了先机；二、因客场作战而导致情报匮乏，无法准确判断敌人的兵力部署，从而未能及时改变战略，并制定相应的战术；三、孤军深入敌境千里，没有根据地，没有援军，没有后勤补给，没有休整再战的转圜余地和时空条件，因此唐军只能寄希望于一战拿下怛罗斯，而一旦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唐军的抗风险能力就降为零了。

葛逻禄人也许就是看出了唐军面临的诸多困境，才会断然倒戈的。

可是，即便没有葛逻禄人的倒戈，唐军取胜的机会也很小，因为高仙芝的战略决策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就算葛逻禄人不反水，唐军还是有可能战败，只不过不会败得那么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许有理由作这样的假设——假如换成是阿拉伯人长途奔袭，而高仙芝坐镇安西、以逸待劳，也许这场战役的结局就会全然不同了。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唐军在怛罗斯战败后，中亚的命运被彻底改变。由于短短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自顾不暇，不得不放弃对中亚霸权的争夺，再也无力染指帕米尔高原以西之地，原本亲附唐朝的中亚诸国转而臣服于阿拔斯王朝。从此，华夏文明彻底退出中亚，这一地区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

怛罗斯之战后，唐军战俘中的造纸工匠被带到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建在撒马尔罕的造纸作坊。从此，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传入阿拉伯，进而传播到中东和整个欧洲，对西方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怛罗斯之战才会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虽然华夏文明最终退出中亚的主因并非怛罗斯之战，而是后来的安史之乱，但无论如何，怛罗斯之战都是中亚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东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以当时盛唐的综合国力，要重新夺回中亚霸权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就在怛罗斯战败的两年后，安西唐军就迅速恢复了以往的实

力，大唐帝国也再次把军事和政治触角伸进了中亚，开始了新一轮谋求霸权的努力。

当然，这新一轮努力的代表人物不再是高仙芝了，而是大唐军界的另一个后起之秀。

他就是封常清。

封常清：我很丑，可是我很努力

据说封常清是一个长得很丑的人。

按照《旧唐书·封常清传》的说法，是“细瘦颣目，脚短而跛”，意思就是干瘦、矮小、斜眼，而且还是个瘸子。除了长得相当对不起观众之外，封常清的命也相当不好。他好像从小就是个孤儿，只有外祖父一个亲人。他小的时候，外祖父犯了罪，被流放安西当守门吏，于是封常清就跟着外祖父来到了安西。

一个被流放边疆的老人，要养活自己，还要把一个孩子拉扯大，显然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也就谈不上给封常清什么良好的教育。好在封常清的外祖父是个知书明理的人，他知道，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虽然没有钱供封常清读书，但还可以自己教。于是那些年里，无论春夏秋冬，每天经过安西南门的人，都可以听见门楼上有一个老人在教一个孩子读书。孩子的声音异常清脆，异常响亮。走出很远，人们仿佛仍然可以听见。

封常清长大成人后，和他相依为命的外祖父去世了，封常清从此孤身一人。他既丑陋，又贫穷，又没有社会关系，成了芸芸众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一直到三十多岁，封常清仍然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谁也看不出这个人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当时的安西节度使是夫蒙灵詧，高仙芝在其麾下担任副节度使兼都知兵马使。我们都知道，高仙芝是个美男子，对自己的风度仪表极为看重，所以每次出巡，身后总要跟着数十个鲜衣怒马的随从。每当威风凛凛的高仙芝带着他的随从马队在安西街市上呼啸而过，那样子别提有多拉风了。封常清曾经在路上遇见过几次，心中艳羡不已，于是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

可是，封常清凭什么呢？

要背景没背景，要资历没资历，要钱财没钱财，个子又长得瘦弱矮小，两条腿还不一样长，甚至连眼睛都是斜的，这样的人想当高仙芝的随从，岂不是痴人说梦？

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封常清。

因为封常清有一个人生信条——只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就能达成别人不可能达成的梦想。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矮小丑陋的封常清来到了高仙芝的府上，从容递上了自己的名牒。高仙芝只看了他一眼，一股嫌恶之情就油然而生——人居然可以长成这样？

“你走吧，我的随从已经满了。”高仙芝面无表情地说。

封常清一句话也没说，扭头就走。

不是因为他负气不干了，而是因为他早就猜到了高仙芝的反应，所以，封常清一点也不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二天，封常清又来了，照旧递上名牒，仿佛昨天的事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高仙芝火了：“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的随从已经满了，干吗还来？”

这一次，封常清也火了。他梗着脖子对高仙芝说：“我仰慕您的高风亮节，情愿追随鞍前马后，所以在没人引荐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前来投奔，您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您若是以才取人，则士人信服；若是以貌取人，恐怕只会失去人心！”

高仙芝勃然作色，当即挥手送客。

见过脸皮厚的，可没见过这么厚的！

毫无疑问，封常清的努力失败了。

高仙芝是个眼高于顶、牛皮烘烘的人，怎么可能收留他这么一个又丑又贫又不要脸的人呢？

如果是普通人，到这个时候就该知难而退了。人要脸树要皮，再去投牒除了遭人羞辱之外，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然而，封常清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认准目标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第三天，封常清又来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连数十天，封常清都来高仙芝的府门前站岗。早上天不亮就来了，一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去。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高仙芝纳闷了。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执着的人呢？这家伙如果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就肯定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

高仙芝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有一天，当高仙芝打马回府的时候，忽然翻身下马，快步走到站得像根木桩一样的封常清面前，定定地看了他很久，然后说了四个字：

“我收你了。”

封常清成功了。

自从成为高仙芝的随从，封常清的人生就彻底不同了。

他有了俸禄，有了身份，有了地位，有了鲜衣怒马招摇过市的威风，有了苦尽甘来鸟枪换炮的成就感。

然而，封常清绝不满足于此。他想要的，是别人根本不敢想象的。

封常清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像高仙芝和夫蒙灵詧一样，成为驰骋沙场的名将，成为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成功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有多大，他的舞台就有多大。

当然，前提是他要有才，并且够努力。而封常清恰好两者都不缺。如果人们还记得南门城楼上那个十几年如一日用功读书的孩子，就不难相信这一点。

在高仙芝麾下当了几年的随从兼幕僚后，封常清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那是开元末年，西域的达奚部落发动叛乱，玄宗下诏命夫蒙灵詧出击，夫蒙灵詧把任务交给了高仙芝。高仙芝随即率领两千骑兵深入追击，在绫岭一带全歼了达奚叛众。回营后，高仙芝正准备写一份捷报呈送夫蒙灵詧，封常清忽然递给了他一份文书。

高仙芝打开一看，大为惊讶。

原来这正是高仙芝平定达奚的一份详细捷报，其中细述了高仙芝在舍

井泉附近遭遇敌军的情形，以及高仙芝克敌制胜所采用的谋略，行文清晰，逻辑缜密，把高仙芝想说的话无一遗漏地写了下来，而且详略得当、文采斐然。

高仙芝万万没想到——这个形貌丑陋的封常清居然能写出如此漂亮的文章。

看来，古人常说人不可貌相确实是有道理的。

高仙芝回到安西后，夫蒙灵詧设宴犒劳。一见到高仙芝，夫蒙灵詧麾下的两个幕僚就忙不迭地追问他："那份捷报是谁写的？副大使幕下怎么会有如此人才？"

高仙芝非常自豪地笑了，随即召来封常清。那两个幕僚赶紧与封常清促膝长谈，一聊之下，竟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封常清在安西军中声名鹊起，高仙芝也对他刮目相看，日渐器重。

后来的几年里，封常清青云直上，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随从逐步成长为安西都护府的高级将领，并成为高仙芝最倚重的心腹。天宝六年，封常清追随高仙芝平定了小勃律。同年十二月，高仙芝取代夫蒙灵詧就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也随之再获擢升，"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不久，又加授"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旧唐书·封常清传》）。

高仙芝每次出征，总是让封常清担任留后（代理节度使），相当于把安西四镇的军政大权全都交给了他。此时的封常清，显然已经成为安西唐军实质上的二把手。

由于出身寒微，封常清始终保持着勤俭的本色，不管有多少公款和财物从他手中经过，从来不会贪污一毫一厘。在这一点上，封常清与贪财的高仙芝恰成鲜明的对照。此外，封常清治军严整，赏罚分明。军中曾有两名将领触犯了军法，封常清当即毫不留情地将其斩杀，以致三军震骇。不管是谁，只要他胆敢轻视或挑战封常清的权威，立马就会大祸临头。

高仙芝的乳母有个儿子叫郑德诠，在军中担任郎将，与高仙芝亲如兄弟，平常在军中很是威风。由于封常清是高仙芝的随从出身，郑德诠打心眼里瞧不起他，总想找机会给他难堪。有一次，封常清带着一帮将领从外面回节度使府，众将都老老实实跟在身后，郑德诠见状，故意拍马追了上去，大摇大摆地走在封常清前面，等过足了瘾之后，才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封常清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

回府后，封常清立刻传召郑德诠，对他说："我出身寒微，这一点你很清楚。但中丞（高仙芝的中央官职是御史中丞）大人既然让我坐在了留后的位子上，你就不能当众侮辱我。今天必须让你死一次，才能整肃军纪！"说完立刻命人把郑德诠拖下去，痛打六十军棍。

当时节度使府与高仙芝的家仅有一墙之隔，高仙芝的乳母和妻子闻讯，慌忙跑来救人，却发现大门紧闭，只好在门外拼命擂打哭号。

封常清却不为所动，直到打完六十军棍，才让人把半死不活的郑德诠拖了出去。

高仙芝的乳母和妻子过后立即写信向出征在外的高仙芝告状，高仙芝见信，大惊失色，赶紧问送信的人："打死了没有？"

数日后，高仙芝回到安西，却只字未提郑德诠的事情。而封常清也是泰然自若，丝毫不向高仙芝表示歉意。其实高仙芝也知道，是郑德诠触犯军纪在先，封常清执行军法并无过错，所以只能让郑德诠吃哑巴亏。经过这件事之后，军中将士无不对封常清敬畏有加。

天宝十年，高仙芝调任河西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改由王正见担任。次年，王正见病逝，封常清升任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旧唐书·封常清传》）。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二月，封常清被正式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至此，封常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如愿以偿地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

此时距怛罗斯兵败已经一年多，安西唐军在此期间已经补充了有生力量，完全恢复了以往的实力。因此，一个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封常清肩上，那就是——走出怛罗斯战败的阴影，从阿拉伯人和吐蕃人手中重新夺回大唐在中亚的霸权地位。

封常清把目光投向了中亚的大勃律国。

大勃律与小勃律相邻，很早就归附了吐蕃。当年高仙芝通过征服小勃律而威震中亚，如今封常清自然也要通过对大勃律的征服，来重振大唐在中亚的声威。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封常清与部将段秀实等人率部从安西出发，重新踏上当年高仙芝走过的漫漫征程，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跋涉，兵锋直抵大勃律的边陲重镇菩萨劳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南）。

封常清让大军稍事休整之后，便顺利攻克了菩萨劳城。而后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前锋不断传回捷报。封常清遂率领主力一直向大勃律的纵深挺进。

此时，身为斥候果毅（军情处长）的段秀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跟唐军交手的几乎都是一些老弱残兵，而且一触即溃，纷纷往大路两侧的深山密林里逃。虽说大勃律军队的战斗力远远不及唐军，但也不至于连一个精壮士兵都没有吧？

段秀实觉得这里头有鬼，于是对封常清说："估计敌人是以羸兵诱我，然后在两侧丛林埋伏精锐，请大帅下令搜索左右山林。"

封常清也觉得这一路打来太过顺手，确实不太对劲，于是依言派出侦察骑兵，在道路两侧的密林展开拉网式搜索，果然发现了埋伏在丛林中的大批敌军精锐。

封常清立刻下令发起了攻击。在丛林中趴了好几天的大勃律士兵们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反而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被悉数歼灭了。

大勃律国王眼见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而且精锐尽丧，只好向封常清投降，转而归附唐朝，承认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这是继高仙芝征服小勃律之后，唐朝在中亚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尤其是在经历了怛罗斯兵败后，封常清此次远征的意义更是非同凡响。它不仅重新确立了大唐在中亚的霸权地位，而且用果断的行动向世人宣告——强大的唐朝绝不会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就一蹶不振，更不会因此中断强势扩张的进程。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样的宣告竟然会成为一种绝响。

因为短短两年之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在盛世崩坍的那一瞬间，大唐帝国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对外扩张史也随之戛然而止。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通过对外战争成长为一代名将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最终不仅在这场内乱中毁掉了一世英名，并且还枉死在了大唐天子李隆基的斩决令下……

东京洛阳的陷落

安禄山于范阳起兵的第七天，亦即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封常清恰好循例入朝觐见玄宗。在骊山的华清宫，玄宗向封常清询问平叛方略，封常清胸有成竹地说："我朝太平日久，所以百姓一旦风闻叛乱就恐惧不安，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虑。臣请求立刻前往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扬鞭奋马，北渡黄河，相信用不了几天，定能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

此时的封常清和杨国忠如出一辙，丝毫没有把安禄山放在眼里。

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安禄山并不是泥巴捏的，而他麾下的十五万铁骑更不是豆腐做的。

玄宗闻言大喜，随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让他即刻前往东京组织防御。旬日之间，封常清就在东京招募了六万人。然而，仓促招募的这些人都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即便封常清是纵横西域的名将，带着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上战场，也注定只能吃败仗。

十一月二十一日，玄宗从骊山匆匆返回长安，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同时赐死荣义郡主。可怜这个皇室之女新婚还不到半年，就成了这桩失败的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在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玄宗朝廷用闪电般的速度进行了防御部署：

在长安北面，亦即河东、朔方一线，擢升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羽林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市）长史，协同防御，阻挡叛军西进。

在长安东面，亦即河南一带，设置了两道防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今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组建第一道防线，由封常清在东京洛阳构筑第二道防线。此外，任命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东征军副元帅（元帅由玄宗之子荣王李琬挂名），率五万人出镇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准备由此东进，迎击叛军。

与此同时，玄宗掏出了他私人腰包（内库）的钱，旬日间在京师募集了十一万人，号称"天武军"。事实上，这十余万人原本都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市井子弟，企图依靠这些人来拱卫京师，基本上就是个笑话。

做完这一切，玄宗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他看来，这个防御计划还是比较周全的，就算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安禄山的叛军，至少也可以挫其锋芒，保证两京无虞了。

可是，玄宗错了。

叛军的战斗力要比他想象的强大得多，而朝廷在西京、东京、陈留等地临时抓来的将近二十万人，只能是安禄山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这个看似严密的防御计划，很快就将被所向披靡的安禄山彻底粉碎。

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大军进抵灵昌（今河南延津县古黄河渡口），随即命人用粗绳拴住一些破船、木头和杂草，从北岸拉到南岸。一夜之间，河水结成坚冰，浮桥自动形成。叛军顺利越过渡河，当天就攻陷了灵昌郡（今河南滑县）。当时，安禄山的军队漫山遍野，老百姓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只知道叛军所过之处，繁华热闹的城镇乡村都变成一片死寂的废墟。

新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陈留没几天，叛军便已大兵压境，他仓促带人登城拒守，可士兵们毫无斗志。五日，陈留太守郭纳开门出降，叛军随即蜂拥入城，生擒了张介然。

至此，河南的第一道防线宣告瓦解。

此时，安禄山得到了长子安庆宗被杀的消息，痛哭流涕地说：“我起兵讨伐杨国忠又有何罪？竟然杀我的儿子？”

其实安禄山自己最清楚他有什么罪。他声称要清君侧，可玄宗却在第一时间杀了他儿子，这无疑是在天下人面前撕下了他的画皮。恼羞成怒的安禄山为了泄愤，旋即把投降的近万名陈留士兵全部砍杀，并将张介然推出营门斩首，随后率部继续西进，兵锋直指东京。

十二月初七，在得知陈留失守、第一道防线告破的战况后，玄宗大为忧惧。为了鼓舞前线士气，他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声称准备御驾亲征，同时命朔方、河西、陇右各节度使亲率主力前来长安集结，限二十天之内抵达。

八日，安禄山挥师进至荥阳（今河南郑州市），立刻发起猛攻。荥阳太守崔无诐率众抵御，无奈官兵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说守城士兵听见

敌人的战鼓声就吓破了胆，自己纷纷从城墙上往下跳，这未免有些夸张，可当时的官兵在叛军面前毫无斗志、畏敌如虎则是不争的事实。

荥阳当天就被安禄山攻陷，太守崔无诐被斩杀，叛军的气焰更为嚣张。安禄山随即命部将田承嗣、张忠志、张孝忠为前锋，迅速扑向东京的最后一道屏障——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此时驻守虎牢关的人就是封常清。

自从陈留失守、荥阳告急，封常清就率部抢占了虎牢，希望凭借这道天险阻遏叛军兵锋，等待高仙芝的东征军来援。然而，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从来就不是险关要隘，而是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要命的是，此刻封常清麾下的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是军队，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群抄着家伙准备打群架的市井之徒。

让他们与身经百战的叛军铁骑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

虎牢关之战毫无悬念，封常清的官军在叛军铁骑的冲锋下一触即溃，虎牢旋即失守。封常清收集余众边打边退，但是却连战连败。史书用这样一段话记载了封常清的惨烈败绩："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虎牢西面），又败；战上东门（洛阳东门）内，又败。丁酉（十二月十二日），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洛阳城内驿站），又败；退守宣仁门（洛阳皇城东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资治通鉴》二一七）

这场洛阳保卫战绝对是封常清一生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面对所向披靡的安禄山铁骑，他不仅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经历了一连串惨败后，封常清知道大势已去，只好从皇城西墙一处坍塌的缺口突围而出，亡奔高仙芝驻守的陕郡。

东京洛阳就这么丢了。

由帝国名将封常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就此崩溃。

封常清退至陕郡时，当地太守已经弃城逃往河东，其他的官吏和百姓也四处逃散，此时的陕郡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封常清向高仙芝禀报："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旧唐书·高仙芝传》）

连日血战，叛军兵锋锐不可当。况且潼关又没有驻兵，万一叛军突入，京师危在旦夕。

而今之计，只有放弃无险可守的陕郡，火速退保潼关！

按照朝廷既定的作战计划，高仙芝应该自陕郡东进，主动迎击叛军。但是此时此刻，面对封常清的奏报，高仙芝意识到——如果按原计划继续东进，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羊入虎口，自寻死路！

所以，封常清的建议是正确的，只有暂时避敌锋芒，退保潼关，才能用空间换取时间，在确保京师无虞的情况下与叛军打持久战。

由于军情危急，高仙芝来不及向朝廷奏报，当即率部向潼关方向撤退。可高仙芝万万没料到，他们前脚刚刚出了陕郡的西门，叛军后脚就杀到了。官军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被叛军打得狼狈不堪，人人争相逃命，结果被自己的人马踩踏而死的，比死在叛军手里的还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好不容易才逃脱了追兵，带着残部仓皇退入潼关，旋即命人抢修防御工事。等到叛军前锋进抵潼关时，发现官军已经严阵以待，方才悻悻退去。安禄山命部将崔乾祐驻守陕郡，准备随时进攻潼关。看着叛军马蹄扬起的滚滚黄尘渐渐东去，惊魂未定的官兵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进入潼关的这一刻，死神已经向他们伸出了冰冷的白爪……

十二月十六日，在听到东京洛阳沦陷的消息后，玄宗震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安禄山起兵仅仅三十多天，就以破竹之势席卷大河南北，并轻而易举地拿下东京洛阳，前锋甚至已经逼近潼关！如此严峻的形势，又怎能不让玄宗感到极度震惊？

从范阳到洛阳距离长达1600多里，就算是在和平时期，以正常的行军速度推进，也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可现在安禄山一路过关斩将、攻城略地，其推进速度竟然只比正常行军多出了十来天，这说明什么？

这足以说明安禄山这一路南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玄宗困惑了。

难道偌大的帝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安禄山的对手？难道在盛世唐朝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的竟然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的事实？

此刻，玄宗的心头真是百味杂陈。所有的惊惶、困惑、懊悔、愤怒、忧愁、无奈，在同一时间向这个苍老的大唐天子汹涌袭来……

而更让玄宗近乎绝望的是——十天前向朔方、河西、陇右发布的集结令，居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至今他也看不到边镇的一兵一卒。

无计可施的玄宗在这个时候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再次强调要御驾亲征；二是下诏命太子李亨监国，并向宰相们透露了传位之意。他对杨国忠等人说："朕在位已经将近五十年，对国事付出了太多的忧虑和辛劳，身心早已疲倦。去年秋天，本来已经打算把皇位传给太子，只因旱涝灾害接连不断，不想把灾祸留给子孙，才把事情拖到今天，只希望能等到一个丰收之年。可万万没想到，逆胡竟然会发动叛乱。朕自当御驾亲征，且命太子监国，等到叛乱平息，朕就要去过清静无为的日子了。"

对于玄宗的传位之意，多数大臣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此时的玄宗已经年逾古稀，而太子李亨也已经四十五岁，被立为储君已整整十七年，玄宗要是再抱着权力不撒手，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不希望玄宗传位。

他就是杨国忠。

因为他是玄宗一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李亨即位，他绝不可能继续保有目前的权力和富贵。所以，一听说玄宗要传位，杨国忠顿时大为恐惧。当天退朝后，杨国忠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韩、虢、秦三夫人，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三夫人深有同感，随即入宫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意识到此事关系到她本人和整个家族的命运，马上哭哭啼啼地向玄宗提出了抗议，千方百计要求他收回成命。

美人一落泪，老皇帝自然就心软了。

于是，太子监国之议就此搁置，所谓的亲征计划亦随即不了了之。

接下来的日子，安禄山与李唐朝廷陷入了短暂的对峙状态。

关键倒不是安禄山不想乘胜西进、攻取长安，而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想干什么？

他想当皇帝。

自从占领东京洛阳之后，安禄山就开始授意手下人张罗登基称帝的事了。在安禄山看来，虽然高仙芝和封常清扼守着关中门户潼关，但这并不等于能够阻止他进军长安的脚步。换言之，此时的安禄山已经把西京长安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早一天晚一天拿下长安，在他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趁着一连串军事胜利之际，及时建立自己的王朝霸业，树立自己的政治旗号，正式与李唐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逐鹿天下！

安禄山在东京忙着称帝，这无疑为节节失利的玄宗朝廷提供了喘息的时间。如果玄宗能够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并把临机专断之权大胆下放给前线的几个主要将帅，朝廷只在宏观上把握战略决策，对前线军队尽量做到不遥控、不干预、不掣肘，那么形势也许就会完全改观，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也会全然不同。

但令人遗憾的是，玄宗并没有这么做。

他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在最紧要的关头临阵斩将、自毁长城，致使战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潼关的失守和长安的沦陷。

玄宗之所以会犯下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首先是因为多年不理朝政的他早已丧失了清明的政治理性，其次是因为听信了一个人的谗言。

这个人就是宦官边令诚。

名将之死：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说起来，边令诚也算是高仙芝的老搭档了。当年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边令诚就是他的监军，在高仙芝受到夫蒙灵詧打压的时候，边令诚还替他说了些公道话，使得高仙芝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一跃而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从这个意义上讲，边令诚也可以算是高仙芝命中的贵人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当初边令诚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客观上帮了高仙芝一个忙；如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样可以把高仙芝置于死地。

此次高仙芝东征，玄宗仍旧派边令诚去当监军。说起“监军”这个职务，实在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所谓监军，说好听点叫作中央特派员、天子特使，说难听点就是公开的特务，他们的使命就是专门给前线将帅找茬儿的，你要是不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动不动就会抓你的小辫子、打你的小报告。如果军队作战胜利，功劳自然有他们一份；要是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推卸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将帅头上。

“监军”的设置始自汉朝，但历来一直由朝臣担任；而让宦官出任监军，其始作俑者正是唐玄宗李隆基。自从他开此先例之后，宦官监军就成了中晚唐历史上的一大弊政。在此后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李唐朝廷将一次又一次因为这项弊政而蒙受巨大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断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然，宦官也不见得都是卑鄙阴险的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以及残缺的生理结构对人格心理产生的影响，再加上他们在政治上与皇权的微妙关系，使得宦官这个特殊群体在为人处世方面，通常会比一般的文臣和士大夫更缺乏原则，更注重私利，更容易干出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边令诚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家伙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生性怯懦贪鄙。当年随同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家伙跟到连云堡就不敢再往前半步了，极为贪生怕死。后来高仙芝悍然发兵洗劫石国，狠狠发了一笔不义之财，边令诚估计也没少敲他的竹杠。史称“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旧唐书·封常清传》）。

按照史书的说法，由于多次索贿不得，边令诚便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

其实，这种说法恐怕不是实情。据《旧唐书·高仙芝传》称，高仙芝此人虽有贪财的毛病，但并不吝啬，相反还颇为慷慨：“（高仙芝）家财巨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既然边令诚曾在客观上帮过高仙芝的忙，而且是深得玄宗宠信的宦官，拥有打小报告的特权，高仙芝当然没有理由得罪他。

所以，边令诚向玄宗进谗言的真正动机，应该是逃避责任，而不是索贿不得。

逃避什么责任？

逃避不战而退之责。

东京陷落后，高仙芝采纳封常清避敌锋芒的建议，在未及请示玄宗的情况下，主动弃守陕郡、退保潼关，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作战略撤退，说难听了就是逃跑。

身为监军，边令诚很清楚，一旦天子怪罪下来，不光高仙芝和封常清难辞其咎，他边令诚必然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边令诚唯一能够自保的方法，就是在玄宗问罪之前抢先入朝，把屎盆子扣在高仙芝和封常清头上！

因此，当高仙芝一退入潼关，边令诚便迫不及待地赶回长安，向玄宗打了小报告，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声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若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做法并没有错，可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

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的做法对当时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和士气进一步造成了恶劣影响，实属罪无可赦！

光凭这三条，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再加上边令诚的一番密奏，玄宗更是暴跳如雷，郁积在他心中多日的所有恶劣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此前由于东京失陷之责，玄宗已经削除了封常清的所有官爵，让他以"白衣"之身在高仙芝军中效命，现在潼关以东的大片国土又全部沦于敌手，玄宗的愤怒就更是达到了极点。

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末日就此降临。

被满腔怒火灼烧得丧失理智的玄宗当即颁下一道敕令，命边令诚立刻前往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地斩首！

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怀揣圣旨，马不停蹄地赶回潼关，即刻宣封常清接旨。

这一天，乌云低垂，北风呜咽，形容憔悴的封常清跪伏在地，脸上的

表情坚硬如铁。从开始听宣的那一刻，直到被押赴刑场的一路上，封常清脸上的表情始终没有改变过。

临刑前，封常清把早已写就的一道遗表交给边令诚，让他转呈玄宗，然后遥望着长安方向的天空，平静地说了最后一句话："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旧唐书·封常清传》）说完即从容就戮。

一代名将就此含恨九泉。

这个长得瘦弱矮小，既跛足又斜眼的封常清，就这么结束了他努力奋斗的一生。

人们常说，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封常清的大半生，不停地凭借过人的努力赢得了原本不属于他的一切，可到了最后关头，他的努力却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和功勋，反而给他带来了厄运和死亡。时耶？命耶？

说到底，封常清的努力并没有错。虽然最终的结果出乎很多人，包括他本人的意料，可作为一个帝国名将，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可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历史了。

封常清东京兵败、撤入潼关后，曾经三度上表，向玄宗陈述自己的兵败缘由，同时客观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并针对叛军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详细拟就了一份应对的方略。然而，这三份极具军事价值的奏表，却被玄宗弃之一旁。封常清不得不拍马入朝，准备当面向玄宗请罪并陈述平叛方略。就在他刚刚走到渭南时，恰好遇到玄宗派出的使臣。使臣向他宣读了玄宗的敕令，命他回高仙芝军中，以"白衣"身份戴罪立功。

封常清怀着满腔的抑郁和失落，黯然折回了潼关。

走到这一步，封常清其实已经预感到了末日的降临。

于是他铺开一纸素笺，挥毫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表，也就是他的遗书。

在这份遗书中，封常清字字泣血、声声哽咽地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同时也慷慨淋漓地展现了他对家国社稷的忠诚与忧思。

众所周知，封常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儒将，尽管他这份遗表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我们还是愿意将其节录于此。因为，通过这篇自表心志

的绝笔，我们足以窥见封常清的磊落襟怀，也足以领略他的文学才华：

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旧唐书·封常清传》）

封常清死了，接下来自然就轮到高仙芝了。

边令诚对高仙芝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所以前去宣敕的时候，特意带上了一百多名陌刀手，一副紧张兮兮、如临大敌的模样。

高仙芝跪地听宣后，和封常清一样，立刻被绑赴刑场。

到了刑场，看到封常清的尸身被随便裹了一张草席扔在那里，高仙芝顿时悲从中来，大声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遇敌而退，固然应该以死谢罪。可今日上戴青天，下履黄土，说我克扣粮饷和朝廷赐物，则是赤裸裸的诬蔑！

当时，边令诚故意把将士们全部召集到刑场周围，让他们现场观刑，企图以此震慑三军。高仙芝面对将士们大喊：“我在京城招募了你们，虽然朝廷分发了一些物品，可事实上连起码的作战装备都不能凑足，本来打算与诸君一道破贼立功，博取朝廷高官重赏，不料敌人太过猖獗，只好引兵固守潼关。我如果真有克扣粮饷和赐物的行径，诸君就大胆揭发；可要是我没有这么做，诸君当替我喊冤！”

高仙芝话音刚落，将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大呼冤枉，其声如雷，在整个

潼关久久回荡。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边令诚手中握着天子亲自颁发的斩决令，任凭三军将士喊破喉咙，也挽救不了高仙芝的性命。最后的时刻，高仙芝对着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旧唐书·封常清传》）

说完这句话，刽子手的鬼头刀便已高高扬起。

而后，高仙芝双目圆睁的头颅便飞离身躯，滚落到了封常清早已冰凉的尸体旁。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像高仙芝和封常清这样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淫日久的玄宗君臣和帝国军民，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就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

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高仙芝和封常清确实是时运不济。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了一个在政治上极为错误的选择，所以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然而，要为帝国买单的人绝不仅仅只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经飞扬跋扈的杨国忠，曾经“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都将作为这场历史性灾难的牺牲品，与盛世唐朝一同埋葬。同时被埋葬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引以为豪的帝王伟业，以及刻骨铭心的绝世爱情。

当然，最先步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尘的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个帝国名将——哥舒翰。

自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成功夺取石堡城后，哥舒翰就成了帝国最知名的将领之一，并日益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器重。战后，已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旋即加封为特进、鸿胪员外卿，加摄御史大夫，并赐一子五品官，赐绸缎千匹，田庄、豪宅各一所；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公元753年），进封凉国公，实封食邑三百户，并兼任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爵西平郡王；十三年（公元754年），加拜太子太保，又加食邑三百户，与前共计六

百户。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哥舒翰必将躺在他那辉煌的功劳簿上，度过逍遥自在、荣华富贵的一生。

然而，命运之神有时候是很小心眼的。她如果给了一个人太多东西，就必然要从他那里夺走另外一些东西。

安史之乱爆发前，哥舒翰最先被夺走的东西是健康。

跟出身孤寒、刻苦自律的封常清恰好相反，哥舒翰从小就是个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由于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哥舒翰前半生从不为钱发愁。直到四十岁以后，老本全都吃光了，哥舒翰才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然从军，没想到一不留神就成了名将。

功成名就之后，哥舒翰的纨绔习气又暴露无遗，“好饮酒，颇恣声色”（《旧唐书·哥舒翰传》），结果很快就把身体搞垮了。天宝十三年，哥舒翰突然中风，昏死了好久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便回到长安，一边寻医问药，一边安心静养，虽然头上挂着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过问边务，而是“废疾于家”，在京师当起了寓公。

当寓公的日子虽然有些闷，但至少图个逍遥自在。可是，仅仅一年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转折，哥舒翰当然也是在劫难逃。起初，哥舒翰根本没有料到命运会安排他走上前线——首先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其次是因为有高仙芝和封常清冲在前头，哥舒翰料想安禄山肯定蹦跶不了几天。

可他错了。

安禄山不仅一直在蹦跶，而且蹦跶得越来越凶！

得知东京陷落的消息后，哥舒翰就感到情况不妙了；紧接着，潼关又传来令他更为震惊的消息——高仙芝和封常清居然被玄宗双双砍掉了脑袋！

哥舒翰预感到——自己的太平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果不其然，高、封二人被杀数日后，玄宗就紧急传召哥舒翰入宫，命他顶替高仙芝的兵马副元帅之职，领兵八万，即刻进驻潼关，准备征讨安禄山。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此时的哥舒翰早已掂量出了安禄山的实力——连高仙芝和封常清都败得那么惨，足见仓促招募的官兵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将领顶上去，结果都只能是凶多吉少，而且十有八九会步高、封二人之后尘！

因此，哥舒翰便以病重为由极力推辞。

但是，国难当头之际，玄宗岂能容他逃避退缩？国家平常花那么多钱养着你们，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如果连你哥舒翰这样的名将都当缩头乌龟，那还有谁能站出来挽救国家危亡？

所以，玄宗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哥舒翰的请求。

就这样，哥舒翰硬着头皮，拖着病体，领着玄宗为他东拼西凑搞来的将近二十万乌合之众，万般无奈地进入了潼关。

潼关——这座威震天下的雄关，将继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成为又一个帝国名将逃不过的鬼门关。

命运之神已经夺走了哥舒翰的健康，现在又夺走了他的安宁；很快，又将夺走他的尊严；最终，还将夺走他的生命……

当然，此时的哥舒翰没有料到结果会这么糟。虽然他对此次出征并未抱有多大的幻想，可还是存着一丝侥幸心理。在他看来，潼关毕竟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安禄山想打进来也没那么容易。尽管自己麾下的这二十万人是一群乌合之众，可凭借这道天险及其坚固的防御工事，哥舒翰相信自己还是能够顶得住的。

然而，哥舒翰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层是——如果玄宗下一道命令，让他出关与叛军决战，导致他丧失天险的凭恃，他会落入怎样的境地呢？

事实上，后来的战局确实是朝这个最坏的方向发展的。

因为玄宗果真下了一道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的命令。

玄宗之所以下这道命令，是因为又有人向他进了谗言。

这次不是宦官边令诚，而是宰相杨国忠。

如果不是杨国忠在最关键的时刻怂恿玄宗作出了极端错误的决定，哥舒翰就不一定会败，潼关也不一定失守，长安也不会沦陷，玄宗就更不用像一条丧家之犬那样，带着杨贵妃和一帮宠臣仓皇逃亡巴蜀。

因为，就在安禄山忙于称帝的这个间隙，河北、河东两线战场均已出现重大转机，只要潼关不丢、京师无虞，李唐朝廷完全有可能一改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从消极防守转入战略反攻，直至最终转败为胜。

河北、河东两线战场的转机，是得益于四个人的努力。

自从安禄山的十五万铁骑滚滚南下的那一刻起，这四个人就始终站在第一线，组织并领导当地军民同叛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

河北战场，领导者是颜杲卿和颜真卿。

河东战场，领导者是郭子仪和李光弼。

[1]　关于怛罗斯之战唐军出动的总兵力，各种史料多有异说：阿拉伯史籍说是十万，《资治通鉴》和《唐历》说是三万，《段秀实别传》说六万，两《唐书》中的相关列传则说二万，杜佑的《通典》说七万。各家均有所凭，莫衷一是。今据有关学者的推测和考证，确定为六万人。

第六章 对峙：唐朝与伪燕

星火燎原：河北的抵抗

颜杲卿和颜真卿是一对堂兄弟，他们的五代祖就是北齐名臣颜之推，著有享誉后世、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这本书中，颜之推列举了平生所见所闻的许多历史掌故，以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用平实而不乏睿智的语言，对后代子孙进行了谆谆教诲，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学养生、为人处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道理。该书虽被冠以《家训》之名，但由于其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人生智慧，因此一问世便迅速流传开来，被人们争相传诵，逐渐成为人格教育方面的范本和经典，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颜氏兄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其学问、修养与人格境界自然皆非常人可比。当安禄山的叛军席卷大河南北，大多数唐朝官吏都望风而降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宁死不屈，以巨大的勇气同叛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其内在动力未尝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家学渊源。

二颜入仕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开元中期。其中，颜杲卿以父荫入仕，史称其“性刚直，有吏干”，最初在魏州担任录事参军，就干出了显著的政绩，“振举纲目，政称第一”（《旧唐书·颜杲卿传》）。其后屡获升迁，于天宝十四年出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

与精明干练的堂兄颜杲卿相比，颜真卿属于比较纯粹的读书人。史称他“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旧唐书·颜真卿传》）。所谓“尤工书”，就是善于书法。众所周知，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师之一，他将篆书、隶书等笔法糅进楷书，独创了别具一格的“颜体”书法，后世把他和初唐的欧阳询、晚唐的柳公权、元人赵孟頫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其中，颜真卿和柳公权还被并称为“颜筋柳骨”。

开元中期，颜真卿以甲科的优异成绩进士及第，此后正式入仕，担任监察御史，期间数度出巡河西、陇右、河东、朔方等地，监察地方的屯田、军备等事宜，执法以公正严明著称。当时，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发生了一起大案，其中颇有冤情，当地官吏久拖未决，颜真卿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前往，很快就查明了这桩冤案。巧合的是，自从冤案发生后，当地便久旱不雨，可颜真卿刚把案子解决掉，老天爷立刻降下甘霖。当地百姓惊喜万分，都把这场雨叫作“御史雨”。

此后的几年，颜真卿不断升迁，历任侍御史、东京畿采访判官、武部员外郎等职，但由于为人正直耿介，从不拍杨国忠的马屁，因此不久就被排挤出朝，外放为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

颜氏兄弟出任地方太守之时，正值安史之乱前夕。此时的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命运即将把他们一举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

颜杲卿的常山郡位于范阳的西南方，属安禄山的管辖范围；颜真卿的平原郡位于正南方，虽不属范阳管辖，但和常山一样，距离范阳都只有十来天路程。也就是说，安禄山的叛军一旦南下，他们所在的郡就是首当其冲的最前线。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于次日大举南下。九天后，安禄山亲率大军进抵藁城（今河北藁城市）。此地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与常山郡城近在咫尺，颜杲卿知道自己兵力薄弱，如果强行抵抗，其结果只能是城破人亡。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人精明的颜杲卿决定采用权宜之计——暂时以诈降的方式麻痹安禄山。

随后，颜杲卿带着长史袁履谦前往藁城晋见安禄山。安禄山觉得颜杲卿还算识时务，就赏给了他三品紫袍和金鱼袋。可与此同时，安禄山

也多留了一个心眼，把颜杲卿的一些子弟留在军中作为人质，然后命他仍旧镇守常山。此外，安禄山又派部将李钦凑率数千人马进驻井陉口（太行八陉之五，位于今河北鹿泉市西），一方面防备河东与朔方的官军，一方面监视颜杲卿。

在返回常山的路上，颜杲卿指着身上的紫袍和金鱼袋，苦笑着对袁履谦说："穿这玩意儿干什么？"

袁履谦心领神会。回到常山后，颜杲卿立刻与袁履谦暗中募兵，并加固城防工事，随时准备起兵反抗安禄山。

和猝不及防的颜杲卿比起来，颜真卿似乎要更敏锐一些。

因为他很早就嗅出了叛乱的气息。

安禄山起兵前夕，平原郡连日暴雨，颜真卿遂以城墙老旧、担心垮塌为由，积极组织人员整修城墙、挖深壕沟，同时囤积粮草，并整理完善了全郡预备役人员的相关资料，以备随时扩充兵力。在做这一切的同时，颜真卿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天天招呼一帮文人学士泛舟河池，饮酒赋诗，希望以此消除安禄山的疑心。

然而，颜真卿的异动并没有瞒过安禄山的眼睛，马上就有耳目一五一十向他作了奏报。可在安禄山看来，颜真卿只是不懂军事的一介书生，就算他早有防备，也绝对翻不了什么大浪，所以安禄山并没有放在心上。

安禄山起兵后，第一时间向颜真卿发出了一道公函，命他率平原、博平（今山东聊城市）两郡士兵七千人，即刻进驻黄河渡口，为南下的叛军打前锋。

安禄山这一招实在是损。如果颜真卿按兵不动，那就等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和安禄山不是一条心；如果他服从命令，那也等于是当了安禄山的炮灰。总之，不管颜真卿作何反应，其结果都很被动。

不过，颜真卿是不会被安禄山牵着鼻子走的。既然安禄山都敢于和朝廷反目成仇，他颜真卿又何惜与安禄山撕破脸面？

所以，在接到安禄山牒文的那一刻，颜真卿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派遣部将李平抄小道飞驰入京，向玄宗禀报河北的战况，同时表明自己誓死捍卫家园的决心。

李平到达长安时，河北郡县几乎已经全部投降了安禄山，玄宗每天接

到的，都是令他极度失望和痛心的消息。这位心力交瘁的老皇帝曾经面对满朝文武发出哀叹：“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直到李平入朝，玄宗才像在茫茫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又惊又喜地对大臣们说：“朕连颜真卿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没想到他竟能做出如此义举！”

在与朝廷取得联系后，颜真卿公然揭起了反抗安禄山的大旗。由于备战充分，旬日之间，颜真卿就招募了一万多名勇士。随后，他又派人至常山，与堂兄颜杲卿相约共举义兵，以掎角之势遥相呼应，“断贼归路，以纾西寇之势”（《旧唐书·颜杲卿传》）。

安禄山万万没想到，正当他在前方高歌猛进、一路势如破竹的同时，颜氏兄弟已经在他后院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

东京陷落后，以河南尹达奚珣为首的大部分官吏都投降了安禄山，唯独东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开元宰相卢怀慎之子）、采访判官蒋清等少数几人宁死不屈，同日被安禄山诛杀。

为了炫耀武功并杀一儆百，安禄山命部下段子光带上李憕等三人的首级，到河北各郡作巡回展览。十二月十七日，段子光得意扬扬地来到平原郡，可迎接他的并不是畏惧的眼神和谄媚的笑脸，而是颜真卿义愤填膺的一声怒喝：“来呀，把这家伙给我拿下！”

段子光还没回过神来，就被五花大绑推了出去，并被一刀砍成了两段。颜真卿随即厚葬了李憕等三人，并召集全体将士祭奠凭吊。

颜真卿在平原郡的首倡义举很快得到了周边各郡的响应。随后，景城（今河北沧州市东南）、饶阳（今河北深州市）、河间（今河北河间市）、济南（今山东济南市）等地的唐朝官吏纷纷诛杀安禄山任命的官员，然后各自拉起队伍，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共同推举颜真卿为盟主，一致反抗安禄山。

随后，玄宗又下诏擢升颜真卿为户部侍郎，仍兼平原太守。

昔日不被安禄山放在眼里的一介书生，此刻已然成为河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颜杲卿在常山也迅速展开了行动。

他的首要目标是拔掉安禄山安插在他身边的那颗钉子——李钦凑。

颜杲卿假造了一份安禄山的军令，命李钦凑率部来常山接受犒赏。十

二月二十二日傍晚，李钦凑兴冲冲地赶到常山，颜杲卿让袁履谦等人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席间还有歌伎舞女作陪助兴。李钦凑和他的部下立刻开怀畅饮，很快就酩酊大醉，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宴会厅上。

袁履谦朝手下使了个眼色，还在梦乡中的李钦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而他的一帮亲信也全都被俘。次日，颜杲卿将这些俘虏全部斩首，然后命人驱散了仍然驻留在井陉的小部分叛军，控制了井陉口。

数日后，安禄山派部将高邈、何千年回幽州征兵，二人经过常山时，颜杲卿又派人用相同手法把他们双双擒获。当时，叛军将领张献诚（张守珪之子）正奉安禄山之命围攻饶阳。何千年为了保命，就向颜杲卿献计说：“在下有一计，既能确保常山不失，又能立解饶阳之围。”他的计策是：派人四处散布消息，声称李光弼已率领一万精锐自河东出井陉口，准备先解饶阳之围，再北上直捣范阳，听到这个消息，不仅南下的叛军会军心动摇，张献诚也必然会解围而遁。

颜杲卿大喜，当即依计而行，张献诚果然连夜遁逃。颜杲卿随即派人进入饶阳慰劳将士，同时命人分赴周边各郡，说：“朝廷大军已自井陉口东进，随时会到，届时必将扫平河北诸郡的叛乱。在此之前，若主动回归朝廷的，必定重重有赏；倘若执迷不悟，顽抗到底，必定会被诛杀！”

河北诸郡本来就不是真心投降安禄山，如今听说官军马上要打回来了，于是一个个相继反正，前后总共有十七个郡宣布脱离安禄山，仍旧遵奉朝廷号令。“其附禄山者，惟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星星之火就这样形成了燎原之势。

随后，颜杲卿乘胜而进，又派了一个叫马燧的手下前往范阳，游说安禄山任命的留守长官贾循，让他归降朝廷。马燧说：“安禄山负恩悖逆，虽然暂时得到了洛阳，但终究会灭亡。公若能揭起义旗，诛杀几个拒不从命的将领，以范阳归国，颠覆安禄山的根基，此乃千载难逢的不世之功啊！”

贾循动心了。可是，慑于安禄山的淫威，贾循还是有些心悸，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贾循的优柔寡断不仅让他与“不世之功”擦肩而过，并且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因为隔墙有耳。

安禄山的一个部将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立刻派人飞报安禄山。

此时，安禄山已经亲率大军出了洛阳，正打算进攻潼关，西取长安。不料，河北接连传来十七郡先后反正的消息，紧接着又得到了贾循企图反叛的密报，刚刚走到新安（今河南新安县）的安禄山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旋即掉转马头，返回洛阳，并命人火速赶回范阳解决贾循。

数日后，安禄山特使抵达范阳，秘密绞死了贾循，而且屠杀了他的所有族人。马燧风闻贾循被杀，慌忙逃出范阳，躲进了西山，被一个隐士收留，就此逃过一劫。

这个大难不死的马燧，后来成了德宗一朝的著名将领，在捍卫李唐社稷、平定藩镇之乱的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功勋。

安禄山诛杀贾循后，命部将牛廷玠执掌范阳军务，同时又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给了驻留河北的骁将史思明，一道给了驻守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的大将蔡希德，命前者率步骑万人南下，命后者率精兵万人北上，目标是同一个——围攻常山。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气急败坏，一下子打出史思明和蔡希德这两张王牌，显然是因为颜杲卿和颜真卿在他后院点燃的这把火确实烧痛了他。

不赶紧将这把火扑灭，安禄山唯恐自己的老巢随时有被焚毁的危险。霸业新举，宏图初展，范阳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呢？尤其是在安禄山正准备登基称帝的这一刻，范阳更不能出任何问题！

临危受命：郭子仪和李光弼

公元756年阴历正月初一，安禄山在东京洛阳举行了登基大典，自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同时任命了文武百官，正式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

就在安禄山黄袍加身的这个时候，史思明和蔡希德也已经完成了对常山的合围。

小小的常山，能挡得住两万燕军铁骑的进攻吗？

此时，距颜杲卿诱杀燕将李钦凑、起兵反抗安禄山才只有八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颜杲卿根本来不及对常山的防御工事进行加固。也就是说，在燕军的日夜猛攻之下，常山城危在旦夕，随时可能被攻陷。

颜杲卿一边率众登城拒战，一边派人突围而出，自井陉口奔赴太原，向兵精粮足的太原尹王承业送去了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从太原到常山大约只有四百里路，如果派出一支轻骑兵昼夜急进，不出三天便可抵达常山，就算不能马上解除常山之围，至少也能削弱燕军的进攻力度，为后续援军的到达赢得时间。

然而，让颜杲卿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王承业居然按兵不动，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颜杲卿当然不会想到，王承业正眼巴巴地盼着他早点死……

早在常山被围之前，颜杲卿就派儿子颜泉明和部下张通幽等人，携李钦凑首级（同时押解何千年、高邈）入朝奏功，途经太原时，张通幽打算投靠位高权重的王承业，就向他献计，让他暂时扣留颜泉明，再写一道奏表，把诱杀李钦凑，俘获何千年、高邈的功劳据为己有，然后另行遣使入朝，向天子邀功请赏。

王承业深以为然，当即依计而行。玄宗得到献俘后，大喜过望，旋即“拜承业羽林大将军，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数”（《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王承业偷了颜杲卿的功劳，难免做贼心虚。所以，当他听到常山被围的消息后，非但不可能出手相救，反而只会盼着颜杲卿赶紧城破身死。道理很简单，颜杲卿要是不死，迟早有一天会揭发王承业的“窃功”之罪，如今燕军恰好跑来帮他杀人灭口，王承业当然乐得作壁上观了，又怎么可能去救颜杲卿呢？

常山的命运就此注定。

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颜杲卿仍旧率众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正月初八，终于城破被俘。史思明和蔡希德入城后，纵兵屠杀常山军民，前后共杀了一万多人，随后将颜杲卿和袁履谦押往洛阳。

就在常山陷落的几天前，玄宗意外得知了“献俘”的真相（窃功邀赏、见死不救的王承业半年后就被玄宗派人诛杀了），赶紧擢升颜杲卿为卫尉卿兼御史大夫，擢升袁履谦为常山太守。然而，诏命未及下达，常山就已经落入燕军之手了。

颜杲卿和袁履谦被押到洛阳后，安禄山指着颜杲卿的鼻子狠狠数落，说：“你本来不过是个小小的范阳户曹，是我保举你为判官，没过几年，又让你升到太守之位，我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造我的反？”

颜杲卿怒目圆睁，破口大骂：“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牧羊的一个羯奴，天子一直把你提到了三镇节度使，恩幸无比，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造他的反？我颜氏世代皆为唐臣，禄位皆为朝廷所有，虽受你保荐，岂能跟你一同造反？我为国讨贼，恨不得亲手杀了你，岂能说是‘反’？臊羯狗，废话少说，赶紧杀了我！”

安禄山气得七窍生烟，立刻命人对颜杲卿和袁履谦施以凌迟之刑。

凌迟，又叫剐刑，俗称“千刀万剐”，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受刑者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地剐下来，但不会马上咽气，而是能清醒地感受到受刑过程中每一丝每一毫的痛苦，可谓惨烈至极，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然而，颜杲卿和袁履谦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他们始终骂不绝口。直到咽气的那一刻，他们的詈骂声才戛然而止。与颜杲卿同日被杀的，还有当初被安禄山扣为人质的多个子侄，以及在常山被俘的许多家眷和族人。据《资治通鉴》称，颜氏一门死于燕军刀斧之下的，前后共有三十余人。

随着常山的陷落和颜杲卿的壮烈殉国，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动迅速陷入低潮。史思明和蔡希德挟新胜之威，“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只有饶阳、河间、景城、平原、清河等少数几个郡仍然在坚持抵抗。

随后，史思明等人又率部猛攻饶阳，河间和景城的唐军先后出兵解救，却被史思明一一击溃。

面对燕军骁将史思明的疯狂扫荡，河北官军已无抵御之力，完全有可能被逐一击破。

河北全线告急，玄宗顿时心急如焚。

危难之际，玄宗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长安的北面——朔方与河东。

除了河北、河南的第一战场外，那里是官军与叛军交锋的第二战场。此刻，有一个英勇矫健的身影正活跃在这个战场上。

他就是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

玄宗知道，眼下除了驻守潼关的病恹恹的哥舒翰，能够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人，就只有这个郭子仪了。

郭子仪，华州（今陕西华县）人，生于武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官宦人家出身，其父郭敬之曾历任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史称郭子仪“长六尺余，体貌秀杰”（《旧唐书·郭子仪传》），也就是长得高大威猛、相貌堂堂，几乎天生就是一块军人的料。所以，年轻时代的郭子仪就进京参加了武举考试，结果力拔头筹，以“高等”的成绩登第，旋即被授予左卫长史之职，从此进入帝国军界。

郭子仪入仕后，曾在边疆诸镇辗转担任边关将领，经过长期历练，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郭子仪被擢升为左卫大将军，出任横塞军使。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横塞军改名天德军，郭子仪仍旧担任军使，同时兼任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从郭子仪的履历不难看出，他其实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

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经五十八岁、年近花甲了，论年龄和资历，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老将，可他的职务却只是区区的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也就是说，当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人早已名震朝野、一个个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时候，郭子仪在帝国军界仍然是一个排不上号的人物。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郭子仪有没有资格在史书中被单独列传恐怕都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要作为一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一代名将而永垂史册了。

安史之乱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高仙芝、封常清，还比如稍后的哥舒翰、杨国忠、杨贵妃，以及玄宗李隆基等等……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被改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而由原本的默默无闻、普普通通被最终改得名扬天下、光芒万丈的人物，恐怕就非郭子仪莫属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成为英雄的潜质，否则时代的汹涌大潮一扑过来，非但不能造就你，反而有可能一口吞噬你。

其实，每当巨变的时代大潮来临，被吞噬的苍生千千万万，而被造就的英雄往往只有一个两个。能成为英雄的人，首先要看上苍是否点选了你，其次要看你是否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闽南语歌曲中有一句经典歌词，叫作“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其实在我看来，“天

定”和“打拼”应该五五开，无论哪一方面弱一些，都有可能导致一个英雄的夭折。

而在郭子仪身上，运气和能力似乎被分配得极为均衡、恰到好处，所以他才能在危急存亡之秋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人物，并且还能在日后不被当权者兔死狗烹，把令人艳羡的权力、地位、名望、富贵保持了整整一生，甚至还能泽被后人，惠及子孙。

放眼古今，这样的成功实属绝无仅有。

因此，后世有人把郭子仪称为“福禄寿考，千古一人”，实非过誉之词。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就在安史之乱拉开帷幕的时候，郭子仪的辉煌人生也随之同步开场了。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弟，玄宗自然是极不放心，所以第一时间就把安思顺召回了朝廷，转任户部尚书，同时擢升右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兼卫尉卿、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太守，命他率部进入河东战场。

这一年，郭子仪已经五十九岁。

安禄山亲率大军南下的同时，命他的党羽、大同军使高秀岩自驻地（今山西朔州市东）出兵，攻击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以此开辟第二战场，一方面牵制朔方与河东的唐军，一方面自北而南威胁关中。可是，高秀岩刚一出兵就遭到了郭子仪的迎头痛击，不得不缩回老巢，另派部将薛忠义进攻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郭子仪闻报，立刻命左兵马使李光弼、部将仆固怀恩等人率部截击，大破薛忠义军，斩杀叛军骑兵七千人。随后，朔方军又乘胜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克复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并打通了一度被叛军控制的战略要地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

朔方军在河东连战连捷，重挫叛军兵锋，使郭子仪一跃成为朝野上下最为瞩目的将帅。玄宗立刻论功行赏，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

就在河东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常山被史思明攻陷，河北告急，玄宗不得不命郭子仪解除云中之围，主力暂返朔方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南下克复东京，同时让他推荐一名优秀将领，并拨出一部分兵力，令其从井陉关东进，火速驰援饶阳，挽回河北局势。

郭子仪向玄宗推荐的这个人选，就是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二号功臣——李光弼。

李光弼，契丹人，生于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祖辈是契丹酋长，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算起来和安禄山、史思明还是老乡。李光弼的父亲是李楷洛，官至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勇果敢闻名军中。

都说虎父无犬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李光弼从小就“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军界，而且起点颇高，“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旧唐书·李光弼传》）。

天宝初年，三十出头的李光弼已经官至朔方都虞候。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对李光弼非常赏识，遂将其纳入麾下，拔擢为河西兵马使。当时，王忠嗣逢人便说：“李光弼这个年轻人，将来必能坐上我的职位。”由于王忠嗣的青睐，加上李光弼本人确实有才，他很快就在河西军中声名鹊起，“边上称为名将”。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李光弼又升任河西节度副使，封蓟郡公。成为河西二把手的这一年，李光弼才刚刚四十出头，而大他十余岁的郭子仪此时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横塞军使。换言之，截至天宝中期，李光弼的官职、爵位、名望，其实都已经远在郭子仪之上。如果说郭子仪是大器晚成的典型，那么李光弼则无疑是少年得志的代表。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所有人都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几年后却突然辞官归隐，一下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致让李光弼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呢？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但又很令人费解。

那是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爱李光弼之才，遂奏请朝廷，任他为朔方节度副使、知留后事。安思顺这么做，显然是把李光弼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几年后李光弼就能顺理成章地继任节度使，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因为安思顺太欣赏李光弼，所以在提拔他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想招他做女婿。按理说这本来是好事，当时安禄山还是玄宗的头号宠臣，安思顺自然也跟着沾光，所以，能成为安思顺的乘龙快婿，这对李光弼日后的仕途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但是，李光弼却一口拒绝了。

他不但一口拒绝，而且干脆把安思顺给他的官也一块辞了。

史书没有解释李光弼作出如此反常举动的原因，可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当时，李光弼肯定早有妻室，而安思顺则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做小，所以，他很可能是希望李光弼把原配夫人休掉，再让女儿嫁过去当正室。

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么这桩婚事对李光弼来讲就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舍弃结发妻子，拥抱大好前程；要么舍弃高官厚禄的诱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李光弼最终选择了后者。

这似乎可以说明，在李光弼心目中，道德伦常的分量要比功名利禄重得多。《旧唐书·李光弼传》中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或许可以为我们的上述推测作一个旁证。该传有一句话说：“（光弼）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也就是说，李光弼在为父亲守丧期间，严格遵守当时的礼制约束和道德规范，始终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同房。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似乎不值一哂；可对古代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人具有高尚节操的标志。从这件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李光弼这个人具有很强的道德观念，为了维护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可以舍弃很多其他东西。

也许，这就是李光弼拒绝婚事并愤然辞官的深层原因。

可是，真正有才的人是不会被长期埋没的。就算李光弼辞了安思顺的官，还是有很多爱才的人会抢着要他。

所以，安史之乱一爆发，郭子仪立刻把李光弼招至麾下。如今，玄宗要郭子仪推荐一位优秀将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就毫不犹豫地保举了李光弼。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初九，玄宗正式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摄御史大夫，稍后又加河北道采访使，让郭子仪从朔方军中拨给他一万精锐，命他即刻奔赴河北战场。

就在李光弼率部开赴河北的同时，史思明的燕军正围着饶阳城日夜猛攻。

虽然这座城池的抵抗力度远远出乎史思明的意料，此外还有情报显示河东援军正向河北快速挺进，但史思明似乎并不担心。

自从开战以来，他就根本没把任何一支唐军放在眼里。他不相信有能

打胜仗的唐军，更不相信有能战胜他史思明的唐军。所以，尽管已经围着饶阳打了好些日子，燕军将士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伤亡，可史思明还是一副指挥若定、信心满满的样子。

此时的史思明并不知道，即将进入河北的这个叫李光弼的人，将和他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唐军将领都不一样。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能打胜仗的唐将，而且是一个能把他史思明打得满地找牙的唐将！

天地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人与人当然也不例外。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光弼就是史思明命中注定的天敌，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梦魇。

史思明的梦魇

史思明，本名窣干，跟安禄山一样，都生于营州，都是“杂种胡人”，而且巧合的是，两个人的生日只隔一天——史思明早一天生，安禄山晚一天生。从小，两个人就是一对死党，经常联手跟人打架，而且都很凶悍，所以在乡里“俱以骁勇闻”。

据说，史思明长得“姿瘦，少须发，鸢肩伛背，廞目侧鼻”（《旧唐书·史思明传》）。简单说就是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在古时候的戏台上，这副尊容上去演奸臣绝对是不用化妆的。和史思明恰好相反，安禄山从小就生得白白胖胖，虎背熊腰，好像史思明身上的肉都长到他身上去了。可以想象，当这一胖一瘦两兄弟肩并着肩招摇过市的时候，整条街上的人肯定都会向他们行注目礼。如果那时候有相声、小品什么的，这哥儿俩往那一站，就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绝佳拍档。

成年以后，史思明和安禄山就很少在街上跟人打架了，而是专心致志地学起了外语（蕃语）。估计俩人没少互相勉励、互相督促什么的，所以安禄山很快就掌握了六门外语，而史思明不多不少，恰好也学会了六门。

掌握多门外语后，他们就学以致用，一起跑到边境集贸市场上当了贸易中介（互市牙郎）。可惜他们财运不佳，干了好些年也没发财，于是安禄山就又找了一个副业——偷羊。晚上偷羊，白天卖羊。为了早一天出人头地，安禄山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史思明是否参与了安禄山的偷羊活动，但根据这哥儿俩的关系推测，不

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们哥儿俩干活时肯定也有明确分工。安禄山脑子好使，可身子太胖行动不便，所以事前的踩点、下手时的望风、事后的销赃等工作，估计都由他负责；而史思明身轻如燕、反应敏捷，最适合干那些飞檐走壁、翻墙扒门的具体工作。总之，哥儿俩有羊一起偷，有钱一块挣，配合得相当默契。

但是，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时候。有一回，他们就失手了。安禄山当即被人绑赴幽州节度使公堂问罪，史思明可能是身子轻跑得快，没被逮着。

不过，史思明肯定也吓得半死。他一定以为，这一生再也见不着与他情同兄弟的安胖子了。

可让史思明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安胖子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身上还多出了一样东西——军装。

一身威风凛凛、帅呆酷毙了的军装。

安禄山凭着临死前一声绝望的怒吼，显示出了异于常人的胆色，因此博得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赏识，从而大难不死、转祸为福，成了张守珪麾下的一员捉生将。而一直与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史思明也随之进入了军队。

从此，这对难兄难弟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他们施展拳脚、尽情挥洒的舞台。

在这个全新的人生平台上，史思明和安禄山再次并肩战斗，随后频立战功，屡获升迁。到了天宝初年，安禄山已官至平卢节度使，摄御史中丞；史思明也位居将军、“知平卢军事”，相当于安禄山麾下的头号武将。

当时，史思明曾奉安禄山之命入朝奏事，得到了玄宗的亲自接见。爱屋及乌的玄宗与史思明一番攀谈之后，对他这个人很感兴趣，就询问他的年龄。史思明用一种略带伤感的口吻答道：“已经四十岁了。”

接下来，玄宗做出了一个让史思明完全始料未及的举动。只见玄宗忽然走到他面前，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卿贵在后，勉之！”（《旧唐书·史思明传》）

毫无疑问，这是玄宗对史思明的一种许诺。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口许诺，史思明顿时受宠若惊。

不久后，玄宗果然颁下了一道任命状，擢升史思明为大将军、北平太守。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经过安禄山的奏请，玄宗又将史思明提拔为平卢都知兵马使。

然而，“平卢都知兵马使”绝不是史思明一生富贵的终点。

若干年后，当李唐朝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铲除了安禄山父子的伪燕朝，这个“鸢肩伛背，嵚目侧鼻”的史思明便又紧步安禄山之后尘，在范阳登基，“僭称大号”，成为又一个与唐朝分庭抗礼的伪燕皇帝。

卿贵在后……

果不其然！玄宗绝不会想到，他当年的一句无心之语，到最后竟然会一语成谶。

天宝十五年二月中旬，李光弼率朔方的番、汉步骑混合兵团一万余人，加上途经太原时征召的神射手三千余人自井陉关东出，进抵常山。

风闻河东援军已至，常山的抵抗力量立刻起兵响应，俘获了燕朝常山太守安思义，随后押着他出城迎接河东援军。

李光弼看着被五花大绑的安思义，说：“你知不知道你该杀？”

安思义闭目不语，一脸桀骜之色。

李光弼接着说：“你久经战阵，依你看来，我现在这支部队，是不是史思明的对手？假如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有什么可取之策，我可以不杀你。”

安思义闻言，立刻睁开眼睛，略微沉吟，说：“大夫（李光弼任摄御史大夫）兵马远道而来，必然人困马乏，若仓促与强敌交手，恐怕抵挡不住。而今之计，最好是率部入城，加强防御工事，等有了必胜的把握再出兵。胡骑的战斗力虽然很强，但他们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必定难以持久，一旦不能获胜，军心就会离散，到时候便可出手反击。史思明目前在饶阳，距此不过二百里，昨夜我已向他发出紧急文书，其前锋明晨必至，而大军也会紧随其后，大夫不可不严加防备。”

李光弼深以为然，当场释放了安思义，然后命全军即刻进驻常山。

在战场上，要杀一个俘虏很容易，可要获取一条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却很难。李光弼这么做，既显示了他的宽仁，又得到了有用的情报，实在是高明之举。

安思义的话里面，至少有两条信息，对刚刚进入河北战场的李光弼至关重要：一、燕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二、史思明马上会解除饶阳之围，转攻常山。

有了这两条信息，李光弼就知道该怎么对付史思明了。

次日凌晨，燕军前锋果然呼啸而至。紧接着，史思明也亲率两万余骑进抵常山城下。

此时的唐军早已严阵以待。李光弼派遣五千步兵出东门迎战，燕军根本没把这几千唐军放在眼里，两万多骑兵蜂拥而上，准备一口吃掉这支唐军，然后自东门攻入城中。

李光弼在城楼上望着黑压压的燕军，嘴角掠过一抹冷笑。他大手一挥，早已准备就绪的五百名神射手立刻冲上城头。刹那间，如蝗箭矢纷纷射入敌阵，冲在最前面的燕军骑兵随即倒下一大片。史思明见状，赶紧率部后撤。

然而，李光弼绝不会让他喘气。就在燕军退却的同时，李光弼已经把一千名弩手分成四个梯队，命他们出城攻击。之所以把弩手分成四队，是为了保证攻击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前排弩手发射箭矢的时候，后排弩手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装填箭矢，四个梯队循环交替，连续攻击，其作战方式类似于近代欧洲的火枪兵。

燕军虽然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可面对唐军一阵紧接一阵的漫天箭雨，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不得不再度退却，撤至官道北面。

李光弼派出五千手持长枪的步兵，命他们在道南结成长枪阵，然后将弓弩手置于方阵之中，继续向燕军发起进攻。

史思明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是头一回吃这么大的亏。他这个人的脾气本来就急躁，现在一早上又被李光弼连续击退了两次，顿时恼羞成怒，于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向唐军发起冲锋。

可是，史思明这么干等于是在找死。

因为，唐军与燕军之间不仅隔着一条官道，而且还隔着一条滹沱河，唐军的箭矢可以隔河射向燕军，可燕军的骑兵却必须涉过河流才能冲到唐军面前。虽然流经常山的这个河段水流缓慢，泥沙淤积，骑兵可以涉河而过，但这个天然的阻隔还是极大地延缓了燕军的冲锋速度。

所以，当燕军骑兵疯狂冲向南岸的时候，唐军的箭雨已经把他们一半以上的人射倒在了滹沱河中。即使有少部分人冒死冲到了唐军的方阵前，如林的长枪还是把他们一个个都挑落马下。

史思明不甘失败，一次又一次命令部队发起冲锋。可是，除了在滹沱河和唐军阵前扔下一片又一片的尸体之外，他什么便宜也没有捞着。

眼看自己的两万多骑兵已经死伤大半，史思明才不得不停止了这种自杀式冲锋，下令部队向北退却，找一个地方休息吃饭，同时等待正在南下的步兵。

短短一个上午的三次交手，已经让史思明结结实实地领教了李光弼的厉害。

有生以来，史思明还是头一次遭遇如此惨痛的失败。

当然，史思明是不会轻易承认失败的。在他看来，自己只是犯了大意轻敌的毛病，仅率领骑兵轻装疾进，才会吃这种单一兵种作战的亏。所以，只要等后续的步兵前来会合，他一定能够对李光弼实施反击。

待会儿，咱们弓箭对弓箭，长枪对长枪，骑兵对骑兵，看看到底谁厉害！

史思明咬牙切齿地想。

然而，此时的史思明绝对无法料到——从饶阳火速赶来的那支援军，马上就将被李光弼一口吃掉。

燕军第三次后撤时，李光弼并没有追击。

因为他料定，敌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

果然，燕军退去不久，常山北面的一个村民就火急火燎地赶来报信，说饶阳方向来了一支燕军步兵，人数大约五千人，已经进抵九门县（今河北藁城市西北）南面，正在一个叫逢壁的地方休息，转眼就会与史思明的骑兵会合。

李光弼闻报，当即决定赶在燕军会合之前，对停留在逢壁的这支敌军发动突袭。随后，李光弼派出步、骑兵各两千人，不带军旗战鼓，沿着滹沱河隐蔽前进，悄悄摸到了逢壁。此时，这支一昼夜赶了一百七十里路的燕军早已人困马乏、饥渴难耐，有的正倒头呼呼大睡，有的正忙着生火做饭。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支唐军特遣队已经悄悄摸到他们身边，并且把屠刀架到了他们脖子上……

这一天中午，在逢壁歇脚的这五千名燕军官兵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全部被唐军砍下了脑袋。

五千余人，没有一个幸免。

听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时，史思明半天也没有回过神来。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碰上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只是史思明并没有料到，从这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的终点，这个对手将与他死死地纠缠在一起，让他一次次品尝挫折的滋味，一次次咀嚼失败的苦果，并且深深感受什么叫作刻骨铭心的耻辱……

李光弼，似乎生来就是史思明的天敌，也是他的梦魇。

五千援兵全军覆没之后，史思明再也不敢恋战，慌忙率领部撤至九门县。

此次战役，李光弼不仅一举克复常山，而且迫使燕军解除了饶阳之围。当时，常山下辖九个县，经此一役，有七个县回到了唐军手中，燕军所控制的，仅剩下九门、藁城两县。

李光弼一到河北就打了这么一场漂亮仗，这无论是对于一度消沉的河北抵抗力量，还是对于一夕数惊、神经早已高度紧张的玄宗朝廷，都无异于一针令人振奋的强心剂。

接下来的日子，随着河北战局的逆转，以及各地唐军的英勇反击，整个战争的形势变得对李唐朝廷越来越有利。与此同时，一度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安禄山，忽然发现自己的情况越来越不妙了。

无论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上，胜利的消息都越来越少，而进攻受阻或遭遇失败的战报则一封接一封地递进他在洛阳的皇宫。

安禄山感到了恐惧。

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恐惧——这刚刚披上身的黄袍，究竟还能穿几天？

四面楚歌：安禄山的恐惧

自从常山失陷、颜杲卿殉国后，仍然坚守在平原郡的颜真卿就有了一种孤掌难鸣之感。

当时，李光弼的河东援军尚未进入河北，史思明、蔡希德等燕军正横扫燕赵大地，颜真卿苦于势单力孤，自保尚且不暇，根本无力对燕军进行反击，所以心里颇为懊恼。

就在这个时候，从附近的清河郡来了一个叫李萼的年轻人。

他打算来跟颜真卿借兵。

清河郡位于平原郡的西南方，与平原相距大约只有二百里，可谓唇齿相依。此郡目前虽仍在唐军手中，但它一旦陷落，平原也就危在旦夕了。此外，尤其重要的是，朝廷很早就在清河设置了一个超大型的战备储藏库，其中囤积了每年从江淮、河南等地收缴上来的钱粮布帛，同时还储存了大量军资器械，在当时被称为“天下北库”，其目的是专为北部边疆各军提供充足的战备资源。截至李萼来见颜真卿的时候，这个军需库里仍然存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兵器铠甲五十余万套。可想而知，一块这么大的肥肉挂在清河，燕军肯定是垂涎欲滴的。无论是北边的史思明，还是南面由安禄山任命的魏郡太守袁知泰，都随时有可能出兵进攻清河。

所以，清河的士绅父老才会委托李萼来跟颜真卿借兵。

李萼这个人刚刚二十出头，年纪不大，可说话的口气不小。他先是恭维了颜真卿一番，什么“首唱大义，河北诸郡恃公以为长城”等等，然后把北库储藏的物资数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颜真卿，紧接着又说：“即便是保守估计，清河的财富至少也是平原的三倍，军事物资至少是平原的两倍。”说完这些，李萼才道明来意，“颜公若能拨给清河一部分兵力，安抚当地父老，则清河、平原二郡，皆可作为您的腹心，而周边各郡县，就会像您的四肢一样，完全听从您的指挥。”

其实，就算李萼不告诉他这一些，颜真卿也很清楚清河的重要性。

可问题在于——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沉吟半晌后，颜真卿面露难色地说：“平原郡所有的军队，都是不久前刚刚招募的新兵，几乎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恐怕自保都有困难，如何援助清河？”说到这里，颜真卿忽然又话锋一转，“不过，我们也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我真的借兵给你，你打算怎么做？”

毕竟，组织力量反击燕军一直是颜真卿日思夜想的事情，如果眼前这个年轻人真有能力，也未尝不能考虑与他联手。

然而，面对颜真卿的试探，李萼却显得很不高兴。他说：“清河父老委托我来找您，并不是自己没有实力，想依靠您的军队抵抗叛军，而是因为仰慕您的高义，希望与您共图大业。如今您连一个准信都不敢给我，我又怎么能轻易说出我的计划？”

听到这句话，颜真卿立刻对这个李萼刮目相看。

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城府显然比一般人深得多。

在颜真卿看来，心里藏得住事的人，就有可能是会做事的人。

可遗憾的是，这只是颜真卿一个人的想法。他身边大大小小的将吏都对这个年少轻狂的李萼极为反感。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颜真卿——别理这小子，燕军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分给他兵力，只能徒然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头来还一事无成！

颜真卿迫于众人的一致反对，最后只好拒绝了李萼。

李萼愤然回到宾馆，马上提笔给颜真卿写了一封措辞激烈，并且充满了威胁意味的信。他说，“清河没有投靠叛军，一直坚持站在朝廷这边，如今还自愿向贵军奉送钱粮布帛和军资器械，可您不但一口拒绝，而且还疑神疑鬼。现在我把话挑明了吧，我回去后，清河势必难以在两强之间长久保持孤立，最后只能投靠某一方。到那时候，清河就成了平原眼皮底下的一个劲敌，您难道不为今天的决定后悔？”

如果碰上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李萼说这种话等于自杀。

因为，这封信不但极大地触犯了别人的尊严，而且还公然发表了投敌言论，实在是有点玩火自焚的味道。在这种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人家要是栽他一个叛国投敌的罪名，随便把他抓来一刀咔嚓了，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幸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萼，碰上的是为人正直、性情宽厚的颜真卿。所以，他不但不会被人一刀咔嚓，反而凭借这封信，促成了颜真

卿借兵给他的决心。

关键是李萼信中的最后一句话，一下子点醒了颜真卿——清河既可以成为平原的盟友，也可以成为平原的敌人！所以，李萼此行与其说是有求于平原，还不如说是在给平原一个机会。

要结盟还是要树敌，就看你颜真卿当下的选择了。

想到这一层的时候，颜真卿顿时有些心惊——自己只顾着随顺众人的意见，差一点就铸成了大错！

随后，颜真卿立刻赶到宾馆会见李萼，然后点选了六千名士兵给他，并且一路把他送到了平原与清河的交界处。握手话别的时候，颜真卿最后又问了一句："士兵我已经给你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

李萼胸有成竹地笑了，说："听说朝廷已派遣程千里率十万精锐，自崞口（今河南林州市西南）东进，但叛军据守险要，竭力阻击，以致官军无法前进。我打算先率部进攻魏郡（今河北大名县），擒获安禄山任命的太守袁知泰，迎回原太守司马垂，推其为河北西南部的义军首领，然后分兵打通崞口，迎接程千里兵团进入河北，继而克复汲郡（今河南卫辉市）、邺郡（今河南安阳市），最后北上直捣范阳。同时，平原、清河两郡可率领各联盟郡县的兵力，集结十万人，南下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黄河渡口），再沿河西进，分兵据守险要，切断安禄山的北归之路。总之，此次官军进入河北的兵力，不下二十万；河南义兵北上者，应该也有十万之众。颜公只要上疏朝廷，让潼关守军坚壁清野，不要出战，我相信用不了两个月，叛军一定会人心离散，猜忌内讧，最后从内部崩溃。"

听完李萼这一番完整而详尽的战略规划，颜真卿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好！"

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颜真卿今天算是见识了一回。

虽然李萼的情报在具体细节上并不完全准确（奉命驰援河北的人并非程千里，而是李光弼和郭子仪），但他对此后整个战局的判断和预测却是惊人的准确，尤其是后来河北形势的演变给燕军造成的强大的心理压力，更是被他一语料中。假如玄宗朝廷最后能够确保潼关不失，那么这场战争的结局肯定会像李萼所预料的那样——叛军北归无路，最后自行崩溃。然而，潼关最后还是丢了，所以战争只能彻底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此刻，颜真卿已经被李萼的一番战略构想激励得心潮澎湃，当即按照他的计划，命麾下将领李择交、平原县令范冬馥，率平原兵六千，会同李萼的清河兵四千、博平兵一千，即刻进驻堂邑（今山东聊城市西），准备进攻魏郡。

燕朝的魏郡太守袁知泰闻报，马上派部将白嗣恭率两万多人前来迎战。双方随即在堂邑展开激烈战斗。唐军的兵力虽然只有燕军的一半，而且多数是新兵，但他们的英勇和顽强还是极大地弥补了兵力和战斗力的不足。两军激战了一天一夜，最后燕军大败。唐军斩杀燕军一万余人，俘敌千余，缴获战马千匹、军资器械无数。

这一仗，袁知泰几乎已是倾巢而出，如今既已遭遇惨败，魏郡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袁知泰赶紧脚底抹油，一溜烟逃到了汲郡。唐军遂乘胜而进，兵不血刃地克复了魏郡，一时间声威大振。

随后，颜真卿又与北海（今山东青州市）太守贺兰进明联手，出兵克复了信都郡（今河北冀州市）。

至此，曾一度陷入低潮的河北抵抗运动又出现了新的转机。而后，随着李光弼援军的到来和常山的克复，唐军兵威更盛，而燕军在河北的日子则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

自从常山惨败后，史思明就龟缩在九门，不敢再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而李光弼兵力有限，也不敢贸然攻打史思明。于是，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四十多天。一直到天宝十五年四月初，史思明才想出了一个对付李光弼的办法。

他不敢与李光弼正面交锋，于是就利用燕军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屡屡派出小股部队袭击唐军的运输队，到最后竟然完全切断了常山的后勤补给线。

常山城内的粮草日渐匮乏，将士们都吃不饱，而战马则只能吃草席和草垫。李光弼知道这么下去不是办法，随即派出五百辆车前往距离最近的石邑县（今河北石家庄市）运粮，以解燃眉之急。石邑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此时由李光弼部将张奉璋驻守。

为了防备燕军偷袭，李光弼特意让车夫全都穿上铠甲，另派一千弓弩手随行，一路结成方阵保护车队。

唐军的弓弩手是燕军骑兵的克星。奉命前来劫粮的燕军远远望见，一个也不敢靠近。史思明只好命蔡希德率兵攻打石邑，却又被张奉璋击

退。最后，五百车粮草终于顺利运抵常山。

但是，这只是一时救急之策，要想保住常山并扩大战果，就必须彻底打败史思明。为此，李光弼立刻遣使向朔方的郭子仪告急，请他率主力驰援河北。

这一年四月初九，郭子仪在征得朝廷的同意后，率番、汉步骑兵团共十万余人进抵常山。

史思明的噩梦就此降临。

四月十一日，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蔡希德在九门城南展开会战。

自安禄山反叛以来，这是官军与叛军在河北展开的最大规模的会战。此战，唐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且朔方军是一支百战之师，与河北当地的团练和义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一战的结果可想而知。唐军大获全胜，中郎将浑瑊在战斗中射杀了燕军大将李立节，史思明带着残部逃奔赵郡（今河北赵县），蔡希德则一口气逃到了巨鹿（今河北邢台市）。

赵郡和巨鹿都在九门的南面，史思明和蔡希德南逃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逃回燕军大本营洛阳。可跑到赵郡时，史思明忽然改变了主意。因为逃到洛阳就等于放弃河北，而放弃河北就等于承认失败，这不仅意味着他在河北将近半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而且安禄山肯定也不会轻饶了他。

思虑及此，史思明只好掉头北上，逃往博陵（今河北定州市）。当时博陵已经反正，但是守军不多，史思明攻入城中后，为了泄愤，一下子把全城的官吏诛杀殆尽。

史思明的暴行激起了河北诸郡的义愤，于是各地的老百姓纷纷组织义勇军，群起抗暴，多则两万人，少则一万人，各自修筑营寨堡垒，处处阻击燕军。

河北的燕军一下子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与之相反的是，凡郭子仪、李光弼军所到之处，各地义勇军无不争相效命。

四月十七日，郭、李军团进抵赵郡，只用了一天时间，便轻而易举地将其攻克。朔方军涌入赵郡后，相当一部分士兵无视军纪，开始劫掠

财物，李光弼大为光火，亲自坐到城门口，见一个抓一个，把他们抢劫的财物悉数没收，然后一一发还给百姓。

唐军克复赵郡时，俘虏了四千名燕军士兵，郭子仪下令全部释放，只斩杀了安禄山任命的赵郡太守郭献璆。

毫无疑问，郭、李二人的宽仁之举极大地赢得了民心。

郭子仪和李光弼之所以会成为备受后人称颂的千古名将，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征善战，也不仅是因为他们通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同时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体恤百姓，尊重生命。

无论在哪个时代，军人都不应该成为嗜血的屠夫。因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止杀。所以，一个真正优秀的军人，应该在坚硬的铠甲下面，包藏一颗悲悯之心。

郭、李军团在赵郡稍事休整之后，随即北上围攻博陵。史思明率众死守，唐军连攻十天未能得手，军中开始缺粮，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撤回常山。

就在唐军南撤的时候，史思明自以为反击的机会来了，立刻率部尾随。郭子仪一边不慌不忙地撤退，一边不断派出精锐骑兵回头阻击，史思明丝毫捞不到便宜。

燕军就这样尾随唐军走了三天三夜。到达行唐（今河北行唐县）附近时，史思明看见士兵们一个个疲惫不堪，再也无力追击，只好命部队掉头返回博陵。

稍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史思明以为唐军早已南撤，完全放松了警惕。可是，当他们刚刚走到沙河（滹沱河支流），郭子仪却突然率部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原本是燕军追击唐军，现在反而是唐军在追击燕军。史思明猝不及防，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九门会战惨败后，蔡希德一口气逃回了洛阳，向安禄山禀报了河北的战况。

安禄山大为震骇，对于河北的局势顿时忧心忡忡。

值此用人之际，安禄山也顾不上追究蔡希德的战败之责了，赶紧又拨

给他步骑两万人，命他即刻返回河北，与史思明会合。同时，安禄山又向留守范阳的牛廷玠发出紧急命令，让他再派一万多人，火速南下驰援史思明。

到了这一年五月，几次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史思明又抖擞起来了。因为南北两路援兵到达后，他麾下的兵力总计已经超过了五万人。

当时，唐军仍然保持着进攻态势，郭、李兵团已经攻占了博陵西北的恒阳（今河北曲阳县）。史思明随即出动大军，把恒阳团团包围。郭子仪采取了深沟高垒、避实就虚的战术，白天只命士兵坚守城池，拒不出战，等晚上燕军睡觉时，再出动奇兵偷袭。

唐军天天这么搞，把燕军士兵搞得一个个神经衰弱，痛苦不堪。

数日后，郭子仪和李光弼知道燕军军心已然不稳，遂大举反攻。

五月二十九日，唐军与燕军在嘉山（曲阳县东北）进行决战。由于燕军官兵早已被郭子仪的疲劳战术弄得头昏脑涨、四肢无力，连走路和骑马都没精神，更不用说上阵打仗了，因此这一战燕军再度惨败，被斩首四万余级，被俘千余，几乎全军覆没。

史思明也很惨。他的坐骑被射死，头盔被打掉，连靴子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只好披头散发，光着脚丫，拄着一杆短枪落荒而逃。

安禄山煞费苦心替史思明攒足的本钱，就这样又一次被他打了水漂。史思明感到了耻辱。

嘉山会战，是史思明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场奇耻大辱！

一直要到四年后，在洛阳城北的邙山脚下，史思明利用唐军将领仆固怀恩犯下的错误，才终于击败了李光弼，洗刷了嘉山脚下的这场奇耻大辱。

嘉山大捷之后，郭子仪和李光弼乘胜进围博陵。史思明始终龟缩在城中，只剩下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随着唐军在河北的节节胜利，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诛杀了安禄山任命的太守，十几个郡宣布光复。

至此，燕赵大地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朝廷手中，范阳与洛阳的联系彻底断绝。往日，在官道上纵横驰骋的燕军骑兵都消失了，只有时不时看见一两个信使偷偷摸摸地从小路疾驰而过，但其中的大多数还是被各

地官兵截获斩杀，能溜过的漏网之鱼少之又少。

驻守在洛阳的燕军将士顿时人心惶惶。

因为他们的家人都在范阳，而今南北路绝，连一封家书都递不到，又岂能不让他们愁肠百结？

一种无可救药的思乡病顿时像瘟疫一样，开始在洛阳的燕军中迅速蔓延。

而燕朝皇帝安禄山此时的心境，也不比士兵们好多少。仿佛在一夜之间，安禄山那称霸天下的雄心就悄然萎缩了。

因为这些日子，来自四面八方的战报实在是让他寝食难安。

西面，他的兵锋受阻于潼关，不能向关中前进半步；西北，他的党羽高秀岩从一开始就没打过胜仗，根本无法有效牵制唐军；西南，唐军层层设防，屡破燕军，使他“下南阳，取武关，经蓝田绕袭长安”的计划始终未能得逞；南面和东南，他的部队也遭到了各路唐军的顽强抵抗，无法顺利进军荆楚和江淮，使他占据江淮一带财赋重镇的希望化成了泡影；而最惨的当然就是河北了，自从郭子仪和李光弼进入河北后，史思明就成了一只无头苍蝇，一次次被打得晕头转向、满地找牙，不但把起兵初期打下的地盘全丢光了，而且让老巢范阳彻底暴露在了唐军的眼皮底下……

什么叫四面楚歌？

这就叫四面楚歌！

安禄山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才当了几天皇帝，为什么形势就坏到了这般地步呢？

早知道这样，老子还不如一辈子在范阳当土皇帝，也不至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到了阴曹地府还要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

安禄山后悔了。

自从起兵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后悔过。

被恐惧、忧愁和悔意折磨得坐立不安的安禄山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些年来一直撺掇他造反的高尚和严庄叫到面前，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

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高尚和严庄吓得面无人色，一连好几天都不敢入朝。

随后，安禄山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件事情——撤军。

如果局势始终未能好转，安禄山只能放弃洛阳，回保范阳。也就是说，只有躲进经营多年的老巢范阳，他才能避免兵败身死的命运。

假如安禄山真的实施了这个撤军计划，那么“安史之乱”也许就不存在了。

只可惜，计划并未实施。

因为短短十天之后，安禄山的所有恐惧和忧愁便都一扫而光了，取而代之的是比此前更为强烈的自信。

究竟是什么挽救了安禄山？

答案很简单——潼关被燕军攻克了。

哥舒翰：生死潼关

自从高仙芝和封常清率唐军退入潼关，安禄山便命大将崔乾祐进驻陕郡，牢牢盯着这座关中门户。哥舒翰接手潼关防务后，只一意修筑工事，深沟高垒，严防死守，从不出战。安禄山屡命崔乾祐出击，其中一次还派了次子安庆绪亲自到前线督战，可潼关不愧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燕军的数次进攻都被据险固守的哥舒翰一一击退。面对这道铜墙铁壁，崔乾祐只能干瞪眼，“数月不能进”，与哥舒翰形成了对峙相持的态势。

在此情况下，只要哥舒翰始终坚壁清野，保证潼关不失，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又乘胜北上、直捣范阳，燕军军心就会瞬间瓦解，安禄山的末日也就到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唐朝廷内部却出现了一个致命危机。

危机源于杨国忠和哥舒翰的相互猜忌。

众所周知，安禄山起兵打的是讨伐杨国忠的旗号，而当时朝野上下也一致认为，就是因为杨国忠恃宠擅权、跋扈专断，逼得安禄山狗急跳墙，才导致了这场空前的大祸乱，所以很多人都对杨国忠咬牙切齿，必欲诛之而后快。

哥舒翰麾下有一个部将叫王思礼，就屡劝哥舒翰上表朝廷，要求诛杀杨国忠以谢天下。可哥舒翰始终没有答应。因为他很清楚，现在杀杨国忠除了泄愤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更何况大敌当前，自己人更不能搞窝里斗。

王思礼以为哥舒翰怕事，就自告奋勇，说他愿意带领三十名骑兵入京，秘密绑架杨国忠，然后抓到潼关杀了。哥舒翰狠狠瞪了王思礼一眼，没好气地说：“你这么干，造反的就是我哥舒翰，不是安禄山了。”

然而，让哥舒翰没有想到的是，他这边处处以大局为重，尽量摒弃个人好恶，可杨国忠那边却早就对他起了猜忌之心。

自从玄宗把将近二十万兵马交到哥舒翰手中后，杨国忠的心就悬起来了。

在他看来，关外的安禄山对他固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此刻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又何尝不是呢？现在满大街的人都在叫嚣要杀他杨国忠，哥舒翰会不会趁此机会反戈一击，拿他杨国忠的人头去收买天下人心呢？杨国忠觉得可能性很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哥舒翰其实比安禄山更让杨国忠感到恐惧。因为安禄山远在千里之外，而哥舒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对于这种态势，就连杨国忠身边的幕僚都替他心惊不已。有人就跟他说：“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杨国忠再也坐不住了，立刻上奏玄宗，说：“如今潼关大军虽然兵力强盛，可万一失利，京师就危险了。臣请求从皇宫下属各部门（“监”“牧”“坊”“苑”等）人员中挑选出三千精壮，加以训练，以备不测。”

玄宗当即照准，并命剑南道（当时剑南节度使仍由杨国忠遥领）将领李福德统御这支后备队。随后，杨国忠又另外招募了一万人，命亲信将领杜乾运率领，进驻灞上（今西安市东灞河河畔），名义上是防备

叛军，实际上是防备哥舒翰。

杨国忠的举动一下子就把哥舒翰惹毛了。

老子在前面浴血奋战，你却在背后拿刀顶着老子，这算什么事儿？

哥舒翰本来一直以大局为重，可眼下也不免要担忧个人的命运了。谁都知道，杨国忠既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又是玄宗跟前的头号宠臣，玄宗现在什么事都听他的，万一杨国忠真想除掉哥舒翰，只要怂恿玄宗下一道诏书，立马可以让他步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尘，然后再让心腹将领杜乾运接手潼关防务。

换言之，杜乾运就是一颗进可攻、退可守的棋子，杨国忠把他置于哥舒翰背后，目的就是要让哥舒翰陷入彻底被动。

哥舒翰不是傻瓜，当然不会任由杨国忠摆布。

他决定吃掉这颗棋子，给杨国忠一点颜色瞧瞧。

杜乾运刚进驻灞上没几天，哥舒翰就上奏玄宗，要求将杜乾运的这支部队划归潼关统一指挥。玄宗根本没意识到这是哥舒翰和杨国忠在暗中角力，而是认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当即表示同意。

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一，哥舒翰借故把杜乾运召到潼关，然后随便栽个罪名就把他杀了。消息传回长安，杨国忠大惊失色。

他万万没料到，哥舒翰竟然会如此胆大妄为，心狠手辣！

有道是打狗也要看主人，哥舒翰这么干，摆明了就是在警告杨国忠，同时更是在对他发出挑战。杨国忠现在越发相信——接下来，哥舒翰随时有可能带兵入朝，以“清君侧”的名义，取他杨国忠的颈上人头！既然如此，杨国忠当然要先下手为强了。

要除掉哥舒翰其实很简单，甚至都不用杨国忠动手。他只需动动舌头，怂恿玄宗下诏，命哥舒翰出关与燕军决战，哥舒翰自然就会死得很难看了……

至此，杨国忠和哥舒翰已经从相互猜忌、相互戒备发展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

这两个李唐朝廷的股肱重臣，一个大权独揽，一个重兵在握，可他们并没有把矛头共同指向潼关外面的敌人，而是掉转方向，彼此指向了

对方。

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里，李唐君臣将用血的事实和惨痛的教训，再一次向我们证明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在杜乾运被哥舒翰诱杀的第二天，玄宗忽然接到了一份情报。情报称叛军大将崔乾祐驻守陕郡的兵力不超过四千人，而且都是老弱残兵，防守异常薄弱，官军应抓住战机大举反攻。玄宗大喜，立即派遣使臣到潼关宣诏，命哥舒翰即刻率部东征，进攻陕郡，克复洛阳。

史书没有记载这份情报的来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份情报是错误的。

更准确地说，这份情报纯粹是捏造的。

因为，崔乾祐作为燕军西进关中的前锋，其兵力虽然不会很多，但至少也在两万到三万之间；更重要的是，崔乾祐麾下的部众都是骁勇强悍的百战之兵，属于燕军中的野战劲旅，尤其是其中的同罗骑兵，更是精锐中的精锐。所以，实际情况绝非那份可笑的情报所说的那样，什么兵力不满四千，还什么老弱病残、防守薄弱云云，完全是扯淡，并且是别有用心的扯淡！

那么，这份别有用心的情报又是谁捏造的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除了杨国忠，没有人会这么做，也没有人敢这么做。

杨国忠捏造情报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哥舒翰出关决战。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稍具军事常识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份所谓的情报基本上就是一张废纸，不仅不会受其蛊惑，还有可能会把提供情报的人抓起来，以谎报军情、欺君罔上的罪名论处，甚至还会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挖出来。

然而，面对这份不值一哂、别有用心的“情报”，玄宗李隆基居然就信了，并且还据此作出了事关整个战局的重大决策。

是玄宗老糊涂了吗？

这个因素固然有，但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此刻的玄宗迫切希望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挽回他早已失落的自尊，来抚慰他极度受伤的心灵。

所以，任何有利于朝廷发动反攻的信息，玄宗都会相信它是真的。

杨国忠很可能正是摸透了玄宗的心思，才大胆捏造了这份假情报。

接到玄宗下令东征的诏书后，哥舒翰蒙了。就目前的战局而言，这无疑是最弱智、最可笑、最不合理的一个决策。

哥舒翰不敢耽搁，连夜起草了一道奏疏，让使者回禀玄宗。他在奏疏中说："安禄山久经战阵，军事经验非常丰富，此次叛乱蓄谋已久，他岂能不作充分准备？如果说陕郡的兵力薄弱，那也必然是以此引诱我军出击，一旦我们真的出击，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而且，叛军千里而来，利在速战速决；我军据险而守，利在打持久战。更何况，叛军残暴，久之必失人心，兵力也会萎缩，迟早会发生内乱，我们只要静观其变，到时候乘虚而入，定能不战而生擒安禄山。总之，我们的目的是求胜，不是求快！如今，向各道征调的军队都尚未集结，还是应该再等一段时间。"

就在哥舒翰呈上奏疏的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也向玄宗提出了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我军正计划北上，直捣范阳，覆其巢穴，俘虏叛军的妻儿老小作为人质，以此向他们招降。届时，叛军必定会从内部崩溃。至于潼关大军，只要坚守阵地，把叛军拖住，让他们筋疲力尽就够了，千万不可轻易出击。"

两份来自前线的奏报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个相同的战略，那就是——坚守潼关。

只要玄宗能够虚心接受这四个字，那么后面的历史很可能就将全盘改写。

可惜，玄宗并不接受。

他一心只想着快速反攻，光复东京，彻底洗刷安禄山带给他的耻辱。所以，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观望拖延。此外，杨国忠又整天在他耳边吹风，说眼下叛军毫无防备，绝不能让哥舒翰逗留延宕、贻误战机云云，玄宗心里就更是急不可耐，随即不断派遣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

此后的两三天里，玄宗接连派出了几十拨传诏使者奔赴潼关。往往是前面一拨刚刚宣完诏书，后面一拨紧跟着又到了。（《资治通鉴》卷

二一八：“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

那几天，哥舒翰耳边始终只回荡着两个字：出关、出关、出关……

这两个字无异于死神的召唤。

然而，军令如山，圣命难违。即便哥舒翰明知道只要迈出潼关一步，就等于迈进了鬼门关，可他也只能怀着满腔的无奈和悲怆往前迈！

天宝十五年六月初四，哥舒翰“抚膺恸哭”，然后挥着眼泪“引兵出关”（《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前方的道路阳光迷离，野草萋萋，十八万大军在沟深坡陡、狭窄逼仄的峪道上缓慢前行。时值盛夏，空气燠热凝滞，一丝风也没有，所有的军旗全都无精打采地垂在旗杆上。士兵们步伐沉重，挥汗如雨，连战马都显得异常烦躁，一个劲地喷着响鼻。

哥舒翰策马走上一面高坡，久久地凝视着从他脚下走过的一队又一队士兵。

他们都长着不一样的面孔，可他们脸上却有着如出一辙的表情——无奈而茫然。哥舒翰知道，现在自己脸上肯定也是这种表情，因为他和这十八万将士一样，正在走向同一个未知的宿命。

最后，哥舒翰下意识地向西遥望了一眼。

忽然间，他的心头掠过一阵莫名的惊悸。

因为，潼关上空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飘荡。

哥舒翰仿佛看见，高仙芝和封常清的亡魂正在潼关上空凄凉地飘荡。他们似乎想跟哥舒翰说什么，可哥舒翰始终无法听见……

灵宝之战

大军出潼关后，整整走了三天，才到达灵宝（今河南灵宝市东北）西原。此处名为西原，实际上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而是北有黄河之险，南有崤山之阻，中间仅有一条狭窄的隘道，而且长达七十里。

很显然，这样的地形对于大兵团的行军是极为不利的。哥舒翰的十八

万大军不仅不能展开，而且很容易在隘道中成淤塞之势。

更为致命的是，敌人如果在这个地方打伏击，十八万唐军势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为任人宰割的十八万头羔羊。

如此得天独厚的伏击地形，如此难得的全歼唐军的机会，崔乾祐会放过吗？

当然不会。

他早就在这里张好了一个口袋，就等唐军乖乖往里钻了。

事实上，哥舒翰并非没有察觉到前方的危险。唐军于六月初七进抵灵宝西原的隘口，前锋就与崔乾祐的燕军发生了小规模的遭遇战。既然崔乾祐已经从陕郡移兵至此，那分明意味着——前方七十里长的隘道肯定隐藏着重重杀机。

换言之，唐军必将在此遭遇一场恶战！

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哥舒翰不敢贸然进军，而是命大军在隘口宿营了一夜。假如哥舒翰不是身负东征之命，他一定不会轻易进入隘道，而是会想办法迫使燕军到隘口决战，如此便能避免被伏击的命运。然而，不幸的是：哥舒翰军令在身，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克复陕郡、进军洛阳，朝廷必然会追究他的迁延逗留之责。因此，即便明知道前面的燕军正严阵以待、虎视眈眈，哥舒翰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八日清晨，哥舒翰与部将田良丘先行乘船进入黄河，在河流中央观察敌情。他发现燕军兵力并不太多，才下达命令，让大军缓缓开进隘道。他命王思礼率五万人为前锋，命庞忠等将领率主力十万继之，自己则另率三万人渡过黄河，在北岸的一处高地上擂动战鼓，为南岸的唐军助威。

哥舒翰如此布阵，足见其内心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把大军一分为三，显然是不希望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此外，亲率三万人渡到黄河北岸，一则是以此作为预备队，二则是万一南岸主力遇袭兵败，自己手里头至少还能留一点本钱。从消极意义上说，这是逃命的本钱；从积极意义上说，这也是日后整兵再战的本钱。

尽管哥舒翰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可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战役的结局还是比他预想的要坏得多。

王思礼率前锋进入隘道后，发现前面的燕军最多不过万人，而且十个一伙，五个一堆，“散如流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阵形。

唐军官兵们不约而同地笑了——看来朝廷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崔乾祐的燕军的确是一帮军纪松懈的老弱残兵。

此刻，正在崤山的峭壁上密切监视唐军的崔乾祐也笑了——因为羊入虎口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可想而知了。唐军前锋刚与燕军接战，燕军的散兵游勇就赶紧卷起军旗，抱头鼠窜。唐军士气大振，立即乘胜追击。等到毫无防备的唐军前锋全部进入伏击圈，崔乾祐令旗一挥，无数的巨石檑木自悬崖峭壁上滚滚而下，顷刻间就把大部分唐军士兵砸成了肉泥。剩下的唐军在逼仄的隘道里挤成一团，手中的长枪长槊不仅派不上用场，而且时不时还捅到了自己人身上。

得知前锋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哥舒翰连忙出动早已准备好的毡车，将其推到队伍前列，准备用它们冲开一条血路。所谓毡车，大概是用结实的牛毡裹住车厢，在上面画满骇人的牛头马面，然后在车厢周身插满长枪大刀，锋刃朝外。可想而知，这种战车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应该是很有震慑力和杀伤力的。

然而，崔乾祐似乎早就料到哥舒翰会来这么一手。他命士兵用数十辆装满枯草的车塞住道路，然后纵火焚烧，滚滚浓烟顿时冲天而起。此时已近中午，烈日高悬中天，本来便已酷热难当，加之东风又起，烈焰浓烟一齐冲向唐军，人人睁不开眼目，只能在烟雾中刀枪乱舞，结果杀死的都是自己人。后面的弓弩手看见前方打得热火朝天，以为燕军杀了过来，于是万箭齐发，直到箭囊全都空了，日影西斜，烟雾散尽，唐军官兵们才蓦然发现，前方只有几十辆烧焦的草车，一个燕兵也没有。

而就在唐军草木皆兵、自相残杀的时候，崔乾祐已经派出一支同罗骑兵，从崤山南麓绕到唐军背后，对隘道中的唐军发起进攻。唐军前方被堵，后路被截，顿时彻底崩溃，人人争相逃命，有的丢弃盔甲逃进了山谷，更多的因相互推挤而掉进黄河，纷纷溺毙。一时间，隘道中到处是惨不忍闻的嘶喊和哀号，死亡的喧嚣直上云端，响彻天地……

至此，王思礼的五万前锋基本上全军覆没。

按理说，尽管王思礼遭遇惨败，可唐军还有足足十三万人，和燕军比

起来，在兵力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只要稳住阵脚，调整战术，不见得就打不过燕军。况且，哥舒翰之所以在战前就把兵力一分为三，也是为了降低风险、保存实力，以便在暂时失利后能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哥舒翰的一厢情愿。

因为庞忠等人率领的十万主力一听说前面的五万人全都被燕军吃掉了，顿时士气尽丧，随即不战而溃。而哥舒翰自己率领的三万人也好不到哪去，他们看见南岸的十五万大军死的死、跑的跑，再也无心恋战，于是也跟着一哄而散。

“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瞬息间，两岸皆空。”（《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十八万东征大军，就这样在一天之间风流云散。

哥舒翰怔怔凝望着滚滚东逝的黄河水，感觉一种彻骨的冰凉瞬间弥漫他的全身。

一切难道就这么结束了？

是的，一切都结束了。

绝望的哥舒翰现在脑袋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跑。

天宝十五年六月初八的夜晚，肯定是哥舒翰这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

这天夜里，他带着麾下的百余亲兵一直向西跑，用平生最快的速度拼命向西跑，可脚下的道路似乎永远也跑不到头。

并不遥远的潼关仿佛也被遗落在了另一个世界。哥舒翰明明感觉自己在无限地接近它，却又好像一辈子也无法抵达……

当然，哥舒翰最后还是跑到了。

他其实只用了一个夜晚，可感觉就像用掉了整整一生。

哥舒翰是从黄河北岸往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市南）方向跑，然后从河东郡的蒲津桥越过黄河，经蒲关南下，折向潼关。

在潼关四周，哥舒翰当初为了阻挡燕军，曾动用无数劳力挖掘了三条宽二丈、深一丈的壕沟。可现在，这三条形同天堑的壕沟阻挡的不是

燕军，而是哥舒翰本人。

不过，哥舒翰最终还是过去了。

他过去的时候甚至可以用“如履平地”来形容。

不是哥舒翰会轻功，而是因为有数千人马已经掉了下去，把壕沟填满了。

这数千人马是跟在他身后跑回潼关的残兵。不知道是因为夜色太黑看不清道路，还是因为背后追击的燕军让他们吓破了胆，总之，数千逃兵不顾一切地往前冲，顷刻之间就填满了壕沟。失魂落魄的哥舒翰总算逃进潼关，捡回了一条老命。

在此之后，又有零零星星的残兵侥幸逃回了潼关，总计大概有八千余人。

十八万剩下八千，这就是哥舒翰灵宝一战的惨痛战绩。

哥舒翰知道，靠这八千个早已丢了魂魄的残兵败将，无论如何是守不住潼关的。

所以，他干脆不守了，而是直接越过关城，径直往关中跑。

六月初九，崔乾祐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据了潼关。

长安的门户豁然洞开……

哥舒翰一口气跑到关西驿（今陕西华阴市东）的时候，忽然勒住了缰绳。

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跑了。

因为再跑就到长安了。

一天之间丢了东征大军，一夜之间丢了潼关天险，他有何面目去见玄宗？

所以，他不能跑，只能回头再战。

当然，此刻再战不是为了打赢燕军，而是为了打给玄宗看的。至少要打一个姿态，让玄宗和满朝文武知道，他哥舒翰是苦战不敌才撤回京师的，而不是一路狂奔回来的。

哥舒翰在关西驿张贴告示，向那些逃进关中的散兵游勇拼命打气，表示要重新组织兵力，夺回潼关。

可是，哥舒翰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他麾下的部众不干。

他们知道，现在不管是回头打潼关，还是一路跑回长安，结果都是一个死。既然左右都是死，还不如把哥舒翰绑了，投降燕军，至少还能保住一条命。

随后，哥舒翰麾下一个叫火拔归仁的番将，纠集了一百多个骑兵，把哥舒翰落脚的驿站围得水泄不通，然后进去告诉哥舒翰："叛军杀来了，大帅赶紧上马。"哥舒翰不知是计，慌忙跃上马背，跑出驿站。

一看到堵在驿站口的一百多名骑兵，哥舒翰马上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完了！

他在心里发出了一声悲凉的长叹。

火拔归仁率众跪在哥舒翰马前，说："大帅以二十万之众，一战而尽丧敌手，有何面目去见天子？大帅难道看不见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教训吗？走吧，请大帅跟我们一起东行。"

哥舒翰当然不肯就范，正准备翻身下马，伺机跑路。火拔归仁眼疾手快，立刻上前按住了他，然后众人一拥而上，把他的双脚结结实实地绑在了马肚子上。接着，哗变士兵又把其他不肯投降的将领也一块绑了，径直押到潼关，献给了崔乾祐。

随后，哥舒翰又被押到洛阳，送到了安禄山的面前。

安禄山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看了他很久，然后说："你一直看不起我，现在，不知道你的看法改变了没有？"

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哥舒翰和安禄山就已经势同水火了。他们两人不和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个性，但最重要的，则是因为二者都是胡人，且都是一时名将，还都是深得玄宗宠信的封疆大吏，出于攀比心和竞争意识，彼此自然是看不顺眼。有一次在宴会上，安禄山甚至当众跟哥舒翰翻脸，哥舒翰本来也想跟他干，只是高力士在旁边一直使眼色，才强抑怒火，没有发作，但是和安禄山的宿怨便越积越深了。

当初的哥舒翰又怎么可能想到，若干年后，安禄山竟然摇身一变就成

了燕朝皇帝，而他却只能万般屈辱地跪在这个死对头的面前呢？

哥舒翰的心中翻江倒海，百味杂陈。

当然，他不能流露丝毫。

不但不能流露丝毫，而且还要向安禄山宣示效忠。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哥舒翰只能向这个昔日的仇敌卑躬屈膝，摇尾乞怜！

什么尊严、晚节、君臣大义、一世英名，让它们通通见鬼去吧！眼下，除了把灵魂出卖给这个恶魔，换取苟延残喘的生存，哥舒翰已经别无选择。

他伏地叩首，用一种十足谄媚的语气说：“臣肉眼凡胎，不识圣人，罪该万死！但如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若留臣一命，让臣写信招降他们，不用多久，天下即可平定。”

安禄山闻言大喜，当即任命哥舒翰为燕朝的司空、同平章事，同时把火拔归仁抓了起来，对他说：“你卖主求荣，不忠不义，该杀！”然后就把他一刀砍了。

可是，哥舒翰企图以尺寸之书而招降各方唐军的想法，实在是一种痴心妄想。

他的招降信很快就一一发出去了，然后收回来的，却是如出一辙的鄙视和义愤填膺的痛斥。哥舒翰从各方唐将洋洋洒洒的回信中，只读出了一句话——哥舒翰，你为什么不去死！（《旧唐书·哥舒翰传》：“诸将报书，皆让翰不死节。”）

是啊，我为什么不去死？

死是何等容易，活着又是如此艰难，我为什么不去死？

然而，强烈的求生本能最终还是战胜了哥舒翰的自尊和愧疚，使他仍然选择了卑贱屈辱地苟活，而不是轰轰烈烈地死去。

其实，哥舒翰并非没有选择。在最后的时刻，他完全可以选择像颜杲卿那样坚守大义，壮烈殉国。倘若如此，一代名将哥舒翰留在史册上的声名将永垂后世，万古长青。

可惜，他没有。

哥舒翰戎马半生，曾经活得像一个英雄。可最后一步，他却让残酷的命运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蝼蚁。

不，是他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蝼蚁。

可是，变成一只蝼蚁就能苟活于世吗？

当哥舒翰向各方唐将发出的招降信全都无效的时候，当事实证明他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时候，安禄山还会用高官厚禄养着他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安禄山随后就把他软禁了。又过了几天，安禄山觉得留着这个家伙实在没用，就把他一刀咔嚓了。

哥舒翰就这么死了，死得窝窝囊囊、一文不值，还在身后留下了变节投敌、苟且偷生的千古骂名。相比于含冤而死的高仙芝和封常清，哥舒翰的结局显然更为不堪。高、封二人至少赢得了后人的同情，可哥舒翰却只能招来世人的鄙夷和唾骂。

然而，哥舒翰最后落到这种下场，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吗？是什么力量把他一步一步逼进了这个历史的死角？又是谁，一手造成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这三位名将的人生悲剧？

如果说高仙芝和封常清之死是在为帝国的不幸买单，那么哥舒翰之死则是在替李隆基和杨国忠背黑锅。因为，哥舒翰的变节投敌使他变成了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所以至少在客观上掩盖了玄宗朝廷决策错误的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李隆基和杨国忠在“潼关失守”这件事上应负的历史责任。

不过，老天爷毕竟是公平的。不管你是谁，只要做错了事，迟早总要让你受到惩罚，付出代价。别人也许可以暂时替你买单，暂时替你背黑锅，但是你自己种下的苦果，最终还是要由你自己品尝。

李隆基和杨国忠，马上就将尝到他们亲手种下的苦果……

第七章 逃亡进行时

孤独的长安

潼关其实不是一座关，而是一张牌。

一张多米诺骨牌。

当它岿然不动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假象，让玄宗朝廷自以为手中的牌还很多。可当它轰然倒下的时候，就会引发可怕的多米诺效应，让某种残酷的真相瞬间暴露在玄宗君臣面前。

这种真相就是——李唐的人心散了。

潼关失守后，几乎只在一夜之间，河东（今山西永济市）、华阴（今陕西华县）、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上洛（今陕西商州市）等郡的防御使就纷纷弃城而逃，各地的守军也跟着逃亡一空。从东到西，自北而南，能够拱卫京畿的军事力量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帝京长安，孤零零地兀立在偌大的关中平原上，看上去就像一面华丽而空洞的旗帜……

潼关陷落的当天，就有哥舒翰的部将逃回长安禀报军情，然而玄宗却没有立刻召见。

因为他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

尽管玄宗料定东征军已经完蛋了，可他仍然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希望潼关还在唐军手中。所以，玄宗当天就命李福德率三千监牧兵驰援潼关。

只要守住潼关，就还有时间组织反击，还有机会反败为胜。

然而，玄宗的最后一丝希望转瞬就破灭了。

从李福德出发的那一刻起，一直到这一天的日暮时分，玄宗一次次登上瞭望“平安火”[1]的高台，可直到昏暗的暮色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东方的地平线上始终没有燃起他望眼欲穿的那一簇火焰。

看不到平安火，玄宗心头迅速掠过一阵痛苦的痉挛。

很显然，潼关丢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种无边的恐惧就像这漆黑的夜色一样，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

六月初十，玄宗召集宰相举行了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潼关已失，长安危急，该怎么办？

其他几个宰执大臣相顾骇然，都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杨国忠神色从容，并且不慌不忙地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

他的对策很简单，就一个字——跑。

如果在这个动作前面加上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是——往西南跑。

西南就是巴蜀，当时称为剑南道。众所周知，巴蜀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饶的富庶之地，也是李唐朝廷最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之一，因此，一旦关中不宁，这里当然就是流亡朝廷首选的避难所。此外，杨国忠长期遥领剑南节度使，自从叛乱爆发以来，他就暗中命剑南留后崔圆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作了充足的准备，一旦形势不妙，他随时可以拥着玄宗往剑南跑。

此时此刻，除了逃亡巴蜀，玄宗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没有了。

所以，他当即不假思索地批准了杨国忠的逃亡计划。

当然，这是一个绝密计划。除了几个宰辅重臣、亲近宦官、得宠妃嫔，以及少数皇室成员以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皇帝要逃跑，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为了尽量不让满朝文武察觉天子和宰相要跑路，六月十一日，杨国忠特地把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上，作出一副惶恐无措、痛哭流涕的样子，询问大家有何御敌之策。此时，李唐朝廷的衮衮诸公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谁还能有什么对策？他们只能哭丧着脸，一个劲地向杨国忠表示：一切全凭宰相大人定夺。

杨国忠撒完烟幕弹后，抹抹眼角的几滴干泪，说：“早在十年前，就有人状告安禄山要造反了，可皇上就是不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实在不是宰相的过错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杨国忠还不忘推卸责任。百官们无不在心里问候他

的十八代祖宗，可表面上，大伙还是不得不对他唯唯诺诺，因为他们都在眼巴巴地盼着这个当权宰相能够帮他们指一条活路。

可百官们绝对没有想到，天子和宰相早已决定把他们彻底抛弃了。

这一天，大唐帝京长安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无论官绅士民，人人惊惶奔走，不知道如何逃避这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原本安宁祥和、繁华富庶的长安，此刻只剩下恐慌、混乱和萧条。

六月十二日，早朝的钟声照常敲响，然而上朝的官员却不到十分之一。为了稳住人心，玄宗还装模作样地登上了勤政楼，下诏宣布要御驾亲征。

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宣布要亲征了。如果说臣民们对前面两次还感到有些半信半疑的话，那么这一次，所有的长安人基本上都是把它当成笑话来听的。“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不过，这个笑话并不能让人莞尔或者捧腹，只会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就在玄宗宣布要御驾亲征的这一刻，逃亡计划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了。这一天，玄宗紧急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相当于流亡朝廷的后勤总管），提拔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其实就是让他留下来当替死鬼，同时命宦官边令诚掌管宫中的所有钥匙，这个间接杀害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凶手，现在也被玄宗抛弃了。

同日，玄宗命快马携诏书先行赶赴剑南，以颍王李璬（玄宗之子）即将前往剑南就任节度使为由，命当地准备好一切接待工作。当天下午，玄宗就搬到了“北内”的一座偏殿里。当时，太极宫称为“西内”，大明宫称为“东内”，兴庆宫称为“南内”。所谓“北内”，估计就是靠近玄武门的地方。玄武门是禁军驻地，玄宗这时候搬到这里来住，显然说明他马上就要开溜了。傍晚时分，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禁卫六军，赏赐给将士们大量钱帛，另外又让陈玄礼挑选了九百多匹膘肥体壮的御马，以备跑路之用。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少数参与的人，绝大多数官员和百姓都被蒙在了鼓里。

没有人知道，此刻的长安已经变成一条撞上冰山的豪华巨轮，而他们

的船长早已悄悄解开了独自逃命的救生艇。

过了这个夜晚，绝大多数臣民就将和长安一同沉没。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沉船事件”之一。然而，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先行逃离的也不是妇女和儿童，而是领导。

六月十三日黎明，李隆基一生中最凄惶的时刻来临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

李隆基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从彻夜难眠的焦虑和不安中走了出来，从数十年的盛世迷梦中走了出来，神色恍惚、步履蹒跚地迈上了那驾前途未卜的马车，迈上了一个太平天子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流亡生涯。一夜之间，这个风流皇帝真的老了。

作为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其实李隆基早就老了，他在叛乱爆发前之所以一直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是因为有盛世伟业的光圈在渲染，还有艺术和爱情的魔力在滋养。如果说人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并不能完全画等号的话，那么李隆基的心理年龄顶多只能算是中年。所以，虽然时光的潮水会裹挟着每一个人从出生、成长一直奔向衰老和死亡，但是李隆基的生命河流显然筑起了一道堤坝——由功业、艺术和爱情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大坝的承重材料，为他成功拦截了数十年的时光潮水，从而有效延缓了生命的衰老。

至少在心理上，在精神状态上，李隆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当安禄山粗暴地将李隆基的生命堤坝一举击碎的时刻，当所有的光圈和魔力遽然消失的时刻，被拦截多年的时光潮水就在李隆基身上发生了某种“泄洪”效应。于是，真相瞬间裸露，一直拒绝衰老的李隆基不得不面对一个客观事实——他已经是一个七十二岁的古稀老人。

最惨的是，这个老人现在还要被迫抛弃他的帝京长安，抛弃他的九重宫阙，抛弃他的万千臣民，抛弃他一生追求和经营的一切，凄凄惶惶地亡命天涯！

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的事吗？

李隆基不知道。

可残酷的命运马上就会告诉他——有。

上苍不仅要夺走这一切，最终还要夺走他的最爱——杨贵妃。

千乘万骑西南行

这一天，跟随玄宗一起逃亡的人有杨贵妃、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以及太子、皇子、公主、妃嫔、皇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少数几个大臣，此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宦官和宫女。这支逃亡队伍在陈玄礼所率禁军的护卫下，从延秋门（宫城西门）出太极宫，匆忙向西而逃。

当时，只有住在宫内的皇家眷属才有幸跟着玄宗逃出生天，而住在太极宫外的妃嫔、公主、皇子、皇孙等，都被抛弃了，更不用说一般的臣民了。

不过，最后的时刻，玄宗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惦记着老百姓的。

经过左藏（国库）的时候，杨国忠对玄宗说："烧了吧，免得落到贼人手里。"玄宗满脸哀伤地望着这个曾经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所在，长叹一声道："算了，如果贼人来了得不到它，必然会劫掠百姓；不如给他们，免得让老百姓受苦。"

玄宗一行出长安西门后，很快就过了西渭桥。队伍刚一过桥，杨国忠立刻命人将桥焚毁。玄宗一见大火燃起，赶紧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当即命高力士带人回去扑火，让他把火灭掉再回头追赶队伍。

玄宗已经不惦记百姓很多年了。这一刻，他终于又想了起来。

这场叛乱带给了他无尽的痛苦，但也带给了他一丝久违的清醒。

只不过，这样的清醒来得太晚了。

六月十三这天，尽管整座长安城早已人心惶惶，可还是有一部分忠于职守的朝臣仍然坚持上朝。是日清晨，部分朝臣按时来到宫门，只听宫中报时的更漏依旧清晰可闻，而在门口站岗的卫兵和仪仗也如同往常一样肃穆森严。

一切看上去都和往日并无不同。

然而，当片刻后宫门开启，朝臣们一下就蒙了。只见一群又一群的宦官和宫女疯也似的从门里冲了出来，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莫名其妙的朝臣们赶紧拦住一两个追问，才知道皇上已经失踪了。一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聪明的人立马撒腿往家里跑，可还是有一些朝臣不死心，慌忙跑进宫里去找。

然而，此时的皇宫早已炸开了锅，人人自顾不暇，到处是一片乱七八糟的末日景象，哪里去找皇帝的踪影？

长安城就这样天翻地覆了。王公大臣、士绅百姓一个个携妻挈子，争相逃命，而一些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则趁火打劫，冲进平日可望而不可即的豪宅大院，把那些有钱人来不及带走的东西洗劫一空。有些胆大的暴民甚至骑着小毛驴冲进皇宫，大肆劫掠金银珠宝，还纵火焚烧了左藏库。

面对如此严重的暴乱局面，新任京兆尹崔光远不敢坐视，赶紧和宦官边令诚一起带人灭火，同时紧急任命了一批府、县的代理官员，并派兵捕杀了十几个领头的暴乱分子，才稍稍稳定了社会秩序。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崔光远和边令诚是在尽忠职守，那就把他们看得太高尚了。

实际上，他们早就想好了退路。

玄宗逃亡当天，崔光远就让儿子带上投降书，到洛阳去见安禄山了，同时带过去的，还有玄宗交给边令诚的一大串宫禁重地的钥匙。

你李隆基可以不声不响地脚底抹油，我们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另择明主。

你可以不仁，我们当然可以不义。

没啥好说的，这很公平。

玄宗一行过西渭桥后，继续向西进发。玄宗命宦官王洛卿为前导，告谕沿途郡县准备接待。到了这一天的中午时分，饥肠辘辘的逃亡队伍抵达咸阳的望贤宫。可让玄宗没有想到的是，整个咸阳根本看不到半个接待官员。派人一打听，才知道咸阳县令和县衙的官吏们早就溜了，就连负责打前站的宦官王洛卿也逃得无影无踪。

玄宗无奈，只好命宦官们在咸阳街头张贴皇帝驾临的告示，希望能有一些忠于朝廷的官吏或百姓出面接待。结果，鼓舞人心的告示贴得满

大街都是，响应号召的人却一个也没有。

当皇帝当到了这个份儿上，玄宗真是满心悲凉。都说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他今天算是深刻领教了。眼看日头已过中天，所有人的午饭都还没着落，玄宗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杨国忠见状，也顾不得自己的宰相颜面了，连忙亲自跑到市场上买了一堆烧饼，权且让天子充饥。

可这些烧饼就算能喂饱玄宗，也喂不饱他身后的一大群金枝玉叶啊。正犯难时，当地一些善良的百姓不忍见天子挨饿，终于挑来了好几担糙米饭，还有一些小麦和大豆。早就饿得眼冒绿光的皇子皇孙们立刻扑上前去，直接用手抓着吃，转眼就把所有食物扫荡一空，可摸了摸肚皮，却感觉还没有吃饱。

对于咸阳父老的雪中送炭之举，玄宗深为感动，赶紧命人拿钱酬谢。众人看着形容憔悴的天子，都忍不住伤心落泪。玄宗一下子悲从中来，也不禁掩面而泣。

献食的百姓中，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叫郭从谨。他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话，一直不知道跟谁倾吐。现在见此情景，他也就不管什么尊卑之礼了，赶紧颤颤巍巍地走到玄宗面前，说：“安禄山包藏祸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没人入宫揭发他的阴谋，可陛下却把举报的人诛杀，才导致祸乱的发生，以致陛下不得不流亡到此。从前那些圣主明君，之所以广求天下忠良，使自己耳聪目明，其缘由正是在此。我还记得宋璟当宰相时，屡屡犯颜直谏，天下赖以太平。可是后来，朝中的大臣们再也不敢说真话，只知道阿谀取容，讨陛下欢心，所以宫阙之外的事情，陛下一无所知。我虽为一介草民，也早就料到会有今天，只可惜九重宫阙，森严遥远，区区之心无路上达……要不是事情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又怎能亲睹陛下之面而一诉衷肠呢！”

郭从谨这番话虽然没什么高明之处，但至少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很多人都已经看出了他的狼子野心，甚至包括像郭从谨这样一个足不出户的乡野村夫，都已经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既然连郭从谨都能察觉，玄宗为什么就没有察觉呢？

其实，玄宗并不是没有察觉，而是不愿意去察觉。

因为他早就被上天宠坏了，所以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一手造成的错误。人们一直以为他是在替安禄山辩护，其实他是在替自己辩护。换言之，晚年的玄宗表面上越是自负，内心就越是脆弱，所以他不愿从自欺欺人的梦境中醒来。只要在有生之年安禄山不反，他就可以把梦做下去，一直做到驾鹤西归。至于身后事究竟如何，那就不是他考虑

的范畴了。虽然这么做很像赌博，可李隆基一生的运气都很好，所以他敢跟老天爷赌这最后一把。

只可惜，这最后一把他输了。

他一生辛辛苦苦赢来的一切，终将在这最后一把中输个精光。

听完咸阳父老郭从谨的一番肺腑之言，玄宗愧悔难当，只好老实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直到送走郭从谨等人，玄宗还是粒米未进。负责膳食的官员跑遍全城去采购，忙活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搞了一顿比较像样的御膳。玄宗让所有随从官员先吃，自己挨到了最后才吃。至于那些护驾的禁军将士，玄宗则命他们分散到各个街坊和村落去乞食，约定未时（下午二时）回来集合，然后继续出发。

将近午夜时分，玄宗一行抵达金城（今陕西兴平市）。这里比咸阳更不堪，不但县令和官吏逃之夭夭，连老百姓都跑得差不多了。好在老百姓家里还囤积了一些粮食蔬菜，白天没讨到饭吃的禁军将士自己动手，总算饱餐了一顿。

从长安到兴平大概只有六十里路，可玄宗一行却走了一天一夜。而且就在这么短的逃亡路上，随从人员已经逃散大半，就连宦官总管袁思艺（与高力士同任内侍监）也抛弃了他的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之大吉了。

对于此次出逃，很多人显然都不抱希望。在他们看来，跟着落难的皇帝这么跑，就算不被叛军追上，兴许在半路上也会活活饿死。与其这样，还不如拍屁股走人，自己去找一条活路。

后半夜，疲惫不堪的玄宗带着妃嫔、公主，和皇子、皇孙住进了金城附近的驿站。驿卒早就跑光了，驿站里到处黑灯瞎火。昔日养尊处优的这帮皇室成员，此刻也顾不上什么尊严和体面了，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破草席上，你枕着我的大腿，我靠着他的肩膀，顷刻间便已鼾声四起了。

这天夜里，不知道唐玄宗和杨贵妃还有没有条件单独住在一起。就算有，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相拥而眠了。

明天，这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旷世佳偶就将阴阳两隔，生死殊途，从此在各自的轮回路上飘零辗转，纵使相见也不复相识，唯余一脉千古难消的幽幽长恨，任无数后人叹息吟咏……

马嵬驿之变

六月十四日，大约中午时分，玄宗一行走到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马嵬镇）。

这里只是帝国千百个驿站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可没有人会料到，它马上就将因为一起重大的事件而永载史册。

行至马嵬驿时，禁军将士们忽然都停了下来，再也不想往前走了。

因为从长安这一路走来，他们已经郁积了太多的不满。

这些禁军官兵都是长安人，仓促跟随玄宗出逃，被迫抛弃了妻儿老小，本来心里就一百个不情愿，加之一路上连饭都吃不饱，更让他们感到委屈和愤怒。于是，他们开始不断抱怨，心中的怒火逐渐升腾，走到马嵬驿时，种种不满的情绪彻底爆发，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

面对群情汹涌的六军将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心中暗暗叫苦。

他知道这回麻烦大了。

此次出逃，他肩上的责任最重。作为禁军的最高长官，他既要负责天子、宰相和一大帮皇室成员的安全，又要在将士们吃不饱的情况下号令他们，其艰难处境可想而知，所以他自己也窝了一肚子火。

此刻，陈玄礼很清楚，如果不能给怒火中烧的六军将士找一个宣泄的对象，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玄礼心念电转，马上就有了主意。

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把矛头指向朝野共愤的杨国忠了。

他随即大声对部众说：“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咨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

此言一出，就像一支火把扔进了柴草堆，六军将士纷纷攘袂高呼：“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旧唐书·杨国忠传》）

诛杀杨国忠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不过，陈玄礼并没有马上动手。

因为，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早在四十多年前，身为禁军将领的陈玄礼就参与了李隆基诛杀韦后的唐隆政变。对于兵变这种事，他自然比一般人更为轻车熟路，可同时也更为成熟和冷静。

他深知，杨国忠是皇帝跟前的头号宠臣，要杀他，就意味着要和皇帝翻脸。换句话说，诛杀宰相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作“清君侧”，说难听点就是逼宫，就是谋反！陈玄礼可不想背上谋反的罪名，所以，必须为这场兵变寻找一个强硬的政治后台，使行动更具合法性。只有这样，陈玄礼才能放手一搏。

那么，谁最有可能作为陈玄礼的政治后台呢？

答案只有一个——太子李亨。

众所周知，早在李林甫当政期间，杨国忠就曾多次充当李林甫的打手，屡兴大狱陷害太子。及至杨国忠当权，他与太子的矛盾更趋尖锐。到了安禄山起兵后，玄宗曾提出要让太子监国，甚至流露了传位之意，可最后还是被杨国忠搅黄了。所以，太子李亨与杨国忠可谓势同水火，不共戴天。

主意已定，陈玄礼立刻找到东宫宦官李辅国，通过他向太子汇报了诛杀杨国忠的计划。

得知陈玄礼的计划后，李亨心里自然是极度赞同的，可他很聪明，他知道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不留神就可能引火烧身。所以，他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表态，更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

当然，他也没有表示反对。

不反对就等于默许。陈玄礼心领神会，遂下定决心动手。

恰巧在这个时候，随同玄宗从长安逃出来的一批吐蕃使节正围在杨国忠马前诉苦，说他们找不到吃的，让宰相帮他们解决饿肚子问题。杨国忠大不耐烦，正准备打马走开。陈玄礼见状，顿时灵机一动，忽然回头对部众大喊：“杨国忠勾结胡虏谋反，杀了他！”

士兵们随即一拥而上，有人马上张弓放箭，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杨国忠大惊失色，慌忙掉头而逃。可他刚刚窜进驿站的西门内，哗变士兵就追上了他，一人一刀下去，转眼就把他砍成了一堆肉酱。随后，余恨未消的士兵们又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了驿站的大门上。

天宝末年最得宠最拉风的一个宰相，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而且死得比谁都难看。

其实，把安史之乱完全归咎于杨国忠，是当时的人们冤枉了他，甚至可以说是高抬了他。

因为，他远远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果真要追究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唐玄宗李隆基肯定是一号人物，其次是一代权相李林甫，最后才能轮到杨国忠。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历史总是把吃饱的感觉归功于第三个馒头。这句话乍一看不太好理解，可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人们在评价历史事件的时候，总是习惯于为它找一个最近的、最浅显的原因，而忽视一些较远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再打个比方。一根稻草肯定压不垮骆驼，可要是一根接一根往上加，最后总有一根会把它压垮。这时候就会有人把骆驼的垮掉，归罪于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盛世唐朝为何垮掉这个问题上，杨国忠就是人们眼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不幸的“第三个馒头”。

杨国忠之所以引起公愤并最终死于非命，原因不过如此。

哗变士兵杀了杨国忠后，愤怒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又生出了一种发泄和杀戮的快感。

杀一个人是杀，杀一群人也是杀，那就干脆把平时看不顺眼的家伙通通杀了！反正事情已经闹开了，索性就把它闹大！

于是，局面开始失控了。

乱兵们紧接着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御史大夫崔方进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面无人色，可还是放不下领导的架子，哆哆嗦嗦地指着士兵们说：“你们怎么敢杀害宰相？”

话音未落，他的脑袋就飞离了身躯。

另一个宰相韦见素听见外面闹得鸡飞狗跳，赶紧跑出来看个究竟。乱兵们不分青红皂白，冲上去就是一顿暴打。韦见素当即血流满面，所幸士兵中有人喊说：“不要伤害韦相爷！”并出手相救，韦见素才得以逃过一死。

当时，玄宗在驿站内惊闻外面扰攘喧哗，忙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侍从人员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听说是宰相杨国忠谋反，已经被士兵们杀了。玄宗大为震惊，但也无可奈何。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尽力安抚哗变士兵，以免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过激行动。

此时，哗变士兵已经把驿站围得水泄不通。玄宗拄着手杖，趿拉着便鞋，踉踉跄跄地来到驿站门口，跟凶神恶煞的士兵们说了一大堆好话，劝他们各自回营。

可大兵们却一个个鼻孔朝天，对皇帝的一番好言好语置若罔闻。玄宗无奈，只好让高力士出面，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片刻后，高力士把答案带回来了。他转达陈玄礼的话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此言犹如五雷轰顶，让玄宗顿觉天旋地转。

玄宗万万没有料到，士兵们到最后竟然会把矛头指向杨贵妃！

在玄宗看来，杨玉环只不过是个女人，而且从来没有干预朝政，你们何苦跟她过不去呢？

然而，这只是玄宗的个人想法。

在当时的人看来，正因为杨玉环是个女人，而且有着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才会让玄宗坠入情网、不可自拔，从而荒废朝政、宠任奸佞，最终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给天下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杨玉环就跟历史上的妲己、褒姒、赵飞燕姐妹一样，属于红颜惑主、狐媚误国的典型。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谢天下！

“告诉他们，我自有处置。”玄宗有气无力地对高力士说，然后转身踱回驿站。

在大门后面，玄宗避开众人的视线，一个人拄着手杖，垂着脑袋默默伫立了很久。

此刻，没有人看见一颗骄傲而脆弱的灵魂正在战栗和哭泣。

此刻，没有人看见一颗热烈而苍凉的心正在瓣瓣碎裂、涓涓滴血。

许久，韦见素的儿子、时任京兆司录的韦谔才大着胆子走上前去，伏地叩首说："如今众怒难犯，安危只在顷刻，愿陛下速决！"

玄宗抬起一双浑浊无光的眸子看了看韦谔，用一种低得连自己都听不清楚的声音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

很显然，玄宗还在作最后的挣扎。

其实他也知道，今天这些哗变士兵要是达不到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可明知如此，他还是要作最后的挣扎——就像一个失足落水的人，在行将溺毙之前所作的那种无望的挣扎。

驿站外不断传来哗变将士烦躁不安的叫骂声，局面随时有可能再度失控。

最后的时刻，最了解玄宗也最忠于玄宗的老奴高力士不得不开口了。他走到玄宗身边，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贵妃自然是没有罪，可将士们既然已经杀了国忠，又岂能让贵妃安然无恙地留在陛下左右？请陛下慎重考虑，只有将士们安定下来，陛下才有安全可言。

高力士的话一下子说中了要害。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杨贵妃有没有参与杨国忠谋反的问题，而是既然将士们铁定了心要杀贵妃，陛下您究竟作何选择的问题。

——要么忍痛割爱，壮士断腕；要么和贵妃同生共死，双双归西！

不是A就是B，没有第三种选择。

至此，李隆基终于绝望。

他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了一间幽静的佛堂里，在此与爱人诀别。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人对泣片刻，仿佛有千言万语需要倾诉，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杨贵妃抹了抹脸上的泪痕，凄然一笑，说：“愿皇上保重，妾身有负国恩，虽死无恨。”

李隆基哽咽着说：“愿妃子善地受生……”话音未落，他便艰难地转过身，蹒跚着向门口走去，同时朝身后的高力士做了个手势。

杨贵妃跪在佛像前，平静地做完最后一次礼拜。然后，高力士手中的三尺白绫就套上了她的脖颈……

一代绝世红颜就此香消玉殒。

李隆基心如刀绞，肝肠寸断。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

十六年前，高力士负责把杨玉环带到了玄宗身边；十六年后，他又负责把杨玉环从玄宗的身边带走。二十二岁到三十八岁，一个女人生命中最惊艳最华丽的部分，从此便永远凝固在了泛黄的史册中。

如果说盛唐是中国历史的一座巅峰，那么杨玉环就是绝顶之上一朵灼灼绽放的盛世牡丹。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环是幸运的。因为，正是有了富贵雍容的盛世作为底色，她的爱情故事才会被渲染得如此鲜艳妖娆；正是有了锦绣华章的时代作为舞台，她的生命之舞才会摇曳得如此绚丽多姿、华美无双。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因为盛世背后就是乱世的深渊，因为霓裳羽衣歌舞未歇，渔阳鼙鼓已经动地而来。刹那之间，盛世崩塌，红颜凋零。当初的艺术和爱情越是令人心醉，此刻的诀别和死亡就越是令人断肠……

传统史家多把盛世的终结归咎于红颜祸主、狐媚误国，却从来不曾细想：这一介红颜，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住，又怎堪为盛世的终结承担罪责？

究其实，她只是被迫为夭折的盛世殉葬罢了。

杨贵妃一死，马嵬驿之变也随之画上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句号。

玄宗命人把杨贵妃的尸体放在驿站的庭院里，让陈玄礼等人前来“验

明正身”。见皇帝已经作出这么大的妥协，陈玄礼等人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随即摘下甲胄，向玄宗叩首请罪。玄宗强打着精神敷衍了几句，命他们回去安抚好各自的部众，准备次日出发，继续西行。

杨国忠与长子杨暄被乱刀砍死于马嵬驿后，其他亲属也没能逃脱灭顶之灾。事发当天，他的妻子裴柔、情人虢国夫人，以及虢国夫人的一双儿女，虽然侥幸逃出了马嵬驿，一口气跑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市陈仓镇），可最后还是被陈仓县令薛景仙派人一一捕杀。此后，杨国忠的另外几个儿子先后逃亡各地，也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

安史之乱爆发才半年多，跋扈宰相杨国忠便满门皆灭。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杨国忠进京算起，他的发迹史前后也不过十二年；而专权的时间更短，满打满算也才四年。想当初，杨氏一门的荣华富贵令多少世人眼红和羡慕，可转眼之间，一切就都灰飞烟灭了。

分道扬镳：你往何处去？

六月十五日清晨，盛夏的太阳照常升起，一夜无眠的玄宗拖着近乎虚脱的身躯登上了西行的马车。

此刻的李隆基就像是一具被掏空了的皮囊。他分明感觉，自己的灵魂早已跟着杨玉环去到了另一个世界。没有人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李隆基只是希望，那里不再有战争和杀戮，不再有阴谋和死亡，那里的爱情之花永不凋谢，那里的《霓裳羽衣》永不散场……

当然，尽管李隆基对那样一个虚幻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可他对眼前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却仍旧充满了眷恋。

这样的心态很矛盾，也很让人纠结。

可李隆基没有办法。

毕竟他仍然是皇帝，这世上值得他眷恋的东西还有很多，需要他承担的东西也还很多。所以，他只能拖着这具丢失了灵魂的皮囊，继续踏上凄凄惶惶的流亡之路，继续走向茫然不可预知的远方。

这天早上，当玄宗的銮驾刚刚走出驿站门口，队伍就忽然停滞不前了。因为禁军官兵又不想走了。

准确地说，是他们不想往西南方向走。官兵们说，剑南是杨国忠的地

盘，那里的将领都是杨的死党，如今他们杀了杨国忠，去剑南岂不是自寻死路？

所以，他们坚决不去。

可是，不去剑南又能去哪呢？

官兵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去河西或陇右，有的说去朔方的灵武，有的说去河东的太原，有的说干脆哪也不去了，往回走，杀回长安城！

玄宗蒙了。

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真是一点没错。面对这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玄宗真是彻底无语了。在他看来，除了蜀地，上面说的那些地方没有一个是安全的，至于说杀回长安，那就更是近乎脑残的无稽之谈了！

可玄宗心里这么想，嘴上却一个字也不敢说。因为昨天发生的一切犹在目前，所以他只能眉头紧锁，嘴巴紧闭，用沉默表示抗议。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刚刚被玄宗任命为御史中丞兼置顿使的韦谔发话了。他说：“要想回京师，就必须有足够的兵力抵御叛军，眼下我们根本没这个实力，不如暂且先到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再慢慢商量下一步去哪里。”

这是一个暂时化解僵局的折中方案。因为扶风是一个南北枢纽，既可以由此北上，前往河、陇、朔方，也可以由此入蜀。玄宗就此方案询问众人，官兵们也都没什么意见，于是队伍即刻开拔。

可是，玄宗一行刚走出没多远，就不得不又停了下来。

因为前面的路被一群老百姓堵住了。

玄宗无奈，只好迈下车辇，换乘一匹马，来到队伍前端。挡路的百姓立刻拥上前去，说：“长安宫阙，是陛下的居所；历代陵寝，是陛下的祖坟。陛下抛弃居所和祖坟，又能往哪里去呢？”

玄宗手握缰绳，骑在马上沉默了很久。最后，他仍然不知道应该跟父老们说些什么，只好让太子李亨留下来安抚他们，自己赶紧拍马先走了。此时的玄宗当然不会想到，从这一刻开始，太子李亨就将与他分道扬镳了。

随着他们父子的分途，属于玄宗的辉煌时代将黯然收场，而新一页的唐朝历史也将悄然掀开。

当地父老眼见天子绝尘而去，马上又缠住太子，说："皇上既不肯留，我等愿率子弟追随殿下，讨伐叛贼，收复长安。倘若殿下和皇上都到了蜀地，那么偌大的中原，又有谁来替百姓当家做主？"

太子李亨面露难色，沉默不语。就在这个时候，从附近村镇涌来了数千个手拿镰刀锄头的青壮农民，一下子把他和随从团团围住，说什么也不让他们离开。

李亨想了半天，才找了一个理由，说："皇上远涉险阻，我又怎能安心离开他？何况，我还没有当面跟皇上辞行，最后是去是留，还是要听皇上的旨意。"李亨话刚说完，眼泪就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然后一边抹泪一边就想拍马走人。

当然，他没能走掉。

因为又有三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们是广平王李俶（李亨长子）、建宁王李倓（李亨第三子）和宦官李辅国。

三个人死死拉住李亨的马头，说："逆胡进犯宫阙，四海分崩离析，不依靠人心，何以兴复社稷！今日殿下若跟随皇上入蜀，叛军必定烧毁栈道，断绝蜀地与关中的交通，如此一来，无异于把中原拱手让给贼人。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重新凝聚，到时候想回都回不来了！而今之计，只有集结西北的边防军，再召回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联合东征，讨伐叛军，克复二京，平定四海，使社稷宗庙转危为安，再修复宫室迎回天子，岂非人间之大孝，又何必执着于区区儿女之情？"

见此情形，李亨不得不点头同意，随后便让广平王李俶去跟玄宗禀报。玄宗带着队伍走了一段路后，就停下来等太子。可左等右等，最后却等到了太子准备与他分道扬镳的消息。

玄宗摇头苦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两个字：天意、天意、天意……

随后，玄宗从护驾的禁军中拨出两千人马，让他们去跟随太子，并告谕将士说，"太子仁孝，足以担当社稷，你们要好好辅佐他。"接着又命人转告太子，"你努力去做，别挂念我，西北的那些胡人将领，我历来待他们不薄，相信一定会效命于你。"最后，玄宗又让人向李亨

转达了传位之意。

李亨闻言，赶紧派人回禀，表示自己绝不接受传位之命。

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

短短一个月后，李亨就在部众的劝进下，“遵马嵬之命”，在灵武登基即位了。

基本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嵬驿“父老遮留”的这一幕，也就没有后来的灵武即位。

正因为此，所以后人普遍认为，“父老遮留”其实是李亨导演的一出戏，目的是为了脱离玄宗，以便寻找机会自立门户。甚至还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嵬驿之变”也是李亨一手策划的。因为从“马嵬之变”到“父老遮留”，再到“灵武即位”，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因果链条贯穿其间。也就是说，其内在动因都是李亨要从玄宗手中夺取天子大权。

那么，真相是否如此呢？

说李亨是“马嵬之变”的幕后主使，在逻辑上固然可以成立，但证据并不充分。综观涉及这一事件的相关史料，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支持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李亨并非事变主谋，他只是事先知情，并对陈玄礼的行动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亨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同谋，不能算主谋。

至于“父老遮留”这一幕，则极有可能是李亨策划的。其因有三：

首先，玄宗幸蜀这一年，李亨已经四十六岁了，入主东宫也已整整十八年，对于这样一个老太子来说，生命中最大的愿望当然就是登基即位了。可是，如果跟随玄宗流亡巴蜀，即位之事必然要被无限期地推迟。所以，李亨肯定要想办法脱离玄宗。

其次，剑南是杨国忠的地盘，而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朝野共知，虽然现在杨国忠死了，可李亨仍然会跟大多数禁军将士一样，担心自己入蜀之后的命运。就算杨国忠的旧部不为难他，但终究是寄人篱下，做任何事情都放不开手脚。倘若如此，不要说何时才能轮到他当皇帝，即便是固有的太子权威也将大打折扣。所以，李亨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随玄宗入蜀。

最后，玄宗在巴蜀建立流亡朝廷，固然可以凭借蜀道的艰险阻挡叛军的进攻，获得一时之苟安，但是凡事利弊相生——既然叛军不容易打

进来，你唐军当然也不容易打出去。就像那些劝留的百姓所说的那样，要是玄宗父子都躲到巴蜀去了，那就等于把中原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安禄山。换句话说，一旦李唐的流亡朝廷龟缩在西南一隅，那么四方的平叛力量极有可能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而所谓的“收复两京、中兴社稷”也只能流于空谈。对此，李亨不可能没有忧患之思。所以，就算不考虑个人的政治利益，而是仅从社稷安危的角度出发，李亨也必须与玄宗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据《旧唐书·李辅国传》称，马嵬之变后，“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由此可见，无论是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史料上看，李亨与玄宗在马嵬分道扬镳，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绝非出于偶然。

既然李亨与玄宗分手是势在必行之举，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要以什么方式、什么借口来分？

这里有两条高压线是绝对碰不得的：一、不能引起玄宗的不快和猜疑；二、不能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

那么，要怎么做才妥当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民意”来说话。

如何显示民意呢？

那当然就要把老百姓请出来了。因此，李亨才会与儿子李俶、李倓及心腹宦官李辅国精心设计了“父老遮留”的一幕。有了这一幕，就足以表明李亨是在被动与无奈的情况下与玄宗分手的；并且只有这样子，才能表明李亨秉承了天意，顺应了民心，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为日后的“擅自即位、另立朝廷”奠定必要的舆论基础。

和太子分手后，玄宗继续西行，于六月十七日抵达岐山（今陕西岐山县）。还没等他喘口气，就听说叛军前锋已经逼近，玄宗不敢停留，又一口气逃到了扶风。

到了扶风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该往何处去？

禁军官兵们不但不想去剑南，而且个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对护驾之事越来越感到厌倦，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满天飞，连咒骂天子的话都出笼了。陈玄礼竭力想平息将士们的怨气，无奈到了这种时候，他的

权威也已经大打折扣，士兵们几乎都不听他的。

眼看又一场马嵬之变行将爆发，玄宗忧心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万分庆幸的是，几天后，从剑南运来了十余万匹进贡的彩帛，恰好运抵扶风。玄宗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马上命人把所有彩帛陈列在城楼下，然后集合禁军官兵，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演讲。

玄宗说："朕这些年老糊涂了，所用非人，导致逆胡叛乱，被迫流亡至此。朕知道，你们仓促跟朕离开长安，不得不与父母妻子诀别，一路跋涉到这里，身心都已疲惫至极，朕实在是愧对你们。从这里到蜀地的路还很远，而且那里郡县狭小，恐怕也供养不起这么多人马，朕现在准许你们各自回家，朕就和皇子、皇孙、宦官们继续西行，相信自己也能走到。今日，朕就与诸位在此别过，请大家把这些彩帛分了，作为路上的盘缠。你们回到长安后，见到父母和家乡父老，请转达朕对他们的问候。从今往后，大家各自珍重吧！"

这番话说完，玄宗已经泪如雨下。

毫无疑问，这是一张足以打动人心的悲情牌。虽然这张牌不乏欲擒故纵的意味，但我们决不能怀疑李隆基此刻的真诚。毕竟这些日子以来，李隆基和所有人一样，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所有骄傲而虚假的面具也都被残酷的现实一一剥落。所以这一刻，与其说李隆基是在用皇帝的身份跟将士们讲话，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向人们进行忏悔和告白。

因此，在这番真情告白中，我们几乎看不见一个皇帝经常使用的套话和空话，而是能够真切地触摸到一个老人的内心。换言之，我们听到了人话，感受到了一些有温度的东西。

不管在什么时候，人们总是喜欢有温度的东西，也总是厌恶空洞的政治说教。

所以，将士们当场被感动了。

当玄宗在城楼上泣下沾襟的时刻，楼下的将士们也不约而同地流下了眼泪。他们齐声高呼："臣等无论生死，决意跟随陛下，绝不敢有二心！"

玄宗默然良久，最后只说了四个字："去留听卿。"（《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从这一天起，所有的牢骚怪话就自动消失了，再也没有人咒骂皇帝，也没有人吵着要回长安了。当然，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安抚效果，那十余万匹彩帛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即便已经是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落魄天子，唐玄宗李隆基的人格魅力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其政治号召力也是不容低估的。

成功导演了“父老遮留”的一幕后，李亨虽然如愿以偿地脱离了玄宗，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

因为他面临的问题同样是——该往何处去？

偌大的天下，哪里才是安全的栖身之所？哪里才是属于自己的“龙兴之地”？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马嵬驿上空黑云漫卷，驿站周围那些茂密的野草在狂乱的风中东摇西摆，发出一阵阵令人烦躁的哗哗声。

广平王李俶看了看神色凝重、一言不发的父亲，又看了看闷声不响的众人，微微干咳几声，头一个打破了沉默：“天色已晚，此地不可久留，大家有什么打算？”

众人抬眼瞥了一下李俶，又瞥了一眼太子，心里都没有主意。

建宁王李倓用一种锐利的目光飞快地扫过众人，见没人吭声，便朗声说道：“殿下曾经遥领朔方节度使，当地文武官员每年都有进京拜见，我和他们见过一两次面，约略记得一些人的姓名。如今，河西、陇右的部众（指哥舒翰驻潼关兵团）基本都已战败投降，留守河、陇的士卒中，多数人的父兄子弟身处贼营，所以很难保证他们不生异心。相比之下，朔方距离此地最近，而且兵马强盛，眼下叛军刚刚占据长安，正忙着抢劫掳掠，暂时无暇扩张地盘，我们应利用这个时间火速赶往朔方，以此为根据地，再慢慢规划复兴大业。”

其实，李俶、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早就商量好了去处，此刻的这番问答，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说服众人而已。

众人闻言，皆称善。而对于太子李亨来说，尽管他并不觉得朔方就一定安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他唯一的选择。随后，太子集合队伍，下令往西北方向进发。

入夜，太子一行刚刚走到渭水河畔，便与潼关溃退下来的一支残兵猝然遭遇。由于夜色漆黑，咫尺莫辨，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了燕军，于是

大打出手。一场激战过后，双方都死伤过半，最后定睛细看，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自己人。李亨把两边的残部集合到一块，沿着河畔找到一处水位较浅的河段，然后骑马横渡。没有坐骑的官兵涉不过去，只好挥泪回到南岸，眼睁睁看着太子一行飞快地消失在夜色里。

李亨率众渡过渭水，经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由于担心燕军追击，太子一行拼命狂奔，一昼夜疾驰三百余里。抵达新平（今陕西彬县）时，士卒和器械已亡失过半，剩下来的部众不过几百个人。进入新平后，李亨听说当地太守薛羽已经先他一步弃城而逃，顿时勃然大怒，即刻命人追击，硬是把薛羽抓回来一刀咔嚓了。当天，李亨又进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当地太守徐瑴同样弃城而逃，李亨照例将其捕杀。

一连杀了两个太守，李亨自己都有些困惑了。

难道李唐的人心就这么散了，再也无从收拾了吗？

难道帝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拯救了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李亨并不太长的余生中，他将耗尽生命中全部的力量和心血，来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肃宗登基

燕军攻克潼关后，安禄山压根就没料到玄宗会在第一时间逃跑。他以为燕军与唐军在长安必有一场恶战，所以不敢贸然进攻，而是命崔乾祐暂守潼关，等待大军集结。

直到崔光远的儿子揣着降表屁颠屁颠地跑到洛阳时，安禄山才得知：原来玄宗早就撒丫子逃跑了，而长安也已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安禄山不禁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他完全没想到，李隆基竟然是如此怯懦的一个人，更没想到长安会如此轻易地落入自己手中！

随后，安禄山即命心腹大将孙孝哲、中书令张通儒率军前去接收。

天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亦即玄宗逃亡的十天之后，燕军兵不血刃地占据了长安。安禄山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仍旧让崔光远担任京兆尹，命将领安忠顺率兵进驻皇宫御苑，同时让孙孝哲统御关中诸将。由于孙孝哲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因而燕朝的文武将吏都对他忌惮三分，连宰相兼西京留守张通儒也不得不受他节制。

长安既然落入孙孝哲这种武夫手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来的日子，凡是跟随玄宗逃亡的那些公侯将相，其滞留长安的家眷全都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无论男女老幼均被砍杀，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燕军士兵在长安城中日夜搜捕，每天都会抓获一批李唐朝廷的文武官员，以及藏匿在宫外的妃嫔、宦官和宫女。那些日子，天天都有数百辆囚车被全副武装的燕军士兵从长安押解到洛阳。囚车上的男男女女有的哭号，有的哀求，有的拼命咒骂，有的一脸麻木，可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眼中却都写着相同的两个字：绝望。

当然，长安城中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不会被押上囚车，更不会感到绝望的。

他们就是变节者。

为首的是前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

自从杨国忠当权后，陈希烈就靠边站了，所以他一直对玄宗怀恨在

心；而驸马张垍曾得到玄宗的口头承诺，说要封他为宰相，结果始终没有兑现，因而也是牢骚满腹。对于这样一些旧政权的失意者来说，长安沦陷非但不是一种灾难，反而是他们咸鱼翻身、扬眉吐气的良机。所以，燕军一进入长安，他们便忙不迭地跑去向新朝廷宣誓效忠，毫不犹豫地当了“唐奸”。

不过，这唐奸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像陈希烈、张垍之流，都是属于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物，安禄山需要他们来为新朝做广告，让人们对李唐王朝死心，所以才会接纳他们。换句话说，想当唐奸也是要有资格的，假如没什么利用价值，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囚车和铡刀。

对于陈希烈、张垍等人的“弃暗投明”之举，安禄山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即任命他们为燕朝宰相。此外，还有一些较具声望的李唐朝臣和在野名士，也都被安禄山授予了相应的官职。

转眼间，安禄山就在长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朝廷，大明宫的城楼上插满了燕朝的旗帜。

这是大唐立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丢掉帝京长安，第一次被人剜掉了政治心脏。

然而，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大明宫的城楼上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插上不同颜色的旗帜，而那些旗帜也将一次又一次地刺痛李唐臣民的眼睛。

此刻，距安禄山范阳起兵不过八个月，燕朝已然据有两京，且“西胁汧、陇（甘肃东部及陕西西部），南侵江、汉（华中地区），北割河东（河北、山西）之半”，俨然已经占据了李唐的半壁江山。

安禄山似乎有理由相信，那残余的另外半壁，很快也将落入他的手中。可事实证明，安禄山不会得逞。

因为他的野心虽然很大，但是他的格局却和他的野心不成正比。

史称燕军占据长安后，“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无论是安禄山本人，还是他麾下的文武将吏，都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缺乏一种包容四海、抚驭万民的气魄和胸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禄山即便登基称帝了，也肯定成不了真正的统治者；即便他占据了东、西两京和李唐的半壁江山，也终究只是一个拥兵割地的草头王。

在他心中，只有地盘，没有天下；只有权谋，没有政治；只有霸术，没有王道！

所以，很快我们就将看到，入据长安非但不是安禄山走向胜利的一个标志，反而是他步入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正当燕军在长安日夜纵酒、纸醉金迷的时候，玄宗一行已经越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河池（今陕西凤县）。同日，剑南副节度使崔圆也带着奏表赶到河池迎接圣驾。他的奏表洋洋洒洒，但中心思想只有八个字："蜀土丰稔，甲兵全盛。"玄宗龙颜大悦，当场擢升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在河池休整数日后，玄宗便在崔圆的护卫下启程入蜀。

差不多与玄宗入蜀同时，太子李亨也已到达平凉（今宁夏固县），进入了朔方的辖区。朔方留后杜鸿渐得到消息，当即敏锐地意识到——太子分兵北上，自立门户的意图非常明显，这种时候，只要把太子迎到朔方，并拥戴太子即位，自己就能成为新朝的首功之臣。

他喜不自胜地对左右说："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随后，杜鸿渐即刻派人赶赴平凉，向李亨呈上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草、布帛及各种军用物资的储备情况。数日后，杜鸿渐又亲自到平凉迎接李亨，说："朔方军乃天下劲旅，如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都在坚守，等待着复兴的时刻。殿下只要前往灵武（朔方治所），训练军队，同时传檄四方，聚拢人心，讨平逆贼指日可待。"

应该说，从马嵬驿北上时，李亨对于朔方将吏的忠诚度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四方郡县仍在坚守的固然不少，可开门降贼或弃城而逃的恐怕更多！尤其是从长安出来的这一路上，所见所闻无不让李亨感到心寒。这些日子以来，李亨的内心其实一直被悲观和怀疑的阴云所笼罩。正因为此，几天前路过新平和安定时，他才会愤然杀掉那两个贪生怕死的太守。李亨这么做与其说是在维护朝纲、杀一儆百，还不如说是在发泄内心的抑郁和愤懑。

不过现在，李亨总算感到了些许欣慰。

因为杜鸿渐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忠诚实在超乎他的意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连日来悲观郁闷的心情，同时也增强了他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七月初九，在杜鸿渐的陪同下，李亨一行终于安全抵达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西南）。

可是，刚一到灵武，有一件事就引起了李亨的不快。

原来，杜鸿渐在得到太子抵达平凉的消息时，就已经吩咐属下设置了一座行宫，里面的装饰、器物、帷帐等等，全部仿造长安皇宫，搞得相当奢华。李亨抵达灵武后，每顿膳食也都备足了山珍海味和美酒佳肴，其规格和排场几乎不亚于天子御膳。

在李亨看来，杜鸿渐这么搞实在是太离谱了。

国难当头之际，你搞这么多花样干吗？这显然违背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利于李亨收揽人心；其次，你杜鸿渐想拍马屁可以理解，但也不能拍得这么没有技术含量啊！你就不能务实一点，别玩这些虚的？

李亨很生气，随即命杜鸿渐把这些没用的花架子通通撤除了。

李亨不想要花架子，是因为他想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皇位，就是他已经渴望了整整十八年的天子之位。

从个人角度来讲，李亨已经四十六岁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蹉跎了；从当时的整个天下大势来看，李亨也必须当这个皇帝。如果不当皇帝，李亨就没有资格号令四方，没有资格领导李唐的臣民们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平叛战争！

可是，尽管玄宗在长安和马嵬驿先后有过几次口头上的传位之命，可那毕竟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正式的传位诏书。在此情况下，李亨如果在灵武自行即位，就有“擅立”之嫌，根本不具备权力交接的合法性，也严重违背了古代的伦理纲常，足以招致“不忠不孝、无君无父”的骂名。

因此，李亨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杜鸿渐给他搞的这些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拥立和劝进！

虽然这样子坐上大位显得合法性不足，但李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现在只能先把号令天下的旗帜立起来，至于那些合法性的东西，以后再找机会慢慢弥补。

先上车，后补票！

杜鸿渐把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着实尴尬了几天，可他这个人很聪明，马上就意识到太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随后，杜鸿渐就与另一个官员裴冕联名，率领朔方的所有文武官员向太子上书，请李亨“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当然，他们的请愿马上被太子婉拒了。可他们锲而不舍，又由裴冕出面向太子进言：“跟随殿下的将士都是关中人，他们之所以千里迢迢地追随殿下到此大漠边塞，就是希望为国家立下尺寸之功。如果不能及时凝聚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再挽回。因此，为了社稷安危和平叛大业，请殿下务必听从民意、随顺人心！”

随后，裴冕等人又连续劝进，李亨当然是一一拒绝。直到他们递上第五封劝进书的时候，李亨才勉为其难地点头同意。

在中国古代，很多人要当皇帝的时候，都需要手下人跟他们一起玩这套“欲迎还拒，一唱三叹”的劝进游戏。像李亨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当然更需要这套东西来弥补合法性的不足。别人往往是“三劝”就把屁股挪到皇帝宝座上了，而李亨足足“五劝”！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亦即抵达灵武的三天后，李亨在灵武郡城的南楼举办了一场并不隆重，甚至略显寒碜的登基大典，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新一任天子。后世按其庙号，称其为唐肃宗。

在登基大典上，群臣欢喜舞蹈，李亨也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

同日，李亨改元“至德”，遥尊远在巴蜀的玄宗为太上皇。

对此毫不知情的玄宗李隆基就这样“被退位”了，属于他的天宝时代也就此成为了历史。当然，除了朔方的军民，基本上没人知道大唐天子已经从李隆基变成了李亨，更不知道这一年的年号已经从“天宝”变成了“至德”。

即位当天，肃宗便任命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为中书舍

人，其他将吏也各有任命。制度草创之际，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当时的肃宗麾下，仅有文武官员二十多人，上朝的时候，官员们都站得稀稀拉拉的，怎么看都是个山寨版的朝廷。

当时有一个朔方将领叫管崇嗣，根本没把这个山寨版朝廷当一回事，上朝时居然背对肃宗而坐，还跟其他人嘻嘻哈哈开玩笑。监察御史李勉见状，立刻发起弹劾，并把管崇嗣关进了御史台监狱。肃宗李亨马上表扬了这个敢于执法的御史，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当天就把管崇嗣放了。

值此非常时期，李亨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武将治罪。不管天子尊严受到了多大的蔑视，他也只能忍着；不管眼下的局面有多么艰难和窘迫，他也只能撑着。

作为一个身逢乱世并且是非正常即位的天子，李亨别无选择。

有趣的是，就在肃宗灵武即位的三天后，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退位"的玄宗还在普安（今四川剑阁县）发布了一道诏书，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兼任"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命他"南取长安、洛阳"；同时任命另外几个儿子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为各个方面的节度大使（皆一人统领数道），并授予他们"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之权。也就是说，此时的玄宗仍然以皇帝的身份在进行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仍然试图以遥控的方式领导四方的平叛力量。

这是唐朝历史上颇富戏剧性的一幕。

儿子不待传位而自行登基，尊父亲为太上皇；父亲却仍以皇帝自居，封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同一时刻，帝国出现了两位天子、两个朝廷、两个权力核心、两套施政体系。于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到底谁该听谁的？

玄宗仓皇逃离长安时，四方臣民都不知道皇帝去了哪里，直到这份诏书发布，人们才知道天子所身在何处。可是，就在接到玄宗诏书的同时，太子灵武即位的消息也已传遍四方，李唐的臣民们不禁纳闷——往后的日子，我们又该听谁的？

灵武：帝国的灵魂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历经艰险，终于抵达此次流亡的终点站——成都。随同他抵达成都的扈从官员和禁军将

士，只有一千三百人。

为时四十多天的流亡生涯宣告结束。回想起一路上所经历的饥饿、疲惫、忧愁、恐惧、痛苦、哀伤，玄宗的心情真是久久难以平静。

八月初二，玄宗发布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似乎是要与天下人分享他劫后余生的喜悦。同一天，河北官员第五琦（“第五”是复姓）入蜀觐见，向玄宗奏报说，平叛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帝国的财赋重镇在江淮地区，如果玄宗授予他相应职位，让他专门负责管理江淮财赋，他保证能为各地的平叛官兵提供源源不断的军费。玄宗闻奏，欣然授予第五琦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之职。

而在此之前，玄宗在入蜀的一路上已经先后任命崔圆、房琯、崔涣为宰相，对流亡朝廷的权力高层进行了必要的重组。种种迹象表明，从马嵬驿之变后，玄宗显然一直在努力走出事变的阴影，并一直在尝试着重新履行一个皇帝的职责。再结合玄宗在普安发布的那道具有战略意义的诏书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刻的玄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和从容，并且已经作好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充分准备。

然而，历史老儿却在这时候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八月十二日，几个来自灵武的使者风尘仆仆地抵达成都，给玄宗带来了太子李亨已于一个月前在灵武即位的消息。

尽管马嵬分兵的那一刻，玄宗对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或多或少有所预感，可当它真的到来时，玄宗还是感到了极大的意外和震惊。

当然，他没有让内心的惊愕流露在脸上。

事实上，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已经四十四年的皇帝，作为一个经验极度丰富的政治家，玄宗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说服的工作，在心态上完成了从皇帝到太上皇的角色转换。因为他知道——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正值盛年的儿子李亨肯定比他这个七十老翁更适合作为戡乱平叛的领袖，也更有可能带领李唐臣民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尽管李亨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让他很有些不爽和纠结，可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玄宗也只能面对现实，把内心的种种负面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的政治利益之上。

因此，当灵武使者不无忐忑地向玄宗呈上太子的奏章时，玄宗立刻报

以一个宽宏而豁达的笑容，同时一脸欣慰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八月十六日，玄宗最后一次以皇帝身份发布诏书，宣称自即日起，由他发布的公文不再称为诏书或敕令，而称为“诰”；皇帝向他呈送表疏时，一律称他为太上皇。此外，所有军国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决，事后再向他奏报；一旦收复长安，他就不再过问任何政务。

八月十八日，玄宗又命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携带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代表他前往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

短短几天之内，玄宗就快速启动了皇权交接的程序，把手中的权力全盘移交给了李亨，仅仅保留了对军国大事的知情权，而且这个有限的权力还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回到长安就自动取消。也就是说，一旦天下稍定，玄宗就要作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太上皇，彻底淡出帝国的政治舞台。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谢幕姿态。

玄宗并非不喜欢权力，也并非不眷恋这个由他主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可他最后还是果断地选择了退出，并且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仅此一点，他就比历史上那些死到临头还抱着权力不撒手的皇帝强多了。虽然玄宗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形势所迫，但假如他丝毫没有放权的念头和急流勇退的智慧，也绝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么完美的谢幕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玄宗李隆基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尽管由于他晚年的荒疏朝政和骄奢淫逸，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可当他一旦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一个杰出政治家所特有的那种智慧与胸襟。

简言之，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往往要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是拿得起，二是放得下。

在某些时候，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自从潼关失守后，河北战场的形势就随之出现了重大逆转。

本来，郭子仪和李光弼已经完全掌握了河北战场的主动权，正在博陵围攻史思明，下一步计划就是直捣范阳；而唐朝的平卢节度使刘正臣也正准备自柳城南下，与郭、李兵团遥相呼应，夹攻燕军老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潼关失陷的消息传到了河北。考虑到京师和天子的

安危，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解除博陵之围，率主力撤出河北战场，自井陉口退回河东，以备随时回援关中。

唐军一撤，史思明立刻尾随追击，却被李光弼击退。史思明在李光弼这儿捞不到便宜，马上又掉头北上，攻击平卢的刘正臣。刘正臣没料到燕军会主动出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部众阵亡七千余人。刘正臣慌忙抛弃妻儿老小，单身匹马落荒而逃。

唐军主力既已撤离，河北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时任常山太守的王俌第一时间丧失了坚守的意志和决心。倒也不能全怪他贪生怕死，实在是因为他麾下没有正规军，只有从附近地区招募的一些民团，其战斗力与郭、李兵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更不是燕军的对手。所以，王俌决意向燕军投降。

然而，王俌的心思很快就被一些部将觉察。随后，诸将合谋，利用一次打马球的机会杀了王俌，夺取了常山的指挥权。可是，诸将心里都很清楚，即使不投降，单单靠手下这些民兵也是守不住常山的。要想抵御史思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向附近友军求援。

当时，信都（今河北冀县）太守乌承恩麾下有一支三千人的朔方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身经百战，个个有以一当十之勇。常山诸将随即派人前往信都，请求乌承恩率部进驻常山。可是，无论来自常山的使者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乌承恩始终不为所动，硬是不肯挪窝。

数日后，史思明、蔡希德挥师南下，进攻九门。唐军进行了顽强的防守。攻到第十天时，唐军终于宣布投降。史思明大喜过望，立刻入城准备接收。可就在他登上城门的一瞬间，唐军伏兵忽然杀出，史思明无路可逃，只好从城楼上纵身跃下，被鹿角（削尖的木桩）刺伤左胸，连夜逃回博陵。

唐军的诈降之计虽然成功了，迫使史思明不得不退却，但此时的唐军将士心里都很清楚，燕军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而诈降的手段是可一不可再的，到时候，九门至常山一线注定要落入燕军手中。

进而言之，没有了郭子仪和李光弼，河北迟早是史思明的天下！

八月初，史思明再度发兵进攻九门，于十日攻克。城陷之日，史思明疯狂报复，屠杀了数千人。随后，燕军乘胜进围藁城。二十日，藁城陷落。

九月初一，史思明进攻赵郡，于五日将其攻陷，随即猛攻常山。十天后，常山陷落。燕军再度屠城，又杀了数千人。

随着常山等地的相继陷落，河北唐军的士气又一次落入了低谷。

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他就是一直在平原郡坚持抗战的颜真卿。

得到消息后，颜真卿惊喜交加，马上写了一道奏表，封藏在“蜡丸”（古代传送秘密文件的惯用方式）中，派人送到了灵武。肃宗见表，随即颁布诏书，对颜真卿及河北军民的坚贞和勇毅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鼓励，并加封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保留他的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等职，然后同样以蜡丸形式把诏书下达到了平原郡。

颜真卿接获诏书，立刻命人传谕河北诸郡，及河南、江淮等地。

直到此时，大河南北的李唐臣民才知道年富力强的太子李亨已经即位为帝，人心顿时大为振奋，抗击叛军的意志也越发坚定。

就在肃宗的诏书下达河北之前，郭子仪已经率领五万朔方精锐回到了灵武，原本兵少将寡的肃宗朝廷立刻变得兵强马壮。李亨大喜，当即擢升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太原）留守，二人都兼任同平章事，且原任的职务全部保留。

随后，李光弼与郭子仪分兵，率五千人马进驻太原，以防史思明西出井陉，进攻河东。

很显然，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此次回师，对于困境中的肃宗李亨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自从叛乱爆发以来，郭、李二人就成了唐军的一面旗帜，也是朝野瞩目的重量级人物，他们能够在新朝廷刚刚建立的时候及时归至肃宗麾下，这不仅是在军事上增强了新朝廷的实力，更是在政治上极大地增强了肃宗朝廷的号召力。可以说，直到郭、李兵团的到来，肃宗朝廷才终于摆脱了草创时期一无所有的尴尬局面，初步具备了一个戡乱朝廷应有的规模和实力。“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灵武，一座普普通通的西北边塞，如今却聚焦了天下人的目光，承载了李唐臣民的全部希望。

在这个四海分崩的非常时期，它已然成为帝国的灵魂。

长安乱

正当肃宗李亨在灵武努力开创新局面的同时，沦陷的长安却在经受着一场可怕的灾难。

最惨的，当属滞留长安的李唐皇族。

燕军入据长安不久，安禄山就下令孙孝哲捕杀了霍国长公主（玄宗的姐妹）和众多的李唐王妃、驸马、皇孙、郡主、县主等。令人发指的是，安禄山的命令并不仅仅是把这些天潢贵胄一杀了事，而是杀完之后还要剖腹掏心，把一颗颗血淋淋的心脏挖出来祭奠他的长子安庆宗。此外，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素所憎恶的那些王公大臣，基本上也都死得很难看。燕军当街用铁棒打烂了很多人的头颅，致使他们脑浆涂地，鲜血横流，其状惨不忍睹。据说前后有八十多人死于非命。

在安禄山的恐怖统治下，不光是李唐皇族和王公大臣遭遇灭顶之灾，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安禄山听说玄宗逃跑时，长安百姓趁乱哄抢了很多财物，便以此为由，命军队和各级衙门天天出动，四处抄家。凡是家中藏有些许财物的，一律没收家产，并将其逮捕治罪。而且一家遭难，亲朋好友也都会受到株连。一时间，“连引搜捕，支蔓无穷”，致使“民间骚然，益思唐室”（《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毛泽东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理古今皆然。虽然长安百姓没有像燕赵民众那样大范围地揭竿而起，但他们也自有抗暴的手段。

大多数手无寸铁的百姓跟燕军展开了心理战。当他们得知太子李亨自马嵬分兵北上后，就天天传播小道消息，说太子已经在北方集结了一支大军，随时会南下克复长安。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跑到街上，扯着破锣嗓子大喊：“太子大军来啦！太子大军来啦！”

长安百姓自发的这种心理战让燕军苦不堪言。白天，每当燕军望见北方的地平线上烟尘大起，就以为是唐军杀来了，于是一个个惊惶奔走；晚上，他们经常会在睡梦中被街上那几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惊醒，而醒来后便再也不敢入睡。总之，在长安百姓的频繁骚扰之下，燕军官兵基本上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日子一久，很多人都患上了神经衰

弱。

除了心理战之外，京畿地区的一些豪杰义士也组织了许多地下抵抗力量，今天干掉一支巡逻队，明天杀死几个斥候兵。虽然每一次的动作都不大，但却神出鬼没，让燕军防不胜防。燕军也曾经发动过几次清剿，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抵抗力量就像春天里的韭菜，刚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让燕军伤透了脑筋。

燕军刚进入关中时，其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京畿地区，而且北抵洛交（今陕西富县）、西至扶风（肃宗即位后改名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可到了后来，随着抵抗运动的不断兴起，燕军不得不大幅回缩战线，其力量所及，北不过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南不过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西不过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基本上只据有长安一座孤城。燕军小股部队只要敢迈出长安西门，就随时有可能被抵抗组织灭掉。

正因为长安和关中百姓这种卓有成效的抵抗运动，才使得燕军被牢牢牵制在京畿地区以内，既不能西进追击玄宗，也无法北上进攻灵武。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此，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赋，才能通过襄阳西上，绕道上郡（今湖北郧西县），再通过凤翔中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玄宗所在的成都和肃宗所在的灵武。

对于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李唐王朝而言，这条运输线无疑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只有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肃宗李亨才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并打响一场匡复社稷、重整山河的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凤翔太守正是诛杀虢国夫人的原陈仓县令薛景仙。肃宗即位后，第一时间就提拔了他，让他坐镇凤翔。事实证明，肃宗的这项人事任命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凤翔的战略地位异常突出，它既是防御燕军西进的一座桥头堡，更是帝国财赋运输线上的一处重要枢纽。而薛景仙到任后，屡次击退了燕军的进攻，牢牢捍卫着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为危机中的李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关中抵抗运动的日渐活跃，燕军的军心开始动摇了。

首先叛离燕朝的是一个叫阿史那从礼的同罗将领。

他料定燕军不可能在长安长久立足，于是便瞅准机会，拉着麾下的五千骑兵逃离长安，跑到了朔方。不过，他并不是想跳槽归附肃宗，而是准备勾结边地的其他胡人部落，趁乱割据，自立山头。也就是说，他既不想再给安禄山打工，也不愿意给李隆基或李亨打工。

肃宗李亨当然不会容许这个胡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割据。所以，阿史那从礼刚一到朔方落脚，李亨就暗中派人去游说他的部众，千方百计进行劝降。结果，还没等阿史那从礼有所动作，手下的一大帮人就被李亨忽悠走了。

阿史那从礼大怒，遂煽动铁勒九姓、六胡州的胡人部落，很快就集结了数万人，并进抵灵武北面，随时准备发动进攻。肃宗闻报，即命郭子仪征调天德军（驻地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讨伐阿史那从礼。郭子仪又把任务交给了麾下的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铁勒九部人）。仆固怀恩旋即命长子仆固玢出兵，不料却被阿史那从礼击败，仆固玢被俘。

数日后，仆固玢侥幸从敌营逃回，可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军法和冰冷的铡刀。为了激励士气，仆固怀恩毫不犹豫地砍下了儿子的脑袋。见此情景，三军将士无不震骇。随后，仆固怀恩发兵再战，唐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百，遂大败同罗及诸胡联军。

击破阿史那从礼后，肃宗李亨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既然阿史那从礼可以勾结诸胡作乱，我为什么不能向诸胡借兵平叛呢？

胡人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劲旅，克复长安也就指日可待了！

肃宗被这个借兵的想法搞得兴奋不已，随即派遣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他们出兵帮唐朝平叛，同时郑重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克复长安之时，土地和百姓归唐朝，财富和美女都归你们！

为了早日夺回京城，此刻的大唐天子李亨已经顾不上自己和帝国的尊严了。

众所周知，从贞观初年起，大唐天子就已经被四夷诸蕃共尊为“天可汗”。当时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和部落，哪一个不是把唐朝皇帝视为天经地义的天下共主呢？太宗皇帝征调四夷兵马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可如今，堂堂天可汗的子孙却再也没有资格向四夷发号施令了。他不仅要屈尊俯就地向异族借兵，而且还要拿京师的财富和美女跟异族做交易！

这是肃宗李亨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的耻辱。

可是，这能怪李亨吗？

一个被叛军打得东奔西逃，连都城都没有的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事实上，从玄宗君臣仓皇逃离长安的那一刻起，李唐王朝就已经尊严扫地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讨论尊严实在是一件很奢侈、很可笑的事情。而李亨虽然已经在灵武即位了，所建立的朝廷也已经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真正摆脱生存危机。所以，尽管李亨拿帝国的财富和子民跟异族做交易显得很无耻，可这就是现实。没有这样的承诺和诱惑，回纥就不可能出兵。回纥不出兵，要夺回长安就会困难得多。而拿不回长安，李亨就永远也找不回失落的尊严。

所以说，并不是李亨不要脸，而是李唐王朝的脸早就被安禄山撕烂了。李亨别无选择。

对于长安的燕军来讲，阿史那从礼的叛逃无疑使得原本就已动摇的军心越发涣散。不管是燕军官兵，还是投降燕朝的原唐朝官员，人人都在忙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于是，京、府、县的各级衙门都没人上班了，就连监狱的狱卒也跑得不见踪影，以致囚犯们一个个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满街溜达。

长安再次出现了严重骚乱。

在此情况下，京兆尹崔光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燕朝如此不得人心，这长安还能守得了几天？自己要是死心塌地跟着安禄山走，到头来又会是个什么下场？

崔光远越想越怕，随即采取了行动。

他派兵包围了燕军大将孙孝哲的府邸，表面上说是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是在监视孙孝哲。崔光远之所以要监视他，其因有二：一、为了避免长安的局势彻底失控，就要防止孙孝哲逃跑；二、万一唐军真的杀回来了，可以拿孙孝哲的人头将功赎罪。

在崔光远看来，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无论最后是唐朝赢了还是燕朝赢了，自己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孙孝哲并不是笨蛋。他当然很清楚崔光远在想什么，只不过碍于此人是安禄山亲自任命的京兆尹，孙孝哲才不敢随便动他。但是，

这并不等于孙孝哲会容忍一大帮“警卫”天天在他家门口站岗。

随后，孙孝哲便向安禄山呈递了一道密奏，内容自然是控告崔光远心生异志，请求安禄山下旨将其诛杀。

孙孝哲的密奏刚发出去，崔光远就得到了消息。

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脚踩两只船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要是再不作出抉择，大祸随时可能临头。最后，崔光远不得不带着长安府、县两级衙门的十几个官员，偷偷逃离长安，一口气跑到了灵武。

面对这些墙头草似的卑鄙小人，肃宗心里虽然极为鄙视，可他还是拿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宽宏姿态，不仅热情欢迎他们归来，而且马上又授予了相应官职。其中，崔光远再次被任命为京兆尹，同时兼任御史大夫。当然，此刻的肃宗朝廷连京城都没有，所谓的京兆尹自然也只是一顶空头乌纱。

封完官后，肃宗马上交给了崔光远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让他前往渭北一带，负责招抚那些流亡在外或者被迫投敌的官吏和百姓。

肃宗笑容可掬地看着崔光远，那笑容里分明在说：“你瞧，像你这种有过特殊经历的人，是最有资格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没有谁比你更适合了。”

崔光远有些傻眼。

可他心里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挑肥拣瘦了。他现在只能抱着将功赎罪的心态，老老实实接受任务。毕竟脑袋没有搬家，他就该谢天谢地了。

跟崔光远比起来，宦官边令诚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几天后，他也从长安逃回了灵武，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将功折罪的机会，而是死亡。

肃宗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把他砍了。

同样作为曾经的叛国者，边令诚之所以和崔光远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倒也不是因为他罪孽特别深重，而是因为对肃宗李亨来说，边令诚和崔光远有不同的利用价值——李亨让崔光远活着，并且让他官复原职，是想让他现身说法，招抚那些已经投降燕朝的人；而李亨杀掉边令诚，同样是让他用掉脑袋的方式，震慑那些即将投降燕朝的人。

赶快回头，你们就能和崔光远一样官复原职；倘若执迷不悟，边令诚

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所以崔光远可以活，但边令诚必须死。

道理就这么简单。

至德元年九月末，也就是肃宗灵武即位的两个多月后，他的朝廷与草创之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现在有兵，有钱，有粮，且外有回纥奥援，内有四方官吏和百姓拥戴。一个朝廷该有的东西他似乎都有了。所以，此刻的肃宗李亨越来越有一种柳暗花明、否极泰来的感觉。

接下来，他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长安。

九月十七日，肃宗离开灵武，于二十五日进至顺化（今甘肃庆阳县）。此地距离长安只有大约五百里路。随后的日子，肃宗还将继续南下，一步一步地逼近长安，组织并打响一场收复两京、重振社稷的帝国反击战。

而就在同一天，负责呈送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也恰好进抵顺化。

终于来了！

万千滋味刹那间涌上李亨的心头。

尽管玄宗送给儿子的这份礼物来得有些迟，但还不算太晚。

在收复长安的战役打响之前，这份礼物其实来得正是时候。

如果说兵马钱粮是肃宗朝廷的血肉，民心士气是肃宗朝廷的骨髓，那么玄宗的传位之旨就相当于是为肃宗朝廷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

灵魂。

是的，从这一刻开始，肃宗李亨就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来自玄宗的这份政权合法性的终极认证，使得李亨终于能够以一个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帝王身份，当之无愧地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当然，李亨城府极深，他是不会让内心的兴奋之情轻易流露出来的。见到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这一刻，尽管李亨心里波涛汹涌，可他的

表情却极为淡定，看上去仿佛仍然是那个谦虚内敛、低调做人的东宫太子。

李亨出人意料地婉拒了玄宗的册命。他对韦见素等人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只因中原尚未平静，我才权且总领百官，岂敢乘国家危难之际，贸然传袭皇位？

群臣闻言，免不了一番阿谀奉承，大赞李亨谦恭仁孝云云，同时极力劝谏，请他接受册命。然而，李亨却执意不肯接受。最后，他把玉玺和诏书供奉在了别殿，每天早晚各礼拜一次，有如给太上皇行“晨昏定省之礼”一样。

这当然是在作秀。

李亨说他不敢“乘危传袭”，可事实上，他早已不待传位而私自承袭了。所以说，李亨此刻的表现，说好听点叫作“谦恭仁孝”，说难听点就叫得了便宜卖乖。

不过，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说，李亨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堵住天下人的嘴，让人再也找不到攻讦他“擅立”的口实。

——你看，连太上皇传位他都不肯接受了，你怎么能说人家抢了父亲的皇位呢？

李亨虽然没有接受册命，但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身为皇帝的合法性了。而玄宗从成都派过来的三位宰相，自然也就留在了他的身边。

在韦见素、房琯、崔涣这三人中，李亨最讨厌的人是韦见素。因为在李亨看来，韦见素一直和杨国忠同穿一条裤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

最受李亨赏识的，是房琯。

此人历来有贤能之名，李亨本来就对他抱有好感，加之房琯一见到李亨，立刻拿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大势，李亨遂被他的风采打动，从此深为倚重，“军国事多谋于琯”。而房琯也当仁不让，“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诸相拱手让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然而，此刻的李亨并不知道——这个房琯只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家伙。

在李亨重整山河、中兴李唐的道路上，在滚滚弥漫的天下烽烟中，真正能够帮助他廓清迷雾、矫正方向的人，根本不是这个徒有虚名、雄辩滔滔的宰相房琯，而是一个生性淡泊、与世无争的布衣。

他，就是中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泌。

[1]　按照《唐六典》记载，所谓的“平安火”是唐代的一种军事预警机制，亦即每隔三十里设置一座烽火台，若无敌情，每天日暮准时燃起烽火，否则就不燃。这种预警机制与我们平常熟知的恰好相反——其他朝代的烽火都是报警用的，而在唐代则是报平安用的。虽然方式相反，但性质一样。

第八章 大唐反击战

李泌：布衣“宰相”

李泌，字长源，自幼聪敏，博涉经史，工于诗书，常以王佐之才自命。李泌从小就有“奇童”之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他刚刚六岁的时候，玄宗便慕名召其入京。李泌入宫觐见时，玄宗正和宰相张说弈棋。为了考察他的才智，玄宗就暗示张说考考他。张说随口说了一句：“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然后让他用“方、圆、动、静”四个字，也照这个样子赋句。李泌不假思索，张口就说：“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新唐书·李泌传》）

此言一出，顿时语惊四座。玄宗大喜，对左右说：“这孩子的心智，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当即赐给财帛，并特地颁了一道敕令，让他的父母善加培养。当时的著名朝臣张九龄、张廷珪等人，都对他非常欣赏，并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常亲切地称他为“小友”。

长大成人后，李泌更为博学，尤其精通《周易》。但他却无心仕途，耻于像一般人那样追求功名，而是钟情山水，欣慕老庄、神仙之术，经常云游或隐居于嵩山、华山和终南山之间。天宝中期，李泌给玄宗

上书，直言当时的朝政得失，玄宗才猛然回忆起当年那个“奇童”，随即征召李泌入朝，授予翰林待诏之职，让他到东宫辅佐太子李亨。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泌和李亨结下了不解之缘。李亨对他非常敬重，常称其为“先生”。从严格意义上讲，翰林待诏只是文学侍从，算不上真正入仕，而玄宗也曾经想授予李泌正式官职，却被他婉拒。所以，李亨和李泌实际上一直是“布衣之交”。

在东宫供职几年后，李泌因看不惯杨国忠的恃宠擅权，写了一首《感遇诗》讥讽朝政，结果得罪了杨国忠，旋即被逐出京师。李泌干脆脱离政治，从此躲到河南嵩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

此后的几年里，李亨和李泌就断了音信。

当李亨从马嵬北上灵武之时，内心的彷徨和无助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李泌，随即派人前往嵩山寻访，希望李泌能出山辅佐他。

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李泌当然没有理由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于是，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跟着使者日夜兼程赶到了灵武。李亨大喜过望，旋即引入内殿，与他促膝长谈。从此，李泌便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留在了肃宗身边，“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就跟当年在东宫的时候一样。肃宗“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此时的李泌虽然仍是布衣之身，但他对肃宗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越了文武百官，甚至超越了宰相，完全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肃宗多次要任命李泌为宰相，可李泌却坚决推辞。他说：“陛下像朋友一样对待我，说明我的身份比宰相还要尊贵，何必一定要我入仕为官，违背我的心志呢？”肃宗只好作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肃宗朝廷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威也日渐提升，一切都在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因而李泌的布衣身份也越来越让肃宗感到尴尬。有一次，肃宗和李泌一起路过军营，士兵们就指着他们窃窃私语，说：“那个穿黄衣服的是‘圣人’，那个穿白衣服的是‘山人’。”所谓“圣人”，意指皇帝；而所谓“山人”，意思就是山野村夫了。肃宗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当然是老大不爽，于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改变李泌的布衣身份。

肃宗把外面的议论告诉了李泌，然后说：“值此非常时期，我虽然不敢强迫先生当官，但还是请先生换一件紫袍（三品以上官服），以免

下面的人说三道四。”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可李泌刚刚把紫衣穿上，肃宗就笑容满面地看着他说：“既然紫衣都穿了，岂能没有一个名分！”随即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道敕令，宣布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所谓“侍谋军国”，是李亨的一项特殊发明，也是专门为李泌量身定做的。由此可见，为了让这个死活不肯当宰相的李泌有一个合适的名分，李亨可谓用心良苦。

这下子李泌才知道自己被肃宗忽悠了，赶紧连声推辞。肃宗一脸正色道：“朕不敢封你为宰相，只是暂时给你一个身份，等到叛乱平定，便任你远走高飞。”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李泌要是再推辞，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李泌无奈，只好勉强答应。

李泌之所以死活不肯当官，首先当然是因为他那与众不同的个性。他一贯鄙视世间的虚名浮利，尤其鄙视那些为了权力、富贵而不择手段的钻营之辈。因此，即便是为了辅佐李亨而不得不出山，他也希望自己始终保有一种超脱的心态，不愿被世间的功名利禄所捆绑。

不过，这还不是李泌拒不为官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上，李泌的真正动机要比这个深远得多。用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话说，李泌之所以屡辞相位，是因为他心中怀有一种关乎唐室兴亡之“大机”。

众所周知，玄宗执政后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君轻爵位”而“人觊贵宠”。这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皇帝既然滥封滥赏，不珍惜朝廷爵禄，百官当然只求谄媚皇帝，一心博取富贵荣宠。天宝末年，之所以内有杨国忠恃宠擅权，外有安禄山阴谋反叛，正是这一积弊导致的后果。

所以，李泌的“大机”，就是想铲除天宝政治的这种积弊。

具体言之，李泌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达成两个目的：一、为肃宗朝廷的文武百官树立一个榜样，使得“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读通鉴论》卷二三）。也就是让官员们真正为国家和百姓做事，而不是唯上媚上，一门心思只想着升官发财。二、在此基础上，使肃宗朝廷自上而下都能养成一种“珍惜爵赏”“不贪荣利”的健康风气，为肃宗的中兴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开局。

毋庸讳言，以李泌一人之力，是很难改变一个时代的积习的，但是唯

其如此，李泌的努力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能够得到李泌这种不世出的王佐之才，实在是肃宗李亨的幸运。李泌纵然改变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但在辅佐李亨这件事上，他的智慧和才能还是绰绰有余的。

刚到灵武不久，李泌就曾经及时纠正了肃宗即将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那是关于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

起初，肃宗是想把这个重要职位交给三子建宁王李倓，因为李倓生性英勇果敢，善于骑射，且富有才略。比如，李亨与玄宗在马嵬分兵后，北上灵武的主意就是李倓提出来的。后来，在奔赴灵武的一路上，李亨一行“屡逢寇盗”，全靠李倓“自选骁勇，居上（李亨）前后，血战以卫上”（《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李亨才得以转危为安。

这么优秀的儿子，李亨没有理由不把元帅的职务交给他。

但是，肃宗的决定却遭到了李泌的反对。他说：“建宁王固然是元帅之才，但广平王李俶是长兄。如果建宁王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那将把广平王置于何地？”

肃宗不以为然地说：“广平是长子，本来就是未来储君的当然人选，何必一定要居元帅之位？”

李泌说：“问题是广平王现在还没有正位东宫！如今时势艰难，人心所向都在于元帅，倘若建宁王大功既成，即使陛下不以他为储君，追随他立功的那些人岂能答应？太宗皇帝和太上皇当年发生的那些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肃宗闻言，不禁悚然一惊。

他一心只想着早日收复长安，却差点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隐患。如果不是李泌及时提醒，他就酿成大错了。肃宗随即改变决定，把元帅的职务给了广平王李俶，命他统御诸将。

事后，建宁王李倓得知此事，马上向李泌当面致谢，说：“这正是我的心愿。”

李泌的这次劝谏，化解了一场兄弟阋墙的危机。

紧接着，他又对肃宗进行了一次劝谏，成功避免了肃宗与玄宗之间有可能产生的父子相猜。

有一天，肃宗和李泌在谈话，话题不知不觉扯到了李林甫身上，肃宗咬牙切齿地说，等到克复长安之日，一定要颁布一道敕令，将李林甫的坟墓挖开，焚骨扬灰，以泄心头之恨。李泌却大摇其头，说："陛下方定天下，奈何找死人寻仇！李林甫现在不过是一具枯骨，无知无觉，陛下这么做，只能徒然显示圣德之不弘而已。更何况，天下降贼的人那么多，一旦听到此事，必然心生恐惧，这不等于阻断了他们的自新之途吗？"

肃宗大为不悦，说："此贼过去千方百计要害朕，让朕朝不保夕。朕能够活到今天，全靠上天庇佑！李林甫当时也看你不顺眼，只是未及对你动手就死掉了，难道你想宽恕他？"

李泌道："臣岂不知李林甫当年的所作所为，但臣考虑的不是这些。请陛下想一想，上皇君临天下近五十年，享尽太平欢乐，而今一朝失意，远走巴蜀。南方气候恶劣，而上皇年事已高，若听到陛下敕令，一定会认为陛下是因为当年韦妃被黜一事 [1] 记恨他。倘若上皇因此产生不安和愧疚，以致感伤成疾，那么陛下必然会被人指为'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到时候，陛下何以自解？"

肃宗闻言，顿时如梦初醒，当即起身，仰天长拜，说："朕根本没想到这些，是上天让先生进此忠言啊！"然后抱住李泌，涕泣不已。

李亨的表现虽然比较夸张，但也是有感而发的。

毕竟，李林甫是玄宗多年宠信的宰相，有道是打狗也要看主人，你李亨要是真的把他挫骨扬灰，那无异于是在扇玄宗的耳光，你让他老人家的脸往哪里搁？更何况，李亨作为一个自立门户的天子，极力淡化"擅立"的恶名犹恐不及，何苦再招惹世人非议，无端背负"不能安君亲"的骂名呢？假如不是李泌深谋远虑，及时进谏，李亨显然又要犯下低级错误了。

李泌处处以大局为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固然对肃宗有很大的帮助，但有时候也难免因直言极谏而得罪人。

比如肃宗朝廷刚刚从灵武迁至顺化不久，李泌就得罪了一个特殊人物。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女人。

她就是肃宗的爱妃张良娣。

张良娣：这个女人有心机

张良娣是一个来头不小的女人。

她的祖母和玄宗的生母窦氏是亲姐妹。玄宗年幼时，母亲窦氏被武则天派人暗杀，玄宗就一直由他的姨母，也就是张良娣的祖母照料。为了报答对姨母窦氏的养育之恩，玄宗即位后，把她的四个儿子全部擢为高官。张良娣就是窦氏最小的儿子所生。天宝中期，张良娣被选入东宫为妃。当时太子妃韦氏已于数年前被黜，加上张良娣本人“性巧慧，能得上意”，所以深受李亨宠爱。

玄宗逃离长安时，张良娣与太子随行。此时张良娣已身怀六甲，即将临盆，可她一直表现得非常坚强，默默忍受着颠沛之苦。据《旧唐书·后妃传》所载，当马嵬百姓“遮道请留”，劝太子不要入蜀时，张良娣也态度鲜明地“赞成之”。由此可见，张良娣很可能也事先参与了“父老遮留”这一幕的策划。

从马嵬分兵北上后，由于一路上不断遭遇危险，张良娣每晚就寝时，都会主动睡在外侧，把李亨挡在身后。李亨苦笑着说：“抵御寇贼，不是你们女人的事情，你何必睡外面？”张良娣却说：“现在的形势这么乱，殿下的卫兵又太少，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妾身还可以替殿下挡一挡，以便让殿下从后门撤离。”

听到这样的话，李亨不可能不被感动。

到达灵武不久，张良娣腹中的胎儿呱呱坠地。可产后的第三天，张良娣就拖着虚弱的身躯，加入到了为战士缝制衣服的行列。李亨大为不忍，劝她安心静养。张良娣回答得很干脆：“这不是妾身静养的时候。”

李亨再一次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更加宠爱张良娣。

作为当事人，李亨除了感动，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想法。可作为旁观者，我们却不能不说，张良娣的表现有些煽情，因此很容易让人产生某些想法。至少，从上面的几则感人小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女人很有心机。

女人有心机，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而作为一个身份特殊、地位显赫的女人，张良娣的心机就更足以让人头疼了。

和这样的女人打交道，势必要万分小心。万一你不小心成了她的对头，那你的麻烦就大了。

不小心惹上这个女人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李泌，还有一个就是建宁王

李倓。

有一次，太上皇李隆基赐给了张良娣一张七宝装饰的马鞍，相当豪华，相当贵重。李泌一看就有意见了，对肃宗说：“如今四海分崩，应该以俭约示人，张良娣不应乘坐这张马鞍。臣斗胆建议，将上面的七宝珠玉摘下来，上缴国库，以备赏赐给立下战功的人。”

李亨正在思忖该不该把那些珠玉摘下来，屏风后面忽然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家乡里乡亲的，不至于这样吧！”

说话的人正是张良娣。

她是京兆新丰人，而李泌也是京兆人，所以张良娣才会酸溜溜地称他为老乡。

就这一句话，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上面那些感人事迹通通都是在作秀。她之所以口口声声替老公阻挡刀枪，还牺牲坐月子的时间替战士缝制衣服，真正的动机就是要获取李亨的怜爱和信任，而不是为了什么家国社稷。倘若她真的是为家国社稷着想，在听到李泌谏言的时候，就应该舍己为公，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人做表率。可她偏偏没有，而是说了那么一句酸溜溜的话，这说明什么？

这足以说明，张良娣上面的作秀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在舍小博大——忍受小痛苦，牺牲小利益，博取政治利益。

张氏的身份毕竟只是一个不高不下的良娣，并非真正的太子妃。所以李亨即位后，她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换言之，在正位中宫之前，皇后宝座并不是非她莫属的，因此，她就必须不择手段地巩固并加深肃宗对她的宠爱。

可是，“七宝鞍事件”不也是一个很好的博取宠爱的机会吗？她为何不按照李泌的意见，顺水推舟地再秀一把呢？

原因当然还是出于政治利益。

要知道，这个七宝鞍的最大价值并不在那些闪闪发光的珠玉上，而是在于它是太上皇送的！上面说过，张良娣的祖母对幼年的玄宗有过养育之恩，这层关系对于日后张良娣的正位中宫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张良娣拥有这张七宝鞍，就等于时刻在提醒肃宗、提醒百官、提醒天下人——我和太上皇的关系非同寻常！

现在，李泌居然要把这个七宝鞍拆了，岂不是要拆张良娣的墙角，阻

挠她正位中宫？

在此情况下，她当然要挺身捍卫自己的利益。

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利益，张良娣断然不会说出那么弱智的一句话。换言之，像张良娣这么一个心机深沉的政治女性，是断然不会舍不得那几颗珠玉的。假如这张七宝鞍是别人送的，我们相信，无须等李泌来进谏，张良娣早就主动把它拆了，而且说辞肯定会跟李泌一模一样——时局艰危，当示天下以俭，妾身不应留着它。这么一说，保证再一次把肃宗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七宝鞍事件”的结局不难想到，肃宗听从了李泌的建议，对屏风后的张良娣解释说：“先生都是为社稷着想啊！”然后就命人把张良娣视为命根的七宝鞍给拆了。

可想而知，张良娣心头的怒火会蹿得多高。

可是，李泌是肃宗亦师亦友的人物，满朝文武、公卿将相的进退都在他一句话，张良娣奈何不了他。

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替罪羊出现了。

他就是建宁王李倓。

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廊下听到了肃宗的决定，顿时感动得眼泪哗哗的。肃宗惊闻外面哭声，赶紧把李倓叫了进来。李倓抹抹眼泪，哽咽着说：“臣近来时刻担忧，这场祸乱一时难以平定。今天看见陛下从谏如流，相信用不了几天，就能看到陛下把上皇迎回长安，一时激动，忍不住喜极而泣。”

毫无疑问，这番话一字不漏地落进了张良娣的耳中。

李倓的悲剧就在这一刻注定了。

张良娣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一言不发地拂袖而去。

老娘固然奈何不了李泌，可老娘还奈何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建宁王？

张良娣觉得李泌是在拆她墙角，阻挠她正位中宫，其实也没有冤枉李泌。因为就在数日之后，肃宗就向李泌流露了立张良娣为皇后的意思，却被李泌不假思索地否决了。

当时，肃宗说：“良娣的祖母，是昭成太后（玄宗生母）的妹妹，上皇对过去的那些事一直念念不忘。朕想让良娣正位中宫，以告慰上皇之心，你认为怎样？”

李泌答：“陛下在灵武，都是因为群臣想得到拥立之功，才不得不登上大位，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至于像册立皇后这样的家事，最好等待上皇的诰命，相信只是多等个一年半载而已。”

如果说在七宝鞍的事情上，李泌还有一个“示天下以俭”的理由的话，那么在这件事上，李泌就是赤裸裸地跟张良娣唱对台戏了。

李泌为什么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倘若肃宗自己册立皇后，那就让人有理由认为——你李亨在灵武自立的动机就是为了抢班夺权，否则你刚当上皇帝，为何就急不可耐地要立皇后呢？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私利吗？

换言之，李泌的潜台词就是：太上皇不忘姨母养育之恩，要立张良娣为皇后，那是太上皇自己的事情，一切让他老人家去定夺，你李亨何必越俎代庖，多此一举，让天下人又来嚼舌头呢？

李泌正是不希望给天下人留下这样的口实，才反对肃宗自己册立皇后。严格来讲，李泌并不是冲着张良娣个人去的。然而，张良娣并不会这么认为。在她看来，李泌就是在故意拆她的台！

所以，张良娣迟早要让拆台的人付出代价。

当然，柿子要捡软的捏。张良娣首先要对付的人不是李泌，而是那个口无遮拦、不知天高地厚的建宁王李倓！

一个被失望笼罩的冬天

有人说，希望是火，失望是烟，人生总是一边点着火，一边冒着烟。对于至德元年冬天的李亨来说，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这一年十月初三，肃宗李亨带着文武百官继续南下，从顺化进至彭原（今甘肃宁县）。此地距长安大约只有四百里路。随着肃宗朝廷的不断南移，李唐王朝反攻长安的态势也日益凸显。

对于即将打响的这场收复长安的战役，李亨无疑充满了信心。因为此刻的朝廷人才济济、兵精粮足，而且回纥可汗也已向唐朝派出了使臣，不日将抵达彭原，与他商讨出兵之事。如此种种，都是李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理由。

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即将来临的这个冬天，将是一个被失望彻底笼罩的冬天。

首先给他带来失望的人，就是他最赏识的宰相房琯。

自从获得肃宗的信任后，房琯俨然就成了李唐朝廷的第一宰相。由于房琯本来就有“喜宾客，好谈论”的名士做派，因而掌握相权后，他马上提拔了一大帮崇尚清谈的朝野名士，而那些来自基层或者起于草莽的文臣武将，则被他视为“庸俗”之辈，纷纷遭到排挤。

房琯这种标榜清流、排斥异己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大多数朝臣的强烈不满。在那些实干派看来，像房琯这种所谓的名士和清流，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他们口口声声要救国，可到头来非但不能救国，反而极有可能误国！

十月初，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入朝觐见。肃宗因其在河北抗战中表现突出，就让房琯起草敕令，准备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并出任岭南节度使兼南海太守。

在房琯眼中，贺兰进明就是属于没文化的庸俗之辈。对于肃宗的任命，房琯表面上不敢有什么意见，可在起草敕令的时候，却自作主张地把岭南节度使和南海太守这两个职务拿掉了，仅给贺兰进明保留了一个御史大夫之职，而且在官职前面还冠以一个“摄”字，相当于代理之意。贺兰进明一下就跳起来了。

当然，他没有去找房琯，而是直接去找了肃宗。

官员被授予新官职一般都要当面叩谢圣恩，贺兰进明就揣着严重缩水的任命状入朝叩谢。肃宗大为奇怪，问他怎么回事。贺兰进明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房琯和他有私人恩怨，所以借机报复。

紧接着，贺兰进明就狠狠参了房琯一本。他对肃宗说：“晋朝时，名士王衍贵为三公，但却浮华虚伪，崇尚清谈，结果导致中原板荡，天下不宁。如今，房琯华而不实，仅凭迂阔之谈博取虚名，和王衍简直是一丘之貉，他提拔引荐的那些人，也都是浮华之辈。陛下用他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此外，陛下应该还记得，上皇不久前曾发布一道

诏书，命陛下和诸王分领诸道，将陛下置于这空旷荒凉的边塞。据臣所知，这道诏命就是房琯建议的。房琯还把自己的心腹派到诸道，表面上说是辅佐诸王，实则暗中掌控实权。房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无论上皇的哪个儿子平定天下，他都不会失去权力和富贵，试问，这是一个忠臣应该干的事情吗？”

对于贺兰进明的这番话，肃宗当然不会全盘相信。但是，只要肃宗信了三分，房琯的日子就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滋润了。

随后，贺兰进明仍旧被肃宗任命为御史大夫，并出任河南节度使。与此同时，房琯则明显感觉到了肃宗对他的冷落和疏远。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光说不练的主，房琯随即向肃宗主动请缨，要求率部出征，克复两京。肃宗也正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当即批准，任命他为“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同时交给了他六七万兵马。

房琯要求自行挑选将佐，肃宗也一口答应了。房琯随后便从心腹朝臣中挑了三个人：御史中丞邓景山，任副帅；户部侍郎李揖，任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任参谋。其中，房琯最倚重的就是李揖和刘秩，他不但把军事指挥权都交给了他们，而且逢人便说：“叛军的精锐虽多，怎能抵挡我的刘秩！”

和房琯一样，李揖和刘秩也都不过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军事，可房琯却对他们充满了信心。

十月中旬，房琯开始胸有成竹地调兵遣将，把大军分为三路：南路由杨希文率领，自宜寿（今陕西周至县）出发；中路由刘贵哲率领，自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出发；北路由李光进（李光弼的弟弟）率领，自奉天（今陕西乾县）出发，浩浩荡荡向长安挺进。

十月二十日，中路军和北路军先行进抵便桥（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次日，二军与燕军的安守忠部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遭遇。房琯采用古代的兵车战术，出动了两千辆牛车，让步兵和骑兵紧跟在牛车后面，对燕军发起冲锋。

安守忠看着唐军的牛车阵，当场笑喷。正巧这时刮起了东风，安守忠即命士兵在阵地前沿燃起大火，然后擂动战鼓，嘶叫呐喊。一时间，火焰，浓烟，以及震天动地的鼓声和呐喊，顺着风势一齐向唐军袭来。那两千头牛何曾见过这等阵仗，一下子都被吓成了疯牛，当即四处狂奔。于是，唐军还没来得及和燕军交手，自己的人、车、牛、马

就开始互相踩踏，乱成一团。燕军趁势发起进攻，唐军大败，死伤四万余人，仅剩数千残兵跟着房琯逃离了战场。

十月二十三日，房琯不甘心失败，又亲自带领南路军与燕军交战，结果再度溃败，士卒伤亡殆尽，将领杨希文、刘贵哲投降燕军。

肃宗朝廷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反击战，就这样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李亨暴跳如雷。

没想到你房琯的本事这么大，一战就把六七万人全给报销了！

房琯失魂落魄地逃回彭原时，肃宗本想把他一刀砍了，无奈李泌极力劝谏，肃宗才饶了他一命。

这次惨败显然对肃宗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首先，它极大地削弱了肃宗朝廷的军事实力；其次，它充分表明肃宗在用人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肃宗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的火焰，被它当头浇下了一盆凉水！虽然还没有完全熄灭，可要重新燃起来又谈何容易？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唐军于陈涛斜遭遇惨败的同时，从关外也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河北全线沦亡了。

自从郭子仪和李光弼撤离后，史思明就重新抖擞了起来。

他先是攻克了九门、藁城、赵郡、常山等地，继而又与另一燕将尹子奇围攻河间。河间太守李奂率当地军民奋勇抗击，坚守了四十余日。颜真卿见河间危急，派部将和琳率一万二千人前去救援，却遭到史思明的强力阻击，士卒溃散，和琳被俘。

得知援军被击溃的消息后，河间军民的最后一丝希望终于破灭。史思明一鼓作气，攻陷河间，生擒李奂，并将其押赴洛阳斩首。紧接着，史思明又攻陷景城（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城破之时，当地太守李暐投河自尽。稍后，史思明派出两名骑兵，携带一封招降信前往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乐安太守几乎连想都没想，就举城投降了燕军。

连下数城之后，史思明接下来的目标，当然就是河北唐军抗燕的大本营——平原郡了。

十月下旬，史思明以部将康没野波为前锋，挥师南下，直逼平原。

颜真卿知道，面对势如破竹的燕军，平原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

守不住怎么办？投降吗？

绝对不可能。

既不能战，也不能降，那就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并不是颜真卿贪生怕死，而是他不想做无谓的牺牲。在乱世之中，死其实很容易，只有顽强地活下去，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才是真正艰难的事情。

十月二十二日，颜真卿率部撤离平原郡，渡过黄河南下，进入江淮地区。此后，颜真卿又通过荆州、襄阳辗转北上，终于在次年四月抵达凤翔，与驻跸在此的肃宗会合。

颜真卿的南撤，意味着曾经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动就此画上了一个悲凉的句号。

史思明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平原郡，随后接连攻克清河、博平等郡，继而进围乌承恩驻守的信都（今河北冀州市）。此时，乌承恩的麾下还有整整五万人马，其中还有三千朔方精锐，如果坚守城池的话，就算最终战胜不了燕军，至少也能给史思明造成重创。然而，这个当初拥兵自重、拒不援救常山的乌承恩，却在第一时间打开了城门，把手中的城池和军队拱手送给了史思明。

河北诸郡中，坚持最久的是饶阳郡（今河北深州市）。

差不多从安史之乱爆发后，饶阳就受到了燕军的围攻。虽然燕军也曾迫于战场形势几度撤围，但很快便又卷土重来。到这一年十一月，饶阳被围已将近一年之久，却仍然在苦苦坚守。史思明扫平其他郡县后，便调集重兵，对饶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在燕军近乎疯狂的攻击之下，粮尽援绝的饶阳终于被攻破。燕军士兵蜂拥入城的那一刻，一直在第一线浴血奋战的太守李系不愿死于敌手，遂纵身跃入火中，壮烈殉国。

李系麾下有一员勇将叫张兴，据说力大无比，能举千钧。城破后，张兴被俘，史思明命人把他带到马前，说：“将军是难得的壮士，愿不愿意和我共享富贵？”

张兴扬起下巴，说：“我张兴生是李唐的人，死是李唐的鬼，断无投降之理。现在我的命在你手中，只想说一句话再死。”

史思明道：“说来听听。”

“皇上（玄宗）对待安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可他不知报恩，反而兴兵犯阙，涂炭生灵。大丈夫纵然不能剪除凶逆，也不必面北称臣！在下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足下能否采纳？”张兴顿了一顿，见史思明闷声不语，便接着说，“足下之所以追随逆贼，不过是为了荣华富贵，可这就像是燕子把巢筑在帐篷上，岂能久安？为何不乘机诛杀安禄山，当下便能转祸为福，长享富贵，岂非美事一桩！”

史思明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张兴绑在木桩上，然后用锯子一下一下地割他的肉。张兴扯开嗓子破口大骂，自始至终詈不绝口。其死状之惨烈，其意志之坚贞，与当初的颜杲卿如出一辙。

至饶阳陷落，河北诸郡已悉数沦于燕军之手。燕军每破一城，城里所有女人、财帛、衣服首饰，以及一切拿得动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壮年男性全部抓去充当苦力，至于那些老幼病残，则被燕军当成了取乐的对象，一个个抓来施虐玩弄，等玩够了，再一刀劈死，或用长枪把人挑起来，狠狠掷向半空……

占领河北全境后，燕将尹子奇本来还想南下进攻北海（今山东青州市），进而攻掠江淮地区，不料回纥军队此时已经入援唐朝，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越过朔方、河东，兵锋直抵范阳城下。尹子奇闻报，慌忙掉头北上，回防范阳。

面对陈涛斜惨败与河北全境的沦陷，肃宗李亨感到了一种无边的失望和沮丧。

强敌如此猖獗，两京何时才能收复？天下何时才能太平？

肃宗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向李泌提出了这两个问题。

李泌的乐观出乎肃宗的意料。他胸有成竹地说：“据臣所知，逆贼所劫掠的财帛子女，全部都运到了范阳，这哪里有雄踞四海之志呢？现在，只有胡人将领仍然效忠安禄山，汉人只有高尚、严庄数人而已，其他全都是被迫胁从的。以臣所见，不过两年，天下无寇矣！”

肃宗半信半疑地看着李泌，说：“先生为何如此自信？”

接下来，李泌综合整个天下的形势，向肃宗提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叛军中的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如今，陛下如果命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郭子仪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绝不敢离开范阳

和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亦不敢离长安，这就等于我们只用两路人马，就锁住了他们四个将领。如此一来，安禄山身边就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庆。下一步，陛下命郭子仪不要攻击华阴，让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道路保持畅通，然后陛下再亲自坐镇凤翔，与郭子仪、李光弼遥相呼应，轮流出击。叛军救头，我们就攻其尾，叛军救尾，我们就攻其头，让他们在数千里间疲于奔命。我军以逸待劳，敌至则避其锋，敌去则乘其弊，不攻击他们的城池，也不切断他们的道路。等到明年春天，再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成南北夹击之势，直捣范阳，覆其巢穴。叛军无路可退，原地坚守又无以自安，届时再命勤王大军从四面合围，安禄山必定束手就擒！”

肃宗听完这一席话，连日紧锁的愁眉才终于舒展开来。

一丝希望的火焰又重新在他的心头燃起。

来年春天，一切会不会像李泌所说的那样——唐军高歌猛进、一路奏凯，而安禄山则走投无路，不得不束手就擒？

李亨不知道。

他只能默默地向天祈祷。

安禄山之死

公元757年正月初的某个黄昏，一枚落日无力地悬浮在洛阳皇宫的上空。

天色殷红，红得像是要滴血。燕朝的中书侍郎严庄迈着急促的步伐穿行在重重殿宇投下的阴影中。

他不时回头张望。

身后没有人。除了远处偶尔走过的三五个宫女和宦官，身后一个人也没有。

周围甚至连声音也没有。

一片静阒中，严庄只能听见自己沉重的呼吸声。看来到目前为止，今晚的行动计划仍然是隐秘和安全的。可不知为什么，严庄还是感到自己的手心和脚底都有些潮湿和冰凉。

数日前被鞭杖的背部和臀部此刻还在隐隐生疼。严庄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对那个肥胖如猪的魔头皇帝不断发出强烈的诅咒。

好在这一切都将在今晚终结。严庄想，最后的时刻，希望安庆绪不要临阵退缩。

这一天终于来了。

安禄山的次子安庆绪望着眼前这个神色凝重的严庄，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严庄刚刚对他说的八个字——事不得已，时不可失！

这八个字就是最后的行动指令。

这一刻安庆绪已经等待了很久。

自从他的长兄安庆宗被杀后，安庆绪就觉得自己的好运来了。因为长兄一死，排行老二的安庆绪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父亲的一切。不久，安禄山又在洛阳登基，成了大燕王朝的皇帝。那一刻，安庆绪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在他看来，燕朝的太子之位非他莫属。

然而，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安庆绪万万没料到，安禄山根本没想把储君之位传给他，而是要传给最宠爱的幼子，也就是安庆绪的异母弟安庆恩。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安庆绪顿时满心沮丧。随着安庆恩的日渐长大，安庆绪觉得自己成为储君的希望日益渺茫，甚至连身家性命都朝不保夕。随后，惶惶不可终日的安庆绪便与安禄山的心腹重臣严庄走到了一起。

安庆绪知道，自己绝不能坐以待毙！要想成为燕朝储君，就必须主动做点什么；而无论要做什么，都必须和这个位高权重、心机缜密的严庄联手。

此时此刻，当严庄终于向他发出行动讯号，安庆绪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也无须再等了！

许久，安庆绪听见自己的嘴里也蹦出了八个字："兄有所为，敢不敬从！"（《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也许是过于用力，安庆绪感到自己的话音坚硬得有如铁器撞击时发出

的鸣响。

这是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鸣响。

也是一种欲望的鸣响。

作为刺杀行动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最终执行人，内侍宦官李猪儿也许是三个人中最坦然的。

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这么说还不够准确。应该说，这是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局。因为，用一个阉人的命赌一个皇帝的命，赔率近乎无穷大——一旦得手就赢得了一切，就算失手也不过赔上贱命一条！

所以，李猪儿不会患得患失。

正因为如此，几天之前，当中书侍郎严庄用一种近乎悲壮的神情来劝他入伙时，李猪儿几乎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严庄说："你这些日子所受的鞭挞和杖打，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吧？不豁出去干他一件大事，你就死定了！"

"好。"李猪儿重重点了一下脑袋。

严庄愣了一下。

他本来还想对李猪儿进行一番苦大仇深的教育，没想到李猪儿的觉悟这么高，还没等他开始动员，这小子居然就答应了。

寝宫的锦帐里，安禄山静静躺在宽大的龙床上，很努力地、接连不断地翕着鼻翼。

他在捕捉一种气息。

这是好几天来一直萦绕在他周遭的一种不祥的气息。

今天晚上，这股气息异常浓烈。安禄山甚至可以清晰地察觉到——这是一股杀机！

可惜自己瞎了。安禄山在心里一声长叹。要是在从前，任何一个人心中暗藏的杀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自从范阳起兵以来，安禄山就患上了眼疾。这个病来得很突然，也来得没头没脑。安禄山找来了无数的医生，可没有一个治得好他的病。到这一年春天，安禄山起兵刚刚一年多，他的眼睛就彻底瞎了。

此外，更让安禄山痛苦不已的是——恰恰也是从起兵开始，他身上就长出了恶疮，并且越长越多，溃脓的面积越来越大，而那些该死的御医却照旧对此束手无策。

这些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志得意满的安禄山遽然陷入无尽的痛苦、绝望和愤怒之中。他的性格变得异常暴躁，动不动就把身边的人抓来泻火。比如内侍宦官李猪儿，挨的鞭挞和杖打最多。又比如他最宠信的大臣严庄——尽管这个精明强干的心腹谋臣鞍前马后跟随他多年，而且历来把军务和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也还是没能逃脱他的鞭子和棍子。至于其他那些朝臣、宫女和侍从，更是经常被他打得遍体鳞伤，有些人甚至被砍掉了脑袋……

自从恶疾缠身后，安禄山就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老天爷既然让我当上了堂堂的大燕天子，让我拥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何又要让我恶疾缠身呢？莫非我终究没有当皇帝的命，强行上位的结果就是遭此报应？

我——不——相——信！

安禄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着苍天怒吼。

然而，苍天无语。

尽管安禄山不断把愤怒发泄到左右的人身上，可他内心的绝望却越来越深……

此刻已经是夜阑人静，安禄山感觉那股杀机更浓了。他继续紧张地翕着鼻翼，可内心的警醒和恐惧终究还是被身体的困乏和疲倦所取代。

很快，安禄山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三条黑影悄无声息地摸进了寝殿。

殿内鼾声如雷。十几个内侍和宫女七倒八歪地靠在黑暗的角落里打盹。宽广的寝殿中只有皇帝的锦帐四周摇曳着微弱的烛光。

三个人径直走到亮光与黑暗的交界处，微微站定。然后交换了一下目光。

严庄神色凝重。

李猪儿面无表情。

安庆绪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没有人看见一颗晶莹的汗珠正从他的鼻尖悄然滑落，在地上无声地溅开。

片刻后，严庄轻微而有力地对李猪儿点了下头，李猪儿随即掀开锦帐走了进去。

伫立在宽大的龙床前，看着锦衾下那个缓缓起伏的滚圆肚皮，李猪儿全身滚过一阵莫名的战栗。在李猪儿的想象中，这个肥硕的肚子已经被剖开无数次了。所以，此刻李猪儿挥刀的动作显得极为娴熟，并且干脆利落。

一道森寒的刀光闪过，殷红的鲜血与凄厉的号叫同时飞溅而出。

殿内的所有人全都惊醒了。

一瞬间，他们就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

可是，无人动弹。与其说他们不敢动弹，还不如说他们不想动弹。

因为，所有人都盼着床上的那个人早点死。

安禄山在挣扎——用尽他一生最后的力量在挣扎。以前他的力量足以掀翻整个大唐帝国，眼下他的力量却不足以保护自己。他一手捂着皮开肉绽的肚子，一手在枕边拼命地抓。

他想去抓那把从不离身的宝刀。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他只抓到了帐竿。然后他就抓着帐竿疯狂摇晃。

他摇了很久。

所以，他的血流得很多，肠子也流得很长。

咽气之前，安禄山发出了撕心裂肺的一声怒吼——“必家贼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是的，安禄山猜对了，凶手的确是三个家贼。换句话说，这是三个离他最近的人——严庄在政治上离他最近，安庆绪在血缘上离他最近，

李猪儿在生活起居上离他最近。

纵横天下的安禄山到头来居然死在家贼手里，他肯定死不瞑目，也肯定觉得很冤。

可是，安禄山本人又何尝不是家贼呢？他这个家贼造了君父李隆基的反，他自己的家贼反过来又要了他的命，这不是很公平吗？安禄山凭什么觉得冤呢？

用普通人的话来讲，这叫活该；用古人的话来讲，这叫“天道好还”；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就叫“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当确定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已经变成一堆三百多斤的死肉后，三个家贼挪开龙床，掘地数尺，用毡子把那堆死肉一裹、一扔，就地埋了。所有宦官宫女全都一言不发地帮着清理凶杀现场，配合相当默契。

片刻之后，龙床挪回原地，一切就都恢复了原样，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最后，严庄冲着在场的所有人做了两个动作：先是一根食指竖着在上唇点了一下，然后那根指头又横着在喉咙抹了一下。

众人相视一眼，心照不宣。

公元757年，是唐肃宗至德二年，也是燕帝安禄山圣武二年。这一年正月初六清晨，中书侍郎严庄在朝会上向文武百官郑重宣布：燕帝安禄山病重，即日册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

第二天，太子安庆绪登基为帝。

第三天，新皇帝尊奉安禄山为太上皇。

第四天，新皇帝发布太上皇驾崩的讣告，旋即举办国丧……

燕朝的文武百官压根还没回过神来，严庄和安庆绪就已联手完成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动作。仿佛只在电光石火之间，这个精明过人的严庄已经把燕朝的命运、百官的命运，甚至包括新皇帝安庆绪的命运——不动声色地捏在了手里。

百官们既困惑又不安。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安庆绪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子富贵。他为此深深地感激严庄。在公开场合，他们以君臣相称，可在私下里仍旧称兄道弟。严庄毫不客气地告诉安庆绪，你既没有军事经验也没有政治经验，而且一紧张说话就颠三倒四，恐怕难以服众，还是不要见人的好。

安庆绪乐呵呵地同意了。他马上封严庄为御史大夫、冯翊王，然后一转身跳进深宫的酒池肉林中，把那些让人烦心的军国大事全部扔给了严庄。

这样挺好。安庆绪想，我喜欢享受生活，你喜欢操持政务；我要的是富贵，你要的是权威。咱哥儿俩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多好！

建宁枉死，永王兵变

对于唐肃宗李亨来说，至德二年的春天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悲喜交加。喜的是安禄山终于死翘翘了，悲的是李唐皇室也有两个重要成员在这一年春天死于非命。

一个是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倓。

一个是李亨的弟弟永王李璘。

自从“七宝鞍事件”后，李泌和李倓就成了张良娣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对此，李倓当然不会没有察觉。年轻人本来就容易冲动，加之李倓的性格又很刚烈，所以他很快就有了先下手为强的想法。

有一天，李倓私下对李泌说：“先生凡事经常替我着想，我无以报德，想帮先生除掉一大祸害。”李泌莫名其妙，问他什么祸害。李倓报出了张良娣的名字。李泌一听，顿时神色大变，说：“这不是身为人子应该说的话，今后不要再提，也千万别一时冲动干什么傻事。”然而，年轻气盛的李倓根本听不进去。

就在李倓摩拳擦掌的同时，张良娣也正在不动声色地给他下套。

毕竟姜还是老的辣，深谙权术的张良娣不但没有和李倓正面冲突，反而在肃宗面前帮他说“好话”，建议肃宗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然后把天下兵马元帅的职务交给李倓。

很显然，这是一个离间计，而且是极其阴险、一石三鸟的离间计。

无论哪朝哪代，立储之事最容易挑起皇子间的争端，张良娣怂恿肃宗议立太子，目的就是在广平王和建宁王之间制造矛盾，让他们同根相煎。此外，张良娣知道，议立储君这样的大事，肃宗一定会找李泌商量。这样一来，自然就把李泌扯进了权力斗争的旋涡。在张良娣看来，无论李泌同不同意这件事，他的处境都会很难堪：如果他同意，建宁王李倓肯定不高兴；如果他不同意，广平王李俶肯定不高兴。总之，李泌必定要得罪其中一个。

不出张良娣所料，几天后，肃宗果然向李泌提出了立储之议。他说："广平当元帅也有些日子了，我现在想让建宁全面负责平叛事宜，又怕像你说的那样，因建宁居功而影响广平的皇嗣地位，所以，不如现在就立广平为太子，你认为如何？"

李泌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人在背后搞小动作了。他从容地说："臣曾经多次讲过，凡是军国大事，陛下必须马上处理，可像册立太子这种'家事'，最好是交给太上皇去定夺。否则的话，后人如何辨别陛下灵武即位的本意？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必定是想借此离间臣和广平王。臣请求，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知广平王，臣相信，他也未必愿意当这个储君。"

随后，李泌就把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广平王李俶，并且解释了自己反对的理由，同时表露了自己的苦衷。李俶也很明智，他知道这个时候当太子绝不是什么好事，于是马上去见肃宗，说："陛下至今尚未迎回上皇，儿臣又岂敢当这个储君！儿臣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迎回上皇，除此别无他求。"

李俶这几句话说得很漂亮、很得体，肃宗听完也觉得很欣慰。册立太子之事就此不了了之。

李泌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张良娣的阴招，既避免了一场潜在的兄弟阋墙之祸，又丝毫没有引起广平王的不满和怨恨，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这个足智多谋的李泌面前，张良娣真有点黔驴技穷的感觉。

不过，她绝不会就此罢手。

因为，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自从肃宗灵武即位以来，肃宗的心腹宦官李辅国就跟她结成了政治同盟。张良娣相信，凭借她和李辅国两个人对肃宗的影响力，绝不可能败在李泌的手下。

李辅国，原名李静忠，貌丑，家贫，从小就被净身送进了宫中，一直在宫廷马厩里养马。由于他粗通文墨，而且人比较聪明，于是后来就成了高力士的仆从，并被提拔为“厩中簿籍”。天宝中期，年近五十的李辅国才进入东宫，成了太子李亨的贴身侍从。

玄宗逃离长安时，李辅国也跟随太子一同出逃。马嵬驿之变中，李辅国是陈玄礼和太子之间的联络人，也算是兵变的参与者之一。事后，他又和广平王、建宁王一起策划了“父老遮留”，成功促使太子与玄宗分兵，并北赴朔方。抵达灵武后，李辅国极力劝请肃宗即位，从而立下了拥立之功。

肃宗即位后，当即擢升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兼元帅府行军司马，并视他为心腹，“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旧唐书·李辅国传》）。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辅国开始逐步掌握宫禁大权，并最终成为肃宗朝的一大权宦。

李辅国平生不食荤腥，长期茹素，而且手里经常拿着一串念珠，所以人人都把他当成了善男信女。可事实上，越是热衷于把佛教拿来装点门面的人，内心越有可能藏着一大堆不可告人的东西。用《资治通鉴》的话来说，李辅国实际上是“外恭谨寡言，而内狡险”。

肃宗即位后，张良娣日益得宠，随时有可能登上皇后宝座。面善心险的李辅国见她得势，便主动向她靠拢，“阴附会之，与相表里”（《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李辅国与张良娣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自然引起了建宁王李倓的嫌恶。于是，这个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每次见到肃宗，都会大骂这两人虚伪阴险，心怀大恶，并称他们内外勾结，企图危害皇嗣。

众所周知，除了李泌之外，李辅国和张良娣都是肃宗最宠信的人，所以，李倓在肃宗面前肆意攻讦他们，非但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只会暴露出自己的冲动和幼稚，从而招致肃宗的反感。

冲动是魔鬼。李泌曾经对李倓作出过警告。

然而，他的警告却未能阻止李倓被自己内心的冲动之魔俘获。

李倓的悲剧就此酿成。

张良娣和李辅国本来就和李倓势同水火，如今又天天遭受他的人身攻击，自然是怒不可遏，所以便夜以继日地在肃宗耳边吹风，说：“建宁王恨陛下不给他当元帅，企图谋害广平王。”

李倓指控张良娣和李辅国危害皇嗣，指的也是广平王。如今，矛盾双方都以皇长子李俶为焦点，相互发出指控，肃宗该怎么办？他该相信谁呢？

肃宗最后还是相信了张良娣和李辅国，并决然颁下一道敕令，将建宁王李倓赐死。

李倓就这么死了。这个在肃宗分兵北上、即位灵武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三皇子，就这样冤死在了张良娣和李辅国的谗言之下。

其实，肃宗之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赐死李倓，并不仅仅是听信了张、李二人的谗言，而主要是因为他本人对这个儿子也抱有强烈的怀疑。因为李倓的个人素质和军事能力太过突出了，远远强于他的兄长李俶，因此肃宗打心眼里不相信李倓会甘心居于李俶之下。他之所以急于要立李俶为太子，就是想彻底断绝李倓的念想，避免一场兄弟阋墙的惨祸。可是，鉴于自己即位的“非正常”性质，他又不得不听从李泌的劝告，暂时放弃册立太子的想法。如此一来，李倓夺嫡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这对于尚未完成平叛大业的李亨而言，不啻一颗万分危险的定时炸弹。

此刻，叛军仍然占据着两京与河北，万一自己的后院在这个时候突然起火，李亨的皇位还怎么坐得稳呢？所以，当张良娣、李辅国与建宁王李倓的矛盾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时，当肃宗觉得李倓觊觎储位的嫌疑越来越大时，他就只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对李倓痛下杀手，除掉这颗定时炸弹！

尽管他万般不忍，可身为皇帝的冷酷最终还是战胜了身为父亲的温情。没办法，这就是政治。

建宁王之死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肃宗朝廷内部在平叛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如果说，建宁王李倓的悲剧还仅仅是发生在宫阙之内，对当时整个天下的形势还不至于产生多大影响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场拥兵割地的叛乱，则无异于是在肃宗刚刚受创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也一度使得当时的平叛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这场叛乱的制造者，就是肃宗的异母弟——永王李璘。

李璘，玄宗第十六子，由于生母郭顺仪早亡，幼时便被年长的李亨抱去抚养。李亨非常疼爱这个年幼的弟弟，夜里经常抱着他入睡，对他的感情既是兄弟，更像是父子。据说李璘相貌丑陋，眼睛还有一点斜视，但因从小聪敏好学，所以长大后还是很受李亨的喜爱。开元十三

年（公元725年）三月，李璘与诸兄弟同日封王，两年后遥领荆州大都督，数年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排行十六的永王李璘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父皇玄宗能给他的，也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外加几个有名无实的荣誉衔而已。他注定只能在长安做一个养尊处优的亲王，连出镇地方、成为封疆大吏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觊觎九五之位了。换言之，在太平年月里，永王李璘只能跟所有亲王一样，老老实实享受属于他的那份荣华富贵，绝不敢对皇位生出什么非分之想。

然而，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一切。

当玄宗在流亡巴蜀途中发布了那道“命诸王分镇天下诸道”的诏书后，隐藏在永王李璘内心的权力欲望就被不可遏止地撩拨起来了。

在玄宗的诏书中，太子李亨、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分别被授予一人节制数道的大权。其中，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兼任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永王李璘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兼江陵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大都督；而盛王和丰王虽然各有任命，但因年纪尚轻，没有实际赴任。所以，真正得到封疆大吏之权的，其实只有李亨和李璘。

永王李璘活了半辈子，还是头一次获得这么大的权力。

就像一个被突然吹胀的气球一样，李璘马上有了一种飘起来的感觉、一种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感觉。

这感觉真好！

接到玄宗的诏命后，李璘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巴蜀，于当年九月抵达江陵。当时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赋都要通过江陵中转，所以江陵的府库中财富山积。李璘到任后，马上动用大量钱粮布帛，招募了数万兵马。他身边的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永王心里在想什么了。随后，以谋士薛镠、永王之子襄城王李为首的文武官员，纷纷怂恿李璘拥兵自立，割据江东。他们说，如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而永王“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应该趁此机会入据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李璘笑了。

就在短短几个月之前，他还只是李唐皇室一个毫不起眼的亲王，可现在，他已经是拥兵数万、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了，而且马上就要将帝

国的半壁江山收入囊中，如果运气再好一点，他说不定还能将皇兄李亨取而代之，成为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

李璘踌躇满志地笑了。

永王李璘在江陵的异动没有逃过肃宗李亨的眼睛。此时，李亨已经接到玄宗的传位诏书，成了名实相副的大唐天子，他当然不能容忍永王拥兵割地的企图。肃宗随即颁布一道敕令，命永王“归觐于蜀”，让他马上回成都，在太上皇身边乖乖待着。

李璘当然拒不奉命，继续在江陵秣马厉兵。

肃宗大感不妙，连忙任命高适（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为淮南节度使，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等十二郡；以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今河南汝南县）等五郡；命二人与江东节度使韦陟配合，严密监视李璘动向，必要时联手将其剿灭。

至德元年十二月，永王李璘率领舟师沿江而下，军容盛大。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太守李希言发觉苗头不对，立刻发了一封书信，诘问其为何擅自引兵东下。李希言这封信，采用的是“平牒”的形式。所谓平牒，就是不分上下尊卑，称谓也没什么讲究，所以李希言就在信中对李璘直呼其名。

李璘见信，勃然大怒，马上给李希言回了一封，大意是说：寡人是堂堂皇子，身份尊贵，礼绝百僚，如今你既然无视尊卑，那就别怪寡人不客气了！

李璘此次率兵东下，摆明了就是要袭取金陵、割据江东，而李希言这封“无礼”的平牒信，恰好给了李璘起兵的借口。

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随后，李璘兵分三路，命大将浑惟明率一路攻击吴郡，大将季广琛率一路攻击广陵，自己则亲率主力进兵当涂（今安徽当涂县）。

没有人会料到，安禄山点燃的烽烟还在北方和中原滚滚弥漫，尚未平息，永王李璘却在自家后院燃起了新的战火。

惊闻永王起兵的消息，吴郡太守李希言慌忙派遣部将元景曜，会同丹阳（今江苏镇江市）太守阎敬之出兵御敌；同时，广陵长史李成式也派遣部将李承庆发兵抵御。

由于永王蓄谋已久，兵锋甚锐，因而一战就击溃了前来阻击的官军，并斩杀了阎敬之，乘胜进占丹阳。元景曜和李承庆见叛军势大，不敢抗拒，随即双双缴械投降。

两军刚刚接战，唐将便一死二降，江淮地区顿时大为震恐。高适、来瑱和韦陟急忙赶赴安陆（今湖北安陆市）会合，商讨平叛之计。鉴于永王的军队是有备而来，兵精粮足，士气正盛，高适等三人决定避敌锋芒，暂且不与叛军正面交战，而是采用双管齐下的战略：一方面沿长江北岸大布疑兵，迷惑对手；一方面积极采取攻心战，力争从内部瓦解叛军。

计议已定，广陵长史李成式随即派遣部将裴茂率部进驻瓜步洲（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广张旗帜，耀于江津”，摆出了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

紧接着，高适发挥自己在诗文方面的特长，撰写了一篇《未过淮先与将校书》，命士卒们四处散发，对叛军官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且诱之以利。同时，世家大族出身的韦陟（前宰相韦安石之子）也利用自己在朝野上下的声望，暗中对叛军的几个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并事先上奏肃宗，对叛军大将季广琛许以高官厚禄，答应他一旦反正，便授予其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之职。

这几招相当管用。

面对旌旗招展的北岸官军，永王李璘和儿子李开始发怵了——在他们看来，朝廷军肯定已经在对岸集结了重兵，接下来的仗要怎么打，他们心里根本就没底。

与此同时，面对官军强大的宣传攻势，叛军的军心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其中，季广琛对于朝廷许给他的高官厚禄更是心动不已。

跟着永王造反，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高官厚禄；如今只要归顺朝廷，这一切便唾手可得，季广琛还有什么理由替永王卖命呢？

季广琛随即秘密召集诸将，对他们说：“我们跟随永王到此，至今也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不如趁此兵锋未交之时，及早各奔前程，否则不但会死于战阵，还要永远背负逆臣的骂名。”众将闻言，都觉得很有道理，当下各自跑路：季广琛率部奔广陵，浑惟明率部奔江宁，冯季康率部奔白沙（今江苏仪征市）……数万兵马顷刻间逃亡大半。

永王傻眼了，慌忙派一队亲兵去追季广琛。亲兵们好不容易追上，却

听见季广琛说："只因我还感念永王恩德，才不和你们交战，只想归顺朝廷。倘若你们定要逼我，我随时可以回头攻杀你们！"

追兵回去禀报，永王只能仰天长叹。

就在永王彷徨无措之际，当天夜里，江北的官军点燃了无数火把，命每个士兵"人执两炬"，火把倒映在水中，"一皆为二"，场面煞是壮观；同时，永王麾下已被官军策反的一部分士兵又举火呼应，于是声势更显浩大。放眼望去，似乎正有千军万马渡江而来。永王李璘吓得魂飞魄散，连夜带着家眷和亲兵逃出了丹阳城。

第二天一早，永王见江面上一个官兵也没有，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可是，即便官军尚未渡江，永王也自知守不住丹阳，只好集合城中的残余部众，向南而逃。

得知永王遁逃，李成式立刻命部将赵侃渡江追击。永王仓皇逃至新丰（今江苏镇江市东南）时，见官军紧追不舍，便命其子李率余下的部众回头阻击。双方刚一交战，李就被官军一箭射中肩膀，栽落马下，被乱刀砍杀，叛军当即哗然四散。

至此，永王身边只剩下一个部将高仙琦和四名亲兵。他们拥着永王继续南逃，经鄱阳、余干，企图从大庾岭逃往岭南。至德二年二月下旬，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派兵阻截，在大庾岭将永王擒获，随即在驿馆中杀了他，然后把他的家眷押赴成都，交由太上皇发落。

得知永王兵败身死的消息后，肃宗心里自然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可表面上，他还是装出了一副"痛失爱弟"的样子，对皇甫侁不仅不加褒扬，反而训斥说："皇甫侁既然生擒吾弟，为何不送到蜀郡而擅自杀害呢？"

所以，皇甫侁捕杀永王非但无功，反而有罪。肃宗随即撤了他的官职，并且永不录用。

当然，对于永王之死，肃宗虽然做足了痛心疾首的样子，但这并不等于他会饶恕那些跟随永王造反的人。

兵变平定后，以薛镠为首的大批永王党羽均被诛杀，其中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差点被砍了脑袋。

他就是李白。

没有人会否认，李白在文学和诗歌领域的才华独步古今，可我们却不

得不承认，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典型的低能儿。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李璘入驻江陵后，向他发出了邀请。李白欣然接受，出任其帐下幕僚。在当时的李白看来，永王李璘既是李唐亲王，又是封疆大吏，投到他的麾下，定能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更能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危亡！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之十一）

然而，这只是一个诗人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

当永王李璘自江陵引兵东下，其割据江东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单纯的李白却仍然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中不能自拔。直至永王兵败，李白被肃宗朝廷判处死刑，他才大梦方醒，后悔莫及。所幸郭子仪多方营救，李白才免于一死，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

永王兵变虽然旋起旋灭，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叛乱，但足以表明肃宗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加上此前的建宁王事件，更足以让肃宗李亨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危机感，肃宗李亨才会迫切渴望克复长安，希望凭此盖世功勋巩固自己的天子大权。

事实上，早在建宁王死后不久，亦即至德二年二月初十，李亨就已经率领文武百官进驻凤翔了。此地距长安仅三百多里，且江淮财赋皆集聚于此，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前敌指挥部。

同日，郭子仪奉肃宗之命，率朔方军从洛交（今陕西富县）出发，进逼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市），同时另遣一路攻击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两路唐军与凤翔的肃宗朝廷遥相呼应，至此对长安形成了两面夹攻之势。

帝国反击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1]　天宝五年，李林甫一手炮制了韦坚谋反案，太子妃韦氏受到牵连，李亨被迫与韦氏离婚，韦氏随后削发为尼。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大唐兴亡三百年⑥

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
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

王觉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联合回纥，克复两京

太原保卫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兴亡三百年 . 6 / 王觉仁著 .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18.10

ISBN 978-7-5115-5492-5

Ⅰ . ①大… Ⅱ . ①王… Ⅲ .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Ⅳ . ①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9639 号

书　　名	大唐兴亡三百年 . 6
作　　者	王觉仁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邀编辑	汪超毅　沈　骏
封面设计	谢明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字　　数	308 千
印　　张	23.25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492-5
定　　价	5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长安光复，李泌归山
唐室再造：渐渐消逝的狼烟
雍丘之战：可怕的张巡
死守睢阳
战火中的人间地狱
第二章 藩镇大裂变
史思明复叛
邺城之战
李光弼的手段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鏖战河阳
江淮之乱：不再安宁的后院
又一幕弑父篡位的闹剧
第三章 太上皇李隆基、肃宗李亨驾崩
李隆基的最后岁月
失乐园：“逼迁上皇”事件
李辅国的欲望
代宗登基
第四章 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异族入侵
趁火打劫的回纥人
树倒猢狲散：史朝义的末日
仆固怀恩：一颗潜在的叛乱种子

吐蕃入长安
烽火再燃：仆固怀恩之乱
力挽狂澜：郭子仪单骑盟回纥
第五章 一团乱麻的帝国
安宁的代价："蜀中之乱"始末
三角政治
破局：鱼朝恩之死
元载：弄权者的下场
田承嗣之乱
谁笑到了最后？
第六章 德宗李适初政
礼法之争的背后
李适：闪亮登场的新帝
两税法：危机与拯救
一个宰相的快意恩仇
杨炎之死
第七章 诸藩自立为王
向藩镇开刀
梦想很坚挺，现实很疲软
李希烈之乱
泾师之变：从天而降的劫难
奉天保卫战

第八章 濒临破产的大唐朝廷

罪己诏：灵魂深处闹革命

图穷匕见：李怀光叛乱

造反也是个技术活

王者归来

三朝帝师李泌

德宗勒紧了裤腰带

胜利：一种“否极泰来”的假象

第九章 四落四起，一代良相李泌

战争与和平

一石三鸟：危险的“平凉会盟”

李泌：一身系天下安危

围堵吐蕃的战略

第一章 联合回纥，克复两京

太原保卫战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唐肃宗李亨将临时朝廷迁到凤翔，正式打响了收复长安的帝国反击战。

二月十一日深夜，郭子仪率部进抵河东城下。

此时，驻守该城的是燕军骁将崔乾祐。他做梦也没想到唐军会这么快摸到他的眼皮底下。而更让他没料到的是，郭子仪早就在河东城中找好了内应。

唐军内应名叫韩旻，时任燕朝的河东司户。他一见唐军兵至，立刻率众击杀了守卫城门的一千名燕军，并打开城门迎接唐军。崔乾祐猝然从梦中惊醒，来不及组织防御，只好从北门翻城而逃。随后，崔乾祐逃进了驻扎在城北的燕军大营，即刻组织兵力对唐军发起反扑。郭子仪率部迎战，大败燕军，斩首四千级，俘虏五千人。崔乾祐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兵逃奔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

安邑没有驻军，当地百姓见燕军败逃至此，便打开城门接纳他们。

正当崔乾祐庆幸自己命不该绝时，城门突然关闭，燕军顿时被截为两段，已进入城门的燕军全部被百姓活活打死。

崔乾祐走在队伍后面，尚未进城，侥幸又逃过一劫。他带着剩下的数百残兵拼命逃窜，最后从白径岭（今运城市西南）方向渡过黄河，一口气逃回了洛阳。

肃宗抵达凤翔十日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的兵马也先后抵达。与此同时，江淮的钱粮、物资也陆续运抵。长安士民听说肃宗驻跸凤翔，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投奔。

一时间，肃宗朝廷群情振奋。

李泌乘势向肃宗重申了他此前提出的战略，要求集结重兵，直捣燕军老巢范阳。

然而，李泌的提议却遭到了肃宗的否决。

肃宗说：“如今各路大军云集，钱粮物资也都有了，应该趁士气高涨之际克复两京，岂能长途跋涉数千里去取范阳，这不是绕远了吗？”

李泌一怔。他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肃宗听到这项战略时，还连连称善，为何现在又出尔反尔了呢？

李泌坚持说：“以现在的兵力，克复两京自然没有问题。可这么做的话，叛军势力迟早会转弱为强，我们也会再次陷入困境。总之，此非长治久安之策。”

肃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凭什么这么说？”

李泌说：“我军现在主要依靠的是西北边塞与诸胡之兵，他们生性耐寒而畏暑，若趁他们士气正盛时攻击叛军，固然可以战而胜之。但是，眼下时节已近暮春，克复两京后，天气也已转热，我军中的西北

将士必定难以适应，到时候归心一动，恐怕难以挽留。而叛军逃回范阳之后，必然会厉兵秣马，等到我西北军撤离中原，他们必将卷土重来，如此，这场战争便永无休止了。臣认为，应把兵力投入燕赵的寒冷之地，扫荡叛军巢穴，令其无路可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祸乱。”

肃宗闭目不语。良久，他才缓缓地睁开眼睛，说：“朕急于迎回太上皇，所以不能听从你的策略。”

李泌闻言，只好在心里一声叹息。

这是深谋远虑的一声叹息，也是历史性的一声叹息。

不久之后，虽然两京顺利光复，但是终肃宗一朝，唐军一直未能克复河北诸镇，甚至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里，终有唐一代，河北诸镇始终强藩割据，长期脱离中央，几成化外之邦……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皆肇始于河北诸镇的首开叛乱与长期割据，也与肃宗李亨拒绝采纳李泌之策不无相关。

纵然李泌之策睿智且富于远见，但天子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更改。

数日后，肃宗命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率部进驻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兵马使郭英乂进驻武功东郊，白水军使王难得进驻西郊，随时准备对长安发起进攻。

二月十九日，驻守长安的燕将安守忠主动出击。郭英乂率先迎战，结果在激战中被一箭射穿脸颊，兵败而逃。王难得眼见郭英乂败退，不敢发兵救援，即刻率部西逃。王思礼见左右翼皆走，只好退守扶风。安守忠乘胜西进，兵锋直抵太和关（今陕西岐山县北）。此地距凤翔仅五十里。肃宗朝廷闻报，大为震恐，即日宣布全城戒严。

就在关中唐军初战失利、肃宗朝廷人心惶惶的时候，一则捷报从太原传到了凤翔，顿时让肃宗李亨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自从扫平河北后，史思明的目光就死死地盯住了太原。

他之所以盯住太原，其因有三：首先，这里的守将李光弼，是史思明最恐惧也最憎恨的天敌，史思明无时无刻不想消灭李光弼；其次，河北燕军连战连捷、士气正盛，如果能一举拿下太原，就能长驱直入朔方、河陇，与关东燕军遥相呼应，对肃宗朝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史思明得到情报，说李光弼麾下的精兵都留在朔方，他带到太原的士兵不满万人，而且大都是团练和义勇，简直就

是一群乌合之众。

如此天赐良机，史思明岂能错过？

至德二载正月，史思明自博陵出兵，蔡希德自太行出兵，高秀岩自大同出兵，牛廷介自范阳出兵，共计十万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朝太原猛扑了过去。

战报传来，太原诸将大惊失色，纷纷提议将城墙加高加厚，以抵御史思明的十万大军。李光弼却摆了摆手，说："太原城的周长足足四十里，叛军转眼即到，我们现在筑墙，不但来不及，而且还没和敌人交手，就会先把自己累个半死。"

随后，李光弼率领部众和百姓在城墙四周深挖壕沟，同时又命人制造了数十万块土砖。没有人知道这些土砖是干什么用的。

直到燕军开始四面围攻、城墙屡屡坍塌之时，众人才发现这些土砖的妙用——燕军每攻破一处城墙，李光弼就命人用土砖把缺口堵上，令燕军无计可施。

为了加大攻城力度，史思明派了三千人回河北搬运攻城器械。当这支运输队带着器械行至广阳（今山西平定县）时，用兵如神的李光弼早就在此设置了一支伏兵。结果，三千燕军被悉数歼灭，所有攻城器械也都被付之一炬。

史思明的十万大军围着太原日夜猛攻，一直打了一个多月，可太原城却依旧岿然不动。

这实在大大出乎史思明的预料。

根据战前得到的情报，太原守军不但人少，而且没什么战斗力，史思明本以为一战便可拿下太原，没想到啃了四十多天硬是啃不下来。

随后，史思明亲自挑选了一批精锐将士，组成了一支游骑兵，叮嘱他们说："我军主力攻北门，你们就去南门；攻东门，你们就去西门。一旦发现薄弱环节，马上给我攻进去。"

可是，史思明的如意算盘很快又落空了。因为李光弼的军令异常严明，不管有没有敌人来进攻，也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每个守城士兵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每一段城墙上都布满岗哨，巡逻队也是到处巡逻，所以史思明的游骑兵根本无机可乘。

史思明无计可施，只好一边继续强攻，一边派人天天到城下叫骂，企图激怒李光弼，逼他出城决战。然而，让史思明十分纳闷的是，他派去打口水仗的那些士兵不但没把李光弼引出来，反而一个个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史思明带着满腹困惑亲自到第一线去察看，只见那些骂阵的士兵刚刚还仰着脖子破口大骂，可眨眼间身子一陷，整个人就掉进土里去了。

史思明恍然大悟。

原来李光弼在跟老子玩地道战！

是的，李光弼就是在打地道战。

早在燕军刚刚围城之时，李光弼就在军中重金悬赏有特殊技能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且对守城有帮助，李光弼就立刻予以重用。后来有三个人自告奋勇，说他们会挖地道。李光弼如获至宝，马上命令他们开挖，从城内一直挖到了城墙外。每当燕军士兵前来叫骂，躲藏在地道中的唐兵就突然掀开覆盖物，把敌兵一下拽进了地道。

来一个，拽一个；来两个，拽一双！让燕军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后来，燕军士兵攻城的时候，眼睛都不敢朝上看，而是死死盯着自己的脚下，生怕一不留神又做了“土行孙”。随着地道越挖越多，燕军的云梯也都靠不上城墙，因为一接近，地面随即塌陷，云梯上的人也顷刻间全被活埋。

除了地道，李光弼还让人制作了大型的投石机，每一颗巨石抛出去都可以砸死二三十人，让燕军吃尽了苦头。

最后，史思明只好命大军退后，一直退到投石机的射程之外，才敢安营扎寨。

燕军虽然减缓了攻城力度，后撤了一段距离，但仍然四面环绕，把太原围得密不透风，显然是想把唐军困住，一直困到粮草耗尽的那天。

让史思明喜出望外的是，没过几天，李光弼果然就撑不住了，派人出城请降，并约定了日期出城缴械。

约定的日子一到，唐军果然大开城门，列队进入燕军营寨，乖乖地缴械投降。燕军士兵都兴高采烈地跑来围观。正当他们看得目不转睛的时候，营地中间轰然发出一声巨响，大片土地塌陷，当场就有一千多

名燕军官兵被活埋。

史思明登时傻眼。

原来李光弼已经把地道挖到了他的大营下面。

顷刻间，燕军营寨大乱，李光弼乘势出击，斩杀并俘虏了一万多名燕军。

史思明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光弼会以诈降的方式主动出击。

他此时的心情就跟当初在河北屡战屡败的时候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他现在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既生明，何生弼？

是安庆绪的一纸诏令把史思明从痛彻骨髓的羞愤中拯救了出来。

这一年二月初，燕朝新皇帝安庆绪的诏书送抵太原，命史思明率部回镇范阳，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围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史思明才知道安禄山死了。

作为一个和安禄山从小玩到大的好友，安胖子之死固然令史思明生出了些许伤感，然而，作为一个拥兵一方的大将，安禄山的暴毙却让史思明的内心忽然生出了某种蠢蠢欲动的东西。

说白了，那就是野心——就是图谋天下、位居九五的野心！

在史思明眼里，那个庸懦无能的安庆绪根本不配做大燕朝的皇帝！

史思明回到范阳不久，安庆绪为了笼络父亲这个最得力的旧部，连忙下诏任命他为范阳节度使，封妫川王。

然而，史思明并不买安庆绪的账。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范阳的主人，就算没有安庆绪的任命状，他也是当之无愧的主人！而且，他手中又握有燕军最精锐的铁骑，他凭什么要遵奉安庆绪的号令呢？更何况，自从安禄山起兵后，从长安、洛阳两京掳掠的所有财富全都运回了范阳，此刻的史思明俨然坐在了一座金山上，俨然成了天下最富有的军阀，他为什么不能藐视安庆绪呢？

“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浸不用庆绪之命；庆绪不能制。”（《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安禄山之死，无疑为刚刚建立的燕朝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即便安庆绪凭借“父死子继”的规则继承了大位，可这并不等于他就能拥有号令百官的大权。换句话说，纯粹依靠权谋和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不可能依赖“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完成权力更迭的。决定其权力归属的最终方式，仍然只能是权谋和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燕朝皇帝的大位注定是史思明的。

安庆绪的败亡，只是或迟或早的事而已。

史思明撤回范阳后，留在太原的蔡希德等人就更不是李光弼的对手了。这一年二月下旬，燕军因久攻太原不下，锐气尽丧，军心动摇。李光弼瞅准时机，亲率敢死队出城攻击，大破燕军，“斩首七万余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捷。

显而易见，李光弼这则“斩首七万余级”的捷报是掺了不少水分的。但不可否认，当这则捷报送到凤翔的时候，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因为，在肃宗决意大举反攻长安的前夕，且在唐军初战失利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则捷报更能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了。

只要能达到振奋人心的目的，捷报掺水分又何妨呢？

就算李光弼不掺，肃宗李亨也会掺。

长安光复，李泌归山

为了斩断长安与洛阳的联系，对长安形成合围之势，郭子仪决定先行克复潼关。

至德二载二月下旬，他派遣其子郭旰、兵马使仆固怀恩、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率部从河东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守关燕军抵挡不住，扔下五百多具尸首仓皇退却。

安庆绪闻报，急命安守忠火速援救潼关。

燕军的反扑非常有力。结果唐军战败，一万多人阵亡，李韶光和王祚战死，郭旰和仆固怀恩渡过渭水，退守河东。三月下旬，安守忠乘胜进击河东。郭子仪亲自指挥战斗，击退了安守忠，斩获首级八千、俘虏五千人。

第一回合，双方互有胜负。

四月，求胜心切的肃宗李亨决定集中兵力，一举克复长安，遂擢升郭子仪为司空、兼天下兵马副元帅，命其移师凤翔。四月底，郭子仪部与王思礼部在咸阳西南的西渭桥会合，而后进驻潏水（渭水支流）西岸。燕将安守忠、李归仁立刻率兵屯驻长安西郊的清渠。两军对峙七天七夜，唐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五月初六，安守忠佯装后撤，郭子仪命令全军出击。燕军以九千精锐骑兵组成长蛇阵，待唐军攻其腹部，首尾瞬间变成两翼，将唐军合围。此战唐军大败，伤亡惨重。将领韩液、监军宦官孙知古被俘。唐军抛弃所有军资器械，退回武功。肃宗的驻跸之地凤翔不得不再度戒严。

第二回合，唐军惨败。

经此一役，郭子仪深感燕军的战斗力仍然十分强大，便劝肃宗再次向回纥求援，请他们发精兵相助。这一年九月，回纥的葛勒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将军帝德率四千余名精兵抵达凤翔。肃宗大喜过望，当即设宴犒劳，并赏赐大量财帛。广平王李俶还和叶护结成了兄弟。

至德二载九月十二日，肃宗发布了总攻的命令，由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西域、回纥等部共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浩浩荡荡向东挺进。

九月二十七日，唐军进抵长安西郊的香积寺，以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领前军，郭子仪领中军，关中节度使王思礼领后军。同日，燕将安守忠、李归仁也率十万大军在香积寺以北摆开了阵势。

这是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燕两军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这场战役将决定长安的命运，也将决定帝国的命运。

燕将李归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的前锋部队迎击，将其击退，旋即挺进燕军阵地。燕军全军出动，很快逼退了唐军，并直扑唐军的辎重部队。唐军阵脚大乱，纷纷向后溃退。前锋主将李嗣业对左右说："今日若不以身挡贼，我们就全完了！"随即脱掉铠甲，赤裸上身，跃马横刀立于阵前，厉声命令士兵们不许撤退。可在燕军凌厉的攻势之下，士卒们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跑。李嗣业大怒，挥舞长刀左砍右劈，将那些逃兵连人带马砍得血肉横飞，一连砍翻了数十人，总算稳住了阵脚。

随后，李嗣业重新集合前军部众，命他们结成长刀阵，横向排开，如墙而进。而且，李嗣业还带着前军的所有将领冲在士卒前面，率先杀进了燕军军阵。

在主将身先士卒的激励之下，唐军士气大振，战场上的形势随之逆转，燕军开始节节后退。

在这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中，不仅是李嗣业这种勇冠三军的猛将表现出了一贯的英勇，就连半年前在武功不战而逃的唐将王难得也拿出了难得的勇气。混战中，他为了救一个身陷重围的副将，被燕军一箭射中眉骨。王难得狠狠把箭拔掉，结果皮开肉绽，额头上的一块皮还垂下来遮住了眼睛。王难得大怒，干脆把皮也撕了，带着满脸鲜血，仍旧奋勇拼杀，一直往前突进。

两军开战前，安守忠知道自己的兵力比唐军少，便在战场东面埋伏了一支精锐部队，准备趁双方激战正酣时，再出其不意，绕到唐军背后突袭。唐军斥候侦察到了这支伏兵，立刻禀报中军主将郭子仪。郭子仪即命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带上一支回纥骑兵，直扑燕军埋伏之处，迅速将这支伏兵歼灭。

得知伏兵全军覆没的消息后，燕军士气顿时大挫。李嗣业乘势与回纥兵团一起迂回到敌军阵后，阻断了燕军的退路，与郭子仪的中军对燕军形成了前后夹击。

至此，燕军终于全线崩溃。

这一仗，从午时（中午十二时）一直打到了酉时（下午六点），燕军一共被斩首六万余级，跌入沟堑被压死和踩死的也不计其数，唐军大获全胜。

安守忠和李归仁带着残部逃回长安后，自知长安必失，于是当天夜里便与燕朝西京留守张通儒、京兆尹田乾真等人弃城而走，一口气逃到了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

至德二载九月二十八日，唐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城中，宣布了长安的光复。

自去年六月燕将孙孝哲入踞长安，迄今共一年三个月。

广平王李俶带着大军进入长安时，受到了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他看见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泪水，那是劫后余生、悲喜交加的泪水。

长安光复了，而兑现诺言的时刻也到了。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面对夹道欢迎的百姓，广平王李俶的脸上一直挂着和煦的笑容，可他心里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从李俶踏入长安的那一刻起，他心里就不停地想起父皇李亨向回纥郑重作出的这句承诺。

怎么办？要不要兑现诺言？

当初为了得到回纥之援，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许诺，可眼下，假如真的兑现承诺，长安百姓必然又要遭受一场可怕的浩劫。倘若如此，长安百姓还会拥戴父皇李亨吗？还会承认这个在灵武自行即位的新皇帝吗？如果夺回了京城，却失去了民心，那么李唐朝廷日后还能理直气壮地号令天下吗？

可是，倘若违背诺言，唐军在接下来的平叛战争中不但不能得到回纥援手，反而会因此结怨于回纥。眼下洛阳未克，伪燕朝未灭，岂能又在自己背后树立一个新的强敌？

最后，左右为难的李俶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虽然这个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让李俶暂时摆脱这种两难困境。

当回纥王子叶护面带微笑地来到李俶面前，婉转地要求他兑现承诺的时候，李俶立即翻身下马，向叶护纳头便拜，说：“现在刚刚克复西京，如果遽然劫掠金帛子女，恐怕东京洛阳的人心都会倒向叛军，并且替叛军固守城池，使我们难以攻克。所以，我希望等到克复东京后，再向贵军兑现承诺。”

叶护一见广平王向他施以大礼，慌忙下马回拜，说：“愿从殿下之言。”

听说广平王帮长安化解了一场灾难，百姓们纷纷簇拥在李俶马前，频频拜谢说：“广平王真华夷之主也！”（《资治通鉴》卷二二○）

九月二十九日，克复长安的捷报传至凤翔，文武百官当即入朝恭贺，肃宗李亨激动得泪流满面，忍不住赞叹：“广平王的智勇，是朕所不能及的啊！”

当天，肃宗便遣使入蜀，上表奉迎太上皇李隆基回銮。

随后，肃宗召见李泌，说：“朕已经呈上一道奏表，请上皇东归长安，同时朕向上皇请求，一旦銮驾回京，朕就回东宫当太子，继续恪尽人子之责。”

李泌一听，忽然表情大变，急着问：“奏表还追得回来吗？”

肃宗一脸迷惑：“使者已经走远了。”

“上皇不会回来了。”李泌斩钉截铁地说。

肃宗大惊失色，忙问李泌何故。李泌答：“陛下建有大功，却不欲居皇位，上皇自然也不会回京坐皇位，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那该怎么办？”

李泌沉吟片刻，说：“由百官联名，再上一道奏表，详细陈述‘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克复长安’之种种情状，然后表示陛下深切思念上皇，渴望早晚在膝下问安，请上皇尽快回京，以成全陛下孝顺奉养之心，这就可以了。”

肃宗闻言，赶紧让李泌起草奏表，写完后拿来一看，不禁泪下，说：“朕原本怀着至诚之心，希望将大位还给上皇，现在听了先生之言，才知道这种想法很不妥当啊。”（《资治通鉴》卷二二○：“朕始以至诚，愿归万机，今闻先生之言，乃寤其失。”）

很显然，李亨是在作秀。

所谓“愿归万机”、回东宫当太子云云，都不可能是真心话。

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乱世即位的中年皇帝，李亨的智商绝对不会低于常人。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第一道奏表是“很不妥当”的。可他又故意要那么写，然后让李泌帮他出主意，最后又不厌其烦地再写一道奏表，目的就是为了向世人表现出他那“愿归万机”的“至诚”之心。换言之，李亨是希望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一个如此孝顺、如此谦恭、如此真诚的人，怎么可能从他父亲手中抢班夺权呢？

李亨总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打扮得很傻很天真。

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在这个充满机心、诡诈和权谋的世界上，聪明外露的人八成是笨蛋，而善于装傻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智者。李亨虽然不一定称得上是智

者，但他肯定不是连奏表都写不好、连太上皇都请不回来的笨蛋。

就在帮肃宗写完奏表的数日之后，李泌忽然向肃宗提出了辞职请求。他说："臣已经报答了陛下的恩德，应该回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了。"

在李泌看来，长安既然已经光复，他出山的目的便达到了。更重要的是，辅佐肃宗的短短一年多来，李泌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旋涡，把肃宗最宠幸的张良娣和李辅国往死里得罪了，如果不及时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他迟早会步建宁王李倓之后尘。

可是，肃宗却不想放李泌走。他说："朕与先生共历忧患，如今正要同享安乐，为何这么快就要走呢？"

"臣有五条不可留的理由，愿陛下准许臣离开，让臣免于一死。"李泌的态度异常坚决。

"哪五条理由？"

"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资治通鉴》卷二二○）

李泌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就在长安光复后的这几天里，肃宗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和信任，便天天拉着他一块饮酒，每晚还与他"同榻而寝"。天下有哪一个臣子，敢心安理得地享受这样的恩宠呢？如此绝无仅有的深宠，又岂能不让宫中的各色人等眼红？

别人暂且不说，就在几天前，掌管宫禁大权的宦官李辅国就假惺惺地要把宫中的符契锁钥交给李泌。当然，李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并极力向肃宗声明——只有李辅国才是执掌宫禁之权的不二人选。后来肃宗发话，李辅国才作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把那些东西收了回去。

李辅国此举醋意十足。李泌很清楚，无论外朝还是内廷，像李辅国这样对他又妒又恨的人绝不在少数。倘若不尽早脱身，日后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李泌列举的五条不可留的理由，肃宗无力反驳，只好悻悻地说："朕困了，赶紧睡觉，此事改日再议。"

李泌却不依不饶："陛下今日在臣的卧榻之上，尚且不同意臣的请求，何况来日在御案之前？陛下不让臣走，就是杀臣！"

肃宗摇头苦笑："没想到卿会如此怀疑朕，像朕这样的人，又怎么可

能会杀害卿呢？莫非卿把朕当成了昏君？”

“正因陛下尚未杀臣，臣才能提出要求，倘若真到了那一天，臣还有什么话好说！再者，杀臣者并非陛下，而是臣方才列举的五条理由。一直以来，陛下待臣如此之厚，臣有些事情尚且不敢进谏，何况天下安定之后，臣就更不敢开口了。”

肃宗一脸不悦，沉默良久，才缓缓地说：“卿是怪朕没有听从你的北伐之谋吧？”

“非也！”李泌鼓起勇气说，“臣所不敢言者，乃建宁王也。”

肃宗一怔，随即俯首长叹：“建宁，朕之爱子，自小英勇果敢，马嵬北上时建有大功，朕岂能不知！可正因为他自恃有功，遂被小人所教，欲加害其兄长，图谋储君之位，朕为了顾全社稷大业，不得已而除之，卿难道不知朕的苦衷？”

“假如建宁王真有不轨之心，广平王必然会心生怨恨，可事实并非如此。广平王每次和臣说起建宁王的冤情，无不痛哭流涕，悲不自胜。臣只因决意要走，才敢跟陛下谈及此事。”

肃宗闻言，脸色越发难看，可嘴里还坚持说：“你不知道，建宁曾在深夜潜入广平王府邸，企图行刺。”

李泌冷笑着说：“这种话都是出自谗人之口，像建宁王如此孝顺友爱、聪明智慧之人，岂能做出如此卑劣而愚蠢之事！陛下应该还记得，当初您曾想任命建宁王为元帅，是听了臣的谏言，才改任广平王。如果建宁王真有夺嫡之心，一定会因此记恨于臣，可他非但不记恨，反而认为这是出自臣的忠心，待臣愈发友善。仅此一事，陛下便足以鉴察其心。”

听到这里，肃宗的两行清泪已经夺眶而出。他无言以对，只好连连摆手说：“先生说得对，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有道是既往不咎，朕不想再听了。”

“臣之所以提起此事，非咎既往，而是希望陛下警戒将来……”李泌看了看肃宗，心里犹豫着要不要说出下面的话，最后还是把心一横，朗声说道：“昔日武后有四个儿子，长子是太子弘，当时武后企图临朝称制，对李弘的聪明十分戒惧，遂将其鸩杀，立了次子雍王李贤。李贤担心步李弘之后尘，常怀忧惧，便写了一首《黄瓜台辞》，希望以此感动武后。可武后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将李贤赐死于黔中。《黄瓜

台辞》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如今陛下已然一摘，慎勿再摘！”

肃宗大为愕然，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你把这首辞抄下来，朕当留在身边，以便随时警醒。”

“陛下只要记在心里就行了，何必形之于外！”

李泌知道，今天这一席话，让身为皇帝的李亨极为难堪，可他如果不在临走之前把这番逆耳忠言说出来，广平王李俶就很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因为肃宗宠幸张良娣，而张良娣又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不但自己想正位中宫，而且一心想把她的儿子拱上储君之位。因此，当她和李辅国联手除掉建宁王李倓、逼走李泌之后，接下来必然会把矛头指向广平王李俶。

其实，早在建宁王李倓刚刚遇害时，广平王李俶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张良娣对他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就产生了和建宁王一样的想法——先下手为强，除掉张良娣和李辅国。

但是，李泌阻止了他。

李泌说：“难道王爷还想重蹈建宁王之覆辙？”

李俶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的不只是自己，也包括先生。”

“我和皇上有约，等到京师光复，我就归山，自然能消灾免祸。”

“先生走了，那我岂不是更加危险？”

对于这个问题，李泌心里也很无奈。他只能安慰李俶说：“王爷但尽人子之孝。至于张良娣，不过是一介妇人，王爷只要委曲顺从她，相信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话虽这么说，可李泌心里跟李俶一样没底。

他知道，像张良娣这种女人其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正因为此，所以在归山之前，李泌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些话跟肃宗挑明了——这既是出于对广平王的关爱，也是为了维护李唐社稷的稳定。

李泌执意归山，肃宗屡屡挽留，两个人为此打了半个多月的太极。直到这一年十月，肃宗实在拗不过李泌，才不得不让李泌归隐衡山，同

时命当地官员在山中给李泌修筑了一座宅子，并赐予他三品官待遇。

李泌来得从容，走得潇洒，因为他没有功名利禄的牵绊。在他眼中，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是生命中最可宝贵、最值得珍视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相提并论。

世人惯于用权力的大小、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去看待一个人，可李泌深知，这是很可笑的。因为在这个诡谲无常、变幻莫测的世界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会永远保有权力和富贵。更何况，在追逐并占有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还要不断付出代价——你必须为之殚精竭虑、牵肠挂肚、如临如履、患得患失。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不仅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心灵，甚至有可能丧失生命！

唐室再造：渐渐消逝的狼烟

光复长安后，郭子仪乘胜挥师东进，又收复了潼关及华阴（今陕西华县）、弘农（今河南灵宝市北）二郡。

安庆绪惊闻长安失守，立刻调集洛阳的所有兵力，命严庄率领，火速增援陕郡，准备死守这个洛阳门户。严庄抵达陕郡后，与败逃至此的张通儒等人合兵一处，共计步骑十五万人。

至德二载十月十五日，广平王李俶率唐回联军进至曲沃（今三门峡市曲沃镇）。郭子仪亲自充当前锋，率部突进，在新店（今三门峡市西南）与燕军遭遇。两军随即展开激战，由于燕军依山布阵，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因而唐军渐渐不支，开始向后退却。燕军顺着山势俯冲而下，准备对唐军施以致命一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燕军突然发现身后卷起了漫天黄尘。

滚滚尘埃中刚刚射出十几支箭，燕军士兵便已相顾骇然。

他们知道，最让人恐惧的对手来了。

回纥骑兵来了！

原来，回纥兵团趁燕军从山上往下冲的时候，已经沿着山脚绕了过来，从后背对燕军发动突袭。腹背受敌的燕军官兵再也无心恋战，纷纷溃逃。郭子仪回师反攻，与回纥兵团前后夹击，将燕军杀得尸横遍野。经此一战，十五万燕军死的死，逃的逃，已经所剩无几。严庄和

张通儒等人只好抛弃陕郡，带着残部逃回洛阳。

看着从战场上侥幸捡回一命的严庄，安庆绪知道大势已去，遂于十六日深夜与严庄等人逃出洛阳，亡奔河北。

至德二载十月十八日，东京光复。

广平王李俶率军入城后，正在担心如何兑现承诺，洛阳百姓就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万匹罗锦。李俶又惊又喜，赶紧把罗锦送到了回纥人手中，总算避免了一场劫掠。

二十一日，郭子仪分兵攻克了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二郡。同一天，安庆绪的逃亡队伍中有一个人掉队了。他带着一脸弃暗投明、诚惶诚恐的表情，来到郭子仪的军营中，向唐朝投降了。这个人就是严庄。短短一个月后，严庄就摇身一变，成了唐朝的司农卿。

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严庄就是。

该造反的时候就造反，该投降的时候就投降；该弑君的时候就弑君，该背叛的时候就背叛。所以，严庄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就是乱世的生存法则。在此后一百五十年的唐朝历史上，从一而终的人当然不是没有，但类似严庄这种墙头草似的“俊杰”却遍地都是。

至德二载十月二十三日，唐肃宗李亨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四个月的长安。

百姓纷纷出城迎驾，从城门一直排出了二十里外，人人手舞足蹈，高呼万岁。

肃宗李亨的銮驾进入大明宫后，御史台立刻将那些曾经投降燕朝的文武官员集中到一起，命他们脱下冠帽鞋袜，赤脚立于含元殿前，捶胸顿首向天子请罪。他们的周围，环立着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同时，跟随肃宗从凤翔回到长安的文武百官们，也奉命来到含元殿前围观，接受“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背离人民为耻”的现场教育。

十月二十五日，以陈希烈为首的三百多名变节官员也从洛阳被押回长安。御史台照旧命他们跟西京的降官们一样，在含元殿前示众了一回，然而分别关进大理狱和京兆狱。

二十八日，肃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亲临丹凤门，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所有士绅百姓，凡受贼官禄、为贼所用者，由三法司分别查实奏报。其中，凡作战中被俘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的，只要向官府自首，一律赦免。”

十一月初，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从洛阳返回长安，肃宗感慨万千地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资治通鉴》卷二二○）

数日后，肃宗封回纥王子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并再次向他许诺，从今往后，唐朝每年向回纥赠送两万匹绢。

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唐武宗时期，这笔开支每年都会列入唐朝中央的财政预算，成为一项债务性的财政负担。不仅如此，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回纥再次出兵，帮唐军收复了被史朝义占领的洛阳，唐朝又与回纥约定，今后每年向回纥购买数万至十万匹马，每匹马支付绢四十匹，病弱之马照价支付。这就是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

绢马贸易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有了，但起初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经贸活动。自安史之乱后，这项贸易活动就再也不是平等交易了。因为唐朝是以数量大、价值高的丝绢，从回纥购回量小质劣的马匹。

这与其说是贸易，还不如说是堂堂天可汗在向昔日的藩属国纳贡。

这项所谓的绢马贸易，让中唐以后的历届唐朝政府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巨额的财政赤字。回纥几乎是用倾销的手段，每年都向唐朝输送大量劣马，而唐朝输入回纥的丝绢始终不抵那些劣马的价钱，只好一再拖欠，“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新唐书·食货志一》）。

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朝积欠的马价绢已高达180万匹。直到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唐朝才一次性还清了历年积欠，但此后回纥又送来大量劣质马匹，唐朝只好继续欠债。直到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朝趁回鹘（回纥改名）衰弱之际出兵将其平灭，这项带有屈辱印记的历史性债务才被一笔勾销。

十二月初，太上皇李隆基从成都千里迢迢地回到关中，进抵咸阳。

肃宗李亨带上御用的车马仪仗，亲自前往望贤宫接驾。

入宫前，李亨特意脱下天子专用的黄袍，换上了普通的紫袍。玄宗当时在望贤宫的南楼休息，李亨一到南楼楼下，立刻下马，迈着小碎步向前慢跑，在楼前拜舞叩首。玄宗赶紧下楼，亲手扶起李亨，抚摸着

他的脸庞，禁不住老泪纵横。李亨也是捧着上皇的双足，涕泣不止。

随后，玄宗命人取来黄袍，亲自披在李亨身上。李亨匍匐在地，一再叩首推辞。玄宗说：“天意、人心都已归属于你，能够让朕安度晚年，就是你的一片孝心了！”李亨推辞不过，才勉强穿上黄袍。

由于离长安还有一段路，父子二人都必须在此留宿一夜，但谁居正殿，谁居偏殿，就成了一道难题。父子俩又是一番谦让。玄宗说：“正殿是天子之位，必须由你居住。”李亨则坚决不同意，最后亲自扶着玄宗登上正殿，坐上御榻，玄宗才没有再谦让。稍后传膳，李亨每一道菜都亲自尝过，感觉鲜美可口的，才命人给上皇递上去。

次日，车驾启程回京，李亨亲自为玄宗整理马鞍和缰绳，并扶玄宗上马，然后又亲手为玄宗牵马。没走几步，玄宗连忙阻止了他。李亨这才乘上自己的坐骑，在前面为玄宗引路，可一路上却不敢走驰道（御用大道），而是始终靠边而行。

看见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后还如此仁孝，玄宗大为感动，对左右说：“我当了五十年的天子，算不上尊贵；如今当了天子的父亲，才是真正的尊贵啊！”（《资治通鉴》卷二二○：“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

这话是由衷的吗？

当然不是。这是说给他儿子听的。

回到长安后，玄宗马上住进了兴庆宫（位于皇城外的兴庆坊，由李隆基登基前的藩邸扩建而成，称为“南内”）。肃宗李亨一再上表，声明自己要回东宫居住，请上皇移居大明宫。当然，他的上表最后都被玄宗一一驳回了。

这父子俩别后重逢的一幕，看上去实在是感人至深。尤其是肃宗李亨的表现，一言一行皆堪称完美。

当然了，首先我们要承认，经历一番生离死别后，任何一对父子重逢之时，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李亨的真诚。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不难发现，李亨的言行举止都显得太过夸张和煽情了，以致充满了“表演”的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亨的表演一直是围绕着“天子名分”在做文章的。不管是“衣紫袍”“居偏殿”，还是“避驰道”“归东宫”，时时处处都在表明自己不想居天子之位。

其实，李亨越说自己不想要，越证明自己很想要；表面文章做得越漂亮，越证明自己心很虚。

这就叫欲盖弥彰，也叫作此地无银三百两。

有道是知子莫若父。玄宗当然很清楚李亨要的是什么，所以一直与李亨默契配合。李亨衣紫袍，他就亲手给李亨披黄袍；李亨牵马执辔避驰道，他就强调自己是天子父，所有尊贵皆因天子而贵；李亨口口声声要让出大明宫，他就坚持要住在兴庆宫。如此种种，其实都是玄宗对李亨的天子身份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追认，而且是反反复复的追认。

说白了，李亨要的就是这个。

只有玄宗一次又一次反复追认，李亨那来路不正的天子之位才能一遍又一遍得到正名，并得到巩固。

安庆绪仓皇逃离洛阳后，一口气跑到了邺郡（今河南安阳市）。当时，他身边只剩下骑兵不到三百人、步兵不到一千人。安庆绪很沮丧，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玩完了。尤其是心腹重臣严庄的降唐，更是让他有一剑穿心之感。

不过，让安庆绪庆幸的是，数日后，蔡希德、田承嗣等将领便各率所部纷纷归来，实力迅速恢复。不久，安庆绪又从河北诸郡紧急招募了一批人，兵力很快增至六万，军声复振。随后，安庆绪把邺郡改为安成府，同时改元“天成”。

做完这一切，安庆绪连日来的沮丧和恐惧才逐渐被东山再起的决心所取代。

既然还有本钱，老子就能接着玩！

然而，一想到老巢范阳掌握在史思明手里，安庆绪就止不住有些脊背发凉。

乱世之中，人心叵测，史思明虽然是父亲最信任、最倚重的左膀右臂，可在唐军大举反攻、燕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史思明会不会像严庄那样幡然易帜、倒戈降唐呢？

有可能，很有可能！

安庆绪越想越觉得史思明靠不住。

为此，安庆绪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刚任命的宰相阿史那承庆和亲王安守忠找来，命二人前去范阳征调史思明的军队，以此对其进行试探。安庆绪叮嘱他们：如果史思明仍然忠于燕朝，肯交出军队，那当然最好；万一他心生异志，就想办法干掉他，以绝后患！

安庆绪的怀疑没错，史思明确实已经心生异志，准备降唐了。

就在安庆绪仓皇逃离洛阳时，史思明的心腹幕僚便力劝他叛燕归唐。他们说："如今唐室再造，安庆绪只不过是树叶上的一颗露珠，转瞬即灭！将军何苦陪着他一块灭亡呢？"

史思明觉得幕僚们的话有道理，眼下唐军兵锋正锐，所向披靡，如果继续顽抗，最后只能陪着安庆绪一块玩完。与其如此，还不如暂时归唐，保存实力，静待时变。

更重要的是，归降唐朝，只不过是换几杆旗帜的颜色和名称而已，地盘和实力一点也不会少；倘若继续留在燕朝，势必会被满腹猜疑的安庆绪釜底抽薪，变成一个光杆司令，甚至随时有可能脑袋搬家！

所以，史思明很快做出了决定。

当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率五千精骑抵达幽州城下时，史思明立刻带着数万兵马亲自出城"迎接"。两军相距一里左右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勒住了缰绳。

幽州城外的原野顿时陷入一片宁静。

那是一种怪异的宁静。

片刻后，史思明阵中突然飞出一骑，驰至阿史那承庆阵前，高声喊道："相公和王爷远道而来，敝处将士不胜欣喜。但边兵怯懦，惧怕相公兵马之盛，不敢上前迎接。请贵部暂时卸下武器，以安众心。"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顿时面面相觑。

卸下武器？史思明想干什么？莫非他真想造反不成？可是，脚踩在人家的地头上，数万人马又剑拔弩张地挡在前面，不卸也不行啊……

卸就卸吧，谅你姓史的也翻不了天！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没有办法，只好命部众卸下武器，然后赤手空拳地走进了幽州城。

史思明当即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美酒佳酿很快洗却了他们的满面风尘，也消除了他们的满怀戒心。与此同时，另一种清洗活动也在悄悄进行。史思明命手下人告诉邺城来的士兵们：想回家的送你们盘缠，愿意留下的重重有赏。

被缴了械的士兵，就如同被拔了牙的老虎。这五千骑兵虽说是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的麾下精锐，可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成了史思明砧板上的鱼肉，除了上面的两条路，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于是，一支军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蒸发了——想回家的都走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当天就被编进了史思明的军营。

酒足饭饱的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在驿馆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就成了史思明的阶下之囚。

至德二载十二月二十二日，范阳使者抵达长安，向唐肃宗李亨献上了降表。表上写明，史思明愿率辖下的十三个郡，八万士兵，外加燕朝河东节度使高秀岩部，向朝廷投诚。

肃宗大喜过望，即日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将他的七个儿子全部任命为高官。同时，肃宗给史思明下达了一条指令——讨伐安庆绪。

随着史思明的归降，唐肃宗李亨欣喜地发现，曾经笼罩大半个帝国的烽火狼烟已经渐渐消逝，海晏河清的那一天似乎马上就要到来……

至德二载岁末的日子，肃宗李亨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惩治和处决了两京失陷时投降燕朝的一批逆臣，二是册封并擢升了平叛期间的所有立功之臣。

对于逆臣的处理，肃宗朝廷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依情节轻重，“以六等定罪”。具体是：一等重罪者在闹市斩首示众，二等罪赐自尽，三等罪重杖一百，最后三等分别予以流放、贬谪等处罚。其中，原河南尹达奚珣等十八人被判一等重罪，于长安西南独柳下斩首；前宰相陈希烈等七人被判二等罪，赐死于大理寺狱。

功臣方面，广平王李俶晋封楚王（次年五月被立为太子，稍后更名为李豫），郭子仪晋升司徒，李光弼晋升司空；所有“蜀郡、灵武扈从立功之臣”，分别予以“进阶、赐爵、加食邑”等封赏。此外，张良娣晋封淑妃（次年三月被立为皇后），肃宗的其他九个皇子也均有晋爵，如南阳王李係晋封赵王，新城王李仅晋封彭王，颍川王李僩晋封兖

王。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平叛战争中英勇捐躯、壮烈殉国的那些烈士。肃宗朝廷开列了一张名单，如颜杲卿、袁履谦、张介然等人，皆被追认为功臣，本人追赠官爵，子孙也都恩荫授官。

对于名单上的绝大多数烈士，人们并没有不同意见。然而，其中却有一个人引起了满朝文武极大的争议。挺他的人认为他功勋卓著，足可名垂青史；贬他的人却认为他有罪，罪名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吃人。

直到今天，关于这个人物的功罪是非，仍然是聚讼纷纭，难有定论。而聚讼的焦点，仍然是那两个字：吃人。

这个千古争拗的人物，就是张巡。

雍丘之战：可怕的张巡

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人，史称其“博通群书，晓战阵法”，志气高迈，不拘小节，“所交必大人长者，不与庸俗合，时人叵知也”（《新唐书·张巡传》）。

张巡于开元末年登进士第，天宝中期入仕，初任太子通事舍人，不久出任清河（今河北南宫县东南）县令。在此任上，张巡扶危济困，选贤任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任职期满后，张巡回京待职。当时杨国忠专权，有人劝他去走杨国忠的后门，以求留任京官。张巡不屑地说：“如今朝纲不振，何必在朝为官？”

就因为这句话，张巡失去了难得的留任京官的机会，再度被外放，出任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东）县令。

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的顶头上司、谯郡（今安徽亳州市）太守杨万石投降了安禄山，逼迫张巡也跟他一起投降。张巡愤而起兵，率领本县吏民数千人，毅然揭起了反抗安禄山的大旗。

当时，附近的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令狐潮准备投降，遭到当地官吏和百姓的反对，令狐潮大怒，逮捕了一百多名反抗者。不久燕军来攻，令狐潮出城迎降，被他关押的吏民趁机逃出监狱，然后关闭城门，抵拒令狐潮，并派人邀请附近的张巡帮他们守城。

天宝十五载二月，张巡进入雍丘，斩杀了令狐潮的妻子儿女，随即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数日后，令狐潮引燕军来攻城，被张巡击退。三月初，令狐潮又会同燕将李怀仙、杨朝宗等人率四万大军，突然进抵雍丘城下。守军大为恐惧，人心动摇。张巡对守城将士说："此次来攻的叛军乃精锐之师，必然有轻我之心。倘若我们利用这一点，出其不意，发动突袭，敌人必定溃退。只有让其兵锋受挫，这个城池才守得住。"

随后，张巡派一千人登城防守，同时亲率一千人，分成数队，突然冲出。张巡身先士卒，直扑燕军阵营。燕军猝不及防，被砍杀了一大片，只好暂时后撤。

次日，燕军再度攻城，出动了一百架大型投石机，把雍丘城团团包围，然后万石俱发，片刻后便将城楼和雉堞轰毁无遗。紧接着，敌军就像蚂蚁一样纷纷攀上了城墙。

张巡命将士在城墙上设置木栅，用以阻挡敌军，同时搬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捆捆蒿草，灌上油脂，点燃之后投向敌军，把正在攀登城墙的燕兵们烧得焦头烂额。后面的大军见状，吓得不敢前进半步。张巡抓住战机，又率众杀出，再次击退了来势凶猛的燕军。

接下来的日子，燕军虽然将雍丘围得水泄不通，却始终攻不下来。每当燕军稍有松懈，张巡就会率众突袭，令燕军防不胜防。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张巡经常派出敢死队进行夜袭，更是让燕军不胜其扰。

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六十多天，经历了大小三百余战。张巡以区区数千之众，死死挡住了令狐潮的四万大军。他和将士们一样，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不卸甲，身上受了伤，随便包扎一下就再度投入战斗，其顽强的斗志令燕军无不胆寒。

最后，燕军官兵锐气尽丧，令狐潮不得不下令撤军。就在燕军后撤之时，张巡再度率众出击，将殿后的燕军杀得丢盔弃甲，并俘虏了两千多人。

五月，不甘失败的令狐潮再度引兵来攻。强攻数日后，雍丘城仍旧纹丝不动，令狐潮万般无奈，就想招降张巡。他与张巡是旧交，所以便邀请张巡到城下会晤，对他说："李唐天下气数已尽，足下坚守危城，图的是什么呢？"

张巡冷笑："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资治

通鉴》卷二一八）

令狐潮无言以对，只好惭愧而退。

随后，令狐潮围着雍丘又打了四十多天，还是徒劳无功。就在令狐潮一筹莫展的时候，关中传来消息，说潼关和长安已相继被燕军攻克，玄宗也已流亡巴蜀。令狐潮欣喜若狂，立刻修书一封，派人送给张巡，再度劝他投降。

当时，雍丘已被围困数月，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络，更无从得知西京沦陷、玄宗流亡的消息。令狐潮的劝降信一到，城中将士顿时人心惶惶，很多人都丧失了斗志。有六名高级将领一起找到张巡，劝他说：雍丘守军兵力薄弱，难以长期抵抗，如今皇帝是死是活也没人知道，不如投降燕军算了。

张巡看了看他们，无奈地点了点头。

次日，张巡将玄宗画像悬挂在大堂上，然后领着所有文武官员一起朝拜。大家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朝拜唐朝天子了，心中百感交集，无不泣下沾襟。就在此时，张巡忽然厉声大喝，命人将那六个将领当场逮捕，先是责以君臣大义，然后便把他们全部斩首。

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所有文武官员都惊呆了。本来想投降的人彻底死心，再也不敢说半个“降”字；而那些不愿投降的人则群情振奋，于是士气更坚。

然而，雍丘毕竟是一座被围数月的孤城，长期得不到后勤补给，所以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箭没了。

经过“斩六将”的事情之后，虽然将士们的战斗意志比以前更为坚定，但是光凭意志是没法打仗的。面对器械精良的燕军，没有箭的唐军就像是被剪断了利爪的苍鹰，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

将士们为此愁眉苦脸，可张巡却气定神闲。

没有人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巡夜的燕军士兵忽然发现，雍丘城头冒出了密密麻麻的黑衣人，粗略估计不下于一千人。只见他们纷纷从城头上缒下，行动迅速，悄无声息，显然又是来偷袭的。巡逻兵立刻禀报了令狐潮。令狐潮当即召集所有弓箭手，命他们列阵于营前，朝着雍丘城头万箭齐发。

不知道过了多久，令狐潮也记不清弓箭手已经射出了多少支箭，反正城头上那一千多个黑衣人身上像刺猬一样扎满了箭，却一个个纹丝不动——既不出声，也不躲避，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简直跟稻草人一模一样。

稻草人……

就在这三个字跃入脑海的同时，令狐潮也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气急败坏的令狐潮急忙下令士兵停止射击。

可是，一切都晚了。因为张巡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

当守城将士兴高采烈地把一千多具稻草人拉上城楼后，清点战果，居然得箭数十万支。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草人借箭”的故事。必须声明，张巡先生这一招绝不是从孔明先生那里学的，因为所谓的“草船借箭”纯属罗贯中先生的文学虚构，是压根没影的事。如果一定要说张巡的借箭之计是从古人那里学的，那他的老师也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与孙权对垒于濡须（今安徽巢县西）。初次交战，曹军大败，于是坚守不出。有一天，孙权乘轻舟亲自来到曹军前沿，观察曹军部署。为迷惑曹操，孙权故意鼓乐齐鸣。曹操生性多疑，见孙军甲仗威武整肃，而孙权又如此悠然自得，担心有诈，不敢出战，只喟然长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随后，曹操下令箭弩齐发，射击吴船。片刻后，孙权的轻舟因一侧中箭太多，船身倾斜，有翻覆的危险。孙权下令调转船头，使另一侧再受箭。很快，箭均船平，孙权安全返航。

由此可见，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描写得绘声绘色的“草船借箭”，其故事原型正是出自孙权。说不定，罗贯中也读过张巡“草人借箭”的故事，所以就把张巡和孙权的故事合二为一，创作出了“孔明草船借箭”的千古经典。

令狐潮折腾了一夜，非但没杀死半个唐兵，反而送给了张巡数十万支箭，心里着实懊恼。他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再也不上张巡的当了。

数日后的一个夜晚，巡逻兵又来报告，说雍丘城头又缒下五百余名黑衣人。令狐潮冷笑着对左右说：这回八成又是稻草人！不用管他！

可是，令狐潮万万没有料到——张巡这回出动的不是稻草人，而是敢死队！

五百多名敢死队员犹如下山的猛虎一样直扑燕军军营，把毫无防备的燕军士卒砍得人仰马翻。令狐潮大惊失色，慌忙弃营而逃。张巡率众一直追出了十几里，方才勒马回城。

尽管令狐潮一再上当受骗、损兵折将，可他还是不死心，很快就又带着援兵卷土重来。

有道是兵不厌诈，令狐潮现在算是彻底领教张巡之诈了。

有一天，令狐潮率众攻城，发现一个叫雷万春的唐将异常勇猛。令狐潮忽然计上心来，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带着一队弓箭兵来到城下，假装向雷万春喊话。雷万春不知是计，刚和令狐潮说了几句，一排箭矢就突然向他射来。雷万春猝不及防，被射中多箭，仅脸上就中了六箭。

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雷万春中箭后，居然还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令狐潮十分纳闷，怀疑张巡又拿个稻草人来诈他，赶紧命人趋近查看，得到的回答是：没错，城上之人确是雷万春。

关于雷万春“面中六矢而不动”之事，《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写得煞有介事，但它的真实性却很值得怀疑。

因为，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无论如何英勇，也不可能在“面中六矢”的情况下屹立不动。退一步讲，就算这事是真的，雷万春也应该当场身亡。可事实是雷万春居然没死，几个月后又生龙活虎地参与了睢阳之战。这就足以说明，所谓“面中六矢”极有可能是传统史家的文学夸张，目的是为了表现雷万春的忠勇。不过，尽管此事有虚构之嫌，但雍丘守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英勇和顽强，却依然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

稍后，令狐潮对着城上的张巡遥遥喊话，说：“方才看见雷将军，才知道贵军果然军纪严明，人皆效死，令在下十分敬佩。不过，李唐气数已尽，足下又如何能改变天道呢？”

张巡仰天狂笑，远远扔给他九个字：“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资治通鉴》二一八）随后，张巡趁敌不备，再度率众出战，擒获燕军将校十四人，斩首百余级。

令狐潮连吃败仗，不得不率部撤往陈留（今河南开封市陈留镇），数月间不敢复出。

十月初，经过数月休整的令狐潮又率一万多人进攻雍丘。张巡出城迎战，再次大破燕军，斩杀数千人，迫使令狐潮再度遁逃。

至此，令狐潮终于不得不承认——张巡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可怕的对手！

雍丘之战，是古代城邑保卫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张巡本人及其所率领的这支军队，也因此声名大振。

随后，燕朝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亲自出马，又与令狐潮一起攻打雍丘，结果还是久攻不克。最后，李庭望和令狐潮只好改变战略，准备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把张巡和一城军民活活困死。他们先是在雍丘城北修筑了一座新城，以此阻断雍丘的粮道；其后，李庭望又出兵攻陷了雍丘外围的鲁郡（今山东兖州市）、东平（今山东东平县）、济阴（今山东定陶县）等郡；而后，李庭望又命大将杨朝宗率步骑两万进攻雍丘东南面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企图彻底切断张巡的后路。

张巡很清楚，一旦宁陵失守，雍丘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独木难支的困境，迟早会落入燕军手里。所以，张巡决定退出雍丘，撤往宁陵固守，粉碎燕军四面合围的战略企图。

十二月初，张巡率众进入宁陵。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率部赶到了宁陵助战。

他就是睢阳太守许远（高宗朝宰相许敬宗之曾孙）。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位于宁陵东面，与宁陵相距不过四十里，两城唇齿相依。也就是说，一旦宁陵失陷，睢阳必难自保，所以许远跟张巡一样，也不会坐视宁陵陷落。

张巡与许远两军刚刚会合，杨朝宗便已兵临城下。

张巡与许远率众出战，与杨朝宗激战了整整一个昼夜，终于大破燕军，斩首一万余级。燕军的尸体塞满汴水（流经宁陵城南），杨朝宗带着残部连夜向北遁逃。

至德二载正月，刚刚即位的安庆绪为了进军江淮，打开唐朝财赋重镇的大门，遂任命大将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命他克期攻下睢阳。尹子

奇赴任后，用最快的速度集结了十三万大军，兵锋直指睢阳这个江淮门户。战报传来，许远立刻遣使向张巡告急。正月末，张巡带着麾下仅有的三千人进驻睢阳。此时，许远的人马也只有三千八百人。也就是说，张巡与许远的兵力加起来，总共也不过区区六千八百人，却要迎战尹子奇的十三万大军！

历史上著名的睢阳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很显然，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

这一战，将比雍丘之战更悲壮、更惨烈、更为艰苦卓绝，也更为惊心动魄……

死守睢阳

敌人开始攻城了。

十三万燕军像铺天盖地的洪水一样漫上了睢阳城头。看那架势，仿佛一天就会把小小的睢阳城淹没。

然而，城头上站着张巡。

有他在，六千八百个士兵就会变成六千八百道铜墙铁壁，让志在必得的燕军每靠近睢阳城墙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张巡的亲自督战和指挥下，唐军昼夜苦战，击退了燕军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进攻。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敌人二十次进攻。十六天下来，燕军在睢阳城下扔下了两万多具尸体，被唐军俘虏的将领更是多达六十余人，可睢阳城依旧傲然屹立在燕军主帅尹子奇的面前。

第十六天夜里，尹子奇不得不悄然拔营而走。

伤亡太大了，士气更是受到了严重挫伤，所以他需要休整。

当然，这只是短暂的休整。

因为把拳头缩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挫败燕军的第一阶段进攻后，许远已经对张巡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张巡说：“我性情懦弱，不习兵戎，将军则智勇双全，我愿把指挥权

交予将军。”

此后，许远只负责粮草、军械等后勤事宜，守城御敌的指挥权则全盘交给了张巡。

两个月后，尹子奇卷土重来。张巡激励将士说：“我等荷国厚恩，而今自当一死报国！”将士们群情激奋，皆愿死战。张巡遂下令杀牛宰羊，慰劳三军，随后率军出战。燕军见唐军只有可怜巴巴的几千人，却贸然出城和他们决战，顿时一个个捧腹大笑。

张巡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因为骄兵必败，哀兵必胜！

这是千古不易的战争铁律。

张巡亲执战旗，一马当先，率众直冲燕军军阵。唐军将士人人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十。燕军的阵脚一下子就被冲乱了，纷纷向后退却。唐军趁势在燕军军中左冲右突，纵横驰骋，旋即大破燕军，斩杀三十余将，击毙士卒三千余人，并乘胜追击了数十里。

尹子奇虽然屡屡受挫，但是他并不灰心。因为他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所以他耗得起。

随后的日子，尹子奇仍然围着睢阳日夜猛攻。张巡站在千疮百孔的城楼上，望着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的燕军，心中若有所思。

当天傍晚，张巡命将士在城中擂鼓呐喊，并集合队伍，作出一副马上就要夜袭敌营的样子。燕军得到情报，立刻加强警戒，从黄昏到次日凌晨，一个个枕戈待旦，丝毫不敢松懈。可天亮之后，张巡却下令停止擂鼓，并把集合的队伍全都解散了。

尹子奇闻报，亲自登上飞楼（瞭望敌情的高塔），仔细观察城内的情况，发现唐军根本没什么动静，于是紧绷了一夜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下令官兵各自回营休息。尹子奇自己也揉着通红的双眼，回中军大帐睡觉去了。

就在这一刻，张巡已经和他的麾下骁将南霁云、雷万春等十余人，各率五十骑精锐，从城门冲出，像离弦之箭射向了燕军大营。

要命的是，这十几支箭全都瞄准了燕军的心脏——尹子奇的中军大帐。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

这就是张巡站在城楼上若有所思的东西。

燕军官兵都熬了一个通宵，此刻正奉命回营睡觉，万万没想到唐军会在此刻来袭。当他们一个个睡眼惺忪地跑出营帐时，脑袋刚好撞上唐军寒光闪闪的刀锋。

一时间，张巡等人如入无人之境，犹如砍瓜切菜一般，一连斩杀了五十多个敌将和五千多名士卒。燕军大营一片大乱，根本挡不住呼啸而来的唐军。张巡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杀到了尹子奇的大帐前。

此时的尹子奇早就惊醒了，已经在亲兵的簇拥下逃出了大帐，开始气急败坏地组织反扑。

由于到处都是敌军惊慌乱窜的身影，张巡他们根本无法在千军万马中认出尹子奇。

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南霁云、雷万春等人一直在焦急地四处张望。

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尹子奇并把他干掉，人多势众的燕军一旦回过神来，必然会进行疯狂的反扑，把人数不多的唐军包围歼灭。

情急之下，张巡忽然想到了什么，马上命人找来一些细木棍，把头削尖，然后当成箭一样射向敌军。被射中的燕兵大为惊喜，以为张巡的箭用完了，纷纷跑去向尹子奇报告。

远远望去，那个骑在高头大马上、对着士兵咿咿呀呀指手画脚的将领忽然变得十分醒目。

张巡笑了，回头看了身后的南霁云一眼。

南霁云心领神会，当即搭箭上弦。嗖的一声，羽箭划破清晨的薄雾，不偏不倚地射入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一声惨嚎，跌下马背。南霁云拍马冲了上去，准备在尹子奇的脖子上补上一刀。

但是，南霁云没有得手。

因为尹子奇的亲兵们纷纷挡在他前面，还有人把尹子奇扶上马背，簇拥着他迅速逃出了南霁云的视线……

侥幸未死的尹子奇一直跑出了很远，才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用剩下

的那只独眼，久久地凝视着远处的睢阳城。

我会回来的。尹子奇说。

七月初，尹子奇从后方调来数万生力军，兵力又恢复到十几万人，随即再度南下围攻睢阳。

经过数月休整的燕军，不仅补充了兵员，士气复振，而且粮草、辎重、军械等等也得到了极大补充，可谓兵精粮足。相形之下，长期得不到后勤补给的睢阳却已逐步陷入粮尽援绝的困境。

睢阳原本有屯粮六万石，那都是许远为了长期坚守睢阳而多方筹集、苦心积攒的。可就在燕军围攻睢阳的不久前，时任唐河南节度使的虢王李巨却命许远拨出一半给濮阳（今山东鄄城县）、济阴（今山东定陶县）二郡。许远拒不从命，可李巨却再三强迫。许远无奈，只好忍痛交出三万石粮食。不久后，济阴太守高承义举城投降燕军，许远刚刚拨给他的一万五千石粮食也白白落入了燕军手中。

燕军从正月开始围攻睢阳，至今已断断续续地围了半年多，睢阳城中的三万石粮食逐渐耗尽，又得不到丝毫补充，形势日益严峻。于是，从七月开始，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规定每个将士每天只能分到一合米（相当于二两）。可想而知，这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所以将士们只好羼杂着树皮、茶叶、纸张来充饥。

经过半年多的苦战，睢阳守军歼灭了燕军的数万精锐，可自己也付出了五千多的伤亡，至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而且，这一千多名将士又是连肚子都填不饱、“饥病不堪斗”的羸兵！所以，此刻的唐军再也不能像前一阶段那样频频出击了。面对百倍于己的燕军精锐，他们除了被动挨打、困守待援之外，已经没有任何退敌之策了。

睢阳之战进入了最后的死守阶段。

尹子奇用他的独眼望着那满目疮痍、被战火熏得焦黑的城墙和雉堞，嘴角露出了一抹狞笑。

随后，燕军不断加大攻城力度，并且出动了云梯。所谓云梯，并不是普通的梯子，而是下面装有轮子，高度与城墙齐高的大型攻城器械。史载这种云梯“势如半虹”，可“置精卒二百于其上”，相当于一座可移动的“高塔”。这种高塔一旦靠上城墙，塔内的士兵可直接跳上城头，对守军展开进攻，具有很强的威胁性。假如有两三座这样的攻城塔一起靠上城墙，睢阳十有八九就要失守了。

当然，张巡是不会让它轻易靠过来的。

为了对付这种可怕的攻城器械，张巡命人在城墙上凿了许多隐蔽的洞口，每三个洞口对付一座云梯。燕军的云梯一靠过来，第一个洞口就伸出一根长木棍，末端绑着铁钩，将云梯钩住，让它不能后退；第二个洞口也伸出一根木棍，死死抵住云梯，让它不能前进；第三个洞口再伸出一根木棍，末端绑着铁笼，笼中燃着熊熊烈焰，用它将云梯点燃。

张巡的这个办法很管用。每当云梯一接近城墙，很快就会从中间烧断，而藏于其上的燕军士兵则尽数着火，纷纷坠亡。

时值盛夏，睢阳守军为了避免烈日暴晒，就在城头上搭了一座座“棚阁”，用以遮阳避暑。尹子奇随即出动“钩车”，专钩城上棚阁，“钩之所及，莫不崩陷”。面对燕军的钩车，张巡针锋相对，设计了一种“吊车”，以木头、铁链、铁环组合成“吊臂”。每当燕军的铁钩一出现，立刻用吊臂末端的铁环将其套住，然后连钩带车一起吊上城头，斩断铁钩，再将车扔下城去。

云梯和钩车都废了，燕军只好又出动“木驴”。所谓木驴，估计原理跟特洛伊木马差不多，就是把士兵藏在里面，避免冲锋时受到箭矢攻击。这种木驴的表面包裹了一层湿牛皮，所以一般的火攻战术奈何不了它。

火攻不行，张巡便采取了“水攻”。

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水，而是银水和铜水。每当燕军的木驴成群结队地冲到城下时，唐军就将银水、铜水当头浇下，把所有木驴和它们肚子里的燕军士兵瞬间烧成了焦炭。

在足智多谋的张巡面前，燕军的“秘密武器”全都成了没用的摆设。尹子奇勃然大怒，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修筑“磴道”。他命人在睢阳城的西北角（树木比较茂密的地方）大量砍伐树木，然后把木材堆积在城墙下，又在其上堆积沙土袋，打算修筑一条坚实宽阔的梯形长堤，以便大军对睢阳发起集团式冲锋。

在燕军修筑磴道的十几天里，张巡一直不动声色。

当然，他只是在白天不动声色。一到夜里，他就命人偷偷出城，把大量的松明、蒿草等易燃物塞在沙土下面的木材里。前后十几天，燕军都没有察觉。到磴道筑成的那一天，还没等燕军顺着磴道发起冲锋，

张巡就命将士们抛出了无数支火把，瞬间就把整条磴道全部点燃。尹子奇和燕军官兵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十几天的劳动成果被付之一炬，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望火兴叹。

冲天的大火一直燃烧了二十多天才渐渐熄灭。至此，尹子奇终于黔驴技穷。

张巡超乎常人的应变之智令他无比愤怒，也令他不得不折服。

最后，尹子奇放弃了强攻的战术，命士兵们在睢阳四周挖掘了三道壕沟，并设置木栅，以此阻挡唐军突围，准备把唐军困死在城中。

尹子奇知道，唐军粮草将尽，他只需要再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睢阳必然到手。

七月中旬，睢阳城中的粮食彻底被吃光了，连每人每天二两都成了一种奢望。

此刻的守军只剩下六百人，张巡和许远各领三百人分别驻守：张巡守东门和北门，许远守西门和南门。张巡和许远在城头上和士卒们同食共寝。而他们最后的食物，只有树皮、茶叶和纸张。

最惨的是，连这三样东西也快吃光了。

如果援军和补给再不来，他们还能吃什么？

当时，有三支唐军距离睢阳都不算远：许叔冀驻扎在谯郡（今安徽亳州市），尚衡驻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贺兰进明驻扎在临淮（今江苏泗洪县南）。其中贺兰进明的兵力最强，可他们为了保存个人实力，却无视睢阳危急，全都拥兵不救。

现在，睢阳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既然他们都不来援，那张巡就只能主动求援了。

张巡把任务交给了南霁云。他给了南霁云三十名精锐骑兵，让他拼死突围，前往临淮向贺兰进明求援。南霁云等人出城后，数万燕军蜂拥来攻，南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令“贼众披靡”，以阵亡二人的微小代价，硬是冲出了燕军的包围圈。

南霁云怀着满腔期望，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地赶到临淮后，见到的却是贺兰进明冷若冰霜的脸。

贺兰进明冷冷地说："你们出来的这些天，说不定睢阳已经失陷，再发救兵有何用处！"

南霁云激愤地说："睢阳若陷，霁云愿一死以谢大夫（贺兰进明的中央官职是御史大夫）。更何况，倘若睢阳失守，叛军的下一个目标必是临淮。睢阳与临淮唇齿相依，大夫岂能坐视不救？"

贺兰进明不为所动。但是对南霁云的忠勇，他心里却非常欣赏，所以决定把他留在麾下。当天，贺兰进明大摆宴席，还特意安排了乐队奏乐，希望能以声色之娱留住南霁云。

可是在宴会上，南霁云却滴酒未沾，连筷子都没有动。见贺兰进明毫无出兵之意，南霁云死心了。他悲愤地对贺兰进明说："我来的时候，睢阳的人已经断粮一个月了，我虽然很想单独享受眼前的美食，但无论如何难以下咽。大夫坐拥强兵，却眼睁睁看着睢阳失陷，没有半点扶危救难之心，这岂是忠义之士所为？"

紧接着，南霁云忽然拔出佩刀，猛然砍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在场众人，包括贺兰进明在内，无不大惊失色、悚然动容。他们听见南霁云说："霁云既然不能完成主将交给的任务，只能留下这根手指，以证明在下已经尽力。"

随后，南霁云连夜离开临淮，赶到了离睢阳不远的宁陵，会同这里的守将廉坦，率领城中仅有的三千步骑，火速东下增援睢阳。

张巡进驻睢阳时，曾交给部将廉坦三千人，命他留守宁陵。此刻睢阳危急，固守宁陵已经毫无意义，所以南霁云只能把这支部队拉出来救援睢阳。

八月初三夜，南霁云率三千援军回到睢阳，立刻杀入燕军重围，一路杀到睢阳城下。经过一番血战，南霁云虽率众突破了燕军军营，杀伤了大量敌兵，但自己也阵亡了两千人，只剩下一千人进入城中。

看着满身血污的南霁云和这一千人马，睢阳城中的将士们顿时绝望。难道，这就是他们望眼欲穿的援兵？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援兵，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援兵。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将士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和绝望，纷纷仰天恸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战火中的人间地狱

最后的时刻到了。尹子奇知道睢阳守军的外援已经彻底断绝，立刻加紧了对睢阳的围攻。

面对这毫无希望的困境，将士们提议：放弃睢阳，撤往江淮一带。张巡和许远也不得不考虑弃城的可行性。但是他们讨论到最后，得出的共同结论仍然是——坚守。

他们认为，睢阳是江淮的门户，一旦弃守，叛军必定长驱直入，到时候帝国的财赋重镇将全部落入敌手。更何况，如今将士们都饿得走不动路了，未必能够突出重围。张巡和许远相信，就算是在战国时代，原本敌对的诸侯在危难之时尚且相互救援，更何况坐拥大军的贺兰进明等人呢？所以，张巡和许远的结论就是——继续坚守，等待援军。

可是，将士们没有吃的，如何坚守？城中的树皮早就扒光了，连茶叶和纸张也都吃完了，接下来还能吃什么？

张巡和许远的回答是：吃马。

很快，马也吃完了，将士们只能“罗雀掘鼠”。没过几天，麻雀和老鼠也都吃光了，将士们只好瞪着一双双饿得发绿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张巡。

张巡默默地看了看他们，忽然转身走下城楼。

片刻后，张巡回来了，肩上扛着一只沉甸甸的麻袋。将士们迫不及待地解开麻袋，冒着绿光的眼睛霎时变得通红。

因为他们看见——麻袋里装着一堆肉。

那是人肉。

准确地说，那是一个女人的肉。

从那堆血肉模糊的残肢断臂中，个别细心的将士认出来了——那是张巡的女人，是他的爱妾！

将士们愕然了一瞬，惭愧了一瞬，也感动了一瞬。然而，短短的一瞬过后，他们就像一群饿狼一样扑向了那堆肉……

他们太饿了。

在饥饿面前，惊愕算什么？愧疚算什么？感动又算得了什么？

张巡的爱妾转眼就被分吃一空了。紧接着，许远也扛来了好几个大麻袋——里面装着被他杀死的几个家奴。

然而，几个人的肉是远远不够吃的。

接下来的日子，将士们开始捕杀城中的女人。不管她们藏身何处，最后都会被抓出来一一烹吃。女人吃光了，就吃男人中的老人和小孩……

或许刚一开始，将士们多少还有一些不良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可到了后来，大伙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因为吃多了、吃久了，那种难以下咽、恶心欲吐的感觉自然就消失了。最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吃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睢阳就这样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每当夜幕降临、燕军攻势退去时，睢阳城里就会燃起一堆堆篝火。只见士兵们三五成群地聚在火堆边，每个人手上都抓着一只手或一只腿在啃咬。火光把他们的身影拉长，令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鬼魅。在他们身边，散落着一根根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白骨。原本万家灯火的睢阳城，此刻只剩下一片黑暗和死寂。每一座宅子，每一条小巷，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腥膻、腐臭的气息。惨白的月光下，到处可见被士兵们随意丢弃的一颗颗老弱妇孺的头颅，以及大大小小、沾满血污的手掌和脚掌……

从八月到十月，以张巡、许远为首的睢阳守军，就是以这种“同类相食”的残忍方式，维持着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存。据《新唐书·张巡传》所载，睢阳守军在这最后的两个月里，被吃掉的老弱妇孺多达三万人。

与此同时，燕军也一直没有停止攻城。到了十月初，睢阳的一千多名守军又陆续战死，最后只剩下四百个人。

准确地说，是剩下四百个疾病缠身、气息奄奄的病号。

他们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已经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彻底耗尽了。

十月初九，当燕军像潮水一样涌上睢阳城头时，唐军将士再也无力举

起手中的刀枪。

张巡绝望了。他向西遥拜，大声喊道："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资治通鉴》卷二二○）

随后，燕军生擒了张巡、许远等人。尹子奇命人把张巡押到跟前，用他的独眼久久凝视着这个令人恐惧的对手，忽然咧嘴一笑，说："听说您每次作战都会把牙齿咬碎，为什么？"

张巡仰天狂笑："我志在生吞逆贼，只恨力不从心！"

尹子奇当即用刀撬开张巡的嘴，果然看见牙床上只剩下三四颗牙齿。尹子奇顿时肃然起敬。他有心想留张巡一条命，然后招降他，可左右却坚决反对。他们说："张巡是一个把气节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不可能为我所用。而且，他深得军心，如果留下他，必为后患。"

尹子奇思来想去，觉得此言不无道理，最后只好将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名唐将全部斩首。许远被押赴洛阳，未久也不屈而死。

张巡终年四十九岁。

据说他死时，"颜色不乱，扬扬如常"，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汉子。

睢阳之战，历时十个月，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许远以不足万人之众（初六千八百人，后增兵三千人），抵挡了尹子奇的十几万大军（初十三万，后增兵数万），且斩杀敌将三百、毙敌十二万人，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寡敌众、以弱制强的经典战例。

张巡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首先当然是因为唐军将士的同仇敌忾和英勇顽强，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巡临敌时的机变无穷。

张巡作战时，从不墨守成规，甚至不依照古代兵法，而是让他的麾下将领各随己意指挥士兵。有人对此深感不解，张巡解释说："燕军主力都是胡人，他们作战，历来是'云合鸟散，变态不恒'，仅仅数步之间，情势就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在刹那之间作出反应，如果事事禀报主帅，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尽量做到让士卒了解将领的个性，将领熟悉士卒的心理，如此一来，他们到了战场上，就能像手掌指挥手指一样运用自如。士卒与将领一旦相知相习，就能做到人自为战，也才能做到临机应变，出奇制胜。"

张巡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他："推诚待人，无所疑隐；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明，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

然而，张巡为了坚守睢阳而不得不吃人之事，却在他身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千百年来一直饱受争议。首先，肃宗朝廷在是否该追认他为功臣这件事上，就产生了很大争议。贬张者认为"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挺张的人则认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资治通鉴》卷二二○），而且吃人之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应该为他记一大功，并且要树碑立传。

这场争议很快就有了结论。

挺张的人赢了。"众议由是始息"，张巡当之无愧地成了大唐王朝的功臣。

可是，李唐朝廷对张巡的承认，并不能消除后世对他的指摘。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件事的看法，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首先也承认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可同时他也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因此，他的结论是："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鉴论》卷二三）

时至今日，"贬张派"和"挺张派"依然是针锋相对。前者认为，张巡为了保全自己的忠义，不惜以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是一种典型的为了理想而拿别人献祭的做法，与法西斯无异。后者则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今天的人不应该以"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因为在当时那种极端的情况下，张巡的做法实属情有可原。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张巡呢？

一方面，就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张巡死守睢阳的战略意义。因为睢阳是江淮门户，而江淮是帝国的财赋重镇，一旦睢阳失守，燕军必定长驱直入，横扫江淮。到那时候，像贺兰进明、许叔冀、尚衡这种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的家伙，断然是非败即降。倘若如此，远在西北贫瘠之地的肃宗朝廷立刻会失去江淮地区的钱粮供给，届时非但没有实力收复两京，甚至连肃宗朝廷本身都会有瓦解之虞。因此，张巡在睢阳坚守十个月，并牢牢牵制燕朝十几万大军，就

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假如张巡早早就败了、逃了，或是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一死”以明志，那么整个战争的形势必会全然不同，李唐朝廷收复两京的日程也将被无限期地推迟。

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得不说，张巡以人肉充当军粮的做法虽然情有可原，但却理无可恕！实际上，不需要用今天的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只需用古代的儒家思想，就很容易发现张巡此举在道德上的缺失。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被张巡他们吃掉的三万老弱妇孺，肯定不是自愿的，所以张巡的做法显然已经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所以王夫之才会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在一般情况还是在极端情况下，张巡吃人的做法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换言之，张巡此举虽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他并不能因此逃避道德审判。这道理就跟过失犯罪一样，可以酌情减刑，但绝不能宣判无罪。

第二章 藩镇大裂变

史思明复叛

公元758年阴历二月，唐肃宗李亨将年号改为“乾元”，同时把使用了十多年的“载”改为“年”。

当初，唐玄宗李隆基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改年为载，是为了向世人宣告他的盛德大业已可媲美于尧舜（尧舜时代大多用“载”表示纪年），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却给了玄宗无情的嘲讽，也给李唐王朝带来了几近覆灭的厄运。

所以，从肃宗李亨灵武即位的那一刻起，他很可能就一直想把纪年名称改回来，可一则因为他刚刚即位、权力不稳，二则因为他正忙于平定叛乱、收复两京，所以就把此事暂时搁置了。直到此刻，他才能趁着改元的机会，把这个让人无比纠结的“载”字改回来。

肃宗启用的新年号“乾元”，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开局、一切从头再来的意思。

很显然，两京的顺利光复给了肃宗很大的信心和希望。在他看来，以安庆绪为首的一小撮叛乱势力已经穷途末路了，天下很快就会平定，李唐的中兴也已指日可待！

这个新年号，无疑就是这种心境的表白。

和肃宗李亨一样，满朝文武似乎也对此充满了乐观情绪，只有少数人不敢掉以轻心。

比如李光弼。

他有一种很强的预感，预感某个刚刚归降朝廷的人一定会再叛。

谁？

史思明。

作为战场上的老对手，李光弼很了解史思明。他知道，史思明的投诚只是迫于时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变，他必会再叛！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李光弼向肃宗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并进而献策，让肃宗派一个史思明信得过的人，代表朝廷前往范阳宣旨慰问，借机除掉史思明。

李光弼推荐的人选是乌承恩，并建议事成后就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

乌承恩的父亲曾是史思明的老上级，对史有提携之恩。两年前，时任信都太守的乌承恩举城投降了史思明。由于有过去的这层关系，史思明对乌承恩非常信任。肃宗朝廷收复两京后，乌承恩便是力劝史思明反正的心腹之一。

要除掉史思明，乌承恩是不二人选。

李亨采纳了李光弼之策，即命乌承恩前往范阳。

这一年六月，乌承恩抵达幽州（范阳治所），受到了史思明的热情款待。乌承恩宣完圣旨后，史思明马上安排他住到了自己的府上。当时，乌承恩有一个儿子在史思明帐下任职，史思明还特意吩咐他去看望一下父亲。

当天夜里，乌承恩父子二人见面。乌承恩当即屏退下人，紧闭门窗，然后激动不已地对儿子说："我奉朝廷之命除掉这个逆贼，事成之后，我就是这里的节度使！"

可是，还没等乌承恩的儿子表达出和父亲同样激动的心情，房间的某个地方就传出了两声冷笑。

有两个人已经在黑乎乎的床底下埋伏了大半夜了，专等着乌承恩露出马脚。

当然，这两个人是史思明安排的。

其实乌承恩一来到范阳，史思明就已经起了疑心，可他却不动声色，而且表现得极为殷勤，目的就是要麻痹乌承恩。

乌承恩的计划就此败露。随后，史思明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许多东西：有李光弼的牒文，文中让乌承恩邀同阿史那承庆一起刺杀史思明，同时还有事成后准备赏赐给阿史那承庆的免死铁券，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列满了乌承恩准备策反的史思明麾下将士的名字。

史思明指着这些东西问乌承恩："我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这么干？"

乌承恩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只好不停磕头：“我有罪！我该死！这都是李光弼的阴谋。”

翌日，史思明集合了范阳的所有文武官员和幽州百姓，面朝西方，痛哭流涕：“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

这一天，史思明当众打死了乌承恩父子，并连坐处死了跟乌承恩有牵连的二百多个文武官员，然后向肃宗上表鸣冤。肃宗赶紧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遣使宣慰说：“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史思明吞不下这口恶气，叫幕僚耿仁智再度上表，其中有一句话说：“陛下不为臣诛杀李光弼，臣只好自己带兵到太原杀了他！”没想到表文装函之前，这句话却被一意归唐的耿仁智偷偷删了。等到史思明发觉，表文已送出。史思明一怒之下，杀了这个跟随他近三十年的心腹，而后再度揭起了反旗。

安庆绪自从逃到邺城后，虽然地盘和实力都比从前小了许多，但毕竟还据有七郡六十余城，钱粮、兵源等等也还算充足，所以安庆绪便又故态复萌，天天纵情声色，大肆营建宫室楼船，把政务都交给了心腹大臣高尚和张通儒。

安庆绪不问政务，高、张二人自然都想趁机掌控大权，于是天天明争暗斗，很快就把这个流亡邺城的燕朝小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大将蔡希德为人比较刚直敢言，看不惯二人的所作所为，便屡屡向安庆绪进言，因而得罪了张通儒，不久就被张通儒随便找个借口杀了。蔡希德一死，他的麾下部众大为心寒，先后有数千人逃离了邺城，留下来的那些将领也是满腹怨恨，渐渐跟燕朝小朝廷离心离德。随后，安庆绪把兵权交给了崔乾祐，任他为“天下兵马使，总内外兵”。崔乾祐为人刚愎自用，残忍好杀，士卒都对他非常不满，于是军心日渐涣散。

伪燕朝上下离心、将相不睦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长安。

肃宗李亨动心了。

本来，他是想把消灭安庆绪的任务交给史思明的，如今史思明既已复叛，那肃宗只能自己动手了。此刻叛军内部矛盾重重，正是将其彻底歼灭的最佳时机。

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肃宗颁布诏令，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九大节度

使，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余万人，即日起从各个方向向邺城进发，准备一举歼灭安庆绪。

可令人费解的是，肃宗李亨并没有为这二十多万大军设置一个元帅，而是设置了一个所谓的“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这个新鲜的头衔是肃宗的一项发明。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就是天子特使，拥有统辖、调遣九路大军的最高指挥权，与元帅无异。

荣膺此职的人，是内侍宦官鱼朝恩。

之所以把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个宦官，李亨的解释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皆为功臣元勋，谁统御谁也不好，所以干脆不要设置元帅，来个“观军容使”就解决问题了。

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

而通常我们都知道，冠冕堂皇的理由往往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李亨害怕。

这年头，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随便一个乡下出来的阿猫阿狗，吆喝数百号弟兄，扯一面带字的布，胸中就会油然而生打天下的欲望了，何况是把这二十多万兵马交到一个节度使手上！更何况，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后续部队将陆续集结。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倾天下之力集于一人之手啊！几年前的安禄山仅凭河北三镇就几乎倾覆整个李唐了，要说今天的某个节度使一夜之间握有天下兵权而不会生出当皇帝的野心，不会突然间掉转矛头反戈一击，李亨还真不敢相信。

所以，李亨只能把这个可怕的力量交给宦官。这种以伺候人为职业的奴才长年与天子朝夕相处，无论如何也比那些以征战杀伐为职业的将帅更让皇帝感到放心。

理由如此充分，足以说明唐肃宗李亨之所以把兵权交给宦官，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然而，肃宗李亨似乎没有想到，让一个久居深宫的宦官去统率身经百战的九大节度使，肯定是难以服众的，即便鱼朝恩再有能力，他也缺乏应有的军事经验。

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从肃宗任命鱼朝恩为观军容使，把讨伐安庆绪的数十万大军交到他手里的这一刻起，邺城会战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十月，郭子仪率领大军渡过黄河，攻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大破燕军守将安太清，毙敌四千人，俘虏五百人。安太清带着残部撤至卫州（今河南卫辉市），郭子仪乘胜进军，将其包围。

安庆绪闻报，立刻与大将崔乾祐、田乾真共率七万大军来援。郭子仪命三千神箭手在营垒之内设伏，然后率部与安庆绪接战，随即佯装败退。安庆绪大喜，下令追击。郭子仪率部退入营垒时，燕军追兵紧随而至，埋伏的神箭手突然出现，瞬间箭如雨下。燕军慌忙后撤，郭子仪挥师反击，大破燕军，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进而一举克复卫州。

安庆绪一路向邺城逃窜，见唐军穷追不舍，便集结残部，在愁思冈（今河南安阳市西南）一带匆忙组织了一次反击，却再度被郭子仪击溃。燕军前后被杀三万人，被俘一千余人。安庆绪仓皇逃回邺城。二十几万唐军随即将其团团围困。

安庆绪知道这回是凶多吉少了。

现在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救他，那就是史思明。

安庆绪即刻遣使向史思明求救，并声称愿意把燕朝皇位让给他，只求他出兵援救。

接到安庆绪的求救信时，史思明笑了。

他发出的是冷笑。

不过，冷笑归冷笑，史思明还是及时出兵了。

邺城是范阳的屏障，要是邺城丢了，范阳就会暴露在唐军的眼皮底下，所以史思明必须援救邺城。

当然，史思明要救的只是邺城，不包括安庆绪。

史思明亲率十三万大军南下，命前锋将领李归仁领步骑一万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接着又在这一年十二月从唐军手里夺取了魏州（今河北大名县），然后就在魏州城里按兵不动了。

前锋李归仁所驻的滏阳距邺城仅仅六十里，可他得到的命令却是：只

准摇旗呐喊，不准轻举妄动。

史思明的态度明摆着——等安庆绪和唐军鹬蚌相争，斗得两败俱伤，他再后发制人，坐收渔翁之利！

邺城之战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初一，史思明忽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魏州筑坛祭天，自立为“大圣燕王”。

史思明是什么意思？他为何早不称王晚不称王，偏偏在唐军与安庆绪激战正酣的这个节骨眼上称王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安庆绪马上就要完蛋了，燕朝也必然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史思明在此时称王，就等于是向燕朝的文武百官宣布——从今往后，我就是燕朝新的政治权威，我就是你们的老大！

说白了，史思明是在为称帝作铺垫。

自从史思明挥师南下的那一刻起，李光弼就有了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此后史思明进抵魏州却按兵不动，摆明了就是在坐山观虎斗，李光弼就更是如坐针毡。他担心的是：如果唐军久攻邺城不下，史思明趁唐军师老兵疲发起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光弼随即向鱼朝恩提议，分兵北上进逼史思明，就算不能取胜，与之相持，也足以解除唐军腹背受敌的危险。

可鱼朝恩却断然拒绝。

他当然要拒绝。一个堂堂的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岂能让麾下的一个节度使指手画脚？更何况，在鱼朝恩看来，唐军拥有数十万之众（除了刚开始的二十多万，随后又有大量兵马陆续前来），攻克邺城根本不在话下，因此没必要如此忌惮史思明。等到拿下邺城，再集中兵力挥师北上，定能将史思明一举击溃！

然而，鱼朝恩太自信了。

邺城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打。

从乾元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数十万大军将邺城团团围困、日夜猛

攻，可耗时将近半年，就是拿不下这块弹丸之地。

唐军久攻不克，最后只好采取水攻之策，在漳水（流经邺城北）上筑了两道堤坝，挖了三条壕沟，硬是把汹涌的河水灌进了邺城。

顷刻之间，邺城“井泉皆溢”，成了一片水乡泽国。燕军官兵就在水上搭建木屋。围城日久，粮食逐渐耗尽，城里的人就吃老鼠。鼠肉行情立刻暴涨，一只鼠卖到四千钱。实在连老鼠都吃光了，人们就抠墙上的泥土，把原来筑墙时羼杂进去的麦壳淘洗出来，再从马粪中淘取尚未嚼烂的纤维，就这样混起来吃。

最后的时刻，原本离心离德的燕军官兵竟然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强，这一点实在大大出乎唐军的意料。当然，也有很多人想要投降唐军，可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大水，让他们根本就出不了城。

乾元二年二月末，史思明终于出手了。

通过将近半年的冷眼旁观，史思明已经彻底摸清了唐军的底细。他知道，唐军的兵力虽然庞大，但是号令不一，进退无据，基本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之所以如此，皆因其统帅是一个宦官——一个自负而愚蠢的军事盲。

一想到李唐天子居然把这么多精锐唐军交到一个宦官手上，史思明就忍不住想对李亨说声“谢谢”。要不是李亨走出这步臭棋，把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可怕的对手置于一个军事盲的指挥下，史思明又怎么有机会战胜他们呢？

对于一心准备称帝的史思明来说，李亨的这个错误决策无疑帮了他一个大忙。

史思明亲率大军从魏州出发，命各将领进至邺城五十里处扎营，每营分发三百面战鼓，日夜擂动，虚张声势。随后，史思明又命每营遴选精锐骑兵各五百人，到唐军大营附近打游击。若唐军不备，他们就劫掠骚扰；唐军一出动，他们就四散逃跑，各回本营。如果唐军白天防备，他们就晚上偷袭；要是唐军晚上防备，他们就白天偷袭。总之，这些游击队严格贯彻史思明提出的“敌疲我扰，敌进我退”的战术思想，把唐军搞得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那些日子，唐军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官兵、牛马或辎重遭到劫掠，很多小兵甚至只是出去砍个柴、割个草，也会被燕军的游击队员悄无声息地抹了脖子。

除了对唐军日夜进行骚扰之外，史思明还有更损的一招。

那就是劫粮。

当时，李唐朝廷几乎倾尽全力在攻打邺城，陆续前来邺城集结的唐军最后竟然多达六十万，所以这六十万人的粮饷补给就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从江、淮（华东）和并、汾（山西）等地，天天都会有大量的车队和船队络绎不绝地往邺城运送粮食。史思明就让他的游击队化装成唐军，四处拦截唐军的运粮队，以速度缓慢、延误时日为名，将负责押运的官兵和民夫全部砍杀，然后把那些粮食付之一炬。

对于这些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燕军游击队，唐军伤透了脑筋，却又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全都穿着唐军军装，就算大摇大摆地从唐军面前走过，也没人能认出他们。

一段时间以后，唐军粮草不继，军心大为涣散。

到了这一年三月，史思明感到时机成熟，遂亲率大军进抵邺城城下，摆出与唐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三月初六，唐军与史思明在邺城外展开了决战。

唐军步骑六十万全部出动，在安阳河（流经邺城北）北岸布阵，史思明仅率精锐骑兵五万迎战。唐军望见燕军兵少，以为不是史思明的主力，顿生轻敌之心。

史思明率先发起进攻，唐军的李光弼、王思礼、鲁炅等人率部接战。一开始，双方不分胜负，伤亡大致相等。不久，鲁炅被流箭射伤，仓皇率部后撤。郭子仪的朔方军刚好在他身后，一下子被冲乱了阵脚。

就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一片漆黑。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刹那间天昏地暗，咫尺莫辨。见此情景，所有人全都吓坏了，于是不约而同地掉头而逃——唐军向南逃，燕军向北逃，一个个奔跑如飞，只恨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

双方都只顾着逃命，铠甲、武器和辎重被扔得到处都是。燕军规模小，损失自然也较小，而唐军则遭受了巨大损失——“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九大节度使中，只有郭子仪还保持着相对冷静。他担心史思明稳住阵脚后，会趁势南下进攻洛阳，于是率部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以确保洛阳无虞。其他的八个节度使，也只有李光弼部和王思礼部在撤回本道的时候秩序井然，既没有骚扰地方，也没有出现逃兵。剩下

的各道兵马，建制全都丧失，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逃兵们所过之处，大肆抢劫百姓钱粮，地方官吏丝毫不敢制止。沿途州县经受了十几天的严重骚乱，等到数十万乱兵过境后，才算消停了下来。

洛阳的官吏和百姓听说六十万官军顷刻间星流云散，吓得魂都没了，于是纷纷出逃，躲进了附近的山区。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员逃得更远，一口气逃到了襄州（今湖北襄阳市）、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等地。

这场讨伐安庆绪的邺城之战，就这样以必胜的姿态高调开局，却以六十万人的大溃逃黯然收场。

虽然唐军不是败在史思明手上，但此次惨败无疑在客观上助成了史思明的强势崛起。

史思明退至沙河（今河北沙河市北），得知唐军已全部南逃，遂集合部队回到邺城，在城南扎营。他既没有进城去见安庆绪，也不向南追击唐军，而是天天在营中饮酒作乐，犒赏三军，要看安庆绪作何反应。

准确地说，史思明是想看看安庆绪如何兑现“让位”的诺言。

唐军走后，安庆绪命人搜罗了唐军遗弃的六七万石粮食，然后紧闭城门，一声不响，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史思明的存在。

安庆绪如此冷落史思明，令邺城的大多数文武官员相当不满。高尚、张通儒等人就对安庆绪说：“史王远道而来，解除了邺城之围，臣等理应出城迎谢，不该避而不见。”

安庆绪知道，从他死乞白赖地求史思明来救命的那一刻起，自己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关键倒不在于那个出让皇位的许诺，因为诺言从来都是很不靠谱的东西，天底下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人多了去了，何止我安庆绪一个？

问题在于——胆敢食言的人必须有实力做后盾。

说白了，安庆绪之所以出现权力危机，归根结底就是他的实力跟史思明差得太远。没有实力做依托，不管你有没有许下出让皇位的诺言，结果都是一样的。如今，高尚、张通儒等人之所以帮史思明说话，并不是因为他们平时做人都很高尚，认为既然许诺就不能食言，而是因为他们看出了史思明的实力，所以一心想要改换门庭、另投明主了。

其实安庆绪比谁都清楚，请史思明来解围纯粹是引虎驱狼之计，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从他逃到邺城的那一天起，他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挨一天算一天了。现在的处境也是一样，明知道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他也只能拖一天算一天。

事已至此，安庆绪只能有气无力地对高、张二人说：“随便，你们想去就去吧。”

史思明见到高尚和张通儒后，立刻痛哭流涕，大倒苦水，作出一副忠心救主却遭人猜忌的冤枉状，然后送给二人一笔厚礼，恭恭敬敬地送他们回城。

实际上到了这一步，燕朝的人心基本上已尽归史思明了。三天后，史思明又秘密约见了安庆绪的心腹安太清，命他想办法诱安庆绪出城。

安太清随即回城大造舆论。最后，在文武百官的同声谴责，甚至是软硬兼施之下，安庆绪不得不命安太清向史思明上表，向他俯首称臣。不过，安庆绪还是不打算出城。他让安太清转告史思明，请他“解甲入城”，说自己将亲自“奉上玺绶”。

解甲入城，亲奉玺绶？

听到这样的话，史思明在心里发出了一串冷笑：我要是真的解甲入城，恐怕还没见到皇帝玺绶，就先见到刀斧手了吧？

史思明很快就给安庆绪回了一封信，说：“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然后把称臣表一同送还给了安庆绪。

史思明这段话的意思是：你我今后就做兄弟之国吧，一有情况就互相支援。大家鼎足而立就好了，至于面北称臣之事，我绝不敢接受。

看见史思明的回信后，安庆绪生出了一丝侥幸心理。他觉得史思明这番话说得蛮真诚的，应该不是什么圈套，于是又惊又喜地要求与史思明见面，并请求双方歃血为盟。

史思明随即向安庆绪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数日后，安庆绪仅率三百名亲兵，高高兴兴地进入了史军大营。史思明命那三百人全留在大帐外等候，然后亲切地领着安庆绪进了大帐。

一进入帐中，安庆绪就向史思明纳头便拜：“臣无能，弃失两都，久

陷重围，没想到大王能念在太上皇的旧情，千里迢迢赶来救援，让臣死而复生，臣摩顶放踵，无以报德！”

安庆绪觉得，既然自己的性命和皇位都保住了，那不妨把身段放低一点，拍拍史思明的马屁，自己身上也不会掉块肉。再者说，把史思明哄高兴了，日后邺城再有危急，定能再次得到“兄弟之国”的“藩篱之援”。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安庆绪的幻想。

当他跪在地上声情并茂地拍完马屁后，头上突然响起史思明震耳欲聋的怒喝：“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安庆绪绝望地抬起头来，看见史思明的怒容后面分明是一张得意而狰狞的笑脸。

姜还是老的辣。

安庆绪最终还是玩不过史思明。

当天，史思明就把安庆绪和他的四个弟弟，连同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人全部斩杀，同时把张通儒、安太清、李庭望等人收入了麾下，分别授予了他们新的官职。

高尚与张通儒长久以来的明争暗斗，至此也算有了一个了局。

随后，史思明率军进入邺城，打开府库犒赏将士，紧接着派人分赴各地，顺理成章地接收了安庆绪辖下的各个州县及其部众。史思明本欲乘胜南下，进攻洛阳，但转念一想，自己刚刚夺取大权，根基未稳，于是留下他的儿子史朝义镇守邺城，自己率部返回范阳。

乾元二年四月中旬，史思明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立其妻辛氏为皇后，立其子史朝义为怀王，任命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大将军，改范阳为燕京。

史思明称帝的消息传至长安，肃宗李亨顿时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眩晕。本以为天下指日可定，岂料转瞬间风云再起，一切又都脱离了他的掌控。

李亨百思不得其解：这场该死的叛乱为何就像春天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呢？安禄山后面是安庆绪，安庆绪后面是史思明，天知道

这个史思明背后，还会有多少人想称王称帝？天知道这种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个头……

李光弼的手段

邺城惨败无疑给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唐帝国再度造成了重创。

帝国要再花几年时间，才能集结这么多兵马，筹集这么多钱粮，打这么一场大规模的平叛战役？

没有人知道答案。

不是不会算这笔账，而是不敢算。

很显然，这场始料未及的失败令肃宗李亨至为心痛，也让朝野上下失望已极。所以，肯定要有人来担这个责任。

当然了，观军容使鱼朝恩是不会担这个责任的，他想都没想就把黑锅扣在了郭子仪头上。鱼朝恩很早就在嫉妒郭子仪的军功，看他很不顺眼，这回刚好抓他当替罪羊。

鱼朝恩回京之后，就日夜不停地在李亨耳边唠叨，说两军刚刚交战，他就亲眼看见郭子仪率先逃跑了，若不追究郭子仪的责任，无以正朝廷纲纪。

郭子仪没有辩驳，他愿意背这个黑锅。

原因很简单，鱼朝恩是天子跟前的红人，若得胜还朝，功劳自然归他；如今战败，责任也自然是九大节度使的。而郭子仪身为九大节度使之首，他不背这个黑锅，还有谁能背，还有谁肯背？

乾元二年七月，肃宗把郭子仪从洛阳前线召回长安，让李光弼取代他的朔方节度使之职，并表示要让李光弼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很敏感也很谨慎地提议，还是派一个亲王来当元帅，自己当副职就可以了。肃宗听了很满意，随即任命赵王李係（李亨次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

郭子仪就这样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他离京的那一天，朔方将士们涕泣不已，纷纷拦在道上不让他走。郭子仪强忍眼泪，对他们说：“我今天是要替一个离京的朋友饯行，暂时还不走。”将士们信以为真，让

开了一条路。郭子仪立刻挥鞭，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

郭子仪走后，其兵权全部转移到了李光弼手上。

也就是说，此时的李光弼已经成了帝国的王牌部队——朔方军的一把手。

不过，兵权固然可以在一两日内移交，可朔方将士的军心却没那么容易移交。

李光弼深知，郭子仪这些年为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且宽仁待众，深受朔方将士拥戴，如今因邺城之败而背了黑锅，又被自己一朝取代，朔方将士必然不服。虽然朝廷授予了自己朔方节度使之职，但这并不等于他会自动获得将士们的拥戴。换句话说，要想当朔方军的老大，不仅要凭朝廷的一纸任命状，更要凭自己的本事和手段！

为了防范朔方将士在他进驻洛阳接管军队时耍什么花样，李光弼不敢在白天公开进城，而是满怀警惕地带着五百河东骑兵，在某个深夜悄悄进入了洛阳。

李光弼赴任后，立刻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接连颁布了一道道严厉的军令。数日之间，洛阳守军的军容焕然大变，无论是士卒的精神面貌，还是营垒的布局结构，甚至连旗帜插在什么地方，都鲜明地刻上了李光弼的烙印。

郭子仪治军向来以宽仁著称，而李光弼治军则以严整见长。现在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光弼更是要处处表现出与郭子仪的不同。

如此一来，将士们自然是越发怀念郭子仪，也越发排斥李光弼了。

就是这种普遍的排斥情绪，差点激起了一场兵变。

当时，朔方军的左厢兵马使张用济驻守在河阳，李光弼传檄让他到洛阳晋见。张用济本来就对李光弼心存抵触，后来听说他到洛阳赴任时还玩了一下手段，顿时大发牢骚：“朔方军又不是叛军，李光弼居然乘夜而入，为何疑心到这种地步？”

现在，李光弼忽然召他晋见，张用济自然是满腹狐疑。

他怀疑，李光弼很可能听说了他那些牢骚怪话，所以就想拿他开刀，杀一儆百。

思虑及此，张用济决定抗命。他马上召集众将领，打算组织一支精锐部队突入洛阳，驱逐李光弼，迎回郭子仪。

张用济是火爆性子，说干就干。突击队很快就集结完毕，人人全副武装，刀剑出鞘。眼看一场兵变就要爆发，时任朔方都知兵马使的仆固怀恩阻止了张用济。他说："邺城兵败，郭公确实负有一定责任，所以朝廷才罢其兵权。今日你若是驱逐了李光弼，强行迎回郭公，就是抗拒朝廷，就是谋反！"

同时，另一个大将也力劝张用济："你发动兵变迎请郭公，朝廷必然怀疑是郭公在幕后指使，你这么干，等于是害他家破人亡！试问张君，郭公一家百口哪里对不住你了，你要置他们于死地？"

张用济闻言，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只好悻悻作罢。

这场兵变虽然没有爆发，但是张用济闹出这么大动静，李光弼当然不会不知道。

数日后，李光弼带着数千骑兵，以巡视防务为名离开洛阳，沿着黄河走到了汜水（今河南荥阳市西北），等着看张用济作何反应。张用济知道自己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只好硬着头皮前往行营叩见。李光弼二话不说，当即以违抗军令为由，命人将张用济推出辕门斩首。

张用济没有及时前往洛阳晋见，自然是违反了军令，但无论如何罪不至死，了不起也就是打几十军棍而已。现在，李光弼之所以如此小题大做，对张用济痛下杀手，目的就是要杀戮立威，以此震慑三军。

这就是李光弼的手段。

有道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意气用事的张用济很不幸地当了这根出头的椽子。

张用济前脚刚被推出辕门斩首，仆固怀恩后脚也进了李光弼的行营。作为朔方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当然也要来拜见这位新老大。

李光弼面无表情地请仆固怀恩入座。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李光弼的卫兵就一脸惊惶地入内禀报，说有五百个胡人骑兵直闯大营，现在已经到了大帐门口了。

李光弼顿然变色。

不用想也知道，这些人是仆固怀恩的手下。

仆固怀恩不动声色地瞥了李光弼一眼，赶紧起身来到门口，指着那些骑兵厉声斥责：“我一再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什么偏偏还来？”

李光弼明白了，这是仆固怀恩和他手下人设计好的一出戏，目的是对他进行武力威慑，以防他大开杀戒，把仆固怀恩变成第二个张用济。

李光弼面带笑容地拍了拍仆固怀恩的肩膀，说：“士卒跟随主将，这是人之常情嘛，何必怪罪他们呢！”说完即刻命人搬出酒肉，设宴款待仆固怀恩一行。

那五百胡骑大为意外，一时颇有些受宠若惊之感。

就这样，李光弼并没有花多大力气，也没有花多长时间，就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收揽了朔方将士的心。尽管还有不少人打心眼里不服他，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们不得不接受李光弼指挥和调遣，从此再也没人敢随便违抗他的军令。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经过六个月的养精蓄锐之后，史思明终于点燃了南征的战火。

史思明命少子史朝清镇守范阳，然后兵分四路：一路由将军令狐彰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出发，进攻滑州（今河南滑县）；他本人亲率一路出濮阳（今河南濮阳市），史朝义率一路出白皋（今河南滑县北），周挚率一路出胡良（今河南浚县东），分别渡过黄河，从三个方向围攻汴州（今河南开封）。

十几万范阳铁骑掀起漫天黄尘，在惊天动地的战鼓声中汹涌南下。

一切就跟四年前的那一幕如出一辙。

唯一的区别只是——当初的主角是安禄山，如今的主角是史思明。

此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南岸巡察防务，得到燕军大举南下的战报后，立即赶赴汴州，对驻守汴州的守将许叔冀说：“你只要坚守十五天，我一定发兵来救。”

这个许叔冀，就是当初龟缩在江淮拒不援救睢阳的那个家伙。别说坚持十五天，就算让他坚持三天恐怕都办不到。当然，许叔冀是不敢对李光弼这么说的。他当场猛拍胸脯，对李光弼赌咒发誓，说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与城池共存亡。

但是，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史思明大军一到，这个缩头乌龟很快就

败了，旋即毫不犹豫地举城而降。史思明马上任命许叔冀为中书令，命他仍旧镇守汴州，随即乘胜西进，兵锋直指郑州和洛阳。

李光弼意识到洛阳无险可守，便与东京留守韦陟商议说：“史思明乘胜而来，兵锋甚锐，我军利于坚守，不利于速战，洛阳易攻难守，韦公有何良策？”

韦陟听出来了，李光弼的意思是想暂时放弃东京，只是身为军队统帅，这种话不方便说，只能由他这个东京留守来说。尽管韦陟很不情愿放弃洛阳，可他也很清楚，从战略上来讲，李光弼的想法是正确的。

韦陟随后提议，大军撤出东京，分一部驻守陕郡，主力则退入潼关固守。

李光弼听完后淡淡一笑，摆摆手说：“暂时撤退肯定是必要的，但也不能退得太深。倘若无故弃守五百里地，敌人的气焰势必更加嚣张。而今之计，不如退守河阳，跟北方的泽潞战区遥相呼应，形势有利则主动进攻，形势不利则依险固守，让史思明不能向西前进半步。韦公啊，要论政治上的事情，我不如你；可在军事方面，你不如我啊。”

其实，李光弼这话未免太谦虚了。

他这个“撤离东京、退守河阳”的战略，恰恰是把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兼顾到了。我们都还记得，当初高仙芝和封常清之所以掉了脑袋，就是因为只单纯考虑军事，从洛阳一下子退到潼关，“无故弃守五百里”，丝毫没有顾及到这么做在政治上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假如李光弼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势必重蹈高、封二人的覆辙。

李光弼说完后，韦陟没有反驳，但另一个将领却提出了质疑：“洛阳是帝京，岂能如此轻易就放弃了？”

李光弼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他一眼，说：“若要守洛阳，则汜水、崿岭（今河南登封县南）、龙门（今河南洛阳市南）等要害之处皆应派重兵布防，你身为将军，你倒是说说看，依目前的形势该怎么守？”

那人眨巴了半天眼睛，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光弼随即发布军令，命韦陟带着东京的所有文武官员及其家眷，即刻西行入关；命河南尹李若幽负责疏散百姓，出城避难；最后，李光弼又命将士把城中所有的重要物资全部运往河阳。

李光弼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洛阳变成一座空城。

洛阳军民有条不紊地撤离时，李光弼亲率五百名骑兵殿后。当时，史思明的前锋已经逼近洛阳东门的石桥。将士们请示李光弼该走北门还是走石桥，李光弼神色自若地说：石桥。

当天夜里，李光弼命全军燃起火把，保持着威严整肃的军容，缓缓向河阳方向行进。燕军的前锋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不敢迫近。最后，燕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唐军渡过黄河，从容进入河阳。

这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史思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京洛阳。

然而，他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史思明也知道洛阳无险可守，便在白马寺附近扎营驻守，并在黄河南岸修筑了一座月城（半圆形的堡垒），与李光弼对峙。

冤家路窄。

这两个老对手又见面了。

史思明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一心想速战速决。

而李光弼则气定神闲，坚守不出，准备跟史思明打一场持久战。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说实话，对于李光弼这个老对手，史思明还是心存忌惮的。他打了大半辈子仗，佩服的人不多，畏惧的人更少，而让他又恨又怕的，也许就只有李光弼一个了。

不过，李光弼也不是没有弱点。

相对于擅长野战的史思明而言，李光弼更善于守城，野战方面并不占优势。在史思明看来，只要能把李光弼诱出城外决战，自己就有很大的把握取胜。所以，他并不急于攻城，而是派人天天到河阳城下骂阵。

当时，史思明麾下有个叫刘龙仙的将领。此人自恃骁勇，特别嚣张，

常常单人独骑在河阳城外叫骂，把李光弼的十八代祖宗挨个问候了一遍，而且骂人时还摆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姿势——把一条腿跷到了马脖子上，另外那条腿还一晃一晃的，一脸欠抽的表情。

刘龙仙的挑衅很快就把唐军将士给惹毛了，可李光弼却不愠不怒，对此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当然，李光弼不生气，不等于他对刘龙仙没有办法。

一连几天，李光弼只是冷冷地站在城头上欣赏刘龙仙的表演。直到身边将士都快忍不住了，李光弼才忽然开口，问左右说："谁能干掉这小子？"仆固怀恩马上请战。李光弼说："杀鸡焉用牛刀！这不是大将该干的事。"左右随即推荐了一个叫白孝德的偏将。片刻后，白孝德奉命前来，坚决要求出战。

李光弼问："你要多少人？"

白孝德答："在下一人足矣。"

李光弼很赞赏他的勇气，可还是坚持让他带兵出战。白孝德略为沉吟，说："那我就带五十个骑兵做后援吧。另外，请大军擂鼓呐喊，为我助威。"

李光弼拍拍他的后背，亲自送他出城。

白孝德手提长矛，策马从浅水处涉河而过。他刚走到一半，城楼上的仆固怀恩就对李光弼说："白孝德赢定了。"李光弼说："还没交手，你怎么知道？"仆固怀恩说："看他跨马揽辔时气定神闲的样子，就知道他已成竹在胸了。"

刘龙仙望见河阳城中慢条斯理地走出一骑，压根没放在眼里。等到白孝德靠近，刘龙仙正准备拍马迎战，却见白孝德向他摇手示意，好像不是要来过招的。刘龙仙满腹狐疑，只好停在原地。白孝德继续走，一直走到离刘龙仙大概十步远的地方，才勒住缰绳，开口跟刘龙仙说话。

刘龙仙耐着性子听了几句，还是没搞明白他想干什么，索性扯开嗓子接着骂。白孝德沉默良久，突然圆睁双目，厉声喝问："叛贼，你可识得我？"

"你是谁？"

“我，白孝德也。”

“嘿嘿，”刘龙仙冷笑，“白孝德是哪里来的猪狗？”

白孝德大喝一声，手中长矛飞动，身下坐骑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向刘龙仙。见白孝德动手，河阳城头上立刻响起震天战鼓，早已等在城门后的五十骑也紧跟着飞驰而出。刘龙仙大惊失色，想射箭也来不及了，只好掉转马头，企图绕过河堤逃跑。

可是，他已经逃不掉了。

白孝德距他只有十步远，拍马一跃就到了他的身后。刘龙仙只听见背后响起扑哧一声，然后下意识地低头一看，一杆长矛已经从他的胸口穿出……

片刻后，白孝德策马回到了河阳城下。他回来时还是跟出去时一样，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只是手上已经多出了一样东西——刘龙仙的首级。

河阳城上的唐军顿时欢声雷动。

而在南岸远远观望的燕军官兵则目瞪口呆，一脸惊骇。

他们亲眼目睹了刘龙仙被白孝德斩杀的全过程。仿佛就在电光石火之间，这个自恃悍勇的“骁将”便已身首异处了。

看来，刘龙仙充其量就是个“嚣将”，而不是骁将。

史思明的诱敌战术被挫败后，很快又想出了一招。

这一招叫心理战术。

燕军的战马大多膘肥体壮，史思明就命士兵从中挑出了一千多匹，让他们每天牵着这些战马到黄河南岸的沙洲洗澡，以此炫耀燕军铁骑的战斗力。

为了表示自己战马的数量很多，史思明就让士兵们每次只牵几百匹出去，然后一批一批轮流洗。如此从早到晚，循环往复，哪怕每匹马都洗上几十遍、洗脱了皮也在所不惜。此外，为了体现战马的壮硕，史思明还特意交代：一定要挑选公马。

看着对岸那些膘肥体壮的北地良马，河阳城上的唐军官兵都恨得牙痒

痒。可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燕军骑兵的优势的确远远胜过唐军。

可是，忽然有一天，史思明的士兵却哭丧着脸回来报告，说今天一大早，所有战马一跳进水里就争先恐后地游向对岸，然后撒着欢儿跑进了河阳城，一匹也没剩下。

史思明勃然大怒，惊问缘由。

士兵说，唐军把他们的马也牵出来洗澡了。

史思明百思不解。他们洗他们的，咱们洗咱们的，为什么咱们的马偏偏就要撒着欢儿跑进人家的城里？

士兵接下来的回答让史思明一下子恍然大悟。

士兵说：因为人家牵出来的是母马。

士兵还说：人家的母马还一个劲地叫唤。

史思明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此刻，李光弼正在河阳城里一边拍着那些北地良马的肥膘，一边笑得嘴歪。

唐军牵出去洗澡的那些母马之所以会拼命叫唤，是因为李光弼叮嘱士兵们，一定要挑那些刚刚下过马驹的母马。所以母马们出城后，其实是在呼唤自己的马驹，并不是在跟对岸的公马唱情歌。可那些公马偏偏会错了意，受不了声声呼唤的“诱惑”，因此才会急不可耐地涉水而来，主动“投奔”了唐军。

史思明聪明反被聪明误，顿时恼羞成怒，决定对河阳发起进攻。

不过，在对河阳发起强攻之前，史思明决定先出动水军，烧毁唐军铺设在黄河上的浮桥。

史思明之所以打浮桥的主意，跟河阳城的独特结构有关。

河阳不只有一座城，而是有三座：北城、中潬城、南城；北城位于北岸，中潬城位于黄河中间一块较大的沙洲上，南城位于南岸；三座城以浮桥相连，彼此呼应。历史上称之为“河阳三城”。

自河阳三城渡桥而南，可直逼东京洛阳；渡桥而北，可直趋上党、太

原；往东北方向，又可直趋邺城，进入燕、赵。河阳具有如此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城池结构，所以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有学者将河阳称为“中古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

因此，只要烧毁黄河上的浮桥，史思明就能切断河阳三城之间的联络，然后将唐军各部各个击破。

数日后，史思明出动了数百艘战船，从黄河上游顺流而下。在这些战船前面，是一整排燃烧着熊熊大火的“火船”。按照史思明的计划，这些火船一靠上浮桥，便可迅速将浮桥引燃，紧随其后的数百艘战船再一拥而上，就能把中潬城团团包围，从而让河阳三城的唐军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

不过，李光弼是不会让史思明得逞的。

他早就料到史思明会打浮桥的主意，所以事先命人准备了数百根长杆，每根的长度都超过百尺，末端固定在浮桥的巨木上，长杆尖端裹上了坚硬的铁叉。

当燕军火船靠近浮桥时，长杆尖端的铁叉立刻叉住火船，令其动弹不得。片刻间，燕军火船立马“玩火自焚”，全都烧成了灰烬。后面的战船一到，照旧被铁叉死死叉住。而唐军早就在浮桥上设置了投石车，一块块巨石砸向燕军战船，要么把燕军士卒砸成肉酱，要么将战船砸出一个个大洞。最后，燕军战船大部被击沉，剩下的几艘慌忙掉头，灰溜溜地逃了回去。

史思明一连出了三招，可每一招都被李光弼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这就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这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史思明还有没有第四招？

有。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史思明又出了第四招——断唐军粮道。

当时，河阳的粮草和补给都是从关中运来的，史思明为了截断唐军粮道，出兵扼守了河阳西面的河清（今河南济源市南黄河渡口）。李光弼得到情报，立刻率部进驻野水渡（今河南孟津县北黄河渡口），在北岸安营扎寨，与南岸的燕军遥遥相望、针锋相对。

一听说李光弼亲自出马，史思明忍不住发出了一阵狂笑。

李光弼啊李光弼，没想到你这只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他当即召来麾下猛将李日越，说：“李光弼擅长守城，短于野战，而今突然出现在野外，要活捉他有如探囊取物。你率五百名精锐骑兵，连夜渡过黄河，给我把他抓住，抓不到就别回来见我。”

然而史思明并不知道，就在他自以为得计的时候，李光弼已经布置停当，悄悄返回了河阳。

就在离开野水渡前，李光弼特意交代守将雍希颢：“敌军的李日越、高庭晖都是力敌万人的勇将，史思明必定派他们其中一人前来劫我。我现在就走，你们在此设下埋伏。敌军一来，你们无须与之交战；敌将投降后，就带他一道来见我。”

雍希颢闻言，不禁暗笑。

不用跟敌人交战，敌将就会自动投降？李大人啊，您是不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了，天下哪有你说的这等便宜事？

然而，雍希颢做梦也不会想到——天下居然就有这种便宜事！

次日凌晨，当李日越带着五百骑兵偷偷摸到唐军营寨前的时候，四周突然响起一片喊叫声和口哨声。李日越知道，中埋伏了。他想起史思明的命令，无奈地向唐军喊话：“司空（李光弼的中央官职）在不在？”

雍希颢笑着说：“昨晚就走了。”

李日越问：“营里有多少人？”

雍希颢答：“一千人。”

李日越又问：“将领是谁？”

雍希颢报上自己的名字。李日越沉吟良久，对部下说：“今天活捉不到李光弼，就算抓到雍希颢回去，我们也死定了，不如归顺。”

看着李日越和他的五百部众放下武器走进唐营的时候，雍希颢不得不承认——一切都被李光弼料中了。

李日越投诚后，李光弼马上将其引为心腹。很快，高庭晖也率部来降。事后有人问李光弼：“为何那么容易就收服了史思明的两员大

将？”李光弼说：“人之常情。史思明一直深憾他没有机会跟我野战，听说我在野外，料想定能将我俘虏，所以对部将下了死令，而李日越抓不到我，势必不敢回去，只有投诚一路；至于高庭晖，他的勇气和才干都在李日越之上，听说李日越深受我的信任，自然不愿落于其后，所以只能跟着归降。”

由于李光弼的保荐，降唐后的李日越连跳数级，被朝廷封为右金吾大将军。高庭晖也受封为右武卫大将军，官秩是正三品，而他在史思明帐下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五台府果毅，官秩是正六品。

鏖战河阳

史思明连连受挫，偷鸡不成反蚀了好几把米，其愤怒可想而知。

十月中旬，史思明终于下令对河阳发起强攻。

他的首攻目标是河阳南城。

当时，南城的唐军守将是郑陈节度使李抱玉。李光弼问他：“将军能不能为我坚守南城两天？”

李抱玉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两天后怎么办？”

李光弼说：“两天后救兵不到，任你弃城。”

李抱玉当即允诺。原本他还以为李光弼一定会给他下死守的命令，没想到居然只要求守两天。李抱玉顿时如释重负——两天一晃就过了，这任务太容易了！

然而，直到燕军开始攻城，李抱玉才意识到这两天有多么漫长。因为燕军在此前频频受挫，自上而下都憋了一肚子闷气，如今一开打，郁积多日的怒火发泄出来，其战斗力远远超出李抱玉的意料，完全可以用“可怕”两个字来形容。

燕军像疯了一样，攻势一波接着一波，完全不给唐军丝毫喘息的机会。从这天清晨到黄昏，燕军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尽管李抱玉一直率众奋力死战，可坚持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唐军的防线还是被撕开了好几个缺口，燕军从缺口处纷纷涌入……

李抱玉万万没想到——原来坚守两天的任务是如此艰巨！

因为他连一天也没守住。

眼看城陷在即，摆在李抱玉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战死，要么投降。

情急之下，李抱玉近乎绝望的脑中忽然灵光一闪，发现自己还有第三种选择。

他随即派人去向燕军请降，说：“我军粮草已尽，请允许我们明晨出降。”

史思明闻言大喜，当即下令停止进攻。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唐军既没有竖起降旗，也没有打开城门。史思明在城外等了老半天，才意识到自己被李抱玉忽悠了。

是的，就利用这一个晚上的时间，李抱玉已经在城防的几个缺口处重新修筑了防御工事。安心休息了一夜的唐军官兵也已精神抖擞地进入阵地，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严阵以待。

史思明咬牙切齿地下达了再度进攻的命令。

可这一天，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燕军经过昨日疯狂的进攻之后，士气已有所衰竭；而唐军官兵都相信只要再坚守一天，援军必到，所以人人斗志昂扬。

观察到燕军士气已经大不如昨时，李抱玉决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他一边率众抵挡燕军的进攻，一边大胆地派出一支精锐骑兵，悄悄绕到了燕军的背后。当这支奇兵对燕军发起突袭的同时，城中守军也随之杀出，迅速对燕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史思明万万没料到，昨天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唐军居然还敢主动出击。他暴跳如雷，匆忙组织反击。可在唐军的前后夹攻之下，燕军的建制一下子被打散了，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最后被唐军打得大败，只好纷纷溃逃。

史思明拿不下南城，只好命宰相周挚率部转攻中潬城。

此城由李光弼亲自驻守。中潬名义上叫城，事实上并没有像普通城池那么高的城墙。它四周仅有高度及人肩的矮墙，称为“羊马城”。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潬城不能算城池，充其量只是一座营寨。

仅靠低矮的羊马城，肯定是阻挡不了敌人的进攻的。作为辅助的防御手段，中潬城外四面皆围有一重栅栏，栅栏外还环绕着一条深、广各二丈的壕沟。可即便有壕沟、栅栏和矮墙的三重防守，中潬城在河阳三城中的防御力仍然是最薄弱的（这也就是李光弼亲自驻守中潬的原因）。所以，要想守住中潬城，就必须立足于战，而不能仅仅依靠消极防守。

十月十二日，燕军开始进攻中潬。

李光弼命部将荔非元礼率精锐士卒在羊马城布防，自己则登上中潬城的东北角，在一处瞭望台上纵观整个战场，用一面小红旗进行指挥。

燕军凭借人多势众，同时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每个方向各有八支纵队，每支纵队前面由士卒铲土填沟。一填平，后面载有攻城器械的车辆就紧跟上来，士卒继而砍伐栅栏，开出一条进军通道。

眼看着燕军从三个方向迅速逼近，而荔非元礼却还按兵不动，瞭望台上的李光弼急了，连忙派人去质问他："你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填平壕沟、砍开栅栏，为什么动也不动？"

荔非元礼回话："大人是想守，还是想战？"

李光弼说："当然想战。"

荔非元礼说："既然想战，敌人耗费体力替我们填沟开栅，何必阻拦？"

李光弼闻言，忍不住笑了，看来自己也有轻率急躁的时候。荔非元礼显然是想以逸待劳，然后趁燕军疲惫之际发动进攻。他命人给荔非元礼回话，说："很好，我倒没想到这一层，你伺机而动吧。"

片刻后，各路燕军已相继砍开栅栏，从缺口处源源不断地涌入。荔非元礼抓住战机，率领敢死队迅速出击，一下子把燕军逼退了数百步远。然而，随着后续部队的到来，燕军很快稳住了阵脚，力战不退。荔非元礼不知道后面赶来的燕军到底有多少战斗力，于是也不恋战，马上率众后撤，准备等摸清情况后再行出击。

一见荔非元礼退兵，瞭望台上的李光弼顿时又惊又怒。

中潬城的三重防御工事已经被燕军破坏了两重，剩下的那道羊马城几乎只是一道摆设，根本无法有效阻挡燕军的进攻。如果荔非元礼退回城中，那中潬城必定陷落。

李光弼情急之下，立刻遣传令官去召荔非元礼，准备将他军法从事，然后再换人上去打。

荔非元礼听到传令官召他，没好气地说："战况正急，召我干什么？"说完就不理睬传令官了，自行率众退回了栅栏内，然后密切关注燕军的下一步动作。

燕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是被荔非元礼刚才那一番突击，士气已经折损了大半。所以唐军撤回栅栏后，燕军也不敢进攻，而是停留在栅栏外犹疑观望。

见此情景，荔非元礼心里就有数了。

他重新集合了麾下的所有精锐部众，却不急于出击，而是继续耐心等待。

栅栏外的燕军既不敢攻，也不敢退，胶着在那里，不久就出现了烦躁不安的阵阵骚动。荔非元礼立刻下令擂动战鼓，全军出击。这一次，燕军终于没能挡住唐军凌厉的攻势，被杀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逃。

望着潮水般退去的燕军，李光弼脸上露出了欣慰的、也略带惭愧的笑容。

毋庸讳言，李光弼在这一仗中接连犯了两次错误，要不是荔非元礼两度抗命，这一仗的结果就很难设想了。由此可见，两军对弈，拼的绝不仅仅是两个主帅的智谋和战略，而是上自主帅，下至每一个将领，甚至每一个士兵在临敌时的机智、胆识和战斗力。不论是荔非元礼组织的中潬城之战，还是李抱玉负责的南城守卫战，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中潬城战败后，燕军重新调整部署，由史思明亲率一部继续进攻南城，由周挚率一部转攻北城。

李光弼得到情报，迅速率众进入北城。他登城观察了一下燕军阵势，然后胸有成竹地对部将说："敌军虽多，但军容不整，不足畏也！我向诸君保证，过不了中午，定能将其击败。"

随后，李光弼命诸将同时出战，但是一直打到这一天中午，双方却依旧难分胜负。李光弼召回众将，问道："这一上午打下来，诸位觉得敌军阵营哪里最强？"

有人答："西北角。"

李光弼即命部将郝廷玉攻西北角。郝廷玉请求拨给他精骑五百，李光弼给了他三百。接着李光弼又问哪里是次强的，有人答东南角，李光弼命部将论惟贞出战。论惟贞要求拨给精骑三百，李光弼给了他两百。

最后，李光弼对众将说："诸位听从我的令旗指挥，若旗帜摇动缓慢，你们自行判断攻击方向；若旗帜快速摇动，并三次朝下指向地面，则万众齐进，不惜一切代价攻入敌阵。若有退者，定斩不赦！"

下完命令，李光弼从卫兵手中拿过一把短刀，插在靴中，大声说："战争就意味着死亡，我身为国之三公（司空），不可死于敌手，万一战事不利，诸君死于敌阵，我必自刎于此，不令诸君独死而我独活！"

众将随即出战，各率所部冲向燕军军阵，双方很快就绞杀在一起。片刻后，郝廷玉突然脱离战场，跑回城下。李光弼大惊失色，对左右说："廷玉一退，情势就危险了。"说完即命传令官去取郝廷玉首级。郝廷玉大喊："我的马中箭了，不是后退！"传令官回禀，李光弼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赶紧命他换了坐骑，返身再战。

稍后，又有两名将领在燕军的进逼下逐步往后退却。

他们是仆固怀恩和仆固玚父子。李光弼又命传令官去取他们首级。仆固怀恩父子望见城中驰出一骑，提刀直奔他们而来，赶紧率部重新杀入敌阵。

就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当口，河阳城头的令旗开始急剧摇动，并三触于地。唐军各部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全力攻击燕军。燕军抵挡不住，全线崩溃，被斩首一千余级，掉进黄河溺死者一千余人，另有五百多人被俘；燕军大将徐璜玉、李秦受被生擒，周挚仅率数骑仓皇逃窜，燕将安太清也带着残部逃回怀州（今河南沁阳市）。

周挚大败后，史思明不知战况，仍在进攻南城。直到唐军把五百多个燕军俘虏押到南城的城头上，他才知道周挚已败，不得不解围而去。

无论史思明是否愿意承认，李光弼始终是他的天敌。

河阳之战，彻底粉碎了史思明速战速战、西进潼关的企图。随后的日子，史思明一直被李光弼牢牢牵制在中原战场上，根本无暇西进，更不用说要攻取长安了。

一种巨大的挫折感在史思明的全身上下弥漫……

此时的史思明当然不会知道，没过多久，李光弼就将败在他的手中。而且败得很惨。

江淮之乱：不再安宁的后院

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大片山河都遭到了叛军铁蹄的蹂躏，战火燃遍大河南北，狼烟笼罩东西两京，唯独帝国的财赋重镇——江淮地区，幸运地躲过了战祸的荼毒，始终保持着相对安宁。无论是当初永王李璘的短暂叛乱，还是燕军一次次向江淮进兵，最终都没能打破这片“帝国后院”的安宁。

然而，到了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江淮地区的安宁还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打破了。

叛乱者名叫刘展，时任淮西节度副使兼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刺史。严格说来，刘展是被逼反的。

因为他一无谋反动机，二无叛乱形迹，之所以走上这条不归路，其实是因为无处不在的官场斗争。

刘展有一个同僚兼好友，名叫李铣，时任御史中丞兼淮西节度副使，两个人都是淮西节度使的副手。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刘展和李铣是不能走得太近的，否则必会引起顶头上司的猜忌。可问题是，刘、李二人的性格都不是那种小心谨慎、温和内敛型的，而是锋芒毕露、我行我素的，所以根本不管这一套。这两人不但成了私交甚笃的铁哥们，而且还是配合默契的政治拍档。他们从不把顶头上司放在眼里，甚至经常联手把上司架空。历任淮西节度使都对这两个桀骜不驯、狂妄自大的家伙深恶痛绝，可又拿他们没办法。后来，有一个狠角儿来到了淮西节度使的任上，于是好戏就开场了。

这个狠角儿叫王仲升。他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更不会像前几任节度使那样心慈手软。上任不久，王仲升就以“贪暴不法”的罪名将李铣逮捕，旋即奏请朝廷，毫不留情地砍掉了李铣的脑袋。

除掉李铣后，王仲升又迅速把矛头转向了刘展。

当时，民间盛传一首谣谶，其中一句是“手执金刀起东方”。王仲升就将谣言附会到刘展身上，然后授意监军宦官邢延恩入朝奏报，称刘展

一贯犯上抗命，且“刘”姓应验谣谶，应尽早将其铲除，以绝后患。

邢延恩回京后，极力向肃宗进言，说：“刘展和李铣是一伙的，如今李铣既除，刘展惧不自安，若不趁势除掉，恐怕会生变乱。但是刘展手握重兵，必须用计除之。奴才斗胆建言，不妨擢升刘展为江淮都统，让他接替原都统李峘，等他交出兵权，前往广陵赴任时，再于途中将其逮捕。”

肃宗依计而行，下诏任命刘展为江淮都统（即一人兼任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同时下了一道密诏，命原江南西、浙西节度使李峘，原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联手除掉刘展。

邢延恩自以为这个调虎离山的计划万无一失，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自作聪明最后竟引发了一场席卷江淮的叛乱！

当邢延恩带着皇帝诏书来到宋州时，刘展马上嗅出了危险的气息。他对邢延恩说：“我自从投身军旅，短短几年间就官至刺史，可以说是骤然大贵了。江淮是帝国的财赋重镇，都统之职更是举足轻重，我既没有什么功勋，又不是皇室宗亲，突然得到皇上这么大的恩典，实在是受宠若惊，更觉得有些匪夷所思。莫非……”刘展顿了顿，然后直视着邢延恩的眼睛，说，“莫非有奸佞小人从中挑拨离间，给刘某设下了圈套？”

说完这番话，刘展忽然作出一副委屈之状，紧跟着眼泪就簌簌地掉了下来。

看来这小子已经起疑心了。邢延恩心里掠过一阵忧惧，可他还是强作镇定，说：“刘公素有才望，皇上深为看重，正是考虑到江淮的重要性，才破格提拔您。可您反倒起了疑心，这是为何？”

刘展收起眼泪，又直直地盯着邢延恩看了片刻，说：“如果这不是一场骗局，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拿到印信符节？”

邢延恩没想到刘展会来这么一手，可他的反应也很快，马上说：“当然可以。”

为了消除刘展的疑心，邢延恩只好赶赴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把情况告诉了李峘，然后将印信符节拿过来交给了刘展。

邢延恩以为这么做一定可以稳住刘展，可他错了。

刘展不是笨蛋。事实上，从邢延恩向刘展宣读任命诏书的那一刻起，

他的计策就已经被刘展识破了，而且就在同一刻，刘展已经下定了反叛的决心——既然皇帝都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了，他又何惜跟朝廷拼个鱼死网破呢？

刘展之所以没有当场跟邢延恩撕破脸面，目的就是想将计就计，把江淮都统的印信符节搞到手，以便调动兵马，号令州县，增加他反叛的筹码。

说白了，自作聪明的邢延恩还没来得及把刘展装进套里，自己就先被对方装进去了。

刘展拿到他想要的东西后，装模作样地给肃宗上了一道谢恩表，然后马上以江淮三道节度使的身份，给遍布江淮的亲信故旧分别颁发了任命状，委以要职，倚为心腹。与此同时，江淮三道的官员也纷纷派出使者，带上本州县的簿册图籍来到宋州，向这位新上司表示祝贺，并恭迎他走马上任。

刘展笑了。

上元元年十一月初，刘展拉上麾下的七千人马，在那些州县使者的簇拥下，浩浩荡荡、风风光光地向广陵进发。

“江淮之乱”就此拉开序幕。

直到此时，邢延恩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他慌忙抢在刘展之前赶到了广陵，与李峘、邓景山一起调兵遣将，准备御敌，同时移檄州县，宣布刘展起兵造反的消息。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同一刻，刘展也向各州县发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牒文，唯一不同的就是——造反者变成了李峘。

各州县长官顿时傻了眼。

老上司和新上司各自宣称对方造反，这到底要听谁的？

随后，李峘和邓景山仓促集结兵马，分别进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和徐城（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摆出严阵以待的架势。然而对刘展来讲，这两个人根本不足为虑。因为刘展治军严整，在江淮一带素有威名，否则他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小兵干到刺史，所以他的军队还没到，整个江淮地区早已陷入一片恐慌了。

刘展进抵徐城后，马上派人质问邓景山：“我奉命前来上任，你这些

兵是干什么的？”同时又派人到城下喊话：“你们都是我的属地之民，不要阻挡我的军队！”

此刻，邢延恩也在邓景山的军营里。他完全可以想象，刘展在命人传这些话时，脸上是怎样一副讥嘲和得意的表情。

是的，刘展就是在玩他们。其实他要击败李峘和邓景山简直易如反掌，可他之所以还要“先礼后兵”，无非就是想跟他们玩一玩猫吃耗子的游戏。

随后，刘展命部将孙待封、张法雷开始攻城。

不出所料，邓景山根本不是刘展的对手。两军刚一交战，官军就自行崩溃，邓景山和邢延恩仓皇弃城，逃奔寿州（今安徽寿县）。刘展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广陵，随后又派部将王晅等人分兵攻取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北）、楚州（今江苏淮安市）、淮西（淮河上游）等地。

李峘惊闻广陵失陷，赶紧移兵至润州北面的北固山，进逼广陵。刘展立即出兵白沙，在瓜洲（扬州市南的长江中小岛）一带大布疑兵，白天擂战鼓，晚上燃火把，一连数日，做出要袭击北固山的样子。李峘赶紧集结全部精锐部队，准备迎敌。可就在这个时候，刘展已亲率主力绕到上游，突然渡江袭取下蜀（今江苏句容市北），一下子截断了李峘的后路。官军顿时闻风丧胆，还没等到刘展来攻，当下便哗然四散。李峘惊惶无措，只好带着几百个亲兵逃奔宣城（今安徽宣州市）。

十一月初八，刘展乘势进据润州。

同日，升州（今江苏南京市）官军一万五千人忽然哗变，起兵响应刘展。当地节度使弃城而逃，把守城御敌之责交给了兵马使。可他前脚刚刚出城，兵马使后脚就投降了刘展。

十二月，刘展派将领傅子昂进攻李峘栖身的宣州，当地节度使照样不战而逃，李峘有如丧家之犬，慌忙又逃奔洪州（今江西南昌市）。

在随后的日子里，原本安宁富庶的江淮地区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叛军兵锋所向，官军望风而逃，苏州、湖州、常州等地相继陷落。紧接着，叛军在两个方向上节节挺进：南路，傅子昂进据南陵（今安徽南陵县），准备南下进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进而夺取江南西道（今江西省）；北路，王晅等人接连攻陷濠州、楚州、舒州

（今安徽潜山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庐州（今安徽合肥市）等地。

短短两个月间，叛军横扫江淮，如入无人之境……

在刘展叛军横行江淮的过程中，唐军官兵上上下下都恍如惊弓之鸟，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有力的抵抗。尤其是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封疆大吏，风闻叛军一到，都在第一时间撒丫子逃跑，使得原本便已低迷的士气更加涣散，同时也极大地助长了叛军的嚣张气焰。

由此足以见出，虽然安史之乱的烽火已经在大唐的土地上燃烧了五年之久，可侥幸未被波及的江淮地区却仍然沉浸在脆弱而虚幻的盛世余绪中，所以这些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才会如此贪生怕死，而他们麾下的官兵也才会如此不堪一击。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并不是安禄山、史思明，更不是这个小小的刘展，而是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虚骄、怠惰、贪图享乐、安而忘危的风气和心态。

在整个江淮地区的高级官员纷纷放弃职守、争相逃命的时候，唯一不抛弃、不放弃的人，也许就只有李峘的副手李藏用了。

早在李峘准备逃离润州之时，李藏用就对他说："大人身居高位，食朝廷重禄，临难而逃，是不忠；掌数十州之兵马钱粮，凭三江、五湖之天堑险要，竟然一矢不发就全盘放弃，是不勇。不忠不勇之人，又何以为国尽职？李某虽不才，却愿集合残兵在此坚守，抵御叛军。"

毫无疑问，李峘并没有被李藏用的这番痛切之言打动，他甚至很庆幸有人留下来替他擦屁股，所以赶紧把所有善后事宜全都丢给了李藏用，然后迫不及待地向南跑了。

李藏用集合了前线退下来的残兵，满打满算才七百余人。随后，李藏用又前往苏州招募了两千余人，继而在郁墅（今苏州西北）与叛军张景超部会战，结果战败，只好退守杭州。

邓景山和邢延恩败逃寿州后，一边遣使飞报朝廷，请求援兵，一边派人前往任城（今山东济宁市），向驻守此地的平卢兵马使田神功求救，并郑重许诺：克复淮南之日，金帛、美女任由田神功处置。

一听说有金帛和美女，田神功和他的部众们顿时两眼放光。数日后，肃宗的诏书也送抵任城，命田神功出兵江淮，征讨刘展。田神功随即倾巢南下，于十二月末进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得知田神功挥师南下的消息，刘展不禁感到了一丝恐惧。

因为田神功跟李峘、邓景山这些酒囊饭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此人原在安禄山麾下，素称骁勇，安禄山起兵时他不愿反叛，率众归朝，数年间一直在河北抵抗叛军。后来，田神功奉命驻守陈留，因寡不敌众败于史思明，被迫投降。史思明随即命他与南德信等人攻掠江淮，田神功趁机袭杀南德信，再度率部反正。

总之，此人驰骋沙场多年，性情诡谲多变，军事经验极为丰富，其麾下部众也都是百战之兵，绝对是个让人头疼的对手。

刘展不敢大意，立刻亲率八千部众北上，并遴选两千精锐将士为前锋，渡过淮河，在都梁山（今江苏盱眙县南）迎击田神功。但是，就像刘展自己预料的那样，平卢兵的战斗力确实远在他的宋州兵之上。两军交战后，刘展的前锋很快就被击败。刘展为了保存实力，赶紧率众退至天长（今安徽天长市），命五百名精骑在一座桥上殿后。田神功紧追而至，全歼刘展的殿后部队，继而大败刘展主力。刘展全军覆没，仅带一骑渡过长江，仓皇南逃。

田神功随即克复广陵、楚州。

然而，令江淮士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刘展叛军入城时，城头上只不过变换了一杆大王旗，百姓的生活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可当田神功的官军进城后，城中的商人和百姓却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资治通鉴》卷二二一）所谓“商胡”，就是胡商，亦即在此经商的胡人。没有人知道田神功为什么要杀死数以千计的胡商。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胡人，而田神功恨他们，所以就屠杀胡人泄愤。至于城中的土地为何会被“穿掘略遍”，也许是因为田神功和他的人把看得见的财富洗劫以后，还不满足，怀疑商人和百姓把更多的财富藏在了地底下，所以才掘地三尺，把广陵和楚州翻了个底朝天。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刘展部将张景超、孙待封数度进逼杭州，却因李藏用的顽强抵拒而始终未能得逞。

正月下旬，田神功兵分四路，大举反攻刘展：命部将杨惠元攻击淮南的王晅；命部将范知新从白沙出发，攻击下蜀；邓景山率部从海陵（今江苏泰州市）渡江，进攻常州；田神功和邢延恩进驻瓜洲，准备渡江南下，直取刘展。

刘展集结步骑一万余人，在蒜山（镇江市西）列阵。二十六日，田神功率众开始渡江，不料当天江面上大风骤起，五艘运兵船被风吹到了金山（镇江市北长江中小岛），刚好暴露在刘展的眼皮底下。刘展立刻发起进攻，把其中两艘船上的士卒全部砍杀，并凿沉了另外三艘船。田神功无法渡江，只好撤回瓜洲。

就在刘展暗自庆幸“天助我也”的时候，范知新已经从白沙渡江，进抵下蜀，忽然截断了刘展的后路，其手法就跟当初刘展对付李峘的时候一模一样。

刘展慌忙回师迎击范知新，但激战多时，始终不能取胜。他的弟弟刘殷劝他东逃入海，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可最后的时刻，刘展却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他说：“若明知大事不成，何必多杀人家的父子？无非一死而已，早晚都是一样的。”

随后，刘展继续率众力战。混战中，刘展被唐将贾隐林一箭射中眼睛，立刻栽落马下。贾隐林冲上去一刀砍下了他的首级。叛军群龙无首，顿时溃散，刘殷等人全部战死。

随后，唐军杨惠元部在淮南击败叛将王晅，王晅带着残部逃到常熟，感觉没有希望，遂投降唐军。叛将张景超原已集结了七千余人，准备再度进攻杭州，听说刘展已死，便把部队交给了部将张法雷，然后只身逃往海上，从此失踪。张法雷随即率众攻击杭州，被李藏用击败，只好投降。与此同时，叛将孙待封也投降了李藏用。

至此，刘展之乱宣告平定。

但是，江淮的祸乱却远远没有终结。

据说平定刘展之乱后，田神功的平卢军又在江淮“大掠十余日”，捞了个钵满盆满。史称“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其实，这样的“荼毒”才只是刚刚开始。

自刘展之乱后，江淮地区就再也不是那个安宁和富庶的帝国后院了。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尽管它始终是帝国的财赋重镇，但无情的战火将“一视同仁”地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换言之，当后来的整个中晚唐历史都充斥着流血、杀戮和死亡的时候，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成为“幸运的例外”。

又一幕弑父篡位的闹剧

史思明被李光弼耗住了。

这一耗整整耗了一年零四个月。

从乾元二年（公元759）十月到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史思明使出浑身解数，企图战胜李光弼或至少摆脱他的牵制，但最终被证明只是一场徒劳。

早在河阳战败不久，亦即乾元二年末，史思明就曾派遣大将李归仁率五千铁骑悄悄西行，准备出其不意袭取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进而威胁潼关。可当李归仁行至礓子阪（三门峡市南）时，却遭到驻守陕州的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的迎头痛击。后来，卫伯玉与神策军兵马使李忠臣密切配合，牢牢扼守在永宁（今河南洛宁县北）与莎栅（洛宁县西）之间，屡屡击败李归仁，使其不得向西前进半步。

上元元年二月，李光弼亲自率部袭取怀州，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截断燕军的北归之路，让史思明既不能进也不能退，把他死死困在无险可守的洛阳。史思明当然不能让怀州落在李光弼手里，于是立刻驰援，却在沁水遭到李光弼伏击，被斩首三千余级。

三月，李光弼又破怀州守将安太清于城下；四月，史思明与李光弼战于河阳西面，再败，被斩首一千五百余级；六月，史思明遣将东进，企图进军江淮，却在郑州被田神功击败。

同年冬，李光弼再度发兵进攻怀州，历时一百余日，终于将其攻克，生擒安太清。

怀州的陷落无疑让史思明的处境雪上加霜。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扭转战局，燕军军心必然会产生极大动摇。而想要在短时间内扭转战局，唯一的办法就是迫使李光弼到黄河南岸决战。然而，恰恰是这一点让史思明无计可施。

因为李光弼的战略就是要把他耗死，又怎么可能主动与之决战呢？

除非出现奇迹……

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期待的奇迹终于出现了。

因为有个人在客观上帮了他一个大忙。

这个人就是唐肃宗的心腹宦官鱼朝恩。

他此时的职务是陕州观军容使。这位天子跟前的红人很不欣赏李光弼的打法。他认为燕军都是北方人，长期在外征战，必定思乡，此时趁其军心涣散大举反攻，绝对可以取胜。他把这意思反复跟肃宗强调，肃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诏命李光弼进攻洛阳。可李光弼却按兵不动，上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

作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也是帝国军队事实上的一把手，李光弼的意见肯定是举足轻重的，肃宗不能不慎重对待。接到李光弼的奏报后，肃宗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另一个军方的重量级人物却站在了鱼朝恩一边，坚决主张进攻。

他就是仆固怀恩。

众所周知，在唐朝的各道军队中，朔方军一直是帝国最重要的平叛主力，而作为朔方军的最高将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这三个人也无疑是平叛战场上的三根顶梁柱。

仆固怀恩是铁勒九部中的仆固族人，其先祖于贞观末年归降唐朝，历代世袭金微都督之职。天宝中期，仆固怀恩升任左领军大将军，其后调入朔方军，历事王忠嗣、安思顺、郭子仪。史称他“为人雄毅寡言”“达诸蕃情，有统御材”，因而深受郭子仪器重。

安史之乱爆发后，仆固怀恩追随郭子仪转战南北，“常为先锋”，“勇冠三军”，为肃宗朝廷顺利收复两京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仆固怀恩也有很明显的毛病，那就是居功自傲，“刚决犯上”。他麾下那些“蕃汉劲卒”也跟他一样，仗着军功，视朝廷纲纪如同无物，“多为不法”，却长期受到仆固怀恩的包庇和纵容。郭子仪生性宽厚，且“素重怀恩”，所以对仆固怀恩及其部众一贯宽容，对他们的很多不法行为总是睁一眼闭一眼，“每事优容之”。

然而，当郭子仪因邺城之败失势，李光弼继任朔方节度使后，仆固怀恩等人的舒服日子就到头了。因为李光弼的治军风格与郭子仪截然相反，素以“持法严肃”“法不贷下”著称，所以仆固怀恩和他手下那帮骄兵悍将只好收敛心性，夹起尾巴做人。

仆固怀恩是个非常自负而且很有野心的人，他当然无法长期忍受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

要想摆脱这样的压抑和苦闷，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李光弼取而代之！

事实上，自从李光弼升任朔方军和帝国军队的一把手后，身为二号人物的仆固怀恩就已经对头把交椅生出觊觎之心了。

既然你李光弼可以取代郭子仪，那我仆固怀恩凭什么就不能取代你李光弼呢？

在仆固怀恩看来，自己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在鱼朝恩的影响下，肃宗已经对一意固守、拒不出战的李光弼很有些不满了，这个时候，只要仆固怀恩坚持主动进攻的意见，就能够有效地压制李光弼，在天子面前争功邀宠。所以，仆固怀恩当然要义无反顾地站在鱼朝恩这边。

二比一，主战派占了上风，肃宗随即下定反攻的决心。

二月下旬，肃宗不断派遣使者前往河阳，命令李光弼出兵。其情形就跟当初玄宗一再逼迫哥舒翰出战一模一样。

面对天子一再催战的诏书，李光弼无可奈何，只好命大将李抱玉驻守河阳，然后与仆固怀恩、鱼朝恩及卫伯玉一同出兵，进攻洛阳。

上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史思明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

这一天将成为史思明的幸运日，也将是他彻底洗刷耻辱的日子。

当唐军进抵洛阳城外的邙山下时，史思明已在此严阵以待。李光弼选择了一个险要的地形列阵，而踌躇满志的仆固怀恩则率兵列阵于一马平川的平原之上。李光弼赶紧告诫他说："依恃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列阵平原，一旦失利则全军覆没。史思明擅长野战，绝不可轻视！"随即一再下令仆固怀恩移兵于险要处，可仆固怀恩却置若罔闻。

就在唐军刚刚列阵、立足未稳之际，史思明便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进攻的号令。

郁积在史思明胸中一年零四个月的怒火，此刻终于化作一声振聋发聩的号令，响彻在燕军官兵的耳边。

顷刻之间，燕军骑兵就像潮水一样漫过了平原。

在这种适合骑兵冲锋的地形作战，唐军实在不是燕军的对手。面对呼啸而来的燕军，仆固怀恩的阵势最先被冲垮，部众纷纷溃逃。其他各路唐军见状，士气大为削弱。尽管李光弼一直据守险要，奋力死战，可还是抵挡不住燕军的凌厉攻势，很快也被打垮。

李光弼的中军帅旗一倒，各路唐军更是不战自溃，在同一时间全部掉头而逃。

这一战，唐军被斩首数千级，丢弃的军资器械更是不计其数。李光弼和仆固怀恩渡过黄河，一路逃至闻喜（今山西闻喜县）；鱼朝恩与卫伯玉逃回陕州；驻守河阳的李抱玉弃城而走。河阳、怀州相继陷落。

李光弼在河阳坚守一年多所取得的战略优势，就这样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邙山大捷之后，史思明乘胜西进，命史朝义为前锋，从北路进攻陕州，他本人则率大军从南路向西挺进。

三月初九，史朝义进至礓子岭（今三门峡市南），被埋伏在此的卫伯玉打了个措手不及。

史朝义发动了好几次反击，却都被卫伯玉一一击退。

眼看前锋屡屡受挫，不能越陕州半步，史思明的南路大军也不敢冒进，只好退驻永宁（今河南洛宁县北）。他恨铁不成钢地对左右说：“小子怯懦，终究不能帮我成就大事！”并扬言要依照军法，将史朝义及其手下将领全部斩首。

一般情况下，老子说要杀儿子都不过是一时气话，基本上是当不得真的。可对史朝义来说，他老子史思明的话却足以令他不寒而栗。

因为他知道那不是气话。

一直以来，史思明对史朝义这个长子从来没什么好脸色，而唯独宠爱少子史朝清。史朝义也搞不懂自己为何不受父亲待见。他只能小心翼翼做人、竭尽全力做事，除此之外，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史思明称帝后，史朝义发现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为不堪。因为父亲摆明了就是想把皇位传给史朝清，而他这个长子充其量就是一个马前卒，是替父亲和弟弟打天下的工具。暂且不说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随时有可能死于非命，就算历经千难万险夺了李唐江山，史朝义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甚至避免不了兔死狗烹的命运。

很多时候，史朝义觉得自己的处境跟当初的安庆绪可谓如出一辙。可人家安庆绪最终毕竟迈出了那一步，从而转祸为福，一举登上了燕朝天子的宝座。如今，史朝义敢像安庆绪那么做吗？

一想到这里，史朝义的心里不由自主地掠过一阵战栗，周身的毛孔都沁出了一层冷汗。

其实，史朝义如果真要动手的话，胜算还是很大的。

因为他父亲很不得人心。

史思明生性多疑，残忍嗜杀，左右之人稍有违逆的，轻则掉脑袋，重则被族诛，时时活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惧之中。所以，史思明麾下很多将领表面上敬畏他，实则早已跟他离心离德。相反，这些将领却都对史朝义抱有好感。因为史朝义为人谦恭谨慎，性情温良，并且非常体恤士卒。对这些燕军将领来说，如果能让这位少主取代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皇帝，他们以后的日子无疑要好过许多。

正因为此，所以当史思明屡屡向左右流露出废长立幼的想法时，许多将领便私下把这些信息透露给了史朝义，其用意当然是怂恿他先下手为强。

可是，史朝义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杀人谋反，而是弑父篡位！这种事无论搁在谁头上，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决断的……

礓子岭战败后，史朝义发现父亲看他的眼神越发阴冷，甚至透出了一股杀机，他内心的恐惧和挣扎自然更加强烈，而先下手为强的念头更是一遍遍地在他的脑海里起伏翻涌。

三月十三日，史朝义接到了父亲的一个命令，让他在军营附近修筑一座“三隅城”（依山而建的三面墙的城堡），用以储存军粮。这本来是个很正常的任务，可问题在于：史思明给的施工期限只有一天。

这就显得很不正常了。

史思明是什么意思？他难道仅仅是由于军情紧迫才给了这么短的期限吗？还是别有用心？

史朝义不敢去想那么多，他只能率部下拼命赶工，终于在黄昏时分筑完了墙体。可后面还有一道涂泥的工序。就在这个时候，史思明来视

察了。他看见工程尚未竣工，立刻指着史朝义的鼻子破口大骂，然后命左右侍从盯在那儿监督史朝义干活。史朝义领着手下继续埋头苦干，终于抢在夜幕降临之前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史思明阴沉着脸前来验收，骑马绕墙走了一圈，最后停在史朝义面前，忽然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等攻下陕州，终究要斩了你这个贼东西！"

史朝义差一点瘫软在地。

这一刻，史朝义心中那个可怕的念头再度翻涌而起，令他全身战栗不已。

当天夜里，史思明宿于鹿桥驿（今河南洛宁县境内），命一个姓曹的心腹将领担任警卫。

史朝义的军营与鹿桥驿近在咫尺，如果要动手，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

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问题。

正当史朝义被这个问题搞得坐卧难安之际，部将骆悦和蔡文景敲开了他的房门。骆悦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等与大王已经命在旦夕了！自古以来，废黜旧主、拥立新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万万不可优柔寡断，请大王立刻召见曹将军，共谋大事！"

史朝义低着头一言不发。

骆悦与蔡文景对视一眼，接着说："大王若不许，我等今天就投奔李唐，只恐大王到头来也不能保全。"

许久，史朝义抬起头来，骆悦和蔡文景看见他的脸上布满泪痕。

此刻的眼泪当然不乏作秀的成分，但不可否认，里面也包含了深深的痛苦和无奈。

最后，史朝义轻轻地说了一句："诸君好好干吧，不要惊动了父皇。"

史朝义一旦点头，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骆悦立刻派人将曹将军召来，把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然后面无表情地问他打算怎么办。

事已至此，曹将军还能怎么办？

他知道史思明不得人心，也很清楚什么叫作众怒难犯。如果不答应，

他马上就会血溅当场，成为史思明并不光彩的陪葬品。

因此，曹将军只犹豫了短短的一瞬就点头同意了。

随后，骆悦等人簇拥着曹将军，率领史朝义帐下亲兵三百人，全副武装直扑鹿桥驿。警卫人员一看这么多人杀气腾腾而来，情知不妙，可定睛细看，一马当先的居然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曹将军，于是纷纷让路，没人敢出手阻拦。

骆悦等人顺利进入驿站后，径直冲进了史思明的寝室。

然而里面却空无一人。

骆悦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四处搜寻。由于夜里太黑看不真切，骆悦等人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砍，一连砍翻数人。其他几个侍从吓得死死趴在地上，举着双手大喊：皇上在茅房。

骆悦连忙带人冲向驿站后院，只见史思明已经跃上一匹马，正准备从后门逃离。骆悦等人立刻放箭，其中一箭正中史思明手臂。史思明跌落马下，众人一拥而上，把他严严实实地捆了起来。

史思明一脸沮丧，问：“乱者为谁？”

骆悦冷冷地说：“奉怀王（史朝义）命。”

史思明一下全明白了。他仰天长叹：“我白天说错了话，活该如此下场。可何不等我攻下长安再动手呢？现在杀我，未免太早，大业恐怕没有希望了。”

骆悦可不想去关心史思明的什么大业，他现在最庆幸的是自己和怀王终于可以免于一死了。是日深夜，骆悦将史思明囚禁在柳泉驿（今河南宜阳县西柳泉镇），然后回营向史朝义作了禀报。

他的禀报其实只有三个字：事成矣！

当时，燕朝宰相周挚正率后军驻守福昌（今宜阳县西福昌镇），听到怀王兵变、皇帝被擒的消息后，吓得跌坐在地上，久久回不过神来。次日，史朝义拔营返回洛阳，经过福昌时，周挚硬着头皮出营迎接。骆悦暗中劝史朝义，说周挚是史思明的头号心腹，若不除之，恐为后患。史朝义随即逮捕周挚，将其斩杀。大军进抵柳泉驿后，骆悦等人深恐军心有变，遂派人缢杀了史思明。

回到洛阳当天，史朝义就在骆悦等人的拥立下迫不及待地登基即位了。同日，史朝义派遣张通儒等人回到范阳，诛杀了史朝清，还有他的母亲辛氏及其一干党羽。

史朝义的斩草除根之举很快就在幽州城里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不久，各派势力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火并，张通儒被杀，动乱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月，死亡人数达到数千人。史朝义随即任命心腹将领李怀仙为范阳尹兼燕京留守，而后才渐渐控制了局势。

虽然史朝义篡了燕朝皇位，但驻守各地的节度使基本上都不买他的账。因为他们大多是安禄山的旧部，连史思明都不见得能收服他们，更不用说这个年纪轻轻的史朝义了。

换句话说，从史思明被杀的这一天起，所谓的燕朝就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躯壳了。各方大将虽然在表面上隶属于燕朝，可事实上没有一个遵奉史朝义的号令，都在各打各的小算盘。在这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情况下，自己究竟能走多远，能把局面玩多大，史朝义实在是有些茫然……

就在这一幕似曾相识的弑父篡位的闹剧中，燕朝又完成了一次非正常的权力更迭。

没有人会料到，史思明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竟然会与安禄山如出一辙。

曾几何时，安禄山和史思明义无反顾地造了李唐王朝的反，可到头来，他们的儿子也毫不留情地造了他们的反。如果用佛教的话来说，这就叫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而报应的方式如此之相似，并且来得如此之迅速，实在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自乾元二年四月称帝，至上元二年三月被杀，史思明的帝王生涯总计不过一年十一个月。而此前的安禄山比他还不如，只当了一年皇帝就命丧黄泉。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他们看上去就像两朵转瞬即逝的浪花。

可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浪花，而是深不可测的旋涡。因为大唐王朝的巨舫一从他们身边驶过，就开始发生剧烈的颠簸和摇晃，并从此进入了一个半世纪的迷航……

安禄山和史思明虽然先后死于非命，但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

毋宁说，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

虽然安禄山和史思明已经命丧黄泉，但是无数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却将在他们的身后蓬勃成长；虽然安史之乱很快就将彻底终结，但是许许多多拥兵割地的跋扈藩镇，却将联手开启唐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大裂变时代！

第三章 太上皇李隆基、肃宗李亨驾崩

李隆基的最后岁月

太上皇李隆基自从回到长安的兴庆宫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始终沉浸在对杨贵妃的哀悼和思念中，无边的凄惶和寂寥就像冬天的大雾一样深深笼罩着这个多情而不幸的老人。然而，逝者已矣，再坚贞的情感，再绵长的哀思，也唤不回那个幽冥永隔的爱人。当昔日的绝世红颜早已变成马嵬驿黄土下那具日渐腐烂的尸骸，当缠绵悱恻的回忆之光只能徒然灼痛形影相吊的孤单灵魂，李隆基只能告诉自己——该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

时间是治疗一切心灵伤痛的良药。随着时光的流逝，李隆基心上的那个伤口自然愈合并且渐渐结痂了。后来，他再也不愿去碰触它。这个经历了种种人间至恸的男人尽管七十多岁了，可他的生命力依然旺健，对生活依然充满了不息的热情。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李隆基有意无意地封存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然后让自己的感官重新朝着现实世界敞开，朝着醇酒飘香、笙歌悠扬的宫廷生活敞开……

宫廷的快乐具有一种魔力，只要你愿意享受它，它就会给你想要的一切，同时让你忘掉不想要的一切。

一时间，生命的指针仿佛又拨回到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宝岁月。

回到长安这几年，依旧有那么多熟悉的人陪伴在李隆基身边：内侍监高力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女儿玉真公主、宫女如仙媛、内侍王承恩，还有那些能歌善舞的梨园弟子。他们把纷纷扰扰的天下阻挡在兴庆宫的宫墙之外，共同为太上皇营造了一个自在、安逸、温馨、祥和的晚年。不管从前那个太平盛世已经在兵燹战火中变得如何面目全非，至少在这里，在这座兴庆宫，李隆基和他身边的人仍然可以拥有一方自娱自乐、自给自足的小乐园。这里虽然不是什么远离尘嚣的世

外桃源，但也不失为一座与世无争的人间净土。

兴庆宫是李隆基的龙兴之地，由他当年的藩王府邸扩建而成，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烙印着李隆基的所有生命过往，见证着这个一代雄主一生经历的辉煌与沧桑。所以李隆基深情地爱着它，无比执著地依恋着它，就像婴儿依恋母亲的乳房，就像草木依恋春天的阳光。对李隆基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和兴庆宫相提并论，也没有任何地方比兴庆宫更适合安置他的生命、滋养他的灵魂……

如果说李隆基是一棵树，那么兴庆宫就是他的根。

李隆基喜爱兴庆宫的原因，除了这个地方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之外，还包括它那独特的地理位置。兴庆宫地处皇城之外，坐落于长安外郭城的市井坊间，最南面的长庆楼更可以直接俯瞰熙熙攘攘的街市人群。这样的地理位置让李隆基能够近距离地感受生鲜活泼的市井气息，让他和长安的士绅百姓有了最直接简便的互动和交流，从而使他获得了一种真真切切的存在感。

李隆基无比珍视这种感觉。

因为，最让一个老人感到恐惧的事情并不是衰老，而是被人遗忘。

尤其是对于一个曾经富有四海的盛世帝王来说，担心被人遗忘的恐惧绝对要比任何人都更加强烈。

所幸，毗邻市井的兴庆宫足以使李隆基避免这种恐惧。

无论何时，只要李隆基的身影出现在长庆楼上，从楼下经过的长安父老就会主动停下脚步，对他顶礼膜拜，口中高呼万岁。每当这种时候，李隆基就会开心得像一个受到表扬的孩子，脸上立马开出一朵花来。然后他就会忙不迭地吩咐宫人，在长庆楼下当街摆设宴席，用精美的宫廷酒食招待那些父老。

如果有朝廷官员从长庆楼下经过，并向太上皇行礼致意，那他们的待遇就更好了。太上皇会请他们上楼，设宴款待，席间往往还有玉真公主和如仙媛等人作陪。被太上皇请吃饭的官员不少，比如羽林大将军郭英乂，还有剑南道入京奏事的官员等等。

与各色人等的交往让李隆基感到了充实，来自方方面面的见闻和信息也让足不出户的太上皇增加了对外界的了解。总之，李隆基对自己的退休生涯总体上还是满意的。虽然丧失了爱情，但他学会了封存记

忆，并努力寻找新的生活乐趣；虽然丧失了天子大权，但他学会了调整心态，并按照新的方式生活。

所以，李隆基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被逼退位的太上皇一样，整天活在失落、苦闷和抑郁之中，而是非常明智地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上自得其乐，安度晚年。

日升月落，寒来暑往。转眼间，李隆基回到长安已经两年多了。他本以为日子可以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下去，可他万万没想到，这种自在平静的生活竟然会在上元元年七月戛然而止。

因为有个人闯进了他的生活，并且强行把他赶出了兴庆宫。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动太上皇？

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居然能对太上皇实施“暴力逼迁”？

这个人就是当权宦官李辅国。

众所周知，李辅国是拥立肃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肃宗即位后，为了报答李辅国，就授予了他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要职。这个职位是战时编制，涵盖多种职能，所以李辅国的权力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举凡肃宗向文武百官发布的诏命，以及全国各地呈递给朝廷的文件奏章，全部要经过李辅国的中转。此外，朝廷和军队中最重要的印章、符节等物，也都由李辅国掌管，甚至连军中的早晚号令，一律要由李辅国制订发布。

回到长安后，虽然朝廷的各项事务逐步走向了规范化，但是李辅国的权力却并没有因此变小，反而越来越大，并且借由规范化而固定了下来。肃宗不但让他“专掌禁兵”，而且所有诏书敕命，必须经过他签名盖章后才能施行；宰相和百官在朝会时间外所上的章奏，以及肃宗下达的各种批示和诏命，都要经过李辅国的“关白、承旨”，也就是中转。

这是多大的权力？

这相当于是让他代行天子之权了！

李辅国每天都坐在他位于银台门的官署内，堂而皇之地裁决天下之事。事无大小，全凭李辅国的一句话。李辅国说的话就是圣旨，就是诏命，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各级官府都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事后才向肃宗奏报。

为了巩固权力，李辅国还设置了一个秘密机构，豢养了数十名鹰犬，专门到民间探查文武百官和士绅百姓的各种隐私，一旦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立刻将当事人逮捕下狱，命有关部门立案审查。这个机构的职能，差不多就相当于明代的东厂和锦衣卫，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可见中国的特务机构自古有之，可谓源远流长。

在李辅国无所不在的淫威之下，朝廷所有部门都对他唯命是从，不管他发出什么指示，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有时候，御史台或大理寺在审查重犯，案子尚未了结，李辅国随便写张纸条就把人犯提到了他的银台门官署，并且任意释放，背后当然没少拿黄白之物。久而久之，三司（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和府、县各级衙门都学会了看李辅国的眼色行事，不管手上接到什么案子，都主动把卷宗直接送到了李辅国府上。如果是李辅国感兴趣的，要轻判还是重判都凭他说了算。当然，李辅国声称一切都是出自天子的诏命，所以没有人敢稍加违逆。

面对权势熏天的李辅国，朝野上下争相献媚拍马，他的同僚们（宦官）都亲切地称他为“五郎”，而宰相李揆出身于中原的世家大族，在他面前也执子弟之礼，毕恭毕敬地称他为“五父”。堂堂宰相尚且对他敬畏如此，普通官员就更不必说了。

看到这里，我们难免会发生一个疑问：肃宗李亨是死人还是阿斗，怎么会任凭一个宦官为所欲为呢？其实，李亨既不是死人，也不是阿斗，他之所以给了李辅国那么大的权力，目的就是要通过他更有力地掌控文武百官，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我们都知道，身为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李亨的权力合法性先天不足，这始终是他最大的隐痛和隐忧。即使到了收复两京之后，李亨仍然担心自己的权力不稳，所以他需要一个足够信任的人来掌握宫禁大权，同时采用各种方式制约文武百官（比如设立特务机构）。而李辅国作为李亨的东宫旧僚，又有拥立之功，并且本身又是宦官，当然是执行上述任务的最佳人选。

在肃宗李亨看来，这种人不管如何专权，说到底都只是奴才，绝对不可能篡位当皇帝，所以最让人放心。

当然，如果李辅国的权力过度膨胀，肃宗也是不会放任自流的。

他会借别人的手来敲打李辅国。

乾元二年四月，刚刚升任宰相的李岘看不惯李辅国的专权乱政，就搜集了他贪赃枉法的一些证据，然后向肃宗告状，要求严惩。肃宗其时

也已意识到李辅国玩得有些过火了，于是顺势罢废了那个秘密机构，并下了一道诏书，说："近来军国事务繁忙，所以有时候就直接以口头方式传达朕意，但是从今往后，这种现象必须杜绝。除非由中书省正式发布的诏命，否则一律不得执行。宫廷内外各种事务的处决权，全部交还各有关部门。最近，一部分禁军军官和一些部门主事官员因事产生争执，甚至发生诉讼案件，今后都要通过御史台、京兆府等正规部门进行裁决，任何个人一律不得干预。如果裁决结果有任何不公平的地方，可直接向朕奏报。"

毫无疑问，这是一道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诏书。傻子都看得出来，里头说的事情无一不是冲着李辅国去的。

李辅国马上作出反应。他以退为进，扬言要辞去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当时叛乱仍未平定，所以还保留着"元帅府"这种战时机构）。李辅国很清楚，现阶段肃宗根本离不了他，所以"辞职"就是最好的要挟手段。

果不其然，李辅国一提出辞职，肃宗就忙不迭地好言劝慰，说什么也不批准。

肃宗知道，如果不对李辅国作出某种补偿，他对自己的忠诚度势必会大大降低。为了安抚李辅国，让他继续发挥制衡百官的作用，肃宗只好作出了一个不太厚道的决定——牺牲李岘。

不久，肃宗就利用一起普通的案件，给李岘栽了一个"交结朋党"的罪名，罢黜了他的宰相之职，把他贬为蜀州刺史。

这就是肃宗李亨的帝王术。

利用李岘敲打李辅国，防止他权力膨胀，达到目的后再回头拿掉李岘，从而安抚李辅国。用今天通俗的话讲，这叫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用古人的话说，这就叫恩威并施。

李岘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李辅国的权力，但他在朝中的地位并没有受到丝毫动摇。尤其是李岘被罢相贬谪后，满朝文武更是对李辅国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因为李岘的下场告诉人们——跟李辅国作对，就是拿鸡蛋跟石头碰，何苦呢？然而，不管李辅国如何权倾朝野，还是有几个人从来不拿正眼瞧他。

那就是太上皇身边的高力士、陈玄礼等人。

李辅国出身微贱，早年是高力士手下养马的飞龙小儿，加上他又长得

歪瓜劣枣、奇丑无比，所以一直混得很失败，直到五十多岁才进入东宫侍奉太子。虽然李辅国现在已经是权倾朝野、今非昔比了，可在高力士眼里，他终究只是个暴发户，是个得志便猖狂的小人。要让高力士去捧他的臭脚，拍他的马屁，那是门都没有！

更何况，在高力士看来，就算你李辅国现在真的很牛逼，可你的主子是李亨，我的主子是太上皇，我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干吗要巴结你啊？

也许，高力士的看法是对的，李辅国确实是个小人，可高力士却忘了一句古训——宁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

正因为李辅国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你才更要捧他的臭脚，拍他的马屁。否则，他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失乐园：“逼迁上皇”事件

上元元年夏天，怀恨已久的李辅国终于发飙。

他对肃宗说：“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每天都和外人交往。尤其是高力士、陈玄礼这些人，日夜聚众密谋，恐怕会对陛下不利。如今的六军（禁军）将士都是当年的灵武功臣，对此忧惧不安，担心会有变乱。臣一再安抚他们，作了很多解释，可没什么作用。看来事态已经很严重了，臣不敢不据实禀报。”

李辅国说了一大堆，无非就是想暗示一点——太上皇想复辟。

肃宗闻言，脸上露出惊讶之色，眼中泪光闪动，说：“这怎么可能？上皇慈悲仁爱，怎么会做这种事？”

李辅国说：“上皇固然没有这个意思，可他身边那些贪图富贵的小人就难说了。陛下，您贵为天下之主，凡事应从社稷大计出发，把祸乱消灭于萌芽状态，岂能遵循匹夫之孝！再者说，兴庆宫与市井坊间杂处，墙垣浅露，不宜让上皇居住。依臣所见，不如奉迎上皇回太极宫，大内森严，怎么说都比兴庆宫更合适，而且还能杜绝小人的蛊惑。倘若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每天觐见三次）之乐，岂不是两全其美！”

肃宗没有回答。

当天的对话就此结束。但是李辅国知道，肃宗不说话就意味着不反对，不反对就等于是默许。为了进一步试探肃宗的态度，李辅国随后又做了一件投石问路的事情。

由于玄宗一贯喜爱骑马射猎，尽管晚年几乎足不出户，可还是在兴庆宫里面养了三百匹马。李辅国便以皇帝敕令的名义，一下子取走了二百九十匹，只给玄宗留下了十匹。

事后，玄宗望着空空荡荡的马厩，不胜感伤地对高力士说："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李辅国抢走太上皇的马后，静静地等了几天。

他在观察肃宗的反应。

可是，肃宗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反应。这当然是李辅国意料之中的、也是他最想要的结果。数日后，李辅国又率六军将士进入内殿，一起向肃宗"号哭叩头"，强烈要求迎请太上皇入住太极宫。肃宗的态度跟此前一样，涕泣呜咽，却一句话也不说。

李辅国笑了。

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上元元年七月十九日，李辅国再次矫诏，以肃宗的名义邀请太上皇到西内（太极宫称"西内"，兴庆宫称"南内"）游玩。玄宗没有多想，带着高力士和几个侍从离开了兴庆宫。

此时的玄宗当然不会料到，今生今世，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兴庆宫了。

玄宗一行走到睿武门时，在此埋伏多时的李辅国突然带着五百名骑兵冲了出来，一个个刀剑出鞘，将玄宗等人团团围住。

李辅国策马走到玄宗面前，神色倨傲地说了一句："皇帝以兴庆宫潮湿逼仄，迎上皇迁居大内。"

自从马嵬驿之变后，玄宗很久没见过这种阵势了，现在又突然听到这句话，顿时一阵眩晕，差点从马上掉下来。高力士见状，立刻挺身挡在玄宗面前，厉声喝道："李辅国何得无礼！"并勒令李辅国下马。

李辅国不得已，只好慢条斯理地翻身下马。高力士狠狠地瞪了他一

眼，然后转向士卒们，大声喊道：“上皇命我问诸位将士安好！”

那五百名骑兵愣了短短的一瞬，又看了看李辅国，见他默不作声，只好刀剑入鞘，然后全部下马，向玄宗行叩拜礼，齐声高呼万岁。

最后，高力士又喝令李辅国跟他一起为太上皇牵马，李辅国也硬着头皮听从了。

尽管忠勇可嘉的高力士在关键时刻帮玄宗保住了最后的尊严，可他也无力改变玄宗的命运，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高力士心里很清楚，从这一刻起，他和太上皇都已经变成李辅国砧板上的鱼肉了！

当天，李辅国把玄宗带到甘露殿，留下数十个老弱充当侍卫，严禁任何人出入，而且不准高力士、陈玄礼及所有宫中旧人留在玄宗左右。做完这一切，李辅国才得意洋洋地领兵离去。

稍后，李辅国又率领禁卫六军的所有高级将领，全部换上素服，前去向肃宗“请罪”。

话说是“请罪”，事实上一半是复命，一半是逼宫。李辅国此举等于是在告诉肃宗——皇上，我已经帮你把生米做成熟饭了，不管你现在心里怎么想，反正你要当着所有禁军大将的面表个态，好让大伙安心。

此时此刻，肃宗的心情肯定是颇为复杂的。作为皇帝，他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庆幸；可作为儿子，他又有一种良心上的不安与自责。

原因很简单，自从李辅国第一次跟他提到太上皇经常与外人来往的情况时，肃宗就已经产生了莫大的疑惧。就像李辅国所暗示的那样，他觉得太上皇不是没有复辟的可能。据李辅国声称，和太上皇来往的官员中，既有京城的羽林将军，又有剑南道的官员，甚至连长安的普通百姓也经常受到太上皇的款待。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难道不意味着——太上皇正在积极组织力量，同时大力收买人心，为复辟做准备吗？

尤其让李亨深感不安的是，安禄山父子虽已败亡，但数十万官军在邺城大败，令朝廷元气大伤，史思明紧接着又僭位称尊，并大举南下，再次从官军手中夺下东京，使得一度明朗的战局再度进入胶着状态。未来战局究竟如何演变，谁也无法预料。在此情况下，倘若太上皇凭借他的余威振臂一呼，谁敢保证不会应者云集呢？

所以，当李辅国提议将太上皇迁入西内时，李亨心里其实是非常赞同的，但他不能明说，只好采取默认的态度。

然而，太上皇毕竟已经七十六岁高龄，若说一个人在如此风烛残年的时候还一心想要夺回天子大权，似乎又有些牵强；而且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表面上虽说是请他迁居，实则与软禁无异，身为人子，李亨难免会有些良心不安。

因此，对于“逼迁上皇”这件事，肃宗内心其实是很矛盾的。而李辅国也正是因为看穿了肃宗的矛盾心态，才会以这种带有威胁意味的方式，迫使他当众表态。

事已至此，肃宗也不能再骑墙了。他对着诸将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南内和西内，其实没什么分别。朕知道，诸位爱卿这么做，是担心上皇受小人蛊惑，正所谓防微杜渐，以安社稷！朕有你们这样的臣子，也就无所惧了。”

玄宗被软禁后，高力士等人就只能任凭李辅国宰割了。

七月二十八日，李辅国以肃宗名义下诏，将高力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洪江市西北），王承恩流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并勒令陈玄礼致仕，将宫女如仙媛放逐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命玉真公主出宫回玉真观。

时任刑部尚书的颜真卿看不惯李辅国的所作所为，遂联合百官，上表向太上皇问安。当然，此举马上被李辅国视为挑衅。他随即奏请肃宗，将颜真卿逐出了朝廷，贬为蓬州（今四川仪陇县南）长史。

初秋的长安，落叶开始片片飘零。

太上皇李隆基从甘露殿的窗口望出去，看见头上的这方天空始终是黑灰色的，像是被谁罩上了一块肮脏的抹布。

从离开兴庆宫的那一天起，李隆基似乎就再也没见过太阳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反正李隆基觉得自己忽然掉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似乎完全陌生的世界。每当夜半无眠的时候，李隆基就会轻轻呼唤高力士，想让他陪自己说会儿话，就像从前那样。可是，每次走到床前的人都不是高力士，而是两个面目陌生的年轻宫女。

那是李亨给他派来的，人还不少，足足有一百多个，只可惜李隆基不认识她们。

一个都不认识。

奇怪的是，高力士去哪了？

他到底去哪了？

李隆基想了好久，直到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他才慢慢想起来——高力士走了。

高力士走了，据说是去了巫州。李隆基不记得巫州在哪里，总之一听名字就知道挺远的。从长安到巫州一趟，少说也要两三个月吧？李隆基曾经跟身边的宫女打听这事儿，可她们都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好像这是天大的机密。

好吧，机密就机密吧，不说就不说吧，反正自己知道也没用。难不成要跟儿子李亨打报告，说想去一趟巫州？

呵呵，别做梦了。李隆基苦笑着对自己说，就连这甘露殿的门都出不去了，就连近在咫尺的兴庆宫也回不去了，还奢谈什么巫州！

一想起兴庆宫，李隆基就会感到身体里面的某个地方被撕裂了。刚开始他还会觉得疼痛，可后来就没感觉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感觉的话，那就是碎了，沉了，空了。

有时候，李隆基会莫名其妙地想起民间小孩儿常玩的那种纸鸢。世人经常说快乐和幸福，可到底什么是快乐和幸福，没几个人说得清楚。李隆基想，当小孩儿把纸鸢放到天上去的时候，那一刻应该就是快乐和幸福的吧？

可纸鸢也有断掉的时候。

当纸鸢和小孩儿越离越远，最后谁也看不到谁的时候，小孩儿心里会不会也是碎了，沉了，空了？

兴庆宫就是我的纸鸢吗？

那片醇酒飘香、笙歌悠扬的乐园，就是我的纸鸢吗？

一个丢失了小小纸鸢的孩子，跟一个丢失了小小乐园的太上皇，区别有多大？

李隆基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百个甘露殿也不及一个兴庆宫，他只知道一百个宫女也不及一个高力士。

对了，李亨不止给他派了一百多个宫女，他把万安公主和咸宜公主（李隆基的女儿）也派来了，让她们伺候自己的生活起居。可是，公主和公主是不一样的，女儿和女儿也是不一样的。当初在兴庆宫的时候，玉真就算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陪自己坐着，李隆基也会有一种闲逸和心安的感觉。可如今，万安和咸宜好像生怕沉默会带来尴尬，所以一天到晚不停地对着他说话，搞到最后大家都很累。

万安和咸宜并不知道，有些东西是靠静默传达的，而有些东西就是被很多话一点一滴冲淡掉的。

要知道甜的感觉，尝一滴蜜就够了，不需要一缸蜜；可要是把一滴蜜掺进一缸水里，你还会觉得甜吗？

可惜万安和咸宜不懂。

不懂的人也包括她们的兄长李亨。

他把四方贡献、山珍海味一堆一堆地搬进了甘露殿，说是要孝敬父皇，可李隆基什么也吃不下。他常常看着那些人间珍馐独自发笑。当了五十年的太平天子，李隆基头一回领悟到，有时候美味佳肴并不是让人吃的食物，而是让人看的装饰品。

是的，它们就是装饰品。它们被李亨一堆一堆地搬进来，然后堆成了一个大大的“孝”字。这个字难道不是让人看的吗？

李亨送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李隆基的食量却一天比一天小。后来，李隆基断了荤腥，专门茹素。

再后来，李隆基就什么东西也不吃了。

不要误会，这个七十六岁的老人并不是闹什么绝食抗议。通常一个人闹绝食，肯定有什么非达到不可的目的，可对于风烛残年、心如死灰的李隆基来讲，余生中还能有什么非达到不可的目的呢？

没有了。

李隆基告诉身边的人，也告诉李亨，自己素来崇信道教，所以现在决定修炼“辟谷”，以求长生不老。

李亨当然知道辟谷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式，可他分明发现——父亲是在以辟谷的名义绝食！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从太上皇宣布辟谷的那天开始，他的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了，各种疾病纷至沓来，迅速吞噬着他衰老的身体。

父亲为什么要绝食？

答案很简单——他不是在求长生，而是在求速死！

父亲为什么要速死？

李亨很自然地想起了一句老话：哀莫大于心死。

父亲的心死了吗？

李亨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问题。他只能在“逼迁上皇”事件发生后，想方设法去满足父亲的一切需求。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一切”事实上只能是外在的物质需求，无法包括心灵需求。是的，李隆基最渴望得到的快乐、幸福、尊严、自由，李亨通通无法给予。

因为，这些东西恰恰是李亨夺走的。

所以，与其说李亨是在向父亲尽孝，还不如说他是在补偿。而尽孝和补偿是大不相同的。尽孝是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补偿只是我想给你什么才给你什么，二者绝不可画上等号。换句话说，尽孝的目的是为了让老人开心，可补偿的目的却是为了让自己安心，这能一样吗？

太上皇刚刚迁入甘露殿的时候，李亨当然也时常去问安，因为所谓的“晨昏定省”就是古人规定的孝道的主要内容之一。老人家因绝食而患病后，李亨就去得更勤了。不过没过多久，李亨自己也病倒了，并且病情还很不让人乐观。他只好派遣宦官代他去向上皇问安。

从此，李亨缠绵病榻的时间要比上朝理政的时间多得多。

在卧病的日子里，李亨想了很多事情。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强迫太上皇离开兴庆宫这件事。李亨越想愧疚越深，同时也生出了些许悔悟。

他觉得，罪魁祸首就是该死的宦官李辅国！

要不是这阉宦一再撺掇并且最后把生米做成了熟饭，自己也不一定下得了这个决心。

像李辅国这种人实在该杀，留着终究是个祸害！

然而，李亨对李辅国的杀机却只能停留在意淫阶段，始终无法付诸行动。

不是他不想动，而是他不敢动。

原因很简单，禁军都掌握在李辅国手里，李亨怎么动？虽说李辅国的兵权也是李亨给的，但是想收回来却没那么容易。因为经过这些年的经营，禁军几乎已经成了李辅国的私人武装。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禁军将士早就被李辅国通过各种手段收拾得服服帖帖。毫不夸张地说，如今他们敬畏宦官李辅国已经远甚于敬畏天子李亨！

一想起逼迁上皇那天，李辅国悍然带着六军将领一身素服前来逼宫的情景，李亨无论何时都会觉得四肢发冷、全身打战。

什么叫太阿倒持？

就在那一刻，李亨深刻体验了这句成语所包含的意味。

李亨一直以为李辅国只是自己手里的一把刀，可事到如今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握着的竟然是刀刃，而刀柄却赫然握在李辅国的手里。

是的，刀柄握在李辅国的手里。

刀柄握在李辅国的手里……

李辅国的欲望

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答：太平洋底的马里亚纳海沟。

错！

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欲壑”，就是内在于人心的那个欲望之洞。

因为欲壑难填。马里亚纳海沟再深，太平洋的水都能把它填满；可人心深处的欲壑，却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

比如李辅国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个这样的黑洞。

成功把太上皇赶出兴庆宫后，李辅国恍然有了一种天下无敌之感。他觉得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成、得不到的。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李辅国忽然觉得自己手中的兵权太小了。和整个帝国的军队比起来，京城的禁军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实在不够劲，要管就要管整个帝国的军队，那才叫爽。

于是，李辅国就跟肃宗说他想当兵部尚书。

肃宗李亨眉头微皱，用一种相当严肃的表情思考了半天，最后就只说了一个字：好。

李辅国去兵部上任那天，肃宗专门替他操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就职典礼：让太常寺演奏雅乐，让御膳房摆设宴席，还让宰相率领文武百官一起向李辅国道贺，随后又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到了兵部大堂。

肃宗原以为这样就能填满李辅国的欲壑，可他错了。李辅国八月初七刚刚到兵部上班，结果还没过十五就向肃宗提出了新的要求。肃宗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

李辅国说他要当宰相。

肃宗真想对他说：人不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当然，这话只能在心里说说而已。事实上肃宗对李辅国说的是："以爱卿的功劳，什么官不能当呢！朕只是担心你在朝中的威望不够啊！"

情急之下，李亨只能把皮球踢给大臣们。

李辅国闻言，就向左仆射裴冕等人放出风声，让他们推荐自己。李亨私底下赶紧向宰相萧华求援："李辅国要当宰相，假如公卿们推荐他，朕就不得不让他当了。"萧华就去质问裴冕。好在裴冕是根硬骨头，一听就说："根本没这回事！要让我卸一条胳膊给他可以，要推举他当宰相——门都没有！"

萧华回禀后，李亨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随后，李亨就在李辅国面前作出一副既无奈又遗憾之状：你瞧，李爱卿，不是朕不用你，而是大臣们不推荐你，朕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啊！

当不上宰相，李辅国自然是怒火中烧，不过他并没有让怒火烧坏脑子。他知道，自己终究是个出身卑贱的宦官，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去统领文武百官，就等于是向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和制度挑战，其难度当然不是一般的大。

李辅国想来想去，决定知难而退。

不，准确地说，李辅国是想以退为进。他固然决定放弃宰相的虚名，但这并不等于他不再渴望宰相的权力。

事实上，此时李辅国想要得到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越了宰相。

是的，李辅国真正想要攫取的，其实是天子大权。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三月，朝廷的京兆尹一职出缺，李辅国马上推荐自己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兼任。肃宗和宰相们对此当然不敢有二话。可是，就在任命书即将下达之前，元载却突然找到李辅国，坚持要辞去这项任命。

李辅国盯着元载的脸看了很久，最后总算看明白了——这小子不是不喜欢乌纱，而是嫌这顶乌纱太小。

京兆尹太小，那他想要什么？

不用说，当然是想当宰相了。

李辅国在心里嘿嘿一笑。也行，你们不是不让老子当宰相吗，没关系，老子就派手下人去当好了。

随后，李辅国向肃宗提出：萧华专权揽政，不适合当宰相，应该罢免，改任元载。

肃宗起初当然不肯同意，可李辅国的眼神告诉他：这不是一项可以否决的请求，而是一项必须执行的决定。

当皇帝当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窝囊。可肃宗能怎么办呢？除非跟李辅国彻底翻脸，把他手中的所有权力，尤其是禁军兵权全部收回，否则就只能向他妥协。

可是，要收回禁军兵权谈何容易！

首先，军队和文职部门是全然不同的。文职部门只要皇帝下一道任命

状，很快就能完成权力的转移和更迭，可军队却没这么简单。如果继任者不能采用强势手段收服人心，就很容易激起兵变。在和平年代，这种可能性也许还比较小，可在如今这个人人自危的战乱年代，在这种遍地都是骄兵悍将的乱世之中，稍有不慎，就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祸乱。

其次，现在的肃宗跟灵武时代的肃宗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的肃宗朝乾夕惕、卧薪尝胆，一心想要收复两京、平定叛乱，颇有中兴之主的气象，可如今的肃宗疾病缠身、精力日衰，只想坐稳皇位、维持现状……二者相去不啻霄壤。这种时候，要是禁军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动一场兵变，肃宗绝对没有办法应付。

鉴于上述原因，李亨只能向李辅国妥协。

数日后，萧华被免去宰相之职，贬为礼部尚书；元载以户部侍郎衔入相，原先兼领的度支使、转运使等重要职务仍然保留。

元载笑了，笑容非常灿烂。

李辅国也笑了，笑容更加灿烂。

对于许许多多的大唐臣民来讲，唐肃宗宝应元年四月无疑是一个黑色的月份。

因为这个月死了两个人。

死人本来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事，可关键在于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非同寻常。

他们就是太上皇李隆基和皇帝李亨。

是的，这父子俩死于同一个月，前后仅相差十三天。李隆基死于四月初五，终年七十八岁；李亨死于四月十八，终年五十二岁。

毫无疑问，唐玄宗李隆基是在无比抑郁和惨淡的心境中离开人世的。如果说人的一生是一本书，那么李隆基无疑拥有非常华丽的封面和辉煌灿烂的正文，只可惜尾声极其潦草，令人不忍卒读，封底更是布满了灰尘和污垢。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皇帝像李隆基这样，拥有落差如此巨大的一生——他所缔造的开元盛世雄踞于历史之巅，令后人叹为观止；可由他一手造成的安史之乱却把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

深渊，亦足以令后人唏嘘扼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落差？

从表面上来看，原因似乎并不复杂，无非是因为李隆基中年以后日渐堕落，荒疏朝政，导致奸臣当道，国事日非，从而最终催生了安史之乱。就像传统史家所言：“开元之初，贤臣当国”，“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总之一句话：“用人之失也！”（《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玄宗李隆基为什么会在中年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呢？答案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

古人经常说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也就是说，历史上早年英明、晚年昏聩的皇帝并不只有李隆基一个，他只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个案而已。西哲也经常说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一旦没有外在力量的制约，任何人在巨大的事功和权力面前，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堕落。换言之，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李隆基个人的思想品质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李隆基和唐太宗李世民拿来做一个对照。

我们都知道，早年的李隆基与李世民极为相似，他以“贞观之治”为执政范本，处处“依贞观故事”，时时刻刻向李世民看齐，任贤纳谏，励精图治，才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从而缔造了一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的太平盛世。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李隆基念兹在兹的执政范本、最让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其实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在贞观中后期，李世民身上已渐露拒谏、骄奢之端倪，魏徵批评他“渐恶直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马周批评他“营缮不休”，致使“百姓怨咨”，很多大臣也纷纷对他“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的行为进行劝谏，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嫔妃徐惠也由于当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而上疏规谏。

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仍然要做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李世民不是在五十一岁那年英年早逝，而是像李隆基一样活到七十八岁，那么彪炳千秋、震烁古今的“贞观之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又会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怎样的晚年形象呢？

再者，假如李隆基没有活到七十八岁高龄，而是像李世民那样英年早逝，那么他的历史形象是不是就会定格在开元时代，从而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没有瑕疵的完美版呢？而骄奢淫逸的天宝时代，连同后来这个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乱”，是不是也就无从谈起了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说，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意义上讲，从“权力腐败定律”的意义上讲，李世民英年早逝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而李隆基得享天年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

当然，这种幸与不幸不是对他们个人而言，而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其实，综观整个中国历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皇帝个人身上，更可以用在一个王朝身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在建国初期几乎都能做到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可一旦太平日久，就会无可挽回地走向腐败与堕落；然后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揭竿而起，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相同的历史又会再度上演……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转着圈圈，转着愚蠢而又可悲的圈圈！

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两个字：制度。

准确地说，是四个字：专制制度。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都是很不靠谱的，不管这个权力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还是集中在一个政治集团手上。而把百姓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全部寄托在这个人（或从属于他的政治集团）身上，显然更不靠谱！

所幸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知道“法治”比“人治”要靠谱得多，已经知道一个普通公民的幸福是如何跟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更知道不能再把民众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身上。但是，毋庸讳言，历史的惯性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国家要从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其道路通常要比人们预料得曲折，其过程似乎也要比人们想象的漫长得多。

也许，历史（最重要的是历史教训）就在这个时候具有了意义。

也许，所谓的“以史为鉴”“鉴往察来”这些话，就在这里具有了意义。

太上皇李隆基驾崩的时候，唐肃宗李亨也已经病魔缠身，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了。得知老父宾天的消息，李亨更是哀伤不已，于是病情愈重。两天后，亦即四月初七，李亨自知不久于人世，遂下诏命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监国，数日后改元宝应。

此时的大明宫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时刻。

因为有两个人正蠢蠢欲动，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控制太子李豫，进而掌控帝国的未来。

他们就是李辅国和张皇后。

代宗登基

李辅国和张皇后曾经是一对配合无间的政治搭档。

早在灵武时期，李辅国为了掌握宫禁大权，张良娣为了当上后宫之主，双方就互为表里、沆瀣一气，联手翦除了建宁王李倓和其他一些政敌，彼此交换过不少利益。回到长安后，李辅国不仅独掌了宫禁之权，并且逐步架空肃宗，窃据了朝柄，而张良娣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母仪天下的皇后。古人说："以利相交者，利尽则交绝。"当双方各自爬上权力的顶峰时，曾经有过的利益联结自然就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日趋尖锐的利益冲突。

而今，肃宗陷入弥留状态，帝国前途未卜，李辅国和张皇后当然都想趁机夺取帝国的最高权柄。一场巅峰对决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暴发了。

张皇后决定率先动手。

她假借肃宗之命召见太子李豫，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四方诏令皆出其口，擅自矫诏逼迁上皇，罪不可赦！他尚存顾忌的只有你和我，现在皇上已陷入弥留状态，李辅国和他的心腹程元振（时任"内射生使"，掌管禁军神箭营）已暗中准备作乱，若不诛杀，祸在顷刻！"

张皇后没想到，她话音刚落，太子李豫竟然当着她的面哗哗地哭了起来，说："陛下生命垂危，此二人皆是陛下的功臣故旧，不奏而突然杀之，必使陛下震惊，恐病体不堪！依我看，这件事还是要从长计议。"

张皇后在心里一声长叹。在她看来，这个大男人脸上的泪水根本不代

表孝顺，只能代表怯懦。

可惜自己两个儿子一个早夭、一个尚幼……张皇后哀戚地想，要不然何至于求到你李豫头上！

李豫仍然在不停地抹眼泪。要说他脸上的泪水纯粹是出于孝顺当然是假话，可要说它只代表怯懦也不够全面。严格来讲，应该是一分孝顺、四分胆怯、五分装蒜。

李豫想，那个老奴才李辅国固然不是吃素的，可你张皇后又何尝是一盏省油的灯？多少回你处心积虑想让你那乳臭未干的小儿子取代我的太子之位，你以为我都不知道？眼下你怂恿我跟李辅国斗，无论是我杀了李辅国，还是李辅国杀了我，到头来不是都便宜了你张皇后么？你这借刀杀人之计好毒啊！要杀你自己去杀，我李豫绝不会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钱。

想到这里，李豫更是作出一副极度伤心的模样，哭得更厉害了。

“好吧，”张皇后无奈地说，“太子暂且回去，容我再考虑考虑。”

当然，此时的张皇后是不可能再考虑的。因为她知道，李辅国不会给她时间。眼下的形势已是剑拔弩张，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绝不容许她有丝毫的犹豫和拖延。可问题在于，她毕竟是个女人，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凭什么和李辅国斗呢？原本还想利用太子对付李辅国，可太子却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在此势单力孤的情况下，张皇后就只能另找同盟了。

关键时刻，张皇后想起了一个人。

他就是李亨次子、时任天下兵马元帅的越王李係 [1] 。张皇后决定跟李係做一笔交易——既然太子李豫跟她始终不是一条心，那不如把李豫废了，另立越王李係，条件是让李係帮她除掉李辅国。

太子一走，张皇后马上召见越王李係，对他说：“李辅国图谋不轨，可太子懦弱，不足以平定祸乱，你能不能？”

让张皇后甚感欣慰的是，李係的回答就一个字：“能！”

随后，张皇后立刻安排手下宦官段恒俊与李係联手，挑选了两百多名勇武的宦官，发给武器和铠甲，命他们埋伏在长生殿后面。

长生殿是肃宗李亨的寝殿，张皇后和李係伏兵于此，想干什么？

四月十六日，张皇后再次假借肃宗名义召见太子李豫，命他到长生殿觐见。

答案揭晓了——张皇后和李係是打算先除掉太子，然后由李係继任储君，再集中全力对付李辅国。

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程元振通过眼线获悉了张皇后和越王的阴谋，赶紧密报李辅国。李辅国立刻命他带兵埋伏在陵霄门外，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截住太子。

太子李豫接到诏命时，以为父皇可能快不行了，召他进宫一定是要交代后事，所以未及多想，匆匆往长生殿赶来。行至陵霄门时，程元振等人忽然一拥而出，将太子团团围住，并把张皇后伏兵长生殿的事情告诉了他。

李豫半信半疑，说："肯定没这回事，皇上病重命我入宫，我岂能怕死不去？"

程元振说："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

还没等太子李豫反应过来，程元振就命士兵把他架了起来，不由分说地把他带到了玄武门外的飞龙厩中，并派重兵把守。此举名义上是保护太子，实则无异于软禁。

当天夜里，李辅国和程元振率兵冲入麟德殿，逮捕了越王李係、宦官段恒俊、内侍省总管朱光辉等一百多人。稍后，李辅国等人又勒兵进入长生殿，宣称奉太子之命迁皇后于别殿，随即逮捕张皇后，把她和左右数十个宦官宫女强行拖下殿，全部囚禁于后宫。

在这场事关帝国未来的巅峰对决中，谁先控制了太子，谁就夺取了斗争的主动权。张皇后机关算尽，最终还是落了后手，在这场终极对决中一败涂地。

突然遭此变故，在长生殿上伺候皇帝的宦官宫女们惊恐万状，纷纷作鸟兽散，把病势垂危的李亨独自一人扔在了空空荡荡的寝殿里。

生命的最后时刻，唐肃宗李亨被自己的臣民遗弃了。

除了无边的孤独和恐惧之外，他肯定还有深深的懊悔。

因为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这个太阿倒持、皇权旁落的局面！

自大唐开国一百多年来，还没有哪一个宦官像李辅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还没有哪一个宦官能够把满朝文武玩弄于股掌之中，并且最终架空皇帝！

可李辅国做到了。

就是在肃宗李亨的宠信和纵容下，李辅国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一个擅权乱政、一手遮天的宦官。如果说安禄山是唐玄宗李隆基亲手培育的一颗毒瘤，那么李辅国就是唐肃宗李亨亲手栽种的一株恶果。

安禄山开启了“藩镇之乱”。

李辅国开启了“宦官之乱”。

把大唐帝国一步步推向衰亡的三大乱象、三大罪魁祸首，此刻已经有两个浮出了历史水面。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里，这两大乱象将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疯狂起舞，拼命肆虐，给帝国造成无穷的灾难，并与有唐一朝相始终。

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里，将有越来越多的藩镇步安禄山之后尘，拥兵割据，抗命自专，名为藩镇，实同敌国；也将有越来越多的宦官步李辅国之后尘，把持朝政，擅行废立，凌驾天子，玩弄百官……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禄山和李辅国固然是历史的罪人，可李隆基和李亨又何尝不是呢？

宝应元年四月十八日，唐肃宗李亨带着无尽的凄怆和悔恨，在阒寂无人的长生殿里黯然闭上了眼睛，终年五十二岁。

李亨刚刚咽气，李辅国便祭起屠刀，斩杀了张皇后、越王李係、兖王李僴（李亨第六子）。同日，李辅国领着一身缟素的太子李豫在九仙门与宰相们见面，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宰相们纷纷跪拜哭泣。

四月十九日，朝廷发布国丧，宣读肃宗遗诏。

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即位，史称唐代宗。

他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被宦官拥立的皇帝，但却不是最后一个。

大功告成的李辅国用一种指点江山的口吻对他说：“大家（皇上）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代宗李豫听到这句话，感觉就像有人在他的心头上狠狠剜了一刀。

当然，他不能喊痛，也不能皱眉。

他只能怔怔地看着李辅国，最后向他露出一个僵硬而无奈的笑容。

数日后，在李辅国的胁迫之下，代宗李豫开始称呼李辅国为“尚父”。此后无论大小政务，一律先征求尚父的意见；群臣出入朝廷，必先觐见天子尚父，而后再觐见天子。

不久，李辅国的心腹程元振被擢升为左监门卫将军，而内侍省总管朱光辉等二十几名宦官则全部被流放黔中。

五月初四，李辅国又晋位为司空兼中书令。

值得一提的是，因肃宗临终前曾大赦天下，当初被流放巫州的高力士得以返回长安。可是，高力士刚刚走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就听到了太上皇晏驾的消息。高力士面朝北方，放声恸哭，最后吐血而亡，终年七十九岁。

宝应元年的夏天，代宗李豫郁闷地坐在长安城的大明宫里，深刻咀嚼着“太阿倒持”这句成语的含义。尚父李辅国在一旁悠然自得地看着天子，心里也在品味着“一手遮天”这个成语的含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正在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看着李辅国。

他当然也没有闲着。

他正在玩味一句俗语，这句俗语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个人就是程元振。程元振并不是一个只会玩味俗语的人，他还是一个善于实践的行动者。

李辅国刚刚体验了一个多月的“尚父”生涯，程元振就和代宗李豫悄悄走到了一起。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程元振很清楚，新天子李豫对这个跋扈多年的老奴才李辅国早已深恶痛绝，之所以不敢动他，无非是因为禁军在他手里。

可现在情形不同了。几年来，程元振早已利用李辅国对他的信任，暗中与禁军将领们打成了一片。所以，眼下与其说是李辅国管着禁军，

还不如说是李辅国管着程元振，而程元振管着禁军。

既然如此，你李辅国还凭什么玩下去？你上无天子的信任，下无禁军的拥戴，唯一剩下的，不就是我程元振对你的一点忠心么？

可这年头，忠心是什么玩意儿？它不就是过河的那条小木桥么？眼下我既然已经过河了，还须苦苦厮守这条小木桥吗？

不。程元振坚决对自己说：不！

于是他就开始动手拆桥了。

而这一边，代宗李豫自然无比惊喜。

有了新一代的宦官撑腰，他当然就不怕那个丧心病狂的李辅国了。

这一年六月十一日，代宗李豫有恃无恐地解除了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职务，将他迁居宫外，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

直到此刻，李辅国才猛然从一手遮天的美梦中惊醒了过来。

他蓦然发现：这几年来，自己在禁军中的地位无形中已经被程元振架空了，就像自己当初无形中架空了肃宗李亨一样！

为了避免杀身之祸，李辅国主动提出辞去中书令的职务。十三日，代宗批准了他的辞呈，同时将他晋爵为博陆王，以示安慰。李辅国上朝谢恩，一边哽咽一边悻悻地说："老奴没有资格侍奉皇上，就让老奴到地下去事奉先帝好了。"

代宗免不了一番好言劝慰，随后命人把他送出了宫。

你别急，朕马上会让你下去的。

九月十九日，代宗又加授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至此，程元振彻底取代李辅国，成了朝中的首席宦官。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十月中旬。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潜入了李辅国的宅第。

翌日清晨，李府的下人们被一幕惨状吓得魂飞魄散——李辅国直挺挺地躺在乌黑的血泊中，颈上头颅和一只手臂已经不翼而飞。

代宗立即下令有关部门追查凶手。

可终究没有找到凶手。

有人猜测这个无头公案的幕后主使是程元振，甚至有人猜测主谋就是皇帝本人。

还有人说，是程元振主使还是皇帝主使根本没有差别，因为宦官程元振和天子李豫早就并肩站在一起了。

是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和天子李豫站在一起了，就像当年宦官李辅国曾经跟天子李亨站在一起一样。

日月轮转，依次照耀着长安城，依次照耀着大明宫。

曾经在太阿倒持的处境中郁闷难当的天子李豫发现一切总算过去了。可他并不知道，所有让他郁闷难当的一切终将再来……

因为程元振的权力欲望一点也不比李辅国小。

[1] 李係在乾元三年从赵王改封越王。——编者注

第四章 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异族入侵

趁火打劫的回纥人

史朝义名义上当了燕朝皇帝，可日子并不好过。登基一年多来，他与各方唐军数度交手，可基本上没打过一场胜仗，不但没把局面玩大，反倒把地盘越打越小。

史朝义感到了强烈的沮丧。

不过，到了唐宝应元年夏天，史朝义的心情却忽然好了许多。

因为唐玄宗和唐肃宗在短短十几天里相继驾崩，李唐朝廷忙于内部的权力博弈和利益重组，自顾尚且不暇，短时间内肯定是腾不出手来对付史朝义了。

史朝义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直入关中，袭取长安。

当然，光凭史朝义本身的力量是肯定不够的，他必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同盟。

放眼天下，谁可以做他的同盟呢？

史朝义的答案是：回纥人。

是的，回纥人。虽然这几年来回纥一直是李唐的盟友，并且多次在战场上对燕军造成重创，但是史朝义坚信——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回纥人当初之所以跟唐朝结盟，唯一的原因就是贪图唐朝的金帛子女。既然如此，史朝义为什么不能同样以此相诱，让他们跟自己结为盟友呢？

思虑及此，史朝义随即修书一封，派人送给了回纥的登里可汗，说："唐室相继出现大丧，如今中原无主，可汗最好火速发兵，与我一同攻取长安，收其府库。"不出史朝义所料，一见到"府库"二字，登里可汗的眼睛立马就亮了。

其实，早在史朝义发信之前，登里可汗就已知道玄、肃二宗病殁的消息了。他的反应和史朝义一样，也是心痒难耐，蠢蠢欲动。如今史朝义既然主动提出跟他联手，登里可汗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

宝应元年夏天，登里可汗亲率大军南下，兵锋直指关中。

此时的唐帝国由于连年战乱，致使州县残破，满目疮痍。回纥军队一路南下，沿途所见几乎都是一片废墟，由此更生"轻唐之志"。

然而，当登里可汗率部进至三受降城时（三城分别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包头市、托克托县南），令他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就在他大举南下的同时，唐代宗李豫也已派遣使者刘清潭北上，准备与回纥重修旧好，请求发兵一同征讨史朝义。可当刘清潭千里迢迢赶到回纥王庭（今蒙古哈尔和林市）时，登里可汗早已起兵南下。刘清潭慌忙又掉头往回赶，终于在三受降城一带追上了回纥军队。他立刻向登里可汗呈上国书，称："先帝虽弃天下，今上继统，乃昔日广平王，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登里可汗就是当年的叶护王子，与当时的广平王李俶曾结为兄弟。虽说出于政治目的而结拜的所谓兄弟一文不值，但此时的登里可汗也不免有几分尴尬——毕竟人家刚刚登基，自己就悍然入寇，不仅有违道义，而且是师出无名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恰恰是李豫刚刚登基，权力未稳，才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一想起长安的“府库”，登里可汗的眼前总是金光闪闪。要是不趁此机会狠狠干他一票，登里可汗实在是心有不甘。更何况，他这次几乎把回纥的精锐之师全都拉出来了，这些兄弟可都是眼巴巴地等着分战利品呢，总不能让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去吧？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管他出师有名还是无名！

主意已决，登里可汗即刻命大军继续前进，同时把唐朝使者刘清潭软禁了起来。刘清潭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好不容易才避开了回纥人的监视，派快马赶回长安报信，称：“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

接到这则十万火急的战报，李唐朝廷大为震骇。代宗慌忙派遣殿中监药子昂，携带数量可观的金帛，急急忙忙北上“劳军”，同时又命驻扎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市）的仆固怀恩赶紧去和回纥人谈判。

仆固怀恩不仅一直是李唐与回纥之间牵线搭桥的人物，而且现在还拥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身份。

他是登里可汗的岳父。

当初的回纥可汗帮肃宗收复两京后，就为儿子叶护求婚，肃宗便做主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嫁了过去。叶护即位后，仆固怀恩之女就成了回纥人的王后——登里可敦。

所以，如今除了仆固怀恩，恐怕是没人能挡住回纥人的兵锋了。

仆固怀恩奉命北上时，回纥大军已进抵忻州（今山西忻州市）以南，距离重镇太原已经近在咫尺了。见到女婿后，仆固怀恩详细为他分析了眼下的形势，告诉他唐朝虽然屡遭变故，但是根基仍然强大，天下人心也仍在李唐；反观史朝义，只不过是个弑父篡位的跳梁小丑，转眼就会败亡。简言之，跟这种人结盟而与唐朝为敌，显然是不明智的。

既然老丈人都出面了，而且分析得头头是道，登里可汗也只好放弃劫掠长安的打算。他随即遣使上表，表示愿意帮唐朝征讨史朝义。

当然，登里可汗之所以作出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绝不仅仅是看在老丈人的面子上。如果仆固怀恩和代宗朝廷不是给他许诺了什么好处，他肯定谁的面子也不会给。换句话说，不抢长安可以，但你总要给他一个地方去抢。

什么地方？

东京洛阳。

为了保住长安，代宗朝廷将再次把洛阳卖给回纥人。反正几年前李豫已经卖过一次了，现在再卖一次又何妨？

经过仆固怀恩的努力，李唐朝廷总算跟回纥达成了协议。但是回纥大军要沿什么路线进攻洛阳，却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登里可汗是打算从蒲关（今陕西大荔县东）渡过黄河，进入关中，经由沙苑（今大荔县南），再出潼关东进。

朝廷特使药子昂一听就觉得不妥，赶紧建议说："关中屡遭战乱，州县萧条，无以供养大军，恐怕会令可汗您失望。如今叛军尽在洛阳，请大军东出太行山，自土门（今河北鹿泉市西）南下，攻略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卫州（今河北卫辉市）、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最后再挺进洛阳，如此便可取叛军资财以供大军所需。"

乍一看，回纥人要走哪条路线似乎无关大局，可事实上这里头大有文章。回纥人之所以想走关中，目的当然是想以筹备"军需"为名，趁机劫掠关中财富；而药子昂之所以建议回纥人从河北南下，是因为邢、洺等州都是燕军的地盘，如果走这条线，既可保护唐朝辖境不被回纥骚扰，又能让回纥人去扫除燕军巢穴，收复唐朝失地，真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登里可汗不是傻瓜。他千里迢迢从大漠跑到中原，可不是来替唐朝卖命的，而是来发财的。所以，走哪条路是给唐朝当炮灰，走哪条路才能轻轻松松发大财，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因此，对于药子昂的建议，他只回答了一个字：不。

药子昂无奈，只好让步，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让回纥军队出太行陉（太行八陉之二，今河南博爱县北），南下夺取河阴（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扼住燕军的咽喉。

很显然，这个建议还是想支使回纥人去打硬仗。因为扼守河阴，就等

于挡住了可能来援的河北燕军，又截断了史朝义的退路。史朝义要是被逼急了，那还不得跟回纥人拼老命？登里可汗才不想去当这个冤大头。所以，他的回答仍旧是一个字：不。

药子昂没辙了。

看来，回纥人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好忽悠的。这帮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伙，在得到明显的好处之前，是绝不可能替唐朝出半点力气的；而且就算出力，他们也绝不会替唐朝独当一面，顶多就是帮唐军充充门面、敲敲边鼓而已。

最后，药子昂只好再退一步，拿出了第三个方案：请回纥军队自陕州大阳津（今三门峡市北黄河渡口）渡过黄河，由太原仓（三门峡市西）负责供应粮草及所有军需，然后与唐朝诸道军队一起东进。

看在“太原仓”的份上，登里可汗才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

宝应元年十月，代宗任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药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执行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命其即日开赴陕州，与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军队会合，克期进攻洛阳。

本来，代宗想起用郭子仪为副元帅，却遭到程元振、鱼朝恩的强烈反对，只好加授时任朔方节度使的仆固怀恩同平章事、领诸军节度行营（相当于各道特遣兵团总司令官），作为雍王李适的副手。

十月下旬，雍王李适率部进抵陕州。当时回纥军队已进驻河北县（今山西平陆县），雍王出于礼节，便率左右属官及数十骑渡过黄河，主动前去拜会登里可汗。

此时的李适当然不会想到，就是这次旨在增进感情的拜会，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礼仪风波”。

双方见面时，雍王李适以平等之礼晋见登里可汗，不料对方大怒，当场指责他为何不以拜舞之礼觐见。所谓拜舞之礼，是指正式场合下，臣子对君王应行的一种隆重礼节。雍王身为唐朝皇帝的长子，隐然有储君之尊，当然不可能向回纥可汗拜舞。

宾主双方刚一见面，还没来得及说些客套话，登里可汗就给了年轻的雍王一个下马威，现场气氛顿时极为尴尬。

药子昂马上站出来替雍王挡驾，声称雍王的身份不适合行拜舞之礼。

登里可汗满面怒容，一言不发。其帐下将军车鼻知道可汗是想借题发挥，便径直走到药子昂面前，声色俱厉地说：“唐朝天子既与可汗相约为兄弟，可汗就相当于是雍王的叔父，他岂能不拜舞？”

药子昂寸步不让：“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玄宗、肃宗）在殡，不应舞蹈。”（《资治通鉴》二二二）

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却始终僵持不下。最后车鼻恼羞成怒，下令将雍王带来的属官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四人全部拉出帐外，每人鞭打一百下，同时以雍王李适年轻不懂事为由，把他逐出大营，遣回了陕州。

药子昂等四人全都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只过了一夜，魏琚和韦少华就因伤重不治，双双毙命。

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无论对于雍王李适来讲，还是对于整个李唐王朝而言，都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

然而，雍王只能忍了，李唐朝廷也只能忍了。

因为他们有求于人。

因为唐朝现在根本惹不起回纥。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事实上涉及了一个朝廷、一个国家的尊严。因为雍王李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亲王，而是潜在的帝国储君，是未来的大唐天子。这样的身份，又岂能向区区一个回纥可汗卑躬屈膝，行拜舞之礼？

其实，如果此次来的人不是雍王，而是另一个普通的李唐亲王，登里可汗说不定就没兴趣强调什么礼仪了，反正拜不拜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恰恰是因为来的人是代宗的长子雍王，登里可汗才故意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其目的就是想借此证明回纥对唐朝所拥有的强势地位，让李唐王朝在回纥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屈居弱者之位。

虽然在此次风波中，李唐的好几个朝廷官员被无端鞭笞并屈辱而死，但无论如何，雍王李适和李唐朝廷至少保住了自己的底线——事关朝廷尊严和国家尊严的底线。尽管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这样的底线屡屡遭到内忧外患的挑战，甚至可以说不止一次被突破了。可是，绝不能因为它曾经被突破、或者还将被突破，就从此破罐子破摔，放弃了精神上的坚守！

这道理就跟一个人即使被敌人杀死、也绝不向敌人下跪是一样的。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用他的行动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君子死而冠不免。意思是君子就算死，也不能丢掉冠帽，丧失尊严。

雍王李适在礼仪问题上的坚持，实际上与此同理。

也就是说，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可以因实力不及而输给对手，但并不等于他（它）就应该在精神上向对手屈服。这两件事绝不能画上等号，更不能混为一谈。

难道在实力上“完全屈居劣势”的雍王，就不应该在事关个人尊严、国家尊严的事情上“仍摆出架势”吗？难道优势占尽的回纥人应该向处处忍让的唐朝“争取尊严”，而“完全屈居劣势”的唐朝反而不该向咄咄逼人的回纥人争取尊严吗？

好像药子昂等四人的鞭子是应该挨的，好像魏琚和韦少华也是应该死的——谁叫你惹怒了代表正义的登里可汗呢？

事实上，登里可汗是什么货色？

他是一个以援助为名，行劫掠之实的强盗！这个强盗不仅要在物质上占尽便宜，还企图在精神上占尽优势！如果说这个强盗对李唐王朝肆意凌辱、百般勒索的做法也可以称为正义的话，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非正义的？

树倒猢狲散：史朝义的末日

宝应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代宗李豫发布诏令，命唐朝诸道军队分别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大举进军洛阳。

西路军，以仆固怀恩和回纥军队为前锋，以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殿后，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出发，经渑池（今河南渑池县）东进；北路军，由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自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出发，经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南下；东路军，由时任河南副元帅的李光弼从徐州出发，经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西进。

史朝义得到情报，大为震惊，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各将领意见。阿史那承庆说：“唐军若只出动汉人部队，我们可全军出击，与之决战；可是，如果有回纥军队参战，其兵锋必然锐不可当，我军应退守河阳，避其锋芒。”

史朝义沉吟半晌，最终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决定死守洛阳。

此时的史朝义并不知道，这个愚蠢的决策将加速他的败亡。

十月二十七日，西路的唐回联军率先进抵洛阳北郊，分兵出击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次日将其攻克，对洛阳形成了包抄之势。三十日，唐回联军进抵横水（洛阳北郊），数万燕军在此构筑营寨，与官军对峙。仆固怀恩自率一路从西面进攻，另遣精骑和回纥骑兵绕道燕军营寨的东北角，两面夹攻，一举大破燕军。

得知城外的部队失利，史朝义随即亲率十万精锐之师出城增援，于昭觉寺一带列阵。唐军趁燕军立足未稳，突然发动攻击。燕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死伤甚众，但仍旧坚守阵地。鱼朝恩派出五百名神箭手参战，给燕军造成了更大的伤亡，但在史朝义的亲自督阵下，燕军却表现得极为顽强，依然坚守不退。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唐军迟迟不能突破对方防线，士气必然受挫，一旦燕军发起反攻，唐军将极为不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镇西节度使马璘对左右说：“战况危急了！”随即单枪匹马杀入敌阵，在万众之中左冲右突，连拔燕军两面令旗，总算撕开了一个缺口。他身后的唐军主力乘势杀入，燕军终于抵挡不住，阵势随即瓦解。

随后，燕军且战且退，唐军穷追不舍，双方又在石榴园、老君庙（均在今河南沁阳市一带）数度激战，但燕军士气已丧，而唐军则越战越勇。燕军退至尚书谷（今河南武陟县境内）时，自上而下都已无心恋战，各部争相溃逃，人马互相践踏，纷纷跌入坑谷之中。唐军一路砍杀，共斩首六万余级，俘虏两万人。史朝义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洛阳，带着家眷和几百名轻骑兵向东而逃。

唐军随即克复洛阳与河阳三城。

仆固怀恩让回纥军队驻守河阳，命其子右厢兵马使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一万多人乘胜东进，旋即又克复郑州。史朝义一路向东逃窜，到了汴州（今河南开封），他属下的陈留节度使张献诚却紧闭城门，拒绝收容。史朝义万般无奈，只好亡奔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史朝义前脚刚走，张献诚后脚就打开城门，弃暗投明了。

燕军终于跑了，两度失陷于叛军之手的东京洛阳终于又回到了李唐王朝的怀抱。

然而，此刻的洛阳百姓做梦也不会想到——唐回联军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福分，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大唐官军和回纥友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后，总共干了四件事——烧，杀，掳，掠。把洛阳扫荡一空后，唐回联军又变本加厉，一鼓作气洗劫了郑州、汴州、汝州等地。（《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

中原的士绅百姓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些穷凶极恶的强盗就是他们日思夜盼的“官军”！

他们目瞪口呆，心胆俱丧，久久回不过神来。

等他们清醒过来时，房屋被烧光了，财产被抢光了，胆敢反抗的人都被杀了，活着的人身上的衣服也全被扒光了。所谓“士民皆衣纸”，就是无论官商士民还是男女老幼，全都被扒得一丝不挂，只能随便抓几张纸来遮羞。当然，这最后一项遮羞物大兵们是不会抢的，因为纸对他们毫无意义。

熊熊大火在洛阳等地燃烧了数十天，烧杀掳掠整整持续了三个月。当劫后余生的大唐子民们穿着薄薄的“纸衣”伫立在焦黑的废墟上、蜷缩在深冬的冷风中，他们肯定都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叛军来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而官军来了这一切就都发生了呢？

同时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叫沦陷？什么叫光复？谁是官兵？谁是寇贼？其实，早在代宗派仆固怀恩去跟登里可汗谈判的时候，洛阳及附近州县就已经被李唐朝廷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出卖给回纥人了。

既然朝廷已经跟回纥人达成了这种协议，那么唐军官兵当然有理由把洛阳等地视为“贼境”了。所谓贼境就是贼人的地盘。既然是贼人的地盘，那官兵们当然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换言之，当李唐朝廷与回纥人达成协议的那一刻，东京及附近州县就已经不是亟待朝廷去光复的沦陷区了，而是唐回联军眼中的大肥肉，是亟待他们去攫取的战利品！

所以，中原的百姓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这就是他们的命。

在历史的大棋盘上，在政治的弈局中，老百姓的性命和财产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老子早就说过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

（统治者）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动乱年代，老百姓的性命往往贱如草芥，只能在逐鹿群雄的刀剑和铁蹄下流血和呻吟。就算生在和平年代，老百姓也随时会被政客们献上祭坛，充当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所谓“苍生福祉”，所谓“百姓利益”，往往是统治者拿来当政治口号用的，绝对不可当真。所以元人张养浩才会发出这样的浩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大抵如此。

有道是兵败如山倒。宝应元年十一月，史朝义一直在没命地往北跑，而仆固怀恩父子也一直在他背后玩命地追。

史朝义从濮州渡过黄河逃往滑州（今河南滑县），仆固怀恩就打下滑州；史朝义逃到卫州（今河南汲县），仆固怀恩就打到卫州。燕朝的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率四万多人前来阻击唐军，仆固玚又将他们击溃，并一路追至昌乐（今河南南乐县）。史朝义又搬来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兵马回头再战，却再度被仆固玚击败。

眼见唐军连战连捷、一路奏凯，而史朝义则疲于奔命、节节败逃，燕朝的节度使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史朝义马上就要完蛋了，而燕朝的气数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大家都心照不宣。

短短几天后，燕朝的邺郡节度使薛嵩率领辖下的相、卫、洺、邢四州向唐朝的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也率赵、恒、深、定、易五州向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投降。

李抱玉和辛云京随即进入薛嵩等人的驻地，接管他们的部队，解除他们的兵权。

然而没过几天，仆固怀恩却下令让薛嵩等人官复原职，各归其位。李抱玉和辛云京大为不满，同时也深为疑惧——你仆固怀恩凭什么如此独断专行、慷朝廷之慨？你这样明目张胆地收买人心，意欲何为？

李、辛二人立刻向朝廷上表，希望朝廷能对仆固怀恩暗中戒备、严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也紧跟着上疏代宗，为自己辩解。

此次征讨史朝义，仆固怀恩无疑建有大功，代宗李豫对他欣赏有加，于是赶紧遣使慰勉仆固怀恩，并正式颁布了一道诏书，称：“凡东京

及河南、河北在叛军中担任伪职者，一律赦免，既往不咎。”

见到诏书，李抱玉和辛云京尽管很不服气，却也无话可说。

十一月二十四日，代宗又擢升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并加授左仆射、中书令，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等职。

至此，仆固怀恩的地位已远远超越郭子仪和李光弼，成了大唐军界首屈一指的人物。

这年年底，史朝义逃到贝州（今河北清河县），与薛忠义等节度使会合。仆固玚追至临清（今河北临西县）时，史朝义自衡水（今河北衡水县）率三万人回头反扑。仆固玚设下埋伏，击溃燕军，史朝义再逃。此时回纥兵团在洛阳的劫掠告一段落，又赶来参战，唐军声势更盛，追至下博（今河北深州下博镇）东南一带，再度大败燕军。史朝义亡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市莫州镇）。随后唐军五路兵马会师下博，继而进军莫州，将史朝义团团围困。

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屡次出城迎战，皆被唐军击败。田承嗣劝史朝义突围前往幽州（范阳治所）征调军队，由他坚守莫州，以待援兵。史朝义想来想去，也觉得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了，遂挑选五千精骑从北门突围而去。

看着史朝义仓皇远去的背影，田承嗣的嘴角掠过一抹冷笑。

片刻之后，田承嗣就在城头上竖起了降旗。

唐军就这样拿下了莫州城。同时拿下的，还有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随后，仆固玚又率领三万人马继续向北追击，在归义（今河北容城县东北）追上了史朝义。史朝义回头应战，再败，只好再逃。

不会永远这么逃下去的，因为幽州马上就快到了。史朝义对自己说。尽管一连串的失败几乎已经摧垮了他的信心，可一想起前面那座熟悉的幽州城，史朝义还是咬着牙告诉自己：挺住，绝不能就这么垮掉！只要幽州老巢还在，最后的希望就在！

前面就是范阳县（今河北涿州市）了。史朝义的心头顿时一热。

范阳县到了，幽州城还会远吗？

可是，此刻的史朝义并不知道，他永远也到不了幽州城了。

因为，他亲自任命的范阳尹、燕京留守李怀仙已经于数日前向唐廷递交了降表。并且，李怀仙还命兵马使李抱忠率三千人马入驻范阳县，目的就是要在这里堵住他。

当满身疲惫、饥肠辘辘的史朝义领着几百残兵抵达范阳城下时，他照例看见了一个紧闭的城门。

一阵强烈的沮丧和恐惧瞬间攫住了他。

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看过太多扇紧闭的城门了——那都是为他而紧闭的，为他而紧闭的！

史朝义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后面追兵掀起的漫天黄尘已经依稀可见。史朝义派人向李抱忠发出了愤怒而痛切的质问，并责以君臣大义。李抱忠的答复是："天不佑燕，唐室复兴！如今我等既已归唐，岂能再为反复？愿你从速决定去就，谋求自全之计。并且，田承嗣必定也已背叛了你，否则官军何以至此？"

李抱忠的答复让史朝义残存的希望彻底破灭，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让他万念俱灰。

洛阳丢了，幽州降了，部众都叛了，自己的妻儿老小十有八九也落到唐军手里了……此刻的史朝义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作树倒猢狲散。

绝望的史朝义最后向李抱忠提出了一个请求——我一天没吃东西了，请给一顿饭吃。

李抱忠动了恻隐之心，把饭送到了东门口的城墙下。

这是燕朝皇帝史朝义最后的晚餐。

吃完饭，部卒中的范阳人纷纷辞别史朝义，陆陆续续走进了范阳城，走进了久别的家园。史朝义无力阻止他们走进家园的脚步，更无力阻止汹涌的泪水在自己的脸上肆意流淌。

许久，史朝义抹抹脸上的泪痕，再次翻身上马，带着最后的百余骑兵东奔广阳（今北京市西南良乡镇）。然而，广阳城门依旧紧闭。史朝义掉转马头，决定向北投奔契丹。可是，走到温泉栅（今河北迁安县

境）附近的一片树林时，史朝义就再也无法前进半步了。

因为一支军队堵住了他的去路。

史朝义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那是李怀仙的脸。

史朝义把目光从这张令人厌恶的脸上移开，最后落在一根粗壮的树枝上。

人生的归宿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一根粗壮的树枝，加上一根结实的绳子。

而这场席卷大半个帝国、深刻影响唐朝历史的安史之乱，其结局也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唐代宗宝应二年正月三十日，一队范阳来的快马风驰电掣地进入长安。为首的那匹马上拴着一个匣子。匣子里的史朝义披头散发、双目圆睁……

仆固怀恩：一颗潜在的叛乱种子

一切终于结束了。

起于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历时七年多的这场叛乱，终于在这一刻偃旗息鼓、尘埃落定了！

代宗李豫不禁为此感慨万千。

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三朝天子忧思万端，满朝文武殚精竭虑，万千臣民同心戮力，无数将士浴血疆场……所有这一切，如今总算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所有的付出，如今总算有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回报。

这对于登基才半年多的代宗李豫而言，不啻上天赐予的一份厚礼。李豫感到了无比的庆幸和喜悦。他终于可以以此告慰玄、肃二宗以及李唐王朝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了！

这一年三月，代宗朝廷为玄、肃二宗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在大明宫中

停放了将近一年的二宗灵柩终于得以入土为安：玄宗葬于泰陵（位于今陕西蒲城县东北十五公里处），肃宗葬于建陵（位于今陕西礼泉县东北十四公里处）。同年七月，群臣为天子李豫进献尊号，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同月，代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元广德，并对平叛有功的所有将领（包括回纥可汗及其将领）论功行赏、加官晋爵。

在安史之乱最后阶段的所有平叛功臣中，功勋最卓著者当非仆固怀恩莫属。

当初郭子仪光复长安时，肃宗李亨曾经情不自禁地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此时此刻，代宗李豫也很想对仆固怀恩说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感激和倚重之情。

是的，如果没有仆固怀恩的积极斡旋，穷凶极恶的回纥人就有可能与史朝义结盟，给李唐王朝带来更为深重的战争灾难；如果不是仆固怀恩军事和政治手段双管齐下，燕朝的河北诸藩就有可能负隅顽抗，而史朝义也不会这么快就败亡。

因此，仆固怀恩对于代宗朝廷可谓厥功至伟，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功臣仆固怀恩的意见就毫无疑义地成了代宗朝廷“河北政策”的唯一指南。刚刚平定史朝义叛乱，仆固怀恩便迫不及待地向代宗上表，奏请将河北的燕朝降将就地任命为唐朝的节度使，李豫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于是，燕朝的河北诸藩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了唐朝的河北诸藩。朝廷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仍辖恒、赵、深、定、易五州，并赐名李宝臣；任命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任命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不久擢为节度使；任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仍辖原有六州。

诸藩相视而笑。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地盘还是那些地盘，刀枪也还是那些刀枪！唯一的差别，就是把城头上的旗子从“史燕”换成“李唐”。

这样的差别实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诸藩都笑得十分惬意。

与此同时，仆固怀恩也在一旁笑得意味深长。

此前，河北诸藩就已经向他表了忠心，愿意投其麾下以效犬马之力，如今朝廷既然承认了他们，那就等于是把河北诸镇划入了他的势力范围。有了这些强藩做党援，仆固怀恩就无须担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在叛乱平定之后被皇帝削弱了。（《资治通鉴》卷二二二：“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

自古以来，功臣与叛乱大抵都是相反相成的，正是有了叛乱的存在，才有了功臣的崛起。同理，叛乱一旦平定，功臣必然会随之恩宠日衰，轻则兵权被削，重则被皇帝兔死狗烹！历朝历代，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正是为了防范这一点，仆固怀恩才会力挺李宝臣、薛嵩这帮燕朝降将，并与他们暗通款曲、互为奥援。

说白了，要想避免“贼平宠衰”，最好的办法就是——养寇自重。

对于仆固怀恩养寇自重的心思，代宗李豫基本上毫无察觉。对他来讲，只要河北诸藩能够弃暗投明，让这场该死的叛乱早一天平定，那就阿弥陀佛万事大吉了。至于这么做是否会导致什么隐患，是否会引发什么新的危机，代宗似乎根本就无暇考虑。

最早对仆固怀恩产生怀疑、并和他发生抵牾的人，是河东节度使辛云京。

辛云京很早就看仆固怀恩不顺眼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番将实在是蹿得太快——几年前不过就是郭子仪手下一个小小的兵马使，如今倒好，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左仆射、中书令，全让他一个人兼了！连他那嘴上无毛的儿子仆固玚都成了朔方行营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这算什么事儿？

如今，与河东近在咫尺的河北诸藩又和仆固怀恩眉来眼去、暗通款曲，这就更让辛云京坐立难安了。

在辛云京看来，这帮安史降将历来是轻于去就的墙头草，只要形势稍有变化，或者出于某种利益，他们随时可能再揭反旗、倒戈相向！万一到了那一天，身为河东节度使的辛云京就是头一个遭殃的。因为河北与河东仅有一山（太行山）之隔，自然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更何况，仆固怀恩是仆骨人，与回纥人同属铁勒诸部，这些年朝廷与回纥的往来交涉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几年前还把女儿嫁给了回纥的登里可汗，更可谓亲上加亲。而今他仆固怀恩之所以眼高于顶、牛皮烘烘，就是因为上有天子宠信，下有兵权在手，内有诸藩暗附，外有回

纥援引，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简直是安禄山第二啊！哪一天他仆固怀恩要是勾结回纥人与河北诸藩一块造反，谁能治得了他？

正是居于这样的一些情绪和想法，所以辛云京多次对仆固怀恩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当初回纥人大举南下，驻扎在太原附近，仆固怀恩奉诏前来太原与回纥人谈判，辛云京就让仆固怀恩吃了闭门羹，既不让他进城，也不出城接待；平定史朝义叛乱后，仆固怀恩送回纥出塞再次经过，辛云京依旧城门紧闭，如临大敌，让仆固怀恩丢尽了面子。

仆固怀恩勃然大怒，随后便上疏向代宗告状，称辛云京对回纥不敬、有碍两国邦交云云。

可是，奏疏呈上多日，代宗却装聋作哑，一点反应都没有。

代宗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这道奏疏让他有点不爽。在他看来，回纥人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借平叛之名从唐朝捞了多少不义之财，朝野上下对回纥人痛恨到了什么程度，你仆固怀恩比谁都清楚。所以代宗觉得，辛云京不招待回纥人实属正常，你仆固怀恩大可不必抱怨，更不应该替回纥人打抱不平。

代宗的沉默越发激起了仆固怀恩的怒火。

好吧，既然天子你不闻不问，那就别怪我自作主张了！

广德元年夏，仆固怀恩突然率领数万朔方兵进驻汾州（今山西汾阳市），同时命其子仆固玚率一万人进驻榆次（今山西榆次市），命将领李光逸进驻祁县（今山西祁县）、李怀光进驻晋州（今山西临汾市）、张维岳进驻沁州（今山西沁源县），对太原的辛云京摆出了赤裸裸的威胁态势。

安史之乱平定不过半年，恃宠而骄、居功自傲的仆固怀恩俨然又成了一颗潜在的叛乱种子。

刚刚散去的战争阴云，又迅速在帝国的上空凝聚。

面对摩拳擦掌、剑拔弩张的仆固怀恩，辛云京却显得气定神闲，一副以静制动的样子。

当然，辛云京并不是不动。

相对于仆固怀恩咄咄逼人的“明动”，他采取的是更隐蔽、更高明的“暗动”。

这一年五月，宦官骆奉仙因事前往太原，回京之前，辛云京给了他一笔重贿，请他回朝向天子进言，称仆固怀恩勾结回纥人谋反，并且“反状已露”。其实，骆奉仙跟仆固怀恩本来还是有些交情的，据说还曾经结为兄弟，可是，在沉甸甸的黄白之物面前，所谓的“兄弟”之情实在没什么分量，因此也就被骆奉仙抛诸脑后了。

骆奉仙回长安必须路过汾州，此时仆固怀恩正驻扎在此。骆奉仙一到，仆固怀恩马上设宴款待，还特意请出自己的老母作陪。酒过三巡，老人家忽然盯着骆奉仙，不紧不慢地说：“你和我儿约为兄弟，现在又和辛云京走得那么近，做人岂能做这种两面派？不过，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也没必要深究。从今往后，你与我儿还是兄弟，大家和好如初吧。”

骆奉仙这才知道，仆固怀恩之所以把老母搬出来，就是为了借老人的口来威胁他。骆奉仙一脸窘迫，只好干笑几声，把话题扯开。

稍后，仿佛是为了冲淡适才的尴尬气氛，仆固怀恩起身离席，亲自为骆奉仙跳了一支舞。骆奉仙连忙赠与“缠头彩”[1]。

仆固怀恩跳完舞，又满怀热情地对骆奉仙说：“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你就多住一天，咱哥俩再好好聚聚。”

一听这话，骆奉仙心里顿时有些发毛。

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刚才借你老娘的话威胁我，现在又来装模作样地留我，你仆固怀恩究竟想干什么？

骆奉仙随即以公务在身、时间紧迫为由极力推辞，可仆固怀恩说什么也不让他走，还命人把他的坐骑偷偷藏了起来。当晚回到下榻的驿馆，骆奉仙看见马厩里空空如也，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

他对左右说：“仆固怀恩白天威胁我，现在又藏我的马，肯定是想杀我了。”说完，骆奉仙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翻墙逃走。仆固怀恩闻讯，情知不妙，赶紧追上骆奉仙，把他的坐骑还给了他。

经此一番惊吓，骆奉仙知道自己已经不能见容于仆固怀恩了，于是回朝之后，立刻向代宗上奏，声称仆固怀恩企图谋反。不久，仆固怀恩得到消息，也赶紧上疏代宗，说骆奉仙与辛云京狼狈为奸，恶意陷害他，请朝廷将二人诛杀。

代宗李豫没想到仆固怀恩和辛云京的矛盾居然会发展到如此不共戴天的地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下诏把两个人都褒扬了一

番，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握手言和。

这道和稀泥的诏书一下，仆固怀恩顿时一跳三丈高。

天子岂能如此是非不分？

仆固怀恩愤怒地想，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自己始终奋战在平叛的第一线，整个家族为国战死的有四十六人，女儿为了国事又远嫁异域；每逢战争的关键时刻，都是自己出面向回纥求援，才得以先后收复两京、平定河南河北。要说平叛的第一功臣，自己绝对是当之无愧！可一个小小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不但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且还信口雌黄、肆意诬陷，而天子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和起了稀泥，这意味着什么？

这难道不意味着，天子是想借辛云京来牵制自己吗？

这难道不意味着，兔死狗烹的大戏已经无声地开锣了吗？

仆固怀恩忍无可忍，立刻给天子上了一道满腹冤屈的奏疏：“臣静而思之，自己有六大罪过：当初同罗部落叛乱，臣为先帝扫平河曲（今山西西北部），此罪一；臣之子仆固玢，为同罗所俘，伺机逃回，臣将其斩首，借以激励部众，此罪二；臣有女儿，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此罪三；臣与子仆固玚不顾身家性命，为国效命，驰骋沙场，此罪四；河北诸镇刚刚归降，各节度使皆手握强兵，臣竭力安抚，消除他们的疑惧，此罪五；臣说服回纥，让他们奔赴急难，帮朝廷平叛，天下平定后，臣又亲自送之归国，此罪六。臣既有此六大罪过，合当万死！纵然含恨九泉、衔冤千古，又能抱怨什么呢？

“臣与朔方将士，功勋最著，贡献最大，是先帝中兴大业的主要力量，也是陛下流亡期间的亲信故旧，可陛下非但没有特别褒奖，反而听信宦官谗言。先有郭子仪受到猜忌，如今臣又遭诋毁，所谓鸟尽弓藏，信非虚言！陛下听信其诬陷之辞，与指鹿为马又有什么区别！倘若陛下不纳臣的一片忠心，一味因循苟且、包庇纵容，臣实在不敢说能保住身家，可陛下又岂能保得住帝国？忠言逆耳利于行，唯请陛下慎重考虑。”

一看到这道怨气冲天、大逆不道的奏疏，代宗李豫登时龙颜大怒。

是，你仆固怀恩是有功，可也没必要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显摆吧？该赏给你的，朕不是都赏给你了吗？你如今功盖天下，极尽荣宠，遭人眼红实在是情理中事。他辛云京的肚量固然是小了些，可无非就是发发

牢骚而已，又没什么真凭实据，还能拿你怎样？你何需如此老虎屁股摸不得，非要朕杀了他不可？再怎么说，他辛云京也是一个堂堂的节度使，一个跟你一样的有功之臣，岂能让你说杀就杀？朕要是依了你，岂不是让功臣们人人自危？岂不是让天下人把我李豫当成了不仁不义的昏君暴君？再者，你对“勾结回纥谋反”一说反应如此强烈，要说心里没鬼，朕还就不大敢信！瞧瞧你这话怎么说的——“鸟尽弓藏，信非虚言！”你这话啥意思？朕怎么觉着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呢？

更让人不可容忍的是，你居然说出“指鹿为马”这样的悖逆之言，把朕当成了昏庸无能、奢侈纵欲的亡国之君秦二世，是谁给你仆固怀恩这么大的胆子？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这一句——“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连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吗？就凭这句话，朕就可以定你狂悖之罪、谋反之罪，朕就可以灭你九族，让你一家老小死无葬身之地，死后还要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

这一切，朕都做得到，别以为朕不敢！

一道奏疏看完，代宗李豫已经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立刻把仆固怀恩抓到长安，五马分尸，千刀万剐！

可是，没过多久，代宗就慢慢冷静下来了。

仆固怀恩尽管出言不逊，可毕竟为帝国建立了不世之功，况且尚无明显的反叛之举，如果真的拿他问罪，不仅会让天下人心寒，而且对于刚刚平定的局势也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思虑及此，李豫不得不把满腔怒火压了下去。

作为天子，要杀一个人是很简单的事情。只不过有些时候，杀人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把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所以，当务之急不是杀仆固怀恩，而是要一边稳住他，一边试探他，看看他到底安的什么心！

广德元年九月，代宗李豫命宰相裴遵庆前往汾州，表面上宣旨慰问，其实是刺探虚实。

裴遵庆临行前，李豫特意叮嘱他，让他以个人名义向仆固怀恩暗示，要他入朝面圣，看他作何反应。

要是他敢来，就表明他心里头没鬼；就算有鬼，朕也能趁机把他收拾

了。

要是他不敢来……

李豫皱着眉头想，那麻烦就大了。

麻烦的确不小，因为仆固怀恩不肯入朝。

裴遵庆到达汾州后，刚一宣完旨，仆固怀恩就紧紧抱着他的脚，痛哭流涕，大呼冤枉。裴遵庆遵照代宗指示，暗示仆固怀恩入朝，让他当面向天子表明忠心。

仆固怀恩当然是满口答应。

可是，裴遵庆刚刚退出，副将范志诚就力劝仆固怀恩不要入朝，说："明公受奸人陷害，与朝廷嫌隙已成，有功高不赏之惧，为何还要入不测之朝？功成而不见容于上，前有郭子仪，后有李光弼，明公若听信裴遵庆之言，必遭杀身之祸！"

次日，裴遵庆入见，仆固怀恩马上改口说，自己一旦入朝，很可能死在宦官手里，所以打算先派一个儿子入朝（相当于去当人质），以表自己绝无反叛之心。

然而，此议再次遭到范志诚反对。仆固怀恩当即又改变主意，再也不提入朝之事。裴遵庆在汾州苦等多日，见仆固怀恩再无任何表示，只好回朝复命，向代宗如实禀报了此行的经过。

既然仆固怀恩不敢入朝，那就说明他心里有鬼。

代宗李豫顿时对仆固怀恩满怀疑惧。

就在这个时候，从河东又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御史大夫王翊刚刚出使回纥回来，走到汾州居然被仆固怀恩强行扣留了。

这唱的又是哪一出？

李豫勃然大怒。你仆固怀恩为何扣押王翊？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是不是你和回纥人之间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李豫觉得，仆固怀恩这么做已经不是此地无银了，而是图穷匕见。

或许，是时候对这家伙采取行动了……

然而，此时的代宗李豫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还没等李唐朝廷动手收拾仆固怀恩，自己背后就突然被人狠狠捅了一刀。

那是吐蕃人的刀。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刀居然一下子捅在了帝国的心脏上。

吐蕃入长安

大唐自立国以来，不断开疆拓土，扩张势力范围，在帝国的西北边境和整个广袤的西域设置了数个都督府和都护府，下辖众多州县。至开元中期，唐帝国在西北和西域分别设置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节度使，而且每年都从关东地区征调精壮士卒戍边，一方面开展大规模屯田，以供军需；一方面开辟了大量牧场，畜养战马和牛羊。在所有重要的城堡和要塞之间，日夜都有巡逻骑兵来往游弋。

大唐帝国就这样在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上，构筑了一个庞大、坚实、严密的边防体系。多年来，虽然吐蕃从未停止过对唐朝西北边境的侵扰，但始终未能有效突破唐朝的边防，更没有机会长驱直入。

然而，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边防体系就名存实亡了。

李唐朝廷为了平定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把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边防重镇的精锐部队全部调回国内，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驻守。吐蕃军队乘虚而入，自大震关（今甘肃张家川县东南）东进，先后攻陷兰州（今甘肃兰州市）、廓州（今青海化隆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岷州（今甘肃岷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成州（今甘肃礼南县）、渭州（今甘肃陇西县）等地，尽取河西、陇右之地。

在吐蕃军队的不断蚕食下，短短数年间，帝国西北部的数十个州相继沦陷。到代宗登基时，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以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以北的唐朝国土，已全部落入吐蕃人的手中。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再次向唐朝发起大规模进攻，边境守将频频告急，可当时正恃宠擅权的宦官程元振却置若罔闻，只将其视为一般性袭扰，既不上奏代宗，也不发兵御敌。吐蕃军队遂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了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唐泾州刺史高晖不仅放弃抵抗，举城而降，而且替吐蕃人充当向导，领着敌军深入关中。直到吐蕃大军越过邠州（今陕西彬县），代宗李豫才惊闻吐蕃入寇的消息。

十月初二，吐蕃大军已迅速进抵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一时京师震恐，代宗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同时起用郭子仪为副元帅，命他火速进驻咸阳组织防御。

社稷有难了，已经被晾了不少日子的郭子仪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中。然而，此时的郭子仪却是一个光杆司令。

因“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此时郭子仪可以直接调动的兵马只有麾下的二十名亲兵。

由于军情紧急，而前线又没有送来任何准确的情报，郭子仪急于了解敌情，来不及等朝廷募兵，就即刻带着他的“二十人兵团”开赴前线。

抵达咸阳后，郭子仪立刻派斥候前去打探。很快，斥候就带回了准确的情报。郭子仪一听，顿时大为震惊——此次的来犯之敌不仅有吐蕃人，还有吐谷浑人、党项人、氐人、羌人，兵力足足有二十多万！

此刻，吐蕃大军已经渡过渭水，正迅速向东挺进，兵锋直指长安。

郭子仪急命部将王延昌火速回朝，请朝廷立刻发兵。然而，让郭子仪万万没想到的是，值此大敌当前、京师危急之际，一手遮天的程元振居然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拒不接见王延昌，更不用说派发一兵一卒了。

郭子仪彻底绝望。

他知道，程元振向来嫉妒他的功勋和威望，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排挤他，可郭子仪怎么也想不到，都到这个时候了，程元振竟然还在一心弄权、排斥异己！

看着二十几万敌军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浩浩荡荡地开向长安，郭子仪只能在心里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长安完了。

十月初四，吐蕃的先头部队进抵周至（今陕西周至县）西面，在这里遭遇了此次入侵的唯一一次抵抗，他们被唐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击退。

然而，这注定只能是一次微弱的抵抗。因为吕月将的兵力只有区区两千人，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吐蕃的二十万大军！

十月初六，吐蕃主力进抵周至。吕月将竭力死战，最后全军覆没，兵败被俘。

十月初七，吐蕃大军渡过西渭桥。至此，大唐帝京长安已经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

得知吐蕃人兵临城下的消息，代宗李豫如遭雷击。他仓皇无措，最后

只好在少数禁军和宦官的簇拥下逃出长安，亡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

天子一跑，京师顿时大乱，满朝文武各自逃命，禁卫六军也顷刻溃散。等到郭子仪赶回长安时，天子和百官已经踪影全无，长安也已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代宗逃出长安不久，随驾的禁军将领王献忠就带着四百余骑叛逃，并裹挟着丰王李珙（玄宗之子，代宗叔父）和其他十来个亲王奔回长安，准备投降吐蕃人。

王献忠一行刚刚进入开远门（长安西北门），恰好和郭子仪迎面相遇。郭子仪大声呵斥，王献忠连忙下马拜见，说："如今皇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天子就是您一句话的事，令公何不顺势而为？"

郭子仪怒视王献忠，一言不发。

王献忠讪笑着说："令公为何不说话？"

他话音未落，郭子仪就已命左右冲上前去，把他一下子按倒在地。王献忠手下面面相觑，可慑于郭子仪的威望，没人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随郭子仪掉头西行，去追天子车驾。

十月初八，代宗一行逃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当地官员都跑光了，无人供应膳食，代宗和护驾禁军又冷又饿，处境极为狼狈。就在这个时候，驻守陕州的观军容使鱼朝恩马不停蹄地赶来救驾了。

饥寒交迫的代宗李豫顿时百感交集。

危难时刻，文臣靠不住，武将也靠不住，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十月初九，吐蕃军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长安。

同日，吐蕃大将马重英与唐朝降将高晖一起导演了一幕闹剧：拥立广武王李承宏（玄宗堂兄邠王李守礼之孙）为帝，翰林学士于可封为宰相，同时又改年号，设百官，忙了个不亦乐乎。

随后，吐蕃人开始烧杀抢掠，"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早早就卸掉武装、躲藏在民间的禁军官兵，此刻非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吐蕃人的暴行，反而趁乱加入了抢劫的行列。长安士民不堪其扰，纷

纷逃出长安，躲进了终南山。

十月十二日，代宗在鱼朝恩的护卫下逃到陕州，四散逃命的文武百官才陆陆续续前来见驾。郭子仪行至御宿川（今陕西长安县西南），得知天子已经脱离危险，便决定不去陕州，而是沿秦岭山麓东行，前往商州、武关等地集结部众。他对王延昌说："溃散的禁军将士大部分都在商州，我们现在赶过去，把散兵游勇召集起来，同时征调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北）的卫戍部队，不出数日，便可北上蓝田，反攻长安。"

此时此刻，郭子仪麾下仅有三十名骑兵。

吐蕃入寇长安的这一年，郭子仪已经六十七岁了，岁月的风霜早已染白了他的双鬓，仕途的坎坷也屡屡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这一切却不曾磨灭他匡扶社稷、保家卫国的勇气和信念。

如果没有郭子仪，长安的收复很可能会遥遥无期，而代宗李豫的逃亡生涯无疑也将被大大延长。因为，当代宗逃到陕州并向四方发出勤王诏书后，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道节度使居然因痛恨宦官专权对朝廷心生不满，而按兵不动，没有人向关中派出一兵一卒！

这其中，就包括当时驻守在徐州的平叛功臣李光弼。

换句话说，宦官程元振的擅权乱政早已寒了天下人的心，就连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的李光弼也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对天子和朝廷彻底寒了心。

然而，郭子仪的心没寒。

即便吐蕃大兵压境的这一刻，权宦程元振还在不择手段地算计他，可他的心还是没寒。

一个人要成为名将不难，要成为功臣也不难，难的是当普天之下人人放弃信念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选择坚持。郭子仪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之所以远远高于李光弼，并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会打仗，也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场哲学，而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忠实于内心的信念，更善于在人生的重大时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足以让人心寒血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最终，你的心寒不寒，你的血冷不冷，并不取决于别人，而是取决于你自己。

郭子仪也许就是凭着身上那一腔永不冷却的热血，才能置个人的得失

荣辱于度外，并且屡仆屡起，愈挫愈奋，从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终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乱世之中始终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并成为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唯一一个善始善终（既保全了禄位又保全了名节）的功臣元勋！

十月中旬，郭子仪沿蓝田、商州、武关一路南下，先后集结了四千余名溃散的将士，随即掉头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师，告谕将士“共雪国耻”、克复长安。稍后，代宗李豫担心吐蕃人会进军潼关，便下诏命郭子仪率军前往陕州护驾，但郭子仪却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代宗想想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反攻长安的计划。

可是，郭子仪只有区区四千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吐蕃的二十余万大军呢？

强攻当然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

郭子仪决定采用疑兵之计，迷惑吐蕃人，迫使其主动撤离长安。

随后，郭子仪派遣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等人率部进驻蓝田。长孙全绪按照郭子仪的计策，白天大张旗鼓，晚上燃起无数篝火，让吐蕃人以为唐朝大军已至。此外，长孙全绪又派人潜入长安，暗中联络了一批江湖豪杰，天天在朱雀大街上击鼓大呼，制造混乱，同时又在百姓中散布消息，说郭子仪已经集结了数十万大军，不日便要攻打长安。

吐蕃人被郭子仪的疑兵之计搞得人心惶惶，遂萌生退意，加之长安的美女财帛也已被他们劫掠一空，所以在他们看来，此刻实在不值得为了这座空城付出血的代价。十月二十一日，吐蕃军队匆匆带上他们的战利品，当天就全部撤出了长安。

降将高晖一见吐蕃人扔下他跑了，无奈之下，只好带着麾下的三百余骑东走，走到潼关时，被守将李日越抓获，当场就被砍了脑袋。

十月二十三日，得知长安光复的消息，代宗李豫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他即日下诏，任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第五琦为京兆尹，同时让宰相元载取代程元振，担任元帅行军司马。

长安虽然又回到了唐朝的手中，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用郭子仪的话说，这是“国耻”。

帝国为什么会遭受这场国耻？

这笔账不能不算。

事实上，早在代宗避居陕州之时，太常博士柳伉就已经帮他把这笔账算了个一清二楚。柳伉说：“吐蕃人长驱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师，洗劫宫闱，焚烧陵寝，士卒却无一人力战，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长期疏远功臣，宠幸宦官，终究酿成大祸，群臣竟无人敢犯颜直谏，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刚刚离开京师，坊间便发生骚乱，暴民公然抢夺府库，自相残杀，此京畿民众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诏各道兵马勤王，尽四十日，无一辆战车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既然内外皆叛，那么请问陛下，今日之势，是安是危？若以为危，岂能高枕无忧，不为天下讨伐罪人？”

柳伉得出的结论是：要想铲除祸乱之源，保全宗庙社稷，就必须砍掉一个人的脑袋。

这个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还说，除了诛杀程元振外，还必须把各级宦官的职权收回，交还各有关部门；并收回神策军的兵权，交给朝中的大臣。同时，皇帝还要削除尊号，下诏罪己，宣布从此改过自新，否则甘愿逊位让贤。

最后，柳伉跟皇帝打赌：“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请将臣全家老小碎尸万段，以谢陛下！”

柳伉这笔账一算下来，把代宗李豫的脸皮撕得可谓一干二净。

李豫为此郁闷了好多天。

可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柳伉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忠言。

不过，事实归事实，忠言归忠言，让代宗把宦官们都给废了那是不可能的，让他下诏罪己、改过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于诛杀程元振嘛……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

十一月初二，代宗下诏削除了程元振的所有官爵，将他遣回原籍。

代宗之所以不杀程元振，表面原因固然是程元振有剪除李辅国之功，代宗不忍诛杀，可事实上，此次吐蕃入寇也让代宗李豫发现了很多问题。就像柳伉所说的那样，这次长安沦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程元振专权乱政之外，无论是士卒将帅、公卿百官，还是四方藩镇，人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要追究罪责，此次应该问罪的绝不止

程元振一个！

既然如此，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杀了他就能让所有人从今往后对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代宗不杀程元振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宦官这个群体仍然抱有极大的信任，因而不想把事情做绝，以免伤了其他宦官的心。

在代宗看来，自己在很多时候仍然是要依赖宦官的。比方说，万一哪天敌寇又来了，士卒将帅、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了，四方藩镇又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了，他身边至少还有像鱼朝恩这样的宦官保驾。

这次吐蕃入寇让代宗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没有谁是真正靠得住的！

百官要是靠得住，母猪恐怕都会上树；藩镇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会跳舞……至于说宦官，当然也不见得始终靠得住。但最起码，宦官总是一支制衡百官、制约藩镇的力量；最起码，在天子孤立无援的时候，宦官总是一副可以暂时依靠的肩膀。

说白了，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李唐朝廷就已日渐陷入内忧外患、人心离散的境地了。此次吐蕃入寇，就是李唐王朝所有老问题和新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任用宦官“或许”会有危险，但不用宦官则“必然”会有危险！

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李唐天子并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知有害也得用。这是他们的无奈。

这一年十二月，代宗从陕州返回长安，郭子仪率城中百官及唐军各部到浐水（灞水支流）东岸迎接，并伏地待罪，主动表示要承担长安失陷之责。代宗亲手把他扶起，激动地说：“都怪朕没有早一天起用爱卿，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

十二月末，代宗下诏，任命此次护驾有功的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领各部禁军。

从此，鱼朝恩彻底取代程元振，成为“权宠无比”的新一代权宦。

一切终将过去，一切终将再来。

这是历史的魔咒，将永远徘徊在唐代宗李豫的头顶上，并将永远缠绕在此后的十二任大唐天子的头顶上。

烽火再燃：仆固怀恩之乱

吐蕃人一走，代宗李豫就必须着手解决仆固怀恩的问题了。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代宗命刑部尚书颜真卿前往汾州，准备向仆固怀恩发出最后通牒，命他入朝面圣。

可是，颜真卿不肯去。

并不是他怕死，而是他知道现在去已经没有用了。

早在吐蕃占领长安、代宗流亡陕州时，颜真卿就曾主动提出要去汾州，以社稷有难为由，迫使仆固怀恩入朝，可代宗却担心仆固怀恩趁机叛乱，所以执意不允。

在颜真卿看来，当时那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现在再去召仆固怀恩入朝，他绝对不肯来，所以去了也是白去。颜真卿对代宗说："陛下在陕州时，臣若前往汾州，以君臣大义为由命他勤王，他没有理由不来。可如今陛下已经还京，他既无勤王之功，又有兵权被削之忧，此时召他，他如何肯来？而且，一直咬定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仙、李抱玉、鱼朝恩四人而已，其他文武百官都认为仆固怀恩冤枉。臣以为，如今最妥当的办法，就是以郭子仪取代仆固怀恩，这样不需要发动战争，便可消除潜在的叛乱。"

就在代宗考虑这个建议的时候，一个在汾州担任别驾的官员忽然回到了京师，代宗立刻召见了他。

这个人叫李抱真，是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的堂弟，他知道李抱玉和仆固怀恩之间已经是不共戴天了，而且仆固怀恩确实心怀异志，所以赶紧溜之大吉，以免惹来杀身之祸。

代宗问李抱真如何对付仆固怀恩，李抱真答："仆固怀恩不足为忧。因为朔方将士日夜思念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怀恩骗他们说郭子仪已经被鱼朝恩杀害了，将士们信以为真，才会服从于他。陛下若能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则朔方将士必定会脱离仆固怀恩，亲附朝廷。"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代宗就没什么好考虑的了。用郭子仪取代仆固怀恩，确实是釜底抽薪的良策。

然而，还没等代宗将这个办法付诸实施，河东就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仆固怀恩动手了。

仆固怀恩的首要进攻目标，当然非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莫属。他事先买通了辛云京麾下的都知兵马使李竭诚，准备里应外合攻取太原。没想到辛云京的警惕性非常高，很快就察觉了仆固怀恩的阴谋，遂斩杀李竭诚，并加紧修固防御工事，以防仆固怀恩来犯。

广德二年正月中旬，仆固怀恩得知李竭诚被杀的消息，索性拉起反旗，命其子仆固玚率部攻打太原。辛云京立刻出城迎战。由于他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武器精良，士卒用命，因而一战就击溃了仆固玚。仆固玚被打得大败而回，只好放弃太原，转攻榆次（今山西榆次市）。

作为安史之乱余波的仆固怀恩之乱，就这样爆发了。

外寇之兵戈方息，内战之烽火再燃！

代宗李豫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奈。

像这种前仆后继、旋灭旋起的叛乱，像这种兵连祸结、内忧外患的局面，究竟要到哪天才是个头呢？

正月二十日，代宗正式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数日后又加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离京赴任时，代宗满怀期望对他说："怀恩父子负朕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二月初，郭子仪进驻河中（今山西永济市），准备进剿仆固怀恩父子。仆固玚围攻榆次半月不下，派人紧急征调祁县驻军，当地守将赶紧把部队交了出去。士卒们还没来得及吃饭就被迫上路了，一路上牢骚满腹，拖拖拉拉。负责率领这支援军的将领焦晖、白玉压根不想跟着仆固怀恩父子造反，只是迫于军令不得不出征，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现在看见士卒们又裹足不前，他们担心驰援不及被仆固玚问罪，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对着走在最后面的几个士兵张弓便射。

士卒们纷纷抱怨："将军干吗射自己人？"

焦晖和白玉没好气地说：“现在跟着人家造反，终究难逃一死。反正是一死，射死有什么关系！”

抵达榆次后，仆固玚认为他们来得太晚，指着鼻子破口大骂。部队中的胡人辩解说：“我们骑马，本来速度很快，都是被那些汉人步兵拖累了。”

仆固玚不分青红皂白，愤而暴打汉人士兵。被打的士卒无不咬牙切齿，说：“这小子眼里只有胡人，根本不把我们汉人当人看！”

经此变故，焦晖和白玉愈发忍无可忍。当天夜里，他们召集了所有汉人士卒，告诉他们反正是一死，不如跟仆固玚拼个鱼死网破，或许还能为朝廷建功。士卒们纷纷响应，随即在焦晖和白玉的带领下发动兵变，杀死了毫无防备的仆固玚。

仆固怀恩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刚揭起反旗，儿子就莫名其妙地死在了乱兵手中。

仆固玚之死，对仆固怀恩至少造成了三重打击：一、白发人送黑发人，诚乃人生最为惨痛的遭遇之一；二、仆固玚不仅是仆固怀恩的儿子，更是他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如今刚刚起事便痛失一臂，无疑是极大地削弱了仆固怀恩的军事实力；三、仆固怀恩父子刚刚起事，麾下部众就发动了兵变，这足以证明，朔方将士的人心仍在李唐，一旦失去了这支劲旅的拥戴，这场反叛还能有多大胜算？

为此，仆固怀恩一连数日忧惧难安。

仆固怀恩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离开河东，前往灵武（朔方治所），召集朔方军中仍旧效忠于自己的一部分胡人士兵，同时派人去跟回纥、吐蕃等异族联络，请他们发兵，联手对付李唐。

主意已决，仆固怀恩便去向老母亲辞行，不料一进门就遭到了老母亲的一通训斥：“我屡屡告诫过你，国家待你不薄，绝不可造反，可你就是不听！如今众心已叛，灾祸随时可能降临，你说该怎么办？”

仆固怀恩无言以对，只好跪地再拜，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然后起身疾步向外走去。他母亲也是胡人，生性剽悍，见儿子不言而去，顿时火冒三丈，随手抓起一把刀就追了上去，一边追还一边喊：“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谢三军！”

仆固怀恩回头一看，大惊失色，当即拔腿就跑。

老太太虽然是唐代人，不像宋以后的妇人那样裹小脚，但毕竟上了年纪，所以追了一段路就再也追不动了，只好停下脚步，可嘴里犹自对着仆固怀恩远去的背影詈骂不休。

仆固怀恩当天就带着麾下仅有的三百亲兵离开汾州，向西渡过黄河，仓皇逃往朔方。

当时，朔方的留守将领是浑释之，仆固怀恩事先给他递了一道公函，声称奉朝廷之命，率朔方军归镇，让他打开城门，出城迎接。此时浑释之已经听说了仆固怀恩反叛的消息，但尚未接到朝廷的正式通报，于是半信半疑地对左右说："仆固怀恩恐怕是打了败仗，溃逃至此吧？"

浑释之的副将、也是他的外甥张韶向来亲附仆固怀恩，马上接口说："这也未必。说不定仆固怀恩已经幡然悔悟，所以才率军归镇，我们岂能闭门不纳！"

浑释之犹豫不决。数日后，仆固怀恩的前锋已至灵武，浑释之不得不开门接纳。张韶马上将浑释之的疑虑告诉了仆固怀恩的手下。仆固怀恩接到手下的密报后，随即命张韶设计杀掉了浑释之，然后将其部众的指挥权交给了张韶，最后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灵武。

当然，张韶只是仆固怀恩手中的一颗棋子。仆固怀恩顺利入踞灵武后，张韶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数日后，仆固怀恩随便找个借口就命人打断了张韶的腿，然后把他关了起来。张韶大呼冤枉，仆固怀恩冷笑着对他说："浑释之是你的亲舅舅，你尚且可以把他出卖，又怎么可能效忠于我呢？"

仆固怀恩逃离汾州后，其时正驻守沁州（今山西沁源县）的朔方将领张维岳大喜，立刻赶到汾州，杀了焦晖、白玉等兵变将领，将其诛杀仆固玚之功据为己有，然后上报郭子仪。

郭子仪马上派部将卢谅前去汾州核实情况，张维岳遂重金贿赂卢谅。郭子仪得到卢谅的回报后，当即上表朝廷，为张维岳请功，同时将仆固玚的首级传送京师。

二月初，郭子仪率部进驻汾州，数万朔方将士欢欣鼓舞，纷纷喜极而泣。

得知仆固玚被杀、仆固怀恩逃亡的消息，群臣纷纷入宫向代宗恭贺。代宗李豫却惨然不悦，说："朕未能推诚立信于臣下，导致为国建功

的人走到这个地步，有什么好祝贺的？”

随后，代宗派人前往汾州，把仆固怀恩的母亲接到了长安，并且好吃好喝供了起来。

当然，代宗李豫可不是想帮仆固怀恩尽孝的。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这老人家已经成了代宗的人质。

虽然朝廷在饮食起居等各方面都提供了极为优厚的待遇，但老人的心境可想而知。一个月后，仆固怀恩的母亲就在无以排遣的抑郁和忧愤中一病而亡了。代宗下令以礼厚葬。朝野上下听说此事，无不替仆固怀恩感到悲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被代宗李豫客客气气请到长安当人质的不止仆固怀恩的母亲，还有另一个平叛功臣的母亲。

谁？

李光弼。

在当时的唐朝天下，要论威望、功勋和军事才能，唯一可以和郭子仪相提并论的，并不是仆固怀恩，而是李光弼。然而，自从吐蕃入寇之后，代宗李豫对李光弼的防范和怀疑，已经丝毫不亚于前些时候对仆固怀恩的猜忌了。

理由很简单，在代宗李豫看来，吐蕃入寇，朝廷下诏命各地勤王，你李光弼却自始至终按兵不动，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宦官程元振专权跋扈，使你对朝政感到失望而引起的吗？

不，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李豫想，这些年来你李光弼转战四方，自以为功劳在仆固怀恩之上，可最终平定史朝义叛乱的功劳却落进了仆固怀恩一个人的手中，你李光弼心里面，难道就没有辛云京式的酸葡萄情结？恐怕是有的吧？

再者，说到底你李光弼也是一个契丹人、一员番将，而且手握重兵，雄踞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云京对仆固怀恩的怀疑，在你李光弼身上也照样可以成立。既然如此，朕当然就要采取一些手段，预防你变成仆固怀恩第二了。

也许正是居于这样的想法，所以吐蕃退兵后，代宗李豫马上把领兵驻扎在徐州的李光弼调往洛阳担任东都留守，表面上示以优宠，实际上

夺其兵权。

果然不出代宗所料，李光弼的反应和当初的仆固怀恩如出一辙。他以保护江淮地区的粮食转运为由，始终待在徐州，拒绝赴任。

保护江淮粮运？

这样的借口是何等牵强啊！

代宗在失望之余，内心不免生出更深的担忧和疑虑。

当时，李光弼的母亲住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于是代宗便频频派遣宦官前去“慰问”，以此向李光弼施加压力，目的是促使他服从调遣。然而李光弼却不为所动。

代宗一狠心，断然把李光弼的母亲和弟弟从河中接到了长安，表面上礼遇甚周，并安排李光弼的弟弟在禁军中担任职务，但谁都知道，这是天子攥在掌心里的政治筹码，目的是以此要挟李光弼，防止他像仆固怀恩那样起兵造反。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代宗李豫与功臣李光弼之间的君臣关系实际上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随时有可能破裂。

对此，李光弼的心里当然不会好受。

自己戎马一生，对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为国家出生入死，屡建殊勋，不料到头来却成了天子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这叫他情何以堪？

可是，让李光弼放弃兵权，去洛阳当一个不大不小的东都留守，他实在是不甘心。更何况，就算他老老实实到洛阳去上任，天子对他的猜忌也不见得会就此消除。更有可能的是，解除兵权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随便找个罪名贬谪流放，到最后很可能就是兔死狗烹！

自古以来，“功高不赏”几乎是每个功臣的必然结局，他李光弼又岂能独免？

所以，李光弼只能硬着头皮和代宗死扛。

这一扛，很快就扛出病来了。

而且这病来势凶猛，一下子就把李光弼击倒了。史称“光弼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每申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惧朝恩之害（实际

上是惧怕代宗之害），不敢入朝，（部将）田神功等皆不禀命，因愧耻成疾。”（《旧唐书·李光弼传》）

李光弼很快就病入膏肓。临终前，左右问他有何遗言，李光弼只说了一句话：“我久在军中，不得奉养母亲。既为不孝之子，夫复何言！”

很显然，最让李光弼抱憾的事情，就是一生为国尽忠，却不能为母尽孝；而最让李光弼至死难以释怀的事情，就是一辈子替朝廷征战沙场，到头来居然连累母亲成了天子和朝廷的人质！

广德二年七月，李光弼带着诸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终年五十七岁。当然，李光弼的身后事是极尽哀荣的。代宗不仅为之辍朝三日，追赠太保，谥号“武穆”，而且为李光弼操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他派遣宦官鱼朝恩到李光弼母亲的府上吊唁，命京兆尹第五琦负责丧葬事宜。葬礼举行那天，代宗还专门下诏，命宰相率文武百官护送李光弼的灵柩，并一直护送到了延平门外。

仆固怀恩借张韶之手除掉了浑释之，紧接着又收拾了张韶，把留守灵武的朔方部众悉数收入麾下，于是兵势复振。

眼看一场战乱已经迫在眉睫，代宗深感忧虑。

为了避免战争，代宗不得不采取了高姿态，不仅对仆固怀恩留在河东的家属厚加安抚，而且专门下诏吹捧仆固怀恩，称其“勋劳著于帝室、及于天下”云云，还说：“朝廷和你之所以产生猜疑和误会，都是因为一些小人从中挑拨离间，仔细考察爱卿的内心，事实上并无反叛之意，还是让君臣之间的大义和深情恢复如初吧！只不过河北既然已经平定，朔方也已有了新的任命，所以就解除你的河北副元帅和朔方节度使之职，但是太保、中书令、大宁郡王等官爵，则全部保留。盼望即刻来京，不要再有猜疑。”

看着这道假惺惺的诏书，仆固怀恩冷笑不已。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跟我来这套？你当我仆固怀恩是吃素的？

广德二年八月，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联军共计十万人悍然入寇，一时间京师震骇。

该来的还是来了。

代宗一想起去年吐蕃大军入侵长安的那一幕，心中犹有余悸。

这一次，长安能守得住吗？

力挽狂澜：郭子仪单骑盟回纥

边境战报传来，代宗紧急召见郭子仪，问他有何御敌之策。郭子仪胸有成竹地说：“仆固怀恩不会有什么作为。”

代宗颇感意外，问他何故。

郭子仪说：“仆固怀恩虽然勇悍，但为人刻薄寡恩，将士并不拥戴他。况且，怀恩麾下将士都是臣的旧部，他们必不忍与我刀刃相向，所以臣料定，仆固怀恩难以有何作为。”

代宗闻言，大为欣慰，随即命郭子仪率部出镇奉天（今陕西乾县），以御西来之敌。

九月下旬，仆固怀恩率回吐联军逼近邠州（今陕西彬县），当时的邠州守将是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他立刻派人向郭子仪告急，郭子仪即命其子郭晞率数万人马驰援邠州。

十月初，仆固怀恩的前锋进抵宜禄（今陕西长武县），被白孝德击退。数日后，仆固怀恩率大军进抵邠州，开始攻城，白孝德和郭晞据城力战。

十月初六，仆固怀恩意识到邠州不易攻克，遂带着大军绕过邠州，直逼奉天。朝廷闻讯，立刻宣布京师戒严。郭子仪麾下诸将纷纷请战，郭子仪说：“敌军深入我方腹地，急于速战速决，我军应坚壁以待，绝不主动出击。敌人认为我们怯战，戒备自然松懈，届时才有机会将其击破。如果现在马上出击，万一失利，军心势必离散。胆敢再言出战者，立斩！”

七日夜，郭子仪在乾陵以南选择了一个险要地形，命士兵构筑了一座坚固的营寨。

八日拂晓，回吐大军进抵奉天。仆固怀恩原以为郭子仪没有戒备，到此一看，才发现唐军早已严阵以待。而且，城外的营寨与奉天互为掎角之势，无论回吐大军攻击何处，必然都会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如果兵分两处，同时进攻，又担心被唐军抓住破绽，各个击破。尤其是像回吐联军这种临时凑在一起的部队，在协调、配合方面本来就存在问题，一旦分兵，形势肯定更为不利。

因此，当回纥人和吐蕃人见到郭子仪给他们摆下的这个阵势后，顿时大为惊愕，观望良久后，终究不敢进攻，遂不战而退。

郭子仪抓住战机，命部将李怀光率五千精骑追击，一直追到了麻亭（今陕西彬县南）。

十月十三日，回吐大军退到邠州。仆固怀恩很不甘心，再次对邠州发起进攻，但强攻七八天，始终未能攻克。此时回吐联军粮草已尽，仆固怀恩无奈，只好于二十一日率众渡过泾水，向西而遁。

仆固怀恩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就这样无果而终了。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再度纠集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数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入侵：吐蕃军团从北路进攻奉天（今陕西乾县），回纥军团继之，仆固怀恩率朔方军殿后；党项军团从东路进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吐谷浑及奴剌军团从西路进攻周至（今陕西周至县）。

郭子仪向代宗紧急奏报："胡虏全是骑兵，进军速度如飞，绝不可掉以轻心，请皇上下令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滑濮节度使李光进、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各部火速出兵，扼守各个军事要地。"

代宗随即颁下诏令。然而，除了李忠臣部接到诏令即刻开拔之外，其他各藩镇都反应迟钝，并未及时出兵。

如果不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个重大意外，致使整个局势为之逆转，大唐王朝很可能又要继两年前的吐蕃入侵之后，再次经历一场严峻的战争考验，而西京长安也很可能再次陷落，代宗李豫也很可能再度狼狈出逃。所幸，这个意外发生得非常及时——仆固怀恩死了。

就在多国联军一路向长安猛扑过来的中途，仆固怀恩忽得暴病，旋即被转移到后方，于这一年九月初八死于鸣沙（今宁夏中宁县）。

仆固怀恩一死，多国联军顿时失去联结的纽带，开始各自行动。而仆固怀恩所率的朔方部众则数易其主：先是被仆固怀恩囚禁的张韶逃出监狱，纠集旧部夺取了指挥权；紧接着将领徐璜玉又杀了张韶，接管了朔方军；没多久大将范志诚又杀了徐璜玉，再次夺取了指挥权。

九月十五日，吐蕃十万大军突然进抵奉天城下，京师再度震恐。

吐蕃人正在城下列阵之际，奉天守将、朔方兵马使浑瑊趁其立足未

稳，突然率领二百骁骑冲入敌阵。浑瑊一马当先，左砍右劈，吐蕃部众大为惶骇，无不披靡。片刻之后，浑瑊就抓获一名吐蕃将领，挟着他策马奔回，随行的二百骁骑无一伤亡。城头上的唐军将士见此情景，顿时士气大振。

十六日，吐蕃军开始大举攻城，浑瑊率众死守，数日内与吐蕃大小二百余战，斩杀五千余人。吐蕃人见唐军如此悍勇，只好拔营而去。

就在浑瑊力拒吐蕃的同时，唐军的各路兵马已纷纷进入战略要地驻防：郭子仪率朔方军进驻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忠臣进驻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李光进进驻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北），马璘和郝庭玉进驻西渭桥（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李抱玉进驻凤翔，宦官骆奉仙与将军李日越进驻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进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最后，代宗李豫亲率禁卫六军屯驻禁苑。

为了鼓舞士气，代宗于九月二十一日下诏，声称要御驾亲征。

皇帝调门很高，说要亲征，可有人却一心只想着逃跑。

这个人就是禁军统领鱼朝恩。

自从听说吐蕃的十万大军在攻打奉天后，鱼朝恩就开始计划逃跑了。他准备挟天子逃往河中，又担心百官反对，决定以武力威逼，迫使百官就范。

某一日早朝，文武百官在宫门外站立多时，眼见上朝的时间早已过了，可宫门却迟迟不开。就在众人大惑不解之际，门忽然开了，只见鱼朝恩一脸阴沉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数十名刀剑出鞘的禁军士兵。

这唱的是哪一出？

百官面面相觑，不知所为。

紧接着，众人听见鱼朝恩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吐蕃屡屡进犯京畿，天子车驾准备巡幸河中，诸位意下如何？”

百官大为错愕。

可他们都知道，鱼朝恩这句话不是设问句，而是陈述句；他不是在征求众人的意见，而是在宣布他的决定。

一瞬间，满朝文武鸦雀无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姓刘的给事中忽然

大步走出队列，面对鱼朝恩厉声道：“敕使（当时对宦官的统称）是想造反吗？现在京师周围大军云集，您不想同心戮力抵御敌寇，却想裹挟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不是造反是什么？”

此言一出，鱼朝恩当场语塞。

他又惊又怒，可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一句反驳的理由，只好拂袖而去。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人胡三省在这个地方写了一句批语：“给事中刘君，身立庙堂，刚正不阿，有如此英雄表现，史书中居然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不知道唐朝设立史馆是干什么用的。”

诚哉斯言！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虽有秉笔直书、不畏强权的传统，但这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能按照这种精神行事的史官恐怕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的。大部分史官，拿的是皇帝的俸禄，看的是大官的脸色，在作历史记录时，或许都会遵循某种约定俗成的行规，那就是：乌纱帽大的，不仅要录其言，载其行，更要留其名；至于乌纱帽小的，能把你的事迹如实记录就算对得起你了，你还想要什么？

名留青史，千古流芳？

做梦去吧！

从永泰元年九月中旬到下旬，关中地区一直暴雨倾盆，这给吐蕃军队的行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眼看各路唐军已经在长安外围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加上天气如此恶劣，吐蕃人只好放弃攻打长安的计划，掉头攻击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准备最后捞一把就走。

与此同时，党项军队则在白水（今陕西白水县）和蒲津关（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渡口）一带烧杀掳掠，数日后引兵遁去。

九月底，吐蕃军队劫掠了大量财帛和数万男女后，开始向北撤退。行至邠州时遇到回纥军团，吐蕃人马上又打起了长安的主意，遂与回纥合兵一处，掉头围攻泾阳（今陕西泾阳县）。

由于仆固怀恩已死，吐蕃与回纥谁也不服谁，都想当老大，结果差点翻脸，遂分开扎营，相互戒备。

此时驻守泾阳的是郭子仪。

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将对手分化瓦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机会。

郭子仪即刻遣使前往回纥军营，希望与回纥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攻击吐蕃。回纥人看着来使，半信半疑地说：“郭公的确在此吗？你在骗我吧？若真在此，何不出来一见？”

使者带回了回纥人的话，郭子仪对左右说：“如今敌众我寡，不能跟他们硬拼。当初，回纥曾数度与我们结盟，我现在亲自前往回纥大营，和他们再续前盟，定能不战而下。”

诸将闻言，一致要求郭子仪挑选五百精骑作为护卫。郭子仪说：“这是害我。”随即跃上马背。他儿子郭晞拉住马缰阻拦他说：“回纥人是虎狼，大人是帝国元帅，岂能拿自己的命去赌？”郭子仪说：“今天如果跟他们开战，不仅我们父子会同死沙场，国家也会陷入危险之地。我诚心诚意前去会盟，他们若能接受，则为四海之福；若不能接受，我身虽死，全家亦可保全。”说完狠狠一鞭抽在郭晞手上，厉声喝道：“走开！”

随后，郭子仪只带着数名亲兵出城，来到回纥大营外喊话：“郭子仪前来拜访。”

回纥人一听，顿时又惊又疑。

咱们不过就这么随口一说，没想到他还真来了。

回纥大元帅药葛罗（登里可汗之弟）更是不敢相信。他马上命大军列阵，然后骑马立在阵前，搭弓上箭，一脸警惕。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更加让人难以置信——只见郭子仪单骑驰入营中，一边策马向药葛罗走来，一边“免胄、释甲、投枪”，也就是把身上的头盔、铠甲和武器全部扔掉了。

回纥诸酋长面面相觑，异口同声说：“真是郭子仪！”随即纷纷下马，毕恭毕敬地向郭子仪行跪拜大礼。

郭子仪翻身下马，就这样手无寸铁地走到药葛罗面前，说：“你们回纥有大功于唐，唐朝待你们亦不薄，为何背弃盟约大举来侵？这是弃前功而结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的愚蠢行为！仆固怀恩背叛君王、离弃母亲，又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我现在只身前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只不过我的部下必与你们死战！”

药葛罗万万没想到郭子仪会走这步险棋。如今人家孤身前来、手无寸铁，光这份胆识就足以令人敬畏三分；而自己则如临大敌、剑拔弩张，首先在气势上就输给了对方。换句话说，双方虽然尚未开战，但第一回合，郭子仪已经不战而胜了。

药葛罗干笑几声，一脸尴尬地说："怀恩欺骗我们，说天可汗已经驾崩，说您也已去世，国中无主，我们才敢前来。而今既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又在此统领大军，而怀恩又已经为天所杀，我曹岂敢与令公开战！"

郭子仪知道，眼下自己虽然在道义上占了上风，但仅凭道义是无法让回纥人退兵的。说白了，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要晓之以理，更要诱之以利！

这一次来，郭子仪已经给回纥人准备了一份厚礼。

当然，这份厚礼不是现成的，需要回纥人跟唐军联手去取。

因为东西在吐蕃人那里。

郭子仪说："吐蕃人凶残无道，趁我国内乱之际，侵我边塞，焚我州县，掳我财帛子女。此次，吐蕃所掠之财不可胜计，马牛杂畜满山遍野，运载财物的队伍长达数百里，这是上天赐给你们的礼物，不取岂不可惜？站在你们的角度替你们考虑，我个人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利的事情了。"

药葛罗一听到"所掠之财不可胜计，马牛杂畜满山遍野"这句话，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对啊，与其跟唐朝为敌，一个州一个县的辛辛苦苦去抢，还不如把吐蕃人抢来的东西一股脑儿全给劫了！如此省心省力的大好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药葛罗越想越美，赶紧一脸正色说："我被怀恩所误，差点铸成大错，实在对不住令公。请令公给我一个出力的机会，我一定击败吐蕃人，以此将功赎罪。"

郭子仪单人独骑、三五句话，就把来势汹汹的回吐联军给摆平了。

唐回双方把盏盟誓，握手言和。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役就此烟消云散了。

吐蕃人得到唐回结盟的消息后，大为惊骇，当天晚上就拔营而逃。唐回联军合力追击，在灵台（今甘肃灵台县）西郊大破吐蕃军队，斩杀万余人，夺回大量财帛，并救回被掳掠的男女四千人。

随后，仆固怀恩麾下的一些骁将自知难有作为，遂陆续归降朝廷。

至此，仆固怀恩之乱宣告终结。

“郭子仪单骑盟回纥”的一幕，从此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战例。

仆固怀恩败亡了，回纥人和吐蕃人也都走了，代宗李豫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可是，天下能从此太平吗？

永泰元年的深冬，代宗李豫伫立在历尽劫难的长安宫阙之上，伫立在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王朝的历史中途，看见此前一百四十七年的帝国往事在他的视野中渐行渐远——无论是旧日的繁华与荣光，还是曾经的无奈与苍凉，都已泛黄枯萎，随风而逝。

未来的岁月，李唐王朝能否远离血火与刀兵的劫难，能否重现昔日的辉煌？

李豫不知道。

他只知道，此时此刻的大唐帝国，与安史之乱爆发以前的大唐帝国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判若天渊了。

李豫清楚地记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也就是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前一年，天下有户口九百余万，人口五千二百八十余万。然而，到了史朝义败亡后的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户部呈奏的普查结果是：天下总户数仅余二百九十余万，总人口只剩下一千六百九十余万。也就是说，经历了一场安史之乱，帝国的总户数就减少了六百余万，总人口锐减了三千六百万，整整丧失了三分之二！

三千六百万……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啊！

不，这不是数字，这是三千六百万条有血有肉的生命，这是三千六百万个鲜活生动的灵魂！可他们就在这样一场空前的浩劫与灾难中消失了，就这样被历史佬儿的无情之手一下子抹掉了……

李豫感到了一种浸透骨髓的无奈和悲凉。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他只能默默地向天祈祷，祈祷李唐王朝能够在未来的岁月里四海升平、帝祚永昌。

此刻，凛冽的北风正在龙首原上驰骋呼啸，四方的浓云正在长安上空奔涌漫卷。辽阔苍茫的天地之间，这座历经劫难的大唐帝京，看上去显得无比的渺小和孤单……

[1]　唐代民俗，凡宴会中有人为其他人献舞，对方必赠与彩色绸缎，称为缠头彩，以示礼尚往来之意。

第五章 一团乱麻的帝国

安宁的代价："蜀中之乱"始末

如果把大唐帝国看成是一个人的身体，那么安禄山和史思明无疑等于恶性肿瘤，而"安史之乱"就是帝国罹患的癌症。

癌症之所以可怕，就在于癌细胞的扩散。一旦它开始扩散，就算你把肿瘤割了也于事无补。如今的唐帝国正与此相似。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虽然都被灭了，但是无数的安禄山和无数的史思明却在帝国的四面八方蓬勃成长。紧继安史之后发动叛乱的仆固怀恩可以视为第一颗扩散的癌细胞。在他之后，历任大唐天子将会无奈地发现——正在或即将发生病变的细胞绝不是以个位数来衡量的，而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

更要命的是，你根本不知道哪一颗健康细胞会在哪一刻突然病变，你更不知道它会不会发展成像安禄山和史思明那么可怕的恶性肿瘤。

就比如现在，永泰元年冬，仆固怀恩之乱刚刚平定，原本相对安宁的蜀中就出事了——一个叫崔旰的将领把蜀中闹得鸡飞狗跳，让代宗朝廷大伤脑筋。

这个崔旰打仗是一把好手，深受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器重，曾奉命进攻西山（成都以西的山区）一带的吐蕃军队，连克数城，拓地几百里。班师凯旋之际，严武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据说还专门制造了一辆“七宝舆”（装饰有各种贵重珠宝的车），让他端坐其上，在一众军民既羡且妒的目光中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成都城，那感觉别提有多拉风了。

那一刻，崔旰恍然觉得自己就是传说中的盖世英雄。

永泰元年四月，严武死了，崔旰比死了爹妈还伤心。不过伤心归伤心，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赶紧推选一个跟自己关系比较铁的节度使。

崔旰很快就向朝廷推荐了一个叫王崇俊的大将。

只可惜，崔旰慢了半拍，被都知兵马使郭英干给抢了先。郭英干联络了其他几个高级将领，推荐了自己的哥哥郭英乂。

由于郭英干推荐在先，而且联名推荐的又是剑南道的主要将领，因而朝廷就任命了郭英乂。郭英乂赴任后，对曾经参与竞争的王崇俊很不爽，没过几天就随便找个罪名把他干掉了，然后又给崔旰发了一道调令，让时任西山都知兵马使的崔旰马上回成都，声称另有任命。

崔旰不傻，他当然知道这道所谓的调令就是一张死亡通知书，所以就以防备吐蕃为由，赖在西山不走。

郭英乂火了。

你小子居然敢抗命，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节度使了？别以为你坐了一趟七宝车就有多牛逼了，老子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随后，郭英乂就断掉了崔旰所部的粮饷。这一招实在阴损，一下子把崔旰逼得没有活路了。更令人不齿的是，因崔旰曾任汉州刺史，家眷都住在汉州（今四川广汉市），郭英乂就派人把他的家眷劫到了成都，还霸占了崔旰的姬妾。崔旰悲愤莫名，可人家毕竟是堂堂的节度使，位高权重，兵多将广，自己实在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崔旰只好率部进入深山，打算跟郭英乂打游击。

按说都把人家逼到这份上了，郭英乂也该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了，可这家伙偏偏要赶尽杀绝，于是“蜀中之乱”就此拉开序幕。

郭英乂随后便以帮助崔旰打吐蕃为名，亲自领兵进入西山，准备一举消灭崔旰。不料当时天降大雪，山谷中的积雪足足有数尺之厚，郭英

义的部队举步维艰，而且冻死了好多士兵和战马，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崔旰趁势出击，把郭英乂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逃，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郭英乂只带着残部一千人狼狈逃回成都。

这次交手让崔旰看清了一件事——这个郭英乂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根本不经打！

紧接着，一个念头浮出了崔旰的脑海。

彼可取而代之！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崔旰要取代郭英乂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崔旰的部众常年在山区地带跟吐蕃作战，士兵都比较吃苦耐劳，战斗力远远高于一般部队；而郭英乂麾下的部队常年驻守成都，养尊处优，打起仗来自然就比较脓包了。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崔旰和手下那帮兄弟相处好多年了，彼此感情深厚，将士同心；而郭英乂初来乍到，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将士拥戴，加之郭英乂生性残暴，不恤士卒，军令苛酷，所以蜀中将士们都跟他离心离德。

这样一比较，崔旰觉得自己基本上胜券在握了。接下来，只要找一个合适的出兵借口，就可以直取成都，把郭英乂给灭了！

借口要找总是有的，何况郭英乂做人本来就不咋地，要抓他的把柄易如反掌。很快，崔旰就利用郭英乂节度使府的选址问题，在蜀中大造舆论，说郭英乂想造反。

此话从何说起？

崔旰绝不是空口白牙乱咬人，他是有证据的。

——郭英乂所在的节度使府原本是玄宗幸蜀时居住的行宫，此地院宇华丽，花木扶疏，被当地人誉为“形胜之所”。玄宗回京后，有关部门就把行宫改为道观，还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玄宗的塑像，供奉在道观中供士民瞻仰。历任节度使来到剑南后，第一件事就是入观参拜，然后再正式上任。可郭英乂一来，居然对这块风水宝地垂涎三尺，马上把玄宗的塑像搬掉，把观里的道士全部驱逐，公然将此地占为己有。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不就是想造反吗？

崔旰对将士们说："英乂反矣！不然，何得除毁玄宗真容而自居之？"（《旧唐书·崔宁传》）

报仇雪恨的时刻到了。

永泰元年闰十月下旬，崔旰率所部五千余人攻打成都。郭英乂出城迎战，双方在成都西郊开打。不出崔旰所料，成都的部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而且多数将士对郭英乂心怀怨恨，都不想替他卖命。所以，连败数阵之后，郭英乂麾下的将领就纷纷投降了崔旰。崔旰随即命他们掉头攻击郭英乂。

郭英乂无力抵挡，就此大败，其麾下部众降的降、死的死、逃的逃，基本上全军覆没。郭英乂只身逃亡，可刚刚跑到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就被崔旰的好友、普州刺史韩澄捕获了。韩澄二话不说就砍了他的脑袋，派人送给了崔旰。

崔旰攻入成都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郭英乂的一家老小全部砍了。

堂堂剑南节度使郭英乂，到任还不满一个月，就这样落了个惨遭灭门、政息人亡的下场。

节度使一死，蜀中顿时群龙无首。于是各地将领纷纷起兵，扬言讨伐崔旰，实际上都是想趁乱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一时间，蜀中大乱。

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二月，代宗命当时的宰相杜鸿渐出任蜀中各道的副元帅，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负责平定蜀中之乱。

稍后，又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命二人同心协力，讨伐崔旰。

这个杜鸿渐就是当年在灵武拥立肃宗的大臣之一，此人生性怯懦、贪财好贿，别的本事没有，最擅长的就是政治投机。当年拥立肃宗，是他这辈子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仅此一票，他就捞到了整个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包括如今的这个宰相职位。

然而，眼下这个"平定崔旰"的任务却令他大为苦恼。因为上战场拼的是真本事，可杜鸿渐最缺的就是真本事。

怎么办？

看来也只能采取“拖”字诀了，让张献诚先上去打，视其成败再作打算。随后，杜鸿渐借故在长安迁延了一段时日。不久，蜀中的战报就传回了京师。

准确地说，这是一份败报——“献诚与旰战于梓州，献诚军败，仅以身免，旌节皆为旰所夺。”（《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晕死，这位献诚兄弟也太惨了，不但全军覆没，连旌旗符节都被人抢了，看来崔旰这小子还真是不好惹啊。既然如此，出兵进剿无异于自寻死路，剩下的办法，就只能是招抚了。

杜鸿渐此后又在京师磨了几个月，一直到这年秋天才慢慢腾腾地启程入蜀。出发前，杜鸿渐专门派人给崔旰送去了一封密信，向他郑重承诺，自己到任后只挂个虚名，军政事务全部交由崔旰处置，大家相安无事，以和为贵。

崔旰见信大喜，立刻着人给杜鸿渐送去了一封措辞谦恭的回函，同时还奉上了数千匹绢帛，让杜鸿渐心里乐开了花。

抵达成都后，杜鸿渐果然遵守承诺，成天和一帮文武将吏饮酒作乐，“州府事悉以委旰”，并且屡屡向朝廷推荐，说崔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好好重用，甚至表示要把自己的节度使职位让给他。

看到杜鸿渐的奏表，代宗真是哭笑不得。

朕让你去讨伐叛乱，你却跟叛将同穿一条裤子，这叫什么事儿？

皇帝很生气，不过后果并不严重。

因为代宗李豫实在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对付崔旰。

郭英乂和张献诚都是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即便不说身经百战，至少也是沙场老将，连他们都被打得那个熊样，再派人去打，除了劳师伤财之外，还能指望打出什么好来？

无奈之下，代宗只好采纳了杜鸿渐的建议，不但对崔旰既往不咎，而且还任命他为成都尹兼西川节度行军司马。

蜀中之乱就这么“平定”了，可这样的结果实在是让人无语。

因为胜利者不是朝廷，而是崔旰。

代宗为了换取表面的和平与安宁，不得不牺牲了朝廷的纲纪，不得不奉行跟杜鸿渐一样的准则——相安无事，以和为贵。

说白了，这就叫妥协纵容、姑息养奸！

第二年，在杜鸿渐的一再推举下，代宗又正式任命崔旰为西川节度使，并赐名为“宁”。从此，崔宁就成了蜀中的土皇帝。“在蜀十余年，地险兵强，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所淫污，朝廷患之而不能诘。”（《旧唐书·崔宁传》）

朝廷对崔宁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深感忧虑，可压根不敢过问。

也许，这就是“安宁”的代价。

三角政治

经过一场安史之乱，李唐朝廷涌现了三个政治强人，他们是：郭子仪，元载，鱼朝恩。在军界，郭子仪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牛人；在朝堂，元载是大权在握的首席宰相；在内廷，鱼朝恩是独掌禁军的头牌宦官。

三个人在政治上构成了一个相互制约又动态平衡的三角，而代宗李豫就站在三角之间，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个微妙的政治格局。

这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不但要考验一个帝王的智商，更要考验他的情商。

比如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二月，在代宗和郭子仪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事。

表面上看，这是件小事，可要是处理不当，则势必酿成一场大祸。

代宗和郭子仪不仅是君臣，还是亲家——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娶了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小两口平时也是恩恩爱爱的，但免不了也有拌嘴的时候。有一天不知何故，两个人忽然吵开了，而且互不相让，越吵越凶，最后郭暧冷不防冒出一句：“你仗着你老子是天子是吧？我实话告诉你，我老子根本瞧不上天子，你让他当他还不当呢！”

完了，冲动是魔鬼。郭暧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他知道，自己一时冲动喊出的这句话，足以让他脑袋搬家，也足以让他老子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更足以让郭氏满门跟着他一块遭殃！

别的不用说，光看升平公主此刻的表情，郭暧就已经知道自己闯下什么样的大祸了——公主一言不发，只是死死地盯着郭暧。

如果此刻公主的目光是火，郭暧肯定成了一块焦炭；如果此刻公主的目光是刀，郭暧肯定成了一摊肉泥。在盯了郭暧足足有半炷香的工夫后，公主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了。

她要去哪？

不用问，回娘家。

准确地说，是回皇宫。

郭暧一想到他那句灭九族的话马上会落进天子的耳中，顿时全身暴汗、双膝发软。他很想叫住老婆，跟她赔礼道歉，可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却令他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

公主就这么进宫了。

听到宝贝女儿怒气冲天地转述完那句话后，代宗李豫也愣了好一会儿。他的眼中瞬间闪过很多丰富的内容。不过，帝王毕竟是帝王，在这种时候情商自然是比普通人高的。

代宗莞尔一笑，说："这事你就不知道了。其实你郎君说得没错，他父亲要想做天子，这天下岂是咱们李家的！"

公主顿时目瞪口呆，原本一张樱桃小嘴此刻变成了一个硕大的圆。

代宗呵呵笑着，温言劝慰她赶紧回家，别耍小孩子脾气。随后，不管宝贝女儿如何暴跳如雷，代宗硬是让宦官和宫女把她送出了宫。

升平公主刚刚被架出宫，郭子仪就满脸惊惶地入宫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

年轻人就是郭暧，他此刻的脸色已经差不多跟死人一样了。

郭子仪对着天子纳头便拜，口口声声请求天子治罪——不但要治郭暧的大逆不道之罪，还要治他郭子仪的管教不严之罪。

代宗还是呵呵笑着，亲手扶起了郭子仪，说：“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闺房之言，何足听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俗话说得好：“不是傻子和聋子，就不要做人家的岳父和公公。”儿女们闺房里的气话，怎么可以当真！

这就是天子的雅量。

即便你没有这样的雅量，也要硬把它装出来，否则一天也别想坐稳天子的宝座。

郭子仪闻言，心里的千钧石头终于落地。

当然，儿子还是要管教的。

回府之后，郭子仪就毫不留情地打了郭暧几十棍。尽管郭暧被打得皮开肉绽，几乎昏死过去，但是郭子仪心头的惊惧和愤怒还是久久不能平息。

“儿女风波”刚刚过去不久，郭子仪就又碰上了一件倒霉事——也不知道是谁吃了豹子胆，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把郭子仪的祖坟给盗挖了。

这个耸人听闻的盗墓事件很快就在长安坊间传得沸沸扬扬。代宗立刻责令有关部门追查盗墓贼，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都说这伙盗墓贼谁的祖坟都不挖，偏偏挖帝国大佬郭子仪的祖坟，显然不光是图财，更是为了泄愤。

谁和郭子仪有这样的深仇大恨？

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大胆猜测，此事的幕后主使很可能是另一个跟郭子仪平起平坐的帝国大佬。

他是谁？

不是别人，正是独掌禁兵的首席宦官鱼朝恩！

人们如此猜测的理由是：鱼朝恩素来嫉妒郭子仪功高，当初就曾处心积虑地利用“邺城之败”整倒了郭子仪，没想到郭子仪这几年又东山再起，鱼朝恩吞不下这口气，总想找机会再把他打压下去。然而，当今天子对郭子仪甚为倚重，况且郭子仪又手握重兵，鱼朝恩明里找不到

机会，只好在暗中做下这等卑鄙龌龊之事，以泄心头之愤。

对于坊间的议论，代宗当然也有耳闻。

尽管他不太相信这件事是鱼朝恩所为，可关键的问题是——郭子仪会怎么想？倘若郭子仪听信坊间风传，或者利用坊间风传，愤然举兵讨伐鱼朝恩怎么办？

如今，这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是朝政稳定、社稷安宁的基础，假如此局一破，各种或明或暗的政治或军事力量势必展开一轮新的博弈，到那时候，社稷就永无宁日了！

代宗对此忧心忡忡。

不久，郭子仪从奉天入朝述职，代宗小心翼翼地跟他提起了盗墓的事情，同时不无紧张地看着他的反应。

郭子仪很清楚天子在担心什么，因此自然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沉默片刻，随即泫然涕下，用一种既伤心又无奈的口吻说："臣长期领兵，未能有效约束部分士卒的暴行，以至盗挖坟墓的事情屡有发生。臣今日遇到这种事，只能说是天谴，与任何人无关。"

"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代宗闻言，顿时如释重负。

这话说得真好，不愧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三朝元老啊！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时值新春佳节，郭子仪照例回朝述职。初七这一天，他忽然收到了一封请柬。

请柬是鱼朝恩让人送来的，盛情邀请他一起去章敬寺进香礼佛。

章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那是两年前鱼朝恩献出自己的一座豪宅，专门为死去的章敬太后（代宗之母）祈福而修建的。据说此寺"穷壮极丽"，工程量非常大，耗费的建材数量也极为惊人，整个京畿地区能够买到的木材全部投入都不够用，最后只好拆了曲江行宫和骊山华清宫的一部分，才算把这座寺院盖完，整个工程耗资"逾万亿"。

毫无疑问，这座章敬寺虽然挂着为章敬太后祈福的名义，实则无异于鱼朝恩的私人寺院。现在，鱼朝恩居然请郭子仪到这里进香，破天荒地向郭子仪示好，究竟是何用意？他是在向郭子仪伸出橄榄枝，还是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郭子仪对此颇感迷惑。

不过，很快就有人帮郭子仪廓清了迷惑，提供了答案。

答案的提供者就是当朝首席宰相元载。他私下通过郭子仪的亲信向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朝恩谋不利于公。”

也就是说，鱼朝恩是准备在章敬寺埋设伏兵，打算趁郭子仪不备把他一举除掉！

然而，这个信息不仅没有帮郭子仪廓清迷惑，反而在他的心头罩上了更多疑云。因为，元载跟郭子仪平时不过是在场面上哼哼哈哈、彼此敷衍而已，双方并无私交，他为什么要告诉郭子仪如此重要的信息？再者，元载是如何知悉鱼朝恩的阴谋的？他这么说有没有凭据，是不是在诬陷鱼朝恩？

疑团一个接着一个，让郭子仪难辨真伪、百思不解。

代宗朝廷的三角政治格局又一次出现了破局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否可以化解，就看郭子仪作何选择了。

郭子仪的选择很简单——去。

就算是龙潭虎穴，他也必须去闯一闯。

左右将领都劝郭子仪在衣服里面套上一件铠甲，同时带上三百名武装侍卫，以防万一。但郭子仪没有同意。他说：“我是国之大臣，鱼朝恩若无天子之命，岂敢加害于我？假如他真奉了天子之命，你们又能改变什么？”

随后，郭子仪欣然赴约，身边只有两三个家僮跟随。

鱼朝恩亲自站在章敬寺门口迎接，一见郭子仪随从那么少，大感意外，惊问何故。郭子仪就把那个“章敬寺设有伏兵”的消息告诉了鱼朝恩，然后笑着说：“我之所以不带多人，就是怕您动手时麻烦。”

你可以把这句话当成毫无含义的玩笑，也可以把它视为大有深意的警告。究竟要作何理解，就看你鱼朝恩是否真的怀藏阴谋了。

鱼朝恩一听，赶紧捶胸顿足，赌咒发誓，说绝没有什么“伏兵”之事，

这都是小人陷害，企图离间二人关系云云。最后，鱼朝恩紧紧握住郭子仪的手，眼里挤出几滴浑浊的老泪，动情地说：“如果郭公不是一位忠厚长者，岂能对我不起疑心啊！”

当天，章敬寺太平无事，跟往常一样肃穆宁静。宾主双方携手礼佛，气氛轻松融洽，然后共享一顿丰盛精美的素宴，最后尽欢而罢。

没有人知道那天的章敬寺里是否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刀斧手，也没人知道究竟是元载陷害了鱼朝恩，企图令鱼、郭二人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还是鱼朝恩确实想除掉郭子仪，只是发现阴谋已经泄露，不得不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

总之，那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尽管如此，通过“章敬寺事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三角政治格局并不稳固。

因为，除了郭子仪之外，鱼朝恩和元载都显得咄咄逼人，大有置其他二人于死地之势！

换言之，就算郭子仪可以凭借他的明智、谨慎和宽容屡屡避开危险、化解危机，可在鱼朝恩和元载之间，却迟早会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平心而论，在三个政治强人中，最骄横、最嚣张的还是鱼朝恩。史称其“专典禁兵，宠任无比，上（代宗）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此外，鱼朝恩最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恣谈时政，陵侮宰相”。元载在朝堂上虽然也很强势，可在鱼朝恩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低眉拱手，“默不敢应”（《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鱼朝恩的张狂。

那是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一座新的国子监（国立贵族大学）在多年战乱后重新落成，“仅能执笔辨章句”的鱼朝恩却“自谓才兼文武”，忙不迭地学人家在讲堂上开讲经文。

有一次，国子监举行祭奠古代圣贤的仪式，礼毕照例要由一些硕学鸿儒升座登坛，为文武百官和学生们开讲儒学经典。于是，自认为满腹经纶的鱼朝恩就当仁不让、大摇大摆地上去了。

那天，鱼朝恩开讲的是《易经》。他专门挑了第五十卦“鼎卦”来讲。众所周知，鼎是国宝重器，象征国家权力，而鼎之三足则通常被用来

指代宰相。鱼朝恩就开始借题发挥，大讲“鼎足折，覆公餗”。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宰相如果不得其人，就形同鼎的三足折断了，鼎就会倾覆，里面的食物便被白白糟蹋，犹如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

当时在场的宰相有两个：一个是王缙，还有一个就是元载。

听到鱼朝恩借讲经之机公然侮辱在座的宰相，王缙当即怒形于色，而元载则怡然自得，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矜持的笑容。

事后，鱼朝恩对左右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他的意思是：喜怒形于色的人最容易对付，不值得担忧；恰恰是该怒而不怒、面对侮辱而面不改色的人，才是深不可测、值得提防的对手。

鱼朝恩的判断没错，元载确实是个值得提防、深不可测的对手，但他并没有料到，元载还是个后发制人、能杀人于无形的对手。

这种人在时机来临之前往往很会装孙子，可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可以把你施于他的所有侮辱和伤害照单全收，但是反扑的机会一旦成熟，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当初遭遇的一切加倍返还于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鱼朝恩尽管没有看错元载，但他毕竟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手。

所以，他只能付出代价。

破局：鱼朝恩之死

很显然，在鱼朝恩、郭子仪和元载的三角博弈中，鱼朝恩已经逐渐居于强势地位。他因此越发忘乎所以，不仅视郭子仪和元载为无物，而且渐渐不把天子放在眼里。

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都要凭天子决断，唯独鱼朝恩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事情必成了。换句话说，别人的奏章是在请求天子批准，他的奏章则仿佛是在通知天子执行。

此外，朝中大大小小的政务，只要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让他参与决策的，鱼朝恩必疯狂叫嚣：“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听到这样的悖逆之言，代宗李豫当然非常不爽，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

不过，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终于有两件事激起了代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

第一件事，是鱼朝恩及其手下居然在禁军中私设黑牢。

为何设立黑牢？

答案很简单：为了钱。

鱼朝恩手底下有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暹，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他们贪图长安某些富豪的财产，就撺掇鱼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特务机构，并网罗了一帮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诬陷某些富豪犯罪，然后将其打入禁军黑牢，百般拷打，迫使他们招供，最后再抄没他们的全部家产。

表面上，这些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事实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只是零头，绝大多数则落进了鱼朝恩、刘希暹、王驾鹤等人的私人腰包。

由于禁军不受任何部门管辖，且自设黑牢不必走任何司法程序，鱼朝恩等人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有多少富豪死于非命，也不知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手里。

得知这件事后，代宗李豫大为震惊。

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居然发生了这种事，国法何在？朝廷纲纪又何在？

正当代宗为此又惊又怒的同时，鱼朝恩又变本加厉地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

鱼朝恩虽是宦官，但养了一大群儿子，最小的养子叫鱼令徽，年方十余岁，在宫中担任内给使，穿绿衣（六、七品官服）。有一天，鱼令徽不知何故与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向鱼朝恩告状。第二天一早，鱼朝恩就怒气冲冲地拉着儿子入宫，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代宗说：“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三品以上官服）。”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然想穿紫衣？

代宗觉得此事太过荒唐，就闭口不言。

没想到，还没等天子发话，有关官员就慑于鱼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鱼朝恩当场命儿子穿上，然后向天子拜谢。

事已至此，代宗只好勉强露出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

鱼朝恩得意洋洋，鱼令徽欢天喜地，满朝文武皆垂首不语。

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

但是一个人注意到了。

他就元载。

元载无声一笑。几天后，他找了个机会向代宗密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代宗虽然极为宠信鱼朝恩，把他视为三角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鱼朝恩为所欲为。

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有生杀之权的天子！而"黑牢事件"和"紫衣事件"，无疑已经突破了天子李豫的底线。

假如任由鱼朝恩的欲望和权力如此膨胀下去，代宗相信，自己苦心维持的这个三角政局迟早会被鱼朝恩打破。

既然这样，那还不如主动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

于是，代宗采纳了元载的建议，命他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一举除掉鱼朝恩。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要收拾鱼朝恩，最重要的就是先摆平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鱼朝恩的贴身侍卫长周皓，鱼朝恩每次进宫，周皓必率一百名禁军士兵随行；另一个是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此人是鱼朝恩的心腹党羽，他手握重兵，是鱼朝恩最主要的外援。

只要摆平这两个人，收拾鱼朝恩易如反掌。而只要鱼朝恩一死，他手下那帮见风使舵的禁军将领根本不足为虑。

但是，要如何摆平周皓和皇甫温呢？

元载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钱。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际关系大多是用钱堆起来的，而要拆解这种关系，最有效的办法当然也是用钱。准确地说，是用钱砸！

元载随即拿出重金，往周皓和皇甫温身上狠砸，果然一下子就把他们砸了过来。此后，鱼朝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都落入了元载和代宗的眼中，而鱼朝恩却对此毫无察觉。

正月末，元载向代宗献计，把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再把皇甫温从陕州调到凤翔。元载此计有两个目的：一、麻痹鱼朝恩，让他以为心腹皇甫温靠他更近了，因而更觉安全；二、万一计划进展不顺，还可以让皇甫温突然倒戈，杀鱼朝恩一个措手不及。此外，元载又建议代宗把兴平、武功、天兴、扶风等地划归神策军管辖，以便进一步稳住鱼朝恩。

代宗依计而行。

鱼朝恩凭空多出一块地盘，顿时大喜过望。

但他并不知道，一条无形的绞索已经悄悄套上了他的脖子。

二月初，鱼朝恩的心腹刘希暹忽然嗅出了危险的气息。

在他看来，“无功受禄”非但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反而有可能是灾祸降临的前兆。因为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鱼朝恩新近并未建功，天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多划出一块地盘给他？

这其中必有蹊跷！

刘希暹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鱼朝恩。至此，鱼朝恩才开始生出一丝疑惧。然而他每次进宫，代宗总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而且对他的恩宠和礼遇丝毫不减于往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所以，鱼朝恩慢慢也就释怀了。

三月初，皇甫温入朝奏事，元载顺势把他留了下来，然后密召周皓，三个人一起制定了一个诛杀鱼朝恩的计划。随后，元载密奏代宗，表示计划已定，随时可以动手。代宗郑重其事地叮嘱说：“小心一点，不要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三月初十，寒食节，代宗在宫中摆设宴席，邀请一些亲贵和近臣赴宴，其中当然也包括鱼朝恩。为了预防万一，元载没有出席这一天的

宴会，而是坐镇中书省，以便随时调兵遣将。

宴会结束后，代宗把鱼朝恩留了下来，说有要事跟他谈。

鱼朝恩刚刚走进内殿，代宗就一改平日的和颜悦色，厉声斥责他恃宠而骄、心怀异图。鱼朝恩虽然察觉势头不妙，但还是坚信天子不敢拿他怎么样，所以仍旧一脸倨傲，极力抗辩，并口出悖逆之言。

代宗李豫盯着鱼朝恩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冷然一笑，轻轻地挥了一个手势。

周皓随即带着一帮禁军冲了进来。

然后，一条绳索就死死勒住了鱼朝恩的脖颈……

缢杀鱼朝恩当天，代宗就下诏罢免了他的观军容使、神策军使、左监门卫大将军等职，仅保留内侍监一职，然后对外宣称——鱼朝恩受诏当日便自缢身亡了。

代宗如此处理，当然是希望稳住鱼朝恩手下的那帮禁军将领。数日后，代宗又加授刘希暹、王驾鹤为御史中丞，紧接着又宣布对鱼朝恩的所有党羽（有一部分已经被逮捕入狱）实行大赦，并说："禁军将士，都是朕的子弟兵，从今往后，朕亲自统领禁军，所有人的官爵待遇一仍其旧，都不要有什么担忧和疑虑。"

经过这样一番明智而审慎的善后处理，代宗终于成功地安抚了禁军。尽管相当一部分禁军将领对鱼朝恩的暴亡真相心知肚明，对天子李豫也不免有一些怨恨，但事已至此，他们也只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了。

唯一没有把尾巴夹紧的人，就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暹。

他是鱼朝恩的头号心腹，也是第一个察觉到天子有可能对鱼朝恩动手的人。如今事实果然被他料中，刘希暹自然比任何人都更为恐惧。事后，他心里一直在担心天子会秋后算账，所以惶惶不可终日，经常在私底下跟王驾鹤诉说心中的疑惧，并发泄对天子的不满。

刘希暹万万没想到，他的哥们王驾鹤居然把这些话一五一十都记在了心里，然后又无一遗漏地报告给了天子。

代宗本来是没打算秋后算账的，可刘希暹如此不识时务，代宗也就没必要跟他客气了。

大历五年九月，亦即鱼朝恩被诛半年后，代宗便下令赐死了刘希暹。从此，有关鱼朝恩之死的话题就在禁军将士中成了一种禁忌。

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否则就必须把“鱼朝恩”这三个字从记忆中抹去，彻底抹去！

在诛杀鱼朝恩的行动中，宰相元载表现得实在是很出色，可谓足智多谋，胆大心细。代宗极为满意，从此对他“宠任益厚”。

然而，诛杀鱼朝恩固然解决了宦官乱政的问题，可同时却难以避免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

宰相专权的问题。

随着鱼朝恩之死，原本那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局被打破了，因而朝政大权势必会过多地集中到锄奸功成的元载手上。也就是说，在代宗培植起新的制衡力量之前，李唐朝廷就会面临宰相专权的危险。

那么，元载会专权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元载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一旦没有了制约，他不仅会专权，还会弄权！

元载：弄权者的下场

从成功剪除鱼朝恩的那一天起，元载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中口出狂言，称自己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腹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

每当这种时候，听众就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可元载却总是洋洋得意、乐此不疲。

没有人会否认，元载这个人确实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也没有人不知道——元载这家伙无德！帝国朝政一旦被这样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把持，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称鱼朝恩死后，元载“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其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鱼朝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人的手底下干活，正直的人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当时，有个叫杨绾的吏部侍郎，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不依附元载，而且在遴选官员时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对“政以贿成”、卖官鬻爵的元载自然是一大阻碍。元载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机会把他拿掉。

大历五年三月底，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了吏部侍郎这个肥缺，遂“倾尽南方珍货”贿赂元载。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声名极臭，以“贪而佞”著称，可元载才不管他臭不臭，他唯独关心的就是一车一车拉到他府上的那些“南方珍货”。几天后，元载就把杨绾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担任国子祭酒，同时把徐浩调入朝中，取代杨绾成为新的吏部侍郎。

毫无疑问，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补缺的所有帝国官员肯定都要被“雁过拔毛”了；而被“拔毛”的官员到了任上，也肯定要千方百计把买官花的钱从老百姓身上加倍搜刮回来。所以，无论什么时代，“买官卖官”与“官员腐败”必定是一对孪生子，有其一必有其二！

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代宗李豫当然不会不知道。可元载毕竟当了好几年的宰相了，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而且又有诛除鱼朝恩之功，所以代宗还是不舍得拿掉他。

大历五年年底，代宗找了个机会单独召见元载，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批评教育，希望他能有所收敛，不要重蹈鱼朝恩之覆辙。

然而，元载却把代宗苦口婆心的劝导当成了耳旁风，仍旧我行我素，毫无半点悔悟的迹象。

通过大半年的等待和观察，代宗终于失去耐心、彻底失望了。

没想到这家伙跟鱼朝恩完全是一个德性、一路货色！

随后，代宗不得不开始考虑收回元载手中的权柄。

然而，代宗也很清楚，这个事情急不得，只能一步一步来。因为元载久任宰相，朝中党羽众多，比如宰相王缙，京兆尹杜济，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等人都是他的死党，其他还有很多公卿大臣也惟其马首是瞻。在此情况下，要想从朝廷的文武百官中找到一个真正忠于朝廷、

而且有能力对付元载的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八月，代宗经过一番谨慎的考察，终于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地方官员身上。

此人名叫李栖筠，时任浙西观察使。

为了避免元载等人的阻挠，代宗索性绕开中书省，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令，召李栖筠回朝担任御史大夫。

代宗交给李栖筠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元载等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然后发起弹劾。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三月，李栖筠不负代宗所望，果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从那个花钱买官的吏部侍郎徐浩身上找到的。

徐浩有一个小舅子，姓侯莫陈（三字姓），原任美原（今陕西富平县）县尉。徐浩想把他搞到京师来，就让京兆尹杜济捏造了一份政绩，声称侯莫陈在主管驿站驿马的工作中表现优异，成绩突出，特此向朝廷推荐。然后，徐浩又让他的同僚、吏部侍郎薛邕出面，将侯莫陈调任长安县尉。

依照规定，长安县尉赴任前必须先到御史台报到。结果侯莫陈一到御史台，李栖筠就不由分说地把他扣下了。

本来这也算不上多大的事，但是李栖筠自从到任之后，就一直睁大眼睛在找元载一党的毛病，如今侯莫陈自己撞上门来，李栖筠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稍微一调查，侯莫陈伪造政绩的行迹就败露了。李栖筠当即发起弹劾，把奏章递到了代宗手上。

代宗即命礼部侍郎于邵负责审理此案。

这个于邵也是元载的党羽，他压根没有意识到代宗就是想利用侯莫陈的案子引蛇出洞的，于是还傻乎乎地替侯莫陈辩解，声称此人虽然政绩造假，但他造假的时间却是在去年的大赦之前（大历七年五月，代宗朝廷曾有过一次大赦），既然“罪在赦前”，自然不该受到处罚。

代宗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好你个于邵，如此牵强的借口你也想得出来？也好，既然你们都是一

伙的，那朕就把你们这帮狐朋狗党一锅端了！

是年五月，代宗断然下诏，将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邕贬为歙州刺史，杜济贬为杭州刺史，于邵贬为桂州长史，一下子把元载一党的四个核心成员逐出了朝廷。

自此，元载的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朝廷的风气也终于有所好转。

但是，这只是代宗收拾元载的第一步而已。

他真正想要的，是元载的命！

大历九年（公元774年），河北爆发了田承嗣之乱，代宗忙于平叛，无暇顾及朝廷内部斗争。一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河北叛乱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代宗才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元载。

这几年来，元载、王缙一党不仅没有因“侯莫陈案”而有所醒悟，反而在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连他们的家人、幕僚、手下低级官吏，甚至是出入他们家中的尼姑，也全部加入了招权纳贿的行列。史称，“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者，争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幕僚）卓英倩等，无由自达……”（《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当然，代宗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由于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元载的耳目，代宗从来不敢跟左右提起诛除元载的计划。满朝文武中，他也唯独只敢跟自己的母舅、时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吴凑商议。

这年三月末的一天，元载和王缙在夜晚设坛，请了一帮道士斋醮做法，具体在干些什么没人知道。可第二天一早，马上有人向代宗密报，说元载和王缙设坛斋醮，图谋不轨。虽然史书没有明载告密者的身份，但是我们不难推测——这个人很可能是代宗安插在元载身边的钉子。所以，不管元载和王缙设坛做法想干什么，他们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

代宗立刻下令吴凑带兵进入中书省，逮捕了正在政事堂办公的元载和王缙，随后又逮捕了元载的儿子元仲武、幕僚卓英倩等人，最后命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此案。

代宗虽然把案子交给了刘晏和李涵，但实际上“问端皆出禁中”，亦即调查重点和调查方向都是由皇帝钦定的。换句话说，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其实就是代宗李豫本人。

既然天子亲自上阵，元载和王缙自然是浑身长嘴也讲不清了，更何况他们本来就劣迹斑斑。所以，开审没多久，元载和王缙就认罪伏法了。

但是，代宗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元、王二人。他要乘胜追击，挖出他们在朝中的所有党羽，将其一网打尽！

当天，左卫将军兼宦官总管董秀就被查出与元载有牵连，随即被乱棍打死。此外，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起居舍人韩会等十几个朝元党成员也先后被捕。

直到一切水落石出，代宗才下令将元载赐死于狱中。

接到赐死令后，元载万般绝望地对狱吏说：“求你快点让我死吧！”狱吏阴阴地答：“宰相大人，死很简单，不过在你死之前，多少总要让你受点委屈，请别见怪！”

说完，狱吏就脱下脚上的臭袜子，一把塞进了元载的嘴里。

直到怒目圆睁的元载尝够了臭袜子的滋味，狱吏才挥起一刀，砍下了元载的脑袋。

古人经常说，士可杀不可辱。对古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受辱。在帝国政坛上跋扈多年的堂堂宰相元载，或许也曾意料到自己总有败落的一天，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以吃臭袜子的屈辱方式死去。

元载死后，他的妻子王氏，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也同日被杀，家产全部抄没。幕僚卓英倩等人被关数月后，于狱中杖杀。

王缙本来也已被下令赐死，但主审官刘晏替他求情，说王缙只是从犯，宜网开一面。代宗才留了他一条命，把他贬为括州刺史。

代宗本来也想把杨炎、韩洄等人全部诛杀，所幸吴凑力谏，才改为贬谪。

如果不是吴凑这一谏，杨炎就不可能在几年后东山再起，赫然登上德宗朝廷的宰相之位，并且创立那个著名的“两税法”了。

诛除元载次月，代宗任命了两位新宰相，一个就是曾遭元载排挤的杨绾，另一个是礼部侍郎常衮。

杨绾向来以“清简俭素”著称，如今代宗让他取代骄奢无度的元载，其用意不言自明。

据说，代宗的任命诏书下达这天，满朝文武便纷纷作出了反应——郭子仪晚年很会享受生活，此日恰好在大宴宾客，府上一派笙歌艳舞，一听到消息，赶紧撤除了五分之四的乐队和歌姬；京兆尹黎干原本拥有一个阵容十分豪华的仪仗队，当天便大力裁减，只留下十名骑兵；御史中丞崔宽，其府邸壮观豪奢、冠盖京华，也不得不忍痛将豪宅拆毁。

总而言之，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天子和朝廷视为元载第二！

杨绾上任后，代宗对他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因为这几年来，整个朝廷已经被元载一党搞得乌烟瘴气，代宗相信假以时日，杨绾必定能够革除弊政，重振朝纲！

然而，代宗再一次失望了。

因为老天爷只给了杨绾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杨绾几乎什么事都来不及做。

大历十二年七月，正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杨绾忽然患病，短短几天后就与世长辞了。代宗李豫悲痛欲绝，面对群臣大声哀叹：“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老天爷不想让朕缔造太平啊，否则为何这么快就夺走了朕的杨绾！

是的，代宗李豫确实有理由质问上苍。

不仅是因为杨绾之死，还因为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一切……

这十几年来，内有宦官乱政，宰相弄权；外有藩镇叛乱，吐蕃入寇。帝国深陷内忧外患之境，大唐天下几乎永无宁日。而在所有这些乱象中，最让代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

回首这十几年来的一幕幕藩镇之乱，代宗李豫充满了一种无力感和挫折感。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剑南骁将崔旰发动兵变，逼杀朝廷任

命的节度使郭英乂，致使蜀中大乱；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朝廷出兵讨伐，竟为崔旰所败，无奈之下只好任命崔旰为西川节度使，并赐名“宁”，才得以息事宁人。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同华（治所在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擅杀监军宦官张志斌，公然叫嚣要“踏破长安城”，并“挟天子令诸侯”。稍后，周智光又被自己的部将所杀，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旋即“以收华州为名”，率部入关，大肆劫掠，把潼关方圆二百里内的官民财富洗劫一空，致使当地官吏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老百姓就更是饿殍遍野、苦不堪言了。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杀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留后”（相当于代理、候补节度使）。朝廷出兵讨伐，竟被朱希彩击败，只好任命其为幽州节度使。

——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幽州军队又发动兵变，杀了节度使朱希彩，共同拥立经略副使朱泚为留后。朝廷也麻木了，照例任命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

事实上，代宗在位的这十几年中，各地爆发的兵变和骚乱可谓不胜枚举，远不止上面这些。换言之，大唐帝国自从经历一场安史之乱后，“目无法纪、犯上作乱、篡位夺权、自立自代”的恶劣风气就已经像瘟疫一样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四方藩镇中，士卒杀部将、部将杀主帅、主帅杀藩镇的事情屡见不鲜，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层层太阿倒持，遍地骄兵悍将！

面对这一切，代宗朝廷为了维护表面的稳定，多数时候也只能采取绥靖政策，尽量姑息，一再容忍。

代宗当然不想这样子，可他没有办法。

这些年来，最让代宗感到无奈、也是最典型的一幕藩镇叛乱，就是河北的田承嗣之乱。

田承嗣之乱

田承嗣，原为安禄山麾下骁将，每次征战皆充当前锋，悍勇过人。安史之乱平定后，田承嗣与李怀仙、张忠志（后赐名李宝臣）等人暗中

投靠了仆固怀恩，摇身一变就成了唐朝的河北诸藩。田承嗣被任命为魏博（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节度使，下辖魏、博、德、沧、瀛五个州。

田承嗣名义上虽然归顺了朝廷，但骨子里仍旧是一个拥兵割地的军阀。这些年来，他“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在其辖境内“重加税率，修缮兵甲”，以“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短短几年间就建立了一支十万人的常备军。此外，魏博境内的所有州县官吏，田承嗣全都自己任命，而且多年来从未向朝廷上缴一分一毫的赋税。

对于田承嗣的所作所为，史书的评价就八个字——“虽曰藩臣，实无臣节”（《旧唐书·田承嗣传》）。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田承嗣又干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公开为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建立了一座祠堂，并尊其为“四圣”。

田承嗣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悖逆之事？

不，田承嗣的脑子没有进水。

他之所以这么干，是想以此要挟朝廷，让他遥领宰相 [1] 之职。

田承嗣的要求很简单——要想让我拆掉这座祠堂也可以，但必须拿一顶宰相乌纱来交换。

得知这件事后，代宗又惊又怒。

但是，除了答应田承嗣的要求之外，代宗实在是别无良策。

因为，他没有理由为了一个“同平章事”的虚衔，跟田承嗣的十万军队大动干戈！

代宗随即给田承嗣颁发了一道任命状，然后命他捣毁那个大逆不道的“四圣祠堂”。

大历九年（公元774年），为了安抚田承嗣，代宗又主动把自己的女儿永业公主嫁给了田承嗣的儿子田华，希望能以儿女姻亲的关系固结其心，防止他再做出什么过火的事儿。

然而，没过多久，代宗最不想看到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大历十年（公元775年）正月，昭义（治所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兵马使裴志清忽然发动兵变，驱逐了昭义留后薛萼（原节度使薛嵩的弟弟），然后宣布归附田承嗣。田承嗣马上以救援裴志清为由，悍然出兵攻取了相州。薛萼只好逃到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向代宗上表请求入朝，随即便一口气逃回了长安。

为了阻止田承嗣吞并昭义，代宗赶紧下诏，任命昭义将领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三人皆为薛嵩族人），同时派遣宦官孙知古前往河北告谕田承嗣，让他和三个新任刺史“各守封疆”，不得相互侵犯。

但是，田承嗣却拒不奉诏，马上又派遣大将卢子期攻取了洺州。稍后，田承嗣又命大将杨光朝攻击卫州，并写信劝薛雄投降。薛雄不从，田承嗣便派刺客暗杀了薛雄，同时屠杀了薛雄全家，然后占领卫州，继而又出兵攻陷了磁州（今河北磁县）。

至此，相、洺、卫、磁四州已悉数落进田承嗣手中，昭义大部被其吞并。田承嗣旋即任命了四个州的官吏，并将昭义的精锐兵马全部编入了自己的魏博军。

为迫使朝廷承认这个事实，田承嗣又导演了一幕“将士归心”的好戏。他事先交代相州和磁州的守将，让他们挑选出部分将士配合他做戏，然后，田承嗣便邀请朝廷使者孙知古一起去巡视相、磁二州。

田承嗣和孙知古一到，早已做好准备的魏博将士（假扮成昭义将士）便纷纷“割耳剺面”，强烈要求朝廷任命田承嗣为他们的节度使。所谓割耳剺面，意思是用刀割下耳朵或划破自己的脸；古代少数民族试图表达某种强烈的心志和愿望时，经常采用这种极端的行为方式。田承嗣本人虽不是胡人，但手下却不乏胡人士兵，所以他有条件导演这幕戏。然而，代宗李豫不是笨蛋，他当然不会这么轻易被田承嗣忽悠。更重要的是，田承嗣这种“公然抗旨、吞并昭义”的行为确实令人难以容忍。如果对这种行为继续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任其为所欲为，那李唐朝廷的脸面何在？日后还有谁肯听从天子的诏令？

所以，代宗决定出兵讨伐田承嗣。

当然，代宗生性谨慎，做事一贯小心，从来不打无把握之战。他这次之所以敢跟田承嗣动手，是因为与魏博相邻的两个藩镇都很主动地向朝廷上表，请求讨伐田承嗣，所以极大地增强了代宗的信心。

这两个自告奋勇的藩镇，一个是成德（治所在恒州，今河北正定县）

节度使李宝臣，一个是淄青（又称平卢，治所在青州，今山东青州市）节度使李正己。其实代宗也知道，这两个人之所以主动请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朝廷忠诚，想为国家建功，而是因为他们跟田承嗣有过节，都想趁机收拾他。

事实上，李宝臣和田承嗣的关系本来很好，不仅是同僚，而且还是姻亲——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娶了田承嗣的女儿。有一次，李宝正去魏州做客，跟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纵横驰骋中，不小心把田维撞下马背，导致田维受了重伤，旋即不治身亡。田承嗣大怒，立刻把李宝正抓了起来，然后写信跟李宝臣讨说法。

李宝臣能有什么说法？虽然此事纯属意外，但毕竟人家的宝贝儿子死了，你总不能再维护自己的弟弟吧？李宝臣没办法，只好回信向田承嗣谢罪，说自己管教不严，请田承嗣不要有何顾虑，该怎么责罚就怎么责罚，他绝无二话。

田承嗣也干脆，一看到回信就命人鞭杀了李宝正。

李宝臣闻讯，顿时目瞪口呆。

他本以为，李宝正再怎么说也是田承嗣的女婿，虽然失手闯下大祸，但纯属无心，就算要罚也绝不至死！所以他才敢跟田承嗣说什么该罚就罚之类的漂亮话。可他万万没料到，田承嗣居然如此心狠手辣，一下就要了李宝正的命！

从这件事之后，李宝臣就跟田承嗣反目成仇了。

至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则向来与田承嗣不睦。他们之间具体有何恩怨，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田承嗣自恃强大，始终看不起李正己。所以，李正己老早就想给田承嗣一点颜色瞧瞧了。这回田承嗣公然违抗诏令，李正己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修理他的机会。

对代宗李豫来说，李宝臣和李正己是什么动机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手里头有兵，而且一心想收拾田承嗣，这就够了。

是的，这就够了！

大历十年四月，代宗下诏，把田承嗣贬为永州刺史，同时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九道节度使，从北面和南面同时进兵魏博，只要田承嗣拒不悔改、继续抗命，就狠狠地打，打到他认罪伏法为止！

此次征讨田承嗣，是代宗李豫自登基以来对叛乱藩镇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代宗相信，只要打赢这一仗，就能用行动教育那些目无法纪、藐视朝廷的藩镇，并对天下所有的骄兵悍将起到一个震慑和警示的作用，从而树立起朝廷的权威。

代宗李豫对这个美妙的前景充满了期待……

当时，幽州留后朱滔（原节度使朱泚的弟弟）正一门心思盼着朝廷给他转正，所以表现得最为恭顺，一接到代宗诏书，马上与成德李宝臣、河东薛兼训联兵，从北面攻击魏博；淄青李正己则联合淮西、河阳等镇，从南面发起进攻。

五月初，田承嗣的部将、镇守磁州的霍荣国眼见大兵四合，慌忙举城向朝廷投降。

五月十五日，李正己攻陷德州（今山东陵县）；同日，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步骑四万猛攻卫州。

面对来势汹汹的朝廷大军，田承嗣也不免有些发怵，可他还是准备顽抗到底。于是，田承嗣一边调兵遣将抵御南面之敌，一边命昭义降将裴志清率部攻击成德辖境冀州（今河北冀州市），企图用“围魏救赵”的办法，迫使北面的李宝臣撤兵。

然而，田承嗣万万没想到，这个刚刚叛到他麾下的裴志清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玩了一回黑色幽默，居然又率部投靠了李正己。

田承嗣气得差点吐血。

你小子可真是根墙头草！一会儿背叛这个，一会儿投靠那个，忒不地道了！老子为你惹了一身骚，你却屁股一拍就走人了，做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田承嗣在心里把裴志清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可骂人并不能解决问题，朝廷的南北两路大军依然在猛攻他的地盘。田承嗣没办法，只好按照原计划，亲自带兵攻打冀州。

不出田承嗣所料，李宝臣果然率部回援。只可惜，田承嗣一点好处也没捞着。因为李宝臣的部队太能打了，尤其是他麾下骁将张孝忠带领的那支骑兵，更是勇猛过人、以一当十。田承嗣连吃了几场败仗，最后只好烧毁所有辎重，灰溜溜地逃回了魏州。

八月，朝廷各路大军步步进逼，而魏博将士则军心涣散。田承嗣无奈地意识到，再这么打下去自己肯定完蛋！于是赶紧遣使入朝，向代宗上表，请求自缚其身到长安谢罪。

代宗大为振奋，遂命各军暂时停止进攻，以待田承嗣入朝。

可是，代宗高兴得太早了。

这只是田承嗣的缓兵之计。

田承嗣知道，自己寡不敌众，绝对不能跟九镇联军硬拼。要想逃过这一劫，只能耐心寻找联军的破绽，再设计将其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在田承嗣看来，九镇联军绝非铁板一块，要离间他们并不难。所以，田承嗣相信，在这场以一敌九、实力悬殊的较量中，自己虽然暂时处于下风，但未必不能笑到最后……

谁笑到了最后？

从八月初收到田承嗣的上表后，代宗李豫就一直在眼巴巴地等着他入朝。可直到八月末，代宗不但连个鬼影都没见着，还等来了一份新的战报。

战报说，田承嗣又派大将卢子期去攻打磁州了。

代宗大怒，急命各路大军继续进攻，一定要把田承嗣打趴下。

卢子期围着磁州整整打了两个月，就在他即将破城之际，李宝臣等人率部赶到，在清水（今河北磁县西北）将其击败。卢子期被生擒，旋即被押赴京师斩首。差不多与此同时，朝廷的南路各军又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大破田承嗣的侄子田悦。

败报传到魏州，田承嗣虽不免有些恐慌，但这样的恐慌并不足以让他举手投降。

因为他已经想到对付朝廷军的办法了。

朝廷的九镇联军貌似强大，其实关键就是李宝臣和李正己这两个人，只要搞定他们，九镇联军便会不战自溃。

那么，如何才能搞定这两个家伙呢？

田承嗣自有妙计。

开战之前，李正己曾经派了一个使者到魏州，后来就被田承嗣扣下了。现在，田承嗣打算把这个使者送回去，而且还要托他带给李正己一份厚礼。

田承嗣恭恭敬敬地把这位使者请到了自己的府上，好吃好喝一顿招待后，又请他来到大堂，面南而坐，田承嗣则郑重其事地面北而拜，并且万分谦恭地向使者呈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个受宠若惊的使者接过礼物一看，一颗心差点从胸口蹦了出来。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这份礼物实在太重了，重得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田承嗣交给使者的，是关于魏博的一份“完全档案”，里头包括了魏博全境的户口图籍、军队名册、钱粮账簿等所有机密资料。

换句话说，田承嗣这是在向李正己俯首称臣，并且拱手让出自己的地盘啊！

为了充分表明自己的诚意，田承嗣还请人画了一张李正己的肖像，挂在大堂上，天天焚香礼拜（古代人臣的事君之礼），俨然把李正己当成了至尊无上的天子。

最后，田承嗣又让使者给李正己捎去了一封信，说：“承嗣今年已经八十有六了（其实他才七十一岁，之所以说得那么老，无非就是想麻痹李正己），随时都可能死掉，儿子们没一个有出息，侄子田悦也是孱弱无能。所以，我今天拥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替您暂时保管罢了，又何必劳您兴师动众呢！”

田承嗣抛出的这根橄榄枝确实诱人，李正己马上被深深打动了。

这老小子过去最瞧不起李正己，现在居然主动当起了孙子，不仅俯首称臣，还表示要献出地盘，这真让李正己心花怒放。

李正己随即命令军队停止进攻，就地安营扎寨，不再前进半步。南路的各镇军队见李正己按兵不进，也都跟着停了下来。

田承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南面的威胁。接下来，他就可以专心对付北方的李宝臣了。

自从这一年五月开战以来，李宝臣对魏博的进攻可谓不遗余力，代宗对此甚为满意，就派遣了一个叫马承倩的宦官前去宣旨慰问。

然而代宗却没有想到，这次宣慰非但没有达到鼓励的目的，反而严重打击了李宝臣的积极性。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宦官马承倩身上。

按惯例，宦官到地方上宣慰，临走前都是要收一笔“劳务费”的，李宝臣当然也不敢怠慢了马承倩。这家伙回朝复命前，李宝臣专程带上了一百匹绸缎，亲自送到了马承倩所住的驿馆。没想到马承倩非但不领情，反而勃然大怒，指着李宝臣的鼻子一通臭骂，最后还让人把那一百匹绸缎全都扔到了大街上。

马承倩并不是廉洁拒贿，而是嫌东西太少。

他本来以为，李宝臣身为强藩，拥兵据地，财大气粗，出手肯定阔绰，不料却只送了区区一百匹绸缎，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最后马承倩一匹也没要，气呼呼地回长安去了。

李宝臣出来混了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羞辱，心里自然很不爽。他的心腹、成德兵马使王武俊就说：“您对朝廷新立大功，尚且被一个瘪三如此羞辱，来日平定叛乱，恐怕一道诏书就卸了您的兵权，把您召回京师软禁起来了。依在下所见，不如放田承嗣一马，这样朝廷才会始终重用您。”

王武俊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李宝臣养寇自重。李宝臣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停止了进攻的步伐，跟李正己的南路各军一样按兵不动了。

听到李宝臣得罪天子使臣的消息后，田承嗣心里乐开了花。这样一来，南北两路的朝廷军就都不约而同地停火了，田承嗣真是打心眼里感激马承倩。

不过，让九镇联军停火只是田承嗣计划的第一步。

他真正想要的，是让他们之间爆发内讧。为此，田承嗣已经在成德李宝臣和幽州朱滔之间，设了一个阴险的局。

田承嗣知道，李宝臣是范阳（幽州治所）人，很早就在打范阳的主意，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下不了决心。现在，田承嗣就打算帮他下这个决心。

首先，田承嗣让人在一块石头上刻了这么一句谶语："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然后命人偷偷把石头埋在了成德境内。接着，田承嗣又找了一个术士去忽悠李宝臣，说某某地方有帝王之气。李宝臣顺着术士的指引找过去，往地下一挖，就把那块写着谶语的石头挖出来了。

最后，田承嗣又派出一个口齿伶俐的说客，继续跟李宝臣忽悠，说："您若与朱滔共取沧州（田承嗣地盘，位于魏博最北端，与李宝臣的辖境接壤），就算打下来，沧州也是朝廷的，非您所有。可是，如果您愿意跟田承嗣尽释前嫌，精诚合作，他自愿把沧州献出来，划归成德。而且田承嗣还说了，如果您想打范阳，他可以竭尽全力，帮您完成心愿。只要您率精锐骑兵为前锋，他必率大军跟进接应，如此，范阳没有不克之理。"

李宝臣闻言大喜。

因为这番话跟石头上那句谶语完全相应，所以李宝臣相信，这一定是上天要把范阳送给他。既然如此，他还犹豫什么呢？

心动不如行动，说干就干！

随后，李宝臣便迫不及待地派人与田承嗣密谋，制订了一个袭取范阳的计划。

田承嗣非常守信用，计划一定下来，他立马率军北上，驻扎在魏博与成德交界，准备随时听候李宝臣差遣。

当时，朱滔正率部屯驻瓦桥（今河北雄县），李宝臣决定擒贼先擒王，出动一支骑兵奇袭瓦桥，把朱滔干掉，再和田承嗣联兵直捣范阳。

为了保证奇袭时能够精确打击，李宝臣就派人去跟朱滔说："听说朱公仪貌伟丽，威如天神，鄙人很想讨一幅画像，日夜瞻仰。"

朱滔被捧得晕乎乎的，立刻着人画像，送到了李宝臣手上。随后，李宝臣就把朱滔的画像挂在了演武堂上，然后天天跟将士们一块瞻仰，口中还不停赞叹："果然是神人啊！"

等将士们把朱滔轮番瞻仰了一遍，李宝臣便从中遴选了两千精锐将士，然后下达战斗指令，说："格杀演武堂画像上的那个人！"

奇袭部队当即出发，昼夜奔驰三百里，兵锋直指瓦桥。当时，幽州跟成德是友军，朱滔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宝臣会来偷袭。所以，直到成德的偷袭部队杀入大营，朱滔才从梦中惊醒。他仓促指挥部众应战，结果被杀得溃不成军。朱滔慌忙换上士卒的衣服，好不容易才脱离险境，狼狈不堪地逃回了范阳。

得知李宝臣与朱滔交兵的消息，田承嗣发出了一阵痛快淋漓的大笑。很好，老子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田承嗣随即打道回府，并且派人给李宝臣送了一句话，说："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我境内有紧急情况，不能和您一起攻打范阳了，至于石头上的谶语，是我和您开玩笑的，千万别当真！

李宝臣目瞪口呆，一张脸涨得像猪肝。

他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进魏州，把田承嗣千刀万剐，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再掏出他的心肝炒着吃！

可李宝臣知道，这只是自己的意淫。

因为成德夹在幽州和魏博中间，本来就已经和魏博不共戴天，现在又跟幽州撕破了脸，自己已经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了，凭什么再跟田承嗣斗？此时此刻，李宝臣不但不能南下攻击田承嗣，而且必须分兵抵御北边的朱滔，防止他出兵报复。

随后，李宝臣垂头丧气地撤回了恒州，同时命骁将张孝忠率七千精锐将士驻守易州（今河北易县），防备朱滔。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征讨田承嗣的军事行动就这样不战自败、无果而终了。

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唯一一次与藩镇大动干戈的结果，就是劳师丧财、损兵失地，而且还换来了一肚子的愤怒、无奈和沮丧。

大历十年十二月末，田承嗣假惺惺地上表代宗，请求入朝。同时，淄青的李正己也频频上表替他说话，希望天子能给田承嗣一个改过自新

的机会。

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二月，代宗李豫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赦免了田承嗣的所有罪行，并恢复其官爵，准许他本人或家属入朝；此外，其麾下部众曾抗拒朝命者，也一概赦免，既往不咎。

谁笑到了最后？

当然是田承嗣。

田承嗣一次次说他要入朝谢罪，其实都是放屁。

他非但不入朝，而且始终没有放弃扩张的野心。

大历十一年五月，汴宋（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留后田神玉病卒，都虞侯李灵曜趁机发动兵变，杀了该镇的几个军政首脑，随即自立为留后，并北结田承嗣为援。而田承嗣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竟公然充当李灵曜的靠山。

代宗为了安抚李灵曜，就任命他为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刺史。可李灵曜却嫌官小，拒绝赴任。代宗无可奈何，只好承认他为汴宋留后。

李灵曜得逞后，更加不把朝廷放在眼里，随即效仿河北诸镇，一口气任命了境内八州的所有刺史和县令，致使朝廷任命的那些官员一夜之间全部下岗。代宗忍无可忍，遂征调五道兵马征讨李灵曜。田承嗣出兵援救，代宗再度削除田承嗣官爵，宣布对田、李二人一起讨伐。稍后，田承嗣和李灵曜分别被朝廷军所败。李灵曜逃亡，后被擒，押送京师斩首。田承嗣惶悚，赶紧又上表请罪，李正己又替他说话，代宗只好再一次就坡下驴，下诏复其官爵……

唐代宗李豫在位的十几年间，这一幕幕藩镇叛乱的闹剧就这样此起彼伏、循环上演，而李唐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藩镇问题，只好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除了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制衡外，代宗李豫实在是别无良策。

朝廷对诸藩处处妥协、一再退让的结果，就是令其越发骄纵、日益坐大。

关于唐代宗大历末年的政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段准确的概述和评论：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籓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众五万；梁崇义（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阳市）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众二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代宗李豫）宽仁（实际上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一听其所为……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名为藩臣，实如异域！

这就是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所面临的历史困境。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春，当心力交瘁的唐代宗李豫陪伴着内忧外患的大唐帝国步履蹒跚地走过十七度春秋后，一切显然都还没有好转的迹象。虽说在这年二月，朝廷的心腹之患田承嗣终于死了，但是代宗并不敢采取什么举措，只能听任其侄田悦自立为留后，随后任命田悦为节度使。三月，淮西都虞侯李希烈又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李忠臣，迫使李忠臣单骑亡走京师。代宗无可奈何，仍复以李希烈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

这年夏天，五十四岁的唐代宗李豫终于在无尽的烦忧和抑郁中一病不起了。

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日暮时分。

长安大明宫紫辰内殿。

唐代宗李豫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看见夕阳的余晖正一点一滴从他的眼前褪去，同时看见一个未知的黑暗世界正一步一步地朝他走来。

这天早上，自知大限已至的李豫颁布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诏书——命太子李适监国。

李豫知道，这个年已三十八岁的长子已经完全有资格继承李唐王朝的社稷江山，但他始终心怀隐忧的是——李适有能力对付那些“名为藩臣，实如异域”的跋扈藩镇吗？李适有能力驾驭这辆险象环生、前程叵测的帝国马车吗？

夜幕徐徐降临，内殿一片静阒。几个宦官小心翼翼地点亮了殿内的火烛。他们的脸在半明半暗的光影中浮沉闪烁。仿佛有那么一瞬间，李

豫蓦然看见了几张熟悉的脸。

那是李辅国的脸、程元振的脸、鱼朝恩的脸……

他们来了吗？

他们去了又来了吗？

李豫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李豫走了。

远处的世界依旧喧嚣，世上的人群依旧扰攘。

李豫走了，把骚动不安的尘世遗落在了身后，把一团乱麻的天下遗落在了身后，把无尽的流血、杀戮、阴谋、谎言、背叛、纷争，全部遗落在了身后……

[1] 所谓“遥领宰相”，就是在原有官爵上加授“同平章事”之衔。虽然这个头衔并无实权，但却是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

第六章 德宗李适初政

礼法之争的背后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即皇帝位，是为德宗。

新天子登基，该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丧。

在古代，服丧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传下来的礼法，无论哪个人遭逢父母之丧，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学名叫“丁忧”。也就是说，不管你当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实实回家去丁忧三年，除了吃饭睡觉看书写字之外，几乎啥事也不能干。

可是，这事要是搁在皇帝头上，就有点不太靠谱了。

道理很简单：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别人还可以替他处理政务；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谁来替他君临天下？

为了解决这个不靠谱的问题，大概从汉文帝开始，就有了一个从权变通的办法，把皇帝的服丧时间从三年缩短为象征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个月）。唐朝自高宗以后，都遵照这个办法执行，到了玄、肃二朝，更进一步缩短为二十七天。代宗临终之前，也在遗诏中表示，新君服丧二十七天，帝国各级官员则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释服”。总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后该干吗干吗去，别耽误了工作和学习，当然也别耽误了娱乐。

代宗这个遗诏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满朝文武极力拥护，都表示要坚决执行。

可是，偏偏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所有官员都必须跟新君一样，服满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这个人就是宰相常衮。

常衮是代宗晚年颇为倚重的大臣，和当时的名臣杨绾同时入相，可杨绾没多久就病逝了，于是常衮就成了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在常衮之前，当政的人是弄权宰相元载。众所周知，元载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腐败，不仅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而且总是变着法儿损公肥私。比如当时宰相上班，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吃工作餐的，元载嫌饭菜不好，就公然向代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都要由御膳房提供，吃的东西必须跟皇帝一样，而且每顿都要准备十个人的量。除此之外，还要求朝廷给宰相及公卿大臣们发放特别津贴——每年绸缎三千六百匹。代宗虽然心里不满，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随后，这两项待遇就形成了惯例。

常衮上台后，为了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就主动向代宗提出：“朝廷发给宰相和大臣们的餐费已经足够了，应该让御膳房停止供应膳食。”代宗很高兴，马上就批准了。不久，常衮又建议废除特别津贴，结果一下子就犯了众怒。

要知道，朝中的大臣们虽然厌恶元载，但没有人会厌恶特别津贴。说白了，当初大伙没跟着元载吃肉，至少还能跟着混口汤喝，可如今你常衮一来，就让大伙勒紧腰带喝西北风，你凭什么呀？

此议遭到众人的强烈反对，常衮只好闭嘴，此事遂不了了之。

事后，公卿百官都在背后大骂常衮，说：“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朝廷高薪是为了养廉，你如果自认无能，对不起这份高薪，那就干脆辞职走人，何必自命清高地辞薪呢？

就这样，常衮一上台就把同僚们都给得罪了，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可是，常衮真的不会做人吗？一个混了大半辈子官场、最后混到首席宰相的人，会连最起码的团结群众都不会吗？

其实，常衮之所以触犯众怒，不是因为他不会做人，而是因为他太急于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了，从而不自觉地损害了百官的利益。

换言之，常衮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却又流于虚伪和矫情。

代宗驾崩后，常衮的虚伪和矫情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按照礼制，满朝文武每天早晚都要到代宗灵前致哀。常衮或许是感怀于代宗的知遇之恩，或许是急于给新君李适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总之每天都在灵堂上哭得稀里哗啦，一副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的样子，让大伙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一天，常衮照例在灵堂上哭得死去活来，甚至做晕厥倒地之状，随从慌忙跑上去搀扶。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时任中书舍人的崔祐甫终于忍不住了，指着常衮对众人说：“臣哭君前，却要人搀扶，天下可有此等礼仪？”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当众揶揄，常衮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顾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强忍着没有发作。

同日，新君李适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各级官员服丧期限的问题，常衮抓住这个表现机会，一再强调：“先帝遗诏虽说‘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但意思是指低级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时候每遇国丧，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礼制，如今皇上须服丧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当如此。”

百官闻言，心里都在问候常衮的祖宗，可表面上还是保持沉默，不想得罪这个首席宰相。唯独崔祐甫再次无视常衮的权威，冷笑着

说："先帝遗诏，并无朝臣和庶人之别。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个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应遵从遗诏，一律服丧三日。"

常衮开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释义，'吏'即'胥吏'的简称，专指官员自行任命的僚属，岂能与公卿百官相提并论？"

崔祐甫寸步不让："《左传》中有一句话，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难道史书上常说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衮发现自己掉书袋比不过崔祐甫，赶紧转移方向："礼法不外乎人情。当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与寻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礼，于心何忍，于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发出冷笑："常大人坚持这么说，将置先帝遗诏于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犹能随便改动，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改的？"

常衮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没有人臣之礼。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责常衮肆意曲解遗诏。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顿时吵得不可开交。

新君李适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里大为不悦，随即宣布会议解散。

常衮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脸面、当众死磕，难道仅仅是单纯的礼法之争吗？

如果你这么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朝代都会爆发程度不同的礼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权力之争。换句话说，所谓的祖宗礼法，往往只是政客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

常衮和崔祐甫之争，当然也不会例外。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说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乱后的变迁。

玄宗时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六部大臣构成，而在初唐时期作为当然宰相的尚书左、右仆射，此时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

列。从安史之乱起，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李唐朝廷开始把中书令、侍中这两个职衔拿来加授给一些功臣元勋，使得这两个宰相职位逐渐有了虚衔的性质。到了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进一步将中书令和侍中升格为正二品（原为正三品），从此这两个职衔就彻底变成了虚衔。

相应地，原中书、门下两省的副职——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为正三品，成为两省的最高长官。此后，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分别加“同平章事”衔来担任，其他的低阶官员（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衔，也可不问资历，直接拔擢进入宰相班子。

很显然，这样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战争和叛乱此起彼伏，朝廷权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枢政治的运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须形成一套灵活简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阶官员，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常衮和崔祐甫之争的起因。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权宰相元载；四月，杨绾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常衮以门下侍郎衔入相；七月，杨绾突然病逝，随后中书侍郎一职便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在此情况下，崔祐甫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书省的政务，无形中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虽无其名，却有其权。

与此同时，常衮也取代杨绾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来，区区中书舍人崔祐甫是没有资格掌管中书省的，于是很快就接管了中书省的政务。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当然是愤愤不平。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报了一则祥瑞，说他一个部属的家里竟然出现了猫鼠同窝的奇异景象——有一只母猫把一只小老鼠当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无私地喂养小鼠。朱泚说，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之事啊，若非皇帝圣德广大，岂能有如此猫鼠和谐之祥瑞！

常衮闻讯，立刻率领文武百官入朝恭贺。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发出了不和谐音。

这个人当然就是崔祐甫。

他当着常衮和百官的面说："万物若违背自然，即为妖孽。猫抓老鼠是天职，如今却为老鼠哺乳，这难道不是妖孽吗？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朝廷应该做的事，是借此反省，看监察部门是否放纵了贪官污吏，看边防部队是否尽到了御敌的职责，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

代宗听说后，马上接受了崔祐甫的批评，并对他表示了嘉许和赞赏。崔祐甫这么做，摆明了就是要让常衮难堪。常衮表面上没说什么，几天后就给崔祐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让他去分管吏部的选官事宜。

如果常衮是真的让崔祐甫"分知吏部选事"，那崔祐甫倒也没什么话好说，毕竟吏部是个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分管官员的选拔工作更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差。可问题在于——常衮不可能把选拔官员的权力真正交给崔祐甫。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崔祐甫借调到吏部后，每次认认真真选报上去的候补官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常衮否决了。

什么理由呢？

不需要理由。

如果一定要有什么理由的话，那也很简单——你得罪领导了！

得罪领导是一件挺让人郁闷的事，但是崔祐甫并不郁闷。

因为他相信：风水是轮流转的，宰相是轮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领导迟早也是要下台的！

而常衮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得人心的领导。崔祐甫知道，自己的群众基础比常衮坚实得多。仅此一点，他就具备了跟常衮博弈的资本。

所以，当常衮在服丧问题上再次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对立面时，崔祐甫便意识到反击的机会来了，于是才会在百官敢怒不敢言的时候挺身而出，公开和常衮叫板。

说白了，常衮拿服丧问题大做文章，目的无非是讨好新君李适；而崔祐甫敢于公然和宰相叫板，也无非是想借此赢得百官的同情和支持，为自己积累更高的声望，以便有朝一日彻底扳倒常衮。

面对崔祐甫的挑战，常衮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坐以待毙。

跟崔祐甫撕破脸的第二天，常衮就上疏弹劾，声称崔祐甫"率情变

礼，轻议国典”，要求德宗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刺史。

为了增强说服力，常衮还把另外两个宰相的名字也署了上去，以表明此次弹劾是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发泄私愤。

被常衮代表的这两个人，一个就是四朝元老郭子仪，时任司徒、中书令，另一个是原幽州节度使朱泚，于大历九年主动入朝，被任命为司空、同平章事。他们虽然挂着宰相的头衔，实际上并不参与朝政，几乎从不到政事堂上班，而常衮则一向“独居政事堂”，大小政务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这次弹劾崔祐甫，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郭、朱二人给代表了。

对于此次礼法之争的实质，德宗李适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常衮和崔祐甫为服丧问题而争执是假，因积怨甚深而借题发挥是真。从根本上来说，这场关于服丧期限的争吵其实是相当无聊的事情。在内心深处，德宗还是比较倾向崔祐甫的。因为若无常衮的矫情，也就不会有崔祐甫的异议和这场无谓的争吵。

然而，面对三个宰相联名弹劾的奏疏，德宗即便倾向崔祐甫也没有用。新君即位，通常都不希望和宰相班子意见不合，如今既然三个宰相都署名了，不处理崔祐甫显然说不过去。但是，把崔祐甫贬到潮州的处罚又未免太重了。思虑再三后，德宗只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把崔祐甫贬出朝廷，但不是贬到山高皇帝远的潮州，而是贬为河南少尹。

本来，这场无聊的礼法之争到此就该画上句号了，而常衮也已经毫无悬念地在这场争斗中胜出。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让常衮本人目瞪口呆。

不，是让常衮追悔莫及，欲哭无泪！

事情是因为那两个“被代表”的宰相而发生逆转的。

崔祐甫的贬谪令下达后，郭子仪和朱泚立刻入宫向德宗求情，称崔祐甫无罪，不应被贬。德宗满脸困惑，说：“二位贤卿不是刚刚上疏弹劾他吗，为何又出尔反尔？”

郭子仪和朱泚对视一眼，很无辜地表示：常衮所上的那道奏疏压根没让他们看过。

此言一出，德宗李适大为震骇。

怎么回事？常衮竟然未征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弹劾大臣？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宰相专权、欺君罔上啊！

如果说新君即位之初，比较忌讳的事情是和宰相班子意见不合，那么最忌讳的事情，恐怕就是被一个专权揽政的宰相蒙蔽和架空了。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初五，德宗李适断然下诏，把首席宰相常衮贬为潮州刺史，同时擢升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诏书一下达，不啻在满朝文武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百官虽然大为讶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在心里拍手称快。

因为常衮的虚伪和矫情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相比之下，既理性又务实的崔祐甫就要比他可爱多了。

此时，被贬出京师的崔祐甫刚刚走到昭应（今陕西临潼县），传诏使者就快马加鞭地从后面追上了他。

跪地听宣的那一刻，崔祐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因为他一贯坚信——风水是轮流转的，宰相是轮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领导也总有一天会下台的！

现在，风水终于转到我家来了。

常衮，你认栽吧！

常衮万万没料到自己的结局会这么凄惨。

他本以为潮州是他给崔祐甫安排的归宿，没想到却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坟墓。

这真是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黑色幽默。

常衮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更不知道新君李适为何如此决绝。他只能在无边的痛苦和失落中想起古人常说的一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

作为代宗时代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常衮与新君李适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容许朝政大权过多地

集中在某个大臣的手上！

所以，就算常衮不在此次礼法之争中落马，迟早也会因其他事情而下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衮其实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因为早些走还可以保住一条老命，晚了很可能就什么都保不住了……

大历十四年这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当常衮黯然神伤地走上那条山高水远的贬谪之路时，德宗李适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崔祐甫的归来。

此刻的李适，已经在心里勾画了一幅重振朝纲、中兴李唐的宏伟蓝图，只等一个务实能干的宰相来到他的身边，帮他把这个美妙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李适：闪亮登场的新帝

新君李适丧服未除，就毅然决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换上了一个区区五品的中书舍人，如此强悍的举动，不得不令满朝文武感到吃惊，也不能不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而李适接下来的一系列举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旋风。

——闰五月中旬，李适颁布诏书，宣布今后不再随便接受四方上贡的各种物品，同时撤除了由玄宗创立的皇家艺术中心（梨园），遣散乐工三百多名。

——闰五月十七日，一个不识时务的地方刺史献上一幅《庆云图》，以祥瑞之名谄媚朝廷、粉饰太平，李适对此深恶痛绝，下诏宣布：“朕以为，只有选贤举能、拔擢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于像庆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之类的东西，又有哪一样对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从今往后，一律不得进献祥瑞。”

——数日后，李适又命人把宫内豢养的大象、豹子、斗鸡、猎犬等动物全部放逐，同时遣散了数百名宫女。

——六月初，李适下诏：“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诉状而地方政府拒绝受理者，可直接进京，向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告状；此外，若地方政府受理诉状，但百姓认为审理不公、对判决不服者，也可直接到三

法司敲‘登闻鼓’，上诉申冤。”此诏一下，四方百姓欢呼雀跃，每天到京师击鼓鸣冤者络绎不绝。

——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刚刚回朝，就被天子李适下令杖打六十，即日流放边疆。此事极为突然，但明眼人却不难知晓个中原委：邵光超出使淮宁时，“按惯例”接受了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重贿，计有绸缎七百匹、上等茶叶二百斤，还有数量不等的奴仆、马匹等。天子这回拿邵光超开刀，摆明了就是要杀鸡儆猴，一举破除“宦官出差必收贿赂”的这个惯例。邵光超出事后，刚刚出使各地满载而归的宦官们得知消息，赶紧把收受的各种贵重物品全部扔掉，一个个空着双手回到了长安。此后的好些年里，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没人敢收受当地官员的贿赂。

——这一年七月初五，朝廷突然派出了一支工程部队，强行拆毁了大贪官元载等人名下的一批豪宅。很快人们便得知，这是新天子李适直接下达的命令。当时，四方百姓在连年战乱中流离失所，而朝中大臣、各地将帅、当权宦官，却竭尽人、财、物力，竞相修建豪宅，而且一座比一座豪华壮丽，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费。老百姓对权贵阶层的这种奢靡之风极度痛恨，纷纷咒其为“土木妖”。而德宗李适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对这种社会现象颇为不满，所以才有了这次铲平豪宅的举动。当那些象征着权贵利益的“土木妖”纷纷倒下之时，京师的百姓们顿时欢声雷动……

就这样，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德宗李适就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革除了种种弊政，树立了全新的政风，同时向帝国臣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李适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纲，中兴社稷！

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天子，德宗李适的上述举措已经足以体现他锐意进取、矢志中兴的勇气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几任天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光有勇气和信念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足够的胆识、谋略和政治手腕。

那么，李适具备这些素质吗？

从下面这三件事中，我们不难得出判断。

第一件事：李适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

众所周知，郭子仪是大唐帝国首屈一指的功臣，历仕玄、肃、代、德四朝，战功卓著，勋业彪炳。历任天子为了奖赏他，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时候，郭子仪兼任的职务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在此，我们不妨罗列一张郭子仪的职务清单：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关内副元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关内支度使、盐池使、六城水运大使以及押蕃部、营田使、河阳道观察使等等。

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个功高权重、身兼十数职的帝国元勋，任何一个皇帝必然都会对其生出畏惧和猜疑之心。虽然郭子仪对李唐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生性谨慎，做人非常低调（否则恐怕早就因功高震主而被兔死狗烹了），但是当初的代宗皇帝还是很不放心，多次想削弱他的权力，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才一直没有动手。

眼下，如何“摆平”郭子仪就成了德宗李适不得不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这个事情的难度在于：虽然郭子仪本人比较厚道，但他麾下那帮将领却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万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帮将领惹毛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要解决这道难题，必须有一个巧妙的办法。

经过一番审慎而周密的考虑，李适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安全的办法。

一个字——分。

也就是说，必须把郭子仪手中的权力“分解”开来，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几个主要将领头上。如此一来，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鸟之效：既削弱了郭子仪的权力，又安抚了那些骄兵悍将，还能让那几个主要将领从此对德宗感恩戴德。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适下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书令，其余兼职全部免除；同时，将郭子仪原来担任的主要军职，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个主要将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至此，这个困扰了代宗许多年的问题，终于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第二件事：李适成功挫败了一起政变阴谋。

这起阴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说它不大，是因为牵涉面不是很广；说它不小，是因为它事关“废立”，直接威胁到了李适的皇权。

阴谋的策划者有两个：一个是兵部侍郎黎干，一个是高阶宦官（特进，正二品）刘忠翼。据称，黎干为人“狡险谀佞”，而刘忠翼则是“恃宠贪纵”，两个人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很早就企图干预代宗“立

后”和“立储”的大政。

若干年前，德宗李适尚未被立为太子，别有用心的黎干和刘忠翼就极力劝说代宗，让他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再立独孤氏的儿子韩王李迥为太子。但是代宗没有受他们的蛊惑，而是册立了长子雍王李适。

李适即位后，黎干和刘忠翼唯恐遭到报复，遂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长安坊间纷纷传言，说黎、刘二人日夜密谋，企图发动政变。李适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便派人暗中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的一个黄昏，黎干又乘坐一顶小轿悄悄进入刘忠翼的府邸，与他密谈多时，至当天深夜才离去。德宗李适得到密报后，立刻采取行动，命有关部门将黎干和刘忠翼逮捕。经过审讯，黎、刘二人对自己的政变阴谋供认不讳。李适大怒，当即开除二人的官籍，并终身流放边地。

闰五月二十七日，黎干和刘忠翼刚刚走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李适就命人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二人赐死。

第三件事：李适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夺回了禁军兵权。

肃、代之际，大唐帝国有两大乱象最为引人注目，一个是藩镇叛乱，还有一个就是宦官擅权。这两大乱象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让李唐天子对武将逐渐丧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军兵权交给宦官，没想到却因此导致了宦官的恃宠擅权；而宦官掌握宫禁大权后，为了巩固权位，又回过头来勾结各地藩镇，致使那些跋扈藩镇越发骄纵难制。

代宗一朝，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权宦先后掌控禁军，又因恃宠擅权而先后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总是治标而不治本——往往是旧一代的权宦刚刚倒下，新一代的权宦便又强势崛起。

总之，宦官虽然走马灯似的换，但宦官擅权的问题却始终如故。

李适即位时，面对的当权宦官是王驾鹤。此人继鱼朝恩之后崛起，时任神策都知兵马使、左领军大将军，“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对于阴魂不散的宦官擅权问题，李适自然也是深以为忧。同时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无法彻底解决宦官问题，是因为他始终不敢把禁军交给武将。

可是，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为什么不变通一下，索性把禁军交给文臣呢？

在李适看来，要彻底解决宦官擅权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禁军交给文臣！

为此，李适一上台，就开始在文官中寻找合适的人选。

最后，他锁定了司农卿白秀珪。

严格来讲，白秀珪并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在李光弼帐下担任幕僚，做事细心勤勉，并且颇有心计。李光弼对他非常信任，将其引为心腹，时常让他参决军政大事。

这样一个人，其实最符合李适的用人标准：首先，他熟悉军旅事务，又没有一般武将桀骜不驯、骄横霸道的习气；其次，他性格沉稳，做事老练，却又没有一般文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毛病。所以在李适看来，此人绝对是接管禁军的不二人选！

大历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见白秀珪，表示了对他的赏识和器重，并明确告诉他：朕准备解除王驾鹤的兵权，然后把禁军交给你。白秀珪受宠若惊，当即发誓，愿为朝廷鞠躬尽瘁，为天子赴汤蹈火！

李适很满意，随即赐给他一个新名字：志贞。

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白志贞顺利接管禁军？

李适找来宰相崔祐甫商议。崔祐甫略一思索，然后附在天子耳边说了一句话。李适微微颔首，一个笑容在他脸上缓缓绽开。

数日后，崔祐甫通知王驾鹤，说有要事与他相商。听到宰相传召，王驾鹤不敢怠慢，赶紧前往政事堂。崔祐甫热情而亲切地接待了他。宾主双方落座后，免不了一番寒暄。但是，让王驾鹤满腹狐疑又百思不解的是——这一天的寒暄也太长了。

崔祐甫一直东拉西扯，七讲八讲，却始终不提正事。王驾鹤耐着性子陪聊，感觉如坐针毡，却又不便开口告辞。

此刻的王驾鹤当然不会知道，正当他坐在政事堂里听崔祐甫海侃神吹

的同时，白志贞已经揣着天子的任命状，以神策军使兼御史大夫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神策军的军营。

等到王驾鹤走出政事堂，他的职务已经变成了东都园苑使。

所谓东都园苑使，就是到东都洛阳去看管皇家园林，一个很适合养老的清闲职务。

毫不夸张地说，唐德宗李适在历史舞台上刚一亮相，就出人意料地博得了个满堂彩。

在见识了新君李适施展的一系列雷霆手段后，朝野上下对他的执政能力顿时充满了信心，纷纷对他寄予厚望——“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尤其是当时的藩镇，对这个闪亮登场的新帝更是满怀忌惮、敬畏不已。反应最强烈的当属淄青镇。据说那里的将士曾经把兵器丢弃于地，相互感叹道：“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明君出现了，咱们还能再造反吗？

更有甚者，大历十四年六月，“畏上威名”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还主动上表，愿意向朝廷献钱三十万缗。

收，还是不收？

这是一个问题。

三十万缗不是个小数目，德宗李适一时有些犹豫不决。

收吧，毕竟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日后不免有受其要挟的危险；不收吧，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推辞，如果硬拒，势必激起藩镇的不满。

就在德宗吃不准要怎么接招的时候，宰相崔祐甫发话了：“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德宗无奈：“朕也认为不能收，可又该如何推辞呢？”

崔祐甫笑了：“很简单，借花献佛。”

德宗迷惑不解，问他此言何意。

崔祐甫正色道：“请陛下派遣使者前去慰劳淄青将士，就用李正己给的钱赏赐他们。如此一来，既能让淄青将士对朝廷和陛下感恩戴德，又能让四方藩镇知道——朝廷是绝不会看重金钱的。”

德宗龙颜大悦，当即依言而行。

当朝廷使者来到淄青，把李正己的三十万缗分发给将士们的时候，淄青将士顿时欣喜若狂。他们不约而同地跪倒在地，对着长安方向三拜九叩，不停地山呼万岁……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李正己傻眼了。

虽然心里很不爽，但对于朝廷此举，李正己还是不得不佩服。

只不过让他感到困惑的是：按说这世界上没人不喜欢钱，可如今的天子和朝廷却为何能够如此洒脱，拿钱不当回事呢？

其实，德宗并不是不喜欢钱，他只是不喜欢那些拿着烫手的钱而已。如果是来路正当的钱，比如朝廷每年从地方收缴上来的赋税，德宗绝对是喜欢的，而且多多益善。

为了让朝廷的腰包鼓起来，以便将来更有底气拒绝藩镇的收买，德宗决定找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来当宰相。

大历十四年八月，在崔祐甫的大力推荐下，一个数年前遭到贬谪的大臣被德宗召回了长安，并随即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个从道州司马任上直接入阁拜相的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财政大臣——杨炎。

两税法：危机与拯救

据说杨炎这个人有三大优点：一、长得帅；二、文章写得漂亮；三、擅长理财。所以史书毫不吝惜对他的赞美之辞：“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救时之弊，颇有嘉声”（《旧唐书·杨炎传》）。

代宗时代，杨炎凭借前两个优点赢得了当权宰相元载的赏识，颇受重

用，可惜元载垮台后，杨炎就被贬到了山高皇帝远的道州（今湖南道县）。直到德宗即位，他的人生才突然跃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他的第三个优点也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杨炎一入相，首先解决的是皇帝的“小金库”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主要用以宫廷和皇室的一些额外花销。一般情况下，小金库的钱是有限的，皇帝大人也得掰着指头过日子，稍不留神，大手大脚一下，皇帝也不免变成“月光族”。所以，大多数皇帝都会想方设法扩大小金库的收入。如果皇帝贤明的话，这方面往往还比较节制，要是碰上昏庸奢侈的败家皇帝，那朝廷的国库就遭殃了——小金库花光就从国库掏，反正天下都是朕的，朕爱怎么掏就怎么掏，想掏多少掏多少，谁也管不着！

有唐一朝，朝廷的国库名为“左藏”，宫内的小金库名为“大盈”。开国伊始，李唐朝廷就订立了一套制度，对国库实行非常严格的监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负责管理左藏的库藏部（太府寺）都会对各地上缴的金帛分批点验，然后悉数登记入库，同时还要由审计署（比部）负责监督，实地查对，以防出现贪污现象。因此，在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里，左藏库和大盈库泾渭分明，一般不会出现皇帝乱掏乱摸的现象。

然而，到了肃、代之际，一切就全都乱套了。

问题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武将身上。这些人自恃对国家有功，加之手中握有重兵，于是就把左藏库当成了他们家的提款机，隔三差五就来提上一笔，连收条都不带打。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军阀，管理国库的官吏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的全国财政总监（度支使）第五琦就为此大伤脑筋，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左藏库里的金帛全都搬进了宫中的大盈库，交给宦官去管理。如此一来，军阀的魔爪固然是鞭长莫及了，但不幸的是，国家财富转眼又落进了宦官的腰包。在肃、代两朝的二十余年间，有权力染指大盈库的宦官前后多达三百余人。不管是库藏部还是审计署，没有人知道这三百多个宦官究竟从国库搬走了多少金帛，也不知道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到底是多少。

除了穷凶极恶的军阀和监守自盗的宦官外，还有一只无形的手也时常在内库中进进出出，而且比前二者更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那是谁的手？

当然是皇帝的。

以前内外两库泾渭分明的时候，皇帝大人也时不时会落入囊中羞涩的窘境。现在好了，没钱花的时候也不用跟度支使开口了，只要往大盈库伸伸手，想拿多少拿多少，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真是不亦快哉！

杨炎上台时，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腐烂的局面。

他知道，如果不从国库的整顿和监管入手，治理国家财政根本无从谈起。

大历十四年年底，杨炎向德宗李适郑重提出："财赋者，国家之大本，民生之命脉。社稷兴亡、朝廷安危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如何管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历朝历代，都委派重臣进行掌管，但尽管如此，仍然无法彻底避免物资损耗和账目不清的情况。如今，国库被宦官把持，每年的收入多少，开支多少，盈余或亏空的情况如何，朝中大臣全都一无所知，政治上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建议，自即日起，将国库的管理和监管之权交回相关部门。至于宫中所需，每年可列出预算，由国库如数划拨，保证宫中用度不致匮乏。只有这么做，才谈得上财政的治理。"

德宗欣然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当天便颁布诏书，宣布从今往后，所有财政收入全部划归左藏库，每年只需精选三五千匹上好绸缎，作为宫廷用度送交大盈库。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杨炎又提出了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措施，彻底废除了已经在唐朝实施了一百多年的"租庸调法"，代之以一项全新的赋税制度。

这就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两税法"。

旧有的租庸调法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是指田赋，"庸"是指劳役，"调"是指捐税，正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自唐朝开国以迄高宗时期，这项赋税制度一直运行得还算正常，但是从武周时代起，地主豪强兼并之风大起，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大量逃亡，到开元年间，逃户现象日趋严重，至玄宗末年，均田制实际上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在此情况下，各级政府的户籍、田亩档案就变得混乱不堪，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符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根据户籍、田亩档案进行赋税征收更是变成一句空话。各级官员为了交差，往往采用非常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征收、加重摊派，令辖境内登记在籍的百姓苦不堪言。

由于战乱频仍、开支激增，李唐中央入不敷出，只好在各级政府中拼命增设财税部门，以致各部门职能重叠，权限交叉，到最后谁也管不着谁，财政状况一片混乱。此外，各地的军政长官又巧立名目，任意摊派，不断增设法令，对百姓横征暴敛，于是旧法未除、新令已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富裕阶层和贫困群体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因为富人有很多逃避劳役和赋税的手段，比如入仕为官和削发为僧，就是当时普遍采用的逃税办法。而对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来讲，当官一途基本上是难于上青天的，甚至连和尚也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因为当时出家必须有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度牒），富人只要找找关系塞塞红包就到手了，可穷人就算把自己卖了，也不见得能换来那份度牒。所以，穷人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乖乖让各级衙门和贪官污吏把他们身上的血汗榨干。

职是之故，整个社会就陷入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之中。在战乱和苛政的双重迫害下，贫苦的老百姓没有活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逃——从户籍所在地逃到没人认识你的地方，让天天逼你交税的官府见鬼去吧！

到了安史之乱后，各地官府统计了一下，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对照从前的户籍档案，仍然留在本乡本土的原住民还不到过去的15%[1]，其他的85%以上，要么死于战乱和饥荒，要么就是逃往异地他乡了。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如果还按照原来的“租庸调法”派发徭役和征收赋税，那各级官府的大爷们就只能自己去修水渠、建大坝了，而朝廷和天子到头来恐怕也得去喝西北风。

所以，废除旧法，出台新法，就成了德宗朝廷的当务之急和势在必行之举。

“两税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这项赋税改革的重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意思是不管原住民还是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拥有土地和资产，一律要登记入籍，依法纳税；同时，不再以“丁身为本”征敛租庸调，而是根据拥有的土地面积和资产额度划分贫富等级，再按照不同等级缴纳相应的土地税和财产税。

具体的实施细则是：

一、将建中以前各种名目的正税、杂税及杂徭全部取消，只征收两税：以谷物方式征收地税（土地税），以现金方式征收户税（财产税）。

二、重新进行人口普查、户籍登记和土地、资产评估，根据贫富程度划分缴税等级，富者多交，贫者少交。

三、唐朝中央对各州府作出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赋税收入为准，确定需要收缴的固定总额，再参照上面两条，将应缴的土地税额平均分摊到每亩，将财产税额按贫富等级分摊到每户 [2] 。

四、另有一条特别规定：凡异地经商者都要和当地居民一样承担纳税义务，按其利润的三十分之一（不久就改为十分之一）缴纳税收。

五、规定交税的时间为每年夏（六月之前）、秋（十一月之前）两季，所以此项赋税制度就定名为“两税法” [3] 。

建中元年正月，德宗李适下诏，正式颁行两税法。

毫无疑问，这个新税制拯救了危机重重的帝国财政。

作为中国土地制度史和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统一了此前混乱不堪的税制，把过去“以人丁为准”的征收原则进一步合理化，改变为“以贫富为准”，从而减轻了贫困阶层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德宗朝廷通过两税法的实施，把安史之乱以来被地方军政长官把持的财政大权重新收回到了中央手中，“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旧唐书·杨炎传》）。

然而，在后来实行的过程中，这项新税法并没有从实际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并且还产生了许多流弊：一、长期没有调整贫富等级，致使“以贫富为准”的征收原则得不到贯彻；二、由于两税中的户税（财产税）部分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而中唐以后，民间货币的流通量严重不足，于是产生了“钱重物轻”的通货紧缩现象，老百姓不得不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换取钱币缴纳赋税，无形中增加了经济负担；三、在两税制下，土地的自由买卖被政府允许，所以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盛行，富人迫使穷人卖地，而土地依旧在穷人名下，其结果就是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不用缴税，而无地的穷人仍然要承担纳税义务，最后只能逃亡。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性循环再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如此，李唐朝廷和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取代它，所以，两税法还是成了此后一千多年历代王朝的基本税制。

两税法的成功实施让杨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使得德宗李适对他更为倚重。恰好在这个时候，首席宰相崔祐甫患病，多数时候都在家里休养，而当初与杨炎一同提拔的另一个宰相乔琳则因为碌碌无为被德宗罢免，所以从建中元年春天开始，杨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独任大政”的首席宰相。

事业、名望、地位、权力，该有的都有了。接下来，杨炎终于可以做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了——算账。

算什么账？

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

一个宰相的快意恩仇

杨炎要报谁的恩？

答案是：元载。

虽然世人普遍认为这个弄权宰相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但杨炎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元载当年提携了他。

在杨炎看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管元载如何罪大恶极、臭名昭著，他永远都是自己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恩人。

因此，杨炎要报仇的对象，就是当初整垮元载的人。

这个人就是刘晏。

尽管当时元载一案的幕后主使是代宗李豫，可刘晏却是该案的主审官。元载被定罪诛杀后，杨炎惨遭株连，被贬到了穷乡僻壤。这笔账，杨炎当然要记在刘晏头上。更何况，代宗死了，刘晏还活着，杨炎想要发泄心头之恨的话，当然不能找死人，只能找刘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私密的原因是——杨炎担心这家伙会对他的宰相之位构成威胁。

因为刘晏和他一样，也是一个理财高手，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高

他一筹。

如果说杨炎是在宏观政策的层面上拯救了帝国财政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归功于这个刘晏。因为许多年来，刘晏一直总揽朝廷的财政工作，长期兼领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等财政职务，在第一线上做了许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既有材力，视事敏速，乘机无滞……军国之用，皆仰于晏”（《旧唐书·刘晏传》）。

刘晏掌管财政之前，李唐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刘晏上任后，一年的财政收入就高达一千余万缗。“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如果没有刘晏，从肃宗时代起便已千疮百孔的帝国财政也许早就轰然崩溃了。换言之，假如没有微观层面上点点滴滴的改善和集腋成裘的积累，杨炎后来创设的两税法就没有了施行的基础和成功的条件，最多也只能是个画饼充饥的东西。

因此，像刘晏这种“任事十余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的人，随时都有可能一步跨到相位上来，分享杨炎的权力。

面对如此强势的威胁，杨炎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忧虑和恐慌。

所以，就算不提当年那笔旧账，杨炎也必须对刘晏下手。

就在两税法颁布的几天后，德宗召两位宰相议事。杨炎奏事完毕，忽然涕泗横流地对德宗说：“陛下可知道，刘晏此人，很早就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身为宰相，没有尽到讨逆之责，罪当万死啊！”

客观地说，杨炎指控刘晏与黎、刘二人同谋，并不能算是诬告。因为京城早有传言，说当年黎干和刘忠翼怂恿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之事，刘晏也曾参与其中。至于这个传言是否属实，那就没人知道了。

对此传言，德宗实际上也早有耳闻，只是当朝宰相如此煞有其事地向他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德宗没有说话，脸上是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

这时候，崔祐甫发话了。他说：“像这种暧昧不明的传言，不可随便采信，况且陛下刚刚颁布了大赦令（朝廷于正月初一改元，同时大赦天下），更不应该追究这种风言风语。”

杨炎一看皇帝的脸色，又听了崔祐甫的话，知道凭这则谣言八成是搞

不定刘晏的，随即转移方向，说："尚书省及其六部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这些年来增设了很多使职，大大分割了尚书省的行政权力，臣建议最好是裁撤诸使，恢复旧制。"

裁撤诸使，首当其冲者当然就是刘晏。

对德宗来说，关于刘晏参与阴谋的传言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所以，仅凭传言将刘晏定罪固然不妥，但完全不理会谣言似乎又让人不太放心。毕竟这则谣言传得这么凶，不会纯属空穴来风。德宗想来想去，觉得最妥当的处理方式还是像杨炎暗示的那样——可以不杀，但不能不贬。

这一年正月底，德宗下诏，宣布自即日起，将国家财税的管辖权（天下钱谷）收归户部的财务司（金部）和粮食司（仓部），同时罢免刘晏兼任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二月，杨炎又怂恿德宗将刘晏贬出朝廷，理由是刘晏不久前呈上的一道奏章中有许多虚假不实之词，隐然有欺君之嫌。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德宗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大臣对他的欺瞒，而杨炎的话则一下子触痛了这根敏感神经。于是德宗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将刘晏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因为杨炎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将刘晏贬官，而是将他置于死地！

这年六月，宰相崔祐甫病逝。杨炎顿时心中窃喜，因为崔祐甫一死，就再也没人替刘晏说话了。

不久，杨炎就暗中授意自己的死党、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指控刘晏，说他自从被贬到忠州后就满腹牢骚，经常埋怨天子，而且还与附近藩镇暗通款曲，此外又在本州大肆招兵买马，颇有起兵反抗朝廷的迹象。

庾准是刘晏的顶头上司，德宗很容易就采信了他的控辞，加上杨炎又在他耳边拼命煽风点火，德宗遂痛下决心，于这年七月派遣宦官前往忠州，秘密将刘晏缢杀，并将其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事后，为了掩人耳目，杨炎又建议德宗发布了一道赐刘晏自尽的诏书。

然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杨炎疯狂复仇的行径还是被天下人看在了眼里。

刘晏无辜被诛后，朝野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替他鸣冤叫屈。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

去年，他卑躬屈膝地向朝廷献钱三十万缗，不料却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总想找机会出出这口恶气。如今，朝廷在刘晏这件事上做得这么不地道，李正己当然要挺身而出，充当一回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正义之士了。

他旋即上疏德宗，对朝廷的做法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和强烈的谴责，同时要求德宗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杀人凶手。

对李正己这一声吼，德宗置若罔闻，可做贼心虚的杨炎却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这就好比某梁上君子夜入暗室，盗得宝贝在手，转身欲走之际，忽然灯火大亮，满屋子站满了围观群众，这贼不活活吓死才怪。

杨炎自以为整死一个刘晏，不关别人鸟事，没想到却一下子触犯了众怒。

怪只怪他太低估刘晏的影响力了——这些年刘晏兢兢业业为国理财，其成绩实在引人注目，所以积累了相当高的威望。现在，朝野舆论的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杨炎，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这滋味实在是不太好受。

怎么办？

事情都做下了，人也已经杀了，难不成叫杨炎公开忏悔主动辞官，或者挥刀自刎以谢天下？

不，这是不可能的。

唯一推卸责任的办法，就是找个人来背这口黑锅。

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杨炎情急之下抓来消灾避祸的这块挡箭牌，居然是当今圣上李适！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二月，为了转移舆论的矛头，杨炎派遣了一

批心腹前往各地，向诸镇的头头脑脑们解释说：“刘晏之所以获罪被诛，完全是因为他当年依附奸臣、谋立独孤氏为后的结果，皇上对他深恶痛绝，才会把他除掉，实在没有别的原因。”毫无疑问，杨炎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错误！

普天之下，他找谁来背这口黑锅都没问题，可他偏偏脑子进水，把皇帝拉出来挡枪子儿，这不是在找死吗？

马上就有人向德宗密奏，说：“炎遣五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旧唐书·杨炎传》）杨炎之所以派遣五路使者前往诸镇，就是担心天下人把杀刘晏的罪名归到他头上，所以才把罪过全推给了皇上。

这下麻烦大了。

德宗刚开始还不太相信，赶紧派宦官到淄青找李正己求证，结果很遗憾——反馈回来的消息和密奏内容一模一样。

德宗李适勃然大怒。

自古以来，只有皇帝抓人来当替罪羊，哪有臣子抓皇帝来当挡箭牌的？这该死的杨炎真是活腻了！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从这一刻开始，德宗就已经下定了除掉杨炎的决心。只是由于这一年春，河北诸镇因继承人问题屡屡跟朝廷叫板，德宗分身乏术，才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这件事。

虽然暂时还留着杨炎，但必须马上找一个人来制约他的权力。

德宗随后找到的这个人，就是中唐时期赫赫有名的奸相——卢杞。

建中二年二月初六，德宗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同时任命卢杞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从此，德宗日渐倚重卢杞，基本上把杨炎给冷冻了。

此时的德宗当然不会知道，重用卢杞将成为他帝王生涯中最大的一道分水岭。

——在过去的两年中，德宗李适凭借自己盛年即位的一腔热情赢得了

一个漂亮的开局，但是自从卢杞上台以后，那些令人鼓舞、令人欣慰的大好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连串令他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失败。

杨炎之死

说起这个卢杞，还是颇有些来头的。

他的祖父就是开元初年与姚崇搭档的宰相卢怀慎，一生清廉，家无余财，据说死后连个棺材都买不起；他父亲卢奕也官至御史中丞，在东都任职，安禄山叛军攻入洛阳时，其他官吏纷纷逃跑，唯独卢奕坚守岗位，遂被叛军所杀。

由于父祖两代皆有令名，卢杞便凭借门荫1直接入仕，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忠州刺史、虢州刺史等职，建中元年擢任御史中丞。

据说，卢杞此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就是长得奇丑无比——“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旧唐书·卢杞传》）

世界上有黄、白、黑、棕四色人种，唯独没听说过还有蓝色人种，可卢大人偏偏就是蓝色的，怪不得人家都把他当成鬼。

关于卢杞大人的容貌，在长安坊间还流传着一则逸闻：说是郭子仪晚年接待客人时，姬妾侍女总是环绕在侧，有一次听说卢杞来访，郭子仪赶紧将侍妾全部屏退。卢杞走后，家人问他何故如此，郭子仪苦笑着说：“卢杞貌陋而心险，我是怕妇道人家一见卢杞尊容，忍不住非议讪笑。日后此人若是得势，郭氏岂能逃过灭顶之灾？”

这则逸闻起码可以说明三件事：一、卢杞的容貌的确已经丑到撼人心魄的地步；二、郭子仪的谨小慎微实在是无人能及；三、郭子仪阅人无数，他认定卢杞不仅貌丑，而且必定是一个心性阴险、睚眦必报之人。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子仪的判断是对的。

其实，长得丑并不是卢杞的错，但是心地阴险就肯定是他的不对了。德宗派了这么一个既貌丑又心险的人来跟杨炎搭档，杨炎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过。

自从卢杞来到政事堂上班，杨炎就不得不和他一块办公，而且每天还要和他面对面共进午餐，于是杨炎便时常有恶心欲吐之感。后来，每

到中午用餐时，杨炎总是借口身体不适，跑到别的地方吃饭，才算解决了吃不下饭的问题。

卢杞一看杨炎连吃饭都躲着他，气得一张蓝脸都变绿了。

为了给杨炎一点颜色瞧瞧，同时树立自己的权威，卢杞入相不久，就借故炒了一个中书主书的鱿鱼。要知道，中书主书可是杨炎的部下，卢杞这么干，摆明了就是要挑衅滋事。杨炎气得在背后直跺脚："主书是我的人，有什么过错我自会管教，哪轮得到你这个丑八怪来狗拿耗子？"

不过气归气，此时的杨炎也知道自己已经失势、风光不再了，所以除了跺跺脚、骂骂娘之外，实在也没别的办法。

建中二年六月，山南东道（治所襄阳，今湖北襄阳市）节度使梁崇义一再违抗天子诏命，大有割据反叛之势，德宗遂命淮宁（原淮西，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节度使李希烈率诸道兵马讨伐。可是，杨炎却力劝德宗不要任用李希烈。他说："李希烈是李忠臣的养子，深受李忠臣宠信，而李希烈却恩将仇报，驱逐李忠臣，夺其权位。此人狠戾无情，身无寸功之时尚且如此嚣张不法，一旦讨平梁崇义，朝廷何以制之？"

应该说，杨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可德宗正对李希烈寄予厚望，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杨炎一再坚持，令德宗大为恼怒。

七月，因淮宁地区阴雨连绵，故李希烈迟迟没有出兵。生性多疑的德宗不免七想八想，卢杞趁机向德宗密奏，说："李希烈之所以迁延逗留，正是因为对杨炎不满。陛下何必为了顾惜杨炎而坏了国家大事？依臣之见，不如暂时罢免杨炎，让李希烈高兴一下，等到平定梁崇义后，再恢复杨炎的职务也无妨啊。"

德宗颇以为然，遂罢免杨炎的宰相职务，改任左仆射 [4] ，同时在卢杞的举荐下，擢升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稍后，卢杞又提拔了一个叫严郢的人担任御史大夫。毫无疑问，张镒和严郢都是卢杞的死党。随着卢杞一党全面把持朝政，杨炎的末日就到了。

这年八月，李希烈轻而易举地讨平了梁崇义。与此同时，卢杞也展开了对杨炎的绞杀行动。

卢杞是从杨炎的儿子杨弘业身上入手的。

按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官场铁律，老子贵为首席宰相，儿子通常不会是什么好鸟。这位杨公子就仗着他老爸的权势，干了一大堆贪赃枉法、受贿请托的事情。严郢被卢杞提拔为御史大夫不久，就在其授意下对杨弘业实施了立案审查。

杨公子被纪检部门“双规”后，吓得六神无主，不但把他自己干过的丑事儿一股脑儿全都抖了出来，而且还把他老爸不久前刚做的一件事也坦白交代了。

这件事的关键词是：家庙。

所谓家庙，就是宗族祠堂。在古代，凡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人都很重视宗族祠堂的建设，因为它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还能借此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势。所以，普通人盖家庙也就是一间两间，达官贵人一盖可就是一大片了。杨炎贵为首席宰相，他的家庙当然更要盖得傲视群雄，不仅要占地广阔、富丽堂皇，还必须建在一块风水宝地上。

杨炎物色的这块风水宝地，位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江畔。这里花红柳绿，景色宜人，在长安城里绝对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宝地，因此，土地的价格自然就不会便宜了。

为了筹足资金搞到这块地，杨炎决定卖掉他在东都的一座宅子。

照理说，不管是卖宅子还是盖家庙，都是杨炎的私事，只要他不强买强卖、仗势欺人，也就没什么问题。但是，杨炎还是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首先，杨炎并不是把东都的宅子卖给私人，而是卖给了公家。

为什么要卖给公家？

这里头当然就有猫腻了。当时，在东都洛阳说话算数的是河南尹赵惠伯，此人是杨炎的心腹。杨炎就建议他动用公款购买这座宅子，至于公家买这个宅子能干什么用，那就不在杨炎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杨炎关心的，只是价格。

当然，赵惠伯没有让杨炎失望，很快就用了一个让杨炎很舒服的价格购买了宅子。

后来，从杨公子的口供中，御史大夫严郢查明，这座宅子的成交价比当时的市场价高出非常多。

这回好了，围绕着家庙问题，杨炎的第一桩罪行浮出水面了。严郢立刻上奏卢杞。卢杞随即找来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寺卿）田晋，问他杨炎该当何罪。田晋答："依照法律，主管官员在公物交易中获利，视同索贿论处，应当撤职。"

"撤职"当然不是卢杞想要的答案。卢杞阴沉着脸对田晋进行了一番暗示，可田晋还是坚持要依法办事。卢杞不说话了，第二天就把这个大理寺卿逐出了朝廷，贬为衡州司马。然后，卢杞又找了大理寺的另一个官员，让他给杨炎定罪。这个官员很聪明，马上说："政府官员执法犯法，应当判处绞刑。"

要的就是这句话！

至此，杨炎的索贿罪名算是成立了。但是，要一举将他置于死地，卢杞觉得这个罪名还不够分量。

什么才够分量？

谋反。

可是，杨炎不过就是盖了一座家庙，够得上这么可怕的罪名吗？

够得上，绝对够得上！官场的事情历来如此，说你有事你就有事，没事也有事；说你没事你就没事，有事也没事。卢杞稍微动了下脑筋，往深里一挖，杨炎的第二桩罪行、也是足以令他死无葬身之地的罪行，立马浮现在世人眼前了。

原来，杨炎并不是第一个在曲江江畔盖家庙的。早在开元年间，当时的宰相萧嵩就在这里盖了一座家庙，可玄宗认为这里是长安官民休闲游乐的风景胜地，不适合建私人祠堂，就让萧嵩把家庙迁到别处去了。

抓住这个证据后，卢杞如获至宝，随即上奏德宗："杨炎家庙所在的这块地，历来就有王气，所以玄宗皇帝当初才会命萧嵩搬迁。杨炎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故意在此地建庙，显然是包藏祸心，图谋不轨！"

好了，啥也别说了。

皇帝非常生气，后果非常严重！

建中二年十月，德宗断然下令，将左仆射杨炎一下子贬到了天涯海角——崖州。

崖州，就是今天海南的琼山市。现在，海南是无数“驴友”趋之若鹜的热带天堂、度假胜地，可在当时，这里却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终年瘴气肆虐、疾病流行。被贬到这里的官员，十个要挂掉九个，剩下那一个，就算有生之年能回长安，差不多也只剩半条命了。所以，在当时所有官员的心目中，崖州几乎就是地狱的代名词。

这年冬天，某个北风呜咽的清晨，杨炎坐在一驾吱吱作响的马车上，凄凄惶惶地走上了不归之路。在途经广西一个叫“鬼门关”的地方，文章圣手杨炎满怀悲凉地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杨炎知道，被贬崖州就意味着死。

然而杨炎并不知道——他甚至已经不能活着走到崖州了。

德宗皇帝派出的使者，在距离崖州一百里的地方追上了他。然后，一条冰冷的绳索就不由分说地套上了他的脖颈……

数日后，河南尹赵惠伯被贬费州（今贵州思南县），还没走到贬所，就遭遇了跟杨炎一样的命运。

诛杀杨炎后，德宗李适终于去掉了一块心病。接下来，他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对付那些跋扈藩镇了。

李适是一个胸怀大志、自视甚高的皇帝，早在即位之前就对肃、代两朝的政治乱象深感不满。他实在搞不明白，自玄宗末年以来，天下诸藩，尤其是河北诸镇，凭什么如此嚣张跋扈、为所欲为，动不动就自立自专、兴兵反叛？而李唐中央又为何如此软弱无力，屡屡被臣藩玩弄于股掌之间？

面对这一切，李适很愤怒。

所以自从登基之后，李适就一直在等待机会，以便铲除那些“名为藩臣，实如异域”的跋扈藩镇，将权力收归中央。

要想达成这个目标，最方便的入手处，当然就是废除诸藩“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了。在李适看来，只要那些强藩一死，朝廷拒绝承认强藩子弟的世袭权力，李唐中央的权威就有了重塑的可能。

建中二年正月，德宗李适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出现——成德（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县）节度使李宝臣死了，其子李惟岳向朝廷上表，企图继任节度使职。

李适意味深长地笑了。

他给出了一个世界上最言简意赅的回答——

不！

[1]　根据《通典》卷七“历代户口盛衰”记载，唐朝天宝年间的户数将近九百万，至代宗大历中期仅余一百三十万。

[2]　可事实上在执行过程中，各州府均以大历年间当地赋税收入最高的那一年为准，因此各地额度参差不齐，全国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税额。

[3]　一说是根据“地、户两税”而得名1　唐朝给予功臣后代的一种政治待遇，不经科举考试便可授予官职。

[4]　自玄宗时代起，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已经变成没有实权的虚职。

第七章 诸藩自立为王

向藩镇开刀

为了让儿子李惟岳能够顺利继承节度使之位，成德李宝臣在临死之前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建中二年正月初，李宝臣以托付后事为由，把跟随他多年的十几个心腹大将召到恒州，并且在同一天全部杀死。

这件事很绝情，很残忍，可李宝臣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李惟岳太年轻，而且生性软弱，缺乏主见，日后很难镇得住这帮悍将，所以李宝臣只好提前帮儿子清场。

当那十几颗血迹斑斑的头颅在李宝臣面前一字儿摆开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感到欣慰，就不由自主地蹙紧了眉头。

因为漏掉了一个。

他麾下最骁勇的将领、时任易州（今河北易县）刺史的张孝忠并没有在这串头颅里面。

这可不妙。李宝臣想，张孝忠不死，儿子将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李宝臣随即派遣使者前往易州，催促张孝忠来恒州晋见。

使者是张孝忠的弟弟张孝节。

看着弟弟那张拧成一团的苦瓜脸，张孝忠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你回去问问李宝臣，那些将领犯了什么罪，竟然同日被诛？你告诉他，我张孝忠怕死，所以不敢去，不过请他放心，我也不敢背叛他。说来说去，就是跟他不敢奉诏入朝一样罢了！”

张孝节的眼泪哗哗就下来了，哽咽着说：“你要不去，我就死定了。”

“我要是去，咱哥俩就全死定了！”张孝忠说，“有我在，他不敢杀你。”

张孝节空手而回，李宝臣在心里一声长叹。

看来张孝忠是杀不掉了，而且这个笨蛋张孝节也不能杀，现在杀他就

等于提前逼反张孝忠。

没办法了，让一切顺其自然吧。儿子李惟岳能不能守住这份家底，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正月初九，李宝臣卒。幕僚胡震等人劝李惟岳秘不发丧，随后以李宝臣的名义上表朝廷，请求由李惟岳继任节度使。

看着成德的奏表，德宗李适的心头不禁掠过一阵战栗。

这是兴奋的战栗。

李适很清楚，李宝臣肯定是一命呜呼了，否则李惟岳也不会这么急着上表。

机会来了！要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于是，德宗一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成德的要求，一边派遣了一个叫班宏的使臣前往恒州，去“探望”李宝臣的病情。

朝廷使臣一到，李惟岳顿时傻了眼。他知道瞒不住了，只好拿出重金贿赂班宏，希望他能够帮着隐瞒。不料班宏却一口回绝，马上回京向德宗禀报了李宝臣已死的实情。李惟岳无奈，这才匆忙发丧，同时自立为留后，并授意成德将领联名上奏，请求朝廷赐给旌节。

德宗再次驳回了他的请求。

天子的强硬态度让诸藩大为惊愕，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危险。

尽管诸藩人人心怀鬼胎，处处明争暗斗，但是在“确保权力世袭”这一点上，他们却是空前团结、高度一致的。早在许多年前，成德李宝臣、魏博田承嗣、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等人就形成了一个秘密约定——诸镇必须齐心协力，确保各自地盘的世袭。

当初田承嗣死时，李宝臣就曾极力帮他的侄子田悦说话，迫使代宗朝廷承认了田悦的世袭权力。

所以，当德宗此次明显流露出“削藩”的意图时，诸藩当然不会坐视。随后，魏博节度使田悦便代表诸藩频频上奏，一再替李惟岳求情。

德宗还是那个字：不！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朝臣劝谏德宗说：“李惟岳承袭父位已经是既成事实，若不顺水推舟，势必发生叛乱。”

德宗当然知道——敢于说“不”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

如果李惟岳及其河北诸藩胆敢抗命，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一战！

为了表示自己向藩镇开刀的决心，德宗李适对满朝文武说了一番话：“这些年来，各种反叛势力凭的是什么？还不是凭借朝廷封给他们的土地、赐给他们的权位！过去，朝廷为了息事宁人，不断给予他们任命，不断满足他们的欲望，可结果呢？叛乱还是有增无减！由此可见：爵命不足以消弭叛乱，适足以助长叛乱！所以，倘若李惟岳必定要叛，给不给他任命，结果都没什么两样。”

朝廷最终拒绝李惟岳的消息传出后，田悦和李正己的使者便迅速赶赴恒州和李惟岳见面。

诸藩紧急磋商的议题只有一个——武力联合，对抗中央！

建中二年五月，诸藩率先动手了。

魏博节度使田悦命兵马使孟佑率五千步骑北上增援李惟岳，同时命兵马使康愔率八千人进攻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命别将杨朝光率五千人在邯郸西北扎营，阻击昭义方向来的朝廷军，而他本人则亲率数万大军围攻临洺（今河北永年县）。

与此同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出兵扼守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州市）及涡口（今安徽怀远县淮河入口）一带，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遥相呼应，封锁了朝廷的江淮运输线。

德宗没料到诸藩居然赶在他前面动了手，顿时勃然大怒，立刻与朝臣们制订了一个平叛计划。

六月初，德宗发布作战命令，准备在南、中、北三条战线上与叛乱藩镇全面开战。

南线战场，由于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屡屡主动要求征讨梁崇义，德宗感其忠义，遂晋封他为南平郡王，加授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命其统率诸道军队进攻山南东道。

中路战场，德宗命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治所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组成联合兵团向魏博的田悦发起进攻。

北线战场，德宗把进攻李惟岳的任务交给了幽州留后朱滔。朱滔二话不说，欣然领命。本来，幽州与成德、魏博（并称河北三镇）一直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可自从代宗大历十年，魏博田承嗣诱使成德李宝臣偷袭幽州的朱滔后，幽州镇就与成德镇结下了梁子。如今朝廷要讨伐李惟岳，朱滔当然要借这个机会报仇雪恨了。

浓密的战争乌云，又一次在帝国上空迅速聚集、剧烈翻涌……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次大战爆发前夕，亦即建中二年六月十四日，大唐帝国的头号功臣、四朝元老郭子仪终于走完了他沧桑而辉煌的一生，病逝于长安家中，享年八十五岁。

在平定安史之乱、挽救李唐社稷的那批功臣中，郭子仪是活得最久的一个，也是声誉最隆、威望最著、功业最盛的一个。其实，郭子仪身边不乏嫉恨他的小人，比如鱼朝恩、程元振等，都曾经不择手段地算计他，甚至想置他于死地，可郭子仪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这首先当然要归功于上天赐给他的好运气，但同时也跟他的处世之道息息相关。

说起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不外乎这四个关键词：谨慎，低调，宽容，坚忍。他之所以能够在惊涛骇浪、大起大落的一生中屡屡化险为夷，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几条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处世原则。

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郭子仪的一生，未尝不可作如是观。

和他同时代的很多武将、文臣和宦官，为了功名利禄争得头破血流，最后却大多死于非命。可郭子仪很少主动去争什么，到头来却拥有了世人梦寐以求的一切：权力、地位、名望、富贵、平安、长寿、妻妾成群、子孙满堂……

史称，郭子仪仅"中书令"一职就兼任了二十四年，光朝廷发给的俸禄每月就多达两万缗（两千万钱），加上各种渠道的私人收入，可谓富甲一方，所以家里的库房总是"珍货山积"。

郭子仪不仅门庭显赫，而且人丁也异常兴旺。在他的长安大宅内，家人、族人，连同奴婢、仆从加起来，足足有三千人，相当于今天正规部队的两个团！

郭子仪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皆为朝廷显官”；孙子有数十个，每次请安的时候，郭子仪连认都认不过来，只好保持同一个表情，对每个孙子都微笑点头。曾担任郭子仪副将的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等人，虽贵为王公，也经常被郭子仪呼来喝去，甘愿受其驱使，以至连郭子仪的家人，也把这几个大将视同家里的仆从差役。

盖棺论定之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郭子仪做了这样的评价：“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终有唐一朝，做人做到这份上的，恐怕也只有郭子仪一个了。

郭子仪死后，德宗为之辍朝五日，命有关部门为他修建一品陵墓，并在一丈八的高度上诏令再加一丈，所有丧葬费用都由朝廷支付，文武百官全部赴郭宅吊唁。出殡那天，德宗李适率百官亲临安福门，为之哭泣送葬，随后谥号“忠武”，让其配享代宗庙庭。如此种种，可谓极尽人臣之哀荣。

就在郭子仪去世的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平藩战争也迅速拉开了帷幕。战争在三条战线上先后打响。

首先来看中路战场。建中二年七月底，马燧与李抱真合兵八万，从壶关（今山西壶关县）越过太行山直抵邯郸，对驻守在此的杨朝光部发起攻击。正在围攻临洺的田悦担心腹背受敌，亲率一万多人回师援救杨朝光。马燧命部将李自良在双冈（今河北邯郸市西北）阻截，并下死令：“如果让田悦过了双冈，你就提头来见！”李自良遂奋力死战，击退了田悦援军。

随后，马燧以优势兵力一举击溃杨朝光，全歼其所部，随即进抵被围已久的临洺。田悦投入全部兵力迎击马燧。双方恶战一百多个回合，田悦军终因士卒疲惫而不敌，被斩首一万余级，连夜败逃。邢州、临洺二州之围遂解。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纳一直封锁消息，自领军政。田悦战败后，慌忙向李纳和李惟岳求援。李纳遂出兵一万，李惟岳出兵三千，与田悦残部合计二万余人屯驻于洹水（流经

河南安阳市）。马燧等人率部进驻邺城，与其隔河对峙。

八月，李纳为父发丧，同时上表请求承袭节度使职。

李适不禁冷笑。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呢！

李适不想给李纳任何答复了。

他现在只想用刀剑说话。

南线战场，兵力单薄的梁崇义唯一一次主动进攻失败之后，便一直集中兵力龟缩在襄阳。李希烈大军沿汉水而上，直逼其老巢。梁崇义急命部将翟晖和杜少诚在蛮水（汉水支流，流经湖北南漳县南）阻击，被李希烈打败，二将皆降。李希烈即命二人暗中返回襄阳，对守城军民进行策反。梁崇义下令闭城坚守，但守城将士却打开城门纷纷出逃。梁崇义无力阻止，绝望之下带着妻儿投井而亡。

随后，李希烈轻而易举地入踞襄阳，割下梁崇义的首级传送京师。

就在中路战场首战告捷、南线战场获得完胜的同时，在北线战场，朝廷在战事未开时就先捡了个大便宜——朱滔成功策反了成德悍将张孝忠。

当时，张孝忠正率领八千精锐将士驻守易州（今河北易县）。朱滔想要南下攻打李惟岳，易州就是必经之地，是他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朱滔知道，张孝忠骁勇善战，所以这颗钉子只能智取，不能硬拔。

大军未发之前，朱滔便先行派人去游说张孝忠，说：“李惟岳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敢对抗朝廷，实在是不自量力！而今昭义、河东军已经攻破田悦，李希烈的淮宁军又克复了襄阳，河南的各路军队都在日夜兼程向北挺进，成德与魏博亡可立待，你若能率先以易州归顺，那么平灭李惟岳的首功便是你的，此乃转祸为福之上策！”

事实上，不用等朱滔来游说，张孝忠早就有心归降朝廷了。

自从李宝臣向功臣宿将挥起屠刀，张孝忠对成德的忠诚早已荡然无存，现在李惟岳又跟朝廷大动干戈，张孝忠当然没有理由再为成德卖命，所以朱滔这番话正中其下怀。随后，张孝忠奉表向朝廷请降。德宗大喜过望，于九月初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

九月初七，为了表彰李希烈平定梁崇义的功劳，同时为了鼓舞前线官军的士气，德宗又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

此时，诸道平叛军队已经对成德的李惟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整个战略形势显然对李唐中央非常有利。

德宗李适大为自豪，他觉得自己基本上是胜券在握了。李适相信，用不了多久，那些拥兵割据的跋扈藩镇必将被一一铲除，而大唐帝国也必将回到大一统的轨道上来！

然而，李适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马上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问题出在刚刚被他树立为平叛英雄的李希烈身上。

种种迹象表明——李希烈并不是收复了襄阳，而是吞并了襄阳！也就是说，李希烈主动请缨、大举出兵的目的，并不是替朝廷平定叛乱，而是趁机壮大实力、扩张地盘！

怎么会这样？

刚刚在他心中涌起的那股豪情刹那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

梦想很坚挺，现实很疲软

本来，在德宗李适的心目中，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可造之才。他相信假以时日，李希烈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像郭子仪那样的帝国功臣。

当初李希烈自告奋勇请求讨伐梁崇义，德宗别提有多高兴了，多次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赞李希烈，说他心忧天下，忠勇可嘉。但是听到这样的赞语，却有好几个大臣不以为然，比如宰相杨炎，还比如黜陟使（负责考察地方官员的中央特使）李承。

当时，李承恰好从淮宁视察回来，对李希烈的野心已经有所察觉。他忧心忡忡地对德宗说：“李希烈此役必能建立战功，可问题是，在此之后他很可能会居功自傲，不服从中央。到时候，朝廷恐怕还要对他发动第二次讨伐。”

德宗当时根本就听不进去

可现在，他终于明白——李希烈的所谓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一旦他具备足够的实力，必将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同年九月初九，亦即刚刚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的两天之后，德宗便任命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让他赶赴襄阳接管梁崇义留下的地盘。

李承临行前，德宗提议要让禁军护送他去，可李承却婉言推辞了。

在他看来，李希烈现在刚刚占领山南东道，立足未稳，肯定不敢跟朝廷翻脸，如果他带着禁军前去，势必引起李希烈的猜疑和恐慌，甚至会迫使他铤而走险。

所以，李承决定单骑赴任。他知道李希烈肯定会视他为眼中钉，但是他相信，在目前的情势下，李希烈还不敢把他怎么样。

不出李承所料，当他带着朝廷的任命状到达襄阳时，李希烈尽管恨得牙痒痒，却不敢轻易动手，只把他软禁在宾馆里，百般威胁，千般恐吓，企图把他吓回长安去。可李承知道李希烈只是在虚张声势，所以不为所动。

到最后，李希烈实在是拿这个新任的节度使没辙，只好在襄阳全境纵兵大掠一番，才悻悻然引兵而去。

李希烈大军虽然撤走，但却留了一个将领在襄阳，名义上说是留守军队物资，实际上是在襄阳插了根钉子。李承接管襄阳军府后，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才让军政事务重新步入正轨。同时，李承也派出心腹数度前往许州和蔡州，暗中收买了李希烈的几个亲信，准备寻找机会干掉李希烈。

至此，德宗朝廷与李希烈的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表面上虽然相安无事、波澜不惊，但背地里却是剑拔弩张、暗流汹涌。

从建中二年冬天起，唐朝政府军与叛乱诸藩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较量。令德宗甚感欣慰的是，官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节节胜利。

先是在这年十一月初，朔方将领唐朝臣等人在徐州大破淄青和魏博的军队，一举打通了被封锁达半年之久的江淮运输线。紧接着在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马燧等部又在洹水大败田悦的魏博军，斩敌二万余级，俘虏三千多人。

田悦带着残部一千余人，连夜逃回老巢魏州，守城大将李长春却闭门不纳。

很显然，李长春是想等官军杀来后举城投降。可直到第二天早上，李长春还是没等到官军，只好打开城门。田悦在城外冻了一夜，勃然大怒，一进城就杀了李长春，然后命令部众全部登城据守。

然而，此时的魏州城内，仅余士卒数千人，而且士气极为低落。尤其是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属，更是哭天抢地，满街哀嚎，搞得整个魏州城人心惶惶。

田悦大为忧惧，这是他继任节度使以来遭遇的最严峻的一次信任危机。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尽快安抚人心、重振士气，说不定还没等官军来攻，士卒们已经把他的脑袋砍下来献给朝廷了。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最能考验一个领导驾驭人心的本事。处理得好，还有机会从头再来；处理不好，身家性命随时可能玩完！

那么，田悦能渡过这次信任危机吗？

作为田承嗣的侄子，田悦能够把田承嗣的一帮儿子通通比下去，被田承嗣选为接班人，当然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

逃回魏州的当天，田悦就在节度使府门口召集军民训话。他骑在马上，把自己的佩刀高高举过头顶，声泪俱下地说：“田悦不成器，当初承蒙淄青、成德两位世伯（李正己、李宝臣）举荐，继承了伯父的事业。如今，二位世伯已经过世，他们的儿子（李纳、李惟岳）却不能子承父业，我不敢忘记二位世伯大恩，决心保举他们的儿子，所以才不自量力、对抗朝廷，以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连累了父老乡亲，这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田悦上有老母，不能自杀，只希望诸公能用我手里这把刀，砍下我的首级，打开城门献给官军，自取富贵，不要和田悦一起陷入死地！”

话音未落，田悦便作出一副悲恸欲绝之状，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

将士们大惊失色，慌忙冲上去把他抱住。

节度使这番话，真可谓慷慨激昂，感人肺腑！军民们大受感动，当场纷纷表态：“大人是出于正义而举兵，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等累世受田氏厚恩，怎么忍心听到这些话！愿为大人拼死一战，若不能胜，再与大人共死不迟！”

田悦泪流满面，激动地说：“诸位不因落败而把我抛弃，田悦即便是到了九泉之下，也不敢忘记各位兄弟的深恩厚意！”

这张悲情牌打得实在漂亮，以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田悦赶紧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然后挥刀断发，与诸位将领结成了生死兄弟。紧接着，田悦又打开府库，把积藏多年的一百余万钱全都拿了出来，分给了所有将士。

经过这一番感情和金钱的双重洗礼，将士们无不精神抖擞、勇气倍增，一个个都发誓要和节度使同生死，要与魏州城共存亡。

在泪弹加银弹的攻击下，田悦成功地俘获了所有将士的心。于是魏博“众心始定”，“军势复振”（《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数日后，马燧等部将魏州团团围困，并日夜猛攻，但是叛军的反抗意志却比他预料的强大得多，所以始终未能攻克。

建中三年正月中旬，朝廷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一连串胜利。

首先，魏博将领李再春以博州（今山东聊城市）归降，田悦堂兄田昂以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归降；接着，朱滔、张孝忠在束鹿（今河北辛集市）击败李惟岳，继而攻克深州（今河北深州市）。正月下旬，成德将领康日知又以赵州（今河北赵县）归降。到了闰正月下旬，成德骁将王武俊又发动兵变，斩杀了李惟岳，然后砍下他的人头向官军投降。

李惟岳的首级传至长安，德宗和百官大为振奋。

二月初，成德将领杨政义又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归降。

至此，黄河以北大致平定，只剩下田悦困守魏州孤城，而黄河以南的官军则猛攻濮州（今山东鄄城县）的李纳。李纳势穷力蹙，基本上也是败局已定。

面对如此大好局面，德宗朝廷顿时充满了乐观情绪，上自天子、下至百官，无不认为天下将从此太平。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德宗朝廷距离最终的胜利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再次把帝国卷进了更大规模的战乱之中……

叛乱诸藩的大部分辖区被官军收复后，朝廷就开始着手分地盘了。

一时间，河北诸镇分田分地，忙得不亦乐乎。

朝廷把成德一劈为三：易、定、沧三州给了张孝忠，任他为节度使；恒、冀二州给了王武俊，任他为都团练使；深、赵二州给了康日知，任他为都团练使。另外把淄青的德州（今山东陵县）和棣州（今山东惠民县）给了朱滔。其余的地盘，朝廷自己收了。

德宗对这样的安排感到很满意——既赏赐了有功之臣，又把旧成德劈成了三瓣，达到了令降将们互相制衡的目的，此外朝廷又收回了魏博大部、淄青大部和山南东道全部，这样的安排真可谓皆大欢喜！

但是李适错了。

这样的安排就让某些人很不欢喜。

比如王武俊就窝了一肚子火。他认为：既然是他亲手宰了李惟岳，那他的功劳绝对在张孝忠之上，凭什么张孝忠能分到三个州，还能当节度使，而自己才分到两个州，并且只封了个小小的“都团练使”，这不明摆着瞧不起人么？非但如此，皇帝还下了一道居心叵测的诏书，让他给朱滔送去三千石粮食，给马燧送去五百匹马……王武俊越想越愤怒：这又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在削弱我王武俊的实力？你李适是不是想借我之手先把魏博的田悦收拾了，接下来再来灭我？

有鉴于此，王武俊遂拒不奉诏。

跟王武俊一样，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是极度不爽。他本以为拿下富庶的深州之后能顺势将其占为己有，没想到朝廷却把它划给了康日知。朱滔再三请求得到深州，朝廷硬是不答应，朱滔索性就赖在深州，说什么也不给康日知挪地儿。

此刻，诸藩分赃不均的一幕被某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已经濒临绝境、困守在魏州城内的田悦。

田悦仿佛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派人前往深州游说朱滔，说：“讨平李惟岳事实上都是你的功劳，当初天子承诺，一旦把李惟岳的城池打下来后就都归属于你，如今看来纯粹是一派谎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今天子志在削藩，打算以文臣取代武将。在此情况下，魏博要是继续存在，你幽州就能高枕无忧；魏博要是亡了，你也就危在旦夕。如果你现在出手援救魏博，那就等于是在挽救你自己子

孙万世的福利啊！”

朱滔觉得田悦的想法正与他不谋而合——朝廷要是把河北诸镇都扫平了，最后是不会单独留下他一个幽州镇的。随后，朱滔马上联络王武俊，二人一拍即合，遂决定三镇（幽州、恒冀、魏博）联兵，再度与朝廷对抗。

刚刚被朝廷任命为深赵都团练使的康日知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狼群之中，第一时间向朝廷发出了求救信号。德宗皇帝匆忙下诏，给了朱滔一个通义郡王的爵位，试图以此安抚他。

然而，此刻的朱滔要的是实地，不是虚衔。他把天子诏书撕得粉碎，立刻与王武俊联合，先以部分兵力包围赵州的康日知，然后二人亲率主力驰援魏州的田悦。

形势突然逆转，此前的平叛力量现在都成了叛乱势力，屯驻河北的马燧兵团顿时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德宗紧急征调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命他率朔方军及神策军共一万五千步骑，开赴前线支援马燧。

建中三年六月底，魏州城下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方援军在同一天进入战场。

田悦马上杀牛宰羊，犒劳朱、王援军；马燧不甘示弱，也摆出盛大军容迎接李怀光部。

所有人都很清楚，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将决定河北诸镇的命运。

李怀光求胜心切，打算趁叛军立足未稳发起进攻。马燧劝阻，可李怀光不听，独自率部向惬山（今河北大名县北）西面的朱滔展开攻击。

朱滔猝不及防，被杀一千多人，向后溃退。李怀光信马由缰地走上一面高坡，望着仓皇逃窜的敌军，满脸得意之色。士兵们见主帅没有追击的命令，随即一头冲进朱滔遗弃的营寨，疯狂争抢战利品。

李怀光没有料到，就在他自以为初战告捷的时候，王武俊突率两千精骑横冲而来，一下子将他的部众拦腰截断；朱滔紧随其后，对其发起猛烈的反扑。

正在抢夺战利品的官军毫无防备，顿时崩溃，逃跑中互相践踏挤压，落进永济渠溺毙者不计其数，尸体堆积如山，渠水为之断流。战场上的形势突然逆转，马燧想出兵援救也来不及了，只好坚守营寨。

当晚，朱滔又出兵截断了官军粮道。马燧等人大为惊恐，连忙拔营西撤，于七月初撤到了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

惬山会战惨败，魏州围解，朱滔又遣将援救被困于濮州的李纳，一时间四镇联合，叛军声势重振。

败报传至长安，德宗李适呆立良久，半晌无语。

建中三年十一月，叛乱诸藩在一夜之间全部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纳自称齐王。

大唐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战国时代。

诸藩设坛祭天，共推朱滔为盟主。朱滔自称“孤”，田悦、王武俊、李纳自称“寡人”；他们居处的厅堂改称“殿”，他们的政务公文改称“令”，所有的属下上书称为“笺”；他们的妻子称“妃”，他们的长子称“世子”。以他们所统治的各州为府，设立留守兼元帅；设立东西曹，视同中书、门下省，设置左右内史，视同中书令、侍中；其余各级官员的设置一律仿照中央政府，只是名称略有差异。

建中三年十二月，更让人抓狂的消息接踵而至——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在河北诸藩的劝进下，自立为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俨然已有称帝之志。

消息传来，李适顿觉天旋地转。

乱套了，一切全都乱套了！为什么朝廷花这么大的力气平藩，到头来居然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为什么自己的梦想那么坚挺，可遭遇的现实却是如此疲软？

接下来该怎么办？

李适心里一片茫然……

李希烈之乱

茫然的德宗李适在新年伊始又遭到了当头一棒。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正月初，李希烈派兵拿下汝州（今河南汝州市），继而攻下尉氏（今河南尉氏县），紧接着又包围了郑州，

同时派出骑兵四处劫掠，前锋已进抵彭婆（今河南伊川县东北彭婆乡），对东都洛阳形成了严重威胁。

据来自东都的战报说，当地官军屡屡出兵征讨，却每每无功而返。东都“士民震骇”，已经有好多人拖家带口逃出洛阳，纷纷躲进了深山老林。

德宗无比震惊。

尤其让德宗感到愤怒的是——东都的南面屏障汝州，几乎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投降李希烈的。

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就出在德宗亲自任命的汝州守将李元平身上。

李元平，原本是湖南一个普普通通的中级官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资治通鉴》卷二二八）。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的宰相关播听他谈了一通兵法，惊为天人，遂极力向德宗推荐，说此人有“将相之器”，才堪大用。德宗信以为真，赶紧把李元平派驻河南前线，让他专门防范蠢蠢欲动的李希烈。

李元平就这么带着天子和宰相的殷切期望，踌躇满志地来到汝州，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刚一到任，他就迫不及待地在城门口贴出告示，说要招募工匠修葺城墙、加固防御工事。

按理说，李元平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可问题是他的告示被李希烈看到了。

李希烈嘿嘿一笑，对手下说：咱也派些人过去，支持一下李大人的工作。

随后，便有几百个淮宁士兵化装成民工，光明正大地走进了汝州城。几天后，李希烈突然派出几百名骑兵，直抵汝州城下。还没等李元平反应过来，一伙“民工”就蜂拥而上，将他摁倒在地，然后把他捆成了一颗粽子，同时打开了城门。城外的淮宁骑兵遂长驱直入，群龙无首的汝州守军只好乖乖缴械投降。

李希烈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汝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被宰相关播誉为“有将相之器，才堪大用”的李元平被押到李希烈面前时，居然吓得屎尿失禁，弄得满身污秽。李

希烈哭笑不得："他娘的宰相瞎了眼，竟然把你当成我的对手，何至于把我轻视到这种地步！"

李希烈骂得没错，能从帝国基层的万千官员中挑出李元平这样的货色，宰相关播的眼光确实"非比寻常"。

那么，李唐朝廷为什么会有关播这样的瞎眼宰相呢？

答案很简单——他是首席宰相卢杞引荐的。

说白了，关播就是卢杞手中的提线木偶。

当初，卢杞除掉杨炎之后，知道德宗肯定要再提拔一两个朝臣为相，于是就主动推荐了时任吏部侍郎的关播。他给关播的定位很明确，就是木偶。他不但不让关播插手政务，甚至连话也不让他随便说。

有一次德宗召集宰相议事，卢杞侃侃而谈，关播忍不住也想畅所欲言，可刚刚要开口，就看到了卢杞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只好硬生生把话吞进了肚子里。会后，卢杞立刻向他提出严重警告：正因为你这个人恭谨少言，我才引荐你当宰相，刚才你怎么可以有说话的冲动呢？从此，关播就把自己的嘴巴缝上了。

有这样的两个宰相盘踞中枢，天下事可想而知。要命的是，德宗李适又偏偏对卢杞宠信有加，事无巨细皆与其商议定夺。这一次也不例外——当李希烈发动叛乱的消息传来，德宗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计于卢杞。

卢杞胸有成竹地说："李希烈年轻气盛、居功自傲，部将们肯定都不敢劝他。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携带陛下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剖析祸福利害，李希烈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到时候，中央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把他降服。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忠贞正直、刚毅果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实在是此行的不二人选。"

德宗频频点头，觉得卢杞的话很有道理。

正月十七日，德宗下诏，命颜真卿前往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宣慰李希烈。诏书颁下，满朝文武尽皆失色。所有人都觉得，卢杞这么做无异于是让年过古稀的颜真卿去送死。

没错，卢杞就是要让他去送死。

自从当上首席宰相的那一天起，卢杞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朝中有

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一个个搞掉，好让自己永远待在首席宰相的位子上。

很不幸，四朝元老颜真卿就是这么一个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这样的人不除，卢杞就寝食难安。

接到诏书后，颜真卿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临行前，他给儿子留了封信，上面只写了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

很显然，这是遗言。

颜真卿知道卢杞的用意，也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是他没有丝毫犹豫，更没有半句怨言。因为，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能够活到今天，实属幸运。若能在古稀之年为社稷和苍生略尽绵薄之力，他宁愿赴死，并且死而无憾。

走到洛阳时，东都留守郑叔则极力挽留颜真卿，劝他在洛阳逗留一段时间，看天子会不会改变主意。颜真卿谢绝了他的好意，说："这是圣旨，岂能逃避！"

颜真卿到了许州，见到李希烈后，刚刚要宣读皇帝诏书，李希烈就暗中指使一千多名亲兵冲进节度使府，一个个刀剑出鞘，将颜真卿团团围住。颜真卿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宣读了诏书。

李希烈见恐吓未能奏效，赶紧换了一副面孔，挺身挡在颜真卿面前，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表情，厉声斥退了那些亲兵，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

李希烈没有杀颜真卿，也不想放他回去，而是把他软禁了起来。

他知道，颜真卿这个人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作为当时硕果仅存的四朝元老，颜真卿在天下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若能迫使他背叛朝廷，投到自己麾下，李希烈就能利用他的威望号令四方，增强起兵叛唐的合法性。

然而，李希烈打错了如意算盘。

倘若颜真卿真是他想的那种人，早在安禄山起兵时他就叛了，何必等到今天？

颜真卿到达许州不久，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也分别派遣使者来到许州，一起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得意洋洋地对颜真卿说："如今

四王皆遣使劝进，可谓不谋而合，太师（颜真卿时任太子太师）都看见了吧，眼下受朝廷排挤、深怀功高不赏之惧者，岂止是我李希烈一个人？”

颜真卿冷笑：“我只看见‘四凶’，没看见什么‘四王’。大帅若不自保功业，而与乱臣贼子为伍，结果只能是和他们一同覆灭！”

李希烈强忍怒火，命人把他扶了出去。数日后，李希烈宴请四镇使节，特意邀颜真卿一起赴宴。席间，四镇使者在李希烈的授意下，纷纷以“宰相”之位劝诱颜真卿，说：“久闻太师德高望重，而今大帅即将正位称尊，太师恰好到来，这岂不是上天要把开国宰相赐给大帅吗？”

众人话音未落，颜真卿就厉声怒斥：“什么宰相？你们听说过那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那就是我的兄长！我已年近八旬，只知守节而死，岂能受你们威胁和利诱？”

四个使者无言以对，只好悻悻闭嘴。李希烈勃然大怒，当天就命人在颜真卿的驿馆里挖了一个大坑，扬言要把他埋了。颜真卿神色自若地对李希烈说：“我自知死生已定，你又何必搞这么多花样？只要给我一把剑，大帅岂不就称心快意了？”

李希烈恨得咬牙切齿，可一想到颜真卿的利用价值，还是忍住没有杀他。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李希烈用尽各种手段，对颜真卿软硬兼施、百般胁迫，却始终不能得逞。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八月，亦即被软禁了一年零七个月后，颜真卿终于被李希烈缢杀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享年七十七岁。

第二年，李希烈之乱平定，德宗为颜真卿举哀，辍朝五日，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在祭悼颜真卿的诏书中，德宗说了这么一句话：“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旧唐书·颜真卿传》）

能在身后得到如此哀荣，颜公在九泉之下当可瞑目矣。

德宗当时虽然派了颜真卿前去宣慰李希烈，但他并没有放弃武力征讨。

建中四年正月下旬，德宗估计颜真卿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遂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哥舒翰之子）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命他率部出征，会同各道征讨李希烈。二月下旬，哥舒曜克复汝州。三月，李希

烈命亲信大将周曾率三万人进攻哥舒曜。

李希烈没有想到，这个周曾早已被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承策反。周曾率军行至中途，随即与另外几个当初被一同策反的将领密谋，准备倒戈攻击李希烈，然后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可是，周曾等人的密谋旋即被李希烈获悉，李希烈立刻派人斩杀了周曾等人。

建中四年四月，哥舒曜率兵行至颍桥镇（今河南襄城县东北），突遇倾盆大雨，不得已而退驻襄城。李希烈命部将李光辉出兵攻打，被哥舒曜击退。

哥舒曜虽然遏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李希烈对东都洛阳的威胁，但随后的几个月里，官军在河南、河北两个战场上都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与叛乱诸镇形成了对峙态势，整个战局一片混沌。

日渐陷入泥潭的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与河北诸镇对峙，而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湖南、剑南、岭南等十余镇军队，皆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与李希烈相持。这么多军队参战，其粮饷和后勤补给本来就已经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加上旧制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全部由中央的财政总署供给，而德宗李适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了一份“酒肉钱”。这对于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有甚者，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大发其财，总是以平叛之名离境，但一出本道边境便按兵不动，实际上并未参战，却照样享受比平时多了好几倍的军饷和补贴。

德宗李适无奈地发现——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正在变成一个可怕的黑洞，即将把整个帝国吞噬。

当然，朝廷总是有办法的。

无论哪朝哪代，国家的财政亏空最终总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建中四年六月，判度支（财政总监）赵赞奏请德宗，出台了两项新税法：“税间架”和“除陌钱”。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举报者赏钱五十缗（一缗一千钱）。

所谓“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

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凡有举报，赏钱十缗，由偷漏税者承担。

新税法颁布实施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可民间却是一片怨声载道。

当然，百姓的声音从来都是微弱的，天子一般听不见。

除非这些微弱的声音日渐聚拢，最终汇成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否则统治者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所以，此刻的德宗李适根本听不到。

眼下，光是李希烈与河北四镇称王称霸的叫嚣就已够让他头疼了。

这一年八月初，李希烈亲率三万精锐将士猛攻襄城，哥舒曜向朝廷告急。德宗急命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增援。李勉认为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直取许州，则襄城之围自解。

为抓住战机，李勉还没等朝廷下诏便命二将出兵。九月十二日，刘、唐二军进抵许州仅数十里处时，德宗派遣的宦官就追上了他们，责备他们违抗诏令，擅自行动。二将无所适从，只好沮丧而回，在半路突遭淮宁李克诚部伏击，士卒死伤过半，唐汉臣逃奔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刘德信逃奔汝州。

官军援兵既破，李希烈更为猖獗，一边继续围攻襄城，一边派遣游击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面十里处的伊阙。

眼看中原战场连连失利，作为东都屏障的襄城也岌岌可危，德宗李适只好征调关内的各道军队紧急出关，增援襄城。

在奉命出关的诸道军队中，有一支部队来自泾原（治所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

此刻的德宗李适当然不会知道，这支部队即将给长安带来一场浩劫……

泾师之变：从天而降的劫难

建中四年十月初三，天气异常寒冷，长安城被笼罩在迷蒙的雨雪之中。

这一天，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士兵途经京师，由于在天寒地冻中跋涉多日，士兵们都显得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半大的孩子。他们是士兵的子弟，反正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跟着父兄一块走，以免在家里活活饿死。除此之外，士兵们也是想多拉几个人头来凑数，以便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

按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都是要给予额外赏赐的。

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

当泾原军抵达长安郊外时，负责接待的京兆尹王翃只给他们提供了一顿极其简陋的饭菜：饭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菜也只是几盘青菜，连块肉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

众人心里不约而同地燃起了怒火。

他们开始发出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踢翻了饭菜，破口大骂：“我们就要死在敌人手上，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凭什么让大伙拿小命去对抗白刃？听说皇宫中有琼林和大盈两座宝库，金银布帛堆得像山一样高，不如去把它劫了再说！”

士兵们一呼百应，立刻披上铠甲，扛起军旗，锣鼓喧天地涌向了长安城。

一场劫难就这样从天而降。

当时，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皇帝辞行，闻讯疾驰出宫，在长乐阪（长安东面）遇上了哗变的士兵。还没等他开口制止，就有人朝他放箭。姚令言吓得趴在马背上，抱着马鬃突入乱兵之中，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们犯下大错了！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为什么干出这种灭族的事来？”

可这种时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丝毫约束力了。乱兵们强行簇拥着姚令言，吵吵嚷嚷地向长安冲去。

德宗听说姚令言已经无力制止，慌忙下令赐给泾原士兵每人两匹绢帛。没想到传令的使臣刚刚走出城门，就被迎面而来的哗变的士兵乱箭射死了。德宗再派宦官出宫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长安东

北第一门）。宦官来不及开口宣旨，就被丧失理智的乱兵们砍成了肉酱。德宗大恐，又下令装上满满二十车的金银绢帛赐给他们。

遗憾的是，这么做已经没有用了。此时乱兵已冲入城中，一个个眼冒绿光，唯一的目标就是宫中的府库，根本没把这区区二十车财宝放在眼里。

长安的百姓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吓坏了，纷纷惊惶奔走，四散逃命。乱兵们大喊："你们不用怕，我们不会抢你们的财产，更不会要你们缴纳间架税和陌钱税！"

百姓们一听这口号，心头的恐惧顿时减轻了大半。

非但如此，老百姓心里甚至生出了一丝庆幸。假如这伙乱兵真的把这句口号付诸行动，那他们就不叫乱兵了，简直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义兵"啊！

稍后，德宗又派了皇子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出面安抚，但此时乱兵已经冲到皇宫的丹凤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和平解决此次兵变的希望非常渺茫。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长安百姓则聚集在周围看热闹。

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德宗李适慌忙下令禁军紧急集合。

可是，德宗李适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跑了好几趟，最后都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皇上，根本无兵可调啊！

李适傻眼了。

怎么回事？朝廷长年累月供着这帮养尊处优的禁军，如今大难临头，居然无兵可调？

其实李适不必惊讶，因为他确实拥有画在纸上、每月按时领取薪饷的禁军名额，但并不拥有真正在职的禁军兵员。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神策军使白志贞并不是德宗想象中的能臣干吏，而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

由于深刻认识到肃、代两朝宦官执掌禁军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因而德宗李适刚刚即位，就把禁军兵权从宦官手上收了回来，交给了他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德宗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完全掌控禁军，从而不会再受到宦官的操纵和胁迫。

然而，德宗万万没想到，白志贞固然没有把禁军变成胁迫天子的工具，但他却把禁军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

这些年来，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另一方面又收受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替补。这些市井子弟虽然名列军籍，每月照常领取薪饷和各种补贴，但人却天天待在长安的商埠坊间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天子根本无兵可调。

司农卿段秀实曾经察觉到白志贞的渎职行为，也曾向德宗进谏："禁军不精，兵员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德宗始终信任白志贞，对此谏言置若罔闻。

如今，德宗李适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上（德宗）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就在德宗茫然无措之际，乱兵已经撞开宫门，蜂拥而入，呐喊声惊天动地。窦文场和霍仙鸣匆忙召集一百多名宦官，拥着德宗、太子、贵妃、诸王等人，从禁苑北门仓皇出逃。

此时此刻，天子李适的心头蓦然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慨——危难之际，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当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肺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久之后，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必将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而相同的历史也将再一次循环上演！

也许，这就是帝国的宿命。

也许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已注定无法摆脱这样的宿命。

德宗一行由普王李谊为前驱，由太子李诵殿后，途经禁苑时，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此打猎。郭曙一看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上前护驾。与此同时，正在军营中教练射箭的右龙武军使令狐建闻讯，也带着四百多名士兵前来追随。

德宗李适就在这些人的簇拥下逃出了长安。

他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泾师之变，则是德宗李适即位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他帝王生涯中最难以忘却的一个耻辱。

暮色徐徐笼罩了前方的大地，也渐渐覆盖了身后的长安。德宗李适策马狂奔在苍茫的天地之间，全身弥漫着一种痛彻骨髓的沮丧。

这是一个有志中兴却无力回天的天子灵魂深处的沮丧。

这种沮丧注定将弥漫他的一生。

德宗等人仓促逃离后，京师的大部分官员和皇室的大部分亲王、公主都没来得及逃走。只有宰相卢杞和关播、翰林学士陆贽、京兆尹王翃、神策军使白志贞、户部侍郎赵赞等人相继逃出，在咸阳追上了天子一行。

随后，长安城开始了一场大暴乱。

哗变士兵欢呼着冲上含元殿，大喊："天子逃跑了，我们可以自求富贵了！"随即争先恐后地冲进府库，大肆劫掠。部分乱民也趁机冲进皇宫抢夺财物，那些没能冲进宫中的，就在大街上公开抢劫，整个长安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各坊居民只好成立自卫队自保。

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皇宫的金银财宝全部被洗劫一空。

抢完府库后，乱兵们一个个都钵满盆满、心满意足。可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一下子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接下来该如何善后？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为此大为头疼。

他本来压根就不想造反，却在乱兵胁迫下参与了整个兵变行动，说起来实在是很冤枉。可他也知道，既然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一步，他身为节度使也难辞其咎，就算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所以，他现在唯一的保命办法只有一个——将错就错！

既然无路可退，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怎么才叫一条道走到黑？

很简单，找一个人出来当皇帝——另立新朝！

姚令言随后找到的这个人，就是当时正被软禁在家中的太尉朱泚。

朱泚是幽州节度使朱滔之兄，历任幽州、陇右、泾原节度使，也算是姚令言等人的老上级。本来，朱泚在朝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可自从朱滔与田悦、王武俊等人联合发动叛乱后，朱泚便被朝廷剥夺了职权，并遣归私邸，形同软禁。

朱泚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完了，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最郁闷、最失落的时候，这些泾原的老部下竟然跑到长安发动了一场兵变，然后又找上门来拥立他当皇帝！

这真是否极泰来、喜从天降啊！

那一刻，朱泚的心脏狂跳不止，全身不由自主地滚过一阵战栗。

这辈子能过一回皇帝瘾，那就不虚此生、死而无憾了！

当天深夜，朱泚就在乱兵的拥护下进入大明宫，登上含元殿，当夜宿于殿中，自称“权知六军”。

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料到朱泚会篡位称尊。就在这一天白天，也就是德宗仓皇出逃之际，翰林学士姜公辅就曾跪在德宗马前极力劝谏，说：“朱泚曾担任泾原节度使，后因朱滔叛乱废弃在家，心中早有反意。臣以前劝过陛下，若终究信不过这个朱泚，不如早点把他除掉，以绝后患。如今陛下离京，乱兵一旦拥立他，其势力必将难以遏制，望陛下当机立断！”

然而，德宗只顾着逃命，根本听不进姜公辅的谏言。

十月初四，德宗一行从咸阳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初五，部分文武官员陆续到达，左金吾大将军浑瑊也率部赶到奉天。浑瑊骁勇善战，随着他的到来，德宗和流亡朝廷的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与此同时，长安城里也开始了一场篡位登基的闹剧表演。以光禄卿源休为首的一帮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向朱泚劝进，怂恿他称帝。随后，又有凤翔和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率兵前来投靠。朱泚自以为众望所归，便开始对百官发号施令，并设置六军宿卫，一切仿照天子之制，篡唐之心已昭然若揭。

十月初七，陆续逃到奉天的大臣们都劝德宗加强奉天守备，以防朱泚派兵来攻。卢杞闻言，居然义愤填膺地说：“朱泚的忠贞，满朝文武无人能及！我愿以阖家百口性命担保，朱泚绝不会造反！”

德宗深以为然。

可是，就在卢杞信誓旦旦替朱泚担保的第二天，野心勃勃的朱泚就用他的实际行动狠狠扇了卢杞一记耳光。

建中四年十月初八，朱泚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翌日，朱泚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其余附庸他的朝臣亦各有任命。

此外，朱泚又封朱滔为皇太弟，并派人送信给朱滔，说："三秦地区（陕西中部）不日即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剿灭残敌了，当择期在洛阳与你会面。"朱滔接信，欣喜若狂，立即将信在军府中传阅，同时复制多份通牒诸道，毫不掩饰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伪朝既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源休劝朱泚把滞留在京师的李唐宗室全部剪除，以绝天下之望，同时杀戮立威。朱泚觉得很有道理，遂下令屠杀了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

就在长安沦陷的同时，被围达数月之久的襄城也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哥舒曜迫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撤至洛阳。李希烈旋即占领襄城。稍后，在河北与叛乱诸镇对峙的李怀光、马燧等人也接到了德宗从奉天发出的勤王诏书。诸节度使遽然听到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消息，无不仰天恸哭。数日后，诸节度使相继撤离战场：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与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率部驰援奉天，河东节度使马燧率部退防太原，河阳节度使李艽率部退防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亦率本部退防临洺（今河北永年县）。

突遭此重大变故，唐朝政府军不得不从主动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十月十三日，朱泚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准备一举消灭德宗皇帝和他的流亡朝廷。

德宗李适万万没想到，自己抱着澄清宇内、重振河山的雄心壮志继承了李唐社稷，可即位才短短几年，天下就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叛乱的烽火不仅燃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而且直接烧到了他的眼皮底下！

李适苦笑着对自己说：现在，就连你自己的性命都朝不保夕了，还奢谈什么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呢？

朱泚叛军倾尽全力猛攻奉天，浑瑊等人率众死守、昼夜力战，唐军大

将吕希倩、高重捷等人先后战死，奉天城危在旦夕……

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大唐王朝还从未遭遇如此严重的危机。

帝国能安然度过这场危机吗？

德宗李适能逃过这场从天而降的劫难吗？

奉天保卫战

奉天只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城市，其兵力、粮草、物资、装备都极为有限，被朱泚强攻半个多月之后，消耗巨大，形势万分危急。如果四方勤王之师迟迟不来的话，奉天随时可能被朱泚攻破。

建中四年十一月初，第一支援兵终于出现了。

这支援兵有一万余人，由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刺史戴休颜、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刺史时常春、渭北（治所在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建徽四路勤王之师集结而成。这支援兵虽然兵力不多，但毕竟是一支生力军，对于鏖战已久、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来讲，它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就算不能解奉天之围，至少能帮奉天多守一段时间，以待后续援军。

然而，此刻奉天城的外围全是朱泚的军队，援军入城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距离奉天北面十二里的漠谷，二是距奉天西北四里的乾陵（唐高宗李治陵寝）。

援军到底该走哪条路？

德宗的临时朝廷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浑瑊和关播都认为，绝对不能让援军走漠谷，因为此地既险又窄，一旦遭到叛军伏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乾陵。援军可以利用茂密的树林隐蔽行军，在树林东北面的鸡子堆扎营，与奉天守军里应外合，分散敌军兵力，减轻奉天的正面压力。

可是，此议却遭到了卢杞的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走漠谷的行军速度更快，就算遭到伏击，奉天也能立刻出兵接应，万万不可走乾陵，因为这会惊动先帝陵寝。

惊动先帝陵寝？

这真是一个愚蠢透顶的理由，可它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从军事上来讲，这个理由不值一哂，更不值一驳；但是从政治上来讲，这个理由绝对正确，而且让德宗李适很难反驳。

德宗眉头紧锁，默然不语。

关播看了看天子，又偷偷瞥了一眼卢杞，然后就闭嘴了。

只有浑瑊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声说：“自从朱泚攻城以来，日夜不停地砍伐乾陵松柏，要说惊动，先帝陵寝早就被惊动了！眼下奉天万分危急，各道救兵都还在路上，只有杜希全等人赶到，这支援兵关系重大，若能安全抵达奉天城下，据守要地，便可击破朱泚，岂能冒险去走漠谷？”

卢杞依旧大义凛然地说：“陛下用兵，不能与逆贼相提并论！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情，倘若让杜希全走乾陵，那就是我们自己惊动了陵寝，罪无可赦！”

看着卢杞的一脸忠贞之状，德宗内心的天平终于倾斜了。他当即下令，命杜希全等人经由漠谷入援奉天。

德宗内心这一瞬间的倾斜，直接导致了接下来这幕惨剧的发生。

十一月初三，杜希全等部奉命穿越漠谷，果然在此遭到了叛军的伏击。朱泚军占据两侧山头，居高临下发射强弩，投掷巨石。漠谷顷刻间变成了死亡之谷，唐军伤亡惨重。奉天紧急出兵接应，却被早有准备的朱泚分兵击退。最后，杜希全等人只好带着残部连夜退守邠州（今陕西彬县）。

唐军的救援行动彻底失败。

朱泚大为得意，命人将缴获的辎重及各种战利品陈列在奉天城下，然后大摇大摆地进行检阅。

唐朝的文武官员们呆呆地站在城头上，一个个面面相觑，心里充满了无奈和恐惧。

随后的日子，朱泚对奉天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同时把中军大帐设置在乾陵之上，居高临下地俯视奉天全城。朱泚此举，首先当然是为了侦察敌情，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羞辱德宗，进而削弱德宗君臣和奉天军民的守城意志。

日子在一天天流逝，最后的时刻也在一步步逼近。

奉天被围一个多月后，城中的物资和存粮均已消耗殆尽，专门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二石糙米，连下饭的菜都没有。负责管理御膳的官员只好趁半夜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缒下城墙，去野地里挖些野菜来充当天子御膳。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此刻的奉天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一次，守军挑选了一个身手敏捷、健步如飞的人，准备派他出城执行侦察任务。此人衣服单薄，临行前向天子跪求一套御寒的衣裤。德宗命人拿一套给他，没想到找了半天，竟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找不到，德宗只好伤心地把他打发走了。

在这样的困境中，奉天还能坚守几天？

德宗内心的沮丧达到了顶点。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公卿将帅召集过来，说："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之地，这是朕咎由自取。诸位爱卿并无罪错，还是趁早投降吧，至少能保住身家性命。"

群臣闻言，慌忙跪地叩首，一个个涕泪横流，纷纷表示愿为天子尽忠效死。德宗也止不住潸然泪下。

很显然，这是德宗李适的一张悲情牌。事到如今，除了这么做，他委实不知道该如何凝聚行将瓦解的人心和士气。尽管这番话不见得都是肺腑之言，可至少也算是真情流露。身为天子而主动引咎自责，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德宗这张牌一打出去，没有理由不赢得臣子们的谅解、感动和支持。

然而，这已经是德宗李适的最后一张牌了。

奉天还能靠这张牌撑几天？

德宗心里根本没底。

建中四年十一月中旬，濒临绝境的奉天终于迎来了转机。

因为援军到了。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所部五万人渡过黄河，进抵蒲城（今陕西蒲城县）。

——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率本部四千人从蒲津关（今山西永济市西）

渡过黄河，沿途招募士卒，最后共计一万余人进抵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

——奉命征讨李希烈的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得到奉天危急的消息后，迅速回师，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进驻七盘山（今陕西蓝田县东南）。

——原驻华州（今陕西华县）的镇国军副使骆元光率一万余人进抵昭应（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

——河东节度使马燧派儿子马汇、部将王权率五千人从太原日夜兼程奔赴关中，进驻中渭桥（今陕西咸阳市东）。

各路勤王之师陆续抵达长安外围，虽然来不及驰援奉天，但已经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

朱泚感到了莫大的恐惧。

他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一座长安孤城，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奉天、颠覆李唐社稷，那他刚刚建立的朱秦王朝转眼就会灰飞烟灭。

最后一战，朱泚使出撒手锏，赶造了一种硕大而坚固的攻城云梯：高宽各数丈，外裹犀牛皮，下装大车轮，可同时承载五百名士兵。一见这庞然大物，德宗君臣和奉天官兵尽皆目瞪口呆。德宗慌忙问计于群臣，浑瑊建议挖掘地道陷其车轮，然后辅以火攻。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朱泚利用大型云梯对奉天城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至十五日晨，叛军陆续攻上了东北角的城楼。眼看守城官兵死伤无数，奉天城破在即，德宗不禁与浑瑊相对而泣，群臣也只能仰天祈祷。

最后，浑瑊向皇帝跪别，然后率领敢死队冲上城防缺口，与叛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战斗异常惨烈，冲在最前面的浑瑊身中流矢，依旧奋力砍杀，但是敌人却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地涌了上来，而浑瑊身边的将士却一个一个地倒了下去……

就在这场奉天保卫战即将以失败告终的时候，老天爷终于站在了李唐王朝这边。

这天黄昏，风向突然逆转，城上唐军借着风势，赶紧把成捆成捆浇有松脂和膏油的芦苇草扔向敌军。与此同时，朱泚的攻城云梯也陷进了

唐军挖掘的地道，动弹不得，埋伏在地道里的唐军马上点火，熊熊火焰立刻从地道口冲出。片刻之间，叛军的云梯和所有攻城的士兵全都被熊熊烈焰吞噬了，焦臭之气弥漫在整个奉天城的上空。

叛军遭到重挫，不得不向东面退却。唐军把握战机大举反攻，太子李诵亲自指挥作战，从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出兵，终于将叛军彻底击溃。

是夜，不甘心失败的朱泚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战斗中，一支冷箭嗖的一声落在了德宗面前三步远的地方，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这已经是朱泚能够射进奉天的最后一支箭了。

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挥师援救奉天，在东南方不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击败了朱泚的阻击部队。朱泚大为震惊。他意识到，自己如果再不回防，长安马上会被唐军拿下，而自己最后肯定也会被诸路唐军包了饺子。

思虑及此，朱泚不得不放弃奉天，带着满腔的遗憾逃回了长安。

望着叛军远去时扬起的漫天黄尘，德宗李适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知道，李怀光要是再晚到一天，一切就全完了！

奉天保卫战虽然以叛军的撤围而告终，德宗君臣也终于摆脱了这场可怕的梦魇，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或者说，导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对此，朝野上下当然会有各种不尽相同的看法，可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李怀光个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这一路走来，他只有两个目的：一是靖难勤王，二是奏请德宗诛杀三个人。

哪三个人？

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

李怀光坚持认为，这三个人就是造成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因为卢杞嫉贤妒能，以致政策失当；赵赞赋敛烦重，以致民怨沸腾；白志贞受贿渎职，以致关键时刻无兵可用。总而言之，这三个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谢天下！

李怀光这一路走来，一直扬言到了奉天就要宰了他们。“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眼下奉天围解、大功新建，李怀光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一定会以特殊的礼遇来回报他，而他的谏言也一定会得到天子的支持和采纳。

可是，李怀光错了。

他在奉天城外的军营中眼巴巴地等了多日，不但没等到天子召见他的消息，反而接到了一纸出兵的诏令。

诏令让他立刻率部进驻西渭桥，与李晟等部会师，择日克复长安。

这一刻，李怀光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愤怒，同时又都浸透着无奈。这种感觉就像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又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千里迢迢前来勤王，而今大功告成，与天子近在咫尺，结果居然连一个面都见不着，连一句话都说不上，这算什么事儿？

其实，李怀光没必要感到困惑和失落，因为德宗李适和他的看法全然不同。

早在德宗刚刚逃到奉天的时候，就曾经和翰林学士陆贽谈到了这场祸乱的起因。陆贽很婉转地告诉德宗："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他的意思其实和李怀光一样，也是把原因归结到了卢杞等人身上，只是他说的话比较艺术，不愿指名道姓罢了。可是，德宗却对此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德宗的意思明摆着——这是老天爷的过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也就是说，即便天下的人都认为卢杞其罪当诛，德宗也是不会这么认为的。

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自从卢杞当上首席宰相后，所犯的错误可谓不胜枚举，为什么德宗竟然视而不见，仍旧一心一意袒护他呢？为什么德宗即位时那么英武果决，现在却变得如此昏庸暗昧呢？

答案很简单，德宗受伤了。

众所周知，德宗本来是一个自视甚高、胸怀大志的人，但这几年遭遇了太多挫折，自信心被打击得一塌糊涂，所以日渐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还有些自卑。在此情况下，任何直言不讳的进谏都无异于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只能引起他的抵触和反感；相反，只有像卢杞这种事事逢迎、处处随顺、从不说半句违逆之言的人，才能抚慰德宗受伤的心

灵。

既然如此，德宗又怎么可能杀卢杞呢？

对于德宗的这种心态，卢杞洞若观火。所以，当李怀光扬言要诛杀奸臣的消息传进卢杞的耳朵时，他丝毫没有恐惧之感。因为他知道德宗离不开他。况且，要跟李怀光这种只会打仗不懂政治的大老粗过招，对卢杞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奉天之围一解，卢杞马上向德宗提议——应该命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不能拖延时日，尤其不能召他入城觐见，因为一进城就要赐宴、颁赏等等，一拖又是好几天，倘若让叛军利用这个时间重整旗鼓，想要消灭就难了。

德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让李怀光吃了闭门羹，还颁下了那道让李怀光怒发冲冠的诏令……

李怀光走了。

他带着自己的五万部众黯然离开了奉天。临走前他说了一句话："吾今已为奸臣所排，（天下）事可知矣！"（《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显而易见，此时的李怀光已经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绝望了。

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的人，通常都属于危险人物。尤其是当这个人手里掌握着一支军队的时候，其危险程度更是不言而喻。

这样的人，接下来会干什么呢？

第八章 濒临破产的大唐朝廷

罪己诏：灵魂深处闹革命

李怀光虽然走了，但他并不是去克复长安。

他走到咸阳就按兵不动了，而且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雷打不动。在此期间，李怀光只做了一件事：频频上表，不厌其烦地声讨卢、赵、白三人。

事情明摆着，李怀光要跟天子做交易——想让我讨伐朱泚，就先诛杀这三人，不灭此三人，我绝不出兵！

面对李怀光的要挟，德宗很生气，但却无计可施。

因为李怀光的手里掌握着五万朔方军。

区区泾原的五千乱兵就把帝京长安搞得天翻地覆了，更何况这五万朔方军！

打从玄宗时代起，朔方军就一直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从“安史之乱”直到今天，朔方军始终是李唐朝廷平定藩镇叛乱的核心力量。如今，天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朔方军要是再作壁上观，或者干脆跟着造反，那德宗拿什么来平叛？这一百六十多年的李唐江山岂不是要就此玩完？

就在德宗万般纠结、左右为难的同时，朝中的舆论也越来越猛烈，文武百官纷纷把矛头指向卢杞等人。

德宗彻底没辙了。

他决定跟李怀光做这笔交易。

建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德宗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宰相卢杞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神策军使白志贞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度支使赵赞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司马。

卢杞一滚蛋，德宗李适的智商马上就有了显著的提升。在翰林学士陆贽等人的积极谋划下，德宗终于对目前整个天下的大势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德宗朝廷针对叛乱诸藩制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

这是一个“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两手战略：对朱泚、朱滔、李希烈之流，就一个字——打；而对田悦、王武俊和李纳，则用另一个字——拉。

德宗知道，自从朱泚称帝后，朱滔便日益骄矜，目中无人，所以眼下田、王、李三人跟朱氏兄弟都是貌合神离，而且他们也会担心，万一朱泚兄弟真的夺了天下，接下来要灭的人就肯定是他们。河北诸藩有了这样一条致命的裂缝，李唐朝廷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

建中四年岁末，德宗遣使暗中向田、王、李三人许诺，一旦反正，所

有罪行全部赦免，而且赠以高官厚爵。

德宗的离间之计虽然产生了一定成效，但是田、王、李三人也只是暗中同意归顺，表面上仍旧与朱滔称兄道弟，而且并未取消王号。

很显然，这三个人是在骑墙。因为就目前这种混沌不堪的局势而言，他们还是很难确定该把宝押在哪一方，所以骑墙对他们最为有利，也最为安全。

幽州的朱滔当然不知道隔壁那几个哥们正在和朝廷眉来眼去，他现在一心只想举兵南下，和他的三哥朱泚遥相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进军中原，然后在东都洛阳会师。

一旦占据两京，他们朱氏兄弟就有了逐鹿天下、号令四方的雄厚资本。每每想起这个激动人心的美好愿景，朱滔睡到半夜都会笑醒。

当然，仅凭他一镇之力，要南下扫荡中原还是有些底气不足的，所以，朱滔需要援手。

朱滔决定找两个帮手：一个是回纥人，还有一个就是魏博的田悦。

之所以找回纥人，一来是因为他们打仗厉害，二来是因为他们贪财好色，只要有打家劫舍的活儿，加之许诺给他们金帛美女，他们肯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而之所以找田悦，是因为田悦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当初田悦被朝廷军围困在魏州，要不是朱滔联合王武俊出手相救，田悦早就一命呜呼了，所以他没有理由不还这个人情。

这一年十二月末，朱滔的使者来到魏州，给田悦送了一封信，说："当初八郎（田悦排行第八）陷于危难之中，我与赵王（王武俊）舍命相救，好不容易帮你解了围，这事你应该没忘吧？如今我三哥在关中秉承天命，我打算和回纥人一起去帮他，希望八郎准备一下兵马，和我一道攻取大梁（同汴州，今河南开封市）。"

田悦见信后大为踌躇。要是答应朱滔，显然是被他当枪使，甚至是替他当炮灰，太不值得；要是不答应，就有忘恩负义之嫌，而且人家天天上门催讨人情债，这脸面实在挂不住。

田悦只好召集心腹扈崿、许士则等人商议，问他们对此有何看法、该如何应对。许士则当即对朱滔这个人进行了一番详尽的剖析。

他说："最初，朱滔只是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麾下一个小小的牙将，就和他三哥朱泚、大将朱希彩一起杀了李怀仙，然后拥立朱希彩，朱希彩从此对朱氏兄弟宠信有加。可没过多久，朱滔就和同僚李子瑗谋杀了朱希彩，拥立朱泚。后来，朱滔又怂恿朱泚入朝为质，随即自立为留后，夺取了朱泚的兵权。再后来，朱滔为了巩固权力，又杀了当初与他同谋的李子瑗，其后又陆陆续续杀了二十多人，都是曾经为他卖命的同党。现在，朱泚在关中称帝，朱滔马上又拉虎皮做大旗，日后他一旦得势，肯定会把朱泚取而代之。像朱滔这种利欲熏心、狡诈多变的人，亲兄弟尚且不认，何况同盟者？"

最后，许士则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而今之计，我们表面上不妨答应朱滔，可暗中必须加强戒备。等他来要兵马，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给他几千老弱应付了事。如此一来，大王既成全了报德的名声，又不必遭人胁迫，可谓两全之策。"

扈崿等人闻言，皆表赞同。田悦也是心中窃喜，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没有明确表态。

稍后，恒冀的王武俊听说朱滔在拉拢田悦，唯恐自己夹在中间腹背受敌（恒冀北面是幽州，南面是魏博），赶紧派人去给田悦打预防针，说："朱泚还没有称帝之前，朱滔和我等比肩为王，就已经瞧不起咱们了，你要是再帮他平定中原，让他和朱泚连成一气，我等必成他们的阶下之囚！所以，八郎千万不能跟他一同南下。他若逼你出兵，你只管闭城拒守，我一定会寻找他的破绽，跟昭义的李抱真联手把他干掉，到时候我们还是唐朝的节度使，犯不着跟他这种乱臣贼子一块遭殃！"

接到王武俊的信后，田悦心里面有数了，随即给朱滔回了一封信，承诺跟他一起出兵。

朱滔大喜过望。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滔亲率幽州步骑共计五万人，外加团练一万余人，还有回纥铁骑三千人，浩浩荡荡从河间出发，准备去实现他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梦想了。

然而，这注定只是朱滔一厢情愿的美梦。

因为，隔壁那几个哥们现在都拿他当贼防着，不会让他的野心得逞；而被他寄予厚望的三哥朱泚，也已经自身难保、命不久矣。

建中四年岁末的这些日子，叛乱诸藩中最得意的人当属李希烈。

朝廷任命的淮西招讨使李勉根本不是李希烈的对手。李勉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被李希烈围攻数月，一直等不到关中来的援军，最后不得不放弃汴州，率所部一万多人突围，退至宋州（今河南商丘市）。

李希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占领汴州，随即向北、西、东三个方向同时出兵。

——北路，叛军刚刚兵临滑州（今河南滑县）城下，刺史李澄便举城而降。

——西路，叛军围攻郑州，一举控制了武牢（今河南荥阳市西）以东地区。

——东路，李希烈亲率大军攻陷襄邑（今河南睢县），守将高翼城破后投河自尽，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江、淮大震。唐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为了自保，赶紧派人晋见李希烈，表示已命令辖下的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寿州（今安徽寿县）、舒州（今安徽潜山县）、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四地守军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一切听从李希烈指挥。

在建中四年这个冰冷刺骨的冬天里，由强藩李希烈点燃的战火正在帝国的腹地肆意蔓延，并且已经烧到了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

与此同时，唐德宗李适正坐在奉天简陋的天子行宫里，看见另一场火焰正在他的灵魂深处灼灼燃烧。

这是一场旧我与新我激烈交战的火焰。

翰林学士陆贽告诉他：要想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重生，他就必须迈出他帝王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步，“痛自引过以感人心”，向天下人公开忏悔自己的所有过错。简言之就是四个字——下诏罪己！

德宗李适并不知道“下诏罪己”能否让帝国获得新生，他只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他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离散的人心将难以凝聚，沦陷的土地将难以收复，失落的尊严将难以挽回，破碎的家国将难以重建。而他本人，也将永远无法走出由这一切构成的巨大梦魇……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初一，大唐帝国的臣民们听到了一则令他们万分意外的消息：天子李适颁布了一道《罪己诏》。

天子罪己？

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

诏书公开发布的当天，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无不奔走相告，都想一睹为快。

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尤为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灾变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惺惺作态。而李适此诏则迥然不同。他一下子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以一种“知耻近乎勇”的精神，一一剖析了自己的毛病、缺点、过错。这既是在灵魂深处闹了一场革命，又不啻于是在天下人面前裸奔了一回。此诏虽是由翰林学士陆贽所草，但肯定是要李适过目点头才能公布的。所以说，李适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真诚和勇气，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今将此文节录于下，以飨读者：

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

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据说，这篇非同寻常的《罪己诏》发布之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此诏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然而，陆贽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迂阔的文人。这篇诏书固然以其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但是这绝非重点。

重点是——它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用陆贽的原话来说就是：“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

当一个政权想要收拾人心的时候，煽情的口号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只有真正关注百姓的利益诉求，并把这种关注落实到政策上，老百姓才会真心拥护这个政权。

具体到德宗的这篇诏书，能够让百姓眼前一亮的东西，能够让他们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显然是间架税、除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若非如此，老百姓是不可能被什么廉价的“真情”感动的。

至于叛乱诸藩，德宗朝廷则通过这篇诏书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只要不称帝、不突破德宗李适最后的底线，所有叛乱者均可既往不咎。所以我们看见，除了朱泚之外，叛乱诸藩及所有胁从者都得到了赦免。为了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朝廷甚至帮朱滔找了一个理由，说他“路远必不同谋”，只要他愿意，也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李唐朝廷抛出这样的橄榄枝，无疑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缔结联盟的基础。不管叛乱诸藩是否会因此归顺中央，反正李唐朝廷已经拿出了自己所能拿出的最大诚意。

所以，与其说此诏是德宗李适裸裎自我的真情告白，还不如说这是李唐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戡乱形势及时出台的一套战略构想。

这道出人意料的诏书一下，叛乱诸藩迅速作出了反应。

当然，各方的反应是大不相同的。

首先是朱泚。由于被锁定为唯一的打击目标，朱泚大为光火，决意回

敬。可他业已称帝，还能有什么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呢？朱泚思前想后，最后挖空心思地把“秦”的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这当然称不上是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但是在历史上，秦的国祚短，汉的国祚长，朱泚改国号为汉，至少表明了他与李唐对抗到底的决心。紧接着作出反应的是王武俊、田悦和李纳。他们本来便已和朝廷暗通款曲，如今又看见了朝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遂取消王号，上表请罪。最后反应的是李希烈。

尽管被朝廷列入了赦免之列，可李希烈并不领情。因为在此刻的叛乱诸藩中，他的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用最足，而且又刚刚打了一连串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在此情况下，他如何甘心再向李唐俯首称臣。他当然不干。

所以，德宗发布《罪己诏》的数日后，李希烈就在汴州断然称帝了。他把国号定为“大楚”，同时改元武成，并设置了文武百官。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虽然恒冀、魏博、淄青归顺了，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德宗李适满意。

因为大唐帝国的土地上还赫然矗立着另外两个称帝的政权。

李适很无奈。

该忏悔的忏悔了，该罪己也罪己了，灵魂深处的革命闹完了，令人难堪的“裸奔”也奔过了……可德宗李适仍然不知道，他的帝国能否在新的一年里获得新生。

图穷匕见：李怀光叛乱

唯一没有对德宗《罪己诏》作出任何反应的人是朱滔。

因为他还在做着逐鹿中原的美梦。

朱滔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恒冀地界时，王武俊表现得非常殷勤，一连数日杀牛宰羊，设宴犒劳；朱滔军进入魏博后，田悦比王武俊更为恭敬，不仅沿途供应丰盛，而且频频派出使者，在朱滔经过的每个地方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

朱滔很满意。

他现在可不是一般人了，他是堂堂“汉元天皇”的皇太弟啊！也难怪这帮草头王要千方百计地拍他马屁。朱滔相信，等他平定中原后，这帮趋炎附势的孙子肯定要争先恐后地管他叫爷了！

可是，事实证明这只是朱滔的臆想。

正月初五，朱滔大军进抵永济（今河北馆陶县东北），派出使者与田悦在馆陶会面。

田悦一见到使者，马上愁眉苦脸地说：“我本来一心想追随五哥（朱滔排行第五）南下，没想到昨天大军刚要开拔之时，将士们突然把我围住，并警告说：‘这一年多来，我们屡屡作战，但是败多胜少，而且粮草和物资也已消耗殆尽，如今将士们缺衣少食，怎么还有力气远征？大王您现在亲自坐镇魏州，尚且担心有变，倘若动身南下，您早上一走，晚上必将发生变乱。’这些话都是将士们说的，不是我的意思。我个人对五哥那是绝无二心的，只是拿将士们没办法。不过请五哥放心，我已命大将孟祐率五千步骑随同南下，定为五哥效犬马之劳！”

使者回去，如实转达了田悦的话。朱滔一听，顿时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田悦这个逆贼！当初你身陷重围、命悬一线，都是我不顾一切前去解救，幸而保你一命。你说要把贝州给我，我没接受；你要拥立我当天子，我也坚决辞让。没想到你竟然忘恩负义，害我大军远道而来，你却编出一套说辞拒不出兵，你到底是何居心？”

其实也怪不得朱滔如此暴怒，因为田悦出尔反尔、不肯出兵，绝不仅是令朱滔的南征兵力大幅缩水，最要命的是，他这么一搞，等于是让朱滔的南征计划彻底泡汤了！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对朱滔来说，经此变故，他根本就不敢再南下半步。因为他担心：田悦既然阳奉阴违，王武俊八成也是没安好心，倘若他执意南下，这两个人联手抄他的后路，甚至把他的老巢幽州也给端了，他朱滔怎么办？他能冒这个险吗？

肯定不能。

所以，朱滔现在只能乖乖地打道回府。所谓逐鹿中原，所谓会师洛阳，如今都成了黄粱一梦！

当然，朱滔是不会吃这个哑巴亏的。就算要打道回府，他也绝不能空

手而回。当天，朱滔就出兵攻占了魏博下辖的宗城（今河北威县东）、经城（今威县北）、冠氏（今山东冠县）。

正月中旬，朱滔在北归途中顺势包围了贝州（今河北清河县），继而攻陷武城（今山东武城县），同时放纵麾下部众和回纥兵在附近各县烧杀掳掠。最后，朱滔又命大将马寔率五千步骑进驻冠氏，对田悦所在的魏州进行威慑。做完这一切，朱滔才意犹未尽地引兵北还。

就这样，朱滔和田悦彻底翻脸了。

对李唐朝廷来说，这当然是件好事。只要河北诸镇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它们的力量就会相互抵消，这样一来，德宗朝廷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关中的朱泚了。

然而，德宗李适绝对没想到，眼下他要对付的敌人不仅有朱泚，还要加上一个人——李怀光。

作为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绝望的人，李怀光自从率部离开奉天的那一刻起，心里就已经生出谋反的企图了。尽管德宗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谏言，放逐了卢杞等人，但这并不足以让李怀光回心转意。

因为他怕德宗会秋后算账。

他知道，德宗之所以作出让步，是因为长安还在朱泚手中，德宗现在还需要他。一旦长安光复，他李怀光也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到那时候，卢杞等人很可能会大摇大摆地回到朝廷，官复原职，而他李怀光则十有八九会被德宗兔死狗烹！

带着这样的疑虑和恐惧，李怀光自然不会再替李唐朝廷卖命。

他现在一心只想保存实力，而且在正式拉起反旗之前，他还想伺机壮大实力。

如何壮大实力？

很简单：吞并友邻部队。

当时，和李怀光一起屯驻在长安外围的部队有三支。

其将领分别是：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

三个人中，李晟的军事才能最高。在心怀异志的李怀光看来，此人对他构成的潜在威胁当然也最大。

不搞定李晟，李怀光绝不敢轻举妄动。

兴元元年正月初，德宗频频遣使催促李怀光出兵，李怀光趁势提出条件，要求与李晟等部合兵一处。德宗没有多想就同意了。随后，李晟等部奉命与李怀光在咸阳西面的陈涛斜会师，这三支部队的节制之权就此落到了李怀光手上。

德宗本以为这样一来，李怀光肯定可以出兵了。没想到他总揽兵权之后，在咸阳一待又是一个多月，始终逗留不进。德宗屡屡派遣宦官前去催促，李怀光总是以“士卒疲弊”为由敷衍搪塞。

德宗当然不会知道，这一个多月里，李怀光已经暗中跟朱泚搭上了线，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在此期间，李晟等将领也几乎天天劝请李怀光开战，但同样被他以各种理由否决。李晟最后终于明白——李怀光八成是想造反了。

一想到这里，李晟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一旦李怀光动手，那他和李建徽等人岂不是成了李怀光砧板上的鱼肉？

李晟随即上奏德宗，要求与李怀光分兵，回到他原来的驻地东渭桥。可德宗却仍然把收复长安的希望寄托在李怀光身上，所以就把李晟的奏章扣了下来，根本不理会他的请求，以免再次触怒李怀光。

然而，德宗的步步退让只能换来李怀光的得寸进尺。

几天后，李怀光又开出了一个条件。他上奏德宗说：“各军的粮饷和赏赐都很菲薄，唯独神策军的待遇最为优厚。如此厚此薄彼，又怎么驱使士兵去作战？”

李怀光的意思明摆着——要想让我去打仗，就要给我涨工资。

应该说，李怀光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神策军是中央禁军，其待遇历来比诸镇的军队高得多。说难听点，跟神策军比起来，其他地方部队都像是后娘养的。如果在平时，李怀光提这个条件，德宗或许还能答应，可问题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朝廷自己尚且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拿什么来给李怀光的部队涨工资？

德宗郁闷了。要是拿不出真金白银，李怀光立马又有了撒娇使气的借口，说不定还会激起士兵哗变，导致泾师之变的悲剧重演，这个后果

不堪设想。但是，眼下朝廷这么困难，上哪去给他弄真金白银？

无奈之下，德宗只好派陆贽出马，希望他去做一下李怀光的思想政治工作。

像这种事，陆贽其实也没辙。

想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让李怀光这种人发扬奉献精神，那基本上是在扯淡。陆贽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不是给李怀光涨工资，而是让李晟主动提出降工资。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也才能堵住李怀光的嘴。

来到李怀光军中时，陆贽特意叫上了李晟，一起到李怀光的大帐中商议。李怀光一看见陆贽就大发牢骚："将士们打的是一样的仗，得到的粮饷赏赐却截然不同，如何叫他们同心协力？"

陆贽无语，只好频频给李晟使眼色。

李怀光满脸得意，也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看着李晟，看他如何接招。

这一回，他算是把李晟逼进死角了——只要李晟自己开口削减福利，一下子就会失去部众的拥戴，到时候不用李怀光动手，神策军将士就会把他生吞活剥了。

在李怀光的逼视下，李晟不慌不忙地开口了："李公，您是元帅，拥有号令三军之权；我只是一支部队的将领，一切当然要听从您的指挥。像削减福利这种事情，还不是您一句话吗？我坚决听从李公的裁决。"

聪明，实在聪明！陆贽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叫好。他偷眼瞥了下李怀光，只见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嘴里却说不出一个字。

李怀光当然不能开这个口。

他拿待遇问题做文章，目的就是要迫使神策军上下离心、将士反目，最好是激起变乱，他好趁火打劫。可要是他亲自下这个命令，就等于是把神策将士的怒火引到了自己身上，李怀光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因为没人愿意开这个口，涨工资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说到底，李怀光只是个粗人，要跟李晟耍心眼，他的智商还不够。

李晟后来之所以成为德宗一朝的三大名将之一，原因也很简单——他不仅打仗比别人厉害，脑子也比别人好使。

陆贽在李怀光的军营中待了几天，敏锐地察觉到了李怀光的异动。回到奉天后，他马上向德宗提议，赶紧让李晟撤回东渭桥，否则迟早会出乱子。德宗听完他的分析，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只好批准李晟撤离。

李晟就此躲过一劫。他一撤，李建徽和杨惠元的势力更显薄弱，陆贽又劝德宗下令，让李、杨二部也从陈涛斜撤出来，以防被李怀光吞并。但是，此议却遭到了德宗的否决。

德宗说："你的想法固然周密，可李晟一走，李怀光很可能已经怀恨在心，倘若再让李、杨二部离开，恐怕李怀光又有意见，反而难以调停，还是缓一缓再说吧。"

这一年二月下旬，李怀光频频与朱泚密谋，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李晟看在眼里，立刻上疏，向德宗发出警报："李怀光反状已明，无论哪一天生变，都要早加防备。臣建议，通往蜀中和汉中的道路绝不能被阻断。"李晟在奏疏中提议，应即刻派兵进驻洋州（今陕西洋县）、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剑州（今四川剑阁县）等咽喉要地，一旦关中有变，圣驾可及时入蜀避险。

可是，即便所有人都已经看出了李怀光的野心和阴谋，德宗李适却仍旧对他抱有幻想。为了安抚李怀光，德宗宣布，不日将亲赴咸阳，慰问三军。数日后，德宗又下诏晋升李怀光为太尉，增加食邑，并赐免死铁券。

当天子使臣带着诏书来到李怀光的军营时，李怀光终于图穷匕见了。他当着使臣的面把免死铁券扔到地上，说："圣上难道怀疑我吗？通常是担心人臣造反才赐免死铁券，我李怀光又不想造反，圣上却赐铁券给我，莫非想逼我造反？"

使臣目瞪口呆。

见过强词夺理的，没见过这么强词夺理的！

李怀光如此跟朝廷撕破脸面，朔方军的上上下下当然都看在了眼里。作为郭子仪当年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朔方军的多数将士对李唐朝廷还是忠心耿耿的。一见李怀光如此悖逆，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第一个站了出来。

他故意站在军营的大门口，对着众将士高声呼喊：“大帅眼睁睁看着叛贼占据长安却不出兵，今天对天子使臣又如此不敬，难道真的要造反吗？他如果定要放弃一世英名，自取灭族之祸，我今日拼了这条性命，也要以死相争！”

李怀光闻言，对左右说：“我不会造反，只是因为叛军的势力还很强大，我军必须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当天，李怀光就以天子要巡幸咸阳为名，命人加固咸阳的城墙，数日后，又下令全军拔营，入踞咸阳。

如果李怀光真的要攻打长安，他还有必要移师咸阳吗？这显然是此地无银的举动。张名振忍无可忍，直接去找李怀光，说：“前几天还说不想造反，现在又带大军来这里干什么？为何不攻打长安，诛杀朱泚？”

李怀光勃然作色，对左右道：“张名振疯了！”马上命人把他拉了出去，当场砍杀。

至此，再也没有人怀疑李怀光的谋反之心了。

李怀光有一个养子叫石演芬，目睹张名振被杀后，立刻派人暗中前往奉天，向德宗密报，请求罢免李怀光的兵权。然而，此事很快被李怀光知悉。石演芬旋即被捕，李怀光厉声质问他：“我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你竟然要灭我全家！你也知道，我绝不原谅背叛我的人，你还有什么话说？”

石演芬苦笑：“天子视您为股肱，您视我为心腹；您既然能背叛天子，我为何不能背叛您？能免于反贼的恶名，我情愿一死。”

李怀光本来想亲手杀了石演芬，听到这句话后，他马上改变了主意。他对左右侍从说：别杀他，让他活着，但要把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剐下来吃！

左右侍从面面相觑，一动不动。

没有人愿意执行李怀光的命令。

最后，有人走上去一刀割断了石演芬的喉咙，然后转身离去。其他人也跟着陆续走出了大帐。离开之前，他们给李怀光留下了一句话：石演芬是个义士，不能受此凌辱！

李怀光气得七窍生烟，可他没有办法。

除非，他把所有人都杀了。

使臣回到奉天，向德宗如实禀报了李怀光的种种悖逆之状。

直到此刻，德宗李适才终于看清了一个早已昭然若揭的事实——李怀光要造反了！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德宗匆忙下令加强警戒，同时命文武百官整理行装，准备一旦有变就移驾梁州（今陕西汉中市）。

二月二十四日，德宗加授李晟为河中（原名蒲州，唐玄宗开元八年改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同绛节度使，把原属李怀光的主要辖区划给了他 [1] 。

二十五日，德宗又加授李晟为同平章事。

德宗的上述举措，显然是要让李晟取代李怀光在帝国军界的地位。

二十五日夜里，李怀光动手了。

他悍然发兵杀进了李建徽和杨惠元的军营。李建徽单骑脱逃，杨惠元在逃往奉天的半路上被追兵所杀，两个人的部众都被李怀光吞并。得手之后，李怀光公然叫嚣："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且当远避！"（《资治通鉴》卷二三○）

我已经和朱泚联手了，李适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兴元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德宗李适与文武百官仓皇逃离奉天，前往梁州。

看着前方漫漫的流亡路，李适的眼中写满了惶惑和苍凉。

因为他看不见道路的尽头。

造反也是个技术活

魏博的田悦自从跟朱滔翻脸后，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几个月来，朱滔连连出兵，在魏博境内攻城略地、烧杀掳掠，而魏博

军则屡屡败北，不仅丢失了大量城邑和土地，而且士兵伤亡多达十之六七，将士们普遍出现了厌战情绪。

田悦担心部众造反，赶紧派人向朝廷告急，恳求朝廷遣使宣慰，安定魏博人心。

兴元元年三月，德宗派遣给事中孔巢父来到了魏博。这个孔巢父是孔子的三十七世孙，据说相当博学，而且口才一流。到了魏州后，孔巢父首先代表天子和朝廷向魏博官兵表达了最亲切的慰问，然后深入基层，了解官兵百姓的疾苦，最后又召开了一次大会，发表了一番重要的讲话。

在讲话中，孔巢父努力宣传中央对藩镇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强调指出，中央对魏博是一贯信任、始终支持的，希望魏博官兵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当前困难，排除一切障碍，紧密团结在以田悦同志为核心的领导层周围，自觉与所有分裂势力、叛乱势力划清界限，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儒家经典中有关忠孝节义的精神，忠诚履行朝廷赋予的神圣职责，在把魏博建设成为一个模范藩镇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再立新功！

据说，孔巢父同志的讲话紧扣主题、言之有物、思路清晰、内涵深刻，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在魏博官兵中唤起了极大的共鸣，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像和煦的春风一样，深深滋润了田悦和所有魏博官兵的心田……（《资治通鉴》卷二三○：“巢父性辩博，至魏州，对其众为陈逆顺祸福，悦及将士皆喜。”）

只可惜，这一切都是假象。

就在这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束当晚，魏州就爆发了一场叛乱，导致田悦及其老母、妻儿十几口人全部死于非命。

叛乱者名叫田绪。

他就是前幽州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也就是田悦的堂兄弟，原任幽州兵马使，现在的身份是囚犯。

是的，他现在是田悦的阶下之囚。据田悦对外宣称，这个堂兄弟生性“凶险”“多过失”，本来应该杀头，田悦念在兄弟之情，不忍杀他，就把他“杖而拘之”。

田绪是否真像田悦说的那么坏，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老爸当初把节度使的宝座送给田悦一事，田绪绝对是耿耿于

怀、极度不甘的。

更何况，田悦现在又剥夺了他的兵权，把他关在牢里，这种事摊到谁头上，谁都不会感到愉快。

魏州召开大会的当天，田悦被中央领导高屋建瓴的讲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就在大会结束后举办了一场丰盛的酒宴，以表达对孔巢父的感激和崇敬之情。宾主双方开怀畅饮，席间一片欢声笑语。

与此同时，田绪却在昏暗潮湿的牢房里咀嚼着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愤怒和悲伤。

还好，这天后半夜，终于有人来看望田绪了。由于田悦大人今天心情好，允许魏博官兵们放开肚皮喝酒，狱卒们也都放松了管制。田绪的几个弟弟和侄儿就趁这个机会，带着酒肉来给田绪打打牙祭。

田绪三杯酒下肚，就借着酒劲发泄对田悦的不满和怨恨，弟侄们都劝他少说为妙，没想到田绪竟然一发不可收拾，嗓门越来越高。弟侄们大惊失色，赶紧去掩他的嘴。田绪只感觉血往上冲，猛然抽出一个侄子身上的佩刀，顺手一挥就把他砍翻在地。弟侄们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旋即夺路而逃，作鸟兽散。

被砍翻的那个侄子当场毙命。田绪看着手上这把滴血的刀，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选择了。

除了造反，他已无路可走。

当天夜里，田绪挥刀冲出牢房，迅速纠集了过去的一帮亲信，从节度使府的后门翻墙而入，径直杀进田悦所在的内院，把酒足饭饱、睡梦正酣的田悦砍死在了床上，然后又把他的老母、妻子、儿女共十几口人全部砍杀。

是日凌晨，田绪假借田悦之命，召集田悦的心腹扈崿、许士则、蒋济到节度使府议事。扈崿昨晚喝高了，睡得晕晕乎乎，接到通知后，翻个身又睡了过去。而许、蒋二人则来不及细想，赶紧跑来开会。他们刚刚迈进府门，田绪的伏兵便一拥而上，将他们乱刀砍死。

此时天色渐亮，附近的军营已经吹响了早起训练的集合号。田绪立刻带着几个手下赶往军营，准备夺取兵权。此刻，田悦的亲信大将刘忠信刚刚集合好部众，田绪就冲进去对着将士大喊："扈崿和刘忠信串通谋反，昨夜杀害了田大人！"

众将士一片哗然，旋即骚动起来。刘忠信未及自辩，就被一伙不明真相的士兵砍倒在血泊之中。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扈崿目睹了节度使府的惨状，情知大事不好，赶紧跑到军营，准备组织力量平叛。

扈崿是魏博的二号人物，说话还是比较管用的，很快就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将士拥到了他的麾下。田绪又惊又怒，匆忙跑上城楼，居高临下地对着校场高声呼喊："我本是前任大帅之子，诸君深受大帅厚恩，今日若能立我为帅，兵马使赏钱两千缗，大将一千缗，下到士卒，每人百缗。我就算用尽公私财产，也一定在五日内将所有赏钱发到各位手上。"

关键时刻，银弹还是最有效的攻心武器。聚集在扈崿周围的将士纷纷转过头去，用一种兴奋而又怪异的目光看着扈崿。

当然，他们看见的不是扈崿，而是一串一串的铜钱。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没什么悬念了。将士们杀了扈崿，全部归顺田绪，然后簇拥着他去找孔巢父。这位负责宣传安定团结的中央领导刚刚起床，就蓦然发现魏博已经变了天了。

当然，领导的应变能力通常是很强的。孔巢父看了看满身血迹的田绪，又看了看刀剑出鞘的魏博将士，马上以魏博宣慰使的身份，代表天子和朝廷，授予了田绪"权知军府"的职务。所谓权知军府，差不多就等于代理节度使。

几天以后，魏博将士们才知道，他们被田绪这小子忽悠了。

原来谋杀田悦的人并不是扈崿和刘忠信，而是刚刚被他们拥立的领导田绪。

然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大伙也只能承认现实，何况腰包里还多出了沉甸甸的东西，他们也就不跟田绪计较了。

过后，田绪又陆续杀了田悦的亲信将领薛有伦等二十多人，魏博将士也都装聋作哑。

反正没杀到自己头上，就权当没这回事。

得知魏博兵变、田悦被杀的消息之后，最高兴的人莫过于幽州的朱滔了。

他仰天狂笑："田悦忘恩负义，老天爷终于借田绪之手把他宰了！"随后，朱滔抓住机会趁火打劫，大举出兵进攻魏州，其部众和回纥人在魏州附近肆意劫掠，如入无人之境。

同时，朱滔还派人给田绪送去了一封信，表示承认他魏博节度使的身份。田绪大喜，连忙向朱滔馈赠了大量金帛。朱滔对田绪的表现很满意，让使者回去告诉田绪——当初因田悦背信弃义而撕毁的盟约，即日起恢复如初。

对于魏博的变乱，比较尴尬的人是恒冀的王武俊和昭义的李抱真。十几天前，他们得知田悦已被朱滔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于是亲自带兵前来救援，不料魏博突然爆发叛乱，他们只好停止进兵，静观待变。后来，田绪迅速控制了魏博的局势，而朱滔也抢先和田绪恢复了盟约，王武俊和李抱真才赶紧做出反应，派人告知田绪——恒冀和昭义始终是魏博最坚定的盟友，只要魏博有难，二镇一定全力支援。

言下之意，就是希望田绪不要和朱滔结盟。

面对各方抛来的橄榄枝，田绪顿时有些受宠若惊，同时也有些举棋不定。他召集将佐商议，几位幕僚一致认为："幽州军队穷凶极恶，所到之处白骨盈野，虽说是前任大帅背信所致，可百姓有何罪错，要遭此浩劫？朱滔目前的兵力虽然强大，但他不行仁义，亡可立待。何况恒冀和昭义正准备对他发动攻击，大帅完全没必要屈居其下，跟着他反叛朝廷。而今之计，应该立即遣使入朝，上表归顺。天子正流亡在外，听说魏博诚心归顺，一定倍感欣慰。相信用不了几天，大帅的官爵定会到手。"

田绪笑了，遂依计而行，遣使入朝。

李怀光虽然扯起了反旗，但他的境况实际上并不舒心，甚至可以说相当窘迫。

原因很简单——他的造反不得人心。

从下面这一连串事件中，我们不难窥见李怀光的窘迫。

首先，发兵吞并李、杨二部的同时，李怀光就企图策动两名朔方旧部在奉天城中发动兵变，一举诛杀德宗。这两个旧部，一个叫韩游环（时任邠宁兵马使），一个叫赵升鸾，当时都在奉天护驾。假如他们真的和李怀光同时发难，德宗必定在劫难逃。所幸，这两个人都心向李唐。接到李怀光的密信后，韩游环就主动向德宗呈上密奏，揭露了

李怀光的阴谋；而赵升鸾也同样向奉天的最高军事长官（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作了禀报，以致李怀光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其后，当德宗车驾仓促逃离奉天时，李怀光又派孟保、惠静寿、孙福达三个将领率精锐骑兵去追杀天子。可三人奉命出发后，却故意在途中逗留延宕，放走了德宗。虽然他们回来后立刻被李怀光解职，但他们都认为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所以无怨无悔。

接下来，李怀光想发兵攻打李晟，可一连下达了三次动员令，将士们都拒不从命。他们说："如果是打朱泚，我们一定效死；要是想谋反，我们宁死不从！"

除了部众和李怀光离心离德之外，朱泚和他的关系也在迅速恶化。

李怀光反叛之前，兵多将广，势力强盛，朱泚对他非常恭敬，不仅致函尊其为兄长，还相约与他在关中称帝，愿为兄弟之国。但是当李怀光起兵后，朱泚却发现李怀光很快失去了部众的拥戴，于是朱泚便又端出一副傲慢的面孔，赐给李怀光"诏书"，以臣节相待，并打算征调他的部队。李怀光勃然大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他现在既担心麾下的部众哗变，又担心李晟会从背后攻击他，所以根本不敢和朱泚兵戎相见。

兴元元年春天，关中的形势显得微妙而复杂：李怀光、李晟、朱泚三方既相互敌对，又相互制约，谁也不敢率先动手。每一方都怕被第三方抄了后路，所以都想等另外两方开打，然后坐收渔翁之利。

三方的心态都一样，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其结果就形成了对峙僵持的局面。

最后，李怀光终于打破了僵局。

不过，他并不是出兵去打谁，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跑了！

李怀光不跑不行。

因为三方之中，他的处境是最尴尬、最不妙的。

人家朱泚戴着"汉元天皇"的冕旒，坐拥帝京，有钱有粮，耗到猴年马月都没问题；而李晟已经取代李怀光，成了大唐军界的一号人物，上有天子宠信，下有部众拥戴，只要秣马厉兵、静观待变，其他的事一点也不用操心。

唯独他李怀光，枯守一座咸阳孤城，内有兵变之虞，外有强敌窥伺，既无外援支持，又无后勤补给，有什么理由跟别人耗下去？

这一年三月初，李怀光命部众烧毁营房，然后纵兵大掠泾原十二县，把这一带掳掠得鸡犬不留，最后率部撤出了关中。

此时此刻，除了撤回自己的老巢河中府，李怀光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然而，即便李怀光主动放弃了对关中的争夺，这条回家的路对他来讲还是很不平坦。

因为一路上不断有人叛他而去。

他刚刚走到富平（今陕西富平县），大将孟涉和段威勇就带着数千人突然掉头，投奔了李晟；此后每走一段路，几乎都有人叛逃；接近河中时，守将吕鸣岳本来想焚毁黄河上的渡桥，不让他进城，后来考虑到守城的兵力太少，恐怕无力抗拒，才硬着头皮打开了城门；进入河中城后，李怀光即命大将赵贵先进驻黄河西面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以防关中唐军来犯，不料赵贵先一到同州就归降了朝廷；最后，李怀光又命大将符峤进驻坊州（今陕西黄陵县），没想到符峤也旋即向附近的官军投诚了……

李怀光万万没想到，自己起兵造反才十几天，就已经落到了众叛亲离、举步维艰的境地。同样是提着脑袋造反，人家朱泚和李希烈至少获得了部众拥戴，至少赚到了一顶天子冕旒，不管将来怎么样，好歹也过了一回当皇帝的瘾，可他李怀光得到了什么呢？

不但什么都没得到，而且连原本拥有的兵力和地盘也在一天天缩水。照这样下去，李怀光迟早会变成孤家寡人，甚至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看来，造反也是个技术活。假如你没有审慎考虑“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基本要素，没有事先做好市场调研、风险评估和可行性分析等工作，仅凭一时冲动就起兵造反，其结果很可能就是玩火自焚！

可是，李怀光能怎么办呢？

现在的他已经是“人在囧途”、身不由己了。

明知前途一片黯淡，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不可能走回头路。

因为，就算他现在肯回头，朝廷虽然也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李怀光也还是会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被德宗秋后算账。

王者归来

兴元元年三月下旬，德宗李适经过二十多日的车马颠簸，终于抵达梁州（今陕西汉中市）。

梁州是山南西道的治所，自古地薄民贫，经历一场安史之乱，户口更是减损大半。所以，此道虽下辖十五个州，但财政收入却不及中原地区的几个县。德宗带着文武百官到来后，各方面的供应都很差，连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有短缺之虞，德宗大感困窘，打算继续流亡，逃往物阜民丰的成都。

这显然是个极其愚蠢、缺乏大局观念的想法。

如果德宗的流亡朝廷真的躲进蜀中一隅，关中军民对李唐的忠诚度势必会受到很大的削弱，而长安的光复恐怕也会遥遥无期。

道理很简单，你当天子的自己都逃到千里之外了，谁还肯替你卖命呢？不要说光复长安的计划会搁浅，各地的叛乱恐怕也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反正关中无主了，谁不想趁机玩一把逐鹿问鼎的游戏呢？

相反，如果德宗以大局为重，安心坐镇梁州，对各种潜在的叛乱势力就会起到一种震慑作用，而对关中军民则会起到一种安抚和鼓励的作用。所以，此事非同小可，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了李唐社稷的安危。

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得知天子入蜀的意图后，立即进言："山南西道毗邻京畿地区，如今李晟正准备克复长安，需要借助陛下和朝廷的声势作为支援，一旦陛下西幸川中，收复长安的日子恐怕就很遥远了。"

德宗闻言，不禁产生了犹豫。文武百官也就此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就在这时候，李晟的一道奏章递到了梁州。他说得比严震更明白："陛下驻跸汉中，足以系亿兆黎民之心、成剪灭叛贼之势；若取小舍大、迁都蜀地，则官民士庶将因之绝望，虽有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也将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就在数日前，德宗刚刚又加授李晟京畿、渭北、鄜坊、丹延四镇节度

使的职务，显然是把光复长安、匡扶社稷的重任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如今，李晟的这番劝谏当然具有很大的分量，德宗无话可说，只好打消入蜀的念头。

这一年四月初十，靠兵变上台的田绪收到了德宗颁发给他的节度使旌节，被正式任命为魏博节度使。

在朝廷和朱滔之间，田绪明智地选择了朝廷，踢开了朱滔。

很显然，这个宝押对了。

可是，被一脚踢开的朱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随即加紧了对魏博重镇贝州、魏州的进攻。五月初，王武俊和李抱真见魏博危急，遂信守承诺，亲自率部驰援贝州，在距贝州三十里外扎营。

正在攻打贝州的朱滔闻讯，连忙把攻打魏州的大将马寔召回，准备集中兵力与王、李二军决一死战。朱滔本想第二天就发起攻击，可好几个幕僚都劝他说，王武俊擅长野战，不可与其正面交锋，应派兵断其粮道，待其疲敝再伺机进攻。

朱滔一时犹豫不决。就在这时候，部将杨布、蔡雄带着回纥将领来到了他的大帐。

他们是来请战的。

回纥将领对着朱滔猛拍胸脯，说："我们回纥人每次与邻国交战，只要五百骑兵，便可击破敌人数千骑，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我在大王军中多时，接受大王的金帛、酒肉无数，一心想为大王建功，眼下正当其时。明日，请大王策马登上高岗，观看回纥铁骑如何为大王剪除王武俊，让他一匹马也别想回去！"

杨布和蔡雄也在一旁帮腔："大王英雄盖世，举幽燕大军南下，本欲横扫河南、肃清关中，如今面对一个小小的敌人就观望不前，势必令远近失望，何以成就霸业！请大王同意回纥的请战要求。"

朱滔一听，顿时豪情满怀，遂决意出战。

此时的朱滔当然不会知道——明天的会战将彻底终结他逐鹿天下的梦想，并将给他的军事生涯画上一个惨痛的句号。

次日清晨，王武俊命部将赵琳率五百骑埋伏在阵地旁边的一片树林中，让李抱真列方阵于后，由他本人亲率精锐骑兵担任前锋，迎战回

纥人。战斗一打响，牛皮烘烘的回纥人就扬鞭奋蹄，直冲王武俊的前军。

王武俊的骑兵们忽然一提缰绳，向两侧避开。回纥骑兵一直冲到阵后，正准备回马之际，王武俊下令全军发起攻击，赵琳的伏兵也从树林中突然杀出，将回纥骑兵拦腰截断。回纥人一下就傻了眼，那个昨天还牛气冲天的将领此刻也顾不上什么脸皮了，慌忙率部杀出重围，一路落荒而逃。

王武俊和李抱真乘胜发起冲锋。朱滔的骑兵一见回纥人败了，赶紧掉头而逃，旋即冲垮了自己的步兵阵地，于是步骑两军未及接战便全线溃败。朱滔拼命想要制止，无奈兵败如山倒，根本止不住，只好逃回大营，闭门坚守。

此次会战，朱滔出兵三万，被杀一万多，逃散的一万多，最后跟着他跑回大营的只剩下数千人，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当天傍晚，战场上忽起大雾，王武俊和李抱真不敢贸然进攻，就在朱滔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北角分别扎营。是日夜里，朱滔放火焚烧大营，然后带着残部从南门出逃，亡奔东面的德州。他在魏博掳掠的堆积如山的财帛和物资一样也带不走，全都落到了王武俊和李抱真的手里。由于雾浓夜黑，王、李二军没有出兵追击。朱滔就此逃过一劫。

跑到德州后，喘息未定的朱滔就愤然砍下了杨布和蔡雄的脑袋。但事已至此，朱滔就算把这两个家伙碎尸万段也于事无补，要怪的话，只能怪他自己太自信、太轻敌了。

随后，朱滔狼狈逃回了幽州。

虽然侥幸捡回一命，但经此一战，朱滔已是元气大伤。从此，朱滔自顾尚且不暇，就更别提那个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美梦了。

李怀光撤出关中后，李晟克复长安的计划就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与此同时，朱泚和姚令言也开始感到了恐惧。他们频频派遣间谍潜入李晟防区，企图打探唐军进攻长安的计划，包括具体的进攻时间。不料，这些间谍却先后被李晟的侦察骑兵一一捕获。

兴元元年五月二十日，李晟在驻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故意安排朱泚的那些间谍坐在观礼台上全程观礼。结束后，李晟又设宴招待他们，并一一发给他们路费，把这帮人搞得受宠若惊。最后，李晟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回去告诉所有叛军士兵，小心防守长安，一定不

要背叛朱泚！”

间谍们面面相觑。

他们知道，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展示李晟的自信，也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从内心瓦解叛军士兵的斗志了。

简言之，这是李晟的心理战。

次日，李晟率领大军进抵通化门（长安东北第一门）外，大举炫耀兵威。叛军上下人人胆寒，都不敢出城迎战。是日，李晟召集众将商议攻城之计。众人一致认为：“应先攻克外城，占领坊市，再向北进攻皇城。”李晟反对，他说：“坊市狭小，如果叛军跟我们展开巷战，百姓惊慌奔走，不利于我军进攻。依我看，如今叛军的重兵都集结在大明宫北面的禁苑里，我军不如从苑北攻进去，直接打掉叛军的指挥中心，余众必定溃逃。如此，宫阙不残，坊市无扰，方为上策！”

众将均表赞同，此计遂定。随后，李晟派快马连夜通知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等部，约定日期在长安城下会师。

唐军反攻长安的战役就此打响。

——二十二日，尚可孤部进抵蓝田以西，在此击败了叛军仇敬忠部，并斩杀仇敬忠。

——二十五日，李晟大军推进到大明宫东北面的光泰门外。

——二十六日，李晟军正在修筑营寨，朱泚趁李晟立足未稳，命大将张庭芝、李希倩出城攻击。李晟笑着对众将说：“我正愁叛军闭门不战，没想到他们却主动跑来送死，此乃上天助我，战机不可失也！”随即出兵，大败张、李二军。

——二十七日，叛军再度出战，又被李晟击败；同日，骆元光部也在浐水（灞水支流）西岸大破叛军。当天夜里，李晟命部众在禁苑北墙凿开了一个两百步宽的缺口，准备从这里突入大明宫，对叛军总部发起强攻。

——二十八日，李晟命全军发起总攻。不料，叛军已连夜在禁苑北墙的缺口处修筑了一排木栅栏，唐军的几次冲锋均被击退。李晟大怒，对众将咆哮：“今天要是攻不进去，我就把你们的脑袋砍了！”

众将大恐，只好率众拼死冲锋，最后终于攻破叛军栅栏，兵分数路杀进了大明宫。此时，亲临一线指挥战斗的叛军首领姚令言犹然力战不已，无奈唐军的攻势太猛，只好带着部众且战且退。唐军将叛军迫至白华门时，数千叛军骑兵突然从唐军后侧杀出。眼看唐军即将落入腹背受敌之境，李晟立刻掉转马头，亲率一百多名骑兵杀了过去，同时命左右高呼：“李晟来也！”

这支叛军一听李晟之名，顿时丧失斗志，当即四散溃逃。

战斗进行到这里，叛军基本上是败局已定了。朱泚和姚令言知道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余众将近万人，从长安西门仓皇出逃。李晟一边安抚城中士民，一边命兵马使田子奇率部追击朱泚等人。同日，浑瑊、韩游环等部也合力克复了咸阳。至此，沦陷了八个月的长安及附近城邑终于又回到李唐王朝的手中。

六月初四，李晟派快马向德宗呈上了长安光复的捷报。德宗闻报，不禁喜极而泣：“天生李晟，是为了社稷，不是为朕一人啊！”

朱泚和姚令言带着余众逃出长安后，一路向西北方向狂奔，打算投奔吐蕃。

然而，他们的部众却在一路上不断逃散。刚出长安时还有将近一万人，可当他们跑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时，逃得只剩下百余骑兵。要命的是，此时的泾州守将、被朱泚任命为泾原节度使的田希鉴还坚闭城门，拒绝接纳他们。

朱泚大怒，在城下向田希鉴喊话：“你的旌节是我授予的，为何在我危难之时忘恩负义、落井下石？”随即命人焚烧城门。

田希鉴站在城头上看着朱泚冷笑。

没错，我田希鉴的官固然是你朱泚封的，可你朱泚的官又何尝不是李适封的？你既然可以背叛李适，我为何就不能背叛你？

当然，田希鉴没有跟朱泚费这番口舌。他只是命人取来节度使的旌节，往城门下的火堆里一扔，大喊一声：“还你的旌节！”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朱泚的部众纷纷发出绝望的哭泣。一部分泾原籍的士兵索性杀了姚令言，砍下他的首级向田希鉴投降。朱泚只好带着余下的亲兵、幕僚和族人，继续向北面的驿马关（今甘肃庆阳县西南）方向逃窜。途经宁州（今甘肃宁县）时，刺史夏侯英又闭门抵拒，朱泚只好折往西面继续逃亡。

当朱泚一行疲惫不堪地逃到彭原西城屯（今甘肃镇原县东）的时候，有两个人不想再跑了。

他们是朱泚的大将梁庭芬和韩旻。

梁庭芬故意放慢速度，让自己的坐骑落在众人之后，然后从容地搭弓上箭，一箭就把朱泚射落马下。朱泚负伤掉进一个土坑中，还没等他挣扎着爬起来，韩旻就挥刀上前，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后，韩旻等人提着朱泚的首级返回泾州，向朝廷投降。

数日后，朱泚的首级被传送至梁州的天子行在。

至此，由泾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叛乱终于尘埃落定，一度兵戈扰攘的京畿也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说到底，朱泚这场叛乱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闹剧，而他本人也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

对于朱泚的败亡，柏杨先生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评论：“史迹斑斑，急于当皇帝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就跟地基刚铺上水泥，还没有凝固，就急着盖一百层高楼一样。而且，当国王（意指称王）还有后退的空间，当皇帝就踏上不归之路。当初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时，曹操失笑说：‘这小子想把我弄到火炉上坐！’朱泚何德何能，一看宝座空出来，屁股立刻就凑上去，仅此一点，他就头脑简单……李怀光军势稍弱，朱泚就马上端起嘴脸，化友为敌，见识何以如此浅陋。一个只知道摆摆架子过干瘾的人，层面就未免太低……智慧及常识两缺，一个笨瓜而已。”

诚哉斯言。

兴元元年七月十三日，在外流亡了十个多月的德宗李适终于回到了长安。

大明宫依旧矗立在那里，默默守候着王者归来。

亮丽的阳光下一切如初。

尽管玄武门上的每一块砖墙都曾经历过流血和死亡，尽管含元殿前的每一寸丹墀也都见证过阴谋和背叛，可如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之下，它们看上去依旧是那么庄严静美，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王者归来的李适受到了万千军民的夹道欢迎。

李适一路上都保持着一副矜持和美好的笑容。那笑容仿佛在说：百姓别来无恙，长安别来无恙！所有的灾难和不幸终将过去，让我们找回昔日的勇气和力量，来重建一个美丽而幸福的家园！

然而，没有人知道，此刻李适的心头正响着另外一种声音。那声音仿佛在说：这世上有一种东西丢了就是丢了，那是找不回来的。

李适不知道自己到底丢了什么。

可他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丢了……

三朝帝师李泌

朱泚败亡，长安光复，德宗接下来要对付的人当然就是李怀光了。

早在长安光复之前，德宗就已经下了一道诏书，历数李怀光的种种罪恶，同时极力褒扬朔方将士的忠贞。在诏书中，德宗宣称，念在李怀光过去对社稷有功的份上，可以赦免他的死罪，但是他担任的太尉、中书令、河中、朔方及诸道节度使和观察使等职，却要全部罢免，另授予太子太保之职；其麾下所辖兵马，命军中将士推举一个功高望重的人来统领，一旦这个人推选出来，朝廷立刻授予旌节。

诏书虽然很早就发布了，但总要派一个人去宣诏才行，否则李怀光也看不到。

回到长安的当天，德宗就迫不及待地向河中派出了一个宣诏使臣。

这个人就是孔巢父。

当初去魏博传达中央精神，其实孔巢父是非常尽心尽责的，要不是那个该死的田绪兴兵作乱，魏博的安定团结就实现了，他也不至于被搞得那么难堪。为此，孔巢父一直感到很遗憾。此次河中之行，他发誓一定要做得漂亮一点，把上次丢掉的脸面挣回来。

可是，孔巢父万万没料到——他这次非但没把脸面挣回来，反而还把小命弄丢了。

一到河中，孔巢父就摆出了一副特别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把猛人李怀光的嚣张气焰一下子镇了下去。在孔巢父同志的浩然正气面前，李怀光自惭形秽，赶紧脱掉身上的官服，“素服待罪”。见此情景，李

怀光的左右将士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虽然他们并不支持李怀光造反，但毕竟跟着他出生入死好多年了，现在看他一世功名毁于一旦，都不免替他惋惜。

通常情况下，受诏官员“素服待罪”其实不过是作作姿态，除非皇帝要将此人砍头或流放，否则负责宣诏的特使是要请对方把官服重新穿上的。换句话说，待罪官员作这个姿态，目的是表明自己的悔过之意；而朝廷特使同样也要作姿态，目的是表明朝廷的宽宏大量。不管这个受诏官员最终命运如何，反正这套官场太极都是要打一打的，这才是上道的表现。

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孔巢父偏偏很不上道。人家李怀光乖乖把官服脱了，只等他一番好言劝慰，再把官服穿上，没想到这位孔兄理都不理，连正眼也没瞧李怀光一下。

这就有点过分了。

就算李怀光过去的官职都被免了，人家现在好歹也是从一品的太子太保，你孔巢父什么官？小小给事中，区区正五品，你有什么资格跟李太保摆谱？

面对这个很不上道的特使，李怀光的左右不禁都有些怒火中烧。

紧接着，这个不上道的特使又作出了更加让人无法容忍的举动——他居然当场召集众将，命他们立刻贯彻天子诏令，推举一个人出来取代李怀光。

完了。

孔巢父就这样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要知道，诏书虽然是这么写的，但你的任务仅止于传达，并不涉及执行。何况这道诏书本来就是得罪人的，你念完诏书赶紧走人就没事了，何苦充这个冤大头呢？这不是引火烧身、自寻死路吗？

孔巢父话音刚落，李怀光的左右立刻炸开了锅，旋即拔刀出鞘，冲上去把这个不识时务的中央特使砍成了一摊肉泥，连带着把跟他一起来的宦官也砍了。

李怀光冷冷地看了一眼血肉模糊的孔巢父，慢条斯理地穿上官服，然后向左右将士下达了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就八个字——操练士卒，严守城池！

他要跟朝廷干到底了。

李怀光纵容手下残杀中央特使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长安。

德宗又惊又怒。

很显然，李怀光知道朝廷的真正意图是想温水煮青蛙——先解除他的兵权，给他一个闲职，等到时机成熟，再找个借口把他干掉！

所以，李怀光不上这个当。既然软的不行，德宗也只好来硬的，跟李怀光刀兵相见、一决雌雄！

但是说说容易，真的要开打，李怀光麾下的朔方军却始终是德宗的一大顾虑。尽管相当一部分朔方将士心系李唐，不愿追随李怀光造反，可仍旧忠于李怀光的部众也不在少数。朝廷要想剿灭这支军事力量，其难度肯定要比对付朱泚大得多。

一连数日，德宗为此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七月下旬，有个朝野瞩目的重要人物从地方上奉诏回到了朝廷，德宗精神为之一振，立刻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 [2] 。

此刻，被德宗引为智囊的这个人，就是大唐帝国硕果仅存的三朝帝师、四朝元老——李泌。

早在肃宗灵武时期，德宗就以皇长孙的身份就学于李泌；肃宗朝廷迁回长安后，李泌功成身退，归隐衡山；代宗时代，李泌禁不住代宗李豫的再三邀请和软磨硬泡，重新入朝辅佐，以翰林学士衔居于宫中的蓬莱书院，李适便以太子身份与李泌问学交游；后来，李泌频遭宰相元载、常衮等人排挤，被贬出朝，辗转担任楚州、杭州等地刺史。德宗即位后，本以为凭一己之力足以澄清宇内，不料到头来却引发了天下大乱。直到流亡梁州时，追悔莫及的德宗才终于想起了三朝帝师李泌，赶紧“急诏征之”，“命泌日值西省以候对”。

基本上可以说，每当天下不宁、社稷有难的时候，李泌必定会被召入朝中；一旦局势稍稍安定，他马上就会出于各种原因淡出人们的视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李泌的人生轨迹就是这么运行的，几乎成了一种规律。如果是一般的官场中人，老这么被折腾来折腾去，恐怕早就牢骚满腹、心灰意冷了，可李泌却无怨无尤。因为他对功名利禄本来就没什么兴趣，所以对他来说，得亦不足喜，失亦不足忧。

李泌一回朝，德宗就迫不及待地跟他谈起了李怀光的问题。德宗说："河中与京城距离很近，朔方兵又素称精锐，如李怀光麾下骁将达奚小俊等人，都是出了名的万人敌，朕为此日夜担忧，不知如何是好？"

李泌淡淡一笑："天下事值得担忧的固然很多，可要说到河中，实在是不足为虑。对付敌人，该重视的是统帅而不是喽啰。如今，李怀光是统帅，达奚小俊这些人不过是喽啰而已，何必在意？至于李怀光这个人，依臣看来，也不过是昏了头的一介武夫。当初，是他解了奉天之围，可他面对朱泚这种行将灭亡的叛贼，却不肯出手剿灭，反而去跟他联手，让李晟建立了消灭朱泚的大功。如今，长安已然光复，陛下已还宫阙，李怀光非但不束身待罪，反而虐杀使臣、倒行逆施，这种人无异于梦游之人，恐怕很快就会被他的部下所杀，甚至都不用朝廷动手。"

德宗闻言，连日来的忧虑顿时减轻了许多。

虽然李泌这番话多少有些过于乐观，但是对于几年来屡遭挫折、自信心备受打击的德宗而言，多一些自信和乐观总不是什么坏事。

李泌的乐观精神固然增强了德宗的信心，但李怀光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兴元元年秋天，奉命征讨李怀光的浑瑊、骆元光部在同州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县东）一带遭遇河中猛将徐庭光部的顽强阻击，官军数度失利，不得前进半步。与此同时，连年战乱也耗尽了国库的钱粮，致使朝廷一度捉襟见肘，于是部分朝臣纷纷建议德宗赦免李怀光，以缩减日渐增长的军费开支，缓解财政困难。

然而，德宗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赦免李怀光固然可以避免当前的战争，但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和平。因为朝廷和李怀光之间的相互信任早已经荡然无存，即便双方暂时偃旗息鼓，也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换言之，依靠绥靖政策换来的虚假和平不仅难以持久，而且很可能只是为下一场更大的战争积蓄能量。与其如此，还不如一鼓作气铲除战乱的根源。更何况，几年来被诸藩叛乱搞得心力交瘁、颜面扫地的德宗太需要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来重振声威了。所以，不管目前的局面有多么困难，他都必须坚持到底。

德宗的坚持很快就有了令人满意的回报。

从八月初到十月末，奉命从北面进攻李怀光的河东节度使马燧取得了一连串骄人的战绩。他先是成功劝降了李怀光的妹夫要廷珍，大将毛朝扬、郑抗，收复了晋州（今山西临汾市）、隰州（今山西隰县）、慈州（今山西吉县），继而亲自率部攻克了绛州（今山西新绛县），然后分兵横扫河中，一连攻下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万泉（今山西万荣县）、虞乡（今山西永济市东）、永乐（今山西芮城县西南）、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与南线战场的浑瑊、骆元光部遥相呼应，对困守河中城的李怀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

李怀光已成瓮中之鳖。

纵然还在困兽犹斗，可他的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就在河中捷报频传的同时，两河战场上的形势也是一片喜人：河北，朱滔被王武俊打得节节败退，局面日蹙，再加上朱泚已死，朱滔极度惶恐，只好上表向朝廷请罪；河南战场上，以宋亳节度使刘洽为首的唐军也开始转败为胜，先后逼降或击败李希烈的大将李澄、翟崇辉、田怀珍、孙液等人，克复了滑州（今河南滑县）、汴州（今河南开封市）、郑州等战略要地，迫使李希烈不得不收缩战线，退保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四面八方传回的捷报让德宗李适大为振奋，然而，偌大的天下还是有一块地方让他始终牵肠挂肚。

那就是帝国的财赋重镇——江淮地区。

自从李希烈发动叛乱以来，他的隔壁邻居淮南（治所扬州）、镇海（治所润州，今江苏镇江市）两镇就不得安生了。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是个见风使舵、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李希烈刚刚起兵之时，他还曾装模作样地出兵讨伐，后来李希烈兵势大盛，陈少游就慌忙把辖区内的四个州主动割让给了李希烈。不久，陈少游听说朱泚在长安称帝，德宗又出逃奉天，他就觉得李唐快完蛋了，于是忙不迭地把朝廷储存在扬州的盐铁专卖收入、总值八百万的金帛全部据为己有，同时又修筑城池、秣马厉兵，大有拥兵割据之势。

李希烈耀武扬威、攻城略地，陈少游又趁乱割据、不断扩充战备，这一切迫使镇海节度使韩滉也不得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立刻采取各种措施闭境自保。他下令封锁了辖区内的所有关卡和渡口，禁止车马舟船随意出境，同时花大力气重筑辖下的军事重镇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东），并在建业（今南京）、东岘（镇江市东）一线紧急修筑了大量营寨碉堡……

韩滉的武力威慑显然发挥了作用。此后，李希烈虽然在河南与官军打得不亦乐乎，但始终无暇也无力出兵江东；而陈少游一看韩滉摆出了那么生猛的架势，当然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在德宗朝廷流亡期间，整个江淮地区尽管剑拔弩张，结果倒也维持了一个平衡局面，始终没打起来。

然而，随着长安光复、德宗回銮，陈少游和韩滉大举扩充战备的行为就不能不受到质疑了。尤其是韩滉，动作那么生猛、场面搞那么大，更是引起了朝中舆论的极大非议。人们纷纷传言，说韩滉显然是心怀异志、图谋不轨，否则他为何趁銮驾播迁之机秣马厉兵，还大修石头城？

德宗李适被这个传言搞得心神不宁。

江东可是帝国的大粮仓啊，韩滉若真的心怀异志，那麻烦就大了！

德宗随即向李泌吐露了自己的不安。

李泌知道，德宗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这几年诸藩接连叛乱，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他的猜忌之心。眼下如果在韩滉这件事上处置不当，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逼反一个韩滉事小，引起相邻诸道人人自危事大，若因之导致整个江淮漕运断绝，那可真是天大的麻烦了！

李泌决意打消德宗的疑虑。他说：“韩滉忠贞清廉，自从陛下乘舆播迁，他的贡赋始终没有断绝。而且，韩滉镇抚江东十五州，地方匪患不生、一派升平，可谓卓有政绩。他之所以修筑石头城，是因为看见中原板荡，说不定陛下会有江东之行，故提前作迎接圣驾之准备，此乃人臣一片忠诚之表现，奈何反以为罪状！韩滉性情刚正严明，不附权贵，得罪的人太多，难免招惹一些毁谤之辞，愿陛下明察，臣敢保证他绝无二心。”

德宗轻轻瞟了李泌一眼：“外面议论纷纷，举报他的奏章多如乱麻，贤卿难道都没有听说？”

李泌道：“臣当然听说了。臣还知道，韩滉的儿子韩皋在朝中担任考功员外郎，已经很长时间不敢回江东探望父母，就是因为这些甚嚣尘上的毁谤之言。”

德宗冷笑：“是啊，连他的儿子都吓成这样，你还替他担保？”

“韩滉的想法臣最清楚，臣愿上疏替他申辩，请陛下将奏疏发到中书省，再向文武百官公布，让所有人都了解真相。”

“这就没必要了。”德宗说，“朕正准备重用你，你千万不可卷入如此复杂的人事当中。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啊！你最好不要跟多数人意见相左，以免受到连累。”

德宗说完，故意面露倦容，示意李泌退下。

李泌退出后，当天就呈上一道奏章，愿意用阖家百口的性命替韩滉作保。

德宗无奈，数日后又召见李泌，说：“贤卿竟然真的上疏替韩滉作保，朕为你着想，已经把奏章留中了（即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到中书省）。朕也知道，你与韩滉是故交，但也没必要为他豁出身家性命啊！”

德宗此言，表面上是爱惜李泌，实际上已经在指责他“回护亲旧”了。李泌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意思。他正色道：“臣岂敢因亲旧之故负于陛下！只是韩滉确实没有异心。臣之所以上疏，为的是朝廷，不是为自己。”

德宗眉毛一扬：“哦？如何为了朝廷？”

“如今天下大旱，蝗虫成灾，关中一斗米卖到了一千钱，公私仓廪都已耗竭，唯独江东丰稔，是朝廷命脉所系。”说到这里，李泌明显提高了音量，“愿陛下早日公布臣的奏章，以解朝中百官之惑，并面谕韩皋回家省亲，令韩滉生感激之情、消自疑之心，以最快的速度把江淮贡米发往京师，这难道不是为了朝廷？”

德宗恍然大悟，喃喃地说：“好，你说得好……朕总算明白了。”

当天，德宗立刻公布了李泌替韩滉申辩作保的奏章，同时召见韩皋，让他回家省亲，并当场赐给绯衣 [3] 。最后，德宗对韩皋说：“最近，你父亲受到很多人的诽谤，朕现已查明内情，不会再听信那些谣言。现在关中缺粮，回去告诉你父亲，赶紧运粮，越快越好！”

韩皋回到润州，韩滉果然感动得眼泪哗哗的，当天就亲自赶到码头，命人将一百万斛稻米全部装船，并告诉儿子韩皋，只准他在家里待五天，时间一到立刻回朝。

五天后，韩皋去跟母亲辞行，哭哭啼啼，恋恋不舍。韩滉大怒，把他叫出来打了一顿，然后亲自把他带到船上，不管风大浪高，立即下令开航。

淮南陈少游听说韩滉向朝廷献了一百万斛米，赶紧也献了二十万斛。德宗大为感慨，对李泌说：“没想到韩滉居然能感化陈少游，让他也献了米！”

李泌笑答：“岂止是陈少游，江淮诸道必然都会争相入贡！”

这年年底，陈少游得知宋亳节度使刘洽攻克汴州时，获取了他当初投靠李希烈的确凿证据，顿时忧惧惶悚，一病不起，没几天就一命呜呼。陈少游死后，淮南大将王韶企图拥兵自立，韩滉得到消息，马上派人去警告他：“你敢作乱，我即日率军渡江把你灭了！”王韶知道自己不是韩滉的对手，只好夹起尾巴做人，乖乖等候朝廷任命新的节度使。

德宗获悉此事后，喜不自胜，对李泌说：“韩滉不仅能安定江东，还能安定淮南，真乃大臣之器，贤卿确实有知人之智啊！”旋即加授韩滉同平章事、江淮转运使。

此后，韩滉就从一个备受猜忌的潜在叛乱分子，一跃而成为天子最赏识的国之重臣。史载，“滉（韩滉）运江、淮粟帛入贡府，无虚月，朝廷赖之，使者劳问相继，恩遇始深矣。”（《资治通鉴》卷二三一）

韩滉能够保住身家性命，还能加官晋爵、平步青云，实在应该感谢李泌；德宗李适能顺利消除一场潜在的叛乱，保住天下粮仓和朝廷命脉，也应该感谢李泌；而江淮地区的老百姓因此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的战祸，更应该感谢李泌！

古人常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李泌在“韩滉事件”中的表现，虽然还提不到“一言兴邦”的高度，但也庶几近之，足以称得上是功德无量了。德宗李适若有悟性，应该不难从李泌身上学到一些识人用人的本事，就算不能举一反三，至少也该变得聪明一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有李泌这样的智者在身边，德宗李适的执政能力也没有得到丝毫提高。下面这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兴元元年岁末的几天，一则令人不安的小道消息开始在长安坊间流传。消息说：当初逼反李怀光的那个奸相卢杞要回朝了。

据说，天子李适很想念他。

德宗勒紧了裤腰带

新年的正月初一，德宗朝廷大赦天下，同时把年号改为“贞元”。

此前的“兴元”年号仅仅使用一年就被抛弃了。新年号的这两个字，出自《周易》，是“贞下起元”的缩略，有严冬已过、春天来临之意，本来是表示天道人事的循环往复、周流不息。而在德宗君臣这里，当然是希望“贞元”二字能让历尽劫波的大唐帝国在新的一年里否极泰来、浴火重生……

帝国能不能在新的一年里否极泰来目前还难以断言，但帝国的前宰相卢杞确实是要时来运转了。德宗的大赦令一颁布，他就从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的任上被调往吉州（今江西吉安市）担任长史。

虽然在帝国辽阔的版图上，从新州到吉州就像是虫子蠕动了一小步，但是这一小步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

卢杞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号。

他知道，德宗很快就要重新起用他了，于是逢人便说：“我必定会再次入朝。”

果不其然，短短几天后，德宗就又命中书省起草一道诏书，准备把卢杞从吉州长史任上擢升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刺史。

很显然，这绝不是虫子在版图上蠕动，这是一个前宰相咸鱼翻身的三级跳——只要再一跳，他就能跳回帝国的心脏，重新当他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光宰相！

负责起草诏书的给事中袁高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头，立刻去找现任宰相卢翰和刘从一，说：“卢杞为相期间，导致銮驾播迁、海内疮痍，为何突然又获升迁？请两位宰相向皇上反映。”

向皇上反映？

说得倒轻巧！

面对这个不自量力、多管闲事的袁高，卢翰和刘从一不约而同地在心里苦笑。

在这两位现任宰相看来，卢杞这家伙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问题是人家跟皇上感情好啊，你能拿他怎么办？再说了，你一个小小的给事

中，只管认真写你的诏书就好了，何必操那份闲心呢？而且皇上也不是那么好劝的人，他亲自下的命令，别说是你袁高，就是我们哥俩，也万万不敢跟他讨价还价。

毫无疑问，卢翰和刘从一都是明哲保身的人，他们信奉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要他们冒着得罪皇帝、丢掉乌纱的危险去谏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很快就绕开袁高，另外找人替德宗草拟了诏书。

正月十九日，诏书发下，袁高却愤然扣下诏书，硬是不让中书省颁布，并亲自去找德宗，痛心疾首地说：“卢杞是大奸大恶之人，文武百官都视他为仇敌，六军将士恨不得生吞其肉，这样的人岂能复用？”

尽管袁高敢于犯颜直谏，但他毕竟人微言轻，所以根本改变不了德宗的想法。

同日，左补阙陈京、赵需等人又联名上疏，说：“卢杞三年擅权，朝纲一片紊乱，此乃天地神祇所共知，若皇上定要宠任此巨奸，必失天下万民之心。”

正月二十一日，袁高又在朝会上公开谏诤。德宗强忍怒火，说：“卢杞不是已经经过两次大赦了吗？”言下之意，有再大的罪也可以赦免了。

袁高说：“大赦只是赦免他的刑责，并不表示他就能当刺史！”

陈京等人也群起而谏，说：“卢杞当权时，百官常感刀在颈上，一旦复用，奸党必将得势逞凶！”

“放肆！”忍无可忍的德宗终于发出一声狂怒的咆哮。

左右侍者从没见过天子发这么大的火，顿时吓退了好几步。刚才还群言汹汹的谏诤者们也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脸上都是一片惊惶之色。

所有谏诤者中，只有陈京一个人依然梗着脖子，对袁高、赵需等人大声说：“你们不要退缩，此乃国家大事，我等当以死相争！”

以死相争？

德宗李适万万没想到，复用卢杞竟然会招来如此浩大的反对声浪，而且闹到了“以死相争”的地步！虽然出面反对者都是些芝麻绿豆大的小

官，但谁敢断言他们背后没有宰相或大臣的支持呢？

在一阵难挨的沉默过后，德宗无奈地摆了摆手，示意朝会解散。

细心者不难发现，天子脸上的怒气已经自动消解了许多。

也许，意识到众怒难犯的天子准备要作出让步了。

第二天，德宗召见了卢翰、刘从一、李勉三位宰相，想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德宗看了看他们，小心翼翼地问："让卢杞去小一点的州当刺史，你们认为如何？"

卢翰和刘从一面无表情，沉默不答，只有李勉开了口。他淡淡地说："陛下要用卢杞，就算是大州亦无不可，但结果必然是天下失望！"

天下失望！

没有什么比这四个字更能代表宰相的态度了。

德宗感到了深深的无奈。数日后，朝廷终于颁下一道诏书，将卢杞调任澧州（今湖南澧县）别驾。同时，德宗派人给袁高送去了一句话："朕慢慢思考贤卿的话，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过后，德宗又不无失落地跟李泌表示，他已经接受袁高等人的谏言。李泌说："这些日子外人议论纷纷，都把陛下比做东汉末年的桓帝和灵帝，今日听到陛下的决定，才知道连尧舜也不一定比得上陛下！"

一个灿烂的笑容在德宗脸上绽放开来，许久不舍得凋谢。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喜欢被人哄：一种是孩子，还有一种就是领导。孩子的年龄越小，领导的级别越高，对此的依赖程度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像皇帝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当然更应该获得跟小孩一样的待遇：需要人们对他们进行"拇指教育"。尤其是当他们感觉自己很辛苦才做对一件事的时候，更需要人们用有形和无形的糖果奖励他们。

李泌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并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辞。

接到朝廷的诏书时，卢杞傻眼了。

他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虽然从地图上看，卢杞向长安又靠近了一步，但他的官位却莫名其妙地往下掉了一级。

这意味着什么呢？

卢杞比谁都清楚，这不是德宗的无心之失，而是借此向他传达另一个信息——对不起，你已经没有机会回朝了。

卢杞知道，德宗已经迫于舆论的压力抛弃了他，永远地抛弃了他！

意识到这一点后，卢杞万念俱灰。

没多久，抑郁和绝望的卢杞就在澧州别驾任上一命呜呼了。

贞元元年的春天，李怀光的处境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窘迫和艰难。三月下旬，河中大将吕鸣岳秘密与马燧联络，准备率部投诚。不料事情泄露，李怀光旋即屠杀了吕鸣岳全家。虽然吕鸣岳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此事对原已四分五裂的河中人心显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不久，马燧进军宝鼎（今山西万荣县西），在陶城（今山西永济市西北）一带击败李怀光军，斩首万余级。四月中旬，马燧与浑瑊在长春宫会师，再次大破李怀光军。河中诸将眼看官军连战皆捷、兵势强盛，遂纷纷归降。

李怀光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但为了再撑一些时日，便向部众诈称：自己愿意归降朝廷，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准备进贡的财帛。

李怀光采用的这个“拖”字诀，表面上看不过是在苟延残喘，实际上他的用意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他知道此时此刻，德宗朝廷的日子也不见得比他好过多少。

虽然朝廷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日渐庞大的军费开支早已让帝国财政不堪重负，再加上自去年以来大范围的旱灾蝗灾，更是让帝国财政雪上加霜。所以，德宗朝廷究竟有没有足够的财力继续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其实还是个未知数。

职是之故，李怀光就有理由跟朝廷穷耗。多耗一天，朝廷的财政就多一分压力，等到无力承受了，就有可能主动赦免李怀光。

而李怀光等的就是朝廷对他的赦免。

可想而知，如果是李怀光主动投降，那他的地盘和兵权就会被朝廷彻底剥夺，顶多只能得到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温水煮青蛙的命运。可如果是朝廷主动赦免李怀光，那情形就完全不同

了。朝廷不仅不能剥夺他的兵权，而且为了安抚他，还要把马燧等人打下的地盘还给他。到那时候，李怀光就仍然是个拥兵一方的封疆大吏。

所以，尽管此时的李怀光已经日暮途穷，可他并没有完全绝望。

他相信——最终妥协的人很可能不是他，而是德宗李适。

正如李怀光所预料的那样，到了这一年六月，帝国财政就再次拉响了警报。负责向军队提供粮饷的财政官员们纷纷请求德宗赦免李怀光，因为国库马上就要见底了！

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晟得知情况后，立刻上疏德宗，提出了五条不可赦免李怀光的理由，并主动要求“发兵二万，自备资粮，独讨怀光”。七月初一，马燧也从前线赶回朝中，向德宗奏称：“李怀光的悖逆之罪，较之其他叛乱者更为严重，倘若赦免，将无以令天下。请朝廷再拨一个月的粮食，臣定为陛下讨平李怀光。”

一个月的粮食？

朝廷再穷，这一个月的粮食总还拿得出来吧？

德宗咬了咬牙，同意了马燧的要求。

就在德宗朝廷勒紧裤腰带，准备对李怀光发起最后一击的当口，又一场近在咫尺的兵变爆发了。

七月初，陕虢（治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夺取了兵权，并要求朝廷授予他节度使旌节。

同时，达奚抱晖还暗中联络李怀光的麾下骁将达奚小俊，请其率部进入陕州协防。

德宗得到消息，差点瘫软在地。

此时此刻，无论哪个地方叛乱都不会给德宗造成这么大的打击。

因为，陕州具有十分独特的地理位置。

首先，陕州、长安、河中三个地方大致处于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上，陕州在东，长安在西，河中在北。也就是说，一旦达奚抱晖与李怀光联手，那不仅意味着朝廷征讨李怀光的战争将功亏一篑，而且这两支

叛乱力量必将形成犄角之势，对长安构成严重威胁。

更要命的是，陕州是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是江淮粮运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一旦达奚抱晖扼住这个咽喉，就等于掐断了朝廷的生命线。如今朝廷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陕州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这不是把德宗朝廷往死路上逼吗？

怎么办？

在这种形势下，朝廷是不可能两面开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能人赶赴陕州，用最小的代价平定陕州的叛乱。

可是，什么人才能担此重任呢？

德宗忙不迭地找来李泌，说："陕州的重要性你也知道，眼下这种情况，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

七月初八，德宗任命李泌为陕虢都防御使兼水陆转运使，准备派神策军随同李泌前往。他问李泌："你需要多少人？"

李泌答："我一个人就够了。"

德宗大惊："单枪匹马怎么进得去？"

李泌说："陕州之人，历来很少抗拒中央，如今作乱者，实际上只有一个达奚抱晖。如果我们大兵压境，陕州必定闭门抵抗。我现在单人匹马前往，他若出动大军，只能被人当成笑柄；若派一两个小将来杀我，未必不会被我策反，反而为我所用。要是陛下实在担心臣的安全，只需做一件事：现在马燧还在朝中，陛下可让他跟我同日离京，一起走一段路，陕州方面畏惧马燧的河东军，担心日后被其讨伐，肯定不敢随便加害于我，这也是一种造势。"

德宗还是放心不下："话虽如此，可朕正准备重用你，宁可失去陕州，不可失去你。算了，朕还是派别人去吧。"

李泌摇头："他人必定进不了陕州。如今事变刚起，众心未定，还可出其不意，挫败达奚抱晖的阴谋。若派别人去，一旦犹豫迁延，让达奚抱晖控制了局面，事情就不好办了。"

见李泌一再坚持，德宗只好同意。

当然，李泌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在单枪匹马去闯那个龙潭虎穴之

前，他必须先做一件事。

第二天，李泌召见了陕州驻京办的官员，说："皇上知道陕州最近在闹饥荒，所以任命我为转运使，目的是想调度一部分江淮粮食用以赈灾，没有别的意思。至于达奚抱晖，朝廷将考察他的表现，要是没什么问题，很快就会授予他节度使旌节。"

达奚抱晖安插在京城的间谍马上把朝廷的意思传了回去。达奚抱晖听了，惴惴不安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放出消息后，李泌对德宗说："如此一来，陕州军民渴望赈灾粮，达奚抱晖渴望节度使旌节，他们尊重我还来不及，怎么会杀我？"

德宗闻言，对李泌的智慧大为佩服，连连称善。

七月十五日，李泌和马燧同日离京。

东出潼关后，李泌发现，达奚抱晖始终没有派出一个将领来迎接他。相反，一路上倒是看见了不少乔装打扮、形迹可疑的人。李泌知道，那是达奚抱晖派来打探情况的间谍。

抵达陕州的前一晚，李泌入宿曲沃（今三门峡市西南曲沃镇）。当天晚上，李泌住宿的驿馆突然来了一大帮人。李泌开门一看，原来是陕州的文武官员，他们不等达奚抱晖下令，便忙不迭地跑来向天子特使示好了。

李泌在心里对自己说："吾事济矣！"

次日，在距陕州十五里处，达奚抱晖终于前来迎接。李泌对他的保境安民之功称赞了一番，说："目前军中有一些风言风语，你不必介意。皇上说了，你们的官位和职务都不会变动。"

达奚抱晖闻言，又吃了一颗定心丸。

进入陕州后，当地的文武官员纷纷请求与李泌私下面谈，都被他婉言拒绝。李泌放出话说："更换统帅之际，军中难免有些不实的传言，这很正常。既然我奉天子之命前来，那些传言也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有些话你们没必要说，我也没必要听。"

李泌很清楚，之所以有那么多陕州官员主动去迎接他，现在又有这么多人想私下会面，无非就是想通过他向朝廷表达忠心，同时与达奚抱晖撇清干系，洗脱叛乱的嫌疑。换句话说，自从他李泌进入陕州的这

一刻起，陕州的文武官员就已经不看达奚抱晖的脸色，而是通通看他李泌的脸色了。

既然如此，李泌就有理由得出结论——达奚抱晖的兵变完全不得人心。说白了，现在的达奚抱晖基本上就是个光杆司令，要拿掉他可谓易如反掌！

到达陕州的第二天，李泌就毫不犹豫地跟达奚抱晖摊牌了。

他单独接见了达奚抱晖，一开口就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达奚抱晖大惊失色，额头瞬间爆出冷汗。

"不过，我不会杀你。"李泌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杀你，并不是爱惜你这个人，而是担心以后凡是出现类似事件的地方，朝廷派遣的将帅都无法顺利赴任。所以，我今天饶你一命，但你必须替我准备酒菜、纸钱，出城去祭奠前任节度使。祭奠完后，随你去哪里都行，可千万别入关，等你找到了安身之处，再暗中回来接你的家眷。你若按我说的话做，我可以保证你没有任何麻烦。"

这一席话听完，达奚抱晖的全身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其实他也知道，李泌是有把握说这些话的。从这两天陕州绝大多数官员的表现来看，不难证明这一点。当然，他也未尝不可以豁出去，跟李泌拼一个鱼死网破，但是胜算显然很小。所以，除了按李泌所说的话做，他已别无选择。

达奚抱晖当天就潜逃了。

李泌离京之前，德宗曾经交给他一份七十五人的名单，里头是根据情报确认的参与兵变的文武官员。李泌驱逐达奚抱晖、顺利接管陕州后，德宗马上要求他把这七十五人都杀了。然而李泌坚持没有这么做。数日后，德宗又派遣宦官前来催促。李泌无奈，只好把兵马使林滔等五个参与兵变的主要将领押解入京，并恳请德宗赦免他们的死罪。

德宗给了李泌面子，把林滔等人流放到天德军去戍边。但是一年多后，德宗还是命人把他们杀了。

达奚抱晖亡命天涯后，从此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当李怀光麾下骁将达奚小俊按照前约，领兵来到蒲、陕边界时，得知李泌已经接管陕

州，只好悻悻然引兵而回。

李泌就这样凭着他的智慧和胆识，成功化解了一场拥兵割据的潜在叛乱。他单枪匹马平定陕州的故事，堪称孤胆英雄的传奇。

贞元元年七月下旬，关中大旱，灞水和浐水几近干涸，长安的所有水井都汲不出一滴水。与此同时，早已不堪重负的帝国财政也走到了最后关头，财政总监哭丧着脸向德宗奏报——宫中和朝廷的经费，总共只够维持七十天了。

七十天？

德宗的脸色在一瞬间苍白如纸。

难道堂堂的大唐朝廷，七十天后就要宣告破产了？

八月初二，德宗紧急下诏，宣布自即日起，但凡不是紧急和必要的开支，必须全部停止；同时，朝廷内外的所有冗员，也要一并裁撤。

德宗不得不再次勒紧了裤腰带。

此时此刻，作为大唐立国一百六十多年来最穷的一个天子，李适只能默默向天祈祷——希望朝廷能够在这七十天内彻底平定李怀光，希望自己能够在破产之前看到来自四方的贡赋和财帛……

胜利：一种“否极泰来”的假象

马燧回到前线的时候，心情是很不轻松的。

因为朝廷按照他自己主动立下的军令状，只给了他最后一个月的粮食。如果不能在这最后的期限内平定李怀光，不仅他本人要入朝向天子请罪，而且天子也将不得不向李怀光妥协。倘若如此，那他马燧的前程就彻底毁了。

所以，他现在必须和时间赛跑。

当时，官军正面最顽固的据点就是河中骁将徐庭光据守的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县东），“长春宫不下，则怀光不可得”（《资治通鉴》卷二三二）。此地守备甚严，浑瑊、骆元光部已对其围攻半年多，却始终未能前进半步，若继续强攻，恐怕也是旷日持久，别说一个月，再过

半年也不见得能打下来。

如果绕开长春宫直取河中，倒也不是不可行，但就怕被徐庭光抄了后路，到时候非但不能速战速决，反而会落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因此，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徐庭光达成协议，让他按兵不动，然后官军绕过他直取河中。李怀光一完蛋，长春宫自可不战而下。

可是，要怎么才能跟徐庭光达成协议呢？

马燧决定亲自去和他谈。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随后，马燧单枪匹马来到长春宫城下，向城上喊话。徐庭光素来敬重马燧，旋即带着麾下诸将来到城头上，向马燧遥拜。

马燧知道，徐庭光为人忠义，却被迫处于朝廷和李怀光的夹缝之中，虽然跟着李怀光造反，但心里并不好受。凭着这一点，马燧相信自己一定能说服徐庭光。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马燧发出试探，向城上喊道："我从朝廷来，可全权代表天子，你们可西向受命。"徐庭光等人一听，立刻以觐见天子之礼向西遥拜。

马燧一看，心里就有数了，接着大声喊道："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朔方军转战南北，为国建功，迄今已三十年，为何一朝与朝廷为敌，自取灭族之祸？你们今日听我一言，不仅可以免祸，还可得到富贵。"

徐庭光等人默然不语。

马燧突然拉开胸前的衣襟，厉声高喊："你们既然不信我的话，为何不拔箭射我！"

徐庭光悚然动容，他身边的将士已经有人跪伏在地，低声发出啜泣。见此情景，马燧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最后说了一句："这场祸乱是李怀光一个人的责任，你们无罪。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将率部直趋河中，希望你们固守城池，不要出战。"

徐庭光听懂了。

马燧的这个计划，是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好办法，也是帮助他徐庭

光摆脱两难处境的最佳策略。徐庭光和左右将士对视一眼，随即异口同声地大喊一声：“诺！”

李怀光的末日就这样降临了。

八月初十，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等部绕过长春宫，进抵焦篱堡（今陕西合阳县南），该城守将尉珪当即率守军七百人望风而降。当天夜里，李怀光得知官军已经到了眼皮底下，慌忙命人燃起烽火，可驻扎在河中附近的各部兵马却始终没有举火响应。

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次日，徐庭光料定李怀光败亡在即，遂下定决心归降，其部众大声欢呼：“从今往后，我辈又是天子臣民了！”

八月十二日，马燧率领各军迅速进抵黄河西岸，河中大恐。城中将士早就厌倦了这场战争，遂惊惶奔走，继而谣言四起，一会儿说：“西城已经投降了！”一会儿又喊：“官军攻进东城了！”片刻后，河中城上就纷纷打出了写有“太平”字样的旗帜。

这是什么旗？

降旗。

最后的胜利竟然得来全不费工夫，让马燧等人颇有些喜出望外。

与此同时，一直心怀侥幸、苟延残喘的李怀光终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打一个结，然后把脑袋伸进去……

李怀光自缢当天，一向反对他发动叛乱的长子李璀亲手杀了两个弟弟，随后自杀。河中大将牛名俊砍下李怀光的首级，率众出降。

马燧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进入了河中城。

从他离京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天。也就是说，只要再过三天，他的部队就断粮了。此时，河中城内尚有守军一万六千余人，假如他们拼死抵抗，马燧非但不会这么快取得胜利，而且还会因粮饷不继而被迫撤退。

倘若如此，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全然不同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燧最后入踞河中的军事行动虽然是一场兵不血刃的完胜，但同时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险胜。

马燧进入河中后，将死心塌地追随李怀光造反的大将阎晏等七人全部斩首，其余将士一概不问。

至此，河中之乱宣告平定。

在李怀光败亡之前，亦即这一年六月，幽州的朱滔在惶惶不安中一病而死，其麾下大将刘怦在部众的拥戴下接过了军政大权；七月，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九月，刘怦又患病身亡，德宗随即下诏任命刘怦之子刘济代理节度使。也就是说，差不多与河中平定的同时，作为叛乱重灾区的河北也总算是消停了。

接下来，德宗朝廷要对付的最后一个敌人就是自称楚帝的李希烈了。其实，随着各方叛乱的相继平定，势穷力孤的李希烈分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

这一年岁末，让德宗李适望眼欲穿的四方贡赋（钱帛）总算陆续入京，濒临崩溃的帝国财政也终于度过了危险期。但是，粮食还是极度短缺，德宗李适还是要眼巴巴地等待着江淮漕米。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春天，已成强弩之末的李希烈又对襄州、郑州采取了几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均被当地官军击败。自此，李希烈一蹶不振、兵势日蹙。

四月初，意志消沉的李希烈又感染重病，其麾下大将陈仙奇遂买通医生，在李希烈的药中下毒，将他毒死。随后，陈仙奇发动兵变，将李希烈的妻子、儿子、兄弟及其家属全部屠杀，最后宣布归顺朝廷。

四月末，德宗下诏，正式任命陈仙奇为淮西（原名淮宁）节度使。

虽然四方叛乱一一平定了，但是德宗李适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禁军将士这些日子都只能喝稀粥了。而且据主管粮仓的官员奏报，过几天连稀粥也没得喝了，只能喝西北风。

禁军将士开始骚动了。一部分士兵甚至跑到了大街上，丢掉头盔，扯掉头巾，对着过往行人大声嚷嚷："朝廷把我们弄进了军营，却不发粮食，这不是把我们当罪犯了吗？"

眼看泾师之变又要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重演，德宗李适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每次上朝，他头一句话就是问百官们：江淮漕米到了没有？

遗憾的是，李适每次听到的都是死一般的沉默。

就在德宗君臣等得花儿都快谢了的时候，终于等到了李泌从陕州发来的一道加急奏章——韩滉发送的三万斛米已经运抵陕州，不日即可转运入京。

这一刻，李适激动得都快哭了。他拿着那道救命的奏章，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跑进东宫，对着太子李诵大喊："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噩梦过去了。

所有的噩梦终于都过去了。

德宗李适感觉直到这一刻，"贞元"年号所象征的"否极泰来、浴火重生"的寓意才开始得到了应验。

是的，诸藩之乱平定了，财政危机也过去了，然而，大唐帝国真的已经"否极泰来、浴火重生"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引发诸藩叛乱的那些根本因素是否已经消除？

似乎是为了给这个问题提供佐证，贞元二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再次发动兵变，杀了毒死李希烈的主谋陈仙奇，夺取了兵权，自立为留后。据说，吴少诚生性狡猾阴险，却是李希烈生前最宠信的大将，他之所以发兵诛杀陈仙奇，是为了给李希烈报仇。

不管吴少诚起事的动机是什么，对于朝廷来讲，他的行为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兵变。这个性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面对拥兵自立的吴少诚，德宗朝廷又会采取怎样的应对之策呢？

德宗李适很快就发布一道诏书，任命虔王李谅（德宗第四子）为淮西节度使，同时任命吴少诚为淮西留后。

这道诏书是什么意思？

意思明摆着——德宗妥协了。

所谓任命虔王李谅为淮西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朝廷的一面遮羞布而已。因为李谅并没有实际到任，仅仅是名义上的"遥领"。既然是遥领，那么淮西的军政大权当然就稳稳落在吴少诚手中了。

至此，我们终于发现——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五月开始，因德宗对成德李惟岳开刀而引发的这场诸藩大叛乱，在经历了五年的战火洗礼并席卷了大半个帝国之后，与其说是以李唐朝廷的胜利告终，还不如说是以德宗李适的妥协退让而草草收场！

我们都还记得，这场诸藩大叛乱之所以爆发，其因有二：一是诸藩的目无朝廷和自代自专，二是德宗的锐意中兴和志在削藩。

可是，这场叛乱又是如何终结的呢？

恰恰是朝廷重新承认了诸藩自代自专的合法性，恰恰是德宗放弃了他的中兴之志和强硬立场，这一切才宣告终结。

相对于这场大叛乱的起因，这种终结的方式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魏博的田绪刺杀田悦、拥兵自立之后，倘若幽州的朱滔病死、刘怦自立之后，倘若淮西的陈仙奇杀了李希烈、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之后，德宗仍然像当年拒绝李惟岳那样拒绝承认他们，那么，叛乱能就此终结吗？战争能就此平息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从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表面上是胜利了，可德宗企图维护的帝国纲纪、朝廷尊严，以及他本人试图树立的强势天子的形象，却在无形中一一丧失了；另一方面，那些起兵叛乱的藩镇首脑是兵败身死了，可诸藩“拥兵割地、一切自专”的这套规则本身，却毋庸置疑地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德宗一朝的君臣在这场平叛战争中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比如德宗李适的真诚罪己，比如谋臣李泌、陆贽审时度势的智慧和韬略，再如猛将李晟、浑瑊、马燧等人的舍生忘死和浴血奋战等等。我们也不会否认，在历经安史之乱和诸藩之乱的重创后，德宗的妥协退让毕竟为帝国换取了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机会。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德宗初年的锐意削藩换来的只是帝国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疮痍；李唐朝廷不顾一切与诸藩大动干戈的结果，也无非是让帝国再次回到了代宗时代的原点。藩镇之乱的根源并没有被铲除，而诸藩废立自专、拥兵抗命的局面也并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善。换言之，此时的大唐帝国依旧是层层太阿倒持、遍地骄兵悍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似乎有理由怀疑：所谓的“贞下起元”“否极泰来”只不过是一种假象。除非未来的德宗李适能够重拾即位之初的雄

心壮志和中兴梦想，否则帝国的臣民又怎能真正享有暌违已久的太平？

[1] 李怀光历年来身兼多职，除朔方节度使外，又兼河中尹、灵州大都督、镇北大都护，以及邠、宁、庆、晋、绛、慈等多地节度使，俨然就是军方的一号人物。

[2] 按《旧唐书·职官志》，该职原为从三品，后升为正三品，“掌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相当于皇帝的高级智囊，通常都授予德高望重的元老勋臣。

[3] 韩皋原为从六品，穿绿衣；绯衣即红衣，浅红为五品，深红为四品。

第九章 四落四起，一代良相李泌

战争与和平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秋天，历时五年的诸藩之乱终于尘埃落定，可德宗李适还来不及享受一下久违的安宁，西北边境就传来了令人心惊的战报。

战报中说，吐蕃宰相尚结赞悍然发兵，大举入寇泾州（今甘肃泾川县）、陇州（今陕西陇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宁州（今甘肃宁县）等地，大肆掳掠人畜，强行收割庄稼，以致边境骚然，各州县莫之能御，纷纷闭城自保。

内忧方平，外患又起，这大唐帝国真的是永无宁日了！

接到战报后，德宗匆忙下诏，命浑瑊率一万人、骆元光率八千人，即日进驻咸阳，以防吐蕃趁势入侵关中。九月中旬，吐蕃前锋的游骑兵果然深入到了好畤（今陕西乾县西北）一带，距长安仅一百五十里

路。

德宗大为震恐，慌忙下令京师戒严，又派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开赴咸阳，加强防守。

虽然陆续派出了三个大将驻防长安门户，但是，二十多年前（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入寇长安的一幕还是不断在德宗眼前闪现。

当年的历史会重演吗？

德宗感到了恐惧。

几天后，长安坊间忽然谣言四起，说天子李适已经备好行装、带齐干粮，随时准备逃离长安。宰相齐映意识到这样的传言不会纯属捕风捉影，赶紧入宫去见德宗，说："皇上，坊间流言纷飞，都说您打算离开京城，现在整个京师已经人心惶惶！皇上啊，两年前您巡幸奉天，虽有幸得返长安，但这样的福气还会有第二次吗？万望皇上三思，凡事与臣等商议之后再作定夺。"

说完，齐映跪伏在地，涕泪交流。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坊间之所以流言汹汹，当然是因为德宗已经动了逃跑的心思，而且确实已经吩咐宦官着手准备了。其实德宗这么做，心里也是很矛盾的。如果唐军将士能够阻遏吐蕃人的兵锋，他怎么可能想去过那种丢弃京城、四处流亡的生活呢？

一想到流亡，两年前仓皇辞庙的酸楚不禁再度涌上李适的心头。

齐映说得没错，如果轻易放弃长安，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回来。

思忖良久，李适终于听从齐映的劝谏，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九月下旬，尚结赞亲率大军进抵汧城（今陕西陇县南），兵锋直指凤翔。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晟决定在汧城打一个伏击战，杀杀吐蕃人的威风。

李晟命麾下勇将王佖挑选了三千精锐士卒，让他在吐蕃大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王佖出发前，李晟对他面授机宜："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不要攻击他的先头部队，因为敌军主力紧跟着就会杀到，你肯定抵挡不住。所以，要让他的先头部队过去，等到举五色旗、穿虎豹衣的部队过来时，那才是他们的中军主力，你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定能大

获全胜。”

随后，王佖遵照李晟的计划，果然把吐蕃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吐蕃中军被王佖的伏兵打得晕头转向，大败而逃。由于唐军将士都不认识尚结赞，他才得以在混乱中逃出一命。若非如此，这个堂堂的吐蕃宰相恐怕这一仗就挂掉了。

逃离险境后，尚结赞又惊又怒地对左右说：“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数日之后，尚结赞重新集结了两万余人的军队，浩浩荡荡开进凤翔境内。

令凤翔军民大为诧异的是，此次吐蕃人居然一反常态，一路上军令严明，对唐朝百姓秋毫无犯。抵达凤翔城下后，尚结赞并不攻城，而是亲自跑到城门口，对着城头上的守军大喊：“李令公（李晟的中央官职是中书令）既然以密信召我前来，为何不出来迎接犒劳？”

城上的唐军将士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尚结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随即把尚结赞的搞怪言行向李晟作了禀报。

李晟冷笑。

这是尚结赞玩的反间计，不过玩得有些拙劣。

李晟告诉将士们：大家坚守不出，看他还能玩什么！

尚结赞在凤翔城下扎营住了一宿，第二天一看，城上守军守备森严，显然对他这个略显小儿科的计策无动于衷。尚结赞很失望，可又不敢发动攻击，只好下令全军撤退，折往邠州、庆州（今甘肃庆阳县）一带继续游掠。

有来无往非礼也。尚结赞给李晟来了一次亲密问候，李晟当然也要有所表示。十月初，李晟再次派遣王佖等人率步骑五千，直插唐吐边境，目标是奇袭吐蕃人的军事重镇摧砂堡（今宁夏海原县）。

十月中旬，摧砂堡的吐蕃守军得到情报，立刻出动二万人迎击，与王佖的唐军展开遭遇战，却被王佖打得大败。王佖率部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克了摧砂堡，斩杀吐蕃大将扈屈律悉蒙，将堡内囤积的所有粮草和物资全部付之一炬，然后全身而退，凯旋回国。

尚结赞万万没料到，他在唐朝境内抢得热火朝天，李晟却趁其不备在

背后狠狠捅了他一刀，还把他们几年来从唐朝掳掠的东西烧了个精光！

尚结赞知道后方战败，军心必然浮动，只好率部北撤。十月十七日，尚结赞撤到合水（庆阳县东），当晚在合水北面扎营。

此时的尚结赞当然不会知道，已经有一支唐军在夜色的掩护下逼近了他的大营。

这是邠宁节度使韩游环派遣的一支奇袭小分队。

就在吐蕃人呼呼大睡之际，唐军突然杀入营中，片刻之间就砍翻了数百人。等到吐蕃人回过神来，唐军又忽然撤退，一下子消失在了夜色里。尚结赞大怒，立刻集合部队，出营追击。

此刻，韩游环已经在不远处一个叫平川的地方摆好了阵势，而且命人携带大量战鼓藏在西面的山谷之中。尚结赞大军追到平川时，才发现唐军已在此严阵以待，而且西山又突然响起隆隆战鼓。尚结赞担心中了唐军的埋伏，慌忙掉转马头，带着部众连夜向北奔逃，把此次入寇所掳掠的粮食财帛全部丢弃在了大营里。

看来，吐蕃人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强大。

这是李晟和韩游环不约而同得出的结论。

贞元二年冬，韩游环奏请德宗，要求主动出击吐蕃，克复不久前被吐蕃人占领的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等地，同时要求马燧的河东军配合出兵，攻击吐蕃人的侧翼。德宗当即准奏，命韩游环、马燧、浑瑊、骆元光等人联合行动。

十二月中旬，马燧率部进至石州（今山西离石县）。河曲六胡州（统称宥州，今内蒙古鄂克托旗）素闻马燧威名，遂望风归降。

得知唐军数路出兵，尚结赞大惧。正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一年冬春之交，吐蕃境内又爆发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尚结赞万般无奈，只好屡屡派遣使臣向唐朝求和。

德宗当然知道这只是吐蕃人的缓兵之计，于是断然拒绝。

尚结赞一看此路不通，随即又派人携带一份厚礼和一封言辞极度谦卑的信去见马燧，承诺要将这几年侵占的唐朝城邑和土地拱手奉还。

马燧心动了。

既然出兵的目的就是要夺回被占领的城池，现在吐蕃人愿意主动归还，那又何必动刀动枪、劳师伤财呢？

马燧随即驻兵石州，不再向吐蕃境内推进，同时上奏德宗，极力主张与吐蕃议和。

朝中的文武大臣就此分成两派：主战派是李晟、韩游环，以及不久前入朝为相的韩滉；主和派是马燧和另一个宰相张延赏。

马燧和张延赏之所以极力主和，除了对时局的判断与主战派不同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和李晟有过节，所以刻意和他唱反调。

尽管有主和派的掣肘，可刚开始，主战派还是占了上风。因为李晟和韩游环坚持认为：吐蕃人向来无信，“弱则求盟，强则入寇”，此时求和，必定有诈！德宗对此深以为然。而韩滉为了加强德宗的信心，更是主动提出——与吐蕃开战的军费和粮饷通通由他去筹措，不需要德宗劳心费神。

此时韩滉仍然兼任江淮转运使，有了他的财政支持，德宗自然是底气十足，于是否决了马燧的议和要求，并敦促他继续进兵。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春，正当主战派摩拳擦掌、准备大举出击的时候，形势忽然发生重大逆转——朝廷的“钱袋子”、德宗时下最倚重的财政大臣韩滉于这一年二月染病身亡，主和派趁机发起反扑，开始从两个方面对德宗施加影响。

这两个方面，一个涉及外交，一个事关内政，也可以说是德宗身上的两个软肋。

外交方面，德宗与回纥有旧怨，主和派与吐蕃人当然要对此充分加以利用；内政方面，德宗对功高望重的李晟已日渐生出猜忌之心，打心眼里不希望李晟在此次对吐作战中再次建功，而主和派恰恰可以利用这一点扳倒李晟、促成和议。

马燧和张延赏相信，只要死死抓住这两个软肋，就不难改变德宗的想法。

关于德宗与回纥人的旧怨，时间要回溯到25年前。当时是代宗宝应元年，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史朝义仍然盘踞在东都洛阳，德宗李适的身

份是雍王、天下兵马元帅。那一年，回纥的登里可汗亲率大军南下，本来是想劫掠关中，后来经过仆固怀恩斡旋，答应帮唐朝攻打史朝义。雍王李适当时驻兵陕州，出于地主之谊，亲自带人前往黄河对岸的回纥大营会见登里可汗。

双方见面时，雍王李适以平等之礼晋见登里可汗，不料登里可汗大怒，强调李适必须向他行“拜舞之礼”，也就是臣对君的礼仪。李适及其手下官员当然不从，于是据理力争。双方就此闹僵。回纥人随即将李适手下官员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四人拉出帐外，每人鞭打一百，并把李适逐出大营，遣回陕州。第二天，魏琚和韦少华便因伤重不治而双双毙命。这件事情对年轻的李适来讲，当然是难以忘怀的奇耻大辱，当时的李适便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即位登基，必定要雪洗前耻。

如今，吐蕃千方百计想要求和，当然要拿这件事来做文章了。韩滉去世不久，马燧便亲自陪同吐蕃使者入朝，强烈表示要与唐朝结盟，共同对付回纥人。

德宗内心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与此同时，张延赏也利用德宗对李晟的猜忌之心，在朝中大造舆论，声称吐蕃人去年入寇时，大肆劫掠邠、宁等地，却唯独对李晟的辖区凤翔秋毫无犯，这足以证明李晟与吐蕃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听到谣言后，李晟大感忧惧，他绝没想到尚结赞那个近似小儿科的反间计，竟然会在此刻发挥可怕的作用。尤其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天子李适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对于这类谣言，他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

李晟为此寝食难安，随即派遣子侄入朝，上表请求削发为僧。德宗当然是好言劝慰，驳回了他的请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宗对李晟的猜忌已经有所减轻。李晟很清楚这一点，随后便亲自入朝，以身患足疾为由，坚决要求辞去凤翔节度使的职务。

一开始，德宗并没有批准，但是禁不住张延赏一直在耳边吹风，说什么“李晟不宜久典兵”云云，便下定决心解除李晟的兵权，同时与吐蕃议和。

贞元三年三月，德宗召李晟入朝，和颜悦色地说：“朕为了西北地区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决定与吐蕃议和。你去年曾与吐蕃交兵，不

适合再担任边境节度使，最好是留在朝廷，朝夕辅佐朕。至于凤翔的职务，你自己选一个人接替吧。”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这一刻，李晟黯然神伤，同时也如释重负。

三月下旬，德宗加授李晟为太尉，仍兼中书令，保留原有的勋阶和爵位，其余兼职一概免除。

五月初一，德宗任命浑瑊为会盟使、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宦官宋奉朝为都监，命其率步骑二万余人前往清水（今甘肃清水县），与吐蕃签订和平协定。

浑瑊出发前，李晟一再告诫他，一定要在会盟地加强戒备，千万不可轻信吐蕃人。张延赏听说后，马上去向德宗告状，说：“李晟企图阻挠此次会盟，所以才让浑瑊严加戒备。皇上，我方一旦露出怀疑形迹，对方必然也会怀疑我们。这样彼此怀疑，还谈什么会盟？”

德宗随即召见浑瑊，严厉要求他一定要对吐蕃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万不可心怀猜疑，破坏吐蕃人和解的诚意。

数日后，浑瑊奏称，已经和吐蕃商定，于这一年闰五月十九日会盟。德宗马上批复同意。张延赏随即召集文武百官，把浑瑊的奏章拿给众人传阅，得意洋洋地说：“李太尉坚持他的成见，认为唐吐两国无法达成和议，可结果怎么样呢？这是浑侍中的奏章，会盟日期已定，皇上也已批复。不知李太尉作何感想？”

张延赏的话很快就传到了李晟耳中。李晟摇头苦笑，对亲信说：“我生长在西北边陲，熟悉吐蕃的情况，也了解吐蕃人的心思，所以才会反对和议。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朝廷被吐蕃诓骗，从而蒙受耻辱！”

此时此刻，上自德宗、下至百官，都认为唐吐会盟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还有谁会去理会李晟的担忧呢？

五月初六，浑瑊等人按预定计划离开长安，前往会盟地点。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直到浑瑊走了半个多月之后，亦即五月二十二日，吐蕃才忽然派人来到长安，说：“清水不是吉祥的地方，请改在原州的土梨树（今甘肃镇原县东）会盟，一旦盟约签订，我方即刻归还盐、夏二州。”

德宗没有多想，立刻派快马去追赶浑瑊，通知他地点已改变。

吐蕃人为什么突然改变会盟地点呢？

满朝文武几乎没人对此产生怀疑，只有神策军一个叫马有麟的将领向德宗提出：“土梨树地势险恶，吐蕃人很容易在那里埋设伏兵，最好是改在原州的平凉川（今甘肃平凉市西北），那里地势平坦开阔，比较安全。”

德宗闻言，心里隐约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但他说不清这种预感是什么。

为了防备万一，德宗还是采纳了马有麟的建议，旋即派人告诉吐蕃使者，将会盟地点改在平凉川。

此时，在千里之外的原州（今宁夏固原县），吐蕃宰相尚结赞正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遥望着东南方向的长安。

他的嘴角，悬挂着一个同样意味深长的笑容……

一石三鸟：危险的“平凉会盟”

闰五月初，德宗内心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赶紧命镇国节度使骆元光进驻潘原（今甘肃平凉市东），邠宁节度使韩游环进驻洛口（今甘肃庄浪县东南），以备随时援助浑瑊。

骆元光率部进抵潘原后，顾不上休息，马上又赶到平凉川，对浑瑊说：“潘原距此足足有七十里，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我如何获知消息？请浑大人让我把部队调过来，与大人连营。”

浑瑊想起临行前天子对他的叮嘱，坚决不同意与骆元光连营。骆元光不听他的，执意把部队开到浑瑊大营的三十里处，并修筑了一座深沟高垒的营寨。相形之下，浑瑊的大营却修得十分草率，壕沟浅狭，栅栏也十分稀疏，根本挡不住骑兵的进攻。

骆元光扎营之后，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派出一支部队埋伏在浑瑊大营的西侧。与此同时，韩游环也派出了一支五百人的骑兵埋伏在浑瑊大营附近。韩游环叮嘱他们：“一旦有变，你们就向西攻击柏泉（平凉市西北），分散吐蕃的兵力。”

此时的浑瑊当然不会知道，这两支兄弟部队的秘密行动虽然不符合“推心置腹、以诚相待”的会盟宗旨，但马上就将挽救他的生命。

贞元三年闰五月十九日。平凉川。

按照事先约定，唐吐双方各派武装部队三千人，排列在盟坛的东西两侧，同时各派文职官员四百人，随同两国特使抵达盟坛之下。

就在会盟仪式开始之前，尚结赞又忽然派人通知浑瑊，建议双方各派数十名骑兵，互相搜索对方区域，以此表明自己的诚意，同时确保双方都能遵循“推心置腹、以诚相待”的会盟宗旨。

浑瑊觉得尚结赞的建议很有道理，所以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当双方的侦察骑兵进入各自的区域后，吐蕃骑兵在唐军大营中穿梭自如，如同在自家的后院里溜达；而唐军骑兵刚一进入吐蕃军营，就全都被捆了起来，一个不漏地成了对方的俘虏。与此同时，吐蕃的数万精锐骑兵早已埋伏在盟坛西面的山谷中，就像一支拉满弓弦的箭，随时准备射进浑瑊的心窝。

浑瑊对此一无所知。

此时，他已率领文官们到达盟坛下，正在帐幕里更换礼服。

突然间，吐蕃大营的战鼓敲出三声巨响。紧接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就像潮水一样漫过平凉川，飞快地向盟坛冲来。

这突如其来的巨变顿时把唐朝官员们吓得魂飞魄散。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吐蕃大军已经杀进帐幕。宦官宋奉朝等一大批官员立刻被砍倒在血泊中。浑瑊毕竟是武将，反应还算快一点，慌忙从帐幕后门逃出，随便抓过一匹马就跳了上去，身子紧贴在马背上，双手死死抓住马鬃，飞也似的朝自己的大营狂奔而去。吐蕃骑兵在后面拼命追赶，如蝗箭矢般纷纷从浑瑊的背上和耳旁擦过。

负责在盟坛警戒的唐军官兵猝不及防，一下子被砍杀了数百人，其他人慌忙向东逃窜。吐蕃骑兵紧紧追击，一路上擒获了一千多人，其中就包括唐会盟副使、兵部尚书崔汉衡。

浑瑊策马狂奔了十多里地，好不容易才逃回大营，可眼前的景象却令他目瞪口呆——整座大营空空荡荡，所有人都逃得无影无踪！

征战沙场数十年，浑瑊还是头一次感到如此狼狈和沮丧。

就在浑瑊近乎绝望的当口，骆元光已命原先那支伏兵在大营外集结，并摆开了阵势。片刻后，吐蕃追兵杀到，一看见严阵以待的唐军，不禁相顾愕然。此时，韩游环的那支伏兵也正按原计划朝柏泉方向运动，吐蕃追兵唯恐被截断后路，赶紧掉头撤退。

生死一线的浑瑊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

就在唐军惨遭吐蕃屠杀的同一天，德宗李适正在朝会上庆贺唐吐会盟的成功。他笑容满面地对文武百官说："今日和戎息兵，真乃社稷之福啊！"

马燧当即接腔："确是如此。"

群臣纷纷附和。

德宗的笑容顿时更加灿烂。

满朝文武中，只有两个月前刚刚拜相的柳浑一脸凝重。等同僚们阿谀奉承完了，他才冷冷地说："吐蕃人犹如豺狼，并不是一纸盟约就能约束的。对于今日会盟这件事，臣一直深感忧虑！"

百官愕然，唯独李晟向柳浑投来赞同的一瞥，说："柳浑说的是。"

德宗勃然变色，厉声道："柳浑一介书生，不知军国大计，你李晟乃当朝太尉，竟然也说出这种不识大体的话！"

一见皇帝动怒，满朝文武赶紧跪地叩首。李晟和柳浑无奈，也只好顿首谢罪。

退朝后，德宗余怒未消，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可他绝对没想到，真正让他郁闷的消息紧跟着就到了——这天深夜，邠宁节度使韩游环的一道加急战报递进了大明宫：吐蕃劫盟，前锋已进抵本镇！

德宗犹如五雷轰顶，木立当场。

一切都被李晟和柳浑料中了！

这帮吐蕃人，为何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呢？

当天晚上，德宗就命人把战报送到了柳浑手上。第二天一早，德宗召柳浑入宫，不无尴尬地说："贤卿是个读书人，没想到却能对敌情判断得如此精确！"

会盟失败后，德宗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吐蕃人再度入侵的消息让他惶惶不可终日，并且又让他动了逃跑的心思。李晟等人察觉后，极力劝阻，才勉强稳住了德宗的心神。

虽然德宗被劝住了，但是吐蕃人的威胁还是让他如坐针毡。闰五月二十一日，德宗匆忙派遣宦官王子恒，携带求和诏书前去原州晋见尚结赞。

这真是风水轮流转。几个月前是吐蕃人低声下气来求和，还被德宗屡屡拒绝，现在却轮到他向吐蕃人求和了，人家会买他的账吗？

很遗憾，王子恒刚刚走到唐吐边界，还没跨进吐蕃境内，就被人家给轰了回来，连尚结赞的面都没见着。

德宗百思不得其解——当初死乞白赖跑来求和的是吐蕃人，如今幡然背盟、刀兵相向的又是吐蕃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尚结赞很快就给了德宗答案。

就在德宗惶惶不安、愁肠百结的同时，尚结赞正在原州对被俘的唐兵

部尚书崔汉衡说："我用黄金打造了一副镣铐，本来打算铐住浑瑊，送给我们的赞普（国王），没想到却让他跑了，白费一场力气，只逮住你们这帮不痛不痒的人。"

随后，尚结赞又接见了几个俘虏。

其中一个是马燧的侄子马弇，另外还有宦官俱文珍，浑瑊部将马宁等人。

尚结赞和颜悦色地对马弇说："我们胡人把马当作生命，去年冬春之交，河曲一带寸草不生，马匹饿得不能动，那时候，如果侍中大人（马燧）渡河攻击，我军必定全军覆没！在那种艰难的局面下，我才不得不与贵国和谈。多亏了侍中大人全力相助，终于促成了这件事。如今我方将士得以保全，我岂能再扣押他的子侄！"

说完，尚结赞当场释放了马弇、俱文珍、马宁等人，将他们全都遣送回国，而崔汉衡等一批高阶官员，则被押到了吐蕃后方囚禁。

马弇等人回国后，德宗很快就从宦官俱文珍的嘴里听到了尚结赞跟马弇说的那番话。

德宗恍然大悟，同时也恨得咬牙切齿。

原来，所谓的会盟纯粹就是一场骗局！

而最可恨的是——马燧居然跟吐蕃人暗中勾结，把天子和朝廷通通给卖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六月初五，也就是马弇等人回朝的第二天，德宗立刻下诏，加授马燧为司徒，仍兼侍中，但河东节度使、兵马副元帅等其他军职全部免除。马燧做梦也没想到，他处心积虑跟李晟唱反调的结果，竟然是和李晟一个下场——被德宗以"外示尊宠"的手法彻底剥夺了兵权！

得知马燧被德宗解除兵权的消息后，尚结赞心满意足地笑了。

事实上直到这一步，尚结赞的棋才算刚刚走完。

从去年九月遭遇李晟伏击、在汧城险些丧命的那一刻起，尚结赞就开始精心设计这盘棋了。他的第一步是亲自带兵到凤翔走了一趟，却对凤翔秋毫无犯，故意空手而回，以此陷害李晟。表面上看，这么做好

像有些小儿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发挥了四两拨千斤之效。他的第二步棋，是利用马燧与李晟的嫌隙，让马燧选择主和的立场，然后通过他影响德宗、促成和议。第三步棋，是利用“平凉会盟”的机会抓住或杀死浑瑊，继而放风声给德宗，让德宗以为马燧和吐蕃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从而借德宗之手除掉马燧或至少解除他的兵权。

走完这三步，尚结赞就能把李晟、马燧、浑瑊这三个“唐之良将”全部摆平，让唐朝的大门从此为他彻底敞开！（《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此三人，唐可图也！’”）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环环相扣、一石三鸟的完美计划。当然，这个计划要想顺利实施，不能没有德宗李适的配合。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德宗确实跟尚结赞配合得相当默契——不仅让吐蕃人成功渡过了一场“羊马多死、粮运不继”的危机，而且还把尚结赞最憎恨、最顾忌的李晟和马燧从战场上拿掉了，为吐蕃日后的入寇打开了绿灯。

总的来看，除了浑瑊侥幸漏网之外，尚结赞的这盘棋走得可谓相当完美。

他足以为此感到自豪了。

然而，尽管尚结赞凭借他的谋略化解了危机，可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从去年冬天开始，一直到这一年六月，屯驻在盐州和夏州的吐蕃守军始终受到粮运不继、补给短缺的困扰，很多人都染上瘟疫，并且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

尚结赞很无奈，即便他很想趁唐军受挫之机杀进关中，在长安城内狠狠掳掠一把，可现实情况却不允许他这么做。最后，尚结赞只好选择撤兵。他命人焚毁了盐、夏二州的房子，拆除了城墙，然后裹挟当地的汉人百姓扬长而去。

马燧因力主和议失势后，同为主和派的宰相张延赏大为忧惧，遂一病不起，一个月后就呜呼哀哉、抑郁而终了。

在张延赏死前不久，宰相齐映、刘滋已先后被他排挤出朝。此时，朝中的宰相只剩下一个柳浑。德宗意识到，值此会盟失败、上下离心的艰难时刻，朝廷太需要一个有资历、有经验、有智慧、有魄力的宰相来掌舵了。

放眼天下，有谁能当此重任？

当然是李泌。

贞元三年六月，时任陕虢观察使的李泌被德宗征召回朝，旋即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对于此次任命，李泌并未推辞，这一点着实让德宗甚感欣慰，同时也让满朝文武很有些意外——这个四朝元老兼三朝帝师，曾经在肃宗和代宗时代数次坚拒宰相职位，这次为什么答应得这么爽快呢？

答案很简单——德宗朝廷有麻烦了！

此时的德宗朝廷正面临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要是李泌再不出手化解，帝国很可能又会爆发一场类似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

因为，曾经在军队中享有极高威望的李晟和马燧，此时与德宗的关系正日益紧张。尽管他们都已被剥夺了兵权，但是为数众多的旧部对他们的拥戴之心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德宗李适对他们的猜忌之心仍然存在。

换句话说，面对李晟和马燧这两个平叛功臣，德宗常常有一种“尾大不掉”之忧；而面对德宗的百般猜忌，李晟和马燧则常常有一种“功高不赏”之惧。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就叫麻秆打狼两头怕！

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谁敢保证李晟和马燧不会迫于无奈、铤而走险呢？谁又敢保证他们不会步李怀光之后尘呢？

要想化解皇帝与功臣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灾难性的后果，李泌就必须以宰相的身份上场斡旋。

李泌知道，自己责无旁贷。

李泌：一身系天下安危

李晟自从回朝担任太尉之后，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活得比谁都小心。但是，他不惹麻烦，麻烦却还是要来惹他。

贞元三年夏天，长安坊间忽然传出谣言，说李晟的宅子中有一座大安园，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大安亭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而李晟就在这片竹林里面藏着一支伏兵，打算一有机会就发动兵变。

面对造谣者如此惊人的想象力，李晟实在是哭笑不得。很快，他就把

大安亭周围的竹林砍了个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在于，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即便李晟砍掉了竹林，别有用心的人依然可以散布其他谣言，比如说——你李晟的宅子那么大、房子那么多，难道不会在每个房间里都藏上几个士兵？

要是再碰上这样的谣言，李晟该怎么办？

莫非他要把家里的房子全都拆了，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为了终止别有用心之人的无穷想象，李泌在拜相的几天后，就跟李晟和马燧一同入宫去见德宗。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我今天就跟陛下作个约定，可以吗？"

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有大功于国，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有朝一日容不下他们二人，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将帅都会扼腕愤怒、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就随时可能发生。身为人臣，能得到天子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官位倒在其次。臣在灵武的时候，什么官都没有，可宰相和将帅却都听命于臣。而陛下当初加授李怀光太尉之职，反而引起他的恐惧猜疑，最终引发了叛乱。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到的。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官位都已臻于极致，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他们必然会全心全意效忠社稷。倘若国家有难，就让他们挂帅出征；一旦天下太平，就命他们入朝参奉。如此一来，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两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两位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李适诚恳地表示接受。

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而今天，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则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自从李泌与德宗达成上述约定后，德宗和李晟、马燧的紧张关系就大为缓解了。

在后来的几年中，君臣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李晟和马燧也总算保住了晚节，安然度过了富贵太平的晚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李晟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德宗为之辍朝五日，谥号“忠武”；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马燧去世，享年七十岁，德宗为之辍朝四日，谥号“庄武”。

贞元三年八月，李泌刚刚化解了德宗与功臣之间的信任危机，一场新的危机就接踵而至了——德宗准备废黜太子李诵，另立舒王李谊。

太子李诵犯了什么错，居然要被废掉？

他没有犯错，犯错的人是他的丈母娘——郜国大长公主（肃宗之女）。

丈母娘犯错，却要女婿买单，这是什么道理？

没道理。可是郜国大长公主犯的错实在太令人愤怒、太不可原谅，所以德宗李适自然就迁怒到了太子李诵身上。

那么，郜国大长公主到底犯了什么错，以至天子如此震怒呢？

首先，这位公主人老心不老，存在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说难听点，就是偷男人了。

有唐一朝，胡风兴盛、观念开放，无论男女，在性观念上都很前卫，尤其是皇室贵族，在法定夫妻之外偶尔偷一偷腥，也算是家常便饭，不值得大惊小怪。可问题是，太子的这位丈母娘胃口太好，别人不过就是偷一两个，她却偷了一堆！

更糟糕的是，她要是偷一些社会上的无业青年，影响倒也不至于太坏，可老公主的品位比较高，偷的居然都是朝廷命官，光职务和姓名数得着的就有这么些个：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县令韦恪，等等。

一群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青年官员，成天出入公主宅邸，专干些蝇营狗苟的勾当，这个社会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既然郜国公主偷的都是朝廷命官，人们仔细一想，就发现不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了，而是有从事权色交易、腐蚀国家干部的嫌疑。要知道，这些官员家里都有贤妻美妾，凭什么来伺候你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说白了，还不就因为你身份特殊、手眼通天，人家想通过性贿赂换取仕途上的好处吗？

换句话说，如果是普通的贵族妇女，老百姓顶多把你的绯闻拿来当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而已，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可你郜国大长公主毕竟是天子的姑母兼亲家，不仅做什么事都容易被人上纲上线，而且肯定会有无数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你。

由于天子李适对这个姑母兼亲家一直恩礼甚厚，别的皇亲国戚早就眼红死了，一直想抓她的小辫子。现在可好，郜国公主居然为老不尊，跟一帮家有妻室的朝廷命官勾搭成奸，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和朝廷纲纪，这不是往皇室和天子的脸上抹黑吗？大伙还能饶得了你？

为了一举扳倒郜国公主，皇亲国戚们不仅针对她的私生活问题整了一份黑材料，还派遣耳目打入公主府邸，千方百计搜集其他罪证，于是很快就抓住了一个比作风问题严重百倍的问题——厌胜。

这回，郜国大长公主死定了！

所谓厌胜，也称巫蛊，说穿了就是诅咒。通常是针对比自己年长或位尊的人，刻一个人形木头或把形象画在纸上，一天到晚画圈圈诅咒这个人，直到将其咒死为止。

郜国公主搞厌胜，对象会是什么人呢？她父亲肃宗早死了，所以“年长”这一项可以排除，剩下的，就是比她“位尊”的人物了。

那么，被公主诅咒的这位尊贵人物会是谁呢？

傻瓜也知道，就是当今天子李适。

郜国公主为什么要诅咒天子？

很简单，天子一死，太子就继位为帝，到那时候，郜国公主就是皇帝的丈母娘了，不就更能为所欲为了吗？别说找一堆情夫，就是一天换一个，估计也没人敢说三道四。

就这样，皇亲国戚们抓住郜国公主“性交易”和“搞厌胜”这两项罪名，立刻联名上表，向德宗告了御状。

德宗见表，不禁勃然大怒。

“妖妄莫甚于巫蛊，罪恶莫逾于奸乱！”（《全唐文》卷五十四《郜国大长公主别馆安置敕》）郜国公主一下就犯了两大死罪，岂能轻易饶恕！

德宗第一时间就把郜国公主抓到皇宫里面软禁了，而且把太子叫到跟前，不分青红皂白地臭骂了一通。

太子被骂得一愣一愣的，好一会儿才搞清楚状况。

本来，老丈母娘偷男人，根本不关他什么事，可要是被定性为“权色交易”，那就关他的事了——毕竟老公主手里没权，想要跟那些年轻帅哥搞交易，当然要让太子在官场上给这些人开绿灯了。

此外，丈母娘搞厌胜，虽然太子主观上并不知情，可这件事客观上却能帮太子早日夺取大位，这当然就触痛德宗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了，而且也把太子逼到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地步。

太子李诵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了，只好主动提出跟太子妃萧氏离婚，从此跟这对倒霉的母女划清界限。然而，德宗对太子的这个表态却远远不满意。他现在心里最强烈的一个念头就是——把这小子废了！

当然，废立太子是社稷大事，所以德宗不能说废就废，必须跟宰相李泌商量。

德宗把李泌找来，把事情跟他说了，然后说：“舒王现在已经长大了，孝顺友爱，温良仁厚，朕打算立他为太子。”

李泌大为惊愕：“何至于是！陛下只有一个儿子（德宗共有十一子，但只有李诵是嫡子），怎么可以一旦疑之，就废子立侄呢？这太欠考虑了！”

德宗一听“废子立侄”这四个字，顿时恼羞成怒：“放肆！你为何离间我们父子？谁告诉你舒王是朕的侄儿？”

“陛下息怒。”李泌不慌不忙地说，“是陛下您亲口告诉臣的。大历初年，陛下有一天曾对臣说：‘今日得数子。’臣问您怎么回事，您说：‘我弟弟李邈早逝，皇上让我抚养他那几个孩子。’陛下，您对亲生儿子尚且如此疑忌，更何况是侄子？舒王虽然仁孝，但若是立他，从现在开始陛下只有自己努力，恐怕不能指望他的孝顺了！”

李泌这话什么意思？

其实他的意思很明显：倘若皇上您猜忌刻薄的性格不加收敛，再孝顺的太子迟早也会被您废掉！

当臣子的敢这么跟皇帝说话，可以称得上是犯上忤逆了。然而李泌说

这句话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仿佛眼前根本不是九五之尊的皇帝，而是一个普通人。

德宗这次没有翻脸，而是阴森森地盯着李泌，一字一顿地说："你难道不爱惜你的家族么？"

这显然是赤裸裸的恐吓了。

李泌平静地说："臣正因为爱惜自己的家族，才不敢不尽言。倘若臣畏惧陛下的盛怒而屈从，陛下明天一后悔，肯定会怪臣说：'我让你独任宰相（此时柳浑已罢相），你却不力谏，以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不但要杀你，还要杀你的儿子！'臣老了，衰躯残年死不足惜，只怕臣的儿子蒙冤而死，让臣的侄儿继承香火，不知臣在九泉之下能否得享祭祀！"

说完，李泌情不自禁，泫然泣下。

李泌最后这一句，实际上还是拐着弯儿在劝谏。德宗当然听懂了。他凄然长叹，眼中也是泪光闪烁。许久，才有气无力地问："事已如此，朕该当如何？"

"此乃社稷大事，希望陛下三思而后行！臣本以为陛下圣德广大，没想到陛下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能信任。臣今日斗胆直言，不敢有丝毫避讳。自古以来，未有父子相猜而不亡国覆家者。陛下可曾记得，肃宗灵武时期，建宁王李倓（肃宗第三子）因何被诛？"

德宗怅然道："建宁叔实在是冤枉，只怪肃宗性情太过急躁，而且谗毁者的阴谋也太歹毒了！"

李泌诚恳地说："臣当初就是因为建宁王的缘故，坚决辞让宰相职位，并发誓不再侍奉天子左右，不幸今天又做了陛下的宰相，又碰见这样的事情。臣在灵武时期，承受肃宗的恩宠和信任最深，却不敢对建宁之冤提半个字，直到临走之前，才敢向肃宗谈起，肃宗也因之悔恨泣下。自建宁王冤死后，先帝（代宗）常怀危惧，臣曾向肃宗言及章怀太子（李贤）的《黄瓜台辞》，让肃宗借此警醒，以防奸人构害先帝。"

"这些事朕当然知道。"此时德宗的脸色已舒展许多，"你这些话固然有道理，可贞观、开元之世皆有更易太子之事，为何国家不亡？"

"贞观之世，太子承乾多次监国，大臣依附者众多，且东宫甲士的数量也很庞大，承乾遂与当时的宰相侯君集联手谋反。事发后，太宗命

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人一同审讯，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然后才召集百官讨论处置的办法。当时有人说：‘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最后只把承乾废为庶人，保住了他的性命，同时还废黜了有夺嫡之心的魏王李泰。由此可见，太宗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是极为审慎的。如今，陛下既然已经知道是肃宗性急才导致建宁枉死，臣倍感庆幸，希望陛下切记前车之鉴，静思三日，定能发现太子并无过错。即便真有谋反迹象，也当召集二十位深明义理的大臣，和臣一起审理，假如罪行属实，也希望陛下遵照太宗的做法，对太子废而不杀，同时把舒王一并废黜，另立太子之子为储君，则百代之后，君临天下者依然是陛下的子孙。”

德宗听着，不由陷入了沉思。

李泌知道天子已经听进去了，接着说：“至于开元年间的废立事件，纯属武惠妃一手陷害，海内同感义愤，皆为太子李瑛三兄弟鸣冤。此事百代之下犹当引以为戒，岂可效法！此外，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此院就在陛下寝殿之侧，太子从未接触外人，也很少介入外面的事务，怎么可能有不轨之心？更何况，岳母有罪，岂能随便牵连到女婿身上？臣愿以阖家性命担保，太子必定没有参与任何阴谋。今日，倘若陛下商议的对象不是微臣，而是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流，恐怕他们早就跑到舒王那里邀取定策之功了！”

德宗沉默良久，说：“这只是朕的家事，本来与你无关，你为何要如此力争？”

李泌正色道：“天子以四海为家，家事即为国事。臣如今独任宰相，四海之内，一事处理不当，臣便须承担罪责。何况眼下太子蒙冤遇险，臣若坐视，其罪大矣！”

德宗再也无话可说，只好妥协：“为了你这番话，朕就等到明天再决断吧。”

李泌立刻跪地叩首，哽咽着说：“臣知道，陛下与太子父慈子孝，必定会和好如初！但臣还有一言，陛下回宫后，当独自思量，不要把想法透露给左右侍从，否则一定有人去向舒王邀功，如此太子必危！”

德宗颔首：“朕明白你的意思了。”

李泌虽然成功说服了德宗，但他毫无欣喜之情。出宫回家后，他不无悲凉地对子弟说：“我本来不想追求富贵，怎奈命与愿违，恐怕迟早要牵连你们啊！”

太子李诵得知李泌为他冒死进谏，赶紧派人去致谢，说："如果事情实在无法挽救，我打算服毒自尽，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李泌道："目前来看，绝不用走到这步。只要殿下谨言慎行，仍旧保持孝顺之心，事情当无可虑。唯一值得担忧的是——万一我不能见容于皇上，事情就不好说了。"

次日，德宗按照李泌的建议，关起门来冷静思考了一天，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犯下大错。第二天，德宗迫不及待地在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涕泗横流地拍着他的肩背说："要不是你恳切进言，朕今日后悔无及！诚如贤卿所言，太子仁孝，实无罪错。从今往后，无论军国大事还是朕的家事，在做决定之前，都要与卿细细谋议。"

李泌当即俯身拜贺，说："陛下圣明，察太子无罪，臣报国之愿已毕。前日因惊恐过度，臣心魂散逸，已不宜为陛下所用，臣请求告老还乡。"

德宗愕然，连连摆手说："朕父子因你而得保全，正想告谕子孙，让你的后人世世代代得享荣华富贵，以报贤卿大德。你今日何出此言？朕断断不允！"

贞元三年八月十四，郜国大长公主的案子有了结果：彭州司马李万因同宗淫乱之罪被乱棍打死，太子詹事李升等人以及公主的五个儿子全部被流放岭南和边地，郜国公主本人被长期软禁于别馆，太子夫妇则安然无恙。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就此消弭，逃过一劫的太子李诵对李泌感激涕零。

在历史上，总有这么一些时候，也总有这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一身系天下安危"这句话的。

李泌就是这样的人。

无论是李晟、马燧还是太子李诵，显然都要感谢李泌，而大唐天子李适和他的臣民们更要感谢李泌。假如没有他，德宗朝廷必定要面临更多的纷争，李唐天下也必定要遭逢更多的祸乱！

消除了内部的种种不安定因素后，李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全力对付外部的敌人了。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最严重的外患，当非吐蕃莫属。

李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想对吐蕃发动一场劳师伤财的战

争，而是试图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这个凶悍的敌人摆平。用李泌的原话来说就是——“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李泌做得到吗？

围堵吐蕃的战略

贞元三年八月末，吐蕃宰相尚结赞集结重兵，并联合羌族和吐谷浑部落的军队，大举入侵陇州（今陕西陇县）。据战报说，吐蕃的联合兵团“连营数十里”，兵力不可胜数。

京师震恐。

九月初五，德宗慌忙派遣大将石季章、唐良臣分别率部进驻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和百里城（今甘肃灵台县西）。

九月初七，吐蕃军大掠汧阳（今陕西千阳县）、吴山（今陕西宝鸡县西）、华亭（今甘肃华亭县），把当地的老弱百姓屠杀大半，剩下的要么挖去双目，要么砍断双手，让他们自生自灭，然后掳掠青壮年一万多人，准备押到安华峡（今甘肃清水县西）一带，配发给羌人和吐谷浑部落当奴隶。

为了炫耀兵威、震慑唐朝军民，吐蕃将领十分嚣张地对所有俘虏说：“准许你们面朝东方，哭辞乡国！”

一万多人齐声恸哭，可以想见那情景是何等惨痛和凄凉。很多人不甘受辱，纷纷跳崖自杀，前后伤亡者共计一千多人。

吐蕃主力押着俘虏满意而归后，还有一支余部胃口尚未被填满，又折回来攻击陇州。当地刺史韩清沔会同神策军将领苏太平，趁夜袭击吐蕃军营，终于将这伙贪得无厌的强盗打了回去。

吐蕃人年年这么烧杀掳掠，而且动不动就深入关中、威胁长安，实在是令唐朝君臣和百姓不堪忍受。

李泌认为，必须有一个从根本上打击吐蕃人的办法，让唐朝彻底摆脱这种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的局面。

如上所述，李泌的办法是“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具体而言，

就是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跟回纥、南诏、大食、天竺等国家缔结同盟，充分利用这些国家跟吐蕃之间固有的争端，促使它们把矛头调转过来对准吐蕃人，让吐蕃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逐步削弱它的实力，最终让它彻底消停！

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需要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切实有效的行动，同时也需要耐心和时间。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要实现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其实并非来自于外，而是来自于内。

说白了，最大的障碍就是德宗本人。

因为德宗和回纥有宿怨。

李泌很清楚，要和南诏、大食、天竺这些国家结盟，德宗肯定都没意见。唯独回纥，是李适心中不可碰触的一块伤疤。要跟回纥人结盟，就无异于把这块伤疤狠狠揭开……

所以，这件事很难。

但是再难，李泌也必须去做。

事实上，从回朝拜相的那一天起，李泌就已经在考虑跟回纥结盟的事情了。有一次，德宗和李泌讨论边境部队屯田的问题，李泌就故意露出口风，说他有一个削弱吐蕃的计划，德宗连连追问，李泌却始终避而不答，因为时机不到，李泌不能贸然开口。

贞元三年秋，也就是吐蕃最近一次入寇的不久后，机会终于来了——现任回纥可汗合骨咄禄屡屡遣使入唐，要求与唐朝和亲。

可想而知，德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正巧这个时候，边防部队的一些将领纷纷上奏，说军队缺少马匹，要求朝廷拨给，可朝廷囊中羞涩，根本满足不了军队的需求。李泌顺势对德宗说：“陛下如果能用臣的计策，数年之后，马匹的价格必然会掉到现在的十分之一，到时候军队就不愁缺马了。”

德宗忙问他什么计策。

李泌说：“陛下要保证开诚布公，并且愿意为了帝国和百姓委屈自己，一切都从社稷大计出发，臣才能说这个计划。”

德宗面露不悦：“你尽管说，不必疑心。”

至此，李泌才和盘托出了他的计划："希望陛下能够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如此一来，不仅能使吐蕃陷入困境，马匹也很容易得到。"

不出所料，德宗一听脸就黑了。他瓮声瓮气地说："其他三个国家，照你的话去办。至于回纥，绝对不行！"

李泌："臣早知道陛下会作此反应，所以一直不敢提出来。但是为了挽救帝国的危局，回纥反而应该优先考虑，其他国家可以暂缓。"

德宗："只有这个回纥，提都别提！"

李泌："臣身为宰相，所说的话陛下可以不听，但不能不让臣说。"

德宗急了："你什么话朕都可以听，唯独跟回纥结盟的事，只能留给子孙后代去考虑，只要朕活着，这事想都别想！"

李泌："莫不是当年的陕州之耻，让陛下难以释怀？"

德宗："对！韦少华他们因为朕的缘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记？只可惜国家多难，没有机会报仇，但绝不能与回纥和解。这事到此为止，你别再说了！"

如果是别人，这时候必定会知难而退，但是李泌绝不会退。除非德宗砍了他的脑袋，或者罢了他的职位，否则别想让他住口。

李泌接着说："害韦少华的人是登里可汗，而登里可汗就是被现任可汗合骨咄禄杀的，可见合骨咄禄替陛下报了仇，有功于陛下，理应接受封赏，怎么会和陛下有仇呢？"

德宗再次变色："照你这么说，与回纥和解就是对的，朕肯定就是错的了？"

李泌："臣为了社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倘若苟且偷安、一味迎合，有何面目去见肃宗、代宗的在天之灵！"

德宗盯着李泌的脸看了很久，最后软了下来，勉强说了一句："容朕徐思之（你让朕好好想想吧）。"

李泌当然知道，所谓"容朕徐思之"只是德宗的搪塞之词，如果李泌从此不再坚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个计划了。

李泌会放弃吗？

当然不会。

接下来的日子，李泌一连十五次跟德宗提起这件事，却被否决了十五次。最后，李泌只好使出撒手锏，再次向德宗提出辞职。

德宗万般无奈，说："朕不是拒谏，而是要和你讲道理，你何必动不动就要走人呢？"

李泌："陛下愿意跟臣讲道理，诚乃天下之福！"

德宗："朕可以委屈自己，但不能对不起韦少华他们。"

很显然，这是在找借口。李泌当然不会让这个借口成立。他说："依臣看来，是韦少华他们对不起陛下，不是陛下对不起他们。"

德宗愣了："怎么说？"

李泌："当初，登里可汗还是王子（名为叶护）的时候，率部助我朝征讨安庆绪，肃宗只不过让臣在元帅府宴请而已，先帝（代宗）根本不出面。后来叶护几次邀请臣到他的军营做客，肃宗始终没有同意。直到回纥大军即将出征，先帝才跟他见面。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回纥人如同豺狼，举兵深入中国腹地，我们不得不防。陛下在陕州之时，年纪尚轻，韦少华他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竟让皇室嫡长子贸然进入回纥军营，而事先又没有和他们协商双方会晤时的礼仪，因此才让回纥人有了放肆逞凶的借口，这难道不是韦少华他们对不起陛下吗？纵然身死，也抵不过他们的失职之罪。"

德宗语塞，脸上的表情既无奈又尴尬。

李泌看在眼里，接着说："当年克复长安时，叶护王子在香积寺大捷中立下大功，打算趁势劫掠长安，是先帝跪在他马前阻止，叶护才不敢纵兵入城。可见，受一时之屈辱而得以保全百姓，是完全值得的。后来叶护继位为登里可汗，再次举全国之兵南下，帮我朝平定祸乱，自然是趾高气扬、意态骄矜，所以才敢要求陛下向他行拜舞之礼，所幸陛下天资神武，不肯屈服。当时的情景，臣真是不敢想象，万一登里可汗强行把陛下留在军营，名为聚宴，实则软禁，只要十天，朝野必定震恐！所幸陛下天威所在，豺狼之辈才不敢过于放肆。随后，可汗之母斥退左右，亲自将一件貂裘披在陛下身上，并恭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若将您的遭遇和先帝在香积寺的遭遇放在一起看，是谁受的屈辱更大呢？依陛下看来，是宁可忍受一时屈辱保全百姓呢？还是

绝不忍受一己之辱，任由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呢？”

德宗彻底无语了。

在这个口吐莲花、辩才无碍的四朝元老面前，德宗觉得自己简直连话都不会说了。

当时，李晟和马燧也在场。德宗愣了片刻，转过头去问他们：“朕素来厌恶回纥，但是听到香积寺的事情，也觉得自己有点理亏，你们二位认为如何？”

李晟和马燧对视一眼，又瞥了一眼李泌，小心翼翼地说：“如果真的像李泌说的那样，回纥似乎可以原谅。”

德宗一声长叹：“你们都不站在朕这边，朕还能怎么办？”

李泌知道德宗已经妥协了。不过，为了不让皇帝太没面子，李泌赶紧把过错推给以前的宰相，说：“臣以为，回纥并不可恨，历来的宰相才可恨！譬如吐蕃，趁我国有难，出兵占据河西、陇右（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数千里之地，又悍然入寇京城，导致先帝蒙尘、銮驾播迁，此乃百代必报之仇！而过去的宰相不为陛下分析这些事情，却一味要跟吐蕃结盟，殊为可恨！”

德宗：“朕和回纥结怨已久，之前刚刚遭遇吐蕃劫盟，其后又屡屡拒绝回纥和亲之请，现在主动提出和解，就不怕被他们拒绝，并且笑话我们吗？”

李泌胸有成竹：“绝对不会。臣可以马上写信给回纥可汗，告诉他若想和亲，必须答应五个条件：一、向陛下称臣；二、向陛下称子；三、每次派来的使团，不得超过二百人；四、每次用马匹与我朝互市，不得超过一千匹[1]；五、不得以任何理由挟持汉人出塞。如果回纥可汗这五条全部答应，陛下才许以和亲。如此一来，我朝声望必可威震北荒、震慑吐蕃，足以使陛下一平胸中块垒。”

要让一贯骄横的回纥人称臣称子，德宗还是觉得没什么把握：“自从至德年间以来，我们与回纥一直以兄弟之国相称，如今一旦让他们称臣，他们肯吗？”

李泌说：“他们早就想与我国和亲，而且臣与他们的可汗、国相向来关系不错，如果一封信谈不妥，不过是再写一封而已。”

至此，德宗没有任何话好说了，答应让李泌着手和亲之事。李泌立刻

发信，没多久，回纥便遣使上表，不但称臣称子，而且五个条件全部答应。德宗大喜过望，对李泌说：“回纥人为何对你敬畏如此？”李泌一听，赶紧把高帽给德宗戴上：“这都是因为陛下英明，臣有什么力量！”（《资治通鉴》卷二三三：“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

德宗问：“回纥既已和解，接下来，该如何结交南诏、大食和天竺？”

李泌答：“跟回纥和解之后，吐蕃就不敢轻易犯边了。第二步，就是要招抚南诏。自汉朝以来，南诏一直臣属于中国。天宝末年，杨国忠政策失当，引起叛乱，南诏才投靠了吐蕃，可是吐蕃的赋税和劳役太重，南诏没有一日不想重为大唐的藩属国。陛下一旦将其招抚，便能切断吐蕃之右臂。此外就是大食，这个国家在西域的势力最强，其疆域东起葱岭（帕米尔高原），西至大海（地中海），国土近乎半个天下，但它和天竺历来仰慕中国，却世代与吐蕃为仇，臣自有办法同它们结盟。”

贞元三年九月中旬，德宗命人送回纥使者回国，同时承诺将咸安公主（德宗之女）嫁给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以结两国的秦晋之好。

从这一刻开始，李泌“联合四国、打击吐蕃”的战略终于拉开了序幕。吐蕃的噩运就此降临。

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十月，回纥合骨咄禄可汗派他妹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回纥国相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共计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地来到长安，迎娶咸安公主。合骨咄禄可汗在给德宗的上疏中，用极为谦卑的语气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三）

随后，合骨咄禄可汗又驱逐了吐蕃使节，宣布与其断交。

为了表示自己亲附唐朝的诚意，并且希望两国关系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合骨咄禄可汗还征得德宗的同意，把国名由“回纥”改成了“回鹘”。

后来的数年间，虽然吐蕃并未停止对唐朝的入侵，但有了回鹘的掣肘，其攻击势头已迅速减缓。同时，南诏也在唐朝的不断策反下，逐渐与吐蕃貌合神离，“归唐之志益坚”，最终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五月遣使上表，正式归唐。

此后的吐蕃，在北方与回鹘不断交战，死伤惨重，在南面又受到南诏和唐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威胁和牵制，其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贞元十年

（公元794年）正月，南诏国王异牟寻亲率大军攻入吐蕃，大破吐蕃军于神川（今云南丽江县境），并乘胜进军，连拔十六城，俘虏吐蕃亲王五人、军队十余万人。

吐蕃从此一蹶不振，国力日衰，自顾尚且不暇，更无余力大规模入侵唐朝了。后来的吐蕃即便偶尔在边境上还有些小动作，但均被西川节度使韦皋一一击退，再也无法对唐朝构成实质上的威胁。

事实证明，从李泌提出围堵吐蕃的战略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吐蕃就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弱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李泌本人却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成功的结果。

早在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三月，历仕玄、肃、代、德四朝，并为肃、德两朝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泌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综观李泌的一生，堪称中国几千年政坛上罕见的传奇人物。

七岁时，李泌便以早慧的才华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和赏识，并与时任宰相张九龄结成忘年之交；二十出头，李泌奉诏进入翰林院，侍奉东宫，与太子李亨交厚，旋即遭杨国忠排挤，归隐山中；肃宗灵武时期，李泌出山全力辅佐，成为朝野瞩目的“布衣宰相”，在肃宗朝廷克复两京的过程中厥功至伟，却遭到权宦李辅国排挤，索性功成身退，归隐衡山；代宗即位后，潜心修道的李泌再次被召入朝，就任翰林学士，并被代宗强迫娶妻食肉，未久又遭权相元载排挤，第三次离朝；数年后元载被诛，李泌回朝，但没过多久，又不被当时宰相常衮所容，再一次被贬谪出朝；建中四年，李泌应德宗之召第五次入朝，但一直到贞元三年，这个六十六岁的四朝元老才最终答应德宗，出任大唐帝国的宰相。

李泌一生，四落四起，仕途多蹇，但始终不慕荣利，恬然自处，得亦不喜，失亦不忧。他最后担任宰相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八个月，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为德宗朝廷作出了一系列贡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足以称得上是有唐一朝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也是功绩最著的宰相之一！然而，李泌在后世享有的声誉，跟他的历史功绩却完全不成正比。时至今日，很多人说起唐朝名相，一般就是“房谋杜断”，再来就是“姚崇宋璟”，顶多外加一个狄仁杰，至于李泌嘛，对不起，不认识。

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检史籍，我们找到了这样的答案——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旧唐书·李泌传》的说法与之大同小异："泌颇有谠直之风，而谈神仙诡道……故为代所轻，虽诡道求容，不为时君所重。"《新唐书·李泌传》虽然也承认"两京复，泌谋居多"，并称李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数为权幸所疾，常以智免"，但同时还是强调，"（李泌）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切"。

说白了，李泌之所以不受当时的士大夫尊重，在后世又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并不是因为他才识不够、品德不好、能力不强、智慧不高、贡献不大，而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宗教信仰跟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太不合拍，在立身处世方面显得太过另类了！

答案其实就这么简单。

在官场上，一个人要想混得好、吃得开，最重要的东西往往不是才识、品德、能力、智慧和贡献，而是看你能不能跟同僚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如果你跟李泌一样，人家喜欢吃肉可你偏偏茹素，人家臭味相投就你孤芳自赏，那不管你工作再卖力，成绩再突出，也没人说你的好。不但不说你好，还要在生前排挤你，在死后埋汰你！谁叫你老是自命清高、独来独往呢？谁叫你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呢？

所以，李泌活的时候仕途多蹇，死了以后千年寂寞，实在也是情理中事。

正所谓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不过，话说回来，后世给不给李泌公正的评价，李泌肯定是不会稀罕的。理由很简单——一个把荣华富贵视若浮云、对功名利禄弃如敝屣的人，要什么死后的名声呢？

还是杜甫说得好："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古罗马的哲人皇帝马可·奥勒留也说过："每个人生存的时间都是短暂的，最长久的死后名声也是短暂的，甚至这名声也只是被可怜的一代代后人所持续，这些人也将很快死去，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更不必说早已死去的人了。"

总之，一个人来到世上，凭良心做人，凭良知做事，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放手时就放手，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最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就够了。

是的，这就够了，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1]　自肃宗年间起，回纥常常以数量庞大的羸马换取唐朝的丝绸，给唐朝财政造成了重大负担。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大唐兴亡三百年 7

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
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

王觉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兴亡三百年 . 7 / 王觉仁著 .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18.10
ISBN 978-7-5115-5506-9

Ⅰ . ①大… Ⅱ . ①王… Ⅲ .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Ⅳ . ①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9565 号

书　　名	大唐兴亡三百年 . 7
作　　者	王觉仁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邀编辑	汪超毅　沈　骏
封面设计	谢明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字　　数	320 千
印　　张	23.25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506-9
定　　价	5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混沌贞元

贤明宰相与糊涂天子

官场铁律：劣币驱逐良币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上）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下）

第二章 从顺宗到宪宗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

王叔文：举世浑浊我独清

飘风骤雨的“永贞革新”

宪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削藩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个心向李唐的人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须努力

第三章 元和中兴

宦官与文臣的博弈

两个宰相的斗法

武元衡被刺案

李愬雪夜袭蔡州

平藩的最后一战

中兴：一朵刹那凋零的昙花

宪宗之死

第四章 青春皇帝，玩乐天子

蠢蠢欲动的河北

永不臣服的心

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相权之争：渔翁得利的李逢吉

敬宗登基

一人独大的朝堂

玩乐天子：我的青春我做主

把娱乐进行到死

第五章 平藩、除阉、斗相，悲剧三重奏

向藩镇宣战

志大“财”疏：文宗的软肋

牛李党争：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流产的“除阉计划”

党争进行时

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甘露之变：喋血大明宫

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

武宗登基

第六章 盛唐终结之前的回光返照

强势宰相与超级宦官

仇士良：一个权宦的完美谢幕

李德裕的人生巅峰

宣宗登基

“傻子光叔”的帝王之路

山河长在掌中看
大中之治：最后一抹辉煌
懿宗登基
第七章 一盘散沙的唐朝
内忧外患的帝国
庞勋之乱：大唐的人心散了
僖宗登基：乱世小皇帝
黄巢：被社会遗忘的人
我花开后百花杀
狼虎谷
第八章 凄凉大唐晚景
遍地枭雄
昭宗：孤独的拯救者
守望春天
灵魂中的七道伤
光化政变：天子成了阶下囚
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
走向终点
后记

第一章 混沌贞元

贤明宰相与糊涂天子

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的损失，更是帝国的莫大损失。

不过，德宗是幸运的。因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还给他准备了另一位贤明的宰相。

他就是陆贽。

早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也就是德宗流亡奉天期间，陆贽就以一个普通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一个宰相的职责。当时，朝廷的许多大政方针都出自陆贽的筹划，德宗也对他言听计从，《罪己诏》的颁布即是其中典型一例。

所以，当时的陆贽普遍被人誉为“内相”。

但是，诸藩之乱平定后，德宗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贽。

因为陆贽为人率直，言辞总是过于激切，经常让德宗很不爽。每次陆贽进言，德宗都会感到宝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此外，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也时常在天子耳边嘤嘤嗡嗡，编排陆贽的不是。因此，即便陆贽德才兼备、人望颇高，却始终与宰相之位无缘。

李泌去世后，户部侍郎窦参、太常卿董晋继任宰相。窦参为人刚愎自用，凡事独断专行，而董晋却是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朝政大权自然都落到了窦参一个人手里。窦参不仅专权，而且还纵容一帮亲信贪污纳贿。德宗屡屡警告，可他却置若罔闻。德宗忍无可忍，只好在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四月将其罢黜。

窦参一贬，朝堂上就只剩下董晋这个形同虚设的宰相了。要想让帝国朝政尽快回到正轨，清除窦参留下的恶劣影响，就必须物色一个刚正贤明、德高望重的人来当首席宰相。

直到此刻，德宗才想起了与他共过患难的陆贽。

这一年四月，被冷落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他的宰相之位。

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陆贽自然是全力以赴。就在拜相当月，陆贽便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荐人才担任下属官员。但是在任命状

上，要注明推荐人的职务和姓名，以便将来考察被推荐人的政绩，从而对推荐人进行相应的奖惩。

陆贽之所以推行这项人事改革，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宰相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任人唯亲、专擅朝政、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而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公开推荐下属官员并承担相应责任，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行政公开化，消除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尽最大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

陆贽这么做，显然极大地削弱了本来属于宰相的权力。

而此时此刻，削弱宰相权力就是在削弱他自己的权力。

仅此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陆贽的坦荡襟怀和无私品格，更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执政者的清明理性和廉洁精神。

无论古今中外，要判断一个执政者（或执政集团）是否合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利益，这个人（或这个集团）愿不愿意用权力的右手砍断权力的左手？或者退一步说，愿不愿意让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和监督？

这个要求貌似很高，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只是对执政者最基本的要求。因为，权力的属性是公有的，从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私有财产，无论这个人或这个集团用什么方式获得权力，都只是权力的“代理人”，而非“所有者”。

虽然陆贽不懂得现代政治文明，但他本着自己的良知做事，却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陆贽之所以愿意削弱手中的权力，就是因为他并不把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因此，为了维护朝廷和国家的利益，他当然乐于为权力寻找一种更有效、更合理、更透明、更公正的运作方式。即使这种方式是用自己的右手砍断左手，即使这么做伤害了他个人的利益，陆贽也在所不惜。

毫无疑问，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者。

对于陆贽推行上述人事改革的目的，以及陆贽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坦荡和无私，德宗当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改革方案，于这一年五月下诏颁行。

然而，仅仅数日之后，便一再有人跟德宗打小报告，说各台省长官举荐的人都是徇私受贿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人才。德宗一听，赶紧私下告诉陆贽：“自即日起，各台省官员的任命和调动，都由你自己做

主，不要交给各部门长官。”

陆贽闻言，随即连上三道奏疏。

第一道奏疏说：“唐朝自开国以来便有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拔由宰相合议，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铨选，然后上奏皇帝批准，下诏任命。但后来佞臣当政，废除了宰相合议制度和公开推举制度，单独行使权力，用以捞取个人利益，因此即便是品行才学出众者，若没有当时宰相同意，也得不到提拔和任用。这就是一直以来的弊政。”

第二道奏疏说：“自从陛下颁布人事改革诏书，被推荐的人才不过十几个，评议他们的资历和人望，并不逊色于同僚；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也没有发现什么污点和败绩。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随口抨击，误导皇上的判断。由此可见，要让用人制度公正透明何其困难！臣建议，让那些抨击者提出具体的指控，何人受贿，何人徇私，然后交给有关部门严加审查，判断虚实。若确有其事，就对推荐人进行惩罚；若纯属诬告，就对诬告者实行反坐法。再者说，宰相不过才几个人，怎么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如果所有官员都由宰相亲自遴选，宰相势必也要辗转向各台省长官征求意见。如此一来，公开推选就变成了私下举荐，阳光政务就变成了暗箱操作（易明扬以暗投），任人唯亲的现象就会更多，流弊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自古以来，只要是实行人事改革，就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能不遭到毁谤。”

第三道奏疏说：“今日之宰相，必是往日之台省长官；今日之台省长官，必是将来之宰相，只是官职有所变化，做事情的方式不会马上改变。既然如此，哪有当台省长官时没有能力推举一两个下属，一旦居宰相之位，便有能力遴选千百个官员？所以，若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要由最高领袖选拔宰辅大臣，宰辅大臣选拔中层官员，中层官员选拔下级官吏——没有比这种层层负责的办法更好。总之，选拔人才的时候，接触面越广越好；考核他们的能力和绩效时，标准则越精细越好。这才是正确的用人之道。”

陆贽这三道奏疏，摆事实讲道理，把用人制度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都分析得十分透彻，相信只要是脑袋清醒的皇帝，一定会采纳他的建议，把人事制度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然而，德宗的脑袋并不清醒。

无论陆贽如何苦口婆心、据理力争，他还是执意追回前诏，罢废了这项新政。

德宗虽然迫于时势，不得不提拔陆贽为相，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喜欢这个人。在德宗看来，陆贽身上的种种闪光点似乎都太过刺眼了。

就拿“清廉”这个品质来说，按理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点，没有哪个领导不喜欢自己的手下清廉，可德宗偏偏就是看不惯陆贽的清廉。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春，德宗让人转告陆贽，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资治通鉴》卷二三四）

你做人太过清廉和谨慎了！各道馈赠的礼物，你一概拒绝，恐怕不通人情，像马鞭和靴子之类的小东西，就算接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陆贽闻言，顿时哭笑不得。

面对这样的糊涂天子，他也只能再次不厌其烦地摆事实讲道理：“官员接受贿赂，就算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须惩处 [1] 。即便是低级官吏，也要严禁受贿，何况是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岂可开此方便之门？受贿之门一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眼前有种种诱惑，内心又岂能不乱！既然与人私下收受结交，就不能不满足他的请求，于是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江河泛滥遂至成灾！再者说，若接受某甲的东西而拒收某乙的东西，则某乙必定会有怨言；若无论何人概不接受，大家便习以为常，又怎么会对宰相生出猜嫌之心？”

不知道陆贽的这番道理有没有说服德宗，反正仅从“鼓励宰相受贿”这一点来看，说德宗是糊涂天子就不算冤枉他。暂且不说大唐的律法对贪污受贿的惩罚是何等严厉，就算没有这些律法，一个皇帝也应该深深懂得“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

当年太宗李世民得知一个官员受贿一匹绢，就大发雷霆，打算砍掉那个人的脑袋，没想到如今的德宗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劝说宰相受贿。太宗皇帝倘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虽然德宗只是劝宰相收一些马鞭、靴子之类的小东西，可就像陆贽说的那样，方便之门一开，谁的欲望不会膨胀？马鞭、靴子既然“奉旨”可收，黄金美玉凭什么不能“奉旨”而收？

正所谓窥一斑可知全豹。有德宗李适这样的天子，大唐帝国重回太平盛世的可能性即便不说是零，恐怕也是微乎其微了。

陆贽很不幸。他怀抱的是辅佐圣主的理想，可遭遇的却是糊涂天子的

现实。在德宗手下当宰相，陆贽注定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在陆贽前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建言献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纳。陆贽的满腔热忱和宏大抱负，最终只能化为一摞摞厚厚的奏章堆积在天子的御案上，旋即又被塞进年深日久、汗牛充栋的宫廷档案库里，等待灰尘的覆盖和白蚁的蛀蚀。

一直到许多年后，有心人把陆贽的奏稿辑为一册，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流传于世，后人才得以从那些发黄的书稿中，窥见一种清明透亮的政治智慧，并且感受到一种超迈高洁的人格力量。

在暗如长夜的贞元年间，在混沌不堪的中唐历史上，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力量虽然不曾照亮那个时代，但它们所发出的光芒却足以擦亮后人回望历史的目光。虽然谏言多数不被采纳，但陆贽却始终不肯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总是犯颜直谏，而且进谏的言辞也不宜太过尖锐。陆贽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计！"

陆贽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可德宗却不能不计较他的天子尊严。

对李适来说，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他总是在这面镜子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丑陋，这就使得皇帝到最后不仅是觉得丢了面子，而甚至于是感到愤怒了。相形之下，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裴延龄就让皇帝很有好感，李适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在，就像他当年跟卢杞在一起时一样。

而这个裴延龄，正是卢杞当年在位时引荐的。

官场铁律：劣币驱逐良币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当初的卢杞最善逢迎，如今的裴延龄自然也是精于拍马。有一次，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却遍寻不获，结果裴延龄马上说："臣最近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的山谷里，发现了几千棵大松树，高达八十尺！"

德宗很诧异，说："开元、天宝年间，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木材，却一直找不到，为何现在忽然有了呢？"

裴延龄答："天生珍材，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年间，怎么可能找得到！"言下之意，如今的天子比缔造了

开元盛世的玄宗还要圣明。

德宗闻言，表面上虽不动声色，实际上却浑身酥麻，受用无比。

当然，德宗之所以喜欢裴延龄，不仅是因为他很会说话，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裴延龄很会帮朝廷搞钱，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搞钱。

贞元九年七月，刚刚当了一年财政大臣的裴延龄奏称："臣自从就任判度支以来，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赋税多达八百余万缗，此外，已征收各州的交易税三百万缗，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三十万缗。臣建议，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季库'，对欠缴、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三个月清查一次；另外设立一个'月库'，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并每月核查。"

裴延龄这道奏疏相当于他上任一年来的工作报告，里头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的问题，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成绩，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看起来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德宗看了奏疏后非常满意，马上照准。

然而，裴延龄真的是理财高手吗？

不，他是个冒牌货。

他所发现的巨额欠税问题，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闻。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可没人能把这笔款收上来。因为欠税的对象均为赤贫或破产的农民，所以这笔巨额欠款早就成了呆账坏账（徒存其数）。此事财政部门尽人皆知，可裴延龄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鼓吹，把它当作上任后的一大政绩。这件事除了忽悠一下外行人德宗李适之外，只能让内行人视为笑柄。

再来就是三百万缗的交易税。这笔钱其实左手收进来右手就花出去了（给用旋尽），到裴延龄汇报政绩时，这笔钱估计已经一文不剩，可他却还煞有介事地设立什么"季库"，好像国库里头的钱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

最后就是管理贡物的所谓"月库"。这也纯属脱裤子放屁的无聊之举。因为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中的经常项目（皆左藏正物），何必多此一举，另立管理部门呢？

很明显，裴延龄之所以要脱裤子放屁，目的就是"虚张名数以惑上（德宗）"。这就像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人去拍相亲照，为了掩饰谢顶的尴尬，只好先把仅有的头发梳到左边拍张左侧照，再把头发全部

梳到右边拍张右侧照，这样不管左看右看就都很帅了，其实他的秀发梳来梳去也就那么几根。

裴延龄就是拿着这样的“相亲照”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幸。“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资治通鉴》卷二三四）

裴延龄为了报答德宗的知遇之恩，除了尽力“充实”国库之外，当然也要尽力充实德宗的小金库。

可裴延龄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还算凑合，要说扩大税源、增收财政，他压根就一窍不通，怎么才能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

很简单，把国库的钱挪到天子的腰包里就行了。

怎么挪？

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挪，要有恰当的理由和说法。

作为一个擅长挪移大法的“半秃头”，裴延龄绝不会说右边的头发是左边梳过去的，而会说左边的头发非常富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梳一些过去给右边。再说了，就算是三毛，人家理发的时候也能理个“三七开”，即使再掉一根，人家还可以理个“中分”嘛，所以裴延龄头上的毛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他左右倒腾了。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秋，裴延龄向德宗奏称：“左藏库过去管理混乱，财物遗失很多，臣最近清仓核查，重新造册登记，居然在尘土中找出银子十三万两，另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粗略估算，价值应该一百万钱有余。这些钱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找出来，当然属于富余物资（羡余），应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使用。”

德宗笑了。

看来裴延龄果真是个理财高手！

然而，说左藏库的尘土里居然能找出十三万两银子和一百余万财物，基本上是无稽之谈。换言之，裴延龄这种行为跟明火执仗的抢劫毫无差别！有朝臣忍无可忍，立即上疏抗辩，说：“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家财产，每月都列表呈报，岂能说是‘羡余’钱物？请皇上即刻派人核查。”

陆贽也提出，应该让三法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对此展开调

查。可是，德宗会同意复查吗？

肯定不会。已经落进口袋里的钱，哪个傻瓜会把它再吐出来？事情明摆着，虽然德宗不会傻到真相信尘土里会长出钱来，但他绝不可能去追查真相。

因为真相对他没好处。

裴延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炮制这样一个弥天大谎。

其实，早在几年前，当德宗准备起用裴延龄为财政大臣的时候，陆贽就曾指斥裴延龄为“诞妄小人”，坚决反对，可德宗却充耳不闻，执意任命了裴延龄。

现在，满朝文武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但大伙更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红人，所以几乎没人敢去惹他。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等少数几个大臣，因职务关系经常跟裴延龄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因而时常向德宗举报。

然而，张滂等人也只是私下举报而已，从不敢公开弹劾。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屡屡上疏弹劾裴延龄的人，就只有陆贽了。

贞元十年十一月，陆贽连续上疏，历数裴延龄的罪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德宗。他说：“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他势必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瞒天过海，所以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就当成他的政绩；把这里的财物转移到那里，就胆敢称为‘羡余’。愚弄朝廷，如同儿戏！从前赵高指鹿为马，鹿和马尚且是同类；如今裴延龄变有为无，指无为有，如此凶险虚妄，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无不对此议论纷纷，但是亿万官民，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臣虽不才，但备位宰相，即便不愿开口，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奏疏呈上，德宗大为不悦，从此日渐疏远陆贽，却愈发宠幸裴延龄。

裴延龄当初被提拔时遭遇陆贽阻挠，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如今又屡屡遭其弹劾，这口恶气更是咽不下去，于是很快就发起反击，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怂恿他罢黜陆贽。

在陆贽与裴延龄的这场较量中，陆贽显然是居于劣势的，因为德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

贞元十年十二月，德宗终于下决心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

太子宾客。

陆贽其实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居然会栽在裴延龄这种小人的手里。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定律，叫“劣币驱逐良币”，意思是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劣币进入流通领域后，人们就倾向于将良币（足值货币）收藏起来，用劣币去交易。最后，劣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就会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

在职场中，这个定律其实同样适用。当君子和小人共事时，君子凡事只考虑公共利益，因此必然不善于自我保护，并且容易得罪人；而小人不管干什么都一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更谙熟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容易吃得开。久而久之，小人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小。最后，君子只能被小人驱逐。

成功扳倒陆贽后，裴延龄再接再厉，又把目标转向张滂、李充、李铦，准备把这些告过他御状的人全部搞掉。他对德宗说，这三个人都跟陆贽结党，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

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但他也不想把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听过也就算了，并没当一回事。

裴延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春，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起来，一些开支不得不缩减。裴延龄趁机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对德宗说：“陆贽、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最近在大庭广众中宣称：‘天下大旱，百姓流亡，度支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的士兵和马匹都没有吃的，这事该怎么办？’陆贽等人散播这种言论，不仅是中伤朝臣，还想动摇士气和民心啊！”

德宗闻言，将信将疑。几天后，德宗到禁苑中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兵恰好向他诉苦，说：“度支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德宗一听，确信陆贽等人肯定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顿时勃然大怒。

这一年四月，德宗下诏，将陆贽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张滂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长史，李充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长史，李铦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长史，把裴延龄痛恨的这些人全部逐出了朝廷。

陆贽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再也没有回到长

安。

裴延龄大为得意。他觉得如此一来，宰相之位肯定非他莫属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尽管裴延龄处心积虑想搏出位，可多行不义必自毙，第二年秋天就身染重病，呜呼哀哉了。

裴延龄一死，朝野上下争相庆贺，唯独德宗一人哀伤不已。

毫无疑问，如果裴延龄不死，肯定会继卢杞之后成为德宗最宠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爷开眼，早早就把这个坏得掉渣的极品小人收了，否则此人必定会像卢杞那样，把帝国朝堂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并最终祸及四方、贻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宗实在是很幸运。

其实，就算把德宗李适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说他是个幸运的皇帝也并不为过。尽管从他即位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早已深陷藩镇割据的泥沼，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但事实上，德宗李适并不缺乏与历史博弈的资本。进而言之，他所拥有的资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之主。

他的资本就是人才——文臣如李泌和陆贽，武将如李晟、马燧、浑瑊。然而，李适终究没能中兴李唐。

问题当然出在他自己身上。

李适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壮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横遭挫折并且迅速偃旗息鼓，除了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之外，主观原因就是他的促狭、猜忌、所用非人而又执迷不悟。比如重用卢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可直到诸藩之乱早已平定的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当曾经的用人得失和成败利钝都已相对明朗的时候，李适有一次和李泌谈话，却仍然在强调：“卢杞忠贞清廉、刚强耿介，人人都说他奸，朕却不这么认为。”

李泌当时的回答是：“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不觉得他奸，这正是卢杞所以奸邪的证明。假如陛下早发现他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泄私愤，诬杀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死地，最后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把卢杞流放到远方，否则大祸如何能止！”

李适不以为然地说：“建中之乱，术士早有预言，说起来也是天命，

卢杞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招致祸乱！”

李泌毫不客气地说：“要是把一切都归于天命，那教育、行政、司法，就全都没用了。”

这场谈话显然并未扭转李适对卢杞的看法，否则李适后来也不会重用跟卢杞同属一丘之貉的裴延龄，更不会把公忠体国、德才兼备的贤相陆贽逐出朝廷。

一个人偶然被石头绊倒，那是运气不好，只要爬起来绕道走就可以了。可如果这个人坚持认为绊倒他的不是石头，而是老天爷，那他就会在这块石头上绊倒第二次、第三次……

像这种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无可救药。

一个无可救药的皇帝，纵然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再多的猛将和谋臣，最终也只能一一成为被驱逐的“良币”。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上）

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德宗在位的整个贞元二十年，大唐帝国就像是一驾行走在混沌黑夜中的马车，看上去显得了无生气而且疲惫不堪。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建中年间那么混乱，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丝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适就像历史上的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依靠惯性在黑夜中前行。

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尽管头上套着马缰、身上拴着车轭，可它们还是经常乱蹦乱跳，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几欲倾覆。进入贞元年间，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毕竟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只有“宣武”和“彰义”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德宗朝廷疲于应付，伤透了脑筋。

宣武镇（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闹起来的。这一年四月，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卒，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调陕虢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可不可以？”

宣武军方说可以，德宗松了一口气，赶紧命吴凑走马上任。

不料，吴凑刚刚走到半路，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并磔杀数名倾向朝廷的文武将吏，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胁迫朝廷发布正式任命状。

德宗慌忙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窦参说："宣武将领大多暗中依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纳，如果朝廷拒绝，恐怕宣武就会和平卢连成一气了。"

德宗担心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重演，只好息事宁人，正式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

然而，即便德宗想要息事宁人，可宣武并没有从此太平。

因为，依靠兵变上台的刘士宁根本就不能服众。刘士宁是个典型的"官二代"，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据说每次出门打猎都要带上好几万人，比别人打仗带的兵还多，而且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往返一次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苦不堪言。

刘士宁很清楚，很多将领心里不服他，尤其是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向来深得将士拥戴，对他始终是个威胁。所以，刘士宁上台没多久就剥夺了李万荣的兵权。

李万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二月十日，刘士宁一大早就带着两万多人出城打猎，李万荣意识到机会来了，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留守的刘士宁亲兵一千多人，宣称朝廷已经敕令刘士宁入朝，并任命他李万荣为留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

就在士兵们半信半疑的时候，李万荣又说："凡执行敕令者，每人赏钱三十缗。"士兵们一听，立刻纳头便拜。紧接着，李万荣又以相同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关闭城门，并派人去对刘士宁说："朝廷命你前往京师，最好马上动身，若稍有拖延，即刻砍下你的人头，传首京师。"

刘士宁顿时傻眼。

他早知道这个李万荣是个祸害，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

刘士宁恨得咬牙切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虽说他现在手底下还有两

万多人，可这些人是跟他出来打猎的，不是打仗的。真要打起仗来，这些人十有八九不会听他的。况且刘士宁也有自知之明，真要跟李万荣过招，他还是太嫩了，压根没半点胜算。

没辙了，刘士宁只好带着五百名亲信骑兵乖乖入朝，另外那两万将士立刻掉头奔回汴州。刘士宁走到东都时，所有亲信骑兵全跑光了，身边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侍妾。到达京师后，德宗马上给他下了道敕令，命他老老实实在京师的宅邸里待着，给他父亲服丧，并严禁他自由出入。

宣武刚刚消停了一年多就又闹起来了，让德宗实在头大。他问当时还在朝中的陆贽该怎么办。陆贽认为，虽然刘士宁被逐是宣武人心所向，但李万荣驱逐节度使并未得到朝廷批准；为了严肃纲纪，应该立即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

可德宗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他对陆贽说："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为节度使，让李万荣代理留后之职，任命状马上就发。"

不知道李适有没有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话，如果有的话，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就是在说他的。自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后，李适就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不管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不管哪个人用什么方式夺取了军权，他最后采取的办法几乎都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

现在他说要派个亲王当宣武节度使，其实就是名义上的遥领。谁都知道，这种"遥领"的把戏不过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陆贽当然不同意妥协，于是接连上疏，说："如今的藩镇将帅，什么事都自任自专、为所欲为。如果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甚至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谁不想以他们为榜样呢？面对巨大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动念，若任由这种祸根潜滋暗长，迟早必生无以挽救的大乱！"

然而，现在的德宗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不颠覆他李适的皇位，他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随后，德宗下诏，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为留后。

次年四月，宣武大将韩惟清等人又发动兵变。李万荣亲自率兵将其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此事的幕后主使就是刘士宁。德宗旋即将刘士

宁流放郴州。

李万荣既然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德宗赶紧以此为由，扯掉了通王李谌这块遮羞布，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五月正式任命李万荣为宣武节度使。

德宗希望用自己的一再妥协换来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匹疯狂的“烈马”却始终不让他省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李万荣中风瘫痪，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马上又慌了神，只好把宦官霍仙鸣找来商量。

皇帝碰到藩镇问题不找宰相，却去找宦官，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很简单，自从陆贽被罢相后，继任者都是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家伙，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情根本就没主意，所以德宗不敢指望他们。相形之下，宦官们这些年来倒是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早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亦即平定朱泚、克复长安后，德宗李适便把禁军重新交到了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的手里。当初那个贪污军饷的文臣白志贞太让德宗失望了，而窦、霍二人则在泾师之变中护驾有功，所以从那以后，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

自从接管神策军后，窦文场、霍仙鸣的势力便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经过多年经营的窦文场、霍仙鸣已然势倾朝野。史称，当时“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资治通鉴》卷二三五）。

既然藩镇将帅多出自窦文场和霍仙鸣门下，此刻藩镇又出了问题，德宗当然只能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宦官了。

霍仙鸣一听藩镇出缺，马上向德宗举荐了宣武将领刘沐。他向德宗担保，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大喜，赶紧擢升刘沐为宣武行军司马，命他代理宣武军政。

德宗以为如此一来，宣武应该就不会出乱子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自安史之乱后，天下藩镇早就把节度使的职位及其相应地盘当作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早成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卧病在床，可他儿子还活蹦乱跳呢，岂容你朝廷来插一杠子？

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诏宦官抵达汴州，刚刚宣完刘沐的任命诏

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李迺就授意手下将士大喊大叫：“兵马使劳苦功高，却得不到奖赏，他刘沐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当行军司马！”随即拔刀出鞘，把刘沐和宣诏宦官团团围住。

刘沐其实是个软蛋，并不像霍仙鸣夸的那么神勇。一见形势不妙，刘沐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赶紧假装中风，哎哟一声扑倒在地，然后就被人七手八脚抬了出去。

紧接着，李迺又纵容乱兵砍杀了好几个不依附他的大将，企图拥兵自立。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迺没有料到，还有一个人也早就盯上了节度使的宝座。

此人叫邓惟恭，时任宣武都虞侯。就在李迺纵容手下作乱的时候，邓惟恭早已和监军宦官俱文珍联手，出动军队包围了节度使府。

双方短暂交手之后，年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迺就败了。邓惟恭随即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万荣几天后也翘了辫子。

宣武乱成了一锅粥，让德宗好生烦恼。无奈之下，他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晋赶赴汴州，就近兼任宣武节度使。

这个董晋就是当初与窦参同朝为相的老臣。此人生性温和，向来与世无争，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个摆设，而且此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德宗病急乱投医，居然把董晋抓到那个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邓惟恭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当节度使，差点笑出声来。这老家伙还能经得起折腾吗？就算他敢来，也不过是来当个摆设，宣武还是老子说了算！

邓惟恭自鸣得意地想。

这一年七月，董晋到达汴州。果然不出邓惟恭所料，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就任之后，马上把军政大权拱手交给了他，而且始终对他客客气气，然后躲进了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脱脱就是一个来此养老的寓公。

邓惟恭笑了。

既然董晋是个毫无作用的摆设，那老子何不把他拿掉，弄一个名正言

顺的节度使来做做呢？

邓惟恭随即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两百多个亲信，发动兵变诛杀董晋，再迫使朝廷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然而，自作聪明的邓惟恭万万没有料到，董晋虽老，却还没老到昏聩无知、任人宰割的地步。

自从就任节度使以来，董晋虽然足不出户，表面上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早就在邓惟恭身边安插了眼线，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邓惟恭刚一密谋，董晋立刻得到了消息。

这一年十一月，董晋赶在邓惟恭行动之前，将他和两百多个手下悉数逮捕，旋即将其党羽全部斩首，最后将邓惟恭执送京师。

姜还是老的辣。没人想到看似懦弱无为的董晋居然能深藏不露、后发制人，连德宗都有些喜出望外。

可是，好景不长。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春，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宣武节度使的人选又一次让德宗感到了头疼。

经过一番权衡，德宗最后还是“就地取材”，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

德宗这次没有看错人，陆长源的确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然而德宗忽略了一点，有才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越有才却谦虚，一类是越有才越骄傲。

很不幸，陆长源就属于后者。

陆长源恃才傲物、刻薄寡恩，所以很不得人心。董晋去世后，陆长源刚刚接手军政，还没被正式任命，就公开宣称：“军中纲纪败坏，为时已久，应该用严刑峻法进行整顿！”

宣武将士一听，顿时人心惶惶。

应该说，陆长源的想法是对的，但他如此口无遮拦却只能把事情搞糟。不久，有人建议陆长源应该按照各地藩镇的惯例，在继任节度使之前，先拿出一些钱物犒赏将士们。不料陆长源却勃然大怒，厉声道：“我岂能跟河北的那些割据军阀一样，要用钱去收买人心，以换取节度使旌节？”

随后，陆长源又授意手下将领孟叔度变相降低士兵待遇。

如此种种，终于把这些骄兵悍将彻底激怒了。

这一年二月，宣武士卒再次发动暴乱，砍杀了陆长源和孟叔度，并且将他们的尸体剁成肉块吞食一尽。监军宦官俱文珍慌忙向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刺史刘逸淮求援。刘逸淮立刻率兵进驻汴州，很快就平定了暴乱。

二月中旬，懒得再思考的德宗顺水推舟，任命刘逸淮为宣武节度使，并赐名全谅。

同年九月初，刘全谅卒，宣武将士拥立都知兵马使韩弘为留后。德宗连想都没想，几天后就颁布了任命状，以韩弘为节度使。

短短七年之间，宣武镇连续爆发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节度使，这不能不让新任节度使韩弘充满临深履薄之感。

他意识到，要想坐稳节度使的宝座，就必须严明军纪；而要想严明军纪，就必须杀一杀这些骄兵悍将身上的暴戾之气。

可是，当初的陆长源不就是因此才掉脑袋的吗？自己现在还这么干，岂不是重蹈陆长源之覆辙？

韩弘的回答是，这事是动手干的，不是动嘴说的，敲锣打鼓的不要，打草惊蛇的不要。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经过一番暗中调查，韩弘锁定了一个名叫刘锷的郎将。据说此人一贯凶暴，历次兵变都冲在最前头，是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此人不除，无以严军纪，无以镇人心。随后，韩弘在营门布置重兵，把刘锷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到一起，用八个字总结了他们的罪状：“数预于乱，自以为功。”随即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全部砍杀。

行刑那天，据说军营门口的地面被鲜血染得一片赤红。

其实，对于韩弘来说，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锷及其手下确为“叛乱积极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弘需要这几百条性命来杀鸡儆猴、杀戮立威。

事实证明，韩弘的目的达到了。

从此以后，在韩弘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整整二十余年间，他的管辖区域内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兵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中大呼小叫。

多年来一直桀骜不驯、麻烦不断的宣武镇总算在韩弘的手中消停了，德宗如释重负。

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个藩镇却突然掀起了一场更大的波澜，让德宗陷入了更深的不安和忧虑之中。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下）

彰义镇（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原本是李希烈的淮宁镇，又称淮西镇，于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正月更名彰义。这块地方在当年的诸藩之乱中本来就是个重灾区，不但是叛乱诸藩中最后一个平定的，而且平定得极为勉强，其节度使吴少诚就是在多次内讧和兵变中上台的，朝廷只不过是承认了他，从而弭兵消祸、息事宁人而已。

贞元十四年九月，吴少诚悍然出兵劫掠了淮南镇的寿州（今安徽寿县）、霍山（今安徽霍山县）两地，斩杀守将谢洋，并将其方圆五十余里地据为己有。

还没等朝廷作出反应，贞元十五年三月，吴少诚又发兵攻击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今河南沁阳县），斩杀监军宦官邵国朝、守将张嘉瑜，掳掠百姓千余人而去。

同年八月，陈许（治所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节度使曲环卒，吴少诚又趁机纵兵大掠陈许镇的临颍（今河南临颍县）、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令中原士民惶惶不可终日……

前些年，宣武镇虽然麻烦不断，但都只是内乱，并未波及相邻藩镇的辖区。而眼下，吴少诚摆明了就是想通过武力扩张地盘，鲸吞相邻藩镇的辖区，其勃勃野心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其行为也已经构成了赤裸裸的叛乱。

德宗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任命陈州刺史上官涚为陈许留后，命他不惜一切代价遏住吴少诚的兵锋。上官涚随即派将领王令忠率三千人阻击吴少诚，不料反而中了埋伏，三千将士全部被俘。

九月，吴少诚乘胜进围许州。

上官涚大为惶恐，准备弃城而逃。部将刘昌裔极力劝阻，说：“城中的兵力足以对付吴少诚，只要我们紧闭城门，不与之交战，过不了几天，其气势必然衰竭。而我们则以逸待劳，到时候伺机出兵，一定可

以破敌。”

上官涚闻言，总算稳住了心神，打消了逃跑的念头，但却始终鼓不起御敌的勇气，只好把守城之责全盘交给了刘昌裔。

从上官涚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德宗识人用人的水平。如果许州城里没有这个叫刘昌裔的普通将领，吴少诚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许州，然后吞并陈许，进而威胁东都。倘若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许州城还有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刘昌裔。

吴少诚围着许州日夜猛攻，可守城将士在刘昌裔的指挥下，却顽强地击退了彰义军的一次次进攻。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许州城里却出了个内鬼。

此人是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因为向来和上官涚不睦，就想趁这个机会投降吴少诚。不料，刘昌裔早就对他多留了一个心眼。还没等安国宁发动，刘昌裔就设计擒获了他，旋即将其斩首。随后，刘昌裔知道安国宁的麾下部众必定不服，于是把他们召集起来，每人发给两匹绢，让他们马上复员回老家。

这些人大眼瞪小眼，一个个都在心里问候刘昌裔的祖宗，却又不敢发作，只好乖乖地脱下军装，放下武器，背上两匹绢出城去了。

城外就是吴少诚的军营，这帮心怀怨恨的家伙会不会……

会的，刘昌裔早猜到了。就在刚才发遣散费之前，刘昌裔就已经派兵埋伏在了城外。他对伏兵们说：“只要看见背上有两匹绢的，就给我砍了。”

原来，这两匹绢并不是遣散费，而是催命符。

后来发生的事情毫无悬念——这些人刚刚出城，就被路边的伏兵相继砍杀，一个也没逃脱。

刘昌裔这么做显然有点狠。可这年头，你不对别人狠就是对自己狠。所以，刘昌裔也是没得选。

解决了内鬼，刘昌裔就可以全力对付吴少诚了。

数日后，刘昌裔发现彰义军士气已衰，便招募了一千名敢死队员，于深夜出城发动突袭，终于大破彰义军。吴少诚攻不下许州，只好转攻

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却又被当地守将孟元阳击退。

得知吴少诚兵锋受挫的消息后，德宗连忙下诏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附近各道共同出兵，合力围剿吴少诚。

各藩镇奉诏出兵后，一开始也打了几场胜仗。

然而，诸道联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各有各的小算盘，谁也不听谁的。每个藩镇都想尽量多捞地盘，可又都想保存实力，所以结果就是各自为战，进退无据。

十二月下旬，吴少诚抓住对手的弱点，在小溵水（今河南郾城县北）一带大破诸道联军。各军的武器、辎重、物资、粮草全部丢弃，悉数落进吴少诚的手中。

败报传回长安，德宗大惊失色，赶紧和大臣们商议，准备物色一个招讨使作为诸道联军的统帅，协同攻防，统一指挥，以免因各自为战让吴少诚捡了便宜。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镇再度联兵进攻吴少诚，却全部被其击败，只好一一退回本镇。

不马上任命一个统帅，这仗是没法打下去了。

二月，德宗在诸藩中选来选去，最后终于选择了夏绥（治所夏州，陕西靖边县北）节度使韩全义。此人出自神策军，是当权宦官、神策中尉窦文场的亲信。窦文场向德宗力荐，说只要韩全义出马，必可将吴少诚手到擒来。德宗大喜，随即任命韩全义为招讨使，命河南、河北的十七道兵马，全部受其一体节制。

韩全义真的像窦文场吹的那么厉害吗？

当初霍仙鸣推荐的那个神勇之将刘沐，碰上士兵作乱就哎哟一声身子一倒被人抬了出去，从此销声匿迹。这回，窦文场能推荐什么好货色吗？很遗憾，韩全义同样是草包一个。

这家伙本来就没什么军事才干，既无勇也无谋，其节度使职位全靠巴结和贿赂窦文场而得。他抵达前线后，天天开会，可每次开会都是和几十个监军宦官在营帐里高谈阔论、口沫四溅，看上去气氛相当热烈，可战略决策从来不曾得出半个。

当时已进入夏季，官军的驻地潮湿燠热，军中瘟疫流行，可身为统帅

的韩全义却根本不懂得抚恤士卒，于是人心离散，士气极度低落。

德宗李适瞪着一双火眼金睛找了两个月，最后居然挑上这样的笨蛋，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这一年五月，韩全义率领诸道联军，与吴少诚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在溵水（今河南项城县西北）南面平原展开会战。联军将士斗志全无，未及接战便四散溃逃，吴秀等人趁势掩杀，韩全义慌忙率部退保五楼（今河南上蔡县东北）。

七月，叛军乘胜追击，在五楼再败朝廷联军，韩全义趁着夜色遁逃，退守溵水城（今河南商水县）。九月，吴少诚亲自率部进抵溵水城下，韩全义怯战，又率各军退至陈州（今河南淮阳县）。

韩全义数战皆败，各藩镇将帅对他彻底丧失了信心。

随后，宣武军和河阳军不辞而别，各自率部撤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萌生去意。韩全义恼羞成怒，以议事为由把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度、河中将领郭湘四人召到大帐，然后全部斩首，以此震慑人心。

就在前线节节败退、朝廷束手无策之际，西川节度使韦皋非常及时地向德宗呈上了一道奏疏，给朝廷提出了应对目前局面的上、中、下三策："臣建议，任命老将浑瑊、宰相贾耽为元帅，统领前线各军，战事必有转机（上策）。若陛下不愿劳动元勋老臣，臣愿率本道精锐一万人，下巴峡，出荆襄，立誓讨灭叛贼（中策）。若陛下不愿再战，应让吴少诚主动请罪，然后顺势赦免（下策）。若不赦免，一旦吴少诚内部生变，被麾下所杀，陛下只能把节度使旌节再度授予凶手，这是除掉一个吴少诚，又来一个吴少诚，必将后患无穷！"

宰相贾耽一听说韦皋推荐他上前线，心里老大不乐意，赶紧对德宗说："逆贼吴少诚肯定也希望得到宽恕，恐怕给他一条生路才是上策。"

此时的德宗当然也不想再打了。十七道兵马被人家打得丢盔弃甲、节节败退，朝廷还有什么脸面和理由再打下去？

德宗现在也巴不得马上罢兵休战。可是，如果吴少诚不主动请罪，德宗朝廷就没有台阶可下——总不能因为打不过人家才宣布赦免吧？

所以，这场战争能不能停止，关键就取决于吴少诚的态度了。

还好，此刻的吴少诚也悄然打起了退堂鼓。

韦皋的奏疏刚刚递到朝廷，吴少诚在朝中的眼线就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了他。在吴少诚看来，如果德宗采纳了韦皋的上策或中策，那自己的胜算就小了。因为浑瑊和韦皋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远不是那个草包韩全义所能比拟于万一的。尤其是韦皋，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独当一面，屡屡击败吐蕃人，可谓战功赫赫、威名远播。所以说，真要和浑瑊或韦皋交手，吴少诚还是颇有些胆怯和疑虑的。

经过再三权衡，吴少诚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战争，与朝廷握手言和。

随后，吴少诚通过个人渠道，将一封求和信和一批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宦官，请他向朝廷转达罢兵之意。德宗见信，大喜过望，就在这年十二月底，下诏赦免了吴少诚及其彰义将士的罪行，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职和爵位。

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和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一样，与其说吴少诚的叛乱是被平定了，还不如说这是德宗再次放弃原则，并采取了一贯的和稀泥政策而不了了之的。

当然，严格来讲，德宗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因为很久以来，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在藩镇事务上已经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放弃了。

也就是说，任何原则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放弃，可当它被放弃了多次之后，一切也就变得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而德宗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己这种行为的呢？是坦然承认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还是自欺欺人地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

对此我们难以断言，但答案更有可能是后者。

从事后德宗对待韩全义的态度来看，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正月，草包韩全义灰溜溜地回到长安，权宦窦文场赶紧在德宗面前极力回护，帮韩全义找了一大堆战事失利的借口。韩全义怕受责罚不敢上朝，就谎称患了足疾，让他的副将崔放代他入朝。

崔放硬着头皮入宫去见德宗，忙不迭地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没想到德宗非但毫无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地说："韩全义身为招讨使，能招抚吴少诚，这是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杀人才算立功呢？"随后，德宗对韩全义依然无比信任，"礼遇甚厚"。

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厚待和礼遇，让韩全义受宠若惊，相信自己家的祖坟一定是冒了青烟。

是的，在德宗李适这样的领导手底下打工，每个草包家里的祖坟都会冒青烟，无一例外地冒青烟。

贞元后期，大唐帝国的马车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但看上去也并没有倾覆的危险。

这样的发现让德宗李适很有些自鸣得意。

得意之余，李适忽然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随后，德宗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以致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几年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这时候，如果你担心他因日理万机而过度操劳的话，那你就太小看李适了。

他选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所以亲自遴选再多的官员也不会觉得累。

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他。

换句话说，只要你出得起钱，皇帝就可以本着公平交换、互惠互利的原则，给你个官做。

关于德宗变相卖官的事情，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贞元十六年底，河东节度使李说病卒，德宗命行军司马郑儋继任节度使。然后行军司马一职就出缺了，德宗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一个叫严绶的刑部员外郎。之所以选上这个人，是因为德宗清晰地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严绶当时还在某个藩镇手下当小幕僚，就曾经很懂事地献给他一笔"进奉"，那时候德宗就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如今河东行军司马一职出缺，德宗当然要用官位回报他了。

对于此事，柏杨先生极为愤慨：“李适身为圣明天子，对于向自己行贿的官员，竟如此欣赏，不次擢升，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五千年来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终于找出缘故：原来，国家的最高领袖，他自己就是贪污大王！”

当然，德宗李适并非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卖官的皇帝，但他在这方面的光辉履历，肯定是唐朝三百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除了卖官之外，德宗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

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这位大唐天子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刚开始总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李泌和陆贽都不在了，现任宰相充其量只能算是天子的秘书，一贯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天下诸道及各州县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便络绎不绝地涌进了宫中的小金库，让德宗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老大帝国的马车在貌似平静中缓缓驶进了第九世纪的黎明。

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让德宗猛然从他那无比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了过来——太子李诵中风了。

太子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一下子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一年，德宗李适六十三岁，显然已经时日无多。

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满朝文武忧心忡忡——下一步，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

[1]　根据唐朝律法，监守自盗者，一尺布打四十棍；受贿枉法者，一尺布打一百棍。

第二章 从顺宗到宪宗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皇亲国戚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李适一直对着亲人们点头微笑。可他焦急的目光却始终在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来回逡巡。

他在寻找一个人。

结果当然是令他失望的——那个人没来。

虽然老皇帝早就预料到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清亮的老泪。

当天李适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病势日渐沉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另立储君。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适已经驾崩。近侍宦官说：“禁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郑等人连忙随声附和。

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心里却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

没错。对太子李诵来讲，如何站起来，并且走向那张人人觊觎的天子御座，的确是个大问题。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并且还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则是庆幸不已。

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

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

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驾崩次日，太子李诵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

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那天在登基大典上，好多禁军士兵半信半疑，踮着脚尖张望，不相信金銮殿上的那个新皇帝真是中风数月的太子。后来士兵们看清了，金銮殿上的那个人的的确确是李诵，据说有人当场激动得掉下眼泪。

也怪不得他们激动。万一太子真的站不起来，大明宫必将因争夺皇位而爆发政治动乱，而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就是这些禁军士兵。

顽强的意志虽然支撑着李诵坐上皇帝的宝座，但却无法使他开口说话，自然也就无法让他在朝会上决断政务。于是新君只能坐在宫中，面前垂下一道帘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百官在帘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

这样一种局面决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身后的谋臣集团。所以，历史也就注定会在这一刻，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

他们就是王叔文和王伾。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草根。他们都来自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既无世族背景，也无政治根基。尤其让满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这两人都不是进士出身。当年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朝中，并且留在太子李诵身边，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长。王叔文“善弈”，是围棋高手；王伾“善书”，是书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诏，王伾以书待诏。

也许正因为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身上少了长安官场的虚伪与骄奢之气，多出了一种草根阶层特有的质朴和率真，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王叔文，对于德宗一朝的政治乱象和民生疾苦有着深切的

感受和认识，并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对李诵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子的老师。

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时任吏部郎中，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都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其时皆官拜监察御史。

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可能缺乏经验和谋略，但绝不缺乏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顺宗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改革。

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看见新朝的政局和帝国的未来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布局。

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顺宗李诵在王叔文的筹划下，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二十二日，任命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叔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考虑到在他们几个人中，只有韦执谊具有相对较高的资历和人望，所以必须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仅是侍臣，人微言轻，难孚众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后。但是谁都清楚——王叔文才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

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做出分工。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作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大幕。

二王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可他们绝对不会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将在致命的打击下中途夭折，最终以人亡政息而草草收场。

而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国手王叔文，也将在这盘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败。

不，是溃败，是尚未与对手在中盘展开厮杀就全军覆没的溃败。

这次溃败不仅彻底埋葬了王叔文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也必将再有的其他改革一样，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挥起来，就直接刺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脏。

被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

之所以选择他，首先是因为此人一贯横征暴敛，被长安百姓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赢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且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身上开刀，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绝不会畏惧强权，而且针对的恰恰是权贵阶层；最后，给形形色色的政敌一个下马威——王叔文连恃宠擅权的宗室亲王都敢动，天下还有谁他不敢动？

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并且纷纷在袖子里藏着瓦片和小石头，守候在李实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砸他个头破血流。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算侥幸逃过一劫。

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与民休息。

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积欠朝廷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后期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

所谓“宫市”，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贞元后期实施以来，宦官们都是打着采购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刚开始，宦官们还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发展到后来，几乎就是直接从商家和百姓手中抢夺了。此外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亦即只要宦官开口说是宫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费奉上，而且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长安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可当年的德宗却置若罔闻。

而所谓的“五坊小儿”，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中的差役。这些差役跟宫市宦官一样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坊间肆意敲诈勒索，百姓也往往是敢怒不敢言。

这些弊政为患多年，而今一朝罢废，长安百姓自然是一片欢腾。

王叔文此举虽然维护了百姓利益，但却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时候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了。

三月十七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两天后，王叔文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只是被他推到台前充充门面而已。

改革派继行政权之后又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财政大权，这不能不引起反对派的极大恐慌。手中握有禁军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他速将广陵王李淳立为储君。顺宗无奈，只好于三月二十四日下诏，立李淳（同日改名李纯）为太子。

四月初六，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看见太子李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不禁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王叔文始终闷闷不乐。因为对于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与东宫集团的强势结合，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那天，王叔文一句话也没说。典礼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仰天长叹，嘴里吟诵着杜甫祭悼诸葛亮的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时的王叔文当然不知道，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

王叔文：举世浑浊我独清

王叔文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随时有可能被扑灭。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原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

此时驻扎在长安西面的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自从德宗回銮之后便一直让宦官执掌。王叔文的此项任命显然又在故伎重施。他希望把老将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让心腹韩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实权。

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军队不同于文官机构，仅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效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禁军将领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说韩泰这种年轻的文官根本无戏可唱，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出马，那些禁军将领也不见得会买他的账。

很快，王叔文就会无奈地明白这一点。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按理说，有了户部侍郎衔，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显得不重要了，但是问题在于，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利用这个职务坐镇翰林院，从而领导这场改革的，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

这一招很损，王叔文等人当然不能接受。王伾立即出面，上疏顺宗，请求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然而，结果还是令王叔文等人大失所望。宦官集团很快以皇帝的名义答复，允许王叔文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但复职请求就免谈了。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天子李诵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控制了。

宦官势力的强大真的让他始料未及。

接下来的日子，更让王叔文痛苦和愤怒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

那并不是来自反对派的打击，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宰相韦执谊已经从他的战友变成了敌人。

导致王叔文和韦执谊反目成仇的原因，首先是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难以容人，树敌太众，而且对改革的期望值太高，打击政敌的手段太狠；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更讲究策略，但也少了一点正直，多了一些心计。

六月初，一个偶然事件使二人的这种潜在差异突然间转变成了公开矛盾。

事情源于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

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不满，于是就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准备以皇帝名义下诏，将羊士谔斩首。可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无奈，退了一步，要求将其乱棍打死。韦执谊还是不从，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就此闹僵。改革派的所有成员都为此深感不安，却又无计可施。

差不多在此前后，有一个类似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二人的矛盾。

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到长安，秘密会见王叔文，准备跟他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说起来，这个韦皋也算得上是个声威远播的牛人了。这些年来，自从有了他坐镇西川，穷凶极恶的吐蕃人就再也不能越过边境一步，在他手里吃了很多苦头。正因如此，所以韦皋一直有些居功自恃。他这次派刘辟来的目的，一来是跟王叔文这个朝中新贵套套近乎，二来是想跟他做笔交易。

什么交易？

韦皋觉得西川的地盘太小，想利用王叔文在朝中的影响力，帮他谋取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山南西道（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把三川之地全部收入囊中。作为交换，他愿意充当王叔文的外援，为他的改革行动摇旗呐喊，必要情况下也可以用武力相助。

如果王叔文世故一点、务实一点、灵活一点的话，他是不应该拒绝这个交易的。

因为，以韦皋的实力和威望而论，若他能成为改革派的盟友，对王叔文肯定会有极大的帮助。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叔文从来不是一个世故、务实、灵活的人，所以他也不可能接受这个交易。

当刘辟来见王叔文时，王叔文一照面就没给他好脸色看。刘辟心里当然不爽，所以说话的口气也就比较狂。他说：“太尉（韦皋的中央官职）让我向您表达诚意，如果您能将西川、东川、山南西道统统划归太尉管辖，那他必将以死相报；倘若不给，他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相报！”

王叔文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像韦皋这种武夫，他本来就不想结交，虽说此人有些军功，可说到底也是个军阀，这种人找上门来做交易，简直让王叔文觉得是对他的侮辱。此时此刻，这个看上去牛皮烘烘、其实屁也不是的说客居然还说

什么“以别的方式相报”，这是在商量事情吗？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啊！

王叔文气得七窍生烟，当即把刘辟轰了出去，然后对韦执谊下达了收拾刘辟的命令。

这命令还是一个字：斩！

可韦执谊照旧还给他一个字：不！

刘辟没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就暂时留在京城没走，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可几天后他就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一溜烟逃回了成都。

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

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

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

从此，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势同水火。

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因为韦执谊确实有自己的小九九。

所谓观点的斗争都是假的，只有利益的斗争才是真的。

从前，同样作为年轻士子的时候，韦执谊当然也跟王叔文一样，满脑子都是经世济民的理想，可随着他在官场上待的时间越久，昔日的理想就显得越发苍白。尤其是当上宰相后，韦执谊更是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头上的乌纱更重要。所以，当王叔文仍然像过去那样对他指手画脚、甚至是颐指气使时，韦执谊的抵触和反感就是可想而知的。

说白了，他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宰相之尊，已经完全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了。如果说这种行为是过河拆桥，那韦执谊宁可拆桥，也绝不甘心再当王叔文的傀儡和花瓶。

对于韦执谊的这种心态，王叔文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就不仅仅是他对友情的背叛，而是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

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

那就是孤独。

一种充塞天地的巨大而无形的孤独。

一种举世浑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

西川节度使韦皋在王叔文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

第一道是给皇帝李诵的："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候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

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其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太子、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绞在一起，唯一的结果只有一个——顺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也绝对是死定了。

飘风骤雨的“永贞革新”

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就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

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

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变成了一张废纸。

王叔文并不知道，早在范希朝和韩泰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给俱文珍发了一封密函，说他们的军队即将服从朝廷的命令，隶属于范希朝。其用意当然是希望俱文珍能表明态度。俱文珍赶紧回函说：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别人。

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

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

除了一双赤手空拳和一张表情沮丧的脸，他没有给王叔文带回来任何东西。

那一刻，王叔文陷入了绝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王叔文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就在他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贞元二十一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但是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

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

因为只要他母亲一咽气，王叔文就必须回家守丧。这无异于是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根本不用他们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知道自己在朝廷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在翰林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

而王叔文邀请的最后一位客人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就是宦官俱文珍。

没有人知道王叔文邀请俱文珍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这场宴席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开场的，并且很快就不欢而散。

开席时，王叔文端起酒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但因身负国家重任，未能亲自侍奉汤药，现在决定请假回家侍候母亲。叔文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所作所为都只为了报答皇上隆恩。一旦离职，各种诽谤必将纷至沓来，不知哪位肯体察叔文苦心，为叔文说一句公道话？"

王叔文的这番真诚告白是什么用意呢？

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还是希望与对手俱文珍达成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谅解？

在俱文珍看来，这两者都不是。他认为，王叔文这一招叫作缓兵之计。他打这张悲情牌的目的，就是想麻痹对手，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所以那天俱文珍始终板着一张脸，王叔文说一句他就驳一句，一点面子也不给，搞得在座的人都相当尴尬。

王叔文无话可说，只好一边干笑一边劝大家喝酒干杯。可此刻的酒除了苦味和酸味，再也喝不出其他味道了。众人勉强干了几杯便纷纷告辞而去。

王叔文看着那一桌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美味佳肴，心里面空空荡荡的。他忽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轻得像是要飘起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重得他无力支撑。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日，一则消息就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

此后又陆续传遍天下诸道及各州县。

消息说王叔文因母丧去职，离开了朝廷。

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并不表示乐观。

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不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虽然不在朝中，可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要重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说好听点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就叫意淫。

王叔文夜以继日反复意淫的结果除了让所有对手发出冷笑之外，只能让那些坚持留在改革阵营中的人发出苦笑。

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

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

如果说王叔文渴望重掌权力是一种意淫，那么此刻王伾的这种请求就近乎愚蠢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改革落到这步田地，除非像韦执谊那样自求富贵，否则无论是谁想替王叔文和改革做点什么，看上去都会显得既可怜又愚蠢。

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王伾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呈上了三道奏疏，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于是初秋的某一天深夜，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就突然听见王伾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出一声惨叫。

第二天王伾就被人用担架抬回了家。

从此他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

事后人们听说，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听见的那一声惨叫是：

“我中风了！”

王伾到底是不是真的中风了？

没人知道，也没人有兴趣去了解真相。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李诵发布了命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同时自行退位为太上皇；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初六，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顺宗颁布了最后一道诏书：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

不久，王伾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宪宗李纯随即下诏将王叔文赐死。

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

韩泰先是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再贬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再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韩晔贬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陈谏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司马；凌准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司马；程异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司马。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谊也没有逃过这一劫，最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

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场失败的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掀开改革大幕，到这一年七月遭遇失败，永贞革新历时不过半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这场飘风骤雨般的改革来得有多么迅猛，败得就有多么惨烈。

王叔文为什么败得这么惨？

原因很简单——刚强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王叔文为人处世的原则性太强，手段太硬，执行力太猛，所以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反弹和极力打压。此外，王叔文的理想和价值观与现实存在太多抵牾，可他偏偏又宁折不弯，所以必然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当然，从人格理想的层面看，王叔文等人的精神是坦荡无私、苍天可

鉴的，不应该遭到世人的诟病。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他们做人做事都太缺乏弹性。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时代，富有弹性的柔弱，都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官场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据说，孔子他老人家有一次曾经去拜访老子。老子在家睡大觉，孔子进去后躬身向老子求教。老子看了他一眼，张开嘴："看看我的牙。"孔子一看，老子的牙全掉光了，点点头。然后老子又道："看看我的舌头。"孔子又看了看，老子的舌头很完整，也很灵活。然后老子就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孔子想了想，躬了躬身就走了。

老子要告诉孔子的是，做人不能像刚强易折的牙齿那样，而应该学习舌头——柔软、有弹性、善于权变。

当然，永贞革新的失败，不完全是主观原因使然，也有其不得不败的客观因素。毕竟此时的大唐帝国，各种政治乱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积弊也已积重难返，并不是靠几个人就足以拨乱反正、振衰起敝的。

都说世事如棋，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不知道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九，二十八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仿佛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仓促？

答案很简单——在手握兵权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咄咄逼人的太子李纯面前，中风瘫痪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

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也无力抗拒下台的命运。

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距还不到八个月。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内，大唐帝国就换了三任皇帝。

在唐朝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风云变幻而又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

宪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进献尊号——应乾圣寿。

年轻的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的气氛也显得喜庆祥和。尤其是“应乾圣寿”这个尊号，看上去显得特别吉利，因为它包含着祝愿太上皇“寿与天齐”的意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仅四十五岁的李诵非但没有寿与天齐，反而在短短十几天后就猝然离世了。

有迹象表明顺宗之死存在着颇多疑点，后世对此也有诸多猜测。可疑点毕竟只是疑点，猜测也只能是猜测。尽管宪宗李纯翻开历史新页的动作显得过于迅猛而急切，但是这个动作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正月初二，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

站在大明宫巍峨的城楼上，站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开端，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的帝国。春天的阳光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欢快地跳跃。李纯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也是一个春天，当时的李纯年方六岁，被德宗皇帝抱在膝上。德宗逗着他说：“你是谁的孩子呀，为什么坐在我的怀里？”

李纯一本正经地望着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是第三个天子呀。”

德宗愣了一下，随即朗声大笑。作为皇长孙，李纯确实可以称之为“第三个天子”。至今，李纯犹然记得祖父德宗那又惊又喜的表情和充满期望的目光。

李纯知道，祖父德宗的目光是在告诉他——既然是第三个天子，那么当你有朝一日坐上天子宝座，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是什么？

两个字：削藩。

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后，大唐帝国就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代、德二宗虽然都曾有过中兴之志，却苦无回天之力，而顺宗在位时间不过半年，更谈不上有何作为。于是，当晃晃悠悠的帝国马车好不容易驶出混沌无光的贞元长夜，终于迎来公元九世纪初的第一抹阳光时，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宪宗李纯身上。

此时的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对于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一直极端不满，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跋扈行为，李纯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跟当年德宗刚刚即位时一模一样——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朝廷，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然而，当年的德宗不就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却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吗？如今的宪宗会不会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呢？

满朝文武无不对此心怀忐忑。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藩镇。说白了，前面几任天子倾尽全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李纯凭什么能做到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于永贞元年八月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便于同月病逝，其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这一幕就跟当年成德的李惟岳如出一辙，明摆着是在蔑视中央的权威。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即位，万事都无头绪，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任命刘辟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职权。

刘辟立刻抖了起来。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遂得寸进尺，于元和元年正月上疏，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四川、东川、山南西道）之地。这已经不止是蔑

视中央的权威，而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朝廷的底线了。

宪宗很快就给出了答复——不。

刘辟冷笑。他觉得李纯这么做无异于是在重蹈德宗年轻时的覆辙，所以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元和元年正月，刘辟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宪宗愤怒了。

难道绵延玄、肃、代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整个德宗一朝的诸藩之乱，又将从刘辟这里开始重演吗？难道大唐的天子永远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

年轻的宪宗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和当年的德宗一模一样的怒吼——“不！”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李唐朝廷就永远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

可是，李纯太清楚德宗说不的后果了。

今天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招致相同的恶果？

李纯心里实在没底。

而满朝文武更没底。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蜀地山川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等等，总之一句话：这仗不能打。

李纯陷入了矛盾之中。

关键的时刻，宰相杜黄裳站了出来，说：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

杜黄裳的理由是：“德宗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姑息迁就、委曲求全。节度使都变成了终身制，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从不敢派人接替。有人死了，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许多宦官便因此而接受大将贿赂，回朝后就极力替其说话，朝廷就授出节度使的旌节，所有的任命几乎从来不是出于天子之意。陛下如欲重整朝纲，就该用国法制裁藩镇，否则天下就无法治理。”

杜黄裳最后说：“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伏他就像弯腰拾草那么容易。只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必能活捉刘辟。”

为此，杜黄裳向宪宗推荐了一个叫高崇文的神策军将领。

同时，杜黄裳还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不要在出征的军队中设置监军宦官。

唐朝历史上，由宦官统率军队或者监督军队所导致的血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但是却往往会被皇帝们一再忽视。

所幸，宪宗这次没有忽视，而是全盘采纳了杜黄裳的建议。

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宪宗命神策军大将高崇文、李元奕，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即刻出兵讨伐刘辟。

削除跋扈藩镇的战役就此打响。

朝廷军刚刚从长安出发，前线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刘辟已经攻陷梓州，活捉了东川节度使李康。

这个消息无疑加强了宪宗朝廷削藩的决心。

正月底，高崇文部穿过斜谷（今陕西太白县境），李元奕部穿过骆谷（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兵锋直指梓州。二月初，严砺率部攻克了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斩杀了刘辟任命的刺史文德昭。

三月初，高崇文率部进抵梓州。刘辟任命的守将怯战，弃城而逃。高崇文遂不战而克复梓州。刘辟开始感到恐惧，随即把李康送到了高崇文的军营中，希望朝廷能赦免他的罪行。然而，高崇文当场就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把李康砍了，意思是让刘辟死了这条心。

数日后，宪宗也下诏剥夺了刘辟的所有官爵。

宪宗是在用行动告诉刘辟——胆敢蔑视中央权威、挑战朝廷底线者，朕绝不姑息！

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另一个藩镇也出了问题。

这个藩镇所辖的就是夏绥（治所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其节度使就是当初讨伐吴少诚时屡遭败绩的草包韩全义。

虽然德宗当时放过了这个草包，但这并不等于韩全义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因为不是每个皇帝都像德宗那么好说话。

宪宗即位不久，就把韩全义召入朝中，撤掉了他的节度使职务，给了他太子少保的闲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准备收拾韩全义的一个信号。

韩全义当然也知道，所以入朝之前便把夏绥的兵权交给了外甥杨惠琳，命他为代理留后，打算遥控夏绥，以便利用这个筹码跟朝廷讨价还价。然而，宪宗根本无视他手中的筹码。没多久，宪宗就断然下诏，勒令韩全义致仕，并委派右骁卫将军李演前往夏绥继任节度使。杨惠琳一下子慌了手脚。

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在韩全义的授意下，一边整军备战，拒绝李演赴任，一边上疏朝廷，声称夏绥将士强行拥立他当节度使。

很显然，这是继刘辟之后摆在宪宗面前的又一个考验。

如果要打，朝廷就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就很可能把帝国再次拖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如果不打，好不容易在对付刘辟时培养起来的自信就会土崩瓦解。

怎么办？

李纯经过短暂的权衡，最后一咬牙：打！

非常幸运的是，朝廷讨伐杨惠琳的前锋军队刚刚开拔，夏绥兵马使张承金就刺杀了杨惠琳，于三月十七日将其首级传送京师。

杨惠琳一死，韩全义也就彻底没戏了，只好乖乖卷铺盖回家。

一场叛乱就这样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朝廷平定夏绥的同时，高崇文部也正在向西川的纵深稳步推进。

刘辟命军队在鹿头关、万胜堆一带（今四川德阳市北）修筑了八座营寨，派重兵布防，企图阻遏官军兵锋。六月初，高崇文部开始对万胜堆发起猛烈进攻，很快就取得八战八胜的骄人战绩，顺利攻克万胜堆，继而将鹿头关团团包围。

至此，征讨刘辟的战役进入了最后阶段。从这一年六月到九月，高崇文和严砺又在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市）、绵州（今四川绵阳市）、玄武（今四川中江县）、神泉（今四川安县南）屡屡击败西川

军队。原本一直负隅顽抗的鹿头关守军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打开城堡向高崇文投降。

随后，高崇文长驱直入，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克成都。刘辟向西逃窜，准备投奔吐蕃，却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州市西北）被追兵追上，自杀未遂，旋即被捕。

十月七日，宪宗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两天后任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十月二十九日，刘辟被押解到长安，宪宗下令将刘辟与所有族人、党羽全部斩首。

西川叛乱宣告平定。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胜利。自安史之乱以后，在李唐中央与四方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中，朝廷似乎还是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李纯登基后的第一次出手，其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通过夏绥和西川的两场胜利，宪宗李纯俨然以一副强势天子的姿态，向天下诸藩发出了一个异常强硬的信息——你们可以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请不要得陇望蜀，更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

诸藩震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实际上就是入朝当人质），以示绝无反叛之意。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九月，镇海（治所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李琦也不得不跟着做做姿态，命手下判官王澹为留后，同时上表请求入朝。宪宗立即批准，并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实际上是督促李琦进京。

李琦本来只是做做样子，没想到朝廷居然当真了，于是迟迟不肯动身，一再拖延行期。王澹和朝廷来的宦官再三催促，李琦老大不爽，干脆上疏说自己病了，等到年底把身体养好再入朝。宪宗就此事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任宰相的武元衡说：“陛下刚即位，李琦说入朝就入朝，说不入朝就不入朝，决定权都在他手上，陛下将如何号令天下？”

宪宗觉得武元衡的想法正与自己不谋而合，遂下诏征召李琦入朝。

李琦慌了。此刻入朝无异于去送死，可不入朝就是抗旨，怎么办？

李琦横下一条心——反了！

九月末的一天，李琦的帐下亲兵突然哗变，大声叫嚣说：“王澹是什么东西，胆敢擅自主管军务！”随即把已经接管军府事务的留后王澹杀了，并剁成肉块吃掉。大将赵琦出面阻拦，也被乱兵杀掉吃了。乱兵随后把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一边作势要杀。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琦带着一副惊诧的表情及时出现，制止了乱兵，救了宦官一命。这个宦官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李琦导演的，而且就是演给他和朝廷看的。

十月初，宪宗向李琦进一步施压，命他入朝担任左仆射，同时命御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镇海节度使。李琦立即上疏，说：“军队叛变，杀死了留后和一员大将。”其潜台词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没人能镇得住。

宪宗不吃他这一套，随即下诏剥夺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淮南（今属江苏）、鄂岳（今属湖北）、宣歙（今属安徽）、江西（今属江西）、浙东（今属浙江）五道兵马会攻李琦。

无独有偶，就跟上次征讨杨惠琳一样，战斗还没有打响，李琦的后院就起火了。他的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共同背叛了李琦。

十一月，李琦父子被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年纪轻轻的宪宗李纯一上台就以雷霆手段收拾了三个叛乱的藩镇，这着实让忠于李唐的臣民们感到扬眉吐气，也着实让一部分飞扬跋扈的藩镇感到惶惶不安。

然而，首战告捷的宪宗并没有过分乐观。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对手还没有上场。

当初把代宗、德宗两代天子搞得焦头烂额的那帮强硬角色，还没有上场。

削藩不是件容易的事

平定夏绥、西川、镇海之后，宪宗李纯就把沉重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就是河北三镇——卢龙（初称幽州）、成德、魏博。

自安史之乱以来，河北三镇就与河南的淮西（后称彰义）、平卢（又

称淄青）两镇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它们不但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而且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朝廷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然而，要收拾这种老牌的跋扈藩镇，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宪宗只能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之子）卒，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宪宗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从，就趁此机会兴兵讨伐。

其实早在三年前，当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李纳之子）病卒、其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的时候，宪宗就很想把李师道端了，借此打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藩镇世袭制，可由于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无力兼顾，只好违心地任命李师道为留后。

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李师道，但宪宗还是把平卢镇的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收了上来。而且，当时宪宗就已经打定主意，平定刘辟之后，无论哪个藩镇胆敢再搞世袭制，朝廷绝不姑息。

所以，当王承宗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时，宪宗马上就向宰相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借此机会削藩。

可是，时任宰相的裴垍却表示反对。

裴垍认为，德宗一朝，平卢节度使李纳（李师道的祖父）是最为“跋扈不恭”的藩镇之一，而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王承宗的祖父）则或多或少“有功于国”，可既然朝廷在几年前承认了李师道，现在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王承宗呢？如果坚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恐怕不光是王承宗不服，天下诸藩都会认为朝廷处事不公。

宪宗也觉得裴垍说得有道理，只好把事情暂时搁置了。但是宪宗想来想去，还是不愿就此放弃，随即便又召见了他最信任的几个翰林学士，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最好是得到他们的支持。

然而，宪宗再次感到了失望。

因为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也都提出了异议。

李绛说："河北诸镇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自立自代是违背纲纪。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朝廷的安排。再者，卢龙、魏博、平卢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派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无语了。

反对削藩的理由这么充分，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算心里非常不爽，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

就在宪宗一筹莫展之际，有个人忽然站了出来，极力支持他的削藩意图，并且自告奋勇，要求率兵讨伐王承宗。

这个人名叫吐突承璀，是个宦官，时任左神策中尉。

可想而知，能当上禁军一把手的人，绝对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此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从小就净身入了宫，一直在东宫侍奉太子李纯，也算是资深宦官了，而且这小子脑瓜子活络，办事精明，所以深受李纯宠信。李纯即位后，立即擢升他为宦官总管兼左监门将军，不久又提拔为左神策中尉。

吐突承璀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挺削藩，着实让宪宗颇感欣慰，也让他对削藩之事平添了几分信心。但是问题在于，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历来都看宦官不顺眼，假如真的让吐突承璀统兵出征，这帮文臣会不会闹翻天呢？

宪宗觉得可能性很大。

所以，即便吐突承璀其志可嘉，宪宗还是有些举棋不定。

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局面，宪宗决定找一个机会，就任命吐突承璀为统帅的问题试探一下大臣们的态度。

有趣的是，宪宗刚起了这个念头，有个叫李拭的朝臣就递上了一道奏疏，说："王承宗不可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完全可以把兵权交给他，让他统帅各军出征，看谁敢不服！"

很显然，李拭在这个时候上这道奏疏绝非巧合。

他是摸透了宪宗的心思，才想通过这道奏疏，把权宦吐突承璀和天子李纯的马屁一块拍了。

宪宗看着奏疏，脸上悄然掠过一丝诡谲的笑意。

当天，他就把奏疏拿给宰相和翰林学士们看，说：“瞧瞧这个奸臣，他已经知道朕打算把兵权交给吐突承璀，才赶紧呈上此奏。诸位贤卿切记，从今往后，绝不能擢升和任用此人。”

李拭万万没料到，他这个自作聪明的马屁一拍下去，居然把一辈子的富贵和前程都给拍没了。

苍天啊，大地啊，我到底错在哪里啊？

很简单，你的错误就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宪宗一眼就看穿了你的投机嘴脸，所以对你的为人相当不齿。

不过，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宪宗必须拿你李拭来说事儿，才能顺带着把授予吐突承璀兵权的事情提出来，从而不着痕迹地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这就是宪宗高明的地方。如果他不这么做，而是直统统地拿着奏疏去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那他就太弱智了。

总之，宪宗的目的无非是想进行一次火力侦察，才顺手把李拭拿来当枪使了。所以，要怪只能怪李拭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能怪宪宗做人不厚道。

让宪宗颇感意外的是，裴垍、李绛等人对他的“火力侦察”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不反应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默许，二是佯装没有察觉，以不变应万变。

在宪宗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尽管意识到大臣们迟早会跳出来反对，可宪宗却不愿坐等。眼下，他还是要抓紧时间进行削藩的准备工作。

于是几天之后，宪宗就起用了一个叫卢从史的人。

此人原本担任昭义（今属山西）节度使，几年前因遭父丧，丁忧去职，随后长时间赋闲在家，一直没机会复出。这回，卢从史听说宪宗一心想削藩，随时可能跟河北开战，赶紧跑回长安，花重金打通吐突承璀的关系，极力表示愿率本镇（昭义）军队出征，充当吐突承璀的前锋，为朝廷赴汤蹈火，誓死讨伐王承宗。

吐突承璀随即向宪宗作了推荐。宪宗不假思索，立刻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并把他过去的职务也一并恢复。

很明显，宪宗是决心拿成德的王承宗开刀了。

然而，削藩之事非同小可，必须从政治、军事、财政多方面综合考量，不是脑门一拍或胸脯一拍就能决定的。所以，宪宗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作两手准备——在采取战争手段之前，尽量先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就算政治手段到头来不顶用，也能为朝廷赢得出兵的理由，增加正义的筹码。

简言之就是四个字：先礼后兵。

这一年七月，宪宗召见李绛等人，说：“关于成德的问题，朕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可必须把他辖下的德州（今山东陵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县）分割出来，另设一镇，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跟平卢的李师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也一律由朝廷任命。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么做势必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八月初，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成德宣慰。

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王承宗谈判，但是宪宗特别叮嘱裴武，谈判内容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王承宗割让德、棣二州。

仿佛是为了考验宪宗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八九月间，卢龙节度使刘济（刘怦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绪之子）、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

事情明摆着——这些人一死，其子弟必然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必将

再度上演。

宪宗随即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知道，宪宗削藩的决心看来是九牛莫挽了，而如今的藩镇形势也确实令人不安。在此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的这些强藩迟早必有一战。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仗该不该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

针对这个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思考，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大多数部众其实并不服从，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则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用好言相劝，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很难预料。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拼死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

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完全有可能按照这个战略一步一步削平两河强藩。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

这个意外就出在成德的王承宗身上。

王承宗宣布自立之后，一直未获朝廷任命，于是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八月中旬，朝廷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当然，裴武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

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区区诚意。”

双方交易就此达成。九月，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欢喜。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宪宗刚刚发布了薛昌朝的任命状，田季安就通过朝中的眼线及时得到了消息。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显然是在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私下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以为他是你的下属就一定是你的人吗？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逮捕了薛昌朝，并把他押到真定（成德治所，恒州所在县）关了起来。

当钦差宦官带着薛昌朝的任命状和节度使旌节经过魏州时，田季安故意盛情款待，把使者留了下来，一连欢宴数日。结果，等到钦差宦官抵达德州时，薛昌朝早已成了王承宗的阶下囚。

宪宗勃然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立

刻传令，命王承宗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破碎。

宪宗忍无可忍。

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诉诸武力了。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

一个心向李唐的人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宪宗果然任命宦官为统帅了。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

就像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文臣们此前的沉默并不代表默许，而只是佯装不知。他们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先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再一拥而上，一起发飙。

第一个上疏力谏的人是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

他说："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未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此举，简直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陛下若是认为吐突承璀勤勉，可授予官爵；若认为他忠诚，可赏赐财帛。至于军国大权，事关社稷安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制、自损圣明吗？"

在奏疏的最后，白居易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请陛下慎思于一

时，以免贻笑于万代。”

宪宗大为不悦。

紧接着，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

然而，宪宗却置若罔闻，对所有谏言一概不理。

十月十六日，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

宪宗头疼了。

讨伐藩镇的战争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全力支持。倘若坚持任命吐突承璀而惹恼了多数朝臣，对于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肯定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无奈之下，宪宗只好作出让步，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同时改“处置使”为“宣慰使”。

表面上看，宪宗似乎妥协了，可熟悉唐朝历史的都知道，所谓的“宣慰使”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吐突承璀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

宪宗在跟满朝文武玩障眼法，李绛不得不继续进谏，极力强调重用宦官之弊。他对宪宗说，宦官做事情缺乏原则，最容易恃宠生娇，谗毁忠良，到头来往往会败坏朝政。可宪宗却不以为然：“他们怎么敢对朕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苦笑：“宦官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岂能不防微杜渐呢？”

然而，宪宗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百官的劝谏。

其实，宪宗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他之所以还是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代文臣擅权揽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吗？远的不说，就以唐朝为例，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恐怕丝毫不亚于宦官乱政的危害吧？

所以，宪宗李纯不得不重用宦官。在他看来，只有把宦官培植成第三

种力量——一种与武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才能利用这种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控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

当然，李纯也知道，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他坚信，自己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李纯终究是过于自信了。

当我们从这一刻起纵观李纯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事实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因为很快，他就将因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到了十一年后，他还将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宪宗李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

元和五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吐突承璀带着宪宗的殷切期望，率领神策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开拔了。宪宗即日下诏，命成德四面所有藩镇出兵讨伐王承宗。

与此同时，久病不愈的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终于翘了辫子，大将吴少阳杀了吴少诚的儿子，于十一月底自立为留后。

宪宗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又出现了。

可是，朝廷刚刚对成德开战，不可能再腾出手来对付淮西，所以宪宗只能装聋作哑，将淮西事务暂时搁置，一切等讨平成德以后再说。

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后，魏博田季安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对众将说："中央军已经二十五年没有渡过黄河了，如今一旦越过魏博，消灭成德（魏博在成德的南面），魏博的命运也就堪忧了，诸位认为该怎么办？"

大将中马上有人挺身而出，说："只要给我五千骑兵，定能消除大帅的忧虑。"

田季安大喜，高声对众将道："壮哉！大军即刻出发，胆敢阻挠者，斩！"

魏博出兵，当然是帮着成德打朝廷的。很多年来，河北的这几个难兄难弟就是这样，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们也时常拿着刀枪互相比画，可一旦朝廷有什么动作，他们立马就会团结起来，掉转枪口一致对外。

不过，河北三镇的人也不全都是反贼，还是有少数人依旧是忠于李唐的。

比如眼下，一个叫谭忠的卢龙将领就是心向李唐的人。

田季安准备出兵阻击中央军时，谭忠正巧奉卢龙节度使刘济之命出使魏博。他意识到，如果不想办法阻止田季安，中央军必然会受到很大的牵制，获胜的希望也将大大降低。于是，谭忠马上去见田季安，说："大帅，您若出兵攻击中央军，势必把四面八方的军队都引到魏博来，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田季安斜乜了他一眼："怎么说？"

"如今，中央军准备越过魏博攻击成德，却不派老臣宿将，而是派一个宦官，不出动天下之兵而以神策军为主力，您知道这是谁的主意？"

"你说是谁？"

"这是天子自己的主意。"

田季安冷笑："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谭忠无视田季安讥嘲的目光，接着说："既然是天子自己的主意，目的当然是想夸耀他的天纵英明，以使朝野对他敬畏拜服。那么大帅试想，倘若中央军还没走到成德边界，就在魏博折戟沉沙，那无异于甩了天子一记耳光，他岂能忍受天下人的耻笑？一旦天子恼羞成怒，势必采用智士良策，派遣猛将精兵，再次渡河北上。到那时候，中央军汲取失败的教训，必然不会越过魏博攻击成德，而是集中全部兵力直取魏博。届时，大帅该怎么办？"

田季安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死死盯着谭忠："那依你之见，眼下魏博该怎么办？"

谭忠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说："中央军进入魏博后，大帅不但不能与之开战，反而应该重重犒劳，随后大张旗鼓，表面上扬言攻击成德，暗中派人告诉王承宗：'倘若魏博攻击你们，河北义士都会说魏博出卖朋友；可要是帮助你们，天下人又会说魏博背叛朝廷。不管是出卖朋友还是背叛朝廷，魏博都不愿意。所以，阁下如果能暗中解除防备，让魏博拿下成德一城，魏博便能以此奏报皇上，以示对朝廷的效忠。如此一来，成德只有小小的损失，魏博却能获万世之安，难道阁下不希望以此换取魏博的友谊吗？'这番话一说，成德肯定不会

拒绝。到时候，大帅岂不是稳如泰山了？”

田季安笑了，笑得十分酣畅：“好极了！先生来此，是上天眷顾魏博啊。”

随后，田季安全盘采纳了谭忠的计策，先是与成德暗通声气，继而装模作样地“攻克”了成德的堂阳县（今河北新河县），然后就按兵不动了。

谭忠成功说服田季安后，立刻动身返回幽州。

他知道，此刻节度使刘济肯定也在为同样的事情头疼。而谭忠想要做的，绝不止是让他像魏博那样保持中立，而是要努力说服刘济配合中央军，出兵攻打成德。

当然，要说服刘济出兵肯定是有难度的，搞不好连谭忠自己的小命都得赔上。但是，谭忠已经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全力争取。

谭忠回到幽州的当天，刘济正好召集众将开会，讨论当前对策。刘济对众将说：“天子知道我们和成德有宿怨（当初王武俊与朱滔经常交兵），一定命我们出兵讨伐，成德也一定会对我们严加戒备，怎么做对我们更有利，大家说说看。”

刘济话音刚落，谭忠便抢先回答：“天子一定不会命我们出兵，成德也一定不会对我们戒备。”

刘济闻言大怒：“你干脆说我和王承宗串通谋反算了！”然后二话不说，命人把谭忠扔进了监狱。

随后，刘济派人去成德边界查探军情，结果令他大为意外——成德居然跟谭忠说的一样，丝毫没有加强戒备的迹象。又过了一天，朝廷果然给卢龙下了一道诏书，宪宗在诏书中对刘济说：“你只要专心保护北部边境就好了，别让朕顾虑北方的胡人，以便一心一意对付王承宗。”

刘济慌了。

这两个情况对他来讲绝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成德对卢龙不加防备，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卢龙与成德暗中勾结；而天子居然亲自下诏叫他不要出兵，摆明了就是怀疑他对朝廷不忠，并且相信他跟王承宗有一腿了。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一旦成德被朝廷灭了，天子接下

来要收拾的人肯定就是他刘济了。

刘济越想越觉骇异，连忙把料事如神的谭忠放了出来，说："你的判断非常准确，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谭忠在心里笑了。他知道，刘济现在已经对他刮目相看了，只要再戳一戳刘济的痛处，刘济必然对他言听计从。于是，谭忠不慌不忙地说："大帅怎么看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这个人？"

刘济不明所以地看了看谭忠，说："卢从史和我关系不错，你提他干什么？"

"大帅有所不知。"谭忠摇头苦笑，"卢从史表面与卢龙亲善，实则包藏祸心；表面与成德决裂，实际上却暗中勾结。"

"何以见得？"

"在下据可靠的情报获悉，卢从史曾对王承宗说，'卢龙虽与成德有旧怨，但成德毕竟是卢龙的南面屏障，所以卢龙不会帮朝廷打成德，成德自然也就不必防备卢龙。'王承宗采纳了卢从史的计策，因此对我们无所戒备。接着，卢从史又密报朝廷，说：'天下人皆知卢龙与成德有仇，可成德却不加防备，足见卢龙也已背叛，暗中与成德联手了。'于是，天子自然会怀疑我们，因此才会下诏让大帅不必出兵。如此一来，成德就解除了北面的威胁，而我们则替成德背了黑锅。"

刘济悚然变色："那你说该怎么办？"

"卢龙与成德有仇，天下无人不知，而今朝廷讨伐成德，大帅您手握大军，却未派一兵一卒参战，这就足够让卢从史一口咬定卢龙勾结成德，背叛朝廷了。其结果就是——卢龙枉怀忠义之心，却要背负反叛骂名，既得不到成德的感激，又落得个恶名远播的下场。天下之事，还有比这更冤的吗？请大帅务必三思。"

刘济万万没想到，卢龙当前的处境居然会如此险恶，要不是谭忠提醒，自己岂不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当天，刘济就向三军发出号令："五日之内，全军出发讨伐成德，凡迁延不进者，一律剁成肉酱示众！"

就这样，谭忠以他的忠诚、机敏和雄辩滔滔的口才，成功地帮李唐朝廷做了两件大事：一、让魏博从反抗军变成了中立者；二、让卢龙从骑墙派变成了讨伐军。

通过谭忠一个人的努力，原本动不动就抱成一团的河北三镇被悄然分化了，这无疑为朝廷讨伐成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换句话说，此时的王承宗已经变成了孤家寡人，四面合围的讨伐大军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把王承宗轻松搞定。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谭忠替朝廷肃清了障碍，声势浩大的中央军最终还是搞不定王承宗。

问题出在哪呢？

出在宪宗任命的最高统帅吐突承璀身上。

因为他根本不会打仗。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须努力

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开始，朝廷的各路兵马就从各个方向对成德发起了进攻，但是一直到三月，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却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唯一帮朝廷取得战果的既不是主帅吐突承璀，也不是朝廷派遣的其他各道兵马，而是被谭忠说服的卢龙节度使刘济。

这一年正月，当其他各路兵马还在途中时，刘济便亲率七万大军率先攻下了成德的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刘济继续南下，围攻乐寿（今河北献县），无奈却久攻不下。而在此期间，其他各路讨伐军则碌碌无功。昭义的卢从史进入成德境内后，始终迁延观望，逗留不进；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倒是推进到了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却突破不了成德军的防线，一直无法前进半步；至于魏博的田季安和平卢的李师道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所以各自“打”下一个县城便按兵不动，谁也别指望他们还能有什么动作。

让人觉得最可笑的是，各路兵马中打得最窝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主帅吐突承璀率领的神策军。自从进入战场后，这支装备最精良、待遇最优厚的中央禁军就没打过一场胜仗，不但在交战中频频失利，而且早早就损失了一员骁将郦定进。

郦定进是左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当初征讨西川时还曾亲手活捉刘辟。这位骁将一阵亡，原本消沉的士气就更加涣散了。

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神策军之所以屡遭败绩，主要责任当然是在主帅吐突承璀身上。史载，“吐突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所以“与承宗战，屡败”（《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眼看河朔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淮西的吴少阳趁机屡屡上奏，要求朝廷给予正式任命。宪宗担心迟迟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只好在这一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吐突承璀指挥无方，各路兵马均无进展，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朝中的大臣们都急眼了，赶紧让翰林学士白居易出面，上疏力劝皇帝罢兵。

白居易在奏疏中说：“河北本不该用兵，如今既已出师，吐突承璀未

尝苦战，先失一员大将，作为主力的神策军与昭义军都未能向前推进，这不仅是他们存心拖延，更是因为他们无力进攻。至于其他各路兵马，战况也大多不佳。陛下观察这样的形势，又有几分成功的指望？以臣愚见，应立刻罢兵，若迟疑不决，必生四大弊害。”

白居易所说的四大弊害是：

一、与藩镇开战，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无论开支多少都不必计较，可要是明知不能取胜，就不应虚费钱财粮秣。既然拖延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何不及早罢兵？如果再拖下去，除了耗费政府钱帛和百姓脂膏之外，还徒然养肥了参与讨伐的河北诸藩。

二、如今朝廷已经承认了淮西的吴少阳，河北诸藩一定会以此为由，要求朝廷一视同仁，昭雪王承宗的反叛罪名，到时候朝廷没有理由拒绝，只能同意诸藩的要求。如此一来，则授予和罢黜的权柄都操于藩镇之手，恩威刑赏皆不由朝廷做主，中央权威岂不是要尽归河北？

三、眼下天气转热，前线将士身心俱疲，疾病瘟疫转眼就会流行军中。何况神策士卒多出城市居民，难以耐苦，万一出现逃兵，很可能会一呼百应。一支部队如果溃散，其他部队必定动摇。倘若走到这一步，朝廷悔之何及？

四、吐蕃与回鹘都在唐朝安插了大量间谍，无论大小事情都可以获得情报。如今朝廷集结天下之兵讨伐一个王承宗，居然从去年冬天打到今年夏天，始终未建寸功。因此，对于唐军战斗力的强弱、所耗军费的多少，吐蕃与回鹘都已经大概知道。万一他们乘虚入寇，以今日之情势，朝廷必然首尾难顾，到时候兵连祸结，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倘若如此，社稷的安全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应该说，白居易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不仅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想法，更是代表了大多数朝臣共同的不安和忧虑。

对此，宪宗到底作何感想呢？

此刻的宪宗当然比谁都郁闷。

整个局势的演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与李绛当初的那套战略构想也是南辕北辙——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开打了，结果打得让人既揪心又窝火；而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而且还要被迫承认它。

宪宗固然知道白居易的谏言不无道理，他也知道这场战争获胜的希望

已经微乎其微，甚至也一度动了罢兵的念头，可他还是不甘心就此放弃。换言之，宪宗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任用吐突承璀，可他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如今吐突承璀打得这么烂，当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李纯有眼无珠、所用非人。

宪宗实在丢不起这个脸。

所以，不管吐突承璀打得多烂，也不管河北战局多么让人郁闷和纠结，他也只能怀着一丝侥幸熬下去，看看能不能熬出奇迹。

不幸的是，到了这一年夏天，宪宗非但没有等来奇迹，反而等来了一个更让他心烦意乱的消息。

消息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送来的。他在给宪宗的奏疏中，拼命指控诸道军队与成德暗中勾结，劝朝廷不要再命令军队往前推进；同时，卢从史还在奏疏中频频暗示，要求宪宗把他的中央官职擢升为宰相。当时很多节度使都遥领中央官职，如“太尉”“中书令”“同平章事”等等，虽无实权，却足以抬高身份和地位。

接到卢从史的奏疏后，宪宗的头一下就大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卢从史的表现实在是有些反常。当初要征讨成德时，他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吐突承璀除外）跳出来高举双手支持的，可战事一开，他却始终迁延观望，现在他又指控其他将帅和王承宗勾结……朝廷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为了查明真相，宪宗就命宰相裴垍去跟入朝呈递奏疏的昭义部将王翊元接触，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捞出点什么。裴垍随即召见王翊元，对他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施压，终于迫使他说出了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卢从史贼喊捉贼。

原来，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正是卢从史自己。

自从开战以来，卢从史就一直与王承宗暗通款曲，并且命部众暗藏成德旗号，以便在战场上制造混乱；此外，他还抬高并虚报粮食和草料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是在养寇自重，并利用各方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当王翊元把卢从史的这些猫腻全部抖落出来时，宪宗惊愕不已。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重用的竟然是这般货色。

裴垍对宪宗说：“卢从史既阴险又骄横，迟早必定作乱。根据王翊元的交代，卢从史和吐突承璀的大营对望，而且卢从史把吐突承璀当成了三岁小孩，往来出入毫无防备，陛下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制伏卢从史，解除他的兵权，以免他日后坐大，朝廷还要出动大军讨伐。”

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但是，像卢从史这种吃里爬外两面三刀的家伙，要是不拿掉肯定为患更大。宪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裴垍的建议。随后，裴垍命王翊元回到前线，暗中策反了卢从史的心腹大将乌重胤。

确定了行动的内应后，宪宗随即给吐突承璀发了一道密诏，命他设计逮捕卢从史。

四月初，吐突承璀接获天子密诏，立即着手制订行动计划。

吐突承璀打仗不行，但玩一玩“请君入瓮”的把戏，还不失为一把好手。

他知道卢从史性贪，于是就天天把自己收藏的奇珍异宝拿出来晒，然后邀请卢从史前来赏玩。当然每次都“忍痛割舍”了某件宝贝，从不让卢从史空手而回。

卢从史乐得屁颠屁颠的，从此把吐突承璀视为知己。

四月十五日这天，吐突承璀事先命兵马使李听在大帐后面埋伏了一队刀斧手，然后邀请卢从史过来赌一两手，顺便赏玩一些新近淘来的宝贝。卢从史一听有得玩又有得拿，欣然赴约。可他刚刚迈进吐突承璀的大帐，伏兵就突然冲出，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扔进早已准备好的囚车，飞快驶离大营。

等到卢从史带来的侍卫们惊觉，关押卢从史的囚车早已往长安方向疾驰而去。侍卫们企图追赶，却被吐突承璀的手下一连砍倒数十人，剩下的只好束手就擒。

卢从史被捕的消息传回他的军营后，部众们马上拿起武器，准备去找吐突承璀算账。可他们还没冲出军营大门，就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这个人就是乌重胤。

乌重胤横刀立马，厉声呵斥：“天子有诏，逮捕卢从史，服从者赏，违令者斩！”

士兵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动，最后只好放下武器，灰溜溜地回到各自的营房中。

顺利摆平卢从史后，吐突承璀当即替乌重胤请功，推荐他担任昭义留后。宪宗也认为乌重胤立了大功，未加细想就打算颁布任命状。可李绛却认为万万不可。他向宪宗郑重提出，应将乌重胤调离昭义，改任河阳节度使，再把原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到昭义。

宪宗愕然。

既然同样是让乌重胤当节度使，为什么要调来调去这么麻烦呢？

在李绛看来，这不叫麻烦，而是必需的。

因为这里头的奥妙大了去了。

首先，昭义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非其他藩镇可以比拟。昭义总部虽然设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但它下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却位于太行山以东，深深楔入河北腹地，与成德、魏博犬牙交错，相互牵制，是李唐朝廷在这个叛乱重灾区中唯一可以有效控制的力量，其战略价值非同小可。所以，对昭义节度使的任命自然要慎之又慎。

其次，原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早就是靠边站的过气人物，他能够重掌昭义兵权，无非是投靠了权宦吐突承璀，并不是直接获得宪宗的赏识，因此他对朝廷并不感激。他复任后之所以对朝廷阳奉阴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朝廷好不容易把他拿掉，却又让宦官吐突承璀再度推荐继任者，这显然又是让恩威刑赏的权柄落入吐突承璀个人手中。乌重胤继任后，自然只会记住吐突承璀的人情而不会感恩于朝廷，因而很可能重蹈卢从史之覆辙。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就必须否决吐突承璀的提议，不给他树立私恩的机会，同时委派乌重胤到别镇赴任，这样才能让他领受朝廷的恩典，使他不对朝廷心生轻慢。

最后，乌重胤既然是昭义部将，那么在昭义镇内，与他平级甚至级高的军官肯定很多，如今乌重胤略施小计就爬到了他们头上，叫他们作何感想？会不会有人不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倘若如此，昭义必将不得安宁。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乌重胤调往他镇。

当李绛向宪宗仔细分析了上述的得失利弊之后，宪宗终于恍然大悟，

赶紧收回成命，于四月下旬改任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调任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朝廷虽然解决了吃里爬外的卢从史，但河北战局还是不见起色。

到了元和五年六月，亦即开战整整半年之后，战事仍无大的进展。除了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曾于四月份打了一场胜仗，以及卢龙的刘济在五月份攻克了一座安平县之外，其他各部均无斩获。

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疏宪宗，说："臣屡屡奏请罢兵，结果却石沉大海，请看今日之局势，比当初更加糟糕，不知陛下还在等什么？"

这个白居易说话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宪宗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又老是在他耳边嘤嘤嗡嗡，而且说话的口气总是那么冲。有一回宪宗与他当面议事，白居易说到激动处，竟脱口而出："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

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有军国大事必与翰林学士商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翰林院的职能较之玄、肃年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地位和作用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艺术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后对翰林学士的重用，如今的翰林院几乎已经具有了内阁的性质，翰林学士们基本上也都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升任翰林承旨（相当于翰林院院长、首席学士）的李绛，更是宪宗最为倚重的高级智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朝廷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了比宰相（比如裴垍）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然而，自打河北战事陷入泥潭后，宪宗就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一个多月不跟他们见一次面。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此时已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绛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宪宗说："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怎么办呢？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

宪宗一听，自觉理亏，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学士。

其实，宪宗不是不想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尤其是那个大诗人白居易，宪宗更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跟学士们见面，却跟李绛提了一个条件："那个白居易，官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出言不

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

李绛一点也不同情宪宗，说：“陛下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才敢竭尽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固然欠考虑，但他也是一片赤心。陛下今日怪罪他，臣担心朝野上下人人钳口，陛下又如何能做到耳聪目明、圣德常保呢？”

宪宗想了想，旋即转怒为喜，从此对白居易一如往常，再也不提罢黜之事。尽管心里不太好受，但李绛的话他还是听进去了。

很显然，宪宗是一个有胸怀的皇帝。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做大事的料，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批评的态度。被人说一句就蹦一下、骂两句就跳两脚的人，是属跳蚤的，注定难成大器；而那种对批评甘之如饴的人，其前程必定不可限量。因为他知道批评有利于他的成长，并且善于从批评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所以说，要判断一个皇帝能不能成就一番伟业，同样要看他是否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一个愿意接受臣下批评的皇帝，就算不能成为明君，至少已经远离了昏庸；而一个动不动就对谏言暴跳如雷的皇帝，其气度和为人已不堪问，要成就什么大业更是免谈。

虽然此时的宪宗正被胶着的河北战事困扰，不敢奢望什么帝王伟业，但是，仅凭他面对谏言的态度，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个皇帝不一般，至少比他的祖父德宗靠谱。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年德宗李适拼尽全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最终很可能要由这个宪宗李纯来完成。

当然，宪宗要想见到他生命中的彩虹，还得先熬过此刻的风雨。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须努力。

元和五年七月，让人万分纠结的河北战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王承宗派遣使节入朝为自己辩护，称所作所为都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免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朝廷准许他改过自新。

王承宗的奏疏呈上后，一筹莫展的宪宗终于等到了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昭雪”了王承宗，不仅恢复了他的所有官爵，还把德、棣二州还给了他。

值得注意的是，宪宗朝廷在这道诏书中用的词是“昭雪”，而不是一般

常用的“赦免”。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赦免”是对犯罪的人用的，而“昭雪”则是对蒙冤的人用的，一词之差，意思截然相反。换句话说，朝廷用“昭雪”这个词，就等于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说明人家王承宗并没有任何罪过，从头到尾都是被冤枉的。

尽管这个结果令人很不愉快，但好歹总算是个了结。

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李唐朝廷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到头来除了换掉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外，别无所获。

宪宗李纯觉得自己窝囊透了。

四年前平定三藩时建立起来的自信在这一刻灰飞烟灭，四年来李唐朝廷拼命维系的表面权威也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元和五年的夏天，大明宫的上空暴雨如注。

三十三岁的宪宗李纯久久凝望着铅灰色的天空，目光黯淡，神情迷惘。都说彩虹总在风雨后，可毕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所以，即便“元和中兴”的彩虹终将在十年后的帝国苍穹中熠熠生辉，此刻的宪宗李纯也只能在元和五年的风雨中默默咀嚼失败的况味……

第三章 元和中兴

宦官与文臣的博弈

在宪宗朝廷讨伐王承宗的这场战争中，最吃力不讨好的人，当属卢龙节度使刘济。他不惜撕破脸面跟成德大动干戈，而且辛辛苦苦帮朝廷打下了好几座城池，结果人家王承宗一转身就跟朝廷握手言和了，朝廷也欣然“昭雪”了王承宗，无疑把刘济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

老子拼死拼活，到头来居然两面不是人，这叫什么事儿？

刘济的愤怒无从发泄，只能憋在心里，于是憋着憋着就憋坏了。就在朝廷罢兵当月，怒火攻心的刘济就病倒了。

刘济一倒，卢龙的内乱就爆发了。

刘济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绲，次子刘总。刘济率军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以长子刘绲为节度副使，留守幽州；以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刘济自己则率部驻扎瀛洲（今河北河间市）。

战争刚一结束，刘济就突患重病，只好暂时留在瀛洲。有一天，突然有人自称是从长安来的，向刘济透露了一个消息："朝廷认为大帅逗留不进，未建尺寸之功，已经擢升副使刘绲为节度使，任命状和旌节马上就到了。"

刘济一听，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还没等他把气喘匀了，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旌节的朝廷特使已经过了太原。

几天后，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过代州（今山西代县）。

节度使人还没死，朝廷就搞这么多小动作，军营中顿时人心惶惶。

刘济在病榻上翻来覆去，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这件事不可能是朝廷干的。

道理很简单，讨伐成德时，他刘济是所有藩镇中最卖力的，就算最后朝廷打了败仗，可他刘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断然不至于被朝廷罢黜。所以，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不可能是别人，百分百就是留守幽州的长子、时任节度副使的刘绲。

刘济怒不可遏。

老子人还没死，你小子就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了？

因为认定是刘绲搞的鬼，所以刘济愤而砍杀了帐下数十个平时与刘绲交好的大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绲带来见他。

得知父亲病重，次子刘总赶紧从饶阳赶来伺候。七月十七日，由于悲愤交加，急怒攻心，刘济病势转剧，整个上午水米未进。到了中午，刘济顿觉饥渴难当。此时，次子刘总亲手为父亲端上了一碗水。

喝下这碗水后，刘济突然七窍流血，当场暴毙。

同日，心急如焚的刘绲刚刚赶到涿州，就被一帮人拦住了去路。他们以刘济的名义宣布了刘绲的罪状，旋即把他乱棍打死。

刘济和刘绲死后，有个人无声地笑了。

这个人就是刘总。

没错，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从散布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在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做完这一切，刘总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

可怜的是刘济，直到死前还在恨自己的长子刘绲。

更可怜的是刘绲，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对于卢龙的这场内乱，朝廷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刘总是否造他老爹的反，朝廷并不关心。只要刘总不造朝廷的反，此时的宪宗朝廷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讨伐王承宗之战无果而终，不仅让李唐朝廷丢尽了脸面，也让朝中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感到痛心疾首。更让朝臣们义愤填膺的是，九月初二，吃了败仗的吐突承璀返回京师后，却仍被宪宗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

宰相裴垍当即进谏："承璀第一个倡议朝廷用兵，结果疲弊天下，却没取得半点功劳，陛下纵然念在旧情不加杀戮，岂能不将其贬黜以谢天下呢？"

言官们也纷纷提议，应该将吐突承璀斩首。

李绛亦奏："陛下今日不责罚吐突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陛下将如何处置？如果诛杀，则是同罪而异罚，被杀之人绝对不服；如果赦免，那么人人只顾保命，谁还愿意在战场上奋死拼杀？愿陛下舍不忍加罪之心，行不可改易之典，使天下将帅有所惩劝！"

宪宗无奈，只好在两天后把吐突承璀贬为军器使（兵器总监）。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然而，吐突承璀表面上的职务虽然降了，可宪宗对他的宠幸依旧，他在朝中的实际影响力也丝毫未减。自德宗以来，当权宦官往往能暗中左右藩镇节度使的人选，所以凡是军队将领企图当上封疆大吏的，通

常都会向权宦行贿，最后也总能达到目的。

作为宪宗最为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自然也不例外。

李绛对这种宦官弄权的现象极为不满，所以经常在宪宗面前揭露吐突承璀的种种专横不法之举。宪宗有一次听烦了，忽然变色：“你说得太过分了！”

李绛当即泣下，至为恳切地说：“陛下视臣为心腹股肱，如果臣畏惧权贵，明哲保身，知而不言，是臣辜负陛下；但若是臣据实而言，陛下却不愿意听，那就是陛下辜负了臣！”

在宪宗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重用宦官，在这一点上他比德宗好不了多少。但是，宪宗和德宗最大的区别，也是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优点之一，就是听得进逆耳忠言。

此刻，当宪宗意识到李绛的良苦用心后，马上压下了心头的怒火，也用一种诚恳的态度说：“贤卿所言，都是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所以，朕才能听见原本听不到的。贤卿不愧为忠臣，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就像今天一样。”

李绛看吐突承璀不顺眼，吐突承璀当然也不会让李绛的日子好过。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绛忽然接到了一纸调令。准确地说，这是一纸升迁令——把他调离了翰林院，擢升为户部侍郎。

李绛苦笑。

他知道，这肯定是吐突承璀在背后对宪宗施加了影响。之所以把他调离翰林院，就是不让他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而之所以把他升为户部侍郎，则是有意把他放在火炉子上烤。

为什么说户部侍郎是火炉？

因为户部主管财政，而宪宗朝廷经过去年的战事之后元气大伤，亟须大量输血，尤其是宪宗本人，更是视财政增收为第一要务。所以，这个户部侍郎就必须生财有道，更要有替朝廷和宪宗大肆聚敛的本领。

李绛有这种本领吗？

没有，所以他惨了。

果然，李绛刚上任没多久，宪宗就找他谈话了，说：“按照惯例，户部侍郎除了打理国库，更要想办法向宫中的内库进奉‘羡余’（财政收入的盈余部分），可你上任以来从不进奉，这是为何？”

李绛回答得很坦率：“陛下身为天子，不应该以聚敛钱财为务。”

宪宗大感冤枉：“如今河南河北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数千里，长期沦陷于吐蕃之手。朕日夜都想洗雪祖宗的耻辱，可财力不足，不得不尽力储蓄。倘若不是为了这个，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存那么多钱干什么？”

宪宗说得没错，他确实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皇帝，他存钱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李绛想了想，觉得自己有点错怪天子了，连忙正色道：“一般的地方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此换取朝廷的恩宠，尚且为天下人所不齿，何况臣掌管户部，更应该以身作则。户部所管理的，都是陛下的财物，无论收入还是支出，一律登记在册，怎么可能有盈余？如果只是把国库里的东西移到内库就算是盈余，那这跟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差别？这种欺君之事，臣不敢做。”

宪宗闻言，对李绛的正直很是欣赏，从此对他更加器重。

吐突承璀处心积虑要李绛的好看，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给李绛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这实在是让吐突承璀懊恼不已。

当然，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随后的日子，吐突承璀一直在耐心地寻找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整垮李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元和六年十一月，吐突承璀还没来得及整垮李绛，自己就东窗事发了。

吐突承璀有一个手下叫刘希光，时任弓箭库使。此人暗中收受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贿款二万缗，企图为其谋求藩镇节度使的职位，不料被人告发，经有关部门查实后，宪宗立刻将刘希光赐死。

刘希光虽然死了，但这个案子没完，因为还有很大的疑点——一个小小的弓箭库使，有什么能耐替人谋求节度使的职位？

案情明摆着——刘希光背后肯定有人。

谁？

傻瓜也知道，躲在幕后大搞腐败的那只黑手就是吐突承璀。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很快就挖出主犯吐突承璀，然后就把这起案件的完整卷宗送到了宪宗手上。

看着这份证据确凿的结案报告，宪宗无语了。几天后，宪宗断然下诏，把他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逐出了朝廷，贬为淮南监军。

宪宗为自己的“大义灭亲”很是自豪了一把，随即对李绛说：“朕把吐突承璀赶走了，这件事办得怎么样？”

还用问吗？这事办得太漂亮了！李绛大有神清气爽之感，赶紧说：“朝臣们都没想到陛下会如此果断！”

宪宗毫不掩饰他的自得之色，说：“这小子不过是个家奴罢了，以前因为他当差的时间久，所以对他特别包容；但是一旦犯法，朕拿掉他，就跟拿掉一根羽毛一样！”

宦官吐突承璀与文臣李绛的这场博弈，最终以吐突承璀的出局而告一段落。

尽管这个吐突承璀并未就此落败，短短三年后就将重返帝国的政治舞台，但此刻的李绛毕竟少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换句话说，没有了吐突承璀的掣肘和排挤，李绛的生存空间就显得敞亮多了，其仕途发展自然也要比过去顺畅。

元和六年十二月末，吐突承璀被贬一个月后，长期参与决策却无宰相之名的李绛终于被宪宗擢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了实至名归的帝国宰相。

在此之前，裴垍已因中风离开相位，目前与李绛同朝为相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原太常卿权德舆，去年九月以礼部尚书衔入相；另一个是原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今年年初以中书侍郎衔入相。

权德舆是个老好人，凡事模棱两可，没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更谈不上什么政治能量。相形之下，李吉甫就要比他强势得多。所以李绛拜相之前，朝堂政务基本上是李吉甫一个人说了算。但是，随着李绛的入相，李吉甫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因为李绛不是权德舆。说白了，李绛本来就不是那种随时俯仰的人，他连皇帝都敢顶撞，又怎么可能去迎合李吉甫呢？

自从李绛拜相后，他和李吉甫就经常当着宪宗的面死磕。

每当二人同时上殿奏事，精明的李吉甫总是“逢迎上意”，顺着宪宗的口气说话，而耿直的李绛则是该反对的反对，该驳斥的驳斥，不止一次把李吉甫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由是二人有隙”（《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元和六年的这个冬天，宦官与文臣的博弈刚刚落下帷幕，宰相之间的激烈比拼就开场了……

两个宰相的斗法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春，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新年还没过，李绛就把元义方贬出了京师，外放为鄜坊（今属陕西）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愧，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

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

宪宗再次报以赞赏的眼色，就说了一个字：“然。”

李吉甫顿时一阵眩晕，心里连连叫苦。

三个回合，李绛连得三分，而李吉甫却三场皆败，得了个鸭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书省后，李吉甫失魂落魄，瘫软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一副大难将至的模样。（《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李吉甫，越发信任李绛。要是李绛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神色紧张地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谏了？”

从宪宗对待李吉甫和李绛的不同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宪宗李纯可以说是个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来个皇帝里面，他应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

出类拔萃的。

也许正因为此，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不断地付出努力，从而在几年后成功平定两河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未让宪宗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把他变成第二个德宗。

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他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

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

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讨伐，会自动归顺朝廷。

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终于很罕见地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

李吉甫大为庆幸。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来看，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渐次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

李绛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刑罚，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须严令诸道秣马厉兵，同时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

效法，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很显然，李绛是打算用离间计分化两河藩镇。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绛抢了风头，自然极度不甘，几天后又屡劝宪宗对魏博用兵，并声称开战所需的军费和粮草皆已齐备，就等皇帝一声令下了。

宪宗动心了，于是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几年前朝廷大张旗鼓地讨伐成德，结果却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气未复，人人厌战，若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祸乱。更何况，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经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虑。”

宪宗闻言，终于一脸兴奋地拍案而起：“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

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可臣担心还有人会蛊惑圣听。”

宪宗厉声道：“朕意已决，谁能蛊惑？”

李绛当即拜贺：“若能如此，诚乃社稷之福。”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绛的计策非常成功——魏博果然爆发了内讧，并很快就归顺了朝廷。

这诚然是社稷之福。只可惜，这并非李绛之福。

因为，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也就到头了。

不出李绛所料，田怀谏终究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所以刚刚坐上节度使的位子，军政大权就落入了家奴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小人得志，全凭个人好恶，肆意任免将领，终于触犯了众怒。九月的一天，魏博数千将士忽然哗变，杀了蒋士则及数十个党羽，然后找到都知兵马使田兴，全部跪倒在他面前，一意要拥立他为留后。

田兴这个人，跟两河诸藩的骄兵悍将有很大的不同，史称他“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资治通鉴》卷二三八）。也就是说，田兴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而更像是个有勇有谋、智虑深远的儒将。

这样的人，当然有他自己的处世原则，也不会在从天而降的利禄面前一下子迷失本性。他知道，节度使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尤其是两河藩镇，这几十年来遵循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如今他一个外人夺了这个宝座，就等于坏了这个老规矩，河南河北的其他藩镇会作何感想？

此外，虽然如今各个藩镇弑上夺权、拥兵自立的情况很普遍，但朝廷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承认的。换言之，如果朝廷觉得有必要，或者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兵讨伐。因此，如果他在将士的逼迫下上了这条“贼船”，就必须做好与朝廷刀兵相见的准备。而这一点并不符合田兴的个人意愿。也就是说，田兴内心对李唐朝廷依然怀有相当程度的忠诚，并不想在纯粹利益的驱动下走上这条“乱臣贼子”的不归之路。

所以，尽管将士们极力拥戴，可田兴却一直不肯点头。

达不到目的，将士们当然也不肯散去。

僵持许久之后，田兴知道自己要是再不答应，很可能马上会有杀身之祸，于是只好勉强同意。但与此同时，田兴也跟将士们约法三章：一、不能杀田怀谏；二、遵奉朝廷法令；三、向朝廷奉上魏博的典册图籍，请朝廷任命各级官吏。

将士们同声承诺。田兴这才命人把田怀谏迁出了节度使府，然后接管了军政大权。

十月初，魏博将士拥立田兴的消息传到朝廷，同时，魏博当地的监军宦官也把田兴的归顺之意向朝廷作了奏报。宪宗大喜过望，立刻召见宰相，对李绛说：“魏博的情况跟你的预判丝毫不差！”

李吉甫在一旁醋意大起，赶紧抢着说：“应立即派遣中使（宦官）前往宣慰，以观其变。”

“不可！”李绛斩钉截铁地说，“如今田兴向朝廷奉上了土地和军民，坐等朝廷任命，如果不乘这个机会推诚安抚，结以大恩，而是派人取回当地将士要求节度使旌节的奏表，然后朝廷才加以任命，这对于田兴来说，恩德就不是来自朝廷，而是来自将士，其感激之心必然不如现在直接任命来得大。所以臣建议，立刻授予田兴节度使旌节，机会一失，悔之无及！”

宪宗顿时犯了踌躇，一时举棋不定。

李吉甫为了阻挠李绛，马上去找平日刻意结交的枢密使（宦官）梁守谦，希望他出面劝劝皇帝。梁守谦随即对宪宗说：“按照惯例，这种时候都要派中使前往宣慰，如果让魏博破了此例，恐怕不太妥当。”

宪宗也觉得有道理，立刻派宦官张忠顺前往魏博宣慰，准备等他回朝复命后再作定夺。数日后，李绛才得知中使已经出发的消息。眼看和平解决魏博问题的良机马上就要错失，李绛心急如焚，连忙入宫去见宪宗，说：“朝廷恩威能否重建，就在这一次了，机会如此难得，为何要白白扔掉？此事的得失利弊十分明显，希望陛下不要再犹疑了。估计张忠顺现在可能刚过陕州，陛下立刻下诏任命田兴为节度使，应该还来得及。”

宪宗沉吟半晌，说：“要不……先任他为留后，看看情况再说？”

李绛急了：“田兴如此恭顺，自愿遵奉朝廷法令，主动献上土地军民，朝廷若不赐予他超乎寻常的莫大恩典，就不可能让他产生无与伦比的感激之情。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赶紧下诏吧！”

看着李绛一脸急切诚恳的表情，宪宗思虑再三，终于点头同意。

十月十九日，宪宗发布了一道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书——正式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

宣慰使张忠顺尚未回朝，诏书便已送抵魏博。连日来心中惴惴的田兴简直可以说是受宠若惊。历来发动兵变、自领军政的藩镇将帅运气最好的也不过是被朝廷任命为留后而已，可田兴万万没料到，朝廷此番出手竟如此阔绰，居然让他一步到位成了节度使！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将士们则欢声雷动。

数日后，李绛进一步向宪宗提出：“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如果不给予超乎所望的重赏，就无以安抚其士卒之心，更无以震慑其四邻藩镇。臣建议，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予魏博。”

李绛这一招实在够狠，狠得让好一段时间丧失了发言权的宦官们忍不住跳了起来，纷纷对皇帝说：“给得太多了！其他藩镇要是都学他们，还拿什么给？”

宪宗也心疼了。

朝廷辛辛苦苦攒这么一点钱，难道就这样撒给河朔的骄兵悍将？

天子思前想后，终究还是有些舍不得。

可是李绛却不依不饶："陛下为何爱惜小财而无视大计？这点钱买的是一镇的人心啊！钱用完了还会来，机会一失则永不复返。假如朝廷派十五万人去打魏博六州，就算一年收复，所花的钱又何止一百五十万缗！"

宪宗想想也对，最后一咬牙，说："朕省吃俭用攒这些钱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平定天下！该花的时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库里也没用！"

于是，天子豁出去了。

在一百五十万缗之外，天子又无比豪迈地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赋税和徭役。

元和七年十一月初六，宪宗命朝臣裴度带着一百五十万缗和免除一年税役的诏令来到了魏博。魏博军民奔走相告，欢声如雷，仿佛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宣慰仪式上，有几个人站在欢腾喧闹的人群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后相顾失色，长叹一声道："倔强者果何益乎！"（《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桀骜不驯、反抗朝廷者，到头来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几个人是相邻藩镇派来刺探虚实的。

魏博正式归顺了。

田兴不仅用最隆重的礼节接待钦差大臣裴度，而且陪着裴度到魏博各州县挨个视察了一遍，把中央的指示精神传达到了魏博的每一座军营和每一间农舍。紧接着，田兴又主动上表，请求朝廷委派节度副使，并奏报下属官职出缺九十人，请求朝廷予以任命。最后，田兴郑重其事地向全境军民重申——从此以后，魏博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严格执行朝廷法令，按时缴纳各项赋税，力争早日把魏博建设成为两河地区最和谐、最稳定的模范藩镇。

魏博和朝廷当着两河藩镇的面如此眉来眼去、卿卿我我，顿时把成德、平卢等镇的老牌军阀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这不是在煽动两河藩镇的将士都起来造节度使的反吗？

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忙不迭地派人去找田兴，使尽浑身解数，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劝他一定要和朝廷决裂，重新回归两河藩镇的怀

抱。

然而，田兴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李师道恨不得把田兴碎尸万段，随即气急败坏地派人去跟宣武（今属河南）节度使韩弘说：“我们和田氏约定了世世代代的攻守同盟，现在这小子居然把咱给卖了，你也痛恨吧？我正打算联合成德去讨伐他，不知你意下如何？”

韩弘回话说：“我不管那么多，我只知道奉朝廷之命行事，你的军队要是一过黄河，我立马派兵拿下你的曹州（今山东定陶县）。”

李师道沉默了，此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二月七日，宪宗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刺激两河诸藩，又趁热打铁，给田兴赐名“弘正”。

浩荡皇恩一次次沐浴魏博，把田兴一次次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也把两河诸藩一次次搞得怒火中烧。可是，尽管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魏博的归顺无异于在两河诸藩的心上插了根钉子。

这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次胜利并没有依靠战争手段，而是一次纯粹运用谋略的“和平演变”。

林肯说过：“摧毁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变成朋友。”李绛显然就是这么做的。然而，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麻烦也来了。

因为他太聪明、太能干了，让宪宗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身为人臣，如果什么事都料事如神，把皇帝的风头抢光了，那么长此以往，皇帝威信何在，脸面何存？

事实上，就在魏博正式归顺的当月，宪宗就已经流露出对李绛的猜忌和不满了。那是在延英殿的一次廷对上，宪宗先是跟几个宰相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事，接着忽然话锋一转，说：“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

李吉甫和权德舆对视一眼，连声说微臣不敢。

李绛很清楚，这话不是说给李吉甫和权德舆听的，而是冲着他来的。

因为自从拜相以来，他一直坚持“举贤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初贬谪元义方时，宪宗就对他起过一次疑心，这回又旧话重提，目的当然还是要敲打他。

李绛趋前一步，坦然自若地说：“如果一个人跟臣非亲非故，臣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加以任用，那又怎么敢用丝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要看其才干是否与官职相称，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核监督，谁能逃得过？”

宪宗知道自己说不过李绛，只好强作笑颜：“对，贤卿说得有道理。”

话虽这么说，但宪宗和李绛彼此都很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

随后的日子，李吉甫和李绛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死磕，老好人权德舆则始终当骑墙派，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宪宗对这个宰相班子越来越不满，遂于这一年二月罢免了权德舆，不久就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

武元衡其实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的。此后，因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召了回来，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在西川待了几年，颇有政绩，而且把当地蛮族也安抚得服服帖帖，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宪宗现在想为宰相班子输入新鲜血液，自然就想起了这个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

武元衡的回朝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今后的藩镇事务上，很可能会逐渐采取强硬立场。因为李吉甫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

至此，朝廷三个宰相有两个是鹰派，只有李绛一个是鸽派，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这年岁末的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李绛说：“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从几个月前暗示李绛不要搞裙带关系，到现在直接指责李绛结党营私，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宪宗如今对李绛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

然无存了。

李绛当然知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古人君最讨厌的事，莫过于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说他们结党。‘结党’听起来令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却往往无凭无据。东汉末年，凡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称为‘朋党’，从而遭到禁锢，被剥夺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的惯用武器，请陛下明察！再者说，君子本来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结党吗？”

说出这番话的同时，李绛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宪宗已经不想留他了。所以，与其灰溜溜地被人赶下台，还不如急流勇退，辞职走人。

此后，李绛以足疾为由数度上表请辞。宪宗正中下怀，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将他罢为礼部尚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绛下台的第二天，几年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承璀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长安，复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

李绛罢相，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宪宗的猜忌，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始终不敢过于倚重文臣。换言之，在宪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的一种重要力量，尽管吐突承璀几年前让朝廷吃了很大的苦头，可宪宗仍然固执地认为——吐突承璀虽然无力对付藩镇，但用来制约文臣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许，文臣李绛和宦官吐突承璀的这种权力跷跷板，只是宪宗施展帝王术的必然结果，不能作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证明，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元和中兴”。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与善于纳谏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中枢政治的糜烂，几乎很多情况下都是始于阉宦的恃宠弄权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在宪宗李纯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实践了前者，因此得以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可同时也很“用心”地实践了后者，以致最终命丧宦官之手，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就烟消云散。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武元衡被刺案

在李吉甫和李绛的斗法中，始终处于下风的李吉甫最后居然胜出了，这实在是令他喜出望外，同时也让他充满了世事难料的感慨。

喜悦和感慨之余，李吉甫当然要竭尽全力报答天子隆恩了。

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李吉甫立即向宪宗进言："淮西不像河北，四周没有援兵，朝廷用以防备淮西的常驻部队有几十万人，国家的人、财、物力都无法再维持，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宪宗也意识到收拾淮西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下诏削去吴元济的官爵，并任命严绶为招抚使，会同宣武等十六道兵马讨伐吴元济。

吴元济一边出兵抵御，一边遣使向成德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求救。王承宗和李师道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断然拒绝。

李师道很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当然不愿坐视朝廷平灭淮西，可同时又想保存实力，不想拿老本去帮吴元济拼命，一时颇为踌躇。他平日豢养的一帮死士见状，就向李师道献计："打仗最急需的，莫过于粮食和物资。眼下朝廷的江、淮赋税都储存在河阴仓（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桃花峪），我等愿秘密前往，将其付之一炬，并招募一批人潜入洛阳，在闹市中抢劫商家财物，并纵火焚烧东都宫殿，闹他个天翻地覆。如此一来，朝廷还没来得及平灭淮西，就要先解救自己的心腹之患，这也算是支援吴元济的一个策略。"

李师道闻言大喜，遂依计而行。

此后不久，东都洛阳陆续发生了一些骚乱事件，令当地士民人心惶惶。这一年四月十日深夜，河阴转运院又突遭一伙身份不明的歹徒攻击，守卫十余人被杀，院中储存的钱三十余万贯、帛三十多万匹、谷子三万多斛全部被焚毁。

消息传到长安，满朝震骇。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求皇帝罢兵，可宪宗坚决不同意。

讨伐淮西的战争继续进行。然而，战况却并不理想。

由于朝廷参战部队众多，号令不一，协调困难，因此一直没取得实质进展。五月，宪宗命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并视察战况。

裴度回朝后向皇帝表示，局势仍然对朝廷有利，平定吴元济只是时间问题。宪宗遂坚定了讨伐的决心。

李吉甫在去年十月朝廷对淮西开战不久就病逝了，此后宪宗便把用兵事宜全部交给武元衡负责。王承宗遣使入朝替吴元济游说，武元衡将使者轰出了中书省。王承宗恼羞成怒，一再上书诋毁武元衡。

这一年六月三日，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夏日清晨，天还没有亮透，武元衡就已经行色匆忙地走在上朝的路上。

前线战事正酣，事务异常繁忙，所以武元衡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此刻，他脑中还在想着昨日未处理完的一批紧急公文。武元衡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宁静的早晨，一场杀身之祸已悄然向他袭来。

武元衡和几个侍从刚刚走出他所居的靖安坊的东门，前方的薄雾中突然射出几支利箭。侍从们大惊失色，当即逃散。还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几个身手矫健的刺客就已经冲到他的坐骑前。

一道刀光闪过，武元衡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

刺客捡起首级，扬长而去。

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同时，另一位主战派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通化坊遭到了行刺。

不过，裴度比武元衡幸运。刺客的刀虽然砍在了裴度头上，但裴度头戴的毡帽极厚，所以只是受伤，并没有死。被砍伤的裴度翻身落马，掉进路边的阴沟里。刺客正欲冲上去再补一刀，却被裴度的侍从王义从背后一把抱住。

王义死死抱住刺客，同时大声呼救。刺客惊恐，慌忙一刀砍断王义的手臂，夺路而逃。

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震惊了整座长安城。

居然有人敢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砍了当朝宰相的脑袋，还砍伤了另一位大臣，这无疑是对朝廷的极大藐视和挑衅。

宪宗暴怒，严令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捉拿凶手，并下令各坊大门加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同时宣布自即日起，宰相出入皆由金吾卫骑兵保护，而且要求卫兵箭上弦、刀出鞘，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状态。

首善之区陷入了一片莫名的恐怖之中。此后数日，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上朝，以致宪宗一连数日都要在金銮殿上枯坐，苦苦等候文武百官上朝。

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当朝大员此刻都成了惊弓之鸟，令一直躲在暗处的刺客窃笑不已。

几天后，得意扬扬的刺客又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们居然致信给负责抓捕的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说："谁先急着抓我，我就先把谁干掉！"

相关的各级官员接到刺客的恐吓信，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随后，案件的调查陷入了停滞。各级衙门仿佛开始了一场缉拿凶手的比赛——不是比谁先抓到凶手，而是比比看谁的动作更慢。

因为大家都不想成为下一个武元衡。

就在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人忍无可忍地跳了起来。他叫许孟容，时任兵部侍郎。许孟容跑去见宪宗，悲愤难当地说："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抓不到凶手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随即奏请宪宗起用裴度为宰相，以此表明朝廷讨伐淮西的坚定态度，并请宪宗严令各级官府缉拿凶手，挖出幕后主使。

六月八日，宪宗下诏，命京师各级衙门全力搜捕，抓到凶手者赏钱一万贯，赐五品官；胆敢窝藏刺客的，满门抄斩！

诏书一下，京师的官员们才动了起来，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连公卿家里的夹墙、阁楼都没有放过。

然而，几天前还致信问候各级官员的那伙刺客仿佛人间蒸发了。整座长安城被翻了个底朝天，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

两天后，案情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有人提供了一条重大线索，说成德进奏院（成德镇驻京办）的几名士兵这些日子一直鬼鬼祟祟的，形迹非常可疑。有关部门当即将张晏等八名成德士兵逮捕，宪宗即命京兆尹和监察御史会审。

疑点就这样集中到了成德的王承宗身上。宪宗想起不久前王承宗曾连续上疏，极力诋毁武元衡，便把那些奏疏全都公之于众。

在没有其他线索和嫌疑人的情况下，王承宗的这些奏疏不啻于是他谋杀武元衡的铁证。六月二十三日，亦即武元衡被刺的二十天后，审查部门终于得出结论——张晏等人就是刺杀武元衡的凶手，而幕后主使就是王承宗。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五天以后，张晏及其党羽十四人被开刀问斩，长安士民们无不拍手称快。

可是，真相真的大白了吗？

此时此刻，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正在他的府上一边举办庆功宴，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有几个人坐在他的身边。他们刚刚从长安秘密潜回淄青，并给李师道带回了一样东西——一颗血肉模糊、业已腐烂的人头。

那是武元衡的头。

李愬雪夜袭蔡州

在裴度养伤的二十多天里，宪宗派驻重兵在他的府第日夜守卫，并多次派宦官前去慰问。有人劝皇帝把裴度罢官，借此安抚王承宗和李师道。宪宗勃然大怒："如果免了裴度的官，等于使奸人的计策成功，将置朝廷尊严于何地？我起用一个裴度，足以打败两个敌人！"

六月二十五日，宪宗任命裴度为宰相，让他继续挑起平定淮西的重担。裴度对宪宗说："淮西是朝廷的心腹之疾，不能不除，而且朝廷既已出兵，两河藩镇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所以朝廷绝不能半途而废！"

七月五日，宪宗下诏历数王承宗的罪行，不许他朝贡，并敦促他幡然悔过，自缚请罪，否则将择日讨伐。

就在朝野上下一致认定王承宗就是刺武案的幕后元凶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一个消息，令宪宗和朝臣们大出所料。

消息是东都留守吕元膺送来的。他破获了一起由李师道幕后操纵的未遂暴动，从人犯的口供中获知——李师道才是谋杀武元衡的真凶。吕

元膺上奏宪宗：李师道暗杀宰相，企图血洗洛阳，实属罪大恶极，不可不诛！

至此，宪宗才得知武元衡被刺的真相。但是，朝廷目前正对淮西用兵，并且又已跟王承宗翻脸，实在是无力讨伐李师道了。此刻，宪宗最关心的就是淮西的战况。只有尽快讨平淮西，朝廷才能腾出手来对付李师道和王承宗。

然而，淮西战况实在是令人无语。

从去年十月到这年九月，讨伐吴元济的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一年，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被宪宗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这个严绶，就是当年上表弹劾王叔文的家伙。此人毫无军事才能，唯有一点非常突出，那就是花钱如流水。从到任的那天起，严绶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后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毫无节制地犒赏士卒，收买人心；二是拼命贿赂宦官，构建人脉。

宰相裴度屡屡强调严绶无能，请皇帝更换主帅。九月底，宪宗终于下决心撤掉了严绶，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前线总指挥。

然而，韩弘的到任却没有为战局带来转机。

因为韩弘与严绶半斤八两。他虽不像严绶那么会花钱，可他却想利用这场战争壮大自身的实力。他知道，对手活得越长久，他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就越重，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多，所以淮西太早平定对他没什么好处。

说白了，韩弘就是想养寇自重。

一连两任主帅都不得其人，淮西战局逐渐陷入泥潭，而与此同时，河北的形势也一点不让人省心。

元和十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出劫掠，把相邻诸镇搞得寝食难安。于是卢龙（治所幽州）、横海（治所沧州）、义武（治所定州）等镇纷纷上疏请求讨伐王承宗。

宪宗早就想收拾成德了，河北诸镇的奏疏正中他的下怀。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宪宗下诏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卢龙等六道兵马出兵讨伐。

至此，李唐朝廷不得不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危险的。不少朝臣想起了德宗当年的覆辙和教训，以宰相韦贯之为首的多

位大臣力劝宪宗罢兵，等平定淮西再回头对付成德。

然而，对于大臣们的谏言，宪宗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反战派对此忧心忡忡，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这个一意孤行的天子。最后，大臣们只好悻悻地闭上嘴，静观事态的演变。

这一年六月，从淮西前线突然传回一则战报，令沉寂数月的罢兵呼声再度响起，并且空前高涨。战报称，淮西前线的主将之一、时任唐邓节度使的高霞寓在铁城（今河南遂平县西南）一带与淮西军会战，结果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此前，前线的参战部队偶有小胜皆会向朝廷夸大战功，凡是打了败仗则一律隐瞒。可这一次实在是败得太惨，只好如实奏报。

消息传来，满朝骇愕，反战派抓住此事大造舆论，并入宫力谏。然而，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宪宗对此依旧不以为然。他若无其事地扫了大臣们一眼，说："慌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当务之急是撤换不能胜任的将帅，及时为前线部队调配粮饷，岂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

朝议的结果只有一个——接着打。

所有宰执大臣中，只有裴度一人坚持站在皇帝一边。

在反战派看来，宪宗这么做简直就是丧失理智。可在裴度眼中，天子这么做就叫义无反顾、百折不挠。

淮西战局的最终结果到底如何，目前还没有人敢断言，大家只知道皇帝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这些日子，反战派大臣一个接一个掉了乌纱。继去年年底宰相张弘靖、翰林学士钱徽等人被免职之后，本年七月，宰相韦贯之亦被罢免，九月，右拾遗独孤朗又遭贬谪……

宪宗似乎在用行动向朝野表明，他收拾跋扈藩镇的决心绝不动摇。

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地同时进行着。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五月，淮西已打了两年多，出兵九万余人，耗费粮饷无数，却未建尺寸之功。而成德打得更艰难，一年多来，朝廷出兵十多万，战线回环数千里，却因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指挥，所以劳而无功；此外，因战线过长，每次从后方运送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牲口，导致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最后，诸道军队都想保

存实力也是朝廷无法取胜的原因之一。仅以卢龙为例，朝廷与成德开战后，卢龙节度使刘总仅仅打下一个县城，就停驻在边境五里处按兵不动。光他这支军队，每月耗费的开支就达十五万贯，令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很显然，这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已无力支撑。去年新任的宰相李逢吉力劝皇帝罢兵，一切等平定淮西再说。宪宗李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矛盾之中。经过多日犹豫，宪宗不得不在五月十七日下令，撤销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

河北草草收兵，让宪宗觉得丢尽了面子。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朝廷已经全力以赴对付吴元济，可淮西依旧固若金汤。

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议，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师老财竭，再次建议皇帝全面停战。只有裴度默不作声。宪宗问他的意见，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战。"

宪宗又惊又喜："卿真能为朕走这一趟？"

裴度说："臣观吴元济上表，显然已是势穷力蹙，之所以仍在顽抗，只因我军诸将心志不一，不能合力围歼。臣亲赴前线后，诸将担心臣抢了他们的功劳，必争相出战。"

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三，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临通化门为他送行。裴度说："臣此去若能灭贼，才有脸回来见陛下；若不能灭，臣永远不回朝廷。"

宪宗闻言，为之感怀泪下。

八月底，裴度抵达前线。很快，他就找到了淮西战局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就是监军宦官在战场上所起的反作用。

众所周知，宪宗爱用宦官。在朝中，他用宦官制约文臣，是为了防止他们大权独揽，架空皇权；在战场上，他也爱用宦官，目的是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居功自恃。所以，自从与淮西开战以来，宪宗就为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驻了监军宦官。

而问题就出在这些阉宦身上。这帮人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经验，却偏偏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宦官们就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是打了败仗，他们就把屎盆子扣

在将领头上。有这样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在战场上掣肘，这仗能打得赢吗？

找到了症结所在，裴度当即奏请宪宗，很快就把所有监军宦官悉数召回了长安。于是，将领们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战场上的形势顿时有了改观。

可是，罢废监军宦官固然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并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平定淮西。所以，裴度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困局。尤其是考虑到不堪重负的中央财政，裴度面临的难题就不仅是如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对于一场胶着了将近三年的战争而言，什么才是最快的决胜之道？

唯一的答案就是，抛弃正面对决的打法，采用出奇制胜的战术。

这年十月，正当裴度在郾城的统帅部里苦思冥想的时候，前线的一位大将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份密报。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作战计划，一个相当大胆的作战计划。

看完计划，裴度不禁拍案叫绝："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资治通鉴》卷二四○）

裴度口中的这位常侍，就是李愬（其中央官职是散骑常侍）。

李愬向裴度呈上的计划是——由他亲率一支奇兵绕过敌军主力，穿越淮西腹地，出其不意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

李愬是德宗时代的名将李晟之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李愬虽是官二代，"以父荫起家"，但本人"有筹略，善骑射"（《旧唐书列传八十三》），并不是全凭老子荫庇的纨绔子弟。李愬入仕后，历任卫尉少卿、晋州刺史、太子詹事等职。元和十一年，淮西前线主将高霞寓遭遇惨败，被贬为归州刺史，朝廷调派荆南节度使袁滋接任，没想到袁滋还是碌碌无功。李愬意识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当即上表自荐，要求上阵杀敌。宰相李逢吉认为他才堪大用，便向宪宗举荐。宪宗遂将袁滋贬谪，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

元和十二年正月，李愬来到前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愬到任后非但没有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反倒对士卒们放话说："天子知道我天性柔弱，善于委曲求全，所以命我前来抚恤你们，至于领兵作战，就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了。"

由于淮西战事迁延日久，且败多胜少，士卒们早已厌战，因此听了李愬的话，人人笑逐颜开。李愬的亲信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流露了不满之意。李愬告诉他："前任袁滋消极怯战，吴元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听说我来了，肯定会严加戒备。我现在故意示弱，就是想让他放松警惕，然后我们才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亲信恍然大悟。随后，淮西军发现朝廷新任的这位主帅和那个袁滋是一路货色，果然放松了戒备。

接下来的日子，李愬一边继续放烟幕弹迷惑对手，一边却暗中积极筹划，准备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突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很显然，要实施这个突袭计划，就必须对淮西的兵力部署和各种战略情报了如指掌。而要获取对手的准确情报，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就是招降敌军的将领了。

元和十二年二月，李愬手下的巡逻兵抓到了淮西的一员骁将丁士良。此人骁勇善战，曾屡败朝廷军，所以将士们都想把他剖腹挖心，以泄其愤。李愬命人把丁士良带到面前，见他面无惧色，视死如归，当即赞叹他是"真丈夫"，并为其松绑。

丁士良感恩戴德，誓愿为李愬效死。

当时，李愬面前的主要对手是淮西大将吴秀琳，此人是吴元济的左膀右臂，长期据守文城，令官军始终不能前进半步。丁士良主动请战，设计擒获了吴秀琳麾下勇将陈光洽，进而逼降了吴秀琳。

李愬不战而入据文城后，对吴秀琳及其降众极为优待，对每个人都进行了妥善安置，凡是家中有父母者，还发给钱帛，让他们回家尽孝。淮西降卒们无不感恩流涕。从此，各地的淮西士卒纷纷来降。李愬的麾下部众也一扫厌战情绪，重新焕发了斗志。

毫无疑问，李愬所做的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攻心。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将领，必须善于攻城；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则不仅要善于攻城，更要善于攻心。

唯其如此，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愬显然深谙此道。

随着淮西将士的相继归降，李愬对淮西的整个战略部署逐渐了然于胸。“愬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曲，由是，贼中险易、远近、虚实尽知之”（《资治通鉴》卷二四○）。

元和十二年五月，在吴秀琳的建议下，李愬又设计擒获了淮西的骑兵将领李祐。此人也是骁将，此前与朝廷军多次交锋，斩杀官兵甚众，所以李愬的手下都嚷嚷着要杀他。可李愬还是亲自为他松了绑，并待之如上宾。

随后，李愬安排李祐住进了自己的帅帐，每天晚上都与他促膝长谈。不久，李愬更是不顾左右的竭力反对，任命李祐为自己的警卫队长，将麾下的三千精锐交给了他。

李愬的礼贤下士和推诚待人令李祐感动不已。

最后，李愬终于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关于蔡州的情报。

李祐告诉他，吴元济的主力全都部署在前线和边境，守卫蔡州的都是一些老弱羸兵，完全可以乘虚直抵其城，等到淮西各地将领得到消息，吴元济早已束手就擒。

李愬闻言大喜，愈加坚定了奇袭蔡州的决心。随后，李愬暗中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每天亲自带队操练，为袭取蔡州做了充分的准备……

接到李愬的报告后，裴度第一时间就批准了他的计划。

吴元济的末日到了。

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李愬亲率九千精锐，分成前、中、后三军，悄悄向蔡州进发。此行除了李愬本人和几个参与绝密计划的心腹将领之外，没人知道队伍要往哪里开拔。

李愬只对将士们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都不要问，一直往东走。

部队经过急行军，迅速占领了六十里外的张柴村，稍事休整之后再度出发。将领们满腹狐疑地追问此行的目的地，李愬才对众人说：“攻击蔡州，活捉吴元济！”

毫无心理准备的将领们闻言，顿时大惊失色。

此时，暴风雪越发猛烈，旌旗冻裂，士兵和马匹接二连三地冻毙倒

地。天色如浓墨一般，咫尺不辨方向。自张柴村以东就是淮西腹地，唐军将士们艰难地跋涉在厚厚的积雪上，人人心中忐忑不安，不敢去想道路的前方会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然而，没有人知道，就是这条雪夜中的道路，将带领他们走向辉煌的胜利。

从张柴村出发后，又经过七十余里的急行军，李愬的部队终于在十月十六日凌晨抵达蔡州城下。望着蔡州城墙上漆黑的雉堞，李愬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三十多年了！自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吴少诚拥兵割据之后，唐朝的中央军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站在这块土地上了。但是李愬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李唐中央的旗帜就将在蔡州的城头上高高飘扬。

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李祐带着一支敢死队在城墙上凿孔，悄无声息地攀上城楼，暗杀了熟睡中的守门士兵，只留下更夫继续打更，然后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

鸡鸣雪停之际，李愬已经率兵突入了第二重城门。

此时此刻，吴元济依旧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唐的中央军会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夜晚“空降”到他的蔡州城里。

负责警戒的将领发现敌情后，慌慌张张地冲进节度使府，叫醒了吴元济，惊慌失措地报告——外面突然出现了一支军队，可能是官军杀进来了！

吴元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笑骂道：“官军？你不是疯了吧，哪来的官军？顶多就是一些俘虏和囚犯闹事而已，等天一亮，老子就把他们通通杀了！”

话音刚落，又有人冲进来报告：“两重外城均已陷落，内城也已被包围了！”

吴元济这才隐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但还是不愿相信城池已经陷落。他骂骂咧咧地披衣起床，说：“都别慌！这一定是前线的士兵回来找我讨要冬装，没什么大不了的。”

吴元济刚刚走进庭院，就听见外面人马杂沓，并传来清晰的传令声：“常侍有令……”紧接着就是一片雷鸣般的响应之声，听上去足有

万人之众。吴元济顿时一脸惊愕：“常侍？什么常侍？怎么到这里来了？”

意识到朝廷已经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吴元济才大梦初醒，慌忙组织士兵登上内城抵抗。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此时的吴元济已是瓮中之鳖。而这场历时三年的淮西之战，结局也已经毫无悬念。

十六日，李愬率部攻破了内城的第一道门，占领了武器库。次日凌晨，又对南面的第二道门发起进攻。这是吴元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气急败坏地召集所有部众进行殊死抵抗。一时间，城头上箭如雨下。李愬担心强攻会付出太多伤亡，遂下令焚烧城门。蔡州城的百姓纷纷抱上柴草前来助阵。到了傍晚，城门终于倒塌。吴元济见大势已去，只好举手投降。

至此，割据三十多年的淮西宣告克复。李愬雪夜袭蔡州，从此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长途奔袭的经典战例。

十月十八日，李愬命人将吴元济押送京师。当天，淮西各州的叛军余部两万多人相继归降。李愬采取了安抚之策，除了一个吴元济外，对淮西的所有将士、官吏等概不追究，让他们各任原职，因而很快就稳定了淮西的人心和局势。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宪宗李纯登兴安门接受献俘，并斩杀吴元济，向宗庙社稷献祭。

当吴元济那颗桀骜不驯的头颅应声落地的一瞬间，宪宗李纯的目光正穿透长安上空厚厚的云翳，像一把寒光闪烁的利剑一样，遥遥地指向河北。

淮西已经重归帝国的怀抱，那个骄纵跋扈、长年割据的河北还能逍遥多久呢？

此时，宪宗李纯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是的，李纯坚信，这个饱经战乱、动荡失序的老大帝国，很快就将在自己的手中回归一统，并且再度崛起，重绽盛唐时代的熠熠光芒。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三首·之二》）

此刻，就连十几年前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放逐的刘禹锡，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个多年来一直忧国忧民却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已经悲喜交集地预见到，一页承载着盛唐余晖的历史，正在被天子李纯缓慢而坚定地掀开。

这一页历史的名字，就叫“元和中兴”。

平藩的最后一战

吴元济败亡后，两河的跋扈藩镇不免生出了唇亡齿寒的忧惧。

最恐惧的莫过于淄青的李师道。

李师道本以为把鹰派宰相武元衡除掉，朝廷就会偃旗息鼓、鸣金收兵，没想到宪宗却力排众议，决意死战，还起用了同属鹰派的裴度为相。而裴度去淮西走了一趟，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顽抗多年的吴元济。不难想见，朝廷的下一个打击目标肯定就是他和王承宗。

形势的逆转令李师道彷徨无措。他手下一个叫李公度的官员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趁机劝他送上人质和土地，向朝廷谢罪，以免步吴元济之后尘。计无所出的李师道只好听从。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李师道遣使奉表，主动请求派长子入朝为质子，同时献出了沂、密、海三州之地，以表自己归顺朝廷的诚意。

宪宗接受了李师道的投诚，随即派遣左散骑常侍李逊前往郓州（淄青治所，今山东东平县），名为“宣慰”，实则是敦促李师道履行他的承诺。

李师道一服软，河北那几个尚在观望的藩镇更是慌了手脚，赶紧纷纷表态。

二月，横海（治所沧州）节度使程权遣使上表，愿带着全族人一起入朝，把横海镇拱手还给中央。

四月，成德的王承宗也把两个儿子送往朝廷为质，同时献出德、棣两州，并自愿将征税和官吏任免权归还朝廷。

同月，卢龙的刘总也在大将谭忠的劝说下向朝廷上表，宣誓效忠。

短短几个月内，跋扈多年的两河藩镇全都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李唐中央的权威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服从。朝野上下一片欢欣。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历尽劫难的帝国很快就将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实现渴盼已久的中兴。

然而，通向光明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惯性。小到个人的生活习惯，大到历史的积习，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对于当惯了土皇帝、逍遥了半个多世纪的跋扈藩镇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所以，最先向朝廷低头的李师道，第一个反悔了。

——朝廷的宣慰使李逊来到淄青后，看到的不是李师道诚惶诚恐的笑容，而是一张阴晴不定的脸。

在两河藩镇中，淄青是拥兵最多、据地最广的一个镇，所以，要让它放弃享受已久的特权，自然也没那么容易。而且，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有道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居安思危”的道理很容易懂，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做。

比如李师道的老婆魏氏。

一听说李师道要把宝贝儿子送到长安当人质，魏氏肺都气炸了。在她看来，淮西的吴元济打不过朝廷，那是他自己无能，凭什么我们就要不战而降？

魏氏咽不下这口气，便怂恿另外几个姬妾，一起向李师道猛吹枕边风：“自从先司徒（李纳）据有淄青以来，我们就拥有十二个州的土地，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割让给朝廷？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兵力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顶多跟朝廷打一仗，就算打不过，到时候再献也不晚啊。”

李师道原本就不太情愿投降，现在被枕边风一吹，立马改变主意。

宣慰使李逊到了郓州后，看出李师道心里有鬼，就问他打算什么时候让儿子入朝。李师道却跟他打哈哈，说：“前些时候因为父子之情，舍不得让他走，而且将士们一再挽留，所以耽搁了一下，未及动身。现在有劳钦差亲自前来，我怎敢再三心二意？只不过，到长安路途遥远，还得让犬子再准备准备。”

李逊让他给个准信，以便自己回朝复命。李师道还是支吾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李逊没再说什么，掉头就走，回朝后立刻向天子奏

报："李师道冥顽不灵，反复无常，恐怕不对他用兵是不行了。"

宪宗勃然大怒，决意出兵讨伐。

没有人喜欢流血，但是历史往往钟情于暴力。自古以来，历史老儿每掀开新的一页，似乎都要蘸上万千生灵的鲜血，否则那一页历史就无法书写。

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的事。

元和十三年七月初，宪宗下诏历数李师道的罪行，命宣武、魏博、义武、武宁、横海五道兵马共同讨伐李师道。

削平强藩的最后一战就此打响。

从这一年秋天起，五路兵马开始对淄青发起全面进攻。挟着淮西新胜的余威，朝廷军在这一战中可谓势如破竹。

首先建功的还是李愬。

十二月，时任武宁节度使的李愬与淄青军连战十一场，每战皆捷，并于三十日攻克淄青的战略要地金乡（今山东金乡县）。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初二，宣武节度使韩弘攻陷考城（今河南民权县）；十三日，李愬攻下鱼台（今山东鱼台县）；十七日，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大败淄青军，斩杀一万余人；二月初，李愬之兄李听接连攻克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东）、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怀仁（今江苏赣榆县）；稍后，李愬又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市）再败淄青军，占据丞县（今山东枣庄市东南）。

开战不到半年，朝廷军便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淄青全境，各条战线捷报频传。

郓州城里军心浮动，人人都开始紧张地思考退路。

李师道平日里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可实际上是个外强中干的货色。接到前线一连串的败报后，李师道惶惶不可终日，很快就病倒了。

眼看大军四合，李师道紧急动员郓州百姓修筑城墙，疏浚壕沟，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可是，还没等官军杀到郓州，李师道的脑袋就被人剁了下来。

动手的人是淄青的都知兵马使刘悟。

早在各路官军挺进淄青的时候，刘悟就已经在准备退路了，所以数战皆败，屡屡后退。李师道的帐下幕僚警告他，说刘悟别有用心。李师道赶紧把刘悟召回，准备杀他。又有人劝李师道，说大敌当前，如果临阵斩将，必然动摇军心。李师道耳根子一向很软，想想也有道理，就采取安抚策略，送了很多金帛，把刘悟放了回去。

可没过几天，又有人警告李师道，说他这是在纵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李师道这才下定决心，暗中派了两个使者到刘悟军营，命行营兵马副使张暹把刘悟干掉。不料张暹一向与刘悟交好，就偷偷跟他报信。刘悟愤然而起，杀了那两个使者，于二月初八连夜率领大军杀回郓州城。守城士兵只做了轻微的抵抗便纷纷投降。李师道在绝望和恐惧中躲进了茅房，最后还是被刘悟搜了出来。

李师道瘫软在地，不停地磕头求饶。

刘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我奉天子密诏把你押送京城，可瞧瞧你现在这样子，有何脸面去见天子？”

话音刚落，刘悟便一刀砍下了李师道的脑袋。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师道的首级被快马送至长安。

淄青宣告平定。

自代宗广德年间迄今，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横跨黄河南北，占据三十几州，赋税自享、官吏自任、一切自专的跋扈藩镇，至此全部回归李唐中央。分裂动荡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唐帝国，终于重新回到了大一统的轨道上。尽管表面的辉煌之下仍旧隐藏着诸多难以根除的隐患，可宪宗李纯已经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刻感到自豪。

十三年了。

从登基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尽管这十三年的岁月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一切总算有了令人满意的报偿。

此时此刻，李纯完全有资格站在李唐王朝列祖列宗的灵位前，无比豪

迈地宣称——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缔造了伟大的中兴。

是的，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无论是李唐先皇的在天之灵，还是帝国的万千臣民，都应该为宪宗李纯感到骄傲，都应该为这一刻的到来额手相庆。

而一个缔造了中兴伟业的帝王，接下来该干些什么呢？

是再接再厉，巩固到手的胜利果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是满足现状，躺在光芒四射的功劳簿上，开始随心所欲地享受人生？

宪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历史很快就证明，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对于李纯个人来讲，这样的选择也许无可厚非，但它却一举终结了李纯刚刚开创的中兴伟业，同时开启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而帝国命运的K线图，也随之在短暂的企稳反弹后，重新掉头向下，再度回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就屡创新低的下降通道上……

当然，此时的李纯看不到这一切。

中兴：一朵刹那凋零的昙花

实际上，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之后，宪宗李纯就开始变了。“淮西既平，上（宪宗）浸骄侈。”（《资治通鉴》卷二四○）

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一改从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由于当时淄青、成德等镇都尚未平定，禁军大将张奉国、李文悦私下认为，此时朝廷仍是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他们又不敢抗命，只好请宰相裴度代为劝谏。

裴度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就在一次奏事的间隙，委婉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宪宗一听，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了宰相，顿时火冒三丈，几天后就把张奉国和李文悦双双贬谪了。等禁军修完麟德殿，宪宗像是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命禁军疏浚了龙首池，另外又建了一座全新的承晖殿。

裴度知道自己怎么劝也是白搭，只好把嘴闭上。

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地上马了。于是，国库的钱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往外流。

为了平衡收支，也为了获得更多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就跟晚年的德宗如出一辙。当时，朝中的两个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出了发生在天子身上的微妙变化，赶紧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在财政收入的大蛋糕上划出了一块专供皇帝的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羡余”，每个月都准时送进天子的小金库。

这两个人，一个叫皇甫镈，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另一个叫程异，时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

可想而知，这两个聪明人很快就博得了天子的宠幸。

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有跟裴度等宰执大臣商议，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皇甫镈和程异为宰相。

诏书一下，朝野哗然。

虽然唐朝历史上多有财政大臣入阁拜相的成例，但其人选通常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而现在的问题是，皇甫镈和程异的资历、品行、德望等等，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比如皇甫镈，据说就是靠贿赂宦官吐突承璀上位的，这种人要是当了宰相，整个朝廷岂不成了权钱交易的乐园？

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满朝文武骇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

宪宗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了裴度的极大不满。裴度当即和另一个宰相崔群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可宪宗却置若罔闻。

裴度愤然提交了辞呈。

宪宗压下辞呈，只回了两个字：不准。

裴度忍无可忍，再度上疏，说：“皇甫镈和程异都只是‘钱谷吏’‘佞巧小人’，当宰相只会让天下人耻笑。倘若陛下执意任命二人为相，那臣只好告老还乡。臣要是不辞职，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要是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陛下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

宪宗看见这道奏疏时，气得脸都绿了。

裴度居然把他最宠信的两个大臣说成“佞巧小人”，这不明摆着骂他有眼无珠吗？

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仅仅是上面那些，而是裴度在奏疏最后说的这一句：“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资治通鉴》卷二四○）

这句话把宪宗彻底惹毛了。

朕无非就是任命两个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犯得着如此危言耸听、上纲上线吗？

在宪宗看来，裴度对这件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问题并不是出在皇甫镈和程异身上，而恰恰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表面看来，裴度坚决反对这项任命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可事实上，此举背后分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

什么动机？

四个字：把持朝政。

身为首席宰相，而且是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的宰相，此时的裴度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此情况下，他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到相位上分享他的权力，所以才会死活不让皇甫镈和程异入相。

说白了，裴度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压异己，其目的就是要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宪宗更加确信自己提拔皇甫镈和程异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们一年能进贡多少“羡余”，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的角度来说，这项任命都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

所以，看完裴度的奏疏后，宪宗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最后，皇甫镈和程异还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进入了宰相班子。

从“宰相风波”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裴度留在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淄青尚未平定，朝廷在军事上还不得不倚重于他。

可尽管如此，宪宗还是没有忘记敲打裴度。

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等人的面，说：“身为人臣，应当尽力为朝廷分

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至极，希望诸卿好自为之！”

听到这种话，皇甫镈表面诺诺，心里却不住窃笑。

因为谁都听得出来，这话是说给裴度听的。

面对天子不点名的批评，裴度坦然自若地回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则向来以利益相交，因此才被称为‘朋党’。”

宪宗冷笑：“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裴度不卑不亢地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其实，类似的君臣对话在宪宗一朝已经多次重演，一点也不新鲜。比如几年前的宰相李绛，就曾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说到底，所谓“朋党”云云，往往只是个幌子而已。李绛和裴度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他们没有私欲、一心为公，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

这就叫功高震主。

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就消失殆尽了。短短两个月后，宪宗便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将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裴度，却只能黯然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

没有人为他送行。

只有灞桥边上绿意盎然的两行垂柳，无言地目送他远去。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高贵的动物，但没有人能否认，人同时也是最多欲、最贪婪的动物。穷困潦倒的时候，人人渴望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渴望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又想要流芳百世，真的建立了流芳百世的事功之后，人又会想要什么呢？

四个字：长生不老。

宪宗李纯虽然是真龙天子，不用像普通人那样白手起家，可他对金钱、权力、成功的渴望，却丝毫不亚于普通人。他当上皇帝的时候，国库里的钱不多，小金库的钱更少，而天下的藩镇又天天跟他叫板，所以他需要用钱来发动战争，然后通过战争摆平藩镇，最后成就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

如今，李纯什么都有了——既不缺钱，也巩固了权力，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自然要考虑长命百岁的问题了。

早在元和十三年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开始频频征召天下方士。皇甫镈赶紧投其所好，向天子举荐了一个叫柳泌的方士。此人自称能炼出长生不死的丹药。宪宗大喜，立刻召柳泌入京，让他住进兴唐观，专门为自己炼药。

柳泌在兴唐观里埋头鼓捣了一段时间，没搞出什么名堂，怕自己脑袋不保，就忽悠宪宗说：“天台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灵草。如果派臣去当那里的地方官，保证能炼出长生之药。”

很显然，这个大忽悠是想找一条退路，离皇帝远一点，一旦事情败露，他就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可宪宗却对柳泌毫不怀疑，二话不说就任命他为代理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赐三品金紫衣，命他即刻走马上任。

谏官们得知此事，大感荒谬，纷纷上疏反对：“历代人君喜欢方士的很多，可还从来没有让他们当地方官的。”

李纯不以为然：“如果竭尽一个州的力量，就能换来人君的长生不老，做臣子的又何必吝惜？”

群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柳泌在台州逍遥了一年多，天天驱使官吏和百姓上山采药，可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柳泌不敢再忽悠了，慌忙带着老婆孩子逃进了山里。他的顶头上司、浙东观察使得知柳泌弃官而逃，赶紧派人去追，最后总算把他抓住，派人押回了京师。

按理说，这个大忽悠这回是必死无疑了。

然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

滋润。

因为当朝宰相皇甫镈罩着他。

一看柳泌露馅，皇甫镈唯恐承担连带责任，便千方百计替他求情。当时宪宗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估计脑子也糊涂了，便又既往不咎地任命柳泌为翰林待诏，让他继续炼丹。

面对如此“钟情”于自己的天子，柳泌在心里哭笑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把忽悠进行到底。

随后的日子，兴唐观便日夜弥漫着浓酽而神秘的药香。没人知道柳泌每天都往青铜大釜里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都有许多丹药出炉，旋即被送进了宫里。

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如获至宝，每天准时服用。

很快，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发现，天子的气色越来越难看，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

起居舍人裴潾忍不住上疏，说：“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士越来越多，臣不免心生疑惑。纵使天下真有神仙，也必然是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怕被人知道，哪有拼命跻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技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岂可轻信他们的话，乱吃他们的药？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所能承受的。陛下若不信，臣请陛下让献药者先吃一年，则真伪自辨。”

宪宗吃药正吃得上瘾，一见此疏，勃然大怒，当即把裴潾贬为江陵县令。

很显然，此时的李纯已经听不进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而所有阿谀谄媚之辞，他则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底，以皇甫镈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议着要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的基础上，再加上“孝德”二字。

这显然是很无聊的文字游戏，不过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场就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最讨巧。既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轻轻松松就能讨领导欢心，大伙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李唐朝廷也不全是摇尾派。

比如宰相崔群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在里面了，没必要再加。"

皇甫镈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里，说："崔群居然对陛下吝啬'孝德'二字，无人臣理！"

宪宗大怒，当即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将他贬为湖南观察使。

种种迹象表明，自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死了。眼下的宪宗李纯，只是一个脸色青黑、目光散乱、行为乖张、性情暴戾的中年男，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专心致志地追求财货、贪慕虚荣、幻想长生的昏庸帝王。

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就了他的奋发有为，可终于到来的巨大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而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变成一朵昙花——一朵刹那盛开又转瞬凋零的昙花。

其实，早在元和十四年夏天，也就是裴度被贬谪出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正直而清醒的朝臣，不无悲凉地向宪宗进了一番忠言。

进言者叫李翱，是个史官。他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一句话是——"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

当然，忠言都是逆耳的。李翱的奏疏旋即被宪宗抛诸脑后。

而后来的历史果然被李翱不幸言中。

宪宗之死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尽管时令已是初春，但料峭春寒依旧笼罩着长安城，令坊间闾巷的士民瑟缩不止，身心备感压抑。而对于大明宫中的宦官和宫人来说，这个萧瑟森冷的春天更是比往年的任何一场春寒都让他们感到痛苦难挨。因为此刻，侵袭他们的不仅是外在的寒气，还有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寒意。

这种寒意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就像死神冰冷的呼吸，时刻在你的耳边和脸上吹拂，令你无从抵挡，无所逃遁。

是的，这是死亡的寒意。它来自大明宫的心脏、帝国最至高无上的地方——中和殿。

那是天子李纯住的地方。

从去年暮冬开始，在所有宦官和宫人眼中，这座雍容富丽的天子寝殿就成了一座阴森可怖的地狱——每天都有人活生生地走进去，然后变成僵硬的尸体被抬出来。

所有被杀的人都是无辜的，而那个残忍的凶手就是他们的天子——李纯。

李纯天天服食丹药，丹中所含的铅汞之毒日复一日地流进他的血管，渗透他的骨髓，最终在他体内燃起了一团暴戾而疯狂的火焰。服侍他的宦官和宫女稍有不慎，就会被这团烈焰无情地吞噬。世人都说伴君如伴虎，可此时的李纯显然已不是虎，而是一个疯狂的屠夫、一个嗜血的恶魔。

为此，中和殿的宦官和宫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看见死亡的利剑就悬在自己头顶，却不知它什么时候会落下。

内侍宦官陈弘志跟其他人一样，日夜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一迈进中和殿的大门，陈弘志就会全身战栗，手脚冰凉。而每次值班结束，多活一天的庆幸刚刚从心里升起，下一轮恐惧便已重新把他攫住。

有人说，对死亡的恐怖比死亡本身恐怖得多。

陈弘志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比死还惨的日子，到底哪一天才是个头呢？除了无可奈何地成为下一个冤死鬼，自己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绝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等死。陈弘志想，肯定要想个摆脱绝境的办法。

可是，办法在哪呢？

作为天子李纯最宠幸的当权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这些日子也活得很不安。

他担心的倒不是像那些内侍宦官一样无端被砍掉脑袋，而是担心天子一旦驾崩，自己的权力和富贵便会随之烟消云散。

吐突承璀之所以能在宪宗一朝备享荣宠，得益于他在宪宗的身边最久——早在李纯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吐突承璀就是他最贴心的奴才。因此，李纯即位后，吐突承璀就成了最得势的宦官。即使是后来因战败和受贿而两次遭贬，他还是能屡仆屡起，圣眷不衰，自始至终都牢牢执掌着禁军大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吐突承璀能否在宪宗死后继续在朝廷混，而且混得好，就完全取决于他跟当今太子的关系。

可要命的问题就在这里。

吐突承璀跟当今太子李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相当不好。

事情要从八年前的立储之争说起。

其实早在元和四年，宪宗就已把长子李宁册立为太子了。可没人料到，李宁福分太浅，才当了两年太子便一命归西了。继任储君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次子澧王李宽（后改名李恽），还有一个就是三子遂王李宥（后改名李恒）。

按惯例，澧王李宽排行靠前，理应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他虽是“长”，却非“嫡”（其母只是普通宫女），而排行靠后的遂王李宥才是真正的嫡子（其母郭贵妃是宪宗元配），所以，大臣们都认为应该册立遂王李宥。

就在这个时候，吐突承璀上场了，力劝宪宗立澧王李宽。

吐突承璀之所以力挺澧王，原因很简单；澧王是庶出，在这场储位之争中处于绝对弱势，大臣们都站在遂王一边，吐突承璀在这个关键时刻挺澧王，一旦他真的入主东宫，必定对吐突承璀感恩戴德。吐突承璀立下了定策之功，日后也就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然而，吐突承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宪宗虽然宠幸他，可在立储的大事上，还是要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所以当即否决了吐突承璀的提议，决定册立遂王。

也许是为了让争议的双方面子上好看一点，并使得最后的结果看上去更有说服力，宪宗在立遂王之前，特意让时任中书舍人的崔群为澧王代拟一份让表，表示他自己主动让贤。没想到崔群却不以为然地说：“把属于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才叫让，遂王是嫡子，太子之位本来就是他的，澧王凭什么让？”

宪宗一听，顿时哑口无言，只好作罢。

元和七年七月，遂王李宥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同时改名为李恒。

吐突承璀跟李恒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他极其失落，同时也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惧。

现在，宪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显然已经时日无多。吐突承璀很清楚，如果坐视太子李恒继位为帝，日后肯定没他的好果子吃。所以，吐突承璀决定孤注一掷，赶在宪宗驾崩之前，废掉太子李恒，改立澧王李恽。

吐突承璀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废立行动，频频召集手下将领和其他要害部门的宦官，日夜密谋。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吐突承璀一动，太子李恒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李恒大为惶恐，赶紧派人去跟他的舅父、司农卿郭钊问计。没想到郭钊却给他回话说："殿下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须忧虑。"

郭钊这话当然没错，可问题在于这是一句废话。在权宦吐突承璀蠢蠢欲动、图谋废立的当口，在东宫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郭钊叫李恒"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基本上就是叫他坐着等死。

李恒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却苦无对策。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帮人站出来力挺他了。

他们是另一拨宦官，为首的是梁守谦和王守澄。

梁守谦时任右神策中尉，手里掌握了另一半禁军。虽然唐朝尚左，梁守谦的级别和地位低于吐突承璀，但在这样一个即将变天的非常时刻，级别和地位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武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守谦足以和吐突承璀打个平手。至于最后的胜负结果如何，就要看谁的出手更狠，动作更快了。

王守澄时任内常侍，跟陈弘志一样，是在宪宗身边侍奉的几个主要宦官之一。平日里，像王守澄、陈弘志这样的内侍宦官，肯定是不敢跟吐突承璀叫板的，可在目前这种特殊时刻，王守澄和陈弘志的优势显然要比吐突承璀大得多。因为天子病重，已经多日没有上朝，此时宫

闱中的情况外臣几乎一无所知。不要说吐突承璀，就连宰相恐怕也很难获悉大内的消息。就此而言，像王守澄和陈弘志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角色，很容易就能掌控宫中的局势。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帝国政局的发展方向。

而梁守谦、王守澄等人之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力挺太子，理由其实也跟吐突承璀一样——无非是想抢一个定策之功，以便保住现有的爵禄富贵，并且在新天子的朝廷里得享更多的权力和荣宠。

至此，博弈双方都已选好各自的阵营，押上各自的筹码。最终究竟鹿死谁手，就取决于天子李纯在最后一刻的态度了。

此刻，在吐突承璀看来，自己的胜算要比对手大得多，因为自己是天子最宠幸的人，当然最有可能影响天子的决定。虽然李恒已经做了八年的太子，可只要促使天子李纯下一道诏书，李恒就得乖乖地滚出东宫，把储君的宝座让给澧王。

一道诏书的事，难吗？

不难。

吐突承璀信心满满地想。

然而，吐突承璀过于低估内侍宦官的能量了。

正常情况下，要影响天子的决策，他当然比王守澄、陈弘志之流更有发言权，可有时候，后者能做的事情绝对是吐突承璀鞭长莫及，甚至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什么事情？

弑君。

是的，就这么简单。李纯如果是一个活人，要影响他确实很难，可要是把他变成一个死人，王守澄、陈弘志等人就可以代替他做出各种决定。换言之，只要李纯一死，内侍宦官们就能以大行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生杀予夺的天子大权。

这一点，是吐突承璀万万没想到的。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深夜。大明宫中和殿。

三两盏金黄的蟠龙烛台在黑暗中擎起几簇微弱昏黄的光亮。飘忽的风从半掩的雕花长窗迤逦而入，幽幽地拂动龙床周匝的透明帷幔。床上那个脸色蜡黄、面目浮肿的中年男子迷迷糊糊地翻了一个身，喉咙里发出几声低沉浊重的闷响。他的半张脸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闪闪烁烁，另外半张隐没在浓墨般的黑暗中。

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向龙床迫近。忽然，殿外掠过一声夜枭的哀鸣。黑影顿了一顿，打了一个寒噤。四周重新陷入一片死寂的时候，鬼魅般的黑影已倏忽飘至龙床之前。

那个中年男人犹自沉睡，对近在咫尺的杀机浑然不觉。他的眼皮在轻微而急促地跳动，似乎在梦中遭遇了令他骇异恐怖的事物。他或许很想逃离那个身不由己的梦境，回到这个由他主宰一切的现实中来；他或许还习惯性地在梦中发号施令，可梦中的一切已无法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最后，这个曾经睥睨天下、指点江山的男人终究没有醒来。

当那个鬼魅般的黑影毫不犹豫地出手，李纯就只能永远留在自己的梦中了。

其实，李纯没有醒来不见得是件坏事。至少，他不用面对被家奴手刃的耻辱；至少，他无须感受死不瞑目的悲愤；至少，他不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蓦然发现——现实有时候远比噩梦更为恐怖。

这一夜，大明宫的上空大风骤起，恍如声声呜咽的鬼哭。中和殿的数扇长窗被凶猛袭来的夜风訇然吹开，龙床周匝所有蟠龙烛台的火光在同一瞬间遽然熄灭。

殿中的黑影摇晃着身子，步履凌乱地冲出了阴森幽暗的大殿。

一弯娥眉月凄清地挂在大明宫阙的一角飞檐上。

月光惨白，照见了一张脸。

那是陈弘志同样惨白的脸。

“庚子，（宪宗）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这就是唐宪宗李纯的最后结局，也是他遗留在史册上的最后一点印迹。

一代中兴之主，竟然以如此方式告别人世，告别他的帝国和臣民，着实令人错愕，更令人不胜唏嘘。

在有唐一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宪宗李纯是第一个被宦官弑杀的皇帝。

在他身后，这一幕还将不断重演。

宪宗之死，历史上被称为“元和宫变”。后人普遍认为谋杀李纯的凶手就是内常侍陈弘志，而幕后主使就是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甚至有人怀疑，太子李恒和他的生母郭贵妃也间接参与了这场弑君的阴谋。

当然，谁也没有确凿证据把这对母子推上历史的被告席，人们只能从李恒事后的一系列行为和表现，猜测他很可能事先知道了宦官们的密谋。即便他没有参与其事，至少他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对这帮宦官的弑逆罪行予以了默认，并在事后予以了充满讽刺意味的褒赏和嘉奖。

仅此一点，太子李恒就难辞其咎。

不过，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换言之，这个世界历来只看重结果，过程通常不必过问，只要目的达到，手段也往往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只要除掉天子李纯，太子李恒和他的拥趸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了。

宪宗被弑的当天夜里，以王守澄为首的内侍宦官就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药物中毒。

发布消息的同时，早已准备就绪的梁守谦带领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进了吐突承璀的府邸，不由分说，将其砍杀，紧接着又冲进澧王府，杀死了李恽。

吐突承璀可能至死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又为何会死得这么难看。

除掉所有对手后，李恒立刻以帝国储君的身份，大举犒赏拥立有功的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并赐予神策左、右军官兵每人五十缗钱。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初三，亦即宪宗暴崩的短短几天后，二十六岁的太子李恒就在宦官的簇拥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唐穆宗。

李恒登基次日，就把宰相皇甫镈逐出了京师，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数日后，又命人将柳泌乱棍打死，将其他所有方士也全部流放岭南。

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

朝野上下当然都会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可人们最多也就是把宪宗之死归咎于迷信方士和误食丹药而已，没有人会想到皇帝的真正死因。所以，对于新君李恒贬逐奸相、流放方士的举措，长安士民无不拍手称快。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新天子英明睿智的表现。

既然朝廷公开发布的宪宗死因是药物中毒，那么罪魁祸首皇甫镈等人当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是给宪宗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有谁会怀疑李恒的动机呢？

其实，李恒的动机还真是值得怀疑。

诚然，恶名远播的皇甫镈和他推荐的那些招摇撞骗之徒早就该被清理了，如今的下场是他们应得的。可如果我们就此把新君李恒视为一个英明之主，那显然是把事情看得太过粗浅了。客观上，李恒固然是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主观上，他难道不是想让皇甫镈和那些方士为宪宗之死背黑锅吗？

说白了，只有把皇甫镈等人推到被告席上进行宣判，李恒才能躲在历史的幕后，不动声色地把弑父弑君的鲜血悄悄抹掉。

也许，这才是李恒的真实动机。

第四章 青春皇帝，玩乐天子

蠢蠢欲动的河北

我们说穆宗李恒绝非英明之主，这并不是在冤枉他。因为他上台后的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让一度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

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刚刚脱掉为宪宗服丧的孝服，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了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却充耳不闻。

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更是花钱如流水。只要他乐意，随时随

地都会赏赐给那些倡优戏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

李恒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几个人是谁啊？"

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

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

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便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你们的话去做。"宰相们听到都很高兴，觉得当今天子在这一点上和宪宗早年还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这是社稷之福、人臣之幸啊！所以他们纷纷向皇帝道贺。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天子李恒对待谏言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从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从未停止过娱乐活动，而滥赏的毛病也一点没改。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军政大权。

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之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

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

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应该说，穆宗朝廷制定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否则当年的代宗和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

然而，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转眼又是一个新年。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

从这个年号中，不难看出穆宗朝廷的乐观情绪。李恒和他的大臣们自认为元和时代足以为帝国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可他们没有料到，那个桀骜不驯的河北是不可能轻易就范的——只要有一丝火星，燕赵大地就将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

事实上，从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的阳光就已经逐渐消隐了。此刻，帝国的上空已然乌云四合。

事后来看，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偶然事件促发的。

这一年春天，从幽州忽然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可能吗？

可此事千真万确，因为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的。

据说，刘总弑父杀兄之后，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出现可怕的幻觉，看见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找他索命。刘总寝食难安，就在府中供养了几百个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而且每天从军府回来，刘总就挤在和尚堆里跟他们一块诵经念佛，这样才觉得安心。可一旦晚上一个人独处，他还是会心惊肉跳，不敢睡觉。久而久之，刘总就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和神经衰弱。最后刘总不得不横下一条心——要想保

命，就得出家。

对这件事，穆宗朝廷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穆宗君臣倒不是不想趁此机会把卢龙彻底收归中央，而是因为此事太过出人意料，不知道刘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穆宗不敢马上同意刘总的请求，而是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以此试探刘总的反应。

不过，穆宗多虑了。因为刘总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他一再向穆宗上表，言辞真诚，态度恳切，表示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舍宅为寺。穆宗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赐紫色僧衣一套。不过与此同时，穆宗还是命人把天平镇的旌节斧钺跟僧衣一块送了过去，意思是任他选择，假如反悔的话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

朝廷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甚坚的刘总就已经把自己剃了光头。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随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了新任的留后，连夜逃出幽州。直到次日天明，将士们才发现刘总已不知去向。

几天后，有人奏报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

经确认，那就是刘总。

没人知道刘总是怎么死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刘总已将卢龙的后事悉数安排妥当，并没有把一个烂摊子扔给朝廷。

临死前，刘总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提出了将卢龙一劈为三的方案，并推荐了三个出镇的人选。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风宽和，颇得民心；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且熟悉河朔民情；卢士玫，时任代理京兆尹，此人虽是刘总妻子的族戚，但一直在朝中任职，也算是朝廷信得过的人。

除此之外，刘总还把麾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难制的部将全都送到了长安，表面上向他们承诺，说朝廷会赐给他们禄位，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

刘总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应该说是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和他的谋臣们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将大大增强，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

然而，对于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一届李唐朝廷来说，这一切注定只能是空想。

因为，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他更关心的是女人、倡优和美酒。

而时任宰相的崔植和杜元颖也好不到哪去。身为宰辅，他们既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当年的裴度、武元衡等人相去不啻霄壤。

在对待卢龙的事情上，他们一连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他们并没有完整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划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士玫，然后把剩下的卢龙大部全都交给了张弘靖，原因据说是出于对前任宰相的尊重。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张弘靖当年出镇河东时，虽然颇有政绩，但河东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军民历来拥护朝廷，与动不动就拥兵割据的河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张弘靖对卢龙各方面的情况都缺乏了解，如果没有薛平这种熟悉河朔士风民情的人去协同治理，光靠他一个人，绝对镇不住幽州的那些骄兵悍将。

其次，崔植和杜元颖完全不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里，压根就没有兑现当初刘总向这些人作出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不但没得到任何赏赐和任命，而且每次到中书省去求官，都会遭到宰相们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张弘靖到卢龙就任之后，朝廷以为形势稳定了，居然对他们下了逐客令，命他们各回本军，听候差遣。

于是，这帮被朝廷视为弃儿的将士只好带着满腔愤怒回到了幽州。

穆宗和他的宰相们没有料到，他们这么做无异于放虎归山。

很快，他们就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永不臣服的心

燕赵大地，自古民风剽悍。

早在东汉年间，人们就以“幽州突骑，冀州弓弩”来形容河北的兵力之精与战力之强。远的暂且不说，就以唐朝为例，大唐开国之初，窦建德就曾雄踞河北，建立夏朝，与长安分庭抗礼。后来，窦建德虽然在虎牢关下被天纵神武的李世民一战击溃，但“折戟沉沙铁未销”，其旧部刘黑闼旋即狂飙突起，横扫河北，一度恢复夏朝全境，用永不枯竭的豪情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愈挫愈奋、屡仆屡起的慷慨悲歌。

尽管历史的如椽巨笔很快就为血雨腥风的乱世画上句号，尽管盛唐治世的到来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可桀骜不驯的河北从不曾真正低下倔强的头颅。当长安的九重宫阙久已不闻《秦王破阵乐》的铿锵之声，转而充斥缠绵悱恻的《霓裳羽衣曲》时，李唐的天潢贵胄和王公大臣们显然没有料到，河北枭雄窦建德、刘黑闼不死的精魂，已然穿越一百三十年的岁月烟尘，悄然附着在了安禄山、史思明身上，并迅速孕育出觊觎天下的勃勃野心。

刹那间，剽悍无匹的幽燕铁骑便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滚滚南下，一举撕碎了玄宗君臣的太平迷梦，重重摇撼了大唐帝国的万里江山……

长安在恐惧中战栗。

因为，他再次看见了河北永不臣服的心。

当安史之乱的烽烟终于散尽，李隆基的子孙们睁开迷离的双眼，却再也看不见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也看不见那个“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大唐，更不可能再享受那种“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的绮靡生活。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唯有一片“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破碎山河。

而这一切灾难的源头，就是河北。

所以，年富力强的德宗李适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向河北宣战了。然而，德宗的志大才疏旋即招致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灾难——“泾师之变”“四王之乱”接连爆发，河北的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同时称王，朱泚、李希烈之流相继称帝；帝京长安沦陷，德宗流亡奉天，战火燃遍四方，帝国几欲倾覆。

河北，再一次用刀剑向天下人展示了他的野性和能量。

长安的光芒更趋黯淡了。

是励精图治的宪宗君臣挽救了危机深重的帝国。在与河北、淮西等强藩的较量中，宪宗朝廷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终于遏住了藩镇跋扈的气焰，重塑了李唐中央的权威。

河北暂时低下了他的身姿。

然而，一把带血的刀收回鞘中，就表示它不会再拔出来了吗？

不。

因为刀的本性就是嗜血。

因为河北，拥有一颗永远躁动不安的灵魂。

当宪宗李纯猝然离世，元和时代成为历史，所谓的“元和中兴”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它脆弱的一面。耽于逸乐的穆宗李恒以为可以在乃父栽种的大树下乘凉，可他错了。暂时的和平，往往是为下一场战争进行铺垫。大明宫内日夜不息的弦乐笙歌，终究掩不住河北磨刀霍霍的金戈之声。

新的灾难降临了。

河北民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狼性。

这种狼性可以被暂时压抑，却不可被彻底驯服。

可惜，新任卢龙节度使张弘靖不懂得这一点。他以为卢龙既然已经臣服于朝廷，就该无条件接受朝廷的管束，并且无条件地听命于他。

这种想法，导致张弘靖犯了一连串致命的错误。

据说，张弘靖是带着一脸傲慢的表情，坐着八抬大轿，带着长长的仪仗队进入幽州城的。这个前任宰相之所以如此摆谱，显然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河北的这些骄兵悍将和粗人莽夫。而且，他并不介意把心里的这种鄙夷和不屑表现出来。

坐镇幽州后，张弘靖为了显示官威，很少直接跟幽州将吏们打交道，总是十天半月才到节度使衙门露一次脸。处理公务的时候，张弘靖也是寡言少语，始终板着一张自命不凡的面孔。总而言之，在卢龙将士看来，这姓张的从踏进幽州的那一刻起，从头到脚就写着俩字：摆谱。

过去的幽州节度使，大多是军人出身，总能跟手下将士打成一片，即便做不到同甘共苦，至少也能跟士卒们称兄道弟。跟他们一比，张弘靖显然是个另类。

卢龙将士每次看见张弘靖那张臭脸，心里的无名火就直往上蹿。

除了张弘靖，还有他带过来的一个心腹将领也让大伙恨得牙痒。

这个人名叫韦雍。不知是出于张弘靖的授意，还是他自作主张，总之，这家伙经常无故克扣将士们的粮饷，而且执法异常严苛。碰到他心情不好，就对士卒们又打又骂，好不容易心情好了，也要拿他们开涮。

有一次，韦雍到校场上溜达，正碰上将士们军训。他站在旁边看了看，忽然冒出一句："如今天下太平，你们能拉两石重的弓，还不如认识一个'丁'字！"

将士们面面相觑，好多人额头上已是青筋暴起。

韦雍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表现着自己的优越感和幽默感。可他并不知道，这是在往一头狼的伤口上撒盐。

也许，从韦雍嘲笑大兵们目不识丁的这一刻起，他和张弘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初，卢龙将士压抑已久的怨气，终因一件貌似偶然的小事而全面爆发。

事情还是跟韦雍有关。

七月十日这一天，韦雍带着卫队正大摇大摆地逛街，对面一个骑马的军官躲避不及，不小心冲撞了他的卫队前导。韦雍二话不说，立刻命人把军官拖下马来，准备当街杖打。此人宁死不屈，还对韦雍破口大骂。韦雍大怒，旋即奏报张弘靖，将这名军官扔进了监狱。

当天晚上，兵变就爆发了。

乱兵们呼啸着冲进张弘靖的府第，砍杀了韦雍和张弘靖手下的多名军官，然后将张弘靖囚禁，并疯狂哄抢张宅的财物和女人。

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

次日早上，发泄完愤怒的乱兵们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而且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便去找张弘靖谈判。没想到张弘靖还是端着一副臭架子，始终闭口不言。

乱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索性横下一条心——反了！

既然事情已经做下，那就没有收手的道理，干脆把它做大。

当天，卢龙将士便拥立兵马使朱克融为留后，正式揭起了反旗。

这个朱克融，就是建中年间“四王之乱”的魁首朱滔的孙子。

就像一头蛰伏的狼被重新唤醒，此刻的河北已然再度昂起头颅，正对着长安引颈长嚎。

穆宗和他的大臣们听见了吗？

可笑的是，就在卢龙兵变爆发的时候，朝廷的文武百官还在向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进献尊号，称“文武孝德皇帝”。

年轻的天子当然是笑纳了，即日宣布大赦天下。

两天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穆宗和他的大臣们愕然良久，慌忙下诏罢免了张弘靖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同时将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是，刘悟不干。

眼下的卢龙是一座火山，刘悟才不会笨到把自己的屁股放在火山口上烤。他上表说：“还是暂且先把节度使之职授予朱克融吧，然后慢慢再想办法。”穆宗无奈，只好收回成命，默认了此刻的现实。

数日之后，朝廷去年实施的那个诸藩大调动，也结出了意料之中的恶果。

七月二十八日夜，成德兵马使王庭凑发动兵变，杀死了从魏博调来的节度使田弘正，同时残忍地杀害了田弘正的幕僚、将吏和一家老小共三百多人，随即自任留后，并上表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消息传来，满朝震骇。

张弘靖倒了，朝廷还不会如此恐慌，可这个田弘正是李唐中央安抚河

北的一面旗帜，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其实说起来，田弘正已经够谨慎了，可还是没能逃脱灭顶之灾。

当初，从魏博前往成德赴任时，他就把帐下的两千名亲兵一同带了过去。可这两千人的编制并不在成德，要想养活他们，只能由朝廷另行划拨粮饷。田弘正向朝廷请求，不料却遭到度支的拒绝。度支的理由是，成德自有成德的军队，魏博的士兵就应该回到魏博，假如同意你田弘正的请求，破了这个例，那以后其他藩镇也这么干，朝廷如何应付？

应该说，度支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就像当初宰相们把非一般性的藩镇问题当成一般问题来处理一样，此刻的这位度支大臣同样犯了这个毛病——他给出的仍然是一个常规理由，可他并没有顾及到田弘正此刻所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局面。

田弘正四次上表，度支四次拒绝。

在如此缺乏远见的朝廷面前，田弘正只好认命，随后就把两千名亲兵悉数遣回了魏博。

于是，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听到田弘正被杀的消息，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悲愤难当，立刻穿起丧服，命令军队出征。可就在大军即将开拔的时候，李愬突然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

穆宗万般无奈，只好让田弘正之子田布（时任泾原节度使）继任魏博节度使，希望他为父报仇，举兵讨伐王庭凑。

河北的两个重镇相继发生兵变，主动要求出征的名将李愬又在这节骨眼上病倒了，这一切真让年轻的天子既意外又沮丧，沮丧得连看戏和打猎都没了心情。

正当李恒郁闷之际，一大堆坏消息又接踵而至。

八月十日，王庭凑派人刺杀了冀州刺史王进岌，随后出兵占领了冀州；十三日，瀛洲（今河北河间市）发生兵变，乱兵逮捕了观察使卢士玫，将其绑送幽州，致使刚刚划出来的瀛、莫二州重新被卢龙吞并；同日，王庭凑又出兵攻打富庶的深州；九月十九日，朱克融又纵兵在易州（今河北易县）一带烧杀掳掠……

河北危机全面爆发，李恒终于坐不住了。

藩镇们这么瞎闹，不但搅乱了他平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让他这个“文武孝德皇帝”显得很没面子。

穆宗随即发布诏书，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一同出兵，在成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王庭凑执迷不悟，立刻进兵讨伐。同时，穆宗还起用了当初被宪宗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成德两镇招抚使。

十月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兵从承天军旧关（今山西平定县东北娘子关）出发，讨伐王庭凑和朱克融。

然而，战事刚刚拉开，才打了两个月，国库就开始捉襟见肘了。

一贯出手阔绰的李恒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

李恒急忙召集宰相问计。宰相们说：“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却留了张弘靖一命，罪有轻重，请赦免朱克融，集中全力讨伐王庭凑。”穆宗赶紧下诏，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这是自“元和中兴”以来，李唐朝廷首度对藩镇作出的妥协。此举意味着宪宗君臣通过十五年奋斗取得的政治成果，就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穆宗李恒即位刚刚一年，一切便都被打回了原形。

这是李恒的悲哀，更是一个帝国的悲哀。

而此时的李恒并不知道，更多的悲哀还在后面。因为既然有了第一次妥协，就很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率领魏博军队攻打成德的田布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据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呈给穆宗的一道奏疏中说，田布率部离开魏博后，“数月以来，都不进讨”，始终未建尺寸之功。而光他这支部队，每月从朝廷支取的军费就高达二十八万缗。白居易认为，倘若魏博军继续迁延观望，朝廷财政必定不堪重负。

当然，白居易也知道，田布之所以徒劳无功，责任不在他，而在魏博的那些骄兵悍将。

众所周知，卢龙、成德、魏博这三个造反专业户历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尽管他们内部也存在种种矛盾，可一旦跟朝廷产生冲突，他们立马就会抱成一团，枪口一致对外。因为他们很清楚什么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绝不可能为了维护朝廷纲纪而放弃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在朝廷的驱使下自相残杀。

带着这样一群心怀异志的部众出征，田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

有道是祸不单行。除了部众消极抗命、拒不出战之外，老天爷也不让田布的日子好过。

这年冬春之交，田布的驻地一连多日天降大雪，运送粮食和补给的道路被阻断，后方什么东西都运不过来。本来就牢骚满腹的魏博部众这下子更是怨声载道。田布没办法，只好紧急征调魏博辖下六个州的租赋来充当军费。

原本以为这么做可以堵住这些骄兵悍将的嘴，没想到却惹来了更多的指责和抱怨。

魏博将领们纷纷数落田布，说：“按照惯例，奉命出征的军队一旦离开本镇，一切军需都要由朝廷供给。如今田大人却搜刮魏博六州的民脂民膏来养活军队，岂不是让老百姓心寒？田大人，您自己想要克己奉公、讨好朝廷，我们管不着，可六州的百姓何罪，要当这个冤大头？”

面对部众的冷嘲热讽，田布只能忍气吞声，权当没听见。

田布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的，事情迟早会向好的一面转化。可是，田布的乐观精神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因为此刻，有一个人正躲在魏博部众的背后，摇唇鼓舌，煽风点火，一心想把事情闹大，以便将田布整垮，然后取而代之。

这个人，就是被田布视为心腹的先锋兵马使——史宪诚。

史宪诚是奚族人，原本只是田弘正麾下一员不入流的牙将，因田布对他非常赏识，屡屡在父亲面前替他美言，田弘正便把史宪诚提拔为大将。不久，田弘正在成德兵变中被害，田布继任魏博节度使，更是对史宪诚“寄以腹心”，不但任他为先锋兵马使，而且“军中精锐，悉以委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按理说，史宪诚受到田布如此不遗余力的栽培和重用，应该对他感恩

戴德、誓死效忠才对，可田布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懂得知恩图报，还有一种人只会恩将仇报。

史宪诚显然属于后者。

就在田布身陷困境、焦头烂额的时候，史宪诚非但没有为他分忧，反而“阴蓄异志”，在背后处心积虑地搞小动作，利用将士们的不满扩大矛盾，制造事端。

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这一回，老天爷似乎一心要把田布逼上绝路了。由于田布日久无功，穆宗屡屡派遣宦官前来督战，并严令田布即刻救援深州。田布虽明知军心不可用，但更清楚诏命不可违，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率部出发，结果还没碰上成德军，部众就不战自溃，哗然四散了。逃跑的部众大部分投到了史宪诚麾下。

万般无奈的田布仅带着中军八千人黯然返回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数日后，田布召集众将，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众将当着他的面断然拒绝，说：“大帅如果能按河朔的老规矩办事（割据），我们就算死，也会尽力效忠；可要是去打成德，我们绝不奉命。”

就在这一刻，田布彻底绝望了。

他自觉讨伐无功，又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再也无颜面对朝廷，遂留下一封遗书，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了。

史宪诚听到消息，不禁喜上眉梢，对将士说：“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随即自立为魏博留后。

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七日，穆宗朝廷还没来得及弄清魏博到底发生了什么，便匆忙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便又向叛乱藩镇作出了妥协。

眼见朝廷如此迫不及待地妥协，史宪诚在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恐怕就只有鄙夷和窃笑了。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半年多，朝廷的裴度、李光颜、乌重胤等部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士卒每天分

配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财政已无力支撑，穆宗朝廷只能再次妥协。

二月初二，穆宗下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希望他能主动退兵，解除深州之围。

至此，卢龙、魏博、成德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割据状态。从这一年起，直至唐朝覆亡，河朔三镇再也没有被收复过。

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更比一波低的K线图上，如果说“元和中兴”是下降趋势中的一次超跌反弹，那么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视为新一轮暴跌的起点。

而此刻的河北，也就有了放量大涨的动能和屡创新高的空间。

是的，当养尊处优的长安在历史的宿命中日渐萎靡和堕落，就再也没人可以阻止河北的野蛮成长了。

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平心而论，此次镇压河北叛乱，穆宗朝廷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如从兵力上来说，前后共计出兵十七八万，主帅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李光颜、乌重胤也都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还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质问穆宗君臣，他们肯定会强调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二，老天爷太不给力，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继，仗自然没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说，上述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么所谓的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后人研究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来说，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从而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经

太平，就没必要保留太多军队，所以应该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是个玩乐天子，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深究，一听此言，当即予以实施。于是，被裁汰下来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啸聚成群，落草为寇。后来，河北叛乱爆发，这些人便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庭凑，而朝廷军队则面临严重缺员的局面，不得不临时招募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则是一帮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双方优劣立判。在此情况下，不管裴度怎么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颜和乌重胤如何神勇过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

第二，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向前线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监军宦官，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

唐朝历史上，利用宦官制约武将的先例是从乾元元年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就发明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鱼朝恩，让他担任实质上的统帅。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邺城之战遭遇惨败，六十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尽管有此前车之鉴，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未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比如宪宗一朝，就屡屡因为宠幸宦官而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召回了监军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袭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然而，到了穆宗这一朝，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了。监军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则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诸将。更有甚者，有些宦官还把部分精锐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有这样的一帮瘟神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穆宗朝廷不仅派遣宦官去制约将帅，而且本身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指手画脚。

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线将士“不知所从”。很多时候，朝廷会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战”。魏博节度使田布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朝廷造成的。

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也可以算是自取其咎、罪有应得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政治表现，也许只能用下面这八个字——天子昏庸，宰相无能。

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对于这几个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评语，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

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长庆二年春，萧俛、段文昌已陆续离开相位，宰相班子还有崔植、杜元颖、王播三人。

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以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长庆元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是翰林学士。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突出才干，上位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王播，更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本是西川节度使，靠巴结宦官得以回朝，故而颇受朝议抨击。前任宰相萧俛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才愤然辞职的，但穆宗对王播却极为宠幸，一回朝就任其为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

王播一贯善于钻营拍马，当然不会令穆宗失望。一当上盐铁转运使，王播马上大事聚敛，对民间的茶叶经营课以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惹得言官们纷纷上疏，极力反对。可穆宗一看王播生财有道，对他愈加赏识，没过多久就让他入相了，并且仍然保留他的盐铁转运使之职。王播上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显而易见，穆宗登基后任命的宰相，没有一个令朝野满意，更无一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可谓相去不啻霄壤。

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又任命了一个宰相。

此人很有才，诗写得很牛，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就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这个牛人就是元稹。

元稹，字微之，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性聪颖，勤奋好学，故而“少有才名”，年纪轻轻便登第入仕。他和白居易是科举同榜，又是好友，两人差不多同时进入仕途，而且诗名并驾齐驱，冠绝当世。据说宪、穆年间，言诗者必称元、白。元稹的诗，“自衣冠士子，至闾

阁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元稹传》）

由于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能够入仕全凭个人奋斗，因而元稹从政之初，很有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右拾遗，属于谏官之列。

元稹认为，自己既然身为谏官，就应该忠言进谏，指陈朝政阙失，因此上任不久，就给当时刚即位的宪宗呈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疏。

宪宗看完，甚为赏识，随即在延英殿召他问对。

初试啼声就引起了天子的关注，令元稹大为振奋。然而，他的做法却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时的宰执大臣。

在那帮官场老油条看来，这毛头小子的乌纱帽还没戴几天，就敢对朝政大放厥词，分明是不懂规矩，不能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没过几天，元稹就被逐出了朝廷，贬为河南县尉。

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尤其是刚进入官场，最大的优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对一切丑恶现象开炮，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摔了跟头也不长教训。

元稹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学乖。几年后，朝廷起用他为监察御史，命他出使东川。元稹一到任，就捋起袖子挖出了一桩陈年旧案，涉案人是已故东川节度使严砺。

自古以来，权力跟腐败总是一对孪生子，官越大，屁股往往越不干净，差别只在有没有被曝光罢了。元稹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严砺生前曾滥用职权，肆意侵吞下级官吏和百姓的财产，而且数额巨大，随即毫不犹豫地上疏指控。宪宗命人复查，果有其事，但严砥已死，无人抵罪，宪宗一怒之下，就对东川七个州的刺史都进行了责罚。作为严砺的旧属，他们就算没有同流合污，至少也存在知情不举的包庇嫌疑。

元稹此举，再次惹恼了当权人物。

官场就是一张网，无论此官与彼官表面上相距多远，背后都可能存在无形而坚固的利益联结。年轻的元稹看不见这张网，更看不见这张网后面的一切，所以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当时，朝中的几个宰相都跟严砺有很深的私交，一看元稹这小子为了

追求政绩，居然拿死人来做文章，顿时大为恼怒，马上把他调离了长安，让他到东都洛阳去坐冷板凳。

可是，到了东都后，元稹的臭脾气还是没改，没过多久又盯上了他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房式，将他的一些不法之事向朝廷告发。

宪宗命人核查，证实了房式的违法行径，遂将其罚俸一月，同时征召元稹回朝。

不畏权贵、刚直敢言的元稹两次遭贬，却又两次复起，足以表明天子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元稹大感快慰，越发相信自己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元和五年二月，元稹迎着和煦的春风踏上了回京之路。

然而，此时的元稹万万没想到，他仕途上的最大一次挫折，已经在前方的不远处等待着他。

这一天，元稹走到华州，见天色已晚，便就近到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下榻。当时，专门接待官员的驿站通常设有上、中、下三种规格的房间，级别高的官员住上房，同级别的则是先到先住。元稹到驿站时，上房还没有人住，驿吏自然把他安排到了上房。

片刻后，麻烦来了。一个叫刘士元的内侍宦官也到了这里，嚷嚷着要住上房。驿吏一看是宦官，不敢怠慢，赶紧跟元稹商量，想让他挪个地方。

年轻气盛的元稹本来就对宦官没有好感，而且自己又是先来的，当然不肯让。驿吏无奈，只好如实告诉刘士元。

刘士元一打听，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御史，竟然敢跟他较劲，顿时勃然大怒，带上手下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房门撞开了。

此时，元稹已经脱了衣服和鞋子，正准备就寝。刘士元凶神恶煞地冲进来，不由分说，挥起马鞭往他脸上就是一下。

元稹捂着火辣生疼的脸颊，当场就懵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元稹见对方人多势众，而且还带着家伙，压根不敢反抗，赶紧拔腿就跑，连衣服和鞋子都顾不上穿。

当时的宦官都是骄横霸道的主，刘士元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元稹。他一边挥舞鞭子穷追不舍，一边还叫手下把元稹的马牵走，再把弓箭拿来，一副非把元稹弄死不可的架势。

元稹吓得魂飞魄散，穿着袜子满驿站乱窜，最后好不容易才逃离了敷水驿，狼狈不堪地回到了长安。

此事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宪宗一向宠幸宦官。虽然他对元稹不乏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宪宗最后还是偏向了宦官。此外，宰相们本来就看这姓元的小子不顺眼，如今出了这档子事，他们正好落井下石，拿他开刀。

几天后，朝廷便以元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为由，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贬谪令一下，好友白居易大为不平，接连上疏替他喊冤。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崔群也面见宪宗，极言元稹无罪。

但是，宪宗不为所动，还是维持原判。

就这样，元稹第三次被逐出了长安，开始了他“山水万重书断绝”“暗风吹雨入寒窗”的贬谪生涯。

这个曾经锋芒毕露、年少轻狂的才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自己到底错在哪了？

在谪居江陵的那些“残灯无焰影幢幢”的日子里，元稹一直在痛苦地反思。

从小到大所读的圣贤书，有哪一本不是教自己要清廉为官、济世安民的呢？又有哪一本是教自己要向权贵低眉折腰，甚至是与其同流合污的呢？

没有。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扶正祛邪、扬善去恶不仅是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更是一个官员的立身处世之本，也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就算不能彻底祛除世界上的黑暗与邪恶，至少也要为人间带来更多的光明与正义。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元稹，假如他继续坚持这种理想，结果

只有两个字——毁灭。

元稹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在险恶的官场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旧的人生观念，学会新的游戏规则。

而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两个字：人脉。

是的，官场就是一张网，一张由人脉所构成的利益联结网。所以，自命清高、四面树敌的人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八面玲珑、广结善缘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最后，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撞得头破血流的元稹，经过一番痛彻骨髓的灵魂挣扎，终于幡然猛醒，大彻大悟，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关系网了。

元稹构建的第一条官场人脉，是一个叫崔潭峻的宦官，此人时任江陵监军。

元稹过去最讨厌宦官，而且也是宦官把他害到今天这步田地的，所以贬谪江陵之初，他对宦官可谓恨之入骨。但是现在，元稹已经不这么想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初刘士元在敷水驿抽下的那一鞭，已经把那个疾恶如仇的元稹打死了。

如今的元稹已然脱胎换骨，再也不会自命清高，以正人君子标榜于世了，更不会再坚守什么修齐治平的圣贤理想了。他现在只想放下身段，广交朋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大腿够粗，他就愿意去抱。

而崔潭峻正是一个大腿够粗的朋友。

因为他是穆宗李恒的东宫旧人。

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天下，元稹遇赦回朝，被任命为膳部员外郎。所谓膳部员外郎，就是宫廷里面管伙食的。元稹举目一望，和他同列的，都是一些刚刚入仕的后生晚辈，而当年与他一起当谏官的同僚，如今早已位列要津，个别人甚至已经贵为卿相了。

元稹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

元和十五年，穆宗登基，崔潭峻被召回朝中，元稹的好日子也终于到了。

早在当太子的时候，穆宗李恒就经常听宫人吟咏元稹的诗歌，对他印象甚佳。崔潭峻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回朝，就给穆宗献上了一百余首元稹的新作。穆宗大悦，顺便问起元稹近况。崔潭峻赶紧说明

了他的尴尬处境。穆宗一听就皱了眉头，这么有才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管伙食呢？

当年五月，元稹便被擢升为礼部的祠部郎中、知制诰。这是个帮皇帝草拟诏书的职位，相当于天子秘书，虽然级别不高，但却举足轻重。

元稹是靠宦官上位的，所以很多朝臣都对这项任命非常不满。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月，天子又颁下一道诏书，擢任元稹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谁都知道，走到这一步，距离相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元稹如此扶摇直上，朝中舆论顿时哗然。他刚到中书省上了几天班，有人就给他难堪了。时值盛夏，有一天中午休息，元稹和同僚们聚在一起吃西瓜，忽然飞来一只苍蝇，嘤嘤嗡嗡惹人生厌。中书舍人武儒衡（武元衡的堂弟）马上拿起扇子拼命挥舞，瓮声瓮气地说：“哪来的讨厌东西，居然往这儿凑！”

众人闻言，当即失色。武儒衡却意气自若。只有元稹恨不得找条地板缝儿钻进去。

不过，难堪归难堪，该干的事儿，元稹还是照干不误。

如今的元稹很现实，绝不会再意气用事，更不会因为同僚的冷嘲热讽就放弃编织自己的官场之网。实际上从回朝的那天起，元稹就已经开始构建另一条重大的人脉了。

那就是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魏弘简。

凭借崔潭峻这条线，元稹挤进了权力中枢；眼下，他又攀上魏弘简这根高枝，目的当然是想一举登上宰相之位了。

然而，元稹要经营相位，就必须拿掉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块绊脚石。

这块绊脚石就是裴度。

此时正值河北叛乱全面爆发，穆宗紧急起用裴度为帅，对他极为倚重。众所周知，裴度在朝野拥有无人可及的威望和影响力，这回要是顺利平定叛乱，为朝廷再立新功，那他十有八九会重返相位。到时候，元稹拿什么跟裴度竞争呢？

因此，要防止裴度复相，元稹就必须千方百计阻挠他在河北建功。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很清楚了——裴度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

元稹和魏弘简就在后方拼命给他使绊子。我们前面所说的“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基本上就是元稹和魏弘简搞的鬼。“度（裴度）所奏画军事，（元稹）多与弘简沮坏之。”

裴度忍无可忍，愤然上疏穆宗：“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太行山以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裴度口口声声所说的“奸臣”，当然就是元稹了。

至此，双方的矛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一边是元勋重臣，肩负平叛重任；一边是朝堂新贵，深受天子宠幸。没有人知道，穆宗内心的天平最终会倾向谁……

相权之争：渔翁得利的李逢吉

面对裴度言辞激烈的奏疏，穆宗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

因为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裴度怒不可遏，数日内又连上二表——前后三次，所奏的内容完全相同。

穆宗当然很不爽，但同时也很无奈。

看来，不给裴度一个说法，河北的局面是无从收拾了。最后，穆宗只好解除了元稹的翰林学士之职，把他调任工部侍郎，同时把枢密使魏弘简罢为弓箭库使。

表面上看，元稹好像是被天子疏远了。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穆宗此举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元稹更不可能轻易放弃对相位的角逐。

到了长庆二年春，形势变得对裴度越来越不利。虽然没有了元稹的掣肘，但河北战局仍然不见丝毫起色，加上恶劣天气、粮草不继等客观因素的困扰，裴度纵然有心杀贼，但也是无力回天。

这种时候，元稹当然不会闲着。他力劝穆宗就此罢兵，为王庭凑昭

雪，把这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争结束掉。与此同时，河北又传来了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穆宗彻底死心，随即下诏承认了河北三镇。

数日后，亦即长庆二年二月十九日，穆宗把碌碌无为的宰相崔植罢为刑部尚书，同时命元稹以工部侍郎衔入相。

在仕途上辗转多年、几经浮沉的元稹，终于否极泰来，位极人臣。

短短几天后，穆宗又颁下一道诏书，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

裴度原任检校司空，现在转正，貌似皇恩浩荡。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穆宗这么做，其实是外示尊崇，内夺其权。不仅解除了裴度的兵权，并且让他到洛阳坐冷板凳去了。而且穆宗的这项任命，十有八九是元稹在背后做的手脚。

满朝文武都替裴度抱屈，纷纷上奏穆宗，说："现在时局仍然紧张，裴度有将相全才，不应该放到闲散的位子上。"

迫于舆论压力，穆宗只好改任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但是朝臣们还是普遍反对，认为裴度应该留在朝中，不宜出外。

穆宗知道裴度的群众基础好，可好到这种程度，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三月底，穆宗不得不再度收回成命，把备受时论抨击的宰相王播罢为淮南节度使，同时任命裴度为相，让他留在朝中辅政。

至此，裴度和元稹基本上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能阻止对方入相，同时谁也没能把谁整垮。

既然二者势均力敌，而且已经同朝为相，就算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至少是没有必要再争个你死我活了。然而，裴、元之争的暂时平息并不意味着穆宗朝廷会从此波平浪静。

因为想当宰相的人，绝不止裴、元二人。

很快，又有一个人摩拳擦掌地加入了这场博弈。

这个人的来头还不小。

此人不但与裴度一样，曾任宪宗朝的宰相，资历深厚，人脉宽广，而且又曾担任太子侍读，算是穆宗李恒的授业恩师，具有常人难以比拟的竞争优势。随着此人的强势介入，这场围绕着宰相之位的权力斗

争，注定要波澜再起，并且变得比此前更为扑朔迷离了。

这位闪亮登场的新选手，就是李逢吉。

李逢吉是元和末年的宰相，与裴度位列同班。当时，因宪宗将平定淮西的重任交给了裴度，李逢吉就犯了跟元稹一样的毛病，背地里频频使坏，企图阻挠裴度建功。宪宗察觉后，一怒之下将他逐出了朝廷，贬为东川节度使（几年后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逢吉栽了跟头，就把这笔账记在了裴度头上，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长庆二年春，裴度与元稹几乎同时拜相，李逢吉随即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在李逢吉看来，裴度和元稹是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如今虽然表面休战，但绝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只要制造事端激化他们的矛盾，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他就能在鹬蚌相争中坐享渔翁之利，夺回失去的宰相之位。

当然，要想重回相位，前提是得先回长安。

为此，李逢吉立刻派侄子李仲言入朝打点，很快就结交了时任枢密使的权宦王守澄，打开了一条回朝复相的快速通道。三月，在王守澄的积极运作下，李逢吉被召回朝中，就任兵部尚书。

第一步大功告成。接下来，李逢吉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激化裴、元二人的矛盾了。

正当李逢吉苦思冥想之际，他派去监视元稹的探子忽然送来了一条绝密情报，顿时令他笑逐颜开。

这则情报显然跟河北战事有关。

当时，朝廷虽然赦免了王庭凑，并已任他为成德节度使，但王庭凑依然没有退兵，还是想把富庶的深州据为己有。被围已达半年多的深州守将牛元翼频频告急，令朝廷非常苦恼。在此情况下，若有人能解深州之围，无疑是大功一件。

三月的一天，有个叫于方的朝臣找到了元稹，自称有办法解除深州之围，救出牛元翼。

此时，元稹虽已贵为宰相，但朝中不服他的人比比皆是，他正想干一两件大事树立威望，一听于方之言，赶紧问他有何良策。

于方故作神秘地一笑，说：“办法倒是有，但还得宰相大人通权达变，此计方能成功。”

元稹瞟了他一眼：“怎么个‘通权达变’法？你倒是说说看。”

于方这才把他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他凑近元稹，压低嗓门说：“下官有两位门客，一个叫王昭，一个叫于友明，都是燕赵奇士，熟悉河朔的风土人情，如果派他们潜入成德军中，施以反间计，不难救出牛元翼。但他们不能空手而去，必须带上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必须给他们二十道兵部和吏部的空白委任状，让他们相机行事，才能诱降那些骄兵悍将，也才能确保反间计的成功。”

“二十道空白委任状？”元稹冷笑，“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下官知道，所以方才已经有话在先，需要大人您通权达变。”于方神色自若地说。

元稹很清楚，于方是在暗示他用宰相权力去搞那二十道空白委任状。虽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毕竟是违法乱纪之举，万一曝光，绝对是一大丑闻，对他这个新任宰相是很不利的。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事要是成了，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功劳，日后在天子和百官面前，自己的腰杆就绝对够硬了。

干，还是不干？这是一个问题。

元稹沉吟良久，最后还是决定赌一把。

此刻的元稹当然不会知道，这一把赌下去，他就将身败名裂，懊悔终生。

李逢吉派出去的探子显然是个职业高手，第一时间就获悉了元稹和于方的密谈内容。

不过，搞到情报是一回事，如何利用情报又是另一回事。本着把水搅浑、把事闹大的指导精神，李逢吉决定把这个情报略作修改，然后透露给裴度，让他去跟元稹死磕。

五月的某一天，裴度的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李赏，并未说明来路，只是神秘兮兮地告诉裴度：元稹和于方密谋，要派刺客干

掉你。

裴度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人，当然不会听风就是雨，而且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也心怀警惕，所以听完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当回事儿。

裴度如此气定神闲，李逢吉自然是大为恼怒。他想来想去，最后索性授意李赏去禁军告发，把这事捅上天去。

消息传开，朝野哗然。

穆宗立刻命人逮捕于方，交给三法司会审。审讯结果，所谓买凶杀人固然是子虚乌有，不过于方和元稹的密谋可就藏不住了。看过本案的卷宗后，穆宗对元稹大为失望——堂堂宰相，居然如此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而且还执法犯法，怎堪为百官表率？

六月五日，穆宗愤然下诏，罢去元稹的宰相职务，贬为同州刺史；同时也免去裴度的相职，贬为右仆射。

很显然，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结果是不公正的，所以诏书一下，谏官们纷纷替裴度叫屈："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却跟于方搞阴谋诡计，处罚得太轻了！"

可是，穆宗却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原判。

至此，穆宗一朝的相权之争总算告一段落。裴度和元稹双双出局，李逢吉则坐收渔人之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相位。

事实证明，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不管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裴度，还是才华满腹、灵活多变的元稹，在权力斗争方面都不是李逢吉的对手。

为了权力，李逢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才能笑到最后。

元稹被贬同州后，愤懑难平，就给穆宗上了一道奏表，竭力表明对朝廷的忠心。他在奏表的结尾说："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旧唐书·元稹传》）

元稹把自己说得可怜巴巴，就是想唤起穆宗的恻隐之心。

然而，奏表呈上却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最后，元稹终于意识到——这一生，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长安的"钟鼓之音"了。

十年后，元稹卒于鄂州刺史任上，终年五十三岁。

敬宗登基

长庆二年，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

武宁镇的治所在徐州，地处江淮，历来是帝国的财赋重镇。这个地方出了乱子，对朝廷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消息称，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他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恶劣的反叛行径，穆宗李恒很头疼。

河北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赋发动一场平叛战争，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朝廷要拿什么来打仗？

最后，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妥协。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变爆发仅仅十多天后，穆宗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么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了。这种好事，当然是人人抢着干。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又爆发兵变，将领李介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

眼看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穆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再轻易让步了，连忙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讨对策。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度支）张平叔为首，他们认为，既然

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为首，他坚决反对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国家的土地了。"

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李逢吉的强硬立场很不认同。他对李逢吉说："李大人，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尺长的旌节，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吗？"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让人很难反驳。

可事实上，杜元颖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绝不是出于对那"几尺长旌节"的爱惜，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试想，假如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藩镇始终采取妥协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必然会以河北、江淮和宣武为榜样，动不动就拥兵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几尺长的旌节"，而是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的绥靖政策是在"顾惜百姓的生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

说白了，这就叫饮鸩止渴、苟且偷安。

李逢吉当然不会听杜元颖等人扯淡，所以坚持原议。双方争执不下，穆宗无所适从，这次御前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不久，宣武下辖的宋、亳、颍三州因不服李介，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穆宗大喜，这才感到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随即向穆宗献计："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命义成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如果李介抗命不遵，就命武宁镇与忠武镇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一定可以顺利赴任。"

穆宗依计而行。

李介果然拒不从命。

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对宣武发起进攻。李介发兵抵御，却屡战屡败。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忧惧中一病不起，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兵马使李质。李质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再度发动兵变杀掉了李介，并将其麾下所有反叛将领全部诛杀，最后把李介的四个儿子逮捕，一起押赴京师。

随后，韩充顺利赴任，并驱逐了一千多名参与李介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了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长庆二年下半年，各地又陆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天，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让整个长安城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穆宗李恒中风了。

天子的病是因一场马球赛而引发的。十一月的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在宫中打马球，一个宦官不慎从马背上跌下，穆宗受了惊吓，随后就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了。

天子卧病在床，一连数日不能上朝，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免忧心忡忡。此外，更让朝野上下惶惶不安的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无论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都必须早立太子。这是人们的一致想法。于是宰相们屡屡上疏，请求入宫朝见，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这种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裴度。裴度年初虽被罢相，但仍以右仆射的身份留在朝中。如今，恐怕也只有像他这种功高勋著的元老重臣，才有资格见上皇帝一面了。

经朝臣们请求，裴度连上三疏，要求册立太子，并请皇帝接见大臣。十二月初五，穆宗终于被宦官用“大绳床”抬了出来，在紫宸殿接见了宰执大臣。

虽然天子的脸色异常憔悴，行动能力也尚未恢复，但是看见他的神志仍然清醒，众人总算稍感安心。

不过，太子是无论如何要赶紧册立的。

裴度和李逢吉不约而同地向穆宗提起了此事。当然，两个人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裴度考虑的是皇权的平稳过渡和社稷的安危，而李逢吉则是想趁此机会抢一个定策之功。所以，两人的劝谏之辞也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

裴度说的是：“请速下诏，负天下望。”

李逢吉不仅极力劝请，还提出了具体人选：“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

景王就是穆宗的长子李湛，此时年仅十四岁。

尽管宰辅重臣请立太子的要求非常强烈，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穆宗李恒却始终不置可否，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穆宗的心情无疑是很悲哀的。因为他现在才二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可宰相们劝他册立太子时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情，好像他是一个马上就要死掉的七八十岁的老头。

不过，这也怪不得宰相们。因为李恒知道自己已经废了，更何况他也知道——死神在拜访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事先询问他的年龄。

所以，不管多么不情愿，他都只能认命。

随后的几天，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请立太子的奏疏，又像雪片般飞进了宫中。穆宗怔怔地看着那堆奏疏，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十二月初七，一道诏书颁下，景王李湛被立为太子。

接下来的整个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朝野上下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帝国貌似一片平静。河北三镇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所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自从朝廷平定宣武之后，各地藩镇似乎也收敛了一些，叛乱势头暂时得到了遏制。

这方面总算让朝廷暗暗松了一口气。可相形之下，朝廷内部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朝堂上，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排斥异己，于这一年八月把裴度逐出了朝廷，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在内廷，宦官王守澄本来就因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此次更是趁穆宗病重之际而彻底成为了天子的代言人。

李逢吉和王守澄就这样互为表里，联手控制了整个帝国朝政。

穆宗的病情在这一年没有进一步恶化，让满朝文武稍感安心。然而，天子随后便又染上了一样新的毛病，不禁让人们的心头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天子喜欢上了长生之术，开始频频服用金石之药，就跟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人们对三年前发生在宪宗皇帝身上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宪宗之所以英年早逝，正是不顾一切追求长生的结果。如今，天子李恒再次走上父亲的这条老路，其下场可想而知。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初一，穆宗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准备恢复因病中辍的例行早朝。

然而，李恒绝对没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銮殿上。

正月二十日，穆宗旧病复发；短短两天后，病情迅速恶化，只好紧急下令太子监国。当天傍晚，刚届而立之年的穆宗李恒就驾崩了。

二十三日，李逢吉自命为“摄冢宰”，即摄政大臣。

二十六日，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敬宗。

穆宗朝的短暂历史就这样浮皮潦草地翻过去了。面对高高坐在金銮殿上这个尚未成年的新君，满朝文武未免都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大唐开国二百余年来，还从没出现过如此年轻的皇帝。

说白了，李湛还是个孩子。

饱经沧桑的大唐帝国，将在这个孩子手中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不敢预料。

一人独大的朝堂

自从裴度和元稹罢相，李逢吉便在朝中一人独大，其地位已无人可以撼动。于是，朝臣中的识时务者纷纷投靠，很快就在李大人周围结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死党。

这个死党以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为首，麾下有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等人，号称“八关十六子”。所谓“八关”，是说李仲言等八人是这个死党的核心层，若有人想求李逢吉办事，必须先贿赂他们，相当于八道关卡；李仲言等八人另外还有八个手下，所以统称“十六子”。

面对权势熏天的李逢吉一党，多数朝臣都不敢招惹，只求洁身自好。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刚直不阿的人，始终不买李逢吉的账。

比如翰林学士李绅。

自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位子提拔上来的，所以中晚唐的翰林学士常有“内相”之称，最典型的就是德宗时代的贤相陆贽。

当初穆宗在位时，李绅就深受天子信任，每逢穆宗跟他讨论朝政，他都会不失时机地贬抑李逢吉。此外，凡是李逢吉有奏表递进宫中，只要让李绅看到了，通常都会利用自己的“内相”职权，不动声色地将其否决掉。

对于这样一个处处跟自己叫板的人，李逢吉自然是恨得牙痒。所以早在去年冬，他就曾精心做了一个局，要把李绅扳倒。

那是长庆三年九月，御史中丞一职出缺，穆宗让李逢吉推荐人选。李逢吉二话不说就推荐了李绅。他的理由是，李绅秉性正直，为官清廉，正是肃清政风、维护朝廷纲纪的不二人选。

穆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批准。

此时的穆宗当然不会想到，李逢吉这是在给李绅下套。他把李绅支到御史台，目的就是要看一场好戏。

当时，御史台的一把手是韩愈。而韩愈跟李绅是同一种人，性情刚直，眼里从不揉沙子。很多人都知道，宪宗末年，韩愈曾因那篇著名的《谏迎佛骨表》差点被宪宗砍掉脑袋，多亏裴度和崔群力谏，才救了他一命。长庆三年六月，韩愈从吏部侍郎调任京兆尹。在他之前，禁军一贯在京师作威作福，过去的京兆尹都不敢惹，可韩愈一来，禁军一下就变乖了，纷纷在私下里相互告诫：“这姓韩的连佛骨都敢烧，咱千万别犯在他手上！”

韩愈当时除了京兆尹，还兼任御史大夫。按规定，有此兼职的京兆尹不仅要在本衙门办公，还要在某些规定时间到御史台去坐班，称为“台参”。

李逢吉就打算在这里做手脚，让李绅和韩愈去死磕。

李绅刚到御史台上任，李逢吉马上通知韩愈不必台参。李绅不知此事，一连几天发现顶头上司都不来上班，便给韩愈发了道公函。韩愈有宰相特许，当然有理由不去。于是两人便在来回往返的公文中打起了口水仗，双方措辞都很强硬，最后闹得沸沸扬扬，满朝皆知。

李逢吉随即上奏穆宗，说李绅和韩愈身为大臣，竟然为了如此芝麻小事就撕破脸面，实在不堪为群臣表率，理应贬谪。

穆宗也觉得李、韩二人太不识大体，遂贬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到了这一步，李绅和韩愈才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他们被李逢吉下套了。随后，两人便以辞谢君上为名入宫觐见。穆宗也依稀感觉事有蹊跷，就让他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仔细讲了一遍。

事情摊开后，傻瓜也明白问题出在哪了。

穆宗当即收回成命，改任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

精心布下的局就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李逢吉大为不甘。

长庆四年正月，穆宗驾崩，敬宗即位，李逢吉一边庆幸李绅的靠山倒了，可一边却不免担心新君会再度重用李绅。

为了彻底摆平这个死对头，李逢吉召集党羽，日夜密谋，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办法；一、破坏李绅的群众基础，让满朝文武都忌恨他；二、破坏领导对他的信任，让新君李湛厌恶他。

从古到今，一个人要想在官场上混得好，都需要“群众基础”和“领导赏识”这两大前提。李逢吉的这个策略，显然是要把李绅的官场根基连根拔起。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许多细致的工作。

首先，李逢吉收买了李绅的一个族子李虞，让李仲言、张又新等人配合他在朝野上下大造舆论，散布谣言，说李绅一直在暗中侦查百官，凡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的，都被他以“交结朋党”为由列入了黑名单，然后再呈报给天子。

由于此事是从李绅的族子嘴里说出来的，很多朝臣都信以为真，自然都对李绅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第一步大获成功，李逢吉随即展开第二步行动，请权宦王守澄帮忙，想办法在新天子面前抹黑李绅。随后的一天，王守澄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对小皇帝说：“陛下，您是否知道，当初是谁拥立您为储君的？”

小皇帝不假思索：“宰相啊。”

王守澄又问：“哪个宰相？”

小皇帝一脸茫然。

王守澄一笑：“这件事的内情，没有人比臣更清楚。陛下之所以能登临大宝，全凭李逢吉一人之力。至于杜元颖、李绅这些人，当时都是想拥立深王的。”

小皇帝虽然年龄不大，但不傻，听了王守澄的话，始终半信半疑。

李逢吉随即加紧攻势，让李续之等人接连上表，一再陈述相同的意思。最后，李逢吉亲自上场，对敬宗说：“李绅此人心怀不轨，终将不利于皇上，必须加以贬谪。”

深谙权术奥秘的人，通常也深谙人心的奥秘。作为权谋高手的李逢吉，很清楚什么叫作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所以他坚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小皇帝李湛顶不住李逢吉一党的轮番轰炸，最后终于将李绅逐出了朝廷，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司马。

李绅被贬当日，李逢吉率领文武百官入朝向敬宗道贺，极力称颂天子英明。出宫后，百官又赶紧来到中书省向李逢吉道贺，极力称颂宰相英明。

满朝文武中，只有少数人没有参与这场闹剧。

因为，他们还没有丧失起码的良知。

然而，在这个充斥着阴谋和谎言的世界上，良知很多时候只会给人带来噩运。

在李逢吉看来，不参与道贺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而在如今的朝堂上，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即便这种反对只是在心里。

几天后，没有参加道贺的右拾遗吴思，翰林学士庞严、蒋防等人便相继被贬谪出朝，放逐远地。当时，庞严有一个好友叫于敖，担任给事中，有权对中书省的敕令提出异议。李逢吉贬谪庞、蒋的敕令一下，于敖便原封不动地把它退了回去。

人们私下里都替于敖捏了一把汗。因为于敖这么干，显然是在替庞、蒋二人打抱不平，可这样一来，就把李逢吉往死里得罪了，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就在亲朋好友暗暗称颂于敖品行高洁、不畏权贵时，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人们听说，于敖把敕书退回去的同时，还给李逢吉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贬得太轻了，应该从重处罚。

人们恍然大悟，敢情这个于敖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是向朋友胸口上插刀啊！

李逢吉本来正寻思着怎么修理这个不怕死的家伙，看见纸条后，顿时开怀大笑，随即重重褒奖了于敖。

李绅被贬到了天涯海角，此生回朝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可李逢吉还不甘心，决意要斩草除根。

随后的日子，李逢吉授意张又新等人屡屡上疏，说对李绅的贬谪太轻了，应该将其诛杀。小皇帝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最后终于点了头。只是什么时候杀李绅，他还下不了决心。

就在李绅命悬一线的时刻，终于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了。

这个人是翰林学士韦处厚。他上疏敬宗说："李绅被李逢吉一党迫害，朝野都为之震惊浩叹。李绅是先帝信任的臣子，就算有罪，也应该从宽处理，才能体现陛下'三年不改父之志'的孝道，更何况李绅本来就没罪呢？"

李湛看完奏疏，略有醒悟，但还是没有明确要不要杀李绅。

最后，一件很偶然的小事保住了李绅的人头。

有一天，小皇帝闲来无事，随手翻阅穆宗一朝留下的卷宗，其中几道奏疏忽然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大臣请立太子的奏疏，署名者分别是裴度、杜元颖、李绅等人。

李湛打开一看，发现李绅当初也是极力拥立他当太子的人之一。

小皇帝看着这些奏疏，慨叹良久。过后，他就命人把李逢吉一党要求诛杀李绅的奏疏全部烧掉了，随后凡是此类奏请，也都被他当成了耳

旁风。

然而，尽管明知道李绅是被冤枉的，李湛还是没有将他召回朝中。

因为，李逢吉一党的势力太大了，小皇帝绝不敢为了一个李绅跟他们翻脸。更何况，李湛太年轻了，他那单纯而稚嫩的心灵根本容不下繁杂沉重的国事。

换言之，李湛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嬉戏玩乐，而不是打理祖宗留下来的这片忧患深重的江山。

玩乐天子：我的青春我做主

其实，小皇帝李湛刚一上台，人们就再次见识了不可思议的遗传力量——他几乎就是他老子李恒的翻版。

首先，他继承了穆宗的慷慨。

刚一登基，他就一连三天对宦官们大加赏赐，不仅金银、绸缎和珠宝随便出手，就连官服也随便赏赐。至于赏赐的标准，则是依小皇帝的心情而定。比如今天刚刚赐给某个宦官绿色官服（六七品），明天就有可能赏他红色官服（四五品）。

其次，他继承了穆宗的娱乐精神。

从当上皇帝的次月开始，李湛就天天打马球、游乐、宴饮、看戏，其次数多得连史官都懒得记载。

最后，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是——小皇帝和穆宗一样，一点也不喜欢政治。所以，例行早朝对他来讲就是一件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事。登基不过才一个多月，小皇帝上朝的时间就一天比一天晚。谏官们屡屡上疏，李湛却置若罔闻。

三月十九日这天，日上三竿，朝会大殿上依旧不见天子的身影。百官都列队在紫宸门外等候，年事已高和体弱多病者都已渐渐不支，几欲晕厥。

谏议大夫李渤对宰相说：“昨天，我刚刚上疏提醒皇上，希望他上朝的时间不要太晚，没想到今天更晚。我身为谏官，难辞其咎，请准许我到金吾卫的军法处待罪。”

最后，哈欠连天的小皇帝总算来了。匆匆开完朝会，他就迫不及待地要起驾回宫，不料左拾遗刘栖楚却站着不走，显然是要进谏。

小皇帝假装没看见，准备开溜，可刘栖楚声音还是高高地响了起来：“陛下，微臣有事要奏。”

小皇帝只好停下脚步。

刘栖楚朗声说道：“宪宗和先帝都是年长之君，天下尚且叛乱不断，陛下年纪这么轻就继承帝位，更应早起治理朝政。可陛下却嗜睡贪色，日晏方起，如何对得起先帝的在天之灵？如今，先帝的灵柩还未

下葬，歌舞伎乐已日日喧腾；陛下的美誉尚未彰显，恶名却已远播四方。臣恐陛下的福祚不会长久，请让臣在台阶上撞死，为荒废谏官之责谢罪！”

话音刚落，还没等小皇帝反应过来，刘栖楚便已跪倒在地，一下一下地用头去撞台阶，瞬间便已血流满面。

小皇帝吓呆了，顿时不知所措。

李逢吉和新任宰相牛僧孺闻讯，匆忙赶来解围，叫刘栖楚退下去听候处分。刘栖楚捧着鲜血淋漓的脑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开口又骂起了宦官。小皇帝眉头紧皱，一直挥手让他退下。可刘栖楚却坚持说：“陛下不听臣言，就让臣死！”

牛僧孺赶紧说：“你所奏之事皇上都已经知道了，先下去等候处分。”

刘栖楚这才不情不愿地退了出去和李渤一起在金吾卫听候裁决。

惊魂未定的李湛赶紧问宰相，此事该如何处置。几个宰相一致认为，谏官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采纳。李湛无奈，只好命宦官前去宣慰，好言好语把刘栖楚和李渤劝了回去。

几天后，李湛下诏，将刘栖楚擢升为起居舍人，并赐四品绯衣，以示对他忠言进谏的表扬和鼓励。刘栖楚的原官秩仅为从八品上，而起居舍人则是从六品上。小皇帝一下子将他连升数级，可以说对他够意思了。可出乎李湛意料的是，刘栖楚一点也不领情，居然以生病为由推掉了官职。

不过，刘栖楚领不领这个情，对小皇帝来讲根本无所谓。

他本来就是迫于舆论压力做个姿态而已，如今刘栖楚自己不识抬举，李湛自然懒得理他。几天后，小皇帝又赐给“内教坊”（宫廷歌舞团）一万缗钱，叫他们抓紧排练，说随时会去观看他们演出。

没办法，这就叫我的青春我做主。

走自己的路，让谏官们说去吧！

在关注娱乐事业、弘扬娱乐精神方面，李湛可以说完全继承了他老爸穆宗的衣钵。让他们接受谏言或许容易，可要让他们改正缺点，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死谏风波”过去后，谏官们不约而同地噤声了。原因倒不是小皇帝改掉了嗜睡赖床、上班迟到的毛病，而是大伙寒了心。

既然刘栖楚以死相争都没效果，那大伙还有什么好说的？

小皇帝的种种荒唐行径很快就成了朝野上下尽人皆知的事实。对这种事，老百姓大多也只是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发发牢骚、苦笑几声而已，不会动什么别的心思。

可是，长安城中有个人却动了心思，而且还是特别大的心思。

他想——既然皇帝不好好干，为何不将他取而代之呢？

假如此人是独揽大权的宰相，或者是手握禁军的宦官，动这个心思还算靠谱，可问题是，这个异想天开的家伙只是个平头百姓。

此人叫苏玄明，是个算命先生。平常估计就是在街边支个摊，旁边插一根“苏铁嘴”或“苏半仙”的旗子，信口忽悠一些无知群众，随便混口饭吃，日子肯定是过得乏味至极。可自从动了这个“彼可取而代之”的心思后，苏半仙就变得精神抖擞了，成天眼睛放光，在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里面拼命搜寻，希望找到那个可以取代李湛的真命天子，然后辅佐他君临天下。

苏玄明有个朋友叫张韶，是宫中染坊的杂役，有出入皇宫的便利。有一天，张韶来他家串门，苏半仙心中顿时一亮，赶紧问了他的生辰八字，然后煞有介事地算了一卦。

卦象出来后，苏半仙忽然瞪大眼睛不说话了。

张韶吓了一跳，连忙问他怎么回事。苏半仙盯着他的脸看了许久，然后用一种深沉的口吻说：“卦象显示，你将会坐在天子的御榻上，与我一同进餐。”

张韶一听就乐了，差点没把大牙笑掉。可当他看见苏玄明异常严肃的表情时，才意识到这家伙并没有发烧。紧接着，他又听见苏玄明说：“现在皇上每天都在打猎和玩球，经常不在宫中，依我看，大事可图！就看你敢不敢干了。”

接下来，不知道苏半仙是不是跟张韶宣扬了许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道理，反正张韶歪着脑袋回味了半天，最后终于大腿一拍，说了一个字：“干！”

于是，唐朝历史上一场绝无仅有的宫廷暴动，就从这两颗朴素的脑袋中诞生了。

两个人说干就干，很快就忽悠了一百多人，都是张韶在宫廷染坊的工友。苏半仙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把他们忽悠得晕头转向、热血沸腾，于是暴动计划就这么定了下来。

四月十七日这天，行动开始了。他们把兵器藏在几辆运染料的车中，准备从大明宫东面的银台门运入宫中，于当天夜里起事。不料，他们刚走到银台门，禁卫人员就察觉车载太重，将他们拦下盘问。苏、张二人眼见事情即将败露，当即提前行动，抽出武器杀了盘查人员，然后和徒众们挥起武器，大声嘶喊着冲进皇宫。

此时，小皇帝正在清思殿和宦官们打马球，忽然听见外面杀声震天，顿时大惊失色。宦官们慌忙关上宫门，可暴民很快便砸烂宫门，一拥而入。魂不附体的小皇帝在宦官的簇拥下仓皇逃往左神策军营。左神策中尉马存亮一听皇上驾到，赶紧跪地迎驾，并亲自把小皇帝背进军营，随即命大将康艺全率领骑兵入宫讨贼。

苏、张二人带着手下径直冲上了清思殿。张韶一屁股坐在天子御榻上，一边招呼苏玄明吃东西，一边兴高采烈地说："你卜的卦可真准！"

苏半仙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敢情张韶这小子拎着脑袋造反，就为了坐在龙椅上吃一回点心啊？苏玄明恶狠狠地盯着张韶，气急败坏地说："我们起事难道就为了这个？"

就在这个时候，殿外传来了禁军的喊杀声。

张韶终于回过神来，慌忙跳起来夺路而逃。

可是，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此刻的清思殿，已经被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团团包围。

接下来的事情毫无悬念。禁军就像砍瓜切菜一般，很快就把苏、张和他们的暴动团伙彻底收拾了。次日，个别漏网之鱼也被悉数抓获，等待他们的无疑将是杀头诛族的命运。

这场突如其来的平民暴动，从头到尾都显得相当无厘头，在唐朝历史上似乎也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即便是把它当成小说情节来看，也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可它却被白纸黑字地记载在史册上。

现在比较流行“气场”一说，意思是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自然会感应什么样的事情。按佛教的说法，叫作“业力感召”。

也许我们只能说，正因为敬宗李湛本人就是个无厘头，才会感召如此无厘头的事情。

事后，有关方面追究责任，认为有三十五名宦官难辞其咎，按律当斩，因为他们看守的各道宫门都被暴民轻而易举地攻破了，明显是玩忽职守。可小皇帝却下诏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只处以杖刑，同时保留他们的所有职务。

对于小皇帝来讲，这场暴动只是虚惊一场，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发现，除了宫门被砸烂几扇、御座上沾了几点染料和污渍之外，自己并没什么损失，所以没过几天，小皇帝就把一切不愉快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几年来，李逢吉在朝堂上俨然已是“教父”级的人物，不仅大多数朝臣唯其马首是瞻，就连宰相班子的人选也几乎都是他举荐的，如中书侍郎牛僧孺、吏部侍郎兼同平章事李程、户部侍郎兼同平章事窦易直等。然而，到了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却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权力金字塔开始有点松动了。

原因就出在他举荐的人身上。

首先是中书侍郎牛僧孺。他于长庆三年入相，已经在宰辅的位子上坐了两年。可这两年当中，朝中的大小事情基本上都是李逢吉一个人说了算，牛僧孺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毫无作用的摆设。这种徒有虚名、无所作为的宰相生涯让牛僧孺苦恼不已。

眼见皇帝荒淫、佞幸当权，牛僧孺很想进谏，却又怕因言获罪。继续保持沉默吧，又不甘尸位素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最后还是决定离开朝廷，以求内心的解脱。

随后，牛僧孺屡屡上表请求外调。敬宗李湛看他去意甚坚，也就不再挽留，于这一年二月命他出任武昌节度使，但仍让他遥领“同平章事”的荣誉衔。

牛僧孺的断然离去让李逢吉很不爽。

因为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是在间接表达对他的不满，让李逢吉感到很没面子。

不过，最让李逢吉不爽的还不是牛僧孺，而是比他稍晚入相的李程。李程可不像牛僧孺什么事都窝在心里，他于长庆四年五月入相，刚一上台就表现出了刚直敢言的作风。当时，小皇帝刚即位不久，打算修建豪华宫殿，李程一看就说："先帝宾天未久，陛下便如此大兴土木，岂是人子尽孝之道？"

小皇帝闻言，也有些尴尬。李程当即建议，把已经准备好的那些建材拿去扩建穆宗陵寝，以示新君的孝心。李湛无奈，只好听从。

李逢吉听说这件事后，就隐隐觉得李程这个人不简单，可能不太好掌控。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果然证实了李逢吉的判断。

王庭凑当初围攻深州，刺史牛元翼只身突围，家属落在了王庭凑手里。事后，牛元翼派人给王庭凑送了好几次钱，请求赎回家人，可王庭凑对他此前的拼死抵抗余恨未消，所以把他送去的钱全都留下了，人却一个不放。

牛元翼悲愤莫名，不久后便抑郁而终。一听到牛元翼的死讯，王庭凑知道手上的人质没用了，就残忍地将牛元翼的一家老小全部杀死。

消息传到朝廷，敬宗李湛很受震动，连连哀叹"宰辅非才，使凶贼纵暴"。翰林学士韦处厚趁机劝谏，说被放逐的三朝元老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如果让他回到宰辅的位子上，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河北藩镇的问题。

敬宗动了心，就打听裴度的近况。韦处厚说，裴度两年前遭李逢吉排挤，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章事"的荣誉衔都没有挂。敬宗不禁愕然。过后，敬宗又就此事询问新任宰相李程。

关键时刻，李程再次体现出了自己的正直。他力赞裴度贤能，请敬宗对裴度施以恩遇，以备大用。几天后，敬宗就下诏恢复了裴度的同平章事之衔，显然有召他回朝复相的意思。

众所周知，裴度是李逢吉的头号政敌。可现在，被李逢吉一手提拔上来的李程居然胳膊肘朝外拐，帮着裴度说话，这无疑极大地触犯了李逢吉的利益。

对李程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李逢吉的恼怒可想而知。

一旦有机会，他必将毫不犹豫地除掉李程。

宝历元年九月，朝中发生了一起要案，李逢吉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事情起于一个叫武昭的人。此人本是裴度手下，在平定淮西时立下战功，深受裴度赏识，几经提拔，后来官至刺史。可几年后，裴度垮台，武昭也跟着遭殃，被贬到了一个闲散的位子上。武昭愤愤不平，自然对李逢吉极为恼恨。

武昭有个朋友叫李仍叔，时任工部的水部郎中，是李程的族人。因为李程和李逢吉不和，所以李仍叔就想帮李程做点事情。当他发现武昭对李逢吉满腹怨言时，顿时生出了借刀杀人的想法。有一次，李仍叔若无其事地对武昭说，本来李程是想起用他的，不料李逢吉极力反对，只好作罢。武昭闻言，更是对李逢吉恨之入骨。

此后，郁郁不得志的武昭时常借酒消愁，每次喝高了便破口大骂李逢吉。九月的一天，武昭又叫了三五个朋友一块喝酒，照例喝得酩酊大醉，对李逢吉当然也是照骂不误。几个朋友都听惯了，也不以为意。可没想到，武昭骂得兴起，最后居然爆出惊人之语，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刺杀李逢吉的计划。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席间有人一听就把这事记下了，随后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了李逢吉的死党张权舆。张权舆马上向李逢吉汇报。李逢吉闻言，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

几天后，李逢吉就暗中派人告发了武昭。

敬宗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随即逮捕武昭，命三法司会审，同时把那天跟他一块喝酒的几个朋友也都抓了起来。被抓的人中，有一个人叫茅汇，时任左金吾兵曹，平时与李逢吉的私交不错。李逢吉马上授意侄子李仲言去探监，并且给茅汇带去了一句话。

李仲言对茅汇说：“只要一口咬定武昭是受李程指使，你就性命无忧，否则，你必死无疑！”

李逢吉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裴度和李程都扯进来，将他们污为此案的主谋。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不仅李程要被逐出朝廷，裴度回朝的希望自然也就破灭了。

然而，李逢吉万万没想到，到头来，不但他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而且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因为茅汇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而是根硬骨头。他对李仲言说：“即便蒙冤而死，我也心甘情愿！要我诬陷别人以求活命，不是我的为

人。”

最后，茅汇如实向三法司陈述了事情经过，并将李仲言要他作伪证的事也说了。

案情就此水落石出。

这一年十月末，三法司宣布判决结果：武昭因蓄谋刺杀宰相，被判杖刑，乱棍打死；李仍叔无中生有，挑拨是非，被贬道州（今湖南道县）；李仲言唆使证人作伪证，妨害司法公正，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县）；茅汇知情不报，有包庇嫌疑，流放崖州（今海南琼山市）。

宝历元年末，朝中要求裴度回朝的呼声日益高涨，敬宗李湛也频频派人前往兴元（山南西道治所，今陕西汉中市）慰问裴度，并暗示很快将召他回朝。

面对这一切，李逢吉感到了莫大的恐惧。

最信任的侄子李仲言因武昭一案被流放，让李逢吉强烈意识到——自己在天子李湛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

一旦裴度回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必将不保。

所以，李逢吉必须堵死裴度回朝复相的道路。

为此，他将不择手段。

把娱乐进行到死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终于在朝野的共同盼望中回到了长安。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则奇怪的民谣忽然间不胫而走，没几天便传遍了长安坊间。

民谣唱道：“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

谁都看得出，这是冲着裴度来的。

“绯衣”等同“非衣”，合起来是一个“裴”字；“坦其腹”的“腹”字可以指代“肚”（度），所以这前半句指的就是裴度；而后半句的“天上有口”合起来，则是一个“吴”字。整句民谣的意思，就是暗指当年裴度平

灭淮西吴元济之事。

如果单纯看这则民谣，很可能以为这是在赞颂裴度的讨平藩镇之功。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与民谣配套出笼的，还有一则流言。

和上面那个民谣比起来，这则流言的杀伤力可要强得多了。

流言说，长安城里由东到西横亘着六条高坡，很像《易经》中“乾卦”的“六爻”卦象。六爻之象，由下往上分别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而裴度的宅邸，恰好位于第五道高坡上。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裴度之宅乃是“九五贵位”。

中国人都知道，古代皇帝有一个代称叫“九五之尊”，可见“九五”是真龙天子的专用名词，任何人不得擅用，一旦有侵权嫌疑，他的麻烦就大了。

所以，把这则流言跟上面那个民谣结合起来看，某些人企图向天下人表露的信息就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裴度既有平藩之功，又有“九五之命”，这样的人想当天子，不也是顺理成章的吗？

正当这则居心叵测的流言在长安传得沸沸扬扬之际，有个人又趁热打铁地入宫觐见天子了。他急不可耐地对敬宗说：“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这个人就是李逢吉的死党张权舆。

看见张权舆如此热心地为流言做注解，敬宗心里不免犯了嘀咕：说裴度“宅占冈原”倒有几分靠谱，可说他“不召而来”就纯属臆测了。他明明是奉了朕的密诏才回京的嘛，怎么可能有什么企图呢？倒是你张权舆的问题很大。你如此热心地为流言作解，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呢？你究竟安的什么心？

张权舆安的什么心，明眼人其实都能看明白。翰林学士韦处厚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敬宗：指不定这个张权舆就是流言的始作俑者。

换言之，韦处厚是在暗示敬宗——李逢吉八成就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敬宗虽然是个玩乐天子，但他并不傻，所以他也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在敬宗看来，假如这事真是李逢吉搞的，那这招也太损了，足以证明李逢吉是个卑鄙阴险的小人，如果让这种人继续把持朝政，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相反，李逢吉如此不遗余力地陷害裴度，反而从客观上证明了裴度对朝廷的价值，也表明裴度的贤能并非浪得虚名。

于是，短短一个月后，敬宗就做出了命裴度复相的决定。

宝历二年二月，李逢吉一党企图陷害裴度的计划彻底落空，裴度被召回朝中，复任司空、同平章事。

李逢吉知道，自己完了。

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处心积虑搞这么多事，不但最终促成了裴度的复相，而且加速了自己宰相生涯的终结。

十一月，把持朝政达四年之久的李逢吉被逐出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虽然敬宗没把事情做绝，仍然让他挂着“同平章事”的荣誉衔，可李逢吉明白，一旦离开政治中枢，这个虚衔与其说是陪伴他走过余生的一种荣誉，还不如说是供他回首往事的一种凭吊。

在贯穿穆、敬两朝的这场政治较量中，权谋高手李逢吉尽管一度赢得钵满盆满，但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了。

然而，小人的出局并不意味着君子的胜利，重回相位的裴度也没有多少欣喜之情。

因为，业已成年的天子李湛对娱乐事业的热衷不仅丝毫未减，且有变本加厉之势。此外，他对宦官的宠幸也是一如既往。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唐帝国的命脉仍然掌握在王守澄等人的手中。

这些年来，朝中政局日非，四方藩镇跋扈依旧，当初与宪宗一起奋力打拼出的那个“元和中兴”早已成为凋谢的黄花。即便裴度仍然怀有老骥伏枥的报国之志，但是面对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帝国，他也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感。未来的日子，裴度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对阉宦集团进行制衡而已。

在李湛登基的第一年，他虽然讨厌上朝，可还是不敢不上，顶多就是迟到而已。可从第二年起，他就开始跳票了，连朝也不上，整天跟宦官们厮混在一起，寻欢作乐，毫无节制，一个月上朝最多不过两三次，满朝文武连他的面都很少见到。

宝历二年，李湛虽然已经十八岁了，可他却玩得比以前还疯，声色犬马样样喜好，无不精通，其中尤以“打马球”和“掰手腕”最为擅长。

据说，天子在这两个项目上的竞技水平已跻身当时超一流选手的行列。为此，禁军和天下诸道纷纷向天子进献大力士，以供天子训练和比赛之用。

当然，最终他们都不是李湛的对手。于是李湛特意悬赏一万缗，命内侍宦官招募能与他交锋的高手。很快，又有更多体育健儿从四面八方涌来，夜以继日地陪伴在天子左右，随时与他切磋技艺。

当然，大部分应召而来的大力士都很清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原则，多数时候都会表现出比天子稍逊一筹的样子，可也有些人一时疏忽，在竞技中险些赢了天子，那他们就遭殃了，动不动就会被流放边地、没收家产。

与此同时，天子身边那些内侍宦官也会跟着遭殃，时不时就会挨上一顿鞭子。

宦官们人人自危，又恨又怕。

这样的情形，看上去让人觉得特别眼熟。

是的，此时的敬宗李湛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当年的宪宗李纯。

一切都是如此似曾相识……

当年那个喜怒无常、滥施刑罚的宪宗皇帝就是被宦官杀死的。这件事外界不清楚，可在大明宫老老少少的宦官中间，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今，敬宗李湛拿宦官不当人，他又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呢？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天子李湛在外面打了一天的猎，深夜才回到宫中。可他意犹未尽，又召集内侍宦官刘克明和禁军将领苏佐明等人一起饮酒。

天子一通豪饮，很快就醉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去内室解手。

刘克明和苏佐明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

一切心照不宣。

苏佐明跟在天子后面悄悄走进内室……忽然间，刘克明掷下一只酒

杯，殿内烛光齐灭，黑暗中传出一个人重重倒地发出的闷响。

李湛死了。

这个年仅十八岁的青春皇帝就这样把娱乐进行到死了。

干掉天子后，刘克明等人当即伪造了一道圣旨，传翰林学士路隋草拟遗诏，命绛王李悟（宪宗第六子）主持军国大事。

十二月初九，宫中发布天子遗诏，绛王李悟登紫宸殿外廊，接见宰相和文武百官。

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满朝文武面面相觑，百思不解。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个浑身上下充满活力的青春天子，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说驾崩就驾崩了呢？

谁也不知道，昨天那个月黑风高之夜，皇帝的寝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满朝文武，只有一个人对此心知肚明。他就是枢密使王守澄。

作为当年谋杀宪宗的主谋之一，王守澄很清楚天子暴毙的真正原因。很显然，内侍宦官刘克明等人干了和他当年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他们的目的也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拥立新君，控制朝政。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王守澄不敢耽搁，立刻召集右枢密杨承和，左右神策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四个当权宦官，被时人称为“四贵”），开了一个碰头会。

经过紧急磋商，“四贵”决定抢在刘克明等人之前动手。

十二月初九，禁军倾巢出动。大明宫内鲜血飞溅。刘克明一党和绛王李悟等全部被砍杀。同日，王守澄等人亲自赶往十六宅（李唐皇族的聚居地），迎请江王李涵入宫……

满朝文武还没从天子暴亡的突发事变中回过神来，眼前的一切再次令他们目瞪口呆。

江王李涵是穆宗李恒第二子、敬宗李湛的异母弟，时年十八岁，仅比李湛小几个月。当一群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在宦官的率领下不由分说地把他拥入宫中的时候，一脸苍白的江王李涵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这群人到底要让他干什么。

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他们是要让他当天子。

直到江王李涵站在金銮殿上，看见那张空空荡荡的帝座向自己蓦然敞开怀抱的时候，他仍然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它的确是真的。

第二天一早，宦官们就拥着李涵来到了紫宸殿的外廊，像昨天的绛王李悟一样，以储君的身份接见宰相和文武百官。

宝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的拥立下，江王李涵登基为帝，更名李昂，是为唐文宗。

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王守澄似笑非笑的目光一直盯在新君李昂的脸上。

这样的目光意味深长——

今天，我把整座江山送给了你；明天，你将回报给我什么？

大典进行的过程中，新君李昂始终目不斜视，看上去似乎显得专心致志。

可是，他只用眼角的余光就读懂了王守澄那个诡谲的笑容——

我知道，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你开启了我的帝王之路，你有定策之功，所以，我会给你梦寐以求的一切富贵。

不过，有一点你要搞清楚，这李唐江山是我父兄留下的遗产，不是你一个奴才可以随手送人的礼物。所以总有一天，我也会给你一样你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惩罚。

一个僭越犯上、擅行废立的奴才应得的惩罚。

第五章 平藩、除阉、斗相，悲剧三重奏

向藩镇宣战

作为一个被宦官拥立的天子，而且是一个与敬宗年龄相仿的天子，刚

刚上台的李昂是很不被大唐臣民看好的。

因为，穆、敬二宗将娱乐进行到死的那副德性太让人印象深刻了，并且鉴于遗传力量的强大作用，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叫李昂的年轻人十有八九也是个顽主。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这回，群众却看走了眼。

新天子非但不是顽主，而且还颇有明主的潜质——他一上台就狠烧了三把火，把臣民们烧得那叫一个目不暇接。

李昂先是一道诏命遣散了三千多名宫女，接着又把“五坊”中专供皇帝狩猎用的大部分鹰犬都放生了，随后又裁汰了教坊、翰林院和内苑总监中的一千两百多名冗员，最后把御马坊和马球场的占地，以及穆、敬二宗私藏的钱帛和田地等物全部划归朝廷的有关部门。此外，新天子还一改敬宗不理朝政的恶习，不但该上朝的时候准时上朝，而且在朝会上还孜孜不倦地向宰相和百官询问政务，以至经常忘了退朝的时间……

很显然，新天子登场后的这一系列做法，是想树立一种去奢从俭、励精求治的新政风，与贪玩好色和荒废朝政的穆、敬二宗划清界限。也就是说，他希望用大刀阔斧的实际行动，来改写李唐天子一蟹不如一蟹的历史宿命。

这样的开局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天子，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宪宗皇帝。

于是，原本弥漫在朝野上下的悲观情绪顿时一扫而光。长安士民争相庆贺，相信太平日子很快就会到来，而帝国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好。（《资治通鉴》卷二四三：“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新年二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太和”。

新时代的大幕拉开了，人们都兴奋地期待着新天子的后续表现。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的希望发展。

除了刚开始的三把火，这位闪亮登场的新天子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李昂登基不过数月，宰相们就发现，这位新君虽不乏宪宗皇帝年轻时

那种虚怀纳谏的雅量，但他却远远不具备宪宗那种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作风。

这些日子以来，君臣们在朝会上为帝国的未来描绘了许多美妙的蓝图，也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可往往是昨天刚刚研究出来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实行，第二天就被天子本人莫名其妙地推翻了。

当这种出尔反尔的现象屡屡发生之时，宰相们的积极性自然是备受打击。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四月，新任宰相韦处厚终于忍不住了，在延英殿上对天子发了一通牢骚，并愤然提出辞职。

天子赶紧赔笑脸，并且说了一大堆好话。

韦处厚很无奈，最后只好收回了辞职请求。虽然他心里仍有些不快，可其实他也知道，天子之所以屡屡出尔反尔，并不完全是主观性格使然，而是有着难言的苦衷。

准确地说，天子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足以通过天子左右帝国大政。这是谁的手？答案很简单——权宦王守澄。

事实上，从文宗李昂即位的那一刻起，王守澄就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帝国政治的幕后推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王守澄说不的，李昂就绝不敢说是。不管文宗君臣对帝国的未来作出了怎样的规划和设想，王守澄都拥有最终裁决权和一票否决权。

这是天子的无奈，更是帝国的悲哀。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乱政”的现象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所致。任何人试图挑战宦官集团的权威，都必须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并且还要掂量自己的分量和实力。对此，无论是位居宰辅的韦处厚，还是君临天下的李昂，都概莫能外。

当然，天子宰相和满朝文武都奈何宦官不得，不等于天下士人就会对这种反奴为主、太阿倒持的政治乱象始终保持沉默。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在文宗李昂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科的策试中，一个叫刘蕡的考生就呈上了一份慷慨激昂的策论，对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终于替天下士人出了一口恶气，也替朝堂上的衮衮诸公说出了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蕡的策论文采斐然，切中时弊，而且把宦官和藩镇骂了个狗血喷头。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所有看过卷子的人都觉得这个刘蕡实在是太有才了，骂得也实在是痛快！

可是，有才归有才，痛快归痛快，就是没人敢录取他。

因为没人敢得罪宦官。

包括天子李昂在内。

半个月后，朝廷张榜，同科应考的杜牧、裴休等二十二人皆被朝廷录取，且被授予官职，唯独刘蕡名落孙山。上榜的考生们义愤填膺地说：“刘蕡落第，我辈登科，岂不令人汗颜！”随即联名上疏，请求把他们的官职转授刘蕡。与此同时，京城的舆论也一片哗然，纷纷为刘蕡鸣冤叫屈。

然而，天子和朝廷始终未作任何表态。

最后，刘蕡默默收拾行囊，黯然离开了长安。据说，刘蕡后来辗转数道，先后做了几个节度使的幕僚，终其一生也未能正式入仕，到死都是个不入流的“吏”。

不过，话说回来，刘蕡的这种结局也未尝不是好事。

道理很简单——连天子本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他一个小小的刘蕡就算入仕为官，不也是宦官砧板上的鱼肉吗？

这些年来，除了“宦官乱政”令人心焦之外，帝国的藩镇事务也是一笔让人无奈的糊涂账。

穆宗一朝，成德出了个王庭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诚，武宁出了个王智兴。无一例外，全都是通过兵变上台的。穆宗李恒像是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还东奔西突地扑了几下，后来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是白搭，索性闭上眼睛当鸵鸟，对藩镇一律采取妥协政策。

到了敬宗一朝，局面更是混乱不堪。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承认他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三百多口，自立为留后。敬宗照例听之任之，于数月后任其为节度使。

差不多在此前后，横海（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节度使李全略死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捷又擅自兼任留后。文宗登基后，李同捷随即送他的两个弟弟入朝为质，希望以此换取朝廷对他的任命。

对李昂来讲，这显然是他帝王生涯中的第一个考验。

如果承认李同捷，那无异于自动承认自己跟穆、敬二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如果拒绝承认，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

刚刚即位的文宗李昂，敢下决心和藩镇开战吗？

他不敢。

可是，既想避免战争，又不甘心被藩镇牵着鼻子走，该怎么办？

文宗想来想去，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把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乌重胤调往横海，再把李同捷调往兖海（治所兖州，今属山东）。

文宗本以为这样一来，既遂了李同捷当节度使的愿，又维护了朝廷的脸面，也算是个两全其美之策。

然而，接到调令的时候，李同捷却发出了一声冷笑。

在他看来，天子这一招叫作调虎离山。

老虎一旦离开自己的山头，被人扒皮的日子还会远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捷不会不懂。于是他假托被将士留住，拒绝赴任。

文宗犯难了。

他意识到，眼下的河北诸藩早已被穆、敬二宗宠坏了，朝廷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宣战，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怎么办？

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敬二宗之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奉行鸵鸟政策的“太平”天子？

要论志向，打从江王时代起就熟读《贞观政要》、对太宗皇帝充满无

限景仰的李昂绝不至于胸无大志。对于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积弊，以及穆、敬年间的种种政治乱象，他也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在内心深处，李昂的中兴李唐之志绝不在当年的宪宗李纯之下。

如今，李昂唯一缺少的，也许就只有行动的勇气了。

太和元年盛夏的那些日子，大明宫中燠热难当，李昂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最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向藩镇宣战。

他要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如今的大唐天子绝不是一个空怀梦想、志大才疏的人，他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朝廷的纲纪和尊严，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这一年八月，文宗毅然下诏，革除了李同捷的所有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史宪诚、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发兵讨伐。

志大“财”疏：文宗的软肋

朝廷的宣战书一下，诸藩立刻产生了不同的反应。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表现得最积极，不仅亲率三万大军开赴战场，而且自备了五个月的军粮。当然，王智兴之所以如此自告奋勇，并不见得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首先，武宁地处江淮，与河北的利益联结不是很紧密；其次，王智兴也未尝不是想利用朝廷与河北的矛盾，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历来同穿一条裤子的河北三镇，此次在对待横海的问题上，却采取了很不相同的立场。

横海虽然位于河北境内，但与卢龙、魏博、成德这三个造反专业户比起来，跟朝廷打架的经验要少得多，本身的实力也小很多。所以，朝廷一发出讨伐令，李同捷就赶紧给三位老大送了一大堆珍玩和美女，希望他们出手相助。

面对李同捷的贿赂和求援，三镇的反应各有微妙之处。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当李同捷的侄子带着礼物来见他时，李载义想都不想就把他绑了，随后连人带东西一块献给了朝廷，做得相当绝情，一点面子也不给。

李载义之所以急于跟横海划清界限，原因自然也不是出于忠诚，而是出于心虚。

作为一个靠兵变上台的节度使，李载义很清楚，自己上位的合法性其实远比李同捷弱得多。人家至少还是父死子继的，而自己却是篡位夺权的。如今，朝廷居然派他这个篡位的去打那个世袭的，显然是给他一个表露忠心、塑造忠臣形象的机会。不管李载义心里怎么想，至少在表面上，他很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洗洗白，以加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巩固节度使的地位。

此外，被他杀掉的前任节度使朱延嗣是朱滔后人，虽然朱氏已被他灭门，但毕竟好几代人当过节度使，在卢龙将士中不乏拥趸，如果李载义不能趁这次机会取得朝廷的信任和支持，日后能否坐稳节度使的位子，实在很难说。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必须对横海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

相对于态度鲜明的李载义，魏博史宪诚的立场则是相当暧昧。

因为史宪诚被横海和朝廷夹在了中间——一方面，他跟李同捷的父亲李全略有姻亲关系，现在李同捷有难，不拉一把似乎说不过去；可另一方面，朝廷又把他也列入了讨伐李同捷的阵营，这既像是对他表示信任，又像是在试探他。

史宪诚颇感为难，只好采取骑墙策略，一边暗中给李同捷资助粮草，一边赶紧派人入朝，去摸朝廷的底。

魏博使者首先拜会了元老裴度。众所周知，自宪宗时代起，裴度就是朝廷处理藩镇事务的核心人物，所以，摸清他对魏博的看法，也就等于摸清了朝廷的底牌。

让魏博使者喜出望外的是，裴度对史宪诚非常信任，居然一再表态，说他相信史宪诚对朝廷绝无二心。

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这一回，裴度对史宪诚算是彻底看走眼了。

不过，明眼人还是有的。当魏博使者又赶到中书省，去拜见中书侍郎韦处厚时，却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韦处厚斜乜了使者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听说，裴大人在皇上面前力保你家大帅，说愿用阖家百口的性命，为你家大帅担保。可惜，我

韦某人跟裴大人看法不同。我只想睁大眼睛，看你家大帅的实际行动。回去告诉史大人，不管他干了什么，朝廷自有纲纪法度在，该赏则赏，该罚则罚，绝不含糊！”

使者忙不迭地跑回魏博，向史宪诚转述了韦处厚的话。

史宪诚听出了一身冷汗。

他知道，韦处厚深受天子信任，在如今的朝廷，其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裴度。所以，如果自己继续玩首鼠两端的把戏，搞不好就是给李同捷当陪葬。

意识到此，史宪诚不得不停止了对横海的资助，并于数月后出兵讨伐李同捷。

在河北三镇中，唯一支持横海的，只有成德的王庭凑。

因为王庭凑对朝廷很不满。

此次讨伐李同捷，朝廷给卢龙和魏博都派了任务，唯独把他成德漏掉了，这是无心之失吗？

显然不是。

这是因为朝廷不信任他。

王庭凑一想到这个就火大——那李载义和史宪诚还不是跟我一样，也是靠兵变上台的，凭什么他们能打着朝廷的旗号出征，我王庭凑就该被甩在一边？

当然，王庭凑这次力挺李同捷，并不仅仅是出于被朝廷冷落的那种醋意。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了一种被朝廷打入另册的恐惧。

既然朝廷在河北三镇中最不信任他，那么一旦摆平李同捷，接下来要收拾的，岂不就是他王庭凑吗？！出于这样的危机感，王庭凑自然要跟李同捷结为盟友，共同对抗朝廷了。

太和元年秋，经过一番利益权衡，河北三镇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阵营，两个投向朝廷，一个靠向了横海。

这年冬天，双方开打。

此时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想到，这场平藩之战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朝廷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场战争前后打了将近两年。

第一年冬天，文宗失去了他最为倚重的平叛主将乌重胤。

第二年冬天，他又失去了最为信任的心腹宰相韦处厚。

当然，这一对文臣武将并非直接死于战争，而是因病去世的，但是对即位不久的文宗李昂来说，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

左膀右臂的遽然离去，令文宗哀伤不已，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落入了焦头烂额的窘境。

由于王庭凑公然支持李同捷对抗朝廷，文宗不得不在太和二年九月同时讨伐王庭凑，在横海与成德之间两线作战。

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军费开支的急剧增长。本来，花钱如流水的穆、敬二宗就没给李昂留下多少家底，如今，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又像是一头张着血盆巨口、并且永不餍足的巨兽，无情地吞噬着李唐天下的民脂民膏和捉襟见肘的帝国财赋……

看着迅速被耗干的国库，文宗李昂感到了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十九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进入了尾声。新任横海节度使李祐攻克横海重镇德州（今山东陵县）；同日，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攻破了横海治所沧州外城。

眼见着大势已去，李同捷只好向朝廷投降，不久便被朝廷的宣慰使砍杀。

是月底，李同捷的首级传送京师，横海宣告平定。

文宗李昂无力地笑了。

与其说这是胜利的笑容，还不如说是近乎虚脱的、庆幸的笑容。

假如李同捷再坚持半年，先垮的肯定不是他，而是朝廷。

因为朝廷再也拿不出军费了。

虽然赢得十分惊险，但文宗毕竟为朝廷赢回了丧失已久的尊严。所

以，他还是感到了一丝欣慰。

然而，李昂断然没有想到，就在李同捷败亡不久，魏博旋即又爆发了一场兵变。

就是这场兵变，将文宗朝廷历尽艰辛赢得的胜利果实毁于一旦。

平定横海后，为了彻底铲除后患，文宗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行政和人事安排。命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转任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市），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镇魏博；同时，把魏博辖下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卫州（今河南卫辉市）、澶州（今河南内黄县东南）三地划出去另设一道，并另行委派了节度使。

魏博的骄兵悍将眼看自己的藩镇即将被朝廷肢解，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史宪诚，希望他能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维护藩镇和地方将士的利益。

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史宪诚既然在讨伐横海时倒向了朝廷，现在当然要跟朝廷步调一致了。因此，他不但心甘情愿服从了朝廷的安排，而且还把魏博府库中的金银绸缎搬运一空，准备全部带往河中。魏博将士忍无可忍，于六月底发动兵变，杀死了史宪诚，拥立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同日，毫不知情的节度使李听抵达魏州（魏博治所，今河北大名县），准备接管魏博。何进滔趁其不备发兵进攻。李听仓促应战，结果招致惨败，士卒死伤过半，余皆逃散，辎重和粮草全部落入何进滔之手。李听仅以身免，仓皇逃回滑台（义成治所，今河南滑县）。

消息传来，文宗李昂目瞪口呆。

国库早就已经见底，如果接着对魏博开战，朝廷拿什么充当军队的粮饷呢？

此时此刻，李昂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痛苦和无奈的事情不是志大才疏，而是——志大财疏。

太和三年八月初，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而且把相、卫、澶三州归还给了魏博。八月二十五，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成德的王庭凑及其部众，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爵。

轰轰烈烈的平藩之战，就此功败垂成。

与藩镇的第一次较量居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对即位不久的李昂来讲，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感到，燃烧在自己胸中多年的中兴壮志，仿佛一下子就熄灭了，并且化成一道青烟袅袅飘散。

李昂从此变得一蹶不振。

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即便后来有钱了，这个深感“志大才疏”的天子在平藩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的斗志和勇气，而是变得跟他的父兄如出一辙——成了一个彻底的妥协主义者。

对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人来讲，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当我们纵观文宗李昂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我们发现，和他此后要遭遇的一连串失败比起来，太和三年平藩之战的功败垂成实在算不上什么。

换句话说，李昂的悲剧人生才只是刚刚开始。

牛李党争：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自从心腹宰相韦处厚遽然离世，李昂心里就有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平藩之战功败垂成后，他的无助之感愈发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与一册册经书史籍为伴。

一个人默默读书，既是李昂从小养成的习惯，更是他自我疗伤的不二法门。

李昂从来不喜欢声色犬马。尤其是情绪不佳的时候，更是对种种歌舞伎乐、射猎宴游等娱乐活动敬而远之。

不仅如此，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李昂似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厌恶。

有一次，驸马韦处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着当时很流行也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夹罗巾”。文宗一看，马上面露不悦，说：“朕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是因为看上你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就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戚去戴好了，你最好别戴。”

事实表明，文宗李昂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即位之初所表现出的种种去奢从俭的作风，显然不宜被视为政治上的作秀，而应该是居于他与生俱来的性格。远的暂且不说，仅与他的父兄，一辈子纵情声色的穆、敬二宗比起来，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就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要当一个好皇帝，仅凭“俭朴自律”四个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想在忧患深重的中晚唐做一个振衰起敝的皇帝，就更需要各种素质和能力的配合。至少，坚定的意志和果决的行动力，绝对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

遗憾的是，文宗李昂在这方面明显偏弱。

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之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

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依靠强势宰相的鼎力辅佐。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们起用了什么人当宰相。比如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奸相卢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宪宗皇帝之所以能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满腹韬略、深谋远虑的人物。

对此，终日手不释卷、熟悉唐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知道。

可眼下，文宗却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

韦处厚去世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他上位后碌碌无为，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

但是，此时的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保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这几年来，裴度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脑力和精力都已严重衰退、今非昔比了。在此情况下，文宗和裴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朝廷必须赶紧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

此人时任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他的背景和资历后，也觉得挺满意，随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此时的文宗和裴度当然不会料到，唐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将由这个人引发，并最终席卷整个帝国政坛。

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许是由于出身显赫，李德裕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甚至对科举取士的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因此，从小到大，李德裕都没有参加科考。尽管他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却连乡试都没参加过，颇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轻人一样，对应试教育颇有微词，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尤为不屑，所以死也不参加。

不过，一个人试图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肯定要具备某种傲人的资本，否则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当然，李德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官二代。

在唐朝，官二代不参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两条，一为科举，一为门荫。所谓“门荫”，说白了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

既然如此，身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自然有资格对高考说不。

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官员，大约于元和十一年入朝，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的禁中书诏多出自他的手笔，故与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绅并称一时才俊。

一开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着父亲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学，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鱼得水，距离父亲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似乎也并不遥远。

然而，到了长庆二年，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顺风船就触礁搁浅了。

早在元和年间，李逢吉与李吉甫的政见就多有抵牾。后来，李吉甫在宪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结下梁子。现在，李逢吉又回来了，当然要拿仇人的儿子开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又贬为浙西观察使，从此远离政治中枢。

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回想早年的春风得意，李德裕觉得当下的处境无异于坐牢。这些年来，李德裕几乎日夜都在引颈西望，无时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诏书。

而今，他终于熬到头了。

一接到诏书，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

离开浙西的那一天，尽管时节已近暮秋，可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凭着多年从政的经验，他已经从朝廷的诏书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

准确地说，那是文宗将对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许。

李德裕相信，七年前与他擦肩而过的宰相之位，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属了。

然而，李德裕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个人已经抢在他前面，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

这个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一个主角——李宗闵。

说起李宗闵，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也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

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坛上的宿敌。

要说清他们之间的宿怨，还要从二十一年前讲起。

李宗闵和牛僧孺是一对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人于贞元末年同登进士榜。及第后，李宗闵授华州参军，牛僧孺授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赴考。而他们与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缘于这次考试。

当时，李、牛二人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就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

赏，便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甚为嘉许。

然而，李宗闵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却把当朝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来，这几个考生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日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愤然而起，立刻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说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愿为此跟宰相把关系搞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长期不得升迁。

因言获罪的李宗闵和牛僧孺虽然满腔怨愤，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殁，李宗闵和牛僧孺头上的紧箍咒总算是解开了，遂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又同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他出征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1]；穆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舍人。

与此同时，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

眼看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几年不但咸鱼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难安，随即利用为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

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

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为了区别于“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

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

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李二党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频上演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雷同的历史大戏。

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

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械斗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党人弃之不顾，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如此恶劣的党派斗争，对于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着一个朋党之争。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头。

年轻的文宗李昂就这样在历史的重负下踉跄前行。

他的眼神迷惘而无助。

他的前方，危机四伏……

流产的“除阉计划”

文宗李昂有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和穆、敬二宗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窝囊天子。尽管他比父兄更自律、更勤政、更有志向，可这个世界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如果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你说

你多努力都没人会相信，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自从即位以来，李昂发现自己多当一天皇帝，就会多一分无力之感——面对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他无力；面对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无力；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他更无力。

在这三者中，藩镇和朋党固然可恶，但李昂多少还能容忍，毕竟他们不会直接颠覆他的帝位，危及他的生命，充其量只能算是远患。让李昂感到最可恨也最可怕的，其实是擅权乱政的宦官。

李昂心里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都是死在宦官手里的，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忘怀的血海深仇；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李昂自己偏偏又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弑逆犯上，也就不可能有李昂的今天。这笔糊涂账，到底该怎么算？

也许，只能把恩和仇分开来算。

李昂登基后，为了报答王守澄的拥立之功，不得不让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为骠骑大将军，可谓荣宠备至。王守澄从此一手遮天，不仅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有架空皇帝之势。

对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如今，该报的“恩”，李昂都已经报答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报仇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了。这不光是为宪、敬二宗报仇的问题，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之策。原因很简单，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阉宦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宪、敬二宗，如今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刻取他李昂的性命，另行拥立天子。

只要他们觉得有动手的必要，估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所以，李昂知道，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会步宪、敬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

对付宦官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情，需要有胆识、有能力、并具备高度忠诚的人来承担，否则，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然而，让李昂深感无奈的是——他身边几乎无人可用。

如今，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几乎都在忙于党争和倾轧，而且大多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中找出一个背景清白、忠诚能干的人，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所幸，文宗李昂找了整整三年，终于找到了一个。

此人名叫宋申锡，时任翰林学士。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李昂觉得此人沉稳干练、忠实可靠，应该可以委以重任。有一天，李昂单独召见宋申锡，鼓足勇气向他发出了试探。这种试探是相当含混的。就像一个内心炽热而外表矜持的窈窕淑女，对某郎君芳心暗许却又不敢直言表白，只好向他抛出那种若有似无、欲说还休的媚眼。

尽管天子的这个“媚眼”抛得有些暧昧，可聪明的宋申锡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读懂了。他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并最终做掉他。

一听此言，文宗李昂顿时龙颜大悦。

看着宋申锡那张敦厚忠直的脸庞，李昂真是无比欣慰。

几天后，李昂就把宋申锡擢升为尚书右丞。太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十一日，李昂又正式任命宋申锡为宰相。

宋申锡蹿得这么快，虽然有些突兀，但人们并没有多想。此时的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包括权宦王守澄在内，都没有猜到这个政坛新贵突然跻身权力中枢的真正原因。因此，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料到他身上所肩负的那项特殊使命。

文宗李昂与宦官集团的第一次较量，就这样悄悄拉开了序幕。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策划，到了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春，文宗李昂与宋申锡终于制订了一个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就是为这个计划物色一个具体的执行人了。

宋申锡选择了时任吏部侍郎的王璠，准备引荐他担任京兆尹，也就是把京畿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让他去对付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

宋申锡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王璠，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选择。

这个选择，将给他和天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宋申锡向王璠传达天子密旨的时候，王璠一开始是颇有些受宠若惊的，然而他转念一想，就觉得不太对头了。

因为这件事的风险太高，收益又太低，很不划算。

先说风险。此次对阵的双方，一边是大权旁落的天子和刚刚上位的宰相，一边是根深势大、权倾朝野的宦官，二者实力之悬殊不言而喻，宦官获胜的可能性大得多。要是脑子一热去蹚这趟浑水，搞不好不但自己人头落地，全家人恐怕都要跟着脑袋搬家。

再说收益。就算天子这边侥幸获胜，那功劳也是宰相宋申锡的，他王璠一个跑腿的能得到什么？也就是个不痛不痒的“京兆尹”而已。为了这顶可有可无的乌纱帽，就押上身家性命跟宦官斗，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所以，王璠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事儿很不靠谱，绝不能干。

当然，在宋申锡面前，王璠是不会这么说的。

他甚至连内心的一丝犹疑都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作出一副疾恶如仇、与宦官势不两立之状，因而彻底稳住了宋申锡。

然后，一走出宋申锡的家门，王璠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了王守澄的宅邸，把他刚才听到的东西一五一十全给抖搂了出来，而且还不忘绘声绘色地添上几滴油、加上几点醋，以博取王守澄的欢心。

得知天子的绝密计划时，王守澄还是有几分震惊的。尽管他知道天子李昂心里对他有些不满，可他绝没想到天子会动杀机。

原来看上去那么文弱的人，内心也有这么强的杀机。

看来，自己还是有点小瞧这个年轻人了。

不过，王守澄丝毫没有慌乱。天子李昂的这点小阴谋小诡计，对于腥风血雨闯荡过来的王守澄来讲，根本就是小儿科。

随后，王守澄召见了一个人。

这些年来，不管碰到大事小事，王守澄都会找这个人过来商量，然后交给他去摆平。

在王守澄看来，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出两个最聪明的人，一个当然就是他自己；另外一个，恐怕就非此人莫属了。

这个人，名叫郑注。

过去看武侠小说，经常会发现一种模式，那就是——一个人的武功高低往往跟他的表面形象成反比。

通常，外表最凶悍的彪形大汉往往武功最烂，他们出场的时候，总是十几个扎堆打一个，结果还老是被人家用一把扇子或一根柳条打得满地找牙。所以说，这种外表凶悍的人根本没用，只是打手级别。

再往上一个层次，一般是风流倜傥的年轻公子，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又或者是满头银发的长须老者。总之，此类人都是比较斯文的，看上去好像不能打，其实一出手就能放倒十几个彪形大汉，属于高手级别。

但是，真正的绝顶高手，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比如，每当几路人马在客栈里乒乒乓乓打得火热的时候，角落里总会坐着一个干瘪瘦小、背部微驼、长得像痨病鬼一样的人。别人嘿嘿哈哈打得半死，他却浑然不觉，只是坐在那儿一个劲地咳嗽。但是，当咳嗽声蓦然停止的时候，整个客栈就会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完全静止下来。

因为，痨病鬼出手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出手的，只知道那些彪形大汉、年轻公子、妙龄女郎、长须老者，都在刹那间被点了死穴，丝毫不能动弹。

最后，痨病鬼会在一连串的咳嗽声中站起来，伛偻着身子慢慢向外走去，没有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脸，只给众人留下一个莫测高深、来去无踪的背影。

在当时的权谋江湖，郑注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毫不起眼、实则内功深厚的绝顶高手。

史称，郑注“眇小，目下视，而巧谲倾谄，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羁贫甚”（《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翻成白话就是，郑注这个人干瘪瘦小，眼睛有斜视的毛病，为人狡险

诡谲、心机极深，要陷害一个人或是谄媚一个人，都很容易得手，因为他善于洞察人的内心。此人早年凭借医术行走江湖，但是混得不怎么样，经常穷得叮当响。

早年跟郑注打过交道的人，肯定没有一个会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日后会成为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郑注的发迹，始于徐州。

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就是平定淮西的名将李愬。

当时，李愬担任武宁节度使，坐镇徐州。他麾下有个牙将有一次生病，老是看不好，后来不知怎么就找到了郑注，结果郑注一来，即刻手到病除。牙将又惊又喜，赶紧把他介绍给了李愬。李愬当时身体也不好，就让郑注试着给他开些方子，服用之后，果然感觉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李愬大喜过望，马上给了郑注一个官职，把他留在了身边。

郑注就此时来运转，从一个穷酸落魄的江湖郎中变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

但是，郑注是个野心很大的人，绝不会满足于私人医生的角色。很快，他就利用李愬对他的信任频频干预军政。也许是因为这家伙确实心机过人，凡他经手的事情总是处理得很好，所以李愬对他越发信任，下放给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郑注得志之后，开始在徐州作威作福，日子一长，自然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

当时，有个人对郑注最为反感，恨不得马上把他赶出徐州。

这个人就是王守澄，当时他的职务是武宁监军。

王守澄找到李愬，说这个姓郑的很不地道，弟兄们都很讨厌他，还是赶紧请他走人吧。李愬笑着说：“郑注虽然有些毛病，但却是个奇才，王大人要是不信，可以找他谈谈。要是实在没什么可取之处，再让他走也为时不晚。”

随后，李愬就让郑注去拜访王守澄。王守澄一开始很不屑于见这个“痨病鬼”，后来一想，其实也不妨见见，挑他一些毛病，也好以此为由把他赶走。

然而，王守澄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会见的结果，竟然会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宾主双方坐下来后，才讲了一会儿话，王守澄就对这个丑陋的痨病鬼刮目相看了，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自己跟他谈话的目的。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一席话下来，王守澄就对郑注的见识和口才大为折服，立刻把他延请到“中堂”（刚开始可能只是在厢房接见，准备敷衍一下就把他打发掉）。然后，两人又进行了一番促膝长谈，其间笑语不断，聊得相当投机。王守澄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二天马上对李愬说：“郑先生果然如您所言，是个难得一见的奇才！”

从这一刻起，郑注再次摇身一变，成了王守澄的密友兼智囊，而王守澄自然也就成了郑注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

长庆三年，王守澄回朝担任枢密使，就把郑注带到了长安，并在自己府邸旁边给他盖了座豪宅，而且很快又把他推荐给了穆宗。当时穆宗正苦于风疾，吃过郑注开的药后，虽然病情不见好转，但是病痛却能得到有效缓解，于是对郑注大为宠幸。

至此，郑注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跨越，从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变成了皇帝的首席御医。

与此同时，王守澄利用天子患病独揽大权，而作为心腹智囊的郑注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王守澄的权力寻租代理人。凡是想巴结王守澄的，必得先过他郑注这一关。

郑注刚到长安的时候，来走后门的不过是一些想往上爬的小官吏，短短几年后，和他交往的就都是清一色的达官贵人和名流政要了。每天，他家门口的高档车马都会摆成一条长龙，吸引着无数路人既羡且妒的目光。

到了文宗年间，郑注俨然已是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然而，他的野心远未满足。

没有人知道，这个当初穷困潦倒的江湖郎中，很快就将实现人生中的第三次跨越。而最后这一次跨越，是踩着王守澄的尸体实现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时的王守澄不可能预料到几年后要发生的一切。

现在，王守澄正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个世界上第二聪明的人，等着他想出一个计谋，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宋申锡彻底摆平，同时给天子李昂一个深刻的教训。

郑注并没有思考很久。

他略一沉吟，一个天衣无缝的反击计划就出笼了。

他问王守澄："王公，依您看，古往今来之人君，最忌讳的事情是什么？"

王守澄脱口而出："谋逆。"

郑注一笑："那么再依您看，如今的宗室亲王中，谁最有贤能之名，最得时人赞誉？"

王守澄再次脱口而出："漳王李凑。"

接下来，郑注不说话了，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守澄。

王守澄想了想，也跟着无声地笑了。

漳王李凑是文宗李昂的异母弟，人望很高，当初敬宗被弑后，这个漳王其实也是宦官们考虑的继位人选之一。王守澄很清楚，对这种人，天子李昂不可能没有猜忌和防范之心。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人指控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再有人出面举证，天子肯定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此一来，宋申锡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现在的问题是，要让谁来指控？谁来举证？

当然，这些活就是郑注要干的，也是他的拿手好戏。王守澄知道，郑注不会让他失望。

很快，郑注就找来了两个人：一个叫豆卢著，另一个叫晏敬则。

豆卢著，时任神策军都虞侯，其职责是秘密纠察文武百官的过失。由他来提出指控，可谓顺理成章，很容易让人采信。

晏敬则，宦官，专门负责为十六宅（宗室亲王的府邸群）采办物品。郑注交给他的任务是——由他以自首的方式出面举证，证明宋申锡曾授意亲信幕僚王师文与他暗中结交，从而通过他向漳王李凑传达拥立之意。

一张天罗地网就这么撒了下来，可此时的文宗和宋申锡却对此浑然不知。

他们仍然以为，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他们仍然相信，肩负重任的王璠马上会给他们带来胜利的消息……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二月二十九日，王守澄匆匆入宫，向天子李昂禀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指控宋申锡，说他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而且证据确凿。

这一刻，文宗李昂目瞪口呆。

完了，彻底完了！

李昂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半年多来苦心制订的除阉计划，已经在这一刻宣告流产了。

因为，无论宋申锡谋反是真是假，这个人都已经不能再留。原因很简单，如果宋申锡真的想谋反，他固然该死；就算他是被诬陷的，也足以证明计划已经泄露，所以王守澄才会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倘若真的是后者，那宋申锡就更不能留。

没得选了，就算明知道宋申锡是被陷害的，此刻的李昂也只能壮士断腕、丢卒保车，否则很可能陪着宋申锡一块完蛋。换句话说，他必须毫不犹豫地牺牲宋申锡，以此向王守澄谢罪，求得宦官集团的宽宥和谅解，才能勉强自保。

王守澄细细玩味着天子的表情，心里掠过一丝冷笑。他当场向文宗提出，要亲自带领两百飞骑去把宋申锡满门抄斩。

李昂茫然无措地看着王守澄，无奈地点了点头。

关键时刻，另一个宦官马存亮站了出来，极力反对王守澄的提议。他说：“未经查实而诛杀宰相满门，必将引起京师大乱！臣建议，应该召集众宰相就此事举行廷议。”

马存亮也是一个元老级宦官，资历并不比王守澄浅，而且曾经救过敬宗皇帝一命。王守澄尽管极为不悦，也不便发作，只好悻悻作罢。

李昂闻言，顿时庆幸不已，自己身边总算还有一个宦官保持中立，没有被王守澄收买，真是谢天谢地！

文宗随即传诏，命宰相们到延英殿廷议。

而直到此刻，宋申锡依然蒙在鼓里。当他跟其他三位宰相一起进入宫门时，忽然被传诏宦官拦住了去路："圣上所召的人中，并无宋公。"

宋申锡懵了。

但是，凭着起码的政治嗅觉，他也能意识到大事不好了。

他知道——王璠肯定把自己卖了，而且顺带着把天子也给卖了。

所托非人，所托非人啊！除了怪自己瞎了眼，宋申锡还能怎么办呢？仅仅由于一个具体环节的疏忽，就导致了整个计划的流产，不仅辜负了天子的重托，还把天子置于了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一刻，宋申锡真的有一种五内俱焚之感。

他满怀惭悚，忧愤难当，最后把朝笏高高举过头顶，往延英殿拜了三拜，黯然转身离去。

延英殿上，当李宗闵、牛僧孺、路隋三位宰相得知此事，顿时大惊失色，相顾骇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这是谋逆大罪啊，还有什么好议的？更何况，宋申锡是皇上您钦点的宰相，现在居然犯了这种族诛重罪，我们还能说什么？所以，皇上您还是自个儿拿主意吧，对这件事，我们只能采取一个态度，那就是——沉默是金。

李昂早就料到了。这几个成天忙于党争、一心想着巴结宦官的宰相不可能替宋申锡说话。

这场沉默的廷议实际上跟没开一样。无奈的李昂只能授命王守澄，即刻逮捕晏敬则和王师文。王师文事先得到消息，连夜逃亡；晏敬则被捕，押进宫中由宦官审理。

三月初二，宋申锡被罢相，贬为右庶子。虽然满朝文武对此案真相心知肚明，但上自宰相，下至群臣，无人敢替其喊冤，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等少数大臣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移交外廷审理。然而，晏敬则早就被郑注摆平了。即便是由朝廷的司法部门审理，他还是一口咬定宋申锡、王师文暗中与他交结，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

既然当事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有心替宋申锡申冤的大臣们也就

无话可说了。

三月初四，此案定谳，宋申锡等人的谋反罪名成立。

朝野上下都知道，等待宋申锡的结果只有一个——杀头。

同日，文宗召集太师、太保，以及台、省、府、寺等所有高级官员再次举行廷议，讨论对宋申锡的处置办法。

很显然，李昂心里仍然存有一线希望——他希望大臣们能在这最后的时刻替宋申锡说一句公道话，保住他一条命。

以左常侍崔玄亮为首的一批谏官终于发出了天子希望听到的声音，一致要求重审此案。李昂感到了一丝欣慰。可在场面上，他还是不得不做一些姿态给宦官们看。他对谏官们说：“宰相们对此案已经没有异议，你们还是退下去吧，不必再坚持。”可谏官们却不肯退下，崔玄亮流泪叩首说：“杀一个匹夫尚且要慎重，何况是宰相！”

李昂用一种近乎感激的眼神看了崔玄亮一眼，说：“既然诸位爱卿如此坚持，朕愿意和宰相们再商议一下。”

李昂随即又召集宰相廷议。牛僧孺看出了天子的心思，便顺水推舟说：“人臣禄位，最高莫过宰相，宋申锡既已为相，若真有谋反企图，到头来仍不过是宰相而已，还能得到什么？故依臣看来，宋申锡当不致如此。”

郑注风闻朝臣们开始同情宋申锡了，担心万一重审、而晏敬则又顶不住翻供的话，真相就会泄露，到时候连他都得搭进去。思虑及此，郑注只好退了一步，劝王守澄放宋申锡一条生路，以免闹得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好处。王守澄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郑注的建议。

三月初五，文宗下诏，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

晏敬则等案犯则被处死或流放，同时还株连了一百多人。

同日，还有一个人向文宗递交了辞呈。

他就是宫中唯一没有依附王守澄的宦官马存亮。

不知是不是已经被王守澄施压，还是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威胁，总之，马存亮是铁定了心要走了。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宋申锡一案中

把王守澄彻底得罪了，如果硬着头皮留在宫中，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他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对于马存亮的心境，李昂比谁都清楚。尽管他很不情愿让身边唯一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宦官就这么离开自己，可他还是不得不批准了马存亮的致仕请求。

因为李昂知道，要是执意把马存亮留下来，他的下场绝不会比宋申锡更为美妙。

马存亮走后，文宗很快又得到一个消息，说宋申锡因抑郁忧愤，病死在了贬所。

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你们都逃离了，解脱了。只剩下朕一个孤家寡人，不知要往哪里逃？

太和五年的暮春，连绵不断的雨水一直顽强地飘荡在长安城的上空。唐文宗李昂独自坐在大明宫中，看见孤独像一张无边的巨网把他层层笼罩——让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党争进行时

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任上，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

部署，迅速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了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等于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

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文宗说得惭愧不已，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

李德裕无奈，只好从命。

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忍。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

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

王践言不止一次对文宗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不仅让吐蕃称心快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实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

眼见皇帝由此对牛僧孺产生了不满，李党成员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当初纯粹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忽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何时能够太平？诸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责备和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辞职。

意识到自己的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随即答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既无奈又伤感地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诏，将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就被征召回朝，出任兵部尚书。数年前与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终于再度向他发出了召唤。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李宗闵不禁忧心忡忡。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对他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所以，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还是没能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随后，李德裕便率领他那些"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朝。

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逻辑终点，无疑便是李宗闵的罢相了。

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不过半年。

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

这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已经当了八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已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一夜之间把帝国的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的话，他就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李昂又能做什么呢？

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发了——他忽然中风，一下子丧失了语言功能。

王守澄随即推荐郑注为天子治疗。

事实证明，郑注的医术确实不是吹的。他一出手，文宗的病情便大有好转，从此开始宠信郑注。于是，李昂的这场病就成了郑注实现第三次人生跨越的重要契机。野心勃勃的郑注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从而一跃成为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没有人会料到，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这个政坛新贵就将与另一个野心家联手，在帝国朝堂上掀起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并对所有既得利益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即将和郑注联手的这个野心家，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他就是李逢吉的侄子、当初的“八关十六子”之首——李仲言。

宝历元年，李仲言因武昭一案被逐出朝廷，流放边地。几年后，在一次大赦中回到了东都洛阳闲居。当时，李逢吉已被罢相，正以东都留守之职在洛阳坐冷板凳。叔侄二人劫后重逢，自然免不了互倒苦水，对当年的失败耿耿于怀。

这些年，李逢吉天天巴望着回朝复相，李仲言更是急切渴望摆脱目前的窘境，于是叔侄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由李逢吉拿出一笔重金，再由李仲言出面，回长安找人打点，谋求东山再起。

而他们决定打点的这个人，就是郑注。

郑注早年流落江湖时，跟李仲言有过一些交情。如今，老友找上门来，郑注自然要给点面子。更何况，李仲言带来的那笔重金也着实让郑注心动。收下贿赂后，郑注就把李仲言引荐给了王守澄，王守澄继而又把他引荐给了天子李昂。

此刻，在洛阳望眼欲穿的李逢吉绝对想不到，他拿出的那笔钱并没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复相之路，而是替李仲言铺就了一条攫取相位的金光大道。

由于李仲言深研《易经》，工于术数，而且能言善辩，富有文采，文宗一见倾心，将其引为奇士，宠幸日隆。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八月，文宗准备让李仲言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李德裕断然反对，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这种人岂能用为近侍？”

文宗不以为然：“难道不能允许他改过吗？”

李德裕毫不退让：“臣听说，只有颜回这样的圣贤才能不二过，至于李仲言这种人，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如何改过？”

文宗说：“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了，不想食言。”

文宗不提李逢吉还好，一提李逢吉，一下就勾起了李德裕的伤心往事。就是因为李逢吉的排挤，他才在浙西浪费了七八年的大好光阴。李德裕随即斩钉截铁地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推荐这种小人来误国，他也有罪！”

见李德裕如此坚决，文宗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好退了一步：“如果当侍讲学士不合适，那么，另外给他一个官总可以吧？”

没想到李德裕一点面子都不给，居然硬邦邦地顶了一句：“不可以！”

文宗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脸转向了另一个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举手要暗示王涯别松口，王涯却已经脱口而出：“可以。”

文宗不无得意地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顿时大为不悦。

不过，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几天后，他便不顾李德裕的反对，让李仲言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

当然，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跳板，迟早，文宗是要重用李仲言的。

李德裕此次面折廷争，把自己推入了相当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一方面，这种做法令文宗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又把权宦王守澄彻底得罪了。

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李仲言毕竟是王守澄引荐的，你李德裕如此不给面子，不就是跟王守澄过不去吗？

随后，王守澄、李仲言和郑注一合计，觉得这个李德裕实在太碍事，不赶紧把他弄走，谁也别想活得自在。

尽管李德裕贵为宰相，可在王守澄等人看来，要把这家伙弄走太简单了，甚至不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只要把某个人召回朝中，拱上相位，就能迫使李德裕滚蛋。

太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翩然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短短四天之后，李德裕就被罢去相职，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日，李仲言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至此，李德裕才意识到自己铸下了大错，连忙入宫向天子“陈情”，请求留在朝中任职。文宗考虑了一下，答应了，同意让他担任兵部尚书。

然而，天子虽然收回了成命，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却绝不答应。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能轻易更改、出尔反尔？

文宗哑口无言，只好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牛党党魁卷土重来，李党党魁再度失势，紧随而来的，自然又是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权力倾轧和政治洗牌。

面对如此阴魂不散的朋党之争，文宗李昂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太和八年岁末的那些日子，看着郁郁寡欢、愁肠百结的天子，李仲言和郑注不断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天子亟须信得过的人帮他排忧解难。如今，谁是天子最信得过的人？

当然是李某人和郑某人了。

李仲言和郑注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而且他们相信，只要能帮领导排忧解难，他们的前程必定不可限量。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仲言忽然上奏天子，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训。

一个人改名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已经活了半辈子才突然改名，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举动。

那么，李仲言为何改名呢？

也许，他是想用一个新的名字，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抱即将到来的辉煌仕途，同时拥抱一个风生水起的崭新人生。

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因为从这一年四月开始，在李训和郑注的一再怂恿之下，文宗李昂终于鼓足勇气，决定突围——从令人窒息的党争泥潭中，从宦官乱政的黑暗现实中，从上天给定的悲剧命运中，作一个历史性的突围。

尽管有着宋申锡的前车之鉴，可李昂并没有丧失信心。

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也不会永远都用错人。

李训和郑注没有辜负天子的殷切期望。

这两个野心勃勃的政坛新贵心潮澎湃地接过文宗给予他们的权力，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向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他们的第一波攻击目标是党人。

李德裕首当其冲。

尽管李德裕在去年十月已被逐出朝廷，外放为镇海节度使，可李训和郑注并未就此罢手。他们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为此，郑注找来了尚书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让他们出面指控李德裕，说他几年前曾与漳王李凑暗中勾结，图谋不轨。

在文宗一朝，这个漳王几乎就是衰神的代名词，不管是谁，只要跟他扯上关系，保准倒霉。

文宗一听李德裕居然跟漳王有瓜葛，勃然大怒，马上把宰相跟郑注、王璠、李汉等人召集起来，讨论如何处置李德裕。

会上，王璠和李汉一口咬定李德裕跟漳王勾结。宰相路隋看不过眼，

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德裕断然不会做这种事。如果硬要说他谋逆，那臣备位宰相，也有失察之罪。"

可想而知，路隋的仗义执言非但没能帮到李德裕，反而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搭了进去。

四月中旬，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宾客，到东都洛阳任职。稍后，路隋被贬为镇海节度使，补了李德裕的缺。

尽管李德裕已经被一贬再贬，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短短几天后，郑注就又找了两条理由，把李德裕踢得更远，连东都的冷板凳都不让他坐。这两条理由是：一、前年冬天天子患病，据说王涯曾邀约李德裕一同入宫探望，可李德裕居然没有去，显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二、李德裕在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曾强行征收赋税三十万缗，致使百姓困苦，怨声载道。

四月二十五日，李德裕再度被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市）长史。

看见李德裕被整得这么惨，李宗闵真是心花怒放，天天乐得合不拢嘴。然而，还没等李宗闵乐够，李训和郑注的枪口就已经转向他了。

这一年六月，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流言忽然在长安坊间传开，说郑注为皇帝配制的丹药，居然是用小孩的心肝合炼的。流言一起，整个京师顿时人心惶惶。

文宗大怒，马上命李训和郑注彻查流言的制造者。

李训和郑注立刻行动起来，很快就向文宗禀报了调查结果。他们说，流言是京兆尹杨虞卿的家人散布的。

文宗二话不说，当即将杨虞卿逮捕，关进了御史狱。

杨虞卿是李宗闵的心腹，他出了事，李宗闵当然不能坐视。随后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四处奔走，极力营救杨虞卿。

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这是李训和郑注专门给他设计的陷阱。所谓的流言及其制造者云云，当然也都是郑注一手炮制的。李训和郑注的目的，就是要在驱逐李德裕之后，把李宗闵及其党人一网打尽。

六月二十八日，一纸诏书颁下，李宗闵被罢相，贬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刺史。

七月初一，杨虞卿被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不久又贬为司户。

七月初九，李宗闵再度被贬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市）长史，不久又贬为潮州司户。

同月，被视为李宗闵一党的刑部侍郎萧浣等人，也纷纷被逐出朝廷，贬为远地司马。

与此同时，李训和郑注开始扶摇直上。李训先是任国子博士，后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仍兼翰林侍讲；郑注先是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后迁工部尚书，兼任翰林侍讲。

当时，朝中人人都说郑注随时可能拜相，侍御史李甘看不惯郑注小人得志的嘴脸，发了一句牢骚，说："只要他入相的诏书一下，我一定当廷把它撕毁！"

几天后，李甘便被贬为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司马。

文宗有一次跟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谈起郑注，问李珏是否与他有过交往。李珏不屑地说："臣深知他的为人。此人异常奸邪，皇上若宠幸他，恐怕对德业毫无帮助。臣忝列皇上近侍，怎敢与这种人交往？"

几天后，李珏便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毫无疑问，在此时的文宗朝廷，不管你是李党、牛党，还是洁身自好的无党派人士，只要不去抱李训和郑注的大腿，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贬谪。

就在全面打击党人的同时，李训和郑注又把目标转向了另一个更为强大、也是最让文宗李昂切齿痛恨的政治势力。

那就是——宦官。

作为短时间内强势崛起的政坛黑马，李训和郑注的发迹，无疑都得益于权宦王守澄的援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得势之后，毅然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守澄。

因为，在李训和郑注这种人眼里，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如今，王守澄还有利用价值吗？

没了。

眼下，只有堂堂大唐天子才是李训和郑注手中最有价值的筹码。所以，不管是牛党、李党，还是阉党，在李训和郑注的眼中都是浮云。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划归某个政治阵营，那也只能说他们是“皇党”。

是的，皇党。他们以此为荣为傲。

现在，李训和郑注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是天子李昂进行历史性突围的骑手和先锋，是睥睨一切旧势力的新时代的弄潮儿。

魔来斩魔，佛来杀佛，天地之间，唯我独尊。

宦官算什么东西？只要是阻挡他们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就一个字——杀。

当然，李训和郑注也知道，宦官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相比党人而言，对付宦官更需要策略。

为了剪除强大的宦官集团，李训和郑注决定采取“以毒攻毒、各个击破”的迂回战术。

他们首先锁定了一个人，作为剪除王守澄的突破口。

这个人，就是时任右领军将军的宦官仇士良。

此人在当年拥立文宗的行动中也曾立过功，由此长期遭到王守澄的压制。李训和郑注向文宗献计，进用仇士良，分散王守澄的权力。

这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仇士良突然被擢升为左神策中尉，取代王守澄掌管了禁军。

对此，王守澄虽然有些不悦，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直到此刻他也没有意识到，李训和郑注的刀子已经从背后悄悄伸了过来。

一个在权力的塔尖上待得太久的人，通常都会被一种凌驾万物的快感所陶醉，从而无视从塔顶跌落后那种粉身碎骨的危险。

王守澄就是这种人。

为了进一步麻痹王守澄，同时为了更快地瓦解阉党，李训和郑注计划的第二步，是反过来与王守澄联手，铲除另外三个一直与他明争暗斗

的元老级宦官。

他们就是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左枢密使杨承和、右枢密使王践言。

这一年六月，这三个大宦官一夜之间全被逐出朝廷，分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

八月二十三日，文宗下诏，指责这三名宦官曾分别与李宗闵和李德裕内外勾结、收受贿赂，故将韦元素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杨承和流放驩州（今越南荣市），王践言流放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同时，文宗又责令有关部门必须将三人戴上枷锁，装入囚车押送。

数日后，这三个人刚刚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派出的使臣便从背后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三人赐死。

太和九年，帝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从这一年四月到九月，在不过半年的时间里，李训和郑注联手掀起的政治飓风，就已经把整个长安官场扫得面目全非。史称，“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闵），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注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这些日子里，只要是跟李训和郑注有过丝毫旧怨或者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立刻就会被划归牛党或李党成员，遭到无情打击。百官几乎被贬逐殆尽，整个朝廷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一大批帝国的基层官员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过巴结李训和郑注而被迅速提拔，纷纷进入朝廷，占据那些突然空出来的重要职位。

看着原本铜墙铁壁般的旧势力被摧枯拉朽般地轰然推倒，文宗李昂终于感到了一种突出重围、豁然开朗的喜悦。看着原本声势浩大的牛党、李党和阉党到头来也不过是一群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年轻的天子顿时焕发出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快意和豪情。

那些日子，李训和郑注胸有成竹地为天子勾画了一幅美妙的政治蓝图，并且信誓旦旦地描绘了一番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他们说，第一步是铲除朋党和宦官，第二步是收复河、湟（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第三步是肃清河北的跋扈藩镇。

李训和郑注说，只要走完这三步，天下必然太平。

如今，党人集团已被彻底清除，接下来，只要把恶贯满盈的阉宦集团铲除干净，这第一步就算是走完了。

这一年九月，在李训的策划下，当年谋杀宪宗皇帝的凶手、时任山南东道监军的宦官陈弘志突然被征召回朝。二十一日，陈弘志刚刚走到青泥驿（今陕西蓝田县南），便被李训派出的人乱棍打死。

随后，李训和郑注又向文宗献计，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进一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

九月二十六日，原任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澄被调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

此刻，王守澄无疑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然而，对于死神近在咫尺的脚步声，王守澄还是充耳不闻。

与王守澄的调动相隔仅一天，文宗又发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

至此，李训终于登上了帝国的权力巅峰。

这个当初被流放边荒、几乎已经输得精光的投机政客，如今却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一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宰相，其发迹之快，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十月初九，李训和郑注认为除掉王守澄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建议文宗下手。

当天，宫中的内侍宦官李好古来到了王守澄的宅第。

他奉天子之命，给王守澄带来了一件礼物。

这是一瓶毒鸩。这个礼物，李昂已经给王守澄准备好多年了，直到今天才算派上用场。

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样你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惩罚。

一个僭越犯上、擅行废立的奴才应得的惩罚。

直到这一刻，王守澄才如梦初醒。

这个反奴为主、三度操纵皇帝废立的权宦，这个权势熏天、把持朝政十五年的幕后推手，终于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无助和恐惧。

可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黯然良久之后，在李好古冷冷的目光中，在一群禁军士兵齐齐的逼视下，绝望的王守澄终于颤颤巍巍地端起毒鸩，万般无奈地领受了这份迟来的礼物。

当天，朝廷发布了王守澄暴病而亡的消息，同时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并且宣布——准备在浐水为王守澄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在李训和郑注的计划中，王守澄的葬礼是非同寻常的。

因为，他们将利用这次葬礼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行动。

准确地说，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他们要在王守澄的葬礼上埋伏重兵，然后把王守澄大大小小的党羽一网打尽。

这样的一场葬礼，当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不是王守澄一个人的葬礼，而是这些年来，把历任大唐天子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整个阉党的集体葬礼。

如果顺利走完这一步，文宗李昂和他的皇党就算彻底粉碎了旧世界，从朋党和宦官的包围圈中成功突围了。无论他们下一步能否如愿以偿地收拾掉河北的跋扈藩镇，光是消灭“朋党之争”和“宦官乱政”这两大政治痼疾，就已经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了。

王守澄的葬礼定在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把这一页历史翻过去，前面就是李昂梦寐以求的那一片朗朗乾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了。

因为，另一个黑色的日子挡在了它的前面。

这个日子是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一天，一场可怕的政治灾难将降临长安，并使得

整座大明宫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后来的人们，把这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称为——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喋血大明宫

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王守澄死了，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无不额手相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帝国的未来也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通过王守澄这件事以及一年来朝堂上发生的一切，李训和郑注所表现出的阴险、狡谲和毒辣，足以令所有人不寒而栗。天子李昂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除了制造更多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外，还能为帝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其实，人们不难理解文宗李昂急于澄清天下的迫切心情，全力打击擅权乱政的朋党、阉党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起用李训和郑注这样的野心家来做这些事情，无异于“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只能为帝国朝政埋下更为深重的隐患。

换言之，文宗这么做，只能叫病急乱投医。

而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往往是旧疾未愈、新病又发，最终只能把原本忧患频仍的帝国，进一步推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可是，文宗李昂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李训和郑注，他的宠幸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李训，李昂更是给予了毫无保留的信任。“训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而涯辈（宰相王涯等人）承顺其风旨，唯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自从当上宰相之后，李训快意恩仇，指点江山，深深品尝了权力的美味。

在人间绝顶俯视芸芸众生，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然而，与这种感觉相伴而来的，却是一丝挥之不去的隐忧。

如今的李训已然位极人臣，还会有什么隐忧呢？

有。

李训的隐忧就是郑注。

古人常说“一栖不两雄”，意思是，一个鸡窝里容不下两只同样好斗的公鸡。同理，权力的塔尖自然也容不下两个同样野心勃勃的人。

所以，李训不得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按理说，郑注应该算是李训的恩人。因为李训当初回长安时，只是个没人搭理的无业游民，要是没有郑注的积极引荐和鼎力相助，李训绝对不可能得到文宗的宠幸，更不可能爬上宰相之位。

但是，就像郑注发迹之后，为了铲除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可以把枪口对准早年的恩人王守澄一样，李训得志之后，为了长保富贵，自然也可以回过头来对付郑注。我们说过，对李训和郑注这种人来讲，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什么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工具。

事实上，早在拜相之前，李训就已经开始排挤郑注了。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两个人都有入相的可能，但是文宗碍于舆论，不可能同时让他们当宰相，所以，李训为了夺取相位，就必须把郑注挤出长安。

那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王守澄虽已被解除兵权，但是还没死，于是李训便以防止王守澄反扑为由，建议郑注谋求凤翔节度使之职。因为凤翔离长安近，万一王守澄垂死挣扎，郑注可以随时调动凤翔军进入长安，与李训里应外合，共同应对，这显然比两个人都窝在长安要安全得多。

当时，李训是这么对郑注说的：“中外协势，以诛宦官。”（《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郑注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丝毫没有怀疑李训的用心，立刻向文宗提了出来，随即出镇凤翔。

结果，郑注才走了几天，李训就顺利拜相了。

如今，李训虽然已经捷足先登攫取相权，但他对郑注的防范却是有增无减。原因很简单，此次诛灭宦官集团的计划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郑注要亲率数百名凤翔的精锐士兵，以护送王守澄的棺椁为名，在葬

礼上出其不意地诛杀宦官。

可想而知，一旦此计成功，郑注就成了铲除宦官的首功之臣，到时候，文宗对他的宠幸和奖赏一定会超过李训，这对李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退一步讲，就算郑注得到的荣宠没有超过李训，他也必定会心存不甘。届时，朋党和阉党既已全部清除，外部的敌人消失了，他们两人必然会拔刀相向，围绕宰相之位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李训都必须先下手为强——在铲除宦官的同时，把郑注一块做掉。

换言之，李训必须另行制订一个计划，赶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王守澄葬礼之前行动。

心意已决，李训立刻召集自己的一帮心腹，商讨具体的行动细节。他的心腹包括宰相兼刑部侍郎舒元舆、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

经过几天的密谋，一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就出笼了。

行动时间，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早朝，比郑注的原计划整整提前了六天。

对此，文宗和郑注当然是一无所知。

而李训和他的心腹们当然也不会料到，这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非但没有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把他们所有人，全都推进了身死族灭的万丈深渊……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切都与往常并无不同。天刚蒙蒙亮，文宗就已经来到了大明宫的紫宸殿，准备举行朝会。

片刻后，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按官阶高低站定班次，只等着金吾将军一如平日那样高声奏报，“左右厢房内外平安”，然后百官就可以奏事了。

可是，这天早朝，左金吾大将军韩约进入大殿的时候，报的却不是平安，而是祥瑞。

满朝文武清晰地听见，韩约用一种异常激动的声音向天子奏报：“左金吾听事（办公厅）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臣已递上‘门奏’[2]，请陛下移驾往观！”。

韩约说完，三拜九叩向天子道贺。李训和舒元舆当即出列，率领百官一起向文宗祝贺。

天降甘露，象征着天下太平，无疑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李训和舒元舆随即邀请文宗前往观赏，以领受天赐的吉祥。

文宗李昂也感到异常惊喜。连老天爷都忍不住降下了祥瑞，这足以证明太平盛世已经指日可待了。

文宗当即宣布——暂停朝会，百官随驾前往含元殿。

于是，百官依次退下，来到含元殿内重新站定。一个时辰后，天子李昂乘坐銮轿出了紫宸门，登上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左仗”（位于含元殿左侧的左金吾办公厅）查看。过了一会儿，李训和舒元舆等人回来向天子奏报：“臣等已经查验过了，恐怕不是真的甘露，应暂缓对外宣布，以免天下百姓争相道贺。”

“怎么会这样？”李昂大为失望，回头命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去重新查看。

仇士良等人随即走出了含元殿。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李训和舒元舆对视一眼，立刻传召河东节度使王璠和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上殿听旨。

按原定计划，王璠和郭行余各带着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等候在丹凤门（大明宫正门）外，一等李训宣旨，他们就要即刻带兵进入大明宫，与金吾卫里应外合诛杀宦官。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王璠带着他的河东兵进来了，郭行余却是单枪匹马，邠宁兵一个也没有随他入宫。

计划开始走样了。

李训感到了一丝不安。

更让李训不安的是，没带兵的郭行余前来殿下听宣了，而带着兵的王璠却脸色苍白、双脚打颤地远远站着，一步也不敢靠近含元殿。

看来，王璠和郭行余是靠不住了。李训忧心忡忡地想。

一切只能看韩约的了。

此刻，含元殿左侧的金吾卫衙门内，宦官仇士良没有看见传说中那晶莹剔透的甘露，只看见了韩约那苍白如纸的脸上一颗颗滚圆的汗珠。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冬天的早晨，这个左金吾大将军竟然会大汗淋漓呢？

仇士良满腹狐疑地盯着韩约，问："将军这是怎么了？"

话音刚落，一阵穿堂风吹过，吹起了厅堂后侧的帐幕。仇士良无意中瞥见了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是兵器。

随着帐幕的晃动，仇士良还听见了一些声音。

那是兵器相互撞击发出的铿锵之声。

什么也不用再问了，所谓的天降甘露纯粹就是一个陷阱。仇士良和宦官们猛然掉头就往外跑。跑到门口时，守卫正准备关闭大门，仇士良高声怒斥，守卫一紧张，门闩怎么也插不上。仇士良等人冲出金吾卫，第一时间跑回皇帝身边，奏称宫中已发生事变。

全乱了，计划全乱套了。

李训知道，此时此刻，谁把天子攥在手里，谁就能掌控整个大明宫的局势。他立刻呼叫殿外的金吾卫士兵："快上殿保卫皇上，每人赏钱百缗！"

仇士良当然不会让天子落入李训之手，马上对文宗说："情况紧急，请皇上立刻回宫！"旋即把文宗扶上銮轿，和手下宦官拥着皇帝冲出含元殿，向北飞奔。李训抓住轿杆，情急大喊："臣还有大事要奏，陛下不可回宫！"

此时，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着三百多名京畿卫戍部队从东面杀了进来，御史中丞李孝本也带着两百多名手下从西边冲过来，都是来增援李训的。他们冲进含元殿，对着那些未及逃离的宦官挥刀便砍，顷刻间便有十余人倒在血泊中，哀叫声此起彼伏。

天子的銮轿在宦官们的簇拥下摇摇晃晃地跑到了宣政门。李训仍旧一路死死抓着轿杆，不停地叫天子落轿。早已吓得失魂落魄的文宗又惊又怒地喝令他住口。仇士良的手下宦官郗志荣一见皇帝发话，冲上去对着李训当胸一拳，将他打倒在地。还没等李训爬起来，銮轿已经进

了宣政门，宫门立刻紧闭。宦官们知道自己安全了，齐声高呼万岁。

此刻，宫中的文武百官早已各自逃命，作鸟兽散。李训意识到行动彻底失败了，急忙换上随从人员所穿的绿色低品秩官服，骑马奔驰出宫，一路大声抱怨："我犯了什么罪，要被贬谪出京！"借此掩人耳目。果然，各宫门守卫一路放行，没人怀疑他。

经此变故，仇士良已经意识到李训等人要对付的就是他们宦官，而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天子本人。仇士良死死地盯着文宗李昂，忍不住破口大骂。

文宗浑身战栗，无言以对。

这一刻，堂堂大唐天子在宦官面前几乎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把头深深地耷拉了下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此刻的宦官仇士良，却有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抓获小偷的快感。

天子惭悚不已，愧悔难当。

而宦官则正义凛然，理直气壮。

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倒错。反正从这一刻起，直到生命终结，唐文宗李昂再也没有在宦官面前抬起过头来。

仇士良开始反击了。

他即刻下令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和魏仲卿分别率领五百名禁军大举搜捕"叛党"。此时，宰相舒元舆、王涯等人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正在政事堂用午膳。一名小官惊恐万状地跑进来喊："不好啦，军队从内廷出来了，逢人便杀！"

几位宰相这才清醒过来，赶紧狼狈出逃。政事堂瞬间炸开了锅，门下、中书两省官员，以及金吾卫吏卒共计一千多人，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把大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片刻后，宦官带着禁军杀到，立刻关闭大门。转眼间，政事堂内未及逃离的六百多人全部被杀。

杀人是很容易获得快感的，尤其是杀那些手无寸铁、毫无反抗意志的人。

此刻的仇士良就充分体验了这种快感。

于是，反击行动迅速升级，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仇士良一声令下，各道宫门相继关闭，驻扎在玄武门的所有禁军士兵全部出动，在大明宫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党”。只要不是宦官和禁军，一律在他们的屠杀之列。

这一天，大明宫变成了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宰场。

正在朝廷各衙门办公的大小官员，以及刚好入宫办事的各色人等，全都不明不白地成为宦官的刀下之鬼。这一天，先后有一千多人被杀，尸体纵横交错，鲜血四处流淌。各个衙门的印信、档案、图籍、帐幕、器具尽皆被毁，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大明宫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与血腥的气息。

大屠杀之后，仇士良又派遣千余名禁军骑兵，在城中大肆捕杀漏网之鱼，同时出城追捕逃亡者。宰相舒元舆独自骑马逃到安化门，被禁军抓获。宰相王涯徒步逃出宫外，躲藏在永昌里的茶肆，也被禁军搜出，旋即被戴上枷锁，押入左军军营严刑拷打。年已七十多岁的王涯禁不起酷刑，最后屈打成招，胡乱承认自己与李训合谋篡逆，企图拥立郑注当皇帝。

这份供词虽然荒谬可笑，可对仇士良来说，有它就足够了。

只要宰相承认谋反，他今天的屠杀行动就能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事变一起，惯于见风使舵的河东节度使王璠第一时间逃回了长兴里的私宅，并即刻部署河东兵进行防守。宦官鱼弘志命禁军向他传话，声称宰相王涯等人已供认谋反，所以天子起用他为宰相，请他出来主持大局。王璠信以为真，赶紧开门出来，旋即被捕，也押进左军。

王璠一见王涯，一开口就埋怨：“你自己谋反，干吗把我也牵扯进来？”

满腹冤屈的王涯万万没想到，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忘倒打一耙。他气急败坏地说：“还记得宋申锡的案子吗？当初是谁把机密泄露给王守澄的？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王璠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看着这帮狗咬狗、一嘴毛的文臣，宦官们在一旁不住冷笑。

凡事明哲保身，临事苟且畏难，任事首鼠两端，见危险就躲，见利益就上。

这就是大唐文臣们的处世哲学。

难怪你们输得这么惨。

紧随王涯和王璠被捕的还有躲藏在太平里家中的京兆少尹罗立言，王涯的家人、眷属和奴婢，李训的族弟、户部员外郎李元皋。

紧接着，禁军士兵开始以执行公务为名抢劫私人财产。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左常侍罗让、翰林学士黎埴等大臣的府邸全部被洗劫一空。长安坊间的一些流氓地痞也开始趁乱烧杀抢劫，并且互相攻击。一时间鸡飞狗跳，尘埃蔽日，整座长安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这一天的流血政变，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

翌日清晨，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前来上朝，都等在宫门外。一直到太阳爬得老高，建福门才徐徐打开。只见伫立在两侧的禁军士兵全部刀剑出鞘，脸上依旧杀气腾腾。百官战战兢兢地走到宣政门，大门却尚未开启。许久，宫门打开，宦官传令：所有朝臣，一律只能带一名随从进入内廷。

紫宸殿上已经没有了宰相和御史，百官随意站立，班位全乱套了。

脸色苍白的文宗皇帝升殿之后，看着表情各异、班位混乱的文武百官，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宰相怎么没来？”

仇士良一声冷笑，说：“王涯等人谋反，已被关进监狱。”随后，召左仆射令狐楚和右仆射郑覃把王涯的亲笔供词呈给皇帝看。

文宗一下子全明白了。

他接过那纸供状，忽然作出一副愤怒而惊愕的表情，问令狐楚等人：“这是王涯的亲笔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天子越发表现得怒不可遏，狠狠地说，“果真如此，死有余辜！”

李昂知道，他现在必须表现得越惊愕越好。因为惊愕就表明他无辜，表明他没有参与宰相们诛杀阉党的计划。这样他才能摆脱干系，以免仇士良等人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天子废掉，甚至杀死。

李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其他的一切，他都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事变第三天，御史中丞李孝本在咸阳西面被抓获；同日，李训也在逃

亡凤翔的中途周至镇（今陕西周至县）被当地官员逮捕，旋即押赴京师。走到昆明池时，李训知道自己反正是一死，倘若被送进禁军军营，还要徒然遭受凌辱，于是便对押送官说："得到我，就等于得到富贵。听说禁军现在正到处搜捕我，待会儿进了城，他们一定会把我抢走，到时候你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不如现在砍下我的首级，秘密送进宫去。"押送官觉得言之有理，随即一刀砍下了李训的脑袋。

事变第四天，满朝文武都被勒令去旁观"叛党"的游街示众和行刑过程。

神策军将李训的首级高挂在"叛党"队列的前方，后面的囚车分别押着王涯、王璠、舒元舆、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游街示众，然后将他们推到闹市的一株独柳下，一一腰斩，最后把首级悬挂在兴安门外示众。

当天，所有"叛党"的宗亲族裔，不论远近亲疏一律处死，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其中，有妻女侥幸未死的，全都充为官妓。

事变第五天，仇士良下了一道密敕，命凤翔监军张仲清将郑注诱杀，随后全家诛灭。

第七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逮捕韩约，次日将其斩杀。

尘埃落定之后，文宗李昂被迫下诏，大举封赏此次镇压"叛乱"的功臣。仇士良和手下的大小宦官，包括禁军官兵，全部获得不同程度的升迁和赏赐。

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就这样以一场政治灾难宣告终结。

李训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就像两颗光芒万丈却乍现即逝的流星，在沉沉的帝国夜空中一掠而过。

在他们身后，黑暗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浓重。

关于"甘露之变"导致的政治后果，史书做了这样的记载："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内侍省），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太和九年深冬的那些日子，唐文宗李昂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被噩梦惊醒。

醒来后的李昂总是怔怔凝望着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

身处何方。直到看清这熟悉的寝殿和龙床，李昂急促的呼吸声才会慢慢地平息下去。

夜未央，可李昂睡意全无。

他只能圆睁双眼，在无涯的黑暗中焦灼地等待——

等待那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天明。

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

转眼已是新年。正月初一，文宗御宣政殿，改元“开成”。

不堪回首的太和九年就这么翻过去了，可文宗却始终没有从“甘露之变”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一年，李昂事实上还很年轻，虚岁才二十七。按常理，这种年纪本来应该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可此时的李昂却显得有些意志消沉和未老先衰。

这也难怪。经历了那么多挫折与失败，就算有再多的锐气和棱角，肯定也都被磨得一干二净了。

过去的李昂虽不喜声色犬马，但至少对左右神策军的马球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从这一年起，李昂却把马球赛减少了十之六七，纵使偶尔举办一两场宴会，他的脸上也从未有过一丝笑容。

闲居的时候，李昂更是郁郁寡欢。左右侍从看见他总是一个人独处，时而徘徊眺望，时而独语叹息，很少主动和人说话。

李昂仿佛在一岁之间就苍老了。尽管他的生理年龄还很年轻，但却无可挽回地走进了心理上的老年。

细心的侍从发现，只有当天子的目光偶尔从书架上的某个地方掠过，眼中才会闪现出一丝旧日的神采。不过，那神采也是极其微弱、稍纵即逝的。

天子注目的那个地方摆着一本书。

那是一册久已蒙尘的《贞观政要》。

自从“甘露之变”后，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基本上一手把持了朝政，其嚣张程度比当初的王守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时期，李石、郑覃、李固言、陈夷行四人先后入相。对于宦官擅权的现实，他们也无可奈何，只求明哲保身。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末，李固言被外放为西川节度使。在剩下的三个宰相中，只有中书侍郎李石的表现还算强硬。虽说他也不敢跟宦官公开较量，但至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朝廷的一些纲纪。

可仅仅因为这样，李石就成了仇士良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李石骑马上朝，刚刚走到半路，忽然从暗处射出几支冷箭，左右随从当即吓得抱头鼠窜。李石被射中一箭。幸亏刺客射艺不精，没射中他的要害。李石慌忙捂着伤口拍马往家里跑，可刚跑到坊门，又有一个刺客从斜刺里冲出，猛然一刀向他砍来。

要是这一刀命中，李石就是第二个武元衡了。

还好李石的反应快，挥起鞭子往马屁股上狠命一抽，坐骑受痛，奋力往前一跃，竟生生躲开了这一刀，只是马尾巴被砍断了一截。

李石就这么捡回了一条命。

得知宰相遇刺后，文宗大为惊愕，立刻命禁军派兵护卫，同时下令各级衙门全力缉捕刺客。然而，各级官员忙活了一整天，却连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

李石遇刺的消息传开后，满朝文武都成了惊弓之鸟，第二天集体缺勤，连请假条也不打，害得文宗在大殿上苦等半天，到最后数一数人头，居然只有九个人上朝。

整个京师人心惶惶，直到几天后才慢慢恢复正常，而那两个刺客则始终没有抓着。

不过，案子没破，不等于没人知道真相。其实，李石自己比谁都清楚，要拿他性命的人，除了仇士良，没有第二个。

事后，李石越想越怕。

仇士良既然想干掉他，就绝不会轻易罢手，一次不成，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与其这样天天担惊受怕，还

不如辞职走人算了。

随后，李石屡屡上表请辞。

文宗虽然明知道此案的幕后主使就是仇士良，但也无可奈何。别说没有证据，就算有，他也不敢拿仇士良怎么样。

正月十七日，文宗下诏，将李石外放为荆南节度使。

与此同时，户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杨嗣复、户部侍郎李珏进入了宰相班子。

随着这两个人的入相，一度销声匿迹的牛李党争便又卷土重来了。

李固言和李石离任后，剩下的两个宰相郑覃、陈夷行均属李德裕之党。作为牛党的李固言担心朝政被李党把持，于是早在临走之前，便极力向文宗推举了杨嗣复和李珏。杨嗣复的父亲杨于陵，就是元和三年录取李宗闵和牛僧孺的主考官。

杨嗣复和李珏入相后，李党的陈夷行非常不爽。每次讨论政务，他便故意跟杨嗣复吵得不可开交。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他甚至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不过，文宗没有答应他。

陈夷行如此剑拔弩张，杨嗣复自然也不甘示弱。所以刚一入相，他便处心积虑想让牛党党魁李宗闵回朝。当然，杨嗣复也知道，郑覃和陈夷行肯定会阻挠，所以他没有直接向文宗提出来，而是搞了个迂回战术——先去跟宦官疏通，再让宦官跟文宗打招呼。

杨嗣复的这一招很管用，因为此时的文宗对宦官基本上不敢说半个不字。

几天后的一次朝会上，文宗主动提出，李宗闵已经外放好几年了，应该召他回来担任朝职。

郑覃一听，马上出列，高声奏道："陛下若体恤李宗闵被贬得太远，最多只能往内地调一调，千万不可再用。倘若陛下非用不可，请先让臣离开。"

郑覃话音未落，陈夷行立刻接腔："李宗闵当初以朋党乱政，陛下为何顾惜这样的小人？"

杨嗣复冷笑："郑大人，陈大人，为人处世，最好是中庸一点，不要

凡事都用自己的爱憎做标准。”

看见双方一下就掐起来了，文宗赶紧打圆场：“这样吧，不妨先给宗闵一个州。”

“陛下！”郑覃急了，“这样对他太优厚了，臣认为，最多只能让他担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司马。”

李党如此霸道，杨嗣复当然没必要跟他们客气。他随即大声指责郑覃和陈夷行是在搞党争。郑、陈二人眼睛一瞪，立马又把帽子扣了回去。于是，当天的朝会就变成了一场口水仗。双方都撕破脸面，高声对骂。天子和满朝文武目瞪口呆，恍然有置身于菜市场之感。

许久，文宗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就这么定了，给宗闵一个州吧。”

眼见天子心意已决，郑覃等人才悻悻地闭上嘴。

当天散朝后，文宗一直长吁短叹，忍不住对侍臣抱怨：“身为宰相，却吵成这个样子，你们说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侍臣们无言以对，只好安慰天子说，郑覃他们也是出于忠心，一时激愤才会这样子的。

文宗闻言，只能摇头苦笑。

忠心？

是啊，也只能理解为忠心了。登基十几年来，这种为了党派利益而不顾一切的“忠心”，朕见得太多了，当然也见怪不怪了。

二月初九，文宗下诏，将李宗闵由衡州司马升为杭州刺史。

这令人不快的一页总算是翻过去了，但是，宰相班子内的两党恶斗却从此愈演愈烈，一刻也没有平息。“李固言与杨嗣复、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郑覃、陈夷行，每议政之际，是非锋起，上（文宗）不能决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要说这样的执政班子能治理好国家，那基本上就是个笑话。

开成三年，让文宗烦心的不仅是宰相之间的恶斗，还有他那个不争气的太子。

太子名叫李永，是文宗的长子，于太和六年册立。其母王德妃生下他后，先是与另一个女人杨贤妃争风吃醋而失宠，不久又被杨贤妃谗害而死。李永从小没了妈，自然比较缺乏管束，于是天天跟一帮内侍宦官混在一起，就知道吃喝玩乐，很少花时间读书。

文宗先后派了几个德高望重的大臣给太子当老师，却始终没什么效果。杨贤妃趁机向文宗猛吹枕边风，添油加醋地编排太子的不是。

到了开成三年九月，文宗终于忍无可忍，便召集宰执大臣们在延英殿开会，历数太子的种种劣迹，准备把他废掉。

废黜储君非同小可，大臣们纷纷表示反对："太子年少，应该允许他改过。储君乃国之根本，不可轻易动摇。"曾给太子当过老师的韦温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没有好好教育他，致使他沉沦到这种地步，难道只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

子不教父之过，文宗自觉理亏，又看见大臣们没一个支持他，只好悻悻作罢。

不过，太子虽然可以不废，但东宫那帮群小却不能轻饶。为了杀一儆百，文宗随后就对太子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进行了严厉惩处，一下子诛杀和流放了好几十个。

文宗本以为太子能够吸取教训，痛改前非，可他没想到，太子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依旧我行我素，日夜沉湎于声色犬马。更让文宗万万没料到的是——短短一个月后的十月初七，年仅十来岁的太子李永就暴毙了。

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文宗震惊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不仅是文宗，满朝文武也觉得此事太过蹊跷，都等着天子对太子死因展开调查。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天子居然什么也没做，只是把太子匆匆殓葬了事。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堂堂储君死得不明不白却无人问津？天子的表现如此反常，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们深感困惑。不过，天子的沉默至少向朝野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太子暴毙案的背后，水很深。

也许，此案的背后并不仅仅只有那个争风吃醋、心狠手辣的女人杨贤妃，很可能还站着另外一群人。

那就是宦官。

人们都还记得，一个月前，天子一怒之下诛杀了一批东宫宦官，虽然这些宦官级别很低，只是些阿猫阿狗，但还是有可能引发那些当权宦官的不满和报复。

假如太子真是被杨贤妃或宦官（或二者联手）所杀，那么天子李昂的反应就很好解释了。说白了，李昂对于太子之死也许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无能为力。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夏天，宰相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逐渐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最后终于来了个总爆发。

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文宗李昂的一句话。

四月的一天，文宗在一次闲谈中，夸判度支杜悰这个人很有才，杨嗣复和李珏一听，马上推举杜悰出任户部尚书。他们这么做，一来是为了迎合上意，二来也是想树立私恩，在杜悰面前讨个人情。

陈夷行当时也在场，随即冷笑着说：“皇上想提拔谁，他自有主张，何必二位多此一举？自古以来国家败亡的，往往都是因为权力被臣下操控了。”言下之意，是说杨、李二人企图架空天子。

李珏针锋相对地说：“陛下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圣明君主，应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选择宰相的时候要谨慎，可一旦选定，就不应随便怀疑。”

陈夷行冷笑不语。

几天后，文宗又和四位宰相讨论政事，陈夷行再次挑起话头，强调不能使威权落入臣下之手。李珏愤然道：“按陈大人的意思，就是说宰相之中有人窃弄陛下威权喽？在下为表清白，愿意辞去宰相之位。”

郑覃笑了笑，说：“李大人不必过于激动，陈大人也是就事论事嘛。按照郑某的看法，开成元年、二年，朝政的确比较清明，这两年，似乎就不如从前了。”

杨嗣复勃然大怒：“照你的说法，头两年你们两个用事，朝政就清明了；这两年轮到我和李大人执政，就有人窃弄威权了？”说着，突然

转身朝天子一拜，“臣有罪，从今往后，不敢再入中书省！”说完，头也不回地往殿外走去。

文宗顿时傻眼，赶紧派宦官把杨嗣复叫了回来，温言劝慰道：“方才是郑覃一时失言，爱卿又何必如此呢？”

文宗这话固然安慰了杨嗣复，没想到却又得罪了郑覃。

郑覃当即酸劲十足地说：“臣生性愚钝，口舌笨拙，方才并不是针对杨大人。可他的反应却如此激烈，显然是容不下臣了。”

杨嗣复余怒未消，狠狠瞪了郑覃一眼，对文宗说：“既然郑覃说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那不仅是臣难辞其咎，就连皇上您也是圣德有亏啊！”

文宗一听，确实觉得郑覃刚才的话把他也数落进去了，心里顿时觉得不太舒服。

当天的廷议就此不欢而散。过后，杨嗣复一连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并且好几天都不上朝。文宗只好派宦官去他家跑了好几趟，说了一大堆好话，总算是把他留住了。

几天后，杨嗣复终于不情不愿地回来上班，可同时却让宦官转达了他对郑覃的态度——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皇上您看着办吧！

既然矛盾已经激化到这种程度，文宗也没法再和稀泥了。

五月十六日，文宗不得不将郑覃和陈夷行双双罢相。郑覃罢为右仆射，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

至此，这场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终于以李党的落败、牛党的胜出而告终。

杨嗣复和李珏大感快慰。

然而，他们并没有高兴太久。

因为，此时的天子李昂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而文宗驾崩、新天子即位后，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们这两个前朝宰相。

武宗登基

太子李永死之后，文宗整整一年没有册立新太子，有个人终于忍不住了。

她就是杨贤妃。

这个女人虽然很有心计，也很有手段，只可惜肚子不争气——嫁给文宗这么多年，始终不能生育。在后宫争宠，没有子嗣的女人显然是毫无优势的。所以，为了保住自己后半生的富贵，杨贤妃很早以前就和文宗的异母弟、安王李溶走得很近。

长期以来，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构陷太子李永，目的就是要拥立与她关系亲密的安王。

开成四年冬天，杨贤妃频频怂恿文宗册立安王李溶。

可是，文宗始终没有答应。

因为他已经有了另外的人选。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十月十八日，文宗突然下诏，立敬宗之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

杨贤妃大为沮丧——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到头来却是为别人做了嫁衣。

太子李永死了一年之后，帝国终于确立了新的储君，满朝文武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时隔整整一年，太子之死的疑云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可是，就在新太子册立的第二天，一件小事却引发了天子的激烈反应，使人们忽然间意识到，原来天子的丧子之痛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他深深地掩藏而已。

这一天，文宗李昂来到会宁殿观看杂技表演，其中一个节目是一个童子表演高竿攀爬。让李昂感到诧异的是，童子在上面表演时，一个男子一直在高竿下面来回走动，而且一脸焦急不安的神色。李昂问左右：“这是何人？”左右回答：“是童子的父亲。”

就在这一刻，天子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哽咽着说：“朕贵为天子，却连一个儿子都不能保全啊！”

当天，文宗就命人将教坊（宫廷歌舞团）的刘楚材等四人、宫女张氏等十人全部逮捕。这些人过去都是太子身边的人。文宗指着他们怒斥："害死太子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如今新太子已经册立，你们是不是还想这么干？"

两天后，暴怒的文宗就将这些人全部斩首了。

毋庸讳言，天子如此大开杀戒，显然有迁怒于人和伤及无辜的嫌疑。即便当初这些人的确是引诱太子纵情声色的罪魁祸首，但也罪不至死。说白了，这些小人物就是天子发泄愤怒的工具而已。

然而，对于大权旁落的文宗李昂来说，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于非命，却不敢也无力去调查真相，这样的一种悲愤除了发泄在这些人身上，还能往哪里发泄？

数日后，李昂就在难以排遣的抑郁和哀伤中病倒了。

年轻的天子逐渐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觉得，自己的大限不会太远了。

这一年深冬，李昂的病情突然有所好转。朝臣们看见天子的脸上甚至泛起了一丝久违的红晕。

然而没有人知道，这只是天子的回光返照。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天，正在翰林院值班的翰林学士周墀忽然接到传唤，说天子请他到思政殿问对。周墀匆匆步入殿中的时候，天子已命人备好了酒。周墀看见天子微笑着示意他坐下，不禁有些诚惶诚恐。

今天的天子看上去精神不错，兴致也很好，又是赐坐又是赐酒，到底想谈什么？

片刻之后，周墀听见天子发话了。

"贤卿，你看朕可以和前朝哪位君主相比？"

周墀听见这没头没脑的问题，慌忙起身回答："皇上是尧、舜一样的君主。"

天子摇摇头笑了："朕哪敢和尧舜比！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朕想知道，朕比之周赧王、汉献帝如何？"

蓦然听见这句话，周墀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啊！皇上怎么突然说出这种话？周墀忙不迭地跪地叩首，用一种颤抖的声音说：“他们都是亡国之君，绝不可以和皇上相提并论！”

天子再次摇头苦笑。

他的笑容中满是泪光。

紧接着，趴在地上的周墀听见天子的声音忽然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沧桑。天子说：“赧王与献帝只不过是受制于诸侯，朕却是受制于家奴！照此说来，朕甚至比他们还不如……”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天子李昂已经泣不成声。

不知是由于过度紧张，还是被天子的悲伤所感染，周墀的眼泪也随即夺眶而出。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不住地叩首，同时陪着皇帝一起啜泣。

这是一个大雪初霁的冬日。一抹阳光正无力地透过窗棂，悄悄洒在这一对相向而泣的君臣泪光闪动的脸上。

阳光在他们脸上驻留了很久，可始终没有让他们察觉到丝毫暖意。

这样的日子，或许连太阳也是冷的。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是唐文宗李昂在位的第十五个年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

病榻上的李昂黯然回首自己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感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乱政。

这是帝国肌体上的三种不治之症，也是属于他李昂的悲剧三重奏。这三大悲剧情节交相辉映，联袂上场，共同演绎了李昂有志中兴、无力回天的悲情人生。

明天的帝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眼下的李昂已经无力思考。事实上，未来的一切也已经与他无关。这个春天，李昂已经倦极累极，连呼吸都必须用尽全力……

天子弥留的时刻，宦官集团自然不会闲着。

其实，早在去年冬天文宗卧病之际，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就已经在设计帝国的未来了。准确地说，仇士良打算为帝国物色一个新的储君。

现在的太子李成美不是仇士良拥立的，所以他很早就打定了主意，准备把李成美废掉，另立李昂的异母弟——颍王李瀍（穆宗第五子）。

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自知不预，紧急传召杨嗣复和李珏入宫，准备命他们辅佐太子，同时下令太子监国。仇士良和鱼弘志得到密报，立刻对杨、李二相说："太子年纪尚幼，又体弱多病，不宜继位，应改立颍王李瀍为皇太弟，命李成美仍为陈王。"

杨嗣复和李珏当然不同意："太子的名位已定，不可中途变更！"

可是，在仇士良和鱼弘志看来，如今的大唐帝国除了他们的意志之外，任何人的决定都是可以变更的，就算是天子李昂也不例外。

他们随即以文宗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册立颍王李瀍为皇太弟，并总领军国大权。当天，仇士良和鱼弘志便亲自带兵到十六宅，迎接李瀍入宫，登思贤殿接受百官朝见。

帝国的命运再次被宦官拨弄于股掌之中，一切都与当年文宗登基时如出一辙。杨嗣复、李珏等宰执大臣们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正月初四，唐文宗李昂崩于太和殿，终年三十二岁。

正月初六，仇士良强迫李瀍下令，将杨贤妃、安王李溶和太子李成美全部赐死。随后，凡是文宗生前宠信的近臣和侍从，甚至包括乐工，全部遭到诛杀或流放。

正月十四日，二十八岁的李瀍即位，是为唐武宗。

虽然李瀍和他的兄长李昂一样，都是被宦官拥立的，但此时的李瀍比当初的李昂大十来岁，其阅历和见识显然要深厚得多。而且，史称李瀍"沉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可见，李瀍比少年即位的李昂更有魄力，也更具城府。

既然如此，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期待——被三大政治顽疾搞得气息奄奄的大唐帝国，兴许能够在这个新天子的手中焕发出一线生机。

[1] 所谓“知制诰”，即参与禁中诏敕的策划和草拟，虽官秩不高，但位居要津，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决策。

[2] 夜间宫门紧闭，凡有紧急奏章皆从门缝投入，称为门奏。

第六章 盛唐终结之前的回光返照

强势宰相与超级宦官

一朝天子一朝臣。

新君李瀍刚一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把宰相杨嗣复和李珏赶下了台。因为这两个家伙反对他入继大统，当然没资格当他的宰相。况且，以李瀍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资历、能力和威望都实在有限，要当这个新朝宰辅显然不够斤两。

李瀍现在属意的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此人曾经出将入相，无论政治才能还是军事才能都相当突出，只可惜仕途不顺，在政坛上几度沉浮，如今还被贬在外，屈居淮南。

李瀍觉得，只有这个人来当自己的宰相，才有望一扫文宗朝的孱弱萎靡之风，在李唐中央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九月初四，此人被征召回朝，就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他，就是李德裕。

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满朝文武不禁喜忧参半。

喜的是——李德裕的能力无疑远远强过开成年间那几个宰相，由他来执政，帝国的政局也许会有所改观；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执朝柄，是否预示着新一轮的党争又将拉开帷幕呢？

仿佛是为了回应人们的疑虑，同时也为了向新君表明自己的清白，李

德裕回朝伊始，就郑重其事地对李瀍宣讲了一番辨别正邪的大道理。

他说："执政的秘诀就在于辨别百官的正邪。但是，正直之人与奸邪小人往往相互指责，所以人主很难分别。臣以为，正直之人就像松柏，独立而不依附他物；奸邪小人就像藤萝，不相互攀缘就无法生存。所以，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先帝虽深知朋党之祸，但所重用的始终是朋党之人，皆因意志不坚，小人才得以乘隙而入。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之人为相，凡奸邪欺君之辈一律罢黜，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信不疑，何愁天下不能大治！"

李德裕这番大道理听上去似乎冠冕堂皇，实际上未免有些大言不惭。他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强调自己并非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与朋党做斗争的人。这样的表白，实在是有些此地无银、贼喊捉贼的味道。身为李党党魁，李德裕如果不搞党争，牛党那一个巴掌又怎么能够拍得响呢？

此外，李德裕说"正直之人"为官，不需要"依附他物"，不需要"相互攀缘"，这也未免有些矫情。地球人都知道，古往今来，一个人在官场上混，假如不搞关系网，不拉帮结派，恐怕立足都有问题，更别说想往上爬了。

其实，不要说别人，单说李德裕此次回朝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附"和"攀缘"宦官的结果。

他结交的宦官，名叫杨钦义。

几年前，李德裕在淮南当节度使，杨钦义任淮南监军。起初，两个人虽说关系挺近，但并无私交，因为自命清高的李德裕对宦官从来没有好感。这一年年初，新君李瀍即位，敕命杨钦义回朝，众人纷纷传言他即将入主枢密。杨钦义心想，这一回，李德裕肯定要来巴结他了吧？

可是，一连数日，李德裕竟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表示。杨钦义心里不免怏怏。直到他即将回朝的几天前，李德裕才忽然表现出罕见的殷勤，不仅单独邀请他赴宴，席间礼遇甚周，而且随后还送给了他好几床金银珠宝。杨钦义大喜过望，觉得以前真是错怪了李德裕。

几天后，杨钦义启程回朝，不料刚刚走到汴州，天子李瀍又下了一道敕命，让他暂返淮南。杨钦义失望已极，觉得自己既然不能入主中枢，就没理由收受李德裕的财物。回到淮南后，他当即将原物奉还。

可李德裕却表现得十分慷慨，说：“那些东西值不了什么钱，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为此，杨钦义颇有些感动。数月后，天子再度下诏，正式召他回朝就任枢密使。杨钦义遂极力向天子举荐李德裕，从而为李德裕的回朝复相铺平了道路。

由此可见，李德裕所谓的“君子为官，不必依附攀缘”的说法，纯属吃了葡萄又说葡萄酸的矫情之言。

不过，李德裕毕竟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虽说这一次，他是通过交结宦官而重掌朝柄的，但他在对待“宦官乱政”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心里面还是有杆秤的。

作为帝国的五朝元老，李德裕比谁都清楚“宦官擅权”对社稷和朝廷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更清楚依附宦官的人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即便不是出于澄清宇内、重振朝纲的政治理想，单纯就李德裕的家世背景、个人心性和政治抱负而言，他也绝不能容许自己委身于权宦集团。

李德裕深知，对付宦官必须采用两手，那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比如对于枢密使杨钦义这类宦官新贵，他的策略是尽量与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私谊，以便让他们成为自己施政的助力；而像仇士良这种一手遮天、根深势大的超级宦官，他不但不会妥协，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制约他们。

理由很简单，与杨钦义这种宦官交往是对等的，双方遵循的是互利互惠的交换原则，谁也不会凌驾于谁的头上；而与仇士良这种不可一世的权宦打交道，则绝不能示好，更不能示弱，否则就会沦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和玩物。

况且，身为宰相，李德裕所能拥有的权力大小，将直接取决于他能从权宦那里夺回多少本属于文臣的权力；而他身为宰相的政绩大小，也将直接取决于他与宦官集团的博弈结果。因此，如果不能成功地制约并削弱宦官势力，他当这个宰相就毫无意义，只能让天下人耻笑。所以，无论在公在私，李德裕都不可能成为仇士良的朋友，而只能站在他的对立面。

既然李德裕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回朝的，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一场强势宰相与超级宦官之间的权力博弈，也就在所难免了。

仇士良拥立李瀍即位时，杨嗣复和李珏极力阻挠，为此，仇士良始终怀恨在心，一直想把他们置于死地。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仇士良频频向武宗施加压力，要他杀掉杨嗣复和李珏。当时，杨嗣复已被贬为湖南观察使，李珏被贬为桂州观察使，尽管已经远离朝廷，但在武宗心里，同样怀有一丝后患未除的隐忧。

三月二十四日，武宗禁不住仇士良的一再怂恿，终于派出两路宦官，分别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和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准备诛杀杨嗣复和李珏。

户部尚书杜悰得到消息，立刻骑上快马去找李德裕，希望他能出手相救。

这个杜悰当初曾得到杨嗣复和李珏的举荐，现在当然要报恩，可问题是，杨、李二人是不折不扣的牛党，现在杜悰却找李党党魁李德裕帮忙，这不是搞错对象了吗？

不，杜悰没搞错。

因为李德裕当场就告诉杜悰——没问题，我愿意帮这个忙。

李德裕之所以作出如此出人意料的决定，其因有三：一、如今牛党已彻底失势，因此朝廷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显然已不在牛李二党之间，而在于文臣与宦官之间；二、李德裕在牛党落难的这个时候施以援手，无异于为自己打一个大公无私的免费广告，足以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光辉形象；三、最重要的是，李德裕很清楚，一心想杀杨嗣复和李珏的人就是仇士良，如果能在这件事上阻止他，就能借此机会打击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同时赢得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心。

总而言之，这已经不是救不救杨嗣复和李珏的问题，而是李德裕能否以此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强势宰相的问题。

所以，李德裕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行动。

三月二十五日，李德裕紧急联络另外三位宰相，一天之内三度递交奏疏，同时敦请枢密使杨钦义到中书省磋商，并请他入宫面奏天子，反对诛杀杨、李二人。

李德裕等人在呈给天子的奏疏中说：“当年，德宗皇帝怀疑刘晏动摇

东宫，仓促将他诛杀，朝野皆替其喊冤，两河藩镇甚至以此为借口而对抗中央。事后德宗追悔，以录用刘晏子孙为官作为补偿。先帝文宗也曾猜疑宋申锡与亲王串通谋反，将他流放贬谪而死，事后同样追悔，为宋申锡而流涕。而今，假如杨嗣复与李珏真的有罪，也只能加重贬谪，就算一定容不下，也当先行审讯，待罪证确凿，杀他们也不晚。如今，陛下不与百官商议便遣使诛杀，朝中无不震惊。恳请陛下登延英殿，允许我们当面陈述！”

武宗还是很给李德裕面子的，当天傍晚便宣他们上殿。

李德裕等人一上殿，第一句就说：“陛下应该慎重考虑，以免后悔！”

李瀍面露不悦，很干脆地说：“朕绝不后悔！”随后命他们坐下，意思是让他们不必如此激动。

可天子一连说了三遍，李德裕等人却还是直挺挺地站着。李德裕说：“臣等希望陛下免除二人死罪，不要因他们之死而让天下人同声喊冤。陛下若不下旨，臣等不敢坐。”

李瀍大惑不解地盯着李德裕的脸，不明白他为何非救杨、李二人不可。看了许久，李瀍终于让步了。

尽管他不是很清楚李德裕的想法，但自己刚刚即位，实在没必要为两个过气的人而跟宰相们闹僵。所以，李瀍最后只好无奈地挥挥手：“罢了罢了，就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命吧。”

李德裕等人如释重负，当即趴在阶下三跪九叩地谢恩。

随后，两路使者被追回。杨嗣复被再贬为潮州刺史，李珏再贬为昭州刺史，但他们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

仇士良恨得牙痒，但却无计可施。

因为他意识到，这次反对他的势力不可小觑——既有李德裕这样的朋党领袖、政治强人，又有新近崛起、明摆着要与他分庭抗礼的另一派宦官头子杨钦义。

面对这种强强联手的反对派，仇士良绝不敢掉以轻心。他预感到，在新君李瀍的朝廷上，自己可能很难像在文宗朝那样为所欲为了。

仇士良的预感是对的。

这一年八月，武宗李瀍忽然下了道诏书，给他加了一个“观军容使”的头衔。虽然左神策中尉的职务仍然保留，但这个新加上的头衔并没有让仇士良感到喜悦，而是感到了不安。

因为，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外示尊崇、内夺其权”的做法。换言之，目前的这个加衔其实只是一种过渡。下一步，李德裕很可能就会怂恿天子卸掉仇士良的禁军兵权，只给他保留“观军容使”这个虚衔。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仇士良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自己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

当然不能。

仇士良决定采取行动，对李德裕等人进行反击。

一旦找到合适的借口，何妨再来一场甘露之变。

仇士良：一个权宦的完美谢幕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百官提议要给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天子同意了，决定择日亲临丹凤楼接受尊号，同时大赦天下。

这将是一个盛大的典礼。届时，满朝文武必将云集丹凤楼，而神策六军的将士也要到场执行警戒任务。假如在这样一个重大时刻出了某种状况，比如禁军士兵因故哗变什么的，那是不是会有一场好戏看呢？

仇士良这么想着，无声地笑了。

他仿佛又闻到了七年前飘荡在大明宫中的冰凉而腥膻的气息。

当然，禁军将士是不会无缘无故哗变的。要看这出好戏，必定需要一个有力的借口。

这样的借口，仇士良早就有了。

举行典礼的日期刚一确定，一则流言便忽然在朝中传开了。流言说，宰相和度支已经跟天子商量好了，准备下诏削减禁军的衣料及粮草供

应。而这个诏令，将在举行典礼的那天同时发布。

还能有什么借口，比这个消息更能激起士兵们的愤怒呢？

就在流言汹涌传播的那几天，仇士良逢人便说："到时候，如果天子真的下了这样的诏命，那么六军将士必将集结在丹凤楼前示威请愿！"

很显然，这是仇士良在向禁军士兵发布行动指令，也是在对天子和宰相进行恫吓。

李德裕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刻做出反应。四月二十一日，亦即大典举行前两天，李德裕紧急要求天子开延英殿，由他当廷申述，辟清谣言。

天子李瀍勃然大怒。

无论他和宰相们是否有过削减禁军军需的打算，仇士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都是让李瀍无法容忍的。他当天便遣使向左、右神策军宣谕："朕与宰相们只讨论过大赦令的内容，从未讨论要削减禁军军需。更何况，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有人肆意散布谣言，到底是何居心？"

天子亲自辟谣，而且姿态如此强硬，顿时让仇士良陷入了被动。

煽动禁军哗变的借口没了，仇士良自然也就没了兴风作浪的理由。

看来，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仇士良无奈地意识到，眼下的李瀍已经不是当年的李昂，而李德裕更不是当年的李训和郑注了。和这样一群稳扎稳打、滴水不漏的对手过招，仇士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后，仇士良不得不服软，带着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去向天子低头谢罪。

这是自甘露之变后，原本不可一世的权宦首次在天子面前低头。武宗李瀍大为欣慰，从此对李德裕越发倚重。

通过与仇士良的两次较量，李德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接下来，他要全力对付的，自然就是跋扈藩镇了。

自从元和末年以来，大唐帝国历穆、敬、文三朝，在藩镇事务上一直采取妥协政策，对四方藩镇，尤其是河北三镇割据自专和官爵世袭的

现象始终予以默认，包括对此起彼伏的兵变也一直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只要各地藩镇不公然起兵对抗中央，李唐朝廷就会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拱手交给那些骄兵悍将。从前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已然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这么多年来，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似乎也已经麻木了。

然而，到了武宗一朝，这样的政治现状注定要被改写。

因为，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种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人。一旦有机会，他们必将在藩镇事务上摆出强硬姿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一个改写现状的契机终于摆在了他们面前——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了，其侄刘稹秘不发丧，以刘从谏病重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留后之职。

给不给他这个继承权？

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不。

昭义镇位于河东，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本来，这个地方是李唐朝廷比较放心的一个藩镇，多年来很少出什么问题，甚至每当河北叛乱时，昭义的兵一直是朝廷的平叛主力。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昭义与朝廷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差。究其原因，还要从八年前的甘露之变说起。

当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流血事变发生之后，李训、郑注、王涯等朝中大臣全部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族诛，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于义愤，于开成元年二月给文宗上了道奏疏，说了些公道话，并且把矛头直指仇士良。

他说："王涯等人不过是儒生，荷国厚恩，岂肯轻易谋反？李训、郑注事实上也是为了除掉乱政的宦官，却被诬陷为谋反，说到底其实也没有罪。退一步讲，就算宰相们真有异谋，也应交付司法审判，岂能让宦官肆意屠杀？而且还连累了那么多无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亲赴朝廷，向陛下面陈是非善恶，又担心遭人陷害，祸及子孙。虽然臣不能亲往，但一定会克尽封疆之责，抓紧操练军队，希望在内为陛下之腹心，在外为陛下之藩篱。倘若奸臣仍旧横行，臣会誓死入朝，以清君侧！"

一看到奏疏，仇士良顿时暴跳如雷，叫嚣说刘从谏有窥伺朝廷的野

心。当时，文宗李昂已完全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只能象征性地给刘从谏加了个“检校司徒”的荣誉官职，以示勉励。但是，刘从谏却断然拒绝，并且对文宗的懦弱表现颇有微词。

从此，昭义与朝廷便产生了隔阂。

武宗李瀍即位后，刘从谏为了改善与朝廷的关系，赶紧给新天子献上了一匹举世无双的宝马。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瀍没有接受。刘从谏越发觉得朝廷不信任他，一怒之下杀了那匹宝马，随后便开始积极扩展军备，明里暗里与中央较劲。相邻诸道见状，顿时大为恐慌，连忙跟着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他搞起了军备竞赛。

会昌三年春，刘从谏患了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对妻子裴氏说：“我以忠直事奉朝廷，可朝廷却不明白我的心意，相邻诸道又与我们极不和睦。我死之后，别人来主持军政，我们家恐怕就没有烟火了。”

随后，刘从谏便效仿河北三镇，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都知兵马使、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同时把所有的亲信全部安插在军队的要害部门，以确保在他死后，家族子弟能承袭节度使的职位。

四月，刘从谏死，刘稹秘不发丧，强迫监军宦官崔士康上奏朝廷，称刘从谏病重，请立刘稹为昭义留后。刘稹坚信，只要严密控制监军宦官，重金贿赂朝廷使臣，暗中加强戒备，不出三个月，朝廷肯定会乖乖送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然而，刘稹万万没料到，他这回运气不佳，碰上了两个注定要拿他开刀的人。

首先，武宗李瀍就不会上他的当。李瀍料定刘从谏已死，立刻命使臣前往宣旨，说：“若从谏的病尚未痊愈，就先到东都洛阳静养，等到病体稍愈，另有任用。此外，希望刘稹能来京朝见，朝廷定会重加官爵。”

随后，武宗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其他宰相、谏官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仿效河朔诸镇，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

李德裕的理由是，昭义的情况与河朔三镇截然不同。河朔割据已久，人心难以挽回，所以历朝以来都把他们置之度外。而昭义却近在中央腹心，军队又一向效忠朝廷，只因为当年的敬宗皇帝荒疏朝政，宰相

又缺乏远见和谋略，才在刘悟死后把官位授予刘从谏。而今朝廷倘若一意因循，姑息纵容，试问天下藩镇谁不想效法昭义？从今往后，又有谁愿意服从中央权威与天子号令？

武宗随即问李德裕："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昭义？"

李德裕胸有成竹地说："刘稹心目中的榜样和靠山就是河朔三镇，只要能让他们不与昭义结盟，刘稹必将无所作为。所以，应派遣大臣前去宣谕成德的王元逵和魏博的何弘敬，告诉他们，历任天子都已经承认他们世代相袭的惯例，但是昭义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如今朝廷要对昭义用兵，如果他们不希望看到朝廷的军队进入河北，就应该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隶属于昭义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并向所有将士承诺，平叛之后，朝廷一定会厚加赏赐。如果这两镇服从命令，不阻挠中央的军事行动，刘稹必定可以手到擒来！"

邢、洺、磁三州是昭义的财赋重镇，但却远离其治所潞州，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一块飞地，而成德与魏博则一北一南把它夹在中间，如果王元逵与何弘敬能奉命拿下这块飞地，朝廷基本上就稳操胜券了。

武宗闻言大喜，立刻按照李德裕的计划行事。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这么一套繁文缛节下来，往往一拖就是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李瀍把所有装模作样的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向河阳、河东、成德、魏博、河中五镇下达了命令。

这个命令就一个字——打！

会昌三年五月初，讨伐昭义的战争迅速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场看得见的战争刚刚打响之际，另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就先行奏凯了。

这就是天子（宰相）与宦官的战争。

战争是以仇士良的缴械投降而告终的。

这一年五月，仇士良自知斗不过如今的天子和宰相，遂屡屡以老病为

由请求调任闲职。武宗正中下怀，随即卸掉他的禁军兵权，改任其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六月十六日，武宗又下诏，让仇士良以上述职位致仕。

至此，这个曾经一手遮天的权宦，终于自觉主动地匆匆谢幕了。

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事实上，包括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在内，对此也都有些始料未及。

不过，这正是仇士良的高明之处。

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急流勇退的人。比起那些到死也不愿放弃权力的人，仇士良当然要高明许多。自从安史之乱以后，李辅国、鱼朝恩、陈弘志、王守澄等跋扈宦官大多死于非命，很少能得善终。而对于仇士良来说，这一生能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并且除掉了无数政敌，他确实应该满足了。

最后，他期望的东西只有一个。

那就是——寿终正寝。

仇士良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告诉自己，只要曾经拥有，无需天长地久。

职是之故，仇士良向世人谢幕的姿态显得相当的优雅和从容。他致仕的那一天，徒子徒孙们给他开了个隆重的欢送会，随后又把他从宫中一直送到了家里。感慨万千的仇士良忍不住发表了一番告别演说。

这番演说是他宦海一生、跋扈弄权的精髓。

现在，他要把它无私地奉献给自己的党徒们。

仇士良说：“你们要记住，千万不可让天子闲暇！应该使他时时刻刻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里，以声色之娱灌满他的耳目，而且还要时时花样翻新，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然后，我等就可以得志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天子读书，也不可让他接近读书人，因为他一旦发现前代的兴亡之迹，就会心生惕厉，到那时，我等就会被疏斥了。切记，切记！”

闻此金玉良言，徒子徒孙们顿生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止不住千恩万谢，频频叩首。

这一刻，仇士良苍白无须的脸上绽放出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我虽然走了，但是我并没有输。

因为，我的精神将在一代又一代宦官的身上传承，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

李唐的天子和文臣们，你们可要小心了！虽然我仇士良跟你们的较量结束了，但是我敢断言，在未来的朝堂上，我的徒子徒孙们跟你们之间的战争，将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李德裕的人生巅峰

按照李德裕的计划，朝廷此次讨伐昭义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河北的态度。如果成德与魏博愿意奉诏，这场仗还没开打，朝廷就已经赢了一半；可万一他们拒不奉诏，并且跟昭义抱成一团，那么朝廷就有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了。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朝廷的诏令，成德与魏博的反应截然不同。

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一接到诏令，就亲率大军南下赵州，并很快就攻克了邢州外围的一座堡垒。可是，直到他的前锋攻入邢州境内月余，魏博的何弘敬却依然按兵不动。

王元逵频频向朝廷呈上密奏，称何弘敬首鼠两端，不可不防。接到密奏后，李德裕当即对武宗说："给何弘敬下一道诏书，称朝廷准备派遣王宰（讨伐昭义的主帅）率军借道魏博，直取磁州。如此一来，何弘敬必然担心朝廷打他的主意，不出兵也得出。"

武宗依计而行，随即命王宰率部直趋魏博。

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何弘敬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再也不敢耽搁，赶紧集结部队匆匆北上，兵指磁州。

从会昌三年七月到次年年初，昭义军在朝廷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刘稹惶恐，不得不两次上书请降，但均被李德裕断然拒绝。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朝廷投诚，并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朝廷军利用这些情报，又打了好几次胜仗，逐渐对潞州形成合围之势。八月，在王元逵与何弘敬

的威逼下，作为昭义财赋重镇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继归降。至此，刘稹的败亡已成定局。

眼见昭义大势已去，刘稹身边的两个人就开始寻找退路了。

他们是刘稹的亲信大将郭谊、王协。

当初唆使刘稹拥兵自立时，这两个家伙最卖力，可眼下刘稹马上就要完蛋了，他们当然不想给他当陪葬。

郭、王二人决定杀了刘稹投降朝廷，用他的人头换取富贵。

在郭谊和王协看来，刘稹年少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可问题在于，刘稹身边还有一个厉害角色——他的族兄刘匡周。

刘从谏临死前，有意安排刘匡周担任中军兵马使，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刘稹。所以，要想除掉刘稹，就必须先摆平刘匡周。

为此，郭谊找了一个机会对刘稹说："十三郎（刘匡周排行十三）坐镇帅府，向来刚愎自用，所以诸将都不敢向您进言献计，怕被他猜忌而获罪。山东三州之所以丢失，其根源就在这里。依在下所见，只有请十三郎离开，众将才有可能开诚布公，也才敢向您提出转败为胜的策略。"

少不更事的刘稹信以为真，随即叫刘匡周以生病为由主动辞职。

刘匡周大怒："我身在帅府，诸将才不敢心怀异图，我要是走了，我们刘氏必遭灭门！"

刘稹认为刘匡周是危言耸听，坚持让他走人。刘匡周万般无奈，只好交出中军兵马使的兵权，黯然离开了节度使府。

他一走，刘稹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郭谊和王协随即设计杀了刘稹，同时将刘氏宗族的男女老少全部捕杀——上自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随后，郭谊和王协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全部灭门。

八月十六日，昭义平定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李德裕："应该如何处置郭谊？"李德裕说："刘稹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之所以对抗朝廷，都是郭谊等人指使，可到了刘稹势穷力孤的时候，他们又卖主求荣，这种人要是不杀，何以惩恶！"

武宗点点头：“朕也是这么想的。”

几天后，刘稹的首级被传送京师。

郭谊、王协等人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的封赏，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最后等到的，居然是朝廷的一纸逮捕令。

与刘稹被杀时隔不过半个多月，郭谊、王协等参与谋杀刘稹的昭义旧将，便悉数被绑送长安，然后全部斩首。

昭义之战，朝廷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地震慑了河朔三镇与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胜利。

自“元和中兴”以来，历穆、敬、文三朝，李唐中央与跋扈藩镇的较量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这一次赢得这么漂亮，忠于李唐的万千臣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毫无疑问，此次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非李德裕莫属。

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李唐朝廷不可能获此完胜。

早在战事刚刚拉开的时候，李德裕就向武宗提了一个问题：数十年来，朝廷频频对藩镇用兵，为何屡屡失利？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是武宗李瀍想知道的。

李德裕说，这是因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三大弊端。

其一，天子（包括他身边的近臣）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往往一天之内就发出了三四道诏令，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必然脱离战场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

其二，前线的监军宦官也各凭己意发号施令，导致前线将帅进退无据，无所适从。

其三，监军宦官们往往将各自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却将老弱残兵投入战斗。而且每次会战，监军宦官都会带着令旗在高岗上观战，一看形势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致使全军随之崩溃。

指出这三大弊端之后，李德裕立即与枢密使杨钦义磋商，一起制订了一套对治之策，然后交由天子颁令实施。

这套对治的办法包括：一、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同时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二、除非宰相与中书省建议，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

在与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李德裕提出的主张。如此一来，朝廷下达给前线的命令就变得既符合实际又简明扼要了，使得前方将帅有了很大的决策权和自由施展的空间，因而才能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李瀍登基不过短短数年，为患帝国多年的"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就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实属难能可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武宗一朝，三大政治顽症只被控制了两个，剩下那个"朋党之争"不但未见消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当朝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领袖，更是党争的始作俑者。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也把他一举推上了一生仕途的巅峰。刚刚平定昭义不久，武宗便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他虽然表面上再三推辞，但最后还是笑纳了。

此时此刻，功成名就、位极人臣的李德裕最想做的一件事，当然就是找那两个老对手算算总账了。

事实上，早在昭义之战刚刚打响时，李德裕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胜利，所以，他也早就为日后想要做的事情打下伏笔了。

当时，李宗闵正担任太子宾客，在东都洛阳坐冷板凳，李德裕觉得这老小子过得太逍遥，就给他扣上了一个"交通刘从谏"的帽子，把他逐出了东都，贬为湖州（今属浙江）刺史。

李宗闵压根想不起自己啥时候跟刘从谏有过交情，可如今人家李德裕正仕途得意，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李宗闵只能自叹命苦，乖乖打起铺盖卷到湖州去了。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湖州这地方总还算山清水秀，日子也不至于太难过。

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他的灾难只是刚刚开始。

只要李德裕当权一天，就绝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

会昌四年九月，亦即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后，李德裕就开始算总账了。他对武宗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牛僧孺

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不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终于酿成大患，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

武宗其实也知道这番话是扯淡——当时刘从谏一不叛乱二不谋反，哪个宰相有理由把他扣留？

不过，即便明知道李德裕是在扯淡，李瀍也会帮他扯。因为李瀍本人对牛党向来就没有好感，何况李德裕对朝廷贡献这么大，帮他发泄一下旧怨也是应该的。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

潞州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

可是，结果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

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制造的东西就是整人的把柄。

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孔目官）郑庆出面做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信，阅后当即焚毁，所以现在找不到。”

人证有了，接下来就是物证。

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

牛僧孺时任太子太傅、东都留守，跟吕述是同事，所以由吕述来揭发，可信度很高。

最后，李德裕把郑庆的供词和吕述的书信一起呈给了天子。

毫无疑问，天子李瀍立刻作出勃然大怒之状，当即把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几天后又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刺史，一个月后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长史；而李宗闵则先是被贬为漳州（今属福建）刺史，继而贬为漳州长史，最后又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

会昌四年冬天，当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

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志得意满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美丽的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跟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

如今，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从今往后，自己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太平宰相了。至于这两个老对手，就让他们在那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了却残生吧。

生，他们回不了长安。

死，他们也别指望葬在长安。

就让他们的肉体在痛苦和绝望中悄悄腐烂，让他们的灵魂在天涯海角无尽地漂泊吧！

宣宗登基

然而，李德裕笑得太早了。

他原以为，刚刚三十出头的天子李瀍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而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可他错了。

因为，年轻的天子即将不久于人世。

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开始，年轻的李瀍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

没有人知道，这些帝王为什么不能从前人的覆辙中吸取教训。

看见李唐的历代天子就在这种让人无语的历史轮回中不断重复着相同的悲剧，我们不禁想起黑格尔说过的那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这是个悖论，也是一条无奈的真理。

犹如飞蛾扑火般前仆后继奔向死亡的李唐天子们，就是这条真理的最好注脚。

会昌五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尊号总共十六个字，读起来实在费劲。不知道百官在称尊大典上齐声颂扬该名号的时候，中间是否要偷偷换气？

其实，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要稍微短点儿，只有十五个字。可天子觉得不太满意，就下令加了一个字——道。

对李瀍来说，这个“道”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它是“道教”的“道”。

道教是唐朝国教，武宗李瀍一直很崇信，自然希望把这个神圣而高贵的“道”字加进自己的尊号里。这些日子，武宗极为宠幸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长生丹药，都是这个赵归真炼制的。

天子既崇信道教，自然对佛教没什么好感。而赵归真为了进一步抬高道教的政治地位，当然也要处心积虑地打击佛教，于是天天在武宗耳旁说佛教的坏话。很快，武宗对佛教的反感便与日俱增，认为佛教“耗蠹天下”，对国家和百姓都没什么益处。这一年七月，武宗终于颁发了一道诏书，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在有唐一代臻于极盛的中国佛教，就此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唐武宗一声令下，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座，民间小型寺院如招提、兰若、精舍、斋堂等四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强迫外国游学僧侣两千余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寺院所属一切财产、器物全部收归国有，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而铜像、钟磬等物则全部熔毁，用于铸造铜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佛教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

佛教遭遇这场灾难，首先当然是出于武宗李瀍的个人意志，同时还有来自道教的竞争和排挤，但是从客观上讲，这场浩劫其实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当时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宗教，还不如说是一个“与国争利”的超级产业。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的现状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同时国库空虚，百姓徭役日重，而佛教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各地寺院不但逐渐占据大量田产，纷纷扩充庄园，驱使奴婢，而且，数量庞大的佛教僧尼又与贵族势力相互攀结，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此外，更有不少寺院通过高利贷活动多方牟利……

如此种种，必然在经济上与国家利益产生尖锐的矛盾。所以，唐武宗断然采取“灭佛”之举，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从“武宗灭佛”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当佛教作为一种终极关怀作用于世道人心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污浊尘世中茕然独立、不可或缺的一朵莲花；可当佛教忘却自身的精神使命，与芸芸众生一起在万丈红尘中追逐物质欲望的时候，它必将异化成一颗吞噬社会健康肌体的恶性肿瘤。

换言之，当寺院建筑的规模一座比一座庞大，当大雄宝殿的香火一天比一天鼎盛，当佛教的出家人一个比一个更加忙碌也更加富有的时

候，我们似乎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标志，还是它走向异化和堕落的开始？

也许，这个问题并不多余。

会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瀍开始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其症状与当年的宪宗皇帝一模一样，可他依然坚持每天服食丹药。

进入冬天，武宗身上的许多器官都出了毛病，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

是的，换骨。为了长生不老，为了得道成仙，就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

李瀍相信，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所以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咬紧牙关，继续吃药。

武宗向宰相和百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李德裕等人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天子的身体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根本一无所知。

直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正月三日，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李德裕立刻要求入宫晋见天子，但却遭到了拒绝。

拒绝他的人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李德裕并不知道，此时的天子李瀍已经卧床不起，甚至不能说话了。

每当这种时刻，帝国的命运就会再次落入宦官的手中。

现任左军中尉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紧急磋商之后，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

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

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因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

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

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诏书发布的当天，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三天后，亦即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唐武宗李炎（患病期间改名）驾崩，享年三十三岁。

三月二十六日，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

登基的这一年，李忱已经三十七岁。自代宗李豫之后，帝国已经将近一百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

尽管李忱的登基让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但对于大多数臣民来说，有一个年长的天子总算是一件幸事。因为，年长就意味着阅历和经验，意味着理智和成熟，意味着不会像穆、敬二宗那样把国事当儿戏，也不会像文宗那么孱弱和意志不坚。

然而，对于李德裕来讲，新君李忱的突然即位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当李德裕与天子的目光偶然碰撞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天子事后对左右说："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到我，都让我汗毛直竖。"（《资治通鉴》卷二四八："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

天子的感觉是汗毛直竖，而李德裕的感觉则是如遭电击。

因为，他看到了这位中年天子的心机和城府，更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李德裕就被罢去了相职，外放为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

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但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不独李德裕自己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无不惊骇。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执政的第二天就把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扫地出门，这种雷霆手段实在是不多见。

随着李德裕的迅速垮台，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开始了。

当年八月，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在一天之间全部内调。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司马牛僧孺调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长史，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的李宗闵调任郴州（今属湖南）司马，潮州（今属广东）刺史杨嗣复调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刺史李珏调任郴州刺史，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崔珙调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市）长史。

终于熬到头了。

这几个仕途多蹇的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

可是，李宗闵还没来得及踏上马车，便抱憾而终，病死在了贬所。就像李德裕所希望的那样，他的灵魂，从此只能在天涯海角漂泊了。

不过，李宗闵不必遗憾，也不必感到孤单。因为，短短三年之后，他的老对手李德裕就会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比他更远的地方，而且同样死在了贬所。

从会昌六年九月开始，李德裕的人生就只剩下“贬谪”两个字了。

他先是被贬为荆南节度使，不久调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三月又调任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再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

这最后一贬，把李德裕真正贬到了天涯海角。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登崖州城作》：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李德裕和李宗闵一样，最终都没能回到帝京长安，没能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那一片故土。

人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是非恩怨，都已随着他们的肉体在荒凉的帝

国边陲悄悄腐烂。

关山万重处，只剩下他们的灵魂在夜夜守望——

守望那永远归不去的长安。

“傻子光叔”的帝王之路

唐宣宗李忱曾经被视为智障人士。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认为。

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在整整三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当成傻子。

李忱是宪宗李纯的十三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文、武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宗室亲王，怎么会在整个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李忱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但却是庶出。他母亲郑氏仅仅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而且入宫前还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小妾。说白了，她就是宪宗皇帝平定镇海时获取的一件战利品。入宫之后，她成了郭贵妃（穆宗生母）的一个侍女，因年轻貌美，被宪宗临幸，不久就生下光王李怡，也就是现在的宣宗李忱。

由于母亲地位卑微，光王出生以后，自然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样的荣宠，只能在一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地成长。所以，李忱从小就显得落落寡合、呆滞木讷，往往与其他亲王群居终日而不发一言。长大成人后，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

当时，光王入宫谒见穆宗生母懿安太后，不料刚好撞上宫人行刺，虽然这个突发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显得更加沉默寡言。十六宅的皇族宗亲们于是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肯定是彻底吓傻了。

此后，无论大小场合，光王就成了人们取笑和捉弄的对象。有一次，文宗皇帝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欢声笑语，唯独光王闷声不

响。文宗就拿他开涮，说：“谁能让光叔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哄而上，对他百般戏谑。可这个光叔始终像一根木头，愣是一句话也没有，甚至连嘴角都纹丝不动。见此情景，文宗不禁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随之哄堂大笑。

然而，一个年轻的亲王却忽然间止住了笑容。

他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瀍。

虽然，性格活跃的李瀍刚才还是戏弄光王最起劲的一个，可现在他却死死盯着这个面无表情的光王，心里飞快地掠过一个念头——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为一切外物所动，如果不是愚不可及，就是深不可测。

李瀍忽然有点不寒而栗。

他下意识地觉得，光王很可能属于后者。

到了李瀍登基之后，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这个“傻子光叔”真的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是一根木头吗？

不。武宗李瀍越来越觉得，光王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任何人所知的东西。

倘若真的如此，那么作为天子的李瀍就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了。

后来，种种“意外事故”就频频降临到光王身上，要么是和皇帝一起玩马球时突然从马上坠落，要么就是在宫中走着走着突然间摔得鼻青脸肿。

然而，光王的命很硬，始终没有出大事。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武宗又邀请诸王和光王随他一同出游。酒后回宫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跟大家一样微有醉意的光王再次“意外”摔下马背，昏倒在冰天雪地中。

漫天飘飞的鹅毛大雪很快就把他层层覆盖。

李瀍和许多人都料定，这个掉队的家伙肯定是回不来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人们却在十六宅里看见了光王，一个活的光王。尽管他走路一瘸一拐，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可这个令人惊讶的事

实还是摆在了李瀍面前——光王没死，他好像无论如何也死不了。

武宗李瀍愕然良久，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

他不想再煞费苦心地制造什么“意外”了，他现在想动真格的。

随后的一天，光王突然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关进了永巷，几天后又被扔进了宫厕。内侍宦官仇公武劝武宗干脆把这个傻子杀了，一了百了。武宗马上就同意了。

可是，武宗没有料到，仇公武并未杀死李忱，而是将他从宫厕中捞了出来，然后把他藏进装粪土的车中，偷偷运出了宫……

光王再一次大难不死，从此流落民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后来的许多笔记史和民间传说都称，光王隐姓埋名，跋山涉水，一直逃到了浙江盐官（今浙江海宁市西南），在安国寺落发为僧，法名琼俊。二百多年后，北宋的大文豪、也是著名的佛教居士苏轼途经此处，追忆唐宣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心中感慨，特地留下了一首诗：“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

据说，沙弥琼俊后来成了一名四处参学的云水僧，曾与禅宗高僧黄檗禅师一起云游。有一天，他们走到了江西的百丈山。黄檗禅师凝望着悬崖峭壁上奔腾激溅的一道飞瀑，朗声出对：“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沙弥琼俊微笑地注视着黄檗。

他知道，这个智慧过人的老和尚早已洞察了他与众不同的身世，也窥破了他深藏不露的内心。现在，老和尚想知道他的下一步打算：究竟是继续走在这条舍妄归真的求法路上，勘破四大五蕴，出离三界六道，最终证得不生不灭的慧命法身，还是回到那熙熙攘攘的俗世，做一个中兴李唐、弘传圣教的人间王者和护法天子？

沙弥琼俊最后收起了笑容。

黄檗禅师看见一道锐利的光芒从沙弥琼俊的眸中激射而出，同时他也听到了答案——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春天，武宗李瀍病危，朝野人心惶惶。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光王回到了长安。

这个命运多蹇、九死一生的光王，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的光王，终于在宦官仇公武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

这一年暮春，光王李怡忽然就成了皇太叔李忱。

所有人都知道，李瀍一旦晏驾，这个皇太叔李忱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大唐天子。可是，让人们满怀错愕的是，天子李瀍自己有五个儿子，李唐宗室也还有几十个智力健全的亲王，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成为储君，而偏偏是由这个智力残障人士入继大统呢？难道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傻子光叔摇身一变，成为金銮殿上的真龙天子吗？

这也太不靠谱了。

在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上，历史老儿竟然跟大唐臣民们开了一个如此荒谬的玩笑，真是让人气结。

不过，朝野上下的人们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因为他们终于想起——这个傻子光叔是宦官拥立的。

宦官们需要的，本来就是一个傀儡——一个可以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和应声虫。既然如此，光王当然就是不二人选。试问，在李瀍的五个儿子中，在李唐宗室的诸多亲王中，还能有谁，比这个傻子光叔更适合充当傀儡呢？

在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宦官仇公武的脸上一直荡漾着一个笑容，一个心花怒放的笑容。

是的，他有理由这么笑。

因为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从臭气熏天的宫厕中捞出的绝不是一个废物，而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一个具有高度利用价值的天子胚胎。所以，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把他捞出来，甘愿提着脑袋去赌明天。

试问，这样的胆识和魄力，满朝文武又有几人具备呢？

既然你们都没有这种远见卓识，更不敢提着脑袋赌明天，那么此时此刻，你们又有什么资格怪我仇某人笑得这么露骨、这么灿烂、这么自得和张狂呢？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当李忱以储君的身份开始接手军国大事，仇公武的笑容就在脸上逐渐凝结了。

因为，这个由他一手扶立的傻子突然间就变了，变得让他感觉无比陌生。

过去那种自闭木讷的神情、空洞散乱的目光、怯懦萎靡的状态，全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威严而自信的脸庞，一双睿智而深邃的目光，以及沉着有力的言谈和大气雍容的举止，看上去不但和从前的光王判若两人，而且根本不像是一个尚未正式即位的储君，更像是一位御极已久的成熟帝王。

仇公武始而诧异，继而困惑，终而震惊。

难道，这才是光王的本来面目？难道这三十七年来，他一直在倚傻卖傻、忍辱负重，就为了今天的这一刻？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当初武宗李瀍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把这个傻子光叔置于死地，就是因为早已看穿了光王的本来面目。

然而，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

因为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

宦官仇公武只能将错就错、听天由命了。他只能无奈而悲哀地看着自己精心饲养的金丝雀，突然间挣破鸟笼，直飞蓝天，变成一只搏击长空、睥睨天下的苍鹰……

看着金銮殿上那个脱胎换骨的傻子光叔，满朝文武的讶异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仇公武。

不过，人们并没有感到悲哀和无奈，而是感到由衷的庆幸。

因为他们知道，这三十七年来，所有人都看错了这个光王。

所以他们相信——一个历经磨难而又百折不挠的人，一个遍尝人间疾苦而又不坠青云之志的人，一旦君临天下，必然也会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帝王。

山河长在掌中看

不出人们所料，新君李忱一即位，就施展了一系列雷霆手段，开始全面清算会昌政治。隐忍了大半生的他，似乎要迫不及待地将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

首当其冲者，就是武宗一朝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及其党人。

正式执政的第二天，李忱就罢免了李德裕；第四天，他又把李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贬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同日，薛元赏的弟弟、京兆少尹薛元龟也被贬为崖州司户。

四月底，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均被杖死或流放岭南。

五月初五，李忱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开始全面恢复佛教的地位。同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入相。随后，白敏中便在新天子的支持下，开始不遗余力地打击李德裕及其党人。

第二年正月，新君李忱改元“大中”。

这个年号，将伴随宣宗李忱和大唐帝国走过十三年的岁月。而这十三年，将是黯淡无光的晚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抹辉煌。

后人将这个时代誉为“大中之治”，也有人称其为“小贞观”。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八月初三，武宗朝的另一位宰相李回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正月初五，右补阙丁柔立上疏为李德裕喊冤，旋即被贬为南阳县尉。

正月二十四日，西川节度使李回再贬为湖南观察使；同日，桂州观察使郑亚也被视为李党成员，坐贬循州刺史。

正月二十八日，中书舍人崔嘏受到指控，称其在撰写李德裕的贬谪诏书时有意搪塞，没有写出李德裕的全部罪行，被贬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刺史。

同年五月，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与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一同入相。

九月，湖南观察使李回再贬为贺州（今广西贺县）刺史。

至此，宣宗李忱基本上完成了对李党的清洗，用行动全盘否定了会昌政治，同时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换血，建立了自己的宰执班子。

一张白纸铺开了。

接下来，宣宗李忱终于可以放手描绘属于自己的时代画卷了。

后人之所以把大中时代誉为“小贞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宣宗李忱时时刻刻把太宗李世民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志成为一个自律和勤政的明君。

登基不久，李忱便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每天政务之余，便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绹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给他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便让令狐绹停下来，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

二月的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绹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

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

令狐绹很为难，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臣手上也没有材料；只有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随后，宣宗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案头时时翻阅。

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

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

樵夫道：“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

李忱一听就来了兴趣，让樵夫说说原委。樵夫答：“李行言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他们杀了。”

李忱听完，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

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

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顿时受宠若惊，却又百思不解。

宣宗说："知道你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李行言一看，在深感庆幸的同时，不免也有一丝后怕。假如他当初在宦官的压力下把强盗放了，那么今天等待他的就不是升官受赏，而是贬谪流放了。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处佛祠，看见醴泉县的一些父老聚集在堂中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奭能够留任。宣宗当即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奭。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竟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奭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在狩猎出巡，其实真正目的是要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并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密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

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

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略作试探，果不其然，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于《处分语》。

在这种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那他就要遭殃了。

有一次，度支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一看，随手就把那个错字的笔画改了过来。

在孙隐中而言，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何况这么微小的细节，皇帝肯定也不会发现。不料，宣宗一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随后，孙隐中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还有一次，新任的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朝辞行。宣宗问他：“建州距京师多远？”于延陵答：“八千里。”宣宗说：“你到任之后，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不要以为那地方远在天边，这阶前就可直通万里，你明白吗？”

于延陵当即吓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宣宗安慰了他几句，就让他上路了。

于延陵赴任后，或许是把天子的告诫忘了，或许是不相信天子真有那么神，总之政绩并不理想。没多久，于延陵就被贬为复州（今湖北天门市）司马。他懊悔不迭，没想到宣宗根本就不是在吓唬他，他在建州的一举一动果然没能逃脱天子的法眼。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李忱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

在宣宗李忱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他几乎要用尽全力把整个天下置于掌中，不论事情巨细。

一个普通人，要想做到凡事亲历亲为并且毫无差池，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可身为日理万机的皇帝，宣宗李忱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许多年前，当宣宗还是一个小沙弥的时候，就曾在江西的百丈山留下了这么一首诗：

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

仙峰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

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

山河长在掌中看。

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何等豪迈的胸襟，何等高远的志向！

除了表明他不同凡响的境界之外，李忱的这句诗，仿佛也为他日后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勤政表现做了最形象的注解。

他似乎在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山河长在掌中看”绝不是一种凌空蹈虚的理想境界，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施政手段。

当然，前提是你有成为明君的意志和决心。

大中之治：最后一抹辉煌

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朋党之争终于渐次消歇，偃旗息鼓了，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宣宗李忱拥有高超的驭臣之术。

关于宣宗驾驭百官的心机和手腕，还要从大中初年一个宰相的际遇讲起。

这个宰相叫马植，于大中二年五月入相，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却突然被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此次贬谪事前毫无征兆，令满朝文武都大惑不解。

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腰带惹的祸。

准确地说，是一条宝玉腰带。

这条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

原因很简单，首先，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且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可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理由认为他们私交很深，甚至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所有人都对之记忆犹新，而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活的党争背后，都无一例外地站着宦官的身影。如今，宣宗李忱又岂能让宰相宦官相互勾结的一幕在他面前重演呢？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也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因为，李忱从即位的那一刻起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强势天子。

基于上述理由，李忱就必须把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在襁褓之中。

大中初年，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人们不难明白一点——要在天子李忱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在他的朝廷上当宰相，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六七个宰相中，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名叫令狐绹。

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绹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与宣宗一朝相始终。而令狐绹之所以能稳居相位的唯一秘诀，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把自己的相权让渡给了天子。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也是他的无奈之处。

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令狐绹别无选择。

然而，即便令狐绹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和指责。

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总是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专门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如果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他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

有一次，令狐绹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绹。

令狐绹慌忙解释："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

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

那一刻，令狐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全身瞬间爆发出的冷汗，早已浸透了他厚重的裘衣。

在大中时代的十几年间，宣宗就是以这样一种无孔不入的精明和难以置信的强悍驾驭着宰相和百官。

当然，如果总是表现得精明强悍，那宣宗的领导艺术就谈不上有多么高超了。其实很多时候，他也会显得宽厚而随和。就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一样，他总是优雅地举着鞭子，从容地把握着节奏，时而严苛猛厉，时而又会笑语温存。

可是，在宰相和百官看来，天子李忱笑语温存的时候，绝对比严苛猛厉的时候更加可怕。

比如有一次早朝，宣宗上殿的时候，脸上还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跟百官都很客气，让大家感觉如沐春风。可当宰相和百官一开始奏事，宣宗马上就换了一副脸色，神情威严，正襟危坐。等到奏事完毕，他又冲百官一笑，说："大家可以扯扯闲话了。"接着就向群臣询问一些街头巷尾的奇闻逸事，或者主动谈一些宫中的琐碎趣事。

这一刻，百官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开始在朝堂上有说有笑地扯闲篇。可就在他们谈得热火朝天、浑然忘我之时，天子却突然板起面孔，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诸位爱卿要好自为之。不知为什么，朕有时候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担心你们会辜负朕，以致日后不能再以君臣之礼相见！"言毕，立刻起驾回宫。

一听此言，百官无不悚然。

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直到天子的銮驾远去，一种无言的恐惧仍然凝固在他们脸上。

为相十年的令狐绹对此感触最深。他不止一次对亲信说过："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李忱既然能够把满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他当然也不想放过那些专权跋扈的宦官。为此，他曾经多次以谈论诗词为名，秘密召见翰林学士韦澳，并屏退左右，单独与他商讨对付宦官的策略。

有一天，宣宗再次秘召韦澳，问："近日，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韦澳不敢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其他："外廷都说，陛下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

宣宗一听，不无失望地闭上眼睛，说："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他们仍然心存畏惧，你说该怎么办？"

韦澳面露难色，小心地说："如果跟外廷商议，恐怕又会重蹈太和年间之覆辙。臣以为，不如在宦官中选择才德兼备之人，与他们商议。"言下之意，就是以毒攻毒，起用后进宦官，对付当权宦官。

宣宗长叹一声，说："这是下策！朕不是没有试过。从擢升那些后进宦官为黄衣（九品官服）开始，一直到绿衣（六七品）、红衣（四五品），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穿上紫衣（三品），他们马上就会和那些当权宦官抱成一团！"

知道这个韦澳难当大任，宣宗只好把目光转向宰相令狐绹。他希望令狐绹能拿出一个诛除宦官的计划，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令狐绹的反应居然和韦澳如出一辙。

令狐绹呈上秘奏，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职务出缺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久，也就自然淘汰，终归于消灭了。"

宣宗拿到奏疏的时候，唯一的反应就是苦笑。

这不是废话吗？如果这么做就能让宦官“自生自灭”，那前几朝的天子和宰相，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

不过，宣宗也知道，太和末年的“甘露之变”，已经把满朝文武都吓成惊弓之鸟了。如今，不光是满朝文武，即便放眼天下，恐怕都找不出一个敢跟宦官较量的人。

剪除宦官的计划就此搁浅。终宣宗一朝，李忱再也没找到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臣助他完成这个心愿。

不过，虽然宣宗没机会对付宦官，但是另一方面，宦官在宣宗李忱强大的威慑力面前，实际上也是颇为忌惮的——在整个大中时代的十三年里，宦官集团一直比较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

宣宗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李唐天子们虽然不乏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加之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可能腾出手去收复失地。

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而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宣宗李忱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他。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由吐蕃控制的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县）、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东北）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这“三州七关”，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宣宗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地驻军出兵接应。到这一年七月底，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州七关正式收复。八月，三州民众一千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朝见天子。宣宗李忱登延喜门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脱下胡服，换上唐

装。围观军民欢声雷动。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并且全部回归大唐帝国的怀抱。

张义潮本是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的一个平民，但却怀有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爆发内乱之时，他便结交了一批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内乱而军心涣散，张义潮觉得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沙州就此光复。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二月，张义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将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同月十九日，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即日下诏，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随后，张义潮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主动出击吐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义潮便以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岷州（今甘肃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大中五年十月末，张义潮让他的哥哥张义泽奉上十一州（包括沙州）的地图和簿籍入朝觐见。

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

至此，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

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

定应对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对于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它们保持现状，默认它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正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卒，军队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就没有予以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后便任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八月，沉迷酒色的王绍鼎暴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懿，宣宗也照例予以承认。

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就毫不手软了。凡有藩镇爆发兵变，或是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相当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强硬。

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七月，浙东军队哗变，驱逐了观察使李讷。九月，宣宗便派出礼部侍郎沈询继任观察使，迅速稳定了浙东的局势。同是这一年七月，淮南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节度使杜悰却依旧耽于宴游，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闻讯，几天后便派宰相崔铉接替了淮南节度使之职，把杜悰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

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湖南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韩悰，杀了大将王桂直；六月，江西兵变，大将毛鹤驱逐了观察使郑宪；七月，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熏。八月，宣宗即命淮南节度使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出兵征讨宣歙叛乱；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征讨湖南叛乱；命光禄勋韦宙为江西观察使，负责征讨江西叛乱。

短短几个月后，宣宗派出的三路人马便都不辱使命，顺利平定了叛乱——十月，崔铉斩杀康全泰及党羽四百余人，平定宣歙；徐商斩杀石载顺，平定湖南；十二月，韦宙斩杀毛鹤及党羽五百余人，平定江西。

大中时代，大唐帝国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太平盛世，但起码算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小康之局。

这在混乱不堪的中晚唐历史上，已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尽管“大中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衰亡之势，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它走向崩溃的历史宿命。

换言之，这个被后世誉为“小贞观”的时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老大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是末世残阳中的最后一抹辉煌。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

诗人无限怅惘的一声浩叹，不啻于是对帝国命运的准确预言。

懿宗登基

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春天。唐宣宗李忱四十七岁。尽管这已经是他帝王生涯的第十个年头，可宣宗李忱治国御宇的热情似乎丝毫不减当年。

面对这个从不知疲倦和懈怠为何物的天子，满朝文武当然是既敬佩又欣慰的——谁不希望这个英明神武的天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力，永远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从而长久地维护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呢？

但问题是，这不现实。

人总是会老、会死的，李忱再怎么强悍，在这一点上也不可能超越自然规律。更何况，他前面的六任天子——顺、宪、穆、敬、文、武，没有一个活过五十岁。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不敢对李忱的长命百岁抱有太大的乐观。所以，帝国必须及早确立储君，才能有备无患。

可让人遗憾的是，宣宗李忱始终不愿立储。他似乎一提起这件事情就烦。对此，宰相和百官自然是忧心忡忡。

正月的一天，宣宗召见宰相裴休，让他对朝廷在新一年里的当务之急畅所欲言。裴休不失时机地再次对天子提出：“当今首务，无如早立太子。”

宣宗闻言，立刻拉长了脸。

片刻后，裴休听见天子冷冷地说：“若立太子，朕岂不是成了闲人？”

对于天子执意不肯立储的原因，百官们自然是议论纷纷。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天子对权力的过度执着和眷恋所致。

这样的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宰相裴休等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其实只是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天子故意要跟大臣们抬杠。

天子并不是真的不想立储，而是在太子的人选上与大臣们产生了严重分歧。

宣宗李忱一共有十一个皇子，长子郓王李温年已二十四，本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问题是宣宗一点也不喜欢这个长子，所以早早地命他搬出皇宫，住到了十六宅[1]的亲王府里。留在宫中的十个皇子中，宣宗最宠爱的就是三皇子夔王李滋，一直有心要立他为太子。可大臣们认为这不合礼制，应该立长子李温。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事情就这么搁置了。

日子很快就走到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帝国的储君依旧迟迟没有确立。

如果说在此之前，大臣们的担心还只是一种隐忧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满朝文武的担心已经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恐慌了。

因为这几年来，这个天纵英才的皇帝又走上了历任李唐天子的老路，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结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这年春夏之交开始，天子体内的毒性发作，背上生了恶疮。到了八月初，恶疮大面积溃烂，天子卧床不起，再也不能上朝。宰相和百官都没有机会见到天子。

天子病危，储君未立，宫内外消息隔绝。帝国再度落入一个危险的时刻。

宣宗李忱自知不预，立即传召左右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宫廷南院总监）王居方，把夔王李滋托付给他们，命其拥立李滋为太子，继承皇位。

天子托孤，而且是废长立幼。这种事情实在是非同小可，必须要有禁军作后盾。三个顾命宦官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一贯与他们交好的右军中尉王茂玄，获取了他的支持。随后他们又紧急磋商，以天子名义发布敕令，把不属于他们一党的左军中尉王宗实外放为淮南监军，以此保证夺嫡行动的顺利进行。

王宗实没有怀疑，即刻准备出发。可他的副手、左军副使亓元实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皇上卧病已一月有余，您只是隔着房门问候起居，今日突然被外放，这件事到底是何人所为，中尉大人难道就不想见了天子再走？"

王宗实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被人摆了一道，立刻怒气冲冲地与亓元实一起奔向皇帝寝殿。

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宣宗已经驾崩，侍从和宫女们正围着遗体哭泣。

王宗实与亓元实立即采取行动，召来王归长等三人当面怒斥，指责他们假传圣旨。王归长等人知道斗不过这个禁军的头号人物，只好趴在他脚下乞求饶命。王宗实随即命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前往十六宅迎接郓王李温。

八月九日，王宗实以天子名义发布遗诏，立郓王李温为皇太子，监理国政，同时改名李漼。同日，左右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被捕，旋即被杀。

又一个李唐天子，在两派宦官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被懵懵懂懂地推上皇位。

大中十三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七岁的李漼登基，是为唐懿宗。

当宣宗李忱走完他的传奇一生，“大中之治”也随之落下了帷幕。

盖棺论定的时刻，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由于这个“小太宗”的励精图治，我们才得以在中晚唐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脉传承自盛唐的明媚、华丽与雍容。

然而，当这一页历史翻过之后，黑暗便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目光。

在未来的黑暗岁月里，在山河崩裂的末世烽烟中，昔日那个煌煌大唐的浩气与精魂已然消失殆尽，只剩下最后几张年轻而惶惑的脸，在大明宫摇摇欲坠的殿廷中浮沉和飘荡……

[1]　唐代诸王集中居住之地，位于京城安国寺东。——编者注

第七章 一盘散沙的唐朝

内忧外患的帝国

懿宗李漼虽然在宦官的拥立下有幸坐上了皇位，但此时的李唐天下并

不是那么好坐的。尽管帝国在宣宗李忱的强力治理下获得了十余年的相对安宁，可是各种历史积弊并没有完全去除，顶多只是被暂时掩盖而已。换句话说，表面稳定的大中时代并不足以成为一株让后人享受荫凉的大树，而充其量只是一只摁住弹簧的手。

当宣宗李忱强有力的大手从弹簧上移开，突然迸发出来的反弹力量就注定会震痛懿宗李漼那支纤弱无力的手臂。

对此，李漼有什么思想准备吗？

很遗憾，他没有。

他以为自己坐上的是一把太平天子的龙椅，不料却是一个无比炙热的火山口。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李漼即位才几个月，浙东平民裘甫便揭竿而起，燃起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把烽火，差不多与此同时，多年来一直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王国也突然变脸，出动军队大举入寇，跟李唐王朝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就这么开场了。

裘甫是浙东的一个平民，起事之初，手下仅有一百来号兄弟，可这些人个个凶悍无比，都有以一当十之勇。所以裘甫一拉起反旗，就迅速攻陷了象山（今浙江象山县）。当地官兵屡次围剿都铩羽而归，以致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的城门在大白天也四面紧闭。随后，裘甫又乘胜进攻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一时浙东骚然。

第二年正月，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派出的官兵又在桐柏观（今浙江天台县西北）遭遇惨败，指挥官刘勍仅以身免。几天后，裘甫占据剡县，开放府库，招兵买马，短短几天之内，队伍就扩大到了数千人。郑祗德大恐，仓促招募了五百名新兵前往征剿，结果在剡县西面再度被裘甫打败，率兵的三个将领全部阵亡，部众几乎全军覆没。

裘甫数战皆捷，四方的无业游民蜂拥来附，变军人数迅速激增至三万人。裘甫立刻抖擞起来，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年号“罗平”，还铸造了一颗“天平国”的大印。

三月下旬，变军越发猖獗，又先后劫掠了衢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台州（今浙江临海市）、上虞等地，攻陷了唐兴（今浙江天台县）、余姚、慈溪、奉化、宁海。所到之处，青壮年全部抓为壮丁，而老弱妇孺则遭到了无情的屠杀。

浙东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令懿宗李漼大为震骇。

江南可是帝国的“钱袋”和“粮仓”啊，怎么能起火呢？

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北方长年兵连祸结，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加上河北诸藩一直拥兵割据，赋税自享，所以帝国的赋税收入便只能依赖于江淮地区。幸运的是，这一百多年来，帝国南方总体上还算安定，因而得以支撑朝廷的用度。可眼下，浙东裘甫的首开叛乱无疑一举打破了江南的安宁，并将直接威胁李唐中央的财政收入，懿宗朝廷自然会为之震恐。眼看星星之火即将燎原，懿宗赶紧派遣前安南都护王式接任浙东观察使，并命忠武、义成、淮南各道的兵力归他调度，全力镇压裘甫叛乱。

王式虽是一介文官，却是一个有勇有谋之人。据说他在担任安南都护期间，便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才干而“威慑华夷”。得知朝廷派王式前来平叛，裘甫及其党羽大为恐慌，军心开始涣散。有人劝他分一些兵力袭取福建，准备一条退路，又有人劝他据险固守，实在不行就逃到海上。裘甫听来听去，却始终拿不定主意。

这一年四月，王式抵达浙东治所越州，一面整顿军纪，一面下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济贫民。这种做法极大地挽回了民心，当地百姓开始支持官军，于是战场上的形势陡然一转。不久，官军屡战屡胜，先后迫降了变军大将洪师简、许会能、王皋等人，大破毛应天、刘天平、孙马骑等部，失陷的城池也接连收复。

六月下旬，节节败退的变军已被团团围困，只剩下剡县一座孤城。裘甫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出城投降。

八月，裘甫被押送京师，斩首于东市。

至此，懿宗李漼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十一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咸通”。

猖獗一时的东南民变虽然被迅速镇压了，但此时此刻，在帝国的西南边陲，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就是南诏与大唐的战争。

此时的懿宗当然不会料到，这场战争不仅规模浩大，而且还将持续十多年之久，几乎与他的整个帝王生涯相始终……

都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南诏之所以突

然跟大唐翻脸，当然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南诏原本依附于吐蕃，但自从德宗年间，宰相李泌实施了围堵吐蕃的战略之后，南诏便转而投靠了大唐。这些年来，南诏年年向大唐称臣纳贡，一直恪守臣藩之礼。当然，南诏同时也从大唐捞到了不少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留学费用由唐朝出）。自德宗以来的五六十年间，南诏每年都要派出数以千计的留学生，统一前往成都学习唐朝文化，期间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全部由当地政府承担。这事情要是搁在天宝年间，财大气粗的唐朝政府绝不会皱半下眉头，可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各级政府的经济状况就大不如前了，几乎都要掰着指头过日子，就算有点闲钱，也得随时准备应付战争、灾荒等不时之需。现在可倒好，自己尚且要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却还得打肿脸充胖子，省吃俭用地供养那些南蛮子弟，当地政府自然是满腹牢骚，所以提供给留学生的待遇也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对此，南诏当然很不爽。其国王丰祐立刻给唐朝递交了一封国书，扬言要把留学生全部召回去，并且措辞极为傲慢。

除了留学生外，南诏从大唐得到的第二个好处，就是纳贡。

按理说，南诏向唐朝纳贡，应该是唐朝得好处，怎么反而是南诏得好处呢？

原因很简单——中国历来讲究礼尚往来，既然人家藩属国千里迢迢前来纳贡，作为泱泱大国的唐朝自然也要回礼。

所以，南诏每年纳贡，唐朝都要对使团大加赏赐，所赐物品的价值远远高于那些贡品。

南诏尝到了甜头，“纳贡”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人人都抢着去唐朝“上贡”，于是派往唐朝的使团人数便逐年递增。久而久之，唐朝政府自然是不堪重负。到了宣宗年间，在西川节度使杜悰的建议下，李唐朝廷终于大幅度削减了对南诏纳贡使团的赏赐，不再做赔本买卖了。

南诏国王丰祐再次气得吹胡子瞪眼，当年岁末便不再纳贡，仅派使节送了一道贺表了事。之后几年，是否纳贡也全凭他的心情而定，心情好了就随便弄一些去凑数，心情不好非但不纳，反而还会派小股部队到唐朝边境去袭扰劫掠。

因此，到了宣宗末年，唐朝和南诏虽然还没发展到敌对状态，但两国

关系其实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

大中十三年，宣宗驾崩，懿宗即位，李唐朝廷派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各藩属国派吊祭使赴长安吊唁。巧合的是，南诏国王丰祐也在这个时候死了，可唐朝却对此一无所知。结果，派往南诏的这一路宦官自然就看不到人家的好脸色了。

此时，南诏的新任国王是丰祐的儿子世隆。他看一眼诏书就随手扔在了一边，怒气冲冲地对唐朝使者说："我国也有丧事，为什么朝廷不派人来祭悼？而且诏书上居然还写着先王的名字，这不是侮辱本王吗？"

使者一脸尴尬，无言以对。随后，世隆就把使者打发到了城外的简陋客栈，接待规格低得不行。宦官们满腹委屈，回到长安后，便把此番遭遇一五一十地向懿宗做了禀报。

年轻气盛的懿宗李漼一听也火了。他当即做出报复，坚决不对世隆进行册封，也就是不承认他南诏国王的身份。懿宗还给出了两条不册封的理由：

一、胆敢不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分明是对朝廷不尊；

二、世隆的名字犯讳，"世"字犯太宗讳，"隆"字犯玄宗讳，显然是大不敬罪。

懿宗以为，世隆为了求得朝廷册封，一定会乖乖地低头认错。

可他错了。这个新任的南诏国王远比他想象的执拗得多，也强悍得多。接到李唐朝廷问罪诏书的那天，世隆发出了一声冷笑。你以为老子稀罕你的册封吗？你不让老子当国王，老子就自己当皇帝！

几天后，懿宗非但没有看到世隆低头认错的上表，反而接到了一则令他目瞪口呆的奏报——世隆称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同时发兵入侵大唐边境，已经攻占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市）。

南诏与大唐的战争就此揭开序幕。

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十一月，安南都护李鄠向入侵的南诏军队发起反攻，收复播州。但南诏却趁他后方空虚，发兵三万，在安南蛮族的引导下奔袭安南治所交趾（今越南河内市），并一举攻占。李鄠后路被抄，只好仓皇逃奔武安（今越南海防市）。

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正月，懿宗下诏命邕州（岭南西道治所，今广西南宁市）及相邻各道紧急发兵援救安南，阻止南诏的进攻。六月，朝廷以失职的罪名把安南都护李鄠贬为儋州司马，同时任命盐州（今陕西定边县）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

七月，南诏军队又攻陷邕州。

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二月，南诏再犯安南，王宽无能，频频上书告急。懿宗朝廷不得不再易主帅，命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并紧急动员忠武、义成、武宁、宣武、荆南、山南东道、湖南、鄂岳八道士兵共三万人，归蔡袭指挥。

南诏见唐军声势浩大，遂暂时撤退。

同年十一月，南诏集结了五万人马卷土重来，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正月再度攻陷交趾。蔡袭率众力战，左右皆战死，他身中十箭，最后蹈海而亡；大将元惟德等人奋力砍杀两千多敌兵，其后也是寡不敌众，壮烈殉国。

南诏两度攻陷交趾，共杀死和俘虏唐朝军队十五万人。安南各蛮族见南诏势盛，纷纷投降。前线接连战败，李唐朝廷不得不放弃安南，命驻守安南的各道士兵全部后撤，退守岭南西道。

懿宗即位才短短几年，帝国的内忧外患便纷至沓来，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深感忧惧。可是，懿宗李漼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忧患意识，而是天天沉浸在游乐宴饮之中。

左拾遗刘蜕愤而上疏："如今南蛮大举入侵，干戈满途，天下并不太平。皇上在所有人面前都没有忧虑的神色，又如何责成人臣尽死效忠？恳请陛下减少娱乐活动，等到四方承平、人心安定，再图享乐也为时不晚！"

然而，懿宗李漼却置若罔闻。

摊上这样一个享乐皇帝，帝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庞勋之乱：大唐的人心散了

从咸通四年一直到咸通七年（公元866年），懿宗朝廷先后派遣的前方主帅康承训和张茵均未克复安南。与此同时，南诏王国在世隆的手

中进入了全盛时代，其版图北逾金沙江，东抵黔中，西达怒江，南抵越南中部。

咸通七年六月，新任安南都护高骈终于对安南发起反攻，在交趾大破南诏军队，并于十月进围交趾，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战，最终将其攻陷，砍下三万多首级。随后，高骈又击败归附南诏的蛮族，杀了他们的酋长；十月底，蛮族士众一万七千人归降大唐。

至此，安南收复。十一月，懿宗诏令安南、岭南西道与西川守军各守疆域，不得再进攻南诏，并遣使向南诏表示修好之意。同月，在安南设置静海镇，以高骈为节度使。

边境刚刚恢复暂时的安宁，懿宗李漼便又变本加厉地纵情声色了。

懿宗李漼酷爱音乐，所以光是在殿前随时侍奉的乐工就将近五百人，每月举办的音乐酒会不下十余次，席间各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应有尽有，歌舞和戏剧表演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对那些优伶和乐工，懿宗的出手相当阔绰，其赏赐动辄千缗。

懿宗的温柔乡还不仅大明宫一处，比如曲江（长安东南）、昆明（大明宫内）、灞水、浐水（渭水支流）、北苑、南宫（皇城外的兴庆宫）、华清宫（陕西临潼）、咸阳宫等处，都有天子专门命人设置的福地洞天。每当他兴致一来，便会立刻起驾前往，以致侍从们经常来不及筹备和布置。为此，有关部门只好在上述各处常备音乐、酒食、锦帐、帘幕等物，以防天子突然驾到。此外，李唐皇室大大小小的亲王们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当天子起驾，他们就会前呼后拥地陪同圣驾出发。天子每次巡幸，宫廷内外各色人以及各衙司随驾侍从的人数往往多达十余万，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

人在逍遥享乐的时候，日子是很容易过的。

时间一晃就到了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这年夏天，当懿宗李漼仍然在他的温柔乡中乐而忘返的时候，一场比裘甫之乱规模更大的兵变爆发了。

咸通三年安南沦陷时，朝廷曾从徐州（徐泗镇治所）调了八百名士兵前往桂州（今广西桂林市）驻防。当初，徐泗镇招募他们时便与其约定，役期以三年为限，期限一到立刻派兵换防。结果，这批士卒在桂州整整待了六年，却始终没有等到换防的调令。思乡心切的戍卒们屡屡向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写信抗议，要求回镇。崔彦曾便召集了将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商议，这些人一概劝他拒绝，理由是徐泗镇目

前军费困难，而派兵接防的开支又太大。他们向崔彦曾建议，命令这批戍卒再驻守一年。

收到徐泗镇的答复后，戍卒们立刻炸开了锅。

这批戍卒中的大多数本来就不是良民，比如都虞侯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原来都是徐州地面上的强盗，只因州县无力征讨才将他们招安。而这伙人之所以接受招安，目的就是想升官发财，不料到头来什么油水都没捞着，还在这穷乡僻壤吃了六年的苦头，他们当然吞不下这口恶气。

这一年七月，许佶等人召集八百名戍卒发动兵变，杀了大将王仲甫，推立粮料官庞勋为首领，一路向徐州杀了回去，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州县莫之能御。

十月十七日，庞勋变军一口气杀到了彭城（徐州州府所在县）。

由于一路上不断纠集和招募，此刻变军数量已达六七千人，鼓噪之声喧天动地。

正所谓盗亦有道。这伙强盗出身的乱兵虽然一路上没少杀人抢劫，可一回到家乡，他们立马变了一个人。进抵彭城后，他们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大加慰抚，因此百姓纷纷依附。结果，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变军就攻破了外城。随后，百姓又帮助变军进攻内城，推来草车焚烧城门，旋即又将内城攻破。变军杀进城中，俘虏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并把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开膛破肚，碎尸万段，然后又屠杀了他们全族。

当日，城中自愿归附变军的士民又有一万多人。

随后的日子，各地前来投奔庞勋的人络绎不绝，都愿意为他效死。不仅是徐州附近州县，就连光州（今河南潢川县）、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兖州（今山东兖州市）、郓州（今山东东平县）、沂州（今山东临沂市）、密州（今山东诸城市）以及淮河一带、浙江地区的变民，也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归附……

对此，李唐朝廷和各级官员都百思不解，为什么帝国会在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变民？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庞勋兴兵作乱，竟然会有那么多百姓帮他攻城，而且还从远近各地争先恐后地跑来追随他？

这个庞勋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无领袖魅力，四无远大的政治抱负，五无号令天下的政治纲领，如此典型的“五无人员”，凭什么能够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呢？

也许，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大唐的人心散了。

人心为什么会散？

答案很简单：民穷思变。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杀伐争战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社会常态。为了应对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各种危机，历届李唐朝廷无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这样的压力，最终必然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德宗年间，李唐朝廷虽然实施了两税法改革，在名义上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但其主要作用，只是通过限制和收缴地方财权，从而缓解李唐中央的财政危机而已，实际上并未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此外，虽然两税法的主观目的之一，是想防止地方政府在正常赋税之外非法聚敛，但实际上，各藩镇州县普遍阳奉阴违，从未停止过对百姓的压榨和盘剥。

处于“社会食物链”最底端的老百姓，既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又没有正常的诉求渠道，只能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收成好的时候，人们或许还能图个温饱，可一旦碰上灾年，就难免于困苦和冻馁了。

然而，各级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和各种利益，根本不会顾及老百姓的死活。到了懿宗年间，百姓与官府的矛盾已经极其尖锐。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六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民变，驱逐了当地观察使崔荛。从这个事件中，人们足以看出当时的官民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当时，陕州发生了旱灾，当地农民颗粒无收，而官府不仅没有赈灾之意，还屡屡催收钱粮，百姓只好集体到官府请愿。观察使崔荛看着这帮闹哄哄的乱民，不屑地指着庭前的一棵树，说：“看见了没有，这叶子不是长得好好的，哪来的旱灾？”随即命人把为首的农民抓了起来，暴打了一顿。

请愿百姓忍无可忍，马上回去召集四邻乡亲，拿起锄头镰刀冲进了官府，准备宰了崔荛。崔荛仓皇逃命，一口气跑出了百八十里地。后来，崔荛跑得口干舌燥，实在是跑不动了，只好到路边的一户人家讨水喝。主人认出了他，但并未点破，而是拿过一个海碗，往里头长长地撒了一泡尿，然后递到他的嘴边。

崔荛知道，他要是不喝，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活活打死。为了保命，他只好捏着鼻子把那碗尿灌进了肚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当官府连饭都不让老百姓吃饱的时候，老百姓凭什么不能让当官的喝尿呢？

与此同理，当那个叫庞勋的人突然拿起武器反抗朝廷的时候，早就对官府深恶痛绝的老百姓凭什么不能推着燃烧的草车帮他攻城呢？凭什么不能马不停蹄地从四面八方跑来投奔他呢？

造反固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既然生存底线早已被突破，老百姓就只能选择这种最后的自我保护方式。

苛政猛于虎。

如果你不想被虎吃掉，就只能把虎打死，二者必居其一。

庞勋之乱震惊了李唐朝廷。

徐州沦陷次月，懿宗朝廷便紧急派遣大将康承训、王晏权、戴可师兵分三路进攻徐州，并大举动员诸道兵力归三帅统领；同时，又采纳康承训的建议，征调沙陀部落的酋长朱邪赤心，会同吐谷浑、达靼、契苾等部落征讨庞勋。

李唐朝廷的这场平叛之战，一开始打得并不顺利。先是康承训率领的中路军因诸道兵力尚未集结而遭遇叛军狙击，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市）；不久，求胜心切的南路军主帅戴可师又在都梁（今江苏盱眙县南）被叛军王弘立部击溃，戴可师战死，所部三万人仅剩几百人脱逃，所有武器、粮草、辎重、车马全部落入叛军之手。

在接二连三的胜利面前，庞勋的暴发户本性暴露无遗，“自谓无敌于天下”，天天宴饮游猎。军师周重劝他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奢淫逸导致得而复失、成而复败的例子太多了，更何况功业未成就骄傲奢侈，岂能成就大事？”

可庞勋却把军师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

也许在这一刻，庞勋的败亡就已经注定了。

从咸通十年正月开始，官军逐渐扭转了劣势，对叛军展开了全面反

攻，尤其是朱邪赤心率领的沙陀骑兵，因其骁勇善战而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随后的半年多，官军节节胜利，相继击溃叛军的王弘立、姚周等部。到了这一年九月，庞勋屡战屡败，最后带着残部两万人逃至蕲县（今属安徽）西面，被官军四面合围，部众几乎被全部歼灭，庞勋也死于乱兵之中。

同年十月，变军的余党基本上肃清，庞勋之乱宣告平定。朝廷论功行赏，擢升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为大同军（治所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并赐名李国昌（李国昌的儿子，就是唐末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李克用）。

庞勋之乱虽然历时不久便被平定，但显然已经动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

史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诏传赞》）。“桂林”指的就是以庞勋为首的桂林戍卒发动的这场叛乱。表面上看，庞勋之乱似乎是偶然的，但实际上，它和先前的裘甫之乱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社会危机不断积累、最终突破临界点的标志。

犹如在地底疯狂奔突的岩浆突然找到了火山喷发口，这样的危机一旦爆发，就绝不会是局部的和短暂的，更不是通过一两场平叛战争就能扑灭的。因为，更多的叛乱和战争必然会紧随其后喷涌而出，其结果，就是焚毁一切，吞噬一切。

僖宗登基：乱世小皇帝

作为一个王朝崩溃的前兆，“民不聊生，叛乱纷起”与“皇帝昏庸，朝政腐败”往往是互为表里的。

懿宗时期的朝政就乏善可陈。

懿宗在位十几年，先后任命的多位宰相要么是平庸无能之辈，要么就是贪赃枉法之徒。比如咸通中后期的两个宰相路岩和韦保衡，就是以贪财和弄权而闻名于朝野的。

路岩于咸通五年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衔入相，其时年仅三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他执掌朝柄期间，大肆收受贿赂，生活奢侈糜烂，并且专权用事，党同伐异，可懿宗偏偏对他宠幸无比，把朝政大权都交给了他。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一个叫陈蟠叟的地方官看不惯路岩的恃宠弄权，便借一次入朝之机对懿宗说：“请陛下没收边咸一家

的财产，就足以供应军队两年的薪饷和粮食。”懿宗听得没头没脑，问他：“边咸是谁？”陈蟠叟说：“路岩的亲信。”

懿宗恍然大悟，原来是拐着弯在弹劾路岩啊！这不是拐着弯在骂朕有眼无珠、所用非人吗？

懿宗大怒，随即把陈蟠叟流放到了爱州（今越南清化市）。

从此，再也没人敢多嘴一句。

跟路岩相比，另一个弄权宰相韦保衡所享的荣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韦保衡的身份非常特殊，早在拜相前，他就是当朝的驸马爷。

咸通十年正月，懿宗把他最宠爱的女儿同昌公主嫁给了时任右拾遗的韦保衡。婚礼极尽奢华，天子用尽宫里的奇珍异宝给公主当嫁妆，还赏赐了广化里的一座豪宅，门窗之上都镶嵌珍宝，就连井栏、药臼和槽柜也都用金银打造，畚箕和箩筐也都用金丝编成，另外又赏赐现钱五百万缗，其余各种赐物的价值也相当于五百万缗。

成婚未及一年，驸马韦保衡就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宰辅。满朝文武瞠目结舌，都说这种事情闻所未闻。韦保衡入相后，和路岩沆瀣一气，极力打压异己。当时，康承训在平定庞勋时立功，受到重用，韦保衡和路岩十分嫉妒，便对懿宗说：“康承训讨伐庞勋时逗留不进，平定后又没有把余党全部肃清，而且带头抢夺战利品，事后又没有及时奏报朝廷……这种人实在不该重用。”

懿宗一听，二话不说就罢免了康承训的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职，贬为蜀王傅（蜀王李佶的老师）、分司东都，不久后又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

咸通后期，当路岩和韦保衡联手剪除诸多政敌后，两大红人为了争夺第一红人之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内讧。由于韦保衡兼有驸马的身份，最后理所当然地在这场较量中胜出。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四月，路岩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

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来得罪的人太多，路岩不免担心会在赴任的路上遭人报复，于是对京兆尹薛能说：“我上路后，就怕有人会用瓦砾给我饯行啊！”言下之意，是让薛能派兵护送。

这个薛能是路岩一手提拔的，所以他相信薛能肯定会还他一个人情。没想到薛能却两眼一翻，拿腔拿调地说：“近来宰相出城时，京兆府

司没有派人护卫的先例啊！”

路岩又羞又恼。可他除了感叹世态炎凉之外，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离京赴任那天，他果然在路上被人用石头瓦砾乱砸了一气。还好他早有防备，才没被人砸死。

路岩被排挤出京后，韦保衡在朝中就一人独大了。可是，还没等他尽情享受权力的美味，所有富贵荣华就悄然终结了。

因为，庇荫他的大树倒了。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三月，一向崇佛的懿宗派人去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大臣们纷纷劝谏，甚至提到了宪宗迎请佛骨不久便崩逝的事情。不料懿宗却说：“朕能活着见到佛指舍利，死也无憾了！”

当时没有人想到，天子随口说出的这句话竟然会一语成谶。

只过了一个夏天，懿宗就病倒了。

七月十六日，懿宗病情突然加重。和宣宗临终前一样——帝国还没有确立储君。这样一个时刻，无疑再度为宦官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这一次，上场的宦官是左右中尉刘行深和韩文约。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懿宗的第五子普王李儇身上。因为李儇这一年刚刚十二岁，很适合做他们的傀儡。

十八日，刘行深和韩文约以皇帝名义下诏：立李儇为皇太子，监理国政。

十九日，懿宗李漼在咸宁殿驾崩。同日，李儇登基，是为唐僖宗。

懿宗一死，韦保衡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九月，被韦保衡打压已久的政敌开始报复，纷纷对他发出指控。韦保衡旋即被贬为贺州（今广西贺县）刺史；一个月后，再贬为崖州澄迈（今海南澄迈县东北）县令；几天后，就被新天子赐死了。

与此同时，路岩的下场也和他如出一辙，先是被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刺史；次年正月，路岩刚走到江陵（今属湖北），新天子就追诏削除了他的官爵，改为流放儋州（今属海南），几天后又被勒令自尽，家产全部抄没，妻儿充为官奴。

当十二岁的李儇被懵懵懂懂地推上皇帝宝座时，他肯定不会意识到，

自己已经荣膺了两项唐朝之最。其一，他是大唐开国二百五十余年来年纪最小的皇帝；其二，他登基之时，正是帝国形势最严峻、忧患最深重、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

疲惫不堪的帝国马车正在朝着万丈深渊奔驰，可小皇帝李儇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一边兴高采烈地握着手中的缰绳，一边东张西望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虽然帝国是老的，可在小皇帝眼中，属于他的江山却是簇新亮丽、多姿多彩的。

从当普王的时候起，李儇就是个贪玩好动的孩子。他有一个朝夕相随的玩伴——宫中马房的宦官田令孜。随着李儇的登基，原本地位低贱的田令孜就摇身一变，成了位高权重的枢密使。

直到此刻，左右中尉刘行深和韩文约才发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这个小小的“弼马温”，所以他们拥立李儇的行动等于是在替田令孜做嫁衣。

小皇帝李儇即位后，就尊称田令孜为“阿父”，把政务全都扔给了他，然后一门心思地投入到了各种游乐当中。

阿父田令孜虽是弼马温出身，但读过一些书，粗通文墨，加上人比较聪明，所以就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帝国的幕后推手。他大权独揽之后，便大肆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想封什么人当什么官，从来不需要通过天子，更不用跟宰相和百官打招呼了。为了体现自己跟小皇帝的亲密无间，田令孜每次去见天子，必亲自带上酒食，一边和天子开怀畅饮，一边神侃海聊，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皇帝毫无君臣之分，更像是一对忘年交。

小皇帝继承了他父亲的秉性，喜欢跟乐工、优伶厮混在一起，所赏赐的金钱动辄万计，宫中的库藏很快告罄。田令孜就帮小皇帝想了一条生财之道，让他派宦官去长安东西两市中搜刮商人的货物和财宝。小皇帝依计而行，果然财源滚滚。有人不服上告，田令孜就命京兆府把告状者抓起来乱棍打死。

对此，宰相和百官也都噤若寒蝉，没人敢站出来说话。

面对无知贪玩的小皇帝和一手遮天的田令孜，人们只能仰天哀叹——

大唐的气数尽了。

就在小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亦即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十二月，各地的加急战报就雪片般地飞进了长安。

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奏报：党项、回鹘军队入侵边境。

感化军（治所徐州）奏报：庞勋余党四处劫掠，州县无法禁止。

西川边境奏报：南诏军队三次抢渡大渡河，唐朝防河兵马使、黎州（今四川汉源县）刺史黄景复力战不敌，全线溃败；敌寇进占黎州，并已越过邛崃关，前锋进抵雅州（今四川雅安市）……

与此同时，帝国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也全面爆发了。

懿宗一朝，由于天子的穷奢极侈，加上连绵不绝的内外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所以各种赋税聚敛日甚一日，令百姓苦不堪言。而天灾又往往与人祸形影相随。咸通末年，关东（潼关以东）地区连年遭遇水灾旱灾，各州县又隐瞒不报，相互推诿，以致民间饿殍遍野，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哭告无门……

无论哪个时代，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忍耐力都是世界上最强的，如果你没有把他们逼到绝路，他们绝不会造反。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无非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他们对幸福的理解，也无非是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只有当统治者把他们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及最微薄的希望都粉碎无遗的时候，他们才会铤而走险。而一旦他们选择了造反，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就是毁灭性的。

乾符元年冬天，这种毁灭性的能量几乎一夜之间就在帝国的四面八方遍地开花。

其中一朵毁灭之花的名字，叫作黄巢。

很快，乱世小皇帝李儇和他的朝廷就将听到一声震天动地的呐喊——

“我花开后百花杀！”

黄巢：被社会遗忘的人

乾符元年冬天，面对各地飞来的战报，年仅十三岁的僖宗李儇自然是手足无措。

新任宰相郑畋、卢携经过一番紧张谋划，随即拿出了应对的办法。命

兖州、郓州等道兵马共同围剿庞勋余党，又调派当初收复安南的功臣、时任天平节度使的高骈前往西川，抵御南诏入侵。

高骈不愧是出色的将领。他一到西川，便亲率五千精锐步骑主动出击，大破南诏军队，并一直将其赶出了大渡河，砍杀并俘虏了大量敌军，擒杀了十几个蛮族酋长。随后，高骈修复了邛崃关以及大渡河沿岸的各座要塞，又在戎州（今四川宜宾市）马湖镇构筑城堡，派重兵驻守，号“平夷军”。此外，高骈还在南诏入蜀的必经之路和各个战略要地修建城堡，每座城堡都派数千士兵驻防，从而在南诏军队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从此，南诏军队再也不敢轻易入侵。几年后，随着南诏国王世隆的病卒，盛极一时的南诏王国便和李唐王朝一样走向了衰落，而南诏与唐朝绵延多年的战争，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外患刚刚平息，风起云涌的唐末农民起义便揭开了大幕。

第一根出头的椽子是王仙芝。

王仙芝，濮州（今山东鄄城县）人，于乾符元年十二月在长垣（今属河南）起兵，次年六月杀回老家，攻占了濮州和曹州（今山东定陶县），士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进剿，却屡屡被王仙芝击败。

紧跟着王仙芝浮出历史水面的人，就是黄巢。

黄巢，冤句（今山东东明县南）人，早年曾与王仙芝搭伙贩卖私盐，精于骑射，为人任侠仗义。但是，他和王仙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识文断字，粗粗涉猎过一些儒家经典，可以算半个文人。所以，他也曾经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理想，试图用知识改变命运，像所有读书人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然而，现实一次次地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打击。黄巢屡屡参加进士考，却每一次都名落孙山。

黄巢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人。

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变幻无常的命运却给他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一个远比走仕途和贩私盐都危险百倍、却获利更丰的机会。

黄巢紧紧抓住这一个机会，从此走进了波澜壮阔、血雨腥风的晚唐历史。

乾符二年六月，黄巢在冤句聚集了数千人，拉起了响应王仙芝的反旗。很快，这两个昔日的私盐贩子就成了并肩战斗的义军领袖。他们合兵一处，劫掠州县，横行山东（崤山以东）。那些缴不起重税和失去土地的贫困百姓争先恐后地投奔到了他们的麾下，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抢钱、抢粮、抢地盘的行列中。

乾符二年七月，京畿地区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所过之处，万顷良田瞬间变成一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连忙向天子李儇上奏。

可是，他上奏的却不是灾情，而是喜讯。

他在奏疏中说："蝗虫飞到京畿地区，都不吃稻谷，纷纷身抱荆棘而死！"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没听说过这种舍生取义、活活饿死的蝗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天子李儇的德政足以泽被万物，连冥顽不灵的蝗虫都被他感化了。

于是，宰相们纷纷入朝向僖宗表示祝贺。

听说在自己的德政之下，居然出现了万古未有的超级祥瑞，小皇帝李儇乐得合不拢嘴。尤其是听说那些蝗虫宁可饿死也不吃稻谷，小皇帝觉得它们简直太可爱了。

乾符三年（公元876年）秋天，王仙芝和黄巢转战中原，先后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州市）、郏城（今河南郏县）、汝州。东都洛阳大为震恐，士民携家带眷，纷纷出城逃难。十一月，义军又南下攻克郢州（今湖北钟祥市）、复州（今湖北天门市）。十二月，王仙芝和黄巢又横扫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寿州（今安徽寿县）、舒州（今安徽潜山县）、蕲州（今湖北蕲春县）等地，所过之处，官兵望风披靡。

眼见变军声势越来越大，僖宗朝廷不得不接受了宰相王铎的再三建议，对王仙芝进行招安，给了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

接到诰命的那一天，王仙芝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

从一个整天被官府追杀的私盐贩子，成长为帝国的一名禁军将领和中央官员，王仙芝觉得这是自家祖坟冒青烟了。

他知足了。

王仙芝决定立刻接受招安。可是，正当他遐想着自己手举朝笏走上金銮殿的情景时，黄巢却面无表情地站在了他的面前。

他的兄弟黄巢正用一种鄙视的目光看着他，目光里有两层意思。

一、王大哥，你居然就这点儿出息？朝廷随便给你一官半职就把你买了？

二、朝廷凭什么就给你一个人封官，把老子和弟兄们都给晾在一边？

那天，黄巢再次感到了一种被人遗忘的痛楚。所以，他一直试图用目光向王仙芝传达自己的困惑和愤怒。可是，王仙芝却一时无法从极度的兴奋和喜悦中自拔出来，所以根本没有读懂黄巢的目光。

最后，黄巢走了上去，对王仙芝说："我们曾经在神明面前立下誓言，要除暴安良，横行天下，如今你一个人去朝廷当官，让这五千多号弟兄往哪里投奔？"

还没等王仙芝反应过来，黄巢已经狠狠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

鲜血顺着王仙芝的脸庞流了下来。透过迷蒙的血眼，王仙芝看见黄巢身后无数的弟兄们正在向他挥舞着拳头。

看来，自己是永远也洗不白了。

王仙芝在内心发出了一声悲凉的长叹——贼永远是贼！

后来，王仙芝撕毁了朝廷给他的那一纸任命状，在蕲州城内烧杀掳掠了一天，随即带着另一名副手尚君长和三千多人呼啸而去。

而黄巢则与他分道扬镳，带着剩下的两千多人走上了另一条路。

从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正月开始，王仙芝与黄巢时而各自为战，时而又合兵一处，虽然四处攻城略地，可在朝廷诸道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所占领的城池都是旋得旋失，始终未能建立长期立足的根据地。农民军和官军一度陷入了相持和胶着的状态。

这一年十一月，朝廷的招讨副使、总监军宦官杨复光再度向王仙芝传达了招安的信息，而一直对此仍然抱有希望的王仙芝正中下怀，当即派遣尚君长前去与杨复光接洽。不料，尚君长刚走到半路就被招讨使宋威擒获。宋威因与农民军多次交战失利而怀恨在心，一意要置尚君长于死地，所以当即上奏朝廷，谎称在战斗中生擒了尚君长。杨复光

连忙上奏，声明尚君长是投诚，并非在战场上被擒。朝廷派御史进行调查，但还没等结果出来，宋威就一不做二不休地砍下了尚君长的脑袋。

两次试图被招安未果，又丧失了一个得力助手，此后的王仙芝信心大减，战斗力也大为削弱，因而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月初六，朝廷的招讨副使曾元裕又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市）东面大破王仙芝，砍杀一万多人，招降并遣散了一万多人。曾元裕因功擢为招讨使，宋威被免职。

王仙芝自此一蹶不振。

短短一个月后，王仙芝在黄梅（今属湖北）与曾元裕进行决战，招致惨败：王仙芝战死，首级被传送长安；士众被斩杀五万多人，余众星流云散。

王仙芝一死，僖宗朝廷解除了一个重大威胁。但是与此同时，新的威胁又接踵而至——时任沙陀副兵马使的李克用在几个副将的拥戴下，趁中原战乱发动兵变，诛杀了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占领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市）。

已被中原民变搞得焦头烂额的僖宗朝廷再也无力讨伐李克用，只好想了一个办法，把李克用的父亲、时任振武节度使的李国昌调任大同节度使，另行派人接任振武节度使，目的是把李国昌父子置于一镇，以免他们分别据守振武和大同。

然而，朝廷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李国昌接到调令后就把它撕得粉碎，同时也彻底撕破了尊奉朝廷的假面。他们父子不但要同时据有二镇，而且要趁天下大乱抢占更多的地盘，甚至逐鹿天下。

随后，李国昌砍杀了振武的监军宦官，并与李克用联兵，攻破了大同周边的遮虏军、宁武军、岢岚军等多处朝廷军营，迅速成为帝国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王仙芝败亡后，尚君长的弟弟尚让率领残部投奔黄巢，推举黄巢为主帅，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委任百官。

随后的日子，已被朝廷任命为镇海节度使的高骈全力以赴对付黄巢，不断调兵遣将，加强了对他的围剿。黄巢在中原战场屡屡失利，手下数十位将领被招降，不得不在乾符五年三月渡过长江，转战南方。七

月，黄巢军进入浙东，凿开七百里山路，转入福建战场。十二月，黄巢攻陷福州，福建观察使韦岫弃城而逃。

乾符六年（公元879年）春，黄巢挥师直趋岭南。

帝国的财赋重镇广州，就此暴露在黄巢的面前。

进入岭南之后，黄巢致信浙东道观察使崔璆和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透露了归顺朝廷的意思，条件是授予他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之职。这里是黄巢的老家，他显然是希望能够衣锦还乡。

然而，朝廷却断然拒绝，粉碎了他衣锦还乡的希望。黄巢退了一步，要求担任广州节度使。僖宗召集大臣商议，左仆射于琮说："广州是国际商船和各种珍宝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怎么能交到反贼手里？"宰相建议给黄巢一个"率府率"（东宫侍卫队长、正四品上）的职务，僖宗同意。

可是，这回轮到黄巢不干了。

接到"率府率"的任命状后，黄巢当场将它撕得粉碎，随即对广州发起猛攻。这一年九月，广州陷落。黄巢逮捕了节度使李迢，命他起草奏疏说已经投降了黄巢。李迢说："我世代荷国厚恩，亲戚故旧遍布朝廷，手可断，疏不可草！"黄巢马上就把他砍了。

由于黄巢的士兵均是北方人，他们进入岭南后水土不服，才一个多月便纷纷染上瘟疫，死了三四成，部下劝他回师中原。黄巢也意识到广州非久留之地，便于十月末率部沿湘江而上，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市），次月又由江陵北上，直扑襄阳。

我花开后百花杀

新年转眼又到了。

这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僖宗李儇即位后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李儇已经十九岁，早已不再是小皇帝了。可是，他的玩性不但丝毫未改，而且各项游戏技能还突飞猛进——举凡骑马、射箭、舞剑、蹴鞠、斗鸡等等，他无不拿手，尤其精通数学、音乐和赌博。

所有文体活动中，僖宗最擅长的还是打马球。他曾经对宫中戏子石野猪说："朕如果参加'打球进士科'考试，一定能当状元！"石野猪

说：“也不见得。如果碰上尧、舜当主考官，恐怕陛下免不了要落榜。”僖宗闻言大笑。

帝国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可僖宗李儇却浑然不觉，依旧在他的小天地里自在逍遥。

此时的李儇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年冬天，那个叫黄巢的私盐贩子就将率领大军杀进长安，然后一屁股坐在他的金銮殿上，夺取了属于他的一切。而他这个大唐天子却只能没命地奔跑在逃亡路上，惶惶若丧家之犬。

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李儇才会蓦然发现——原来，当皇帝也并不是那么好玩的。

广明元年无疑是黄巢的幸运之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这一年上半年，他在江西战场遭遇了一些短暂的挫折，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困守了一段时间，士卒再度因染上瘟疫而损失过半。但是到了五月，幸运女神就开始频频关照他了。

他先是用诈降的手段击败了高骈的麾下猛将张璘，继而又一举突破了高骈的封锁线，从此军威大振。整个下半年，黄巢在北征的路上便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了。

六月二十八日，黄巢军攻陷宣州（今属安徽）；七月，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横渡长江，大举北上；九月，攻陷泗州（今江苏盱眙县淮河北岸）；十月，攻陷申州（今河南信阳市），横扫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徐州（今属江苏）、兖州（今属山东）各境，兵锋所及之处，士民纷纷逃亡。

十一月十七日，号称六十万的黄巢大军攻克东京洛阳，唐朝的东京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接拜谒。

十二月初一，黄巢的前锋部队开始进攻潼关，两天后将其攻克，大军随即直指长安，当天进抵华州（今陕西华县）。

十二月初四，僖宗慌忙下诏，封黄巢为天平节度使，可黄巢面对诏书的唯一反应就是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十二月初五，大唐王朝的文武百官听说乱兵已经攻克潼关，散朝后便开始各自逃命。宦官田令孜带着五百名神策兵，拥着僖宗从金光门仓皇出逃，随行人员只有福、穆、泽、寿四王以及数名嫔妃。

天子和百官一跑，长安旋即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城中的士兵和百姓趁乱冲进宫中，大肆抢夺府库中的财物金帛……

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黄昏。唐朝的金吾卫大将军张直方带着几十名文武官员，毕恭毕敬地来到灞上，准备迎接黄巢。

一轮血红的残阳挂在西天，把长安城外的原野渲染得一片金黄。

远远地，张直方看见一顶用黄金装饰的轿子慢慢进入了他的视野，一群头发披散、用红巾扎束、身穿锦绣衣服的武士护卫在黄金轿两侧。在他们身后，是漫山遍野全副武装的铁甲骑兵。再往后，则是一望无际、仿佛绵延千里的各种辎重车辆。

此时，坐在黄金轿中的这个人正双目微闭，口中喃喃自语。

他在吟咏一首诗。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吟咏过这首诗了。

因为写诗的那一年，他正在经受屡屡落第的打击，正在咀嚼被社会遗忘的痛楚。而此刻，他情不自禁地再次吟诵它。没有别的理由，只因当年所有的痛苦，都已经在这一刻化成了冲天的快意和豪情。

当黄巢透过轿帘的缝隙，遥遥望见长安城上的那一排雉堞时，他忍不住把这首《咏菊》大声地念了出来——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当黄巢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长安时，百姓们争先恐后地夹道围观，如迎王师。黄巢的副手尚让一路上不断晓谕百姓：“黄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绝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你们，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不要害怕！”

刚开始的几天，一切果然如同尚让所说——士兵们对百姓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人安居乐业，一派秩序井然。

这几年来，黄巢的士兵们从北打到南，又从东打到西，走到哪抢到哪，很多人早已腰缠万贯，所以他们进了长安城后，不但不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还时常慷慨解囊，把财物施舍给那些贫穷的人。

百姓们又惊又喜——都说黄巢的军队是强盗，可这样的“强盗”，显然比朝廷官兵好上百倍啊！

看来，官方的宣传根本就不可信。

然而，短短几天之后，一切就都变了。

因为大兵们实在是憋不住了。自从造反的那一天起，烧杀掳掠已经逐渐变成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乐趣，如今叫他们每天不烧不抢、无所事事，简直比叫他们去死还难受。

于是，几乎就在一夜之间，黄巢的大兵们就撕掉了温良恭厚、乐善好施的假面，纷纷抄起武器和火把，急不可耐地冲上了街头。

刹那间，繁华富庶的大唐帝京就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

到处都在抢劫和纵火，到处都在强奸和杀人。每一座房子都烈火熊熊，每一条街道都浓烟滚滚，每一处坊间都充斥着令人发指的暴行，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绝望和恐怖的气息。长安的士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眼中写满了困惑、惊恐和无助。

黄巢与尚让也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尽管他们频频勒令士兵停止暴行，可是却屡禁不止……

黄巢领导的这次“起义”除了攻城、杀人、抢劫、纵火、强奸之外，除了让黄巢和他的农民弟兄们翻身做主、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之外，并没有任何制度建设的东西，也看不出他们对历史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

当然，有一点还是非常突出的，那就是社会人口大大减少，缓解了过剩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客观上提高了人均土地面积的占有量。

凡是黄巢军队经过的地方，只能看到“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只能看到落后、野蛮、残忍、暴虐、血腥，以及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尽管黄巢和他的弟兄们揭竿而起的原因是朝政腐败和民不聊生，尽管农民们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宣泄仇恨、滥用暴力的借口，更不能以此作为“革命者”剥夺他人生命财产权的理由。

归根结底，黄巢“起义”的最大动力，不过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这种黄袍加身的梦想罢了。而他们“起义”的结果，充其量也

就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政治权力和私人财产的转移。即便他们成功摧毁了旧王朝，历史也仍然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有可能出现倒退。

狼虎谷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一日，为了让长安士民对李唐王朝死心，黄巢下令屠杀了所有来不及跑掉的滞留长安的李唐宗室成员。

连婴儿都没有放过。

十三日，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封其妻曹氏为皇后，任命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

一个所谓的“新政权”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不过可惜的是，到头来，黄巢还是没有革掉李唐王朝的命，自己的脑袋反而被革掉了。

就在黄巢称帝的同时，僖宗李儇和他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到了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惊魂甫定之余，僖宗匆忙下诏，命诸道出兵收复京师。数日后，附近诸道的勤王之师相继来集，可兴元的物资和粮食却极度匮乏，根本供养不起这么多军队，也无法长久支撑流亡朝廷的用度。最后，在田令孜等人的劝说下，僖宗只好沿着当年玄宗的逃亡路线进入蜀地，于第二年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

随后的日子，僖宗一再下诏，命时在淮南的功臣高骈征讨黄巢。

僖宗对高骈寄予厚望。他相信，这个能征善战的高骈当初既然能够平定安南、击退南诏，如今也一定有本事光复长安。

然而，僖宗没有料到，此时的高骈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忠于朝廷、急于建功的高骈了。如今，高骈一人身兼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东面都统等多个重要职务，手中既有兵权又有财权，俨然是一方土皇帝。有道是位子决定思维，屁股决定脑袋，眼下的高骈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根本不是社稷的安危。所以，接到僖宗的诏令后，高骈一直以各种借口推托，始终不肯出兵。

宰相王铎料定高骈已经心存异志，于是再三向僖宗请求亲自出征。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僖宗任命王铎为主帅，率忠武节度使周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宣武节度使康实等诸道

兵马征讨黄巢。与此同时，僖宗罢免了高骈的东面都统之职，不久又免其盐铁转运使之职。高骈大怒，从此不再上缴赋税，公然与中央决裂。

对于高骈的反目，僖宗极为恼火，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自从黄巢横扫天下、入据长安后，大唐帝国便已逐渐陷入分崩离析之局了。如今，不仅高骈在淮南与中央分庭抗礼，帝国的四面八方也都燃起了叛乱的烽火，如浙东、魏博、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平卢（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市）、怀州（今河南沁阳市）等藩镇州县，都相继发生了动乱，就连僖宗目前所在的西川，不久前也刚刚爆发了一场兵变。此外，这几年来，割据忻、代二州（今属山西）的李克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四境的袭扰，大有称雄北方之势……

总之，所有迹象表明——此时此刻，流亡西川的李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弱，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王铎亲赴前线之后，诸道官军开始从各个方向陆续往京畿一带集结。黄巢的势力逐渐萎缩，只保有长安和同、华二州（今属陕西）。然而，半年多下来，尽管王铎率领各军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但却只能与黄巢进行拉锯战，始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一直到这一年九月，黄巢麾下一员猛将的投诚，才让僖宗朝廷看见了一丝平定黄巢的希望。

这个在紧要关头出卖黄巢的人，就是朱温。

朱温，于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出生于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县）的一个小山沟。跟历史上的所有开国皇帝一样，这个未来的后梁太祖一出生就带上了神话光环。据《旧五代史》记载，他出生的那天，他家的茅草屋突然红光冲天，邻人大惊失色，以为着火了，赶紧跑来扑救。可跑到房前才发现，朱家好好的，什么都没发生，唯一跟往日不同的是——里面传出了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众邻人啧啧称奇，都说此儿绝非凡胎，将来必有一番造化。

朱温诞生时的这个神迹，与五百年后出生在安徽凤阳的那个朱重八一模一样。这是巧合还是有意识地“借鉴”，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想象力实在贫乏，乃至帮皇帝编个神话都要撞车。

朱温虽然带着神迹出世，但小时候的家境却不太好，父亲老早就去世

了，寡母无力抚养他们兄弟三人，只好把排行最小的朱温送给邻县一个叫刘崇的人收养。

也许是因为父亲死得早，从小没人管教，所以朱温长大后变得性情暴戾，好勇斗狠，什么营生都不想干，成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极为乡人鄙视。他养父刘崇怒其懒散，动不动就拿棍子揍他。

在养父家里，唯一疼朱温的人就是刘崇的老母亲。这位老妇人时常告诫家里人说："朱三不是常人，你们应该善待他。"家人很不屑，问她何故。老妇人说："他有一次熟睡，我忽然看见他化成了一条赤蛇。"言下之意，朱温有天子之象。

家里人听了，无不嗤之以鼻。

就朱三这种好吃懒做的货色，也能当皇帝？做梦去吧！

没人肯信老妇人的话，自然也就没人肯给朱温好脸色看。而朱温则不以为意，继续过他那小混混的日子，既不务农，也不经商，更不想读书应考。

朱温就这样混到了二十多岁。当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泼皮无赖彻底绝望的时候，属于朱温的时代来临了。

乾符年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黄巢也在曹州（今山东定陶县）一带纵横驰骋，朱温立刻投奔到了黄巢麾下，由于作战勇敢，很快就成了领兵队长。

随后的几年，朱温跟随黄巢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将领。黄巢攻克长安后，命朱温率部驻守东渭桥。不久，朱温设计招降了唐将诸葛爽，从而再立大功，旋即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

同州是黄巢政权在长安东面的最主要屏障。黄巢把这样的战略重地交给朱温，足见对他的赏识和信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朱温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了黄巢政权即将败亡的命运。随后，朱温断然斩杀了黄巢派到他身边的监军宦官，举城投降了李唐朝廷。

朱温的投降，无异于斩断了黄巢的一支臂膀，同时也把势穷力蹙的黄巢政权进一步推入了绝境。

得知黄巢骁将朱温倒戈，僖宗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为同华节度使，不久又改任其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

此刻的僖宗当然不会料到，短短二十年后，这个朱全忠就将成为帝国的终结者，一手颠覆三百年的大唐江山。

中和二年十二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以“雁门节度使”作为交换条件，成功招降了骁勇善战的李克用。僖宗大喜，随即加封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命他全力征讨黄巢。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二月，李克用率兵进围华州，于三月将其攻克。

至此，同、华二州相继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困守孤城的黄巢已经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四月初八，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攻进长安。黄巢力战不敌，只好焚烧宫室，从蓝田方向突围而去。

长安光复后，李克用因功升任河东节度使，朱全忠升任宣武（治所汴州）节度使。僖宗随即命他们会同忠武节度使周岌、武宁节度使时溥一起肃清黄巢余部。

五月，黄巢率余部窜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发兵攻城。唐朝守将秦宗权兵败城破，投降黄巢。此后的一年里，黄巢与秦宗权合兵一处，兵威复振，又在中原大肆劫掠。朱全忠、周岌与时溥勉力围剿，却始终不能取胜。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眼看朱温等人与黄巢基本上打得两败俱伤了，李克用才从容出手，率军渡黄河南下，于五月在中牟（今属河南）北面大破黄巢军队，砍杀一万余人。黄巢军队一举溃散，尚让率部众投降时溥，其他的将领投降朱全忠，黄巢带着最后的残兵不足一千人东走兖州。李克用一路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黄巢的老家冤句。

由于马不停蹄地奔走了两百多里，人马都已极度疲乏，骑兵中能跟上的只有几百人，加之粮草已绝，李克用只好率兵撤回汴州，在城外扎营，准备稍事休整后再行追击。

中和四年五月十四日这天，当李克用带着他那支悍勇无匹的沙陀军队进入汴州城时，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心里忽然涌出了几个念头。

念头一：这沙陀人李克用果然名不虚传，打仗确实了得。

念头二：收复长安他抢了首功，眼下大破黄巢他又出尽了风头，如果再让他亲手灭了黄巢，那他就成了帝国的头号功臣，再加上他手下这支所向无敌的沙陀军，到时候，天底下还有谁能和他李克用抗衡？

念头三：如果真让李克用走到了那一步，那我朱全忠凭什么和跟他一

较短长？

念头四：如今的天下，有朱全忠，就不能有李克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念头五：啥也别想了，先下手为强。

当天，朱全忠便向李克用发出了热情邀请，硬是请他住进了上源驿的高级宾馆，随后又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宴席。席间，朱全忠不但对李克用礼遇甚周，而且态度十分谦恭。李克用三杯酒下肚，倨傲的神色就浮了上来，言语之间盛气凌人，根本不把朱全忠放在眼里。朱全忠一边赔着笑脸不停劝酒，一边冲身边的大将杨彦洪使了个眼色。

李克用和随从们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没有人注意到杨彦洪很早就悄悄离席了。

酒宴到黄昏才告结束，李克用已经烂醉如泥，左右刚把他搀起来，四周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突然间，朱全忠的军队就像潮水一样漫了进来。那一刻，亲兵们的酒一下子全醒了，可李克用依旧不省人事。亲兵们一边奋力抵挡，一边用冷水浇醒了李克用。

大梦初醒的李克用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在心里把朱全忠的祖宗十八代全都问候了一遍，然后抓过弓箭跳了起来。虽然仍旧有些头重脚轻，但他接连射出的几箭还是不偏不倚地射入了几个宣武士兵的心脏。

此时，宣武士兵开始在四面纵火，烈火浓烟顷刻就把他们包围了。左右亲兵拥着李克用翻过院墙，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在枪林箭雨中突围而出。他们最后逃到汴州南门，亲兵用绳索把李克用缒下城墙，总算让他逃过了这场劫难。可是，那天跟随他进城的三百多名亲兵却全部战死……

李克用和朱全忠就这么结下了血海深仇。

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将伴随着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走完最后的二十年，并且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后代身上，最终演变成五代初年国与国之间的连年征战和惨烈杀伐。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李克用弥留之际，交给了儿子李存勖三支箭，同时把自己最刻骨铭心的三个仇人的名字告诉了李存勖，叫他一定要报仇雪恨，否则自己死不瞑目。

这三个仇人的名字，第一个就是朱全忠。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夏天，黄巢一直在没命地奔跑，而唐将李师悦和黄巢降将尚让也一直在后面拼命地追击。六月十五日，李师悦和尚让终于在瑕丘（今山东兖州境内）追上了黄巢，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致命的打击。

在这最后一战中，黄巢残部死的死，散的散，几乎被消灭殆尽。六月十七日，黄巢带着他的家人逃进了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市西南）。

狼虎谷，一听这名字就透着几分凶险。

是的，这里就是一代枭雄黄巢的终结之地。

当黄巢带着满身的疲惫策马走进这片草木繁茂的山谷时，四周一片寂静，静得仿佛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此刻，黄巢没有注意到他的外甥林言已经悄悄跟在了他的背后。

一阵阴寒的山风倏然钻入黄巢的脖颈。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噤。突然，后背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感觉。黄巢猛然转过头来。

一道森冷的刀光，一张狰狞的面孔。

这就是黄巢在这个世界上看见的最后景象。

林言干脆利落地砍下了黄巢的头颅，同时还砍下了他兄弟、妻子、儿女等十几个人的头颅。一一砍完之后，林言就拎着这一大串头颅走上了弃暗投明的道路。

可他刚刚走出狼虎谷，迎面就撞上了追击他们的沙陀军队。

还没等林言说出半句效忠李唐的豪言壮语，沙陀士兵就咔嚓一声砍下了林言的脑袋，把他加进那一串头颅中，策马回营邀功请赏去了。

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黄巢的头颅和林言的头颅随着剧烈起伏的马背不断颤动。

它们时而狠狠地撞在一起，时而又冷冷地四目相对……

从公元875年六月起兵，到公元884年六月败亡，黄巢起义历时整整九年。

在这九年里，他转战大半个中国，攻陷了唐朝的东西两京，创建了大齐政权，到达了他的人生巅峰，同时也把李唐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花开后百花杀。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做到了。他确实用无数人的鲜血浇灌了自己的野心和梦想，用无数人的白骨铺平了自己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从而让自己真正成为了一株名副其实的“毁灭之花”。

对于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而言，还算幸运的是，这朵毁灭之花在短暂的绽放之后就被连根拔起了。然而，真正的不幸在于——他并不是最后一朵毁灭之花。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正是在黄巢败亡之后，一幕比一幕更为惨烈，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群雄混战才在九世纪最后的那些年里频频上演。正是在这朵毁灭之花凋谢之后，百朵千朵的毁灭之花才在大唐帝国的土地上争先恐后地灼灼绽放。

一个黄巢踉跄跌倒在血泊与尘埃中，而更多的黄巢，却正凶猛地驰骋在唐朝末年血雨腥风的天空下……

第八章 凄凉大唐晚景

遍地枭雄

平定黄巢的第二年三月十二日，僖宗李儇终于从成都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长安。

经过这几年刀兵战火的无情洗劫，此时的大唐帝京早已变成一座残破荒凉的死城，到处长满了野草和荆棘，狐狸和野兔随处可见。

劫后余生的李儇神情凄楚地站在大明宫中，感觉一切恍如隔世。

十四日，僖宗改元“光启”。

从这个年号不难看出，僖宗李儇是希望帝国能够摆脱所有黑暗、屈辱和不幸，能够重新开启幸福和光明。

然而，这终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和美好幻想。

因为，此时的大唐帝国早已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了。

光启元年（公元885年），朱全忠据宣武（汴、宋诸州），李克用据河东（太原、忻、代诸州），秦宗权据蔡州，王重荣据河中（蒲、晋诸州），李可举据卢龙（幽、蓟诸州），王镕据成德，时溥据武宁（徐、泗诸州），高骈据淮南八州，刘汉宏据浙东（越州）。此外，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等州也都有大小军阀拥兵割据。

在这种遍地枭雄的局面下，李唐中央政令所及，只剩下河西（黄河以西，今陕西北部）、山南（秦岭以南，今陕西南部及四川东北部）、剑南（剑阁以南，今四川中南部）、岭南（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数道，满打满算，也就几十个州而已。

各方军阀割地自雄，截留财赋，致使两河及江淮的漕运彻底断绝，各地赋税根本无法送达朝廷。自从长安沦陷，李唐中央的财政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就已名存实亡，僖宗回京后，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仅能依靠京畿、凤翔、同、华几个州，府库日渐枯竭，连朝廷开支和百官俸禄都已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士兵薪饷和各种赏赐了。

如此惨淡的局面，不但令天子李儇焦心，更令李唐朝廷幕后的那个掌控者焦心。

这个人就是大宦官田令孜。

自从僖宗登基之后，田令孜从一个小小的马坊使一跃而成枢密使，旋即擢升右军中尉，不久又迁左军中尉，彻底掌控了禁军，把原左右中尉刘行深和韩文约排挤得无影无踪。盘踞中枢后，极具政治野心的田令孜并未就此止步。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没有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和根基，他在朝中的权力就始终是不稳固的，况且关东叛乱日益猖獗，形势越来越严峻，更需未雨绸缪。所以，早在黄巢攻进长安之前，田令孜就已经很有先见之明地把他的三个心腹任命为三川节度使。陈敬瑄据西川，杨师立据东川，牛勖据山南西道。而为首的这个陈敬瑄，正是田令孜的亲哥哥（田令孜本名陈仲则，入宫后投靠田姓宦官，改姓田）。

僖宗流亡西川后，田令孜更是把天子和整个流亡朝廷紧紧攥在了手里。由于长安沦陷时禁军已经溃散，田令孜便在蜀地招募了五万四千人，重新组建了左、右神策军。这支新禁军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天子和

流亡朝廷，事实上却是他田令孜的近卫军。有了这支武装力量，田令孜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但是，五万多人所需的薪饷、粮草、兵器、铠甲、服装以及各种物资无疑构成了一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当田令孜带着这支军队跟随僖宗回到长安后，残酷的现实一下子摆在了他的面前——早已山穷水尽的中央财政根本养不起这支军队。

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开始不断发出抱怨。田令孜心急如焚。如果再不想办法搞到钱，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最后，田令孜终于想到了一个财源，那就是安邑、解县两地的盐池收入。

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安邑镇）和解县（今运城市西南解州镇）是当时最大的两个产盐地，一直都是归朝廷的盐铁使管辖，其盐业专卖的利润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但自从广明元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之后，这两大盐池就落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手中。王重荣只是每年象征性地向中央输送三千车食盐，而绝大多数利润则落入了他的个人腰包。田令孜决定夺回这两座金山。

这一年四月，在田令孜的授意下，僖宗下诏，让他兼任了两池盐榷使。王重荣被断了财路，马上跳了起来，不断上疏抗议。五月，田令孜又授意僖宗下诏，将王重荣调任泰宁（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节度使。王重荣当然是怒不可遏，所以拒不奉诏，并且不断上疏抨击田令孜，还在奏疏中列举了田令孜的十大罪状。

眼看矛盾一触即发，田令孜急忙联络静难（治所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准备与他们联手对付王重荣。王重荣马上向李克用求援。由于朱玫和李昌符暗中依附朱全忠，自然被李克用视为敌人，于是李克用便与王重荣结成了联盟。十一月，李克用上表，请僖宗斩杀田令孜、朱玫和李昌符。僖宗当然不会同意，而是下诏让他们和解。但是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天子的和稀泥已经毫无用处了。十二月，双方在同州一带开战，李昌符和朱玫被李克用打得大败，仓皇逃回本镇。李克用率兵直扑京城。

田令孜情急之下，只好挟持僖宗，从开远门逃出了长安，再度出奔凤翔。

回到长安还不到一年，僖宗李儇就被迫开始了第二次流亡生涯。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正月，田令孜想再次强迫僖宗前往兴元，僖宗不肯。当天晚上，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凤翔行宫，强行挟持僖宗前往宝鸡（今属陕西）。

经过同州一战，朱玫和李昌符才发现李克用和王重荣的势力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而田令孜手里除了天子这个筹码外一无所有，于是转而投靠了王重荣，并与他一起上表请杀田令孜。

田令孜担心朱玫等人会兴兵前来，不敢在宝鸡多作停留，遂于二月下旬劫持僖宗前往兴元，而最终目的地当然就是他的老巢西川。

得知田令孜挟持天子跑了，朱玫和李昌符随即出兵追击。

从宝鸡到兴元的这一路，僖宗一行走得极为艰难。不仅道路崎岖难行，而且随时都有兵马围追堵截。三月中旬，僖宗一行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兴元。

朱玫没有劫回僖宗，大为恼怒，于是心生一计。

他的想法非常大胆，但是却很简单，就是找一个傀儡，另立朝廷。

这一年四月初三，朱玫胁迫百官，拥立肃宗的玄孙、襄王李煴监理国政，同时自命为左、右神策十军使。

僖宗被迫走到兴元后，死活不肯再跟着田令孜入蜀。田令孜思前想后，决意放弃僖宗，以求自保。随后，他主动向僖宗推荐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同时自命为西川监军，旋即逃往西川。

五月，朱玫加封自己为侍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同时号令百官，专擅大权。

李昌符心里老大不平衡，坚决不肯接受朱玫给他的新官职，并上表给驻留兴元的僖宗，准备接过田令孜丢弃的这张牌，借此同朱玫抗衡。

与此同时，李克用和王重荣也是火冒三丈。

田令孜本来是他们驱逐的，可如今朱玫不但窃取了朝政大权，而且俨然成了田令孜第二，这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于是向僖宗上表，决意讨伐朱玫。

十月，朱玫迫不及待地拥立李煴即皇帝位，改元“建贞”，遥尊僖宗为太上皇。远在兴元的僖宗得到消息，不禁悲愤莫名，可他一筹莫展，

只好问计于杨复恭。杨复恭遂以僖宗的名义发布檄文到关中，宣称有能斩朱玫首级者，便以静难节度使之职赏他。

此举果然奏效。李克用和王重荣尚未出兵，朱玫的部将王行瑜便砍下了朱玫的脑袋。

朱玫一死，依附他的二百多名文武官员只好拥着新立的皇帝李煴逃奔河中（今山西永济市）。可这群无头苍蝇根本跑错了方向。因为这是王重荣的地盘，往这里跑无异于飞蛾扑火。王重荣满面笑容把他们接进城中，随即手起刀落，砍下了李煴的脑袋，同时杀了一百多个大臣，并将余下的人全部囚禁。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三月中旬，僖宗李儇从兴元返回凤翔。

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和朱玫“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僖宗自己送上门来，他当然不会让他从自己的手上溜掉。

随后，李昌符便以长安宫室荒废为由，强行把僖宗扣在了凤翔。

这一年，僖宗李儇年仅二十六岁。可当他回顾自己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历程，却感觉仿佛已经过了好几辈子。

留在凤翔的日子，每当僖宗回忆起荒唐而奢侈的少年时代，又想到这几年颠沛流离、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涯，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

滞留凤翔的第二年春天，终日郁郁寡欢的僖宗李儇终于病倒了。

李昌符意识到，再扣留这个病恹恹的天子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还很容易给人兴兵讨伐的借口，遂将僖宗放归。

二月二十一日，僖宗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次日下诏，改元“文德”。

三月初二，僖宗疾病发作；初五，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懿宗第七子）为皇太弟，监理国政。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初六，僖宗李儇在灵符殿驾崩。同日，皇太弟李杰即位，改名李敏，次年又改名李晔，是为唐昭宗。

昭宗：孤独的拯救者

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晔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这样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是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截然不同，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即便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李晔一样也没有。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

虽然昭宗李晔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刚一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昭宗要收拾田令孜的原因很多。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其罪魁祸首就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可他却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拒不奉诏。由此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更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让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广明元年冬天，黄巢杀进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因为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外，其他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所以，昭宗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收拾田令孜。

巧合的是，就在昭宗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时，跟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朝廷，请求把陈敬瑄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可想而知，田令孜和陈敬瑄当然不会奉诏。接到诏令后，他们便积极整饬武备，准备随时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治所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以王建为节度使，让他与韦、杨二人共同讨伐陈敬瑄。

讨伐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就把目光锁定在另一个权宦身上了。

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现在对昭宗的威胁更大。

他就是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在这帮义子眼中，当然只有杨复恭，根本没有朝廷。比如龙剑（治所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节度使杨守贞、武定（治所洋州，今陕西洋县）节度使杨守忠等人，就从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并且动不动就上表诽谤和讥笑朝廷。

这样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只能沦为笑谈。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纬、张濬等人商议定夺的，竭力避免让杨复恭干预。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整治宦官。

杨复恭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是坐着轿子来的。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纬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纬就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纬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纬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典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

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

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

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杨

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他李顺节，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擢升为天武都头（禁军一部指挥官），同时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

平步青云的李顺节自然是对天子感恩戴德。

受宠若惊之余，他也渐渐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所在。

他知道，天子是想让他对付杨复恭。

李顺节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原因很简单，杨复恭的义子多如牛毛，他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可天子的心腹宦官却只有他一个。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杨复恭，到时候，岂不是轮到他李顺节来收养义子了？

为了这个美好的前景，李顺节死心塌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昭宗提供了诸多有关杨复恭的秘密情报。

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笑容。

网已经撒开了。

李晔在心里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

守望春天

除了收拾宦官，昭宗李晔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无疑就是对付藩镇了。

李晔很清楚，要对付藩镇，自己手中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

为此，他从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

那么，要从哪里开刀呢？

这些年来，天下诸藩中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非河东李克用莫属。

要对付藩镇，肯定要先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是光复长安、平定黄巢的功臣，朝廷要对他用兵，肯定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之际，借口忽然就有了。

大顺元年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义（治所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旋即又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河北，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陷入腹背受敌之境，加之麾下两员勇将又一死一降，只好引兵撤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多数大臣坚决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其实，昭宗比任何人都更想利用这个机会消灭李克用，可他自己却不想把讨伐李克用的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话留给了张濬和孔纬。

昭宗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万一讨伐李克用失败，自己顶多就是丢卒保车，把张濬他们牺牲掉而已，断不至于让李克用有反抗朝廷的口实。所以，昭宗召开此次廷议，其目的也不过是让文武百官替他当一回证人而已。

天子既然是这个心思，那这次廷议就纯属走过场了。当主战派和主动派各自把观点亮出来后，昭宗忽然说了一句："李克用有讨平黄巢、复兴帝国之功，今日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将如何看待朕呢？"

孔纬立即接过话茬："陛下的思虑是一时之仁，张濬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昨日，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赏赐等等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陛下您的决断了！"

最后，昭宗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件事就交给二位贤卿了，希望不要让朕蒙羞。"

大顺元年五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开除其宗室户籍（当初朱邪赤心被赐皇姓时，编入了李唐宗室户籍）；同时，任命

张濬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揆为副帅，并命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

五月二十七日，张濬率五万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张濬屏退左右，对天子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这个内患，当然就是指杨复恭了。

此刻，杨复恭正躲在屏风后面，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听了去。

军队开到长安城东面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饯行。杨复恭向张濬敬酒，张濬不喝，推说醉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如此扭捏作态呢？"张濬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

杨复恭悚然一惊。

张濬得意地跃上马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从张濬率领大军出征的那一刻起，昭宗就陷入了无比的焦灼和紧张之中。

因为，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元气、鼓舞人心了。

他强烈地希望，张濬能够像前朝宰相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藩镇，让他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然而，希望从来是美好的，而现实却终究是残酷的。

这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张濬，非但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用一个月就讨平李克用，反而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损兵折将，一再败北，最终全线崩溃。

回顾这半年来接二连三的败报，昭宗的心仿佛在滴血——

八月，大战还没开始，副帅孙揆就在长子（今属山西）西面的山谷中被河东伏兵生擒，旋即被杀。

九月，南面主将朱全忠在马牢山（今山西晋城市东南）被河东军击

败，大将邓季筠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一万多人。

九月下旬，北面正副主将李匡威、赫连铎在蔚州（今河北蔚县）取得一次短暂的胜利之后，随即遭到李克用主力的迎头痛击。李匡威的儿子、赫连铎的女婿皆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数以万计。

十月，当各路讨伐军已被李克用各个击破后，张濬率领的主力才刚刚推进到晋州。先头部队与河东军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县）遭遇，刚一交战就败退下来，后方大军不战自溃。河东军乘胜追击，直抵晋州城下。张濬出城御敌，再败，从各镇征调的士兵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张濬在晋州困守了一个月，料定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从含口（山西绛县西南）仓皇逃遁，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然后拆卸民房的木板拼凑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

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死的死，逃的逃，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就这样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场，而以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

昭宗充满希望的一颗心瞬间跌入失望和悲哀的谷底。

紧接着，一阵恐惧就袭上了心头。他知道，不给李克用一个说法，他肯定跟朝廷没完。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濬贬为鄂岳观察使，把孔纬贬为荆南节度使。然而，李克用并不罢休。他怒气冲天地上了一道奏疏，说：“张濬以陛下万世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便与其私相联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的藩镇，只能暂到河中居住，应该去向何方，恭候陛下指令！”

河中？

昭宗一下就傻眼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吗？

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与潼关仅仅隔着一条黄河，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一步跨过黄河，天子和朝廷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

接到奏疏的当天，昭宗就忙不迭地把张濬再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把孔纬再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

二月，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又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把张濬再贬为绣州（今广西桂平县南）司户，才算是把李克用安抚住了。

讨伐河东之役不到半年就败了，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同样遭遇了失败。而且，西川的失败比河东更让昭宗痛心疾首。因为河东败得干脆，顶多只是短痛，而西川则打了整整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师费财，无疑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长痛。

大顺二年三月下旬，宰相和财政大臣不得不向昭宗禀报，国库已经空了，再也没办法给西川前线输送一毫一厘的军费了。

那一天，文武百官看见天子李晔忽然把头低了下去，而且沉默了很久。最后，李晔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恢复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的所有官爵，同时命王建等人罢兵休战，各回本镇。

接到诏书的那天，陈敬瑄和田令孜忍不住相视而笑。

可他们笑得太早了。

因为，天子虽然放弃了，但王建却没有放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建非但没有退兵，反而加大了进攻的力度，先后占领了西川辖区内的大多数州县，然后猛攻成都。陈敬瑄数次出城迎战，却屡屡被打败。到了七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陈敬瑄和田令孜终于绝望了，不得不开城投降。

田令孜亲手把西川节度使的帅印和旌节交给了王建。

随后，王建把陈敬瑄和田令孜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并于两年后将其诛杀。

昔日称霸一方的军阀被消灭了，可王建却从此成为西川的土皇帝。天复三年（公元903年），王建自封为蜀王。公元907年、亦即唐朝覆亡的那一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王建为前蜀高祖。

登基才三年，昭宗在藩镇事务上就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过，让昭宗在痛苦中感到一丝欣慰的是——几年来，与权宦杨复恭的斗争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基本上可以收网了。

大顺二年九月，昭宗发现李顺节已经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断

然采取行动，将杨复恭贬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赴任，并以生病为由提出致仕，试图以此要挟昭宗。不料昭宗却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恼羞成怒，遂与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准备发动叛乱。

十月初八，昭宗命李顺节带领麾下禁军进攻杨复恭的府第。杨复恭率卫士抵抗，杨守信也立刻率部前来增援。

双方展开激战。稍后，宰相刘崇望又率领一队禁兵参与进攻，杨守信不支，部众溃散，只好跟杨复恭一起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逃出，亡命兴元，投奔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

骄横跋扈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昭宗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

不过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不安却悄然向他袭来——一代权宦杨复恭被打倒了，新一代宦官李顺节会不会恃宠生娇、居功自傲，成为杨复恭第二呢？

昭宗觉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他不能不把这种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这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昭宗就命人把李顺节诱杀了。

也许，昭宗这种兔死狗烹的做法显得相当腹黑，但是为了不让李顺节成为新一代权宦，为了不让这几年对付宦官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他只能这么做。

大顺二年冬天，一场又一场大雪从苍旻深处缓缓飘落，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大明宫的垂宇重檐上，并且摇曳着落在天子李晔的发梢、鼻梁、眉间、心上。

是的，心上。李晔感到整整一个冬天的大雪很可能全部落在了他的心上。否则，他的心头何以变得如此僵硬、沉重而冰凉？

天仿佛已经裂开了。

大雪仿佛永远下不完。

来吧，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李晔站在大明宫铺满积雪的殿庭中，有些悲壮地仰望苍天。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直到把这个肮脏的世界全部覆盖，直到把所有罪恶、阴谋、杀戮、流血、死亡全部

覆盖……

然后，春天就该来了吧？

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也许就干净了吧？

灵魂中的七道伤

春天终究还是来了。然而，这个世界并没有丝毫改变。

新年正月，昭宗改元“景福”。

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和苦难，充满了无尽的缺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对它抱有希望。因为除了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我们一无所有。

李晔对自己说。

景福元年（公元892）一开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同州节度使王行约、秦州节度使李茂庄突然联名上奏，指控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窝藏乱臣贼子杨复恭，请求出兵讨伐，并共推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昭宗很清楚，这些人打着讨伐贼臣的幌子，事实上无非是想吞并他镇、扩张地盘。所以，他很快就下了一道调停的诏书，命他们和解。

但是，五节度根本不听他的。

二月，李茂贞与王行瑜悍然出兵攻打兴元，半年后将其攻克。李茂贞随即将兴元据为己有。杨守亮、杨复恭等人逃奔阆州。

景福二年（公元893）正月，昭宗眼见李茂贞果真吞并了兴元，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派宰相徐彦若取代他的凤翔节度使之职。

李茂贞勃然大怒。他之所以出兵，目的就是为了据有两镇，如今天子想用山南交换他的凤翔，他当然不会答应。随后，李茂贞不但拒不奉诏，还上表羞辱天子，说：“您贵为天子，可惜连自己的舅父都保护不了（昭宗舅父王环几年前被杨复恭谋杀）；您贵为九州共主，却连杨复恭家的一个小子（杨守亮）都不敢杀，真是可悲可叹！”

受到这等羞辱，昭宗当然不能容忍，当即宣布讨伐李茂贞，命宰相杜让能立刻征调士兵，筹集粮饷。杜让能再三劝阻，表示此时朝廷无力同强藩抗衡，只能暂时忍耐。可昭宗却睁着血红的眼睛说："朕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无所作为地坐视社稷衰亡！你只管为朕筹备粮饷，军事行动自有亲王负责，成败与你无关！"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杜让能还能怎么办？

他只能从命。

九月初十，昭宗命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三万禁军护送徐彦若去凤翔就任。

李茂贞闻讯，立刻与王行瑜联手，发兵六万在周至布防。

李嗣周率领的这支禁军都是新近招募的京师少年，而李茂贞与王行瑜的部下却都是久经沙场的百战之兵。所以，这一战的结果也就不难想见了。

九月十七日，李茂贞挥师进攻。两军尚未交锋，朝廷军就不战而溃，四散逃亡了。李茂贞迅速兵临长安城下，要求诛杀首倡征讨之人。杜让能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李茂贞，说："发动战争不是皇上的意思，都是我出的主意。"

十九日，李茂贞陈兵临皋驿（长安西），请诛杜让能。杜让能当即入宫向天子辞别："臣早知必有今日，请用臣的生命解除皇上所受的威胁。"

昭宗不禁潸然泪下，说："朕与你永别矣！"

这一天，昭宗下诏贬杜让能为梧州（今属广西）刺史，次日再贬为雷州（今属广东）司户。然而，李茂贞并不退兵。他扬言，不杀杜让能，誓不罢休！

至此，昭宗再也无力保全杜让能了，只好赐他自尽。不久，昭宗下诏，以李茂贞为凤翔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兼中书令；十一月，又任命静难节度使王行瑜为太师，赐号"尚父"，并赐免死铁券。

得到了这些，李王二人方才心满意足，引兵西去。

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正月，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王重荣的弟弟）病卒，部将推举他的侄子王珂为留后。此时，王重盈的儿子王珙在保

义（治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担任节度使。他原以为父亲一死，河中自然也要归他所有，不料王珂却捷足先登，王珙很不甘心，立刻出兵进攻河中，同时上疏昭宗，宣称王珂非王氏子，要求朝廷另行委派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暗示朝廷把河中也一并给他。

王珙说“王珂非王氏子”，令王珂大为恼怒。因为，王珂本是王重荣的侄子，后来过继为养子，血缘关系还是挺近的，而河中本来就是王重荣传给王重盈的，所以他认为自己肯定有资格继任节度使。而且，王珂还是李克用的女婿，有这么一座大靠山，他当然更不会向王珙示弱。

随后，王珂赶紧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随即上表替女婿请命。与此同时，王珙则用重金贿赂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很快，三节度也联名为王珙请命。

面对这个僵局，昭宗大为头疼。两边都有强藩撑腰，都不能得罪，不过相比之下，李克用对朝廷的威胁似乎要比李茂贞等人小一些。所以最后，昭宗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以李克用奏请在先为由，拒绝了李茂贞等人的请求。

如此一来，关中三镇与朝廷的矛盾便再度激化了。

五月，李茂贞等三镇各出数千精兵，浩浩荡荡杀进了长安，准备废掉昭宗，另立吉王李保。不过，他们很快就得到了李克用自河东出兵的消息，于是不敢久留，只杀了一些与他们不睦的朝臣和宦官，同时迫使昭宗把河中给了王珙，随后留下部分兵力控制朝廷，方才各回本镇。

六月，李克用率兵大举南下，传檄讨伐李茂贞等三人。当时，驻留长安的兵力有两支，一支是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另一支是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

听说李克用大兵压境，两人大为恐惧，于是长安城中就出现了相当戏剧化的一幕，李继鹏企图劫持昭宗前往凤翔，而王行实也想劫持昭宗前往邠州，两军随即大打出手，一时京师大乱。最后，昭宗只好在禁军部将李筠的保护下逃离长安，越过秦岭，于七月初到达石门（今陕西蓝田西南）。

昭宗登基之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品德与才干远胜僖宗百倍，可没人会料到，他最终不但重蹈了僖宗的流亡命运，而且日后的遭遇比僖宗还要不幸百倍。

八月，李克用大军进驻渭桥，派兵前往石门护驾，并分兵进攻三镇。李茂贞知道自己不是沙陀军的对手，只好杀掉李继鹏，上表请罪。昭宗随即赦免李茂贞，命李克用讨伐王行瑜。

八月底，昭宗返回长安。

九月，李克用开始大举进攻王行瑜，很快便兵临邠州（今陕西彬县）城下。王行瑜登上城头，痛哭流涕："我王行瑜没有罪啊，胁迫天子的事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请您到凤翔去问罪吧，我王行瑜愿意自缚向朝廷请罪。"

李克用在城下仰着头说："王尚父，你谦恭得有点过头了吧？我奉朝廷之命讨伐三个叛贼，阁下是其中之一。你想自己回朝廷，我可不敢擅自做主。"

数日后，王行瑜抛弃城池，带着全家老小向西而逃。可他刚刚跑到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地界时，就被自己的部将砍杀了，首级也被传送京师。

一场祸乱总算平息了。

十二月，昭宗加封李克用为晋王，他的所有部下和子孙也全都加官晋爵。李克用遣使谢恩，同时秘请昭宗诛杀李茂贞。

昭宗觉得，如果杀了李茂贞，李克用的势力将更为强大，到时候就没人可以制衡了。因此，昭宗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不禁对左右感叹："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怀疑我别有用心。我敢断言，李茂贞不除，关中将永无宁日！"

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被李克用不幸言中。

昭宗从石门返京后，深感手下无兵之苦，于是很快就招募了数万人，在禁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后四军，全部交给宗室亲王统领。

得知朝廷招兵买马的消息，李茂贞立刻跳了起来。在他看来，天子此举显然是在针对他。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李茂贞再次勒兵，直逼京畿。昭宗大恐，一边遣使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再次逃离长安，准备前往太原。没想到，昭宗一行刚刚跑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便被韩建给扣了下来。

当时，李克用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牵制，无暇南下勤王，于是昭宗便被韩建软禁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韩建与李茂贞互为表里，逼迫昭宗

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李筠，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不久，又发兵围攻诸王府邸，丧心病狂地将通、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十一王全部杀死。其后，又迫使昭宗下诏罪己，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官爵。

做完这一切，韩建和李茂贞才于第三年八月把昭宗放还。

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之后，改元“光化”。

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五次改元。纵观昭宗一生，在位十五年，总共七次改元，平均差不多两年改一个年号，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改元最频繁的一任天子。

也许，改元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回溯整个唐朝历史，就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二十三年，仅仅使用了“贞观”一个年号；而唐玄宗李隆基一生中最鼎盛的二十九年，也仅仅使用了“开元”一个年号。而这两个年号，却成了盛唐的标志，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词。

而反观唐昭宗七次改元所置身的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就会有一种近乎无奈的顿悟——原来，唐朝末年这七个年号并不是普通的年号。

它们是七簇血迹、七道泪痕，是一个巅峰王朝临终前的七声呼告，是一个末世帝王绝境中的七次挣扎，是一个突围未遂的士兵遗落在战场上的七把断戟，是一个失败的男人灵魂中永不愈合的——

七道伤口。

光化政变：天子成了阶下囚

自从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回到长安后，昭宗李晔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从前的天子温文尔雅，冷静自律，如今却变得酗酒贪杯、喜怒无常。对此，最为不安的莫过于他身边的宦官了。因为自登基以来，昭宗对付藩镇没什么本事，可打击宦官却很有一套。大宦官田令孜和杨复恭都在他手里头栽了，而就在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春，他又和宰相崔胤联手除掉了专权揽政的左右枢密朱道弼、景务修。宦官们人人自危。无论是身居高位的权宦，还是专供洒扫的小黄门，都对这个性情难测、日渐暴戾的天子又惧又恨。

当时，宦官集团的首领是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与左右枢密王彦范、薛齐偓。一种相同的忧虑和恐慌不断在他们中间蔓延。鉴于这种处境，四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应该主动出击，绝不能坐以待毙。

经过多次密谋，四个权宦终于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伺机发动兵变，拥立太子即位，逼迫天子退位为太上皇，同时与凤翔李茂贞、镇国韩建结为奥援，对内控制朝廷，对外威逼诸藩，挟天子以令诸侯。

方案既定，接下来就是等待时机了。

这一年十一月初四，昭宗到北苑狩猎饮酒，深夜回宫时已经酩酊大醉，忽然狂性大发，砍杀了几个侍从宦官和宫女。次日清晨，宫门迟迟未开。刘季述意识到机会来了，便以“宫中必有变”为由，到中书省叫上崔胤，然后带着千名禁军破门而入，直趋昭宗寝殿。

众人进入寝殿，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们目瞪口呆——昨夜被杀的几个人仍旧僵硬地躺在地上，鲜血喷溅得到处都是，而天子居然还四仰八叉地躺在龙床上呼呼大睡。

刘季述冷笑着对崔胤说：“瞧瞧吧，这就是主上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如何还能治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皆然！为国事计，这恐怕不能算不忠吧？”

看着刘季述身后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崔胤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只能诺诺点头。

初六，刘季述召集百官入宫，陈兵殿前，拿出一份要求太子监国的联名奏章，命崔胤和百官传阅后签署。满朝文武没人敢说半个“不”字，纷纷签字画押。

然后，逼宫行动就开始了。

刘季述拿着百官联名的奏章，率领一千多名禁军，一路大摇大摆地进入宫中，路上逢人便杀，一直杀到了昭宗所在的思政殿。

听见外面杀声四起，昭宗吓得从御榻上一头栽下。刚爬起来想跑，刘季述就走过来一把按住了他，说：“陛下厌倦当皇帝了吧？如今，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太子监国，请陛下移居东宫（少阳院），好好静养吧。”

昭宗不甘心地说：“前天与贤卿们一块饮酒，多喝了几杯，哪里会糟到这种地步呢？”

刘季述晃晃手上的奏章："这事不是我们干的，都是南司（朝臣）的意思，我们也没办法。请陛下暂居东宫，等局势稳定了，再接您回宫。"

当天，昭宗被迫交出传国玉玺，与皇后一起被押送少阳院，随从的只有嫔妃、公主和宫女十几个人。看着天子的一副窝囊样，刘季述忽然生出一种施虐的渴望，于是把天子叫到面前，拿起一根银棒在泥地上写写画画，说："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这是你的第一条罪；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这是你的第二条罪；某年某月某日……"如此这般，一直数落了几十桩，直到把天子脚边的地方都画满了，才意犹未尽地停了手。

离开的时候，刘季述亲手锁上院门，又把铁水灌进锁孔，随后命左军副使李师虔率兵把守，让他严密监视天子的一举一动。最后，刘季述又命人在院墙上凿了一个洞，用来递送饭菜，同时严令所有人，一律不准把兵器、剪刀、针之类的东西递进去。

很显然，刘季述是不想让昭宗自杀，而是要把他困在里头活受罪，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几天后，昭宗让人递出话来，要求得到一些银钱布帛。

刘季述一听就乐了。

阶下之囚要钱干什么？莫非你是想拿钱贿赂看守，改善处境？呵呵，想得倒美！

昭宗的请求被拒绝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只要纸和笔。

刘季述再次冷笑。

纸和笔？你又想干什么？难不成是想写封求救信递出去，让人来把我杀了，好把你救出去？你真把我刘季述当傻瓜了？

可想而知，昭宗的所有要求都被刘季述一口回绝。

当时已是深冬，天气极其寒冷，跟天子一起被关的嫔妃和公主们缺衣少被，哀泣声日夜不绝。

初十，在刘季述等人的一手策划下，太子李裕改名李缜，即皇帝位，同时以李晔为太上皇，少阳院也改名问安宫。

天子成了阶下囚，并且遭到废黜和虐待，天下诸藩人人心知肚明，可人人都按兵不动。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所有人都在等待和观望，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都想后发制人，坐收渔翁之利。其结果，就是什么事也没发生——昭宗被废整整一个月，天下依旧一片沉默。

在此情况下，宰相崔胤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凭着平日与禁军将领孙德昭等人的私交，崔胤暗中找到他们，请求他们诛杀宦官，救出天子。当然，崔胤给他们开出了很高的价码，承诺事成之后必将给予高官厚禄。孙德昭等人怦然心动，遂于次年正月初二发动兵变，将刘季述、王仲先等四人全部杀死，救出了昭宗。

昭宗复位后，第一时间便把刘季述等四人满门抄斩，同时诛杀了一大批党羽。紧接着，昭宗论功行赏，任命孙德昭为静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并赐名李继昭。

昭宗虽然复位了，但这场政变仍然令他和宰相崔胤心有余悸。不久，崔胤就向昭宗提出，所有祸乱的根源皆因宦官掌握兵权，要彻底根除祸乱，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禁军兵权收回来，由宰相掌控。

这何尝不是昭宗的想法？可是，这件事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唐朝，宦官掌控禁军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所有人早把这看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绝不是说变就能变的。此外，从禁军本身的角度来讲，他们肯定跟宦官更为亲近，对文臣则没什么好感。因为一般而言，文臣总是比较讲究纲纪和原则的，这对禁军将士无疑会形成束缚。而宦官就不同了，除了利益，他们不会在乎任何东西。

所以，崔胤刚刚提出建议，立刻在禁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将领们纷纷发出强烈抗议。就连已经离开禁军的李继昭也站了出来，替昔日同僚向天子进言说：“我们世代从军，从没有听说把军队交给书生的！”

昭宗无奈，只好再次以宦官韩全诲、张彦弘分任左右中尉。

这两个宦官以前都当过凤翔监军，和李茂贞的关系非同一般。如今宰相崔胤跟宦官势同水火，韩、张二人势必要引李茂贞为援。而与此同时，跟朱全忠私交甚笃的崔胤则担心自己遭到宦官报复，当然也要以朱全忠为外援。

可想而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两派势力必将要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大权旁落、命若飘蓬的天子李晔，也必将在这样的恶斗中再度

成为牺牲品。

在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原的朱全忠俨然已经取代河东的李克用，成了天下势力最强的军阀。

自从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消灭相邻的劲敌秦宗权之后，朱全忠就展开了大规模的扩张行动。首先，他把兵锋指向了东方，先是在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消灭了盘踞徐州的时溥，接着又在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吞并了郓州和兖州。随后，朱全忠又把目光转向了北方的河朔三镇。

光化元年（公元898年）五月，朱全忠渡河北上，攻取了李克用辖下的邢、洺、磁三州。同年十二月，李克用的部将李罕之以潞州投降朱全忠。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幽州的刘仁恭南侵魏博，朱全忠援助魏博的罗绍威击退刘仁恭，从而将魏博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又兵临镇州城下，逼降成德的王镕。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十月，朱全忠又进攻定州，逼降义武的王处直。刘仁恭出动大军援救，被朱全忠击败，部众被杀六万多人，刘仁恭大势已去，只好向朱全忠臣服。

至此，河北诸镇全部归附朱全忠，李克用的右臂已被齐齐斩断。

紧接着，朱全忠又把目光转向了河中。

在朱全忠看来，只要再卸掉李克用这另外一条膀子，河东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

天复元年（公元901）正月，朱全忠突发大军，一举攻陷了河东的绛州和晋州，扼住了河东与河中的咽喉，随后大军直扑河中。

河中节度使王珂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朱全忠的对手，慌忙向李克用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信，他的妻子在信中质问李克用：“女儿随时可能被敌人俘虏，父亲大人为何坐视不救？”李克用无奈地回信：“敌军扼守晋、绛，我军寡不敌众，如果我执意出兵，势必和你们一同灭亡。告诉王郎，倘若实在不能坚守，不如全族归顺朝廷。”

到了这个地步才让女儿女婿归顺朝廷，显然只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虚幻慰藉。

二月，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王珂不得不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随即将王珂全族迁到大梁，不久便将其诛杀。三月，朱全忠派遣大将氏叔琮率兵五万，自天井关出太行山，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太原；同时又调动魏博、成德、天平、义武等诸道大军，分别从新口（今河北武安市西）、土门（今河北鹿泉市西南）、马岭（今河北邢台市西北）、飞狐（今河北涞源县）、阴地（今山西灵石县西南）等方向出发，兵分六路，对李克用发起了总攻。

随后，氏叔琮一路攻城略地，以所向披靡之势逼降了河东的多员大将，于三月底兵临太原城下。

至此，李克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随后的日子，李克用毅然离开帅府，亲自登城组织防御。当时正逢天降大雨，数十天内连绵不绝，城墙遭雨水浸泡后连连坍塌。李克用指挥士兵随塌随筑，多日衣不解带，连吃饭喝水都没有时间。

就在太原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老天爷救了李克用一命。

由于氏叔琮贪功急进，部众多日苦战，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加之连日大雨，很多士兵都感染了疟疾，战斗力大为削弱。此外，由于战线拉得太长，补给线又被大雨阻断，粮草已然不继。在此情况下，朱全忠不得不向氏叔琮下达了撤兵的命令。

李克用就此躲过一劫。

但是，经此重创，李克用已经元气大伤。后来的几年里，他只能收缩战线，休养生息，再不敢轻易跟朱全忠直接交锋，更无力与他逐鹿天下了。

据有河中之后，朱全忠向北遏制河东，向南威胁关中，势力空前壮大，天下已经无人可以匹敌。

走到这一步，朱全忠问鼎天下的野心便已昭然若揭了。接下来，他自然要把目光瞄向关中，瞄向长安，瞄向大明宫中那个目光忧郁、神情凄惶的天子李晔。与此同时，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之间的斗争也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由于崔胤在朝中的势力不小，韩全诲等人担心斗不过他，便暗中联络李茂贞，准备把昭宗劫持到凤翔。而崔胤则料定宦官们必有这个打算，也赶忙致信朱全忠，宣称奉天子密诏，命他发兵入京保护天子。朱全忠本来就想把昭宗劫到洛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见信后正中

下怀，遂于这一年十月从大梁出兵，直驱长安。

十月十九日，韩全诲等人得知朱全忠已经出兵，立即率兵入宫，胁迫昭宗随他们西走凤翔。昭宗悲怆莫名，秘赐手札于崔胤，最后一句说："我为宗社大计，势须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资治通鉴》二六二）

天复元年十一月初四，韩全诲陈兵殿前，对昭宗说："朱全忠大军迫近京师，打算劫持陛下到洛阳，企图篡位，我们请陛下驾临凤翔，集结勤王之师共同抵御。"昭宗说什么也不肯走，韩全诲便命人纵火焚烧宫室。昭宗万般无奈，只得和皇后、嫔妃、诸王共计一百多人，一步一回头地登上了离京的马车。

那一天，天子泪流满面。所有同行的人也全都放声恸哭。

走出宫门很远之后，天子李晔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熊熊烈火正在疯狂燃烧，把大明宫的上空映照得一片通红。

那一刻，李晔觉得有另一场烈火正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燃烧。

许多东西，已经在这场无形的大火中灰飞烟灭。诸如勇气、豪情、梦想，诸如信心、希望、使命感……所有这一切，全部都化成缕缕青烟，在冬日的寒风中飘散。

朱全忠大军自河中入关后，先是进逼华州，迫降了韩建，继而攻打邠州，逼降静难节度使李继徽，如入无人之境。

得到消息后，李茂贞与韩全诲震恐，赶紧假传天子诏命，急召李克用入关。李克用随即发兵袭击朱全忠的后方。朱全忠匆忙回镇河中。

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四月，崔胤前往河中，泣请朱全忠讨伐李茂贞，救出天子。五月，朱全忠发精兵五万，再次入关，进击凤翔。六月初十，李茂贞出兵与朱全忠在虢县北面展开激战，结果李茂贞大败，被杀一万余人。十三日，朱全忠进围凤翔。

从这一年六月到十一月，李茂贞下辖的其他州县相继被朱全忠占领，凤翔就此变成一座孤城。那些日子，朱全忠的士兵天天在凤翔城下击鼓叫嚣，骂守城的人是"劫天子贼"，而城上的凤翔士兵则骂攻城的人是"夺天子贼"。

凤翔受困日久，粮食耗尽，加上这一年冬天天气奇寒，城中饿死冻馁的人不计其数。往往是一个人刚刚倒地，还没咽气，身上的肉就被人

剐了去了。市场上公开出售人肉，每斤叫价一百钱，狗肉则叫价五百钱。日子一长，就连李茂贞本人的积蓄也全部耗尽。而昭宗李晔则只能拿着他和小皇子的衣服到市场上变卖，以换取一点可怜的粮食。公主和嫔妃们更是天天喝稀饭，不仅有上顿没下顿，而且就连这最后一点粮食也即将告罄……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正月，李茂贞再也无力支撑，只好斩杀韩全诲、张彦弘等宦官，向朱全忠投降，同时放归天子。朱全忠入城后，将所有宦官全部屠灭，前后共杀七十二人。此外，又秘密派人搜捕京畿附近所有已经辞官归隐的宦官，又杀了九十人。

正月二十七日，昭宗回到长安。这是他第三次流亡后的王者归来。昭宗在心中暗暗祈祷，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一年之后，昭宗还将第四次被迫离开长安，踏上流亡之路。并且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

昭宗回京后，崔胤当即上奏，要求将宦官斩尽杀绝。昭宗同意了。正月二十八日这天，朱全忠在大明宫中展开了一场大屠杀，一日之间杀了数百名宦官，喊冤哀号之声响彻宫廷内外。随后，那些奉命出使各藩镇的监军，也纷纷被就地捕杀。

大屠杀过后，皇宫中只留下三十个年纪幼小的小黄门，以供洒扫。

不久，左右神策军并入六军，全部交由宰相崔胤统领。

宦官时代就此终结。

自安史之乱后，为患帝国一百五十多年的“宦官乱政”终于画上了句号。大明宫里，再也看不见那些面白无须，手握生杀废立大权的人了。然而，到了这一刻，大唐帝国距离那个覆灭的终点也已经不远了……

天复三年二月，昭宗下诏，赐给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名号。

朱全忠命心腹将领朱友伦、朱友谅率步骑一万留守京师，然后回军大梁。随后的日子，朱全忠对东方的残余势力（淄青镇）展开了最后的兼并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攻克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临淄、登州（今山东蓬莱市）等地，而后进围青州。

九月，淄青节度使王师范投降。

至此，大河南北全部被朱全忠纳入囊中。

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轮到朱全忠挟天子令诸侯了？

是的。不过在此之前，朱全忠必须先除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这些年来最得力的盟友——宰相崔胤。

自从铲除宦官集团后，崔胤就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大有一手遮天之势，不但百官进退要以他的好恶为转移，就连天子的一举一动也要向他报告。天复三年五月，崔胤又以禁军兵员严重不足为由，奏请天子招募士兵、扩充军队。他这么做，表面理由当然是为了保护朝廷和天子，其实是为了培植和巩固他的个人势力。

这一切，当然都没有逃过远在汴州的朱全忠的眼睛。

朱全忠意识到，这个在朝中日渐坐大的家伙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盟友了。换句话说，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道理很简单，当初朱全忠跟崔胤交结，目的无非是想让他在朝中充当内应，随时窥伺天子和朝廷的动静，可现在，长安业已驻留了自己的军队，天子也已完全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留着这个崔胤还有什么用呢？

留着他，无异于留着一颗绊脚石。

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奏天子，指控崔胤擅权乱政，离间君臣，随后便命心腹将领朱友谅杀了崔胤。

最后，朱全忠就要“挟天子令诸侯”了。

正月十三日，朱全忠驻兵河中，强迫昭宗迁都洛阳。二十二日，迁都行动开始，汴州军队强行驱赶长安城中的士民和百官上路，一刻也不准停留。成千上万的百姓们扶老携幼，一路不停地哀叫哭号。二十六日，朱全忠命军队将长安城内的宫殿、民宅及所有建筑全部拆毁，拆除下来的木料全都扔进了渭水。

绝世繁华的帝京长安，从此沦为一座废墟。

二十八日，昭宗一行到了华州，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昭宗不禁泣下，说：“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资治通鉴》二六四）

当天晚上，昭宗下榻在华州行宫，黯然神伤地对左右说：“民间有句俗语说，‘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如今漂泊流亡，不知道最终要落向何方？”

言毕已经涕泪沾襟，左右皆陪着天子同声落泪。

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但是，肯定会有一个终点。

洛阳，会是昭宗李晔的终点吗？

走向终点

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昭宗李晔一次次寻找机会派人向诸藩告急，命河东李克用、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等节度使火速率兵勤王。朱全忠发现天子始终徘徊不前，知道其中有诈，遂一再催促。昭宗先是推托皇后刚刚生产，不便上路，随后又授意司天监上奏，说星象有变，东行不利。

然而，不管昭宗找什么借口，朱全忠给他的答复只有一个相同的动作——杀人。

昭宗说皇后刚刚生产，朱全忠就命人杀了医官。昭宗说星象有变，朱全忠就命人杀了司天监的人。到最后，昭宗终于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路。

自从崔胤被杀后，禁卫六军基本上就溃散了，跟随天子东行的，只有两百多个内苑的少年，但也仅是陪伴天子打球，以供差遣而已，根本谈不上保卫天子的安全。

即便如此，朱全忠还是没有放过他们。

天复四年闰四月初九，昭宗一行抵达洛阳郊外。朱全忠在营帐中摆设宴席，召集那两百多个少年一同赴宴，然后就在宴席上把他们全部勒死了。

之所以用绳子勒死，而不是用刀砍，是为了不让鲜血弄脏他们身上的衣服。因为那些衣服，朱全忠有用。事先，朱全忠已经找了两百多个年龄、身材都与他们相仿的少年。事后，他让这些人穿上了死者的衣服，一如往常地侍奉天子。昭宗刚开始毫无察觉，过了好几天才发现，但也只能佯装不知。

闰四月初十，昭宗李晔进入洛阳，于次日改元“天祐”。

此时的昭宗，显然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

然而，此时的李唐之天，已经没有人可以庇佑了。

历时二百八十多年的大唐帝国，开始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随后的几个月里，朱全忠得到耳目奏报，说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藩镇之间公文往来异常频繁，文中都是一些振兴社稷、匡复李唐的话。朱全忠随即产生了一种夜长梦多之感。而且，在朱全忠看来，昭宗年长，在位日久，要将他取而代之，相对于幼主无疑要困难得多。思虑及此，朱全忠决定采取最后的行动。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八月，留在洛阳负责监视天子的心腹将领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接到了朱全忠的行动指令。

八月十一日深夜，蒋玄晖等人带着几百名士兵敲响了皇帝寝宫的大门，声称有紧急军情要奏，必须面见天子。嫔妃裴贞一刚打开宫门，一眼就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士兵，不禁脱口而出：“奏事何须带这么多兵？”

话音未落，蒋玄晖的手下史太已经一刀把裴妃砍倒在了血泊中。

随后，蒋玄晖等人长驱直入，又撞见了昭仪李渐荣。

蒋玄晖喝问：“皇上在哪？”

昭仪李渐荣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赶紧高声呼叫：“宁可杀了我们，也不能伤害天子！”

此时，昭宗正喝得烂醉如泥，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但是李昭仪故意发出的叫喊还是惊醒了他。昭宗慌忙从床上跳起，躲到了寝殿的柱后。然而，蒋玄晖已经带人冲了进来。李昭仪也冲进来挡在了天子身前，史太先把她砍倒，随即一把揪住天子，高高地举起了那把带血的屠刀……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唐昭宗李晔的眼前，是否闪过他十五年不堪回首的帝王生涯。是否还会想起，他即位之初那一番拯救社稷、匡扶李唐的雄心壮志。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这一刻的李晔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个左冲右突、奋力厮杀的单兵，这个疲惫绝望、无人喝彩的单兵，这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的单兵，此刻终于可以躺下休息了。

他太累了，需要一场长眠——一场永不被世人惊扰的长眠。

昭宗一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八月十二日，蒋玄晖假传诏书，拥立辉王李祚（昭宗第九子）为太子，改名李柷，并宣布由太子监国。同日，年仅十三岁的李柷在昭宗的灵柩前即位，史称昭宣帝，又称哀帝。

而上面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朱全忠都不在洛阳。也就是说，他拥有“昭宗被弑案”的不在场证明。

直到十月，朱全忠才“听说”蒋玄晖、朱友恭等人刺杀了昭宗。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朱全忠露出痛不欲生的表情，发出如丧考妣的哭泣，然后又做了一个“投身触地”的危险动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真实自然，足以令观者悚然动容。表演完毕，朱全忠才不无悲愤地说：“这些奴才辜负了我，害我蒙受万世骂名！”

十月初三，朱全忠来到洛阳，扑在昭宗的灵柩上痛哭流涕，然后晋见昭宣帝，赌咒发誓说这些事都与他无关。十月初四，朱全忠将朱友恭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氏叔琮贬为白州（今广西博白市）司户，随即又命他们自杀。朱友恭临死前大喊：“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资治通鉴》卷二六五）

然而，此刻的朱全忠会畏惧鬼神、担心绝后吗？

显然不会。

因为，他要做的事还很多，要杀的人也还很多。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二月初九，朱全忠在洛阳宫的九曲池大摆宴席，盛情邀请昭宗的九个儿子（德王、棣王、虔王、沂王、遂王、景王、祁王、雅王、琼王）赴宴。九王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忠命人把他们全部勒死，然后投尸九曲池。

六月，朱全忠又将裴枢等颇具时望的三十几名朝臣召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全部砍杀。左右对他说：“这群人平时自诩‘清流’，要是把他们投入黄河，岂不成‘浊流’了！”朱全忠纵声大笑，随即将这三十几具尸

体全部抛入黄河。

十一月，朱全忠晋位相国，总揽帝国朝政（总百揆）。

做完这些，朱全忠就图穷匕见了。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朱全忠逼迫昭宣帝禅位。四月，朱全忠更名朱晃，将汴州改为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同时废昭宣帝为济阴王，不久后又将其诛杀。

这位朱晃（朱全忠、朱温），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

至此，历时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帝国宣告覆亡。

唐朝虽然覆灭了，但是死亡和裂变却远远没有终结。

因为，朱温篡唐只不过是完成了中枢政权的转换而已，并没有一统天下。他建立后梁时，十世纪初的中国全境仍然是一个分崩离析、群藩割据的乱世残局。除了朱温建于中原的后梁政权外，遍布四方的主要割据势力还有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凤翔的李茂贞，淮南的杨行密，西川的王建，浙江的钱鏐，福建的王潮，湖南的马殷，广州的刘隐……

在十世纪的上半叶，几代乱世军阀轮番入据中原，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中枢政权，史称“五代”。与此同时，散处四方的藩镇也分别建立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等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五代十国。

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开始南征北讨，一一消灭了散处四方的割据政权，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残局才逐步走向终结。

（全书完）

后记

书写完了，屈指一算，差不多写了三年，一千余个白天与黑夜。

这三年里，我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剥离出来，埋首故纸堆，一天十几

个小时噼噼啪啪敲击键盘，朋友冠我以“人肉打字机”之名，我会心一笑，回过头来继续敲，用行动告诉他什么叫浑然忘我、甘之如饴。每天，我足不出户，万缘断绝，俨然不食人间烟火，一心唯与古人神交。倘若不是QQ自动弹出的新闻窗口告诉我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我几乎就穿越成唐朝人了。

现在，敲完最后一个句号，我的魂才飘飘摇摇地落回肉身之中。这一刻，我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就像《尘埃落定》里的那个傻子少爷每天醒来都要这样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

三年的唐朝之旅，我的心魂到一千多年前酣畅淋漓地爽了一把，却把现实的这具肉身搞得疲惫不堪。在这三年里，我的体重增加了三十多斤，两鬓多出了数十根白发，活脱脱一个标准的中年宅男，至于久坐码字引发的腰酸腿疼、关节痛、鼠标手、肩周炎等等毛病，那就更多了，不提也罢。

累，真累！

有时候我经常想，人要是只有精神，没有肉体，那该多好！就像老子说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其实，老子这话说得不太厚道。人活在世上，肉身替我们干了多少事，我们把它使唤累了，使唤坏了，不感谢它就算了，怎么还能埋怨它呢？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我和老子一样不厚道，总觉得肉身于精神而言是一种桎梏，一种累赘。

说起《大唐兴亡三百年》的写作，可谓事出偶然。尽管我和很多人一样，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对唐朝心存偏爱，情有独钟，但几乎没想过要把它完整地写出来，因为生怕自己笔力不逮。

2008年初，我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尝试着写了唐朝历史的后半截，不料跟帖者甚众，而且帖子还被编辑推荐为“天涯头条”，于是不少网友对我说，何不把整个唐朝都写一下？

我一想，也对，然后就开始翻检史料，潜心构思。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当我在空白的WORD文档上敲出第一句——“隋炀帝杨广死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时，我就知道，我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攫住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再也无法挣脱。

也许，这就叫上天注定。

人一辈子要干什么，其实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事情，而是事情选择了我们。而在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知道，是唐朝选中了我。

当然，面对卷帙浩繁的唐朝史料，我也产生过一丝惶恐，但是，更多的却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于是，我一头扎进故纸堆，开始回溯千载、神游物外，开始面朝一千多年前那座名叫长安的城，心如潮涌，纵情狂奔……

从杨广华丽而凄迷的目光中，我看见了隋末大地的滚滚烽烟；在李世民纵横驰骋的马背上，我听见了大唐雄浑的脉动与心跳。

我见过玄武门前的四度喋血，也见过大明宫中的万国衣冠；我听过箭指天山的壮士长歌，也听过折戟辽东的英雄叹惋。

感业寺内，女尼武媚泪痕犹在；洛阳宫中，一代女皇却已笑靥嫣然。太液池旁，霓裳羽衣歌舞未歇；燕赵大地，渔阳鼙鼓却已动地而来。

当藩镇铁骑踏破长安，我感受了大地的战栗；当李唐皇室屡屡播迁，我目睹了天穹的裂变。在九世纪的黑夜里，“元和”与“大中”曾经光芒乍现，可当它们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接踵而来的，却是更深更浓的黑暗。

当黄巢种下的菊花开满长安，我闻到了一个王朝衰朽弥留的气息；当朱温点燃的兵燹燃遍中原，我看见了一个帝国仓皇趔趄的身影……

我就这样走过唐朝的二百八十九年，仿佛经历了一个生命的轮回。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七本书，一百六十余万字，就是这趟轮回之旅的见证。我不知道它好还是不好，我只知道，我尽力了。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出版商读客公司，以及天涯煮酒的众多网友。没有家人承担家务，我当不成“坐家”；没有读客公司的用心，这套书的市场化程度肯定要打折扣；没有网友的支持，我会感觉孤独。三年了，网友们还一直守着帖子等我更新，在这里，我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王觉仁

2011年9月9日于福建漳州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关注公众号：黑火电子书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关注公众号：黑火电子书

Table of Contents

大唐兴亡三百年

大唐兴亡三百年.2

大唐兴亡三百年.3

大唐兴亡三百年.4

大唐兴亡三百年.5

大唐兴亡三百年.6

大唐兴亡三百年.7

Table of Contents

大唐兴亡三百年

大唐兴亡三百年.2

大唐兴亡三百年.3

大唐兴亡三百年.4

大唐兴亡三百年.5

大唐兴亡三百年.6

大唐兴亡三百年.7